乌克兰
东方与西方之间

（套装共7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乌克兰
东方与西方之间

（套装共7册）



乌克兰，东方与西方之间（套装共7册）

[美]浦洛基 [英]安格斯·罗克斯伯勒 张树华 等 著

曾毅 胡利平 林华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

强权与铁腕：普京传

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

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

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

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罗马史诗三部曲）

欧洲之门

乌·克·兰·2000·年·史



目录

导言 关于乌克兰历史的综述

第一卷 黑海边境

第1章 世界的边缘

第2章 斯拉夫人的到来

第3章 第聂伯河上的维京人

第4章 北方拜占庭

第5章 基辅的钥匙

第6章 蒙古治下的和平

第二卷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第7章 乌克兰的诞生

第8章 哥萨克人

第9章 东方的变革

第10章 大叛乱

第11章 分裂

第12章 波尔塔瓦的裁决

第三卷 帝国之间

第13章 新的边界

第14章 起源之书

第15章 多孔的国界

第16章 前进

第17章 未完成的革命

第四卷 世界大战

第18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第19章 破灭的梦想
第20章 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第21章 斯大林的堡垒
第22章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
第23章 胜利者
第五卷 独立之路
第24章 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第25章 再见，列宁
第26章 独立广场
第27章 自由的代价
结语 历史的意义
致谢
附录**A** 大事年表
附录**B** 乌克兰主要历史人物表
术语表
延伸阅读

献给
乌克兰人民

导言

关于乌克兰历史的综述

苏格兰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常常夸耀哪些书籍肯定了他们对塑造人类历史做出的贡献，乌克兰人也许同样有理由为自己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而自豪。1991年12月，乌克兰公民纷纷涌向投票站，选择了独立。那时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也确实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乌克兰公投之后一个星期，强大的苏联就解体了，美国总统乔治·H. W.布什随之宣布西方在漫长而艰难的冷战中取得了最后胜利。

乌克兰下一次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是2004年。这一年，身着橙色衣衫、情绪高昂的群众挤满了基辅的广场与街道，要求举行公平的选举。他们最终达到了目的。由于这次“橙色革命”[1]，从塞尔维亚到黎巴嫩，从格鲁吉亚到吉尔吉斯斯坦，诸多国家发生的撼动威权统治的革命都被称为“颜色革命”。颜色革命并未改变后苏联时代的世界，但它们留下了遗产，也留下了终将改变的希望。接下来，乌克兰人又在2013年的11月到12月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们再次走上基辅的大街，支持国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此时正值欧盟各成员国对联盟的热情降至低点，乌克兰人却不顾零摄氏度以下的气温，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在街上游行、坚守，令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公民们感到震惊和鼓舞。

2014年年初，乌克兰国内形势出现了意外而悲剧性的转折。抗议者与政府部队之间发生了暴力对抗，将先前抗议中那种热烈得近乎街头狂欢的气氛一扫而空。2014年2月，就在电视台摄像机镜头的全程记录下，防暴警察和当局的狙击手向抗议者开枪，导致数十名亲欧盟抗议者死伤。这样的画面震惊了世界。同样令人目瞪口呆的还有2014年3月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企图，以及同年春末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2]地区策动的混合战。这一年7月，亲俄的分离主义者更是将这场俄乌冲突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国际冲突。乌克兰局势的发展对欧洲和国际事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致政客们开始谈论“为欧洲的未来而战”和回到冷战的话题，而在1991年，这里正是冷战宣告落幕之地。

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是什么？历史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到底应该属于谁？为何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会造成巨大的国际震动？近年来，这些问题被一再提出，理应得到全面的解答。要理解当今乌克兰局势及其对世界的冲击背后的各种趋势，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考察。粗略地说，这就是

这本书的主要任务。我写作这本书，正是希望历史能为我们提供对当下的洞见，进而影响未来。无论是预测当今乌克兰危机的结局及其长远影响，还是预测作为一个国家的乌克兰的将来，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将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在历史中漫游仍有助于我们从每日新闻的密集轰炸中找到意义所在，并能让我们在面对事件时深思熟虑，从而改变事件的后果。

本书在“长时段”[3]尺度上呈现乌克兰历史，内容起自希罗多德[4]时代，终于苏联的解体和当下的俄乌冲突。乌克兰和法国国土面积差不多大小，现拥有接近4 600万人口，其历史上的过客更是数以亿计。如何才能将它超过千年的历史浓缩到短短数百页的篇幅之内？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所取舍，这也是历史学家的一贯做法。然而历史学家们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现代乌克兰史学的奠基者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5]是本书中将会出现的一个人物。哈佛大学的乌克兰历史教席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赫鲁舍夫斯基将他的研究主题视为一个起自渺茫远古并历经繁荣、衰落和复兴的民族的历史，其复兴的顶点则是乌克兰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的创生。

乌克兰历史在赫鲁舍夫斯基的手中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然而他的许多批评者和继承者对他的方法提出了疑问。赫鲁舍夫斯基的学生们侧重乌克兰国家的历史；苏联历史学家将乌克兰历史描述为一部阶级斗争史；一些西方作者强调乌克兰的多族群特征；而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则转向了跨民族研究。这些后起写作潮流对乌克兰和其他民族历史的处理方式对我的历史叙事有所影响。晚近史学中的文化转向以及身份认同史研究也为我提供了养分。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当代主义的，对此我并不避讳，但我也力争不用现代的身份认同、归属、观念、动机和情感等概念来曲解过去的历史。

本书书名中的“欧洲之门”当然是一个隐喻，但这样的命名并非无关紧要，也不应被视为一种营销的手段。欧洲在乌克兰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乌克兰在欧洲历史上同样如此。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的西缘，许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在某些时代，战争和冲突会导致“门户”的关闭，此时乌克兰就是阻挡东来或西来侵略者的一道屏障。而在乌克兰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门户是开放的，此时的乌克兰就成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促进着民族、商品和思想的交流。在漫长的岁月中，乌克兰也充当了各大帝国——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谈判地点（以及战场）。在18世纪，乌克兰被圣彼得堡、维也纳、华沙和伊斯坦布尔轮流统治。到了19世纪，乌克兰的统治者就只剩下了前两个。20世纪上半叶，莫斯科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上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每个帝国都对乌克兰的土地和财富提出要求，在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群特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同时也帮助塑造了乌克兰独特的边境身

份和民族气质。

民族概念是本书的重要分析范畴和叙事要素，却并非全部。它与变动不居的欧洲概念一起界定了这一叙事的性质。本书讲述的乌克兰历史的地理边界是由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志学者和地图绘制者确定的，常与当今乌克兰国家的边界重合，但并非一直如此。从中世纪基辅人国家（在史学界被称为“基辅罗斯”[6]）直到现代民族主义兴起，各种观念和身份概念将这些土地联系在一起。本书追随这些观念和概念的发展脉络，解释现代乌克兰国家及其政治民族的起源。在这一过程中，本书将乌克兰族视为乌克兰人口构成中最大的民族，也将之视为现代乌克兰民族和国家创生的主要驱动力，但也没有忽视乌克兰的少数族群，尤其是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并认为多族群、多文化的现代乌克兰民族尚在形成之中。乌克兰文化向来都与其他文化共享生存空间，在其早期更是在“他者”的夹缝中生存。乌克兰社会拥有跨越内部及外部边界并获取这些边界所创造的身份的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本书所呈现的乌克兰历史的主要特征。

外部和内部的政治过程可以为历史叙述提供一个很方便的框架，然而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发现地理、生态和文化是更为持久的元素，因此就长期而言有更大的影响。从“长时段”文化趋势的角度来看，当代乌克兰是两条移动中的边界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条边界由欧亚大草原和东欧稀树草原的分界线确定，另一条则由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线确定。第一条边界还是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分界线，并最终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分隔开来。第二条则要回溯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对罗马帝国的分裂，是存续至今的欧洲东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异的标志。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特征在这两条边界的移动中产生，并成为当代乌克兰身份的基础。

不讲述乌克兰各地区的故事，就无法讲述整个乌克兰的历史。边界移动造成的文化与社会空间从来不是同质化的。作为国家与帝国的疆界在由乌克兰族群边界所确定的土地上移动。各不相同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移动中被创造出来，成为乌克兰各地区的基础。这些地区包括被匈牙利人统治过的外喀尔巴阡[7]、历史上曾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8]、曾被波兰占领的波多里亚[9]和沃里尼亚[10]、第聂伯河的哥萨克左岸[11]及下游、斯洛博达乌克兰[12]，以及俄罗斯帝国开拓的殖民地——黑海沿岸地区和顿涅茨盆地[13]。与之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我不会尝试将乌克兰各个地区——如曾经的俄罗斯统治区和奥地利统治区——的历史在不同的章节各自讲述，而是会将它们视为一体，为它们在特定时期的变化提供一个比较视角。

最后，我要就术语的使用说上几句。现代乌克兰人的先辈曾在数十个前现代的或现代的公国、王国和帝国治下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和身份。他们用以界定自己这片土地的两个关键词是“罗

斯”和“乌克兰”。（“罗斯”的西里尔字母拼写是Русь，其中最后一个符号是软音符号，表示对其之前的辅音进行腭音化。）在9世纪至10世纪间，基辅罗斯人将维京王公和战士们招揽来，并将他们斯拉夫化。“罗斯”一词即由维京人传播到这片地区，并被基辅罗斯人吸收。今天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使用的“罗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化的“Rus’”和希腊化的“Rossiia”等不同形式。到了18世纪，莫斯科沙皇国[14]采用了后者，将其作为国家和帝国的官方名称。

根据他们所处的地区和时代的不同，乌克兰人有过各种不同的称呼。他们在波兰被称为卢森人（Rusyns），在哈布斯堡王朝被称为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在俄罗斯帝国则被称为小俄罗斯人（Little Russians）。到了19世纪，乌克兰民族的缔造者们决定放弃“罗斯”这个名字，以终结这种混乱，并将他们与其他东斯拉夫世界居民，尤其是俄罗斯人，区别开来。在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他们都选择采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这两个词来定义他们的土地和族群。“乌克兰”一词起源于中世纪，在近现代被用来表示第聂伯乌克兰[15]地区的哥萨克国。在这些19世纪社会活动家的集体心理中，大部分哥萨克人都起源于本地，是最纯粹的乌克兰人。为了将“罗斯的”过去与“乌克兰的”将来连接起来，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把自己的十卷本巨著命名为“乌克兰-罗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事实上，今天任何讲述乌克兰历史的作者都必须使用两个或更多的名词来定义现代乌克兰人的祖先。

在本书中，我在涉及中世纪时期时，大部分时候会使用“罗斯人”一词（但并非全部如此）；在涉及近现代时，我会使用“罗塞尼亚人”；在涉及现代时，我则会使用“乌克兰人”。从1991年独立乌克兰国家的建立开始，这个国家的公民，不管其族群背景，都被称为“乌克兰人”。这一用法反映了当下历史学界的惯例。虽然这会造成一些麻烦，但我希望它还不至于让人误解。

“来吧，你会看见。”现代乌克兰史学奠基之一《罗斯史》[16]的佚名作者在其作品前言的结尾写道。我无法想出比这句话更好的邀请来作为本书前言的结语。

---

[1] Orange Revolution，指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引发的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橙色革命”从2004年11月持续到2005年1月，以反对派的胜利告终。（本书中的脚注若非特别注明，均为中译者注。）

[2] Donbas，亦作Donbass，即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盆地，包括顿涅茨克州中部、北部和卢甘斯克州南部。

[3] longue durée，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历史研究层次。布罗代尔认为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对历史学家更为重要。

[4] 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作家，著有《历史》一书。他打破了荷马史诗的传统，采用系统性和批判性的方法来搜集历史材料，并用史学叙事的方法来组织它们，被誉为“历史之父”。

[5] Mykhailo Hrushevsky（1866—1934），乌克兰政治家、历史学家。他是20世纪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复兴中的重要人物，曾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任乌克兰革命议会“中央拉达”主席。

[6] Kyivan Rus’，由维京人奥列赫建立、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存在于882年至1240年间，以基辅为首都，正式名称为罗斯，被认为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三个东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前身。后文中有时使用“基辅”来代指基辅罗斯。

[7] Transcarpathia，乌克兰最西部的一个州，曾属奥匈帝国，1945年被纳入苏联，苏联解体后归属乌克兰。

[8] Galicia，历史地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属于奥匈帝国，今分属乌克兰和波兰。

[9] Podolia，历史地名，今主要位于乌克兰中西部与西南部，还包括摩尔多瓦北部的部分地区。

[10] Volhynia，历史地名，今分属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11] Cossack Left Bank，历史地名，位于乌克兰北部的第聂伯河东岸，在17世纪至18世纪间曾为沙皇俄国境内的哥萨克国。

[12] Sloboda Ukraine，历史地名，今分属俄罗斯和乌克兰。“斯洛博达”（俄语слободá）一词意为“自治地区”。

[13] Donets basin，亦作顿涅茨盆地，即顿巴斯。

[14] Muscovy，即The Grand Duchy of Moscow，多译作莫斯科公国或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1547年后自称沙皇，并将国号改为俄罗斯沙皇国（Tsardomof Russia，亦译作沙俄、莫斯科沙皇国），直至1721年彼得一世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但本书作者仍将这段时期的俄罗斯称之为Muscovy。考虑到与原文的一致性，本书中凡出现于1547年至1721年之间的Muscovy一词均译作“莫斯科沙皇国”。

[15] Dnieper Ukraine，历史地名，范围包括第聂伯河中游地区。

[16] History of the Rus’，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一部由佚名作者创作的历史，以俄语出版于1846年，主要讲述从古代到1769年间罗塞尼亚人及其国家小俄罗斯的历史。

第一卷

黑海边境

ON
THE PONTIC
FRONTIER

第1章
世界的边缘

第一位记录乌克兰的历史学家正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通常，只有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才有资格得到这位“历史之父”的书写。乌克兰是一片由草原、山地和森林组成的地区，位于被古希腊人称为*Pontos euxeinos*（意为“好客之海”，罗马人用拉丁文写作*Pontus euxinus*）的黑海之北，正是当时地中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的重要性又与众不同。希罗多德的世界以古希腊各城邦为中心，向南延伸到埃及，向北延伸到克里米亚和黑海大草原[1]。如果说埃及是上古文化和哲学的王国，值得研究和模仿的话，那么今日乌克兰所在的这片土地则是典型的边境地带，是希腊文明与其野蛮对立面的碰撞之地。这里是后来被称为“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圈的第一道边界，是西方借以定义自身和他者的起始界线。

希罗多德在希腊语中被称为Herodotos。他来自位于今日土耳其境内的希腊城市哈利卡纳索斯[2]。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生活、写作和朗诵他的《历史》的年代——他的出生地还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他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在雅典度过，曾经在意大利南部居住，也曾在地中海世界和中东世界穿梭往来，到访过的地方包括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他是希腊式民主的崇拜者，用希腊语的爱奥尼亚方言写作。然而就他身处的年代而言，他的关注已经包罗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他的《历史》被后人分为九卷，讨论了希波战争的起源问题。希波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99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有很长一段与这段时期重合。战争于公元前449年结束后，他又花了30年时间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他将这一系列冲突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史诗般的斗争——希腊代表自由，而波斯代表奴役。虽然他的写作不免掺入了他自己的政治和思想立场，但他仍然希望从双方的角度来呈现这段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在于“将希腊人和野蛮人双方的伟大成就都记录下来，以保存过去的记忆”。

正是由于对“野蛮人”一方的兴趣，希罗多德把目光投向了黑海大草原。公元前512年，即希波战争开始前13年，波斯帝国最强大的统治者大流士大帝[3]为了报复曾经捉弄过他的斯基泰人[4]，入侵了这片地区。斯基泰王统治着黑海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些游牧民族首领的军队十分机动灵活，曾经让大流士从多瑙河追击到顿河，却找不到任何交战的机会。这对这位十多年后将成为希腊世界最大威胁的君主而言，无疑是可耻的失败。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不遗余力讲述了他所知道和听说过的关于斯基泰人的土地、风俗和社会等的一切。他虽然周游列国，却从未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因此似乎不得不依赖别人讲述的故事。然而他对斯基泰人统治下的土地和

人民的描述备极详尽，让他不仅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历史学家，也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公元前45000年左右，捕猎猛犸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成为黑海以北地区最早的人类定居者。对他们的住所遗迹进行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大约3 000年以后，迁入黑海大草原的人类驯化了马。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库库特尼-特里波里文化[5]的先民们在多瑙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带定居，饲养家畜，耕种农田，修建了大规模的定居点，用黏土制造塑像，并烧制彩陶。

大多数希腊人对黑海以北地区一无所知，直到希罗多德开始在雅典的公共节日上朗诵他的作品段落。在这之前，他们把那片土地想象成蛮族的领地和诸神的游戏场。一些人相信，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的主角阿喀琉斯（Achilles）就长眠在多瑙河或第聂伯河河口的某个岛屿上；而亚马逊人[6]——希腊神话中那些为了让张弓更稳而切掉了右乳的女战士——也生活在那片地区，就在顿河附近。他们还相信那里的克里米亚半岛[Crimea，即希腊人称之为陶里卡（Taurica）的半岛]上生活着凶残的陶里安人（Taurians）；如果有不幸的旅人为躲避黑海的风浪来到群山林立的克里米亚海岸，便会遭到陶里安女王伊菲革涅亚[7]的毒手，被她献祭给女神阿耳忒弥斯[8]，因为伊菲革涅亚的父亲阿伽门农（Agamemnon）要将她献祭，是阿耳忒弥斯将她从祭台上救走的。很少有人愿意涉足如“好客之海”周边那样危险的地区。黑海虽名为“好客之海”，航行起来却十分艰难，以常常毫无预兆地出现巨大的风暴而闻名。

希腊人从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口中首次听说黑海以北的土地和人民。辛梅里安人是一个由战士组成的部族，在公元前8世纪被斯基泰人从黑海大草原驱逐，来到安纳托利亚[9]。游牧的辛梅里安人首先迁移到高加索地区，随后又转移到小亚细亚，在这里遭遇了地中海诸文化，接触到他们悠久的定居生活和文化成就。辛梅里安人在地中海地区被视为典型的蛮族，其声名在《圣经》中也有记录。先知耶利米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施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訇。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10]辛梅里安人的野蛮战士形象甚至进入了现代流行文化。在1982年的热门电影《野蛮人柯南》（*Conan the Barbarian*）中，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曾扮演辛梅里安国王柯南。这是作家罗伯特·E.霍华德[11]于1923年虚构的一个人物。

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辛梅里安人被迫离开故土之后，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海滨地区就进入了希腊人的视野。希腊殖民地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建立这些殖民地的定居者大部分来自米利都[12]，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之一。米利都人建于黑海南岸的锡诺普（Sinope）以其自身的地位，

成了其他一些殖民地的母体。建于黑海北岸的殖民地则有潘提卡彭（Panticapaeum），距离今天的刻赤[13]不远，有位于今天的费奥多西亚[14]的忒奥多西亚（Theodosiia），还有位于现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15]附近的克森尼索斯[16]。这三个殖民地都位于克里米亚。然而最有名的米利都殖民地莫过于位于南布赫（波赫）河[17]河口的奥尔比亚（Olbia）。南布赫河在此地汇入比它更大的第聂伯河（Dnieper）的入海口，然后共同注入黑海。奥尔比亚拥有石砌的城墙，有一座卫城，还有一座德尔斐的阿波罗[18]神庙。根据考古发现，奥尔比亚在其全盛时期占地超过120英亩（约48.6公顷），约有1万居民。奥尔比亚人实行民主政治，并以契约方式处理与其母城米利都之间的关系。

同其他希腊城市和恩波里亚（市集）[19]的繁荣一样，奥尔比亚的繁荣有赖于与黑海大草原当地居民的良好关系。从这座城市初建，直到其整个鼎盛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当地的居民恰好都是斯基泰人——一个起源于伊朗人[20]的部落混合体。奥尔比亚的希腊人不仅与他们的邻居一起生活，来往贸易，还相互通婚。大量拥有希腊和“蛮族”双重血统的混血人口随之出现。他们同时沿袭希腊的和当地的风俗。奥尔比亚的商人和海员们把谷物、干鱼和奴隶运往米利都和其他希腊地区，并带回酒、橄榄油和包括织物与金属制品在内的手工制品，在当地市场出售。从对斯基泰首领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发现，当地也有用黄金制成的奢侈品。这些坟墓遍布乌克兰南部草原，如今大部分都风化成小丘，在乌克兰语中被称为“库尔巴尼”（kurbany）。

在斯基泰金器文物中，有一件三层胸饰令人尤为惊叹。这件金器于1971年出土于乌克兰南部，如今藏于基辅乌克兰历史珍宝博物馆。这件胸饰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曾为某位斯基泰王所佩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斯基泰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视角。它的中央部分刻画了两个下跪的蓄须斯基泰男子，手中捧着一件羊皮外套。考虑到整件胸饰由黄金制成，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阿耳戈英雄（Argonauts）[21]夺取金羊毛的故事，而金羊毛乃权威和君主身份的象征。在中央场景的右边和左边是一些家畜的图案，有马、母牛、绵羊和山羊。金饰上还有斯基泰奴隶的形象，其中一人为一头母牛挤奶，另一人则为一头母羊挤奶。这件胸饰清楚地显示，斯基泰社会的主体由草原战士构成，男性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其经济则有赖于畜牧业。

如果说这些人物和家畜的形象让我们得以一窥斯基泰世界的内部，胸饰上的野生动物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了希腊人对他们眼中的世界边缘的想象，而非黑海大草原上真实情况的反映。狮子和豹子追逐野猪和鹿，长着翅膀的狮鹫（希腊神话中最强大的怪兽，鹰首狮身）猎杀马匹，而后者是斯基泰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动物。这件胸饰不仅是希腊文化传播的最好证明，也是

黑海大草原上希腊世界和斯基泰世界相互影响的最好证明。

各种文化的交织让希罗多德得以搜集考古挖掘无法得到的有关斯基泰人的信息。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就是一例。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写道："根据斯基泰人自己的讲述，他们是所有民族中最年轻的。"据称塔尔吉陶斯（Targitaus）有三个儿子，斯基泰人就是他的后裔。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进行了复述："在他们[22]统治这片土地的时候，天空中落下了四样器具：一把犁、一副轭、一把战斧，还有一只酒杯，全都是黄金制成。"两个哥哥伸手去拿这天降的宝物时，宝物就开始燃烧，只有最年轻的弟弟拿到了宝物，成为它们的主人。两个哥哥立刻尊弟弟为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一个斯基泰部落由此兴起。他们保有从天而降的神器，并统治着黑海大草原，被称为"斯基泰王族"。斯基泰人显然自视为黑海大草原上的原生种族，否则不会声称他们的始祖塔尔吉陶斯是主神宙斯和包律司忒涅斯河河神之女的血脉——包律司忒涅斯河即今天我们所知的第聂伯河，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河流。这个神话还表明，尽管斯基泰人的统治阶层是游牧者，但他们同时也自视为农耕种族，因为天降的神器中不仅有轭，还有犁，都是明显的农耕文化符号。

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描述中，斯基泰人也分为牧人和农夫两个群体。在黑海北岸，这两个群体各自从事与环境相符的产业。如果我们在第聂伯河上向南航行，我们在右岸会看到希腊殖民地奥尔比亚。希罗多德关于这一地区的主要知识都从奥尔比亚的公民和旅人那里得来。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可知，奥尔比亚北面的邻居是卡里皮达伊（Callipedae）部落，他们可能是希腊人和当地斯基泰人通婚的后裔。再往北，在德涅斯特河[23]两岸和斯基泰王族控制的草原北面，是阿拉佐尼安人（Alazonians），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与斯基泰人有相似的风俗，却播种和食用谷物、洋葱、大蒜、扁豆和小米"。在阿拉佐尼安人以北，生活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人们被希罗多德称为耕田的斯基泰人（Scythian plowmen），他们生产谷物用来出售。而居住在第聂伯河左岸的人们则被他称为农业斯基泰人（Scythian agriculturalists），或包律司忒尼人（Borysthenites）。希罗多德认为，这些部落与居住在南方黑海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有很大的不同。

希罗多德发现，第聂伯河两岸是全世界最丰饶的土地之一：

> 就我看来，作为斯基泰诸河中的第二大河，包律司忒涅斯河不仅在此地诸河流中最有价值、最为富饶，在全世界也是如此，仅次于那独一无二的尼罗河。它带来了最丰美的草地以及无论数量和品质都远超其他河流的鱼群，还有最甘美的饮水——它的河水清澈晶亮，而此地其他河流的水却甚是污浊。包律司忒涅斯河两岸种植的作物别处无可比拟，而在这里还没有开垦的地方，则生长着全世界最好的青草。

这的确是恰切的描述。第聂伯河盆地的黑土至今仍被视为全球最肥沃的土地之一，为乌克兰赢得了“欧洲面包篮”的称号。

农耕族群定居的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还不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尽头。此地往北仍有人类的踪迹。希腊殖民者或各行各业的斯基泰人即使对这些人有所了解，也所知甚少。这些人的居住地区才是最远的边境。在第聂伯河右岸，这些人被称为涅乌里人（Neuri），在其左岸更往东和往北的地方，则被直接称为“食人族”。希罗多德对这些人没有太多了解，然而涅乌里人所居住的普里皮亚季[24]沼泽位于今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恰与古斯拉夫人的一个可能起源地重合。在此地尚能发现乌克兰方言中最古老的一些变种。

如果希罗多德和他的资料来源可信，那么斯基泰王国应该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集团，集团内部各族群在社会形态和劳动分工上的位置由地理和生态决定。希腊人和希腊化斯基泰人占据了海滨地区，成为地中海希腊世界与内陆地区的贸易和文化桥梁。主要的贸易商品——谷物、干鱼，还有奴隶——来自稀树草原或林草混交带。这些商品，尤其是谷物和奴隶，要抵达黑海港口，必须取道斯基泰王族所在的草原地区。斯基泰王族控制着贸易，将大部分收入收归己有，并将他们的部分黄金宝藏留在了这一地区的许多小丘里。希罗多德描述的海岸、草原和森林地带之间的区分将是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乌克兰历史中的主要区分方法之一。

《历史》所刻画的层次丰富的斯基泰世界在公元前3世纪终结。当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夺取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并将之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时，他们需要面对的草原之主已经不再是斯基泰人。

新的一群游牧者——萨尔马提亚人[25]——来自东方。他们击败了控制着农耕地区与希腊殖民地之间商路的斯基泰牧人，并将他们赶走，取代了其位置。新来者同斯基泰人一样，也是伊朗人。希罗多德认为萨尔马提亚人居住在顿河以东，并记述了一个传说：萨尔马提亚人是逃脱希腊囚笼的斯基泰人和亚马逊女战士的后裔。类似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也由不同的部落组成，并统治着许多族群，比如洛克索拉人[26]、阿兰人[27]和雅济格人[28]。萨尔马提亚人统治黑海大草原长达500年之久，直至公元4世纪。在其鼎盛时期，萨尔马提亚人控制着东至伏尔加河、西至多瑙河的全部地区，并渗入了中欧，直至维斯瓦河[29]。

较之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的强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远远少于对斯基泰人的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希腊殖民地与乌克兰内陆之间的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交流）在斯基泰人统治时期繁盛一时，在萨尔马提亚人到来之后却几乎完全中断。这片土地曾经的主人斯基

泰人被萨尔玛提亚人驱赶到克里米亚，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国——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控制着克里米亚半岛、半岛以北紧邻的草原，以及各希腊殖民地。萨尔马提亚人拥有黑海大草原剩下的全部土地，却与希腊殖民地隔绝开来。斯基泰人则失去了对整个草原和内陆地区的掌握。大草原新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损害了当地的贸易，并逐渐威胁到各希腊殖民地的安全。（斯基泰人和其他游牧者一样，无论贸易状况好坏，都会向殖民者索取金钱或财物。）此外，另一个因素同样有力地削弱了当地贸易——地中海市场有了新的农产品供应者。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和罗马帝国的兴起，从埃及和中东通往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岸的商路得到了保护，谷物随之源源而来。

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的势力延伸到了黑海北岸，为此时处于罗马监护下的希腊殖民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让从前的贸易得以复活。然而这次复兴在最乐观者的眼中也是一场苦战。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修斯·纳索）[30]在公元8年被奥古斯都大帝放逐到黑海岸边的托米斯（今属罗马尼亚）[31]，10年后在那里去世。他为我们留下一份记录，形象地描述了公元初年左右一个希腊沿海殖民地日常面临的重重危险：

数不清的部落环布四周，以残酷的战争相威胁，

认为不靠掠夺的生存是一种耻辱。

城外没有一寸地方安全：山丘的防护全靠

薄弱的围墙，以及巧妙的选址……

要塞给我们提供的保护极为有限：甚至连

城内与希腊人混处的野蛮人也令人心生恐惧，

因为这些野蛮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毫无分隔，

还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房舍。

这种与“野蛮”邻居之间的敌意和安全感的缺失所造成的状态，让本地一度繁荣的殖民地的情况变得越发糟糕。希腊演说家和哲学家狄奥·赫里索斯托姆[32]自称曾在公元1世纪末期拜访过奥尔比亚（在他的年代，这座城市被外人称作包律司忒涅斯），并留下了一份关于这个衰落中的殖民地的生动记录：

> 包律司忒涅斯城的规模与其古代的声名并不相称。这是因为它曾多次遭遇战争，并多次陷落。长久以来这座城市都身处蛮族的围困之中，而且这些蛮族差不多还是最爱打仗的族群，因此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正其如此，此地希腊人的财富事实上已经萎缩到极低的水平，以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不再结合成城市，而其他人也仅仅能勉强结成群落生存。加入他们群落中的大多数也都是蛮族。

以上就是罗马人来到这里一百多年之后这些希腊殖民地的状况。这片地区再也没能恢复其在希罗多德时代的繁荣、贸易以及与内陆地区的联系。殖民者要么与当地部族处于战争状态，要么就是处于对战争的担忧之中，因此对他们的邻居也知之甚少。“远方是博斯普鲁斯[33]、顿河，还有斯基泰泽地，”从流放地托米斯向东方和北方远望的奥维德写道，“只是几乎无人踏足的土地上的几个名字。比那里更远的，只有人类无法居住的严寒。啊，我与世界尽头已近在咫尺。”

与奥维德同时代的斯特拉波[34]著有受人称道的《地理志》，比那位鼎鼎大名的罗马流放者对黑海大草原有更多的了解，让我们得以知道萨尔马提亚人各部落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各地区的名称。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雅济格人和洛克索拉人是“住在大车上的人”，也就是游牧部落。不过，关于第聂伯河地区林草混交带的定居民族的状况，这位闻名的地理学家没有提供一点信息，更不用说更北方森林地带的情况。然而，与奥维德不同，斯特拉波并没有在这里的居民中生活，他的信息提供者也不如希罗多德的——他们对“北方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对这种“关于接下来更北方一些的居民的状况”的普遍无知，斯特拉波表达了不满：“我既不了解巴斯塔尔人[35]，也不了解萨乌洛马特人[36]，简而言之，对居住在本都[37]以北的所有居民都毫无认识。我既不知道他们到大西洋的距离，也不知道他们的国土是否濒临着它。”

斯特拉波的信息提供者来自这片地区的一个殖民地。如果说希罗多德曾多次提到第聂伯河的话，斯特拉波却似乎对顿河更加熟悉。他的信息源更可能来自位于顿河河口、属于博斯普鲁斯王国[38]的希腊殖民地塔纳伊斯[39]。博斯普鲁斯王国是随着罗马人到来而复兴的希腊殖民地联盟中的最强大者。对斯特拉波而言，顿河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欧罗巴最东部的边界。（“欧罗巴”这个词被爱琴海本土的希腊人用以描述希腊在外部世界的整个存在范围。）顿河以西是欧罗巴，从顿河以东开始则是亚细亚。

因此，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开端，当罗马人来到黑海沿岸殖民地时，乌克兰大地再次变成那个将被称为西方文明的世界的边缘。希腊化世界的北部边界如今成为欧洲的东部界线。乌克兰在接下来近2 000年的时间里都处于这个边缘地位，直到18世纪俄罗斯帝国兴起——俄国将重新绘制欧洲

地图，把它的东部边界一直推进到乌拉尔山。

在罗马人统治的年代，黑海大草原被分成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这件事并没有太多意义。斯特拉波曾提到散布在顿河左岸和右岸的萨尔马提亚人，而他的后继者之一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更提到过两个萨尔马提亚，一个位于欧洲，另一个位于亚洲。在接下来的15个世纪里，这种划分将在欧洲地理学家的著作中频繁出现。比这种想象性的欧洲东部边界更重要的，是黑海北岸地中海殖民地与黑海大草原游牧部落之间那个真正文明化的边界。与那些用高墙坚垒包围起来的希腊殖民地不同，这个边界从来不用石块将自己限定于一地，而是为殖民者和当地居民创造了一片宽广的交流地带。语言、宗教和文化在这里得以交融，产生新的文化和社会现实。

那条位于草原游牧部落与林草混交带定居者之间的边界至关重要。希罗多德对之有所了解，斯特拉波却不曾留意。我们很难断言它是完全消失了，还是仅仅不为地中海的作者们所知。地理和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然而人口构成很可能已与从前不同。我们将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期希腊学者的作品中再次见到关于这一边界地带的描述。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它并非一成不变。

---

[1] Pontic steppes，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干草原，属于欧亚大草原的西部，也称钦察草原。Pontic一词来自希腊语Πόντος（拉丁字母转写为pontos），意为海。

[2] Halicarnassus，古希腊城市，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的博德鲁姆。

[3] Darius the Great，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大流士一世（？—前485）。

[4] Scythians，希腊古典时期活动于欧洲东北部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古波斯人称之为塞克人。

[5] Cucuteni-Trypilian culture，公元前6000至前3500年左右活动在东欧地区的新石器—铜石时期古文化。

[6] Amazons，亦译作阿玛宗人，意为“无乳”。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全部由尚武善战的女战士构成的民族。

[7] Iphigenia，希腊神话人物，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女。在神话中，她在被阿伽门农献祭时，被女神阿耳忒弥斯转送到陶里斯，成为当地的神庙祭司。

[8] Artemis，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与狩猎女神。

[9] Anatolia，即小亚细亚半岛。

[10] 《耶利米书》6：23，译文据和合本。

[11] Robert Ervin Howard（1906—1936），美国恐怖小说、冒险小说和奇幻小说作家。

[12] Miletus，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的古希腊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力量，并建立了许多殖民地。米利都拥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世称“米利都学派”。

[13] Kerch，克里米亚城市，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侧，是刻赤海峡中最重要的港口。

[14] Feodosiia，克里米亚东部城市，旧称卡法（Caffa）。

[15] Sevastopol，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的海港。

[16] Chersonesus，位于克里米亚西南部，最早是希腊殖民地，公元前2世纪晚期属于希腊殖民地联盟博斯普鲁斯王国，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属于拜占庭帝国。

[17] Southern Buh（或Boh），乌克兰河流，一般按俄语发音译作南布格河，发源于乌克兰西部波多里亚高地，注入黑海，全长806千米。

[18] Apollo Delphinios，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既是太阳神，也是德尔斐（Delphi）的守护神，故被称为德尔斐的阿波罗。

[19] Emporia，希腊语emporion和拉丁语emporium的复数形式，意为“市集”。

[20] Iranians，指印欧语系中说伊朗语支语言的种族。他们曾遍布亚欧大陆各地，非指今天的伊朗人。后同。

[21] 阿尔戈英雄，指希腊神话中追随伊阿宋，乘坐快船“阿耳戈号”前往科尔喀斯（今格鲁吉亚境内）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们。

[22] 这里的“他们”指塔尔吉陶斯的儿子们，即里波克塞斯（Lipoxais）、阿尔波克塞斯（Arpoxais）和克拉克塞斯（Colaxais）。

[23] Dniester，欧洲东部的一条河流，起源于喀尔巴阡山脉，注入黑海，全长1 362千米。

[24] Prypiat，今乌克兰基辅州城市，位于乌克兰北部近白俄罗斯边界，因处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疏散区而被废弃。

[25] Sarmatians，起源于中亚的一个伊朗人部落联盟，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

4世纪间达到鼎盛。

[26] Roxolani，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支，公元前2世纪左右居住在黑海东岸草原地区。

[27] Alani，即Alans，伊朗人游牧部族之一（Alan为“雅利安”的一种伊朗方言发音）。公元1世纪波斯和罗马的资料记载了阿兰人在黑海大草原上的活动。

[28] Iazyges，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支，公元前200年左右从中亚地区迁入黑海大草原。

[29] Vistula，欧洲中部河流，位于今波兰境内，在格但斯克湾注入波罗的海，全长1 047千米。

[30] Ovid（公元前43—约公元18），本名普布利乌斯·奥维修斯·纳索（Publius Ovidius Naso），古罗马著名诗人，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等。

[31] Tomis，即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Constanța）。

[32] Dio Chrysostom（约公元40—约115），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演说家、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33] Bosphorus，此处指黑海东北部的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Cimmerian Bosphorus），即连接黑海与亚速海的刻赤海峡两岸，而非今天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一词来自古希腊语中的Bόσπορος（Bosporos）一词，意为“运牛的通道”。

[34] Strabo（公元前64 / 63—公元23），古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著有《地理志》17卷。

[35] Bastarnae，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左右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第聂伯河之间的一个部族。

[36] Sauromatae，即萨尔马提亚人。

[37] Pontus，本都王国，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的一个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希腊化国家，势力曾遍及黑海沿岸。

[38] Bosporan Kingdom，又称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王国，位于刻赤海峡两岸，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在公元前16年成为罗马的附庸国。

[39] Tanais，位于顿河三角洲的一座古希腊城市，建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在公元5世纪被遗弃。

第2章
斯拉夫人的到来

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古希腊人与乌克兰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贸易和文化交流决定，然而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除了贸易与战争双管齐下之外别无选择。到了公元4世纪，随着在旧史学中被称为“蛮族入侵”、在现代被称为“迁徙时期”的时代到来，罗马人与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更近乎战争状态。在这个时代里，来自亚欧大陆和东欧地区的人口和部族大规模流向欧洲中部和西部，最终在5世纪下半叶让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压力下崩溃。虽然受到削弱，但史称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仍在草原游牧部落和随之而来的北方农耕民族的攻击下得以幸存，直到15世纪中叶。

乌克兰在戏剧性的迁徙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场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入侵的一些关键参与者曾在这里生活或从这里经过，其中有哥特人和匈人[1]，后者由他们的君主“匈王”阿提拉率领。迁徙浪潮终结了包括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在内的伊朗游牧部族长久以来对黑海大草原的控制。哥特人拥有日耳曼血统，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匈人发源于蒙古大草原。随着匈人一起来到这片地区的，还有许多中亚部落。到了6世纪中叶，匈人已经被一些说突厥方言的部落取代，消失无踪。

以上提到的迁徙浪潮的参与者都到过乌克兰，一度停留下来统治这里的草原，最终也都离开了。然而另一个被迁徙浪潮的涌动推到前台的族群却拒绝离开。这是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被定义为斯拉夫人的部落集团，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斯拉夫语言的印欧语系根源说明他们在公元前70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从东方进入欧洲，并在东欧定居下来，远远早于希罗多德第一次对这个地区及其居民做出描述的时间。他们把黑海大草原以北的森林地带视为自己的家园，在其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地中海学者们所知。

斯拉夫人第一次引起广泛注意是在6世纪初。他们出现在已被哥特人和匈人削弱的拜占庭帝国的边界上，随后迁入巴尔干地区。拥有哥特血统的6世纪拜占庭学者约达尼斯[2]将这个时期的斯拉夫人分为两个主要群体。“尽管他们因部落和地域的不同而拥有各种各样的名字，”约达尼斯写道，“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被称为斯科拉文人[3]和安特人[4]。”约达尼斯将斯科拉文人的区域定位在多瑙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而将安特人的区域定位于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在本都海[5]的蜿蜒海岸上。”语言学资料显示斯拉夫人的故土位于第聂伯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森林地带和林草混

交带，主要是今天乌克兰的沃里尼亚与普里皮亚季沼泽地区。到了约达尼斯写作的年代，斯拉夫人必然已经从他们藏身的森林地带来到了草原上，并给查士丁尼大帝[6]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查士丁尼大帝在527年至565年间统治着拜占庭帝国。他雄心勃勃，曾尝试恢复包括东西两部分在内的整个罗马帝国。在多瑙河地区的边境上，当地部落无休无止地攻击着拜占庭人。查士丁尼大帝决定在这里采取攻势。6世纪拜占庭学者普洛科皮乌斯[7]为查士丁尼大帝的战争留下了详尽的记载。他曾提到皇帝的近臣、军事统帅奇里布迪乌斯[8]在6世纪30年代早期被派往多瑙河以北作战。奇里布迪乌斯在对安特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让查士丁尼大帝得以将“安提库斯”（意为安特人征服者）加入自己的帝号。然而胜利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三年后，奇里布迪乌斯战死，查士丁尼大帝放弃了越过多瑙河的尝试，重拾多瑙河沿岸边界的防御政策。

查士丁尼大帝恢复了罗马帝国古老的“分而治之”策略。到了6世纪30年代末期，安特人已经在对斯科拉文人作战，其中不无拜占庭人的鼓励和诱导，而拜占庭的将军们也同时从这两个族群中为帝国军队招募兵员。即便如此，来自斯拉夫人的袭扰仍没有停止。在与斯科拉文人作战的同时，安特人还是设法入侵了拜占庭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行省[9]。他们在这里展开掠夺，掳走大量奴隶，将他们带回多瑙河左岸。在展示了他们的破坏能力之后，安特人才向帝国输诚。查士丁尼大帝将安特人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把多瑙河以北被废弃的希腊城市图里斯（Turris）划拨给他们作为都城。

与拜占庭帝国的众多其他敌人一样，安特人为了从帝国国库得到定期的报酬，也成了帝国的守护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安特人声称他们俘虏了皇帝最优秀的将军奇里布迪乌斯，并打算将他奉为自己的领袖。由于奇里布迪乌斯曾被查士丁尼大帝授予“野战军主帅”（*magister militum*）——该地区所有帝国军队的指挥官——的称号，安特人的这一举动就会让他们成为帝国的合法公民，而不仅仅是帝国的看门人。这条诡计没有奏效。真正的奇里布迪乌斯当然早就死了。冒充者被抓了起来，送到查士丁尼大帝面前。安特人也只好接受“同盟部族”[10]的地位，成为这个大帝国的盟友而不是公民。

拜占庭帝国的这些新盟友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外貌？以何种方式战斗？拥有何种信仰？普洛科皮乌斯曾不止一次提到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那些有关斯拉夫人生活方式的详尽描述适用于这两个群体。根据普洛科皮乌斯的说法，斯拉夫人是一个半游牧族群，住在“简陋而彼此相隔很远的棚屋里”。他们经常改变居住地。斯拉夫战士都是“个头很高、身体粗壮的男子”。关于他们的

长相，普洛科皮乌斯有如下描述："从皮肤和毛发看，他们算不上金发的白人，却也不完全是黝黑的类型，而是每个人的皮肤都略微呈现红色。"斯拉夫人"生活艰苦，从不在意身体的舒适……身上总是覆满污垢。从各个方面来讲，他们都不卑鄙，也不作恶，然而他们仍保留着匈人的所有质朴特征"。

尽管满身都是污垢，斯拉夫人却以其民主制为历史所知。"因为这些民族，"普洛科皮乌斯写道，"这些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不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他们长久以来就生活在民主之中，其结果是有关他们利益的任何事情，不论是好是坏，都由民众来决定。"他们在战场上喜欢赤裸上半身，却与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Braveheart*）中那些中世纪苏格兰人不同——斯拉夫人对暴露私处的态度更为得体。"当他们身处战场时，"普洛科皮乌斯说，"大多数人会徒步向敌人发起攻击。他们手持小盾牌和投枪，却从来不穿胸甲。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汗衫和斗篷也不穿，只是将裤子提到私处的高度，就投入与敌人的战斗之中。"

其他关于斯拉夫人战斗方式的信息见诸拜占庭的《战略》（*Strategikon*）一书。这本书著于公元600年左右，常被认为是拜占庭皇帝莫里西乌斯[11]的作品。作者对渡过多瑙河来到巴尔干地区定居的斯拉夫人做出了一些细节描述。他发现这些斯拉夫人对旅人甚为友善，但过于自由散漫，不愿遵守条约，也不愿服从多数的意见。在他们位于多瑙河以北的故乡，斯拉夫人将居处或建在森林中的河岸上，或建在沼泽地带，以免让入侵者轻易找到。他们最喜欢伏击战术，尽量避免在开阔地带作战，对常规军事队列也毫无兴趣。他们以短矛、木弓和短箭作为武器，在部分箭头上涂抹毒药。他们强迫俘虏做他们的奴隶，但会把奴役期控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关于斯拉夫人的宗教，普洛科皮乌斯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斯拉夫人完全不是一神论者。"他们相信一位神祇——闪电的制造者——独为万物之主，并向他献上家畜和其他各种牺牲。"普洛科皮乌斯写道。然而，尽管只崇拜一个主神，斯拉夫人却完全没有放弃古老的自然崇拜习俗，并且同样祭祀其他神明。正如普洛科皮乌斯所述："他们崇拜……河流、水妖以及其他各种精灵，向它们个个都献上祭品，并将他们的卜筮与这些献祭联系起来。"让这位拜占庭作者震惊的并非斯拉夫人向诸神献祭的习俗，毕竟前基督教时代的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传统，而是他们对改宗基督教的排斥，这一点不同于帝国其他那些早已改宗的臣属。"他们对它[12]既不了解，也决不肯承认它对人拥有任何力量。"普洛科皮乌斯对此表示了惊愕，如果不是失望的话，"但当他们面临死亡——比如生病或开始作战时，他们会发誓说，如果自己能够生还，就立刻向神明献上祭品，以抵偿自己的生命。而当他们真的生还时，他们也会信守诺言，献上他们承诺的

祭品，并相信这些祭品已经换回了他们的安全。”

普洛科皮乌斯和其他拜占庭作者对斯拉夫人的描述在乌克兰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了一些印证。人们通常把安特人与考古学上的彭基乌卡[13]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个文化遗址以乌克兰的一个城镇的名字命名。彭基乌卡文化的创造者在6世纪、7世纪和8世纪早期生活在乌克兰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带，并在第聂伯河两岸定居。这片地区包括了约达尼斯所认定的安特人区域。与普洛科皮乌斯所描述的安特人和斯科拉文人一样，彭基乌卡部落成员也栖居在泥地上挖出的简陋住所里。他们同样会经常改变居住地。定居点时而有人居住，时而被遗弃，时而又被重新启用，这表明这些居民过着一种流动的农耕生活。考古发现还揭示了一个普洛科皮乌斯没有告诉我们的事实：彭基乌卡部落拥有设防的城镇，并把它们当作地方统治者的根据地、行政中心和军事力量中心。

到了7世纪初，随着阿瓦尔人[14]的入侵，斯拉夫人在这片地区唱独角戏的时代结束了。阿瓦尔人来自北方的里海草原，是一个说突厥语的部落集团。他们摧毁了安特人的社会结构。

阿瓦尔人在这片地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其中一部分流传到11世纪和12世纪，被当时正在写作一部历史书的基辅基督教修士记录下来。这部记录后来被称为《古编年史》或《古史纪年》[15]，其第一部分掺杂了本地传说和来自拜占庭的资料。根据《古编年史》，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发动战争，并侵袭杜勒比人[16]，后者也是斯拉夫人”。这里提到的杜勒比人是一个居住在布赫河沿岸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甚至对杜勒比女子施以暴行，”编年史的作者记述道，“一个阿瓦尔人要旅行时，他的车上不套马也不套牛，而是下令给三个、四个或五个女人戴上轭具，强迫她们拉他的车。”这种行径受到了天谴。“阿瓦尔人体格魁梧，性格傲慢，上帝最终消灭了他们，”作者继续讲述，“他们都死了，没有一个阿瓦尔人活下来。直到今天还有一句罗斯谚语：‘他们像阿瓦尔人一样死了个精光。’”

首先从阿瓦尔人手中接过黑海大草原统治地位的是保加尔人[17]，之后是哈扎尔人[18]。哈扎尔人终结了迁徙时期，于7世纪末在这里建立起相对的和平。先前阿瓦尔人在乌克兰草原上的臣民对哈扎尔人的记忆要好得多。“随后，当他们居住在山林中时，哈扎尔人来到他们中间，”一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要求他们纳贡。”根据这位作者的记述，这些当地人之前臣服于被称为德列夫里安人（林中人）[19]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的贡品是剑，这是一个有反抗意味的举动，也是将来复仇的誓言。不过，除了讲述这个故事，为同意向哈扎尔人纳贡的基辅人辩护之外，这些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对入侵者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恨意。

哈扎尔人对林草混交带的控制力相当有限。第聂伯河多多少少把他们的统治区域限制在森林地带。哈扎尔人中拥有突厥血统的精英集团对和平和贸易更感兴趣，对外界的影响持开放态度。他们曾欢迎一个基督教传教团的到来，甚至接受了犹太教，这导致了哈扎尔人起源于东欧犹太人的传说的兴起。哈扎尔人创建的政治体的核心地带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地区，以伏尔加河河畔的伊的尔[20]和顿河河畔的萨克尔[21]为主要中心。哈扎尔精英集团通过控制商路集聚他们的财富。这些路线中，通往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伏尔加河通道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余，最初甚至令通往拜占庭帝国的第聂伯河通道相形失色。

哈扎尔人在7世纪20年代与拜占庭帝国缔结了和约。此时拜占庭已经在黑海北岸地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存在。4世纪时落入哥特人之手的奥尔比亚已经湮灭无踪，但拜占庭的指挥官们在克里米亚南端海岸地区占据了一片土地。山脉将这片土地同半岛上的草原地区隔离开来。拜占庭人在这里的克森尼索斯建立起其克里米亚属地的政治中心。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这一带的主要城镇都有军队驻守。哥特人从这里西迁之后，先是到了中欧，最后一直抵达伊比利亚半岛。然而有一小股哥特人在同胞离开后仍然留在这里。帝国军队将这些哥特人征召入伍以保卫帝国的领土，并派工程师帮助他们加固克里米亚山中高处的洞穴村镇。哈扎尔人成为拜占庭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盟友，希望能维持通往全世界最富有的市场君士坦丁堡的商路。

在哈扎尔人控制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地区时，我们对这里的斯拉夫人的了解情况如何？比这之前要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好多少。我们主要的信息源，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源，是比他们晚很多的基辅编年史作者的记载。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后来成为哈扎尔人地区最西部前哨的基辅大约建立于6世纪前的某个时期。但向我们解释了基辅为何如此重要，为何被选中成为定居点的，是那部编年史。当地的一个传说将基辅的建立与附近的一条河流联系在一起。这里的居民们认为，这座城市由他们的统治者基建立，基辅的山丘得名自基的两个兄弟，而流经基辅注入第聂伯河的那条河流则得名自他的妹妹利比德。[22]利比德河河畔有一座这四位基辅创建者的塑像，如今已成为乌克兰首都的主要地标之一。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提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12个斯拉夫部落。他们的定居点分布向北最远直至拉多加湖[23]，离今天的圣彼得堡不远；向东直至伏尔加河上游和奥卡河[24]；向南则到德涅斯特河下游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这些斯拉夫人是今天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语言学家根据从6世纪开始发展的方言差异，将他们定义为东斯拉夫人，与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区别开来。西斯拉夫人是今天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的祖先，而南斯拉夫人的后裔则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

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其他斯拉夫民族。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记载的这12个部落中，有7个居住在今天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布赫河、普里皮亚季河[25]、杰斯纳河[26]和索日河[27]沿岸。这些部落中只有一部分处于哈扎尔人的统治之下。虽然统治者和政治结构不同，他们在风俗和其他方面却与邻居们相同，或者是非常接近。这至少是基辅编年史作者传达给我们的印象。这位作者碰巧还是一名基督教修士。他将自己同胞之外的所有部落都视为野蛮人。“他们像野兽一样住在森林里，吃各种不洁净的东西。”这位蔑视自己异教祖先和当代同胞的编年史作者写道。

考古学家的发现证明东斯拉夫人更有定居倾向。他们居住在用原木搭建的房屋里，每30到40座房屋组成一个村庄，这些村庄又聚成群落。斯拉夫人在每个群落的中心建起一座堡垒，当作遇袭时的军事指挥部。他们从事农耕，饲养家畜，还有自己的酋长。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实行军事民主，与普洛科皮乌斯描述的那些斯拉夫人一样。此外，他们和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一样将雷霆之神视为主神，并称他为佩伦[28]。

与普洛科皮乌斯笔下的斯拉夫人相比，这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所描述的斯拉夫人在个人卫生方面有了一些进步。假托那位据称将基督教传播到基辅的使徒圣安德鲁[29]之口，这位作者讲了下面的故事：“我看见斯拉夫人的土地。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我留意到他们用木头搭建的浴室。他们会先将自己熏到极热，然后脱去衣衫。往身上涂抹一种酸性液体之后，他们会用嫩枝抽打身体。他们的抽打十分猛烈，简直要将自己活活抽死。”

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住在基辅附近，很可能也在这里长大。他在嘲讽北方地区（今天的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居民常用的沐浴步骤时不吝讽刺。至于他的同胞中那些前基督教时代的古老风俗，他将之视为野蛮人的习惯，更是毫不留情。“德列夫里安人，”他在对基辅的前统治者的描述中说，“活得就像野兽和牲口一样。他们自相残杀，吃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些人没有婚姻的传统，到处掳掠少女。”根据这位作者的描述，其他斯拉夫人部落也有同样的罪过。“他们不结婚，”他写道，“只有各个村庄之间的节庆。他们在节日中聚在一起游戏、跳舞，还参加其他各种邪恶的娱乐。男人们在这样的场合随便抢夺女人当作自己的妻子。只要征得她们的同意，每个人都可以夺走任何女子。实际上，每个人甚至可以拥有两名或者三名妻子。”如果我们将这位编年史作者对斯拉夫人婚俗的描述（更准确地说是他关于斯拉夫人不结婚的看法）当作一种常态而非异常，那就是谬以千里了。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是后世的一名狂热教徒。毫不奇怪他会向一切违反基督教道德的行为开火，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有悖婚姻体制的年轻人节庆行为上。来自科尔多瓦[30]、拥有犹太血统的摩尔人[31]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32]曾在10世纪中期到访过西斯拉夫人的土地。他发现斯

拉夫人有稳固的婚姻，而嫁妆还是他们积攒财富的主要方式之一。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年轻的斯拉夫男性和女性在婚前通常就有性经验。“他们的女子一旦结婚，就不会通奸。”伊本·雅各布写道，“但如果少女爱上了某个男子，就会委身于他，以满足自己的欲火。如果丈夫娶到妻子之后发现她还是处女，他会对她说：‘但凡你有一些长处，就会有男人想要你，而你也肯定能找到一个人向他献上贞操。’然后他会把她从自己身边赶走，送回娘家。”

关于10世纪到11世纪之前定居在乌克兰的那些斯拉夫人的情况，我们所知极为有限。大体上，我们了解的情况要么来自这些人的拜占庭或哥特仇敌，要么来自上百年之后的狂热基督徒，如那位在斯拉夫人身上只看到异教迷信的基辅编年史作者。两方面的记载都将他们视为与基督教帝国或基督教教条仪轨为敌的蛮族。他们是如何从部分位于今天乌克兰西北地区的故土出发，以大体和平的方式对东欧进行殖民，深入南方的巴尔干地区，西渡维斯瓦河直到奥得河[33]，北至波罗的海，东至伏尔加河和奥卡河的？由于编年史作者的无视，这个过程基本不为我们所知。斯拉夫人是游牧部落入侵之后来到这里的农耕民族，因为除了用来放牧畜群的草原外，“创造历史”的游牧民族通常不知道如何利用土地。斯拉夫人的殖民浪潮过程缓慢，方式基本平和，也造成了绵延久远的影响。

---

[1] Hun，在公元4世纪西迁进入欧洲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公元5世纪时达到极盛，在领袖阿提拉（Attila，406—453）的率领下多次入侵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迅速瓦解消失。

[2] Jordanes，6世纪拜占庭帝国官员、史学家，曾著有《罗马史》和《哥特史》。

[3] Sclaveni，中世纪早期入侵并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集团。

[4] Antes，6世纪时居住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西北岸地区的斯拉夫人集团。

[5] The sea of Pontus，即黑海。

[6] 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即查士丁尼一世，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年在位）。

[7] Procopius（约500—约565），东罗马帝国重要的史学家，其著作包括《战争史》《建筑》和《秘史》等，是研究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历史的一手资料。

[8] Chilibudius（？—533），拜占庭帝国将军，其事迹见于普洛科皮乌斯的作品。

[9] Thrace，东欧历史地理概念，今包括保加利亚南部、希腊北部和土耳其欧洲部分。

[10] Foederati，Foederatus的复数形式，表示罗马帝国与蛮族根据条约保持的同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罗马在帝国内为蛮族提供居住地，蛮族则与罗马军队共同作战。这是一种雇佣关系，罗马方面提供酬劳，而蛮族依约不侵扰罗马领土。

[11] Mauricius（539—602），拜占庭帝国皇帝（582—602年在位）。

[12] 见普洛科皮乌斯的《战争史》第七卷第十四章第23节，此处的“它”是指“命运”。

[13] Penkivka，今乌克兰西部文尼察州城镇。

[14] Avars，在6世纪左右迁徙到欧洲中部和东部的一个游牧部族。

[15] Primary Chronicle，亦作Tale of Bygone Years，是中世纪基辅罗斯的一部描述东斯拉夫人早期历史的著作，根据拜占庭的编年史、西斯拉夫和东斯拉夫的文学作品、官方文件及口头文学等资料汇编而成。

[16] Dulebians，早期东斯拉夫人部落联盟，可能存在于6世纪至10世纪之间。

[17] Bulgars，起源于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游牧民族，拥有突厥特征，7世纪时期活跃在黑海—里海草原地带，成为半游牧民族，被认为是伏尔加鞑靼人、楚瓦什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祖先。

[18] Khazars，一个半游牧化的突厥民族。他们建立了存在于7世纪至10世纪间的哈扎尔汗国。

[19] Derevlianians，或作Drevlians，6世纪至12世纪间居住在今乌克兰波利西亚（Polesia）和右岸乌克兰地区（Right-Bank Ukraine，第聂伯河以西部分地区的历史称呼）一带的东斯拉夫人部落。

[20] Itil，亦作阿的尔、阿得（Atil），意为“大河”，8世纪中至10世纪末为哈扎尔汗国的都城。

[21] Sarkel，9世纪30年代哈扎尔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修起的砖石要塞，位于顿河下游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境内。

[22] 基（Kyi）、谢克（Shchek）、霍里夫（Khoryv）和利比德（Lybid），传说中基辅的四位建城者。基辅市中心的谢卡维奇亚山丘和霍列维奇亚山丘即得名自基的兄弟谢克和霍里夫。

[23] Lake Ladoga，位于俄罗斯西北部卡累利阿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的湖泊，面积约1.8万平方千米，是欧洲最大的湖泊。

[24] Oka River，位于俄罗斯境内，是伏尔加河最大的支流，全长1 500千米。

[25] Prypiat River，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流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长约710千米。

[26] Desna River，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流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基辅以北注入第聂伯河，全长1 130千米。

[27] Sozh River，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流经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长648千米。

[28] Perun，斯拉夫神话中的最高神，除了是雷霆之神外，还是火焰、山岳、风、橡树、鸢尾花、雄鹰、车马、武器和战争之神。

[29] St. Andrew，亦作圣安得烈，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位门徒，被普世教会称为首召者。据传他曾在小亚细亚沿黑海传道。

[30] Cordoba，位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一座城市。

[31] Moor，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西西里岛、马耳他、北非和西非等地区的穆斯林。

[32] Ibrahim ibn Ya’qub，10世纪时期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名旅行家。根据史籍和他自己的作品，人们通常将他视为一名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15世纪前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他是有犹太血统的穆斯林。

[33] The Oder，东欧河流，发源于捷克，流经波兰西部，成为波兰和德国的界河，注入波罗的海，全长854千米。

第3章
第聂伯河上的维京人

在乌克兰，与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迁徙时期或“蛮族入侵”最后都让位给了维京时代。维京时代从8世纪末一直延续到11世纪下半叶。我们很容易想到，“蛮族入侵”的结束并非侵略行为本身的终结。新的入侵者来自今天的瑞典、挪威和丹麦，也就是维京人。他们在西欧被称为诺斯人（Norsemen）或诺曼人（Normans），在东欧被称为瓦良格人（Varangians）。无论是整个还是部分的国家，都是他们劫掠、征服和统治的对象。维京人为已有的社会形态带来了改变，并创造出新的社会形态。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关于不列颠岛上的维京时代，我们知道一个确切的日期——793年6月8日。这一天，可能来自挪威的维京海盗们进攻并洗劫了英格兰海岸附近林迪斯法恩岛[1]上的一个基督教修道院。他们将一些修士扔进海里溺毙，将另一些人掳为奴隶，然后带着修道院的财宝登上他们的长船，消失无踪。差不多在同一个十年里，维京人或诺曼人（后来的诺曼底省即得名于此）还出现在法国海岸附近。维京时代到来了。

拜占庭宫廷与维京人的首次接触不晚于838年。这一年，代表罗斯（Rus’/Rhos）国王的使节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向帝国表达和平与友好的愿望。他们来自北方，却因担心遭遇敌对的部落，不愿沿原路返回，于是皇帝让他们绕道日耳曼尼亚[2]回国。在查理大帝之子、法兰克国王“虔诚者”路易[3]的宫廷里，维京人则被称为瑞典人或诺斯人，并被怀疑是间谍。实际上，他们可能有各种身份，但唯独不是间谍。他们也有足够理由担心在回北欧的路上遭到攻击。攻击者可能是斯拉夫人部落，更可能是黑海大草原上的游牧者。

拜占庭与维京人初遇时的甜美和平很快被对立取代。859年[4]，一支小规模维京舰队在地中海上昭示了它的存在。第二年，另一群维京人沿第聂伯河南下，横渡黑海，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攻击了君士坦丁堡。与林迪斯法恩受到的进攻一样，这一次维京人对强大的拜占庭帝国首都的进攻也有确切的日期——860年6月8日。君士坦丁堡和整个帝国都对此感到猝不及防。帝国皇帝米哈伊尔[5]此时正身先士卒，在小亚细亚作战，而他的舰队也远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上，保护帝国不受阿拉伯人和前一年出现在这里的维京人的进攻。没有人想到维京人也能从北方到来。

入侵者的装备不足以支持一场长期的围城战，也无法突破城墙，但他们对郊区发动攻击，洗劫教堂和庄园，淹死任何敢于抵抗的人，并恐吓平民。

之后他们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在帝都附近的王子群岛[6]上继续劫掠。牧首佛提乌[7]——此时城中最高的教会领袖和帝国长官——在布道和祈祷中祈求神的护佑。他在一次讲道中描述了居民们面对入侵者时的无助：“敌船从城外经过，船上的人亮出刀剑，似用屠刀恐吓这座城市。一切人性的希望从人们心中一点点流走。城市已孤立无援，只能向神呼救。”入侵者在8月4日离开。佛提乌将君士坦丁堡奇迹般的幸存归功于圣母的保佑。这个解释逐渐流传，成为后来天主之母神圣保护节或波克洛瓦节[8]的起源。有趣的是，这个节日并没有在拜占庭发扬光大，倒是在维京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所途经的地区——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格外流行。

佛提乌和他的同代人对860年夏天进攻拜占庭首都的维京人并非一无所知。这位牧首将入侵者称为“罗斯人”，与838年那个罗斯使团的成员一样。他甚至声称这些人是拜占庭的臣属，却把细节留给他之后一代又一代学者去探寻。这些人到底是谁？在过去两个半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寻求答案。多数当代学者认为“罗斯”（Rus’）一词有其斯堪的纳维亚根源。主要用希腊语写作的拜占庭学者们很可能是从斯拉夫人那里借用了这个词，而斯拉夫人则是从芬兰人那里学来的。芬兰人将瑞典人称为“Ruotsi”。在瑞典语中，Ruotsi的意思是“划船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划着船，先是渡过波罗的海进入芬兰湾，然后取道拉多加湖、伊尔门湖[9]和白湖城[10]来到伏尔加河上游。这条河流当时是通往里海和阿拉伯国家的萨拉森（穆斯林）[11]通道的重要一段，日后将成为俄罗斯的象征。

罗斯维京人是由来自挪威、瑞典或许还有芬兰的诺斯人组成的集团。他们最开始进入东欧时是作为贸易者而非征服者，因为这一带的森林中没有什么值得劫掠的东西，中东才是真正的财富之地。对于将他们与中东隔开的这片土地，他们需要的只是通行权。但就我们对维京人的了解而言，他们从不认为贸易和战争——或者不如说贸易与暴力——不能相容。毕竟，当地部落并不欢迎他们的出现，他们也不得不一路保护自己。他们从事的贸易也有强迫的色彩，因为他们的贸易品不光是毛皮和蜂蜜这样的森林产品，还包括奴隶。为了得到这些东西，维京人必须建立起某种对当地部落的控制，从他们那里收取可以通过萨拉森通道进行交易的贡赋。他们在里海周边的市场上用这些产品交换阿拉伯的迪拉姆[12]银币。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这种银币窖藏。它们成为连接斯堪的纳维亚和里海的维京贸易通道上的一个个标记点。

问题是，维京人并非这种贸易模式的第一个发明者，他们还面临着来自哈扎尔人的竞争。哈扎尔人控制着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贸易，同样从当地部落那里收取贡赋，此外他们还是拜占庭的盟友。部分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哈

扎尔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修筑了萨克尔要塞，罗斯人才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报复性的攻击。萨克尔位于顿河左岸，让哈扎尔人得以完全掌握亚速海上的贸易。哈扎尔人在第聂伯河商路上还有一座位于基辅的前哨，但他们的统治没有延伸到第聂伯河西岸的森林地带，并且很快就失去了对基辅的控制。

作为我们了解这段时期的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古编年史》讲述了882年多个维京人群体之间爆发的对基辅的争夺。被编年史作者称为“奥列赫”的赫尔吉[13]杀死了另两名首领阿斯科尔德[14]和迪尔（Dir，今天在基辅仍能看到前者的墓地），夺取了这座城市。据称赫尔吉代表着罗里克（《编年史》将之称为“留里克”）家族。[15]这个家族当时已经统治着今天俄罗斯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大诺夫哥罗德）[16]。尽管人们能够也有理由对故事的许多细节提出疑问，比如其年表的不可靠（编年史作者根据后来拜占庭的资料对年表进行了大量修订），但这个传说很可能反映了某个维京人群体在今天大诺夫哥罗德和基辅之间的东欧森林地区巩固其权力的真实过程。

现存的大部分文献都将这片地区称为“瓦良格—希腊”商路沿线，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使这样一条商路真的存在，其投入使用的年代也不会早于10世纪下半叶，而且它的某些路段比其余路段更繁忙。一些学者倾向于将它改称为“第聂伯河-黑海”通道。就算维京人不是这条较短的“第聂伯河-黑海”通道的最早使用者，至少也让它重新恢复了活力，这是因为他们在伏尔加河沿岸的萨拉森通道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在此前一个世纪里，哈扎尔汗国的内乱已经让伏尔加河通道变得不再安全。大约在同一时期，阿拉伯人挺进地中海地区，影响到拜占庭帝国与欧洲南部的贸易。哈扎尔人试图帮助其拜占庭盟友（也为帮助自己），充当了君士坦丁堡与中东地区贸易的中间人，使它改道黑海和亚速海。此时北方贸易路线对希腊人而言有了与从前不同的重要性，变得也许比希罗多德时代之后任何时期都有分量。在这个时代，向南方输送的主要产品不再是乌克兰林草混交带出产的谷物，而是得自更北方森林地带的奴隶、蜂蜜、蜡和毛皮。维京人从南方带回的商品中最珍贵的则是丝绸。罗斯维京人与拜占庭在911年和944年两次缔结条约，以确保其贸易特权。

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17]在950年左右创作了《帝国行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此前不久，他们刚与维京人第二次缔约。他在书中解释说这些商品来自受维京人控制的斯拉夫部落。“每年11月初，”他写道，“他们的酋长们就会带上所有罗斯人一起离开基辅，开始*poliuddia*。这个词的意思是‘巡回’，也就是到维尔维亚人[18]、德拉戈维奇人[19]、克里维奇人[20]、谢维里亚人[21]和其他所有向罗斯人纳贡的斯拉夫人地区去。”一些部落会俯首纳贡，另一些却会抗争。德列夫里安人

生活在第聂伯河右岸，曾经占领过基辅。他们每个人要向维京人进贡一张貂皮。但是随着进贡数额一年年提高，德列夫里安人最终进行了反抗。

《古编年史》对德列夫里安人反抗及随后被镇压的过程进行了描述，让我们得以早早一窥10世纪维京王公统治下基辅世界的面貌。

根据《古编年史》，德列夫里安叛军对赫尔吉的继承者英格瓦一世（基辅的编年史作者称他为伊赫尔）[22]发动了攻击并将他杀死。“德列夫里安人听说他即将……到来，就和他们的王公玛尔（Mal）商议说：‘如果一头狼来到羊群中，除非消灭它，否则它会把羊一只接一只地吃掉，直到把一整群羊都吃光。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把他除掉，就会被他毁灭。’”编年史作者这样解释反叛的起因。德列夫里安人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杀死了英格瓦，接下来做出了更加鲁莽的举动：反叛的首脑、德列夫里安王公玛尔向英格瓦一世的遗孀赫尔加[23]求婚。考虑到赫尔加在斯拉夫尤其是乌克兰历史传统上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改用她名字的乌克兰语读法，即奥丽哈（Olha）——俄语读作奥丽加（Olga）。编年史作者对玛尔的提议做出了解释：他试图以此控制英格瓦年幼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24]——斯堪的纳维亚语作斯文纳尔德（Sveinald）。

这个故事向我们暗示：维京人统治集团与本地斯拉夫人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因为纳贡的问题，也因为维京人对贸易和整个地区的控制。很明显，玛尔希望取代英格瓦一世的统治者地位，而不仅仅是成为奥丽哈的丈夫。然而，奥丽哈用计骗过玛尔，邀请他和他的部下到她位于基辅的城堡来，把他们活活烧死。一种说法是她将德列夫里安人烧死在他们来时乘坐的船上。随后她又从德列夫里安人精英中邀请来第二群提亲者，同样把他们杀死。这一次是在浴室里——奥丽哈告诉客人：他们必须沐浴之后才能觐见她。显然，德列夫里安人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蒸汽浴室一无所知。浴室的温度急剧升高，把客人们全部烫死。

船和浴室是诺斯文化里的重要元素，这向我们透露了这个传说的斯堪的纳维亚根源。罗斯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葬礼中都有将死者在船上火葬的内容。然而故事同样向我们暗示了维京人在基辅统治力的脆弱。在烧死玛尔之前，奥丽哈似乎已经确保基辅人站在她一边。在她的建议下，毫不起疑的玛尔和他的部众拒绝骑马或步行前往奥丽哈的城堡，而是要求当地人用船将他们载去。这令基辅人感到不安。根据编年史中的说法，基辅人发出哀叹：“沦为奴隶将是我们的命运。”在奥丽哈走上战场面对德列夫里安人的军队之前，她一共用计谋消灭了三批德列夫里安领袖。即便如此，她仍不能击败剩下的部落军队，也无法夺取他们的要塞。于是她再一次运用诡计，将敌人的要塞付之一炬。如果维京人在基辅占据压倒性多数的话，她这么做就毫无必要。

大公夫人奥丽哈之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是第一位我们对其外貌有所了解的基辅统治者。（基辅的编年史作者称奥丽哈不仅足智多谋，也非常美丽，但没有关于她的具体描述留存下来。）这位基辅王公在10世纪60年代初从他母亲手中接过权柄。拜占庭的编年史作者执事列奥[25]曾亲眼见过他，并做出了描述。根据列奥的记述，斯维亚托斯拉夫身材中等，肩膀宽阔，不留颌须，却有浓密的唇髭。他的头顶也剃过，只留下一绺头发表明他高贵的身世。这位王公的眼睛是蓝色的，鼻子短而宽。他身着朴素的白衣，浑身上下只有那枚嵌着一颗红宝石和两粒珍珠的金耳环透露出他的尊贵地位。这次会见发生在971年7月，当时列奥正陪同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26]在保加利亚参加一次战役。

斯维亚托斯拉夫与拜占庭皇帝的会面并非其军事生涯的巅峰，反倒是一次低谷。他的军事生涯始于他母亲奥丽哈对德列夫里安人发动的战争。当奥丽哈终于在战场上与叛乱部落正面对决时，斯维亚托斯拉夫有幸成为战斗的发起者。“双方军队都已准备好战斗，”编年史作者写道，“斯维亚托斯拉夫向德列夫里安人投出他的矛，但这支矛连马头都没有飞过，落在了他自己的腿上，因为王子此时还是个小孩子。然后奥丽哈军队的维京统帅斯文纳尔德[27]和阿斯蒙德（Asmund）说：‘王子已经发起了战斗！诸位大人，跟随王子，向前冲锋！’”斯维亚托斯拉夫最终成长为一名战士。他在其军事生涯中与部下同甘共苦，在战场上把马鞍当作枕头。执事列奥曾目睹他和部下一起划船，要不是他的衣衫更干净，几乎难以将他从部下中辨认出来。

斯维亚托斯拉夫在10世纪60年代初亲政，在972年战死。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他取得了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胜利。一些学者认为，10世纪下半叶的罗斯维京人从贸易转向战争，是为了挽回他们的损失：被开采多年之后，中亚地区的银矿枯竭了，不再产出白银，由中亚银币驱动的东欧贸易随之走向终点。在其生涯最早的战役中，斯维亚托斯拉夫夺取了最后一批附属于哈扎尔人的东斯拉夫部落的控制权。这些部落被称为维亚季奇人（Viatichians），生活在奥卡河流域。他们居住的区域包括今天莫斯科的周边地区。达到这个目的后，斯维亚托斯拉夫转而向哈扎尔人发起进攻。经过一系列战役，他夺取了哈扎尔人在顿河地区的要塞萨克尔，将其变成罗斯人的前哨。随后他又洗劫了哈扎尔汗国位于伏尔加河河岸的都城伊的尔，并击败了哈扎尔人的封臣伏尔加保加利亚人[28]。哈扎尔汗国灰飞烟灭，哈扎尔人与维京人对斯拉夫部落控制权的争夺也基本结束。现在这些部落都承认基辅的统治地位。

然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很少待在他的都城里。他其实有迁都到多瑙河地区的想法，并且在10世纪60年代晚期对拜占庭作战时就萌生了这个念头。编年史作者认为斯维亚托斯拉夫希望迁都到多瑙河，是因为他的土地上出产的

大部分商品都通过多瑙河运输。他并非只是对土地贪得无厌，更可能是希望将这个时期最主要的贸易线路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之前的两位基辅大公——赫尔吉（奥列赫）和英格瓦一世——已经在富有的拜占庭市场为罗斯商人们取得了有利的贸易待遇。传说赫尔吉甚至成功地将他的盾牌钉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上。他没有夺取这座城市，但据称让拜占庭皇帝做出了宝贵的贸易让步。

拜占庭人向斯维亚托斯拉夫支付酬金，让他进攻拜占庭的敌人巴尔干保加利亚人[29]，斯维亚托斯拉夫因此涉足巴尔干地区。他消灭了保加利亚军队，占领了他们的大片国土。拜占庭人以为他会将获得的土地转交给他们，但是斯维亚托斯拉夫拒绝这么做。于是拜占庭人收买了黑海大草原上新出现的游牧部落佩切涅格人[30]，让他们进攻基辅。斯维亚托斯拉夫不得不回师对付佩切涅格人，然而969年他又回到了保加利亚。第二年，他围困了距君士坦丁堡不到150英里（约241千米）的拜占庭城市阿德里安堡[31]，也就是今天的埃迪尔内。帝国宫廷一片恐慌，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派出他最优秀的将军之一前去解围，然后自己很快率军前往保加利亚，包围了斯维亚托斯拉夫留在那里的军队。斯维亚托斯拉夫只得撤退。

执事列奥见证了斯维亚托斯拉夫与约翰·齐米斯基斯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斯维亚托斯拉夫承诺不再对帝国作战，离开保加利亚，并放弃他对克里米亚南部土地的任何要求。作为回报，皇帝保证斯维亚托斯拉夫和他的人马平安回国。这是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他死在回基辅的路上，就在他和部下在第聂伯河险滩附近弃船登岸时。这段险滩长40英里（约64千米），河床上满布悬崖，曾被视为航行的畏途。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修起一座大坝，险滩才被淹没在水下。旅行者们别无选择，只能登岸绕过其中最湍急的一些河段。“如果罗斯人乘船来到拦河的峭壁前，他们只能将船从水里拉上来扛在肩上，从陆路绕行才能通过。此时佩切涅格人发动袭击的话，罗斯人一身不能二用，就会被轻松击溃，剁成碎片。”[32]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写下这些话之后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斯维亚托斯拉夫就送了命。

可能正是因为在险滩附近必须下船，才让佩切涅格骑兵得以发动攻击，杀死斯维亚托斯拉夫。据称佩切涅格人的首领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颅骨制成了一只酒杯。另有传言称是约翰·齐米斯基斯向佩切涅格人透露消息，推动了这次袭击。然而斯维亚托斯拉夫死在第聂伯河河畔的草原地带，这已经说明了一个他和他的前任都没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尽管他们在基辅及其北方的广袤森林地带聚集起巨大的权力，他们仍然未能完全控制草原地带，甚至没能建立穿过草原的安全通道。这使得基辅的统治者无法掌握黑海北岸地区，也无法完全利用地中海世界提供的种种经济和文化机遇。仅仅是击败哈扎尔人尚不足以打开通向大海的道路。

历史学家们将斯维亚托斯拉夫视为“最后的维京人”。的确如此——他的军事远征，还有他抛弃基辅迁往新都以控制拜占庭帝国与中欧城市之间贸易的想法，都说明一点：统治这片由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前任们建立、由他自己在征战中扩大的国土，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去世标志着乌克兰维京时代的终结。尽管瓦良格人部属将继续在基辅的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继承者们却会开始尝试减少对这些外族战士的依赖。他们将专注于统治自己已经拥有的这片土地，而非到别处去开疆拓土。

---

[1] Lindisfarne，位于今英格兰东北诺森伯兰郡海岸的一个潮汐岛，是中世纪凯尔特基督教的圣地。

[2] 原文为Germany，即今德国。此处根据中世纪罗马人和希腊人对日耳曼人居住地区的称呼，译作日耳曼尼亚（拉丁语Germania）。

[3] Louis the Pious（778—840），法兰克王国国王和皇帝（814—840年在位），查理大帝（Charlemagne）的儿子与继承者。

[4] 原文作959年，有误。

[5] Michael，指米哈伊尔三世（840—867），拜占庭帝国皇帝（842—867年在位）。

[6] Prince Islands，位于马尔马拉海中，在今伊斯坦布尔东南方约20千米处，由9个岛屿组成。

[7] Patriach Photius（约810—893），也称圣佛提乌或佛提乌一世，9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858—867、877—886年在位）。

[8] Pokrova，乌克兰语，意为“保护”，俄语作Pokrov（Покровъ），东正教节日之一，如今在每年10月14日（儒略历十月一日）庆祝。

[9] Ilmen，位于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州，在历史上是瓦良格人和希腊人的贸易通道。

[10] Beloozero，俄罗斯城市别洛焦尔斯克（Berlozersky）的旧称，位于别洛耶湖（Lake Beloye，又译作白海、白湖）南岸。

[11] Saracen，源自阿拉伯语，意为“东方人”，在西方历史文献中常被用于泛指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

[12] Dirham，古代及当前流通于阿拉伯地区的货币单位，其名得自希腊货币单位德拉克马（Drachma）。

[13] 即诺夫哥罗德的奥列格（？—912），在古诺斯语中被称为赫尔吉（Helgi），乌克兰语中称为奥列赫（Oleh），俄语中称为奥列格（Oleg）。他是古罗斯人（瓦良格人）王公，诺夫哥罗德的第二位大公，也被视为基辅的第一位大公。

[14] Askold，基辅王公，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第一个东斯拉夫人国家的奠基者。他被认为是基辅建立者基的后裔和基辅第一位基督徒王公。

[15] House of Rorik / Rurik，半传说人物瓦良格王公留里克的家族。据称862年左右留里克在今俄罗斯大诺夫哥罗德建立了留里克王朝。他被认为是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位大公。

[16] Velikii Novgorod，今俄罗斯西北部诺夫哥罗德州首府，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于859年。

[17] Porphyrogenitus（905—959），拜占庭皇帝（912—959年在位）。波菲洛吉尼都斯为其外号，意为“生于紫室者”，表示其血统尊贵。他热心学术，著有《帝国行政论》《典仪论》等。

[18] Vervians，即前文中的德列夫里亚人。

[19] Dregovichians，从6世纪起居住在今白俄罗斯南部的一个斯拉夫人部落。

[20] Krivichians，从6世纪起居住在今白俄罗斯北部和俄罗斯西部的一个东斯拉夫人部落联盟。

[21] Severians，第聂伯河中游以东地区的一个早期东斯拉夫人部落或部落联盟。

[22] Ingvar I（？—945），英格瓦一世（古诺斯语），古斯拉夫语称伊戈尔一世（Igor I）。他继奥列格（赫尔吉）为诺夫哥罗德王公、基辅大公。

[23] Helga（约890—969），赫尔加（古诺斯语），基辅大公伊戈尔一世的妻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大公的母亲和摄政，俄罗斯东正教会最早追认的圣人之一。

[24] Sviatoslav，即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约942—972）、伊戈尔一世和奥丽加之子、基辅大公。他在10世纪60年代末进攻并消灭了哈扎尔汗国。

[25] Leo the Deacon（约950—？），拜占庭历史学家、编年史作者，他著书记载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二世至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的历史，尤其以对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第一手记载著称。

[26] John Tzimisces（925—976），即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969—976年在位）。他在对阿拉伯帝国和基辅罗斯的战争中功勋卓著。

[27] Sveinald，瓦良格人，半传说的留里克王朝军事首领。古诺斯语中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同名。

[28] Volga Bulgars，伏尔加保加利亚的居民。伏尔加保加利亚是7世纪至13世纪期间存在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汇地区的保加利亚人国家。

[29] 指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存在于681年至1018年间。

[30] Pechenegs，西突厥人的一支，在10世纪来到顿河和多瑙河下游。

[31] Adrianople，即今土耳其的埃迪尔内（Edirne），旧称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由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建造。阿德里安堡在1365年至1453年间曾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32] 这是君士坦丁七世在《帝国行政论》中关于为何罗斯人必须与佩切涅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论述。

第4章
北方拜占庭

在关于第聂伯河地区罗斯王公们的最早记载中，我们就了解到他们对拜占庭帝国的兴趣。将维京商人和战士引向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和曾将匈人和哥特人引向罗马的是同一种东西：世俗的财富，外加权力和地位。维京人从未尝试推翻拜占庭，但他们竭尽所能地接近这个帝国和它的首都，并为夺取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多次远征。

斯维亚托斯拉夫在972年的死亡标志着罗斯历史和罗斯与其南方强邻关系上一个重要时代的终结。接下来两代基辅统治者同样强烈希望与君士坦丁堡发生联系，并不亚于斯维亚托斯拉夫，但这些继承者关心的不光是财富和商业，他们还渴慕君士坦丁堡辐射出的权力、地位和精致文化。他们没有像其先辈们一样尝试征服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君士坦丁堡，而是决定在第聂伯河上复制这座城市。罗斯人与拜占庭希腊人之间关系的这一转折，以及基辅王公们的新想法，在斯维亚托斯拉夫之子弗拉基米尔[1]及后者之子雅罗斯拉夫[2]的时代开始浮现。这两位大公统治基辅的国土半个多世纪，常被认为是两位改造者，将基辅罗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国家——一个拥有相对确定的国土，拥有行政体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最后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拜占庭。

作为一名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不像他父亲那样好战和雄心勃勃，但在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一点上更胜一筹。他父亲死在第聂伯河险滩时，弗拉基米尔只有15岁。他的兄弟们同样希望将大公宝座据为己有。新一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到来为他的登基铺平了道路。在从他一位兄弟手中夺得宝座之前，弗拉基米尔曾在家族故土斯堪的纳维亚避难超过5年。随后他率领一支新的维京军队返回了罗斯。基辅的编年史作者记述说：弗拉基米尔夺取基辅之后，他的士兵们曾向他索取酬劳。弗拉基米尔答应将本地部落送来的贡赋发给他们，却没能兑现。于是他将维京指挥官们封为他在草原前线建立的要塞的长官，并同意这支军队的其他人参加对拜占庭的远征。他又命令他的子民不得同意这支军队进入他们的城镇，并要阻止他们返回。

弗拉基米尔继位之后，维京人部队仍是他军队中的核心力量。但根据《古编年史》的记载，他统治时期的一大特点即是他与部属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维京人的“第二次到来”，与上一次完全不同。现在他们的身份不是商人，也不是统治者，而是一位统治者的雇佣兵。这位统治者同样拥有维京人血统，但他主要的忠诚对象是自己的公国领土。弗拉基米尔对第聂伯河

地区的资源足够满意，不曾梦想将都城迁到多瑙河。他不仅将逐渐削弱自己麾下部众拥有的巨大权力，也将削弱各部落精英集团的影响力。为了制衡这些人，他将自己的儿子和家族成员分封到帝国的不同地区进行管理，为将来那些依附于基辅的公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维京时代终于在罗斯这片得名于维京人的土地上结束了。这一变化在《古编年史》中也有所体现。编年史作者通常会将王公的部属组成归纳为维京人、本地斯拉夫人和乌戈尔芬兰人[3]，前两个群体共同被称为“罗斯”。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罗斯”先是成为王公部属的统称，后来又成为他全部子民的统称，最后变成了他统治的国土的名字。“罗斯”和“斯拉夫”这两个名词在10世纪和11世纪期间开始变得可以互换。从《古编年史》和拜占庭人对这一时代的记载中，我们都可以得到这种印象。

弗拉基米尔在980年登基。在他统治期的第一个十年里，他的主要精力用在了战争上，确保他的先辈创建的国家不致分崩离析。追随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脚步，他再次击败了哈扎尔人和伏尔加保加利亚人，重新取得对奥卡河流域的维亚季奇人的统治权，并向西推进到喀尔巴阡山，从波兰人手中夺取了许多要塞，包括位于今天波兰-乌克兰边界上的普热梅希尔（波兰语Przemyśl）[4]。不过弗拉基米尔的主要注意力却集中在南疆。罗斯人在那里的定居点长期受到佩切涅格人和其他游牧部落的攻击。为了加强边防，弗拉基米尔沿着苏拉河[5]和特鲁比日河[6]等当地河流修筑要塞，然后将战俘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臣民安置在这一带。罗斯是一个在征战中诞生的国家，如今它追求稳定的手段却变成了防守自己的边界，而非进犯其他国家的边界。

在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基辅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他与他那些基辅大公宝座上的先辈不同。据传赫尔吉曾发兵拜占庭，以谋取贸易优待。斯维亚托斯拉夫也有同样的举动，其目的则是在巴尔干地区开辟疆土。弗拉基米尔在989年春天入侵了克里米亚，却是为了争取联姻（如果不是为了爱情）。他将拜占庭城市克森尼索斯团团围住，要求得到皇帝巴西尔二世[7]的妹妹安娜[8]。此前数年，巴西尔二世曾向弗拉基米尔请求军事援助，并许诺将安娜嫁给他。弗拉基米尔派出了援军，巴西尔二世却丝毫不着急兑现他的承诺。受到这样的羞辱，弗拉基米尔不能忍气吞声，转而开始进攻拜占庭。他的策略奏效了。巴西尔二世被克森尼索斯陷落的消息震动，立刻把妹妹安娜送往克里米亚。她的随行人员包括许多基督教传教士。

拜占庭人满足了弗拉基米尔的联姻要求，其回报则是这位蛮族酋长（这是基辅统治者在君士坦丁堡眼中的形象）保证改宗基督教。弗拉基米尔履行了承诺。他的受洗开启了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也为这片地区的历史

翻开了新的一页。迎亲的队伍刚刚回到基辅，弗拉基米尔就从一座俯瞰第聂伯河的山丘上移除了异教的万神殿——最强大的雷神佩伦也未能幸免——并让基督教传教士为所有基辅人施洗。罗斯的基督教化从此开始，但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几个世纪后才得以完成。

关于罗斯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根据他的记述，保加利亚穆斯林、信犹太教的哈扎尔人、信基督教并代表罗马教廷的日耳曼人和一名为拜占庭基督教（弗拉基米尔最终的选择）代言的希腊学者都曾对弗拉基米尔纠缠不休。自然，《古编年史》对这次信仰抉择的记述在许多方面都过于天真，但它的确反映了这位基辅统治者当时面对的各种选择，而弗拉基米尔也确实进行了挑拣。他最后选择了这个地区最强大国家的宗教。在这个国家里，皇帝在教会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普世牧首，事实上还要更高。通过选择基督教，他获得了皇族姻亲的身份，这立刻提高了他的家族和国家的地位。弗拉基米尔对其教名的选择让我们对他接受基督教的理由有了更多认识：他的选择是那位皇帝的名字——巴西尔。这表明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在基辅进行模仿的政治和宗教样板。一代人之后，伊拉里翁都主教[9]等基辅学者将会把弗拉基米尔与君士坦丁一世相比，并把他推动罗斯皈依基督教与君士坦丁一世承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10]相提并论。

诚然，拜占庭的政治和教会高层帮助弗拉基米尔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并不喜欢这桩联姻，但对罗斯的皈依则十分欢迎。860年罗斯维京人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拜占庭就开始向罗斯派出传教团。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也就是为我们描述了维京人的进攻的那一位牧首，派出他最好的学生——塞萨洛尼卡[11]的西里尔[12]——前往克里米亚和哈扎尔汗国。西里尔和他的兄弟美多德共同创造了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 alphabet），以便将基督教经文转写为斯拉夫语言。兄弟二人在后世被视为“斯拉夫人的传道者”，并受封圣人。让基辅统治者皈依基督教的努力在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有其祖母奥丽哈的故事为证。奥丽哈是我们所知的基辅第一位基督徒统治者，也是基辅第一位以海伦为教名的女基督徒。除了宣传基督教外，拜占庭精英阶层还逐渐取得了对这些“蛮族”统治者及其民众的影响力。这些“蛮族”没有华丽的家世，也没有精致的文化，却拥有巨大的破坏力。

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之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创建了罗斯都主教区。这是少数几个以其居民而非以主教或都主教所在城市命名的教区之一。牧首把任命罗斯教会都主教的权力留在了自己手中。这些都主教大多是希腊人。都主教掌握着其下属主教（多出自本地精英阶层）的任命权。第一批修道院在基辅建立起来，使用的还是拜占庭的教会法规。在初期，教会斯拉夫语[13]是让本地精英能够理解希腊经文的主要翻译工具，它也成为基辅罗

斯最早的书面语言。弗拉基米尔颁布了新的法规，确定教士阶层的权利和待遇，并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教会。基督教从基辅罗斯顶层开始，沿着社会阶梯慢慢向下传播，沿着河流和商路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带扩散。在一些偏远地区，尤其是罗斯的东北部，异教祭司们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中仍坚持抗争，拒绝接受这种新宗教。直至12世纪，前往这些地区的基辅传教士仍会送命。

弗拉基米尔的选择将对他的国家和整个东欧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罗斯政治体不再与拜占庭开战，转而与罗马帝国仅存的部分及其继承者结成联盟，并由此向来自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敞开大门。弗拉基米尔不仅将罗斯带进了基督教世界，也让它成为东方基督教的一部分，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举动。它造成的许多后果不仅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之初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今天也同样如此。

弗拉基米尔把基督教带到了罗斯。然而决定这一事件将对罗斯的政治、文化和外交带来什么影响，并在拜占庭皇帝领导的基督教世界中为罗斯争得一席之地的，是他的后继者们。在这些决策过程中，弗拉基米尔之子雅罗斯拉夫比其他继承者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雅罗斯拉夫的祖父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历史上被称为“勇者”，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获得了“大帝”的称号，而雅罗斯拉夫自己则有“智者”之名。此外他还被称为“立法者”或“建造者”，表明他在远超四分之一世纪（1019—1054）的统治期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非来自战场，而是来自和平的领域，来自对文化、国家和民族的构建。

雅罗斯拉夫影响深远的遗产之一是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雅罗斯拉夫建起了基辅大城堡，城堡附近矗立着金门[14]。”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在被考古学家称为雅罗斯拉夫城的区域周边，这位王公下令建起一圈新的城墙，金门则是城墙上的大门。人们很难不注意到雅罗斯拉夫的金门与君士坦丁堡金门的相似之处，而后者是一座凯旋门，也是帝国首都的正式入口。基辅的金门系石头砌成（部分环绕城堡的城墙同样如此），地基至今可见。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在这些地基上建起了老金门的复制品。

城墙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雅罗斯拉夫的建设成就中最惊人的作品。这座杰出的建筑拥有5座主殿、5座半圆形后殿[15]、3条长廊和13个穹顶。教堂的墙体系花岗岩和石英石砌成，并间以成列的砖块，内墙和天花板则以壁画和镶嵌画装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完工日期不晚于1037年。学界一致认为：雅罗斯拉夫不仅借用了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名字和主要设计元素，还从拜占庭帝国请来了那座教堂的建筑师、工程师和石匠。他不只是在建造城墙和教堂，而是在为他的国家营造一座首都。这座首都模仿的对象是罗斯人所见过的最美丽也最强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

除修建教堂和支持基督教之外，被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归功于雅罗斯拉夫的还有对教育和学术的扶持。“他专注于阅读，焚膏继晷。”《古编年史》如此描述，“又召集了许多抄写员，并让人将希腊文翻译成斯拉夫文。他还写作并收集了大量书籍，让虔信者得享宗教启迪，并受到教益。”雅罗斯拉夫统治期是基辅罗斯人掌握读写能力的开端。基辅罗斯接受了教会斯拉夫语。这种语言使用圣西里尔和美多德特意为斯拉夫人设计、用来翻译希腊文本的字母。保加利亚人比基辅王公们更早接受基督教，于是教师、典籍和语言本身从保加利亚开始流向罗斯。

根据《古编年史》作者的说法，在雅罗斯拉夫统治期间，基辅人不仅阅读典籍，还从事翻译。原创的作品很快也涌现出来。雅罗斯拉夫任命的都主教伊拉里翁在1037年至1054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写出了《律法与神恩训》[16]，这是基辅人原创作品最早的例证之一。如前所述，这篇布道词将弗拉基米尔大公与君士坦丁大帝相提并论，帮助刚刚基督教化不久的罗斯进入了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另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历史写作在基辅的开始。大多数学者相信基辅的第一部编年史创作于11世纪30年代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地点可能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过了一段时间，编年史写作的地点才转移到基辅洞穴修道院[17]。这座修道院模仿拜占庭的修道院建成，并将其源头上溯至雅罗斯拉夫统治末期。

如果说基辅模仿了君士坦丁堡，那么这个公国的其他城市则模仿了基辅。这正是波拉茨克[18]和诺夫哥罗德都开始兴建新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来由（诺夫哥罗德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从前一座同名木质教堂之上），也是罗斯东北部的弗拉基米尔城[19]在后来兴建它自己的金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读写能力和知识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中心，打破了早期基辅对典籍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垄断。以基辅编撰的编年史为基础，诺夫哥罗德的文人很快也开始了历史写作。正是通过诺夫哥罗德的一位编年史作者，我们才知道“智者”雅罗斯拉夫不光是一位爱书人、一位城堡和教堂的建造者，也是一位立法者。

雅罗斯拉夫曾作为其父弗拉基米尔的代表成为诺夫哥罗德王公。他在基辅登基后，作为奖赏，给予诺夫哥罗德此前它不曾享有的自由。这表明了他对自己在争夺基辅大公宝座时从诺夫哥罗德所获支持的感激。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作者将这份特权和优待与雅罗斯拉夫修撰法典《罗斯正义》[20]联系在一起。《罗斯正义》是一部习惯法汇编，对基辅罗斯及其后继公国的法律体系有着巨大的影响。《罗斯正义》是否真的由雅罗斯拉夫主持修撰，我们不得而知。这项工作有可能更晚一些在他的后继者手上才得以完成。但可以确信的是，它不可能在雅罗斯拉夫之前完成，因为在那之前，根本没有足以胜任这项工作的受教育群体。

追随君士坦丁堡，以拜占庭皇帝为榜样，这不仅意味着要取得某种程度上

的合法性，也意味着要拥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后者注定会得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我们知道雅罗斯拉夫至少有两次曾直面帝国展示他的独立地位，并没有退让。第一次，他将罗斯本土出生的伊拉里翁——那位声名赫赫的《律法与神恩训》作者——提升为罗斯都主教，而没有选择一名由君士坦丁堡派遣的高级教士。在这次事件上，雅罗斯拉夫模仿了拜占庭皇帝在其教会中的角色，但他的决定同样也构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挑战：后者将罗斯都主教的任命权视为禁脔。伊拉里翁的升职在罗斯教会内部同样产生了分歧。雅罗斯拉夫在1054年去世后，基辅回到了从前的道路上，伊拉里翁的继任者仍由君士坦丁堡派往罗斯首都。

雅罗斯拉夫另一次直接挑战君士坦丁堡是在1043年。这一年他的一个儿子率领的小型舰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以发动攻击相威胁，向君士坦丁堡索求金钱。这是回到了维京人与君士坦丁堡打交道的做法，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难道雅罗斯拉夫在基辅复制君士坦丁堡的尝试过于靡费，耗光了他的财富？我们只能猜测而已。这也许是对拜占庭人的行为表示不满的信号，也许是让对方不可轻忽罗斯力量的提醒。无论如何，希腊人拒绝付钱，选择了战斗。罗斯舰队击败了拜占庭舰队，却险些被一场风暴摧毁，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基辅。维京人的行事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罗斯在860年攻击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人立刻开始了使罗斯基督教化的尝试。如果我们将这种努力视为拜占庭与野蛮的罗斯保持和平、终结其攻击行为的方法，它无疑在雅罗斯拉夫时代达到了目的。与他的先辈们不同，雅罗斯拉夫总体上与拜占庭保持了和平甚至友善的关系。然而很难说宗教是这位基辅王公与拜占庭保持大体和平的主要原因。在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扩张已经不再是罗斯王公们的主要目标，如何保有并治理已有的疆域才是他们首要的任务。这种情况下，把拜占庭作为盟友以及知识和威望的来源，比将与它为敌要划算得多。

在雅罗斯拉夫治下，罗斯成为基督教国家群体中的正式成员。后世历史学家将他称为“欧洲的岳父”，因为他将自己的妹妹和女儿们嫁给欧洲各国统治者。他父亲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以及随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影响来到罗斯是这一进展的重要前提。雅罗斯拉夫没有像其父一样迎娶某位拜占庭公主，但他的儿子弗谢沃洛德[21]则仿效祖父，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洛马科斯[22]的一个女儿成了婚。雅罗斯拉夫本人迎娶了瑞典国王奥拉夫·埃里克松[23]的女儿，这也反映出其王朝的维京起源。他的女儿伊丽萨维塔（伊丽莎白）[24]嫁给了挪威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25]。他的另一个儿子伊贾斯拉夫[26]娶了波兰国王卡齐米日[27]的妹妹，而卡齐米日本人又是雅罗斯拉夫一个妹妹的丈夫。雅罗斯拉夫另一个女儿阿纳斯塔西娅[28]嫁给了匈牙利国王“白色的安德烈”[29]，还有一个女儿安娜[30]则成为法国国王亨利一世[31]的妻子。

无论这些婚姻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单就文化而论，这些欧洲君主从婚姻中比基辅王公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安娜的婚姻就是最好的例子。与其夫不同，安娜能够阅读，并能签字，这也说明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对雅罗斯拉夫爱好读书和提倡教育的颂扬不无道理。安娜曾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她的新家“屋宇昏暗，教堂简陋，习俗令人厌恶，是一片蛮荒之地”。亨利一世治下的巴黎自然不能与君士坦丁堡比肩，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安娜的眼中它甚至无法与基辅相提并论。

---

[1] Volodymyr（约958—1015），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980—1015年在位）。他击败其兄亚罗波尔克一世后成为基辅大公。东正教在他统治时期成为基辅罗斯的唯一宗教。

[2] Yaroslav（约978—1054），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一世弗拉基米罗维奇（1019—1054年在位）。他击败其兄斯维亚托波尔克一世后成为基辅大公，被称为“智者”雅罗斯拉夫。

[3] Ugro-Finns，使用芬兰—乌戈尔语族语言的民族。这一语族属于乌拉尔语系，而非印欧语系。多数语言学家认为芬兰语、匈牙利语和爱沙尼亚语都包含在此语族中。

[4] Premyshl，今波兰东南部城市。

[5] Sula River，位于今乌克兰境内，属第聂伯河的左支流，注入克列缅丘格水库，全长365千米。

[6] Trubizh River，位于今乌克兰境内，属第聂伯河的右支流，全长113千米。

[7] Basil II（958—1025），拜占庭皇帝（976—1025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消灭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被称为“保加利亚屠夫”。

[8] Anna Porphyrogenita（963—1011），巴西尔二世之妹。她在989年嫁给弗拉基米尔，成为基辅大公夫人。

[9] Metropolitan Ilarion，11世纪基辅罗斯都主教、学者。他是基辅罗斯第一位非希腊血统的都主教。

[10]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274—337）在313年承认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曾大力推动基督教的发展，也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但基督教在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东罗马皇帝）和格拉提安（Flavius Gratianus，西罗马皇帝）时期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11] Thessalonica，即今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

[12] Cyril of Thessalonica（826—869），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神学家、传教士。他和他的兄弟美多德（Methodius，？—885）为了向斯拉夫人传教，创造了西里尔字母的前身格拉哥里字母。兄弟二人后来被东正教会授予“斯拉夫人的传道者”称号，并被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封为圣人，称“圣西里尔和美多德”。

[13] Church Slavonic，此处应指古教会斯拉夫语（主要应用于9—11世纪间），是斯拉夫语族最早的书面语，在斯拉夫语言历史上有重要作用，后演化为教会斯拉夫语。

[14] Golden Gate，11世纪基辅城堡的大门，建于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其名得自君士坦丁堡的金门。基辅金门在中世纪被拆除，在1982年由苏联政府复建。

[15] Apse，拥有半球形拱顶的半圆形建筑，对于罗马、拜占庭和哥特式教堂而言，多指东端主楼的所有半圆形或多角形末端。

[16] Sermon on Law and Grace，基辅都主教伊拉里翁写作的布道词，是存世的最早斯拉夫语文本之一。它对基辅罗斯文学的风格和内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 Kyivan Cave Monastery，建于1051年。自中世纪到近代，这座修道院都对乌克兰的宗教、教育和学术有巨大影响。

[18] Polatzk，即今白俄罗斯波洛茨克。

[19] Vladimir，今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首府，位于莫斯科东北190千米处，曾是东北罗斯的中心。在基辅罗斯被蒙古人击溃之后，东北罗斯的中心才从弗拉基米尔转移到莫斯科。

[20] Rus’ Justice，又称《罗斯法典》或《雅罗斯拉夫法典》，是一部集习惯法、王公法令和司法判例的汇编，也是古罗斯最重要的法律文献。

[21] Vsevolod（1030—1093），即基辅大公弗谢沃洛德一世（1077/1078—1093年在位）。

[22]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约1000—1055，1042—1055年在位），他是拜占庭女皇佐伊一世（Zoe I，约978—1050，1028—1050年在位）的第三任丈夫和共治皇帝。

[23] Olaf Ericsson（约980—1022），即瑞典国王奥洛夫·斯科特康农（Olof Skötkonung，995—1022年在位），他将自己的女儿因格戈尔德（Ingegerd，1001—1050，又称伊雷妮、圣安娜）嫁给了雅罗斯拉夫。

[24] Yelyzaveta（1025—约1067），挪威语称Ellisif。

[25] Harald Hardrada（约1015—1066），挪威国王（1046—1066年在位），其名字意为“无情者哈拉尔”。

[26] Iziaslav（1024—1078），基辅大公伊贾斯拉夫一世（1054—1068、1069—1073、1076—1078年在位），雅罗斯拉夫的长子。

[27] Casimir（1016—1058），波兰国王（1039—1058年在位），被称为“复兴者”。

[28] Anastasia（约1023—1074/1096），雅罗斯拉夫的长女。

[29] Andrew the White（？—1060），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国王安德烈一世（1046—1060年在位），被称为“白色的安德烈”或“天主教徒安德烈”。

[30] Anna（约1030—1075），法语作Anne，法国国王亨利一世之妻，曾担任其子腓力一世的摄政。

[31] Henry Ⅰ（1008—1060），法兰西王国卡佩王朝国王（1031—1060年在位）。

第5章
基辅的钥匙

正如“拜占庭”一样，“基辅罗斯”是后世的称谓，不为当时这些国土上的人民所用。19世纪的学者们创造了“基辅罗斯”这个名字。今天这个词用来表示一个存在于10世纪到13世纪中叶、以基辅为中心的政治体。13世纪中叶之后，这个政治体在蒙古人的攻击下解体。

谁是基辅罗斯的正统继承者？谁掌握着人们常说的“基辅的钥匙”？过去250年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成为许多罗斯历史著作关注的焦点。最开始，争论主要集中在罗斯王公们的血统上：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斯拉夫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们的关注范围开始扩大，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继承者地位的竞争成为其中一部分。20世纪中，“智者”雅罗斯拉夫（我们在上一章用大量篇幅对他的统治期进行了讨论）的遗骨也成为争论的对象，这充分显示了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

雅罗斯拉夫在1054年2月28日去世，被安葬在他主持建造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一具白色大理石制成的石棺中，石棺外壁上雕刻着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各种地中海地区的植物作为装饰，其中甚至有棕榈树——这根本不是基辅罗斯本地的植物。一种观点是：这具石棺是拜占庭文化帝国主义的石质象征，曾经是某位拜占庭显贵的安息之所，经四处劫掠的维京人或冒险的希腊人之手运到基辅。石棺至今仍保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然而“智者”雅罗斯拉夫的遗骨却在1944年德国占领时期从基辅消失了。根据某些说法，它落入了侨居在美国的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之手，并曾在战后现身于曼哈顿。有人认为遗骨现在可能存放在布鲁克林的圣三一教堂。

为何雅罗斯拉夫大公的遗骨会被人转移到远至西半球？这并非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作祟，而是与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继承者地位的主张紧密相关。逃离祖国的乌克兰大主教带走了遗骨，以免它落入正在逼近的苏联军队之手。为何那座布鲁克林教堂一直拒绝与乌克兰政府代表就雅罗斯拉夫遗骨问题进行商谈？对遗骨一旦回到基辅就可能被俄罗斯获得的担忧足以对此给出解释。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声称“智者”雅罗斯拉夫是他们的国家在中世纪时的杰出统治者。他的头像同时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纸币上。在乌克兰纸币上，雅罗斯拉夫留着乌克兰式的唇髭，符合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及乌克兰哥萨克人的那种传统样式。在俄国，他是雅罗斯拉夫尔城[1]传说中的建城者——他去世17年后，一部编年史上首次提及这座城市。因此俄国纸币上

有一座献给这位建城者的纪念碑。此外，这张纸币上的雅罗斯拉夫留着和伊凡雷帝[2]及其同时代俄国沙皇们一样的大胡子。

雅罗斯拉夫到底是一名俄罗斯统治者，还是乌克兰统治者？或者，如果二者皆非，那他和他臣民的“真正”身份还能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最好是把精力集中到他去世后几十年间的历史上。雅罗斯拉夫的去世是基辅罗斯历史上统一国家时代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基辅罗斯走上了加洛林帝国[3]曾经走过的道路。查理大帝在814年去世后不到100年，他的帝国就分裂成了好几个国家。这两个帝国的衰落和瓦解的原因并无太大差别，其中包括长期存在的君位继承权问题、统治王朝内部的争斗、地方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兴起，以及对外来威胁和干涉的应对无能。长期而论，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常被视为现代国家雏形的政治体的兴起：加洛林帝国的崩溃造就了法国和德国，而基辅罗斯的崩溃则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

作为一位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预见到了他的家族在自己去世后会遇到的麻烦。他也许还记得自己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有多么漫长和血腥。这一过程从他父亲弗拉基米尔在1015年去世开始，一直延续了20多年，直到1036年他的兄弟姆斯季斯拉夫[4]死去——姆斯季斯拉夫曾迫使雅罗斯拉夫与之分治国土。在这两人去世之间的岁月里发生了许多次战斗和冲突，以雅罗斯拉夫众多兄弟的死亡为标志。其中两人——鲍里斯和赫里布[5]——没能得到基辅的君位，却获得了圣徒的地位，至今仍作为殉难的王子被人们纪念。部分历史学家怀疑是雅罗斯拉夫谋划了他们的遇害事件。无论如何，在接近其生命终点之时，雅罗斯拉夫显然希望他的儿子们能避免这种自相残杀。

根据《古编年史》，雅罗斯拉夫留下一份遗嘱，将其国土分封给他的儿子们，每个儿子得到一个公国。根据遗嘱，长子将继承基辅大公之位，除了拥有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的土地之外，还凌驾于其他王公之上。其他儿子则在长子的保护和监督下治理各自的公国。一般认为这份遗嘱要求大公之位在兄弟之间依长幼之序传承，直到这一代王公全部去世，再从下一代开始循环——从上一代长子的长子重新开始。许多学者质疑雅罗斯拉夫遗嘱的真实性，但无论它是否存在，那些据称出自这份遗嘱的文字正反映了雅罗斯拉夫死后发生的情况。

雅罗斯拉夫去世时有5个儿子在世。“遗嘱”中提及了其中4人，然而只有3人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得到过最高权力。在世儿子中的最年长者伊贾斯拉夫获得了大公之位，但他与两个弟弟[6]分享了权力。两个弟弟分别统治着切尔尼戈夫[7]和佩列亚斯拉夫[8]，两座城市离基辅都不远。他们组成了某种非正式的三头政治，共同做出的决定对其他留里克（Rurikid，留里克是

基辅统治王朝的名字，源自传说人物留里克）王公具有相当的约束力。三人镇压了对他们权力的挑战，将波洛茨克（位于今白俄罗斯境内）王公[9]——他们兄弟中的一个——抓了起来。在各种罗斯编年史中，他们各自的都城成为“罗斯国土”（Rus' Land）的三个中心。

“罗斯国土”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伊拉里翁都主教的《律法与神恩训》中就曾出现过，因此可以被认为来自“智者”雅罗斯拉夫的时代。这个词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初变得空前流行。此时三巨头已经谢幕，而他们的子侄们一边忙于处理家族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矛盾，一边还要抵抗来自南方的侵略。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10]——“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孙子和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科斯（Constantine IX Monomachus）的外孙——在其一生中都在宣示并证明自己对罗斯国土的忠诚。作为三巨头之一的儿子，他成为佩列亚斯拉夫王公，统治着从南方的边境草原绵延到东北方莫斯科周边森林的广袤土地。此时在东北方森林地带生活着的是叛乱的维亚季奇部落。

维亚季奇人抗拒基督教化，经常杀死基辅人派去向他们传教的修士，然而莫诺马赫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们身上，而是把目光集中于公国南疆越来越频繁的游牧部族活动。罗斯王公们刚刚削弱了佩切涅格人（雅罗斯拉夫在1036年击败了他们），更具侵略性的新部落就出现在基辅的边界上。这些人被称为波罗维茨人或库曼人[11]。在11世纪末，他们占据着欧亚大草原的大片土地，东至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各罗斯公国无力独自对抗波罗维茨人的攻击，他们必须联合起来。没有人比佩列亚斯拉夫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更坚持这一立场的了。一部编年史称他组织了多次针对波罗维茨人的远征。

作为罗斯国土统一化的伟大推动者，莫诺马赫提出了对王公继承制度的改革。1097年，在莫诺马赫的推动下，罗斯王公们在柳别奇[12]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废除“智者”雅罗斯拉夫建立的平行（横向）继承制度，因为它过于僵化，容易引起冲突。与其让三巨头的子孙们轮流占据王公之位，并个个都努力争取最终成为基辅大公，不如让他们各自统治自己的疆域，只有雅罗斯拉夫长子伊贾斯拉夫的后代才可以继承基辅大公的宝座。然而这个新制度没能付诸实施。莫诺马赫自己也没有遵守它，在1113年成为基辅大公。他的继承者们同样如此。从1132年到1169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就有18位统治者轮流入主基辅，比基辅大公国此前历史上的全部君主数量还要多4位。

基辅宝座上的新面孔大多数都是通过政变或恶意夺权上台的。每个人似乎都觊觎着基辅，只要有一丝机会就会试试运气。然而这个模式在1169年被打破了。这一年，位于今天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13]的

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14]——罗斯王公中最强大也最野心勃勃者之一——派出大军夺取了基辅。他本人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派他的儿子领军作战。胜利者攻下基辅之后，在城中连续大掠三天。这位王公拒绝迁往基辅，也拒绝将之作为自己的都城。

博戈柳布斯基的选择是他自己的都城——克利亚济马河[15]上的弗拉基米尔。这反映了12世纪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发生着的某种变化。在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深陷无尽纷争的同时，基辅世界外缘的主要公国正在变得更富有，更强大。在君士坦丁堡的支持下，喀尔巴阡山脉脚下的哈利奇公国[16]（位于今天的乌克兰西部）沿着多瑙河与巴尔干人展开了贸易。哈利奇王公们不需要第聂伯河通道来发展自己。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博戈柳布斯基成功地挑战了保加利亚人对伏尔加河贸易的垄断。西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则从波罗的海贸易中获得财富。基辅和第聂伯河通道依然存在，而且虽然波罗维茨人虎视眈眈，这里的贸易量仍在增长。但它已经不再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经济生命线，甚至连主要的都算不上了。

随着各地王公们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富有，他们开始谋求自治权，甚至完全从基辅统治下独立出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从父辈和祖辈手中继承来的土地作为自己主要的忠诚对象，而非那片以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为中心被神化了的罗斯国土。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就是第一批有如此想法的王公之一。他在1169年对基辅的洗劫给基辅人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而他的其他一些行为同样让他想成为独立统治者的企图昭然若揭。这一切从安德烈离开基辅附近的维什戈罗德[17]迁往东北方（这一举动违背了他父亲尤里·多尔戈鲁基[18]的心愿）时就开始了。在1147年建立了莫斯科的尤里是老一代思维的代表。他是莫诺马赫之子，将苏兹达尔公国从莫诺马赫的遗产中独立出来，并着手将之变得更大更强，然而他的最高目标仍是基辅的大公之位，并作为苏兹达尔王公以自己的力量得到了它。尤里最终在大公任上死去，并被安葬在基辅的一座教堂里。

多尔戈鲁基叛逆的儿子对基辅毫无兴趣。他将自己公国的都城从苏兹达尔迁至弗拉基米尔，并尽一切力量将其变成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基辅。安德烈离开维什戈罗德时并非两手空空，而是带走了当地的圣母（希腊语Theotokos）像——这幅圣像后来以弗拉基米尔圣母像[19]之名闻名于世。将一件圣物从基辅地区移往弗拉基米尔，这是博戈柳布斯基将罗斯首都的权力的象征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最好隐喻，因为基辅的重要性得益于其全罗斯都主教驻地的地位。安德烈从未将自己的公国视为罗斯国土的一部分——他希望拥有自己的都主教区。1162年左右，即他洗劫基辅之前7年，他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使团，请求拜占庭批准他提名的新任都主教。君士坦丁堡断然拒绝了他，这对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已经做好了成立都主教区的所有必要准备。为了迎来一位都主教，他新建

了一座金顶的圣母安息大教堂——与基辅的金顶圣米迦勒大教堂几无二致——最后却只能让它容纳一位主教。

安德烈还建起了一座金门，这无疑是另一个源自基辅的工程。教堂和金门至今尚在，成为这位弗拉基米尔王公雄心的证据。与他的先辈“智者”雅罗斯拉夫一样，安德烈复制了现有的帝国都城，以证明自己独立于它的地位。有趣的是，安德烈的模仿比雅罗斯拉夫走得更远：他不仅将圣像、观念和建筑的名字从基辅搬到弗拉基米尔，还用基辅的地名为本地地标命名。这就是弗拉基米尔周边的河流——利比德河（Lybid）、波察伊拿河（Pochaina）和伊尔平河（Irpin）——都得名自其基辅原型的由来。

“智者”雅罗斯拉夫和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同为罗斯王公，很可能也有类似的族群文化身份，然而从他们的建筑工程可以看出，在罗斯国土的问题上，这两位王公有不同的忠诚对象。雅罗斯拉夫的忠诚明显属于基辅和从基辅一直延伸到诺夫哥罗德的广大国土，这令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区别开来——斯维亚托斯拉夫并无这样的眷恋，也令他与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不同——莫诺马赫的忠诚主要献给了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周边的“罗斯国土”。安德烈的情感则仅系于大罗斯内部他个人继承的部分，这使他与先辈们都不相同。多种多样的罗斯身份认同逐渐出现在罗斯诸编年史和法律文献中。我们应当将罗斯王公们忠诚对象的变化置于这些认同的发展脉络中来考察。

《古编年史》的作者们（记录事件并进行评论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在一代又一代修士中传承）不得不在他们的叙事中调和三种不同的历史身份：基辅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的罗斯身份、受教育精英阶层的斯拉夫身份，以及本地部族身份。尽管基辅的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接受了罗斯这个名字，但他们自我认同的基础是与这个名字发生联系的斯拉夫身份，而非斯堪的纳维亚身份。留里克王公们在斯拉夫腹地统治他们的国土，他们的臣民大多数也是斯拉夫人。更重要的是，斯拉夫身份认同向基辅地区之外的流布与以下两点密不可分：第一，对拜占庭基督教的接受；第二，教会斯拉夫语成为罗斯祷文、布道词和知识分子对话使用的语言。在基辅疆域中的斯拉夫区域和非斯拉夫部分，基督教都以斯拉夫语言和斯拉夫文化的外观出现。罗斯越是基督教化，也就越会斯拉夫化。基辅的编年史作者们将本地历史纳入了巴尔干斯拉夫文化发展的大语境，并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将之纳入了拜占庭和基督教世界的历史。

在地方层面，部族认同缓慢却又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对本地公国，对那些与基辅联系在一起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的认同。编年史在叙事中开始用那些以诸王公都城为中心的地区来代替土著部族。正因如此，编年史作者才会说1169年洗劫基辅的军队成员来自斯摩棱斯克，而不将他们称为

拉迪米奇人[20]。维亚季奇人或马里亚人[21]被改称为苏兹达尔居民，西维利亚人[22]也被改称为切尔尼戈夫人。这种做法蕴含着基辅君主治下全部土地的统一感。尽管留里克王公之间有大大小小的冲突，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仍被他们视为“我们的”，而不是外国人或异教徒。关键在于承认罗斯王公们的权威。当一些突厥草原部落承认这种权威时，他们也开始被称为“我们的异教徒”。

多样化的部落地区在政治和行政上统一起来，导致它们的社会结构也开始标准化。占据着金字塔顶端的是留里克王朝的王公们，更准确地说是“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后裔们。他们之下是王公部属。这一团体最早由维京人组成，但是其中的斯拉夫人越来越多。他们与本地部落精英共同组成被称为“波雅尔”[23]的贵族阶层。这些人是战士，但在和平时期也管理国家。波雅尔是主要的地主阶层。根据公国的不同，波雅尔们对王公行为的影响力或大或小。教会大主教和他们的仆从同样属于特权阶层。

剩下的社会成员需要向王公纳税。包括商人和工匠在内的市民阶层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可以在市民会议上决定一些地方治理事务。本地王公的继承问题也会受到此类会议影响——这种情况在基辅偶有发生，在诺夫哥罗德则更为经常。占人口大部分的是没有丝毫政治权力的农民，分为自由农民和半自由的农奴两种。后者可能失去自由，原因往往是负债。债务还清或一段时间过后，他们也能重获自由。接下来还有奴隶，多为在战争中被俘虏的战士或农民。被俘战士的奴隶生涯可以限于一定时间，而被俘农民却要终身为奴。

在法典《罗斯正义》对不同罪行的惩罚条款中，基辅罗斯社会的阶层结构得到了最好的证明。立法者希望能禁止或限制血亲复仇，同时又希望让王公的钱袋变得充实，于是他们引入了罚金制度，对杀死不同阶层成员的行为进行罚款，所得归于王公的金库。杀死一名王公部属或亲族（波雅尔）的罚款是80赫里夫尼亚[24]；杀死一名为王公服务的自由民的代价是40赫里夫尼亚；一名商人的命价为12赫里夫尼亚；一名农奴或奴隶则只值5赫里夫尼亚。然而，如果一名奴隶打了自由民，杀死这名奴隶则被视为合法行为。基辅罗斯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惯法，因此一部共同法典的引入有助于整个国家的同质化，正如基督教和教会斯拉夫语文化自基辅向外辐射所产生的效果。看起来，在同质化不断扩散的同时，基辅疆域内的政治碎片化却几乎不可避免。希望拥有自己公国的留里克王公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基辅疆域的广大，以及其境内各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都在动摇着这个一度统一了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土地的政治体。

从“智者”雅罗斯拉夫到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基辅王公们地缘政治目标的变化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忠诚下降的过程：先是从整个基辅罗斯下降到由“罗斯国土”界定的几个公国，最终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下降到足以挑

战基辅的外围强大公国。历史学家在这些基于公国的身份认同中寻找现代东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被视为早期近代莫斯科大公国的雏形，并进而成为近代俄罗斯的前身。白俄罗斯历史学家在波洛茨克公国寻找他们的根源，乌克兰历史学家则通过对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25]的研究来挖掘乌克兰民族建构运动的基础。然而，所有这些身份最终都要归于基辅，这令乌克兰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根本不用离开首都就可以对自己的根源展开寻找。

---

[1] Yaroslavl，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首府，位于伏尔加河与科托罗斯尔河交汇处，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2] Ivan the Terrible（1530—1584），即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常被称为“伊凡雷帝”或“恐怖的伊凡”。他是莫斯科大公（1533—1547年在位），并在加冕后将国号改为俄罗斯沙皇国，成为第一位全俄沙皇（1547—1584年在位）。

[3] Carolingian Empire，即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一世（查理大帝）于公元800年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前身），故加洛林王朝有时被称为帝国。

[4] Mstyslav（978—1036），切尔尼戈夫王公（基辅罗斯王公之一）。雅罗斯拉夫虽然在1019年成为基辅大公，但一直未能制伏姆斯季斯拉夫，并在1026年与之划分了势力范围。

[5] Boris and Hlib，弗拉基米尔一世的两个儿子，在1015年至1019年间被其兄斯维亚托波尔克一世杀害，并在1071年被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圣人。

[6] 指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二世（1073—1076年在位）和弗谢沃洛德一世（见本书第4章译者注）。

[7] Chernihiv，乌克兰北部古城，今切尔尼戈夫州首府。

[8] Pereiaslav，即今乌克兰基辅以南95千米处的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

[9] 此处应指波洛茨克王公弗谢斯拉夫二世布里亚奇斯拉维奇（Vseslav II Bryachislavich，约1039—1101）。他是弗拉基米尔一世的重孙，因此是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们的远房侄子。原文疑有误。他在1067年被监禁，但在1068年基辅市民起义中被释放，并被推举为基辅大公（1068—1069年在位）。

[10] Volodymyr Monomakh（1053—1125），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1113—1125年在位），弗谢弗洛德一世之子。莫诺马赫是他的称号，来自其外祖父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科斯，意为“单独战斗者”。

[11] Polovtsians or Cumans，中亚地区的一个突厥语游牧民族，是库曼—钦察游牧同盟的一部分。

[12] Liubech，乌克兰古城，位于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

[13] Vladimir-Suzdal，基辅罗斯诸侯国之一，存在于1168年至1389年间，都城在今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

[14] Andrei Bogoliubsky（约1111—1174），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1157—1174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弗拉基米尔取代基辅成为罗斯的政治中心。

[15] Kliazma River，今俄罗斯境内河流，属奥卡河的左支流，流经莫斯科州、下诺夫哥罗德州、伊万诺沃州和弗拉基米尔州，全长686千米。

[16] Halych，又作Halychyna（哈利奇纳），拉丁语转写后为Galicia（加利西亚），基辅罗斯诸侯国之一，存在于1124年至1199年间，都城在今乌克兰西部城市哈利奇附近。

[17] Vyshhorod，今乌克兰城市，位于第聂伯河右岸，距基辅18千米。博戈柳布斯基幼年即被封为维什戈罗德公爵，但他于1155年在自己的出生地苏兹达尔建立了政权，并将府邸设在弗拉基米尔。

[18] Yurii Dolgoruky（约1099—1157），苏兹达尔王公、基辅大公（1149—1151、1155—1157年在位）。他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奠基人。

[19] 此为著名的东正教圣像，据传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送给其外孙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礼物，今陈列在莫斯科的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

[20] Radimichians，11世纪前居住在第聂伯河上游支流索日河两岸的一个斯拉夫部落。他们在984年试图脱离基辅罗斯，但被弗拉基米尔一世击败，此后逐渐与周边部族融合，其土地最终成为切尔尼戈夫公国和斯摩棱斯克公国的一部分。

[21] Meria or Mari，今俄罗斯境内的一个乌戈尔—芬兰民族，历史上居住在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卡马河一带。

[22] Siverians or Severians，历史上居住在第聂伯河中游东岸的一支东斯拉夫人部落或部落联盟。

[23] Boyar，指封建时代的保加利亚、莫斯科公国、基辅罗斯、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等地区仅次于王公和沙皇的贵族阶层成员。

[24] Hryvnia，11世纪时基辅罗斯的货币单位。今乌克兰的现行流通货币也叫赫里夫尼亚。

[25] Galicia-Volhynia，1199年至1349年间罗塞尼亚人在加利西亚（哈利奇）和沃里尼亚地区建立的公国，亦称罗塞尼亚王国，是基辅罗斯的后继国家之一，领土包括今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及波兰和匈牙利东部部分地区。

第6章
蒙古治下的和平

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基辅罗斯并无公认的诞生时间，其末日却精确到日，即1240年12月7日。这一天，蒙古人，又一群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侵略者，攻陷了基辅城。

从许多方面而言，蒙古人对罗斯的入侵标志着草原政治体重新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乃至（某种程度上）文化的主导力量。它终结了基辅罗斯境内各个基于森林地带并一度统一的政治体及社会的独立地位，也终结了它们与黑海沿岸（主要是克里米亚）和更大的地中海世界保持联系的能力。蒙古人将时钟调回到哈扎尔人、匈人、萨尔马提亚人和斯基泰人的时代，即草原政治体控制内陆并从通往黑海诸港的商路中获益的时代。然而蒙古人是一支远比他们之前任何草原民族更为可怕的军事力量。在蒙古人之前，草原民族最多只能统治欧亚大草原的西部，通常东起伏尔加河流域，西至多瑙河河口。蒙古人则控制了整个欧亚大草原，囊括了东至阿姆河和蒙古高原、西至多瑙河和匈牙利平原之间的土地——至少在其初兴时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建立起“蒙古治下的和平”[1]，即一个由蒙古人掌握、由众多属国和半属国组成的政治复合体。罗斯地区在这个复合体中处于外围，同时又是其重要的一环。

蒙古人的到来打碎了基辅罗斯国家政治统一的迷梦，也终结了罗斯地区真实存在的宗教统一。蒙古人承认了罗斯地区王公统治的两大中心，即位于今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和今乌克兰中西部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拜占庭人效法蒙古人，将罗斯都主教区也分为两部分。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土上的政治和宗教统一从此瓦解。加利西亚王公和弗拉基米尔王公开始集中力量在自己的领土上建设自己的罗斯国家。虽然这两个公国都声称拥有“罗斯”这个名字，它们的地缘政治轨迹却已分道扬镳。双方的王朝传承都来自基辅，也从基辅继承了他们各自的罗斯法律、文学语言以及宗教和文化传统。双方也都屈从于陌生的蒙古统治之下。然而他们对蒙古人的依附性质却不相同。

蒙古人在弗拉基米尔统治着今天属于俄罗斯的土地，直到15世纪末。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鞑靼之轭”，得名自蒙古军队中说突厥语的部落。数量并不多的蒙古人离开之后，鞑靼人仍留在这里。将蒙古人的统治描述得极为漫长而严酷是传统俄罗斯历史学界的特点之一，并一直影响着人们对这一时期整个东欧历史的理解。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俄罗斯历史书写中欧亚学派的支持者向这种关于蒙古统治的负面看法提出了挑战。蒙古人在乌

克兰地区的历史也为纠正传统的“鞑靼之轭”式批评提供了更多材料。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王公治下的乌克兰，蒙古人比在俄罗斯表现出更少的侵略性和压迫性，并且统治的时间也较短，事实上在14世纪中叶就结束了。这一差异将对两个地区及其人民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蒙古在世界舞台上的突然崛起始于蒙古草原地区，时间是1206年。当地一个部落的首领和军事指挥官铁木真在这一年将许多部落联盟统一起来，获得蒙古部落可汗的称号，并在去世后被称为“成吉思汗”。在成为蒙古最高统治者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同中国北方人作战，并将他们的土地首先纳入其迅速膨胀的大帝国。他的下一个巨大的收获是中国以西、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到了1220年，布哈拉[2]、撒马尔罕[3]和喀布尔都已落入蒙古人之手。接下来他们在1223年击败了波罗维茨人和伏尔加保加利亚人（以及部分罗斯王公）。此时蒙古人也侵入了克里米亚，并夺取了这里的要塞苏达克[4]，它是波罗维茨人地区的丝绸之路贸易重镇之一。

在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之前，他将国土分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们。他的两个孙子[5]获得了最西的部分，包括当时中亚和伏尔加河以东草原。两人中的拔都可汗对这份遗产并不满足，将其国土的边界向更西推进。这次推进即是人们熟知的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1237年，蒙古人围困并攻陷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东部边境上的梁赞[6]。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在1238年2月初沦陷。弗拉基米尔的保卫者们在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修建的圣母安息大教堂进行最后的抵抗，于是蒙古人放火焚烧了教堂。抵抗格外坚决的城镇都遭到屠城的下场。在坚持了几个星期之后才陷落的科泽利斯克[7]就是一例。罗斯王公们尽了他们的最大力量来阻挡蒙古人的进攻，但由于各自为政，又缺乏组织性，他们根本不是高度机动又协调一致的蒙古骑兵的对手。

蒙古人在1240年逼近基辅。他们的庞大军队令守军胆寒。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他那些大车的吱呀声、他（拔都）那些多到数不清的骆驼的叫声，加上他的马群的嘶鸣，盖过了一切声响。敌人已遍布罗斯的土地。”基辅人拒绝投降，于是拔都用投石机摧毁了基辅的城墙。那是建于“智者”雅罗斯拉夫时代、用原木和石块修筑的城墙。市民们涌向圣母安息大教堂，那是弗拉基米尔为庆祝自己受洗而修建的第一座石质教堂，然而教堂的墙因避难者和他们的行李太重而倒塌，将他们活埋。圣索菲亚大教堂得以幸存，但同城里其他教堂一样，其珍贵的圣像和器皿被洗劫一空。胜利者在城中大肆劫掠，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则满心恐惧，藏身在基辅的废墟中——这座辉煌一时的都城，曾令其统治者们梦想比肩君士坦丁堡。奉罗马教皇之命前往蒙古觐见大汗的使者若望·柏朗嘉宾[8]在1246年2月经过基辅，对蒙古人攻打基辅地区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以下描述：“在穿

越这片土地时，我们看见死者留下的数不清的骷髅和尸骸，遍布原野。”

基辅遭到蒙古人致命重创，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都没能恢复其昔日的地位和繁荣。然而基辅和佩列亚斯拉夫的居民们并未完全放弃这片土地，没有像一些19世纪俄罗斯学者以为的那样，迁往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流域。如果基辅居民不得不逃离草原边缘地带，他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在离家乡更近的普里皮亚季河和德斯纳河沿岸的乌克兰北部森林地区找到避难所。在普里皮亚季森林和喀尔巴阡山脉山麓丘陵一带能发现最古老的乌克兰方言并非偶然，因为这里的森林、沼泽和山地阻挡了游牧民族的攻击。

基辅被蒙古人攻陷时，已不再是高居他人之上的统治者，而且自身也已落入外来者之手。负责基辅城防的指挥官名叫德米特罗（Dmytro），听命于位于今乌克兰西部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君主丹尼洛（丹尼尔）[9]。丹尼洛王公在此前一年通过与基辅大公米哈伊洛[10]的协商，将基辅这座罗斯都城纳入他的保护之下。米哈伊洛一开始曾经尝试抵抗蒙古人，却丢掉了自己的主要据点切尔尼戈夫城，之后就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哈利奇的丹尼洛是罗斯政治世界中的一颗新星。与成吉思汗一样，他在幼年失怙。1205年他4岁时，他父亲，即被编年史作者称为“罗斯君王”的罗曼[11]，在与波兰人的战斗中身亡。此前数年，继承了沃里尼亚公国的罗曼取得了邻国加利西亚的权力，成为基辅以西全部罗斯国土的统治者。丹尼洛和他的弟弟瓦西里科[12]继承了父亲的头衔，却没能得到他的遗产。这些土地成了敌对的罗斯王公、加利西亚的波雅尔们，还有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争夺的对象。直到1238年，也就是蒙古人开始进攻东北罗斯那一年，丹尼洛才重建了他对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控制，并将他的沃伊沃达[13]，即军事指挥官，派往基辅履职。

丹尼洛作为君主和将领的能力在蒙古人的入侵中经受住了考验。更重要的是，这次入侵还展示了他作为外交家的能力。当蒙古将军要求丹尼洛交出他的都城哈利奇时，他前往拔都可汗在伏尔加河上的都城萨莱[14]。其他罗斯王公此前也这样觐见可汗，目的在于向蒙古宣布效忠并接受可汗的“雅尔力克”[15]，即对他们自己公国的有条件的统治权。根据罗斯编年史作者的记载，可汗曾问丹尼洛：“你是否愿饮黑奶？这是我们的酒，母马的库米思[16]。”“我从未饮过此酒，但若得可汗您的旨意，我便当饮之。”丹尼洛如此回答，向可汗展示了他的尊重和顺从。编年史作者以这种隐喻的方式描述了丹尼洛的输诚和他被蒙古精英群体接纳的过程。

编年史作者对信奉基督教的罗斯王公向异教的蒙古可汗效忠的做法不以为然，并记载了这些王公在面对蒙古人时的三种行为模式。切尔尼戈夫王公米哈伊洛首先垂范，他的做法也最受编年史作者称道。据记载，拔都要求

他在一丛灌木前叩头并放弃基督教信仰，而他拒绝了，并被可汗下令杀害。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王公雅罗斯拉夫[17]代表了第二种模式——叛教者。据称他同意向灌木叩头，因此受到编年史作者的谴责。丹尼洛采取了第三种方式，对蒙古的统治既非完全拒绝，也不是完全服从。根据那位对丹尼洛怀有同情心的编年史作者的看法，丹尼洛没有向灌木下跪以玷污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但他选择饮下马奶酒，表示他愿意承认可汗在俗世的权威。

真实的情况是，蒙古人从未要求罗斯王公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并且整体而言对东正教表现出了最大的宽容。然而编年史作者对这三种行为模式的区分的确能反映罗斯王公之间在选择抵抗或与蒙古人合作时的真实差异。米哈伊洛王公的确被拔都下令杀害，因为他在1239年曾拒绝向蒙古人投降，甚至处死了可汗派去受降的使者。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二世恰恰相反，是第一个向蒙古人宣布效忠的罗斯王公，这令他取得了罗斯大公的头衔，以及在基辅派驻军事长官的权力。直到1246年死去之前，雅罗斯拉夫二世对蒙古人保持着忠诚，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8]同样如此。涅夫斯基因抵抗西方入侵者瑞典人和条顿骑士团[19]，保卫了罗斯国土，在后来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封为圣人。丹尼洛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他向拔都可汗效忠，却并未长期信守他的誓言。

丹尼洛承诺向蒙古人纳贡，并参与蒙古人在本地区的军事行动，因此从拔都手里获得了统治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雅尔力克”。尊蒙古为宗主国不仅使与之敌对的罗斯王公们不能对他的领土提出要求，也使他免遭来自西方和北方邻居的侵略。丹尼洛利用这种新政治环境的稳定，开始复兴他国土上的经济。蒙古人在邻近草原地区建起了前哨，实施直接统治，而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被破坏的程度小于乌克兰其他地方，成为邻近草原地区居民的避难目的地。如果罗斯的编年史作者们的记载可信的话，丹尼洛王公保护下的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城镇的经济发展的机会吸引了大量来自基辅一带的难民。

丹尼洛将他的都城迁到新建的城市霍尔姆（Kholm，今波兰境内的海乌姆），这里距草原更远。他热切地想把这里变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丹尼洛王公发现上帝眷顾此地后，就开始招募定居者。他们中有日耳曼人和罗斯人，有其他部落成员，也有利亚赫人（波兰人）[20]。”编年史作者写道，“每一天都有人从鞑靼人的地方逃离，来到这里。有年轻人，也有各行各业的工匠——鞍匠、弓匠和箭匠、铁匠、铜匠和银匠。于是百业俱兴，城市周围的原野和村庄建满了人们的居所。”霍尔姆并非丹尼洛唯一投注精力的地方。他还建起其他新城市，其中包括这片地区未来的都城利维夫[21]，并加固了原有的城镇。利维夫以丹尼洛的儿子列夫[22]的名字命名，第一次出现在编年史中的时间是1256年。

在丹尼洛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囊括了当时乌克兰地区有人定居的土地中的大部分。使基辅权力遭到削弱并使外围公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是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勃兴的原因。蒙古人的入侵促进了这一勃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罗斯王公们关心其臣民的生活，那么接受蒙古人就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佳政策。根据他们的论证，蒙古人的统治为这片地区带来了稳定和贸易。诚然，基辅被摧毁了，在几个世纪之后才能恢复元气。然而造成这种深远后果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通道从第聂伯河向东转移到了顿河和伏尔加河，向西转移到了德涅斯特河，而非基辅被毁灭的程度。

同样，蒙古人对克里米亚的占领也远非毁灭性的。与早期历史学界的普遍观点相反，将克里米亚鞑靼人带到这个半岛上的并非蒙古人。突厥人（钦察人）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占领早在蒙古入侵之前就已开始，蒙古人只是促进了这个过程。苏达克要塞在13世纪20年代被蒙古人攻下，其地位逐渐被费奥多西亚（卡法）取代。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费奥多西亚先是被威尼斯人控制，随后又转移到热那亚人手上。克里米亚保持着这片地区商业枢纽的地位，将蒙古统治时期的欧亚大草原与地中海世界联结起来。

在13世纪下半叶的乌克兰地区，蒙古人是一支强大然而时常缺席的力量。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统治者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开始寻求通过建立地方联盟来脱离金帐汗国的统治。

在外交上，丹尼洛致力于与他西面的邻居重建联系，结成能在将来反抗蒙古人时提供帮助的联盟。1246年，在觐见拔都后的归程中，他遇到罗马教皇的使者若望·柏朗嘉宾（我们此前引用过他关于蒙古人摧毁基辅的描述）。二人讨论了在丹尼洛和教皇之间建立关系的问题。一回到加利西亚，丹尼洛就向当时的教皇驻地里昂派出了一名东正教教士，以达成直接的接触。教皇英诺森四世[23]希望罗斯王公们承认他为他们的最高宗教领袖，而丹尼洛则希望教皇站在他这一边，巩固中欧天主教君主们对他反抗蒙古人的支持。

加利西亚王公和教皇在柏朗嘉宾的帮助下建立了联系，终于使英诺森四世在1253年发出诏书，要求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君主们参加一次对蒙古人的东征。他还向丹尼洛派出使节，赐予他基督教国王的王冠。王公丹尼洛由此成为国王丹尼洛，是为*rex ruthenorum*（罗斯国王）[24]。除了获得教皇的支持，丹尼洛还同匈牙利国王最终结成同盟，对方同意将女儿嫁给丹尼洛的儿子。他的另一个儿子则迎娶了一位奥地利公爵的女儿。1253年，得到中欧提供帮助的保证后，丹尼洛有了勇气，开始对蒙古人采取军事行动，很快就夺取了蒙古人控制下的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他选择进攻的时机再好不过，因为金帐汗国的拔都可汗在1255年去世，其两个继承者

统治的时间也都不到一年。

5年之后，蒙古人才派出一支新的军队回到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打算恢复他们对这片土地的占领。此时丹尼洛急需来自西方的支持，但支持从未兑现。中欧君主们无视教皇关于东征蒙古的诏书。由于匈牙利尚未从对捷克人的战败[25]中恢复过来，姻亲关系也几乎没有帮上什么忙。丹尼洛必须独自面对这支新的蒙古军队。率领大军来到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蒙古将军是卜伦岱[26]。他勒令丹尼洛加入蒙古军队对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作战，由此摧毁了丹尼洛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来的联盟。卜伦岱还要求丹尼洛拆除他在城镇周围建起的城防，令他的公国暴露在来自草原的潜在攻击之下。丹尼洛一一照办，再次宣布成为蒙古人的臣属。

为了那次在13世纪50年代与罗马教皇的结盟，丹尼洛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一次对蒙古的征战，还有他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和罗斯东正教会的关系。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参加者洗劫君士坦丁堡之后，东方和西方两个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对立就不再只是神学和管辖权的纷争，而是变成了公开的敌意。由于君士坦丁堡派遣的都主教的存在，这种敌意在罗斯变得更加严重。丹尼洛最终设法平息了本地教会对他与罗马结盟的反对声音，但他无法消弭君士坦丁堡的反对。1251年，受丹尼洛庇护的全罗斯都主教、前霍尔姆主教西里尔[27]前往君士坦丁堡接受祝福。他被君士坦丁堡确认为都主教，然而条件是他不能以加利西亚为都主教驻地，因为人人皆知那里的王公与教皇沆瀣一气。本是加利西亚人的西里尔遂迁往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

1299年，在西里尔的继任者、希腊人马克西穆斯[28]担任都主教期间，都主教驻地的迁移得以正式化。1325年，另一位被任命为都主教的加利西亚人彼得罗[29]又将驻地迁移到莫斯科。这将是莫斯科王公们上升为东北罗斯——近代俄罗斯的核心——领导者的重要原因。蒙古人在今天的俄罗斯领土上的统治比在罗斯其余部分更严酷，也更漫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莫斯科周边离金帐汗国可汗统治地区的腹地更近。蒙古人设立了罗斯大公，让他帮助治理他们的土地，并征收贡赋。罗斯大公的位置最初归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王公，然而后来这一地区的两个主要公国莫斯科和特维尔[30]也加入了竞争。经过漫长的争夺，都主教驻地的“主人”莫斯科王公最终赢得这个位置，更重要的是，赢得了蒙古统治下的罗斯地区的管理权。

尽管都主教的驻地从基辅迁往弗拉基米尔再迁往莫斯科，其教区仍保留了“全罗斯都主教区”的名字。作为补偿，君士坦丁堡在1303年允许加利西亚人建立自己的都主教区。新的都主教区设于哈利奇纳公国的都城哈利奇，被称为小罗斯都主教区，包括一度受基辅都主教区管辖的15个大主教区中的6个，其中不仅有今乌克兰境内的大主教区，还包括今白俄罗斯境

内的图罗夫[31]大主教区。“小罗斯”这个概念从此诞生。一些学者认为希腊人将之理解为“内罗斯”或“近罗斯”。许多年以后，这个词会成为乌克兰民族身份论争的焦点。进入20世纪，人们更是将乌克兰人中的“全俄罗斯派”或“亲俄罗斯派”称作“小罗斯人”。

蒙古人对黑海大草原的入侵并在此地长期存在使罗斯精英阶层首次面对一个两难抉择：是选择由草原游牧民族和拜占庭基督教传统共同代表的东方，还是选择承认罗马教皇神圣权威的中欧君主们代表的西方？在今天属于乌克兰的这片土地上，亲基辅的精英们第一次发现自己身处欧洲最主要的政治和文化断层，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平衡性质的举动，这使他们事实上独立于东西方的地位多保持了至少一个世纪。

历史学家们通常将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视为17世纪中叶哥萨克国崛起前乌克兰土地上最后一个独立国家。我们需要对这个判断做一些条件限制。尽管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与金帐汗国的可汗之间常有分歧，偶尔也有战争，但直到它在14世纪40年代走向终点之前，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一直是向金帐汗国纳贡的臣属。作为回报，可汗允许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在内部事务上拥有完全的独立。在国际竞技场上，加利西亚-沃里尼亚自始至终得益于“蒙古治下的和平”。这一东欧国际秩序的削弱和最终崩溃也加速了作为统一国家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陨落。

在今天看来，加利西亚-沃里尼亚解体的导火索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它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政治体却极其重要，那就是统治家族的血脉断绝。具体到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即其统治王公家族的断绝。丹尼洛王公的两个曾孙在1323年死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在与蒙古人的战斗中送了命，而在当时，这场战斗是错误的选择。由于丹尼洛没有其他男性后裔，两位王公的外甥波兰的马索维亚[32]亲王博莱斯瓦夫[33]接管了他们的公国。博莱斯瓦夫身为天主教徒，却改宗了东正教，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尤里——对他而言，举行一场仪式就能获得政治利益显然相当划算。然而这对当地罗斯贵族波雅尔们来说却不够。这位新统治者无视他们的利益，凡事听从他从波兰带来的人的建议，令他们十分反感。1340年，波雅尔们毒死了尤里-博莱斯瓦夫二世，最后一位自称*dux totius Russiae Minoris*（全小罗斯公爵）的君主。这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争夺，并最终葬送了这个公国。在15世纪上半叶，这个曾强盛一时的公国已经分为两部分：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归于波兰，而沃里尼亚落入立陶宛大公国[34]之手。

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三世[35]是波兰攫取加利西亚这场大戏中的主角。他在1340年第一次尝试夺取利维夫——从13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加利西亚的都城。以加利西亚波雅尔德米特罗·德德科[36]为首的当地精英阶层向蒙古

人求援，并在后者的帮助下击退了波兰人的进攻。然而卡齐米日三世在1344年卷土重来，并夺取了这个公国的一部分土地。1349年德德科死后，波兰军队占领了利维夫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其余地区。第二年，立陶宛军和本地军队又将他们从沃里尼亚赶了出去，但波兰人在加利西亚站稳了脚跟。14世纪中叶，数以百计的波兰贵族从波兰王国的其他地方来到加利西亚，搜求作为他们战功酬劳的土地。在卡齐米日三世看来，附带条件的土地所有权能够保证这些贵族阶层不忘守卫这个新省份的职责。

直到15世纪30年代，波兰王国才完全吞并了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的罗斯土地，将其变成罗斯（罗塞尼亚）和波多里亚诸省。大约在同一时期，作为对当地贵族（既有波兰人也有乌克兰人）要求的回应，王国向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贵族授予了无条件的土地所有权。与加利西亚和部分波多里亚并入波兰王国相关的最重要的政治进展，是本地贵族获得了与波兰贵族一样的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参加地方自治议会[37]。在自治议会上，地方贵族们不仅可以讨论本地事务，也可以讨论国家和外交政策。他们还获得了选举代表进入王国议会的权利。此外，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他们成为阻止草原部落入侵加利西亚-波多里亚边境的防御力量，其地位变得愈发重要。他们也尽可能利用这种地位在波兰宫廷中谋求利益。

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被并入波兰王国后，开始受到波兰式贵族民主、日耳曼式城市自治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教育滋养的影响。然而一些乌克兰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影响的代价过于高昂了，让这一地区丢掉了半独立的地位和波雅尔式上层贵族政治，即王公权力及其对本地政治的主导。文化上的波兰化不仅影响了上层贵族阶层，也影响了地方贵族。罗斯工匠加速从本地城镇中流失，而东正教信仰也面临来自罗马天主教会的有力挑战。

立陶宛大公国展现了另一种将乌克兰土地合并入外来政治体的模式。大公国在与波兰对手的激烈竞争中夺得沃里尼亚，还得到了基辅地区。与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不同，基辅直到14世纪之前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蒙古的直接统治下。因此较之波兰模式，立陶宛模式更有利于本地精英政治影响力、社会地位及文化传统的存续。

在其最著名的君主格季米纳斯[38]大公的统治下，立陶宛大公国在14世纪上半叶出现在乌克兰舞台上。格季米纳斯是一位事实上的帝国建立者，也是立陶宛统治王朝的开创者。根据某些记载，14世纪初期，格季米纳斯将他自己的一位王子任命为基辅王公。这似乎没有立刻对这个公国的地位产生影响，然而随着率领本地部众的立陶宛王公们开始将鞑靼人逐入草原深处，变化会逐渐显现出来。决定性的一战发生在1359年。这一年，在今乌克兰中部的锡尼沃迪河[39]河畔，格季米纳斯之子阿尔吉尔达斯[40]率领立陶宛和罗斯军队击败了金帐汗国在黑海大草原上的主要部落诺盖鞑靼人[41]。其结果是立陶宛大公国的南部边界得以向南推进到黑海海岸的德涅

斯特河河口。至此，立陶宛大公国不仅成为基辅罗斯的强大继承者，也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的统治者。

立陶宛人将他们自己的格季米纳斯王朝的代理人派到罗斯，但格季米纳斯的后裔比10世纪的留里克先行者们更快地本土化了。立陶宛统治者们与当地罗斯家族通婚，乐于接受东正教和斯拉夫式的教名。罗斯在文化层面上的统治地位加速了立陶宛人的文化融入。直到15世纪，立陶宛的精英阶层还持有异教信仰，如今却受到拜占庭东正教权威的影响。罗斯书记语（Rus’chancery language）基于10世纪末由基督教传教士们传播到基辅的教会斯拉夫语，如今成为立陶宛大公国官方通用的语言。大公国的法令在16世纪被称为《立陶宛法典》，也是基于《罗斯正义》。除了王朝的连续性之外，立陶宛大公在各方面都成为基辅罗斯的事实继承者。一些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个国家视为一个立陶宛-罗斯甚至罗斯-立陶宛政治体，而非一个立陶宛人国家。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夺取了大部分乌克兰土地后，造成了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变化。在对罗斯精英阶层和罗斯社会的接纳和同化上，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差异极大。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了一些类似倾向的出现和增强。这些倾向导致了诸罗斯公国自治权的丧失。到了15世纪末期，罗斯公国将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上被彻底抹去，基辅罗斯自10世纪开始的王公时代也就此终结。

---

[1] Pax Mongolica，史学名词，仿自Pax Romana（罗马治下的和平），指蒙古帝国的征服对亚欧大陆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生活所产生的稳定效果。

[2] Bukhara，中亚古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南部。

[3] Samarkand，中亚历史名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撒马尔罕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曾为帖木儿帝国都城。

[4] Sudak，今克里米亚南部城镇。

[5] 指斡尔答（Orda Ichen）和拔都（Batu Khan）。两人均为铁木真长子术赤之子。他们继承的蒙古领土被称为金帐汗国（钦察汗国）。

[6] Riazan，今俄罗斯梁赞州首府，位于俄罗斯中部联邦管区奥卡河河畔。

[7] Kozelsk，位于今俄罗斯卡卢加州。

[8]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46年，他奉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前往蒙古上都哈拉和林，觐见蒙古大汗贵由，成为第一个到达蒙古宫廷的欧洲人。他在其《蒙古行纪》中留

下了西方对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亚、罗斯等地的最早记录。

[9] Danylo（1201—1264），丹尼洛·罗曼诺维奇，或称加利西亚的丹尼洛一世，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公。他在1253年受一位罗马大主教加冕为罗斯国王。

[10] Mykhailo（约1185—1246），基辅大公米哈伊洛·弗谢沃洛多维奇（Mykhailo Vsevolodovich，1237—1239、1240—1243）、切尔尼戈夫王公（1224—1236，1243—1246年在位），亦称切尔尼戈夫的圣米哈伊洛。他因拒绝放弃基督教信仰而被拔都下令杀死，因此被视为殉道者。

[11] Roman（约1152—1205），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公罗曼·姆斯季斯拉维奇。

[12] Vasilko（1203—1269），沃里尼亚王公（1231—1269）。

[13] Voevoda，亦作Voivode或Vaivode，古斯拉夫语中部队长官的称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

[14] Sarai，波斯语中意为“宫殿”，为金帐汗国首都。此处指老萨莱（拔都萨莱），位于今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支流阿赫图巴河河畔。

[15] Yarlyk，亦写作jarlig，源自蒙古语，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中指可汗的“许可”。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东北罗斯的王公们需要接受雅尔力克以获得对自己土地实施统治的权力。

[16] Kumis，即马奶酒，在13世纪由鞑靼人发明，其中最高级的是用黑马奶酿制。

[17] Yaroslav II（1191—1246），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二世（1238—1246年在位）。

[18] Aleksandr Nevsky（约1221—1263），诺夫哥罗德王公（1236—1252年在位）、基辅大公（1246—1263年在位）、弗拉基米尔大公（1252—1263年在位）。他使今俄罗斯西北部地区免遭天主教国家征服，因而在1547年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封为圣人

[19] Teutonic Knights，中世纪时期由罗马教皇组织的修士骑士团之一，正式名称为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圣母马利亚骑士团，1198年成立于今巴勒斯坦境内的阿卡（Acre）。1809年，拿破仑解散了作为军事组织的条顿骑士团。1929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宣布条顿骑士团成为纯宗教修士会。

[20] Liakhs，亦作Liakhy，乌克兰语中对波兰人的旧称。

[21] Lviv，亦译作利沃夫（俄语发音），乌克兰西部主要城市，利维夫州首

府。

[22] Lev（约1228—约1301），加利西亚的列夫一世、哈利奇王公（1269—1301年在位）、罗斯国王（1269—1301年在位）、基辅大公（1271—1301年在位）。

[23] Innocentius IV（约1180 /1190—1254），1243年至1254年间任罗马天主教教皇。

[24] 拉丁语，意为“罗塞尼亚国王”。

[25] 指1253年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与波希米亚国王普热米斯尔·奥托卡二世之间的战争。

[26] Burundai（？—1262），金帐汗国将军，曾参与1240年攻打基辅的战役和1241年击败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蒂萨河之战。

[27] Cyrill（？—1281），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西里尔三世。

[28] Maximus（？—1305），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1283—1305年在任）。

[29] Petro（？—1326），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1308—1326年在任）。他被视为莫斯科的主保圣人。

[30] Tver，中世纪俄罗斯封建公国。在争夺俄罗斯未来领导权的竞争中，特维尔曾是莫斯科最大的对手。1485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最终吞并了特维尔。

[31] Turaŭ，亦作Turov，白俄罗斯南部城镇，在中世纪时曾为图罗夫公国。

[32] Mazovia，波兰中部偏东历史地名。

[33] Bolesław（1305/1310—1340），即波兰皮雅斯特王朝马索维亚亲王尤里-博莱斯瓦夫二世（Yurii-Bolesław II）。

[34]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存在于十二三世纪至1569年的欧洲国家，在1569年加入波兰-立陶宛联邦。

[35] Casimir III（1310—1370），波兰皮雅斯特王朝国王（1333—1370年在位），被称为卡齐米日大帝。

[36] Dmytro Dedko（？—1349），通常被认为是一位加利西亚波雅尔，可能是后来波兰-立陶宛联邦大贵族奥斯特罗斯基家族的先祖。

[37] Dietine，波兰语作Sejmik，14世纪下半叶开始存在于波兰及1564年开始存在于立陶宛大公国的贵族领地自治机构。波兰王国的全国议会则被称为Diet（波

兰语作Sejm）。

[38] Gediminas（约1275—1341），立陶宛大公（1315/1316—1341年在位）。他开创的立陶宛大公国成为一个连接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帝国。他被视为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建立者，并流放了留里克王朝最后一位基辅王公斯坦尼斯拉夫。

[39] Syni Vody，即今锡纽哈河（Syniukha River），是布赫河的一条左支流。

[40] Algirdas（约1296—1377），立陶宛大公（1345—1377年在位）。

[41] Noghay Tartars，亦作Nogais，主要生活在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说诺盖突厥语的民族。在15到17世纪间建立了诺盖汗国。

第二卷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EAST
MEETS
WEST

第7章
乌克兰的诞生

随着乌克兰地区在14世纪末被并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及双边关系开始决定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两国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对乌克兰地区的将来尤为重要。

1385年，33岁的立陶宛大公约盖拉[1]（他自称蒙神恩的“立陶宛人大公及罗斯领主”）在今属白俄罗斯的小镇卡列瓦[2]签署了一条敕令。这条敕令除了名称外，完全就是一份与12岁的波兰女王雅德维加派来的代表签署的婚前协议。为了得到波兰的王位，约盖拉同意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皈依基督教，并推动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合并。一年后，约盖拉被加冕为波兰国王。又过了一年，即1387年，波兰和立陶宛联军帮助波兰从匈牙利人手中夺走加利西亚，使它重归波兰王国。

卡列瓦联合达成之后，两国又建立了一系列其他同盟以强化联系，最终达成了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3]——波兰-立陶宛联邦由此诞生。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边界在联邦内部重新划定，将大部分乌克兰土地归于波兰，白俄罗斯地区则留给了立陶宛。波兰与立陶宛的联合由此意味着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讲，怎么强调卢布林联合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它将成为近代乌克兰版图形成并成为可资本地精英阶层利用的知识资源的开端。

在立陶宛大公国的罗斯精英阶层看来，与波兰王国的联合只会带来麻烦，没有任何好处。卡列瓦联合的直接结果就是罗斯对立陶宛大公失去了影响。这位大公不仅离开了立陶宛，还成了天主教徒，并为他那些兄弟创造了先例——他的兄弟中本有一些人是东正教徒。东正教会主教们对在欧洲最后一片异教土地上建立拜占庭基督教而非拉丁基督教的希望破灭了。

然而，对罗斯政治地位的真正挑战发生在1413年。这一年的霍罗德沃[4]联合被史学界视为一次王朝的结合，深化了只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之间一次个人联姻的卡列瓦联合。霍罗德沃联合的签署双方分别是如今的波兰国王约盖拉与他的堂兄、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5]。新的协议将许多波兰贵族拥有的权利或特权延伸到立陶宛贵族身上，包括无条件的土地所有权在内。近50个波兰家族允许同样数量的立陶宛家族使用他们的纹章。然而问题出现了：只有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家族才被允许加入这场盛宴。新的权利或特权没有被赐予立陶宛的东正教精英阶层。这是国家层面上第一次出现对罗斯精英阶层的区别对待。未能获得新特权的东正教贵族们由此

被排除在大公国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之外。雪上加霜的是，霍罗德沃联合的始作俑者之一维陶塔斯大公此前刚刚削弱了罗斯的自治权——他用自己指派的人替换了沃里尼亚王公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统治者。

维陶塔斯在1430年去世后不久，罗斯精英阶层对自己的地位受到侵犯表达不满的机会就出现了。对立陶宛大公宝座继承权的斗争演变为一场内战。以沃里尼亚的波雅尔们为首的罗斯贵族支持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斯威特里盖拉[6]。他的对手西吉芒塔斯[7]王公在1434年做出回应，将霍罗德沃联合保证的权利或特权延伸到大公国的东正教精英阶层身上，将战争的局势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扭转。尽管沃里尼亚和基辅地区的罗斯王公及贵族们依然对西吉芒塔斯的意图抱有疑虑，他们对斯威特里盖拉的支持还是减弱了，使大公国局势恢复了相对的平静。立陶宛宫廷对罗斯地区和各罗斯公国自治权的限制从未间断。随着宗教不再成为罗斯精英阶层不满的根源，这一限制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1470年，立陶宛大公及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8]废除了王公时代的最后遗存——基辅公国本身。10年后，基辅王公们密谋杀害卡齐米日四世，并推举自己挑选的继承人。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导致主谋被捕，其余密谋参与者则被迫逃离大公国。随着他们的离开，恢复基辅罗斯王公传统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最后希望宣告破灭。到了15、16世纪之交，无论是在乌克兰的政治版图中，还是在其制度、社会及文化图景中，几乎都已经找不到两个世纪之前那个时期留下的痕迹——彼时加利西亚-沃里尼亚正努力摆脱蒙古的宗主权，在本地区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角色。尽管罗斯法律和罗斯语言仍占据主流，却已经开始失去它们先前的统治地位。罗斯文化的核心再也无法与拉丁化影响和波兰语相抗衡。在卡列瓦联合之后，波兰语就在立陶宛大公国中取得了最高地位。

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君权的膨胀、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对政治及社会行为的约束成为16世纪的标志。另一方面则是贵族阶层对君权加强的反对与日俱增。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内，这种反对来自立陶宛大公国的贵族。他们深深扎根于基辅罗斯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王公传统中。然而到了16世纪中叶，大公国只有在波兰的帮助下才能与日渐严重的外部威胁抗衡，于是精英阶层对君权膨胀的反对也日益无力。威胁来自东方——在15世纪中，东方的莫斯科大公国已经成为一支新兴的强大力量。

1476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9]（他是第一位自称沙皇的莫斯科统治者）宣布从金帐汗国独立，并拒绝向可汗继续纳贡。他还发起了一场“统一罗斯国土”的运动，吞并了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普斯科夫[10]，并向从前蒙古占领区域之外的罗斯国土提出了领土要求，其中包括今天的乌克兰。15世纪晚期，新生的沙皇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就基辅罗斯的传承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莫斯科处于进攻一方。到了16世纪初，立陶宛的大公不

得不承认沙皇对此前属于立陶宛的两块领土——斯摩棱斯克和切尔尼戈夫——的统治。这是莫斯科第一次在今天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上获得统治权。

莫斯科大公国的西进在16世纪初受到立陶宛大公们的阻碍，但在16世纪下半叶又重新开始。1558年，兼具魄力和领袖魅力同时又古怪、残忍并拥有极端自毁性格的莫斯科沙皇伊凡雷帝进攻了利沃尼亚[11]，引发了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利沃尼亚位于立陶宛大公国边境，包括今天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部分领土。战争将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瑞典、丹麦、立陶宛都身陷其中，最后波兰也参加进来。1563年，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越境进入立陶宛大公国，夺取了波拉茨克并袭击了维捷布斯克（维特布斯克）[12]、什克洛乌（什克洛夫）[13]和奥尔沙[14]（均在今白俄罗斯境内）。这次战败激发了立陶宛下层贵族对波兰-立陶宛联盟的支持。

1568年12月，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15]在卢布林召集了两个议会（其一为波兰议会，另一为立陶宛议会），希望议会代表能够达成新的联盟条件。谈判之初相当顺利，双方同意共同推选国王，选举共同的议会（国会），并给予立陶宛大公国更多自治权。然而立陶宛的大贵族们拒绝归还他们手中的王室土地，而这是波兰贵族最主要的要求。立陶宛代表们收拾起他们的东西，召集起他们率领的贵族代表，离开了会议。这一举动事与愿违：离席的立陶宛人出乎意料，波兰议会在国王的批准下开始签署法令，将立陶宛大公国的省份一个又一个地转移到波兰王国治下。

立陶宛大贵族们曾经恐惧他们的土地落入莫斯科沙皇国之手，现在却眼睁睁看着这些地方将变成波兰人的地盘。为了阻止他们强大的波兰盟友的恶意接管，立陶宛人回到卢布林签署波兰代表指定的协议。然而他们回来得太晚了。1569年3月，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族群边境地区的帕得拉夏[16]省被划给了波兰。沃里尼亚在5月被划走。6月6日，也就是波兰-立陶宛谈判重开的前一天，基辅地区和波多里亚地区也归于波兰。立陶宛贵族们只能接受新的现实：如果他们继续抵制联合，将失去更多土地。19世纪著名的波兰艺术家扬·马泰伊科[17]曾以其庄严的笔触刻画了卢布林议会的情景。画中，联合的主要反对者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18]在国王面前下跪，却又抽出宝剑。

卢布林联合创造了新的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个国家拥有一位由全国贵族共同推举的君主和一个共同的议会，并将波兰贵族享受的自由权利延伸到立陶宛大公国贵族身上。立陶宛大公国仍保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国库、司法系统和军队。这个被称为“两国共同体”（两国即波兰和立陶宛）的新国家是一个准封建制国家，由地理上得到扩大、政治上也得到强化的波兰王国主导。位于乌克兰的贵族领地并非一次性被波兰合并，而是被逐个蚕食的。除了有关政府和法庭可以使用罗塞尼亚语（乌克兰中部方言）以及东

正教会权利将得到保护的承诺外，这些被合并的领地没有得到其他保证。

在卢布林议会上，乌克兰地区由本地贵族代表。这些贵族包括王公和波雅尔们，与立陶宛的联盟反对者的构成相同。但与立陶宛贵族们不同的是，乌克兰代表们选择了加入波兰王国，同时要求他们的法律、语言和宗教得到保障。乌克兰的精英阶层，尤其是那些王公家族，为何要同意这样一个协议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决定现代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之间分界线的行政划分将以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的新边界为基础。

立陶宛大公国的乌克兰省份是因其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与白俄罗斯省份不同而加入波兰王国，还是卢布林分界线造成了两个东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差异？我们没有证据认为16世纪中期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在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边境地区，人们仍使用一种介于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之间的方言。也许在16世纪时他们使用的就是这种方言，这令我们难以仅仅根据语言学标准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不过，基于故有罗斯土地分界线的卢布林边界似乎强化了长久以来一直在形成的差异。历史上，基辅地区及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与北方的白俄罗斯地区有着很大的不同。从10世纪到14世纪，它们曾是独立或半独立公国的核心地区。到了15世纪和16世纪，乌克兰地区在立陶宛大公国中处于边缘位置，又面临着来自开阔草原边境的威胁，这一切都使乌克兰地区与立陶宛大公国其他地区变得不一样。

与立陶宛贵族们不同，乌克兰精英阶层不认为保持大公国的事实独立地位对他们有多少好处——在面对来自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鞑靼人日益增大的压力时，立陶宛已显得孱弱。波兰王国可以在对莫斯科的战争中帮助立陶宛，但它不太可能在乌克兰对抗鞑靼人的低烈度战争中施以援手。让这些边境地区加入波兰则可能让波兰改变态度。无论如何，乌克兰王公们同意了将他们的土地并入波兰。我们也没有证据认为他们曾经对此感到后悔。在波兰的保护下，沃里尼亚各个王公家族的领地不仅没有丢失，还获得了急剧的增长。

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19]在本地王公中毫无争议地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他通过选择支持国王决定了联盟的命运。他不仅保住了自己原有的弗拉基米尔城[20]长官和基辅总督的位置，还扩大了自己的土地。到了16世纪末，奥斯特罗斯基已经坐拥一个私人帝国。40座城堡，1 000个城镇和1.3万个村庄归这位王公所有。17世纪初，他的儿子雅努什[21]拥有的金银财宝足以支付整个联邦两年的预算。奥斯特罗斯基只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召集一支拥有2万名步兵和骑兵的军队，其规模是国王在边境地区拥有的军队的10倍。在他一生中，奥斯特罗斯基还多次成为波兰和莫斯科沙皇国君位的候选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附于他的下层贵族无力对抗这样的一位

显贵。因此，奥斯特罗斯基继续掌握着一个庞大的贵族网络，地方和联邦议会中都有听命于他的代理人。不仅本地贵族无法对他构成威胁，就连国王和议会也不敢挑战这位罗斯无冕之王的权威。议会禁止王公们在战时派出自己的军队，但鞑靼人的攻击长期威胁着草原边境地区，而联邦常备军没有王公们的军事力量支持就难以应对这种局面。

卢布林联合之后，一些乌克兰王公保住并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奥斯特罗斯基父子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的，但并非独一无二。另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沃里尼亚王公家族是弗什涅维茨基家族。米哈伊洛·弗什涅维茨基[22]在沃里尼亚的土地与奥斯特罗斯基相比微不足道，但他将之向第聂伯河以东拓展。这些土地要么尚未开垦，要么在蒙古人统治期间被定居者抛弃，现在又暴露在诺盖鞑靼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攻击之下。弗什涅维茨基家族向草原扩张，建起新的定居点，修筑城镇，资助修道院。很快，弗什涅维茨基家族在左岸乌克兰（东乌克兰）的土地就足以与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在沃里尼亚的土地比肩。这两个王公家族成了乌克兰最大的地主。

沃里尼亚王公们是草原边境地带垦殖的最大推动者，而卢布林联合在这片地区造成的变化帮助了他们。波兰王室组建了一支规模不大但十分机动的常备军队，由王室领地的收益供养。这支军队帮助沃里尼亚抵御了鞑靼人，并推动了对草原地区的持续殖民。刺激人们对草原边境地带进行垦殖的另一个因素是这片地区被纳入了波罗的海贸易圈。随着欧洲市场上谷物需求的增长，乌克兰逐渐开始赢得其“欧洲面包篮”的称号。希罗多德时代以来，乌克兰谷物第一次出现在外国市场上。大批农民为了摆脱农奴身份，从邻近政府中心的土地上逃离，涌入这片地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迁入乌克兰的草原边境地带，因为这里的王公贵族们正实施免税的定居政策，允许新来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用服劳役，也不用缴税。作为交换，他们必须在这里定居，并开垦土地。

东进的移民潮为乌克兰犹太人群体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文化机遇。根据保守的估计，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乌克兰犹太人的数量增长了10倍多，从约4 000人增加到5万多人。他们组成新的社区，建起犹太会堂，并开办学校。然而这种新的机遇并非没有代价。它们让乌克兰犹太人身处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的夹缝之中。最开始，这两个群体都是东正教徒。然而到了17世纪中叶，随着许多王公改宗天主教以及波兰贵族涌入这片地区，犹太人陷入了满腔怨气的东正教农奴和贪得无厌的天主教主人的包围。这种状况是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

与国王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的期望相反，卢布林联合并没有成为反对派贵族们的约束。可以肯定的是，它让奥斯特罗斯基和其他乌克兰王公的地位变得更加显要。然而，这些人的故事里并非只有聚集财富和土地。自加利

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消亡以来，乌克兰王公们第一次开始涉足文化和教育事业。这种文化觉醒在新的波兰-立陶宛边界两边同时发生，在王公们的政治野心刺激下愈演愈烈，并与这个时代的宗教矛盾直接相关。

在立陶宛大公国，拉德维拉斯家族成为将政治、宗教和文化结合起来的典范。作为卢布林联合的最主要反对者，“红人”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也是波兰和立陶宛的加尔文教教徒领袖，还创办了一所加尔文教青年学校。在他的堂弟“黑人”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23]资助下，第一版波兰译文的全本《圣经》在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族群边界的城镇布列斯特[24]发行。16世纪70年代，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在沃里尼亚城镇奥斯特里赫[25]开始了他自己的出版事业。他在这里聚集起一群学者，让他们对照希腊文《圣经》和教会斯拉夫语《圣经》文本，对后者进行修订，由此出版了有史以来最权威的一部由东正教学者修订的《圣经》。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项目，参与者不光来自立陶宛、波兰，还来自希腊，而他们在工作中使用的《圣经》也来自罗马和莫斯科等不同地方。奥斯特里赫《圣经》在1581年发行，首版印数约1 500册，现存约400册。今天的参观者可以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见到其中一册。

教会斯拉夫语《圣经》译本首先在奥斯特里赫出版，而不是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这暗示着乌克兰在东正教世界中的新崛起。奥斯特罗斯基没有止步于《圣经》的出版。这位王公不仅继续着他的出版事业，用教会斯拉夫语和大众更容易接受的罗塞尼亚语印刷书籍，还通过开办东正教青年学校（与拉德维拉斯创办的加尔文教学校类似）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学术活动。他的雄心也并未就此满足。有清晰的证据显示他曾探索过将牧首驻地从君士坦丁堡迁往奥斯特里赫的可能性。这个想法从未实现，但在16世纪末，奥斯特里赫可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东正教研究中心。

罗斯的无冕之王奥斯特罗斯基从历史和宗教中寻找证据，为自己在本地区扮演的角色正名。在奥斯特里赫《圣经》的介绍文字和这位王公聚集起来的那些学者的作品中，奥斯特罗斯基被描述为弗拉基米尔“大帝”和“智者”雅罗斯拉夫所开创的宗教及教育事业的继承者。“因为弗拉基米尔以洗礼启蒙了这个民族，而康斯坦蒂以文字兴起了唯一的普世教会。”赫拉西姆·斯莫特里茨基[26]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很可能也是上面这句诗的作者。他来自“波兰罗斯”，即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那里的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贵族和居民受益于波兰的文艺复兴教育，远较立陶宛大公国的同等阶层为早。

奥斯特罗斯基聚集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国际化的，其中最出色的一些人拥有波兰背景。那些为奥斯特罗斯基作颂词的波兰贵族对他为东正教做出的贡献不感兴趣，却竭尽所能为他塑造一个半独立的统治者形象。如果说东正教知识分子将奥斯特罗斯基上溯到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波兰的

颂词作者则“构建”了他与哈利奇的丹尼洛——奥斯特罗斯基的出生地沃里尼亚最有名的统治者——之间的历史联系。服务于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和他们的姻亲扎斯拉夫斯基家族[27]的波兰人为他们的恩主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和政治空间，其范围不由东正教会或立陶宛大公国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已有边界决定。这个空间就是“波兰罗斯”，即波兰王国内部的东正教地区。通过将卢布林联合制造的边界加于东正教罗斯的旧地图之上，颂词作者们创造出一个现实的历史政治存在，它将在未来为近代乌克兰民族的形成提供一份地理蓝图。

在艺术与文学领域之外，实际地图的绘制也是将卢布林分界线加于旧地图上的方法之一。一份由托马斯·马可夫斯基[28]在16世纪90年代制作的地图显示了波兰与立陶宛罗斯（用现代名词来说就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新边界。这张地图名为“立陶宛大公国及毗邻地区”，其中包括乌克兰地区和一张第聂伯河流域的插图。学界认为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为这张地图提供了乌克兰地区的资料。本地名词“乌克兰”很可能经由这位王公或他的家臣之手才得以出现在这张地图上。这个词成为卢布林分界线以南部分地区的标注，指的是位于第聂伯河右岸、北至基辅、南至卡尼夫[29]的区域。如果人们选择相信制图师，那么卡尼夫以南就是蛮荒的草原，上面的标注为*campi deserti citra Boristenem*（意为“包律司忒涅斯河此岸的荒原”）。由此“乌克兰”覆盖了这个区域中相当一部分草原边界。看上去它似乎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地方，上面点缀着许多此前的地图上没有的城堡和定居点。同一张地图上这片地区还有另一个名字——*Volynia ulterior*（外沃里尼亚）。这个命名强调了新“乌克兰”和奥斯特罗斯基家族故土老沃里尼亚之间的紧密联系。

卢布林联合开辟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这一空间首先为信仰东正教的王公家族的精英们所掌握和利用。联合并没有剥夺他们的地位和权利，反而将之放大。当王公的饱学家臣们用与主人的政治野心相关的内容填充这个空间时，他们在历史中寻找参照和先例，诸如弗拉基米尔“大帝”“智者”雅罗斯拉夫和哈利奇的丹尼洛的事迹。尽管对过去投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们创造出来的却是一个新事物，它将在未来成为“乌克兰”，这个名字在16世纪王公权力复兴期间初次在这一地区出现。它与卢布林联合所创造的新空间合为一体还需要时间。

---

[1]　Jogaila（约1352/1362—1434），即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国王瓦迪斯拉夫二世雅盖沃（波兰语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他于1377年开始统治立陶宛，在1386年皈依天主教并与波兰女王雅德维加（Jadwiga，1373/1374—1399）结婚，被加冕为波兰国王（在雅德维加去世前两人共治）。

[2] Kreva，今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地区城镇。

[3] Union of Lublin，1569年签订于今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协议合并了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形成波兰立陶宛联邦。

[4] Horodło，波兰东部村庄。1413年霍罗德沃联合协议在此签署。

[5] Vytautas（约1350—1430），立陶宛大公（1392—1430年在位，作为已成为波兰国王的约盖拉在立陶宛的摄政）。

[6] Švitrigaila（1370—1452），立陶宛大公（1430—1432年在位），约盖拉的弟弟。

[7] Žygimantas（约1365—1440），立陶宛大公（1432—1440年在位），维陶塔斯的弟弟。

[8] Casimir IV（1427—1492），约盖拉之子、立陶宛大公（1440—1492年在位）、波兰雅盖隆王朝国王（1447—1492年在位）。

[9] Ivan III（1440—1505），莫斯科大公（1462—1505年在位）。他使莫斯科大公国从蒙古人统治下独立，合并了多个罗斯公国，并在1502年灭亡了金帐汗国，被称为伊凡大帝。

[10] Pskov，俄罗斯西北部古城，今普斯科夫州首府。它在12世纪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国。

[11] Livonia，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大部分领土的旧称。

[12] Vitsebsk（Vitebsk），今白俄罗斯东北部维捷布斯克州首府。波兰语读作维特布斯克（Witebsk）

[13] Shkloŭ（Shklov），今白俄罗斯东部莫吉廖夫州城市，俄语读作什克洛夫（Шклов）。

[14] Orsha，今白俄罗斯东北部维捷布斯克州城市。

[15] Sigismund Augustus（1520—1572），即雅盖隆王朝的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特，波兰国王及立陶宛大公（1548—1572年在位）。

[16] Podlachia（波兰语作Podlasie），历史地名，其北部位于今波兰东北部的波德拉谢省境内。

[17] Jan Matejko（1838—1893），19世纪波兰画家，以描绘波兰历史上著名政治和军事事件著称。

[18] Mikalojus Radvilas（波兰语作Mikołaj Radziwiłł，1512—1584），立陶

宛贵族、维尔纽斯总督伯爵，外号“红人”。他曾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成立前后担任立陶宛大公国的军政要职。

[19] Kostiantyn Ostrozky（1526—1608），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的一位罗塞尼亚王公。他是1569年卢布林联合谈判中事实上的乌克兰领袖，被视为16世纪乌克兰文化和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人物。

[20] Volodymyr，即今乌克兰西北部城市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Volodymyr-Volynsky）。

[21] Janusz，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贵族，康斯坦蒂之子。他是联邦中最富有的人之一。

[22] Mykhailo Vyshnevetsky（1529—1582），16世纪时期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罗塞尼亚贵族。

[23] Mikalojus Radvilas the Black（波兰语作Mikołaj Krzysztof Radziwiłł，1515—1565），与其堂兄“红人”一样担任立陶宛大公国许多军政要职。

[24] Brest，亦作布格河上的布列斯特（Brest-on-the-Bug）或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今白俄罗斯西南部城市。

[25] Ostrih，亦作Ostroh，今乌克兰西部城市。1581年，史上第一部全本教会斯拉夫语《圣经》在这里出版。

[26] Herasym Smotrytsky（？—1594），出生于波多里亚，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乌克兰作家、学者，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之父。奥斯特罗斯基邀请他到奥斯特里赫学术圈，并成为领袖之一。

[27] Zaslavskys（波兰语作Zasławscy），波兰-罗塞尼亚贵族世家。

[28] Tomasz Makowski，16世纪末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名著名雕版师。

[29] Kaniv，今乌克兰中部城市。

第8章
哥萨克人

15至16世纪间，乌克兰草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基辅罗斯时代之后，边境拓殖线第一次停止了向普里皮亚季沼泽和喀尔巴阡山脉方向的后撤，开始向东和向南推进。语言学研究表明，乌克兰的两大方言体系波利西亚[1]方言和喀尔巴阡-沃里尼亚方言从西方和北方开始融合，并各自向东、向南移动，创造出第三个方言体系——草原方言。草原方言区域如今覆盖了从西北部的日托米尔[2]和基辅到东部的扎波罗热[3]、卢甘斯克[4]和顿涅茨克[5]的地区，并向东南延伸到今俄罗斯境内的克拉斯诺达尔[6]和斯塔夫罗波尔[7]一带。这种方言的融合在整体上反映了人口的流动。

这种巨变的根源就在草原自身。金帐汗国内部从14世纪中叶开始的纷争导致汗国在15世纪中叶解体。其继承者克里米亚汗国[8]、喀山汗国[9]和阿斯特拉罕汗国[10]无一能够重新统一故土，其中一些甚至失去了独立地位。1449年，克里米亚汗国在成吉思汗的一位后裔哈吉·德乌来特·格莱[11]的领导下从金帐汗国独立出来。哈吉·德乌来特建立的格莱王朝一直延续到18世纪，但其领土未能一直保持独立。1478年，克里米亚汗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属。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由突厥人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国家，在14、15世纪间取代了拜占庭，成为地中海-黑海地区西部的主要强权。奥斯曼人在1453年将伊斯坦布尔（从前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他们的首都，并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卡法（今费奥多西亚）建立起他们的主要据点，实现了对克里米亚南部沿海地区的直接统治。格莱王朝掌握着克里米亚山区以北的草原以及乌克兰南部诸游牧部落。16世纪中，诺盖汗国成为这些部落中的最强大者。

奥斯曼人出于安全考虑和商业利益来到这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奴隶。奴隶贸易向来对这片地区十分重要，但在此时更占据了统治地位。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规只允许非穆斯林成为奴隶，并鼓励解放奴隶，因此一直对无偿的劳动力有需求。诺盖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这种需求做出了回应，将他们掳掠奴隶的范围扩大到黑海大草原以北，甚至还经常深入乌克兰和莫斯科大公国而不是止步于边境地区。奴隶贸易带来的收益成为诺盖人的畜牧业经济和克里米亚人的畜牧业及定居农业经济的补充。于是不好的收成就意味着对北方更频繁的袭扰，以及更多运回克里米亚的奴隶。

鞑靼人前往定居地区掳掠奴隶使用的5条路线都经过乌克兰。其中德涅斯特河以东的两条经西波多里亚通往加利西亚，南布赫河对岸的两条经西波

多里亚和沃里尼亚再通往加利西亚，最后一条经过以哈尔基夫[12]为中心、后来被称为斯洛博达乌克兰[13]的地区，通往莫斯科大公国南部。如果说对谷物的需求是乌克兰地区在16世纪融入波罗的海贸易圈的原因，那么这一地区与地中海贸易圈的联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鞑靼人对奴隶的掳掠。乌克兰人占黑海以北草原边缘地带人口的绝对多数，并为种植谷物深入了草原，因此成为严重依赖奴隶的奥斯曼帝国经济体系最主要的目标和牺牲品。克里米亚东北的俄罗斯族则紧随其后。

立陶宛的米沙隆（迈克尔，Michael）[14]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作者。他曾访问克里米亚，并引用他与一名当地犹太人的对话对此地的奴隶贸易规模进行了描述：这名犹太人“看到我们的同胞常年不断地被作为俘虏运到那里，多到不可胜数，于是他问，我们的土地上是否同样人口繁多，这么多人到底从何而来”。据估计，在16、17世纪间被运到克里米亚奴隶市场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数量在150万到300万之间。这些奴隶的命运各不相同。大部分男性奴隶会被送到奥斯曼帝国的大船上或田地里工作，而许多女奴则成为家中的仆役。勉强要说的话，也会有一些人交上“好运”。一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在帝国政府里谋得职位，但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宦官。一些女子则被送入苏丹和帝国高级官员们的后宫。

一名乌克兰女子成了最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15]的妻子，在历史上以罗克索拉娜[16]之名为人所知。她的儿子也成了苏丹，即塞利姆二世[17]。被称为许蕾姆苏丹的罗克索拉娜支持穆斯林社会的慈善事业，并出资兴建了奥斯曼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距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不远的许蕾姆苏丹公共浴场（Haseki Hürrem Sultan Hamamı）就是其中之一，由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建筑师米马尔·锡南[18]设计。在过去的200年间，罗克索拉娜成为乌克兰和土耳其许多小说和电视剧的女主角。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她的一生和成就只是一个例外，而非常规。

鞑靼人的袭击和奴隶贸易在乌克兰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奴隶的命运是无数“杜马”（*dumas*，一种用于演唱的乌克兰史诗）的主题。这些“杜马”哀悼囚笼中人的命运，描述他们如何逃脱克里米亚奴隶贸易，并颂扬解救和解放奴隶的人。诗中的民间英雄被称为哥萨克人。他们对鞑靼人作战，远征大海对抗奥斯曼人，并确实经常为奴隶们带来自由。

哥萨克人是谁？答案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年代。可以确认的是第一批哥萨克人是游牧者。“哥萨克”这个词本身来源于突厥语，根据语境的不同可以指一名护卫、一名自由人或一名强盗。第一批哥萨克人三者兼具。他们结成小规模的群体，居住在他们的定居点或部落营地之外的草原上。草原之外的哥萨克人以捕鱼、狩猎和抢掠为生。草原上纵横分布着许多商路，那

些没带足护卫就铤而走险来到草原的商旅成为早期哥萨克人抢掠的对象。正是从一起这样的商旅遇袭事件中，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草原上哥萨克人的存在。这些哥萨克人并非来自东方或南方，而是来自北方立陶宛大公国境内的定居地区。

1492年，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登陆被他称为圣萨尔瓦多的加勒比海岛那一年，也是斐迪南国王[19]和伊莎贝拉女王[20]签署命令将犹太人从西班牙驱逐出去那一年，哥萨克人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根据克里米亚可汗发给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一世[21]的一封谴责函所述，来自基辅和切尔卡瑟[22]的大公的子民俘虏并掠夺了一艘鞑靼人的船，地点可能是第聂伯河下游。对这些人是不是他的子民或是否真的进行了一次草原式的拦路抢劫，大公没有提出疑问。他要求边境地区（此处他的用词是“乌克兰”）官员对可能参与这次袭击的哥萨克人进行追查，并下令将袭击者处死，将其财产（其中显然包括那些偷来的货物）转交给可汗的代表。

就算亚历山大一世的命令得到了执行，也并没有产生长期的效果。第二年，克里米亚可汗再次指责切尔卡瑟的哥萨克人袭击了一名莫斯科大公国的使节。1499年，哥萨克人出现在第聂伯河河口，洗劫了位于奥恰基夫[23]的鞑靼人要塞周边地区。为了阻止哥萨克人从第聂伯河顺流而下直抵黑海的攻击，可汗甚至考虑用铁链将奥恰基夫附近的第聂伯河封锁起来。这个计划似乎从未真正实施，或者从未对哥萨克人的活动造成影响，而可汗向大公发出的抱怨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立陶宛大公国边境地区的官员一面尝试阻止哥萨克人的劫掠，一面又要利用他们来保护边境不受鞑靼人的威胁。1553年，大公派王公米哈伊洛·弗什涅维茨基——切尔卡瑟和卡尼夫地方长官——前往第聂伯河险滩以南地区修建一座小型要塞，以阻止哥萨克人的袭击波及第聂伯河更下游的地区。弗什涅维茨基则任命他的哥萨克仆从来完成这项任务。毫不意外，克里米亚可汗将这座哥萨克要塞视为对其国土的侵犯。四年后，可汗派出一支军队，打算将弗什涅维茨基从他的堡垒里赶走。在民间文化中，弗什涅维茨基王公被视为第一位哥萨克“统领”（hetman，波兰军队对其最高指挥官的称呼）和对抗鞑靼人与奥斯曼人的无畏战士，成为大受欢迎的英雄。

到了16世纪中叶，基辅以南的地区已经遍布定居点。“而基辅一带，上天垂顾，欣欣向荣，人丁也十分兴旺，因为包律司忒尼斯河和它的支流两岸到处都是人口繁盛的城镇和村庄。”立陶宛的米沙隆写道。他还对定居者的来历做出了解释：“一些人或为了逃离父辈的威权，或为了逃离奴役、兵役，或为了逃离犯罪（的处罚）、债务，或其他什么；还有一些人则是受到（此地的）诱惑而来，以春天为甚，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猎物和更广阔的土地。另外，在此地的要塞中碰过运气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愿回去。”根据迈克尔的记述，哥萨克人以抢劫手段来补充他们的渔猎收益。

他曾写到一些破败肮脏的哥萨克棚屋里却“装满昂贵的丝绸、珍稀的宝石、黑貂皮和其他毛皮，还有香料”。他发现：在这里“丝绸比在维尔纽斯更便宜，胡椒价格比盐还低”。这些精美和奢华的商品正是商人们从奥斯曼帝国运往莫斯科大公国或波兰王国的货物。

尽管最早的哥萨克人居住在普里皮亚季河和第聂伯河沿岸的城镇中，到了16世纪末期，本地农民的加入却使哥萨克群体大为膨胀。这种人口流入终结了人们对哥萨克人的政治、族群和宗教身份的种种猜测——他们到底是克里米亚和诺盖鞑靼人，还是大公和国王们的乌克兰子民，甚或一个杂糅各种民族和信仰的混合体？哥萨克人中的绝大多数是乌克兰人。他们为了免于历史学家们所谓的“二次农奴化”，离开了大小贵族们巨大的封地（大庄园）来到这里。如本书第7章所述，显贵们和其他上层阶级承诺有限期的免税政策，以吸引人们到他们在乌克兰边境新获得的土地上定居，因为这里并不安全，一直受到鞑靼人袭击的威胁。政策到期之后，许多农民为了继续避税，向危险重重的草原更深处迁移。他们中不少人加入了哥萨克群体，其社会诉求也变得更加激进。

如上一章所述，在托马斯·马可夫斯基的地图上，乌克兰是第聂伯河中游沿岸的草原边境。对乌克兰进行垦殖是沃里尼亚王公和第聂伯河哥萨克人的共同目标。1559年，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成为基辅总督，也就是广大的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长官。他的管辖范围一直延伸到卡尼夫和切尔卡瑟，管理哥萨克人也成为他的责任之一。对不断发展的草原垦殖来说，哥萨克人对鞑靼人和奥斯曼人的劫掠式攻击既是一种保障，也是一种阻碍。奥斯特罗斯基首先做出了将哥萨克人纳入军事体系的努力。这种做法与其说是让哥萨克人成为战斗力量，倒不如说是为了让他们离开第聂伯河险滩以南地区，并对这群桀骜不驯的家伙建立起某种控制。由于利沃尼亚战争，立陶宛大公国与莫斯科沙皇国的边界上对兵员的需求日益增长，于是一些哥萨克部队在16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其中一支部队拥有多达500名战士。

此前哥萨克人只是为边境官员服务的民兵，如今被重新组织成听命于军官的部队，这开启了哥萨克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在册哥萨克”这个词从此出现。被纳入军队并进入“册籍”的哥萨克人可免缴税赋，并不受地方官员管辖，此外还有军饷可拿。自然，希望进入册籍的人不在少数，但波兰王室招募的人数有限，且军饷和各种优待也仅在现役时才有效。一些人一开始就未能入册，或在某次战争或战役之后被注销册籍。他们拒绝放弃在册身份，导致了哥萨克人与边境官员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哥萨克人注册制为政府解决了一个麻烦，却带来了另一个。

1590年，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批准创建一支1 000人的在册哥萨克部队，

以保护乌克兰边境不受鞑靼人攻击，同时保护鞑靼人不受不在册的哥萨克人攻击。虽然国王发布了必要的命令，却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到了1591年，第一次哥萨克叛乱已经席卷了乌克兰。在此之前，哥萨克人袭扰的还是奥斯曼人的地盘，包括克里米亚汗国、摩尔达维亚公国[24]（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和黑海海滨地区，现在他们却将矛头掉转向内。哥萨克叛乱针对的并非国家，而是他们自己的“教父”，即沃里尼亚的王公们，尤其是雅努什·奥斯特罗斯基（波兰语作奥斯特罗格斯基）王公和他的父亲康斯坦蒂。雅努什是比拉采尔科瓦[25]的地方长官，此地既是一座城堡，也是基辅以南的一个哥萨克要塞。康斯坦蒂则作为基辅总督“监督”其子的行动。奥斯特罗斯基父子完全掌握着这片地区的大权，并一心通过从下层贵族手中攫取土地以扩大自己的地盘。没有任何本地贵族敢于挑战这两位强大的王公。

克里什托夫·克辛斯基[26]是被奥斯特罗斯基家族欺压的贵族中的一位，同时也是一名哥萨克统领。当雅努什夺走克辛斯基经国王授权拥有的土地时，克辛斯基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向国王申诉上，而是聚集起他的哥萨克部众，袭击了小奥斯特罗斯基的权力中心比拉采尔科瓦城堡。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和沃里尼亚另一位王公亚历山大·弗什涅维茨基[27]召集起一支私人军队，最终击败了克辛斯基。这些王公没有向王室请求援助，自行镇压了叛乱。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哥萨克人的“教父”们在惩罚自己的“孩子”时，却借助了其他听命于他们的哥萨克人的力量。奥斯特罗斯基手下最有名的哥萨克统领无疑是塞维伦·纳里瓦伊科[28]。塞维伦率领奥斯特罗斯基部下的哥萨克人对克辛斯基的部队作战，又将流散在波多里亚草原的哥萨克人聚集起来，带领他们尽可能远离奥斯特罗斯基的产业。

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对哥萨克叛乱的控制和操纵毕竟是有限的。哥萨克人会选举自己的统领，并跟随他走上战场，但只要征战结束，而统领的所作所为有违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不惮于将他废黜甚至处死。当时的哥萨克人极为分化，并不限于在册和不在册之别。在册的哥萨克人来自哥萨克人中的有产阶级，其成员居住在基辅和切尔卡瑟之间的城镇和定居点里。他们有机会通过向王室效劳获得特别的权利。然而另有一个哥萨克群体，即扎波罗热哥萨克，其成员从前多为农民。他们在第聂伯河险滩以南的岛屿上修筑了一个被称为“锡奇”（Sich，得名自他们用来防御的栅栏）的设防定居点，远离王室官员的管束。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袭扰大都由他们造成。在动荡时期，扎波罗热哥萨克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心怀不满而从草原逃离的镇民和农民。

纳里瓦伊科受奥斯特罗斯基的委派管理哥萨克的“乌合之众”（这些人大部分是逃亡的农民），并很快与桀骜不驯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结成了不稳定的同盟。到了1596年，他已经自行其是，不再听从奥斯特罗斯基的命令，

并领导了一场新的叛乱，比克辛斯基叛乱规模更大。16世纪90年代初的几年歉收导致了灾荒的发生。更多农民在饥饿的驱使下逃离贵族的田产，加入哥萨克人的序列。这一次王公们的部众已不足以镇压叛乱，于是他们召来了由波兰陆军指挥官率领的王室军队。1596年5月，波军围困了哥萨克人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营地。“老”哥萨克（那些来自城镇的哥萨克人）倒戈攻打“新”哥萨克，并将纳里瓦伊科献给波兰人以求赦免。纳里瓦伊科最终在华沙被处死。在哥萨克编年史作者和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眼中，这个曾为王公仆从的哥萨克叛党是一位为哥萨克人和东正教事业献身的烈士。歌颂过纳里瓦伊科的诗人中包括孔德拉季·雷列耶夫[29]，他在1826年同样因领导一场反抗威权的叛乱而被处死。

在16世纪末，将哥萨克人纳入对外政策考量的不仅有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奥斯曼帝国，甚至也包括中欧和西欧的各种势力。159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尔夫二世[30]的使节埃里希·冯·拉索塔（Erichvon Lassota）拜访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并提议他们加入他的君主对奥斯曼人的战争。三年后，教皇的使节亚历山德罗·科莫略（Alessandro Comuleo）也为类似的目的来到这里。这些访问没有收到什么成果，只留下了科莫略的书信和拉索塔的日记。两人记述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锡奇中的民主秩序，增加了我们对早期哥萨克历史的了解。但此时哥萨克人已进入维也纳和罗马的视野，很快也将吸引来远自巴黎和伦敦的目光，对莫斯科而言则将是一个重要威胁。

乌克兰哥萨克人在16世纪50年代开始为莫斯科沙皇伊凡雷帝效力，成为他们登上国际舞台的开端。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们不请自来，出现在莫斯科。莫斯科沙皇国此刻正身陷一场被称为“动荡之年”[31]的经济、王朝和政治危机，一片混乱。危机开始于16、17世纪之交的一连串毁灭性饥荒。饥荒的部分原因则是今天被称为“小冰河时期”的低温气候，它从135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1850年左右，长达500年，并在17世纪初左右达到顶峰。这场危机在最不凑巧的时候袭击了莫斯科沙皇国，因为此时莫斯科的留里克王朝君主已经绝嗣，众多贵族集团正为新君主的正统性问题而争论不休。直到1613年第一位罗曼诺夫王朝沙皇被推上莫斯科的君位，王朝危机才宣告结束。然而在危机结束前，许多候选人都试图在政治上一试运气——其中还有一些人自称伊凡雷帝的在世亲属，被称为“觊觎者”——由此为外国的干涉打开了大门。

哥萨克人在这段漫长的过渡期中支持过两个莫斯科君位的觊觎者——伪德米特里一世[32]和伪德米特里二世[33]。当波兰王室大统领斯坦尼斯拉夫·茹乌凯夫斯基[34]在1610年向莫斯科进军时，多达1万名哥萨克人加入了他的军队。尽管三年后米哈伊尔·罗曼诺夫[35]（延续到1917年革命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创者）被推选为沙皇，但哥萨克人并没有停止他们对莫斯科

事务的介入。1618年，一支2万人的乌克兰哥萨克军与波兰人合兵进军莫斯科，并在围城战中攻占了这座首都的一部分。最终基于一份对波兰王国有利的协议，哥萨克人帮助结束了这场战争。协议的一条内容是将立陶宛大公国在16世纪初输掉的切尔尼戈夫地区划归波兰。到17世纪中叶，切尔尼戈夫将成为哥萨克世界的重要部分。然而，与之前各种时候一样，哥萨克人对波兰国王的外交事务既是助力，也是障碍。在其与莫斯科人的战争中，波兰-立陶宛联邦一直未能获得其希望的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哥萨克人持续不断的海上行动和对奥斯曼帝国海滨地区的攻击。

1606年，哥萨克人乘坐他们被称为“海鸥”（chaiky）的长船顺第聂伯河而下进入黑海，攻打了奥斯曼人在黑海西岸最坚固的堡垒之一瓦尔纳[36]。1614年他们洗劫了黑海东南岸的特拉布宗[37]，下一年更是进入了伊斯坦布尔的金角湾（Golden Horn）并在城郊大掠，正如维京人在约750年前所做的那样。不过，维京人同时也与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而哥萨克人的行动更类似从地中海到加勒比海的海盗们对沿海地区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在于抢劫和复仇，也在于解放在苦难中煎熬的奴隶（正如乌克兰民歌所描述）。1616年，哥萨克人攻打了位于克里米亚海岸的主要奴隶贸易中心卡法，并释放了那里的所有囚徒。

看到哥萨克人对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不断攻击，帝国的苏丹、他的宫廷以及各国使节都感到震惊。基督教君主们终于能严肃地将这些袭击者视为其对奥斯曼帝国战争中的潜在同盟。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塞西伯爵菲利普·德阿尔莱（Philippe de Harlay of Césy）在1620年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信中写道：“尽管哥萨克人力量弱小，但他们每一次从黑海上接近此地都能取得惊人的收获。人们甚至传言：尽管大君主（苏丹）费尽力气派出几艘战船前去迎敌，他们仍然需要用棍棒敲打，才能强迫奥斯曼士兵与哥萨克人战斗。”

在菲利普伯爵向他的国王通报奥斯曼人无力控制哥萨克人海上攻势的同时，16岁的苏丹奥斯曼二世的顾问们却在思索如何能两面作战——他们在陆地上要对付波兰军队，在海上要应付哥萨克人。1620年夏天，奥斯曼帝国军队向今摩尔多瓦境内的普鲁特河[38]进军，攻击波兰-立陶宛联邦。后者的军队中包括波兰和乌克兰大贵族们私人的哥萨克部队。奥斯曼人此举表面上是为了惩罚波兰-立陶宛联邦没有控制哥萨克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袭击，其真实目的却宏大得多——他们希望保护这一地区的奥斯曼属国不受波兰-立陶宛联邦日益增强的势力影响。1620年9月，在今天摩尔多瓦-罗马尼亚边界上的小镇楚措拉[39]，战斗在人数约为1万的波兰军队与据估计两倍于他们的土耳其人之间爆发了。战斗持续了20天，以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惨败结束。

由于波兰-立陶宛联邦没有常备军，这一场败仗让其宫廷和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每个人都认为奥斯曼人将继续进军波兰，而奥斯曼人也的确这样做了。第二年，一支庞大得多的奥斯曼军队（据估计有12万人）在苏丹的亲自率领下，穿过摩尔多瓦向波兰-立陶宛联邦进发。他们遭遇了一支约有4万人的联邦军队，其中半数为乌克兰哥萨克人。这支军队由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40]率领。此人是1616年哥萨克人攻打卡法时的英雄，也是1618年他们进军莫斯科时的指挥官。战斗在被奥斯曼人围困的要塞霍京[41]附近的德涅斯特河两岸发生，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霍京之战结束时并未分出明显的胜负，但这一未定结果在华沙被视为波兰王国的胜利。波兰人在自己的边境上阻挡了奥斯曼大军，并签下了一份不含割地条款的和约。每个人都清楚，没有哥萨克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哥萨克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联邦的宠儿（虽然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战争结束不久后出版的书籍上，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已被视为波兰最伟大的战士之一。他的纪念碑如今位于基辅的波迪尔区（Podil），就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尽头。

有了在霍京之战中的军事成就，哥萨克人得以重新提出自己在联邦中的政治和社会诉求。他们的主要要求是让哥萨克军官们获得贵族地位（如果不能让整支部队都成为贵族的话）。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因在霍京之战中受伤，于1622年在基辅去世。他去世时，基辅兄弟会学校教师卡西安·萨科维奇[42]为这位哥萨克统领作了悼亡诗，很快得到基辅洞穴修道院的出版。卡西安在诗中称颂哥萨克人为基辅罗斯时代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基辅王公们的继承人。据他看来，哥萨克人为“金色自由”而战，也配得上这样的自由。“金色自由”是一个隐语，所指正是联邦贵族阶层所享受的权利与自由。“所有人都为得到它而努力奋斗，”萨科维奇写道，“然而它不能为每个人享有，唯有祖国和主公的保卫者才配得到它。骑士凭其在战斗中的勇气撷取这一荣耀——他们付出的是鲜血而不是钱财。”将哥萨克人视为骑士让他们离跻身于贵族行列仅有一步之遥。

哥萨克人的社会诉求并没有实现。他们进入联邦议会（仅限贵族）参加国王推选的企图在1632年被断然拒绝。在这一耻辱之前，他们刚刚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失利。当局在1625年和1630年两次镇压了哥萨克人的叛乱。霍京之战时，他们有2万名战士，之后在册哥萨克人数先是被压缩到6 000人，后来又改为8 000人。哥萨克人在1637年和1638年再度揭竿而起，却又一次被王室军队击败。他们声称自己不仅为哥萨克的自由而战，也为东正教信仰而战。这一做法在最初为他们赢得了支持，但政府采取了容纳东正教会的政策，让哥萨克人与教会之间的纽带越来越难以维系。1630年还有部分基辅教士支持哥萨克人，到了1637年和1638年，教会已对他们的诉求充耳不闻，这令哥萨克人深感自己遭到背叛。洞穴修道院出版的颂词

也不再为哥萨克统领们歌唱，转而开始赞美曾对哥萨克人作战的东正教贵族们。

1637年和1638年对哥萨克叛乱的镇压令当局开始尝试某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们的设想很简单：哥萨克战士们必须接受国王任命且信任的统领，必须融入联邦的法律和社会结构，才能获得合法的身份。1638年的哥萨克法令在满足哥萨克上层军官的要求方面走得太远——它将哥萨克视为一种独立的身份，拥有不受服役期限制的专属特权和待遇，其中包括将身份和地上财产传给子孙的权利。当局对这种新获承认的身份实行准入控制，限制国民中其他阶层成为哥萨克，尤其限制了那些在草原边境城镇中与哥萨克们比邻而居的城镇居民。

不仅如此，波兰当局还将在册哥萨克人的数量压缩到6 000人，仅为1625年名额的一半，并将他们置于波兰军队最高指挥官王室大统领的管辖之下。哥萨克长官和6名哥萨克团长（colonel）都是波兰贵族。而哥萨克人在哥萨克部队中能得到的最高军衔仅仅是上尉。在扎波罗热的锡奇（第聂伯河险滩以南那座哥萨克叛军堡垒），6个哥萨克团只能轮流驻守。为了阻止哥萨克人的海上军事行动并改善与奥斯曼人的关系，当局还重建了第聂伯河险滩上游的可达克（Kodak）要塞。这座要塞最初建于1635年，但在后来被哥萨克人烧毁。被当局派去监督重建工程的是法国工程师纪尧姆·勒瓦瑟·德·博普朗[43]，他在1639年绘制了第一张乌克兰地图，即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草原边境地区地图，其中包括波多里亚、布拉茨拉夫[44]和基辅等省份。博普朗绘制了大量乌克兰地图，让“乌克兰”这个词在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制图师群体中得到普及。

哥萨克人被平定并在部分程度上得到接纳，第聂伯河不再是向黑海发动军事攻击的通道，扎波罗热的锡奇也处于控制之下，这让波兰-立陶宛联邦进入了被称为“黄金和平”的十年。在这段时期，草原边境地区不断得到垦殖，贵族们的地产和庄园也不断扩大。为追逐此地迅速增长的经济机遇，更多的权贵、农民和充当中间商的犹太定居者来到这里，为乌克兰带来了人口增长。人们将会发现，这一切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一次规模比从前大得多的哥萨克叛乱正在酝酿之中。

哥萨克人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他们曾经是在基辅南方草原上活动的小股渔民和猎人，后来成为草原边境新土地的垦殖者；他们曾经是为王公们效力的私人武装，后来作为一支独立部队的军人而受到外国人的尊重；他们曾是难民和冒险者，后来成为一个联系严密的军事组织，自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并向当局要求比金钱更多的东西——对他们战士身份的承认。只有设法接受哥萨克人提出的社会诉求，波兰当局才有可能从哥萨克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潜力中获益。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会一再告诉我们：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 Polisian，亦作Polissian，Polesian，Polesie，东欧地理和历史名词，包括今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部分地区。

[2] Zhytomyr，乌克兰西北部日托米尔州首府。

[3] Zaporizhia，乌克兰中东部扎波罗热州首府。

[4] Luhansk，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首府。

[5] Donetsk，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克州首府。

[6] Krasnodar，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库班河河畔，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首府。

[7] Stavropol，俄罗斯西南部斯塔尔罗波尔边疆区首府。

[8] Crimean Khanate，存在于1430年至1783年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及其以北地区。

[9] Kazan Khanate，存在于1438年至1552年，范围在伏尔加保加利亚区域，即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和鞑靼斯坦共和国一带。

[10] Astrakhan Khanate，1466年至1556年间存在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一带的小汗国。

[11] Haji Devlet Giray（？—1466），克里米亚汗国奠基人，拔都的弟弟秃花帖木儿的后人。

[12] Kharkiv，亦作哈尔科夫（俄语），今乌克兰东北部哈尔基夫州首府。

[13] Sloboda Ukraine，见导言注。

[14] Michalon the Lithuanian，亦作Michalo Lituanus，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作者，生平不详，著有《鞑靼人、立陶宛人和莫斯科人风俗》一文。

[15]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494—1566），即苏莱曼一世。他在位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进入极盛期。

[16] Roxolana（约1502—1558），亦作Roxelana，在土耳其被称为许蕾姆苏丹（Hürrem Sultan），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性之一。

[17] Selim II（1524—1574），1566—1574年在位，被称为“酒鬼塞利姆”。

[18] Mimar Sinan（约1489/1490—1588），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及穆拉德三世的首席建筑师及工程师。他在50年间负责监督及建造了奥斯曼帝国许多主要建筑。

[19] Ferdinand II of Aragon（1452—1516），阿拉贡国王（1479—151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年在位）。通过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在1474年的婚姻，斐迪南二世成为统一的西班牙的第一位国王。

[20] Isabella I of Castile（1451—1504），卡斯蒂利亚女王（1474—1504年在位）。她和丈夫斐迪南二世在1479—1504年间是统一的西班牙地区的共治君主。

[21] 指雅盖隆王朝的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Jagiellon，1461—1506），卡齐米日四世之子。他在1492年成为立陶宛大公，在1501年成为波兰国王。

[22] Cherkasy，今乌克兰中部城市，切尔卡瑟州首府。

[23] Ochakiv，今乌克兰南部黑海海滨小城。

[24] Moldavia，东欧历史上的一个公国，形成于14世纪，在1859年与瓦拉几亚公国（Wallachia）合并，成为现代罗马尼亚的前身。

[25] Bila Tserkva，今乌克兰基辅州城市。

[26] Kryshtof Kosynsky（？—1593），16世纪乌克兰帕得拉夏地方贵族，扎波罗热哥萨克统领。他领导了两次哥萨克叛乱，最终在1593年战败被杀。

[27] Oleksandr Vyshnevetsky（约1560—1594），米哈伊洛·弗什涅维茨基之子。

[28] Severyn Nalyvaiko（？—1597），乌克兰哥萨克统领，1594—1596年间纳里瓦伊科哥萨克叛乱的领袖，乌克兰民间文学中的英雄。他于1597年在华沙被处死。

[29] Kondratii Ryleev（1795—1826），俄国诗人、出版商、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他在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中被俘，并于1826年7月25日被处绞刑。原文作1825年，疑有误。

[30] Rudolf II（1552—1612），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76—1612年在位）。

[31] Time of Troubles，亦称“动乱时代”“空位时期”，指俄罗斯历史上1598年费奥多尔一世去世到1613年米哈伊尔一世登基间的混乱时期。

[32] False Dmitrii I（约1582—1606），全俄沙皇（1605—1606年在位），自称是伊凡雷帝的幼子。他在1606年5月17日被暴动者杀死。

[33] False Dmitrii II（？—1610），出现于1607年，自称在1606年暴动中死

里逃生的伊凡雷帝幼子（伪德米特里一世）。他在被波兰人废黜后于1610年被其部下杀死。

[34] Stanisław Żółkiewski，1547—1620），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的波兰贵族、军事家。他从1588年起成为王室陆军统领，并在1613年成为王室大统领，取得了对莫斯科公国、奥斯曼帝国和鞑靼人的许多胜利。

[35] Mikhail Romanov（1596—1645），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一世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1613—1645年在位）。其父是伊凡雷帝的中央顾问。

[36] Varna，黑海西岸城市，今属保加利亚。

[37] Trabzon，黑海东南岸城市，今属土耳其。原文作“西南岸”，有误。

[38] Prut River，多瑙河支流，发源于乌克兰境内，流经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

[39] Țuțora，今属罗马尼亚。

[40] Petro Konashevych-Sahaidachny（约1582—1622），乌克兰军事家、政治家、民间领袖，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统领（1616—1622年在任）。他将松散的哥萨克部队改造为一支正规军。

[41] Khotyn，乌克兰西部城市，位于德涅斯特河右岸。

[42] Kasiian Sakovych（约1578—1647），乌克兰教士、哲学家，曾任基辅主显兄弟会学校（Kyiv Epiphany Brotherhood School）校长。

[43] Guillaume Levasseur de Beauplan（约1600—1673），法国制图师、工程师和建筑师。

[44] Bratslav，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的省份之一，首府在今乌克兰西南部城市布拉茨拉夫。

第9章
东方的变革

关于当代乌克兰有许多成见，其中之一即是其割裂国家的形象——它被分为东正教东方和天主教西方两部分。塞缪尔·亨廷顿[1]销量最大的作品《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有一张地图，其中的东西方基督教文明分界线正好穿过乌克兰，将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包括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划入天主教一侧，而乌克兰其他部分则被归于东正教地区。这张地图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按图索骥，你会发现这个国家里被这条线归为天主教一侧的地方几乎没有罗马天主教的痕迹。沃里尼亚是一个东正教占绝对优势的地区，而加利西亚的天主教徒虽然众多，却未占绝对多数。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将加利西亚的天主教堂和礼拜仪式与东正教的区别开来，因为大多数乌克兰天主教徒也使用东正教的仪轨。

我们不应苛责制图师。在乌克兰这样的国家，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异常困难的。所有文化的边境地区都是如此，但在乌克兰，一个杂糅东西方基督教元素的混合型教会的存在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它起初被称为“联合教会”[2]，这个名字反映出其综合各种元素的初衷。今天这个教会被称为“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希腊”一词表示其使用拜占庭仪轨）或被简称为“乌克兰天主教会”。它在体制上对基督教世界最古老的鸿沟之一进行了弥合，并远比其他弥合的尝试来得成功。这个教会诞生于16世纪晚期。此时正值西方政治和宗教模式向东推进并逐渐因应东正教故土的时期。然而本土社会的抵抗及其不断增长的自我认同常常伴随着这一过程。对西方潮流的接受与抵抗在乌克兰东正教信仰中得到体现。17世纪上半叶，这一信仰系统为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罗斯东正教会中的亲西方运动开始于16世纪90年代初，起因是基辅都主教区陷入的一场危机。教会拥有大量的田产，贵族阶层也将教会职位视为其子嗣们的择业良选。这些职位的竞逐者往往对宗教本身无甚兴趣，却热衷于教会的财富。因此，主教们和大修道院的掌院[3]们往往在教会的世俗恩主的帮助下从国王手中得到任命，甚至不需要发修道誓愿。牧师们只受过最基本的教育，连主教也往往如此。即使他们希望学习更多知识，也无门可入。与此同时，加尔文教和天主教的学校和学院却开始向东正教贵族的子嗣们敞开大门，耶稣会[4]学校尤其如此。其中之一设于维尔纽斯，距白俄罗斯边界不远，很快将成为一所高等学院。另一所则建立于加利西亚的小镇雅罗斯拉夫[5]。

与欧洲其他地方新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开始前的普遍形势相比，基辅都主教区的情况并无太大不同。从许多方面来看，一切都还正常，但东正教会的精英阶层开始嗅到危机的气味。在耶稣会的学校和学院的帮助下，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天主教会此刻正忙于对自身进行再造，这对尚在故步自封的东正教信仰暗暗构成一种挑战。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王公周围的圈子发起的出版和教育事业是对这种挑战的最早回应。乌克兰各大城市中的东正教工商业兄弟会对教会事务的局势同样关切。其中最富有也最有影响力的利维夫兄弟会对本地东正教主教的权威发出了挑战，认为此人腐化不堪，是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徒做交易时的一个不利因素。利维夫市民在1586年成功摆脱了其主教的支配。他们没有坐等主教行动，又在1591年开办了自己的学校。

东正教会的主教们此时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局。在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联邦中，他们的地位低于那些天主教主教。后者是上议院的成员，并拥有直达国王的渠道。（奥斯特罗斯基和其他王公们则认为他们才是教会的真正主宰。）兄弟会已经公开作乱，打破了主教对传授教会规训的垄断。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没有向他们施以援手，反而将乱党们置于自己羽翼之下（这些乱党知道如何打动这位急需资金的牧首）。然而，与罗马联合的主意突然为这个困局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东正教会大主教共同接受的教会联合设想基于1439年佛罗伦萨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会议[6]所提出的一种模式。拜占庭帝国当时日薄西山。皇帝和牧首为使帝国能抵挡奥斯曼人的进攻已不顾一切。罗马教廷承诺提供帮助，条件是将两个教会联合在教皇权威的领导之下。拜占庭的统治者们同意了这个条件，让他们的教会变成罗马教廷的从属，并以天主教教理代替东正教教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在最重要的“和子说”（拉丁语*flioqu*）问题上与天主教徒站到了一边，承认圣灵不仅来自圣父，也来自圣子耶稣基督。不过他们仍设法保留了牧师可以结婚的制度、希腊语和拜占庭仪轨。

1595年夏天，两名东正教会主教带着教会主教团写给教皇的信件，踏上了前往罗马的漫长旅程。信中请求教皇同意以与佛罗伦萨联合近似的条件接纳他们加入天主教会。罗马的教皇克雷芒八世[7]接见了这两名客人，并在梵蒂冈的君士坦丁大厅举行仪式，欢迎他们和他们的教会“回归”。两名主教带着教皇的诏书和许多致国王的谕令返回，准备召集一次教会会议，宣布达成联合及将基辅都主教区转归罗马教廷的统辖。国王非常乐意地安排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1596年10月，布列斯特（位于今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交界处）[8]。

看上去这是一笔已经敲定的合作——教皇、国王和主教们都希望合并。问题出在信徒们身上，更准确地说，出在教会利益攸关者的主体上。这些人中有王公奥斯特罗斯基及和他一样信奉东正教的大贵族，有工商业兄弟会

的成员们，还有修道院的修士，以及教区神职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大贵族不想失去对教会的控制，因为在宗教改革的年代，那是一笔宝贵的、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宗教资产。兄弟会希望改革从下层开始，不愿看到主教们的权力膨胀。一些修道院的掌院——那些不曾发过修道誓愿的修道院管理者——希望继续掌握教会的田产。而一部分修士、教士和普通信徒则无法接受抛弃君士坦丁堡牧首从而背叛神圣的东正教会的行为。改革派和保守派、虔信徒和投机者结成了一个无序却又强大的同盟，让罗马、华沙和东正教会高层的计划蒙上了阴影。

作为也许是乌克兰最有权势的人，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王公决心阻止这次教会合并。为保住罗塞尼亚王公们在联邦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奥斯特罗斯基以东正教信仰为武器与王室权力抗衡，而从主教们的计划来看，合并将让教会脱离奥斯特罗斯基的控制，并削弱他的抗衡能力。奥斯特罗斯基肯定也感受到了对他个人的背叛。两名前往罗马请求合并的主教中，有一名是他的老朋友伊帕季·珀提[9]。奥斯特罗斯基曾说服他放弃政治生涯成为一名主教，以实现改革教会的目标。奥斯特罗斯基向珀提表示：他支持教会合并，条件是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批准。珀提很清楚君士坦丁堡不可能同意，选择了将之抛开。和珀提一同前往罗马的是基里尔·捷尔列茨基[10]。基里尔不仅是一位督主教（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个人代表，负有在本地区维护牧首利益的责任），还是沃里尼亚主教区的主教，而沃里尼亚主教区正是奥斯特罗斯基的大本营。

深感震惊的年迈王公曾派出配备武装的部下拦截两位前往罗马的主教，然而他们逃脱了，毫发无伤。于是奥斯特罗斯基带领一支由东正教贵族和仆从组成的支持者部队前往布列斯特参加教会会议。他也获得了其新教盟友立陶宛贵族们的支持。由于国王下令关闭了镇上的东正教堂，这些立陶宛贵族中的一位主动把自己的宅邸献出来作为会场。国王的代表们同样带着自己的武装部属来到布列斯特。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尚未发生的教会合并不仅可能告吹，甚至会造成流血冲突。

史称“布列斯特会议”的单次事件实际上从未发生，因为它变成了两个会议——一个天主教会议和一个东正教会议。天主教会议的参加者支持合并，他们中有东正教会的都主教和大部分主教。东正教会议由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一名代表主持，参加者包括两名东正教会主教和许多修道院掌院及教区教士代表。他们拒绝加入联合，并发誓继续忠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基辅都主教区由此分裂，其中一部分宣布倒向罗马。这次分裂有着清晰的地理特征：包括利维夫和普热梅希尔在内的加利西亚留在了东正教会内，而沃里尼亚和白俄罗斯的各主教区则支持新的联合教会。这样笼统的描述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的复杂：宗教忠诚往往导致家族的分裂，而各个教区和修道院也不止一次改变阵营。

布列斯特联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国王仍旧坚持。他只承认两场布列斯特会议中的一场，即支持合并的那一场，并由此认定联合教会为他的国家中唯一合法的东方基督教会。两名主教、数十座修道院、上千座教堂和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东正教信徒如今被认定为违法。东正教贵族们将官司打到了地方议会和联邦议会，宣称王室当局是在对贵族受到保障的宗教自由发动攻击。事实也的确如此。早在16世纪70年代，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死后不久，信仰新教的贵族就将宗教自由变成了每位获选的波兰国王都需要宣誓服从的“条款”里的核心原则。

此时新教贵族们向他们的东正教同侪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将议会变成了宗教战场，在每一次联邦议会上都提出“接纳奉希腊仪轨的罗斯民族”的议题。然而直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11]在1632年去世前，他们都没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东正教会都以一种没有官方身份也不被承认的状态存在。由于新主教的圣职任命必须得到国王的批准，联合教会希望坐等东正教会中反对合并的主教全部死去，变成一个没有主教的教会。东正教会全靠违背国王和王室当局的命令才幸存下来。王室的权力没有因布列斯特联合而增强，反而遭到削弱。正如之前的卢布林联合一样，教会的合并造成了其始作俑者意料之外的后果。

支持和反对教会合并的斗争没有被局限在议会之内，而是借出版业之手进入了广大得多的公共领域。各种论文、声明、檄文和抗辩像井喷一样涌现。这些文章在今天被统统归于“论争文学”的范畴。起初双方都没有进行严肃的宗教论争的准备，全靠各自的波兰支持者的帮助。彼得·斯卡加[12]是一名出席了布列斯特会议的耶稣会士，也是那些拿起笔对教会合并表示支持的人之一。奥斯特罗斯基则请他的一名颇具才华的新教代理人做出反击。从那时开始，新教徒们就常用笔名写作。他们的笔名通常来自希腊，以强调他们维护东正教的立场和他们文字的权威性。其结果就是，大部分早期论争文章都用波兰文写就。直到论争后期，他们仍然继续使用波兰文，而本地作者则开始用罗塞尼亚文写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教会和东正教会都开始使用与自己同样背景的作者。这些作者能针对对手挑起宗教政策、教会历史和神学方面的议题。在东正教会方面，一位名叫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13]的作者表现尤为突出。他是奥斯特里赫《圣经》编者赫拉西姆·斯莫特里茨基的儿子。梅列季多才多艺，史上第一本教会斯拉夫语语法著作即是他的作品，此著作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都被奉为标准参考书。从出版物的数量来看，东正教会比联合教会表现更加活跃，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缺少其他保卫自己事业的渠道，也得不到宫廷的支持。

在布列斯特联合与哥萨克阶层兴起的推动下，乌克兰的两条主要边界——

基督教-伊斯兰教边界和东西方边界——都开始向南和向东移动。这一推移过程为乌克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带来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最有标志性的变化就是基辅城自13世纪中叶蒙古入侵以来第一次重新夺回乌克兰历史中心的地位。在17世纪上半叶，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将成为东正教改革的重镇。这得益于从君士坦丁堡到莫斯科的东正教会应对欧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努力以及它们对自身进行的改革。

基辅作为宗教和文化中心的复兴始于17世纪早期。此时这座古城已经成为加利西亚东正教知识分子的避难所。在西乌克兰，来自华沙、迫使东正教与罗马教廷合并的压力与日俱增，而基辅的环境对他们的宗教和教育事业更为有利。将基辅转变成东正教中心的关键在于顶住布列斯特联合的压力，保持东正教会对基辅洞穴修道院的控制权。这座修道院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富有的机构，远远超出其他修道院。1615年，洞穴修道院掌院叶利谢·普列捷涅茨基（Yelisei Pletenetsky）将一度由利维夫东正教主教掌握的印刷所迁到基辅。从利维夫和加利西亚迁来的不只是印刷所，还有作者、校勘者和印刷工。他们在普列捷涅茨基的引导和庇护下创造了一个新的学术中心。同年，一个东正教兄弟会在基辅成立，并像利维夫兄弟会一样开办了自己的学校[14]。这所学校将在后来成为一所西式学院。在普列捷涅茨基于1624年去世前，洞穴修道院的印刷所也已经出版了11部书。此时基辅已经取代了奥斯特里赫和维尔纽斯的位置，成为东正教出版活动的大本营。

从16世纪晚期开始，基辅以南的地区实质上已成为哥萨克人的保留地。这一事实也帮助了基辅崛起为与波兰天主教权威相颉颃的宗教、教育和文化重镇。哥萨克人在两个主要方面为基辅的文艺复兴做出了贡献：第一，他们的存在极大地压制了来自鞑靼人的威胁，让宗教异见者们在这座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安全，也让修士们和在洞穴修道院田产上耕作的佃农们安心生产，为出版和教育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第二，在基辅修士面对华沙政府与日俱增的压力时，哥萨克人为这些从加利西亚来的东正教避难者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保护。1610年，哥萨克人的统领写下亲笔承诺：他们将杀死一名联合教会派往基辅督促本地东正教会改宗的代表。8年后，哥萨克人履行了他的诺言，将这个人淹死在第聂伯河里。“别的民族用长篇大论来争取的事，哥萨克人用行动来完成。”东正教知识分子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写道。此时他已成为哥萨克人的辩护者。

由于国王拒绝授予任何主教圣职，东正教会一度陷入缺少主教的境地，似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新的东正教主教团获得圣职至为重要。哥萨克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620年秋天，最著名也最为人敬仰的哥萨克领袖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说服了在旅途中经过乌克兰的耶路撒冷牧首塞奥法尼斯三世[15]，让他为新

的主教团授予圣职。这次圣职授予不仅让东正教基辅都主教区重获新生，也让基辅成为一座宗教之都。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国王不承认新的都主教约夫·博列茨基[16]，并发布命令要逮捕他和新主教团的其他成员。这令博列茨基无法继续留在维尔纽斯附近的新格鲁多克[17]（14世纪以来东正教会基辅都主教的驻地）。他别无选择，只能前往由哥萨克人控制的第聂伯河地区中心基辅。如今东正教会在哥萨克人中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而哥萨克人也得到东正教思想家和印刷所的助力，可以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诉求进行宣传。

哥萨克人与东正教会的联合在1632年秋天尤为令华沙头痛。这一年莫斯科人的军队进入波兰-立陶宛联邦边界，企图重夺斯摩棱斯克和他们在“动荡之年”中丢掉的其他土地。联邦在边境地区几乎没有部署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此时的情况与1620年颇为相似，当时是萨海达奇内在霍京之战中挽救了这个国家。更糟的是，西吉斯蒙德三世在春天死去，联邦此时正忙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国王推选。这位推动了布列斯特联合的国王的去世对联邦上层而言是一个麻烦，却也带来了一个机遇：他们从此可以探索解决宗教危机的新道路。布列斯特联合没能缓和宗教分歧，反而令罗斯社会陷入分裂，并让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站在了当局的对立面。

华沙方面制定的解决方案被称为“宗希腊礼的罗塞尼亚民族接纳方案”（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Ruthenian Nation of Greek Worship）。东正教会将被承认为一个合法实体，享受与联合教会同等的权利和待遇。这个方案在有东正教贵族代表出席的联邦议会中讨论产生，得到尚未登基的国王瓦迪斯拉夫四世[18]的支持，也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标。它令东正教会的忠诚在短期内重归联邦，也确保了哥萨克人加入斯摩棱斯克战争，与联邦军队共同作战。此外，王室当局对东正教会的承认还在教会高层与哥萨克人之间制造了一道裂痕：教会的生存不再需要哥萨克人的保护，从此开始倒向华沙一方。

在协议推动者们看来，东正教会与王室当局的和解要求成立一个新的神职领导层。为了增强“与华沙媾和”一派的力量，议会的东正教参与者推选了一位新的都主教彼得·莫希拉[19]。莫希拉甫一抵达基辅，就逮捕了他的前任，并将其送进基辅洞穴修道院的牢房。身为一名前波兰军官和洞穴修道院前掌院，这位新东正教会领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曾与斯莫特里茨基和博列茨基相熟，在自己的教会里不需要依赖哥萨克人或受哥萨克保护的人。他还拥有王室当局无保留的支持，因为他毕竟出身于一个统治家族。

彼得·莫希拉没有王室血统，但他是摩尔达维亚公国东正教统治者（领主[20]）的儿子，因此无疑属于联邦的贵族阶层。莫希拉的颂扬者们将他视

为罗斯的新领袖。奥斯特罗斯基等王公和萨海达奇内等哥萨克人曾被东正教知识分子歌颂为基辅王公弗拉基米尔大帝和“智者”雅罗斯拉夫的传承者，如今莫希拉却取代了他们的地位。“你是否记得罗斯曾多么光荣？有多少伟大的君主？”莫希拉的一位颂扬者以圣索菲亚大教堂（“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建筑遗产，莫希拉将之重建）的口吻写道，“如今他们已经凋零。罗斯需要您的出现。”

莫希拉抱着极大的热忱，将恢复罗斯时代的教堂视为己任，重建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然而在17世纪中叶，“重建”这个词与今天的含义相去甚远。正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外观所显示，莫希拉和他的建筑师们从来无意恢复这座教堂的拜占庭式面貌。他们“重建”教堂时采用的新样式来自西方，受到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不同文化风格趋势的融合决定了莫希拉担任都主教时期各种作为的本质，而我们今天所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正是这种融合的范本。尽管教堂内部仍用拜占庭式的壁画装点，从外观上看它却是一座巴洛克式教堂。

拜占庭传统的西方化，还有东正教会对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挑战的适应，是莫希拉的宗教和教育创新的两大驱动力。就建筑的例子而论，莫希拉采用的那些风格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同时还是“天主教的”。联合教会和东正教会之间相互竞争，努力尝试在追赶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拜占庭传统。联合教会可以将他们的学生送到罗马以及中欧和西欧的耶稣会学校，东正教会却无此优待。为应对这种挑战，莫希拉在基辅建立了第一所东正教学院，并改造耶稣会学院的课程为己所用。这所1632年建立的学院合并了基辅兄弟会学校和洞穴修道院学校，后来被称为基辅莫希拉高等学院，如今是乌克兰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与17世纪时一样，它也是乌克兰最西方化的大学。

莫希拉巩固了基辅作为联邦东正教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一流出版业中心的地位。17世纪40年代在基辅出版的书籍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乌克兰。其中的《圣礼仪轨》[21]是第一本对东正教仪式进行系统化的著作。另一本题为《正教信条》[22]的作品则在史上第一次对东正教信仰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以问答的方式对260个问题做出解释。这本书在1640年左右写就，在1643年的一次东正教牧首会议上获得通过，于1645年在基辅出版。这部深受天主教风格影响的《正教信条》成为对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里尔·卢卡里斯[23]1633年那部有新教倾向的问答式作品的回应。东正教牧首们的认可令《正教信条》成为包括莫斯科沙皇国在内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权威著作。

莫希拉所开创的教育和出版事业最主要的目标在于革新基辅东正教会。这位都主教致力于加强教会中主教的权力，强化神职人员戒律，改善与王室当局的关系，而一个教育良好的教士阶层、一个概念清晰的信条系统和一

套标准化的圣礼实践与他的这些努力息息相关。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对整个欧洲宗教生活信条化浪潮中的标志性事件——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做出的应对。“信条化”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在16世纪，处于天主教—新教分界线上的所有教会都忙于信条规范化、教士教育、戒律强化和圣礼仪式标准化，并通过与世俗权威的合作来实现。到了17世纪中叶，彼得·莫希拉领导下的东正教会也加入了这场欧洲大合唱。

值得一提的是，自1240年的蒙古入侵之后，基辅这座城市就几乎从东正教世界的地图上消失了，此时扮演着东正教改革领导角色却是基辅，而不是莫斯科或君士坦丁堡。除了前文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了这一现象。“动荡之年”过去之后，莫斯科的牧首们相信除了莫斯科沙皇国之外没有真正的宗教，因此不光与西方隔绝，也被东方基督教世界摒弃。处于奥斯曼人控制下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尝试仿照新教模式进行改革，却未能沿这条路走下去。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里尔·卢卡里斯在1629年用拉丁语出版了一部深受新教教理影响的东正教信仰的《释疑》（*Confessio*），却在1638年被苏丹下令绞死，罪名是唆使哥萨克人进攻奥斯曼帝国。同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会议因卢卡里斯的神学观点将他革出教门。竞争发生在莫希拉和卢卡里斯之间，也发生在东正教改革的天主教模式和新教模式之间，最终莫希拉的模式取得了胜利。他的改革运动将在接下来的150年中对东正教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布列斯特联合的影响下，无论广义的联邦内的整个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社会，还是狭义的乌克兰精英阶层，都分裂为两个教会阵营。这种分裂在今天的乌克兰仍然存在。然而有关布列斯特联合命运的斗争也让这个社会对其共性——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尽管斗争中充斥着激烈的言辞，偶尔还发生实质性的暴力，它却促成了一种新的多元政治宗教文化的诞生。这种多元文化允许讨论，包容不同意见。东西方基督教世界交界地带的位置为乌克兰带来的，不是一个融合两种基督教传统的“边界”教会（这顶帽子往往为联合教会所专享），而是两个。在寻求对自身的改革和适应布列斯特联合之后几十年间新情况的过程中，东正教会同样拥抱了来自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新潮流。17世纪初，要想在乌克兰境内画出一条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清晰分界线，比现在更加困难。

在这条宗教分界线的两侧，关于布列斯特联合的论争都起到了帮助罗斯社会从知识长眠中苏醒的作用。辩论者们涉及的话题有罗斯的皈依和基辅都主教区的历史，有教会、立陶宛大公爵治下罗斯国土和卢布林联合之后的东正教信仰的各种权利，也有后来那段时期的王室法令和议会解决方案。对于能够阅读并参加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发展中的人而言，论争者们创造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如果说论争者们在宗

教议题上各执一词，他们却都对那个被他们称为罗塞尼亚民族（*naród Ruski*）的实体表现出了最高敬意，并都宣称自己是在为它的利益而战。

---

[1] 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当代美国政治学家，以其作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闻名于世。

[2] Uniate，现称东方天主教会或东仪天主教会，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包括20多个自治教会。它们完全承认罗马教廷地位，但保存了与其有关的各东方基督教会的仪式。

[3] Archimandrite，东正教会和东方天主教会中由主教任命的高级修道院院长，负责对某座大修道院或数座普通修道院履行监督之责。

[4] Jesuit，意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成员或“耶稣会的”。耶稣会是天主教会的主要男修会之一，创立于1534年。

[5] Jarosław，今波兰东南部城镇。

[6] 指1439年至1445年间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它是罗马天主教的第17次大公会议。由于拜占庭帝国希望借罗马教廷的影响力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因此也有许多东方教会受邀与会。这次会议造成许多东方教会与天主教的共融。一些东仪天主教会由此诞生。

[7] Clement VIII（1536—1605），1592—1605年在位。

[8] Brest，今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首府。

[9] Ipatii Potii（1541—1613），基辅及加利西亚都主教（1599—1613年在任）。

[10] Kyryl Terletsky（？—1607），曾历任图罗夫-平斯克主教和卢茨克-奥斯特罗主教，他是第一位被君士坦丁堡任命为督主教（Exarch）的乌克兰人。

[11] Sigismund III（1566—1632），波兰国王、立陶宛大公西吉斯蒙德三世（1587—1632年在位）。他也曾出任瑞典国王（1592—1599年在位），称西吉斯蒙德。

[12] Piotr Skarga（1536—1612），波兰耶稣会士，波兰-立陶宛联邦中反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以辩才闻名。

[13] Meletii Smotrytsky（约1577—1633），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乌克兰作家、语言学家，曾任波洛茨克大主教。其作品对东斯拉夫语发展有深远影响。

[14] 此即基辅主显兄弟会学校（Kyiv Epiphany Brotherhood School），见本书第8章注。

[15] Theophanes III（约1570—1644），东正教耶路撒冷牧首（1608—1644年在任）。

[16] Yov Boretsky（?—1631），基辅、加利西亚及全罗斯都主教（1620—1631年在任）、著名的教会领袖、教育家和东正教护教者。

[17] Navahrudak，今白俄罗斯西部城市。部分学者认为新格鲁多克在13世纪曾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

[18] Władysław IV Vasa（1595—1648），波兰瓦萨王朝国王及立陶宛大公（1632—1648年在位）。

[19] Peter Mohyla（1596—1647），基辅、加利西亚和全罗斯都主教（1633—1647年在任），出生于摩尔达维亚，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神学家。

[20] Hospodar，多种斯拉夫语言中господар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意为“主人”“领主”。

[21] Liturgicon，乌克兰东正教会最重要的圣礼仪轨著作，1629年出版于基辅。在1721年被俄罗斯东正教会采用的文本取代。

[22] Confession of the Orthodox Church，莫希拉主持编撰的问答式著作。

[23] Cyril Lucaris（1572—1638），希腊主教及神学家、亚历山大希腊牧首西里尔三世及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西里尔一世。他致力于利用新教神学来对正教会进行改革。1629年，新教加尔文教在日内瓦出版了冠以卢卡里斯之名的拉丁文版《东方基督教信仰释疑》（Eastern Confess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即下文中的Confessio），并在1633年出版希腊文版本。

第10章 大叛乱

史称“大叛乱”的哥萨克起义在1648年春天爆发。这是16世纪末以来的第七次大规模哥萨克暴动。联邦镇压了前六次，但这一次叛乱的规模已经大到无法镇压。它改变了整个地区的政治版图，并诞生了一个被许多人视为近代乌克兰雏形的哥萨克国家。它也开启了俄罗斯涉足乌克兰事务的漫长历史，被广泛认为是作为不同民族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关系史的开端。

大叛乱始于对一块政府赠地归属权的争执，与1591年克里什托夫·克辛斯基领导的第一场哥萨克叛乱如出一辙。争吵发生在一名显贵和下层贵族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1]之间，后者碰巧还是一名哥萨克军官。时年53岁的赫梅尔尼茨基曾在多次战斗中为国王尽忠竭力，并在1638年的哥萨克叛乱之后担任哥萨克军团书记官[2]。在他位于苏博季夫[3]的庄园被一名联邦高官的仆从夺走后，赫梅尔尼茨基向宫廷求助，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却被他的强大对手送进了监狱。他逃了出来，直奔扎波罗热的锡奇。锡奇的哥萨克叛乱者像亲人一样欢迎他的到来，并推选他为统领。其时为1648年3月，“黄金和平”终结，大叛乱登场。

截至此时，事态的发展还与从前的哥萨克叛乱没什么两样，但赫梅尔尼茨基改变了人们已经熟悉的模式。他没有立刻到北方去摧城拔寨进而面对联邦军队，而是先前往南方寻找同盟。他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颠覆了惯常的草原政治生态，向克里米亚可汗表示出善意，并向对方提供了一个机会。谨慎的可汗许可他的臣属——克里米亚以北的诺盖部落——加入哥萨克人阵营。对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叛军而言，这不啻一个意外的大喜。尽管哥萨克人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总以骑手的形象出现，但在17世纪中叶哥萨克士兵大都是步兵。他们没有自己的骑兵部队，因为维持一支骑兵部队的费用太过昂贵，只有贵族才养得起适合作战的军马，往往还不止一匹。通过与马上作战的鞑靼人建立新同盟，赫梅尔尼茨基解决了缺少骑兵的问题。从现在开始，哥萨克人不再只能攻打防守薄弱的边境城镇，也不再只能躲在自己营垒中防守，而是可以在战场上与波兰军队正面作战。

没过多久，这次结盟就证明了它的价值。1648年5月，哥萨克和鞑靼联军击败了两支波兰军队：一次是在若夫季沃季（黄水）[4]附近，距扎波罗热的锡奇北面的通道不远；另一次是在中第聂伯河地区的小城科尔松[5]。除了近4 000名诺盖骑兵参与这两次战役外，哥萨克人成功的关键还在于约6 000名在册哥萨克士兵决定倒戈，抛弃了他们的波兰主子，加入了赫梅尔尼茨基的叛乱。波兰的常备军全军覆没。其两名主将——王室大统领和王

室副统领——以及数百名军官都成为鞑靼人的俘虏。

哥萨克人的意外成功震动了整个联邦，然而赫梅尔尼茨基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位统领对下一步行显得犹豫不决。1648年6月，随着波军的溃败和联邦陷入一片混乱，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给自己放了一个夏日假，回到故乡奇希林[6]思索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然而叛军们拒绝止步不前。原有的在册哥萨克人部队在基辅以南的小城比拉采尔科瓦附近驻扎下来，但整个乌克兰其余地方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受到哥萨克胜利的鼓舞，农民和市民都起来夺取权力。他们进攻大地主的庄园，袭扰他们撤退中的雇佣军，找贵族清算旧账，并四处追捕天主教牧师。然而在1648年夏天的农民叛乱中被伤害最深重的，却是乌克兰犹太人。

赫梅尔尼茨基在叛乱之初写给当局的第一批信件里就提到了犹太承租人。这位哥萨克统领控诉了王室官员们、团长们（指挥在册哥萨克人的波兰军官）、“甚至”还有犹太人对哥萨克人做出的“不可忍受的不公行为”。犹太人只是被赫梅尔尼茨基顺便提到，在他的敌人序列里只能排到第三或第四位。然而右岸乌克兰地区的叛军们有他们自己的优先目标。此地的犹太人从1648年6月开始遭到全面袭击。进攻犹太人的叛军往往将他们（尤其是犹太男子）杀害，这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社区的覆灭。在1648年夏天的三个月里，叛军几乎将右岸乌克兰地区的全部犹太人社区从地图上抹去。由于我们不知道叛乱之前有多少犹太人生活在这里，也就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受难者，但大多数学者估计有1.4万到2万名犹太人丧生。考虑到事件发生的年代和地点，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尽管17世纪的乌克兰经济发展迅速，它相对而言仍属人烟稀少的地区。

20世纪的犹太和乌克兰历史学家十分重视17世纪第聂伯乌克兰地区反犹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城镇中犹太工商业者与基督徒工商业者之间的对立，还有犹太承租人作为贵族和农民之间中间人的角色，都可以部分地解释哥萨克叛乱中发生的暴力现象。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乌克兰犹太人遭受的攻击中的宗教动机。在基督徒-犹太人分野中的任何一方，宗教都是决定社会身份的关键因素。内森·汉诺威[7]是记录这些屠杀事件的编年史作者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将攻击者称为“希腊人”，意在表明他们的东正教信仰，而不是表明他们所属的民族。部分叛乱者要求在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改宗，认为这是自己的宗教责任。许多犹太人由于被强制改宗基督教而保全了性命。其中一些人加入了哥萨克群体，另一些则在被灭族的威胁消除后重归犹太教信仰。

到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军队在1648年秋天渡过第聂伯河西进时，这一地区远至卡缅涅茨[8]（位于波多里亚）和利维夫（位于加利西亚）等波兰要塞的犹太人、波兰贵族和天主教牧师群体都已被他们消灭。联合教会的信徒们也消失了：他们要么向西撤退，要么改宗了东正教。后一个选择倒是不

费什么力气：很少有人了解或关心教理上的问题，因此两个东方基督教会之间的差别仅仅是辖区不同。新召集的波兰军队试图阻止哥萨克-鞑靼联军的西进，却在波多里亚的匹里亚乌奇[9]再次大败。到1648年年底，哥萨克人与鞑靼人的部队已经围困了利维夫和波兰-乌克兰族群边界上的小城扎莫希奇[10]。但他们并没有继续前进。此时在哥萨克军和华沙之间并无军队防守，决定攻势到此为止的不是军事因素，而是政治考量。

此时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新诉求已与叛乱第一个月时不同，不再是保护哥萨克的权利和待遇，但也并不是联邦的毁灭。1649年1月到2月间，波兰使节在基辅东南的佩列亚斯拉夫拜见了这位哥萨克统领。在谈判中，赫梅尔尼茨基公开了他的新计划。他宣布自己是罗斯唯一的统治者，并威胁要将波兰人赶到维斯瓦河以西。此时的赫梅尔尼茨基必定是将自己视为了基辅罗斯王公们的继承者。

1648年12月，赫梅尔尼茨基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在基辅为自己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基辅都主教对这位统领表示了欢迎。耶路撒冷牧首也同样做出友好的姿态，将赫梅尔尼茨基称为王公，并为他对波兰人的战争进行祝福。莫希拉建立的基辅学院的师生们热切地迎接罗斯的新领袖，将他称为将罗斯民族从波兰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摩西。他们一直未敢对他们的前一位庇护者——两年前去世的都主教莫希拉——献上这样的荣誉。这位哥萨克统领肩负起了整个民族的领袖责任，不再只为哥萨克人的权利而战。他保护罗斯民族权利的办法是创建一个“公国”，或者说一个国家。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哥萨克人刚出现时尚处于社会边缘，处于一个成熟政治体的对立面，现在却开始思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问题。

新国家的疆界将在战争中划定。1649年夏天，划界过程中最关键的战役在沃里尼亚小城兹博里夫[11]附近爆发。在克里米亚可汗伊斯兰三世格莱[12]率领的鞑靼人的帮助下，赫梅尔尼茨基的军队向新任波兰国王约翰二世卡齐米日[13]的军队发起进攻。依靠鞑靼盟友的助力，哥萨克人取得了胜利，迫使波兰官员签署协议，对联邦里这个名为自治实为独立的哥萨克国给予王室的承认。国王同意将在册的哥萨克人的名额增加到4万人。（实际上此时兹博里夫的哥萨克军的兵力已达到10万人，由哥萨克、农民和市民组成。）哥萨克人得到了在联邦东部三个省内居住（实际上是统治）的权利。这三个省是基辅、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它们共同组成在历史上被称为“哥萨克国”[14]的新哥萨克国。哥萨克国的很大一部分正好位于被早年间的波兰和法国制图师们称为“乌克兰”的草原地区。不久以后，哥萨克国将以“乌克兰”之名为人所知。

新国家的元首及军事长官就是哥萨克统领。他在其参谋部的协助下统治哥萨克国土。参谋部包括一名书记官、一名炮兵指挥、一名法官及其他军

官。早期哥萨克时代的军事民主在叛乱的第一个月还起到了关键作用，此时却已成为历史。团长们和参谋部成员们的会议取代了每个哥萨克人都有权参加的大会，一切重要事务都由他们决定。由于针对采邑制度的叛乱摧毁了旧的经济体系，杀死或驱逐了该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包括犹太人在内），而农民都宣布自己是哥萨克人，拒绝为贵族耕种田地，这个新生的国家只能依靠战利品、关税和对碾磨谷物收取的磨坊税来充实自己的国库。

老的联邦行政体系在理论上得以保留。基辅总督的职位归于一位忠于国王的东正教贵族，但哥萨克统领掌握着实际统治权，甚至不需要向国王报告他的行为。基于他们的边境地区经验和军事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哥萨克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引入了一种受奥斯曼帝国军事或行政模式影响的新行政系统。他们将哥萨克国分为一个个“团区”，设立团长来管理每个区的行政、司法和财政机构——当然，最重要的是管理其军事组织。这样的团区一共有20个，每一个都以其最主要的城市命名，并必须拥有一支可以随时作战的哥萨克团。这种将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结合在同一个部门的结构也为更小的城镇和村庄所沿袭。管理这些底层单位的长官被称为队长，其主要任务是在战时集合起一支连队（“百人队”）。

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结盟使哥萨克人在叛乱前两年的胜利成为可能。这次结盟也将赫梅尔尼茨基卷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网络，因为奥斯曼人在黑海北岸地区拥有许多附庸国，其中包括克里米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这些国家与伊斯坦布尔的关系为赫梅尔尼茨基提供了一个样板，让他得以建立相对于国王的独立性，而不需要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哥萨克国家地位。哥萨克乌克兰已经做好接受苏丹保护的准备，就像奥斯曼人的其他附庸国一样。这正是赫梅尔尼茨基在1651年春天和夏天与伊斯坦布尔谈判的核心内容。为了应对与联邦的另一次大冲突，他甚至签署了一份承认奥斯曼帝国苏丹宗主地位的文件。

赫梅尔尼茨基需要的回报是直接的保护，也就是需要奥斯曼帝国军队真正向波兰军队发动进攻，就像他们1620年在楚措拉和1621年在霍京所做的那样。但此时奥斯曼人正忙于和威尼斯人的海战，无法脱身。年方9岁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15]的顾问们没有派出自己的军队，而是命令克里米亚可汗为赫梅尔尼茨基提供军事支援。这并非哥萨克统领所希望的回报，因为克里米亚人有自己的算盘：他们希望让这一地区的冲突尽可能延续下去，以免哥萨克人对联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649年的兹博里夫战役正是如此：克里米亚可汗选择了与波兰国王媾和而非帮助赫梅尔尼茨基打败波兰军队。同样的事情完全可能再次发生。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确实再次出现了，并且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发生的。

1651年夏天，在沃里尼亚的柏列斯台奇可[16]附近发生的战役中，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两军交战正酣时撤离了战场，导致哥萨克军主力部队被包围歼灭。与可汗一同撤退的赫梅尔尼茨基成了自己盟友的人质。他被释放后重新组织防御，才避免了哥萨克国的灭顶之灾。这场灾难终结了赫梅尔尼茨基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依赖。1651年秋天，他与联邦订立了一份新的协议：在册哥萨克人名额被减半到2万人；哥萨克国的范围被缩减到基辅省；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则将重归联邦的直接管辖。由于这样的条件并没有兑现，另一场战争似乎就在眼前。

哥萨克国需要新的盟友。赫梅尔尼茨基把目光锁定在摩尔达维亚公国身上。摩尔达维亚是奥斯曼帝国的正式属国，但一直在伊斯坦布尔与华沙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关系。1650年，这位哥萨克统领向摩尔达维亚派出一支哥萨克军队，迫使对方与他正式结盟。他还说服摩尔达维亚统治者瓦西里·卢普[17]将其女儿罗克珊达（Roxanda）嫁给自己的儿子提米什[18]。哥萨克人在柏列斯台奇可战败后，卢普试图将自己从这桩结盟中解脱出来，却没有成功。1652年，赫梅尔尼茨基再次派出数千名“提亲者”前往摩尔多瓦。“提亲者”们在途中的巴提赫之战中击败了一支波兰大军，随后在瓦西里·卢普的宫廷里为提米什和罗克珊达举行了婚礼。赫梅尔尼茨基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成为受到国际承认的君主中的一员。

仅仅通过与奥斯曼人及其附庸的联盟，赫梅尔尼茨基的所获终究有限。这一事实在1653年秋天得到惨痛的证明。当时哥萨克人正在波多里亚的日瓦涅茨[19]小镇附近对王室军队作战。哥萨克一方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再一次阻止了哥萨克人获得胜利。战役的结果正如克里米亚可汗所愿，没有分出胜负。波兰王国和哥萨克国再次回到他们在兹博里夫签署的协议上：在册哥萨克人名额为4万人，三个省归哥萨克人管辖。人人都清楚这只是另一次停火，而非实质性的妥协或持久的和平。哥萨克人想要的是整个乌克兰和一部分白俄罗斯，而波兰国王（议会更甚）甚至不打算承认哥萨克人在其实际控制的三个省的管辖权。

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国必须寻找不一样的盟友。尝试与联邦当局达成妥协逐渐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而哥萨克人只靠自己无法在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克里米亚人允许他们起来抗争，但不能接受他们击败波兰人。奥斯曼人没有派出自己军队的打算，而与摩尔达维亚人的结盟则以赫梅尔尼茨基的个人悲剧告终。1653年9月，他的21岁的长子提米什在苏恰瓦要塞[20]（今属罗马尼亚）的守城战中被杀死。进攻方是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21]的联军——这两个国家的君主对赫梅尔尼茨基与卢普的结盟不满。1653年12月底，赫梅尔尼茨基把他的儿子安葬在位于苏博季夫自己的庄园里，离奇希林不远。葬礼在新建的圣伊利亚教堂举行。这座教堂是哥萨克草原上的巴洛克式建筑的典范，至今尚存，并成了乌克兰

纸币上的图案。埋葬了提米什之后，这位年迈的哥萨克统领将自己的国家纳入奥斯曼帝国政治体系的计划也宣告终结。

赫梅尔尼茨基叛乱国际化过程的转折点发生在1654年1月8日，地点是佩列亚斯拉夫城。这一天，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率领匆忙召集起来的一群哥萨克军官，向乌克兰的新君主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谢·罗曼诺夫[22]宣誓效忠。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漫长而纠缠不清的关系从此开始。1954年，苏联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三百周年。庆祝意在暗示全乌克兰人都在佩列亚斯拉夫选择了重归俄罗斯，并接受沙皇的统治。然而1654年在佩列亚斯拉夫真正发生的事情并非如苏联历史学家所声称，它既不是乌克兰与莫斯科沙皇国（它后来被彼得一世[23]改称为“俄罗斯帝国”）的重新结合，也不是两个“兄弟民族”的再次携手。1654年，没有一个身处佩列亚斯拉夫或莫斯科的人会从族群的角度来考虑或谈论问题。

莫斯科沙皇国使馆的材料中记录了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在哥萨克军官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从这份讲话中，我们得以略微了解这位乌克兰统领对其选择做出的介绍和解释：

> 我们已经召开了一次全体人民都可以参加的会议。这样你们可以和我们一道，有机会从四位君主中自由选择一位。第一位是土耳其沙皇（苏丹）——他多次通过使节请求我们接受他的统治；第二位是克里米亚可汗；第三位是波兰国王——只要我们愿意，他仍会给予我们像从前一样的恩遇；第四位是信仰东正教的大罗斯[24]君主、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东部的君王——六年来我们一直向他恳请庇护。现在，按你们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吧！

很明显，赫梅尔尼茨基耍了一个花招。他和哥萨克军官们早已做出选择，决定倒向莫斯科的君主。根据莫斯科沙皇国使馆的报告，这位首领利用听众对东正教共同体的情感来打动他们。参加会议的人都高喊他们希望信仰“东方”正教的沙皇成为自己的统治者。

这听起来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中那些基于宗教的联盟一样。此时“三十年战争”[25]才刚刚结束五年。在这场战争中，欧洲各国所结成的联盟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各自的宗教认同。我们无须指责莫斯科或乌克兰的精英集团不把对方视为兄弟和同属一个罗斯民族的成员。双方甚至需要翻译才能相互理解。在俄罗斯档案中，保存至今的赫梅尔尼茨基写给沙皇的信件大部分是这些官方译员提供的翻译件。以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为代

表的基辅罗斯传统依旧存在，但仅仅是存在于几部手抄的编年史中。

四个世纪以来，未来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一直身处不同的政治环境，受不同的国家统治。这加剧了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在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团长们打算跟俄罗斯使节瓦西里·布图尔林（Vasilii Buturlin）商谈协议条款时，这样的差异就浮出了水面。布图尔林告诉哥萨克人说，沙皇将给予他们超过波兰国王能提供的待遇，但拒绝谈判。赫梅尔尼茨基表示反对，声称他们已经习惯于与国王和其官员们谈条件。然而布图尔林回答说，波兰国王只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君主，地位不能与继承制的俄罗斯沙皇相比。他同时还拒绝就他向哥萨克人做出的宽泛承诺起誓，理由是沙皇从来不向臣民宣誓。赫梅尔尼茨基亟须莫斯科人的军队尽快投入战斗，最终在无法得到对方誓言的条件下同意向沙皇宣誓效忠。

哥萨克人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视为对双方义务做出约定的契约。就赫梅尔尼茨基而言，他和他的政治体进入了沙皇权威的羽翼之下。他们承诺效忠并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莫斯科的保护。然而在沙皇眼中，哥萨克人只是一群新的臣民，他在为他们提供了一定权利和待遇之后就不再负有任何义务。至于他对新领土的权利，沙皇是从王朝传承的角度来看待的。对沙皇和他的内阁来说，他只是在接管自己祖传的遗产，即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这三座城市。

无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法律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何，沙皇还是兑现了布图尔林许下的承诺，向哥萨克人提供了波兰国王从未同意过的待遇：承认哥萨克国的国家地位、6万人的在册哥萨克人名额，以及哥萨克人领地享受特别优待。他还同意给予他们波兰国王治下其他阶层所享受的自由。

然而，这份协议首先奠定的是一个军事同盟的基础。它没有为哥萨克领地划定西面的边界，这意味着只有刀剑能决定他们能向西走多远。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从各自的战线上对波兰-立陶宛联邦开战了。在一支莫斯科部队的协助下，哥萨克人从波兰王国境内的乌克兰发动了攻势，而莫斯科自己的军队则从斯摩棱斯克附近开始进攻，并向西穿过白俄罗斯，推进到立陶宛境内，也就是划分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卢布林边界以北。尽管1654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在克里米亚可汗的援助下抵挡住了东线的进攻，到了1655年夏天和秋天，联邦的反攻却崩溃了。哥萨克人再次围困了利维夫，而莫斯科人的军队则进入了立陶宛大公国的都城维尔纽斯。

这是波兰历史上“大洪水时代”（Deluge）的开端。不光是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深入了波兰-立陶宛联邦领土，到了1655年7月，瑞典人也渡过波罗的海向联邦发起进攻。同年10月，华沙与波兰旧都克拉科夫[26]都已

落入瑞典人之手。瑞典人对被莫斯科军队征服的那部分立陶宛大公国领土也提出了要求。莫斯科沙皇国开始担心波兰的彻底崩溃及瑞典的急剧膨胀。1656年秋天，莫斯科的外交官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在维尔纽斯签订和约，终结了波兰与莫斯科之间的敌对状态。由于未获允许参加谈判，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哥萨克军官们被激怒了。莫斯科人与波兰单独媾和意味着哥萨克人需要再次独自面对他们的宿敌。对他们来说，沙皇违反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中他的主要义务——为其臣民提供军事保护。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无视莫斯科与波兰之间的和约，派出军队帮助瑞典的盟友——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统治者——对抗波兰。如今，连沙皇与哥萨克人之间的军事同盟也摇摇欲坠。瑞典与波兰甫一开战，赫梅尔尼茨基就已经开始物色新的盟友。瑞典人似乎决心摧毁波兰-立陶宛联邦，而这也正是赫梅尔尼茨基所希望的。这位哥萨克统领眼中沙皇对乌克兰的背叛行为发生后，关于乌克兰-瑞典协议的谈判加快了。如果这份协议达成，波兰-立陶宛联邦就将被彻底终结，也能保证哥萨克国不仅能占有整个乌克兰，还能获得如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

赫梅尔尼茨基没能活着看到这个新国际同盟的达成。他在1657年8月去世，将他打造的这个国家和他领导的哥萨克人抛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尽管赫梅尔尼茨基认为他与沙皇的联盟已经结束，他仍在形式上遵守着他在佩列亚斯拉夫达成的交易。佩列亚斯拉夫发生的事件成为这位年迈统领留下的巨大而有争议的遗产中的重要部分。18世纪的哥萨克编年史作者们对赫梅尔尼茨基大加颂扬，与1648年12月他进入基辅城时基辅学院的师生们如出一辙。他们赞美他为民族之父，是打碎波兰人加诸他的人民的枷锁的解放者，也是在与沙皇的谈判中取得了最好结果的哥萨克统领。在佩列亚斯拉夫谈判之后获得沙皇批准的《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条款》也被颂扬者们视为一份保护俄罗斯帝国境内乌克兰人自由的《大宪章》[27]。

---

[1] Bohdan Khmelnytsky（约1595—1657），哥萨克国首任酋长（1648—1657年在位）。他领导了赫梅尔尼茨基起义，建立了哥萨克国。他在1654年与莫斯科沙皇国订立《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使得乌克兰最终被并入俄罗斯。

[2] Chancellor，哥萨克军团中负责各种文书和联络工作的高级军官。后文中的总书记官（General Chancellor）则是哥萨克国中央行政机构总军事书记处（General Military Chancellery）的首脑，负责监督统领的国内外事务，掌管印玺、档案、文书和法令起草等事务，并有代理统领签署命令的权力。

[3] Subotiv，乌克兰西南部城镇。

[4] Zhovti Vody，乌克兰中部城镇，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其地名意

为“黄水”，得名于流经此地的若夫塔河（Zhovta River）。

[5] Korsun，在今乌克兰中部城市科尔松-舍甫琴奇夫斯基（Korsun-Shevchenkivskyi）附近。

[6] Chyhyryn，乌克兰中部切尔卡瑟州城市，在1648年至1669年间是哥萨克国的都城。

[7] Nathan Hannover（？—1663），罗塞尼亚犹太人历史学家、犹太教法学者。

[8] Kamianets，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城市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Kamianets-Podilskyi）。

[9] Pyliavtsi，位于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的匹里亚瓦村（Pyliava）附近。

[10] Zamość，今波兰东南部卢布林省城市。

[11] Zboliv，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城市。

[12] Islam III Giray（1604—1654），克里米亚汗国可汗（1644—1654年在位）。

[13] John II Casimir（1609—1672），波兰瓦萨王朝国王及立陶宛大公（1648—1668年在位）。John亦译作“扬”（波兰语作Jan）。

[14] Hetmanate，多译作哥萨克酋长国或哥萨克国。本书根据hetman一词的波兰军队指挥官的原意，统一将hetman一词译作统领而非酋长，故后文中的Cossack Hetmanate均简称哥萨克国，以免混淆。

[15] Mehmed IV（1642—1693），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1648—1687年在位）。

[16] Berestechko，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小城。

[17] Vasile Lupu（1595—1661），摩尔达维亚王公（1634—1653年在位）。

[18] Tymish Khmelnytsky（1632—1653），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长子，在1653年战死。

[19] Zhvanets，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的一个村庄，位于日旺奇克河汇入德涅斯特河的河口附近。

[20] Suceava，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达维亚及布科维纳地区城市，在14—

16世纪间曾是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

[21] Transylvania，今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在16—18世纪间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诸侯国。

[22] Aleksei Romanov（1629—1676），指莫斯科沙皇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45—1676年在位）。

[23] Peter I（1672—1725），即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他于1721年将莫斯科沙皇国（沙俄）改为俄罗斯帝国。

[24] Great Rus'，指莫斯科沙皇国（后来的俄罗斯），相对小罗斯（哥萨克国）和白罗斯（今白俄罗斯东部）而言。

[25] Thirty Years' War，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欧洲国际战争，发生于1618—1648年间。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为肇始，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告终。

[26] Cracow，今波兰第二大城市，波兰南部小波兰省首府。

[27] Magna Carta，又被称为《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Libertatum），是英格兰国王约翰（1166—1216）最初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的贵族权益保障协议。1225年，经过修订的《大宪章》首次成为法律。

第11章
分裂

赫梅尔尼茨基的叛乱开启了一段漫长的战争时期，这令许多历史学家将叛乱之后的几十年称为“废墟年代”。乌克兰尤其是第聂伯河右岸遭受的摧残和人口减少的确对本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造成了巨大打击，然而战争最主要的长期后果则是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在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之间的分裂。作为边界的第聂伯河成为乌克兰早期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认为这条分界线有其意义——它对居住在从前波兰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的文化倾向（某些时候也包括政治倾向）产生了影响。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对哥萨克国的期待是领土的扩张，而非被分割成小块。然而哥萨克军官阶层内部的裂痕最终将导致哥萨克国的分裂。老统领在1657年8月去世后，裂痕很快变得明显起来，其导火索是对本地区最高领导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在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政治体中并不鲜见。赫梅尔尼茨基原本打算建立自己的王朝。在他死前不久，他主导了一场推选，将自己的儿子尤里[1]推上了统领宝座。尤里是一个体弱多病的16岁年轻人，时常发作癫痫。读过亚历山大·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2]的人对接下来将发生的事都不会感到惊讶。一名被指派为摄政的老练朝臣废黜了尤里（不同的是，乌克兰的这场政变中没有流血），接下来又导演了一场推选让自己成为统领的闹剧。

导致分裂的戏剧大幕已经拉开。如果说赫梅尔尼茨基曾期待哥萨克国的继承制度像波兰那样，通过选举将同一个王朝的成员一个接一个送上王位，实际出现的模式却更类似摩尔达维亚公国的情况——新君主的获选和废黜都由奥斯曼人的意愿或许可来决定。与摩尔达维亚不同的是，有三个强权参与了对乌克兰的争夺：莫斯科沙皇国、波兰和奥斯曼帝国。无论三强中哪一个获胜，哥萨克人都是输家。他们的继承制度完全是一团糟，为整个地区带来的只有动荡。

在1657年秋天将尤里·赫梅尔尼茨基推翻并接过统领权杖的人是伊凡·维霍夫斯基[3]。他一生的轨迹和事业与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截然不同。维霍夫斯基出身于一个东正教贵族世家，其贵族地位从无疑问。他被推选为统领是哥萨克精英集团中贵族们的胜利，而非1648年前就是在册哥萨克的老资格军官们的胜利。这个角度也清楚地解释了他对新任总书记官的选择。这个位置没有落到一名老资格哥萨克军官手中，而是被一名乌克兰大贵族取得。这名贵族名叫尤里·涅米里奇[4]，他的田产足以与弗什涅维茨基家族的

王公们比肩。

以当时的标准而言，涅米里奇所受的教育堪称极为优秀。他属于波兰宗教改革中被称为“反三一派”[5]的激进派。（“一位论”教会[6]的创立者之一约瑟夫·普利斯特里[7]在17世纪晚期将持这一立场的教派带到了美国。）涅米里奇在波兰的一所反三一派学校里学习，后来迁往西欧，在莱顿、巴塞尔等地（据某些记载也包括牛津和剑桥）的大学深造。在波兰的“大洪水时代”，他站在了同为新教徒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世[8]一边。然而他很快对瑞典人感到失望，改宗了东正教，成为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朋友，并迁居哥萨克乌克兰，以便接近统领归还给他的田产。

哥萨克序列中的许多人对大权落入伊凡·维霍夫斯基领导的贵族集团手中不满。第聂伯河险滩以南的哥萨克人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反对。他们曾在1648年推选赫梅尔尼茨基成为统领。然而，此后新的哥萨克国在草原以北第聂伯河中游的农耕地区崛起，不仅夺走了他们独享的选举统领的权力，也夺走了他们的名号——哥萨克国的正式名称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如今被边缘化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提出应在第聂伯河险滩以南重新举行一次统领选举。他们对维霍夫斯基当选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而部分哥萨克团长也准备听听他们的意见，并给予支持。同样重要的是，莫斯科也在支持维霍夫斯基的反对者，承认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直接与沙皇使节接触的资格。莫斯科当局的打算是利用哥萨克群体中的分裂来削弱统领的权力，令其无法像其前任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那样独立自为。

维霍夫斯基不打算任人摆布。1658年6月，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下，维霍夫斯基的军队在左岸乌克兰的波尔塔瓦[9]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及其在哥萨克国内的盟友们对垒。维霍夫斯基取得了胜利，但也伤亡惨重。根据一些估计，这次战役中约有1.5万人死亡。这是1648年以来哥萨克人之间第一次内战，并从此创立了一个先例，最终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毁灭。维霍夫斯基确信莫斯科在叛军背后撑腰，但他要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呢？

和赫梅尔尼茨基一样，这位统领相信自己与沙皇之间的协议是有条件的（他将之称为“自愿归顺”），一旦沙皇不能履行其义务，他就可以废除这份协议。然而沙皇并不承认协议所附加给他的条件，他只承认自己加于臣民的条件。当赫梅尔尼茨基对自己与沙皇之间的约定不满时，他除了倒向瑞典人和奥斯曼人之外别无他途，但他的继任者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波兰人做交易。哥萨克人本来就是波兰政治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对波兰人的力量和弱点一清二楚。他们相信，让哥萨克国重归波兰-立陶宛联邦同时保持其广泛的自治，不仅值得追求，也完全可能实现。

1658年9月，维霍夫斯基在左岸乌克兰小城哈佳奇[10]召集了一次哥萨克

会议。会议批准了哥萨克国回归波兰国王治下的条件。由此达成的波兰-哥萨克条约被称为“哈佳奇联合”，是维霍夫斯基的股肱之臣尤里·涅米里奇的智慧成果。这个条约完全称得上把乌克兰贵族阶层在17世纪上半叶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围绕布列斯特联合发生的斗争中，东正教贵族们对卢布林联合做出了一种与时代错位的解读，认为其不仅承认立陶宛大公国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内的平等伙伴，也承认联邦中的罗斯地区为平等伙伴之一。如今涅米里奇决定把这一愿望变成现实，其手段是将哥萨克国塑造成罗斯公国，以与波兰和立陶宛平等的第三方身份加入联邦。

哥萨克大叛乱让部分波兰精英对罗斯公国这一概念持比从前更开放的态度，但哥萨克群体的崛起也造成了其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结构，增加了重归的难度。于是，参照1648年前哥萨克上层提出的要求，哈佳奇联合立刻向1 000个哥萨克家族授予了贵族地位，并每年为每个哥萨克军团提供100个家族的贵族名额。除了满足哥萨克人的社会地位需求外，哈佳奇联合还满足了哥萨克人及其贵族们关于宗教的要求。只有东正教徒才能在新的公国里担任行政职务。奇特的是，这个条约中还包含一条关于彼得·莫希拉创立的基辅学院的条款，承认其为一所高等学院。很明显，代表哥萨克一方前来谈判的贵族们感兴趣的不只是哥萨克权利。

哥萨克人与波兰人重归于好的消息促使沙皇发出呼吁，号召哥萨克人起来反抗“叛徒”维霍夫斯基。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和反对维霍夫斯基的哥萨克人（包括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夺取了哥萨克国的南部地区。1659年春天，维霍夫斯基也发出呼吁，争辩说是沙皇违反了他与哥萨克人的协议，侵犯了哥萨克人的权利和自由。他召集了克里米亚盟军，对挺进中的莫斯科军队发动了攻击。1659年6月，战斗在今天俄罗斯-乌克兰边界附近发生，被称为“科诺托普[11]之战”。这场战役以维霍夫斯基的大胜告终。超过10万人的莫斯科军队被击败，4万多人阵亡。莫斯科人的精锐骑兵也被歼灭。鞑靼人乘胜追击，洗劫了莫斯科沙皇国的南部边境。莫斯科城内关于沙皇即将逃离首都的谣言也四处流传。

维霍夫斯基未能向莫斯科进军。尽管他在科诺托普取得胜利，莫斯科人在乌克兰的守军仍坚持战斗，而哥萨克人中反对维霍夫斯基的一派也恢复了力量。有关波兰议会批准哈佳奇联合的消息更加快了他们的恢复：最后在议会通过的条约未能满足波兰谈判代表向维霍夫斯基许下的承诺。尽管哥萨克统领希望得到今天乌克兰西部的地区，包括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但条约将新公国的领地限制在基辅、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戈夫三省。它还将在册的哥萨克人的数量限制在3万人，外加1万名雇佣兵，即总共4万人，比赫梅尔尼茨基在佩列亚斯拉夫谈判后很快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6万人名额少了2万人。尤里·涅米里奇曾亲自赶往华沙，在议会为哈佳奇联合申辩。“我们生而自由，在自由中成长。我们也将作为自由人重归自由。”他

对议会代表们说。最终议会批准了联合，但不是涅米里奇和维霍夫斯基想要的版本。收到修改过的版本后，维霍夫斯基告诉信使说他带来的是死亡。

如今维霍夫斯基被大部分哥萨克人视为了叛徒。涅米里奇在与维霍夫斯基的反对者们的冲突中被杀。波兰议会中其他哥萨克代表也在统领的敌人召集的哥萨克会议上被处死。维霍夫斯基本人不得不逃之夭夭。他取得了每一场战斗的胜利：在波尔塔瓦之战中他击败了反对派，在科诺托普之战中他击败了莫斯科军。他输掉的只是自己集团内部关于与波兰关系的争论。从统领之位退下之后，维霍夫斯基逃往西乌克兰，成为波多里亚地区巴尔城[12]的长官，同时保留了基辅省总督的头衔和随之取得的波兰上议院席位。这是哈佳奇联合中唯一得到真正执行的条款。

维霍夫斯基担任统领的时代为哥萨克乌克兰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以内部纷争和同族相残为标志的一页。由于单凭哥萨克军队的力量不足以保住哥萨克国，每一个成为统领的人都必须保持哥萨克群体的团结，同时还必须不断在地区强权之间周旋。几乎没有人能成功完成这样的任务。赫梅尔尼茨基通过严刑峻法才让哥萨克军官们服从管束：他的手段包括将作乱者绑在大炮上（1648年屠杀事件的主导者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13]就曾受到这种处罚），甚至下令处死哥萨克中的叛变者。维霍夫斯基没能保住哥萨克国内的统一。这一任务再次落到了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儿子尤里身上。维霍夫斯基被推翻后，尤里再度被选为统领。赫梅尔尼茨基的王朝回来了，但乌克兰的问题仍然远未得到解决。

1659年秋天，尤里·赫梅尔尼茨基在一些哥萨克军官的支持下上台。这些军官相信他们能同沙皇达成协议，而且不会比老赫梅尔尼茨基争取到的条件差。然而他们失算了。尤里和他的支持者开始与莫斯科人谈判时，才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新的哥萨克会议在一名莫斯科军事长官（*voevoda*）的提议下召开了，会场周围却是一支4万人的莫斯科沙皇国军队。会议确认了小赫梅尔尼茨基的当选，但条件是削减他父亲曾得到的权利和待遇。从此哥萨克统领选举都需要得到沙皇的明确首肯，而获选的统领也无权处理外交事务，也不能不经莫斯科的同意就任命团长。此外，哥萨克国内的所有主要城市都要有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驻扎。

维霍夫斯基倒向波兰没能像他的对手们期待的那样让莫斯科人做出让步，反而让他们削减了哥萨克国先前拥有的权利。沙皇的官员希望臣民们明白：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容忍有人破坏与莫斯科达成的联合。1660年1月，莫斯科沙皇国的总督们给小赫梅尔尼茨基送去了一个信号以明确这一点。在一次对基辅的莫斯科驻军发动的袭击失败后，丹尼洛·维霍夫斯基（Danylo Vyhovsky）——前统领的兄弟、小赫梅尔尼茨基的表亲——落

到了莫斯科人手里，被折磨至死。他的尸体旋即被送到年轻的新统领位于苏博蒂夫祖产的住处。看到丹尼洛的棺材的那一刻，这位统领痛哭流涕。“他全身被鞭子抽烂，挖空的眼眶里塞进了银子，耳朵也被人用钻头挖开，同样塞上了银子。”一名当时碰巧在场的波兰外交官写道，“他的手指被削掉，双腿也被人沿着脉管切烂。总之，如此残忍闻所未闻。”

如果沙皇和他的官员们希望借此恐吓年轻的统领和他的部属，他们没能达到目的。根据同一篇记述，这位哥萨克军官惨遭屠戮的遗体不仅让小赫梅尔尼茨基流下了眼泪，也在他的宫廷中激起了愤怒。丹尼洛·维霍夫斯基年轻的遗孀对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发出了诅咒。复仇在这一年晚些时候来临。1660年秋天，在莫斯科军与一支受克里米亚鞑靼人支持的波兰部队的战斗中，小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军队改变了阵营，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莫斯科军被击败了，其指挥官成为克里米亚人的俘虏，长达20年之久。

尽管波兰人的胜利令哥萨克人喜悦，它却没能为哥萨克国带来好处。哥萨克人重归波兰国王治下，却不得不接受比哈佳奇联合曾为波兰议会批准那个版本更苛刻的条件。新的条约直接删掉了“罗斯公国”这些对哈佳奇联合的哥萨克推动者们至为重要的字眼。在莫斯科人与波兰人争夺乌克兰的战争中，哥萨克人每一次改变阵营，都会失去更多的主权。对哥萨克人的政治体而言，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王国这两个对手太过强大。他们施加的压力很快就超出了这个酋长国所能承受的极限，让它沿着第聂伯河分裂成了两部分。

1660年，当尤里·赫梅尔尼茨基在第聂伯河右岸建立自己的大本营时，位于左岸的哥萨克军团在莫斯科人的支持下选出了他们自己的临时统领。赫梅尔尼茨基发动了一系列进攻，试图征服叛乱的军团，却没能实现目标。那一地区接近莫斯科沙皇国边界，沙皇国的军事长官们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跟。1663年年初，22岁的统领彻底绝望，宣布退位，并归隐于一座修道院。统一的哥萨克国至此正式终结。同年，右岸哥萨克人选出了一位忠于波兰的统领，而左岸则选出一位承认莫斯科沙皇国统治的统领。4年后，也就是1667年，莫斯科和波兰的外交官们签署了安德鲁索沃[14]停战协议，将哥萨克乌克兰分成两部分。左岸归于莫斯科沙皇国，右岸归于波兰。

老的哥萨克国并非没有进行抗争就任人宰割。彼得罗·多罗申科[15]是哥萨克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的后裔。他率领那些将哥萨克国视为真正祖国并反对其分裂的人揭竿而起。多罗申科的祖父在17世纪20年代曾担任哥萨克人的统领，他的父亲则是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部下的一名团长。他本人出生于奇希林，在统领的宫廷中开始了他的生涯。被升为团长后，他参与了一系列外交任务，其中包括与瑞典人、波兰人和莫斯科人的谈判，甚至曾率领

一个哥萨克使团前往莫斯科。作为尤里·赫梅尔尼茨基的支持者，他投向了右岸乌克兰，并在1665年被右岸的哥萨克人选为统领。

哥萨克乌克兰将被分割的消息让哥萨克精英阶层感到震惊，也激起了他们的斗志。多罗申科赢得选举也正是因为他承诺将再度发起对波兰的反抗，并将统一第聂伯河两岸的乌克兰地区。与他之前的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一样，多罗申科依靠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他们的联军在1667年秋天对波兰军队发起进攻，迫使国王承认右岸哥萨克国的自治权。随后多罗申科东渡第聂伯河，夺取了左岸乌克兰——当时左岸已经发生了反对莫斯科人的叛乱。出于征税的目的，沙皇的官员们试图发起一次普查，这令左岸哥萨克人感到不满。当乌克兰将被分割的消息从安德鲁索沃传来时，不满变成了公开的叛乱。

已是右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的多罗申科在左岸也被选为统领。尽管身处两大瓜分势力之间，哥萨克国仍然再度统一起来。然而这次统一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多罗申科就不得不离开左岸乌克兰，前去对付波兰人的新攻势以及他们扶植的一名新统领。莫斯科的军队借机占领了左岸地区。如今多罗申科只剩下奥斯曼人可以指望。1669年7月，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给他送来了新的仪仗（insignia of office），其中有一柄统领权杖，还有一面旗帜。苏丹将多罗申科和他部下的哥萨克人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之下，条件与他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统治者的一样：一经召唤，他们就要为苏丹动员自己的军队。伊斯坦布尔想要的不仅是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乌克兰，还包括维斯瓦河以东和涅曼河[16]以南的全部罗斯土地。

伊斯坦布尔的野心甚为远大，然而此刻的局势似乎有利于哥萨克人将20年前赫梅尔尼茨基的梦想变成现实，将波兰-立陶宛联邦内的全部罗斯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次奥斯曼人送给哥萨克统领的不只是仪仗，还有实实在在的军队。1672年，一支超过10万人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渡过多瑙河，在其臣属克里米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加上现在的哥萨克人的配合下，对波兰军队发动了攻势。他们的兵锋深入联邦，远远越过了霍京（半个多世纪前那场关键战役的发生地），将波多里亚的卡缅涅茨要塞团团围困。这座要塞地处悬崖之上，周围是一道深谷，被认为是不可能攻克的天险。然而仅仅被围10天之后，卡缅涅茨要塞就落入了奥斯曼人手中。很快苏丹的军队又围困了利维夫。波兰人选择媾和，放弃了波多里亚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多罗申科和他的支持者们沉浸在喜悦之中。

然而多罗申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奥斯曼人将卡缅涅茨要塞和其周边的波多里亚地区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哥萨克人获得了第聂伯河中游的旧地，却没有得到一个独立的国家。土耳其人没有打算将攻势延伸到第聂伯河左岸或向北进军沃里尼亚和白俄罗斯。而这还只是多罗申科的麻烦的开始。奥斯曼人将一些基督教堂改成了清真寺，并纵容克里米亚鞑靼人在这

一地区掳掠奴隶，这激起了民愤。在多罗申科名义上的统治下，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人口迅速减少，而他的支持者减少的速度也不遑多让。随着本地居民向东西两个方向逃亡，右岸地区变得寥无人烟。许多人渡过第聂伯河前往左岸。此时莫斯科人已经粉碎了左岸哥萨克精英阶层的叛乱，扶植了一名顺从的新统领，并开始推动经济的复苏。右岸却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也是乌克兰历史中整个“废墟年代”的得名由来。

多罗申科离开乌克兰政治舞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他不仅没能将乌克兰统一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关系松散的保护国，反而引入了又一个宰割乌克兰的强权，而这一个比之前的强权更具毁灭性。1676年，莫斯科人的军队在其左岸哥萨克友军的支持下渡过了第聂伯河，进军多罗申科的都城奇希林。这位哥萨克统领辞去了他的职务，并向沙皇宣誓效忠。沙皇放了他一条生路，反而因为他的“弃暗投明”而授予他总督的头衔，让他前往莫斯科以东近900千米的维亚特卡（今基洛夫）为沙皇工作。他得以在今天莫斯科州的村庄雅罗波勒兹（Yaropolets）退休。多罗申科娶了一名俄罗斯贵妇为妻（他们的后裔之一是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妻子娜塔莉亚[17]），并在1698年死于雅罗波勒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9年，一个波多里亚人社团在多罗申科的坟墓上建起了一座小教堂——波多里亚是受奥斯曼人统治祸害最烈的地方，而将奥斯曼人带到乌克兰的正是多罗申科。

奥斯曼人对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直接统治没有持续多久。他们没有把太多注意力放在这片边境地区，而是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取资源，尤其是地中海地区。多罗申科去世的那一年，波多里亚就重归波兰的统治。奥斯曼人离开了这个舞台，而第聂伯河也完全恢复了莫斯科沙皇国-波兰王国边界的地位。哥萨克国并未完全消失，但其领土和自治权（更不用说独立性）都遭到严重削减。如今哥萨克国只存在于左岸乌克兰。17世纪上半叶曾繁盛一时的哥萨克土地可以集聚足够的人力、财力和军力来挑战本地区的强权，却不能保护哥萨克革命取得的成果。至于外国盟友，哥萨克人可以说是尝试了所有可能性——从克里米亚人和奥斯曼人开始，至莫斯科人、瑞典人和波兰人结束。没有一个选择获得了成功。不仅哥萨克乌克兰，连整个乌克兰地区都失去了统一性。直到18世纪末，大部分从前由波兰掌握的乌克兰地区仍分属波兰和俄国。这一分裂状态将对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

[1] Yurii Khmelnytsky（1641—1685），他曾多次短暂出任哥萨克国统领和后来的奥斯曼乌克兰哥萨克统领。

[2] Boris Godunov，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1799—1837）的悲剧作品，描述了沙皇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戈东诺夫（Boris

Fyodorovich Godunov，1552—1605；1598—1605年在位）的一生。鲍里斯去世后其子费多尔继位，不久就被暴动者杀死。

[3] Ivan Vyhovsky（？—1664），哥萨克国统领（1657—1659年在位）。

[4] Yurii Nemyrych（1612—1659），波兰贵族、哥萨克政治家。

[5] Antitrinitarians，基督教中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主张并无《圣经》根据的派别。宗教改革后，波兰兄弟会在波兰兴起，极力反对三位一体论。

[6] Unitarian Church，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的基督教派别。此教派强调上帝只有一个位格。16至17世纪，有组织的一位论派出现于匈牙利和波兰，之后传到英美等地。

[7] Joseph Priestley（1733—1804），18世纪英国自然哲学家、化学家、牧师、教育家和自由政治理论家。

[8] Charles X（1622—1660），即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古斯塔夫（1654—1660年在位）。

[9] Poltava，今乌克兰中部波尔塔瓦州首府。

[10] Hadiach，今乌克兰东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1] Konotop，今乌克兰北部苏梅州城市。

[12] Bar，今乌克兰西部文尼察州城市。

[13] Maksym Kryvonis（？—1648），赫梅尔尼茨基叛乱时期哥萨克切尔卡瑟团团长，以作战勇猛和手段残忍知名。

[14] Andrusovo，今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

[15] Petro Doroshenko（1627—1698），哥萨克政治和军事统帅，曾任右岸乌克兰统领和莫斯科沙皇国的维亚特卡（今俄罗斯基洛夫州首府基洛夫）总督。

[16] Nieman，亦作Neman，东欧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白俄罗斯山区，流经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俄罗斯，注入波罗的海，全长937千米。

[17] Natalia Pushkina（1812—1863），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之妻，当时莫斯科最受人瞩目的名媛之一。1837年普希金在与丹斯特的决斗中被丹斯特卑鄙地抢先开枪击中。普希金去世后，她守丧7年后再嫁。

第12章 波尔塔瓦的裁决

以莫斯科沙皇为宗主，哥萨克国仅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得以存续，并成为各种民族开创事业的温床。其中一种潮流可以与“乌克兰”这个词挂上钩：它视哥萨克国为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和祖国，并由此成为近代乌克兰民族认同发展的根源。另一种则与哥萨克国的官方名称“小俄罗斯”联系在一起，后来我们所知的“小俄罗斯主义”（将乌克兰视为“次俄罗斯”、将乌克兰人视为大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由它而来。

在1708年哥萨克统领伊凡·马泽帕[1]掀起最后一次大规模哥萨克叛乱之前，这两种知识传统一直在哥萨克国内并存。马泽帕叛乱针对莫斯科沙皇国，也针对俄罗斯帝国的正式开创者沙皇彼得一世。这场叛乱在俄军击败跟随卡尔十二世[2]进入乌克兰的瑞典军队后结束。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3]深刻地改变了哥萨克国和整个乌克兰的命运。马泽帕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整体，而卡尔十二世的失败对他和他关于乌克兰的设想则是双重的打击。接下来的一段岁月里，将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与俄罗斯紧密联系起来的小俄罗斯主义阐释将在哥萨克国的官方话语中占据统治地位。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特的祖国、政治体乃至民族的观点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将在一个多世纪中远离乌克兰话语的中心。

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莫斯科人得以将左岸乌克兰置于自己掌控之下，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军力强大，也是因为他们比竞争对手更富于弹性。尽管沙皇们利用每一次哥萨克统领选举来削减哥萨克国在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时期获得的权利和优待，他们也懂得一张一弛。1669年，在彼得罗·多罗申科叛乱期间，莫斯科就曾同意重新回到与赫梅尔尼茨基所获待遇相近的条件。当第聂伯河另一侧的哥萨克人本就少得多的优待条件遭到波兰人削减时，莫斯科人就是这么做的。其结果不难想象：波兰治下的哥萨克地区的人们纷纷被吸引到左岸定居，左岸的经济得到持续发展，而右岸则变成了一片真正意义上的荒漠。在允许哥萨克人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沙皇们也成功地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子民。

没过多久，左岸的经济发展就带来了基辅的经济和文化复兴。基辅学院重新开课；在17世纪50年代曾经逃离的教授们迎来了新一批学生；学院开设了新的科目；诗人们创作新的诗篇；剧院也开始上演新戏。在17世纪早期由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开创的乌克兰巴洛克文学在伊凡·维里奇科夫斯基[4]的诗歌和拉扎尔·巴拉诺维奇[5]的散文中达到顶峰。巴拉诺维奇曾是基辅学院的一名教授，后来成为切尔尼戈夫大主教。他的学生西蒙·波罗茨基

[6]将基辅的巴洛克文学风格带到了莫斯科，并在那里帮助奠定了俄罗斯世俗文学诞生的基础。基辅的作品、实践和观念在17世纪下半叶不断向莫斯科沙皇国传播，在该国东正教会中造成了一次分裂。沙皇和牧首支持彼得·莫希拉式的革新，保守派们却群起反抗，团结在遵奉“旧信条”[7]的领袖周围。难怪官方教会对他们的称呼“拉斯科尔尼奇”（*raskol'niki*，意为“分裂者”）也来自乌克兰。

然而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基辅的教士们在将西式文化的样本从乌克兰带到莫斯科沙皇国的同时，也从莫斯科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获得武器。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将信奉东正教的沙皇视为这个新的政治和宗教世界的枢纽。波兰-立陶宛联邦中的东正教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没有一位自己的君主，因此渴望能有机会进入一个拜占庭式的理想东正教世界，一位专制君主与唯一真教会能够琴瑟和鸣的世界。然而最终现实的考量压过了理想主义。早在17世纪20年代，新获得圣职的东正教会主教们因为受到华沙的打压，选择了莫斯科作为他们的后盾和可能的避难所。对沙皇保护的渴求在佩列亚斯拉夫协议（1654）之后变得更加强烈，并在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1667）将哥萨克一分为二之后达到顶点。

根据停战协议的条款，位于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本应在两年的宽限期后归属波兰。再次回到天主教君主统治之下的前景让基辅的教士阶层恐惧不已，于是他们发挥了自己从基辅学院和欧洲的耶稣会学校学到的全部说服能力，让沙皇相信基辅应该留在他手中。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基辅洞穴修道院掌院因诺肯季·吉泽尔[8]是“说服沙皇”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愿望是将基辅留在沙皇治下，同时保留基辅都主教区的独立地位。然而事与愿违。沙皇在17世纪70年代成功留下了基辅。下一个十年，乌克兰境内的莫斯科沙皇国官员和他们的支持者成功地将基辅都主教区的管辖权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莫斯科。管辖权的转移发生在1685年——基辅的教士得到了沙皇的保护，却付出了失去独立的代价。

对基辅的未来的争夺催生了现代以前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第一册印刷版罗斯历史“课本”，这本书在吉泽尔掌管的洞穴修道院出版，有一个长长的巴洛克风格的名字：《关于斯拉夫—罗斯民族起源、神佑之城基辅的早期王公及神圣而虔诚的基辅及全罗斯大公、开国君主弗拉基米尔生平的诸编年史简编或略要》（*Synopsis,or a Brief Compendium of Various Chronicle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lavo-Rossian Nation and the First Princes of the Divinely Protected City of Kyiv and the Life of the Holy, Pious Grand Prince of Kyiv and All Rus', the First Autocrat, Volodymyr*，以下简称《略要》）。它第一次出版是在1674年，当时基辅正准备应对奥斯曼人的进攻，而波兰人也要求莫斯科人归还基辅。在这本《略要》中，基辅被描述为历代莫斯科沙皇的第一个首都和莫斯科式东正教信仰的诞生

地，是一座不可能丢弃给异教徒或天主教徒的城市。书中有关斯拉夫-罗斯民族的内容更加支持了这样的论点：根据《略要》作者们的说法，因为有斯拉夫-罗斯民族，莫斯科沙皇国与哥萨克国才得以结合成一个政治实体。这为许多俄罗斯人至今仍然相信的一个神话打下了基础，即他们的民族起源于基辅。然而在17世纪，莫斯科沙皇国的精英阶层并未思考民族血缘的问题。将莫斯科沙皇国和乌克兰的居民们视为同属一个民族的是基辅的修士们。直到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建造者们才会完全体会到基辅修士这种创见的好处。

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对乌克兰的分割导致了一种危机。在这种危机下被迫产生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不仅有基辅的教士们，也有哥萨克军官阶层。在这方面，哥萨克精英们已经不再需要依赖教士们的创造：基辅学院的毕业生中不仅有牧师和主教，也有哥萨克军官，甚至包括不少统领。如果说教士们无法设想一个没有东正教沙皇的家园，哥萨克军官们却根本不需要什么沙皇。他们的忠诚归于一个共同的哥萨克"祖国"，第聂伯河两岸都在它的怀抱之中。

在1663年之前，也就是乌克兰第一次发生事实分裂那一年之前，哥萨克军官们用"祖国"这个词描述整个波兰-立陶宛联邦或波兰王国。在1658年的哈佳奇联合时期，正是回归波兰祖国的念头诱使他们回到波兰国王治下。然而分裂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一位又一位的统领开始在他们的通函或公告中呼吁乌克兰祖国的统一，而乌克兰祖国指的正是包括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国。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之后，所有的统领（包括彼得罗·多罗申科和尤里·赫梅尔尼茨基在内）都将乌克兰祖国的利益描述为他们的最高效忠对象，高于其他任何忠诚和义务。哥萨克祖国的范围超越了哥萨克人更传统的忠诚目标——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它不仅包括哥萨克军团，也包括哥萨克国的领土及其居民。统领们将这个祖国称为"乌克兰"。1667年之后，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人都开始用"乌克兰"来称呼他们的祖国。

最后一名尝试将第聂伯河左岸和右岸统一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哥萨克统领是伊凡·马泽帕。只有两位统领的形象出现在乌克兰独立后发行的纸币上。一位是五赫里夫尼亚纸币上的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另一位就是十赫里夫尼亚纸币上的伊凡·马泽帕。在乌克兰之外，尤其是在西方，马泽帕可能比赫梅尔尼茨基更为知名：伏尔泰、拜伦勋爵、亚历山大·普希金和维克多·雨果都描述过马泽帕的生平和功勋。他出现在欧洲歌剧院和北美剧场的演出中，以"Mazeppa"（他的名字的法语拼写）之名，以一位君主和一位爱人的形象在文学和文化中赢得了声名。在马泽帕担任哥萨克统领期间，两种不同的祖国概念——乌克兰和小俄罗斯——再次展开了竞争，而他统治的结果则是一种新的小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形成。

马泽帕统治哥萨克国的时间超过20年（1687—1709），比他的任何前任都要长，并最终得享天年。这本身就已经算是一个成就——他的前任中有两人或被杀害，或被判处死刑。马泽帕之前的两名统领都在被控“叛国罪”后遭莫斯科派遣的总督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家人也遭到迫害。仅仅是得罪莫斯科的朝臣们就足以让一名哥萨克统领丢掉职衔、自由甚至性命，不需要他犯下阴谋反对沙皇或尝试与波兰人、奥斯曼人或瑞典人合作等罪行。

马泽帕的生命轨迹反映了17世纪最后数十年间哥萨克群体的普遍命运。这位将来的统领出身于左岸乌克兰的一个东正教贵族家庭，在基辅莫希拉学院和华沙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在西欧学习了炮兵技术。回国后，年轻的马泽帕在波兰国王的宫廷中开始了他的外交和军事生涯。他在后来加入了哥萨克统领彼得罗·多罗申科的阵营，却被与莫斯科人结盟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俘虏。根据那个首先由伏尔泰向西欧读者讲述后来又被许多人重复过的故事，马泽帕落到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手中是因为一件结局悲惨的风流韵事。据称他是一名波兰高官年轻妻子的情人。高官发现这桩情事之后，下令将马泽帕剥光衣服绑到一匹马身上，然后将这匹马放入荒原。在这个故事中，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马泽帕，并将他救活。无论故事的真相如何，可以肯定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让马泽帕的哥萨克生涯得以平步青云。他们将这个俘虏送到了统领伊凡·萨莫伊洛维奇[9]那里。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并见多识广的军官，马泽帕得到了伊凡的任用。

在17世纪的后几十年中，大批哥萨克显贵、普通士兵、市民和农民从第聂伯河右岸迁到了俄国人控制的左岸乌克兰。马泽帕也是这股迁移潮流的一员。政治的稳定，外加哥萨克国从沙皇那里得到的相对广泛的自治权，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复苏。正如彼得·莫希拉时代一样，复苏的中心仍然是都主教驻地基辅，是洞穴修道院和基辅学院。接任统领之后，马泽帕尽其所能地推动哥萨克国的持续经济复兴以及宗教和文化生活的繁荣。

成为统领的马泽帕下令修复在漫长的哥萨克战争中年久失修的教堂，其中有莫希拉曾经修复过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有圣母安息大教堂和洞穴修道院的圣三一教堂。它们是基辅罗斯时代留下的建筑遗产的一部分。马泽帕还下令修建新的教堂，包括洞穴修道院的圣母诞生教堂，还有基辅和他的都城巴图林[10]（位于哥萨克国东北部，接近莫斯科沙皇国边境）城中的其他许多教堂。洞穴修道院之外的大部分教堂都没能在20世纪30年代幸存下来：布尔什维克们打算将基辅变成一座真正的社会主义首都，派出拆迁队将这些教堂拆毁。然而马泽帕在洞穴修道院内修建的那些教堂连同修道院的部分围墙得以保存至今，成为这位哥萨克统领的慷慨和财富的证明。这是莫希拉之后基辅城中第一次大兴土木。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建筑风格在

后来被称为哥萨克风格或马泽帕巴洛克风格。

与他之前的所有统领都不同，马泽帕是一名能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的统领。这是因为他从帝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沙皇彼得一世视马泽帕为他的忠仆。在彼得与其异母姐姐索菲亚[11]的权力斗争中，马泽帕选择站在未来沙皇一边。彼得在后来让马泽帕成为获授圣安德鲁勋章的第一人，那是彼得亲自设立的尊崇奖励。当哥萨克军官们向沙皇抱怨他们的统领并习惯性地控告他叛国时，沙皇将告发信交给了马泽帕，而没有采取莫斯科统治者们的传统做法——用这样的控告来打击哥萨克统领。彼得甚至允许马泽帕处死这些来自哥萨克精英阶层的告发者，向他展现出了更多的信任。

彼得-马泽帕同盟关系在170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时正值大北方战争（1700—1721）[12]的白热化阶段。战场位于波罗的海地区，交战双方是莫斯科沙皇国和瑞典及它们各自的盟友。战争之初，瑞典似乎占上风。在击败了莫斯科人的盟友、波兰的“强者”奥古斯特二世[13]并迫使他下台后，年轻而雄心勃勃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开始向莫斯科进军。彼得且战且退，使用焦土战术来拖慢敌军的进攻步伐。

这种毁灭性的手段加剧了哥萨克精英阶层早已有之的不满，将他们从彼得一方推向卡尔十二世。多年以来，哥萨克团长们一直向马泽帕抱怨彼得在哥萨克国境外对哥萨克军团的调用，尤其是利用他们来开掘圣彼得堡城内和周边的运河。（彼得在1702年建立了圣彼得堡，它将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由于严寒和疾病，哥萨克人在圣彼得堡像蚊蝇一样大量死去。雪上加霜的是，彼得还引入了新的税种及行政改革，让哥萨克国面临失去其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沦为莫斯科沙皇国普通省份的危险。团长们坚持认为，这一切都侵犯了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与莫斯科沙皇国之间订立的保护盟约。

马泽帕与卡尔十二世的波兰盟友们取得了联系，对他的各种外交政策选项进行了思量，但没有采取行动。瑞典国王在其进军莫斯科的路上决定绕道乌克兰，而沙皇却拒绝派出任何援兵。这意味着马泽帕必须独力保卫哥萨克国，并放火烧掉卡尔十二世进军路线上的村镇。直到此时，马泽帕才听从了团长们的要求，倒向了战争的另一方。尽管莫斯科沙皇国与历代哥萨克统领之间有众多的协议，它却没有执行它的首要义务——为哥萨克国提供保护。如今连左岸乌克兰也得考虑一下其他选择了。哥萨克军官们开始琢磨50年前的哈佳奇联合中提出的条件。1708年11月，马泽帕率领一群心腹之臣和一支哥萨克小部队离开了都城巴图林，加入了前进中的卡尔十二世的大军。

为了保密起见，在突然离开巴图林之前，马泽帕没有在哥萨克国内采取任何会刺激到彼得的行动。这对马泽帕的个人安全来说是一个审慎的决定，但对反叛本身则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得知马泽帕叛逃的消息后，彼得派他的得力干将亚历山大·缅什科夫[14]率领一个军团进入了乌克兰。没有一支哥萨克军队采取行动来阻止缅什科夫，于是莫斯科人的军队出其不意地夺取了统领的首都巴图林，获得马泽帕为自己和瑞典人的军队准备的大量军备物资。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巴图林的陷落对整个乌克兰社会造成的打击。缅什科夫不光夺取了这座城市，还下令屠城。包括妇孺在内，超过1万名巴图林守军和市民惨遭杀害。巴图林如今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一个考古重镇。在此工作的考古学家们至今仍不断发现死者的遗骨。缅什科夫发出的信号强烈而清晰：沙皇不会容忍叛变行为。

双方开始对哥萨克人和哥萨克国其他居民的忠诚展开争夺。争夺主要以公告的形式进行：彼得发出公告，马泽帕则以公告回敬。这场被称为“宣言之战”的争夺从1708年秋天持续到1709年春天。沙皇给马泽帕扣上叛国的罪名，将他称为犹大，甚至下令准备一个羞辱性的圣犹大勋章，好让他在马泽帕被抓获后给他戴上。马泽帕则拒绝接受这样的指控。与他之前的维霍夫斯基一样，他将沙皇与统领之间的关系视为契约。在他看来，沙皇侵犯了曾经许给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继任者们的权利和自由。这位统领争辩说：他的忠诚不归于君主，而是归于哥萨克军团和乌克兰祖国。马泽帕也向他的民族宣示了忠心。他在1708年写道：“莫斯科，也就是大俄罗斯民族，向来憎恨我们小俄罗斯民族。它长久以来一直满怀恶意，一心要把我族驱向毁灭。”

由于“宣言之战”、莫斯科军的果断行动，以及在彼得授意下举行的新统领选举，马泽帕的阵营里出现了一道新的裂痕。那些曾经劝说马泽帕倒戈的团长们如今担心遭到报复，没有召集各自的部队前来为马泽帕效力。许多人加入了莫斯科人一方。在普通哥萨克士兵、市民和农民中，马泽帕也没有什么支持者。比起接受天主教徒、穆斯林或这一次的新教君主的统治，普通人更倾向一个信仰东正教的沙皇。当卡尔十二世与彼得的决战到来时，莫斯科一方比瑞典一方拥有更多的哥萨克人。

1709年7月初，在波尔塔瓦城附近的战场上，一支2.5万人的瑞典军团与两倍于己的莫斯科军相遇了。双方阵营中都有哥萨克部队，但都作为侧翼参战。这不光反映了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也说明哥萨克人不是欧洲国家正规军的对手——曾经令人胆寒的哥萨克军已经成了历史。约有3 000到7 000名哥萨克人站在马泽帕和瑞典人一方，而投向莫斯科人的哥萨克人要多出3倍以上。敌军的数量优势对卡尔十二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他曾击败过比这更多的俄国人和波兰人。但这一次不同了。在敌国土地上度过一个冬天之后，他的军队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强大。一向身先士卒的卡尔十二

世也在几天前受了伤。他把自己的责任分派给一批军官，而不是集中在一名指挥者手上。战斗来临之际，这样的安排在瑞典军中造成了混乱。

战斗以莫斯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卡尔十二世和马泽帕被迫逃离乌克兰，前往奥斯曼人控制的摩尔达维亚寻求庇护。1709年秋天，流亡中的伊凡·马泽帕在摩尔达维亚城市本德尔[15]去世。卡尔则直到5年后才回到他的王国。波尔塔瓦战役常被历史学家们视为大北方战争的转折点。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奇特的转向：一场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的军事冲突在乌克兰战场上一决胜负，导致瑞典失去了它在北欧的霸主地位，并使俄国踏上了跻身于欧洲大国之林的道路。然而，在波尔塔瓦战役造成的各种后果中，最富戏剧性的无疑是战役发生地出现的变化。

莫斯科人的胜利为基辅教士阶层和沙皇当局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1708年秋天，沙皇就曾迫使基辅都主教将马泽帕谴责为叛国者，并将他革出教门。波尔塔瓦战役之后，曾将马泽帕比作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基辅学院的院长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16]在沙皇面前做了一次长篇布道，对他的前恩主进行谴责。这些会被马泽帕视为变节的行为在彼得眼中却是忠心的宣示。普罗科波维奇在后来成为彼得的改革中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将支持彼得夺取绝对权力的努力，并将提出一种论证，证明彼得有权在其君位的传承上打破寻常的父终子继模式——彼得以叛国罪将自己唯一的男性继承人送上了审判台，并让他死于牢狱之中。[17]普罗科波维奇是《灵魂规训》[18]一书的主要作者。这本书以由一名世俗官员担任主席的圣主教公会[19]取代了牧首在俄国东正教会中的统治权。他还支持将彼得称为“祖国之父”的观念。从前普罗科波维奇和其他基辅教士们用这个称号颂扬马泽帕，如今却将它带到了莫斯科沙皇国。

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辉煌的帝国生涯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现象，即帝国将受到西式教育的基辅学院毕业生收入彀中的努力。彼得需要这些人来实现对莫斯科沙皇国的教会文化和社会的西化改革。基辅学院的毕业生们纷纷流向莫斯科沙皇国，一开始数以十计，后来数以百计，并在那里开展他们的事业。他们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有东正教会临时首脑，有主教，也有随军牧师。其中一名基辅人——罗斯托夫[20]都主教季米特里·图普塔罗[21]——甚至因其对“旧信条”的斗争而被封圣。这些人不仅帮助彼得对俄国进行西方化改革，还通过宣传新俄罗斯祖国乃至新俄罗斯民族的理念，将俄国改造成一个近代政治体。乌克兰人，或者说小俄罗斯人，则被视为这个民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如果说彼得旨在加强其独裁统治和集中国家机构的政策为宗教领袖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机遇，这些政策对哥萨克军官们来说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马泽帕的叛逃令沙皇更加感到将哥萨克国整合到帝国体制和行政结构

中的迫切性。如今的哥萨克统领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22]受到一名俄国人的监督。他的都城从被夷为平地的巴图林迁到了距离俄国边界更近的赫卢希夫[23]。俄军如今也在哥萨克国内长期驻扎。追随马泽帕流亡的哥萨克军官的家眷们遭到逮捕，其财产也被没收。1721年大北方战争以俄国的胜利结束后，更多的变化接踵而至。彼得沙皇将莫斯科沙皇国改名为“俄罗斯帝国”，并自称为俄罗斯帝国第一代皇帝。接下来的几年中，沙皇利用斯科罗帕德斯基去世的机会直接取消了统领的职权，将哥萨克国置于被称为“小俄罗斯管理委员会”（Little Russian College）的机构管辖之下。管理委员会的首脑则是彼得指派的一名帝国军官。哥萨克人群起抗议，向圣彼得堡派出了一个请愿团以争取他们的权利。然而这些努力都落了空。沙皇逮捕了哥萨克反对者中的领袖帕夫洛·波卢博托克[24]团长。帕夫洛在圣彼得堡的圣彼得和保罗要塞[25]的一间囚室里死去。

马泽帕选择铤而走险，但最终失败。他一心要保护的哥萨克国同样失败了。我们无从知道如果卡尔十二世没有在战前负伤，而追随马泽帕的哥萨克人更多一些的话，哥萨克国的命运将会如何。我们能确知的是马泽帕的后继者们希望建设并在其中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方面的知识来自一份呈给皮利普·俄尔里克[26]、被称为《共识与条件》（*Pacta et conditiones*）的文件。俄尔里克是摩尔达维亚的流亡哥萨克人在马泽帕去世后选出的统领——不用说，这些流亡哥萨克人不会承认在彼得授意下被选出的斯科罗帕德斯基为他们的合法领袖。这份《共识与条件》在今天的乌克兰被称为《皮利普·俄尔里克宪法》，通常被视为乌克兰的第一部宪法。许多人骄傲地宣称它比美国宪法更早获得通过。事实上，与《共识与条件》最接近的应该是波兰议会选举国王所依据的条款。这份文件尝试通过保障哥萨克军官和普通哥萨克士兵的权利来对统领的权力做出限制。由于有许多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跟随马泽帕流亡，《共识与条件》对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权利保障尤为突出。

关于哥萨克国的过去、当下和将来，《共识与条件》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独特的视野。俄尔里克曾担任马泽帕的总书记官。聚集在他周围的哥萨克军官们没有去基辅罗斯和弗拉基米尔大公那里寻找自己的起源——那已经是被基辅的沙皇拥护者们据为己有的经典神话。他们将自己的血统上溯至哈扎尔人，也就是基辅罗斯之前的游牧先民之一。这一观点更多基于语言而非历史。虽然在今天看来可笑，但以早期近代的语言学标准视之，它却相当站得住脚。在乌克兰语中，“哥萨克”和“哈扎尔”这两个词的发音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十分接近。至关紧要的，是要主张确有一个独立而不同于莫斯科人所属民族的哥萨克民族存在。俄尔里克和他的军官们视情况不同会将这个民族称为哥萨克人、罗塞尼亚人或小俄罗斯人。然而俄尔里克的大部分观点不为其同胞们所知或者支持。在他们的故乡乌克兰，哥萨克人正努力为保住他们仅存的一点自治权而斗争。

彼得一世在1725年2月去世，比身陷囹圄的哥萨克团长波卢博托克去世晚了几个星期。哥萨克国内的哥萨克人将这看作上天对彼得施于他们的不义做出的惩罚，也看作拿回他们被沙皇褫夺的部分特权的良机。在他们的诉求中，恢复统领的职权成为第一要务。1727年，哥萨克军官们选举彼得早年的反对者丹尼洛·阿波斯托尔[27]担任新近重设的统领一职，完成了心愿。为了庆祝夺回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曾取得的这一特权，哥萨克人找出了这位老统领的一幅画像，恢复了对他的崇拜。他们不仅将赫梅尔尼茨基视为将哥萨克人从波兰的压迫下救出来的解放者，也视为哥萨克人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赫梅尔尼茨基的这种新形象让他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哥萨克国精英们的小俄罗斯主义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意味着只有维持哥萨克人的特殊地位和特权，才能换取他们的政治效忠。

这一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粗糙却有效的混合体，其中既有教士阶层的亲俄话语，也有哥萨克军官阶层的自治主张。小俄罗斯主义理念最显著的特点是对沙皇的忠诚，同时其身份认同又强调帝国中哥萨克民族的权利和待遇。哥萨克精英阶层眼中的小俄罗斯仅限于左岸乌克兰地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都不同于北方的白俄罗斯地区和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其余地方。这一新政治体和新身份认同的基因中有着明显的早期民族建构印记。在这一时期的哥萨克文献中（18世纪早期，哥萨克历史写作的出现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罗斯或罗塞尼亚、小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可以互换的名词。这样的用法有其逻辑，因为这些名词的背后是各种紧密相连的政治体和身份认同。

要确定这些名词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能找到的最佳类比莫过于一副套娃玩具。最大的一个套娃是后波尔塔瓦时代的小俄罗斯身份认同。它里面的一层是涵盖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乌克兰祖国理念。下一层是波兰-立陶宛联邦中的罗斯或罗塞尼亚身份认同。而在这套套娃的核心，所谓小俄罗斯身份认同中，则保存着关于古老的罗斯共同体和晚近的哥萨克乌克兰的记忆。乌克兰核心终将从小俄罗斯套娃的外壳里破茧而出，并对过去的哥萨克人曾拥有或追求的土地提出要求，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在波尔塔瓦战役刚刚结束之际，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

[1] Ivan Mazepa（1639—1709），彼得大帝时代的左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1687—1709年在任）。

[2] Charles XII（瑞典语作Karl XII，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年在位）、军事家。

[3] Battle of Poltava，俄国与瑞典的大北方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发生于

1709年6月27日。俄国在波尔塔瓦战役中的决定性胜利终止了瑞典作为欧洲北方霸主的时代。

[4] Ivan Velychkovsky（？—1726），乌克兰诗人、波尔塔瓦教区大司祭。

[5] Lazar Baranovych（1620—1693，一说1593—1694），乌克兰宗教、政治和文学界人士，曾担任基辅莫希拉学院院长、切尔尼戈夫大主教，并曾多次临时担任基辅、加利西亚和全罗斯都主教。

[6] Simeon Polotsky（1629—1680），白俄罗斯出生的俄罗斯诗人、戏剧家、牧师。他是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俄罗斯文化和教育西方化潮流的先锋。

[7] The Old Belief，指俄罗斯东正教会中“旧信徒”（Old Believers，或称旧礼仪派，Old Ritualists）所持的信条。旧信徒们为反对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尼孔（Nikon，1605—1681）的教会改革，于1666年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

[8] Inokentii Gizel（约1600—1683），日耳曼裔的东正教会圣人和文化人士，曾担任基辅学院哲学教授和基辅多座修道院的院长。

[9] Ivan Samoilovych（？—1690），左岸乌克兰的哥萨克统领（1672—1687年在任）。

[10] Baturyn，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古城。

[11] Sofia Alekseyevna（1657—1704），沙皇阿列克谢一世之女，曾任摄政（1682—1689年在位）。彼得一世亲政后，她夺权不成，被放逐为修女。

[12] Great Northern War，1700年至1721年间俄国与瑞典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俄国从此称霸波罗的海。

[13] Augustus II（1670—1733），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1694—1733年在位）、波兰国王及立陶宛大公奥古斯特二世（1697—1706、1709—1733年在位）。他因身形魁梧、力大无穷而获得了“强者”的绰号。

[14] Aleksandr Menshikov（1673—1729），彼得大帝时期俄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曾获俄罗斯帝国陆军大元帅、海军上将、最高枢密院成员、神圣罗马帝国亲王和俄罗斯帝国王公等头衔。

[15] Bender，今摩尔多瓦东南部城市。

[16] Teofan Prokopovych（1681—1736），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作家、哲学家。

[17] 这里指的是彼得大帝的长子阿列克谢·彼得洛维奇（Alexei Petrovich，1690—1718）。他曾在1716年逃往奥地利，希望逃离父亲的控制。回国后被控叛国罪，遭到残酷迫害，并死于狱中。

[18] Spiritual Regulation，彼得大帝时期的一部东正教会改革纲要。

[19] Holy Synod，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在1721年至1918年间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彼得大帝在莫斯科牧首阿德里安去世后设置。彼得大帝取消了牧首一职，代之以由沙皇任命的多名主教和世俗官员组成的宗教会议。

[20] Rostov，今俄罗斯西部雅罗斯拉夫尔州首府。

[21] Dymytrii Tuptalo（1651—1709），俄罗斯东正教会圣人、作家、神学家。

[22] Ivan Skoropadsky（1646—1722），左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1708—1722年在位），马泽帕的继任者。

[23] Hlukhiv（俄语作格鲁霍夫），今乌克兰东北部城市，紧邻俄罗斯。

[24] Pavlo Polubotok（1660—1724），哥萨克政治和军事领袖，曾在1722年至1724年间任左岸乌克兰临时统领。

[25] St. Peter and Paul Fortress，圣彼得堡的一座城堡，建于1706—1740年。

[26] Pylyp Orlyk（1672—1742），马泽帕的部下，摩尔达维亚境内流亡哥萨克人的统领。

[27] Danylo Apostol（1654—1734），左岸乌克兰统领（1727—1734年在任）。他曾在马泽帕叛乱中支持马泽帕，但在后来倒戈。

第三卷

帝国之间

BETWEEN
THE
EMPIRES

第13章
新的边界

东欧和中欧的地缘政治在18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和原因是俄罗斯帝国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增强。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之后，俄罗斯帝国就走上了成为欧洲超级大国的道路。俄罗斯帝国的首席大臣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1]——他是哥萨克国一个显赫军官家族的后裔——曾在17世纪末对一名年轻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欧洲每一发炮弹的发射都需要征得俄国的同意。"帝国的边界向西和向南迅猛推进。奥斯曼人不得不从黑海北岸退却，波兰-立陶宛联邦也已解体，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

许多乌克兰人的积极参与推动了这些巨变的发生。18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别兹博罗德科就是其中之一。别兹博罗德科促成的变化对他家乡的同胞也造成了影响。乌克兰如今成为地缘政治大变革的中心，既从这场变革中受害，也从中受益。此时哥萨克国已从欧洲和俄罗斯帝国的地图上消失。乌克兰境内的两条主要文化边界——东西方基督教分界线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分界线——也开始移动。俄罗斯帝国的疆域变化也改变了文化空间。在西方，俄国当局将天主教会和联合教会的扩散阻止在了第聂伯河一线，并将之向后压缩。在南方，草原边界的"消失"成为新的刺激因素，促使乌克兰向黑海和亚速海方向发展。

在研究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学家眼中，18世纪首先是一个启蒙的世纪。启蒙时代始于17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晚期。其特点是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理性在政治和哲学领域的兴起，这也是启蒙时代又被称为理性时代的原因。然而"理性"这个词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自由理念与保护个人权利是这一时期各种著作的中心议题，然而理性统治和君主专制同样如此。近代共和制和近代君主制同样深深植根于法国哲学家们的思想中。18世纪欧洲的专制君主和美国的建国者一样，深受启蒙思潮的影响。前者中包括三位在历史上被称为"启蒙独裁者"的君主——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2]、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3]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4]。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第二位使用各自名字的君主，都相信理性的统治、绝对的君主制和自己统治的正当性。除开这些，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参与了对波兰的多次瓜分（1772—1795），由此最终摧毁了波兰-立陶宛联邦在启蒙运动激发下进行的改革尝试。为瓜分波兰欢呼的不是别人，正是伏尔泰。他将对波兰的宰割视为自由主义和宽容的胜利，甚至是理性的胜利。他还给叶卡捷琳娜二世写信，称俄罗斯帝国政府将最终为欧洲的那片地区带来和

平。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俄罗斯帝国超过30年。她的构想和改革可以用如下原则来解释：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合理的统治，还有对帝国所有地区和所有臣民施行统一的标准。这些原则对哥萨克国来说都不是好兆头——哥萨克国是一个自治的国中之国，其存在的基础正是它在帝国内拥有的特殊地位。关于这一地区，女皇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帝国内部的边界，将哥萨克国完全纳入帝国。“小俄罗斯、利沃尼亚和芬兰都是拥有确定特殊待遇的省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4年写道，“我们应以尽可能和缓的方式，将这些省份和斯摩棱斯克俄罗斯化，以免它们一直像狼一样渴望回到森林。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很简单，选择明智的人担任这些省份的总督即可。一旦小俄罗斯没有了自己的统领，我们不光不应拔擢新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还要全力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关于统领和统领时代的记忆。”

彼得一世是第一个废除哥萨克统领的俄国君主。他在1722年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死后就这么做了。彼得一世于1725年去世。两年后哥萨克人选出一名新统领，恢复了哥萨克国的自治。然而这一次复国没能持续多长时间。18世纪30年代中期，帝国政府在哥萨克统领丹尼洛·阿波斯托尔死后禁止举行新的统领选举，哥萨克国再度归于政府机构小俄罗斯管理委员会的管辖之下。1750年，统领制度再度短暂恢复，但权杖并未落到某位哥萨克团长或总参谋部成员手中，而是归于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长，他的名字是基里洛·罗苏莫夫斯基[5]，是一名游历甚广、多才多艺的22岁的年轻人。

罗苏莫夫斯基出生于哥萨克国，在哥廷根大学接受教育，最主要的身份是一位帝国朝臣。他的少年得志和辉煌生涯得益于其家族的各种关系。他的哥哥阿列克西[6]是基辅和切尔尼戈夫之间的小城科泽列奇[7]的一名年轻人。他的歌唱天赋让他进入了圣彼得堡的宫廷合唱团，担任歌手和班杜拉[8]琴手。阿列克西在这里遇到了彼得一世的一名孙女、后来的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9]。他们成了恋人，据某些记述说他们还秘密结了婚。无论真相如何，反正哥萨克人阿列克西·罗苏姆变成了俄国伯爵阿列克谢·拉苏莫夫斯基（乌克兰语罗苏莫夫斯基），被一些朝臣称为“夜帝”。在“夜帝”的建议下，伊丽莎白女皇恢复了哥萨克统领职衔，并将它赐给了阿列克西的弟弟。

大罗苏莫夫斯基为伊丽莎白登上帝位立下了汗马功劳（1741年伊丽莎白登基时他是宫廷总管），小罗苏莫夫斯基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女皇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宫廷卫队的支持下通过政变上台，她的丈夫和合法君主彼得三世[10]则在政变过程中被暗杀。除开谋害其夫之外，本名索菲·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冯·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多恩堡（Sophie Friederike Auguste von Anhalt-Zerbst-Dornburg）的叶卡捷

琳娜对帝位的继承权也不太站得住脚。将叶卡捷琳娜拥立上台的人认为她因此欠了他们的情。“每名卫士在看到我时都可以说：‘是我让那个女人成了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说。乌克兰的哥萨克统领基里洛·罗苏莫夫斯基就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之一。他希望得到的回报是将统领之位改为世袭，而他在哥萨克国的臣民也想要更多的自治权和本地的立法权。

哥萨克人中的一些爱国者如今也将哥萨克国称为小俄罗斯，但将它视为与被他们叫作大俄罗斯的帝国核心平等的政治体。“我并非臣服于你，而是臣服于你的君主。”谢曼·季沃维奇[11]在其诗歌《大俄罗斯与小俄罗斯的对话》（“A Conversation Between Great and Little Russia”，1762）中写道。这首诗写于叶卡捷琳娜即位后不久，诗中一个拟人化的小俄罗斯向大俄罗斯说出了上面的话。季沃维奇在这句话之后继续写道：“不要以为你是我的主人，你我的君主才是我们的共同统治者。”这种将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的合并视为王朝联合的图景可以追溯到哈佳奇联合的精神。然而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无意统治一个主张特权和优待的政治联合体。她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它将以合理的方式被划分为各个行政单位，而非哥萨克国这样的国中之国。

叶卡捷琳娜二世将统领召回了圣彼得堡，并在1764年秋天整个撤销了哥萨克统领的职衔。希望破灭的不光是罗苏莫夫斯基，还有哥萨克国内的许多爱国者。新任的哥萨克国（如果它还能被称为哥萨克国的话）统治者是彼得·鲁缅采夫[12]将军。鲁缅采夫是俄罗斯人，其职衔是新创设的“小俄罗斯总督”，并统领着这一地区的俄国军队。他统治哥萨克国20多年。农奴制和帝国的税务邮政系统也在这个时期被引入了哥萨克国。18世纪80年代初，他主持取消了哥萨克国的领地自治权，并废除了基于哥萨克军团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哥萨克部队被纳入了帝国常备军。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整个帝国推广的新行政体制，哥萨克国的行政单位被整合成三个帝国省份。

在将她心目中那个秩序井然的帝国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无疑是从容不迫的。从废除统领职衔到将哥萨克国在行政上纳入帝国，同化哥萨克国的过程持续了差不多20年。转变以渐进的方式发生，没有引起新的叛乱，也没有制造出为乌克兰自治献身的烈士。这一过程也得益于许多哥萨克人的支持——他们将帝国对哥萨克国的吸纳视为天命。哥萨克国的许多体制和实践似乎都已经过时了，无法应对理性时代的挑战。帝国的整合将哥萨克部队变成了纪律严明的军队，还为哥萨克国带来了学校系统和正式邮政服务等公共设施。当然，整合也带来了农奴制，但几乎没有哥萨克军官对此提出抗议，毕竟他们是农奴劳动的受益者。

哥萨克精英阶层在哥萨克国和斯洛博达乌克兰——从17世纪开始即受俄国

直接管辖的哈尔基夫和苏米[13]周边地区——占有统治地位，但占这两个地区人口大多数的则是农民。18世纪中，这些农民发现自己不断失去的不光是土地，还有赫梅尔尼茨基叛乱取得的最大成果——自由。18世纪下半叶，哥萨克国内近90%和斯洛博达乌克兰境内超过一半的农民已经生活在别人的田庄上。田庄的拥有者包括东正教会和如今已成为贵族的哥萨克军官。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3年5月颁布法令，禁止生活在贵族田庄上的近30万农民离开他们的居住地，并强迫他们为地主无偿劳动。这是乌克兰的第三次农奴化浪潮。

一些观点认为：哥萨克国内至少有一个人发出了反对农奴化的声音，这个人就是瓦西里·卡普尼斯特[14]。他是波尔塔瓦地区一个哥萨克军官家族的后裔，写下了叶卡捷琳娜时代最知名的抗议诗篇——《奴隶制颂歌》（“Ode on Slavery”，1783）。部分学者认为卡普尼斯特抗议的是农民的农奴化，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他是在反对哥萨克国体制的废除。事实上，这两者可能都是他反对的目标。它们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发生，由同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推行。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给他的家乡带来的后果，卡普尼斯特没有掩饰他的失望。他用诗句来描述女皇如何对待自己的子民：“而你压迫他们，用锁链束缚那些为你祈祷的手。”

众多乌克兰精英在圣彼得堡度过了他们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都做出了贡献。卡普尼斯特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的《奴隶制颂歌》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经典的行列。在彼得大帝时代，乌克兰教士们纷纷迁往俄罗斯并加入帝国教会。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大量涌来的则是哥萨克军官的后代和基辅学院的毕业生。这些人更倾向于选择世俗的职业。仅在1754年到1768年间，这所高等学院就有超过300名毕业生选择为帝国服务或前往俄罗斯。他们所受的教育令他们可以轻松地在国外继续学业，之后再回来为帝国工作。整个帝国里乌克兰医生的数量是俄罗斯医生的两倍。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圣彼得堡师范学院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哥萨克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禁止乌克兰教士加入俄罗斯教会（她登基时，大部分俄罗斯主教都已经是乌克兰移民），但乌克兰人流入帝国行政部门和军队的速度并没有慢下来。

新一代哥萨克军官将他们对哥萨克国的忠诚与为帝国服务结合起来。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的生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747年，别兹博罗德科出身于哥萨克国的总书记官家庭，后来在基辅学院接受教育。如果他早出生几十年，这样的背景足以为他在哥萨克国内开始一段辉煌生涯打下很好的基础。但时代已经不同了。别兹博罗德科成了团长，但其上司已经不是哥萨克统领，而是小俄罗斯的帝国总督彼得·鲁缅采夫。年轻的别兹博罗德科参加了一次对奥斯曼人的战争，在许多战斗中展示了自己的勇气，并在担任鲁缅采夫的书记处负责人时表现优异。他在1774年成为团长，下一年

就到了圣彼得堡，受女皇亲自差遣。

1768年至1774年间的俄土战争加速了别兹博罗德科的晋升，让他从前哥萨克国来到帝国首都。不光是哥萨克国，整个乌克兰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巨大冲击。战争的导火索是1768年春天发生在右岸乌克兰的一场叛乱。

事实上，有两场叛乱同时发生：第一场是一次暴动，或者用当时当地的话来说，是（波兰的和波兰化的）天主教贵族的反抗“同盟”，针对的则是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授予宗教异见者（尤其是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同等权利的决议。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自己的使节迫使议会中的天主教代表们通过了这一决议——俄国使节威胁说他将调遣俄国军队来达成目标。对叶卡捷琳娜二世而言，这是证明她有资格代表俄国和东正教立场的方式。叛乱者们拒绝服从议会决议，将之解读为一个不仅会破坏他们的宗教，也会侵害他们的国家主权的俄国阴谋。这次贵族起义在波多里亚小城巴尔爆发，因此得名“巴尔同盟”。

巴尔同盟的成员们在右岸乌克兰地区追捕剩下的东正教徒。这种行为激起了另一场叛乱，其参加者是信仰东正教的哥萨克人、市民和农民。他们受俄国政府和教会官员的鼓动，起来反抗天主教贵族，在人们心中激起对1648年（赫梅尔尼茨基叛乱的第一年）那种规模的屠杀再度出现的恐惧。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再一次与那些曾听命于当局的哥萨克人携起手来。前者的领袖是马克西姆·萨利兹尼亚克[15]，后者则以伊凡·贡塔[16]为首。在乌克兰民粹主义者眼中和后来的苏联历史叙事中，这两名哥萨克领袖都将成为英雄。与1648年一样，叛乱的受害者是波兰贵族、天主教会和联合教会牧师，还有犹太人。18世纪，犹太人已经回到了右岸乌克兰，重建了他们的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他们中许多人追随拉比以色列·巴尔·谢姆·托夫[17]。这位拉比于18世纪40年代在波多里亚城市梅德日比日[18]传授哈西迪[19]教义。天主教叛乱者想要得到一个不被俄国插手的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徒想要的则是受俄国人管辖的哥萨克国；犹太人则希望不受干涉。他们都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1768年夏天，俄国军队跨过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第聂伯河边界，对巴尔同盟的天主教徒和信仰东正教的哥萨克人和农民同时发起进攻。这一行动尤其出乎后者意料，因为他们将沙皇的军队看作自己的解放者。然而帝国有自己的逻辑。两场叛乱都威胁了这一地区的稳定，也都遭到镇压。然而在叛乱被平定之前，一支自称归属俄国的哥萨克部队从巴尔塔[20]踏出波兰边界，进入了克里米亚汗国的领土。奥斯曼人和法国人都对俄国在这一地区日益膨胀的影响力感到担忧，遂利用这次事件对俄罗斯帝国宣战。俄国接受了挑战。

小俄罗斯总督彼得·鲁缅采夫率领一支帝国军队和一支哥萨克部队进入了摩

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俄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别兹博罗德科在拉尔加和卡古尔的战斗[21]中表现突出），取得了对这两个公国的控制，连同其各自首都雅西[22]和布加勒斯特在内。俄军还攻下了奥斯曼帝国位于多瑙河畔的要塞伊斯梅尔[23]和基里亚[24]，今天这两座城市都位于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也落入俄军之手，导致几乎整个南乌克兰都被俄国人控制。奥斯曼人兵败如山倒。在地中海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也被得到英国顾问帮助的俄国舰队摧毁。

就俄国人在黑海地区的野心而言，1774年签署的《库楚克凯纳尔杰条约》[25]似乎是一种倒退。帝国军队不得不离开多瑙河河畔的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此外圣彼得堡还必须将其部队撤离克里米亚。原因很简单：许多欧洲强国不愿看到俄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突然膨胀。然而条约在其他方面补偿了俄罗斯帝国。它实际上将奥斯曼人从黑海北岸地区和克里米亚赶了出去。俄国得以在亚速海和黑海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前哨。克里米亚汗国也宣布成为独立国家。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克里米亚半岛虽然从伊斯坦布尔手中独立出来，却成为圣彼得堡的附庸。

1783年，克里米亚正式并入俄罗斯帝国。一支俄国军队进入半岛，将最后一位克里米亚可汗流放到俄罗斯中部地区。此时已经是俄国外交政策主导者的别兹博罗德科在这一进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还是所谓“希腊方案”（Greek Project）的始作俑者。这一方案旨在瓦解奥斯曼帝国，建立一个受俄国控制的新拜占庭帝国，并在多瑙河河畔建立由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合并而成的新国家达西亚（Dacia）。这个方案无果而终，但从帝国当局给克里米亚城市起的希腊式名字中仍可以发现它的遗响。这些城市包括辛菲罗波尔[26]、叶夫帕托里亚[27]和最有名的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归于俄国之后两年，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建立了海军基地。

178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前往克里米亚视察。受到这个消息和“希腊方案”传言的刺激，奥斯曼人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意在夺回黑海北岸的控制权。然而他们再一次失败了，这一次输给了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结成的同盟。根据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1792年在雅西签署的和约，俄罗斯帝国将其地盘扩大到整个南乌克兰地区。奥斯曼人承认克里米亚和刻赤海峡对岸的库班地区[28]为俄国领土。随着别兹博罗德科的笔尖落在和约上，乌克兰草原这条边界从此被俄罗斯帝国抹去。然而文化意义上的边界依旧存在，只不过被纳入了帝国内部。

军事手段取消了草原上的边界，同时使它向受帝国鼓励和主导的殖民化敞开。这一地区不再需要哥萨克人。事实上，帝国当局认为哥萨克人易于引起叛乱和冲突，还容易带来与邻国的矛盾，因此希望他们离开。俄罗斯哥萨克人参加了1773—1774年间的普加乔夫起义[29]，让政府更加确信这一点。下一年，从摩尔达维亚前线返回的俄罗斯帝国军队包围了扎波罗热哥

萨克军，将哥萨克人驱散。被驱散的哥萨克人中的一部分被招入新建的哥萨克编伍，其中包括黑海哥萨克人——他们在后来被送往毗邻动荡不安的北高加索地区的库班半岛。其他哥萨克人留了下来，却不再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存在。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7年来到克里米亚时，她的宠臣格里高利·波将金[30]向她展示了这些哥萨克人的定居点。“波将金村”的说法就来自这次展示——它之所以虚假，并不是因为这些村庄不存在，而是因为这些村庄早就在那里了，基本不是波将金努力的成果。

乌克兰南部草原地区的大规模垦殖在其还处于哥萨克人控制下时就开始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自己就曾邀请避难的农民来到这里。在从哥萨克人手中夺来的土地上，政府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新定居点。逃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塞尔维亚难民来到叶利萨维特格勒（今基洛沃格勒）[31]和巴克赫穆特（今顿涅茨克州的阿尔乔莫夫斯克）[32]以北地区。他们定居的两个地区分别被称为新塞尔维亚和斯拉夫塞尔维亚。随着俄国人的堡垒向南扩散，随着帝国从俄土战争和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中取得新的领土，整个扎波罗热哥萨克地区如今成了被称为“新俄罗斯”的帝国省份的一部分。（这个省份的边界随时间而变迁，有时包括顿涅茨河地区和克里米亚，有时又将它们排除在外，但它从未如那些在2014年主张分裂乌克兰的俄国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包括过斯洛博达乌克兰的哈尔基夫地区。）新俄罗斯以从前属于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地区为中心，在18世纪最后数十年间成为国内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从1789年到1790年，为逃避强制兵役，第一批门诺派[33]教徒从普鲁士迁入这一地区，在紧邻第聂伯河险滩南面的霍尔蒂恰岛[34]上定居下来。更多来自他们故乡、与他们同属一个教派的人很快也将来到这里，一起到来的还有德意志新教徒和来自中欧的天主教殖民者。然而，“外国人”中的大部分却来自奥斯曼帝国，包括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摩尔达维亚人。俄罗斯帝国当局对农民和工匠的需求早有确证。它鼓励这些人迁入，并向他们提供土地、税收减免以及各种俄国臣民梦寐以求的福利。

帝国上层对定居者的多族群构成感到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这可以证明帝国及其统治者的伟大。“摩尔达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希腊人，还有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无论他们来自世界的哪一片天空之下，都是叶卡捷琳娜的子民。”18世纪晚期的诗人V. P. 彼得罗夫[35]写道。截至18世纪末，这一地区总共约50万男性人口中已有20%是“外国人”，剩下的则是东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中有一部分是被流放到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宗教异议者，然而大多数都是逃亡的乌克兰农民——他们多来自右岸乌克兰地区。新俄罗斯省由帝国创建，有着多族群色彩，然而这个省份的族群构成仍以乌克兰人为主。

新俄罗斯省的人口以乌克兰人为主，然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却在包括克里米

亚半岛在内的陶里达省[36]占有压倒性多数。圣彼得堡竭力让克里米亚被和平纳入帝国，给予克里米亚贵族以俄罗斯贵族的地位，还把从前属于可汗的土地赐给他们。汗国中的其他社会制度，包括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在内，都未被触动。帝国并不急于求成。与哥萨克国的情况一样，帝国对克里米亚汗国的吸纳过程将花费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如此谨慎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人口的外流。截至18世纪末，有近10万克里米亚汗国的前臣民离开了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北方的黑海沿岸草原，去往奥斯曼帝国。对这种人口流动的一种解释是，这些人希望生活在一位穆斯林君主统治之下；另一种解释则是，草原边界的消失造成了此地经济机会的流失，因为奴隶贸易和战争掠夺已经彻底行不通了。

别兹博罗德科签署的雅西和约使俄国对克里米亚和南乌克兰地区的占领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变得合法。第二年，也就是1793年，前哥萨克国的西部边界上发生了另一起戏剧性的事件。俄国和波兰之间那条沿第聂伯河划定的边界由来已久，120多年来一直将乌克兰一分为二，却突然被抹去了。俄军渡过了第聂伯河向西挺进，其中部分由已经是帝国军队高级军官的前哥萨克军官们率领。他们占领了包括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要塞在内的东波多里亚，以及包括日托米尔城在内的沃里尼亚的一部分。在北方，俄军则占领了白俄罗斯城市明斯克和斯卢茨克[37]。

这次事态的变化是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它终结了第聂伯河边界的存在，也让乌克兰哥萨克人梦想已久的右岸和左岸乌克兰的统一变成了现实。对波兰的第一次分割发生在1772年，其时欧洲的三大强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夺取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普鲁士分得了但泽（格但斯克）[38]，使其核心地区和东普鲁士[39]连成了一片；俄国得到了东白俄罗斯；奥地利则分得了加利西亚。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都通过迫于其军事和政治压力的波兰议会主宰着整个波兰-立陶宛联邦，更近一段时间则通过一位忠顺的波兰国王来实施控制。因此这第一次瓜分对俄罗斯帝国来说是一种损失，而非收获。实际上它是一个避免军事冲突的策略，因为此时圣彼得堡尚未做好战争的准备。奥地利人对俄国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中的胜利感到担忧，站在了奥斯曼人一边，威胁要进攻俄国。因此俄国同意接受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实则是在利诱奥地利，让它不要插手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

奥地利人吞下了这个诱饵。他们想要西里西亚[40]，即以今天的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41]为中心的地区，但俄国人给出的则是加利西亚。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后玛利亚·特蕾西亚[42]不喜欢“瓜分”这个词——在她看来那意味着这整个方案缺乏正当性——于是尝试用历史来为这次吞并正名。从历史上匈牙利国王们对中世纪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提出的领土主张中，特蕾西亚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从此这片新领土就被称为加利西

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43]。奥地利人没有把自己捏造的奥地利与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联系当成一个玩笑。1774年哈布斯堡家族声称加利西亚王公对布科维纳[44]拥有主权，从摩尔达维亚攫取了这块地方。由于从1699年起整个外喀尔巴阡省（今天乌克兰最西端的地区）就处于维也纳的掌握之中，现在哈布斯堡家族得以将三个未来的乌克兰省份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一状况将对近代乌克兰和整个东欧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没有增加俄罗斯帝国手中的乌克兰领土——俄国获得的地盘都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然而到了1793年，华沙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让情况发生了变化。1791年5月，波兰议会的代表们通过了一部新的、旨在让联邦重新站起来的宪法[45]。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新宪法注重权力集中、善政和教育，并在宗教宽容领域实现了一些进步。在波兰周边的瓜分势力看来，这部宪法更重要之处则在于它承诺让波兰政府重新变得可以正常运转：它强化了国王权威，移除了所有议会决议必须全票通过的规定，即著名的，或者不如说臭名昭著的“自由否决权”（拉丁语*liberum veto*）[46]。

看起来，尽管（或因为）遭遇了第一次瓜分的冲击，波兰-立陶宛联邦仍试图让自己脱离贵族党争的泥沼，重新成为一个中欧强国。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普鲁士和奥地利攫取了更多波兰领土。俄国人也不甘人后，他们的借口是保护传统的波兰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否决权”在内。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边界必须被抹去，新的边界在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建立起来。俄国人将帝国国界一直推进到奥属加利西亚的东端，这让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变成了邻居。与玛利亚·特蕾西亚皇后一样，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十分注重合法性的问题。第二次瓜分完成之后，俄国皇室发布了一枚纪念章，上面刻有帝国新边界的地图，其铭文为“我已收复失土”，意指这片地区曾经属于基辅罗斯。

俄国的边界还在继续向西推进。这已经与恢复基辅罗斯旧地无关，而是源于波兰-立陶宛联邦内部因第二次瓜分而发生的一次起义。起义的领袖是白俄罗斯人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47]。他是巴尔同盟的老兵，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修筑了西点防御工事，并被大陆会议晋升为准将。1784年科希丘什科回到波兰-立陶宛联邦，在波兰军队中担任少将。1794年，他在克拉科夫发动起义，成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所有的瓜分势力——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派军越过了波兰边界以镇压这次暴动。其结果是波兰王国的彻底毁灭。

这一次三位“启蒙独裁者”将第二次瓜分后波兰剩余的土地分了个干净。奥地利在与俄国对沃里尼亚（洛多梅里亚）的争夺中失败，改为吞并了包括克拉科夫在内的部分波兰国土。为了让吞并变得合法化，奥地利将这片土地视为加利西亚的一部分。普鲁士则扩大了其位于波罗的海南岸的地盘，

直抵华沙。然而最大的受益者是俄国：它分得的部分有波罗的海诸省、立陶宛、西白俄罗斯，在乌克兰则获得了包括里夫涅[48]和卢茨克[49]在内的沃里尼亚地区。

一些人将对波兰的历次瓜分视为乌克兰的重新统一过程。苏联历史学界无疑采取了这一立场。事实上，对波兰的瓜分在乌克兰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统一，也造成了其他部分地区的分裂和切割。如果说在瓜分之前乌克兰大部分土地被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俄罗斯帝国分享，现在分享者则变成了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就乌克兰土地而言，俄国从小“股东”变成了大“股东”，掌握着乌克兰族群地区的大部分。瓜分波兰的结果之一是：俄罗斯帝国内的乌克兰族人口占比从13%上升到22%，而俄罗斯族则从70%下降到50%。在俄国新获得的乌克兰土地上，犹太人占总人口的10%，另有大约5%是波兰人和波兰化的天主教徒。这让这片土地成了一张族群拼图，与帝国在南乌克兰地区鼓吹和引以为自豪的族群构成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帝国新获得的波兰、犹太甚至乌克兰（按当时的说法即小俄罗斯）臣民对帝国的忠诚远非理所当然。这些多族群居民并非这片土地上的新来者，那个夺取了它的国家才是。这个国家只欢迎其新臣民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早在1791年，帝国政府就实施了“定居范围”[50]，将犹太人定居地区限制在前波兰-立陶宛联邦省份，后来又加上了其从南方新获得的一部分地区。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都在“定居范围”之内。

18世纪下半叶，一系列谈判导致了乌克兰边界的重大变动。这些谈判中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哥萨克公爵”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我们已经知道身在圣彼得堡的别兹博罗德科一直是哥萨克故乡（他称之为祖国）的忠诚爱国者。他推动出版了一部哥萨克编年史，并亲自撰写了从1734年丹尼洛·阿波斯托尔统领去世到1768年俄土战争爆发之间的哥萨克国历史。这部编年史对哥萨克人与奥斯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战争进行了大量描述。然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在他提议吞并克里米亚时，在他在雅西参加决定黑海北岸地区命运的协商时，还有，在他与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就如何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进行谈判时，别兹博罗德科是否受到了自己“小俄罗斯”背景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他推动将克里米亚和波兰-立陶宛联邦从地图上抹去的时候，他自己的祖国也已经从那张地图上消失了。18世纪不仅是一个启蒙和理性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帝国时代。

---

[1] Oleksandr Bezborodko（1747—1799），18世纪俄国政治家、外交家，继尼基塔·帕宁（Nikita Ivanovich Panin，1718—1783）之后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外交政策的主导者。他被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封为公爵。

[2] Catherine II（1729—1796），即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Yekaterina II Alexeyevna，1762—1796年在位），亦译作凯瑟琳二世（英语发音），被称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她是德意志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亲王的女儿、俄国沙皇彼得三世的妻子，在彼得三世继位后不久就发动政变将其废黜。

[3] Frederick II（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军事家、作家、作曲家。他在位期间，普鲁士在政治、军事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得到迅猛发展，让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也令普鲁士获得了欧洲大国的地位。

[4] Joseph II（1741—1790），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奥地利大公（1765—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年在位）。

[5] Kyrylo Rozumovsky（1728—1803），乌克兰哥萨克政治家、最后一位小俄罗斯哥萨克统领（1750—1764年在任）。他担任过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长。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4年废除哥萨克统领职衔后，罗苏莫夫斯基成为俄罗斯帝国陆军元帅。

[6] Oleksii Rozumovsky（1709—1771），阿列克西·罗苏莫夫斯基（或罗苏姆，Rozum），乌克兰哥萨克歌手。他受到俄罗斯帝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的宠爱。

[7] Kozelets，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小城。

[8] Bandura，一种乌克兰拨弦民族乐器。

[9] Elizabeth Petrovna（1709—1762），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一世之女、俄罗斯帝国女皇（1741—1762年在位）。她在1741年推翻年仅1岁的伊凡六世后登基。

[10] Peter III（1728—1762），俄国沙皇（1762—1762年在位）、彼得一世的孙子、伊丽莎白女皇的外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丈夫。他在1762年登基后不到半年就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黜。

[11] Semen Divovych，哥萨克统领赫卢希夫政府中的一名翻译。

[12] Petr Rumiantsev（1725—1796），18世纪俄罗斯帝国名将、陆军元帅。

[13] Sumy，亦译作苏梅（俄语发音），今乌克兰北部城市。

[14] Vasyl Kapnist（1758—1823），乌克兰诗人、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15] Maksym Zalizniak（约1740—1768），1768—1769年波兰-立陶宛联邦

哥萨克叛乱中的扎波罗热哥萨克领袖。

[16] Ivan Gonta（？—1768），曾是波兰的基辅总督手下的哥萨克雇佣兵首领，在1768年叛乱中倒戈，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合作。

[17] Israel Baal Shem Tov（约1700—1760），即以色列·本·埃利泽（Yisroel ben Eliezer），18世纪西乌克兰地区的一名犹太教拉比，犹太教哈西迪派的创始人。

[18] Madzhybizh，多作Medzhybizh，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小城。

[19] Hasidism，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倾向于神秘主义。“哈西迪”意为“虔诚”。

[20] Balta，今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城市。

[21] 均为第五次俄土战争中的著名战役。拉尔加之战（Battle of Larga）发生在1770年7月7日，卡古尔之战（Battle of Kagul）发生于同年8月1日。俄军在两场战役中均以少胜多。

[22] Jassy，今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曾为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

[23] Izmail，今乌克兰西南部敖德萨州城市。

[24] Kiliia，今乌克兰西南部敖德萨州城市。

[25] Treaty of Kuchuk Kainarjae，第五次俄土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达成的和约，于1774年7月签订于库楚克凯纳尔杰（今保加利亚境内凯纳尔贾）。

[26] Simferopol，克里米亚半岛中部城市，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首都。

[27] Yevpatoria，克里米亚半岛西岸港口城市。

[28] Kuban region，俄罗斯南部库班河一带，位于顿河草原、伏尔加河三角洲和高加索山之间，与克里米亚半岛隔刻赤海峡相望。

[29] 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发生于1773年至1774年间，领导者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Yemelyan Pugachev，约1742—1775）。

[30] Grigorii Potemkin（1739—1791），18世纪俄罗斯帝国军人、政治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曾任克里米亚总督。“波将金村”的典故来自他在接待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弄虚作假的布置，后来成为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代名词。

[31] Yelysavethrad，今乌克兰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首府基洛沃格勒（Kirovohrad）。

[32] Bakhmut，今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城市阿尔乔莫夫斯克（Artemivsk）。

[33] Mennonites，由荷兰神学家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1496—1561）创立的基督教团体。

[34] Khortytsia，第聂伯河上的一座岛屿，由扎波罗热市管辖。

[35] Vasily Petrovich Petrov（1736—1799），18世纪俄罗斯诗人、翻译家。

[36] Taurida Province，俄罗斯帝国历史地名，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及位于第聂伯河下游和黑海、亚速海海岸之间的地区。Taurida亦作Tavrida（塔乌里达），是希腊人对克里米亚的称呼。

[37] Slutsk，今白俄罗斯中部城市。

[38] Danzig，格但斯克（波兰语作Gdańsk）的德语名称，今波兰滨海省（波美拉尼亚省）省会。

[39] East Prussia，普鲁士王国及后来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省，今分属立陶宛、俄罗斯和波兰。东普鲁士包含了古普鲁士人在波罗的海的领地，被认为是容克贵族的发源地。

[40] Silesia，中欧历史地域，曾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1945年后大部分并入波兰。

[41] Wrocław（德语Breslau），今波兰西南部城市，下西里西亚省省会。

[42] Maria Theresa（1717—1780），德语作Maria Theresia，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之女和弗朗茨一世之妻，也是当时哈布斯堡王朝权力的实际控制者。

[43] Kingdom of Galicia and Lodomeria，亦称奥地利波兰，于1772年成立，包括今波兰南部和乌克兰西部，是奥地利皇室的领地。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成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洛多梅里亚即沃里尼亚。

[44] Bukovyna，中欧历史地域，在奥匈帝国时期曾属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今分属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45] 即五三宪法，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国家宪法，仅晚于178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五三宪法在1792年俄波战争中被废除，仅施行一年。

[46] 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晚期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中的制度。在此制度下，

任何议会代表都可以终止当前议程并否决该议程已通过的法案。

[47] Tadeusz Kościuszko（1746—1817），波兰-立陶宛联邦自由主义者、军事家。他曾加入美国大陆军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回到波兰参加1792年俄波战争，并在1794年的科希丘什科起义中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总司令。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美国均将科希丘什科视为民族英雄。

[48] Rivne，今乌克兰西北部里夫涅州首府。

[49] Lutsk，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首府。

[50] Pale of Settlement，俄罗斯帝国西部为犹太人划出的定居范围。Pale一词来自拉丁语palus，意为木桩，引申义为栅栏或边界。

第14章
起源之书

“乌克兰还没有灭亡”，这是乌克兰国歌的开头字句。对任何歌曲来说，这样的开头都难称乐观，但这首歌并非唯一一首无法激起乐观情绪的国歌。波兰国歌的开头与此类似，是“波兰还没有灭亡”。波兰国歌歌词作于1797年，而乌克兰国歌歌词作于1862年，因此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一目了然。这样的悲观主义从何而来？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言，民族灭亡的观念都来自他们在18世纪晚期的经历，即波兰的被瓜分和哥萨克国的终结。

与其他许多国歌一样，波兰国歌原先是一首进行曲。这首歌为跟随拿破仑·波拿巴——未来的法国皇帝——在意大利征战的波兰军团而作，最初叫作“东布罗夫斯基玛祖卡[1]”，得名自波兰军团的一名指挥官扬·亨里克·东布罗夫斯基[2]。波兰军团中许多军人，包括这位指挥官在内，都曾参加过科希丘什科起义。这首歌作于波兰被瓜分势力摧毁之后，意在鼓舞波兰人的情绪。歌词的第二行就明确表示：“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波兰就不会灭亡。波兰国歌不仅将民族的命运与国家联结在一起，也将它与自视为民族成员的那些人联结在一起，因此不仅让波兰人看到了希望，也让其他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的代表们看到了希望。波兰和乌克兰的新一代爱国者拒绝把上个世纪的悲剧当作对他们民族命运的最终判决。这两个民族的活动家开始宣传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理念：它应该是一个由爱国公民组成的民主政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拥有领土的政权。

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用歌声和枪尖将民族和人民主权的观念传遍整个欧洲。1807年，这位法国皇帝击败了普鲁士，并在普鲁士从瓜分波兰中获得的土地上建立了华沙公国。波兰军团成员们的梦想离实现更近了一步：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祖国复国这一令人激动的前景。1812年，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也群起支持被他们视为解放者的法国侵略军。这一时代波兰首屈一指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3]在其史诗《塔德乌什先生》（*Sir Thaddeus*）描述了法军进入今天白俄罗斯地区时当地波兰贵族的兴奋之情。这部作品至今仍被波兰学校列为必读篇目（在白俄罗斯则不然）。“光荣已属于我们，”诗中的一名波兰人物说道，“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就会重生。”

1815年，15岁的密茨凯维奇在进入维尔纽斯大学学习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亚当·拿破仑·密茨凯维奇。此时波兰人的“我们的共和国重生”的梦想早已被粉碎。拿破仑和东布罗夫斯基以及他们的法军和波兰军团都已从俄罗斯帝国败退。拿破仑侵俄失败一年以后，俄军占领了巴黎，而拿破仑被流

放到厄尔巴岛。但这些努力并非全部白费。决定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命运的维也纳会议（1814—1815）[4]让波兰再次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维也纳会议在拿破仑创建的华沙公国废墟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原被奥地利吞并的土地，建立了波兰王国[5]。这个波兰王国与它的强邻俄罗斯帝国拥有共同的君主，在俄国被称为沙皇国（tsardom），而非王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6]还赐予波兰帝国其他部分无法企及的自治权和特殊待遇。

以帝国统一化和行政司法标准化为标志的叶卡捷琳娜理性时代就此结束，特殊对待的时代又回来了。那些失去了特权的民族都对波兰人满怀羡慕，其中包括前哥萨克国的精英阶层。尽管近代波兰民族主义是在拿破仑的翼护下成长起来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最初兴起时却以反波拿巴为旗帜。在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帝国的报纸第一次开始刊登乌克兰语而非俄语的爱国诗歌。这批诗歌中的一首出现在1807年，题为“啊哈！恶棍杂种波拿巴，你还没有餍足吗？”（“Aha! Have You Grabbed Enough, You Vicious Bastard Bonaparte?”）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拿破仑都激起了当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在波兰人、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用各自的母语表达这些情感的同时，一些乌克兰人决定他们也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在乌克兰以及欧洲其他地区，语言、民间故事、文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历史，都成为构建一种近代民族认同的砖瓦。

近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7]就是那些准备拿起武器抵抗拿破仑的乌克兰人中的一员。他出生在前哥萨克国境内的波尔塔瓦地区，自己组建了一支哥萨克部队，加入抵抗拿破仑的斗争中。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名下级官员的儿子，在一所神学院接受教育，曾做过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也曾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军队，在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中作战。1798年，还在军中服役的他出版了其诗作《埃内伊达》（*Eneïda*）的第一部分。这部诗作是基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的模仿之作，其中的主要人物并非希腊人，而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正如人们对真正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期待那样，诗中人物都说乌克兰方言。然而，我们只有在回顾中才能理解这部诗作的语言选择背后的逻辑。在18世纪晚期的乌克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位先驱——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方言创作一部重要诗篇的作者。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尝试发出某种政治声明。实际上，选择模仿文体正表明他是在进行一场语言和主题的游戏，而不是要创作一部高度严肃的作品。很明显，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不乏文学天赋，对时代精神也有精准的把握。18世纪晚期，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将民族国家设想为不仅是一个人民享有主权的政治体，还是一个文化实体，一个等待被民族文艺复兴唤醒的睡美人。在德意志地区，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8]将语言和文化作为自己对民族的新理解的基础。

在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一样：后来被称为民俗学学者的狂热分子们到处搜集民间故事和歌谣，在找不到“好”样本时，就自己创作。在英国，古代吟游诗人莪相[9]的“发现者”詹姆斯·麦克弗森就成功地将爱尔兰民间传说变成了苏格兰的民族神话。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写作《埃内伊达》第一部分时，正值教会斯拉夫语这一在上一时代统治俄罗斯帝国文学的语言框架分崩离析之际。各种基于方言的文学作品得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公共领域。俄国出现了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乌克兰则有了自己的伟大诗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无论他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初衷为何，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从未对这个选择感到后悔。他还将完成《埃内伊达》的其余五部，并成为第一批乌克兰语戏剧的作者。这些戏剧中包括以一个乌克兰村庄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娜塔尔卡-波尔塔夫卡》（*Natalka-Poltavka*，即《波尔塔瓦的娜塔尔卡》）。前哥萨克国的波尔塔瓦地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故乡）所使用的语言将成为标准乌克兰语的基础，并为以第聂伯河为中心，东至顿河、西至喀尔巴阡山脉的不同乌克兰方言的使用者所接受。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阿列克西·帕夫洛夫斯基（Oleksii Pavlovsky）在1818年出版了其作品《小俄罗斯方言语法》（*Grammar of the Little Russian Dialect*），让这种语言有了自己的第一套语法系统。一年后，米科拉（·尼古拉）·采尔捷列夫[10]编撰的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也得以出版。

如果不是其他数以十计（后来更发展到数以百计）富有才华的作者的作品出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及其作品完全可能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小小脚注，一个异数而已。这些作者并非都用乌克兰语写作，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浪漫主义者，都怀有19世纪初那种对民间传说和传统的美好想象，都重视情感而非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乌克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是哈尔基夫。1805年，帝国当局在这里开办了一所大学，邀请全国各地的教授们前来任教。在当时，身为一名教授通常意味着对地方志和民间传说感兴趣，而哈尔基夫正有丰富的传统。在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年代，它是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居住着乌克兰哥萨克人和逃亡的农民。到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这片土地常被人称为“乌克兰”。因此，1816年哈尔基夫开始出现的第一份文学年鉴被命名为《乌克兰先驱报》（*Ukrainian Herald*）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这份刊物以俄语印刷，但它也接受乌克兰语投稿。它的许多作者所讨论的也是乌克兰历史和文化主题。

哥萨克历史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趣焦点，这在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埃内伊达》中已有所显示。哈尔基夫的浪漫主义者们对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乌克兰历史著作《罗斯历史》（*Istoriia rusov*）的积极欢迎和宣传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关于乌克兰哥萨克人的历史被归为18世纪的东正教大主教赫俄希·科尼斯基[11]的著作，但其真正的作者（或作者群）来自前

哥萨克国斯塔罗杜布地区的哥萨克军官后裔阶层。无论《罗斯历史》的作者是谁，他都对哥萨克军官和俄罗斯贵族群体中的不平等状况十分关心，并更加公开地主张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的平等。这是在18世纪哥萨克文献中回响的传统主题，但现在拥有了更适合浪漫主义时代情感的表现形式。

《罗斯历史》将哥萨克人刻画成一个独特的民族，并通过乌克兰哥萨克统领们的英雄事迹、战斗历程和死于敌人之手的故事来赞美哥萨克历史。这些敌人和其叙事中的反面人物大都代表着别的民族——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帝国各地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们的想象力都被《罗斯历史》点燃了。这些人中包括圣彼得堡的孔德拉季·雷列耶夫、亚历山大·普希金和尼古拉·果戈理。在哈尔基夫，这一神秘文本的主要鼓吹者是本地大学的一名教授伊斯梅尔·斯列兹涅夫斯基[12]。与他之前的麦克弗森一样，斯列兹涅夫斯基同样自己创作民间传说。麦克弗森利用爱尔兰神话来达到目的，斯列兹涅夫斯基则在《罗斯历史》中寻找灵感。这部作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前哥萨克国地区风靡一时，将一段关于哥萨克社会阶层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对一个新兴民族社群的记述，迈出了近代乌克兰民族塑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曾经存在的哥萨克国为近代乌克兰民族的构建提供了砖石——一个关键的历史神话、一种文化传统和一种语言。除此之外，它还提供了建筑师：《埃内伊达》的作者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的编撰者米科拉·采尔捷列夫和写出第一本乌克兰语语法著作的阿列克西·帕夫洛夫斯基都来自前哥萨克国。在乌克兰民族构建的早期阶段中，哥萨克国精英阶层占有如此突出甚至是统治性的地位，其原因很简单：在19世纪的乌克兰，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与当地人共享同一种文化的唯一地区就是前哥萨克国。在奥属加利西亚和俄属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右岸乌克兰，主导当地政治和文化图景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或是波兰化的乌克兰贵族。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得到垦殖的南方草原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则是族群意义上或文化意义上的俄罗斯人。因此，哥萨克国境内的旧哥萨克民族后裔几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民族塑造斗争的先锋。这个新民族从其语言到其名字“乌克兰”都来自哥萨克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代乌克兰民族构建的初始阶段被一些学者称为遗产收集时期，滥觞于拿破仑战争期间及紧接其后的一段时间。第二阶段则受到19世纪30年代波兰起义的影响。这场起义导致了早期乌克兰民族运动政治方案的形成。

波兰的起义早有其缘由。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开明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他刚刚把“波兰沙皇”的称号加入自己的头衔）为自己新获得的领土提供了一部欧洲范围内最自由的宪法。然而这位沙皇很快就证明他头衔中的“皇帝”二字并非虚设。他对波兰王国的统治权获得欧

洲列强承认之后不久，亚历山大一世的开明路线就走到了尽头。他的代表经常无视波兰议会，侵犯言论自由，并不顾沙皇原先允诺的其他公民权利。当不满的波兰青年们组织起秘密会社时，警察就对他们展开追捕。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情况愈发恶化。这次起义中，包括部分显赫哥萨克家族后裔在内的俄国军官们率部发动叛乱，要求制定一部宪法。叛乱被镇压了，皇帝尼古拉一世[13]长达30年的保守统治由此拉开序幕。1830年11月，一次由年轻波兰军官在华沙发动的兵变很快演变成一场起义，席卷了整个王国和包括今天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前波兰领土。一支波兰军团被派往沃里尼亚，而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右岸乌克兰的波兰贵族也开始叛乱。他们号召乌克兰农民们加入起义的队伍，有时候甚至许诺会将他们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帝国以其优势的军力镇压了这次起义。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参加者和支持者，包括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内，都逃离了波兰，其中大部分人逃往法国。运气差一些的人则被关进俄国人的监狱或被流放。

十一月起义不仅是一场对波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动员，它同样在俄国土地上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响。由于拿破仑战争而染上明显反法国色彩的俄罗斯帝国爱国主义者如今开始激烈地反波兰。亚历山大·普希金一派的人物在理念领域引领了对波兰叛党及其法国支持者的攻击。在其诗作《致俄国的中伤者》（“To the Maligners of Russia”）中，普希金要求对波兰解放事业提供保护的法国人不要插手，把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的矛盾留给斯拉夫人自己解决。普希金在波兰人的叛乱中看到了对俄国领土的威胁，并认为这种威胁不限于波兰王国的范围。在他看来，这场叛乱仍是对乌克兰的争夺。当俄军攻下叛党盘踞的华沙后，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们将防线后撤到何处？

难道要退过布赫河？退过沃尔斯克拉河[14]？直到（第聂伯河）河口？

那时沃里尼亚将属于谁？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遗产又将是谁家之物？

如果承认叛党的权利，

那立陶宛人不也会唾弃我们的统治吗？

还有基辅，那拥有金顶的老朽古城，

罗斯的万城之祖——

难道它也要让那些神圣的陵墓

落入野蛮的华沙之手？

在十一月起义期间，普希金甚至动起了写作一部“小俄罗斯”历史的心思。

在波兰起义之后的几十年中，俄国在乌克兰和其他前波兰属地上的政策主旨都是抵抗来自西方尤其是波兰的影响。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国已经准备好“本土化”，用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新生的民族主义来保卫其获得的领土。在这段时间里，帝国教育大臣谢尔希·乌瓦罗夫[15]伯爵明确了新的俄罗斯帝国身份认同的几大基础：专制政体、东正教信仰和民族。如果说乌瓦罗夫的三原则中的前两个是俄罗斯帝国意识形态的传统标志，第三个原则则是对这个新兴民族主义的时代做出的回应。乌瓦罗夫所谓的“民族”并非泛指，而是专指俄罗斯民族。乌瓦罗夫曾写道：他的三原则构成了“俄罗斯的独特本质，并专属于俄罗斯”，它们“将俄罗斯民族身份的碎片连成一个整体”。这个民族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共同组成。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对乌瓦罗夫的三原则的具体含意争论不休，但其明晰简洁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便于我们对19世纪30年代之后帝国的西部边境政策进行讨论。罗曼诺夫王朝的理想子民不仅要忠于帝国（在理性时代这一条已经足够），还必须属于俄罗斯民族和信奉东正教。波兰的十一月起义让乌克兰农民阶层对帝国的忠诚变得可疑了。在帝国当局眼中，这些人无疑属于俄罗斯民族，却往往不信仰东正教——大部分新领土上的居民仍留在联合教会内。因此，要保证他们对帝国的忠诚，让他们变成沙皇的理想子民，就必须让他们从联合教会改宗东正教，以打破联合教会的农民信徒和天主教贵族之间的联结。当局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在本质上与布列斯特联合的方法正好相反：帝国政府及联合教会内部的政府支持者没有在个人层面上让联合教会的信徒改宗，而是要使整个教会改宗东正教。这或多或少有些类似波兰当局在16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针对联合教会的做法。

1839年，一次联合教会会议在政府的支持下召开，宣布了联合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重新统一”，并请求得到沙皇的祝福。皇帝同意了这个请求，调遣军队进入这一地区，以保证这次反向联合不会遭遇新的反抗。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超过1 600个教区和150多万名（据某些估计）信徒在一夜之间“回归”了东正教。在白俄罗斯、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很大一部分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东正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被结为一体，以便为专制政体服务。这是前联合教会信徒漫长“东正教化”过程的开端，他们在文化上

的“俄罗斯化”也同时发生。东正教会的神学院都使用俄语作为教学语言，因此教会的知识精英阶层不仅从联合教会的天主教信仰改宗了东正教，在民族身份上也从乌克兰人或罗塞尼亚人变成了俄罗斯人。

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是如何争取受波兰起义威胁的领土上那些世俗精英阶层的“心灵和意志”。起初，帝国采用了其通常的策略，在将波兰贵族阶层并入帝国的同时不削减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地产权利。亚历山大一世任用波兰贵族和知识分子来推行他的开明改革。波兰人在教育领域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这是因为1795年亡国之前波兰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

在帝国乌克兰省份的新教育体系的创立过程中，波兰贵族出身的亚当·安杰伊·恰尔托雷斯基[16]公爵起到了关键作用。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他曾担任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并有几年成为事实上的俄国外交政策首脑。亚历山大一世还委任恰尔托雷斯基负责管理维尔纽斯教育区。这一教育区以维尔纽斯大学为中心，管辖范围包括西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另一名波兰贵族塞维伦·波托茨基（Seweryn Potocki）是哈尔基夫教育区的长官。该区以哈尔基夫大学为中心，管辖乌克兰其余地区的教育体系。在俄罗斯帝国首任教育大臣、基辅莫希拉学院毕业生彼得罗·扎瓦多夫斯基[17]主导的教育改革中，这两所大学的创办和整个地区公立学校体系的建立均进入了改革的主要成就之列。

如果19世纪早期的圣彼得堡有任何关于民族身份问题的政策，它必然基于斯拉夫民族联合的理念，即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也被认为包括在内）和波兰人的联合。十一月起义让情况发生了变化。直至1823年还是维尔纽斯教育区主管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在1830年12月成了波兰革命政府的首脑。后来，恰尔托雷斯基又在巴黎朗贝尔饭店套房里领导“大移民”[18]团体的活动（“大移民”一词指流亡西方的波兰起义者）。俄国专制政府和波兰天主教贵族阶层之间的联合不复存在。教育领域的进展也停滞了，因为这一领域有赖于波兰人的参与和忠诚。帝国政府接受了十一月起义领导者发起的文化挑战，开始对乌克兰和帝国境内其他前波兰领土采取俄罗斯化措施。乌瓦罗夫伯爵急切地希望发展俄语教育和俄语文化，以制衡在这些边境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波兰文化。

一度在招生水平上堪与牛津大学比肩的维尔纽斯大学在1832年被关闭。政府不再能容忍这样一所被其视为波兰民族主义温床的学校。地区内其他由波兰人管理的教育机构也被关闭，其中包括位于沃里尼亚城市克列梅涅茨[19]的一所学院。政府将该学院丰富的图书馆藏、雕塑藏品及其植物园中的草木都搬到了基辅，并于1834年在基辅建立了一所新的帝国教育中心，用以取代维尔纽斯大学。波兰语在这里被禁止使用，俄语成为唯一的教学语言。新的大学以弗拉基米尔大帝的名字命名，因为根据官方历史的说法，他是第一位信仰东正教的君主，还是一名俄罗斯人。

此时基辅只有3.5万居民，被普希金在将之与华沙相比时称为“老朽”。帝国当局开始着手将基辅改造成一座位于欧洲文化边缘的帝国堡垒和俄罗斯民族堡垒。他们根据帝国的时代潮流重建了基辅的东正教堂，并驱逐了这座城市的犹太居民。政府修建了新的街道，给城市各地冠以新的名字。其中一条街道被命名为“宪兵街”，以彰显警察力量对当局在象征和实际两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帝国统治在这一边境地区的稳固。新任基辅、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总督带着将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融入”帝国的使命来到基辅，并在1833年提议修建一座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碑。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审查了这个提议，并十分赞赏。工程耗时20年才得以实现。1853年，塑像在基辅落成，至今尚存。它没有按原计划坐落在弗拉基米尔大学附近，而是位于第聂伯河岸上。关于这座塑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历史蕴意，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人将之理解为俄罗斯-乌克兰的宗教和族群统一，也有人理解为对第一个乌克兰国家创立者的纪念。到了今天，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竖立这座塑像的最初用意是明确帝国对第聂伯河右岸原波兰属地的统治权。

新大学（利维夫和哈尔基夫之后乌克兰地区的第三所大学）在基辅的创办成为这一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所大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本地骨干，让他们成为俄罗斯影响力的代表和俄罗斯身份的宣传者。政府还成立了历史委员会，专司手稿和文件的搜集和出版，以此构建右岸乌克兰、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自古就是俄罗斯领土的历史叙事。刚开始时一切尽如计划。本地人才（大多数要么来自哥萨克军官家族，要么是牧师或是前哥萨克国下层官员的儿子）纷纷来到基辅，加入这些新机构，投入与哥萨克人的宿敌波兰人的论战。然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帝国当局发现他们的处境有些不妙：这所大学和这个历史委员会原来被视为保卫俄罗斯身份认同、应对波兰挑战的堡垒，如今却变成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和新的民族主义的温床。

1847年2月，一名叫阿列克谢·彼得罗夫（Aleksei Petrov）的基辅大学法学学生出现在基辅教育区的办公室，揭发了一个以将俄罗斯帝国变成共和国为目标的秘密社团。根据彼得罗夫的告发展开的调查挖出了地下的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这个名字来自那两位不仅用宗教还用一种新的语言和一套新的字母启蒙了斯拉夫人的基督教传教士。兄弟会成员包括基辅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米科拉（·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20]——他将在后来成为现代乌克兰史学的奠基人[21]，还有新任的素描教师塔拉斯·舍甫琴科[22]。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出身于邻近斯洛博达乌克兰的沃罗涅日省的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却常常强调自己的母亲是一名乌克兰农妇。无论其说法是真是假，19世纪中叶的基辅知识分子们的确把农民出身视为一种光荣——他们都希望能为人民服务，离人民越近越好。

兄弟会中没有哪位成员比科斯托马罗夫的志同道合者塔拉斯·舍甫琴科更有资格自称平民主义者。1814年，舍甫琴科出身于右岸乌克兰一个农奴家庭。他在年轻时进入一名富有的波兰地主家中，作为其府上的仆役先是去了维尔纽斯，后来又到了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展现出自己的艺术才华。他在圣彼得堡著名的夏园（Summer Garden）写生时，被那里的一名乌克兰画家发现。画家将舍甫琴科引荐给当时俄国文化舞台上的一些领袖人物，其中包括普希金之前俄国最有名的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23]和俄罗斯浪漫派艺术开创者之一卡尔·布留洛夫[24]。舍甫琴科的作品、人格和遭际震撼了圣彼得堡的艺术圈，让他们决定不惜代价解放这名年轻的农奴。最后他们以2 500卢布的价格换得了舍甫琴科的自由，这以当时的标准算得上是一笔惊人的巨款。布留洛夫为了筹款，特意为茹科夫斯基绘制了一幅肖像。这笔钱正来自这幅肖像的拍卖所得。

舍甫琴科在24岁时成为自由人。随后他证明自己不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还是一名杰出的诗人。1840年，也就是他获得自由两年之后，舍甫琴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题为“科布扎尔”（《歌手》）[25]。“科布扎尔”也将在未来成为他的别名。尽管诗集在圣彼得堡出版，其语言却是乌克兰语。舍甫琴科少年时代就离开了乌克兰，在圣彼得堡长大成人，并成了一名自由的艺术家和诗人，为何他会选择用乌克兰语而非俄语写作呢？毕竟后者才是圣彼得堡大街小巷上和艺术沙龙里使用的语言。

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圣彼得堡那些出力帮助舍甫琴科获得自由的乌克兰友人对他的影响。这些人中有一位波尔塔瓦人，名叫叶乌亨·赫列宾卡[26]。赫列宾卡遇见舍甫琴科时，正在将普希金为1709年波尔塔瓦之战所作的诗歌翻译成乌克兰语。他坚信乌克兰应该有自己的母语文学，包括翻译文学。1847年，舍甫琴科在《科布扎尔》新版前言里阐明了自己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原因：

> 我的灵魂被巨大的忧伤笼罩。我听说，有时候也读到这样的消息：波兰人在出版书籍，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黑山人和俄罗斯人都在出版书籍。但我从未听说乌克兰人出版书籍的消息，似乎我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我的同胞们，这是为什么？也许你们害怕受到外国记者的打扰？不要害怕！不要理会他们……也不要理会俄罗斯人。让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也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们是有自己语言的民族，我们也是。让人民来评判谁的作品更好吧。

舍甫琴科对尼古拉·果戈理尤为不满。果戈理是前哥萨克国人，以其乌克兰主题的作品——包括《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在内——成为现代俄罗斯散文文体的奠基者。“他们将果戈理作为我们的典范。这个人根本

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却用俄语。沃尔特·司各特[27]也是一样，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舍甫琴科写道。这些典范没法让他心服口服。“为什么V. S. 卡拉季奇[28]、沙发里克[29]和其他人没有变成德意志人——他们要这样做的话是多么轻而易举——而是仍把自己视为斯拉夫人，视为自己母亲的亲生子，并同样获得了荣名。”他对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文化运动中的巨擘发出了如此的评论，“我们是多么可悲！然而，同胞们，不要绝望。我们要运用智慧为我们不幸的母亲乌克兰工作。”

舍甫琴科在离开圣彼得堡去往乌克兰后写下了以上文字。他在乌克兰的友人中包括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一些成员。如果我们不知道现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者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为何用乌克兰语写作[30]，舍甫琴科却在《科布扎尔》的前言中确定无疑地吐露了他自己、他的友人和同党们的心声。他们是19世纪初因响应泛日耳曼运动而形成的泛斯拉夫运动的一部分，认为乌克兰在自己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上都落在了后面，但同时也相信：只要像果戈理这样的乌克兰骄子能用其才华为祖国服务，乌克兰也可以为斯拉夫世界的其他地区做出巨大贡献。在他们的想象中，乌克兰应该是更广大的斯拉夫世界中的一个自由共和国。

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起草了兄弟会的章程，题名为“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The Books of the Genesi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之一是《波兰人民和波兰朝圣之书》（*Books of the Polish People and the Polish Pilgrimage*）。在这本书中，亚当·密茨凯维奇将波兰历史呈现为波兰民族的一部弥赛亚式受难故事。在密茨凯维奇眼中，波兰将从坟墓中重生，并为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带来解放。科斯托马罗夫将这个弥赛亚式的角色留给了乌克兰：由于其哥萨克源头，乌克兰天生是民主主义的和平等主义的；与俄罗斯人不同，乌克兰人没有沙皇；与波兰人不同，乌克兰人没有贵族。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成员们视乌克兰的哥萨克历史为宝贵的遗产，追求废除农奴制，并主张将帝国改造成为平等共和国的联邦，而乌克兰将是这些共和国之一。

这个社团的成员规模很小，存在期也不到一年。它的成员们很快遭到逮捕：科斯托马罗夫在自己的婚礼前几天被捕，舍甫琴科则在为参加友人婚礼来到基辅时被捕。帝国官僚在兄弟会的活动中嗅出了一种新的潜在危险倾向发端的气味，将这些嫌疑犯的观点描述为“分裂主义”。皇帝本人也将之称为来自巴黎（指那些流亡波兰的人）的宣传的结果。然而其他一些人相信兄弟会成员是帝国的忠诚子民，是为罗斯抵抗波兰影响的真正卫士——他们只是在本地的小俄罗斯爱国主义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些，不应受到太重的惩罚。最终，政府官员决定对他们处以相对较轻的刑罚，以免让这个兄弟会引起太多注意，也避免让乌克兰爱国者（这是19世纪中叶政府人士口中出现的新名词）与波兰民族运动结成联盟。

俄国当局将兄弟会的理想描述为沙皇权杖下斯拉夫人的统一，却隐瞒了其真正的计划，使帝国最高层的官员都不得而知。科斯托马罗夫获刑一年，其他兄弟会成员受到入狱6个月到3年不等或国内流放的刑罚。所谓国内流放，一般指被送往偏远省份从事案头工作。皇帝尼古拉一世对舍甫琴科的处罚最重，派他到帝国军队中当了一名列兵，为期10年，其间不得从事素描、绘画和写作，这是因为皇帝对舍甫琴科在诗中和画作中对他和皇后的攻击感到震惊。舍甫琴科认为专制政府应当为他的同胞和祖国——不是俄罗斯，而是乌克兰——所受的苦难负责，因此他的作品对乌瓦罗夫的“官方民族主义”三要素中的两点——专制政府和民族——都进行了攻击，而他的东正教信仰和帝国推行的东正教信仰也不是一回事。

通过他们的写作和活动，科斯托马罗夫、舍甫琴科和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其他成员拉开了今天被我们称为乌克兰国家构建事业的大幕。他们在历史上第一个利用文物研究者、民俗学者、语言学家和作家的成果来构造一个政治方案，而这个方案将导致一个民族社群的出现。在下一个世纪里，由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成员们提倡并在舍甫琴科饱含情感的诗歌中为更广大的人群所知的理念将深深地改造乌克兰和这片地区。今天这一改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基辅大学主楼前方的那座舍甫琴科纪念碑——它替换了这所大学的创立者尼古拉一世皇帝的塑像。

---

[1] Mazurka，起源于波兰民间舞蹈玛祖卡舞的一种舞曲。

[2] Jan Henryk Dąbrowski（1755—1818），波兰将军，曾参加科希丘什科起义，后在海外致力于波兰独立运动，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征战时其麾下波兰军团的创立者和拿破仑战争的参与者，被视为波兰民族英雄。

[3] Adam Mickiewicz（1798—1855），波兰浪漫主义诗人、政治活动家，被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视为民族诗人。其史诗作品《塔德乌什先生》描述了1811年至1812年间俄国占领区内发生的故事，被视为波兰的民族史诗。

[4] The Congress of Vienna，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目的在于解决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导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会议的目标包括恢复战前国界和保持列强的权力平衡。

[5] Kingdom of Poland，亦被称为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或波兰沙皇国（Tsardom of Poland），存在于1815年至1915年间，是俄国的共主联邦。

[6] Alexander I（1777—1825），俄国沙皇（1801—1825年在位）、芬兰大公、波兰王国国王。他在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复兴欧洲各国王室，成为欧洲霸主。

[7] Ivan Kotliarevsky（1769—1838），乌克兰作家、诗人、戏剧家、社会活动家。

[8]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他是德意志启蒙运动、狂飙运动和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重要人物。

[9] Ossian，传说中公元3世纪的爱尔兰英雄、吟游诗人。1761年，苏格兰诗人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宣布发现并出版了据称为莪相史诗的作品，对欧洲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麦克弗森“发现”的莪相诗作的真伪，文学批评界一直有巨大争议。

[10] Mykola（Nikolai）Tsertelev（1790—1869），俄国民族志学者、教育家。

[11] Heorhii Konysky（1717—1795），18世纪乌克兰宗教人物、作家。

[12] Izmail Sreznevsky（1812—1880），俄国19世纪重要的语言文献学者和斯拉夫文化研究者，自1854年起为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士。

[13] Nicholas I（1796—1855），俄国沙皇（1825—1855年在位），亚历山大一世之弟。

[14] Vorskla，第聂伯河的左支流，全长464千米，发源于中俄罗斯高地，流经波尔塔瓦。

[15] Sergei Uvarov（1786—1855），19世纪俄国古典学者、政治家。

[16] Adam Andrzej Czartoryski（1770—1861），波兰贵族、政治家、作家，曾担任事实上的俄罗斯帝国部长会议主席（1804—1806年在任），并在1830年到1831年间的波兰十一月起义中担任波兰民族政府主席。

[17] Petro Zavadovsky（1738—1812），乌克兰哥萨克人，曾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秘书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罗斯帝国教育大臣。

[18] Great Emigration，指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大批波兰精英流亡西方国家的过程。

[19] Kremianets，亦作Kremenets，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城市。

[20] Mykola（Nikolai）Kostomarov（1817—1885），19世纪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

[21] 本书导言中对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有同样评价，且都使用了定冠词（the founder）。

[22] Taras Shevchenko（1814—1861），19世纪乌克兰诗人、画家、民俗和民族志学者、政治活动家，其文学作品被视为现代乌克兰文学和乌克兰语言的奠基之作。

[23] Vasilii Zhukovsky（1783—1852），19世纪初俄国杰出诗人、翻译家。他将浪漫主义潮流引入了俄罗斯文学。

[24] Karl Briullov（1799—1852），19世纪俄国画家，被视为俄国绘画从新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25] Kobzar（乌克兰语作кобзар），指乌克兰哥萨克人中的游吟诗人或歌手。

[26] Yevhen Hrebinka（1812—1848），乌克兰浪漫主义作家、诗人、博爱主义者。

[27] 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

[28] Vuk Stefanović Karadžić（1787—1864），塞尔维亚语文学家及语言学家，是塞尔维亚语的主要改革家。他因对民间诗歌、传说和谚语的搜集工作而被称为塞尔维亚民间传说研究之父。他用新改革的语言编写了塞尔维亚语词典，并翻译了《新约全书》。

[29] Pavel Jozef Šafárik（1795—1861），斯洛伐克语文学家、诗人、文学史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30] 此处原文有误。“Ukrainian”一词后缺少逗号。

第15章 多孔的国界

1848年，即俄国当局取缔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之后一年，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乌克兰人在利维夫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政治组织——罗塞尼亚最高议会。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自称罗塞尼亚人或卢森人，也以这样的名字在帝国为人所知。这个议会与1846年至1847年间存在于基辅的兄弟会有很大的差异：兄弟会从事地下活动，只有很少的成员，并被俄罗斯帝国当局摧毁；但最高议会则是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总督的帮助和鼓励下成立的，并拥有为数众多的成员和广泛的公众支持。

尽管这两个组织有各种不同，它们在创立时间上的巧合却暗示了乌克兰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和政治行动主义的发展。这一发展沿两条轨道进行：当其中一条轨道上的速度放慢或停滞时，另一条轨道上的运动仍能继续，甚至加速。乌克兰政治活动家们被俄国-奥地利边界分成两部分，却在民族构建过程中有着数不清的联系。19世纪，将乌克兰人分为两部分的边界已不仅是政治边界，也变成了一条宗教边界，将乌克兰（联合教会的）天主教徒与乌克兰东正教徒分开，然而上述的那些联系跨越了它。与两股互相竞争的帝国势力所期待的相反，两个乌克兰政治活动家群体之间的联系不仅没有中断，反而通过多种渠道得到了发展，这让这场运动的两个分支得以孕育一个关于乌克兰未来的共同图景。

这两个乌克兰政治活动家群体被政治边界分开，但在精神和国家理念上则能保持一致。他们之所以能突破自身的局限，得益于一个简单事实：两个帝国的政府对待乌克兰人这一少数民族的政策截然不同。其中最能彰显这种差异的，是两国对待它们从波兰-立陶宛联邦继承而来的联合教会的态度。与俄国当局不同，奥地利政府从未迫害联合教会信徒，也不曾尝试让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母教会”（在奥地利即天主教会）“重新统一”。事实上，他们对联合教会信徒相当尊重，这一点从官方对这些信徒的新称呼——希腊（奉拜占庭仪轨的）天主教徒——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波兰天主教同胞则被称为罗马天主教徒。奥地利政府还建立了一所神学院（先是在维也纳，后来在利维夫），为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士们提供教育。19世纪初，希腊礼天主教会将利维夫主教区升级为都主教区，让自己从留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各联合教会教区中独立出来。由于大多数世俗精英都倾向天主教和波兰文化，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就成了罗塞尼亚社群唯一的领袖群体，并将成为现代乌克兰民族运动的脊梁。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为何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吊诡的是，他们的理由竟

和罗曼诺夫们如出一辙。两个帝国都将正在兴起的波兰民族主义视为心头之患，只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对付它。俄罗斯帝国政府取缔了联合教会，并出于保护帝国的俄罗斯民族不受波兰人“蛊惑”的目的，尽力阻止乌克兰人的民族运动。奥地利当局则不然：他们在国内培植罗塞尼亚民族运动以制约波兰人的宣传。他们从未尝试将罗塞尼亚人改造成日耳曼人，也无意干涉他们成为独特民族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奥地利人还鼓励了这种发展，以使之能与发达而有组织的波兰民族运动相抗衡。

在革命之年——1848年，奥地利当局首先付诸实施的正是上述政策。其时，自由民族主义浪潮正在欧洲兴起，从巴勒莫到巴黎，再到维也纳，概莫能外。这对维也纳会议划定的各种边界和这些地区的政府都形成了挑战。1848年3月，受到巴黎革命鼓舞的匈牙利人提出了从哈布斯堡帝国独立出来的要求。他们将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波兰人紧随其后，先是在克拉科夫，后来又在利维夫掀起波澜，要求得到公民自由和自治权。这些诉求对维也纳政府和至少半数的加利西亚居民来说都难以接受。加利西亚省的450万居民中，大约一半是乌克兰人。波兰人占40%左右，还有近7%是犹太人。在所谓的东加利西亚（传统上的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人占据了绝对多数，而波兰人则在今天被称为西加利西亚、包括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占据多数。犹太人则散居在这个扩大之后的帝国省份各地。在东加利西亚的犹太人中，有约60%居住在城市和较小的市镇上。

加利西亚省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程度低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瓜分波兰之后，皇帝约瑟夫二世将传统的波兰精英阶层从政府管理岗位上剔除出来，代之以帝国官僚（其中大多是来自波西米亚的日耳曼化捷克人），以建立一套新的行政体系。他还提高了这个省份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并保护农民不受其主人的欺凌。尽管约瑟夫二世剥夺了波兰精英们的政治权力，他刚开始时却没有对犹太人采取措施，任由他们保持自治权，作为他们缴纳所谓“容忍税”[1]的回报。到了1789年，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容忍法令》（Edict of Toleration），这是犹太人解放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但他同时也解散了犹太人的传统组织，禁止在公文中使用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建起德语学校，还将犹太人纳入了服兵役的范围。当革命浪潮在1848年3月来到利维夫时，许多犹太人自愿加入了波兰人反抗帝国的队伍。不过，随着奥地利军队在俄军的帮助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波兰人恢复联邦的希望和犹太人对平等的期待也破灭了。

加利西亚居民中从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是乌克兰人。他们很可能是对帝国忠诚度最高的人群，也是革命队伍中最不情不愿的参加者。由于波兰人最初的呼吁中没有提到本地乌克兰人和他们的诉求，乌克兰人对加入波兰人的反抗行动并不迫切。1848年4月，乌克兰人社群的领导者们（他们恰好全部都是联合教会的教士）向皇帝请愿，在请愿中宣示了他们的忠诚，要求

帝国保护他们不受占统治地位的波兰人侵害，还要求使用罗塞尼亚语的权利。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总督弗朗茨·施塔迪翁[2]伯爵的许可和支持下，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创立了他们的罗塞尼亚最高议会。利维夫的治安长官利奥波德·冯·扎赫尔[3]（后来那位作家的父亲）还批准了第一份乌克兰语报纸《加利西亚星报》（*Galician Star*）的出版。施塔迪翁将新议会的成立视为“抵消波兰影响、在加利西亚恢复奥地利统治的手段”。

在神职人员的领导下，罗塞尼亚最高议会的确成为制衡波兰民族革命的领导组织——波兰民族议会的有效力量。几乎在所有主要议题上，最高议会与波兰民族议会的诉求都不相同。如果说波兰人偏于激进，乌克兰人则高度保守。关于加利西亚的未来问题，波兰人想要的是整个省份的自治权，乌克兰领袖们却希望将之分割，恢复从前那个较小的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那里占据人口总数的70%。20万人在一份请愿上签名，要求对加利西亚省进行分治。他们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加利西亚仍保持完整。然而乌克兰人在这场革命中登上了舞台：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报纸，被空前地动员起来。

最为革命性的进步无疑是农奴制的废除和农民们积极参与选举政治的开始。这两项进展在加利西亚的出现都是为了回应波兰人的革命要求，但其推出者则是奥地利当局。乌克兰人从中受益匪浅，因为这个省份的大多数农民是乌克兰人。在加利西亚的奥地利议会中，25名乌克兰议员中有16名是农民。布科维纳地区选出的5名议会代表更是均为农民出身。乌克兰代表被选入议会的事实给他们的社群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将哈布斯堡帝国中的乌克兰人引入了选举政治的世界，让他们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采取政治行动而不是造反（尽管农民起义仍时有发生）。

革命的结束意味着罗塞尼亚最高议会的终结（它在1851年被政府废除），但在1848年的事件中诞生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并没有结束。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同一个神职人员群体仍然领导着这场运动。他们被称为圣乔治会（St. George Circle，这个名字来自利维夫的希腊礼天主教会主堂）。他们的另一个名字“老罗塞尼亚人”则具有其族群色彩。这些领导着罗塞尼亚民族运动的希腊天主教主教和教士们忠于帝国，在政治和社会观点上都持保守立场，并将自己和哈布斯堡帝国内的同胞们视为一个独特的罗塞尼亚民族的成员。他们的主要敌人是波兰人，主要盟友则是维也纳。至于那些居住在俄奥国界另一侧的乌克兰同胞，或者说小俄罗斯人，似乎很少引起他们的注意。

虽然1848年革命推动了一个新的乌克兰民族的形成，它却没有回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的问题。罗塞尼亚最高议会领导者们所代表的“罗塞尼亚”选项中包括了各种可能性。于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文学舞台上、被称为“罗塞尼亚三驾马车”的一批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在身份认同上所做的选

择则是这些不同可能性的最佳代表。“罗塞尼亚三驾马车”的领军人物是雅基夫·霍洛瓦茨基[4]、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5]和伊凡·瓦西列维奇[6]。他们都是利维夫神学院希腊天主教分院的学生。与欧洲其他民族的觉醒者一样，他们四处搜集民间传说，并痴迷于历史。他们的动力来自哈布斯堡帝国中其他斯拉夫民族文化活动，其理念则植根于第聂伯河地区那些乌克兰民族觉醒者的作品：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埃内伊达》、俄罗斯帝国出版的乌克兰民歌集，还有哈尔基夫的浪漫主义文学。“三驾马车”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年鉴于1836年出版于布达[7]，题为“卢萨尔卡德涅斯特洛瓦伊亚”[*Rusalka dnistrovaia*，即《德涅斯特河的水泽仙女》（*The Nymph of the Dniester*）]。

年鉴出版时，团体的三位领袖还将哈布斯堡帝国内的乌克兰人视为更大的乌克兰民族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信仰将发生动摇，遭遇竞争。到了今天，三人中只有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被人们尊为加利西亚乌克兰文学的奠基者。沙什科维奇死于1843年，距1848年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知识界动荡还有一段时间。他的同侪伊凡·瓦西列维奇在1848年加入了亲波兰的罗塞尼亚议会，后来被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们视为叛徒。“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位成员雅基夫·霍洛瓦茨基则在19世纪50年代成为加利西亚亲俄派（这些人把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当作更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的领袖之一。因此，用后来的历史学术语来说，“三驾马车”这几位成员选择的道路恰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运动中的三种倾向一致：乌克兰路线（沙什科维奇）、亲波兰路线（瓦西列维奇）和亲俄路线（霍洛瓦茨基）。

不同路线的选择与对书写乌克兰文本的字母的选择紧密相关。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字母战争”在乌克兰社群中两次引起了震动。这场“战争”中同样有三条路线：教会斯拉夫语所使用的传统西里尔字母、普通西里尔字母（类似俄罗斯帝国所使用的字母），最后还有拉丁字母。奥地利官方和波兰精英阶层倾向于使用后者，因为它让新生的乌克兰文学更为接近帝国的标准，在文化上也更易于波兰化。然而，政府在1859年试图在乌克兰语文本中引入拉丁字母时遭到了乌克兰人的联合反对。人们很快就发现，在加利西亚逐渐形成的新民族不会采用西里尔字母之外的任何文字。至于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还是更大的俄罗斯民族或乌克兰民族的一部分，则尚未确定。

1859年发生在加利西亚的“字母战争”在帝国边界的另一边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一年，俄国当局禁止了用拉丁字母印刷的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文本的出版和进口。这一措施被视为一次反波兰的举动，其发起者是基辅的一名审查官员，名叫诺维茨基（Novytsky）。他在一份备忘录里称：加利西亚的奥地利当局正在试图通过使用拉丁字母，将“俄罗斯人”变成波兰

人。他相信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使用拉丁文本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当西部省份的农民们在当地遇到用波兰字母印刷的小俄罗斯语书籍，他们自然会更倾向于学习波兰字母而非俄国字母。”诺维茨基写道，而这又将引领他们去读波兰书籍，暴露在波兰的影响下，使他们远离“俄罗斯文学的灵魂和潮流”。他所提倡的禁令几乎立刻就得到了执行。

这位审查者主要关注的是农民群体，当时农民已经快要得到解放。农奴制在俄罗斯帝国境内被真正废除是在1861年，比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解放农奴晚了12年半。这次解放没有引发一次革命，但于1863年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引起了一场波兰人的起义。与归属哈布斯堡王朝的乌克兰农民一样，俄国人统治下的乌克兰农民获得了个人自由，却只得到了很少土地，这使他们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贵族阶层。然而与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乌克兰农民不同的是，被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乌克兰农民既没有得到参与选举政治的权利，也不能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们不能获得大学的教席，也不能读到用母语印刷的书籍。更甚的是，帝国政府还禁止用“小俄罗斯方言”出版宗教类和教育类的作品。

俄罗斯帝国境内对所有乌克兰语出版物实际上的全面禁止发生在1863年夏天，正值当年1月开始的波兰人起义的中期。乌克兰农民阶层对帝国的忠诚再度面临危险。政府决定，当问题涉及乌克兰语言时，它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巩固帝国的俄罗斯民族统一，而这就要求将农民阶层隔绝于不受帝国欢迎的乌克兰爱国者群体的影响之外。“此前出版的小俄罗斯语著作的目标读者仅仅是南俄罗斯地区的受教育阶层，然而现在那些小俄罗斯民族性的宣传者已经将他们的精力转移到了未受教育的大众身上。以普及读写能力和教育为伪装，那些试图实现政治野心的人已经开始印刷识字课本、字母书、语法课本和地理课本等书籍。”帝国内政大臣彼得·瓦鲁耶夫[8]在一条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指令中写道。这条禁令不光禁止了拉丁字母版的乌克兰语出版物，西里尔字母版的也未能幸免。瓦鲁耶夫禁令涉及的范围不包括虚构作品，但这类作品当时还非常少见。从1863年到瓦鲁耶夫离开其职位的1868年，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数量从38种减少到仅存一种。

出版禁令最初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但在1876年5月变成了永久性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9]在这个月颁布了一条被称为《埃姆斯上谕》（Ems Ukase）的法令（他当时正在德国小镇埃姆斯[10]享受温泉）。这条法令比瓦鲁耶夫的禁令走得更远，它禁止了所有出版和从国外进口乌克兰语书籍的行为，还禁止了乌克兰语戏剧制作和乌克兰语歌曲的公开演唱。与瓦鲁耶夫禁令一样的是，《埃姆斯上谕》没有对公众公开。禁令在19世纪80年代变得松弛，关于戏剧和歌曲的规定被取消了，然而对出版或从国外进口任何乌克兰语书籍的禁令仍继续存在，直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才被废止。政府仍坚持那条被归于彼得·瓦鲁耶夫的准则——瓦鲁耶夫曾声

称："任何独特的小俄罗斯语都不存在，不曾存在，也不能存在。"乌克兰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被视为一种对帝国统一的威胁：它威胁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性，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波兰的民族主义。

尽管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埃姆斯上谕》时身处遥远的德国，这条法令的主要提议者和推动者却在基辅。米哈伊尔·尤瑟佛维奇[11]是来自前哥萨克国波尔塔瓦地区的乌克兰人，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的贵族寄宿学校（高中）。他在青年时代与普希金交好，也是一名诗人，曾担任军官在高加索地区作战并负伤。19世纪40年代，尤瑟佛维奇成为基辅教育界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他取得了基辅教育区的一个领导职位，并积极参与基辅考古委员会的工作，主要负责从文献角度证明右岸乌克兰从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从其政治和文化观点来看，尤瑟佛维奇持典型的"小俄罗斯主义"立场：他热爱乌克兰，认为自己是在为包括第聂伯河两岸的小俄罗斯的利益而工作；他也是温和的平民主义者，相信小俄罗斯农民阶层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波兰贵族、犹太承租人和天主教（联合教会）教士的侵害；最后，他还是俄罗斯民族所有"部族"统一的信仰者。尤瑟佛维奇将帝国视为他所代表的小俄罗斯爱国主义的盟友和保护者，称得上是帝国的忠诚子民。

对那些从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时代起就被官方称为乌克兰爱国者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尤瑟佛维奇既是他们的盟友，也是他们的对手。这种关系依时间和情况的不同而变化。尤瑟佛维奇在兄弟会成员被捕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其立场却更多地与兄弟会而非当局站在一边。他拒绝接受一名向他揭发兄弟会颠覆活动的学生提交的书面告密材料，后来又向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发出警察即将前来搜查的提醒，并帮助科斯托马罗夫销毁了那些会被当成罪证的材料。尤瑟佛维奇不相信科斯托马罗夫及其朋友们的活动会对国家造成危害，而是把他们当成对抗在右岸乌克兰和沃里尼亚占统治地位的波兰文化的盟友。在尤瑟佛维奇的积极参与下，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纪念碑得以在基辅城中竖立起来，它也成了尤瑟佛维奇的信念与忠诚的证明。纪念碑上最初的铭文如下："致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

纪念碑揭幕在1888年揭幕，此时尤瑟佛维奇已不相信乌克兰爱国者是一个无害的群体。1875年，他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所谓的乌克兰爱国者运动"（"On the So-Called Ukrainophile Movement"）的备忘录，并将之提交给帝国当局。在这份备忘录中，那些来自乌克兰爱国者阵营、与他观点对立的人被他冠以图谋将乌克兰从俄罗斯分裂出去的罪名。尤瑟佛维奇声称：瓦鲁耶夫禁令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只是让俄罗斯帝国内部和奥属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爱国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紧密，而后者正是波兰人的代言人，因此俄国必须采取更激烈的措施来制止乌克兰爱国者们的破坏活动。

尽管包括基辅总督在内的本地官员们认为尤瑟佛维奇的控诉过于夸张，圣彼得堡当局却认同他的论证和逻辑——他们担心帝国统一受到威胁，也担心来自波兰人还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各种可能阴谋。于是皇帝签署了那道上谕，不仅禁止了乌克兰语书籍的出版和进口，还为一份加利西亚报纸提供了补贴，因为这份报纸被视为一座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抵抗乌克兰爱国主义的堡垒。

被尤瑟佛维奇认为对帝国构成严重威胁的这些乌克兰爱国者是何许人呢？他们中有乌克兰国歌《乌克兰还没有灭亡》的词作者帕夫洛·楚宾斯基[12]，也有基辅大学的古代史教授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13]。以上两人都是基辅知识分子团体“基辅赫洛马达”（“基辅社团”）的成员。这个团体的兴趣基本都集中于文化领域。楚宾斯基和德拉霍玛诺夫都不曾主张乌克兰应该脱离俄罗斯帝国，也没有亲波兰倾向。然而他们都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老一代小俄罗斯主义者领袖群体不满，因为那一代人未能推翻瓦鲁耶夫禁令。更重要的是，德拉霍玛诺夫和他的支持者将尤瑟佛维奇从基辅学术活动重镇基辅地理学会的领导位置上赶了下来，这是《埃姆斯上谕》出台的原因之一：尤瑟佛维奇进行了反击，并造成了纷争之初谁也没能预料到的后果。

《埃姆斯上谕》让乌克兰爱国者们变得更加激进，使得乌克兰爱国者和小俄罗斯主义理念支持者之间的代际矛盾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对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而言尤其如此——他的大学教授资格被剥夺，随后离开俄罗斯帝国前往瑞士，定居于日内瓦。他在这里写下的一批作品使他成为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乌克兰政治思想家。德拉霍玛诺夫也是第一个接受社会主义理念的人。在19世纪80年代，他为乌克兰民族的独特性大声疾呼，并宣扬一个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联邦的理念。这一理念可以上溯到科斯托马罗夫的《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中的观点，但德拉霍玛诺夫心目中的联邦并不限于斯拉夫民族，而是包括整个欧洲。通过德拉霍玛诺夫的著作，乌克兰民族运动从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被摧毁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开始重新思考其政治目标和其文化活动的含义。

德拉霍玛诺夫也是第一个以其观点对奥属乌克兰的局势造成巨大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尽管尤瑟佛维奇对乌克兰爱国者群体的指控大部分不属实，但其中也有符合事实的部分：这些人与加利西亚之间联系紧密，而瓦鲁耶夫禁令只起到了加强这种联系的作用。由于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用乌克兰语出版著作完全没有可能，乌克兰爱国者充分利用了在加利西亚存在的机会。《埃姆斯上谕》在尤瑟佛维奇的检举启发下出台后，加利西亚对实现用乌克兰语出版著作的目标变得更具吸引力了。由于俄属乌克兰地区的文学出版遭到禁止，乌克兰最有名的文学家，包括作家伊凡·涅崔-列维茨基[14]和剧作家米哈伊洛·斯塔利茨基[15]在内，都在加利西亚出版他们的作品。

《埃姆斯上谕》未能阻止乌克兰文学的发展，却造成了一种局面：大部分最杰出的作者身处俄罗斯帝国境内，他们的读者却在边界另一边的奥地利。这些作家无法与他们的读者直接接触，反之亦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局面竟帮助推动了一种共同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在帝国边界两侧的发展。

在东部乌克兰人发现加利西亚这个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地方和出版市场的时候，加利西亚本地的乌克兰人事实上已经分裂为两个相互竞争的群体：亲俄派和乌克兰爱国者派。1867年哈布斯堡帝国的宪法改革之后，这道裂痕变得十分明显。在输掉对意大利和普鲁士这两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战争之后，奥地利当局决定向帝国最好战的成员匈牙利人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帝国的延续。“奥匈折中方案”[16]创造了一个被称为奥匈帝国的二元帝国。匈牙利王国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更大的自治权，与帝国其他部分的关系仅系于皇帝个人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然而匈牙利人并非哈布斯堡帝国中唯一受惠于折中方案的民族：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取得了自治权。令乌克兰人恐慌的是，他们成了波兰人自治权的牺牲品——维也纳将加利西亚省的统治权交给了本地的传统波兰的精英阶层。

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感到自己遭遇了背叛：哈布斯堡家族惩罚了他们的忠诚，却奖励了那些不安分的民族。1867年的妥协方案为教会主教团和“老罗塞尼亚人”的主导地位敲响了丧钟，并使亲俄运动的力量得到增强。亲俄派的领袖们，包括希腊礼天主教会牧师伊凡·纳乌莫维奇[17]在内，宣称罗塞尼亚人的忠诚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而如果他们还想抵抗波兰化，就不得不改变对当局的态度。纳乌莫维奇还抨击了试图创造一个独特的罗塞尼亚民族的努力——在波兰人的强大政治和文化攻势下，这个民族事实上毫无获胜的可能性。在纳乌莫维奇看来，奥地利的罗塞尼亚人是更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他的支持者们将自己视为小俄罗斯人，声称俄罗斯书面语言其实是小俄罗斯语的一个翻版，一个“小俄罗斯人”在一个小时内就能学会它。然而这个目标被证明远没有那么容易达成：在尝试掌握俄语的过程中，亲俄运动的领导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俄语和教会斯拉夫语的混合体，并尝试将它用于彼此交流和写作。

19世纪60年代晚期，亲俄派掌握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大部分乌克兰人组织的控制权。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刚刚获得权力的匈牙利人实施积极的马扎尔化[18]政策，遏制了一切本地文化的发展。俄国政府则通过津贴和奖学金等方式支持亲俄派的活动，自然也引起了维也纳的疑虑。1882年，纳乌莫维奇被奥地利当局逮捕，被控叛国罪：他发起了一场农民请愿运动，要求在一个拥有希腊天主教传统的村庄建立东正教教区，这被视为一次亲俄宣传的尝试。加利西亚和外喀尔巴阡地区亲俄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也与纳乌莫维奇一样遭到当局审判。他们最终被判定犯下了各种反对国家的罪

行，并被送进监狱。此后，包括纳乌莫维奇本人在内的许多被诉者都迁往俄罗斯帝国。

1882年的审判之后还发生了其他针对亲俄派活动家的起诉。一方面，俄罗斯帝国当局四处追索那些对乌克兰人是大俄罗斯民族一部分的观点持异议者，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却对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进行迫害。奥地利官方对亲俄行为的镇压削弱了亲俄派运动，另一群活动家借机出现在加利西亚政治舞台的中心。这群人被称为平民主义者或乌克兰爱国者。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罗塞尼亚三驾马车”及其主要理论家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然而其直接传承则来自“普洛斯维塔协会”[19]（“启蒙会”）。该会成立于1868年，即奥匈折中方案之后一年。与亲俄派一样，乌克兰爱国者们相信从前那种倒向帝国政府的罗塞尼亚民族运动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老罗塞尼亚人”推崇的民族构建模式也没有出路。然而乌克兰爱国者们主张的前进方向与他们的对手有很大区别：他们提出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罗塞尼亚人事实上是一个更大民族的一部分，但这个更大的民族并非帝国化的俄罗斯民族，而是就居住在国界另一边的乌克兰民族。这些乌克兰爱国者与罗塞尼亚民族运动的传统领导者——教士中的精英阶层——发生了分歧，并将自己描述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这也是他们被称为“平民主义者”的原因。

加利西亚的平民主义者和他们的出版物成为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的天然盟友。1873年，在哥萨克统领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的后代伊丽莎白·米洛拉多维奇[20]的资助下，加利西亚的平民主义者们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学会。为了强调它与俄属乌克兰的联系和它对联合所有乌克兰人的关注和追求，这个学会在后来以塔拉斯·舍甫琴科的名字命名。基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还帮助加利西亚的同人成立了为东西两个乌克兰人群体服务的乌克兰语报纸和杂志。在来自东方的援助下，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爱国者以一点一滴的方式，在与亲俄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夺取了布科维纳的罗塞尼亚人组织的控制权。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这两个奥地利省份，来自俄属乌克兰的智力支持被证明是乌克兰爱国者运动兴起的关键因素。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两个分支相互依存，以各自的方式受益于双方的合作。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将基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的思想变得更加激进，让一个独立于泛俄罗斯帝国蓝图之外的乌克兰民族进入了他们的想象。

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到来之际，乌克兰仍被奥地利-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分为两部分，与一个世纪之前波兰被瓜分时代的情况一样。然而此时的乌克兰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这个新的联合并非源于教会的统一：东正教会与联合教会之间的分裂仍然存在，在俄国对其治下的联合教会信徒进行“重新统一”之后，这条分界线恰与帝国的边界重合。新的联合

来自新的民族观念。那个认同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信仰希腊天主教的独特罗塞尼亚民族概念尽管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得到加强，却只延续了20年，没能挺过哈布斯堡帝国向二元帝国的转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哈布斯堡帝国内部的民族运动就摆脱了宗教意义上的排他色彩。亲俄派和乌克兰爱国者派都与边界另一边的东正教同胞建立了联系。在这两个阵营中，人们都不怀疑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罗塞尼亚人与罗曼诺夫王朝治下的小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分歧只在于他们到底是哪个民族的组成部分，是泛俄罗斯民族还是泛乌克兰民族。

身处俄罗斯一侧的乌克兰活动家们同样分为两派：泛俄罗斯派和泛乌克兰派。他们也同样尝试回答奥匈帝国境内同胞们所面临的问题。在19世纪最后一段时间出现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政治舞台上的那一代民族活动家将会给出他们的回答。这将是一个工业进步、城市化、读写能力普及和平民政治得到迅猛发展的时代。

---

[1] Toleration tax，奥匈帝国对犹太人征收的一种税项，指犹太人需要缴税才能换来对他们的“容忍”。

[2] Franz Stadion（1806—1853），19世纪中叶的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加利西亚总督、内政大臣和教育大臣等职。

[3] Leopold von Sacher（1797—1874），奥地利官员、博物学者。他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穿裘皮的维纳斯》的作者利奥波德·冯·扎赫尔-马索克（Leopold von Zacher-Masoch，1836—1895）之父。“马索克”是扎赫尔的妻子夏洛特·冯-马索克的姓氏。原文此处作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疑为误将扎赫尔之子的名字与他本人的名字混淆了。

[4] Yakiv Holovatsky（1814—1888），出生于加利西亚的著名乌克兰历史学家、民族志学者、语言学家、诗人。

[5] Markian Shashkevych（1811—1843），出生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牧师、诗人、翻译家。

[6] Ivan Vahylevych（1811—1866），出生于加利西亚的浪漫主义诗人、语文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7] Buda，前匈牙利王国首都，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位于多瑙河西岸的部分。

[8] Petr Valuev（1815—1890），俄罗斯帝国政治家、作家。他在1861年至1868年间担任俄罗斯帝国内政大臣，从1862年开始兼管出版审查，在1863年7月

13日向时任教育大臣发出了一条关于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秘密指令，但他本人并未担任过教育大臣。此处原文为“教育大臣”，与本书所附大事年表中对瓦鲁耶夫的职务也不符，有误。

[9] Alexander II（1818—1881），俄国沙皇（1855—1881年在位）。他是尼古拉一世的长子，在位期间实施了废除农奴制等重大变革。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3月13日遇刺身亡。

[10] Ems，即今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城市巴德埃姆斯（Bad Ems）。

[11] Mikhail Yuzefovich（1802—1889），基辅教育区副总监、基辅考古委员会主席。他以其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闻名。

[12] Pavlo Chubynsky（1839—1884），19世纪乌克兰诗人、民族志学者。

[13] Mykhailo Drahomanov（1841—1895），19世纪乌克兰政治理论、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民族志学者。

[14] Ivan Nechui-Levytsky（1838—1918），乌克兰著名作家，被视为乌克兰现实主义叙事的奠基者。

[15] Mykhailo Starytsky（1840—1904），乌克兰作家、诗人、剧作家。

[16] Austro-Hungarian Compromise，1867年奥地利帝国在其国际地位下降之际为避免帝国分裂而与匈牙利达成的妥协，其结果是奥匈帝国的产生。

[17] Ivan Naumovych（1826—1891），加利西亚乌克兰牧师、议员，19世纪西乌克兰亲俄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18] Magyarization，即“匈牙利化”。马扎尔人为匈牙利人的别称。

[19] Prosvita，乌克兰语为просвіта，1868年创建于加利西亚的利维夫，成员来自多个知识分子群体，宗旨为对抗当时的反乌克兰的殖民主义和亲俄主义潮流。到1913年年底，普罗斯维塔协会已经拥有77个分会。

[20] Yelyzaveta Myloradovych（1832—1890），俄国女伯爵、社会活动家。

第16章
前进

1870年，威尔士企业家约翰·詹姆斯·休斯[1]率领8艘船从英国起航。船上装载着各种冶金机械，乘客有近100人，都是熟练的矿工和冶金工人。大部分工人与休斯一样来自威尔士。他们的目的地则是乌克兰南部、亚速海以北、顿涅茨河沿岸的草原。这支远征队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座体系齐全的冶金工厂。“刚启动这些工作时，我一心致力于培训那些将留在这里的俄国工人。”休斯在后来写道。这项工程耗费了数年时间。在非专业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劳工们的帮助下，休斯和他的部下很快建起了冶铁厂和铁轨厂，还在工厂周围建起了一座小镇。这些工厂和小镇成为尤兹夫卡（今天的顿涅茨克）[2]的雏形。这座城市直到最近一段时间还拥有超过100万人口，是顿巴斯地区（顿涅茨河工业盆地）的主要中心城市。

休斯的到来标志着乌克兰历史中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人口生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转变源于迅猛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在经济扩张、城市化，以及俄罗斯农民（他们将为城市提供人力，并将成为工业无产阶级主力军）大量流入的过程中，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地区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同样的进程也发生在加利西亚——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石油工业在这里起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普遍特征，而乌克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世代中的乌克兰经济、社会和政治图景都因这些进程而改变。

俄属乌克兰地区的最初变革始于1854年9月英法远征军登陆克里米亚。一年以前，俄法之间因争夺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而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这次入侵正是那场战争的最新行动。此时奥斯曼帝国已日薄西山，它的未来和列强在其广大属地上的影响力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目标。英法联军把俄罗斯帝国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看作对它们在地中海地区利益的威胁，将之团团围困。漫长的围城和军事行动给双方都带来了惨重的伤亡（在巴拉克拉瓦战役[3]中，英军轻骑兵旅的灾难性冲锋震惊了英国公众）。塞瓦斯托波尔最终在1855年9月落入入侵者之手。这成为俄罗斯历史记忆中抹之不去的伤痛和耻辱。双方签署了《巴黎和约》，正式结束了战争。条约禁止俄罗斯帝国在塞瓦斯托波尔或黑海沿岸任何地方拥有海军基地。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在帝国政府和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反思。俄军曾在1814年征服巴黎，40年后竟在自己视为后院的土地上战败！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受到战败的打击，于1855年3月驾崩，在位30年。他的去世让一次政策转向变得几乎不可避免。新君亚历山大二世实施了雄心勃勃

的改革方案，希望赶上西方的步伐，让俄罗斯实现社会、经济和军事现代化。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只能用帆船对阵英法联军的蒸汽军舰，还不得不自沉其黑海舰队的舰只以阻止敌舰进入塞瓦斯托波尔港。现在，俄国无论如何都要拥有一支新式海军。此外它还需要铁路，因为在没有铁路的条件下将兵力、弹药和补给运到距帝国腹地千里之外的克里米亚这样的地方太过困难。令圣彼得堡难堪的是，在克里米亚修筑第一条铁路的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他们在围城期间建成了连接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铁路。

如果俄国还想保住克里米亚，就需要通往这个半岛和其海军基地的铁路。于是当局决定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那是帝国的另一个偏远角落，官员们认为它难以防守，很容易被英国人夺走。但俄国不会放弃克里米亚。此时克里米亚鞑靼人已经在向奥斯曼帝国迁移，俄国的舰队和要塞都已不复存在，但塞瓦斯托波尔成了大众瞻仰的目标，成了俄罗斯帝国的新圣地。帝国政府批准了连接莫斯科和塞瓦斯托波尔、途经库尔斯克和哈尔基夫的铁路修筑方案，但问题在于资金的匮乏。国库拿不出这笔钱，而俄国在1863年对波兰叛党的镇压又引发了类似后来的国际制裁的反应。法国政府说服当时法国重要的铁路建设投资者詹姆斯·迈耶·德·罗斯柴尔德[4]不要借钱给俄国，而打算承担修建工程的英国公司又无法从伦敦金融城获得足够的资金。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被推迟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工，但在乌克兰南部修筑铁路的念头已经深深植入了俄国政府、军队和商界精英的头脑中。

与后来连接莫斯科与塞瓦斯托波尔的铁路相比，本地的第一条铁路有些太过简陋。它从克里米亚西北部黑海海滨的敖德萨[5]通往波多里亚城市巴尔塔。这条新铁路建于1865年，比连接利维夫和普热梅希尔、克拉科夫和维也纳的铁路晚4年。与利维夫铁路不同的是，从敖德萨出发的这条铁路与政治、战略和政府都没什么关系。它存在的理由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因素。在19世纪中期，乌克兰的出口额占整个俄罗斯帝国的75%。帝国以西伯利亚毛皮为主要出口产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西伯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时代尚未到来，因此乌克兰的谷物填补了帝国预算表上的这块空白。波多里亚是帝国境内的主要产粮区之一，而敖德萨这座1794年建于从前诺盖鞑靼人定居点上的城市就成了连接帝国与欧洲市场的主要通道。

财源匮乏的帝国希望增加其出口额，这就需要有一条铁路，而修筑铁路又需要钱。敖德萨总督提议利用俄军中的刑徒营，打破了这个死循环。这不是帝国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用免费劳力解决问题，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设想中，敖德萨-巴尔塔铁路是敖德萨-莫斯科铁路的第一段，应当经过基辅，将充斥着不安分的波兰贵族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与帝国腹地连接起来，以此削弱华沙的影响。然而这个计划在经济上毫无意义，因为基辅地

区及基辅城北的森林地区没有什么可供出口的产品。因此，梦想着巩固帝国政治统一的战略家们最终输给了追求利益的游说团。从巴尔塔出发的铁路没有经过基辅，而是经过波尔塔瓦和哈尔基夫，并将在哈尔基夫与后来的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连通。后者在长期拖延之后，于1875年竣工。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俄罗斯帝国重新取得了在黑海拥有海军的权利，于是它在塞瓦斯托波尔建设自己的新海军。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其关键的重要性却是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经济方面，这条铁路促进了地区贸易以及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的发展；文化方面，它以从前无法设想的各种方式，将遥远的克里米亚与帝国的核心地区连接起来，推动了俄罗斯对这个半岛的文化殖民过程。到了19世纪末，原来仅是黑海岸边一个小渔村的雅尔塔[6]已经成了帝国的夏都。皇帝和他的亲眷们在克里米亚海岸上建起华丽的宅邸，并对此地的东正教堂和修道院的建设提供支持。沙皇和皇族之外，为数众多的朝臣、高级和中级官员，以及（最后然而同样重要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在克里米亚消夏。安东·契诃夫[7]在雅尔塔拥有一所朴素的房子。他在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士》（*Lady with a Lapdog*）中刻画了那些来到这个克里米亚度假胜地的俄国游客的体验。俄国社会上层将克里米亚变成了他们视之为家的广袤帝国的一部分。

1894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8]在雅尔塔附近利瓦季亚[9]的庄园中死去。人们用马车将他的遗体运到雅尔塔，再用船转运到塞瓦斯托波尔，然而从那里用铁路运回圣彼得堡。到他去世之时，铁路已经在乌克兰大地上纵横交错，将敖德萨、波尔塔瓦、哈尔基夫、基辅，还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联结起来。从敖德萨坐火车出发，你还可以抵达利维夫，而基辅也与利维夫和华沙连通。第一条敖德萨-巴尔塔铁路长度仅有137英里（约220千米）。到了1914年，乌克兰境内的铁路总长度已经超过1万英里（约16 093千米）。铁路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流动性，也打破了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在帝国最新获得的领土乌克兰草原地区，这一变化的影响比在其他地区更为深远。

曾经被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地区如今已为士绅阶层所控制，并变成了欧洲的面包篮。此地什么都不缺，只缺有能力来开垦这些处女地的人手。尼古拉·果戈理的经典之作《死魂灵》[10]中的主角乞乞科夫试图通过将死去农民的“魂灵”卖给政府并将他们“迁”到此地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现实中，“魂灵”越少而土地越多，就意味着农民阶层越富裕，而在整个帝国境内，南乌克兰地区的农民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都过得好。在19、20世纪之交，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及半岛以北草原地带的塔乌里达省[11]平均每户农民拥有40英亩（约16.2公顷）土地，而在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地

区，每户仅有9英亩（约3.6公顷）。

许多世纪以来，定居人口占据的林草混交带和游牧人口占据的南方一直存在差异。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界线以及奥斯曼-波兰-俄罗斯之间的国界让它变得更加明显。然而这一差异正在缓慢地成为历史。铁路将北方的产粮区与南方黑海沿岸的港口联结起来，也就成为乌克兰腹地与地中海和利润丰厚的欧洲市场之间的纽带。在乌克兰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受到游牧民族威胁的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和顿河商路如今变得安全了，并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复兴贡献着力量。维京人曾围绕第聂伯河-黑海贸易通道建起基辅罗斯国家，此时这条通道开始兑现人们对它的期许。第聂伯河险滩段成为剩下的唯一后勤障碍。

铁路建设还为高速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并因此再度让南方受益。城市的膨胀成为乌克兰各地的普遍现象。到了19、20世纪之交，基辅已经是俄罗斯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人口从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2.5万增加到1900年的25万。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增长，在南方的发展面前也黯然失色：1814年敖德萨同样只有2.5万人，到了1900年却已有45万居民。城市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快速的工业化，在这一方面南方仍然走在了前面。尤兹夫卡的人口在1897年之前的10年中就增加了超过5倍，达到接近3万人，并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又翻了一番还多，在1917年的革命前达到7万人，突出显示了乌克兰东南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尤兹夫卡的故事于1868年在伦敦发端。这一年，53岁的成功商人、发明家和米尔沃尔钢铁公司[12]经理约翰·詹姆斯·休斯，也就是我们在本章开篇见证其离开英国的那个人，决定选定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遭到克里米亚战争的打击之后，俄国政府正忙于加强对进入帝国的海陆通道的防御。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就曾从波罗的海上炮轰圣彼得堡的屏障——海岛要塞喀琅施塔得[13]。有意思的是，俄国政府打算为应对来自英国的可能攻击而加强防御，找来的帮手却是米尔沃尔钢铁公司。俄国将军、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英雄爱德华·托特列边[14]主持了谈判。休斯前往圣彼得堡安排这项工程。俄国人向休斯提供了在他们的帝国领土上修建冶金厂的特许权，而他则接受了这项挑战。

甫一抵达亚速海岸边的草原，这位威尔士人和他的团队就在奥维契（Ovechii）农庄落下了脚跟。奥维契是17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建立的一个小定居点，然而休斯对这一地区的哥萨克历史没什么兴趣。他买下这片土地并来到奥维契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4年前，俄国工程师们已经将此地划为建立冶金厂的理想地点，因为它距离铁矿、煤矿和水道都不远。政府曾试图在这里建起一座工厂，却因为缺少建筑技术和运营冶金厂的经验而没有成功。休斯则在这两方面都是专家。1872年1月，他新建的冶铁

厂就生产出了第一块生铁。19世纪70年代中，他又建起了更多的高炉。这些工厂雇用了近1800人，成为帝国最大的金属生产企业。工人们聚居的地方渐渐被称为尤兹夫卡，其名得自创始人的姓氏（“休斯夫卡”）。这座钢铁和矿山之城将在1924年被更名为斯大林，在1961年再度更名为顿涅茨克。

休斯是极少数亲身迁居乌克兰的西方企业家中的一个，但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前往乌克兰草原的熟练工人则成百上千。数以百万计的法郎和英镑从他们的祖国流向此地，他们则追随而至。为改造乌克兰南部地区提供金融资本的主要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银行家。在20世纪初，乌克兰超过50%的钢材、超过60%的生铁、70%的煤炭和所有的机械都由外国公司生产。俄国企业的资本和技术都相对有限，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投入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业潜力的挖掘中。

帝国有一样几乎可以无限量供应的资源：非熟练工人。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让更多的婴儿存活下来，而活下来的人的寿命也变得更长了。一个村庄中的人口越多，就意味着每户人家拥有的土地越少。人口的相对过剩在农奴解放之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村庄中的一大问题。在帝国姗姗来迟的工业革命意味着“过剩”的人口从此可以流向膨胀中的城市。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乌克兰南部勃兴的工业城镇就成了吸引数以十万计农民离开贫穷村庄的磁铁。大多数来到这里的人都来自俄罗斯的南方省份，因为那里的土壤远比乌克兰贫瘠，对土地的渴望也更加强烈。

尤兹夫卡提供的工作相当危险，但以当时的标准而言报酬甚为丰厚，吸引了许多俄罗斯农民来到此地。年轻的尼基塔·赫鲁晓夫[15]就是他们中的一员。1908年，14岁的赫鲁晓夫离开俄罗斯小村庄卡里诺夫卡[Kalinovka，位于从前哥萨克国的首府赫卢希夫东北面约40英里（约65千米）处]来到尤兹夫卡和他的家人会合。在将全家人搬到这里之前，赫鲁晓夫的父亲谢尔希是尤兹夫卡地区一条铁路上的季节工，后来又成了全职的矿工。谢尔希从未放弃攒够了钱之后买上一匹马回到卡里诺夫卡的梦想，他的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梦想。赫鲁晓夫热爱城市生活，成了一名矿山机械师。他在1917年革命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从此开始他辉煌的政治生涯。1957年斯普特尼克1号[16]发射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的领导人都是赫鲁晓夫。

在未来的苏联领导人中，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是唯一一个举家迁离某个俄罗斯村庄并受益于南乌克兰地区工业繁荣的。在赫鲁晓夫一家迁居之前几年，伊利亚·勃列日涅夫（Ilia Brezhnev）就来到了乌克兰工业城市卡缅斯克（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17]。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8]于1906年出生在这座钢铁之城。他曾是赫鲁晓夫的得意门生，并最终继承了苏联的最高权力。赫鲁晓夫一家和勃列日涅夫一家都是俄罗斯农民向南乌

克兰的大迁移的参加者。这场迁移运动是这一地区城市中乌克兰裔人口比例下降的原因之一。1897年，俄罗斯帝国进行了它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人口普查。此时帝国乌克兰诸省的乌克兰人数量为1 700万，俄罗斯人数量为300万，比例接近6：1。然而在城市中，两个族群的人口数势均力敌——俄罗斯人略多于100万，乌克兰人略少于100万。俄罗斯人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占据多数：他们在哈尔基夫超过60%，在基辅超过50%，在敖德萨则约为50%。

跻身于企业主阶层的乌克兰人不多，其中大多数又居住在乌克兰中部地区。19世纪下半叶，有赖于当地甜菜种植的糖业得到发展，让一些乌克兰企业主发了财。谢梅连科家族是这群人中的翘楚。这个家族的成员之一普拉东·谢梅连科[19]给从流放地归来的塔拉斯·舍甫琴科提供了帮助，并资助出版了舍甫琴科的作品《科布扎尔》的一个版本。（今天这个家族主要以雷内特·谢梅连科苹果为人所知。普拉东的儿子列夫是这种苹果的培植者，并以父亲的名字为它命名。）谢梅连科家族的出现并非常例，而是一个异数。在企业家群体中，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都远多于乌克兰人。

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同样的族群比例也体现在产业工人阶层中。他们大都是俄罗斯人。犹太工匠们离开了从前归属波兰的乌克兰地区，来到东部和南部的中心城市，并在手工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东部的哈尔基夫不在犹太人的“定居范围”（帝国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地区）之内，但乌克兰其他地方，包括敖德萨和卡特琳诺斯拉夫（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20]，都允许犹太人定居。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南乌克兰地区的总人口中，犹太人的比例为12%到14%之间，但他们在小城镇中占据了多数。在大城市中，犹太人虽然不占多数，却也不可忽视：他们在敖德萨居民中占37%，在卡特琳诺斯拉夫则是第三大族群。

乌克兰人占据了乌克兰居民中的大半，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没有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这是为什么？在此，赫鲁晓夫一家和勃列日涅夫一家的故事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状况。两个家庭都是从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省迁往乌克兰东南地区的。在19世纪下半叶，库尔斯克省农民户均拥有的土地不超过7英亩（约2.8公顷）。他们来到的地方属于卡特琳诺斯拉夫省，这里的农民户均拥有土地是25英亩（约10.1公顷），而且都是所谓的黑土，比库尔斯克地区的肥沃得多。如前所述，本地的农民生活状况远远好于俄罗斯帝国任何其他地区。这些农民倾向于留在家乡，而且通常也能负担得起。如果迫不得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选择到帝国东部的偏远草原地区重新定居，而不是到邻近的钢铁工业和矿业城镇去忍受20世纪早期工业的恶劣条件。

乌克兰中部和北部诸省的农民尤为符合上述情况。切尔尼戈夫省即是一例。这里的农民户均拥有土地不超过17英亩（约6.9公顷），且都相当贫

瘠。另一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1]的家族故事让我们得以一窥乌克兰人迁徙史中的这一面。20世纪早期，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潘捷列伊蒙·霍普卡洛（Panteleimon Hopkalo）从切尔尼戈夫省来到斯塔夫罗波尔[22]地区的草原上。1931年，戈尔巴乔夫在这里降生。以当时的情况而言，斯塔夫罗波尔及北高加索地区与乌克兰的环境相似程度几乎超过人们的想象。许多不愿迁往城市、希望寻找免费土地的乌克兰农民迁移到了更远的地方，直至俄罗斯的远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年中，超过150万乌克兰人来到俄罗斯南部和东部边境定居，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些地方获得土地。

农民迁徙浪潮受对土地的渴望驱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全乌克兰范围内都在发生的现象。在俄罗斯帝国之外的奥属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这种现象更加显著。20世纪初，东加利西亚的户均拥有土地数量仅为6英亩（约2.4公顷），比俄属乌克兰人口最为过剩的沃里尼亚省的户均数量还少3英亩（约1.2公顷）。此外，喀尔巴阡山脉中的土地通常比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的土地还要瘠薄得多。该地区的农民大量流失。“这片土地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人口，也无法经受如此的贫困。”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作家瓦西里·斯泰法尼克[23]在其短篇小说《石头十字架》（*The Stone Cross*）中写道。这篇小说创作于1899年，灵感正来自加利西亚农民大批迁居北美的浪潮。仅在斯泰法尼克出生的那个村庄，就有500名农民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

在1914年之前，约有60万乌克兰人离开了奥匈帝国。他们来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那里的矿山和工厂雇用乌克兰移民；他们来到加拿大的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诸省，在那里农民们可以得到土地，在牧场上定居下来。乌克兰人不是唯一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北美的族群。来自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小镇的犹太人通常比他们来得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中，约有35万犹太人离开加利西亚来到美国。原因很简单：与农民一样，奥匈帝国东部省份那些陷入贫困的小镇居民在经济上看不到希望。来自各族群和各宗教团体的移民为他们的新祖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好莱坞明星和娱乐圈名人的祖上都是从加利西亚迁往美国的移民，比如杰克·帕兰斯（帕兰纽克）[24]的乌克兰父母，还有芭芭拉·史翠珊[25]的犹太祖父母。在1990年至1995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督的拉蒙（·罗曼）·纳蒂欣[26]的父母来自布科维纳，而安迪·沃霍尔[27]的父母则来自兰科[28]地区。

加利西亚是奥匈帝国最贫穷的省份。波兰商人、帝国议会和省议会成员斯坦尼斯拉夫·斯捷潘诺夫斯基[29]在其著作《加利西亚的悲惨状况》（*Galician Misery*，1888）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谴责。他在将加利西亚的劳动生产率和消费状况与欧洲其他地区比较时写道：“每个加利西亚居民

只能完成四分之一个人的工作，只能得到半个人的口粮。”工业化并未完全抛弃加利西亚，但它并未显著地增强这一地区的经济运势，也没能为本地人的生计带来多大改善。自古以来，在德罗霍贝奇[30]和鲍里斯拉夫[31]等城镇附近汩汩冒出地面的石油为当地居民带来的只有麻烦。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令人恶心的黑色物质才第一次为当地的药剂师们所用——他们知道如何从中提取煤油。这一新发现的首批受益者中即包括利维夫综合医院的医生和病人们：1853年，这所医院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全部用煤油灯照明的公共建筑。

斯捷潘诺夫斯基是第一批采用蒸汽钻探的方法从加利西亚的石油中获得财富的企业家之一。他的工人们多为波兰裔移民。作为一名秉持波兰民族建构信念的理想主义者，斯捷潘诺夫斯基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并尝试改善他们的境遇，最后却破了产。在奥属加利西亚，生意和民族建构并不总是能协调一致。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英国、比利时和德国公司都来到这里。它们采用的是加拿大工程师和企业家威廉·亨利·麦加维[32]首创的深钻技术。新的管理层取代了多为犹太人的小企业主。乌克兰和波兰农民（前者约占本地劳工人数的一半，后者约占三分之一）的非技术劳动力也不再受欢迎。到了1910年，本地的石油产量已经达到200万吨，占全球产量的4%。当时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则是美国和俄罗斯帝国。

石油为当地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也带来了更多教育机会。一所矿工学校在鲍里斯拉夫开办起来。那个年代修建的许多城市建筑至今尚存，让参观者回想起那段“过去的好时光”。然而就整体而言，石油繁荣对当地经济状况的影响甚为有限。作为这一繁荣进程的中心城市，鲍里斯拉夫的人口在19世纪下半叶增长了两倍，达到1.25万人。整个油田区的人口也是如此，在19世纪最后10年达到41.2万人。但在整个加利西亚范围内，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地区首府利维夫的人口在1870年至1910年间从5万人增长到超过20万人。这个数字看似惊人，但若与经济发展给第聂伯乌克兰诸城市带来的影响相比，就不值一提。冶金繁荣的中心卡特琳诺斯拉夫的人口在5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增长了11倍，到1914年达到22万人。乌克兰最大的城市是敖德萨，人口为67万。基辅紧随其后，拥有63万居民：这一数字差不多是19世纪中叶基辅人口的10倍。

尽管俄属乌克兰诸省和奥匈帝国治下乌克兰诸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同，但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这两个乌克兰地区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资本、商品和人口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观念和信息也同样如此，这标志着现代社会的诞生。新的劳动分工改变了传统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并创造出新的社会群体，尤其是产业工人阶级，这导致一些地区的经济振兴，另一些地区却陷入衰退。乌克兰南部地区是变革的受益者之一：通过黑海诸港，其国际贸易额不断增长，而其工业基地也在迅

速发展之中。

一条新的经济和文化分界线出现了，取代了那条划分乌克兰中北部农业地带和南部游牧民族地带的旧有边界。南方如今已是乌克兰工业和农业的动力之源。这里的农业人口仍记得扎波罗热哥萨克时代的光景，几乎没有经历过农奴制，并且比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要好。铁矿和煤矿的发现又把这一地区变成了勃兴的工业地带。乌克兰南方在俄罗斯帝国的行政管理下逐渐成熟起来。无论是族群意义上还是宗教意义上，这里的人口构成都比更北地区的更加多样化。此外，南方的城市化程度也是全乌克兰最高的。因此，在20世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乱象中，南方将成为整个乌克兰的先驱。

---

[1] John James Hughes（1814—1889），威尔士工程师、商人、顿涅茨克的开创者。

[2] Yuzivka，亦作尤佐夫卡（Yuzovka），今乌克兰顿涅茨克市的原名。

[3] Battle of Balaklava，1854年10月25日发生在克里米亚城市巴拉克拉瓦（今塞瓦斯托波尔的一部分）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由于情报传递失误，英军轻骑兵旅对错误的俄军炮兵阵地发起冲锋，伤亡200多人。

[4] James Mayer de Rothschild（1792—1868），德裔法国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分支的创始人。

[5] Odesa，或Odessa，今乌克兰南部海港城市、敖德萨州首府。

[6] Yalta，克里米亚半岛南岸城市，是黑海沿岸的疗养胜地，也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举办地。

[7] Anton Chekhov（1860—1904），俄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戏剧家。

[8] Alexander III（1845—1894），俄国沙皇（1881—1894年在位）、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他在位期间俄国没有发生国内战争且和平稳定，是俄罗斯帝国后期最繁荣的时期。

[9] Livadia，今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城镇，位于雅尔塔以西3千米处。

[10] Dead Souls，书中“魂灵”（俄语дýши）一词既可表示“灵魂”，也是用于人口的量词。乞乞科夫的生财之道是收购已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即“死魂灵”，并将他们作为活农奴抵押给政府，骗取押金。

[11] Tavrida gubernia，即陶里达省（Taurida Province），见本书第13章注。

[12] Millwall Iron Works Company，1824年创建于英国伦敦的一家钢铁制品公司，曾为英国海军舰船制造装甲和其他装备。

[13] Kronstadt，今俄罗斯港口城市，位于圣彼得堡以西30千米处的科特林岛（Kotlin Island）上。

[14] Eduard Totleben（1818—1884），德裔俄国陆军将军、军事工程师。

[15] 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年在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年在任）。

[16] Sputnik，世界上第一颗进入地球轨道的人造卫星，由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在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发射。

[17] Kamenske，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Dniprodzerzhynsk），位于今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18] Leonid Brezhnev（1906—1982），继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1966年在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66—1982年在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1964、1977—1982年在任）。

[19] Platon Symyrenko，乌克兰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

[20] Katerynoslav，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乌克兰中南部第聂伯罗夫斯克州首府。

[21] Mikhail Gorbachev（1931年生），苏联政治家、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1991年在任）、苏联总统（1990—1991年在任）。

[22] Stravropol，今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首府。

[23] Vasyl Stefanyk（1871—1936），乌克兰散文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为奥地利议会成员。

[24] Jack Palance（1919—2006），原名弗拉基米尔·帕兰纽克，美国演员、歌手，在1992年获得奥斯卡奖男配角奖。

[25] Barbara Streisand（1942年生），美国女歌手、演员、制片人。她是美国历史上唱片销量最大的音乐人之一，并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奖。

[26] Ramon (Roman) Hnatyshyn（1934—2002），通常被称为雷·纳蒂欣，加拿大政治家。

[27] Andy Warhol（1928—1987），美国艺术家，波普艺术代表人物。

[28]　Lemko，即Lemkovina，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今波兰、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交界地带。在这里聚居的族群被称为兰科人。

[29] Stanisław Szczepanowski（1846—1900），波兰经济学家、工程师、企业家。

[30] Drohobych，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市。

[31] Boryslav，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市，以石油为主要产业。

[32] William Henry McGarvey（1843—1914），加拿大石油大亨。

第17章
未完成的革命

1905年1月9日是一个星期天。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清晨，近2万名工人和工人家属从圣彼得堡郊区出发，向市中心行进。35岁的波尔塔瓦省人、毕业于圣彼得堡神学院神父格里高利·加蓬（Grigorii Gapon）引领着这支游行队伍。队伍前列的人抬着一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肖像，还举着教会的旗帜和圣像。人们口中吟唱宗教歌曲，其中还包括为沙皇所做的祷告。工人们希望向沙皇递交一份由加蓬神父起草的请愿书，希望沙皇能保护他们不受雇主的恶劣对待。

圣彼得堡的主要工厂都陷入了罢工，然而工厂主们拒绝满足工人提出的包括引入8小时工作制在内的要求。工人阶级是随工业革命而生的新社会现象，如今他们正请求沙皇承认其基本权利。“我们要求的并不多，我们要求的只是必需的权利，没有它们，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就只是艰苦的劳动和无尽的苦难。”加蓬神父写道。然而请愿中也包括了一些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求选举产生宪法会议。上一次有人向沙皇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还是在1825年12月。那一次政府镇压了后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军官们的叛乱，还用上了大炮。沙皇和他的政府认为，他们必须再一次展示决心，以免重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覆辙：在他们看来，让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丢掉王冠和性命的，正是他的优柔寡断。

当示威者们接近沙皇的冬宫（如今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所在地）时，军队开火了，当场打死100多人，受伤者超过500人。加蓬神父幸免于难，但他再也不会为沙皇祷告，也不再希望得到沙皇的保护。在当夜写下的控诉中，加蓬将沙皇称为畜生，并呼吁人们进行报复：“同胞们，让我们向那受到人民诅咒的沙皇复仇，向他所有那些拥护帝制的恶毒爪牙复仇，向他的大臣们和不幸的俄罗斯国土上的强盗们复仇！”彻底的复仇要在13年后才会到来——布尔什维克们在1918年7月枪杀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但沙皇宫廷希望避免的革命在此时就爆发了。这场革命将整个帝国，包括乌克兰诸省在内，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平民政治的时代，其特点包括政党的创建、议会选举、男性公民获得普选权，以及政府越来越有赖于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圣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之后3天，革命传播到了乌克兰。在星期三，也就是1905年1月12日，基辅南俄罗斯机械制造厂的工人们开始罢工。卡特琳诺斯拉夫、尤兹夫卡和顿巴斯其他地区的冶金工人们很快也加入了罢工。阶级斗争的火焰席卷了此前15年中的经济繁荣地区。如果说1905年1

月之前，工人们只是对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报酬和8小时工作制提出恳求的话，此时他们开始用罢工、示威和对当局的公开抵抗来支持自己的诉求。说到抵抗，那些人口过剩的贫穷村庄也并没有落在城市后面太远。农民们开始砍倒属于贵族的森林中的树木，并开始袭击贵族们的庄园。这样的袭击一共发生了超过300起，以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从前哥萨克国境内的农民最为踊跃。农民们期待沙皇发布诏书，将属于贵族的土地分配到他们手中。这个梦想没能实现。政府没有发出公告，而是派出军队镇压叛乱。1905年12月，政府军在波尔塔瓦省的大索罗钦齐[2]——尼古拉·果戈理（乌克兰语读作米科拉·霍霍里）的出生地——打死了63名农民。而且，大索罗钦齐惨案远非孤例。

1905年夏天，政府开始失去军人们（他们多为农民出身）的无条件支持。这一年6月，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战舰发生哗变。哗变首领和参与者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乌克兰招募的水兵。由于水兵们的“波什”（甜菜汤）[3]中被加入了腐肉，这场原定于10月的哗变提前在6月爆发。根据一些记载，来自日托米尔地区的海军军士赫利霍里·瓦库连丘克（Hryhorii Vakulenchuk）用乌克兰语向他的战友们发出呼吁：“我们还要做多久的奴隶？”在一名高级军官开枪打死瓦库连丘克之后，哗变的领导权传到了来自哈尔基夫地区的26岁水兵奥帕纳斯·马丘申科（Opanas Matiushenko）手中。叛军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升起红旗，从公海航向敖德萨，为正在这座城市举行罢工的工人提供支持。战舰和瓦库连丘克遗体的到来在敖德萨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骚乱和与警察的冲突。

俄国的哥萨克部队封锁了从敖德萨城前往港口的通道，其中包括著名的“波将金阶梯”[4]。在谢尔希·爱森斯坦[5]的经典电影《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1925）中，“波将金阶梯”被描述为大规模杀戮和高度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没有证据表明有人真的在这道阶梯上丧生，然而在全城范围内，的确有数以百计的人被警察和军队开枪打死。“波将金号”战舰最终离开了敖德萨，避免了与一支忠于政府的舰队遭遇，并航向罗马尼亚。哗变的水兵们在罗马尼亚向当地政府投降。他们的领导者马丘申科在欧洲和美国度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敖德萨，继续革命斗争。他最终遭到逮捕和审判，并在“波将金号”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被处死。马丘申科早已成为革命的象征，却拒绝加入任何政党。他遇难时年仅28岁。

1905年10月，工人们的罢工浪潮达到了顶峰。一场铁路罢工让整个帝国陷入瘫痪。在乌克兰地区，主要铁路枢纽如基辅、哈尔基夫和卡特琳诺斯拉夫等地的铁路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产业工人们也很快加入了他们。到了10月中旬，全乌克兰有12万工人罢工，整个帝国的罢工人数则接近200万。于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改变了策略，向他的叛逆臣民做出了一个重大让步。在10月17日发布的诏书[6]中，尼古拉二世对基本的公民权利——信

仰、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给予了承认。这道谕令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引入了帝国，还规定在举行杜马（第一届俄国议会）选举的过程中将保证全社会所有阶级的代表权。至此，俄国距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仅有一步之遥。自由知识分子们也对尼古拉二世的诏书感到欢欣鼓舞。

诏书发布之后，欢庆的人们涌上乌克兰各大城市街头，其中最为兴奋的是犹太人群体。保守派的皇权支持者将犹太人视为革命的紧密同盟，并指责犹太人是工业化和快速的城市化开始以来本地人群遭遇的一切麻烦的根源。许多乌克兰城市中的欢庆活动最终以对犹太人的迫害（pogrom）告终。在乌克兰，或者在整个犹太人“定居范围”内（包括从前波兰-立陶宛联邦诸省和乌克兰南部），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第一波大规模的迫害浪潮发生在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者刺杀之后，人们将他的死亡归罪于犹太人。1903年发生在今天摩尔多瓦境内的基希讷乌[7]屠杀持续了三天三夜，夺走了49人的生命，在美国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并触发了新一轮犹太移民浪潮。然而与1905年发生的迫害犹太人事件相比，从前的事件都黯然失色：当年10月，数百人在基辅、卡特琳诺斯拉夫和敖德萨发生的迫害犹太人事件中丧生，受伤者达到数千人，遭到毁坏的犹太人房屋和企业则数以万计。

在基辅，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一场示威后爆发。这次示威原本的目的是庆祝胜利，也为斥责沙皇的10月17日诏书不过是当局方面开出的空头支票。示威者们攻打市监狱，释放政治犯，污损基辅大学门前的尼古拉一世纪念碑，摘下将大学主楼正面的帝国国徽，毁坏帝国国旗并代之以红旗，并要求绞死沙皇。保守立场的公众将这一切归罪于犹太人。第二天晚上，由外来工人、东正教狂热信徒和彻头彻尾的罪犯组成的团伙开始袭击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来，拿去你们要的自由，拿去你们要的宪法和革命，拿去你们要的皇冠，还有我们沙皇的肖像！”一名袭击者高喊道。27人在袭击中身亡，近300人受伤，约1 800座犹太人住宅和商铺被毁。基辅主要街道赫列夏季克大街上的28家犹太人商店中，只有一家幸免于难。

目睹了这起迫害事件后，20世纪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肖洛姆·阿莱汉姆[8]离开了这座城市，也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往遥远的纽约。在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卖牛奶的台维》（*Tevye the Dairyman*）中，对犹太迫害的预期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在他创作的其他一些故事中也十分明显，百老汇经典剧目《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即基于这些作品。在小说《卖牛奶的台维》和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中，基辅的警察都对犹太人抱有同情态度。实际上，一部分警察的确同情犹太人，但其他许多警察在迫害发生之时置身事外，鼓励暴力行为。基辅发生的情况看起来即是如此。到警察对迫害的实施者采取行动时，对犹太人的袭击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天。

基辅的迫害犹太人事件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乌克兰其他大城市中发生的情况的缩影。袭击的实施者通常是工人，他们刚从俄罗斯的贫穷村庄中迁移到这些城市。另有少部分是需要与犹太人竞争工作机会的乌克兰人，这些人认为自己受到城市和工厂中的官员和企业主的剥削和歧视。犹太人成为他们最软弱的猎物和"合法"的目标：通过对犹太人的袭击，袭击者可以宣示并捍卫自己的"真正俄罗斯人身份"，以及对帝国的专制政体、东正教信仰和民族性等原则的忠诚。农民们则会加入对位于小城镇和大城市周边的犹太人财产的袭击。这些罪犯肆意地破坏了他们此前无法染指的财产。

暴徒们将革命事件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然而，领导那些庆祝沙皇发布诏书同时又对诏书感到不满的群众的，是来自各种政治组织的活动家，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犹太人。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9]中的激进派。他们走在了工人罢工和示威队伍的前列，并对沙皇诏书嗤之以鼻。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通过全帝国范围内的罢工和起义来推翻帝国政府。孟什维克则是同一个党派中的另一个团体，他们反对列宁的发号施令，自行组织其宣传活动。同样非常活跃的还有俄国社会革命党[10]，革命爆发之前，他们就在哈尔基夫、日托米尔、切尔尼戈夫和其他一些乌克兰主要城市建立了分支组织。许多犹太人加入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但犹太人也有自己的政党。在1905年的革命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党派之一即是犹太劳工同盟，它是一个代表犹太工人和工匠的社会主义党派。

犹太人对革命的投入（他们通常团结在犹太劳工同盟的旗帜下）显示了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在逐步开展的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然而，那些"全俄罗斯"的主要党派拒绝向帝国其他民族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犹太劳工同盟的领导人曾参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工作，但当列宁对他们这个组织的自主地位及其专属的犹太工人代表权提出质疑后，这些人就退出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相信工人运动统一而不可分割，正如俄罗斯帝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一样。社会革命党人则更为变通，承认文化自治的重要性，并愿意考虑在俄国建立联邦制度。然而这些让步还远远不足以让帝国内的少数民族不去组建他们自己的政党。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俄奥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就都忙于建立自己的党派。此时正是整个欧洲各路政治力量进入党派创建阶段的时代。他们走上街头，努力动员大众支持他们的政治目标。俄属乌克兰的第一个政党建立于1900年，其动员阶段始于哈尔基夫城。这一年，一群不愿加入那些全俄罗斯党派并寻求融合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理念的当地学生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革命乌克兰党。活动家们在乌克兰建起组织网络，并来到农民中间开展工作，呼吁他们起来反抗。哈尔基夫律师米科拉·米可诺夫斯基

[11]写出了一本题为“独立乌克兰”（*Independent Ukraine*）的小册子，在加利西亚出版。革命乌克兰党人将这本书中阐述的理想当作他们的纲领。通过这个纲领，俄罗斯帝国境内成立的第一个乌克兰政党宣布：他们的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

“一出宏大历史悲剧的第五幕‘民族斗争’已经上演，落幕很快就会到来。”米可诺夫斯基写道。这句话几乎是对不久以后的世界大战将造成的灾难的预言。米可诺夫斯基认为，“那些站起来反抗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并在最近获得自由的民族指明了”一条摆脱列强对抗噩梦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同样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继续写道，随后就宣布了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作为一名律师，他还从法律和历史两方面进行论证，抨击1654年由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达成的俄乌协议。米可诺夫斯基声称赫梅尔尼茨基时代哥萨克军官们得到的权利和特权已被俄国蚕食，因此俄国早已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与从前的哥萨克军官们不同的是，米可诺夫斯基呼吁他的同胞们争取完全的解放，而不是去接受波兰人或瑞典人的保护。

这本小册子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境内乌克兰政治思想的一次转折。乌克兰第一个政党将之作为纲领，更加发扬了米可诺夫斯基的理想。然而这个政党很快就因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孰先孰后的问题而分裂了。在接下来的17年中，米可诺夫斯基提出的乌克兰独立论题退居次位，在1918年1月另一场革命的火焰中才重登舞台。而在当下，即1905年革命时期，多数乌克兰政治家追求的都是在一个“自由”的民主联邦制俄国内部实现自治，而非完全独立。“斯比尔卡”（意为“同盟”）[12]的成功正是这种情绪的证明。“斯比尔卡”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党派，脱胎于米可诺夫斯基的革命乌克兰党，但在成员构成上则是多族群的，并与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劳工同盟有着紧密联系。到了1905年4月，“斯比尔卡”已经拥有7 000名成员。它是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一条地方支流，这也是它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

沙皇的十月诏书为乌克兰的政治舞台带来了更多变化。诏书的发布是沙皇为重夺政治主动权并分化反政府力量的孤注一掷，它将公民权利赋予俄国民众，并引入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为表示对诏书的支持，君主主义党派“十月十七日同盟”[13]成立。10月，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14]也应运而生。紧接着，持国家主义和反犹立场的俄罗斯人民同盟[15]在11月成立。乌克兰的政治光谱如今呈现三种不同色彩：第一种是“斯比尔卡”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全俄罗斯”党派和团体；第二种是自由派的乌克兰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名称颇有误导性的“乌克兰激进民主党”[16]，与俄罗斯立宪民主主义者展开合作；最后一种则是从前的“小俄罗斯主义”的继承者，他们构成了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君

主主义组织的核心。

就他们对乌克兰民族问题的关切而言，这三个阵营都植根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间的乌克兰文化复兴，并都声称塔拉斯·舍甫琴科是他们的先驱。没有一个阵营有兴趣将舍甫琴科视为一名圣彼得堡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有人都将他想象成一个留着哥萨克式髭须、身穿农民式羊皮外套的“人民诗人”。舍甫琴科成了他们与广大农民接触的通行证：而在平民政治的新时代，这完全可能是一张通向胜利的门票。然而，三个阵营中只有一个，即乌克兰自由派，在与民众对话时使用的是舍甫琴科的语言。40多年的禁令之后，1905年革命让他们终于可以这样做。突破性事件发生在1905年2月：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在这个月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呼吁废除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学术界将乌克兰语（小俄罗斯语）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而非仅是一种方言。

1905年10月，在尼古拉二世发布诏书的当天，官方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也解除了。到了1905年12月，已有两家乌克兰语报纸得以出版，一家在卢布尼[17]，另一家在波尔塔瓦。1906年9月，乌克兰自由派在基辅开始出版第一份乌克兰语日报《拉达》（《会议》）[18]。1907年，他们开始发行第一本乌克兰语杂志。第一本乌克兰语学术期刊在下一年问世。此时总共已有9份乌克兰语报纸，发行量达到2万份。而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几年中，乌克兰语出版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其中最为风靡的形式是配有插图、风格幽默的小册子，在1908年至1913年间总印数达到近85万册，其次是印数为近60万册的诗集。事实证明，乌克兰农民更喜欢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讲笑话和朗诵诗歌。

针对乌克兰民众心灵和头脑的第一场竞争发生在1906年春天，第一届俄国国家杜马选举之际。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选举，自由派得到很高的票数。民主主义者中的激进派与俄国立宪民主派合作，也为其成员和同情者在杜马中获得了数十个席位。来到圣彼得堡后，当选议员们立刻成立了“乌克兰人俱乐部”，以宣传乌克兰的文化和政治目标。95名乌克兰议员中有44人加入了这个俱乐部。然而，第一届国家杜马没能存在多久：沙皇发现它过于倾向革命，在两个月后将之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在1907年年初举行。这一次社会民主党人也积极参加进来。斯比尔卡党获得14个席位，在所有乌克兰人党派中仅次于保皇派：后者赢得了近四分之一的民众投票。国家杜马中的乌克兰人组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党团，成员为47人，其目标之一是让乌克兰语进入公立学校。这个党团同样短命：随着帝国内的革命活动逐渐衰退，沙皇得以再度将杜马解散。这届杜马存在于1907年3月到6月，比第一届的寿命只稍长一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成为革命结束的标志。

乌克兰活动家们在1905年至1907年间的行动——无论是组织议会党团，

还是建立乌克兰教育和学术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参照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同胞们所取得的成就。奥匈帝国在几十年前就进入了平民政治时代。俄奥之间的国界并未成为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阻碍，反而是一个有利条件：当一方的情况恶化，另一方的活动家就会接过火炬，并向他们的同胞施以援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当第聂伯河地区的乌克兰人因乌克兰语出版禁令而遇到麻烦时，他们总是能得到加利西亚乌克兰爱国者的援助，也向对方提供支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加利西亚人相信帮助第聂伯乌克兰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0岁的利维夫大学乌克兰史教授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19]是加利西亚经验向第聂伯乌克兰传递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毕业于基辅大学，在1894年来到加利西亚，成为俄奥边界两侧乌克兰学术界的领袖。他开始写作其多卷本的《乌克兰-罗斯史》。这是从学术上构建一个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版本的乌克兰历史叙事的开山之作。赫鲁舍夫斯基还担任了位于利维夫的舍甫琴科科学会主席，并将其改造成一个等同于国家科学院的机构——此时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尚付阙如。当他得知乌克兰人俱乐部在第一届国家杜马期间组成时，赫鲁舍夫斯基立刻离开了他在利维夫的学生们，前往圣彼得堡，为这个俱乐部编辑刊物，并担任乌克兰议员们的顾问。接下来几年中，赫鲁舍夫斯基将他在利维夫编辑的刊物《文学和学术先驱报》（*Literaturno-naukovyi visnyk*）迁往基辅，并仿照利维夫的舍甫琴科科学会，在基辅创建了乌克兰学会。

“俄罗斯的解放”是革命前夕在俄罗斯帝国出现的泛自由派联盟的目标，但赫鲁舍夫斯基声称没有乌克兰的“解放”，这个目标就不会实现。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存在于民主化的联邦制俄罗斯国家内部、民主而自治的乌克兰。赫鲁舍夫斯基呼吁乌克兰知识分子加入乌克兰人自己的政党，不要为实现那些“全俄罗斯”的政治目标而牺牲自己的民族诉求。他还尝试阻止俄罗斯自由派与波兰民族主义者可能结成的联盟——这一联盟将以牺牲乌克兰的政治和文化目标为代价。他提出：民族问题上不应有私相授受，所有民族都应受到平等对待。他的担忧在于：一旦俄国人和波兰人就将波兰语引入前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学校的问题达成一致，会导致乌克兰语被这一地区的学校系统排斥在外，然后，在帝国西部省份，乌克兰乡村地区的俄罗斯化就会被乌克兰农民群体的波兰化取代。不过，随后发生的情况表明，这种威胁并没有变成现实。

赫鲁舍夫斯基在加利西亚的经历很好地解释了他的焦虑。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政治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乌克兰民族民主党[20]，于1899年在赫鲁舍夫斯基和他的亲密盟友伊凡·弗兰科（加利西亚乌克兰人中最著名的作家）[21]帮助下成立。乌克兰民族民主党联合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持乌克兰爱国主义的平民主义者，宣称其最高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比米可诺

夫斯基的革命乌克兰党提出这一口号更早）。他们的短期目标则包括将加利西亚分为乌克兰和波兰两部分，以及实现帝国内部各个族群的平等。这两项主张都令各个波兰人政党感到不快。罗曼·德莫夫斯基[22]领导的波兰民族民主党追求将乌克兰人融合到波兰文化之中，而未来的独立波兰国家的元首约瑟夫·毕苏茨基[23]领导下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则主张以联邦的方式解决乌克兰人问题。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对加利西亚的不同设想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

在1907年的帝国和加利西亚议会选举（奥匈帝国第一次基于男性普选权原则举行的选举）中，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乌克兰人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表现不错，却未能打破波兰人对加利西亚立法机构的控制：选举法本身就有利于波兰上层阶级，又受到波兰官员的操纵。选举的结果是乌克兰人的失败，以及双方之间导致数人死亡的暴力冲突。在大学校园里，分属两个民族社群的学生之间也严重对立，以至于赫鲁舍夫斯基感到去教授晚间课程时有带上一把手枪的必要。1908年4月，在一名乌克兰学生刺杀了波兰裔的加利西亚总督后，波兰人-乌克兰人关系更是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乌克兰民族民主党人未能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分割加利西亚省，并在奥匈帝国内部取得乌克兰人的自治权，但在落实他们的教育和文化目标方面做得不错。在19世纪90年代，乌克兰爱国者和波兰权力集团之间曾实现过一次短暂的和解。在此期间，乌克兰语被作为一种教学语言引入了加利西亚的学校。尽管在20世纪的头10年中波兰人-乌克兰人关系恶化了，乌克兰语的这一地位仍然得以保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有2 500所学校使用乌克兰语教学。因此，对第一代普遍接受教育的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来说，用乌克兰语了解国际局势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在加利西亚，这一简单事实将在未来的世代中成为一种强烈的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基础。

在这场学校课表争夺战中，致力于推广某种形式的俄语的亲俄主义者们失败了。在对选票的争夺中他们同样一无所获。在1907年的选举中，乌克兰政治家们与犹太候选人结成了同盟（至少有两名犹太代表在乌克兰选民的支持下得以进入奥匈帝国议会）。波兰人试图帮助亲俄主义者，却没能成功。乌克兰人党派在帝国议会中斩获了22个席位，亲俄主义者只得到2个。在加利西亚，亲俄主义运动对乌克兰平民主义潮流已不再构成威胁。

1905年革命之后，俄罗斯帝国内的各乌克兰人党派面对的情况完全不同。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在乌克兰人群体中，这些党派的影响也在逐渐丧失。乌克兰语从未被允许进入学校，而随着革命的落幕，当局也开始对各种乌克兰人组织实施封杀，并骚扰甚至关闭乌克兰语出版物。与此相对，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却可以不受约束地在乌克兰农民中进行自己的宣传。

通过对俄罗斯国家主义激进派进行动员，俄国保守派首相彼得·斯托雷平[24]的政府在帝国西部边境地区逐步赢得政治支持。国家主义倾向的候选人也在新选举法的帮助下赢得选举。与在帝国其他地区一样，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在乌克兰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教和神父们结成同盟，在乌克兰农民和城市居民中散布俄罗斯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俄罗斯帝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审判“贝里斯案”[25]就发生在基辅。此案中，一名犹太人被指控将一名基督徒男孩杀死献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月中，沃里尼亚的波查伊夫修道院[26]成为俄罗斯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温床，而俄罗斯人民同盟在整个帝国的最大分支组织也以沃里尼亚为基地。该同盟和其他类似组织的成员宣称自己是在保护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则是指小俄罗斯人）不受波兰人和犹太人等“外国”剥削者的压迫。在他们的宣传中，这些“外国人”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吸血鬼和激进的革命者。

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1912）的乌克兰选举结果证明了帝国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在乌克兰的41名胜选者中，36人被认为是“真俄罗斯人”——这是当时用来定义俄罗斯国家主义者的名词。1911年9月，彼得·斯托雷平在基辅遭一名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但这并未让帝国政治有所改变。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国家主义党派在乌克兰获得了70%的选票。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乌克兰人口中俄罗斯族的比例不超过13%。不光是选民中的大部分，就连以俄罗斯国家主义者身份赢得选举的人中的大部分也都是乌克兰族。俄罗斯国家主义者基辅俱乐部的创始人、第四届国家杜马高级成员阿纳托利·萨文科[27]就是一例。另一名乌克兰人季米特里·皮赫诺[28]则是俄罗斯人民同盟基辅支部的首脑。皮赫诺担任编辑的基辅报纸《基辅人》（*Kievlianin*）则成为这些国家主义组织的传声筒。小俄罗斯身份认同宣传者群体中的乌克兰独特性本已所剩无几，到了1905年革命期间，这种独特性更是在事实上已被激进的俄罗斯国家主义取代。

在不止一种意义上，1905年革命都是半途而废的，然而它仍是俄罗斯帝国内部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乌克兰的活动家们第一次成功地将他们的理念传递到民众之中，第一次让自己的力量和受欢迎程度经受考验。这是他们史上第一次被允许用乌克兰方言向大众传达信息，并利用媒体传播自己的想法。他们在乌克兰全国各地组织乌克兰人俱乐部，创建普洛斯维塔协会。这种进入公众生活的突破是老一代乌克兰爱国者们难以想象的。这些活动家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革命的结束，以及随后出现的、受到激进俄罗斯国家主义派别支持的官方政策倒退，让各个乌克兰人党派陷入了混乱和幻灭之中。在奥属乌克兰地区，乌克兰爱国者们击败了“全俄罗斯”理念的主张者们，却未能打破波兰人党派对加利西亚政治的垄断。两个帝国中的乌克兰活动家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然而，如果不发生一些足以动摇帝国统治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基础的事件，他们连地方自治这样的成就都无法取得。乌克兰独立（甚至自治）梦想的实现需要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作为前提。这场地震的第一轮震波发生于1914年8月。

---

[1] Hermitage Museum，亦译作隐士庐博物馆，位于圣彼得堡的涅瓦河河畔，冬宫是这座博物馆的主要建筑。

[2] Velyki Sorochyntsi，今乌克兰中部波尔塔瓦州城镇。

[3] Borshch，即罗宋汤，是发源于乌克兰的一种浓菜汤。在东中欧地区，罗宋汤多以甜菜为主料。

[4] Potemkin Stairs，亦被称为“敖德萨阶梯”，位于敖德萨市内，通向黑海岸边，共192级。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爱森斯坦运用这道阶梯表现其电影蒙太奇理论，成功再现了1905年1月5日的“流血星期日”和波将金号起义两起历史事件。

[5] Sergei Eisenstein（1893—1948），苏联导演、电影理论家、电影学中蒙太奇理论奠基人之一。

[6] 即“十月诏书”，其正式名称为“对国家秩序的改善宣言”。

[7] Chișinău，今摩尔多瓦首都。

[8] Sholem Aleichem（1859—1916），原名肖洛姆·瑙莫维奇·拉比诺维奇（Solomon Naumovich Rabinovich），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作家，1906年后定居美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斯杰姆别纽》《莺喉伊奥谢列》等。

[9]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亦称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或俄罗斯社会民主党，1898年成立于明斯克，是俄罗斯帝国国内许多革命组织的联合体。它在后来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

[10] Russian Part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20世纪初俄国的主要政党之一。1917年11月，该党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中赢得了多数。

[11] Mykola Mikhnovsky（1873—1924），乌克兰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独立运动的理论家和领袖，参与了多个乌克兰党派的创建与领导工作。

[12] Spilka，即1904年成立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同盟。

[13] Union of October 17，又称十月党，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非革命中间派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末。该党坚定拥护君主立宪制，受到自由派贵族、商人

和部分官员的支持。

[14]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地方自治局人士组成，主张在俄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15]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右翼民族主义保皇党派，是俄国保皇派武装组织“黑色百人团”的重要成员。

[16] Ukrainian Radical Democratic Party，1904年成立于基辅，主张废除专制，实行立宪，追求在乌克兰设立自己的议会，并推广乌克兰语。

[17] Lubny，乌克兰中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8] Rada，乌克兰语作Рада，意为会议、委员会、议会。

[19] 见本书导言注。

[20] 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亦称罗塞尼亚民族民主党，1899年成立于利维夫，是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1918—1939）最大的乌克兰人党派乌克兰民族民主联盟的前身。

[21] Ivan Franko（1856—1916），乌克兰诗人、作家、翻译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语写作侦探小说和现代主义诗歌的作者。

[22] Roman Dmowski（1864—1939），波兰政治家，波兰民族民主政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曾担任波兰外交部长。他与下文中的约瑟夫·毕苏茨基并称为波兰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23] Józef Piłsudski（1867—1935），波兰政治家、波兰第二共和国国家元首（1918—1922年在任）和独裁者（1926—1935年在任）。

[24] Petr Stolypin（1862—1911），俄罗斯帝国首相（1906—1911年在任），以镇压革命势力和实行土地改革著称。

[25] Beilis affair，对被控杀死一名基督徒男孩的犹太人梅纳赫姆·门德尔·贝里斯（Menahem Mendel Beilis，1874—1934）的审判，于1913年在基辅举行。贝里斯最终被判无罪，但审判之前的两年中，该案在俄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诋毁犹太人群体的潮流，并导致俄国的反犹政策在国际上广受批评。

[26] Pochaiv monastery，位于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的波查伊夫，在历史上一直是乌克兰西部各东正教派的意识形态中心。

[27] Anatolii Savenko（1874—1922），俄国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律师、作家、记者。

[28] Dmitrii Pikhno（1853—1913），俄国经济学家、记者、民族主义政治家。

第四卷

世界大战

THE
WARS OF
THE WORLD

第18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1914年6月28日清晨，萨拉热窝城只听到了两声枪响。19岁的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1]用第一枪打伤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用第二枪击中大公的妻子苏菲女公爵。大公和大公夫人都在午前不治身亡。然而这起事件的附加后果更为严重：普林西普在扣动那把勃朗宁手枪扳机的同时，也扣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扳机。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团体的成员，痛恨哈布斯堡家族，梦想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南斯拉夫国家。奥匈帝国政府对此却有不同的想法：它希望维持帝国的存在，决定将大公遇刺事件当作一个向塞尔维亚开战的借口，对这个在帝国境内煽动起斯拉夫民族主义浪潮的国家施以惩罚。俄国站在了塞尔维亚一边，德国人支持奥匈帝国，而英国和法国则支持俄国。到了8月初，几乎整个欧洲都燃起了战火。全世界有多达1 800万军人和平民在这场在当时被称为“大战”的战争中丧生，受伤者则超过2 200万人。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对人类历史上这第一场全面战争的起因争论不休。他们通常会将之归结于两个军事阵营对世界的割裂，即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的三国协约（协约国）和德国、奥匈帝国及意大利（后来为奥斯曼帝国取代）组成的三国同盟（同盟国）。弗拉基米尔·列宁强调大国的对抗是为了争夺对市场和资源的控制。其他因素则包括欧洲大众政治的兴起，以及强调迅速动员和先发制人重要性的军事原则。以上所有因素都对冲突的爆发有所贡献，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参战各国无法提前结束战争，让这场屠杀延续了四年之久。

在对战争的潜在原因进行考察时，我们不应忽视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开枪以及奥匈帝国决定开战的动机——日趋激进的民族主义与迅速衰落的多民族帝国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这场由一个激进民族主义者引发的战争对各大帝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被战争压垮的不仅有奥匈帝国，还有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前者彻底瓦解，后两者的君主制垮了台，失去了部分领土，以新的形态存活下来。而从战争中得益的则是众多民族解放运动：在从前不可战胜的庞大帝国的废墟上，他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尽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乌克兰都算不上胜利者，但它仍是那些在这场战争中得到创建自己国家的机会的各民族中的一员。

在最初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中，这场战争没有给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运动

带来任何希望，反而掀起了拥护统治王朝和帝国权利的浪潮。俄国政府利用战争的爆发向乌克兰爱国者组织施加了更多限制。政府官员们将乌克兰的活动家们称为“马泽帕党”（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中联合瑞典与俄罗斯为敌的那位哥萨克统领[2]），并将他们视为哈布斯堡家族的潜在代理人。尽管这些人保证忠诚于帝国，政府仍旧封杀他们的组织团体，普罗斯维塔协会也未能幸免。政府还叫停了剩下的乌克兰语出版物，其中包括日报《拉达》——1905年革命所开启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后遗留。乌克兰领袖们将战争视为在俄罗斯人国家内部创建一个统一而自治的乌克兰国家的机会，然而政府的所有这些举动令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乌克兰自由派宣布保持中立，拒绝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激进的左派分子则倒向奥地利人，希望以此击败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军队在战争之初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北方突入了普鲁士境内，在南方则进入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1914年9月初，俄军夺取了利维夫，又在年底之前控制了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口通道，并进入外喀尔巴阡地区。由于俄罗斯帝国对乌克兰人组织的新禁令，奥匈帝国境内的乌克兰活动家们也遭到打击。俄国对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915年5月，时间长得足以表明罗曼诺夫帝国将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乌克兰人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占领当局升起代表泛俄罗斯民族的重新统一和解放的旗帜，将此前已被边缘化的亲俄派重新带回加利西亚政治舞台的中央。俄国政府还用俄语取代了乌克兰语作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语言，并将那座被奥地利人和犹太人称为伦贝格（Lemberg）、被波兰人称为勒沃夫（Lwów）、被乌克兰人称为利维夫（Lviv）的城市改名为俄语的利沃夫（Lvov）。

尽管亲俄派受到俄国人支持，奥地利人却在战争甫一爆发就开始迫害他们。1914年9月4日，第一批被逮捕的亲俄派活动家抵达施蒂里亚州[3]格拉茨[4]附近的塔勒霍夫收容营地。其他数千名被捕的亲俄分子及其家属接踵而至。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社群的领袖人物，如牧师、教师和受教育阶层，但大多数只是单纯的农民。在整个战争期间，塔勒霍夫收容了接近2万人，并获得了欧洲第一个集中营的不光彩名声。近3000名囚徒死于寒冷和疾病。今天，只有格拉茨机场附近的一条道路的名字——拉格尔街（Lagerstrasse，即营地街）——还能让我们回想起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亲俄派的这一段悲惨历史。其他亲俄分子则被送往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境内的要塞特莱西恩施塔特（或称泰雷津）[5]集中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也是这座监狱的囚徒之一。1918年4月下旬，普林西普在这里死于肺结核，此时距他引发的那场战争结束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在加拿大，乌克兰人被政府视为“拥有敌国国籍的外国人”，其中近4 000人遭到关押，另外8万人则被要求定期向警方报到。由于他们都是最近从奥匈帝国移民到加拿大的，所以国籍都被定为“奥地利人”。

与亲俄派不同，奥匈帝国境内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宣布忠于帝国君主。这也是他们的农民阶层支持者中大多数人的做法。战争爆发之前的年月里，这些农民最喜欢的歌谣就是关于皇帝弗朗茨·约瑟夫[6]之妻伊丽莎白皇后（茜茜）[7]的。这位在1898年遭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的皇后在歌中被称为“我们的夫人”，弗朗茨·约瑟夫则被称为“我们的父亲”。随着战争的爆发，乌克兰活动家们组建了乌克兰人最高议会，其名参照1848年革命期间成立的那个罗塞尼亚最高议会。这个议会催生了奥地利军队中第一支乌克兰人部队。当局从1万名志愿者中选出2 500人，组成一支被称为“锡奇步枪队”的军团——这个名字无疑指向扎波罗热锡奇和第聂伯哥萨克人的历史，表达出一种“全乌克兰”身份认同和加利西亚志愿者们的人心所向。

奥匈帝国乌克兰政治家们的政治蓝图有两重目标：第一，分割加利西亚，争取实现其乌克兰部分的自治；第二，在俄属乌克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人国家。为了达成第二个目标，奥匈帝国乌克兰人不仅加入了帝国军队，还实施了将俄国战俘中的小俄罗斯人转变成乌克兰人的计划。实施这一计划最力的是乌克兰解放同盟。这一组织成立于维也纳，但大部分成员来自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移民，知道如何与自己的同胞对话。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将在未来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之父。他来自南乌克兰，有一个俄语姓氏：德米特罗·东佐夫[8]。

1915年春末和夏天，一场德奥联合发动的攻势让奥地利人重新夺回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大部分地区。其结果是亲俄派被完全从这一地区清除出去，与俄军一起向东撤退。“他们由各自的村长率领，拖家带口。和他们一起的，是他们的牛马和所有来得及带走的财富。”报纸《基辅思考》（*Kievskaia mysl’*）这样描述亲俄派的逃亡。大部分逃难者在罗斯托夫和位于俄罗斯-乌克兰族群边界的顿河下游地区停下了脚步。这是亲俄主义运动作为一支主要政治力量的历史的终结：有幸免于进入塔勒霍夫集中营的亲俄分子如今都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前往俄国。1916年春天和夏天，在才华过人的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9]将军的指挥下，俄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攻势，重夺沃里尼亚、布科维纳，还有加利西亚的部分地区。然而这场攻势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个濒临经济和军事崩溃的帝国的回光返照。很快，与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乌克兰地区一样，“全俄罗斯”理念在罗曼诺夫王朝的领土上也开始遭到攻击。

罗曼诺夫王朝（如果不是帝国本身的话）在1917年3月初走向终点。在此前的一个月中，彼得格勒（Petrograd，战争时期圣彼得堡的名称）[10]的食品短缺已经引发了工人罢工和军队中的兵变。国家杜马的领袖们说服被长年战争搞得心力交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放弃皇位。他传位给他的弟弟[11]，但后者拒绝接受——杜马领袖们预测，如果他接受皇位的话，将导

致一场新的叛乱。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落幕：来自街头的压力、士兵的叛乱和曾经忠诚的杜马的巧妙操纵在王朝的棺盖上敲下了最后一根钉子。随后杜马领袖们着手创建一个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之一是举行选举，以产生一个决定俄罗斯国家未来的宪法会议。

彼得格勒发生的事变史称“二月革命”。这场革命出乎正处于焦头烂额之际的乌克兰人组织领袖们的意料。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运动和第聂伯乌克兰1905年革命中的关键人物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听到窗外的喧哗和喊声时，正在莫斯科公共图书馆写作一篇文章。他问图书管理员出了什么事，才知道发生了一场革命：莫斯科人正涌向克里姆林宫，打算夺取这座作为俄国国家象征的建筑。3月初，来自各乌克兰人政治和文化组织的代表们在基辅成立了一个协同机构，名为“中央拉达”[12]。他们选举赫鲁舍夫斯基为主席，并坐等他火速赶到基辅。下车伊始，赫鲁舍夫斯基就对年轻一代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群体表达了他的支持。这个群体主要由学生和20岁出头的专业人士组成。

赫鲁舍夫斯基在乌克兰民族运动温和派（如今被称为乌克兰进步主义者协会）中的老战友很少有人愿意加入年轻革命者们的阵营。他们经历过1905年革命，了解革命总是被反革命潮流终结，因此宁愿向当局输诚，换取对方在文化空间内的让步。对他们来说，让乌克兰语成为教学语言是第一要务。赫鲁舍夫斯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争取教育改革的时代，是时候要求乌克兰在一个改革后的俄罗斯国家里的领土自治权了。对许多老一辈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来说，考虑到乌克兰与帝国政府打交道的艰辛历史，这个目标就算不是脱离现实，也太过野心勃勃。然而赫鲁舍夫斯基和他那些更年轻、更富有激情的支持者们对此有不同看法。

人们在3月开始行动起来，工作地点是基辅城里的教育博物馆地下的一个房间。他们创建了一个以杰出现代主义作家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13]为首的总书记处，将之作为乌克兰的自治政府。维尼琴科用乌克兰语和俄语两种语言写作，是尼古拉·果戈理之后第一位在全俄罗斯范围内受到广泛阅读的乌克兰作家。新政府宣称对今天乌克兰的大片地区拥有管辖权，包括基辅、波多里亚、沃里尼亚、切尔尼戈夫和波尔塔瓦的帝国省份。它在7月被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承认为乌克兰地区政府。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乌克兰自治理念自1905年革命后就被边缘化，而俄罗斯自由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来自“真俄罗斯”爱国者群体的大俄罗斯国家主义提倡者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未来蓝图，乌克兰自治理念何以能在与它们的竞争中胜出？事实证明，在当时的革命气氛中，“中央拉达”的年轻领袖们所鼓吹的杂糅自由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是一种极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积极参与政治的民众开始将各乌克兰人党派宣传的领土自治视为摆脱各种淹没这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作为当

时唯一能同时满足“土地”和“和平”这两种民众需求的机构，“中央拉达”脱颖而出。

士兵们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因此大量士兵热情地支持“中央拉达”。当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忙于在东线战场发动一场新攻势，并恳求他们与英法盟军一起战斗到最后时，“中央拉达”却承诺将带来和平，因而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俄军中的“乌克兰化”部队（由从乌克兰诸省征召的新兵组成并在1917年中被派往前线乌克兰段的部队）宣布向“中央拉达”效忠。这样的新兵接近30万人，都是身着军装的农民，已经厌倦了战争。他们不仅一心思归，而且还希望能赶上对贵族土地的重新分配——这是“中央拉达”不顾来自地主阶层的强烈反对而做出的承诺。在政治上主宰着乌克兰农民阶层的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恰好是“中央拉达”中的第一大政党，因此农民也成为“中央拉达”的坚定支持者。

“中央拉达”原本不过是一个持乌克兰爱国主义立场的各政治和文化组织的协调委员会。然而在1917年夏天，由于农民、工人和士兵等群体各自的全乌克兰代表大会纷纷向“中央拉达”派出代表，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议会。少数族裔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特意呼吁他的支持者们不要允许1905年那种对犹太人的迫害重演，并向犹太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承诺让他们在一个与俄罗斯结成联邦的乌克兰共和国内获得文化自治。作为回报，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党派加入了“中央拉达”并支持乌克兰领土自治的立场，其他少数族裔的左翼代表们也同样如此。“中央拉达”的成员数量超过了800人，以致其领袖们不得不创设一个小规模的常务机构——“小拉达”——来协调这个新生革命议会的各项工作。

数十名乌克兰名流从彼得格勒和在1918年3月被布尔什维克们定为俄国新首都的莫斯科返回基辅，参与到新乌克兰的建设中。富有才华、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赫奥尔希·纳尔布特[14]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成了乌克兰美术学院的创建者，也成为乌克兰国徽和这个国家第一批纸币和邮票的主要设计者。国徽包括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图案（借鉴自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时代钱币的三叉戟和一个哥萨克人的头像），这是因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宣称自己所继承的是基辅罗斯和哥萨克国。国徽上的蓝色和黄色则来自数百年来就将这两种颜色用于纹章的加利西亚。色彩的选择象征了世界大战东部战线两侧的乌克兰土地的统一。

在这个新生的乌克兰自治国家中，并非一切都如此美好。“中央拉达”没能建立起一套可以运作的国家机器，也没能利用向这个政府宣誓效忠的数十万官兵创建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发现自己手握议会大权的作家、学者和学生们沉浸在民族革命和砸烂旧国家机器的浪漫梦想中。到了1917年秋天，当“中央拉达”因无法兑现从前许下的承诺而开始失去对现实局势的控制时，一个运转有效的政府和一支忠诚军队的缺失就成了问题。“中央拉

达”在各大城市的支持率下降到9到13个百分点（只有基辅除外，“中央拉达”在这里仍拥有25个百分点的支持率），权力逐渐转移到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代表会议）手中。由于“中央拉达”既没有带来土地，也没有带来和平，农村局势也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农民们开始自己发动起来，夺取国有的和贵族们的土地。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政变后来被称为“十月革命”，对乌克兰局势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作为对政变的直接回应，“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自主而仍与俄罗斯保持联邦关系的国家。它还对东部和南部的土地——哈尔基夫省、赫尔松省[15]，以及塔夫里达[16]、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17]三省中乌克兰人聚居的部分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这样的行动宣告了“中央拉达”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短暂合作的终结，尽管他们此前还曾在基辅合力击败了忠于临时政府的军队。基辅的乌克兰政府与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之间的对立自此拉开序幕。

由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体的代表创建的苏维埃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各个政党都竞逐苏维埃的权力。取得对苏维埃的控制之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俄国的大权。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18]于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格勒召开，并由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主导。会议承认了这场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布尔什维克打算在乌克兰采取相同的策略，宣布于1917年12月在基辅召开乌克兰苏维埃大会。然而大部分出席大会的代表都是支持“中央拉达”的农民，布尔什维克在基辅策划的革命失败了。

然而这对他们只是暂时的受挫。布尔什维克组织者们离开基辅，前往哈尔基夫。12月下旬，乌克兰东部工业地区的苏维埃大会在哈尔基夫召开。大会于1917年12月24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18年1月初，来自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军队进入了乌克兰，以在哈尔基夫成立的那个虚构国家的名义向基辅进发。在俄国军官米哈伊尔·穆拉维耶夫[19]的率领下，这支军队搭乘火车，一路进军，夺取了许多主要的工业中心，并在这些地方得到被布尔什维克动员起来的工人团体的支持。“中央拉达”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工业城镇的控制——它在这些地区得到自由派知识分子拥护，却没能赢得工人的支持。面对俄国的入侵，“中央拉达”少得可怜的军队也无法为它提供保护。在1917年夏天曾宣布支持乌克兰独立的那些部队已经被派往世界大战前线。此时“中央拉达”的领袖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宣布自己的国家从俄国完全独立出来，却又没有军队来保卫它。

1918年1月25日，“中央拉达”发布了其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通令（universal）——这是哥萨克时期对法令的称谓——宣布了乌克兰的政治

独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就此成为一个属于乌克兰人民的、独立的、自由的主权国家，不臣服于任何人。”通令写道。在将通令草案向“中央拉达”提交时，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强调了通令的两大要务：第一，促成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和约签署——只有独立国家才有这样的资格；第二，保护乌克兰不受布尔什维克入侵和赤卫队叛乱的破坏——后者是布尔什维克在主要工业中心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然而这第四份通令的历史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紧急要务：它是自伊凡·马泽帕时代以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第一次公开决裂。独立乌克兰国家的理念17年前才在第聂伯乌克兰地区被首次提出，如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合法性。独立的精灵已经从帝国的魔瓶中逃离出来。

“我们希望与所有邻国和平友好地共存，包括俄罗斯、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在内，但任何邻国都无权干涉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的命运。”通令写道。当然，表态很容易，要把这样的愿望变成现实则不同。俄军正从北方和东方两路向基辅会合，布尔什维克也在基辅城内的军械厂掀起了暴动——这座军械厂是基辅最主要的军事工厂，其建筑如今已成为基辅艺术中心和展览馆的场地。“中央拉达”缺乏可靠的部队，而布尔什维克又做出关于土地、和平和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承诺，吸引许多人投向他们。“中央拉达”发出了总动员的号召。在切尔尼戈夫地区的克鲁季[20]火车站，一支由约400名乌克兰学生和士官生组成的部队与来袭的布尔什维克军发生了交战，后者队伍中有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也有一支来自彼得格勒的部队。27名乌克兰战士落入敌手，并遭到枪杀——这是为了报复他们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军时长达5个小时不屈不挠的抵抗。在乌克兰人的历史记忆中，这27名战士成为第一批为民族独立事业付出生命的烈士。更多人将步上他们的后尘。

1918年2月9日，“中央拉达”放弃了基辅，向西撤退。同一天夜里，在今天波兰-白俄罗斯边界上的布列斯特镇，“中央拉达”的代表与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及其盟友）签订了和约。“中央拉达”在1917年夏天和秋天拒绝成立一支常备军，因此如今别无选择，只能向乌克兰国境之外寻求保护。乌克兰代表们向德国和奥地利请求军事援助，并很快得到对方同意：在漫长的战争消耗之下，同盟国的军队和经济都急需农业产品的支撑，而乌克兰早有“欧洲面包篮”的美誉。和约规定双方“相互交换各自盈余的……重要农业和工业产品”。为交换乌克兰的谷物，同盟国方将付出他们装备精良又训练有素的战争机器。和约签署之后不到10天，同盟国军就进入了乌克兰。到了3月2日，同盟国军已将布尔什维克逐出了基辅，“中央拉达”再次回到了教育博物馆大楼。在克鲁季战死的学生们以军葬礼的仪式被安葬在阿斯科尔德小丘（Askold’s Mound），也就是传说中基辅第一位维京统治者的安息之地。

布尔什维克们一路后撤。他们无法在军事上阻挡人数约为4.5万人的德奥联军的进攻，于是转而尝试外交和法律手段。他们开始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创立各种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人民共和国，并宣告它们独立。于是，敖德萨、克里维伊里赫[21]、塔夫里达等“共和国”纷纷在2月和3月间宣布独立。然而同盟国对此毫无顾忌。在乌克兰军的协助下，他们甚至夺取了“中央拉达”从未主张过的克里米亚地区，不过并未将其并入以基辅为首都的那个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没过多久，布尔什维克就被完全逐出了乌克兰，并被迫承认乌克兰独立，以与同盟国达成他们自己的和约。

如今，新生的乌克兰国家不仅在法理上，也在事实上独立于俄国。然而其相对于同盟国（“中央拉达”曾承诺向同盟国提供100万吨谷物）的独立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这一点在1918年4月下旬变得十分明显：德国军事当局不相信社会主义者占主流的乌克兰政府能兑现其“输送谷物”的计划，于是在“中央拉达”同意向盟军交付上述100万吨谷物和大量其他农产品不过数天之后，就将其解散。德国人主导的政变让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22]将军的政府得以上台。斯科罗帕德斯基是18世纪一名哥萨克统领的后裔，立场极为保守，代表着乌克兰地主阶层的利益。他宣布自己为这个新生国家的统领，以此来迎合民众的历史记忆。仿照从前的统领们的传统，他实施了独裁统治，其权力仅受外国势力——德奥军事指挥部——的约束。

在1917年的革命中，临时政府委任斯科罗帕德斯基指挥其新组建的乌克兰军团，这是一次为让战争继续下去而取悦于少数族群的绝望尝试。于是有俄国文化背景的斯科罗帕德斯基迅速地乌克兰化。他先是拥护乌克兰自治的理念，后来又转向支持乌克兰独立，并为之（也为其德国靠山）奉献终生，直至1945年4月在柏林死于盟军的轰炸。斯科罗帕德斯基的统治被证明是对乌克兰国家和体制建设的一次巨大促进。乌克兰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银行和可以运转的财政系统。这位统领招募帝国时期的官僚们来管理各个部门，建立地方政府机构，并让帝国军官组建部队。在教育领域，乌克兰拥有了自己的科学院，有了第一座国家图书馆，也有了一座国家档案馆。此外，这个国家又出现了两所新大学，一所在卡特琳诺斯拉夫，另一所在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尽管斯科罗帕德斯基本人从未完全掌握乌克兰语，他仍推动完成了“中央拉达”启动的计划，将乌克兰语引入学校系统，实现了乌克兰爱国知识分子们多年的梦想。

无论斯科罗帕德斯基在体制空间内有什么成就，其统治仍受到“中央拉达”的社会主义领袖们厌弃。这些人拒绝与新政府合作，将之视为被布尔什维克革命赶出俄国的俄罗斯保守派为自己创造的避难所，而他们的这种看法往往也有充分的理由。许多社会主义领袖转入地下，策划他们的政治回归。一场反对统领的暴动似乎就在眼前。斯科罗帕德斯基的政府在劳工阶层中最不受欢迎——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延长到12个小时。农民同样不

满，因为当局会没收他们收获的粮食。1918年夏末时，已有数千工人处于罢工之中，近4万名加入了武装自卫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乌克兰最不缺的就是受过训练的军事人员。德军派出部队对暴民进行惩罚，却只让情况变得更糟。到了秋初，当局已经陷入了垂死挣扎。它打算举起联邦的大旗，与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结合。此举意在讨好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支持俄国统一的立场），却事与愿违。“中央拉达”那些社会主义领袖正在积极筹划推翻统领，而当局这种在形式上放弃乌克兰独立的做法让他们更加愤怒。不过，让斯科罗帕德斯基政府走向末路的最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1918年11月11日，在巴黎以北的贡比涅森林[23]，德国统帅部代表与其法国和英国对手签署了停战协定。敌对状态的终结意味着德军和奥军将撤离乌克兰。三天后，也就是11月14日，以前“中央拉达”政府首脑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指挥部”（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的法国革命政府）开始公开反对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德奥军队在指挥部的允许下离开，随后，指挥部那支主要由叛乱农民和抛弃了统领的部队组成的军队在12月19日进入基辅。统领政府宣告落幕。这个作为战争产物且以交战国一方为靠山的政府最终被证明无法独立生存下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又回来了，并顺手接管了其前任创建的各种机构，然而共和国政府对基辅的控制完全谈不上牢固。同年早些时候在德奥军队进攻下被迫退却的布尔什维克们此时正在准备重新夺取乌克兰。

在战线另一侧的加利西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催生了另一个乌克兰国家，它很快将被称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创建始于1918年10月，紧随新帝卡尔一世[24]关于将奥匈帝国联邦化的公告。乌克兰领袖们主张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为乌克兰人的民族地区。此时奥匈帝国正在走向末日，其最后的举动就是在11月3日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此时美国也加入了协约国一方。身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统治下的各个民族都急切地想要脱离帝国的牢笼。然而，帝国的二元君主制崩溃了，没能熬过11月，于是各民族领土主张之间的竞争变得不可遏抑。为争夺对加利西亚的控制权，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尽管维也纳当局有过种种承诺，它仍未能将这个省份分为东西两半，其结果就是波兰人对整个加利西亚提出了要求。

1918年11月1日，乌克兰人首先发起了进攻，夺取了利维夫。这座城市被乌克兰人占主体的乡村包围，但市内人口的族群构成则以波兰人和犹太人为主。攻下利维夫的乌克兰人在同一天宣布了这个全新乌克兰国家的独立，然而波兰人做出了反击，在20天后重夺利维夫。以杰出律师和民间领袖叶乌亨·彼得鲁舍维奇[25]为首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领导者们不得不将其机关东迁，先是来到捷尔诺波尔[26]，后来又迁往斯坦尼斯拉维夫（今

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27]。这成为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的开端。1918年12月1日，东西两个乌克兰共和国的代表决定合作，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双方都极度需要他们所能达成的最大程度的统一。两个共和国的未来都布满阴云。被许多人认为将终结一切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其落幕那一刻就点燃了新的战火。

奥地利试图维持自己对境内斯拉夫民族的控制，而俄国自居巴尔干人的泛斯拉夫民族保护者，并打算将其泛俄罗斯身份认同渗入奥匈帝国，从而引发了世界大战。两个帝国政府都成为输家。战争先是削弱，然后摧毁了中欧和东欧的帝国，同时社会革命又粉碎了旧的秩序。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乌克兰从战争的废墟中出现时已经面目全非：其国土满布弹痕，经济崩溃，人口锐减，各种族群身份认同都处于躁动之中，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变得比从前任何时代都多。然而帝国的崩溃赋予了乌克兰人一个新的身份，催生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的乌克兰国家，并让乌克兰出现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战争造成的新政局让从前帝国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有了一个清晰的政治目标——独立。在战争爆发之前，独立不过是一个幻想，然而它演变成为一种理念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为“中央拉达”的社会主义领袖们、斯科罗帕德斯基的保守派支持者们以及加利西亚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战士们所共享的理念。然而，独立的目标在将乌克兰人动员起来的同时，往往会激起其他少数族群的反抗，也会带来与邻国的分歧。宣布独立是一回事，将它变成现实则是另一回事。为了独立，乌克兰人将不得不在不止一条战线上进行抗争。

---

[1] Gavrilo Princip（1894—1918），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在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1863—1914）及大公夫人霍恩贝格女公爵苏菲（Sophie, Duchess of Hohenberg，1868—1914）。

[2] 见本书第12章。

[3] Styria，位于奥地利东南部，亦作施泰尔马克州（德语Steiermark）。

[4] Graz，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施蒂里亚州州府。下文中的塔勒霍夫（Thalerhof）是格拉茨附近的一个村庄。

[5] Theresienstadt，捷克语作Terezin，即今捷克共和国西北部城市泰雷津。

[6] Franz Joseph I（1830—1916），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48—1867年在位）、奥匈帝国第一位皇帝（1867—1916年在位）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7] Elizabeth Amalie Eugenie（1837—1898），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之妻、巴

伐利亚女公爵，通常被家人与朋友昵称为茜茜（Si Si）。

[8] Dmytro Dontsov（1883—1973），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作家、记者、政治理论家。他的激进思想对1929年成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简称OUN）产生了巨大影响。

[9] Alexiei Brusilov（1853—1926），俄国军人，曾任俄罗斯帝国军队总参谋长、俄罗斯共和国军总司令和苏维埃政府的骑兵总监。

[10]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因应当时的“去日耳曼化”风潮，圣彼得堡被更名为彼得格勒。

[11] 此即指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Mikhail Alexandrovich，1878—1918）。他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幼子和尼古拉二世的弟弟。

[12] Central Rada，意为“中央会议”，在1917年4月至1918年4月期间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议会。

[13] Volodymyr Vynnychenko（1880—1951），乌克兰政治家、作家，在1917年6月至1918年1月期间担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于1919年流亡海外。

[14] Heorhii Narbut（1886—1920），20世纪乌克兰杰出的图案设计家。

[15] Kherson gubernia，今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以北。

[16] Tavrida，俄罗斯帝国省份，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以及第聂伯河下游与黑海和亚速海海岸之间的地区。

[17] Voronezh，今俄罗斯西部沃罗涅日州。

[18] 俄历1917年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的当天，布尔什维克召开了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通过了向工农与士兵代表苏维埃移交权力的法令。

[19] Mikhail Muraviev（1880—1918），俄国将军。他在十月革命后率领工人赤卫队进攻乌克兰，并攻下了基辅。1918年6月11日，穆拉维耶夫由于支持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发动叛乱而被逮捕，并在拘捕时被枪杀。

[20] Kruty，位于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博尔兹纳区。

[21] Kryvyi Rih，亦作克里沃罗格（俄语发音），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城市。

[22] Pavlo Skoropadskyi（1873—1945），乌克兰军人、政治家，在1918年4月至12月间担任乌克兰统领，后逃亡德国。

[23] The forest of Compiègne，位于法国皮卡第大区贡比涅市附近，距巴黎

60千米。

[24] Charles I（1887—1922），德语作Karl I，哈布斯堡王朝与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1916—1918年在位）。他于1918年10月14日同意将奥匈帝国改为联邦制国家。

[25] Yevhen Petrushevych（1863—1940），乌克兰律师、政治家，在奥匈帝国瓦解后担任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统（1918—1919年在任）。

[26] Ternopil，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首府。

[27] Stanyslaviv，今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州首府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Ivano-Frankivsk）。

第19章 破灭的梦想

1919年1月22日是星期三，基辅迎来了一个晴朗的冬日，还有些霜，但没有下雪。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一个电影摄制组当天正在城里拍摄一次公共活动，这是对这座乌克兰首都的公共活动最早的拍摄之一。此时距“中央拉达”在其第四份通令中宣布乌克兰独立已有整整一年。部分前“中央拉达”领袖利用重新执掌权力的机会发布了另一份重要的公告，宣布将从前的俄属和奥属乌克兰地区统一为一个独立国家。他们选择那座基辅罗斯时代的大教堂[1]为群众集会、教堂仪式和阅兵式的背景，建起了一座从弗拉基米尔大街通往圣索菲亚广场的凯旋门。这些都是为庆祝统一而精心筹划的活动，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前，在俄奥国界两边的乌克兰地区，统一还不过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一个梦想。

当索菲亚大教堂敲响午钟，摄像机的镜头中出现了欢欣的笑容、持花的女子，还有成群身着军装的男子。画面的中心被新的革命政府“指挥部”的成员们占据。他们中为首的是一名留着山羊胡、身穿黑色皮大衣、头戴宽边羊毛帽的高个男子，那是从前“中央拉达”政府的总理、如今的指挥部首脑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行进在他右边的是来自西乌克兰的代表们——从前哈布斯堡家族治下乌克兰地区的公民会议授权他们来完成两个乌克兰人国家的统一事宜。然而吸引摄像师最多关注的，不是维尼琴科，也不是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议会副主席列夫·巴金斯基[2]。在镜头中停留最久的是一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他和他身边大多数军官一样，头戴一顶羊皮帽。在影片的一个镜头中，他站在维尼琴科身边，口含一支雪茄；另一个镜头里他又在整理自己的腰带和制服。此人名叫西蒙·彼得留拉[3]，是指挥部军队的最高“俄塔曼”[4]，也就是总司令。

彼得留拉于1879年生于波尔塔瓦，在这段影片拍摄时年方39岁。与比他大半岁的约瑟夫·斯大林一样，彼得留拉在还是一名神学学校学生时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并从底层逐步晋升，成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之一。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彼得留拉担任了许多乌克兰语刊物和报纸的编辑——最先是在基辅，后来转至圣彼得堡，从1912年起则在莫斯科。1917年，他先是作为乌克兰总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作为“中央拉达”的军事事务总书记，担任俄军编制中乌克兰部队的首脑。后来，这些部队中的一支被分出来交给未来的乌克兰统领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来指挥。

在1919年1月22日拍摄于基辅的这部影片中，彼得留拉站在弗拉基米尔·维

尼琴科身边，但两人并无对话。这并不是因为两位政治家的友好关系发生了破裂。两人的对立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时他们都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维尼琴科有强烈的亲布尔什维克情绪，指责彼得留拉激怒了布尔什维克，导致对方对乌克兰的入侵。1917年12月，入侵发生前夕，彼得留拉被迫从政府辞职。尽管彼得留拉和维尼琴科联手领导了反对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的起义，这两位指挥部成员之间的矛盾仍未消弭。到了1919年3月，仍旧持亲苏维埃和亲布尔什维克态度的维尼琴科将退出指挥部，离开乌克兰，基本上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彼得留拉则将在1919年5月初被选举为指挥部首脑，并独揽大权。

彼得留拉的崛起有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原因。这一时期，不光是维尼琴科，1917年革命中另一巨头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同样流亡国外。在乌克兰革命从议会阶段进入军事阶段之际，彼得留拉先后担任的政府军事事务主管和总司令这两个职位变得极为重要，从而使他脱颖而出。1919年年初乌克兰再度遭到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时，彼得留拉已是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长。1919年2月2日，即《统一法案》庆祝活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指挥部被迫撤离了基辅，先是迁往文尼察[5]，后来又在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落下脚跟，建立了机关。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位于从前的俄奥边境、如今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边界附近。

他们除了撤退之外别无他法，因为乌克兰军再一次被击溃了。彼得留拉在1918年年底反抗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时率领的农民部队几乎烟消云散：总共10万名农民战士里只有四分之一留在彼得留拉麾下，其他人则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剩下的事应该交给他们帮助建立起来的政府，于是返回了各自的村庄。留下的人由各个“俄塔曼”指挥。“俄塔曼”一词在哥萨克时代意为“指挥官”，如今则指各路独立的军阀。彼得留拉的头衔“最高俄塔曼”反映出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他所统率的，是一群桀骜不驯的军阀，而非纪律严明的军队。彼得留拉和他的军官们从未成功将这支义军改造成一支正规军。事实证明，乌克兰的政治家们是成功的反叛者，但在创建国家和组建武装力量方面只是三流水平。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可靠部队由加利西亚士兵们组成。他们原是在奥军中服役的乌克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军俘虏，并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后加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事实证明，他们是这一时期历届乌克兰政府的军队中纪律最为严明的一支队伍。1919年7月，彼得留拉得到了来自加利西亚的新援军：超过5万人的加利西亚乌克兰军渡过曾为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界河的兹布鲁奇河[6]，加入了彼得留拉在波多里亚的部队。半年前，东西乌克兰在基辅宣告统一，此时似乎终于结出了第一批果实。然而统一所面对的形势无疑十分严峻：彼得留拉的军队和加利西亚军都已处于溃败的边缘，后者正被前进中的波兰军队逐出加利西

亚。

这样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其原因又是什么？尽管西乌克兰政府在1918年11月让利维夫落入波兰人之手，但它仍对东加利西亚大部分乌克兰人地区保持着有效控制。西乌克兰政府创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重新分配土地。这一政策让农民受益，并让整个乌克兰族群动员起来，团结在从波兰独立出来的理念周围。波乌战争的转折点发生在1919年4月：由约瑟夫·哈勒尔·冯·哈伦堡[7]将军率领的一支6万人的军队进入了加利西亚。哈勒尔的部队组建于法国，由波兰战俘组成（他们先前为奥地利一方作战），并由协约国加以武装，其部分军官还是法国人。这支部队被派往东部前线的目的是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哈勒尔却将它用来对付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军。法国人提出了抗议，并发来质询电报，波兰人则一边向法国人保证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布尔什维克，一边将装备不良的乌克兰军向东驱赶。1919年夏天，加利西亚乌克兰军撤退到兹布鲁奇河，并渡河加入了彼得留拉在波多里亚的部队。

加利西亚军兵力超过5万人，忠于彼得留拉的部队有3.5万人，再加上其他同盟“俄塔曼”部下的1.5万人，乌克兰武装部队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此时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已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而加利西亚人的到来让彼得留拉获得了重夺这些领土的机会。然而，事实证明，东西方乌克兰人的联盟并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牢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层持保守立场，难以在目标上与东乌克兰指挥部政府的左翼成员们达成共识。加利西亚指挥官们不能理解东部那些前叛军的松散军纪。在寻找可能的盟友的问题上，双方也无法保持一致。

除了基辅的乌克兰政府，前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府同样抵制布尔什维克1917年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武装起义，尤以波罗的海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为甚。在俄罗斯南部，一些前帝国军官和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们联合起来，组成了白军[8]，为恢复前布尔什维克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战。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向邓尼金[9]将军率领的白军提供了支持。1919年初夏，邓尼金在乌克兰开始向布尔什维克发起进攻。邓尼金在南乌克兰地区的出现和他向北发动的攻势向乌克兰政府及其武装力量提出了一个难题：他们是应该联合邓尼金进攻布尔什维克，还是回避跟他打交道呢？邓尼金的目标可不光是要取消乌克兰领袖们主张的社会革命，还包括重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国家。

加利西亚人和第聂伯乌克兰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西乌克兰人对与反布尔什维克和反波兰的白军结盟没有任何意见，东部人将加利西亚人憎恨的波兰人视为其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白军的潜在盟友，而那些“俄塔曼”甚至不反对加入红军。东西乌克兰人在理念和局势的驱使下走到了一起，却仍各自为政。8月，当白军和加利西亚部队同时进入基辅时，加利

西亚人大方地撤退了，把这座城市留给了白军。这在彼得留拉与加利西亚军指挥官们之间造成了激烈的冲突。关系的最终破裂发生在1919年11月：一场大规模流行的斑疹伤寒几乎消灭了双方的军队，迫使剩下的加利西亚人加入了白军，而彼得留拉则与波兰人达成了协议。

1919年有一个美好的开始，让两个乌克兰国家都对未来抱有巨大的期望，却在灾难中走向尽头。这一年年底，乌克兰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其国家地位也变成了泡影。东乌克兰人的失败源自他们的政治分裂和糟糕的组织，而加利西亚人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他们的兵力和装备都弱于敌人，同时他们的东部同胞又没有施以援手。两个国家和两支军队的联合更多的是一个军事同盟，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或是一支统一的军队。长久以来，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严重地影响了双方精英阶层及各自支持者的政治和军事文化，尽管他们相信彼此属于同一个民族。不过，虽然遭遇了1919年的困厄，东西方乌克兰人仍未打算放弃这一信念。

乌克兰的军队退出了战场，乌克兰独立的梦想似乎也渐行渐远。此时竞逐乌克兰控制权的主要有三股势力：其一是波兰军队，他们控制着加利西亚，并进入了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梦想着重建一个版图尽可能与被瓜分前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接近的波兰人国家。其二是以协约国为靠山的白军，他们从南乌克兰地区向北进军，突入俄罗斯境内，其蓝图是重建一个沙皇时代那样的统一且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国家。其三是布尔什维克们，他们的远景理想是世界革命，迫在眉睫的目标则是在军事上自保——正如弗拉基米尔·列宁所公开承认的那样，没有乌克兰提供的煤炭和面包，他们就无法做到任何一点。

1919年在乌克兰厮杀的各路势力和军队中，布尔什维克留下了最深的痕迹，控制基辅的时间也最长——从2月到8月，他们都占据着基辅，12月又再度回到这座城市。然而，控制了首都和乌克兰草原上的各大工业城市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整个乌克兰：乡村地区仍在反抗新来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许多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在原则上接受苏维埃权力，但不愿为之牺牲他们建国的梦想。农民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做出的土地分配承诺坚信不疑，到头来却因被迫上缴他们的收成而对布尔什维克不满。1919年12月，在击败邓尼金并重夺基辅之后，布尔什维克们决定从前一年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弗拉基米尔·列宁亲自就“1919年教训”对其支持者们做出了阐释。他认为此前布尔什维克忽视了民族问题。于是，布尔什维克军在1919年年末和1920年年初重归乌克兰时，打着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号，与乌克兰人沟通时也使用他们的母语。他们在乌克兰摈弃了“俄罗斯化”，代

之以让民族革命适应乌克兰文化的政策。他们将入党的大门向乌克兰左派敞开，这一举动让人想起当年帝国当局吸收地方精英的做法。这些前社会革命党成员早已接受以苏维埃的方式组织未来的乌克兰国家的理念，因其主要刊物《波罗特巴》（*Borot'ba*，意为"斗争"），被称为"波罗特巴党"[10]。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为该党提供了其急需的讲乌克兰语的干部和文化精英。同样，农民们最终也被融合了，并得到了长久以来一直被许诺给他们的土地：1920年春，布尔什维克推迟了在从贵族手中没收得来的地产上建立大型集体农庄的计划，允许农民们分掉他们的前主人的土地。

新策略奏效了。布尔什维克得以在1920年建立起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控制，将最后一个真正的威胁拒之门外。1920年4月下旬，在彼得留拉残军的支援下，约瑟夫·毕苏茨基的波兰军队从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战线发起了一次向基辅的进军。毕苏茨基的目标是在波兰和苏维埃俄国之间建立起一个能起到缓冲作用的乌克兰国。波军的进攻一开始十分顺利。5月7日，彼得留拉再次作为乌克兰政府首脑进入了基辅。然而这一次他身边没有了加利西亚盟军，这是他为得到波兰人的支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代价本身并无太多实际价值，却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最高统领同意承认波兰人对加利西亚的控制，这成为压垮两个乌克兰国家之间困难重重的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彼得留拉的成功并不长久。苏维埃发起了反击，迫使波乌联军于6月13日退出基辅。在这场战争中苏俄最有名的骑兵指挥官谢苗·布琼尼[11]的率领下，苏俄的第一骑兵军突破波乌联军的防线，对撤退中的敌军进行了拦截，并在他们阵地后方进行打击。红军在整条战线上——不光是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全面推进，每天向前移动20英里（约32千米），很快迫近了利维夫。时任红军某段前线政委的约瑟夫·斯大林决意攻下利维夫来让自己声名远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是波兰人，乌克兰军——彼得留拉从东乌克兰带来的部队——在面对红军对利维夫的进攻时同样选择了坚守。他们最终成功地守住了利维夫。这一场胜利成为导致苏俄在对波兰的战争中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战争的走向在1920年8月中旬再度发生转折。在获得协约国的援助，并得到英国和法国军官（其中包括后来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为其担任顾问后，波兰军队在华沙城郊那场被称为"维斯瓦河奇迹"[12]的战役中击败了红军，遏止了红军的进攻。在苏俄一方，斯大林是需要为这场"奇迹"负责的人之一：他鼓动布琼尼违抗其上级的命令去攻打利维夫，而不是向华沙进军。红军节节败退。到了10月，也就是双方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波兰和苏俄的边界在北段已经深入白俄罗斯，在南段则深入乌克兰境内。波兰人再度控制了乌克兰的沃里尼亚，以及波多里亚的部分地区。不过，虽然

取得了以上利益，波兰人建立一个以基辅为首都的乌克兰缓冲国的努力却没能成功，同样落空的还有乌克兰人重获独立国家地位的梦想。此外，“维斯瓦河奇迹”也终结了苏俄将其革命之火传播到欧洲腹地的计划。

波苏战争最有名的记述者莫过于敖德萨出生的俄国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3]。在作为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一员参加战斗的过程中，他坚持记日记，并在后来利用这些日记创作了一部题为《红色骑兵军》（*Red Cavalry*）的短篇小说集。布琼尼指责这部小说集扭曲了他麾下士兵的英雄形象，因为它描述了战争的残酷、红军骑兵的暴力，以及乌克兰犹太人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在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里，各路军队彼此厮杀，战线如拉锯一般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乌克兰平民还未从灾难中得到一丝喘息之机，就又陷入了新的恐怖和毁灭之中。在所有族群中，犹太人的命运最为悲惨：他们遭到来自所有势力的打击，不论是红军、白军、乌克兰军，还是各路军阀。

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乌克兰乃至整个“定居范围”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此时犹太人需要面对的是全副武装的迫害者。迫害造成的伤亡急剧增加，仅在乌克兰就超过了3万人。从前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外以下几种原因：掠夺欲、经济冲突、基督教中的反犹太教主义，以及近代的反犹太人潮流，然而现在又多了一种原因：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在这种新的视角下，犹太人一方面被视为资本主义剥削者而遭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宣传家的仇视，在另一阵营又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热情支持者。

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进入乌克兰的1918年春天。然而迫害实施者并非挺进中的德国人或“中央拉达”的军队，而是败退的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怀有革命的正义感而非基督徒的狂热，认为自己对诺夫霍罗德-西沃斯基[14]和赫卢希夫（从前哥萨克国的都城）犹太人的打击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进攻。1919年春，当彼得留拉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下向西退却时，乌克兰部队同样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普罗斯库里夫（今赫梅尔尼茨基）[15]，导致近1 700名犹太人丧生。这一年晚些时候，心思主要放在劫掠上、对各种口号没有多少兴趣的军阀们又率领他们军纪涣散的部队对犹太人定居点进行了洗劫。到了秋天，邓尼金的军队打着“痛揍犹太人，挽救俄罗斯”的反犹新旗号，也对犹太人展开了屠戮，其中规模最大的行动发生在基辅以南的小城法斯蒂夫[16]，造成近1 000名无辜者的牺牲。总体而言，在所有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中，约20%系白军所为，红军的比例约为10%，军阀们约占25%，而彼得留拉的部队约占40%。后者在战争期间实施了最多的反犹屠杀。白军则是唯一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其士兵对犹太人的屠杀都得到了上级军官的明确授意。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战士们成为仅有的未参与反犹屠杀的群体。

乌克兰犹太村庄的居民们也组织起自卫部队。他们在抵御军阀势力方面卓有成效，但面对大规模的军队时则无能为力。也有大量犹太年轻人加入了红军。红军的政治领袖列昂·托洛茨基[17]出生于乌克兰，常被视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象征，然而红军在犹太人中的受欢迎的程度远非托洛茨基一人所能代表。犹太革命家们从前就积极参与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或加入孟什维克[18]，或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外，就实施反犹屠杀的次数多寡而言，红军似乎是对犹太人最为友好的，因此吸引了许多犹太年轻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伊萨克·巴别尔的经历在敖德萨的犹太年轻人中并不算出奇：他先是在列宁的秘密警察机构契卡[19]中待了一小段时间，后来又作为一名政委和随军记者加入了布琼尼的骑兵军。

1919年的反犹屠杀终结了革命初期形成的乌克兰人-犹太人同盟，也让西蒙·彼得留拉成为乌克兰反犹主义的恐怖象征。1926年，流亡巴黎的彼得留拉被前红军士兵沙洛姆·施瓦茨巴尔德[20]枪杀，让他的这一形象更加得到了强化。许多人相信施瓦茨巴尔德是在苏俄秘密警察的指派下刺杀了这位乌克兰移民政治领袖，但施瓦茨巴尔德本人声称刺杀是他的自发行动，是为他那些在乌克兰反犹屠杀中死去的犹太亲属复仇。巴黎的一个法庭无罪开释了这名刺客。

彼得留拉真的应该为那些反犹屠杀负责吗？他在革命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又在左翼的指挥部中担任领导人，无论从其观点还是政治背景来看，彼得留拉都是一名国际主义者。他与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和中央拉达的其他领袖们一样，认为犹太人是乌克兰人反抗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事业中的天然盟友。这一立场在他向其部属发出的命令中也有所体现。“是时候认识到全球的犹太人，包括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妻子，都和我们一样，被剥夺了民族自由，身受奴役之苦了。”彼得留拉在1919年8月签署的一道命令中这样写道，“我们不应让他们与我们疏离——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分享我们的命运和不幸。我在此严正下令：任何煽动你们去迫害犹太人的人，都将被逐出我们的军队，并将被视为祖国的叛徒而接受审判。”

在彼得留拉的意识中，攻击犹太人等于背叛乌克兰。问题在于，尽管他发出了命令，但他极少或并不急于惩罚那些反犹行为的实施者。“俄塔曼”伊凡·塞米申科（Ivan Semesenko）的部队是1919年2月普罗斯库里夫反犹屠杀的执行者，而彼得留拉在1920年3月才下令对塞米申科进行审判和处决。这一惩处来得太晚，未能在反犹迫害达到高潮时对他的军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由于彼得留拉对其军队的控制力有限，他并不愿意真正执行自己的命令。乌克兰军队参与反犹迫害的理由与其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失败的理由是一样的：这支军队纪律涣散，缺乏组织。彼得留拉这种持社会主义立场的乌克兰领导人是在农民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然而从乌克兰

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而言，农民革命来得太早了。在他们的国家陷入革命浪潮、外国干涉和内战之前，乌克兰的活动家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农民大众展开工作，没能在农民中普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机会在乌克兰进行自由宣传的党派都是小俄罗斯理念的鼓吹者和各种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而反犹主义是他们的理念中的关键元素。右岸乌克兰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堡垒，在1919年也是最骇人听闻的反犹屠杀的发生地。

唯一一个曾经尝试约束部队不去参与反犹屠杀并在自己的农民军队伍中对反犹主义进行了斗争的军阀是涅斯托尔·马赫诺[21]，而他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马赫诺身材不高，而且很瘦弱，留着唇髭和一头长发。他曾是从前俄罗斯帝国规模最大的“私人”部队的指挥官，富于领袖魅力，其部属在全盛时有4万人。马赫诺出身农家，在政治立场上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乌克兰的各路军阀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他的根据地和活动区域是南乌克兰的胡利艾波勒[22]，此地位于顿巴斯的煤矿和克里维伊里赫铁矿之间，是典型的农业地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条铁路将上述两个地区连接起来，与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相交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今天的扎波罗热）[23]，此地正离马赫诺的故乡不远。铁路的位置让马赫诺和他的军队成为争夺的焦点。

马赫诺手下的农民战士们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和梦想并不买账，也看不上那群受意识形态驱动而围绕在他们的“巴特科”（*bat’ko*，即“父亲”，这是他们根据农村的家长制传统对马赫诺的称呼）身边的无政府主义者。农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控制（这种态度正吸引了马赫诺身边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并希望没收并重新分配土地。与早期近代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们一样，在从前的哥萨克-鞑靼人边境地区活动的马赫诺军与北方的各个乌克兰政府保持着距离，并经常与他们作战。尽管绝大多数马赫诺的战士都是乌克兰族，而马赫诺对乌克兰民族解放的目标也并不陌生（他那个做教师的妻子就是这一目标的积极宣传者），这位军阀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理想大体上仍旧是国际主义的。

在对乌克兰展开争夺的所有势力中，被马赫诺视为潜在盟友的只有布尔什维克。马赫诺帮助布尔什维克击败了他们的大敌——彼得·弗兰格尔[24]将军率领的白军，让克里米亚成为后者残部的最后阵地，然而布尔什维克却立刻对马赫诺反戈一击。弗兰格尔政权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克里米亚地区的第八个政府——第一个则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在1917年12月25日成立的克里米亚人民共和国。在两次大规模向奥斯曼帝国移民的浪潮之后，鞑靼人还占克里米亚半岛总人口的近30%（其余人口则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犹太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代表）。鞑靼人的共和国是伊斯兰教组织建立世俗国家的最早尝试之一，这是上一代克里米

亚鞑靼人中的活动家们开展的各种文化和教育活动的结果。这些活动家以伊斯梅尔·伽斯皮拉里[25]为首，他也被称为现代克里米亚鞑靼民族之父。然而，克里米亚人民共和国很快就夭折了。1918年1月，半岛的控制权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宣布成立独立的陶里达（克里米亚）共和国，不过很快又被乌克兰军和德军侵占。

在德国占领时期，克里米亚保持了对乌克兰的独立地位，但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在1918年9月宣布对克里米亚半岛实施经济封锁，迫使克里米亚政府作为自治地区加入了乌克兰。这一状态也未能持续多久：随着德国人的撤军，以出身犹太教伽来特派[26]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所罗门·克里姆[27]为首的新政府上了台。克里姆政府的司法部长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28]，正是那位著名作家的父亲。然而此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进军途中。1918年7月，他们在乌拉尔山中处死了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1919年4月7日，罗曼诺夫皇族的幸存者们逃离他们位于雅尔塔附近的庄园，搭乘英国的无畏级战舰“马尔伯勒号”前往西方避难。从1919年6月开始，克里米亚就落入了白军之手，先是由邓尼金将军掌管，在邓尼金于1920年4月辞职后，又成为弗兰格尔将军的地盘。

弗兰格尔声称自己是南俄罗斯地区政府的长官，然而他实际控制的区域只有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半岛以北的一小片草原。他与他的部长们希望光复整个俄罗斯帝国，然而这个目标在嘴上说起来比实现起来容易得多。尽管他背后有协约国的支持，弗兰格尔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中仍节节败退。1920年11月8日，红军及其盟友马赫诺的部队从大陆开始了对克里米亚的攻势。他们冒着严寒涉过锡瓦什潟湖[29]的浅水，对白军位于彼列科普地峡[宽4英里（约6千米），是连接半岛与大陆的桥梁][30]的工事发起猛攻。11月17日，他们进入了雅尔塔城。弗兰格尔将军将其残部撤退到伊斯坦布尔。被遗弃在前线的近5万名军官和士兵惨遭屠戮，这也是这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屠杀行动。然而，这并不是这场血腥的革命战争中最后一次屠杀，而只是一支序曲，预示着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广袤国家的统治的来临。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都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1921年3月，俄罗斯联邦[31]、苏维埃乌克兰[32]和波兰三方在拉脱维亚的里加签署和约，确定了一条新的波兰-苏俄边界。根据这份和约，波兰不仅保有加利西亚，还取得了从前归属于俄国的沃里尼亚。此时的乌克兰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只分属于两个国家，而是被四国瓜分：1918年被罗马尼亚占领的布科维纳仍在布加勒斯特手中，而战败的匈牙利不得不把外喀尔巴阡地区交给新成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人西面的邻居——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此时都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国家。然而，除了在一个由俄罗斯领导的政治体内的自治权外，为创建自己的国家不断努力的乌克兰人几无所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那些更强大、侵略成性又声称对乌克兰土地拥有主权的邻国的存在，然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成熟，以及独立国家理念在分属于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的乌克兰地区的姗姗来迟。尽管乌克兰身份认同和全俄罗斯身份认同之间的分歧在1918年的奥属加利西亚已不存在，在第聂伯乌克兰地区，这种分歧却贯穿了整个战争和革命。地方主义是乌克兰各地不同历史轨迹的产物，也是存在于奥属乌克兰和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一大障碍：在奥属乌克兰，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民族建构机制各不相同；在第聂伯乌克兰，乌克兰国家理念在前哥萨克国和波属右岸乌克兰地区受到的支持远较东部和南部的草原地区为多。城市地区，尤其是有大量非乌克兰人口居住的大城市，均不属于乌克兰人的独立追求所能涵盖的范围——这种追求几乎完全依赖于农民群体的支持。

考虑到乌克兰民族解放事业所背负的各种限制，我们需要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民族运动尚处于襁褓之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第一次形成独立的政治目标，迟至1918年才真正认同这个目标，那么，在这片被从前的帝国势力和其他更发达的民族运动主宰的政治版图上，乌克兰民族运动何以能走得这么远？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个帝国的崩溃带来的革命性冲击为1917年和1918年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机遇，而乌克兰民族运动也充分利用了这些机遇。乌克兰人的民族解放事业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旋涡之中，诞生于远比从前更成熟的独立斗争之中。尽管它没能在奥属乌克兰和第聂伯乌克兰大地上成功建立一个能有效运转的国家，却已让独立统一国家的理想成为新乌克兰信念的核心。

---

[1] 指圣索菲亚大教堂。

[2] Lev Bachynsky（1872—1930），加利西亚乌克兰政治家、律师，曾任奥地利议会议员和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拉达副主席。

[3] Symon Petliura（1879—1926），乌克兰政治和军事人物、民族主义者，他同时也是一名作家和记者。十月革命之后，彼得留拉组织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与红军和白军双方作战，试图维持乌克兰的独立。他在失败后流亡欧洲，于1926年5月25日在巴黎被暗杀身亡。

[4] Otaman（乌克兰语作отаман）一词原指哥萨克军团的指挥官。

[5] Vinnytsia，今乌克兰中西部文尼察州首府。

[6] Zbruch River，今乌克兰西部河流，为德涅斯特河的左支流，全长244千米。

[7] Józef Haller von Hallenburg（1873—1960），波兰陆军中将。

[8] The White Army，1917年至1922年俄国内战期间的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军事联盟。

[9] Anton Denikin（1872—1947），俄罗斯帝国将领、白军前期领袖，在失败后流亡海外。

[10] Borotbists，亦作“斗争党”，存在于1918年至1920年间的乌克兰左翼民族主义政党。波罗特巴党于1920年3月解散，其成员多被吸收入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1] Semen Budenny（1883—1973），苏联军人，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内战、波苏战争、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布琼尼在1935年成为苏联最早的五名元帅之一。

[12] Miracle on the Vistula，即1920年8月中旬至下旬的华沙战役。

[13] Isaac Babel（1894—1940），苏联犹太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以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知名。他于1939年被诬为间谍，次年被秘密处决。

[14] Novhorod-Silversky，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古城。

[15] Proskuriv，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首府赫梅尔尼茨基（Khmelnytskyi）。

[16] Fastiv，今乌克兰基辅州城市，位于基辅以南63千米处。

[17] Leon Trotsky（1879—1940），即列夫·托洛茨基，俄罗斯帝国-苏俄-苏联时代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十月革命指挥者和苏联红军缔造者之一。他在列宁去世后逐渐失势，后流亡海外，并于1940年被苏联特工刺杀于墨西哥。

[18] Menshevik，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派别，意为“少数派”，与布尔什维克的意思相对。1921年，苏俄政府宣布孟什维克非法。

[19] Cheka，苏俄时期的情报机构，创建于1917年12月20日。契卡于1922年被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

[20] Sholom Schwartzbard（1886—1938），俄裔法国犹太诗人，以在1926年刺杀彼得留拉闻名。

[21] Nestor Makhno（1888—1934），俄国内战期间的乌克兰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和游击武装领导人。他于1921年流亡海外，于1934年死于巴黎。

[22] Huliaipole，亦作古利艾波列（俄语发音），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城市。

[23] Aleksandrovsk，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首府扎波罗热。

[24] Petr Wrangel（1878—1928），俄罗斯帝国军官，俄国内战后期担任俄罗斯南部白军指挥官，后流亡法国。

[25] Ismail Gaspirali（亦作Ismail Gasprinski，1851—1914），克里米亚鞑靼教育家、政治家，被视为俄罗斯帝国最早一批穆斯林知识分子之一。

[26] Karaite Judaism或Karaism，犹太教教派之一，以《塔纳赫》（《希伯来圣经》）为本，不承认任何口传的律法如《塔木德》等经籍。

[27] Solomon Krym（1864—1936），克里米亚政治家、农学家。

[28] Vladimir Nabokov（1870—1922），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俄国记者、犯罪学家、政治家，俄裔美国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纳博科夫之父，于1922年在柏林被一名右翼君主主义者刺杀。

[29] Syvash lagoon，也被称为腐臭之海、腐海或懒海，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北部、亚速海西岸，由一系列浅湾组成。

[30] Perekop isthmus，连接欧亚大陆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窄长陆地，宽5至7千米。

[31] Russian Federation，全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联的第一个加盟共和国。

[32] Soviet Ukraine，即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1937年改名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联的第三个加盟共和国。

第20章
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1918—1939），乌克兰人成了民族问题仍有待解决的最大欧洲民族。乌克兰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其土地分属于欧洲四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中苏维埃乌克兰在1922年成为俄罗斯领导下的苏联的一部分，包括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根据1921年的里加和谈结果，苏维埃乌克兰与波兰的共同边界位于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与罗马尼亚之间则以德涅斯特河为界。前协约国同盟在1920年的巴黎和会中承认了这后一条乌克兰与罗马尼亚的边界，但苏俄当局对它提出了挑战。

每一个控制着乌克兰国土的政府都以各自的方式尝试解决乌克兰问题，使用了从融合到镇压等各自不同的策略。在东欧地区，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的竞争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与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相互冲突，也会以民族共产主义这样的杂糅形式来寻求相互妥协。对乌克兰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动员方式各有不同，导致各种旨在替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诉求的乌克兰民族理念浮出了水面。其中两种新理念最具影响力：其一是苏维埃乌克兰（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或乌克兰SSR[1]）的苏维埃版民族共产主义；其二则是主要植根于波属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激进民族主义。20世纪乌克兰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将由这两种类型的乌克兰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所定义。

1922年12月，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它将在1937年更名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个包括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政治体——与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共和国[2]正式达成协议，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当时斯大林担任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设立的总书记职务，他希望乌克兰和其他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在联邦内各自保留自治地位。乌克兰的共产主义领袖们对此表示拒绝。这些人中有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也有那些相信社会革命本身就意味着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相信建立一个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达成这两个目标的最好办法。列宁支持乌克兰方面的立场，因为他的梦想是世界革命，在其蓝图中，中国、印度、德国、法国和美国都将加入联盟。

联盟的创立充分考虑了乌克兰的诉求，直接目的在于接纳乌克兰人，排斥波兰人，并限制俄罗斯人。莫斯科当局认为乌克兰人是其治下最不安分、

最叛逆的少数族群——以西蒙·彼得留拉为代表的乌克兰领袖已经被证明拥有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也认为俄罗斯国家主义者的诉求对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威胁。波兰则是毫无疑问的敌人，在西方的支持下很可能对联盟发起另一场进攻，并将乌克兰的一部分从联盟夺走。于是，身处联盟条约所代表的联邦主义和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所代表的集权主义之间，乌克兰享有事实上的自治权，其拥有的特权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间乌克兰主流政治家们乃至1917年革命初期“中央拉达”领导人们所梦想的更多。

在自称“人民专政”的苏维埃当局建立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乌克兰将把其民族建构的这一新阶段变成现实。20世纪20年代初，当局试图巩固其对这个被战争、革命和内乱摧毁的国家的控制，允许部分市场元素通过“新经济政策”这道后门重新进入其高度集中的苏维埃经济体系。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苏维埃领导人也在寻找各种能让自己保住罗曼诺夫帝国遗产的新方法。对这后一个问题，他们在*korenizatsiia*（本土化）[3]政策中找到了临时的解决办法。这种政策重视非俄罗斯的边缘地区的经济建设，以及对本地文化的支持和发展。1923年4月，即苏联成立一年多之后，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4]决定将本土化列入党和政府的官方政策。

培养忠诚的地方精英阶层是莫斯科打算利用本土化政策达成的目标之一。罗曼诺夫王朝曾通过将地方精英阶层纳入帝国体制的办法来开疆拓土。这一手段在革命时代已不再适用。对地方革命精英的笼络始于1920年，即允许前社会革命党中的波罗特巴派[5]成员加入乌克兰共产党之时。然而这种做法损害了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因此未能继续。此外，乌克兰本土的共产主义精英在数量上也不足以保证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稳定性。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维埃乌克兰的总人口数不到3 000万，其中乌克兰人约占80%，俄罗斯人不足10%，犹太人约占5.5%。党员的族群构成却与此大相径庭。1922年，在总计约5.5万名乌克兰共产党员中，俄罗斯人以53%的比例占据绝对多数，乌克兰人却几乎不足24%，与其他所有族群代表（这些代表又以犹太人为主）占比差不多。这个新的政权在乌克兰农民眼中与外国统治者没什么两样。莫斯科的共产党当局希望改变这种看法，以建立对乌克兰农民阶层的控制。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中有一派是民族共产主义者。他们将革命视为让俄罗斯统治下的少数民族获得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手段，提出：要弥合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城市与小资产阶级的农村世界之间的鸿沟，党必须接受占乌克兰人口主体的族群的语言和文化，而在乌克兰，这一主体族群就是乌克兰人。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城市现象，农村在共产主义者对乌克兰化问题的思考中就会被视为一种主要的阻力，正如其在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乌克兰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主张的

策略与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拜占庭的改宗劝导者们的做法相似：通过接受本地语言和文化来实现推广新信仰的目标，只是此时的新信仰变成了共产主义。最终拜占庭策略压倒了坚持所有真信徒都应使用同一种通用语的罗马帝国策略：民族共产主义者们主张的立场变成了党的官方路线。然而这仍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艰难处境。

最大的阻力来自乌克兰共产党本身——它的大部分党员都不是乌克兰人。根据一份报告，在所有乌克兰公务员中，娴熟掌握乌克兰语者的比例为44%，而在担任公务员的乌共党员中，这一比例仅为18%。以亚历山大·舒姆斯基[6]为首的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们要求以更强硬的手段来推行乌克兰化。舒姆斯基本人希望让乌克兰裔的乌克兰政府首脑弗拉斯·丘巴尔[7]担任乌共总书记，取代斯大林的门生拉扎尔·卡冈诺维奇[8]。后者是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却一直未能熟练掌握乌克兰语。舒姆斯基还要求斯大林在工人中推行语言上的乌克兰化。一开始，乌克兰化政策的推广范围仅限于乌克兰族，而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族群则不在其内——这些族群也自有其本土化方案。因此，乌共十分不情愿在俄罗斯裔或高度俄罗斯化的工人阶级中推行一种很可能受到他们抵制的语言政策。舒姆斯基在这场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

斯大林拒绝撤掉卡冈诺维奇，声称这一提议不合时宜。尽管在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正在争夺党的控制权，而作为苏联最大党组织的乌克兰共产党的忠诚对他来说至为重要，他的态度仍十分强硬。对在工人阶级中推行乌克兰化的问题，斯大林同样拒绝让步。“在保持一定速度的条件下，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党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可以而且需要乌克兰化。但是决不能从上面使无产阶级乌克兰化。”斯大林在1926年4月给乌共政治局——乌克兰最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信中写道。对将乌克兰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区别开来的呼声，斯大林的批评态度尤为严厉，并将这种呼声与俄罗斯裔乌克兰作家米科拉·赫维列沃依（原名尼古拉·菲季列夫）[9]的作品联系起来。“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和他们的共产党都对‘莫斯科’、对这个国际革命运动和列宁主义的堡垒深表同情的时候，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都怀着赞美的心情仰望飘扬在莫斯科的旗帜的时候，乌克兰共产党员赫维列沃依却号召乌克兰活动家‘尽快地’摆脱‘莫斯科’。”斯大林写道。[10]

斯大林决意从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中夺回主动权，命令他的亲信卡冈诺维奇亲自领导乌克兰化运动，对舒姆斯基关于乌克兰化步调太慢的焦虑做出回应。卡冈诺维奇遵命而行，将1926年前推行的乌克兰化转变为一种有效得多也全面得多的政策。1927年，卡冈诺维奇成功地在乌共党代会上用乌克兰语做了发言。关于在教育机构以及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宣传工作中使用乌克兰语的问题，他也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卡冈诺维奇在1928年被召

回莫斯科。他的波兰裔继任者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11]延续了他的路线。根据官方统计，1926—1927学年乌克兰高等教育机构中使用乌克兰语教学的比例为33%，到了1928—1929学年，这一比例已提高到58%。到了1932年，乌克兰语报纸在全部乌克兰报纸中的比例已从1926年的30%提高到92%。1932年6月，面向矿工发表的演说有75%都使用乌克兰语。

尽管乌克兰化是乌克兰本土化政策的核心，但本土化涉及的并非只有乌克兰族。犹太人、波兰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民族自治地区在乌克兰纷纷建立起来。在这些地区，出版社用民族语言印刷书籍，学校也使用民族语言来对学童进行教育。然而，这一政策的效果大体上仍局限于农村地区。在城市中，少数族裔俄罗斯化的速度比乌克兰化的速度更快。1926年，62%的哈尔基夫乌克兰裔居民将乌克兰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但只有41%的犹太人这样做。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如出生于涅斯托尔·马赫诺的都城胡利艾波勒的格里高利·科尔内尔（赫里茨科·科尔内连科）[12]——欢迎乌克兰化，并选择使用乌克兰语写作，然而更多人则选择俄语，将之视为更直接的通往现代性的途径。许多人离开乌克兰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取得了更显赫的成就。分别来自乌克兰两个最著名犹太重镇敖德萨和别尔基切夫[13]的作家伊利亚·伊利夫（法因兹尔贝格）[14]和瓦西里·格罗斯曼[15]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

斯大林对乌克兰化的支持只是暂时的和战术性的。他相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根本就是同一个民族。苏共在20世纪20年代末决定限制乌克兰人创造一种完全独立文化的野心，因为俄罗斯人是最大的族群，其支持至关重要。

1929年，苏联秘密警察展开了一系列逮捕行动。乌克兰知识分子领袖们成为在哈尔基夫举行的公审的主要目标：他们被控属于所谓“乌克兰解放同盟”。检方指控他们与流亡海外的乌克兰人和波兰政府接触，密谋掀起一次以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为最终目的的起义。排在这份“密谋者”名单前列的，是乌克兰科学院负责学术事务的秘书长、曾任“中央拉达”第二把手的谢尔赫·叶夫列莫夫[16]，以及曾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弗拉基米尔·切希夫斯基[17]。后者还是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18]的领袖之一。该教会独立于莫斯科牧首区，被检方认定为密谋者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这些指控均为不实，但被告中则有15人被判处死刑，192人被处以不同形式的监禁，另有87人被判国内流放。这场审判直接打击了站在乌克兰化运动最前沿的知识分子群体，并透露出一个信号：党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它的打击对象不再是俄罗斯霸权沙文主义，而是变成了地方民族主义。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们，包括颇有影响力的教育部长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19]在内，向莫斯科提议针对俄罗斯“霸权沙文主义”进行一次类似的审判，却没有成功。

语言和文化上的乌克兰化运动没能改变共和国东部和南部工业地区的文化。这一状况在乌克兰的新首都哈尔基夫表现得最为明显。从1926年到1939年，哈尔基夫居民中将乌克兰语当作自己母语者的比例仅仅从24%增长到32%。考虑到对这座城市进行乌克兰化的巨大努力，这样的增长微不足道。然而更让人忧虑的是，这段时间内哈尔基夫的人口从41.7万增加到了83.3万，几乎增长了一倍，而其中乌克兰人所占的比例也从39%增长到了49%，将俄语当作自己母语的居民比例却保持不变，仍为64%。实现这座城市的乌克兰化是乌克兰文化事业的需要，然而在做到这一点之前，乌克兰化政策的势头就遭到了遏制。这一失败将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自我认同造成深远的影响。然而，乌克兰化政策也在乌克兰社会中留下了另一道印记：它创造出一种局面，让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城市居民宣称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使用俄语。说俄语的乌克兰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在说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和说俄语的俄罗斯人之间形成了一条关键的文化纽带。事实上，这三个群体共同拥有一种由乌克兰语和俄语杂糅而成的通用方言——“苏尔日克”（*surzhyk*）[20]。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领导人在邻国的乌克兰人群体中积极展开秘密行动，试图动摇并削弱这些多民族的东欧国家。另一方面，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列强则打算将这些国家变成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向欧洲扩散的缓冲区。苏维埃乌克兰的领袖们将自己的共和国描述为一个乌克兰版本的新“皮埃蒙特”[21]，一个将为暂时处于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乌克兰人带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国家。“皮埃蒙特”这个词源于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在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皮埃蒙特地区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波兰人首先将“皮埃蒙特”这个比喻用于加利西亚，乌克兰人紧随其后——这两个族群都将加利西亚视为各自民族运动的中心。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们再次拾起了这个概念。随着乌克兰化运动的进行，将苏维埃乌克兰描述为乌克兰民族性的灯塔十分容易，因为西方的许多乌克兰人地区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事实上的被占领状态，并在几乎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遭到压迫。

波兰人统治下的加利西亚的政治和文化局势最为艰难。加利西亚的总人口数约为5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近440万。《凡尔赛和约》《里加和约》以及波兰宪法保证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少数民族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并有权开办自己的学校，在公共领域使用乌克兰语。然而现实的情况与新生的波兰国家承诺尽到的国际义务并不一致。波乌战争的惨痛记忆宛如昨日：波兰当局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关押了近7万名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抵制当局在加利西亚的各种机构，自己开办地下大学，并对当局的1920年普查和1922年选举置若罔闻。然而，1923年3月之后，这些战术不再有效：巴黎和会创立的大使会议[22]做出决议，承认了波兰对加利西亚的统治。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原本指望来自西方的干涉可以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一决议却让他们彻底失望，让他们不得不靠自己的最大努力来适应这种新的政治局势。

大使会议认为乌克兰人将会得到某种形式的自治，因而做出了上述决议。然而乌克兰人自治并未变成现实。新生的波兰人国家的民族政策打算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实现对少数族群的同化。波兰于1926年从共和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权，其当局将少数族群——除了乌克兰人，还有白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犹太人——视为对波兰政权稳定的最大内部挑战。1924年通过的所谓“格拉布斯基法”（*Lex Grabski*）即体现出对在加利西亚占多数的乌克兰人的歧视。这条法案得名于波兰教育部长[23]。他在教育系统内限制乌克兰语的使用，并启动了将乌克兰语学校转变为波兰语-乌克兰语双语学校的政策。

语言成为在文化上对少数族群实行波兰化的政策中的关键因素。1910年，东加利西亚的人口中乌克兰人占65%，波兰人占21%。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这一地区乌克兰人——或者说将乌克兰语视为自己母语的人——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9%，而波兰人比例则上升到29%。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当局鼓励波兰语学校并打压乌克兰语学校的教育政策。1930年，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地区共有58所波兰语高中（gymnasiums），而乌克兰语高中只有6所。尽管乌克兰人创办私立高中，却仍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同一年，该地区的私立波兰语高中为22所，而私立乌克兰语高中只有14所。新教职几乎都被波兰人获得。在加利西亚的1.2万名教师中，只有不到3 000人是乌克兰人，其余则都是波兰人。近600名乌克兰教师因无法在家乡找到工作而被迁移到波兰人聚居地区。

统计数据中波兰人口的增长不仅源于官方对波兰语的支持，也因为政府鼓励波兰人向东加利西亚——如今被称为“小波兰”——地区移民的政策。波兰独立后不久，其领导集团就决定分割大土地拥有者的地产，将之分配给普通农民。在加利西亚和波兰的其他乌克兰人聚居区，这样的改革意味着拥有土地最多的波兰地主遭受损失，而乌克兰农民阶层将从中受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又引入了对迁居到加利西亚的波兰退伍军人和农民的优待政策。同样的政策也在沃里尼亚施行。沃里尼亚从前属于俄罗斯帝国，这里的波兰人口比例向来低于从前属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地区。然而政府将从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可分配土地的40%都分给了新来的波兰定居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有近30万波兰人迁移到波兰境内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和帕得拉夏等乌克兰人地区。

乌克兰人在加利西亚的村庄中占绝对多数，犹太人则在这一地区的小城镇人口中占70%以上，然而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却让他们离开这一地区，甚至离开这个国家。应为这一不断增长的移民浪潮负主要责任的，是经济的停

滞不前以及政府对东部边境地区的忽视。加利西亚的石油产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最高点下降了70%，然而除了小规模的林业和农业之外，没有其他产业来填补石油产业的衰落。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地区的工人数量还没有超过4.5万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乌克兰族农民们尝试恢复奥匈帝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的合作化运动。奶业联盟是这场运动中最成功的合作组织，其不光在本地竞争中胜出，还将产品出口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几乎所有乌克兰族农民都加入了奶业联盟。然而，合作化组织所能做到的也只是缓解乌克兰人聚集的乡村地区的困厄。在城镇中，工作机会仍然极为稀少，而缺少耕地的农民[大约半数农场只拥有不到5英亩（约2公顷）耕地]往往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个国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足有20万名乌克兰农民离开了波兰。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美国。在20年代中期美国关闭移民窗口之后，他们又转投加拿大和阿根廷。大约同样数量的犹太人也离开了波兰，其中许多人（数量约为7.5万）[24]去了巴勒斯坦，其他人则前往阿根廷和美国。犹太人移民的驱动力来自经济状况的恶化（大部分生活在加利西亚和波兰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和日益严重的反犹主义——波兰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店铺的抵制和对犹太社区的攻击即源于这种潮流。波兰国家元首约瑟夫·毕苏茨基曾尝试抑制反犹主义，然而在他去世后，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波兰各地发生了许多骚乱和冲突，导致数十名犹太人死亡和数百名犹太人受伤。波兰政府请求西方列强和这些国家的犹太社群帮助在波兰陷入贫困的犹太人或者接受犹太难民，打算以这样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然而西方各国政府对此根本无动于衷。

20世纪20年代波兰当局在乌克兰人地区实施的经济和文化政策与同一时期苏维埃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好相反。波兰政府没有寻求快速的工业发展，而是以农业为根本；它也没有尝试将乌克兰人纳入国家体制，而是鼓励他们离开，并促使波兰人——不光是波兰管理者，还有波兰定居者——流入这一地区。然而波兰拥有一个苏联从来不曾拥有的条件——基于民主选举原则的政治体系。即使在1926年约瑟夫·毕苏茨基发动政变之后，波兰仍然保留了政治多元主义和宗教宽容等元素，让乌克兰人得以建立自己的政党、教会和文化组织。

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国家于1919年失败之后，希腊礼天主教会重新成为加利西亚地区主要的民族机构，教会领袖安德烈·舍普提茨基[25]都主教则被普遍承认为民族领袖。前一种状况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从1848年革命开始，教会就曾履行过这种职能），然而舍普提茨基成为民族领袖这件事却甚不寻常。他是一个罗塞尼亚贵族世家的后裔，其家族早在18世纪就曾为该教会贡献过一位都主教。在不止一代人之前，他的家族在文化上就已经

波兰化，所以舍普提茨基生下来就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他于20世纪初取得希腊礼天主教会主教团中的最高职位后，乌克兰社群中的许多人认为他投身希腊礼天主教会是波兰人企图夺取本地区最后的乌克兰“全国”机构控制权的阴谋。然而舍普提茨基本人却更多地自认为是奥匈帝国的忠诚子民，而非波兰之子。他尽了最大努力保护他的教会及其成员不受新生的波兰国家的波兰化政策影响。由于波兰语越来越普及，而当局又拒绝将民族作为人口普查的一个分类，宗教（在此特指希腊天主教）就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加利西亚乌克兰人身份认同的主要标志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深有根基的党派全国民主同盟[26]成为加利西亚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其领袖来自奥匈帝国时期的乌克兰全国民主党[27]。1929年，由叶乌亨·科诺瓦列茨[28]上校（他在1918年至1919年曾积极参与东乌克兰地区的独立斗争）领导的地下网络“乌克兰军事组织”[29]被改组为政党“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30]，令加利西亚政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组织从其前身那里继承了乌克兰独立和民族统一的目标，也继承了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秘密组织方式和恐怖主义战术。它的新特点则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点为那些在1918年至1921年间参加乌克兰独立战争的前辈们所无。这种新的理念唾弃战前那些乌克兰民族运动领袖们的自由派民族主义立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指责他们将自己的斗争局限于语言问题，培养出一种失败主义文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宣称民族优先于一切其他价值，并致力于创造一种“新人”。出生于东乌克兰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德米特罗·东佐夫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他从未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但他的写作塑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新一代领导人和活动家。

在乌克兰政治舞台上，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至多也不过是一支边缘力量，然而它几乎立刻就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一种远超其实际政治分量的影响力。1934年6月，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名声大噪，因为其成员刺杀了波兰内政部长布洛尼斯拉夫·皮尔拉基[31]，称他在“平乱行动”（Pacification，1930年秋天针对乌克兰激进分子的一系列镇压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在皮尔拉基遇刺之前的1933年，作为对1932—1933年间苏维埃乌克兰发生的饥荒的报复，一名苏联外交官也在利维夫遇刺。两次刺杀的策划者是同一个人——利维夫理工学院的25岁学生、于1933年6月成为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的斯捷潘·班德拉[32]。在班德拉被波兰警方逮捕并被起诉后，公众对他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理念有了更多的了解。班德拉因皮尔拉基遇刺事件在华沙受审。对他的第二场审判则于1936年在利维夫举行，这一次是因为利维夫一所高中德高望重的乌克兰校长在1934年7月（班德拉被捕之后）遇刺身亡——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认为这位校长与波兰警方合作。

在利维夫审判的总结陈词中，班德拉解释了为何他和他的同志们不仅不惜夺取他人的生命，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非常珍视其成员的生命，但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理念是如此伟大，为了它的实现，仅仅牺牲个人的生命是不够的，还需要牺牲成百上千人的生命。”班德拉口中的“理念”即是指乌克兰的独立。因为他在皮尔拉基遇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班德拉被判处死刑，但在后来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他将在1939年9月重获自由——德国和苏联对波兰的侵略让波兰监狱陷入混乱，也让包括班德拉在内的许多囚犯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明显植根于加利西亚，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它开始渗透到加利西亚之外的乌克兰地区，尤其是从前的俄国省份沃里尼亚。沃里尼亚的族群关系显著不同于加利西亚。根据1931年的普查数据，68%的沃里尼亚人把乌克兰语当作自己的母语，17%的人选择波兰语，另有10%选择意第绪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沃里尼亚曾是俄罗斯国家主义的温床。当地农民缺乏明显的民族身份意识，还将俄罗斯人民联盟及其兄弟组织的成员选入俄国国家杜马。在被纳入波兰后，这个省份成为波兰集中殖民化的目标，同时也成为两种乌克兰民族建构路线的擂台。这两条路线都属于乌克兰人，然而前一种成型于加利西亚，有强烈的反波兰色彩，后一种在文化和语言上仍旧是乌克兰的，但在政治上则忠于波兰当局。

波兰政府竭尽全力将沃里尼亚隔离在加利西亚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之外。它建立了所谓的“索卡尔[33]边界”（其名得自加利西亚与沃里尼亚边界上的一个小镇）以限制加利西亚乌克兰人组织的活动超出其边界。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也被禁止向沃里尼亚、波利西亚、帕得拉夏或霍尔姆地区派遣代表，因为这些地方的希腊天主教徒从属于波兰罗马天主教会。在索卡尔边界以北，政府禁止普罗斯维塔协会开展活动，也限制来自加利西亚的文学作品的流传。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沃里尼亚发展其网络的活动更是被政府严加禁止。

索卡尔边界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行者之一是亨里克·约瑟夫斯基[34]。他曾担任波兰政府内政部长，并在1928年到1938年间担任沃里尼亚总督。他是波兰人，却出生于基辅，在基辅接受教育，并在西蒙·彼得留拉的乌克兰政府中出任内政部副部长。1921年，约瑟夫斯基成为彼得留拉-毕苏茨基联盟的支持者。作为毕苏茨基的总统办公厅首脑和内政部长，他还主导了波兰-乌克兰融合计划——他认为：只要将沃里尼亚屏蔽于加利西亚的“有害”影响之外，这样的融合就能变成现实。约瑟夫斯基与所谓“好乌克兰人”密切合作——这些人是彼得留拉流亡政府在波兰的代表，也是他在第聂伯乌克兰时的战友——在沃里尼亚培植出一种忠于波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版本。他支持一个独立于莫斯科、归属于华沙都主教区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也在选举中支持那些立场温和的乌克兰政治家，

其中包括彼得留拉的外甥斯捷潘·斯克里普尼克[35]。斯克里普尼克曾担任波兰议会议员，在后来成为一名东正教主教，并将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之后被选为独立于莫斯科的乌克兰东正教会[36]的牧首。

沃里尼亚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反波兰思潮不仅来自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也来自苏维埃乌克兰的那些西乌克兰共产党（CPWU）[37]的追随者。后者人数远多于前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CPWU拥有约1 600名成员，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只有800人。两个群体都向乌克兰农民们兜售一种杂糅了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意识形态产品。到了30年代末期，当局同时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镇压。自然被捕的共产主义者也远比民族主义者为多：警方逮捕了近3 000名共产主义组织的支持者，却只逮捕了约700名民族主义者。尽管苏联在30年代大肆实行政治清洗，在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前夕，沃里尼亚青年们仍然收听苏联广播，并对苏维埃乌克兰充满憧憬。

约瑟夫斯基对苏联的影响进行了反击。他尝试封锁布尔什维克对波苏边境的渗透，并镇压了沃里尼亚亲苏农民的暴动。他还从苏联的乌克兰化政策中得到启发，打算将沃里尼亚变成一个乌克兰的“皮埃蒙特”。约瑟夫斯基支持在沃里尼亚创办乌克兰语学校，这与波兰政府在加利西亚实行的教育政策截然不同。他还推动乌克兰语成为波兰-乌克兰双语学校中的必修课程。随着约瑟夫斯基在1938年辞去总督职务以及1935年毕苏茨基死后波兰官方对少数族群的态度普遍趋于强硬，沃里尼亚的实验终结了。尽管约瑟夫斯基做出了种种努力，他仍然未能阻止民族主义思潮在沃里尼亚的扩散。这个省份在1914年前深受俄罗斯帝国主义潮流影响，约瑟夫斯基对乌克兰语言和身份认同的宽容反而帮助它变成了一座有着强烈反波兰色彩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堡垒。

无论是国内（比如波兰境内的索卡尔边界）还是国际的（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国界为代表）障碍都被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打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罗马尼亚境内乌克兰人的状况即证明了这两个群体无视国际边界的能力。这段时期有近100万乌克兰人生活在罗马尼亚北部的布科维纳、南部的比萨拉比亚[38]和马拉穆列什[39]等地区。与同时期的波兰一样，罗马尼亚对不同的乌克兰人群体也采取了不同政策。

罗马尼亚政府对从前在彼得留拉军中服役的老兵表示欢迎，还允许前俄属乌克兰地区（尤其是比萨拉比亚南部）创办乌克兰语学校。然而针对前奥属乌克兰地区的官方政策就完全不同，因为这些地方的族群动员程度要高得多。在从前属于奥匈帝国的北布科维纳，独裁倾向日趋严重的罗马尼亚当局对乌克兰人文化和政治活动的限制较之波兰政府在加利西亚实施的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实行以牺牲乌克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鼓励罗马

尼亚人到当地定居的农业改革外，当局还对乌克兰人进行大规模的罗马尼亚化，将他们当作忘记了自己母语的罗马尼亚人来对待。罗马尼亚语成为北布科维纳唯一的公务和教育用语，就连东正教的祷文（东正教在本地占统治地位）也被要求使用罗马尼亚语而非教会斯拉夫语。

罗马尼亚当局在乌克兰人中极不受欢迎。他们开始寻找更能代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党。如果说南比萨拉比亚对共产主义宣传的态度更为开放，北布科维纳则成了适合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土壤。北布科维纳最大的乌克兰政党全国民主党竭尽所能地发展各种文化组织，并在议会中维护乌克兰族群的利益。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大部分时候都无法改变政府的决策。这导致立场更为激进的群体的出现，其中就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群体——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于1934年在布科维纳建立了其第一个分支机构。民族主义者们大部分都是学生。他们很快就在比萨拉比亚和马拉穆列什积极活动起来，出版了广受欢迎的报纸《自由报》（*Svoboda*）。在其于1937年被罗马尼亚当局禁止之前，这份报纸的订户数已经达到7 000。这一年，官方的镇压措施让民族主义者们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的地下组织仍然存在。

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早期，在对另一个欧洲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国界的渗透上，共产主义者的成绩比民族主义者更加出色。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让约50万生活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奥匈帝国中匈牙利的一部分）的乌克兰人来不及决定自己是要做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另一个独立的族群罗塞尼亚人。他们与19世纪下半叶的加利西亚罗塞尼亚人面临相同的选择，但他们的选择过程更为漫长，也更为艰难。1919年，这一地区自愿加入了新成立的泛斯拉夫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并从此被称为下喀尔巴阡罗斯（Subcarpathian Rus'）。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度在民族身份问题上保持中立，但逐渐也开始支持发展一种政治中立的罗塞尼亚身份认同。较之奥匈帝国时期企图对当地人口进行“马扎尔化”的布达佩斯当局，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布拉格当局还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停滞不前，在制造业产出方面仅占全国的2%。然而，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政府一样，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把大部分管理职位都交给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不是乌克兰人，并且也在这里推行再定居计划，把许多土地都留给外来的定居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唯一一个不仅在口头尊奉民主价值，也在现实中践行民主价值的国家。在外喀尔巴阡地区问题上，这就意味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由于本地艰难的经济状况、农民手中土地的匮乏，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来越紧张的社会矛盾，从布拉格当局赋予的民主自由上获益最多的是持共产主义立场的激进左翼党派：1924年，共产主义者获得了40%的选票。外喀尔巴阡地区的民族建构者们则陷入了

令人绝望的分裂境地。亲俄、亲乌和罗塞尼亚这三种不同的乌克兰民族身份的支持者们相互竞争，其中最强大的是亲俄派和亲乌派。亲乌的普罗维斯塔协会在这一地区建立了96个阅读室，而亲俄的杜赫诺维奇协会[40]则有192个阅读室。亲俄派把持了东正教会，而亲乌派则渗透到传统上由亲匈牙利群体控制的希腊东正教会。现代乌克兰身份认同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属于后来者，但在20世纪20年代已成为当地最为活跃的政治力量。它将外喀尔巴阡地区与其他乌克兰人地区联系起来，团结到各有特色却又紧密相连的现代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中。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占据着部分乌克兰土地的所有政权里，只有莫斯科的共产党当局允许乌克兰民族事业拥有某种形式上的国家地位，并对乌克兰文化的发展给予支持。共产党的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不仅在苏维埃乌克兰，也在周边拥有大规模乌克兰族群的东欧国家中拥有广泛的吸引力。然而，民族共产主义这种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手段在执行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东欧地区，共产主义乌克兰的支持者需要跨越各种各样的障碍：各国政府的反共和反乌克兰政策、来自寻求与现政权和平共处的主流乌克兰人党派的反对，还有来自崛起中的激进乌克兰民族主义理念的竞争。不过，民族共产主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戏剧性政策变化。这些变化将原本被想象为共产主义“皮埃蒙特”的苏维埃乌克兰变成了共产主义“庞贝”[41]：斯大林主义的火山喷发之时，乌克兰民族建构者们对莫斯科的革命政权曾经抱有的憧憬灰飞烟灭。

---

[1] Ukrain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简称Ukrainian SSR，以区别于苏联（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的简称USSR。

[2] 即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的第四个加盟共和国，存在于1922年至1936年间，后分裂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加盟共和国。

[3] 亦作korenization，俄语为коренизация，意为“本土化”。

[4] 指1923年4月17日至25日举行的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原文作第十三次，疑有误。

[5] 见本书第19章。

[6] Oleksandr Shumsky（1890—1946），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领袖，曾为波罗特巴党左翼领导人。

[7] Vlas Chubar（1891—1939），乌克兰共产主义革命家、苏联政治家、

1932—1933年间乌克兰大饥荒的责任人之一。他在1939年的“大清洗”中被处决。

[8] Lazar Kaganovich（1893—1991），苏联政治家、斯大林的门生。他在1961年因反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而被开除出党。

[9] Mykola Khvyliovy（1893—1933），乌克兰作家、诗人。他在1933年因反对斯大林的乌克兰政策而自杀。

[10] 本段两处引文出自《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54年）第136—138页。

[11] Stanislav Kosior（1889—1939），波兰裔苏联政治家，曾担任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苏联副总理、苏共政治局委员等职务，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他被认为是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12] Grigorii Kerner（1863—?），亦作Hrytsko Kernerenko，乌克兰最早的用乌克兰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之一。

[13] Berdychiv，今乌克兰北部日托米尔州首城市。

[14] Ilia Ilf（1897—1937），苏联犹太作家阿诺尔多维奇·法因兹尔贝格的笔名。

[15] Vasilii Grossman（1905—1964），苏联犹太作家。

[16] Serhii Yefremov（1876—1939），乌克兰政治家、文艺批评家、历史学者。他原姓奥赫里缅科（Okhrimenko），叶夫列莫夫为其笔名。他于1939年死于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

[17] Volodymyr Chekhivsky（1876—1937），乌克兰政治家，曾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和俄罗斯国家杜马成员。他于1937年在狱中被枪决。

[18]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乌克兰三大东正教会之一，由受1917年二月革命和随后乌克兰独立影响而脱离乌克兰正教会的部分人士在1921年成立。

[19] Mykola Skrypnyk（1872—1933），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乌克兰教育委员会主席。他是苏维埃乌克兰时期文化领域乌克兰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1933年7月开枪自杀。

[20] Surzhyk，在乌克兰部分地区及其周边使用的各种乌-俄混合语的统称。

[21] Piedmont，今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大区。皮埃蒙特在18世纪成为撒丁王国（亦称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的一部分，并在后来成为1859年至1861年间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祥地。

[22]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是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立的盟国间组织，由法国外交部长和英国、意大利、日本驻法国大使组成，后被纳入国际联盟。

[23] 指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Stanisław Grabski，1871—1949），波兰经济学家，曾在20世纪20年代两度担任波兰教育部部长。

[24] 原文作“其中大部分人”（most of them），与前述20万人的规模不符，疑有误。

[25] Andrey Sheptytsky（1865—1944），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都主教（1901—1944）。他出身于罗马天主教家庭，但在青年时期加入了希腊礼天主教会。

[26] 指乌克兰全国民主联盟（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1918—1939）最大的乌克兰人政党，存在于1925年至1939年间。

[27] 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奥匈帝国时期至波乌战争时期西乌克兰的主要乌克兰人政党。

[28] Yevhen Konovalets（1891—1938），奥匈帝国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人、乌克兰民族运动领袖之一。他在1938年在鹿特丹被苏联间谍暗杀。

[29] Ukrain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1920年至1929年间活动于波兰东部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抵抗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争取乌克兰独立。

[30]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1929年建立于维也纳、活动于波属西乌克兰地区的右翼乌克兰人政党，在1940年分裂。至今乌克兰仍有许多政党声称是该党的继承者。

[31] Bronisław Pieracki（1895—1934），波兰军人、政治家、内政部长（1931—1934年在任）。

[32] Stepan Bandera（1909—1959），乌克兰政治家，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与纳粹德国关系密切。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克格勃间谍刺杀身亡。

[33] Sokal，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小城。

[34] Henryk Józewski（1892—1981），波兰政治家、艺术家，曾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波兰第二共和国担任职务。

[35] Stepan Skrypnyk（1898—1993），乌克兰东正教会主教。他在1990年

被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牧首推选为第一任基辅及全乌克兰牧首，称姆斯季斯拉夫一世。

[36] 此即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

[37] Communisty Party of Western Ukraine，缩写为CPWU。

[38] Bessarabia，指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之间的三角地带，今分属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39] Maramureș，东欧地理、历史和民族地区，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东北部蒂萨河沿岸，今分属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40] Dukhnovich Society，得名自奥匈帝国卢森（Rusyn）牧师、作家、社会活动家亚历山大·杜赫诺维奇（Alexander Dukhnovich，1803—1865）。杜赫诺维奇被视为卢森民族的启蒙者。

[41] Pompeii，古罗马城市，在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喷发时被摧毁。此处与前文中意大利统一运动发祥地皮埃蒙特相对，代表两种相反的命运。

第21章
斯大林的堡垒

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50岁诞辰，这一天苏联举国庆祝。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接班人们长达10年的斗争终于产生了一名新的最高领袖，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们对这一点都再无怀疑。在通往胜利的岁月中，斯大林将党的总书记这一原本处于次级地位的职务变成了苏联最有权势的角色：他用党的机器接管了政府及其专政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秘密警察的委婉说法）[1]。

此前的和平年代中从未有过这种一切系于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冲动的情况。斯大林的权力和影响力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包括彼得一世在内的所有帝国时代的统治者。尽管将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一切都归于斯大林一人未免有失偏颇——他也经常被动地因应局势，而非主动改变局势——但无疑这一时期苏联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由斯大林及其身边的助手小圈子做出的。这些助手大都服从于斯大林的权威和智慧。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往往变得不再敢对领袖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整个30年代中，对这位领袖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在他们眼中，革命政权正遭到外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国内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认为农民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的围攻，而斯大林是革命政权存续下去的最大希望。

在《真理报》[2]为斯大林诞辰出的特刊中，大量出自斯大林忠诚助手笔下的文章不仅将他誉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还将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组织者和领袖”。第一个名词“社会主义工业化”，指一种苏式的工业革命，即由政府出资、由国家运营、旨在为工业生产带来革命性增长的计划，其中重工业、能源产业和机械制造产业的发展处于优先地位。第二个名词“集体化”，指建立国有集体农庄。国有集体农庄的土地来自革命战争期间及之后分配给农民的小块土地（这一争取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事业的方法在当时取得了成功）。20年代末期，这两项计划齐头并进，实质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新经济政策将国家的管控限制在部分关键产业，并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允许市场经济元素的存在。

在苏联领导层看来，工业化与集体化方案，外加肃反运动（为培训新一代干部以取代旧的管理和官僚阶层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是保证共产主义政权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国际环境中生存的最好办法。这三套方案是布尔什维克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改造为现代工业强国的蓝图中的核心要素。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领导人一直对应该以什么样的步调来实现他们

的设想争论不休。一开始就明确的一点是，他们只能依靠国内的资金来支持工业化，而所谓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唯一国内来源就是农业，换句话说，就是农民阶层。斯大林最初支持的是“自然的”、进化式的工业化，但是他后来改变了立场，坚决主张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

乌克兰是人口第二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虽然只占苏联领土的2%多一点，却拥有全国人口的近20%。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乌克兰的农业产量和潜力让它成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而其东部和南部已有的工业潜力又让它成为合适的投资地区。然而，由于资源完全被中央掌握，乌克兰的领导层不得不靠说服莫斯科来为乌克兰的城市争取投资，而这些资金原本就是从乌克兰的村庄中抽走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中，乌克兰的表现还不错，获得了全国总投资中的约20%，与其人口在整个苏联中所占的比例相称。然而1932年之后，乌克兰开始遭到克扣：资源的分配开始朝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工业化倾斜——这些地区位于苏联更东部，距离危险的波苏边界更远。而大部分分配给乌克兰的资金又都流入离边境更远的东南部传统工业地区。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仍然以农业为主——投入这里的资金基本都花在了红军防线的修筑上。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乌克兰启动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无疑是第聂伯罗赫斯[3]，即位于第聂伯河险滩下端的第聂伯河大坝和水电站。工程地址位于亚历山德里夫斯克[4]。为了纪念当地的哥萨克历史，也为表达对哥萨克神话在革命年代中的重要性的承认，此地在1921年被改名为扎波罗热，意为“险滩下游之地”。扎波罗热原是一座寂静的小城，如今却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水电站成为工业化的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维伊里赫地区主要的能源提供者，其周边建起了各种冶金综合项目。除了生产电力之外，大坝还将增加第聂伯河的水深，淹没了险滩，完全打开了这条河流的航道，从而解决了阻碍本地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第聂伯河水电站成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样板，而扎波罗热的人口也在10年中增加了3倍，从1926年的5.5万人增长到1937年的24.3万人。

与其同时代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相信技术的变革力量。苏联的宣传机构声称第聂伯河水电站是迈向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重要进展，然而位于权力顶层的那些人很清楚，他们不仅需要苏维埃的统治，还需要资本主义式的效率才能达成目标。“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5]斯大林在1924年如此断言。一些美国顾问住在拥有两座网球场和一座高尔夫球场的“美国花园城市”中的新砖房里，向第聂伯河水电站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们提供美国的专业经验。这些美国顾问中为首的是土木工程师休·林肯·库珀[6]上校。他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的多伦多水电站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7]的威尔逊水坝工程上一鸣惊人。库珀是自由企业的支持者，曾在国会面前作

证反对美国政府直接介入各种经济工程。在他为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服务范围进行谈判之前，布尔什维克就向库珀的账户中存入了5万美元。他立刻接受了对方的邀请。

斯大林希望用来与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的“俄国人的革命胆略”让数以万计的乌克兰农民来到了第聂伯河水电站。这些农民并无技能，却迫切地需要养家糊口。大坝和水电站建筑工程雇用的工人从1927年的1.3万人增长到1931年的3.6万人。尽管苏联政府放弃了早期那种所有门类工人报酬相同的政策（顶层管理者的收入达到非技术工人收入的10倍，而技术工人的收入也是后者的3倍），工人流动率仍然高得惊人。农民们要成为工人，除了必须学习技术，还不得不学会遵守上工时间，不得随意休息，还有服从上级命令。这对许多刚刚来到这座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上的新人而言，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仅在1932年，第聂伯河水电站管理局就雇用了9万名工人，同时裁掉了6万人。

1932年5月1日，在长达5年的建设之后，工程师们对水电站的水轮机和发电机进行了第一次测试。这些设备由美国公司制造，其中包括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坞公司[8]和通用电气公司。同年10月，这座全新的工厂正式启动并投入运营。它的原计划投资是5 000万美元，然而竣工时投资已经增长了8倍。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9]亲临现场主持竣工仪式。人们发表讲话，对共产主义大加赞扬。过后不久，库珀上校和其他5名美国顾问都被颁发了劳动红旗勋章[10]，以表彰他们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

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创造了历史。这是乌克兰的工业发展开始以来工人群体第一次主要由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构成——乌克兰人占了约60%，而俄罗斯人只有30%。任何人只要在1932年10月离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到周边的乡村考察一番，就不难发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乌克兰乡村地区即将迎来那场人为造成的饥荒。

20世纪20年代末，乌克兰的村庄开始变得不再宜于村民们居住，与革命前的俄罗斯村庄中发生的情况一样，甚至更加严重。这不是因为土壤的贫瘠或气候的恶劣，而是因为政治氛围的急剧转变。转变让乌克兰的乡村变成了农民的地狱，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去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这样的地方。这是强制集体化政策带来的后果：这种政策在榨干乡村一切可用资源的过程中，将农民赶出了他们的自然栖居地。

1929年秋，在乌共前总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他在前一年被召回莫斯科，负责农业部门）的支持下，苏联开始实施对土地和家庭的集体化，并要求这项政策得到全面执行。这场席卷了整个苏联的运动对粮食产区造成

了最大的冲击，而乌克兰正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数以万计的格别乌官员、党的干部以及普通党员来到乡下，强迫农民们加入集体农庄。这意味着农民必须放弃他们自有的小块土地、马匹和农具。1930年3月的官方报告显示全部可耕地中已有70%实现了集体化，比前一年增长了10倍还多——那时只有不到6%的土地属于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大部分农民在胁迫之下加入集体农庄，然而仍有许多人反抗。到了1930年春天，乌克兰乡村地区已被农民暴动的浪潮吞没。仅在1930年3月，官方就记录了超过1 700次农民暴动和抗议。骚乱者杀死了几十名苏维埃政府官员和积极分子，并攻击了更多的人。在乌克兰邻近波兰边境的地区，整村整村的人暴动起来，朝边境进发，逃离集体化政策的高压。

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地区的农民们暴动起来，而农村的动荡浪潮还在向苏联其他地区蔓延。政府开始出动军队和秘密警察对付骚乱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富裕农民阶层——这些农民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动力，往往成为反对农民财产强制集体化的抗议领袖。当局不仅将反抗领袖逮捕起来送进监狱，还将所有被定性为“库尔库勒”（俄语为“库拉克”）[11]——这个词原指富裕的农民，后来其意义扩展到包括农村人口中所有不属于最贫困阶层的人——驱离乌克兰，强迫他们到别的地方定居。1930年，有多达7.5万个家庭被指控为“库尔库勒”，从而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乌克兰，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政府将许多人送上火车，送往遥远的森林地区，并任由他们在那里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然而农村的反抗浪潮太过巨大，仅凭镇压无法消弭。当局决定在战术上退却。1930年3月，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强制集体化归咎于地方官员的过度狂热。文章的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可谓意味深长。党内积极分子们将这篇文章解读为党发出了停止集体化的命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半数此前被集体化的土地回到了离开集体农庄的农民手中。然而退却仅仅是暂时的。到了1930年秋天，强制集体化运动再度启动。这一次农民们大部分选择了消极形式的抵抗，包括拒绝栽种超出生存所需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宰杀家畜以防止它们被国家征收，以及逃离村庄。许多逃离者去往扎波罗热等工业中心，在那里加入新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面对这种新形式的农民抗争，当局拒绝承认失败，转而指责农民故意破坏，称他们企图让城市陷入饥饿，进而损害工业化进程。当局宣布农民们私藏谷物，并提高了对农民的征粮额，无论他们是参与了集体化还是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对莫斯科的经济计划而言至关重要，因而受到当局特别的严苛对待。到了1932年中，70%的乌克兰家庭已经被集体化，而同期全苏联的集体化程度只有60%。这个加盟共和国的谷物产量占苏联全国总量的27%，却被要求上缴占全国总量38%的粮食。新政策对乌克兰林草混交带人口最稠密的农业地区造成了打击。饥荒在1932年冬季和第二年春

季来到乌克兰，大量人口食不果腹。

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陷入了饥荒。1932年仅在基辅地区就有超过8万人饿死。位于基辅西南面的城市比拉采尔科瓦和乌曼[12]周边的甜菜产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乌克兰政府首脑弗拉斯·丘巴尔在1932年6月承认：过度的征收让农民们没有粮食可以充饥，正是饥荒发生的原因。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鉴于粮食征收计划在整体上无法完成——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乌克兰全国的产量减少，而在收割时又有巨大的损失（这是集体农庄低下的经济组织水平以及来自中央和地区的管理严重不足造成的）——我们采取了一套方案，征收个体农民生产的所有谷物——包括他们储备的种子在内，并对集体农庄的几乎全部产出实施征收。"

按照丘巴尔的说法，在饥荒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未参加集体化的个体农民。由于无法缴足征粮份额，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排在次位的则是家庭人口众多的集体农庄成员。到了1932年3月和4月，数以百计的村庄中有成千上万人忍饥挨饿，垂死挣扎。1932年5月，一名来自基辅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在乌曼地区随机挑选了7个村庄。仅在当月，这些村庄就登记了216起饿死人的事件，还有686人被认为将很快死去。这位党员干部写信到哈尔基夫（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向他的上级们报告说："已有近百人死亡。每天的死亡人数为8至12人。总计600个家庭里，有100个出现了浮肿现象。"丘巴尔请求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饥荒援助。但斯大林拒绝承认饥荒的真实性，甚至禁止官方文告中使用"饥荒"这个词。

对其政策的失败，斯大林不仅归咎于农民对集体化和粮食征收额度的抵制，也归咎于乌克兰党员干部群体的暗中违抗。

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无疑是在担忧其政权的未来命运。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军队在1920年春天对基辅发起的突然进攻。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在那次进攻中加入了约瑟夫·毕苏茨基和西蒙·彼得留拉的进攻部队。斯大林担心1920年的事件会以更大的规模重现。20世纪30年代初，乌克兰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接近50万，其中60%都是乌克兰裔——这一点要感谢乌克兰化政策。如果毕苏茨基再度来犯，这些干部还会对斯大林保持忠诚吗？斯大林对这一点表示严重怀疑。1932年7月，苏联与同一个毕苏茨基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确保接下来的3年中不会遭到来自西面的进攻。在斯大林看来，对乌克兰的粮食进行征收，让那些抵制集体化的农民得到教训，对那些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的人控制的乌共机关进行清洗，从而"确保不失去乌克兰"，现在正是时候。

斯大林在1932年8月写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包括了一份关于如何防止"失去"乌克兰的详尽计划。他建议用新的干部来替换时任的乌共和乌克兰政

府领导人，以及乌克兰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我们应该把目标定为将乌克兰变成一座真正的苏联堡垒，一个真正的模范共和国。”他写道。11月，斯大林向乌克兰派出一名全权代表，接管了那里的秘密警察机关。12月，他把一个讨论粮食征收的政治局会议改成了抨击乌共领导集体的会场，批评他们不仅没能完成征粮份额，还歪曲党的乌克兰化路线。“中央委员会和人民代表苏维埃注意到，”在斯大林授意下出台的会议决议称，“在乌克兰的许多地区，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相反，乌克兰化政策只是被机械地实施，没有考虑到每个地区的具体特点，没有对乌克兰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进行仔细挑选。这使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敌人轻易地取得合法伪装，建立起他们的反革命分支和组织。”

这份政治局决议宣告了乌克兰人定居的北高加索地区和远东地区乌克兰化运动的终结，也成为对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化政策及其执行干部进行批判的基础。它导致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免职或逮捕。乌克兰负责教育的人民委员、全国乌克兰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也因此自杀。斯大林指责国内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乌克兰农民破坏党的政策，私藏粮食，从而损害工业化运动的罪魁。对乌克兰农民的攻击与对乌克兰文化的攻击双管齐下。当苏共政治局发布这份关于粮食征收和乌克兰化的决议时，饥荒现象刚刚开始在乌克兰出现。饥荒不仅源于当时对待乌克兰农民和党机关的错误政策，也是源于民族政策调整的结果——这一调整在农民对粮食征收的抵制与民族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

1932年12月，斯大林派遣卡冈诺维奇和苏联政府首脑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13]前往乌克兰，确保完成那份不现实的征粮计划。在来自莫斯科的全权代表的领导下和格别乌的威胁下，乌共干部从正忍饥挨饿甚至濒临死亡的农民手中夺走了他们能夺走的一切。当局通过切断基本生活物资——诸如火柴和煤油——来惩罚那些无法完成征粮份额的村庄。遭到没收的不光是粮食，还有家畜，以及一切可以被当作食物的东西。新饥荒造成的第一批人员死亡在1932年12月发生。到了1933年3月，饥饿导致死亡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现象。乌共的领导们如梦初醒，向哈尔基夫和莫斯科发出了雪片一样的援助请求。援助物资到来了，然而数量不足，也来得太晚，无法挽救数百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饿农民。大部分牺牲者死于当年春末和夏初，也就是食物供应完全断绝的时候。很多人的死亡原因是吃野草和未成熟的蔬菜——经历了几个月的饥饿之后，他们的胃无法消化这些粗粝的食物。

受灾最严重的是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稀树草原地区。这两个地区在此前的春天已经遭遇了饥荒，农民们身体过于虚弱，无法正常播种，又几乎没有任何物资，因此成为第一批饿死的人。截至1933年年底，基辅州和哈尔

基夫州的人口已经分别减少了近100万人。而乌克兰草原上的主要产粮州敖德萨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则各自损失了超过30万人。受影响较小的顿巴斯工业地区在1933年也有17.5万人饿死。干草原地区由于没有在前一年遭遇饥荒，损失较稀树草原地区为小。即使情况真的变得过于糟糕，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可以前往扎波罗热、克里维伊里赫和顿巴斯地区的建筑工地避难。此外，在1933年春，莫斯科当局向乌克兰南部提供救援粮的意愿也比对中部地区大得多：莫斯科需要更多的粮食，而让主要产粮区的居民能够活下来收割作物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办法。至于其他人，则可以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这一点也变成了现实。最终，在乌克兰总计有近4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从1932年到1934年，每8个人中就有1个饿死。

饥荒让苏维埃乌克兰变得面目全非。苏联政府从乌克兰的党和政府机关中清洗了那些不愿站到自己同胞对立面的干部，从而成功地把乌克兰保留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在总计500多个地方党委书记中，有超过一半人在1933年上半年被撤职，其中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流放。剩下的人则会无条件服从。这些人才是苏联政府希望——至少是暂时希望——留下的干部。有幸在饥荒中活下来的农民都得到了教训：只有加入集体农庄才有活路，因为集体农庄缴纳的税赋更低，也是仅有的在1933年春天得到政府救助的农庄。对绝大部分家庭和土地的集体化如今都已完成，并极大地改变了乌克兰乡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

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称之为“霍洛多摩尔”[14]）是不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针对乌克兰及其人民的种族灭绝？2006年11月，乌克兰议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部分其他国家的议会和政府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然而俄罗斯政府却发起了一场国际行动，抨击乌克兰的主张。围绕乌克兰大饥荒性质产生的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论延续至今，其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对“种族灭绝”的定义。然而在对1932—1933年饥荒部分关键事实及其解读方面，一种广泛的共识正在形成。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这场饥荒的确是由官方政策导致的人为现象。尽管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饥荒，但只有乌克兰的饥荒是由明显具有民族色彩的政策所导致。饥荒发生于斯大林决定终止乌克兰化政策之后，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干部遭到的打击同步发生。这场饥荒给乌克兰社会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让它在未来数代人的时间里都失去了公开抵抗苏联当局的能力。

斯大林将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模范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乌克兰首都从哈尔基夫迁回基辅，此时基辅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清洗的沉重打击，已经不再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这次迁都标志着乌克兰从一个自治的、经常有自己想法的共和国向一个单纯苏联省份的转型最终得以完成。

正如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所期待的那样，乌克兰成了苏维埃工业化和集体化

的范本。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乌克兰的工业产量较之1913年已经增长了8倍。这一成就仅比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略微逊色。农业部门的集体化已经完成。98%的农村家庭和99.9%的可耕地成了集体财产。问题在于，完美无瑕的集体化数据掩盖了农业部门令人失望的成绩。1940年，乌克兰的粮食产量为2 640万吨，仅比1913年多出330万吨，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还不到13%。受到大饥荒和集体化摧残的乡村地区无法跟上工业城市高速成长的步伐。尽管乌克兰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却为这一“跃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926年到1937年，苏维埃乌克兰的人口从2 900万下降到2 650万，在1939年才回升到2 800万多一点。

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许多乌克兰人都死于“大清洗”。“大清洗”指1936年至1940年间席卷了整个苏联的多次逮捕、处决和流放浪潮，其中尤以1937年为甚。从1937年到1938年，乌克兰有27万人遭到逮捕，其中近半数被处决。“大清洗”与斯大林在30年代的其他许多政策有着相同的目标——确保苏维埃政权的延续、确保斯大林的最高领袖地位。斯大林那些仍然在世的前盟友和前敌人都遭到处决，其中包括列夫·加米涅夫[15]、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16]和尼古拉·布哈林[17]。在大饥荒期间向斯大林展示了忠诚的乌克兰党、政府和秘密警察等机关领导人同样难逃厄运。当局需要的是温顺且对之前的失误一无所知，从而能效忠领袖的新干部。除乌共干部群体之外，遭受打击最重的是非布尔什维克党派的前成员们和少数民族群体。乌克兰是一个位于边境地区的共和国，拥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当局无法信任这些族群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因此乌克兰再一次成为严苛审查的对象。波兰裔和德裔族群排在敌人名单的前两位。在遭到逮捕的人中，近20%是波兰裔，而德裔则占约10%。这两个族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1.5%，却被苏联当局当作为其当时主要敌人（波兰和德国）服务的潜在间谍和“第五纵队”。

1938年，斯大林认为一场战争即将到来，将他的新干将尼基塔·赫鲁晓夫派往乌克兰执行最后的镇压措施，以让这个共和国为战争做好准备。赫鲁晓夫的任务与他的前任们一样——将乌克兰变成一座社会主义的堡垒。“同志们，”赫鲁晓夫在1938年6月乌共党代会上宣布，“我们将不遗余力，确保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们的任务和指示——将乌克兰变成一座敌人无法攻破的堡垒——得以光荣完成。”接下来的几年中，这座乌克兰要塞的强度将受到考验。

1938年10月，已经残缺的捷克斯洛伐克（当时这个国家正遭到希特勒的宰割）政府任命乌克兰活动家、主教奥古斯丁·沃罗申[18]为自治的外喀尔巴阡地区政府首脑。外喀尔巴阡地区即从前的下喀尔巴阡罗斯，如今被改名为喀尔巴阡-乌克兰。在将外喀尔巴阡地区中匈牙利人聚居部分（连同这一地区的两大城市中心乌日霍罗德[19]和穆卡切乌[20]）转交给匈牙利之

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做出了这一任命决定。新的外喀尔巴阡地区政府取代了一个短命的亲苏派政府，将乌克兰语定为其官方语言。这个政府还创建了自己的准军事部队，以抵抗来自匈牙利和波兰的民兵进攻。这些部队被称为喀尔巴阡锡奇，其名来自加利西亚的“锡奇步枪队”和第聂伯乌克兰的锡奇哥萨克人。其成员多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年轻人。他们来自波兰，为创建一个乌克兰人国家的事业而战斗。

1939年年初，欧洲各国外交部中泛起传言，称希特勒打算将喀尔巴阡-乌克兰当作进攻苏维埃乌克兰的跳板，进而将所有乌克兰人聚居地区“重新统一”起来。当年1月，希特勒向来访的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21]表示他将进攻苏联，将从苏联夺得的乌克兰领土用来交换但泽[22]和连接波兰与波罗的海的走廊地带。贝克拒绝了这一提议。希特勒无视贝克的立场，决定至少暂时不对斯大林使用乌克兰这张牌。1939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布拉格，终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他决定不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人国家，而是把外喀尔巴阡地区送给他的盟友匈牙利。这一决定让外喀尔巴阡地区的自治政府陷入了震惊和失望。

3月15日，也就是希特勒的军队进入布拉格的那一天，喀尔巴阡-乌克兰议会宣布独立。这个新国家选择蓝色和黄色作为国旗的颜色，并将《乌克兰还没有灭亡》定为国歌。然而独立宣言没能阻挡匈牙利军队的步伐。匈牙利人在进入这一地区时没有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抵抗。唯一与他们作战的是喀尔巴阡锡奇部队。“800万捷克人向德国屈服，没有丝毫抵抗，然而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却站了出来，与数千名匈牙利士兵作战。”当时的一名乌克兰记者写道。喀尔巴阡锡奇总共拥有约2 000名战士。双方差距悬殊，乌克兰人的抵抗力量很快就被击溃。沃罗申主教的政府逃离了这个国家。许多活下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在返回加利西亚的途中被匈牙利部队或波兰边防军抓获。这是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战士经历的第一场战火洗礼，更多的战斗即将到来。

斯大林对外喀尔巴阡地区的局势变化感到十分焦虑，以致在1939年3月于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党代会上嘲讽了关于德国人支持乌克兰独立的看法。大片的乌克兰人地区处于苏联之外，可能会被希特勒用于挑战斯大林对苏维埃乌克兰的控制权，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的“堡垒建设者”们考虑的主要问题。他们的防御性壁垒上似乎出现了一道裂缝——来自乌克兰民族统一主义的威胁。

---

[1] Chief Political Directorate，此处应指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俄语Объединё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НК СССР，缩写为ОГПУ，拉丁字母转写为OGPU），它于1923年11月15日由国家政

治保卫局（GPU，音译“格别乌”）改组而来。是苏联在1923年至1934年的秘密警察机构。后文中的“格别乌”均指OGPU。

[2] Pravda，苏共党报。

[3] Dniprohes，乌克兰语作ДніпроГЕС，是第聂伯河上最大的水电站，位于今乌克兰东部扎波罗热州。

[4] Oleksandrivsk，即今乌克兰东部扎波罗热州首府扎波罗热（Zaporizhia）。

[5]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46年），第164—165页。

[6] Hugh Lincoln Cooper（1865—1937），美国军人，著名的土木工程师。

[7]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成立于1933年5月，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中专门负责解决田纳西河谷问题的机构。

[8] 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and Drydock Company（NNS & DD），美国规模最大的私人造船厂，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创办于1886年。

[9] Mikhail Kalinin（1875—1946），苏联政治家、革命家。从1919年3月开始直至1946年去世，他一直担任苏俄和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10] Order of the Red Banner of Labor，设立于1920年，授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杰出的个人和劳动者班组，等级相当于军事上的红旗勋章。

[11] Kurkul’，乌克兰语куркуль的拉丁字母转写。俄语为кулáк，拉丁字母转写作kulak。

[12] Uman，乌克兰中部切尔卡瑟州城市。

[13] Viacheslav Molotov（1890—1986），苏联政治家，曾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1941年在任）和外交部长（1939—1949、1953—1956年在任）。

[14] Holodomor，乌克兰语作Голодомóр，意为“饥荒”。

[15] Lev Kamenev（1883—1936），苏联政治家、革命家，苏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他在1926年被打倒并被逐出党中央，在1936年被枪决。

[16] Georgii Zinoviev（1883—1936），苏联政治家、革命家，苏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他与加米涅夫一样在1926年被逐出党中央，并在1936年遭枪决。

[17] Nikolai Bukharin（1888—1938），苏联政治理论家、革命家、经济学

家，苏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他在1926年协助斯大林打倒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9年被逐出中央政治局，在1938年被捕并被执行枪决。

[18] Avgustyn Voloshyn（1874—1945），乌克兰政治家、作家、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主教。他担任了仅存在一天（1939年3月15日）的喀尔巴阡-乌克兰国总统。

[19] Uzhhorod，今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阡州首府。

[20] Mukacheve，今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阡州城市。

[21] Józef Beck（1894—1944），波兰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毕苏茨基的亲信。

[22] 指1920—1939年间的半独立的但泽自由市，受国际联盟保护，但与波兰结成关税同盟。

第22章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

在其作品《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中，希特勒描述了他对世界未来的设想。这本书写于巴伐利亚的兰茨贝格[1]监狱，当时希特勒因为参与了1923年11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2]，正在该地服刑。在囚室中，这个前哈布斯堡帝国子民发誓要对抗所谓犹太人主宰世界的阴谋，并提出建立一个能为雅利安种族在东欧提供“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他的纳粹党也掌握了大权，这让他拥有了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希特勒于1923年首次提出的理念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就这些理念所造成的毁灭性冲击和悲剧性后果而论，很少有地方能与乌克兰比肩——希特勒心目中“生存空间”的中心正是乌克兰。

德国人的“生存空间”理念并非希特勒首创。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成型，设想了德国在全球各地攫取领土的前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令其突破英国控制的海路进行殖民扩张的计划变得不可能，于是希特勒发现：只有东欧还有扩张的空间。“在欧洲通过军事斗争来扩大领土，比在海外发动战争夺取地盘要更加现实。”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3]承认了处于德奥军队占领下的乌克兰从俄国独立出来，为德国向东扩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然而希特勒对东方的民族建构毫无兴趣。他的目标不在于此，而是打算消灭远至伏尔加河的所有现存人口，将东欧（尤其是乌克兰）的肥沃土地变成德国定居者的家园。“健康的农民阶级是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我们亟须采取足以维持这样一个阶级存在的政策。这种需求太过重要，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们社会中现存的许多罪恶完全源于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的比例失调。”

希特勒心目中的德国人农业乌托邦不仅需要攫取更多的土地，还需要对新的领土进行去城市化和去人口化。他对东欧的设想与由布尔什维克们引入、由约瑟夫·斯大林推行的计划完全不同。两名集权者都打算使用暴力手段来建设他们的乌托邦，也都需要乌克兰的国土、沃野和农业来达成目标，然而他们对待城市和当地人口的态度则相去甚远。在1941年到1944年被纳粹德国占领的3年中，乌克兰将会从现实中认识到这种差异，并对两个强权之间的不同程度做出评估。在1914年之前，乌克兰享有“欧洲的面包篮”的美誉，同时也是欧洲犹太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因此，它将成为德国扩张主义的首要目标，也将跻身于纳粹德国的主要受害者之列。从1939年到1945年，乌克兰将损失近700万公民（其中近100万是犹

太人）。这个数量比其战前人口的16%还要多。只有白俄罗斯和波兰（希特勒的“生存空间”中的另外两个国家）的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乌克兰。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想了与英国结盟击败法国、与俄国立约摧毁波兰的前景。在这份蓝图中，最终俄国（或者说苏联）将向希特勒提供他想要的东西：定居所需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土地和资源将让德国变成一个大陆帝国，而英国海军将无法动摇帝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与英国的联盟从未变成现实，然而在1939年秋天，希特勒的确与苏联达成了协议，并摧毁了波兰。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此时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经基于不到10天前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4]就瓜分波兰领土达成了一致。斯大林延迟了苏联参战的时间，因为他担忧英国和法国的反应，同时也受到正在蒙古上演的苏日冲突困扰。德国外交官们打出了乌克兰这张牌，以促使苏联早日进攻波兰。他们宣称，如果苏联继续拖延对波兰的入侵，德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在约定划归苏联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国家，而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出现一个由德国撑腰的乌克兰人国家是斯大林最不愿意在这一地区看到的事。斯大林最终派遣军队越过了波兰边界。他的军队所打的旗号是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们提供保护。

1939年10月初，遭到两大强邻夹击的波兰军队已经不复存在。苏联俘虏了大部分波兰普通士兵，随后又将他们释放。然而波兰军官们则遭遇了不同的命运。苏联将近1.5万名波兰军官被扣押在三个羁留营中，其中一个在乌克兰，另两个在俄罗斯。1940年春天，这些被俘军官中的大部分人会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Katyn Forest）和其他屠杀地点被杀害。然而，最初很少有人猜到苏联人的意图，那些非波兰族群尤其如此。苏联红军在机械化程度上无法与德军相比，却展示出远远高于波兰军队的装备水平。他们拥有新式坦克、飞机和现代化的枪械，这些都是斯大林的工业化努力的成果。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苏军官兵多半着装粗劣不堪，伙食也相当糟糕，以致波兰商店中相对丰裕的食品和货物就让他们大吃一惊。当地人发现苏联军官都受到意识形态的灌输，没有什么修养，也没什么头脑。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们都会反复讲述红军军官的妻子们把睡衣当成晚礼服，穿着它们上剧院的传说。然而前波兰国家的非波兰裔族群却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群武装精良的土包子“解放者”——只要后者承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这些“解放者”一度似乎也真的会这样做。

红军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夺取了利维夫和其他重镇之后，就开始在当地举行苏维埃式的选举，组成了西乌克兰国民大会。大会旋即请求基辅和莫斯科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并入苏维埃乌克兰。新获任命的乌克兰共产党

第一把手尼基塔·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包括布列斯特城在内的北波利西亚也应划归乌克兰，然而斯大林决定将这片土地交给白俄罗斯共和国。新政权允许当地乌克兰人和犹太人进入政府机关，担任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在波兰人统治时期他们无法获得的职位。他们对待本地犹太人还算得上友善，但往往拒绝那些被德国人逐出波兰的犹太人进入边境。当局发动了一场全面的乌克兰化运动，要求那些使用波兰语的大学、学校、剧院和出版社都改用乌克兰语。他们还将大地主的地产收归国有，分配给贫苦农民。各个共产主义和左翼党派组织的成员本就有浓厚的亲苏倾向，如今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

然而苏维埃政权与当地乌克兰人之间的蜜月关系没能持续多久。在前波兰共和国，有组织的宗教是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制度基础，然而苏维埃政权对其从无好感。它没收了希腊礼天主教会的地产，并试图限制传统教会（包括东正教会和希腊礼天主教会在内）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苏维埃当局对待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前领导人和普通成员的态度更加令人震惊：这些人往往被怀疑为民族主义者，并最终成为苏维埃秘密警察关注的对象。同样的怀疑很快就落到了那些在本地政府和教育机构中升至高位的乌克兰干部头上。

占领当局在1940年对当地人群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驱逐的目的地包括极北地区、西伯利亚和中亚。在当局的“人民之敌”名单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来到这里的前波兰政府和警察机构官员、波兰政党党员和武装定居者占据了前列。1940年2月，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5]执行了对第一批近14万波兰人的大规模驱逐行动。近5 000名被流放者在途中死于寒冷、疾病和营养不良，没能抵达他们的流放地。从1939年秋天开始，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为止，苏联秘密警察将总共近125万人驱逐出了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展开搜捕。包括斯捷潘·班德拉在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们逃往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斯大林将这些人视为对其政权明显而紧迫的威胁。

1940年5月，巴黎落入了德军之手，令斯大林大为吃惊。他开始认为希特勒会很快将矛头转向东方，对苏联展开进攻。苏联当局必须将对其新获领土的控制变得更加稳固，消灭那些潜在的“第五纵队分子”。他同时决定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划给他的东欧势力范围进行全面占领。这些地区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也包括了含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在内的罗马尼亚部分地区。1940年8月，这位苏联领导人将有大量乌克兰人定居的南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入了苏联。与其早些时候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实施的政策一样，苏联当局在这些地区实行土地国有化，提拔非罗马尼亚裔的干部，并对各种机关进行乌克兰化。逮捕和放逐接踵而至。

斯大林开始防范来自希特勒的攻击。他认为进攻会在1942年发生，然而德国人的行动比他的预计早了一年，令这位苏联领导人措手不及。希特勒急需苏联的资源，包括乌克兰的小麦和煤炭。在他与英国作战时，这样的需要变得愈发紧迫。英国已经成为不列颠群岛上的困兽，但它的身后是更大的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德意志帝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入侵苏联无法解决德国的任何问题，只会让德国经济流血，然而希特勒不顾他们的劝阻，悍然对苏联发动了进攻。此外，德国军方高层更倾向于与苏联而不是与西方作战，希特勒乐得满足他们的愿望。

1940年12月，希特勒签署了准备向苏联开战的直接指令。行动代号是“巴巴罗萨”[6]，其名得自那位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12世纪日耳曼人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最后淹死在一条河里，因为他身穿重甲，却选择涉水过河，而不是跟他的部下一样使用桥梁。这无疑是一个不好的兆头，然而此时“巴巴罗萨计划”的知情者们并不在意历史上的先例。与在他之前的巴巴罗萨一样，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走一条捷径，并不惮于承担风险。计划制定者们的目标是在一场不超过3个月的战役中击败苏联人，将他们驱赶到伏尔加河以东。希特勒希望他的军队首先夺取列宁格勒，随后拿下顿巴斯的煤矿，最后再攻下莫斯科。德国国防军在没有为士兵们配备冬衣的情况下就把他们送往前线。这个策略最终被证明是个错误，不过它在短时间内起到了误导斯大林的效果——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人在没有做好冬季战役准备时就发动进攻，因此在德国人入侵时毫无防备。

1941年6月22日凌晨，入侵行动在北至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战线上展开。德国及其盟友（包括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投入了380万兵力。德国南方集团军的攻击目标是乌克兰。他们从波兰境内的驻地出发，沿着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和普里皮亚季沼泽之间的古道进军。罗马尼亚人则在更南方发动攻势，他们进入乌克兰的路线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南麓和黑海之间。5世纪的匈人和13世纪的蒙古人都曾通过这些路线入侵中欧，此时的入侵者则反向而行。他们脚下仍是那些未经铺设的道路，但这次扬起烟尘的不再是骑兵，而是机械化部队。德国人在苏联前线上集中了约4 000辆坦克、超过7 000门火炮，空中则有4 000多架飞机执行掩护任务。制空权几乎全在德国人手中，因为大部分苏联战机还未能起飞，就被突袭的德国空军炸毁。

红军在苏联西部边界上的兵力人数大致与德国相当，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数量则比德国人多出不少。然而苏联人的装备在先进程度上与德军的新式装备无法相比。此外，率领苏军加入战斗的军官们也缺乏经验（他们刚刚取代了那些被斯大林清洗掉的富有经验的指挥官），以致出现了指挥官遗弃自己的部队的情况。士兵们也士气不振——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饥荒和集体化运动中劫后余生的农民。德国人利用突袭优势，以惊人的速度攻占

苏联领土，给后撤中的苏联部队造成巨大伤亡，这让苏军的士气每一天都变得更加低落。苏联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后获得的新领土曾被斯大林视为他的胜利，如今却被证明是个陷阱。在德军入侵之前一个月，斯大林为保卫新的国界，已经将自己的军队调拨到此前10年内修筑的防线以西。现在苏军不得不保卫一条根本来不及设防的边界。与闪电战战术制定者们所设想的一样，德军的装甲部队撕破了苏联人的防线，将苏联红军团团包围，并在红军后方大肆破坏。

红军指挥官们在西乌克兰的卢茨克、布罗德[7]和里夫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攻，将他们全部的坦克编队送上了战场，却被一支小得多的德国国防军坦克部队以策略击败。此后局势每况愈下。德国国防军在三个星期之内向东挺进了300至600千米。苏军不仅将他们刚刚占领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拱手相送，还丢掉了右岸乌克兰的大片土地。苏军的2 500多辆坦克和近2 000架飞机在战斗中被摧毁。人员伤亡则难以估计。8月，德军部队在波多里亚城市乌曼附近包围并俘虏了超过10万名红军战士。然而，下一个月在基辅附近德国人又取得了他们的最大胜利。考虑到基辅重要的象征意义，斯大林不顾包括总参谋长格奥尔基·朱可夫[8]在内的红军将领们的建议，拒绝从基辅地区撤军，因而导致了也许是整个战争期间苏联所遭遇的最大军事失败。

红军部队的指挥官是出生于切尔尼戈夫地区的米哈伊洛·基尔波诺斯[9]将军。红军面对德国的机械化部队，虽然竭力抵抗，却无能为力。1941年9月19日，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第二天，基尔波诺斯将军在洛赫维察[10]附近阵亡。在基辅包围圈中，德国国防军围困并俘虏了超过66万名红军战士。10月，同样的命运降临到南乌克兰梅利托波尔[11]和别尔迪扬斯克[12]之间的10万名红军头上。另外10万人于11月在克里米亚的刻赤附近投降。截至当年年底，红军已经被迫放弃了几乎整个乌克兰，超过350万名官兵成为战俘。撤退中的苏军采取了焦土战术，从他们即将离开的地区带走工业设备、牲畜、给养和人口，总计将约550座大型工厂和350万名熟练工人带往东方。

在1941年夏天，许多乌克兰居民欢迎德国人的到来，盼望就此终结苏联占领当局在战前岁月中实施的高压政策。不仅新近被苏联控制的西乌克兰地区如此，就连中乌克兰和东乌克兰也是一样——那里的人们从未原谅饥荒和集体化造成的恐慌。一些人期待“民族社会主义”可以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则只希望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由于人们从苏联政府领到的薪水连买双鞋都不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会怀有错误的期待，会想象“从欧洲来的”德国人将会改善他们从莫斯科的掌控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的生活。许多人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奥地利人，也记得1918年德国人对乌克兰的占领——跟斯大林的高压政策相比，当时的德国人算得上

是相当温和。一些人将德国人的再次到来视为恢复乌克兰国家的前奏——正如统领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统治时期那样。不论他们出于何种原因相信德国的占领会带来更好的生活，怀着这种期望等待德国人到来的人们很快就被证明犯了错误，而且往往是致命的错误。

担任德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3]。他是一名波罗的海德意志人[14]，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多个地方接受过教育，是德国关于乌克兰的计划的始作俑者。他打算支持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苏联民族对独立国家地位的追求，以打击苏联。在他的设想中，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乌克兰政治体可以和波罗的海联邦、白俄罗斯和芬兰一样，成为第三帝国的傀儡。事实上，罗森贝格手下的专家甚至鼓吹将乌克兰领土拓展到伏尔加河。然而罗森贝格在这场政治角力中输给了德国安全部队首脑和后来的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15]、国会议长和航空部长赫尔曼·戈林[16]，以及其他急于实施他们的种族理念，急于从新征服领土上榨取最后一点经济资源的纳粹领袖们。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关于由德国控制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诸国的设想在1941年夏天被另一种模式取代。这种模式植根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其特点是殖民肢解和殖民剥削。

德国人将他们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分割为三个部分：加利西亚被并入曾经的西加利西亚和华沙地区，组成一个被称为“总督府”[17]的行政区；从西北部的沃里尼亚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之间的大部分乌克兰地区加上平斯克[18]和霍梅尔[19]周边的白俄罗斯南部地区组成了乌克兰总督辖区[20]；而在东乌克兰，从北方的切尔尼戈夫到南方的卢甘斯克和斯大林城（Stalino，即尤兹夫卡，也就是后来的顿涅茨克）仍属于军事管理区，因为这里过于靠近前线，无法设立民事管理机构。德国人对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进行了分割，并将沃里尼亚并入第聂伯乌克兰，这反映出德国人对这一地区的观念仍基于18世纪晚期建立起来的那条俄国-奥匈帝国边界。这样的划分并非那些先前深受苏联之苦的乌克兰人的唯一失望之处。他们很快就会发现：1941年的德国人和1918年的德国人没有丝毫共同点。

第一批在纳粹统治下尝到失望滋味的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们。1940年，就在其最激进的领袖之一斯捷潘·班德拉于1939年9月大摇大摆走出波兰监狱之后不久，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发生了分裂。班德拉掀起了一场反对老派组织骨干的运动，很快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最大派别和最激进成员群体的领袖。1941年2月，他的组织与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21]）达成协议，在支持者中组建起两支特别行动队。其中一支代号为“夜莺”（Nachtigall），是在当年6月29日首批进入利维夫城的德军部队之一。第二天，“夜莺”参加了班德拉派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举行的宣告乌克兰独立的活动，这为德国人与班德拉支持者之间的合作画上了句

号。对乌克兰有完全不同计划的德国人开始清算这些前盟友，逮捕了包括班德拉本人在内的数十名班德拉派成员，并要求班德拉谴责独立宣言。班德拉拒绝了，随后被送往萨克森豪森[22]集中营。班德拉在那里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两名兄弟同样被逮捕，并死于奥斯威辛[23]集中营。

一夜之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班德拉派从德国人的忠诚盟友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以安德里·梅尔尼克[24]上校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温和派试图利用德国人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向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派出自己的远征队，在那里建立组织网络，对占领当局对乌克兰骨干分子的选拔施加影响，并在当地人群中进行教育和宣传活动。1941年年底，随着德国占领当局对乌克兰总督辖区的控制愈加严密，这一派的活动也戛然而止。纳粹警察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镇枪杀了数百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到了1942年年初，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两个派别都陷入了与德国人的冲突之中。

对于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居民而言，纳粹对待苏联战俘的做法则释放出另一个信号，再度证明1941年的德国人与1918年的德国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如果说1918年的德国人仅仅是占领者，1941年的德国人则是不把被征服者当人看的殖民者。

战前，斯大林曾拒绝签署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25]：这份公约对如何对待战俘做出了规定，然而苏联是一支革命力量，不愿遵守资本主义者制定的行为规范。他在1941年夏天改变了主意，然而为时已晚。德国人不同意向苏联战俘提供他们给予西方战俘的待遇。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还有几分尊重，承认对方的军阶，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也提供定量的食物和衣物，却拒绝给予苏联战俘任何上述优待。此外，并不是每个愿意投降的人都能活命——许多人被直接枪杀。1941年6月6日，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两个多星期，德军总部已经下令各部对俘获的红军政委、政治军官、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和犹太人执行当场枪决。不能证明自己的割礼与犹太教无关的穆斯林往往因此送命，而被俘红军指挥官遭到处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活下来的人则被送往各个临时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有时是废弃的工厂，有时是学校，有时则只是用带刺铁丝网圈起来的空地。

在被迫前往这些集中营的死亡行军中，看守会射杀那些因负伤、生病和疲劳而无法继续行走的俘虏。当地人努力为疲惫的战俘送来食物，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儿子、丈夫或父亲也在战前被征入红军，很可能正经历着同样的苦难，而他们期待也会有别人喂饱和帮助自己的亲人。进入集中营之后，俘虏们往往得不到食物和饮水，陷入饥饿，甚至饿死，最终导致人吃人的惨剧。那些靠着一点点可怜的配给

勉强活下来的人又难逃疾病的魔爪。纳粹的宣传将苏联战俘描述为一群野蛮人，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堪称真正的野蛮。意识形态的差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德国人从未打算接收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战俘。在战争开头的几个月里，死掉的战俘越多，德国国防军的压力就越小。直到1941年11月，第三帝国经济上的管家们才开始考虑把战俘当作劳动力来使用的问题——当时德国正面临劳动力的短缺。在整个战争期间，东线战场上的战俘有60%死于牢狱之中。

与其他受苏维埃统治的苏联西部民族成员一样，乌克兰人在战俘营中受到的待遇普遍要好于俄罗斯人和穆斯林。一开始德国人甚至允许他们离开，认为他们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有威胁性。基于这样的考虑，纳粹在1941年9月发布命令，允许释放战俘中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如果他们是来自某一特定地区，或是有亲人来认领，这些囚徒就可以离开集中营（以致一些妇女将陌生人认作自己的丈夫）。这一政策在11月被废除，然而也许有数万（甚至数十万）被征入红军队伍并在1941年夏秋之际被俘的乌克兰人因此得以渡过劫难，与家人团聚。到了战争后期，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也比俄罗斯人更容易被召入治安部队接受训练，以保卫那些因本地居民被清除而被德国定居者占据的东欧土地。当第三帝国领导层意识到那应许给德国人的东欧殖民天堂的到来已经无限期延迟之后，纳粹还让其中一些人担任了位于波兰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

在纳粹占领区这个扭曲的世界里，大屠杀将曾是苏联战俘的人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在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第一批死于毒气室中的人就是苏联战俘——德国人在1941年9月用他们来测试齐克隆B型毒气[26]的效果。后来，又是那些从战俘营中招募来的卫兵（他们在特洛尼基[27]受训，被称为特洛尼基人）帮忙把抵达集中营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先期抵达的囚犯中被挑出来的犹太人则负责对死者的衣物进行收集分类。在集中营里，活下来往往也意味着参与对同类的毁灭。德国占领之下的乌克兰就是一座规模更大的集中营。与在那些真正的集中营里一样，在乌克兰，抵抗与合作、受害与共谋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清晰，然而也不是完全无法分辨。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活下来的人必须在战后面对自己的抉择。许多人能够坦然，一些人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然而几乎每个人都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所折磨。

被纳粹占领期间的乌克兰发生了无数恐怖的事件，然而大屠杀无疑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事件。许多成为受害者的犹太人根本没有抵达奥斯威辛或其他灭绝营。在由德国占领当局组建的地方警察的帮助下，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别动队”[28]在这些犹太人生活的城市或村镇外将他们枪杀。在德国国防军从撤退的苏军手中夺取的地区，枪决的做法从1941年夏天开始得到全面执行。到1942年1月，也就是纳粹高官们在柏林郊区的万湖[29]讨论如

何协同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30]时，纳粹别动队已经杀害了近100万犹太男女和儿童。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执行这样的行动，有时甚至公开行刑，而且行刑地点几乎都在当地非犹太居民能听见枪声的距离之内。乌克兰和其他苏联西部地区发生的大屠杀不仅毁灭了当地的犹太族群及其社会生活（与整个欧洲范围内一样），还重创了目击者的心灵。

每六个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中就有一个来自乌克兰，总计达近100万人。其中最著名也是牺牲者最多的，无疑是发生在基辅郊外的巴比亚尔[31]（乌克兰语发音为“巴比恩亚尔”，意为“老妇谷”）的屠杀事件。在德国和当地警察的帮助下，第三别动队的第4a特遣队（Sonderkommando4a of Einsatzgruppe C）在两天之内用自动武器枪杀了33 761名基辅犹太居民。这起枪杀事件发生于1941年9月29日和30日，下令者是基辅的军事长官库尔特·埃伯哈德[32]少将。战争结束后，此人在被美国人关押期间自杀。

埃伯哈德下令实施这场大屠杀的用意在于打击苏联特务的破坏活动。9月19日，即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5天之后，苏军撤退前埋下的炸弹被引爆了，摧毁了基辅城中的几座标志性建筑。不出意料，当时的德军指挥部正设于这些建筑中，因此爆炸导致不少德国高级军官丧生。纳粹在宣传中声称德国人在东方的战争是为了打击犹太人社群——这些宣传者指的是苏维埃政权，因为他们将犹太人的起源与其部分早期领袖的共产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在德国当局眼中，苏联特务与犹太人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他们已经在利维夫、克列梅涅茨以及其他西乌克兰城镇让这种联系显露无遗。在离开这些城市向东撤退之前，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射杀了数百名囚犯，其中许多人是当地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当时德国人曾鼓励实施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反击”苏联人的暴行。然而，从8月开始，德国人改变了政策。党卫队（SS）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业已授权对犹太妇女、儿童进行屠杀，对犹太社群实施整体毁灭。反犹迫害已经不够了。犹太人必须灭亡。

“基辅城区及周边的犹太人！”9月底在基辅城中散发的一张传单上写道，“你们必须在星期一（9月29日）早上8点之前，带上自己的财物、文件、细软和御寒衣物到多洛霍兹希茨卡大街的犹太公墓旁集合。未能到场者将被处死。”此时基辅的犹太市民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男丁们已被征召入伍。他们以为这次集合是为了迁居，不会受到伤害。第二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Yom Kippur）[33]。响应传单号召的人们被带到犹太墓地大门口，被勒令交出他们的文件和细软，并脱光衣服，随后被枪杀在一条山谷的斜坡上——每10人一组。巴比亚尔大屠杀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欧洲首次对一个主要中心城市的全部犹太人社群采取的灭绝行动。然而，在巴比亚尔大屠杀之前和之后，都有许多规模惊人的屠杀

事件发生。8月底，一支德国治安部队枪杀了2.3万多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匈牙利统治下的外喀尔巴阡地区的难民。10月，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近1.2万名犹太人在城郊的一个山谷中被枪杀，屠杀的发生地在后来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的校址。12月，哈尔基夫的约1万名犹太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遇难的地点是哈尔基夫拖拉机厂——苏联工业化事业的明珠。

罗马尼亚的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34]夺回了斯大林在1940年迫使他交出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并将敖德萨和波多里亚的一部分置于自己掌控之下。他对犹太人的蔑视和野蛮程度与他的纳粹主子如出一辙。1941年10月，在苏联人炸毁敖德萨的罗马尼亚军事指挥部驻地建筑，杀死一名罗军高级指挥官之后，安东内斯库为了反击，对巴比亚尔大屠杀如法炮制，下令处死了1.8万名犹太人。在罗马尼亚人占领敖德萨及周边地区期间惨死的当地犹太人总数约为11.5万到18万之间。此外，还有约10万至15万名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犹太人死于罗马尼亚对希特勒的大屠杀的效仿。与居住在总督府地区的波兰犹太人一样，大多数加利西亚犹太人在纳粹下令修建的贫民窟中度过了几个月的隔绝生活之后，在1942年纷纷死去。在德国治安长官们的命令下，他们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治安部队聚集起来，送往各个灭绝营。当地人往往会试图从自己的犹太邻居们的不幸遭遇中牟利，或向当局告发他们，或抢夺他们的财产——这样的行为与其说出于反犹主义，不如说出于贪婪。不过，大多数人只是选择袖手旁观。

在乌克兰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有一点与中欧和西欧的大屠杀不同：在这里，试图搭救犹太人的人不仅会被逮捕，还会遭到处决，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幸免。虽然如此，仍有许多人努力搭救他们的犹太邻人。截至今日，以色列国已经将超过2 500名乌克兰公民认定为“国际义人”，因为他们在大屠杀期间保护了犹太人。这份名单并不完整，还在增长之中。乌克兰天主教会的都主教安德烈·舍普提茨基就是被这份名单漏掉的人之一。他曾将数以百计的加利西亚犹太人藏在自己的居所和修道院中。1942年2月，他还向希姆莱写信，抗议德国使用乌克兰治安力量来围捕和灭绝加利西亚犹太人。这封信并没有起到作用。代希姆莱向这位都主教传话的人告诉舍普提茨基：如果不是因为年迈，他也难逃被枪决的命运。几个月之后，舍普提茨基发布了他最著名的一封主教信——《不可杀人》，就人类生命的尊严进行了讨论。这封信在所有乌克兰天主教堂中被人们诵读，并被视为他对大屠杀的谴责。舍普提茨基的名字没能出现在“国际义人”名单上，因为他在1941年夏天曾欢迎德国人接管已被苏联人占领两年的加利西亚。无论舍普提茨基和他的同胞们对德国统治抱有何种期待，这些希望都很快就成为泡影。

在希特勒的乌克兰“生存空间”中，占领当局的残酷程度根据地区的不同而

有差别。罗马尼亚人根本不想要敖德萨及其周边地区，只想用它来交换匈牙利手中的北特兰西瓦尼亚，因此他们只管从南乌克兰地区掠夺一切他们能得到的东西。相比之下，德国人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温和，而生活在军管区和前奥属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得到的待遇也更为人道。

乌克兰总督辖区的情况最为糟糕。纳粹的乌克兰总督埃里希·科赫[35]正是乌克兰纳粹占领当局所犯下的一些最可怕罪行的罪魁祸首。科赫时年45岁，是东普鲁士地区的纳粹党首脑。他身材粗壮，言语粗野，留着希特勒式的唇髭，以残暴和办事果决闻名。在乌克兰时，他被委以掠夺这一被征服地区的资源并削减其人口的任务。他对待当地乌克兰人的态度与欧洲殖民者对待其海外殖民地上的黑人和亚洲人的态度没有两样。科赫曾言："这些低劣民族永远不值得任何一个德国士兵为他们牺牲。"他不希望乌克兰人接受超过小学四年级程度的教育，并关闭了大学和其他15岁以上学生就读的学校。"如果我发现有哪个乌克兰人竟有资格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我必定让他死在枪下。"他曾在某个场合这样说道。他的部下们也的确枪杀了许多人，其中一些处决就发生在巴比亚尔山谷，也就是几个月前德国人屠杀了近3.4万名基辅犹太人的地方。到1943年11月德军对基辅的占领结束时，在巴比亚尔死于纳粹屠刀之下的冤魂又增加了6万人，其中包括苏联战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苏联地下党员和罗姆人。

科赫将他的总部设在沃里尼亚的里夫涅城。这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波兰。在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里夫涅已经是那个被称为"乌克兰"的政治体的第三个首都：苏联人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了高度俄罗斯化的工业城市哈尔基夫，而不是被他们视为"民族主义堡垒"的基辅；德国人则偏爱地处乡野的里夫涅，而不是那个规模庞大、如今已严重苏维埃化的基辅。陷于封锁和饥饿中的基辅出现了1933年以来的第一场饥荒。纳粹的"生存空间"想象包括对乌克兰的田园化，也包括对乌克兰各大中心城市的清除——否则他们就不得不供养这些城市人口，并导致第三帝国及其军队所需的资源流失。因此纳粹的政策正是让这些城市陷入饥饿：一旦城市居民被饥饿驱往乡下，就能成为一支生产力量，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为帝国提供粮草。德国人没有触动那些集体农庄，而是从这种榨取农村人口资源的苏联发明中牟利。他们拒绝对大型企业实行私有化，而是通过新设立的银行、新发行的殖民地货币和价格控制来规划残存的乌克兰经济。至于人口的流动，他们则使用身份证制度来管理。

从1942年开始，纳粹对乌克兰资源的掠夺就不再限于农产品，而开始包括强迫劳动。就在这个月，第一列运送所谓"东方工人"（*Ostarbeiter*）的火车离开基辅前往德国，车上都是受到工作承诺、优越生活和游历欧洲等机会诱惑的乌克兰年轻人。"德国在召唤你！美丽的德国在欢迎你！"基辅一家报纸上的广告如是说。一份海报的标题是"高墙已经倒塌"，描绘了乌克

兰人通过那道将苏联同欧洲隔绝开来的高墙上的裂缝向外张望的画面，地平线上是德国城市的天际线。“斯大林在你们周围筑起了一道高墙，”海报上这样写道，“他很明白，任何人只要看到墙外的世界，就会完全明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可悲状况。现在高墙已经打开，去往更新更好未来的道路已经开放。”对年轻一代来说，这是一个离开乡村去看世界的机会。许多人表露出了他们的兴趣，甚至是热情。

然而这些广告被证明是个陷阱。无论这些年轻的乌克兰男女是在德国人的工厂还是家庭里做工，他们最终都成了奴工：他们被迫戴上写着“OST”[36]字样的牌子，被德国当局和德国社会中许多人视为低等人。他们在德国受到血汗剥削的消息传到乌克兰后，占领当局每个月征召4万名乌克兰劳工的任务愈发难以完成，于是他们开始随意抓捕当地人，将他们强迫送往德国。从1942年到1943年，总计有近220万乌克兰人遭到逮捕，并被押送去德国。其中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疾病，以及盟军对他们所在的兵工厂和军需厂的轰炸。那些幸存下来并在1944年年底和1945年被红军解放的人（战争结束时，只有12万人被登记为流散人口）往往被视为叛徒，其中一些人被直接从德国人的集中营送往苏联人的古拉格[37]系统集中营。乌克兰并非德国人实施奴工抓捕行动的唯一苏联地区，但它无疑是这些“猎场”中最大的一个。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从东欧占领区掠往德国的所有“东方工人”中，乌克兰公民占了近80%。

到了1943年夏天，原来那个在乌克兰建设德国农民天堂的计划几乎已成泡影。1942年夏秋之际，希特勒在乌克兰逗留了不少时间。利用苏联战俘的苦役，德国工程师们在乌克兰文尼察附近的松林中为希特勒建起了他最东的一座指挥部，其代号为“狼人”[38]。1943年春天，希特勒仍在这里逗留，然而他在当年9月15日最后一次离开“狼人”，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天，他下令乌克兰的德军后撤到第聂伯河防线。一周后，苏军从基辅以北渡过第聂伯河，第一次打破了希特勒的东方防线。德国人将在1944年春天从这一地区撤离时将“狼人”的整个地下结构全部炸毁。

那个关于征服与“生存空间”的幻梦已经破灭，然而它释放出的恐怖仍未消散。乌克兰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坟场（此处仅仅列出了最大的几个受难族群）。大部分乌克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死去。在南乌克兰和沃里尼亚定居的德意志人和门诺派教徒也消失无踪——如果他们没有在1941年被苏联人遣送出境，如今也只能跟随撤退的德国国防军逃之夭夭。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波兰族群也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红军在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取得胜利，随后开始挺进乌克兰。此时苏联领导层面对的，是一个与他们在1941年夏天和秋天匆忙抛弃的乌克兰完全不同的国家。城市变得空空荡荡，其中的工业企业已被夷为平地。

活下来的人将红军视为解放者，热烈地欢迎他们。然而苏联官员们却不信任这些幸存者的真诚。欢迎者在敌人的统治下活了下来，在苏联掌控之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这足以让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体制产生怀疑。东正教信徒们已经习惯了希特勒带给他们的唯一自由，即信仰自由。那些原先不太从民族角度定位自身的人也开始转变——毕竟，在纳粹占领期间，族群问题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以上这些情况都对取得战争胜利的共产党政权构成威胁。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公民仍需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回答诸如自己或自己的亲属有无在德占区生活过之类的问题。此类问题在表格上紧挨着那些关于个人犯罪记录的问题。

---

[1] Landsberg，即莱希河畔兰茨贝格（Landsberg am Lech），今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南部城市。

[2] Munich Beer Hall Pustch，德国纳粹党于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勒啤酒馆发动的失败政变。

[3] Treaty of Brest-Litovsk，常被简称为《布列斯特条约》，是苏俄政府在1918年3月3日与同盟国在今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署的和约。和约终止了俄国与同盟国的战争状态，承认芬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

[4] Molotov-Ribbentrop Pact，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于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协议，即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5] 此即“NKVD”（俄语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拉丁字母转写为Narodnyi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成立于1934年，解散于1946年，是斯大林时代主要的政治警察机构，其下辖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

[6] Barbarossa（1122—1190），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1155—1190年在位）。“巴巴罗萨”这个名字来自他企图统治的意大利北部诸城，意为“红胡子”。他于1189年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在1190年溺毙于今土耳其境内的格克苏河。

[7] Brody，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市。

[8] Georgii Zhukov（1896—1974），苏联军事家、政治家、元帅。他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9] Mykhailo Kyrponos（1892—1941），苏联红军上将，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担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在1941年9月的基辅战役中阵亡。

[10] Lokhvytsia，今乌克兰中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1] Melitopol，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城市。

[12] Berdiansk，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城市。

[13] 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德国理论家，在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中以战犯身份被判处绞刑。

[14] Baltic German，指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裔居民。

[15] 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重要头目，曾担任内政部长和党卫队领袖，被认为对欧洲犹太人、同性恋者、共产党人和罗姆人的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企图与盟军单独媾和失败，服毒自杀。

[16] Hermann Göring（1893—1946），纳粹德国重要头目，曾担任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国会议长和普鲁士总理等职务，并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他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被判绞刑，但在行刑前服毒自杀。

[17] General Government，全称波兰被占领区总督府，简称总督府，指德军所占领的波兰领土中未直接与德国合并的部分。

[18] Pinsk，今白俄罗斯西南部布列斯特州城市。

[19] Homel，今白俄罗斯东南部霍梅尔州城市。

[20] Reichskommissariat Ukrain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占领乌克兰后在当地设置的管理政权。

[21] Abwehr，意为“防御”，是存在于1921年至1944年间的德国军事情报机构。

[22] Sachsenhausen，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奥拉宁堡的纳粹集中营，在1936—1945年间主要用于关押政治犯。

[23] Auschwitz，纳粹德国时期最主要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今波兰南部小镇奥斯威辛。

[24] Andrii Melnyk（1890—1964），20世纪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军事和政治人物，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梅尔尼克派的领袖。

[25] 《日内瓦公约》是1864年至1949年间在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人道对待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总称。

[26] Zyklon B，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勃发明的氰化物化学药剂，原为杀虫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使用它进行大屠杀。

[27] Trawniki，波兰东部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这里设立了特洛尼基集中营。

[28] Einsatzgruppen，意为“特别行动队”，是纳粹党卫队中执行行刑任务的组织。

[29] Wannssee，柏林西南部地名，因1942年1月20日在此举行的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而著名。

[30] Final Solution，德语为Die Endlösun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计划。

[31] Babi Yar，基辅郊区山谷。1941年9月29日至30日，3.3万多名犹太人在这里被杀害。

[32] Kurt Eberhard（1874—1947），纳粹德国党卫军和陆军军官。他在1945年11月被捕，于1947年9月自杀。

[33] 希伯来历提斯利月第十天，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信徒们会在当天全日禁食。

[34] Ion Antonescu（1882—1946），罗马尼亚军人，在1940年至1944年间任罗马尼亚总理，是罗马尼亚事实上的独裁者。他在1946年被枪决。

[35] Erich Koch（1896—1986），德国纳粹党官员，曾任东普鲁士纳粹党总管（1928—1945年在任），并在1941年至1943年间担任乌克兰总督。

[36] 上文中“东方工人”（Ostarbeiter）一词的缩写。

[37] Gulag，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简称。

[38] Werwolf，意为“狼人”，是纳粹德国的元首总部之一。

第23章 胜利者

苏联军队于1943年11月6日从撤退的德军手中夺回了基辅。时年49岁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进入基辅城的部队集群）政治委员尼基塔·赫鲁晓夫中将大喜过望。作为战前乌克兰的共产党首脑，他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十分熟悉，他的进城路线也是战前他往返自己乡间别墅时走的那条路。赫鲁晓夫发现基辅城中的建筑几乎没有变化（与1941年撤退时的苏联人不同，德国人并没有炸掉这些建筑）然而整座城市却完全被遗弃了，因为他在前一天曾下令炮轰这座城市以促使德国人加速撤离。

尽管苏联人在1941年试图炸毁基辅城中心的歌剧院，它却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当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的陪同下走近这座建筑时，他看到一名男子高叫着向他跑来，口中喊着："我是最后一个犹太人！我是基辅最后一个活着的犹太人！"赫鲁晓夫努力让这名男子平静下来，然后问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妻子是乌克兰人，"男子答道，"她把我藏在阁楼上，给我送来食物并照顾我。"此时人们开始从藏身之处走出。几分钟过后，另一名基辅市民，一名留着大胡子的老人，上前拥抱并亲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当时他"受到极大感动"。在1941年夏天，许多人只希望当局的战士打败仗，然而这些战士在归来时却成了拯救者。幸存者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们把红军战士不仅当作胜利者也当作解放者来欢迎。这种改变与其说是由于苏联人在归来后做了什么，不如说是由于德国人在占领期间做了什么。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乌克兰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已经随着德国人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红军将会把乌克兰其余领土从德国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然而直到盟军在1945年5月取得对德国的最后胜利，苏联人才真正完全地控制了这些地区。苏联政府将会在1945年6月划出一条新的乌克兰西部边界，不仅并入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中苏联主张的土地，还并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地区。这是一种无情的、典型苏联式的胜利者正义。

从1941年9月让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开始，尼基塔·赫鲁晓夫就一心想着重返这座城市。1942年春天，红军遏制了德国人向莫斯科的进军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力主在乌克兰发动一场旨在夺取乌克兰旧都哈尔基夫的反攻，并向工业中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推进。反攻的号角在1942年5月12日吹响。苏联坦克编队冲破敌军防线，越过哈尔基夫，进入了左岸乌克兰的草原地区。然而，苏军向西南方向继续前进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

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掉进了德国人的圈套。德军的部队已经合拢，形成了前一年里让红军吃尽苦头的那种包围圈。赫鲁晓夫央求斯大林停止进攻，却遭到拒绝。此时无论怎样补救，都已无济于事。在一场持续18天的灾难性作战中，苏军损失了28万人。这些人或阵亡，或失踪，或被俘。当斯大林向赫鲁晓夫问起德国人公开的20万战俘这个数字是不是谎言时，赫鲁晓夫回答说数字大体准确。斯大林将这场失利归罪于他。然而当斯大林拒绝赫鲁晓夫的提议，拒绝终止那次无望的作战行动时，正好有别的政治局委员在场。只是因为这一点，赫鲁晓夫才逃脱了可能被处决的厄运。

对乌克兰的争夺漫长而血腥。1943年2月，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击败了上百万人的德军及其盟军，扭转了战争的局势。斯大林格勒战役甫一结束，红军就继续进攻，从德国人手中重夺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和哈尔基夫。然而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泰因[1]发动了反攻，夺回哈尔基夫和别尔哥罗德，并击溃了苏军52个师的部队。直到1943年8月23日在库尔斯克取胜之后，红军才又一次夺回了哈尔基夫。9月8日，苏军在斯大林城（从前的尤兹夫卡和未来的顿涅茨克）上空升起了红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军夺取了左岸乌克兰的其余地区。他们的战线长度超过1 400千米，将希特勒为阻止苏军攻势而在右岸乌克兰建立起来的防线“东墙”撕开了多个缺口。红军在战场上投入了250万兵力，德军则有125万人。战斗的过程异常激烈。根据保守的统计数字，苏联在这次战役中死伤人数超过100万，而德军的损失也超过50万人。平民人口的损失同样惊人，然而没有人去进行统计。

作为乌克兰被占领区的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深深地涉足德军后方的游击队建设之中。纳粹在占领区的政策激起了人们的怨恨、愤怒，最终导致了反抗，并驱使人们加入抵抗组织的队伍。城市中出现了众多抵抗团体，而乡村则是大规模游击组织的天然庇护所——他们对占领者发动了长期的消耗战争。生态学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关键因素：草原无法为抵抗战士们提供很好的掩护，因此他们选择基辅以北和切尔尼戈夫地区的林地、沃里尼亚北部的森林和沼泽，以及喀尔巴阡山脉的丘陵地区作战。让这些游击者联合在一起的，除了他们的活动区域之外，还有他们宣传的乌克兰爱国主义和对纳粹占领的仇恨。然而，意识形态以及从前的苏联-波兰分界线又让他们分裂：在这条线以西，游击队组织的领导力量是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则在东部的游击队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

按照常规，共产党游击队的组织者是苏联的秘密警察。他们从一个被称为“乌克兰游击运动参谋部”的机构接受命令和给养。这个机构受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领导，是莫斯科的“游击运动中央参谋部”的组成部分。乌克兰游击者最著名的领袖之一是西迪尔·科夫帕克[2]，他曾在战前担任一个市政府的长官。科夫帕克早在1918年德国占领乌克兰期间就有游击队指

挥官的经历，并毕业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办的一所专门训练游击战干部的学校。苏联游击队从1942年年初开始活动，在战线后方和占领政府的各个中心地区对德军部队发起攻击。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红军的向西推进，苏联游击队的人数和活动范围也扩大了。如果说1942年只有5 000名游击战士，到了1944年，他们的人数已经增长了几乎10倍。

德国人试图对付日渐高涨的游击运动——游击战不仅对德国对乌克兰的控制构成挑战，也扰乱了通信和给养运输。于是他们开始使用恐怖手段对当地人群实施统治，其中包括焚毁那些被占领当局认为受到游击队控制或被怀疑支持游击队的村庄。当德国人自己的人手不足时，他们开始依靠从当地人群中招募的治安部队。治安部队成员很少有人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加入，其中有许多还是寻求免于被占领当局迫害甚至处决的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Komsomol）。对立的两个阵营中都有当地人，因此游击战往往演变成野蛮的仇杀，而游击队员和治安警察的亲属们则为他们亲人的选择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随着战争的天平在1942年向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偏转，越来越多的治安警察转投游击队阵营。有时甚至难以分辨一个人到底是通敌者还是抵抗战士。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许多人在战争期间都发生了角色的转变。

夺回基辅之后，赫鲁晓夫立刻投入了对当地的治理工作，将前苏维埃政权控制的领土重新整合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SSR），并将战前还不受苏维埃政权控制的地盘再次纳入。这是一项冗长而艰巨的任务，将会占据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到了1944年年初，战线已经推进到到第聂伯河以西。3月，苏军已经夺回了右岸乌克兰，并越过战前的国界进入了罗马尼亚。10月，红军翻过喀尔巴阡山脉，夺取了外喀尔巴阡地区。官方宣传将这一胜利誉为重新统一乌克兰国土的最后一步。没有人提到这些土地也许应该归还给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毕竟，在夺取西乌克兰的战斗中，超过50万名红军战士献出了生命。

“在将德国人向西驱赶时，我们遭遇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一宿敌。”赫鲁晓夫在讲述1944年至1945年间他为将西乌克兰重新纳入苏维埃统治而付出的努力时回忆道。苏维埃当局往往将这些民族主义者统称为“班德拉分子”，因为民族主义反抗行动几乎由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斯捷潘·班德拉的派别全盘主导。“班德拉分子”逐渐被用来指任何在班德拉支持者控制的乌克兰反抗军（UPA）[3]中作战的人员。这个称呼在不止一层意义上具有误导性。首先，并非所有乌克兰反抗军战士都认同民族主义理念或属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其次，在1941年夏天被德国人逮捕之后，班德拉从未回到乌克兰，对这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武装力量也没有实质上的控制力。他成了一名象征意义上的领袖和徒有其名的民族之父，然而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身陷德国人的监牢之中，随后又作为一名移民生活在联邦德

国。

乌克兰反抗军在1944年夏天的巅峰时期拥有近10万名战士。他们在苏军战线后方作战，扰乱红军的通信，攻击那些远离前线的红军部队。这支军队有一批指挥官，其中最优秀的莫过于曾担任“夜莺”部队长官的罗曼·舒赫维奇[4]。与舒赫维奇一样，乌克兰反抗军的许多指挥官都在作为辅助警察部队成员时接受过德国人的训练。他们在1943年年初离开了这些部队，却带走了武器。乌克兰反抗军将德国人视为自己的首要敌人，然而194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作战对象都是波兰反抗军。在沃里尼亚与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的仇怨由来已久，此时更因对彼此意图的猜疑越来越强而恶化，终于在1943年春天和夏天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行动，其中包括焚毁村庄和大批屠杀无辜平民。

苏联在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胜后不久，西迪尔·科夫帕克率领的苏联游击队就进入了沃里尼亚，引发了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的冲突。他们从沃里尼亚的一些波兰定居者那里获得支持，因为后者将苏联人视为共同对抗乌克兰人的潜在盟友。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层是否鼓励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鼓励过乌克兰人对波兰村庄进行攻击，乌克兰和波兰的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争吵不休。可以确信的是，这场种族清洗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波兰人。据估计，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死于波兰人行动的乌克兰人数量大约在1.5万到3万之间，而波兰死难者的数量则在6万到9万之间，是前者的两到三倍。德国人并未积极地参与到乌克兰人与波兰人的冲突中，却煽动双方继续厮杀，有时还向双方战斗人员提供武器——即使他们无法控制乡村地区，至少还可以让敌人保持分裂。此外，德国人还受益于乌克兰反抗军对挺进中的红军的作战。

乌克兰反抗军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是杀死了苏军的重要指挥官尼古拉·瓦图京[5]将军。1944年2月29日，瓦图京结束了与部下的会议，从曾是纳粹德国乌克兰总督辖区首府的里夫涅返回，在途中遭到乌克兰反抗军战士的伏击并受伤，随后在4月中旬于基辅去世。赫鲁晓夫出席了瓦图京的葬礼，并将他的这位朋友安葬在基辅的政务中心。战后，他为瓦图京的纪念碑想出了一条碑文：“乌克兰人民纪念瓦图京将军。”赫鲁晓夫相信这条碑文会激怒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然而莫斯科的共产党官员们却将之视为同一种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宣言。赫鲁晓夫直接请示了斯大林，后者同意了他继续原来的方案。这条乌克兰语碑文被刻在了1948年竖起的瓦图京纪念碑上。这座纪念碑至今仍伫立在基辅市中心，成为乌克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众多标志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克兰人加入的阵营不止一个。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加入了红军一方作战。莫斯科从乌克兰征召的各族士兵总计超过700万

人——每5名或6名苏联士兵中就有1名是乌克兰人。战争爆发之初被征召的乌克兰人超过350万名，战争进行期间又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乌克兰人被征入伍。许多在德国人的进攻和囚牢中幸存下来的士兵获得释放，与家人团聚，却在红军重夺他们居住的地区后很快被迫再次入伍。他们逐渐被称为“黑衣军”，这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征后立刻被投入战场，没有正规的制服，没有接受训练，没有弹药，甚至连武器都没有。由于曾生活在德占区，他们被指挥官们视为叛徒和可牺牲的力量。“黑衣军”中的大部分人在期待已久的“解放”之后不久，就战死在他们家乡的村镇郊外。

在将乌克兰人征召入伍并送上战场这个问题上，苏联人从无疑虑，德国人却长期拒绝从被自己征服的领土上补充常备军兵员。不过德国人欢迎他们成为辅助力量，即*Hilfswillige*（志愿者），简称Hiwis。约有100万苏联公民加入了德国人的志愿者辅助部队，其中乌克兰裔和乌克兰居民约占四分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人开始遭遇人员短缺，开始改变上述政策。新组建的非德国人部队直接受海因里希·希姆莱监督，成为希姆莱的野蛮治安力量党卫队（SS）中军事部门党卫军[6]的一部分。党卫军中包含了几乎所有欧洲民族成员组成的部队，有法国人、瑞典人、俄罗斯人，也有乌克兰人。战争期间，近2万名乌克兰人在被称为“加利西亚师”的党卫军第十四掷弹兵师中服役。

加利西亚地区的德国总督奥托·冯·瓦赫特[7]是建立加利西亚师计划的推动者。作为一名维也纳人，他使用了从前奥地利人支持乌克兰人打击波兰人的伎俩。在他统治期间，加利西亚的乌克兰语学校数量出现了增长。其德意志政权在当地禁止政治组织，搜捕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但对乌克兰人的福利、文化乃至学术机构表现出了宽容。这一点与乌克兰其他所有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瓦赫特相信乌克兰人足够忠诚，可以被委以武器。然而在柏林有许多人对他们的忠诚度和种族性质持怀疑态度。最终，德国领导层决定将这个师称为“加利西亚师”，而非乌克兰师，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加利西亚人是从前奥地利的臣民，较之广义的乌克兰人，是一个更“文明”、更可靠的族群。柏林不仅用从前的俄奥分界线来划分乌克兰人，还沿用从前奥地利人的方式来执行对乌克兰不同地区的政策。加利西亚师只能由加利西亚人组成，其代号和标志都与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无关。

加利西亚师征召志愿者的计划在1943年4月被宣布，并立刻在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中造成了分裂：班德拉派激烈反对加入加利西亚师，然而班德拉的对手安德里·梅尔尼克上校的支持者们却对之表示支持。包括天主教会主教们在内的主流乌克兰政治领袖们也陷入了分裂。支持成立加利西亚师的人与决定创建它的德国人一样，考虑到的是加利西亚在奥地利人统治期间的历史。在1918年，奥军中的乌克兰军团让乌克兰人得以训练自己的干部，并得到他们后来在独立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乌克兰社群中许多人认为

历史将会重演。他们中很少有人喜欢德国人对乌克兰人的统治，支持纳粹理念的人则更少。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还对德国人统治下的未来抱有信心的人更是一个也没有。除了出于实际的算计之外，让乌克兰政治家和德国当局走到一起的，就只剩下他们共同的反共产主义立场。

加入加利西亚师受到乌克兰主流政治家的支持，并且为乌克兰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逃往森林地区加入班德拉派抵抗组织和坐等即将到来的苏联占领之外的选择，因此在将自己的儿子送进这支部队的父母眼中成为一个不那么糟糕的选择。现实很快就会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后悔。加利西亚师在德国人手中受训，并受德国人指挥。1944年7月，他们在加利西亚城镇布罗德首次经历了战火的考验。这是一次洗礼，也是一次葬礼。加利西亚师与另外7个德国师一起陷入了苏军的包围。德军的损失高达近3.8万人，其中1.7万人被俘。加利西亚师原有近1.1万人，在这一战中几乎被完全消灭，只有约1 500人逃出。布罗迪之战标志着加利西亚师作为一支战斗部队的终结。当年晚些时候，在补充了新的兵员之后，加利西亚师先是被调往斯洛伐克，随后又被调往南斯拉夫同游击队作战。历史的确重演了，然而却是以一场闹剧（如果不是悲剧的话）的形式：1918年身着奥地利军服的乌克兰部队帮助乌克兰获得独立的故事已成为记忆中的陈迹，在1944年让位给乌克兰人佩戴纳粹党标志镇压其斯拉夫同胞的解放运动这一现实。

1944年7月27日，红军重夺了利维夫。夺取这座城市和西乌克兰地区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层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对利维夫的最大担忧是这里可能出现一个向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效忠的波兰市政府。赫鲁晓夫匆匆赶往这座被撤退的德国人抛弃的城市。“我们担心一些地方组织可能在此崛起，并反对苏维埃的统治，”他在后来回忆道，“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让我们的人掌管这座城市。这也正是我们做到的。”在1944年，利维夫是一座以波兰人为主的城市，处于以乌克兰人为主的乡村地区的包围之中。它成了斯大林与受到西方同盟国支持的波兰流亡政府之间争夺的焦点。赫鲁晓夫在利维夫建立起苏维埃行政机构，意味着斯大林不打算满足波兰人保有这座城市的希望。

夺取利维夫之前两天，斯大林就已经强迫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一个由苏联人创建的候补共产党政府，旨在代替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们同意了将来的波兰国家边界。这条边界大致基于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将利维夫划入了苏联一侧。此前几天赫鲁晓夫寄来的一封信为斯大林的这一努力提供了帮助。那位乌克兰共产党首脑不仅希望将利维夫和其他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移动的地区纳入他的共和国，还想取得霍尔姆城（波兰语作海乌姆）。这座城市位于一个乌克兰人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雷芙娜·库哈尔丘克[8]即来自这一地

区。斯大林用赫鲁晓夫的要求对他的波兰傀儡发出威胁，让对方明白如果不同意放弃利维夫，他就进而索求霍尔姆。波兰人屈服了，留下了霍尔姆，放弃了他们对加利西亚首府的要求。红军在1944年7月23日夺取了霍尔姆，这是苏联人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以西攻下的第一座城市，也成为附庸于莫斯科的波兰政府的第一个政府所在地。

9月，共产党人主导的波兰政府和赫鲁晓夫领导的苏维埃乌克兰政府签署了关于新边界和人口交换（以使新的国界不仅成为政治边界，也成为族群边界）的协议。这一协议背后的想法很简单：波兰人应该去往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边界以西地区，而乌克兰人应该到边界的东面来。为了让未来的边界安定，为了去掉那些少数民族，从而杜绝苏联境内任何民族统一运动的可能性，斯大林不仅急于移动国界，也急于对人群进行迁移。尽管民族主义者们也打算让战前的国界与族群边界变得一致，斯大林却比他们走得更远：他调整族群边界来适应自己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国界。

1945年2月，当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到雅尔塔同斯大林商谈战后世界的未来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坚持要求沿着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建立苏联与波兰之间的新边界。两位西方领导人同意了，给业已在进行之中的人口迁移补上了合法性。斯大林还确保拥有新的西部边界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成员，使新的苏联边界变得更加合法。在击败德国并终结欧洲的敌对状态之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们又于1945年夏天参加了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将从前属于德国的西方土地划归波兰，以补偿波兰在东方的领土损失。莫斯科将超过750万德意志人从新成立的波兰国家领土上驱逐出去，腾出土地让东部来的波兰人定居。早在红军夺取德国东部土地之前，苏联就开始了将波兰人向西输送的工作。正因如此，在1944年9月，那些居住在利维夫、原本要前往布雷斯劳（波兰语作弗罗茨瓦夫）的波兰公民才会被临时“安置”在卢布林附近的前马伊达内克[9]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到达位于前德国领土的最终目的地。

乌克兰人与波兰人的地下组织之间的战斗已经公开化，种族清洗现象也随之出现。因此，许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对离开家乡没什么意见——就算不能保住财产，至少还能保住性命。仍有一些人拒绝离开，不过这不要紧，斯大林和他的波兰代理人已经迫不及待要用上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争期间取得的大规模人口驱逐经验，来达成他们创造“无少数民族”国家的目标。苏联官员把驱逐行动称为“遣返”。然而“被遣返者”却是虚构出来的——许多遭到驱逐的人不是返回家乡，而是从家乡被赶走。仅在乌克兰，就有约78万波兰人被“遣返”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边界以西。从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被迁移到新生波兰国家境内的人口大约也是这个数目。被驱逐者中包括近10万名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苏联犹太人。这些人大多数被重新安置在

斯大林取得西方领导人勉强同意后划给波兰的前德国领土上。

波兰人和犹太人向西而去，乌克兰人则向东而来。从1944年到1946年两年间有近50万乌克兰人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边界以西被驱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由于与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同谋或仅仅是有嫌疑，西乌克兰地区有超过18万乌克兰人遭到逮捕，被送往西伯利亚和苏联内陆地区。另有7.6万乌克兰人在1947年10月也遭到流放。流放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乌克兰民族主义抵抗力量。战争结束之后很长时间里，这些抵抗者仍在西乌克兰坚持斗争。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曾声称斯大林已经准备好将所有乌克兰人迁往东方，然而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然而，全体驱逐对波兰的共产党政权来说是个可行的选项，只是在规模上要小一些。1947年，在一次代号“维斯瓦河”的行动中，波兰人从自己的东部边境地区赶走了仍留在波兰境内的所有当地乌克兰男女和儿童，共计14万人，并用波兰人取代了他们。他们把这些被驱逐者从家乡赶走，安置到波兰西部和北部的前德国领土上。由于当地人口混杂的族群和宗教状况，波兰-乌克兰的边界一度错综复杂，此时却开始变成一条清晰的苏联-波兰边界，一侧是波兰人，另一侧是乌克兰人。由于犹太人遭到灭绝，波兰人和德意志人遭到驱逐，在其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多族群地区的乌克兰也开始成为一个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共享主导地位的国家。

斯大林实行人口大迁移的目的不是要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而是要打击民族主义，并强化自己对边境地区的控制。他封锁苏联边界的手段不仅是设立新的界线和边防哨兵，还有针对资本主义西方的漫长对抗。他把乌克兰通往欧洲的大门关得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更紧，甚至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紧。纳粹占领期间的现实已经粉碎了乌克兰知识分子群体加入欧洲的梦想。德国人带到乌克兰的欧洲以殖民帝国的面目出现，驱动这个帝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的则是种族、剥削和灭绝“低劣人种”（*Untermenschen*）等概念。苏联人对这种新近的对西方的失望加以利用，为冷战期间的宣传添砖加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会不断将乌克兰抵抗者称为“德意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将乌克兰民族主义与德国法西斯绑定在一起。

为抹杀由来已久的文化边界，苏联当局同样投入了大量精力。1946年3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其代理人召集了一次乌克兰天主教会特别会议。与会者被迫解散教会，加入俄罗斯东正教会。这次会议没有主教出席，因为主教们早在一年前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苏联就做出了摧毁乌克兰天主教会的决定，并在三巨头会议所确定的国界内实施。由于此时外喀尔巴阡地区尚未正式成为苏维埃乌克兰的一部分，乌克兰天主教会得以在那里继续存在了3年时间，直到1949年冷战开始时才

被取缔。苏联怀疑天主教会在整体上都受梵蒂冈和西方势力的指使。一切体制上、宗教上和文化上与西方的联系都必须被切断，由此造成这个长久以来一直充当天主教西方和东正教东方之间桥梁的团体的毁灭。短短几年之内，超过500万名乌克兰天主教徒成了名义上的东正教徒。

到了1945年，通过武力手段获胜的苏联将其边界深深推进到欧洲中东部腹地。苏联人剽窃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蓝图，将名义上的乌克兰共和国加以扩展，囊括原属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各个乌克兰人传统聚居地区。

这些领土要求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构成了新的挑战。1917年革命之后，通过承认乌克兰对往往为俄罗斯人所聚居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工业中心的主张，苏联当局已经将第聂伯乌克兰与苏联绑定在一起。在夺取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归于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奥匈帝国乌克兰人聚居地区之后，斯大林又将发展成熟的自治、议会民主、社群和民族自组织传统带进了乌克兰，而这些传统在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并不存在。此外，乌克兰的苏维埃当局还要面临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威胁——激进民族主义。这种潮流以拥有良好政治组织和自己的游击武装的乌克兰反抗军为代表。

苏维埃乌克兰和苏联对上述新领土的完全纳入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整合，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莫斯科还需要将民族主义反抗组织驱入地下，最终消灭他们，才能平定这些地区。仅这一过程就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地区要实现完全苏维埃化，还必须经历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过程，此外还必须向这些地区的年轻人灌输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然而，即使在很长时间之后，苏联新获得的这些领土与欧洲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历史联系仍未断绝。苏联边界的西进让那些此前不属于苏联的乌克兰地区变成了国内的边境。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当局在这些地方实施的政策都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政策不同。

苏联使用乌克兰这张牌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其对这一地区的占有合法化，还在于在这里实现苏维埃化。莫斯科重拾其20年代的乌克兰化政策，允许这一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实现乌克兰化后加入苏联社会。然而，由于对当地骨干群体不抱信任，当局对他们的吸纳进展相当缓慢，因此不得不从乌克兰的中东部地区调来乌克兰人。这拖延了整个地区的完全融合。同时，以乌克兰文化换取政治忠诚的做法也让乌克兰其他地区的俄罗斯化进程慢了下来。这种勉强的乌克兰化，以及前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波兰）境内高度发达的民族动员历史传统，再加上对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的记忆，让西乌克兰（尤其是加利西亚）在后来的整个苏联时期都成为乌克兰民族文化和政治运动的中心。

[1] 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德国陆军元帅，纳粹德国国防军中最著名的指挥官之一。

[2] Sydir Kovpak（1887—1967），苏德战争时期乌克兰抵抗力量的杰出领袖。

[3] Ukrainian Insurgent Army，存在于1942年至1956年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准军事组织，后来成为游击队，曾与纳粹德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各方作战。

[4] Roman Shukhevych（1907—1950），乌克兰政治家、军事领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与纳粹合作的“夜莺”部队指挥官，后成为乌克兰反抗军最高司令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之一。1950年，他在利维夫附近遭到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工逮捕时开枪自杀。

[5] Nikolai Vatutin（1901—1944），苏联红军大将，曾担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和西南方面军司令，曾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会战、第聂伯河战役和基辅战役等。他于1944年2月29日在前线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伏击，重伤去世。

[6] Waffen-SS，纳粹德国党卫队下属的准军事部队，是希姆莱的精锐力量。

[7] Otto von Wächter（1901—1949），奥地利律师、纳粹德国政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担任克拉科夫地区总督和加利西亚地区总督，后被任命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德国军事政府首脑。

[8] Nina Petrivna Kukharchuk（1900—1984），赫鲁晓夫的第三任妻子尼娜·彼得雷芙娜·赫鲁晓娃的原名。

[9] Majdanek，今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附近的村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纳粹集中营所在地。

第五卷

独立之路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第24章
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1945年4月的旧金山会议[1]承认了乌克兰的联合国成员地位，并将之视为创始成员。这将乌克兰的国际地位提高到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国自治领，乃至比利时和巴西等主权国家比肩的程度。尽管如此，此时乌克兰距离取得国家独立以与其联合国成员地位的要求相称，还有接近半个世纪的路要走。在这条道路上，乌克兰为瓦解各个帝国并在帝国的废墟上创立新的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这一进程让全世界的独立国家数量从1945年的70个增加到今天的190多个。

尽管乌克兰拥有了联合国席位，地位也有了提高，但战争结束之际的乌克兰一片凋敝。从地图上看，乌克兰似乎已经跻身于战争的主要受益者之列——其领土增加了超过15%——然而这个共和国实际上却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它失去了多达700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15%还多。在剩下的3 600万乌克兰人中，约1 000万人流离失所，约700座城镇和2.8万个村庄已成废墟。乌克兰损失了40%的财富和超过80%的工农业设备。1945年，这个共和国的工业品产量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农业产量也不过战前水平的40%。

乌克兰的工业基地已被苏联的焦土战术、德国人的去工业化和去城市化政策以及两军的激烈交战摧毁。在某些地区，乌克兰的建设甚至几乎需要从零开始。西方的顾问们建议说修建新厂比修复旧厂更容易，然而当局决定重建其在30年代曾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工厂。与从前一样，苏联将重工业置于优先地位。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其他领域都没有那么紧迫。

到了1948年，苏联与英美之间的战时同盟已经为莫斯科与西方之间的冷战取代。与西方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的前哨一样，苏联对欧洲中东部地区的控制也变得岌岌可危。由于苏军已经部署在西至德国的地区，乌克兰不再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那样是一个紧邻西方敌人的边境共和国，然而其在整个苏联工农业生产力上的重要性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样巨大。为了应对许多人眼中共产主义东方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迫在眉睫的冲突，乌克兰必须生产武器、食品和士兵。对乌克兰人而言，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枪炮和少得可怜的黄油。到了1950年，乌克兰已经恢复了其经济潜力，但它的农业生产拖了后腿，直到60年代才重新达到战前水平。

重建破碎的经济、重新安置受到震惊和创伤的社会，以及重建党对战争期间一度落入德国人及其盟友之手的地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是战后的

第一个十年中乌克兰的主旋律。在西乌克兰，也就是那些从前属于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省份，由于德国入侵之前苏维埃的统治只维持了不到两年时间，所谓恢复党的控制事实上是引入党的控制。这段时间里，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模式在整个乌克兰范围内得到（重新）执行。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再热衷于实验——斯大林主义在其晚期显然已经耗尽了革命激情。斯大林及其助手们所做的大部分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受到刚刚结束的战争和针对西方国家的备战（克里姆林宫相信战争很快就会到来）的影响。

扎波罗热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战前苏联工业化的巨制之一，也是被苏联政治金字塔顶层人士赋予高度优先地位的重建项目。苏军在1941年撤退时，曾炸毁扎波罗热水坝的一部分。在1943年，当德国人打算完成苏军的未竟工作时，苏联人却挽救了这座大坝的残留部分——他们的间谍剪断了用来引爆炸药的线路。大坝和水电站的重建成为新任扎波罗热地区共产党首脑、未来的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工作重点。勃列日涅夫在1946年来到扎波罗热，发现这座水电站和那些环绕它修建的工业企业已成为一片瓦砾。“砖块和钢铁的缝隙里长出了青草。野狗的狂吠声从很远之外就能听见。周遭除了废墟一无所有。烧焦的树枝上挂着乌鸦的窝巢。”这是勃列日涅夫对1946年夏天他参观扎波罗热工业基地时的第一印象的回忆，“在内战之后我也曾看到过类似的景象，然而当时最令人恐惧的是那些工厂的死寂，此时它们却已完全化为瓦砾。”

根据一个政府委员会的报告，此时的扎波罗热市没有电力供应，也没有自来水。超过1 000栋公寓楼、74所学校、5家电影院、2所大学和239家店铺被彻底摧毁。然而莫斯科将勃列日涅夫派往扎波罗热的主要目的并不于重建城市，而是让那座水电站和被称为扎波罗热斯塔尔的钢铁厂重新运转起来。勃列日涅夫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了任务。1947年3月，扎波罗热水电站开始发电。同年9月，钢铁厂生产出第一批钢材。为了奖励勃列日涅夫的功劳，克里姆林宫在1947年11月将勃列日涅夫从扎波罗热召回，提升他为邻近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乌克兰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勃列日涅夫离开扎波罗热时，此地已经在生产电力和钢材，然而仍是一片废墟。这就是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模式——工业企业优先。民众的苦难甚至死亡则被置之不理。

在其首次出版于1978年的回忆录中，勃列日涅夫提到了当时城市中的艰难形势，却对乡村的状况不置一词。1946年和1947年，乡村地区再次出现了规模堪比1932年和1933年的饥荒。近100万人在这场饥荒中死去。受灾最重的是乌克兰南部，包括勃列日涅夫领导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毫不意外，由于他自己身处高位，勃列日涅夫对当局这桩导致数十万公民饿死的新罪行缄口不言。另一名高官则拒绝保持沉默，他就

是当时勃列日涅夫的上级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通过地下渠道流入西方，并于70年代在美国出版，然而苏联读者直到80年代晚期才能读到它。（与之相较，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在70年代的印数就达到近1 500万册。）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不仅描述了饥荒的景象，还描述了共和国领导层在救助受难者时所表现出的无能——在影响乌克兰人生死的问题上，莫斯科仍是唯一的决策者。

正如他对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做出的解释一样，赫鲁晓夫将这场新的乌克兰饥荒归咎于斯大林。在这件事上，他无疑是找对了目标。1946年夏天，乌克兰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然而莫斯科当局仍从被战争和糟糕收成破坏的乌克兰乡村征粮。各个城市的再次工业化和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此时都需要粮食。斯大林向东欧输粮数以百万吨计，以使这些地区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保持运转。为阻止即将到来的灾难，赫鲁晓夫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要求像对城市居民一样给农民发放配给卡。他的请求被置若罔闻。此外更有人开始散布流言，指控赫鲁晓夫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因为他对他的共和国及其民众表现出了过度的保护。赫鲁晓夫很快就失去了斯大林的宠信，并遭到降职。尽管他仍保留了乌克兰政府首脑的职务，却失去了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的位置。他的新上司、乌共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接任者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20年代乌克兰化政策的推行者和30年代大饥荒的责任人之一。

卡冈诺维奇将自己在乌克兰的新使命视为加强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新古典主义诗人、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马克西姆·雷利斯基[2]成为卡冈诺维奇的意识形态政治迫害的主要受害人。他在媒体上被指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并在1947年秋天被撤职。尽管斯大林很快就将卡冈诺维奇召回莫斯科，赫鲁晓夫也夺回了他的党内职务，对乌克兰文化界人物的攻击仍在继续。这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领域负责人安德烈·日丹诺夫[3]发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日丹诺夫给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纯”和“向西方献媚”等罪名。日丹诺夫发起的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包括俄罗斯讽刺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4]和乌克兰讽刺作家奥斯塔普·维什尼亚[5]。作家们在作品中只能描述一种冲突：好和更好之间的冲突。这等于捆住了讽刺作家的手脚。对意识形态异见者的搜寻范围从作家群体扩大到音乐家和历史学家群体。在乌克兰，迫害“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在1951年达到顶峰：这一年，《真理报》对杰出诗人弗拉基米尔·索休拉[6]写于1944年的爱国诗歌《热爱乌克兰》（“Love Ukraine”）发动了批判。当局寻求强化对从前德国占领区的控制，因此在战争期间有助于动员乌克兰爱国主义反抗德国侵略的作品如今被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

苏联将1941年到1945年间的苏德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由于苏联政权在战争中没有倒下，并击退了侵略者，因此这场战争为当局赋予了新

的合法性。然而战争同样改变了苏联的政治版图，让民众获得了革命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力量。莫斯科重建意识形态统一性及中央集权水平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乌克兰这样的共和国尤其如此。进入50年代之后很长时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仍在继续。西乌克兰（尤其是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在战后多年仍处于事实上的军事占领状态，并受到与乌克兰其他地区不同的对待。

直到20世纪50年代，乌克兰反抗军仍在加利西亚乡间挑战苏维埃的统治，比东欧其他苏占区任何武装反抗力量坚持的时间都长得多。在1947年左右，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们改变了战术，将大型部队拆分为不超过50人的小部队，后来又进一步拆分为不超过10人的小组。他们避免与人数优势巨大的苏军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保存力量，等待在他们看来随时可能发生的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新战争。与此同时，这些小规模反抗军部队仍为苏维埃当局带来麻烦。他们攻击共产党的代表，攻击国家机器，并破坏当局的农业集体化努力和当局通过教育系统实施的对当地的苏维埃化。当局则以镇压手段做出回应，其中包括对数十万被怀疑支持地下组织的乌克兰人的流放。

直到1950年春天，苏联安全部门才追查到乌克兰反抗军总司令罗曼·舒赫维奇的下落，并将他杀死。另一名指挥官接替了舒赫维奇的位置，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有组织的抵抗运动遭到大面积摧毁，而小股的地下部队彼此之间也失去了联系。一些反抗队伍设法穿过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境来到西方，在联邦德国加入斯捷潘·班德拉领导下的流亡民族主义者群体。1951年，为了搜集情报，英国和美国开始将班德拉组织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空投回乌克兰。作为回应，苏联加强了对班德拉和其他在德国的乌克兰流亡者领袖的暗杀努力，并在1959年秋天取得成功：一名苏联间谍用一支填充了氰化物的喷枪杀死了班德拉。刺客于1961年叛逃到西方，承认了其刺杀班德拉和在1957年刺杀另一名乌克兰流亡者领袖的行为。他在联邦德国法庭上的证词充分证明：杀害流亡者领袖的命令出自苏联政府的最高层。

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几年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无论是真正的还是仅仅只是受到怀疑的——并非苏联宣传机构和秘密警察的唯一打击目标。就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犹太人在苏联的敌人名单上进入了前列。在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清洗行动中，犹太人就是受害者之一，然而直到40年代晚期，他们才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打击目标。这一转折与冷战的开始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同步发生。此时苏联的犹太公民开始被怀疑为两面派，与西方站在一边反对他们的苏维埃祖国。

1948年1月，苏联犹太人领袖之一、著名演员和艺术指导所罗门·米霍埃尔

斯[7]被杀害。当年年底时，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8]被投入了监狱。热姆丘任娜出生于乌克兰南部，是米霍埃尔斯的积极支持者。苏联媒体向所谓“世界主义者”（“犹太人”的隐语）宣战，将许多犹太人从党的机构和安全机构驱逐出去。乌克兰犹太人成为这场歧视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1952年，随着许多犹太医生的被捕，这场反犹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些犹太医生与他们的斯拉夫同事们一样，被控谋害包括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而事实上日丹诺夫在1948年死于自然原因。直到斯大林去世，这场反犹运动才被终结。苏联领导层为这场运动踩了刹车，并从监狱里释放了那些幸存下来的医生。然而，反犹主义仍在莫斯科、基辅和其他苏联中心城市的权力机关中阴魂不散。

约瑟夫·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他的去世宣告了苏联历史上最恐怖的年代的终结。他推行的政策将在接下来数代人的时间内对其继任者们和他们领导下的国家产生影响。反犹运动正是这些政策的诸多方面之一。去斯大林化将成为斯大林的继承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主政时期的重要特征。然而，这位乌克兰共产党前领导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进而开辟其反斯大林主义的路线。

尼基塔·赫鲁晓夫登上苏联权力之巅的历程始于1949年12月。当时斯大林将正在利维夫与民族主义地下组织作战的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并将他此前担任过的莫斯科地区共产党首脑职务交还给他。盛大的斯大林七十周年诞辰庆祝活动在赫鲁晓夫抵达莫斯科之后几天举行。在官方庆典上，斯大林让赫鲁晓夫坐在自己身边，而另一边则安排了从中国来访的贵宾毛泽东。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很快成为4名最有权力的苏联领导人之一。1953年6月，他策划了对其最危险的竞争者、安全机构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9]的逮捕行动。1955年2月，他除掉了贝利亚曾经的盟友、苏联政府首脑格奥尔基·马林科夫[10]。1957年6月，他又粉碎了斯大林的前助手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反抗。1958年3月，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首脑。他的成功离不开他在乌克兰的代理人的帮助：由于俄罗斯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党组织[11]，乌克兰共产党就成了全苏联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以人口计），因此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拥有最多的票数。

赫鲁晓夫慷慨地回报了他的乌克兰代理人，将他们召回了莫斯科。第一个回到莫斯科的是阿列克谢·基里琴科[12]。他是革命之后第一个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的乌克兰人。1957年，基里琴科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苏联权力第二大的人。赫鲁晓夫的门生们还包括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前党委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成了最高苏维埃主

席，也就是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乌克兰党组织的另一个贡献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尼（乌克兰语作米科拉·皮德霍尔尼）[13]。他曾经担任乌共中央的第一书记，在1963年被赫鲁晓夫提拔进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以上这些人以及赫鲁晓夫的其他几十名门生也都将自己的代理人从乌克兰提拔到中央。斯大林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依赖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干部，赫鲁晓夫依赖的则是从乌克兰来的人。通过将乌克兰共产党的干部提拔到莫斯科的实权岗位上，赫鲁晓夫让乌克兰共产党精英阶层成为俄罗斯共产党[14]的新搭档以及管理苏联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政府首脑。这个阶层的成员们取得了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力，也在乌克兰内部事务的决策上获得了更多自主权。

从1954年1月的全苏联佩列亚斯拉夫会议（1654）[15]300周年庆典开始，乌克兰逐步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序列中取得了仅次于俄罗斯的光荣地位。这次会议批准将哥萨克国置于莫斯科沙皇的保护之下。党的官方宣传机构将它歌颂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统一"。这一口号植根于19世纪俄罗斯帝国那套"罗斯的重新统一"话语——它需要专制的俄罗斯国家的努力和保护才能实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一份特别文件——《关于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的决议》（"Theses on the Tercentenary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Ukraine with Russia"），对这一口号在新形势下的意义做出了解释。这份文件以将俄罗斯人视为"苏联所有民族的领导力量"（这是1945年5月斯大林在庆祝苏德战争结束的宴会上祝酒时创造的说法）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为基础。它将乌克兰人提升为苏联第二重要的民族。根据这份文件的说法，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不同的民族，却因为历史和文化的缘故紧密联系在一起。

苏联当局下令为该纪念日建造一批纪念碑，并用"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这些冗长而别扭的字眼为许多机构命名，其中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所大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所大学由统领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在1918年创建，其时俄军已被赶走，乌克兰正处于德国控制之下。最为大方的象征性姿态则是俄罗斯联邦管辖的克里米亚半岛在1954年2月被移交给了乌克兰。此前10年，克里米亚鞑靼人由于被指控全体与德国人合作，被迁出了克里米亚。尽管官方宣传机构竭力把克里米亚半岛的移交描述为两个民族兄弟情谊的证明，这一行动的真实原因却没有那么浪漫。关键的原因在于地理因素。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之间被刻赤海峡隔开，却通过交通线与乌克兰本土连接在一起。战争、德国的占领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驱逐等事件破坏了克里米亚半岛的经济，其重建需要来自乌克兰的帮助。

克里米亚在1950年向国家上缴的粮食、烟草和葡萄数量分别只有1940年的五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从俄罗斯联邦来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定

居者们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对当地经济的重建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当赫鲁晓夫在1953年访问这个半岛时，沮丧的定居者们将他的轿车团团围住，要求得到援助。赫鲁晓夫从克里米亚直奔基辅，开始关于将克里米亚移交给乌克兰的谈判——他认为乌克兰有责任帮助这个陷于经济困境中的地区，也相信乌克兰的农业专家们知道该如何对付干旱和在干草原地区种出粮食。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代理人和莫斯科的同僚向他提供了支持。到了1954年2月，乌克兰、俄罗斯和全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已经签署了移交协议。

克里米亚成了乌克兰的一部分。这是乌克兰领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基于地理和经济考虑而非出于族群因素的扩张。在克里米亚的120万居民中，俄罗斯人占了71%，乌克兰人只有22%。新的安排以及来自乌克兰政府的投资和技术对这个半岛不无裨益。从1953年到1956年，克里米亚的葡萄酒产量增长了一倍，发电量则增长了近60%。不过，克里米亚经济的主要增长发生在下一个10年中，其原因是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修建——这条运河的第一期工程在1963年完成。随着工程在接下来的年头里继续推进，这条运河让第聂伯河总水量的30%得以进入克里米亚，灌溉了超过6 000平方千米的农业用地。此外运河还成为费奥多西亚、刻赤和苏达克的用水来源。

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于1956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秘密讲话为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的命运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这位新领导人抨击约瑟夫·斯大林掀起的对党员的清洗运动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他并没有提到数百万非党员所受到的迫害，没有提到1932年和1933年的大饥荒，也没有提到对许多民族进行的整体人口迁移。随着赫鲁晓夫讲话启动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不断推进，许多乌克兰前领导人——如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弗拉斯·丘巴尔和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都获得了政治平反。乌克兰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新名字）和乌克兰总检察院重新审查了近100万件政治恐怖受害者的案件，平反了近30万人。被控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立场、参加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和与德国人合作等罪名的人所受的起诉和判决则仍然有效。不过，仍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成员从古拉格系统中被释放出来，那些幸存在世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主教和神父们也同样获释。这些人一经获释，克格勃就对他们中的大多数实施了监控。

赫鲁晓夫本人也是一名信徒——他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公开向他的人民和全世界宣布：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将在接下来的20年中奠定。用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来说，这就意味着生产大量消费品的能力，而当时苏联正处于消费品供应短缺之中。赫鲁晓夫还在党内通过了一份新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对这一确定了

共产主义天堂降临日期的世俗宗教的推动与对传统宗教进行的斗争同步进行。战后在去斯大林化过程中，赫鲁晓夫对宗教团体实施了新的压迫政策，承诺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消灭宗教，还保证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电视上播出最后一名宗教信仰者的镜头。20年代和30年代的反宗教运动得以复兴，成千上万的东正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和祈祷所遭到关闭。从1960年到1965年，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数量从8 207个下降到4 565个，减少了接近一半。乌克兰东部和中部的宗教组织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当局在加利西亚则更谨慎，不想因为关闭太多教会而驱使新改宗的东正教信徒们转投处于地下状态的乌克兰天主教会。

许多人都明白对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预言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然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结束、某些类别的政治犯的获释以及揭露斯大林执政时期阴暗面的作品得以出版（其中包括曾在1945年至1953年间沦为古拉格囚犯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6]的作品）等现象都制造出一种被称为“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自由的气氛。在乌克兰，“赫鲁晓夫解冻”的标志是在斯大林统治晚期作品被禁的一批作家和艺术家重归公众视野，其中包括乌克兰最著名的电影制作人亚历山大·多夫任科[17]——他终于得以结束自己在莫斯科的流放状态，回到家乡重新开始工作。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遭到批判的诗人马克西姆·雷利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索休拉也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促进了新一代乌克兰诗人的成长，其中包括伊凡·德拉奇[18]、维塔利·科罗迪奇[19]和莉娜·科斯坚科[20]等“60年代”诗人中的领军人物。这一代诗人不断寻求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化的限制。

面对那些感到焦虑的干部，党的新路线则被包装成向“列宁主义原则”的回归。这意味着许多东西，其中包括终结对党政机关的清洗和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去中心化。这两项转变都令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精英阶层的力量得到增强。乌克兰的干部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新机遇。各地建立了负责经济发展的地方委员会（另一项向20年代政策的回归），这让乌克兰的当权者掌握了位于本国境内企业的90%以及全部农业设施。较之他们的前任，此时的当权者们独立于中央的程度大大提高了。从50年代初开始，乌克兰的管理者们就变成了当地官员，几乎不再有来自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政官员流入。地方干部们互相之间连接成一种裙带网络，而党机关第一把手的位置则由他（当时的党机关中很少有女性身影）对其上级的个人忠诚决定。乌克兰共产党的这张网络一直延伸到克里姆林宫，由此变得比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的网络更加稳定和独立。

赫鲁晓夫的改革促进了苏联工业的惊人发展，也让苏联社会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他提出的五层廉价公寓（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公寓）建设计划改变了每一座苏联城市的天际线，让数以十万计的市民得以从临时居所和狭小的社区公寓搬进配备了暖气、自来水和室内厕所的独立公寓。在赫鲁

晓夫时代，尽管大部分国家资源都流向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和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开发，乌克兰仍是新的工业增长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第聂伯河上又出现了三座新的水电站，改变了自然的河水流向，形成了巨大的人工湖，淹没农田和附近的矿山，并永久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态。为生产农业杀虫剂和大众消费品而建起的化工项目增强了乌克兰的经济实力，却也增加了乌克兰生态系统的压力。乌克兰还深深地参与到苏联的核计划和太空计划中。这两项计划都是伴随了几乎整个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的产物。铀矿在1648年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与波兰王室军队之间的第一次战役发生地附近的城镇若夫季沃季被发现并得到开采。欧洲最大的导弹工厂则兴建于附近的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乌克兰对苏联实现进入太空的突破同样贡献巨大。作为对这一贡献和乌克兰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序列中象征性地位的认可，第一名搭乘苏联火箭进入太空的非俄罗斯宇航员就是乌克兰人。这名宇航员名叫帕夫洛·波波维奇[21]，出生于基辅地区。他在1962年首次进入太空，并在1974年再次实现太空之旅。

可以预见，苏联的太空计划发展和军工项目并未为民众带来多少福利，反而让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濒临饥荒。这次食品短缺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农业生产遭遇了一系列旱灾。这一次，政府不再像1932—1933年间和1946—1947年间那样继续出口粮食，而是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从而避免了重复上述时期的灾难。这一举动成为与斯大林时代分道扬镳的标志。通过大幅提高农业产品的收购价（其中粮食价格提高了7倍），赫鲁晓夫努力减轻农民们的困境，增加集体农庄的生产效率。他还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们的自留地削减了一半，认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免于家中的额外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集体农庄的耕作。

然而赫鲁晓夫出于善意的政策没能带来他期待的结果。他继续保留着集体农庄应该种植什么作物以及如何种植的决定权，努力推动玉米产量的增长，然而玉米无法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官僚们所选定的地区生长，最终也没能长出来。赫鲁晓夫试图让农民获得更多休息时间，却因此削弱了自留地上的农业产出。从1958年到1962年，农民们个人拥有的家畜数量从2 200万头下降到1 000万头，减少了一半多。旨在增加生产力、提高乡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改革反而让城市中的农业产品价格飞涨：黄油的价格增长了50%，肉类价格则增长了25%。50年代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记忆中失去的天堂，而农民们则更喜欢60年代。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身边小圈子的成员们（包括他来自乌克兰的门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尼古拉·波德戈尔尼在内）通过一场政变将赫鲁晓

夫赶下了台。赫鲁晓夫为苏联带来改革，却没有多少苏联公民为他说好话。他们反而充分利用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提供的机会，公开对这位被推翻的领袖和他的经济政策提出抱怨，因为他的经济政策让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让农业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苏联的新领导人们发动政变的部分原因在于担心赫鲁晓夫会将经济困境归咎于他们，并剥夺他们的权力。他们决定放慢脚步，废除了地区经济委员会，在莫斯科重建全国性的政府部门，将之作为苏联经济的主要管理机构，从而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不过他们并未触动处于高位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由此将农业从斯大林时代的收入来源变成了一个不断需要新补贴的经济黑洞。集体农庄中的农民们的生活从来不易，此时也有了小小的改善，然而他们的生产效率并未能提高。此外，新领导人们一直没有恢复农民的自留地份额，而是继续压制农业领域中个人的积极性。与赫鲁晓夫一样，他们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官方目标，却又担心私有财产和个人积极性带来的威胁。

赫鲁晓夫下台了，接替他成为党的第一把手的是缺乏理想主义色彩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这使得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明天”宣传运动逐渐降温，斯大林时代那种对公共讨论的管制也得以恢复，高压政治卷土重来。作为转变的信号，新的领导层逮捕了两名在西方出版作品的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22]和尤里·丹尼尔[23]，并以从事反苏活动的罪名起诉他们。逮捕发生在1965年秋，即赫鲁晓夫被解职之后一年。1966年年初，这两名知识分子被分别判处7年和5年苦役。这场审判意味着“赫鲁晓夫解冻”寿终正寝。

在乌克兰，逮捕行动始于1965年夏天，比上述事件还要早上几个月。基辅和利维夫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解冻”时期开始进行文学和文化活动，如今却成为克格勃的目标。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早期活动家叶乌亨·斯维尔斯丘克[24]在后来将他们的活动定性为一场为“年轻的理想主义……对真理和正直的寻觅……以及对官方文学的拒斥、抵抗和反对”所驱动、主要发生在文化领域的运动。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关注乌克兰民族及其文化的命运，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进行论争，不断挑战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和“重归列宁主义”运动所设定的限制。这一点在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第一批“萨姆维达夫”（*samvydav*，俄语读作*samizdat*，意为“自行出版”）作品之一《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篇文章写于1965年针对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的第一次逮捕行动之后不久，作者是年轻的文学批评家伊凡·久巴[25]。文章认为斯大林主义的苏维埃民族政策已经脱离了列宁主义方向，成为国际主义的敌人，并为俄罗斯沙文主义所绑架。

当局在政治上越来越僵化，对各种形式的反对也越来越不能容忍。然而，

在乌克兰，“赫鲁晓夫解冻”却并未随着第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被捕而结束，并在某些方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点至少在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的复兴上体现得十分明确。这场复兴运动拥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彼得罗·谢列斯特[26]。谢列斯特出身于乌克兰东部哈尔基夫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20年代加入共产党。与同时代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们（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获得平反，还在60年代的乌克兰受到纪念）一样，谢列斯特相信自己的主要任务不是听从莫斯科的命令，而是推进乌克兰的经济发展，并支持乌克兰的文化。此时俄语给乌克兰语造成的压力与日俱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乌克兰语学校的学生数量就不断下降，而俄语学校学生所占的比例却从1939年的14%升高到1955年的25%，在1962年更是超过了30%。

这样的数据让彼得罗·谢列斯特感到不安。他主导了一场新的乌克兰身份认同建构运动。这种身份认同以乌克兰在击败德国侵略中做出的贡献和其在苏联中提高的地位为傲，将对社会主义实验的忠诚、乌克兰本土爱国主义和对乌克兰历史文化的推崇融为一体，堪称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苏维埃身份认同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罗马尼亚乃至外喀尔巴阡地区形成的民族认同的结合。尽管苏维埃元素在这种身份认同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却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在文化上变得比在别的情况下更有乌克兰色彩，变得更加自信。

这一时期莫斯科的政治局势与20年代颇有相似之处，让谢列斯特得以回归民族共产主义理念，并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仍长期保有实践这种理念的能力。与20年代一样，60年代有许多政治派系参与到对党和政府的控制权的争夺中，来自乌克兰共产党干部的支持在莫斯科变得十分重要。当时勃列日涅夫集团正面临以克格勃前首脑亚历山大·谢列平[27]为首的干部集团的竞争，谢列斯特乐意以向勃列日涅夫提供支持来为乌克兰换取有限的政治和文化自治权。这一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在1972年走向终点。其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将谢列平边缘化，决定开始对付谢列斯特。后者在1972年被调往莫斯科。尽管谢列斯特仍是位于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因他的著作《啊，乌克兰，我们的苏维埃故乡》（*O Ukraine, Our Soviet Land*）而被批判为倒向民族主义，因为这本书充满了对乌克兰历史和乌克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的骄傲之情。

勃列日涅夫以他的忠实党羽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28]替代了谢列斯特。谢尔比茨基来自勃列日涅夫的家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派在莫斯科和基辅排挤了其他乌克兰干部，对党和国家机器的控制越来越牢固。随着谢列斯特离开乌克兰，他的追随者遭到清洗，而乌克兰知识分子群体也受到攻击。“民族共产主义”作品《国际主义还是俄

罗斯化》（*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的作者伊凡·久巴由于他在1965年的这篇作品，被判5年劳改外加5年国内流放。米哈伊洛·布莱切夫斯基[29]和其他许多研究1917年之前的乌克兰历史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哥萨克时期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被逐出了乌克兰科学院等机构。克格勃补上了它在彼得罗·谢列斯特掌管乌克兰时无力完成的任务。然而，高压措施所能做的仅限于此，并且总会结束。下一次，当乌克兰共产党精英阶层和乌克兰知识分子建立起反抗莫斯科的共同阵线时，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团结在重归列宁主义理想的口号之下。

---

[1]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指1945年4月到6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起草《联合国宪章》。

[2] Maksym Rylsky（1895—1964），乌克兰诗人，曾获列宁奖和斯大林奖。

[3] Andrei Zhdanov（1896—1948），斯大林时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曾被斯大林属意为其继承人。

[4] Mikhail Zoshchenko（1894—1958），苏联讽刺作家。他对社会现象的讽刺使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广受欢迎，但自1946年日丹诺夫批判后，他的作品不能出版，只能从事翻译工作。

[5] Ostap Vyshnia（1889—1956），原名帕夫洛·胡本科，乌克兰讽刺作家。

[6] Volodymyr Sosiura（1898—1965），乌克兰抒情诗人。

[7] Solomon Mikhoels（1890—1948），苏联犹太演员、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的艺术指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在1948年被斯大林下令暗杀。

[8] Polina Zhemchuzhina（1897—1970），苏联犹太裔女政治家，莫洛托夫之妻。

[9] Lavrentii Beria（1899—1953），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失败，遭到撤职并被秘密处决。

[10] Georgii Malenkov（1902—1988），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短时间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并于1953年3月5日至1955年2月8日期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在1957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1961年被开除党籍。

[11] 1990年之前，俄罗斯没有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其地区党务由苏共中央直接负责。

[12] Oleksii Kyrychenko（1908—1975），苏联政治家，在1957年至1960年间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3] Nikolai Podgorny（Mykola Pidhorny，1903—1983），乌克兰裔苏联政治家，曾在1957年到1963年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5年至1977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4] 此即苏共。

[15] 见本书第10章。

[16] 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苏联-俄罗斯著名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其作品有《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

[17] Oleksandr Dovzhenko（1894—1956），苏联电影编剧、制片人和导演，被视为苏联早期最重要的电影制作人之一和苏联电影蒙太奇理论的先驱之一。

[18] Ivan Drach（1936年生），乌克兰诗人、编剧、文学评论家和政治家，乌克兰人民运动的创立者之一。

[19] Vitalii Korotych（1936年生），乌克兰作家、记者。

[20] Lina Kostenko（1930年生），乌克兰女作家、诗人，1987年舍甫琴科奖获得者。

[21] Pavlo Popovych（1930—2009），苏联宇航员。他是苏联第四位和全球第八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22] Andrei Siniavsky（1925—1997），俄罗斯作家，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

[23] Yulii Daniel（1925—1988），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持不同政见者。

[24] Yevhen Sverstiuk（1928—2014），乌克兰文学和社会批评家，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

[25] Ivan Dziuba（1931年生），乌克兰文学批评家、社会活动家，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曾任乌克兰文化部长（1992—1994年在任）。

[26] Petro Shelest（1908—1996），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63—1972年在任）、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1964—1973年在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72—1973年在任）。

[27] Aleksandr Shelepin（1918—1994），苏联政治家、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克格勃首脑（1958—1961年在任）。

[28] Volodymyr Shcherbytsky（1918—1990），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政治家，曾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65—1972年在任）和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72—1989年在任）。

[29] Mykhailo Braichevsky（1924—2001），乌克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第25章
再见，列宁

1982年11月15日，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公民们都紧紧盯着他们的电视机屏幕。每个频道都在播放一条从莫斯科发出的消息：苏联领导人、众多外国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的莫斯科人都聚集在红场上，送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个统治这个超级大国长达18年的乌克兰人。他身患慢性病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几天前在睡梦中死去。许多从不知有其他领导人的电视观众难以相信“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了世界和平不知疲倦的战士”——这是官方宣传机构对他的颂词——就这样走了。他的老人政治冻结了苏联社会向上的活力，让所有改变的希望破灭，似乎拥有让时间停止的力量。对此，官方使用的术语是“稳定”。很快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将被人们称为“停滞时期”。

在1966年到1985年的20年间，乌克兰的年度工业增长率从8.4%下降到3.5%，而表现向来不佳的农业的增长率则从3.2%下降到0.5%。这还只是官方数字，在一个充斥着虚假报道的时代里没有太多意义。现实的情况更为严峻。苏联越来越依赖其通过向海外出售石油和天然气获得的硬通货。在70年代初，当苏联和西方的工程师们还在忙于修建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和中亚送往欧洲的管道时，产自乌克兰达沙瓦[1]和谢别林卡[2]的天然气被运往中欧而不是国内消费者家中，以换取硬通货。随着这些气田的枯竭，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天然气进口国。

赫鲁晓夫曾向苏联民众承诺他们将会生活在共产主义时代。这一承诺从未变成现实，并已被当局的宣传家们彻底遗忘。苏联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有如自由落体，仅仅当世界油价高企时才会稍微减缓。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之时，精英阶层和大众中的虚无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虚无主义不仅针对共产主义，也针对“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词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官方对苏联社会形态的定义。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灵柩被放进克里姆林宫围墙附近新开掘的墓穴，克里姆林宫的钟楼报出下一个时辰，礼炮也齐声鸣放，宣布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到来。激进的改革尝试、急剧的经济下滑和强大苏联在政治上的分崩离析都将在这个新时代出现。在这个崩解过程中，乌克兰将走在前列，迎来自己以及其他那些不那么具有决定性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在那些站在列宁墓前的主席台上为已故的勃列日涅夫致祷词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一个人显得与众不同，他就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此时是11月，天气寒冷，然而满头银发的谢尔比茨基

为了表达对勃列日涅夫的敬意，一直没有戴上帽子。谢尔比茨基在其政治生涯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勃列日涅夫的代理人，因此有理由感到悲伤。在勃列日涅夫意外辞世之前，克里姆林宫内部已有传言说勃列日涅夫会在即将到来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宣布辞职，将权力移交给谢尔比茨基，以此保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派在这个国家的领导集团中的优势地位。谢尔比茨基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本地人，在被调往基辅前就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共产党首脑。然而勃列日涅夫死在了全会召开之前。新任的党的第一把手是克格勃前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3]。安德罗波夫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派毫无瓜葛，很快就会对勃列日涅夫的党羽们展开腐败调查。

葬礼之后，谢尔比茨基将会返回乌克兰，在那里韬光养晦，以求平安渡过这段叵测的时间。身体状况良好的他此时才64岁，在政治局成员中算得上是年轻人。他的直接竞争对手们年龄都比他大，健康状况也不佳。此外，在他执掌乌克兰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时期，谢尔比茨基已经建立起一个忠于自己的代理人群体。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4]去世，而他的继任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5]于1985年3月病逝。谢尔比茨基活到了他们去世之后，然而此时他攀上莫斯科权力之巅的机会已经过去了。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建立、由勃列日涅夫加强的俄罗斯-乌克兰上层之间的合作关系此时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新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上台。他精力过人，与乌克兰共产党机构没有任何关联。戈尔巴乔夫的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他在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混居的北高加索地区长大，从小就对乌克兰民歌耳熟能详，然而他首先是一位苏联爱国者，对俄罗斯之外的任何加盟共和国都没有特别的感情，并将勃列日涅夫的盟友们在各加盟共和国创建的代理人网络视为对他的权位和他上台伊始就启动的改革计划的威胁。

那条在此前30年中不断将乌克兰干部向莫斯科输送的传送带很快就停止了运行。戈尔巴乔夫从俄罗斯各地区调来新人，其中包括后来击败他的鲍里斯·叶利钦[6]。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打破了自斯大林去世以来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默契——每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都必须是本地人，且须来自本地第一民族。他将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7]“空降”到哈萨克斯坦，替换了忠于勃列日涅夫的哈萨克人丁穆罕默德·科纳耶夫[8]。与叶利钦一样，科尔宾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位于乌拉尔山区的工业城市叶卡捷琳娜堡）的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官员，与哈萨克斯坦从无关系，也不曾在那里工作。他的任命让哈萨克学生们走上街头，掀起了苏联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暴动。

1986年4月，距基辅不到70英里（约113千米）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在乌克兰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技术灾难。此后不久，莫斯科的新领导集团与乌克兰领导层之间的裂痕就公开化了。提议将核能带到乌克

兰的是乌克兰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而当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首脑的彼得罗·谢列斯特希望为乌克兰迅速发展的经济提供新的电力，在60年代努力鼓吹这一方案。1977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开始并网发电时，包括“60年代”领军人物之一伊凡·德拉奇在内的乌克兰知识分子都对乌克兰进入核能时代表示欢迎。对德拉奇和其他乌克兰爱国者而言，切尔诺贝利意味着乌克兰向现代化更进了一步。然而，德拉奇和其他热情的核能鼓吹者没有留意到：这个项目的运行权力掌握在莫斯科手中，而电站大部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来自乌克兰之外。乌克兰从切尔诺贝利获得电力，却对核电站内部事务几无发言权。与苏联其他所有核设施以及乌克兰大部分工业企业一样，这座核电站归属苏联政府部门管辖。这座核电站与在这里发生的那次事故都以俄语对附近那座城市的拼写命名，并为世界所知——也就是切尔诺贝利（Chernobyl、俄语Чернобыль），而非乌克兰语的乔尔诺贝利（Chornobyl、乌克兰语作Чорнобиль）。

1986年4月26人，由于一次失败的涡轮机测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直到此时，乌克兰领导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他们对自身的命运以及这个共和国的命运多么缺乏掌控。一些乌克兰官员被邀请加入中央政府负责处理事故后果的委员会，却几乎没有发言权，只能听从莫斯科以及莫斯科派出的现场代表的指令。他们负责组织核电站周围30千米范围内居民的重新安置工作，却不被允许将事故的规模和它对自己同胞健康的威胁告知全体乌克兰人。这个加盟共和国的政府对乌克兰命运掌控权的有限程度在1986年5月1日早上变得昭然若揭。这一天发生了风向改变，原本向北和向西的风向转为向南，使辐射云飘向乌克兰首都。这座城市拥有超过200万人口，而辐射状况正在发生快速变化。考虑到这一点，乌克兰当局试图说服莫斯科取消原计划的国际劳动节游行，却没能成功。

5月1日，当党的组织者们让组成队列的学生和工人走上基辅大街，准备开始游行时，共和国领导人中有一位非常引人注目地缺席了，那就是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在五一节游行时迟到。当他乘坐的豪华轿车最终出现在基辅的主要街道和游行的核心路段赫雷夏蒂克大街时，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发现谢尔比茨基流露出明显的不安。“他告诉我：要是你搞砸了这次游行，就请直接退党吧。”这位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对他的助手们说。没有人不明白这句话里那个没被提到名字的“他”是谁——整个国家里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威胁将谢尔比茨基开除出党，那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尽管辐射水平正在快速上升，戈尔巴乔夫仍旧命令他的乌克兰下属照常执行任务，以向全国和全世界显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而切尔诺贝利的爆炸也不会威胁到民众的健康。谢尔比茨基和其他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却觉得除了听从莫斯科的命令之外别无选择。游行按原计划举行，他们只能将它从四个小时缩短到两个小时。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反应堆的爆炸和部分熔毁将约5 000万居里的辐射量释放到大气中，这相当于500颗广岛原子弹释放出的辐射量。仅在乌克兰就有超过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受到辐射污染，比整个比利时的面积还要大。光是反应堆周围的隔离区面积就达2 600平方千米。爆炸发生后一周之内，有9万多居民从隔离区被疏散出来，其中大部分人从此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近5万名核电站建筑工人和运营人员居住在普里皮亚季城。这座城市至今仍处于遗弃状态，成为一座现代的庞贝城和苏联最后岁月的纪念碑。在普里皮亚季城中建筑物的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共产主义建设者们的肖像，也能看到赞美共产党的口号。

在乌克兰，有2 300个定居点和超过300万人受到辐射尘的直接影响，因依赖第聂伯河和其他河流水源而受到这场爆炸威胁的人口则有近3 000万。这次事故对乌克兰北部的森林地带也是一场灾难。这里是乌克兰最古老的定居区域，千百年来当地居民一直在这里躲避来自草原的入侵者。现在这些曾让人们免于游牧民族伤害、曾为1932—1933年大饥荒幸存者提供食物的森林却变成了毁灭之源。树叶成了辐射源，而辐射这一看不见的敌人让人无从躲避。这是一场世界级的灾难，而乌克兰是除了毗邻的白俄罗斯之外对这场灾难感受最为痛切的地区。

辐射影响了从党的领导层成员到普通大众的每一个人，因此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乌克兰党内和社会各界对莫斯科及其政策的不满急剧增长。当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动员乌克兰人面对这场灾难的后果并打扫中央留下的烂摊子时，许多人不禁要问自己：为何他们要拿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命来冒险？他们在餐桌旁抱怨中央的失败政策，向他们信任的人吐露失望情绪。然而乌克兰的作家们不愿保持沉默。在1986年6月的一次乌克兰作家协会会议上，许多在10年前曾为核能的到来欢呼的人，开始将它谴责为莫斯科用来控制他们的国家的工具。伊凡·德拉奇是引领这场攻击的人之一。他的儿子是基辅一所医学院的学生，在事故后不久就被派往切尔诺贝利——没有接受合格的培训，也没有防护设备——并因受到辐射而中毒。

切尔诺贝利的灾难让乌克兰觉醒了，让人们开始思考诸如加盟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和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这样的基本问题，并促成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多年死寂之后的第一场公共大讨论——这个社会正在努力夺回自己的发言权。“60年代”的领军人物站在了这场运动的最前列，他们中包括作家尤里·谢尔巴克[9]。谢尔巴克在1987年年末成立了一个环保团体，后来发展成为绿党。环保运动将乌克兰视为莫斯科行为的牺牲品，因此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乌克兰最早的民族动员形式之一。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不仅让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与他疏远，还让拥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充满民族意识的知识阶层动员起来反对身为统治上层的前者。结果证明，乌克兰的这两个彼此冲突的群体——共产党体制内集团和新生的民主反对派

——将会在对莫斯科统治集团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反对中找到共同利益。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60年代”的领军人物。他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的影响，也受到苏联和东欧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60年代宣传的社会主义改革理念启发。1968年“布拉格之春”[10]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兹德涅克·姆利纳日[11]正是戈尔巴乔夫5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读书时的室友。戈尔巴乔夫与他的顾问们希望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让它变得更有效率，“对用户更友好”，或者如1968年苏联入侵之前布拉格人所说：要创造一种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首先从“加快”苏联经济发展着手。这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却强调对现有机构和资源进行更有效率的利用。然而此时的苏联经济能加快的只有衰落的速度。正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笑话所说：“我们曾站在深渊边缘，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加速”的话语很快就让位于“改革”政策，这要求莫斯科的各部放弃决策权，并且不像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将之转交给各地区和各加盟共和国，而是交给各个独立的企业。这令中央的官僚机构和各地的领导人感到头痛，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更让他们寝食难安。如今下层也可以对他们发出批评，并且受到莫斯科媒体的鼓励。“改革”政策在一开始让这位新领导人和他的改革派观点获得了来自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阶层的支持。这些人已经受够了勃涅日涅夫时代对公共生活的控制和官方宣传中的谎言。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从社会下层进行政治动员创造了机遇。在乌克兰，那些60年代和70年代的异议者刚刚从古拉格系统中被放出来不久，就成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气氛的先锋。1988年春，他们建立起“改革”时期乌克兰第一个公开的政治组织——乌克兰赫尔辛基同盟[12]。这个同盟的大部分成员此前都属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包括其领导者、在莫斯科接受律师训练的律师列夫科·卢基扬年科[13]在内——他在监狱里和国内流放中度过的岁月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是一个创建于1976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以监督苏联政府履行1975年夏天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所确定的人权义务为己任。如果说赫尔辛基小组和后来的赫尔辛基同盟的许多成员在60年代时都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期待恢复“列宁路线”的民族政策的话，那么1972年彼得罗·谢列斯特被调离乌克兰和同期发生的逮捕行动则让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彻底破灭。赫尔辛基运动为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人权理念，其中包括个人和民族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权利。

在“改革”时期的头几年，对民族文化尤其是语言的保护是业已被动员起来的乌克兰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乌克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组织就是

乌克兰语言（保护）协会。这个协会创建于1989年，而到了当年年底，它已经拥有15万会员。乌克兰知识分子们认为乌克兰民族的根本——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正在受到威胁。其中语言受到的挑战尤其突出。根据1989年的普查结果，乌克兰5100万人口中有73%是乌克兰族，然而这部分人中只有88%声称乌克兰语为他们的母语，而将乌克兰语当作常用语言的更是只有40%。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进程——当乌克兰人从乡村迁入城市，他们在文化上就被俄罗斯化了。截至80年代，大部分乌克兰城市的人口仍以乌克兰人为主（像顿涅茨克这样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城市是极为少见的例外），然而，除了位于西乌克兰的利维夫之外，所有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常用语言都是俄语。乌克兰语言协会希望逆转这一进程，将那些不常说乌克兰语却自称乌克兰人并认为自己的子女应当说乌克兰语的人当作首要的宣传目标。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到了80年代晚期，苏联往往被描述为一个不仅未来不明确、连过去也不明确的国家。与其他非俄罗斯民族一样，乌克兰人努力尝试恢复被苏联官方史学和宣传掩盖数十年之久的历史。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的历史著作重新进入了公共空间，印数达到数十万册，成为这场“恢复”运动的起点。作品得到重印的还包括20年代的一批作家和诗人——他们是所谓“被砍头的乌克兰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其中许多人没能活过30年代的恐怖时期。与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记忆协会[14]在乌克兰也成为挖掘“大清洗”时代斯大林政权的罪行的领导者。在这一方面，乌克兰知识分子们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属于他们祖国的故事要讲。其中第一个故事就是此前被当局完全掩盖的1932—1933年大饥荒，第二个故事则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反抗军战士们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进行的武装抵抗苏联运动。

大饥荒是乌克兰东部记忆的一部分，而民族主义抵抗和暴动则是西乌克兰的特征，然而某一历史叙事想象的复活却能将东部和西部联合起来，那就是关于哥萨克历史的故事。彼得罗·谢列斯特在1972年被调离之后，当局曾对历史学家和作家群体中所谓的“亲哥萨克派”进行了一次清洗，将对哥萨克历史的兴趣等同于民族主义思想的表达。此时，随着官方历史世界观的崩溃，哥萨克神话重回公众视野。没错，正如勃列日涅夫的宣传家们所认为的，这一神话的确与民族主义思想紧密相关。

乌克兰活动家们——其中许多人来自加利西亚和西乌克兰——在1990年夏天组织了一场“东进”，即对第聂伯河下游地区扎波罗热和哥萨克遗迹的一次大规模朝圣活动，旨在“唤醒”这个加盟共和国东部地区民众的乌克兰身份认同。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成千上万的民众动员起来，并普及了另一版本的乌克兰历史——与那个在仍旧十分亲共的南乌克兰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版本不同。第二年，原本反对这次“东进”的当局决定加入日渐崛起

的哥萨克神话潮流，在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都举办了哥萨克历史纪念活动，却没能收获期待中的政治红利。党和党的信用正在急剧崩溃之中。

“得有多白痴才会想出‘改革’这个词？”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时，谢尔比茨基对他的下属们说道。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对基辅的访问中要求经过克格勃筛选的民众向地方领导层施加压力。谢尔比茨基当时在场，他转向自己的助手，指向自己的脑袋，暗示戈尔巴乔夫头脑混乱，并问道：“那他到底还有什么人可依赖呢？”1989年9月，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对勃列日涅夫政权在政治局中的最后遗老——谢尔比茨基本人——发动进攻了。他在当月来到基辅，告知当地共产党领导层：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表决同意将谢尔比茨基赶出政治局。于是乌共中央委员会也别无选择，只能免去谢尔比茨基的第一书记职务。不到半年，谢尔比茨基选择了自杀：他无法面对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无法面对他一生维护的那个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终结。

在不止一个意义上，1989年都是乌克兰政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首先，随着第一次半自由的苏维埃议会选举，大众政治得以兴起；其次，第一个大众政治组织“人民改革运动”[15]得以出现，这个被简称为Rukh（运动）的组织的成员数量在1989年秋天就达近30万，到1990年年底又翻了一倍还多；最后，曾被斯大林政权赶入地下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也在这一年被合法化，其成员数以百万计。1990年，新的乌克兰议会选举更是戏剧性地改变了乌克兰的政治版图。民主派代表们组成了被称为“人民会议”的党团。尽管“人民会议”的成员仅占议会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却改变了乌克兰政治的基调。同年夏天，乌克兰议会追随波罗的海诸加盟共和国议会和俄罗斯议会的脚步，宣布乌克兰为主权国家。这次宣言并未确定乌克兰退出苏联，却将乌克兰法律置于苏联法律之前。

中央无力制止各加盟共和国对自己主权的确认。苏联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此时自身难保。共产党上层已经离他而去，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知识阶层也不再支持他。他的经济改革让整个经济体系失去了平衡，让产量数据出现螺旋下降，并让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共产党巨头们认为这场改革威胁他们的权力，被他们认为注定失败，并将进一步让他们的地位难保，因此对之十分不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则认为这场改革还不够激进，实施得也过于缓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相互敌对的群体将戈尔巴乔夫，进而将整个中央视为共同的敌人。对主权和最终的完全独立的追求成为这些在乌克兰政治光谱中处于对立的势力实现合作的平台。

由于历史的原因，乌克兰各个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大众动员模式。在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布科维纳——也就是基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被划归苏联的地区——大

众动员模式更接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遭苏联吞并的波罗的海诸国的模式。在这些地区，从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打着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号，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并取得了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共产党中的精英集团尽管满心疑虑，却仍不肯放弃权力——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缘故，他们的继续存在取决于他们在共和国议会和地方议会中赢得选举的能力。当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56岁的沃里尼亚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16]为其新主席时，这名新领导人来自西乌克兰的事实看上去仍无足轻重。然而时代正在发生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让议会在政府体系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分支。到了1990年年底，老谋深算的克拉夫丘克已经成为乌克兰权力最大也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他是唯一能与正在兴起的、主要植根于西部地区的反对运动对话的乌克兰官员，在共产党上层集团中也有相当多的支持者——这些人谋求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自治，被称为“持主权立场的共产党人”。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克拉夫丘克展现出真正的政治才能。他在各个议员群体中游刃有余，操纵议会向取得主权并最终取得独立的方向前进。克拉夫丘克遭遇的第一次能力考验发生在1990年秋天。由于受到立陶宛在当年3月宣布独立的警示，也由于其他加盟共和国中日渐兴起的独立运动，戈尔巴乔夫屈服于来自其政府中强硬派的压力，默许了对民主自由化的反击。在乌克兰，占议会多数的共产党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人们在议会大厦附近示威，并批准逮捕了议会中人民会议的一名成员。然而事态的演变让共产党强硬派们大吃一惊。1990年10月2日，数十名来自基辅、利维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学生冲进了基辅城中的十月革命广场（后来的独立广场，又被称为“玛伊当”[17]）开始绝食抗议。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乌克兰政府总理辞职以及乌克兰退出新的联盟条约谈判——那是戈尔巴乔夫为挽救苏联而提出的方案，将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

面对学生的绝食，当局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反应。政府出动了警察以驱散抗议者，基辅市议会却允许抗议继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绝食抗议者增加到150人。当政府组织其支持者驱赶学生时，近5万名基辅人来到广场上保护绝食的学生。很快，基辅的所有大学都开始罢课。抗议者们向议会进发，占领了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一方面受到街头抗议的压力，一方面被克拉夫丘克和议会温和派劝说做出让步，议会中占多数的共产党最终决定让步。他们允许学生在电视上提出自己的诉求，还解除了参与新联盟谈判的政府首脑的职务。这是乌克兰学生和整个乌克兰社会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1990年10月在基辅市中心发生的事件在后来被称为“第一次玛伊当”。第二次玛伊当将会出现在2004年，第三次则会在2013年和2014年发生。

1991年8月1日，美国总统乔治·H. W.布什从基辅飞往莫斯科以促成乌克兰

留在苏联内部。此时乌克兰的政治团体因目标不同已分为两派。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的少数派希望完全独立——乌克兰国内的独立呼声在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之后日益高涨。议会中占多数的共产党人想要的则是在一个改革后的联盟中拥有更大的自治权——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戈尔巴乔夫尝试用武力阻止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独立行动，却在1991年年初遭到失败。随后他呼吁用全民公投来决定联盟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公投于1991年3月举行，投票者中有70%支持成立一个经过改革的新联盟。戈尔巴乔夫也重启了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谈判——谈判对象包括俄罗斯的鲍里斯·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试图说服他们组成更松散的联盟。他与这些人于1991年7月下旬达成协议，然而乌克兰却不打算签字。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他的代表团主张的是另一种解决方案，即由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组成一个邦联，而乌克兰的加入需要满足它自己提出的条件。

在对乌克兰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选择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他的讲话被美国媒体称为“软弱的基辅讲话”，因为这位美国总统竟然不愿支持乌克兰民族民主主义派代表们对独立的追求。布什倾向于让波罗的海诸国独立，但仍将乌克兰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结为一体。他不愿在世界舞台上失去一个可靠的伙伴——戈尔巴乔夫和他所代表的苏联。此外，苏联出现不受控制的解体的可能性也让布什和他的顾问们感到担忧，因为这可能导致各个拥有核武器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除了俄罗斯之外，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土上都有核武器部署。布什在对乌克兰议会的演讲中呼吁他的听众放弃“自杀式的民族主义”，并避免将自由与独立混为一谈。占多数的共产党人对布什的演讲表示热烈欢迎，而占少数的民主派则感到失望：华盛顿、莫斯科和乌克兰议会中的共产党代表结成的联盟对乌克兰的独立构成了巨大障碍。谁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月结束之前，乌克兰议会竟以几乎一致通过的方式选择了独立。到了11月底，原先担心这个后苏联国家（post-Soviet state）出现混乱和核战争的白宫也对这次投票表示了支持。

促使乌克兰议会中的保守派代表改变想法，乃至在后来让整个世界改变想法的，是1991年8月19日强硬派在莫斯科发动的反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这次政变事实上在前一天开始于乌克兰，更准确地说，是在克里米亚——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此地避暑。8月18日傍晚，政变者出现在位于福罗斯[18]附近的戈尔巴乔夫的海滨别墅门口，要求他实行军事戒严。戈尔巴乔夫拒绝签字，迫使他们自己采取行动。第二天，政变者们在克格勃首脑、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的领导下，宣布全苏联进入紧急状态。以克拉夫丘克为首的乌克兰领导层拒绝在乌克兰实行紧急状态措施，然而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对政变提出反对。当克拉夫丘

克呼吁乌克兰人民保持冷静时，叶利钦却带领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并在军队与抗议者之间的第一场流血冲突发生后迫使军队撤出了莫斯科。政变一方的犹豫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这场政变开始之后不到72小时就结束了，政变者们也遭到逮捕。莫斯科人走上街头，庆祝自由战胜了独裁，也庆祝俄罗斯战胜了苏联中央政府。

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却无法夺回他的权力。事实上他已成了另一场政变的牺牲品。这一次的政变领导者是叶利钦，他利用中央的衰弱，开始了俄罗斯接管联盟的过程。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撤回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队首脑的命令，并中止了苏联共产党的活动，这让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只能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俄罗斯正在成为联盟的实际控制者。这一意外的转折让1991年8月之前仍希望成为联盟一部分的各共和国对联盟失去了兴趣。此时乌克兰成了脱离联盟的领导力量。

1991年8月24日，也就是叶利钦接管联盟政府之后一天，乌克兰议会就独立问题举行了投票。“鉴于1991年8月19日的政变为乌克兰带来的致命威胁，也鉴于乌克兰千年以来的国家建构传统，”由列夫科·卢基扬年科（古拉格系统中服刑最长的囚犯，此时的乌克兰议会成员）起草的《独立宣言》这样写道，“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庄重宣布乌克兰从此独立。”投票结果出乎包括卢基扬年科在内的所有人意料：346名代表赞成独立，5人弃权，只有2人反对。1990年春天议会第一次会议以来一直反对独立的共产党多数派似乎消失了。克拉夫丘克和他的“持主权立场的共产党人”团体由于没有反对政变而遭到反对派的抨击，选择了向民族民主主义者靠拢，还将强硬派也一并带了过来——后者感到自己被莫斯科背叛，而且受到叶利钦对党发动的攻击的威胁。当投票结果出现在屏幕上，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议会大厦外聚集的人群也陷入了狂喜：乌克兰终于独立了！

卢基扬年科的宣言在提到乌克兰国家的千年历史时，指的是由基辅罗斯所开创的传统。事实上，他的宣言是20世纪以来乌克兰人的第4次宣布独立的尝试：第一次于1918年发生在基辅及随后的利维夫；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外喀尔巴阡；第三次是在1941年的利维夫。以上的独立尝试都发生在战争时期，最后都以悲剧收场。这一次的结果会有不同吗？答案将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揭晓。全民公投定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与之前确定的第一届乌克兰总统选举在同一天。这次公投将会确认或推翻议会选择独立的投票结果。公投方案的重要性体现在不止一个方面。在8月24日，这个方案让占议会多数的共产党人中那些对独立心存疑虑的人选择了投下赞成票，因为他们的投票毕竟还不是最终决定，仍有可能在将来被推翻。此外，公投还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个脱离联盟同时又不与中央发生公开冲突的

机会。在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3月举行的前一次公投中，约70%乌克兰人选择留在一个经过改革的联盟内，然而这一次公投将让乌克兰彻底独立出来。

戈尔巴乔夫相信支持独立的乌克兰人绝不会超过70%，叶利钦却没有这样的信心。1991年8月底，也就是乌克兰议会投票选择独立之后不久，叶利钦就吩咐他的新闻秘书发出一份声明：如果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俄罗斯将有权对这些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提出质疑。叶利钦的新闻秘书暗示克里米亚和包括顿巴斯产煤区在内的乌克兰东部将成为可能的争议地区，如果乌克兰坚持独立，它将面临被分割的威胁。随后叶利钦又派出了以他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兹科伊[19]将军为首的高级代表团，以迫使乌克兰扭转立场。然而乌克兰人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让鲁兹科伊两手空空地回到莫斯科。恐吓没能奏效，而叶利钦既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也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兑现他的威胁。

1991年9月，乌克兰进入了一个政治新纪元。6名候选人参选总统，而且这6人在竞选中都支持独立。克拉夫丘克说服克里米亚当局暂时搁置将克里米亚半岛从乌克兰独立出来的计划，留待另一次公投来决定。民意调查显示：在所有民族团体和所有地区，独立的支持率都在上升。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是乌克兰最大的两个少数民族群体，分别有超过1 100万人和近500万人，而这两个团体也都表达了对乌克兰独立想法的支持——在1991年11月，有58%的乌克兰俄罗斯人和60%的乌克兰犹太人支持独立。少数民族也开始拥护乌克兰的国家路线。他们对莫斯科比对共和国的首都表现出了更多的担忧和疑虑，这是1918年不曾出现的现象。

1991年12月1日，各种族群背景的乌克兰人都走进投票站决定他们的命运。面对投票结果，哪怕是最乐观的独立派也感到难以置信——投票率高达84%，其中支持独立的选民超过90%。西乌克兰地区走在了前面：加利西亚的捷尔诺波尔州有99%的投票者选择独立。然而中部、南部乃至东部也并未落后太多。中部的文尼察州、南部的敖德萨州和东部的顿涅茨克州的独立支持率分别高达95%、85%和83%。哪怕是克里米亚，支持独立的选民也超过了半数：塞瓦斯托波尔有57%的人选择独立，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独立支持率也有54%。（当时克里米亚人口中俄罗斯人占66%，乌克兰人占25%，而不久前刚刚开始返回故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只占1.5%。）在中部和东部，许多人既投票选择独立，也支持克拉夫丘克竞选总统。克拉夫丘克在普选中赢得了61%的选票，在除加利西亚之外的所有地区取得多数。加利西亚地区的胜利则归于利维夫地区政府首脑、在古拉格系统中被囚禁多年的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20]。乌克兰选择了独立，将其未来托付给一名被许多人认为既能在乌克兰众多宗教派别和民族之间取得平衡，也能在这个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历史和独立未来之间取得平衡的候选

人。

乌克兰的独立投票宣告了苏联的终结。公投的参与者们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历史。那些尚依附于莫斯科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也因乌克兰而获得解放。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在白俄罗斯贝拉维察森林[21]的一座狩猎屋里与克拉夫丘克会面，最后一次尝试说服克拉夫丘克签署一份新的联盟条约。克拉夫丘克拒绝了，并将包括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在内的乌克兰各州的公投结果告知叶利钦。叶利钦只得退却，他告诉新当选的乌克兰总统：如果乌克兰不打算签字，那么俄罗斯也不会签。叶利钦曾不止一次向美国总统解释说：如果联盟中缺少了乌克兰，俄罗斯就会在数量和选票上被各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压倒。乌克兰和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一个联盟如果既没有乌克兰也没有俄罗斯，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对别的加盟共和国没有吸引力。于是，三位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在贝拉维察创建了一个新的国际性政治体，即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中亚各共和国于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苏联从此不复存在。

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了他的辞职讲话。苏联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元老院[22]的旗杆上降下，被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代替。基辅选择的国旗则为蓝黄两色，其中不再有对莫斯科与基辅之间关系的象征。不同的乌克兰政治力量曾在各种情势下进行过4次失败的独立尝试，而今却不仅结成一体，还获得了独立，从此走上自主道路。几个月前还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帝国已烟消云散，一个新的国家已经诞生。从前的共产党上层与年轻而雄心勃勃的民族民主主义领袖们携手创造了历史，让乌克兰成为欧洲最后一个帝国的掘墓人。现在，他们还需要找到办法，创造一个未来。

---

[1] Dashava，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镇。

[2] Shebelynka，位于今乌克兰东部哈尔基夫州。

[3] Yurii Andropov（1914—1984），苏联政治家、苏共中央总书记（1982—1984年在任）。

[4] 原文作12月，有误。

[5] Konstantin Chernenko（1911—1985），苏联政治家、苏共中央总书记（1984—1985）。

[6] Boris Yeltsin（1931—2007），苏联和俄罗斯政治家、俄罗斯首任总统

（1991—1999年在任）。

[7] Gennadii Kolbin（1927—1998），苏联政治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6—1989年在任）。

[8] Dinmukhamed Konayev（1912—1993），苏联政治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4—1986年在任）。

[9] Yurii Shcherbak（1934年生），乌克兰作家、编剧、政治家、传染病学家，曾任乌克兰环保部长（1991—1992年在任）和乌克兰驻以色列、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大使。

[10] Prague Spring，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始于1968年1月5日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及华约成员国于当年8月20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1] Zdeněk Mlynář（1930—1997），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布拉格之春”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是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的有力支持者和智囊。

[12] Ukrainian Helsinki Union，乌克兰共和党的前身。“赫尔辛基”一词来自1975年37个国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达成的《赫尔辛基协议》。1976年创立的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Ukrainian Helsinki Group）和1988年创立的乌克兰赫尔辛基同盟都主张苏联政府应实现《赫尔辛基协议》中对人权的保护。

[13] Levko Lukianenko（1927年生），乌克兰政治家，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

[14] Memorial Society，在多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活动的历史和人权组织，致力于记录和公开苏联时期的历史，同时也关注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权问题。

[15] The Popular Movement for Perestroika，乌克兰右翼政党，现名“乌克兰人民运动”。

[16] Leonid Kravchuk（1934年生），乌克兰首任总统（1991—1994年在任）。

[17] Maidan，基辅独立广场的简称，为乌克兰语“广场”（Майдан）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

[18] Foros，克里米亚半岛南岸城镇。

[19] Aleksandr Rutskoi（1947年生），俄罗斯政治家、军人，曾任俄罗斯历

史上唯一联邦副总统（1991—1993年在任）。他在1993年的莫斯科十月事件中被捕，后于1994年获得大赦。

[20] Viacheslav Chornovil（1937—1999），乌克兰政治家，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代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

[21] Belavezha Forest，亦作比亚沃韦扎森林（波兰语作Białowieża），横跨波兰和白俄罗斯两国，是欧洲现存唯一的原始森林。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总统舒什克维奇在此签署协议，宣布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22] Senate building，位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座建筑，修建于1776年至1787年，最初是俄罗斯帝国的立法机构所在地，现为俄罗斯总统府的办公地点。

第26章
独立广场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讲话标志着苏联的正式终结，然而它的解体过程在那一天才刚刚开始。苏联的遗产不仅是凋敝的经济，还有一套社会经济基础结构，还有军队、思想方法，以及被共同的历史和政治文化绑在一起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无论取代这个失落帝国的是一个由真正独立国家组成的联合体，还是一个新版本的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政治体，其结果都不会是理所当然。戈尔巴乔夫辞职之后，新当选的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他的助手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包括说服他们的俄罗斯同侪不要让独联体变成苏联的化身。这并非易事。

1991年12月12日，在俄罗斯议会批准独联体协议之际，鲍里斯·叶利钦对议会发表讲话说：“鉴于当今的局势，唯有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让那个在许多个世纪中建立起来、如今却几近丧失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得以存续。”2014年3月，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叶利钦的继承者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他的前上司的这番话做出了响应：“在独联体诞生之初，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共和国都有许多人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新的主权联盟。”然而，就算当时乌克兰有一部分人这样想，他们也没有进入乌克兰议会，因为乌克兰议会在1991年12月20日发表了一篇立场相反的声明：“因其法律地位，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受国际法之约束。乌克兰反对将独联体变成一个拥有自身管辖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国家结构的做法。”

无论叶利钦的意图为何，乌克兰在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并打算利用独联体建立的协商机制来讨论“分手”的条件，而不是“复婚”的条件。俄罗斯将独联体视为一个重新整合后苏联时代空间的工具，乌克兰则坚持从莫斯科完全独立出来。1993年1月，乌克兰拒绝签署《独联体宪章》（Statute of the Commonwealth），因而没有成为这个它在两年前参与创建的组织的正式成员，这让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浮出了水面。乌克兰将在经济方面积极参与独联体的统筹和行动，但在军事方面则不会如此。《独联体宪章》从未得到乌克兰的签署。在整个90年代期间，基辅方面还多次拒绝与其他独联体成员国签署各种共同安保协议。在苏联武装力量的将来、核武器库控制权以及苏联黑海舰队处置方案等问题上，基辅都与莫斯科有着严重的分歧。

乌克兰领导层在早些时候已经决定以驻扎在乌克兰境内的苏联陆军和海军部队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海军。波罗的海诸国要求苏军离开，

并从零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而乌克兰人却不能这样做：驻扎在乌克兰的部队规模庞大，拥有超过80万名官兵，并不打算自愿离开。他们无处可去，因为俄罗斯当时已经被数以十万计从中东欧地区回归的部队人员的安置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为获取完全的主权，那些中东欧国家正在脱离莫斯科的影响范围，并一去不返。

乌克兰领导层把转化苏联军事力量为乌克兰部队的任务交给了时年47岁的科斯坦丁·莫洛佐夫[1]将军。他当时是驻扎在乌克兰的一支空军部队的司令，在1991年秋天成为乌克兰首任国防部长。莫洛佐夫出生于东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有一半俄罗斯血统，但他在1991年12月6日（贝拉维察会议和独联体成立之前不久）宣誓忠于乌克兰，将自己的命运与乌克兰独立的前景联结在一起。1992年1月3日，第一批苏联军官向独立的乌克兰宣誓效忠。乌克兰对80多万人苏联陆上武装力量的接收在1992年春天全部完成。军官们可以自由选择效忠乌克兰并留在军中服役或迁往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地区。驻乌苏军部队中总计有7.5万俄罗斯人。大约1万名军官拒绝宣誓，选择了退役或调往他国。苏军中的普通士兵和士官各自返回家乡——无论他们来自何处。新兵则都从乌克兰招募。

1992年1月，苏联黑海舰队各部也开始宣誓效忠乌克兰。然而黑海舰队司令伊戈尔·卡萨托诺夫[2]上将命令所有人员登船，并离港出海，给乌克兰对黑海舰队的接收造成了一个大问题。这在1992年5月导致了俄乌关系上的第一次主要危机。当年9月，两国总统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对黑海舰队进行分割，从而避免了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然而分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支拥有超过800艘舰艇和近10万人军人的舰队一度完全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俄罗斯在1995年将舰队中18%的舰艇交给乌克兰，却拒绝离开塞瓦斯托波尔。1997年，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为俄国舰队（包括300多艘舰艇和2.5万名军人）2017年之前继续在塞瓦斯托波尔驻扎提供了法律支持。尽管乌克兰在对黑海舰队的争夺中落败，协议却为签署保障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俄乌友好条约奠定了基础。双方在1997年签署条约，然而俄罗斯议会却花了两年时间才将之批准。随着这一过程的结束，乌克兰与其俄罗斯邻居和前帝国主宰的“和平分手”似乎终于得以完成。

到20世纪90年代末，乌克兰已经解决了它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和领土问题，创建了自己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并在外交和法律上奠定了加入欧洲政治、经济和安全组织的基础。长久以来，让乌克兰成为欧洲民族和文化大家庭的成员一直是乌克兰知识分子们心中的梦想——从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到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共产主义领袖米科拉·赫维列沃依都是如此。1976年，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的第一份正式宣言中就体现了这样的欧洲观点。“我们乌克兰人生活在欧洲。”赫尔辛基小组宣

言的开篇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乌克兰是联合国的正式创始成员，却未能受邀参加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然而，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仍旧相信苏联在赫尔辛基承诺的人权义务同样适用于乌克兰。因为坚持这样的看法，他们被投入监狱，在古拉格系统中或国内流放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乌克兰在1991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出现，让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就机制上而言，独立意味着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与其苏维埃历史分道扬镳，也可以对其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革，并抵消莫斯科对其前属地依旧拥有的巨大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乌克兰主权的完全实现与其加入欧洲国家大家庭的追求紧密地联结了起来。在这一系列彼此相关的任务中，乌克兰精英阶层的政治技巧、乌克兰各地区的统一以及关于乌克兰与其最大和渊源最深的邻国俄罗斯之间兄弟关系的苏联时代话语都将受到考验。

1994年1月，在美国的调解下，乌克兰与西方签署了一项协议，成为乌克兰与西方的政治关系正式开启的标志。根据协议，乌克兰放弃了它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就其潜力而论，那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核武器库。同年12月，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在布达佩斯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向作为无核国家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尽管基辅有许多人认为放弃核武器不够审慎[2014年，曾在《布达佩斯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中承诺保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俄罗斯却试图分裂乌克兰，佐证了这些怀疑者的看法]，但这一做法在当时仍可以带来重大利益：曾经拒绝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乌克兰终结了其在国际上的事实孤立状态，并成为接受美国外援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

1994年6月，乌克兰政府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这是欧盟与后苏联国家之间达成的第一个此类协议。同年，乌克兰成为独联体正式成员和参与成员中第一个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NATO，北约）达成和平伙伴关系[3]协议的国家。北约是西方国家在1949年冷战开始之际为保护西欧不受苏联威胁而建立的军事同盟，如今却开始改造自身。它开始在机制上与从前的东欧敌手（包括俄罗斯在内——在乌克兰与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协议之后一个月，俄罗斯也签署了同样的协议）建立沟通桥梁。1997年乌克兰与北约又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纲领，进一步加深了与北约的合作，并在基辅创建了一座北约情报中心。1998年，乌克兰与欧盟在四年前签署的合作协议生效。情况看起来令人乐观。然而，乌克兰知识分子关于让乌克兰成为欧洲国家一员的理想仍面临着巨大障碍。这些障碍大多来自乌克兰自身。

与许多后苏联国家一样，在其获得独立之后的头五年，乌克兰遭遇了因经

济衰退和社会混乱导致的巨大政治危机，并一直忙于解决总统府与议会这两个诞生于苏联最后岁月的政治动荡中的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俄罗斯在1993年9月解决了这一矛盾：当时叶利钦总统命令坦克向俄罗斯议会大厦开炮，俄罗斯副总统和议长也被控煽动反对总统的政变，遭到当局逮捕。叶利钦的顾问们改写了宪法，对议会的权力进行限制，将其变得更像是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橡皮图章，而非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乌克兰则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了总统与议会之间暴露出来的矛盾。克拉夫丘克总统同意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并在选举中失利。1994年夏天，他与他的继任者前总理列昂尼德·库奇马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后者曾是一名火箭设计师，并担任过欧洲最大的导弹工厂的领导。

在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中，乌克兰不仅成功做到了第一次让两名总统职位的竞争者交接权力，还保留了竞争性政治制度，并在法律上为一种可行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1996年，库奇马总统修改了苏联时期的宪法，但他是在与议会的合作中完成这一任务的，而议会也仍在乌克兰政治进程中保有其重要地位。乌克兰在民主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地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乌克兰的早期和晚近历史共同留下的遗产。它体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差异，在议会中得以表达，在政治角力场中以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成为复兴的共产党的根据地，而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由前古拉格系统囚犯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领导的“人民改革运动”中则有大量来自从前属于奥地利和波兰的西乌克兰地区的议会代表。然而，无论谁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其多数地位都是某种联合协议的结果，并必须与难以满足、不愿合作的反对派打交道。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能强大到将另一个团体摧毁或迫使其出局的程度。那段时期的乌克兰民主往往被称为“当然的民主”（democracy by default），并被证明是一件好事。在后苏联地区，完全出自政治设计的民主难以维持很长时间。

前殖民地官员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情结。基辅的精英阶层在面对其俄罗斯同侪时也是如此。一开始他们会以俄罗斯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挑战。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俄罗斯模式在乌克兰行不通——乌克兰与俄罗斯是不同的。这一点在乌克兰的宗教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乌克兰东正教会曾负责苏联地区60%的东正教社区，然而到了1992年它已经分裂为四个派别：脱离地下状态的希腊天主教徒、仍处于莫斯科管辖下的东正教徒、从属于独立的乌克兰东正教基辅牧首区的教徒，最后还有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它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同样不承认莫斯科的权威。克拉夫丘克总统尝试仿照俄罗斯对莫斯科牧首区的做法，将基辅牧首区转为事实上的国教会，却没能取得成功。库奇马总统的选择则是莫斯科牧首区下属的乌克兰东正教会，而他的努力同样遭到失败。

在21世纪来临之际，乌克兰的政治舞台仍如其刚刚宣布独立之后那样呈现出多样性。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也只能是它的差异化程度比从前更甚。最终，各股政治势力不得不接受现实：俄罗斯式的政治解决方案大部分时候都不适用于乌克兰。库奇马总统在2004年他第二个任期将近结束之际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此做出了解释。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乌克兰不是俄罗斯》（*Ukraine Is Not Russia*）。

乌克兰政治进程的民主性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其宣布独立后陷入的灾难性经济衰退。民主也往往因此受到指责。跟这种衰退比起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期乃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看上去都像是失去的天堂。从1991年到1997年的6年间，乌克兰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8%，国内生产总值（GDP）则惊人地缩水60%。最严重的衰退发生于1994年（这一年的GDP较上一年减少了23%），正是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和与欧盟签署第一份协议的那一年。这样的数据堪与美国在大萧条时期遭遇的衰退相比（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5%，GDP则下降了30%），而在严重性上则更有过之。

20世纪90年代的乌克兰遭遇了巨大困难。这10年接近尾声之际，近半数乌克兰人表示自己的钱几乎不够买吃的，而生活水平相对舒适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到3%。这种状况导致了更高的死亡率和更低的出生率。乌克兰的死亡率在1991年首次超过出生率。10年后，乌克兰政府进行了独立后首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数据为4 840万，比1989年最后一次苏联人口普查所得的人口数5 140万少了300万。

乌克兰再一次成为人口对外迁移的源头。为了赚得在国内无法挣到的收入，许多人长年累月在国外工作。他们的主要目的地包括富有石油和天然气财富的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和欧盟地区。另一些人则一去不返，乌克兰犹太人是这些人中的先行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80年代被禁止离开苏联，成为所谓“不准离境者”（refuseniks）。当局拒绝向这些人发放离境签证，将他们从大学开除，不允许他们进入政府工作，让他们成为二等公民。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离开了，而离开的人数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从1989年到2006年，超过150万名苏联犹太人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乌克兰犹太人。从1989年到2001年，乌克兰的总人口下降了约5%，而乌克兰犹太人的数量则令人震惊地减少了78%，从48.73万人下降到10.55万人。Paypal（贝宝）公司的共同创始人马克斯·列夫琴[4]一家和WhatsApp（瓦次普）公司共同创始人扬·库姆[5]都在这一时期离开了乌克兰。然而犹太人并非唯一希望离开的族群。许多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族群的成员同样向外迁移。此外，乌克兰还是来自独联体其他地区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非法移民的中转站。

造成这种急剧经济衰退的原因不胜枚举。苏联经济的崩溃不仅破坏了连接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纽带，也宣告了苏联军方采购的终结。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军事工业体系，乌克兰在这方面遭到的损失尤为惨重。与俄罗斯不同，乌克兰没有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来缓和这种打击。此外，挺过了苏联经济崩溃并成为乌克兰政府预算主要资金来源的乌克兰冶金工业体系完全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不得不接受这种宝贵商品不断走高的价格。然而，导致乌克兰经济衰退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乌克兰亟须一场经济改革，政府却裹足不前，并继续通过释放信用和发行更多货币的方式对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补贴。通货膨胀不可遏抑，在1992年达到了惊人的2 500%，最终将经济送上了急速下滑的轨道。

独立之后的最初几年，乌克兰政府不愿放弃对苏联时期的工农业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而这些企业对国家补贴的需求越来越高。当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它们时，在议会中却遭到反对。反对者大多是被称为“红色主管”的大型企业管理者。1995年，议会让6 300个国有企业免于私有化，此时已实现私有化的工业企业数量尚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私有化第一阶段以向全民发行票券的方式实行。“红色主管”们从这种方式中获益甚多。他们拥有了资产，却几乎没有可用于投资的资源，而缺少投资和重组的私有化无法振兴乌克兰的经济。到了1999年，近85%的乌克兰企业已转为私有，而它们的产值却不足全国工业总产量的65%。全国工业企业中有半数处于亏损状态。企业不论大小，最终都落入苏联时代的管理者和在政府中有关系的人手中。这些人维护垄断，限制竞争，让经济危机变得愈发严重。

乌克兰需要新的资产所有者和一个新的管理阶层来让经济走出泥潭。一个年轻、富于野心、冷酷无情的商人群体应运而生，满足了这两种需求。这些人与苏联时期的旧式计划经济没有瓜葛，而是在“改革”时期的经济乱局和20世纪90年代的黑帮斗争中出人头地。与俄罗斯的情况一样，这些人在乌克兰被称为“寡头”。寡头们成了私有化第二阶段的主要受益者——这一阶段国有资产的出售价格仅为其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寡头们的财富不仅来自创新和冒险，也来自逢迎、贿赂和跻身于“红色主管”阶层的努力。由于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急剧衰退，冶金工业成为90年代和21世纪初乌克兰最为有利可图的领域。在这段时间，全国超过半数的工业产值都来自东部的四个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是乌克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钢材的产地。

顿涅茨克集团的首脑里纳特·阿赫梅托夫[6]是新一代“钢铁大亨”群体之一。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取得了一家名为Lux的公司的领导权，而在当局眼中，这家公司兴起于犯罪活动，并与犯罪组织仍有关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大部分冶金工业资产则被两名本地商人瓜分：一为与库奇马总统家庭联姻的维克多·平楚克[7]，一为乌克兰首家大型私有银行的创立者

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8]。其他人同样参与到这场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私有化盛宴当中。尽管私有化进程有着腐败甚至往往是犯罪的色彩，但这场乌克兰经济的“寡头化”正好与经济衰退的结束同时发生。新千年伊始，乌克兰也进入了快速的经济复苏。不论是好是坏，寡头们都成为这个新的成功故事中的重要角色。

乌克兰工业私有化的大部分进程发生于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1994—2004年在任）的任期中。库奇马本人就曾是“红色主管”中的一员。作为这场最终让寡头们受益的私有化进程的主持者，他也从寡头们那里得到经济和政治支持。1999年，库奇马将自己包装成唯一能击败共产党人的总统候选人，赢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此时共产党人正利用经济衰退和困境来谋求重新崛起，并试图对民族民主主义派别进行分化。库奇马的主要“右翼”对手、人民重建运动领袖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则在离大选仅有数月时死于一场可疑的车祸。在他始于1999年的第二个任期中，库奇马成为新兴寡头群体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最高仲裁者。他还尝试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并让议会边缘化，然而没能取得想要的效果：乌克兰毕竟不是俄罗斯。

2000年秋，反对派领袖、乌克兰社会党首脑亚历山大·莫罗兹[9]公开了库奇马的一名卫士在其办公室取得的秘密录音，让库奇马走上了下坡路。这份录音记录了库奇马与涉及私有化密谋的地方官员之间的交易、他的受贿行为和他压制反对派媒体的企图。录音中提到了31岁的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10]——网络报纸《乌克兰真理报》（*Ukraïns'ka Pravda*）的创办人。库奇马希望将他抓起来送往俄军与叛军作战的车臣地区。2000年11月[11]，贡加泽的无头尸体在基辅附近的一座森林中被发现。法庭一直未能证实库奇马参与了这起谋杀，但听过那份被公开的录音的人坚信总统曾命令内政部长对这名记者实施威胁和绑架。

这起在乌克兰被称为“库奇马门”的丑闻成为乌克兰政局的转折点。它终结了总统府中正在出现的威权主义倾向，并暴露出总统政策中的腐败一面——在其第一个任期，库奇马曾因解决黑海舰队争端、保住克里米亚、说服俄罗斯承认乌克兰国界、让乌克兰转向西方以及实施被拖延已久的私有化等成绩而受到赞誉。此时这位总统却被证明还是一名骗子，甚至可能是杀人犯。包括前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乃至共产党人在内的反对派以“乌克兰不要库奇马”为口号，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公民们对这场号召取缔政治和经济腐败的运动做出了积极响应。此时苏联时期的受教育阶层已被经济崩溃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已经厌倦了官员的腐败、对政治活动的镇压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乌克兰需要改变。

库奇马挺过了录音丑闻的直接打击，但已无力阻止各种政治活动的兴起。领导库奇马政府反对者的新生力量不是像苏联时期那样来自政治体制之外，而是来自内部。那些希望终结政府腐败、改善乌克兰与西方之间因“库奇马门”而受损的关系并启动加入欧盟计划的人将维克多·尤先科[12]奉为他们的领袖。尤先科时年47岁，相貌英俊，曾担任政府总理。他来自东北部农业地区，与乌克兰东部那些政治和经济集团之间没有瓜葛。

维克多·尤先科曾在经济复苏之初主持过经济工作。在其1999年12月至2001年5月的短暂总理任期内，尤先科与他的副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13]堵住了让寡头们得以逃税的漏洞。他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税负，让乌克兰经济中很大一部分走出了阴影，并让国家财政收入得以增长。这反过来又让尤先科政府有能力支付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在尤先科的监管下，乌克兰的GDP停止了下滑，在2000年实现了6%的强劲增长，而同期的工业产值也增加了12%。在接下来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增长态势还将继续。尤先科在“库奇马门”事件期间被解职，随即成为“我们的乌克兰”党的领袖。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我们的乌克兰”党赢得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民众选票。

当年9月初，在选举中领先的尤先科突患重病。由于诊断结果不明确，尤先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的助手们将他送往维也纳的一家诊所。维也纳的医生们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这位“我们的乌克兰”党候选人的病情系被人下毒所致。这种毒药十分特别，是一种只有几个国家生产的二噁英[14]。正确的诊断挽救了尤先科的生命。尽管面容被毒药破坏，还需要依赖大量服用药物来减轻剧痛，尤先科仍然回到了竞选的道路上，并获得了更多支持。

2004年10月底，乌克兰公民们走向投票站，从24名总统候选人中选择自己的总统。尤先科的得票数处于领先，亚努科维奇则紧随其后。两人都赢得了近40%的选票，并进入了第二轮投票。那些未能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的支持者们大多都选择支持尤先科。11月21日，第二轮投票结束后，独立的出口民调显示尤先科占据明显优势，赢得了53%的民众选票，而亚努科维奇的得票率只有44%。然而，当受政府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公布官方计票结果时，大多数乌克兰选民都瞠目结舌：根据官方结果，亚努科维奇的得票率为49.5%，超过尤先科的46.9%。这是官方舞弊造成的结果。根据从亚努科维奇竞选团队成员之间的电话讨论中截获的信息，他们对选举委员会的服务器动了手脚，篡改了发往基辅的选举结果数据。

尤先科的支持者们被激怒了。约20万基辅人来到玛伊当（基辅的独立广场），对选举舞弊提出抗议。这成为“橙色革命”的开端——其名得自尤先科竞选阵营官方所使用的代表色。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抗议者不断从乌克兰其他地区赶来，让抗议集会的参加人数膨胀到50万。电视台的摄像

机将独立广场上的抗议画面传遍了全世界，让欧洲的观众自己发现了乌克兰，让他们第一次不是仅仅将乌克兰视为一个地图上的遥远角落。这些画面清楚地证明：乌克兰民众想要自由和公正。欧洲和整个世界不能袖手旁观。在选民的支持下，欧洲政治家们介入了乌克兰危机，在其解决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关键的人物是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15]。他说服库奇马总统支持宪法法院的决定——官方的选举结果因舞弊而无效。

2004年12月26日，乌克兰人在两个月内第三次走向投票站选举他们的新总统。不出预料，尤先科赢得了52%的选票，超过亚努科维奇的44%。这个结果也接近第二轮选举中的独立出口民调数据。“橙色革命”如愿以偿。然而这位总统是否能兑现革命的承诺，打败裙带资本主义，将这个国家从腐败中解放出来，让它跟欧洲走得更近呢？尤先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他的乌克兰变革之路要借助欧盟来实现。

尤先科总统将外交政策置于优先地位，并曾向他的一名助手透露说：加入欧盟是值得一生努力的目标。乌克兰的外交官们竭力将“橙色革命”为乌克兰在西方带来的正面形象转化为资本，打算赶上欧盟扩大化这趟列车，这是因为2004年欧盟吸纳了10个新成员国，其中有7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或加盟共和国。然而乌克兰太迟了，列车已经离站。尽管欧洲议会在2005年1月投票批准与乌克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将考虑在未来将其吸纳为成员，在扩大化问题上拥有决定权的欧盟委员会却更加谨慎。欧盟委员会没有对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而是向它提供了一份加强合作的方案。

历史的火车头没有将刚刚经历“橙色革命”的乌克兰像其一些西面邻居一样带进欧盟，这有几个原因，而其中一些超出了基辅所能控制的范围。德国和欧盟其他主要利益攸关者对已经发生的扩大化将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怀有疑虑。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对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地位提出了质疑。然而，乌克兰未能加入欧洲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乌克兰自身。后“橙色革命”时代的乌克兰国内矛盾重重，政府的政策既有重大成功，也有惊人的失败。

新政府结束了对政治反对派的迫害，并赋予公民和媒体言论自由。在经济方面，乌克兰的表现比可能的预期还要好。从2000年到2008年，尽管乌克兰经济受到全球衰退的冲击，其GDP仍然增长了一倍，达到4 000亿美元，并超过了1990年（苏联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的水平。然而，就生活和经商环境而言，尤先科政府没能把乌克兰变成一个更加公平的地方，对猖獗的腐败现象几乎无能为力。首先，尤先科阵营在2004年同意的宪法修改虽然取消了舞弊的大选结果，却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难以管理。根据亚努科维奇支持者们所要求并为尤先科所接受的宪法修正案，总理不再由总

统任命，而是由议会选举产生。从此总理成为乌克兰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独立角色。无论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独自推行改革，而尤先科在与他曾经的革命盟友、此时的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取得共识的问题上也举步维艰。

在尤先科任期结束的2010年年初，乌克兰已经弥漫着对他的执政的失望情绪。他与季莫申科之间的对立让乌克兰政坛变成了一出无休无止的肥皂剧，也损害了乌克兰的改革和加入欧盟的事业。总统努力普及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记忆，并大力颂扬与苏联政权做斗争的乌克兰反抗军战士，希望以此建立一种强大的乌克兰国家认同，却未能将这些努力转化为选举中的普遍支持。这种历史记忆的政治实际上让乌克兰社会陷入了分裂。尤先科向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追授“乌克兰英雄”称号的行为尤其引起争议。“班德拉事件”不仅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也在基辅和利维夫的自由派知识阶层中引发了强烈的负面反应，并在乌克兰和它的欧洲友人之间造成了隔阂。当时的观察员们认为尤先科的确打算将乌克兰带入欧洲，然而他心目中的那个欧洲仍滞留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而非21世纪初。

不光是乌克兰，整个后苏联地区都没能跟上时代的节奏。它们仍在努力实现从帝国臣仆到独立国家的转变，而中欧国家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快，乌克兰就陷入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将让我们回想起19世纪的许多问题，会引发外国的干预、战争、领土兼并，乃至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的想法。它会考验乌克兰保持独立的决心，也会对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基本元素提出挑战。

---

[1] Kostiantyn Morozov（1944年生），乌克兰首任国防部长（1991—1993年在任）。

[2] Igor Kasatonov，苏联及俄罗斯海军将领，退役时为俄罗斯海军第一副司令。

[3] Partnership for Peace，1994年1月，北约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与中欧、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方案。

[4] Max Levchin（1975年生），乌克兰出生的IT企业家，网络支付公司Paypal（贝宝）的创始人之一。

[5] Jan Koum（1976年生），乌克兰出生的IT企业家，通信软件公司WhatsApp（瓦次普）的创始人之一。

[6] Rinat Akhmetov（1966年生），乌克兰商人、寡头、乌克兰SCM控股集

团创始人和主席。

[7] Victor Pinchuk（1960年生），乌克兰商人、慈善家、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的女婿。

[8] Igor Kolomoisky（1963年生），乌克兰犹太商业寡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前州长。

[9] Oleksandr Moroz（1944年生），乌克兰政治家、乌克兰社会党创始人之一，曾两度担任乌克兰议长（1994—1998、2006—2007年在任）。

[10] Heorhii Gongadze（1969—2000），格鲁吉亚裔乌克兰记者。他于2000年9月16日被绑架失踪，同年11月，警方在基辅州的一座森林中发现疑似他的无头尸体，是为“贡加泽案”。时任总统库奇马涉嫌因录音丑闻而指使这起事件。

[11] 原文中作9月，有误。

[12] Viktor Yushchenko（1954年生），乌克兰前总理（1999—2001年在任）、前总统（2005—2010年在任）、2004年至2005年年初乌克兰“橙色革命”领袖。

[13] Yulia Tymoshenko（1960年生），乌克兰女政治家、商人、前总理（2005、2007—2010年在任）。她是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领袖之一。

[14] Dioxin，一类有机化合物的简称。尤先科体内验出的二英为四氯双苯环二英（TCDD）。

[15] Aleksander Kwaśniewski（1954年生），波兰政治家、前总统（1995—2005年在任）。

第27章
自由的代价

2014年2月20日清晨，博赫丹·索尔察尼克（Bohdan Solchanyk）搭乘火车从利维夫来到基辅。他是一名28岁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新锐诗人，在利维夫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任教，并正在华沙大学的一名导师指导下写作一篇关于选举实践的博士论文。索尔察尼克在2月的这个寒冷冬日踏上了基辅火车站的地面，但他旅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此时基辅没有举行选举，却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在2008年写下诗歌《我的革命在何方？》（“Where Is My Revolution?”）时，索尔察尼克就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在诗中吐露了他这一代人对“橙色革命”在2004年许下却从未兑现的承诺的失望情绪。

此时的乌克兰已经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2013年11月下旬，数十万人再次涌上基辅街头，要求改革，要求终止政府腐败，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索尔察尼克感到他应该与基辅的抗议者们站在一起。2月20日是他第四次投身到这场革命当中，也会成为他的最后一次。抵达基辅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索尔察尼克和其他数十人丧生于狙击手枪口之下。索尔察尼克的死亡将让他成为“神圣百人”中的一员——事实上在2014年1月到2月被杀害的抗议者超过了100人。这场屠杀抹去了22年来乌克兰政治大体上的非暴力色彩，并在乌克兰历史上翻开了戏剧性的新一页。乌克兰人在苏联解体时以和平方式赢得了民主，在1991年12月以选票赢得了独立，然而此时它们都陷入了不仅需要言语和游行还需要武器来保卫的境地。

导致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遭到大规模屠杀的诸多事件发端于2010年2月维克多·亚努科维奇——2004年独立广场抗议行动的主要目标——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这位新总统上台伊始就着手改变政治游戏规则。他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威权政府，因此他竭力将尽可能多的权力集中到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成员手中。他强迫议会取消了2004年修正案，将更多权力赋予总统府，由此修改了宪法。随后，在2011年夏天，他主导了一场审判，将他的主要政治对手、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投入了监狱——罪名是她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有害于乌克兰经济的天然气协议。在将权力集中于己并让政治反对派陷入沉默或退缩之后，亚努科维奇与他任命的官员开始专注于让统治集团变得更加富有。短短时间内，亚努科维奇、他的家族成员和他的党羽手中就积聚起巨额的财富，将多至700亿美元的资金汇入国外账户，由此威胁到乌克兰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到了2013年秋，乌克兰已经处于债务违约的边缘。

随着反对派遭到镇压或收编，乌克兰社会再度将希望系于欧洲。在维克多·尤先科总统执政期间，乌克兰已经与欧盟就签署一份联系国协议（association agreement）展开了谈判，协议内容包括创建一个自由经济区以及放宽对乌克兰公民的签证政策。乌克兰人的希望在于：协议一旦签署，就能挽救和加强乌克兰的民主机制，对反对派的权利提供保护，并将欧洲的商业标准引入乌克兰，以制约发源于国家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猖獗腐败现象。一些寡头对总统及其团伙日益增长的权力感到恐惧，希望通过建立透明的政治和经济规则来保护自己的资产，因此对与欧盟的联系国协议表示支持。大型企业也希望能进入欧洲市场，而且它们还担心一旦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关税同盟，自己就会被俄罗斯竞争者吞噬。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协议定于2013年11月28日在维尔纽斯举行的欧盟峰会上签署。然而，就在峰会召开前一个星期，乌克兰政府突然改变了方向，提出推迟签署联系国协议。亚努科维奇来到了维尔纽斯，但拒绝签署任何文件。如果说欧洲领导人们对此感到失望的话，那么许多乌克兰人感受到的则是愤怒。政府违背了其一年来许下的承诺，让乌克兰加入欧洲的美好愿望受到挫折。那些在玛伊当扎营抗议的男男女女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情绪。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在政府宣布拒绝签署协议后于11月21日傍晚来到这座广场。亚努科维奇的助手们试图尽快结束抗议，以免引发一场新的“橙色革命”。11月30日夜间，防暴警察对在玛伊当扎营的学生发动了野蛮的攻击。乌克兰社会无法容忍这样的行径。第二天，超过50万基辅人——其中包括被警察殴打的学生的父母和亲友——涌入基辅市中心，将玛伊当及周边地区变成了一个不受腐败政府及其警察力量控制的自由王国。

这场运动一开始只是加入欧洲的呼吁，如今却演变为一场“尊严革命”。它将各种彼此歧异的政治力量——从主流政党中的自由派到激进派，乃至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2014年1月中旬，在为时数周的和平抗议之后，流血冲突开始爆发。冲突一方是警察和政府雇用的暴徒，另一方是抗议者。暴力于2月18日达到高峰，在3天内造成77人死亡，其中有9名警察，68名抗议者。屠杀在乌克兰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引发了巨大震动。招致国际制裁的可能性迫使乌克兰议员们把对总统报复的恐惧抛在一边（许多议员担心制裁同样会损及自己的利益），通过了禁止政府使用武力的决议。议会站在了亚努科维奇的对立面，防暴警察也撤出了基辅市中心，这迫使亚努科维奇于2月21日夜间逃离了革命的基辅。玛伊当上一片欢腾：暴君已经逃跑，革命已经胜利！乌克兰议会投票罢免了亚努科维奇的职务，任命了代总统，并组建了一个由反对派领袖们领导的新临时政府。

基辅发生的抗议是由外交政策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众动员，这并不寻常，也让政治观察员们感到震惊。抗议者们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反对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

俄罗斯主导乌克兰的想法是独立广场上发生抗议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他从2000年就开始领导俄罗斯政府，先是作为总统，然后作为总理，接着再次成为总统——曾在公开谈话中将苏联的解体定性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在他于2012年重返总统办公室之前，普京曾宣称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与1991年时一样，这个空间缺少了乌克兰就将是不完整的。普京在2004年和2010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都支持亚努科维奇。他希望后者能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那是未来更全面的后苏联国家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基础。亚努科维奇对俄罗斯做出了妥协，将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租期延长了25年，但他并不急于加入任何由俄罗斯主导的联盟。相反，为了抵消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影响和野心，亚努科维奇慢慢地倒向与欧盟的联合，并准备签署协议，然而他的尝试没有成功。

俄罗斯在2013年夏天做出回应，对乌克兰发动了一场贸易战争，并将本国市场对部分乌克兰商品关闭。俄罗斯在阻止乌克兰倒向西方的努力中使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胡萝卜包括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50亿美元的贷款，以使资金匮乏、腐败丛生的乌克兰政府免于迫在眉睫的债务违约。第一笔钱在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欧盟联系国协议之后汇入乌克兰，然而独立广场（玛伊当）上的抗议让克里姆林宫改变了计划。乌克兰安全部门在后来进行的一次调查称，那些在独立广场上开枪的狙击手打死了对立双方的数十名人员，并最终导致了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倒台。

2月26日夜，也就是4天之后，一群身着无标识军装的人夺取了克里米亚议会的控制权。据说，在他们的保护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作用下，一位亲俄党派的领袖成为克里米亚的新总理——该党在前一次议会选举中仅获得4%的选票。随后俄军与行动之前至少一周就从俄罗斯联邦遣入克里米亚的雇佣兵和哥萨克部队一道，在当地招募的民兵配合下将乌克兰军队封锁在他们的基地内。当乌克兰新政府正忙于控制此前忠于亚努科维奇的警察和安全部队之际，克里米亚的新政府仓促组织了一次决定克里米亚命运的公投。新政府切断了乌克兰电视频道的信号，阻止乌克兰报纸向订户投递，并对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进行大肆宣传。公投的反对者——其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克里米亚鞑靼人——遭到恐吓或绑架。

2014年3月中旬，克里米亚公民被要求前往投票站决定是否与俄罗斯重新统一。这场公投的结果让人想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投票——那个时代公布出来的投票率高达99%，而支持官方候选人的票数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组织者声称这一次有97%的选民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地官员上报的亲俄选票数量甚至高达注册选民人数的123%。克里米亚新政府公布的投票率为83%，但根据俄罗斯总统府下辖的人权委员会的说法，只有不足40%的注册选民参加了投票。3月18日，也就是公投之

后两天，普京号召俄罗斯议员们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实现历史的正义——此举可以部分弥补苏联解体为俄罗斯带来的损失。

基辅的乌克兰政府并不承认这次公投，却对之无能为力。由于国家仍处于“尊严革命”的政治混乱所造成的分裂之中，乌克兰政府不愿冒战争的风险，遂下令让其军队从半岛撤离。俄罗斯联邦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曾在车臣长期作战，并在2008年执行了俄国对格鲁吉亚的战争，而乌军多年来一直资金不足，也没有战争经验，无法与前者抗衡。此外，基辅还忙于阻止莫斯科在乌克兰国内其他地区制造的动荡。克里姆林宫要求实现乌克兰的“联邦化”，其内容包括每个地区都拥有对中央政府签署国际协议的否决权。俄罗斯想要的不仅是克里米亚，它还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阶层进行操纵，力图阻止乌克兰向欧洲靠拢。

顿巴斯是乌克兰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作为从前属于苏联、现今属于乌克兰的铁锈地带[1]的一部分，顿巴斯依赖中央的大量补贴才能维持其日薄西山的煤矿产业。该地区的主要中心顿涅茨克是唯一一座俄罗斯人口占相对多数的乌克兰大城市——其俄罗斯族人口占比达48%。许多顿巴斯居民仍对苏联理念和符号怀有感情，还保留着象征当地苏联身份认同的列宁纪念碑（“尊严革命”期间，乌克兰中部的列宁纪念碑大部分被夷为平地）。正是通过对其掌控的乌克兰东部选区的动员，通过对东部与中部（更不用说西部）之间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强调，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政府才得以上台并维持权力。亚努科维奇政府声称东部占统治地位的俄语正受到来自基辅的威胁，而当地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如此——据称它因西乌克兰那些乌克兰反抗军的赞扬者而处于危险之中。语言上的分裂和历史上的对立的确在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之间造成了芥蒂，然而政客们为了赢得选举，将这一分歧夸大，使之远远超出了其实际上的重要性。这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2014年4月，许多准军事部队出现在顿巴斯地区。到了5月，这些部队已经控制了当地大部分中心城镇。被罢免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利用其残存的政治关系和丰富的财政资源在自己的家乡制造动荡。这位流亡总统雇用的团伙对支持基辅新政府的人发动攻击，而腐败的警察则向这些团伙提供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和住址。当地上层也参与进来，为首的是乌克兰的巨富寡头里纳特·阿赫梅托夫，被罢免的亚努科维奇是他的生意伙伴。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分别对应顿巴斯工业地区的两个州）为名，将顿巴斯变成自己的领地，以保护他们不受来自基辅的革命性变革的打击。然而他们失算了。到了5月底，他们对当地的控制权已经落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当地激进分子之手，而这些人发起了一场反对寡头的革命。与基辅的情况一样，顿涅茨克人同样受够了腐败。

然而不同的是，许多顿巴斯人将希望寄托在俄罗斯而不是欧洲身上。他们想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苏联时代的国家计划经济和社会保障。如果说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那么东部的亲俄暴动者则以一个更广大的“俄罗斯世界”的成员自居，并将他们的斗争视为对受到堕落的西方欧洲威胁的东正教价值的保护。

乌克兰失去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顿巴斯陷入了混乱，而俄国人还在哈尔基夫和敖德萨施加影响。这让乌克兰社会再次动员起来。包括许多曾参与过独立广场抗议的人在内，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加入了军队和新组建的志愿部队，向俄罗斯主导的东部叛军开战。由于政府只能为士兵们提供武器，乌克兰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志愿者组织。他们四处募捐，购买给养并送往前线。乌克兰社会负担起了乌克兰国家无法履行的责任。根据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的数据，从2014年1月到3月，乌克兰成年人口中支持独立的比例从84%上升到90%。希望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人口比例则从2014年1月的10%下降到同年9月的5%。即便是在顿巴斯地区，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也认为他们的家乡是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从2014年4月到9月，顿巴斯地区被调查者中支持顿巴斯独立或加入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的比例从不足30%上升到超过40%，但从未达到多数。这种状况让大部分亲欧乌克兰人怀有保住这些领土的希望，但也表明建立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将会多么困难。

乌克兰选民们在2014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展示出了他们的政治团结，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将彼得罗·波罗申科[2]选为总统。49岁的波罗申科是乌克兰最显赫的商人之一，曾经积极参与独立广场上的抗议活动。随着推翻亚努科维奇造成的合法性危机的结束，乌克兰终于可以开始应对公开的和潜藏的侵略活动。7月初，乌克兰军队取得了第一次大胜，解放了斯拉维扬斯克[3]——这座城市曾被著名的俄国指挥官、前军事情报机构中校伊戈尔·吉尔金（斯特列尔科夫）[4]作为自己的总部所在地。为了阻止乌军的前进，俄罗斯人铤而走险，开始向反政府军提供包括防空导弹在内的新装备。

8月中旬，分裂主义者建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处于溃败边缘之际，莫斯科加强了进攻力度，将正规军与雇佣军一道派上了战场。克里姆林宫让这两个自立的共和国免于崩溃，却没能实现原先那个建立“新俄罗斯”的计划——计划中的“新俄罗斯”是一个东至顿涅茨克、西至敖德萨、由俄罗斯控制的政治体，将能为俄罗斯提供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通道。此外，俄罗斯也没能阻止乌克兰加强与西方的政治经济联系。乌克兰拒绝放弃任何领土，也拒绝放弃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融入西方的目标；俄罗斯则拒绝任由乌克兰脱离其势力范围；而西方虽然关注国际边界受到的威胁，却在何为遏制俄国人的最佳策略问题上陷入了分歧。这一切让乌克兰东部的战争变成了一场结局遥遥无期的漫长冲突。

截至2015年春末，顿巴斯地区的战事已经夺去了近7 000人的生命，并造成超过1.5万人受伤。逃离家园的人数则多达近200万。此外，随着那些不被国际承认的顿巴斯地区共和国逐渐进入“封冻冲突”[5]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境，约400万人被困在这片无主之地上。为了融入欧洲的前景，这样的代价是否过于高昂了？也许是的。然而，在当下的这场冲突中，受到威胁的是乌克兰及其大部分民众与欧盟所共享的价值观——民主、人权和法治，而不仅仅是可能的欧盟成员国地位。除此之外，乌克兰的国家独立和乌克兰民众自由选择其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也面临危机。许多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人民一直在这样的价值观和理念激励下追求自己的和民族的自由。

乌克兰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在保卫自己的统一和主权的同时还需要对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制进行改革。然而它在这项任务上取得成功的希望也在不断增加。乌克兰人民的创造性和决心是这种希望的最大前提。2015年夏，乌克兰经济发展部发布了一个面向国际投资者的乌克兰宣传片。这个国家的传统优势——农业——在宣传片中得到了强调。乌克兰拥有的肥沃黑土占全球总量的33%，还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然而，乌克兰的智力资源更令人印象深刻：乌克兰全国的识字率当前已达到惊人的99.7%，可能是全球教育水平第四高的国家。每一年，乌克兰的高等院校都培养出64万名毕业生，其中13万人主修工程学，1.6万人主修信息技术，5 000人主修航空航天技术，这令乌克兰成为中东欧地区的软件工程中心。

对乌克兰而言，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继续存在、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以及它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基础，都因俄乌冲突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因这场冲突而同样陷入疑问的还有乌克兰的民族建构道路的性质——其中包括历史、族群、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在乌克兰政治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问题。这个国家的公民来自不同族群，说不同的语言（尽管往往可以自由切换），属于不同的教会，居住在各个迥然不同的历史地区。这样一个国家不仅要抵抗一个军事上强大得多的宗主帝国的进攻，还要抵抗后者对所有说俄语或信仰东正教的人提出的忠诚要求。它是否有成功的可能？

俄罗斯想要以语言、地区和族群边界来影响乌克兰。尽管这种策略在部分地区起了作用，但乌克兰社会主体仍旧团结在这样的理念周围：乌克兰人是一个行政和政治上统一的多语言、多文化国家。这一理念从乌克兰遍布荆棘，甚至往往是悲剧性的内部分裂历史的教训中得来，其基础则是乌克兰的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许多个世纪以来的共存传统。

---

[1] Rust belt，指曾经工业繁盛后来陷入衰落的地区。

[2] Petro Poroshenko（1965年生），乌克兰企业家、总统（2014年至今在任）。

[3] Sloviansk，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城市。

[4] Igor Girkin（1970年生），常被称为斯特列尔科夫（Igor Strelkov，意为“射手伊戈尔”），俄罗斯格鲁乌（GRU，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退役中校。他是2014年乌克兰东部反政府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顿巴斯人民军指挥官。

[5] Frozen conflict，指活跃的武装冲突已经平息，却尚未达成和约或政治解决框架的局势。

结语

历史的意义

2014年3月18日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胜利日，此时正是这位61岁的俄罗斯总统的第三个任期。当天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地点是克里姆林宫中建于沙皇时代的圣乔治大厅——用来会见外国代表团和举行最隆重的国家仪式的地方。这位总统在演说中请求聚集于此的俄罗斯联邦议会成员通过一条关于将克里米亚纳入联邦的法律。他的听众们不止一次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样的反应意味着这条法律无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三天之后，联邦议会即宣布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俄乌之间各条约和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1]曾对乌克兰的主权给予了保证。在乌克兰看来，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行动。然而在演说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这次吞并视为历史正义的胜利。普京的论证在本质上也的确是历史的和文化的。他将苏联的解体称为对俄罗斯的剥夺，不止一次将克里米亚称为俄罗斯国土，将塞瓦斯托波尔称为俄罗斯城市。他指责乌克兰当局漠视克里米亚人民的利益，并曾在近期试图侵犯克里米亚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普京声称：正如乌克兰有权脱离苏联，克里米亚也同样有权脱离乌克兰。

在乌克兰危机中，历史不止一次成为借口，也不止一次遭到滥用。它不仅被用来对危机参与者进行宣传和鼓动，也被用来为对国际法、人权乃至生命权本身的侵犯行为辩护。尽管俄乌冲突的爆发出乎意料，让许多被波及的人猝不及防，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姑且不论对历史证据的宣传式利用，至少有三种植根于过去的过程如今正在乌克兰同时上演：其一是俄罗斯在17世纪中叶以来莫斯科所取得的帝国范围内重建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努力；其二是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涉及其中（后者往往被地区边界所分割）；其三则是基于历史和文化断层的争夺——这些断层使得冲突参与各方将这场冲突想象为东方与西方的竞争，想象为欧洲与俄罗斯世界的竞争。

乌克兰危机让世界想起18世纪晚期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并吞以及俄国在南乌克兰所创建的那个没有存在多久的帝国省份“新俄罗斯”。让关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帝国扩张的记忆浮出水面的，不是那些尝试将当下俄罗斯的行为描述为帝国主义行为的外界观察者，而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混合战背后那些理论家——“新俄罗斯”方案的提出者。他们所寻求的，是以帝国征服和在克里米亚鞑靼人、诺盖鞑靼人和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故乡建立俄

罗斯统治为基础，发展自己的历史意识形态。在将塞瓦斯托波尔视为俄罗斯光荣之城的修辞中，这种努力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修辞是一个植根于1853—1856年间克里米亚战争（那场战争对俄罗斯帝国而言是一场灾难）的历史神话，它将族群多样的帝国军队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归于俄罗斯一族。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以及创立敖德萨共和国和哈尔基夫共和国（这两座城市也同为设想中的“新俄罗斯”的组成部分）的尝试同样有其历史根源，可以上溯到苏俄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1918年3月）。当时布尔什维克们在这些地区创建了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共和国和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苏维埃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自称独立于莫斯科，因此不在条约限制范围之内。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借用了1918年的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共和国的部分符号——与从前那个共和国一样，如果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和支持，他们的这个新“国家”就没有机会兴起或者维持下去。

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和革命历史的引用已经成为为俄罗斯对其周边保持扩张心态提供辩护的史学话语的一部分，然而这次冲突背后的历史动因却来自更晚近的时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关于“收回”克里米亚的演说中曾回忆起苏联迅速而出人意料的解体过程。这场解体才是乌克兰危机最为直接的历史背景。当下的俄罗斯政府一直声称乌克兰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国家，而乌克兰的东部领土是苏俄赠送给乌克兰的礼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克里米亚一样。根据这种历史叙事，唯一血统纯正因而拥有历史合法性的政治体就是帝国——早先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俄罗斯政府努力反击和打压任何贬低帝国合法性的历史传统和记忆，比如对1932—1933年间乌克兰大饥荒或1944年苏联迁移克里米亚鞑靼人等事件的纪念活动。2014年5月，俄罗斯当局在克里米亚宣布禁止公开纪念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移70周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今天的俄罗斯似乎走上了部分帝国前身的老路：哪怕在失去帝国很久之后，它们仍对之依恋不舍。苏联的崩溃让俄罗斯精英阶层对帝国和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切齿痛心，并将这场崩溃想象为一次由西方的恶意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等愚蠢竞逐权力的政客所导致的偶然事件。对苏联解体的这种看法让他们难以抵挡重写历史的诱惑。

俄乌纷争还让另一个植根于历史并在历史中分叉的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现代俄罗斯民族和现代乌克兰民族尚未完成的民族建构进程。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为“援助”顿巴斯地区独立势力所做的辩护宣传，是在保护俄裔居民和整个俄语群体的旗帜下进行的。这种将俄语与俄罗斯文化乃至俄罗斯民族性画等号的观念，是许多前往顿巴斯的俄罗斯志

愿者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这种解读存在一个问题：尽管俄裔居民的确在克里米亚人口中占据多数，也是部分顿巴斯地区重要的少数族群，但在他们设想中的“新俄罗斯”地区，占人口多数的仍是乌克兰裔。尽管俄罗斯及分离主义者的宣传对许多乌克兰人有某种吸引力，这些乌克兰人中的大多数仍然拒绝将自己归于俄罗斯或归为俄罗斯族——哪怕他们还在继续使用俄语。这是“新俄罗斯”方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方案的始作俑者却对它的失败感到十分意外。

将乌克兰人视为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可以上溯至近代俄罗斯民族孕育并诞生于“俄罗斯（而非罗斯）万城之母”基辅的起源神话。1674年首次出版的《略要》（那部由寻求莫斯科沙皇庇护的修士们编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2]第一次在俄罗斯提出了这一神话，并加以传播。在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人都被视为“小俄罗斯人”。这种视角容忍乌克兰民间文化和口头方言的存在，却不允许它成为高级文化或近代文学。1917年革命之后，乌克兰人开始被承认为一个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独特民族，这对“小俄罗斯人”视角形成了挑战。然而，2014年发生的危机却基于“俄罗斯世界”理念。对乌克兰人而言，这与苏联时代的做法相比也是一种倒退。对未来“新俄罗斯”民族建构的设想，没有在更广泛的俄罗斯民族内部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族群留出空间。这很难说是一种漠视或一种因战争热度导致的偏颇。就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不到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曾在一次有记录的谈话中声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属于同一个民族。2015年3月18日，他在纪念吞并克里米亚一周年的演说中又重复了这种看法。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建构道路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转向这样一种观念：创造一个单一而非分散的俄罗斯族，并以俄语及俄罗斯文化为基础联合各东斯拉夫民族。乌克兰则成为这种模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第一个试验场。

这种新的俄罗斯身份认同模式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紧密相关，由此对乌克兰的民族建构事业构成了重大挑战。从19世纪诞生之初开始，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就将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视为自己的核心，但它也从一开始就允许其他语言和其他文化的使用。被许多人视为乌克兰民族精神之父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的俄语作品即可作为这一点的例证。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早已成为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准则，将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纳入乌克兰民族的范畴。这对俄乌纷争的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克里姆林宫所期待的不同，俄罗斯的举动未能得到俄军直接控制地区（指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之外俄罗斯族居民的支持。

根据声誉卓著的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俄罗斯族占乌克兰总

人口的17%，而调查对象中仅有5%的人认为自己只是俄罗斯人，其余则认为自己既是俄罗斯人，也是乌克兰人。此外，那些仅将自己视为俄罗斯人的调查对象往往也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事务的干涉，拒绝将自己与普京政府的立场捆绑在一起。“乌克兰是我的祖国。俄语是我的母语。我希望来拯救我的人是普希金，希望普希金而不是普京来让我摆脱这悲伤和动荡。”基辅的一名俄罗斯居民在其脸书（Facebook）上写道。莫斯科和受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大力宣传那种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东正教结合起来的“俄罗斯世界”理念，将之视为独立广场抗议者们所提出的亲欧选择之外的一个选择。这反而令1991年以来乌克兰人和犹太人组成的亲欧联盟变得更加牢固。“我早就说过，乌克兰人与犹太人的联合是我们的共同未来的保障。”一名独立广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自己的脸书上如是说。

乌克兰在历史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又因过去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乌克兰中部稀树草原和南部干草原之间的分界线成了北方农业地区与南方蕴含丰富矿藏的草原上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一条多孔边界。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界线在17—18世纪间推至第聂伯河，随后又后撤到加利西亚，令人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国界。在从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区中，加利西亚有别于曾大部受匈牙利人统治的外喀尔巴阡和前摩尔达维亚公国省份布科维纳。在从前俄罗斯帝国的地盘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归于波兰的沃里尼亚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苏联的波多里亚不同。此外，曾由波兰统治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与曾属于哥萨克国的左岸地区之间存在差别，而哥萨克人地区与18—19世纪间俄罗斯帝国在集权化过程中所殖民的地区也有所不同。这些地区上的各种边界又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中更喜欢说乌克兰语和更喜欢说俄语的人群之间的分界线。

实际上，乌克兰的地方主义比上文中的描述更为复杂。前哥萨克国占据的传统哥萨克地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南乌克兰省份米科拉伊夫在族群构成、语言使用和投票行为等方面与克里米亚更是迥然不同。然而，尽管存在以上各种差异，乌克兰各地区彼此之间仍然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上述诸多边界尽管在历史上曾十分清晰，却几乎不可能在今天重新建立起来。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张由各种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交会地区连成的网络。它将各个不同地区连缀在一起，让这个国家保持统一。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条将克里米亚同与之相邻的南乌克兰各地区分隔开来的清晰文化边界，而顿巴斯与其他东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历史地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脱离乌克兰的强烈意愿，而这些地区的精英阶层也没能将当地民众动员起来支持脱离。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确出现了这种动员，但那只是俄罗斯干涉带来的后果。

在“尊严革命”发生的同时，乌克兰出现了一场推倒剩下的列宁纪念碑的运

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500多座列宁纪念碑被摧毁。这是一次与苏联时代历史的象征性决裂。在顿巴斯的反基辅叛军中仍有许多人维护从前的苏联价值观，但俄罗斯的雇佣军和志愿军带来的则是另一种支配性理念。与著名的俄国指挥官伊戈尔·吉尔金一样，这些人来到顿巴斯是为了保卫“俄罗斯世界”价值不受西方打击。在这样的语境下，他们将乌克兰视为腐朽西方价值——如民主、个人自由、人权，还有（尤为不可接受的）少数性取向团体权利等——与传统俄罗斯价值之间的战场。按照这种逻辑，乌克兰人的头脑只是被西方的宣传蒙蔽了，而俄罗斯人有责任为他们带来光明。

对俄乌冲突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知识传统当中。尽管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将俄罗斯对欧洲文化的参与排除在外的近代俄罗斯历史，但同样真实的是：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要么与西方隔绝，要么与中欧和西欧国家发生冲突。哪一套历史经验最能够定义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呢？俄罗斯知识界中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旷日持久，始于19世纪。这场争论将两种观点对立起来：一种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部分；另一种则视俄罗斯为一种负有世界责任的独特文明。当下，亲斯拉夫派和反西方派的继承者们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

对乌克兰而言，其独立主张则从来都有一种亲西方的色彩，这是乌克兰历史经验的产物：作为一个国家，乌克兰正位于东西方分界线上。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是中欧帝国和亚欧大陆帝国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接触区，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乌克兰人可以学会共存。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使之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乌克兰向来以其社会的文化混合性（hybridity）著称，近来更是因为这种混合性而备受推崇。然而，在面临一场“混合战”之际，一个民族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这是当下的俄乌冲突将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乌克兰的亲欧革命发生于冷战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却借鉴了冷战时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共有的对欧洲西方的想象，在某些时候甚至将这种想象变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宗教。“尊严革命”与这场战争在乌克兰社会中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新定位。2014年1月到同年9月，乌克兰人中对俄罗斯持正面态度的比例从80%下降到不足50%。同年11月，民意调查中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者的比例已达64%（在2013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2014年4月，只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到了当年11月，这一比例已超过50%。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战争的体验不仅将大多数乌克兰人团结起来，还让这个国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西方。

在历史上，战争的冲击、失败的耻辱以及国土沦陷的伤痛都曾被当作增强民族团结和塑造强烈民族认同的工具。18世纪下半叶波兰被瓜分使得这个国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却成为近代波兰民族主义形成的开端。19世纪初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入侵导致了泛日耳曼理念的兴起，并促进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激发法国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的民族想象的，正是对战败和国土丧失的记忆。被羞辱、战伤累累的乌克兰似乎正遵循着这样的普遍模式。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顿巴斯引发战争，并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引发动荡。这不仅在乌克兰，也在整个欧洲造成了一种危险的新局面。无论当下乌克兰危机将走向何方，乌克兰的未来、东欧-西欧（俄罗斯-欧盟）关系的未来，进而至于整个欧洲的未来都将有赖于危机的解决。

---

[1] 见本书第26章。

[2] 见本书第12章。

致谢

我要感谢吉尔·尼瑞姆为我的手稿找到了一个优秀出版社，感谢拉拉·海默特热情而勇敢地接受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挑战，也要感谢她的基本图书出版社团队——尤其是罗杰·拉布里，是他们让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我要感谢米洛斯拉夫·尤尔科维奇为手稿编辑了不同版本，感谢我的妻子奥莱娜对本书的批评和最终的支持，感谢弗拉基米尔·库里克和罗曼·普罗齐克纠正书中那些不应出现的错误，感谢我的研究生梅根·邓肯·史密斯在我的课程“欧洲的边境——1500年后的乌克兰”中的出色助教工作——我正是在这一课程中对本书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检验。我要感谢在2014年秋季学期中选修这门课程的哈佛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他们的课堂问题、邮件以及在课程网站上的提问和评论都让他们对本书有所贡献。最后，我还要感谢在我漫长的历史学家和教师生涯中帮助我弄明白本书应该和不应该讨论哪些问题的每一个人。本书的任何瑕疵无疑都不是他们的责任。

附录A

大事年表

世界史：约公元前**45000**年，人类到达欧洲南部。

约45000—43000 BC 狩猎猛犸的尼安德特人在乌克兰修建他们的居所。

约42000—40000 BC 多瑙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的人类驯化了马匹。

约4500—3000 BC 掌握了泥塑和彩陶技术的库库特尼-特里波里新石器文化诸部落在多瑙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定居。

世界史：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

1300—750 BC 小说中“蛮王柯南”的故国辛梅里安王国在乌克兰南部黑海大草原上建立统治。

750—250 BC 斯基泰骑兵将辛梅里安人赶出这片地区。

750—500 BC 希腊人在黑海北岸建立起贸易殖民地。在希腊人的想象中，诸如亚马逊女战士之类的神话人物生活在北方的乌克兰草原上。

世界史：公元前**753**年，传说中的罗马城建立时期。

512 BC 波斯的大流士大帝穿过黑海大草原，试图击败斯基泰人的军队，没有成功。

约485—425 BC 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希罗多德认为斯基泰部落和斯基泰人分属不同的阶层，其中包括斯基泰王族和农业斯基泰人。后者是林草混交的边境地区的定居部族。

250 BC—250 AD 萨尔马提亚人从斯基泰人手中夺取了这片草原。

1—100 AD 罗马人在希腊殖民地建立统治。斯特拉波将顿河视为欧洲的东部边界，将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划入欧亚分界线的欧洲一侧。

世界史：约公元**30**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250—375 哥特人击败萨尔马提亚人，在乌克兰地区建立统治。

375—650 迁徙时期：匈人、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穿过黑海大草原。

约551 历史学家约达尼斯将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这两个斯拉夫人部落的活动地区确定为多瑙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同一世纪早些时候，安特人因攻击罗马帝国而见诸史册。

650—900 哈扎尔汗国从乌克兰地区的斯拉夫人部落中收取贡赋。

世界史：**800**年，查理大帝被加冕为罗马皇帝。

838 西方文献中首次提到罗斯维京人。

860 罗斯人首次从黑海北岸进攻君士坦丁堡。

950 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记述了与罗斯人的贸易以及既被用于贸易也被用于战争的第聂伯河-黑海通道。

971 拜占庭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在多瑙河上会见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协商拜占庭与罗斯之间的停战问题。

989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围困克里米亚的拜占庭要塞克松尼索斯，迎娶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并宣布其个人和国家都皈依基督教。

1037 基辅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完成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造。这座教堂是罗斯都主教座堂，也是罗斯第一座图书馆所在地。

世界史：**1054**年，基督教会在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分裂。

1054 基辅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去世。他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欧洲的岳父”，因为他将自己的女儿分别嫁给了许多欧洲王室成员。他的去世标志着基辅罗斯解体的开端。

1113—1125 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暂时恢复了基辅罗斯的统一。他推动了中世纪乌克兰历史的主要记载来源《古编年史》的写作。

1187—1189 一名基辅编年史作者首次使用“乌克兰”一词描述东至佩列亚斯拉夫、西至加利西亚的草原边境地区。

世界史：**1215**年，英格兰国王约翰颁布《大宪章》。

1238—1264 曾被教皇加冕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公丹尼洛通过挑拨东方的金帐汗国与西方的波兰和匈牙利等王国对立，取得对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他是利维夫城的建立者。

1240 蒙古军队攻陷基辅。乌克兰进入金帐汗国的势力范围。

1241—1261 匈牙利国王夺取外喀尔巴阡地区。

1299—1325 罗斯都主教将其驻地从被蒙古人摧毁的基辅迁往克利亚济马河河畔的弗拉基米尔，随后又迁往莫斯科。加利西亚则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都主教区。

1340—1392 强盛一时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分裂。加利西亚归于波兰，而沃里尼亚和第聂伯河地区归于立陶宛大公。

世界史：**1347**年，黑死病肆虐欧洲。

1359 立陶宛和罗斯的军队在锡尼沃迪河之战中挑战金帐汗国对乌克兰草原的统治。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成为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

1386 立陶宛大公约盖拉迎娶波兰女王雅德维加。这是立陶宛社会上层改宗天主教的开端，也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逐步实现统一的开端。

1430—1478 立陶宛大公国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精英阶层反抗大公国的天主教统治者的歧视政策。

1492 乌克兰哥萨克人首次见于历史记载。

1514 立陶宛大公国和莫斯科大公国争夺前基辅罗斯地区期间，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王公在奥尔沙之战中击败莫斯科军队。

世界史：**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

1569 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之间通过卢布林联合创建波兰-立陶宛联邦。通过联合，波兰建立起对乌克兰的统治，而立陶宛则保有白俄罗斯。两个东斯拉夫人地区之间出现了第一条行政边界。

1581 第一部教会斯拉夫语《圣经》全译本在奥斯特里赫出版。

1590—1638 哥萨克人在哥萨克叛乱时期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

1596 通过布列斯特联合，东正教基辅都主教区的一部分归于罗马教廷。这使联合教会（后来的希腊礼天主教会）从东正教会分裂出来，直至今日。

1632—1646 基辅都主教彼得·莫希拉创建基辅学院（后来的基辅莫希拉学院），按照天主教皇教改革的原则改革自己的教会，并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东正教《正教信条》。

1639 法国工程师和制图家纪尧姆·勒瓦瑟·德·博普朗绘制出他的第一份乌克兰地图。这份地图反映了当时乌克兰草原边境地区的垦殖状况。

世界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

1648 哥萨克军官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发动反抗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起义。起义导致波兰地主被驱逐，犹太人被屠杀，并创造了一个被称为酋长国的哥萨克国家。

1654 哥萨克军官们承认莫斯科沙皇的宗主权，引发莫斯科与华沙对乌克兰控制权的漫长争夺。

1667 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将乌克兰沿第聂伯河一分为二，分别归于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这引发了由统领彼得罗·多罗申科率领、反抗两大强国的哥萨克起义。

1672—1699 奥斯曼人统治右岸乌克兰。

1674 基辅洞穴修道院的修士们出版了《略要》。这部历史文献将基辅置于罗斯君权和罗斯民族的中心位置，呼吁东斯拉夫人在宗教、王朝和民族上统一起来，以应对来自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1685 基辅都主教区脱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归于莫斯科牧首管辖区。

1708 因俄罗斯人对哥萨克权利的侵害，哥萨克统领伊凡·马泽帕起兵反抗彼得一世，与率军来袭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结盟。

1709 俄军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获胜，导致哥萨克统领一职的废除以及哥萨克国自治权的削减。

世界史：**1721**年，《尼斯塔德条约》[1]的签署让俄国成为欧洲强国。

1727—1734 哥萨克统领一职暂时恢复。丹尼洛·阿波斯托尔担任统领。

1740年代 犹太拉比以色列·本·埃利泽（更常见的称谓是巴尔·谢姆·托夫）在波多里亚城镇梅德日比日聚集学生和追随者，教授哈西迪教义。

1764—1780 作为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中央集权改革的一部分，哥萨克国被废除。

1768 波兰贵族的巴尔同盟及“海达马基”[2]农民起义在右岸乌克兰地区引发对联合教会信徒和犹太人的屠杀。

1775 俄国在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取胜，随后废除了第聂伯河下游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军。

1783 俄国吞并克里米亚。

世界史：**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1772—1795 波兰被瓜分。加利西亚归于哈布斯堡帝国，右岸乌克兰和沃里尼亚归于俄罗斯帝国。

1791 叶卡捷琳娜二世创建犹太人“定居范围”，禁止从前居住在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人迁入俄国腹地。乌克兰成为“定居范围”的一部分。

1792 俄罗斯帝国再次赢得对奥斯曼人的战争，巩固了对乌克兰南部的控制。

1798 波尔塔瓦贵族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出版作品《埃内伊达》。这是第一部用近代乌克兰语创作的诗歌，催生了近代乌克兰文学。

1812 乌克兰哥萨克人加入俄罗斯帝国军队，对拿破仑作战。

1818 第一部乌克兰语语法著作出版。

1819 迅速兴起的城市敖德萨成为自由港，吸引来新的商业和新的定居者。

1830 波兰人的起义导致波兰地主阶层与俄国政府对乌克兰农民忠诚的争夺。

1834 沙皇尼古拉一世创建基辅大学，从此俄国开始着手将基辅改造为俄罗斯帝国认同的堡垒。

1840 艺术家及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出版诗集《科布扎尔》。他被许多人视为乌克兰民族之父。

1847 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起草了初生的乌克兰民族运动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在宣言中他呼吁创建一个以乌克兰为中心的斯拉夫联邦。

世界史：**1848**年革命。

1848 “民族之春”[3]动摇了哈布斯堡帝国。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得以兴起。乌克兰人以罗塞尼亚最高议会为核心团结起来。帝国当局决定解放农奴。

19世纪50年代 加利西亚出现石油开采工业，将德罗霍贝奇地区变成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油田之一。

1854 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围困了塞瓦斯托波尔，并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修建了乌克兰国土上第一条铁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失去了其黑海舰队。

世界史：**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

1861 俄罗斯帝国对农奴的解放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开明改革改变了乌克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局面。

1863 受到新一轮波兰起义和“全俄罗斯民族”出现分裂风险的警醒，俄罗斯帝国内政大臣彼得·瓦鲁耶夫发布了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

1870 威尔士实业家约翰·詹姆斯·休斯抵达南乌克兰，在此建立起冶金工厂。这成为顿涅茨河工业盆地兴起和俄罗斯劳工移民流入乌克兰的开端。

1876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埃姆斯上谕》，对乌克兰语的使用实行进一步限制。基辅大学的年轻历史学教授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移居瑞士，在那里为乌克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19世纪90年代 对土地的渴求加快了奥属乌克兰地区农民向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速度，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俄属乌克兰地区农民向北高加索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迁移。

1900 哈尔基夫的律师米科拉·米可诺夫斯基阐述了乌克兰政治独立的理念。加利西亚也出现了类似思潮。

1905 俄罗斯帝国发生的革命终结了对使用乌克兰语的禁令，并使政党的创建成为可能。革命浪潮导致俄罗斯国家主义和反犹迫害的兴起。肖洛姆·阿莱汉姆离开基辅前往纽约。

世界史：**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的战场。

1917 俄国君主制的崩溃让乌克兰国家的创建成为可能。建国的领导群体是乌克兰革命议会“中央拉达”中的社会主义者。

1918—1920 俄属和奥属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政府宣布独立，但在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和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这两个更强大的邻国的战争中失败。

20世纪20年代 苏维埃乌克兰的民族共产主义时代。

1921—1923 苏俄、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瓜分了乌克兰地区。

1927—1929 布尔什维克当局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这些政策旨在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

世界史：**1929**年，“黑色星期五”引发美国大萧条。

1932—1933 由于人为原因导致的饥荒，近400万乌克兰人被饿死。这场饥荒在今天被称为“霍洛多摩尔”。

1934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刺杀了波兰内政部长布洛尼斯拉夫·皮尔拉基。这成为乌克兰社会对波兰统治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以及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兴起的征兆。

1937 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达到顶峰。在“大清洗”中，数十万人被处死，上百万人被送进古拉格系统劳改营。

世界史：**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签署导致苏联对此前属于波兰的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属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的占领。此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地区的乌克兰活动家们宣布了一次短命的独立，随后这一地区归于匈牙利。

1941 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导致乌克兰被德国和罗马尼亚占领，并成为大

屠杀的主要发生地之一。数百万不同族群背景的乌克兰人丧生。

1943 苏维埃重归乌克兰，重建了共产主义统治，并在西乌克兰地区开启了苏联安全部队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武装之间的漫长战争。

1944 克里米亚鞑靼人被控与德国人合作，从克里米亚被驱逐到中亚地区。

1945 雅尔塔会议为新的波兰-乌克兰边界赋予了国际合法性，使利维夫归于乌克兰，并让乌克兰得以成为联合国成员。同年晚些时候，莫斯科迫使布拉格政府同意将外喀尔巴阡地区划归苏维埃乌克兰。

1946 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被废除。其领袖们被控遵循梵蒂冈的反共政策，并与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保持联系。

世界史：**1948**年，冷战揭幕。

1953 斯大林的去世终结了正在兴起的反犹主义运动，也终结了对被控犯有民族主义错误的乌克兰文化人物的迫害。

1954 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主导下，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被划归乌克兰，以促进这一半岛地区的经济复苏。这是因为克里米亚的复苏有赖于乌克兰大陆地区提供资源。

1956 去斯大林化运动开启。乌克兰共产党领导阶层成为俄罗斯领导集团统治苏联的助力。

1964 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推翻，终结了当局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让步。斯大林时代晚期的政治原则得以部分恢复。

20世纪70年代 苏联进入停滞时期。其特征为经济增长放缓，社会问题增加。

1975—1981 受到《赫尔辛基决议》鼓舞，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保卫人权而组织起来。赫尔辛基小组的许多成员被克格勃逮捕，并被投入监狱。

1985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启动旨在改善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1986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人们开始追问中央政府在这场环境灾难中的责任，并导致苏维埃乌克兰第一个大众政党绿党的形成。

1990 第一次竞争性的乌克兰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个议会反对派。该议会在同年宣布乌克兰是苏联内部的一个主权国家。

世界史：**1991**年，苏联解体。

1991 在莫斯科的一次失败政变之后，乌克兰12月1日的独立公投对苏联造成了致命一击。其他加盟共和国也效仿乌克兰脱离了苏联。

1994 在乌克兰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移交给俄罗斯之后，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共同承诺保障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1996 新宪法保障民主化自由，在总统府和议会之间实行分权，使议会成为乌克兰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1997 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边界协议，承认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乌克兰则将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租借给俄罗斯。

2004 对政府腐败和俄罗斯干涉乌克兰选举进程的广泛抗议引发了民主化的“橙色革命”。以总统维克多·尤先科为首的持改革立场的亲西方政府得以上台。

2008—2009 乌克兰表达了加入欧盟的意愿，申请参加北约成员行动计划，并成为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成员。

2013 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贸易战争，迫使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的政府放弃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在乌克兰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后来被称为“欧洲独立广场运动”（Euro Maidan）和“尊严革命”。

2014 基辅街头的抗议变得暴力化。乌克兰议会罢免了总统亚努科维奇。俄罗斯则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将军队和给养送入顿巴斯地区，由此发动对乌克兰的混合战。

2015 俄乌冲突造成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东西方关系危机。

---

[1] Peace of Nystad，俄国与瑞典于1721年9月10日在芬兰西南部的尼斯塔德签署的和约。

[2] Haidamaky，指18世纪中右岸乌克兰地区反对波兰统治的农民叛军。

[3] Spring of Nations，1848年革命的别称。

附录B
乌克兰主要历史人物表

1054年前的基辅大公

赫尔吉（奥列格、奥列赫）（？—约912年在位）

英格瓦（伊赫尔、伊戈尔）（？—约945年在位）

奥丽哈（奥丽加、赫尔加）（约945—962年在位）

斯维亚托斯拉夫（962—972年在位）

亚罗波尔克（972—980年在位）

弗拉基米尔大帝（980—1015年在位）

“恶棍”斯维亚托波尔克（1015—1019年在位）

“智者”雅罗斯拉夫（1019—1054年在位）

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诸统治者（1199—1340）

罗曼大帝（1199—1205年在位）

哈利奇的丹尼洛（1205—1264年在位）

列夫一世（1264—1301年在位）

尤里一世（1301—1308年在位）

安德里和列夫二世（1308—1325年在位）

博莱斯瓦夫-尤里二世（1325—1340年在位）

宗教和文化领袖（1580—1648）

伊凡·费多罗夫（约1525—1583），1581年奥斯特里赫版《圣经》的出版

者。

康斯坦蒂（·瓦西里）·奥斯特罗斯基王公（1526—1608），沃里尼亚大贵族，东正教改革的推动者。

伊帕季·珀提（1541—1613），联合教会的创立者和都主教。

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约1577—1633），宗教论辩家、第一部教会斯拉夫语语法著作作者。

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约1582—1622），哥萨克统领、东正教会的支持者。

彼得·莫希拉（1596—1646），东正教改革家、基辅都主教（1632—1646年在任）。

哥萨克诸统领（1648—1764）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1648—1657年在位）

伊凡·维霍夫斯基（1657—1659年在位）

尤里·赫梅尔尼茨基（1659—1663年在位）

帕夫洛·捷捷里亚（1663—1665年在位）

伊凡·布柳霍维茨基（1663—1668年在位）

彼得罗·多罗申科（1665—1676年在位）

德米安·姆诺霍赫里什尼（1668—1672年在位）

伊凡·萨莫伊洛维奇（1672—1687年在位）

伊凡·马泽帕（1687—1709年在位）

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1708—1721年在位）

丹尼洛·阿波斯托尔（1727—1734年在位）

基里洛·罗苏莫夫斯基（西里尔·拉苏莫夫斯基）（1750—1764年在位）

艺术和文学人物（1648—1795）

因诺肯季·吉泽尔（约1600—1683），基辅洞穴修道院掌院（1656—1683）、《略要》（1674）的出版者。

内森·汉诺威（？—1663），犹太教法学者、卡巴拉主义者、《绝望的深渊》（*Abyssof Despair*，1653）一书的作者。

萨米洛·维利奇科（1670—1728），哥萨克官员和历史学家。

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基辅学院院长、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的顾问。

犹太拉比巴尔·谢姆·托夫（？—1760），犹太教哈西迪派创始人。

赫利霍里·斯科沃洛达（1722—1794），哲学家、诗人、作曲家。

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1747—1799），哥萨克军官、俄罗斯帝国大臣、哥萨克国历史学家。

民族“启蒙者”（1798—1849）

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1769—1838），《埃内伊达》（《埃涅阿斯纪》的仿作）作者。

亚历山大·杜赫诺维奇（1803—1865），外喀尔巴阡地区牧师、诗人和教育家。

塔德乌什·查茨基（1765—1813），克列梅涅茨学院的创办者（1805）。

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1811—1843），诗人、年鉴《德涅斯特河的水泽仙女》（1836）的出版者之一。

米科拉·霍霍里（尼古拉·果戈理）（1809—1852），小说家、乌克兰历史和文化的推动者。

塔拉斯·舍甫琴科（1814—1861），艺术家、诗人、作家，常被视为乌克兰民族之父。

雅基夫·霍洛瓦茨基（1814—1888），历史学家、民族志学者、年鉴《德涅斯特河的水泽仙女》的出版者之一、亲俄运动领袖。

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乌克兰民族运动第一份政治章程的起草者。

官员和实业家（1800—1900）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埃马纽埃尔（1766—1822），法国保王党人、敖德萨总督（1803—1814年在任），通常被视为敖德萨城的建立者。

尼古拉·列普宁-沃尔孔斯基（1778—1845），俄国军事指挥官。他在担任小俄罗斯总督（1816—1834年在任）期间推动改善农奴的生存状况，并反对削减哥萨克人权利。

弗朗茨·施塔迪翁（1806—1853），奥地利政治家。他在担任加利西亚总督（1847—1848）期间解放了农奴，并促进了乌克兰人的政治动员。

约翰·詹姆斯·休斯（1814—1889），威尔士实业家、尤兹夫卡城（今顿涅茨克）的建立者、顿涅茨河盆地工业地区兴起的开创者。

普拉东·谢梅连科（1821—1863），实业家。他资助出版了塔拉斯·舍甫琴科作品《科布扎尔》的一个版本。

拉扎尔·布罗茨基（1848—1904），实业家、慈善家。他资助建立了基辅最大的犹太教会堂。

斯坦尼斯拉夫·斯捷潘诺夫斯基（1846—1900），企业家、政治家、《加利西亚的悲惨状况》（1888）的作者。他在加利西亚引入了蒸汽钻探法，推动了加利西亚石油工业的发展。

政治和文化活动家（1849—1917）

米哈伊尔·尤瑟佛维奇（米哈伊洛·尤瑟佛维奇）（1802—1889），教育家，乌克兰爱国者运动的早期支持者。他推动了1876年《埃姆斯上谕》的出台。

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1841—1895），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思想家，乌克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

伊斯梅尔·伽斯普林斯基（伊斯梅尔·伽斯皮拉里）（1851—1914），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复兴的领袖。

伊凡·弗兰科（1856—1916），诗人、作家、时评家，加利西亚社会主义

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米科拉·米可诺夫斯基（1873—1924），律师、政治活动家，乌克兰独立理念的早期宣传者。

作家和艺术家（1849—1917）

尤里·费德科维奇（1834—1888），诗人、民俗学研究者，以其关于布科维纳生活的故事而著名。

利奥波德·里特尔·冯·扎赫尔-马索克（1836—1895）[1]，记者、作家。他创作了许多关于加利西亚的浪漫故事。

米科拉·李森科（1842—1912），作曲家，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的创始人。

伊利亚·列宾（1844—1930），现实主义画家，以其史诗画作《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回答》（*Reply of the Zaporozhian Cossacks*，1891）知名。

肖洛姆·阿莱汉姆（所罗门·拉比诺维奇）（1859—1916），杰出的意第绪语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为《卖牛奶的台维》，后被改编为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

赫奥尔希·纳尔布特（1886—1920），平面艺术家、乌克兰美术学院的创立者之一、1918年乌克兰国徽的设计者。

1917—1921年乌克兰革命人物

叶乌亨·彼得鲁舍维奇（1863—1940），律师、政治活动家，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8—1919）首脑。

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1866—1934），杰出的历史学家，乌克兰革命议会（1917—1918）“中央拉达”主席。

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1873—1945），一个显赫哥萨克家族的后裔，俄罗斯帝国军人，1918年任乌克兰统领。

西蒙·彼得留拉（1879—1926），记者、政治活动家，“中央拉达”军事事务总书记、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指挥部首脑。

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1880—1951），畅销作家，在1917年至1919年间

任乌克兰政府首脑。

涅斯托尔·马赫诺（1888—1934），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乌克兰南部一支农民武装的司令（1918—1921年在任）。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记者、作家、《红色骑兵军》（1926）作者。

尤里·科茨乌宾斯基（1896—1937），乌克兰作家米哈伊洛·科茨乌宾斯基之子，布尔什维克，1918年进入乌克兰的红军部队的指挥官。

文化复兴人物（1921—1933）

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1872—1933），共产党官员、乌克兰化运动的推动者，在大饥荒后自杀。

帕夫洛·狄青那（1891—1967），从象征派转向社会主义现实派的杰出诗人。

亚历山大·多夫任科（1894—1956），编剧、导演、苏联电影蒙太奇理论的先驱。

济加·韦尔托夫（戴维·考夫曼）（1896—1954），纪录片制作先驱，其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持摄像机的人》（*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1929）在内——摄制于乌克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和反面人物（1939—1945）

安德烈·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罗曼·亚历山大·玛利亚·舍普提茨基）（1865—1944），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首脑（1901—1944）、加利西亚社会领袖。

西迪尔·科夫帕克（1887—1967），苏联游击队指挥官。

米哈伊洛·基尔波诺斯（1892—1941），红军将领、1941年基辅保卫战的指挥官。

埃里希·科赫（1896—1986），东普鲁士纳粹党总管（1928—1945）、乌克兰总督（1941—1943）。

尼古拉·瓦图京（1901—1944），苏联将领、红军第一乌克兰方面军指挥

官。

奥托·冯·瓦赫特（1901—1949），纳粹德国的加利西亚地区总督。

罗曼·舒赫维奇（1907—1950），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之一、乌克兰反抗军总指挥（1943—1950）。

斯捷潘·班德拉（1909—1959），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及其西欧和北美地区分会的领袖。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1938—1990）

尼基塔·赫鲁晓夫（1938—1949）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1925—1928，1947）

列昂尼德·梅尔尼科夫（1949—1953）

阿列克谢·基里琴科（1953—1957）

米科拉·皮德霍尼（1957—1963）

彼得罗·谢列斯特（1963—1972）

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1972—1989）

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1989—1990）

乌克兰异议运动领袖（20世纪60—80年代）

列夫科·卢基扬年科（1927年生），律师、政治活动家。他是《乌克兰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一生中超过25年时间在狱中和国内流放中度过。

格奥尔基·文斯（1928—1998），浸信会牧师、宗教活动家。他曾两次被捕并被苏联法庭宣判有罪，最终于1979年被逐出苏联。

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1937—1999），记者、60年代乌克兰异议运动的记录者，曾被关押在苏联监狱和集中营中。

穆斯塔法·杰米列夫（1943年生），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运动领袖，曾6次被捕，在苏联劳改营和国内流放中度过多年。

塞门·格鲁兹曼（1946年生），精神病学家、人权活动家。

乌克兰总统（1991—2015）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1991—1994年在任）

列昂尼德·库奇马（1994—2005年在任）

维克多·尤先科（2005—2010年在任）

维克多·亚努科维奇（2010—2014年在任）

彼得罗·波罗申科（2014年至今在任）

---

[1] 本书第15章中利维夫治安长官利奥波德·冯·扎赫尔之子。

术语表

中央拉达（Central Rada）——中央会议，1917—1918年间的乌克兰革命议会

海鸥（*chaiky*）——哥萨克人使用的长船

指挥部（Directory）——1919—1920年间的乌克兰革命政府

杜马（*dumas*）——一种用于演唱的乌克兰史诗

古别尔尼亚（Gubernia）——俄罗斯帝国对省份的称呼

海达马基（Haidamaky）——匪帮，是对18世纪右岸乌克兰地区平民起义参加者的称呼

统领（hetman）——哥萨克指挥官（源自德语中的*Hauptmann*）

酋长国（Hetmanate）——存在于1649年至1764年间及1918年的哥萨克国家

库尔巴尼（*kurbany*）——墓葬堆

库尔库勒[*Kurkul'*，俄语作“库拉克”（*kulak*）]——一个含义宽泛的用词，是苏维埃政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富裕农民的称呼

玛伊当（Maidan）——意为“广场”，是对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以及2004年、2013年和2014年发生在那里的革命事件的简称

州（Oblast）——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省份的称呼

俄塔曼（*otaman*）——哥萨克官员

拉斯科尔尼奇（*Raskol'niki*）——旧信徒（Old Belief）教会的成员

萨姆维达夫（*Samvydav*）——苏维埃乌克兰时期自行出版的异议文学

沃伊沃达（*voevoda*）——罗斯时代和莫斯科大公国/沙皇国时代的军事指挥官

雅尔力克（*yarlyk*）——蒙古可汗向各公国授予的有条件统治许可

扎波罗热（Zaporozhians）——16世纪时在第聂伯河险滩下游建立自己基地的哥萨克人

延伸阅读

导言 关于乌克兰历史的综述

Dmytro Doroshenko, *A Survey of Ukrainian History*, with introduction by O.Gerus, upd. ed. (Winnipeg, 1975); Mykhailo Hrushevsky, *A History of the Ukraine* (New Haven, CT, 1940; Hamden, CT, 1970); idem, *History of Ukraine-Rus’*, vols. 1, 6–10(Edmonton and Toronto, 1997–2014); Ivan Katchanovski et al.,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Ukraine*, 2nd ed. (Lanham, MD, 2013);Paul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Westport,CT, 2008); 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2nd ed. (Toronto, 2010); idem,*Ukrain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Toronto, 2007); Anna Reid, *Borderl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Ukraine* (London, 1997); 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4th ed. (Toronto, 2009); Roman Szporluk, *Ukraine: A Brief History*, 2nd ed. (Detroit,MI, 1982);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3rd ed. (New Haven,CT, 2009); Serhy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New York, 2007).

第一卷 黑海边境

Paul M. Barford, *The Early Slav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Eastern Europe* (Ithaca, NY, 2001); David Braund, ed., *Scythians and Greeks: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Scythia, Athens and the Early Roman Empire* (Exeter, UK, 2005); Martin Dimnik, *Mikhail, Prince of Chernigov and Grand Prince of Kiev, 1224–1246* (Toronto,1981); idem, *The Dynasty of Chernigov, 1146–1246* (Cambridge, 2003); 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 *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 (London, 1996); Edward L.Keenan, *Josef Dobrovský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gor’ Tale* (Cambridge, MA, 2003); Jukka Korpela, *Prince, Saint and Apostle: Prince Vladimir Svjatoslavic of Kiev* (Wiesbaden,2001); Omeljan Pritsak, *The Origin of Rus’,* vol. 1 (Cambridge, MA, 1981);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Reimagining Europe: Kievan Rus’ in the Medieval World* (Cambridge, MA,2012); Renate Rolle, *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London, 1989).

第二卷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Ludmilla Charipova, *Latin Books and the Eastern Orthodox Clerical Elite in Kiev,1632–1780* (Manchester, UK, 2006); Brian L. Davies, *Warfare, State and Society on the Black Sea Steppe, 1500–1700*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Linda Gordon, *CossackRebellions: Social Turmoil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Ukraine* (Albany, NY, 1983);Borys A. Gudziak, *Crisis and Reform: The Kyivan Metropolitanate,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Union of Brest* (Cambridge, MA, 1998); DavidA. Frick, *Meletij Smotryc'kyj* (Cambridge, MA,1995); Iaroslav Isaievych, *VoluntaryBrotherhood: Confraternities of Layme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 (Edmonton and Toronto, 2006); *The Kiev Mohyla Academy*. Special issue of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8, no. 1–2 (June 1984); Paulina Lewin, *Ukrainian Drama and Theater in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Edmonton, 2008); Jaroslaw Pelenski, *The Contest for the Legacy of Kievan Rus'* (Boulder, CO, and New York, 1998); Serhii Plokhy, *The Cossacks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 (Oxford, 2001); idem,*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Cambridge, UK, 2006); Ihor Ševčenko, *Ukraine Between East and West: Essays on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 (Edmonton and Toronto,2009); Frank E. Sysyn, *Between Poland and the Ukraine: The Dilemma of Adam Kysil,1600–1653* (Cambridge, MA, 1985).

第三卷 帝国之间

Daniel Beauvois, *The Noble, the Serf, and the Revizor: The Polish Nobility Between Tsarist Imperialism and the Ukrainian Masses, 1831–1863* (New York,1992);Serhiy Bilenky,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Russian, Polish,and Ukrainian Political Imaginations* (Stanford, CA, 2012); idem, ed., *Fashioning Modern Ukraine: Selected Writings of Mykola Kostomarov, Volodymyr Antonovych,and Mykhailo Drahomanov* (Edmonton and Toronto, 2014); Martha Bohachevsky-Chomiak,*Feminists Despite Themselves: Women in Ukrainian Community Life, 1894–1939*(Edmonton, 1988); Alan W. Fisher,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the Crimea, 1772–1783*(Cambridge, UK, 1970); Alison Frank, *Oil Empire: Visions of Prosperity in Austrian Galicia* (Cambridge, MA, 2005); Leonard G. Friesen, *Rural Revolutions in SouthernUkraine: Peasants, Nobles, and Colonists, 1774–1905* (Cambridge, MA, 2008); GeorgeG. Grabowicz, *The Poet as Mythmaker: A Study of Symbolic Meaning in Taras Ševčenko*(Cambridge, MA, 1982); Patricia Herlihy, *Odesa: A History, 1794–1914* (Cambridge,MA, 1986); Faith Hillis, *Children of Rus': Right-Bank Ukraine and the Invention of a Russian Nation* (Ithaca, NY, and

London, 2013); John-Paul Himka, *Socialismin Galicia:The Emergence of Polish Social Democracy and Ukrainian Radicalism,1860–1890* (Cambridge, MA, 1983); idem, *Galician Villagers an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88); idem, *Religion and Nationality in Western Ukraine: The Greek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Ruthe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Galicia, 1867–1900* (Montreal and Kingston, ON, 1999); Zenon E. Kohut,*Russian Centralism and Ukrainian Autonomy: Imperial Absorption of the Hetmanate,1760s–1830s* (Cambridge, MA, 1988); Natan M.Meir, *Kiev, Jewish Metropolis: A History, 1859–1914* (Bloomington, IN, 2010); Alexei Miller, *The Ukrainian Question:Russian 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dapest and New York, 2003); Serhii Plokhy, *Tsars and Cossacks: A Study in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 2003); idem,*The Cossack Myth: Histor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ge of Empires* (Cambridge, 2012);idem, ed., *Poltava 1709: The Battle and the Myth* (Cambridge, MA, 2013); Thomas Prymak, *Mykola Kostomarov: A Biography* (Toronto, 1996); Ivan L. Rudnytsky, *Essays in Modern Ukrainian History* (Edmonton, 1987); David Saunders, The Ukrainian Impact on Russian Culture, 1750–1850 (Edmonton, 1985); Orest Subtelny, The Mazepists:Ukrainian Separatism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Boulder, CO, and New York,1981); Willard Sunderland, Taming the Wild Field: Colonization and Empire on the Russian Steppe (Ithaca, NY, and London, 2004); Stephen Velychenko, National Historyas Cultural Process: A Survey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Ukraine's Past in Polish,Russian, and Ukraini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914 (Edmonton,1992); Larry Wolff, The Idea of Galicia: History and Fantasy in Habsburg Political Culture (Stanford, CA, 2010); Charters Wynn, Workers, Strikes, and Pogroms: The Donbass-Dnepr Bend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1870–1905 (Princeton, NJ, 1992);Andriy Zayarnyuk, Framing the Ukrainian Peasantry in Habsburg Galicia, 1846–1914(Edmonton, 2013); Sergei I. Zhuk, Russia's Lost Reformation: Peasants, Millennialism,and Radical Sects in Southern Russia and Ukraine, 1830–1917 (Washington, DC,Baltimore, and London, 2004); Steven J. Zipperstein, The Jews of Odessa: A Cultural History, 1794–1881 (Stanford, CA, 1985).

第四卷 世界大战

Henry Abramson, *A Prayer for the Government: Ukrainians and Jews in Revolutionary Times, 1917–1920* (Cambridge, MA, 1999); John A. Armstrong,*Ukrainian Nationalism*, 3rd ed. (Englewood, CO, 1990); Karel

C. Berkhoff, *Harvest of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 (Cambridge, MA, 2004); Bohdan Bociurkiw, *The 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Soviet State, 1939–1950*(Edmonton, 1996); Kate Brown, *A Biography of No Place: From Ethnic Borderland to Soviet Heartland*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04); Robert Conquest, *The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New York, 1987);Theodore H. Friedgut, *Yuzovka and Revolution: Life and Work: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s Donbass, 1869–1924*, 2 vols. (Princeton, NJ, 1989–1994); Andrea Graziosi,*The Great Soviet Peasant War: Bolsheviks and Peasants, 1917–1933* (Cambridge,MA, 1996); Jan 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exp. ed. (Princeton, NJ, 2002); Mark von Hagen, *Warin a European Borderland: Occupations and Occupation Plans in Galicia and Ukraine, 1914–1918* (Seattle, WA, 2007); Halyna Hryn, ed., *Hunger by Design:The Great Ukrainian Famine and Its Soviet Context* (Cambridge, MA, 2008); Bohdan Klid and Alexander J. Motyl, eds., *The Holodomor Reader: A Sourcebook on the Famine of 1932–1933 in Ukraine* (Edmonton, 2012); Bohdan Krawchenko,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Ukraine* (London, 1985);Andrii Krawchuk, *Christian Social Ethics in Ukraine: The Legacy of Andrei Sheptytsky*(Edmonton, 1997); Hiroaki Kuromiya, *Freedom and Terror in the Donbas: A Ukrainian Russian Borderland, 1870s–1990s* (Cambridge, 1998); idem, *Conscience on Trial: The Fate of Fourteen Pacifists in Stalin's Ukraine, 1952–1953* (Toronto, 2012); George Liber, *Alexander Dovzhenko: ALife in Soviet Film* (London, 2002); Wendy Lower,*Nazi Empire-Building and the Holocaust in Ukraine* (Chapel Hill, NC, 2005); James E.Mace, *Communism and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National Communism in Soviet Ukraine, 1918–1933* (Cambridge, MA, 1983); Paul Robert Magocsi, *TheShaping of a National Identity: Subcarpathian Rus', 1848–1948* (Cambridge, MA,1978);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and London, 2001); Alexander J. Motyl, *TheTurn to the Right: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Ukrainian Nationalism,1919–1929* (Boulder, CO, and New York, 1980); Yohanan Petrovsky-Shtern, *The Anti Imperial Choice: The Making of the Ukrainian Jew* (New Haven, CT, 2009); idem,*The Golden Age Shtetl: A New History of Jewish Life in East Europe* (Princeton, NJ,2014); Serhii Plokhy, *Unmaking Imperial Russia: Mykhailo Hrushevsky and the Writing of Ukrainian History* (Toronto, 2005); idem, *Yalta: 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2010); Anna Procyk,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Ukraine: The*

Nationality Policy of the Volunteer Army During the Civil War (Edmonton, 1995); Thomas Prymak, *Mykhailo Hrushevsky: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Culture* (Toronto, 1987); George Y. Shevelov, *The Ukrainian Languag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00–1941: Its State and Status* (Cambridge, MA, 1989); Timothy Sny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New Haven, CT, 2003); idem,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2010); Stephen Velychenko,State Building in Revolutionary Ukrain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s and Bureaucrats, 1917–1922 (Toronto, 2011); Serhy Yekelchyk, Stalin's Empire of Memory: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oronto, 2004);idem, Stalin's Citizens: Everyday Politics in the Wake of Total War (New York, 2014).

第五卷 独立之路

Anne Applebaum, *Between East and West: Across the Borderlands of Europe* (New York, 1994); Omer Bartov, *Erased: Vanishing Traces of Jewish Galicia in Present Day Ukraine* (Princeton, NJ, 2007); Yaroslav 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The Ukrain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Brunswick, NJ, 1964); Marta Dyczok, *TheGrand Alliance and Ukrainian Refugees* (New York, 2000); idem, *Ukraine: Movement Without Change, Change Without Movement* (New York, 2000); Andrea Graziosi,Lubomyr A. Hajda, and Halyna Hryn, eds., *After the Holodomor: The Enduring Impactof the Great Famine on Ukraine* (Cambridge, MA, 2013); Bohdan Harasymiw, *Post Communist Ukraine* (Edmonton and Toronto, 2002); Askold Krushelnycky, *An OrangeRevolution: A Personal Journey Through Ukrainian History* (London, 2006); Taras Kuzio, *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Borys Lewytzkyj,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Soviet Ukraine, 1953–1980* (Edmonton, 1984);Paul Robert Magocsi, *This Blessed Land: Crimea and the Crimean Tatars* (Toronto,2014); David Marples,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Chernobyl Disaster* (New York, 1988);idem, *Ukraine Under Perestroika* (Edmonton, 1991); idem, *Stalinism in Ukraine in the 1940s* (Edmonton, 1992); idem, *Heroes and Villains: Creating Nation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Ukraine* (Budapest, 2007); Kostiantyn P. Morozov, *Above and Beyond:From Soviet General to Ukrainian State Builder* (Cambridge, MA, 2001); Alexander J.Motyl, *Dilemmas of Independence: Ukraine After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93);Olga Onuch, *Mapping Mass Mobilization: Understanding Revolutionary Moments in Argentina and Ukraine* (New York, 2014); Serhii

Plokh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2014); William J. Risch, The Ukrainian West:Culture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Soviet Lviv (Cambridge, MA, 2011); Gwendolyn Sasse,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Cambridge, MA, 2014);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CA, 2000); Catherine Wanner, Burden of Dreams: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Post-Soviet Ukraine (University Park, PA, 1998); idem, Communities of the Converted: Ukrainians and Global Evangelism (Ithaca, NY, and London, 2007); Amir Weiner, Making Senseof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Fate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rinceton,NJ, 2001);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Cambridge, 1997); idem,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2005); Kataryna Wolczuk, The Moulding of Ukraine: Th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Budapest, 2001); Sergei Zhuk, Rock and Roll in the Rocket City: The West,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Soviet Dniepropetrovsk, 1960–1985 (Washington, DC,Baltimore, and London, 2010).

结语 历史的意义

John-Paul Himka, "The History Behind the Regional Conflict in Ukraine," *Kritika* 16, no. 1 (2015): 129–136; Volodymyr Kulyk, "Ukrainian Nationalism Since the Outbreak of Euro Maidan," *Ab Imperio*, no. 3 (2014): 94–122; Edward Lucas, *The New Cold War:Putin's Russia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New York, 2014); Alexander J. Motyl, *Imperial Ends: The Decay,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Empires* (New York, 2001); Richard Sakwa,*Frontline Ukraine: Crisis in the Borderlands* (London, 2014); Andrew Wilson, *Ukraine Crisis: What It Means for the West*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14).



图1 公元前770—前100年的希腊人定居点（本书插图系原书插图）



奥涅加湖
拉多加湖
科列拉人
楚德人
东克赛那河
拉多加
别鲁泽罗
维斯人
波罗的海
埃斯兹人
斯洛文尼人
尤列夫
诺夫哥罗德
普斯科夫
伏尔加河
雅罗斯拉夫尔
罗斯托夫
库尔斯人
利夫斯人
托罗佩茨
弗拉基米尔
克利亚济马河
日穆德人
克里维奇人
穆罗姆
波洛卡尼亚人
波拉茨克
格但斯克
维捷布斯克
奥卡河
普鲁士人
伊贾斯拉夫尔
奥尔沙
斯摩棱斯克
维亚季奇人
莫尔德瓦人
立陶宛人
明斯克
雅特维吉人
格罗德诺
拉迪米奇人
杜波克
德拉戈维奇人
斯塔罗杜布
布列斯特
平斯克
图罗夫
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
里斯特文
波兰人
柳别奇
德列夫里安人
桑多梅日
奥夫鲁奇
切尔尼戈夫
库尔斯克
克拉科夫
弗拉基米尔
切尔文
西维利亚人
贝尔兹
伊斯科罗斯坚
罗姆内
杜勒比人
基辅
萨诺克
普热梅希尔
佩列亚斯拉夫
东波兰人
斯洛伐克人
哈利奇
捷列博夫利亚
科尔松
波罗维茨人
佩切涅格人
顿河
马扎尔人
乌利奇人
蒂维尔奇人
敖列西亚
哈扎尔人
亚速海
比尔戈罗德
特姆托罗坎
佩列亚斯拉维茨
库班河
赫尔松
苏罗日
卡索格人
多瑙河
多罗斯多隆
大普雷斯拉夫
黑海
保加利亚人
菲力波波利斯
阿德里安堡
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帝国
20°
30°
40°
60°
50°
1054年的基辅罗斯边界
弗拉基米尔大帝（980—1015年在位）夺取的西方国土
拜占庭帝国边界
黑体部分为部族
0 100 200 300 400 500公里
0 100 200 300英里

图2 公元980—1054年的基辅罗斯

资料来源：Zenon E. Kohut, Bohdan Y. Nebesio, and Myroslav Yurkevich, Historica Dictionary of Ukraine (Lanham, Maryland; Toronto; Oxford: Scarecrow Press, 2005).



图3 公元1100年左右的罗斯诸公国

资料来源：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图**4** 公元**1300**年左右的金帐汗国

资料来源：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0), p. 117, map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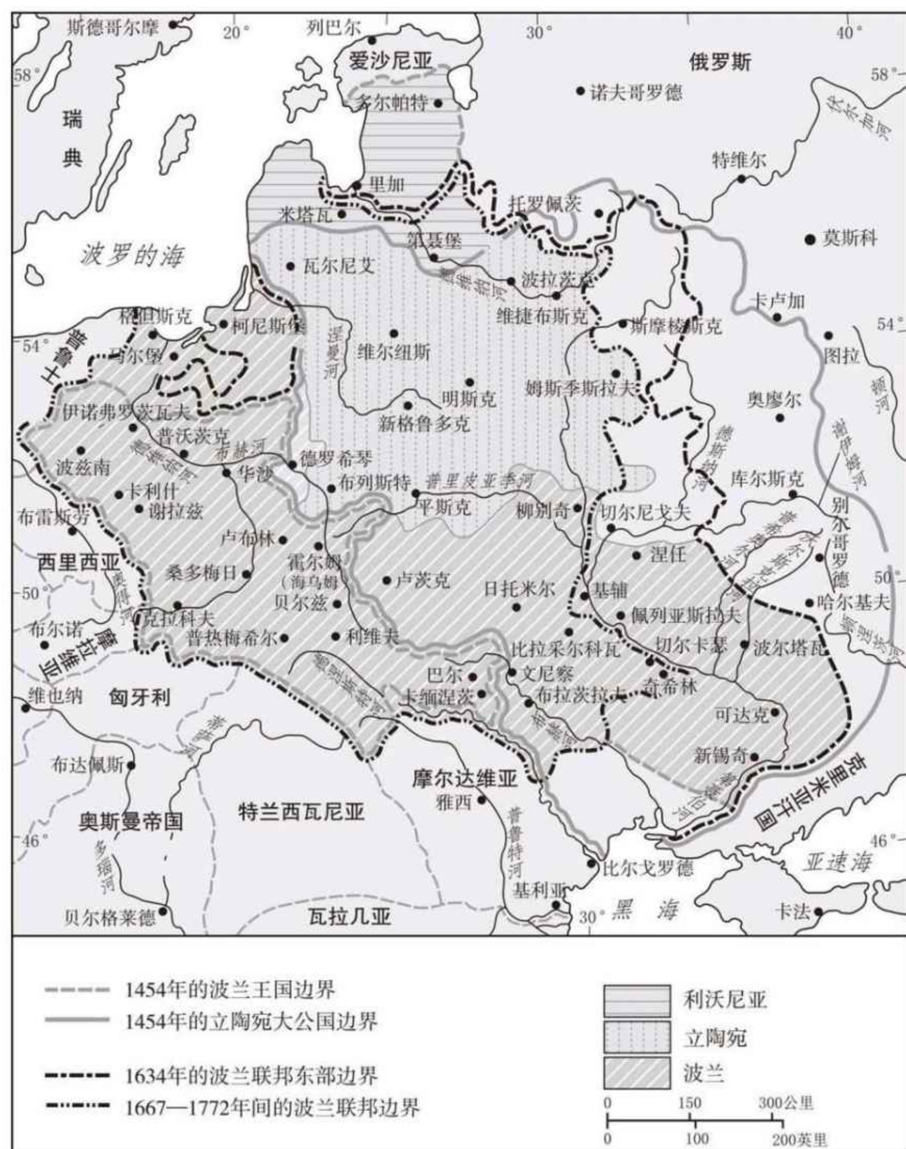


图5 16—18世纪间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疆界

资料来源：Encyclopedia of Ukraine, ed. Volodymyr Kubijovych and Danylo Husar Struk, vol. IV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图6 1650年左右的哥萨克乌克兰

资料来源：Mykhailo Hrushevsky, History of Ukraine-Rus’, ed. Frank E. Sysyn et al., vol. IX, bk. 1 (Edmonton and Toronto: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Press, 2005).



哥萨克国
德斯纳河
第聂伯河
俄罗斯帝国
斯塔罗杜布
波兰-立陶宛联邦
切尔尼戈夫
涅任
普里卢基
基辅
佩列亚斯拉夫
卢布尼
哈佳奇
米尔戈罗德
波尔塔瓦
哈尔基夫
斯洛博达乌克兰
哥萨克人
伊久姆
斯拉夫塞尔维亚
新塞尔维亚
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扎波罗热锡奇
鞑靼人
亚速海
奥 斯 曼 帝 国
巴赫奇萨赖
黑 海
0 100 200 300公里
0 50 100 150 200英里

图7 18世纪50年代的哥萨克国及其周边地区

资料来源：Zenon E. Kohut, Russian Centralism and Ukrainian Autonomy: Imperial Absorption of the Hetmanate, 1760s—183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xiv.



图8 瓜分波兰

资料来源：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0), no. 25, p. 3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美）浦洛基著；曾毅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ISBN 978–7–5086–7118–5
I. ① 欧… II. ① 浦… ② 曾… III. ① 乌克兰 - 历史 - 通俗读物 IV. ①K51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4318号
审图号 GS（2019）119号

THE GATES OF EUROPE By Serhii Plokhy
Copyright © 2015 by Serhii Plokh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n imprint of Perseus Books, LLC, a subsidiary of Hachette Book Group,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
著者：[美]浦洛基
译者：曾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63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775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审图号：GS（2019）119号
书号：ISBN 978 –7–5086–7118–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强权与铁腕 普京传

普京前新闻顾问首次披露普京执政内幕

[英] 安格斯·罗克斯伯勒◎著　胡利平 林华◎译

THE STRONGMAN

Vladimir Putin and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一位秘密警察的舞会

第二章 向西方“求爱”

第三章 经济改革之战

第四章 阴暗面

第五章 老欧洲，新欧洲

第六章 第二任期

第七章 四面树敌

第八章 新的冷战

第九章 媒体、导弹、梅德韦杰夫

第十章 走向战争

第十一章 重新设定与西方的关系

第十二章 强人和他的朋友

第十三章 双人驾驶学

结束语

版权页

前言

和普京握手时，你几乎注意不到他的手是否有力，你全部的注意力都被他的眼神吸引住了。他微垂着头，眼睛上挑地凝视着你，仿佛想在几秒钟内记住每一个细节，抑或是把你的容貌同他此前记忆中的一张照片做比较……他的眼神里透着阴郁，直穿你的内心，令你感到浑身不自在。

俄罗斯的这位“国家领导人”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国的总统或总理。1999年普京刚出人意料地被推上最高职位时，这位前克格勃特工矜持寡言，不善交际。如今他却变得肆无忌惮，成了一个强汉和自恋者，频频上镜曝光，炫耀自己强健的体魄。起初曝光的，只不过是寥寥几张挑选出的照片——赢得柔道冠军的普京，坐在战斗机驾驶舱内的普京。此后，尤其是2008年由总统改任总理后，普京外出参加活动时开始携带摄影组，大力将自己打造成如电影明星般的角色。在摄影师的镜头下，普京把卫星跟踪仪安放在北极熊、老虎、白鲸和雪豹身上，让摄影师拍摄他在一条冰冷的西伯利亚河流里蝶泳，在山区光着膀子骑马，亲自参与扑灭山火行动，驾驶摩托雪橇、摩托车或一级方程式赛车，滑雪，潜水，打冰球，甚至用英语哼唱《蓝莓岭》一曲，在大庭广众之下弹钢琴。尽管他既不擅长唱歌，又不擅长弹琴，但毫无羞涩之意。2011年8月，普京参加一次体检时，还带了一位摄影师同往，拍下了他上身赤裸的照片。

除了普京，还有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如此行事？奉行强悍政策另当别论，就爱好虚荣而言，无人能与普京相比。

与人会晤时，普京谈及敏感问题时注意力集中，好与人争辩，有时会勃然大怒。他通晓世界事务，但对西方人的生活又显露出惊人的无知。他待人彬彬有礼，但有时也粗鲁蛮横。普京先后作为总统和总理以铁腕掌控着俄罗斯。近年来，他喜欢当众训斥手下的部长，造成了一种下属不敢表达反对意见，甚至因为担心不合他意，不敢直抒己见的气氛。普京创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垂直权力体制”。在此体制下，人人心怀恐惧，畏首畏尾。

俄罗斯成了一个无视本国人民权利的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称，他遵循的首要方针是，凡是普京说的都是正确的。议会主席称，议会“绝非讨论的场所”。在这个国家里，谁出任总统这个头号问题，实际上是由两个人私下商定的，公众毫不知情。2011年9月就上演了这一幕。当时普京的门生、继他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同意干一任后下台，让普京2012年再次出任总统，而且一干有可能就是12年。这两个人还坦承，自从2008年普京

卸任总统后始终是这种安排。此前人们早有怀疑，但没有实据。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任任期不过是为普京留住位子，目的是让普京在权位上想干多久就干多久，同时表面上遵守（实则践踏）宪法禁止一位总统任期超过两任以上的规定。

普京刚上台时并不是这样。2000年，众多西方领导人最初对他的新颖做法以及表达的寻求合作和共识的意愿表示欢迎。本书试图描述并解释后来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普京变得越来越专制？他如何挑战西方，西方又如何挑战普京？为何各方都看不到另一方的关切，从而导致双方猜疑日深，丧失了机遇？美国人和西方眼里看到的是：俄罗斯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车臣的血腥战争及对记者的谋杀、腐败和与日俱增的好战，直至出兵格鲁吉亚并与乌克兰爆发了天然气之争。而俄罗斯眼里看到的是：美国人在世界上的霸道行径，包括它的导弹防御计划、入侵伊拉克、北约的扩大、俄罗斯做出的积极姿态受到冷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革命蔓延到俄罗斯的危险。双方都缺乏远见：普京看不到他在国内采取的强硬措施与国外做出的敌对反应之间的关系；小布什不懂得俄罗斯历史上害怕受到包围的心理，或是对他专横地推行外交政策之行径的愤怒。

撰写本书时，普京依然是俄罗斯最得人心的政治家，也许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俄罗斯人生活上的稳定和自尊。借助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一有利于俄罗斯的局面，在普京任期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然而他提出的众多目标均未能实现。普京上台时许诺要根除恐怖主义，然而恐怖袭击次数不减反增；腐败盛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的人口锐减了220万；外国投资在俄罗斯经济产出中所占的百分比远低于诸如巴西和中国这些增长迅速的新兴市场；尽管过去10年里俄罗斯靠能源收入财源滚滚，却未能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本书讲述了俄罗斯内部的改革之争，探讨作为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到底是一个不得志的自由主义者（看上去常常给人这种印象），还是形同虚设。

政客惯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尤其是当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时。近年来对所有国际政治问题中或许是最棘手的问题——小国的自决权——的讨论尤其如此。科索沃、车臣、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左岸……在解释一国的独立是否构成其他国家的先例一事上，人们费尽笔墨和唇舌，往往是各执一词。通常是“母国”坚持认为，其他一切例子均不可复制（俄罗斯与车臣、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而小国则要求像对待已获得独立的国家那样对待它们。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因为俄罗斯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多民族国家，数十个民族杂居在一起，不同民族的自主权或大或小。克里姆林宫担心俄罗斯任何一个共和国若是通过独立树立一个先例，会导致俄罗斯解体。这一问题贯穿过去10年的历史，从车臣战争和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到2008年俄

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的一场短暂战争。在这样的冲突中，通常没有哪一方是“对”的，不承认这一点是看问题简单化的表现。如果认为西方承认科索沃或北约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未来成员资格做出的决定对俄罗斯与四周邻国的关系没有影响，同样是想得太简单。一方对另一方的看法或误解常常比现实的作用更大，而且往往更有害。

这是我撰写的讲述俄罗斯的第三本书。我知道，任何一个外国人若是自称了解这个令人琢磨不透的国家实属狂妄。研究政治学的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写道：“我们俄罗斯人读到外国人笔下对我国不友好的描述时，心理上会产生对外国人的反感和排斥。”在当今的俄罗斯政治中，有很多地方令人感到不快，而且应该写出来。俄罗斯有时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凭空想象外国对它的图谋，害怕而不是欢迎民主的扩展。但西方同样也未能理解俄罗斯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作为一个希望成为世界一部分，而不是受世界排斥的国家，俄罗斯同样没有受到西方的尊重。

我曾在由布鲁克–拉平制片公司（Brook Lapping）制作、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4集电视纪录片《普京、俄罗斯和西方》中担任首席顾问。我的这本书部分来自我在此期间的工作经历。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我们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采访了众多高层人士，时间长达几百小时。这些原始的采访资料使我对很多从前报道过的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过去3年里，我任普京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顾问，本书的有些内容来自这段个人经历，尤其是第九章。2006年，克里姆林宫决定聘用纽约的一家公关公司凯旋公关（Ketchum）和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合伙公司GPlus，而当时凯旋公关和GPlus内部均没有熟悉俄罗斯的人，突然间它们需要这么一个人，于是给了我这份工作。当时我报道欧盟事务已经8年，想到能再次深入俄罗斯社会，我觉得这份工作不无吸引力。我学过并教过俄语，在莫斯科做过笔译，在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工作过，做过《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日后又转到英国广播公司。

我过去的经历中，曾有过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令我更难拒绝这份送上门来的工作。1989年，普京仍是一名派驻德累斯顿的克格勃特工时，他的上司为了报复撒切尔夫人下令驱逐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也将我驱逐出苏联。我当时任《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是被驱除出境的8名外交官和3名记者中的一个。这是冷战时期最大的一次间谍丑闻。我不禁想，作为普京的顾问重返莫斯科该是何等的讽刺！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媒体顾问，工作地点在布鲁塞尔，但定期往返于布鲁塞尔和莫斯科之间。全球范围内这批人的人数在20～30左右，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

一个全职顾问。我与佩斯科夫和他手下的人员混得很熟，虽然他们始终对我存有戒心，但在那段岁月里，我恐怕是最接近俄罗斯权力中心的外国人了。我讲述的2006～2009年间的事情，基本上源自我个人的所见所闻。

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顾问，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劝说他们对报界开放。一个简单的前提是：你说得越多，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就越多。俄罗斯的政界人士对这一观点极为抵触。我离开公关一行、重操记者旧业后很久，他们一如往日。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这套节目时，发现了这一点。劝说俄罗斯的高层政客接受采访难上加难，几位关键人物干脆拒绝接受采访。其他人同意接受采访，但此前他们的上司百般阻挠。他们似乎不愿意甚至是害怕把我们的请求转达给自己的上司，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发言人纳塔利娅·季马科娃干脆把我们拒之门外。有意思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夕，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二次俄国革命》节目时，见到克里姆林宫的头号领导人反倒比现在还容易些。临近2012年总统选举的一年里，随着政治前景越来越不明朗，我们的工作也愈加难做。整个政府机构陷入停顿，普京和他的总统梅德韦杰夫不肯透露两人中谁会竞选连任。我们突然发现，原先答应过的采访又被取消了。显然，在局势变幻不定的时候，谨慎的政客和政府官员不敢抛头露面。

尽管如此，为拍摄这一电视纪录片以及我写的这本书，我们还是采访到了100多位人士（其中一些人不愿透露姓名），包括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高级顾问。在俄罗斯，我们采访了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阿纳托利·安托诺夫、斯坦尼斯拉夫·别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奇若夫、鲍里斯·肖奇耶夫、阿卡迪·德沃尔科维奇、维克托·格拉先科、格尔曼·格列夫、阿列克谢·格罗莫夫、谢尔盖·古里耶夫、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伊戈尔·伊万诺夫、谢尔盖·伊万诺夫、格里戈利·卡拉辛、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维克托·赫里斯捷恩科、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爱德华·科科伊季、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康斯坦丁·科萨切夫、亚历山大·克拉马连科、阿列克谢·库德林、马拉特·库拉赫梅托夫、谢尔盖·库普里亚诺夫、谢尔盖·拉夫罗夫、费奥多尔·卢科亚诺夫、米哈伊尔·马格罗夫、谢尔盖·马科夫、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奥列格·米特沃利、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德米特里·罗戈津、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维克托·申德洛维奇、德米特里·特列宁、尤里·乌沙科夫、亚历山大·沃洛申和伊戈尔·尤尔根斯。

在美国，我们采访了马修·马雷扎、比尔·伯恩斯、尼古拉斯·伯恩斯、埃里克·埃德尔曼、丹尼尔·法塔、丹尼尔·弗里德、菲利普·戈登、罗斯·高特莫勒、托马斯·格雷厄姆、斯蒂芬·哈德利、罗伯特·汉密尔顿、约翰·赫布斯特、菲奥娜·希尔、詹姆斯·琼斯、戴维·克拉默、迈克尔·麦克福尔、特赖伊·

奥伯林、斯蒂芬·皮弗、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斯蒂芬·希斯坦诺维奇、迪安·韦尔克宁和戴蒙·威尔逊。

在格鲁吉亚，我们采访了伊拉克利·阿拉萨尼亚、达维德·巴克拉泽、格加·伯克利亚、妮诺·布尔贾纳泽、弗拉基米尔·恰奇巴亚、拉斐尔·格卢克曼、纳塔利娅·金奇拉、埃罗西·基茨马利什维利、丹尼尔·库宁、巴图·库捷利亚、亚历山大·罗玛亚、瓦诺·梅拉比什维利、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埃卡·特克舍拉什维利、格里戈尔·瓦沙泽、特穆尔·雅科巴什维利和埃卡·兹古拉德兹。

在英国，我们采访了托尼·布伦顿、约翰·布朗、尼克·巴特勒、乔纳森·科恩、迈克尔·达文波特、玛莎·弗里曼、大卫·米利班德、克雷格·奥利芬特、乔纳森·鲍威尔、乔治·罗伯逊和亚历山大·特默科。

在乌克兰，我们采访了列昂尼德·库奇马、赫里霍里伊·奈米里亚、奥列赫·雷巴丘克和维克托·尤先科。在波兰，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和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接受了采访。

在德国，我们采访了罗尔夫·尼克尔、亚历山大·拉尔特、格哈特·施罗德和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法国，让–大卫·莱维特和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接受了采访。

在此，我谨感谢布鲁克–拉平制片公司制片人诺玛·珀西和执行制片人布赖恩·拉平给予我的这个机会，使我得以投身这一旷日持久却意义重大的写作项目。我还要感谢两位导演万达·科什契察和戴维·奥尔特审阅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还有助理制片人蒂姆·什蒂尔扎克尔不知疲倦地查找资料并提供多方协助。我尤其感谢纪录片的导演保罗·米歇尔和莫斯科的制片人玛莎·斯洛尼姆对我提出的大量宝贵意见。尼尔·巴克利和菲奥娜·希尔抽出宝贵时间阅读了书稿，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经纪人比尔·汉密尔顿和I.B.Tauris出版公司负责此书的出色编辑乔安娜·戈德弗雷。

第一章　一位秘密警察的舞会

新千年的降临

20世纪最后一天的中午时分，普京时代开始了。叶利钦总统在电视上露面，以嘶哑的声音慢吞吞地宣读了他的辞职决定，令全世界大吃一惊。此时距他总统任期结束还有6个月。叶利钦哽咽着请求俄罗斯人原谅他的错误和缺陷，并告诉本国人民，俄罗斯进入新的千年时，应该换上“新的政治家，新的面孔和精力充沛、精明强干的新人”。

当天早晨，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完成了这篇讲话的录音。除了他的女儿塔季扬娜和心腹顾问外，最先知道这篇讲话内容的就是录制讲话稿的电视台技术人员。叶利钦讲完后，转过身拭去眼角的泪水，旋即打开一瓶香槟酒，为摄制组成员和寥寥几位在场的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斟满酒，然后将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与此同时，在同一房间的一块幕布后面，他指定的继任人普京正在接受化妆师的化妆，为录制他对本国人民发表的新年讲话做准备。

普京的讲话将在午夜时分播放，不过此前他还需要走完一些既定程序。下午两点，普京接过了装有发动核打击密码的“核手提箱”。随后他召开了5分钟的内阁会议，之后又召开了一次时间略长一点的联邦安全会议。下午6点，普京签署了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法令，宣布叶利钦及其家人免于刑事起诉。之后他很快逐一召见了各位部长。最后，他取消了原计划的圣彼得堡之行，一支总统车队驶出克里姆林宫，直奔伏努科沃机场。新年伊始，普京在一个不寻常的地方有自己的计划。

就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亿人或和亲朋好友聚集一堂，或燃放鞭炮庆祝千禧年降临时，俄罗斯的这位新代理总统正乘坐一架军用直升机试图进入叛乱的车臣共和国。由于天气恶劣，这架直升机被迫返回附近的达吉斯坦基地。这就是世人即将认识和畏惧的普京——一条硬汉，一位实干家，他一门心思打击恐怖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立志重振这个国家的雄风。

就在普京乘坐的直升机与恶劣天气搏斗的同时，俄罗斯的电视台播放了他事先录制好的对全国人民的讲话。讲话简明扼要，他表示将不会出现权力真空，并赞扬了他的前任。普京在讲话里只做了一项政策保证。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一保证，极不寻常。他说：“国家将坚定地保护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大众媒体的自由、财产权以及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

普京赞扬的自由和权利恰恰是亡于前苏联，复生于叶利钦时代的自由和权利。然而不出几年，普京即受到指控，说他本人蔑视这些自由和权利，建立了一个苏联解体后的专制模式，践踏报社新闻自由，打击敢于同他叫板的富商或任何人。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了解普京所走之路的要诀，或者说要诀之一是审视他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来的俄罗斯——一个不仅经济上和军事上羸弱，而且还仰赖西方接济的俄罗斯。

叶利钦与克林顿

2000年6月，普京就任总统仅两个月后，克林顿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访问俄罗斯。克林顿与叶利钦见面二十余次，两人建立了可以彼此互开玩笑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被人称为“比尔—鲍里斯秀”。克林顿也见过普京两次，但和大多数西方领导人一样，除了知道普京擅长柔道、曾是克格勃的一位特工外，对他所知甚少。仅凭对普京的点滴了解，也足以使克林顿心存戒备。这一次他发现普京是一位不好对付的谈判高手。令克林顿恼火的是，在普京眼里，他已经是一位距任期结束不足半年的跛腿鸭总统。

普京站在高大魁梧的克林顿身边，比他足足矮了6英寸。如同一位柔道选手一样，普京用灵活性和技巧弥补身高的缺陷。他坚决抵制美国人的企图——废弃（哪怕是修改）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便放手制定一项全国导弹防御计划，即最早由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体系。《反弹道导弹条约》禁止美苏两国部署核导弹防御体系。对普京来说，这是核威慑的基石。倘若一方获准研制能够击落另一方远程导弹的体系，微妙的均势就会被打破，有防御盾的一方或许会先发制人发动打击。

对克林顿批评他在车臣发动的新的残酷战争和整肃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独立电视台（NTV），普京不屑一顾。同时，他流露出对1999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难以释怀的怨恨。这一事件从根本上影响了此后10年普京对外交政策的思考。

当初空袭塞尔维亚是为了制止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进行的种族清洗。这一事件成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境内战火纷飞时期，莫斯科支持米洛舍维奇，至少原因之一是因为俄罗斯人与塞尔维亚人有传统的手足之情。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一样，同属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

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兄弟纽带”或许被夸大了，然而毫无疑问，在克里姆林宫眼里，米洛舍维奇试图压制科索沃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

与叶利钦处理车臣问题的方式有相似之处。正如叶利钦称车臣的叛乱分子为“匪徒”一样，米洛舍维奇（而且一度还有美国政府）把科索沃解放军视为一个恐怖主义团伙。鉴于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了一场血腥战争，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大批难民外逃，它支持米洛舍维奇设法维护南斯拉夫剩余领土版图的完整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而叶利钦请求不要打击塞尔维亚的呼吁完全没有人听。莫斯科于是感到，尽管有“比尔—鲍里斯秀”这层关系，尽管西方大谈欢迎俄罗斯加入文明国家阵营，俄罗斯的话却一钱不值。北约即将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空中打击前，叶利钦同克林顿通话时会大发雷霆，有时干脆挂断电话。[1]

1999年3月23日，叶利钦的总理普里马科夫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根据计划，他将会见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普里马科夫这一次访问的使命是争取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以求稳定因1998年8月金融崩溃而动荡不定的俄罗斯经济。据普里马科夫的助手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说，飞机在爱尔兰的香农短暂停留加油时，普里马科夫总理接通戈尔的电话，问：“你们是不是还要轰炸南斯拉夫？”戈尔回答说：“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2]

这架政府专机于是再度起飞，横越大西洋。机舱后面是俄罗斯的商业大亨和官员，边喝伏特加，边玩多米诺骨牌。四五个小时以后，普里马科夫通过充满杂音的保密电话线路突然接到戈尔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北约即将发动空袭。普里马科夫立即与叶利钦通话，在与驾驶员核实了飞机有足够的燃料飞回香农后，他走到机舱后面通知商人，此次访问取消，因为此时此刻与美国人谈生意极为不妥。众人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商业大亨报以掌声，他们的爱国主义压倒了生意经。科萨切夫说，当时的情景“令人为之动容”。下令让正在飞行途中的飞机掉头飞回是为了表示俄罗斯的极度不悦。此后几天，同样的情绪蔓延到街头，数千俄罗斯人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

一年以后，克林顿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时，发现创伤仍未愈合。普京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绝不允许别人再次无视或慢待俄罗斯的人。他连续两天批评美国单方面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最后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告别会晤时，普京发出了不祥的警告：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俄罗斯将作出“适当的”、“或许是意想不到的，很有可能是非对称性的”反应。换言之，俄罗斯人不会去研发美国人高精尖的昂贵体系，但会采取措施令其失效。这可以是任何措施——可能是制造大量的核导弹使防御盾防不胜防，也可能是待美国人的设施一旦建成，立即将其摧毁。克林顿听完普京的说教后，转过身对助手塔尔博特轻声说：“我想这个人以为我第一次没听懂他的意思。要么他傻，要么他以为我傻。咱们赶快把这件事打发掉，然后去见鲍里斯。”[3]

美国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离开克里姆林宫驱车去同克林顿的朋友、前总统叶利钦话别。叶利钦如今已经退休，住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克林顿没有想到，他抵达叶利钦的别墅前，普京已经给叶利钦打过电话，请他再说几句重话。叶利钦告诉克林顿，俄罗斯不会容忍任何威胁俄罗斯安全的美国政策。听完了对方怒气冲冲的长篇发言后，克林顿把谈话引到他本人对俄罗斯未来的关切上。克林顿的临别之言意义非凡，反映了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看法。克林顿说："鲍里斯，你真诚信仰民主，你骨子里信任人民，你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真正的民主派人士和改革家。可我不知道普京是否和你一样。你一定要对他留意，运用你的影响确保他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鲍里斯，普京需要你，俄罗斯需要你……你改变了俄罗斯。俄罗斯多亏有了你，世界多亏俄罗斯有了你，我多亏有了你。你我两人一起做了很多事，做了一些好事，它们会流传下去的。而你做这些事是需要勇气的。我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你比我更难。"

克林顿离开叶利钦的别墅时，转身对助手塔尔博特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鲍里斯了，我想我们会想念他的。"

显然，克林顿这番不无感伤的话表明，他认为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国内状况非常好，而且俄罗斯扮演了美国希望它扮演的角色。而事实是，俄罗斯的状况并不好，而且它也不想只跟着美国人的指挥棒走。实际上，美国人怀念的是一位恭顺的俄罗斯领导人，甚至对他们到了俯首帖耳的地步——普京可不是这样的人。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西方的做法可以说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西方的大公司对一个巨大的新市场的前景喜不自禁。俄罗斯政府聘请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们敦促它以疯狂的速度引入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俄罗斯人民的感受以及给他们造成的后果漠不关心。叶利钦政府内的改革分子积极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为首的经济学家盖达尔从两年前诸如波兰等国家为实现经济转型而采用的"休克疗法"中受到启发。叶利钦授命予他"给予人民经济自由，扫除阻碍自由企业和自由企业家精神的一切障碍"。不出几年，数百万的俄罗斯人陷入赤贫，而少数胆大的人和前共产党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身家数十亿的寡头，迅速廉价地攫取了国家资产。

毋庸置疑，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人享有自由，而且是令人目眩的自由。在俄罗斯上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俄罗斯人从未享有过这样的自由。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苏联时期积压了70年的能量猛然释放了出来。任何人，只要敢闯，加上手头上有点现金，均可做个小生意，哪怕只是出售士力架和伏特加的一个街头小摊。俄罗斯

人可以自由出境，阅读任何想看的东西，随意发表言论，示威抗议本国的领导人。竞选自由，党派林立。国家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尖刻地嘲讽时政，肆无忌惮地抨击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新涌现出的私有银行出钱赞助芭蕾舞演出和音乐会。商店里很快摆满了从前俄罗斯人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的各类商品和食品。如今人们不再恐惧，对未来感到乐观，觉得有了盼头。无疑，这就是西方观察家眼里的俄罗斯。显然，这也是克林顿所认识的俄罗斯。

然而当我翻阅昔日的笔记本和撰写过的新闻稿时，回想起当年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我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报道文章讲述了我在俄罗斯十年间的所见所闻和俄罗斯人的惨淡生活。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仿佛是一个恶棍当道的国家。在高速公路上，可以看到这些人乘坐的带有茶色玻璃的轿车飞驶。他们一掷千金，在最高档的餐馆点成瓶的葡萄酒，对服务员吆三喝四，在价格贵得离谱的商店购物，有时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火并。俄罗斯黑手党性质的团伙瓜分地盘和生意范围，雇用杀手司空见惯。

英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室位于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叫保罗·塔特姆的美国人拥有这家购物中心的一部分。因生意上的事，他与他的车臣合伙人起了争执。一天下午5点，他走进酒店附近的地铁站时，被人用AK–47步枪打成了筛子，而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一次我开车时遇到堵车，就在我一点点往前蹭时，看到路旁有人正在抢劫。同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可怜的人趴在地上，几个男人用枪对准他的头。还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的一家餐馆就餐时遇到抢劫，我和其他人都扑倒在地，等待警察逮捕嫌犯。走进附近我常去的超级市场时，必须经过身穿迷彩服、怀抱AK–47步枪的保安。最初涌现出的新资本主义行业全都伴随着暴力和恐吓。无论是经营一家五星级酒店，还是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用支起的木板桌子贩卖小纪念品，都需要向黑社会支付保护费。

在大城市（尤其是莫斯科）的郊区，所谓的“新俄罗斯人”建造了配有游泳池、酒窖和角楼的豪宅，被围在15英尺高的围墙里面。这批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与此同时，1992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将数百万人抛入贫困。突然放开物价导致价格飞涨。人行道上，俄罗斯的普通百姓纷纷摆摊，出售个人物品。莫斯科市中心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至今我仍清楚记得一个人，一位有着博士学位的中年科学家，摆摊出售生锈的挂锁及其他小玩意儿。

其他科学家流落海外，寻找一份有体面工资的工作，其中很多人带走了俄罗斯的战略知识和机密。就在俄罗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一流的人才却流失到了国外。

火车站里到处是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莫斯科通往南方的主要火车站库尔斯克站成了狄更斯笔下的廉价客栈，扒手和病夫比比皆是。参与过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截肢退伍军人在地铁车厢里穿行行乞。到处是做生意的人，最显眼的就是出售看上去可疑的烈酒和食品的小商品亭。在耗子成群的废弃空地上，涌现出了一家家店面，贩卖不适于人食用的肉食品。绝望的人把自己的存款投入各种理财计划中，结果都打了水漂，落得身无分文。1992年，政府向每位公民发放了私有化券，初衷是让人们用私有化券换取私有化后的企业股票。而实际情况是，数百万人要么将其卖掉，要么送了人，最终落到了少数精明的企业家或国企高管手里，造就了俄罗斯的新生资本家。

企业垮掉了，工人拿不到工资，或是拖欠几个月后才领到工资，而且常常是以发实物的方式而不是发钱，如毛巾、肥皂、药棉。企业之间也用实物交易。一个昔日自豪的大国接受了外国的粮食援助、来自欧盟库存的糖和人造黄油，还有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剩余口粮。一个超级大国如今沦落到行乞的地步。

1993年4月，叶利钦飞到温哥华向克林顿求援。叶利钦指出，别忘了，民主德国结束社会主义制度曾需要1000亿美元。叶利钦返回俄罗斯时，克林顿仅许诺提供16亿美元，大部分还是以提供信贷或粮食援助的形式。有人不禁想，西方是否缺乏想象力。苏联时代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好不到哪里去。难道俄罗斯不需要一项重建其老旧基础设施的“马歇尔计划”吗？

西方的各家咨询机构从西方的援助计划中得到的好处十有八九超过了俄罗斯人。我记得采访过莫斯科一家小面包房的经理。她在英国一家咨询公司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管理培训，费用由西方政府出。她告诉我：“其实我缺的就是买一流面包机的钱，我知道如何管理我的公司！”

俄罗斯因社会转型受到沉重打击。人们突然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苏联曾是一个由15个共和国组成、拥有2.5亿人口的国家，如今四分五裂了。2500万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外国居民，陷入所谓“似在国外”的境地。西伯利亚的居民再也不能到克里米亚度假去了，甚至连莫斯科也去不成了，因为买不起机票。一次我去西伯利亚，吃惊地听到当地人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为“大陆”，好像他们被遗弃到了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

面对这个陷入紊乱的国家，我几乎看不出克里姆林宫聘用的西方顾问有任何解决办法。西方各国政府似乎没有注意到俄罗斯的混乱局面，抑或是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而不在乎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短期后果。西方的公司只看到自己的产品有了一个庞大的新市场。电视节目里每隔一个广告，就会有一句奇怪的俄语“来自宝洁”，就像是一句

新政治口号。我心想，俄罗斯人一定听腻了这句话。它天衣无缝地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口号，可它许诺的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没几个俄罗斯人买得起的洗发液和尿不湿。

成群身穿笔挺西服的美国咨询顾问四处奔波，赞许地谈论下诺夫哥罗德州的私有化项目及其年轻的改革先锋分子。伏尔加河畔旧称高尔基的城市率先向普通百姓出售大量国有资产。在很多方面，这种做法的确激励了人民。我记得去过一次拍卖会，看到一些渴望自己做买卖的俄罗斯人仔细查看195辆破旧不堪的国有卡车和面包车，随后竞相报价。对我来说，我想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也同样，看到如此多的外国人指导自己国家的改革进程让人感到不对劲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令人感到似乎是美国正在甩卖俄罗斯。

对于赶上浪头的人，如合伙买下商店自行经营的商店员工“互助会”，出售国有资产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变成店主后，为了千方百计地吸引顾客，商店员工开始满腔热忱地改造自己的商店，很快前苏联时期买东西难的局面为之一变。然而对于柜台对面的买主，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物价飞涨，他们的储蓄和养老金所剩无几。人均寿命直线下降，酗酒人数增加，成千上万的江湖医生、巫师和“行善女巫”应运而生，乘人之危借机捞钱。

之后又有了车臣战争。叶利钦曾鼓励俄罗斯各地区行使自己的权利，然而位于北高加索的一个穆斯林小共和国车臣竟然宣布自己独立。如果认可车臣独立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先例，导致俄罗斯联邦的解体。于是1994年12月，叶利钦下令出兵车臣。结果是一场灾难，数千缺乏训练的俄罗斯士兵死于战争。成千上万的车臣人要么被打死，要么背井离乡，逃到临近的其他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沦为一片瓦砾。车臣人心怀仇恨，走向极端主义，复活了苏联时期沉寂一时的伊斯兰教信仰。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分裂主义的民兵队伍，最终迫使俄军撤出自己的国家。这是一次使俄罗斯颜面尽失的失败。1996年底，车臣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叛乱分子同时开始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恐怖主义袭击。1995年夏，他们在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的一家医院扣押了1000多名人质。当局试图冲进医院解救人质（至少造成130多人死亡），但后来又让扣押人质的人逃之夭夭。

1996年初，叶利钦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不仅他推行的改革不得人心，而且车臣战争以灾难告终，总统本人也因多次在公开场合喝得醉醺醺而令人难堪。毫无疑问，当年夏天的大选若是公平的话，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会当选为总统。然而该国的新寡头——担心共产党重新上台后会失去自己新攫取的财富的亿万富商——结成一伙，确保了叶利钦起死回生。正是这批人在1995年实行的“贷款换股权”方案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攫取了俄罗斯最大的一些国有产业部门，包括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作为交换，

他们出资搭救两手空空的政府。如今他们出钱大力赞助叶利钦的竞选活动，在自己拥有的国家电视台一边倒地支持叶利钦。叶利钦顺利当选，西方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克林顿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看来，俄罗斯的“民主”和“自由市场”得到挽救。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头等大事，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大多数西方领导人感受不到作为个人，也作为一个民族的俄罗斯人遭受的心灵创伤。对于这种创伤，普京远比他们懂得多。

美国学者斯蒂芬·F·科恩写道，当时美国的流行看法是，“自从1991年底苏联不复存在后，俄罗斯成了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复制品的国家”。[4]

姑且不论鉴于巨大的文化和历史差异，俄罗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复制品”。实际情况是，俄罗斯人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来不及适应民主。

早在1965年，苏联时代著名的诗人和歌手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就预见到这种迷惘。当时，他只能凭空想象摆脱了社会主义紧身衣后会是什么情形：

昨天，他们给了我自由，

可自由对我到底有什么用？

西方人假定，俄罗斯人完全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自由，似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好像俄罗斯人就是美国人，只不过被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几年而已。一旦去掉枷锁，再有一个自由市场，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克林顿手下的俄罗斯问题顾问（他们制定了第一个援助俄罗斯计划）承认：“也许我们美国人对苏联社会的看法过于褊狭，高估了俄罗斯人想按照美国规则生活的愿望。我们当初的假定是，转型会很快，混乱也会很快过去，代之以正常生活。顺便说一下，混乱也没有被看作混乱，而是转型期。”[5]

然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反而被它吞没。此外，俄罗斯人对外国人教他们如何“开化”极其反感。不错，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极浅，大多数俄罗斯人毫不费力地就将其丢弃了，然而他们并没有丢弃早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就有的、深藏在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某些思维方式。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俄罗斯人对失去苏联时期的“集体感”感到惋惜。“集体”意识不是苏联时期的发明，而是扎根于俄罗斯的历史中。但现在，它同西方强加给俄罗斯人

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念发生了冲突。

以上我描述了一幅暗淡的图景，也许比总体形势还要暗淡，因为毫无疑问，叶利钦当政时期俄罗斯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令人极为欢欣。然而正是90年代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经常被西方所忽视——日后成了普京播种他观点的沃土。

从筒子楼到克里姆林宫

这是一本讲述普京执政的书，而不是一本传记，然而稍微回顾一下他的早年生活会给人以启示。普京过去的背景以及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为他日后成为总统后自相矛盾的做法提供了线索：一个不相信民主的民主分子；一个对西方一知半解、主张西化的人；一个信仰自由市场，但世界观形成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人；一个对俄罗斯抱有坚定的信念，用一个前克格勃特工冷酷无情的眼光审视祖国“敌人”的人。

1952年，普京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夷为瓦砾、仍在重建中的城市。“二战”期间，列宁格勒遭到德国人长达900天的围困和轰炸。普京的童年是在一个居民筒子楼里度过的。他家有一间住房，和其他家庭共用厨房和厕所。很多俄罗斯人对过去住筒子楼的经历有着甘苦参半的记忆。一方面，居住条件恶劣，没有独立卫生间，也没有热水，楼梯井口处耗子乱窜；另一方面，各家住在一起以及参与战后重建的共同经历加强了当年乐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青年时代，普京的思维方式完全受到苏联时期宣传的影响。他并非出生于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家庭或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或许会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或谈论反政府的话题。上学期间，普京学到的是：西方是一个邪恶的地方，资本家剥削工人，并且对苏联磨刀霍霍。老师告诉他，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苏联人过得比西方人幸福多了。普京满12岁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已经结束，因此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度过的。这段时期的特点是苏联更加好战，与西方对抗，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僵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普京对加入共产党的执政机器——克格勃——显露出兴趣，而直到1975年他从列宁格勒法学院毕业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

普京称，他甚至没有想过斯大林时代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造成的全民恐怖。他说：“我对克格勃的看法源于讲述特工人员的浪漫故事。完全可以这样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产物。”[6]

不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普京作为克格勃的一名特工在列宁格勒工作的10年里，将会清楚地了解到克格勃在做些什么。正是在这段时期

内，克格勃把异见人士投入劳改营或精神病院，没收外国刊物，干扰外台广播，完全控制本国人与外国来访者的接触，严格审查极少数获准出国的苏联公民，想尽办法协助共产党对全社会实行完全的控制。在国外，克格勃的任务是颠覆西方民主政府，偷窃军事和产业机密，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社会主义并协助东欧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压制不同政见。我们不确知这些年里普京做了什么，不过从他干过反间谍工作以及在列宁格勒监视过外国人可以推测，他完全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并对受到西方颠覆的危险保持警惕。时至今日，普京对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仍然嗤之以鼻，对和他一样选择了特工这一行的人充满敬意（2010年，他亲自欢迎在美国暴露身份的10位俄罗斯特工回国）。

普京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当年他问年轻的普京，在列宁格勒的克格勃机构里都干些什么时，普京神秘兮兮地说：“我是一个交际专家。”

1985年，普京晋升为少校，被派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德国从事情报工作，工作地点在德累斯顿。据普京讲，他负责“政治情报”——招募线人并收集有关政治人物和“头号敌人”北约组织的情报。此时，普京多半仍是苏联意识形态的信徒，而且未直接接触过西方国家。他也未亲身经历过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下苏联的觉醒。

就在莫斯科的各家报纸和剧院打破昔日的苏联形象、逐渐丢弃将西方妖魔化的陈词滥调时，普京却被派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对内压制最严厉的国家之一。直到最后一刻，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都在抵制从莫斯科吹来的改革之风。然而，此后普京目睹了民主德国局势的日益动荡。1989年下半年，柏林墙终于倒塌。共产党政权宣告结束前几周，和平变革恰恰始于德累斯顿。就在普京的眼皮底下，示威者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这位未来的俄罗斯领导人因而有近水楼台之便，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终结。虽然他错过了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推行的革命，但他亲眼看到了东欧人如何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摆脱了苏联的轨道。作为克格勃特工，他的工作还包括研究北约的可能反应。因而，普京将会完全知晓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据说由美国国务卿贝克向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口头保证，即北约不会借东欧剧变之机向前苏联阵营扩张。

民主德国共产党结束执政，随即苏联在民主德国的“太上皇”地位也宣告结束。此时，普京正在他位于德累斯顿的办公室里疯狂地焚烧掉一切最敏感的文件，甚至不得不挥舞手枪，吓退一伙想冲进来抢劫的人。此前他们已经洗劫了民主德国秘密警察的办公室。日后普京说，他可以理解这伙人对民主德国秘密警察的仇恨。“他们受够了秘密警察的绝对控制。整个社会没有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在他们眼里，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是魔鬼。”（无人知晓，普京是否意识到，在俄罗斯人眼里，克格勃和民主德

国的秘密警察是一丘之貉。）

对普京来说，整个事件中最令他不安的是，就在愤怒的人群挤在门前，他打电话向德累斯顿的苏联驻军司令求救时，他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莫斯科的批准，他们爱莫能助。普京说，“然而莫斯科始终沉默。我感觉，国家已不复存在。任何人都能看出，苏联病了，而且患的是一种称为瘫痪的致命绝症——权力的瘫痪。”普京说，他知道苏联靠镇压和铁丝网对半个欧洲的控制不可能持久。但他承认，他对苏联失去影响力耿耿于怀，认为这是国家的耻辱。“我们就这样抛弃一切，一走了之。”

就在此时，普京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使他首次接触到了一些与他童年时代、在校读书和在克格勃工作期间的信仰格格不入的观念。1990年1月，普京从民主德国返回家乡列宁格勒——这座城市很快将更名为圣彼得堡。最初他保留着在克格勃的编制，但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外事部门找到一份工作，随后担任列宁格勒市议会议长、前经济学家安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索布恰克是改革时期思想最解放的理论家之一，很快就当选为圣彼得堡市长。1991年6月，他让普京执掌该市的外事部门。当时圣彼得堡市正努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金融和投资中心。没过多久，索布恰克任命普京为副市长。

于是这位前“苏联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出的完人”不仅接触到索布恰克对民主的看法，而且掉进了他不熟悉的西方贸易和金融的奇妙世界。1991年8月，共产党内的顽固派（包括普京的上司、克格勃领导人克留奇科夫将军）发动了一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据普京讲，当时他就在索布恰克身旁，鼓励群众支持民主，抵制政变。日后普京说，他认为发动政变的人阻止苏联走向解体的初衷是“崇高的”，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1991年底，苏联解体。对于普京来说，这是一个分水岭。“我参加克格勃时信奉的一切理想和目标轰然坍塌。”

普京担任副市长时的工作并非没有引起争议。在一次涉及进口食品的丑闻中，该市议会的议员试图以腐败罪名将普京免职，但未遂。然而1996年索布恰克因败选下台，普京也成了闲人。

靠着运气和关系，普京很快到了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机构里步步高升。[7]1997年3月，他出任叶利钦总统的办公厅副主任。1998年7月，被任命为克格勃的继承者联邦安全局的局长。1999年3月，他又兼任联邦安全会议主席。

他的后台是被称为“家族小圈子”的一伙人，即叶利钦总统的亲密顾问，其中有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瓦伦丁·尤马舍夫（日后成了塔季扬娜的丈夫）、现在的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能量极大

的商业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拥有俄罗斯国家主要电视频道全国电视网（ORT）49%的股份，而且是实际的控股人。

1996年，这个家族小圈子策划了叶利钦的连选连任。时隔不久，他们又很快做出安排，确保普京出任总理，目的是最终让他作为叶利钦的接班人出任总统。普京的忠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领导者，普京阻止了对据说牵扯到叶利钦家族成员和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的重大腐败和洗钱案件进行的调查。（其中一名官员帕维尔·博罗金被指控在修缮克里姆林宫期间侵吞巨额公款，而正是此人将普京从圣彼得堡调到莫斯科，给了他政府中的首份工作。）普京还帮助他的前恩师索布恰克逃避因腐败罪名而被起诉。

日后证明，忠诚是普京的一大性格特征。正如他因忠于家族小圈子而受到犒赏一样，一旦当上总统，普京将重赏那些忠于他的人，同时惩罚与他作对的人。他没有让家族小圈子成员失望。2000年普京出任代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了一项法令，使叶利钦及其亲属免于刑事起诉。

1999年夏，叶利钦的小圈子派别列佐夫斯基去见普京，提议他担任总理。当时普京正和家人在法国的比亚里茨海滨度假。普京谢绝了，显然是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胜任这一职务。然而他返回莫斯科后，叶利钦不允许他说“不”。[8]

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年里，普京着手处理了一些日后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事件。1999年3月，原苏联阵营的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加入了北约。无论美国许诺戈尔巴乔夫北约不会东扩的传说（美国官员坚决否认做过这一许诺）是否属实，俄罗斯都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即该军事联盟开始向俄边境做不必要的、具有威胁性的推进。此后10年普京执政期间，北约东扩问题始终挥之不去。

北约扩大后仅11天，即开始了对塞尔维亚的空中打击。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反响本章前面已经讲述过。8月，过去两年半以来一直阴燃的车臣问题突然蹿出火舌，点燃了普京的心中怒火，此后很多年，他在国内外的一系列举动均来自这股怒火。打击恐怖主义成了普京朝思暮想的目标。

自从1996年底俄罗斯军队撤出车臣后，该共和国一直享有事实上的自治，越来越无法无天。民选的政府无力约束诸如萨尔曼·拉杜耶夫和沙米尔·巴萨耶夫这样的军阀，后者在幕后参与策划了布琼诺夫斯克市的人质劫持。绑架事件司空见惯。在6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遭到杀害、4名电信公司员工被绑架后，外国人几乎不敢再去车臣共和国。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此地生根，一些军阀同中东地区的恐怖团伙建立了联系，包括基地组织。

1999年8月7日，巴萨耶夫和沙特阿拉伯出生的一个伊斯兰教主义者伊本·哈塔卜在精心策划下，率领1500人对邻近车臣的达吉斯坦发动了进攻，目的是在那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也是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国家的第一步。这次袭击一下子把普京推到最高权力的位置上。第二天，叶利钦任命他这位行事果决的安全部门领导人出任总理，处理车臣问题。

普京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令人愕然。在当时的俄罗斯，几乎鲜有人知道普京是谁，政治精英同样对他知之甚少。然而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普京展示了俄罗斯的一副新面孔——在对付车臣恐怖分子日益猖狂的袭击时精力充沛、态度强硬而且毫不手软。

9月份，在两周之内，布琼诺夫斯克市、莫斯科（两次）和伏尔加顿斯克市的居民区内发生了4起爆炸事件，将近300人被炸死。俄罗斯指责说是车臣人干的。这些爆炸事件再加上对达吉斯坦的入侵，给普京提供了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口实——如果他需要一个借口的话。9月12日，普京会晤克林顿时，激动地画了一幅车臣地图，讲述了他准备消灭分裂主义分子的计划。之后他对记者恶狠狠地说：“这些家伙不是人，连畜生都不如。如果是畜生，也是穷凶极恶的畜生。”

鉴于居民区被炸恰好使普京有了一个借口开战，借此提高自己的威望，一些俄罗斯人认为，爆炸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干的。俄罗斯境内关于各种阴谋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且多荒诞不经。如果都信的话，历史都要改写。然而在梁赞市的第五次爆炸事件令人疑心重重。根据密报，警察在一个居民区楼群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三口袋白色粉末，挫败了一次阴谋。警方证实白色粉末是炸药，而且还带起爆器。几个口袋被运走时，数千居民被疏散。普京本人表彰了及时发现有人将这几个口袋运进居民楼的人，夸他们警惕性高。然而当涉嫌安置炸弹的嫌疑犯被逮捕时，他们的身份却被证实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该局的局长称，这是一次“演练”，以测试公众的反应——那几个口袋里装的是白糖。然而梁赞市当地的联邦安全局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演练，并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惊讶。

此外，居民楼爆炸案还有几处疑点。例如，国家杜马议长向议会宣布，9月13日他就收到了伏尔加顿斯克市发生爆炸事件的报告，而当天实际上是莫斯科发生了爆炸案，伏尔加顿斯克爆炸案是三天后才发生。难道事先对所有这些策划中的爆炸事件知情的某人把日期搞混了？然而在俄罗斯，对这些事件展开的调查受到阻挠，针对爆炸事件提出的疑问令克里姆林宫怒不可遏。不仅如此，试图查明事情真相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两名成员被暗杀，第三个成员死于一次交通事故。该委员会的律师被捕后被投入监狱，罪名是非法拥有武器。2006年，调查过这些爆炸事件的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前克格勃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双双遇害。

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是为了一雪俄罗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败北的耻辱，同时遏制普京眼中的伊斯兰分子对俄罗斯全国的威胁。普京的一名心腹顾问匿名告诉我，普京担心，他这个总理可能当不了几个月就要下台（如同他的几位前任一样）。他想趁自己在台上的机会防止俄罗斯走向解体。“车臣人入侵达吉斯坦是匪徒发出的一个信号，显示他们会得寸进尺，沿着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联邦其他的伊斯兰共和国，如巴什科尔托斯坦和鞑靼斯坦。”

我从未听到普京（或俄罗斯的其他领导人）谈起过车臣人民实实在在的怨恨。斯大林时期，他们被大批逐出自己的家园，流放到中亚地区。苏联时期，车臣的文化和语言又被淹没在俄罗斯人的海洋中。几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正是1994年俄罗斯出兵车臣导致车臣人走向激进，助长了宗教极端主义。第一次车臣战争前我去车臣共和国时，根本看不到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影子。正是这场战争以及俄罗斯军队的所作所为将原来的分裂主义分子转变成怀有信仰的恐怖主义分子。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普京重点战火的结果必然是雪上加霜。

普京很快让世人领教了他的铁嘴钢牙和直言不讳——这些成了他的一大特点。9月24日，当有人问到第二次车臣战争的残酷时，普京回答说：“无论恐怖分子在哪儿，我们都要穷追到底。他们如果在机场，就在机场干掉他们。如果——请原谅我的用语——在厕所抓到他们，就在厕所消灭他们。没什么好讲的。”

普京发动的这场战争很快使他不再默默无闻，但他还不是俄罗斯深孚众望的政治家。他的前任之一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时，公开谴责叶利钦小圈子成员的腐败，宣布自己打算竞选总统。他同前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一起组建了一个政治集团——“祖国——全俄罗斯”联盟，一切迹象显示他在12月份的议会选举中很有希望胜出，从而为他参加定于6月的总统选举提供了一个跳板。

就在此时，别列佐夫斯基介入选举，以确保家族小圈子的候选人普京赢得大选。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全国电视网完全倒向普京，同时对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极尽污蔑之能事。别列佐夫斯基将一个有名的节目主持人谢尔盖·多连科揽入旗下。此人擅长报道丑闻和桃色新闻，以发表褊狭评论著称。别列佐夫斯基乐得让多连科炮轰普里马科夫。后者任总理时，曾派人搜查过别列佐夫斯基开办的公司，威胁要把他这样犯有经济罪的商人投入监狱。每天晚上，俄罗斯最大的电视频道无休止地评论普里马科夫的年迈体弱和卢日科夫的腐败，同时颂扬普京在车臣的英雄事迹。

与此同时，小圈子里的人——别列佐夫斯基、尤马舍夫和塔季扬娜·季亚琴科在叶利钦办公厅主任沃洛申的别墅秘密碰头，谋划组建一个支持普京的

政治组织。9月份，距国家杜马大选还有三个月时，一个叫“统一俄罗斯党”的新政党诞生了。这是一个没有根基、没有指导思想，可以说也没有任何政策的政党——只有支持普京这一条，不过得到了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全国电视网和他拥有的其他几家报纸的大力支持。12月19日，统一俄罗斯党赢得的选票几乎是“祖国——全俄罗斯”联盟的两倍。现在万事俱备，只等叶利钦在新年前夕宣布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他的总理和既定接班人。

国家杜马选举后的第二天是“契卡日”。作为前苏联时期传统的延续，俄罗斯大多数行业在日历上均标出这么一天，用于纪念国家现在和昔日的秘密警察（早年叫契卡）。一大早，普京将一块牌子重新钉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的一面墙壁上，以纪念他加入克格勃时该机构的首脑安德罗波夫。叶利钦去苏联化时期，这块牌子被摘掉了。在当晚举行的盛装舞会上，总理对自己当年的老同事发表了讲话，开玩笑说：“我向诸位报告，联邦安全局秘密安插在政府部门内的一批特工干得很顺利，正在执行首期任务。”

下一期马上就要开始了。10天后，叶利钦辞职，普京出任俄罗斯最高领导人。

---

[1] Strobe Talbott,*The Russia Hand*(New York:Random House,2002),p 416.

[2] Interview with Konstantin Kosachev,16 December 2009.

[3] Talbott,p 397.

[4] Stephen F.Cohen,*Failed Crusade:America and the Tragedy of Post-Communist Russia*(New York:W.W.Norton&Co,2000),p xii.

[5] Interview with Toby Gati,RIA Novosti,22 March 2011.

[6] Vladimir Putin,*Ot pervogo litsa*(http://archive.kremlin.ru/articles/bookchapter3.shtml–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7] For a good account of this part of Putin’s career,see Peter Baker and Susan Glasser,*Kremlin Rising:Vladimir Putin’s Russia and the End of Revolution*(New York:Lisa Drew,2005),pp 47ff.

[8] *Ibid.*,p53.

第二章　向西方“求爱”

“我希望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从1999年3月北约盟国开始轰炸南斯拉夫起，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即被冻结。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宣布：“我们已经让北约驻莫斯科代表卷铺盖走人。对南斯拉夫的侵略停止之前，我们不会与北约有任何接触，包括北约秘书长。”

然而2000年伊始，普京刚出任俄罗斯代总统不久，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秘书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伊万诺夫。新上任的北约秘书长罗伯逊着实吃了一惊。10月他到布鲁塞尔走马上任后，将争取使俄罗斯“恢复安全合作”确定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伊万诺夫故作羞涩、扭扭捏捏地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在考虑造访莫斯科的话，你或许会发现你很受欢迎。”[1]

于是罗伯逊成了西方第一个会晤俄罗斯新总统的重要政治家。2月，他乘坐德国空军提供的一架飞机飞抵莫斯科。

在机场，普京问：“为什么您乘一架德国飞机来呢？”

罗伯逊马上意识到，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轰炸机造成的恐怖，他乘坐的这架飞机上面涂的德国空军徽记触动了俄罗斯的某根敏感神经。罗伯逊解释道，北约本身没有飞机，所以他不得不借用成员国的飞机。

“哦，原来如此，”普京试着讲英文，“秘书长，也许下一次您再来应该乘一架英国飞机。”

罗伯逊给普京带来了一份礼物，一本讲述沙皇宫廷的英文书。他是在一家旧书店里淘到的。俄罗斯的这位领导人喜笑颜开，原来他正在努力学英语，因为他又增添了很多要“交际”的外国领导人。

普京告诉罗伯逊：“我喜欢大声朗读英文书，作为练习。”随后他又补充说，“所以我的狗现在英文很流利。”

两人的会面不只是展开魅力攻势和互开玩笑，也谈了实质内容。罗伯逊记

得，普京相当坦率，讲话直切重点。“当时他不像现在那样自信。他刚刚上任，甚至连总统都还不是，只是代总统。”

普京说：“我想解决我们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们的关系并不具有建设性。我想逐步恢复与北约的关系，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与我有分歧。”普京指了一下他的国防部长马歇尔·谢尔盖耶夫元帅和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但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希望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才是它未来的归属。让我们看一看如何能最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英国大使告诉罗伯逊，他对这一果敢的早期外交政策决定印象深刻。鉴于当时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极为紧张，普京说“我想恢复这种关系”不同寻常。罗伯逊感到，普京想发展“一种线条清楚的关系”，撇开昔日遗留下来的障碍，只谈重大问题。“他们希望被当作世界上的一个重要成员。”

还有一位世界领导人热衷于满足俄罗斯的愿望。布莱尔首相看到，英国有机会成为俄罗斯在欧洲的“最佳伙伴”，并决定于3月上半月访问俄罗斯，普京当时甚至还没有当选总统（大选定于3月26日举行）。此时，布莱尔比德国总理施罗德或法国总统希拉克更愿意迁就普京在车臣发动的战争。英国外交部对这位前克格勃特工存有戒心，显然此人是车臣战争的导演。然而布莱尔在唐宁街的顾问坚持认为，普京是一位新型的领导人，一个值得对他尽早押宝的人。布莱尔办公厅主任乔纳森·鲍威尔说：“根据我的经验，克格勃官员在昔日的苏联官僚体制中属于比较开放的一批人。我们决定在竞选期间就与他接触，而不是等到选举结束以后。那时等着见普京的人会排成长队。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但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而且也确实产生了结果。”[2]

鲍威尔说，布莱尔出访俄罗斯前几乎没怎么关注车臣问题。直到上飞机后，才开始阅读为他准备的背景材料文件夹。“外交部准备的文件夹令布莱尔越看越恼火，因为早在那时，托尼已经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感到担忧。他看到了它的危险性，觉得我们在对待俄罗斯对付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做法上有那么点儿‘双重标准’的味道。于是他在飞机上决定，待到双方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在车臣问题上他要给普京一点儿自由行事的空间。”

普京满面春风地全程陪同首相布莱尔及夫人切丽游览了自己的故乡圣彼得堡市，参观国立冬宫博物馆，在沙皇金碧辉煌的夏宫彼得宫举行会谈，傍晚前往马林斯基剧院，观看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唯一一个不快的小插曲是在彼得宫举行会谈时，英国大使罗德里奇·莱恩爵士一屁股坐在一把椅腿细长的古色古香的椅子上，把椅腿压断了。

普京俏皮地说：“我希望你会赔偿这把椅子。”据一位目击者说，普京不完

全是开玩笑。

这次访问极其圆满。这是布莱尔想要的结果。鲍威尔承认，叶利钦与法国人和德国人（更不要说克林顿了）打得火热，英国感到自己被撇在了一边。现在布莱尔自己“挤了进来”。总统选举刚一结束——大选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普京赢得了53%的选票——布莱尔马上邀请普京访问伦敦。“格罗兹尼屠夫”受邀去温莎宫拜见女王时，媒体一片哗然。[3]

一段时间内，布莱尔的确看上去成了普京在西方的主要联系人。11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未定，在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时，普京打电话给布莱尔，询问他是否应该给小布什打电话表示祝贺。鲍威尔回忆道：“托尼建议普京等一等，待局势明朗后再说。普京非常感谢，于是没有给小布什打电话。这件事很有意思，通常你不可能与俄罗斯总统有这么深的关系。我们因此感到，这宝是押对了。”

当然，考虑之一是英国的商业会受益于更密切的政治关系。因此4月访问伦敦时，普京会见了一批大企业家。英国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对普京印象深刻：“他令人耳目一新。”普京向英国商人许诺要严守法律，打击腐败。普京不苟言笑的冷漠举止让他们感到，他说话是算数的。3年后，在普京和布莱尔主持的一个仪式上，英国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的一家大石油公司俄罗斯秋明石油公司（TNK）签署了一份合同，组建一个合伙公司，两家各占50%的股份。当时，英国石油公司投入的67.5亿美元是有史以来俄罗斯得到的最大一笔投资。双方皆大欢喜。然而，随着普京开始质疑把本国的战略资产卖给外国人的做法，前面将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

看到普京的灵魂

至于美国，普京已经决定耐心等待克林顿余下的任期结束，再开始向小布什的班子伸出触角。俄罗斯人早就预料到小布什会获胜。2000年7月底，他们甚至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在费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之一米哈伊尔·马格罗夫是俄罗斯上院的议员和公关专家，他曾在普京的竞选班子里干过。他说，这是统一俄罗斯党对外联络的一项内容，“与世界各地的保守党交往”，目的是为普京的党派打造中间偏右的“牌子”。团员会晤了赖斯和小布什班子里的其他成员。会晤的时间并不长，但足以使他们再次受到邀请，参加1月份的总统就职典礼。[4]

就职典礼那天，赖斯找到一位俄罗斯外交官，要他代表美国新政府向普京转达一个积极的口信。赖斯会讲俄语，而且是一位苏联问题专家。在随后的年月里，小布什在制定俄罗斯政策时，她的作用举足轻重。赖斯的口信

表达了对发展友好关系前景的期待，但绝不是比尔—鲍里斯秀的重演。赖斯认为，克林顿与叶利钦之间的亲密关系，个人色彩过于浓厚，而且克林顿要求俄罗斯人对其在车臣的所作所为负责时表现得太软弱。2000年12月31日，《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赖斯撰写的一篇文章，严厉批评了克林顿的政策。

美国政策的缺陷在于，克林顿始终欣然接受叶利钦和他身边被视为改革者的做法完全失败了。美国当然需要与国家元首打交道，而叶利钦是俄罗斯的总统。

然而，美国对民主和经济改革的支持成了对叶利钦的支持，他的议程成了美国的议程。

明明没有改革，美国却做证说俄罗斯正在改革，在没有任何重大变革迹象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资金。

一些耐人寻味的私有化手段因而被捧为经济自由化，对一些权势人物掠夺国家资产的现象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置若罔闻。俄罗斯的现实与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看法完全不符。

赖斯还知道，麻烦事还在后面，因为小布什打算比克林顿更坚决地追求建立一个导弹防御体系的目标。在一次采访中赖斯说："布什讲得很明白，重新调整军备控制中的攻防关系对他极为重要，而《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导弹防御的一大障碍。"[5]

然而普京认为，白宫换主是一个好兆头。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总统后，俄罗斯期待着与他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没想到，不久发生了一件让俄罗斯人猝不及防的事。3月，美国人宣布驱逐在华盛顿和纽约打着外交官幌子从事情报活动的50名俄罗斯间谍。俄罗斯当时没有意识到，而且时至今日（根据我们通过采访所了解的情况）仍没有意识到，新一届小布什政府对这件事同样毫无准备。俄罗斯人以为，小布什决定上台伊始发出了一个强硬信号，而实际上他不过是打发掉从他的前任接手过来的一个难题。

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查明了50名外交人员的真实身份，然而克林顿政府不愿意将他们驱逐出境，担心克林顿任期即将结束时会损害与叶利钦的特殊关系。如今弗里看到白宫换了主人，加之他知道自己不久也要走人，于是决定走之前了断这件事。

在一次采访中，新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蒂芬·哈德利回忆说："弗

里坚持己见，认为必须对美国境内的俄罗斯间谍网采取行动。我感觉，这件事他憋在心里已经很久了，但出于一系列的原因，克林顿政府在任期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年里觉得时机不妥。这意味着它成了新总统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判断是，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并需要采取行动，而且要尽早尽快。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间谍，而不只是外交官。驱逐他们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也不是要发出什么信号。决定已经做了，继续拖下去不会使问题变得更容易处理。”[6]

通知俄罗斯人的差事落到了布什的国务卿鲍威尔身上。他礼节性地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尤里·乌沙科夫，乌沙科夫也得以有一个机会与新任国务卿见面。鲍威尔先以轻松话题开场：“你想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乌沙科夫回答说：“好东西留待上甜点时吃。”

鲍威尔于是端上了“开胃小吃”。他客气地解释说，虽然有一个君子协定，每一方可以在己方使馆里安排一定数量的间谍，但是俄罗斯的间谍数量远远超出了这一限额。“我们已经查明了大约50个人的身份，明天我们将通知你们具体是哪些人。他们必须在几天之内离境。我需要你一回使馆便打开传真机，通知莫斯科。”[7]

乌沙科夫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怒不可遏。他回忆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次有政治目的的举动。我们认为，美国人这样做是想向世人显示，谁是世界的霸主。”[8]

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戳到了俄罗斯人的痛处。普京过去16年就是干这行的，被驱除的人都是他的契卡同事。普京召开了一次由负责军事、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各位部长组成的联邦安全会议。会议决定以同样的方式回敬美国人，但要让他们更难受。联邦安全会议首脑谢尔盖·伊万诺夫挂通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的电话，通知她说：“我们会对你们毫不客气。我们将驱逐你方的50名外交官，但不会马上这样做，而是拉开一段时间。我们不仅会精心挑选真正的间谍，还要挑选‘干净的’外交官。我们要让你们的使馆乱成一团。”[9]

针锋相对的互相驱逐开始了。然而小布什的班子急于向前看，毕竟这件事不是他们开的头。鲍威尔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建议了结此事。

伊万诺夫回答说：“这件事还没完，我们将驱逐50个人。如果你们驱逐我方更多的人，我们会一直奉陪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双方的外交官就会被驱逐净尽，只剩下你我二人处理我们的双边关系。”

两人同意叫停。5月18日，伊万诺夫携带普京的一封信飞往华盛顿。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不再纠缠于此，在信中强调了他对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讲过的同样观点。他希望重新启动两国关系，以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鲍威尔和伊万诺夫一致认为，两国总统需要见面。他们选了一个中立的场所——斯洛文尼亚，时间定在2001年6月16日。

在位于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以北不远、建于16世纪的布尔多城堡里，彼此从未见过面的小布什和普京开始了两人的首次约会。普京模仿对方的能力极强，并能博得他们的信任。靠着这种能力，他成了克格勃一位出色的“交际家”。普京青睐的一位关系很广的克里姆林宫记者叶莲娜·特雷基波娃叙述说，普京任联邦安全局局长时曾带她去一家日本寿司餐馆吃饭。“他极善于与人打交道……堪称一位人际关系大师……能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出和他在一起的人，让他们觉得他同他们是一类人。他做得很巧妙，对方显然没有察觉到，仍自我感觉良好。”[10]

在布尔多城堡，普京对小布什施展了他的魔法。小布什提起他在背景材料文件夹里读到的普京人生中的一个插曲，普京母亲曾送给儿子一个基督十字架，而普京让人在耶路撒冷为这个十字架祈福。普京马上意识到，这件事引起了布什内心的共鸣。据布什自己亲口对美国记者伍德沃德说，普京答道，“确有此事。”[11]

布什说，他告诉普京，他没有想到，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克格勃特工竟愿意戴一个十字架（此次会晤普京并没有戴十字架，不过一个月后他确实把这个十字架带到热那亚给布什看）。布什说：“对我来说，这件事意义深远。总统先生，我能称呼您弗拉基米尔吗？”

普京随后告诉布什，他父母家的别墅在一场大火中坍塌。他从废墟中想找到的唯一物件就是这个十字架。“我记得，消防队员的手掌张开后，露出了我母亲送给我的十字架，似乎是命运使然。”布什简直听迷了。

两人继续私下交谈时，等候在外面的两位总统的助手变得焦虑不安起来。布什的国务卿鲍威尔一直与俄罗斯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聊天。日后鲍威尔回忆道：“我和伊戈尔，还有两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坐在那里，假装是在开会讨论重大问题，其实我们大家不过是枯坐而已，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猜测两人到底在干什么。”[12]

两国总统最后终于露面，共同出席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一位记者问了布什一个要命的问题：“美国人可以信赖此人吗？”中了魔法的布什激动万分：“我从这个人的眼睛里看出，他是一个极为坦诚和值得信任的人。我们谈得很好，我看到了他的灵魂。”

普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转向布什，用英语轻声说：“谢谢您！”布什的助手们听呆了。赖斯小声对一位同事说：“天哪！后一句话够我们解释的。”

鲍威尔后来把总统拽到一边说：“您知道，您可能看到了您说的这一切，可我从他眼睛里看到的是一个克格勃特工。别忘了，他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是克格勃在德国的间谍，而且是克格勃的头子。”

直到布什总统任期结束，“看见了他的灵魂”这句话始终纠缠着他。

共同打击塔利班

时隔不到3个月，两人的友谊就面临考验。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了世界上伤亡最惨重的袭击后，普京是最早打电话给布什表示哀悼和支持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看到飞机撞向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的新闻画面令普京感到震惊，但他并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就在前一天，他打电话给布什，说他认为“一项重大阴谋”正在酝酿中。此前，9月9日，阿富汗反塔利班的北部联盟领袖马苏德遭到暗杀。俄罗斯情报部门认为，这是一个恶兆。几年来，俄罗斯一直向北部联盟提供武器和现金，以求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

普京立即在克里姆林宫召见安全部门的首脑，询问他们能帮什么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推迟即将在太平洋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海军演习，因为这有可能会不必要地分散美军的注意力。普京给白宫打电话，然而无法与布什总统通话。当时布什正乘坐空军一号飞往一个安全的地方。赖斯接了电话，她在白宫的地下室里，这里刚刚做出一项决定，下令美军进入最高一级警戒状态，即三级警戒状态。

日后赖斯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我告诉普京，美军已经进入最高一级警戒状态。我记得他说：‘我知道。’我马上想到，他们当然知道了，他们正在注视我们的军队进入警戒状态！普京告诉我，他们降低了自己部队的警戒等级，并取消了一切演习。当时我想，冷战真的结束了。”[13]

美国人很快决定了如何反击。这次袭击是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策划的，该组织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支持。普京问还能做点儿什么时，答复是明确的：除了美国在该地区的航空母舰外，对阿富汗发动打击的唯一合适地方就是前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而这几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虽然名义上独立了，但莫斯科对它们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普京的第一反应是请这些中亚国家给予配合，并告诉了美国人他的想法。然而普京在自己的政府内遭到未曾料到的反对。强硬派人士、现任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是普京最紧密的盟友之一，而且和普京一样曾是克格勃间谍，但比普京更文雅，更了解西方。他也是康多莉扎·赖斯与莫斯科之间的主要联络渠道。赖斯出任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伊万诺夫在俄罗斯担任同样的职务。2001年3月，伊万诺夫改任国防部长，但赖斯喜欢他，继续保持了与他的联络渠道（尽管根据外交礼节，赖斯本应该与俄罗斯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拉基米尔·卢沙洛直接打交道）。据赖斯讲，在卢布尔雅那首脑会议上，布什问普京："如果我们找不到你，需要一位你信得过的代理人的话，应该打电话找谁？"普京说："那就找谢尔盖·伊万诺夫。"布什答道："我这边是康迪（赖斯昵称）。"

恐怖主义袭击后仅3天，"可靠的代理人"伊万诺夫突然对俄罗斯助美国一臂之力的立场唱起了反调。他在访问亚美尼亚时说："我看不到任何哪怕是假设北约在中亚国家领土上开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美国人对彼此互相矛盾的信号困惑不已。这几个中亚国家并非世界上伟大的民主国家，但它们的总统突然间红得发紫。普京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卢沙洛去中亚国家打探口风。布什派自己的副国务卿博尔顿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争取该国总统卡里莫夫的支持。美国人现在没有心思再去纠缠这种事情。赖斯日后回忆道："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一个价码问题。卡里莫夫需要钱，他知道我们有求于他。"博尔顿显然发现，卡里莫夫愿意效力。"我事先为艰苦谈判做了充分的准备。而卡里莫夫说：'你干吗不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呢？'"[14]

这恰恰是俄罗斯人，而不只是伊万诺夫最担心的事：美国人的"军事存在"——为了打阿富汗战争有限使用中亚的军事基地——可能会演变为某种更永久、更具有政治性的东西。

伊万诺夫回忆道："我们担心，一旦美国人在这个地区立足，'推行民主'就会接踵而至。我们非常熟悉这些国家，它们曾是同一国家（苏联）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俄罗斯所说，'东方是一个异常诡秘的地方'。我们担心，政治进程有可能开始对我们十分不利。日后的局势发展验证了这一点。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领导人开始向我们诉苦，他们对美国人有求必应，然而美国人开始同反对派搞在一起推行民主。"[15]

这是最早的迹象，可见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把自己邻国实行民主的前景视为一种威胁。

9月22日，星期六，普京在他的别墅召集国防部长和安全部门首脑开了6小

时的会，讨论危机问题。他的别墅位于索契俯瞰黑海的悬崖顶端，掩隐在树丛之中。普京认为，帮助美国人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符合俄罗斯自身的利益。首先，长期以来，莫斯科一直对几个中亚共和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抬头感到不安，阿富汗煽动了其中的一些势力。自从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在阿富汗的战争惨败后，它再也无力向阿富汗派出地面部队。如果美国人替他们出兵，俄罗斯又何乐而不为呢？谢尔盖·伊万诺夫回忆说："作为回报，我们指望能得到美国人的帮助。我们知道阿富汗境内有哪些训练营地——我的意思是，我们掌握着准确的地图坐标。这些营地用于训练恐怖主义分子，包括来自车臣和达吉斯坦，还有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的恐怖分子……我们指望美国人会捣毁这些营地，或是抓获这些恐怖分子，移交给我们。"

其次，普京把"9·11"恐怖主义袭击同他在车臣面对的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威胁联系在一起，协助美国人只会有助于获得对他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或至少不再批评他打击恐怖主义）。普京已经向美国人讲述了基地组织和车臣极端分子之间的联系。他甚至称，本·拉登本人去过车臣两次。现在俄罗斯人有一个机会协助美国人铲除俄罗斯本国境内麻烦的部分根源。普京告诉手下的人："我们必须看到，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

强硬分子被说服了。普京在一次采访中说："甚至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同意了我的看法。新的形势意味着我们必须协助美国人。"

散会后4小时，普京打电话给美国总统，通知他做出的决定。普京回忆说："这是一次涉及实质性内容的交谈，我们就马上采取的具体步骤以及长远步骤达成了一致。"普京表示，如果美国飞行员在阿富汗北部上空被击落，俄罗斯愿意提供后勤支持、情报及搜寻救援，甚至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给予美国军用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的权利。他告诉布什，更重要的是，"我准备通知与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中亚各国政府的领导人，我们不反对美国在中亚发挥的作用，只要它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且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16]最后一句话至关重要。10年以后（尽管2009年俄罗斯人试图让美军离开中亚），美军仍在使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空军基地。[17]2005年，美军被赶出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地。

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主要采取了空中打击的形式。与此同时，阿富汗人自己（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将参加地面战斗。赖斯说，她和谢尔盖·伊万诺夫受命负责向北方联盟提供军火、为作战做好准备。就在普京在索契与布什通话的同时，俄罗斯的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宁将军正在塔吉克斯坦与一位北方联盟的领导人举行会谈。

俄罗斯现在似乎在反恐战争中完全与美国结成同盟。谢尔盖·伊万诺夫称，阿富汗战争打响后不久，塔利班的代表找到部署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塔吉克

斯坦边境的俄罗斯边防部队。“他们称，奥马尔授权他们建议俄罗斯和塔利班联手同美国人作战。”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莫斯科时，普京提到了这件事。普京用英语说，“我们的答复只有一个”，同时打了一个粗鲁的俄罗斯手势，攥起拳头，把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拉姆斯菲尔德大笑，说：“我们打的手势略有不同，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18]

10月7日，美国人发动了打击。这一天是普京的生日，普京和受邀参加生日晚宴的客人一道观看电视播放的首次空中打击的画面。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转向普京，举起一杯伏特加说：“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乔治——弗拉基米尔秀

普京似乎回答了卢布尔雅那那位记者提出的“美国人能否信赖此人”的问题。普京欣喜地看到，他被看作与西方步调一致，而不是与它为敌。接下来他继续发动魅力攻势，首先访问了德国，在德国议会从头到尾用德语发表演讲，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普京强调了他的国家与西方在反恐上的合作，并将之与轰炸塞尔维亚时俄罗斯挨的一记耳光做了比较。轰炸塞尔维亚一事虽然过去两年了，但造成的创伤仍未愈合（普京仍难以释怀）。“他们往往在我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做出决定，事后才敦促我们支持做出的决定。然后他们重弹忠于北约的调子，甚至说没有俄罗斯的参与，这些决定无法执行。让我们扪心自问：这种情况正常吗？这难道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吗？”

普京说：“没有一种信任的气氛，就不可能有一个团结的大欧洲。”他随后阐述了一个最终结束冷战的宏伟前景：“今天，我们有责任告诉世人，我们摈弃了昔日的成见和野心。从今以后，我们将共同确保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安全。”

德国总理施罗德完全支持普京提出的俄罗斯参与“共同”确保欧洲安全的想法。早在普京来访前，德国人已经开始思考不可想象的事：俄罗斯或许会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日后施罗德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他们讨论了他称为“颇具远见的”外交政策思路。“我与普京讨论了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而我觉得完全可能。这一前景对俄罗斯，也对北约不无裨益。”[19]

一周后，普京前往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罗伯逊，打算继续试试运气。会谈伊始，普京的开场白令罗伯逊吃了一惊：“你什么时候邀请俄罗斯加入北约？”[20]

普京的顾问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坚持说，普京不过是“打个比喻”，可罗伯逊却当真了。[21]他耐心地解释说，加入北约的程序不是这样的。罗伯逊回忆道：“我说，‘总统先生，我们不主动邀请他国加入北约。一国需要首先提出申请，然后经过一套证明它能够被纳入北约体系的程序，北约才会邀请它加入。’普京耸了耸肩，说了一句话，大致意思是：‘俄罗斯不会和一些无足轻重的国家挤在一起排队。’我说，‘既然如此，我们能否不再就加入北约问题继续外交舞剑，而是认真研究一下建立一种实际可行的关系，看看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22]

普京毫不气馁，继续做出和解的姿态向西方求爱。从布鲁塞尔返回莫斯科后，普京批准关闭在海外的两个苏联时期的军事设施：位于越南金兰湾的一个海军基地和位于古巴卢尔德的一个侦听站。俄罗斯官员私下里承认，这两处设施耗资巨大，他们乐见甩掉它们。不过他们仍然希望对方能把关闭这两个基地视为善意的信号，并对此投桃报李。莫斯科在一系列始终关注的问题上，期待对方做出妥协。苏联时期，美国于1974年颁布了一项法案，后称之为《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规定如果苏联不取消对犹太人移居海外的限制，美国将一直限制与苏联的贸易。这个问题早就不复存在，然而《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仍未废除，尽管俄罗斯一再请求废除该法（美国人也多次许诺过）。俄罗斯还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然而美国不给俄罗斯的申请放行，还对进口的俄罗斯钢材增加了关税。最重要的是，普京依然心存希望，他的良好表现或许会给《反弹道导弹条约》带来一线生机，甚至会使美国人回心转意，放弃导弹防御体系。

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布什竞选总统时做出的许诺之一即在美国建立一个全国导弹防御体系，而《反弹道导弹条约》成了他的绊脚石。

2001年11月普京访问美国时，这一问题被置于议程之首。美国人试图说服俄罗斯人，他们完全无须害怕导弹防御体系，因为它是为了保护美国今后不受诸如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不久前他称这几个国家是“邪恶轴心”）这样的“流氓国家”可能研制出的导弹的袭击，因此防御体系不会打破美俄战略平衡。鲍威尔回忆说：“总统想向普京总统表明，他，布什，知道冷战已经结束了，而我们必须避免用冷战的眼光审视俄罗斯联邦。”[23]

据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哈德利称，布什说：“我个人倾向于我们双方一致同意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宣布就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展开合作。弗拉基米尔，如果你觉得由我单方面宣布退出，从而你可以与此撇清关系对你更有利的话，我没问题。你甚至可以批评我几句。”[24]

现在轮到美国人竭力想用柔曼的音乐诱惑普京了。布什邀请普京前往他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普京备感荣幸。他解释说，他从未去过另

一位世界领袖的家。气氛十分和谐。室外雷鸣电闪，室内炉火熊熊。苏联时期的一位英雄人物范·克莱本为客人弹奏了乐曲。早在1958年，他即夺得了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冠军。赖斯展示了她的舞姿，普京的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用西班牙语同布什总统交谈。他回忆道："我说西班牙语，因为我曾在西班牙工作过。布什知道后，总爱用西班牙语与我聊天。他称呼我'伊吉'（伊戈尔昵称）。他喜欢说，'伊吉，comoestas（西班牙语里'近来好吗'的意思）？'"[25]

然而在《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上，双方立场丝毫没变。普京无意和美国人一起退出该条约，从而给美国人提供一块遮羞布。双方同意的唯一一点是，布什不会在普京仍在美国期间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免令普京难堪。

12月，国务卿鲍威尔飞抵莫斯科去埋葬该条约。鲍威尔通知普京，3天之内布什总统将公开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鲍威尔讲述了普京做出的耐人寻味的反应："普京用冷冰冰的目光注视着我，开始抱怨起来，'这太糟糕了。你们正在踢掉战略稳定的凳子腿，我们会在此事上批评你们的。'我说，'总统先生，对此我完全理解。'随后普京脸上绽开笑容，倾身向前对我说，'很好！我们终于甩掉这一问题了。现在你和伊戈尔（伊万诺夫）赶紧商讨一个新战略框架。'我回答说'是，长官'。"[26]

不到5个月，一个新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拼凑而成。同此前冷战时期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和老布什签署的两份《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相比，新条约不那么起眼，只有薄薄的两页A4纸。虽然它削减了双方的核武库，但没有任何核查条款，甚至也没有规定永久销毁核武库的任何义务。但布什和普京都需要这么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条约。两国领导人打得火热，因而需要一个条约证明这一点。

新条约签署后，普京及夫人陪同布什及夫人劳拉参观了克里姆林宫，随后把他们领到自己的别墅，一起在池塘边垂钓——普京是在回报布什邀请他去克劳福德农场。次日，他们飞到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市，参观了该市宏大的战争纪念馆、冬宫博物馆和一所大学。之后普京偷闲参加了一场柔道比赛。当天晚上，两国总统偕夫人，外加双方的各位部长和助手，在著名的马林斯基剧院观看了《胡桃夹子》芭蕾舞剧。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赖斯和谢尔盖·伊万诺夫成了一对好朋友。虽然两人都酷爱芭蕾舞剧，但谁也不想坐3个小时观看《胡桃夹子》。灯光渐渐暗下来后，伊万诺夫欠身问赖斯："康迪，你真想看《胡桃夹子》吗？"

"你有什么打算？"

“我建议你去另一个地方。你听说过艾夫曼的芭蕾舞吗？”

赖斯有所耳闻。鲍利斯·艾夫曼是一位更合她口味的先锋派编舞家。她回答道：“走，看他的芭蕾舞去。”

伊万诺夫和赖斯溜出马林斯基剧院，直奔艾夫曼的排练房。两人并排坐在排练房里，聚精会神地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演出。整个排练房里，只有他们两位观众（除了被派来陪同他们的一脸不乐意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拉基米尔·卢沙洛）。

伊万诺夫后来回忆道：“我看得出，她很喜欢这出芭蕾舞剧。这种事情，装是装不出来的。”[27]

两人赶在《胡桃夹子》演出结束前赶回马林斯基剧院，恰好赶上和官方代表团一起于午夜时分乘游船沿运河游览圣彼得堡市。

赖斯在一次采访中吐露说：“个人关系的确起作用。我开始相信，谢尔盖·伊万诺夫是一个能说到做到的人。我认为，他对我也有同样的信心。”[28]

一个新时代似乎真的降临了。有谁会想到，时隔不久，这一切即将成为过眼烟云？

---

[1] Interview with George Robertson,9 March 2011.

[2] Interview with Jonathan Powell,9 March 2011.

[3] Guardian,18 April 2000.

[4] Interview with Mikhail Margelov,29 April 2010.

[5]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14 April 2011.

[6] Interview with Stephen Hadley,24 January 2011.

[7]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3 March 2011.

[8] Interview with Igor Ivanov,11 December 2010.

[9] Interview with Sergei Ivanov,29 October 2010.

[10] Yelena Tregubova,*Bayki kremlevskogo diggera*(Moscow:Ad Marginem,2003),pp 160ff.

[11] Bob Woodward,*Bush at War*(New York:Simon&Schuster,2002),p 119.

[12]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3 March 2011.

[13]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20 June 2011.

[14] Bolton interview with Peter Baker and Susan Glasser,quoted in *Kremlin Rising*,p 131.

[15] Interview with Sergei Ivanov,29 October 2010.

[16] White House translation,quoted in Woodward,*Bush at War*,p 118.

[17] In 2009 the Russians finally tried to force the Kyrgyz government to eject the Americans from Manas by offering loans worth $2 billion.The price paid by the US to be allowed to stay was a quadrupling in the rent and the renaming of the air base into a less permanent-sounding'Transit Centre'.

[18] John Bolton,*Surrender is not an Option*(New York:Threshold Editions,2007),p 71.

[19] Interview with Gerhard Schöder,8 June 2011.

[20] Interview with George Robertson,9 March 2011.

[21] Interview with Sergei Prikhodko,30 June 2011.

[22] Interview with George Robertson,9 March 2011.

[23]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17 May 2011.

[24] Interview with Stephen Hadley,24 January 2011.

[25] Interview with Igor Ivanov,11 December 2010.

[26]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17 May 2011.

[27] Interview with Sergei Ivanov,29 October 2010.

[28]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20 June 2011.

第三章　经济改革之战

搭建新班子

令西方印象深刻的不只是普京的外交政策，还有他在国内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刺激经济，进一步巩固自由市场，把过去的残渣余孽扫入垃圾堆。在国际社会上，普京因经济改革声名鹊起。早在普京还未当上代总统、仍是总理时，他就搭建了一个由倾向于西方模式的改革者组成的新班子，负责起草改革方案。有些人，如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是普京在圣彼得堡工作时的老相识。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是一个神童，从美国杜克大学毕业后刚刚回国。普京自己对经济尚是门外汉，但积极学习经济知识并听取他人意见，并且坚信必须改革。库德林在一次采访中称普京是“新一代的人物，懂得现代社会的运作原理”。[1]

叶利钦执政时期推行了一些重大改革，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价格的放开。然而国家并没有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新涌现出的私有部门效益不佳。尤其是俄罗斯的工业基础几乎完全限于开采和出售原材料——石油、天然气、铝、木材，现代制造业几近于零。

1999年底，普京任命年仅35岁下海经商的律师格列夫执掌一个新成立的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成了经济改革的发动机机房。格列夫留着托洛茨基式胡子，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根本算不上什么经济学家，但没人怀疑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财政部副部长库德林称他“有勇有谋……好比一辆坦克，一部发动机，坚定不移地搞改革”。

格列夫领导的这个中心有点儿像智库。日后他在一次采访时回忆说：“你知道，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争取达成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制订方案时希望尽可能吸收知识分子、学者、研究人员、管理者和经济学家的意见。我们希望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不至于认为我们的方案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这样大家就会尽力去实施该方案。为此，首要任务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方案的起草。”[2]

潮水般涌来的各种建议并非都同格列夫的想法完全合拍，他面露微笑地提到其中一项：“我们收到了形形色色的建议，老实说，有些建议很奇特。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向我们提交了一些建议，倘若付诸实施的话，等于再次恢复社会主义制度。我记得，他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国家基金，用

于支付所有人的工资，然后将一切工资标准化。”

此后几个月里，这批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吹风会和头脑风暴，一点点筛选各种建议，并草拟了一个方案。普京有时会参加会议，主要是听取发言并提出疑问。他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对社会福利会产生什么影响。普京身边还有一位“御用”的经济大师——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遇到问题会找他咨询，在有些问题上借助他制衡格列夫的一班人马。

格列夫曾邀请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伊拉里昂诺夫加盟他的中心，但据伊拉里昂诺夫称，他觉得该中心对他来说“凯恩斯色彩过于浓厚”，因而婉拒了。伊拉里昂诺夫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怪人，他桀骜不驯，喜欢挑战世俗观念。如今他是质疑“环境变化说”的知名人士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他严厉抨击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及1998年8月债务违约的各项政策。也许是他直言不讳的性格吸引了普京的注意（不过几年后他为此丢了乌纱帽）。2000年2月28日，代总统打电话邀请伊拉里昂诺夫去他位于莫斯科郊外的诺沃奥加廖沃（Novo-Ogaryovo）别墅“聊聊”。

两人在一起聊了一晚上，讨论经济问题，其实更不如说是讨论经济学。伊拉里昂诺夫在一次采访时说：“他不光想了解利率等内容，还想对经济改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例如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应该做什么、怎么制订方案。显然他在一个他不熟悉的专业领域里学到了很多东西。”[3]

两人的交谈曾被走进来的一位官员打断，他递给了普京一张纸。代理总统欣喜地读到，俄罗斯军队重新攻克了车臣叛乱分子盘踞的沙托伊市。但伊拉里昂诺夫马上给普京泼了一瓢冷水，他一向反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干预，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普京，车臣战争是“犯罪”。伊拉里昂诺夫说，他力主允许车臣独立。他认为靠军事手段永远不可能征服车臣，反而会导致恐怖主义有增无减，殃及俄罗斯人民。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普京坚持认为，必须彻底消灭叛乱分子。伊拉里昂诺夫说：“他的声调都变了。刚才讨论经济问题时声调还很正常，突然间声音里仿佛掺了铁或冰。就在你眼皮底下，他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人。我感觉我俩随时会吵崩，再无和好的可能。”

伊拉里昂诺夫回忆说，半个小时后，普京看到根本谈不拢，突然说：“够了，不要再讨论车臣问题了。”“他就这样打断了对车臣问题的讨论。此后6年我们在一起开会时，普京从未当着我的面提及车臣，抑或和我讨论车臣问题。不再争论车臣问题后，我们的话题重新回到了经济改革上。”

指针指向了10点半，伊拉里昂诺夫该告辞了。他以为在车臣问题上与普京争吵后，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然而普京约他第二天再来。伊拉里昂

诺夫为普京补习经济学越来越频繁。4月12日，普京正式任命伊拉里昂诺夫为他的首席经济顾问，日后又任命他作为总统代表参加八国集团会议。

5月底，中心起草的改革方案基本定稿。用格列夫的话说，这一方案“超级自由化”。库德林说：“一旦给私有部门松绑，经济就会增长。”即将完成的改革方案有厚厚的一大本，没法呈交给代总统。由于他们没有用幻灯做讲解的经验，于是雇用了一家一流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国际咨询公司。格列夫说：“我们在该公司的莫斯科办事处泡了一个星期，搞出了两个版本的方案，简版用于对公众发表，专业版提供给政府各部门，解释它们该如何执行该方案。”

5月5日，普京就职两天前，该小组成员来到普京在索契的家，向他“深入介绍了”这一方案。这些年轻的改革者心情激动。库德林说：“我当时兴高采烈，因为一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从早到晚，一场会接着另一场会，只有吃饭或在和煦的阳光下散步时，会议才会暂停一会儿。这批经济学家同普京讨论了方案中的每项内容。普京不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但批准了方案的要点。这一方案日后被称为“格列夫方案”。然而执行该方案要比拟订它更难。

土地私有化

在此后的岁月里，格列夫方案改变了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个人所得税减少了，税率从最高30%减至仅仅13%的单一税率，公司税从35%减至24%。新土地法允许买卖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一部新法典得以出台，其中含有打击洗钱的措施，同时试图拆散一些最大的国有垄断行业，例如把电力生产从供电网中分开。

改革个人所得税势在必行，因为工资已经少得可怜的数百万俄罗斯人干脆不再交税，原因是税率不堪重负。公司税也是一样，大约80%的公司想方设法避税。格列夫提出，对所有人一律适用单一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大幅降低公司税。这一建议极为大胆，旨在一方面降低税率，另一方面增加税收。然而如果老百姓继续不交税的话，国家的预算就会出现更大的黑洞。普京看到了这一点。格列夫特别记得他和库德林与普京的一次谈话。

“总统问我们：‘你们有把握税率降低后，税收总额不会减少吗？’

“我们回答说，‘有把握。’

“他又问：‘假如你们搞错了呢？’

“我答道：‘那我就辞职。’

“普京说：‘对不起，可我不会根据你刚才的回答批准你的计划！你还没有考虑成熟。为什么你觉得辞职就可以弥补预算将会出现的亏空？从政治角度讲，你的辞职无法弥补预算的损失。’”[4]

格列夫和库德林回去后重新做了统计，再次向普京提交了他们的方案。这一次普京放行了。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满意。格列夫说：“当时我们仍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莫斯科办事处密切合作。然而他们拒绝批准我们的方案，我们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会议上谈得很艰苦。我们于是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感谢他们的意见，但我们仍然要降低税率。”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开了俄罗斯。但格列夫认为，改革方案是“一项决定性的正确决策，此后我国的经济开始腾飞”。

土地改革方案引起的争议更大，这一次是因为该方案触犯了数百万共产党人以及认为土地应该属于“人民”的人。叶利钦从来不敢触犯这些人。就在格列夫准备向国家杜马提交他的土地改革方案时，数千人打着红旗和反资本主义的标语上街游行。

政府在最后一刻做了一点让步，加强了对出售农业用地的监管，然而毫无作用。国家杜马主席请格列夫上台介绍他的法案时，台下一片骚乱。共产党议员（占1/4席位）冲到格列夫身边，不让他离开政府官员席位区走上讲台，有些人还试图扯住他。杜马主席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打闹声中，于是他打电话给格列夫，让他在自己的席位上提出他的法案。“反正没人能听见你说什么，”他说，“但你必须做一介绍，否则我们无法表决。”

格列夫于是赶紧发言，提交了他的法案。与此同时，共产党人的议员用拳头捶击自己席位前的桌子，叫喊声淹没了格列夫的声音。随后对法案进行了表决，法案获得通过……刹那间杜马大厅沦为战场，两派敌对的议员拳脚并施，彼此扭打成一团。

日后格列夫微笑地回忆说：“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在俄罗斯拥有土地的权利。”

不许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一揽子改革计划初见成效。俄罗斯人开始交税。通货膨胀从2000年的20%降至2006年的9%。经济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6%至7%之间。加上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的大宗出口项目）价格持续上涨，政府不仅达到收支平衡，而且有了盈余，开始偿付巨额外债。1998年，俄罗斯的外债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130%；而截至2006年底，这一比重为18%。

随着石油收入滚滚流入政府的钱包，俄罗斯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局面。一部分人，包括经济部长格列夫，想把这笔横财用在基础设施上，包括公路、铁路、教育事业和医疗保健体系。而财政部长库德林却担心，这样做会助长通货膨胀，因此他建议设立一个稳定基金用来吸收多余的流动资金，一旦将来石油价格下跌，可以使国家有一个缓冲，不致受到太大冲击。大多数部长都想马上为自己主管的行业拿到这笔钱。地方州长向普京抱怨说，库德林从经济中抽走了资金。格列夫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争执得很厉害。"最终两人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成立了一个投资基金，每年向基础设施投入30亿美元。格列夫说："这是一个公私合伙企业。如果有私人投资，政府就会出钱资助，从而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修建大工厂、发电站及其他基础设施。"

不过最大的赢家还是库德林建立的"稳定基金"。截至2005年1月初，该基金的资金总额高达5220亿卢布（合185亿美元）。俄罗斯靠这笔钱完全付清了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33亿美元）。石油收入继续源源不断。截至2006年8月，俄罗斯已完全付清了苏联时期拖欠的由债权国政府组成的巴黎俱乐部的大约400亿美元，节省了77亿美元的利息。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飙升，支付了如此大笔的钱款后，稳定基金的资金继续增长。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石油价格下跌时，俄罗斯得以从容应对。

普京第一任总统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总理是卡西亚诺夫，一位自由市场的信奉者，风度翩翩，声音洪亮，英文流利。他负责格列夫方案的执行，日后他成为抨击普京最有力的人和反对派领袖之一。2008年，他曾竞选总统。然而，克里姆林宫声称发现为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征集的200万人签名是骗局。不过当年，他和总统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看法都完全一致。直到今天，卡西亚诺夫仍然承认，当时的普京完全支持自由化的改革。"当时我感觉自己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盟友，正携手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型的民主国家。在此期间兴许有一些失误。"[5]

改革者只在一件大事上未能如愿以偿，日后证明此事意义非同小可。当有人问卡西亚诺夫，普京是否经常干预政府的日常工作时，他回答说："90%的时间里都没有，剩余的10%涉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及几乎所有和它沾边的事。"[6]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俄国最大的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厂家。该公司的前身是苏联时期的天然气部，叶利钦时代转为私有企业，但国家仍持有该公司40%的股权。公司当时经营混乱，成了腐败、侵吞资产和避税的温床。[7]普京上台后誓言要整顿该公司，并任命了他在圣彼得堡的密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和阿列克谢·米勒分别担任新的董事长

和首席执行官。据卡西亚诺夫说，米勒对天然气行业几乎一窍不通，第一年没干别的，都用于熟悉自己的工作。然而问题不止于此。对格列夫班子里的成员来说，问题主要出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一个苏联时期的庞大怪物，它对勘探、开采和销售各个环节的垄断窒息了竞争。与此相反的一个例子是石油行业，90年代它被拆成众多相互竞争的公司。

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当年是能源部的一位年轻副部长，负责天然气部门的改革。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打破垄断，把分销公司和生产公司分开，使其变成规模较小的企业，然后将其私有化，让它们彼此竞争”。[8]普京曾不顾自己顾问伊拉里昂诺夫的反对，支持打破电力部门垄断的相似方案。然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其他公司不一样。

2002年秋，米洛夫草拟了一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改革方案，得到格列夫和卡西亚诺夫的批准。卡西亚诺夫说：“似乎不少人认为，将天然气的生产和运输部门分家会导致整个行业的崩溃。而天然气行业当时是支撑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些人现在还在吓唬人，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如果不能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下去，整个国家就会崩溃。这都是危言耸听。事实上，所有称职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都知道，改革天然气行业是毫无风险的，改革的一切条件已经具备。”

据米洛夫称，改革方案递交给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后，他旋即为此事找到普京。“米勒怒气冲冲地给普京写了一份备忘录，说这样做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做法威胁到了国家安全。普京在备忘录上批了一句话：‘我基本赞同米勒先生的意见。卡西亚诺夫先生，请您斟酌。’”

米洛夫说，他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普京很早就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特别感兴趣。显然，普京把这一公司视为权力的最大象征和源泉。”

卡西亚诺夫先后三次将这一方案提交给他的内阁，然而普京坚持说，需要进一步修改该方案，并建议他的总理继续与米勒商讨。他告诉卡西亚诺夫：“听听米勒的意见，你自己亲自去找他，不要只听撺掇你的那些人。”

2003年，普京干脆下令卡西亚诺夫不要再提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改革方案一事。“就在内阁会议开始前5分钟，普京打电话给我，通知我从议程中删除这一议项。”后面几章里将会提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日后将成为普京在应对媒体、经济以及外交政策方面最有力的权力杠杆。

好日子

主要由于经济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在普京总统第一任期内，外国投资人首次显出了信心增加的迹象。消费者方面，诸如法国连锁超市欧尚和瑞典家具店宜家这样的大跨国公司，率先在莫斯科郊区建立了庞大的零售店。宜家每新开一家店，耗资5000万美元，但宜家期待很快能收回投资，因为说来奇怪，莫斯科市民似乎有钱在他们的店里消费。然而所有企业家在俄罗斯依然遇到了烦琐的手续和腐败，没有几个外国人有足够的毅力或办法对付它，这成了阻碍外国人进一步投资的唯一障碍（第十二章讲述了腐败给俄罗斯带来的严重恶果）。尽管如此，宜家蓝黄两色的巨大家具店仍仿佛是现代生活的一面面旗帜，在莫斯科四周的郊区迎风招展。不用多久，其他城市也将飘起宜家旗帜。

就俄罗斯人的心理而言——在可能了解的限度内——20世纪90年代的震荡似乎正在过去。我感觉（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主观印象），俄罗斯人觉得自己不像在叶利钦时代那样依赖西方的施舍。外国顾问不见了，新的经济增长常常给人一种本土感。超市里本国产品琳琅满目，但不再是过去出售的盛在清一色褐色纸袋里的劣质产品，而是不逊色于西方产品的包装精美的本国产品。俄罗斯人开始改用以前自己喜爱的品牌，如买Vologda牌黄油而不是银宝（Lurpak），买本地产的软甜口味的香肠而不是进口的德国香肠。人们重新领到了工资，90年代初成千上万在街头摆摊出售自己私人物品的人不见了踪影。莫斯科虽然让人感到招摇肤浅，但人气很旺。到处是平地而起的大厦，每天都有新的商家开业。

俄罗斯人有理由感到乐观。人们去宜家购物是因为他们正在装修自己的公寓，将昔日的旧瓷砖和苏联时期的家什扫地出门。很多人（至少是在大城市）在过了10年前途未卜和贫穷的日子后，终于看到了生活正与过去真正分道扬镳。

2002年岁末，形势看上去相当不错。普京和布什成了好朋友，普京的班子将俄罗斯转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经济体。

然而阴暗势力并没有闲着，俄罗斯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仍笼罩在这些势力的阴影之下。

---

[1] Interview with Alexei Kudrin,14 December 2010.

[2]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7 December 2010.

[3] Interview with Andrei Illarionov,27 January 2011.

[4]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7 December 2010.

[5] Mikhail Kasyanov,*Bez Putina*(Moscow:Novaya gazeta,2009),p216.

[6] Interview with Mikhail Kasyanov,16 February 2011.

[7] See Marshall Goldman,*Petrostate*(New York:OUP,2008),chapter5.

[8]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Milov,16 February 2011.

第四章　阴暗面

禁锢媒体

鲍里斯·叶利钦正在晃动摇篮里的婴儿普京，婴儿啼哭不止，叶利钦哼着小曲哄他睡觉。

叶利钦叹了口气：“你怎么长得这么丑啊！上帝饶恕我，你的来历如此黑暗……看上去这么阴沉……主啊，为什么让我这个民主到骨子里的人生出了他呢？”

此时一个仙女在他头顶上方现身。仙女不是别人，正是20世纪90年代末把普京扶上台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是啊，你的第一个孩子长得比他好。”

叶利钦打了一个哈欠，垂下头说：“我简直累死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会儿。”随后，他进入梦乡。

别列佐夫斯基说：“可怜的人啊，他已经累坏了。”

突然，婴儿开始大叫大嚷起来：“把他们消灭在厕所里。一个不留……消灭在马桶里！”

“轻点儿声，”别列佐夫斯基说，“不是所有的人。孩子，安静点儿。我们要把你培养成人。”

以上这段素材源自德国作家E·T·A·霍夫曼写的童话故事《小查克斯》，故事讲述了一个相貌丑陋的侏儒请一个仙女给他施了魔法，在别人眼里变成了一个俊小伙。这段对白是一出精彩的讽刺木偶剧《木偶》中的一个片段，曾在独立电视台播放。

普京刚当上总统时，周复一周不得不忍受电视上播放的这类讥讽节目。他简直恨死这些节目了。“把他们消灭在马桶里”当然是指普京发出的剿灭车臣恐怖分子的威胁。正是别列佐夫斯基这个寡头，利用他旗下的电视频道“美化”普京，掩盖他当过克格勃的历史，助他竞选。那么侏儒是指谁呢？俄罗斯的电视观众无人不晓，这是暗指普京的五短身材。

《木偶》剧本是维克托·申德洛维奇根据《小查克斯》一书改编的。他是一个喜好恶作剧的幽默作家，留着大胡子，全然不把权威放在眼里。他知道因为该剧的缘故，普京永远不会原谅他。“好几个人告诉我，该剧播放

后，普京气疯了。”[1]

然而《木偶》并非独立电视台播放的唯一一个冒犯了普京的节目。叶利钦时代这一电视频道创办之初，立刻赢得了自由思想播种机的名声。独立电视台不加删节地播放了车臣战争的战况报道（包括俄罗斯军队犯下的暴行和俄军的士气低落）。星期天晚上播放的由该频道大牌记者伊夫吉宁·基塞约夫主持的政治脱口秀，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俄罗斯人必看的节目。

俄罗斯的广播业当时仍然很稚嫩。西方全面、独立报道的传统尚未在此扎根。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老板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毫无顾忌地利用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全国电视网的大股东别列佐夫斯基也是一样。1996年，两个人均为叶利钦当选总统出过力。当时如果共产党人卷土重来，他们的商业利益有可能受到威胁。然而1999年国家杜马大选期间，别列夫佐夫斯基控制的全国电视网全力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而独立电视台却为普京的竞争对手摇旗呐喊。

距2000年3月总统选举只有两天时，独立电视台播放了一个节目，引起克里姆林宫的震怒。节目内容是对前一年夏天梁赞市居民楼爆炸案可疑背景的调查，以及对联邦安全局插手的可能性的讨论（见第一章）。新闻部长米哈伊尔·列辛告诉古辛斯基的副手伊戈尔·马拉申科，独立电视台“已经逾越红线，在政府眼里已属不法分子”。

似乎从这一刻起，独立电视台就死定了。包括独立电视台在内的古辛斯基的商业帝国“桥”媒体集团（Media-Most）陷入财务困境。20世纪90年代，它曾贷款数十亿美元用于推行庞大的业务扩展计划，甚至斥巨资发射了自己的卫星，期待新生的中产阶级很快会买独立电视台的接收器和节目。古辛斯基计划公司在纽约证券市场上市，筹集资金支付欠债。然而1998年8月爆发金融危机后，以上计划全泡了汤，俄罗斯的电视广告市场同样化为乌有。“桥”媒体集团发现自己欠债累累，无力偿还。它最大的债权人是国有的天然气垄断集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克里姆林宫决定扼杀古辛斯基时，用的就是这个撒手锏。据基塞约夫称，此前古辛斯基一直在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讨论重组债务的问题。然而普京当上总统后，下令这家天然气公司立即要求独立电视台偿付拖欠的所有贷款。如果“桥”媒体集团拒绝支付，就没收电视台的资产。5月11日，普京就职总统后仅4天，数十名手持武器、头戴面罩的税警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部队冲进“桥”媒体集团的总部大楼。日暮时，他们带走了成百箱的文件、录音带和设备。马拉申科称这次突击搜查“完全是政治性的，是对我们的报复和恐吓”。

不过独立电视台或许尚存一线生机。大约就在这时，马拉申科直接收到克里姆林宫的一项建议：如果满足某些条件，报复就会终止。据申德洛维奇

说，这些条件是：不再调查克里姆林宫的腐败，改变对车臣的报道，尤其是“从《木偶》一剧中去掉‘一号人物’”。换言之，节目不得再模仿普京的相貌特征。

申德洛维奇好似一头看到斗牛士挥舞着红布的公牛，被彻底激怒了。他的反应是又写了一集令人捧腹的《木偶》，对克里姆林宫的这一命令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由于不能再演普京，他们把原来影射普京的人物改成一丛着火的灌木。以普京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的面目出现的摩西，从一位未露面的领袖手中领受刻有克里姆林宫“十诫”的石板。剧终时，这位领袖被称为“吾主上帝”（Gospod Bog），俄语里简称GB（听上去没有哪个俄罗斯人不会联想到KGB——克格勃）。在英语里，“吾主上帝”这一称呼听上去怪怪的，然而在俄语里它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而且充满了挑衅意味。

两周后，6月13日，古辛斯基被逮捕。一位电视台记者问到此事时，普京假装不知，说“我对此感到意外”，几乎难以掩饰嘴角浮现出的一丝微笑。“我希望做出这一决定的政府部门——我想应该是总检察院——有充足的理由。”

古辛斯基面临一个抉择：要么把他的媒体帝国卖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要么因涉嫌重大诈骗案接受审判。这是讹诈，但古辛斯基屈服了，随后逃到海外。俄罗斯最自由的媒体集团现在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囊中之物。

另一个媒体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的命运比古辛斯基好不到哪儿去。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时，他被指控犯有诈骗罪。普京出任总理后，放弃了对他的起诉。在众人眼里，他成了最有权势的寡头，拥有一个媒体帝国，外加庞大的工商业资产，包括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俄罗斯航空公司。随着别列佐夫斯基逐渐被排挤出普京的小圈子，他拥有的媒体集团对他变得更加重要。6月，别列佐夫斯基批评了普京宣布的重新收揽权力的计划。古辛斯基被逮捕的次日，检察官宣布开始调查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财务，别列佐夫斯基涉嫌犯有重大欺诈罪和洗钱罪。

就在3月总统大选前夕，普京誓言要取缔寡头：“至于那些集权钱于一身的人，我决不允许这些寡头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普京这番话令不少人脊背发凉。普京不能接受的是财富（尤其是庞大的不义之财）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尽管别列佐夫斯基曾协助他攫取权力，但他不喜欢别列佐夫斯基凭借自己的媒体帝国（不光是全国电视网，还有另一个频道“电视6台”及几份报纸）呼风唤雨。

和古辛斯基的情况一样，别列佐夫斯基的倒台很可能是由一个电视节目引

发的，或者说这一电视节目加快了他的倒台。2000年8月，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沉没，艇上的188名官兵遇难。事件发生后，全国电视网批评普京反应迟钝。该电视网的首席播音员谢尔盖·多连科——当年被雇来帮助普京的政党赢得1999年底大选的鹰犬——如今开始咒骂总统。核潜艇事件发生后，整整5天，普京仍留在索契度假。又过了4天后，普京才前往位于北部的基地接见遇难官兵的家属。普京还拒绝了英国和挪威提出的参与救援的请求。多连科剖析了普京在一次采访中为自己所做的辩护，对每一句话冷嘲热讽，让人觉得他对本国总统鄙夷至极。例如，普京在电视上说，16日外国才提出参与救援。多连科长叹了一口气后反驳道："对不起，事实上一些国家15日就提出参与救援。倘若不是我们一直对世界谎称一切顺利，无须他国帮忙的话，它们还会更早提出帮忙。"多连科还播放了一段普京私下会见死者家属的谈话录音，听到他指责媒体应对这次事故负责。"他们都是骗子，全是骗子。过去10年，电视节目始终在诋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

多连科的节目被砍掉了。不久，别列佐夫斯基步古辛斯基的后尘流亡海外。8月底，别列佐夫斯基被召到克里姆林宫见普京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后者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把他拥有的全国电视网的股权移交给国家，要么当古辛斯基第二，即受到起诉。次日，普京亲自召见别列佐夫斯基，指责这个商人蓄意诋毁他，两人大吵一顿。据别列佐夫斯基讲，普京对他说："你应该把你的股票交由我亲自控制……我将以我的方式管理全国电视网。"别列佐夫斯基一口回绝，随后拂袖而去。

实际上别列佐夫斯基还是放弃了他对该电视台的控制，把他的股份卖给了另一个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后者乖乖地把他的表决权转给了国家，政府因此完成了对这一电视频道的接管。11月1日，总检察长起诉别列佐夫斯基诈骗俄罗斯航空公司上亿美元的资产。当时别列佐夫斯基在国外，决定暂不回国。躲在海外的别列佐夫斯基称，指控他侵吞的钱中有一部分曾用于资助普京的竞选。

此后别列佐夫斯基一直住在伦敦，尽管俄罗斯多次设法将他引渡回国。2003年9月，别列佐夫斯基被给予政治庇护。普京亲自出马，设法劝说英国将他遣返回俄罗斯，并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他对西方体制的无知。普京要布莱尔对法院施压，要它同意引渡别列佐夫斯基。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讲，布莱尔解释道，这在英国办不到，此事的决定权在法官手里，而不是英国政府。无法理解法院独立性的普京很不高兴。[18]别忘了此人是一个克格勃特工，苏联培养出的产物，无意间把自己不民主的标准套用于一个西方国家。

人们没有理由认为普京是在演戏，他看上去更像是真的以为西方的政治家可以像俄罗斯领导人一样左右法院。同样，他也以为各国媒体都是受政府

控制的。2005年，普京当面指责布什总统亲自下令解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持人丹·拉瑟。还有一次，当一位记者问为什么俄罗斯警察常常殴打和平示威者时，普京说，西方的示威者因为到了不该到的地方被警察“用警棍敲脑袋是家常便饭”。

垂直权力结构

对本书前两章讲述的普京总统当初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改革领域的举动，西方赞誉有加。然而西方的赞誉从一开始就因为普京对民主的理解而打了折扣，普京对自由媒体的打压只是原因之一。

普京总统上任伊始，首先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着手建立他所称的“垂直权力结构”——将所有政治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收归到他个人手里。普京认为，中央权力分散是俄罗斯种种弊端的根源。叶利钦领导无方导致犯罪和腐败盛行，寡头权力膨胀，地方政府不听指挥，各行其是。叶利钦曾鼓励地方政府“有多大能耐，就做多大主”。一个未曾料到的后果是，地方州长因而悄然无视，甚至暗中破坏中央政府的法令。俄罗斯联邦面临可能走向四分五裂的危险。很多地区通过了与俄罗斯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截留应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款，或同外国签署双边协议。有些地区如果自成一国可以过得很好，例如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生产的钻石占世界产量的1/4（人口仅不足50万），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人口150万）是世界第二大石油产地。

5月13日，普京就任总统后仅6天，宣布将全国89个地区划归总统个人任命的7位“超级州长”管辖。其中5位州长曾是以前的“强人”（silovik）[19]，包括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维克多·切尔克索夫，昔日他曾参与过迫害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

6天后，普京启动了对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相当于“参议院”）的改革。此前，当选的地区州长和区域立法委员会都是凭官位当选的上院议员。如今这些地方大员被任命的代表所取代，克里姆林宫得以把“友好的”上院议员塞进联邦委员会中。

接下来，普京着手将征税和税收分配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此前，中央和地方的比例为50：50，权力集中后的比例变成有利于中央政府的70：30。

然而处于新的垂直权力结构顶端的不是联邦政府，而是普京本人。普京把他信任的前安全部门或家乡圣彼得堡的同事安插在要害部门，从而大权独揽。不仅如此，很多人还被任命为国有企业的董事，从而建立了一个以普

京为核心的、纵横交错的蜘蛛网般的庞大政治商业结构。

伊戈尔·谢钦的履历无可挑剔。他曾是普京在圣彼得堡的同僚。据有人讲，此前他可能还干过特工，在非洲的葡萄牙语国家作为翻译从事间谍活动。谢钦成了普京最信任的顾问，1996年随普京从圣彼得堡到了莫斯科。普京出任代总统后，留下了叶利钦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但马上任命谢钦为办公厅副主任，负责管理普京的来往公函，并且实际上主持能源部的工作。2004年，谢钦又成了一家国有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

曾在列宁格勒克格勃部门任职的维克托·伊万诺夫成了普京负责人事的办公厅副主任，同时兼任俄罗斯“金刚石–安泰”防空公司和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谢钦和伊万诺夫被人看作普京圈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1999年，普京在圣彼得堡的另一位旧同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来到莫斯科，担任办公厅第三副主任，同时兼任国家天然气的垄断集团——国家天然气公司的董事长。

普京将他在圣彼得堡的同事阿列克谢·米勒调到莫斯科，出任能源部副部长，随后任国家天然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两位经济改革的主将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同样来自圣彼得堡。格列夫任国家天然气公司的董事，库德林则出任俄罗斯外贸银行和一家钻石生产商“俄–萨金刚石”股份公司的董事长。

另一位列宁格勒人，和普京一同上过克格勃学校的谢尔盖·纳雷什金在普京第二任内被提升为总统办公厅主任，第一电视频道董事会主席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副董事长。

普京在列宁格勒克格勃部门的另一位老同事尼古拉·帕特鲁舍夫继普京后出任联邦安全局局长。

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在联邦安全局时曾在普京手下干过，后来成了内政部长。前面提到过的切尔克索夫当时是普京在联邦安全局的另一位下属。

和普京一起在德累斯顿干过特工的谢尔盖·切梅佐夫被调到莫斯科执掌俄罗斯最大的武器出口公司——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另一位“契卡”弗拉基米尔·雅库宁被调到交通部，后来成了俄罗斯铁路运营公司的总裁。

雅库宁与普京还有一层关系：二人同是一个名叫“别墅合作社”（又称“湖畔社”）的创始成员。该合作社负责管理他们在圣彼得堡郊区共青团湖边的乡村别墅。普京在“湖畔社”的其他朋友（第十二章将谈到）如今均在政

府、银行和媒体身居要职。

车臣战争及其恶果

普京出任总统后的头几年里，车臣的局势给他声称正在把俄罗斯带入“欧洲大家庭”的说法投下了一条长长的阴影。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1994~1996年），我在车臣待过几个月，亲眼目睹了俄罗斯军队给这个共和国造成的严重破坏。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俄军犯下了严重战争罪和侵犯人权罪。我和其他几十名记者均报道了这些罪行，然而国际社会毫无作为，也许是因为倾注于巴尔干半岛上的另一场战争。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完全毁于炮火，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非命，他们的家所在的街区被俄罗斯军队的飞机和大炮夷为平地。以消灭被称为“匪徒”的叛军为借口无法为以上行为开脱。我采访过俄罗斯人建立的“甄别营”（fltration camp）里的幸存者。车臣人在这里受到刑讯逼供，有时逼供人仅为了取乐。我去看过野外的巨大死人坑，里面有几百具尸体，一些人的手被捆绑在背后。我见过数十个家庭悲痛欲绝的成员，目睹了被杀害的妇女儿童、车臣境内村子里数百家残垣断壁的房子、逃离俄罗斯军队的如潮难民、趴在地下室里躲避空袭的人。我见过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在自己沦为瓦砾的家里卧床不起，在饥饿和寒冷中等死。这一切都是在叶利钦当政时发生的，然而西方痴迷于叶利钦对民主的支持，因而把这场冲突看作“内政”，只是敷衍了事地谴责了几句。

根据各方面的报道，1999年普京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更为惨烈，然而报道这场战争的西方记者人数更少。原因很简单，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至少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车臣人对记者总体上十分友好。自从那时以来，这个共和国沦为一个无法无天的烂泥潭，记者被绑架或杀害的风险极大。叛乱分子自己和当年的俄罗斯军队一样野蛮。这一次，主要靠像《新报》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这样勇敢的记者向世界报道战争真相（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位西方领导人要求以战争罪审判哪怕一位俄罗斯指挥官或政治家）。

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记者在车臣境内的行动自由没有受到什么限制，因此才有了强烈批评这场战争的报道，不仅是西方的报道，俄罗斯的报道也是一样，尤其是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报道。俄罗斯当局汲取了教训，这一次开始限制去战区的人数。2000年年初，一位为自由广播电台工作的俄罗斯记者安德烈·巴比斯基因为在报道中抨击战争甚至被俄罗斯联邦军队绑架，然后交给车臣战斗人员，换回俄罗斯的战俘，好像他本人是一名战斗人员似的。普京显然支持这一荒谬做法。他表示，他看不出交换有什么不对，因为巴比斯基——别忘了他是一位记者——是叛徒。普京对《共青团真理报》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去见那些他为之效劳的人。”[2]

如果普京认为批评性质的报道无异于与敌人为伍的话，那么完全可以猜到他内心对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看法。独立电视台遭整肃后，她成了报道俄罗斯人在车臣的野蛮行径的最重要的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耐心倾听车臣百姓的痛苦倾诉。

当局称，车臣军事行动是一次“安全行动”，目的仅是消灭恐怖分子。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采访过目击了俄罗斯“安全扫荡”的人，例如家在格罗兹尼郊区的45岁难民苏尔丹·舒阿杰波夫。他向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讲述了他从自己住的那条街上收敛安葬了51具尸体的经过。以下只是他讲的部分内容：

74岁的萨义德·祖巴耶夫从5街36号的家门走出时，正好撞上联邦军人。士兵强迫他跳舞，对他脚下开枪，逼他往上蹦。老人跳不动后，被士兵射杀。感谢真主！他再也不会知道家人的遭遇。

晚上9点左右，一辆步兵军车撞开大门上的锁，冲进祖巴耶夫家的院子，士兵二话不说，非常麻利地把那位老人64岁的妻子扎伊纳布，他们45岁的女儿玛丽卡（俄罗斯民兵一位上校的妻子），玛丽卡8岁的小女儿阿米娜，萨义德和扎伊纳布的另一个女儿、40岁的玛丽耶，他们44岁的侄子赛义德–艾哈迈德·祖巴耶夫，两位老人的儿子、35岁的鲁斯兰，他怀孕的妻子露依莎和8岁的女儿叶琳娜从房子里带到外面，在台阶上排成一行。机枪声响过后，所有人倒卧在血泊中。祖巴耶夫一家人中只有鲁斯兰14岁的女儿伊妮莎活了下来。她长得很漂亮，士兵屠杀前把她领到了一边，之后把她强行拉走了。

我们千方百计想找到伊妮莎，可她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苏尔丹说）。我们猜想他们一定是强奸完她后，找个地方把她活埋了。同一天晚上，第55中学校长遇害。他们先让他靠墙站，长时间毒打他，所有肋条都打断了，然后对他脑袋开枪。在另一间房子里，我们看到一位84岁的俄罗斯老太太和她35岁的女儿拉丽莎并排倒卧在地上。两人被强奸后遭射杀。拉丽莎曾是格罗兹尼一位有名的律师。车臣国立大学的物理教授、42岁的阿德兰·阿卡耶夫四仰八叉地横卧在自家院子的地上，死前曾被拷打过。47岁的德米尔汗·艾哈迈多被砍头，两只胳膊也被剁掉。新卡泰马一带军事行动的特征之一是砍下人的脑袋。我看见过几个砍完头滴着鲜血的木墩，在谢瓦卡亚大街上，一把斧头卡在一个木墩上，上面还有一颗带着红围巾的妇女的头颅。旁边的地上，倒卧着一具无头男子的尸体。我找到了那名被砍头妇女的尸体，她的腹部被剖开，里面塞进了一颗头颅。是她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不得而知。[3]

尽管发生了证据确凿的种种暴行，但只有一位高级军官被绳之以法。尤里·布达诺夫上校被指控撒酒疯时绑架、强奸和杀害了一位18岁的车臣姑娘艾鲁萨·昆吉耶娃。士兵把她从家里拖了出来，塞进一辆装甲运兵车带走了。

据说借口是他们认为她是个狙击手。强奸罪名后来被撤销了。布达诺夫供认勒死了这名妇女，但声称他审讯这位姑娘时因暴怒丧失了理智。最初他被判无罪，重审后改判10年有期徒刑。2009年1月，他提前15个月被释放，2011年6月在莫斯科一条街道上被人暗杀。

俄罗斯军事行动引发的报复是，此后10年车臣恐怖主义分子在俄罗斯全国各地发动的袭击——在飞机上，在地铁车厢里，在学校和街道上。2002年4月18日，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宣布车臣战争结束。时隔仅6个月，俄罗斯首都的中心即遭到恐怖主义袭击。2002年10月，大约50名车臣武装人员（其中不少人是妇女）冲入正在上演一出叫《东北风》音乐剧的杜布罗夫卡剧院，将演员和850名观众扣押为人质。这些人身携武器弹药，妇女身上系上炸药。他们要求俄罗斯军队在一周内立即无条件从车臣撤军，否则开始射杀人质。

此后3天，普京同自己的安全部门首脑几乎夜以继日地开会讨论如何处理这场危机。在首次会议上，国家安全部门建议强攻剧院。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总理坚决反对，建议与恐怖分子谈判，以避免人员伤亡。据卡西亚诺夫说，安全部门首脑坚称，没有必要让步，因为伤亡难以避免。普京原定去墨西哥出席亚太领导人峰会，但改派卡西亚诺夫代他出席。有人提出，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支走唯一反对使用武力解救人质的人。然而连卡西亚诺夫本人都认为，当时普京绝无可能出国（尤其是考虑到“库尔斯克号”核潜艇遇难事故后他受到的责难）[4]。1995年布琼诺夫斯克市人质危机期间，叶利钦前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参加一次7国会议，留下他的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同扣押人质分子谈判，并允许他们逃离。普京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几位政治家和记者（包括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确试过对扣押人质分子晓之以理，然而毫无结果。最终安全部门采用了自己的方式。特种部队先在剧院里施放了一种麻醉气体以麻醉恐怖分子（还有人质），随后突击队员冲了进去。交火之后恐怖主义分子悉数被打死（包括已经被气体熏昏的恐怖分子）。然而130名人质死亡，大多数人死于化学气体中毒后未能马上得到医疗救护。这次行动受到多方责难，包括对使用的气体化学成分严加保密，甚至连参与抢救的医务人员都不知情，也不知道能用什么解毒剂。这无疑造成了更大的伤亡。

普京后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数百人的性命得到挽救。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国政府找到了对付这种情况的万无一失的办法。然而这位强人真的充分考虑保护人质性命了吗？“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时，人们揣测普京拒绝外国帮助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想让北约的救援人员在一艘高度机密的俄罗斯核潜艇上转来转去。用于解救剧院人质的化学制剂也是军事秘密，具体配方是什么始终没有披露过。

俄罗斯当局拒绝正视的一个大问题是恐怖分子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是如普京所说扎根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还是对自从1994年以来俄罗斯试图征服车臣而采取的野蛮行动的报复？从包围剧院期间一些枪手回答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问题中，可以找到答案。她请一名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释放岁数大一点的孩子（岁数小的已经被释放了），她得到的答复是：“孩子？这里没有孩子。在安全行动中，你们不放过年满12岁以上的人，我们也不会放过你们的人。”

“为了报复？”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问。

“为了让你们尝尝是什么滋味。”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问，能否至少允许她给孩子带点儿吃的。

“你们在安全行动中让我们的孩子吃东西了吗？你们的孩子同样可以不吃不喝。”

降服工业金融寡头

普京出任代总统12小时后首次对全国发表讲话时誓言尊重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财产权。2000年7月28日，普京同俄罗斯20位商界和金融寡头摊牌，向他们解释了他讲话的含义，并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

叶利钦时代，这批人钻尽空子，违法枉法、行贿受贿、杀人越货、敲诈勒索、对为让他们力挺叶利钦而送上门来的公司和资产一律笑纳，结果个个腰缠万贯。他们拥有国家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石油天然气管道、铝冶炼厂、电信和广告业、汽车制造厂、钢铁企业、一家酿酒厂和几家最大的银行。在克里姆林宫宏大的圆柱大厅里，与他们一同等候总统的是政府改革小组的一批年轻人：卡西亚诺夫、库德林和格列夫。他们亟须这些寡头付税，从而整顿好政府的财政。然而自从这些寡头听到普京威胁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后，他们的心思完全不在纳税上。他们刚看到自己的生意同伴古辛斯基被剥夺了个人财富，逐出国门。另一位媒体大亨别列佐夫斯基也不见了踪影。

众寡头不分等级高低，围坐在一个巨大的面包圈形状的桌子旁。然而当总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时，一眼就能看出谁说了算。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普京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不会逆转私有化进程，但有两个条件——寡头必须开始纳税，而且不得干政。普京说话很小心，避免听上去像是下最后通牒，但意思很明白。

格尔曼·格列夫简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普京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没有

国有化或没收资产的计划。他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我们对你们做出了姿态。我们大幅减税，建立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并保护私有财产权。不过诸位，既然我们降低了税率，你们就应该纳税。其次，如果你们选择了经商，那就一心一意地经商。’”[5]

这些巨商欢天喜地离开会场，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高兴得差点儿想哼两句小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无意介入政治。而就他们拥有的财富而言，纳税只是极小的代价。五金矿产集团总裁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听上去几乎不无愧疚：“我们这些寡头把自己当作精英，然而社会并不认同我们这些精英。我们必须更好地做人。”

召开这次会议的想法来自下诺夫哥罗德州前州长鲍里斯·涅姆佐夫。他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率先启动了私有化进程，如今是一个政党——“右翼力量联盟”的领袖，致力于保护新生的中产阶级利益。他把这次会议称为分水岭。以此为界（他不无讽刺地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历经10年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结束了。换言之，就在这次会议上，俄罗斯的“强盗资本家”被给予了一个改邪归正、老实经商的机会。

这些寡头基本上顺从了普京。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流亡海外，前者悄然无声地移居国外，后者在国外继续与普京作对。石油巨头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成了国家杜马的议员及偏远地区楚科奇自治区的行政长官。但他没有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挑战普京，而是对自己2003年购买的英格兰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更感兴趣。

只有一个寡头不肯对普京俯首帖耳——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因顽固不化，多年被关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监狱里，成了俄罗斯和西方关系最大的紧张之源。

霍多尔科夫斯基问题

早在戈尔巴乔夫刚刚尝试改革时，霍多尔科夫斯基就对商界下手了。作为一个共青团干部，他利用关系先后搞了一个咖啡馆和一家进口企业，后来又建立了俄罗斯首批商业银行之一——梅纳特普银行。从那时起，他的生意风生水起。1995年，他贷款给破产的叶利钦政府，利用出台的“贷款换股权”计划获取了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很大一部分股权。次年，他用远低于公司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其股票——实际上是从他自己手里购买——仅花费3.09亿美元即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不到几个月，该公司价值达到60亿美元。这一切都不违法，因为计划出自政府之手。

毋庸置疑，霍多尔科夫斯基采用了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建立自己的帝国。美国记者大卫·霍夫曼在他撰写的《寡头》一书里承认，即使是在作了艰苦调查后，他仍然搞不清霍多尔科夫斯基玩过的一些猫腻，从海外交易、幌子公司到“变戏法”。[6]

然而霍多尔科夫斯基控制了尤科斯石油公司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决定采用严格的西方财会和透明度标准（主要是想吸引外国投资）。霍多尔科夫斯基成了西方的宠儿，因为他比任何一个寡头更能代表新一代的俄罗斯资本家——不仅是一条大肆敛财的鲨鱼，还是一位慈善家。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尤科斯制定了一部公司管理章程，他同时也是引入美国财会标准的第一位俄罗斯商人。他自己出钱在莫斯科一座18世纪的庄园里建了一个教育机构，给130个穷孩子上课。他设立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每年向涉及教育、公共卫生、领导人培养计划和文化事业的项目及慈善事业捐赠1500万美元。

然而没有哪个名字能比霍多尔科夫斯基更让普京的一双眼睛露出冰冷的鄙夷之色。霍多尔科夫斯基最终因经济犯罪—偷逃税款、欺诈和侵吞财产—被判入狱。普京会毫不犹豫地举出他的其他罪状，如“政治”罪，甚至是谋杀罪。

霍多尔科夫斯基当然不是什么圣徒。2002年2月，霍多尔科夫斯基去伦敦拜访英国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主动提议允许英国石油公司认购25%的尤科斯股权。布朗不为所动。日后布朗解释了为什么说话轻声细气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让他感到不自在：“他开始谈论让一些人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说他如何能做到让石油公司少纳税，如何玩弄众多权势人物于股掌之上。我感觉他这个人的权势似乎太大了点儿。事后这么讲很容易，然而当年他的做派令人感到他不是一个本分人。”[7]

对推行改革的俄罗斯政府来说，“不守本分”一词太轻了。格尔曼·格列夫说：“尤科斯不点头，什么草案也别想通过。”实际上，贿赂国家杜马议员已司空见惯。议员从形形色色的商业利益集团手里拿钱以中饱私囊。然而石油公司的能量更大，尤其是尤科斯石油公司。当涉及对石油出口征收影响石油公司利润的新关税时，事情变得棘手起来。格列夫记得国家杜马即将投票表决前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对他的一次拜访。他说：“格列夫先生，我们非常赞赏你为发展市场经济所做的一切。然而，明天你要提出一项对我们不利的法规。因此我们希望你能懂得，首先，这项法规不会通过，所有人都会投反对票，我们已经和他们达成了协议。其次，如果你仍然坚持的话，我们会让所有石油生产商集体写一封信，要求你和库德林因缺乏专业水准辞职。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不过兴许你会推迟讨论这项法规，我们可以同你达成某种协定。”[8]

第二天早上库德林和格列夫抵达国家杜马时，发现霍多尔科夫斯基已经拼凑了一个立场坚定的阵营，包括国家杜马里人数众多的共产党议员。日后格列夫对这件事所含的讽刺意味进行了思考。“共产党人本来应该是社会政策的倡导者，反倒投票反对一项对石油公司巨额收入征税的税法！”

这是对改革者的一次沉重打击。格列夫回忆道：“预算里没有足够的资金偿付政府债务。当时石油价格走高，但只是肥了石油公司，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一年后，格列夫才得以让议会通过了这项法律，但内容被冲淡了许多。

从普京的角度看，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野心更具有颠覆政府的性质。他资助了一些反对派政党，包括自由民主党、右翼力量联盟和共产党。2003年年初，霍多尔科夫斯基秘密会见了一些政党的领导人，主动提议出资几十万甚至上亿美元赞助他们在当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的竞选活动。[9]据卡西亚诺夫总理称，最令普京恼怒的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对共产党人的资助。卡西亚诺夫说，后来他惊奇地发现，虽然赞助两个亲西方的政党得到了“批准”，资助共产党人——尽管完全合法——显然需要总统的秘密特许。[10]

霍多尔科夫斯基称，他的所作所为乃属正常的“游说”，任何一国都不例外。可克里姆林宫不这么看。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气愤地大声说：“他是在行贿国家杜马！”显然，佩斯科夫和他上司一样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说法感到气愤。克里姆林宫显然害怕，霍多尔科夫斯基正在计划运用自己在国家杜马的影响力修改宪法，将俄罗斯改变为一个议会制民主国家，甚至本人出任总理，直接挑战普京的权力。

认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人常常提及他做事不计后果的秉性。2003年2月19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会见一批商业巨头时，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这一性格在这次富有戏剧性——也许是灾难性的会见中显露出来。[11]会议的主要议项是腐败，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主讲人。事先他打算针对政府高级领导人可能涉及的腐败行为大胆直言，但他有点儿紧张，于是打电话给他的副手列奥尼德·涅乌兹林征求意见，问：“你认为我的发言会有危险吗？”

涅乌兹林也有同感：“如果普京本人与这些交易有染怎么办？”

霍多尔科夫斯基大声说：“你别瞎说了。总统控制国家预算，你难道认为他会为了拿区区几百万美元的回扣干这种事吗？”[12]

霍多尔科夫斯基事先把发言稿送给普京的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征求意见，然后携带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而准备好的各种图表前去开会。

他的发言基本上以民意测验的结果为依据。27%的俄罗斯人认为腐败是对国家最严重的威胁；49%的人认为，绝大多数国家官员是贪官（15%的人认为无官不贪）；大多数人认为，政府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意做任何事打击腐败。

霍多尔科夫斯基继续讲下去："从下一张幻灯片中你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涉及腐败的金额大约在300亿美元，也就是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2%。"

另一张幻灯片显示，72%的俄罗斯人对司法系统毫无信心，因为整个司法界都烂掉了。霍多尔科夫斯基提到了俄罗斯大学专业申请状况的一个惊人事实：青年人读书更想成为税务官，而不是工程师或石油开采专业人员！税务官的工资不高，但收取贿赂自肥的机会比比皆是。霍多尔科夫斯基说："如果现在的年轻人都走这条路，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普京反驳说："你讲的问题值得思考。不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学生不好！"

然而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是在热身。下面他开始提到一起涉及普京小圈子内人员的具体腐败案，即普京的亲信、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戈尔·谢钦。他实际上控制了国有石油部门（很快他将出任政府控股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

霍多尔科夫斯基讲述了上个月俄罗斯石油公司用6亿美元收购了一家较小的石油企业——北方石油公司，收购价远远超过该公司的实际价值。"所有人都认为，这笔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在场听他发言的人来说，他的话含义十分清楚。日后普京的顾问伊拉里昂诺夫回忆道："显而易见，销售价和实价之差就是回扣，也就是说腐败。"[13]换言之，收购该公司多付出的巨额钱款被公司拥有人和批准这笔交易的政府官员私分了。

霍多尔科夫斯基继续说下去："腐败的确正在我国蔓延。或许可以说，腐败的根子就在我们这里……我们迟早必须制止腐败！"

普京予以反击，坚持认为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为了增加自己的储备有义务收购诸如北方石油公司这样的资产。至于霍多尔科夫斯基自己的公司，普京暗示他是以非法手段攫取到手的。"一些如尤科斯这样的公司拥有巨大的石油盈余，他们是如何把石油弄到手的正是本次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不要忘了纳税问题，或者说不纳税的问题，你自己的公司（尤科斯）就有逃税问题，而我必须指出你的问题。过去你同税务部门达

成了协议，案子就此了结，或者说正在了结，但当初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

普京结束发言时发出了明显的威胁：“因此我现在要把责任推给你。”其含义是：你说我身边的人腐败，我的人将开始追究你的腐败。

坐在总统身边的卡西亚诺夫说，围着桌子而坐的寡头们“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普京是不是要重新全盘提出90年代俄罗斯战略行业如何私有化的问题？

卡西亚诺夫说，会后他去普京办公室见他。“我天真地以为，总统并不知道俄罗斯石油公司交易的细节。我说，‘你不该反应如此激烈，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对的。’”然而普京根本不听，坚持认为俄罗斯石油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有权增加自己的资产，这笔交易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卡西亚诺夫十分吃惊：“他开始援引连我这个总理都不知道的一些数字，对这件事他比我还熟悉。”[14]

为了预防普京暗示的报复，两周后霍多尔科夫斯基找到卡西亚诺夫，提交了一个方案。霍多尔科夫斯基说，他代表其他寡头建议通过一项新法。根据这项法律，20世纪90年代以廉价购得国有企业—如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寡头应该向国家支付赔偿金，有点儿像是为这些企业资产的膨胀缴纳一次性税款。这笔意外钱款将用来建立一个特别基金，资助“重要的改革”。卡西亚诺夫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政府可以得到额外的150亿~200亿美元用于修建新的高速公路、高速火车线路、电力网、机场及其他基础设施。卡西亚诺夫让霍多尔科夫斯基拟定一份法律草案，一周后草案就拟好了。卡西亚诺夫把草案呈送给普京总统，此后它便石沉大海。[15]普京已经开始思考惩罚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其他办法。

涅乌兹林记得从俄罗斯情报机构里的一位相识那里听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我获悉，已经成立了一个直接向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和他的副手安德雷·佐斯特罗夫茨耶夫汇报的特别小组，任务是针对尤科斯公司展开刑事调查，并监视该公司的经理人和股东。”

夏初，一个叫国家战略委员会的智库发表了一份题为“国家与寡头”的分析报告，由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贝可夫斯基执笔。人们认为他与国家安全部门关系密切。贝可夫斯基在文中提出，寡头正在悄悄策划一场政变，将国家杜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改写宪法，把霍多尔科夫斯基推上执掌实权的总理宝座，而将总统降为一个有职无权的人。

几天以后，在普京的年度记者招待会上，一位事先安排好的记者提了一个有关贝可夫斯基报告的问题。有备而来的总统令人胆寒地提起他如何对付

自己的政敌："我坚信，经商和从政已经分家……不同意这一政策的人要么已不存在，要么被送到偏远之地。"

普京有很多理由惧怕或厌恶霍多尔科夫斯基。两年半以来，霍多尔科夫斯基一直无视总统要寡头远离政治的指示。即使是霍多尔科夫斯基自己的纯粹商业活动也同国家安全部门起了冲突，后者把国家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视为重要的战略资产，认为不应交由私人管理，更不能交给外国管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看法恰恰相反：私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更高。如果外国的参与有益无害，又何乐而不为呢？

2003年4月，尤科斯（当时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生产商）同意与阿布拉莫维奇拥有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组建一个资产达350亿美元的世界第四大石油公司（阿布拉莫维奇正是靠这笔交易买下了切尔西足球俱乐部）。霍多尔科夫斯基接着又迈出了灾难性一步，开始同美国的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谈判，向它们中的一家出售尤科斯公司的一大笔股权。卡西亚诺夫总理批准了这笔交易，然而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怒不可遏。

2003年夏天，局势急转直下。6月，尤科斯的保卫部门负责人阿列克谢·匹楚金因谋杀罪名被逮捕。次月，尤科斯的控股公司梅纳特普集团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商业伙伴亚历山大·列别捷夫也遭逮捕。卡西亚诺夫总理马上予以谴责，指出以经济犯罪嫌疑的罪名逮捕企业家只会损害国家形象，令投资人望而却步。

涅乌兹林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甚至不屑于掩饰监视我们的车子。每天晚上上床时，我都准备好一个包，如果第二天凌晨5点他们来抓我，坐监狱所需的东西包里面都有。"他离开俄罗斯去了以色列。然而直到最后一刻，霍多尔科夫斯基仍然无视种种警告。

10月份，武装警察突击搜查了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郊外开办的孤儿院，带走了该院的计算机。几天后，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李·雷蒙德来到莫斯科参加一场经济会议并与总统会谈。他似乎给了普京一个（很可能是错误的）印象，霍多尔科夫斯基计划向这家美国公司出售尤科斯 - 西伯利亚石油公司51%的控股权，而不是25%。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大·特默科承认："像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公司不可能是一个小股东。当然它会说，我们可以买25%的股份，但需要给我们一个购买控股权的选择。"

此时的普京似乎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日后英国石油公司的布朗回忆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前不久，我与普京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普京措辞严厉地顺便提了一句：'我受够了这个人的气。'"

普京召见总检察长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要他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10月25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当时这位石油寡头去了西伯利亚，天真到竟然无视两天前收到的一份传真。传真由乌斯季诺夫签字，要霍多尔科夫斯基就“尤科斯石油公司纳税时存在的问题”到总检察长办公室报到。霍多尔科夫斯基乘坐的飞机正在新西伯利亚市加油时，全副武装的联邦安全局军人冲上飞机，给霍多尔科夫斯基铐上手铐领走。他即将因蔑视国家安全部门失去人身自由和个人财富。

震荡

一切含义尽在报纸的大标题中：“俄罗斯的一场政变”（《俄罗斯日报》）。《纽约时报》撰文：“俄罗斯头号富翁周末被逮捕后，随着俄罗斯的股票、债券和货币的暴跌，俄罗斯踉踉跄跄走向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同事发表了一个声明，谴责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今天俄罗斯的商家不信任执法机构及其领导人，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每天都受到这些机构的粗暴对待。当局犯的低级错误让国家倒退了好几年，人们不再相信当局所做的不允许扭转私有化成果的保证。”

莫斯科货币交易市场因汇率暴跌而暂停了交易。普京的办公厅主任沃洛申辞职。他的继任人梅德韦杰夫公开质疑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否明智。“这样做很危险，因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措施造成的后果将立即影响到经济……造成政坛上的愤慨。”[16]在一团混乱中，普京拒绝了几个寡头的求见，并要求停止他所谓的“歇斯底里和投机活动”，然后补充道（似乎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法院逮捕一个人肯定不无原因。“在涉及执法机构工作的问题上，我不会见任何人，也不会做任何交易。”他说，政府的部长不应被拖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卡西亚诺夫总理讲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克里姆林宫想让他任命一个人。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位将军维克托·伊万诺夫是普京的首席猎头顾问，他几次给卡西亚诺夫打电话，敦促他任命一个年轻人阿纳托利·谢尔久科夫担任税务部副部长。卡西亚诺夫婉拒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急于任命此人，并对他是否胜任这项工作表示怀疑。此人以前一直在圣彼得堡市的一家家具店工作。当时卡西亚诺夫不知道此人是财政部第一副部长（也是普京在圣彼得堡的老同事）维克托·祖布科夫的女婿。2004年2月卡西亚诺夫被解职后，谢尔久科夫立即被调到税务部，负责调查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案。两周后，他又被提升为联邦税务局局长。普京现在有了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收集针对自己敌人的最致命的证据。

普京的两副面孔

本章讲述的种种事件——禁锢媒体、建立“垂直权力结构”、在重要部门安插自己的密友、车臣战争、对“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的麻木反应、驯服寡头以及打压霍多尔科夫斯基——对西方那些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和普京打交道的人来说不啻一帖清醒剂。向西方领导人伸出手并在国内推行值得欢迎的经济改革的这个人，同时也露出了他真实的一面，从而证实了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一朝是契卡，永远是契卡。普京的所作所为使西方一些人，尤其是小布什政府内有些人更加理直气壮，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张对普京采取强硬立场。

英国的《观察家报》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看法，说现在对于普京是“关键时刻”。普京必须决定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布什总统和托尼·布莱尔的一个思想倾向西方的盟友，还是一个内心深处怀念昔日苏联艰难岁月的人？……如果普京选择专制的道路，伦敦和华盛顿就该重新评估关系。”[17]

然而就在西方对普京的幻想破灭之际，普京对他一直追求的西方幻想同样也走向破灭。

---

[1] Interview with Viktor Shenderovich,14 December 2010.

[2] *Komsomolskaya Pravda*,11 February 2000.

[3] *Novaya gazeta*,27 March 2000,reprinted in Anna Politkovskaya,*Nothing but the Truth*(London:Harvill Secker,2010).

[4] Mikhail Kasyanov,*Bez Putina*(Moscow:Novaya gazeta,2009),p 217.

[5]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7 December 2010.

[6] David E.Hoffman,*The Oligarchs*(Oxford,Public Affairs Ltd,2002),p 449.

[7] John Browne,*Beyond Business*(London:Weidenfeld&Nicolson,2010),p 145.

[8]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7 December 2010.

[9] Martin Sixsmith,*Putin’s Oil*(London:Continuum,2010),p 52.

[10] Interview with Mikhail Kasyanov,16 February 2011.

[11] My account of this meeting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those present,on(edited)video of the event and on the versions given by

Sixsmith,*Putin's Oil*,and Andrei *Kolesnikov in Kommersant*,20 February 2003.

[12] Interview with Leonid Nevzlin,14 May 2011.

[13] Interview with Andrei Illarionov,27 January 2011.

[14] Interview with Mikhail Kasyanov,16 February 2011.

[15] Kasyanov,*Bez Putina*,pp 199ff.

[16] Quoted in Sixsmith,*Putin's Oil*,p 153.

[17] *Observer*,2 November 2003.

[18] 拒绝俄罗斯引渡别列佐夫斯基（还有莫斯科想引渡的车臣流亡领导人艾哈迈德·扎卡耶夫）请求的法官是蒂莫西·沃克曼。几个月后，2004年1月，在伦敦北部一个静谧的村子，一位同姓的83岁老人罗伯特·沃克曼打开前车门时被一个陌生人射杀。谋杀动机始终不明，凶手也一直没有抓到。有人推测，这可能是一起误杀案。

[19] silovik一词常被理解为“强人”，但它的本来意思是“安全部门的一员”。该词源自silovyestruktury，意思是“权力结构”，指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内务部等部门。“silovik”一词的实际含义是因在某个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过而成为政府要员的男人（我想不出有哪个女人借此飞黄腾达）。

第五章　老欧洲，新欧洲

一只脚跨进北约门槛

恐怕托尼·布莱尔最能理解吞噬弗拉基米尔·普京那颗克格勃之心的痛苦。自从普京当选前布莱尔对圣彼得堡的首次具有奠基意义的访问后，两人继续定期举行会晤。除了正式会谈外，两人还穿着牛仔裤和衬衣在首相的乡村别墅契克斯庄园聚会，在莫斯科的一家啤酒屋Pivnushka一起饮伏特加，品尝酸黄瓜。布莱尔设法打消俄罗斯人对美国研发导弹防御体系的焦虑。虽然普京恐吓说莫斯科将不得不采取对策，但他意识到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在一次不公开的采访中，布莱尔的一位助手言谈倨傲，一语道破天机。假如普京知道这就是布莱尔的真实想法，一定会怒不可遏。“布莱尔从与普京的交往中领悟到了一点，不可轻慢他们。俄罗斯人感到不满，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排除在贵宾席之外，没有被当作一个超级大国。你必须对他们表示尊敬，即使他们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你也必须假装他们是。托尼向美国人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

为了赋予这一想法具体内容，布莱尔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把俄罗斯人与西方联盟更紧地联系在一起。虽然谈不上俄罗斯是北约的一个成员，但至少让俄罗斯人有属于这个俱乐部的感觉。1997年以来俄罗斯与“常设联合理事会”一直都是协商关系，实际上俄方在常设联合理事会里对北约的行动没有任何影响。如今，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意味着这一关系显著升级，俄罗斯将向北约总部派驻一位常设代表，与19位其他成员国代表一道以平等地位参加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会议。换言之，现在该理事会不是“俄罗斯加北约”，而是“俄罗斯加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及北约其他成员国。

布莱尔的建议在西方国家受到普遍欢迎。他们认为，设想俄罗斯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国不切实际，而布莱尔的建议更可行。一些人，包括德国总理，曾讨论过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时隔不久，布莱尔的这一想法被一直在和普京套近乎的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接了过去。贝卢斯科尼和普京在性情上十分相似，同样“男人味十足”，同样爱虚荣，同样喜欢开低俗玩笑。普京从贝卢斯科尼的媒体帝国中看到了自己控制俄罗斯电视台的理由。

2002年年初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刚刚在爱丁堡机场下飞

机，准备去他在苏格兰的家过周末，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贝卢斯科尼，他决定意大利将主办一次启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北约特别峰会。

罗伯逊说："等等，西尔维奥，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贝卢斯科尼回答说："好了，好了，我已经和弗拉基米尔谈过了，一切都讲好了。这次峰会由我们主办，开会所需费用由我们承担。"

罗伯逊不肯就范。"你不能就这样同普京定了。北约有19个国家，我必须征求每一个国家的意见。不过我们会考虑你的建议的。"[1]

然而贝卢斯科尼为这次峰会出钱的建议一锤定音。劝说其他国家同意让贝卢斯科尼上演这出戏没费多少时间。这的确是一出戏，一出不惜血本的戏。贝卢斯科尼把会址选在了位于罗马郊外的破旧失修的普拉蒂卡迪马雷空军基地，将其改造为一个古罗马帝国风格的堂皇建筑——一个由帆布搭成的模仿斗兽场形状的宏大会议中心，衬以古罗马大理石雕塑。

5月28日，一份历史性协议得以签署，其首次允许俄罗斯的将军们在北约总部常设办公室。虽然俄罗斯无法否决北约的决定，但至少可以和北约成员国一道讨论诸如维和、区域安全、救援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问题。据布莱尔的办公厅主任乔纳森·鲍威尔说，最初的设想——让俄罗斯"切实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实际上被北约机构冲淡了。[2]俄罗斯日后抱怨说，北约代表常常在理事会开会前提前开会，协调己方的立场，然后实际上作为一个集团与俄罗斯会谈。

协议签署仪式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普京说的一番话令出席仪式的一些人愕然。他说："我国的问题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是俄罗斯为一方，几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为另一方。我们从与世界对抗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国绝大多数公民对此一清二楚。俄罗斯正在重返文明国家的大家庭。她最需要的莫过于自己的意见被人倾听，自己的国家利益受到尊重。"

普京讲的这番话颇具震撼力，以致9年后罗伯逊仍然记忆犹新，几乎可以凭记忆背下来。"我感觉这番话代表了一位俄罗斯领导人对多年失败的非同寻常的反思，以及对他今后目标的认真思考。"

普京的讲话也完全验证了布莱尔对他渴望受到尊重的认识。然而西方很多人看到俄罗斯国内的现状后都不愿相信，俄罗斯真的是一个"重返文明国家大家庭"的悔过儿女。

究竟该怎么看俄罗斯？

小布什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外加夹在两派中间的形形色色的其他观点。一些懂俄语并研究过苏联的人，例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并非是对新俄罗斯态度最友善的人。普京的几位顾问曾对我说，赖斯是一位“苏联专家”，而不是“俄罗斯专家”。他们觉得，赖斯仍然透过红色镜片看俄罗斯。她在俄罗斯出兵车臣问题上态度强硬，对俄罗斯干涉四周邻国的举动态度更是强硬。她把这视为后苏联时期故态复萌的一个迹象。尽管如此，赖斯确实认真去了解了俄罗斯政策背后的深层原因。

布什政府内部的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对俄罗斯演变的过程认识不足，不能期待俄罗斯一夜之间（也许永远不会）就被“西化”；争取普京的办法是了解他的担忧（布莱尔的观点），接受俄罗斯有权期待自己的意见得到倾听，本国的利益受到尊重。持这一观点的最高政府官员是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据一位要求不披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与普京建立了真正友谊的布什总统本人倾向于这一派。然而那些压根儿就不信任俄罗斯的人，即所谓的“新保守派”，往往对政策的制定有更大的影响，如副总统理查德·切尼、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联邦安全会议里负责欧洲和亚欧大陆事务的丹·弗里德，以及美国驻北约大使（日后出任副国务卿）尼克·伯恩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和她的副手斯蒂芬·哈德利介乎于两个阵营之间。

这位圈内人接着说：“有些决策者很了解情况，但他们的认识取自某个特殊角度。真正参与制定俄罗斯政策的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欧洲安全的那批人。他们的目标是继续90年代未竟的事业——一个自由的、没有分割的、和平的欧洲。有人认为，如果将俄罗斯的观点考虑在内，等于肯定了它坚持某些利益或特权的权利。”

因此，布什的俄罗斯政策基本上是由最关心中欧和东欧安全的那些人制定的。他们认为，西方“打赢了”冷战，于是决心将苏联的卫星国纳入自由西方阵营，包括北约和欧盟，哪怕这样做有可能得罪俄罗斯。1999年，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已经加入了北约。现在北约即将开始第二轮扩张，吸收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其成员，外加——就俄罗斯而言，争议更大——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曾是苏联的一部分，与今天的俄罗斯比邻。

在伦敦一家旅馆吃早餐时，我问尼克·伯恩斯，俄罗斯是不是对北约一直扩大到他国门前以及美国在该地区部署新型武器有合理的关切。毕竟这里曾是俄罗斯人的“后院”。他的答复相当强硬：“那没办法！他们丧失了这一权

力。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3]我感觉，他的回答似乎排除了照顾一个哪怕是改革后的“民主”俄罗斯的利益的可能。俄罗斯丧失了影响自己后院事务的权力，理由显然是它继承了苏联的罪孽，而美国却有权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因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

伯恩斯接着说：“在北约要不要接纳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争执得很凶，无论是与欧洲人，还是在华盛顿内部。举个例子说，连乔治·特尼特（中央情报局局长）都反对接纳。然而我们中的很多人基本上对可以信任俄罗斯人或把他们纳入西方不抱希望。2002年岁末时，人们越来越觉得，普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无法让俄罗斯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友。我们因此得出结论，需要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但冷战后该地区的首要目标是东欧和中欧的自由和解放。在这一点上，来自美国国内的阻力极大，我们不得不同反对派展开激烈争论。但我们认为，确保苏联解体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果实更重要。布什对这一观点笃信不疑。”

新保守派认为，20世纪90年代信任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我早就知道，俄罗斯会想方设法再次称霸欧洲，因此我们必须保护东欧人和中欧人。”伯恩斯说，“普京一门心思要恢复俄罗斯的强盛。到2002年年底时，这一点越来越明晰。”[4]

他上面的一句话很说明问题：使俄罗斯再次走向强盛恰恰是普京的愿望，也恰恰是华盛顿的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事。

布什政府内的“亲俄派”发现，他们的观点在西欧国家引起共鸣，在华盛顿却和者寥寥。其中一人说：“似乎有人认为，如果你设法了解并阐述俄罗斯的观点，就意味着你赞同这些观点并使之合法化。欧洲人就不这么想，所以我们才与德国人，甚至与英国人龃龉不断，原因是大多数欧洲同事都设法照顾到俄罗斯的观点，因为他们不想公开与俄罗斯对抗。”

出于种种原因，法国人和德国人觉得，同美国人比，自己与俄罗斯人的关系更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理解前华沙条约国家对加入西方体制、抵御那个压迫了自己半个世纪的国家的殷切心情。尤其是德国人，自己尚沉浸在柏林墙坍塌后实现了国家统一的喜悦之中。同样，这也不仅仅是因为讲究实际或贸易的需要，虽然后者对德国十分重要。实际上，这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尤其是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觉得俄罗斯“属于”欧洲，他们与俄罗斯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现在是欢迎他们“回家”的时候了，无论俄罗斯的民主还多么不健全。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欢迎俄罗斯回家恰恰是改善该国民主的最佳方式。

法国总统希拉克即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本人对俄罗斯有着浓厚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他的父母曾在家中收留了一位俄国流亡者。希拉克本

人学过俄语，甚至还把普希金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法文。据他的外交事务顾问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说，希拉克觉得俄罗斯给人一种“永恒”的感觉，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东方。他同叶利钦相处融洽。后者请他洗桑拿浴，品尝鱼子酱。虽然希拉克最初对普京比较冷淡，但愿意把个人意见搁置一边，即使是车臣问题也不例外。

古尔多–蒙塔涅说：“希拉克在言谈中竭力帮普京说话，而不是批评他，帮助普京以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肩负摆脱苏联时期的落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任。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回到苏联时期。他们一步跨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前面的道路还很长，需要得到我们的支持。再说尽力帮助俄罗斯人也符合西方的利益，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希拉克认为，欧洲大陆的稳定依赖于巴黎、柏林和莫斯科这一轴心，所以2007年前才有那么多的三方会议。三国关系如此热乎很有意思。”[5]

三方关系中的另一人、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他的大多数德国同胞一样，对俄罗斯痛快地从东德撤军感激不尽。为表示友好，他后来取消了俄罗斯拖欠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60亿欧元的债务。

不错，两国关系起初并不太好。1998年德国大选期间，施罗德曾保证不再像他的前任赫尔穆特·科尔那样向俄罗斯提供大笔资金。他想建立一种基于商业利益和保持一定外交矜持的现实关系，而不是科尔和叶利钦当年搂搂抱抱的关系。2000年1月，科尔的外交部长约瑟夫·菲舍尔首次会见普京时，几乎造成一次外交事件。他谴责车臣战争，要求立即停火。2000年6月普京总统首次访问柏林前仅一周，施罗德本人照旧访问了波罗的海三国（科尔不肯这样做，因为担心会触怒俄罗斯人）。

然而普京对德国的这次访问成效巨大。由于普京会讲德语，两人在没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交谈了5个小时。尽管布莱尔极力想“捷足先登”，但普京显然把德国视为俄罗斯在欧洲的最重要盟友。施罗德本人懂得，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是鼓励民主化的最好方式。他写道：“每当俄罗斯对欧洲开放、积极参与交流并把自己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思想发展连在一起时，它总是欣欣向荣。”[6]两人搞了一项欧洲国家中绝无仅有的活动——“圣彼得堡对话”。每年俄罗斯和德国举办一次对话，既有学术讨论，又有政府间机构的会谈和两国商界激烈的贸易谈判。很快，施罗德就被吸收到普京的蒸桑拿——饮伏特加的圈子里。两人成了挚友，常常携带家人互访。施罗德60岁生日那一天，普京甚至亲自飞到这位德国总理的家乡汉诺威市为他祝寿。普京还帮助施罗德收养了圣彼得堡的两个孩子。施罗德去职后，出任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北欧天然气管道财团董事长，该公司把天然气从俄罗斯直接输送到德国（施罗德任总理时支持了这一项目）。同时，施罗德不再对普京的政策提出任何批评（而希拉克却拒

绝了普京送上门来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里的一份高薪工作）。

施罗德在一次采访中回顾了他与普京的关系，把普京形容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对人坦诚，而且很有幽默感，虽然外表上看不出。他很重家庭，从不让朋友失望。即使我无须在政治上与他打交道，他也是一个我乐于一起喝杯啤酒或红酒的人。”[7]以上这番话显然出自一个不愿贬损一位仍然在位且与他本人有着密切商业往来和私交的同事之口，但这不意味着这番话无足轻重。恰恰相反，随着俄罗斯设法在世界上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普京与施罗德之间的关系——以及普京与希拉克的关系——成为2000年年初的一大要素。

英国的观点介于欧洲和美国之间。在此情形下，妥协在所难免，其中包括2002年北约做出的两项重大决定。5月，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成立，使俄罗斯距离这一俱乐部近了一步。然而6个月后，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峰会上，北约邀请前苏联的7个卫星国加入俱乐部。普京要求被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时，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北约的太阳照耀在东欧上空

布拉格城堡里建于17世纪的西班牙大厅的灯光渐渐熄灭了。舞台上，伴随着莫扎特的音乐，两位舞蹈演员正在表演捷克出生的舞蹈编导依利·基利安创作的一个欢闹的节目。演员身着仿古式样的服装（给人以衣不蔽体的感觉），头戴假发。其中有个片段，演员像跳蚤一样跳来跳去，在一张巨大的四柱床上表演疯狂的男女交媾仪式。然而台下的观众并非来自布拉格哈维尔总统文化圈内的朋友，而是北约现在和未来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及700名嘉宾。不是所有来宾对北约扩大进程会伴有如此粗俗的表演都有思想准备。

2002年11月21日的布拉格峰会是哈维尔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的终曲。这位剧作家出身的政治家希望这次峰会能够以它的艺术风格和历史意义载入史册。他自己的国家已经是北约的成员之一，今天他想庆祝又有7个国家获得了新生。

俄罗斯人很难明白，这确实是为了庆祝新生，而不是威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亚历山大·雅科文科阴郁地提到，“在距圣彼得堡市仅几十公里的俄罗斯边界上，北约军事潜力已经显露”。

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本人给这一事件涂上了一层积极的色彩：“俄罗斯不再把北约的东扩视为一种威胁，因为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北约联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把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作为自己的重

点。”然而俄罗斯人并不明白，为什么北约有必要东扩。他们不仅相信戈尔巴乔夫曾得到过北约不会东扩的保证，而且同样不懂，为什么俄罗斯作为一个伙伴被接受后，还会有国家觉得需要防御它。而且他们心里很清楚，尽管北约信誓旦旦，但如有必要，它一定会保护它的新成员。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上刚与人握过手的俄罗斯，在布拉格峰会上却又好似被扇了一记耳光。

俄罗斯人完全看不到自己在国内的政策和行为与他们在国外形象之间的关系。几年后，我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顾问工作时，不得不面对这一难题。我的客户不懂得，改善他们国外形象的关键不在于更好的公关，而在于更好的行为（详见第九章）。我通过与他们的密切共事得出的印象是，他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东欧人，特别是巴尔干人，仍然对自己身边的这个庞大邻居怀有戒心。

在布拉格峰会上，自然没有人公开谈论自己对俄罗斯的恐惧心理，然而你不需要对历史寻根究底就能明了这种恐惧的根源。观看瓦茨拉夫·哈维尔安排的演出的几乎所有东欧领导人都和他一样，亲身经历过苏联占领的恐怖，并在一个极权政权下生活过。昔日的旧怨依然未消。波兰人认为，俄罗斯政府在承认（更不要说道歉）1940年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杀害数万波兰军官和知识分子的卡廷事件一事上仍然做得太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不仅被苏军占领，而且被纳入苏联版图，不得不为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成千上万的人被送入集中营。俄罗斯公民成群涌入他们一丁点儿大的国家，带来了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外加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官僚体制，将他们变成二等公民。土生土长的拉脱维亚人只占本国首都里加人口的不足一半。当地人普遍对俄罗斯人的存在心怀怨恨。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刚刚造成一点儿松动时，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就率先起来反对苏联的统治。

1991年三国恢复独立后，问题并没有因此全部消失。政治上，俄罗斯接受了这一现状，然而多达100多万俄罗斯人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定居，克里姆林宫觉得自己有权力和义务保护他们。新独立国家的政府并不总能善待本国的俄罗斯少数族裔。波罗的海三国的大多数人内心深处认为，俄罗斯人当初就不该来到这里。正是这些人把波罗的海国家变成殖民地并征服当地人民，因而他们是咎由自取。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境内的俄罗斯人因《语言法》和《公民法》失去了祖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对此提出了批评。欧盟把修改这些法律作为两国加入欧盟的一个条件。自从三国独立以来，俄罗斯一直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立陶宛境内的俄罗斯人人数很少，且多无怨言）境内的公民权状况怨言不断，有时言辞激烈。因此对俄罗斯人来说，北约张开双臂接纳波罗的海国家本应是意料之中的事。

外界普遍认为，在布拉格峰会上，拉脱维亚总统瓦伊拉·维基耶-弗赖贝加因她的一次雄辩有力的脱稿即席演讲抢了风头。她本人并没有在苏联的统治下生活过。正当红军“解放”她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7岁的她随父母逃离了拉脱维亚。然而她的讲话概括了这次峰会的意义：

在一段漫长的时期内，拉脱维亚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她既懂得自由的含义，也懂得失去自由的含义。拉脱维亚懂得安全的含义，也懂得失去安全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被邀请加入一个将保证我们安全的联盟在我国的历史上将是一个重大的时刻。

我们拉脱维亚人希望在政治稳定的基石上，而不是在变化无常的流沙上建设我们的未来，我们不想置身于某种政治上捉摸不定的灰色地带。我们想享受北约多年来一直捍卫的种种自由和权利的灿烂阳光。我们不想被遗弃在外面的黑暗中。任何国家，如果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希望捍卫同样的价值观，追求同样的理想，愿意作出同样的努力，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它们被遗弃在黑暗中。我国人民在历史的火焰里经受了考验，在苦难和非正义的熔炉里千锤百炼。他们懂得自由的含义和价值，懂得全力去支持、维护和捍卫自由并为之而奋斗是值得的。

她发言时，她的听众——全部是男性国家元首——几乎屏住了呼吸。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日后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老实讲，当时我的双眼噙满了泪水。正是这样的动人时刻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结束了，我们正在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种感受……透过了皮肤，让我浑身战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布拉格一个共产党人曾用来召集会议的皇宫里结束了，而今它的主人是现任总统哈维尔。”[8]

在场的所有来宾皆有同感，也许俄罗斯代表团除外。俄罗斯代表团是前来出席次日上午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一次简短的仪式性会议的。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回忆道，他努力向他的西方同伴解释，北约新的成员国确保自己“安全”的途径就是令俄罗斯感觉不安全。他说：“这些国家想加入北约的实际利益是什么呢？不错，是获得政治利益。但威胁来自何方呢？首先应当阐明实际威胁，然后再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或对付这些威胁。”他又补充道：“实际上这样做并没有增加任何人的安全，无论是北约国家，还是俄罗斯，而是增加了一个不信任的因素。你们关心自己的安全，却不关心俄罗斯的安全。”[9]

美国人对诸如此类的抱怨有现成的答复。下面是尼克·伯恩斯的一席话：

你知道，通过扩大北约，我们也是在将俄罗斯一军。自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一直说，他们变了，而且认为欧洲应该成为一个人民在没有外来统治的恐惧下自由决定自己未来的地方。通过在2002年11月

邀请这7个国家加入北约，我们告诉所有人，如果你在未来的一个民主体制下选择自由，我们可以协力保证并维护这一自由。不少俄罗斯人后来说，这是北约背信弃义之举，显示了北约言而无信。我觉得这种说法让你充分认识了这些俄罗斯的领导人。他们不相信民主。

在当代世界，在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在1991年后的世界，俄罗斯人无权决定其他国家人民的未来。他们无权把自己的帝国强加在他们称之为近邻国家的人民头上。如果我们有力量，就像我们现在有力量一样，能确保其他国家的人民获得自由和民主，帮助他们获得这种自由毫无疑问是正当之举。[10]

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各说各话的能力着实令人吃惊。俄罗斯人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自己在本国内的行为仍然令四周的邻国感到畏惧。美国人及其盟友认识不到，俄罗斯人因为被看作潜在的侵略者而不快。2002年北约的两次峰会被赞誉为冷战的终结，但实际上两次峰会使冷战死灰复燃，开始了一场新冷战。从俄罗斯的角度看，昔日横穿欧洲腹地的铁幕如今正在被一个更靠近自己国门的新铁幕所取代。

普京再次失言

当年春天普京发表的国情咨文听上去让人觉得他似乎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在世界舞台上受到尊重，而且几乎可以称自己是反恐战争的共同领导人之一。普京说："俄罗斯今天是国际稳定最可靠的保障者之一。"正是"俄罗斯的原则立场"促成了一个持久的反恐联盟。普京说，通过共同的努力，他们铲除了阿富汗境内最危险的国际恐怖主义中心。

随后，普京谈到俄罗斯"为融入欧洲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步骤"，以及他与欧盟建立一个"单一经济空间"的目标。

上面一番话说得很动听，然而普京失言的老毛病又犯了。2002年11月普京前往布鲁塞尔出席一次与欧盟领导人的峰会时，言谈之间使用的语言令人感到，他不是一位世界政治家，而是酒吧里的一个恶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法国记者问了普京一个关于车臣的直截了当却并非特别无礼的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动用杀伤性地雷和炮弹，造成上百人的伤亡？难道总统先生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消灭恐怖主义的同时，全体车臣人也正在被消灭吗？也许《世界报》这位可怜的记者没有意识到，他触动了普京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在普京眼里，仅仅提出这一问题就足以表明这位记者同情恐怖主义。普京怒斥道："如果你渴望成为一名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愿意接受割礼的话，我请你到莫斯科来。我们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不缺这方面的专家。我会建议他们动手术时把你割干净，以后再也不会长出

来。”

这件事距布拉格峰会开幕只有一周。它又一次提醒了北约新旧成员国，普京也许还没有完全做好加入文明世界的准备。

反对伊拉克战争同盟

倘若普京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说粗话的话，他兴许会博得华盛顿的一笑和赞许。然而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日益对抗，使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又被打进了一个楔子。它表明，涉及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时，美国甚至不屑做做样子，假装把俄罗斯当作一个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当然美国会讨好普京，以求得到他的支持。然而如果得不到的话，美国人不会因此而却步。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政府没有兴趣听取俄罗斯的意见，正如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克林顿没有兴趣听取俄罗斯的意见一样。

2002年一年，伊拉克危机不断加深。人们猜疑日深，萨达姆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正在继续生产和储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2年11月8日，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谈判，联合国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1441号决议，给伊拉克“最后一个机会”解除武装，否则将面对“严重后果”。11月下旬，武器核查人员返回伊拉克。此后几个月里，他们没有发现违禁武器，但也未能证实伊拉克人销毁了此前记录在案的武器储备。正在演变的这场外交对抗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是否应该给予武器核查人员更多的时间以完成他们的任务（如首席核查官汉斯·布利克斯希望的那样），以及下一步怎么办？因为1441号决议没有授权动武。在这场外交对峙中，一方是美国和英国，另一方是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由于俄罗斯和法国是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和英国显然无法在安理会通过一项授权军事行动的新决议。美国人轻蔑地把普京—施罗德—希拉克联盟称为“老狐狸轴心”，不无讽刺地将这几个国家同布什所说的“邪恶轴心”（伊拉克、伊朗和朝鲜）连在一起。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不屑地称法国和德国是“老欧洲”，而“新欧洲”是总体上支持美国立场的更听话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拉姆斯菲尔德的这番话无意间进一步疏远了法国及德国与美国的关系。

出于种种原因，普京坚决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计划。俄罗斯在伊拉克有重大的商业利益。它担心，如果战后大量石油涌入市场，石油价格可能会下跌。俄罗斯对它眼里的美国无视国际社会决定的单边主义极其愤怒，反对隐藏的政权更迭计划。俄罗斯认为，应该允许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继续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用尽一切外交手段劝说萨达姆·侯赛因退让或辞职。普京完全支持反恐战争，但和布什不同，他不认为伊拉克是一个赞助恐怖主义的国家。

俄罗斯人对2003年2月5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安理会做的不能令人信服的发言不屑一顾。鲍威尔的发言似乎证明，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谢尔盖·伊万诺夫回忆道："我们看到了从高空拍摄的照片，有运载化学武器的大卡车，还有一些重型卡车。他们说，这是可靠的证据。我们回答说，'等等，也许你们掌握了这些情报。可我们没有。'"[11]

不过普京当初并不倾向于公开表态，以免损害他与乔治·布什新建立的关系。一开始，他在公开讲话中始终坚持谨慎支持美国确保萨达姆裁军的努力的立场。他告诉一批法国记者："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唯一任务，是确保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是找到这些武器并迫使伊拉克销毁它们。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确保伊拉克与联合国的核查人员充分合作。"

2月9日前往柏林与施罗德总理举行简短会晤时，普京警告说："对伊拉克单边使用武力只会给数百万人带来苦难，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普京也告诫，不要给反美情绪火上浇油。

次日普京前往巴黎进行国事访问时，立场变得更强硬了。访问期间，三位领导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谴责使用武力。三边宣言源自一项法德倡议。施罗德和希拉克两人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就在前一个月，在凡尔赛举行的一次纪念两国具有历史性的《爱丽舍宫友好条约》（《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的活动将这一关系推向高峰。据希拉克的顾问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外交圈内他被称为"米高梅"[14]）说："我们是德国人的亲密盟友。我们知道，德国人对伊拉克局势的评估和我们一致，但我们不了解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的立场。英国人站在美国人一边，但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立场是什么呢？因此我们了解俄罗斯的立场至关重要。"他说，普京和希拉克见面前，谁也不确知对方是否准备好否决一项新决议，而且谁也不想独自行使否决权。德国作为安理会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有表决权，但没有否决权。因此施罗德依赖希拉克替他投否决票，并一起拉上普京。[12]

蒙塔涅和他的德国同伴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并商定一俟普京从柏林来到巴黎，希拉克将设法拉普京加入。法国人在戴高乐机场为普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军乐队、红地毯、三军仪仗队。希拉克甚至一直走到飞机舷梯前迎接普京，向他献上一个大花篮。蒙塔涅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俄罗斯人。"希拉克想显示他对普京的尊重，讨取他的欢心，让俄罗斯人感到他们是一个大国，是国际社会里一个地位平等的伙伴。"两人乘一架空军直升机飞抵巴黎市区。希拉克让普京看宣言的案文，普京马上对其表示同意，只提出几点小的修改意见。蒙塔涅和普京的外交顾问普里霍季科一起对案文做出修改并征得了柏林的同意。宣言指出：现在仍未到言战之时，使用武力只能被作为最后手段。俄罗斯、德国和法国决心尽一切努力

以和平手段解除伊拉克的武装。

古尔多–蒙塔涅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契约”：“直到最后一刻，普京对法国仍然心存疑虑，因为当时法国人给人的普遍印象是，虽然态度强硬，但到了最后关头往往会改变主意，支持美国。现在普京知道希拉克将投否决票，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人将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两国立场一致。”

华盛顿也知道，如果它仍然对伊拉克开战，将得不到联合国的授权。康多莉扎·赖斯坦言：“我们不想看到，在事关美国安全利益的一个问题上，我们的亲密盟友和俄罗斯人站在一起。”[13]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普京为竭力避免战争做了两轮秘密外交努力。2月22日，他派俄罗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普里马科夫访问巴格达。出于某种原因，普里马科夫有“老狐狸”的绰号。也许他就是一只老狐狸。1999年他反对过普京，但后来又改为支持他。在此之前他历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外交部长和总理。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中东问题专家，与萨达姆·侯赛因相识多年，因此是执行这一使命的最理想人选。普里马科夫伊拉克之行的消息走漏风声后，外界推测他也许会设法劝说萨达姆销毁他拥有的萨姆德2型导弹。俄罗斯外交部在不得不表态的情况下称，普里马科夫访伊的目的是“解释俄罗斯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并寻求伊拉克做出保证，它将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并无条件地充分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行合作”。

其实普里马科夫的使命远不止这些。普京只给了他一项使命：劝说萨达姆让步，从而使伊拉克免遭入侵。萨达姆边听普里马科夫的发言边做笔记，并让他当着伊拉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的面重复一遍普京的口信，然后站起身，一只手用力在普里马科夫的肩膀上压了一下，转身走出房间。

普里马科夫飞回莫斯科，首先向普京，然后向克里姆林宫的联邦安全会议报告了这一坏消息。俄罗斯人还有最后秘密一招没有用。所有人一致同意，普京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应该立即飞往华盛顿，最后一次劝说美国人放弃战争计划。

沃洛申晚上飞抵华盛顿后，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尤里·乌沙科夫一起去餐馆吃饭。两人畅饮到次日凌晨。之后沃洛申突然接到电话，约他早上8点15分见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日后沃洛申面带微笑回忆说：“我那时刚上床。”离开中央情报局后，他又被领到白宫见康多莉扎·赖斯。两人会晤时，布什总统“顺道走了进来”（总统绕过外交礼宾规定得以会见沃洛申这样级别客人的唯一办法）。沃洛申说：“他讲了10分钟，谈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问题。布什很激动，讲话时始终站着而不是坐着。随后又闲聊了一会儿，总共也就20分钟。我告诉布什，我们意见不一致，但我觉得他对

我的回答并不感兴趣。反正他已拿定主意，因此不怎么关心双方观点的分歧。他只关心我们是否支持他。”一位美国官员证实说：“总统不是去听沃洛申的意见或答复他。”

沃洛申见到了所有政府大员，从副总统切尼到国务卿鲍威尔和参议院领袖。然而最让他吃惊的是他与商业部长唐纳德·埃文斯的一次会见。埃文斯问，他们能否私下交谈。于是两人到了埃文斯的办公室。埃文斯说：“你和普京关系很密切，我和布什总统关系也很密切。布什总统托我问你，作为支持我们的条件，你们想要什么？”

沃洛申意识到，美国人是在行贿。俄罗斯在伊拉克即将损失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华盛顿现在提议补偿它的损失。“我们不想讨价还价，”沃洛申说，“这是一场不义的战争，所有的人都会深受其害。再说伊拉克和恐怖主义毫不沾边。”

美国人最后又试了拙劣的一招，竭力想向沃洛申证明，萨达姆和车臣之间不无联系。一位美国官员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们以为，这个问题会引起俄罗斯人的兴趣，然而沃洛申最后表示：‘太乏味了，你们说的毫无新意。’”

沃洛申证实说：“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很长的动人故事，说一个曾在车臣打过仗的恐怖分子日后现身伊拉克。故事编得很蹩脚，可他们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听。”

哪怕在普京最在意的问题上投其所好也无济于事，双方立场相差十万八千里。3月19日，“震撼与威慑”军事行动开始了。

受到冷落的普京

对普京来说，伊拉克不是一切。值得争取的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目标：美国放弃导弹防御计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增加贸易等等。普京决定不让他的这次失败妨碍他与布什的友谊。

很快又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普京给世界留下一个他自由开放和“欧洲化”的印象。5月底，在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彼得大帝修建该城是为了把它作为俄国“对西方开放的窗口”——将举办建城300周年的纪念活动。所有墙都被粉刷一遍，所有的灰泥雕塑被涂上一层金色。整座城市装扮一新，迎接延续了一个周末的各种庆祝活动。世界主要领导人均收到邀请。普京打算在圣彼得堡市具有罗马风格的街道和诸多气势恢宏的皇宫的衬托下大出风头。

星期五一天，普京出席了一个波罗的海节日的开幕式，在一艘船上主持了一场亚洲领导人的峰会，亲自陪同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奥地利的领导人游览了城市。晚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世界领袖云集马林斯基剧院。次日，普京会晤了更多的总统，并与欧盟的所有领导人举行了峰会。世界精英参观冬宫博物馆并出席了在涅瓦河上举行的一次水节活动。

第二天晚上，乔治·布什终于露面，出席了最后一场晚宴。此前他决定先访问新欧洲——波兰，一个为伊拉克战争出了力的国家，普京受到了羞辱。

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捕捉到了俄罗斯人的心境。“我觉得俄罗斯人失望至极。令人惊奇的是，与我关系很好的康迪（赖斯）本应知道俄罗斯人是怎么想的，居然给布什出了这么个馊点子，建议他去圣彼得堡之前先去华沙。我简直无法理解。”

之后蒙塔涅听到普京与希拉克的交谈，觉察到普京与美国人的“恋爱关系”结束了。普京对希拉克说：“我以前的轻重次序是：与美国的关系第一，与中国的关系次之，与欧洲的关系再次之。现在倒过来了，第一是欧洲，然后是中国，最后是美国。”

2002年5月，美俄签署了削减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约》。同月，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罗马成立。一年后，昔日的好心境不再，而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

[1] Interview with George Robertson,9 March 2011.

[2] Interview with Jonathan Powell,9 March 2011.

[3] Interview with Nicholas Burns,15 July 2010.

[4] Interview with Nicholas Burns,21 January 2011.

[5] Interview with Maurice Gourdault-Montagne,20 June 2011.

[6] *Die Zeit*,5 April 2001.

[7] Interview with Gerhard Schöder,8 June 2011.

[8] Interview with Alexander Kw niewski,24 November 2010.

[9] Interview with Igor Ivanov,11 December 2010.

[10] Interview with Nicholas Burns,21 January 2011.

[11] Interview with Sergei Ivanov,29 October 2010.

[12] Interview with Maurice Gourdault-Montagne,20 June 2011.

[13]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14 April 2011.

[14] 他的法文全名的字母缩写MGM，恰好是好莱坞米高梅电影公司的简称。——译者注

第六章　第二任期

格鲁吉亚投靠西方

2003年11月22日星期六傍晚，出席联邦安全会议一次例行会议的俄罗斯领导人散会后一起来到莫斯科市中心一家叫“格纳茨瓦”的格鲁吉亚顶级餐馆。结实的橡木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开胃小菜——热乎乎的奶酪面包、红豆绿豆汤、茄子核桃卷、鸡肉酸奶酱味汁……木头拼成的墙壁上爬满了藤蔓，壁炉里燃烧的劈柴冒出袅袅青烟，弯弯曲曲地盘升到粗木房梁上。侍者手持俄罗斯伏特加酒和格鲁吉亚葡萄酒不离餐桌左右，为来此就餐的这几位俄罗斯政要服务：总统普京、总理卡西亚诺夫、总统办公厅主任梅德韦杰夫、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卢沙洛、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和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

选择这家餐馆吃饭同高层领导人当天讨论的话题不无关系——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当前的局势。在公认的舞弊盛行的议会选举之后，曾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总统设法平息街头连续三周愈演愈烈的示威活动。谢瓦尔德纳泽的总统任期本来还剩下两年，然而民众对他这一届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怨声载道，反对党领导人呼吁他辞职。普京对谢瓦尔德纳泽没多少好感，认为苏联的解体有他一份责任。然而普京不喜欢看到俄罗斯周边一个邻国的暴民闹哄哄地夺权。他还知道，高喊“受够了”口号游行示威的学生是在效仿2000年最终导致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下台的一场运动。这次运动得到了美国民主团体的支持，包括亿万富翁、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以及国家民主研究所，后者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民主的组织（普京惧怕的那种民主）。

忽然一位助手请普京在保密电话机上接一个电话，对方是谢瓦尔德纳泽。星期六白天，局势终于失去了控制。谢瓦尔德纳泽前往议会，决心召开议会使选举合法化。然而第一大反对党领袖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对聚集在主要广场的人群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即让国家摆脱这个人（谢瓦尔德纳泽）。”此后的局势混乱不堪。反对党领袖每人手持一朵玫瑰涌入正在展开辩论的议会大厅。谢瓦尔德纳泽被保镖连推带搡地护送到安全地方。议会议长妮诺·布尔贾纳泽宣布，她将代行总统权力。后来”玫瑰革命“开始了，这是给俄罗斯周边邻国带来民主的所谓“颜色革命”的第一场革命。普京将这些革命视为对俄罗斯本国的威胁。谢瓦尔德纳泽回到自己的官邸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后接通了普京的电话。

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时期，谢瓦尔德纳泽仍是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时

曾说过一句话，表白他的共和国对俄罗斯的恭顺：“对于我们格鲁吉亚人，太阳从北边升起。”现在他拼命想在一个独立的格鲁吉亚保住自己的权力。谢瓦尔德纳泽找普京求救无异于证明自己和过去没啥两样。围坐在餐桌旁的这一伙人很清楚，他们中间谁最适合去第比利斯。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他本人甚至还懂一点格鲁吉亚语。而且从80年代起他就认识了谢瓦尔德纳泽。当时伊万诺夫在外交部工作，是谢瓦尔德纳泽的顾问。普京让他带上几个保镖从餐馆直接去机场。给伊万诺夫的指示非常明确：竭尽全力避免第比利斯街头流血，并确保依据格鲁吉亚宪法行事（这实际上意味着不要让一群暴民推翻总统）。

伊万诺夫在一次采访中说：“你知道，我们同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并不总是很融洽。但普京讲得很明确：他是合法选出的总统，我们必须帮助他。”[1]

伊万诺夫半夜飞抵第比利斯，定于次日早上会见谢瓦尔德纳泽。但他想事先了解一下民情，于是带上两名保镖，来到了市中心示威者安营扎寨的地方。伊万诺夫小心翼翼地在帐篷和篝火间穿行，努力弄清局势到底有多严重。他告诉我们记者：“我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格鲁吉亚，但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地方。”

突然有人认出了他，一片嗡嗡声传遍了广场。“伊万诺夫来了，伊万诺夫来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祖拉布·日瓦尼亚的耳朵里。他是前议会议长，一位得人心的政治家，与萨卡什维利和布尔贾纳泽一道领导了玫瑰革命。人群开始骚动不安起来。日瓦尼亚敦促伊万诺夫走上讲台对群众讲几句话。伊万诺夫回忆道：“我问他格鲁吉亚语里怎么说‘俄格友谊万岁’，然后我对着麦克风一连说了好几遍，群众反映很好！我感觉，人们认为俄罗斯有办法帮助解决这场冲突。”

头一天下午，自封为代总统的议会议长妮诺·布尔贾纳泽一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日后她回忆说：“我和日瓦尼亚及萨卡什维利一直忙到凌晨4点。我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儿，秘书走进来告诉我：‘伊万诺夫正在对群众发表讲话。’我还以为是在做梦！不过我还是走下楼，果然看见了伊万诺夫。他甚至还用格鲁吉亚语对群众讲了点儿什么！”[2]

伊万诺夫于是扮演起了调解者的角色，在反对派和谢瓦尔德纳泽之间往来穿梭。凌晨时分，他与萨卡什维利、日瓦尼亚和妮诺·布尔贾纳泽举行会谈，以求弄清楚他们到底有哪些要求。伊万诺夫回顾当年的情景时说，任何时候都没有人坚持要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当时提出的要求只是重新举行议会选举，反对派知道他们输掉上次议会选举是舞弊的结果。伊万诺夫一晚上都在征求格鲁吉亚的朋友和外交官的意见，最后得出结论：“钟摆已经摆向反对派一边。”

次日早上，伊万诺夫把这一信息带给了谢瓦尔德纳泽总统。“我从1985年就认识他了。我觉得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他，我同所有这些人见了面，既有反对派，也有他周围的人，我感觉他几乎丧失了所有人的支持。”伊万诺夫觉得自己未能让谢瓦尔德纳泽相信，他已经是众叛亲离。不过他还是说服了谢瓦尔德纳泽同意会见反对派领导人。

23日下午，伊万诺夫终于领着日瓦尼亚和萨卡什维利来到谢瓦尔德纳泽的官邸举行会谈。此刻伊万诺夫觉得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在桌子边坐了下来。谢瓦尔德纳泽和他的助手坐在一边，日瓦尼亚和萨卡什维利坐在另一边。我说：‘我认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普京总统要我来协助你们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现在这是你们的事了，一起坐下来谈，避免流血。我现在可以走了。’”

伊万诺夫于是离开总统官邸，飞往格鲁吉亚西部城市巴统市。他定于在这里会见当地领导人阿斯兰·阿巴希泽。伊万诺夫本来期待他在第比利斯安排的会谈能达成重新举行选举的协议，与此同时谢瓦尔德纳泽继续留任总统，至少是暂时留任。然而当他在巴统市走下飞机时，阿巴希泽走上前来问他：“你到底干了些什么？谢瓦尔德纳泽辞职了！”

伊万诺夫无意间促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倒台，而他本人始终没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今天回首这段往事，伊万诺夫不无幽默地笑起来。领导了玫瑰革命的三位领袖中，伊万诺夫对祖拉布·日瓦尼亚最有好感，形容他是一个“睿智、沉着和公允的人，渴望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他对萨卡什维利的评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萨卡什维利凭借个人魅力在反对派的领导人中脱颖而出。“米沙”身材魁梧高大，精力充沛，具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他曾在斯特拉斯堡和纽约留过学，娶了一位荷兰老婆），同时又洋溢着格鲁吉亚人的魅力和热情。年仅36岁的萨卡什维利在2004年1月4日的总统大选中轻而易举胜出，赢得了96%的选票。这一选举结果显示，萨卡什维利不仅体现了支持玫瑰革命的成千上万的示威者的希望，而且体现了格鲁吉亚绝大多数人民的希望。他们把投票看作终于能铲除腐败的政权，使自己的国家走向西方和民主之路的一个机会。

大约一年后，我采访了萨卡什维利。当时他的亲西方政策已经开始令莫斯科恼怒万分。我提醒他前任总统说过的那句名言“太阳从北边升起”。我问他难道不怕触怒这头俄罗斯熊吗？他告诉我：“别担心，我也知道太阳从什么地方升起。我们希望与西方建立最良好的关系，也同我们北边的伟大邻国建立最良好的关系。”[3]

令人纳闷的是，萨卡什维利就任总统后推出的首批措施与普京上台伊始的所作所为没啥两样。他立即推动修改宪法，增加总统的权力，同时大大削弱了议会的作用。萨卡什维利撤换了地方领导人，开始将电视台置于政府

的控制之下。[4]为打击腐败，萨卡什维利下令逮捕了一些前政府部长和商人，同时（和俄罗斯不同）大力整顿警察队伍，行贿受贿现象为之改观。他和他的总理祖拉布·日瓦尼亚通过大幅减税和积极吸引外资对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一样，同样面临分裂主义的威胁。1991年该国脱离苏联独立后，阿布哈兹省和南奥塞梯省双双脱离格鲁吉亚，经过短暂的内战后享有事实上的独立——在俄罗斯的支持下。第三个“自治共和国”阿扎尔虽然没有宣布独立，但在它的专制总统阿巴希泽的统治下，宛如一个封建王国。和普京梦寐以求征服车臣一样，萨卡什维利梦寐以求重新控制格鲁吉亚丧失的省份。2004年1月24日萨卡什维利就任总统前夕，在格鲁吉亚12世纪大卫王“建国者”的墓前庄严宣誓，“格鲁吉亚会统一和强大，它将恢复自己的版图完整，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

正是他将格鲁吉亚的少数族裔再次纳入自己国家版图的决心导致了他的国家4年后与俄罗斯兵戎相见。

和一位不把霸道的前夫放在眼里的莽撞的离婚妇人一样，萨卡什维利还公开炫耀他与西方的爱情。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是应邀出席萨卡什维利就职仪式的主宾。他回忆道：“奏国歌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国歌奏完后，我刚要坐下来，又奏起了另一首歌。这一次是《欢乐颂》，与此同时，一面欧盟旗帜冉冉升起。我暗自想，我的乖乖！伊戈尔（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肯定不会喜欢仪式中的这一部分。”[5]

伊戈尔倘若在场的话，肯定不会喜欢接下来发生的事。萨卡什维利邀请鲍威尔同他一道走进市政厅。大厅里面并排悬挂了几十面格鲁吉亚国旗和美国国旗。鲍威尔回忆道：“随后我们走进市议会的会议厅，面对在场的所有人坐在一张桌子旁，通过全格鲁吉亚的电视直播与格鲁吉亚人民开了一次镇民大会。在场的只有萨卡什维利总统和美国国务卿，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贵宾和高级官员，包括来自俄罗斯联邦的高级官员，都等候在市政厅外面，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

不过萨卡什维利还算谨慎，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出国访问没有往西去，而是去了北边。2004年2月10～11日，萨卡什维利对莫斯科的访问居然非常成功。两国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会面时，伊戈尔·伊万诺夫在场。他回忆道，考虑到日后这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厌恶，这次访问的气氛十分积极。“萨卡什维利见到普京后相当激动，欣喜万分，说他非常尊敬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普京，一直向往成为他一样的人。萨卡什维利说他要在自己的权限内竭尽全力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还说格鲁吉亚前领导人犯了很多错误，他将设法予以纠正。”

萨卡什维利的外交部长捷多·贾帕里泽证实，格鲁吉亚总统会谈结束后出来时几乎被普京迷住了。“会谈结束后他兴奋异常，对与普京的会谈乃至对见到普京本人激动万分。‘他是一位真正的领导人，一个铁腕男人，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下——国家杜马、媒介等等。’我们驱车去机场的路上，他一开口先对我们讲了这番话。”[6]

萨卡什维利在一次采访中讲述了两国总统撇开自己的外交部长，单独来到一个房间私下交谈的经过。普京建议两人脱掉西装解下领带，随后对他最担心的问题——格鲁吉亚滑入美国人温暖的怀抱——慷慨陈词。普京担心的不仅仅是美国人参与支持了玫瑰革命，或者如俄罗斯人坚信的那样，参与策划了玫瑰革命。过去两年里，美国还在格鲁吉亚留驻了少量的军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批美军士兵是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请来的，为的是帮助他解决一个正在损害他与俄罗斯关系的难题。1999年年底普京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后，成千上万的车臣人，包括携带武器的战斗人员（还有外国的伊斯兰战士）从车臣一侧翻山越岭进入格鲁吉亚，定居在潘基西峡谷地区。俄罗斯称，该峡谷成了恐怖分子的一个基地并威胁要轰炸它。美国担心俄罗斯会袭击格鲁吉亚，于是主动提议帮助训练格鲁吉亚的武装部队，从而它可以自己肃清潘基西峡谷的恐怖分子。格鲁吉亚训练装备方案于2002年5月启动，最初只有200左右的美军官兵参加。然而该方案使美国人第一次在高加索地区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两年后科林·鲍威尔出席萨卡什维利的就职典礼，对参加阅兵式的士兵正步走的风格作了如下评论：“我坐在那里，观看格鲁吉亚士兵从我面前走过，走步的风格完全模仿苏军。这也是他们以前接受的训练的结果。随后走过的另一个方队完全是美军风格，每分钟120步，正如我国士兵接受的训练一样。我觉得有意思极了。我自言自语道：时代真变了！”

因此毫不奇怪，普京传递给格鲁吉亚新总统的最强硬信息就是要他冷却与美国的关系。据萨卡什维利讲，一方面普京强调说俄罗斯是美国的一位朋友并正在与它发展关系，但另一方面普京又称东欧国家已经成了“美国人的奴仆”，对美国大使馆的“随便哪个二等秘书”的话言听计从。“他的话题基本上不离美国，滔滔不绝地讲了20～25分钟，直到我最后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说，‘我很高兴您向我介绍了你们同美国的关系，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讨论美国的。’我问，‘您真的以为格鲁吉亚发生的一切是美国策划的？您真的以为我国政府是从美国人那里或索罗斯那里拿钱，并听从他们的指挥？’普京说：‘不，不，当然不是您。可您政府内的一些人也许是这样，他们同美国人密切合作。’”[7]

（实际上几乎可以肯定，普京知道萨卡什维利的高级顾问是一个曾在国家民主研究所干过的美国人丹尼尔·库宁，而且他的薪水不是由格鲁吉亚政府支付，而是美国人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支付。华盛顿的官员需要找格鲁吉

亚的这位领导人或对他施加影响时，首先与库宁联系。[8]）

萨卡什维利说，他建议两国关系从头开始。作为一个小国，格鲁吉亚将尽力照顾俄罗斯的利益；作为交换，希望俄罗斯也能理解格鲁吉亚自己比俄罗斯小得多的利益。他说，普京似乎很乐意接受。“实际上我喜欢他。我觉得布什说看到了他的灵魂说得没错，因为我的第一印象是我喜欢他。我思忖着，不错，他从前是干过克格勃，与我过去的经历和信念极为不同。可他好像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爱自己的国家，也许会以非常实际的方式代表自己的国家行事。我们可以达成某种理解。你知道，会谈中他一直想让我知道，他可以为解决一些问题出力。”

关系融洽的普京和萨卡什维利定期通电话，双方都做出了真诚的努力来修补关系。然而萨卡什维利既希望与莫斯科建立友好关系，又有两大心事——恢复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结束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三个省份事实上的独立）以及把自己的国家同西方的重要联盟北约和欧盟捆绑在一起。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萨卡什维利来说绝非易事。

2004年2月25日，萨卡什维利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了美国，马上提出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问题。他还宣布了一项新的5年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美国陆军教官将训练数千名格鲁吉亚士兵。

与莫斯科的蜜月持续到2004年5月。用普京的话说，他“最后又帮了一次”萨卡什维利。格鲁吉亚新政府与苏联时代桀骜不驯的阿巴希泽领导的阿扎尔省已经走到了内战的边缘。和他的前任谢瓦尔德纳泽一样，萨卡什维利给普京打电话求助。普京再次派伊戈尔·伊万诺夫——这一次不再是外交部长，而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往格鲁吉亚。伊万诺夫首先飞往阿扎尔省省会巴统市，打算与阿巴希泽谈判，然后再飞往第比利斯。伊万诺夫回忆说，5月5日晚上他与阿巴希泽共进晚餐时，传来一支格鲁吉亚装甲车队正驶向巴统的消息。伊万诺夫打电话给格鲁吉亚总理，要求他下令车队停止前进。时隔不久，巴统市近郊爆发了激烈的交火。“仗打得很激烈，我们在宫殿里甚至可以嗅到火药味。”据伊万诺夫说，阿巴希泽告诉他，他自己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对付格鲁吉亚军队并把他们赶出去。然而伊万诺夫回答说：“我在飞机场有一架飞机。如果您愿意和我一起去莫斯科的话，尽可利用这个机会。”阿巴希泽抓住了这个去俄罗斯政治避难的机会，带上他身兼巴统市长的儿子一起逃离了巴统市。

几小时后，萨卡什维利的军队进入市区，阿扎尔再次成为格鲁吉亚的一部分。次日，萨卡什维利本人作为胜利者来到巴统市，对市中心欢呼雀跃的人群发表了讲话：“你们是英雄的人民，你们得到了你们的格鲁吉亚。我们向全世界显示，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我们能够在6个月内发动两次不流血的革命。”在不停地呼喊“米沙！米沙！”的兴奋的支持者的簇拥

下，萨卡什维利步行到多年来格鲁吉亚领导人难以企及的黑海海滩上，用海水浸湿了自己的面颊。随后他做了一个许诺，或者说发出了一个威胁，中央政府重新控制阿扎尔只是他使命的开始："我们必须开始谈判，同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就国家的统一及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严肃、和平的谈判，我们在阿扎尔证明，采取和平而果决的行动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格鲁吉亚将会强大起来，我们一定会去苏呼米（阿布哈兹的首府）。具体什么时候去，让我们拭目以待。"

萨卡什维利深知莫斯科在化解这场危机和去掉阿巴希泽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他打电话给普京表达感谢。据萨卡什维利说，普京的回答简短生硬："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帮了你一把，但请记好，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上我们不会再白白送礼了。"俄罗斯在格鲁吉亚这两块分裂出去的领土上的利益远远大于在阿扎尔的利益。阿布哈兹是一个拥有大约20万（对这一数字有争议）人口的共和国，还不到1992年前人口的一半，因为内战期间几乎所有的格鲁吉亚人都逃走了。苏联时期，阿布哈兹位于黑海的海滨城市——苏呼米、加格拉和皮聪大一直是俄罗斯人的主要度假胜地。南奥塞梯比阿布哈兹小多了，苏联时期人口还不足10万（大约1/3是奥塞梯人，1/3是格鲁吉亚人），20世纪90年代的内战后，只剩下7万来人。奥塞梯人大多与居住在北奥塞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一个共和国）的亲属往来密切。南奥塞梯人依赖俄罗斯保护他们不受格鲁吉亚人的威胁，并得到俄罗斯的大量补贴及其他支持。由于大多数人过去不是，也不想成为格鲁吉亚公民，普京提出了一项"护照化"政策，向这两个省的居民颁发俄罗斯护照。克里姆林宫这样就可以说它有权保护自己的公民。在这两个共和国内，俄罗斯人占据了重要职位。在南奥塞梯，前克格勃官员被请来在政府内各重要部门任职。

普京"不再白白送礼"的话明显是想警告萨卡什维利，但萨卡什维利却置若罔闻。也许他根本就误解了据说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首次见到他时做的一点暗示，即他愿意在南奥塞梯问题上做一笔交易，恢复格鲁吉亚对它的主权。5月份，被萨卡什维利任命为冲突解决部部长的电影导演乔治·坎德拉瓦看到安全部副部长的办公室里挂着一些地图，标出对南奥塞梯发动军事打击的计划。他告诉高加索问题专家托马斯·德瓦尔："每一天的行动都详尽规划好了。他们想完全照搬阿扎尔模式。"[9]2004年5月26日是格鲁吉亚的独立日。萨卡什维利在第比利斯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并用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对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发表讲话，敦促他们重新融入格鲁吉亚。南奥塞梯总统爱德华·科科伊季曾是一位摔跤运动员和商人，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萨卡什维利呼吁重新融入格鲁吉亚传递出了一条清晰的信息："我想强调指出，他是在一列坦克隆隆驶过鲁斯塔维利大街时说这番话的。对奥塞梯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呼吁，而是威胁。奥塞梯的每一个人都把这一呼吁视为一种威胁。"[10]

5天后，萨卡什维利将坦克部队调到南奥塞梯边境，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走私”军事行动，表面上是为了关闭厄尔涅梯村的一个巨大市场。该市场是俄罗斯、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之间大量商品非法流通的一个场所。格鲁吉亚的袭击造成该地区自从1992年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也许真正的目的是促成南奥塞梯政府的垮台，然而却适得其反，科科伊季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南奥塞梯的普通百姓更加仇视格鲁吉亚。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厄尔涅梯市场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俄罗斯外交部发出警告，“挑衅行为”或许会导致“极其消极的后果”。萨卡什维利于是动身前往华盛顿求援。然而华盛顿同样认为他的举动既莽撞，又危险。国务卿鲍威尔回忆道：“我觉得（格鲁吉亚）总统好高骛远。我不得不清楚地告诉他，‘你也许认为，此事关于贵国的关键利益，但我们对此不那么肯定，而且这不涉及我们的关键国家利益。所以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你可能无法应付的局面，然后认为我们会驰援你们，把你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所以请你慎行。’”

萨卡什维利听进去了。8月，格鲁吉亚军队撤出南奥塞梯。

选举之夜

莫斯科历史上屡遭火灾。位于首都中心的城堡克里姆林宫早期的木质结构多次毁于大火。16世纪，入侵的鞑靼人放火焚城。1812年，就在拿破仑的大军进入莫斯科时，一场大火几乎吞灭了整个城市。此后，莫斯科几乎从废墟上重新建起。

2004年3月14日星期天傍晚，与克里姆林宫一墙之隔、曾是前沙皇马术学校的马涅日展览馆莫名其妙地起火，熊熊大火一直燃烧了几个小时，火光映红了夜空。[11]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大红墙内登高眺望火势。电视播放了他凝视大火的镜头，随后普京神情忧虑地掉转身离去。也许他把这场大火看作了不祥之兆。这一天恰是选举日。几小时前，投票刚刚结束。普京赢得71%的选票，再次当选为总统，任期4年。当年拿破仑眼睁睁看着到手的战利品毁于一场大火。普京对远景的设想会不会因为外国人凭借俄罗斯人感到陌生的民主观念蚕食俄罗斯而毁于一旦？

我无从得知，那一瞬间普京总统的脑海里是否闪过这样的念头。然而几个月后俄罗斯南部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表明，近于幻想狂的对虚弱和外部威胁的幻觉萦绕在普京这个强人的脑海。又一次血腥的恐怖主义袭击造成一所学校内数百儿童的死亡。普京显然认为，这一事件证明他对国家的控制太软弱无力，俄罗斯是一个四面受敌、被釜底抽薪的国家。身处困境的普京将予以反击，证明自己的力量。普京在第二任期将成为一只烈火中涅槃的

凤凰。

别斯兰和“宪政政变”

悲剧发生在9月1日，这是俄罗斯孩子暑假结束后返校的一天。别斯兰是一个人口3.6万人的小镇，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北端，距离车臣西面开车不到一小时。兴高采烈的孩子身穿崭新的校服来到第一中学。上午9点刚过，正当孩子和家长一起在学校操场参加一个典礼时，一群武装分子乘坐一辆军用卡车冲进学校，对空鸣枪后将1100多人，包括孩子、家长和老师，驱赶进学校大楼里。这是莫斯科剧院悲剧的重演，不过这一次恐怖分子汲取了教训，因而当局更难对付这次危机。扣押人质的恐怖分子事先做了周密的策划，对学校的具体位置了如指掌。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内，十余名人质被枪杀。此后三天里，全国目睹了恐怖事件的发展。枪手在学校四周拉上绊网并安置炸药，不允许向学校运送食品、水或药品。普京总统再次面对最为棘手的难题：如何解救人质，挽救生命，同时又不屈从恐怖分子的要求。和以往一样，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包括立即允许车臣独立。一位曾协助解决围困剧院危机的医生和一位当地政府官员同恐怖分子举行了谈判，但毫无结果。孩子们在高温下拥挤在学校的体操馆里，干渴难耐。第三天，在发生了两次情况不明的爆炸后，特种部队冲进学校。叛乱分子负隅顽抗，28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但334名人质也因此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孩子。

这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在本土上收效甚微的反恐斗争中最黯淡的一天。枪手和人体炸弹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滥杀滥伤。当局的无能和普京所称的“赢得反恐胜利”的荒谬暴露无遗。仅2004年一年，俄罗斯就发生了6起重大恐怖主义事件，别斯兰是其中之一。

2月，41人死于莫斯科地铁的一次炸弹袭击。

5月，车臣亲莫斯科的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在首府格罗兹尼的一次胜利日阅兵式上遭到暗杀。

6月，一批来自车臣的恐怖分子袭击了临近的印古什共和国首府，打死95人，获取了大批武器，后来被用于别斯兰袭击。

8月，人体炸弹同时炸毁了正在飞行的两架客机，90人死亡。

8月底，就在别斯兰事件的前一天，一名妇女在莫斯科的一个地铁站引爆身上的炸弹，她本人和10名过路人被炸死。

9月4日星期六晚上，别斯兰事件以流血方式结束后的第二天，普京总统终

于通过电视对全国发表了讲话。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去过别斯兰学校探望一些幸存者。普京看上去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情绪激动。他缓缓地讲述了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这场可怕悲剧。如同葬礼上的牧师一样，普京请人们“悼念最近几天死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受害者”，随后悲哀地垂下自己的头。他的话题旋即从眼下的这场危机转到一些意义深远、令人不安的结论上。从多重意义上讲，这些结论决定了他这一任总统任期的性质。

俄罗斯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灾祸和苦难。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辽阔伟大的国家解体后的时代。这个国家很不幸，无法在一个迅猛变化的世界中幸存下来。然而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仍然保存了辽阔的苏联的内核。我们把这个新国家命名为俄罗斯联邦。

普京演讲的风格颇为奇特，在举国哀悼的时刻上了一堂历史课，唤起人们对苏联昔日辉煌的怀念。普京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流露出他对苏联时期国家铁拳的眷恋。如今涣散取代了铁拳。

国内冲突和种族分裂曾受到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有力压制，然而现在这些问题爆发出来。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不再重视国防和安全问题，听任腐败侵袭我们的司法和执法体系。不仅如此，曾受到最强大的国防体系保护的我国漫长边界一夜之间面目全非，西部和东部边界难以御敌。巩固现代化的和真正得到保护的新边防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和几十亿卢布。尽管如此，假如我们在合适的时机采取有力行动的话，收效本可以更大。

普京接下来暗示很快要采取镇压措施：“我们暴露出自己的虚弱，而弱者是要挨揍的。”

普京对这次恐怖主义袭击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他只字不提本国军队在车臣犯下的暴行，而这才是俄罗斯境内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普京连“车臣”这两个字都没有提，反而指责西方！他对西方的指摘包裹在既奇怪又模棱两可的措辞中：

有些人想从我们这里抢走“一块上好的蛋糕”。还有一些人为他们出力。他们的想法是，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的核大国之一，因此对他们依然是一种威胁。他们因而认为，应该消除这种威胁。毋庸置疑，恐怖主义只是达到这些目的的一个手段。

普京似乎是想说，别斯兰事件是西方企图肢解俄罗斯联邦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外国政府正在利用恐怖分子达到这一目的。如同战争一触即发前的一位领导人，普京开始告诫本国人民为即将临头的灾难做好准备：

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不止一次面对危机、反叛和恐怖主义袭击。然而今天发生的事情，恐怖主义分子这一次犯下的罪行前所未有，惨绝人寰。这不是对总统、议会或政府的挑战。这是对整个俄罗斯的挑战，对我们全体人民的挑战。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攻击。

普京发誓，身为总统，他既不会被吓倒，也不会惊慌失措。“我们面对的是国际恐怖主义针对俄罗斯的直接干涉。这是一场残酷的全面战争。”普京告诫俄罗斯人，他们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活得“无忧无虑”，并要求国家安全部门严加打击。普京保证将采取“旨在加强我国统一的一系列措施”。

此后几天，这些措施相继出台。认为俄罗斯已经过于专制的人极为震惊，普京的前总理卡亚亚诺夫（半年前刚被解职）称这些措施是一次“反宪法的政变”。

首先，普京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名废除了地方州长的直接选举。从现在起，他本人将任命地方州长，然后地方议会给这些任命盖上橡皮图章。（此举的含义虽未有过像样的解释，但似乎是说，如果不是地方州长“肆意妄为”的话，别斯兰事件本来不会发生。）其次，独立的政治家或激进反对派几乎不可能进入国家杜马。此前，议会450个席位中的一半是从政党的候选人名单中选出的，剩余一半由225个选区的选民直接选出。从现在起，所有议员都从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选出。单议席选区被废除，一个政党进入议会的资格从5%的支持率上调到7%的支持率。组建新政党的规则也收紧了。

普京强化了自己的权力并扼杀反对派。2000年的“垂直权力结构”现在变得更加僵硬。普京请出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用了一个名词定义他的措施。苏尔科夫称其为“主权民主”，有时也称为“指导式民主”，实际上是民主的终结。苏尔科夫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的采访时，对刚刚通过的改革一揽子计划做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式的解释，表面看到和听到的与实情截然相反：新的选举制度不会削弱反对派，而是“使它们走出政治上的默默无闻”；改革措施强化的不是普京的权力，而是国家的权力；任命后的州长权力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普京又提出了一项新举措，建立一个新的“人民院”，一个由126名被任命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机构，用于讨论公民倡议并起草法律。普京的这一提议令人不无困惑，因为这本应该是选举产生的国家杜马的职责。苏尔科夫解释说，议会的缺点是议员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重新当选。在西方，这被称为“对选民负责”。苏尔科夫认为，这一制度在俄罗斯只会导致民粹主义。人民院的专家不需要迎合政治风向，因而可以更客观。[12]（几年后，苏尔科夫对现实的认识显露出一角。他在电视上称：“普京是俄罗斯危难之秋命运和上帝赐予的一个人。他命中注定要保国安民。”[13]自不待言，上帝赐予的这位领袖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民主。）

那么对普京总统所说的外国势力企图抢走“一块上好蛋糕”，又该如何理解呢？据一位经验丰富的分析家德米特里·特列宁称，普京的外交政策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他写道，直到2003年以前，“俄罗斯在‘选择欧洲’的口号下基本上奉行讨好西方的政策，寻求与美国结盟”。此后，“莫斯科奉行不结盟政策，越来越独立于西方，但同时又不愿与之对抗”。[14]

这是新孤立主义姿态的开端。普京在第二任期内，再也不会去逢迎哪国。普京认为，俄罗斯过去掉以轻心，如今需要保护自己不受双重邪恶的威胁——恐怖主义（如今定义为外国阴谋的一部分）和西方式民主。后者正在渗透前苏联的地盘，先是通过格鲁吉亚，时隔不久……又要假道乌克兰。

---

[1] Interview with Igor Ivanov,11 December 2010.

[2] Interview with Nino Burjanadze,29 March 2011.

[3] Interview with Mikheil Saakashvili,9 May 2005.

[4] See Thomas de Waal,*The Caucasus:An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94–5.

[5]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3 March 2011.

[6] de Waal,*The Caucasus*,p 197.

[7] Interview with Mikheil Saakashvili,31 March 2011.

[8] *Wall Street Journal*,30 August 2008,*Daily Telegraph*,23 August 2008.

[9] de Waal,*The Caucasus*,p 199.

[10] Interview with Eduard Kokoity,4 April 2011.

[11] The cause of the fire,which left only the outer walls intact,has never been fully established.The de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 building(erected after the Napoleonic fire of1812)provided an excuse for its total reconstruction,which was criticised by conservationists for distorting the original architectural vision.

[12] *Komsomolskaya Pravda*,28 September 2004.

[13] Surkov on Chechen television,8 July 2011,quoted by Interfax and Reuters.

[14] Dmitry Trenin,‘*Moscow the Muscular*’:*The Loneliness of an Aspiring Power Center*(Moscow:Carnegie Moscow Center Briefing,volume11,issue1,January2009).

第七章　四面树敌

橙色革命

2004年下半年，基辅街头的情景令克里姆林宫怒不可遏：一片橙色衣服和旗帜的海洋，100万示威者冒着零下气温的严寒不分昼夜地露宿街头，导致乌克兰的首都陷入瘫痪。这一情景是一年前第比利斯事件的重演——抗议选举舞弊，大批民众支持一位亲美的民族主义者候选人。该候选人代表了不同于腐败专制的亲俄政权的另一种选择。对俄罗斯来说，这一局面已经够糟糕的了。然而这一次是发生在对俄罗斯来说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重要的一个——乌克兰。乌克兰人口4700万，领土是格鲁吉亚的10倍。乌克兰人口的1/6是俄罗斯少数族裔，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混合家庭不下数百万。普京（和众多俄罗斯人一样）把乌克兰视为俄罗斯自身的延伸。据说2008年普京告诉布什总统："乔治，你不懂，乌克兰根本不是什么国家。乌克兰是什么？它的一部分领土在东欧，但大部分领土是我们送给它的礼物。"乌克兰的一部分——克里米亚半岛——的确是一份礼物。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通过一项法令将原属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半岛划归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对于俄罗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黑海舰队的基地在这里。整个国家如同一块巨石横亘在俄罗斯和欧洲的战略通道之间——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电力网、军用高速公路，也是俄罗斯和日益扩大的北约之间的最后一块缓冲区。然而娶了一个美国老婆，即将成为乌克兰总统的那个人维克托·尤先科却说要加入北约！

普京不会重蹈覆辙，再派他的外交部长去乌克兰"解决问题"，从而冒让乌克兰如同格鲁吉亚一样从自己手中滑走的风险。这一次普京将竭尽全力制止乌克兰的这场骚乱。他委派自己的办公厅主任梅德韦杰夫制定一项战略。

早在7月份乌克兰大选拉开帷幕之初，普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危险。亲西方的反对派有两位富有魅力的领袖：一位是已经当过央行董事长和总理的尤先科，另一位是感情奔放的女政治家尤利娅·季莫申科。季莫申科一头金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像是果盘边缘的花饰。她以这一招牌发型和富有争议的生涯而闻名。在天然气部门工作期间，季莫申科一跃成为乌克兰最富有的人之一。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结成一个叫"人民力量"的竞选联盟并做成一笔交易——如果尤先科当选总统，将任命季莫申科出任总理。两人都坚定支持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独立，尤其是如果乌克兰愿意的话，支持乌克兰有权加入欧盟和北约。

现行体制的候选人是总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一个平淡无奇的人，年轻时曾因抢劫和斗殴罪两次被判刑。甚至连普京对亚努科维奇也心怀戒心，不过他显然比尤先科强。一些与上层有关系的俄罗斯人告诉我，普京并不认为亚努科维奇是最佳人选，但还是默认了，因为亚努科维奇得到现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的全力支持。库奇马动用了一切政府资源支持亚努科维奇的竞选。国家电视台对亚努科维奇做了大量的积极报道，同时把尤先科描绘成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犯忌娶了一个美籍乌克兰女人——她甚至有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密谋帮助自己丈夫夺取权力。

库奇马在一次采访中证实，他和普京曾讨论过哪位候选人更合适的问题。“这不是什么秘密。难道西方没有讨论过谁应该当乌克兰总统？整个西方阵营都讨论了这一问题。而另一方只有俄罗斯，只有普京一人。普京了解尤先科的发言内容和观点，对他掌权不那么热心。”[1]库奇马选择亚努科维奇作为他的继任人后，普京立即对亚努科维奇表示支持。乌克兰成了争夺势力的战场，美国和俄罗斯公开支持对立的候选人。

正如前一年在格鲁吉亚一样，西方的民间组织深深卷入了竞选活动，充当尤先科和支持他的本土组织的顾问。最大的青年组织叫“波拉”（意思是“是时候了”），它借用了塞尔维亚团体“奥特波”和格鲁吉亚团体“克玛拉”使用过的非暴力反抗的手段。俄罗斯人则派遣了所谓的“政治技术专家”，其中有著名的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苏联时期曾是一位异见人士，如今是普京的顾问）和政治顾问谢尔盖·马尔科夫，与亚努科维奇的竞选班子一道参加竞选，同时充当他们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联络渠道。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翰·E·赫布斯特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西方国家的使馆“研究制订了方案”，以确保大选的自由和公正。“我记得，加拿大大使带头搞了一个由感兴趣国家的使馆组成的工作小组，监测有关大选的情况。当时我也搞了一个定期会议，起初是每月开一次，后来好像是每两周开一次。参加会议的有关心大选的所有国际组织和乌克兰的民间组织。我们借开会之机了解他们为鼓励自由公平的选举都做了哪些工作，同时就如何加强协调以取得预期结果集思广益。结果是举行了自由、公平的选举，而不是哪个人赢得了大选。”和在格鲁吉亚时一样，美国国际开发署为促进公民社会、自由媒介和对民主的宣传资助了数百万美元。赫布斯特说，所有政党，甚至包括共产党在内，均可利用这些基金和方案。[2]

竞选期间，赫布斯特曾主动找到俄罗斯媒体专家，想探明他们有何目的。“我邀请帕夫洛夫斯基和他的同事马拉特·戈尔曼一起吃饭。午饭吃得很愉快，但谈话很拘谨。他们不愿多说他们在忙些什么。”赫布斯特说，他直言不讳地介绍了美国人在乌克兰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我处于有利地位，因为我们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公开的。我们想推动一次自由公平的选举，而且我们对正在做的事情直言不讳。我也爽快地告诉他们，乌克兰

的民间组织，还有国际民间组织，也在为同一目标而努力。他们对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讳莫如深，我可以理解为什么。”

约翰·赫布斯特说自己只不过是支持自由公开选举，然而帕夫洛夫斯基不这么看。“我在乌克兰看到了这些顾问和大批民间组织的活跃分子，他们完全亲美或亲大西洋。”当被问到他的目标是什么时，帕夫洛夫斯基三缄其口，只是说，他的作用是“作为联络渠道”，但发现很难影响库奇马。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候选人竞选总统。“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库奇马选择了亚努科维奇，有的州长更容易被选民接受。我觉得库奇马估计会爆发冲突，而亚努科维奇似乎是一个有能力对付冲突的干才。这是他判断错误。亚努科维奇的粗鲁和粗俗惹恼了选民。普京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此很不高兴。”帕夫洛夫斯基说，竞选结束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撰写报告给莫斯科报忧，汇报竞选总部如何“失去控制”。[3]

谢尔盖·马尔科夫在一次采访中更直言不讳，讲述了俄罗斯顾问向库奇马—亚努科维奇班子提供的咨询意见，并对俄罗斯人认为西方民间组织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看法。马尔科夫坦承，实际上是强调，他和他的同事是俄罗斯总统班子派来做这项工作的（影响一个主权国家的选民）。据马尔科夫说，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向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提供专家对每日局势发展所做的分析，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应对。其次，“我们看到，在大众媒体上露面的专家大多受西方基金会的影响。这些西方基金会基本上不许他们讲俄罗斯的任何好话。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被赶出基金会，失去赠款，身无分文。因此我们来到这里，组织各种研讨会和会议，或与他们合办新闻节目，以绕过这种‘禁令’”。[4]

应该说，这一评估与反对派自己（及大多数西方观察家）的看法截然相反。后者认为媒介完全被政府所操控，自始至终报道亲俄罗斯的观点。

马尔科夫对反对派候选人的看法令人咋舌：“我们坚信，尤先科完全听命于自己的老婆，而她属于一个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与纳粹运动有染，虽然不一定与美国情报机构有什么瓜葛，但与东欧各地的侨民圈子有联系。这些侨民对俄罗斯的仇恨堪比波兰民族主义者。我当时确信，荏弱的尤先科会完全执行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纲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制造事端，而且越大越好，最好是一场小规模战争。为了挑拨这些兄弟国家，离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他们必须制造流血事件。我坚信，这些人一门心思想挑动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自相残杀。我是说自相残杀。”

以上他谈的个人观点令人愕然，然而很值得重视，因为十有八九马尔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的老板和他一样持有这种大难临头的观点。

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明白，尤先科极有可能赢得大选，于是悄悄对他的竞选班子做出了一些奇怪的表示。雷巴丘克是尤先科的竞选主管，也是未来的总统办公厅主任。他说，他冷不丁接到昔日上大学时一位朋友的电话。他们已经24年没见过面了。“他给我打电话时，我知道他在克格勃工作。他建议我来莫斯科见一些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人。”[5]

此后一个半月里，尤先科的这位顾问每周去一次莫斯科，在“灯光幽暗的餐馆”与人见面，“窃窃私语”。俄罗斯人想知道，如果尤先科当选，会怎么做。雷巴丘克告诉他们：“我们的政策很简单。我们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欧洲国家。我们想为了欧洲的安全加入北约。我们执政后不会成为麻烦，因为我们怎么做，不会出乎你们的意料。”他的这番话可不是克里姆林宫一直期待听到的保证。

9月5日，距大选日期仅两个月，尤先科和乌克兰安全部门首脑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后突感不适。回家后他服了止痛药，然而第二天早上病情加重。雷巴丘克回忆道：“大约上午10点左右，他说，‘快点儿开完会吧，我很疼，似乎有点儿不对头。’疼痛的原因一直查不出来。3天后，尤先科飞到维也纳，被送到一个私人诊所。诊断结果是二英中毒。中毒造成胃溃疡和脾受损，以及面部严重毁容。”

尤先科回忆道：“我记得早上5点半在诊所苏醒后，半边脸都麻了。又过了不到3小时，我嗓子几乎发不出声音，丧失了说话能力。每天早上我对着镜子看自己，看到面部越肿越大。”[6]

连续两周，季莫申科代替尤先科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指责尤先科的敌人“不顾廉耻地给他下毒”。尤先科终于返回乌克兰继续竞选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得人心。他昔日那张英俊面孔上的伤疤成了证明他的敌人穷凶极恶的佐证。通过第5频道——尤先科“我们的乌克兰”党内的一位富商拥有的一家电视台——他的演讲被实况转播到俄罗斯各地的公共广场。“亲爱的朋友们，过去两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

莫斯科现在必须加紧宣传在民意测验中落后的自己的候选人。10月9日，普京事先没有打招呼，突然邀请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前往莫斯科参加他的生日活动。电视报道极力显示三个人多么情投意合，期望普京的魅力能传给乏味的亚努科维奇一点。

“谢谢你们接受了我这么仓促发出的邀请，”普京热情洋溢地说，“这是个让咱们聚一聚的好由头。”

“绝好的由头。”这两个乌克兰人同样热情洋溢地回答说。面对电视镜头，库奇马借机说了几句显得他这位总统很“中立”的话，同时如同谢瓦尔德纳

泽在这种场合可能会说太阳从北边升起一样，警告国内的同胞："有人问我怎么看这两位总统候选人时，我回答说，以我之见，这不是一个大选后谁当政的问题，而是大选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乌克兰的问题。乌克兰会走哪一条道路？是今天我们已经尝试过的道路，已经有了成果的道路——即使我国人民也许还未能完全感受到这些成果——还是会导致过去1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危及全局的道路？我认为，这次（与普京）会晤将有助于推动形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普京唯恐有人还心存疑虑，10月底又对乌克兰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在头一轮大选前夕对乌克兰的前所未有的干预。普京不需要去干那种拙劣的事，如公开称赞亚努科维奇或贬低尤先科。他亲临乌克兰足以提醒人们，这次选举事关重大。人人皆知，哪一位候选人亲俄罗斯。普京首先接受了直播采访。乌克兰三家国家电视台频道同时进行了转播。电视观众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提问。此后两天里，普京与乌克兰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与亚努科维奇并肩参加纪念乌克兰从纳粹占领下（被俄罗斯人）解放60周年纪念仪式。这些操纵媒介行家干得很漂亮。此时俄罗斯人认定尤先科绝无可能当选。

然而10月31日的大选结果证明他们失算了。尤先科与亚努科维奇两人的选票均略低于40%，但尤先科得票比亚努科维奇多一点点，因此需要对两位领先的候选人举行第二轮投票，日期定在了11月21日的星期天。

在第二轮选举中，西方国家驻乌克兰的使馆对投票选民做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尤先科领先他的竞争对手11个百分点。然而官方结果是现任总理领先尤先科3个百分点。西方选举观察员谴责了这一结果，说他们目睹了为帮助亚努科维奇竞选而滥用国家资源的现象。尤先科的竞选主管雷巴丘克回忆道："我在基辅市中心的一个小投票站正在投票。来这个地方投票的人一向少得可怜，然而大选那天，忽然间投票的人排起了长队，手里拿着额外的选票。这些人来自顿涅茨克地区（亚努科维奇的老家），他们的人数比来这个投票站投票的基辅人还多！"

选举中的舞弊现象显而易见。尤先科的支持者开始涌到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又称广场）建起了一个帐篷城，准备扎营露宿，直到改变选举结果。橙色成了革命的颜色。选择橙色而不是乌克兰国旗的蓝黄二色是为了避免民族主义色彩。此后一周，100万人加入了进来，包围了政府大楼。

然而普京马上打电话给亚努科维奇表示祝贺，说："竞选很激烈，但却是公开的、诚实的。你的胜利令人信服。"除了"激烈"一词外，其他的几个形容词与实际情况差之千里。往好处想，这也许可以说明一点。当时普京正在巴西，或许不了解情况。但他的情报部门对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顾问帕夫洛夫斯基说这绝不是搞错了，而是普京刻意在这场他称之为围绕大选

结果的“国际斗争”中对西方的挑战。“普京祝贺亚努科维奇是发出的一个政治信号，围绕承认选举结果的斗争已经开始，普京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最终俄罗斯输了。假如它没有输的话，本来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库奇马总统一筹莫展。他的首都目睹了自从苏东剧变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民权利的展示，他曾动过强行驱逐示威者的念头，同时寄希望于零度以下的气温会把示威者冻走。然而示威者没有离开，而且始终坚持和平示威，以避免引发暴力冲突。11月23日凌晨时分，库奇马给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克瓦希涅夫斯基回忆说：“他紧张得要死，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我绝不允许在这里流血’。他要我来基辅。我说，‘现在正值深更半夜，容我明天早上告诉你我能帮什么忙。’”[7]

第二天早上，克瓦希涅夫斯基接通了布莱尔的电话。布莱尔的办公厅主任乔纳森·鲍威尔回忆道：“克瓦希涅夫斯基敦促布莱尔和他一起去基辅，但布莱尔有顾虑，因为俄罗斯人总以为我们在包围他们，认为西方正在打入他们的势力范围。托尼因此决定不去基辅。”

波兰总统于是组成一个欧盟团，准备在两位候选人和库奇马总统之间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们定于周末动身去基辅。然而事态急转直下。

11月23日星期二，尤先科宣布自己赢得了大选，并象征性地宣誓就职总统。他的竞选伙伴尤利娅·季莫申科急躁地宣布，她将带领示威者前往总统府并宣称：“要么他们让权，要么我们夺权。”她发出的这一号召在自己的竞选班子内引起激烈争吵。雷巴丘克告诉她：“你不应该这样挑动群众，万一有人被打死怎么办？”

据雷巴丘克说，季莫申科回答说：“那他们就是死得光荣。”

次日，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亚努科维奇赢得大选。面对大选中肆无忌惮的舞弊现象，为确保选举公平投入甚多的美国现在必须决定何去何从。国务卿鲍威尔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就在局势急剧变化的时候我来到办公室，说：‘此事事关重大。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含糊其辞。’”鲍威尔来到记者室，发表了一份导致华盛顿与莫斯科对峙的声明：“我们不能接受这一选举结果是合法的，因为它不符合国际标准，而且也没有对有关选举舞弊的大量可信报道进行过调查。”

普京总统结束对拉美的访问返国途中，在海牙短暂停留，参加一场与欧盟领导人的峰会。在这里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在道义上，我们无权陷一个欧洲大国于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我们也不应允许以暴民夺权手段解决这类冲突成为国际惯例的一部分。”

普京在幕后似乎建议库奇马控制形势，把人群从街道上清走。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库奇马承认："普京作风强硬。他并没有直接说'出动坦克清除街道'，他说话很注意方式。但他给了我点儿暗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种暗示显然很强烈，库奇马不得不予以抵制："我不会动用武力清除广场上的示威者，因为我知道那里有孩子，动用武力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显而易见。"[8]

星期五，大选结束后的第五天，由克瓦希涅夫斯基和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率领的欧盟代表团抵达基辅。然而就在100万尤先科的支持者在街头耐心等待的时候，来自亚努科维奇家乡顿涅茨克的4万矿工向基辅进军。克瓦希涅夫斯基告诉库奇马："你打算怎么办？这意味着一场屠杀！我告诉你，如果发生屠杀的话，我和索拉纳马上去机场，然后在布鲁塞尔召开一次庞大的记者招待会，指控你在乌克兰挑起内战。"

库奇马采取了必要措施避免灾难发生。日后他回忆说："我对一些重要人物有影响力。我们设法制止了他们。"

调解谈判开始前，库奇马给莫斯科的普京打电话，强调"圆桌会议"必须有一位俄罗斯代表参加。普京建议派叶利钦参加。克瓦希涅夫斯基听着像是戏言。他告诉库奇马："对不起，我没法把这话当真。尽管我很尊敬叶利钦而且和他合作得很愉快，但我们希望举行严肃认真的谈判，而不是作秀。"[9]

普京没派叶利钦，而是派了一位他信任的政府官员、前内政部长和国家杜马议长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参加谈判。此前普京刚任命他出任自己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党魁。格雷兹洛夫对谈判的贡献比派叶利钦参加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先科说，气氛极其紧张。"我知道，俄罗斯最不希望看到我当选总统。选举中的弄虚作假、俄罗斯人表达的关切、他们在选举期间采取的偏袒立场以及对乌克兰内政的干涉……这一切尽人皆知。"

据克瓦希涅夫斯基称，格雷兹洛夫的出发点是，亚努科维奇是总统，讨论传言的选举舞弊是浪费时间。这都是外国势力煽动的，没什么好谈的，圆桌会议毫无意义。

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互相指摘对方在不同选区操纵选票。有人提出，总体来看，受操纵的选票不超过10%。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他盯着此人说："好啊，那你就在本国宪法里加上这一条，倘若被操纵的选票不超过10%，选举有效！"格雷兹洛夫提到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并建议说，他们应该和美国人一样，接受一次显然有瑕疵的选举结果。"我们还是以宪法为依据。"

谈判陷入僵局。克瓦希涅夫斯基知道，只有一个人可以打破僵局——德国总理施罗德，于是他请施罗德出面与普京谈一谈。“我说，‘您跟普京熟，请您告诉他，如果你硬说这是一个由西方势力资助、没有合法性的人为的运动，硬说没有人操纵选举，那么你就错了，这意味着你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施罗德拨通了普京的电话，但听到的是一连串的指责。普京认为，他非常了解局势，远比克瓦希涅夫斯基和他的欧盟代表团更了解。施罗德将通话结果告诉了克瓦希涅夫斯基，说这是他与普京之间最艰辛的电话通话之一。

无从得知施罗德的电话起了什么作用，或普京后来是否对库奇马说了些什么。然而大选后一周的一个星期天晚上，美国大使馆得到消息，最坏的情况即将发生。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被派去驱赶示威者。约翰·赫布斯特大使给华盛顿打电话，告诉国内的人：“我认为鲍威尔国务卿需要与库奇马总统通电话。”

鲍威尔获知，内政部管辖下的部队正在城市郊外集结。“我试图与总统通话，但突然间他人不见了。”库奇马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他不接电话是因为当时是凌晨3点，他身边没有翻译。与此同时，美国大使设法找到了库奇马的女婿维克多·宾楚克并告诉他：今晚若有任何镇压举动，库奇马要负个人责任。

派出的部队撤回了。第二天早上鲍威尔终于接通了库奇马总统的电话，库奇马告诉他，什么也不会发生，这只是一场“虚惊”。随后他又补了一句：“国务卿先生，倘若白宫像我的总统府和政府机构一样被人包围，您会怎么做？”据库奇马说，鲍威尔避而不答他的问题。

库奇马变得越来越绝望。他现在打算丢弃自己的人选和尤先科，对新的候选人重新举行一次选举。他说：“如果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统，乌克兰在国际上会遭到唾弃。街头上的压力会继续下去，外加西方的外交封锁，尤其是美国。”

然而没有莫斯科的许可，库奇马什么也做不成。12月2日星期四，库奇马飞往莫斯科，与普京在瓦努科沃机场举行磋商。普京似乎赞同他的想法。他告诉库奇马：“（在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之间）再选一轮也许同样毫无结果。然后是第三轮，第四轮，第二十五轮，直到一方如愿以偿。”

普京谈了自己的担心，乌克兰有可能会一分为二：西乌克兰和与俄罗斯接壤的东乌克兰。前者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当地人一面倒地支持尤先科；后者高度工业化，当地人基本支持亚努科维奇。普京告诉库奇马：“我必须

坦率地告诉您，我们对乌克兰走向分裂的趋势极为担忧，对目前的局势没有漠不关心。据人口统计，乌克兰人口的17%是俄罗斯人，即俄罗斯少数族裔。事实上我觉得俄罗斯少数族裔的人数远比这一数字要多。这是一个说俄语的国家，无论是东边还是西边。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乌克兰的每两个家庭中，就有一个与俄罗斯有亲戚或个人关系，甚至不止一个，所以我们才对局势的发展如此担忧。”

显然，普京把乌克兰几乎看作（日后他透露给小布什）俄罗斯的一个行省，至少绝对视为他日后所称的“特权利益范围”。他的顾问马尔科夫说，普京出任总统后不久，他为普京起草了背景介绍文件，其中称“乌克兰的公众舆论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不设边界，所有公民均得以享受同等权利，使用同一货币，适用同一教育和新闻政策。但同时乌克兰保留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国旗和国歌、自己的总统和公民权等等”。

这就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所相信的。美国政府同样坚信，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与西方结盟，大多数乌克兰人渴望加入北约和欧盟。

实际情况是，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都低估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乌克兰是一个各方势力互相牵制的微妙平衡体。讲俄语的人和讲乌克兰语的人之间有语言隔阂；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有宗教隔阂；有人怀念旧时光（更安全、冲突少、腐败少、几乎没有族裔争端），有人希望向前走（开放、民主、企业自由）；既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又有俄罗斯少数族裔，地理分布上大致可以按“东—西”两部分划分。舆论并没有显示出全国各地的乌克兰人绝大部分都希望加入北约，尽管加入欧盟更受欢迎。普京说的家庭纽带的确存在，但与此同时，现在的乌克兰已不是当年苏联“大家庭”内一个组成部分的那个乌克兰。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一种新的认同感正在与日俱增。乌克兰语的使用范围远比苏联时期广泛。当年我曾问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使用什么语言，令他尴尬不已。如今这个国家有了一种新的自豪感，而且认识到至少就经济而言，把自己的未来同西方连在一起，比同俄罗斯改革了一半的腐败经济连在一起要好多了。

2004年大选就是在这种思潮背景下依据12月26日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重选的。新的选举严格规定了竞选程序，以减少舞弊现象。尤先科在选举中胜出，赢得了52%的选票。亚努科维奇赢得44%的选票。国际观察员宣布，选举是公平的。

普京为了阻止他心目中因西方阴谋“失去”乌克兰用尽了一切办法，选举结果却让他颜面尽失。

橙色革命像是一扇大门，在设法理解对方的俄罗斯和西方中间砰然关闭。

很难想象出对任何一个事件能做出观点如此对立的解释。西方把橙色革命视为民主的胜利。

在俄罗斯，橙色革命基本上被看作美国情报部门做的手脚。帕夫洛夫斯基把橙色示威者形容为“红色近卫军”，受到美国顾问的训练和资助。“然而这不是什么精密科学。有相当一批当地专家自从1990～1991年车臣计划以来一直在从事‘灭掉俄罗斯’计划。”[10]

马尔科夫说，这是一场政变，目的是让乌克兰远离俄罗斯。尤先科获胜是因为他弄虚作假。“橙色军从来不曾靠自由选举掌权。他们掌权靠的是一次反宪法的政变，这次政变自然得到了美国政府和西方观察员的支持。无论有多少美国参议员说这样做是合法的，实则它是反宪法的。”

革命期间，帕夫洛夫斯基这个克里姆林宫的操盘手不得不化装才得以离开。“我离开基辅的经过很可笑。我当时住在市中心的一个酒店里，位于封锁了总统府的橙色人群中央。我不得不像克伦斯基（被1917年革命推翻的俄国总理）一样乔装打扮。据苏联课本讲，当年克伦斯基装扮成一个女护士逃走了。我围了一条橙色围巾，戴了顶橙色帽子走出人群。”

震荡

没有几个人能说他们熟悉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尽管过去十几年里他是克里姆林宫内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他隐藏在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这一头衔后面，其实是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设计师，依照普京的指示设计出新的体制和理论，为普京新的需要提供支持。他提出的“主权民主”概念实质上意味着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行决定它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果今天这意味着各政党需要7%而不是5%的选票才能进入议会，苏尔科夫会出面解释为什么。倘若几年后决定还是5%更合理，苏尔科夫又会为此提供佐证。如果不应再选举产生州长，苏尔科夫会解释为什么任命州长同样是民主。

苏尔科夫出生于1964年。他曾长期隐瞒自己的父亲是车臣人（他的原名是杜达耶夫）。苏尔科夫在金属研究院读的大学，在军事情报部门服了几年兵役后改学艺术，成了一个剧院的编导。此后，他又转攻经济学，投身商业。他谱写摇滚乐谱，现在仍然写小说。这个后苏联时期多才多艺的人曾当过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公关主任，之后去俄罗斯中央电视台干了短暂的一段时间，随后以苏联人当年所称的“意识形态秘书”身份加入普京办公厅。

橙色革命之后，拟定战略以防止这场革命波及俄罗斯（统治阶层一致认为在所难免）的任务落到了苏尔科夫的肩上。他在拟定战略时参考了曾在乌

克兰亲历了当时混乱局面之人的意见。

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靠橙色装扮安全脱身后，在报纸上撰文写道："基辅对俄罗斯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为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技术做好准备。政治体制内在的弱化加上外部的压力和挑衅有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革命，而在俄罗斯发生一场全球革命绝非小事。1991年我们避免了流血，简直可以说是奇迹。1996年和1999年除了车臣外，我们在俄罗斯各地也避免了流血，但这并不意味着还会有一次奇迹。"[11]

2008年2月回顾往事时，帕夫洛夫斯基对英国广播公司说："这场灾难对我们非常有用。我们汲取了很多宝贵的教训，普京开始认真对待他面临的威胁。我们很快清楚地看出，他们试图向我们输出橙色革命。我们需要迅速做好准备，加强我国的政治体制，使之能应对来自外部的打击——'戴着丝绒手套'的一击，然而这一击足以打倒我们。2005年，普京迅速巩固了精英阶层和政治体制，从而确保了橙色革命不会在俄罗斯重演。一年之内，我们打退了颜色革命的浪潮。"

苏尔科夫和他的同志们锁定了两个潜伏的危险："盲目"而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和外国资助的民间组织。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完全忠于普京和现政权的群众性青年组织，起名为"纳什"，意思是"我们自己人"。"纳什"一词含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沙文主义色彩，隐喻所有不属于"纳什"的人都"反对我们"，甚至是叛徒。

谢尔盖·马尔科夫称自己是创建这一组织的苏尔科夫班子里的一员。"纳什"带有浓厚的苏联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共青团"的味道。马尔科夫在一次采访中说："'纳什'的主要目标是避免俄罗斯发生橙色革命，所以首批加入的成员都是超级爱国者。对他们的要求，第一条就是居住的位置。他们必须住在开车10小时内可以到莫斯科的地区，从而可以乘夜车第二天一早抵达莫斯科并占据红场，捍卫国家主权。"

"纳什"很快有了自己的网站（www.nashi.su，用的仍然是继续有效的代表苏联的两个字母"su"，而不是代表俄罗斯的"ru"）。此后几年里，"纳什"在莫斯科以北的谢利格尔湖畔开办爱国夏令营，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政治教育和准军事训练。夏令营成员经常身穿红色T恤衫走上街头，不光是举行自己的示威，而且还淹没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对他们不喜欢的组织或个人（包括西方国家的大使）举行抗议活动，抨击政府的报社，甚至连一家不幸叫"反苏"的烤肉店也不能幸免。"纳什"形容自己是一个"民主的反法西斯青年运动"，其成员很快超过10万人。

2005年5月15日，苏尔科夫班子成员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天"纳什"组织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聚集了大约6万名"纳什"成员，

其中大多数人搭乘上千辆客车连夜赶到莫斯科，列宁大道为此陷入瘫痪。据马尔科夫讲，“此后，再也听不到有人谈论橙色革命了”。

“纳什”的使命是完成了，然而其作用远没有结束。“纳什”成了自封的表达公众愤慨的喉舌，一支自称独立，而实际上得到国家绝对保护的强大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员的行为多么无法无天和蛮横霸道。他们搞的活动与预防俄罗斯发生橙色革命毫不相干。英国大使托尼·布伦顿2006年7月参加了一次由一个反对党联盟“另一个俄罗斯”召开的会议，结果被“纳什”盯上了。托尼·布伦顿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惯有的自嘲方式回忆了这件事：“我前去参加‘另一个俄罗斯’的会议，以表达我们对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支持。为此我讲了一通枯燥乏味的话。我不是出席这场会议的唯一一位大使，但不知何因俄罗斯人独独盯上了我。这个‘纳什’组织是执政党的青年团体，因此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工具。它要求托尼·布伦顿为干涉俄罗斯政治道歉。我当然不可能道歉，于是他们说，那我们就让布伦顿不得安宁，直到他道歉为止。我的工作包括忍受这样的骚扰，我也就认了。”[12]

“纳什”对布伦顿及其家人的骚扰几乎构成犯罪。“纳什”的成员在他家外面安营扎寨；无论他到莫斯科什么地方都尾随跟踪；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时他们在后排高声叫骂；他夫人开车出门购物时，“纳什”的人用拳头捶她的车顶。布伦顿对显然违反了关于外交官地位的《维也纳公约》（且不说反骚扰法）的恫吓行径提出抗议，然而直到半年后俄罗斯外交部才采取行动迫使“纳什”有所收敛。

“纳什”对爱沙尼亚大使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以表示“俄罗斯人民”对爱沙尼亚将一个苏联解放爱沙尼亚纪念碑从首都塔林的市中心移走这一决定的“愤慨”。

每次接到申诉时，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总是耸耸肩，称自己对此完全不知情，几乎把它作为无害的笑料一笑置之。然而这些活动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清楚无误。“纳什”网址上常常可以看到苏尔科夫、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撰写的文章。这几个人还参加“纳什”的会议和夏令营活动。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也有自己的正式青年组织“青年近卫军”（又一个苏联时期的名词）。该组织比“纳什”纪律更严明。

苏尔科夫为抵御橙色“传染”发动的第二轮行动针对民间组织，尤其是得到国外资助或支持的民间组织。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革命（以及2005年2月在前苏联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三次基层反叛）的因素，而且据称是美国策划让普京政权垮台的手段。

自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允许登记首批“非正式”组织后，公民社会在俄罗斯蓬勃发展。目前民间组织达数十万个，其中涉及人权和民主问题的民

间组织大约有2000个，诸如卡内基中心提供对俄罗斯政治的独立专家分析，赫尔辛基小组监测侵犯人权的现象。其中有些组织得到西方政府或海外民间组织的赠款或补贴。

乌克兰革命后不到一年，国家杜马立法限制这些民间组织。该法将为外国资助的民间组织在俄罗斯开展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为此西方反对声四起。布什总统通过游说得以软化其中部分条款。尽管如此，2006年1月10日，普京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的最后文本，要求俄罗斯的所有民间组织披露其财务及筹资来源，确保它们的活动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否则将被取缔。外国团体更难资助或支持它们在俄罗斯的伙伴组织。（截至10月底，“人权观察”组织、“大赦国际”组织、丹麦人权理事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两个分支因为不符合登记要求被迫暂时中止活动。）[13]

普京签署该法律两周后，一位78岁的人权活动家、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领导人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正在莫斯科自己的家里，一位朋友打电话让她马上打开电视机。她告诉我：“我马上打开电视机，看到一些奇怪的画面。节目主播拿腔拿调地说，几位英国外交官在某个广场的一块岩石里安放了一台高科技的无线电发射器。”[14]国家电视台独家得到了拍摄的英国间谍现场秘密活动的录像带。画面显示这几名英国外交官，其中一人是“二等秘书”（军情六局的委婉说法）马克·道，从安放在一个公园里的一块假石头里提取资料，电视画面显示那块假石头其实是一个无线电发射器。打开石头后，内藏一个詹姆斯·邦德电影里用的那种小玩意儿。

这则报道荒诞离奇，然而并非捏造。托尼·布莱尔的办公室主任乔纳森·鲍威尔承认：“间谍石头令人尴尬。他们把我们逮了个正着，所有人通过电视屏幕都看到了那块石头。显然他们早已掌握了情况，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一直没有动它。”[15]

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越往下看，越觉得这一报道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突然话题转到了英国使馆这名叫马克·道的外交官身上。他们说，他‘操纵了’我们这些人权组织，随后出示了写着‘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一张纸。马克·道签字的那页文件似乎是授权将2.3万英镑转交给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

俄罗斯人没有驱逐他们当场抓获的任何一名英国间谍。这则消息另有目的，即显示诸如“赫尔辛基小组”这样的民间组织不仅拿西方的钱，而且还拿英国情报机构的钱。阿列克谢耶娃说，她从未见过马克·道，赫尔辛基小组也只收到过英国外交部下属的“全球机会基金”给的一笔赠款，而且是通过英国大使馆给的。英国外交部说，提供给俄罗斯民间组织的钱都公开登载在它的网站上。然而英国外交部经一名间谍之手提供部分经费正中俄罗斯人的下怀。

“间谍石头”案发两天后，普京总统把谍报与民间组织的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通过有争议的《民间组织法》的理由。“我们看到，有人试图利用情报机构同民间组织串联。这些组织从情报机构那里拿到经费。没人能说拿这种钱不可耻。我想，很多人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俄罗斯通过了一部管理这个国家民间组织活动的法律，该法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干涉俄罗斯联邦的内政。”

强人的胜利

2005年4月，普京在每年一次的总统致辞中说了一句话，后来常被人引用来证明他对昔日社会主义的怀念。普京说：“苏联的解体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实际上他在这里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惋惜一个庞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消逝。在同一篇讲话中他继续说，苏联的解体导致俄罗斯失去了“数千万同胞”。如他所说，这是俄罗斯民族经历的“一场真正的大变局”。这一看法很难反驳。

普京使用的措辞极为不当，因为从他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他做的很多事的确让人觉得他极力想恢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昔日的一切。别斯兰事件发生后，普京取消了选举制度中诸多最民主的因素，强化了他个人的权力。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革命后，他压制人权组织，成立了一个沙文主义性质的青年组织。与此同时，他继续扼杀媒体自由。

普京班子里真正的自由派人士如今已经没有理由再留下来了。早在2004年2月，普京已经失去了他的总理卡西亚诺夫——他与普京多次发生分歧后被解职。令他终于忍无可忍的一件事是，普京决定任命他的朋友伊戈尔·谢钦担任国有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谢钦和普京的其他几个密友一样，除了在政府任职外，还执掌庞大国有企业（其他人包括前克格勃维克多·伊万诺夫，主管意识形态的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和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梅德韦杰夫）。卡西亚诺夫认为这证明了“普京正在偏离自由主义的道路，改为走向一条指令性经济的道路”。[16]卡西亚诺夫离开政府后，成为一位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鉴于他曾和普京一起共事过3年并认为普京当初锐意改革，他也是一位可信的反对派领导人。

下一个挂冠而去的人是普京的经济学顾问伊拉里昂诺夫，一个认为车臣战争既徒劳无益又残酷无情的人。然而普京依然将其延揽为自己的顾问。与普京共事5年后，2005年12月，伊拉里昂诺夫对俄罗斯的现状做了极其尖锐的评论，然后拂袖而去。他说，俄罗斯不再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而是由追求自身利益的国有企业掌管的国家。不久前他还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今天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无法继续干下去。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一年后，尚未因任何罪名被判刑时，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动手攫取他的资产。他拥有的尤科斯石油公司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卖给了国家。俄罗斯政府声称尤科斯欠政府270亿美元，于2004年12月19日拍卖尤科斯公司下属的最大子公司尤甘斯克油气公司，以收回尤科斯拖欠的税款。国有天然气垄断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通过旗下新成立的一个石油子公司——俄气石油公司——登记参与拍卖。参加拍卖的还有一家12月6日才刚刚成立的叫贝加尔金融集团的公司。该公司登记的办公地址在莫斯科以北的特维尔市，同时使用同一地址的还有一家伏特加酒店、一家移动电话商店和一家旅行社。无人知晓谁拥有俄气石油公司。尽管如此，它依然从国有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得到了一大笔用于参加拍卖的贷款。拍卖当天，俄气石油公司放弃竞标，结果默默无闻的贝加尔金融集团以93亿美元购得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

两天后，普京访问德国期间，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说，贝加尔金融集团的股东是“从事能源行业多年的人”，“据我所知，他们计划与俄罗斯其他感兴趣的能源公司建立某种协作关系”。普京当然不知道会是哪些公司，然而“国有公司与市场上的其他公司享有同样权利”。

12月23日，普京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再也记不得“贝加尔金融集团”这个名字。就在当天，贝加尔金融集团被囫囵卖掉，而买主不是别人，正是伊戈尔·谢钦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人们认为，是谢钦成立了这家神秘而又短命的贝加尔金融集团。普京说：“今天，国家正在运用完全合法的市场机制确保自己的利益。我认为这再正常不过了。”

与此同时，当初把尤科斯发展成为一个石油巨头的人正在继续接受审判。2005年5月，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因犯有欺诈罪被判处9年徒刑。

能源武器

西方各国政府，包括西方的投资者，心有余悸地注视着以上事件的发展。然而大祸还在后面，橙色革命的余波远没有平息。

2005年1月24日，乌克兰的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就职后第二天马上前往莫斯科。普京总统对此似乎很欣赏。听到尤先科称俄罗斯是一个“永久的战略伙伴”时，普京略显惊讶，指出：“您刚才提到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愉快的迹象。”

尽管如此，这次会见仍然看不到微笑。尤先科觉得自己受到误解。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最令我不安的是，我们采取的一切措施，尤其是涉及我们的民主改革、恢复我国的历史或是乌克兰融入文明世界，俄罗斯一概视为

反俄罗斯措施。”[17]

这是一次敷衍了事的访问，一共只有半天时间。随后尤先科直接去了斯特拉斯堡出席欧洲理事会的会议，之后又前往布鲁塞尔对欧洲议会发表了演讲。4月份尤先科访问华盛顿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他对美国国会讲的一席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今天，乌克兰满怀希望和憧憬展望未来。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而产生的新一代政治家走上了国家的领导岗位，他们摆脱了昔日苏联陈旧思维的羁绊。”

随后，尤先科被带往白宫会见布什。总统的乌克兰问题首席顾问戴蒙·威尔逊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尤先科似乎说话抓不住重点。“他首先讲述了他作为乌克兰总统面临的各项挑战，尤其是与俄罗斯的关系。随后，他一一列举了他认为需要与俄罗斯一起商讨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我记得好像一共有12点。就在他刚开始啰里啰唆地阐述这些挑战时，布什总统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需要为这12项挑战操心。你只需要关注一项挑战——与俄罗斯的关系。莫斯科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主权独立的和民主的乌克兰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才是你们面对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挑战。”[18]

威尔逊说，尤先科首次访美后，美国人极为担忧。“我们非常关切他是否意识到他肩负的重任，是否知道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你知道，虽然当时我们对尤先科仍然十分热情，乐于给予他支持，政策上也致力于探寻如何帮助他达到目标，但他访问华盛顿后我们的确第一次感到了不安。我们对困难可能估计不足，我们担心尤先科是否能兑现橙色革命期间所做的许诺。”

岁末时，美国人的不安有增无减。尤先科为了摆脱进口俄罗斯天然气问题的一场危机，出人意料地做了一笔美国人认为有腐败嫌疑的交易。

普京的“天然气战”是2005年3月开始的。当时俄罗斯人显然决定惩罚乌克兰人搞橙色革命，为此宣布从次年1月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出口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从每千立方米50美元涨至大约225美元。由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同时为欧盟提供25%的天然气，主要是通过乌克兰的管道输送给欧盟，基辅为此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征收过境费（有些国家百分之百地依赖俄罗斯通过乌克兰输送的天然气），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以远低于世界水平的价格向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提供天然气。既然现在乌克兰不把俄罗斯放在眼里，宣布要与西方结盟，莫斯科认为没有理由再继续贴补它。

10月，尤先科的办公厅主任雷巴丘克被召到莫斯科听取严厉警告：接受价格上涨，否则将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雷巴丘克回忆说：“普京警告我们，这不是威胁，不是在虚言恫吓。如果1月底以前达不成交易，他

们将中断供应天然气。”[19]

截止期前两天，普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俄罗斯提供一笔价值36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帮助乌克兰支付新的价格。尤先科拒绝了。新年除夕，普京在最后一分钟又提出了一项建议：冻结价格3个月，如果基辅同意3个月后接受新的价格。尤先科说，他不会接受超过80美元的价格。新年一大早，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工程师关闭了通向乌克兰的管道。天然气供应被切断了。

输往欧洲的天然气也中断了。匈牙利和波兰很快发现输给它们的天然气被切断了。本来出口管道是不应该受到影响的，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声称，乌克兰人偷窃过境管道的天然气以弥补自己短缺的部分。欧洲各国政府愤怒不已。莫斯科称自己别无选择，这是一场商业纠纷。然而西方将其视为高压手段，目的是报复基辅的独立自主。

欧洲委员会将圣诞节期间正在度假的部长们召回，参加1月4日召开的紧急会议。然而还没等到开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突然宣布，他们达成了交易。表面上看，这一协议是一次不错的妥协。乌克兰同意以市场价格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同时向它出售来自土库曼斯坦的更为廉价的天然气，从而将总价格降至每千立方米95美元。为了给这服药加上糖衣，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还同意把支付给乌克兰的欧洲天然气过境费上调47%。

令西方再度担忧的原因是，现在所有的天然气不是通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销售，而是通过一个在瑞士注册的“俄乌能源贸易公司”出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拥有该公司的一半股权，另一半股份分别属于两个背景不明的乌克兰商人。成立于2004年的这家公司由普京和前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共管。西方观察家不理解为什么尤先科现在同它搅在一起。

美国大使约翰·赫布斯特回忆道：“乌克兰人来我这里解释了这笔交易，我听后大吃一惊。我的德国同事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同事一样惊愕万分。因为我们原以为，乌克兰人的谈判立场合情合理，而且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然而用婉转的外交辞令说，最终结果并不理想。”[20]

戴蒙·威尔逊讲述了华盛顿的焦虑：“这个总统与成立了俄乌能源贸易公司的俄罗斯做了一笔交易。该公司做的很多交易来路不清。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一安排成了支付回扣的手段，进一步助长了乌克兰最糟糕的商业行为。这是橙色政府核心内部的腐败。”

尤先科的办公厅主任雷巴丘克承认，这笔交易不无争议，但他们别无选择。“尤先科的立场是：普京是总统。不错，我晓得天然气是肮脏的行

业，然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与俄罗斯打交道。”

如今华盛顿和欧洲发现自己理想中的乌克兰正在一点点消逝。他们大力支持的乌克兰民主派结果一点儿都不可靠。威尔逊把这件事形容为幻想破灭的一刻。美国人认识到，在新乌克兰，旧的习惯势力依然很强大。莫斯科方面，普京显示出他愿意使用一个从未使用过的武器——能源供应。1月初切断天然气的那几天给全欧洲带来的巨大恐慌，引发了人们对欧盟能源政策的根本反思。从现在起，普京已不再是西方乐于与之打交道的人了。

---

[1] Interview with Leonid Kuchma,22 March 2011.

[2] Interview with John E.Herbst,16 May 2011.

[3] Interview with Gleb Pavlovsky,18 February 2011.

[4] Interview with Sergei Markov,30 June 2011.

[5] Interview with Oleh Rybachuk,28 November 2010.

[6] Interview with Viktor Yushchenko,29 November 2010.

[7] Interview with Alexander Kw niewski,24 November 2010.

[8] Interview with Leonid Kuchma,22 March 2011.

[9] Interview with Alexander Kw niewski,24 November 2010.

[10] Gleb Pavlovsky,*Nezavisimaya gazeta*,7 December 2004.

[11] *Nezavisimaya gazeta*,7 December 2004.

[12] Interview with Tony Brenton,5 April 2011.

[13] *ICNL*(*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t-for-Profit Law*),volume9,issue1,December2006.

[14] Interview with Lyudmila Alexeyeva,23 February 2011.

[15] Interview with Jonathan Powell,9 March 2011.

[16] Interview with Mikhail Kasyanov,16 February 2011.

[17] Interview with Viktor Yushchenko,29 November 2010.

[18] Interview with Damon Wilson,2 March 2011.

[19] Interview with Oleh Rybachuk,28 November 2010.

[20] Interview with John E.Herbst,16 May 2011.

第八章　新的冷战

龃龉日增

至此，一连串的幻灭开始侵蚀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连布什和普京这对“朋友”也开始指责彼此背信弃义。2005年2月（橙色革命刚刚过后），在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峰会充满着火药味。会上，普京从西装外套的内衣兜里掏出一叠3英寸×5英寸的卡片（美国人称其为普京的“牢骚卡”），开始教训布什，说他听够了美国人对他的教训。他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大致意思是：我们尽量配合你们，支持你们的反恐战争；我们关闭了自己的基地；你们撕毁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我们也没有怎么样；就连伊拉克战争我们都没有因之影响和你们的关系。可是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你们没有废除《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14]；我们要加入世贸组织，你们却把标准节节提高；你们没有批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项军控条约；你们想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使我们处于劣势；你们还企图把我们所有的邻国都拉进北约。对我们改革经济、努力和国际体系接轨的政策你们没有只言片语的肯定，反而不停地批评我们的内部事务——人权、所谓的民主“倒退”、车臣、我们的新闻媒体，还有霍多尔科夫斯基。你们还有完没完？

据布什的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回忆，这“可能是这两位领导人火气最大的一次会面”。[1]普京攻击布什说美国没有新闻自由，证据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新闻主播丹·拉瑟遭到解雇，据说是布什搞的鬼，因为丹·拉瑟批评了他。[2]布什试图解释说事实并非如此，但普京听也不听。他对美国的民主也进行了抨击，声称美国的总统不是美国人民，而是选举人团选出来的。布什回答说：“弗拉基米尔，千万别在公开场合这么说，不然大家都会知道你完全不了解我们的制度。”

3个月后，出现了一次和解的机会。普京邀请一些世界领导人于5月9日来莫斯科庆祝同盟国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的总统站在红场的观礼台上参观苏联式的军力展示。普京对布什前来感到高兴（10年前克林顿总统为抗议第一次车臣战争而拒绝参加类似的阅兵式），但对他此前和此后的行为却大为不满。

布什前往莫斯科的途中访问了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在那里他表示完全支持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的解释，即前来解放它的苏联红军赖着不走，变成了占领军。它赶走了纳粹统治，又来了另一个极权政权。布什说，苏联对欧洲国家的压迫是“历史上最大的罪恶之一”。波罗

的海国家把苏联的“解放”视为占领，对此俄罗斯政府怎么也不能接受，它宣称这是对那些把这些国家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苏联战士的侮辱。

布什“论史”已经让莫斯科不爽，布什“谈今”更是火上浇油。他离开莫斯科后直接飞往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那里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布什投桃报李，夸格鲁吉亚为“这个地区以至全世界的自由灯塔”，显然是敦促其他前苏联国家效而仿之。他赞扬格鲁吉亚向阿富汗和伊拉克派遣部队，宣布说：“你们的勇气激励着民主改革者们，你们的号角传遍了全球——自由将成为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未来。”这些话使得克里姆林宫愤怒不已，就在当时，俄罗斯正在加紧向格鲁吉亚施压，以“卫生问题”为由禁止进口格鲁吉亚世界闻名的葡萄酒和矿泉水。

整个2005年间，普京限制民主、建立青年组织纳什、镇压非政府组织、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对这一切西方无可奈何，只能严词批评。俄罗斯也不甘示弱，以牙还牙。2006年5月初，美国副总统切尼出访另一个前苏联波罗的海共和国立陶宛，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再次猛烈抨击俄罗斯——而且摆明了不是副总统信口开河，而是美国政府深思熟虑的观点。当时任职于白宫联邦安全会议的戴蒙·威尔逊解释说：“我们知道这是又一个重要的机会来重申总统关于自由事业的主张。莫斯科经常对切尼副总统的话不予重视，说，‘这个切尼副总统，我们都知道他是激进派，是美国政府里的新保守派，归根结底和我们打交道的是布什总统。’所以我们和副总统办公室以及他的撰稿人密切合作，确保副总统的讲话完全符合政府口径。我们写的演讲稿在部门间会议上经过了反复讨论和审查，讲话发出的关键信号就是支持民主阵线，对俄罗斯国内发生的事情批评得相当犀利。”[3]

切尼对自由和民主广为传播大加赞颂后，话锋一转开始批评普京政权：

在公民社会的许多领域，从宗教和新闻媒体到活动团体和政党，政府都对人民的权利进行了不公平和不恰当的限制。俄罗斯政府其他的一些行动产生的效果事与愿违，并有可能影响与别国的关系。使用石油和天然气作为威胁或讹诈的工具，无论是操纵供应还是企图垄断运输，都不能达到任何合法的目的。破坏邻国的领土完整或干涉民主运动的行为没有任何道理。

他呼吁俄罗斯恢复民主改革，成为信奉西方价值观念的“可信赖的朋友”：“我们要满怀信心地声明，俄罗斯周围的邻国成为稳固的民主国家对俄罗斯有百利而无一害。俄罗斯若是和西方站在一起，就会和我们共同走向繁荣和伟大的康庄大道。”接下来，切尼飞往哈萨克斯坦，在那里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双重标准，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独裁统治赞不绝口，“向过去15年来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表示钦佩”。

普京对这种事可不会放过。6天后，他在对议会的一篇演讲中说了一番高

深莫测的话，让美国人煞费思量。不过他针对的目标十分清楚。讲话中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军队的重要性，狠狠地说："我们看见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看见了！就像人们说的，'狼同志知道要吃谁'。他吃个不停，谁的话也不听。显然他根本不打算听。"

在纽约华尔道夫大酒店的会谈中，一贯温文尔雅、不露锋芒的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发火了。会谈的话题是伊朗。美国怀疑伊朗试图利用俄罗斯提供的民用核技术来发展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一年前，俄罗斯同意和欧盟国家的三驾马车（英国、法国和德国）再加上美国和中国一起制定一个共同的对策。俄罗斯曾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建议，由它为伊朗尚未竣工的布什尔核电站加工浓缩铀，用过后再运回俄罗斯。但在2006年4月，俄罗斯宣布向伊朗出售先进的防空系统，使美国人大为恼怒。

这次在华尔道夫大酒店，伊朗问题小组的6位外交部长在探讨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但切尼在维尔纽斯做了演讲后，美俄双方撕破了脸。晚宴上与康多莉扎·赖斯和她负责政治事务的副手尼古拉斯·伯恩斯对面而坐的拉夫罗夫越来越激动。伯恩斯回忆说："通常在外交场合大家彼此都以礼相待，对事不对人。但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拉夫罗夫脸涨得通红，怒不可遏。他拍着桌子斥责我，因为我在公开讲话中批评了俄罗斯对伊朗的军售。"拉夫罗夫还提到切尼的讲话，要美国人少对别人指手画脚。伯恩斯原想反唇相讥，赖斯抓住他的胳膊才把他按下。[4]

就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酝酿已久的冲突爆发了。2006年9月，南奥塞梯的武装部队向载有格鲁吉亚国防部长奥克鲁阿什维利的军用直升机开火，迫使直升机紧急着陆。此前奥克鲁阿什维利曾发誓要在南奥塞梯的首府茨欣瓦利庆祝下一个新年——换言之，要在2006年底把该地区重新纳入格鲁吉亚。装备俄罗斯武器的南奥塞梯士兵和美式装备的格鲁吉亚军队发生了小规模交火。月底，格鲁吉亚以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了4名俄罗斯军官。国际调解人介入几天后他们获得释放，但此前他们戴着手铐被格鲁吉亚女警押解的图像已经在电视上广为传播。

萨卡什维利宣布说："格鲁吉亚正告我们的强邻俄罗斯，适可而止。"

俄罗斯视此为有意羞辱，用最严厉的制裁还以颜色：召回了大使，切断了铁路、海上、公路、空中和邮政的一切联系。居住在莫斯科的格鲁吉亚人开始日子不好过：几百个拿不出合法文件的人被集中起来送上飞往第比利斯的飞机；学校奉命提供名字听起来像格鲁吉亚人的学生名单，以便当局调查他们是否为非法移民。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谋杀案

西方政府就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所作所为正批评得起劲，一起远更惊人的事件发生了。2006年10月7日，普京54岁生日那天，因不惧危险，深入车臣进行报道和对克里姆林宫发表批评而闻名世界的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莫斯科她居住的公寓楼的电梯里遭到枪杀。谋杀案震惊了全世界——除了弗拉基米尔·普京。他先是没有任何反应，4天后在出访德国期间，当他终于对一位记者的问题做出回应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她并不重要。

他说，这是“一桩令人发指的残酷罪行”，杀人犯不应逍遥法外。然而他又说：“她对俄罗斯政治生活的影响很小。在媒体圈子里、人权圈子里和西方，她很出名，但她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对她的谋杀，对一位女性、一位母亲的野蛮杀害，本身就是针对我们的国家，针对俄罗斯的行为。这起谋杀对俄罗斯政府，对她前一阵工作的地方车臣的打击比她发表的任何作品都大。”按照普京这一奇谈怪论，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之死其实是为了打击他，而且效果要比她那些不值一提的作品大得多。他哀悼的是“一位女性和母亲”的死，而不是记者的死。

一次我问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许多著作普京有没有读过。“没有”，他边答边摇头，似是要强调她的著作不值得读。但很难相信普京不知道她做过的事情。她供职的《新报》是最出名的反对派报纸，创办人之一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她撰写文章，对俄罗斯国内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特别是对车臣战争进行了辛辣的批评。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剧院（杜布罗夫卡剧院）危机中她参与了同劫持人质者的谈判。别斯兰学校人质事件发生后，若不是她在从莫斯科飞往那里的飞机上被下毒（又一桩无头案），她可能也会参加谈判。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对她惨遭杀害纷纷表示谴责并要求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国务院称她为“一个勇敢的人，尽管接到过死亡威胁，但仍坚定地追求正义”。

然而克里姆林宫却无动于衷。

车臣的领导人自然成了怀疑对象，特别是车臣总理拉姆赞·卡德罗夫。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曾激烈地批评他践踏人权。有人怀疑是卡德罗夫的追随者报复杀人，也有人说是卡德罗夫的敌人杀了她来栽赃于他。

2003年，拉姆赞·卡德罗夫的父亲艾哈迈德·卡德罗夫通过人为操纵的选举被普京扶植为亲俄的总统。老卡德罗夫遭到暗杀后，小卡德罗夫成为车臣的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统。他们父子二人原来都属于叛军——老卡德罗夫是车臣分裂运动领导人杜达耶夫手下的穆夫提，即宗教领袖，甚至曾号召过对俄罗斯发动圣战。1995年，我曾在车臣叛军控制区的一座房子里和他喝过一次茶。我还记得他天真地问我英国人民是否在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卡德罗夫父子后来改变了反俄立场，转而支持1999年普京对叛军发动的战

争。拉姆赞的私人武装卡德罗夫派名声不佳——据说他们滥施酷刑、绑架、谋杀，无所不为。俄罗斯根据实现车臣和平的新战略，先是扶植艾哈迈德，然后又推拉姆赞上台，让他们做“吉斯林式的”领导人，即忠于莫斯科的车臣人。

车臣恐怖分子袭击别斯兰学校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办公厅副主任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对俄罗斯的车臣战略做了如下介绍：“解决的办法复杂而艰难，不过我们已经开始实施了，包括在北高加索积极推动社会融合，逐步建立民主机构，为公民社会打下基础，建立有效的法治制度，建立工业能力和社会基础设施，解决大规模失业、腐败以及文化教育崩溃的问题。”事实上，克里姆林宫的政策等于是把车臣共和国完全交给忠于俄罗斯的拉姆赞·卡德罗夫。只要车臣留在俄罗斯联邦之内，就会放任卡德罗夫拥权自肥，为所欲为。卡德罗夫宣称他“热爱”普京，说普京是他的“偶像”。他把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主要街道重新命名为普京大道。

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尽管剩下的伊斯兰叛军继续其恐怖暴行，但他们的活动主要在车臣以外。而在共和国之内，卡德罗夫恢复了一定的秩序。格罗兹尼经历了两场战争后原已被夷为平地，现在靠着从俄罗斯源源而至的石油美元又大体重新建设了起来。这里有着欧洲最大的清真寺。正常的商店和咖啡馆又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这个被炸成一片瓦砾的城市做战地报道的时候，还以为再也没有这一天了。但是，莫斯科的战略对普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肌肉发达、满腮胡须的卡德罗夫桀骜不驯、冷酷无情。2008年我参观了他位于岑托罗伊村外的行宫，见识到他神话般的财富——宫苑内有一个人工湖和一个豢养着黑豹和斑豹的动物园——也领教了他简单野蛮的思维方式。我问他对策划了近来俄罗斯境内大部分恐怖袭击的叛军领导人沙米尔·巴萨耶夫的死有何看法，他回答说：“我听到他被杀的消息时先是高兴……然后又感到可惜，因为我原想亲手杀死他。”他在他的领地实行伊斯兰律法的规定，夸奖往街上没戴头巾的妇女身上喷射颜料的男子干得好。

2006年8月，几个美国外交人员在达吉斯坦参加过一场喧闹的婚礼，亲眼看到主宾卡德罗夫的牛仔裤后裤袋里插着一把镀金手枪，一边跳舞一边向一起跳舞的孩子们抛撒美元的百元大钞。[5]

像传统的车臣人一样，卡德罗夫对他的敌人睚眦必报，以血还血。他在任期间，许多反对他的人下落不明。做过他保镖的乌马尔·伊斯拉伊洛夫曾揭发说，他亲眼见到卡德罗夫派民兵犯下了酷刑和杀人的行为，结果他于2009年1月在维也纳被枪杀。6个月后，在格罗兹尼“纪念碑人权中心”工作的娜塔莉娅·埃斯特米洛娃遭到绑架和杀害。卡德罗夫说她是个“没有荣誉、尊严和良知”的女人。至于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她于200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描述了自己和拉姆赞·卡德罗夫一次令人惊惧的会面，其间卡

德罗夫吹嘘说他的爱好是打仗和女人。交谈中有这么一段喜剧式的对话：

“您接受的是什么教育？”

“高等教育。法律。我很快就要毕业了，正在考试。”

“什么样的考试？”

“您说什么样的是什么意思？考试就是考试呗。”

“您要毕业的是哪个大学？”

“莫斯科商学院的一个分院，在古德尔梅斯。法学院。”“您具体是做？”

“我是律师。”

“那您是专修刑法，还是民法……？”

“我不记得了。我写过一个东西，但我忘了。事情太多。”

后来，卡德罗夫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荣誉院士的称号。

谈话的第二天早上，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吃惊地又见到了他，他带来的一个身穿黑色T恤衫的民兵对她怒叱：“应该在莫斯科街头把你打死！”卡德罗夫也帮腔说：“你是敌人，应该把你打死。”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说他是“克里姆林宫豢养的一条小龙。他们必须喂饱他，否则他会喷火烧毁一切”。她遇害时正准备发表又一篇关于车臣践踏人权和酷刑的文章。

她被害的那天不仅是普京的生日，而且比卡德罗夫的生日只晚两天。（我知道这个是因为那天晚上我恰好在莫斯科的一家餐馆里坐在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旁边，他拿出手机打电话给拉姆赞·卡德罗夫，谄媚地祝贺他满30岁了。）这起谋杀会不会是谁送给这位车臣强人迟来的“生日礼物”呢？要不就是卡德罗夫送给他的“偶像”普京的礼物？在俄罗斯无法无天的黑社会中，这种猜测并非完全不靠谱。或者说谋杀的目的在于给他们二人中的一个抹黑？抑或是另有动机？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克里姆林宫对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活动深为恼火，特别是她的一些夸张的指控，比如她指称造成130人死亡的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是俄罗斯秘密警察机构一手导演的。

检察官起诉了三个车臣人，但由于缺乏证据，他们于2009年被无罪释放。

后来此案奉命重审，另一个被指控实际开枪的人被逮捕。2011年8月，上次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的前警官德米特里·帕伊留申科夫中校被指控策划了这起谋杀。至于谁是犯罪的主使——法院对这个问题碰也没碰。

别动我们的石油

2006年间，随着普京和他的强人集团着手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资源（其中有些属于外国公司）的控制，对俄罗斯的批评日渐增多。我们先前看到俄罗斯想将尤科斯卖给一家美国石油巨头，结果成了促成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把他的资产收归国有的一个因素。现在，普京把注意力转向叶利钦和西方石油公司签署的所谓《共同生产协议》。根据这样的协议，外国石油公司负责出资进行勘探开发，一旦石油或天然气项目投产，该公司可以拿走初期收入以抵偿它投入的成本；此后的利润则由政府和公司（按商定比例）分享。

普京认为这些协议丧权辱国，只有自己没有技术能力采油的第三世界国家才做这种交易。1994年签署的第一份《共同生产协议》被称为萨哈林2号项目：一个叫萨哈林能源的财团，其中包括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占55%的股份）和两家日本公司，三井集团和三菱集团，在俄罗斯远东的萨哈林岛（库页岛）附近开发巨大的油田和天然气田。协议中预计的开发费用为100亿美元，也就是说，项目投产后，在俄罗斯政府得到任何收入之前，壳牌石油公司及其合伙人先要扣除这笔钱。

然而，壳牌石油公司在2005年宣布说开发费用翻了一番，达到200亿美元。普京在当年11月访问荷兰时对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罗恩·范·德·维尔进行了“狠批”。壳牌公司这么做就意味着俄罗斯要失去100亿美元的收入，这给普京推翻这个12年期的协议提供了借口。他在2006年期间通过阴谋策划和施加压力达到了目的。在政府战略的执行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一位环保积极分子，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监督局副局长奥列格·米特沃利。2006年5月，监督局远东地区代表来到莫斯科找米特沃利，向他出示了一些照片。“令人难以置信，”他回忆说，“从照片上看到大片的森林被连根拔起，山体滑坡，一片大规模的混乱。我问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他们说是萨哈林能源在修造输油管。”[6]修造输油管的工程包括大约1000根管道穿过鱼类产卵的河流，阻断了鱼群逆流而上的水路。

米特沃利全身心地投入了抗争。他把记者带到萨哈林向他们展示当地受到的破坏。资源利用监督局估计只是清理阿尼瓦湾就要耗资500亿美元，因为对阿尼瓦湾的大规模疏浚毁坏了渔场（壳牌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当时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米特沃利是在奉政府之命，挖掘一切丑闻来支持

政府对壳牌公司的指控。报纸称他为克里姆林宫的“鹰犬”。但是，他坚持说他的行动完全出于对环境的关心，他与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环境团体的合作比和克里姆林宫的合作更为紧密。他甚至说他有一次接到了一位“高官”的电话，对他发表的过激言论“破坏投资气候”表示关注。和我交谈过的其他环保人士说他们相信他的话。他们也为森林和海洋生物遭到的破坏而感到震惊沮丧。他们知道米特沃利是真正的环保斗士，他在环保方面还有其他成就，包括帮助劝说普京禁止猎杀海豹。

即便如此，米特沃利如果没有最高层的支持，绝不可能对一个重要的外国投资者进行如此规模的抗争。壳牌公司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2月，萨哈林能源在压力下屈服了，把51%的股权出售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普京成功地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混合项目重新收归国有。在签字仪式上，总统宣布可以认为环境问题“已经解决”。萨哈林危机结束了，但克里姆林宫的蛮横手法给俄罗斯吸引外资的努力造成了长期的破坏。

对普京来说，这只是把俄罗斯的战略能源留在或收归国家控制之下的大战略的一部分。俄罗斯欢迎外国公司参加合资项目，但它再也不会像叶利钦那么草率地把资源拱手让出。俄罗斯起草了新法，限制外国公司参与42个产业，其中包括军工和飞机、渔业、贵重金属和碳氢化合物。

普京对别国的战略资产却没有那么多顾忌。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克里姆林宫的钱袋被石油美元塞得鼓鼓的，于是俄罗斯开始寻求对外投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购买英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森特里卡表示了兴趣，随后又开始谈判，要购买位于奥地利鲍姆加登的欧盟天然气供应的主要分配中心——中欧天然气枢纽50%的股权。欧洲委员会阻止了这一行动。

2006年9月，消息传来，国家控股的俄罗斯外贸银行悄悄地购买了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5%的股份。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航空航天公司，主要生产空中客车飞机，还生产许多防务设备。普京的外交事务顾问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建议购买更多股份——比如25%——这样就可以对公司的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安格拉·默克尔听说后，明确地对法国总统希拉克说绝不能允许此事发生。9月底，希拉克和默克尔在巴黎附近的贡比涅会见了普京，告诉他这笔投资不受欢迎。

普京在10月份访问巴伐利亚时嘲笑西方的紧张：“干吗这么歇斯底里？来的不是苏联红军，是拿着钱来投资的俄罗斯商人。”

冷战式的会面

时值2006年10月21日星期六，普京位于诺沃奥加廖沃的乡间官邸窗外，白桦树枝头最后的黄叶正在飘落。阴雨绵绵，秋寒萧瑟，普京的心情非常糟糕。前一天他出席了在芬兰拉赫蒂举行的有25位欧盟领导人参加的峰会。这本应该是场“非正式”的会议，没有固定的议程，也不需要签署什么协议，就是大家轻松地聚一聚，但他还是听了一连串的抱怨——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杀，俄政府企图把壳牌公司挤出几十亿美元的萨哈林2号项目，俄罗斯不是可靠的能源供应者，还有格鲁吉亚。

欧洲人说他们决意同俄罗斯这个南方邻国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强烈反对克里姆林宫最近对格鲁吉亚实施的制裁。普京详细地解释说，他认为萨卡什维利总统一心要夺回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这两个分裂出去的地区，并警告欧洲人说这将会引起流血。只有他的朋友雅克·希拉克支持他，说和俄罗斯的关系比，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更重要。

普京回到家已经时过半夜。星期六下午，他把11位权力最大的同事——他的联邦安全会议成员召集到官邸，对他们讲了他与欧洲领导人不愉快的会晤，和他们共同商讨对格鲁吉亚可以采取的各种办法。普京还和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有约。赖斯正等在莫斯科的酒店里，但普京很不愿意赴约。“他不想见她，”普京的一位紧密助手说，“但他知道必须见。”

赖斯很纳闷会见怎么拖后这么久。她后来说：“他通常马上就会见我，除非他想表达某种意思。”[7]

工作会议结束后，联邦安全会议的成员们驱车前往附近的政府宾馆——位于巴尔维哈的一处豪华城堡——去吃晚餐。这顿晚餐意义特殊，因为他们中间有三个人，包括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伊戈尔·伊万诺夫和未来的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都是在这几天过生日。

此时普京决定跟赖斯“开个玩笑”。据一位在场者说，普京看了看手表，露出恶作剧的笑容。“干吗忙着收摊？咱们给她小小地表演一下。她要是想见我，告诉她就在这儿见，但别说全体联邦安全会议成员都在。”

赖斯回忆说：“5点、5点半、6点、6点半，我一直在等，最后大约7点半的时候，他们说普京可以见我了。”

汽车载着她和美国驻俄大使比尔·伯恩斯沿着俄罗斯高官常来常往的鲁布廖沃－乌斯片斯科耶公路风驰电掣地开入黑暗寒冷的乡间，路旁星罗棋布着红砖豪宅。他们穿过有着兰博基尼跑车展示厅和名牌服装店的“巴尔维哈精品村”，驶入了政府庄园高高的铁门。

赖斯和伯恩斯从来没在俄罗斯见到过这样的建筑——塔楼处处，楼梯幽

暗，好像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城堡。突然间餐厅的门大开，展现在两个美国人面前的是一幕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场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全体成员，俄罗斯权力的核心，团团围坐在宴会桌旁。据一位目击者说，伯恩斯“连气都喘不上来了”，赖斯却镇定如常，说：“哦，安全会议在这儿。”

俄罗斯人对她的处变不惊颇为欣赏。普京的一位助理说：“她不是铁娘子——比铁娘子强多了。”

她的老朋友谢尔盖·伊万诺夫和她开玩笑说：“我们正在讨论绝顶机密的事情。这里有一些绝密的军事情报。你想看看吗，康多莉扎？”大家哄堂大笑。俄罗斯人拿出了格鲁吉亚葡萄酒，美国人不禁感到惊讶，因为此前刚刚发生过俄罗斯军官被逮捕的事情，也刚刚实施了对格鲁吉亚产品的禁运。接着他们讲起了关于格鲁吉亚人的粗俗笑话——尽管翻译企图滤除过分的字眼，但赖斯还是听懂了。

过了一会儿，赖斯对普京说：“别忘了咱们还有正事要干呢。”

普京把客人带到另一个房间，一起过来的还有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和担任翻译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这里，谈话变得严肃起来。

普京开始给赖斯上课，讲乌克兰的情况。他给她讲乌克兰的历史和人口组成，讲为什么美国想都不该想把乌克兰拉入北约。伊万诺夫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普京解释了乌克兰的情况——它的人口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俄罗斯族，也解释了如果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被拉入北约，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整个欧洲都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据比尔·伯恩斯说，赖斯反驳说主权国家有权自己决定参加哪个机构或联盟，不应该视之为威胁。

但普京坚持己见。“你们不明白你们在做什么，”他说，“你们在玩火。”

接下来他提起格鲁吉亚最近发生的事情。赖斯决定还以颜色。“布什总统让我对你说，如果俄罗斯对格鲁吉亚有什么动作，美俄关系就会决裂。”

伯恩斯大使记得普京的回答明确无误：如果格鲁吉亚的挑衅造成安全问题，俄罗斯必将做出回应。赖斯听得出普京的声调冷硬起来。

突然，普京站起身来，怒气冲冲，令人生畏。赖斯条件反射地也站了起来。穿着高跟鞋的她比普京高，俯视着普京。她回忆说那“不是个愉快的时刻——可能是我们之间最僵的时刻”。

普京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他们（格鲁吉亚人）挑起暴力，”他说，“一定会有后果！把这话告诉你的总统。”

作为翻译的拉夫罗夫没有翻译最后那句话，但赖斯听懂了。这是愤怒的普京发出的强硬警告。两年后，萨卡什维利头脑发热地对南奥塞梯发动攻击，俄罗斯大军随即对格鲁吉亚还以泰山压顶般的万钧重击。那时，赖斯又清楚地想起了普京的警告。

冷战式的谋杀

对克格勃来说，最可恨的敌人莫过于掉转枪口对内的自己人。它从不宽恕背叛。

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曾是克格勃的一名官员，后又在克格勃之后的联邦安全局工作。20世纪90年代他专门负责反恐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在车臣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被分配到联邦安全局新组建的分析和镇压犯罪组织局。这个局实际上由暗杀队组成，任务是消灭俄罗斯黑手党的高层人物。但利特维年科发现了这个局内部的腐败和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于是开始反叛。1998年3月，他泄露消息给石油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说他和他的4位同事接到命令要杀死他。（别列佐夫斯基当时是在克里姆林宫最吃得开的人物。1996年他策划帮助叶利钦再次当选，很快又要帮助安排他的交接班。）那年7月，普京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别列佐夫斯基马上带利特维年科去见普京，向他报告安全局内部的腐败。据这位石油寡头说，普京未做回应。于是，别列佐夫斯基于11月13日在《生意人报》上发表了给普京的公开信，把此事公布于众。4天后，利特维年科和局里的4位同事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上面命令他们杀死别列佐夫斯基。[8]利特维年科立即被联邦安全局开除。这显然是普京亲自下的命令。他后来告诉记者叶莲娜·特雷基波娃：“就任联邦安全局局长不久后，我开除了利特维年科，解散了他所属的单位。”他所不能接受的不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从事法外杀人，而是利特维年科和他的同事居然敢把这种事公之于众。“联邦安全局官员不应该召开记者招待会，那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应该家丑外扬。”[9]

1999年期间，利特维年科两次被捕，被监禁的时间长达数月，但最终被无罪释放。2000年11月，他逃到伦敦申请政治避难并得到批准。在伦敦，他在那时已流亡海外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手下从事反对普京政权的活动，2006年10月成为英国公民。他在伦敦的活动在许多方面引起俄罗斯政府的痛恨。首先，他的雇主别列佐夫斯基上了俄罗斯的通缉犯名单，但英国拒绝把别列佐夫斯基引渡回俄罗斯。（据说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还为他提供了一名保镖。）其次，他坚信引发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

1999年公寓爆炸事件背后有联邦安全局的黑手，并把初步调查的结果发表在一家俄罗斯报纸上，还制作了一部电影。本书前面已经说过，对他这些指控做过调查的几位记者和政界人士都神秘地死于非命。

利特维年科在伦敦流亡的日子里不遗余力地挑衅克里姆林宫。他提出的指控似乎越来越匪夷所思、强迫偏执，甚至是无端妄想：他说联邦安全局不仅操纵了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和别斯兰学校危机等车臣恐怖袭击，而且还有世界上其他恐怖袭击，包括2005年伦敦连环爆炸案的幕后黑手。就连他的好友都认为他极端狂热，因对普京和联邦安全局的仇恨而昏了头脑。他毫无证据地指称克格勃训练了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扎瓦赫里，还说普京有恋童癖。他和流亡的车臣分裂主义政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邻居就是他们的外交部长艾哈迈德·扎卡耶夫。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遇难后，利特维年科在伦敦的前线俱乐部对记者做了一次演讲，谴责普京亲自指示了这起谋杀。

几周后，2006年11月1日，利特维年科见了两位从俄罗斯来的访客，前情报官员安德烈·卢戈沃伊和德米特里·科夫通，和他们一起喝了茶。之后他就病了，备受剧痛折磨后，于11月23日不治身亡。调查人员确定他是被一种罕见的放射性元素钋–210毒死的。警方调查后认定，毒药是从外面带到英国的，可能是科夫通经由德国带来，因为在那里也发现了微量的这种元素。下毒的应该是卢戈沃伊，他利用和利特维年科见面的机会把毒药放到他的茶里。利特维年科在剧痛中辗转挣扎慢慢死去，成了整个11月的重头新闻。此前谁也没听说过这个俄罗斯人，随着记者和调查人员把关于他被毒杀的点点滴滴拼凑到一起，英国民众一方面对这酷似拉加雷[15]小说情节的事件感到震惊气愤，同时又因为在他们的首都附近和从莫斯科飞来的飞机上发现了钋 - 210的踪迹而惊慌失措。这一事件使人们想到1978年冷战高峰时期克格勃曾使用蘸毒的雨伞尖在伦敦杀死一名保加利亚流亡人士。《每日邮报》写道：“克格勃的触角依然远及八方、令人畏惧。”人们突然记起，2006年7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立法，允许安全部队在全世界搜捕并消灭极端分子。“极端分子”的定义也得到了扩大，明确包括任何诽谤俄罗斯当局的人——利特维年科显然属于这样的人，而且他这方面的行为可说是不胜枚举。

此事确实令人发指，但别列佐夫斯基和他的炒作专家——撒切尔夫人的前形象顾问贝尔勋爵掌管的公关公司——也对它进行了巧妙的利用。他们刊出了一张极具冲击力的照片，照片上濒临死亡的利特维年科头发已经掉光，形销骨立。利特维年科临死前在他的朋友，同在别列佐夫斯基手下工作的亚历山大·戈尔德法布为他起草的声明上签了字，谴责普京亲自下令谋杀他。“我躺在这里，清楚地听到死亡天使翅膀的拍打声，”他用文绉绉的英文写道，“你可以杀死一个人使他不再发声，但是，普京先生，你终其

一生都逃脱不了全世界抗议的怒吼。”在别列佐夫斯基同克里姆林宫的争斗中，恐怕没有哪个武器比他手下这个人的死更有力了。

利特维年科死后第二天，他对普京的指控公布于众的时候，普京正在赫尔辛基参加欧盟和俄罗斯的峰会。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当然没法回避关于此事的问题。就像对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一样，他有意把利特维年科说成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只是说“人死了总是个悲剧”。至于利特维年科对他个人的指控，他斥之为政治挑衅，说可能是由别人捉刀代笔。不过，普京的新闻发言人，向他报告利特维年科死前声明的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告诉我，普京私下里怒不可遏。“他不能相信有人会指控他下令谋杀，”佩斯科夫说，“作为一个人，他感到非常气愤。”我问普京为什么不公开表示愤怒，那样可能比他的不动声色更容易使人相信他的无辜，佩斯科夫回答说：“他不喜欢在公共场合表露感情。”

不过，几年后普京在谈到2010年出卖了包括大名鼎鼎的安娜·查普曼在内的11名在美国的俄罗斯特工时却真情流露：“他们自有一套规矩，所有干情报这一行的都知道这些规矩。叛徒永远没有好下场，通常是死在路边，死于酗酒或吸毒。”也许他应该再加上一条，死于毒药。

利特维年科之死离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害不到两个月，而对钋的追踪又铁证如山地一路指向莫斯科，这大大影响了西方对俄罗斯的观感，尤其是英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英国首相布莱尔极力想维持他和普京的良好关系，力主谨慎，但其内阁的一些成员强烈反对“温和对待”一个藐视人权的政权。布莱尔为此召开了内阁应急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一次普京曾应邀旁听在唐宁街10号内阁应急委员会会议室举行的安全通报会。那是在2005年10月，伦敦连环爆炸案刚发生不久。据一位在场者说，普京语惊四座，说：“我们了解你们是如何追捕恐怖分子的，也非常欣赏你们的专业精神。但换了我们，一旦找到恐怖分子，格杀勿论。”

2007年1月，英国调查人员认定利特维年科之死是一起“俄罗斯情报部门策划的国家暗杀事件”。5月，英国外交部正式要求俄罗斯引渡主要嫌疑人安德烈·卢戈沃伊。俄方回答说俄罗斯宪法不允许引渡俄罗斯公民。他们表示可以在国内审判卢戈沃伊，但称英国在引渡要求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立案。这个说法大致不差：英国当局当然不会把所有证据都交给俄罗斯人，因为其中许多是他们搜集到的绝密情报。但是，没有证据俄罗斯人既不肯引渡卢戈沃伊，也不肯对他进行审判。事情就僵在那里。卢戈沃伊利用这段时间竞选进入了国家杜马，因而获得了起诉豁免权。他多次接受访谈，指责别列佐夫斯基才是谋杀的主使。

2007年6月28日，英国内阁改组，大卫·米利班德成为新任外交大臣。他上

任后的第一个周末埋头阅读情况通报，阅后深为震惊。他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说："我没有想到英俄关系如此恶劣。从伊拉克（战争）开始，后来又有别列佐夫斯基的事情，俄罗斯人认为那是我们搞的政治动作。所以，即使没有利特维年科被害的糟糕事情，我们仍然存在很深的政治问题。"[10]

一周后，克里姆林宫拒绝了英国引渡卢戈沃伊的要求。"我们必须决定如何回应。我们不想造成俄罗斯人的过激反应——不想和他们断绝外交关系。"英国驱逐了4位俄罗斯外交官，冻结了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关系，实际上这意味着切断了英俄两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要合作渠道。英方是否明白这样的后果不得而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回忆说："我们只能跟他们解释，在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是协调反恐活动的牵头机构，是国家反恐委员会的领导。所以如果我们的英国同事不再准备同联邦安全局合作，我们就只能冻结我们在那个领域中的合作。这很令人遗憾。"[11]

作为报复，俄罗斯也驱逐了4位英国外交官，对伦敦坚持要求引渡报以嘲笑。普京总统提醒英国说："在伦敦藏着30个犯下严重罪行、受到俄罗斯执法机构通缉的人——可伦敦却根本不想引渡他们。"他是在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和青年积极分子坐在一起讨论时政时说的这番话，这是典型的普京式活动场景。他又说："他们不把藏在他们国内的人引渡给我们，反而向我们提出侮辱性的建议，让我们改宪法。要改的是他们的脑子，不是我们的宪法。"

两国关系显然降到了最低点，米利班德该出手安抚了。"在伊朗问题、恐怖主义，甚至气候变化上我们都必须合作。于是我建议会见拉夫罗夫外长。我们提议9月在联合国大厦里见面。需要表明我们虽然在利特维年科一案中谋求正义，但同时我们也愿意在外交战线上和他们合作。"

这位新任外交大臣完全没有料到会见的情形竟然会是那样。有17年的时间，拉夫罗夫可以说就住在联合国总部，其中有10年是作为俄罗斯大使。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精明敏锐的外交家，对过去20年的外交史了如指掌。他喜欢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啜饮威士忌，说出来的话像利剑一般。米利班德回忆说："开始会谈时我先聊足球。我问他支持哪支足球队，他却不搭我的茬儿。那场会谈大约持续了三四十分钟，对我是一堂非常非常难熬的外交课。对方认为自己是个中老手，什么都清楚，没有我说话的份儿。那是一次相当激烈的会见，这种初次见面的方式可真够艰难的。"

而据拉夫罗夫回忆，米利班德闲谈的是另外一个同样不合适的题目。他笑着说："谈话一开始，大卫问我们的统一俄罗斯党为什么和保守党而不是和工党建立伙伴关系。我完全没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党与党的合作和我不沾边，但他对此非常感兴趣。"至于关于克服利特维年科危机的新主

意，拉夫罗夫说："我没听他提出任何新主意。我重复了俄罗斯的立场，包括总检察长表示，如果能得到英国调查人员掌握的所有材料，可以和英方展开联合调查。"

普京说英国的"侮辱性"要求是"殖民主义思维的残余"，拉夫罗夫也说到了这点。米利班德说："他说我们不能总以为自己还是帝国，可以要求别的国家改变宪法。他把这点说得十分清楚明白。"

米利班德和拉夫罗夫会见后，两国关系的裂痕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进一步加大。12月，克里姆林宫宣布关闭英国文化协会设在俄罗斯的两个办事处，理由是它们拖欠税款，而且官方身份不合规定。许多人认为俄罗斯此举对它自己不利，因为英国文化协会的主要任务是教授英文和组织文化交流。但拉夫罗夫认为这两个办事处"违反了关于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同时他又明确表示这是为了进一步报复英国对俄罗斯的"单方面行动"——具体地说是冻结了关于便利发放签证的谈判。

回顾他和拉夫罗夫角力的那段时间，米利班德认为那是两个没落帝国之间的冲突。"我认为，俄罗斯视英国为衰落的大国，而英国也视俄罗斯为衰落的大国。这不一定会导致误解，但必然导致英俄关系中一直存在的那种崎岖和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导致了双方不肯妥协的态度。"

5年间，两国的政治接触继续处于实际冻结状态。即使在新任首相卡梅伦于2011年9月访问莫斯科之后，两国关系依然死气沉沉、没有起色，像一艘船，搁浅在2006年在伦敦发生的冷战式的残暴谋杀这座沙洲之上。

采取主动

普京努力把他的国家描绘为自由的现代民主国家，但后来几年发生的一系列谋杀事件使得他劳而无功。在普京做总统的两任期间，好几个记者遭到杀害。这些谋杀案并非都出于政治动机，受害者也鲜有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那么高的声望。但是，这些谋杀案几乎无一侦破，使人感到在俄罗斯杀害记者可以逍遥法外，特别是如果这些记者惹怒了当局的话。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政治流亡者利特维年科都在高层为自己树了敌。他们对普京政权极为敌视——事实上，他们写的东西内容几乎一样，都是指控联邦安全局犯下了可怕的暴行，为支撑普京政权而牺牲上百人无辜的生命。

马丁·斯克斯密斯是利特维年科一案的调查员。调查完毕后，他的结论是普京并未亲自下令杀人，但也难脱干系，"因为他造成了杀人的气氛和条件，在这种气氛里，一些积极主动的现任或前任联邦安全局人员注意到克里姆林宫的信号，自己就会主动采取行动"。[12]我认为波利特科夫斯卡娅

的被害也是一样。在这两个案子里，可能暗杀者没有收到直接的命令，他们甚至不需要命令，他们杀人也不需要准许，因为他们知道“消灭国家的敌人”是当局所默许的。他们也许是擅自行动，为了报仇或者让主人“高兴”。不管怎样，他们都知道不会受到惩罚。

联邦安全局内设有专门从事非法杀人的单位，由此可知今天的俄罗斯是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单位虽然被普京解散了，但千万不要幼稚地以为联邦安全局就此摇身一变，成了全是和蔼可亲的克鲁索[13]的俱乐部，或者以为公平审判和陪审团取代了左轮手枪和玻璃管中的钋粉。

---

[1] Interview with Stephen Hadley,24 January 2011.

[2] Rather was at the centre of a controversy after publicising documents critical of President Bush’s military service during the2004presidential campaign.The documents’authenticity was later disputed,and in November Rather announced he would retire the following March,but there was never any suggestion that Bush had put pressure on CBS to fire him.

[3] Interview with Damon Wilson,2 March 2011.

[4] Interviews with Nicholas Burns,21 January 2011,and Condoleezza Rice,20 June 2011.

[5] Wikileaks cable in theGuardian,1 December 2010.

[6] Interview with Oleg Mitvol,14 April 2010.

[7] These events are reconstructed from interviews with Condoleezza Rice,Bill Burns,Sergei Ivanov,Igor Ivanov,Sergei Lavrov and others.

[8] Some of Litvinenko’s colleagues later‘returned’to the FSB fold and accused him of having tricked them into making this appearance.For an excellent account of all the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intrigues surrounding the case,see Martin Sixsmith,The Litvinenko File(London:Macmillan,2007).

[9] Yelena Tregubova,http://viperson.ru/wind.php?ID＝413357&soch＝1(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10] Interview with David Miliband,7 July 2011.

[11] Interview with Sergei Lavrov,25 October 2010.

[12] Sixsmith,*The Litvinenko File*,pp 303ff.

[13] 克鲁索是喜剧电影《粉红豹》里面的法国侦探。——译者注

[14] 1974年美国通过此修正案，借苏联及东欧国家没有移民自由的理由拒绝给这些国家贸易优惠。——译者注

[15] 拉加雷是英国小说家，曾写过许多以冷战期间英国情报部门和克格勃的间谍战为题材的小说。——译者注

第九章　媒体、导弹、梅德韦杰夫

西方的公关机器

苏联解体后，普京总统为使俄罗斯作为备受尊敬和重视的国家重回世界舞台显要位置做出了诸多努力，其中，2006年本应是一个里程碑。自从俄罗斯1997年成为由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的一员后，这年它第一次轮到做主席——这是个机会，可借此影响全球议程的形成；7月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将主办八国集团峰会，若是安排得无懈可击，将能传誉全球。

然而我们看到，新年伊始，俄罗斯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恐怕这不是它想在世界上树立的形象。年前的几个月里，普京的所作所为已经让西方紧张不安了。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对权力的控制，压制反对的声音，包括限制非政府组织，纵容青年组织“纳什”恫吓政治反对派和骄狂自大的外国大使。

西方保守阵营中已经有呼声要求把俄罗斯逐出八国集团，至少要求布什总统抵制圣彼得堡峰会。

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后总统办公楼幽暗的走廊里，有人提出了一个新奇的主意：俄罗斯需要更好地宣传自己的形象，需要西方公关公司的帮助。克里姆林宫没有公开招标，[1]而是通过私人关系找到纽约一家大公关公司——凯旋公关和它的一家欧洲伙伴公司——布鲁塞尔的GPlus。这两家公司的最高层主管飞到莫斯科，共同向普京的新闻秘书阿列克谢·格罗莫夫和他的副手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宣讲设想和计划。（他们二人共同承担发言人的职责：格罗莫夫承担主要角色，英文流利的佩斯科夫基本上专门和外国记者打交道。）

在这个时候，原来和我同做记者的几个GPlus的主管拉我加入他们的团队，当俄罗斯事务首席顾问。本章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我那时的经历写成的。

在我们看来，做克里姆林宫顾问的任务很简单：让俄罗斯人了解西方媒体运作的方式，并力图劝说他们采纳政府处理与新闻界关系的最佳做法。我们是顾问，不是发言人。虽然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政府对西方经济顾问的意见求之若渴，可是在媒体关系这个“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问题上向普京的团队提供咨询却绝非易事。佩斯科夫确实对学习西方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初见成效后，我们眼看着我们的“客户”又逐渐故态复萌。波利

特科夫斯卡娅被害后，利特维年科又被毒杀，再后来是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看到这一系列事情，我开始猜想克里姆林宫之所以决定雇用西方公关公司，是不是因为他们事先知道自己的形象马上要一落千丈。

他们为改善形象不惜重金。凯旋公关向美国司法部提交的申报显示，开始几年俄罗斯几乎每个月付给凯旋公关100万美元。[2]（凯旋公关还和因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之战”而麻烦缠身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了另一份合同，大约也要这么多钱。）钱不是直接由克里姆林宫出，而是通过俄罗斯的一家银行支付，从而避免了经过国家预算审批。[3]这件事遭到了一些俄罗斯媒体的批评，他们不理解克里姆林宫为什么需要西方（而不是俄罗斯）的公关公司，为什么没有作为国家项目公开招标。[4]

凯旋公关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俄罗斯人对西方媒体的运作一无所知。他们根据对付国内媒体的经验，真心相信我们能用钱买到有利的报道——比如花钱找人在《华尔街日报》评论版发表文章，说俄罗斯的好话。他们相信，记者发稿写什么、怎么写，全看报社老板（或政府）的意思，对那些批评俄罗斯的记者，他们想予以“惩罚”，不邀请他们参加新闻活动（事实上因此而放弃了影响那些记者的机会）。他们不停地骚扰《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卢克·哈丁（和他的家人），显然是因为他所属的报纸发表了对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采访，采访中别列佐夫斯基呼吁推翻普京——尽管哈丁与那篇采访没有任何关系。[5]在利特维年科一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俄罗斯分社的三名工作人员在莫斯科街头遭到袭击。这一切很难使记者们对俄罗斯做出克里姆林宫所希冀的积极报道。俄罗斯人总是要求凯旋公关“使用我们的技术”改善对俄罗斯的报道。我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想要他们使用的技术是每天早上10点钟召开像电视剧《白宫风云》那样的记者招待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

我们提交了一份又一份的说明文件，反复阐述我们的基本主题——向媒体开放。和记者打成一片，请他们吃中饭，和他们谈天说地，向他们透露点儿小道消息，慢慢地争取他们。对记者解释自己的情况，他们会逐渐对你产生信任。接受采访，上广播电台，上电视，因为你不上，你的对手就会上，媒体关注的题目就会由他们来确定。我们的建议一度得到了执行。佩斯科夫请驻莫斯科的记者在高级餐馆吃了几次晚餐（比我们设想的聚餐正式得多），反响不错。他们还建立了有指定部长参加的“星期二通报会”制度，使驻莫斯科的记者团大喜过望。但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谋杀案发生后，佩斯科夫非常担忧，取消了这个制度：他知道不论通报会原定题目为何，记者们一定都会问有关人权和民主的问题。还是不见他们为妙。

凯旋公关的大部分工作是世界上多数政府派自己的使馆和外交部做的事情，但克里姆林宫显然对本国的这些机构没有信心。俄罗斯的部长出国访问时，由我们安排记者招待会，提供背景资料文件，列出他们可能会被问

到的问题（有时还提供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做出的答复——虽然他们很少采用我们提供的说法）。我们为部长（甚至总统）起草文章，但通常被莫斯科当局改得面目全非，无法卒读，很难在任何报纸上刊载。令人费解的是，佩斯科夫要求我们为能源部长或外交部长起草文章，却又不告诉我们部长想说些什么。如果问他，他通常回答说："你们觉得他该说什么就写什么。"于是我们只能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起草文章或演讲稿。然后我们写好的东西又被从头写过。特别是拉夫罗夫外长，他不想让"无知"的外国人为他捉刀代笔（他这么做完全正确）。

凯旋公关每天向克里姆林宫送交3份新闻总结，分别是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新闻汇编，对世界各地关于俄罗斯的报道做出全面的——也许是过于详细的——报告。报告经常长达100多页，包括任何提到"俄罗斯"的文章的全文和摘要，但不做分析。第一份合同执行期间，在俄罗斯担任八国集团主席那年，凯旋公关雇用了一家机构把媒体的每篇文章都以颜色标注，用红、黄、绿来标明报道对俄罗斯不利、中立或是有利。到年底做成图，即可显示由于凯旋公关的努力，代表有利的绿色多于代表不利的红色。公关工作这个常用的方法在克里姆林宫政治的微妙环境中却行不通。此外，不同颜色的选择似乎毫无章法，和文章的内容没有关系——就连体育新闻或天气预报也被加上红点或绿点。（这项"服务"后来终止了，因为人们意识到它全无用处。）

克里姆林宫还定期收到"路线图"——今后3个月/6个月/1年的"全景"公关战略。里面用的都是唬人的大词，什么"利用将来的机会"，什么"可取得的成果"，还有"争取利益攸关方"。其实，大部分工作说到底是帮助安排部长访问、组织记者招待会和报告西方发生的大事这类平常的事情。

作为公关这一行的新手，我每次看到"与影响者关系"和"第三方接触"这些云山雾罩的说法总是忍俊不禁。它们的意思其实就是培养与对俄罗斯感兴趣的专家和"思想领袖"的关系。凯旋公关对任何这方面的接触都进行巨细无遗的报告，比如同某智库的成员共进午餐或出席讲演会。所有这些都作为完成的任务记录下来，每月送交莫斯科。如果一位"影响者"在文章中写了一句积极的话，这句话就将在报告中作为"成功"予以引用。我记得凯旋公关一份关于工作成就的报告引用了加拿大总理的一句话，说"我认为俄罗斯近几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知道克里姆林宫是否真的相信这里面有我们的功劳。

我们的一个不容置疑的成功是开启了"电话通报会"的办法，记者们可以打电话参加佩斯科夫或某个部长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俄罗斯人觉得这比面对面的记者招待会自在。他们终于找到了向媒体解释他们行为的办法。

我和佩斯科夫一起工作了三年多，和他混得很熟。40出头的他高高的个

子、衣着整洁、举止随和、很有魅力、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土耳其语也很流利，因为他在安卡拉使馆工作过多年）。1999年叶利钦总统访问土耳其时发现了他，把他调回国，在总统办公厅工作。普京上台后，他成为克里姆林宫新闻关系办公室主任和总统的副发言人。从那以后，他一直是媒体眼中的无价之宝，全俄罗斯几乎唯有他有能力、有权威，也有意愿接受外国媒体的公开采访。他因此成了大忙人。我在英国广播公司莫斯科分社的同事一直渴望能多采访几个人，他们曾恳求我说："请让他们多派些发言人。德米特里是很棒，可他没有时间……"然而，除了几个部长之外，俄罗斯没有人愿意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难怪他们觉得把信息传递出去那么难。

我对德米特里进行媒体培训，帮助他在电视摄影机前表现得更加自如。不仅训练他的声音和举止，而且对他提出最尖锐的问题，教他如何以简明扼要、条理清楚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意思。许多没有研究过西方简明新闻报道的人在接受采访时常常说个没完，但总说不到点子上。

2007年在德国举行的一次八国集团峰会上，佩斯科夫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修改普京总统将在危地马拉市为支持俄罗斯争取在索契承办2014年冬季奥运会所做的讲演稿，要改得更风趣些。俄罗斯申奥成功了——这个大功我自然居之不疑！（其实，我提的大部分建议都未被采纳！）2008年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后，我负责就视频和播客提供咨询，至少一部分建议被采纳在他创新性的视频博客中。

德米特里的上司阿列克谢·格罗莫夫是普京任总统期间克里姆林宫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听说他是"唯一无须预约就可以进入普京办公室的人"。普京和他每天见面，经常就政策问题征询他的意见。格罗莫夫对俄罗斯媒体实施严格的控制。一次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喝茶，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台长走了进来。格罗莫夫把我简单介绍给他，接着挥手要他去后间自己倒点喝的，在那里等着。这是他们每周例行的谈话，格罗莫夫会把今后一周的议程过一遍，确保新闻报道"正确"。

格罗莫夫和佩斯科夫一样，也是干外交出身，曾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工作，1996年奉命回国任叶利钦的新闻办公室主任。他喜欢穿格子开衫毛衣，用长烟嘴吸万宝路香烟。作为普京的新闻秘书，他只管俄罗斯媒体，由佩斯科夫对付外国媒体。在一次和格罗莫夫的会面中，我提起了我的一贯主张：在西方看来，俄罗斯在思维和行为上正越来越往苏联的老路上走，为了扭转这种看法，不仅需要停止苏联式的行为（比如禁止反对派集会示威），还需要通过演讲和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大力批判苏联的历史。格罗莫夫的答复非常说明问题。他承认这样做会改变西方的态度，使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更加积极。但是，他说："我们得照顾国内舆论。而国内舆论对苏联的看法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我们首先要考虑国内的政治稳

定。”确实，俄罗斯有许多人，特别是老一辈的人，怀念过去，如果对他们的观点提出挑战可能会导致“不稳定”。令我泄气的是格罗莫夫对此只是被动地接受。以他对俄罗斯媒体的影响，他完全可以发起一场运动来改变人民对昔日的看法。毕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职时都这样做过，民众的态度也确实发生了改变。而现在政府拒不作为。

那几年我提建议尽量有话直说，即使有时超越了“公关咨询”的正常限度。在那段时期里，当局开始驱散由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领导的名为“另一个俄罗斯”的新反对派联盟组织的示威。我对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解释说，多少公关都弥补不了一张防暴警察殴打老太太的照片造成的破坏。当然，我说这些话的对象不对。我坚信佩斯科夫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他无权改变警察的做法。

有一次他们要我对一篇文章发表意见，文章是用俄文以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名义写的，想在声名卓著的《外交》杂志上发表。那是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那篇文章写得极其蹩脚（好像是由至少三个意见迥异的人共同执笔的），我发回的评论也毫不客气，说除非他们想让人认为他们的总统是个精神分裂的疯子，否则就该把这篇文章撕成碎片。我那些专业从事公关的同事大为吃惊，担心雇主会不高兴。但佩斯科夫却对我的建议表示感谢。

无论佩斯科夫后来多么信任我的判断，我最终认识到那其实是没有用的。克里姆林宫想要我们帮助传播信息，不是改变信息。他们事先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比如我们要求事先拿到重要讲话的讲稿（或至少是节选），好在早间新闻简报会上透露一点口风，吊起记者的胃口，以保证晚间收到最大效果。这是西方政府新闻办公室的标准做法，但克里姆林宫不信任我们这些顾问。普京的讲话稿发到记者手中的同时才发给我们。至于引起西方注意的公关手段，比如显示普京男子汉气魄的照片，那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永远是事后才知道。

凯旋公关2007年的工作赢得了一项很有威望的公共关系奖，但我知道克里姆林宫想让它的公关顾问“闯劲更大一些”——不仅是安排记者招待会和采访，或提供背景材料和分析文件，而且要想办法引着记者多说俄罗斯的好话。我记得一次和佩斯科夫的副手谈话，他批评我们在一位部长接受采访后没有采取后续行动以确保记者对采访的报道写得“对路”。报纸说我们是歪曲事实的专家，努力洗刷普京的人权记录——确实，克里姆林宫可能就是想让我们这么干。事实上，凯旋公关的主要作用是让克里姆林宫了解外界对他们的观感，并鼓励他们采取措施改变这种观感。当然，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信息本身，不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但那是远远超过凯旋公关职权范围的政治上的挑战。

其他的西式做法

凯旋公关还不是当时克里姆林宫唯一的“宣传工具”。2005年年底俄罗斯成立了24小时播放的卫星电视台“今日俄罗斯”（后来改名为RT），就世界大事发表“俄罗斯的看法”，并向全世界观众介绍俄罗斯的政治和生活。它第一年的预算是6000万美元，雇用的播报员都是英语一流的俄罗斯人，也有外国人。它看上去非常专业化，比起全球电视市场上的许多竞争者来毫不逊色。然而，与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或新出现的法国24台这样的对手不同的是，它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公平冷静、实事求是地报道新闻。“今日俄罗斯”的使命是让世界了解俄罗斯，所以它重点报道国内的政治新闻，很少对其他国家进行全面报道。苏联时期新闻报道中的西方是一张黑白照片，充满了阶级斗争和贫穷，相比之下苏联则是一片光明。“今日俄罗斯”的手法则细致多了。它知道观众还有其他消息来源，所以不回避报道反对派的活动，甚至是对俄罗斯的批评。这样，它造成了俄罗斯媒体多元化的幻觉，掩饰了这一真相：“今日俄罗斯”是俄罗斯电视体系的例外，因为它是面向外国观众的。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它露出了本相和真实的目的，“今日俄罗斯”扔掉了所有貌似公平的伪装，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彻头彻尾的宣传工具。

这家电视台是由国有新闻机构俄罗斯新闻社创办的。俄新社和它的前身，苏联时期的苏联新闻社一样，身兼二职：首先，它收集新闻，主要向外国受众提供新闻报道（苏联新闻社庞大的驻外记者网中也包括许多秘密克格勃特工）；其次，它的驻外分社是宣传俄罗斯政府新闻的中心。这第二个职能与凯旋公关和GPlus的作用有很大的重叠之处，因此导致了一些摩擦。我感到俄新社十分不满外国人篡夺了它作为克里姆林宫官方宣传工具的作用。比如，有几次要GPlus安排俄罗斯驻布鲁塞尔大使叶甫盖尼·契卓夫的新闻发布会，结果发现俄新社已经安排了——而且俄新社财大气粗，排场十足，新闻发布会经视频连线直通莫斯科。

另一个宣传俄罗斯形象的新举措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它成立于普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主要推手也是俄新社。瓦尔代俱乐部每年9月召集大约50名“俄罗斯观察家”（主要是记者和学者）同俄罗斯本国专家举行10天的辩论，加之参观游览（每年都去一个新鲜地方）并接受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的接见（官员的级别逐年升高）。2004年的第一次辩论会在莫斯科北部的瓦尔代湖举行，瓦尔代俱乐部即由此得名。而且那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京总统竟然亲自接见了他们。他正因别斯兰惨剧憋了一肚子火，愿意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和这群人见个面，发泄一下怒气，回答他们的问题。自那以后，俱乐部成员们游览过喀山、车臣、西伯利亚和圣彼得堡等地，和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分别）在他们莫斯科郊外或索契的别墅里共进过丰盛的午餐。梅德韦杰夫显然认为瓦尔代俱乐部同普京的联系过于紧

密；他在2009年成立了自己的外国专家聚会——“雅罗斯拉夫尔全球政策论坛”。

瓦尔代俱乐部是影响外界观感的全新手法——比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或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或引导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对俄罗斯进行更积极的报道来要细致多了。这是一种软宣传——风险不小，因为50个外国人在五星级酒店住10天耗资不菲，也肯定不能保证一夜之间能够改变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想法是：来宾们——这些资历深厚的克里姆林宫观察家在学术杂志上撰写文章，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作为权威在媒体上发表评论——如果有机会和普京悠闲地共进午餐并花上一个来星期的时间和友好的俄罗斯专家与官员辩论问题，那么他们对普京的好感就会增加。

莫斯科知识界的批评家对这个项目嗤之以鼻，说大多数参加者都是“被利用的傻瓜”，他们受了蒙蔽，回去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们在享受清蒸龙虾和美酒时被灌输的宣传辞令。

比如，卡内基基金会的丽莉娅·谢夫佐娃就说克里姆林宫通过瓦尔代俱乐部“收编”和利用西方评论家：“外宾来瓦尔代吸收俄罗斯领导人的意见，然后传达给世界。”[6]我完全同意这正是克里姆林宫的意图所在，否则他们不会不惜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然而，我参加了三次瓦尔代会议之后，认为她高估了瓦尔代的效果。也许有些与会者的批评不再那么尖锐——而且确实几乎所有人，无论是不是瓦尔代俱乐部的成员，亲自接触到普京都会被他迷住（撒切尔夫人曾有类似的魔力，哪怕是对批评她的人）。但是，参加了几届俱乐部活动后，成员们并不是回去就大唱赞歌。保守的“传统基金会”成员艾瑞尔·柯恩和经验丰富的马歇尔·戈德曼绝不能算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

见到官员总比见不到强。大部分参加瓦尔代活动的人都有足够的经验，分得出什么是宣传、什么是事实。基本上，来时对俄罗斯有好感的人离开时仍然有好感，之前认为普京是骗子、反民主的人也很少改变看法。大部分记者和学者都欢迎有机会见到一个国家如此之多的官员；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自动接受这些官员的观点，更别说“传达”了。比如，听普京谈上几个小时的话不一定让人从此爱上他，因为听众得以近距离观察他的举止、他的偏执，甚至有时是他的愤怒，而对一个信奉民主的人来说，观察的结果远不能令人安心。我对瓦尔代参加者感到不满的不是他们轻信宣传，而是他们——也许是被普京镇住了——没人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和他争论：他们只是问一个（通常是温和的）问题，然后耐心地听他滔滔不绝地回答——从来不敢继续提问或打断他的话，或指出他哪里错了。即使是号称“尖刻”的那些人提问时也都先说上一大堆奉承话。佩斯科夫私下告诉我，（明显喜欢和人争辩的）普京本人也因听不到论战式的提问而着急无奈。

普京好像也怀疑瓦尔代行动到底多么有效。2007年他第四次和俱乐部成员会见时，一上来就说了一番尖利刻薄的话，明显表示出他认为西方媒体是奉某种“指示”行事的：“近年来，我看出来欧洲和北美媒体的纪律非常严明。从你们发表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我们的会议产生过任何明显的结果，虽然我相信你们对我国了解得更多了。如果你们能把了解到的情况传达给你们的读者和观众，打破西方对我们的僵化印象，我们将很高兴。”

普京在第二任期的又一个发明是“民主与合作研究所”，它远比瓦尔代俱乐部更为有害（尽管实际效果不彰，但至少意图如此）。它在纽约和巴黎设有分部，是今天俄罗斯最彻底的苏联式做法的复辟：这个智库的目的是要证明践踏人权和民主的是西方，不是俄罗斯。研究所的使命声明说，它希望“改善俄罗斯在美国的名声”并就美国民主提供“分析”。它的纽约分部主任是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此人虽然是亚美尼亚裔，却狂热支持俄罗斯所谓干涉邻国的权力；巴黎分部主任是娜塔莉娅·纳罗奇尼茨卡娅，她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还极力为米洛舍维奇辩护。他们派到前线之前都在我这里接受过媒体培训。我可以有信心地说西方完全不必害怕他们能破坏人们对西方民主的信念，但我敢肯定他们两人在美国和法国待遇优厚的闲散职位上都会乐不思蜀。

慕尼黑

2007年2月，克里姆林宫要我去德国。普京总统将在巴伐利亚州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他的新闻团队预计反响会非常强烈，想要人帮助安排普京演讲后由佩斯科夫接受各种采访。像通常一样，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演讲内容的细节。佩斯科夫和他的副手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紧张又兴奋：“这活儿不好干！”他们说，“我们得确保记者明白演讲的意思。”他们大可不必担心：那是普京政治生涯中最直言不讳、最强硬的演讲。

贝尔里施尔霍夫酒店周围层层围满了保安人员，里面世界要人济济一堂——不仅有几十位国防部长和高级将领，还有议会议员、政治家和名记者。谁也没有料到普京的讲话会如此强硬。据消息人士说，2007年年初俄罗斯总统终于对美国人失去了耐心。“够了，”他对助理们说，“我受够了！”他如此大发雷霆是因为华盛顿最近决定着手实施它在欧洲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它刚刚开始和波兰会商，打算在其领土上部署10枚拦截导弹，也在和捷克共和国谈判在那里建立一座最先进的导弹追踪雷达站。普京初任总统时，勉强默许了布什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决定，但现在美国人想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对此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俄罗斯坚信，美国此举将使俄罗斯的核威慑效力全失。

普京大步走进会议厅，他这次带来的可远不止通常他牢骚卡上的那些抱怨。演讲开始时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警告下面的听众：

由于这样的会议安排，我不必过于彬彬有礼，不用说一些拐弯抹角、好听然而空洞的外交辞令。这种会议形式能使我对国际安全问题畅所欲言。如果我的话在同人们听来过于激烈、尖锐或不精确的话，那么请你们不要生气，毕竟这只是一场会议。我希望我开始讲话两三分钟之后，特尔契克先生（主席）不要开亮那边的红灯[19]。

普京对美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美国妄想统治世界，做世界“唯一的主人”，在听众中引起一片骚动。

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几乎任意地过分使用强力——使用军事力量，这正在把世界推向永久冲突的深渊。这使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找到对任何冲突的全面解决。政治解决也成为不可能。我们看到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日益遭到蔑视。事实上，独立的法律规范越来越向一国的法律体系倾斜。一个国家——当然首先是美国——在所有意义上都越过了自己的国界。它强加给别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政策现在都显示出这一点。谁会喜欢这种情况呢？谁对此能感到高兴呢？

他说美国“意识形态僵化”、奉行“双重标准”。他指控美国对俄罗斯奢谈民主，自己却侵略别国、践踏国际法、挑起军备竞赛。他怀疑美国可能并未销毁按照不久前缔结的军控条约应该销毁的导弹，而是“把它们藏在仓库里以备不时之需”。谈到布什总统的导弹防御计划时，普京谴责“外空军事化”并建议缔结一项规定此类武器为非法的条约。他把北约的扩张称为“挑衅”：

我们有权发问：扩张是针对谁的？华沙条约解散时我们的西方伙伴做的保证呢？今天那些宣言在哪里？人们已经全然忘怀了。但我却要提醒一下诸位它们是怎么说的。我想引用北约秘书长沃纳先生1990年5月17日的讲话：“我们不准备把北约部队派到德国领土以外，这本身就是对苏联的一项坚定的安全保证。”这些保证如今到哪里去了？

普京警告说一道新的铁幕正降临在欧洲大地上。当他指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一样——也实现了制度转型，却没有得到一点承认时，语气愤懑不平：

柏林墙的石头和混凝土块早已成为纪念品，但我们不应忘记柏林墙的倒塌要归功于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我们的人民，俄罗斯人民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我们选择民主、自由、开放和与欧洲大家庭所有成员建立真诚的伙伴关系。现在有人企图把新的分裂线和分裂墙强加给我们。这些墙也许是

虚拟的，但它们仍然把我们的大陆分成了两半。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坐在第一排，普京讲话期间他一直在纸上振笔疾书。他的助理丹·法塔和埃里克·艾德尔曼赶紧跑过来问听了刚才的讲话后是否要他们帮他重写他第二天早上的演讲。盖茨拿出他写的那张纸说：“看看，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

法塔和艾德尔曼听他念了一遍，对视一眼，说：“太棒了！”

他们的上司回答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驯马大会。”[7]盖茨的经历和普京十分相似。他1966年进入中央情报局，老布什任总统时升任中情局局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发言的第二天，他在讲话中做出和解的姿态，并提到了这段经历。

在座诸位中的许多人有外交或政治方面的背景，而我和昨天的第二位演讲人一样，背景完全不同，是干间谍出身的。我想大概老牌间谍都习惯有话直说。但是我受过再教育，当过4年半的大学校长，和教员打交道。近几年来不止一位大学校长在教员面前领教到，如果不客气点，就得走人。我们今天的世界比起二三十年前大不一样，复杂得多。我们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必须和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携起手来予以应对。打过一场冷战已经足够了。

分析家德米特里·特列宁把普京的慕尼黑讲话描述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新阶段的开始。如果第一阶段是“同欧洲和美国和解”，第二阶段（伊拉克战争后）是“不结盟，但不愿与西方对抗”，那么慕尼黑会议之后的第三阶段就是“强迫建立伙伴关系”。特列宁写道：“普京列出了他要强迫美国和欧洲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的条件：接受现状、平等相待、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合作。”[8]最后，特列宁写道：“强迫的伙伴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因为2008年和2009年年初，俄罗斯开始和可能成为它伙伴的国家渐行渐远。

不过，在2007年慕尼黑讲话后的那几个月，普京确实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和美国人就导弹防御达成妥协。可能他希望他那篇讲话会对美国人造成震动，促使他们合作。双方离达成协议只差一步之遥，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这一次，美国人和普京一样难辞其咎。

来自伊朗……或俄罗斯的威胁

乔治·W·布什从就任总统起，就坚持说计划建立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为了保护美国不受像伊朗和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的攻击。尽管它们尚未具备

此种能力，但看来它们正在发展中程和远程导弹系统，有朝一日可能会打到美国。据说伊朗导弹的弹道将经过东欧上空，所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欧洲部分就需要在捷克共和国建立雷达设施（以便在导弹发射后对其进行追踪）并在波兰部署拦截导弹（好把它们击落）。

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谢尔盖·普里霍季科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能接受这些计划。”[9]俄罗斯人的拒绝有几个理由：伊朗还没有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要防的远程导弹，很多年内都不会有；即使他们有，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也不是拦截的最佳地点；最关键的是，捷克的雷达将能够侦察俄罗斯的设施，而波兰的导弹则会破坏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

此前，俄罗斯只是一味批评这些计划，却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办法。但2007年6月，普京前往德国海滨度假胜地海里根旦姆参加八国集团峰会时带去了他自己的计划。除了峰会本身的事情以外，普京与布什总统举行了双边会谈。他有备而来，使美国人措手不及。此前一周内，他咨询了军事专家，头天晚上，普京在他的房间里画出了导弹弹道图，还记下了别的数据。现在他把这些往布什面前一摆，详细阐述了为什么美国的计划完全不对。据一位当时在场的助理说，普京解释了雷达应该安在哪里，为什么布什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被他的顾问误导了，以及为什么俄罗斯感觉受到威胁，等于“宣讲了一篇实实在在的论文”。[10]

据说布什看着他说：“噢，我看得出这对你们是件很严重的事。没人跟我说你们对这事这么认真。”

普京说：“我们想到这事连觉都睡不着！”

布什说：“好吧，作为朋友，我可以保证我们会研究你刚才说的那些。”

但是普京有一个新的具体建议，为的是打消美国的行动——同时也要试探一下这个系统是不是真像布什所说是针对伊朗，不是针对俄罗斯的。他说：“你看，我昨天和阿塞拜疆的总统谈过了。我们在那里有一座雷达站，在一个叫加巴拉的地方。我愿意让你们用。那地方离伊朗更近。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联合系统。你们用我们在阿塞拜疆的雷达，就不需要在捷克共和国设雷达了。”

普京是大棒和胡萝卜并用。峰会召开几天前，他曾凶狠地暗示美国人若是在东欧部署导弹拦截武器，那么俄罗斯作为报复只能把它的导弹再次瞄准欧洲。现在他却主动提出如果美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计划，他可以收回他的威胁：“这样我们即可不必改变立场，不必恢复我们导弹的瞄准目标。我国不需要在接近欧洲边界的地方部署导弹打击系统，美国也不需要在外空部署导弹打击系统。”

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个不可轻视的机会：普京首次主动提出如果让俄罗斯参与的话，他可以不再反对导弹防御。布什答应和他的军事顾问商量一下。

普京感到布什被他说动了，于是不到一个月后，又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7月1日，他飞往美国缅因州肯尼邦克港与布什进行非正式会谈，地点是布什在沃克点的老家，位于一个伸进大西洋的小小半岛上。他和小布什以及他的父亲一起乘坐快艇在海上航行，和布什一家人享受有龙虾和剑鱼的晚餐，一起吃饭的还有两国的外交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美方是康多莉扎·赖斯和斯蒂芬·哈德利，俄方是谢尔盖·拉夫罗夫和谢尔盖·普里霍季科。“气氛非常轻松怡人，”赖斯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坐在起居室轧光印花布面的沙发上，窗外就是大海。”[11]

第二天他们去钓鱼，普京又提出了新建议。他不仅让美国使用阿塞拜疆的加巴拉雷达站，而且说他会把雷达站更新换代。另外，他们将在俄罗斯南部的阿尔马维尔建立一座全新的雷达站，也可供美国人使用。他们可以建立共同导弹防御的联合预警系统，不仅有美俄两国参加，而且包括整个北约。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终于可以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了。普京提出可以在莫斯科成立一个“信息交流中心”，建议在布鲁塞尔也成立一个类似的中心。“这将是一个一整套的系统，全部实时运作。”普京接着说，“我们认为这样就无须在欧洲建立设施了——我指的是要在捷克共和国建立的设施和在波兰部署的导弹。”

布什对普京说的最后一点不能完全肯定，但觉得他的其他建议很有道理——尤其是普京似乎是把他关于导弹防御的具体建议放在了建立全新战略联盟的大背景中。后来拉夫罗夫回忆道：“普京强调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一起工作，这实际上就使我们成为了同盟。普京提出这个建议是希望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

会谈结束后，两位领导人正准备出去对媒体讲话，哈德利把布什总统拉到一边：“普京说得太好了，正是我们一直所希望的。你觉得他会愿意公开那么说吗？”

布什回答：“我不知道。咱们去问问他。”他走到俄罗斯总统面前说，他觉得如果普京能在电视摄影机面前重复他刚才私下说过的话，那将会加快两国关系的进展。[12]

普京欣然同意。他对媒体说：“此种合作将为俄美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带来重大的改变。事实上，它将导致我们两国在安全领域逐渐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事情迄今为止一切顺利，但美方尚未看到普京让他们使用的设施是什么样

子。国防部门的新保守派对此深为怀疑，认为普京此举是一个花招，意在离间美国与波兰和捷克的关系。国防部副部长埃里克·艾德尔曼回忆说："我怀疑这是否表示俄罗斯真的愿意在导弹防御方面和我们合作。我认为，他们做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为了用毫无意义的讨论或其他问题拖住我们，防止我们在导弹防御上采取行动。"[13]

9月，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帕特里克·奥雷利带领一组专家飞往阿塞拜疆视察加巴拉雷达站。他们看到的是一座苏联时期的老旧设施，条件不怎么样。新保守派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欣欣自得。据艾德尔曼说，"奥雷利说有这么一座雷达站，有一定能力，可以派上用场。但它也相当老旧，需要大规模升级更新。将来若真让它发挥作用得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力气。"

视察小组的结论是，普京提供的雷达只能帮助监视导弹攻击的威胁。但美国设想的是可以防御导弹攻击的系统——而那样的系统仍然需要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设施。

美国政府内对俄比较友好的轴心接受了这种意见，但又不想扔掉普京伸出的橄榄枝；在普京的慕尼黑讲话后，他们本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友好。赖斯和盖茨在五角大楼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单独见了一面。赖斯回忆道："我们两个都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我们说得想办法把话挑明，把俄罗斯人排除在外，将雷达设施设在捷克共和国和波兰，他们必然会感到恼怒，而我们得想办法化解。显然这方面问题很多。有没有什么可以采取的建立信心的措施？"

盖茨和赖斯反复地讨论各种想法，最终想出了一个大概可行的办法。10月他们前往莫斯科参加所谓"2＋2"会谈——这是两国的外交和国防部长之间的会谈：赖斯和盖茨对拉夫罗夫和谢尔久科夫。

10月12日星期五早上，他们驱车前往普京总统在诺沃奥加廖沃的官邸，走的是一年前赖斯去那场不欢而散的意外生日宴会所走的同一条路。普京想在"2＋2"会谈开始之前接见他们——他的心情和一年前几乎同样糟糕。虽然他没有别的会见，但还是让美国人干等了半个小时。然后，他把两国代表团召集在桌旁坐下，在电视摄影机前再次向美国的计划开炮："我只想说一点，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在这个复杂的谈判进程正在进行的时候，执行你们原来和东欧国家达成的协议。要知道，我们可以决定有朝一日共同在月球上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但现在由于你们的计划，我们可能失去合作的机会。"

盖茨说普京质疑美国是否真正需要防御伊朗攻击的系统。"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画着伊朗导弹的射程弧线。他的意思是根据俄罗斯得到的情报，伊朗很多年内都制造不出可以打到欧洲的导弹。听到这里我说，'那么你需

要另换个新的情报部门。’”[14]

当时的新闻报道引用了普京讽刺地提到在月球上部署导弹的话，认为这证明会谈失败了。其实在幕后，盖茨和赖斯提出了一个俄罗斯人喜欢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为了弥合美俄之间关于伊朗是否构成威胁的意见分歧。拉夫罗夫记得：“他们说除非我们和他们一起确定威胁存在，否则美国不会启动他们的导弹防御系统。”[15]

据赖斯说，“盖茨说：比方说我们把弹坑挖好，然后一道对伊朗的威胁进行评估，除非我们对伊朗的意图达成共识，否则我们不会实际开始部署拦截武器。”

盖茨又说：“反正导弹设施真正投入运转要几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等伊朗试验了可以打到欧洲的导弹后再安装拦截武器。”

俄方对这项建议欣然接受，因为它至少起到了拖延的作用，但是它却丝毫没能打消他们坚定不移的想法，即美国的真正目标是他们，不是伊朗。此刻盖茨提出了一个建议——现在他苦笑着承认那个建议和国内鹰派的主张大相径庭。“我觉得我们在提高透明度、让他们了解情况方面大有可为。我们甚至可以让俄方派常驻人员，比如武器视察员。”

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几分钟内就发展成让俄罗斯向美国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设施设立永久性的全天候军事存在。这使俄罗斯人大喜过望。他们的首席谈判代表阿纳托利·安托诺夫回忆说：“我们没有具体讨论人员住在哪里，由谁担负他们的费用这些技术细节……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主意。”[16]

盖茨回想起来仍然有些懊恼：“我谈到的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我当场灵机一动想到的。如果我和赖斯没意见，为什么不试试看普京能不能同意呢？”

拉夫罗夫请美方把这些建议写成白纸黑字。可是，盖茨和赖斯带着他们临时提出的建议回到华盛顿时，用盖茨的话说，遭遇的是“震惊”。他们的想法要经过所谓的“机构间进程”，由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国防部、国务院、联邦安全会议——予以评估。情况很快表明，新保守派绝不肯让俄罗斯人24小时随时进入美国最尖端的设施。他们也和捷克和波兰方面进行了磋商，但此时磋商为时已晚，捷克和波兰均反应冷淡。盖茨微笑着含蓄地说：“机构间进程把我们的建议磨去了一些棱角，弄得不那么诱人了。”

按俄方的要求，美方把建议落实到了纸面上，但把“俄罗斯永久性的军事存在”改成建议俄罗斯使馆的武官可以偶尔访问捷克和波兰的设施。俄罗斯人对此予以轻蔑的拒绝。拉夫罗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11月接到了

文件，原来的建议里面一条也没有。”

2008年3月举行了第二次“2＋2”会谈，但气氛恶劣，一事无成。至此俄方已经清楚地看到布什政府将坚持原有的计划。几个月后，美国就与捷克和波兰签订了协议（尽管两国的公共舆论都反对）。普京又一次企图迫使美国考虑俄罗斯的意见，却又一次没有成功。

克里姆林宫学说

普京对外日益强硬时正值国内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时期。2007年，普京总统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我与克里姆林宫人员共事期间觉察到总统思谋自己的未来时，他的班子几乎陷于瘫痪。按照宪法，他不能第三次竞选连任，普京也几次三番地声明他不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修改宪法。他的团队中许多人怂恿他修宪——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这是最受欢迎的办法，但普京想另找办法来继续发挥作用。

这位决心至少在形式上照章办事的专制者此时左右为难。他无意离开政治舞台：普京在多次谈话中都表明，他担心自己带领俄罗斯走上的道路仍然有可能被逆转；他不能充分信任任何人能像他自己那样坚决地捍卫这条道路；他也绝不信任老百姓通过民主选举一定能选择“正确的”道路——哪怕是只给他们两个“经批准的”候选人让他们二选一。他得想法子把一个他所信任的替身推上驾驶座——这个人既要延续他的政策，又不会对他在幕后大权独揽、做终极“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提出挑战。问题是，普京自己都不知道怎样才做得到。而且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也没有选定合适的替身。

肯定不能用现任的总理。1999年叶利钦任命普京做总理是为了培养他做总统，而普京最近任命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做总理却是为了正好相反的原因——就是要一个毫无个性、没有野心、对他唯命是从的人做政府首脑。

有两个人最有可能入选：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自从2005年11月起一直担任第一副总理，被视为“自由派”，与强人集团没有明显的关系；而曾做过情报主管和国防部长的谢尔盖·伊万诺夫在2007年2月15日也被提升为第一副总理，因此而引发人们猜测他是未来总统宝座的有力竞争者。这两人已经开始组建忠于自己的团队，包括新闻秘书，但最聪明的官员还是暂时不投靠任何一边。

结果，政府所有高级层面的人都缩手缩脚，不敢做长远决策，也拿不准支持哪个候选人。这种明显的犹豫踌躇从2007年年中一直延续到12月的议会大选，甚至到2008年3月28日总统大选之后。有将近1年的时间，强人的难题把国家弄得软弱无力、瞻前顾后。

有一点是清楚无误的：俄罗斯的老百姓——应该说任何不在最高权力圈内的人——对俄罗斯下一任总统由谁担任没有丝毫发言权。不过普京还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想出了办法。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他在年初时一点儿主意也没有，其思路是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产生并逐渐演变明朗起来的。我常常问克里姆林宫的熟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相信他们不是在撒谎，就连普京自己都不知道。

这种状况造成了早已消亡的"克里姆林宫学说"的重起。过去研究这一学说都是由像我这样的人仔细琢磨红场上政治局成员列队的照片，或计算《真理报》对那些崭露头角的苏联领导人的报道各有多少字。2007年1月梅德韦杰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做了一篇相对开明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而谢尔盖·伊万诺夫在2月陪同普京参加慕尼黑会议回来5天后就被晋升到和梅德韦杰夫一样的级别，这些都受到外界的密切关注。

新的"克里姆林宫学家"，包括那些身在克里姆林宫内为自己的未来担心忧虑的人，热烈地辩论这两位候选人孰优孰劣。梅德韦杰夫可能太倾向自由主义，或者太软弱（虽然普京就是想要这样的人，好对国外显示温和的形象）。伊万诺夫属于强人集团，自然和普京关系更近，过去几年提拔了那么多情报人员和军人……但话又说回来，可能他太强了，太有自己的主张，因此是个威胁。普京会不会让他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代表政府的不同侧面呢？还是说普京最终会改变规则，竞选第三任？

看起来伊万诺夫是培养对象，他更常在电视上露面，和普京一起旅行比较多，慷慨激昂地痛斥西方也像普京。民意调查如果可信的话，直到6月之前都显示梅德韦杰夫稍稍领先，但在6月的民调中，伊万诺夫领先了4个百分点。

突然，9月12日，普京导演了一场拙劣至极的政治剧。电视上，总理弗拉德科夫走进总统办公室，可以说他是要自废武功，且手法相当笨拙。"鉴于目前的政治进程，"弗拉德科夫嘟嘟囔囔地说，"我希望您能完全不受限制地做出决定和任命。所以我想主动空出总理的位置，以便您按照您认为合适的方式组阁。"话说白了就是：显然下一位总统不是我，所以我干脆辞职让你任命你想要的人。（这里的假设是，普京将和叶利钦一样，把他的接班人任命为总理。）

普京假装对此事无法置喙，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并立即任命了新总理。但普京任命的既不是梅德韦杰夫也不是伊万诺夫，而是他在圣彼得堡的老同事维克托·祖布科夫。他和弗拉德科夫一样沉闷乏味，但普京任总统期间，他几乎一直担任金融监管局这个权力巨大的反洗钱机构的领导，这使他得以掌握精英阶层的金融秘密。没有多少人听说过他，但几天后，66岁的他就宣布他也许要参加总统竞选。

对此大吃一惊的不只是国外观察家。那天我刚巧在莫斯科同瓦尔代俱乐部那群人在一起。我们和伊万诺夫有约，而两个小时前，他刚刚得知这个消息，这说明他并不是内定的接班人。他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但从他的行为举止中看得出来，他和别人一样深为震惊。他的事业本来如日中天，却忽然跌了个嘴啃泥。他说普京根本没有和他讨论过这件事。

那么祖布科夫会是下一位总统吗？只有在普京遵循叶利钦先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普京要另辟蹊径。他和叶利钦不同，他不想任命一个接班人，然后体贴地淡出政治。两天后，普京宣布“至少有5个”合格的候选人。“克里姆林宫学家们”猜想他指的是祖布科夫、伊万诺夫、梅德韦杰夫，还有两个别的人。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消息来源告诉我，这不单纯是为了迷惑评论家而抛出的烟幕弹：普京自己还没拿定主意。

12月2日国家杜马选举后，普京才终于揭晓了他的选择。其实杜马选举的结果——他的统一俄罗斯党毫无悬念地获得了64%的选票——对他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他选定的人既不是祖布科夫，也不是人们压宝的伊万诺夫，而是本来在最后冲刺中似已落败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那又是一场安排好的貌似民主的表演。刚选入国家杜马的4个政党的领导人来找普京，提出梅德韦杰夫的名字。普京故作惊讶地转向恰好在场的梅德韦杰夫：“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他们和你谈过吗？”

“是的，我们初步讨论过。”这位候选人答道。

“好吧，”普京只能同意，“既然代表俄罗斯社会4个不同阶层的4个政党都这么建议……我认识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17年多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密切合作，我举双手支持这个选择。”

第二天，梅德韦杰夫宣布如果他当选，他将任命普京为总理。经过了几个月的混乱和权谋，前面的道路忽然豁然开朗。普京将继续维持他的政治生涯，他将（不动宪法的一字一句）把总理这个职位从弗拉德科夫和祖布科夫在任时清静的闲职变为俄罗斯真正的权力中心。

梅德韦杰夫虽然和普京出生于同一座城市，毕业于同一所法学院，但他比普京年轻13岁，背景也截然不同。他1965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87年大学毕业时正是戈尔巴乔夫力图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民主化的高潮时期。那时的时代精神就是揭露批判普京选择作为自己职业的克格勃。在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真正的选举中，梅德韦杰夫效力于自由派改革者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他的法学教授之一）的竞选运动。索布恰克成为圣彼得堡市长后，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都进入他的对外关系办公室工作——他俩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后来梅德韦杰夫追随普京到了莫斯科，1999年就任普京的

办公厅副主任并负责他2000年的竞选运动。普京当选总统后，任命梅德韦杰夫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又任命他为总统办公厅主任。

普京之所以选中梅德韦杰夫而非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伊万诺夫，大概有几个原因：他没多少个人魅力，自己没有权力基础，比起和普京同属强人集团（可能会想要逐渐把普京挤开）的伊万诺夫来威胁更小，而且对一个矮个子来说相当重要的是——他比普京还要矮。总的来说，比起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不怒自威、曾把康多莉扎·赖斯一把抱起的伊万诺夫，他差得多了。还有一个好处是梅德韦杰夫有思想开明的名声，西方会愿意接受他，可能他可以起到避雷针的作用，暂时缓解普京的压力。今后4年普京要把梅德韦杰夫管紧，并至少保留他自己重返总统大位的可能性。

我们这些倒霉的克里姆林宫公关人员再一次眼看着给西方造成好印象的机会白白失去。两个候选人都是制度内的，对于如何管理经济各有一套意见，在他们中间二选一，这和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并无二致。然而俄罗斯人民却没有机会发表意见。普京的选择是唯一重要的选择。正如普京的朋友，不到一年前被任命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丘洛夫所说，“丘洛夫的第一法则是普京永远正确”。

国家电视台对普京选中的候选人进行了密集报道，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3月2日的选举中理所当然地以70%的票数当选。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赢得近18%的选票，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得了9.5%的选票。“民主”反对派的候选人，前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原已登记参选，但因后来受到指控说支持他参选的许多签名是伪造的而被取消参选资格。

选举结果宣布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身穿皮夹克、牛仔裤，一起走到红场上，梅德韦杰夫竭力模仿着普京大踏步的行姿。他们打断了在圣巴塞尔教堂前举行的摇滚音乐会，梅德韦杰夫做了简短讲话，申明他将继续沿着过去8年的道路走下去。当普京接过话筒赞扬他的爱将时，支持者人群的欢呼淹没了他的声音，人们呼喊着“普京、普京、普京……”没人喊“梅德韦杰夫”。

选举结束了，梅德韦杰夫也于5月宣誓就职。但一个多月以后，依然一片混乱，官僚们都忙着争抢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位子。我在克里姆林宫新闻部所目睹的可能是整个政府情况的缩影：官员们费尽心机揣测真正的权力所在——是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克里姆林宫，还是距离10分钟以外，莫斯科河畔普京总理的政府所在地“白宫”？回想起来，那些去了“白宫”，希望从那里监管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的官员是聪明人。4月，佩斯科夫被普京任命为发言人后，带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参观了一圈作为告别。

“离开这里有什么感想？”

佩斯科夫摸着唇髭说：“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普京为了保持对新总统的控制，做了一系列巧妙的人事安排，佩斯科夫的调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佩斯科夫把他长期的副手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带到了“白宫”做总理新闻办公室主任。在前几任总理手下，这个单位几乎没有事做。是佩斯科夫（而不是总统的新闻秘书）任命了由年轻新人组成的总统新闻团队，并说明他们要听他指挥。普京过去的发言人和盟友格罗莫夫留在了克里姆林宫，被晋升为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办公厅副主任，这是公然企图维持对总统新闻工作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梅德韦杰夫把他竞选时的新闻顾问纳塔利娅·季马科娃留下来做了新闻发言人。她不是佩斯科夫提拔起来的人，而是他的对手，很快她就开始拉拢佩斯科夫在总统新闻办公室安插的队伍。她忠心耿耿的对象不是总理，而是总统。不到一年，裂痕便清晰可见：梅德韦杰夫的团队很快感到他们应该忠于总统，而不是任命他们的人，这原是意料之中的事。后来几年，我强烈感到这两个新闻办公室日益疏远，甚至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计划。

知情人士告诉我，其他部门也有同样的情形，所以，在2010～2011年间，有两套官僚机构互相竞争，双方都知道自己的未来取决于老板，因此都竭力确保自己老板的生存。这种情形是普京所始料未及的。

普京把他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索比亚宁和影响力很大的经济学家伊戈尔·舒瓦洛夫从克里姆林宫带到了“白宫”，但他留下了一些他所信任的高级幕僚以确保在梅德韦杰夫治下的“延续性”。这些人里不仅有负责大众媒体的格罗莫夫，还有担任梅德韦杰夫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的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外交事务顾问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和经济顾问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普京是想把政府的这两个分支紧紧绑在一起，同时确保他安插在克里姆林宫的人掌握大权。但事与愿违，那些人融入了他们的团队，专心为新主人服务。就连“理论家”苏尔科夫也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梅德韦杰夫的新举措，其中有些举措与他原来代表普京宣扬的观点截然相反。

普京总统的遗产

2008年2月8日，竞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普京做了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等于是他对自己成就的评价。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坚称“我们作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国家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然而他详细的阐述听起来却更像是愤愤不平地承认失败：“我们关闭了在古巴和越南的基地。得到的是什么呢？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了新的美军基地。波兰成了新的第三个导弹防御区。”俄罗斯没能阻止美国“以它的导弹防御系统

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因此被迫制造“和别的国家同样，甚至更加先进的新型武器”作为回应。他像是坏了的唱片，一遍又一遍地声明：“不负责任地蛊惑人心，企图分裂社会，凭借外国援助和干涉在俄罗斯进行政治斗争，这些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非法的。”

不过国内的形势却是一片大好。他说俄罗斯现已成为世界上七大经济体之“一。我们的主要成就是实现了稳定。我们为今后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打下了基础。叶利钦时期富饶的俄罗斯一度沦为人民的困苦之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开始实施使国家摆脱危机的方案。我们不懈努力，创立了一套健全的政治制度。金融集团和媒体大亨左右国家决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经济增长是7年来最快的。俄罗斯的外债减少到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过去的两年是俄罗斯“真正的投资繁荣”期，人口出生率也在上升。

普京暗示说某些政治上的限制是有理由的。他说：“政党必须认识到它们对俄罗斯的未来、对社会稳定肩负的巨大责任。把国家推到混乱的边缘无论如何是得不偿失的。”这是在微妙地提醒国人他向他们提出的——其实应该说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似是而非、心照不宣的交易：为了不断增长的繁荣和稳定，必须限制政治自由。

反对派对他说的这两点一一予以驳斥：专制主义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并没有真正取得经济成功，因为早期的自由化改革已经完结。

2008年2月，普京的两个主要政敌——鲍里斯·涅姆佐夫和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发表了一份严词批评普京的报告。他们承认有些官方数据看上去不错：在普京治下，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收入翻了一番还多；贫困减少了，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降至16%（2000年有29%）；预算得到了平衡，黄金储备达到4800亿美元，稳定基金则达到1570亿美元。

但是……这些大部分都要归功于石油价格的飙升，叶利钦时代，石油每桶价格平均为16.7美元，而普京上台后涨到每桶40美元（现在则直逼100美元大关）。报告的作者写道，石油带来的大笔收入没有用来实现经济现代化，进行经济改革，“我们的军队、养老金体系、医疗保健和初级教育在普京任职期间都退步了”。[17]与此同时，腐败猖獗，到了“俄罗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严重程度”，那些没有被普京赶到国外或投入监狱的寡头，牺牲国家利益，自己大发横财。他们说，从苏联解体的崩溃中恢复不是始于普京时代，而是在那之前，在叶利钦任总统的最后几年。普京推行的不是“专制现代化”（若果如此，理论上人们也许还可以原谅他统治下的一些反民主倾向），而是“没有现代化的专制主义”。开明的改革只进行了短短

一段时间即告夭折，取而代之的是“对财产贪婪的再分配，把俄罗斯变成了警察国家”。

就在同时，美国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后来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和凯瑟琳·斯通纳－魏斯在《外交》杂志上撰写的文章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写道，虽然在普京治下国家财政增收，得以及时支付养老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金并增加在道路和教育上的开支，但总的来说国家的表现不佳：“在公共安全、保健、反腐和保障财产权等方面，俄罗斯人民今天的处境其实比10年前更差。”[18]安全这个“国家给人民提供的最基本的保障”恶化了：普京治下恐怖袭击更加频繁；在车臣，军队和平民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战争高得多，而且北高加索地区的冲突还在扩大；谋杀案发案率在上升；俄罗斯每天大约有40人死于火灾——大约为西欧平均火灾死亡人数的10倍。医疗保健开支下降了，人口总数在减少，酒精消费大增，平均寿命也缩短了。“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的安全和健康水平都出现了退步，”麦克福尔和斯通纳－魏斯写道，“同时俄罗斯在经济竞争力、经商环境、透明度和反腐败方面的国际排名也有所下降。”腐败日益加剧，财产权受到破坏：国家一手操纵把尤科斯的资产贱价卖给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也被迫把萨哈林2号项目的多数股权卖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2008年5月7日就任时，俄罗斯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有迹象表明，他同意，或至少理解，对他前任执政记录的批评。他在竞选期间唯一一次讲话的经典语录是“自由比不自由好”，他在就职演讲中保证“真正实现对法律的尊重，克服法律虚无主义”。

在外交事务方面，梅德韦杰夫想迅速打开局面。他（和普京一样）就任后不久就匆匆赶往柏林发表演讲，希望这篇演讲能开辟新的天地。他慷慨激昂地呼吁缔结新的欧洲安全条约。显然（虽然他没有明说）这一新条约将取代所有现存的条约和结盟，使北约和欧安组织成为多余，当然，俄罗斯在新组织里将占据它应得的首席位置。他的建议基本上没人理睬，不仅仅是因为它过于草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主要是因为它与现实脱节：俄罗斯的行事方式仍然使许多人想起苏联。它与邻国打天然气战，对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利特维年科的谋杀案不予追究，欺凌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没人想听这么一个国家就欧洲安全说教。我们凯旋公关提交了备忘录，解释说像这样的外交政策倡议要想得到别国的重视，必须伴以在国内推行自由化，让它成为“一揽子”的一部分。我们指出戈尔巴乔夫成功的原因：他是共产党领导人，但他在军备控制方面做出的姿态得到了重视，因为他开启了开放进程，释放了政治犯。我们告诉克里姆林宫说，只要他们在国内民主上面开倒车，就没人会认真对待他们的安全建议。

也许——希望如此——梅德韦杰夫总统真想在国内进行变革。普京和后来

的梅德韦杰夫费尽力气地证明他们的国家摆脱了苏联的过去，已经变成真正可信任的欧洲民主国家，但2008年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一下子让他们所做的努力前功尽弃。这是俄罗斯自1979年入侵阿富汗以后第一次和邻国发生战争，让所有实现自由化的希望都归于破灭。关于“5天战争”之前的事态发展以及最终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各方众说纷纭，争执不下。激烈的公关战更是进一步扰乱了视听——公关战中格鲁吉亚比俄罗斯灵活得多。下一章我将试着说明当时发生的事——但不敢妄称能提供肯定的回答。

---

[1] Dmitry Peskov,interviewed on Dozhd television,4 October 2011.

[2] US companies are obliged to declare fees received from foreign principals for‘political activities’.For the period January to June2008,the fee declared by Ketchum and its partner The Washington Group for work done in North America and Japan on behalf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as $2,436,600.GPlus received a similar sum for its work in Europe,making a total of almost $5million for that six-month period.The initial contract for the G8year has been rolled over year by year,with the fees for each new contract varying somewhat.

[3] Dmitry Peskov,interviewed on Dozhd television,4 October 2011.

[4] See,for example,*The New Times*,16 March 2009.

[5] See Luke Harding,*Mafia Stat*(London:Guardian Books,2011).

[6] Lilia Shevtsova,*Lonely Power*(Moscow:Carnegie Endowment,2010),pp 98ff.

[7] Interviews with Dan Fata,1 March 2011,and Eric Edelman,4 March 2011.

[8] Dmitri Trenin,‘*Moscow the Muscular*’:*The Loneliness of an Aspiring Power Center*(Moscow:Carnegie Moscow Center Briefing,volume 11,issue 1,January 2009).

[9] Interview with Sergei Prikhodko,30 June 2011.

[10] Off-the-record interview with senior Russian official.

[11]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30 June 2011.

[12] Interview with Stephen Hadley,24 January 2011.

[13] Interview with Eric Edelman,4 March 2011.

[14] Interview with Robert Gates,16 May 2011.

[15] Interview with Sergei Lavrov,25 October 2010.

[16] Interview with Anatoly Antonov,2 April 2011.

[17] Boris Nemtsov and Vladimir Milov,Putin:Itogi(Moscow:Novaya gazeta,2008).

[18]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Foreign Affairs*,volume87,number1,January/February2008.

[19] 这里指主席台上放置的提醒发言人时间的小灯。——译者注

第十章　走向战争

从科索沃到布加勒斯特

2008年2月17日星期日，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占多数的科索沃省宣布独立。第二天美国即予以承认。星期二，一个记者问布什总统："这会不会激怒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其他说你暗中赞成世界各地分裂运动的人呢？"

布什回答说："其实，我们和俄方一直在密切合作……你知道就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都相信，历史将证明这是在巴尔干实现和平的正确办法。"

普京担心的不是巴尔干地区。俄罗斯反对承认科索沃有它自己的理由——与塞尔维亚的"兄弟关系"只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个。现在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无论美国及其盟国如何强调科索沃独立与众不同——它的情况特殊，不构成先例——世界其他要求分裂的民族仍然欢欣鼓舞。如果科索沃人因为"母国"塞尔维亚对他们犯下军事攻击、种族清洗等种种野蛮行为，所以投票赞成独立，从塞尔维亚分离出来，那么车臣人在俄罗斯的处境难道不是一样吗？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不也是一样吗？

俄罗斯当然最不希望助长车臣分裂主义运动，但也谨防鼓励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因为这可能成为前苏联的其他小国遵循的先例，特别是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一连串躁动不宁的穆斯林共和国。在前苏联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集团"独立国家联合体"的一次峰会上，普京总统对科索沃独立的后果发出了毫不含糊的警告："科索沃的先例是可怕的。"他在座位上激动地扭转身子，厉声说道："它实质上打破了运行了不是几十年，而是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体系，这毫无疑问会带来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后果。"

一个月前重新当选的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坐在听众中，听到普京说西方政府这次打错了算盘，紧张得气也喘不上来。普京说："这个大棒有两头，总有一天另一头会反过来砸在他们的脑袋上。"在峰会期间的一次双边会见中，普京试图打消萨卡什维利的担心："我们不会学美国人的样子，不会因为他们承认科索沃独立，我们就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但是萨卡什维利不相信他的话，而且他和普京一样，心里都明白科索沃已经创下了先例，他知道如果不立即行动，这两个要求独立的省可能会效法科索沃。2004年他拿下南奥塞梯的企图以失败告终。自那以后，他在美国的帮助下大大提高了军力。不过如果要冒着同俄罗斯对抗的风险使

用武力夺回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话，他所需要的可远远不止美国的后勤支持。

科索沃独立9天之后，萨卡什维利在一次讲话中解释了格鲁吉亚更加迫切地想加入北约的理由。“我们为什么需要加入北约？”他问道，“因为格鲁吉亚所处的地区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因此需要战略保护，需要得到安全保障。”北约很快要于4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一次关键的峰会，会议将审议是否允许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开始执行“成员行动计划”，这被普遍认为是加入北约的第一步具体行动。为争取支持，萨卡什维利3月飞往华盛顿，在国会大厦及白宫的走廊里和各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大打民主牌。

他满口好话，在摄影机前对布什总统奉承道：“我们的目的是把自由事业进行到底。这是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的价值观，为了美国对于我们所有国家的意义，因为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的是理想主义。”

布什高兴得笑成一朵花，世界上没有人像这个家伙一样这么支持他。总统的欧洲事务顾问戴蒙·威尔逊回忆说：“他棒极了，说得正在点子上。他要总统知道他在任时要把格鲁吉亚建设成一个民主国家。这正是我们想听的话。”[1]

萨卡什维利也得到了他想要的答复。布什对记者说：“我相信加入北约对格鲁吉亚有好处。我已经告诉总统先生我会把这个意思带到布加勒斯特。”

然而，并非所有盟友都如此认为，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萨卡什维利刚抵达华盛顿还没到白宫，就接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电话。萨卡什维利说他见到布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刚才接到咱们共同的朋友安格拉·默克尔的电话，她说，‘我知道你要去见布什谈马上要召开的北约峰会的事。我想亲口告诉你，我们德国的立场是你们还没有达到成员的资格，我们不会支持你们。’”[2]

据目击者说，布什微微一笑，对萨卡什维利说北约成员里有大有小：“你去对付卢森堡，把安格拉交给我。我来对付她。”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法国人和德国人有两个理由认为格鲁吉亚不适合加入北约，而这两个理由都与“姑息俄罗斯”无关：第一，他们觉得吸纳一个国内有像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这样“冻结的”冲突的国家有危险；第二，萨卡什维利的个性和最近的表现令他们不放心，担心他远非乔治·布什眼中的民主主义者。

2007年11月，第比利斯的警察使用暴力驱散规模宏大的反政府示威，反

对派电视台“伊梅季”对此做了全面报道。萨卡什维利随即关闭了这家电视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指控俄罗斯策划政变，企图推翻他。就连白宫对他这种行为也大为惊骇，康多莉扎·赖斯立即派助理马修·布莱扎前往第比利斯对萨卡什维利提出严重警告。

不过华盛顿和柏林之间的默契是不公开表示不满。然而就在萨卡什维利3月与布什见面的几天前，默克尔前往莫斯科，和普京并肩站在一起公开谴责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北约梦，气得美国人火冒三丈。

默克尔绝不能算普京的粉丝。一年前在索契开会时，普京明知道她怕狗，还把爱犬科尼带来，让它围着她的腿嗅来嗅去，把她吓得要死。（默克尔的一位高级助理告诉我，他们把这视为“克格勃典型的威吓手法”。）在民主德国长大的默克尔亲身经历过极权统治，也深深知道普京和民主德国秘密警察“斯塔西”密切合作的过去说明了普京是什么样的人。

不过默克尔确实同意普京的意见，即如果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开启加入北约的进程，将造成和俄罗斯关系的急剧紧张。在莫斯科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普京指出大多数乌克兰公民不想加入北约，还说：“归根结底应该由每个国家自己决定如何最好地确保安全，我们一定会接受乌克兰人民和格鲁吉亚人民做出的任何决定，但必须是人民，而不是政治统治阶层做的决定。”默克尔表示同意地说：“所有未来北约成员的民众都必须支持他们的国家加入北约。”并补充道：“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条件之一是国内没有冲突。我们在讨论中必须考虑这一点，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也会讨论到。”

两天后默克尔在柏林对德国军队高级将领讲话时再次公开表示担心：“我非常严肃地说，我认为纠缠在区域或内部冲突中的国家不能加入北约。我们的联盟是为了保证集体安全，成员国不能连自己的安全也搞不好。”

布什的格鲁吉亚问题顾问戴蒙·威尔逊说，总统认识到必须“亲自私下”找默克尔谈，劝她回心转意。“他认定德国总理是关键，如果能把她争取过来，北约其他的成员就都能解决。”在布加勒斯特峰会之前，布什和默克尔开了好几次视频会议。威尔逊说：“值得注意的是，听她解释以后，我发现她和布什总统关注的问题没有多大的不同。对于乌克兰，我们担心它执政缺乏连贯性，民众不支持它加入北约。对于格鲁吉亚，我们两国深入关注的都是民主机构能否持久、根扎得能有多深。”分歧在于下一步如何做。布什说让格鲁吉亚执行北约的成员行动计划会激励他们“好好干”，而默克尔甚至不愿意开启这个进程。威尔逊说：“她不相信萨卡什维利是民主主义者。”

他们在最后一次视频会议上仍然争执不下。对布什来说，支持脆弱的民主是原则问题，他告诉默克尔他会去布加勒斯特实现这个目的。事后他对助

理们说："好吧。咱们去OK牧场，把枪准备好。"[32]

布什也给其他盟友打电话拉票。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表示支持美国的立场，但法国总统萨科齐却是另外一种态度。美国人从萨科齐的顾问那里得到的反馈使他们顿生警惕。布什联邦安全会议的一位成员说："我们听他们很多人说他们对格鲁吉亚算不算欧洲国家都存疑，更不愿意开始讨论让它加入北约。"

布什和萨科齐亲自交谈后，觉得这个法国人"可以争取过来"，因为他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有"欧洲和大西洋的素质"。但萨科齐也希望布什考虑考虑俄罗斯。据法国总统的外交事务顾问让–大卫·莱维特说，萨科齐"试图对他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德国一致，我们想给俄罗斯时间，让它慢慢明白它的未来其实是和欧洲绑在一起的，它的安全问题不应该把我们分开，而应该把我们连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在成员行动计划的问题上操之过急，虽然应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我们的伙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出积极的信号"。[3]

在和美国总统的谈话中，关于加入北约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意义，萨科齐还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新观点。成员行动计划是"迈进门里的一只脚"，是不可逆转的一步，最终将使它们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然后就不能不想到北约规章中关于共同防卫的第五条。萨科齐问："如果我们的新成员受到攻击，我们愿意派多少部队去支援？"正是为此，法国才倾向于将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这一议题置于真正优先的地位，"使我们大陆上的所有国家对安全问题的看法一致起来"。

即使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疑虑。国防部长盖茨和国务卿赖斯同意欧洲人关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民主的一些关注。盖茨回忆说："我觉得说到改革的进展，这两个国家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4]但最终"自由议程"占了上风。"如果美国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后退，不给它们成员行动计划，"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说，"就会引发联想，等于向俄罗斯人表示他们可以让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永远进不了北约。那不会给欧洲带来稳定，反而只会造成持续的紧张。"[5]

4月2日到4日的布加勒斯特峰会在罗马尼亚前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光怪陆离的宫殿里召开。那是北约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次会议。美国和广泛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东欧国家为一边，对阵被它们称为"姑息"俄罗斯的法国和德国，两边互相指责攻讦，全然不顾外交礼仪。第一天晚上，外长们在晚餐会上讨论峰会要通过的文件，但各方立场南辕北辙。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说他觉得有些"盟友"（指德国人）向俄罗斯人做了承诺，不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执行成员行动计划。[6]

赖斯说她感到东欧的一些官员差不多就要对德国人说："这些国家就是因为德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才遭到暴政压迫的，你们最不应该阻挡它们"。[7]

德国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感到受了侮辱。他争论说高加索地区存在着冲突，北约有被卷入的风险。但是，他说："有人把反对北约扩大比作1938年慕尼黑的绥靖，这种不实不当之词我再也不想听到。"[8]

北约领导人的全会定于第二天早上9点召开，但美国人决定清晨安排早餐会，争取把问题解决掉。参加的有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再加上波兰和罗马尼亚。戴蒙·威尔逊承认他们是为了拉援军："我们认为需要邀请东道国罗马尼亚，邀请波兰人是因为他们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当然，这两个国家也都非常支持我们的立场。"

法国国家安全顾问莱维特记得："他们在凌晨1点和3点两次打电话给我，确认我不会记错早餐会的时间和地点。"但他说早餐会的气氛一点儿也不融洽友好，"反而更像法庭"。他们勉强拼凑了一个案文，说今后一段时期北约会和格鲁吉亚及乌克兰保持"密切接触"，12月将再做进展评估。

9点开会之前，案文散发给了与会者，一些东欧领导人看后勃然大怒。立陶宛、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总统都说他们认为案文"距我们希望的差得很远"。"他们大发雷霆，"哈德利说，"他们认为文件屈服于俄罗斯的压力和反对，一定要改。"北约做决定都是通过协商一致，但领导人们在巨大的圆形会议桌旁就座的时候，连一点儿协商一致的影子也没有。大家仍然在拼命努力达成妥协，但不是在主会场的会议桌旁，而是在会议厅四周厚重的墙幔后面，顾问们和外长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涉、谈判。

哈德利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起接下来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所有外长都起身到会场后面去，他们都是头发花白、西装革履的男人。然后身穿漂亮的青柠色上装的安格拉·默克尔也站起来，走到那些中欧和东欧国家灰白头发的外长们中间坐下。一会儿，打扮得光彩照人的赖斯也到他们后面去了。他们用什么语言交谈呢？当然是俄文！安格拉年轻时在民主德国学过俄文，赖斯做学者研究俄罗斯问题时学会了俄文。"

后来是默克尔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了一句话，最终使协议得以达成："今天我们同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有一天将加入北约。"这句话不提成员行动计划，只声明这两个国家将要加入北约。东欧人抗议说"有一天"等于是"永远不"，于是这个状语被删去了。赖斯离开了几分钟，回来一看既惊且喜："那句话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我想，这结果相当不错，于是去找总统说'接受吧'。"

旋风过后，文件得到通过，戈登·布朗凑近乔治·布什开玩笑地说："我真拿不准我们刚才做了什么。我知道没有给它们成员行动计划，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接纳它们做成员了！"

这一妥协的后果人们到后来才完全意识到。布什和东欧国家满意，因为它保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将加入北约；默克尔满意，因为它只字未提它们什么时候加入；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大体上也满意，但对它们加入北约之日遥遥无期却不太高兴；俄罗斯则暴怒不已。

我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不禁自忖：普京曾经询问过加入北约的事情，如果北约更加认真地对待他这个看似无意的询问，岂不是更好吗？如果北约的盟国们做决定时也让俄罗斯——加上格鲁吉亚与乌克兰——一起参加，而不是明显为了照顾俄罗斯的意见而草率达成妥协却又假装没有顾忌俄罗斯，岂不是更合理吗？

问题的根源

1991年夏我在格鲁吉亚待过几个星期，目击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第一波民族主义的躁动。格鲁吉亚刚刚宣布从苏联独立出来，它的领导人是老一辈民族主义者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像13年后的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一样，加姆萨胡尔季阿要动手限制这两个想留在苏联内的地方的自治权。此举激起了狂暴的反击。

阿布哈兹黑海沿岸的沙滩一度有苏联的"蔚蓝海岸"之誉，现在却荒凉沉寂，因为俄罗斯人不再来了。首府苏呼米似乎做好了暴力来袭的准备，暴力事件也很快发生了。1992～1993年的内战造成了25万格鲁吉亚人（几乎是阿布哈兹一半的人口）蜂拥逃离，剩下的9.3万阿布哈兹人原来仅占人口的18%，现在成了以他们命名的这块土地上主要的群体。这个地区现在享受事实上的独立，由俄罗斯的维和部队和联合国的观察员监督。

小小的南奥塞梯约10万人口，其中奥塞梯人占2/3，那里的内战已经开始。奥塞梯人想要宣布独立，加姆萨胡尔季阿则派格鲁吉亚的国家卫队前去恢复秩序。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战争。我记得进入首府茨欣瓦利的道路空无一人，两头堵着装甲车和用沙袋筑成的工事，工事后面有士兵把守着。那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三两成群的格鲁吉亚难民站在那里，呆望着道路那边自己房屋被焚毁的废墟。有些人在等待军队护送他们经过奥塞梯的领土去格鲁吉亚的村庄。茨欣瓦利仍然到处可见格鲁吉亚其他地方已经清除掉的共产主义标语，那里的一位奥塞梯妇女告诉我的恐怖故事，我后来在前苏联许多其他被蹂躏的地方又多次听到过："格鲁吉亚人不给我们饭吃，他们只顾杀害我们。他们拔掉人的指甲、挖出眼睛、烧毁房

子。”我也听格鲁吉亚人说奥塞梯人犯下了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在一个村子里，人们给我看一辆被烟熏黑的汽车。他们说4名格鲁吉亚人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我在茨欣瓦利的一所学校里看到一处新坟场，安葬着“格鲁吉亚法西斯恐怖受害者”。奥塞梯人的一切供应都经由罗基隧道从北奥塞梯运来。我当时写道“难以想象这两个族群能够再和平共处”。[9]

这以后的17年间，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作为单独的实体存在着，同格鲁吉亚的关系紧张而又脆弱，对俄罗斯的依赖则越来越强。在普京治下，它们的无国籍公民拿到了俄罗斯护照。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一样，也受俄罗斯领导的维和部队的巡逻监督。欧安组织的观察员努力控制着麻烦，使其不致爆发。

按照逻辑，普京和萨卡什维利对待这些“冻结的冲突”本应站在一起。俄罗斯支持这些地区运动，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像它们要求的那样予以承认，普京一点也不想因承认它们而使科索沃的先例后有来者。那样的话他对车臣分裂主义运动可就无话可说了。普京希望的结果是通过谈判让这两个地区在自治有适当保证的情况下重回格鲁吉亚。但另一方面，他不愿，也不能允许用武力收回它们。

冲向战争

2008年1月，萨卡什维利在竞选连任时发誓要光复这两个地区。他称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为一颗“该拔掉的松动的牙”，并保证“最多数月内”把它夺回。[10]

科索沃的先例和布加勒斯特峰会模棱两可的决定似乎成了对他的鞭策。可能他决定必须尽快解决“冻结的冲突”，因为它们是加入北约的主要障碍。布加勒斯特峰会结束的第二天，瑞典外相卡尔·比尔特在第比利斯同萨卡什维利共进晚餐，听到他说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夺回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震惊之余打电话向他的美国同事发出警示。布什听了比尔特传来的消息后打电话给萨卡什维利说：“亲爱的朋友，我把话讲明了：我们绝不会支持你。是的，你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尊重你。但如果你率先使用武力，你将得不到美国的支持。”

有人说萨卡什维利3月出访华盛顿时得到了错误的印象，以为布什总统对他收复叛乱的共和国开了绿灯。戴蒙·威尔逊坚决否认布什对军事行动给过任何鼓励。“总统的话不可能说得更清楚了，他强调军事行动完全不可行。他鼓励萨卡什维利走外交途径，还告诫他不要自作主张贸然行

动。”[11]

可萨卡什维利对外交途径失去了信心。布加勒斯特峰会召开几周前，俄罗斯国家杜马宣布：“格鲁吉亚当局走向完全融入北约的道路，使格鲁吉亚丧失了整合它的领土以及生活在其领土上的人民的权力。”然后，俄罗斯于4月16日突然“升级”与这两块领土的外交关系。这两项举动俨如协同攻略，似乎意在防止格鲁吉亚整合这两块领土，甚至要吞并它们。一位分析俄罗斯军事形势的专家帕维尔·费尔根豪尔说，莫斯科就是在这时决定打仗的：“目标是摧毁格鲁吉亚的中央政府，防止格鲁吉亚加入北约。”[12]

第比利斯明显也是这么认为的，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开始摩拳擦掌。一位美国高级官员4月份和格鲁吉亚负责安全的部长们谈过一次话，他们说：“俄罗斯人已经要动手了。他们正在集结部队，准备进入我国。我们格鲁吉亚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我们觉得与其坐等他们打过来，不如先发制人。”

那位美国官员的反应是：“你们知道那是自杀。”

格鲁吉亚人答道：“如果他们越过红线，也许我们宁愿像真正的爱国者，像真正的格鲁吉亚男子汉那样死去。”

2008年的整个春天，俄格双方都说对方即将发起进攻——爆发点似乎会是阿布哈兹而不是南奥塞梯。俄罗斯向那里派去了增援部队，格鲁吉亚也在它控制的上科多里河谷加强了兵力。格方的大黄蜂无人驾驶侦察机飞越阿布哈兹上空监督俄军的动向。阿布哈兹称格鲁吉亚为侵犯主权，俄罗斯的战斗机还击落了几架格方侦察机。4月底，俄罗斯外交部声称格鲁吉亚计划对阿布哈兹进行军事干预，俄罗斯发誓要动用“一切”资源保护这两块有争议地区内的俄罗斯公民。5月初，赖斯对阿布哈兹俄军力量的增加表示关切，一周后，格鲁吉亚公开了侦察机拍摄的录像，证实了俄罗斯部队和军事设备在阿布哈兹的行动和部署。

5月底，俄罗斯宣布派遣400人“不带武器的”部队去阿布哈兹修复铁路线。格方认为这证明他们要准备入侵了，于是领导层开始激烈讨论何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他们中间的三个成员在后来的采访中回顾了他们当时的观点。副外长博凯里亚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即使我们不能肯定是否会遭到大规模入侵，我们作为主权国家到什么时候才不得不出手？”[13]国防部副部长巴图·库特利亚说：“我们的国民需要知道格鲁吉亚可以保护他们，格鲁吉亚可以对人民的担心做出反应，国家将动用一切资源来消灭这一威胁。”[14]格鲁吉亚议会议长布尔贾纳泽建议谨慎克制：“有些人想说服总统和我，说俄罗斯的坦克都老旧生锈了，而我们有现代化的装备，格鲁吉亚一夜之间就能打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几乎所有成员都想对阿布哈兹发动军事行动。”[15]

萨卡什维利总统尽管热切希望收复“失地”，但决定最后再试一次外交途径。毕竟俄罗斯总统现在换成了梅德韦杰夫，就连普京总理发出的信号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在俄罗斯派军队进入阿布哈兹修铁路时，法国报纸《世界报》问普京，对萨卡什维利“给予阿布哈兹空前自治”并“把格鲁吉亚一个国家副总统的职位留给阿布哈兹人”的和平计划有何想法。“我非常希望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建议的计划能逐步得以执行，”普京回答说，“因为它总的来说是个好计划。”

几天后，在6月6日圣彼得堡的前苏联国家峰会上，萨卡什维利和梅德韦杰夫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两人似乎都是抱着积极态度而来，好像真的要从头开始一样。梅德韦杰夫说：“我想我们能够解决当今面临的一切困难，找到长期的解决办法。你觉得呢？”

“我同意，”萨卡什维利答道，“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没有哪个是解决不了的。”

萨卡什维利后来回想那次会面说：“他的作风似乎和普京截然不同。他坦率开放，很有吸引力。”（萨卡什维利第一次见到普京时也是这个印象。）梅德韦杰夫解释说这些局势是他“继承的，不是他开始的”，并表示愿意“在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框架内”[16]解决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冲突，萨卡什维利听后深感鼓舞。这等于保证俄罗斯不打算吞并这两个地区，而且把它们视为格鲁吉亚的一部分。

萨卡什维利说那次会见使他“充满希望”，梅德韦杰夫还建议在索契见面“坐下来研究各种可能性”。但谢尔盖·拉夫罗夫指出，有一点萨卡什维利没有说，那就是俄罗斯提出，鉴于格鲁吉亚明确宣布打算收回这两块领土，所以如果想取得任何进展，前提是它应该签署一份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书。梅德韦杰夫的外交事务顾问谢尔盖·普里霍季科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这里面的关键是我们建议起草一份不使用武力的文件，连签署的地点都提出来了，就在索契。我记得，萨卡什维利的反应相当积极。”[17]

但不使用武力协定成了后来几个月困扰两国关系的难题。萨卡什维利说俄罗斯人想让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签署这样一份协定——由俄罗斯做担保。在他看来，这就像是“让狐狸守卫鸡窝”。他只同意和俄罗斯签署不使用武力协定，但俄方的回答是：我们为什么要签？我们又不是在那里作战，只是维持和平。

两人都认为，在他们的分歧缩小到能够产生实际结果之前，会面没有意义。6月中旬，他们交换了秘密信件。我后来看到了这些信件的内容。萨卡什维利在给梅德韦杰夫的信中提出了几个他自以为有助于缓和阿布哈兹紧张局势的建议，但他的信和梅德韦杰夫的回信显示出双方存在根本性分

歧。萨卡什维利建议俄罗斯维和部队撤出阿布哈兹离格鲁吉亚最近的地区（加利和奥恰姆奇拉），让格鲁吉亚难民回来，由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共同管理这两个地区，在这之后（萨卡什维利估计要到12月份）才能就不使用武力和格鲁吉亚难民回到阿布哈兹的其他地方达成协议。作为甜头，萨卡什维利提出格鲁吉亚愿意帮助筹备将要在阿布哈兹以北的索契举行的2014年冬奥会。但与此同时，他要求俄罗斯“迅速撤回”军事增援，还要宣布普京4月16日发出的关于升级同这两个闹独立的地区关系的指令无效。梅德韦杰夫在回信中欢迎他帮助筹备索契冬奥会，但礼貌地拒绝了其他建议，认为它们形同画饼。他说，难以想象阿布哈兹的任何地方能让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联合管理，谈论难民回归也为时太早。当务之急是格鲁吉亚应真正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最重要的是同阿布哈兹签署不使用武力协定，把格鲁吉亚军队撤出科多里河谷。梅德韦杰夫说如果萨卡什维利同意这样做，他们可以在7月或8月召开一次峰会签署相关文件。

俄罗斯还试图借力美国，让美国人向他们的盟友施压。拉夫罗夫打电话给赖斯说：“萨卡什维利在玩火，别让他冒险。说服他签署不使用武力协定。”

据拉夫罗夫说，赖斯的回答是：“谢尔盖，别担心。他想加入北约。他很清楚，如果他使用武力，加入北约的事就想也别想了。”赖斯也记得那次谈话。她说她甚至补充道：“如果他们使用武力，加入北约就得等到下一代了。”但她也告诉俄方，他们的威胁行动如果使萨卡什维利签署不使用武力协定，他们就难以向国内交代。

在开战已成定局之前，梅德韦杰夫和萨卡什维利又见了一次面。那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一个暑气逼人的星期六晚上。第二天，7月6日，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生日，他从许多国家请来贵宾到一家高级夜总会庆祝。梅德韦杰夫谢绝了萨卡什维利和他举行正式会谈的要求，但这个格鲁吉亚人几次找上他。事后梅德韦杰夫回忆说：“很难躲开他，因为如果他想抓住你，他会黏住不放！我们在大巴上谈，在公园散步时谈，晚上出去喝茶喝酒……坐在沙发上不停地谈以后开会的事情。”

当事二人对那次谈话的回忆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既然那似乎是一个关键时刻，标志着双方沟通破裂，一个月之后战争即告爆发，所以我应该把他们二人的两种说法都写下来。

萨卡什维利说他催促俄方按在圣彼得堡商量好的安排在索契召开后续峰会，但梅德韦杰夫闪烁其词，暗示他做不了主：“他说，‘你知道，我在这里见到你非常高兴，我们听同样的音乐，喜欢同样的社交环境，彼此相处很自在。在许多方面，咱俩的背景是一样的，但莫斯科另有一套游戏规则，如果我现在急着和你开会，会遭到误解。’”

“我说，‘开会总比不开强，我们应当作成点儿事。’但他说，‘现在开会你会失望的，因为我们达不成任何结果，可能还不如以前。’我对他说，‘德米特里，你得了吧，还有什么能比我们现在的情形更坏呢？我们每天都受到挑衅，局势真的要失控了，各种事件不断发生，情况不可能再糟了。’听到这儿他打断了我的话，‘你错了。你很快就会看到事情可能会糟糕得多。’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

必须强调，萨卡什维利说这些话是事后诸葛——是在时隔一个月战争已然爆发后说的。也必须记住，他要按对他有利的方式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他这番话包含了两个有意思的内容：第一，梅德韦杰夫表示他并不完全掌控政策（鉴于梅德韦杰夫刚刚上任两个月，这点是可信的）；第二，梅德韦杰夫阴沉地暗示俄罗斯在计划军事行动（虽然他的话也可以简单地解读为局势正在失控）。把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拼凑在一起时，重要的一点是萨卡什维利把梅德韦杰夫的话理解为威胁——也许这促使他先发制人予以阻止。

萨卡什维利所述在夜总会和梅德韦杰夫见面的故事结尾处相当夸张。“我显然看上去很紧张。纳扎尔巴耶夫走过来说，‘米沙，你怎么啦？我从来没见过你的脸色这么苍白——他跟你说什么啦？’我说，‘没什么。’然后他说，‘别担心，事情会解决的，你得给他点儿时间，我相信你能找到办法。’”[18]

战争过去三年后，萨卡什维利在接受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采访时说，阿斯塔纳之行后他多次给梅德韦杰夫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总是：“等着吧，到时候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萨卡什维利认为梅德韦杰夫避而不见就证明了“他不想再进行认真的谈话”，因为“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19]

梅德韦杰夫的说法则完全不同。他说他们二人确实同意在索契再次会面“认真讨论问题”，但此后萨卡什维利却奇异地沉默了。“我可以认真地告诉你，后来的一个月中我经常查问我们的格鲁吉亚同事有什么反馈，结果什么也没有。”梅德韦杰夫和其他三位俄罗斯高官在采访中特别指出（显然这是他们后来内部讨论后得出的结论）：4天后康多莉扎·赖斯访问了第比利斯，之后萨卡什维利不知为何陷入了沉默。梅德韦杰夫说：“那次访问后，萨卡什维利干脆停止了和我们的一切沟通。他不再理睬我们，不写信，也不打电话。显然他有了新的计划。”[20]

无可否认，赖斯在访问期间发出的信号互相矛盾——她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她7月9日飞到格鲁吉亚。前一天，俄罗斯又进行了武力恫吓。他们的战斗机飞越南奥塞梯，用外交部的话说，为了“让第比利斯头脑发热的人冷静一下”。赖斯和萨卡什维利在科帕拉餐馆俯瞰姆特科瓦里河的阳台上用餐时，再次坚持要求他放弃使用武力。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他说，“我一点儿好处也得不到。”

赖斯答道：“你只能那么做，别无选择……如果你们和俄罗斯军队打起来，没人会帮助你们，你们会打败。”[21]然而，虽然她私下里谈话强硬，她的公开讲话却可能使萨卡什维利认为是对他计划的鼓励。离开第比利斯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赖斯强烈支持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并批评俄罗斯，还说：“我们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帮助盟国自卫的义务，这一点所有人都要明白。”赖斯接受采访时说那不是随随便便的保证：“一定要让格鲁吉亚人知道，他们若是遇到了困难，如果俄罗斯人不履行他们自己的义务，美国会站在他们一边。我有意在媒体前说美国将站在格鲁吉亚一边。”

看来俄罗斯相信萨卡什维利从中听到了他需要的鼓励。梅德韦杰夫说：“我不相信美国人真的怂恿格鲁吉亚总统入侵，但我相信有一些微妙的暗示……满足了萨卡什维利希望美国在任何冲突中都支持他的心愿。在政治中，隐含的暗示和微妙的含义非常重要。”

简言之，梅德韦杰夫相信萨卡什维利听了赖斯的话大受鼓舞，决定出兵南奥塞梯，这才停止了和俄罗斯的沟通。萨卡什维利则相信梅德韦杰夫停止沟通是因为普京已经决定出兵格鲁吉亚，所以要他闭嘴。无论真相如何，双方一旦陷入沉默，通过外交避免战争也就希望渺茫了。

几天后，俄军第58军开始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有8000名士兵、700辆军车和30架飞机参加。与此同时，1630名美国和格鲁吉亚军人在格鲁吉亚举行了代号为“立即反应2008”的联合军演。令人吃惊的是，尽管南奥塞梯局势紧张，小冲突不断，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领导人似乎都觉得，形势还没有紧张到让他们放弃休假的程度。一位7月份出访第比利斯的美国高级官员回忆起和格鲁吉亚领导人一起进餐的情形，他们都马上要去度假，萨卡什维利要去意大利的一个保健疗养中心，副外长博凯里亚要去西班牙。“他们都很开心，完全放松，一边互相拥抱一边说‘一个月或3周后再见，可别想工作的事！’”

8月的第一周，俄罗斯领导层也几乎全体去度假了。就在此时，南奥塞梯爆发了格鲁吉亚和奥塞梯人之间4年来最激烈的冲突。几天内，上千的奥塞梯人拖家带口逃到北奥塞梯寻求安全。8月5日星期三，一位俄罗斯政府官员阴郁地告诉我，不是战争“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战争一定会发生”。战争最后爆发是在8月7日到8日的夜间。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发动大规模攻击，接着是俄罗斯军队直插格鲁吉亚腹地，远远越过有争议地区的界限。俄格战争至少刚开始时外界几乎普遍认为责任在俄罗斯，这场战争被比作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的名声因此而遭到重大打击。然而调查这场战争的欧盟委员会在确定责任方面更为公

允，它得出的结论是格鲁吉亚是先发动侵略的一方，使用了“按照国际法无可辩解的”武力。报告也说双方事先都加剧了紧张的局面，俄罗斯反应过度，“超过了自卫的合理界限”。

战争及其后果

8月7日晚19点，萨卡什维利总统宣布停火，但接着又命令军队于23点35分进攻茨欣瓦利。格鲁吉亚军队使用坦克、榴弹炮和冰雹多管火箭炮发动大规模炮轰，把茨欣瓦利的大片城区夷为平地，造成许多平民伤亡。格鲁吉亚地面部队随之开进。许多因普京的“护照化”政策而成了俄罗斯公民的奥塞梯人被杀死，有些俄罗斯维和部队士兵也死于炮火。俄罗斯声称这是“种族灭绝”，说格鲁吉亚的进攻杀死了2000名平民，这一数字后来证明被严重夸大。第二天，几百辆俄军坦克经罗基隧道拥入南奥塞梯，伴以强力空中支持。后来5天内4万俄罗斯军队进入格鲁吉亚，一半经由南奥塞梯，另一半经由阿布哈兹。俄军很快把格鲁吉亚军队赶出了茨欣瓦利，随即挥师进入格鲁吉亚本土，炮轰哥里市，攻击各地的机场和军事基地，甚至摧毁了在争议地区许多英里以外的波季港。随着俄军向南面的首都第比利斯挺进，几十万格鲁吉亚人逃离家园。在已成空城的哥里，南奥塞梯的民兵横冲直撞，俄罗斯部队则听之任之。最后，国际外交活动促成了敌对行动的中止，俄军也停止了前进。5天的战争造成850人死亡，3.5万人流离失所。

这些是基本事实，但这一切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问题。对茨欣瓦利先行发动攻击后不久，格鲁吉亚军队的指挥官马姆卡·库拉什维利对记者说，格鲁吉亚“决定在整个地区恢复宪政秩序”，这似乎证实萨卡什维利总统决心一偿他重新征服南奥塞梯的夙愿。后来据称这项声明未经授权，虽然萨卡什维利亲口宣布“茨欣瓦利的一大部分现在解放了”。事后，格方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们诉诸武力只是为了对抗已经开始大规模入侵的俄罗斯军队，但多数观察员（包括欧盟委员会）都说没有证据表明格鲁吉亚攻击前那几个小时有任何大规模的入侵。事实上，萨卡什维利本人当时也没有做这样的指控，8月8日，格鲁吉亚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说：“那天5点30分，第一批俄罗斯军队通过罗基隧道进入南奥塞梯。”两年后，格鲁吉亚政府的几位官员在采访中被问到事态发展的时间时好像都糊里糊涂，说不明白。

格鲁吉亚先发动攻击，目的是夺回南奥塞梯而不是打退俄罗斯的进攻，这一点可由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和格鲁吉亚外长艾卡·特克舍拉什维利在进攻茨欣瓦利前一天的谈话来证明。“艾卡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要在整个南奥塞梯建立宪政权威。我的理解是他们要打进去。我警告她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要特别小心，因为失去冷静会带来可怕的后

果。”[22]

当时，梅德韦杰夫总统正在伏尔加河的游艇上度假，普京总理在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拉夫罗夫外长在俄罗斯中部地区（离莫斯科4个半小时的飞行距离）。他们都不得不赶回莫斯科去应对这场危机，这也说明俄罗斯猝不及防，攻击不是它挑起的——尽管它的军队显然准备充分，来之能战。

那么这场战争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打响呢？就在大约一周前，格鲁吉亚的领导人们还在度假。他们最精良的部队派驻在伊拉克。虽然萨卡什维利想收回失去的领土，但他似乎还是想给外交手段最后一次机会。就在8月7日，格鲁吉亚方面的谈判代表雅科巴什维利还去茨欣瓦利参加计划好的会谈，但会谈没有举行（因为南奥塞梯方面拒绝参加，俄罗斯的特使也没有到场，说他的汽车轮胎爆了）。俄罗斯确实一直在进行武力恫吓，但目的主要是吓阻格鲁吉亚的进攻，不是自己想发起进攻。事实上，莫斯科进攻格鲁吉亚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虽然有相反的说法）它从来没有表示出任何想吞并，或者哪怕承认这两个地区的意愿。它重创格鲁吉亚，后来又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为“独立国家”，这些是后来的事，不应当用它们作为证据追溯为俄罗斯的一贯意图。

在我看来，直到战斗打响的前夜，双方还都没有认真计划打仗（尽管它们都在备战）。那就是说，致命的决定是萨卡什维利和他几个最紧密的顾问在最后一刻做出的。可能他们觉得全世界都在聚焦北京奥运会，无暇他顾；可能他们仔细权衡了最近美国人说的话后认为，基本上美国是支持他们的；可能他们真的接到情报（哪怕是假情报）说俄军已经从罗基隧道蜂拥而入；可能他们认为俄方和南奥塞梯方没有和他们的谈判代表会谈是凶兆，梅德韦杰夫的回避推托和关于“事情会更糟”的暗示是威胁；可能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抓住他们心目中夺回南奥塞梯的天赐良机。不管原因为何，开战的决定都证实了萨卡什维利的美国同僚和其他西方同僚最大的担心——他们喜欢他，尊重他，对他在民主方面的表现赞赏有加，但也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反复无常、任性冲动，甚至他精神上的不稳定。关于那场战争，一幕长久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图景是英国广播公司摄影机前的萨卡什维利，电视上，正在等待接受现场直播采访的他紧张得把领带的一头直往嘴里塞。俄罗斯马上抓住此事，说这证明他“精神失常”。萨卡什维利的许多西方同僚也有同样的担心。在安格拉·默克尔和他讨论和平解决的会谈中，他极度狂躁激动，拿着空杯子喝水，还把一瓶水打翻在桌子上。

战争打响几周前的一个深夜，一位和萨卡什维利极为亲密的美国高级官员在第比利斯目睹了一次高层聚会。“我当时觉得，怎么能用如此闹闹哄哄、毫无章法的方式做出重要的决定。但那是格鲁吉亚人做事的方式，至少是那群人的做事方式。他们没有喝醉，也不是幼稚或者愚蠢，就是东拉

西扯地闲聊。我进去时他们说：‘你们说我们没有机构间协调进程，这就是我们的进程。要喝点儿酒吗？’”

虽然是格鲁吉亚点燃了导火索，但在熊熊战火中俄罗斯却被千夫所指，部分的原因是舆论受到最初国际电视媒体对战争报道的影响。电视上几乎看不到格鲁吉亚对茨欣瓦利的轰炸和破坏的画面，却有大量的图像显示俄罗斯后来对哥里的轰炸。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俄罗斯不准记者进入南奥塞梯，而格鲁吉亚则积极鼓励媒体去哥里。英国广播公司的外国新闻编辑约翰·威廉斯在博客中写道：“安全情况不允许我们从第比利斯前往南奥塞梯的茨欣瓦利这个据俄罗斯说被格鲁吉亚人摧毁的城市。直到星期三——第一枪打响6天后——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组才能去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也是在俄罗斯官员的陪同下。”

战争中公关顾问的作用在很多文章中得到大肆渲染。其实，格鲁吉亚的主要法宝是萨卡什维利总统本人，他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法文不停地接受采访——我猜想这一定不需要他的西方公关团队催促。而另一方面，莫斯科却坚决拒绝公关顾问关于允许记者去南奥塞梯的请求，后来很晚的时候才派会讲英文的人接受像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样的电视台的采访。

但俄罗斯而非格鲁吉亚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是：无论怎样，它入侵了一个独立的邻国，目的是阻止那个国家做一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事情，即（尽管是以残暴的方式）恢复自己的领土完整，正如俄罗斯恢复了它对车臣的管辖一样。俄罗斯领导人看不到两者的相同之处。他们指责西方容忍格鲁吉亚的侵略，却忘记了西方总的来说也容忍了俄罗斯对车臣残暴得多的攻击。两者在西方看来都是内部事务，攻击外国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俄罗斯《新报》记者安德烈·克列斯尼科夫所说：“俄罗斯好像把自己当成母国，把格鲁吉亚当成是叛乱的偏远省份。”

结果是格鲁吉亚这个主权国家被肢解，几十万人，主要是格鲁吉亚人，被迫离开几世纪来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在阿布哈兹，俄罗斯等于把这块经过种族清洗不再有格鲁吉亚人居住的土地交给了一个1991年前只占人口1/5的民族。[23]格鲁吉亚领土的1/6现处于俄军控制之下。

格鲁吉亚发起进攻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普京在北京会见了布什总统和萨科齐总统。他们二人都劝俄罗斯在反应时保持克制，但都遭到断然拒绝。普京已经不再是三军总司令了，但他表现得好像他还在那个位子上。萨科齐把儿子路易介绍给普京，普京热情拥抱了他——但那是普京最后的友好表示。萨科齐的助理让–大卫·莱维特记得他的老板竭力劝和。“他对普京说，‘听我说，我现在是欧盟主席，我可以让欧盟尽全力阻止这场战争，它对俄罗斯、对欧洲、对俄罗斯和欧洲的合作都是灾难性的。可是弗拉基米

尔，我需要48小时才能做到。’回答是什么呢？‘不行。’于是萨科齐总统说，‘等一下，弗拉基米尔，你想过这会有什么影响吗？至少给我24小时。’‘不行，不可能。’总统说，‘那么，到晚上8点吧。’‘不行。’”[24]

不过俄罗斯出兵是梅德韦杰夫决定的。他说他在头24小时内甚至没有和普京讨论过这件事，因为没有通往北京的安全的电话线，这话有些让人难以置信。梅德韦杰夫说他被国防部长叫醒，听他报告说茨欣瓦利受到攻击，但希望那只是挑衅而已。他是听说一座住满俄罗斯维和士兵的帐篷被击中，里面的人全部死亡后，才下令反击的。如果有谁以为比起硬汉普京，梅德韦杰夫是个“软柿子”，那可是大错特错。是总统（据他自己说）下令出兵的——他甚至没有和联邦安全会议商量。最终联邦安全会议开了会，支持了他的决定，但这时普京还没有从中国回来。普京终于回来后，先是飞往北奥塞梯的弗拉季卡夫卡兹视察当地形势，然后才去索契见梅德韦杰夫，和他进行商讨。[25]

开战第二天，俄军出动120架轰炸机去摧毁格鲁吉亚的基础防御设施，包括从美国、以色列和乌克兰那里买来的崭新装备。

一天后，和姨妈及妹妹刚开始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绿蔷薇豪华度假村度假的赖斯打电话给拉夫罗夫，要求停止入侵。那次对话引起了双方的一次大争执。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有三个条件：

“第一，格鲁吉亚军队必须回到营房中去。”

赖斯说，“行。”

“第二，他们必须签署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书。”

“行。”

“第三，就我们两个人知道，萨卡什维利必须下台。”

赖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谢尔盖，美国国务卿和俄罗斯外交部长不能私下谈论推翻一个民选总统。”[26]

她认为这是俄罗斯威胁要在格鲁吉亚实现政权更迭，决定把此事公之于众。8月10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卡里扎德宣布：“拉夫罗夫外长对国务卿说格鲁吉亚民主选举的总统——我引证——‘萨卡什维利必须下台。’——引证完。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出格言辞。”

拉夫罗夫非常生气。他在采访中说：“把和伙伴讨论的事情向全世界公布，这不是我们的外交做法。”不过他并未完全否认他说了那样的话，只

是坚持说他的意思不过是“我们再也不和他打交道了”。[27]

到8月11日，格鲁吉亚人看到哥里受到轰炸，城里的民众被全部赶出，相信俄罗斯军队准备向首都第比利斯进发。总统办公楼里一片惊慌：油画从墙上摘了下来，文件塞进箱子准备快速撤退。卡尔·比尔特和美国特使布莱扎当时在场，他们估计再有半个小时俄军就要进城了。

萨卡什维利请求布什总统施以援手，认为那是布什答应过的。“我对他说，‘你看，就在你的总统任内，苏联可能会死灰复燃，可能会在我的国家东山再起。那将是历史上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当然如此，因为我们就要完了——但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也是一样。’”[28]

他说俄罗斯即将进入他的首都，把格鲁吉亚并入某种新形式的苏联。这可以视为他偏执妄想，为达目的危言耸听，或狡猾地企图掩盖他自己做出的灾难性的开战决定。但晚些时候梅德韦杰夫间接地证实了他的话，说虽然“我们当时的任务是摧毁格鲁吉亚的战争机器”，但也考虑过更彻底的办法：“萨卡什维利应该感激我命令我们的部队停止前进。如果他们开进第比利斯，现在格鲁吉亚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总统了。”

华盛顿对这个威胁相当认真，尤其是鉴于拉夫罗夫此前对赖斯说过的那番话。布什召集了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回忆说：“情报室里几乎所有人都明确认为俄罗斯公然侵略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并要着手肢解它。”[29]

美国人甚至考虑亲自进行军事干预。据国务卿赖斯说：“大家有些慷慨激昂，讨论了我们该怎么做，如何用军事手段向俄罗斯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干蠢事。”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说：“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投入作战部队？如果要拯救第比利斯就需要地面部队。”[30]

但那就要冒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国家发生冲突的风险，对此盖茨力促谨慎：“我非常坚定地主张不给萨卡什维利武器援助。我当时的看法是俄罗斯人在陷阱里放了诱饵，萨卡什维利直接跳进去了，所以双方都有责任。”

最终，俄军停战回师，美国不再需要考虑军事回应。美国派海军运输机飞到第比利斯机场，并派战舰通过黑海驶到巴图米港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就连这也引起了俄罗斯的愤怒），但决定借助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尽管他们对萨科齐总统的能力颇感怀疑，但还是决定让时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领导做外交努力。

虽然俄罗斯人当时坚持只有梅德韦杰夫一人同萨科齐会谈，但普京也在，不用说是唱黑脸的。在一次会谈中他宣称要揪掉萨卡什维利的鸟毛。（俄方否认此事，但后来普京本人间接承认他说了这话。）[31]

萨科齐来会谈时带了一份协议草案，拉夫罗夫说："我们改了一点。"事实上，这份包括6点内容的文件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第一句成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部队将完全撤离"。

萨科齐的助理让–大卫·莱维特回忆说："他们把逻辑全部改过，不再是停火，不再是撤军，而基本上成了对格鲁吉亚的勒令。"

用梅德韦杰夫的助理谢尔盖·普里霍季科的话说，萨科齐"难对付，非常难对付"。他最后对俄罗斯人的谈判手法失去了耐性，说："好了，我们对这份草案一直在来来回回说同样的话，我现在拿起笔来写一个新案文。好，首先冲突各方同意不使用武力。同意不同意？同意。"

下面还有5点：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自由通行，格鲁吉亚部队撤回原来的基地，俄罗斯部队撤回战事爆发前的阵地，就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未来地位举行国际谈判。

第五点包括一条额外条款，不久后就引起了麻烦。"在建立国际机制之前"，俄罗斯"维和人员"将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这条规定伸缩空间很大，俄罗斯在和平协议生效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它为依据在大片的安全区内，甚至在格鲁吉亚本土的某些部分维持驻军。

萨科齐带着文件飞往第比利斯。萨卡什维利拒绝接受的却是第六点，因为"未来地位谈判"似乎把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作为未定问题。拉夫罗夫接受采访时说，放入"就这两个地区的地位举行国际谈判"这一条款的目的就在于表明俄罗斯无意单方面承认它们。但萨卡什维利坚持他的意见。萨科齐半夜给莫斯科的梅德韦杰夫打了电话后，把这点改为：就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举行谈判"。从那以后，这样的谈判在日内瓦时断时续，未见任何成果。

但萨卡什维利大头已经输掉了。8月26日，梅德韦杰夫总统突然宣布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这两个新生的国家后来只得到了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太平洋岛国瑙鲁的承认，就连俄罗斯的前苏联盟国都不愿意承认。俄罗斯终于接受了科索沃的先例（当然不是接受科索沃本身）。这使全世界以为它下一步就要吞并这两个国家，而且一直就是这么打算的。

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对现在的状况感到高兴的俄罗斯人。确实，格鲁吉亚

加入北约的梦想彻底破灭了。确实，俄罗斯可以说“增强了安全”，现正在阿布哈兹修建新的海军基地。但毋庸置疑，如果和格鲁吉亚建立和平的关系，对俄罗斯的安全会更有利。

归根结底，格鲁吉亚的悲剧和它与俄罗斯的战争可能都源于一个反复无常、自欺妄想的人的个人悲剧。曾是萨卡什维利紧密同盟的尼诺·布尔贾纳泽说他“贸然宣战，坚信他能打败俄罗斯军队”。“我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战争开始5天前，我对他说：‘如果你挑起战争，我的国家就完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可是，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萨卡什维利在西方的支持者，特别是美国，一边告诫他不要发动战争，一边又任凭他幻想他能够全身而退。安格拉·默克尔和别人知道他狂躁冲动，但北约却鲁莽地坚持答应让他的国家（和乌克兰）加入——即使这样做使俄罗斯感到不安全。直至今日，也没人认真地设想过未来欧洲和北美所有国家可以共同努力确保安全，只想着把有些国家的安全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安全的基础上。

本章描述的事件比过去12年间的任何事件都更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和西方彼此互不理解，不考虑对方的关切和担心。布什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普京暴跳如雷、威胁恫吓。美国说俄罗斯必须放弃它“周边”的“势力范围”，俄罗斯说美国别以为自己是世界霸主。布什指责普京是专制主义，普京指责布什是冷战思维。两人都没说错，结果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

[1] Interview with Damon Wilson,2 March 2011.

[2] Interview with Mikheil Saakashvili,31 March 2011.

[3] Interview with Jean-David Levitte,12 March 2011.

[4] Interview with Robert Gates,16 May 2011.

[5] Interview with Stephen Hadley,24 January 2011.

[6] Interview with Radoslaw Sikorski,25 November 2010.

[7]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20 June 2011.

[8] Interview with Frank-Walter Steinmeier,20 June 2011.

[9] Angus Roxburgh,‘Georgia Fights for Nationhood’,*National Geographic*,volume181,number5,May1992.

[10] Quoted in Thomas de Waal,*The Caucasus:An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208.

[11] Interview with Damon Wilson,2 March 2011.

[12] http://www.rferl.org/content/Did_Russia_Plan_Its_War_In_Georgia__/1191460.html(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13] Interview with Giorgi Bokeria,30 March 2011.

[14] Interview with Batu Kutelia,29 March 2011.

[15] Interview with Nino Burjanadze,29 March 2011.

[16] Interview with Mikheil Saakashvili,31 March 2011.

[17] Interview with Sergei Prikhodko,30 June 2011.

[18] I do not regard Saakashvili as a particularly reliable witness.His interview for the TV series contained at least two‘memories’that are verifiably false.He has a clear tendency to embellish stories to his own advantage.

[19] Interview on Ekho Moskvy,published7 August 2011.

[20] Medvedev interview with Russia Today,PIK-TV and Ekho Moskvy,published5 August 2011.

[21]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20 June 2011.

[22] Interview with Radoslaw Sikorski,25 November 2010.

[23] I accept that this is an oversimplification.The ethnic balance of Abkhazia changed hugely over the decades:the Abkhaz were once the majority ethnic group,and huge numbers of Georgians and Russians were brought into the region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a deliberate Georgian policy,the Abkhaz say,to turn them into a minority.

[24] Interview with Jean-David Levitte,12 March 2011.

[25] Medvedev interview with Russia Today,etc,5 August 2011.

[26]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14 April 2011.

[27] Interview with Sergei Lavrov,25 October 2010.

[28] Interview with Mikheil Saakashvili,31 March 2011.

[29] Interview with Robert Gates,16 May 2011.

[30] Interview with Stephen Hadley,24 January 2011.

[31] In a live television phone-in programme on4 December 2008Putin was

asked by a viewer,‘Is it true that you promised to hang Saakashvili by“one place”?’Putin paused for a moment,smiled,and replied:‘Why by“one”?’

[32] 此言出自美国的西部枪战片《OK牧场大决斗》。——译者注

第十一章　重新设定与西方的关系

高加索战争的余波

战争原是格鲁吉亚挑起，西方却站在格方一边，这使俄罗斯人怒不可遏。他们像是失去了理智，对所有的人都恶语相向。格鲁吉亚对茨欣瓦利的攻击被比作美国的“9·11”。普京按典型的俄罗斯阴谋论的思路，说是美国一手挑起了这一冲突，目的是要支持同奥巴马竞争总统宝座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

拉夫罗夫外长声称，某些国家用萨卡什维利来“试探俄罗斯政府的力量”并“迫使我们放弃现代化，走上军事化的道路”。他坚称俄罗斯只是打掉了格鲁吉亚用来攻击他们的那些阵地。拉夫罗夫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用手机通话时，把萨卡什维利叫作“疯子”。

俄罗斯人似乎浑然不觉，他们因为出兵并控制了一个邻国的大片土地，目前在国际上极不得人心。8月底，梅德韦杰夫总统首次提出从这场战争中总结的重要结论，后来他又数次提到。他阐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5项新“原则”，其中有些原则的含义令人心惊。第四项原则宣布，俄罗斯的要务是保卫俄罗斯人的生命和尊严，无论他们在何处。这包括“保护我们在国外工商社团的利益”。梅德韦杰夫矢言，任何对他们的侵犯行为都将受到坚决回击。第五项原则宣布俄罗斯在一些地区有“特权利益”。这似乎包括与它相邻的所有有俄罗斯族居民的前苏联国家。梅德韦杰夫有意没有用“势力范围”这个词，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意味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些新近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前苏联共和国由于有人数众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因此也被俄罗斯正式划归它的势力范围。人们原以为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危机后能幡然悔悟，但它宣布的新政策证明事实恰恰相反。

俄罗斯没有谦卑地放低身段，反而借着这场战争的由头再次提出过去已经遭到过拒绝的倡议。10月，梅德韦杰夫总统跑去参加在法国埃维昂召开的会议，再次呼吁缔结一项新的欧洲安全条约，说高加索地区的事件“表明”他的主意“多么正确”，而且“证明单极国际安全体系已不再有效”。他在说什么呀？难道他忘了他的国家刚刚侵犯了一个邻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吗？他喋喋不休地呼吁缔结新条约，但无人理睬。真让萨卡什维利说着了，狐狸要求当鸡窝的主人。

至于普京，他的总理职位意味着他主要负责经济，而不是外交政策。这也为他插手“特权利益”地区提供了工具。他的主要工具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股份公司。2002年他不准各部门瓜分这个庞大的国家垄断企业，现在它成了有用的外交政策工具。能源就像手中的鞭子，随时可以用来惩罚邻国。2006年，俄罗斯同乌克兰发生天然气纠纷几个月之后，又中断了对立陶宛的石油供应，因为立陶宛没有把马泽伊基艾炼油厂卖给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而是卖给了一家波兰公司。同年，通往格鲁吉亚的输油管神秘地发生爆炸，俄罗斯却拒绝让格鲁吉亚调查人员查找证据或帮助修复输油管。2007年，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因拆除一座苏联战争纪念碑发生争执，随即中断向爱沙尼亚输送石油。

2008年年底，俄乌之间的另一场天然气冲突山雨欲来。俄罗斯再次坚持把天然气价格提高到世界水平，而乌克兰拒绝付款。这次，克里姆林宫有西方公关公司的帮助，事先采取行动以防舆论对它不利。他们警告乌克兰（以及更靠西的客户）冲突即将发生，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派遣高层主管去各个欧洲国家首都说明情况，以确保如果天然气供应像三年前一样中断的话，人们都知道责任在乌克兰，不在俄罗斯。但是没人想到普京居然会故意切断不是对乌克兰，而是对西欧的天然气供应。

乌克兰拖欠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天然气费用已达24亿美元。现在俄方想把2009年的价格涨至每千立方米250美元（几天后又涨至450美元）——乌克兰付不起这个价格。2009年1月1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像2006年一样，切断了对乌的天然气供应。乌克兰为了弥补短缺，也像2006年一样开始从出口管线分气。很快，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的客户就注意到天然气气压大大降低。找不到解决办法，欧洲国家开始惊慌起来。斯洛伐克甚至考虑重启一座尘封的核电站。

1月5日，普京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他召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领导阿列克谢·米勒，还叫来了摄影师。二人在摄影机前进行了一次装模作样的谈话，借此宣布，有史以来俄罗斯第一次要在天寒地冻的严冬切断对西欧客户——俄乌争端的无辜旁观者——的天然气供应。他们的交谈如下：

米勒：乌克兰还欠2008年天然气费用6亿多美元。如果情况继续这样下去，乌克兰继续偷用俄罗斯的天然气，欠款很快就会达到几十亿美元。

普京：你有什么建议？

米勒：有人建议要按乌克兰偷取的数量6530万立方米减少输送到俄乌边境的天然气，将来的供气也要减去被偷走的气量。

普京：按天算吗？

米勒：是的，按天算。

普京：但是那样的话，我们的西欧伙伴就得不到合同规定的全部供气了。

米勒：是的，如果是那样，我们的西欧伙伴就得不到被乌克兰偷走的那部分天然气，但我们公司会尽全力用其他办法补上那一部分。我们可以增加俄罗斯经由白俄罗斯和波兰的供气，增加通过蓝流管道输往土耳其的供气。

普京：乌克兰的用户呢？对他们的供气也会不足。那可不是小数目：我记得乌克兰每天消费1.1亿到1.25亿立方米天然气。乌克兰消费者要受苦了，我同情的是老百姓。

米勒：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亲自命令单方面中止就今年对乌克兰的供气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谈判，显然他并不同情老百姓。

普京：他不同情，但我们同情；大家都应该同情他们，我们和那里的人民是血肉相连的亲戚啊。

米勒：我们还知道乌克兰的天然气年产量是200亿立方米，目前乌克兰的天然气储量超过了它的年产量。如果乌克兰领导人发善心，老百姓就不会受苦。

普京：我同意。从今天开始减少供气。

就这样，普京假装同情可怜的乌克兰人民，“同意提出的建议”，减少经过乌克兰输往中欧和西欧的天然气供应。这是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第一次减少对其西方客户的天然气供应。俄罗斯一贯坚持说它一直是，并将永远是可靠的能源供应者，此举却将这一立论完全推翻。

普京的决定对欧盟来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一直力劝它的欧洲伙伴从多个来源获取能源，以免被俄罗斯掐住脖子。现在这成了紧迫需要。欧盟开始探索所有可能的替代能源供应方，从阿尔及利亚到伊朗到土库曼斯坦。普京的决定也给名为纳布科的项目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个项目计划铺设一条绕过俄罗斯、从土库曼斯坦或阿塞拜疆经土耳其向中欧输送天然气的管道。

纳布科项目的竞争对手是俄罗斯自己的“替代”管道——经过黑海、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南流天然气管线。另一条替代乌克兰向欧洲供气的管道——穿越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管线的设计也已进行到相当的程度。俄罗斯没有听明白（或者是假装没明白）西方的意思，即他们已经不信任俄罗斯

是可靠的能源供应者了。俄罗斯把责任完全推到过境国乌克兰头上，提出把南流和北溪作为两条对欧洲的供气管线，以防将来乌克兰线路可能中断。欧盟担心这不仅使乌克兰，而且使波兰（另一个过境国）在将来也可能遭到讹诈：俄罗斯如果同波兰或乌克兰发生争端，可以切断对这两个国家的供气，使用新管线继续向它们西边的国家供气。对欧洲人来说，纳布科完全绕开了俄罗斯，似乎更加安全。但事实是纳布科能提供的天然气量很小（俄罗斯已经提前买断了土库曼斯坦多年的天然气生产）。无论如何，坐拥巨大能源储藏的俄罗斯在可见的未来注定是一个主要的能源供应者。普京2009年1月5日做出决定后，人们再也不能完全信任它了。

直到1月20日深夜普京和乌克兰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达成协议之后，对欧洲的供气才得到恢复。乌克兰将按欧洲的价格付款，但2009年给它打折。作为回报，乌克兰维持它收取的天然气过境费数额不变。双方同意不再用俄乌能源公司做中间商——这家名声欠佳的公司和季莫申科从前的同事、现在的对头尤先科总统关系密切。

一年后，故事又有了续篇。2010年2月，2004年受普京支持但被橙色革命推翻的亚努科维奇终于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任总统期间，国事一塌糊涂，内斗不休、腐败猖獗、经济政策无能。有人把这视为橙色革命的失败，但这是短视的看法。亚努科维奇在公平的选举中打败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季莫申科，所以民主本身并不是问题。而且，事实证明亚努科维奇掌权后并不完全是俄罗斯的哈巴狗。他的确很快与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了协议，把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基地的租约延长近30年，以此换来乌克兰多年廉价获得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合同。但他在俄罗斯使用克里米亚基地的费用问题上狮子大开口。普京说："给我们开的简直是天价。竟敢要这个价，我真想把亚努科维奇和他的总理活吞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军事基地要这么多钱，没有这样的价格！要是按这个合同付款，我们10年得付400亿到500亿美元。"

后来，亚努科维奇也开始质疑乌克兰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季莫申科在2009年和普京达成的交易被认为使乌克兰吃了大亏，她因此被判滥用职权罪而锒铛入狱。）2011年夏，亚努科维奇要求俄罗斯把价格砍掉一半，降到200美元以下。至于乌克兰的西进，虽然它放弃了加入北约的计划，但亚努科维奇继续朝着进一步融入欧盟努力——普京企图拉他和俄罗斯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却被他拒绝了。

奥巴马效应

2008年夏秋之交，俄罗斯只顾纠缠格鲁吉亚问题，没有注意到在世界的另一边正在发生的大事。普京过去8年的死对头乔治·W·布什马上要卸任了，

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获胜者很有可能是一个迷住了全世界的自由派年轻黑人。俄罗斯人首先不相信一个黑人能打败约翰·麦凯恩参议员，而且他们也不肯相信如果巴拉克·奥巴马获胜会有什么不同。我记得曾坐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办公室里向俄罗斯官员解释奥巴马很有可能获胜，那将是改善俄美关系的好机会，他们应该开始考虑如何和他建立联系。他们的反应是耸耸肩冷笑一声："什么都不会变的，还是同一伙人。"

俄罗斯真的是卡在了凝固的时间里。西方的确仍把俄罗斯视为骨子里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少了些形式上的东西而已。而俄罗斯的世界观也还停留在冷战时期《真理报》刊登的一幅漫画上：山姆大叔一手给"军工大企业"喂食，一手向苏联发射导弹。在他们看来，奥巴马只是制度的一个产物，不会有任何改变。

11月4日，奥巴马当选。几乎各地都以欣喜若狂的大标题予以报道。别的姑且不论，奥巴马起码不是乔治·W·布什。在许多人眼里，他的当选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梅德韦杰夫总统那几周一直在准备他的第一份国情咨文讲话——原来宣布10月底讲，后来改到11月5日。奥巴马胜选的消息传来后，克里姆林宫的公关公司凯旋公关赶快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说这是向美国新总统示好的理想时机，建议国情咨文就两国未来的合作说些热情的话。但是，克里姆林宫不仅没有理睬凯旋公关的建议，甚至好像不知道奥巴马胜选的消息。

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大宫殿炫目的白色大厅里讲了一个半小时，但连奥巴马的名字也没提，更别说祝贺他了。他倒是提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说它是造成格鲁吉亚战争的元凶。他还宣称俄罗斯有可能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以对抗布什的导弹防御系统。

第二天的媒体头条记录下了这次失去的机会。伦敦《泰晤士报》的标题是"世界欢呼奥巴马之际，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命令在欧洲部署导弹"。《华盛顿邮报》的标题则是"俄罗斯尖刻警告奥巴马"。

人们经常指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反应性的，普京时代也确实基本如此，他很少主动出击。我们看到，他期望北约"邀请"俄罗斯加入，他以合作的姿态回应"9·11"事件，以对抗的姿态回应北约东扩和导弹防御计划，但他很少自己采取主动，让别人反应。这一次还是一样，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变，但美国人必须先有动作。

奥巴马任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麦克福尔做他的俄罗斯问题首席顾问。新班子马上提出了一个务实的新思路，称为"双轨接触"，即美国政府不会将国与国关系与俄罗斯在人权或民主方面的表现挂钩。它将继续就俄罗斯的人权记录和它对格鲁吉亚的占领强烈质疑克里姆林宫，但不会因此影响

在其他领域（如伊朗或导弹防御）的外交和军事合作。两者将在各自的轨道上分别运作。麦克福尔说："意思很简单，我们将在两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同俄罗斯政府合作。我们也会就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直接和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包括俄罗斯政治反对派人士打交道。"[1]

2009年2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时第一次公开提出关于这一新思路的暗示。两年前就在这里，普京等于宣布了和美国决裂。"过去几年中，俄罗斯和我们联盟成员的关系出现了危险的发展。"拜登说，现在美国想"按下重启键"。此言一出，很快成为奥巴马对俄新政策的简称。一个月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电视上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她向她的俄罗斯同人谢尔盖·拉夫罗夫赠送了一枚硕大的红色别针，上面印着"重启"。不巧，这个词的俄文却被译成了"超载"或"超负荷"。在这项政策正式启动时，这个误译引起了一些微笑。

更加重要的重启行动也同时在幕后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拜登讲话一周后，麦克福尔前往莫斯科，亲手送交奥巴马写给梅德韦杰夫的私信。这封信是要当作诱饵，放在山洞口引诱张牙舞爪的俄罗斯熊出洞。信中说他们正在仔细研究导弹防御方案，暗示在这个问题上两国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信中对美俄关系做了概括性的展望，指出美国的利益其实基本上也是俄罗斯的利益。两国应寻求"双赢"的局面，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顽固坚持"零和"的态度。

俄罗斯熊嗅嗅诱饵，似乎挺喜欢。梅德韦杰夫参加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时，于4月1日第一次同奥巴马见了面。两人先客气寒暄一番——真巧咱们两人都年轻，都是律师，又都新上任。然后，奥巴马决定试试他的新"双赢"办法，看能不能解决最近发生的一件麻烦事。几个月前，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在俄罗斯的威逼利诱下，突然宣布要美国离开玛纳斯空军基地这个阿富汗战争中重要的中转站。巴基耶夫做出这一决定的当天，俄罗斯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20亿美元的贷款。在美国大使位于摄政公园的官邸内，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坐在一起，以稍带点儿傲慢的态度向他解释让美国人留在玛纳斯为什么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我需要你明白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有基地，它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我们的部队从这里进出阿富汗。他们在这里洗澡，吃上一顿热饭，在这里准备好去阿富汗作战，去对付我们的敌人，那也是你们的敌人。如果我们不打他们，你们也得打他们。所以你说，梅德韦杰夫总统，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个基地帮助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会不符合你们的国家利益呢？"梅德韦杰夫没有马上作答。但三个月后，美国人签署了一项允许他们留在玛纳斯的协定。

麦克福尔记得梅德韦杰夫在伦敦会议上还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姿态，提出扩大所谓的阿富汗"北方分配网"，第一次允许美国经过俄罗斯领空运输

武器弹药。

这成了奥巴马2009年7月首次正式访问莫斯科时宣布的一项关键协议，另外还有一项关于开始谈判新裁军条约的框架协议。新的裁军条约将取代12月到期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被称为新起点的新条约将成为重启美俄关系的重头戏，但双方在条约是否也应对导弹防御加以限制这个问题上意见截然相反。为了兼顾双方的观点，光是商定框架协议的措辞就需要高度的外交技巧。

奥巴马总统保证要“重审”乔治·W·布什的导弹防御计划，9月份，俄罗斯人欣喜地听到他宣布取消在捷克共和国设立雷达和在波兰部署拦截武器的计划。但他仍然打算在这两个地方建点儿东西，而且美国人坚决不肯在新起点条约中放入任何妨碍他们发展导弹防御的内容。俄罗斯人则同样坚决地要把两者挂起钩来。他们坚持说，对进攻性核导弹建立防御打破了总体战略平衡，使没有防御的一方难以抵御第一次打击。

“我们明确表示不能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谈，”麦克福尔说，“我们可以另外谈导弹防御，但在这里要谈的是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只能谈这个问题。俄罗斯人想一起谈，我们说不行。”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雅博科夫回忆说：“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我想对我们的美国朋友也是一样——导弹防御问题会成为绊脚石。”[2]

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但意思模糊、语焉不详。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包括一条“关于战略进攻性和战略防御性武器相互关系的条款”。两国总统对此条的解释大不相同。在二人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梅德韦杰夫说：“我们同意两国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系统应算一个整体。”奥巴马说：“我们的讨论不仅谈进攻性武器系统，而且也谈防御性武器系统，这是完全合理的。”他没有说它们应该“算一个整体”，他甚至明确指出，美国计划的导弹防御完全是为了应对来自伊朗或朝鲜的打击，和俄罗斯的战略武器没关系。奥巴马还补充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讨论中联系上旨在对付和俄罗斯强大的能力无关的另一类威胁的导弹防御系统是不合适的。”那么到底有没有联系呢？意思的模糊使谈判得以开始……但基础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7月的莫斯科峰会是按新的“双轨”思路安排的，不仅和俄罗斯国家最高领导进行会谈，而且还和“公民社会”接触——在独立的新经济学院讲话，会见反对派，包括麦克福尔所说“我们能找到的批评俄罗斯政府最严厉的人士”。

第一天奥巴马全天都在和梅德韦杰夫总统会谈，但他也非常想见到过去10年来在俄罗斯举足轻重的人物。于是第二天的活动以在普京的别墅阳台上吃早餐开始。菜式丰盛，包括三种不同的鱼子酱（美方的一个人说，“至少有一种肯定是违禁的”）。会见原定一个小时，实际用了两个半小时。奥巴马开门见山地问普京：“我们是怎么搞的——过去几年美俄关系怎么会如此低迷？”还好奥巴马善于倾听，普京的回答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他从头叙说两国关系的历史，老调重弹，说到西方对塞尔维亚的轰炸，历数在那之后他感到俄罗斯受到的侮慢：反弹道导弹条约、伊拉克、世贸组织、北约东扩、导弹防御、科索沃……这一系列都是普京认为他的善意没有得到回报的事例。麦克福尔感到，虽然对普京所说的实质内容有争辩的余地，但“总理说的话我想其实奥巴马总统也同意——如果我们集中注意两国的共同利益，对同意和有异议的问题进行非常务实的讨论，那么我们是能够合作的”。对奥巴马来说，普京大讲历史反而是好事，因为他能够趁机向普京强调：我不一样，我是新人，我不想让未来永远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下。我真的想重新设定和俄罗斯的关系。

峰会达到了目的，却令人惊讶的低调。没有冷战期间东西方首脑级会见引起的狂喜（或紧张）。奥巴马热没有蔓延到俄罗斯，听他做公开讲演的学生显得相当无聊。

然而，重设关系的努力逐渐开始生效。效果之一是俄罗斯对伊朗的立场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俄罗斯自从2005年加入伊朗问题六国对话以来，一贯说它反对核武器扩散，但它不认为伊朗在试图制造或近期内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它辩称有权帮助伊朗发展民用核计划，不愿意支持制裁。但是他们2009年4月在伦敦首次见面时，奥巴马惊讶地听梅德韦杰夫承认，在评估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方面，美国人比俄罗斯人“可能估计得更准”。

9月，美国人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证明他们关于伊朗有核武器野心的意见也是正确的。两国总统定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就在会见之前，奥巴马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詹姆斯·琼斯将军打电话紧急约见他的俄罗斯同人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在华尔道夫大酒店的房间里，琼斯给普里霍季科看了一些间谍照片，显示伊朗正在圣城库姆附近建造一座秘密浓缩铀工厂。普里霍季科接受采访时承认：“这可不是让人特别高兴的意外。”[3]琼斯说他惊愕之极，不断摇着头说，“糟糕，真糟糕……”[4]

拉夫罗夫外长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迈克尔·麦克福尔拉到一旁说：“迈克尔，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们？”

麦克福尔答道：“嗯……我们以为你们知道。我是说，他们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

接下来，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见面讨论了这个消息。梅德韦杰夫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反应在西方国家报纸的头条报道中受到好评，因为他第一次说“制裁很难产生积极的结果。但在一些情况下，制裁是不可避免的”。两天后，在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峰会向世界披露了库姆浓缩铀设施的消息，人们这才明白梅德韦杰夫为什么改变了态度。俄罗斯和西方终于在伊朗问题上开始了一定的合作。第二年6月，俄罗斯对联合国的新制裁给予了支持，9月时甚至取消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系统，损失了一单10亿美元的合同。

与此同时，关于新起点条约的谈判在日内瓦正式开始。很快，两个棘手的问题浮出水面。第一个是“遥测信息”的交流——分享有关导弹测试和发射的数据。第二个是“特有标志”——给每枚导弹都标上条形码以便查点追踪。

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都亲自深入参与这个进程，通过电话和面对面的交谈敲定所有最重要的细节。梅德韦杰夫后来开玩笑说“遥测技术”成了他最喜爱的英文词。

12月，他们二人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见了一次面。当时哥本哈根的每一处地方都被讨论全球变暖问题的人们占据了，结果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最后只能在一家女装店用帘子隔出一间临时会议室，帘子外到处散落着裸体木头模特。这样的气氛倒是很有助于谈话取得成果。奥巴马解释了特有标志的概念：“你看，我们就是把条形码印在导弹上好便于计数。条约不就是这个目的嘛。”

俄方谈判代表一直不同意这一点，坚持说“我们签了条约自然就会遵守”，说不能假设俄方会作弊。不过梅德韦杰夫觉得这主意有道理。“好吧，”他说，“只要公平就行。你们和我们都做，互相对等。”

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后，遥测信息分享也解决了，似乎离协议只差一步之遥。1月，琼斯将军从莫斯科机场打电话给奥巴马，他刚刚和俄罗斯人谈完，看来大功告成了。

但事情至此忽然横生枝节。美国人一直假定俄罗斯人同意把这项战略武器条约作为单独的文件，和导弹防御没有关系。可现在奥巴马取代布什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做法渐具雏形，俄罗斯人看了很不高兴。与其在捷克共和国建雷达站和在波兰部署拦截武器，奥巴马采取的是他所谓的“分阶段适用做法”。这个做法在许多方面对俄罗斯构成的潜在威胁可能更大，包括布置高度机动的海基导弹和雷达，还有部署在东欧的短程导弹。2010年2月4日，美国宣布这些导弹将部署在罗马尼亚。莫斯科的态度因此而强硬起来，因为他们看到就在他们即将同意一项大幅削减俄罗斯战略武库的条约

时，美国人却在他们的家门口修建起一道围墙。

2月24日，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的热线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梅德韦杰夫再次要求在削减武器条约里加入限制导弹防御的法律规定。奥巴马生气了。“德米特里，我们就此已经有过协议了！如果这是达成条约的条件，那么就不会有条约。”奥巴马也生他手下工作人员的气，本来听他们说的情形好像马上就要成功了。他的谈判代表让俄罗斯人以为可以在条约中加入一个条件，冻结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这给奥巴马帮了倒忙。

在日内瓦和莫斯科又进行了三周的紧张谈判后，3月13日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通了一次电话，这才最终达成协议。“新起点条约”于4月8日在布拉格正式签署。如美国所愿，它只涉及武器削减。此外，双方都附上了关于导弹防御的单方面声明。美国人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不是为了改变与俄罗斯的战略平衡。俄罗斯的声明却宣称，如果它认为将来美国导弹防御能力的加强会威胁到它的战略核能力，它有权退出条约。俄罗斯人以此确定了他们想要的某种联系：如果他们觉得美国的导弹防御过于强大，他们随时可退出条约，加强自己的核力量。

梅德韦杰夫

迄今为止，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国际事务上的行为和普京基本同出一辙。人们注意到，普京作为总理仍在就外交事务发表意见，甚至出访外国。比如，是他公开声称导弹防御事实上是阻挡达成战略武器协议的障碍。几周后，梅德韦杰夫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结果激怒了奥巴马。

梅德韦杰夫捍卫俄罗斯的利益，要求被当作平等伙伴，这样的立场和他的恩师并无二致。尽管在伊朗问题上与西方和解，但那不代表任何战略上的变动，因为出于商业、政治和战略等种种原因，俄罗斯绝不会冒与伊朗为敌的风险。

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梅德韦杰夫在慢慢地改变国内的议程，但费尽力气却成效不彰。他早期的外交活动也是一样。他在柏林和埃维昂的基调演说是彻底的失败。但现在和奥巴马总统的关系开了头，他看到了一个可能会提高他在国内外形象的办法。既然“现代化”是他的标语，那么就应当让人们看到他和一位现代的美国总统亲密往来。光是使用苹果平板电脑和拍摄视频博客还不够，他需要去西方，去参观硅谷。普京度假时做的那些男子汉气概十足的运动他干不来，但他可以试着和奥巴马及施瓦辛格在一起谈笑风生，挥洒自如。还是说他怎么看都只是个小不点儿？这正是问题所在。

“新起点条约”签署两个月后，梅德韦杰夫动身对美国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一个立志现代化的总统该做的事他全都做了。他开通了推特（Twitter），参观了思科公司和苹果公司以及斯坦福大学，接见了在硅谷工作的俄罗斯侨民，然后又飞往华盛顿和国会议员举行会谈，还和奥巴马一起即兴去雷氏地狱汉堡店吃午餐。用餐时两人都没穿西装外衣，只穿着衬衫，边吃边讨论是墨西哥辣椒好还是酸黄瓜好。可是奥巴马没有告诉梅德韦杰夫美国联邦调查局刚刚抓获了一窝俄罗斯间谍，这消息等梅德韦杰夫回到莫斯科后才披露出来。7月9日，双方在维也纳机场按原汁原味的冷战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的间谍交换。10名俄罗斯“潜伏”特工，包括艳光四射、一夜成名的安娜·查普曼，换回了4名押在俄罗斯监狱里、被控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人。

这一事件不只使所有人再次意识到间谍活动仍然非常活跃，还令人不禁想到曾是梅德韦杰夫的恩师，现任俄罗斯总理的老牌特工。普京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归来的间谍——尽管他们作为“潜伏者”以假身份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却几乎一事无成。他们没能渗透进任何有价值的机构，刚进行了一些最基本的间谍活动就被抓了。不过普京对他老本行的忠诚度是毫不含糊的，他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些俄罗斯特工的教父。特工们归来大约一周后，普京给他们开了个加油会。会上大家高唱前苏联爱国歌曲，他保证他们会在“重要的地方”工作，一定会有“有意义的光明未来”。他还信誓旦旦地要惩罚那个向美国人揭发了他们的叛徒：“这就是叛变的结果，叛徒都没有好下场。他们通常都死在路边，死于酗酒或吸毒。”

他们合唱的歌曲中有一首为《从哪里认识祖国》。这是一首电影插曲，出自1968年拍摄的电影《剑与盾》，讲的是一个苏联特工在纳粹德国活动的故事。普京在12月的一次慈善活动中还在钢琴上用两个指头弹奏过这支曲子，显然他很喜欢这首深情的爱国歌曲……

从哪里认识祖国？

从妈妈教我的歌唱，

从忠诚的战友身上，

从亲如家人的邻居，

从轻风吹拂的田野上的白桦树，

从马车辘辘的车轮声，

从望不到头的乡间小路，

从远处茅棚灯光点亮的窗户……

从哪里认识祖国？

从你心中的誓言。

---

[1] Interview with Michael McFaul,15 April 2011.

[2] Interview with Sergei Ryabkov,27 October 2010.

[3] Interview with Sergei Prikhodko,30 June 2011.

[4] Interview with James Jones,4 March 2011.

第十二章　强人和他的朋友

度过全球金融危机

普京曾说他“厌倦了外交政策”，比起做总统来更喜欢做总理。但2008年9月，他就任新职仅4个月后就碰上了让他焦头烂额的金融危机。8年前，普京曾向手下年轻有为的改革者讨教，恶补经济学。但在金融危机的急风暴雨面前，他仍然准备不足，只能仓促上阵。

就在全球的金融崩溃之前，形势看起来还是一片大好。石油价格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推动俄罗斯经济从1999年到2008年间以7%的平均增长率高速前进。为缓解石油价格回落的冲击而建立起来的稳定基金聚集了巨额资金，并被一分为二：一个是1400亿美元的储备基金，另一个是300亿美元的国家福利基金，后者主要用于应对隐然可见的养老金危机。就在2008年2月，普京还夸口说“我们的主要成就是实现了稳定”。但俄罗斯的公司从西方银行大量举债，而那些银行马上就要破产了。

所幸普京的专家团队还在，他们一直在关注着美国次贷危机越滚越大，也清楚地知道金融海啸很快将淹没俄罗斯。美国雷曼兄弟公司9月15日破产后第二天，普京的经济团队齐聚副总理舒瓦洛夫的办公室。团队里有梅德韦杰夫总统的经济顾问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和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此人后来被《欧洲货币》杂志评为“年度财政部长”。“当我们意识到市场上每个人都可能一夜之间破产的时候，我们知道得赶快采取行动，”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制订了计划，给295个企业提供最高限额的贷款，让他们享有从银行获得信贷的特别权力。”[1]这里说的295个企业占俄罗斯全国收入的80%。

计划准备通过两家国有银行——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提供贷款。时任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普京早期改革的设计师格尔曼·格列夫有些犹豫：“我说我愿意放款，但必须有国家担保，因为我掌握的是股东的钱。如果风险太大，我得对他们负责。”[2]

会议确定了一个让中央银行为贷款担保的办法。格列夫说：“我们在联邦储蓄银行里待了两天两夜，把谁欠谁、欠多少的文件全部理了一遍。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两天没合眼。”

最后，中央银行为救经济用去了2000亿美元，等于它现金储备的1/3左右。大部分资金用在了给银行重新融资、买进股票提振股市和支撑走软的

卢布上。中央银行向295家企业提供了500亿美元，让它们用来归还外国债权方的硬通货贷款。受益者有私人寡头，像奥列格·德里帕斯卡（45亿美元）和罗曼·阿布拉莫维奇（18亿美元），但也包括国有公司，如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46亿美元）和俄罗斯技术公司（70亿美元）。这个一揽子救市方案所耗资金为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3%，是八国集团中力度最大的。就连美国数额巨大的救市方案也难与之相比，因为它787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5%。

战略奏效了。两年内，银行和企业几乎所有的贷款全部还清，俄罗斯走出衰退时的状况比一些西方国家还要好。危机期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8%，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中下降得最多的，但一年之内，经济增长率就回升到5%以上。

谢尔盖·古里耶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奥巴马总统初次访俄时曾会见过他。他说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是“坚决而有效的”。“严重的金融危机过后，俄罗斯金融系统可以说是毫发无损，失业仍然在控制之中。政府防止了银行系统的崩溃。而且，危机并未导致对私人公司的大规模国有化。在金融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打着应对危机的旗号把所有银行和公司都收归国有，但它没有这样做。”[3]

尽管如此，衰退的那几年里还是有成千家俄罗斯银行和企业倒闭。外国投资者开始逃离，俄罗斯股票市场的损失高达1万亿美元。

普京拒不承认危机暴露了俄罗斯经济结构性的缺陷。他把问题全部归咎于美国的草率鲁莽，认为这再一次证明了美国霸权的罪恶。“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在美国开始的。这是一场我们大家都面临的真正危机。令人悲哀的是，我们看到有关方面根本没有能力做出妥善的决定。这已经不再是某些个人的不负责任，而是整个制度的不负责任。大家都知道这一制度还自称是（全球）领导。”

他是在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的这番话，但就像对梅德韦杰夫在出兵格鲁吉亚后关于世界安全的说教一样，没有人对普京为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感兴趣。毕竟就在几天前，俄罗斯还拒绝向欧洲人供应天然气，害得他们在家中冻得瑟瑟发抖。

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和对基础更加稳固的西方经济的影响不太一样。随着石油价格从每桶145美元暴跌到35美元，这个国家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变得明显可见。俄罗斯几乎没有制造业出口——既没有电子产品、成衣，也没有机械制造业——来为它提供较为稳定的收入。危机还暴露出苏联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部分工业基地的凄惨现状。苏联时期建立了一些工业区，其规模之大为西方所未见。它们被称为“工厂城”，以一家巨大的工厂

为中心，城中的一切都围绕着并依赖于这家工厂。居民不是在工厂里或在它的某个附属单位或供应单位工作，就是受雇于地方政府、学校、医疗系统或为工人服务的商店。如果中心工厂——无论是汽车厂、铝厂还是炼钢厂——停工，那么围绕着它的整个网络也就随之崩溃。苏联的计划者从未设想过经济有下滑的一天。现在，他们建造的工厂城转入了私人手中，但仍然是无可救药的脆弱，受制于华尔街每一个莫测的变化。

圣彼得堡附近的皮卡廖沃就有这样一个工厂城。它原来是一座水泥厂，现在发展成由3家互相紧密联系的工厂组成的工业中心。其中一家工厂的主人是俄罗斯首富之一奥列格·德里帕斯卡。2009年年初，经济危机造成几千名工人没有拿到工资就遭到解雇。当工厂没钱支付当地供暖和供电公司的账单时，整个镇子的热水和暖气供应被切断。面对巨大的社会危机，民众行动了起来。就在普京访问他的故乡并要为一处崭新的日产汽车组装厂剪彩时，抗议的人群拦住通往圣彼得堡的主要高速公路，造成400公里大塞车。这下事情演变成了全面的危机。6月4日，普京在皮卡廖沃对工厂主和政府部长发出严重警告，命人当天就把4100多万卢布的欠薪发还给工人们，并教训那些厂主："你们使几千名工人沦为你们的野心、无能和贪婪的牺牲品。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普京威胁说国家要接管，似乎一下子把市场经济的那些神圣概念抛在了脑后："不管厂主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这个工业中心无论如何都必须开始运行。如果你们达不成协议，我们就撇开你们自己干。"

在令电视观众错愕的一幕中，普京要求被他比作蟑螂的工厂主签署一份让工厂重新开张的保证书。"大家都签字了吗？你呢？德里帕斯卡，你签了吗？我看不到你的签字……过来！"那位亿万富翁一步一蹭地走过去，乖乖地在文件上签名，然后普京厉声对他说："把笔还给我！"

这就仿佛勃列日涅夫的魅影又回来了。可这是2009年，俄罗斯皈依资本主义已经近20年了。普京的办法只能解燃眉之急。从长远来说，俄罗斯必须想办法使工厂城按照市场规律运行。

莫斯科东南800公里处，坐落在伏尔加河畔的陶里亚蒂是俄罗斯最大的工厂城。它有70万人口，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在生产拉达牌小汽车的俄罗斯伏尔加汽车公司工作。衰退开始前不久，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在2008年2月花10亿美元买下了俄罗斯伏尔加汽车公司25%的股权。但是，雷诺和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制造商一样，在危机中大伤元气。雷诺公司没能精简流程或解决人浮于事的问题，积压了10万辆汽车卖不出去。普京总理还是本能地把工人的福利放在首位，工厂不能垮。对陶里亚蒂这样的城市来说，龙头工业的垮台将给几十万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将对国家稳定构成威胁。2009年3月30日，普京参观了伏尔加汽车厂，赞扬工厂管理方没有大批解雇工人（与皮卡廖沃截然不同），并保证政府将提供贷款、现金和担保等

价值250亿卢布（8.3亿美元）的援助。谢尔盖·古里耶夫说解救“这个效率低下的庞然大物”是政府在危机期间犯下的少数错误之一。

普京同时也诉诸强硬的外交手段以确保该公司的长期生存。10月，他向雷诺公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帮助拯救伏尔加汽车厂，否则它所持的25%的股权就要减少。“他们要么参与给公司进一步供资，要么我们就得和他们谈判我们持有的相对股权。”11月27日，他赶往巴黎，得到了他想要的。雷诺答应为工厂提供新技术，俄罗斯政府这边则再注入500亿卢布的资金。

普京在巴黎的那两天顺风顺水。除了和雷诺公司达成交易之外，他还出席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法国能源巨头法国电力集团的协议签字仪式。协议内容是法国电力集团要参加具有争议的“南流项目”——绕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不可靠”的过境国为欧洲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的建设。另外，法国另一家能源巨头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与普京举行了会谈，希望购买另一条绕道管线“北溪管线”9%的股份。这两条管线现在都进展顺利：德国政府和德国能源公司支持北溪管线，意大利的埃尼集团则是南流项目的合作伙伴。相比之下，欧盟的替代管道纳布科项目却是步履蹒跚。

与此同时，在和法国总理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普京提到了一个造成更大轰动的话题——购买一艘法国制造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这是法国海军舰队中第二大舰只，可装载直升机、坦克、登陆艇和750名突击队员。一年后，法国确定向俄罗斯出售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北约过去从未转让过这样的海军技术，这在俄罗斯的东欧邻国中间引起了不小的焦虑。

普京总理当俄罗斯的国际推销员当得兴致正高，但他遇到了一次重大的失败——还是与汽车工业有关。2009年春，他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联手支持拯救已破产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欧洲的子公司——德国欧宝公司，计划由国家控股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一家叫麦格纳的加拿大公司购买欧宝公司55%的股权，成功后可保全几万个工作机会，主要在德国。默克尔和普京经常会面讨论并力促交易成功。对9月面临大选的默克尔来说，这项交易的政治意义非同小可。对普京来说，这是俄罗斯获取西方技术的又一个机会：奥列格·德里帕斯卡拥有的高尔基汽车厂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竞标伙伴，它有望获得欧宝的最新技术，造出高质量的汽车，打破俄罗斯人只会生产劣质拉达牌汽车的印象。

9月10日，通用汽车公司同意了这个交易。普京兴高采烈。“我希望这是我们朝完全融入欧洲经济迈出的一步。”他在他的乡间别墅对瓦尔代俱乐部的成员们说。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格尔曼·格列夫穿梭飞行于莫斯科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底特律总部之间，坐镇最后谈判。谈

判达成了一份长达5000页的合同。“然后，11月初的一个晚上，”格列夫回忆说，“我刚好在和普京开会，当天晚上就要飞到德国欧宝公司总部所在地吕瑟尔斯海姆，准备第二天早上签合同。我开完了会出来突然听说通用决定不卖欧宝了！”一开始格列夫以为是开玩笑。“整个交易的细节都已经完成。我们为得到所有欧洲政府的同意做了大量的工作！”

最终，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弗雷德里克·亨德森打电话给格列夫向他道歉，解释说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格列夫对他说，他俩现在最好别说话，因为他可能会冲口说出一些日后他会后悔的话：“电话很短。我震惊至极，过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我们一大群人夜以继日花了半年的工夫才完成这个交易。”

普京暴跳如雷。这不仅对他重振俄罗斯汽车工业的希望是沉重的打击，而且又一次证明了美国人的不守信誉：“我们将来必须记住他们这种和合作者打交道的方式，虽然他们的卑鄙手段主要影响的是欧洲人，不是我们。通用公司没有警告任何人，没有告诉任何人……尽管达成了那么多协议，签了那么多文件。我觉得这是个好教训。”

改革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暴露了俄罗斯经济改革不充分留下的弱点。不能只靠一个精力充沛的总理跑来跑去追着工厂主签保证书，或者要外国人来投资。经济本身必须更能适应变化，更能吸引投资者。普京的改革团队明白这一点，他的总统也明白。梅德韦杰夫的顾问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说：“我们必须自问，为什么俄罗斯的经济受的打击比别人更大？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俄罗斯经济的结构跟不上现代世界的要求，面临的风险太大。当然，2000年我们在普京领导下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一点就很明显。我们在那8年间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经济结构并没有改变。”[4]

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提高了生活水平，但也造成了对经济改革的自满懈怠。德沃尔科维奇说：“当2008年石油价格再次下跌时，我们认识到改革还不够，必须改变方向。梅德韦杰夫提出我们不能再沿着老路走下去了。”

改变方向的信号是梅德韦杰夫撰写的一篇题为“加油，俄罗斯！”的文章，这篇文章2009年9月10日发表于一家网上杂志（那是当然了）。在文章的第四行他就点到了主题，批评俄罗斯是“建立在原材料贸易和普遍腐败上的原始经济”。持怀疑论的俄罗斯事务评论家拒不承认梅普二人有任何区别，但事实是普京从未这样说过俄罗斯的经济。这篇文章使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一些文章。他也被批评为只会分

析，提不出解决办法，他的许多改革措施也遭到保守派的扼杀，或在苏联制度严酷的土壤中萎缩凋零。

梅德韦杰夫说："20年的沧桑巨变仍未使我们的国家摆脱对原材料令人羞耻的依赖。我们现在的经济依然存在着苏联制度的主要缺点：漠视个人需求。除少数例外，国内企业没有发明创造人民需要的产品和技术。"他还说："这一切证明前些年该做的事情没有都做，做了的也没有都做对。"这话似乎是指他前任进行的改革。他保证要在各方面都实现"现代化"。国家将从世界各地请来最好的专家，要对内投资，引进现代信息技术，甚至进行政治改革——议会各政党将"像大部分民主国家一样"，定期轮流执政。

这篇文章像是竞选宣言。若是有自由选举的话，他该在选举之前发表这篇文章，而不是当选一年后才发表。这是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观点开明的文章中的第一篇，但他的主张很少得到实现。至于原因为何，分析家言人人殊。梅德韦杰夫会不会只是普京的傀儡，大跳开明舞蹈以娱西方，其实主人在幕后操纵着他的一举一动？还是说他是真正的改革者，但处处受他主人的掣肘？抑或是改革俄罗斯的任务过于艰巨，任何举措在现存制度和腐败的抵抗面前都毫无胜算？

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梅德韦杰夫采取的第一批措施是自上而下发布指令，要实现西方市场无须政府插手而自行取得的成果。2010年3月，他选择莫斯科地区的斯科尔科沃为基地，要把它打造成俄罗斯的"硅谷"。然而，政府通过法令建立"发明中心"，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按照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的说法，这没什么矛盾。他大力倡导所谓的"专制现代化"，说经济改革不需要政治自由化。据苏尔科夫说，"自然的现代化"只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可行，而法国、日本和韩国（也引申到俄罗斯）则依靠"指导性方法"。

一个月后梅德韦杰夫宣布了另一项"自上而下的改革"：把莫斯科打造成为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但怎么才能做到呢？它听起来像极了梅德韦杰夫以前要把卢布设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企图（他是在格鲁吉亚战争后的埃维昂会议上呼吁缔结新安全条约那篇不识时务的讲话中宣布这一意图的）。他似乎完全不懂由赌博冒险、揣摩猜测、经验心得和深谋远虑混杂在一起构成的市场心理。为叶利钦和普京做过办公厅主任的亚历山大·沃洛申领命负责这个项目。他是出了名的精明强干，但就连他在如此巨大的任务面前也似乎束手无策。一年后，梅德韦杰夫宣布项目已"完成了一半"。照他这么说，如果进展顺利，到2012年年中莫斯科就将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了。

俄罗斯无法融入世界经济，这成了梅德韦杰夫的心病。2009年，外国投资下降了41%。2010年2月，总统任命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亲自领导一个"部内特设机构来分析投资的障碍"，以期改善俄罗斯的投资形象。舒瓦

洛夫是个精明的年轻政治家，脸刮得干干净净，理着平头，很受西方工商界的钦佩。为了推动俄罗斯走向世界，他身体力行，在伦敦租有一处400平方米的公寓，还在奥地利租了一栋面积为1500平方米的别墅。舒瓦洛夫主导了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这对融入世界经济至关重要）——这个过程时断时续，既有来自美国的阻挠，也有普京不够热心的原因。比如，2009年6月，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代表成功地完成了和舒瓦洛夫的一轮会谈，使俄罗斯可以在“年底”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但两天后，普京突如其来地宣布俄罗斯只会和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一起作为“单一海关联盟”加入世贸组织，尽管那两个国家入世谈判的进展比俄罗斯落后很远。这件事似乎梅德韦杰夫和舒瓦洛夫事先都不知情，结果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梅德韦杰夫总统2010年7月访问加利福尼亚州大开眼界。回来后，他召见俄罗斯驻外使节，对他们做了一次非公开讲话，对他们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工作方法予以严词斥责。（这使我想起，当我们问及外交部官员为什么安排个副部长的采访要花那么长时间时，回答是：“我们这里还是19世纪。”）梅德韦杰夫严厉地告诉他的外交官们，不准再给他送关于世界大事的毫无意义的报告。“我在互联网上都看得到，”他说，“而且比你们的报告快得多。”以后，俄罗斯的外交工作要全力以赴为梅德韦杰夫的宏图——现代化——服务，要帮助推进俄罗斯的大业需从外国，特别是关键国家吸引投资。他说的关键国家指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整个欧盟和美国。当时在场的一位克里姆林宫官员把总统讲话的大意总结为“改观念，换脑筋，要不就离开外交这一行”。[5]

不过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这个问题自从苏联解体之后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俄罗斯没有，或者无法像中国或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变成蓬勃兴旺的制造业国家？它有科技人才，有教育良好又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有广袤的土地可以修建新工厂，有对西方商品如饥似渴的市场……可是你什么时候在衣服上看到过“俄罗斯制造”的标签或买过从俄罗斯进口的电脑、照相机或家具？

解释有很多，不过对外国投资（或在俄罗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障碍可以一言以蔽之：腐败。这个词的含义十分复杂，一位俄罗斯大企业家告诉我，我作为西方人永远不可能明白。他说：“盗窃不是你所知道的盗窃，是整个制度——政治制度、工商业、警察、司法部门、政府——从上到下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

我在第三章里描述了宜家是如何成为第一个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开设分店的公司的。现在俄罗斯全国各地有12家宜家连锁店，它们深受欢迎，几百万老百姓周末去那里购买既便宜又时髦的家具。宜家在改善苏联时代建造的公寓的家居环境和舒适度方面立了大功。然而，俄罗斯的国家机器——

地方的市长、官僚、法官、警察——不遗余力地百般阻挠。他们不是反对这家瑞典企业进驻，而是他们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不能想象自己不捞足了油水就准许它进驻——而宜家大义凛然地拒绝用行贿的手段打通关节。公司甚至因此解雇了两名高管。他们自己并没有行贿，但公司发现他们对宜家的一家次级承包商和一家供电公司之间的腐败交易知情不报。然而，宜家坚守道德的立场却引起了想象不到的麻烦，使得这家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差一点进不了俄罗斯市场。

贪官向企业勒索钱财经常使用的手法是编造一个问题（比如缺少某个许可证），然后向该企业要钱，给了钱他们就可以对这个“问题”不予追究。如不支付贿金，问题就解决不了，开发许可证就会被收回。更有甚者，他们会叫警察来以“违反”某些规定的罪名把企业家投入监狱。索贿金额的多少取决于公司的大小——所以俄罗斯官员自然把宜家看作一部庞大而友好的蓝黄两色提款机。

宜家的俄罗斯市场经理伦纳特·达尔格伦1998年来到莫斯科，一待就是8年，其间他为开办宜家在俄罗斯的首批连锁店和“美家购物中心”和政府官员争斗不息。后来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克服荒诞：我如何在被俄罗斯征服的同时征服了俄罗斯》。[6]书中不失幽默地讲述了他在俄罗斯做生意不行贿这一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当公司在莫斯科郊外的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修建造价4000万美元的第一家连锁店时，有一天警察忽然到来，关闭了整个工地，说是因为手续不全。“要建造像宜家或美家这样的大型购物中心，得需要300多种不同的许可证。”他说。当地的市长要宜家交出1000万卢布，后来改成3000万卢布，然后才准许重新开工。达尔格伦同意给钱，但不是给市长，而是给一个慈善基金，而且把这事公之于众。结果事情办成了。

一年后，宜家想在莫斯科郊外的希姆基开办大型商场，但遇到了困难，因为购物中心的供电要靠备用发电机，而且当地没有立交桥。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宜家不得不花400万美元建造两座立交桥，并认捐100万美元帮助发展儿童体育。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尔·卡姆普拉德说俄罗斯的电力公司多收宜家的电费和燃气费，骗走了1.9亿美元。他说那就是因为宜家拒绝行贿。

每年世界银行都发布一项调查，列出世界上183个国家按“适宜经商程度”的排名。2011年，俄罗斯名列123——远远低于其他一些前苏联国家，如格鲁吉亚（第19名）和吉尔吉斯斯坦（第44名）。在“发放建筑许可证”项下，俄罗斯是第182名，仅高于厄立特里亚。[7]

达尔格伦想安排宜家的老板——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对在俄罗斯经商充满热情——和普京见一次面。俄罗斯方面先是用和一位副总理见面

来搪塞他，后来达尔格伦有机会向普京团队中的一个人提出这一建议，但那人告诉他，他们觉得宜家并不真正想和普京见面。达尔格伦写道："我不知道他们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他们说：'宜家一毛不拔，和普京的见面费是500万到1000万美元，你们绝不肯出这个钱。'"

俄罗斯《新时代》周刊引用政府内部的消息来源说，和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的见面费是15万美元。一个市民在推特上给梅德韦杰夫总统留言说，2011年2月他求见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却被要求支付30万美元。梅德韦杰夫居然回了信："我把你的推特给苏尔科夫看了。你给他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谁在勒索你。"

自不待言，官方对所有关于出钱才能见到高级官员的传闻都一律否认。但对于俄罗斯猖獗的腐败现象，政府似乎听之任之——在俄罗斯现任领导下，腐败更是以惊人的速度蔓延。2010年10月29日，克里姆林宫开会专门讨论腐败问题。梅德韦杰夫指出俄罗斯每年因为腐败要损失330亿美元。负责政府采购的官员从供应商那里收取巨额回扣。按照官方数字，它占了国家所有开支的1/10。据军事总检察长说，军方采购预算的20%落入贪官的荷包。[8]梅德韦杰夫说，总的来说"据最保守的估计，杜绝偷窃可以减少1万亿卢布的费用。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政府采购领域）官僚和在这个领域活动的无良商人贪污了巨额资金"。[9]一份独立的报告说贪污的数字甚至更高——每年300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4。[10]

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腐败没有任何影响：据内务部的官方报告说，从2008年到2009年，俄罗斯一次行贿的平均金额增加了近3倍，达到2.3万卢布（776美元）。同一份报告还说，行贿的平均金额2010年7月达到4.4万卢布（1500美元），2011年7月更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30万卢布，或1万美元。内务部经济安全局局长杰尼斯·苏格罗波夫告诉记者说："负责采购以及为国家或市政所需物品下订单的官员特别容易受贿。"透明国际的莫斯科办公室主任说，1万美元只是做生意行贿的平均数，不代表"巨型项目"的贿金，"只是中型企业给官员的贿赂"。

奇怪的是，这些调查人员虽然知道贿金的平均数，但他们显然不知道受贿者是谁，至少很少采取行动。至于腐败猖獗对外国投资者的阻力有多大，看看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即知，这一指数按人们心目中公共官员和政客的腐败程度给世界各国排名：自1996年以来，俄罗斯从世界排名第46名降至2000年普京上台时的第82名，到2010年更是大幅度滑落到第154名。换句话说，世界上只有十来个国家被认为在腐败程度上超过俄罗斯。

反腐斗争也取得过几个小小的胜利。2010年8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总统办公厅监察局局长康斯坦丁·楚琴科向梅德韦杰夫总统报告对

国家医院购买医疗设备进行审计的情况。他发现的问题包括买170台电脑断层（CT）扫描仪花了75亿卢布（2.5亿美元）——比出厂价高两三倍。楚琴科认为这说明公共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梅德韦杰夫却直言不讳：“你知道，我认为这不只是腐败，而是丧尽天良、肆无忌惮地偷窃公共资金。参与舞弊的人无耻之极，毫无良知。”[11]此后，一批负责医疗采购的官员受到起诉，不只是低级官员，甚至有总统行政团队的成员。其中瓦迪姆·莫扎耶夫和安德烈·沃洛宁两人合伙对医疗设备制造商（比如东芝公司）进行敲诈勒索，谎称它们上了黑名单，说它们的产品不能参加公共采购招标，然后说如果这些公司付100万美元，他们就能帮助把它们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删掉。东芝公司向警方告发了他们，警方调查后逮捕了这两个官员。沃洛宁被判处三年徒刑。[12]在另一起著名的案子中，国防部医务局局长亚历山大·别列维京因从一家电脑断层扫描仪的外国供应商那里收受16万美元的贿赂，于2011年6月2日被捕。[13]

可是，有时似乎美国的立法——《海外腐败行为法》——比俄罗斯人自己更有办法揭露在俄罗斯犯下的行贿受贿罪。2010年，美国自动提款机制造商迪堡按照《海外腐败行为法》开除了它俄罗斯子公司的5名高管，因为发现他们为拉生意给官员提取回扣。根据《海外腐败行为法》，德国的戴姆勒汽车公司被指控为争取俄罗斯政府公车的购买合同行贿超过300万欧元。购车单位主要是内务部、国防部和为政治精英服务的“特别任务车队”，由戴姆勒把贿金打到海外账户上。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后，2010年11月梅德韦杰夫总统下令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14]

腐败和缺乏独立司法性是孪生兄弟。尽管梅德韦杰夫呼吁结束他所谓的“法律虚无主义”，但情形依旧。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年轻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2009年11月死于监狱一案。他指控一些官员舞弊，而就是这些官员把他投入了监狱。马格尼茨基生前曾是英国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的律师。赫米蒂奇是俄罗斯最大的外国证券投资公司，创始人比尔·布劳德为俄罗斯吸引投资者出了大力，并自诩为普京的支持者。他甚至赞扬逮捕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是清洁俄罗斯商界的举动。他在他投资的俄罗斯公司中推动良好的公司管理，打击腐败，以期提高这些公司股票的价格，增加赢利。2005年11月，他试图迫使对公司内部情况讳莫如深的苏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传说和普京有关系）披露其所有权结构，结果被作为“威胁国家安全分子”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俄罗斯。第二年6月，据赫米蒂奇的人说，一些腐败的执法人员突击搜查了赫米蒂奇的莫斯科办事处。他们偷走了报税文件和公司印章，策划了一起惊天骗税案，造成国家预算收入的重大损失。马格尼茨基在调查中发现，有组织犯罪分子伙同腐败的官员使用偷来的文件进行欺诈，骗回了赫米蒂奇的三个附属公司上交的2.3亿美元的税款。马格尼茨基刚刚正式举报那些查抄赫米蒂奇办事处的警察进行欺诈，同一伙警察立即逮捕了他，把他关进布特尔卡监狱。未

受审判的他在污秽不堪的牢房里被监禁了11个月，身患重病却得不到治疗，直到他2009年11月16日死去。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没有医疗记录，家人发现他的手指被折断，身上有淤伤。梅德韦杰夫总统的人权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小时紧急需要医护的时候，8个警察给他戴上手铐，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对他进行殴打，然后把他扔在那里长达一个小时无人理睬，而等在外面的急救车却因得不到许可无法进去。[15]

这个故事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噩梦——个人被残酷无情、无可理喻的制度消灭。本应捍卫法律的人却是不法之徒，被指控的罪犯反过来迫害指控他们的人。赫米蒂奇对此案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大量证据，发现一个名叫弗拉德林·斯特潘诺夫的人在海外银行有巨额存款。此人的妻子奥尔加·斯特潘诺娃是莫斯科第28税务局的领导，是她批准给那些假公司“返还税款”的。斯特潘诺夫家的财产估计有3900万美元（比他们夫妇共同申报的收入多1000倍）。他们在波斯湾和亚得里亚海边拥有豪华别墅，在莫斯科的别墅价值2000万美元。一个小小的税务官混成这样真是不错了。他们在税务局中的同犯和与此案有牵连的警察也都个个腰缠万贯。比如，赫米蒂奇发现（年薪10200美元的）阿尔乔姆·库兹涅佐夫中校警官在逮捕马格尼茨基之后的那几年，家里增加了300万美元的资产。[16]

赫米蒂奇提出的指控在俄罗斯没有得到调查。梅德韦杰夫总统接到他的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之后，称马格尼茨基的死是“犯罪”。几个高级监狱官员被解职，两名狱医最终被判渎职罪。报告也发现对马格尼茨基的起诉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包括对他进行调查的人正是他所举报的人），然而，那些被指控犯下巨大欺诈罪又嫁祸于马格尼茨基的人却逍遥法外。有些调查人员甚至还受了奖，提了职。受赫米蒂奇指控的税务官奥尔加·斯特潘诺娃现就职于联邦武器、军事、专业技术装备和物资供应署。它是国防部的采购单位，而国防部部长安纳托利·谢尔久科夫恰好曾经担任过联邦税务局局长。

2011年7月，美国国务院宣布禁止向美国认为与马格尼茨基之死有关的俄罗斯官员发放赴美签证。克里姆林宫不去调查赫米蒂奇揭露的案情，反而宣布要把某些美国公民列入黑名单作为报复。

在俄罗斯中低级官员中，贪赃枉法已经到了明目张胆、无所顾忌的地步。这种情况上延到什么层次呢？对于最高层的腐败，没有经核查的事实，只有数不清的怀疑猜测、小道消息、责难指控和间接证据。事实是，普京戴的名贵手表说明他的收入应该远远多于他的工资，而且他毫不掩饰地公开佩戴名表。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也是一样。好几个网站上都贴有他们二人戴着价值等于他们一年工资的手表的照片。

人称消息灵通的政论家斯坦尼斯拉夫·别尔科夫斯基曾语出惊人，宣称他

有“证据”证明普京的资产达到400亿美元。据别尔科夫斯基说，普京握有苏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37%的股份、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4.5%的股份，还拥有他的朋友根纳季·季姆琴科设在瑞士的神秘石油贸易公司贡沃尔石油公司75%的股份。[17]这样的指称完全没有办法核实，别尔科夫斯基又是自我宣传的能手。一位同普京和季姆琴科都相熟的著名俄罗斯企业家告诉我，说那些数字完全是胡说八道，普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因为像黑手党头子一样，他想要什么尽管拿就是了。重要的不是据为己有，而是控制权和关系网。

不可否认的是，和普京关系密切的一小群生意人在普京任总统期间大发横财。[18]如果他的朋友们不觉得欠他的情，那才令人吃惊呢。

根据俄罗斯《财经》杂志2011年2月公布的俄罗斯富豪名单，个人财产为89亿美元的根纳季·季姆琴科排在第17位。他的公司贡沃尔石油公司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贸易公司，掌握着俄罗斯石油出口的1/3，包括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出口。季姆琴科和普京的关系要追溯到普京在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工作的日子。据《金融时报》报道，公司记录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二人加入了一个叫金门的公司，要在圣彼得堡港建造一个储油库，但因为同有组织犯罪团伙起了冲突，公司倒闭了。地方议会记录显示，“普京1991年任市政府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任时，主持过一个丑闻缠身的石油换粮食方案，其中大笔的出口配额给了季姆琴科开的一家公司”。据说季姆琴科与效忠于克里姆林宫的苏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的关系也十分密切，那家公司的所有权在谁手里至今无人知晓。[19]

普京青年时代一起练柔道的伙伴阿尔卡季和鲍里斯·罗滕贝格兄弟各有资产17.5亿美元。阿尔卡季拥有的公司中，一家获得了筹备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大单合同，另一家则参与了经过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天然气管线的铺设。罗滕贝格兄弟和季姆琴科一起成立了亚瓦拉–涅瓦柔道俱乐部，而普京是名誉主席（还有，前第一副总理维克托·祖布科夫是俱乐部董事）。

20世纪90年代，普京在湖畔别墅合作社的邻居尤里·科瓦里楚克是俄罗斯银行和国家传媒集团的大股东，估计个人资产有9.7亿美元。他的传媒集团拥有两家国家电视频道——RenTV电视台和第五频道，另外，2011年2月国家传媒集团又从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手中仅花1.5亿美元买下了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电视台第一频道25%的股份。根据反对派提出的一份关于俄罗斯腐败情况的报告，俄罗斯银行的资产从2004年初的2.36亿美元飙升到2010年10月的82亿美元，主要是因为它低价收购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关键资产。[20]

普京的另一位邻居尼古拉·沙马洛夫也是俄罗斯银行的股东，有5.9亿美元

的身家。2010年底，他卷入了一则耸人听闻的传言。据说在俄罗斯南部离索契不远的格连吉克有一座为普京修建的“行宫”。据网上刊出的照片，行宫是凡尔赛宫式的，空中照片显示它位于黑海之滨一条隐秘道路的尽头。后来这座“别墅”被发现在沙马洛夫名下。但他原来的生意合伙人谢尔盖·科列斯尼科夫声称，有证据表明这座行宫其实是2005年普京任总统时克里姆林宫委托建造，供普京个人使用的。后来，《新报》刊发了据说是经过认证的建筑合同的副本，上面签名的是克里姆林宫负责资产管理的官员弗拉基米尔·科真。记者想参观这座行宫，但被政府保安人员拦住，尽管那地方据说是沙马洛夫的私人财产。科列斯尼科夫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梅德韦杰夫总统，把此事公之于众，并要求总统进行调查。他说他本来一直亲自参与此事，直到2009年他因对腐败问题的关注而被排除在外。他说建造行宫的是一家国有建筑公司，使用的资金是非法挪用的国家资金。克里姆林宫和普京的发言人对这些指控自然是一概否认。3月，沙马洛夫显然是为了把丑闻压下去，把别墅卖给了另一个商人亚历山大·波诺马伦科。他是阿尔卡季·罗滕贝格的伙伴，但与普京关系并不密切。

吞噬了俄罗斯巨大国有财富的腐败网触及俄罗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司机向交通警行贿，小店主给公共卫生官员塞钱换一张徒有其表的卫生证书，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向外国贸易公司勒索上百万卢布。

何塞·格林达·冈萨雷斯是一位西班牙检察官，负责对俄罗斯在西班牙长期有组织犯罪的情况进行调查。他的努力使60名嫌犯落入法网。他的结论是，俄罗斯政府的行为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活动别无二致。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一封电报显示，他对美国外交官说俄罗斯实际上已经成为“黑手党国家”，在“俄罗斯政党、有组织犯罪和武器走私之间，有着业已证明的联系”。他说当局利用有组织犯罪集团进行“政府不合适做”的活动，比如向库尔德人出售武器以破坏土耳其的稳定。任何敢于不听联邦安全局吩咐的犯罪集团头目都会被“消灭”——或是被杀死，或是被“投入监狱，使他们再也不能争夺势力范围”。[21]

腐败不仅阻碍投资、破坏经济，也是政治上的定时炸弹。反对派已成功地给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贴上“骗子和窃贼党”的标签——我相信多数俄罗斯人都知道这个用语。统一俄罗斯党要告这个用语的发明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涉嫌诽谤，反而是替他做了宣传。

三十来岁的纳瓦尔尼是律师、商人，也是政治积极分子。他立志要清除俄罗斯工商界的层层污垢。他是俄罗斯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博主，以揭露腐败大案闻名。纳瓦尔尼购买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管理政府石油管线的）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这类国有公司的股票，然后开始调查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他的有些调查结果促成了刑事调查，也引起了当局的愤怒。一次，他发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通过叫Transinvestgas的中介公司向一家小公司诺瓦泰克公司购买天然气，虽然它完全可以以低70%的价格直接向诺瓦泰克公司购买。中介公司至少把差价中的1000万美元转到了一家伪造的咨询公司的账上。又一次，国有大型银行——俄罗斯外贸银行从中国购买了30套石油钻探设备——也是通过一家中介公司以极高的价钱买到的，1.5亿美元的差价全部落入那家中介公司的腰包。他最耸人听闻的指称是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在铺设从西伯利亚到太平洋长达4000公里的输油管道时，侵吞了“至少40亿美元”。[22]

纳瓦尔尼在俄罗斯一家叫作“实时日志”的网站写博客，发表他的调查结果。他的推特也有大量关注者。他最近建立了一个名为RosPil.info的新网站，专门“打击利用国家采购制度中饱私囊的官僚”。这个网站利用了梅德韦杰夫总统一项要求在网上公布政府所有招标信息的决定。纳瓦尔尼请读者们发来任何可疑的招标信息（“比如，500万卢布的合同，要设计一个政府网址，只给1周的申请时间”），以供专家们分析跟踪。在这样的曝光下，已经有几十起可疑的投标撤回了：2011年8月，这个网站号称阻止了价值70亿卢布的腐败合同的签订。[23]这方面的事例包括一个地区领导要购买30块镶钻金表（“作为给荣誉教师的礼物”），内务部要定制一张用稀有木材手工雕刻而成的镀金床，还有圣彼得堡当局要花200万卢布给一家精神病院里的700名病人定做貂皮大衣。[24]

---

[1] Interview with Alexei Kudrin,14 December 2010.

[2]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7 December 2010.

[3] Sergei Guriev and Aleh Tsyvinski,‘Challenges Facing the Russian Economy after the Crisis’,in Sergei Guriev,Anders Aslund and Andrew Kuchins(eds),*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p21.

[4] Interview with Arkady Dvorkovich,29 June 2011.

[5] *Kommersant*,No.124,13 July 2010.

[6] Currently available only in Russian and Swedish.

[7] http://www.doingbusiness.org/rankings(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The top ten countries for ease of doing business are,in order:Singapore,Hong Kong,New Zealand,UK,USA,Denmark,Canada,Norway,Ireland,Australia.

[8] http://www.gazeta.ru/politics/2011/05/24_a_3627341.shtml(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9] http://news.kremlin.ru/transcripts/9368(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10] Report by INDEM foundation,quoted in V.Milov,B.Nemtsov,V.Ryzhkov and O.Shorina(eds),*Putin.Korruptsiya.Nezavisimyy ekspertnyy doklad*(Moscow,2011).

[11] http://eng.kremlin.ru/news/752(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12] http://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1247042/skandal_s_zakupkami_tomografov(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13] http://ria.ru/trend/belevitin_case_02062011/(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14] Financial Times,12 November 2010.

[15] http://en.rian.ru/russia/20110706/165063309.html(last accessed8 September 2011).

[16] See http://russian-untouchables.com/eng/(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17] Guardian,21 December 2007.In a different interview,with Die Welt,Belkovsky put Putin's stake in Gunvor at50rather than7per cent.

[18] Putin's own website reprints an article from the opposition newspaperNovaya gazetaabout the prime minister's network of business friends and interests:http://premier.gov.ru/pda/eng/premier/press/ru/4558/(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19] Financial Times,15 May 2008.

[20] Milov,Nemtsov,Ryzhkov and Shorina(eds),*Putin.Korruptsiya.Nezavisimyy ekspertnyy doklad*.

[21] *Guardian*,1 December 2010.

[22] http://navalny.livejournal.com/526563.html.

[23] http://rospil.info/results.

[24] See Julia Joffe's excellent account of Navalny's work in*The New Yorker*,4 April 2011.

第十三章　双人驾驶学

双人自行车

自从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普京转任总理之后，国内外的人们一直都在寻找这“双人驾驶”之间出现分歧的迹象。也许这只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希望，因为他俩之间的不同之处与其说是实质上的，不如说是风格上的。这种寻找捕风捉影，毫无头绪，成了现代版的克里姆林宫学。人们仔细研究照片，逐字分析句子，以冀分辨出克里姆林宫幽暗角落（或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内心深处）的动向。这或许可以称为“双人驾驶学”。

常有人说他们之间分歧不大，因为自从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以来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当然，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不想变化。在我看来，在外交政策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几乎察觉不到，但事实表明，他们在经济和人权问题上的确意见相左——尽管这些领域中的进步微乎其微。到了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的后半部分，他们的分歧更加明显。两人之间出现了某种竞争，好像都要做2012年总统大选“正统”的候选人。可以肯定的是，支持他们的是不同的群体。如果两人意见相同，这种情况本是不会发生的。他们其实可以各自组建政党，为俄罗斯的未来指出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情形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普京紧紧地把着车把，很少转过头来听梅德韦杰夫力争也许应该走另一条路，或换一辆更好的车。有证据表明，梅德韦杰夫在后座上越来越沮丧不满，决心竞选连任总统。然而他们两人早就说好不做竞选对手。梅德韦杰夫知道，如果普京决意返回克里姆林宫，他一定会说到做到。况且这次竞选获胜好处更大，因为2008年底，梅德韦杰夫把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到了6年。

开始时，梅德韦杰夫最有象征意义的反抗举动是在2009年1月接见反对派报纸《新报》的编辑。那是在《新报》的一位记者被职业杀手开枪打死的10天后。要想明白此举的意义，就得像我一样亲耳听听普京团队的人对《新报》的谩骂。在他们看来，这家报纸实在太出格了。它曾刊登过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对普京政权的猛烈抨击。我听见总理手下的人用污言秽语咒骂它，还说普京也有同感。《新报》的老板是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伦敦《标准晚报》及《独立报》的老板亚历山大·列别捷夫。它规模不大，却是反对腐败和专制统治的急先锋。它的一位年轻记者安娜斯塔西娅·巴布洛娃和人权律师斯坦尼斯拉夫·马科洛夫在莫斯科街头被枪杀。马科洛夫为俄罗斯在车臣残暴行为的受害者以及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做过辩护律师，和《新报》联系非常密切。人们认为他是枪手的主要目标，而巴布洛娃被杀是因为她目击了这起谋杀。

枪杀发生后，梅德韦杰夫总统打电话给《新报》总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这与普京对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之死的满不在乎形成鲜明对比。穆拉托夫回忆说："他请戈尔巴乔夫和我去克里姆林宫讨论这件事，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向我们表示了对死者的哀悼，没看笔记就说出了安娜斯塔西娅父母的名字。"穆拉托夫说他觉得梅德韦杰夫非常真诚，并提醒我别忘了："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害的时候，普京却说她的死对国家的伤害比对她本人更大。"穆拉托夫还指出，杀害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而杀死巴布洛娃和马科洛夫的凶手——一个新纳粹集团的成员——已被缉捕归案，被判了无期徒刑。[1]

和梅德韦杰夫谈话时穆拉托夫说，自2000年以来已有4名《新报》记者被杀。他承认，为此曾想过把报纸关门停刊算了。梅德韦杰夫的回答是："谢天谢地报纸没有停刊。"他甚至同意把他就任总统后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机会留给《新报》，并对穆托拉夫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从来不对任何人卑躬屈膝。"对总统的第一次采访发生在三个月后，采访中梅德韦杰夫公开与普京的"社会契约"理念拉开距离。根据普京的这一理念，国家为公民提供稳定和一定程度的繁荣，公民则在政治上顺从国家。梅德韦杰夫说不能把民主和福祉对立起来。他要让俄罗斯既有自由，也有繁荣。

4月14日，采访刊出的同一天，梅德韦杰夫召开总统人权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梅德韦杰夫破天荒地命令工作人员从会议开始起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分批发表在他的网站上，公众因此得以知晓他和人权积极分子在会上说的每一句话。

他批评干涉民众示威或迫害非政府组织的官员，承认"我们的政府机器深陷腐败的泥淖之中"。会议讨论了对俄罗斯历史的官方说法。一位发言人是曾任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副主席的伊琳娜·亚西娜。她毫不留情地说："整个20世纪期间，人的生命价值被否定，人权被践踏，这还是说轻了。作为经历了那个世纪的人们的后代，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梅德韦杰夫答道："我同意亚西娜女士的话，整个20世纪是否认人的生命价值的世纪。"

6个月后，在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那天发表的视频博客中，梅德韦杰夫总统把矛头指向新教科书的作者，因为新教科书企图为历史开脱。他说："让我们想一想：恐怖和不实的指控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几百万人哪。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甚至连像样的葬礼都没有。多少年来，他们的名字就这么从历史上抹去了。然而，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人说无数受害者受苦受难是为了什么更高的国家目标。我认为，国家的任何进步、

成功或雄心都不能建立在人的痛苦和生命的损失之上。没有什么能比人的生命价值更重要，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镇压辩解。”

相比之下，普京任总统时重新起用了苏联时期的旧国歌，呼吁在学校恢复苏联时期的基本军训。

梅德韦杰夫不只是“口头自由派”，他也采取了一些不大但实实在在的步骤，使民主派振奋鼓舞。比如，2009年1月，他不声不响地阻止了一项得到普京支持的法案的通过。那项法案原本要扩大叛国罪的定义，使其涵盖几乎一切对政府的批评和同外国人的接触。梅德韦杰夫说，促使他反对那项法案的是来自媒体和社会的强烈反对。

他还采取了措施保护公民示威的权利。从7月开始，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开始在任何有第31天的月份的最后一天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以此象征宪法关于保障公民集会权利的第31条。每一次集会都是刚开始几分钟就被防暴警察冲散，参加集会的抗议者被逮捕。国家杜马还通过了一项法案，进一步加紧对街头抗议的限制，但梅德韦杰夫11月否决了这项法案。反观普京对抗议者的看法则是，“示威者要是待在他们不该在的地方，警察用警棍敲他们的脑袋是正常的”。

2010年6月，国家杜马提出法案，为“打击极端主义”扩大了安全部门的职能。法案允许联邦安全局向它认为“即将”犯罪的人发出警告，他们如果置之不理即可对他们进行威胁、罚款，甚至处以长达15天的拘留。梅德韦杰夫总统听到人权委员会抱怨说这项法案“复辟了极权国家最恶劣的做法”后，把它的规定大大减弱，还强调说：“我要你们知道，这是我亲自下的命令。”

在此期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从未公开唱过反调，但他们各自代理人之间的思想战却打得不亦乐乎。一家自由派智库“现代发展研究所”在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不久成立，由总统任董事会主席。该研究所所长伊戈尔·尤尔根斯说总统对他的观点“有些赞成，也有些不同意”，但几年下来，梅德韦杰夫确实是越来越向“现代发展研究所”的观点靠拢。2010年2月，研究所发表了一份长篇报告——《21世纪的俄罗斯：理想的明天》，里面建议取消普京的多项政治改革。它设想建立西方式的两党制，媒体不受国家干涉，法院独立，直接选举地区领导人，削减安全部门的权力。普京的宣传家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立即对此报告予以谴责，宣称：“不可能三天内建成民主，不可能一下子把一个孩子变成大人。”

到11月，梅德韦杰夫对普京津津乐道的“稳定”亲自发起了攻击，遣词用字酷似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把他自己上台前政府管理的时期称为“停滞”的年代。梅德韦杰夫在一段视频博客里似是谴责了普京的统一俄罗斯

党事实上的一党专政："众所周知，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停滞的迹象，稳定有可能会变为停滞。这种停滞对执政党和反对派同样有害。如果反对派完全没有机会赢得公平的选战，它就会堕落，变得可有可无。如果执政党从未输过一次选举，它就会不思进取。最终它也会堕落，像任何静止不动的生物一样。为了这些原因，必须加强政治竞争。"

尽管梅德韦杰夫似乎是鼓励媒体敢于冒险，但克里姆林宫仍然牢牢控制着中央电视台的各个频道。11月底，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弗拉基米尔·波兹纳在他的每周节目结束时提到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死在监狱里的事，结果他这段话被剪掉了。另一位受人尊敬的电视记者列奥尼德·帕尔菲奥诺夫在一次授奖仪式上尖锐抨击对电视新闻的管制——负责管制的人大多数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上。他说新闻简报越来越像苏联时期的宣传，不允许对总理或总统表示任何批评、怀疑或嘲讽。"记者……不再是记者，而是唯唯诺诺的官僚。"他这样说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9月，梅德韦杰夫本人还利用他对国家电视台的控制，败坏莫斯科的腐败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名声，然后又撤了他的职。从这件事上可看不出一点儿梅德韦杰夫有民主倾向的影子。因为普京废除了市长选举，所以无法通过投票赶走卢日科夫，只能用总统令这一招。没有充足的理由又不能这么干，特别是对像卢日科夫这么威权赫赫的市长。他的腐败也同样猖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人都知道莫斯科绝大多数利润最丰厚的建筑合同都给了他妻子的公司，他妻子也因此而成为俄罗斯女首富。可卢日科夫在克里姆林宫根基深厚，他从叶利钦时代起即任莫斯科市长，现在仍然颇受群众拥护。他把莫斯科建成了一个展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重新崛起的流光溢彩的橱窗，并且他有普京的支持。但是梅德韦杰夫想开掉他，让梅德韦杰夫忍无可忍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卢日科夫公开批评总统停建一条高速公路的决定。那条高速公路要经过莫斯科北面的原始森林，因而引起了不少争议。在圣彼得堡和报纸编辑的一次会见中，梅德韦杰夫用了一个很不文雅的俄罗斯俗语说卢日科夫满口胡言，这倒像普京的说话风格。

梅德韦杰夫上紧了旧式宣传机器的发条，命令帕尔菲奥诺夫所谓的记者"官僚"听从主人的吩咐。三大电视台都播出了给卢日科夫抹黑的纪录片，批评卢日科夫"重建"莫斯科建筑遗产的政策，说18世纪的建筑物只是保留了表面，里面全被拆毁；把莫斯科的交通拥挤归咎于他；揭露他妻子神话般的财富；讽刺他在2010年酷暑难当的夏天，当莫斯科笼罩在泥炭起火造成的有毒烟霾之下时，不是帮助莫斯科人渡过难关，却去国外度假或照看他的蜂巢。

9月17日，卢日科夫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梅德韦杰夫的办公厅主任要他"悄悄地走人"，但他没有悄悄走人。他先去奥地利休了一个星期的假，然后

在9月27日给梅德韦杰夫写了一封信，指责他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污蔑运动”，想要赶走一位“太独立、太难管”的市长。卢日科夫要求恢复市长选举，还说梅德韦杰夫要把他赶下台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市长的位子上，使他自己在将来的总统选举中胜算更大。“你有两个选择，”卢日科夫写道，“如果你有足够理由的话就开除我，要不就公开疏远那些帮了你这个忙（策划抹黑宣传战）的人。”第二天早上，梅德韦杰夫解除了他的职务，说他“失去了总统的信任”。

任命新市长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这说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人选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最后选中了普京的得力助手谢尔盖·索比亚宁。他是普京的办公厅主任，是普京一手提拔起来的。（顺便要说的是，他在首都才住了5年，对这个他即将掌管的城市一无所知。至于莫斯科臭名昭著的交通拥堵，他只是在乘坐政府配发的轿车沿高官专用道飞驰而过的时候透过黑色的车窗玻璃扫过一眼。）如果卢日科夫怀疑得不错，梅德韦杰夫确实想安插他自己亲信的话，那么这场重要的战役他败给了普京。以后他还有更多次失败。

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以来力图建立自由开明的形象。但石油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仍然身陷囹圄，这使得梅德韦杰夫的努力效果大打折扣。霍多尔科夫斯基到2011年底服刑期满，但他的敌人（霍多尔科夫斯基特别点名副总理伊戈尔·谢钦）坚决要多关他几年，无论如何也不想让他在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之前获释，于是2009年2月对他进行了第二次审判，对他提出的新指控完全不合情理。第一次审判已经判他犯了诈骗罪和逃税罪。这次检方想证明他和另一个被告人普拉东·列别捷夫侵吞了尤科斯从1998年到2003年生产的全部石油——可是过去检方说尤科斯出售了那些石油，却没有上缴应缴的税款。如果已经确认石油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出售”了，那么怎么可能又被他“偷窃”了呢？

工业部长维克托·赫里斯捷恩科和前经济部长格尔曼·格列夫都出庭做证，对检方的指控提出怀疑。这似乎给辩方打了一剂强心针。格列夫说：“如果发现有侵吞的事情，应该会向我报告。”赫里斯捷恩科则表示，他不知道几百万桶石油消失的事。

不幸，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辩护律师们没有高兴多久。法官本应于12月15日做出判决，但那天一早来到法院的记者们却看到门上贴了一张通知，说宣判推迟到27日，却没有任何解释。也许有一个解释：第二天，也就是16日，总理要出席一年一度的电视连线节目，一定会有人问他有关这场审判的问题。那就尴尬了，普京要想影响判决肯定也太晚了。现在判决推迟，他就可以利用回答民众打电话问问题的机会公然干涉司法进程。当有人问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普京说，“小偷就得进监狱”。这听上去像是向当时正在斟酌各种选择的丹尼尔金法官发出的直接命令。就连梅德韦杰夫总统都

不认同这么公开的干涉。他在电视采访中说："任何官员都没有权力在法院宣判前发表对案子的立场。"这是梅德韦杰夫第一次超越了仅仅发表与普京稍有不同意见的界限，实际上是公开的申斥。

可是这对审判的结果没有丝毫影响。丹尼尔金法官按照强人的意志宣判霍多尔科夫斯基有罪，并判处他14年徒刑，与对他的第一次判决合并执行，时间追溯到他被捕的2003年。他要等到2017年才能重获自由。

2009年和2010年间，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民主和人权讲了很多，偶尔也采取点儿实际行动，可他总理的反应却越来越怪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普京开始在百忙之中抽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宣传作秀，通过异乎寻常的方式显示他的阳刚活力，以表明尽管他比梅德韦杰夫大13岁，但他更加强健。

2009年8月，普京赤裸着胸膛在西伯利亚冰冷的河水里以蝶泳的姿势畅游。克里姆林宫的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响成一片，记录下他钓鱼和骑马的镜头。2010年间，他几乎每个月都有这么一次照相的机会：他给一头北极熊套上追踪的项圈，他骑着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参加摩托车拉力赛，他驾驶飞机向熊熊燃烧的野火洒水救火，他在海上的狂风巨浪中用十字弓向一头鲸发射飞镖，他驾驶着一级方程式赛车以每小时240公里的速度飞驰。10月，媒体纷纷猜测他可能为显得年轻采取了非常手段。在基辅的一次露面中，他的脸看上去浮肿淤青，化妆痕迹明显。"没有淤青，"他的发言人说，"他只是飞行和开会太多，非常疲倦而已。另外，光线的角度也可能不对。"但是媒体猜想他可能和他的朋友、永远年轻的前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一样，做了面部拉皮手术，或注射了肉毒杆菌。

梅德韦杰夫没有试图和普京比试硬汉的身手——虽然他走路时也开始摆出雄赳赳的姿态，说话时像是在咬牙切齿，这都是跟普京学的。不过总体上他的道具不是赛车和野兽，而是平板电脑和推特。

形象对他们二人都至关重要，他们是在向不同的群体争取人心。到2010年年底，离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还剩一年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明朗了：两人都想做下任俄罗斯总统，而决定谁上的人是普京。说到底，他们共驾的双人自行车是前轮大后轮小的那一种。

2011年大选

从某种意义上说，梅德韦杰夫在他整个总统任期期间都在为下一次选举进行小火慢工的竞选。然而随着最后一年的开始，总统的克里姆林宫和总理的"白宫"再一次陷入瘫痪——和上次大选之前的情况一样。一致的口径是他们二人将"共同决定"谁将成为2012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会在时机成熟

后宣布。两个阵营的官员们猜不准最后结局如何，纷纷开始私下活动。在最高层，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发言人惜字如金，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对会造成天平的倾斜。在较低层次，官僚们随时准备一俟形势明朗就另选靠山。每个级别的官员都害怕因说错话影响前程。

米哈伊尔·德沃尔科维奇（总统的经济顾问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的弟弟）在博客中写道："部长们不知道真正的老板是谁，茫然失措，努力执行着经常是互相矛盾的指示。这两人其中一个会在2012年成为总统，在他们中间做选择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一着棋错，一年后就会成为'政治上的死人'。"

2月底，佩斯科夫告诉我几个月后世界会陷入"歇斯底里"。我以为他指的是普京将宣布参选总统。但没有任何动静，仍然是一片人心浮动，惶惶不安。

两位"候选人"虽未公开宣布，但已经开始了选战，第一枪是关于索契冬奥会吉祥物的闹剧式的争论。普京要昭显他只要说一句话就能影响国家的任何决定。正如他发话"小偷就得进监狱"，使审理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的法官大伤脑筋一样，这次——在就冬奥会吉祥物举行全国电视投票的几小时前，他似乎不经意地表示雪豹做冬奥会的吉祥物就挺合适。雪豹果然中选了。梅德韦杰夫可是很不高兴。两天后，在谈到新的电子身份证的设计方案应放到网上让大家讨论这件完全无关的事情时，他尖刻地说："我希望能比对奥运会吉祥物的讨论更公平一些。"

更为对立的交锋还在后面。3月，在世界对卡扎菲镇压利比亚反对派该如何回应这个问题上，两位"候选人"的分歧公开化了。俄罗斯就授权对卡扎菲的部队进行空袭的联合国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这个立场是一个妥协——梅德韦杰夫想支持西方的立场，但外交部不同意。普京则愤怒不已并公开开炮。在参观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一家弹道导弹工厂时，他把联合国决议比做"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号召"。他说他对于"在国际事务中如此轻易决定使用武力"感到担忧。他把这看作美国政策中这种倾向的延续："克林顿时期他们轰炸了贝尔格莱德，布什派兵进入阿富汗，然后又使用莫须有的借口入侵伊拉克。现在轮到利比亚了，借口是保护和平的人民，但空袭炸死的正是平民。逻辑何在，良知何在？"

普京此言是直接批评梅德韦杰夫允许西方进行空袭的决定，梅德韦杰夫得知以后大为光火。外交政策是他的地盘，不归总理管。不到两小时后，他就召集了一群俄罗斯记者到他的别墅，在花园里对总理的话做了严厉的长篇反驳。他紧张地吞咽着口水，抽动着肩膀，说普京的评论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提到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字眼可能导致文明的冲突。他还说："我们不要忘记是什么促使安理会通过决议的。这些决议是对利比亚

当局行为的反应，所以我们才作了这样的决定。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平衡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我们赞成了第一项安理会决议，对第二项投了弃权票。我们是有意这样决定的，目的是防止暴力的升级……如果现在又纠缠于这件事，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时在做什么，那么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是我们清醒地做出的决定。这是我给外交部的指示，他们执行了我的指示。”

这是梅德韦杰夫总统第二次（第一次是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杀普京总理的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大约一周后，梅德韦杰夫的新闻秘书季玛科娃紧急电告所有电视台不准播放普京带着梅德韦杰夫驾驶新款试验车的镜头也就不奇怪了。选战至此已全面开打，不能再有普京在驾驶座上的镜头。

这是一场荒诞而不真实的选战。唯一真需要说服的人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本人——是他们拍板他俩之间谁当选。（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唯一的选举是普京脑袋里的选举。）但梅德韦杰夫决定向人民喊话，可能他希望获得媒体的支持，使普京迫于压力允许他留任总统。3月3日，他利用纪念亚历山大二世沙皇废除农奴制150周年的讲话提出他的思想理论，说“自由是不能推迟的”。普京自是不肯让他独出风头，几个月后找出了历史上可与自己相比拟的人物——不是“解放者沙皇”，而是俄国最后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首相，既是改革家又是镇压者的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推行了开明的土地改革但杀人如麻，大批反对他的人被处决，人们甚至因此把绞索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普京使用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的词语赞美斯托雷平，还呼吁在政府“白宫”前为斯托雷平立纪念碑。

梅德韦杰夫呼吁自由后又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他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的一篇讲话中列举出改善投资环境需要做的10件大事。他要求兼任国有公司领导的政府部长放弃公司的职务，引起一片哗然。此事涉及的人中包括普京最紧密的盟友、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伊戈尔·谢钦。梅德韦杰夫（他自己就曾在任副总理时兼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说不能再让“为产业制定规章制度的政府领导同时担任互相竞争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生意人报》把这个用独立董事取代国家官员的建议称为革命性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实质上是要求废除国家资本主义。”

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说政府（也就是普京）“难以同意这项举措”。[2]专门研究精英阶层构成的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什塔诺夫斯卡娅却说，自从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之后，强人在国家机构中的势力日益减弱，而这个步骤只是大趋势的一部分。在强人势力的鼎盛时期，安全部门和军方的官员占政府精英的47%，而到了2007年夏天，这个数字降到2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普京把重要职务的任命权让给了新总统。克里什塔诺夫斯卡娅说在75位“关键人物”中，除两人之外，其余仍然全是“普京的人”。[3]

意义重大的是，不受政府部长必须退出公司董事会这一新要求约束的例外是最大的国家控股公司，有着密集的政治、商业和媒体关系网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正如10年前改革派试图打破它的垄断而它却毫发无损一样）。8月底，政府宣布第一副总理维克托·祖布科夫将留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虽然他退出了其他公司的董事会）。祖布科夫是普京过去打击金融犯罪的得力干将，也是他在圣彼得堡时的朋友，他的柔道俱乐部的董事。德沃尔科维奇解释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能接触到大量的“机密情报”，因此任命独立董事“比较难办”。[4]这似乎印证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普京体制中心不可动摇的位置。普京用它来控制媒体，对外国施加压力，给他关系网中的密友们充实私囊。

对梅德韦杰夫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的“宣言”，普京的回应是4月20日在国家杜马的长篇演讲。讲话中，他警告不要对经济作“剧烈变动或自由主义的鲁莽实验”。看起来好像普京已不再完全信任他的门生会坚持正确道路了。

那年春天，似乎普京——可能梅德韦杰夫也一样——一度想寻找另外的政治解决办法。官方曾企图扶植，当然也想拉拢一个立场中间偏右、叫作“正义事业党”的小党，可能想把它立为官方许可的自由派“反对党”。开始曾争取让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和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做这个党的领导人，但经过大约一周的密谋策划后，两人都拒绝了。后来，俄罗斯首富之一，寡头米哈伊尔·普罗霍罗夫成为党魁。他发誓要把这个党变成“统一俄罗斯党”真正的竞争对手，并开始激烈批评克里姆林宫。这可不是原来设想的“忠实的”反对党，于是在9月份一次闹剧式的党内大会上，普罗霍罗夫被推翻了。他指控克里姆林宫的“傀儡主人”弗拉基米尔·苏尔科夫把“政治制度变为私有财产”。

最后，普京在5月6日撕去了所有民主的伪装，宣布了一个苏联色彩十分鲜明的决定。在没有任何公众协商或事先讨论的情况下，普京在伏尔加格勒讲话时宣布他将成立一个名为全俄人民阵线的新组织。核心是他的统一俄罗斯党，但欢迎“非党支持者”参加，组织或个人都可以。第二天，全俄人民阵线就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在普京的别墅开会计划竞选事宜。后来几周，加入的个人和组织数以千计。整条街道、整座工厂、整个机构、青年团体、退伍军人、音乐制作人协会和驯鹿饲养人组织都来参加。各个工会也竞相报名，许多甚至事先未征求过成员的意见。有些人拒绝被如此裹挟。建筑师协会后来投票推翻了代它作出的决定。音乐家协会的一些成员大声抗议，说他们不会帮助普京上演“假选举”。[5]

表面上，全俄人民阵线是为了在12月的议会选举中助统一俄罗斯党一臂之力。这个党在民意调查中支持度直线下跌，可能非此不能确保它胜选。但

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透露了真正的目的。他对记者说："全俄人民阵线是超乎党之上的，不是以党为基础的。因为是普京提出的想法，所以更多是围绕着他的。"

普京此举使俄罗斯已经软弱无力的政党制度更加成了笑话。正常情况下，不同的政党代表的是政治光谱的不同部分，普京却想把统一俄罗斯党建成一个代表所有群体的界限不明的群众组织。不要忘了，苏联共产党当时"打选战"也不是单枪匹马，而是作为"共产党员和非党人民组成的坚不可摧的阵营"的一部分。

普京在伏尔加格勒的演讲中是这样介绍他的主意的：

我有些建议想向大家说明。我想指出国家杜马候选人的甄选在8月前就得完成了。然后需要对候选人进行讨论，以便在9月的党代会上确定候选人名单。参加甄选工作的不仅应当有统一俄罗斯党党员，而且也应包括非党员支持者、工会成员、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成员、公共协会、公民中的积极分子。简言之，所有愿意通过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的成员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人。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该怎么做呢？基本上，我建议成立一个政治实践中所谓的广泛的民众阵线。（掌声）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

在重大政治活动之前整合广泛的政治力量的做法过去就有，现在各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在不同时期仍然在这么做：左派、我们所说的右翼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和爱国力量都在这么做。

它叫什么名字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构想和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这是一个把有志一统的政治力量团结在一起的工具。

我非常希望统一俄罗斯党和其他政党、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还有退伍军人组织，包括"二战"退伍军人和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每一个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希望找到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的最佳办法的人都能利用这个共同的平台，让我们称它为"全俄人民阵线"，因为在5月9日之前在斯大林格勒就有这样的意见。"全俄人民阵线"似乎是个相当合适的名字……（掌声）

谢谢大家。

我猜想这就是佩斯科夫预言将引起"歇斯底里"的事件，因为它看起来明显是为了进一步排挤梅德韦杰夫总统，把普京推上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不

仅是一个力量渐衰的政党的党魁，还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人民阵线的首脑。未来的国家杜马大选中，人民阵线的海报和普京的照片将占据首要位置。

梅德韦杰夫的反应先是冷静——只说这个想法是“合理的”——后来激烈起来。总理做出宣布一周后，他对来自各个政党的“年轻议员”说：“企图改变政治制度去适应某个个人是危险的……权力过分集中肯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在我们国家曾多次发生过……它一般都会导致停滞或内战。”

到夏天，梅德韦杰夫已经有些无奈认命的意思了。他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第一次承认他想竞选连任：“我想任何担任总统这个职务的人一定都想竞选连任。另外的问题是他是否会决定参选，决定参选和愿意参选不完全是一回事。”[6]这是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总统都羞于承认的：我想要竞选连任，但这不是我自己决定得了的事。

梅德韦杰夫的“竞选”活动仍然在继续着。在一次普京式的大规模记者招待会上，他显示了他自由派的一面。他说霍多尔科夫斯基如果获释，“绝对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在纪念对格鲁吉亚战争3周年的采访中，他表现出他可以和普京一样强硬，坚持说是他自己决定出兵格鲁吉亚的。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他宣布普京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已经寿终正寝：“是的，在我们发展的一个阶段中需要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的混乱过后必须稳住局势。但现在这条路的潜力已经发掘殆尽……这样的经济模式对国家的未来是危险的。”据报道，在同工商界领袖的闭门会上，他呼吁他们支持他的经济政策，而不是他前任的政策。他还对各政党领导人说他打算扭转普京的几项政治改革：把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从7%降到5%、“下放”权力，还保证要进行其他的改变，但未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改变。

有些评论家说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实际上仍然在联手行动，一个在前面推动改革，另一个则呼吁谨慎以防改革进程失去控制。[7]但这种意见忽视了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大选在即，他们二人当中只有一个能够成为执政精英的候选人。两人对候选人花落谁家都十分在意。

看起来梅德韦杰夫很快会灰溜溜地，用克里姆林宫的资深顾问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的话说是，“蹑手蹑脚地退出克里姆林宫”，因而向全世界证实他从来都是普京的替补。他的4年总统任期就像是一场闹剧，目的是为了在形式上保持宪法不变，实际上却是要加强普京的专制统治。

8月，普京去黑海一处古老的考古场址潜水，出水时竟然捞上来两个希腊古陶罐。几世纪以来，数以千计的潜水员居然都没看到这两个躺在海底的罐子。普京仿佛是无所不能，回归总统宝座对他来说肯定也不是难事。

因此，9月24日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他要竞选总统，并说他如果当选将任命梅德韦杰夫做总理，这并不是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然而由于此事的含意，它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梅德韦杰夫对于政治经济停滞以及需要改革大谈特谈之后，俄罗斯却将迎来12年的普京统治。梅德韦杰夫在他题为“加油，俄罗斯！”的文章中畅谈的梦想灰飞烟灭。他的强颜欢笑难掩他遭受的羞辱。最令人寒心的是，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表明，过去一年来所说的“时机成熟再作决定”的那些话全是在演戏——他们俩交换职位早在几年前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办移交的时候就讨论过了。

电视和大选进程全部掌握在克里姆林宫手中，2012年3月普京当选总统已毫无悬念，俄罗斯的未来是由两个人在密室中决定的。

---

[1] Interview with Dimitry Muratov,14 December 2010.

[2] Interview with Arkady Dvorkovich,29 June 2011.

[3] Interview with Olga Kryshtanovskaya *inSvobodnaya pressa*,8 February 2011,svpressa.ru/politic/article/38451(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4] http://www.bfm.ru/news/2011/08/29/dvorkovich-zubkov-ne-ujdet-iz-gazproma-do1-oktjabrja.html(last accessed7 September 2011).

[5] Guardian,1 July 2011.

[6] *Financial Times*,20 June 2011.

[7] http://www.rferl.org/content/medvedev_talks_reform_in_st_petersburg/24238558.html(last accessed 7 September 2011).

结束语

本书展现的俄罗斯不是我本来希望描述的样子，也不是20年前苏联刚解体时我想象它将发展成为的样子。[1]

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时向西方示好，采取措施刺激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后来他却压制媒体自由，扼杀民主，并利用一切现代通信手段发展个人崇拜。俄罗斯经济依然几乎全部依赖原材料出口，没有现代化的制造业基础可言。政府自己都承认腐败猖獗并且还在不断恶化——腐败是维持这个黑手党式的国家的黏合剂。统治国家的是普京来自克格勃、圣彼得堡，甚至他别墅合作社的一小撮朋友和同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若是真的想改变这一切的话，他已一败涂地。普京发誓要镇压寡头，但矛头所指只是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人。与此同时，国家财富大量集中于巨富的大亨和官僚手中。这块土地地大物博，人才济济，却至今未能繁荣昌盛。一项民调显示，约40%的年轻人宁肯移居海外。[2]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普京这么受欢迎？事实上，他的支持度在稳步下降。据俄罗斯最大的独立民调中心列瓦达中心统计，2011年8月，只有39%的受访者说他们肯定会投票支持普京。而三年前在格鲁吉亚战争期间，普京的支持度高达58%。同期他的“满意度”从83%降为68%。（梅德韦杰夫的满意度从73%降到63%，只有20%的受访者说“肯定”会投他的票。）还应当记住，专制统治的气氛（以及对克格勃残存的恐惧）意味着许多俄罗斯人在回答民意调查人（哪怕是独立民意调查人）的问题时，只肯说他们认为政府喜欢听的话。

不过，尽管普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失败，他仍然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要寻求对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请再读一遍我在第十一章结尾处翻译的他最喜欢的那首歌的歌词。西方人可能觉得它矫情伤感，那些风雅世故、愤世嫉俗、痛恨普京和他所代表的一切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可能对它嗤之以鼻。然而，如果你到过几百万俄罗斯百姓家中，你会看到人们听到苏联时代的经典歌曲就会热泪盈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普京扣动的是几百万俄罗斯人怀旧的心弦——他们怀念过去简单的日子，怀念“平等”，怀念同志的情谊，怀念团结，怀念在俄罗斯比在任何地方都持续得更久的战时精神。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可能大多数西方人难以理解，但这是真的。

俄罗斯共和国的群众总的来说和“一般”西方人不一样。2008年举行过一次电视选拔活动，要选出“俄罗斯第一伟人”。结果斯大林得票第三——人们

觉得若不是当局为避免尴尬难堪而对投票结果做了手脚，他本应稳居第一。

我在第一章中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以为俄罗斯是一个等待解放的西方国家是大错特错。普京就是利用了民众心中对此的本能反抗。他代表着那些想建立西方式经济并享受其种种好处，但想找到自己的未来之路，对西方的失败和不足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他代表着渴望俄罗斯受到世界尊重的人——不幸的是，这也包括几百万错把恐惧当成尊重的人。他还代表着全身心地热爱俄罗斯，沉醉于它独一无二的特点的人——这些人使像我这样真心努力“弄懂”俄罗斯的西方人气沮至极。他们对我们冷笑着说：“你们永远也不懂俄罗斯的灵魂。”

如果普京的直觉能伴以民主的本能和对人民选择的信任，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但普京并不真正懂得民主。我们看到，他相信美国总统可以开除讨厌的新闻主播。他相信阴谋论（认为格鲁吉亚战争打响是为了帮助麦凯恩参议员），也相信他的情报机构向他报告的无稽之谈（说美国有单独的禽类加工厂，专门生产不达标的肉鸡卖给俄罗斯）。他建立了一个（他认为）需要他事必躬亲的制度。2010年夏天的野火肆虐时，他甚至命令在被烧毁的村庄里安装闭路电视以供他从办公室监督重建的进度。

他的领导方式包括在电视上公开申斥官员，有时逼着他们在摄影机前当场改变政策。下面是一个例子：

普京：我想弄清楚俄罗斯航空公司要买多少俄罗斯制造的飞机。否则你们想占据国内市场，又不想买国内的设备，那可不好。

萨维利耶夫（俄罗斯航空公司总裁）：可是我们买了俄制飞机呀……

普京：买得不够。

萨维利耶夫：好吧，我们去作计划，作好以后我会向您报告。

普京：好。

普京建立了一个传统（梅德韦杰夫把它保持了下来），每次内阁会议开始时都会录像，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转播。显然他认为这显示了开放和民主。事实上，它意味着议政会议成了作秀。本来应该是不受打扰，在内阁的闭门会议上无所顾忌地讨论棘手的问题，现在却成了听普京讲话，至多是他和部长们装腔作势的对话。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电视上播出内阁会议的情形，谁也不期望有这样的转播，因为困难的决定只能在非公开的场合做

出。所以，普京抓住“民主”的皮毛——把决策者搬上电视——把它变成了独裁的工具。

2011年2月普京参观第一频道的演播室时暴露了自己对媒体自由的粗陋理解。他对记者们说：“我想所有部门的代表都必须上联邦电视节目，介绍他们部门的工作，解释那里的情形，使人民能听那些官员亲口说明他们的意图和计划。”乍看之下这个想法很开明。但俄罗斯电视缺少的不是对政府“意图”和已然确定的“计划”的“说明”，而是在计划确定之前对政策进行有理有据的自由辩论。

然而，普京的制度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它却不像人们经常肤浅地说的“和苏联一样”。2009年1月，普京在达沃斯对如何改革资本主义经济发表议论后，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嘲讽的评论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很高兴听普京总理鼓吹自由企业，我希望在他那儿能行得通。”2011年，《巴尔的摩太阳报》刊载了一篇关于俄罗斯人喜欢快餐店的文章，标题是：“同志，我们就是喜欢。”（取自麦当劳的广告）同志！俄罗斯人彼此不称同志已有20年了，但似乎过去的印记依然存在。

只要看看在莫斯科机场排队准备举家出国度假的兴奋的人群，或参观一下展出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物品的古拉格博物馆，或去剧院观赏根据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改编的话剧，或浏览一下俄罗斯的网站和博客，或哪怕只是在今天的莫斯科下饭馆，逛商店，你就会知道俄罗斯已经完全变了。

本书即将完成时，我想引用曾任英国驻苏联大使的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爵士的话。他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和对它的人民的理解使他对俄罗斯的观察别具慧眼。“普京的办法有许多缺陷，”他写道，“但它使俄罗斯恢复了自尊，为将来的繁荣和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外人最好闭嘴，不要乱提建议。那些建议有时是傲慢的、侮辱性的，经常是不得要领或毫无帮助的。”[3]

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恰恰没有这样做。正如本书所述事件表明的那样，对于新冷战的爆发，可能美国和普京都有责任。前者麻木迟钝，后者为追求恢复俄罗斯的自尊和地位这一合理目标不惜采取强硬蛮横的手段。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双方都落入了固定思考模式的窠臼，这种思考模式是植根于两种意识形态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什么“俄罗斯意识形态”，而且争取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完全不同于苏联理念向全球扩张的野心。然而双方都停留在冷战思维中，仍然时有冷战式的摩擦，结果是彼此剑拔弩张，而不是试着理解对方的忧惧。

俄罗斯的人民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表示出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但他们痛恨随之而来的混乱。普京带来了稳定，却限制了民主。俄罗斯人尚未找到一位能让他们二者兼得的领导人。

---

[1] I notice that my book about the Gorbachev years ended very hopefully.See Angus Roxburgh,*The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BBC Books,1991).

[2] *Sunday Times*,14 August 2011.

[3] http://valdaiclub.com/history/29960.html–18 August 2011(last accessed 7 September 2011).

强权与铁腕：普京传
[英]安格斯·罗克斯伯勒　著
胡利平 林华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4年6月第2版
字 数：240千字

纸书书号：978-7-5086-4590-2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书院
中信书院：App下载地址https://book.yunpub.cn/（中信官方数字阅读平台）
微信号：中信书院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学术

The Logic of Big Power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30 Years from Soviet Union to New Russia

俄罗斯之路30年

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

张树华◎著

Zhang Shuhua

全方位展示俄罗斯30年沧桑剧变

大纵深聚焦大国兴衰与俄罗斯民族命运

明线条梳理普京的振兴之路



孔 丹 王海运

弗·布罗夫

亚·罗曼诺夫

叶·格拉齐科夫

联袂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录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引言

第一篇 自由化迷途

第一章 失去灵魂——指导思想的动摇

第二章 失去领导权——体制的失灵

第三章 失去话语权——舆论阵地的坍塌

第四章 思想蜕变与理论衰变

第五章 科学之殇

第二篇 私有化困境

第六章 从非国有化到私有化

第七章 全盘私有化

第八章 私有化乱象

第九章 私有化后果

第十章 俄罗斯经济之困

第三篇 民主化陷阱

第十一章 民主诱惑与政治裂变

第十二章 民主畸变

第十三章 主权民主与威权稳定

第十四章 民主标准与发展困境

第十五章 政治大国之梦

版权页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

《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

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孔丹

2015年10月25日

引言

一

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已经过去近30年了。30年间，世界政治版图和俄罗斯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这些突变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社会制度改变“颜色”。苏东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版图。苏共垮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苏联曾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大党。苏共、苏联也曾经是对新中国革命和建设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密不可分。苏共政治思想变质、苏共内部组织上的瓦解是导致国家分裂、苏共败亡的直接原因。今天，以苏共为代表的苏联、东欧地区共产党的兴衰史仍然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为保持我们党永续执政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必要深入研究苏东剧变和苏共败亡的原因，总结共产党“掌好权”“执好政”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防重蹈苏共覆辙。

二十多年前，由意识形态同源、历史经历相近的共产主义大党执政的中苏两国，有着相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背景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一个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一个业已分崩离析——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走向瓦解？苏联瓦解后，俄罗斯又选择了一条什么道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背景下，近30年来俄罗斯内政外交又是如何跌宕起伏的？在苏联大地上新生的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21世纪开启后，普京又是如何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超常的洞察力带领俄罗斯勇敢地迎接挑战、走出困境的？

二

研究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既是一项严肃的、跨学科的学术课题，也是一项政治性和思想性很强的研究项目。多年来，苏共兴衰史始终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要时刻对照检查，引以为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苏共大党有着悠久的光荣革命历史，取得过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却在成立九十多年、执政七十多年之后失去了政权。有人形象地讲，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

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国家分崩离析。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苏东剧变二十多年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结论各异、众说纷纭。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先后总结出50多种说法，如“体制僵化说”“经济落后说”“民族矛盾说”等。苏东剧变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塌，还包含了社会制度改变“颜色”、道路改弦易辙、共产党的衰亡、国家政权更迭等含义。由此看来，导致苏东剧变的原因和因素复杂而繁多，可以罗列出政治性、经济性、社会的、思想的、历史的、现实的、军事的、民族的、体制性、主观性、内部的、外部的诸多因素。

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苏联和东欧国家想进行一些调整，但在西方等各种势力的强大攻势下，这种调整偏离了正确方向，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交织，推波助澜，终于导致在1989年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苏联的教训让我们看到，党的理论正确与否，政权是否牢固，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会顷刻失去政权并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挖坟掘墓”，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三十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被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十分深刻。研究和反思苏共垮台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之后，我们认为，苏联剧变关键在苏共，而导致苏共蜕变的关键问题又出在苏共内部。

俄罗斯有句谚语，鱼从头上开始烂。而苏共蜕变正是先从党内高层开始的，苏共高层的蜕变又是以思想理论的蜕变为先导的。

三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基。党的领导关键是确立正确的路线与方向。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的6年多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

领导地位”的错误路线。戈尔巴乔夫通过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关于苏共作为领导核心的规定，盲目推行西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削弱了国家力量，搞乱了社会，结果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苏共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进攻下被攻击、被瓦解、被摧毁。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领导核心被动摇了、被打垮了、被推翻了，完整的苏联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使党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手里，必须制定正确的组织路线，高度重视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苏共的失败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苏共不是被基层群众起义推翻的，而是由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东国家共产党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正是苏共执政后期，高层领导人在思想上的背弃、在路线上的背离、在政治上的背叛导致苏共的败亡。

苏联的问题关键在党，关键在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关键在思想理论武装。思想理论之于党，就像人有无精气神。生命后期失去了精气神的苏联共产党犹如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土崩瓦解，轰然倒下。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连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四

意识形态指的是代表社会中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信仰和一整套思想观念体系。它体现为人们对所在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见解、信仰、追求，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思考。意识形态工作就是以主导思想观念体系为基础而进行的宣传、解释、研究、传播、教育等活动，通常涉及理论研究、文化艺术、宣传鼓动、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众多领域。

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和较量的战场。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政党不去占领，甚至拱手让与他人，无异于思想上自动解除武装，无异于政治上的投降。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8月19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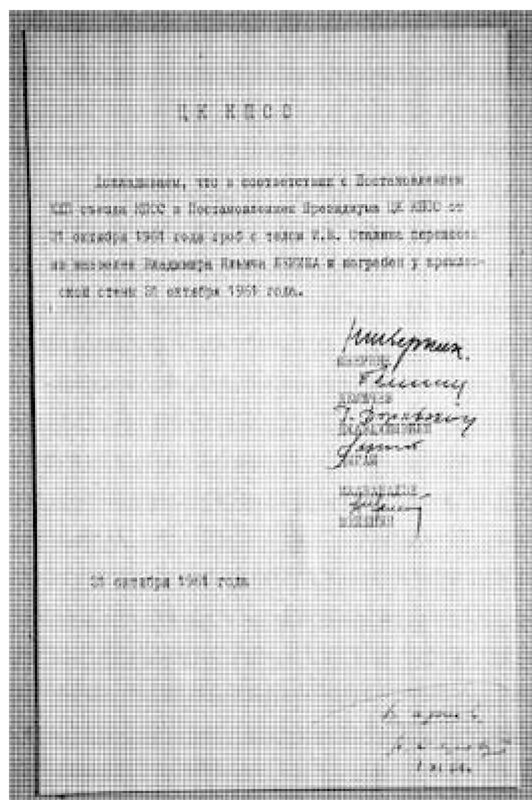
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蓄意隐瞒或模糊意识形态工作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始终鲜明地紧抓意识形态工作，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关注政治教育工作，时时刻刻防御西方敌对势力的“心理战”和“信息战”。在长期党建和执政过程中，苏共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形成了一些经验，末期却犯了严重的错误。在74年执政的中后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由教条、保守、僵化演变成意识形态自由化、多元化、西化等，脱离、背离、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党员丧失信仰、思想分裂，成为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思想方向上摇摆不定，社会随之一盘散沙。面对内外敌对思潮的侵袭，苏共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送进了“火葬场”。因此，研究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的思想根源和舆论原因，有助于科学地总结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2.

[2]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1).

第一篇　自由化迷途



ЦК КПСС

1961年10月31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称根据苏共22大决议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已经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迁出，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

（原件藏于俄罗斯当代历史国家博物馆，作者查于2014年夏）



自称是列宁思想的“好学生”戈尔巴乔夫

（原件藏于俄罗斯当代历史国家博物馆，作者查于2014年7月）



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1989年苏联电视频道政论性节目《观点》正在热播

（俄罗斯当代历史国家博物馆藏，作者查于2014年7月）



苏共后期，戈尔巴乔夫推动历史反思和平反，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列宁和斯大林都成了抹黑和攻击的对象。苏共意识形态危在旦夕，苏联摇摇欲坠。

（图片为作者提供）

第一章　失去灵魂——指导思想的动摇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生命力的灵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严重偏移，先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将其教条化、片面化、绝对化、凝固化，并机械地加以搬用，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而当社会发展中积累了大量问题需要加以改革的时候，苏共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原来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思想严重僵化的一个极端，转向了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道路的另一个极端。从思想信仰上的动摇发展到在历史方面搞自我否定，导致民众思想混乱，信仰缺失，从而使庞大的苏共变成失去思想灵魂的“泥足巨人”，土崩瓦解。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就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要么教条地理解和盲目迷信，要么完全抛弃的做法，都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曾说道：“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1]苏东剧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

一、缺钙与失魂：理想的丧失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2]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是否坚守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否坚守党的意识形态阵地，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苏共所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苏共垮台的思想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苏联领导人从自身就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

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堪称典范。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十月革命是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则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和典范。在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

在全党和全社会人民心中，列宁作为革命的领袖具有无可置疑的思想和理论权威。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4]

列宁逝世后，在俄共（布）内部，思想和路线的斗争日趋激烈。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共（布）和以托派为代表的“不断革命论者”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和政治对立。双方都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而战，但目的却不同。而且他们利用列宁针对各个完全不同时期的著述，找出相应的引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个时期，党的内部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看风使舵者”。[5]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国内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新生苏维埃政权进行攻击和封锁，新的世界大战即将到来。面对如此形势，斯大林十分重视全党的思想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斯大林不仅多次过问，而且经常亲自撰写总结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章。他先后撰写和指导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

在分析苏共失败的原因时，俄罗斯一些学者认为，苏共是自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脱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奉行的是“右倾修正主义”。在2000年，俄罗斯著名政论家、历史人物传记作家，原“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对记者表示，赫鲁晓夫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上的作用很大，苏联后期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其实是在他领导苏共的11年内形成的。赫鲁晓夫当政时，开展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提出了完全不切实际的“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冒进口号。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行为，被西方情报部门迅速利用。西方的反苏、反共势力如获至宝，他们利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大肆鼓噪，推波助澜，严重削弱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根基。苏共和苏联思想理论界开始动摇和怀疑，党内一些领导人甚至变得不知所措，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产生动摇。此时，苏共内部的一些理论权威摇身一变、改弦易辙，将笔锋转向了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上，结果引发了全国上下思想上的混乱，给苏共党员队伍带来分裂，产生巨大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之后，为了纠正赫鲁晓夫的理论偏差，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引用经典文本对这一概念进行宣传和阐释。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在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做斗争方面，依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也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国际形象。在苏联内部，苏共在积极宣传、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出现了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党的领导人

在理论上鲜见创新和突破，多数情况下只是满足于采用马列主义个别言辞和论断，以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和根据。这种僵化、凝固的思想氛围使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人们心目中逐渐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开始背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思想上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推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社会发展中期望和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最后导致“改革”误入歧途，瓦解了国家，埋葬了苏联共产党，也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二、失去信仰、背弃信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共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越来越僵化、教条化，而到了苏共后期则开始批判马克思主义信仰，最后乃至背叛。正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叶·利加乔夫所言，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一伙人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政治观点，政治蜕化了。

（一）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转变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改革刚刚起步，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转变。戈尔巴乔夫提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6]

戈尔巴乔夫所谓破除精神垄断和推行多元化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放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搞思想自由化。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说“共产主义”是“激进的、革命的专制思想，是绝对的、完全的平均主义”。他居然攻击共产主义是“在马克思晚年已经死去的思想”，认为共产主义被引入俄罗斯是一个错误。他在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话时称，共产主义是一种绝对性、极权性的空想社会改良说，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戈尔巴乔夫曾经极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赤诚的“列宁主义者”，后来却发生180度大转变，指责“列宁，特别是年轻时的列宁，却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7]

据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一位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回忆，“戈尔巴乔夫早在赴莫斯科任职前，内心深处就做好要摧毁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8]

为达到此目的，他认真阅读了各种地下出版物及由助手们挑选和推荐的一些不同意见的内部读物和翻译作品。戈尔巴乔夫的这位亲密助手坦言，戈尔巴乔夫掌权时转而求助于那些自由化的、国外的思想是自然而然的。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召开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公开宣扬“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应当是多元的，意识形态也要与此相适应。搞多元化，必须废除苏联传统上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精神垄断”，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以外各种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存在与传播。在这之后几年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思想混乱，使苏共逐渐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1990年《苏联出版法》的出台，进一步使得苏共失去了对一些新闻报刊的控制权。过去是苏共宣传阵地的很多报刊的编辑、记者掉转枪口，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由此可见，苏共总书记思想上的背离成为苏共领导层和思想理论界蜕变的催化剂并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理想发生动摇，党员失去信仰，激进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在苏联泛滥起来。

（二）雅科夫列夫的公开背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高层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他曾主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然而正是这位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比戈尔巴乔夫更进一步，露骨地诋毁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十月革命、献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亚·尼·雅科夫列夫便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主义。1985年12月，作为当时戈尔巴乔夫的亲信，雅科夫列夫进言：“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其危险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必须在理论上做出这样的突破，才能制止极权主义和对自由、创造的蔑视，才能结束意识形态的单一化……不仅仅要拆除斯大林主义，还要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9]

对于马克思主义，雅科夫列夫公开宣称：“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尤其要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10]雅科夫列夫声称，历史进程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的单维性、普遍性和物质的同一性等谬误学说抛到生活的一边了。他在1991年10月自白：“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长期在

苏共中央宣传部门工作的雅科夫列夫竟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犯罪世界除了无道德和犯罪行为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什么。他对十月革命怨恨不已，要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公开叫嚣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斩草除根。雅科夫列夫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降临时，就落在这样充满暴力和极端仇恨情绪的土壤上。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充塞烦琐哲学、解决问题的简单处方、迷惑人心的乌托邦观点。[11]雅科夫列夫在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观念却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曾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12]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党的事业失去了信心，不仅在思想上背叛党，而且在组织上瓦解党，拱手让出意识形态阵地，思想教育工作放任自流，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党的领导人和广大党员与党离心离德。不难想象，这样的党还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吗？离自掘坟墓、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

---

[1]邓小平年谱：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3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3]李慎明。列宁新经济政策浅析[M]//李慎明。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68—271.

[4]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5]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2.

[6]李兴耕。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8.

[7]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谈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摘编）[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5)：22—23.

[8]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M].徐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209.

[9]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8—30，286.

[10]同上286.

[11]同上104—109.

[12]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8—30，339.

第二章　失去领导权——体制的失灵

一、组织领导弱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以及教育等领域对沙俄及资产阶级旧文化残余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保证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摈弃了国家不能干涉文化的错误论点，全面实现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武装和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当时的苏联党和政府也积极利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随着政治思想工作的推进，斯大林逐步确立了自己在党内外不可置疑的理论权威地位，与此同时，社会中也形成了一种旗帜鲜明、面面俱到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现今的俄罗斯学者评论道，当时的苏联社会“在思想理论方面，在社会意识领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铁板一块’。人们相信社会公正，相信自己的幸福未来和国家的美好未来。当时看来，不用说消灭这样一个社会，甚至连撼动它也绝无可能”。[1]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领导丢掉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传统，思想停滞不前，工作安于现状，不善于独立思考和战略谋划，经常满足于顾问班子、专家和助手们“万金油式”的套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苏共内部几乎再没有出现一个既具备远见卓识的理论家才能，又具备开阔视野和高超组织能力的领导者。

苏共执政后期，在组织和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和方式、方法上出现了不少失误，但关键性的错误就是苏共领导人将意识形态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苏共叛逆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内部就已冒出分裂的苗头，苏共灭亡的命运早已注定。1990年夏，苏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八大期间，戈尔巴乔夫向跟随自己多年的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坦言：“听着，托利亚，别以为我看不见……我看到了……你们的信也看了。阿尔巴托夫、什梅廖夫[2]……许多人像是商量好了一样，都劝说我甩掉总书记一职。可你要明白：不能松开绳索，放开这只可恶的疯狗（指苏共）。如果我这样干了，那这个庞然大物就会反对我。”

有关戈尔巴乔夫要摆脱党的思想的表现，身为亲密助手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1993年和1998年两次出版的回忆录中均有透露。只是害怕授人以柄，

在1998年书籍再版时用“怪物”一词代替了“狗”。[3]可以想象，一个党的总书记，在最后的关头，竟然想弃之而去，苏共悲惨的命运实难避免。果不其然，一年之后，就是在“8·19”事件之后，在外休假时被叶利钦挟持回来的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第一个签署的命令就是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勒令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一）由思想分野到组织分裂

苏共末期，戈尔巴乔夫重用了西化改革派旗帜性人物雅科夫列夫，取代“保守”的叶·利加乔夫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雅科夫列夫作为一个隐藏在苏共高层内部的“两面人”，深谙思想斗争的技巧，也熟知苏共的软肋。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达到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的，他出谋划策，或通过提交报告、演讲文稿等途径，利用一切机会灌输这些主张。雅科夫列夫成功地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理想信念不坚定、意志薄弱、爱好虚荣、习惯于信口开河、夸夸其谈等弱点，不断渗透控制其头脑，利用其嘴巴和权力，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2月，雅科夫列夫就以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甚至公开提出了在组织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4]据苏联科学院原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60年代以后苏共几任总书记顾问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的确，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也曾讨论过这一方案。”院士本人也认为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5]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分裂苏共时说：“生活在迅速地赶超理论、赶超构思。”[6]他认为，应该赶在事件发生的前头。也许，将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之举。那样就可以给现有的分歧以组织上的出路。

由于雅科夫列夫长期在苏共宣传思想部门工作，深谙思想斗争和开展内部瓦解工程的手段。他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打碎苏联机构，不能采取像叶利钦那样的正面直线进攻的方式进行。他认为，要避免失败，就应当讲策略，对有些事情缄默不言，有些问题要绕着走，这样才能达到目的。雅科夫列夫一方面利用作为戈尔巴乔夫“心腹和亲信”的身份，直接进言或采取适当迂回策略，另一方面，还积极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机会，网罗了一批变质的苏共报刊舆论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

1986年至1988年苏联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雅科夫列夫安插的“新

人”接管：《消息报》《星火》《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新世界》等报纸杂志的总编辑纷纷换人。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的同窗好友弗罗洛夫先后出任《共产党人》和《真理报》的主编。[7]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1987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前，这些苏共中央办的全国性主流报刊到处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和搞乱舆论的急先锋。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短短的几年内，雅科夫列夫成功地领导着瓦解苏共的内部工程：1985年他提出“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让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他利用纪念十月革命讲话推销自由化思想；撤换异己，安插和怂恿激进自由报刊主编，领导对苏共历史的翻案；他压制和打击党内不同声音等。

1990年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雅科夫列夫眼见戈尔巴乔夫已经日薄西山，政治影响力每况愈下，他开始与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看到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雅科夫列夫深表不满，他决定丢下多年的面具，直接宣布退党，迈出了分裂苏共的步子。随着苏共垮台，他成功地躲进了苏共另一叛逆者——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阵营，成为苏联和苏共的“掘墓人”。

（二）随波逐流与不敢担当

在苏共生命后期，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和纵容下，为所欲为，从内部、从思想上搞乱了全党。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又进行了一次“政治改组”，让“保守”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利加乔夫主管农业，“激进”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主管国际问题，而起用另一“中庸”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苏共最后一位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瓦·安·梅德韦杰夫平庸无能，但在思想政治上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却是一脉相承。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社会舆论界，在“公开性”和“新思维”的搅动下，浊浪滔天，一片乌烟瘴气。诋毁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甚至公开号召推翻苏共的声音此起彼伏。1988年身为苏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梅德韦杰夫，作为苏联科学院的经济学通讯院士，在由他领导编撰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抹杀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删除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美化资本主义制度。[8]苏共丢失了一个又一个思想舆论阵地。此时，那个辉煌的、拥有近2000万

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大势已去，穷于应付，难以招架。梅德韦杰夫自己承认，任凭他怎样打招呼，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仍然我行我素，公开发行包括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禁书”。[9]1989年，为应付四面袭来的攻击，在舆论上已是四面楚歌的苏共中央不得不最后出面，决定由软弱的梅德韦杰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所谓的“快速反应小组”，以应付舆论界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历史的歪曲等。然而，事与愿违，苏联理论界、社会科学界对此反应平淡。因为在颠倒是非的情况下，一些学者正确的、理智的观点往往被贴上“保守”“教条”“过时”等标签。苏共已经失去了社会中坚力量的支持，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专家成了苏共被埋葬的“看客”。

1990年至1991年初，在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和敌对势力的两面夹击下，长期“缺钙”的苏共犹如失去灵魂的“泥足巨人”，只留下一个外壳，内部已经成为空洞并开始瓦解和坍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和广大党员离心离德，庞大的党员队伍不但横向分裂出左、中、右三派，而且纵向也出现了三级断裂：中央委员、各级地方党委和党的基层组织。[10]苏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政治纲领问题上的严重分裂就是明显的例证。[11]苏共思想上的蜕变和瓦解成了组织上分裂的导火索和助燃剂。

二、思想钝化与队伍弱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势，如何培养自己的宣传和教育队伍，如何转化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知识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对于旧知识分子，一方面批判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另一方面用同志合作的气氛来影响他们，积极吸引他们参与到新生活的建设中来。在哲学界和理论界，通过几轮思想和观点的交锋，人们逐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含义，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文化艺术方面，通过批判各种宗派主义、虚无主义，加强了队伍统一，保证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方向。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坚持政治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重视苏共思想理论队伍的培养。卫国战争期间，为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扩大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专门设立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科学处。除此之外，负责宣传和思想文化工作的还有中央宣传鼓动部、红军总政治部、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苏联人民政府委员会下属的艺术事业委员会、全苏高校事务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处等。可以说，战争不仅是对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严峻考验，也是对苏联人民精神的严峻考验。战争的胜利提升了苏联文化的威望，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思想教育干部。战后一个时期，他们一度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骨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领导干部不应“爱惜自己的羽毛”，面对错误思潮和言行，应敢于“亮剑”。在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岗位上，不应论资排辈，安排照顾，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会“两把刷子”。“二战”胜利后，苏共内部就出现了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虚伪的“假思想家和理论家”。正是这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列主义者后来逐渐占据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层，腐蚀了思想理论队伍。早在“二战”前，这些号称意识形态领域的行家里手在苏联政治生活中便身居高位，其中一些人已接近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们当中存有不少毫无原则、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只想尽快升官的人，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经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极力攫取特殊的物质福利待遇。他们善于钻营，许多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成了科学院院士。例如，20世纪6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乔夫，一辈子不但连小册子都没写过一本，甚至连报上的文章都是由部下代劳，却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显赫终生的头衔。[12]

苏共内部的“意识形态行家”不是专心于思考具体的理论工作，而是善于制造并挑拨社会矛盾，发动反对米丘林生物学、反物理学唯心主义、反控制论、反共振理论、反巴甫洛夫学说等运动。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同现代科学隔绝并对立起来，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威信，将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言论绝对化，阻碍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甚至将意识形态斗争的矛头指向包括苏联朋友如爱因斯坦、狄拉克、贝尔纳、玻尔等在内的著名西方学者，谴责他们是“唯心主义”，使西方进步学者同苏联之间产生隔阂。

80年代末期，伴随着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的背叛，苏共思想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也乘势反戈一击，与西方反苏政治力量遥相呼应。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苏联体制或极权主义”的斗士。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文集——《别无选择》。这部书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也很快在中国翻译出版。文集的作者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多是以批判斯大林体制，批判苏联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如社会学家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经济学家波波夫、经济学家谢留宁、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伏罗洛夫、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作家格拉宁等。[13]

其后，戈尔巴乔夫重用了一些人，他们都是所谓的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院士专家。现在看来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看出了某些社会问题，但却开错了医治的药方，或者说他们的处方已经无益于病入膏肓的苏共。这些处方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种：一是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经济全盘市场化、私有化；二是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14]，他曾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曾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成为“民主派”的领头羊。在苏联后

期，他与苏联知识界的一些精英一起，对摧毁苏联制度起了很大作用。波波夫当时提出，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计划体制，因此必须打破官僚机构，苏联应当分成50个“旧俄省”或“郡”，之后再组成“邦联”。他曾经提出“三非”理论，为苏联改革开出药方：非国有化、非苏维埃化、非联邦化。[15]

在上述“民主化”精英的带领下，苏联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于是去红色化、去苏化、去苏共化愈演愈烈，苏联社会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西方观察家指出，1989—1990年，苏联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愈发激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苏共精心培养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去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16]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苏联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后来有一部名为《20世纪的俄罗斯》的历史“教材”，其内容充斥着“极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大规模镇压”“农业中的困难”“民族矛盾”“新的镇压浪潮”等词汇，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等已经成为暴力和罪恶的代名词。苏联卫国战争被描述成“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个法西斯之间的战争”。一时间，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平等”在苏联的表现就是“同等贫穷”。他们期望在弹指一挥间跨越时代和社会鸿沟，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堡垒一下子就跃至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王国。

---

[1]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6.

[2]格·阿·阿尔巴托夫，现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名誉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曾多年担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职务，20世纪60年代后曾为赫鲁晓夫直至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苏共领导人的政治外交问题“智囊”和“笔杆子”；尼·什梅廖夫，作家、经济学家，曾任苏联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思想理论界的领潮人物之一。

[3]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M].莫斯科，1993：356；苏联总统助手日记[M].莫斯科，1998：326；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M].徐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425.

[4]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82.

[5]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462.

[6]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33.

[7]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54—155.

[8]曹长盛，张捷，樊建新。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3.

[9]瓦·安·梅德韦杰夫。洞察、神话还是背叛？[M].莫斯科：欧亚出版社，1998：275.

[10]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54.

[11]列·阿巴尔金。社会替代理论永远不变[M]//李慎明。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张树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14.

[12]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7.

[13]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M].莫斯科：角度出版社，2002：95—96.

[14]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莫斯科国际大学校长。原为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1989年3月起任苏联人民代表，1989年6月起任跨地区议员小组共同主席，1990年3月起任莫斯科市议会“民主俄罗斯”联盟议员，同年4月20日赢得选举，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1991年6月至1992年6月任莫斯科市首任市长。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波波夫与叶利钦等人一起，引领了苏联“民主化、反苏共”的浪潮。

[15]加·波波夫。前景与现实[J].星火，1990（50、51）.

[16]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M].莫斯科：角度出版社，2002：95—96.

第三章　失去话语权——舆论阵地的坍塌

一、“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

1923年3月，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和党性，因此，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妥协的进攻性斗争是共产党人的使命。[1]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传播，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文化、科学、出版和教育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查封了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报纸，成立了一些传播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培养意识形态干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如共产主义大学（1919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年）、党史研究会（1920年）、红色教授研究院（1921年）、列宁研究院（1923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等。

“二战”之前，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国外敌对势力一直对苏联施加思想高压，在思想教育领域，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占领了文化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面对“二战”前敌对势力的包围圈，思想理论上可谓是“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二战”以后，硝烟未尽，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准备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并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

应当说，面对西方日益强烈的心理战，在战前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组织了有效的反击。在军队系统，伏龙芝将政治工作视为“补充武器”，在军队总政治局下设进行心理战的机构和政治宣传委员会。贝利亚领导的安全情报部在对外侦察和反宣传方面也卓有成效。日丹诺夫在领导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思想方面，组织了宣传工作，有力整合了国内宣传机构，统一思想，集中精神，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大量精力，也为后来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

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为此而兴起的美国苏联学起到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在西方也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苏联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总体说来，美国苏联学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谋士们认为，思想战、信息战、心理战是美苏较量的有力武器。而欲取得效果，进而达到取胜的目的，必须"里应外合"。因此，西方专家非常关注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十分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人们注意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宫在非俄罗斯族群日益增强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压力下做出让步，那么通向和平演变的大门就打开了。为此，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经济上的原因，不如说是思想上的原因。作者认为，西方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了"分子入侵"，先是制造对体制怀疑的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最后直至共产党和国家解体。他认为，这一过程至少在60年代就开始了。产生这种情况，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3]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这是信息心理战的结果。西方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改革的空想，并进一步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

二、"放任自流"：舆论阵地拱手让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举什么旗帜和走什么道路，事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苏联解体首先发酵的就是舆论领域。当时苏联主要媒体逐渐脱离了党的领导，舆论领域大面积出现丑化和否定党的历史的现象，把社会和人心搞乱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戈尔巴乔夫有意识地纵容和雅科夫列夫背叛的情况下，苏共主动打开思想战线的“闸门”，自愿放弃坚守的思想战线，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

（一）报刊电视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4]该法规定，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该法明确提出，对大众传媒禁止进行书报检查；国家机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以及任何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均可以获得登记出版资格。

在《苏联出版法》的鼓励下，舆论领域的监管和进入门槛全部放开。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例如，《论据与事实》周报是苏联“改革”以来至今在俄罗斯十分流行、发行量居首位的报纸。它在1990年10月获得重新登记资格后，马上在头版声明：请读者注意，我们报头上原来标注的由全苏知识协会（相当于“科协”）主办，已经变为记者集体自己主办。另外，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和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最后结果却是掌握着权力和证据的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七十多年的报纸主管权。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西化自由派的舆论阵地，而且一度为外资所控制。

此后，在办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5]许多传播自由、激进思潮的出版物如《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画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而且常常是刚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自嘲“虽然腹内空空如也，但此时却贪婪、如饥似渴地呼吸这‘自由’的空气”。以《仇恨的面孔》批判美国而受到赏识的维·科罗季奇成为《星火》画报的主编后，笔锋一转，很快将刊物变成侮辱苏联军队、丑化历史、否定斯大林的阵地。苏联解体后，他“及时”移居美国，并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6]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台，苏共报刊舆论阵

地逐渐被蚕食，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摆脱控制和剪辑。例如，几个年轻记者在苏联电视一台创办了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他们要求现场直播。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

包括一些学术刊物和书籍在内，将整个苏联历史都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描述得一团漆黑。有人称，“二战”苏联军队是靠督战队才打赢的，因为士兵害怕背后的子弹。有人声称有确切的证据，说朱可夫曾经用尸体填平壕沟，让军队踩着通过。[7]此外，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纷纷出笼。一些本应严肃的报刊，包括莫斯科地区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眼球。媒体和社会上要求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公开建议莫斯科市划出专门街道成为“红灯区”。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不但忘却了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苏联时期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严肃的学术著作只能依靠内部印刷进行小范围的交流。

苏共执政后期，苏共领导人一方面拱手出让思想舆论阵地，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将苏共一些全苏性质的报刊和苏共中央级出版社变成传播自己背叛思想的工具。为配合“公开性”运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中央决定出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由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出版这样的刊物原本是向全党和全社会通报每次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的材料。然而，就是这样一份重要刊物，却有意回避现实生活问题，反而热衷于揭发斯大林的问题，诋毁和所谓反思1917年以来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甚至占据2/3的篇幅。

（二）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

1988年以后，苏共领导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席卷苏联社会的政治选举热也强烈冲击着苏共思想根基和民众心理。例如，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政治改革构想。苏联最高苏维埃根据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精神，对1977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做了重大修改，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1988年12月3日，《真理报》公布《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1989年春，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社会上下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此时的竞选活动可谓是天赐良机：不仅有了染指权力的机会，而且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宣传自我。更重要的是将来有机会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

在这期间，为了打败苏共，激进派人士周围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迎合民众心理，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竞选开始以后，激进的自由民主派积极利用各种讲坛，一方面以富有鼓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另一方面为激进的改革纲领勾画出一幅诱人的美好蓝图。他们高呼“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进行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打击腐败、建立‘法制国家’等”。在这种情形下，谁“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谁选举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谁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就拥护谁”；“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是民主人士”。一些苏共异己分子乘机改换颜色，踏上“自由化”的浪尖，振臂一呼，赢得了百姓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崇拜。

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成为思想上和组织上否定苏共的开始。正如美国前驻苏大使、苏联问题专家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所说：当他看到苏共会议文件时“兴奋不已，新内容比比皆是……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权力分散、司法独立……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有些提法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提法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舆论界的演变

积极的舆论能够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民意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相反，消极的舆论则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迷魂汤、分离器、软钉子甚至是社会冲突的催化剂。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新闻舆论充当了马前卒和吹鼓手的角色，成了苏联社会分裂的迷魂汤和催化剂。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神化西方。他们自傲于到过西方国家，认为西方国家完美无缺，连西方街头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这些知识分子一般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因此报纸、杂志的编辑也很乐意发表这些人的文章。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苏联各级会议上差不多一半发言中都用过“文明国家”这个词，而“文明国家”指的就是现在的西方国家。各种派系的杜马代表，包括反对派代表在内，都一再使用这个词，话里话外是在断言自己的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不如西方国家文明，有制度缺陷。争论问题时，只要不运用西方的材料，你的论据就不能被对方接受。神化西方使得苏联丧失了自信，丧失了独立思维，丧失了自主评价能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

第二阶段，1988年至1989年，报刊等舆论界的“公开性”运动进一步高涨。一些报刊开始虚无苏联的革命历史，积极鼓吹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否定十月革命，美化沙俄历史，流露出对西方露骨的崇拜。一些学者顶着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头衔开始宣传：“苏联的道路不是文明发展的正路，‘西方文明国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榜样，应该在各方面都跟着它们走。”他们提出，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才是经济科学的基础。《文学报》、《莫斯科新闻》和《共产党人》等报刊杂志经常刊载一些专家的文章，公开号召要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市场化；要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民主化”。

第三阶段，政治家来表演和实施。这些人有的是以知识分子身份从政的“新贵”，也有部分原苏共的高级官员。他们看到了迅速市场化和快速私有化的好处，利用手中掌握的党和政府的权力，捞取了巨额的财富，实现了权力向资本的转变。其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了私有化，造成了两极分化，用国家财富培育和扶植了私人财团；在政治上，摧毁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一个代表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寡头“民主”政治。

苏共党内的叛徒故意拱手出让意识形态阵地，给反对派宣传和传播自己观点的机会。看到苏共大势已去，苏共的异己分子则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忘掉自己的誓言，改旗易帜。自由改革派先锋人物、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人民代表加·波波夫，以及《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叶·盖达尔公开宣称：抛弃社会主义模式，移植资本主义制度，要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8]一度为叶利钦之后俄罗斯第二号政治人物的根·布尔布利斯宣称，“资本主义”是目前为止人类创造出来的虽不是最理想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俄罗斯可以大胆采用，无须任何民族性的修饰。[9]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后，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国家复兴有赖于人的精神解放、真正的信仰自由和完全的放弃任何意识形态的强制。”[10]

三、改旗易帜：信息战下的全面崩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主动放弃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在舆论导向上放任自流，任凭各种攻击、造谣和蛊惑人心的言论泛滥，导致苏共丧失了对主要媒体的控制，最终被淹没在反对派汹涌的声浪之中。苏共执政后期，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的新闻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搞乱了社会的思想，瓦解了苏共的理论基础。

（一）挖墙与凿船：“公开性”运动与“新思维”倡议

“公开性”一词在列宁时期便开始使用，原意是为了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渠道，更畅通地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1986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利用“公开性”的提法，将其与促进信息公开、民主化联系起来，把所谓信息公开、新闻公开视为发扬民主、扩大批评的工具。

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对新闻媒体讲话时说：“造成党和国家思想和行动停滞不前的许多保守主义现象、错误和失误，与缺乏反对派、缺乏不同意见有关。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11]1987年召开的苏共一月全会又一次特别强调“公开性”问题。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此后，“公开性”运动一发不可收。

在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记者、政论编辑热衷于翻历史旧账，寻找污点，肆意放大。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公开性”已经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的突破口。“公开性”的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扩大“公开性”成为暴露苏共和苏联社会消极面、阴暗面以及宣扬西方的富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运动。苏联舆论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狂欢时节”。一些文人自由地抒发着情感，以解多年积藏在内心的压抑。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回忆，某些知识分子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鲜的空气，暂时忘却了空空的货架和腹中的饥饿。[12]雅科夫列夫对此十分满意，他写道：“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起初，就想不仅要把公开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作是打开监督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活动的钥匙。我个人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实现这项任务，就能炸毁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机关的保密系统。”[13]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崇的新闻和社会生活的“公开化”也被美国苏联问题专家视为赢得思想战的绝好机会。对此，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深有感触，他在《全球化与人类命运》中写道：“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14]

在国内积极推行“公开性”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境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倡导“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倡导以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戈尔巴乔夫一方面鼓吹“文明社会价值”和“核时代的文明”，一方面单方面主动对西方让步，这为他在西方赢得了奖赏，也从根本上颠覆了苏联舆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良好愿望”最后没能换来西方真正的回应，但他那些国际关系“新思维”的主张却有效解除了苏共思想武装，使西方轻而易举地打

赢了多年的攻心战，赢得了冷战。

（二）从“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

在“民主化”“公开性”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这股反思浪潮彻底瓦解了苏联，不仅延误了改革时机，还使社会分裂，苏共丧失了威望、失去了凝聚力，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15]

自1987年开始，到1991年苏共下台前后，苏联社会中的激进势力利用各种“历史问题”大做文章，有些做法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他们疯狂地揭批斯大林，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场少数人制造的超恐怖的革命”[16]。列宁也成为被讥讽和批评的对象。例如，经济学家瓦西里·谢留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说：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并非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17]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后来思想舆论界开始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则开始鼓吹，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却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试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如果能够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罗斯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中，意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1991年“8·19”事件过后，莫斯科等地原先矗立着的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广场上矗立的少数还保留之外，一夜间，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此厄运，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也被搬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竞相换掉和原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18]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一些旧势力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叶利钦亲自主持国葬。同时，自由激进势力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历史沧桑，星移斗转。苏联人民的理想破灭，人们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否定历史引起了社会思想的混乱，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加速了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进程。

（三）文学的解禁与舆论的狂欢

1987年至1988年是苏联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发生剧烈转变的一年。据戈尔巴乔夫自己称，“公开性”不仅意味着打破禁区，“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

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侨民文学著作”。[19]

1987年是“解禁文学”最为流行的一年，这一年发表的这类文学作品比重大、数量多、反应强烈。其中包括：作家布尔加科夫1925年创作的《狗心》，普拉东诺夫1930年创作的《地基坑》，伊萨科夫斯基40年代创作的长诗《关于真理的童话》，雷巴科夫1966—1983年完成的《阿尔巴特大街的孩子们》，等等。1987年苏联作协代表大会还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并决定出版他的作品全集。不仅是文学，电影戏剧也如此，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影片呈现了情绪激愤的群众与红军发生严重冲突的经过。此后，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5个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言辞激烈，思想激进。由几位年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创办的《视点》节目为争取摆脱约束还积极争取直播。《视点》节目内容和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叛逆色彩，善于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一时间社会影响巨大。[20]

（四）从“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瓦解苏联、摧毁国家制度

在许多改革和经济问题争论过程中，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进行了3年多的时间，经济改革丝毫不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社会舆论认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官僚主义是苏联落后的“罪魁祸首”，官僚机构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21]按这种思路，戈尔巴乔夫认定，“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官僚机构“从中作梗”。他认为，“改革”触及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官员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暗中极力地抵制“改革”。苏联社会上上下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层层网，一堵堵墙。“改革”大船被一种特殊的“阻碍机制”缠绕，航行困难。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地广泛发动群众，在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的带领下，向官僚机构施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波波夫在宣传打碎经济管理机构方面最为出力，也出尽风头。他撰文提出，要彻底摧毁部门和地方上层的官僚管理机构，为改革开道。2010年波波夫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当时萨哈罗夫是如何说服他，希望他们与叶利钦等人联合起来，一起在政治选举中打败苏共。[22]

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仿佛被遗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苏联

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

（五）由“争自主”到“搞分裂、闹独立”

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中央权威日渐衰落，苏联和苏共成为“众矢之的”。“经互会”组织中的一些东欧国家认为过去是被“强拉硬配”，是“站错了队”，言语中显露出与苏联为伍的极尽埋怨、后悔之意。在苏联内部，政治松动和经济困境促使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

几经试探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最开始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在各地纷纷成立，声势日益浩大。“人民阵线”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

除了政治气候的转变以外，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其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在首都得到了苏共内部“民主派”和反共势力的积极响应。他们以“俄罗斯”作后盾，反苏共、反中央，举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对苏共的统一战线。以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自由派人士公开提出，俄罗斯应“甩掉落后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包袱”，首先“自救”，然后轻装上路，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怀抱。

苏联社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俄罗斯民主、独立”的大旗下。在普通群众的眼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连同“苏共”“社会主义”等已失去了旧日的光彩，俄罗斯才是真正民族、国家及传统的象征。俄罗斯人很不情愿听到自己被称为“苏联人”。他们在对“苏联”的象征表现反感的同时，为自己将重新作为“俄罗斯人”而感到欢欣鼓舞，充满自豪。这样，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在强烈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戈尔巴乔夫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忽左忽右，节节败退。他倡导的“改革”已失去控制，最后“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不讲政治原则、不坚持党的领导、不顾复杂的国内外客观实际的“民主化”和“公开性”，造成了苏联社会舆论的严重失控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大肆发泄，苏共历史和苏联体制受到了质疑。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苏共领导层面临

着空前的“信任危机”。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苏共将国家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23]。作为苏联最大支柱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宣布，只有“独立”，实现“主权”，才能办好自己的事，必须选择走一条激烈的社会变革之路。

（六）理想信念的背离

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维”。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寻找北欧模式。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层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曾打出政治上“中间路线”的旗号，试图改变颓势，避免苏联解体，但已是力不从心。

1989—1990年，“社会主义”开始在苏联知识分子当中失去吸引力。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如“民主的、人道面孔的”等前缀的企图也宣告失败。例如，戈尔巴乔夫崇信的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社会学会会长塔·扎斯拉夫斯卡娅也停止了她“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革”的研究方向。1990年，她在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型研讨会”上公开宣称，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而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戈尔巴乔夫另一法学顾问、主管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的副院长弗·库德里亚采夫的赞同。一位西方苏联专家曾这样描述当时苏联知识界的情绪和期盼：“社会主义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24]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联社会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人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问卷选择了中国方式。[25]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彻底革命”之路，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当时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人亚·雅科夫列夫写道：“如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离开的那条大路上去。”[26]

（七）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使一种逻辑越来越鲜明地浮现在激进派和西方派的头脑中。这个逻辑推理简单而明了：苏联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的比赛中败北，苏共改革和完善这种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最后只有完全抛弃这种制度，全面照搬和推行在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体制。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真实写照。1991年8月事件以后，“激进化”“空想化”倾向在苏联社会思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苏联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苏联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27]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叶利钦宣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在经济生活中，他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等等。

在“胜利情绪”的驱使下，俄罗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界人士也摇旗呐喊。他们坚信，市场经济能够带来俄罗斯文艺的复兴。他们认为，在自由和市场的条件下，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可以筛选出优秀的成果或文艺作品。

新一轮激进改革派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并借此蒙骗急欲摆脱困境的俄罗斯百姓。当时一位自由派的女经济学家、时任莫斯科市政府经济顾问、经济学博士阿·彼娅舍娃的言论，真实地表达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的舆论思潮和社会心态。她写道：“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把所有共产主义的象征物搬进博物馆。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就是俄罗斯社会的复兴之日。”[28]

---

[1]泽齐娜，等，著。俄罗斯文化史[M].刘文飞，苏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89.

[2]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6—86.

[3]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M].徐昌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反苏计划[M].莫斯科：阿尔戈利特姆出版社，2003：8—9.

[4]鲍·伊·瓦列茨基。书页沙沙、旗帜猎猎——三种政治制度下的俄罗斯报刊[M].莫斯科，2001：191—192.

[5]苏共的失败及教训[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168，171.

[6]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11.

[7]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26.

[8]盖达尔。胜利与失败的日子[M].莫斯科：瓦戈利乌斯出版社，1996：247，365.

[9]弗·索戈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1985—1994）[M].莫斯科：全世界出版社，1994：118.

[10]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6.

[11]尼·涅纳舍夫。时代的人质[M].莫斯科：进步与文化联合出版集团，1993：351.

[12]弗·索戈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1985—1994）[M].莫斯科：全世界出版社，1994：32—36.

[13]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84.

[14]根·久加诺夫。全球化与人类命运[M].何宏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79.

[15]［俄］文化报，1994-1-19.

[16]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8.

[17]瓦·谢留宁。源泉[J].新世界，1998，5.

[18]如列宁格勒、高尔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大城市相继更名为圣彼得堡、下诺夫格罗德、叶卡婕琳堡等。

[19]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50.

[20]安·康·索科洛夫，维·斯·佳热丽科娃。苏联历史教科书（1941—1991）

[M].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348—349.

[21]B·维克多洛娃，A·格利得齐娜.内部最坏的敌人[M].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7；［苏］莫斯科真理报，1987-5-7.

[22]加·波波夫。我警告过：谁说转型是轻松的，那他是在欺骗人民[M]//李慎明。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张树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23—224.

[23]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62.

[24]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1.

[25]社会与经济变动：社会舆论调查[J].全俄社会舆论调查通报，1993（6）14.

[26]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74.

[27]叶利钦总统的讲话[N].消息报，1991-11-28.

[28]［苏］阿·彼娅舍娃。靠自由痊愈[J].祖国，1990（5）8.

第四章　思想蜕变与理论衰变

一、文化建设与科学研究

列宁在世前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苏共和苏联政府是十分重视发展国民教育、思想文化建设问题的。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8年）在通过的党纲中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制度，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苏联逐渐消灭了文盲，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国家整体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升，爱国主义教育、无神论教育也取得可观的成就。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70年代，苏联总体科研潜力占世界的1/4，而基础科学研究潜力为1/3。70年代对科学研究的支出占财政预算的5%，教育拨款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全体居民的70%、就业人口的88.3%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学历。1960年到1980年苏联的大学生数量翻了一番，从150万人升到300万人。1980年每10万人口有219名大学生，这一比例在世界排名第五位。[1]美国历史学家乔治·贝雷蒂在他的著作《苏维埃社会的变化》中写道："众多图书馆的建立、戏剧艺术和电影工业的进步、体育运动的发展、青年组织的活跃——这些是苏联最成功和最明显的成就之一。"[2]长期以来，苏共在领导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成绩的同时，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思想教条和体制僵化倾向

在教条主义的浓厚氛围下，苏联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和科研模式。文化建设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严重，苏共建立的文化和学术团体也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影响了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社会科学领域，领袖人物的几篇著作和讲话就能影响苏联哲学、语言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多年，一些新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长时间被禁止；恢复并执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实行复杂的送审和检查、追查制度；将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变成"附庸"，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专家推向政治对立面。

对文化和科学研究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队伍庞大，效率低下。例

如，在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除中央马列研究院、科学院、高校等行政隶属关系外，苏共中央还设有专门处室对相关学科和学者进行调控，如管理经济学研究的苏共中央科学部经济学科处。长期以来，苏联社会科学界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严重，盛行严格的等级和论资排辈之风。其结果是，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鲜见理论创新，在历史的关头，不仅没能预见到苏联解体的趋势，而且在社会剧变面前不知所措，毫无立场、观点，成为“看客”。

未能处理好文化、科研对外开放与自我创新的关系，未能把握好“度”。长时间将文化建设和科研工作置于封闭状态，隔离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之外。一段时间里，苏共将十月革命前俄国和当代西方社会的科学文化成果统统视为“资产阶级”的毒素，全盘否定和拒绝，有意识地减少或限制科学家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出国交流，企图在“无菌世界”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崭新体系”，致使苏联社会科学长期处于与外部世界隔离的状态，极大地限制了其生命活力和创新能力。其结果是，削弱了苏联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与西方对话的能力。冷战结束后，面对打开的大门，苏联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丧失了应有的鉴别力和免疫力，从对西方的恐惧变成对西方的无限崇拜，任凭“病毒”入侵，最终在瞬时泛起的各种思潮的夹击下落得一败涂地。

（二）后期在思想和方向上的背离和背叛

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了体制僵化、官僚文牍盛行等严重弊端。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共对文化和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推动“公开性”“民主化”，鼓吹对外关系“新思维”，宣扬“全世界的价值观”。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领导人亚·雅科夫列夫、瓦·梅德韦杰夫等人将资产阶级的思想奉为圭臬，公然抛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3]

1987年前后，不顾党内的反对，在戈尔巴乔夫的亲自指示下，《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忏悔》等文艺作品纷纷出版。1988年苏共取消了报刊检查制度，彻底放弃了对文化艺术的领导权。苏共“民主化之父”“改革的谋士”雅科夫列夫曾亲自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训话。他言辞激烈，批判苏联的社会科学至今还死死抱着1930—1940年的陈旧格式不放，充满教条主义，他号召苏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敢于批评，扩大批判对象，直到能够清除所有的垃圾，解放学者们的思维。[4]在苏共主要领导人的直接纵容和推动下，80年代后期苏联新闻舆论领域掀起了层层巨浪，否定自我，美化沙俄，崇拜西方思潮逐渐成为主流。一股股激烈的政治改组风暴和否定历史热潮使文化界和理论界迷失了方向。思想理论界变得像一盘散沙，社会科学队伍出现严重分裂。在理论界，受西方化、市场化的影

响，“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声音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被终止或被改头换面，变成西方哲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学等学科的教学或研究机构。一种简单化、两极化的思维方式甚为流行：非社即资，非此即彼，非红即白。

短短几年的时间，苏联文化和科学的命运一波三折。苏共的失误加上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使得文化事业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从神圣的殿堂被抛到市场的边缘，文化艺术和科学院系统被看作“旧极权主义制度的残余”，陷入被解散的境地。政治动荡加上经济的困境，造成像莫斯科大剧院在内的许多著名文化机构都难以为继，人才流失严重。文化和科研队伍中的许多人纷纷出国，投奔美国、德国或以色列，苏联科研潜力损失近半。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如何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要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更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反思历史，绝不能心血来潮、一哄而起，或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实际只是为迎合当前的政治需要。这在本质上是重复了过去的错误，不仅是有害的，也是可耻的。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正是扮演了这样全面诋毁苏共历史的角色。

苏联的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的政治批判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解释。但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思想文化领域一些极端势力再次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把舆论矛头直接指向斯大林和苏共历史。他们无休止地纠缠于历史旧账，肆无忌惮地否定苏共过去的一切，先是否定和诅咒斯大林，随后又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体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执政后期的否定历史运动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反思历史活动是由苏共最高领导人亲自组织计划进行的

当今一些历史学家在评价戈尔巴乔夫时期掀起的“反思历史”运动时写道，

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号召填补“空白点”、改写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倾向性，并非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而主要是为推动他的“改革”制造舆论，实现其政治目的。[5]

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要求重新编写教科书。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强调说“历史问题上不应遮遮掩掩”。为保证新闻舆论思维有正确的“宣传口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经常和新闻界领导人“对表”。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和新闻界、艺术创作领导人座谈会上谈到，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应原谅和饶恕。[6]

1987年，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雅科夫列夫等精心策划和起草了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7]报告对斯大林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后来得意地回忆，这个报告的创新之处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转到批判斯大林体制”[8]。雅科夫列夫坦白，他的目的是借70周年大会将“新思想”推向前进。在这份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声称要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9]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上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他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10]

应当指出，当时苏共党内领导层中间对待这场“历史热”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片面丑化苏联历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11]对于“反思历史”“翻历史旧账”，苏联历史学界深表担忧，苏共普通党员和群众反对丑化历史的声音也很强烈。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批评了社会中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来信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非正式组织活动，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认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文章指出，“改革”进行几年了，非但未见成效，反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隐藏着世界主义的倾向。文章发表后，一些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些党组织开始讨论。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报》的维·阿法纳西耶夫亲自组织，4月5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

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真理报》认为，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是苏联社会的保守势力的声音，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开始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判马列主义是空想和教条。从此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参与下，苏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过去的历史道路方面走得更远。[12]

（二）趁报刊“反思历史”之际，掀起平反历史错案运动，制造声讨苏共的舆论氛围

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曾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直至赫鲁晓夫时代起，这些冤假错案才陆续得到纠正。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登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

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大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后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审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名为“纪念”的历史教育协会。该协会的目的就是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原历史真相，为苏联历史受害者建立纪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改变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13]

（三）在这场“历史反思热”中非历史专业的记者、作家等充当了“急先锋”

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В.沃罗比耶夫在1989年初指出的：“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成为的那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众所周知，他们在我国有成千上万），积极卷入这项工作的，真是屈指可数。”[14]

不过，还是有少数激进的历史学家投入到“改写历史”的运动中，如尤里·阿

法纳西耶夫和德·沃尔科戈诺夫。前者一度被包装成“民主斗士”，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则偃旗息鼓；后者则由苏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将军变成了叶利钦的御用文人，极力攻击列宁和斯大林，现已不在人世。这股反思历史的潮流造成整部苏联历史都需要改写。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取消那一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今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猛。

面对历史领域的混乱状况，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历史学家座谈会，会议由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瓦·梅德韦杰夫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辩解：“当前的社会政治气氛取决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应维护那些应当受到揭露的东西。良心不能交易。对过去错误的清算必须进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15]参加此次会议的苏联历史学界的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斯米尔诺夫、尤·库库什金、德·科瓦里钦科等纷纷发言，对当时社会的历史热潮表示忧虑。格·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他不赞成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尤·库库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缺乏理论准备，改革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尤·库库什金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学术秘书德·科瓦里钦科院士要求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面对院士们的发问，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瓦·梅德韦杰夫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列宁、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选择。[16]此次苏共中央的座谈会便没有了下文。

（四）反思历史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否定苏共历史和社会主义

自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这股思潮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推动下，死灰复燃，很快成为蔓延之势。反对势力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历史文献档案，借过去的一些所谓历史冤假错案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做准备。

1987年6月，由苏共异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画报[17]第26期披露了列宁的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严厉谴责斯大林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军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不久，《莫斯科新闻》刊载了从未发表过的肖洛霍夫1927年写给老党员列维茨卡娅的一封信，批评农业集体化过火，“压制富农，可把中农也压扁了，贫农也在挨饿”，致使“人们狂怒，情绪极端恶劣”。《科学与生活》杂志则刊登了作家西蒙诺夫20年前写的《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职责》，谴责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初期处决三批高级军事干部，给军队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对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等等。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已由斯大林主义指向20—50年代的社会制度，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代表的苏联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1989年以后，揭批斯大林的材料开始减少，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逐渐转变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十月革命的批评。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18]1988—198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维护马克思主义，实则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章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它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作者提出，1917年到1988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19]

“反思历史”运动从揭批斯大林开始，进而否定十月革命，怀疑十月革命以后的制度，最后导致美化沙俄历史和否定自我，迷信西方道路。丑化苏共历史最终导致了俄罗斯理论界肆意“揭批俄罗斯的历史缺陷、诋毁国家”。有关俄罗斯文明较之西方文明存在着“历史性缺陷”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的做法，构成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哲学基础。在80年代末期，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20]打开一本当时出版的笑话集，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一辆美国汽车停在莫斯科，车身下的泥浆中躺着几位正在扎轮胎的苏联人。过往的人问：你们在那里干什么？他们回答：我们想吸一些来自美国的自由空气。”

在当时学术界的一些讨论会中，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在苏联可以谈论何种经济？只能是原始穴居的野人经济。”有时，甚至可以听到遗憾的叹息：“唉！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德国人占领？”在这一时期，一些“改革”的风云人物，自由民主化的“弄潮儿”的演讲多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以赞扬西方结束。“如果人们所想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对于这个带有一种始自伊凡雷帝的天生极权主义特征的、不合格和未开化的民族来说，有一条简单而自然的出路——在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将国家全面引向殖民地状态。”有的报刊文章还证明说，有必要在苏联领土上引入联合国仲裁、引入“维和部队”、实施“人道主义援助”，设立联合国监督员和观察员。[21]有一家名为《自鸣钟》的报纸曾刊载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真诚地期待这样的结局，而且，殖民地状态有什么不好？”于是，该文接下来就讨论怎样才能成为殖民地，并建议向西方商人求助。[22]

正是在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推动下，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

度，导致社会思想混乱，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打开了大门。20世纪80年代末期，某些涉及历史问题的书籍、文章和言论公开全盘否定斯大林，讽刺和挖苦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把苏共视为“官僚障碍机制的物质载体”和“沉湎于谎言和自我欺骗之中的故步自封的组织机构”，就这样一步步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三、崇高与毁灭

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促进思想文化建设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列宁认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应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耐心、细致、说理的思想理论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点。由此，列宁领导党积极探索各种长久而有效的思想教育形式：倡导要积极利用纪念性的人物开展教育工作，先后有数十座杰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文化活动家的纪念碑落成并揭幕，如莫斯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纪念碑、马拉纪念碑、苏维埃宪法方尖碑等；与此同时，一系列有纪念意义的革命性节日碑确立下来；各种文化剧目和演出也积极宣传革命精神的历程和优良传统。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为了维护和加强苏联社会的团结，斯大林领导的联共（布）在思想领域肃清错误思想和流毒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尊重知识及人才，注重社会榜样的作用，强调正面宣传工作。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各行业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竞赛活动，激发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国家设立奖励和功勋制度，注重发挥榜样和英雄的作用，激励群众，引导群众。例如，1927年设立了劳动英雄称号（1938年改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30年设立列宁奖章。1929年起，全苏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此后，又先后开展合理化建议、突击队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等。斯大林时期还拍摄了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教育培养苏联人的国家和民族精神。苏联政府给予“切留斯金号”船员、帕帕宁探险队员和契卡洛夫机组成员[23]极高荣誉。俄罗斯的军事传统也得到恢复，如肩章、军衔等，对东正教的态度也发生转变。这样，通过制度规范和思想宣传，苏联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劳动光荣，懒惰、钻营、投机可耻的氛围。

当今俄罗斯学者指出，20世纪30—40年代苏联人民的精神状态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准备用胸膛保卫苏联！”“誓死保卫斯大林、誓死保卫莫斯科！”“祖国母亲在召唤！”，等等，现在被看作宣传口号的东西，那时却是发自内心的呐喊。

赫鲁晓夫时期是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转折点。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开

展个人崇拜的揭批，在某些程度上有利于缓和紧张的政治生活，舒缓人们的精神压力，但其采用的行事方式特别是“秘密报告”却给国际和苏联国内思想界和群众心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苏联知识分子心灵震撼，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国际共运出现分裂，西方期待社会主义的人士掉转方向，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造成了巨大的信仰危机，打碎了权威，揭批领袖，实际上是自乱阵脚，给敌人以口实，造就了内部一批思想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坦言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和心灵震撼。

列宁不仅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还经常亲力亲为，亲自办报、办刊，自己撰稿或亲临现场发表演说。列宁的文章犹如闪电，刺破夜空；列宁的演说，犹如惊雷，震撼世界。然而到后期，苏共一方面掌握了庞大的宣传工具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宣传文化工作却失去了战斗力、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失去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庞大的宣传机器效率递减，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上也鲜有创新。政治宣传工作更加脱离实际，宣传空洞乏味，简单化和套话盛行，不仅无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反而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一些《言论集》《选集》经常再版并广泛散发，苏共“意识形态行家”的宣讲和空洞文章连篇累牍，但这些都没能抵得住来自西方的侦探小说、移居国外的苏联侨民著作或者抽象派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的冲击。

苏共一些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方法简单，遇到问题不做具体的分析，而是使用行政命令甚至安全特工手段解决。当知识分子被西方社会表面上的物质充足和生活富裕吸引，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产生怀疑，得出苏联落后的结论时，苏共“意识形态行家”既不能给予及时的解答，也不能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是仍在空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总危机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越来越脱离实际生活，出现了思想教育和群众心理“两张皮”的状况。在社会意识中，特别是在部分知识分子心中，一方面暗暗滋生对西方社会的崇拜，另一方面也出现不问政治、厌恶政治宣传和教育的观念倾向：什么政治不政治，都见鬼去吧。我们只想好好地生活，挣钱过日子，自由自在地呼吸，享受物质生活。[24]

80年代后期，作为苏共意识形态体系的反叛分子，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十分熟悉也善于利用各种思想政治手段从内部瓦解苏共思想教育体系：利用“公开性”口号，取消报禁，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开禁；利用“新思维”旗帜，堂而皇之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反思历史，否定过去，靠攻击苏共历史，成就自己“自由、民主、开明”的形象，短时间里迅速赢得境内外

媒体的关注和观众的“眼球”。戈尔巴乔夫等人不遗余力地利用苏共各种思想教育手段反其道而行之，还常常亲自出马，利用报告、讲话、出书等机会宣传自己的错误主张。

苏联主流的报纸和电视台的转向宣传，极大地影响着群众的意识。多年来，苏联人民有根深蒂固的相信报纸和电视的心理，报纸和电台的影响强烈冲击着多年形成的思想观念。群众的思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宣传舆论的误导首先引发了民众对苏共的不信任。据来自各方面的民间抽样调查，1988年前的几年中，人们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而1990年则下降到20%，1991年初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1989年到1991年进行的几次“自由选举”，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苏共推出的候选人往往失败于苏共的对手。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苏共内部出现大批党员退党现象，后来，势头越来越猛。据统计，1990年1月苏共有19228217名党员，而到1990年10月，苏共党员人数减少为17742638人，退党人数接近150万。[25]而1990年全年共有180万党员退出苏共。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名。[26]到1991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后不久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得不承认，苏共党员退党人数达500万人，已经由原来最多时候的2100万党员减少到1500万！

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言行和舆论导向偏差也严重地影响了苏共党员的思想。部分党员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感到厌倦，产生了冷漠观望情绪，也有部分党员失去了航标，信仰发生动摇。1988年1月8日，《真理报》在《读者论坛》专刊中发表了一封名为《为了不失去信仰》的来信，明斯克市一位名叫韦切尔的居民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我三十岁）和许多其他几代人一样，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不信上帝。我们的上帝，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想。父母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都是培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我们靠社会主义理想生活了七十年。社会主义理想给过我们并正给予我们生活的目的。但是，由于公开性政策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没有节制的批评，社会主义理想的威信已在某些方面遭到破坏。别人都怎样，我不谈，但我个人的信仰动摇了。我过去会把任何一个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喉咙咬断。可现在连我都动摇了。那些年轻的、还不坚定的心灵会如何呢？假如反面信息的巨流会向我们滚滚涌来的话。”宣传舆论的误导，造成了苏联社会思想混乱，人们对过去的信仰产生怀疑，失去了对苏共的信任和对苏联社会未来的信心。

---

[1]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38—344.

[2]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8.

[3]亚·尼·雅科夫列夫。我为什么放弃马克思主义[N].苏维埃俄罗斯报，1991-8-3.

[4]亚·尼·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旋涡[M].莫斯科：瓦戈利乌斯出版社，2000：488.

[5]玛丽雅·费列蒂。记忆的紊乱：俄罗斯与斯大林主义[EB/OL].（2002-11-20）.http://www.polit.Ru.

[6]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言论集：第5卷[M].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8：217；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M].莫斯科：角度出版社，2002：84.

[7]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85—186.

[8]鲍·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M].孙凌齐，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5.

[9]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言论集：第5卷[M].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8：386—436.

[10]亚·尼·雅科夫列夫。看破红尘之苦[M].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93.

[11]真理报.1987-9-11.

[12]安·康·索科洛夫，维·斯·佳热丽科娃。苏联历史教科书（1941—1991）[M].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349—350.

[13]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M].莫斯科：角度出版社，2002：93—94.

[14]苏美历史学家“圆桌会议”材料[J].历史问题，1989（4）100。此处引文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J].史学理论研究，1998（4）。

[15]Историческоесознаниеобщества-науровеньзадачперестройки[J/OL].历史问题，1990（1）3.http://annales.info/sbo/contens/vi3.htm；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M].莫斯科：角度出版社，2002：140.

[16]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M].莫斯科：角度出版社，2002：141.

[17]《星火》画报是苏联著名的政治刊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维·科罗季奇担任主编。此人在70年代曾发表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仇恨的面孔》一文，言辞激烈，受到赏识。担任画报主编后把《星火》变成了揭批苏共、仇恨苏联制度的大本营。后来科罗季奇移居美国长期居住。

[18]参见1990年春由刚刚赢得选举的莫斯科民主派主办的杂志《首都》周刊，或［苏］亚·齐普科。我们的原则好吗？[J].新世界，1990（4）。

[19]亚·齐普科。斯大林主义的根源[J].科学与生活，1988（11-12）.

[20]安·米格拉尼扬。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M]//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68—269.

[21]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苏联解体前夕，由于苏联社会商品包括日用消费品极度短缺，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向苏联运送了食品等“人道主义”物资。一些食品包装直接用俄文标注“人道主义援助”。

[22]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64.

[23]“切留斯金号”为苏联的北极探险船，于1934年撞浮冰失事，船员困于冰上，经艰苦卓绝的努力，苏联飞行员将其救出；帕帕宁（1894—1986），苏联北极探险家、地质学家、海军少将，曾率探险队在北极建立了第一个考察站（1937—1938）；契卡洛夫，苏联英雄，其机组多次创造远距离飞行纪录，1936—1937年完成莫斯科—远东，莫斯科—北极—美洲的不着陆飞行。

[24]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4—85.

[25]http://www.yabloko.ru/publ/colobova/in.bounker.html.

[26]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总统的第二任期[M].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54.

第五章　科学之殇

一、政治引领与刻板管控

早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对外舆论一致，有效地反击了国内外各种反苏宣传。但由于苏共具体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政治思想水平和治理能力的问题，对科学文化工作的政治引领往往变成了包办代替和层层审批。这种“管卡压”式的领导方式和管理形式，简单粗暴，影响了党和科研文化群体的联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社会科学界，过度审批和过严过细的审查，干扰了正常的科研创新工作，科研创作变成了对苏共最高领导人言论的诠释。苏共推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实行严格送审和检查、追查制度。例如，在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中，要给杂志寄送一篇文章，必须同时附寄大量证明文件（5—10种）；这样的附件还要有十来个人签名，学术会议提交报告提纲时，它常常是不可缺少的一页。不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在广播电视上发表演讲时需要，有时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必须如此。这些过分的禁令常常引起科研人员的不满，人们想方设法绕着它走，或者干脆交出不伤大雅的“白开水”甚至“垃圾式”的科研成果和文化作品。

在社会生活和一些研究领域，苏共那些善于看风使舵的“意识形态行家”经常设置各种清规戒律，层层加码，自行开辟出许多荒唐的禁区：禁止抽象艺术、先锋派音乐、摇摆舞、西方侦探文学、西方的许多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一系列俄罗斯哲学著作，等等。这种粗暴的“禁止”行动不但收效甚微，而且往往会引发更加强烈的“兴趣”。[1]过多的管制使得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政治的附庸”。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专家横加批判，直至采取清剿和镇压行动，日渐将其推向政治对立面。

过多地设立“研究禁区”，抑制了社会科学在解决实践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在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苏共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苏共领导人奉行的是一种庸俗的国际主义。为了“尽快消灭民族间的差异”，他们常以最隐蔽的形式，将“庸俗的国际主义”塞入所制定的民族政策中，以便掩盖苏联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为解决民族问题，有的学者曾提供过好的理论建议，但是没有被采纳。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是如此，他们说，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彻底解决了。

不重视发挥社会科学的作用，不仅使得苏共改革失去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而且使得改革迷失了方向。苏联社会科学界人员众多，但效率低下，人力和智力资源浪费严重。不少理论工作者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性、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

家、历史学家习惯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八股盛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多以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开头，以党代会的决议结尾。苏联哲学研究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苏联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既没能很好地解释苏联社会，也没能改变社会，甚至没能预见苏联的解体和体制的崩溃。苏联哲学界如此，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苏共掌握的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鲜见理论创新，在历史的关头，不仅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趋势，而且在社会剧变面前不知所措，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看客”。

改革之前苏联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正因为如此，他们能过着舒适的生活，享受着较高的社会地位。科学院院士以及一些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拥有汽车和助手，可以出入豪华别墅。但实际上苏联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并不坚定。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达自己的怀疑。由于当时苏共严格的控制，多数知识分子出于工作和生存的需要，还不敢离经叛道。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彻底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一些人转而批评苏联体制，并获得了媒体的欢迎和舆论的欢呼。作为苏共和苏联体制的对立面，他们很自然地把西方社会奉为佐证，而不管那些例证并非西方社会的本质，只是一些皮毛和表象。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苏联某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激进特性开始显现。随着戈尔巴乔夫左摇右摆的“改革”尝试屡屡受挫，社会经济生活不见好转反而迅速恶化，知识分子中间的激进思潮愈演愈烈。

在一些苏联知识分子看来，历史总是直线地向前发展，过去永远不如现在，现在不如未来。因此，只要勇敢地打碎旧秩序，抛弃苏联身上的一些包袱，俄罗斯便会跨入美好的明天。苏联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天真地认为，一旦苏联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便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当前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放任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为社会造福。他们坚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主张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病危的苏联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快刀斩乱麻。

对西方模式的青睐，幻想得到西方的援助，这也是苏联部分知识精英选择资本主义模式的一条重要原因。苏联最后一任政府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曾要求西方金融家提供240亿美元支持苏联的“改革”；后来的盖达尔也曾指望从西方国家和金融中心获得200亿—400亿美元的援助；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的“500天计划”纲领中，也提出要在5年时间内争取外资向苏联投入1500亿美元。当然，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多次卑微的请求，[2]还是苏联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乞求，西方总是口惠而实不至。最后，即便是有一

些资助和借贷，也被部分高官和精英截留，甚至西方支援苏联的智囊也一同参与其中，中饱私囊。[3]

除领导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外，利益的诱惑和商业化的影响也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知识分子政治转向的原因之一。苏联体制曾耗费了大量资源，为文化和科研领域的知识分子们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80年代后期，苏联一些知识分子有机会出国到西方社会参观，随后一些文人特别是一些文化界人士开始宣扬，市场化和商业化不仅可以保障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致富的机会。在他们眼里，西方社会文艺界包括明星聚敛大量个人财富，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能想象的。而他们的才能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同行，因此他们要突破体制实现自己富足的梦想。[4]

对功名与仕途的追逐也加速了苏联部分知识精英对自己原本信仰的背叛。在苏联“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曾得到过去没有过的重视，特别是法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某些与戈尔巴乔夫意见相投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成为“改革”的谋士。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发表呼吁“改革”的文章，不仅受到苏共领导人的青睐，而且受到媒体的吹捧。一时间，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谓名声大噪，如社会学家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经济学家波波夫、经济学家谢留宁、经济学家彼得拉科夫、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弗罗洛夫、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作家格拉宁，等等。

然而不久后，随着苏联社会激进思潮等愈演愈烈，这些第一拨鼓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知识界“改革先锋”，逐渐被更为年轻、更激进的西方化的知识精英所代替，如经济学家盖达尔、丘拜斯、亚夫林斯基，哲学家拉齐斯，法学家沙赫莱，等等。这些年轻的知识精英已经不像第一拨的知识精英们一样，只限于发表某些修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他们开始大胆地将矛头指向苏共、指向社会主义。他们通过媒体逐步地向社会灌输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来的词语和概念。例如，他们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完成从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变，走出“苏维埃野蛮”的死胡同（“历史的黑洞”）。在经济生活中，坚持市场是万能的，反对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彻底退出经济领域，实行价格完全市场化；推崇私有制，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坚持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实行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打开大门，实行经济“世界主义”等。俄罗斯这些年轻的改革派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等等。这些概念和观点让执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社会感到既陌生，又新奇。

这些年轻而又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新人，言语激烈，富于感染力和攻击

力。在他们的映衬下，不仅苏共官方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就连拥有众多院士的苏联科学院的学院派经济学界也望而生畏。1990年前后，这些年轻的改革者以简单而蛊惑人心的口号迅速掌握了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后来一些人还扶摇直上，一步登天，副教授级别的学术新人火箭式的变身为掌管经济改革大权的部长、总理。

二、地下出版物、“持不同政见者”与非政府组织

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是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其中难免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或异己的力量。如何发现、准确分辨和判断这些不同的意见或敌对的声音，是摆在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个长期而复杂艰难的挑战。苏共后期在文化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常常以强制、行政命令来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性质问题，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

（一）地下出版物：从有效监管到遍地开花

对于苏联肌体上的一些伤口或病痛，苏共领导人不是积极医治、施以良药，而是经常简单地加以掩盖，致使伤口化脓，疤痕扩大，甚至癌变，结果不仅损伤了自身肌体，而且为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病毒入侵的窗口。

苏联时期的地下刊物指的是“私下印刷出版物”，俄文称“萨米兹达特”，为“自己出版”之意。长期以来，苏共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这使得敌对势力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记者亚·金兹别尔格搜集和编辑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诗人的一些诗歌，并以打印机打印出来，秘密结集传播诗刊。诗歌内容主要是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如迫害和集中营等，两月出刊一期，刊物印刷后秘密传播。

应当指出，苏联有关部门对地下刊物给予了有效的监视。到1965年，据苏联克格勃秘密报告，从事地下刊物印刷的只有35—40人，有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工程师，也有文化工作者。1967年，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提交有关地下刊物情况的绝密报告，但苏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将其列入议题，而是提请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伊参考和研究。1969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致苏共中央的备忘录中描述了地下刊物的思想倾向：“在这些材料中，共产主义建设的个别缺点被作为普遍现象表达出来，歪曲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表达与党和政府在民族问题、经济和文化发展措施方面不同的意见，宣传各种各样的‘改良’苏

联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提出废除书刊检查的要求，要求为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被判有罪的人恢复名誉，要求修改苏联宪法。”[5]

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局势的缓和，特别是在西方反苏政治势力的支持下，苏联境内直接从事地下刊物印刷的人数已经多达400人。印刷的内容也由传播一些诗歌和被禁止的文艺作品，转变为以刊登政治和社会批评性材料为主。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平台，开始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此时的地下刊物已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与此同时，一些手稿或刊物被偷运到苏联境外，在西方印刷，然后在苏联侨民中间散发或运回苏联传播。这些刊物与“萨米兹达特”相类似，被称为“他米兹达特”，意指“境外出版物”。70年代末期，“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搜集一些地下刊物并利用这些材料作为对苏俄语广播的节目内容进行播送。

（二）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的失策

俄语中有两个相近的词语表示“持不同政见者”之意。一是инакомыслие或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直译为“异己思想”“持不同思想者”，二是借用英语中的dissident一词音译转为диссидент来表示“持不同政见者”。在此，我们统一用“持不同政见者”的提法。

20世纪60—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与官方立场不同的少数知识分子；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则经常与维护人权、否定苏联模式、宣扬西方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在近30年的历史过程中，“持不同政见者”现象虽然一直存在，也引得世人关注，但人数不多，实际影响并不大。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斯大林时期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为成千上万的人恢复了名誉，使其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曾经受到伤害的人并不是平反了就没有社会负面效应，这些被平反的人不断向人们讲述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待遇，影响了社会上许多人的思想信念，打破了原来人们心目中固有的社会主义高大形象，萌生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结成秘密小组、出走示威、出版地下刊物、流亡国外、发动人权运动等几个阶段。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和主张是多元的，有宣传俄罗斯传统民族主义的，有暗含西方自由主义的，有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也有不少当时以及至今仍坚持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6]其中一部分属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特殊的健康力量。他们敢于直言批评党内和苏联社会上

种种消极现象，因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如政论家、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因发表不同于官方的政治见解、在西方出版书籍被开除党籍，受到迫害。而在“8·19”事件后，苏联共产党被禁止活动，社会上反共情绪高涨，大批原苏共的高官们纷纷倒戈，改弦易辙，与苏共划清界线，而此时的麦德维杰夫却为争取共产党的生存权展开斗争，并积极组建左派政党。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出现了新的动向。1975年8月，美国、苏联等35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定》。该文件规定“所有欧洲的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苏联以此获得欧美国家对战后东欧边界的正式承认。但与此同时，协定标明了保卫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内容，规定所有签字国都有义务允许东西方之间人民、思想与商业更自由的交流与往来。这为西方国家干预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打开了方便之门。俄罗斯学者指出，1975年8月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定》是苏联领导层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中“犯下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从此之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苏联破坏了其自愿签署的国际条约”。因此可以说，该协定的签署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苏联境内的新老“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关注人权问题，且通过成立人权组织等形式与国际上取得联系，获得西方的呼应和支持。

1970年，苏联成立了包括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3年“大赦国际”在苏联成立分部。1974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5年以后，苏联社会出现了一些“赫尔辛基小组”，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势力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西方社会出于各种目的，对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各类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开始获得津贴，他们经常获得各种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有时小题大做，有时费力不讨好，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闹得沸沸扬扬，结果使得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7]

应当指出，国外势力的支持，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是“持不同政见运动”得以持续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他们一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向苏联公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苏联国内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

家的借口。

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最先提出这一战略，指出“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8]。20世纪60年代初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明确提出“和平战略”，要“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并“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与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其“和平战略”的目标。[9]西方国家投入巨资以多种手段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思想上的进攻，诋毁苏联社会主义，支持那些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人，资助他们在西方出版著作，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得到了美国苏联学家和美国国内舆论的支持。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经抱怨：“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不断损害着我们的关系。……他们时不时为了宣传目的打这张牌。审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公众舆论及苏美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西方围绕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是一场意在搞垮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10]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持不同政见者”多方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声援性质的。

但总体来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逐渐衰落。长期主管国家安全问题的安德罗波夫曾经说，影响社会安全的首先是民族问题，而“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已经在我们掌握之中。

（三）非正式组织的兴起及演变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非正式组织又滋生开来并且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短短三四年的时间便犹如雨后春笋、四处蔓延，最后变得不可收拾，酿成大祸。

自1986年，苏联社会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的组织。这些小规模的组织相对于官方有组织的团体和单位而言，具有秘密性、非组织性、灵活、业余等特点。1987年，非正式组织已经蔓延到苏联一些大中城市，有的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小组等形式出现。如，1987年2月由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出版的《经济、组织与管理》杂志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跨专业的“改革”俱乐部。参加俱乐部的人有后来的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盖达尔、丘拜斯等。1987年3月，“改革”俱乐部召开了一次最具影响的讨论会，研讨的题目为“国有企业法”。在随后的一年里，俱乐部先后召开一系列经济改革研讨会，吸引了苏联一些经济学家参加。例如，莫斯科大学经济教授波波夫等在一次讨论会上就提出了自由选举、取消书报审查、发展市场关系等口号。[11]

1987年年底之后，受苏共“公开性”和“民主化”思想的启发，一些非正式组织开始分化，其中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不断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

1987年后，与非正式组织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1987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首先出现了亚美尼亚民族自决联合会。在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中先后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环保组织”。在此基础上，1988年6—7月，一些加盟共和国开始成立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雅科夫列夫曾表示，他支持成立人民阵线。[12]

与此同时，日益活跃的“民主组织”公开宣称：“他们与各地的人民阵线组织有着共同的敌人。”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左摇右摆，经济不见起色，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下降，工人的罢工特别是煤矿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开始增多。1988年夏，莫斯科地区的“民主联盟”公开提出“反苏共”的口号。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查尔科夫叫嚷：“等着，很快我们将要将枪口对准你们。”[13]他们于8月21日和9月5日两次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进行示威，公开叫嚣推翻苏联制度，引得报刊记者争相拍照。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苏联警察部门抓捕了一些人后，又很快释放。

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推进，各种非正式出版物也四处开花。1987年非正式的出版物开始出现。这与过去的地下刊物有所不同，这些报刊已经基本是正式印刷和散发了。1987年7月，一本名为《公开性》的杂志出版。杂志的宗旨是联合各类非正式社会团体，声援保护人权活动。1987年8月，旨在联系各非正式组织的《快讯》问世。《快讯》与西方的电台等保持紧密联系，转载或介绍其他苏联境内非正式出版物的内容，发行量最大。1987年夏天出现非正式组织的通讯社，名为“劳动人民跨职业自由联合”通讯社。到1987年10月，苏联境内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其中17家这类刊物的主编还会聚集在列宁格勒市，邀请了《消息报》《接班人》《文学报》以及列宁格勒市共青团的记者或代表与会。总之，随着“公开性”的推进，这些报刊并未萎缩，反而经常得到一些大报的支持。

由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的纵容，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而上述各类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成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头羊”，如盖达尔和丘拜斯。因此，一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是苏联—俄罗斯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三、两个极端：严控与放纵

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告诉我们，在思想领域必须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理论，创新思维；必须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时刻保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必须加强队伍建设，坚守思想阵地，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党性，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必须把握新闻舆论的正确导向，改善对文化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思想教育工作要深入人心，贴近群众，保证思想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苏联曾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涉及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私人领域也不例外。苏共及其历届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工作也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和组织工作一样被摆在党的工作的重要位置。除历次党代会外，还经常召开专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全会。然而，貌似强大的苏共却没能经得起思想风浪的冲击，在内部叛徒和外部敌人的思想进攻下，好似一尊泥足巨人霎时坍塌瓦解了。

（一）理想信仰：从教条主义和自我封闭到背离和背叛

长期以来，苏共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千篇一律、万马齐喑的状态，不准许探讨被苏共称为唯心主义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只准照搬被他们阉割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且不能越雷池一步，新思想、新理论不加分析，均被斥为唯心主义的东西。因循守旧，文件泛滥成灾，死抱住老一套不放，而不是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沉醉于以往的成绩，沾沾自喜，极力回避社会矛盾和冲突。当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时，苏共没有及时认识到全球发展趋势，只沉醉于石油美元，错过了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国家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大大超过了苏联。70—80年代之交，苏联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幅度放缓，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苏共在思想领域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宣传机器中用了多年的“发达社会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对抗性矛盾和全面危机”的口号已经无法被人在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下认同，成为空洞无物的空话和套话。

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庞大的苏共宣传机器实际上是在“空转”，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已经出现了。此时，民族独立思潮和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借口的地区分裂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苏共内部开始分裂出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西化激进势力。一些“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振臂一呼，便极具诱惑性和感染力。与已经显得过时的、俗套的、群众感到厌烦的苏共思想宣传口号相比，任何具有“新鲜味儿”的思潮都具有穿透力和杀伤力——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西化、激进的，或者是原始宗教色彩的。在报刊媒体的推崇下，一系列西方“民主自由的样板和市场经济的神话”开始排挤马克思主义主阵地，逐渐主导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一些理

论家和“弄潮儿”连篇累牍地向人们头脑中灌输“改革”“市场”“西方文明国家”“私有化”等观念，却有意地回避这些观念的实质。苏联社会一些人被这些漂亮的言辞迷惑，流露出对西方自由和富足的无限憧憬。苏共无数党员丧失了判断的能力，自动放弃了思想武装，他们做好准备，情愿接受任何后果的社会改革试验。

（二）新闻舆论：由空洞无物、表面文章到哗众取宠、造言惑众

在宣传思想工作中，苏共依赖手中掌握的强大而无所不包的宣传机器，狂轰滥炸、一味灌输。意识形态领导人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和表面上的思想一致性和舆论一致性，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变化；热衷于进行声势浩大的造势鼓动活动，而对社会心理动态、意识形态领域内各种深层动向缺乏深入调查研究；满足于以各种会议决议等行政方式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能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70年代苏共经常发出号召，提出要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统一起来，把思想、政治、劳动和道德教育统一起来。[14]然而，这些号召经常流于形式，缺乏可操作性。就连苏联知识分子对上述决议和号召都表现出漠不关心、充耳不闻的态度。当时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科技人员，极力回避政治。相反，他们当中许多人却对核扩散、核污染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问题十分关心，积极参加环保活动，对苏共在国际事务和国内政治方面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

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宣传工作要注意多样性和针对性，特别是要关注艺术形式、宣传话语的创新和吸引力。宣传思想教育工作需要在坚持党性的原则下，更新话语体系。苏共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些使用多年的陈词滥调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和吸引力。一些宣传概念对于最为广大的受众来讲，按照经济学上“边际效率递减”的原理，其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相反，西方的通俗文化和攻心战术却形式多样，花样翻新。一些文艺形式或研究手段对习惯单一的苏联民众极具吸引力，自西方引进的一些概念或提法虽不解其意，但却能哗众取宠、耸人听闻。

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理论宣传工作当然要旗帜鲜明、弘扬正气，批驳错误思潮，固守主流阵地。但苏共却忽视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强调革命性、战斗性的同时，要注意话语范式的创新，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创造出针对不同受众的文体和话语体系。现实是一些错误的理论或舶来的观念虽晦涩难懂，却能假借新鲜的概念或时髦的词语迷惑受众。因此，加强宣传理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做到“以理服人，以言动人，以文引人”。二是在注重理论和思辨的同时，应注意使用鲜活的事例。一些反共的思潮往往是假借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或事件，任意夸大和放大，进而延伸到对根本制度和方针的影射和批判，常常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甚

至产生轰动效应，达到其分化、瓦解的目的。苏共在开动宣传机器的同时，很少利用活生生的事实说话，不善于利用一些反面的事例作为反面教材警示群众。因而宣传思想工作缺少说服力和战斗力，变得无的放矢和过于空泛。

（三）思想教育：由形式主义、连篇累牍到失去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党员的马列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对系统的马列主义知识教育体系，出版了不少教科书，开设了系统的正规党校课程和业余课程。在教育系统，高等学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程——苏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为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学习的达数千万之众。

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共党校系统和各高等院校都在学习总书记“著作”和历次代表大会文件，而这些领导讲话和文件常常充斥着空话和套话，意思模棱两可，主题含混不清，缺少鲜活的思想。这些政治教育活动后来成为群众讽刺的笑话。自我标榜伟大的“列宁主义者”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和契尔年科的空洞无物的“著作”被百万册地出版和翻印发行，并指令在党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科学领域组织学习和研究。这些政治教育内容干瘪，形式枯燥，理论内容与实际严重脱节，效果很差，让社会反感，与和风细雨和寓教于乐的境界相差甚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西方的消费心理和世俗文化给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现代派”“先锋派”消费文化从境外传入苏联社会，吸引苏联城市青年对西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但苏共领导人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做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却逃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在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的时候，多数党员和群众显得不知所措，失去了前进的航标。

（四）文风与学风：由文牍主义、空话连篇到崇洋媚外、照搬照抄

长期以来，官僚主义使苏共缺乏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斯大林时期，苏共专注于世界性大战略问题的思考，却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有去过基层考察。长期以来，党内不深入调查研究之风盛

行。赫鲁晓夫个人经常轻率地做出重大决策。当然，脱离实际、形式主义的典型代表当属勃列日涅夫。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之类的材料，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列日涅夫对什么问题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但是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却出版了9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还居然获得了苏联最高的“列宁文学奖”。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辞，都要别人起草。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照本宣科，也常不知句读，前后颠倒。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常常是苏联社会私下里政治笑话讽刺的对象，被民众揶揄和调侃。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干部思想中充满“守旧性”和“惰性”，行动上循规蹈矩。苏共一些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文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失去了主动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苏共《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深有体会地回忆说：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为表明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语、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辞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时，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五）党风与文风：由言行不一、文过饰非到唯利是图、抛弃崇高

苏共后期官僚作风严重，干部等级制度森严。苏共上层的特权阶层习惯脱离群众，享受特权和各种特供、特需。苏共官僚的作威作福行为逐渐曝光，普通党员和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共一些高官已经逐渐丧失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献身精神，抛弃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口头上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是为了向上爬的伪装而已。对于他们来讲，共产主义理想已不再神圣，重要的是学会阿谀奉承，尽快捞取实惠。70年代以后，苏共领导集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逐步丧失了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责任感。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宣传机器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民心中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感召力和吸引力。这些理论和说教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冰冷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可笑的、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在一种虚假的、片面的宣传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人民大众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甚至完全离开政治生活，变成一群只管个人生活的人。苏联群众之所以表现出对政治的漠然态度，是由于苏共高层已经丧失信念，首先变成了“只管私人生活的人”。在苏共瓦解、苏联解体过程中，绝大多数苏共党员虽有不满，但仍沉默地接受了这一个又一个现实，这本身就说明苏共高层在党员和普通群众心中的威信已降至何等地步。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赖以生存的石油价格下跌，苏联国内市场消费品短缺。社会中地下经济活动猖獗，领导人腐败和特权现象蔓延。社会纪律松弛，政治思想教育与群众心理变成“两张皮”。社会心理和道德风气开始败坏。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对此视而不见，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活本来如此。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也借机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然而，西方敌对势力却在紧锣密鼓，一方面加紧支持和怂恿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舆论攻心；另一方面积极在苏共党内高层寻找代言人，用金钱或物质利益收买。[15]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信息和宣传部门，加足马力，开动宣传机器，西方的价值观在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的掩盖下，逐渐向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渗透。苏共领导人忽视了西方长期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他们对西方针对苏联开展的“心理战”和“攻心战”缺乏认识，丧失警惕，甚至全面敞开胸膛投入西方的怀抱，丧失了自我，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轰然倒下。

四、苏联解体——谁之罪？怎么办？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曾语重心长地讲道：“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以，对这个问题要有自觉性，老同志尤其要有这个自觉性……垮下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下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16]

2011年底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最后一任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17]发表文章，他说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三类人：一是苏联党政精英，他们无力应对时代挑战，一些人甚至走上了背叛道路；二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他们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要摧毁苏联；三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他们不清楚社会政治体制更替会造成何种后果，没有奋起捍卫国家免于分裂。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

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8]因此，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垮台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的领导。教训十分深刻。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的政治剧变使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数量锐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格局，给国际政治思想领域以巨大冲击和影响。苏东剧变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为保持党的永久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要深入总结苏东剧变深刻的历史教训，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共产党“掌好权”“执好政”的经验与教训，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纪律、作风等方面的建设，认真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各项工作，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廉洁勤政，带领全国人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步迈进。

---

[1]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88.

[2]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助手之一阿·切尔尼亚耶夫回忆道，那时戈尔巴乔夫几乎向会见的每一个外国人反复提出一个问题：“波斯湾危机七国集团花费了700亿—1000亿美元。这笔钱找到了。为什么就找不到帮助苏联改革的钱呢？苏联的改革对世界政治，包括未来整个世界进程具有不是百倍的意义，至少也有几十倍的意义。”参见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M].徐葵，张达楠，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438、533.

[3]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77—184.

[4]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随着俄罗斯向自由市场的迅速转变，最大的损失者就是知识分子。他们仿佛一夜间掉入自由市场的冰窟窿，因为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就分崩离析了。参见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2.

[5]戈里亚耶夫。苏联政治性书报检查历史：文件和述评[M].莫斯科，1997:191.

[6]张捷。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刘

军。偏激的行为沉痛的教训[J].西伯利亚研究，2003（5）；王守泉，吴波。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5）.

[7]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62—163.

[8]转引自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22.

[9]转引自张虎林，等，编。跨世纪的角逐——反“和平演变”十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5.

[10]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M].肖敏，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566.

[11]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M].莫斯科：角度出版社，2002：87，88.

[12]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M].莫斯科：角度出版社，2002：108.

[13]［苏］莫斯科新闻，1988-9-8.

[14]M.约夫楚克。苏维埃精神文化的发展问题和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J].哲学问题，1976（3）.

[15]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43—575.

[16]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67.

[17]尤里·普罗科菲耶夫（ЮрийАнатóльевичПрокóфьев），出生于1939年2月20日。苏共被禁止之前在1989—1991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90—1991年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8·19”事件中虽名义上没有加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积极参与并支持，而后遭到叶利钦政权的调查。曾出版《苏共被禁前后——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回忆》（2005）、《杀死苏共——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证词》（2011）两部书，在俄罗斯颇有影响。苏联解体后，先后领导几家大型高科技军工企业，并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担任“‘祖国’全俄社会主义人民运动”主席团主席、战略文化基金会主席等职务。此文刊发于2011年12月25日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原标题为“苏联解体20年：谁之罪？怎么办？”。文章全文参见李慎明。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M].张树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84。

[1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0.

第二篇　私有化困境



俄罗斯教材中给学生提问：你如何形容私有化？右面是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不久老百姓用它只能换20美元或几瓶酒或几斤香肠。

（图片为作者提供，图中文字为作者翻译）



俄文：俄罗斯私有化是黑幕，老百姓全不知情。私有化的获利者是与新政权亲近的一小撮，他们即后来的财阀和寡头。

（图片为作者提供，图中文字为作者翻译）



俄文：众所周知，俄罗斯私有化是在美国中情局的策划和操纵下进行的。俄罗斯国有资产委员会的一层坐满了美国顾问。打着哈佛大学旗号的中情局特工或“芝加哥学派”的青年人，分配着几十年苏联人民积累的财富，将工厂、油井私有化给他们指定的人。

（图片为作者提供，图中文字为作者翻译）



当时的一幅俄文漫画：国有资产大卖场。问：有几种私有化模式可选？答：那要看你想瓜分多少！

（图片为作者提供，图中文字为作者翻译）

第六章　从非国有化到私有化

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掌权的中期，苏联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社会生活稳定，生产发展较快，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美国，而且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日见缩小，在军事实力及尖端武器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成为角逐世界霸权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70年代中期以后，躺在“石油美元”上的苏共领导层觉得高枕无忧，变得不思进取，害怕改革，苏联体制逐渐僵化，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另一方面，苏共领导干部队伍严重老化，以权谋私及浮夸奢侈之风盛行，引起广大群众和干部的不满。

苏联社会凝固不前，人心涣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昔日的“集体主义、劳动竞赛”精神早已被淡忘。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官僚机构不思创新。苏联社会普遍的情况是，生产劳动纪律散漫，缺少责任感。可以说，苏联社会丧失了激励机制，经济发展正失去内在的动力。勃列日涅夫时期广泛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很有代表性：

一天，外国记者参观苏联某工厂生产车间。厂房高大，机器轰鸣，一片热闹景象。

临别时，外国记者特意问在机床旁工作的工人收入多少。

工人回答：25卢布。

外国记者十分惊讶：为什么这样少？

工人一笑：上面象征性地发工资，我们下面象征性地工作。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后，继任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听取苏联干部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意见，采取了一些“强化纪律，整顿涣散”的措施，并安排研讨经济领域改革的具体方案。然而安德罗波夫执政仅一年多便因重病离世。继任的契尔年科总书记循规蹈矩又年老体迈，于1985年3月去世。之后苏共中央选举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此后6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先后提出了“改革”、“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等口号，宣扬其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经济“加速战略”，接着便在思想领域提出“公开性和多元化”，并以“民主化、多党制”等为口号着手推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在对外

政策中宣扬“新思维”，对西方世界单方面地妥协退让，结果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民族分裂、苏共丧失政权、统一的苏联国家分崩离析。

在1985年的四月全会上，苏共中央提出了“加速战略”（即“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目的是集中财力和物力，大力发展机械制造业，购买西方技术，实现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加速”口号反映了苏联人民要求发展经济，缩小与西方国家差距的愿望，但这一发展战略仍然是不计投入，只强调增长速度，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逃脱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片面增长的老路。

1986年2—3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在批准“加速战略”的基础上，又推出了《苏联1986年至1990年及200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层急于求成和好大喜功的心理：乐于制定宏大的战略，而不是艰苦细致、脚踏实地推进改革与发展。几年后随着政治斗争的激化，这些宏大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便被束之高阁。

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也尝试过在农业部门实行租赁或承包形式，1987年准许个体农场经营合法化。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同年底，又出台了关于计划、价格、财政、信贷、金融、物资技术供应、外贸等10个改革配套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思路是“下放权力”，使企业实现“三自一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企业自治，完全的经济核算）。1988年5月，苏联通过了《苏联合作社法》，1989年出台了《租赁法》。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和法律却有始无终：1988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将改革重心和目标转向政治领域。其结果是：经济管理失控、商品短缺、卢布贬值和通货膨胀。

戈尔巴乔夫并不熟悉经济工作，他热衷于政治空谈，并常常忽东忽西、舍本求末，在政府管理上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反酗酒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政策不得人心，财政损失惨重。戈尔巴乔夫喜欢出镜作秀，幻想左右逢源，政策朝令夕改。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在一个月前讲妥要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了一连串儿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短短的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方向的清单不知填写过多少次。”[1]

回忆起当年情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讲：“当时我已经提出了改革不能从各行各业同时开始，总得有个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启示意义。首先应该把市场机制引进到农村和城市关系中，把农村和城市的经验结合起来。”戈

尔巴乔夫听不进也不愿听不同的意见。唯意志论的决策和急躁冒进的思想，很快在苏共领导层占据了上风。

从1987年开始，苏联政府制定的计划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5%—4.0%，而1986—1988年仅增长2.8%，低于改革前的速度。更为严重的是，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的窘境归因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窘境又为更加激进的自由化改革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经济改革裹足不前，造成新旧问题叠加，消费市场供应日趋紧张，商品“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在“公开性”和舆论开放的背景下，经济的失败严重损害了“改革”和苏共领导人的威信。急于在国内外树立形象的戈尔巴乔夫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外交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不见成效的根源在政治领域，而改革不力源自苏联社会的“停滞机制”和苏共党内的“保守力量”。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吹响了全面政治改革的号角，从此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虽然会上有不少党代表提出应当讨论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但戈尔巴乔夫一意孤行。他坚持认为，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改革注定要失败。戈尔巴乔夫引证历史说：60年代赫鲁晓夫经济改组之所以半路夭折，正是碰到行政官僚的暗礁上。官僚的保守是扼杀创新的“祸首”。结果，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获得了全胜，西方舆论也为戈尔巴乔夫战胜“保守势力”而欢欣鼓舞。戈尔巴乔夫幻想避开“经济改革”，害怕长时间艰苦的劳作，转而选择一条捷径，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希望通过快速的政治改革，就能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还能换取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埋下了一颗颗政治“地雷”，无异于落入了改革“陷阱”。

此后苏联社会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受到猛烈的抨击，随后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开始大行其道，一夜间竟成为思想界和舆论的主流。

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混乱而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趁机推波助澜，期盼着将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国有资产的特权官僚集团和蜕化变质的企业管理者更是蠢蠢欲动，欲乘私有化之机“近水楼台先得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说：“当时党的高层精英群体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限。有人当上了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就能控制那个州里几乎所有的财富。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国有化”浪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最后转为完全支持。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发挥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潜力。”他还说：“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

然而到了1990年8月，还是同一个戈尔巴乔夫，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还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为与其政治改革即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大力推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快速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

1989年下半年，苏联经济继续恶化，高通胀，高物价，失业严重，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苏共高层和苏联政府仍在围绕不同的经济改革方案而争论不休。苏联政府方案以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为首，以阿巴尔金提供的材料为基础，主张改革在各行各业同时铺开，逐步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管理机制。雷日科夫认为：“我们建议渐进地推行市场经济。我们研究过中国的改革，希望我们也能逐步地推进。我计算后认为，这至少需要8年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方案，经补充、修改形成“500天计划”。“500天计划”是沙塔林等人经戈尔巴乔夫授权，根据亚夫林斯基、叶利钦等人提出的方案修改、补充而成，目的是与政府方案抗衡。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订的“500天计划”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采取激进市场化手段，目的是促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将苏联国有行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1990年前后，苏共高层内部以及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激进势力围绕选择和实施哪种经济改革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1990年8月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同意以“500天计划”为基础，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为代表的稳健派则反对以“500天计划”为代表的全盘自由化和全盘私有化的经济改革计划。

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

领之争。戈尔巴乔夫的纲领表面上介于前两个方案之间，但实质上全盘接受了亚夫林斯基—沙塔林计划中全面私有化的内容。其主旨是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以及私有化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他提出“必须向经济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进”。经济改革方案之争很快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斗争，经济私有化也进入快车道。

自1988年夏天，苏联经济形势开始严重恶化。1989年，经济增长逐月下降，1990年开始出现“二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据统计，1990年、1991年经济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就达到15%。[2]经济状况空前恶化，使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集贸市场价格增长2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价格9倍。

1989年苏联的财政收入、社会劳动生产率、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众消费品产量等计划指标均未完成。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词中对经济形势做出如下描述：“消费市场的情况极为困难，经济关系严重失调，交通运输混乱，国家纪律显著松弛，围绕着所有权、自主权和职权范围划分问题的政治冲突有时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犯罪持续增加——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目前危机仍在继续深化……”[3]1990年前10个月，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比1989年同期下降3%、0.8%和2%。经济形势极度恶化造成社会日用消费品市场供应急剧紧张，各地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引发职工群众日益不满。1989年前7个月有500多家厂矿企业先后爆发罢工。

戈尔巴乔夫时期将经济改革完全寄希望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甚至为了获得西方的支持，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时间里，苏联政府外债从13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多次向“七国集团”的首脑乞求财政和经济援助。但西方国家却“口惠而实不至”，找出各种托词，始终不肯给苏联任何实质性的资金和贷款支持。1991年前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又恳求英、美、德等国首脑，要求提供紧急贷款或援助，而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均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而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当时报刊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时代留给人们的印象，首先是称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分崩离析，其次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再就是80%的人进入贫困状态，成百万的贫困者流落街头。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说：“1990年、1991年开始发行各式各样的票证，有蓝色的、粉色的。当时我还小，记得排了大半天的长队。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前边的妇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肠买走了，到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1991年11月，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走过74年的历史，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界的一处森林里，签署协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实体自此消失。随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总统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黯然宣布退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和斧头苏联国旗在漆黑的夜幕下悄然下落。

1991年12月27日，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收拾行囊，然而此时，叶利钦已经端坐在他昔日宽大的座椅上，令戈尔巴乔夫尴尬万分。

二、私有化的密谋与设计

时光倒流。1986年夏，在列宁格勒市郊外的森林里，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30多位年轻的经济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经济问题，形成了“经济改革秘密小组”。6年后，这些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书生，站到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潮头”，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明星人物。他们是盖达尔、丘拜斯、科赫、阿文、瓦西里耶夫等。

几年后，在他们当中盖达尔曾两次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之职，负责制定和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被称为“俄罗斯经济改革之父”。丘拜斯也是两次出任政府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科赫曾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阿文曾出任外经部部长。

1986年8月的列宁格勒郊外之夜，围绕在燃烧的篝火旁，这群未来俄罗斯改革的精英，一面饮酒高歌，一面高谈阔论。他们指点江山，抨击时弊，让人联想起沙皇时代的“十二月党人”，也是一群贵族知识青年，不满沙皇的封建统治和生活的沉闷，在沙龙聚会，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此时的盖达尔和他的同伴们谈论更多的是经济话题。但是话题和言辞已经突破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禁区”：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保护私有权利。他们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做诊断，并开出了消除官僚经济弊端的药方。这些未来的经济掌权者提出，苏联经济的出路在于建立西方社会那样的自由市场，改变公有制，确立私有制。

当时这类“激进而出格”的观点和主张，并没有受到冲击和批判。相反，随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到来，激进的思想给他们带来了空前的荣誉和地位。他们昔日的师长、那些满腹经纶的院士已经被视为“保守势力”，退到了舆论的边缘。后来掌权的“自由派”势力将他们看作是“怀揣着经济妙方的神仙智囊”，叶利钦总统称盖达尔为“经济学神童”“经济天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体，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过去的苏共反对派被推上了前台。但人们发现掌权后的激进反对派除了反共、加快改革的口号外，并没有像样的、成熟的、详尽的经济改革方案。

1991年末，苏共垮台。突如其来的胜利，甚至于连激进派都未曾料到。正像一位俄罗斯作家形容的，政权突然地落在自由反对派的“脚下”，仿佛从天而降。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面对手中的权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特别是怎样处理近乎瘫痪的经济，更是缺乏良策。他们原本想在一旁观看苏共怎样熬过经济改革的“痛苦”，现在却不得不“披挂上阵”。

在激进派眼中，戈尔巴乔夫改组的失败，印证了一条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既然苏联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国家的比赛中败北，既然改革、完善这种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只有完全抛弃此制度，全面采取和推行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制度。

苏联解体后不久，叶利钦又一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演说中叶利钦谈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美国这一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叶利钦承诺，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

在俄罗斯新一轮的改革派看来，一旦俄罗斯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就会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为社会造福。俄罗斯新一轮的改革派庆幸甩掉了原苏联的“包袱”，现在终于可以轻装前进了。

当时一位自由派的女经济学家写道：“每当我思考俄罗斯复兴之路时，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战后德国阿登纳政府的经济奇迹。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把所有共产主义的象征物搬进博物馆。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就是俄罗斯社会的复兴之日。”[4]

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终于宣布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不难看出该计划正是出自那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之手。盖达尔、丘拜斯、绍欣等进入俄罗斯政府，并出任第一副总理等高级职务，执掌经济大权。

在《总统笔记》一书中，叶利钦回忆，当时之所以让盖达尔负责经济改革，是出自以下几种考虑：

早在很久以前，叶利钦就几次公开宣布，未来的政府成员的年龄一个也不

许超过自己。身为苏联时期高级干部的叶利钦，已经习惯了旧时的官僚，他决定让年轻的人小试身手。

盖达尔能把经济改革讲得“头头是道”，这样完全能够同议会反对派“相互理论”。

盖达尔保证经济改革马上见效，物价上涨三个月后便能回落，这正合叶利钦的心意。

叶利钦宣布，明年也就是1992年秋天俄罗斯经济便会好转。叶利钦感觉到，人们早已厌烦了戈尔巴乔夫的“空谈”，希望尽快感受到经济改革的效果。叶利钦回忆说，他坚信自己的直觉，他说他和女儿两代人都深受盖达尔祖父写的红色故事的影响，他期望，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定会继承先辈的聪明睿智，救俄罗斯于水火。

1991年10月，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阐述了全面推行经济改革的思想。之后不久盖达尔受命组建新政府，全面负责经济改革。昔日的一介书生一夜之间成为政府总理。

三、俄罗斯“休克疗法”

所谓“休克疗法”，原本是医学上临床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其原意是——对生命垂危的某些病例，通过对病体注入大剂量的药物，杀死带有病毒的细胞，使健康的细胞处于休克状态，然后得以复苏，使病人逐渐康复。

后来“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被用来形容治疗经济危机“后遗症”——通货膨胀。此种经济药方的基本用意在于，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辅以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由于上述经济措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社会经济会受到极大的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故有了医学上“休克疗法”的比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某些拉美国家受到通货膨胀和巨额外债的双重困扰，经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年轻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受聘于玻利维亚政府，出任该国总统顾问。萨克斯根据西方货币主义理论，制订出了一个激进的稳定经济计划。该计划的主导思想是，对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要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采用“休克疗法”坚决给予制止。后来此方果然灵验，萨克斯名声大震。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政局突变。各国急切想要摆脱经济危机，尽

快实现经济体制转轨。萨克斯教授应波兰等东欧国家之邀，开出了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药方”。

他认为，“休克疗法”的转轨战略应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政府努力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价格体制，停止价格控制，削减乃至取消国家补贴，进出口贸易自由化。第二，取消对私营经济活动的限制。第三，通过私有化和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严厉的控制，约束国有企业。第四，实施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削减赤字，平衡预算，以稳定物价。

后来萨克斯又将“休克式”的经济转轨战略概括为稳定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并认为这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三大支柱”。

俄罗斯新政府组成后，萨克斯被邀担当俄罗斯政府“顾问”。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官员、智囊班子也经常飞往大洋彼岸学道取经。盖达尔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与萨克斯“休克疗法”的思路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在俄罗斯，在价格改革与私有化究竟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以盖达尔为首的改革班子曾一度犹豫不定。有的意见认为，在经济非私有化之前，放开价格不会达到预计的效果，因为旧体制对市场的变化“反应迟缓”。最终，还是决定价格改革在先，而私有化亦不能“拖延”，否则将“错失历史改革的时机”。

以1992年初为起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全部放开价格；商业、外贸自由化；大规模私有化。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次性大范围地放开物价，形成自由价格制度，为经济市场化创建必要的条件；实施严厉的财政金融政策，紧缩银根；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实行外贸体制改革，外经贸活动自由化。

“经济自由化，确立私有制”概括了“休克疗法”的内涵。俄罗斯原国务秘书、叶利钦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布尔布利斯直言：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私有制”，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还没有创造出比它更符合人的天性的东西来。私有制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是现实中最好的。这种制度存在于欧洲、美洲及东南亚，并无须任何民族性的修饰。经济自由化是为了彻底摆脱“官僚机构”的束缚，而私有化目的是使革命不可逆转。丘拜斯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宣称，正像民主一样，私有制是万能的。他坚信，市场和私有制是俄罗斯社会富足的充分保证，也是政治和精神自由的靠山。

四、紧缩货币、放开价格

1991年末，俄罗斯市场商品供给告急，食品等日用必需品几乎从货架上消失。居民紧张不安地等待着价格改革的出台。1992年新年刚过，俄罗斯政府宣布放开物价。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物价似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

收。

稳定而低廉的物价曾被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之一。

在原苏联，全社会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日用消费品、交通、儿童用品、医药、文化出版等都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在斯大林时期，药品等日用品价格还几次下调。国家严格控制物价也成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特色。1992年以前，苏联生产的大部分商品干脆将零售价格直接标在商品的最显眼之处。药品的价格印在包装上，西装、大衣的价码缝制在里面，就连每个鸡蛋也都打上日期和价格。

几十年来，苏联的许多商品价格一成不变。例如，居民必需的通心粉、食用植物油、食糖等食品价格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未变。1962年以来，肉类、乳制品等副食品的零售价格从未上涨。1950年一个面包卖12戈比（0.12卢布），到1990年仍是12戈比。

戈尔巴乔夫时期，居民手中的货币增多。另外，生产和服务远不能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居民所需的食品、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严重匮乏。物价低廉，但却没有保障，出现了“隐形通货膨胀”，形成了俄罗斯特色的“黑市交易”。

在低物价、商品短缺的情况下，一方面造成囤积、抢购风潮，另一方面也浪费严重。苏联粮食和面包的价格“倒挂”，以至于集体农庄的农民将面包买回去喂牲畜。

俄罗斯新一代改革派决心放开价格，使商品回到“货架”。按他们的设想，商品零售价格充其量会上涨2倍，3个月过后，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生产厂家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出满足需求的产品。届时俄罗斯市场充盈，物价趋于平稳。叶利钦通过电视向全国表示，“休克疗法”过后，到1992年秋天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有好转。然而事与愿违。两周后物价上涨幅度便超过了10倍，黑市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拿出一根香肠，提问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盖达尔是否能说出香肠的价钱。盖达尔对着电视机镜头回答：1公斤香肠市场价是9—10卢布。当时舆论哗然。实际上，当时香肠的市场价已是90卢布/千克。

1992年，俄罗斯物价仿佛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不断攀升。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1992年俄罗斯社会消费品的价格和服务费用比1991年高出26倍，而与1990年相比物价上涨幅度竟达6700%。仅一年的光景，许多商品的价格便上涨了100倍，甚至更多。1992年以前，这里曾有着世界上最便宜的地铁交通。当时乘坐一次地铁的价格为5戈比，也就是0.05卢布。当时的平均工资为250—270卢布。到1997年，地铁票价为2000卢

布，平均工资为80万—100万卢布。下面简单列举几种食品价格几年间变动的情况，以增加感性认识（见表6-1）。

表6-1　俄罗斯食品价格的变化[5]

	1990 年（卢布）	1997 年（卢布）
面包 / 个	0.12	3 000
面粉 / 千克	0.22	5 000
大米 / 千克	0.40	6 000
鸡蛋 /10 个	1.50	5 000
洋葱 / 千克	0.20	3 000
土豆 / 千克	0.06—0.20	2 500

为了便于比较，下面列出两组表格来描述俄罗斯几年间物价和居民实际货币收入的变动情况（见表6-2、6-3）。

表6-2　俄罗斯物价上涨指数[6]

为上年 12 月的百分比（%）					为 1990 年的倍数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260	2 610	940	315	231	2.6	67.8	638	2 010	4 643

表6-3　俄罗斯居民实际货币收入的变化（为上一年的百分比%）[7]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货币收入	101	41	108	112	87
退休金	……	……	……	94	81
工资	112	52	94	92	74

1992年放开物价后，通货膨胀严重，卢布急剧贬值。特别是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在1000倍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下，顷刻间化为乌有。而当时银行里居民的储蓄总额相当于1990年居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由于储蓄存款贬值，俄罗斯百姓损失惨重，不仅导致了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而且使“吸引居民广泛参与私有化”的口号变为一句空话。

---

[1]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M].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88，89.

[2]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曹荣湘，孟鸣歧，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1.

[3]叶·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M].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37.

[4]阿·彼娅舍娃。靠自由痊愈[J].祖国，1990(50)8.

[5]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7.

[6]同上37.

[7]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8.

第七章　全盘私有化

我们不需要一小撮百万的富翁，我们需要上百万的私有者。私有化券——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走进自由经济的通行证。

——叶利钦总统1992年夏天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

两三年的时间，他将官僚垄断了七十年的财产分割掉。没有内战，没有流血，简直是奇迹！

——某诗人评价丘拜斯

共产党的权贵们自愿地成为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他们期望在共产主义制度的葬礼上发财致富。俄罗斯的私有化是国家财产被“官僚私有化”。官员们将手中的对国家财产的支配权、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

——盖达尔

俄罗斯私有化是一次重大的失败！

——经济学家叶·亚辛，1994年任俄罗斯政府经济部部长

证券私有化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大破坏！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利西齐金

私有化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骗局！

——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谈私有化

一、私有化的发起与实施

1990年以前，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学术界和媒体大多使用“非国有化”一词。当时这种提法只是停留在“试探性”的理论探讨阶段，还缺乏具体政策和内容。1991年“8·19”事件后，苏共垮台，政权更替，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毫无顾忌地打出了“私有化”的旗帜。其目的有三：一是显示与过去“官僚、僵化的经济体制”决裂，首先用“私有化”来剥夺官僚们的权力；[1]二是利用“私有化”所包含的“民营、私有”等含义，强调“给予”之意，借以赢得人心；三是借用“外来的新词”，表明俄罗斯与国际大潮相辅相成，符合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倾向和心态。

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纲要》的规定，私有化要实现以下七个重要目标：（1）形成一个私有者阶层；（2）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3）利用私有化收到的资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4）促进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5）提高竞争力、实现经济非垄断化；（6）吸引国外投资；（7）创造条件，建立良好的私有化组织体系。

（一）放松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控制，容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

戈尔巴乔夫时期，为了放松对个体劳动者的限制，1986年11月通过了《苏联个体劳动活动法》，该法案从法律上规定和扩大了个体劳动者的活动范围。

不久，为了鼓励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88年5月颁布了《苏联合作社法》。而后，合作社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各种私人合作社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为了发展租赁承包关系，1989年11月，当时的苏联立法机构通过了《关于租赁法的原则》。

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统的后期，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随即在1991年7月1日签发了《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简称《私有化法》），1992年6月6日又对上述法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应当说，此时俄罗斯已经确立了对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的法律框架，这一法律成为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基本大法。

俄罗斯《私有化法》中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制定私有化纲要及纲要的基本内容；俄罗斯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财产基金会、投资基金会与控股公司的职能、任务与权限；国有和地方企业实行私有化的程序、方式和方法等。

私有化是俄罗斯经济改革中的“重头戏”。为了使私有化真正起步，俄罗斯总统于1991年12月29日发布总统令，公布了《1992年国有和地方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1992年6月11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了由政府制定的《俄罗斯联邦1992年国有和地方企业私有化纲要》。这是两个具体指导实施俄罗斯私有化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中确定：近期私有化的目的和目标，企业实施私有化的原则及分类，私有化要实现的指标和任务，私有化方法以及对劳动集体成员的优惠措施等。

（二）组建推行私有化的部门和机构

为了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根据法律规定，俄罗斯成立了一系列新的组织机构。

1.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属于政府职能部门。其中，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它是俄罗斯指挥和推行私有化运动的“最高司令部”，因其所拥有的极大的权限而被称为“超级大部”。一般来说，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兼任。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国有财产的私有化，包括：制定私有化纲要和其他私有化规范文件，监督私有化纲要的实施，向总统和议会报告纲要的执行情况，归纳各方面对私有化的意见和建议，领导并监督地方实施私有化的进程，协助建立投资基金会和控股公司。俄罗斯全国共成立了86个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2.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财产基金会。

它们不是政府部门，而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法人组织。这些基金会负责出售联邦所属国有企业、股金、股票。

财产基金会的主要职能是：临时掌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移交的国有企业股份公司（合伙公司）资本中的股金与股票的份额所有权证明书，在股东大会上代表国家股实施权力；在持股企业份额范围内，对企业的活动承担风险和责任，出售属其份额的企业股金和股票；创办股份公司（合伙公司），购买它们的股票与股金；成立投资基金会和控股公司，将国有股票换成投资公司与控股公司的股票，但不得超过每个公司股票总数的20%；监督国有企业改造过程中向职工提供的优惠。

3.建立投资基金会和控股公司。

在俄罗斯，为了建立有价证券的一级市场，减少股票购买者的风险，决定成立投资基金会。俄罗斯的投资基金会分别属于财政部的投资基金会和国家财产委员会的证券投资基金会。按规定，一个投资基金会有权持有一个股份公司有投票权的股票，但不得超过10%；可以购买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但不得超过自身资产的5%。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规定，一个投资基金会对一家股份公司的投资不得超过股份公司法定资本的25%。这些规定，一方面是要投资基金会通过购买“一篮子”股票，以便分散投资风险，另一方面是为了反垄断，防止单独“坐庄”。投资基金会应从投资中获得利润，并向基金会成员发放红利。为了促进企业与其协作伙伴的合作，规定成立控股公司，但不允许成立使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提供的某种服务走向垄断化的控股公司。

（三）推行商业化、公司化以及租赁制

在大规模私有化尚未开始以前，经济非国有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租赁和建立合作社，或在国有企业之下建立非国有的公司。

租赁制实施的轨迹是：一开始企业先改为租赁，一般由原职工队伍承包或租赁，租赁后，租赁人有权赎买企业的固定资产，此后企业变为股份公司，有些职工成为股东。例如，莫斯科水晶玻璃厂于1988年改为租赁制，1992年变成股份公司，职工和厂领导成为股东。1991年以前，原苏联所有企业中有14%的企业实行了租赁制，私有化后，实行租赁制的企业比例有所下降。

原苏联及俄罗斯非国有化的另一途径是国有企业“商业化、公司化”。一些行业主管部门也纷纷成立或改组为商业性公司，特别是1988年《合作社法》生效后，国有企业“商业化、公司化”的步伐加快。新成立的公司往往是一些在工艺上独立的下属部门，从原企业分离后，有的名义上是国有的，但实际上已是私有的或半私有的。1991年，在国有“母体”基础上成立的公司中，80%是从原企业获得原材料，并租赁企业的固定资产，莫斯科“狄纳莫”工厂就是这样的例子。有的公司干脆是由销售部门改组而来。

二、全民私有化进行时

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多数采取出售、拍卖、投资招标、股份制改造等形式。从规模上看，俄罗斯私有化又分为“小私有化”与“大私有化”。

“小私有化”包括批发与零售商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农产品加工、食品工业及建筑业与建筑材料工业企业等，主要采取公开拍卖、租赁或者出售的方式。

“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其步骤为：首先将大中型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或集团，以变更其所有权，然后将股份公司的股票推向市场。“大私有化”分为“证券私有化”（1992年7月1日至1994年6月30日，历时两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现金私有化”（1994年7月1日至1996年底，该阶段的特点是按照市场价格出售国有资产）和“个案私有化”（1997年后，特点是大规模私有化停止，转为有选择地进行，强调私有化的重心是增加投资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强国家的监督）三个阶段，经过“由面向点”，过渡到正在进行的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招标或竞拍，最后是国家剩余股份的管理与增值阶段。

三、财富转移与社会分化

1992年10月1日起，俄罗斯政府开始向居民发放私有化证券（亦翻译成“票证、票、券”），从此拉开了全面私有化的序幕。

证券私有化是俄罗斯“大私有化”的第一阶段，从1992年7月起，截至1994年6月30日，历时两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发放私有化证券（票）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所以被称为“证券私有化”阶段。1992年7-9月，在发放私有化证券之前，为保证私有化过程中企业股票数量的“供给”，采取自愿和强制的形式，将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改造成开放型的股份公司。这类企业一般属于联邦或州一级所有，固定资产超过5000万卢布的企业。在完成私有化证券的发放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之后，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证券私有化迈出了第三步，在专门的拍卖市场上出售企业股票，企业职工和社会居民均可以用私有化证券购买。

发放私有化证券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根据规定，每个公民不分民族、性别、年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从刚刚降临人世的婴儿到临终的老者，都可获得1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计算，一张私有化证券相当于150美元，或4个月的平均工资。

发放私有化证券是俄罗斯接受西方经济“谋士”的建议，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借鉴而来的。在私有化酝酿阶段，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计划设立居民个人银行账户，或发放记名、凭证式证券，但到实际实施过程中，俄罗斯政府为“方便和抢时间”，改为发放不记名、不挂失的普通证券。

据当时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策划人盖达尔回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1992年的俄罗斯面临着改革的机遇。在价格全面放开后，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对改革的热情一落千丈，议会反对派势力也在蠢蠢欲动，此时再不实施私有化，推出私有化证券，“经济改革”将失去历史性的大好时机。

参照俄罗斯社会的人口总数，俄罗斯私有化证券预计发行1.48亿张。官方宣称，社会中的国有资产是七十多年来全体人民的劳动积累，搞私有化，就应将这些财产平均地发给每一个人。那么怎样分，又分多少呢？

官方表面上宣布，政府将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和登记，登记结果表明，到1991年底，俄罗斯国有企业数量为25万家。最高苏维埃计划将其中70%的资产以私有化证券形式分给居民，而以盖达尔为首的政府却坚持只分其中的35%。这不包括按当时物价估算的全国房屋价值——16.5亿卢布。35%的资产均摊到全民身上，就得出了每张私有化证券1万卢布的面值。

几年后的情况表明，实际上当时真正的国有资产评估和统计工作根本没

有，也不可能完成。俄罗斯新政府成立于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经济管理陷入混乱，新组建的俄罗斯政府面对的是一片废墟。后来的资料显示，当时俄罗斯政府对包括港口、厂矿、钢铁厂等在内的众多国有企业的资产根本没有进行资产评估，而是使用苏联1984年最后一次经济普查中的数据，而计价仍然是苏联卢布币值，即1993年仍是按照1984年的评估价值——4万亿卢布。这样4万亿卢布的35%就得出私有化的企业价值为1.4万亿卢布。[2]

1991年11月，开始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借以负责私有化工作。对于每张私有化证券的面值，据盖达尔在《胜利与失败的日子》一书中回忆，只是一拍脑袋，定为1万卢布，图的是“计算方便”。

俄罗斯学者指出，即使私有化证券面值总额基本上相当于1991年底国有资产的价值，但到1992年10月，居民从银行开始领取私有化证券时，物价已经上涨了20倍。这时政府本应及时地按上涨后的价格对国有资产进行重新评估，但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拖了将近一年，也就是1993年中期以后，才开展这项工作。而在1993年，4万亿卢布的资产总额根本算不上大钱，因为1993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为22.2万亿卢布，相当于GDP的14%。这也意味着，一开始俄罗斯居民领取的私有化证券的价值仅为国有资产实际价值的1/20，甚至是百分之一。

1993—1994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每月高达7%—18%，1994年1月1美元兑换1247卢布，6月便上涨为1985卢布。按照这样的比价计算，4万亿卢布只相当于20亿美元，这还比不上一个核电站的资产价值。然而，当时俄罗斯政府主管私有化工作的副总理丘拜斯却鼓动说，一张私有化证券升值后，可以换回两辆“伏尔加”牌轿车。但事实并非如此。1992年10月到1994年10月期间，一张私有化证券平均价格为1.25万卢布，但在大多数地区，私有化证券发行三个月后，也就是1993年春季时，私有化证券迅速贬值，在投资公司或证券交易所中只值5美元，而在俄罗斯一些边远地区一张私有化证券只卖到4000—5000卢布，约合3—5美元。

一张私有化券，没有换来丘拜斯这位俄罗斯“私有化之父”许诺的“伏尔加”牌轿车。在1993年，俄罗斯人只能用它换回1公斤香肠，或买回1瓶普通的伏特加酒，有7%-10%的居民干脆没有去领，认为区区一张小纸根本不值得费神排队领取。然而当时涌现的大批证券投资基金会，却乘机大量收购和倒卖私有化证券，从中大发横财。

一些投资公司利用媒体大做广告，许诺高回报、高红利。这些基金会在背后动了手脚，把盈利的股票转手给自己的下属公司，把一些不赚钱的股票留给需要投资的股民。在圣彼得堡市，1994年通胀率高达3位数，一家证券投资基金会的股民1000卢布的股票的红利只有区区39卢布。

在这一时期的俄罗斯证券市场上，还出现了许多投资公司。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和法规，证券市场混乱不堪。一些公司想方设法蒙骗普通居民：有的使用各种“诱饵”迷惑股民；有的公司发行股票，自我定价，内部炒卖；还有的公司相互“繁衍”，如某家股份公司吸纳社会资金后，接连成立新的公司，“繁衍”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资产转移。众多的中小股民不知其中的奥秘，被蒙在鼓里。

有不少居民把刚刚领到的私有化证券交到了这类投资公司手中，老百姓哪里想得到，在拍卖活动中，用私有化证券可以购买任何企业的股票。政府规定，属于州和联邦两级所有的企业，在私有化时要拿出35%的股票，让老百姓以私有化证券购买；购买企业时，购买者有权使用私有化证券缴纳35%的付款。

据统计，约6100万俄罗斯人直接将私有化证券卖掉，这大约占私有化证券的40%；还有2500万俄罗斯人将私有化券投入到投资基金会；一些居民用私有化证券直接购买了一些开放式无限责任股份公司的股票，成为股民。然而，老百姓所得到的红利少得实在可怜。例如，在圣彼得堡市，一张面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只能购买500卢布的股票，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年能获得100%—200%红利，也就是500—1000卢布，只够购买一张公共汽车或地铁票，有的企业在郊区或外地，家远的人有了红利都不敢去领。将证券出售换成现金或赠送亲友，这对生活困难的居民来说，可以买点儿食品，称得上是一次性的生活“补贴”。

俄罗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俄罗斯私有化证券过低的牌价，甚至比不上东欧小国捷克。俄罗斯证券私有化本应在1993年底结束，但由于许多居民手中还存有大量的证券，不知如何处理，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将证券私有化延长半年，至1994年6月30日。

证券私有化，免费给全体公民发放国有企业股份凭证，搞大众化的私有化模式，实质是在平均分配的旗号下分光、卖光七十多年积累的社会主义财富，形式上将原来国家所有的资产转变为公民个人所有，但是，它并不能根本改变企业所有权结构，从而真正达到形成所谓“所有者阶层”的直接目的。证券私有化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群众受骗上当，受益的只是瓜分到社会财富的“一小撮”。

在私有化过程中，原盖达尔政府曾计划于1994年再次发放私有化证券，但由于出现的问题过多，新政府班子上台后，放弃了这一做法。1994年6月30日，俄罗斯政府宣布，私有化证券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私有化进入下一阶段——“现金私有化”阶段。

自1994年7月1日起，俄罗斯私有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俄罗斯政府宣

布，不再以私有化证券的形式出售股票，而一律改用现金形式出售股票。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私有化有几个重要变化。

1.私有化的目标重点发生变化。前一时期的私有化重点是分配国有财产，其中一大部分是平均分配，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所有者阶层。新时期私有化的重点是将投资与改造结合起来，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吸引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资金，利用他们的资金进行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和改造，最终使私有化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

2.私有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前一些禁止私有化的企业和部门，将被纳入私有化进程。这样，私有化的范围扩展到了燃料动力部门和军工部门。俄罗斯军工企业中，除了30%的企业禁止私有化外，其他企业都将私有化。与此同时，扩大了必须进行私有化的设施范围，从前私有化不包括不动产以及由私有化企业所占用的土地，在第二个时期都可以私有化。

3.私有化方法更加灵活多样化。例如，可以采取招标形式选择新的企业主；对不进行私有化的财产可以租赁；进行现金交易的专门拍卖；对超大企业（按1992年1月1日价格，其法定资本在100亿卢布以上）的私有化，则制定专门的方案。同时，减少强制性做法，更多地考虑地区和部门的特点，使地方政府机关和主管部门能更多地参与选择私有化的方式和方法。

4.俄罗斯官方宣布，在今后的私有化过程中，要加强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将私有化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

5.大大减少对私有化企业劳动集体和企业领导人的优惠。俄罗斯政府在《1995—1997年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规划》中希望，现金私有化阶段应做到：找到关心企业效益的新主人；促进企业投资；吸引对低效企业感兴趣的投资者。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俄罗斯政府决定采取以下新措施：

1.将股东或投资者感兴趣的企业与需要投资者大量追加费用的项目分类，出售时区别对待。

2.将地产纳入企业资产。其办法是把企业占有的土地列入企业资产的组成部分，或把这些土地以优惠价格出售给先前已被私有化的企业，以增加吸引力和投资者的信心。

3.把出售企业股票所得的51%的款项，转入企业本身的投资账户。

4.为了吸引大投资者，俄罗斯政府规定，谁拥有法定资本的25%以上的控股，谁就可以负责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的出售。

5.决定向市场出售联邦政府所有的某些大型企业的部分股份，以加强私有化的吸引力，增加收入，弥补巨额的预算赤字。

6.预先发布每年的出售国有资产的计划进度表，给潜在的投资者以时间，创造竞争环境。

7.确保在国外金融市场销售一部分股票。

应当说，俄罗斯私有化进行得可谓是轰轰烈烈，特别是在速度和数量上，俄罗斯私有化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国际上评论，像俄罗斯这样高度“国有化”的国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将众多国有企业变卖，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俄罗斯学者评论称，“私有化”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追求的是虚幻的政治目的。

谈到私有化的直接结果，俄罗斯官方列出如下数字：在1995年，实现私有化的企业共计1万多家，其中88%是职工总数不超过200人的小企业；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主要采取股份制，一年里建立了2270家股份公司，法定资本5830亿卢布，资产总值1.7万亿卢布，其中27%为固定资产。这些股份公司中，77%原属于联邦或地方一级的企业，79%在改组前是盈利的，25%的企业在股份改造后，其控股权在国家手中。

在部门分布上，1995年建立的股份公司，27%属于工业部门，18%属于建筑部门，12%属于商业部门，6%属于运输和邮电部门，5%属于科学和科技服务部门。最大型的股份公司，一般都属于有色冶金、电力、燃料、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部门。

在1995年一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建立的股份公司共发行股票8.54亿股，其中1/3在企业职工中分配，1/3为国家所有，1/3用于自由出售。由于居民存款数目微乎其微，再加上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用于市场自由出售部分的股票，一半多未能销售出去。1995年，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售和拍卖款项2.8万亿卢布，与原计划规定目标——8.8万亿卢布相比，相差甚大。在这种艰难情况下，不知是迫于财团的压力，还是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弥补预算亏空，俄罗斯政府决定采取“以国有股份作抵押，换取银行贷款”的办法。

四、私有化升级版：从现金赎买到抵押拍卖

在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过程中，俄罗斯政府接受“货币主义”政策，实行紧缩的货币金融政策。几年的时间里，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得以下降，但由于缺乏资金，企业“三角债”严重，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通过私有化增加国库收入，是改革派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俄罗斯政府希望通过私有化所得，增加预算收入，缓解收支矛盾，但实际上收效甚微，巨额的财政亏空，企业间相互拖欠的“多角债务”日益严重，已达天文数字。所有这些压得俄罗斯政府几乎难以喘息，开动印钞机器，又有悖政府的初衷，造成“前功尽弃”。

正在政府进退两难之际，新生的金融财团势力代表，后来一度出任政府副总理的“财阀”波塔宁向政府提出建议。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将手中掌握的大企业的股权作抵押，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拍卖和暂时的出让，换取相应数额的银行或财团的贷款或闲置资金，以弥补财政赤字。抵押期限为3年，财团有权管理企业，整理并出售企业的股票。3年后，国家可以归还贷款、赎回股权，否则，股票将归买主所有或处理。银行家许诺，通过此举，政府可以获得2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填补预算的亏空。

这一措施为银行和财团进一步控制社会财富“开了绿灯”，使金融资本得以顺利地向工业领域渗透，获得了对优势企业乃至工业部门的控制权。当时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科赫承认，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官僚和企业领导获得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而“抵押拍卖”则是将经济权从“红色经理”手中夺回来，但不是夺回归国家所有，而是归金融寡头所有。俄罗斯舆论指出：一方面，政府在“手拿金碗要饭吃”，因为国家出手的正是战略性的骨干企业；另一方面，私人银行的资金实际上就是被截留和占用的财政预算款项。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实行“银行全权代理制度”，私人银行变成了政府部门的“会计科”，这些银行手中积聚了巨额的财政资金，仅1996年，私人银行代理财政支付的款项就达30亿卢布，许多银行90%的资金来源于官方各级的财政预算。正是“官银不分”才使得私人银行迅速膨胀，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联合进出口银行”就是靠代理国家海关关税等暴发起来的。正是靠吃国家的“奶”，才养大了许多的私人银行。在俄罗斯，银行势力往往取决于官方背景的深浅。

随着一些特大型企业被推向拍卖场，俄罗斯私有化自此也拉开了新的一幕。几乎每个私有化企业，每一次拍卖都伴随着争议和丑闻。

在“抵押拍卖”过程中，一些企业极力抗争，千方百计地阻止外来资本势力的介入。有的擅自扩大企业股票发行，以分散股权，也有的转移资产，更有的从职工手中赎买股票，以获得控股权。银行也不甘示弱，有的提前游说，有的寻找资金。等到拍卖之日，只是走形式而已，因为胜者早已事先确定。

被进行“抵押拍卖”的往往是俄罗斯企业中的“肥肉”，自然引起激烈的争斗。上亿美元的资金，不是所有企业或银行能拿得出，拍卖场经常成为几大财团之间争斗的场所。

1995年11月17日，俄罗斯最大的有色金属和矿产企业——“诺利斯克镍业”被推向拍卖场，只有三份竞拍申请，并且三者同属于一个财团——波塔宁的“联合进出口银行”。

按规定，参加竞拍需有银行担保，于是三者相互担保。由于另一强硬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信贷银行”被事先排挤在外，波塔宁财团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拍卖。

“诺利斯克镍业”38%的股份拍卖的初始条件是，向政府提供1.7亿美元的贷款，波塔宁财团以1.701亿美元的条件中标。而伦敦金属交易所对这一巨型公司的资产评估为40亿美元。“诺利斯克镍业”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俄罗斯铜产量，该公司1995年在国际市场上镍和铜的销售额高达24亿美元，获纯利近4亿美元。事情至此，波塔宁财团仍不罢休，后来又以10亿美元的投资许诺，获得了这家战略性企业的51%有表决权的股票份额。至此，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私人财团完成了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

1995年年底，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抵押拍卖”活动。在拍卖过程中，缺乏透明的交易规则，揭标的条件“因人而异”。俄罗斯舆论将私有化中的“抵押拍卖”称为一次“内部人之间的分配”。就这样，利用“抵押拍卖”，波塔宁财团又获得了原油储藏量居全俄罗斯第一，开采量居第四的“辛丹克”石油公司51%的控股权。

1995年12月8日，国际石油界的“巨人”，俄罗斯开采量第二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拍卖揭晓，结果不出所料，俄罗斯另一大金融集团“梅纳捷普银行”独领风骚，从国家手中接过了78%的控股权。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自编自导”，“梅纳捷普银行”自己负责组织拍卖，自己参加竞拍。一年之后，“梅纳捷普”集团再接再厉，又从国家手中赎买了剩余国有股份，至此俄罗斯在这家石油公司的股份仅为象征性的0.1%。而这些资本运作的幕后老板就是后来成为俄罗斯首富的著名寡头、普京的对手——霍多尔科夫斯基。

1995年，俄罗斯私有化中的“抵押拍卖”闹得满城风雨，未分得“蛋糕”的经济势力、议会反对派纷纷叫嚷“取消拍卖结果”，将出售的企业重新收归国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政府是在“手拿金碗要饭吃”，“变相地将国有资产最肥厚的部分拱手出让”。一些报刊揭露，私人银行的资金不明，实际上大部分资金源于“拖付的国家资金”。

“拍卖抵押”大大促进了俄罗斯金融工业资本的积聚和扩张。一些私人财团正是利用私有化才得以迅速地膨胀，越来越多地掌握了私有化中的主动权。由于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俄罗斯整个国家体制都带有深深的寡头垄断烙印，因此有人

认为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寡头资本主义”。[3]

1996—1997年后，俄罗斯私有化过渡到企业“个案性”的资产拍卖和重组。1997年7月，俄罗斯“电信投资”25%的股权竞拍落下帷幕，“电信投资”25%的股份拍卖成交总额为18亿美元，创下俄罗斯私有化之最。又是波塔宁财团获得全胜。不同的是，世人在胜利者的背后，发现了国际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的身影，18亿美元的巨资，其中10亿多美元正是出自这位“金融巨鳄”之手。

然而，在俄罗斯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并非索罗斯，而是拍卖背后私有化官员每人收受的9万美元的“高额稿费”。随着几位政府高官的先后下台，使得即便不了解私有化内幕的俄罗斯百姓也画出一个又一个惊叹号。

---

[1]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M].李铁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31.

[2]私有化券：一张黄色票证的20周年祭[N/OL].论据与事实，2012-8-22.http://www.argumenti.ru/toptheme/n353/197784.

[3]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俄罗斯资本主义剖析[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5(10)46.

第八章　私有化乱象

一、私有化的立法与操盘

苏联解体后，如何进行经济改革成为俄罗斯政坛上新的斗争焦点。随着价格放开以及私有化运动的展开，围绕经济改革的方向、方法等争论愈发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原来反共联盟的分裂，进而形成了以议会、副总统为一方，总统、政府为另一方的政治对立。

在政治野心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斗争的双方互不相让，最后造成总统同议会兵戎相见，坦克、军车闯入莫斯科市街头，炮击议会驻地——“白宫”，硝烟滚滚、瓦砾成片。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被解散后，叶利钦迅速扩大了总统的权限，新一届议会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发言权极其有限，“私有化”几乎变成了政府机构的“专利”，完全被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年轻领导班子“承包”下来。

（一）私有化的立法

作为一项深刻的、全局性的经济变革措施，俄罗斯私有化的立法基础是联邦性的法律法规、总统令、政府法规、决定及有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等。

几年的时间里，俄罗斯议会先后通过了以下涉及私有化的法律文件：《俄罗斯联邦国有财产私有化和市镇财产私有化原则法》（1991年和1997年两次修改通过）、《俄罗斯股份公司法》、《俄罗斯民法通则》等。俄罗斯议会只是颁布了一些私有化的原则性法律，缺少对私有化的具体立法和监督。

1993年，新的俄罗斯宪法出台，其中规定，“总统令”具有法律效力。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以俄罗斯“总统令”名义颁布的私有化法规很多，其中以1991年12月29日签署的《俄罗斯私有化基本原则》总统令，以及1992年1月1日签署的《加快私有化进程的总统令》最为重要。

有关俄罗斯私有化的总统令，一般均出自主管私有化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手中，而规定私有化的具体操作规则的文件，更是这个部门的“专营项目”。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被称为是私有化的“司令部”。

俄罗斯国家杜马曾经成立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特别稽查委员会，对俄罗斯私有化工作进行了一次检查，最后完成了一份调查报告。1996年4月，该

报告的内容被一家俄罗斯反对派报纸披露。在谈到私有化的立法情况时，俄罗斯议会的稽查专家指出，私有化的操作规则，有悖于俄罗斯私有化的初衷，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经常是“联邦法律”被“总统令”取代，而“总统令”又被“政府决议”或“部门的规定”所代替，最终，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得不到实施。除此之外，俄罗斯议会私有化问题稽查委员会的报告还特别指出了以下问题：

1.一些私有化法规，缺乏对俄罗斯生产力水平的认识，没有考虑生产的发展前景；

2.私有化过程中，特别是在航空航天等军工领域的私有化中，忽略了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的作用；

3.对新的所有者，缺少环境保护方面的限制以及在治理污染方面的要求；

4.忽视了国有产权或股份的管理和增值；

5.没有明确国有资产在国家安全和经济独立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6.缺少详细的规定和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国家对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或企业的控制；

7.一些反垄断措施针对的是国内市场，抑制了俄罗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8.缺乏对私有化改造后的监督，缺乏违背私有化前承诺的惩罚细则；

9.缺少对企业买主情况和资金来源的调查等。

俄罗斯议会的调查专家指出，明确、严谨的法规是私有化的根本，而严格、细致的规章是私有化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俄罗斯立法方面的疏漏，严重影响了私有化的实施，而一些法律法规的相互抵触，使得私有化偏离了法治的轨道。就像诺思所言，那种认为让停滞和病态的经济走上增长之路只需要进行私有化，是对制度分析的歪曲理解。[1]

（二）俄罗斯私有化的“外国军师和操盘手”

1992年，俄罗斯私有化开始之际，直接负责私有化工作的政府机构——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才刚刚组建。新成立的这家机构既缺少人马，又缺乏经验，因此，来自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帮助显得十分必要。在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设有专门的“外国技术帮助司”，由年轻的美国专家

乔治·海伊担任司长。

1992年9月，在海伊的建议下，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专家评定委员会”。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非同小可，可谓“责任重大，权限极宽”。成立该委员会的第188号文件中明确规定：有关俄罗斯私有化方面的总统令、政府决议以及“国资委”主席决定等文件草案，一律必须通过“专家评定委员会”的评议和论证，尤其是在涉及工业部门私有化、集团控股公司的改组及企业的股权拍卖等方面，“专家评定委员会”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另外，“专家评定委员会”还负责众多规范性法规文件的审评。

1992年10月5日，当时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兼“国资委”主席丘拜斯签署文件，任命美国人乔治·海伊为“专家评定委员会”的副主任。该委员会除两位是俄罗斯人外，其余均为外籍人士。

在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国资委”先后邀请了200多位外国专家，为俄罗斯私有化出谋划策，其中15位国外专家为经常性的“私有化顾问”。

后来，在丘拜斯的坚持下，“国资委”又发文，明令规定：机关文件必须有乔治·海伊的签署意见，否则不能盖章、编号、归档。不知是海伊的智谋超群，还是丘拜斯的故作姿态，以赢得西方的好感，一时之间，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机关内部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如果没有海伊叔叔，俄罗斯休想得到美国的援助！

“美国厨师制作俄式私有化大餐”，应当说，俄罗斯政府聘请的外国“谋士”为私有化出了不少力气。俄罗斯“国资委”借助国外专家的帮助，制定了一系列原则性的法律、法规，推出了一些私有化具体操作规范。正是在国外专家的影响下，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方针才得到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认可。因此，国际上给予俄罗斯的援助或贷款，这些外国“谋士”功不可没。

俄罗斯“国资委”的机关大楼门前，正规警察部队荷枪实弹，平常人等不得随便靠近，然而，来自冷战对手的美国人海伊先生却能畅通无阻。海伊后来也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大赚了一笔，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俄罗斯一家航天企业的股份。[2]

1992年初，受俄罗斯政府邀请的外国专家共有200人之多。外国专家提出，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现象，是企业走向市场、吸引外资的最大障碍，今后，包括军工保密企业在内，私有化必须“公开化”“透明化”。

在外国专家的建议下，1992年11月，叶利钦总统签署命令，筹建“俄罗斯私有化中心”。随即，俄罗斯境内纷纷建立“私有化中心”。这是一种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机构，任务是搜集当地企业的信息，了解每个企业的状况和发展前景，为可能的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提供信息帮助。“俄罗斯私有化中心”的经费来自外国的资助，人员编制属俄罗斯“国资委”配备。一般每个地区的“私有化中心”有3—5人，工资以外汇支付，每月平均1000美元左右，这是俄罗斯社会平均工资的6—8倍。虽然“私有化中心”的人员不多，但是能量很大，活动范围西起波罗的海，东至太平洋，北自北冰洋沿岸，南及黑海海域，全俄罗斯境内类似的中心共有200多个。

私有化的信息搜集工作不能说不细。俄罗斯安全技术部门在检查中发现，“国资委”掌握了俄罗斯内务部、反间谍局、总参谋部等机构的秘密“据点”。这些“据点”多用民用房产作掩护，也属私有化之列。这让俄罗斯保密检查机构大为吃惊。

俄罗斯一些报刊透露，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邀请的国外“私有化顾问”中，有不少人与国外军方或情报机构有联系。在美国派遣的援俄“谋士”中，既有俄罗斯问题专家，也有美国军方甚至是中央情报局的谍报人员。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武官迈克·迪萨罗，对俄罗斯私有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迈克·迪萨罗在1989—1992年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期间，与时任俄罗斯政府私有化问题顾问的海伊关系密切，在海伊的协助下，他多次前往俄罗斯腹地，了解和搜集俄企业和经济私有化的进展情况。

除此之外，许多外国机构或组织也参与了俄罗斯私有化规范文件的研究和制定，其中包括：“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欧盟委员会”以及美国“摩根投资”等国际上众多的投资咨询公司。其中在“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的支持和参与下，俄罗斯出版了长达600多页的《私有化守则》。据俄罗斯报刊透露，这期间，俄罗斯有上百种政府决议和规定出自外国专家和机构之手。

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个主管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机构，掌握着比原克格勃还要多的经济机密，这里每天汇集着有关俄罗斯工业布局、企业经营、资产状况等数据资料。在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最清楚俄罗斯七十多年的“家底”。西方社会通过私有化这扇“窗口”得以透视俄罗斯，终于看到了剥去面纱之后的俄罗斯经济实力，或多或少触摸着俄罗斯的经济脉搏。

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1991年11月，盖达尔受命组阁。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最大的难题。鉴于此，盖达尔决定启用丘拜斯，让他出任主管

私有化的政府大员，并给予副总理的职位。在一个有着七十年计划经济历史的国度，进行国有企业改造，无疑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对于如何进行私有化，理论界、学术界意见不一。

以原苏联时期的政府副总理、主管经济改革的阿巴尔金院士为代表的老一代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国企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产权改革或履行“法律手续”。

盖达尔、丘拜斯属于俄罗斯经济学界的“新生代”，他们都曾是阿巴尔金、沙塔林院士的学生。这些“少壮派”经济学家强调，私有化是改造俄罗斯经济的有效“药方”，而私有化的要义就是一个“分”字。

1992年，“少壮派”经济学家进入俄罗斯政府，执掌了经济改革的大权。此后两年的时间里，分配国有财产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特别是数量方面，私有化的成果有目共睹：到1994年中期，60%的企业实现了私有化，4000万人成了股民，俄罗斯绝大部分地区都进行了私有化；截至1998年初，大约13万家原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企业，非国营经济成分在俄罗斯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超过70%。

为此，丘拜斯称他领导的“国资委”实现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完成了“一场不流血的财产大革命”。

然而按规定，除了负责国有财产的分配外，俄罗斯“国资委”还肩负着另外几项不容推卸的责任：国有财产的监督与管理、国有财产的保值与增值。几年的光景，私有化“青年近卫军”只顾得攻城拔寨，分割国有财产，却明显忽视了国有财产的管理问题。

1994年底，疾风暴雨式的私有化第一阶段告一段落，鉴于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叶利钦总统不得不免去丘拜斯兼任的“国资委”主席的职务。1994年11月14日，叶利钦责成总统下属的监察总局，对俄罗斯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检查。

1995年6月10日至10月16日，监察总局完成了对“国资委”机构内部工作的检查。与此同时，俄罗斯议会也组成了一个特别的调查委员会，检查了负责私有化的俄罗斯政府的三个重要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

来自总统机构和议会的两个调查小组，坐镇三个私有化主管部门，前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分别整理出近百页的调查报告。俄罗斯观察家指出，俄罗斯最高级权力机构的检查活动，并无意否定私有化，甚至出于政治力量的对比，并未出具任何政治结论，但调查中揭露出的问题几乎涉及了俄罗

斯私有化的方方面面。

在对俄罗斯“国资委”机关工作的检查中，两个调查小组发现，“国资委”领导放松了对国有财产的监督与管理，在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方面“严重失职”。“国资委”将工作重点放在“制定和发布私有化文件”上，而且制定的这类文件繁多，远远超过了议会和总统制定、发布的文件，有时甚至超出了自身的权限。

两个调查小组认为，俄罗斯私有化的主管部门经常“站错立场”，一些必要的、旨在维护国家或社会利益的法规，“国资委”故意拖延，迟迟不出台。

在国有企业转制的过程中，一些企业负责人缺乏约束，滥用职权严重。为了规范企业行为，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失，1994年2月，俄罗斯政府委托“国资委”制定《国有企业规范章程》，拟定约束企业负责人的《合约》，准备作为范本推广实行。然而，负责此项任务的“国资委”副主席莫斯特沃伊对此置若罔闻，一拖再拖，始终没有拿出任何东西。

在私有化过程中，俄罗斯大批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包括军工企业也变成了股份公司，国家在这类公司拥有股份，为保证国家的利益，通常会派驻国有股份“代表”代行股东的权力。1994年6月，叶利钦总统发布命令，要求政府研究、制定一份《股份公司国家代表合约》，俄罗斯政府将此任务交与“国资委”。然而，任凭总理大人先后8次催促，那位“国资委”副主席莫斯特沃伊根本不予理睬，最后不了了之。

调查小组指出，总统、总理的指令，“国资委”可以搁置一旁，对于自身的利益却十分关心。按规定，企业的拍卖所得10%—20%要归“国资委”或相关机构所有，引资性招标中，投资额的1%由“国资委”和负责拍卖的“国有资产基金会”提成，所以，私有化主管部门十分热衷企业拍卖，哪怕是低价出售。

1993年1月28日，俄罗斯“国资委”制定并颁布了一项决定。这份代号为151的文件规定，新的投资者对某一企业的投资，可以按资金额折换相应的股份。例如，某一俄罗斯新贵或国外富商，只要投资与企业原注册资本相当的数额，就可获得该企业50%的股权。由于俄罗斯通货膨胀严重，在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通胀率下，原企业注册资金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这样的规定，自然赢得了私有化企业买主的“欢心”。

俄罗斯议会和总统的调查小组还指出，在国有财产的清产核资方面，“国资委”的工作漏洞颇多。作为主管俄罗斯私有化的最高政府机构，“国资委”没有独立的、细致的统计体系，只能依靠统计部门的有关资料。这造成俄罗斯境内许多地区，缺乏翔实的国有企业的核查材料。

“国资委”既缺少国有财产被使用、出租、转让等方面的具体数据，又对商业性机构占用国有财产缺乏有效的监督。据初步估测，俄罗斯境外财产达60亿美元，多年来分属于外交部、外贸部、塔斯社等机构，但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缺少境外财产的完整账目和记录，故苏联解体后，对遗留在境外，包括在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大量资产，“国资委”都没能及时地处理和办理继承等相关法律手续。“国资委”既缺少对购买国有企业股票的登记，又缺少外国资本在二级证券市场上购买股票活动的资料。

企业国有财产的价值评估不规范、不及时，多数情况依据企业自己提供的数据，必然会导致国有财产被低估、少算。例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评估价格只相当于同类英国公司的3%，而俄罗斯通信企业每条电话线路的估价只相当于日本电信公司的2%。

“国资委”缺乏对大量的具体私有化案例的监控，通常只是对企业的私有化文件进行整理，将企业私有化文件按日期分类和归档。

在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机关内部，缺乏严密的安全保密制度和规章。外国顾问可以随时调取重要的经济情报或具体的企业经营材料。外国机构和组织无偿赠送的电脑、复印机等办公设备，未做任何技术处理，便直接安放在机关办公室、会议室。

俄罗斯“国资委”的会计统计制度混乱。总统和议会两个检查小组在核查时才发现，1992—1994年世界银行给予俄罗斯“国资委”的巨额专项贷款不知去向，甚至连银行收款票据都不翼而飞。实际上，在此期间，仅“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的援助就达14亿美元，据称专项用于帮助“俄罗斯私有化”，除此之外，还有四个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共计16亿美元。

在俄罗斯，国有房产的出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按规定，所有的公用办公用房的出租，皆由俄罗斯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监督和决定，租赁合同必须同“国资委”签订，租金上交国家财政。然而，1995年，在对俄罗斯政府“社会保障部”、“原子能部”和“外贸部”的检查中发现，上述三部委有70%以上的办公用房都已出租，而其中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签订的租赁合同只占10%，仅10个月，三个单位国有房产出租，就使国家财政少收入890亿卢布。

三、联邦财产基金会

根据《俄罗斯私有化法》的规定，“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是国有财产的国家代表，管理和汇集国有财产私有化后的所得款项。受“国资委”的委托，“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直接负责国有资产的拍卖和出售，然而，总统监察总局和议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表明，“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在工

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为了“赶进度”，增加“私有化收入”，该基金会往往抛售一些盈利的重点企业。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变卖“正生蛋的母鸡”。

俄罗斯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很年轻，他们接受西方货币主义理论，为了降低过高的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但由于生产萎缩，税收困难，严重影响了政府预算和国库收支，经济活动中相互拖欠严重，企业“三角债”盛行。为了避免重新开动国家印钞机器，年轻的改革派自告奋勇，宣布“私有化、出售企业，就可以大大增加财政收入”。这一度成为私有化领导人回击议会反对派的“一个理由”。

1994年后，特别是1995年，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企业拍卖活动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发现，被推向拍卖场的大多数是一些盈利的或有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利润丰厚的燃料能源、天然气、通信等部门的企业，屡屡被看中出售，交通、军工企业也不例外。然而由于企业拍卖价格过低，实际上是“得不偿失”。据俄权威人士披露，俄私有化进程杂乱无章，国有资产被廉价出售，原来国有的12.5万家企业仅以每家企业1300美元的平均价格被卖到私人手中。俄罗斯500家大型企业，出售总额为72亿美元，而专家和国家财团评估的市场价值为2000亿美元，[3]其中324家大型国有企业平均拍卖价格仅为400万美元。[4]资料显示，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占预算收入的0.13%—0.16%。[5]

1994年，在俄罗斯3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拍卖过程中，有23起拍卖活动只有一个竞争者。这不仅造成竞拍活动有欠公允，也严重违反私有化的有关法律规定。俄罗斯舆论指出，在一些“肥水”企业的拍卖过程中，总有几家私人银行或财团的身影。

“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主持进行了一些投资、引资性质的私有化拍卖。按规定，竞争者必须履行向企业投资的义务，然而，拍卖的锤子落下后，有些揭标方违背合约，拒不履行注资的义务。这涉及俄罗斯一些大型的有色金属或石油企业，使企业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仅在1995年，在“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主持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活动中，就发生了85起揭标或购买方违约的事件。其中，未按时提交注资文件的有41起，拖延注资的35起，注资不足的9起。除此之外，还发现大量的违规操作，权钱勾结等现象。

对参加企业私有化拍卖的公司，“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缺少对其资信情况的调查，经常发生银行内部互相提供担保。对于拍卖后的注资情况，“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只是简单地查看一下有关的票证，而对将来

的资金去向和使用情况漠不关心。

在私有化竞拍过程中，有的公司资金来源不明，不排除俄罗斯境内外黑社会势力“洗钱”的可能。外国公司也有意地避开俄罗斯法律，利用冒牌公司出现在私有化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并未吸引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生产性公司的参与。在私有化突飞猛进的1996年，全俄工业生产下降5%，全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8%。[6]在拍卖市场上经常出现的总是几家国籍不明的证券投资公司，它们或者注册在塞浦路斯的免税区，或者来自加勒比海小岛上的自由经济区。

私有化企业拍卖过程中，缺乏公开和透明度。拍卖信息和宣传落后，影响了有潜力的投资者的参与。

最令两个检查小组气愤的是，作为俄罗斯政府管理国有财产的机构，“俄罗斯联邦基金会”竟然被一家私人商业银行欺骗，损失总金额高达400多亿卢布。

1995年期间，“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选择了一家名为“莫斯科储蓄银行”的私人金融机构，委托它全权代理私有化企业拍卖的资金款项，并且在有关新闻媒体上广泛公布。

然而，事隔不久，莫斯科这家私人银行由于侵吞客户的290多亿卢布的资金，官司缠身。1995年9月6日，俄罗斯检察机关正式立案，对这家银行进行刑事侦查。直到此时，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的领导人才如梦初醒，急忙宣布中断与这家银行的联系，并要求银行在3天内归还“基金会”所存的巨款。然而，银行断然回绝，宣布已无任何履约能力。

由于“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的失误，不仅使俄罗斯政府损失了400多亿卢布的资金，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俄罗斯私有化的信誉，因为400多亿卢布中包括拍卖国有企业股票的收入，也包括竞拍失败方缴纳的保证金。

另外，调查中还发现，俄罗斯私有化的三个主管部门内部管理混乱，在人员任用上“任人唯亲”。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官员，大多来自圣彼得堡，也就是说，都是丘拜斯、科赫等人的同乡好友；“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的官员则多来自叶利钦的故乡——乌拉尔地区的叶卡捷林堡，甚至连来自该市的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还在莫斯科读大学一年级便被安排在机关工作，并委以重任。

四、联邦倒闭事务总局

“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在隶属关系上，属于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

员会。法律规定，“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应执行国家有关政策，防止企业的倒闭或破产，对困境中的企业给予帮助和整顿，使其健康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负责处理企业倒闭事务的这家专门机构，可以比喻为企业的“急救所”。

在1995年度国家预算中，俄罗斯政府为支持一些困难企业，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决定划出8000亿卢布，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拯救濒临倒闭的企业。然而，到年底，令财政部官员惊讶的是，此项资金分文未动，“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也未曾提出过支持困难企业的任何申请。与此同时，大批的国有企业虽然产品有销路，却缺少原料和资金，只好坐以待毙，眼巴巴地看着私有化官员将企业拍卖。俄罗斯报刊称，“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的行为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

1995年底，俄罗斯议会和总统监察总局的两个调查小组对“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的工作进行检查。结果发现，“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成立的这几年时间，正是俄罗斯私有化的顶峰时期，这一阶段也是俄罗斯社会生产下降幅度最大的时期。1994年，大中型企业生产下降了26%，许多企业处境艰难，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作为政府处理濒危企业事务的主管机构——“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对企业的危机却熟视无睹、漠不关心。8000亿卢布的政府专项资金不加利用，却忙于清查企业，频频地宣布一些企业“倒闭、破产”，原因何在？

原来俄罗斯“国资委”曾就濒于倒闭企业的出售发布政府文件，文件规定这类企业出售后所得的20%将留归“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因此，“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在决定企业命运的时刻，不是积极“拯救”，而是更乐意宣布企业“倒闭”，变卖了事。

实际上，“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变成了国有企业和买主之间的“掮客”。难怪俄罗斯许多企业十分惧怕“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将“破产局”视为“阎王殿”，把该局局长莫斯特沃伊（兼任“国资委”副主席，后因稿费丑闻被解职）称为“活阎王”。截至1995年底，几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先后有1000多家国有企业难逃厄运，被“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宣判“死刑”。

据称，俄罗斯“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宣布企业倒闭、破产时，有一些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依据“企业的支付能力”一项。正是在这条线下，许多支柱性部门的企业被划入“死亡名单”。1995年有27个产业部门，1035家个国有企业被宣布“倒闭”，其中属于俄罗斯农业部的企业有275家，燃料能源部186家，国防工业委员会261家，交通部121家，工业委员会100家，也就是说，76%以上的破产企业，隶属于五大战略性重要部门。

正当来自俄罗斯议会和总统办公机构的调查小组坐镇“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进行检查之时，又有41家俄罗斯企业被宣布“丧失支付能力”。这些企业中，包括一些大型航空企业，机械、仪表制造企业，以及军工企业。人们发现，这类生产性企业倒闭的原因，往往是完成了国家订货后，不能回收资金，军工产品也是如此。

本来按规定在企业面临困境时，“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应会同企业，派驻管理干部，进行紧急救援。俄罗斯政府为建立和培训类似的管理人员，专门拨出款项。这就像“急诊医生”，要求既有管理经验，又有专业知识和应变能力。然而有关资料显示，“联邦倒闭（破产）事务总局”在这方面的工作存在着“明显的不足”。125个曾经参与濒危企业救援工作的人员中，只有7人受过专门训练，并持有相应的资格证书，46人未能通过有关的考核，72人根本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

---

[1]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M]//詹姆斯，等。发展经济学的革命。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18.

[2]私有化券：一张黄色票证的20周年祭[N/OL].论据与事实，2012-8-22.http://www.argumenti.ru/toptheme/n353/197784.

[3]真理报，1995-1-25.

[4]私有化券：一张黄色票证的20周年祭[N/OL].论据与事实，2012-8-22.http://www.argumenti.ru/toptheme/n353/197784.

[5]真理报，1996-4-24.

[6]切尔尼科夫，等。谁主宰了俄罗斯[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1.

第九章　私有化后果

一、私有化引发的政治争斗与寡头统治

（一）叶利钦政权危机与炮打“白宫”

1991年“8·19”事件以后，民主派掌权不久，分裂的矛头便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严重受挫，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进一步激发了上层的权力之争。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权力体制，走什么样的经济变革之路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经济危机、政权危机、宪法危机交织在一起，政治大决战不可避免。

俄罗斯政权内部对立的双方，一方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掌权一派，另一方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为代表的议会反对派。另外，还有与俄罗斯当局对立的左派俄罗斯共产党人以及民族主义势力。随着矛盾的进一步升级，议会反对派与俄罗斯当权派的矛盾难以调和，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最终导致兵戎相见。1993年9月21日晚，叶利钦总统决定彻底摊牌，他通过电视，向全俄罗斯宣布了第1400号总统令，决定中止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最高苏维埃的各项职能。这一做法犹如一颗原子弹爆炸，在俄罗斯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议会反对派坚决予以回击，反对解散议会。于是叶利钦下令，强行围困并攻打议会所在地“白宫”。1993年10月初，莫斯科街头重兵云集，坦克轰鸣，议会大楼浓烟滚滚，结果是当权派一方获得胜利。距1991年“8·19”事件仅两年的时间，坦克履带已经两次碾过“民主”莫斯科的街道，俄罗斯百姓开始迷惑。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1991年的炮声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而1993年的炮声则给自由民主派写下了血的注脚。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说：“1993年，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始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时候，（总统）却向那些提要求的人开炮。自己的最高苏维埃刚表示出不同的意见，就把他们轰了。”民选总统用坦克和大炮攻击了议会大厦，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道”“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美好的辞藻和良好的愿望被隆隆炮声击得粉碎。

（二）政府被金融工业集团绑架

俄罗斯政坛背后多了一双挥之不去的黑手——实力雄厚的俄罗斯金融工业

集团。以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为后盾，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极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政府政策。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轻易地操纵了政府机构。连叶利钦本人也说，“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金融巨头们试图操纵国事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银行家们将莫斯科的官员、市政府玩弄于股掌之间；其他银行家做地方官员的工作；还有一些银行家，例如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投入所有资金创建强大的电视集团公司、印刷控股公司来垄断大众传媒”。[1]

俄罗斯七大寡头之一，号称“克里姆林宫教父”的别列佐夫斯基说：“如果没有政治支持，我们就无法保护我们的资产。俄罗斯最富的一帮人都知道，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为俄罗斯的未来负起责任。我们明白，叶利钦周围的改革者们无法阻碍共产主义的脚步，因此我们需要聚集起来共同合作，希望最终获得政权。”更多的时候，这些寡头们在幕后操纵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就连曾任俄罗斯副总理的盖达尔也无可奈何地说：“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

私人寡头绑架政府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它不仅使俄罗斯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而且使国家权力被操纵，权钱交易盛行，腐败丛生。

二、私有化的社会经济后果

私有化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极其惨重的后果。1990—1995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幅度达38%，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生产下降了50%，涉及95%的商品门类。其中：

机械制造业下滑65%—80%；

高新技术产品下降90%；

日用消费品下降55%；

70%的食品需要进口；

农业、机械、仪表、电子、道路建设等部门或行业几乎全军覆没。

国际上，曾一度热衷于对中俄两国不同的改革道路和社会结果进行比较和评论。在此问题上，俄罗斯社会内部更是莫衷一是，中俄改革比较成为报刊文章、大学讲台，甚至议会论坛的热门话题。1996年4月18日，《真理

报》发表了驻北京记者克鲁申斯基搜集的一组数字（见表9-1）。

表9-1　中俄社会经济变化对比

	中国		俄罗斯	
主要产品及产量	1990 年	1995 年	1990 年	1995 年
发电量（亿千瓦）	620	10 000	10 820	8 620
钢（百万吨）	63.5	94.0	89.6	51.3
化纤（百万吨）	1.6	2.9	0.6	0.2
化肥（百万吨）	18.7	24.5	16.0	7.5
拖拉机（万台）	3.9	6.3	21.4	2.1
电视（百万台）	26.8	34.7	4.7	0.98
洗衣机（百万台）	6.6	9.4	5.4	1.3
布（亿米）	188	210	84	17
谷物（百万吨）	88.8	417.0	107.8	63.5
肉类（百万吨）	25.1	42.0	6.6	2.3

俄罗斯居民普遍认为，“休克疗法”的社会效果不佳，主要表现为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分化、治安状况恶化等几个方面。同时，持续几年的经济危机也对俄罗斯社会的人口、健康以及就业形势等产生了严重影响。

1.人口减少、寿命降低。1992年，俄罗斯社会的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这是自1942年“二战”以来，俄罗斯人口生产首次出现负增长，特别是人口自然减少的幅度增大。由于民族冲突不断，战争使冲突地区的居民颠沛流离，纷纷举家迁移至辽阔的俄罗斯内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口减少的缺额，但俄罗斯社会上下对未来的人口形势表示忧虑。如今，受生活所迫，俄罗斯许多年轻家庭放弃了生孩子的打算，人口增长急剧下降。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俄罗斯人口恢复增长，要经过15—20年的时间。否则，俄罗斯人口将锐减，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恶化。1995年，俄罗斯男性居民的平均寿命约57岁，而女性则为71岁。

2.居民健康状况恶化。俄罗斯物价放开后，药品、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最大。过去，苏联实行的是免费医疗制度，甚至病人住院期间的饭费也由国家支付。现在，俄罗斯广泛推行有偿医疗，实行强制医疗保险制度。有关资料显示，许多退休的老人大部分的积蓄和退休金都用在求医买药上。社会中酗酒、吸毒的人数增加，每年因酒精中毒而死的人数约为4万。因为生活的压力，精神和心理疾病发病率显著提高，自杀比例上升，1995年自杀人数超过6万。

3.失业严重。一方面经济改革大大增加了俄罗斯人自由择业的机会，人员流动、职业变更次数增多；另一方面，在生产萎缩、经济下降的条件下，社会失业、半失业情况严重。1994年正值私有化的高潮时期，俄罗斯的失业率一度达到10.4%，而非官方估计的数字为13%左右，失业人口超过880万。职工待业期连续拉长，1992—1994年3年的时间里，待业期分别为4.5个月、4.7个月和5.2个月。在失业的人群中，妇女的失业比例高于男性，占65%—70%。16—29岁的青年人口流动频繁。在地区分布上，大都市就业机会多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在边远民族地区和产业单一的地区，大多数企业不得不停产关门，职工下岗失业现象严重。私有化导致的大量失业现象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首先，失业造成了贫困阶层人口增加。其次，失业大军的存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俄罗斯一些煤矿工人不断罢工、抗议。失业人口，特别是青年人往往成为黑社会势力招募的对象。为生活所迫，俄罗斯不少体育明星、退役军人和警察也流入犯罪集团的队伍。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社会的危险因素。最后，居民广泛从事第二职业，地下经济盛行，灰色收入的比重上升。日益蔓延的“地下经济行为”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道风景线。

4.生活消费水平倒退20年。俄罗斯科学院居民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休克疗法”严重影响了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社会为激进的变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1992年，也就是“休克疗法”实行的第一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56%，国民收入下降到1976年的水平，居民的消费水平倒退了二十多年，降至60年代的水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居民的存款大幅度贬值。1990—1991年，俄罗斯居民的储蓄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56%以上。1992年，居民储蓄贬值，原来俄罗斯人手中的1卢布到年底贬值为0.04卢布，也就是4戈比。政府的失策，使居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俄罗斯专家估计，老百姓存款贬值所受到的损失要超过5000亿卢布，涉及200多万个储户。

2.居民的大部分收入用于糊口，食品消费比重增大。联合国粮农组织使用恩格尔系数，通过统计食品在居民全部消费中所占比重来衡量居民的生活

水平。一般说来，食物支出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越小，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相对富裕；30%以下富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食品消费的比重一般不超过20%。在1990年以前，俄罗斯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30%，而1995年为53%，一些贫困家庭的食品支出比重更高，达80%—90%。

3.居民的膳食结构中，高蛋白的食品消费量减少，而淀粉类食物的摄入量增加。“休克疗法”后，在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肉、奶、蛋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品消费量减少，而面包、土豆等淀粉类食物消费量增多。俄罗斯居民人均肉和肉制品的消费量从1991年的66公斤减少到1996年的51公斤；奶和奶制品从1991年的349公斤下降到1996年的247公斤；鸡蛋从1991年的229个下降到1996年的196个；鱼类消费从1991年的14公斤下降到1996年的9公斤；土豆则从1991年的98公斤上升到1996年的114公斤。

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增加且占总人口的比重高。1992年，俄罗斯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11倍，但消费品价格上涨了25倍，而且由于工资拖欠现象十分严重，有相当多的职工长期领不到工资，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比年初下降了55%。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使居民实际收入总体下降了约43%，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60%，退休金下降了45%。截至1999年底，全俄罗斯有1/3的人口（约5000万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37美元/月的贫困线以下，失业人数达870万。[2]

三、私有化冲击社会安全底线

俄罗斯学者认为，改革不同于革命。为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计手段；而改革则不同，改革既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就应计算改革的代价。苏联末期，经济改革浅尝辄止，政治改革却狂飙突进，最终冲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几年后，在私有化运动高歌猛进之时，俄罗斯社会又跌入灾难性的危机之中。表9-2是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发布的俄罗斯社会危机指标监测数据。

表9-2　俄罗斯社会处于危机的临界点（1995年）

	指标名称	国际警戒线	俄罗斯社会指标	将要导致的社会政治经济后果
1	工业生产下降程度	30%—40%	51%	非工业化，经济实力下降
2	进口食品比例	30%	40%	食品短缺，对外产生战略依赖
3	加工品出口比重	30%	12%	原料输出型
4	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	10%—15%	1%	科技研发落后，竞争力下降
5	地下经济成分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	20%	50%	偷税、漏税严重，经济统计信息扭曲，收入差距加大
6	科技投入占 GDP 的比重	2%	0.5%	科技智力潜力降低
			社会领域	
7	10% 的最富阶层与 10% 的最贫困阶层收入差距	10:1	14:1	社会结构分化，社会产生阶层对抗
8	贫困线以下居民比重	10%	25%—40%	大多数社会居民转向贫困化、无产化
9	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对比	1:3	1:10	劳动力非专业化
10	失业率	8%—10%	13%（含隐性失业）	社会问题尖锐，社会保障困难
			人口方面	
11	育龄妇女生育系数	2.14—2.15	1.39	人口换代困难
12	预期寿命	75—79	64 岁，其中：57 岁（男）；71 岁（女）	健康水平下降
13	出生率与死亡率	1:1	1:1.63	人口总量减少

续表

	环境状况			
	指标名称	国际警戒线	俄罗斯社会指标	将要导致的社会政治经济后果
14	GDP 中环保支出	5%	2%	环境恶化
15	环境损耗占GDP 的比重	5%	10%—20%	
	社会异端行为			
16	每 10 万人口中犯罪率	500—6 000 起	6 000—6 500 起（含隐性犯罪）	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17	酒精消费	8 升纯酒精 / 每人 · 每年	14—18 升	居民健康体质恶化
18	每 10 万人口中精神病发病率	284（1992 年）	280	居民心理压力增大
	政治领域			
19	坚持要求改变现制度的人口比例	40%	43%	政权合法性丧失
20	对中央政权的信任率	20%—25%	10%	失望情绪，权力异化

四、俄罗斯人如何评价私有化

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经济改革究竟给俄罗斯人带来了什么？俄罗斯人民如何看待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显示，在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人民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俄罗斯人要求改革；另一方面，却不能接受改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俄罗斯人民怀恋旧制度下的无忧无虑，又不希望共产党重新执政。老百姓厌烦了无法无天、治安混乱以及虚假的民主形式，但又不愿见到旧体制回头。

从以下表格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几年来的改革并不满意。老百姓对叶利钦推行的改革的评判，主要出自于切身的生活感受。现实生活中失望多于希望，这种态度可以在俄罗斯民众看待政治制度、经济私有化等重大问题的态度上体现出来。（见表9-3、表9-4、表9-5）

表9-3　俄罗斯居民对改革的态度（1995-1997年三次调查结果）

答案选择（占被调查人数的%）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基本肯定（%）	11	10	9
基本否定（%）	51	58	54
没有任何变化（%）	15	12	15
难以回答（%）	23	20	22

资料来源：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

表9-4　俄罗斯居民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态度[3]

问题和答案	1994	1995	1996年初
对现行制度完全满意（%）	3	3	2
有缺点，但可以改革（%）	45	25	37
必须根本改变现制度（%）	43	43	40
难以回答（%）	9	29	21

资料来源：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

表9-5　俄罗斯社会对私有化的态度（%）

问题和答案	占被调查人数的比例
认为私有化应进行下去	3
私有化有必要，但方式要变	34
私有化应停止推进	35
难以或没有回答	28

资料来源：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

如今，许多俄罗斯人称20世纪90年代为充满苦难的“疯狂年代”，就连著名

的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人物俄联邦原政府总理米·米·卡西亚诺夫也不得不承认："90年代确实是一个很难的时期，俄罗斯民众承受了这场苦难。这场苦难把居民的收入和存款突然化为零……使居民的收入、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6岁。此时的民意调查表明，从尼古拉二世以来20世纪俄罗斯所有领导人当中，对叶利钦的评价最差，甚至比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还差，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只有1%。[4]

五、官方对私有化的评估与结论

第二任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伏·波列瓦诺夫在1995年初向政府提交的私有化阶段性总结报告，在社会上引起震动。该报告称，俄罗斯私有化在其实施的过程中"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方法和手段也过于简单，在规定的私有化七个目标中，除第七项目标基本实现、第一项部分实现以外，其余五项均未完成。

（一）私有化没有增加财政预算收入

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预算资金收入也微乎其微。

在1992—1994年的两年时间里，俄罗斯共计有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5]占四年间私有化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在这期间，私有化提供的各级财政预算收入为1万亿卢布左右，仅为匈牙利的一半。另一个东欧国家——捷克，通过"小私有化"获得的收入为12亿美元。捷克25000个小企业的平均售价为48000美元，而俄罗斯小企业私有化的平均收入不足25000美元。

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第292号令中提出，私有化及联邦政府移交地方股权应得的预算收入为11.4万亿卢布，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仅完成了1/10多一点，即1.374万亿卢布，这是俄罗斯私有化领导班子在1996年总结报告中承认的数字。[6]可面对社会各方的指责，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领导班子此时却坚决反对"将私有化作为增加财政预算收入的手段"。[7]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占预算收入的0.13%—0.16%。

（二）私有化没有提高经济效益

私有化后的企业与原国有时的经营状况相差无几，经济效益差别不甚明显。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经营管理、劳动态度等方面，反倒是一些新成立的私营企业大大区别于私有化的企业和国有企业。

俄罗斯学者认为，仅仅改变所有制的形式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益的提高，将“无主的公有”变为“少数人私有”只是为增加效益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加强市场调研、更新设备、改善工艺等都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在一次对私有化的专门调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罗斯中央一级所属的1666家机器制造企业中有1389家被股份化，占83.4%。在这期间，1992年生产下降幅度为11.5%，1993年为14.9%，1994年竟达到43.9%。

（三）私有化并没完成反垄断和增强竞争力的任务

事实上，由于近几年来国外产品特别是西方舶来品的冲击，俄罗斯企业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场：机械产品生产连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达45%，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

在反垄断方面，一些有利可图的石油工业、航空运输和原料部门分离出不少公司，例如原来统一的“苏联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门仍被特大型金融工业集团控制。“反垄断”的旗号被用来当作利益均沾、你争我夺的掩护。由于某些反垄断措施“操之过急”，结果破坏了原来固有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对农工综合体、森林工业和冶金工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私有化并没能有效地吸引外资

在吸引外资方面，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显。1994年正值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1994年前9个月的外国投资仅为7.68亿美元，而1993年为29.2亿美元。但是不少外资，特别是金融“游资”投放到证券市场，投机意味大于投资。多数外国投资集中于原料采掘部门。几年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国外投资成倍增长，而机器制造、建筑业的外资增长却大幅度回落。

（五）私有化并没能造就大批中产者

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1993年4月，俄罗斯居民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证券私有化”能使自己变为所有者，到

1993年底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却降至9.6%。与此同时，俄罗斯64%的居民认为私有化只不过是“政治手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而取得红利的人数也微乎其微。

1994年，只有4%—5%的股民获得“分红”，[8]实际上由于企业大部分停工或开工不足，“股东”已名不副实。俄罗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公式为：一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两年后变为：一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0000卢布＝7美元＝1千克香肠。在社会心理方面，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分得的不是国有财产，而是微不足道的“补助”，或是一张“彩票”。俄罗斯学者指出，这种“平均分配”国家资产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经济上也是徒劳无益的，大多数居民没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或所有者”。随着“大众私有化”阶段的结束，“货币私有化”的开始，俄罗斯一些“油水”企业纷纷拍卖、招标，绝大部分居民更是与之无缘，只能做“看客”。

俄罗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会政治目的是剥夺官僚机构手中的“国家财产支配权”，造就新的所有者阶层。而私有化的结果，却是旧官僚、“影子经济”等成为真正的赢家。

俄罗斯学者指出，权贵的私有化进程早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期就开始了。随着经济管理权的下放，一些经济管理机构或企业领导人截留权力，积极投身于“影子经济”，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帮”就是此时形成的。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展开，官员们已不满足分享经济权力，捞取一时的经济好处。于是分割国有资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成了俄罗斯未来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标，例如，一些部委改为康采恩或集团公司，各种利用国家资本出现的私人银行，大批由国有供销机构改造而来的商品交易所等。俄罗斯报刊称之为“隐形私有化”，其结果是“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形成了俄罗斯商界精英中的“红色资本家”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红色资本家”，还是暴发的“新俄罗斯人”，虽然他们手中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因为这些并非他们经营或劳动的积累，所以他们并不珍惜。他们既缺少市场知识，又没有现代管理经验，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叶利钦总统承认，私有化造就了一批“所有者”，却未出现“管理者”。此外，俄罗斯社会所期望的动力阶层——“中产阶级”也尚未形成。官僚资本、新兴的垄断、官员的腐败、沉重的税赋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敲诈都严重阻碍着中小企业、私人经济的顺利发展。

（六）私有化给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俄罗斯有关部门认为，私有化纲领没有顾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保密，过急的实施办法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局势紧张，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会安全。

损害经济安全。大量材料显示，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无法统计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削弱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1992年，私有化运动开始之时，俄罗斯全社会70年积累的国有资产总量（不含居民住房）估价为1.5万亿卢布，这个数字是按1991年物价改革前的价格统计的，到1992年发放私有化证券时价格上涨已达20倍，然而相应的资产重估却未进行。这样一来，一些证券投资公司大量低价收购私有化证券，结果是国有资产几乎被无偿地变卖。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10亿美元，一家私人财团购得价格仅为400万美元，后因经营不利、负债累累，莫斯科又重新将之收归国有。莫斯科市化工进修学院的房产及设施价值约1亿美元，被某公司仅以800万卢布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被贱卖的事例很多，俄罗斯报刊对此经常披露。除有形资产外，私有化过程中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流失更是难以统计。

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报告指出，私有化不但没能使转轨政府的财政预算增加，反而使国家失去了对一些大型企业，甚至工业部门的控制。俄罗斯私有化的实践表明，私有化步伐快的领域，往往是利润丰厚、前景诱人的部门。俄罗斯境内外的灰色经济势力的目标从港口指向陆地，从地下指向天上，石油、有色金属等原料部门，航空和军工企业都成为各种资本势力争夺的对象。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损害国防安全。在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企业一般不纳入私有化的范围，重要军工企业私有化的名单由政府和议会审查决定。但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外国商人或通过俄方公司购买军工企业的股票，或采取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窃取尖端技术，达到进入或控制这些企业的目的。类似的事件已发生多起，特别是涉及航空航天、导弹制造等军工企业。

威胁社会安全。疾风暴雨式的变革使俄罗斯老百姓措手不及，不同地位、不同起点的社会居民参与变革的程度各异，受益不均。大多数俄罗斯老百姓生活江河日下，但俄罗斯社会少数人却在经济变革的浪潮中“暴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最高阶层平均收入是最低阶层平均收入的14—15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扩大为27:1。俄罗斯学者认为，私有化的推行，使得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仅表现在工资收入

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占有财富和资产的多寡上。1992年以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暴富群体”，与社会大多数居民的贫困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随着资本收益几何级数的增长，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分化将更为严重，势必激起社会大多数的不满情绪，导致社会的紧张状态。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接近社会冲突的临界点。[9]

与西方社会不同，俄罗斯社会缺少稳定的“中间阶层”。西方的社会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而俄罗斯却为“金字塔”状。据西方报刊描述，莫斯科市每年进口的“奔驰”超豪华轿车，比德国售出的总数还多。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西式漂亮的洋房、别墅随处可见。法国南部的疗养胜地，以前本是欧洲富贾和阿拉伯石油大亨喜爱的场所，现如今，俄罗斯新贵携大把的美钞现金纷纷涌入。

（七）私有化导致犯罪猖獗

近几年，俄罗斯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经济领域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犯罪案件激增。

仅1996年就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记在案，而自私有化运动开展以来，共发案30000余起。1997年初，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将题为《俄罗斯联邦反经济犯罪和贪污的情况与措施的报告》提呈叶利钦总统，报告中援引俄罗斯科学院分析中心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罗斯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

私有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犯罪活动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欺诈行为等。更为严重的是私有化的主管部门——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丑闻”不断，仅1996年就有152位该部门官员，6000名负责拍卖、招标的人员被检察机关起诉。特别是1997年夏天揭露出的涉及俄罗斯几任私有化领导班子的“9万美元稿费丑闻”，导致了副总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等7位“私有化高官”的解职。稿费丑闻同俄罗斯私有化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拍卖——“电信投资”有直接的关系。俄罗斯舆论称，稿费丑闻可作为窥视私有化的“一面镜子”。

之后，随着像石油、军工等一些“肥缺”企业被拍卖，巨型金融工业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战更为激烈。私有化成为俄罗斯传统垄断部门和新兴的金融财团争夺利益的“舞台”。西方学者指出，权力和金钱绞在一起，使俄罗斯私有化进程步入迷途。

（八）俄罗斯官方披露的私有化后果的有关情况

1.总检察长写给总理的信。

就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暴露的众多问题和一些犯罪事实，俄罗斯联邦代理总检察长伊留申科写了一封给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的信。以下是该信的片段：

检察机关对一些科技生产联合会、设计局、科学研究院和俄罗斯联邦军工委员会的企业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国家资产流失严重。检察人员发现了大量国家资产被非法私有化的情况。一些企业的下属部门擅自独立，并实行股份化；一些企业财产被非法划归商业机构；有人滥用职权，随意支配企业的资产和周转资金。

如一家名为“星辰”的国有企业，总经理非法从本厂拨出几百万卢布，作为儿子和妻子所属私人公司的注册资本，并私自将该厂一部分厂房出租，获取非法收益而不纳税。莫斯科半导体技术研究所的领导，非法将130万卢布投入到“卫星轨道”商业银行；将30万卢布投入到“联合电业”股份公司；将5万卢布投入到“特维尔通业银行”；私自将500万卢布投入到另一家商业银行，还有900万卢布被非法挪用。

检查结果有待进一步总结。但很明显，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存在严重的失误。它没有消除国家资产的挥霍浪费现象，没有对企业获取和运用贷款情况进行监控。许多商业银行不顾《俄罗斯联邦抵押法》的规定，没有征得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同意，将一些军工企业的资产作为抵押，私自为一些企业贷款。

检察机关的材料表明，有些企业和人员，故意混淆国有资产和个人所有制形式。一些企业为获取眼前利益，将国有资产转到私人手里。

2.原“克格勃”搜集的情报：私有化危害国家安全。

①圣彼得堡“电力”股份公司19%的股份被一家英国公司购走。“西门子”公司也想购买该公司20%—25%的股份。他们此举的目的，是要把“电力”股份公司的产品挤出市场，并利用该公司进行劳动密集型、简单、低报酬的生产，而主要产品的核心仍在西方公司生产，用“西门子”商标。

②西欧、美国一些公司的专家认为，外国对俄罗斯投资中，大部分属于短期证券投资，而且带有很大的投机性。俄罗斯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不仅十分低廉，而且它们的开盘价可能会快速升值，所以很多西方公司乘机大赚一笔。（俄罗斯联邦反间谍总署第一副署长，1994年11月29日，卷宗152/4745号）

③在远东滨海地区，由于政策失误和官员们的营私舞弊，私有化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腐败分子和刑事犯罪集团控制了改革进程。（俄罗斯联邦反间谍总署署长斯捷巴申的密信，1994年6月24日，代号1629—CH）

④在私有化进程中，西方获取了俄罗斯大量的新技术，北约为整理和研究这些先进技术出台了一个专门项目《东欧集团国家与全球网络及信息技术兼容性》。该项目负责人邀请俄罗斯专家，按欧洲标准把从俄罗斯获得的技术进行分类，并对它们的应用提出建议。（选自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巴申的报告：《西方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的政策走向，1994年8月26日》）

⑤美国公司——“新世纪投资控股”公司假冒其他公司购买了俄罗斯一些有发展潜力的电力企业的股票，该公司想借此来把俄罗斯许多地区的电力网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

⑥外国公司共控制了全俄大型股份公司——“统一电力”17%的股份。

⑦美国投资公司“CS First Boston”打着股份公司的旗号，购买了俄罗斯军工厂的10%的股份。该厂87%军工产品提供给俄罗斯总参谋部和俄罗斯联邦反间谍总局。该厂章程规定，只要控股10%，就可以选派一名代表进入该厂厂长委员会参与领导工作。

⑧世界驰名的集团“西门子”公司收购了俄罗斯军工企业——“卡卢加”涡轮机厂20.8%股份。该厂专门为俄罗斯核潜艇研制生产涡轮机设备。

⑨莫斯科电机厂和“石墨”研究所生产军用火箭所需的原材料石墨。

而现在该厂30%的股份属于俄罗斯的一家招牌为“格拉尼克斯”公司。实际上“格拉尼克斯”公司的资金属于同美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的美国人海伊。现在，该工厂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不再接受俄罗斯军事航天部门的订货，只按美国的工艺，为其生产、制造零配件。

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有关私有化问题听证会公布的材料，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其中经济损失5500万亿卢布，社会损失4000万亿卢布，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还有专家估计，由于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国家损失至少高达1万亿美元。

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私有化结果和其他改革措施一样，都未达到预期目的。私有化本应防止国家资产的控制权落入官员们手中，但事实上，私有化后许多官员却合法地掌握了这些资产。私有化只不过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私有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

了法律手续。就连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叶·盖达尔也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10]

一些俄罗斯专家提出，私有化是俄罗斯新政权最彻底的一次改革，非常符合国家垄断或权贵垄断演变的潮流。私有化并未造就广泛的私有者阶层，而是形成了一小撮国家资产继承者，私有化不但没有克服反而强化了经济的垄断。国家反垄断政策根本没有奏效。一些“横空出世”的私人金融工业集团比原国家性质的集团更缺乏责任感、更具威胁性。

2004年，俄罗斯联邦审计署对1993—2003年私有化进行专门审计，内容主要涉及私有化的法律基础、执法机关在私有化中的作用、私有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其结论是：私有化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改革之一，俄罗斯通过私有化在最短的时间内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并在社会冲突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产权再分配。但私有化结果却与其战略目标相去甚远：未能形成广泛有效的私人所有者阶层，未能带来企业效益的提高，所吸引的投资对于企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和社会发展远远不够，在一系列行业里没能保持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该报告还指出，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着法律不健全、执法机构违规越权、贱卖国有资产、对私有化交易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管、政府机构存在大量腐败等问题。

六、私有化的社会遗害

俄罗斯当局本想通过私有化建立稳定的“公民社会”基础，但事与愿违。经过几年轰轰烈烈的私有化，社会上充斥着犯罪和权钱交易现象，结果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两极分化严重。作为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财产争夺战，俄罗斯私有化触及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改变了社会的利益格局，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成为经济主管官员、新旧企业主、外资、私有化主管部门、普通职工之间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在许多俄罗斯居民看来，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犹如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一样，又是“一场改革闹剧”。自由派许诺的“公平分配社会财产”的迷雾渐渐散去，俄罗斯老百姓发现，身边的少数人一夜之间暴富。而在这场以“私有化证券”为赌注的赌局中，大多数百姓是输家，真正的赢家是原厂长经理阶层，还有一些暴发的地下经济势力。俄罗斯私有化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每项私有化纲领的出台都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论的焦点。私有化不仅引起左翼反对派的抗议，而且导致当权的自由派内部的分裂。当然，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最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催生了少数私人财阀，豢养了一小撮金融寡头，这也是激进的经济私有化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政治遗产。

“财阀控制经济、寡头要挟政治。”1996年，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少数寡

头出资赞助叶利钦成功连任总统之后，这些寡头变本加厉，向当局要求经济回报，甚至进行政治要挟。少数财团乘机控制新闻媒体，借机操纵政治，分享权力，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怪胎”。[11]

俄罗斯私有化暴露出的问题，特别是少数财阀、寡头的所作所为，不仅激怒了俄罗斯百姓，而且也为西方社会学术界所不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哈佛大学俄罗斯经济问题教授马歇尔·格德曼等多次对俄罗斯的改革模式以及私有化运动提出批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对俄罗斯私有化提出批评。索罗斯把俄罗斯经济制度定义为“掠夺式资本主义”“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索罗斯几次在公开的场合面对俄罗斯新生寡头，咒骂他们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盗窃”。他说：“我认为，俄罗斯已从苏维埃制度的一个极端走向了一种恣意妄为的、更近于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这位美国金融大亨对“俄罗斯寡头这种粗暴野蛮和凶恶贪婪的行为”感到震惊，索罗斯写道：“国家瓦解了，而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偷窃国家的财产。”索罗斯认为，丘拜斯推动的私有化是为了将“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变成合法的资本主义”。[12]

1999年8月26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至理名言，也许对真正的老百姓却是灾难》的文章，其中援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调查报告，称“私有化使得1亿多人陷入赤贫，数百万人失去社会保障”。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私人财团“爆炸式”的膨胀，约5%的少数人在短时间内聚敛了无数的财产之后暴富。

俄罗斯私有化的失败是必然的，其社会后果十分严重。一方面私有化打着“全民私有化”的旗号，实际上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根本没有明白、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参与到经济私有化的过程，“全民私有化”只不过是当局打出的欺骗性的口号。叶利钦提出的通过私有化在俄罗斯“建立广大私有者阶层”的计划也流产夭折。另一方面，通过急速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私人财团“爆炸式”的膨胀却成为现实。短短的几年时间，有不到5%的俄罗斯人乘私有化之机，聚敛了无数的财产，短时间内暴富，数量更少的一小撮人成为私人财阀。在叶利钦掌权的后期，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七大财阀大肆干预政治，独揽权力，演变成横行一时的俄罗斯寡头。

2007年，在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俄罗斯自由派政治势力在西方的支持下，企图利用总统大选时机对普京展开政治反扑。鉴于此，普京对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操作者和获利者大加鞭挞。在2007年1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普京指出：

在当今俄罗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国稳定地向前发展的。也有一些人，他们狡猾地利用假民主和华丽辞藻，想让我们返回到不久前的过去：有些

人想能像过去那样不受惩罚地窃取国家的公共财富、掠夺人民和国家，还有些则想使我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失去独立性。

2010年12月16日，在评价西方支持的俄罗斯自由派人物时，普京一针见血地说道：

这些人想要的只是金钱和权力。90年代，他们与别列佐夫斯基以及那些当下正被关在牢里的人一起窃取了数十亿的资产。现在他们被从能捞到油水的地方赶走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自然想回来填满自己的口袋。可是，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干，几十亿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会将整个俄罗斯都卖光。

---

[1]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M].曹缦西，张俊翔，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1：105、109.

[2]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N].独立报，1999-12-30.

[3]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俄罗斯寻求战略：社会与政权[M].莫斯科：研究所内部研究报告，2000：248.

[4]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N].报刊文摘，2008-11-3(A02).

[5]阿·科赫，等。私有化（1996）：结果与结论[J].社会与经济，1997(1—2).

[6]同上。

[7]同上。

[8]证券私有化的结果，居民的评价及意见[J].经济与社会变动：公众舆论显示器，1994(4).

[9]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俄罗斯社会及其社会政治形势：分析与预测[M].莫斯科：研究所内部研究报告，1995：81—83.

[10]叶·盖达尔。国家与变革[M].莫斯科：欧亚出版社，1995：103.

[11]俄“中心电视台”总裁奥·波普佐夫答《共同报》记者问[EB/OL].http://www/nns/ru/chronicle/center/03/08/2001.

[12]［俄］实业界，1997-6-25.

第十章　俄罗斯经济之困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私有化成为俄罗斯经济改革内容的“重中之重”。然而私有化没有像叶利钦所讲的那样，成为俄罗斯人通往自由经济的通行证。只有5%的极少数富人赶上了市场经济的列车。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2.5%的巨富阶层控制着70%的俄罗斯资产。俄罗斯财富两极分化的程度与非洲的肯尼亚、布隆迪、塞内加尔等国家相似，10%的最富阶层拥有全社会33.5%的财富。200位最富有的俄罗斯人掌握的财富总额高达12.5万亿卢布，这超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1]

经历了戈尔巴乔夫6年的“改革”和叶利钦近9年的自由化经济改革，俄罗斯学者这样描述俄罗斯资本主义社会：“历时八年草率的资本主义改革将经济彻底搞垮了，俄罗斯经济跌入崩溃的边缘，俄罗斯在世界国民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及2%，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1%，国际地位降低。在社会经济领域，居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民不聊生。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几年间，俄罗斯工业产值减少了70%，农业下降了50%。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左右。”[2]1999年12月31日，刚刚代理俄罗斯总统职务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的演说中指出：“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3]

一、普京打击财阀寡头、掌控经济

痛定思痛，在2000—2008年的两个总统任期中，普京决意与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做法分道扬镳。普京着力恢复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掌控力，巩固执政的经济基础，增强俄罗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治治理和经济整顿的举措。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俄罗斯社会反对私有化的声音越来越强烈。1999年11月，俄罗斯“罗米尔”社会舆论调查机构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65%的被调查者同意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18%的人表示反对，17%的被调查者没有回答。1998年，曾任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多次表示，如果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经济犯罪、私有化造成停产、分光资源等现象，就应当审议私有化结果，甚至考虑重新国有化。普里马科夫甚至宣布，已经为那些在私有化中巧取豪夺的寡头们准备好了“监狱号子”。

在社会各派对私有化议论纷纷的情况下，私有化问题也成为1999年普京出任总理后政策走向的一块“试金石”。面对错综复杂的私有化难题，上台之

初的普京出言谨慎。他一方面认为“前些年的私有化出现了许多问题，犯了一些错误”，另一方面又强调“今天根本谈不到也不应该谈重新分配俄罗斯财产问题。如果我们允许重新分配财产，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损失比过去搞私有化时还大”，[4]如果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律”的事实，那么检察机关应当予以追究。

2000年，普京正式当选俄罗斯总统。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几次提及“寡头参政、操纵舆论、瓜分财富”等情况。普京强调，国家权力不应被少数寡头收买或私有化。之后，普京巧妙利用机会和矛盾，“稳、准、狠”出击，各个击破。为消除私有化的后果，有效打击寡头势力，防止寡头操纵媒体、插手政治和恣意妄为，普京动用安全、检察、税务等部门的力量，在2000—2003年的两三年时间里，先后下令查处了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号称“克里姆林宫教父”的别列佐夫斯基和全国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些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寡头，可谓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通过有针对性地出击财阀、寡头，普京当局顶住了国内外包括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大政治压力，顺利地收回了一些重要部门如电视台和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能力。

2004年以后，普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作用，重新控制了战略性资产，彻底摆脱叶利钦时期寡头凌驾于政府之上并干预政治经济的模式；通过市场和司法手段，拆分私人寡头企业；促进国企强强联合，组建超大型国家公司；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掌控，用国家资本主义取代寡头资本主义。借助打击寡头的机会，俄政府成功收回并控管了大多数传媒机构和能源、银行、航空、核能、军火出口等主要战略性产业及装备工业，同时确定涉及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外贸、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的1063家大中型企业为国有战略企业，规定政府无权对这些战略企业实行私有化。俄还任命政府高官直接到战略性大企业兼职。

据俄“三家对话”投资银行和《专家》杂志保守估计：2004—2007年间，国有股份在俄资本市场中的占比从24%上升到40%，2009年达到50%。1997—2009年，国有经济比重从30%回升至67%，在银行业、加工业、石油天然气行业中，国有股份占比分别达到60%、50%和45%。其间，私有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每年的私有化计划实际都完不成。

在俄罗斯，国企包括联邦和联邦主体所属两级企业。在普京的社会经济政策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在加强。这些职能主要集中在发展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公共交通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政府职能的物质基础，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俄罗斯政府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手段强化国企的作用，加强经济掌控。

（一）将能源私企重新国有化

能源工业在经济中的特别地位，决定了能源国企是俄政府调控经济的龙头。能源私企国有化是俄政府确立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核心地位的坚定步骤。

1.采取司法手段，将“有问题”的私有石油公司的核心资产收归国有。能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是俄罗斯经济的命脉。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4年燃料能源综合体保证了俄罗斯80%的出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4由石油天然气收入构成。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使得80%以上的石油资源控制在私人财团手中。2004年12月，俄联邦政府依司法裁定，拍卖尤科斯属下尤甘斯克油气公司76.79%的股份以抵偿偷逃税款，使最终购买者国有独资的俄罗斯石油公司每年增加石油开采能力6500万吨。

2.采取市场手段，由国家控股企业收购私有西伯利亚石油公司。2005年9月，俄联邦政府控股的天然气工业公司以131亿美元收购西伯利亚石油公司72.6%的股份，每年增加石油开采能力3500万吨。

以上做法使联邦政府控制的石油开采能力从占总开采量的7.5%提高到了30%，总计约每年1.4亿吨。国有化整合壮大了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使俄政府拥有了对能源工业的有效控制力。在俄罗斯，控制能源工业等于掌握调控经济的杠杆。

（二）通过立法保证战略性国企的核心地位

通过立法让重要领域的核心国企拥有垄断地位，这是俄政府保障国企对国民经济绝对影响力的典型做法。普京在第二任期内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将对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企业以国家独资或控股的形式收归国有。《自然垄断法》（1995年）、《天然气供应法》（1999年）的规定使天然气工业公司成了决定其他企业开采量和出口量的阀门；依《自然垄断法》和《电力法》（2003年），国有统一电力系统（发电量占全俄70%）垄断全俄电力生产、传输和调度权；《破产法》修正案（2004年）最重要的内容，是把联邦与联邦主体两级政府共有的油气开采审批权完全收归联邦政府，改“两支笔”为“一支笔”；《天然气出口法》（2006年）给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其独资子公司出口天然气的专有权，其他独立公司可以在支付佣金的基础上通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其下属的天然气出口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其他独资子公司出口天然气。

（三）政府积极扶助国企扩张

利用行政权力扶助国企实施资源、市场和资本扩张，是俄政府提高国企经济调控能力的有效途径。

1.支持天然气工业公司主导科维克塔凝析气田开发。该气田为东西伯利亚最大气田，开采权属于合资的THK-BP公司。由于THK-BP公司没有也无权自建出口管道，致使气田多年无法工业开采。俄政府则以拖延开采为由威胁撤销其开采权，迫使该公司与天然气工业公司探讨共同开采，类似情形还发生在萨哈林大陆架二号项目上。此外，俄政府还以直接注资方式壮大天然气工业公司。

2.支持俄罗斯石油公司获得更多油气资源。

3.支持统一电力系统公司购入动力机器公司股份。2005年12月7日，俄政府批准了统一电力系统公司以1.014亿美元购入私有的动力机器公司22.43%的股份，后者是俄最大的发电和配送设备制造企业。此交易明显加强了统一电力系统公司的实力和垄断地位。

4.支持国有的对外贸易银行的资本和业务扩张。2005年12月21日，俄联邦政府决定把中央银行持有的其他数家俄境外银行的股份全部转给对外贸易银行，使后者完全持有或控股这些银行。这样，对外贸易银行不仅银行资本剧增，而且迅速扩大了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卢森堡的金融业务。对外贸易银行成为俄境外融资和外贸结算的核心金融机构。

（四）加强对战略国企的监管

1.俄政府高级官员到大国企兼职，既是政府履行经营国有资产的责任，也是保障国企忠实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组织措施。

2.在加强对重要国企组织人事控制的同时，普京也强调对国企的上缴利润和税收的监管。早在1999年担任俄政府总理之时，普京就召集专门会议，对大型国企藏匿利润提出严厉批评。普京举例说明，1999年俄罗斯4000家国企中只有517家上缴利润。而像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卢克石油公司等拥有40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特大型国企上缴的利润也只有70万—400万美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同时，普京向俄罗斯政府下令，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国有资产包括办公房屋等事业性财产的登记和审核。

3.利用税收手段，把石油超额利润缴入联邦财政。在从政治、思想以及法律上确立了对寡头的优势以后，普京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和调节手段更加多样，运用得更加从容和自如，积极利用税收手段对内销石油征收矿产开采税，对出口石油征收关税。例如，2005年4月，乌拉尔牌石油均价每桶

46.86美元，当月开采税每桶8.13美元，出口关税每桶19.67美元，[5]两税赋水平相当，且均随国际油价浮动。其中石油出口税率核定标准是把高于每桶25美元以上部分的90%作为出口税额。从2004年1月至2005年11月，主要以石油出口税建立的联邦稳定基金已达1万亿卢布，约350亿美元。稳定基金主要用于应对石油价格下跌对俄经济造成的风险以及提前偿还外债，客观上也是俄实行社会领域改革的“保险基金”。

（五）限制和规范中小企业的私有化

政府通过对中小国企私有化，既甩掉了经济包袱，又为发展和壮大国企提供了资金。俄罗斯中小国企私有化的特点是：

1.私有化对象只能是非战略性企业。在俄罗斯，战略企业是指其产品和服务对国防、国家安全和保障公民精神、健康和合法权益有着战略意义的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是单一制联邦企业，也可以是联邦政府持股的股份企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在战略性股份企业中持股比例大于25%，即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至少拥有否决权。

2.私有化行为规范化。为规范私有化，俄联邦政府制定并公布年度私有化企业名单及政府拟出售股份总数和比例。例如，联邦政府每年8月份公布下一年度私有化企业名单，主要是经营效益差的单一制国企和政府持股低于25%的股份企业。

二、在强化国企与私有化之间纠结

（一）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经济私有化运动

时至今日，俄罗斯要如何处置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那些一夜暴富的寡头及其资产，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几位总统候选人对此都纷纷表态。总统候选人、亿万富翁普罗霍罗夫建议，应将俄罗斯商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可疑方式收购的资产合法化，但商人必须为这些资产纳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则建议：“首先是把矿产资源收归国有，否则任何一个问题都无法解决。整个铁路和管理系统、通信系统、石油天然气管道等都应由国家掌握。”普京在俄罗斯工业企业家联合会第19届代表大会上表示，应当制定相应的机制，比如要求私有企业主一次性缴费，以便对俄罗斯私有化问题“盖棺定论”。但原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则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普京提出的关于私有企业主一次性缴费的机制，会恶化俄罗斯的经济和法律环境。

普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承认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是不公正的，

但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和经济上的考虑而不主张公开剥夺寡头资产。这是普京对待这场私有化运动的立场。2012年1月30日，普京在《导报》上刊发了一篇经济性竞选纲领。在这篇题为《我们需要新经济》的文章中，普京又一次谈到了对私有化运动的看法："社会上许多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包括抵押拍卖是不公正的。对此我完全同意。但现在剥夺这些人的财产，像一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则会导致经济停滞、企业瘫痪和失业暴增。而且，有一些所有者在形式上是正常的购买者，他们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许多人对企业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增加了新的工作岗位，成了卓有成效的企业主。他们在2009—2010年危机期间的行为表明，商界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大大增强了。"

对于前些年普京上台后发起的打击私人财阀的行动，他认为："当时在90年代暴富起来的人和想把他们的钱归还国家用于造福整个社会的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我们当时的行为是合理的，提高了国家对原料部门的掌控力。"

普京坚持，打击寡头是合理合法的，否则俄罗斯财富不仅会被一小撮私人财阀控制，而且会被变卖给国外势力。普京说，打击寡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企图继续直接收买政治。在我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国家的战略资源掌握在区区几个私人手里数年，我们遇到了把国家关键资产卖给国外的强烈企图。这意味着可以从外部控制俄罗斯的经济……看看国际资本在动荡、混乱、感觉危机临近时的表现就能清楚，为了挽救他们自己国内的核心事业，这些西方资本毫不犹豫地就从新兴市场撤走了资金，而且在它们看来，俄罗斯就属于新兴市场"，这更容易得手。

（二）俄罗斯私有化是进还是退

由于20世纪90年代那段私有化的狂风暴雨和惨痛的历史教训，俄罗斯社会上下对进一步私有化的意见不一。在要不要推进私有化、如何进行私有化等问题上各持己见。例如，俄共坚决反对私有化，甚至主张将一些大企业重新收归国有。而俄罗斯当局内部对私有化和国有企业的态度也分歧严重。以俄罗斯政府原副总理谢钦为代表的一些实力派官员认为，国家经济的命脉，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战略行业（比如能源）应该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而能够集中精力开发大型项目，以提高俄罗斯的经济速度和竞争力。他们认为，国家对战略性资产的控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然而，以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俄罗斯当权派中的自由派势力则对国有企业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垄断资源、低效而浪费，因而极力主张要进一步私有化。例如，在2012年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会议上，俄总理梅

德韦杰夫说，国企私有化是俄政府工作的重要方向，相关国企股权出售应该按照制订的计划执行。他说，2013年的私有化进程不应放缓，“因为私有化既可以补充财政收入，又能提高企业管理效率，而且从整体来看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高潮时期，私人财阀一度控制了俄罗斯石油行业的80%。而如今国企在经济比重中占据了50%。2012年，随着俄罗斯政权的又一轮新老交替，涉及私有化问题的争论又走到前台。2012年6月21日，普京在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表示，国企的战略性重组不是恢复苏联，更不是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俄罗斯不应由私营部门的垄断来取代国家垄断。普京强调：“如果没有合理的竞争，市场经济就会显示出一种走向衰败的趋势，这显然与行政命令体制的走势没有什么两样。”

普京多次强调，开展私有化必须防止出现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资产被廉价甩卖的情形。同时普京进一步提出，私有化并非为了扩充国库，而是结构性的。普京在2012年1月30日《导报》的文章中指出：“我们出售资产不单单是为了预算得到更多的资金，而首先是为了提高经济的竞争水平，为私营经济发挥主动性扫清障碍。但不看市场行情贱卖资产，这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一个当家人会这样做。”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在第三个总统任期的首次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俄罗斯政府打算进行的私有化不应与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或抵押拍卖雷同。今后的（私有化）应是以公道实际的价格、诚实并且公开出售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私有化不仅关系到增加财政收入。私有化更重要的是首先关乎民众对国家行动的信任，关乎能否出现真正合法、受人尊敬的所有者。普京请求负责私有化的政府方面谨记这一点。俄罗斯舆论认为，这是普京总统对力促国企私有化的梅德韦杰夫政府和自由派人士提出的警诫。

对于战略性国有企业今后的改革方向，普京提出，今后俄罗斯将减少国家居主导地位的大型企业和银行，并将剥离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内的大型垄断企业的非主营业务如控股的媒体公司等。普京提出，在当今条件下将限制国有公司在俄罗斯购买新的资产。“巨鲸”不应该妨碍私营经济在自己部门的正常发展，不应该把私营企业家排挤出最有利的项目。普京认为，创造增长的宏观经济条件，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俄罗斯“建立正常的资本主义”。

（三）俄罗斯经济发展：重新工业化，还是后工业化？坚持现代化，还是发挥原材料优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工业在短时间里下降了60%，产业和技术链条崩溃，

产品失去竞争力和传统市场。普京在2012年1月30日刊发的《我们需要新经济》一文中提出："俄罗斯超过1/4的GDP靠的是向世界市场出售天然气、石油、钢铁、木材等原料或初级产品。如今俄罗斯依赖世界经济，依赖程度比多数国家更大……我国的大体地位是原料型国家。实际上我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非工业化，丧失了发展质量，全面简化了生产结构，从而高度依赖消费品进口，依赖进口技术和复杂产品。"对此，俄罗斯有不少人提出，俄罗斯今后无须"争强好胜"，应安心选择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那样的依靠矿产、原材料出口的经济发展道路。例如自由派人士、经济学家叶夫根尼·亚辛曾提出：俄罗斯缺少机制和技术，难以走欧洲现代化的道路；俄罗斯缺乏"细致和勤劳"，也不能照搬中国、日本等亚洲模式。今后俄罗斯可以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利用能源和原材料优势，参与世界分工。[6]当然，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同的是，俄罗斯还可以保持自己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国际影响力。

对于俄罗斯应安心发展矿产能源及原材料行业的建议，以普京为代表的重新工业化道路派和以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欧洲式的后工业化道路派均不认同。他们坚持认为，俄罗斯迫切需要建立国家发展的新经济模式，摆脱对原料和能源出口的依赖，实现经济现代化。

2012年，在总统竞选前夕，由梅德韦杰夫亲自担任监事会主席的智囊机构——现代发展研究所出台了一份名为《探索未来：2012战略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认为，俄罗斯不应选择（普京倡导的）国家主导的重新工业化道路，而是应当走后工业化发展道路。该所所长、自由派人士尤尔根斯提出，后工业化发展道路要求政府的政策重点集中于保护产权（包括免于国家的掠夺）、人的发展，以及吸引外资。后工业发展战略的支持者反对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后工业社会技术快速更新，居民的需求及其满足能力快速扩大，使得经济与技术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未来的预测能力极大地降低，因此，不可能清楚确定应该优先发展的行业。梅德韦杰夫的经济助理、时任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德沃尔克维奇也公开支持后工业化战略："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必须要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需要在两种方案中选择一个：或者是新型工业化，或者是后工业社会……我本人赞同第二种道路，建立在开放性、私人企业家的广泛参与以及竞争基础上的道路更具吸引力。"

而普京等人则认为，处于原材料产地的国际分工定位对于一些国家而言是可行的，但对于俄罗斯则是"不可接受的"，不利于"稳定、主权与体面的生活"；只有在高技术领域立足才能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获取高额收入、摆脱对外依赖，进而赢得全球竞争。普京提出，俄罗斯要想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竞争，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而由于私人资本不愿进入高科技领域承担风险，所以政府挑选优先发展方向并提供扶植是发展高科技

产业所必需。普京还具体提到了几个应该占据领先地位的产业：制药、高科技化学、复合材料与非金属材料、航空工业、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以及仍然保持传统优势地位的原子能与宇航工业。普京认为，发展这些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必须有国家的引导和支持。

梅德韦杰夫等自由派人士经常声称，国家（的投资）总是犯错误，支持那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妨碍了新企业的发展。针对这种观点，普京提出，以上说法从理论上讲是说得通的。但是俄罗斯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的非工业化，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私人大资本不会主动进入新的行业，不想冒大风险。我们是否准备仅仅为了纯经济理论而让俄罗斯的未来冒那样大的风险？普京引用韩国和中国这些国家顺利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实际经验，指出必须由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这将利大于弊。普京认为，俄罗斯要想恢复国际竞争能力，就必须发挥国家和国有战略性大企业的作用。针对西方舆论对普京“恢复苏联、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普京反驳说，俄罗斯大型国企的整合、重组并不是像西方舆论诟病的那样，并不是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普京提出，今后俄罗斯将利用国家的力量支持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首先，要使俄罗斯的交通四通八达，包括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可靠的交通运输联系，同样重要的还有地方路网。其次，普京还计划加快对俄罗斯城市群和大城市周边区域的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

俄罗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以下原因：第一，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大变革时期，各国实力对比剧烈变化，为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仅仅因为可能会出现的失误与腐败而放弃国家产业政策，就会使俄罗斯错失在竞争中取胜的机遇。因此，反对产业政策的实质，是“仅仅为了纯粹的经济理论”而“拿俄罗斯的未来冒险”。第二，国家投资不会抑制私人资本的进入，因为政府致力于扶植的产业目前是私人资本不愿并且没有能力进入的。第三，韩国与中国的经验证明，国家的推动是必要的，其成效会超过犯错误的风险。对于俄罗斯而言，如果没有目的明确的努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将很难实现。

但从现实条件分析，普京提出的俄罗斯重新工业化与现代化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并没有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工业化的政治社会条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失去了原有的经济空间和产业链，而苏联留下的技术潜能和工业老底也已折腾殆尽。20多年来，俄罗斯先后有20多万科技人才流失到海外，俄罗斯科技教育整体水平下滑。再加上当今俄罗斯司法烦琐、低效，官员腐败盛行，行政障碍重重，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经济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俄罗斯社会陷入了“社会混乱—权力膨胀—行政低效—经济下滑—官员腐败—犯罪猖獗—经营困难—增长乏力”的怪

圈。当今俄罗斯，丢了苏联时期的好东西，留下了缺点；没学到西方的好东西，拿来了唯利是图等弊端；非东非西，不伦不类。除此之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俄罗斯社会将难以形成一种良好的、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治理机制。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普京的掌控下，俄罗斯社会的思想分歧也很严重，各派政治力量暗中较量，社会还未就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等问题形成有效的共识。俄罗斯当局的现代化构想还存在着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例如：目标与途径的冲突、自主性发展与西方化的矛盾、经济目标与政治手段的矛盾、自由化改革与维护稳定的矛盾、国有资本与私有经济的矛盾、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等。未来俄罗斯之路究竟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

---

[1]私有化券：一张黄色票证的20周年祭[N/OL].论据与事实，2012-8-22.http://www.argumenti.ru/toptheme/n353/197784.

[2]谢·罗戈夫。地缘挑战和俄罗斯与世界接轨的问题[C].第二届全俄“俄罗斯与21世纪”讨论会材料。莫斯科，1999：107—112.

[3]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N].独立报，1999-12-30.

[4]普京在全俄国家财产管理系统会议上的讲话[N].俄通社—塔斯社电，1999-11-22.

[5]对出口石油免征18%增值税。

[6]Новаямодель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ростаРоссиинапериоддо2020года[EB/OL].http://ru.exrus.eu/-id4fa38f016ccc1929170001d1.

第三篇　民主化陷阱



1989年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教授索布恰克当选苏联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后来成为列宁格勒市市长，也被视为从东德退回的克格勃上校普京的政治领路人。

（俄罗斯当代历史国家博物馆藏，作者查于2014年7月莫斯科）



1990年8月，在苏共最后一次党代会二十八大上，叶利钦丢下党证，宣布退党后走出会场。

（俄罗斯当代历史国家博物馆藏，作者查于2014年7月莫斯科）



苏联解体前夕，“民主派”拆除莫斯科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大楼前的捷尔任斯基的塑像。普京上台后，又在大楼内部重新安放了捷尔任斯基的小型塑像。

（俄罗斯当代历史国家博物馆藏，作者查于2014年7月莫斯科）



2012年5月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

（来自新闻图片）

第十一章　民主诱惑与政治裂变

30年前，戈尔巴乔夫信奉民主社会主义，鼓吹“民主化和新思维”。不到6年时间，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改革”就葬送了七十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有九十多年历史、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叶利钦打着“民主、自由、自决”等旗帜，将戈尔巴乔夫赶下台后，大规模推行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不仅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民主和幸福，反而酿成了普京总统所言的“一场灾难”，没有带来民主，而“只是一小撮财阀和寡头的自由”。苏联解体后，西方阵营并没有停止对走上资本主义“民主和市场”道路的俄罗斯的遏制和打压。2006年以后，为应对西方的围剿和“颜色革命”冲击波，普京提出了“主权民主”概念，强化了政治防卫和政治思想还击。

2005年，面对苏联解体后民族分裂和恐怖主义带来的灾难，身为俄罗斯总统的普京通过电视向全俄民众说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之一。二十多年前，苏联改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彻底改变了当代世界政治格局。二十多年来，国际上对于戈尔巴乔夫“民主化”与“新思维”的改革评价总是大相径庭。一般说来，俄罗斯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失败的，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不仅没能给俄罗斯带来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还导致了国家解体，各民族反目成仇。正如普京所言，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无所获。而西方世界却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开启了苏联的剧变，也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东欧才结束了社会主义试验，西方趁机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2010年3月11日，在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发起苏联改革25周年之际，一家由戈尔巴乔夫的同窗好友创办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列瓦达（Левада-Центр）中心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34%的受访者对戈尔巴乔夫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中间立场的占45%，基本上正面的占13%，难以回答的占7%。53%的受访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带来的是负面的、消极后果，24%的受访者认为是积极的，23%没有回答。[1]

2010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接受瑞典《地铁报》（Metro）记者采访，在回答“你的改革[2]带来了哪些成果”的问题时，戈尔巴乔夫称，成果不少，“首先是人们自由了，使国家摆脱了极权制度。不能说，我们已经快速建立了民主，没有，我们在民主过渡中只是走了一半路程……”[3]

然而，美国苏联问题专家，长期以来称得上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拥趸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蒂夫·科恩却写到，如果使用通常的政治标准来看，

戈尔巴乔夫失败了。因为他在苏联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最终导致了国家解体和政权的瓦解。[4]

2014年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23周年。二十多年前，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这些突变直接导致了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社会制度改变“颜色”。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败亡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给国际政治思想领域造成了混乱，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东欧突变、苏联解体与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密不可分。苏共自身变质、苏共内部瓦解是导致苏联国家分裂、苏共败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苏共的垮台？是哪些因素叠加瓦解了苏联？苏联败亡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有没有因果关系？对这些疑问，20年来国内外学界给出了多种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此之前，苏联在3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三位年老体衰的总书记去世。苏联社会上下对“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领导苏共，带领苏联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西方主要国家首脑也对戈尔巴乔夫“满怀期冀”，认为他是一位“鸽派”人物，是一个好“打交道”的苏共领导人。然而，只用了几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就将苏联和苏共引向了绝路。短短6年之后，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丢掉了政权，统一的苏联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打着“改革和民主化”的大旗，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输掉了与西方的冷战，在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2005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2007年11月，在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即将展开之际，普京总统又一次严厉批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政策，指出20世纪末俄罗斯普遍的贫穷和贪腐盛行应当归罪于国家高层领导的失败。普京在那次演讲中指出，正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当权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抛下人民不管，导致人们甚至得不到最起码的服务和商品，人们没有糖、肉、盐、火柴，等等。普京认为，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5]

一、民主梦幻及思想迷失

（一）背弃政治信仰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破坏和捣乱。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们一开始就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二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更是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自由世界”的威胁。此后五十多年，西方阵营除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外，更是选中了“和平演变”作为与苏联进行政治和思想较量的手段。丘吉尔、杜鲁门、乔治·凯南、尼克松、里根、布什等西方政要都坚持，要对苏联进行政治战、心理战、文化战，以“民主、人权”为工具，摧毁苏联制度。

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积极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将其视为攻击苏联政治制度的有效砝码和利器。西方称苏联是“共产主义专制”国家，祭起“人权”“民主”“自由”等旗号，对苏联发起了猛烈的政治和外交攻势。历次苏美高层会晤，美国都把“人权”、“民主”和“自由”问题列入会谈的议事日程，对苏联领导人施加强大压力。同时西方国家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基金会，与情报部门配合，暗中扶持政治代理人，支持苏联的政治反对派或民族分裂势力。美国“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刊物《民主杂志》的主编之一、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曾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人权”和“民主化”，就是要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

在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面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列宁始终洞若观火。列宁反对抽象的谈论民主，多次批判了“一般民主”“绝对的民主”[6]“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7]。列宁指出，民主、自由和平等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列宁历来反对笼统地、抽象地大谈一般“民主”、“自由”与“平等”。[8]他指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9]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政治领导人逐渐失去了政治信心，理想信念开始动摇。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倡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美等国在1975年8月签署了欧安会最后文件。从此苏联国内的政治与人权问题成了外交讨论的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先是遥望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后来在西方“自由式民主”的诱导和进攻下，苏联社会完全缴械，饮下了贴着美酒标签的政治毒药。

当代俄罗斯独立学者罗伊·麦德韦杰夫曾经写道：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的蜕变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正是赫鲁晓夫的“草率和鲁莽”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导致当时正在成长的苏联年轻一代的信仰开始动摇，出现了文艺界的“60年代人”现象。

苏共召开二十大时，大学刚毕业不久的戈尔巴乔夫25岁，正处于世界观、

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赫鲁晓夫在思想理论上的变化，给思想正处在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已经动摇了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道：“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10]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否定得还不彻底，没有从制度根源上去批判这个“极权主义者”。

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新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11]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试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俄罗斯历史学家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台伊始的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火热”的列宁主义者。1985—1988年，他的讲话稿中经常整段地引用列宁的话语。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以列宁的学生自居，能够背诵大段的列宁语录。但细心的人会发现，他在号召思想“回到列宁”的同时，有意回避马克思、恩格斯，谈列宁也是特意挑出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及后期在病榻上的一些论述，闭口不提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久，苏共为布哈林平反，这成了后来批判和诋毁斯大林的重要砝码。

之后随着总书记权力的进一步巩固，戈尔巴乔夫思想“人道化、西化”的味道越来越浓。戈尔巴乔夫也由“火热、坚定的列宁主义者”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1987—1988年期间，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说：“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要攻入它的基础本身。”[1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负责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亚·尼·雅科夫列夫也极力吹捧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诋毁马列主义，恶毒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对于雅科夫列夫从内部瓦解苏共的“功绩”，就连一直与他因为在戈尔巴乔夫面前争宠而后来反目的阿·切尔尼亚夫耶也毫不讳言：“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否定他在打破统治我们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谎言和教条中所起到的巨大进步作用。”[13]20年前，在苏共党内泛起的这股“具有人的面孔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共主要领导人的推波助澜下，来势汹涌，一度成为苏共的主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到

了1990年夏天，苏共召开二十八大期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报告已经冠以“建设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一方面在代表大会的会场外，各地区分裂势力蠢蠢欲动，罢工四起，国家如坐在火山口上；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与亲信们正热议是在名称上还是在纲领上将苏联共产党改变成“社会民主党”。二十八大是苏联共产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此时苏共内部思想分裂和组织涣散达到顶峰。苏共已经丧失了领导社会的能力，人心涣散，苏共的思想已被掏空，苏共的领导已是徒有其名。

短短6年的时间里，这股打着“民主、人道”旗号的政治思潮不仅使得苏联改革误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国际共运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着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

1991年，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公开与历史上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决裂。2010年4月，在自己发动“改革”2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独立报》主编采访时说道：“当别人问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社会中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经验，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光是市场，还有所有制问题，以及对所有制的态度。而我对趋同性社会的理解是，这是一种与人的面孔的民主社会主义相似的制度。”

苏共后期的领导人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接受“看上去很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这其中除领导人的因素外，也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社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还不能一下子接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与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相比，民主社会主义更具亲近性和诱惑力，再加上苏共领导人的鼓动与带动，更使得这股思潮具有内部性、蛊惑性、隐蔽性和危险性。但是，民主社会主义令人炫目的愿景并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安定和富裕。这朵美丽的蓝色妖姬不仅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反而使苏联社会失去了公平、失去了七十多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更加引人深思的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人道化”的口号导致了俄罗斯“财阀、寡头的为所欲为”，为90年代野蛮的、原始的、犯罪式、官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

如今，在欧洲是个“好东西”的这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俄罗斯却命运不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寡头资本主义在俄罗斯横行一时，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潮流已经毫不留情地被抛弃、被边缘化。打着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俄罗斯政治力量像一盘散沙，社会影响微乎其微，被逐出政治舞台的中心，被遗弃到社会的边缘。正如俄罗斯媒体指出的那样，如果说苏联解体10年之后，俄罗斯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右翼势力逐渐变成人人唾弃

的“政治僵尸”，那么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则变成了无本飘浮的飞絮，像是几只蠕动的小虫，成了政治侏儒。

对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场的转变，除上面提到的尼克松之外，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著名的苏联通马特洛克[14]，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等人早已洞若观火。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朝一日，苏共将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15]

（二）民主化梦幻

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否定苏共历史，这对于一个政党来讲，无异于是“思想自宫”行为。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兵营式的社会主义”之名，力图改弦易辙，走一条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导致了苏共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引发了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从此走上了一条政治自杀的绝路。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决意在政治和思想方向上改弦易辙，于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舆论和理论准备：新闻舆论公开化、历史领域的反思热、文艺领域的又一次解冻、外交上的“新思维”和世界主义，等等。

苏共领导层在政治立场上发生动摇和偏移，首先表现在如何看待苏联70年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上。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便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称为“行政命令式体制”“专制和集权的制度”，之后开始使用“斯大林模式”“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暴力的社会主义、毫无人性的制度、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主义”等名词来形容苏联制度，后来干脆抄袭“二战”期间德裔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原本针对德国法西斯制度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概念来诬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有文章公开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声称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是“一种斯大林的法西斯战胜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斯大林的法西斯比纳粹更残酷和恶毒”，等等。

思想混乱必然导致方向性的迷失和政治信仰的动摇，苏共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愈陷愈深、越走越远。苏共二十七大之后，在苏共领导层的支持下，苏联思想理论界和文化舆论界霎时间也变得波涛汹涌、浊浪滔天。借“民主化”“公开性”政策，清算苏共历史、向苏联制度抹黑的言论和文艺作品不断在出版物和大众传媒上出现。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激化。随即，不少刚刚还宣称信奉马列主义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也转而信仰西方的

自由资本主义。

1988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多之后，苏联社会的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危在旦夕。1991年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彻底走进死胡同，苏联被“改革”折磨得遍体鳞伤、七零八落。在经历了“8·19”事件最后的绝望反击之后，苏联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开始分崩离析。首先是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借机单方面宣布独立，乌克兰的全民公决结果也赞成“单过”。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如热锅上的蚂蚁，关心的是叶利钦能否承诺每月发给他4000卢布的个人退休金。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苏联在别洛韦日森林被判了死刑。上述三人表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衰弱和退化，并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失败了。[16]

二、民主溃疡与自由泛滥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对自己提出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寄予厚望，特别是将“扩大公开性”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戈尔巴乔夫认为，舆论放松，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支持率，激发民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实践表明，在矛盾潜伏、思想混乱的社会改革关头，贸然打开舆论闸门，推行“毫无限制的公开化”，只能像是肆虐的洪水东冲西决；没有责任、没有相应法治环境的“公开性”，只能变成阴谋家的暗箭、野心家的权杖、庸人的游乐园、俗人的垃圾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缺少经营创业致富的经济追求，缺乏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苏联社会的新闻舆论演变成了“公开性”的肆意狂欢。这种狂欢很快汇聚成滔滔洪水，冲毁了大坝和堤岸，淹没了乡村良田和城市街道，卷走了个人的自由和大众的民主，甚至夺去了一些人的性命。

（一）政治自我否定

苏联在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僵化停滞和官僚主义等弊端。苏共领导人应当采取措施，稳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扩大社会参与，改革和完善各种体制和制度。但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层陷入了把“民主、改革、公开”等概念绝对化的误区而不能自拔。戈尔巴乔夫多次宣扬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改革的基础”和“改革的灵魂”，要求“民主化、再民主化”。“民主化”变成了唯一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变成了衡量改革的唯一标准：民主就是改革，改革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公开，公开和选举就是民主。

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同样把一些民主原则如多数原则、公决原则、选举原则、公开原则等绝对化和简单化。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1800万苏共党员贬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把大多数人看成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在反思历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尔巴乔夫视为“自由选举”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大肆攻击苏共、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演说成了反苏和反共势力获胜的不二法宝。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对此深有体会，他回忆道：“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17]而对此，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是“不要干预、不要干预、要保持距离”。

15年后，身为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反思说，20世纪末，我们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犯了“幼稚病”。多数原则、选举原则、公决原则在任何国家都不是绝对的，都要根据国情施以具体的规定，避免滥用。例如不少国家规定上级立法机关有权撤销下级立法机关虽经多数通过但并不正确的法规和法律。但是戈尔巴乔夫不顾苏联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改革需要，强调下级可以不服从上级，称这是民主的需要。于是，每个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多数”和“民意”行事，结果就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各共和国公然与中央开展“主权战”“法律战”，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势力趁机大肆夺权。

（二）舆论公开绝对化

“公开性”作为一项民主政策，在列宁时期意为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渠道，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1986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利用“公开性”的提法，将“公开性”与扩大信息公开、与“民主化”联系起来，把“扩大公开性”变成了苏共形象上自我否定、思想上自我毁灭的一场运动，严重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特征”。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此后，“公开性运动”一发不可收。戈尔巴乔夫使“公开性”成为一个响亮的政治口号，成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关键，其目的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而是想引导社会舆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结果“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的突破口。“公开性”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扩大“公开性”成为暴露社会消极面和宣扬西方样板的思想运动。苏联舆论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狂欢时节”。一些文人自由地抒发着感情，以解多年积藏在内心的压抑，一时间，对苏联以及苏共历史的肆意抹黑和歪曲评价造成了社会思想的混乱，动摇了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激化了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矛盾。

在国内积极推行“公开性”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境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戈尔巴乔夫在此书中倡导“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倡导用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戈尔巴乔夫一方面鼓吹“文明社会价值”和“核时代的文明”，另一方面单方面在外交战略上主动向西方让步。然而，戈尔巴乔夫单方面的“良好愿望”最后没能换来西方的真正回应，只有他本人在苏联即将瓦解之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西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冷战，打赢了多年的对苏攻心战。

（三）思想内部瓦解

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18]戈尔巴乔夫所谓破除精神垄断和推行多元化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放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搞放任自流，给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势力打开大门。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强调“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是多元的，意识形态也要与此相适应。搞多元化，必须废除过去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精神垄断”，使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想和意见自由存在和传播。

在这之后几年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使苏共逐渐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领导层的背离是苏共领导层和思想理论界思想蜕变的催化剂，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理想发生动摇，失去信仰，西化自由主义思潮迅速泛滥起来。

为顺利打开舆论大门，推行言论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开始更换新闻媒体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会，网罗了一批变质的苏共报刊舆论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2000年，雅科夫列夫在自己撰写的《记忆的旋涡》一书中公开承认，当时他主动担负起保护一些尖锐文章作者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人，纵容了一些人”[19]。

此后，苏共的政治反对派也积极利用舆论放开的大好时机，在境外西方传媒的策应下，对苏共和苏联发起了一轮轮的思想攻势。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瓦解苏共与苏联的势力正是从制造舆论开始，先做演变意识形态的工作，然后趁思想混乱之机，

煽动社会骚乱，瓦解党的组织，乱中夺权，最后利用手中的权力，瓜分或捞取巨额财富。

（四）历史清算与社会复辟

在“民主化”“公开性”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这股浪潮导致了社会分裂，使苏共丧失了威望，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

这股清算苏共历史的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中达到高潮，1989年以后，批判的矛头主要集中在斯大林，然后转向批判20世纪20—50年代的苏联社会制度。一些报刊文章作者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与此同时，批判斯大林主义逐渐转向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20]

1988年以后，苏联社会上某些势力利用反思历史的机会，积极推动所谓“平反历史错案运动”，造成了强大的声讨苏共历史的舆论声势。报刊上要求恢复名誉或描述历史案情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股“历史热”的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些作家、电影人或记者编辑。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亲自策划、组织和领导了这场反思历史和平反错案的运动。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自1988年开始，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周报等推波助澜：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改变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

从1987年开始，到1991年苏共下台，苏联社会中的激进势力利用各种“历史问题”大做文章，有些做法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他们疯狂地揭批斯大林，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场少数人制造的超恐怖的革命”。[21]列宁也成为被讥讽和批评的对象。

“历史热”彻底颠覆了苏联社会部分人的信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列宁的形象也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遭到质疑。历史根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成为苏共组织瓦解的先导。丑化苏共历史最终导致了俄罗斯思想理论界肆意“揭批俄罗斯的历史缺陷、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诋毁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22]

（五）权威散落与治理失败

1988年前后，在苏联社会关于改革和经济问题的争论过程中，苏共存在的“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开弓没有回头箭，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在叶利钦等民族地方政治分裂势力的牵扯下，迅速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拆毁”的大戏。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经济改革不见任何成效，导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这更是给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提供了口实。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开始放下不久前喊出的“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苏联共产党及其国家制度。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改革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仿佛被遗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溶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党和政府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你争我夺，各自为政，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

（六）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苏联内部，政治松动和经济困境导致各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苏联部分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认为，是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

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首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其次，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独立于苏联”。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与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反苏共、反中央，拉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这样，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苏联和苏共已是“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

苏共的失败是从苏共党内的分裂开始的，而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则是撕开苏共的重要裂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兴起之际，当地苏共党组织姑息、纵容甚至参与民族分裂活动。1989年末，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宣布独立，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1989年

6月，为抵制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不作为，建立了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但他们后来在叶利钦等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势力的影响下，不由自主地汇入瓦解苏联的大潮中。正可谓，一个染上民族主义的党，是一个走向灭亡的党。[23]

（七）政治反对派横空出世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应当指出，国外势力的支持，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是苏联社会“持不同政见运动”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经常将所谓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西方国家投入巨资以多种手段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思想上的进攻，诋毁苏联社会主义，长期支持那些不同政见者，资助他们在西方出版著作，并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

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逐渐衰落了。但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地下刊物问题又滋生开来，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犹如雨后春笋、四处蔓延，最后变得不可收拾，酿成大祸。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的号召下，自1986年，苏联社会开始出现一些新生的非正式组织。1987年，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已经蔓延到苏联一些大中城市，并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小组等形式出现。1987年之后，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开始不断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与非正式组织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随着“公开性”的推进，一些地下刊物也开始浮出水面，并得到苏联一些大报和西方电台的支持。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反社会主义、反苏共的主要舆论阵地。而上述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成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则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头羊，如盖达尔和丘拜斯，这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是培养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八）走向政治激进主义

在俄罗斯联邦，叶利钦代表了激进自由民主势力，而各地民族势力则以各加盟共和国或更小的民族区域为大本营，乘机夺取话语权和阵地。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势力提出，只要彻底“告别社会主义”，迅速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就会在一两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24]俄罗斯只要自己实现独立，甩掉身上其他加盟共和国

这些贫穷包袱，三四年后就会变成西方式的富裕国家。

随着社会思想的激进化，各种思潮沉渣泛起，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过来的粗糙的“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盛行一时。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25]在经济生活中，他们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等等。当时，苏联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界人士也摇旗呐喊，他们宣扬，市场化和商业化不仅可以保障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像西方社会文艺明星一样的致富机会。

苏共后期的领导人习惯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香风美酒，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和号召力。经济改革不见成效，奢谈民主和自由，政权摇摇欲坠，政治上已经自身难保。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一会儿宣称“中间道路”，一会儿宣称要实施紧急状态，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旗号不久便轻易地被自由激进或民族主义势力所取代。可见，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共后期在推进改革中犯下了一些致命错误，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和民族关系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在西方进行和平演变和开展对苏“心理战”“攻心战”的情况，苏共丧失警惕，全面放下武器，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妄想投入西方的怀抱，输掉了冷战，成了失败者，结局惨痛，教训深刻。

三、政治改革与民族分裂

（一）主要阶段

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随着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信念的改变而逐渐发生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从1985年3月到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这一阶段的改革以经济为重心，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完善苏联政治制度。

在1985年3月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加速发展战略，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上。在1986年2月的二十七大上，讨论的重点是基于科技进步和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加速”战略。同时在本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社会主义进一步民主化、加深人民的社会主义自

治问题”，其措施是“活跃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劳动集体和人民监督工作，加强公开原则”，扩大苏联人的政治权力和自由。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完善”政治体制，并没有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的口号，同时强调苏共仍然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政治体制的核心，苏维埃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

第二阶段从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到第一位，政治上的“民主化”被视为整个改革不可逆转的保证，全社会掀起“民主化”“公开性”的热潮，同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被推出。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在于“阻碍机制的存在”，认为想要消除“阻碍机制”，就要“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人民自治”，“只有通过民主和借助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实现”。此外，报告提出应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在1987年6月中央全会召开时，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强调“民主化是改革的先决性条件”。1988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舆论界、意识形态机关和创作协会的领导时说：“民主化与公开性不仅仅是改革的手段，而且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我们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26]

1988年6月苏共第二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将“根本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首要地位，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构想，而把权力中心从苏共向苏维埃转移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此外，在这次会议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被首次系统地加以阐释，并宣布苏联人民将有一个“内容充实和无条件的民主”的光明前景。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会议标志着苏联改革开始转向。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从一般的“民主化”“公开性”进一步发展到向“权力中心”转移；改革从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病开始向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倾斜；改革的目标由“完善社会主义”转变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第三阶段从1988年6月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会议到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在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全面转向，苏共对国家的领导被逐渐削弱和取消，建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自由选举、多党制和总统制相继在苏联实现。

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并由此选出最高苏维埃。由于“公开性”无限制的推行，苏共的威望开始下降。在1989年春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中，许多民主派积极分子当选。同年5月、6月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形成了具有议会党团性质的“跨地区议员团”，当时名噪一时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进入该团。他们多次提议取消苏联宪法关于苏共领导权的第六条，即“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

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1990年苏共二月中央全会决定修改宪法第六条，改行多党制和总统制，并在全国人大通过，成为法律和事实，从根本上取消了苏共对政权的领导。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前夕，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已进行了5年。从1987年、1988年开始全面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之后，经济形势日益恶化，民族分裂趋势日益严重，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激烈。在苏共二十八大会议上，出现了代表三种不同政治势力的行动纲领：苏共中央纲领、民主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提出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该行动纲领正式被讨论通过。至此，它表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政治思想路线已经成为苏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路线。

第四阶段从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在这一阶段，“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被大力推行，苏联加速演变。

苏共二十八大以后，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1990年8月上旬，全国性政党已经发展到20多个，非正式团体发展到9万个。各派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城市的苏维埃选举中，民主派大获全胜，以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两大政治力量的夺权斗争日趋激烈。

同时，在实现了政治多元化之后，苏联开始把斗争重点转到经济改革上。在戈尔巴乔夫的一再妥协下，由沙塔林等人制定的“500天计划”被推出，试图在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实现财产的非国有化、私有化，放开商品价格，向市场经济过渡。

在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中央发起了“法律战”“主权战”，纷纷宣布独立。在俄罗斯联邦和各加盟共和国遥相呼应下，戈尔巴乔夫被自己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束缚住手脚，无力维护联盟的统一。到1991年8月，苏联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急剧加深。由部分苏联领导人仓促策划的“8·19”事件不仅没能挽救苏联的解体，反而加剧了危机。最终，在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完全解体了。

（二）政治改革、抛弃苏共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组涉及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关键性要素：苏共、宪法、选举、议会等。首先是修改宪法，取消苏共领导地位。苏联宪法原第六条规定，苏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核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不除，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特别是多党制就难以实现。1989年12月12

日，在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有代表建议将修改宪法第六条的问题列入会议议程时，戈尔巴乔夫说，宪法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讨论和修改。这实际上是为二月全会取消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做舆论准备。在二月全会召开前夕，即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说："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27]在这次全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必须清除一切把党同专横官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的东西"，苏共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应"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苏共执政地位的获得，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即依靠选票）去"争取"。[28]

苏共中央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进一步提出，"苏共不攫取国家政权的全权"，"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鉴于这一点，党认为必须通过立法动议程序，把涉及国家根本法第六条的有关建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29]这意味着苏共要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变为与其他匆忙组建的团体和组织一样的地位。苏共只有与其他参政党平等竞选，才能获得执政地位。

其次是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中进行的广泛民主化，带来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了各种社会政治团体和运动。这种进程将导致在某一阶段建立一些政党，苏共将根据这种新的情况进行工作"[30]，与所有这些组织合作并进行对话，意即将允许建立各种各样的政党。二月全会通过的提交苏共二十八大审议的行动纲领草案也指出，要与"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决裂"，实行"民主制和政治多元化"，因此，"社会的发展不排除再建立若干政党的可能性"，"苏共不谋求垄断权，准备同一切主张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进行政治对话与合作"。[31]这个纲领的内容，是对戈尔巴乔夫多年来倡导的"多元化"与"民主化"的回应，表明苏共在政策上要实施多党制。

再次，实行议会制、设立总统。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的一些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就公开提出，要研究三权分立的学说。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法治国家"的概念和"法律至上"的思想，大大助长了对三权分立学说的研究。1988年11月14日，苏联《消息报》刊登法学博士库拉什维利的文章，称正在试图设立一个相当于西方国家总统的职务。1989年5月，苏联政府和苏联议会开始分权，权力中心由党向苏维埃转移。而后，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派出一些团体秘密或公开地去美国、法国等国家考察西方议会和总统制。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中表示，"三权分立"能避免大权独揽和滥用权力。他说："国家和其他政治结构发展的主流是人民社会主义自治的思想和实践

同经过多年经验考验的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则保证执行权力与立法权力的严格分开，并保证司法的独立性”。

1989年年底，苏共中央由政治局委员亚·尼·雅科夫列夫挂帅起草苏共行动纲领，在这个纲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总统制。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助理沙赫纳扎罗夫在会见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时说：苏联正在研究实行总统制，以给戈尔巴乔夫“非常大的权力”，在紧急情况下行使强权，总统可对议会行使否决权。他还说：“美国的制度是人类建立的最良好的制度之一。”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他指出：苏维埃在需要采取果断行动的地方未采取果断行动，因此，“必须在最高领导层里重新进行力量调配”，需要“建立总统制”，以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来贯彻改革的政策”。[32]

自1987年以来，在戈尔巴乔夫“政治多元化”口号的鼓励下，苏联各地纷纷建立非正式组织，1987年12月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有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有的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有的要求复辟沙皇贵族统治，等等。这些组织的活动地点有的在波罗的海地区，有的在高加索地区，有的在苏联的心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它们遥相呼应，目标一致对准苏共和联盟中央。

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推动下，苏联各地的政治热潮很快汇成汹涌澎湃的海啸，直逼联邦国家和苏共中央。1990年2月4日，在苏共中央召开二月全会的前夕，莫斯科有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

（三）执政党的瓦解与分裂

苏联国家是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产物。苏联大厦维系在苏共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苏共是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成为政治改革的对象，5年左右的时间，苏共遭受了“被改革—被改组—被边缘—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

1.内部削弱。

改革初期，苏联和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苏共。但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新思潮”冲击下，苏共开始逐渐丧失对改革和国家发展的引导力量，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

首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不力的情况下，把苏共视为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阻碍机制”。戈尔巴乔夫把1800万各级管理人员都看成“改革的阻力”，

使他们经常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和干扰而无法正常工作。苏联部长会议在成立一年半的时间内，就被激进的议员提出6次不信任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满腹牢骚地说：“政府每天都受到攻击，打开报纸，都在骂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工作？”原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在总结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时写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33]

所有这些逐渐导致苏共成为舆论批评的众矢之的。1990年，苏共已经感受到非常严重的危机，当社会上自上而下地出现了意识形态危机和政治多元性后，苏共已经是徒具形式上的统一，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被大大削弱。在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上，许多代表纷纷表达了对党的高层领导及总书记身边人员的不满情绪，许多人忧虑党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摇摆不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说，改革理论处于变动和自我发展中，应该根据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来总结新的理论和得出结论。大会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最终，党的宗旨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苏共活动的组织基础遭到彻底的改变。

2.取消职能——由领导党变为议会党。

早在1988年，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就提出废除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随着人民代表选举活动的开展，一些政治势力看到此时与苏共拉开距离更容易走上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代会上和同年12月的第二次人代会上，多次提出废除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之后，苏共党内外的一些势力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启发下，把取消党的领导和建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作为政治斗争目标。

1990年，受到东欧剧变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对多党制表示认可。随后，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第6条的决议，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在民主过程范围内，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中争取执政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苏共起着议会党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所设计的新的党政关系模式，实际上是向西方的议会制模式靠拢所迈出的一步。然而，在咄咄逼人的民主派面前，苏共先后在许多共和国、州、市丧失了执政地位。

3.瓦解分裂。

早在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之际，他身边的政治谋士就已经准备了从政治和

思想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计划。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向其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建议在组织上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在政治思想方面已经分裂在即。苏共二十八大为按民族和地区继续分立留下了政治和程序空间。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规定，除了与苏共有着共同的“纲领性原则”之外，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以后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文件，独立解决政治、组织、干部、宣传和财政问题，在共和国的国家体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领域实行各自的路线，与其他包括国外政党的组织和社会运动单独建立联系”。据此，俄罗斯学者写道：“在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之间建立联邦关系是导致后来苏联被否定和肢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34]

“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在宣布解散苏共的前夕，描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共面临分裂的危局。戈尔巴乔夫写道，苏共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解体，“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罗·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指他宣布解散苏共的事，引者注）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35]

可以想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4.政治上排挤与组织上抛弃。

除了在外部面临民主派的竞争与攻击外，苏共在内部实际上经常遭到戈尔巴乔夫等高层的背弃。1990年之前，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怀疑主义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戈尔巴乔夫在向“民主派”做了一系列政治让步之后，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国家需要设立总统一职。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之后，立即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总统委员会制定决策方案后，或通过总统交给立法机关议决，或由总统发布命令执行，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无能力影响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制约戈尔巴乔夫的能力越来越小。虽然戈尔巴乔夫仍保留了总书记的职位，但更多的是有意摆脱苏共的控制，直到最后完全摈弃苏共。1990年夏，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决

定要抛开党。曾担任政府总理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戈尔巴乔夫亲手解散了苏共，但他并不为自己的言行有丝毫的悔意与不安。他说："从更广袤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义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36]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后，苏联的国内形势更加危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集会和示威连续不断，此起彼伏。广大党员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引发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大批党员退党或脱党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不满和抗议。1991年7月，叶利钦签署了其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一道总统令，宣布禁止一切政党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内的活动，蓄意要把共产党的组织机关从政府机关、军队和企业中清除出去。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是拒绝动用总统权力维护苏共的利益，直至苏共解散。

四、国家裂变与经济崩溃

（一）政治改革热潮

一般来讲，政治与经济进程应当相辅相成，政治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而戈尔巴乔夫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极力推动政治改组单兵突进，而不顾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曾任古巴大使、后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的卡普托回忆到，他在任苏共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局局长时，与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的学者撰写报告提出，中国改革的经验就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逐步推进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他们将报告送交戈尔巴乔夫，但后者没有任何反应。卡普托指出，现在回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随便把改革历史梳理一下就会发现，任何一项政策都没有落实到底，都是半途而废，接着又提出新的改革政策。在1983年和198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过农业领域的小改革，这些小改革也失败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一开始是实施加速战略，接着是科技进步，然后是更多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下一步就是政治改革和民主社会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消灭了苏联和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最初的经济改革战略未见成效，但他并没有考虑到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反而急于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把"民主化"视为改革成功的关键，进而把"民主化"当作改革的目标和本质。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不见成效的根源在于政治领域，在于党内的"阻碍机制"，因此要将工作重心集中到"政治领域"，打碎官僚机制，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改革方案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属品和牺牲品，苏联经济形势日

益恶化。1988年，苏共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发了党争、政争、派别之争和民族间的争斗，这都加剧了苏联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的局面，使得正常的经济建设难以继续进行。

苏共领导地位和权威性的丧失导致从中央到地方的经济管理体系遭到破坏，管理上造成“真空”。新成立的各级政府包括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国家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不能适应，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不知所措，而调整后的党的机关不再决策社会经济事务，因此出现了三不管局面：党无权管、政府无力管、苏维埃不知怎么管。各共和国的地方割据和封锁破坏了生产联系和协作关系，造成经济更加无序和混乱。1991年起的罢工风潮造成了明显的经济损失。1990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4%，是战后以来苏联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1991年苏联国民收入进一步下降15%，[37]当时政府负责经济的领导人感叹道，1990年和1991年苏联经济的急剧下降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后果。

戈尔巴乔夫热衷政治改组、不愿在经济上辛勤劳作的所作所为，也可以从苏共高层会议和决策的情况中看出来。1988年至1990年的两年间，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到苏共二十八大，苏共一共召开13次中央全会，其中只有一次专门讨论经济问题（即1989年3月的中央全会讨论农业问题），其余全都主要讨论政治改组和权力分配问题。在此期间，还召开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三次全国性的选举活动（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加盟共和国人民代表和苏共二十八大代表），并对宪法做了两次重大修改，进行过两次以上的共和国和全苏范围的全民公决投票。在彻底改组政权的过程中，苏共被日益边缘化，苏维埃、政府的作用被忽视，而戈尔巴乔夫却由担任党的总书记，先后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总统、最高统帅，最后甚至被赋予特殊全权——实行总统直接治理。经济发展不见成效，政治改组如火如荼，游行、示威、罢工、民族流血冲突此起彼伏，这些都是在改革和“民主化”的旗号下进行的。

（二）经济失控

1988年，随着苏联政治改革如火如荼，整个苏联社会沸腾起来，而经济形势却迅速恶化。仅在1988年一年中，戈尔巴乔夫就在经济决策上出现五大错误，使得苏联经济一下子落入深渊。俄罗斯学者、已故俄罗斯当代史和国际问题专家阿·乌特金在其2009年出版的《总书记背叛：败逃欧洲》一书中分析指出，正是这五大致命的错误决策，使得苏联经济坠入崩溃的边缘。

第一是盲目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戈尔巴乔夫好大喜功，下令国家计委确定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加2.8%。在总书记的压力下，1988年11月，财政部

长宣布苏联的预算赤字降为600亿卢布。1989年，预算赤字已经达1000亿卢布。戈尔巴乔夫寅吃卯粮，一方面开动印钞机，另一方面大举外债。戈尔巴乔夫把借债视为西方相信苏联的象征，但西方却口惠而实不至。

1988年戈尔巴乔夫所实施的第二大致命的举措是强行出台《国有企业法》，放弃对企业的约束。其结果是在没有真正的市场而经济又短缺的情况下，企业借机肆意涨价。自行其是的企业领导人得以挣脱了党和国家的控制，一起摧毁了苏共的管理体系。

第三大致命的举措涉及行政管理体制。1988年，戈尔巴乔夫要彻底改变管理体制。戈尔巴乔夫宣布，"党的工作是意识形态"，不允许政府官员干预生产和经济活动。国家再也不能养活150万寄生虫似的国家官员。很快一些部门被解散，仅仅在一年内中央部委的人数从170万削减至70万。

第四大致命举措是打乱了苏联的外贸秩序。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头脑发热，宣布"经互会"内部实行用西方的硬通货结算。这很快导致了"经互会"成员之间的经贸关系混乱不堪。缺少外汇使得这些国家经济联系几乎中断，而苏联80%的外贸是通过"经互会"进行的。

彻底改变苏联命运的第五大致命举措是在1988年10月爱沙尼亚宣布主权后采取的。之后，各地纷纷拒缴税收，有的甚至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统一的苏联经济空间变得各自为政、以邻为壑、四分五裂。

国内局势失控，到处乱作一团。戈尔巴乔夫急忙向西方大国哀求经济援助。此前，戈尔巴乔夫十分相信西方"神圣的诺言"，相信苏联在裁军、两德统一等方面的巨大让步，能够换来西方对他的支持，相信西方外汇援助会像下金子雨一样落下来。

1991年3月底，戈尔巴乔夫请求布什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戈尔巴乔夫说，如果美国不提供援助，俄罗斯冬天可能出现饥荒。可是，布什总统冷漠地说："我想，最好等一等事态的发展。"4月底，布什对苏联总统喋喋不休的援助请求已经很生气："应该给他上一堂古典经济学课。生意是生意。"

1991年春天，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回忆道：戈尔巴乔夫幻想奇迹的发生，幻想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并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援助。他认为，他们为了拯救小小的科威特而攻打伊拉克花费了数千亿资金，而对俄罗斯，他们几乎承诺了不封顶的援助，并且200亿—300亿美元也算不上一个大数目。因为，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为他们省下的资金数额，要比这个数目大得多（由于结束冷战而省下的资金按1991年价格为3万亿美元）。当时西方的外交官都为戈尔巴乔夫的肤浅和可怜感到震惊。

1990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在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又一次向西方恳求经济援助。美国副总统丹奎尔在访谈中声明，任何大规模的经济援助都是不可能的。

1991年6月2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道破了西方设下经济“诱饵”的政治目的。尼克松称，“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是要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促进建立民主政府、市场经济和俄罗斯及非俄罗斯民族实行自决。”参与苏联经济改革“500天计划”的美国人费尔希曾说，西方不会拿出大笔款项来兑现诺言。西方将开始一个进程，在进程结束后（如果是成功的）才提供大量援助，西方想要拥有的是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改革几年后，戈尔巴乔夫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也走向尽头。1989年苏联国家财政收入、社会劳动生产率、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众消费品产量等计划指标均未完成。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非但没有使苏联摆脱经济停滞的困境，反而加剧了苏联经济的危机。消费市场、经济关系、交通运输、国家纪律均出现混乱与失灵，有关所有权、自主权和职权范围划分等问题的政治冲突日益严重，犯罪现象持续增加，经济社会的危机继续深化。戈尔巴乔夫曾向人民许愿：“当人民感觉到食品供应出现了重大变化时，这就将是对改革和我们呼吁人民所做的一切的最好宣传。”[38]然而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非但没有提高，到后来反而连最基本的日常用品也开始出现严重短缺。国内市场空前紧张，1200种基本消费品中，竟有1150种经常断档缺货，财政赤字已高达581亿卢布。与此同时，苏联中央内部以及俄罗斯联邦政权等各方力量围绕经济改革是选择“500天计划”还是“休克疗法”方案的较量也更加激烈。实际上，上述方案均以西方上千亿美元的援助为前提，企望采取激进的改革手段，谋求一夜间形成西方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只能是天方夜谭。

五、民主迷途与亡党亡国

短短6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推行以“民主化、新思维”为旗号的修正路线，非但没有革新苏共、给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反而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戈尔巴乔夫“民主化”的改革引来的是叶利钦时期野蛮资本主义的倒退和“鲍利斯沙皇”专制的复辟。理论上诱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妖姬”，吞食和埋葬了苏联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换来了横蛮的“官僚和寡头的资本主义怪兽”，倒退到犯罪猖獗、黑势力猖獗的原始资本主义泥潭。

其一，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使苏联经济走出停滞状态，

反而触发和加深了苏联的经济危机。戈尔巴乔夫留下的“首先是这个被称作苏联的世界大国分崩离析，第二个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第三个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39]

其二，犯罪猖獗、无政府主义泛滥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又一大恶果。在戈尔巴乔夫的倡导下而成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于后来政治派别的争权夺利，许多问题议而不决，延误时机，各级苏维埃几乎变成了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场所。特别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极端势力进入苏维埃后更是欲置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于死地而后快，造成社会严重动荡不安。而此时戈尔巴乔夫一味与激进派妥协，急于建立总统制，企图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寻找灵丹妙药。然而，苏联并未出现戈尔巴乔夫所期望的“权威的立法机关、强有力的总统、高效率的政府、独立的法院”等情况，反而是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持续混乱，政府濒临瘫痪，社会持续混乱，犯罪率上升。1991年3月，苏联内务部和国防部在公告中指出，“重大犯罪的数量在增加，而且常常带有肆无忌惮的卑鄙下流性质。袭击内务部机关工作人员、军事设施、哨兵、单个军人及其家属的事件日益增多”[40]。

其三，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的苏联各共和国公然违抗苏联宪法和法律，与中央开展“法律战”“主权战”，纷纷声明其法律高于联盟法律，这在任何一个联邦国家都是闻所未闻的。为了效仿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一些地方领导人纷纷自命总统，以至于一时间一个国家内竟然出现了20多位有总统称号的官员。

其四，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不但没有带来民主和自由，反而导致了严重的政治衰退。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没能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没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会形势却持续恶化，政局动荡不安，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最终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否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选择的政治道路。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居民中承认“俄罗斯是民主社会”的比例越来越小。连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化”进程遇到挫折，民主的成果被俄罗斯当权派篡夺，俄罗斯当权者“损害人权、压制民主”。

俄罗斯政治学者亚·叶利谢耶夫写到，俄罗斯文化历史上缺少民主思想的浸淫，“民主”常常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非叶利钦等“民主自由派”的理想和追求。叶利钦时期的自由民主派表面上打着西方民主的旗号，实际上是将“民主、民族自决”等口号作为他们打败苏共的手段。苏共失败后，自由民主派曾期望使用“这种民主体制”能够比苏共模式更有效，但20世纪90年代近10年的“民主化”实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并不了解

民主的真谛，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向往。

其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是深重的民族灾难与沉重的政治遗产。2005年和2007年，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曾两次强调，他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悲剧，也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其六，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原有的国家政治制度，而且意味着丧失了一系列历史信仰。当然，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最大的失败在于亡党亡国，引来了俄罗斯野蛮、犯罪的资本主义。2005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14周年。在2005年的10月份，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57%的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避免的，66%的人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76%的居民认为苏联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盛行一时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这样的概念不再有吸引力：60%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西方模式对俄罗斯没有好处。

与在俄罗斯境内的境遇相反，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仍是天使。至今西方社会仍然称“戈尔巴乔夫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戈尔巴乔夫至今仍是西方的座上宾。2009年，戈尔巴乔夫还接受了美国总统授予的“自由”奖章。

1991年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道：“仅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41]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宣布辞去苏联总统时的电视讲话中称，他“对从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确信不疑”。[42]

十多年过后，2006年，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在第五期刊登了中国记者对戈尔巴乔夫的专访。访谈中，戈尔巴乔夫言称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他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

---

[1]http://www.kp.ru/daily/24454.3/616824/.

[2]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实际上含有“改造、改建、重建”等意思，与通常使用

的“改革”（реформа）不同。戈尔巴乔夫1986年4月在一次外出讲话中第一次使用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后来“改革”一词与“公开性”“新思维”等词汇成了戈尔巴乔夫自造和专属的政治名词。在英语、德语等文献中，“改造”“公开性”等俄语词汇一般采用音译标注。20年来，中文习惯将其翻译成“改革”。为便于阅读，这里沿用这种译法，但提请读者注意其特有的含义。

[3]МихаилГорбачев:Мывывелистрануизтоталитарногорежима.[EB/OL].（2010-04-23）http://www.gorby.ru/rubrs.asp?art_id=27393&rubr_id=21&page.

[4]Stephen F.Cohen，Soviet Fates and Lost Alternatives:From Stalinism to the New Cold War[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328.

[5]张树华。普京严词否定叶利钦时期的政策[M]//2007年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跟踪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40.

[6]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

[7]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1.

[8]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5.

[9]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23—424.

[10]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M].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3.

[11]俄罗斯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这代人出生在1927—1933年，被称为“金色的一代”。因为1918—1926年出生的男性参加了卫国战争，不少人战死在疆场。而戈尔巴乔夫一代是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又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开始步入社会。参见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M].莫斯科：角度出版社，2002：56.

[12]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71.

[13]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M].徐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227.

[14]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M].吴乃华，魏宗雷，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162、164、169.

[15]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M].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65-66、76-77.

[16]尼·克拉斯尼科夫。中情局用经济绊倒苏联？——西方特工机构插手摧毁苏联[N].共青团真理报，2010-12-8.

[17]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M].吴乃华，魏宗雷，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244.

[18]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N].真理报，1988-7-1.

[19]亚·尼·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旋涡[M].莫斯科：瓦戈利乌斯出版社，2000：256.

[20]参见1990年春由刚刚赢得选举的莫斯科民主派主办的杂志《首都》周刊；［苏］亚·齐普科。我们的原则好吗[J].新世界，1990（4）.

[21]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8.

[22]安·米格拉尼扬。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M]//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68—269.

[23]叶·库·利加乔夫。警示[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284.

[24]叶利钦总统的讲话[N].消息报，1991-11-28.

[25]弗·索戈林。现代俄罗斯政治史[M].莫斯科，1994：55.

[26]江流，等，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57.

[27]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戈尔巴乔夫言论选录（政治部分）[G].北京：92.

[28]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90-2-5[G]//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3、4.

[29]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行动纲领草案[G]//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42.

[30]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90-2-5[G]//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4.

[31]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行动纲领草案[G]//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31.

[32]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90-2-5[G]//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13—14.

[33]吴恩远。从共产党的先进性看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历史原因[M]//苏联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47.

[34]Д.Л.兹拉托波里斯基。摧毁苏联[M].莫斯科，1998：24.（ЗлатопольскийД.Л.РазрушениеСССР.М.，1998：24.）。

[35]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69.

[36]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M].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69.时至今日，戈尔巴乔夫依然为自己开脱，认为他的改革之所以失败，除叶利钦等势力的干扰外，来自苏共的阻碍是关键因素。他后悔没有一开始就下手对苏共实施“彻底改革”。例如，2010年4月6日，在“改革”25周年之际，俄罗斯《独立报·政治专刊》刊登对戈尔巴乔夫的专访。记者问：“有人指责您把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从宪法中删除了，而且您却没有把国家管理现代化的工作进行到底。您同意这些说法吗？”戈尔巴乔夫回答：“我以为（我看成是自己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及时改革苏共，这导致苏共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进程的障碍。”

[37]江流，等，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08.

[38]江流，等，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02.

[39]江流，等，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09.

[40]同上197.

[41]黄宏，纪玉祥，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717.

[42]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M].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

第十二章　民主畸变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主化”波涛如潮起潮落，来去匆匆，政局变幻与社会动荡足以令世人反思与感叹。俄罗斯选民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后来又变为“拒绝民主”[1]也不过是几年的时间。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居民对这种“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政治变革很快感到厌倦。俄罗斯选民之所以祈望西方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常常将“民主与西方的生活富足”联系起来，然而现实生活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俄罗斯人在苏共时期不好过，以为在民主制度下将会好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虽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却更困难了。”[2]苏共下台后不到几年的时间，俄罗斯民主派的光环就已经变得黯淡了。长期驻莫斯科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写道：“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1992—1996年之后，‘民主派’一词和妓女一样，已经成了不加引号的骂人话。”[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过度自由化已经感到厌倦的俄罗斯选民开始怀念秩序和稳定。俄罗斯百姓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几百年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又一个“混沌时期”。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居民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仓促而草率的“公开性”“民主化”埋葬了苏共、葬送了强大的苏联，[4]接下来叶利钦近十年的“民主化”试验的结果表明，最终受益的只是极少数财阀、寡头，而绝大多数百姓被愚弄、被抛弃。

戈尔巴乔夫的过度“民主化”没能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没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社会形势却持续恶化，政局动荡不安，最终使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导致政权瓦解。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现实表明，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三权分立名不副实，政党制度还不完善，选举制度存在不少弊端，法院司法尚待重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财团参与政治，寡头政治盛行；黑金政治，家族、帮派“暗箱”操作；新闻媒体被财团控制，恣意妄为；腐败蔓延，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动乱，政局不稳。上述事实说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主化”不成功，政治“休克疗法”没有促进政治发展，反而造成严重的政治衰退。

一、民主神话与转型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俄罗斯政治变革，特别是“民主化”转型的研究成为俄罗斯国内，中国学术界以及西方学者共同关心的热门课题。由于研究者分析角度不同，加上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西方学者、特别是一些研究一般政治发展和民主理

论的政治学家习惯从“民主化”的角度观察俄罗斯政治。他们断定，苏联的解体、苏共的解散意味着俄罗斯民主时代的来临，从而与其他国家一起汇成了20世纪末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5]弗兰西斯·福山等人为此欣喜若狂。他们认为，这可谓是“不战而胜”，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覆灭和民主化第三波的兴起”，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是历史的终结点”等。[6]

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政局出现多次反复，腐败、暴力等现象不断，这些令习惯以“民主样板”来衡量或诠释他国现实的西方政治学家十分沮丧，他们对俄罗斯的态度也180度地大转弯，由原来的欣喜变成现在的指责或咒骂。面对俄罗斯的政治现实，他们使用的民主理论框架又一次落入了尴尬的窘境：他们不能解释，俄罗斯“民主化”的落潮是民主的短命，还是有悖逻辑和现实的一次“泡沫”。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俄罗斯社会“中左翼”力量的一度复兴，特别是普京总统着力整顿政治经济秩序、实行“可控民主”以来，西方主流社会开始有些惊慌失措。一些西方媒体叫嚷“俄罗斯民主正在倒退，警察专制开始降临”。有些西方学者认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既没有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又没有出现真正的西方民主制度。[7]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西方世界批判俄罗斯的文章比比皆是，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西方只有懒汉才不骂俄罗斯”[8]。

俄罗斯社会内部对苏联的解体以及近些年的政治剧变也是评价各异，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政治评价也大相径庭。由于社会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加上一些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存在较大的差异，政治学者对社会局势的评价很难达成共识，对未来政治道路的设计也常常是南辕北辙。

苏共败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学研究一度兴盛起来。20世纪90年代，激烈的政治变动诱发了其他学科的人纷纷转到政治学研究中来。一般认为，俄罗斯政治学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专业：一是历史专业，特别是世界现代史专业；二是科学共产主义专业或苏共党史专业，一般以教师居多；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专业；四是国家与法律专业的研究人员；五是来自部分新闻专业或原领导秘书、助手等。

在俄罗斯政治学研究队伍中，源于历史专业的学者注重罗列政治事实、记述政治事件、评价政治人物；一些原科学共产主义专业的教师，则借助自己外语特别是英语的优势，积极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术语和理论，编写政治学教科书，使用西方政治学术语分析或描述当今俄罗斯的政治现实；自马克思哲学研究转行而来的政治学者则专注于哲学地描述或思考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探求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部分作家、新闻记者或领导秘书和助手则进行政治人物分析，或书写领袖传记。

与俄罗斯学者常陷于现实政治漩涡不能自拔相比，中国学者应当是“旁观者清”。在研究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治进程时，我们应当关注那些带有浓重俄罗斯“特色”的政治现象，如“财阀、寡头”问题、帮派政治问题、政治精英蜕变和循环再生问题、影子政治问题等，除此之外，更应当加强对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总体评价和研究，利用俄罗斯十多年来政治变化过程中涌现出的大量资料和事实，对一些政治理论和概念，特别是“民主、民主化、政治发展”等国际上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在国际学术界，像前些年冷战结束后“转型经济、转轨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一样，政治学研究中有关“政治转型”的研究也成为国际上政治学科的热点。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研究机构纷纷以苏联、东欧国家为对象，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评价和观察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囿于政治立场和学术背景的差异，西方国家学者在研究原苏东国家的政治转型时还是受制于“（东方）独裁专制——（西方）民主自由”的分析框架。与袒护和接纳完全倒向西方阵营的波兰、捷克等“依附性”国家不同，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多持蔑视和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叶利钦之后没有真正实行以西方为样板的民主政治模式，俄罗斯政治转轨不力，甚至有回归苏联制度的嫌疑。

西方政治学者的武断和偏执，多是出自意识形态偏见和地缘政治利益。这也影响了西方国家这些年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西方阵营多次冷面拒绝了俄罗斯“回归西方、走进欧洲”的请求。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不顾俄罗斯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几次暗地在苏联地区策动“颜色革命”，这不能不激化与俄罗斯的政治矛盾和外交对立。

如何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治改革和发展问题，如何处理好“民主、稳定和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政治学研究者需要回答的现实理论问题。而西方学者对俄罗斯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的研究不能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外交利益的束缚，这样很难得出有建设性的、有逻辑价值的学术结论。

研究国际问题，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观察俄罗斯政治转轨和“民主化”，应深入挖掘其政治素材，同时不应回避对一些基本政治理论问题的思考。戈尔巴乔夫发动政治“改革”，在总共不到6年的时间里搞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叶利钦掌权近9年，高举反共大旗，推行经济全面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现在，连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也承认，西方学术精英开出的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已经在俄罗斯失效，[9]西方的“民主转型”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俄罗斯以及一些非西方转轨国家的政治现实。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剧变和民主化转型，展示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潮起潮落，剖析其中的成败与得失。

二、民主幻影与政治冒进

1989年以后，一场席卷原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民主化”浪潮不仅为这些国家的理论界和学术界所始料不及，就连一直观察和鼓吹推行“全球民主化”的西方政治学家也感到意外和惊讶。

苏东剧变后，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之家”组织急忙出版年度报告，宣称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目已由1972年的42个变为1991年的75个，[10]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39%。然而时不过两年，正是这个组织在1993年以“民主在退却”为题，不得不承认世界的“民主国家”数目在减少，生活在所谓“自由国家”的人数也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9%。

1993年12月，西方著名政治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表了题为《民主发展的前景：由扩张到巩固》的演讲，坦言“已经很难将高加索地区的原苏联共和国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国家列入民主国家之列”。不仅如此，他认为，俄罗斯社会的民主前景也不令人乐观。这位以“文明的冲突”“第三波”等论点闻名于世的西方学者接着强调，鉴于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种种困扰，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民主也处于“危险”之境地。[11]

在俄罗斯，由于整个20世纪90年代政局跌宕、冲突不断，官员贪污盛行，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再加上经济下滑近半的空前灾难和社会治安混乱，导致“民主化”“民主派”等词汇失去了原有的魅力，人们开始怀疑“自由派”所宣称的“民主制度”的真实性，怀疑西方式“民主”能否解决摆在俄罗斯社会面前的众多难题。

经历了短暂的民主梦之后，俄罗斯大多数百姓发现，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社会陷入各种危机之中，一些领域甚至濒于灾难的境地。经济多年严重倒退，民主政治神话已经破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一些舆情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老百姓中多数人并不认可“俄罗斯是民主社会”。1996年，60%的俄罗斯人认为民主化在俄罗斯遭受了失败，50%的人拒绝将俄罗斯社会称为“民主社会”，同时一半以上的人不承认掌权者为“民主派”。[12]

一项国际性的社会调查也表明，与西方社会通常50%的民主满意度相比，俄罗斯人对民主进程的满意度逐年下降。1991年11月，俄罗斯人对民主的满意度为15%，5年过后，1996年11月，该项指标下降为8%，而不满意的比例超过80%。[13]

60%—73%的俄罗斯人认为，当今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不是民主制度，俄罗斯人民需要民主，但掌权者破坏了民主的声誉，当今的“民主政权”与维护

多数劳动者权利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2000年10月，“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就俄罗斯人对民主和市场的态度等问题，对俄罗斯33个地区、83个居住地的1600个被调查者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对“你认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是民主社会吗？”这个问题，调查结果如表12-1所示。

表12-1　你认为当今俄罗斯是民主社会吗？

是	26%
不是	54%
没有回答	20%

资料来源：2000年11月9日（http//www.polit.ru）.

苏联解体后，表面上，俄罗斯与过去的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彻底决裂，俄罗斯自此踏上与西方社会同样的“民主自由之路”，但是，10年过去了，俄罗斯大多数居民并不接受现行的政治制度（见表12-2）。

表12-2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百姓对政治制度的态度[14]

调查时间 备选答案	1994年5月	1995年5月	1995年11月	1996年1月	1996年5月	1997年1月	1997年8月	1998年12月	1999年11月
完全同意现行政治制度	3	3	1	2	5	3	4	2	3
有不少缺点但可以改进	45	25	34	37	43	35	40	32	37
应彻底改变现行政治制度	43	43	40	40	31	43	38	49	42
难以回答	9	29	25	21	21	19	18	17	18

三、民主：从浪漫到毁灭

1985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推行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旗号的“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政策。之后在6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非但没有革新苏共和社会主义，也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反而彻底葬送了苏共和苏联，成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霸权。20世纪80年代末期，轰轰烈烈的戈尔巴

乔夫民主化运动，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民族流血冲突，造成统一的国家分崩离析。而几年后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叶利钦上台，他打着效仿“西式民主、西式自由”的旗号，却将俄罗斯社会导向野蛮资本主义、“鲍利斯沙皇”独裁和寡头政治。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经一度在苏联社会鲜艳诱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妖姬”，吞食和埋葬了苏联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换来了俄罗斯蛮横的“官僚和寡头的资本主义怪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使俄罗斯陷入“权钱勾结、黑势力猖獗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泥潭”。

1998年4月7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描述当时的俄罗斯社会是“一个由无政府状态和民主政治、个人独裁和政体混乱、垂死的福利经济和寄生的资本主义、政治精英对原超级大国地位恋恋不舍的怀旧情绪和公众对旧的帝国野心的厌倦等组成的‘大杂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新思维”政策的刺激下，原苏联制度内的反对派政治情绪逐渐激进化，叶利钦作为原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由于政治纠葛和仕途受挫，开始向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软弱”的中央政权挑战。[15]在思想意识和政治口号方面，叶利钦等新生“激进民主”势力对七十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持否定态度：否定苏共，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完善社会主义、使其人道化、民主化”的努力逐渐走向失败，这使得一条逻辑简单至极的推理鲜明地印在掌权的“民主派”头脑中：既然苏联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的比赛中败北，既然苏共改革和完善这种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只有完全抛弃这种制度，全面照搬和推行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体制。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16]此时在俄罗斯的官方舆论中到处充斥着打碎旧制度、与社会主义决裂的声音。自由派先锋波波夫和盖达尔甚至直言不讳要抛弃社会主义模式，移植资本主义，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17]

1988年以后，经过短短3年时间的政治较量，被称为“民主之父”[18]的叶利钦击败了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摧毁了苏联，登上俄罗斯总统的宝座。而后，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自此彻底埋葬了苏联共产主义，正跻身西方文明、民主国家之林。然而，恰恰是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政局跌宕起伏、党派斗争不休，寡头干政，媒体失控，在“全民公决”和“全民大选”的背后，贪污腐败空前绝后，刑事犯罪大行其道，黑社会现象猖獗。梦想加入西方民主大家庭的俄罗斯，等来的却是“野蛮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

对于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所谓民主变革，原苏联部长会议

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说："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千百万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许多人都在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的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的是历史的必需和必然吗？""人民终于明白，原来第一拨'民主派'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们"。[19]

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的政治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1年到1993年，在这一阶段，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全面崛起，瓦解了旧体制并全面推进激进改革。但取得胜利不久的"民主派"旋即发生了严重分裂，以宪法制度、经济改革等问题为中心，形成了以叶利钦总统、政府为一方和以最高苏维埃为另一方的政权对立。"双重政权"最终于1993年以叶利钦"炮轰白宫"、逮捕反对派、解散最高苏维埃的方式结束。第二阶段从1994年到1996年，在这一阶段，由于车臣战争的爆发和人权等问题，民主派内部进一步发生分裂。同时，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打出民族、爱国的旗号，力量迅速壮大。叶利钦的威信降至低点。第三阶段从1996年夏到1999年末，在这一阶段，叶利钦通过"黑金"勉强赢得大选，再次掌权，但由于疾病缠身，难以理政。金融寡头、"家族势力"、少数亲信操纵政权，财阀和近臣为争抢权力、瓜分财富大打出手，政局跌宕起伏，政府被多次改组。1998年夏天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以叶利钦为首的当局遭到严重的挫败。与俄罗斯的政治进程相对应，俄罗斯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势头也潮起潮落、飘摇不定。在经济生活中，叶利钦启用盖达尔和西方经济顾问，采用以稳定财政、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休克疗法"，尽可能迅速和彻底地摧毁旧体制和旧所有制关系，以清除社会主义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尽快形成一种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一个强大的有产者阶层，以增强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20]盖达尔认为，在价格改革问题上的犹豫不决葬送了苏联政府和联盟本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之后正是彻底的价格改革葬送了"盖达尔政府"。

在联邦制和民族问题上，苏联被瓦解后，激进的改革派庆幸甩掉了其他加盟共和国这一包袱。甚至为了迎合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地方分离势力，叶利钦公开宣称："地方能吞下多少主权，就可以拿走多少。"在外交方面，俄罗斯全面向西方"一边倒"，力争同西方建立"伙伴"和"盟友"关系，以期换取西方对俄的经济援助。

俄罗斯政治学者威廉·斯米尔诺夫在《俄罗斯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一文中指出，"就其性质而言，这属于一场反革命政变。这场政变的绝大多数拥护者都曾浪漫地相信，同时对苏联政治体制实施全面拆除，在经济领域进行激进的市场改革，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进而实现俄罗斯的变革，激进民主派认为"在摆脱了共产党政权之后，必须利用这个短暂

的‘机会之窗’大开的时期，对国家上层体制进行最迅速和根本的变革”[21]。

伴随着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改组行动的狂飙突进，俄罗斯经济不但没有实现市场充裕，反而陷入全面的休克。1992年初开始实施的“休克疗法”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对旧的经济机制的破坏和为市场关系腾出发展空间的工作进行得迅速而广泛，但是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5%，工业生产下降18%，固定资本投资大约下降了40%，[22]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储蓄所中的存款迅速贬值，而国家组织和企业工作人员的工资涨幅缓慢，通货膨胀速度明显超过了工资增长速度。

但正是政府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严重失误，直接导致了“民主派”内部的分歧与矛盾，社会各界对政府政策也展开了激烈的批评。1993年前后，中左派政治势力提出的停止野蛮私有化、加强国家调节作用、实施社会保护的主张并未引起盖达尔等“激进改革家”的重视，这进一步导致“民主派”阵营的分裂和政府与议会之间新的权力斗争，俄罗斯政坛上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以“民主派”为主要支柱的执行权力机关与以各种反对派为后盾的立法权力机关，围绕着新宪法的制定和国家体制选择问题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

与此同时，面对社会急剧转轨中出现的大量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浪漫的民主”显得无能为力。由于民主权利的滥用，各级新的政权体系几乎陷于瘫痪，各地频发“法律大战”。各种黑势力乘虚而入，大行其道。当时的副总统亚·鲁茨科伊大声疾呼：“俄罗斯的‘民主’正在变成无政府主义，变成街头政治的专政。”[23]激进的民主派发现，恰恰是他们极力推崇的民主制度剥夺了他们实施自己改革政策的权力，限制了他们的手脚。浪漫的民主之梦破灭之后，激进的民主派开始推崇权威主义模式。此时的叶利钦从为“民主”而战，转为为权力而战。他并未被他所崇尚的“浪漫民主”束缚住手脚，1993年10月，坦克开进莫斯科街头，炮打“白宫”，解散最高苏维埃，逮捕了副总统和议会议长等人，同年12月，强行通过了为自己定制的、以加强总统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新宪法。

1993年，经全民公决产生的宪法虽然正式把西方民主政治作为宪法的根本原则，以所谓的人民主权、联邦制、共和制、分权作为宪法制度的基础，但也正是这部宪法确立了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尽管宪法的制定运用了法国和美国许多经验，甚至较全面地确认了人权和自由，但从宪法构建的角度说，新的政治体制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政治体制的基础不是被正式赋予国际公认的所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享有主权的人民和公民，而是总统制。”[24]

为走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泥潭，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最后选择了依靠武力驱散议会的方式，形成了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权体制。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的政治现实和经济衰败打碎了俄罗斯人的民主梦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政治转轨主要是围绕政治进行的，俄罗斯百姓除了一些虚幻的民主意识外，基本上没有参与政治进程，新政权中占多数的仍是旧时的权贵。经历了短暂的民主之梦后，俄罗斯人民回过头来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现梦想加入西方大家庭的俄罗斯等来的却是“野蛮的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不但国力急剧下降、政局反复、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而且国家的完整与统一都受到巨大威胁。俄罗斯人民开始怀疑“民主派”宣称的“民主制度”的真实性，开始怀疑从西方移植来的民主是否能够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所实施的激进政治改革表明：一方面“民主派”对“自由、民主、市场”的主张只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简单化，“追求的是对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西方社会体制模式的重建，甚至是对革命前俄国的复兴”[25]；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主化”与“市场化”政策依靠“革命式”的手段去实施，“民主俄罗斯”运动联合主席之一列夫·波诺马廖列夫就说过，“要用革命的速度去分配土地和组织工业、商业的私有化……要像叶利钦在政变期间（指1991年8·19事件）的做法那样行事”[26]。这种脱离国情、幻想一蹴而就的政治改革注定要遭到挫败，不过是昙花一现。20世纪末，这场俄罗斯民主化浪潮来势凶猛，却黯然退场。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近10年的自由民主运动成就了总统专权和寡头干政，破坏了政治稳定，失去了治理效率，击碎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民主梦想。寡头式民主、财阀当政、总统家族式的统治，10年间，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一些政客“你方唱罢我登场”，说唱着各种政治言辞，试穿不同颜色的政治外衣，显得热闹非凡。唯独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被迫游离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边缘。

四、民主化？黑帮化？寡头化？

叶利钦执政时期，罗斯政治转轨的一个特点就是“破坏”有力，而“建设”无术。叶利钦摧毁了苏共建立的苏维埃体制，却没有建立起另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上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法律的缺失与国家权威的衰落，俄罗斯的政治转轨伴随着大量的新伤与痼疾，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一）民主宪政下的“超级总统制”

1993年12月，匆匆而就并强行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俄罗斯总统拥有超乎寻常的权力：总统掌握外交、国防、内务，甚至包括直接指挥经济以及任

命政府总理的权力，支配着全国重要干部的任免；在司法权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宪法法院院长及总检察长人选均要由总统提名；总统有权独立做出解散议会的决定，无须同总理及议会两院议长磋商；总统发布的命令，无须总理或有关部长签署；总统可以决定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的基本方针。民主宪法确立了“强总统”和“弱议会”的政坛格局。按照俄罗斯宪法，俄罗斯总统掌握的权力比法国或美国总统掌握的权力更大。俄罗斯总统是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总统主持召开政府会议，实质上领导着政府工作。总统可以对外宣战，并且只要将他的决定通知议会，议会便不能否决，而在美国，是由国会正式对外宣战。俄罗斯总统制定国家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这一点与法国总统一样，而美国总统在这方面要显得“逊色”。俄罗斯总统直接领导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等所谓“强力部门”，而不必通过总理。

在三大权力机关的关系上，虽然俄罗斯仿照美国宪法宣称三权分立，但俄联邦总统实际上是凌驾于三大权力机关之上的。任何一个权力机关——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在与总统的相互关系上都不是独立的，三大权力机关的相互关系也是由宪法授予总统全权协调的。实际上，这一协调功能是通过总统，首先是总统办公厅来完成的，甚至议会的预算也由总统办公厅控制。

在俄罗斯，由总统提名总理人选，如果议会连续三次否决提名，总统有权解散议会，重新组织议会大选，法国总统拥有与之相当的权力，而美国总统则不能解散国会。像法国一样，俄罗斯总理负责任命部长，但实际上，总统可以自己改组政府，他还可以不经议会同意便解散政府。总统还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发布戒严令，只需经议会上院批准即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议会只能批准总统的决定。总统颁布的“总统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议会无法监督总统，甚至对政府的约束也只限于批准预算。宪法法院、最高法院、仲裁法院的法官由总统建议，而其他联邦法官则由总统任命。总统机构还控制着包括上述三法院、议会的财权和物权。[27]

虽然宪法中有对总统弹劾的条文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弹劾程序不可能完成，这实际上使得三大权力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制度变得形同虚设。唯一弹劾总统的办法是指控他叛国或严重犯罪，但至少要有1/3的下院（国家杜马）议员提出动议，并要获得2/3的多数，指控才能成立，即使如此，还必须得到最高法院的核准。按照俄罗斯新宪法，要弹劾总统是十分困难的。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共产党曾在其力量的鼎盛时期，期望凭借其在议会中的多数，启动弹劾程序，结果也是无功而返。为保证叶利钦总统职位不受挑战，“民主”新宪法还特别取消了相对独立的“副总统”职位，这样一来，总统便又有了自己挑选接班人的权力。[28]

俄罗斯学者指出，1993年新宪法所确立的超级总统制赋予总统比原苏共中

央总书记、比任何西方国家总统大得多的权力。在这种总统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国家各方面的大政方针，如国有经济私有化纲要等都可以依靠总统个人的决策，这导致了政治失衡。20世纪90年代后期，叶利钦常常在电视上即席签署“总统令”，来绕过议会，强行实施私有化政策。俄罗斯总统的“强权政治”不仅缺少监督和制衡，也给国家治理埋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后来的实践证明，随着叶利钦健康情况的恶化，基本上不能履行其正常的总统职责，俄政坛的“真空”状态引发了政治精英激烈的政治较量，削弱了国家的权威与能力。这种“没有强总统的强总统制”的怪胎与民主背道而驰，俄罗斯被弱化的国家权力既不能从制度上推进民主和治理，也不能在实践中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二）“民主斗士”与“鲍里斯沙皇”

在苏联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叶利钦是作为反抗“专制、保守”的民主斗士而闻名的，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主化浪潮的“旗帜和领头人”。一些分析者在对叶利钦的政治经历进行跟踪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民主派代表人物叶利钦除具有一些模糊的改革的直觉外，更多追求的是权力。一般从外界来看，叶利钦是对苏共旧体制和官僚治理方式的反叛，而内心的思想意识和后来的执政方式与民主思想又相距甚远。他对民主、市场、改革的理解多是限于直觉的感受，如“美国先进而悠久的民主制度”，“休斯敦的超市货架上数不清的各种美味香肠”。[29]叶利钦常常醉心于欣赏少壮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满腹经纶和侃侃而谈，但缺少对整个社会和经济改革过程的布局谋篇。

1993年的十月冲突给俄罗斯民主罩上了“阴影”。通过“炮打白宫”，叶利钦的政治生命在又一次生死的交锋中获得了新生。新宪法确立了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威，俄罗斯成为总统制国家，议会的权力被大大削弱。

1994年以后，人们发现叶利钦的政治形象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在连续几年的致议会“总统咨文”中，前些年“反专制”“反特权”的口号，已经换成了维护“总统的权威”和“国家的秩序”。叶利钦在1994年的新年致辞中说：“俄罗斯一定要强大。要有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你们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总统。”民主、民主，所有人是“民”，只有叶利钦是“主”。在俄罗斯，经常有人将叶利钦称作“鲍利斯沙皇”。叶利钦也乐此不疲，对年轻的内阁成员常以父辈自居，希望从中看到自己的“接班人”。曾被叶利钦选为“接班人”、担任过政府副总理的涅姆佐夫认为，“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现代民主社会，而更像是一个旧式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叶利钦心目中只有“权力”。叶利钦的原新闻发言人科斯济科夫写到，权力是他的生活、是他的生命、是他的思想、是他的一切。叶利钦在自己出版的自传《总统马拉松》（中文译《午夜日记》）中承认，他之所以要撤换总检察

长是因为“在俄罗斯谁也不能使他按照别人的规则去行动”。[30]

当然，也有人认为，对叶利钦的评价应该五五开。叶利钦既有维护权力的愿望，也有推进改革的考虑。在问到“叶利钦是想为俄罗斯做些什么，还是出于夺取政权，报复那些侮辱他、撤他职务人的欲望”时，原叶利钦的宠臣、首任俄罗斯外交部部长安·科济列夫说：“两者都有……当然，叶利钦不是萨哈罗夫。他从来都不是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九十的民主派改革者，但认为他是贪权者也是不公平的。”[31]

（三）多党林立与“沙发党”现象

在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中，多党制被认为是民主体制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俄罗斯现行宪法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俄罗斯独立后已经基本完成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但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多党政治暴露出诸多缺陷，其制度的不完善性表现无疑。

1.政党组合和政党体系的混乱无序

苏共瓦解后短短几年时间里，俄罗斯政党数量繁多，鱼龙混杂。1991年上半年，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达800多个，到1993年达到1000多个，第二届杜马选举之前，其数量上升到2000多个，虽然1996年总统大选后，“政党热”有所降温，但1997年初仍然有1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32]如此繁多的政党给建立正常的政治秩序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也不利于代表和整合社会各方利益。

与西方成熟的政党制度相比较，俄罗斯的政党组织体系不稳定、不健全。许多政党是名副其实的“沙发党”“口袋党”，人数不多，缺少社会基础，仅靠坐在沙发上的“领袖”人物活动。这类政党以少数政治领袖为中心，疏于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建设，缺乏社会基础，很难代表民众的利益。就像“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亚博卢”集团等这样有影响的政党，其活动也只限于中央和少数几个大城市。与此相关，政党的命运常常取决于其领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其政治命运也随着领袖人物的声望和地位大起大落。

2.俄罗斯党派构成错综复杂、政治界限不清

在俄罗斯，党派构成十分复杂。左、中、右这三种传统的分类法很难正确描述政党体系的构成状况。除了左派、中派、右派政党，俄罗斯还存在极左、极右、中左、中右等各种派别，甚至还有诸如“啤酒爱好者”“香蕉党”等这样难以确定其政治属性的政党。党派构成复杂，各政党的政治界限模糊不清，多数政党甚至提不出自己的思想纲领。各个政党大多从实用主义出发，在政治斗争中左右摇摆，缺乏独到见解。

3.立党随意、竞争失范，加剧了国家政局的混乱局面

在20世纪90年代初，各类政党以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和参加集会为主要手段进行活动，“街头政治”盛行一时。在这之后，虽有所收敛，但存在相互攻讦、争权夺利的弊病，这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的政局不稳和社会思想混乱。

4.政党发育不良、政党作用有限

在叶利钦时期，由于政党自身发育不良，加上超级总统制的压制，党派之间争斗不休，俄罗斯政党作用的发挥受到压制，不利于建立真正有效的民主制度。由于缺乏公民社会的基础，加上现行政治体制的限制，俄罗斯的政党作用有限。即使是几个有影响的政党也只是在议会选举时才发挥有限的作用。俄罗斯总统选举的提名除政党外，也可以由百万签名或临时的选举联盟完成。平时政党发挥作用常常局限于议会讲坛，政党对政策的影响甚至不如非正式的帮派和寡头。“亚博卢”党主席亚夫林斯基称俄罗斯是“寡头的民主”，是“寡头资本主义”。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实际上成为“无党制”。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政党政治，不仅无助于民主的发展，而且加深了社会不稳定，使社会政治分化更加严重。

（四）没有选择的选举

在谈到民主时，西方学者赋予投票选举以极其重要的意义。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对民主做了如下定义：“民主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33]这一定义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亨廷顿称“选举是民主的本质”[34]。但是对于那些社会处于激烈转型阶段、民主体制尚未完全成熟、公民社会尚未完全形成的国家，将这种在美国和西方运行良好的选举体制引入的结果会是怎样呢？作为民主的重要形式的选举在俄罗斯独立以后得到了大力的推广，俄罗斯全民投票直接选举总统和议会的做法甚至超过了西方，但俄罗斯的选举制度在叶利钦时期暴露出不少弊端。

叶利钦时期的几次总统和议会选举，其选举结果与民众意愿常常出现很大的差距。1993年10月炮打白宫和12月全民公决之后，正当民主派踌躇满志，意欲完全掌控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极端民族主义却横空出世，创造了名噪一时的“日里诺夫斯基现象”，自由民主党大败民主派。1995年，俄共经过两年的重建，展现了自己第一大党的能量，久加诺夫也坚信自己将成为俄罗斯新的总统，然而，叶利钦在背负着经济下滑、腐败与犯罪上升、车臣战争的流血事件的种种罪名的同时，居然奇迹般地在最后赢得了

1996年总统大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99年，仅仅在选举前几个月组建的两个选举联盟——“祖国—全俄罗斯”和“团结”——共取得了37%的选票。

俄罗斯的选举结果的戏剧性和不可选择性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在俄罗斯及原苏联国家处于过渡和转型的剧变阶段时，全民选举和投票犹如一场“政治赌博”。一些党派和政治领袖往往不吝许诺，让普通百姓在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方向等问题上进行选择，其后果不仅普通百姓无法预料，就连那些政治家恐怕也无法知晓。与此相反，西方的选举都是在一些非常细小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比如税收、枪支、堕胎，而这些分歧是在主要社会制度多数认同的情况下出现的细小分歧，这种选举不会造成社会分裂。因此，在俄罗斯及原苏联国家的这种“赌博式”的投票，不是选民真正意义上的投票，而是“没有选择的选举”。其次，俄罗斯政党体制的不完善，是选举结果不确定的另一重要原因。稳定的政党体系，如英美的两党制，对选举后果的预测相对清晰。而在俄罗斯，从1993年到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平均每次选举都有27个政党或竞选联盟参选，多数政党缺乏社会基础，有的甚至只是少数政治家的一个招牌，他们很难代表大多数百姓的利益。在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况下，百姓很难对之做出抉择，这也就增加了选举的不确定性。一项问卷调查显示，1993年的议会选举时，三分之一的选民在选举前一个月才决定支持哪个政党，二分之一的选民甚至在投票当天才做出决定。[35]最后，由于俄罗斯私有化的极度不公正，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流动机制的极端不合理，俄罗斯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并没有体现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结构特征，公民的政治分化也表现出不成熟的特征，这也增加了选举的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在实际的选举进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各类选举中，金钱政治、灰色政治交易、收买选票等现象屡见不鲜，各种媒体信息战、相互攻讦从未间断过。其结果往往是，谁掌握舆论、谁动用权力和金钱的能力越大，谁赢得选举的机会就越多。

票决选举并非建立民主社会的充分条件，更不是过渡时期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最佳方式。在西方国家，各政党之间的竞选纲领中很难发现有原则上的差别，不同之处往往集中在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方面，其影响和实际执行的结果是普通选民可以感受到或预见到的。然而，在原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剧变过程中，全民选举犹如一场“政治赌博”，公民投票时就像是在下“赌注”。许多选民已经厌烦了不良政客的空头许诺，选民投票不是用“脑”（理智），而是用“心”（情感），甚至是用“脚”（抗议）投票。因此，选民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有时对所有候选人均不满意，只能“几害之中取其轻”。俄罗斯报刊称之为“没有选择的选举”，是在进行“政治赌博”。

在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选举类似赌博的例子很多。20世纪90年代初，高加索地区有的政治家先以98%的得票率被选为全民总统，一年之后又被95%的人赶出首都，死无葬身之处。而中亚一些国家则出现民主选举的“终身总统”，或者总是赢得大选的“国父总统”等，然后时间不长又因“选举舞弊”被赶下台。因此，很难将类似的“选举”与民主联系起来。

（五）民族冲突与地区分离

苏联时期，国家按照民族区域原则建设联邦，从法律上建立了联邦国家，但是由于苏共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虽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间存在不少问题，但并未涉及民族分裂和地区分离主义倾向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由于其推行政治民主化、多元化，引入多党制，打破了苏共一统天下的局面，激进的民族独立思潮在苏联各个民族地区泛起。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独立运动与其他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形成合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苏联解体之后，民族势力“谋主权、求独立”的矛头立即转向了俄罗斯自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成为关系到俄罗斯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

1.联邦中央权威的衰落。

在苏联瓦解过程中，各地的“宣誓主权”“法律大战”此起彼伏。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中央权威的衰落，联邦中央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迅速下降，社会一度出现失控现象。中央权威衰落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大刺激了地区层级自治共和国对独立和主权地位的追求。俄罗斯少数民族地区利用苏联解体和国家改制的机会，将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共和国，自治区升格为联邦主体。俄罗斯人为主的地区面对中央政权软弱的局面，开始自主的组织起来，争取自己在俄罗斯联邦中的权益和地位，反对少数民族地区享有特权，要求与民族共和国获得同样的权利和自主性。俄罗斯许多州和边疆区都掀起“主权化”“共和国化”风潮。一时间，苏联时期除苏联总统外，一下子冒出近30位各级别的“总统”，沦为国际笑谈。这种多位总统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叶利钦后期，至今仍有几位“共和国总统”在位。叶利钦时期，克里姆林宫为了保住国家表面上的统一，被迫与40多个联邦主体进行谈判，分别给予他们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但这也未能有效地阻止各地区民族独立、政治分裂、经济分立的趋势。

2.政治离心与地区分立。

在“主权化”和“共和国化”的过程中，地方势力逐渐成为俄罗斯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地方势力不仅对联邦中央的决策形成制约，且政治离心倾向

日益增长。地方长官以民选产生，无视中央权威，我行我素，不少地方甚至动用立法权，与联邦法律相抗衡。地方政府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来调节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控制了地区一级的大部分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逐渐形成能够与联邦中央抗衡的力量，形成越来越强的地区利益观念，要求重新界定中央和地区两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以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为首的“莫斯科集团”就拥有强大的金融和工业潜力，成为地区势力兴起中相当有代表性的一支力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政府推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政策，莫斯科地区集中的国家资产最为“肥厚”。当时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的阿·丘拜斯决意插手莫斯科市的私有化，但硬是被强势市长卢日科夫顶了回去。叶利钦总统只好让丘拜斯停手，放任莫斯科可以独立开展经济“私有化”。叶利钦时期，莫斯科的经济实力大增，在包括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等地在内的外省一片萧条的背景下，莫斯科一度集中了全俄罗斯80%的金融资本，雄踞金字塔的顶尖，以至于叶利钦总统认为卢日科夫“实际上在摧毁国家的垂直管理体系”[36]。

3.去中心化与民族分裂。

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由一百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问题一直是当局非常棘手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刺激下，长期受到压制的民族矛盾开始表面化和尖锐化。苏联解体后，随着中央权威的不断下降和对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少数民族地区要求自治甚至是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同时，过去被压制已久的民族冲突与矛盾增加了社会冲突的程度，中央权力机关之间的斗争和社会的无序混乱更放纵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蔓延。车臣共和国是在独立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一个共和国。自原苏军上校杜达耶夫1991年发生军事政变，宣布车臣—印古什为独立国家之后，叶利钦政府用和平谈判、军事手段解决车臣问题的尝试均见效不大。车臣共和国的民族分裂行动是俄罗斯民族分裂主义达到癫狂的代表，严重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六）民主变质与精英蜕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政治转轨主要是围绕政治上层进行的，除一些虚幻的民主幻想外，大多数居民基本上没有参与到政治进程。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和反革命”过去后，迎来了一次次投票选举。然而，新政权中占多数的仍是旧时的权贵，这也使得人们对俄罗斯的民主抱怀疑态度。

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苏共的下台，俄罗斯政治发生了制度性的根本变化。按照政治的一般规律，社会精英阶层也应随之彻底更新。然而10年来社会动荡、政治更替并未出现政治精英的大换血，原政权的老权贵也未

受到很大的冲击。俄罗斯政治制度改变后，真正掌权的政治精英大多数仍是苏共时期遗留下来的老权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专家进行了多次社会调研。调查结果表明，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社会中的当权者，60%以上的是改变了某种旗号的旧权贵。老权贵在地方政权中所占的比例更高，达80%以上。

1991年，“民主派”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权力，这只不过是打着“民主、自由、市场”招牌的反共、反苏势力的胜利。俄罗斯一些民主派所宣称的“自由民主”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的自由主义，更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与现时代》杂志主编弗·索戈林教授指出，“民主派”只不过是利用西方社会做样板，玩“自由牌”，他们关于民主以及市场的主张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简单化。

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混乱，尤其是1993年10月的炮击议会事件，打碎了俄罗斯人心中的民主之梦。到1995年年底，相信俄罗斯建立了西式民主制度的居民由1991年的96%降到25%。借助自由民主的旗号上台的政治精英，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比原共产党更大的权力，而且从私有化和经济改革中捞取了更大的经济好处，及时地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并使其合法化。而社会中绝大多数居民认为，普通居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福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居民对政权机关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见表12—3）。

表12—3　几年来俄罗斯百姓对权力机构的态度变化情况[37]

政权机构或组织	信任						不信任					
	95.1	96.1	96.5	97.1	97.8	98.12	95.1	96.1	96.5	97.1	97.8	98.12
俄罗斯总统	9	12	20	17	14	6	74	73	65	73	67	85
俄罗斯政府	8	12	14	14	12	11	69	68	65	72	68	66
联邦委员会	7	7	11	10	9	8	60	66	59	65	56	67
国家杜马	10	14	15	14	13	13	61	60	61	64	61	69
总统办公厅				9	7	3				74	68	83
安全委员会				10	8	9				66	64	65
地方领导人	11	17	17	28	15	23	59	57	59	62	49	39

续表

政权机构或组织	信任						不信任					
	95.1	96.1	96.5	97.1	97.8	98.12	95.1	96.1	96.5	97.1	97.8	98.12
警察、法院、检察院	16	15	14	10	13	11	59	58	59	66	74	74
军队	35	34	31	36	32	27	40	45	49	50	43	46
工会	18	15	17	11	13	17	52	61	56	62	64	62
教会	—	32	30	33	27	33	—	42	44	48	40	39
政党、运动	6	12	9	11	7	13	63	56	62	65	59	61
媒体	21	20	13	20	16	18	53	57	62	60	60	62
银行、企业家阶层	6	6	8	8	6	5	65	72	69	74	69	78
对谁也不信任	—						25	33	30	35	28	27

资料来源：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分析中心。

（七）黑帮政治与寡头干政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以瓜分国有财产的方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金融寡头在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通过“合法的抢劫”大肆侵吞国家财产、控制传媒、操纵社会舆论、与上层权力相互勾结，寡头干政现象出现，俄罗斯也由此获得了“寡头资本主义”的称号。俄罗斯寡头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政治现象。这些寡头通过从事商业活动接近政权或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他们的行为是一种篡夺政权的行为。俄罗斯改革之所以走入寡头式资本主义这一误区，与激进的私有化改革、法律的欠缺与混乱、政权软弱，以及当权者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而有意为之是分不开的。

叶利钦在改革初期，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做出扶持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决定：一是希望通过扶持，试图培育一个与经济改革利益一致的社会阶层或群体来支持当时自由派所推行的经济私有化方针，以此保证社会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性；二是当局希望新兴的金融工业集团能够凭借政府的支持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把资金投入到发展经济的优先领域，用金融资金保障工业和科技进步，带动经济走出危机，进而推动经济发展。[38]1993—1996年，俄罗斯通过总统令、政府条例和立法等手段大力促进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

与俄罗斯传统的、按照行业类别划分的、具有官僚性质的利益集团（燃料和能源综合体、军工综合体、农工综合体等）不同，新兴的金融工业势力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金融或进出口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借助国家的财力，通过参与和操控私有化进程，利用改革政策和法律的漏洞，迅速完成了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财团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这之后，金融工业寡头开始觊觎政治权力，院外游说成为他们获取政治支持和左右重大决策出台的主要手段。

当然，与传统的行业利益集团相比，政治上最为活跃的还属新兴的私人财阀。通过疾风暴雨式的私有化运动，暴富的私人财阀已经不再满足于拥有巨额财富，他们开始将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渴望影响或直接掌握权力。1996年6月4日，“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谢尔盖·穆拉夫连科在俄《独立报》撰文声称：“在当今俄罗斯，企业家应该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人物。除了企业家外谁都不可能准确地预测政府采取的政治决策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生活逼迫我参与政治。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这一点。所以，在俄罗斯，大企业家必须是大政治家。”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财阀积极在幕后操纵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金融工业集团积极出资高达5亿美元，利用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肆意抹黑政治对手，阻止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当选，保证维护他们利益的叶利钦以微弱的选票优势继续执政。而当选后的叶利钦则投桃报李，在第二个任期进一步加大银行和国有战略性垄断行业私有化的速度。1998年5月底，当年轻的基里延科政府试图追缴财阀寡头拖欠的国家税款时，由犹太裔的大财阀别列佐夫斯基发起，这些金融寡头在新生寡头、当时最具财力的财阀波塔宁的私人游艇上召开会议，密谋去说服叶利钦总统，解散了基里延科政府。

鉴于私人财阀在总统大选中为叶利钦立下的汗马功劳，叶利钦再次当选后，作为回报，为他们继续侵吞资产和进军暴利行业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寡头很快得到了插手传媒事业和其他经营特许权的机会。英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指出，当时的这种回报是通过将俄罗斯最有价值的一些国有资产（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进一步私有化给“少数人”而实现的。[39]

除此之外，俄罗斯私人金融工业资本的代表开始直接进入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导核心层，1996年8月14日，叶利钦总统任命只有35岁的私人银行家弗·波塔宁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波塔宁在俄罗斯20名富豪榜上排行第4名，拥有15000万美元自有财产的金融资本，其领导的银行奥涅克西姆银行是俄罗斯五大银行之一。1996年10月29日，叶利钦又任命俄罗斯金融工业资本的代表鲍·别列佐夫斯基为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负责经济和战后车臣恢复建设等问题。不到5年时间，别列佐夫斯基由一位普通的数学家成为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10大企业家之一。他在1989年创立了罗戈

瓦斯汽车集团，1993年创立了全俄汽车联合公司，1992—1993年曾任俄罗斯政府所属工业政策委员会成员，1994—1995年开始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股份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别列佐夫斯基与叶利钦家族及其亲信关系密切。他曾经与叶利钦的女婿一起出资控股原苏联遗留下来的、最大的国际航空公司。如日中天的别列佐夫斯基通过传媒公开声称，国家应该归官员和大资本“共同所有”。[40]

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官僚垄断和金融寡头一方面贪婪地吞食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极力插手政治，企图分享国家政权，将政府置于他们影响之下。七大财阀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70%，公开要与政府分享权力。1997年，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寡头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年也是财团、寡头之间争斗最为激烈的时期。围绕瓜分国有资产，爆发了一次次的“银行大战”“股权大战”。俄罗斯寡头的贪婪，政府官员的贪污和渎职，导致俄罗斯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1998年，俄罗斯政府搭建的短期国债金融“金字塔”终于崩塌。随之而至的一场金融风暴宣告几年来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试验遭到失败。

在叶利钦时期，寡头赤裸裸地参与政治，对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各金融工业集团的政治游说和直接干政严重影响了政权的权威性，伴随寡头资本形成的权力“寻租”行为，造成了严重的腐败。除此之外，寡头的行为使得经济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经济上垄断盛行，缺乏自由竞争，中小企业受到长期的压制。由于贫富过于悬殊，社会的安定也得不到保证。

财阀、寡头肆意干预政治、要挟国家的行为严重扭曲了俄罗斯的政治进程，一个放权而松散的弱势政府并不是自由和民主的同义词，而是等同于无政府状态和无法无天，为一小撮暴富强人为非作歹敞开大门，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布局和广大公众的利益。

（八）民粹政治与资本控制的传媒

新闻自由历来被西方政治学者视作实现民主的必备条件之一。美国政治学家科恩在他的《论民主》中说，在一个社会中把言论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也就在同样程度上限制了民主。因为表达自由是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工作上的需要。公民对社会关心的所有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是形成民意的基础条件，也就是实现民主的前提。[41]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了控制舆论、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当局对前苏联的新闻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媒体进行了向私有化和自由化过渡的尝试，由单一的国家成分变为国家的、地方政府的、私人的多种成分并存的结构。但是，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新闻传媒在相当程度上与国家

和政府脱离了所属关系，失去了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支持，被迫委身于资本和权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媒体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寡头和各大财团广泛参与媒体运作。一方面，失去国家财政支持的媒体急需新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寡头们也热衷于通过向媒体渗透来操纵俄罗斯的政治进程，通过操控舆论来影响政府的改革政策和政治进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赢得政府给予的好处。寡头和大财团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由于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成为如俄罗斯人所说的“传媒帝国”。几乎俄罗斯所有重要传媒都被各大财团瓜分，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也乘虚而入。财阀和寡头操纵社会舆论，扰乱民心，成为政府施政的掣肘。在叶利钦时期，由俄罗斯传媒大亨古辛斯基的“桥”传媒集团控制的独立电视台曾播出过一个名为“玩偶”的节目，当时政界要人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先后被该节目模仿和讽刺，令当局大为尴尬，但是当局迫于“舆论自由”对其也无可奈何。

几年后普京总统表示，如果（俄罗斯）新闻受控于“两三个”钱袋子，那么，新闻媒体本身就不会存在任何的自由，相反，媒体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者。新闻媒体只有在确定自己角色之后，才能实现新闻自由。所谓自由就是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公民同样受到用民主方式通过的法律的限制，否则历史就会重演，自由会变为处于失控状态的无政府主义。[42]在一个民主传统和民主政治不十分成熟的社会，无节制地开放媒体言论，并非真正有利于人民的福祉，也不利于民主氛围和社会监督机制的真正构建。

（九）贪腐盛行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俄罗斯社会各种高层腐败的传闻层出不穷，各类经济犯罪大案时常见诸报端。而这些均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和舆论自由化背景下发生的。在灰色经济蔓延、权钱交易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洗钱案、偷税案经常是财团之间相互瓜分市场、争夺利益的口实；而揭发贪污大案、暴露高层丑闻也常常是政治斗争、相互倾轧的工具。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贪污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是见怪不怪。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社会腐败丛生的根源在叶利钦时期，而源头则在戈尔巴乔夫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政治放松和经济重组，打开了犯罪的闸门，使得境内外黑社会势力公然与蜕化变质的苏共官员勾结，借解体混乱之机浑水摸鱼。而打着“反苏共特权”起家的叶利钦一旦掌权，黑手党、财阀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和总统“家族”的亲信势

力一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其嚣张程度可谓登峰造极。乃至于叶利钦总统惊呼，“黑手党”已经掐住了国家的喉咙。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在即，作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在境外拥有大量财产，除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动产外，还有上百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保存在驻外大使馆、商务代表处、驻外文化机构以及苏联对外银行、国营外贸公司和航空公司的账户上。在境内外，苏共中央有关部门也掌握有大量援外资金，克格勃系统也在一些外国银行网络中拥有户头，并联系着不少驻外公司。随着苏联解体，当时联盟中央一级的部委陷于瘫痪，当然没有谁去关心境外的财产。而后，俄罗斯新政权忙于政治斗争和权力分配，结果除外交部、科学院两个机构未遭大规模改组之外，其余所有部委机构，如国家计委、克格勃等或被取消或遭重组，巨额的境外资产来不及登记、注册和交接。据西方咨询机构推测，此时流失的财产有数百亿美金之巨。

以叶利钦为首的亲西方的民主自由派本是打着反腐败、反特权上台的。然而掌握大权后不久，便不断披露出新政权内部一些高官营私舞弊的事件。1992年，叶利钦的政治顾问、昔日的民主斗士，改革担任莫斯科市领导职务的谢·斯坦凯维奇贪污受贿，携带数十万美金逃往国外，现隐居波兰。他声称不再回俄罗斯，是因为害怕“政治迫害”。不久，叶利钦总统的左膀右臂——主管文化、新闻的副总理波尔达拉宁被迫辞职。据称是因为在处理原苏联在东德的财产时，犯有经济问题。与叶利钦同为战友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后圣彼得堡）两大都市的市长波波夫、索布恰克掌权不久，便大肆聚敛财富。不同的是，前者及时出任与美国合资的莫斯科国际大学的校长，占据了原苏共党校的房产，每月领取几万美元的高薪。而后者在竞选连任失败后，不得不在亲友的帮助下仓惶逃亡法国，假借养病为由，逃避俄罗斯检察机关的调查。1999年前后，他本想借与普京特殊的政治关系参加议会选举，重返政坛，但不久便神秘死亡。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掌权后的俄罗斯民主派和自由派极力推进国有资产私有化运动。私有化过程中，各级官员和黑势力相互勾结，贪腐行为更加肆无忌惮。1993年，原俄共党员、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苏军大校，后来被邀担任叶利钦总统竞选搭档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向媒体声称，他领导的调查小组在短时间里已经搜集了整整11箱政界高层人物的腐败犯罪材料，涉案49起！这位副总统鲁茨科伊因此也与总统叶利钦渐行渐远，最后分道扬镳。正当俄罗斯人等待其中的详细消息时，这位副总统却在十月总统与议会冲突的炮击声中成了阶下囚。鲁茨科伊在1995年议会大选中失利后，一度竞选州长成功，但11箱档案材料却不知去向。

俄罗斯私有化暴露出西方境外势力参与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甚至内外勾结从事国际“洗钱”等不法行径。1999年8月下旬，美国《纽约时报》披露，

据美国执法官员调查，一些人内外勾结，利用纽约银行的账户进行非法“洗钱”活动。这些往来的巨额资金，均来自俄罗斯，但来历及涉案人员与当今俄罗斯最高层人物及某些黑社会势力有瓜葛。与此同时，欧洲中部的瑞士也接连传出消息，报道瑞士检察官发现了不少新线索，证明俄罗斯黑社会势力渗入欧洲商界。瑞士有约500家公司受俄罗斯黑社会势力控制，涉案资金达400亿美元。1999年8月19日，瑞士检察官冻结了俄罗斯极具影响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在20家瑞士银行中的账户。一些媒体开始透露，案件不仅与叶利钦总统周围的一些亲信有关，而且直接牵扯到叶利钦本人及其女儿、女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资金外流严重。俄罗斯每年外流的资金达几百亿美元，特别是以1991—1996年尤为严重。据1997年初俄罗斯联邦内务部提交叶利钦总统的一份关于反经济犯罪的报告中指出，这期间俄罗斯流失外汇1500亿—3000亿美元。权钱勾结、大量资金境外循环。1998年8月，俄罗斯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向俄罗斯政府提供约48亿美元的稳定资金援助。然而，这些资金并未用于真正的援助，而是分别由27家俄罗斯商业银行先后转移到美国的账户。而这些均与民主派掌权人物有关。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统治的八年是腐败的高峰期。这期间也是俄罗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狂飙猛进的时期。苏联瞬间解体、俄罗斯私有化快速地推进，其关键因素在于掌权的权贵阶层迅速改头换面、改旗易帜。接着通过分割社会财产，占尽先机，及时将权力转化为资本。俄罗斯特有的“共青团经济”现象、内部人私有化、权贵私有化都是明证。俄罗斯猖獗的腐败和犯罪现象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对立，这些也遭到了西方世界的“唾弃”。叶利钦宣称的“人民资本主义”蜕变成了“腐败的资本主义、野蛮的资本主义、犯罪的资本主义（索罗斯语）、权贵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失败了的俄罗斯不仅没有被西方揽入怀抱，反而被逐步挤到国际舞台的边缘。

2007年11月21日和11月29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两次严词批判了90年代的当权者及其改革政策。普京在讲话中揭露当时的当权者结党营私、中饱私囊，导致了国家分裂和百姓贫困。普京指出，这些人出卖俄罗斯利益，不顾百姓的疾苦，他们厚颜无耻，疯狂敛财。他们用惯有的无耻手段塞满自己的口袋，他们想霸占和瓜分俄罗斯积累的巨大财富。普京称：“10年前，政治投机者控制了联邦会议和政府的关键席位。高官们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腐败是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手段。这些人年复一年制订的预算既不平衡，也不负责任，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普京的支持者、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

之一奥·莫洛佐夫称：“90年代的改革是失败的、无情的、残酷的，造成整个国家充斥着腐败和盗窃。”

贪腐难除，源自制度。过去苏共的“特权”表现为获取级别不同的“特供商品”。而如今大权在握的自由民主派已经抛弃了信仰，也没有任何党的纪律约束、况且，私有化使得他们手中的支配权变成了所有权，私有化使得瓜分得来的财富合法化。而且与苏共时期不同，这些经济和政治特权可以合法地传宗接代。

十多年来，在民主和自由的旗号下，贪腐在俄罗斯蔓延泛滥，愈演愈烈。本来肩负维护法律、打击腐败的一些部门如海关、税务、消防、缉毒、检察、内务公安、交管、法院、军队等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且相互掣肘。更加严重的是，腐败的癌细胞已经浸透到了社会肌理，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严重恶化了社会道德风气。行贿受贿、金钱铺路甚至演变成了社会规则，成了一种社会常态。

根据国际组织“透明国际”每年评选出的“全球腐败指数排名”，2007年俄罗斯居第143位，与一些非洲国家的腐败程度不相上下。有许多数据都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腐败程度有多严重：近一半的国家财政预算拨款被贪污转移，三分之一的军费流入不法之徒手里，企业约30%的成本用来行贿各级官员，等等。政府部长之间的年收入差距高达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权贵子女年纪轻轻便安排于银行、外贸等大企业，且担任高管。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工作人员也由“灵魂”和“天使”变成了各类索贿的“蛀虫”。孩子入托、看病拿药都成了“贿赂”的门槛。俄罗斯一家著名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对“当今俄罗斯高官代表谁的利益”问题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回答“保障官员个人利益的占55%，认为是为国家利益的占20%，认为是为民众的利益只占12%”。

综上所述，虽然俄罗斯的政治转型是以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为目标，1993年俄联邦宪法还全盘照搬西方宪政制度的一些原则，如三权分立、普选制、联邦制、多党制等，作为宪法制度的基础，但正所谓“桔生于淮则为枳”，移植西方民主模式不仅无力解决大量复杂而棘手的社会问题，不能给人民带来民主和幸福，反而滋生了贪腐和寡头政治，使政治进程陷入深深的泥潭。

五、民主透支与治理赤字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主化的实践表明，推翻苏共并不意味着自由的到来。高喊着“反共、民主”口号的民主派和自由独立派很快蜕变，也没能给俄罗斯带来制度性的民主和自由。在历史和文化中较少有民主传统的俄罗斯，在社会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仅从制度上移植西方政治模式并不能

药到病除。民主不是万能药，不仅没能解决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还触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充分体现出“民主”无能，“自由”无力，社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除上一节列举的九方面的政治乱象外，90年代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政治民主化进程使国家险象环生。

民主化激发了民族自我意识，而一些政客则利用民族情绪，打着民主、自决的旗号，乘机搞分裂、分离，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王国。民族战争、民族冲突、移民、难民等问题成了社会拖而不决的棘手问题。对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批判，对执法机关的多次改组，使得执法机关在日益严重的犯罪现象面前失去权威和监管权力，变得软弱无能，束手无策。各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已经公开化、集团化、恶性化。贪污受贿盛行，官员以权谋私现象严重，各种利益集团争权夺利、损公肥私。精神文化领域缺乏统一凝聚的力量，斗争激烈。俄罗斯文化人士惊呼，社会上文化艺术庸俗化，道德伦理水平下降，居民情绪低落，缺乏上进的精神，俄罗斯社会正在失去赖以重新振兴的精神因素和智力潜能。

政治混乱导致了俄罗斯陷入经济上的困境，在政治民主化浪潮的鼓舞下，“休克疗法”和私有化不仅没有培育出类似西方“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反而将大多数居民抛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和底层，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俄罗斯科学院“过渡时期的社会变动和社会紧张状况”课题组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急速推进的国有财产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指价格、金融、证券市场和物资交易自由化），只使得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有利地位的极少数人获得了好处，而绝大多数居民却未能明白其中的“奥秘”，也没有心理和经济上的准备，更无能力参与其中。市场中缺乏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只能造成“灰色经济”现象盛行和产生特殊的“新俄罗斯人”。少数人的暴富和1/3以上人口的贫困，加剧了社会生活底层更容易接受“强权、铁腕”。西方学者指出，东欧国家贫困人口的增加给这些国家的民主造成了又一难题。普京在担任总统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要想在俄罗斯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俄罗斯还太穷。

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民主化，换来了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失败。随后便是“忧郁的、黑暗的、野蛮的、强盗的、彪悍的、狂妄的、肆无忌惮的叶利钦时期的90年代”。叶利钦时期既无民主、又失效率，政治贪腐、社会动荡，成为政治衰败的典型。2007年11月21日和11月29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先后两次严词批判20世纪90年代的当权者及其改革政策。普京在讲话中谴责当时的当权者结党营私、中饱私囊，导致国家分裂和百姓贫困。普京指出，90年代的那群当权者仍企图卷土重来，重新瓜分国家财富，搜刮百万无助的居民。

普京认为，俄罗斯的90年代是失败的。2007年11月21日晚，普京总统在

莫斯科一个体育中心向5000多名支持者发表了讲话。普京在讲话中对那时的当权者及其政策给予了严厉的抨击，并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特别是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彻底划清了界限。普京把20世纪末俄罗斯普遍的贫穷和贪腐盛行归罪于高层领导的失败。普京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当权者在“80年代末期抛下人民不管，导致人们得不到最起码的服务和商品，人们没有糖、肉、盐、火柴，等等”。普京指出，“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普京毫不留情地指责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身居高位的当权者：“10年前，政治投机者控制了联邦会议和政府的关键席位。高官们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腐败是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手段。这些人年复一年制订的预算既不平衡，也不负责任，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普京愤怒地讲，人们开始满怀幻想。可后来呢，情况更糟糕。一场场悲剧使人们大失所望：把胡作非为当成民主，把洗劫千百万人的血汗和一小撮人的暴富当成市场和市场关系，放纵瓜分和盗窃本属于全体人民的巨大资源财富。这就是90年代俄罗斯社会的真实写照。

普京把这些当权者称为“人民的敌人”。他说，这些人出卖了俄罗斯利益，不顾人民的疾苦，他们厚颜无耻，疯狂敛财。普京在讲话中称“这些先生们一旦掌权，将继续欺骗上百万的百姓，用他们惯有的无耻手段塞满自己的口袋……他们想霸占和瓜分俄罗斯积累的巨大财富，这种事他们干了不止第一次了”。

普京在讲话中提醒国民，当年的当权者虽然已经下野，但“他们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一些党派的候选人和赞助人之列”。普京称“正是这些人在20世纪末造成了俄罗斯的普遍贫穷和腐败蔓延，至今仍祸患未除”。普京向民众指出：“正是他们不想退出政治舞台……他们想复仇，企图重掌大权，施加影响。并且逐步地复辟那种以腐败和谎言为基础的寡头制度……他们过去在不负责任地许诺和欺骗人民，而且到现在还在撒谎……正是这些人想教我们如何生活！”

普京指责这些人是西方的“走狗”。普京直截了当地批评叶利钦时期的当权者，也就是现在的一些政治反对派：“这些人另有目的，另眼看待俄罗斯。他们需要一个虚弱病态的社会。他们希望俄罗斯社会混乱无序、迷失方向、分崩离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背地里耍花招，拿我们的利益去换一点蝇头小利。遗憾的是，我们国家里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向外国使馆、外交代表机构摇尾乞怜，指望外国基金会和政府的扶持，而不是自己国民的支持。”普京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吸取西方势力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利用选举、扶持代理人、煽动“颜色革命”的教训，揭露一些人“从西方专家那里学了两招，又在邻国接受了训练，现在他们要上街游行了，想要

煽风点火和进行挑衅”。

普京对叶利钦时期的不点名式的批判，并非只是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代表目前俄罗斯社会主流的思想共识。刚刚赢得议会大选的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声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15年是“混乱和失败”的15年。在2007年出版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编写的《从叶利钦到普京》一书中，叶利钦时代被冠以“混乱的90年代”之名。描述叶利钦改革时期的章节多被冠为“混乱”、“冲突”和“经济萧条”等字眼。而俄罗斯电视台播放反思叶利钦时期改革乱象的电视片也被冠以“彪悍而肆无忌惮的90年代”，揭露那时靠瓜分国有资产或浑水摸鱼而暴富的一些人的种种行径。

六、政治衰败与呼唤权威

俄罗斯10年的政治转轨表明，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三权分立名不副实，政党制度不完善，选举制度弊端不少，法院司法尚待重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财团参与政治、寡头政治盛行，家族、帮派“暗箱”操作，黑金政治，新闻媒体被财团控制后，无法无天；腐败蔓延，行政效率低下，调控无力，令不行禁不止，政治动乱，政局不稳。上述事实表明，俄罗斯政治转轨以失败告终，政治“休克疗法”没有推动政治发展，反而造成严重的政治衰退，俄罗斯大多数居民不接受现行的政治制度。

随着俄罗斯民主化进程遭遇的波折，俄罗斯选民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进而“拒绝民主”。近几年的舆论调查显示，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在短短几年之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推出了名为《今日俄罗斯公民：自我意识及社会理想》的报告。该报告以1994—2004年进行的数次大型名调为基础，对俄罗斯人十年间的价值观变化做出了权威性的调查。报告显示，与90年代初对苏联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相比，如今更多俄罗斯人对苏联的态度趋于理性化，认为经历苏联解体是“人生悲剧”的人数明显增多；仅有25%的俄罗斯人愿意生活在自由社会中，而有54%的人选择了平等社会；其中主张社会平等的大多数人认为强有力的国家比民主更会捍卫民众利益。[43]调查显示，对过度自由化已经感到厌倦的俄罗斯人民开始怀念秩序和稳定。

2000年10月，“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就俄罗斯对民主和市场的态度等问题，对俄罗斯33个地区、83个居住地的1600个被调查者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在回答“你认为当今俄罗斯是民主社会吗？”时，有一半多（54%）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是，只有26%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44]2008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进行的一项名为“俄罗斯自我认同的社会学维度”的调

查显示，只有5%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最近15年俄罗斯所经历的民主完全符合他们自己对民主本来面貌的设想，只有29%的人认为，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俄罗斯的民主已经接近最优，超过43%的受访者认为，今天俄罗斯离民主仍遥不可及。[45]

同样，经历了民主浪潮的起伏之后，俄罗斯民众对民主的理解也与西方传统民主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俄罗斯人并不认为言论自由、政治竞争及反对派的存在等原则是当前俄罗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反，他们认为一个高效的民主制度首先应该保障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以及没有极端的社会财产两极分化。[46]很明显，秩序与稳定已经被视为俄罗斯社会最现实的问题。

除了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外，90年代后期俄罗斯政治思潮的变化还有其历史文化环境的制约。在分析俄罗斯民主化曲折艰难的原因时，许多人都谈到俄罗斯文化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和两极性，并且常常引证俄国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那段著名的论断："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救世主义、全人类性……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47]

俄罗斯文化中缺乏理性，过于情绪化。俄罗斯文化富于感情，但往往缺少法治观念和所有权意识，喜欢走极端。曾有人提出，俄罗斯人没有耐心，使俄罗斯不能经历酝酿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曾经在俄国游历，后任总统的捷克人马萨里克在1913年写道：与其说俄罗斯人倾向民主，不如说他们更醉心于革命。法制缺位，模式上照搬照抄，行动上极端激烈，拒绝缓慢的酝酿，缺少相应的监督和制衡，这些是俄罗斯民主化失败的具体原因和现实表现。正如19世纪俄国的著名思想家别林斯基描述得那样：一个自由后的俄国知识分子不是去国会，而是赶紧去酒馆，砸碎玻璃，然后把上等人绞死。

俄罗斯文化崇尚道德与精神，常常遁入理想以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俄罗斯人不是以因果逻辑去判断事件，而是通过"诺言"和"拯救"的道德——宗教前景来感受。[48]俄罗斯人习惯上幻想的是道德公正，沉醉于宗教上的"惩罚"与"报应"，认定"善"将代替"恶"。俄罗斯人行动上习惯于"一下子"和"大规模"，至于这种极端做法的结果如何，他们常满足于回答：可能吧……或许吧……政治是发展，还是衰退？是民主的"单兵突进"，还是"稳定、效率与民主"的和谐共赢？1985年以来，苏联—俄罗斯政治发展历程虽然没能对此给出满意的答案，却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政治素材。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自1994年之后，在俄罗斯国家内部，不同学

科的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改革及相互关系等问题，认为国家主义、政治权威主义是可行的、可操作的。

俄罗斯总统委员会成员、俄罗斯著名学者阿·米格拉尼扬从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欧洲政治发展历史入手，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自传统社会向现化社会转变时都经过了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其中不少国家在塑造民族性格，树立民主价值观和建立民主制度方面花费了几百年时间。因此，政治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俄罗斯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结合战后世界各国政治发展和民主进程的经验教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少发展中国家都争相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其中有的国家颁布了宪法，进行选举，然而结果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一系列的政变、内战打断了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部分国家先后出现了“强硬政权”，如弗郎哥时期的西班牙，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以及土耳其和东亚一些国家及地区等。经过一个时期过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市场经济关系得以发育并成熟，社会结构日趋合理，最终使一些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轨道。

莫斯科大学的一些学者提出，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不能等同于社会发展的“过渡模式”；过渡时期经济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保障；鉴于俄罗斯社会的教训，结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经验，政治权威主义是可操作的、也是可行的。

米格拉尼扬等学者提出，极权主义制度和权威主义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不应将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混同起来。对俄罗斯社会来说，权威主义并不比庸俗的民主更可怕，它可能是一剂苦药，但却是通向民主的一座桥梁。

国际经验特别是战后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进程也证明，民主是复杂而艰辛的过程，不考虑民主、效率、秩序的协调，不兼顾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民主进程不会一帆风顺。

在政治体制与经济变革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探讨中，俄罗斯学者提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制度的角度看，民主化都不能视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先决必要条件，在时间秩序上后者应先于民主。

1994年之后的俄罗斯，无论是在议会讲坛，还是在媒体以及学者的文章中，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经常成为不同意见争论或佐证的对象。1999年在普京出任总理进而代任总统之际，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为普京提供了一份有关中国经济、政治改革和发展情况的长篇报告。这篇旨在总结和吸取中国发展经验的内部报告先后有200多人参与研讨，目的是供俄罗

斯的政治上层参阅。俄罗斯有关专家指出，完善的市场经济和经济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这不仅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而且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在经济改革中，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会影响或触及部分阶层或集团的切身利益。为了使改革纲领不陷于无休止的争论，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是非常必要的。

在俄罗斯民间意识中，呼唤权威的思潮也颇受欢迎。许多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俄罗斯民众渴望“权威”，希望“铁腕人物”出现。比起“民主、自由”来，72%的俄罗斯百姓更希望“稳定和秩序”。有文章写道：“民主是一个误区，俄罗斯社会还没有成熟，俄罗斯人缺少法治观念……俄罗斯人应像蜜蜂、蚂蚁一样组织起来，他们渴望领袖和训导。”[49]

俄罗斯有近一半意见认为，缺少社会方向共识，缺少政治凝聚力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见表12—4）。

表12—4　俄罗斯居民对国内局势及其前景的看法（%）[50]

评价内容	1999年	2000年
灾难性	21	26
危机状态，但若掌权者有意志和能力能够改变	62	47
认为局势可能稳定，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9	14
认为局势不错，前景良好	0.3	2
其他回答	7.7	13

资料来源：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政治进程社会分析中心。

（原调查者）注：1999年的数据是在泰梅尔自治州进行的居民抽样调查所得，2000年的数据则为在莫斯科进行的专家问卷所得。

对与未来的局势发展，多数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居民希望看到掌权者表现出意志和能力，力挽狂澜，使俄罗斯社会摆脱多年的危机。俄罗斯政治学家纳伊舒里直言，俄罗斯应借鉴“皮诺切特的智利模式”，恢复稳定，整顿秩序，发展经济。俄罗斯国将不国，何谈民主与自由？

2000年前后，俄罗斯社会强化国家治理、呼唤政治权威的声音越来越强，

甚至可以说形成了“大合唱”。世纪之交，刚刚从叶利钦手里接过管理俄罗斯权杖的普京发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普京在文中指出：“俄罗斯不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在那两个国家里，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而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不是什么坏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51]2001年3月初，普京总统通过互联网回答了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和网民的提问。他认为，俄罗斯过去的十年是政治上悲剧的十年。财团控制国家、新闻媒体被少数财团控制的状况是不能容许的。

俄罗斯学者认为，民主不能靠打碎和抛弃国家来建成，而是多年培养的结果。看来，经历了10年的转轨，俄罗斯社会开始对国家、民主、自由等问题进行反思，对稳定、秩序、效率等问题重新定义。2000年以后，普京决意加强权威，恢复地方控制，整顿经济秩序，引导舆论声音，出击寡头势力……可以认定，普京整顿政治秩序的行动意味着俄罗斯新一轮政治转轨的开端。

---

[1]近年来有大量俄罗斯舆论调查材料表明，俄罗斯人对民主表示失望，渴望秩序，甚至为恢复秩序不惜任何代价。一项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拒绝民主。参见鲍·尼·卡什尼科夫。作为俄罗斯困难命运的民主[J].社会科学与现时代，1996（2）43.

[2]列·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369.

[3]朱利叶托·基耶萨.别了，俄罗斯！[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73.

[4]2005年5月，在戈尔巴乔夫上台20周年之际，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层的错误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同时“全俄舆论调查中心”在2011年3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否定态度，参见2011年3月5日，www.strana.ru.

[5]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3—26.

[6]福山.历史的终结[M].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

[7]苏联瓦解后，西方主流舆论对俄罗斯的赞美或批判，多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缺少深刻的现实政治分析。研究宏观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习惯于使用抽象的“市场和民主”模式，去衡量和观察后苏联时期的新俄罗斯社会。西

方模式移植失败后，他们便开始对俄罗斯口诛笔伐。与此不同，倒是西方某些专注俄罗斯研究的区域问题研究专家一直保持冷静，能够较深入地观察俄罗斯社会实际，指出暴露或隐藏的问题。例如：A.Brown，The Russian Crisis:Beginning of the End or End of the Beginning?[J].Post-sovietAffairs，1999，1(15)；B.Clark，An Empire's New Clothes:The End ofRussia's Liberal Dream[M].London：Vintage，1995;M.Goldman，The Pitfalls ofRussian Privatization[M].Challenge：1997;Th.E.Graham，Russia's Non-Democrats[J].Harper'sMagazine，1996，292，No.1751;J.S.Millar，FromUtopianSocialismtoUtopianCapitalism:TheFailureofRevolutionandReform inPost-sovietRussia[M].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175thAnniversaryPapers，1996(2).

[8]阿·弗·卢金。民主化还是帮派化？——西方学者对俄罗斯变革观点的演化[J].政治学研究，2000（3）.

[9]马歇尔·戈德曼。改革出了什么毛病？[M].纽约，1992.

[10]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3—26.

[11]亨廷顿。民主的未来：由扩张到整合［J］.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5（6）88-89.

[12]弗·瓦·拉普金，弗·伊·潘金。当代俄罗斯政治定向和政治制度：相互演化的问题［J］.政治学研究，1999（6）47.

[13]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January 1992，February 1993，Autumn 1994，March 1997).

[14]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舆情监测：经济和社会变化，1999（1）.

[15]亚·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74—275.

[16]叶利钦总统的讲话[N].消息报，1991-11-28.

[17]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21.

[18]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俄罗斯“民主之父”的除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利钦之外，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原莫斯科市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加·波波夫，以上三人在戈尔巴乔夫后期被称为摧毁苏共的“三驾马车”。与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不同的是，这些“民主自由之父”原本属于苏

共“体制内”。

[19]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3.

[20]许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55.

[21]斯米尔诺夫。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J].康晏如，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2）.

[22]亚·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18.

[23]B．维汝多维奇。鲁茨科伊要负责纪律和秩序[N].消息报，1991-12-27.

[24]威·斯米尔诺夫。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J].康晏如，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2）.

[25]威·斯米尔诺夫。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J].康晏如，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2）.

[26]亚·卢金。俄罗斯政治1985—1993：俄罗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变[J].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1998（3）.

[27]威·斯米尔诺夫.21世纪门槛上的俄罗斯政治体制[J].权力，2000（2）.

[28]亚·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48—349.

[29]列·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91-192.

[30]叶利钦。午夜日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1]列·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336.

[32]俄罗斯报，1999-1-16.

[33]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37.

[34]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5—6.

[35]俄罗斯报，1999-1-16.

[36]叶利钦。午夜日记。曹缦西，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59.

[37]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俄罗斯：克服民族灾难——1998年俄罗斯社会政治局势[M].莫斯科，1999：173.

[38]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26.

[39]卡瑟琳·丹克斯。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M].欧阳景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7.

[40]阿·祖金。寡头政治是后共产主义时期俄罗斯的政治问题[J].社会科学与现时代，1999（1）.

[41]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25—128.

[42]普京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谈新闻自由[N/OL].2003-9-26.http://www.kremlin.ru.

[43]俄罗斯社会心态扫描[N].参考消息，2004-11-17.

[44]2000-11-9.http//www.polit.ru.

[45]РабочаягруппаИнститутасоциологииРАН，Российскаяидентичностьв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мизмерении//Полис,2008,№2.

[46]同上。

[47]尼·别尔加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2—3.

[48]A.A.卡拉—姆尔扎，A.C.帕纳林，И.К.潘金。当代俄罗斯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状况：发展的前景[J].政治学研究，1995（4）.

[49]鲍·米罗诺夫。人民期盼强权[N].俄罗斯报，1993-11-9.

[50]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俄罗斯寻求战略：社会与权力——1999年俄罗斯社会及政治形势[G].莫斯科，2000：118.

[51]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N].独立报，1999-12-30.

第十三章　主权民主与威权稳定

1985年至今，俄罗斯分别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含梅德韦杰夫4年过渡期）执政的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主流舆论和一些政治学者认定，戈尔巴乔夫的6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民主自由的时期；叶利钦的9年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最为接近的时期；而普京执政的俄罗斯则背离了民主，与西方世界渐行渐远。

然而，俄罗斯民众的看法却截然相反。2005年10月，俄罗斯一家名为“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社会舆论调查机构分别在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分别有72%和80%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统治下的“自由民主时期”。该项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最高，为67%。而现实生活中，普京的政治支持率也一直保持在70%—80%的高位，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收回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普京的政治支持率达到了80%以上的历史高点。

一、社会乱象与政治遗产

（一）超级大国的衰落

2000年，普京执掌国家大权之初，正值俄罗斯社会处于危机的历史关头。在经历了苏联的崩溃和此后的剧烈变革后，叶利钦留下的俄罗斯可谓是一个“烂摊子”。普京执掌大权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现实的要求，但普京接手的俄罗斯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客观上看，俄罗斯地理面积广阔，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无论是天然矿产资源的产量、储藏量，还是品种，俄罗斯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数的2.4%左右，却拥有全世界10%的领土。俄罗斯的森林资源居世界总量的20%。俄罗斯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的45%，石油储量占13%，煤炭储量占23%。俄罗斯人均农业可耕地大约1公顷，相当于芬兰的1.8倍、美国的1.3倍，是中国的10倍以上。俄罗斯土地资源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另外，俄罗斯拥有地球上20%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淡水资源极为丰富。俄罗斯渔业产量和水生资源占世界第七位。同时，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丰厚的科技潜力，俄罗斯每10万人就有37位学者或工程师，数量上几乎与美国相当，相当于德国的1.5倍。俄罗斯学者认为，从上述意义上看，可以说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度。

另外，应当指出，苏联解体之后，苏联也给新生的俄罗斯留下了雄厚的"家底"和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外，苏联社会主义七十多年的建设历史也留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包括港口码头、工厂矿山、机场道路、宇航基地、电网、地铁、能源管网等基础设施。苏联时期有着令人羡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文化体系。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福利保障方面相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有优势。有学者指出，正是这些七十多年形成的社会主义"安全网"减缓了10年资本主义"激进改革"对百姓生活的破坏性冲击，使俄罗斯承受了照搬西方模式，进行"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痛苦。但"激进改革"过去了，这些未加润滑和修理的"减振器"再也不能承受更多的"颠簸"和"折腾"，车体开始摇晃和熄火，甚至随时会出现倾覆和报废的危险。

与原苏联曾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相比，1998年俄罗斯经济总量下降到世界第16位，到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约合苏联时期的25%，1990—199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达27%，欧盟为15%，日本为9%，而同期俄罗斯却下降了40%以上。普京上台时估算，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左右。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罗戈夫估计，当时俄罗斯在世界GDP的比重不足2%，在世界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比例则更低。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大大降低，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影响力，甚至不能通过独联体来有效地抑制离心的倾向。[1]

（二）社会衰败

叶利钦掌权期间，政府更换了七八次，总理更换如走马灯一样，国家实力一落千丈。10年的改革失败造成俄罗斯国力下降、经济规模缩小。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GDP下降了56%，工业生产下降了70%，农业生产下降50%，投资减少了75%，俄罗斯内外债积累一度达225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贫困化，居民实际收入减少50%，俄罗斯人均食品消费从原来的世界第7位下降到第40位。据俄罗斯高层战略专家预测，俄罗斯如果要避免坠入"二流"国家，保持一极地位，那么按人均购买力计算，俄罗斯GDP应占世界总量的4%—5%，只有这样，才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接近最发达国家。然而要实现此目标，按现在的发展速度，俄罗斯需要追赶40—50年，而且俄罗斯必须保持5%—6%的增长速度，即使是按8%—10%的高速度发展，俄罗斯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是2030年后的事情。

叶利钦掌权不到10年，上演了一场场"私有化"大戏，表面上声称是为了防止"苏共复辟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次空前的"财富大瓜分运动"。如今，俄罗斯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场无法无天、空前绝后的"大骗局"。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巨大财富被瓜分殆尽，只有极少数人获利暴富。

几年间，大规模、“闪电式”的私有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俄罗斯社会的面貌，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了“财团、寡头”参政的局面。[2]“私有化”运动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滋长了经济犯罪，威胁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贻害无穷。[3]

戈尔巴乔夫6年的“改组、重构”，在政治上导致了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在经济上中断了企业联系、破坏了经济布局、失去了统一的经济空间。叶利钦9年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非但没能消除苏联后期的弊端，反而加重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无序和混乱，将苏联遗留的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体系拆得七零八落、四面透风。苏联昔日的辉煌正在暗淡，当今俄罗斯甚至不能承担也无力担当。普京上台之际，全社会75%的设备或房产疏于管理、年久失修，城乡到处是落魄、衰败的景象。当时资料显示，2003—2004年，俄罗斯有60%—80%的生产设备老化，需要完全更新。俄罗斯专家预计，由于资金缺乏，电力、煤炭、运输等部门大部分设备也无力折旧更新，只能报废。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资料显示，在21世纪初，即使是利润丰厚的石油加工部门大多仍在使用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时期的设备，设备老化率达70%。苏联解体后的10年里，俄罗斯各种灾难事故频发，人祸和生产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了自然灾害的损失。其结果是，俄罗斯每年因天灾人祸损失掉3%—5%的国民生产总值。更令人悲观的是，这些灾害损失仍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加。

在社会生活方面，“休克疗法”造成了经济衰退，引发了社会领域的衰退，“三角债”蔓延，工资拖欠严重，社会欠账太多，社会财富两极悬殊、贫富分化严重。多年来俄罗斯社会10%的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是10%的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的14倍。自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逐年开始减少，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出现负数，若不是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移民补充，俄罗斯人口形势会更为严峻。在2000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俄罗斯人口每年减少75万人，人口问题已成为重大政治挑战。而俄罗斯专家预计的情况更为可怕，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社会经济措施，15年后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200万，这相当于现在俄罗斯居民人数的1/7。[4]

2001年，刚刚接任总统大权的普京指出，过去这些年的内讧和不负责任的激进改革将俄罗斯折腾得“精疲力竭”，苏联留下的“家底”已经被戈尔巴乔夫的“改组”和叶利钦的“改革”折腾殆尽。2005年，普京及俄罗斯政界高层公开讲话，一致认为过去的15年（即1985—1999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改组”和叶利钦“改革”的年代）是“失败的、混乱的”15年。

上任之初，普京承认，如果将俄罗斯社会比作一个家庭的话，俄罗斯的日子并不好过，社会中许多人在艰难度日、勉强糊口。20世纪末，步入政治

绝境的叶利钦将权柄交给普京。新世纪开局，俄罗斯灾祸便接连不断，2000年因此被称为“灾难年”。莫斯科市中心爆炸案，俄海军“库尔斯克”核潜艇沉没案，全俄最重要的电视塔发生大火，莫斯科广播发射中心被飓风破坏事件等，对此，普京深有感触道：“一系列的灾难说明俄罗斯社会和经济状况已到了灾难性的境地。”这预示着20年积累的、潜伏多年的社会问题和生产事故随时都可能爆发。可见，普京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普京面对的是一个昔日豪华、现在却摇摇欲坠的宫殿，既要整修一新，又不能破坏其结构，以免造成坍塌。材料不足、资金短缺等无疑是摆在普京面前的一道道难题，但更为艰难的是，这间房屋内的居民的长期惰性和过度的自由精神。

（三）思想溃败与精神失落

普京几次指出，俄罗斯“市民社会”刚刚起步，尚不发达。俄罗斯居民缺乏主动性和创新精神。而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责任心、政党和社团的成熟程度以及新闻媒体的社会作用。[5]由于市民社会不发达，社会中表现出极强的依赖、等待和惰性心理。

在剖析俄罗斯社会消极沉闷、缺少主动创新的状况时，俄罗斯《专家》杂志描述道：“目前俄罗斯社会的结构极为简单，没有进展。无产阶级有时候以矿工罢工的形式出现在现实社会中。农民、甚至连80年代末一度诱人的家庭农场主似乎也难以得见。工会是很乖顺的，没有人记得其领袖的姓名。知识分子更不用提了，他们在最近10年中并没有领悟，也没有学会什么。大商业资本的活动还比较引人注目，但它没有统一的立场，且隐瞒利润。官僚们团结得紧密，通过组建政权党团结在一起。但这是大部分官僚出自保住现有地位的局部的和策略上的考虑，而非出自发展的目的。如今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他们是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动力，但中产阶级并没有政治代表。”[6]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指出，当今俄罗斯社会严重缺乏活力和创新精神，社会和居民变得惰性十足、萎靡不振。而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是摆在普京总统面前、也是整个社会面前的一个难题。一些社会调查表明，俄罗斯人依赖心理严重，一种流行的说法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既然我们把选票投给普京，选普京为总统，就让他对所有一切负责。”在问到“谁应担当起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的重任”时，45.4%的人认为普京应担当振兴俄罗斯的使命，只有35.3%的人认为是全体人民，认为政党承担此任的只有3.1%。[7]俄罗斯社会难觅道义和精神上的领袖，缺少有威信的政治反对派，当局缺少对话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肩负振兴俄罗斯重任的普京显得孤独而悲壮。2001年6月12日，正值俄罗斯独立10周年，普京接见30位社会团体代表时强调：“俄罗斯要建设强国家，也要建

设强社会，社会也应承担起责任。”

在俄罗斯社会，惰性、缺乏责任感的另一面是过度的自由精神和放纵心理。变革中政府对百姓利益的藐视，造成俄罗斯百姓对国家机构不信任，轻视法律和法规。普京在2000年国情咨文中引用斯托雷平所形容的“放纵的自由”，要求令行禁止，规范行为，遵守法律。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守法并不总能解决问题，所以俄罗斯许多情况下认为守法并不是社会中唯一准确的行为方式。抽样调查表明，俄罗斯只有30%—50%的居民认为以下行为是可以饶恕的：偷税、逃避服兵役、藏匿他人财物、不守信用等，有三分之二的人竟认为“有时行贿或受贿是正常的”。[8]

俄罗斯学者指出，与爆炸、火灾等显性的天灾人祸相比，俄罗斯还隐藏着更多的隐性危险，思想溃败、理论混乱、文化和科技潜力衰退才是更加危险而可怕的。1999年11月22日，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赛二世在《劳动报》上刊登文章，提出比起其他领域的危机来，俄罗斯社会的“精神危机最可怕”。不少俄罗斯思想家认为，1985年开始的“改革”使俄罗斯社会在精神上处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2000年5月16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与俄部分作家座谈时谈到，俄罗斯正面临着精神和领土的分裂，俄罗在精神和道德上衰落了，恢复起来需要150年。

2010年1月26日，汤姆森路透集团发布的一份科技评价报告指出，自苏联解体20年以来，俄罗斯的科研产出持续下滑，仅占全世界论文总量的2.6%。苏联是曾经的科学与技术强国，俄罗斯如今却排在了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之后，仅仅略微领先于荷兰。这篇报告将俄罗斯科技教育衰退的原因归结为：俄罗斯政府长期以来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有限；科研队伍严重老化；商业化造成公众缺乏对科学的尊重；苏联解体后有超过8万名科研人员外流等。

（四）政治遗产

普京执掌国家大权之初，正值俄罗斯社会处于一个危机的历史关头。人们看到，普京接过了叶利钦的权棒，也继承了其沉重的政治遗产，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两个方面。在宪政制度层面，叶利钦照搬的西方政治制度在俄罗斯并不成功。正如许多俄罗斯学者所言，这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制度体系，表面上貌似民主的外壳，实际上保留了不少过去苏联时期的势力残余和官场作风。在实际政治运行层面则表现为，叶利钦在位近十年，其首要目的是保住权力，维护总统宝座，是像沙皇一样“统治”，而非领导和治理国家。其结果是，在“超级总统制”的形式下，实际上是大权旁落，家族势力和幕后政治盛行；财团寡头操纵媒体，要挟国家；地方势力

乘机坐大，民族分裂分子武装恐怖，公开对抗联盟中央。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权力机关分庭抗礼，秩序混乱，政令不一，令行不止，政局跌宕起伏，官场腐败丛生。

普京面临的是大国崩溃后的一场空前的政治灾难。2005年9月初，俄罗斯发生了别斯兰人质事件，1200多人被劫持为人质，人质死亡300多人。恐怖惨案发生之后，普京在向议会的国情咨文中沉痛地宣告，现行的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不符合现实的要求，不能应付各种挑战。[9]

对于过去的十几年，普京在2001年2月26日对韩国电台记者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工作在革命时期，而我认为革命对俄罗斯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开始一个稳定的、正常的、加强国家机构、发展公民社会和经济的时期。"2002年1月中旬，普京在访问波兰和法国时，曾前后两次指出，需要拨乱反正，过去的那种"民主秩序"只是对极少数寡头有利，在经历了十多年激烈的变革之后，俄罗斯社会还处在"过渡阶段"，[10]而这个过渡时期可能要长达10—15年。[11]

二、寡头干政与政治困境

回顾俄罗斯十几年的政治演化历程，总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留下的政治遗产，俄罗斯学者通常把这15年历史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失败、苏共垮台、苏联崩溃瓦解的阶段，时间为1985年3月至1991年12月。第二阶段是"改朝换代"和"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阶段，时间为1991年12月至1993年10月，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10月炮打"白宫"和制宪公投，主要表现为政权改变了颜色，政治失败者下台，胜利者开始分享或重新分配国家权力。第三阶段是"你争我夺"的财产私有化阶段，时间大体为1993年底至1998年末，代表性事件为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和1998年8月金融危机。在这段时间里，"自由民主派"政权内部政治争权仍在继续，但对财富和所有权的争抢更为激烈。其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大分配、大转移，少数人瓜分并攫取了大量资产，进而操纵经济、影响政治。

可见，争夺政权、瓜分财产——"政治上抢、经济上夺"演示着十多年来俄罗斯社会演变的主题。而政局动荡不稳、官场腐败丛生、社会停滞不前、经济陷入危机则是其必然结果。俄罗斯舆论提出，普京执政后必须采取坚决的整顿措施，强化政治权威、整顿经济秩序，结束政治领域的"斗"和经济领域的"抢"，进入"治"的阶段。只有这样俄罗斯才有希望迎接新世纪，步入新时期。

2000年7月8日，时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的叶戈尔·斯特罗耶夫形容说："普京总统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开刀后发现病人肌体千疮百孔，几

乎各个器官都有问题。”2000年7月13日，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刊登了普京总统与法国作家马克·阿尔泰的谈话，普京认为俄罗斯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有两个：贫穷和犯罪。俄《独立报》时任主编维·特列齐亚科夫在该报1999年最后一期撰文指出，普京执政将遭遇“三大对手”，这“三大敌对势力”分别是：地方封建势力、灰色经济势力、官僚腐败分子。

解散苏共之后，戈尔巴乔夫组建并任主席的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鲍·古谢列托夫认为，比起经济和社会遗产来，普京继承的政治遗产更为可怕，这其中之一就是分离主义和分裂主义甚嚣尘上。在叶利钦交权、普京上台之际，有俄罗斯报刊评论道，叶利钦打败了苏共，撕裂了苏联，赢得了政权，却没有进行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由于叶利钦身体健康不佳，造成国家大权旁落，寡头通过“家族”操纵政局，地方势力乘机坐大。俄罗斯联邦内民族分裂势力膨胀，地方分离主义盛行。车臣公开独立，并武装拒合，一些民族共和国几乎成为独立王国。

20世纪90年代，效仿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总统”称谓，俄罗斯各地掌权者自命“总统”成风，一国之内有“总统”称号的人物竟达30位之多，这种政治反常现象一直持续到2010年底才有所收敛。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分离主义严重，各地政权各行其是，实施地方经济封锁，拒绝上缴财政税款，甚至威胁发行自己的货币。一些地方官员为所欲为，组织只服从自己的警察保安机构，阻挠法院的判决。普京强调，俄罗斯地方有25%的法律或法规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12]。这些地方法规有3500多件。另外有一些共和国的宪法与俄罗斯联邦的宪法相抵触。缺乏统一的法律空间，宪法制度遭到破坏，俄罗斯几乎处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政治状态。

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另一个“怪胎”是寡头参政、财阀横行。新生的私人财团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控制着金融、能源以及一些原料生产部门，通过销售天然气、石油等掌握了巨额的外汇和收入。与日益削弱的国有经济相比，这些私人财团财大气粗，横行一时。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七大寡头一度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一半以上。1996年，他们动用手中的金钱，扶持政治上几乎奄奄一息的叶利钦重新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寡头们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要求政治回报，企图将国家政权“私有化”。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寡头将手开始伸向传媒，以扩大社会影响力。叶利钦后期，寡头纷纷争抢新闻媒体，把新闻媒体视为“肥肉”。[13]于是俄罗斯媒体成为财团和寡头的“婢女”，变成他们争夺财富和权力的工具。正如原“俄罗斯电视台”台长奥列格·波普佐夫所言：在俄罗斯金钱可以购买言论，舆论成了商品，媒体成为娼妓。[14]叶利钦当政时期，在金钱上受制于7大寡头，叶利钦的亲信甚至与寡头联姻，形成了叶利钦的“家族”统治。部分财阀或出任政府副总理，或出任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游走于官场和商场之间。正如叶利钦形容的那样：国家被寡头和黑

手党掐住了喉咙，政府成了财阀的人质。叶利钦的寡头民主和“家族”政治已走到尽头。

三、普京的治国理念

普京上台前后，俄罗斯以及西方的媒体纷纷对普京及其思想进行猜测，一些分析家试图给普京贴上这样或那样颜色的标签：有人断言普京是“反共分子”，有人认为他是要退回到苏联的“保守克格勃”；俄罗斯有人认定普京“是对俄罗斯独特道路不感兴趣的西方派”，西方有人则认为普京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有人说普京是“自由民主派”，有人称普京是“铁腕专制主义者”；俄共认为普京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自由主义”，而右派则指责普京是企图恢复“警察式国家”的国家主义者；有的学者将普京比喻为“戴高乐主义”，有的学者则把普京与“皮诺切特”模式联系在一起，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普京像亚历山大三世，有的历史学家则认为普京更崇拜彼得大帝。对于上述议论，一些人认为有些合理的成分，但形容得并不完全准确，一些标签显得牵强。于是有的分析家采取了“排他法”，提出普京既不属于右派，也不属于左派，政治上非白，也非红。普京支持民主，但有别于自由派，经济上主张放松和自由，但又强调国家和控制，等等。因此，可以认定普京在政治上倾向权威主义，在经济上推行国家主义，在思想和道德上属于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上实行现实主义。

我们认为，将普京及新时期俄罗斯将选择的道路用某种“主义”来概括未免失于简单。普京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务实的精神，不以任何“主义”为目标，而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俄罗斯实际为坐标，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因此其思想呈现出一种多彩的、混杂的、交叉的景象。应当说普京的历史观和社会价值观集中反映在普京初期的治国理念里面，而普京的治国之道则具体体现在其对时代、阶段、战略、目标、方向、任务、手段、策略等问题的认识上。

时代观。普京认为，有两种因素决定着未来发展的趋势：一是过去百年的历史证明，苏联共产主义的尝试遭到失败，以市场经济、民主、尊重人权和自由为原则的体制在全球扎根；二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形成，要求现代化必须推广高新技术，增加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变生产结构，大力发展信息、公共设施、科学和教育体系。

历史观。普京认为应该尊重历史和传统，不应“数典忘祖”，刚刚过去的七十多年的苏联历史，与父辈们的生活命运紧密相连。2007年12月12日，普京在回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提问时指出，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在于，（后来）人们失望了，因为有人打着民主的旗号肆意妄为，有人借市场和市场关系之名洗劫了数百万民众，一小撮人大发横财，侵占

和瓜分本该属于全体人民的无数资源。普京对《时代》周刊记者讲：

苏联解体意味着什么？2500万俄罗斯裔的苏联公民被抛在新俄罗斯境外，连想都没想。2500万，这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他们陷入什么样的境地——变成了外国人？有谁过问吗？苏联解体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例如比利时此时的艰难抉择，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出台某项决议之前，会征询民众意见："您是否愿意脱离你们目前共同生活的国家？"我相信，如果当年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进行了全民公决，绝大多数公民未必会说："是的，我们愿意脱离苏联。"可是谁也没有问过他们。难道这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民主方式吗？我们不想揭这个伤疤，也不想谈这些。但事情就是这样。

这样，2500万人被抛弃在国外，他们缺乏生活资料，面对着当地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他们却不能来到新俄罗斯——他们历史上的祖国，他们不能来看望亲友，因为没钱坐火车和坐飞机。他们在俄罗斯没有一席之地。居无定所，无处工作。这难道不是悲剧吗？我指的就是这个。我指的不是苏联解体在政治层面上的，而是人道的悲剧。这难道不是悲剧吗？当然是悲剧，还能有比这更惨的悲剧吗？[15]

价值观。普京认为，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建设成就的，应当寻找能够凝聚全社会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新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100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普京认为，俄罗斯思想应当包含以下核心价值内容：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概念、社会团结。普京提出，当今俄罗斯社会应当重新弘扬"爱国主义的传统"；俄罗斯必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俄罗斯强有力的国家是"秩序的源泉和保障，是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俄罗斯应发扬互助精神，保持稳定和社会和谐，防止重新陷入"政治内讧"。因此，可以将普京的价值观概括为"爱国主义是旗帜，强国意识是核心和支柱，国家主义是手段和动力，社会团结和稳定是基石"。

社会发展观。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社会"绝大多数人反对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希望维持来之不易的稳定和妥协。2001年2月26日，普京在出访韩国之前对韩国电台记者说："叶利钦工作在革命时期，而我认为革命对俄罗斯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开始一个稳定、正常的、加强国家机构、发展公民社会和经济的时期。"可见，冻结革命、拒绝极端、保持稳定是普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9月，普京在与境外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和记者对话时谈道："至于2012年以后会怎样？你们知道，很难预料。我的任务是保证这个大方向：政权要稳定、正常运转和有效。"[16]

普京认为，俄罗斯“你死我活”的革命性阶段已经过去，俄罗斯应当转入日常的建设时期，“强国富民”是根本任务。2001年4月3日，普京在向议会两院宣布国情咨文时明确指出，过去的10年，毫不夸张地说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现在可以坚定地宣布，这个时期结束了，不会再有革命和反革命，坚实的、有经济基础的国家稳定是俄罗斯和百姓的幸福所在。普京认为，这是人们正常的生活逻辑。人们应当意识到将面临长期艰苦的劳作。俄罗斯面临的难题是如此之盘根错节，不能采取“强攻”战略，而是需要专业性的、日常性的劳作。

对于执政的目标和任务，基于对俄罗斯社会灾难性处境的领悟和丧失大国地位危险性的深刻认识，普京上台后明确提出了“强国富民”的口号，维护国家主权统一，解决社会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005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百姓的储蓄贬值，原有的理想破灭，很多机构被匆忙地解散或改组。国家的完整性由于恐怖主义的入侵而遭到破坏。少数寡头当道，多数民众赤贫，经济严重衰退，财政不稳定，社会领域瘫痪。解决这些难题是一项十分艰巨和繁重的任务。俄罗斯的目标是，保住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不丢掉肯定的成就，证明俄罗斯民主制度的生命力，找到俄罗斯自己建设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和国家的道路。

俄罗斯的道路和模式选择。普京提出：一方面，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失败”，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反而使俄罗斯偏离了人类康庄道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俄罗斯决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另一方面，普京对10年来俄罗斯所进行的激进改革提出批评，认为社会已经“精疲力竭”，再也无法忍受激进改革，俄罗斯必须寻找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渐进改革道路，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更不应照抄外国教科书上的模式和公式。

四、政治整顿与经济治理

2008年2月8日，在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即将离任总统之职的普京满怀深情地回忆：

你们都很清楚，八年前国家的形势是极其严重的。国家凋零衰败，公民的货币储蓄变得一文不值。恐怖分子在我们眼皮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粗暴地入侵塔吉斯坦，在一些俄罗斯城市中爆炸楼房。但是我们的人民没有绝望，没有被吓倒。相反，我们的人民挺起了腰杆，加强了团结，以此进行了回答。起来捍卫俄罗斯及其领土完整的不仅有军人，而且是整个社会。许多个月没有得到工资的医生和教师们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工人、工程师和企业家们辛勤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劳动，力图使我们的经济摆脱停滞和崩溃。[17]

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进入21世纪，普京接管俄罗斯大权。经历了15年的风风雨雨，历史证明了激进革命与反革命行动已经成为过去，追求西方的“赶超模式”也行不通。俄罗斯社会应当探索符合俄罗斯传统与现实需求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权应当适应俄罗斯特有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心理。[18]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政治可以称为是“有控制的民主”或者是“能管理的民主”，但绝不应当是过去道路或西方模式的翻版。

2004年3月，普京高票赢得大选，蝉联俄罗斯总统。在执政的5年中，他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果断而强硬的政治举措：出兵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整顿联邦秩序、恢复和加强中央权威；出台相关法律，强化政党管理；打击寡头势力，规范和控制传媒；提倡爱国主义，凝聚国民意志等。这些拨乱反正的政策和治理整顿的措施，符合俄罗斯多数居民的愿望，适应了俄罗斯社会摆脱危机的现实要求，得到了上层政治势力特别是军队及强力部门的大力支持，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国理念和执政风格。借助近年来较好的国际市场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普京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独一无二的政治魅力，通过灵活而有效的政治手段和斗争策略，在稳定大局和恢复秩序方面赢得了民心，取得了政治优势。

普京上任之初，俄罗斯著名政论家、政治基金会会长维·尼科诺夫认为，普京为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和三大任务”：以振兴俄罗斯为最高目标，三大任务则是横向摆脱财团寡头影响，纵向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全面建立正常市场经济秩序。

普京认识到，今日俄罗斯社会的症结与其说是在经济领域，不如说是在政治领域。因此普京首先从政治领域入手，恢复宪法秩序、整顿联邦体制，拉开了普京“新政”的大幕。普京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兵车臣、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

出兵车臣，打击恐怖主义、分裂势力和极端分子，拉开了他一系列政治战役的序幕。加强政治控制、打击地方分裂势力也是普京恢复政治秩序的重要行动。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不应四分五裂，要“统一法律空间”，各地区权力一律平等，不能搞特殊化。他就职不久便决定在89个地方行政主体基础上成立七大联邦区，由总统亲自任命并派遣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七个联邦辖区与俄大军区区划相似。据称，从内务部独立出来的武装警察——“内务部队”也将在七个联邦区总统代表所在地设立分部。普京的同乡、原政府总理、现任杜马“审计委员会”主席的谢·斯捷帕申声明将在七个联邦区派驻审计代表，以监督和审查各地执行中央预算和财政情况。看来，普京决意结束地方势力各自为政的局面，削弱地方政治势力，确保政

令畅通。

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有关联邦委员会的改组，这也是涉及地方官员命运的问题。2000年5月17日，普京向俄议会下院提交了三项法案，即《联邦委员会（上院）组成法法案》《联邦主体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组织原则修正案》和《联邦地区自治设置原则修正案》。目的是使总统有权罢免“违法”的地方长官和解散地方议会，改组上院，使地方首脑不再自动成为上院议员。根据此项法案，到2002年联邦委员会组成应该更换完毕，届时地方行政和立法首脑不再兼任联邦委员会委员。

普京强调以上所有联邦中央与地方等关系的改革是在俄罗斯1993年联邦宪法的范围内进行的，上述行动不但完全符合宪法，而且正是为了贯彻和实施宪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3500多项与联邦法律不符的地方法规80%已经得以纠正。对于社会中修改宪法的呼声，普京坚决予以回绝。他认为，俄罗斯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之一，许多人为之付出了劳动，修改宪法只能引起政治纠纷和政治动荡。

（二）出击寡头、整合传媒秩序

普京上台伊始，曾宣布将与各财团、寡头“保持同等距离”。几个月之后，普京开始巧妙地分别出击寡头势力，迫使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财阀寡头流亡境外，消除了百姓对普京的疑虑，赢得了俄罗斯社会多数人的赞誉。2002年，在普京的授意下，俄罗斯最大的国有控股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出资将原来由古辛斯基私人控制的“桥传媒”（Медиа-Мост）公司改组，实现控股。2004年10月，在普京指示下，俄罗斯政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西方的压力，由几个强力部门联合对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掌控的“尤科斯”（ЮКОС）石油公司进行查处，并在外地逮捕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之后，经过几轮的法庭审判，将嚣张一时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投入监狱，并且以偷税、洗钱、诈骗等罪名几次延长刑期。2010年底，不顾美国政府的一再施压，普京总理公开表态，强调“非法盗窃和强盗式的掠夺者应该坐牢”。

在对寡头出手的同时，2001年，普京敦促政府和有关方面，开始对俄罗斯的老大难问题——自然资源垄断行业进行改组。着手改组天然气、电力、铁路运输等传统垄断部门，目的是增强上述公司的效益和透明度。在这些复杂利益争夺和政治较量中，普京表现得十分稳重，步步为营，强调“行业改组要以社会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公司或公司领导人的意愿为主”。2001年夏天，俄罗斯宣布成立国家统一的价格和收费委员会，防止垄断部门自行定价。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传媒业在“自由化、商业化”的洪流中陷入混乱。1993年以后，少数暴富的财阀、寡头开始将触角伸向传媒业，不久，一些国家级的报刊甚至电视频道被寡头占据。凭借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寡头一方面参政、胁持政府，继续争抢剩余的国有财富；另一方面，与境外资本特别是西方传媒大鳄相互勾结，企图掌控俄罗斯传媒市场。普京深知掌握舆论阵地的重要性，2001年4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一读通过了《新闻媒体法修正案》，规定媒体中外资的股份不能超过50%。

普京多次强调政府对舆论的引导，加强政府对媒体的管控。早在普京当政伊始，俄罗斯政府吸取上次车臣战争的教训，加强了政府对媒体报道的引导和控制。在向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公开表示，他对俄报刊媒体受制于私人财团或少数政客表示担忧。“在90年代，涌到俄罗斯正在成长的媒体市场的有各种各样的资金，其中一些资金很难说是透明的。那些资金的主人追求的利益与俄罗斯的社会需求相去甚远……在俄罗斯发展的那个时间段，威胁新闻自由的已不再是以前垄断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寡头资本的棍棒。”[19]之后不久，在“电视一台”和“中心电视台”两家媒体许可证到期之际，俄罗斯政府借机施加影响，增强了国家的管控。对于与官方不和谐的声音，当局开始采取行动，并迫使个别财阀寡头放弃了对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媒体的控制。

2004年以后，在遭受一系列恐怖袭击之后，普京进一步强化了对境内传媒和记者的管控。2005年，普京在向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我再说一下，我们的现实情况不能让我们满意，因为大的媒体在摆脱寡头集团的控制以后，没有能保护它不受个别主管人员不健康思想情绪的影响。”[20]普京接着讲，今后“我们应当做出保证，保证国家电视广播将不受国内任何集团的影响，最大限度客观地反映国内所有社会政治力量的情况”[21]。

（三）规范政党政治、加强国家权威和统合

在政党制度方面，普京多次呼吁建立成熟的政党体制，消除“党派众多、实际上是无党”的局面，通过制定并实施新《政党法》，逐步使俄罗斯形成三个或四个大党的体制，改变政党数量繁多、政客见风使舵的政治局面。普京认为，正常的政党制度能够使群众明确方向，为国家准备后备干部队伍。2007年前后，俄罗斯修改了《选举法》和《政党法》，将政党通过选举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提高到7%的得票率。2007年，普京在向议会发表国情咨文中指出：“新的选举办法不仅会加强政党对建立民主政权的影响，而且还会促进政党之间的竞争，从而增强和改善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素质。一些政党将根据选举的结果有权去要国家的拨款。俄罗斯的纳税人有权利希望，他们的钱将不被用于空洞的平民主义承诺，或用来动摇国家制度的基础。”[22]

（四）推进行政改革、增强政治效率和执行力

普京认识到，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俄罗斯就不能建立有效的权力执行体系，不能形成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普京认为行政改革不仅包括中央政府，还包括地方整个行政体系。他强调，这里不需要革命，不是要开除或解职某些官员，而是要对每个改革方案进行认真研究和论证，目的是加强行政效率。[23]

减少行政干预、促进经营便利是上任初期普京大力推进的又一项重要举措。普京支持由经济部长格列夫提出的“经济活动非官僚化”的主张，减少政府和官员对企业的无端干预。2001年上半年，由俄罗斯政府经济部向国家杜马提出14项法律修正案，宗旨是防止官员干涉企业活动，简化手续，减少各种检查和批复。经济部的提案受到了众多政府主管部门的反对和抵制，包括文化、体育、卫生等部门在内的官员不愿减少手中的控制权。普京几次打电话到杜马，坚决支持经济部的倡议和法案，其结果是俄罗斯需要审批的项目由原来的500多个减少为102个。与此同时，俄罗斯新《税法典》获得通过，俄罗斯统一实行13%的所得税。普京坚持未来俄罗斯企业的利润税下降为24%，取消或合并过多的税种。普京声明，其他国家的公民可以享受正常的经济自由，俄罗斯人在自己的国度也应如此。经营活动应当自由化，官员应当放松管制和无谓的监督，让资本自由流动。但几年的实践表明，时至今日，俄罗斯在改善经营环境和放松经营限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推进司法改革及社会领域的改革

在立法方面，普京强调首先要理顺立法关系，清理各部门与法律不符的规章；在司法改革方面，要提高法院的作用，加强法院审判效率，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工资，以增加法官的权威性，防止权力或黑社会拉拢和影响法官的决定。10年过去了，俄罗斯司法环境仍有待改善。俄罗斯司法透明度和独立性仍是遭受诟病最多的领域，也常常是西方批评俄罗斯的借口。

多年来，俄罗斯政治运动轰轰烈烈，但社会领域的改革却一直未动。俄罗斯劳动法典是1972年通过的，居民的房屋修缮、水、电、煤气等仍基本沿袭着苏联时期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普京出任总统的第二年便开始对土地、税收、海关、预算体制、劳动领域、公用事业、教育、养老金等领域进行改革。2005年普京本想凭借连任总统的余威，推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改革，但由于各地民众的反对而无果而终。俄罗斯分析家指出，普京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因为相对于过去俄罗斯善于提出宏大纲领和计划来说，社会领域的改革触及多数人的切身利益，通常不受人们的欢迎，会遭到抵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往往给俄罗斯带来的不是灾

难，就是做表面文章。这样看来，“水滴石穿”策略可能更适用于积重难返的俄罗斯社会。

2001年7月1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新闻发布会。一位最先在西方媒体上提出“Who is Mr.Putin?”问题的美国记者，又向普京提出了“普京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普京笑着答道：“最好不要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像您这样聪明的记者自己心里清楚。首先我自己不愿给自己做评语，更不喜欢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况且谈论一个人，不应看他自己的言辞，而应观察他的行动。”在回答“当3年半后总统任职期满时希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时，普京说道：“我希望，我们今天开始的，并积极努力地实施的这一切，到那时能够实现，并带来实际成效，让每个公民都能通过自己的口袋切实感受到的成效。希望我们的人民感觉更安全、生活更幸福、更富有，每时每刻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24]

五、普京的民主观

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之后，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特别是随着普京出台一系列加强国家权威和治理整顿的政治措施之后，批判普京压制民主、限制自由的声音愈来愈强烈。普京是如何认识民主问题的，是怎样就民主自由问题与西方国家开展政治对话的？下面是普京执政前5年在民主问题的上一些论述。

（一）关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民主性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民主社会了吗？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民主化改革”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改革？他们留下的是政治遗产，还是烂摊子？对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普京认为是“偏激”的和“年幼”的，[25]超越了俄罗斯的社会现实。2002年普京在一次讲话时指出：

俄罗斯的民主事实上是从上面来的，这是一。在历史范围最短的时期内我们根本改变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二。我们所以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首先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时急剧地超越了社会适应这些自由的能力……[26]

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政治进程，打倒苏共、瓦解苏联、照搬西方政治民主模式并没有使俄罗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反而造成少数财团寡头干政，地区、民族冲突不断，犯罪猖獗，社会秩序混乱，分裂活动甚至威胁着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对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民主的阶级性质，普京认为，90年代末期俄罗斯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

的上层人物的自由。在2000年，普京指出，“政权因内部矛盾而陷于瘫痪状态，无疑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最自由的社会，但遗憾的是，甚至自由到不要法律、秩序和道德的约束……但‘不受限制的自由’最终既压制国家，又压制公民，而使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消失殆尽”。2004年9月，别斯兰严重恐怖事件发生后，普京在全国电视讲话上再次强调：“我们现在生活在伟大国家——苏联解体之后形成的环境中……我们生活在经济过度不符合现状和政治体制不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27]

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主幼稚病和叶利钦时期的假民主和伪革命不同，普京决定探索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二）推进民主化应符合俄罗斯现实、历史和文化传统

普京认为，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应符合俄罗斯的现实，能够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普京在2005年与美国总统布什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会面中说道：“14年前，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赞成民主的选择……这是我们最终的选择……但是我认为，很多人将同意我的观点，民主原则和标准的贯彻不应该让国家解体或让人民受穷。我们认为，而且我个人认为，在俄罗斯土地上实施并加强民主不应危及民主理念。它应当使国家更加安定团结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8]面对来自西方“民主教师爷”的种种说教，普京强调说，俄罗斯只能自主地确定民主原则和方式，民主必须从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及国情出发。俄罗斯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能够也将自主地决定民主道路上的时间期限以及推进民主的条件。[29]

（三）关于民主与稳定、国家与社会等相互关系问题

普京认为，现阶段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才能保护俄罗斯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国家的软弱只会阻碍民主进程。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说道：

我们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利用国家的工具来保证各种自由：个人自由、经营自由、发展公民社会机构的自由。有关权利与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至今在这场争论中还有人利用专制和独裁的题目搞投机。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只有强有力的、有效的（如果有人不喜欢强有力这个词，我们就使用有效的），和民主的国家才能保护公民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能够为人们的幸福生活，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创造条件。[30]

国家的软弱无力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与独裁政权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同样严重。没有国家的有效工作，就不会有人和公民的权利，也不会有人和公民的自由，说实在的，也就不会有公民社会本身。[31]

普京认为，在当今俄罗斯加强国家权威与维护民主、保障自由并行不悖。2000年2月25日，普京在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中指出：

我知道，许多人现在害怕秩序。但秩序也是规则。一些人至今错误地坚持，说不要秩序才是真正的民主。别再耍花样了，别再拿过去来吓唬我们了。多数俄罗斯人都在说，“俄罗斯土地富饶，只是缺乏秩序”。[32]

（四）关于政治发展的目的、趋向以及民主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

普京指出，民主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之上。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说道：“俄罗斯需要一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益的、社会公正的、能够保证政治稳定发展的经济体制。稳定的经济——这是民主社会的主要保障，是世界上受尊敬的强国的基础。”[33]2004年3月，普京向法国记者表示：“绝对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当然，有一些不能不遵从的民主基本原则。但是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想保障这些民主原则是不可能的”。[34]

（五）关于民主、法制与秩序的关系

普京认为法治是民主的基础，推进民主不能以牺牲法治和稳定为代价，“学会按照宪法生活，这是民主的高等学校，是我们大家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35]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又强调，“在俄罗斯发展民主的必要条件是建立有效的法律及政治体系。法治、来之不易的稳定、平稳推行现有经济方针，发展民主不能以牺牲上述一切作为代价”。[36]

（六）关于民主与新闻自由问题

早在2000年普京执政之初，他就认为经济上不独立的大众传媒不能算是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法律禁止检查和干预媒体的活动，当局严格地遵循着这一原则。但检查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检察，干预也不可能仅仅是行政干预。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媒体经济效益不好，只好屈从于其主人或赞助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媒体被用于打击竞争对手，有时甚至变成了搞歪曲报道的媒体，变成了与国家斗争的工具……我们必须确保新闻工作者享有真正的而非装饰门面的自由，为文明的新闻业创造法律和经济条件。[37]

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我们想要保证大众传媒的真正独立，最重要的是要为他们建立起独立

的经济条件，使他们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那些只保护自己集团利益而不是人民利益的寡头集团。[38]

（七）关于民主与选举形式等问题

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垂直权利体系的措施，其中包括取消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直选，西方政界批评这是“民主的倒退”。普京在2004年12月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当地方立法机关的合法代表由该地区全体居民不记名选举直接产生时，当代表们投票支持由总统提名的州长时，这种权利体系无论是从地区的角度，还是从多民族的角度考虑都将是最优选择，它并不会破坏民主原则，也不会损害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的基础。[39]

2005年5月，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普京进一步表示：

在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地方领导人曾经一直是被任命的。因此地方领导人任命原则不是一国民主与否的标志。国家总统向地方议会代表提议州行政长官的人选，然后地方议会投票表决，而地方议会的代表是由公民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只不过是通过复选人。在俄罗斯，俄联邦总统是由全国人民直接不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而在美国是先选出复选人，然后再选出总统。本质上，我们把这种复选机制引入了俄罗斯联邦州长的产生。这种在美国运用于全国的机制被认为是民主的，而在俄罗斯复选机制被用于地方水平上反而成了非民主的。总统由全民直接不记名投票产生应该是更民主一些，但是你们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体制。[40]

（八）剖析西式民主、反驳西方的无端指责

普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也不是尽善尽美。2005年初，普京对法国记者称，如果认为在所谓西方民主制度中没有腐败，是会被人笑掉大牙的。2005年5月，普京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对记者说道：

（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选举的结果最后要通过法院来确定，说明选举体制本身并未有效运作，只能求助于法院体系。这意味着，选举体制内部本身存在着矛盾。但是我们并不准备插手，因为只有美国人民自己才能决定好坏。但是当我们对美国伙伴说“你们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听到的回答是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看到问题了，但是人民已经习惯

了，还将这样继续下去。”我认为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41]

2005年以来，布什、赖斯在民主问题上加紧了对俄罗斯的指责，认为俄罗斯应当保持“民主的发展轨道”，俄罗斯的民主应符合“自由竞争、法制、新闻自由、选举”四项标准。普京对美国《60分钟》节目记者说，美国在经历了2000年总统大选的尴尬之后，已经没有资格再来给俄罗斯上民主课。

（九）关于“颜色革命”

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政权更迭事件被西方鼓吹为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普京在2004年12月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这些地区

最让我担忧的是以非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倾向，这才是最危险的。持续不断的革命秩序正在建立，时而是玫瑰色的，时而又是什么蓝色的。我们应该习惯按照法律来生活，而不是按照其他地方的政治目的性，这是我最担忧的。应在社会内部发展一定的法规和秩序，当然，也需要维护民主。但是，如果走上一条持续不断的革命之路，这些国家和人民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后苏联地区都将陷入无尽的冲突中去，后果严重。[42]

普京对西方在民主选举问题上的双重态度颇有微词。在2004年12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普京表示：

伊拉克就要进行选举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将从约旦监督这次选举。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但当我们提议监督车臣共和国的选举时，得到的回答是——不行，不可以，因为那里条件不允许！尽管那里军事冲突早已结束，且组建了政府机构。而在伊拉克全境百分之百被占领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选举！[43]

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期间，普京在印度访问，他说，西方人拒不承认选举结果，非要选举出自己合适的人不可，为此他们可以选举第三次、第四次！

（十）关于输出民主问题

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时认为，“第一，民主是不能输出的，民主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第二，在当今，对国际法的遵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起民主的世界秩序”。[44]同时，普京认为，不应当把民主问题作为外交手段，以此来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和政策，特别是不容许利用民主问题，企图从外部操纵作为一个大国的俄罗斯。2004年12月，在记者招待会上，普京

表示，“民主不应成为外部势力支持本国反对派颠覆现政权的手段。如果别国的批评是积极的，俄罗斯将洗耳恭听，但如果那只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的话，则置之不理”[45]。

2005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出钱、出人、出力，策划“颜色革命”，极力用“民主化”手段来包围、挤压俄罗斯。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态势，2005年7月20日，就在美国国会讨论拨款问题的同一天，普京会见俄罗斯社会团体和人权委员会的代表。普京在会上严肃地表示，俄罗斯坚决反对国外势力资助俄境内社会组织。普京指出，谁出钱，谁点歌，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俄罗斯的事情只能靠自己来解决。

六、西方的政治围剿

2000—2008年，普京执政整整8年。在这期间，普京坚决打击分裂势力，削弱寡头影响，整顿经济秩序，规范大众传媒，改组权力结构，积聚社会资源，强化中央权威，力图走一条俄罗斯式的政治发展道路。8年来，俄罗斯强化政治稳定以及控制经济资源的政策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政府的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对外政策更加灵活主动。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显然不喜欢俄罗斯的特立独行甚至离经叛道。他们既害怕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又不满俄罗斯“脱离西式自由民主模式”。因此，这些年来，特别是普京执政以后，西方政要和媒体对俄罗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他们指责俄罗斯政府“压制民主、控制传媒、强化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损害人权、打压反对派、破坏司法独立、压制非政府组织、阻碍他国的民主化进程……”认定俄罗斯“在民主上退步，在恢复苏联传统，倒退回苏联”，甚至不惜给普京扣上“独裁、专制”的帽子。2006年7月，随着八国峰会在圣彼得堡的召开，西方社会批判俄罗斯“压制民主”的声浪达到高潮，西方政界人物和一些主流媒体甚至公开宣称，应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面对西方的“民主攻势”，俄罗斯不甘示弱，一方面在外交场合积极对话，一方面内部采取措施、主动应对。

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西方阵营自觉赢得了对苏联阵营的冷战，以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为主要模式的西方阵营取得了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全胜，西方民主自由是永恒的、普世的，西方政治模式光芒四射，闪耀山巅；俄罗斯只配得上失败者的角色，只能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指教，匍匐在西方自由民主的旗帜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西方世界占领了思想和道德的制高点，西方政治模式不容许任何质疑和挑战。因此，面对普京掌权的俄罗斯，一开始西方世界便报以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傲慢地观察着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

西方认为，普京加强中央集权，对新闻媒体严加管控，是在背离“市场和民主的轨道”。在西方智囊和政治谋士眼里，俄罗斯因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和核武库，仍然是西方世界的重大威胁。俄罗斯仍在试图挑战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即使是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和“改朝换代”之后也是如此。西方认为普京时期借助巨额的石油外汇收入，正在谋求“恢复苏联”，而这将构成对西方世界的严重挑战，使西方失去冷战后获得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红利”。

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不久，2001年10月4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美俄商会上发言称，虽然俄罗斯在“9·11”事件后与美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但美俄双方的一些严重分歧依旧存在，特别是在武器扩散和人权问题上的分歧。赖斯警告说，“简单地掩盖我们仍存在一些分歧的事实，对我们任何一方都是不好的”，“我们将继续关注车臣的人权问题，继续就此问题进行会谈。”此后不久，美国政府发表的2002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俄罗斯正处在充满希望的转型时期，正在争取民主的未来，并成为反恐战争中的伙伴。报告说，俄罗斯迟早会认识到，社会和政治自由是国家强大的唯一途径。美国将鼓励俄罗斯发展民主和开放经济，因为这些是国内稳定和国际秩序的最坚实基础。只要俄罗斯不受有效的民主政府的管理，稳定仍将是难以实现的。美国政府努力劝说俄罗斯政府，俄罗斯及其所在地区的民主进程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有好处，并能改善俄罗斯与美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反，阻止俄罗斯国内和国外民主发展的行动将妨碍俄罗斯与美国、欧洲以及邻国关系的发展。

随着普京政府治理整顿的步伐加快，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的“警告和威胁”也愈发频繁。2004年以来，在民主问题上美国官方进一步提高了对俄罗斯指责的调门。美国政府认为俄罗斯已经偏离了“民主的发展轨道”，俄罗斯的民主已经不符合“自由竞争、法制、新闻自由、选举”四项标准。2004年初，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甚至通过议案，要求布什政府说服其他西方盟友把俄罗斯赶出八国集团，因为俄罗斯当前的政治体制正朝着“违反民主的”方向发展。针对别斯兰事件后普京总统进行的旨在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政治改革，美国指其为“民主的倒退”。

2005年7月，欧洲议会提交了300多页的报告，对俄罗斯民主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俄罗斯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民主国家”。

2005年2月，美国国务院正式表态，将停止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援助。2006年将是美国对促进俄罗斯经济改革实施援助的最后一年。与此同时，美国计划大量增加对俄罗斯民主发展的资助，更确切说是对独立于当局的非政府组织的资助，首先资助的是反对党。美国政府声称，“俄罗斯民主和人权方面的消极趋势要求我们在2006年给予更多的援助……特别是对非政府组织、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机关改革的援助”[46]。

2006年3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俄罗斯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进：美国能做些什么？》的报告。起草报告的两党专家小组由两名前副总统候选人负责，包括布热津斯基、塔尔博特、奥尔布赖特在内的多名前美国政要参加了撰写。报告称，俄罗斯继续背离民主准则，苏联崩溃后的15年，美俄关系明显在向错误的方向发展；美俄之间的分歧大于共识，短期内美与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已不现实；美国应奉行新的对俄政策，即“有选择的合作”“有选择的对抗”。

同年3月8日，美国国务院在其发表的《2005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俄罗斯政府，并列出了俄罗斯“打压非政府组织”“控制新闻舆论”“使民众的民主选举权利丧失”等17条罪状。3月16日，美国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对俄罗斯政府“迷失民主之路”深表担忧，指责俄罗斯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不够彻底。报告称：“最近的种种趋势说明，俄罗斯正在偏离自由与民主之路，美俄两国未来的关系取决于俄如何调整其政治、外交和国内政策。”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澳大利亚发表讲话，批评“克里姆林宫的中央集权”，并且公然煽动说，她希望俄罗斯人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建立负责的、透明的制度，要求能够自我组织起来向政府请愿，必要时采取行动更迭政府”。5月4日，美国副总统切尼在立陶宛出席黑海及波罗的海地区领导人会议时说道，“在当今的俄罗斯，反对改革的人们正在伺机颠覆过去十年取得的成果。俄罗斯政府限制了人民的权利，这是不公正也是不恰当的”，公开批评俄罗斯压制民主、恢复苏联体制、利用能源手段阻碍独联体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2006—2008年，面对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复兴与发展，部分西方保守派人士认为这是对西方自由世界的“最大挑战”。西方一些政治人物或学术精英极力鼓吹西方应结成“民主国家同盟”，打造“自由之弧”，推行“价值观外交”，挑起一股股“新冷战”的阴风。2007年前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上公开宣称，美国要在国际上开辟“意识形态战线”，对付思想上的敌人。

2007年6月6—28日，八国集团峰会将在德国举行。2007年5月31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访欧前夕接受了5家欧洲媒体的采访。布什谈到与俄罗斯的分歧时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告诉我们，在他的国家民主发展一切正常，但我们对事态的评价正好相反。”同一天，美国国务院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戴维·克拉默指责莫斯科“镇压真正的反对派、限制抗议权、打压公民社会、对记者施加更大压力”。他认为，“对俄外交‘挥舞拳头、批评欧安组织的民主倡议’等需要予以应有的还击”。

2007年6月6日，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又一次发布《联合战略计划》，声称俄罗斯正日益中央集权化，对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不断进行打压，同时，政府日益介入经济活动并且限制媒体，这一切都是令人忧虑

的趋势。俄罗斯对伊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武器销售，也在整个国际社会引发了深切担忧。俄罗斯对邻国的政策也是另一个重大挑战，尤其严重的是，莫斯科支持格鲁吉亚与摩尔多瓦的分裂势力，向格鲁吉亚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并且借助其垄断地位，利用能源向邻国施加压力，借此获得对基础设施和战略资产的控制。美国认为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增加透明度和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将提升该地区能源安全的系数。虽然有着这些挑战，但美国政府对于在任何可能的地区推动积极趋势，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其措施包括促成俄罗斯加入一些以法规为运作基础的组织，促使它融入全球经济，同时在这个国家催生支持民主和法治的中产阶级。美国希望看到俄罗斯成为一个开放、民主和稳定的地缘政治伙伴。美国政府将在能够取得成果的领域与俄罗斯进行接触，同时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盟友的支持下，继续坚定地捍卫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观，同时抵制俄罗斯的负面行动。

为配合对俄罗斯的思想攻势，美国还不时祭起屡试不爽的“自由、人权”大旗，或有目的地向某些政治人物颁发由西方把持和操纵的国际奖项，或象征性地树立“专制受难者纪念碑”，给他国制造政治压力。这其中，所谓“被奴役国家”的概念便是一例。

“被奴役国家”的概念始于冷战时期，当时美国力图把社会主义国家丑化为“被奴役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未放弃此项每年一度的活动。2008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并公布了年度《被奴役国家》报告，竟然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相提并论，并称之为“二十世纪的罪恶事件”。几年来，设在美国纽约的“自由之家”组织在每年发布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排行榜”上，多次把俄罗斯列为“非自由国家”。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推进自由和民主》报告多次严厉批评俄罗斯“不民主”。

近年来，伴随着西方政界不时出现的“新冷战”声音，西方一些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智库也纷纷发表报告和言论。2006年4月30日，《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一书的作者、供职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独裁者联盟？——为何中国和俄罗斯将继续支持独裁政权》的文章，宣称“当前这个时代或许正演变成自由主义与独裁制度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独裁制度的主要拥护者不会是布什主义理论上所针对的中东独裁小国，而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它们构成了‘反恐战争’新模式下未能料想到的旧挑战。”[47]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政治学家格拉姆·罗伯逊断言，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形成了“新的家长式监督技术的21世纪专制新模式”。哈佛大学的蒂莫西·科尔顿和华盛顿大学的亨利·海尔在两人共同撰写的一篇题为《普京式投票：杂交体制下的总统选举》的文章中，将俄罗斯政治比喻为“杂交”体制，是非西方的异类。[48]2008年1月5日，法国评论家蒂埃里·沃尔顿也在《费加罗报》发表题为

《要知俄罗斯向何处去，请看看中国》的文章，称西方世界要警惕，要团结起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在思想和道路上的挑战。他写到，克里姆林宫的当政者想要对西方国家进行报复，因为他们把苏联解体和后来俄罗斯衰败的责任归咎于西方国家。沃尔顿甚至危言耸听地声称，西方世界要警惕正在形成的莫斯科—北京轴心。[49]

2008年9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在美国智囊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演讲时称，俄罗斯“走上了一条孤立道路”，越来越变得“在国内独裁和在国外好斗”。美国政府要在俄罗斯国内及其周边国家扶持和支持“自由民主势力”。赖斯的讲话暴露了美国大肆兜售民主背后的战略考量。正如有位亚洲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标准的“民主国家”首先是要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国家，即使同样是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如果不跟着美国的战略利益走，就可能被视为非民主的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必须是美国的“乖孩子”。在美国或西方的公共舆论中，真正的民主已经不关乎制度和程序的问题了，制度和程序的标准固然需要，但更心照不宣的标准是看对方的力量是否强大。美国眼中的“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听从美国领导的、不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

在西方向俄罗斯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攻势，极力向俄罗斯兜售自由民主的同时，美国在民主问题上惯于使用“双重标准”的手法也暴露无遗。经历了国家解体和民族分裂之后的俄罗斯的有识之士开始怀疑，美国是真心关心俄罗斯的民主政治进程，还是关心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和思想霸权。亲美的、美国扶持的国家轻易地被美国贴上“自由民主”的标签，甚至被美国视为民主的“灯塔”。格鲁吉亚便是例证。这个苏联解体后刚刚独立的高加索地区的小国，总统是年轻的在美国留学和工作过的萨卡什维利。这几年，在西方主导的市场自由度、腐败透明度、自由民主指数等排行榜上，格鲁吉亚均名列原苏联地区国家之前。而同样是全民选举出任总统的普京却被美国媒体视为“异端”，是自由民主的对立物。人们知道，自由的格鲁吉亚一直依靠美国的军援，美国军事教官一直在帮助格鲁吉亚军队。而格鲁吉亚政府宣布外部的主要敌人便是俄罗斯。

可见，美国与俄罗斯的民主之争，其内涵更多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反映了国际上思想压制与反压制的矛盾。2007年7月13日，俄罗斯《独立报·军事评论》专刊刊载军事观察家维克托·利托夫金对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罗戈夫的访谈。其中提出，俄美在双边关系及国际政治领域一些关键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这种新的俄美对峙模式涵盖了经济、能源及地缘政治等各领域。种种迹象表明，双边关系的冲突模式正在形成，两国的确面临着滑向“新冷战”的前景。在地缘政治领域，正在回归零和游戏。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对抗。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在过去的时代一切都可以理解，因为一方是共产主义，

另一方是非共产主义。可如今的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俄罗斯，人们都说两国的价值观不一致，指的就是意识形态观念不同。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公开呼吁要重新对俄罗斯进行遏制，就像当年美国遏制苏联那样。双方都发起大规模宣传战。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智囊也为如何应对俄罗斯的“不民主”出谋划策。例如，2009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下属的贝尔弗科学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事务专业教授、贝尔弗中心国际安全计划和原子能控制项目研究员托马斯·尼科尔斯的文章《改善俄美关系：今后的步骤》，提出美国政府要继续施压俄罗斯完善民主发展进程，并以此作为俄罗斯成为大西洋共同体成员国应付的代价。俄罗斯要想与西方站在一起，就必须在民主问题上就范。美国对此不能迁就。不与美国站在一起，就是美国的敌人，就是不民主的国家。在此文中，政治大西洋中心主义昭然若揭。一切以美国利益为准绳，以美国好恶来划线。民主标准也不再是一个标尺和信仰，而是变成了随意变换的旗号，成了可以弯曲和造型的橡皮泥和橡胶棒。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西方吹起的对俄“新冷战”的阴风中，某些原东欧国家积极充当西方反俄阵营的“马前卒”。这些原东欧和原苏联国家在脱离原社会主义阵营后，一头倒向西方阵营的怀抱。在国内，他们极力推行政治清算，力图“去共产党”和“去苏联化”。为表明对西方“新宗主国”的忠心，一些国家多次带头在欧洲委员会等机构提出议案，要求“共产主义与纳粹一样应遭到谴责”，要求俄罗斯“赔偿苏联时期的占领”。2003年12月开始，原苏联地区先后爆发“颜色革命”，不时看到东欧国家的政治身影。此后，一些国家还不时挖俄罗斯的墙脚，暗中支持原苏联地区一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兴风作浪，给俄罗斯制造种种政治难题。

七、对西方的政治反击

2012年3月16日，俄罗斯《观点报》刊登署名叶·罗曼诺夫的文章，题为《堵漏洞的工作》，副标题为《美国务院汇报在俄罗斯发展民主的花费情况》，文章详细披露了美国近年来支持俄罗斯发展民主的开支情况。在奥巴马执政后，美国为在俄罗斯发展民主拨款2亿美元。据前一天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戈登的特别报告称，“维护人权和支持民主仍是我们的工作方向。2009年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美国为支持俄罗斯的民主和人权花了2亿美元”。美国将继续资助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为此，在国会的支持下政府投入500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专项基金。除此之外，美国对俄罗斯的“民主渗透”还通过以下渠道披露出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网站上有2009—2010年俄罗斯得到资助组织的名单，其中

常常看见俄罗斯的“士兵母亲”的各地区组织，如普斯科夫分支得到2.16万美元，受资助最多的是“圣彼得堡士兵母亲”，收到9.4万美元。俄罗斯拿到美国资金的其他组织有社会信息通讯社（6.7万美元）、极端新闻中心（5万美元）、下诺夫哥罗德反酷刑委员会（8.5万美元）、列瓦达民调中心（3.3万美元）等。在这个名单中还见到了轰动一时的保卫选民权利组织“戈洛斯（选票）”协会的身影。

（一）外交针锋相对

面对西方的批评和指责，在提出主权民主思想，积极进行思想和理论应对的同时，俄罗斯也针锋相对，在政治和外交上积极开展与西方面对面的交锋。普京多次与布什在不同的场合就民主话题直接交锋。俄罗斯政府也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国际传媒阐明俄罗斯对民主问题的看法。普京讲到，俄罗斯在追求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时，并没有否认民主的基本原则。2006年7月12日，在接受美国、加拿大和法国三国媒体采访时普京表示，俄罗斯的民主模式秉承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并强调俄罗斯选择民主道路是“自愿的，并没有外界的强制力量”。[50]普京认为，当今俄罗斯并不像西方社会描述的那样是“在民主进程中倒退”。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建立的所谓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年幼”的民主，[51]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的上层人物的自由。针对西方社会宣传“戈尔巴乔夫时期最民主”的说法，普京说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先生生活在革命的时期，现在革命和反革命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俄罗斯需要建设。

面对来自西方愈来愈强的政治压力，普京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掷地有声地强调，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决定自己的民主道路。[52]普京提出，俄罗斯不去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民主化之路陷入了停滞。他不止一次地对西方记者直言，与通过选举人选出总统的美国选举制度相比，俄罗斯通过不记名的全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的办法参与性更加广泛、更加民主。

2006年7月，在八国峰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与普京就民主问题的交锋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背负着国内舆论压力，布什不得不对普京提起“民主”话题。事后，在布什与普京共同出席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言道：“我渴望促进世界上部分地区的制度变革，像伊拉克那样，那里有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我告诉他，我们国家许多人希望俄罗斯能做同样的事情。”对此，普京立即明确地回答：“我要坦诚地告诉你，我们绝对不需要伊拉克式的民主。”在众多媒体面前，布什显得十分尴尬。

2007年2月10日，在世界政要和媒体云集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直言

不讳，一针见血地反驳了西方霸权思想，回击了对俄罗斯民主和外交的指责。在这篇名为《打破单极世界幻想，构建全球国际安全新结构》的讲话中，普京比喻美国像是森林里为所欲为的“狼同志”，提出某些国家在破坏世界秩序，企图主宰整个世界。普京谈道：“今天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在国际事务中毫无节制地肆意使用武力，世界因此陷入了冲突不断的深渊，最终无力解决任何一个冲突，反而使政治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望。”[53]普京指出：“当然，这与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众所周知，民主是顾及少数人利益和意见的大多数人的政权。顺便说一句，经常有人给我们俄罗斯上民主课。但是，那些给我们上课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自己却不愿学习。”[54]

（二）抵制“颜色革命”、反对民主输出

西方国家在对俄罗斯施加思想压力的同时，在外交和安全上也积极挤压俄罗斯的政治空间。一些西方国家认为，普京执政的俄罗斯正在背离民主化的道路，改变过去全盘西化路线的俄罗斯和西方“渐行渐远”。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支持原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来挤压俄罗斯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通过树立民主样板来影响俄罗斯，使其内部发生改变。美国积极拉拢波罗的海国家作为攻击俄罗斯破坏人权和民主的桥头堡，同时极力扶持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家组成“民主选择共同体”，把这些国家称为“民主改造”的榜样和先锋。对于俄罗斯内部，美国继续加大“美元攻势”，通过金钱利诱，寻找代理人，达到分化和内部瓦解俄罗斯政权的目的。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暴乱之后，乔治·索罗斯撰文宣称，俄罗斯暗地支持乌兹别克斯坦现政权，普京应对乌兹别克斯坦“屠杀”事件负责。

普京明确反对西方国家任意推行民主的做法，称民主是不能输出的，民主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要严格遵守国际法。普京反对将民主作为外交手段，借以干涉别国内政。对于西方把“颜色革命”称为是西方民主扩张和胜利的说法，普京反驳说，这些地区“最让我担忧的是以非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倾向，这才是最危险的。持续不断的革命，时而是玫瑰色的，时而又是什么蓝色的。应该习惯按照法律来生活，而不是屈从于外部的政治意愿，对此我深感忧虑。应在社会内部发展一定的法规和秩序，当然，也需要维护民主。但是，如果走上一条持续不断的革命之路，这些国家和人民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后苏联地区都将陷入无尽的冲突中去，后果严重”。[55]

普京对西方大肆宣传民主改造，借民主的旗号在原苏联地区推行“颜色革命”的做法十分反感。2006年9月，普京向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直言，乌克兰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在原苏联地区玩地缘政治游戏，[56]他多次警告，这不仅会威胁该地区的稳定，还会严重影响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

（三）内部防范外来干预

为推销“民主”，美国政府不仅出钱、出力资助和支持他国的非政府组织，而且设立专门机构，加大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化”的力度。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的晚宴上宣布将建立一支旨在支持世界范围内“民主发展”的“民主别动队”。美国国务院则将增设一个“重建和稳定办公室”。据称，该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帮助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向和平、自由和市场经济过渡”。新建的“民主别动队”将在该机构的指导下活动。根据美国政府设想，“民主别动队”将由外交人员和众多文职人员组成，一旦国际上出现“民主形势”的机会，其成员能够以民间救助者的身份迅速前往目的地。布什总统强调，有了这个部队就可以像军队一样将需要的专家派遣到国外，并在“几天或几个星期而不是像现在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充分开展“政治民主援助计划”。

2005年7月20日，美国国会两院分别批准在2006财政年度拨款5.6亿多美元，专门用于支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原苏联地区“民主化”进程。其中用于促进俄罗斯的民主和经济变革的资金拨款达8500万美元，比2005年度4340万美元的拨款多出近一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资助俄罗斯反对党和独立律师制度。

2006年7月13日，在八国首脑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俄罗斯“公民阵线”领导人、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及前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等人举行“另一个俄罗斯”的集会，宣称“莫斯科已经成为全世界专制力量的大本营”。除美国、英国、加拿大驻俄大使外，美国两位副国务卿也不顾俄罗斯政府的劝阻和反对，执意参加集会并表示支持。对此，俄罗斯议会和当局一方面表示抗议，另一方面组织亲政府的青年组织“我们”在会场外示威。同时，在莫斯科召开了由政界、学者以及传媒等代表人物参加的“我们与西方”的会议。在会上，莫斯科市市长、俄罗斯最具影响的政党“统一俄罗斯”执委之一的卢日科夫撰文激烈抨击西方以“老大哥”的样子对俄罗斯内政“指手画脚”。原俄罗斯政府总理普里马科夫也指出，西方国家想“强加某种特定的民主模式是不可能的，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矛盾与冲突”。

2006年，在接受美国、加拿大和法国三国媒体采访时，普京谈到民主的“另一面”，即某些国家利用俄罗斯的民主问题作为借口，以达到其对外政策的目的。普京认为，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准备与任何伙伴在平等的条件下合作，接受善意的批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利用可能的杠杆，其中包括民主问题来干涉俄罗斯的内部事务”。

2007年2月，普京在慕尼黑国家安全会议上演讲时谈到，他对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受到外国政府的资助表示担心。普京指出：“我们就认为它

们是其他国家实行针对俄罗斯的某种政策的工具，这是第一。第二，所有国家都对竞选活动的资助进行明文规定。来自其他国家的资金对非政府组织进行资助，难道这是正常的吗？难道这是正常的民主制？这是对社会隐瞒的资助，有什么民主可言？没有！你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不是民主，只不过是一国对另一国施加影响。”[57]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弗·苏尔科夫说：“有人认为民主比主权重要，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这两者都重要。”他批评西方某些国家在民主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不是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关系亲疏来划分所谓“民主阵营”，这种做法十分危险。

面对美国和西方愈演愈烈的“民主化”攻势，俄罗斯内部积极部署、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避免在俄罗斯内部发生类似“颜色革命”的“白桦革命”。例如：挖掘和迅速打击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人物和西方的政治代理人，利用查税或丑闻等手段削弱前总理卡西亚诺夫等政治对手，限制政治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扩大安全部门权力，整顿外国背景的各种基金会；采取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管制传媒；成立金融信息监测署，构筑金融安全网；公开透明包括高官在内的收支及个人和家庭账户；规范政党秩序，改革选举制度；加强青少年工作，支持成立亲政府的青年政治组织，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强调历史传统、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利用经济特别是能源手段转移话题，引诱或分化西方阵营；利用反恐等其他问题避开在民主人权上的分歧，躲过西方批评的锋芒；成立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机构，加强俄罗斯包装宣传，改善俄罗斯国家形象等。

经过公开交锋和暗地较量，俄罗斯在与西方的民主之争中逐渐由被动变主动，初步赢得了“有建设俄罗斯式民主的权利”。但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西方国家承认俄罗斯争得了俄式民主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与西方的民主较量到此罢休。实际上，俄罗斯与西方的分歧有着更深的战略考虑和文化根源。遏制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一直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始终不变的“战略考虑”。俄罗斯在经历了十五年的内部纷争与支离破碎之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但西方国家并不愿看到俄罗斯的复兴，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妖魔化俄罗斯，指责俄罗斯在压制民主、回到过去，恢复令西方害怕的“邪恶帝国”。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认为，“西方国家更喜欢一个软弱的俄罗斯，他们把俄罗斯维护自身安全视为一种威胁”[58]。

八、主权民主论

普京时期在政治思想上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主权民主论”。“主权民主论”既是对西方兜售民主、发动“颜色革命”的回应，同时也表明要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西化、民主化”和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的自由”划清界限。主权民主的思想体现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共识：这就是消除政治混乱，实现政治稳定；通过政治治理，完善体制，巩固国家；民主化

要有序地、自主地实行。

2005年以后，在西方某些国家大肆“推销民主”和一些国家先后爆发“颜色革命”的背景下，西方世界与俄罗斯围绕“民主问题”的斗争更加激烈。面对普京政府加强中央权威、整顿政治秩序的一系列举措，西方政要和媒体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评。他们指责普京压制民主、控制传媒、强化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指责普京损害人权、打压反对派、破坏司法独立、压制非政府组织、阻碍他国的民主化进程，等等。一些研究俄罗斯问题的西方专家认定俄罗斯是在“民主退步，回归苏联”，甚至给普京扣上“独裁、专制”的帽子。

面对西方的“民主攻势”，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当局针锋相对、毫不示弱。除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以外，俄罗斯政界和学界也在积极探索，在汲取教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理论构想。“主权民主论”便是思想探索的结果之一。普京总统的政治顾问、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被认为是最早提出“主权民主论”的人。他提出，“主权民主”是俄罗斯式的政治民主模式，代表着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当今俄罗斯政坛最具影响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则宣称，“主权民主”将是该党的思想指针。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则将“主权民主与强盛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起并称为当今俄罗斯全民价值观的三大支柱。在2006年7月“八国峰会”召开前后，俄罗斯境内外围绕“主权民主”的争论一度达到高潮。

（一）政治背景

“主权民主”的提法出自克里姆林宫，最早出现是在2005年5月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负责政治事务的副主任苏尔科夫的一次秘密报告中。在这次对俄罗斯商界高层人士的讲话中，被称为“俄罗斯政治设计师”的苏尔科夫严厉批驳了自由派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论”，提出了“有民主，但更要主权”的观点，并号召俄罗斯政治和商界精英要在政治民主方面达成共识，尽快形成俄罗斯式的民主发展观。2006年2月7日，苏尔科夫在“统一俄罗斯党”骨干分子大会上详细阐述了主权民主的思想。7月份，在圣彼得堡进行的“八国峰会”期间，俄罗斯与西方的“民主之争”到达顶峰。8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高层政治研讨会上，“主权民主”正式成为“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指导思想。

俄罗斯提出“主权民主”有着深层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的政治考虑。随着2007年议会选举的临近，俄罗斯政治重组和党派斗争日趋激烈，围绕选举制度改革、民主化、政治模式与政治道路等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一方面，普京多次明确表示不再谋求第三个总统任期，而这需要为政治交接、未来政

治走向等做出思想准备和前景规划；另一方面，近年来，西方加大了对俄罗斯内政的批评和民主化的压力，俄罗斯当局迫切需要国内达成共识，对外做出回应。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西方的外交和舆论压力、寻找俄罗斯式的民主化道路就迫切地摆在俄罗斯当局面前。因此，2006年初以来，围绕“主权民主”的阐释和讨论越来越丰富和密集，“主权民主”几乎成了当今俄罗斯的政治宣言。

普京支持有关“主权民主”提法的讨论。2007年9月，普京在与参加“瓦尔代”俱乐部会议的境外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和记者对话时指出，将主权与民主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引发了争论。普京认为：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精密科学，还是人文学科有很多东西处于各学科领域的边缘和交叉地带。一些人认定这个概念站得住，可以为之所用，在逻辑上也有一定的道理。也许您注意到了，我一直避免加入这场辩论。不是认为这种辩论会带来坏处。相反，这是一件好事，当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从外部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对国际事务敏感的，能让本国公民生活得很舒心的社会，我感觉，探索这一理论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不干涉，也不会单方面站在某个立场上，因为我喜欢这样的辩论。

普京指出，在当今世界还存在集团势力和单极霸权的情况下，主权概念非常重要。普京讲道：

坦白地说，当今世界上有幸宣称自己拥有主权的国家屈指可数，也就是中国、印度、俄罗斯，还有几个国家。其余国家在一定程度或很大程度上要么互相受制，要么受制于某个集团的首要国家。这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但我个人坚信这就是事实。据了解，也很遗憾，在某些东欧国家中，不仅国防部长，甚至级别更低的官员的人选都要和美国大使协商。好还是不好？我认为，这对上述国家不好，对美国也不利，因为它迟早会重蹈当年苏联霸权在这些国家的覆辙。今天也许还皆大欢喜，明天就可能是个麻烦。连老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在自己的政策中考虑到北约的利益。你们知道都是怎么做决定的吧？大概不需要给你们挑明了吧？因此，主权是当今最宝贵的东西，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主权，俄罗斯无法生存。它要么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要么就什么都不是。[59]

普京提出，为应对西方大国的政治压力，俄罗斯必须勇敢地拿起自己的理论武器，进行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2007年4月26日，普京在向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从国外流入的用于干涉我们内部事务的资金也在源源不断地增长。如果看看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甚至殖民主义时代所谓的殖民国家传播文明所做的陈词滥调还在重复。现在有人拿传播民主的口号来当作武器，但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要获得单方面的优势和好处，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60]因此，普京号召俄罗斯政党领导人

和有识之士团结起来，保持警惕，积极应对。

（二）政治目的

综合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和学者专家的言论，可以看出，俄罗斯提出“主权民主”的概念主要是出自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质疑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拒绝外部无礼的指责。俄罗斯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倡和发起的“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运动，是出于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盲目追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借鼓吹民主模式的普遍性之名，将“民主化”当作政治夺权、推动民族分裂和搞垮苏共的工具和手段。“民主化”实际上被模式化、简单化、庸俗化。“民主化”被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自由化和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当今多数俄罗斯政界和知识界代表人士认为，1985—1999年这15年是俄罗斯灾难性的15年，是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的15年。[61]在这期间，苏共异己分子和自由西化政治势力狂热地崇拜西方的民主样板，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造成国家分裂、民族冲突，至今后患难消。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西方“战略家”罪责难逃。20世纪末期，西方战略家有意识地向苏联等其他国家输出“软弱的自由民主思潮”，却为自己保留了极端保守和富有进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而戈尔巴乔夫等人落入西方的圈套，盲目进口西方的“民主价值”，导致“民主、自由”泛滥，国家解体，人民丧失了尊严。

苏尔科夫批评西方某些国家在民主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不是真正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关系亲疏来划分所谓“民主阵营”，这种做法十分危险。2006年9月20日，俄罗斯著名政治评论家亚·杜金在俄罗斯《新闻时报》上撰文指出，在当今世界，“民主”这个词具有双重标准：对美国人有利的一切都是“民主”，对美国人不利的一切都是“独裁”。一些国家的主权常常在“民主化”的幌子下被剥夺。他认为，“主权民主”这个术语就是要强调它不同于声名狼藉的“民主”。

普京提出，东西方国家可以就民主问题展开平等的对话，但不能动不动就以教师爷的口气训斥他国。普京严词回绝了西方政治势力借“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批评和干涉俄罗斯内政的企图。普京指出：“如果要解决科索沃问题，那我们就谈科索沃；如果要谈伊朗核问题，那就谈伊朗核问题，不要扯到俄罗斯的民主问题上。这于事无补。如果真的想关心俄罗斯目前的局势，那就直截了当。不要闪烁其词，别有用心……有人企图借民主之名来影响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顺便说一下，我认为这是有害的，也是错误的。这反而会损害对民主制度及其原则的信任。”[62]

俄罗斯《消息报》著名政治评论员安·科列斯尼科夫撰文指出，目前俄罗斯

提出“主权民主”的概念，目的是向西方国家表明两点：首先，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其次，俄罗斯有权走自己的道路，别人无权干涉。[63]

二是与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民主自由体制”划清界限。俄罗斯政治学者叶利谢耶夫写道，俄罗斯文化历史上缺少民主思想的浸淫，过去“民主”常常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非叶利钦等“民主自由派”的理想和追求。叶利钦时期的自由民主派表面上打着西方民主的旗号，实际上是将“民主、民族自决”等口号作为他们打败苏共的手段。苏共失败后，自由民主派曾幻想“这种民主体制”能够比苏共模式更有效，但20世纪90年代近10年的政治结果却表明事实完全相反。他们并不了解民主的真谛，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向往民主。[64]打垮了苏联、拆毁了苏共之后，俄罗斯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出现的是极少数人的“寡头式的民主”：个人专权、寡头政治、犯罪猖獗、黑手党为非作歹、腐败贪污盛行。[65]普京认为叶利钦时期所谓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幼稚”的民主，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掌握金钱和财富一小撮上层人物的自由。

2007年11月，普京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今，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俄罗斯稳定地向前发展的。有一些人，他们狡猾地利用假民主和华丽辞藻，想让俄罗斯返回到不久前的过去，使他们能像过去那样不受惩罚地窃取国家的公共财富、掠夺人民和国家，还有些人则想使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上失去独立性。

2010年12月16日，在评价西方支持的俄罗斯自由派人物时，普京义正词严地说，这些人想要的只是金钱和权力，90年代，他们与别列佐夫斯基以及那些当下正被关在牢里的人一起窃取了数十亿的资产。现在他们被从能捞到油水的地方赶走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自然想回来填满自己的口袋。可是，如果允许他们这样干，几十亿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会将整个俄罗斯都卖光。

俄罗斯学者写道，西方对俄罗斯怀有恶意，在莫斯科掌权的哪怕是食人鬼，只要西方国家能够获得利益，那么也会被承认是民主政府。[66]苏尔科夫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媒体的一些文章充斥着“俄罗斯黑势力的猖獗、甚至渗透到国家内部”的言论。他认为，如果把那种情形称为民主的话，现在“我们要远离的正是这种民主，而且越远越好”。苏尔科夫几次强调，当今俄罗斯政治精英特别是州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一定要对20世纪最后15年的政治混乱和政治谎言有清醒的认识。[67]

三是对近期爆发的“颜色革命”现象的回应。“统一俄罗斯”党最高理事会主席团书记维·沃洛金提出：“俄罗斯提出主权民主的构想就是要回应‘颜色革命’的挑战。一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爆发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是在民主化的旗号下，达到外部控制的目的。”[68]

俄罗斯学者菲林认为，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是苏联解体后遗症，是上层争权夺利的结果，是一种扭曲和变质的体制，与民主毫无共同之处。那些打着民族的旗号、搞“非苏、脱俄”运动的，并非真心想要民主，只不过是妄图捞取投入西方怀抱的资本。

苏尔科夫认为，那些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实际上是十多年前俄罗斯的翻版，这些国家将陷入政治泥潭，而走出这种泥潭也得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他拒绝将俄罗斯民主称为“可控的民主”。过去西方媒体常讲俄罗斯实行的是一种“有控制的民主”“可控的民主”。苏尔科夫认为这种提法倒是可以使用于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那是一种异化了的民主，成为改朝换代、少数人私有化和谋求西方赏识的手段和工具。“可控的民主”是被操纵的、是外部强加的、是一种无效的政治经济制度。[69]

俄罗斯政治调研所所长谢·马尔科夫也认为，主权民主论是对西方推行民主输出、鼓动“颜色革命”的回应。“颜色革命”实际上是在民主化的旗号下建立外部傀儡政权。普京对西方大肆宣传民主改造，借民主的旗号推行“颜色革命”的做法十分反感。2006年9月，普京向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直言，乌克兰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在原苏联地区玩地缘政治游戏，[70]他多次警告，这不仅会威胁该地区的稳定，还会严重影响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

四是强调要寻找俄式的民主之路。俄罗斯宪法法院院长、俄罗斯当今最具影响的法学家瓦·佐尔金提出，“主权民主”应当称为是“自主发展着的民主”。俄罗斯的民主之路应当很好地将自由、民主、权威等因素结合起来。[71]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格·巴甫洛夫斯基写到，俄罗斯在20年前丧失了一次机会，20年前就应当认真讨论民主问题。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俄罗斯还没有明白什么是民主、怎样建设民主等问题，20年里的多数时间就是一味地要融入西方、向西方学习。针对俄罗斯境内外一些人对主权民主概念的批评和民主不需要任何定语等说法，巴甫洛夫斯基反驳道，世界上有“代表制民主、社会民主”等不同的概念。欧盟国家官方承认的“社会民主”概念在美国却不得不到承认，而美国却提“市场民主”。他认为，国际上对民主理解和民主模式等不同需要宽容和包容。[72]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讨论主权民主的同时，一些人强调俄罗斯是一个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他们提出，可以借鉴俄国历史的民主传统如市民大会、村社集会等形式。对于苏联时期，也不应割断这段历史。俄罗斯著名政治分析家、原《独立报》主编特列齐亚科夫写到，普京的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以下重要思想，即苏联时期不是什么“历史的黑洞”，苏联也不是邪恶帝国。俄罗斯要保持思想和道德的继承性，历史的不间断性。[73]普京公开指出，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苏联解体，绝大多数老百姓是一无所获。普京认为，卫国战争中的苏联红军是为自由而献身的反法西斯战士。

对于如何看待“主权民主”问题，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主权民主”追求的不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形式，而是提出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是保证长远的发展条件。苏尔科夫提出，概念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主权民主”的政治经济基础。只要存在着对社会稳定和国家独立的威胁，“主权民主”的价值观就不会过时。[74]俄罗斯舆论认为，“主权民主”的思想体现了普京总统的政治哲学，就是在混乱后首先实现政治稳定，通过政治治理，完善体制，巩固国家，而民主化要有序地进行。在普京时期，俄罗斯民主没有倒退，而是为更好地实现民主创造了条件。亚·杜金写到，普京保留了国内主要的民主架构，但是给其增添了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内容。“主权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民主程序和准则服从于加强大国主义和国家体制的标准。他认为，“主权民主”这个术语相当准确地描绘了普京当政时期的真实情况。“主权民主”这个概念在2007—2008年议会和总统大选之前提出来，是因为当时俄罗斯面临着政治继承和路线交接的问题。普京要求未来的接班人不仅要忠于他，而且要继续他的事业。“主权民主”这种提法的出现正是为了明确地指出普京政权的政治内涵。当前，为应对国际上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竞争，维护俄罗斯民族利益，迫切要求俄罗斯政治精英行动起来，在民主和政治发展等问题上达成共识。[75]

当然，主权民主的提法还是遭到了俄罗斯不少人的批评，一些政治精英也不接受这种概念。例如，“主权民主”的提法一经出台，俄罗斯政府原总理普里马科夫就表示，他不接受“主权民主、主权民主的经济”等概念。他认为，这是在否定全人类的价值，如三权分立、选举自由等。时任政府第一副总理，2008年之后继任总统的德·梅德维杰夫也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民主”就是民主，前面不能有任何形容词。梅德韦杰夫怀疑俄罗斯不能把“主权”和“民主”两者结合起来，怀疑有没有一条独特的俄罗斯之路。而俄罗斯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丘拜斯则公开撰文，指责主权民主是一个伪命题，是庸俗专制的代名词。他认为，主张“主权民主”只能带来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引发与西方国家新一轮的对抗，重新回到冷战时期。丘拜斯反对“树敌”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弱国心态的表现。他认为，俄罗斯最大的威胁是自己，是法西斯主义。

（三）政治追求：寻找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新思想

围绕“主权民主”的讨论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未来政治发展的探索。有分析家指出，主权民主的思想反映了普京总统的政治哲学。虽然对此俄罗斯政界和理论界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普京也没有正式认可此概念，但普京承认，这类讨论和探索是有益的，应当继续下去。

2006年8月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化条件下的主权国家：全球化与

民族认知”讨论会上，作为俄罗斯最具影响和实力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已经公开接过“主权民主”的旗帜。该党领导人明确表示，“主权民主”构想将成为党的思想主线，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支柱。他们将努力争取使这一提法成为多数政治精英的共识，最终成为反映全民利益的思想。对于这种做法，普京总统在对统一俄罗斯议会党团的一次讲话中对此给予了表扬。普京认为该党已经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有了自己的理论和形象，形成了党对俄罗斯政治未来的看法。同时，普京指出，俄罗斯是一个主权的、民主的国家。[76]

“主权民主”概念的提出使得俄罗斯政界和理论界异常兴奋，一些人认为俄罗斯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俄罗斯一些自由西化派政治人物极力叫嚷，称“意识形态终结、意识形态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在结束苏共“思想专制”之后，极端的自由主义并没能掌握俄罗斯人的头脑。90年代中期，叶利钦突然下令，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全俄范围内寻找“俄罗斯思想”，结果半途而废、无果而终。一个时期里，俄罗斯犹如一盘散沙，社会成员迷失方向，几乎变成没有思想和灵魂的“泥足巨人”。一些媒体认为，在经过了长达近20年的社会思想真空之后，俄罗斯终于在2006年找到了全民思想。

当前，俄罗斯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和理论界人士已经将主权民主的构想提高到全民思想和今后俄罗斯政治发展道路的高度。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在《消息报》上撰文指出《全民价值观的三大支柱》，把“主权的民主、强大的经济、强盛的军力”作为俄罗斯思想和建设的三大支柱。有的俄罗斯政治精英认为，俄罗斯未来的主导战略是“能源超级大国加主权民主”的思想。[77]其中，他们认为，主权的民主是重中之重，而主权又应放在上述提法的首位。一些报刊还经常以“主权民主的经济”为题举办大型研讨会。

俄罗斯学者认为，“主权民主”的概念在苏联解体后20年间，首次明确回答了一直困扰俄罗斯社会的问题，即“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些媒体提出，这是俄罗斯首次没有和无须别人的教导，实现真正的思想上的独立。

（四）化解西方的思想政治压力

俄罗斯围绕主权民主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俄罗斯的“国际观”和“时代观”，反映了俄罗斯精英层对国际局势和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看法。时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撰文，论述俄罗斯思想和未来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他认为，当前世界重要的特征就是竞争。竞争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而且表现在包含各种价值观在内的意识形态领

域。当今世界大国不仅有边境、经济、军队，还有着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并且借此影响或决定世界主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伊万诺夫写到，俄罗斯应当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方案，迎接挑战，参与到严酷而不妥协的斗争之中。俄罗斯不能躲避必然的对抗，应当彻底和充分地维护自己的立场，与公开或隐蔽的敌人做斗争。在民主问题上，谢·伊万诺夫的看法是，实验室试管中培育的民主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民主价值观的首要价值之一就是要人民自主地、没有外来压力地决定事情。世界中不能只有一种超级的力量，依靠其军事和经济实力来强加规则于他人。更不能打着民主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推翻他国合法政府，追求自己的私利。伊万诺夫指出，俄罗斯反对将世界划分为“自由国家”和“流氓国家”，反对在民主等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主张任何一个国家不能自我授权，利用反恐来将民主模式强加于别人。谢·伊万诺夫提出，俄罗斯要进行思想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赛。俄罗斯不仅应当明白，拿什么来保卫，也要知道保卫什么。俄罗斯只能是“主权民主”，否则便会既失去民主，也失去俄罗斯。[78]

“主权民主”的提法反映了俄罗斯力争俄式民主的权利和要求，也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差异和较量。这种争论与较量有着很深的战略考虑和文化根源。

首先，遏制俄罗斯战略空间和政治空间一直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始终不变的“战略考虑”。俄罗斯在经历了十五年的内部纷争与支离破碎之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但西方国家并不愿看到俄罗斯的复兴。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妖魔化俄罗斯，指责俄罗斯在恢复苏联，恢复西方所想象的“邪恶帝国”。2006年7月13日，俄罗斯政坛实力派人物、“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之一、莫斯科市市长尤·卢日科夫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我们与西方》的文章指出，历史上西方与俄罗斯长期存在着文化对立与相互猜疑。西方害怕布尔什维克革命，害怕“世界革命”和苏联，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后来的苏联解体而欢呼。之后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为求得西方一笑而自我趴下。过去的俄罗斯国家衰弱，对外敞开资源的大门，几乎处于半解体状态，肆意盗窃和无耻贪污横行。现在，俄罗斯醒过来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出局后又重新回到国际赛场。卢日科夫的文章还引用中国古代哲人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之语，反驳西方强加给俄罗斯的种种罪名。[79]

其次，除战略和道路上的差异外，无疑西方和俄罗斯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还是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的差异所致。而思想和理论上的差异除源于社会道路和制度的不同外，俄罗斯与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更是不容忽视。正如俄国著名的哲学家伊万·伊利因所言：“西方不能理解和容忍俄罗斯的独特性，他们把一个统一的俄罗斯视为其贸易、语言和扩张侵略的障碍。他们欲将俄罗斯分解为无数细小的树枝，以此点燃自己日渐衰落的文明。”[80]

谈到西方与俄罗斯的民主之争，卢日科夫强调，西方特别是美国多次企图强行推行民主化，认定自己具有在世界上推广民主的使命。他希望美国自己成为正常的国家，西方要学会从天上回到地上。世界上没有通行的民主标准，需要历史和文化的结合。卢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过去15年的民主化历史史无前例，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当今俄罗斯需要保留合理的保守主义。俄罗斯要重新定位，要有自信，不应躲躲闪闪，应主动提出“主权民主”之路，参与到与西方的竞争中去。

---

[1]谢·罗戈夫。地缘挑战和俄罗斯与世界接轨的问题[G]//第二届全俄“俄罗斯与21世纪”讨论会材料。莫斯科，1999：107—112.

[2]弗·梅德韦杰夫。政府是怎样扶持寡头的，国家因此损失多大[J].今日俄罗斯联邦，1998（8—9）.

[3]论据与事实，1996（30）.

[4]普京。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R].俄新社，2000-7-8.

[5]普京。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R].俄新社，2000-7-8.

[6]专家.2000-12-11（14）.

[7]符·别图霍夫。社会与政权——相互关系的新特点[J].自由思想——21世纪，2001（4）.

[8]符·别图霍夫.社会与政权——相互关系的新特点[J].自由思想——21世纪，2001（4）.

[9]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M].张树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80.

[10]参见俄罗斯国家新闻网站www.nns.ru/archive/center/2002/01/16.

[11]俄罗斯过渡时期概要[R].独立报，2002-2-8.

[12]普京总统答俄罗斯记者问我们的俄罗斯正在寻找自己的位置[N].红星报，2000-12-24.

[13]普京。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R].俄新社，2000-7-8.

[14]俄“中心电视台”总裁奥·波普佐夫答《共同报》记者问，转引自http://www/nns/ru/chronicle/center/03082001.

[15]普京。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M]//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57—658.

[16]普京。与“瓦尔代”国际俱乐部代表的见面会[M]//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64.

[17]普京。关于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M]//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70—671.

[18]列·格·贝佐夫。“后过渡时期”的轮廓[J].社会学调研，2001（4）.

[19]普京。新闻业是推动世界进步、保障社会公正发展的重要条件[M]//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31.

[20]普京.2005年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M]//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83.

[21]同上191.

[22]普京.2007年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M]//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41.

[23]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记者招待会[EB/OL].http://www.strana.ru/state/kremlin/2001/07/19/.

[24]普京总统克里姆林宫记者招待会[EB/OL].(2001-07-19).http://www.strana.ru.

[25]早在2000年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招待会上，普京就说过“我们政治开端的偏激性和我们民主的年幼性都已成为过去”。参见普京。普京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66.

[26]普京。俄罗斯不应该也不会成为警察国家[M]//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0.

[27]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09/04/1752_type63374type82634_76320.shtml.

[28]参考资料，2005-2-28(27886).

[29]2005年国情咨文[R/OL].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4/25/1223_type63372.type82634_87049.shtml.

[30]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M]//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81.

[31]普京。发挥非政治性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中的作用[M].//普京。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16.

[32]消息报，2000-2-25.

[33]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M]//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80.

[34]2004年3月普京答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问。

[35]普京。学会按照宪法生活，这是民主的高等学校[M]//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21.

[36]2005年普京致联邦议会的国情咨文[R/OL].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4/25/1223_type63372type82634_87049.shtml.

[37]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M]//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83—84.

[38]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5/09/0800_type63379_87802.shtml.

[39]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12/23/1414_type63380type82634_81691.shtml.

[40]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5/09/0800_type63379_87802.shtml.

[41]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5/09/0800_type63379_87802.shtml.

[42]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12/23/1414_type63380type82634_81691.shtml.

[43]同上。

[44]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5/09/0800_type63379_87802.shtml.

[45]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12/23/1414_type63380type82634_81691.shtml.

[46]参见СШАвыделятна“развитиедемократии”около$32млрд（美国拨款320亿美元用于推广“民主”）[N/OL].（2005-7-21）http://www.strana.ru.

[47]http://express.cetin.net.cn:8080/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 no＝270008.

[48]http://express.cetin.net.cn:8080/cetin2/servlet/cetin/action/

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 no＝394592.

[49]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jsessionid＝1ED2178D 62AB9452BB9861E0E9E524B3?baseid＝1&docno＝333143.

[50]普京接受美国、加拿大和法国三国媒体采访[EB/OL].(2006-7-12).http://www.kremlin.ru.

[51]早在2000年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招待会上，普京就说到“我们政治开端的偏激性和我们民主的年幼性都已成为过去”。参见普京·普京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66.

[52]2005年国情咨文[R/OL].(2005-4-25).http://www.kremlin.ru.

[53]普京。打破单极世界幻想，构建全球国际安全新结构——在慕尼黑安全问题会议上的讲话[M]//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72.

[54]同上。

[55]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12/23/1414_type63380type82634_81691.shtml.

[56]参见2006年9月13日，http://www.strana.ru.

[57]普京。打破单极世界幻想，构建全球国际安全新结构——在慕尼黑安全问题会议上的讲话[M]//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80、391.

[58]国家的职责[R/OL].(2006-7-14).www.strana.ru.

[59]普京。与“瓦尔代”国际俱乐部代表的见面会[M]//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32—533.

[60]普京.2007年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M]//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42.

[61]维·沃洛金。俄罗斯有比西方更多的民主[EB/OL].(2006-09-13).http://www.edinros.ru；德·梅德维杰夫访谈[EB/OL].(200-09-15).http://www.strana.ru/stories/02/03/19/2607/.

[62]普京。与“瓦尔代”国际俱乐部代表的见面会[M]//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32—534.

[63]安·科列斯尼科夫。“主权民主”：国家的还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EB/OL].(2006-07-19).http://www.rian.ru.

[64]亚·叶利谢耶夫。“主权民主”成为“民族的”[EB/OL].(2006-09-05).http://www.prognosis.ru.

[65]安·科列斯尼科夫。主权民主对抗民主[EB/OL].(2006-09-08).http://www.gazeta.ru.

[66]谢·菲林。俄罗斯的“主权式”民主与乌克兰“被控制的”民主[EB/OL].(2006-07-03).http://www/km.ru/maagzin/.

[67]弗·苏尔科夫。主权民主的构想依靠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尊严[EB/OL].(2006-09-08).http://www/edinros.ru.

[68]维·沃洛金。俄罗斯有比西方更多的民主[EB/OL].(2006-09-13).http://www/edinros.ru.

[69]谢·菲林。俄罗斯的“主权式”民主与乌克兰“被控制的”民主[EB/OL].(2006-07-03).http://www/km.ru/maagzin/.

[70]参见2006年9月13日，http://www.strana.ru.

[71]瓦·佐尔金。讲“主权民主”是有法律依据的[EB/OL].(2006-9-8).http://www/edinros.ru.

[72]格·巴甫洛夫斯基。主权民主需要像通用的概念一样研究[EB/OL].(2006-9-8).http://www.kleml.org.

[73]维·特列齐亚科夫。主权民主[EB/OL].(2006-9-8).http://www.archipelag.ru.

[74]参见2006年9月13日，http://www.strana.ru.

[75]马·戈利高利耶夫。俄式与美式的“主权民主”[EB/OL].(2006-08-30).http://www.russ.ru.

[76]安·科列斯尼科夫。“主权民主”：国家的还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EB/OL].(2006-7-19).http://www.rian.ru.

[77]亚·叶利谢耶夫。“主权民主”成为“民族的”[EB/OL].(2006-09-05).http://www.prognosis.ru.

[78]谢·伊万诺夫。民族价值观的三大支柱[EB/OL].http://www.old.mil.ru/articles/article14358.shtml）。

[79]国家的职责[N/OL].俄罗斯报，2006-07-14.http://www.strana.ru.

[80]同上。

第十四章　民主标准与发展困境

2008年3月，在普京的安排和支持下，梅德韦杰夫当选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上台之际多次声称，将沿着普京既定方针，保持大局稳定，保证大政方针的延续。梅德韦杰夫盛赞前任普京的功绩，称在俄罗斯处于危难之际，普京拯救国家于深渊。在普京的正确领导下，俄罗斯实现了稳定和发展。梅德韦杰夫表示今后在总统的职位上要竭尽全力，实施由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提出的到2020年的“普京计划”。

一、政治现代化：稳定还是竞争？

执政初期，梅德韦杰夫提出了两个重点问题即制度创新和反腐败。2008年之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上石油等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跌，重创了刚刚步入上升势头的俄罗斯经济。2009年前后，梅德韦杰夫的言辞中开始表露对俄罗斯现状特别是政治生态的不满。梅德韦杰夫公开批评，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官僚化严重，垄断了过多的政治资源，压制了其他在野党的政治空间。梅德韦杰夫担心，由于俄罗斯政治生态中缺少活力和竞争，这将导致政治发展出现停滞。梅德韦杰夫进而提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俄罗斯应当彻底改变过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要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内容也要包括政治现代化。

（一）继承？求变？

其实早在2008年7月，由梅德韦杰夫亲自担任监事会主席的智囊机构——现代发展研究所就出台了一份政治报告。这份长达80页的未来政治发展计划是由该所理事长伊·尤·尤尔根斯牵头，委托政治运作中心基金会联合俄罗斯一些自由派政治学者完成的。报告的题目为《民主：发展俄罗斯模式》[1]。

这份名为《民主：发展俄罗斯模式》的报告于2008年6月正式出炉，7月2日首次提交相关政治学者讨论。据该所俄文网站上透露的内容，报告的开篇引用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就职仪式上的讲话，称俄罗斯需要创新，需要制度、机构、规制、环境、投资等领域的创新。报告指出，应当承认，“民主”一词在当今俄罗斯不是最流行和受欢迎的口号。俄罗斯没有对民主的迫切需求。俄罗斯政治精英阶层对民主的看法是，不看好俄罗斯民主的前景。俄罗斯多数人认为，对于现代化方案来讲，民主只是一个“手段”。他们认为，在俄罗斯，发展民主有许多限制性的条件，只能是长远的任务。

报告分析了俄罗斯社会环境和民主条件，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市场经济框架，具备了发展民主所需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宪法。但是，俄罗斯发展民主所需要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发达，中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报告对普京留下的俄罗斯政治运行机制表示不满，指出普京的政治模式是“手动挡式的管理模式”，不利于调动社会的积极性。在普京治理期间，俄罗斯民主发展进程缓慢，这表现在俄罗斯的经济潜力和经济竞争力远远高于其民主制度和实践指数。

报告的撰写人甚至批评普京时期的政治运行机制“只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缺少横向的联系”。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公民社会弱小，社会封闭，这是这些年“手动挡式的管理模式”的结果。报告中提出，如果一个社会只依靠独裁、权威领袖的眼光，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暗含极大的危险。这类社会压制政治和社会主体的独立性，割断社会联系，其民主前景暗淡。报告认为，照此下去，俄罗斯式的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梅德韦杰夫政治智囊团的报告提出，今后俄罗斯必须改变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俄罗斯要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为此，报告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现代化与民主的联系。报告分析了现代化与民主化的一般规律，指出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俄罗斯的特殊性。报告提出，民主化是俄罗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民主化与经济增长一样，是现代化内容的组成部分，民主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条件，是新的现代化领导班子的要求。报告中提出，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开始并不需要民主化，反而需要权威统治。但俄罗斯不走中国的发展路子，俄罗斯在地理上属于欧洲，具有欧洲历史文化传统。

该报告提出，民主是现代化的前提。俄罗斯必须发展民主，否则难以实现现代化。报告建议，今后俄罗斯要确定俄罗斯式民主，走发展民主之路。而如何发展民主呢？梅德韦杰夫总统依赖的这个政治智囊团开出的药方是：在俄罗斯发展民主，只能是靠“上层的脉动”，而且只能用这种脉动激活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公民的积极性。俄罗斯需要法治，需要公民自由，需要强调权力对社会的责任。

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发表了题为《俄罗斯，向前！》的文章。俄罗斯媒体认为，与1999年12月底普京接任叶利钦代理总统之职之际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类似，这是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发表纲领性的言论。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向前！》一文中提出，今后俄罗斯要改革政治体制，提高公民的积极性，增加政治活力和竞争性，发展民主和自由。

梅德韦杰夫写道：“俄罗斯政治体制也应极为开放和灵活，具有更加复杂的内部结构，以适应快速发展、灵活多变、透明而又多维的社会结构，满足自由、富足、富有批判精神和自信的人民的政治文化需求。”梅德韦杰

夫拿西方国家的例子，来论证俄罗斯也应实行西方国家那样的政党政治："正如大多数民主国家一样，议会政党将成为政治斗争的主导者，轮流上台执政，将由党派及其联盟来组建联邦和地区执行权力机关，提出国家总统候选人、地区及地方自治领导人。这些人拥有丰富的经验，懂得如何开展文明的政治竞争，如何同选民负责任地、卓有成效地合作，如何与党派合作，寻找解决最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协商性方案。他们将能够把社会的各个部分、各民族的公民、各种不同的团体以及享有广泛权限的俄罗斯各地区都团结为一个政治整体。"[2]

鉴于过去俄罗斯政党发育不足，议会作用不大，选举效果不实的弊端，梅德韦杰夫建议，未来俄罗斯政治体制将在开放的政治团体自由竞争的过程中得到更新和改善。俄罗斯各政党将就外交政策、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宪法制度基础、国家主权、公民权利及自由的保护、财产权的保护、反对极端主义、支持公民社会机构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我组织和自治等战略问题达成共识。当今所有民主体制都采取这种协商原则。梅德韦杰夫称，俄罗斯已经开始着手建立这种政治体制。在此之后，梅德韦杰夫提名自由派政党的别雷赫为州长候选人。梅德韦杰夫许诺，今后俄罗斯政党将获得更多的影响联邦主体和市政行政机关组建的能力；对政党建设一系列问题的形式上的要求有所降低；提名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的条件放宽；将从立法上规定议会政党平等使用国家媒体的权利。

近两年来，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俄罗斯各阶层的社会不满情绪也在增长。得到西方舆论支持的自由反对派势力频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喊出了"不要普京"的口号，矛头直指普京。梅德韦杰夫周围的自由派智囊也接连出台报告或发表文章。2010年2月，现代发展研究所又发布一篇报告，标题为《21世纪的俄罗斯形象》。报告指出在现行的执政模式下，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战略和创新计划只是徒有虚名。就任总统两年来，梅德韦杰夫未能推出有效的具体政策措施，俄罗斯仍然是沿着普京制定的"管制型"政治模式行走。俄罗斯很难摆脱"原料和能源出口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报告中提出，前任总统普京实行的是强权政治，对于平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混乱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不过，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暴露了这种政策的局限性。200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了8%，俄罗斯在"金砖四国"中处于垫底的位置，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现代发展研究所的专家在报告中指出，现代化和技术革新需要的是个人的自由、创造性和自尊心。这也是梅德韦杰夫总统的观点和看法。

梅德韦杰夫的智囊撰写的这份报告对普京时期形成的"垂直"的强权体制提出了批评，指出只有"政治自由"才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报告呼吁重

建议会和司法等国家政治制度；完善投资环境；保护私有财产等。

报告提出，历史上有两次俄罗斯快速向现代化迈进的时期，就是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时代。这两次都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梅德韦杰夫的智囊为俄罗斯描绘了一条欧洲式的发展路线，提出俄罗斯要改变发展方式和道路，面向西方走欧洲的现代化之路。

（二）稳定抑或竞争？

2009年9月10日，俄罗斯许多报刊都刊载了梅德韦杰夫那篇题为《俄罗斯，向前！》的纲领性文章。梅德韦杰夫提出要推进政治领域的改革，但改革要谨慎地进行。他写道：

有人提出必须加快改革政治体制，有时还有人表示要重新回到“民主的”20世纪90年代。但回到一个瘫痪的国家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要使支持不断革命的人伤心了。我们不会仓促行事的。政治改革方面的仓促和考虑不周在历史上已不止一次导致悲惨后果，使俄罗斯濒于解体的边缘。我们无权拿社会稳定来冒险，并为了某些抽象理论而使我们公民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们无权哪怕为最崇高的目标而牺牲稳定的生活。孔夫子就曾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在这方面吃了太多的亏。改革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改革。那些主张完全维持现状的人，那些害怕并且不希望变革的人也会对我的话感到难过。将会发生变革，不过，这些变革将是逐步的，周密的，分阶段的，但会是坚定不移的，始终一贯的。

1.放松政治限制

梅德韦杰夫提出改革，矛头指向普京留下的、俄罗斯现行的政治机制。而在此之前，观察俄罗斯政局的人士注意到，稳定是普京时期的代名词。2007年年底，在即将离任之际，普京曾说过，他喜欢稳定。

梅德韦杰夫对普京时期加强中央权威、防止过多纷争的一些政策进行软化或纠正。在普京时期，普京加强了政治调控，规定州长不能进入联邦委员会。取消了州长和市长的直选。提高了党员人数最低限额和进入议会政党得票比例的门槛。这样，俄罗斯政党数量几年间减少了80％，由原来的36个减少到7个。

近两年过去了，梅德韦杰夫显然开始不满意这种稳定。梅德韦杰夫认为需要放松控制、推动政治竞争。梅德韦杰夫决定要在政治生活中有所改变。2009年11月12日，梅德韦杰夫在致联邦会议上下两院的国情咨文提出，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实际上已降到5％。政党获得了提名联邦主体领导人候选者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十方面的政治改革措施：第

一，对俄联邦主体立法权力机关代表人数的规定实行统一标准。按人口平衡代表人数。第二，地区议会中的所有党派都可以建立议会党团。所有政党都有权用自己的代表去填补空缺的常设代表席位及领导岗位。第三，在尚无此项规定的地方，在地区选举中支持率超过5%的政党应有权在联邦主体的立法机构中拥有代表席位。第四，在国家杜马中没有代表，但在联邦主体立法机关有党团的政党无须为参加相应地区的选举征集签名。市镇选举也可以规定这种原则。未来应完全废除征集签名这种政党参加选举的准入方式。第五，各级立法权力机关最好每年至少能专门举行一场会议，听取在立法机关中没有代表的政党的意见和建议。还应该保证非议会政党有经常参与中央和地区选举委员会工作的机会。第六，应该彻底整顿地方选举的提前投票制度，防止非法操纵。第七，在所有联邦主体通过保障地区议会政党活动得到大众新闻媒体平等报道的法律。第八，仿照俄罗斯宪法，把地方执行权力机关向地区议会作年度总结报告的条款写入俄联邦主体的章程和宪法。第九，2009年各政党对完全通过党派名单来选举各级代表权力机关的必要性展开了讨论。第十，加强政治竞争“技术保障”方面的工作。

针对普京时期政治制度上一些严格的限制，梅德韦杰夫做出了一些实际的调整。在选举制度方面，2009年和2010年他先后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一揽子法案，旨在使各政党能够有同等机会接触国家和地方媒体。在政党政治方面，修改法律，使得在地方议会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获得了向总统提名州长人选的优先权。反对派政党也可以确保在地方议会获得领导职位。降低了参加选举所需的联名数量和政党进入各级议会的比例门槛。

2.执政党内部清党

为防止执政的大党失去活力、队伍退化，2008年之后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开始了内部清理行动。前些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并未加入该党。2008年，普京即将卸任总统之职，才受邀成为该党的领袖。近些年来，俄罗斯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一直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吸引了各级官员纷纷加入，被民众称为是“官僚党”。成立不到十年，“统一俄罗斯党”队伍急剧膨胀，号称几百万党员之众，人数大大超过了组织严谨的俄罗斯共产党。该党除在议会、政府中把持着重要职位外，还有近70位地方行政长官，在60多个地方议会中占据多数议席。而随着普京声望高居不下，“入党”“与熊为伍”（“统一俄罗斯”党的标志和别称为“熊”）成为政治时髦用语，各色谋求仕途或追逐利益之徒纷纷进入该党。

2008年4月，普京接手该党主席职务时表示，由于统一俄罗斯党与权利走得太近，很可能会被骗子利用。而这种隐忧是存在的：各类骗子都会不遗余力地挤进来，并且经常能够得手。这些人并非是为百姓谋福祉，而是为了个人发财。他们的这种行为只会败坏政府和党的声誉。普京要求，统一

俄罗斯党应该进行改组，要摆脱那些唯利是图和言行不一的投机分子，并把他们清除出党，这样才能保证将党的领先地位至少保持到2020年。

2008年5月底，“统一俄罗斯党”在莫斯科市原苏共中央办公大楼内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深入讨论党内的“党员审查、核定及干部任期制”等问题。据透露，由于前些年大张旗鼓地扩张党员队伍，造成党内“死魂灵”数量增加，3.8%的党员、也就是约7.6万的党员与党没有联系。常常是整个单位一起入党，其中许多人根本没有党的意识。当然更多的情况是，许多党员根本没有信仰和价值追求，只是看到统一俄罗斯党大权在握才申请加入。资料显示，在2001年到2008年间，该党已经清理了3.4万余人。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层声称，2008年开展新一轮的“清党”，被开除的党员人数可能达到15万人。今后要求地方党的领导主要负责党员的质量，改变过去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做法，严格入党条件。一方面在审查过程中将那些追求个人目的的投机分子清除出党；另一方面，改变官僚、政要、富豪和社会名流占党内多数的结构，与各种社会团体积极配合，在青年、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和农村劳动者中开展工作，吸收他们入党，以改变党内过于官僚化的倾向。

2010年，在政党关系方面，被称为俄罗斯“政党政治设计师”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开始向统一俄罗斯党施加压力。他提出，今后“统俄党”在议会获得宪法大多数（2/3席位）的难度将大大增加，要他们准备好与其他政党合作。苏尔科夫认为，只有增进政党竞争，才能激发政治活力，预防在野党出现退化，防止执政党失去活力。

3.除恶反腐

近些年，俄罗斯腐败现象更加严重。腐败形式也由过去的行贿受贿，衍生出变相的高官厚禄、内幕交易或子女的升迁。

2008年，刚刚执掌俄罗斯总统大权的梅德韦杰夫立即重组总统反腐败委员会，并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法律专业出身的梅德韦杰夫首先力推多年酝酿的《反腐败法》的出台。2008年5月19日，梅德韦杰夫总统主持召开反腐专题会议，提出了今后俄罗斯反腐计划的三大重点和步骤：第一，出台《反腐败法》，同时完善相关立法工作，弥补现行法律中的漏洞；第二，要加大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打击和预防腐败的力度，从根本上减少滋生腐败的条件；第三，要在全社会宣扬反腐败的意识，使人民树立相应的法律观念。

近期俄罗斯社会种种迹象表明，梅德韦杰夫的反腐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但反腐败工作不可能借助几次哪怕是大规模的“运动”完成。出台反腐计划或相关法律也许并不难，而解决反腐的制度、体制问题和培养清廉的

社会文化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梅德韦杰夫的反腐大业和俄罗斯重新振兴仍任重而道远。

时至今日，俄罗斯仍是国际上腐败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这使得部分俄罗斯人甚至失去了信心。2010年梅德韦杰夫也公开承认，反腐败行动一直原地踏步，毫无效果。

4.以竞争打破停滞

2010年11月，梅德韦杰夫指出俄罗斯国家政治生活有陷入停滞的迹象。[3]在此之前，普京更多倾向使用“稳定”这个词。现在，梅德韦杰夫开始谈到这种稳定变成了使国家政治生活陷入停滞的因素。他认为，这对执政党和反对派同样有害。[4]如果反对党根本没有机会在公平的选举中获胜，它就会衰弱和边缘化。失去活力的执政党最终也会退化。

2011年1月26日，俄罗斯《导报》刊登了对梅德韦杰夫的访谈录，标题为《梅德韦杰夫：政治竞争是必要的》。在此次访谈中，梅德韦杰夫向俄罗斯社会提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要全面进行，现代化也包括政治领域。

梅德韦杰夫称：“我不是说，我国的整个政治体制应当改变。不管怎么说，它还很年轻，有不足，也有一定的长处。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关注政治体制。但我不认为，只要改变政治制度，使其走上正轨，我国的经济就会改变。认为会有不受贿的好官员、会有不干预经济生活的国家、会有绝对公正的司法，将建立起全面幸福的社会，这是幻想。这里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种种成就的拼凑。有一些国家管理非常严厉，甚至是专制的社会，但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很少腐败，一切都按十分理想的经济版本得到发展，而这些国家政治体制并不发达。”[5]梅德韦杰夫进而提出，竞争是预防出现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倾向的疫苗，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人们看到，普京执政8年间平定了分裂和动乱问题，但俄罗斯的官僚机构增加了一倍，行政效率降低，司法进步甚微，腐败现象蔓延。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断言，普京时期形成的政治阶层和官僚才是现代化的障碍，能否打破这种局面是一个问题。如果梅德韦杰夫在进入第三个执政年头仍没有实质性的动作，那么他可能会一事无成。

2009年，俄罗斯政府下达1753条命令，只有1084条得到执行，执行率下降了15%。2010年春天，梅德韦杰夫趁着普京出访的机会，在一次会议上斥责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称“不服从命令的就请他滚蛋”。随着4年任期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梅德韦杰夫总统内心的焦虑也逐渐暴露出来。梅德韦杰夫的民主梦想能否冲破俄罗斯官僚的阻隔，能否实现效率与自由，

俄罗斯民众对此存有极大的疑虑。

（三）政治选择的困境

1.自由派的压力

梅德韦杰夫的政治现代化面临着多方面的羁绊、制约与压力。首先是来自右翼自由反对派的政治压力。自由派在西方舆论的支持下，利用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经济的困境，不时在俄罗斯各地发起抗议活动。自由反对派认为，俄罗斯建成的是“蛮横的警察国家”，普京必须下台，俄罗斯必须实行彻底的西方式的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

2009年9月16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俄罗斯前国家杜马议员、自由派人士弗·雷日科夫的一篇访谈录。雷日科夫直言，俄罗斯专制统治逐渐走向成熟，民主渐行渐远。俄没有独立的议会和法院，没有真正的多党制。专制体制在俄罗斯彻底建成。梅德韦杰夫执政一年半以来，他没有一块自己的菜园，他在哪里种下一个土豆，普京就会到哪里种胡萝卜。总统手里只有一些总理不感兴趣的旷地：纳米技术、发展网络……普京重申，俄罗斯的权力更迭按钮有两个按键。普京暗示，梅德韦杰夫不能自由决定是否第二次参选总统，他的权力受到限制。普京仍然大权在握，并将重返总统职位。

雷日科夫称，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暴力机关的打击对象。因此，大量资本外流，没有投资和正常的发展态势。所有人都厌倦了这一切，但大家都很害怕。2011年后俄经济将陷入困境，当局要同时为国家杜马和总统选举做准备，俄将经历经济政治上十分困难的年份。未来5年，俄罗斯可能实现民主或面临动荡，但最大可能是普京在未来十多年继续主政，与俄罗斯一同走向衰败。

雷日科夫透露，一年前梅德韦杰夫的智囊伊·尤尔根斯曾表示，应组建由梅德韦杰夫领导的改革者联盟。也就是说，公开呼吁普京放弃权力，由梅德韦杰夫成为改革派领导人和自由旗帜。但这会出现因梅普组合解体而造成的危机。况且只有5%—7%的人支持梅德韦杰夫表现出独立性。

与梅德韦杰夫认为右翼自由派队伍中也有优秀的政治家的言论不同，普京总理对自由派的批评毫不留情。他几次强调，自由派的目的就是借机重新掌权，企图在混乱之中大肆盗取和瓜分钱财。普京表示，绝不会让这些人得逞。

俄罗斯自由派人士声称，只要俄罗斯的专制政权不被民主政权所取代，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而俄罗斯要想确立真正的民主政权仍然“道路漫漫”，因

而俄罗斯的现代化前景自然也就不会令人乐观。

2.官僚行政机器的制约

梅德韦杰夫提出了走向现代化的口号，但找不到推进现代化进程可以依靠的力量。各级官员只是口头应付，实际却是推诿怠工。俄罗斯学者分析，官僚阶层已经习惯了依靠出口高价的原材料和石油天然气轻松获利，他们的眼光只盯着油井和输气管，内心和行动缺少创新的愿望和动力。

经济学博士、俄罗斯后工业化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自由思想》杂志主编弗·伊诺杰姆采夫认为，在国际上一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现代化是当政者保持权力的手段。而在俄罗斯，权力和财富结合得太紧密，人们从事政治仅仅是为了金钱，掌权变成了盗窃掠夺的手段。官僚阶层看重的不是政权，而是眼前的财富。梅德韦杰夫承认，俄罗斯政治机制不能令人满意，政治体制不完善，不能满足他所理解的民主的要求。

2010年7月19日，俄罗斯《导报》刊登美国华盛顿世界安全研究所俄罗斯和亚洲项目主任、俄罗斯问题专家尼·兹洛宾的一篇文章，题为《选择的需求》。兹洛宾写到，俄罗斯的政治很像是苏联时期的商店，货物单一，选择有限。由于强大的行政机器掌控着社会利益分配，限制了人们的政治需求，滋长了政治黑市。在官僚机器的挤压下，社会缺乏力量的多样性。俄罗斯社会机制萎靡不振。统治集团的政治胃口无耻膨胀，就像苏联时期的精英那样，只着眼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全然不顾国家的需求。其结果是，统治阶层脱离社会，抗议情绪与日俱增，控制力逐渐消失。梅德韦杰夫自己承认，国家官员包括警察和司法人员，对民主机制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因此，梅德韦杰夫现代化的口号很难依靠各级官员去落实，很可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3.目标与途径的矛盾

除了目标与途径的矛盾之外，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构想能否顺利实现，还需解决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的矛盾、竞争性改革与维护稳定的矛盾、国有经济与自由市场的矛盾、利益集团的矛盾等。

2010年12月6日，梅德韦杰夫在出访波兰前回答了波兰媒体的提问。在访谈中，梅德韦杰夫向记者强调，民主与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贫穷则没有民主。他认为，在民主建设方面，俄罗斯才刚开始打基础，俄罗斯应当拥有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不能只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尽管这是俄罗斯经济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的经济应当以创新和新技术为基础。同时，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俄罗斯需要一套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来确保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建立高效的现代化经济和建立高效的法治国家应同时推进。

梅德韦杰夫称，穷国无民主，对此他深信不疑。梅德韦杰夫认为，一个从不谈论民主话题的专制国家将无法建立现代化的发达经济。对于“你最好不要做任何事情，只有等经济状况彻底改变之后，才能完善政治制度和保障自由”这样的建议，梅德韦杰夫称这是谬论。他认为，俄罗斯不可能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实施经济改革。也许对某些国家来说这是可行的，但在俄罗斯则行不通。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大部分人把自己看成欧洲人，认同来自欧洲的价值观——无论是宗教、道德还是政治观念。因此，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建立先进的政治制度应当是同步的。

2011年1月26日，梅德韦杰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演讲时称，民主将因为经济现代化而发展。原始的原料经济不能保证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未来，这意味着它也不能保证俄罗斯民主的稳定。为了不受民粹主义的威胁，民主应当建立在发达经济和独立社会的基础上。俄罗斯将摆脱原料和能源出口型的经济模式，走创新科技发展之路。而政治的自由民主模式是保障俄罗斯现代化的条件，也是现代化的内容。

谈到改革与民主的关系时，梅德韦杰夫称，政治改革不能引起混乱和民主制度的瘫痪。我们的任务是巩固民主，而不是破坏民主。俄罗斯媒体认为，梅德韦杰夫很像二十多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夸夸其谈，提出的目标与现实进程相差甚远，并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逻辑与顺序。这些构想推行的结果是，不但很难解决俄罗斯面临的难题，而且很可能制造出新的问题。

4.不确定的西方因素

对于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目标，西方政界做了多个“两手准备”：施压与拉拢相结合；鼓励政治现代化与冻结经济现代化相联系；官方与民间相配合等。首先，西方国家在外交和政治上拉拢梅德韦杰夫。奥巴马在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俄罗斯，在与梅德韦杰夫会谈时，不忘挑拨“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的关系”。奥巴马对梅德韦杰夫称，普京的一只脚还留在过去的苏联。

2010年10月1日，美国《国家利益》周刊（网络版）发表基辛格同仁公司高级研究员、曾在2004年至2007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高级主任的托马斯·E.格雷厄姆的文章，题目为《俄罗斯：2012问题》。这位美国有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提出，美国应当支持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因为梅德韦杰夫当选有利于美国。如果梅德韦杰夫再次当选，那么即使普京仍担任总理一职，也将预示着一个政治体系开放进程更加迅速、鼓励个人进取心、营造与美欧良好关系的未来。相较而言，普京的回归则将带来不同的前景，政治讨论更加受限、国家在经济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与美欧关系也将更疏远。不管双头政治存在与否，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都将最终

与普京就任带来不同的结果，而梅德韦杰夫就任的前景可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前些年，来自美国民主党党派的克林顿总统就车臣战争多次炮轰俄罗斯，来自共和党党派的布什总统也将普京时期的民主倒退作为抨击的把柄。2008年以后，奥巴马决定不再当面批评俄罗斯领导人的民主退步。2009年10月13日，俄罗斯《生意人报》刊登一篇题为《获美国人肯定的民主》的文章，透露奥巴马的俄罗斯问题特使迈克尔·麦克福尔在与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会晤后表示，美俄关系“重启”后，华盛顿不会公开批评俄罗斯的“民主”。麦克福尔对苏尔科夫讲，美国不打算再给俄罗斯上民主课，而将专注于与非政府组织有关的切实工作。

虽然美俄领导人当面示好，但并不妨碍两国就民主人权问题远隔重洋继续论战。2010年5月，美国国务院又一次发表民主人权问题年度国别报告。报告声称，将继续批评俄罗斯的民主自由状况，并称美国每年通过非政府组织向俄罗斯提供资助，以巩固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普通公民参与社会生活。此外，美国当局还支持遭到迫害的俄罗斯商人推动立法改革等。

与此同时，西方主流媒体和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继续批评俄罗斯的不民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菲什（Steven Fish）称，造成俄罗斯独裁专制的原因有三个：石油太多、经济放权太少和立法机构太弱。2008年，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下属的同名基金会，与委内瑞拉等国一起，将俄罗斯列为世界上民主有缺陷的10个国家之一，民主水平排在科索沃之后。2010年1月，号称非政府组织的自由之家组织又发布《世界自由国家》报告，指出俄罗斯由于迫害记者和压制人权等原因，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原苏联国家仍属于不自由国家。自由之家的报告称，俄罗斯的选举民主水平处于自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可见，西方惯用的在民主和在政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能否对“梅德韦杰夫和普京”政治组合产生作用，西方能否如愿让比普京更年轻的梅德韦杰夫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提出“新思维”，在政治和外交上完全倒向西方，这不仅关系到俄罗斯的政治走向，关系到俄罗斯现代化能否成功，也关系到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变化。

二、民主标准与法治幻想

2006年7月，正当俄罗斯政治精英层热议普京政治智囊提出的“主权民主”概念之时，时任政府第一副总理的梅德韦杰夫就公开发表意见，称他不同意“主权民主”的提法。梅德韦杰夫认为，“民主”不应有任何的限制词和形容词。民主是普世的，在国际上民主应该有统一的标准。梅德韦杰夫

称，民主只能是“有”，或者是“无”。梅德韦杰夫这种说法，不由得让人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市场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盖达尔的言论，市场或者有，或者无，就像女人怀孕一样，没有半怀孕。盖达尔还提出，实行市场，就像跳过悬崖，只能一次跳过，不能中间停顿。2008年5月继任普京的总统之职后，梅德韦杰夫更是多次谈及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等问题。

（一）民主价值

梅德韦杰夫多次强调民主普遍价值。2009年9月10日，梅德韦杰夫在其纲领性的《俄罗斯，向前！》一文中大谈民主的必要性。梅德韦杰夫写道：“我之所以认为技术发展是社会和国家的优先任务，还因为科技进步与政治体制的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通常认为，民主诞生于古希腊，但那时民主并不是所有人的民主，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确立了普选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真正民主，适用于每个人的民主出现的时间没有多久，也就80至100年前。只有在最必需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具有大众性，在西方文明的技术发展水平保证人们能够获得最必需的财富、教育、医疗服务及信息交流的情况下，民主才成为了大众的民主。每项能够改善生活质量的新发明都能给人以更大程度的自由，使人的生存条件更加舒适，社会关系也更加公正。我们的经济越‘聪明’，越智慧，越有效，我们公民的富裕程度就会越高，我们的政治体制就会更加自由，更加公正，更加人道，整个社会也将如此。”

2009年9月14日，梅德韦杰夫在由他亲自发起的世界政治论坛“现代国家和全球安全”国际会议上又讲道：“对于我来讲，一个现代国家应首先是一个民主国家。现代民主机制理应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即社会发展目标应优先通过非暴力途径来实现，而不是靠强迫、压制、恐吓或彼此对立。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核心应是宽容、平和、对话，个人创造力的发挥，个人、社会及国家利益的接近，以及各个社会与国家利益的接近。现代的政治体制应是开放的、灵活的，也是相当复杂的，这样才能符合当前的需要，与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文化进程的性质与速度相适应。它们应能保护个人，保护国家主权，并维护公民社会的各个机构。”梅德韦杰夫认为，以上是民主应当遵守的共同的、可能也是最基本的原则，这些正是制定民主政策标准时所应遵循的原则。

2010年9月9日至10日，梅德韦杰夫又亲自出席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古城雅罗斯拉夫尔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政治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现代国家：民主标准和效率准则”。梅德韦杰夫在演讲中指出：“我不仅坚信作为管理形式的民主，不仅坚信作为政治制度形式的民主，而且坚信民主在实际应用中能够使俄罗斯数以百万计的人和世界上数以亿万计的人摆脱屈

辱和贫困。”

（二）民主的迫切性

梅德韦杰夫的智囊机构——现代社会发展研究所在2008年7月出炉的那份名为《民主：发展俄罗斯模式》的报告中详尽地论述了民主对于当今俄罗斯社会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报告指出，国际上的民主化进程，有典型性民主，有西方经典的民主模式，也存在着非典型性的东亚模式。非典型性的民主化模式是首先经过社会自由化阶段。通过社会生活的开放性、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的发展，达到自由化的制度化阶段。在实行非典型性民主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民主不仅是价值观，而且是“选择小恶”的政治考虑，是为了防止国家的效率降低和保持创新的激励机制的政治需要。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民主程序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等社会传统较好地结合了起来。

该报告提出，俄罗斯社会应当实现三重的转变：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极权主义转向民主，统一意识形态的多民族国家转向民族国家。而俄罗斯的这些转向必须是现代化与民主化、经济与政治同时进行。

梅德韦杰夫的自由派政治智囊还引证西方经典著作来说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而俄罗斯社会既缺少市场，更缺乏资产阶级。但是俄罗斯必须要实行民主，这是因为，一是受苏联制度的影响，俄罗斯市场经济发育不良，市场关系薄弱；二是俄罗斯在地理上属于欧洲，在经济和文化上与欧洲联系密切，不民主要受到严峻的外部压力；三是俄罗斯面临着实现后工业化现代化任务，但俄罗斯社会缺乏创新，社会多数成员趋于保守。

（三）民主标准

在2010年9月9日至10日的第二届世界政治论坛上，梅德韦杰夫在演讲中提出，与人权一样，民主标准（实际上民主标准包括人权在内）也应该是国际公认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有效的。重要的是，共同制定的标准不应是模糊不清和虚假的。因此，每一个参与制定标准的国家，都应该把这些标准运用到自己的国家，使所有国家都遵循这些标准，而不必担心它们会被用来限制主权和干涉内政，或者被用来作为一种欺骗的、施加压力的手段，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服务，有时甚至只不过为某些领导人的陈腐偏见和野心服务。

梅德韦杰夫还详细地向与会者介绍了他所理解的民主的普遍标准：第一，从法律上体现人道主义价值和理想。第二，国家拥有保障和继续保持科技高水平发展的能力，促进科学活动，促进创新，最终生产充足的社会财

富，使公民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水平。贫困是民主的主要威胁之一。显然，贫困者不可能是自由的人。把国外的民主形式移植到贫困社会的尝试往往会导致混乱，或者导致专政。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改革导致了大规模的贫困，“民主”这个词在俄罗斯获得了消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变成一种骂人的话。现在，经过一些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俄罗斯获得了较高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背景下，民主在俄罗斯变得较易理解了，或者成为有效益的了。民主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俄罗斯相当多的民众现在不再拒绝民主，也不再把民主当作别人的东西了。第三，民主国家有能力保卫本国公民不受犯罪集团的侵犯。例如，恐怖主义、腐败、毒品交易、非法移民以及其他威胁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无视俄罗斯法律的犯罪活动。第四，高水平的文化、教育、交流手段和信息沟通工具。第五，公民们确信自己生活在民主社会。这也许是主观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四）梅德韦杰夫眼中的俄罗斯民主状况

1.包括苏联时期在内，俄罗斯历史上没有民主

梅德韦杰夫多次宣称，俄罗斯在过去1000年包括苏联七十年历史上从未有过民主。2010年9月9日至10日的第二届世界政治论坛上，梅德韦杰夫在演讲中提出，俄罗斯在很多世纪中，在千百年间，走的是非民主的发展道路。2010年12月6日，梅德韦杰夫在出访波兰前对波兰媒体记者说，“我们没有民主传统，这是实话。民主不是几年就能建立的。在1991年当代俄罗斯诞生之前，我们国家从未有过民主。我强调的是‘从未有过’——无论是沙皇还是苏联时期都没有。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2.俄罗斯民主历史不足20年

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有民主，但民主的历史很短，还不足20年。2010年9月9日至10日，在第二届世界政治论坛上梅德韦杰夫说过，他坚决不同意那些说什么在俄国没有民主、独裁主义传统在俄国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言论。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毫无疑问，俄罗斯是民主国家。在俄罗斯存在民主。诚然，这种民主是年轻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缺乏经验的，但它终究是民主。俄罗斯正处在道路的起点，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毕竟，俄罗斯实行民主还不足20年。

3.现在俄罗斯民主好于12年前

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还很年轻，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现在的民主要“比5年前民主要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判

断。这是否意味着，梅德韦杰夫时期政治成果或民主成就要高于5年前普京时期的成就？值得回味。

4.俄罗斯要向西方学习民主

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民主是和西方的民主一脉相承的，而且俄罗斯的民主应当刚刚处于“小学阶段”，俄罗斯要像“小学生”一样虚心向西方成熟、老道的民主学习。2009年9月15日，梅德韦杰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时称，俄罗斯的民主毕竟还很年轻。在新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出现之前，俄罗斯还从未有过一个民主的社会。无论沙皇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从来未曾有过民主。民主在俄罗斯总共只存在了18年。如果同美国经验相比的话，这不算很多。

2009年11月7日，梅德韦杰夫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们的价值观与西方相同。我不认为，我们与你们在自由和人权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尤其是与欧盟新成员相比……欧洲国家不能认为，俄罗斯是黑暗的、没教养，目前还不能让它进入欧洲——这样说并不正确。

2010年4月，梅德韦杰夫在访问北欧国家挪威期间，对众多媒体说道，俄罗斯的民主还很年轻，不足20岁，你们都有1000年了，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梅德韦杰夫向西方记者讲道，坦率地说，由于各种原因，民主在一个规模和领土不大的国家更容易实现。而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这个过程难度大增。因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20年中什么也没做，特别是最近10年。

（五）民主与新闻自由

2009年9月15日，梅德韦杰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时，谈到新闻自由：

当然，对此会一直存在着各种考量。我已经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同我的美国同行谈起俄罗斯新闻业现状。有人认为，俄罗斯媒体少，但并非如此，媒体非常多，其中包括电子媒体，印刷媒体，互联网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人认为，媒体受到了压制。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记者几乎可以在媒体上提出任何问题。我也不否认，有时是有压制媒体的情况，这往往发生在地区，比如地区领导人不太喜欢针对自己的批评性报道。这种情况是有的，对此应该做出反应，媒体应有自我保护能力。不管领导是否喜欢，但在当今全球信息领域无法掩藏什么秘密。电视可以对某件事保持沉默，不在电视节目中作任何透露，但我们还有近4000万互联网用户，任何事情5分钟后全世界就知道了。所以，压制新闻自由，这绝对是无法得逞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当然应该明白新闻业的变化。您本人对这一

行一清二楚。90年代我们的新闻业有所不同，该行业属于五大寡头之一，他们借助大众传媒互相报复，并不时地向国家领导施压。这也是不对的。新闻业应该明白自己的尊严，自己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在民主分工中的作用。新闻业不仅不应该受到国家压制，还应不存在资金的压力，理应具有稳固的储备。我觉得，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理想的，我向来愿意就此进行对话。因此，从总的情况来看，近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已变得更加成熟。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这一体制还远不理想，这是实话，它确实远不理想。目前我们有许多民主机制还停留于纸面。人们不懂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提出各种要求。法院的工作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人们通常是去找各个领导，而不是诉诸法院。当然，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觉得这是绝对不正确的。需要一种不同的法律文化，需要一个受尊重的法院以及有效的护法机构。这方面还有工作要做，我们会去做的。

2010年4月12日，梅德韦杰夫访美前夕，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对其的访谈，称冷战是无聊乏味的东西。他说：

俄罗斯像美国一样是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这是指，我们有着相近的价值观。俄罗斯人所希望的同普通美国人所希望的差不多。我们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确保国人过上安全、舒适的生活，但很遗憾，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正面临着一系列威胁，我们正努力应对。我们有一整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我们正向其迈进。作为几乎20年前才成立的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我们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经验。

（六）民主与自由

2010年9月9至10日，梅德韦杰夫在第二届世界政治论坛上提出，人的教育和文化程度越高，在做出判断时就越自由，表达观点时就越独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教养、有文化的人的社会。过去那种由“领袖们”向“普通老百姓”指示应当如何生活以及为什么而生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正是在20世纪，在所谓帮助“普通老百姓”的旗号下建立了最恶劣的专政。21世纪是有教养的、聪明的、也可以说“复杂的”人的时代，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才能，他们不需要那些代替他们做出决定的领袖、保护人。当然，这应当是聪明的国家、聪明的社会、聪明的政策。现在，政治和法制文明、社会行为文明、公民对话文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公民们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自由，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每个现代人都知道，民主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民主国家减少对社会的调节和镇压职能，把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部分职能转交给社会本身。而文明程度的低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不能宽容、不负责任和攻击性都对民主起着破坏作用。因此，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在实践中是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框架下实现的。将

来也应如此。

梅德韦杰夫认为，民主制度不是民众处理事务时遵循的惯例，尽管这也很重要。它是一系列严格规定的准则和规章的目录清单。只有严格执行这些准则和规章才能保证民主的效率。因此，民主不仅是自由，而且是自我克制。由于获得知识和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正在转向民主的新水平。显然，我们以后不仅要实行间接的或代议制的民主，而且要实行非间接的、直接的民主。在这种民主的条件下，人们可以立即表达自己的意志，表明他们希望达到哪些具体结果。现在通过公开辩论和非正式表决就可以了解社会上对所有重要问题的意见。

梅德韦杰夫讲道，自由和公正不仅仅是政治口号，而且是哲学、社会学范畴，但最主要的——这是人的感情。可以把这些词写进宪法和其他法律，在学术讨论会上进行辩论，但是假如人们自己感觉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问题。在这一方面，任何社会都存在缺陷，任何民主都有缺陷，俄罗斯民主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政府可以不断地对自己的公民说，你们是自由的。但是，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2011年1月26日，在刚刚经历了莫斯科东部机场恐怖爆炸之后，梅德韦杰夫飞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讲到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梅德韦杰夫认为，人们的感受、对社会的评价和自我感觉可能是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公民坚信自己生活在民主国家，政府与民众开诚布公的对话——这是现代民主的重要特征。这种民主的质量和效率不仅取决于政治程序和制度，还取决于政府和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彼此倾听。光自己拥有自由是不够的，还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民主国家间的关系。

（七）民主形式

2009年9月10日，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向前！》一文中提出，他鼓励和看好直接民主，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要善于利用网络民主等形式。梅德韦杰夫提出，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普及为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这类基本的政治自由，为发现和消除腐败源头，直接到达几乎任何事件现场，为全世界人们直接交流意见和知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社会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开放和透明，即使统治阶级对此未必喜欢。

梅德韦杰夫在一次国情咨文中提出，俄罗斯政府将加强政治竞争“技术保障”方面的工作。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还认同一位俄罗斯地方记者的意见，称现代选举制的建设是俄罗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

分，就像通信、公路、电网及邮政一样，国家基础设施缺少了这种成分，就意味着俄罗斯人的生活存在着一种缺失。

为推行直接民主和扩大民主参与，梅德韦杰夫号召俄罗斯政府要推广宽带网的计划，以促进就各种问题展开自由的社会讨论及获得全面信息。积极采用电子手段计票和处理各选区信息将有助于打击竞选中的腐败行为。为使地区竞选体制更加透明，责成政府会同中央选举委员会及各地方加快选举系统技术改造。

（八）民主与法治

梅德韦杰夫多次谈到俄罗斯历史上的法律虚无主义。2009年9月10日，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向前！》一文中提出，“民主制度需要维护，就像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需要维护一样。首先是不能让人民受到恣意妄为、不自由和不公平所造成的腐败的伤害。梅德韦杰夫称，我们刚刚着手建立这样的保护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应该是法院。我们将建立现代化的高效法院，按照审级制度的新法规并依靠对法律的最新理解开展工作。我们还要避免轻视权利和司法制度的做法，我多次说过，这是我国可悲的‘传统’。在建立新的司法权力机关时，不能赶任务，搞冒进，可有人空谈说，这个制度已经腐朽，营造新的司法和护法机构比改造它们更容易。我们没有‘新的’法官，就像我们没有‘新的’检察官、警察、情报人员、官员、企业家一样。要为现有的护法机构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坚决把无赖清除出去。要让护法人员学会维护权利和自由，公平、明确而有效地解决法律纠纷。必须排除对法律工作的非法律影响，无论是谁的主张。总之，司法系统本身要搞清，什么是为了国家利益，什么是为了腐败官员或企业家的私利。必须培养对法律文化的兴趣，引导人们奉公守法，尊重他人的权利，包括所有权这种重要权利。法院要依靠广泛的社会支持消除我国的腐败现象。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能够完成，其他国家就做到了。”

2010年12月6日，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称，俄罗斯处于法治建设的初始阶段。“我们不是唯一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中遇到困难的国家。我已经多次说过，我对俄罗斯建立法治国家所面临困难的认识。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的经济或政治现状，还在于我们的历史和早在一两百年前就在我国根深蒂固的法律虚无主义。”

梅德韦杰夫认为，最近10年，俄罗斯巩固了国家和法律制度。他认为，为了确保法律的统治地位，它应当以国家为支柱。梅德韦杰夫讲到，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法律系统是通过国家机构起作用的。如果这些国家机构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垮台，那么法律就不可能拥有统治地位。所以说，弱国无强法。在治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时更需谨记这一点。

2011年1月26日，梅德韦杰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演讲时称，“俄罗斯常常受到批评，有时是公正的，有时则是完全不公正的，比如指责我们缺乏民主，有独裁倾向，司法系统疲弱。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自己。我想说，俄罗斯确实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有效的现代化经济中面临很多困难。俄罗斯遇到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最严峻的挑战。俄罗斯有很多社会问题，尽管近年来它们有所减少。最后，俄罗斯所有做决定的人不保证不犯通常的错误。但应当明白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我们确实在发生重大变化，重大的社会变化，我们的发展和进步是实实在在的。特别是打击腐败，司法和执法领域的现代化，尽管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还没有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但这是我们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实际尝试。我重申，我们暂时没有取得杰出的成绩，但我们有决心继续做下去。我们在自学，也愿意接受友好的建议。但不要教训我们，应当合作。”

如果俄罗斯立法进程缓慢，跟不上社会的需求，梅德韦杰夫建议直接采用欧盟的法律。2011年1月26日，俄罗斯《导报》发表了梅德韦杰夫去达沃斯之前的一篇访谈录。梅德韦杰夫提出，“我们能够改变立法，使它服务于现代化。这里指的是什么呢？三年前谁都不会注意技术标准、技术管理问题。这妨碍了所有人的工作，过时的条条框框束缚住所有人的手脚，而这却没有引起重视。我不得不相当严厉地要求政府和企业家组织来做这项工作。于是出现了现代化的技术管理法。此外，我还督促着做出一项有关俄罗斯可以实行欧盟立法的决定。是的，这证明，我国立法不发达。”

（九）国际范围内民主问题

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在那篇名为《俄罗斯，向前！》的文章中提出，“俄罗斯不会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公民社会不是外国赞助就能收买的。政治文化也不是简单模仿先进社会的政治习惯就能改变的。有效的司法制度不能靠输入。自由不可能来自书本上描绘的东西，哪怕是深奥的书本。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向其他国家的人民学习，吸取它们的经验，思考其民主机制发展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但是，任何人也不能替我们感受我们的生活，任何人也不可能让我们自由、成功和具有强烈责任感。只有我们自己有了民主建设的经验，我们才有权确信：我们是自由和成功的，我们有强烈的责任感。”

虽然，梅德韦杰夫也谈发展俄罗斯式的民主，但与普京时期强调民主的“主权性”和“民族性”不同，梅德韦杰夫认为在民主问题上不要设更多的防线，俄罗斯要与国际特别是西方合作。2010年7月12日，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驻外使节及国际组织常驻代表会议上讲话中称，“两年以来，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应该促使全世界，首先是本国的社会制度更人道，当然不能放弃国家利益，必要时要力保国家利益。遵守多数国家的民

主标准基本上也符合俄罗斯民主的利益。当然，不能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不能把民主标准单方面强加于人，我们有亲身经历，对此太清楚了，有人也试图强加于我们。要共同制定民主标准，考虑到各有关国家的意见，包括前不久才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这指的是我们这些国家或者目前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大家知道，这指的是哪些国家。要遵循共同制定的标准，关键是不虚情假意、不强加于人，因为这是我们一起商定的。”梅德韦杰夫指示，俄罗斯使馆、代表处应广泛吸收国际智囊和非政府组织在论坛上讨论民主问题，更积极地与之合作。

三、民主迷思与道路之争

2012年10月16日，俄罗斯《观点报》刊登了亚·米申的一篇文章，题为《民主不是主要问题》，副题为《社会学家分析反对派在地方选举中失败的原因》。米申引用俄罗斯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全俄舆论调查中心发布的社会调查结果之后指出，在当今俄罗斯社会，民主和人权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派空想出来的，它们并不关心民众的实际想法。当今俄罗斯人更关心日常生活等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首要关心的问题是住房公用服务，此后依次为通胀（50%），酗酒、吸毒和腐败（均为48%），低质量的生活（47%）。有41%的受访者担心医疗保健，36%的人担心失业和退休保障，30%的人关心青年状况和犯罪率。只有26%的受访者关心道义和道德问题，关注教育状况的人占23%，担心寡头影响国家的人占21%，担心生态的人占20%，担心经济的人占19%。俄罗斯人关注度排在最后几位的是：人口状况（16%）、恐怖主义威胁（15%）、军队状况（14%）、民主和人权（11%）、拖欠工资（9%）。

对此，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米·列米佐夫解释到，调查显示的俄罗斯老百姓对民主与人权关注度之低，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并不表明人们不关心公民权利，只是因为这些词汇通常被看作是口号，政治反对派或外国的媒体常常利用它们来大做文章”。他认为，在俄罗斯社会，“人权往往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体制外反对派的政治影响力不足，它们往往抓住这一点不放，把民主看作是开启所有大门的金钥匙，从而失去社会的好感……按照正常思维，民主不是建立发达社会的机制，更像是发达社会的专利，也就是说这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达到一定的发达程度后所具有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应用政治学系副主任列昂尼德·波利亚科夫说，“中产阶层的俄罗斯人关心的不是如何选择自己的政党、在市议会中的代表和州长，他们关心的是家庭的保障、身体健康、子女的前途。可以把这说成是对政治漠不关心，但我不这样看。人们首先应当明白生活中什么最重要”。他认为，人们对俄罗斯的民主尺度感到满意，尽管对民主的关注度

略有提高。波利亚科夫说，令他惊讶的是，激进的反对派政治家认定主要任务是解决俄罗斯没有民主的问题，却不关注人们的实际想法。

据此，米申在《观点》报上指出，结合过去不久的民调表明，俄罗斯人认为强大的经济比民主更重要。有3/4的人更看重有强大的经济（75%），只有19%的人认为民主更重要，有7%的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情况变化不大，2011年有73%的人认为，经济更重要。这10年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数几乎没有变，尽管自2002年以来认为民主更重要的人（11%）有所增长。

（一）近**30**年来俄罗斯曲折的历史与教训

20年前，1991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了6年的国内“民主化”和外交“新思维”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苏联之后的俄罗斯，不仅失去了全球性“超级大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地位，而且被西方大国视为冷战后失败的国家。为迎合西方，叶利钦推行“倒向西方”的政策，不但没有得到回报，反而受到西方大国的轻蔑和进一步挤压。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掌权的9年间，西方阵营抛弃自己的承诺，坚持“北约东扩”、轰炸南斯拉夫、在苏联地区策动“颜色革命”，大大压缩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直到2000年前后，普京掌管俄罗斯，政治上整顿治理，经济上强化国家掌控，逐渐稳定了社会秩序。依靠几年间巨额的石油收入，俄罗斯终于在15年后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犹如对西方世界多年压制的“反弹”，普京不时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中俄罗斯重新树立了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和能源大国的形象。

2008年，连任两届8年期满的普京婉拒“民族领袖”的称号，安排“年轻、正派、有修养”的梅德韦杰夫竞选总统，自己则出任总理和执政党的主席，以保证政局稳定和政策延续。期间，执政党制订了未来20年的、旨在强国富民的“普京计划”，而“梅普搭档”组合正是为了使此计划得以贯彻实施。

然而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重创了俄罗斯，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俄罗斯经济急速下滑。俄罗斯内政外交政策不得不重新面临重大调整，社会又一次走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俄罗斯是谁？”“怎么办？”“俄罗斯向何处去？”近期，俄罗斯社会和政治精英在有关“国家定位和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举棋不定，在“民主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各持己见。

（二）当今俄罗斯内政外交：要自主还是开放，向东还是向西

如今，俄罗斯社会又好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处在一个社会发展的关节点上。普京执政8年，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混乱、失败的15

年”，实现了政局稳定、恢复了秩序、确定了未来的大政方针。然而，突如其来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又一次击倒刚刚站立起来的俄罗斯，一时间新旧问题叠加，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俄罗斯政治高层不得不苦苦思索：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在思想和方向上，是继续像普京时期那样，坚持国家主义或开明的保守主义，强调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秉持欧亚定位，宣扬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还是接受西方的思想理念和价值标准，“切割”苏联这段历史，宣扬个人自由，试图靠近欧洲？

在外交战略上，是强硬地反击西方，敢于说“不”，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和势力范围，敢于挑战美国和与其对抗？还是将外交重点转向西方，避免与美国正面为敌，努力寻求与欧洲的合作？

在政治领域，是强调“主权民主”，继续加强中央权威，重视国家机器的作用，约束反对派，规范媒体？还是要“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结束“政治停滞”，鼓励反对派政党的竞争，给予自由派势力以政治空间，引进欧洲的法制环境，认同西方的政治标准和民主理念？

在经济生活中，是保持俄罗斯作为传统的原材料和能源大国的优势，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战略掌控？还是面向欧洲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标准，突出技术创新和智能经济，争取在核能、纳米等产业或技术上有所突破和领先，进而向“现代化”目标迈进？

（三）未来发展道路选择：要自主性发展，还是期望西式现代化

当今俄罗斯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争论和分歧，部分源于“双头政治”。不能否认，相差13岁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在人生履历、经验、知识禀赋和世界观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这只是主观的、个人方面的因素。实际上，不能不看到，思想差异和道路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矛盾和历史文化传统惯性的两极性张力。在争论和分歧的背后，更有着当今俄罗斯不同政治派别的尖锐争斗和利益集团的激烈较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倾向梅德韦杰夫。这样，俄罗斯可能更倾向西方，更容易接受自由主义和西方价值观，主动与西方交好。奥巴马首次访俄，别有用心地对梅德韦杰夫讲“普京一只脚踩在现在，一只脚还踩在过去冷战时期的苏联”。俄罗斯媒体比喻美俄两位“60后”总统的做派像是“新戈尔巴乔夫”，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1965年出生的梅德韦杰夫步入社会时，正值苏共败亡之际，他曾在高校教授法学，世界观中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和西方情节。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初期，有关“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的言行受到了部分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媒体的欢迎。普京倚重的是政治实权派，掌

握着国家经济大权。两者虽然都提出“现代化”的目标，但在途径、模式及紧迫性上都存在差异。总体来讲，普京希望国强民富的现代化结果，强调国家的权威和作用，希望走一条俄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梅德韦杰夫的目标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设想多停留在“口号”和“想法”上，企图借用一套全新的欧洲式的现代化系统，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然而，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工业化相比，今后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失去了原有的经济空间和产业链，苏联留下的技术潜能和工业老底折腾殆尽。20年来，先后有20多万科技人才流失海外，致使俄罗斯科技教育整体水平下滑。再加上当今俄罗斯司法烦琐、低效，官员腐败盛行，行政障碍重重，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经济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俄罗斯社会陷入了“社会混乱—权力膨胀—行政低效—经济下滑—官员腐败—犯罪猖獗—经营困难—增长乏力”的怪圈。当今俄罗斯丢了苏联时期的好东西，留下了缺点；没学到西方的好东西，拿来了唯利是图等弊端；非东非西，不伦不类。可以断定，未来很长一个时期里，俄罗斯社会难以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治理机制。自由派人士、经济学家亚辛也认为，俄罗斯缺少机制和技术，难以走欧洲现代化的道路；俄罗斯缺乏“细致和勤劳”，也不能照搬中国、日本等亚洲模式。俄罗斯只能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利用能源和原材料优势，参与世界分工。[6]当然，俄罗斯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同的是，俄罗斯还可以保持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国际影响力。

（四）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的俄罗斯

每逢大选的临近，俄罗斯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潮纷纷出炉，各种利益集团在台前幕后的活动更加活跃。除右翼政治势力和俄罗斯共产党之外，“统一俄罗斯党”内部以及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思想差异也值得关注。是举起开明的保守主义大旗，走一条自主的、依靠自身力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是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重复欧洲的成功之路，是摆在俄罗斯执政精英面前的艰难选择。

一方面，2000年以来，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曾经宣称该党的意识形态是“合理的保守主义”。2010年秋天，在梅德韦杰夫提出要西方式自由现代化的口号之后不久，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著名导演尼·米哈尔科夫发表署名文章，声称俄罗斯要遵循“开明保守主义”，号召要尊重俄罗斯历史传统，探索符合俄罗斯特色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执政阶层内部自由思想的涌动也值得关注。金融危机后，普京的政治威望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2月1日，在叶利钦诞辰80周年之际，梅德韦杰夫前往叶利钦的老家乌拉尔地区，出席叶利钦纪念碑

的揭幕仪式。梅德韦杰夫在讲话中宣称，是叶利钦使得改革得以延续，使俄罗斯走出绝境。同日，叶利钦的亲信、原叶利钦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利钦的女婿尤马舍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若叶利钦在世的话，对国家和高加索问题可能比普京要解决得好。尤马舍夫承认，普京执政期间，叶利钦的确有些对普京不满意。与此同时，自由派人物也在为“驱赶普京”摇旗呐喊。2011年2月1日，也就是在叶利钦80诞辰纪念日的当天，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主权民主：名词已死，但模式留存》，认为时至今日，由于普京的存在，俄罗斯建设民主制度架构仍是不可实现的幻想。[7]

1999年前后，普京接手俄罗斯之际，200多名俄罗斯安全和情报部门的专家向普京提交报告，建议俄罗斯借鉴中国重视国家作用的发展经验。梅德韦杰夫几次公开表态，称中国模式不适合俄罗斯，俄罗斯不会照搬中国做法。2010年9月在雅罗斯拉夫尔第二届世界政治论坛上，面对与会者和记者的提问，梅德韦杰夫断言，中国体制不适合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强调，俄罗斯政治改革目标既不是美国模式，更不是类似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俄罗斯不能选择中国的发展道路，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对俄罗斯是行不通的。未来俄罗斯会怎样发展？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政治现代化”和发展民主的目标会一帆风顺吗？

1985年上台后，戈尔巴乔夫打着“民主化、新思维”旗号开始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此后6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革新苏共、给苏联带来“民主和人权”，反而彻底搞垮了苏共和苏联，葬送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成果，输掉了冷战，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民主化”之后，开始了叶利钦9年的“全盘西化、自由化改革”，带来的不是叶利钦许诺的“人民资本主义的幸福天堂”，而是“野蛮资本主义”“犯罪的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俄罗斯社会从此陷入泥潭。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罗伊·麦德韦杰夫称赞普京8年的治国之道，认为普京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梅德韦杰夫曾宣称，俄罗斯应遵循“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公开承认“民主价值的普遍性”，认为西方民主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刚刚开始民主的俄罗斯“要向西方学习”，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都要实现欧洲式的现代化，要向西方主要国家看齐。然而，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俄罗斯能够穿上欧洲模特的多年缝制的华丽外衣吗？应然的目标与实然的现实差距有多大？梅德韦杰夫现代化的目标是否符合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逻辑与顺序？现代化的理想与追求民主的愿望，能够解决俄罗斯迫切的反恐、防止四分五裂的政治任务吗？

2006年普京提出主权民主论以后，西方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批评，认为普京与西方民主世界渐行渐远。美国政要不时指责普京压制国内民主，阻

止“颜色革命”，向其他邻国施压，企图恢复苏联。然而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仍然我行我素，坚持走符合俄罗斯实际的政治道路。随着政权的又一轮回，普京将义无反顾地把既定的政治方针坚决贯彻下去。

2011年11月27日，“统一俄罗斯党”举行代表大会，普京作为“统俄党”候选人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提名获得全票通过。普京欣然接受提名并发表演说，阐释其施政思路，并表示俄罗斯民主还年轻，需要稳定的政治机制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长期稳定发展。普京指出，20年来，俄罗斯不止一次遭受沉重的社会、经济冲击。对于曾经历过历史动荡和变革失败的俄罗斯来说，民主原则是重要的任务，但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是渐进、稳定、连贯的，因此，应以谨慎并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发展。就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普京说：“我们必须冷静并负责任地发展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民主还年轻，[8]我们需要一个不仅能够有效服务于我们今天，还能服务于我们子孙的政治体制。”普京强调，俄罗斯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机制”，以确保俄罗斯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2012年3月，普京顺利地第三次出任俄罗斯总统之职，随即提名梅德韦杰夫转任总理之职。这样，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将在新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保持政治稳定，力求社会团结，打击寡头和激进势力，维护社会稳定，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俄罗斯之路。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议会发表第三次就任总统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普京宣称，俄罗斯应当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并保留自身的特点。他说：“21世纪在全球经济、文明和军事力量的格局重新配置的背景下，俄罗斯应当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主权国家。我们不仅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同时也应当保留自己民族和精神的特点，俄罗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罗斯永远依旧是俄罗斯。”[9]

2013年年底，围绕乌克兰“向东还是向西”，西方与俄罗斯更是不顾一切地打起了一场争夺战。2014年3月，乌克兰形势骤变，普京带领俄罗斯社会同仇敌忾，面对西方的制裁和打压，普京义无反顾，坚决果敢，维护俄罗斯利益，全力反击西方的制裁。之后在俄罗斯国内，普京多次指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未雨绸缪，完善立法，强化对自由反对派和互联网基金势力的监管，进一步压缩政治反对派的声音和生存空间。这几年，在普京的强权治理下，西方政界几乎丧失了对“西化、民主化”俄罗斯的信心。2014年6月，北约会议已经将俄罗斯视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鉴于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方面将俄罗斯视为“政治异类”，掀起“新冷战”，另一方面加紧外交围剿和军事准备，准备与俄罗斯对抗。

面对新的境内外政治形势，面对制度性的缺欠和社会中显见或隐含的各种危险，俄罗斯将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现代化，依靠谁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对上述问题，至

今俄罗斯当局和精英层仍在苦苦探索。俄罗斯又一次步入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民主与经济发展、自由与现代化，稳定与廉洁、效率与民主，谁是因？谁是果？谁是条件？谁是结果？经历了十多年的磨难，看来普京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2013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普京选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排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前。2014年，由于普京果断应对乌克兰危机，敢于与西方较量，顺利收回了克里米亚，普京在俄罗斯社会的支持率也达到历史高峰。但是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局势和西方世界的围追堵截，俄罗斯能够顺利地走上普京画出的政治坦途吗？

---

[1]http://www.riocenter.ru/ru/events/index.php?id4＝226.

[2]ДмитрийМедведев:Россия，вперёд!10сентября2009года，http://www.kremlin.ru/news/5413.

[3]http://www.rian.ru/politics/20101124/300458422.html.

[4]http://www.rian.ru/analytics/20101124/300470907.html.

[5]http://www.vedomosti.ru/newspaper/article/253776/politicheskaya_konkurenciya_neobhodima_dmitrij_medvedev#ixzz1CE5lAIee.

[6]2020年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新模式[R/OL].http://ru.Exrus.eu/.id4fa38f016ccc1929-170001d1.

[7]НиколайГульбинский“Сувереннаядемократия”:терминумер，модельосталась.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от01.02.2011，http://www.ng.ru/ng_politics/2011-02-01/9_democracy.html.

[8]意为“稚嫩、不成熟之意”——作者注。

[9]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2-12/12/content_16011140.htm.

第十五章　政治大国之梦

早在2013年年初，就曾有德国媒体指出，2013年世界历史将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将首次降至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为此德国舆论充满忧伤地哀叹，“西方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随着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西方世界光彩不再。斯诺登事件、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以及最近的美国政府“停摆”等，这些都表明，昔日在世界上风光一时、一呼百应的美国，此时却缺少了克服政策堵塞与执政困境的政治底气。美国这个自诩为上帝宠爱的“山巅之城”，不得不脱下了“皇帝的新装”。世人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已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13年世界政治的赛场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疑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不同于戈尔巴乔夫的软弱妥协与叶利钦的鲁莽暴躁，普京秉承着“稳、准、狠”的一贯作风，在决策效率和领导能力上显然更胜一筹。“普京道路”也正成为新时期俄罗斯立足于世界舞台最大的“政治品牌”。然而，当今世界格局仍由西方主导，复兴之路面临诸多难题的俄罗斯能否再度实现政治上的大国梦，这不仅取决于“普京道路”的政治道义与核心价值能否真正转化为促进俄罗斯内部团结与社会政治整合的动力，而且取决于“普京道路”特有的政治发展力与竞争力能否带领俄罗斯顺利通过新时期的重重考验。

一、转型陷阱与政治衰退

二十多年前，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与“新思维”使苏共失去了“灵魂”，最终导致了苏联在西方阵营的攻势面前败下阵来。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不仅失去了全球性“超级大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地位，而且被西方大国视为冷战失败的国家，沦落到“被排挤、被边缘化的境地”。

此后，为了迎合西方，叶利钦政权一度推行彻底“倒向西方”的政策。这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受到了西方大国的蔑视和进一步挤压。在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掌权的9年间，西方阵营抛弃自己的承诺、坚持“北约东扩”、轰炸南斯拉夫、在苏联地区策动“颜色革命”，大大压缩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

事实上，与外交失势、经济大幅度衰退相比，更可怕的是持续的政治衰败。在“忧郁的、黑暗的、野蛮的、强盗的、彪悍的、狂妄的与肆无忌惮”的叶利钦时期，试穿“西式民主”的外衣换来的只是徒有其表的民主假象。一方面，三权分立名不副实，政党制度极端混乱，选举制度弊端丛生，司法系统尚待重建；另一方面，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财团政治、寡头

政治盛行，家族、帮派“暗箱”操作屡见不鲜，行政效率低下、调控不力、令不行禁不止。上述政治乱象充分说明，俄罗斯的政治转轨并不成功，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西方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叶利钦对西方的一味迎合与妥协，换来的反而是西方的继续打压。政治“休克疗法”没有导致政治发展，反而造成严重的政治衰退。

十多年前，世纪之交，普京接过了叶利钦手中的权棒，也继承了俄罗斯沉重的政治遗产。在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混乱的、失败的”15年之后，正如普京所言：“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经过8年、两个总统任期的拨乱反正和励精图治，普京由一个勇猛果敢的政治“救火队员”，逐渐成长为政治的中坚和全民的领袖。

普京通过铁腕式的治理整顿，实现了俄罗斯社会的政治稳定，又通过提出“主权民主”，回击了西方的政治打压。如今，经过了梅德韦杰夫“短暂的过门儿”，普京重新唱响振兴俄罗斯的大戏，以全俄“民族领袖”的政治抱负，希望名垂青史。普京多次表示，他要效仿“二战”前后连任4届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争取20年的稳定发展期，富国强兵，最终将俄罗斯打造成世界一流强国。

当然，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内外环境并不太平，掣肘因素很多，面临一些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此外，振兴俄罗斯仅靠宏大的计划和美好的目标是不够的，齐心合力的团队和精干向上的官员干部队伍是普京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否则俄罗斯的振兴无疑将是普京一个人的独舞。

二、反思照搬西式民主

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以来的近30年间，俄罗斯分别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执政的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政要和舆论普遍认为，戈尔巴乔夫的6年是最民主自由的时期，叶利钦的9年是与西方关系最为接近的时期，而普京执政的时期则背离了民主，与西方世界渐行渐远。近些年，在西方政要和主流媒体眼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成了“民主之敌”，西方媒体对普京本人竭力妖魔化，将其描述为西方世界的“公敌”，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

然而，俄罗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却不这么认为。2017年2月14日，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2月14日报道，俄罗斯舆情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公布了一项民调结果。调查的问题是：“最近100年来，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国家管理体制，您认为，哪个时期俄罗斯的生活最

好？”

结果显示，俄罗斯人选择现阶段即普京执政时期的公民最多（占32%）；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支持者略微少一些（占29%）；认为1917年革命前和斯大林执政时期生活最好的公民均为6%；选择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叶利钦时代的公民分别仅占2%和1%。

俄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所专家理事会成员阿列克谢·祖金指出：“这是自苏联解体后，公民首次认为当下好于过去。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一转折非常重要。尤其是人们对当前生活质量给出正面评价时，经济其实没有处在最佳状态。相关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表明，当前俄公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均出现明显下滑。”

2017年2月14日，美国作家莉萨·迪基在美国沃克斯网站刊登文章称，数周来，特朗普总统不懈地赞扬普京，令世界各国领导人感到不安。他时常称赞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聪明机智、强大坚定且深得民心。2015年迪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普京在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支持率。他写到，在俄罗斯的三个月期间，他目睹了普京拥有的巨大的公众支持。迪基得到的印象是：很多普通俄罗斯人坚信普京已经让俄罗斯变得再次伟大。他们因此爱戴他。虽然西方观察家批评普京的人权记录、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希望颠覆地缘政治秩序，然而这些问题丝毫无损普京在国内的公众支持度。迪基分别于1995年、2005年和2015年三次前往俄罗斯。每次他都去了同样的11座城市，采访了同一批俄罗斯人。

回顾历史，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新思维”式的改革不仅未能解决既有的社会弊病，反而使苏联在短短数年间就陷入全面的社会动荡与发展停滞，并最终导致整个国家走上了解体的厄运。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失败，换来的是叶利钦时期野蛮资本主义和“鲍利斯沙皇”的独裁。叶利钦近十年的“民主化”试验的结果表明，改革最终的受益方只是极少数的财阀、寡头，而绝大多数百姓只能是被愚弄和抛弃。

俄政治学家认为，俄罗斯人更加尊重普京的执政经验，这与普京有能力保持俄罗斯的稳定局势有关。当今多数俄罗斯政界和知识界代表人士认为，1985—1999年这15年是俄罗斯灾难性的15年，是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的15年。他们认为，在这些方面，西方的所谓的“战略谋士”罪责难逃。20世纪末期，西方战略家在有意识地向苏联等其他国家输出“软弱的自由民主思潮”的同时，却为自己保留了极端保守和富有进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而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落入了西方的圈套，盲目进口西方的“民主价值”，从而导致“民主”与“自由”的泛滥和国家的解体。例如，普京的亲信批评西方某些国家在民主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认为这种以利益或关系亲疏来划分所谓“民主阵营”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在当今世界，“民主”这个词具

有双重标准：对美国人有利的一切都是“民主”，对美国人不利的一切都是“独裁”。

曾经梦想一步迈入西方式民主天堂的俄罗斯，在短暂的“自由民主之梦”后蓦然惊醒。曾经长期作为西式民主“小学生”的俄罗斯，在付出了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等沉重“学费”之后，并没有实现对大多数人的民主，结果只是“财阀当政和寡头式的自由”：个人专权、寡头政治、犯罪猖獗、黑手党为非作歹、腐败贪污盛行。因此，普京当政后，俄罗斯当局痛定思痛、改弦易辙，力图探求一条符合俄罗斯实际的“普京之路”。

三、俄罗斯向何处去

俄语中，“普京”这一姓氏，与“道路”一词有着同样的词根。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决定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俄罗斯发展道路”。执政初期，普京在政治上整顿治理，经济上强化国家掌控，逐渐稳定了社会秩序。依靠几年间巨额的石油收入，俄罗斯终于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混乱与失败”的15年后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犹如对西方世界多年压制的“反弹”，普京敢于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中重新树立了俄罗斯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和能源大国的形象。

普京的治国理念首先体现在其对俄罗斯新时期发展阶段的判断之上。他认为，“你死我活”的革命性阶段已经过去，俄罗斯应当转入日常的建设时期，“强国富民”是根本任务。对于执政的目标和任务，普京明确提出要维护国家主权统一，解决社会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俄罗斯的目标是，保住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找到俄罗斯自己建设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和国家的道路。

其次，普京从国家民族的层面出发，高度强调政治稳定与“新俄罗斯思想”对于国家复兴的重要性。普京提出，俄罗斯社会“绝大多数人反对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希望维持来之不易的政治稳定。因此，俄罗斯的政治大方向是：“政权要稳定、正常运转和有效”。此外，普京还认为，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建设成就的，应当寻找能够凝聚全社会的“俄罗斯思想”。普京主张，俄罗斯思想应当包含以下核心价值内容：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理念、社会团结。与自由主义思潮不同，普京推崇国家的作用，认为强有力的国家是“秩序的源泉和保障，是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普京号召，俄罗斯人应发扬互助精神，保持稳定和社会和谐，防止重新陷入“政治内讧”。由此，普京的价值观可大致概括为“爱国主义是旗帜，强国意识是核心和支柱，国家主义是手段和动力，社会团结和稳定是基石”。

四、政治领袖与政治大国

2012年3月，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面对外界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的指责，俄罗斯用她的民意有力地进行了回应。为什么俄罗斯人需要普京？俄罗斯有着自己的回答：俄罗斯人需要普京，因为他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梦想和自豪感，并使国人振奋精神，重新燃起对大国地位的强烈渴望。

俄罗斯人不会忘记，正是普京结束了叶利钦时代的内政混乱、经济衰退及国际地位的下降，开辟了“普京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粉碎了车臣非法武装，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俄罗斯人不会忘记叶利钦“迷失的时代”以及西方所给予的惨痛教训。

普京面对西方国家显得更加强硬，风格果敢，带有一种不可动摇的自信和淡定，这些都让俄罗斯人钦佩不已。俄罗斯人知道，普京之所以敢强硬地同西方国家抗衡，是因为他内心充满重塑国家大国地位，重返先进国家之列的决心。俄罗斯人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位有才华的领袖以及永不熄灭的造福人类的渴望。他们希望享有尊严和荣耀，他们拒绝平淡、毫无色彩的生活。普京就像一面镜子，他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内心的渴望，因此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俄罗斯人需要普京。他之所以能征服俄罗斯人的心，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无私无畏，他敢于代表人民利益。在普京当总统期间，俄罗斯收获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增强以及人民的富裕。普京还打击了靠国家大发横财的寡头，平息了民愤。

西方指责普京推行“可控民主”，但在俄罗斯人看来，普京象征着稳定、发展和秩序。他们认为，没有“秩序”就谈不上“稳定的民主社会”和“繁荣的市场经济”。民主社会离不开国家实力，民主是一种建设性力量，不应该与国家精神背道而驰。俄罗斯人相信，在普京的领导下，拥有健康民族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的俄罗斯将稳定发展，并向世界展示奇迹。

2013年，特别是在俄罗斯高超地处理斯诺登过境与逗留事件和叙利亚问题之后，普京高超的外交手腕和卓越的外交表现力大大增强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冲击了西方世界的道德神坛与话语权，提高了俄罗斯在国际上尤其是在非西方世界中的威望。在当今的国际赛场上，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队可能综合实力已大不如苏联，但她的总领队兼主教练——普京却魅力超群，凭借出神入化的指挥，敏锐而机智地找准对手的软肋和破绽，勇敢地搏击，提高了俄罗斯在国际上的政治竞争力和影响力，为俄罗斯加分，赢得国际上的喝彩！

五、道路之争关乎国家存亡

2016年见证了一个个西方政治领导人黯然下台，普京则成了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1985年至今的三十多年间，俄罗斯先后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掌权的三个历史阶段。多年来俄罗斯主流社会普遍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掌权的15年是“混乱、失败的15年”，普京在随后这15年中则始终保持了较高支持率。不过，西方主流舆论的看法与此截然相反，它们批评普京“独裁”“强权”“蛮横”，把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比作冰天雪地里凶猛而可怕的北极熊。

（一）政治道路之争是场生死较量

路线关乎命运，道路关乎存亡。近年来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与西方围绕政治道路和民主问题而发生的激烈斗争，突出反映了国际政治领域思想和政治较量的险恶程度。

普京陷入西方大国政治围攻和舆论围剿并非源自个人恩怨，这乃是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折射和写照。历史上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充满曲折和纠葛，现如今西方世界囿于结构性矛盾和地缘利益又将俄罗斯视为最大的对手甚至敌人。回顾历史，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新思维”式的改革不仅未能解决既有社会弊病，反使苏联在短短6年内陷入全面社会动荡与民族危机，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继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试验失败后，俄罗斯赢来叶利钦时期原始而野蛮的资本主义以及“私人财阀和寡头政治”。其9年多的“经济私有化和外交西方化”试验结果表明，改革最终的受益方只是极少数财阀、寡头，绝大多数百姓只能是被愚弄和抛弃。

普京当政后的俄罗斯当局痛定思痛、改弦易辙。2003年以后，普京坚决打击分裂势力，削弱寡头影响，整顿经济秩序，掌控大众传媒，改组权力结构，积聚社会资源，强化中央权威，力图走一条俄罗斯式的政治发展道路。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显然不喜欢俄罗斯的特立独行甚至离经叛道，它们既害怕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又不满俄罗斯“脱离西式自由民主模式”。因此，西方政要和媒体多年来对普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而批评和丑化普京的目的，显然在于妖魔化和瓦解俄罗斯。西方更愿意看到一个衰弱、破碎的俄罗斯，他们极不希望俄罗斯重新崛起。

（二）俄罗斯不再充当西方世界的政治小学生

面对西方的政治压力和频频发起的“民主攻势”，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不甘示弱，一方面在外交场合积极对话，另一方面内部采取措施、主动应对西方民主“教师爷”的攻击。俄罗斯专家认为，30年来俄罗斯之所以不断遭遇灾

难和打击，西方所谓的战略谋士以及民主化和市场化“教师爷”们难辞其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战略家一方面有意识地向原苏联等国家输出“软弱的自由民主思潮”，另一方面却为自己保留了极端排外和富有进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

在当今世界，“民主”这个词具有双重标准：对美国人有利的一切都是“民主”，对美国人不利的一切都是“独裁”。痛定思痛的俄罗斯不再充当西方世界的小学生，开始批评西方大国在民主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俄罗斯政治精英们终于意识到，即使俄罗斯继续对西方笑脸相迎、妥协退让，西方大国也不会让俄罗斯再一次站起来，而是希望俄罗斯永远匍匐在西方脚下，进一步衰弱下去，瓦解成更小的碎片。

曾梦想一步迈入西方式民主天堂的俄罗斯，在短暂的“自由民主之梦”后蓦然惊醒。在付出了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等沉重“学费”后，俄罗斯并未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得到的却是“财阀当政和寡头式的自由”。对此，普京曾痛苦地回忆到，苏联解体后90年代初期，西方大国认为俄罗斯也很快将不复存在。西方阵营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根本配不上西方的平等相待和尊重。

（三）突破西方围剿、塑造政治大国形象

不畏西方霸权，勇敢维护俄罗斯主权、安全和利益是普京政治的最大亮点，而这也是西方世界围剿普京的国际政治根源。这些年来，面对西方大国绕开联合国、践踏国际法、肆意武装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善于依据国际准则，巧妙出击，勇敢回击，有效地维护了自身利益和国际公理。

比如，继“阿拉伯之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谋求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2013年9月12日，普京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俄罗斯恳请谨慎》一文，警告军事打击叙利亚只会带来混乱和伤亡，指出很多国家已不把美国视为民主典范，而是视为只懂得耍蛮动粗的国家，并批评了美国的“例外主义”。普京巧妙地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发声，加倍放大了俄罗斯的声音和外交议程设置的能力，起到了“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就连美英媒体也不得不承认，围绕叙利亚等问题，近两年俄罗斯在国际舆论中抢得了道德制高点。

经过十多年磨炼，普京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柔道高手”，他以鲜明性格和独特领导风格征服了俄罗斯，也常常成为世界舆论的聚焦点。无论是处理斯诺登事件，还是出兵解决叙利亚危机，普京高超的外交手腕大大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有力地冲击了西方阵营的道德神坛与话语权，提

高了俄罗斯国际上尤其是在非西方世界中的威望。

过去和现在，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一些人总在声称，俄罗斯在政治和国际影响力上已经沦为“二流国家”，在经济上更是无足轻重。但普京领导着俄罗斯以突破西方重重围剿的方式，努力塑造着自身政治大国形象，彰显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
张树华　著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字 数：312千字

纸书书号：978-7-5086-8683-7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书院
中信书院：App下载地址https://book.yunpub.cn/（中信官方数字阅读平台）
微信号：中信书院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
|
1999



民族的重建

波兰 / 乌克兰 / 立陶宛 / 白俄罗斯

1569—1999

[美] 蒂莫西·斯奈德 —— 著
Timothy Snyder
潘梦琦 —— 译



美国历史学会 乔治·路易斯·比尔奖 —— 获奖作品

知名政治思想史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
《国际历史学评论》《外交事务》《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 赞誉推荐

南京大学出版社

目录

名字与来源

地名表

缩写

档案

导论

第一部分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祖国之争

第1章 立陶宛大公国（1569—1863）

第2章 立陶宛！我的祖国！（1863—1914）

第3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维日诺之间（1914—1939）

第4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维尔纽斯之间（1939—1945）

第5章 尾声：苏维埃立陶宛的维尔纽斯（1945—1991）

第二部分 危机四伏的乌克兰边境

第6章 近代早期的乌克兰（1569—1914）

第7章 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边缘（1914—1939）

第8章 乌克兰西部的种族清洗（1939—1945）

第9章 波兰东南部的种族清洗（1945—1947）

第10章 尾声：共产主义和被清除的记忆（1947—1981）

第三部分 重建波兰祖国

第11章 爱国的反对派和国家利益（1945—1989）

第12章 标准的民族国家（1989—1991）

第13章 欧洲标准和波兰利益（1992—1993）
第14章 尾声：回到欧洲

致谢

致玛丽安娜·布朗·斯奈德和盖伊·伊斯泰尔·斯奈德
纪念露西尔·费雪·哈德利和赫伯特·米勒·哈德利

名字与来源

本书的主题是关于民族理念的转变、种族清洗的原因以及民族和解的条件。其中一个主题是领土争端，那些有争议的地方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群来说有不同的名字。另一个主题是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区别，当我们留心名字时，这种区别就会显现。根据争议民族在相关时刻的用法，本书的主体部分会指出华沙和莫斯科之间的城市名字。这将使时代错误被最小化，让人们想起语言对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并强调对城市的支配永远不是最终的。地名表提供了用八种语言写作的地名。

国家的名字也需要特别注意。在本书中，中世纪公国基辅罗斯（Kyivan Rus'）修饰语为“罗斯的”（Rusian）。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内部的东斯拉夫文化被称为“鲁塞尼亚的”（Ruthenian）。“俄罗斯的”（Russian）这个形容词特指俄罗斯帝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的”（Ukrainian）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阶段是一个地理术语，在现代语境下是一个政治术语。“白俄罗斯”（Belarus）标志着一种倾向地方传统的定位；“白俄罗斯亚”[1]（Belorussia）表示一种与俄罗斯完整关联的信念。“立陶宛的”（Lithuanian）和“波兰的”（Polish）指在某段时期对应的政体或文化。自始至终，本书都会用“加利西亚”（Galicia）和“沃里尼亚”（Volhynia）这两个从拉丁语延伸出的英语术语来指称这两片历史上的土地。

本书引用了档案材料，文件集，议会记录，部长备忘录，不同国家和时期的地方、全国以及少数民族报纸，日记，回忆录和通信，学术著作，其他付印及未付印的资料来源，对公务员、议会议员、部长和国家首脑的采访。不同档案在引用时缩写为四个字母，文件集在引用时加注简短标题：这些可以在本书最后找到。首次引用的书本及文章会标注完整，之后引用时会加注作者姓氏和简短标题。其他引用资料会标注完整。即便因为音译而出现不一致，作者的姓名依旧以它们出现在所引著作中的姓名拼写为准。在处理翻译文字时，用一种字母表拼写的文字，要在另一种字母表中具有易读性，音译是不可避免的做法。与英语、法语和德语一样，波兰语、立陶宛语和捷克语使用的是罗马字母的不同正字法（orthography）。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和俄语使用的是西里尔字母的不同正字法。和翻译一样，音译充满了难处理的问题，挑剔的读者要明白，所有解决方法都是不完美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姓氏，本书中的西里尔字母使用简易版美国国会图书馆体系（Library of Congress system）进行翻译。除了立陶宛语之外，所有翻译均由我个人完成。

---

[1] 该译名及书中部分地名仅为区分对应原文词汇所使用，翻译时以尽量接近原文读音为准。——编者注

地名表

汉语	乌克兰语	波兰语	白俄罗斯语	俄语	意第绪语	德语	立陶宛语	英语
维尔纽斯	Vil’nius	Wilno	Vil’nia	Vil’nius	Vilne	Wilna	Vilnius	Vilnius
利沃夫	L’viv	Lwów	L’vou	L’vov	Lemberik	Lemberg	Lvovas	Lviv
基辅	Kyiv	Kijów	Kieu	Kiev	Kiv	Kiew	Kijevas	Kyiv
明斯克	Mins’k	Mi sk	Minsk	Minsk	Minsk	Minsk	Minskas	Minsk
加利西亚	Halychyna	Galicja	Halitsiia	Galitsiia	Galitsye	Galizien	Galicija	Galicia
沃里尼亚	Volyn’	Woły	Valyn	Volyn’	Volin	Wolynien	Volyne	Volhynia
波兰	Pol’shcha	Polska	Polshcha	Pol’sha	Poyln	Polen	Lenkija	Poland
立陶宛	Lytva	Litwa	Letuva	Litva	Lite	Litauen	Lietuva	Lithuania
白俄罗斯	Bilorus’	Białoru	Belarus’	Belorussia	Vaysrusland	Weissrussland	Baltarusija	Belarus
乌克兰	Ukraina	Ukraina	Ukraina	Ukraina	Ukraine	Ukraine	Ukraina	Ukraine
俄罗斯	Rosiia	Rosja	Ras’eia	Rossiia	Rusland	Russland	Rusja	Russia

波兰语中的“w”在英语中的发音是“vain”中的“v”；波兰语中的“ó”在英语中的发音是“true”中的“u”；波兰语中的“j”在英语中的发音是“yoke”中的“y”；波兰语中的“ń”在英语中的发音是“onion”中的第一个“n”；波兰语中的“ł”在英语中的发音是“wonder”中的“w”。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中的地名通常用西里尔字母拼写，意第绪语中的地名通常用希伯来字母拼写。
表格引自原书，在翻译时添加“汉语”一列。——编者注

缩写

AK Armia Krajowa 波兰救国军

EU European Union 欧盟

OUN Orhanizatsiia Ukrains’kykh Natsionalistiv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SSR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NKVD Narodnyi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 内务人民委员部

UNDO Ukrains’ke Natsional’ne Demokratychne Ob’iednannia 乌克兰民族-民主联盟

UPA Ukrains’ka Povstans’ka Armiia 乌克兰起义军

YIVO Yidisher Visnshaftlekher Institut 犹太研究学会意第绪科学院

档案

AMPN Archiwum Muzeum Polskiego, Dział Narodowościowy

波兰博物馆民族部档案（伦敦）

AWKW Archiwum Wschodnie, Ośrodek Karta, Wspomnienia

卡塔中心东部档案：传记（华沙）

BUWR Biblioteka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 Dział Rękopisów

华沙大学图书馆手稿部（华沙）

CAWR Centralne Archiwum Wojskowe

中央军事档案馆（华沙，伦贝尔图弗）

GARF Gosudarstvennyi Arkhiv Rossiiskoi Federatsii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莫斯科）

LCVA Lietuvos Centrinis Valstybes Archyvas

立陶宛国家中央档案馆（维尔纽斯）

SPPL Studium Polskiej Podziemnej

波兰地下档案（伦敦）

VUBR Vilniaus Universiteto Biblioteka, Rankraščiu Skyrius Vilnius

大学图书馆手稿部（维尔纽斯）

导论

民族是何时产生的？是什么导致了种族清洗？国家间如何达成和解？

本书追溯了现代独立国家历史中的一段时期，起始于近代早期欧洲历史中最庞大的共同体——16世纪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建立之时。当时，王国内的民族构成是其贵族，既有天主教徒，也有东正教徒和新教徒。波兰、立陶宛和东斯拉夫的贵族由共同的政治和公民权利所联合，他们用拉丁语或波兰语描述自己是“来自波兰民族的”。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在万事万物的自然秩序中，国家、演说、文学和宗教礼拜仪式的语言本就不同。18世纪，在王国遭到后来崛起的帝国瓜分后，一些爱国者将民族（nation）重新解释为国民（people），而民族性（nationality）则由人们所说的语言决定。在20世纪末，也就是本书追溯的历史的尾声，原来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核心地区已经分裂为四个以民族命名的现代国家：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自那时起，有关民族性概念的盛行观点认为，说不同语言的人群应以国界线作为边界，而演说、政治和宗教礼拜时应该使用同一种语言。那么，早期的一种民族观念是如何演变为四种现代民族观念的？

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这块土地上涌现的民族观念分为三个时期，即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王国时期（1569—1795）、19世纪帝国瓜分时期（1795—1918）以及独立国家和随之取代它们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1918—1939）。我们会发现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在瓜分后依然幸存，并在帝国统治时期逐渐繁盛，而它的瓦解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连现代民族观念都是在与近代早期民族观念的激烈竞争中逐渐显现的，以此和更遥远的帝国统治背景形成了对比。而传统爱国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之间胶着的竞争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政权形态中依然存在。1918年之后，尽管国家本身已经强制做出选择，不再考虑其他选项，但是当时刚刚出现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特许观念并未占得支配性地位。直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织暴力，这层历史外壳才被最终打破，而关于近代早期民族性的各种观念只有依赖这层历史外壳才能协调一致。驱逐、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彻底破坏了历史区域，洗劫了多文化并存的城市，为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扫除障碍。大屠杀和精英置换将历史传统连根拔起。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本书将聚焦于战时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经历，探寻他们之间相互实施种族清洗的原因。在苏维埃和纳粹的四年占领之后，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又对彼此进行了四年的种族清洗，造成的后果是超过10万人死亡，140万人被迫定居别处。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是民族主义导致了种族清洗，还是种族清洗给不同人群贴上了民族标签？

单一民族国家能够挨过这段历史吗？被粗暴地表现为种族清洗的现代民族观念的要求，能否找到一种更加和平的表达方式？以上都是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间，人们陆续提出的问题。在1989年革命发生后，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们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冲突的原因：帝国瓦解、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国界线、挑衅的少数族群、扬言复仇者、恐惧的精英人群、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种族清洗的记忆以及长期冲突的民族迷思。意识到现代民族性存在的波兰东部政策，从一开始就促成了一种稳定的地缘政治秩序。苏联的解体是被预料到的，被加速了，最终转向了和平的目的，而证明波兰的成功的最简单证据就是西方对这片地区曾发生的历史敌对和战时种族清洗一无所知，而这些正是本书所要描述的。在90年代爆发武装冲突的国家，比如前南斯拉夫，人们对那里先前的战争和可能存在的古老仇恨所知一二。而在和平与繁荣盛行之地，比如波兰，"重返欧洲"的历史叙述重回人们的视野。波兰的东方政策的成功，另一个证据正是波兰被整合进了西方。1999年，人们惊讶地看到所谓新欧洲的失败与成功同时出现：北约接纳了波兰，同时北约轰炸了南斯拉夫。正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塞族人和他们的邻居之间的冲突时，一支波兰-乌克兰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为何欧洲东北地区能够团结一致，而欧洲东南地区却分崩离析？

时间

现代民族何时产生，种族清洗为何发生，民族国家如何和平共处——这三个问题与本书研究的时间顺序正好一致，即1569—1999年。1569年标志着近代早期波兰民族的诞生。是年，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通过成立卢布林联合（Lublin Union）建立了波兰-立陶宛王国。从那以后，立陶宛和波兰贵族共同加入一个议会，共同选出统治者，并逐渐共享一种共同的文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依然保持独立的法律条文和行政机构，并且保持内部分界线。卢布林联合针对国界线的修改对波兰更为有利，它将立陶宛东南地区的斯拉夫人的土地划给了波兰。这分裂了东斯拉夫的贵族和人民，在今天我们熟知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划定了新的边界。尽管卢布林联合提倡一种宗教包容精神，它却与雄心勃勃的宗教改革保持一致。东斯拉夫贵族从东方基督教向西方基督教的转变，在现在我们称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上造成了贵族和平民之间一种新的区别。因此，在贵族组成的波兰民族保持统一的同时，其他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新的分裂。之后1648年在乌克兰发生的叛乱，大致描绘出波兰、乌克兰甚至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历史。

1569年是一个特别的历史起点。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民族历史通常从中世纪开始，据称如今这些民族国家历史都可追根溯源到那时。为了识别出这种变化，最好的办法是承认在近代早期领土广袤

的王国内明显存在单一的近代早期民族，然后再思考它给现代政治留下的影响。这个近代早期民族被称作“波兰人”，但是这个词语象征的是一种公民权利和文明，而不是语言或种族。从1569年这个时间点作为起始，能够使我们看到近代早期波兰民族内在的一致性和吸引力，并且使我们摆脱我们对民族性概念的现代假定。既然这是一份关于民族性而非国家的研究，它的年代划分也是非传统的。19世纪是波兰文明的“美好时代”，尽管王国已经在1795年分裂。本书没有像浪漫主义传统、民族传统和历史编纂传统所倾向采取的那样，将1795年视为近代早期政治的终点，而是选择了1863年这个年份。在1863年，波兰贵族最后一次反抗俄罗斯人的统治；而在1863年之后，俄罗斯帝国开始动摇波兰在西部领地的文化和经济支配优势。在反抗起义后，波兰精英中重要的一部分人开始反对传统上对政体和民族的定义，一些帝国行政官和底层活动家加入了他们，这些人认为民族是以宗教和语言所决定的。直到1863年之后，我们才发现近代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对近代早期政治遗产的敌视，以及有关白俄罗斯概念的苗头。而在被奥地利掠夺的、面积很小的旧王国土地上，并不存在如此分裂。如此，我们应将注意力放在1876年，那一年乌克兰出版物被俄罗斯帝国封禁，乌克兰的理念在奥地利开始成型，而在当时的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Austrian Galicia），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敌对关系开始显现。

我们应当明白，在现代民族的崛起过程中，历史的影响非常重要——但不是以现代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那种形式。我们所遭遇的每一种现代民族主义都忽略了近代早期的传统，反而支持想象中的中世纪历史延续。我们也应发现，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尽管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民族兴衰的基本事实。现代社会的特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民主政体、不断精进的宣传技巧、大众媒体、公立教育、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在这份研究中均有所涉猎。民族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同时迷信于所谓集权化的国家：前者将国家投射到过去；后者适当地强调了国家的新奇性和潜力，但有时也夸大了建国者取得的成就。国家，和民族一样，也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当人们认为国家的权力是合法的，它就是合法的。而本研究表明，现代集权国家的建立，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复杂结果。国家被建立、被摧毁、被摧毁的方式往往会决定下一代的民族观念。当国家被建立时，它的形式经常是含糊不清的，比如：早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政策时有改变，每当民族复兴浪潮涌来，知识阶层就暴露在大规模清洗的危险中；内战中的波兰因对民族的定义不同而分裂，雄心勃勃的波兰人既不能消除分歧，也无法建立起联邦结构；战后波兰的国家合法性源自种族同质性，却由共产主义者统治这个国家。在处理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历史时，本书将重点关注建立国家的经验如何塑造或阻碍民族观念的诞生。

在20世纪中叶，作为集权化国家的一种类型，纳粹德国和苏联分别占领了本书所涉及的所有领土。这两个国家输出的统治系统对那些处于它们治下

的人民满怀敌意，且与当地政治传统格格不入。在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国家如何被建立和被破坏时，本书更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民族人民的命运。“二战”摧毁了近代早期的民族性残余，使现代民族主义传播甚广。尽管1918年和1945年都是历史进程的停顿点，但后者更为重要。1863年后，现代民族理念将“大众”（mass population）这一因素纳入其中；1945年后，大众开始接受现代民族理念。因此出于相同的理由，本书的研究终止于1999年，而非1989年。尽管波兰在1989年后重获国家主权，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也在1991年获得独立，但是波兰在1999年加入北约才真正宣告了这一民族历史进程阶段的终结。成为北约成员不仅意味着对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波兰所取得的成功的认可，这也是对波兰成功解决敏感民族问题的奖赏。支持处于本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同时，波兰成功将自己划入西方阵营。1569年标志着近代早期的波兰向东扩展的雄心，这一扩展的脚步止于20世纪40年代；而1999年标注着新生的波兰维护西方阵营的安全和政治认同的决心。

领土

本书没有将重点放在20世纪民族国家领土边界或19世纪帝国边疆上，而是关注1569年波兰-立陶宛王国成立后划分的领土区域。第一部分的重点是城市维尔纽斯（Vilnius）。维尔纽斯是当时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它曾是俄罗斯帝国维尔纽斯省首府、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时的波兰城市以及“二战”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城市。今天，维尔纽斯是独立后的立陶宛的首都。在希特勒实行“最终解决方案”[1]之前，犹太人称维尔纽斯是“北方的耶路撒冷”，不久前波兰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还有立陶宛人曾接连对这座城市宣称主权。如果放在近代早期的政治民族框架中来看，维尔纽斯属于立陶宛，因为它一开始就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但如果放在现代政治民族框架中来看，维尔纽斯在“二战”前根本不属于立陶宛：其居民几乎没有立陶宛人，而且它属于波兰版图内。至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维尔纽斯如何在现代民族观念、人口和文化变迁过程中变成一座立陶宛城市。

第二部分将关注东部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Volhynia）地区。大量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居住在这些东部斯拉夫领土上，这里也是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中心地区，在王国衰亡后这里依然是帝国腹地。在18世纪晚期，沃里尼亚被划给了俄国，而加利西亚被划给了奥匈帝国。根据立陶宛的历史记载，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在整个19世纪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19世纪末，波兰大地主们或是让位于沃里尼亚的俄国竞争对手，或是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政党达成妥协。在俄国和奥匈帝国，波兰民族主义者通过贬低波兰的民族性，帮助乌克兰人达成了他们的事业。事实上，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达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他们塑造了一种以波兰语为载体的文

明。通过在人群中重新识别出民族，波兰民族主义者将波兰人重新定义为一个独特的种族群体，并且在未受教育的农民中产生影响力。“一战”以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都被整合进一个新的波兰国家中。尽管在两次大战间，波兰针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显得优柔寡断，但是20世纪早期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与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非常相似。“二战”彻底破坏了这两个区域的历史一致性，现代民族主义在这里生根发芽。1945年，这两个区域被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1991年起这里是乌克兰独立呼声最高、最爱国的地区，今天这里被人们称为“西乌克兰”（western Ukraine）。

着重关注维尔纽斯（考察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以及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考察波兰和乌克兰）是基于所谓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理论以区分这些地方的历史变迁。如果我们把目光锁定在这四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经济和社会变化，发现军队的前进和后退，以及观察20世纪的种族灭绝、驱逐和流亡。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如果我们能专注地沉浸下去，就会发现一些令人感伤的巨变。我们看到了政治版图的流变：破裂最终演变为一种全新的事物。为了探明20世纪40年代的变化，本书第三部分会描述维尔纽斯、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在1989年革命后面临的每个主权民族国家可能面临的外交新问题，但不会花太多篇幅。第三部分将着重讨论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战略，即如何承认东欧地区分裂为目前的国家版图现状，且进一步加固这种现状。这种战略也许非常直接，但这确实是波兰政治理论的一大创新，而且这种外交策略在共产主义终结后的东欧地区中并不常见。

犹太人、俄国人、德国人？

当加利西亚城市科洛梅亚（Kolomya）的列宁雕像被推倒后，雕像的底座被改造为犹太人墓碑。今天科洛梅亚是乌克兰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在1939—1941年和1945—1991年间，这里属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1—1944年，这里曾是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辖属城市；在“二战”前，这里是斯坦尼斯拉维夫省（Stanisławów）的一个城市；在“一战”前，这里属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在1772年前这里只是波兰王国中鲁塞尼亚人（Ruthenian）居住地的一个小镇。在1941—1942年“最终解决方案”实施期间，无论科洛梅亚的实际统治者是谁，它都是一座犹太城市。犹太人在科洛梅亚甚至整个东欧的缺席，正好与共产主义对东欧40年的统治相吻合。20世纪90年代东欧的民族“历史债”乱成一锅粥，很多由共产主义者编纂的新研究往往从起始于“二战”的民族主义世界。犹太历史与东欧的主流历史逐渐分离开来。正如以色列历史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成功，忽视以色列政治的东欧源头，东欧历史学仅关注独立国家，没有给犹太人应有的重视。当然，也有很多有价值的非主流研究著

作，近来一种值得称赞的趋势是出版容纳各类民族观点的选集。虽然这样做确实有效，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历史上的民族主义问题，这只能导向一种政治正确的多维民族主义（multi-nationalism），后者将平行的民族研究从历史的土壤中连根拔起，而这才是我们需要耐心研究的问题。

那么，考虑到本书的研究视野，为何要把犹太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从副标题中删去呢？因为这是一份关于现代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民族性的研究，本书并未对追溯德国人、俄国人或犹太人的民族性及对此下结论有任何雄心。这是一种谦逊的做法，而非无视。因为德国的民族历史主线将我们引向别处，在这里我们只考虑和近代早期乌克兰和立陶宛有关的俄国民族观念。基于以下五个原因，我们必须在别的研究中探寻犹太民族观点的问题。首先，犹太民族是比斯拉夫民族或波罗的民族（Baltic nations）历史更悠久的社群。第二，要研究这个问题，必须涉及犹太人在波兰-立陶宛王国中公社式的自治传统，但这与本书的结构相去甚远。第三，犹太人进入现代政治生活的路径是通过废除社群特权、王国统治下的独立司法以及缓慢而渐进式的个人权利拓展而达成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帝国逐渐分崩离析的19世纪。这一经验与非犹太教徒的限制主义民族政治历程截然不同，因此需要别的解释。第四，21世纪兴起的以领土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强调恢复昔日的王国边界，并使之成为民族国家，但这种民族主义从来不是犹太人的选择。最后，尽管大屠杀和以色列建国的关系可以成为本书的重要论据之一，但这个问题将转移我们在东欧领土上的注意力，而这才是构成本书研究方法的要素。犹太民族研究与本书的研究存在异同，无论如何，划分和论证这段历史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重构方式。

尽管本书没有研究俄国、德国和犹太民族历史的雄心，但本书认为，只有理解了这三个民族，才能理解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民族历史。因此本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二战”后的整体历史，将一些以往分而述之的部分汇总在一起。“最终解决方案”被视为战时及战后东欧的一个组成部分。1941—1944年对维尔纽斯犹太人的种族清洗以及1944—1946年对维尔纽斯波兰人的驱逐，都属于战后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对维尔纽斯的重建。我们会发现，1942年的沃里尼亚大屠杀培养了那些参与1943年针对沃里尼亚波兰人的屠戮行动的年轻人。苏联的暴力行为开始在这里扎根。在1944年乌克兰人针对波兰人的种族清洗中，苏联对波兰的领土企图使之改变了本国的民族政策。而波兰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军队的直接帮助下，以及在波兰民族主义者的间接帮助下，于1947年实施了所谓的“民族净化”（national homogenization）行动。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段历史的延续性：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到针对某一方的种族清洗，再到为了建立新的统治而实行的大清洗。

本书从当代东欧历史研究成果中获益良多。但是，我希望本书能在另一种

分析框架中呈现这段民族历史。本书要回答的是关于多个民族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一种单一民族叙事或对现有叙事做调整；向前迈进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中，后者往往避免触碰后来的政治如何形塑了历史这一问题。本书关注的特定的地理空间，我们将审视在这些地方的民族理念、社会运动和政治主张所经历的变化。书中所呈现的近代早期的历史或是那种复杂的民族性，对现代读者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这其中充满了意外、偶然事件和运气。本书对成功民族的案例和对失败案例（比如白俄罗斯）的关注一样多，因为后者也让我们了解了现代民族走向政治成功需要具备的因素。在近代早期的背景下，那些民族英雄所思考的、不断适应的以及拒绝服从的民族理念也在本书中有所体现。此外，本书重新解读了那些在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相反的意识形态。以上提及的这些目标已经被许多来自东欧或研究东欧历史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我对此并未做出任何创新，我只希望能在他们设立的框架内写作这样一本书。

尽管这些章节提供了一些新的论述，第1章到第7章受到前述历史学家的帮助最多。本书用浪漫主义来论述分别出现在帝国统治时期、民族国家和苏联时期的近代早期和现代民族观念，也许称得上是创新。此外，对比其他民族运动取得成功的背景，本书系统性地研究了白俄罗斯民族失败的案例；还研究了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化过程——据我所知，此前未有类似的研究涉及以上方面。第8章到第14章参考了档案资料和其他重要文献研究，不仅呈现了许多新的论证依据，还展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第8章到第10章第一次在英文学术著作中完整描述了发生在1943年至1947年间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相互实施的种族清洗事件。第11章到第14章将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精心制订的国家战略、在90年代实行的东部政策与波兰成功融入欧洲联系起来。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关于南斯拉夫解体和欧洲东南部分裂的研究，但这四个章节首次对波兰在欧洲东北部的稳定化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本书对近代早期的波兰王国和其现代继任国做了整体性的研究。只有横跨国界的限制——如东欧和苏联或俄国和奥匈帝国——我们才能绘制出民族性从近代早期到现代的流变画卷。

元历史（Metahistories）与迷思

本书呈现了一种全新的东欧历史，但是几乎很少涉及民族迷思。例如，关于波兰军队在1920年进驻维尔纽斯后发生的事件，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立陶宛和波兰方面的研究；而关于1943年发生在沃里尼亚的种族清洗，乌克兰和波兰方面仍然各执一词。这些民族争端的每一方都提供了重要证据，但是即使把各方证据综合起来，还是不能满足一个局外人的好奇心。外交上的冲突妥协固然重要，但对历史学家来说这徒然无益。妥协无法产生独立的视角，而历史学家必须在独立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没有人能声称所有研究框架都是超越政治的，但是在建立学术研究机制和为民族迷思下定论之

间存在明显差异。驳斥所谓的迷思无异于和骷髅共舞：当音乐响起，你会发现自己很难从“舞伴”柔软的肢体中抽离开来，很快你就意识到你的舞步只是徒劳地让这具尸体不断旋转而已。你很容易沉浸在制造迷思和破除迷思的舞蹈中，但要再找回自己的节奏却很难。而且，这种研究带来的陈腐气味一时很难消散。

同样，本书也不会流连于19世纪宏大的民族历史观——当代已有太多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了。例如，在口语中，“波兰人”（Poles）通常指代生活在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中的波兰人，在这个意义上的王国类似今天的波兰。而俄国人认为，东斯拉夫地区在波兰-立陶宛王国中度过的几个世纪，对这一地区“重新回归”俄罗斯帝国毫无意义。在这里，以上元历史观点“甚至连错误都算不上”。这些观点如此深入人心，也给反对者带来灵感，提出完全相反的论述：立陶宛人能够“论证”中世纪维尔纽斯不属于波兰，而是立陶宛的；乌克兰人能够“证明”是他们而不是俄国人继承了基辅文明。与元历史争辩同时冒着认可它的风险，但是胡言乱语的反面依然是胡言乱语，在元历史中没有有效的分析，只有“这些观点”和“那些反对的观点”。关于迷思和元历史的辩证法使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更锐利了，但这只是一个研究主题，而非民族历史的研究方法。

意见和模式

迷思制造者和元历史学家的声音往往真诚而令人信服，他们的观点不证自明。而民族主义理论家的声音疏离而充满讽刺，他们认为那些不言自明的事情是明显的错误，众人深信的事物往往是错误的。问题是为何这些漏洞百出的观点大行其道？部分可能是因为讽刺的本质充满了欺骗性。在尖锐矛盾的伪装下，讽刺更加固化了我们对世界麻木的误解。讽刺源于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东西，我们的自满成为讽刺的牵引力。如果我们将讽刺视为事物的终结，那么我们将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民族性是被发明出来的，是偶然产生的，或者民族性太令人迷惑了以至于难以归类。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乌克兰活动家，一个希腊天主教会（Greek Catholic）成员，竟然在一个波兰家庭长大，并且在天主教会受洗。这种讽刺实际上说明了加利西亚地区的复杂性，以及从近代早期的王国时代到现代的艰难转变。同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波兰政治家竟然称自己是“立陶宛人”，还有每个波兰人耳熟能详的那句诗：“立陶宛！我的祖国！”如果我们把讽刺的事物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入口，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代早期王国的民族性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才彻底消亡。在本书中，讽刺不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更不是答案的代替物。在这里，民族既不是信念的对象，也不是取乐的对象，而是研究对象。

本书的叙述模式是按时间顺序的历史叙述。这种模式曾被批评倾向于

将“民族”当作文学中与磨难、救赎等主题相关的史诗作品的主角。正如这篇导论所提出的，一种批判性的民族历史叙述也许可以这样写：关于什么主题、关于哪段历史时期、关于哪个地点，以及关于何人的意见和观点。但这还称不上是冒险。叙述性历史对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至关重要。近年来，几本优秀的社科著作引发了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的争论，这些著作全都“寄生”在历史之上。“寄生”（parasitism）是个很糟的字眼，我想表达的是当社会科学家兴致勃勃地分析民族主义时，他们都在谨慎地使用历史叙述。而当历史编纂学颤颤巍巍地想要迎接这个挑战时，寄生成了相互利用的代名词。说到底，由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在民族研究中提出了种种问题，最终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历史研究。而且，就像历史叙述可以在社会学批评中拉开和政治的距离，社会科学也可以在历史学中获得一种政治视角。毕竟，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无法摆脱为政治服务的烙印。今天，一些人饶有兴致地想要证明乌克兰是奥匈帝国（德国、波兰，等等）因素的“产物”，就像另一些人坚持认为一种“必要的”、不间断的乌克兰历史赋予了乌克兰独立的合法性。在南斯拉夫战争之后，人们有时会认为种族清洗者背后的动机就是这种关于血缘与归属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t）观点；事实上，历史研究揭示出那些相关人士正是采用了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关于民族性的复杂观点。民族性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基础，这个简单事实暗示它的拥护者——民族研究——理应服务于此。为了完成这项事业，历史叙述者提供了编年史、比较研究和一致性（coherence）等这些来自历史学家的朴实馈赠。然而，在历史结束之际，我们又如何分辨这种历史叙述是不是靠得住？

传统智慧就像薄薄的冰层，覆盖了未知事物的深海。历史叙述会像流水一样因势而变吗？水屈服于重力和寒冷，随时改变以通过任何路径。当水冻结就能封住还未显露的缺口，最终聚集成冰，水最终会和它流经的物体融为一体。抑或，历史叙述像一艘破冰船，它依靠一己之力扬帆远行，找出问题并直面问题？它是否能一往无前，迎战恶劣的天气，在肆虐的风暴之后依然存活？在它消逝之际，它是否唤醒了沉寂的深海，在白色的冰面上凿开一道黑色的裂痕，引得其他船只竞相追随？

---

[1] 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计划。——译者注（下文脚注如无另行说明，皆为译者注。）

| 第一部分 |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祖国之争

第1章

立陶宛大公国（1569—1863）

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如同健康一般，

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贵。

——亚当·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

很久以前，立陶宛大公国统治着中世纪东欧。然而自1991年以来，立陶宛共和国一直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小国。曾经的大公国首都维尔纽斯，如今依然是共和国的首都。这一延续似乎让人感受不到其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91年前的500年中，立陶宛语既不是维尔纽斯的官方语言，也不是大多数维尔纽斯居民所说的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尔纽斯三分之一家庭使用的语言是意第绪语；街上、教堂中和学校里使用的语言是波兰语；而维尔纽斯农村通用的语言是白俄罗斯语言。1939年，几乎没有人会在维尔纽斯说立陶宛语。在那一年，苏联从波兰手中夺取了这座城市。在这之后，今天的“立陶宛”——这个以维尔纽斯为首都、地狭人稀的独立民族国家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如果往昔和当下关联紧密，历史又是如何施加影响的？

对现在的理解几成定论。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座城市一直是波兰文明和犹太文明的中心。在成为一座立陶宛现代城市之前，维尔纽斯的波兰性和犹太性突然消失了。维尔纽斯曾经是跨民族王国的首都，现在却成了一个小国的首都，关于立陶宛大公国是一个联邦国家的现代观点也不攻自破了。尽管在过去200年间，它大多数时候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统治下，但这座城市最终也没有加入俄罗斯；尽管农村居民以东斯拉夫农民为主，维尔纽斯也没有加入白俄罗斯。基于历史和语言的现代立陶宛理念最终在维尔纽斯取得胜利，即使我们发现一直对维尔纽斯心心念念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并没有从历史和语言中获得多少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民族主义如何重新划分领土边界？为什么是这种民族主义胜利了，而不是另一种？

民族观念的现状与历史争论息息相关。对历史延续性和正义的伸张以及主权国家的民族历史在其背后支持，在激烈而充满未知数历史竞赛中，这些都曾是有力的武器。接下来的五章将集中讨论维尔纽斯的前世今生，不仅

会讨论立陶宛的成功，更会涉及这座城市中波兰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曾经的目标与计划。此后，这个昔日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将被野心家和居住者赋予不同的名字，立陶宛人称它为“维尔纽斯”，波兰人叫它“维日诺”（Wilno）；白俄罗斯人叫它“维尔尼亚”（Vil’nia）；犹太人称它“维尔纳”（Vilne）；俄罗斯称它“维尔那”（Vil’no），之后是“维那”（Vil’na），再之后是“维尔纽斯”（Vil’nius）。[1]名字上的变化乍一看有些复杂，却能让我们看到其中的政治争端，唤起我们对地理学“事实”的怀疑。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发现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运动和国家曾经的面貌：从近代早期大公国的精英重建时期到新的现代国家时期。为了避免将这些发展视为无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关注其中的曲折、偶然、误解和无心插柳的后果。我们应该分析那些成功和失败之处。

在民族观念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之间，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存在不同形式的民族忠诚，而这些不同可能使一些重要问题难以达成共识。民族观念自有其力量，能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局外人用于政治用途。除了获得力量的情况之外，民族观念也兴起于以下情形：当传统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笨拙的；当它们以延续性的名义尴尬地要求创新的变化。民族观念在让我们误解过去这件事情上越发有效，为了理解它们隐藏这些变化的力量，我们必须先矫正对过去的理解。我们的目标不是纠正民族迷思，而是揭示这些迷思在何种政治和社会状况下获得生命力。通过定义近代早期的民族性，本章及下一章将帮助我们理解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波兰的现代民族观念有何新颖之处。为了了解那些影响20世纪现代民族活动家的历史遗产，我们必须先审视中世纪的立陶宛大公国和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对维尔纽斯的争夺战起源于立陶宛历史上关于界定一个国家的早期理念。

立陶宛大公国，1385—1795

立陶宛大公国的公爵曾是13世纪和14世纪欧洲的大军阀。他们掠取了广袤的领地，从波罗的海地区向南，穿过东斯拉夫腹地，直到黑海。立陶宛异教徒们拿下了蒙古帝国攻占基辅罗斯后留下的几片领土，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东斯拉夫王国收入囊中。信仰东正教的罗斯波雅尔[2]已经习惯于蒙古帝国的封建君主地位，他们将立陶宛人视为盟友而非掠夺者。当立陶宛的军事力量流入南部的基辅，罗斯文明——东正教、斯拉夫教会语言和成熟的法律传统——也相应传入北方的维尔纽斯。自此，维尔纽斯取代基辅成为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的中心，两大天主教势力条顿骑士团和波兰王国，开始寻求立陶宛领土。身为异教徒，立陶宛大公国的公爵敏锐地以接受天主教洗礼为交易条件，在14世纪晚期，立陶宛大公国公爵约盖拉（Jogaila）以皈依天主教为条件，获得了波兰国王的王冠。波兰贵族为了避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将一位11岁的公主雅德维加（Jadwiga）送给约盖拉做新

娘，并获得了波兰国王的继承权。约盖拉，作为立陶宛大公和罗斯人的王和继承人，于1385年宣布了他治下波兰和克鲁瓦（Krewo）合并，次年，他以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Wałdysław Jagiełło）之名受洗，并被选为波兰国王。继承权的共识保障了波兰和立陶宛的联合，前提是恢复立陶宛的自治权，将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联合。雅盖沃王朝对波兰和立陶宛的统治接近两个世纪，直到1572年结束。

即使在1385年克鲁瓦联合之前，立陶宛在宗教和语言上也更像一个斯拉夫东正教国家而非波罗的海异教国家。约盖拉此前皈依天主教的承诺仅限于自身，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异教徒，他王国的大多数人，他的大部分亲戚已经是东正教徒了。向一个大部分人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引入罗马天主教，在此意义上，约盖拉本人的皈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异教国家基督教化的意义。天主教的引入，在立陶宛和欧洲之间建立了一种文化上的联系，并为波兰日后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立陶宛大公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这确保了立陶宛不再是像莫斯科公国（Muscovy）建国时那样的东正教国家。同样，约盖拉的受洗也为莫斯科公国摆出东正教保护者的姿态提供了机会。当立陶宛将基辅吸纳进本国时，东正教的主教区就此让位给了克利亚济马河沿岸的弗拉基米尔市（Vladimir-on-the-Kliazma）。主教区易位莫斯科公国的结果让立陶宛所谓的罗斯人继承者的声明变得复杂。约盖拉原本能解决这一矛盾，在14世纪80年代他有机会在天主教的波兰和东正教的莫斯科公国之间做选择。1382年，他已经同意与德米特里·顿斯科伊[3]（Dmitrii Donskoi）的女儿成婚，并皈依东正教。但是，这个计划有两个不足之处：首先，不确定东正教是否会保护立陶宛免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后者将东正教视为异端；其次，东正教会更青睐在立陶宛的斯拉夫波雅尔，他们比约盖拉的波罗的海立陶宛贵族人数更多、更有文化。而波兰王冠和天主教十字架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更受欢迎：它们为抵抗条顿骑士团提供了更可靠的堡垒，为向东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为雅盖沃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多荣耀。

撇开政治不谈，中世纪的波兰和立陶宛的共同点比常人想得更多。当我们想象1385年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协商联盟条款时，或者1410年他们计划在格伦瓦德（Grunwald）向条顿骑士团发起攻击时，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之间不仅能用拉丁语交流，也能用斯拉夫语交流。由南边的东正教士带来的教会斯拉夫语，经过本土化的改变，成为斯拉夫官方语言（Chancery Slavonic），即大公的朝堂语言。在兼并加利西亚（一个基辅罗斯省，被波兰人称为“罗斯的领地”［Rus’ Palatinate］）后，波兰也拥有了当地的东正教士和斯拉夫语抄写员。在共同分割了基辅罗斯的土地后，波兰和立陶宛也分享了共同的文化遗产。当年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在语言上的隔阂并没有像今天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区别那么大。1386年后，波兰-立陶宛宫廷使用拉丁语和另外两种区别明显的斯拉夫语言：来自波兰王国的波兰语

和大公使用的斯拉夫官方语言。立陶宛语在立陶宛大公和他们的随从间继续通用了一个世纪，但在波兰-立陶宛政治生活中这种语言的使用频率很低。[4]

在下一章，我们会发现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语（Baltic Lithuanian）为现代立陶宛民族的诞生提供基础；我们必须先更加关注它在近代早期立陶宛大公国中无关紧要的位置。显然，最后一任熟知立陶宛语的大公是卡齐米日四世（Kazimierz IV），他于1492年逝世。卡齐米日四世在1457年重申了立陶宛的特权，他用拉丁语和斯拉夫官方语言同时宣布；当他颁布王国法律条款时，他只使用斯拉夫官方语言。在卡齐米日四世的统治内，印刷术已经传到波兰：克拉科夫（Cracow）的出版商出版波兰语和教会斯拉夫语的图书，而不是立陶宛语的。立陶宛大公国的第一位印刷商弗兰斯克·斯卡利纳（Frantsysk Skaryna）在1517年前后，用经过白俄罗斯语改良的教会斯拉夫语出版了大量的《圣经》。[5]在16世纪早期，我们可以发现用斯拉夫方言——鲁塞尼亚语（Ruthenian）——翻译的《圣经》译本，而不是波罗的海方言——立陶宛语。和斯卡利纳出版的《圣经》不同，这些译本中有从希伯来语翻译的《旧约全书》。显然，这些《旧约全书》的翻译是由立陶宛犹太人完成的，他们既通晓希伯来语，又会说鲁塞尼亚语。[6]既然16世纪早期，当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说鲁塞尼亚语，那么这些译本的预期读者自然是他们。在东正教和天主教传统中的7022年/1514年——“semtisiach dvadtsat vtoroho”年，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用斯拉夫官方语言颁布了一条保证犹太人特权地位的法令。[7]而1529年大公国法律也是以斯拉夫官方语言写成的。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国王齐格蒙特·奥古斯特（Zygmunt August）在16世纪40年代回复维尔尼亚上层阶级时，对该法律做了一番解释，其中夹杂着波兰语。

在莫斯科公国，立陶宛大公国的官方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斯拉夫官方语言”，曾被称为“立陶宛语”或“白俄罗斯亚语”。尽管现代的俄国历史学家将这种语言称作“俄语”，当时的莫斯科抄书吏不得不将立陶宛语法令翻译成莫斯科方言，以便在法庭上使用这些法令。[8]斯拉夫官方语言和今天的波兰语有很大的区别，但是通过和波兰的王朝联合，波兰语言和观念得以在斯拉夫人的地方流传开来。早在1501年用斯拉夫官方语言写成的法律文本中，已经出现了波兰词语甚至是波兰语语法的痕迹。立陶宛大公国1566年的法律序言，记录下立陶宛上层阶级已经开始在生活中使用波兰语。[9]1569年卢布林联合法案孕育了波兰-立陶宛王国，这份法案只有波兰语版本。在立陶宛，并非因为波兰移民提高了波兰语的地位，而是因为人们对波兰政治秩序的逐渐接受，最终由1569年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将这一秩序汇编为法律。1588年的大公国法律强调，这一切是由于政治文化造就，而非个人行为，正因如此，犹太人皈依天主教显得异常尊贵。波兰也将欧洲法律趋势带入立陶宛，此前罗马法从未能踏足莫斯科公国，1566年

和1588年颁布的法律阐释了罗马模式（和日耳曼模式）在立陶宛不断增加的重要性。[10]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曾从意大利通过拉丁语传到波兰的思潮，再次通过波兰语从波兰传到立陶宛。

在波兰，波兰语的地位被提升为书面语言，它取代了斯拉夫官方语言（和鲁塞尼亚方言）在立陶宛的地位。波兰和立陶宛贵族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开始讲同一种语言，这促进了近代早期单一政治共同体的诞生。这意味着，在波兰的从拉丁语到波兰语的转变和在立陶宛的从斯拉夫官方语言到波兰语的转变有着巨大的不同。在波兰王国，方言（波兰语）取代了外来的书面语言（拉丁语）的统治地位。波兰语被提升到和拉丁语一样的地位，这代表了整个使用拉丁语的欧洲地区的历史趋势，从意大利人的“语言之问”[11]开始。[12]在立陶宛大公国，外来语（波兰语）取代了本土的政治和法律语言（斯拉夫官方语言），并阻止了当地方言（鲁塞尼亚语）进一步用于书面文字。众所周知，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语言在很久之前就失去了政治重要性。文艺复兴掀起的“语言之问”在立陶宛找到的答案非同寻常。在但丁之后的意大利，以及整个基督教欧洲，方言成为文学和国事语言。而立陶宛大公国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在其中文化和政治的语言和方言不仅不接近，反而相去甚远。作为公认的高级语言，波兰语满足了共和机构和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联合理念的需求；但是当现代民主到来后，民族理念孕育了这些相同的名字，波兰语却无法满足新的需求。

近代早期和近代民族

在指出近代早期和近代政治遗产时，我们必须清楚区分它们的不同。由立陶宛上层阶级共同缔造的近代早期波兰民族，与今天我们熟悉的近代民族观念大相径庭。前者建立在共和国公民权的基础上，即上层阶级可以享受广泛的法定权利。到16世纪早期为止，波兰的上层阶级已经确保他们不会受国王的肆意妄为或驳回新立法之害，国王是当时主要的外交事务引导者。波兰政治制度不断加强的法律基础，使得一些地方传统权利得以长期保留，例如皇家普鲁士（Royal Prussia）。[13]出于同样的原因，波兰政治体系为邻国那些希望固化和拓展他们的特权的上层阶级也创造了一种模式。[14]在决定是否与波兰正式联合时，立陶宛的上层阶级也希望为自己争取到权利、特权和庇护。在与波兰的王朝联合时期，立陶宛成为一个东斯拉夫王国，其上层阶级享受着与主权相关联的各种权利。1569年卢布林联合缔结后，立陶宛的贵族加入了波兰邻居们，参加同一个议会，共同选举国王。同时，立陶宛保留了本国的头衔、行政机构、财政部门、法律和军队。联合王国因此造就了一个由上层阶级组成的共和国，他们认可的萨尔玛提亚人起源[15]（Sarmatian origin）神话中包含了不同出身和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贵族，但将其他人排除在外。[16]



图1：弗兰斯克·斯卡利纳（1490？—1552？），文艺复兴时期的东斯拉夫

人。这幅雕刻自画像作于1517年。起初，立陶宛还以本国的斯拉夫教会和官方语言参与了文艺复兴运动，到斯卡利纳去世时，波兰语已经成为当时的文明语言。

1569年后，立陶宛上层阶级对波兰身份的认同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问题，有时混杂着对波兰文字那种文艺复兴式的魅力的接受，有时又有从东正教转向天主教的倾向。在立陶宛大公国，新教改革和反新教改革交替出现。如同其他欧洲贵族家庭，很多立陶宛名流在16世纪五六十年代转向加尔文主义[17]。东正教徒转向新教，不仅因为新教的教义和教理，还因为新教在以下问题的做法上和东正教颇为相似：牧师的婚姻、礼拜仪式中民族语言的使用和普通教众使用的圣餐杯。德国和法国的贵族只是从天主教的一种宗派转向另一种宗派，立陶宛贵族则不同，他们经常通过从东方基督教转向西方基督教的方式参与宗教改革。[18]在一代新教徒之后，这些原来的立陶宛东正教家庭通常会转而信仰罗马天主教。通过这种方式，新教无意中成了天主教在立陶宛大公国的盟友。并非是天主教本身，而是宗教改革使得立陶宛东正教贵族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先是新教，然后是天主教。当然，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派也采取了对手新教的策略。这些教派使用波兰语作为教会语言（尽管天主教也会用立陶宛语出版几本图书），这加强了波兰文化在立陶宛贵族中的声望，而信仰的改变也促使说立陶宛语的农民开始接触到波兰语。[19]1579年，耶稣会教士在维尔那设立了一所学院，他们的反新教宣传伴随着他们希望东正教接受罗马教廷权威的呼声。[20]

尽管罗马天主教被认为是“波兰信仰”；甚至在反宗教改革后，“波兰信仰”对“波兰”政治忠诚毫无必要，天主教依然保持这个地位。如同语言，宗教也能被之后的民族主义者追溯为一种民族身份的记号或载体。然而并没有发生过导致领土争端及其解决方案的宗教冲突，无论是德国的“谁的王国，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方案，还是法国的“一个王国、一部法律、一种信仰”（un roi, une foi, une loi）方案。1566年立陶宛大公国的法令由五名东正教徒和五名天主教徒组成的委员会拟定。奥古斯丁·罗顿都斯（Augustyn Rotundus），一位在立陶宛参加反宗教改革的波兰人，他是米科瓦伊·拉齐维尔（Mikołaj“the Black” Radziwiłł，1515—1565）的朋友，后者是维日诺的巴拉丁伯爵，也是立陶宛重要的宗教改革倡议者（先是倡导路德宗，然后是加尔文宗，最后是反三位一体派）。罗顿都斯是一位波兰天主教徒，他写了一篇为立陶宛法律辩护的长文，而作为立陶宛新教徒的拉齐维尔出版了这篇辩护词。罗顿都斯还将1566年立陶宛法律编译为拉丁语，他同意拉齐维尔的观点：立陶宛的“公共事务秩序良好”（respublica bene ordinata）。[21]波兰最伟大的耶稣会教士彼得·斯卡加（Piotr Skarga，1536—1612）将他1577年出版的伟大著作[22]献给了基辅的巴拉丁伯爵——东正教徒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Konstantyn

Ostroz’kyi）。事实上，那次不同宗派间的和解并不顺利。奥斯特罗日斯基是一位自负且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想要教会按照他的意思行事，他将这版著作买空并焚烧一尽。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政治秩序不仅基于对西方基督教各宗派的包容，也基于对东方基督教的包容。1573年的华沙同盟（Confederation of Warsaw）确立了王国内对全体天主教贵族的宗教宽容。这种宽容仅限于社会少数阶层，尽管在我们看来这存在某种排斥，但是同一时代在欧洲还未出现类似华沙同盟如此宽容的存在。

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观念比起之后的现代民族主义，它有时更排外，有时又更包容。它更排外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获得了所谓全体民族成员的支持，而近代早期的波兰政体则将有投票权的政治团体同被剥夺公民权的下层阶级区分开来。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不是以经济水平为导向的阶层，富人总是贵族，但几乎没有贵族生来就富有。富有的中产阶级只有成为贵族后，才算得上是公民。近代早期的民族观念在政治领域却比现代民族主义更包容，因为后者要求的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波兰-立陶宛王国保留了波兰和立陶宛的法律及行政机构。而近代早期民族在个人领域更为包容，现代民族主义倾向于坚持民族身份应包含文化源头和政治命运；而近代早期的波兰认同则认为上层阶级可以在文化上倾向一方，在政治忠诚上倾向另一方。在当时，贵族们与同僚商谈政事时使用一种语言（波兰语），在家中或与农奴交流时使用另一种语言（我们今天所称的白俄罗斯语或立陶宛语）。

一位贵族的出身可以是“立陶宛人”，他在政治上可以是“波兰人”，在宗教上可以是“罗斯人”（或“希腊人”）。既然在很长时间以来，立陶宛境内有大部分东正教国民，继承了基辅的诸多遗产，因此它也被称为“罗斯”王国。1385年，约盖拉以“立陶宛大公与罗斯人的王和继承人”的名义将他的领地与波兰合并。在1449年波兰-立陶宛王国与莫斯科公国的条约中，前者被称为“罗斯的”，而后者被称为“莫斯科的”（Muscovite）。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后，莫斯科公国声明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它是东正教所在地、拜占庭的继承人以及基辅罗斯的后继者。这为莫斯科公国与他们的东斯拉夫伙伴立陶宛发生战争，提供了合法性的理由，因为一个世纪以来立陶宛大公一直视自己为基辅君主的继承人。[23]事实上，莫斯科公国关于罗斯后继者的声明将立陶宛推向波兰。当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30—1584年在位，1547年加冕为沙皇）在1558年挑起利沃尼亚战争（Livonian Wars）时，他加速了波兰和立陶宛在1569年的联合。当然，在那是波兰-立陶宛也自称罗斯后人：1569年，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加冕典礼上的头衔是“波兰国王，立陶宛大公，罗斯人、普鲁士人、马佐夫舍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王和继承人等”。同年，伊凡四世对待波雅尔对手的方式也与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治下立陶宛贵族的法定权利形成鲜明的对比。[24]

尽管波兰-立陶宛王国在17世纪与俄国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扬·索别斯基（Jan Sobieski）1683年将维也纳从土耳其人手中顺利营救，也为波兰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但王国在18世纪却遭受了接连失败。我们在第6章中将看到，乌克兰的反叛在17世纪中叶对王国造成了致命打击。王国没能为成为现代强权积蓄起财政和军事实力。刚开始的好运用完后，之后的几任君主没有维护好王国的利益。无法建立起王朝的国王们，更无心考虑王国的福祉，而出身国外的国王们也不愿意投身波兰政治的困局中。波兰和立陶宛上层阶级不断拓展的权利，也为俄罗斯帝国（莫斯科公国在1721年后的国名）提供了使王国政体瘫痪的可乘之机。考虑到王国议会的议事原则是全体一致，那么只要贿赂一个人，就能阻止任何改革通过。沙皇彼得一世（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的势力渗透至波罗的海，从内部腐化王国。莫斯科的独裁者利用了波兰的无序状态。然而即使王国在18世纪瓦解为一个国家，其最珍贵的包容原则也被逐渐破坏，波兰文明依然进一步渗透进立陶宛大公国。任何曾经能代表贵族的标志，如今成为地位的象征，因此整个18世纪所有和波兰相关的事物都在立陶宛欣欣向荣，即便波兰-立陶宛王国早已消散成为回忆。[25]王国的文化不断演化，它的制度却没有适应这种演化。1772年，奥地利、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第一次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波兰-立陶宛贵族最后一次试图修复王国制度的努力是1791年的五三宪法（Constitution of 3 May 1791）。这部宪法将波兰-立陶宛贵族阶层视作单一政治联合体，取消了议会投票的全体一致原则，希望建立一个现代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26]这激起了1793年王国被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第二次瓜分。1794年，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27]领导的反沙俄起义被击溃，1795年王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遭到瓜分。从此，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从欧洲地图上被抹去了。

俄罗斯帝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期间在位）逐渐吞并了原立陶宛大公国的几乎所有领土：1772年波洛茨克、1774年的明斯克和1795年最后成为维尔那的城市。通过吞并立陶宛，俄罗斯帝国吸收了一些讲波兰语的精英，讲我们今天所说的白俄罗斯语的农民（大多数人如此）和大部分居民为犹太人的城镇。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终结意味着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即除去地方偏见，犹太人可在其中享受到共同的制度性包容。[28]突然间，俄罗斯帝国掌握了犹太人世界的大部分领土。维也纳会议（1815）使沙俄在瓜分了王国领土后又将华沙纳入其中，整个帝国境内有当时世界上大部分波兰人。仅从立陶宛大公国——既不是当时建立的所谓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Kingdom of Poland），也不是乌克兰——整个俄罗斯帝国吸收受波兰文化影响的贵族比当时受沙俄文化影响的贵族还要多。在19世纪早期，沙皇治下能阅读波兰语的臣民比能阅读俄语的要多得多。一些曾经的波兰-立陶宛王国贵族，如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Prince Adam Czartoryski）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的朝廷中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比方说，俄罗斯帝国于

1804年颁布的犹太人法典中的某些条款，恰尔托雷斯基负有部分责任。[29]

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夭折，以及俄罗斯帝国的犹太定居界限区（Paleof Settlement）[30]的出现，这些都与帝国极度想要改革犹太教和犹太社会规制的愿望相关。我们将在第3章再来讨论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指出这些历史迷思不仅仅是领土问题（如1760年拉比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 Tov］去世后，哈西迪犹太教在乌克兰兴起），或泛欧洲趋势的问题（如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些历史趋势尽管最终汇聚在维那，但它们不是立陶宛大公国历史传统的变体。只有在19世纪末，诸如犹太世俗政治之类的事物才开始出现。对沙皇统治下的基督教臣民来说，近代早期上层阶级形成的民族正在慢慢地被现代民族概念所代替，后者以民族语言的形式被表达。19世纪在立陶宛的基督教徒中，民族分歧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程，它本身并不是现代民族主义者们创造的那种非黑即白的、回溯性的民族分类。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在1834年创作的诗歌《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或《萨帝厄斯殿下》（“Lord Thaddeus”）］就像棱镜一般，从中可以观察到近代早期立陶宛爱国主义中色彩分明的民族观念。

俄罗斯帝国和立陶宛祖国

密茨凯维奇（1798—1855）出生在波兰-立陶宛王国被第三次瓜分三年后的圣诞夜，他生于新格鲁代克（Nowogródek），镇上的居民说意第绪语和波兰语。当地的立陶宛鞑靼人那时刚刚建造了一座崭新的清真寺。虽然旁边就是立陶宛村庄，但大多数当地农民说的还是白俄罗斯语。密茨凯维奇在一个体面的波兰上流家庭长大，虽然他的父亲很可能是东正教教徒，他的母亲可能有犹太血统。[31]密茨凯维奇就读于维日诺的帝国大学，这所机构很好地展示了一个无知的帝国吸收了大批知识家庭后如何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19世纪早期，沙皇俄国的政策目标是维持波兰人的教育成就，而不是将潜在的优秀臣民俄国化。1803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维尔那学校（耶稣会教士于1579年建立）重建为大学，规定波兰语为教学语言。大学和整个维尔那学校的事务由沙皇的朋友、顾问和导师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1770—1861）负责。作为王国遗产的维尔那大学是当时俄罗斯帝国最大的大学。在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后，大学培养了一批当地精英，比如密茨凯维奇，在他们心中文化和政治语言应该是波兰语。大学及其附属学校培育了一批人，他们有能力编纂消失的立陶宛大公国遗留下的历史、文学和诗歌遗产。[32]（顺便说一句，恰尔托雷斯基的秘书和他的顶头上司都是乌克兰人。正如18世纪晚期波兰被瓜分后，波兰人纷纷服务于沙皇俄国，一个世纪前安得所沃条约［Treaty of Andrusovo］的签订瓜分了乌克兰，乌克兰人因此来到俄国。）

如果没有在大学期间受到波兰和立陶宛文化的熏陶，我们很难想象密茨凯维奇的诗人生涯。这一点从他的杰作《塔杜施先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首诗是他在1834年流亡巴黎期间所作。这首诗是关于立陶宛上流家庭的爱恨情仇，故事到1812年春天戛然而止，彼时拿破仑和他的军队横扫立陶宛，直奔莫斯科。在诗中，立陶宛贵族青年加入了法国军队，这从史料上来说确凿无误，密茨凯维奇从13岁时就开始观察这些。事实上，1812年加入拿破仑的上层阶级青年中，有三分之一是维尔那大学的学生。最终，沙皇亚历山大赢得了这场战争。当亚历山大重新夺回立陶宛，他拒绝关闭维尔那大学，因此密茨凯维奇才能在1815年顺利入学。在登记入校时，密茨凯维奇获得了政府奖学金，这位年轻人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亚当·拿破仑·密茨凯维奇。就读于沙皇所办大学的立陶宛上流社会年轻人却参与攻击俄罗斯帝国，沙皇对此依然保持耐心，这使密茨凯维奇能获得更高阶的波兰语教育，因此他才能创作出这首怀旧杰作，将波兰的悲剧和那次攻击俄国事件联系起来。[33]

在密茨凯维奇的大学时代，前波兰-立陶宛王国遗民认为立陶宛人的崛起指日可待，这将加速王国重建。而这一切的假想敌并非对立的民族主义思潮——当时并不存在这些——而是俄罗斯帝国。这些新的思潮影响了密茨凯维奇和他的学生朋友，他们称自己为“爱智者”（Philomaths）。毕业后，密茨凯维奇逃脱了在考纳斯[34]教书的苦差事，取而代之的是被捕入狱、流放到俄国各地的经历。这段流放到敖德萨、彼得堡和莫斯科，之后又先后移居德累斯顿和巴黎的岁月，是他创作波兰语诗歌最鼎盛的时期。密茨凯维奇没有参加1830—1831年波兰人对抗俄国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失败标志着波兰政治思想进入浪漫主义时期。这次起义也直接导致维尔那大学关闭。大学的学生四散到立陶宛、波兰、俄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是人性和民族渴望的完美融合，波兰-立陶宛王国复国无望，他也未有机会看到祖国立陶宛复国的那一天。他的杰作《塔杜施先生》写于1832年到1834年间，就在起义失败后不久开始创作。今天，每位波兰和立陶宛学童都知道这首诗的第一句话：“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如同健康一般，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贵。”[35]

尽管他的作品被证明能够超越时间，我们应该将密茨凯维奇本人放在他那个时代来理解。就像其他欧洲浪漫主义者一样，密茨凯维奇希望“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创造一个新世界”[36]。对中欧和西欧的浪漫主义者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彻底毁灭了古典欧洲，当下的任务是建立起新的政治和文化准则。在密茨凯维奇和其他波兰浪漫主义者看来，瓜分波兰破坏了旧有秩序，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提供了一点儿波兰复国的希望。在拿破仑被打败后，立陶宛大公国的上流阶级没有任何像样的盟友，只有包围他们的农民，于是密茨凯维奇的浪漫主义诗歌就制造了一个政治困境。其他没有国家的民族浪漫主义者，比如意大利或德国的，他们要想将“人民大众”纳

入新兴的“政治共同体”中相对容易一些，但立陶宛的历史问题要复杂得多。赫尔德[37]提出的所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这一理念很难运用到那些不同区域、语言和宗教长期共存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情况。问题不仅在于文化的多样性，还在于人们对政治制度的鲜活记忆。在19世纪中叶，统一的德国或意大利的理念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因为此前没有类似的先例存在。但是，统一的波兰的理念会让人想起刚刚灭亡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幽魂，人们更会想起王国在灭亡前刚刚出台了欧洲第一部宪法。在密茨凯维奇的观念中，立陶宛也是这种政治传统的一部分，还是诸如和谐、美丽、活力和愉悦等浪漫主义美德的源头。如同赫尔德曾相信斯拉夫人可以让欧洲重焕年轻与活力，密茨凯维奇也相信立陶宛将复兴曾经的王国。[38]



图2：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欧洲浪漫主义诗人、波兰语诗人，这是他的诗歌《塔杜施先生》1834年版的卷首插画。

密茨凯维奇关于“立陶宛”的近代早期式的观念，将立陶宛视为一片不同民族共居的土地，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纷争，当民族性彻底改变后，这片土地最终迎来成为波兰的命运。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位波兰大众民族主义者，也从未涉足华沙或克拉科夫，但是在他1855年去世后，波兰大众民族主义者将他优美的诗歌用作一种宣传媒介。虽然密茨凯维奇从未设想过立陶宛会独立于波兰存在，但是他描绘的图景让立陶宛激进分子更加确信他们独特的种族和民族身份。在19世纪晚期，在原立陶宛大公国的西北角，立陶宛语提供了一种文化特殊性，倡导建立单一种族的立陶宛国家的激进分子最终将利用这一点，其中就包含了如何将密茨凯维奇转化为立陶宛民族诗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们认为，兴起于波兰中部和立陶宛西北部的民族性的种族定义是一种对历史趋势的合理描述，那么按此定义，密茨凯维奇既不是波兰人也不是立陶宛人，而是白俄罗斯人。毕竟，密茨

凯维奇的出生地和“塔杜施先生”的背景都在东斯拉夫农民的居住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白俄罗斯人。也许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白俄罗斯上层阶级和文人是最坚定的密茨凯维奇支持者，而且他们从未抓住“种族”优势不放，继而将他据为他们的“民族”诗人。围绕在密茨凯维奇的立陶宛、曾经的大公国周围，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现代种族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主要建立在“语言”上，即我们今天所知的白俄罗斯语。但这种种族民族主义从未产生。种族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概念，它的成与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种族群体”的人数多少几乎没有关系。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现实政治如何最大程度地促成对《塔杜施先生》最具原创精神的解读（立陶宛和波兰的种族民族主义），以及如何边缘化对这首诗歌最忠实的政治解读（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联邦主义）。

正如密茨凯维奇所说，对近代早期立陶宛爱国主义的考验就是1863年反抗沙俄统治。某些少数人士相信立陶宛大公国和王国的复兴，有赖于说波兰语的上层阶级与说立陶宛语或白俄罗斯语的农民阶级的联合。在俄国人败于克里米亚战争（1856）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1861）之前，一些立陶宛的波兰贵族曾密谋以一种同时满足地主和农民的方式彻底解决农奴制问题。[39]雅各布·盖伊什托尔（Jakób Gieysztor，1827—1897）曾组织运动说服立陶宛贵族，在沙皇之前还农民以自由身。虽然盖伊什托尔的号召在当地得到响应，但立陶宛贵族整体错失了抢下这个功劳的机会。盖伊什托尔自认是波兰贵族，在建立和波兰人民的联盟关系；他创办了一所以立陶宛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并没有发现其中的矛盾。[40]他之前就反对1863年的反抗沙俄统治运动，运动开始后，他秘密联合激进的康斯坦蒂·卡利诺夫斯基（Konstanty Kalinowski，1838—1864）[41]。在起义期间，卡利诺夫斯基用农民的语言（白俄罗斯语）向农民许诺他们能拥有自己的土地。[42]安塔纳斯·马可维西斯（Antanas Mackevičius）[43]现在被视为最早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他力争通过与波兰的临时结盟达到光复立陶宛大公国的目的。[44]1863年，这三人都试图说服农民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战，但他们都不相信农民能理解复国的重要意义。这些人和1863年起义的其他领导者已不再是近代早期式的爱国者，后者寻求的是光复一个由上层阶级组成的共和国；但他们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现代民族主义者经过充分准备，试图将民族定义为国民。他们希望借助人民的力量来打败俄罗斯帝国，这种尝试带来了两个根本困境。革命者使用的是各种不同语言，而不只有波兰语，这预示着一种新的民族政治诞生。如果他们以农民所说的语言来号召农民冒此生命危险，那么在和平时期他们也希望能继续使用这些语言。而贵族需要将土地出让给农民，以得到他们的支持，这就迫使贵族要在个人安全和民族解放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1830年起义失败后，密茨凯维奇的怀旧作品指向的是一个近代早期式的政

治共同体。1863年起义失败后出现的却是现代民族理念。

---

[1] 考虑到作者的意图及区分，下文将在不同语境中保留上述不同译法。

[2] 波雅尔（boyar）：公元10—17世纪，在保加利亚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基辅罗斯、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出现的一种仅次于大公的贵族头衔。

[3]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弗拉基米尔与莫斯科大公，1359—1389年在位。

[4] Juliusz Bardach,Studia z ustroju i prawa Wielkiego Księstwa Litewskiego, Warsaw: PWN, 1970，18-21; S.C. Rowell, Lithuania Ascen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296-299; Zigmas Zinkevičius, The History of the Lithuanian Language, Vilnius: Mokslo ir enciklo-pediju leidykla, 1996，71-76. 关于波兰人和德国人，Paul Knoll, The Rise of the Polish Monarch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5] 再版为Bibliia: Faksimil'nae uznaulenne Biblii, vydadzenai Frantsyskam Skarynaiu u 1517—1519 gadakh , Minsk: Belaruskaia savetskaia entsyklapedyia, 1990–91。他的教会斯拉夫语经大公国的斯拉夫贵族用方言润色，并受到捷克语版《圣经》的影响，他曾在布拉格研究过捷克语版《圣经》。J. Sadouski,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Four Books of Kings Printed by Skaryna in 1518,”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7, 224–226.关于斯卡利纳的方言散文，见Pradmovy i pasliasloui pasliadounikau Frantsyska Skaryny, Minsk: Navuka i tekhnika, 1991; 也见Arnold McMillin, Die Literatur der Weissrussen, Giessen: Wilhelm Schmitz, 1977, 40–47。

[6] Moshe Altbauer,The Five Biblical Scrolls in a Sixteenth-Century Jewish Translation into Belarusian (Vilnius Codex 626) , Jerusalem: Dorot, 1992, 13-37. 也见Paul Wexl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e-Ashkenazic Jewish Settlements in the Slavic Lands in the Light of the Linguistic Sources,” in Antony Polonsky, ed., From Shtetl to Socialism, London: Littman Library, 1993, 3-18。

[7] Zbiór praw litewskich od roku 1389 do roku 1529 tudzież Rozprawy sejmowe o tychże prawach od roku 1544 do roku 1563 , Poznań: Drukarnia na Garbarach 45, 1841, 112. 犹太人的特权使他们获得保持他们的律法和宗教的特权，在社群事务中使用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特权，以及在没有城市公民身份的情况下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可查阅Jacob Goldberg,Jewish Privileges in the Polish Commonwealth, Jerusalem: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85, 1-40。

[8] 这一壮举在当代再次出现，1529年大公国法律于1960年在明斯克被翻译为俄语，苏联学者得以对此进行研究。之后他们声称这种语言肯定不是俄语，事实上是白俄罗斯语：K.I. Iablonskis, ed., Statut Velikogo Kniazhestva Litovskogo 1529 goda,Minsk: Akademiia nauk BSSR, 1960, 3-12。把斯拉夫官方语言作为另一种不同的语言来看待是最合理的。参见JonasŽmuidzinas, Commonwealth polono-lithuanien ou l'Union de Lublin, Paris: Mouton, 1978, 7982; Juliusz Bardach, "Od aktu w Krewie do Zare ̧czenia Wzajemnego Obojga Narodów," in Jerzy Kloczowski, et al., eds., Unia Lubelska i tradycje integracyjne w Europie środkowo-wschodniej, Lublin: IESW, 1999, 14-18; Stanislovas Lazutka, "Język Statutów Litewskich i Metryki Litewskiej," Lithuania, 1–2 (22-23), 1997, 26-33。

[9] 1566年法律序言由Augustinus Rotundus Mieleski于1576年写成，见Archiwum Komisji Prawniczej, Vol. 7, Cracow: Polska Akademia Umiejetnósci, 1900, xx; 也见Jürate Kiapene，"The Grand Duchy and the Grand Duk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Richard Butterworth, ed., The Polish-Lithuanian Monarchy in European Context,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86-87。

[10] Halina Dzerbina,Prava i siamia u Belarusi epokhi Renesansu, Minsk: Tekhnalohiia, 1997.

[11] 在文艺复兴之前，意大利语并不是意大利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直到13世纪，意大利作家才开始用母语代替拉丁语开始创作，促进了本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发展。

[12] Harvey Goldblatt, "The Emergence of Slavic National Languages," in Aldo Scaglione,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Languages, Ravenna: Loggo Editore, 1984, 125, 165.

[13] Karin Friedrich,The Other P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皇家普鲁士是波兰-立陶宛王国从条顿骑士团获得的领土所建立的省，直到1569年之前该地区一直享受充分自治。——译者注）

[14] 关于政治体系，Andrzej Kami ński, "The Szlachta of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in Ivo Banac and Paul Bushkovitch, eds., The Nobility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New Haven, Conn.: Yale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Publications, 1983, 17-46; 以及Mariusz Markiewicz, "The Functioning of the Monarchy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lectors of Saxony," in Butterwick, Polish-Lithuanian Monarchy, 172-192。也见Daniel Stone, The Polish-Lithuanian

State, 1386-1795,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15] 萨尔马提亚人起源于东欧，属印欧语系民族。鼎盛时期，其部落分布在西到维斯瓦河和多瑙河、东到伏尔加河、北到希柏里尔、南到黑海和里海的区域内。

[16] 关于卢布林联合编年史的简要评述有Bardach,Studia z ustroju i prawa, 11-18以及Žmuidzinas, Commonwealth polono-lithuanien, 143-151。关于1569年重要的俄语解释者有M.K. Liubavskii和I.I. Lappo。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方面的基本观点由Joachim Lelewel, Mykhailo Hrushevs'kyi, M.V. Dovnar-Zapolskii和Adolfas Šapoka呈现。两次大战间波兰方面研究卢布林联合的主要学者是Oskar Halecki和Stanislaw Kutrzeba，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方面的重要贡献者是V.I. Picheta，Francis Dvornik则持有摩拉维亚泛斯拉夫主义的观点。英语方面的介绍有Harry Dembkowski, The Union of Lublin,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2。

[17] 加尔文主义（Calvinism）是16世纪法国宗教改革家、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毕生的主张和实践，其宗派是基督教新教原始三教派之一。在现代神学论述中，加尔文主义常指“救赎预定论”和“救恩独作说”。加尔文认为教义应该回归《圣经》，他支持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

[18] 1387年，立陶宛异教徒家庭全部皈依天主教，但是大多数波雅尔依然是东正教教徒，并保持了两个多世纪的信仰。人们认为当宗教改革开始时，维尔纽斯的东正教教徒比天主教教徒多。

[19] Jerzy Ochma ński, “The National Idea in Lithuania,” in Ivo Banac and Frank Sysyn, eds., Concepts of Nationhood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Mas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1986, 312-313.

[20] 1577年后，彼得·斯特加关于新教和东正教的无数出版物是最好的证明。Pis- mawszystkie, 5vols. Warsaw: Ultima Thule, 1923-1930.

[21] 对立陶宛的捍卫见Rozmowa Polaka z Litwinem, Brest: Drukarnia Radziwil- lowska,1565。其作者在1549年拿到波兰王朝的年金时已经是一个“圆胖”（rotund）的人了，两年后他搬到了立陶宛。Maurycy Krupwicz, ed., Sobranie gosudarstvennykh i chastnykh aktov, kasaiushchikhsia istorii Litvy i soedinennykh s nei vladienii, Vilnius: Zavadzkago, 1858, 38-39; Marja Baryczowa, “Augustyn Rotundus Mieleski, wójt wileński, pierwszy historyk i apologeta Litwy,” Ateneum Wilenńskie, 11 (1936), 144. 罗顿都斯不太可能把自己看作一位文辞成熟（phrases bien arrondies）的学者。在古拉丁语

中，“rotundus”这个词的意思很可能是“成熟的”，这个词的这一含义可能最早出现在西塞罗的《论演说家》中，罗顿都斯看过这部作品。但是这个可能性在16世纪和在如今一样渺茫：罗顿都斯很可能只是胖。要理解近代早期的民族性和现代民族性的区别，我们要清楚每个单词的意思在何时改变了，在何时没有改变，“rotund”这个词在16世纪和在今天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波兰的”或“立陶宛的”在16世纪和今天的意思是不同的。

[22] 此处应指彼得·斯加卡最负盛名的圣徒言行录《圣人的生活》（Żywoty świętych）。

[23] Paul Bushkovitc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arly Modern Russia,” in Banac and Sysyn, Concepts of Nationhood, 356-357; Jaroslaw Pelenski, “The Origins of the Official Muscovite Claim to the ‘Kievan Inheritance,’”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 1 (1977), 48-50.

[24] Andrzej Kami ński, Republic vs.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25] 见图表1。一部编年体评论集也清楚地展示了这点：Vilenskaia arkheograficheskaia kommissia in the series “Akty, izdavaemye Vilenskoiu arkheograficheskoiu kommissieiu,”“Akty, izdavaemye Arkheograficheskoiu kommissieiu, vysochaishe uchrezhdennoiu v Vil’nie,” and “Akty, izdavaemye Vilen- skoiu kommissieiu dlia razbora drevnikh aktov”。

[26] Artūras Tereškinas, “Reconsidering the Third of May Constitution and the Rhetoric of Polish-Lithuanian Reforms,”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7, 4 (1996), 300. 也见Andrzej Walicki,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Nationhood,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9。关于波兰改革的启蒙辩论：Larry Wolff,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83。

[27] 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军队领导人，1794年担任波兰国家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领导了反抗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柯斯丘什科起义。

[28] 关于这个议题的介绍，请见Gershon David Hundert, “So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Poland,” in Polonsky, From Shtetl to Socialism, 19-25; M.J. Rosman, The Lords’ Jews, Cambridge, Mas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90, 1-22。常被引用的章节为Salo Wittmayer Baron,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vol. 1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29] Jacob Goldberg, “Privileges Granted to Jewish Communities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in Jewish Support,” in Chimen Abramsky, Maciej Jachimczyk, and Antony Polonsky, eds., The Jews in Poland, Oxford: Blackwell, 1986, 31-54; Daniel Beauvois, “Polish-Jewish relations in Russian territory,”同上书，81; Artur Eisenbach,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Jews in Poland, 1780-187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126-127, 158-160.

[30] 犹太定居界限区指1791年到1917年间俄罗斯帝国西部的区域，该区域的边界时有变动，帝国允许该犹太人永久定居在该区域内。

[31] 密茨凯维奇之后与一位犹太裔女性结婚。密茨凯维奇的出身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他在维尔那学习时的优秀教师莱莱韦尔（Joachim Lelewel，1786—1861）是当时最伟大的波兰历史学家，是一位德国贵族的儿子。对密茨凯维奇来说，民族性中的种族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一个人无法通过“揭露”他的父母或祖父母来确定“真实”的自己。关于密茨凯维奇的出身的争论见Anne Applebaum, Between East and West, London: Macmillan, 1995, 114122; Irena Grudzińska-Gross, “How Polish is Polishnes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14, 1 (2000), 5ff.; Neal Ascherson, Black Se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144ff。关于鞑靼人的清真寺见Jan Tyszkiewicz, Tatarzy na Litwie i w Polsce, Warsaw: PWN, 1989, 287。基础著作有Wiktor Weintraub, The Poetry of Adam Mickiewicz,The Hague: Mouton, 1954, 第14–15页讨论了这些问题。

[32] 在俄罗斯帝国，波兰语教育的拓展没有遍及犹太人。在维尔纽斯，是俄国人而非波兰人，为犹太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窗户。

[33] A. Bendzhius et al.,Istoriia Vil’niusskogo universiteta, Vilnius: Mokslas, 1979, 64-66; Daniel Beauvois, Szkolnictwo polskie na ziemiach litewsko-ruskich 1803-1832, vol. 1, Lublin:KUL, 1991, 37-39, 273-275. 俄国沙皇允许一位立陶宛波兰人追求自己的事业，这个例子多年来一直是波兰爱国主义的象征，这一点无可厚非。另一个例子是Michal Kleofas Ogiński（1765—1833），他所做的A小调波兰舞曲《向祖国告别》是波兰巴洛克时期曲目中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

[34] 考纳斯，旧称考诺（Kowno），今立陶宛第二大城市。

[35] 把密茨凯维奇关于失去立陶宛的诗句和普希金关于发现圣彼得堡的诗句做比较：“我们注定如此/为了打开欧洲的一扇窗户/为了牢牢地站在海边。”《叶甫盖尼·奥涅金》写于1832年，《塔杜施先生》写于1834年。普希金和密茨凯维奇是朋友。见Jerzy Tomaszewski, “Kresy wschodnie w polskiej my śli politycznej,” in

Wojciech Wrzeziński, ed., Między Polską etniczną i historyczną, Wrocław: Ossolineum, 1988; 97ff.; 及I.I. Svirida, Mezhdu Peterburgom, Varshavoi iVil’no, Moscow: OGI, 1999。

[36] Jacques Barzun,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14.

[37]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成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基础。

[38] Nina Taylor, “Adam Mickiewicz et la Lithuanie,” in Daniel Beauvois, ed.,Les confins de l’ancienne Pologne,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88, 70.

[39] N.N. Ulashchik,Predposylki krest’ianskoi reformy 1861 g. v Litve i Zapadnoi Belorus sii, Moscow: Nauka, 1965, 5 – 6.

[40] Jakób Gieysztor,Pami ̨etniki, Vol. 1, Vilnius: Bibljoteka Pamie ̨tników, 1913, 36, 61, 136.

[41] 康斯坦蒂·卡利诺夫斯基，19世纪作家、记者、律师和革命家。他是白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1863年反抗俄罗斯帝国的“一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42] 原版及俄语报纸，见K. Kalinovskii,Iz pechatnogo i rukopisnogo naslediia, Minsk: Belar us, 1988。又见Piotrłossowski and Zygmunt Młynarski, Rosjanie, Białorusini, i Ukraińcy w Pow staniu Styczniowym, Wroclaw: Ossolineum, 1959, 166-186; John Stanley, “The Birth of a Nation,” in Béla Király, ed., The Crucial Decade, New York: Brooklyn College Press, 110-119。

[43] 安塔纳斯·马可维西斯（1828—1863），立陶宛神父，也是1863年“一月起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

[44] Egidijus Aleksandravičius, “Political Goals of Lithuanians, 1883-1918,”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3, 3 (1992), 230–231; Nerijus Udrenas, “Book, Bread, Cross, and Whip: The Construction of Lithuanian Identity within Imperial Russ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Brandeis University, 2000.

第2章

立陶宛！我的祖国！（1863—1914）

就像蝴蝶淹没在金色的琥珀中

亲爱的，让我们保持原样，恰似我们曾经那样。

——亚当·密茨凯维奇《康拉德·瓦伦罗德》（圣彼得堡，1828）

1863年后的近代政治意味着摆脱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重负，接受农民及其用以界定民族的语言。这一点首先在原立陶宛大公国激进的西北部地区变得清晰明了，1863年起义失败加速了以语言为界定条件的现代立陶宛民族主义的发展。农民解放的巨变催生出农业现代化，并最终创造了一个繁荣的立陶宛农民新阶层。[1]俄罗斯帝国决定将立陶宛学生引到圣彼得堡而不是华沙，以培育一批新的世俗精英。学校参差不齐的去波兰化过程导致了一种意外且彼此相似的民族建设后果，因为俄国文化对立陶宛学生拥有的吸引力，要比波兰文化曾拥有过的要小得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崛起的立陶宛农民在学校学会了阅读母语，那些说波兰语的、失势的上层阶级开始重新学习立陶宛语，在俄国大学受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和医生，以及罗马天主教神父——他们共同塑造了立陶宛民族运动。[2]立陶宛民族活动家认为1863年民族主义起义的失败是由于波兰的原因，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发展出一套更好的民族主义战略。相比武装叛乱，这批新生代将注意力转向民族文化。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和1863年后波兰主流爱国主义思潮相似，波兰实证主义者建议通过实际的“有机工作”来建立民族团体。[3]对波兰人来说，这种“基础工作”意味着加强精英民族团体的大众基础，立陶宛人则发现要做到这些，首先要完成自身的民族化。

立陶宛人的民族基础却被厚重的历史埋葬了。几个世纪以来，立陶宛语从未被列为某种政治语言。立陶宛大公也从未出版过立陶宛语书籍。最后一任熟知立陶宛语的大公在哥伦布发现美洲那年就去世了。不仅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传统是以波兰语和斯拉夫官方语言（和白俄罗斯语类似）记录下来的，立陶宛农民也非常希望跟随他们的神父和国王的脚步。在整个19世纪中，说立陶宛语的农民逐渐被同化到白俄罗斯语的阵营，这为之后朝波兰语或俄语进一步同化提供了斯拉夫文化的基础。在一些农民家庭中，祖父辈说立陶宛语，父辈说白俄罗斯语，子孙这一辈说波兰语：一个家庭就

是历史变革的缩影，这也正是立陶宛活动家希望改变的。富裕的农民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学习波兰语的学校（即使波兰语不是教学语言，至少也是校园中有声望的象征），这直接使他们的孩子波兰化。显然，民族忠诚岌岌可危，立陶宛活动家因此坚持一种激进的修辞。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的波兰语比立陶宛语说得和写得更好，民族复兴的紧迫感由此而来。

作为祖国的立陶宛种族

立陶宛活动家以一个想象中的立陶宛大公国作为参考，以解决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他们无视1569—1795年确凿的、连续的历史传统，转而相信1569年与波兰订立卢布林联合前波兰和维尔纽斯的中世纪迷思。活动家看重一种在近代早期的大公看来无足轻重的语言（立陶宛语），强调一个在大公国时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说立陶宛语的农民）的重要性，屈服于一种出于异教信仰的浪漫主义怀旧。他们将1569年和波兰的联合描绘成专制君主对农民的压迫，而当代的“国王”（波兰-立陶宛上层阶级）则是民族的背叛者。正如对民族历史的重新解释是为了应对想象的民族遇到的真实问题，这种观念的偏颇源于许多立陶宛民族活动家遭遇的社会困境。

如果立陶宛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它一定是由农民组成的民族。因此，农民共同体的领导者一定会在语言和历史的脆弱基础上来质疑社会上层人士。就算没有立即带来必要的自信，废除农奴制以及向农民子弟敞开学校大门也为农民提供了政治机会。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苏瓦乌基（Suvalkai）地区，拿破仑在1807年废除了当地的农奴制。1863年后对波兰语学校进行“俄国化”（The “Russification”）是又一项重要举措。马里扬泊列（Mariampol）高中曾是1863年波兰化的产物，它在1867年成了一所帝国学校。学校禁止教授波兰语，立陶宛语被加入课程大纲。马里扬泊列高中造就了两位最重要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Jonas Basanavičius）[4]和文采斯·库迪尔卡（Vincas Kudirka）[5]。他们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从小就是聪明的孩子，两人都曾被寄予希望成为天主教神父，但是他们在俄国教育系统中找到了更好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863年后俄国当局企图遏制波兰在立陶宛的影响，无意中为建立在立陶宛语基础上的现代立陶宛民族运动创造了社会空间。

实际上，1863年后开始沿用的历史和语言规则在很久之前就存在了。特奥多尔·纳尔布特（Teodor Narbutt）[6]提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明，他在1835年至1841年间用波兰语写作出版了大量的立陶宛历史著作。在4000页巨著的最后，纳尔布特总结说，立陶宛历史在1569年就“停止”了，并且象征性地在之后登基的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的坟墓前折断了他的笔。[7]纳尔布特的巨大成就在于，他为一种政治观点——现代立陶宛历史应该从中世纪而不是从近代早期的故国开始描述——提供了学术基础。在19世

纪，这种观点比任何其他立陶宛历史著作被引用的频率都更高。[8]事实上，西蒙纳斯·道坎塔斯（Simonas Daukantas）[9]在更早之前就使现代立陶宛民族主义形成了一个体系。道坎纳斯是密茨凯维奇在维尔那大学的同学，同密茨凯维奇一样，他也着迷于中世纪立陶宛。道坎纳斯似乎第一个将1569年立陶宛与波兰的联合视为一种投降条约，并认为波兰语的扩张是对本地文化的破坏。1822年，他将这些主张写进了第一本用立陶宛语写作的立陶宛历史著作。尽管这本书到1929年才出版，但另一份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在1845年就已出现。

立陶宛历史学家创造了这种新的历史划分法，在他们的划分中，中世纪历史充满荣光，而近代早期历史是可耻的，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为这段光荣历史增色不少。他的史诗著作《格拉日娜》（*Grażyna*，1823）和《康拉德·瓦伦罗德》（*Konrad Wallenrod*，1828）都将背景设在中世纪立陶宛。有趣的是，道坎纳斯和密茨凯维奇无意中的一次合作也为中世纪历史的理想化提供了另一基础。1822年，道坎纳斯将密茨凯维奇年轻时的一组诗歌习作从波兰语翻译到立陶宛语，很明显他将这组诗歌误解为真实的编年史选段。之后，道坎纳斯又将密茨凯维奇关于立陶宛公主日薇拉（Żywila）的故事纳入历史写作中。当1884年日薇拉故事的著作权归属于密茨凯维奇时，这个故事在立陶宛民族历史中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0]日薇拉的“揭秘”并未改变什么。另一位虚构的公主“格拉日娜”也是密茨凯维奇杜撰的，“格拉日娜”这个名字在19世纪末成了常见的立陶宛女孩名。但是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和他的立陶宛现代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密茨凯维奇在《康拉德·瓦伦罗德》前言的最后引用了诗人席勒的一句话：“诗歌的永恒必腐蚀在真实生活中。”在密茨凯维奇的观点中，古代立陶宛确已消亡，人们应该怀念的对象——就像《塔杜施先生》中所写的——应该是加入波兰王国的近代早期立陶宛。然而，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却跟随着道坎纳斯和纳尔布特的脚步，他们认为立陶宛历史终结于1569年，所以人们必须复兴的是中世纪立陶宛。这就是最早的现代立陶宛语著作所传达的历史模型。

1883年，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决定创办一家立陶宛语报纸。巴萨纳维丘斯是马里扬泊列高中的毕业生，在他求学时，这所高中的教学语言从波兰语变成了俄语，并且增加了立陶宛语课程。他是众多得以在帝国大学学习的立陶宛年轻人之一，这段经历使他翻译了更多的文摘，并且理清了他关于立陶宛的观点。在莫斯科，他师从法语教授，和保加利亚民族活动家成为朋友，还出版了用波兰语写成的立陶宛历史书。1879年，他完成了药学专业的学习并移民保加利亚，在那里成了一名医生，同时继续他的立陶宛历史研究。这些经历促使他于1882年来到布拉格，他在那里遇到了捷克民族运动的参与者。和他的保加利亚朋友一样，他的捷克朋友也强调中世纪庄严宏伟的历史，不断解释着近代早期的民族失败。正是在布拉格巴萨纳

维丘斯决定创办一家立陶宛语评论报纸。他在布拉格看到的这幅从黑暗中觉醒的民族图景打动了他，巴萨纳维丘斯决定将这份报纸命名为“黎明”（*Aušra*）。[11]

1883年，巴萨纳维丘斯计划和一些同胞在德国印报纸。虽然立陶宛语在俄罗斯帝国境内是合法的，但是必须以西里尔字母[12]印刷。在德国，立陶宛活动家可以出版立陶宛语和以拉丁字母拼写的作品，然后偷偷带入俄国境内。巴萨纳维丘斯在布拉格编辑了最初几期报纸，将德国的出版工作委托给一位叫作尤尔吉斯·米克舍斯（Jurgis Mikšas）的人。在一次恋爱危机后，米克舍斯不得不离开德国，他的工作由约纳斯·什柳帕斯（Jonas Šliupas）接替，什柳帕斯在和波兰共产主义政党“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密谋政治中获得激励，此时什柳帕斯（1861—1944）正在被普鲁士驱逐期间。对1569年以前的立陶宛历史和独立于波兰的立陶宛大公国形象的研究，因为这40期《黎明》而变得流行起来。这全都因为道坎纳斯和纳尔布特的研究以及密茨凯维奇的诗歌。[13]

不出意外，《黎明》跳过近代早期立陶宛历史的决定——从中世纪历史直接到现代——是追随了同时期的捷克民族活动家发展出的框架。1569年卢布林联合对立陶宛人的意义正如1621年白山战役[14]对捷克人的意义，即标志着民族生命终结的象征，外族入侵是罪魁祸首，中世纪的荣光应被珍惜，并以此解释活动家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人民大众的地位应该获得提升的理由。[15]就像卢布林联合（据说）根除了立陶宛贵族，白山战役的失败（据说）亦迫使捷克贵族流浪外乡。因此民族复兴需要新鲜血液，而我们只能在普通民众身上重振民族传统。在这两个例子中，这种中世纪-现代历史分析最先在近代早期的高雅文化语言中发展出来，即捷克人所说的德语和立陶宛人所说的波兰语。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将这些观点传达给人民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这同样面临着重重阻碍。

历史、美和力量

19世纪80年代，《黎明》以当时的方言立陶宛语出版。我们已经知道，“黎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弱小而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的一种比喻：曾经的消亡只是沉睡，当世界天翻地覆，长夜回归白昼，沉睡者将被唤醒。然而，以立陶宛语写作来表达这种理念的企图会带来另一个更深层的可能性。唤醒沉睡民族的概念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可能性，就是通过夸大他者的成就来美化落后者。举例而言，立陶宛字母其实只被发明了一次。[16]然而，那些希望将方言演讲编纂成书面语言的民族活动家必须再发明一次字母，以便和普通民众建立联系，这是充满民族德性的必要实践。这次我们不仅要关注“黎明”的意思，还要看看“Aušra”的拼写。在历史书中，在拼写这个单词时使用了字母“š”，实际上1883年它的拼法应该

是“Auszra”。区别在于，当时立陶宛语的拼写常常参照波兰语正写法，波兰语中“sz”发音同英语中“sh”的发音，而捷克语正写法中“š”发音同英语中“sh”的发音，报纸编辑想要他们的语言读起来少些波兰语烙印。这种拼写调整和在沙俄境内出版毫无关系：两种语言都使用罗马字母拼写，因此都是不合法的。无论是报纸名称是“Aušra”还是“Auszra”，都会被沙俄警察没收查抄，只有叫作“Аушра”才被允许。因此，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关心的仅仅是使立陶宛文化从波兰影响下脱离出来。

立陶宛语借鉴捷克语，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反讽意味。（1）在中世纪，波兰和立陶宛两国联合之前，波兰语正是在捷克语的影响下成为一门可书写的语言。[17]近代早期进入立陶宛大公国的波兰语，正式借鉴了旧捷克语（Old Czech）的书写形式。几个世纪后，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从现代捷克语中拷贝的语言符号，其实是现代捷克人为了避免他们的语言中存在德语辅音组合和特定的字母而改造过的。在这次改造后，现代捷克语和波兰语的区别也变大了，因为波兰语保留了旧捷克语中的拼写元素以及用辅音组合替代单音节的习惯。捷克语改造后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让很多捷克泛斯拉夫主义者深感惋惜，而这正是吸引立陶宛人的地方，因为他们主要的文化对手是波兰文化。举例而言，传统上在捷克语、波兰语和立陶宛中都用“w”代替“v”的发音，这和德语一样。在语言改造后，捷克语和立陶宛语直接使用“v”。类似地，这三种语言以前都用“cz”代替“ch”；在改造后，捷克语和立陶宛语直接使用“č”。因此，立陶宛人用这种新捷克语正写法取代了和波兰文化纠缠密切的旧立陶宛语。

（2）但是由于俄罗斯帝国禁止立陶宛语书写中出现拉丁字母，在维尔纽斯，立陶宛人两种语言都不能使用。所以，在德国东普鲁士边界处，立陶宛人用捷克字母来书写（或多或少）改造后的立陶宛语。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一种原本目的是限制德国文化传播的字母体系，又再次回到了德国。（3）然而，还有更深层的讽刺。借鉴了捷克语的立陶宛语正写法中，部分写法是分别用“š”和“č”代替“sz”和“cz”。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August Schleicher）多年来一直倡议另一部分的改造，即放弃波兰语中的“ł”，采用“v”代替波兰语中的“w”。所以，最终一位德国语言学家支持了这种捷克语借鉴，如此沙俄境内的立陶宛语终于可以摆脱波兰语的影响。（4）德国语言学研究中兴起的对立陶宛语的兴趣，源于其本身的浪漫主义学术转向，部分目的是为了使德国文化摆脱法国文化的影响。这就好比在一个摆满了镜子的屋子里走动，我们会发现在19世纪末的欧洲，民族性观念反射出一些奇怪的观点，甚至连地方的民族主义者也希望自己的形象是独特、纯粹和美好的。同时，我们也能在其中看到18世纪法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形象，在莱茵河以东的人们看来，法国是政治哲学的源头和民族国家的典范。[18]

在欧洲这样一个地方，文学被普遍视为国家地位的象征，人们对语言内在价值的加倍关注，使立陶宛文学长期缺位这一事实变得更加费解。巴萨纳维丘斯坚持认为，语言上的尽善尽美可以证明古立陶宛人已经处于文明之中。由于没有什么留存下来的世俗文学可以支撑他的观点，语言的悠久历史成了代替品。就像尽管近代早期发生了经济衰退，但多亏这一点，托斯卡纳小镇上的中世纪塔楼才能幸存，尽管近代早期的文学中看不到立陶宛语作品，但多亏这一点，立陶宛语才能保留下那些古朴的价值。波兰语——而非立陶宛——经受了拉丁语、德语和法语新词的冲击；而且，立陶宛语极度复杂的语法也通过农民们难懂的谈话保留下来。密茨凯维奇曾说立陶宛语是“在欧洲大陆上使用的最古老语言”。1843年，他将立陶宛语比作梵语（立陶宛人好比一支失落的印度部落），这比立陶宛历史学家纳尔布特早了八年，后者在他的立陶宛历史巨著的第一卷中，表达过立陶宛语和梵语的联系。纳尔布特请求一些德国权威学者的帮助，比如雅各布·格林[19]（1785—1863），他是一位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同时也致力于收集民间故事。道坎纳斯在他1845年的研究中，也引用了语言学家施莱歇的著作。[20]密茨凯维奇对古立陶宛形象的绘制，也部分借鉴了德国文化的来源，比如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关于普鲁士历史的作品。[21]为了证明立陶宛语的独特性，道坎纳斯、纳尔布特和密茨凯维奇都从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民间文化以及德国学者的成果中获得资源。此外，密茨凯维奇在流亡巴黎期间很容易和法国历史学家交流，比如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22]。米什莱在担任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时，在讲座中表达了关于立陶宛历史地位的主张。[23]德国人和法国人有关立陶宛语的结论，之后变成了立陶宛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这在我们看来有些讽刺。然而，波罗的海立陶宛方言在与高雅文化完全隔离了数个世纪后得以保留，如果没有这个简单粗暴的事实，这些学术结论就是无稽之谈。

在19世纪末期，当立陶宛人人数还不足以成立一个国家，当活动家还停留在与近代早期文化的联系中，活动家觉得有必要证明新旧文化之间可以勾连起来。整个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者们认可这样一种关于民族性的共同标准：高雅文化是必要的，文学是一种高雅文化，但是古老文化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在美产生之前的历史，完全没有美可言。在接受了格林、纳尔布特和密茨凯维奇关于立陶宛语悠久历史的说法后，《黎明》一代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一同证明了他们的语言可以承受现代文字的重量。立陶宛作家接受密茨凯维奇的预设，即高雅文化和政治命运紧密相连，他们把密茨凯维奇的诗歌翻译成立陶宛语，为了证明他关于波兰语是立陶宛语的高级形态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如果立陶宛语可以表现密茨凯维奇卓越的诗歌，那么立陶宛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拥有光明未来的独立民族。民族复兴的文学柔术表面上充满了对波兰文化的敬意，实际上揭示了立陶宛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为了跳过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人们花费了巨

大的努力，历史终将成为美。[24]

这种美说服了他们周围的波兰人，也说服了在立陶宛人中的波兰人。为了掀起一场民族运动，为了让美变成力量，民族活动家之外的人也必须被说服。比巴萨纳维丘斯略年轻几岁的诗人文采斯·库迪尔卡在历史和美之间找到了一种向人民传达的方式。他的故事很复杂，与其说是对近代早期波兰遗产的排斥，不如说是一种融合。尽管库迪尔卡和巴萨纳维丘斯一样也在马里扬泊列高中学习立陶宛语，但这所学校对他主要影响是使他波兰化了。我们来看看他对学生时代的回忆："我的自卫本能告诉我不要说立陶宛语，确保没人注意到我父亲穿着一件粗糙的农民外套、只会说立陶宛语。我尽全力只说波兰语，尽管我说得很差。当我的父亲和其他亲戚来看我，如果我发现有同学或其他绅士在看，我就会躲开家人们；只有在独处或在外头时，我才会与他们和气地说话。我把自己看作一个波兰人、一个绅士，我已经被这种波兰精神所感染。"[25]有人可能会问，为何马里扬泊列高中对巴萨纳维丘斯和库迪尔卡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在学生时代就成了一个自觉的立陶宛人，后者却把自己看作波兰人。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俄罗斯帝国政策中最细微的细节有多重要。巴萨纳维丘斯比库迪尔卡年长几岁，他在军事法时期就读于马里扬泊列，那时俄国人以武力禁止人们说波兰语。当1872年军事法取消，此时正好是库迪尔卡入学第二年，波兰语重新回归立陶宛的课程大纲。甚至马里扬泊列，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再次成为波兰化的基地。

和巴萨纳维丘斯一样，库迪尔卡离开立陶宛到俄罗斯帝国大学接受大学教育。但是，库迪尔卡在华沙学习，在那里他把自己当成了波兰人，在波兰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接受了政治洗礼。最终，他和波兰的长期结缘却促成了立陶宛人的事业。巴萨纳维丘斯在保加利亚和捷克民族复兴主义者那里接受教导，而库迪尔卡不是简单地拒绝波兰遗产，而是选择与之融合。巴萨纳维丘斯最出色的一击就是忽略近代早期历史的复杂性，如同捷克人和保加利亚人一般为中世纪历史增添荣耀。库迪尔卡1889年从华沙回来后就接受了现代立陶宛观念，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对近代早期的波兰理念加以利用。他的贡献不仅是将历史上的立陶宛与波兰分离开来，就像巴萨纳维丘斯所做的那样，还将如今的立陶宛当作平等的民族存在。尽管过程中遭遇了很多波折和超出理性的尝试，但对民族地位的追求是始终贯穿着的。追求和展示文化的信念激励着库迪尔卡以一位绅士的身份做出朝气蓬勃的尝试；在他步入中年时，这个信念支撑他投身更大的运动，帮助农民阶层参与政治，此举使他和他的出身都变得高贵起来。他在19世纪70年代对波兰的迷恋，为他在90年代完成挑战提供了能量。他在波兰语方面的渊博知识，使他有能力将密茨凯维奇的作品用于建立一个由农民组成的民族。库迪尔卡在华沙发现，波兰民族活动家正在把密茨凯维奇变成一个现代波兰爱国者。对此库迪尔卡的回应是将密茨凯维奇的杰出作品转变为现代立陶

宛爱国主义的源泉。密茨凯维奇诗歌中孤零零的开头“立陶宛！我的祖国！”在库迪尔卡这里翻译为充满希望的语言：“立陶宛！我们的祖国！”1898年，库迪尔卡在一首诗中化用了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的第一句话，这首诗后来成了立陶宛国歌。[26]

对密茨凯维奇之后的两代人来说，曾经的语词有了新的含义。和密茨凯维奇不同，库迪尔卡相信那个尚不确定的祖国就是这个说立陶宛语的民族命中注定的国家。在这种理解下，异质的变成了原初的，如果能和这套说辞相匹配，那么密茨凯维奇经过翻译和略微改动的语言，自然成了立陶宛民族运动的箴言。除了讽刺意味，这一切还意味着：关于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长期的浪漫主义观念，变成了现代民族形式中的某一种，1830年起义失败造就了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的成熟；1863年起义失败则使民族主义运动分裂为不同支流，1863年后库迪尔卡和其他立陶宛浪漫主义者希望“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创造一个新世界”。对他们来说，波兰-立陶宛王国已成废墟。

作为祖国的立陶宛大公国

1863年为立陶宛民族性划下了一个休止符。在波兰和白俄罗斯的例子中，我们更难分清何时是现代民族主义的黎明，何时是近代早期大公国的薄暮。甚至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立陶宛现代活动家定义了立陶宛独立的历史和民族后，说立陶宛语的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还是将“立陶宛”视作一个地理上和政治上的概念。在他们的理解里，要成为立陶宛人就要退回立陶宛大公国的传统。除此以外，很多人发现了一个不算重要的民族问题：许多波兰上层阶级都存在波兰语中所说的“tutejszość”（“地方性”，如果不是逐字翻译，更确切的意思是“注重地方性的”），这个词意味着当遇到看起来与地方现实和传统不相符的意识形态时，人们会警觉地反对。[27]维尔尼亚周围的农民“注重地方性”，这正是对复杂的语言同化模式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避免受说波兰语的上层阶级或沙俄官员约束的圆滑方式。[28]在19世纪晚期，和密茨凯维奇的学生时代一样，这些地区人们广泛接受波兰语作为交流方式的优越性。[29]

甚至在1863年起义失败后，有政治抱负的上层人士依然努力使大公国的历史传统适应现代政治。其中，践行这一理念的最重要人物就是波兰革命家、政治家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1867—1935），他的父母都来自优越的立陶宛贵族家庭。[30]毕苏斯基在维日诺的俄国学校学习、成长。在西伯利亚流亡过后，他回到了立陶宛，在19世纪90年代的维日诺开始了自己作为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生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是促成波兰于1918年建国、之后兼并维日诺的最重要的人。他的爱国主义不是建立在现代种族意义上或语言学意义上的对波兰的定义，而是出于对立陶宛大

公国共和理念的怀念，他尤为反对历史上专断俄国的主张。毕苏斯基称自己是立陶宛人，他会说家乡的波兰方言、乡村人民说的白俄罗斯语和流放西伯利亚时学会的粗略俄语。正如我们所见，他的盟友为他作为立陶宛人的失败做担保，正是这些盟友给予了他作为波兰人的成功。[31]

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对立陶宛大公国的兴趣，以及他们所持的社会主义联邦制主义和毕苏斯基的观念不谋而合。然而，那些以“白俄罗斯”这个新名字来寻求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人们，却被他们对近代早期波兰性的认同限制了。波兰语作为当地的文化语言已有300年历史，它的地位为当地罗马天主教精英家庭和罗马天主教会所维护，而且得到了西部地区数百万说波兰语人民的支持。立陶宛语虽然在地位上无法和波兰语媲美，但作为不可动摇的波罗的海语言脱颖而出。说立陶宛语的人口虽然在缩减，但是他们比说白俄罗斯语的人能得到更好的地缘庇护。白俄罗斯的地位最微妙：未经编纂的、地位低下的斯拉夫方言，在词法上介于波兰语和俄语之间，使用者处于波兰文化和沙俄权力的控制下。说白俄罗斯语的农民将波兰语（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有俄语）视作有学识的语言，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白俄罗斯语则是普通大众之间简单交流的语言。要超越农民阶级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就是要说波兰语或俄语，成为波兰人或俄国人。[32]对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如此珍贵的语言灵活性，对希望促成以白俄罗斯语为民族界定的现代民族主义者来说却是负担。

那么，我们为何要逼迫自己进入如此狭窄的领域？为何要关注说白俄罗斯语的人们和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即使他们对维尔尼亚的所有权声明并不会被严肃对待，即使现代白俄罗斯民族还未产生？大公国传统的白俄罗斯分支警示我们不要忽略那些危险思潮，即认为过去的语言或“种族”群体就是现有民族群体的祖先，这种想法犹如在现代性的魔法下变得栩栩如生的假人。在已有现代民族的情况下，这些民族的历史学家会发现要“证明”他们继承自某些“种族群体”是很容易的。因此，白俄罗斯人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测试。我们现在已知在某个未有定论的区域内有一个最大的“种族群体”。根据俄罗斯帝国在1897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维那省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口比说其他语言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在维那、明斯克、格罗德诺（Grodno）、莫吉廖夫（Mogilev）和维捷布斯克（Vitebsk）几个省，与历史上立陶宛领土相邻的地区，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20世纪，这个“种族群体”却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与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的成功放在一起看，白俄罗斯人的失败帮助我们认识到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必需的。如果他们的成功只是由于对立陶宛大公国传统的忠诚，或者是因为说某种语言的人口数量，那么白俄罗斯人原本会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希望。白俄罗斯人的失败是民族推论无法适用的、社会和政治的偶然现象，因此值得历史学关注。[33]

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祖国？

诗人文森特·迪南-马尔钦克维奇（Vincent Dunin-Marcinkievič，1807—1884）曾用优美的语言表达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希望。迪南-马尔钦克维奇出生于一个立陶宛-波兰贵族小家庭，他在彼得堡接受教育。1840年，他以一出波兰语-白俄罗斯语喜歌剧在维尔尼亚首次登场，这部歌剧是与作曲家斯坦尼斯拉夫·莫纽什科（Stanisław Moniuszko）[34]一起完成的。[35]1859年，迪南-马尔钦克维奇完成了将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翻译为白俄罗斯语的工作。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一样，迪南-马尔钦克维奇想当然地认为，方言获得尊严的吉兆就是它与波兰语之间地位的平等，要证明这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用方言翻译波兰文学。他真切地感受到斯拉夫文学语言对两者的压力：据他的解释说，《塔杜施先生》的俄语译本而不是波兰语原版促使他开始了将该书翻译为白俄罗斯语的工作。和立陶宛人一样，迪南-马尔钦克维奇很享受可以说是来自诗人本人的支持。密茨凯维奇曾说白俄罗斯语是“最丰富和最纯粹的古老语词源头”；迪南-马尔钦克维奇想通过将密茨凯维奇的小说《白俄罗斯绅士的》翻译为“白俄罗斯农民”也能阅读的语言来证明这点。[36]这真是非常雄心勃勃的想法，因为原诗篇幅极长，故事优美而复杂，而白俄罗斯方言还未经编纂。尽管白俄罗斯-鲁塞尼亚语在16世纪曾为书面语言，但是1569年波兰语获得胜利后，前者几乎很少用于书写。

初始工作已经开始了：扬·切乔特（Jan Czeczot或Jan Chachot，1796—1847）将白俄罗斯民谣翻译为波兰语。切乔特曾与密茨凯维奇一起在维日诺学习，也是密茨凯维奇秘密社团的一员，他们是一生的挚友。密茨凯维奇曾将白俄罗斯传统民谣改编为《祖先的前夜》（*Forefathers' Eve*，1822年和1832年的两部诗选集），他还在《塔杜施先生》中描绘了生活在说白俄罗斯语的土地上的波兰上层阶级，而他的朋友切乔特则收集了各种民谣歌曲，并将它们改编为丰富多彩的波兰文学语言。[37]从实际操作来看，切乔特的计划远比迪南-马尔钦克维奇的要容易得多。在一个非常讲究地位社会里，把民间文化翻译成文学语言是一回事，把文学杰作翻译成农民语言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人从猪圈里带回一颗沾满泥土的珍珠，放在文化人面前，他们也许会为它着迷，但如果他们发现有人把珍珠扔在猪面前，就不见得会如此了。

地位带来的难题也横亘在白俄罗斯爱国者面前。他们中很少有人真正看得起白俄罗斯农民。与密茨凯维奇和切乔特一样，迪南-马尔钦克维奇接受的还是近代早期王国式的爱国主义，将波兰语看成政治和文化语言。同时，迪南-马尔钦克维奇也意识到波兰语即将在一种新的政治形态中发挥新的作用。无论密茨凯维奇的初衷如何，但他以波兰语创作诗歌的事实实际上加强了一种以语言（种族）为界定的波兰民族主义。[38]在波兰，波兰语的

地位“下降了”，而白俄罗斯爱国者希望能“提高”白俄罗斯语在白俄罗斯的地位。迪南-马尔钦克维奇知道，《塔杜施先生》的故事发生在白俄罗斯语的方言背景下，他希望能提高这种语言的地位，帮助那些生活在密茨凯维奇的立陶宛中的白俄罗斯人。

第二类难题出现在现实政治中，而作家们不得不在其中生活和工作。在波兰人可以出版原版《塔杜施先生》、俄语译本也能流通的情况下，俄国审查者以迪南-马尔钦克维奇的译作使用拉丁字母而非西里尔字母为由，没收了他的所有译作。[39]那时候官方并未禁止白俄罗斯语，只是不允许以拉丁（波兰）字母书写白俄罗斯语。真正的问题是迪南-马尔钦克维奇的白俄罗斯语译本的标题就是“Pan Tadeusz”，和波兰语原文一模一样，而不是和俄语译文相同的“Пан Тадеуш”。立陶宛活动家通过和在德国的同胞合作来避开这种问题，但是迪南-马尔钦克维奇没有这样的办法，那时所有白俄罗斯人都住在俄罗斯帝国境内。那时已有勇敢的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那些方言原本可以变成一门书写语言，原本有数百万人有机会学习如何阅读这门语言。但是在19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人只会白俄罗斯语，没有面向白俄罗斯人的出版途径，白俄罗斯语书籍也没有市场。

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白俄罗斯？

很明显，问题在于俄罗斯帝国政策是根植于立陶宛大公国留下的波兰和罗马天主教遗产，而这正是白俄罗斯人期望复兴的传统。首先，俄国官方是支持大公国遗留的体制的。教宗克雷芒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1773年禁止耶稣会的活动，但耶稣会被允许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传教。在1820年沙俄颁布禁止令之前，耶稣会办的学院、学校和印刷出版机构主要通行语言是波兰语。维尔那大学（前身是耶稣会于1579年建立的学院）和维尔那学区使用的都是波兰语，一直持续到1832年。直到1840年，立陶宛大公国1588年颁布的法令依然有效。尽管法令是以斯拉夫官方语言写成，这种语言和白俄罗斯语很相似，贵族参与的当地议会（dietines）和司法审讯的语言都是波兰语。最初，沙俄的统治在宗教、教育和法律领域保留了立陶宛大公国留存的波兰文明，这一切并没有看起来的那样怪异。沙皇亚历山大的统治与今日波兰——俄国历史的现代民族主义版本大相径庭，这块民族主义的棱镜是1863年后才嵌入的。19世纪初期，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选派地方精英，而非大众动员，亚历山大相信启蒙运动奠定的基本原则——就像他的波兰朋友恰尔托雷斯基教给他的那样——是吸引精英们加入俄罗斯帝国最坚实的基础。[40]

19世纪的旧立陶宛和18世纪很像：波兰政治理念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是波兰文化却大步向前。这正是米特罗凡·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Mitrofan Dovnar-Zapolski，1867—1934）——一位来自维尔尼亚地区小贵族家庭

的白俄罗斯历史学家——称亚历山大的俄国政策是“波兰化”（Polonization）的原因。[41]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出生于1863年后，他目睹了如火如荼但互不相关的民族主义事件，但他依然高度强调1863年前波兰文化在白俄罗斯土地上的持续影响。即便在1830—1831年起义失败后，现在我们称为白俄罗斯人的贵族们仍可以毫无困难地参与波兰和沙俄政治，而不必再留心他们周围农民的语言和风俗习惯。[42]毫无疑问，1840年大公国法令被取消后，白俄罗斯贵族的传统地位骤降，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下降了不少。1863年后，一些贵族转向立陶宛大众民族的阵营，另一些则加入了白俄罗斯大众民族的阵营。他们再次面临一个制度性难题，从表面上来看这又是沙俄统治的结果。

半个世纪内，沙俄政策允许白俄罗斯上层人士向波兰高雅文化靠近，这样做的结果是抽离了独立的白俄罗斯民族这一流行观念的宗教基础。当波兰-立陶宛王国于1795年最后一次被瓜分时，立陶宛公国内大约五分之四的农民是东仪天主教会[43]信徒（Uniates）。[44]1839年，这些地区的东仪天主教会被东正教会合并。当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以罗马天主教作为区别于沙俄的标志时，白俄罗斯的活动家只能徒然地惋惜失去了“他们”的东仪天主教会。自1863年起义后，白俄罗斯爱国者一直为东仪天主教会的命运扼腕叹息。[45]然而，1839年时东仪天主教会远远不能成为白俄罗斯人的民族信仰。这一教派是为波兰-立陶宛王国所建，其教会语言是波兰语。近200年来，教会的统治层从未真正使用过当地方言。尽管最初从波兰语转到俄语的过程困难而痛苦，但实际上等于从一种外来书面语言转到另一种。诚然，东仪天主教会在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成了民族信仰，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一个多世纪的国家支持，以及当时与俄罗斯帝国竞争的国际环境。如果东仪天主教会能在白俄罗斯幸存下来，它也许会成为白俄罗斯的民族信仰，但这需要白俄罗斯与近代早期传统彻底决裂，而不是继续延续。（见65页图表1。）[46]

种族意义上或历史意义上的立陶宛？

1863年起义失败的余波为立陶宛民族运动开放了一些社会空间，却消除了白俄罗斯人原本就有限的空间。1863年后，活动家以立陶宛人和他们所说的语言为基础，宣扬作为种族观念的立陶宛，他们享受着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某种优势；而以波兰-立陶宛王国传统为基础，宣扬作为精英观念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方言的活动家却处于明显劣势。虽然1863年起义的后果创造了新一代的现代立陶宛活动家，但它使白俄罗斯爱国者恰恰处于迷人的波兰文化和渐增的沙俄权力的夹缝中。想想康斯坦蒂·卡利诺夫斯基，这位说波兰语的立陶宛贵族在1863年与农民阶层结盟，他的宣传册上写的是白俄罗斯语。在后1863年的大众政治时代，他向普通大众发出的诉求颇有前景，但是用白俄罗斯语作为发出诉求的方式这一点却不尽然。1863年起义

后，白俄罗斯人不能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以白俄罗斯语出版。1905年前，白俄罗斯民族复兴的阵营在遥远的克拉科夫、波森（Posen）和维也纳。[47]弗兰切斯查克·巴甫舍维奇（Frantsishak Bahushevich），维尔尼亚地区小贵族一家的儿子，在19世纪90年代于克拉科夫出版了他的白俄罗斯语诗歌——以白俄罗斯语和波兰正写法写作。即使（在1905年后）当白俄罗斯语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已经合法化，波兰字母表依然在白俄罗斯语出版物中被广泛使用。第一家重要的白俄罗斯语期刊《我们的土地》（*Nasha niva*）同时出版了罗马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版本。尽管巴甫舍维奇现在被视为白俄罗斯文学之父，但当时他的诗歌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影响有限。他的诗歌在1908年被禁，不是因为白俄罗斯语的问题，而是因为诗歌中怀念那些在沙俄统治前的传统。[48]

似乎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也面临着相似的难题。从19世纪60年代起，沙俄境内非法的立陶宛语出版物一直在德国出版，而立陶宛民族运动的领导人都远在保加利亚和美国。那么，为什么1863年后立陶宛民族运动能持续下去，而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就不行？实际上，第一眼看上去像是劣势的，反而会变成优势。就拿立陶宛人想要和过去决裂的需求来说。虽然立陶宛民族主义理念中包含了非凡的历史想象特质，但是写大部头来发明历史比通过改变精英们的行为以改变传统要容易得多。传统包括了人们现在在做的事情，而历史叙述了人们曾经应该做过的事。传统在哪里终止，历史从哪里开始，这些大部分取决于民族活动家的社会起源。相比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在这方面又有了意想不到的优势。出身低微的活动家们——他们的家庭从没有在近代早期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发现如果把整个过去当作历史来对待会容易许多。立陶宛活动家往往是受沙俄教育的农民后代，他们可以欣喜地跳过几个世纪的历史，无所顾忌地讨论民族复兴。白俄罗斯活动家们来自说波兰语、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上层家庭，从父辈和曾祖父辈那里习得的关于历史传统的真理，却让他们深陷泥沼。因此对他们来说，接受建立在白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语基础上的种族白俄罗斯观念，要比让立陶宛人接受种族立陶宛观念更难。立陶宛活动家为了打破他们和波兰文化的联系，他们发明了新的正写法；而这时的白俄罗斯人为了和沙俄拉开距离，开始使用波兰字母和拼写规则。

这提醒了我们，在斯拉夫语系中白俄罗斯语与波兰语和俄语都很相似，而作为波罗的海语言的立陶宛语和二者差别很大。沙俄禁止以罗马字母出版立陶宛语的规定影响到一些说立陶宛语的农民，这正好为立陶宛活动家所用。如果国家机器剥夺了某个团体视作珍贵的东西，那么那些能提供这种东西的组织就能得到支持。在这一点上，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再次陷入更糟的境地。在俄罗斯帝国，没有人在教堂或学校里学过如何阅读白俄罗斯语。有读写能力的白俄罗斯人已经学会了波兰语和俄语。因此，禁止白俄罗斯语出版物的规定对白俄罗斯活动家来说几乎无用。没有人像怀念立陶

宛语那样怀念白俄罗斯语。结果，立陶宛活动家或立陶宛神父在对付立陶宛农民时，比说俄语的官员或说波兰语的上层人士更有优势。另一方面，一个白俄罗斯活动家在这方面的优势比他的俄国和波兰对手要小得多。从这些角度来看，不可预知的语言事实决定了民族主义者能取得多大的影响力。

再让我们回到民族活动家移民国外的问题上，很明显在两个案例中这个问题都很棘手。尽管移民海外在所有民族殉道史中都扮演了突出的角色，移民（émigrés）本身对民族事业非常有帮助。虽然密茨凯维奇美好地且无疑是真诚地向往着祖国立陶宛，但事实上他本人是考纳斯一个无聊而生硬的学校教师。入狱、流放和移民使他成为原本能成为的那个伟大诗人。本书中引用的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出版于圣彼得堡、德累斯顿和巴黎。当然，无论他在哪里，他都能找到波兰同伴，这一点很重要。离开沙俄、在德国普鲁士东部出版《黎明》的立陶宛人和密茨凯维奇一样，都是渴望失落家园的浪漫主义者。而且，他们也和他一样，能够利用同道者的思想资源。当时在德国大约有10万名立陶宛人。将立陶宛资料从德国走私到沙俄的书贩们表现出高度的组织化特征，至少他们的任务是可持续且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白俄罗斯人完全被俄罗斯帝国边境限制住了。跨越国境和其他白俄罗斯人合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努力在遥远的克拉科夫维持民族复兴大业的白俄罗斯人几乎找不到当地的合作者，容易淹没在当地波兰人的汪洋大海中。无论他们用白俄罗斯语出版了什么，都必须穿越这遥远的距离，才能够获得一些效果。现在来看，分裂有时也有好处。

这些因素——民族活动家的社会起源、民族语言的特征以及帝国边界的位置——和主流民族性叙述格格不入。首先，总体而言，成功的民族活动家在解释他们的成功或失败时没有提到这些因素。其次，对这些因素的认可破坏了“种族群体”即“原初民族”的普遍观念。当时，说白俄罗斯语的农民这一“种族群体”是说立陶宛语的农民这一“种族群体”的10倍，而且前者的人数增长是以后者为代价的，但立陶宛民族运动有了结果，而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却没有。第三，这些因素证明了这种观点，即现代化国家（modernizing state）创造了民族。1863年后，沙俄政策无意中促进了其他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在沙俄统治下，大公国旧都遗民从未大规模地称自己是“俄国人”。[49]其中最有名的人身上的“俄国性”是和立陶宛大公国的遗风分不开的。

立陶宛：作为俄国的伟大祖国

1863年后，沙俄当局基本上将波兰精英视为敌人，将立陶宛民族运动视作削弱敌人的方式，将白俄罗斯亚农民视作沙俄境内的民族之一。地方上层精英失去了大部分权威，部分原因是1863年后集权国家对他们的惩罚，另

外还因为1861年获得土地的解放农奴。沙俄第一次着手解决这些大量人口的民族性问题。虽然这个过程缓慢而复杂，但是19世纪60年代确是沙俄解决立陶宛——帝国西北部领土——历史问题的转折点。沙俄逐渐挑起地方人民对抗地方精英，而不是依靠地方精英统治地方人民，以此将民族性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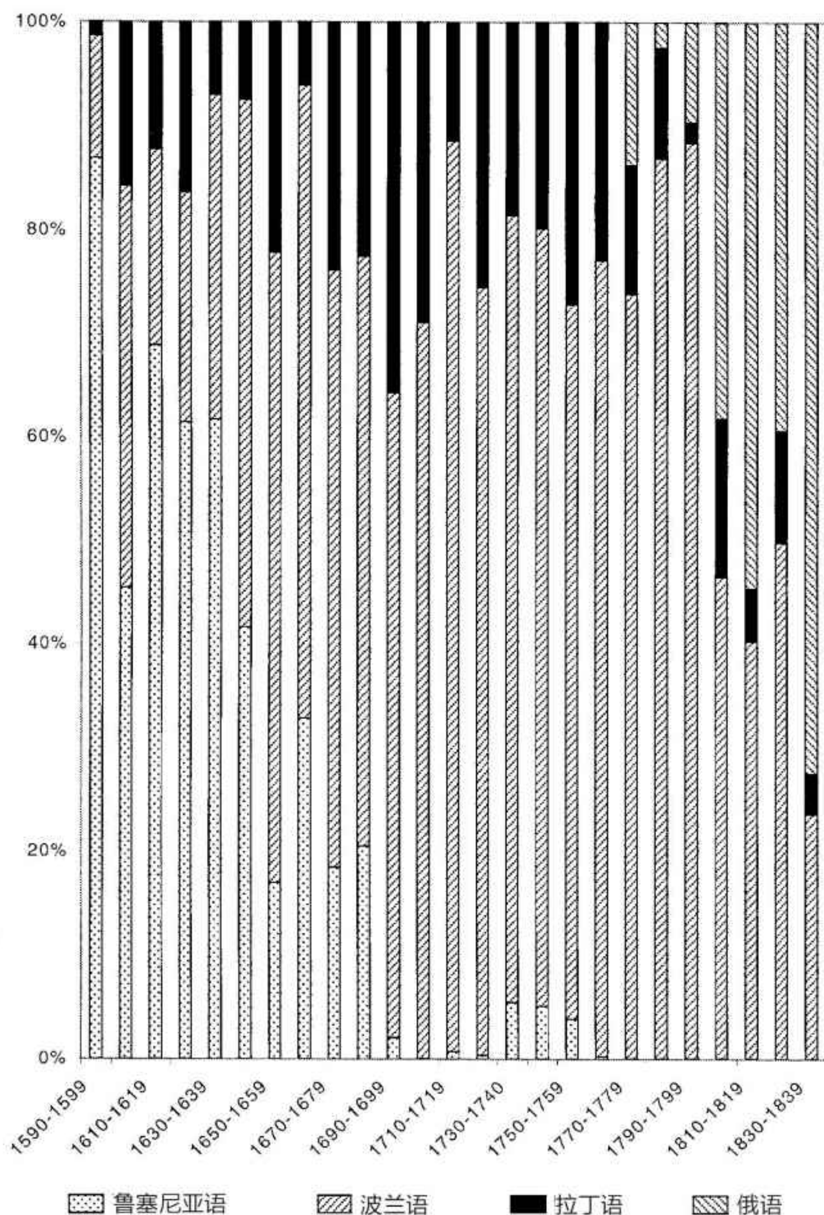


表1

1863年起义后对波兰上层阶级的压制，和M. N. 穆拉维约夫（M. N.Muraviev）有关，他是当时被派去镇压起义的维那总督。他的残忍为他

在俄国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中间获得了“绞刑男”（The Hangman）的名声。穆拉维约夫把起义看作俄国人和波兰人为争夺维那而爆发的民族战争。起义证明了他关于波兰人生来反叛的观点，在此意义上，他将沙俄看作一个类似民族国家的存在。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大受欢迎，不仅因为他不负残忍的名声，而且因为他有能力将这种民族范式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他把立陶宛当作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民族战争的舞台，实际上他也是这么行动的。他的政策迫使关于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观念退出舞台。我们想想康斯坦蒂·卡利诺夫斯基就行，他用白俄罗斯语写作，支持东仪天主教会，将立陶宛大公国当作自己的祖国。1846年，作为支持波兰语和天主教的代表，穆拉维约夫下令将卡利诺夫斯基在维那处以绞刑。

穆拉维约夫的行动无意中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促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联盟。1863年以前，俄罗斯帝国西北部最大的人口群体——说白俄罗斯语的农民——普遍自称是“立陶宛人”。1863年后，沙俄的宗教政策、镇压行动和等级分类迫使这一传统观念转向社会觉醒的边缘。帝国将东正教徒视同“俄国人”，人们因此被迫在不同的民族标签中做选择。到19世纪末，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如果是东正教徒，就说自己是“俄国人”，如果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就说自己是“波兰人”，如果他们没有信仰就说自己是“本地人”。沙俄当局从人们的脑海中移除了“立陶宛人”这个词的历史感，这样一来，他们为现代的、种族的立陶宛定义扫清了道路，并且简化了立陶宛民族活动家的任务。[50]如同1863年后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沙俄历史学家也重新发现了立陶宛大公国的新含义，后者将其视为沙俄帝国的雏形。1863年起义失败被民族主义的语言重新诠释，沙俄视作异质的波兰和天主教的影响，在沙俄和东正教的土地上终于迎来终结。

1898年，俄罗斯帝国境内其他地方的波兰人为纪念密茨凯维奇百年诞辰，为他竖立了一尊塑像；与此同时，俄国人和沙俄效忠者们也在维那树立了一尊穆拉维约夫总督的塑像。密茨凯维奇激发了人们解放维那斯脱离沙俄统治的爱国热忱；穆拉维约夫则使得这些热忱加速成为现代民族主义。当然，1863年以后确实有些改变，我们从P. D. 斯维尔托波克-米尔斯基亲王（Prince P. D. Sviatopolk-Mirskii）的职业生涯中就可看出端倪，他于1902—1904年出任维那总督。沙皇需要穆拉维约夫的残忍以镇压起义，而米尔斯基是一位欢迎宏大改革计划的总督。和前者一样，米尔斯基也想当然地认为波兰人（和他们的犹太人盟友）是来自维日诺和曾经的立陶宛的劲敌。但是和穆拉维约夫不同的是，米尔斯基将波兰性和天主教教义区分开来。他争辩说帝国政策驱使波兰人以外的天主教徒投向波兰民族性的怀抱，通过一种更巧妙的方法可以在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亚人中建立对帝国的忠诚。1904年，米尔斯基总督生涯的最后一项举措是说服沙皇允许立陶宛语读物以拉丁语字母的形式出版。1905年出任内政部部长时，米尔斯基甚至开始支持白俄罗斯亚民族性。当然，米尔斯基相信在波兰和沙俄宏

大的历史竞争背景下，这些民族运动是没有未来的。以他看来，这些民族会慢慢被波兰民族性所同化，为沙俄必然的胜利争取时间。[51]

一些心怀感激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认识到，米尔斯基并非他治下领土的入侵者。和许多为沙皇管理波兰和立陶宛的帝国官员一样，米尔斯基是旧立陶宛上层阶级的后裔。在大公国时期，大部分贵族家庭都是东正教教徒出身，米尔斯基和其他人一样在沙俄统治下"重新皈依"东正教。有学识的波兰-立陶宛上层家庭不仅为俄罗斯帝国的官僚制提供了新鲜血液，也提供了一些保守思想家。[52]20世纪早期，当米尔斯基统治维那时，大俄罗斯（Great Russian）帝国的理念中已经增加了现代民族元素。新的民族构成包容一切，在它的影响下，"失落的"斯拉夫土地被"重新寻回"，所有民族安于俄国人治下。在这种历史叙事中，立陶宛大公国被视为一个曾被波兰和天主教夺去的立陶宛-俄国国家，如今它又重回沙俄和东正教。

这种大俄罗斯历史观和现代立陶宛活动家在1863年后提出的历史观惊人地一致。现代立陶宛和现代俄国的视角都略去了近代早期历史，即波兰-立陶宛大公国两个世纪的历史，而更偏向符合现代政治需求的中世纪立陶宛历史。在立陶宛的案例中，古代历史意味着在自己的王国内的立陶宛族的历史。在俄国的案例中，古代历史意味着大俄罗斯的历史叙事。1863年后，立陶宛人和俄国人都重新以中世纪时的名称称呼原大公国首都。立陶宛人开始称这座城市为"维尔纽斯"，俄国人称这座城市为"维那"——他们都拒绝承认这座城市的波兰名字"维日诺"，这是迄今它最为流行的名字。立陶宛和俄国的民族主义正史是中世纪史和现代史的综合产物，唯独忽视了近代早期历史。以所谓延续中世纪历史的名义，它们都倾向于去除近代早期历史遗产的激进变革。这两种史观都以历史深层逻辑的名义，使家庭忠诚的剧烈变革正当化。立陶宛活动家往往是说波兰语的上层人士，他们通过联合人民大众来达到"回归本源"的目的。沙皇治下的官员也往往是说波兰语的上层人士，他们"回归本源"的方式是皈依东正教、帮助沙皇取得东斯拉夫领土。

这些俄国人不仅相信要将东斯拉夫元素融合进俄罗斯民族，他们还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活生生的例子。米尔斯基很可能认为他回到维那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值得讽刺的地方，立陶宛也是他的祖国。

---

[1] Andreas Moritsch, "The January Insurrection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Peasants in the Polish-Russian Provinces," in Béla Király, eds., The Crucial Decade, New York: Brooklyn College Press, 180–182.

[2] Algis Kasperovičius, "Kształtowanie się narodu litewskiego," in Krzysztof Jasiewicz, ed.,Europa nie prowincjonalna, Warsaw: Rytm, 1999,

218-223; Miroslav Hroch,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9; Vytautas Merkys,“Biskup Motiejus Valanczius a polityka narodowo ściowa rządu Rosji,” in Jerzy Kłoczowski et al.,eds., Belarus, Lithuania, Poland, Ukraine, Lublin: IESW, 1994, 317-318.

[3] 关于波兰的实证主义，见Jerzy Jedlicki,A Suburb of Europ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Press, 1999; Stanislaus Blejwas, Realism in Polish Politics, New Haven, Conn.: Yale Concilium on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84。

[4] 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1851—1927），立陶宛民族复兴运动的提倡者，创办了立陶宛第一家报纸《黎明》，他也是立陶宛科学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作为1917年立陶宛国民大会的成员之一，他参与签署了1918年《立陶宛独立法案》。

[5] 文采斯·库迪尔卡（1858—1899），立陶宛诗人、医生，他是立陶宛国歌的词、曲作者，被视为立陶宛民族英雄。

[6] 特奥多尔·纳尔布特（1784—1864），立陶宛历史作家，曾是俄罗斯帝国的军事工程师。他最负盛名的著作是十卷本的波兰语立陶宛历史。

[7] Teodor Narbutt,Dzieje narodu litewskiego, vol. 2, Vilnius: Marcinkowskiego, 1841, 492.

[8] Virgil Krapauskas,Nationalism and Historiography,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 graphs, 2000, 31, 108.

[9] 西蒙纳斯·道坎塔斯（1793—1864），立陶宛作家、民族之学者和历史学家，他是立陶宛民族复兴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10] Tomas Venclova, “Native Realm Revisited: Mickiewicz’s Lithuania and Mickiewicz in Lithuania,”引用自手稿，1–5，以波兰语发表在Zeszyty Literackie, 70（2000)。Józef Ignacy Kraszewski的诗歌也有类似的作用。关于道坎塔斯，也见Jonas Žmuidzinas, Commonwealth polono-lithuanien ou l’Union de Lublin, Paris: Mouton, 1978, 148。

[11] Jean Pelissier,Les principaux artisans de la Renaissance Nationale Lituanienne, Lausanne: Léman, 1918，25-45．也可比较密茨凯维奇受欢迎的诗歌《青春颂》（1820）最后两句：“欢迎，欢迎，自由的黎明/拯救的阳光即将带来”。

[12] 西里尔字母（Cyrillic characters），是通行于斯拉夫语族大多数民族中

的字母书写系统，目前使用西里尔字母作为标准文字的国家，其中有半数在苏联疆域范围内。

[13] Jerzy Ochma ński, Litewski ruch narodowo-kulturalny w XIX wieku, Białystok: PAN, 1965, 137ff.; Krapauskas, Nationalism and Historiography, 15.

[14] 白山战役是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早期的一次战役，发生在今天布拉格附近。波希米亚贵族的军队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二世的军队打败，之后帝国皇帝迫使波希米亚人改信天主教，否则将驱逐出境。

[15] Jiří Rak, Bývalí Čechové, Prague: H&H, 1994, 127-140. 也可参阅Vladimír Macura,Českýsen, Prague: Lidové noviny, 1998, 14-53。

[16] David Diringer,The Alphabet, Vol. 1,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 1968, 157–164.

[17] Francis Dvornik,The Slavs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2, 301–303;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69.

[18] 这种关于民族主义传播的观点来自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 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即《格林童话》的编纂者之一。

[20] Narbutt,Dzieje narodu litewskiego, Vol. 1, 454-464; Krapauskas, Nationalism and Histo riography, 74.

[21] Wiktor Weintraub, The Poetry of Adam Mickiewicz, The Hague: Mouton, 1954, 115. 有疑问的著作是Preussens ältere Geschichte, 4 vols., Riga: Hartmann, 1808。

[22] 儒勒·米什莱（1798—1874），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他是第一个使用和定义“文艺复兴”这个术语的历史学家，法国历史学家傅勒曾说米什莱的《法国大革命史》是“所有大革命史的基石，也是一座文学丰碑”。

[23] 关于密茨凯维奇在巴黎，见Andrzej Walicki,Philosophy and Romantic Nationalism,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7, 265–267。

[24] 关于语言与民族复兴的标准模型，见Vladimír Macura,Znamení zrodu, Prague: H&H,1995, 61-79。立陶宛活动家们同时希望不仅在政治意义上，还要在种族意义上展示密茨凯维奇是立陶宛人，寻找他熟知立陶宛语的证据。总之，作

为无能的补偿的历史，与真正的历史一样古老。见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55。

[25] 引自Czeslaw Milosz, “Rodziewiczówna,”Kultura, 522 (1991), 21。

[26] Pelissier,Les principaux artisans, 45-59; Venclova, “Native Realm Revisited,”22.

[27] Bardach, “Polacy Litewscy i inne narody Litwy historycznej,” in Kłoczowski, Belar us, Lithuania, Poland, Ukraine, 366.

[28] Ryszard Radzik, “Samookre ślenie jako element świadomo ści etnicznej ludu białoruskiego w XIX wieku,” Przegla ̨d Wschodni, 4, 3 (1997), 616.

[29] Valerius Czekmonas, “O etapach socjolingwistycznej historii Wile ńszczyzny i rozwoju polskiej świadomości narodowej na Litwie,” in Kloczowski, Belarus, Lithuania, Poland, Ukraine, 457-463.

[30] Wacław Jędrzejewicz, Kronika Życia Józeja Piłsudskiego, vol. 1, London: Polska Fundac ja Kulturalna, 1997, 15-16.

[31] 另外一种反应是更加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毕苏斯基政党中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Kazimierz Kelles-Krauz出身于立陶宛波兰家庭。见拙作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Modern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97。年轻的Feliks Dzierżyński（1876—1926）因为在维日诺的学校里说波兰语而遭到驱逐。他后来成了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加入卢森堡主义的波兰社会主义阵营。该阵营拒绝关于波兰国家复兴的理念，他最后在共产主义俄国成了契卡的头目。Robert Blobaum, Feliks Dzierzynski and the SDKPiL,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3. 又见Bohdan Cywiński, Rodowody niepokornych, Paris: Spotkania, 1985; Norman Naimark, The History of the “Proletariat,”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79。

[32] Piotr Wróbel,Kszałtowanie się białoruskiej świadomości narodowej a Polska, Warsaw: Wy dawnictwo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 1990, 16.

[33] 数据引自Steven Guthier, “The Belorussian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Assimilation,”So viet Studies, 29, 1 (1977), 40-47。关于“种族群体”和民族历史见Jeremy King, “Loyalty and Polity, Nation and State,”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29-33。为此辩护的有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34] 斯坦尼斯拉夫·莫纽什科（1819—1872），波兰作曲家、指挥家，其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被誉为波兰民族歌剧的创始人。

[35] M.V. Dounar-Zapolski,Historiia Belarusi, Minsk: Belaruskaia Ents'iklapedia, 1994, 360; Celina Gajkowska, "Wincenty Marcinkiewicz," Polski Słownik Biograficzny,vol. 19, Wrocław: Ossolineum, 1974, 588-590.

[36] 密茨凯维奇引自A.A. Loika and V.P. Rahoisha, eds.,Belarusskaia litaratura XIX stahod dzia, Minsk: Vyhsheishaia shkola, 1988, 32; Dunin cited after his Zbor tvorau, Minsk: Dziarzhaunae Vydavetstva BSSR, 1958, 370。

[37] Jan Czeczot,Piosnki wieśniacze znad Niemna i Dźwiny, Vilnius: Zawadzkiego, 1839. 又见T.V. Valodzina, "Ian Chachot i brat'i T'ishkevich," in Falklor, Minsk: Belaruskaiia Navuka, 1997, 6; Marceli Kosman, Historia Białorusi, Wrocław: Ossolineum, 1979, 219; Weintraub, Poetry, 13; Arnold McMillin, Die Literatur der Weissrussen, Giessen: Wilhelm Schmitz, 1977, 82-83。

[38] Walicki,Philosophy and Romantic Nationalism, 73.

[39] Jan Zaprudnik,Belaru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3, 54—55; Kosman, Historia Bi ałorusi, 220.

[40] Edward Thaden,Russia's Western Borderlands, 1710—187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especially 54, 68 – 69, 79, 121, 126; Patricia Grimsted,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lexander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104—150.

[41] Dounar-Zapolski,Historiia Belarusi, 250.

[42] Sofia Kuz'niaeva, "Nats'iial'nae adradzhen'ne i nats'iianal'naia s'viadomas'ts' belarusau u pershai palove XIX ct.," Belaruski Histar'ichn'i Ahliad, 1, 1 (1994), 57.

[43] 东仪天主教会（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是指完全承认罗马教宗权威的东方公教会。它保存了东方基督教派的仪式、神学基础和奉献的传统，但仍与东正教会、东方正统教会和东方亚述教会存有分歧。

[44] 在19世纪奥地利管辖的加利西亚地区内，东仪天主教会也在当地的乌克兰人中起到了这种作用。国家政策很重要，因为1795年东仪天主教会在这两地都处境艰难。Uladzimir Sosna, "Uniiatskae pi'tanne u belarusakau viosts'i," in M.V. Bich and P.A. Loika, Z histor'ii Unii atstva u Belarusi, Minsk: Ekaperspekt'iva,

1996, 90-92.

[45] L.K. Tarasiuk, “Adliustranne uniatskaii temat’iki u tvorchasts’ Frantsishka Bahushevicha,” in Ryszardłużny, Franciszek Ziejka, and Andrzej Kępiński, eds., Unia brzeska, Cracow: Universitas, 1994, 526 – 531.

[46] 关于教会在19世纪30年代的机构范围可见G.I. Shavel’skii,Posliednee vozsoedinenie s pravoslavnoiu tserkoviiu uniatov Bielorusskoi eparkhii, Petersburg, Sel’skago Viestnika, 1910。

[47] Jan Zaprudnik,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Byelarussians and the Road to Statehood,” in Vitaut Kipel and Zora Kipel, eds., Byelorussian Statehood, New York: Byelorussian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88, 13; Jan Jurkiewicz, “Nasze widzenie Bialorusinów w XX w.,” Dzieje Na jnowsze, 27, 2 (1995), 68.

[48] Nicholas Vakar,Belo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82-83. 审查官的劝告见Frantsishak Bahushevich, Tvory, Minsk: Belarus, 1967, 202-205。

[49] 公平来说，Ernest Gellner某种程度上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化的国家有时候创造了一个民族，有时候创造了几个民族。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50] 关于俄国精英的观点和1863年起义，见Henryk Głębocki, Fatalna sprawa, Cracow: Arcana, 2000; M. Prudnikov, Chego zhe khochet Pol’sha? St. Petersburg: Glavnoie upravleniie voenno-uchebnykh zavedenii, 1863。关于农民的自我定义，见Radzik, “Samookre ślenie,”612-614; M. Koszelew, “Polacy w oczach Białorusinów,” Dzieje Najnowsze, 27, 2 (1995), 83-85。

[51] 关于这种转变，见Theodore Weeks,Nation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73; Theodore Weeks,“Russification and the Lithuanians,” Slavic Review, 60, 1, (2001), 109; Dominic Lieven, Nicholas II, New York: St. Martin’s 1993, 134-135; Witol Rodkiewicz, Russian Nationality Policy, Lublin: Scientific Society of Lublin, 1998, 226-231; Pelissier, Les principaux artisans, 158-159; O russkoi pravdie i polskoi krivdie, Moscow: Universitetskaia tipografiia, 1863, 28-29。

[52] Łukasz Chimiak, Gubernatorzy Rosyjscy w Królestwie Polskim, Wrocław: FNP, 1999, 70-79; Andrzej Chwalba, Polacy w służbie Moskali, Warsaw: PWN, 1999, 66; Paul Bushkovitch, “The Ukraine in Russian Culture,”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39, 3 (1991), 347-350. 又见L.E.

Gorizontov, Paradoksy imperskoi politiki, Moscow: Indrik, 1999; Vakar, Belorussia，73。Josif Hurko是当时的华沙总督，波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俄罗斯化倡导者，他也是一位波兰-立陶宛后裔。

第3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维日诺之问（1914—1939）

死亡，也许能让他的伤口愈合。

——亚当·密茨凯维奇《祖先的前夜》（德累斯顿，1832）

1914年，原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成为希望通向民族之路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渴求的政治家园；这里也是居住在其中最特殊的群体——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对掌权的沙俄官员来说，这里还是一座古老的俄罗斯城市。这里大多数学校都以俄语教学，大多数教堂是罗马天主教堂，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是犹太人。1863年之后，俄罗斯帝国的维那省的人口翻了不止两番，这座城市的人口占该省人口比例增加了近三倍；维那城内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多。[1]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1863年后俄罗斯帝国西部的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更都市化、受教育程度更高。这座城市还是有不同的名字——立陶宛语的“维尔纽斯”，波兰语的“维日诺”，白俄罗斯语的“维尔尼亚”，俄语的“维那”以及意第绪语的“维尔纳”。1905年革命后，对这座城市种族所有权的声明第一次激起辩论，语言的不同更能代表这些不可调和的观点。

对立陶宛活动家来说，维尔纽斯是大公国的旧都，立陶宛大公盖迪米纳斯（Gediminas）[2]在立陶宛鼎盛末期建造了这座城市。活动家越发认为中世纪的立陶宛大公国是独立的立陶宛的前身，有某种类似种族边界存在。尽管立陶宛活动家更喜欢在维尔纽斯活动，但是在那里说立陶宛语的人口所占比例极小（大约在1%到2%）。[3]虽然立陶宛人最显著的标志是他们的语言，但是立陶宛活动家对维尔纽斯的所有权声明却建立在所谓的历史基础上的。这种概念上的模棱两可被一些宏大规划掩盖了，比如1902年立陶宛民主党（Lithuanian Democratic Party）的纲领，该党是在“民族志边界的大约范围内”来讨论一个独立的立陶宛。在1905年革命时期，由左翼和中间团体组织的立陶宛民族议会呼吁以“现有民族志边界内的核心”建立一个自治的立陶宛，这意味着把维尔纽斯和周边地区囊括进来。用“现有的”（present）来修饰“民族志的”（ethnographic）并非偶然。正如当时的波兰民族民主人士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立陶宛活动家将民族志看作科学和政治变化的产物。在他们看来，维尔纽斯周围那些看起来像波兰人或白俄罗斯人的人，只是碰巧会说波兰语或白俄罗斯语。在恰当的环境

下，“民族志的立陶宛”（ethnographic Lithuania）是可以扩展的。[4]我们之后会发现，他们在这点上是正确的。

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和立陶宛对手一样，当时也在维尔尼亚。他们也在追溯立陶宛大公国的过往，将自己视为大公国的后裔，并声称维尔尼亚是他们的首都。[5]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坚信1569年与波兰的联合破坏了立陶宛的独立，但白俄罗斯活动家不同，他们更偏向于复兴曾经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我们会发现这一点体现了历史诠释的一个重要区别。立陶宛人对波兰影响的非议起始于19世纪40年代，在80年代开始公开化，但似乎在1910年前没有任何白俄罗斯思想家质疑过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价值。[6]在20世纪早期，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者最先声称对维尔尼亚的所有权，他们都来自说波兰语的罗马天主教上层家庭，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传统的联邦主义是内在一致的。[7]在1905年革命中，波兰和立陶宛政党再次体现出行动果决和大众支持，这场革命对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来说是一次温和得多的试验。革命之后，独立的白俄罗斯这一概念对作为“沙俄西部”帝国的白俄罗斯这一概念产生了真正的冲击。[8]第一家重要的白俄罗斯语期刊《我们的土地》诞生于1906年。在1914年以前，那些把白俄罗斯人看作一个民族的人没有想过让白俄罗斯独立出去。正如我们所见，“种族特征”（ethnicity）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在维那城内，说白俄罗斯语的人要比说立陶宛语的人多得多。而在整个维那省，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维那、明斯克、格罗德诺、莫吉廖夫和维捷布斯克各省——邻近历史上的立陶宛上的地区——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但是，没有任何地区的白俄罗斯农民从工业化中受益，没有任何地区的白俄罗斯人在城市生活中占主导。在每个白俄罗斯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和别的群体相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低。[9]

尽管对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活动家来说，维尔纽斯/维尔尼亚非常重要，但是这些活动家在俄罗斯帝国治下的维尔那却无足轻重。1914年，波兰语主导了公共生活，虽然这里的波兰语和华沙的波兰语不同。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下，一种特别的波兰文化巩固了它对维尔那及维尔那地区（Wileńszczyzna）的掌控。尽管一系列法律都旨在将土地所有权转给俄国人和东正教徒，但在20世纪初期波兰人依旧拥有着维那省的大部分土地。[10]1914年，波兰人口也许比犹太人口稍多一些，是城市中的多数派。至于波兰人是维尔那及其周边地区的主要民族，还是根本不算一个民族，这取决于个人的不同观点了，那时改说波兰语和加入某个特殊的民族团体或某个颇受尊重的社团根本不是一回事。[11]在历史上的立陶宛，几乎没有出现过有关“唤醒”波兰语人群认同他们“真正的”民族身份的思潮，因为这种文化无论如何都是吸引人的，而且掌握这种语言本身就象征着一种社会地位。在原立陶宛大公国里，波兰文化不是因为活动家的积极工作而被视为一种可以转化成政治权力的“种族”现实，反而是一种人文品质，

这种品质的代言者（无论他们原来的“种族”是什么）决定了什么是有教养的交流。

1905年后，这种波兰性的精英代表被称为“当地人”（krajowcy），他们认为他们的波兰性区别于波兰领土（crownlands）以西的波兰性。这些精英认识到他们的家族渊源在立陶宛贵族之间，而且他们自己常常会说两种语言或三种语言，他们认为大公国是波兰遗产中最美好的部分。对这些波兰人来说，维尔那是文明的中心，这种文明是他们已经形成的、维持的并希望在复兴的波兰中继续体现的。他们根本没有将维尔那视为未来“种族的”波兰国家东北角、由波兰“种族”构成的城市，他们将其视作历史上立陶宛的首都，而历史上的立陶宛和波兰领土的联合，始终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心问题。他们所有人都按照1569年后的历史定义，将立陶宛视为自己的政治故乡。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历史上的立陶宛会与波兰领土组成一个共同体，尽管一些人更希望将这个问题留给未来的维尔那议会。[12]比起现代波兰或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当地人”是密茨凯维奇更加忠诚的学生。在20世纪早期，受社会主义爱国人士——如约瑟夫·毕苏斯基——的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属于联邦主义的政治架构。

如此立陶宛的波兰人假定，由于立陶宛大公国历史传统中的美德，他们身上的波兰性比别人的更高级，而且这种波兰文化总体上比立陶宛语或白俄罗斯语中包含的波兰文化品质更高。随着现代民族性观念的传播，这种双重自信导致了一个圈套。一方面，这种由波兰领土引发的优越感是建立在地方传统上，因此不会被华沙或克拉科夫的波兰人所接受。不断地将密茨凯维奇解释为完全的波兰人，便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对这种高度本地化的传统的培育可能带来一个恶果。既然民间文化被视为立陶宛大公国的遗产之一，那些以波兰语进行早期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民族复兴的活动家们对此毫无怨言。[13]然而，早期活动家的成果中的形象和比喻，对现代主流文化的质疑者来说依然有效，他们用立陶宛语和白俄罗斯语再造了这些成果。当一些天主教精英家庭的成员“背叛”了1905年后的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民族运动，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反而在乡村地区出现，波兰性就渐渐变成了一个必须被维护的选择。[14]

1905年革命时期，立陶宛议会赢得了沙皇政权意义重大的妥协。一些波兰的立陶宛人，如米哈乌·罗默（Michał Römer）[15]，他们吸取教训，认为立陶宛的民族性是需要被严肃对待的一支力量。罗默相信历史上的立陶宛可以被塑造为由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中立陶宛人扮演领导角色，波兰人在不同文化中扮演调和角色。这种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忠实于大公国传统，但新立陶宛民族运动却对此警惕，现代民族活动家不会轻易接受这种方案。事实上，如巴萨纳维丘斯和什柳帕斯等立陶宛激进主义领导者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想法。[16]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立陶宛活动家在继承使用这一多民族遗产时面临着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他们将以种族的形式定义立陶宛。就在一些立陶宛的波兰人已经准备好接受妥协时，立陶宛活动家却决心在一个差不多以种族来定义的立陶宛国家里，用立陶宛文化取代波兰文化。[17]

犹太人与古老文明之间的关联毋庸置疑，他们的独特性显而易见，他们并没有陷入立陶宛人的辩证法。1914年，犹太人当时占到城市人口的40%，当时四分之三的商人也许都是犹太人，他们大规模地居住在“立陶宛的耶路撒冷”已经有400年了。[18]所谓存疑的“立陶宛”指的是原立陶宛大公国，大公国包含的城市有明斯克（当时约有51%的人口是犹太人）、戈梅利（Homel，当时约有55%的人口是犹太人）、平斯克（Pinsk，当时约有74%的人口是犹太人），还有维捷布斯克（当时约有51%的人口是犹太人）。那个时代的维捷布斯克最有名的就是当地人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9]的画作。维尔纳是当时研究《塔木德》的学术中心之一，也是许多学者的故乡，如以来亚·本·所罗门（Elijah ben Solomon），后来人们更熟悉维尔纳的加翁（Gaon of Vilne）这个名字，他被认为是哈西迪犹太教运动最大的反对者。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这些反对：加翁和哈西迪犹太教教义一样，试图践行卡巴拉（Kabbalah）[20]，并且从基督教徒那里学习关于草药学的知识。他甚至尝试过制造机器人。19世纪，维尔纳是俄罗斯帝国中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21]或者说犹太启蒙运动的主要中心。哈斯卡拉运动影响下的年轻人逐渐成为现代犹太政党的奠基者。尽管政治参与被局限在世俗化的（或世俗进程中的）小部分年轻人中，但是城市中的氛围有利于促进建立在历史可能性之上的犹太政治团体的诞生。他们所缺乏的是一种政治同化主义（如同在当代维也纳和利沃夫［Lwów］中一样），这种同化主义在广泛使用的主要语言和对政治体制的忠诚之间建立了联系。在当时的维尔纳，主流基督教文化是波兰和罗马天主教文化，但是政治体制确是俄国和东正教为主导的，19世纪末立陶宛的犹太人对于波兰文化可以使沙俄政权自由化这一点毫无希望。[22]这种由波兰政治导致的巨大的疏离感，使得维尔纳（维日诺）区别于勒姆瑞克（Lemberik，即利沃夫），成为现代犹太政治中非传统观念的阵营。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一种形式，但这两者都造成了维尔纳的波兰文化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社会主义者相同，比起立陶宛民族主义的渴望，他们对波兰民族主义更有敌意，他们的逻辑是立陶宛将会是弱小的多民族国家，而波兰将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反应性的民族主义，通过向犹太人许诺给予他们自己的领土家园，以保护他们、给他们尊严。在原立陶宛大公国时期犹太人集中在市镇（这些市镇之后大多归入犹太定居界限区），由此来看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计划。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法在过去建国或如今人口统计的基础上对欧洲领土声明所有权：他们被公认的家

园在亚洲（在一些其他版本中是在非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法参加对原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竞争，但是在使用意第绪语和推广希伯来语的过程中，他们可以进一步拉开犹太文化和波兰文化的距离。与之相对，在历史上的立陶宛中的犹太社会主义者设想的未来是通过一场欧洲革命或是国际革命实现的。这一重大转变将使人们重新思考立陶宛大公国的遗产和信贷民族主义者的奋斗。然而同时，发动革命是必要的，这些犹太人的政治语言是俄语或意第绪语。维那的犹太社会主义者使用俄语而非波兰语的情况使波兰政治活动家十分恼怒：举例而言，毕苏斯基曾提议大家使用意第绪语作为妥协。[23]1897年，来自历史上的立陶宛的、说俄语的、犹太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在维那组成了同盟，他们在1905年革命中于当地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世界大战与民族主张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在历史上的立陶宛领土上诞生了新的国家。俄罗斯帝国的失败和崩溃为立陶宛和波兰建国开辟了道路，也为它们对维尔纽斯/维日诺的争夺提供了机会。在1919—1920年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以及波兰军队和立陶宛军队之间爆发的小规模冲突之后，波兰于1920年夺取维日诺。虽然这个过程由波兰联邦主义者完成，但这正与波兰民族主义者的企图相符。

我们之前已经聚焦过维日诺地区的波兰联邦主义，但事实上波兰民族主义中的这一主流趋势是在华沙、罗兹（Łódź）、克拉科夫、波兹南（Poznań）和波兰中部的乡村地区建立的。在原波兰领土上，历史和社会的不同确保了“何为波兰”的理念能够向现代理念进发。在这里，说波兰语的精英直面的不是说其他语言的农民，而是说波兰语的农民，还有在市镇的犹太人和德国人，以及俄国、德国和奥地利帝国的政府代表。一些农民和工人也说波兰语的地方没有成为波兰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点反而加强了民族性的语言定义，而非历史定义。在19世纪晚期，语言的（种族的）民族主义能联合起波兰中部的精英和大众：使用这种人人能理解的语言并非耻辱，这种语言本身已经过编纂和丰富。事实上在波兰中部，波兰文化的保存已成为爱国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波兰语、罗马天主教信仰和精通浪漫主义诗歌成为波兰民族性的标志。[24]虽然维日诺的波兰爱国主义根植于那些把历史上立陶宛大公国的国家地位拿来做参考的精英家庭，波兰领土上的民族主义——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25]发起的民族民主运动——却是与那些准备好迎接现代民族国家的波兰农民和工人息息相关。

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代表了不同的波兰性，他们对波兰的想象也不同。毕苏斯基的社会主义联邦主义是对立陶宛的波兰人转向现代政治的一种效

仿反应。在俄罗斯帝国中，他的密谋式社会主义鼓动很自然地从东部的波兰人开始，他们自认是有文化的精英，对秩序的认识更优越。1892年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主义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简称PPS）设想了一种联邦制度。这种社会主义联邦主义取近代早期爱国主义和现代大众政治的折衷版本，和德莫夫斯基的民族民主运动有着三点不同。首先，这是一种传承而来的传统，而不是被发明的传统，希望大公国复国的精英阶层所经营的是代代相传的、连续的民族性概念。其次，社会主义联邦主义的推进不仅通过启蒙大众的方式，还通过与可信任的同志合作的方式。在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内，民族问题的辩论非常热烈，但是直到该党于1905年分裂，政党领导层都没有考虑过应该跟从大众而非领导大众。最后，社会主义联邦主义假定民族不是一个语言群体，而是一个身份群体。重点不是想象在特定领土上的每个人都属于同一个种族群体，因此理应有一个民族国家，而是识别他们之间的不同，并在波兰公民身份的共和理念下引导他们。东部的波兰上层家庭的后代自信于他们比当地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农民和犹太人的地位更高，他们相信这个共和国在文化上是属于波兰的。1914年前，在俄罗斯帝国的密谋政治中抱持此种理念的人不在少数，我们有理由认为，1918年后维日诺地区的波兰上层阶级会支持民主波兰的左翼联邦主义者。[26]

石匠之子德莫夫斯基来自波兰中部一处穷乡僻壤之地，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得出了不同的政治结论。当毕苏斯基想象一个波兰的政治民族漂浮于多民族的边陲——他称之为家的地方，德莫夫斯基看到的是在与狡猾的犹太人和自律的德国人的激烈竞争中诞生的波兰大众民族。他制定了这个设想中的大众民族的标准：波兰人在语言和宗教上与别人不同。在解释为何波兰人必须巩固他们的特征并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攻击时，德莫夫斯基还加上了时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据。毕苏斯基是一个怀旧的人，反之德莫夫斯基称自己是“一个现代波兰人”。德莫夫斯基公然地设法毁灭波兰-立陶宛王国遗产，以现代波兰人的身份取而代之。尽管毕苏斯基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德莫夫斯基更加关注社会变化和大众政治对何种意识形态满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莫夫斯基的成就比起以毕苏斯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们令人惊叹的政变行动来说要平淡得多，但是他在波兰民族性内容方面做了更多工作。1914年时，德莫夫斯基对波兰性的定义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他的民族民主运动组织成为波兰土地上最重要的政治团体。[27]正是他领导的政党在1918年之后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大部分波兰人的选票。

毕苏斯基和德莫夫斯基的理念不仅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中意义非凡，在那些乍一看由军事力量决定事件走向的重要时刻，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维日诺成为三重竞争的舞台：（1）两种波兰性观念的代表间的竞争；（2）国际主义者、多民族主义者和现代民族主义者对“立

陶宛”的不同定义的信徒间的竞争；（3）布尔什维克、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在这座城市的实际控制权问题上的竞争。1918年，所有之前提到过的团体——来自大公国的国际主义者之子（相似的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波罗的海人）最终成为布尔什维克，大公国忠心耿耿的后代最终成为波兰或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以及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和波兰现代民族主义者——对国家组织的恰当形式、国家边界的恰当安排都各自有着坚定的想法。布尔什维克希望共产主义能扩展到维那，波兰和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同意维日诺/维尔尼亚将成为多民族国家的首都，波兰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意维日诺/维尔纽斯将包含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但对究竟是哪个民族国家意见不一）。我们会发现，联邦主义比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难有市场得多。联邦主义的解决方案需要恰当的边界、地方精英之间的妥协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共识。比起苏维埃俄国或其他民族国家吞并维日诺，这些事宜天然地要复杂得多。

在维日诺/维尔纽斯被某一民族国家吞并这件事上，波兰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都是正确的，而且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哪个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作为预言者和胜利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还远远不是强大的群体。在本国，他们可能是最弱小的群体。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与白俄罗斯联邦主义者不同，他们甚至没有指望获得立陶宛大公国土地上的人民支持。和布尔什维克与波兰联邦主义者不同，他们从来没有派出过占领维日诺的军队。和其他所有群体（包括布尔什维克）都不同，他们从来没有提过立陶宛大公国的遗产。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国家制度和边界安排上的双重胜利，揭示了在帝国崩溃之际现代民族主义理念具备的优势。毕苏斯基曾有实质性的优势，但被联邦主义计划的复杂性困住了。当其他各方都拒绝联邦制度时，毕苏斯基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把他的力量投入德莫夫斯基的政策中。波兰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胜利，这只是关于波兰的一种设想。这也称不上是战后民族自决的范例，而是现代民族主义对立陶宛大公国传统的多民族爱国主义的胜利（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民族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的胜利。）

到1918年为止，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怀念立陶宛大公国的产物——成为现代波兰和现代立陶宛民族主义的准则。1920年，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愿望——成为士兵们夺回维日诺，将其纳入波兰民族国家版图内的动力。让我们从充满讽刺的现实回到战争世界，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

1917年11月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在俄国西北部领土——曾经的立陶宛大公国——之上造成了让人非

常困惑的局面。德国军队在西线败于英国、法国和美国之手，但它在东线却未被打败。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和俄国白军（Russian White Armies）之间发生战争；在历史上的立陶宛地区，当地政治家宣布民族独立，竭力组建自己的部队。协约国对民族自决的支持为波兰独立提供了规范性基础，但是西方国家缺乏军事力量以决定或促成东方国家的结局。德国军队陆陆续续撤退，他们经常能找到留下并和布尔什维克战斗的理由。[28]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活动家希望能以德军作为掩护，在布尔什维克到来前完成他们自己的新国家建设。白俄罗斯人对维尔尼亚的争取最先失败了。由安东·卢茨克维奇（Anton Lutskevich）领导的白俄罗斯民族委员会于1918年3月正式宣布，维尔尼亚是独立的白俄罗斯的领土之一。他们构想中的白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与领土声明一同发布的还有对包容性的声明。卢茨克维奇希望将原立陶宛大公国重建为一个横跨波罗的海和黑海的现代社会主义联邦国家。这份声明是在德国占领期间发布的，德国方面对此没有给予任何支持。在1918年12月红军进入前，卢茨克维奇和委员会大部分成员无论如何也要逃往明斯克。在维尔尼亚，他们提出了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同盟的提议。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者相信联邦制度能将维尔尼亚从“文职资产阶级”（clerical bourgeois）民族国家立陶宛手中拯救出来。[29]当时正陷于极度困境的立陶宛领导人对这个拯救方案不感兴趣。因此，以白俄罗斯之名重建历史上的立陶宛的计划在那时就此终结。这一失败却催生了一连串的成功。虽然布尔什维克党是集权化的，但它向留在明斯克的白俄罗斯亚活动家许诺建立一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0]尽管这个共和国刚开始只有明斯克周围的一小片土地，但在1922年苏联成立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急剧扩张，并存在了70年。

布尔什维克革命消除了立陶宛政治生活中的对沙俄的忠诚，而战争经验也使立陶宛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更加清晰了。在战争的最后一年，独立运动层出不穷。1917年9月，德国军队在维尔纽斯宣布保护立陶宛民族委员会（Taryba），这对“在民族志边界内”独立的立陶宛来说是必要的。德国人已经为波兰王国的宣言背书，他们希望借此防止波兰声明对维日诺和立陶宛的所有权。立陶宛活动家充分认识到德国的这一战略考虑，决定对此充分加以利用。[31]在1917年12月2日，立陶宛民族委员会在维尔纽斯宣布独立，同时接受德国保护国的地位。立陶宛活动家紧张地关注着德国和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谈判，双方都以民族自决为依据支持它们对立陶宛的所有权声明。在1918年2月，立陶宛民族委员会再次宣布独立，这次他们不再宣誓对德国的忠诚。柏林对此几乎不在意，此时德国军队正挺进俄国。德国在西线的失败让立陶宛民族委员会在1918年10月得以绘制新的路线。[32]他们没有时间庆祝。红军很快向立陶宛推进。他们与波兰军队关于保护立陶宛的紧急谈判在1918年12月破裂了。没能组建起一支军队的立陶宛政府，从毫无防备的维尔纽斯撤离到更西面的考纳

斯。当地的波兰志愿军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后者于1919年1月5日接管该城。之后，维尔纽斯成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由两名立陶宛共产主义者领导。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很快和新的白俄罗斯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维尔纽斯成为“立-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对立陶宛爱国主义者、波兰联邦主义者和拥护共和制度的社会主义者毕苏斯基来说，这是最坏的结果。在华沙，他默默流泪。[33]

但是，在华沙和考纳斯的立陶宛人看来，这一结果并非定局。在1919年初，军事力量的进驻或撤出几乎没有改变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对维尔纽斯/维日诺的想法。立陶宛领导人将维尔纽斯视作他们国家的首都，处于极度弱小状态的他们需要波兰撤回所有权声明。毕苏斯基现在是波兰的国家领袖，他已经准备好把维日诺授权给立陶宛人，条件是立陶宛加入波兰组成联邦。但是加入波兰国家的想法是立陶宛政治家最厌恶的，他们害怕波兰的高雅文化和可量化的优势地位，现在他们渴望的是完全的独立。[34]毕苏斯基和波兰联邦主义者没能完全认识到立陶宛人的恐惧和热望，尽管他们的立场比其他波兰人的立场更自由。他们在波兰的对手——德莫夫斯基的民族民主党人，则认为小小的立陶宛（如果他们能幸存下来）别无选择，只能成为波兰的卫星国。[35]波兰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在关键问题上想法一致：波兰-立陶宛王国已经灭亡了，多民族联邦更无从谈起。

布尔什维克的实力这一实际议题被置于道德义务的框架内看待。1919年2月，波兰军队向东行进与红军交战。波兰议会在这次不宣而战的战争的领土目标问题上产生分歧，但他们正式对外宣布“波兰东北部省份和首都维日诺”应该被解放。[36]毕苏斯基的军队于1919年4月21日将红军驱逐出维日诺。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逃往明斯克，彼此指责称“立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陷落是对方的过错。在进攻前，毕苏斯基派了同伴米哈乌·罗默——一位波兰的立陶宛人——去往考纳斯组建一个波兰-立陶宛政府，但是没有一个立陶宛部长对此有兴趣。4月22日，维日诺的立陶宛人听到了“致前立陶宛大公国居民的声明”中毕苏斯基的承诺，他承诺说当地居民可以选择自己的政府。波兰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纷纷谴责这一声明。在华沙，波兰民族民主党人认为不把维日诺当作波兰城市是很荒谬的；在考纳斯，立陶宛政府将毕苏斯基引证大公国历史的做法当作波兰帝国主义的伪装。

1919年夏天，当协约国在巴黎试图对领土分配做最后决定时，波兰和立陶宛武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结果不明的小冲突。1919年8月，毕苏斯基两次提议全民投票，一次是在波兰武装占领的土地上，另一次是在立陶宛的其余地区。立陶宛领导人反对他的提议，理由是维尔纽斯是立陶宛民族的领土，无论其居民对此发表什么意见。外交部部长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Augustinas Voldemaras）相信“一个民族由更多死者而非生者组成”，

这个想法也许在计算选票时会引发实际问题。[37]之后，毕苏斯基在1919年8月试图推翻考纳斯的立陶宛政府，但是他的策划者找不到一个立陶宛合作者，很快他们就被逮捕了。如果当时在立陶宛领导层中有任何结盟波兰的支持者，这次惨败也会使他们哑口无言。

在1919—1920年冬天，毕苏斯基相信他们能在战场上打败俄国，维日诺的问题随之也就迎刃而解了。1920年4月，毕苏斯基的波兰与西蒙·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38]的乌克兰结盟，这是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一次进攻。大约同一时间，布尔什维克-立陶宛条约谈判开始。1920年7月，在立陶宛和布尔什维克俄国准备签订双边条约时，战局开始对波兰不利。考虑到这将是致命一击，布尔什维克俄国许诺把维尔纽斯给立陶宛，作为交换红军将能自由地经由立陶宛前往波兰。立陶宛同意在1920年7月12日的《莫斯科条约》中附上这一秘密协议；红军很快占领了维尔纽斯，之后将其交给立陶宛。1920年8月，波兰军队在华沙边界处阻止了红军的行进，并将红军赶出了波兰。[39]如果波兰人在1920年战败，那么布尔什维克俄国肯定会吞并小小的立陶宛国。当时立陶宛政府想的全是波兰，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能保住立陶宛的独立，并使立陶宛拿回维尔纽斯。这肯定是错误的想法。[40]

当波兰和布尔什维克代表1920年9月在里加（Riga）进行和平商谈时，协约国强权向波兰和立陶宛施压，要求他们解决双方分歧。因此，双方在1920年10月7日达成政治共识，划定了停火线，将维尔纽斯归到立陶宛这边。事实上，毕苏斯基秘密计划了一次军事行动，旨在夺回维日诺，重燃建立新立陶宛大公国的希望。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卢茨扬·泽里格斯基（Lucjan Żeligowski）将军，这也是一名波兰的立陶宛人。泽里格斯基之前服役于俄国军队，他娶了一个俄国妻子，说着一口类似白俄罗斯语的波兰语：换言之，他也是大公国之子。在去往维日诺的路上，从毕苏斯基向其他军官发表的关于“立陶宛-白俄罗斯”划分的讲话，我们可以听出一种非常地方化的爱国主义诉求：“你们来自这些地方，你们已经武装好，那么继续向家迈进。”[41]1920年10月9日，泽里格斯基大约带领1.5万名士兵进军维日诺。立陶宛军队完全没有抵抗，城市里的波兰市民欢迎这些士兵入驻。10月12日，泽里格斯基正式宣布这里是“中心立陶宛”（Central Lithuania），即这里将作为一个立陶宛州（canton）以联邦的形式加入波兰。

另外两个州是以考纳斯为首都的民族立陶宛，以及以明斯克为首都的白俄罗斯的立陶宛。立陶宛以省的形式加入波兰联邦，这个想法并不是当时才有的。1863年起义期间，这个想法就被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就此讨论了几十年。然而，在1920年的背景下，这个想法是不可能实施的。一个复兴的、联邦制度下的立陶宛大公国至少需要有三个州，而泽里格斯基和毕苏

斯基只能创立一个州。当然，考纳斯的立陶宛政府根本不想成为州，而入侵考纳斯不仅会违反联邦主义精神，还会激怒其他欧洲强权。波兰民族民主党人尽力确保不会出现一个白俄罗斯-立陶宛州。就在泽里格斯基正式宣布“中心立陶宛”的那一天，在里加的波兰代表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明斯克和波兰军队占领的其他土地归波兰的提议。每个人都明白这为联邦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位波兰代表受控于民族民主党人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Stanisław Grabski，1871—1949），后者希望建立一个波兰人处于统治地位的波兰。他越过了毕苏斯基的盟友利昂·瓦西莱夫斯基（Leon Wasilewski）设定的联邦主义者界限。[42]这位代表代表的是民主波兰政府和选民选举出的议会，不是波兰国家首脑毕苏斯基。在毕苏斯基背后的是军队和军官团队，而站在格拉布斯基背后的是由民族民主党人主宰的议会。

由于华沙的波兰民族民主党人和考纳斯的立陶宛政府强烈反对，联邦理念前景黯淡，两方都阻止白俄罗斯和民族立陶宛州出现的任何可能性。为了创造新的民族国家，为了埋葬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传统，现代民族主义者心照不宣地结成联盟。毋庸置疑，立陶宛已经正式退出了1569年卢布林联合。

里加的民族后果，1921—1939

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活动家把里加协议视为背叛和悲剧。其他打击将接踵而至，而且里加之后，他们很难再将华沙视为白俄罗斯民族期望的盟友。虽然波兰拥有了维日诺和一些白俄罗斯西部领土，要让联邦制度变得可信，这还远远不够。里加协议中的边界规定使得在波兰说白俄罗斯语的群体变成少数派，且都在农村地区，而这正是民族民主党人想要的结果。没有明斯克，白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人数太少，以至于无法成为支持波兰政治结构的盟友；一旦明斯克成为苏联的领土，那么波兰国内对白俄罗斯民族抱有期望的人可能被视为布尔什维克秘密党人（crypto-Bolshevism）。[43]苏联确实对波兰的白俄罗斯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1921年里加协议签订后，作为名义上的共和国联盟，苏联于1922年诞生了，其中就包含了白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其首都在明斯克。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执行了苏联的政策，即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应该向西扩展，将波兰境内属于白俄罗斯亚族的土地纳入进来。

20世纪20年代，传入波兰的共产主义利用了反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苏联刚刚成立的时候，列宁的两大战略创新——与农民阶层结成联盟、利用民族自决——在策动波兰革命时发挥了作用。国内的行动支持了境外策动。种族原则是苏维埃白俄罗斯国内的复仇主义和建立在波

兰的西部白俄罗斯亚共产党的基础，事实上苏联内部就已经执行种族原则了。苏维埃白俄罗斯在1923年、1924年和1926年不断向东扩张领土，而这是以曾经的俄罗斯共和国（Russian republic）为代价的。在20年代，莫斯科支持白俄罗斯文化。在沙皇时期没有学校用白俄罗斯语授课，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却以拥有这些为荣：一个国家科学院、一所国立大学、一所文化研究所、一座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4000所白俄罗斯语学校。第一本正式的白俄罗斯历史课本正是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编写的：但它并未出版，其作者也被流放至莫斯科。[44]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波兰的高压政策下，国内剩下的白俄罗斯语学校被关闭，异见者被关进监狱。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在维尔尼亚停滞不前。白俄罗斯活动家几乎没有机会使现代民族理念从维尔尼亚传播到众所周知的落后地区，比如波利西亚（Polesie）。波兰当局从不允许任何白俄罗斯亚民族社团成立。另一方面，斯大林的苏联也在30年代摧毁了自20年代兴起的苏维埃白俄罗斯社团。我们从白俄罗斯政治家和作家布拉尼斯洛·塔拉什克维奇（Branislau Tarashkevich，1892—1938）的命运就可以看出这种反差。塔拉什克维奇出生在维尔尼亚附近，之后在城里上学，年轻时就参加了俄罗斯帝国的波兰和白俄罗斯组织。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他是白俄罗斯民族事业的主要倡导者，担任议会议员、白俄罗斯语学校的负责人以及农民组织赫罗马达（Hromada）的创始人和领袖。1925年，他加入了西部白俄罗斯亚共产党，在波兰被捕入狱。他被关在狱中四年多，在牢房里翻译了《塔杜施先生》全诗。1933年的一次囚犯交换后，塔拉什克维奇带着翻译手稿去了苏联。在那里他也无法出版手稿。事实上，他甚至不被允许居住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1937年他又在莫斯科被捕，并在次年被处以死刑。多亏了塔拉什克维奇的遗孀，他的翻译手稿才得以幸存。[45]



图3：普里皮亚季沼泽（靠近平斯克），波利西亚地区，波兰，1934年。在今天的白俄罗斯，人们很难查明在这些地方的当地人究竟是何种国籍。



图4：霍迪尼琴科（Chodynicze）的两位老人，波利西亚，波兰，1934年。



图5：拉特涅（Ratno）与科布林（Ko-bryń）间的一位流浪者，波兰，1934年。拉特涅位于今天的乌克兰境内，科布林在今天的白俄罗斯境内。拍下这张照片时，摄影师正在波兰的波利西亚沼泽间。

波兰。里加协议、白俄罗斯被瓜分，以及维日诺被暴力夺取，这些都标志着密茨凯维奇的大公国理念在波兰政治生活中遭遇惨败。毕苏斯基作为这种联邦传统的代表，被宣扬民族主义不可或缺的德莫夫斯基给彻底打败了。民族民主党人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他们的方法非常简单。他们还享受着基本的政治地理优势。由于那时波兰东部已经被红军占领，1920年2月选出的议会仅代表了波兰中部。议会中民族民主党人占绝对多数，因此议会也无意于兼并更多东部领土以创造一个联邦国家。议会对里加协议的支持使波兰变成一个太过向西以至于无法成为联邦的国家，但是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它又不够向西。1921年，民族民主党人在

里加向布尔什维克拱手让出了明斯克、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ieniec Podolski）、别尔基切夫（Berdyczów）和周围地区，这迫使数十万波兰人——他们中很多人对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联邦国家表示欢迎——归入莫斯科的“悉心照料”下。大多数生活在苏联的波兰人在20世纪30年代被驱逐到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同时，民族民主党人的弃权使波兰失去了大约200万东斯拉夫潜在人口（potential population）和数十万犹太潜在人口。[46]民族民主党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如果波兰的边界再往东面延伸，他们根本不可能赢得选举。正如1922年议会选举所显示的那样，里加协议划定的波兰会慢慢地被民族民主党人和右翼人士分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和少数族群也会形成分裂。1922年12月9日，左翼人士、中间派和少数族群选出了波兰历史上第一位总统加布里埃尔·纳鲁托维奇（Gabriel Narutowicz）。一周后，他被一名右翼极端分子刺杀身亡。和毕苏斯基一样，纳鲁托维奇是波兰的立陶宛后裔，他倾向于为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纳鲁托维奇被刺身亡对毕苏斯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他（暂时）退出政坛。

毕苏斯基在维日诺所取得的残缺胜利不可避免地瓦解成民族民主党人所构想的波兰。波兰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葬送了毕苏斯基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理想，同时维日诺也被民族国家波兰同化。1923年1月8日，泽里格斯基在维日诺安置的文官政府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这场选举是在波兰军事统治下进行的，当地的犹太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抵制选举，期间频发的违法事件也破坏了选举工作。但是，维日诺市内54.4%的参与率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信息，非波兰人士的抵制意味着推崇领土合并的波兰人控制了当地议会。追根溯源来看，波兰吞并维日诺似乎因为维日诺是一个“种族上”属于波兰的城市。实际上应该反过来说：吞并维日诺是根除传统爱国主义，加速波兰和立陶宛种族爱国主义的第一步。在全民公投后，波兰正式兼并了维日诺和周围领土，协约国也承认了这些新的边界。

立陶宛。如果波兰把维尔纽斯/维日诺授予立陶宛，那么立陶宛的民族主义会如何发展呢？许多说波兰语的维日诺居民投票支持兼并，毕苏斯基和泽里格斯基和他们一样，也称自己是立陶宛人。毕苏斯基忠诚于历史上的立陶宛，德莫夫斯基渴望的是吞并一座“波兰”城市，他们二人间的分歧真实存在且十分重要，分别代表了毕苏斯基的传统爱国主义和德莫夫斯基的种族民族主义。不过，毕苏斯基通过占领维日诺巩固了一种领土秩序，即那里的波兰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得以欣欣向荣，这是毕苏斯基之前的左膀右臂米哈乌·罗默建议的。无论毕苏斯基的动机如何，在立陶宛人看来夺取维日诺之举不符合大公国的传统。正如我们所见，立陶宛和维尔纽斯之间的联系是有历史渊源的。无论毕苏斯基如何考虑自己的行动，武装占领该城注定会使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从对民族的政治性理解转向种族性理解。而且，就像罗默指出的那样，吞并维尔纽斯将一个新的立陶宛国家从波兰的

立陶宛人和犹太人手中夺走，他们本可以使立陶宛社会更加繁荣，使它的政治制度更具操作性。罗默深知，犹太人已经渐渐开始同情立陶宛人的所有权声明，他们相信一个以维尔纳作为首都的、多民族的立陶宛，会更尊重他们的权利。他们得到的回报是1919年现代维尔纳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大屠杀。[47]

无论边界如何划定，任何在大公国领土上建立的民族国家都会强制个人做出选择。1920年后，世俗犹太人得出结论：只有拥有了有别他人的犹太政治生活才能维护他们在波兰的维日诺的利益。在声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后，天主教精英通过确认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民族社会中起到何种作用以及国家权力的可用性，而确认相应的民族认同。大多数波兰的立陶宛人在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作为毕苏斯基曾经的同志、使节以及之后的批评者，罗默在1920年永远地选择了立陶宛，把他的名字立陶宛化为“罗梅里斯”。作为一名法官、法学教授和考纳斯大学校长，他很好地为立陶宛国家和社会服务；他终生反对激进民族主义，并致力于调和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其他人的选择也出乎意料。加布里埃尔·纳鲁托维奇——被刺杀身亡的波兰第一任总统——是斯坦尼斯洛瓦斯·纳卢塔维修斯（Stanislovas Narutavičius）的兄弟，后者是立陶宛民族委员会主席团和第一任立陶宛政府的成员。

“立陶宛！我的祖国！”

和其他波兰的立陶宛人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毕苏斯基从未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真正做出选择；世界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而民族国家是由相应种族的公民组成的，他从未接受过这一点。他夺取了维日诺，和至少一代立陶宛人的关系恶化，毕苏斯基说他还是“忍不住把他们视为兄弟”。在意识到联邦主义不切实际之后，他还是不能接受民族主义。他的共和理念并未被大多数波兰同伴认可，最终他依靠军事实力和克里斯马式的个人魅力遏制住大部分人的观点。1926年通过军队力量获得权力后，毕苏斯基既不信任波兰公民可以代替他，也无法想象自己专制统治的情景。九年来，毕苏斯基统治了一个让他既失望又陌生的波兰。当他在1935年逝世后，他被埋葬在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城堡（Wawel Castle），和历代波兰国王葬在一起，其中包括立陶宛大公约盖拉。他的心脏从胸腔中被取出，安置在维日诺的罗萨墓园（Rossa cemetery），按照家族传统紧挨着他母亲的坟墓。

“你如同健康一般，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贵。”



图6：波兰革命家、继承立陶宛传统的政治家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的心脏葬礼，1936年5月12日在维日诺（今天的维尔纽斯）。

毕苏斯基深知，从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传达的意境来看，他最终失去了立陶宛。毕苏斯基的心脏和他的身体分置两地，比这更能影射历史上的立陶宛和现代波兰的分裂的，也许是毕苏斯基的波兰没有为密茨凯维奇在维日诺竖立纪念碑。[48]在诗人从未踏足的波兰城市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对密茨凯维奇的纪念，比如华沙和克拉科夫，但是在他上学和从这里被流放的城市，却没有任何永久性的纪念。在沙皇统治时，纪念密茨凯维奇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密茨凯维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东斯拉夫土地上持久的波兰文明，不断吸引皈依的罗马天主教文化，以及俄国武力和俄国教育无法根除的敌对民族理念。然而在独立的波兰，维日诺波兰人发现他们在密茨凯维奇的本意和如何阐明他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维日诺是被子弹和选票征服的：哪里又有诗歌和预言的空间呢？

“就像蝴蝶淹没在金色的琥珀中……”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日诺，冷酷无情却令人向往的现代民族主义使浪漫主义的形象固定为化石，但不能赋予它们生命。最好的证明就是波兰人占领维日诺后试图为密茨凯维奇建立一座纪念碑。泽里格斯基将军召集了一个委员会以处理此事，但是他的任何计划都没有得到支持。驻守当地的波兰军队的军营穿过涅里斯河（River Wilia），不在当地市镇当局的管辖

范围内，军队想在军营内树立一尊雕塑。他们接受了先锋派艺术家兹比格涅夫·普罗纳什科（Zbigniew Pronaszko）笨重的形式主义设计。雕塑的木质底座一经公布，就遭到当地居民的嘲弄。当地的主要报纸抱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波兰人被一个“灰色的幽灵”代表。[49]这座四层楼高的模型始终未被用混凝土浇灌起来。1939年夏天，这座雕塑被闪电击中，它的碎片沿着军事基地旁的山丘滚下来，掉进涅里斯河。普罗纳什科的设计灵感源于密茨凯维奇伟大的竞争者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Juliusz Słowacki）[50]的一句诗，他将密茨凯维奇比作立陶宛的神。而这座雕塑的命运如同异教神在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后的遭遇一般。

1939年，另一座密茨凯维奇的纪念碑在维日诺动工。在军队公布了建造计划后，全城继续搜寻更得体的替代方案。市政纪念碑的设计者是波兰犹太雕塑家亨里克·库纳（Henryk Kuna），他在那年夏天完成了花岗岩浮雕部分。9月，他未完成的作品被德军炮弹击中。如果有比1939年7月纪念碑被闪电击中损毁本身更具象征意涵的事情，那肯定就是1939年9月的闪电战损毁了纪念碑。是月，波兰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入侵并瓜分。1939年，斯大林把维日诺转让给立陶宛，然后在1940年将立陶宛并入苏联。纳粹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在1941—1944年全面清洗维日诺的犹太人。在纳粹占领下，库纳的纪念碑剩下的花岗岩板材被用来加宽一座墓园的主路。[51]1944年红军再度回到维日诺，在立陶宛再次确立了苏联的统治。在1944年到1946年期间，维日诺的波兰人遭到驱逐。

“亲爱的，让我们保持原样，恰似我们曾经那样。”

在苏维埃立陶宛，这些花岗岩板材被从墓园取出，放置到当地的艺术学院。这个国家肯定被俄罗斯化，艺术被分门别类，诗人也被遗忘了吗？这座城市非但没有成为俄罗斯的维那，还成了立陶宛的维尔纽斯。而密茨凯维奇非但没有被遗忘，还成了立陶宛民族诗人。1984年在苏维埃立陶宛，立陶宛人在波兰人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格季米纳斯·约库博尼斯（Gediminas Jokubonis）完成的密茨凯维奇（或者应该说是米茨凯维邱斯）雕像在维尔纽斯亮相。1996年在独立后的立陶宛，库纳的花岗岩板材作为背景材料用在了这座新的纪念碑上。从波兰纪念碑，变为碎石、墓园小路、艺术品残片，最后成为立陶宛纪念碑：这是浪漫主义式的乱中有序，浪漫主义民族理念令人难以置信地重新回归公共艺术和政治生活。“二战”期间，立陶宛获得了维尔纽斯，在苏联的统治下使当地的公共生活重新立陶宛化，从波兰人那里夺回了伟大诗人的所有权，并最终赢得民族独立。下面两章将揭示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

[1] M.V. Dovnar-Zapol’skii,Narodnoe khoziaistvo Belorussii, 1861–1914 g.g., Gosplana BSSR,1926,8-28.

[2] 盖迪米纳斯（1275—1341），于1315年继任立陶宛大公，直到1341年去世。在他统治时期，立陶宛领土从波罗的海扩展到黑海，他被认为是立陶宛历史上最赫赫有名的人物。

[3] 1909年，一份官方统计发现共有205250名城市居民，其中1.2%是立陶宛人，20.7%是俄国人，37.8%是波兰人，36.8%是犹太人。P. Gaučas and A. Vidugiris, “Etnolingvisticheskaia situatsiia litovsko-belorusskogo pogranich’ia,” Geografiia,19 (1983), 62-63. 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统计出40%的犹太人，31%的波兰人和2%的立陶宛人。Nicholas Vakar, Belorussi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2. 又见Zinkevičius, History of the Lithuanian Language, 288; Piotr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o ściowe na Litwie w XX wieku,” Przegląd Wschodni, 1, 3 (1991), 456-457。

[4] 引自1902年Egidijus Aleksandravičius, “Political Goals of Lithuanians, 1883-1918,”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3, 3 (1992), 234; from 1905, Jean Pelissier, Les principaux artisans de la Renaissance Nationale Lituanienne, Lausanne: Léman, 1918, 177; 也可参阅Alfonsas Eidintas and Vytautas 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39; Piotrłossows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 1918-1920, Warsaw: Ksi ą żka i Wiedza, 1966, 35-40。

[5] Vitaut Kipel and Zora Kipel, eds.,Byelorussian Statehood, New York: Byelorussian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88, 32-36, 37-52, 125-129.

[6] Adam Maldzis, “Belaruska staulenne da Liublinskai unii,” in Jerzy Kłoczowski et al., eds., Unia lubelska i tradycje integracyjne w Europie środkowo-wschodniej, Lublin: IESW, 1999, 154-155.

[7] Mikhal Bich, “Ad idei adnaulennia Rech’i Paspalitay da barats’b’i za stvarenne nezalezhnay belaruskay dziarzhav’i,” in Kloczowski et al., eds., Unia lubelska, 173.

[8] Aliaksandr Ts’vikevich, “Zapadno-russizm,” Minsk: Navuka i tekhnika, 1993［1928］, 314.

[9] Guthier, “The Belorussian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Assimilation,”Soviet Studies, 29, 1 (1997), 40—47; Piotr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ósciowe na Litwie, Warsaw: Przegl ąd wschodni, 1997, 46; Piotr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ościowe na Białorusi, Warsaw: Editions Spotkania, 1994, 14. 这些比例数据基于1897年人口普查，以当地语言采集数据。

[10] 关于土地，见Witold Rodkiewicz,Russian Nationality Policy, Lublin: Scientific Society of Lublin, 1998, 79; on language, Zofia Kurzowa, Język polski Wileńszczyzny i kresówpółnoc no-wschodnich, Warsaw: PWN, 1993, 221-311。

[11] 在这个方面，这些波兰人的波兰性与奥地利转向大众民族主义政治前奥地利自由主义者身上的德国性（Germanness）相似。Pieter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12] Juliusz Bardach, “O świadomo ści narodowej Polaków na Litwie i Bialorusi,” in Wojciech Wrzeziński, ed., Między Polską etniczną i historyczną, Wrocław: Ossolineum, 1988, 246-247; Aliaksandar Smalianchuk, “Histar’ichnaia s’viadomas’ts’i idealiohiia paliakau Belarusi i Litv’i na pachatku XX stahodz’dzia,” Belaruski Histar’ichn’i Ahliad, 1,2 (1995), 32-40.

[13] 例如Michal Römer, Litwa, L’viv: Polskie towarzystwo nakladowe, 1908。其他类似的著作有Bardach, “Polacy Litewscy,” in Jerzy Kloczowski, et al., eds., Belarus, Lithuania, Poland,Ukraine, Lublin: IESW, 1994, 372-373。

[14] 数据来源于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

[15] 米哈乌·罗默（1880—1945），立陶宛律师、科学家和政治家。他后来将名字改作了立陶宛语的米科拉斯·罗梅里斯（Mykolas Römer’is）。

[16] Eidintas and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18; Egidijus Motieka, “Pocza ątki nowożytnego państwa litewskiego,” in Krzysztof Jasiewicz, eds., Europa nie prowincjonalna, Warsaw: Rytm, 1999, 224-231; Rimantas Miknys, “Wilno i Wileńszczyzna w koncepcjach Michała Römera i krajowców,”同上书，70; Vytautas Berenis, “Problem dziedzictwa kulturowego Wielkiego Księstwa Litewskiego w ideologii litewskiego ruchu narodowego,”同上书，467-473.

[17] 当时有人试图把波兰语作为使有阅读能力的公众重新立陶宛化的工具。Tadeusz Bu-jnicki, “Polskojęzyczne pisarstwo Litwinów w Wilnie,” in Greta Lemanaitė and Paweł Bukowiec, eds., Litwa, Cracow: WUJ, 1998, 117-122.

[18] 上文所引的1909年统计数据表明，当时有37.7%的波兰人和36.8%的犹太人。根据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当时城市里有40.4%的犹太人和30.9%的波兰人。关于贸易方面，见Nancy and Stuart Schoenburg, Lithuanian Jewish

Communities, New York: Garland, 1991, 354。

[19] 马克·夏加尔（1887—1985），超现实主义画家之一，出生于维捷布斯克贫困的犹太家庭。故乡的自然景象和宗教传统为夏加尔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元素，不断出现在其作品中。

[20] 卡巴拉，字面上的意思是“接受/传承”，是与犹太哲学观点有关的思想，用来解释永恒的造物主与有限的宇宙之间的关系。

[21] 哈斯卡拉运动，即犹太启蒙运动，是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犹太人的一场社会运动，运动旨在吸取启蒙运动的价值，推动社群更好地融入欧洲社会。哈斯卡拉运动标志着欧洲犹太人与世俗世界开始更广泛地接触。

[22] 关于拉比巴尔·谢姆·托夫（也称Besht）和拉比加翁的比较，见Moshe Rosman, Founder of Hasid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36-37。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波兰的社会起源，见Ezra Mendelsohn, Zionism in Polan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关于维也纳的同化主义与民族主义，见Marsha Rozenblit, The Jews of Vienna1867-1914, Albany, N.Y.: SUNY Press, 1983, 175-195。又见Joshua Levisohn, “The Early Vilna Haskalah,”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23] Harry Tobias,The Jewish Bund in Russi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46, 52-53; Henri Minczeles, Vilna, Wilno, Vilnius, Paris: Éditions de la Découverte, 1993.

[24] Stefan Kawym,Ideologia stronnictw politycznych w Polsce wobec Mickiewicza 1890-1898,L’viv: Filomat, 1937; Józef Kozłowski, “My z niego wszyscy . . .” Warsaw: Czytelnik, 1978.

[25] 罗曼·德莫夫斯基（1864—1939），波兰政治家。他开创的民族民主政治运动在50年内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波兰的历史与政治，并令其追随者成为当时波兰最强大的政治集团之一。

[26] 该评估基于Jeffrey Kopstein和Jason Wittenberg在2000年为他们的项目“重新思考两次大战间中东欧独裁与民主的社会基础”所收集的数据。

[27] 1939年Ksawery Pruszy ński把德莫夫斯基的社会根源与一种新的波兰民族主义联系起来。Niezadowoleni i entuzjaści, Warsaw: 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 1990, 637-644. Andrzej Walicki做了清醒的介绍，“The Troubling Legacy of Roman Dmowski,” East European Pol itics and Societies, 14, 1 (2000), 12-30。Brian Porter把现代波兰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过去历史的放弃来看待：

When Nationalism Began to H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又见Patrice Dabrowski, “Folk, Faith, and Fatherland,” Nationalities Papers, 28, 3 (2000), 397-416。可大致参阅Piotr Wandycz, The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Stefan Kieniewicz, Historia Polska 1795–1918, Warsaw: PWN, 1997; Antony Polonsky, Politics in Independent Po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28] Vejas Liulevicius,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9] Bich, “Ad idei adnaulennia Rech’i Paspalitay,”174-175; 引自Vasil Zacharka, in Kipel and Kipel, Byelorussian Statehood, 97。

[30] Ivan Lubachko,Belorussia under Soviet Rule,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72, 24-25.

[31] Antanas Smetona,Die litauische Frage, Berlin: Das neue Litauen, 1917, 29.

[32] Stanley Page,The Form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30-97; Wiktor Sukiennicki, East Central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 vol. 2,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4, 668-705.

[33] Andrzej Garlicki, “Wilnaż ądaj ą wszyscy,” in Robert Traba, ed., Tematy polsko-litews kie, Olsztyn: Borussia, 1999, 72.

[34] PiotrŁossowski, Po tej i tamtej stronie Niemna, Warsaw: Czytelnik, 1985, 105. 关于立陶宛人的挫败感，见Juozas Gabrys, L’Etat Lithuanien et Mitteleuropa, 1917; Lituanus, La vérité polonaise sur les Lithuaniens, Lausanne: Bureau d’Information de Lithuanie, 1917。

[35] Piotr Eberhardt, “Wizje i projekty Polskiej Granicy Wschodniej w latach 1914-1921,” Przegla ̨d Wschodni, 5, 2 (1998), 348-351.

[36] Piotr Wandycz,Soviet-Polish Relations, 1917-192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0.

[37] Alfred Erich Senn,The Great Powers, Lithuania, and the Vilna Question, Leiden: Brill, 1966, 55.

[38] 西蒙·彼得留拉（1879—1926），乌克兰政治家、军事家。“十月革命”后，他组织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俄国白军作战，企图维护乌克

兰的独立自主，失败后流亡欧洲。

[39] Norman Davies,White Eagle, Red Star, London: Macdonald and Co., 1972; Lucjan Żeligowski, Wojna w roku 1920, Warsaw: Polska zjednoczona, 1930.

[40] Wandycz,Soviet-Polish Relations, 209; Eidintas and 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70, 77; Andrzej Ajnenkial, “Od aktu 5’ego listopadu do traktatu ryskiego,” in Mieczyslaw Wojciechowski, ed., Traktat Ryski 1921 roku po 75 latach, Toruń: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Mikołaja Kopernika, 1998, 27. 这是1939年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波兰战败，苏联把维尔纽斯割让给立陶宛，之后苏联占领了立陶宛。

[41] Lucjan Żeligowski, Zapomniane prawdy, London: Mildner and Sons, 1943, 32-43; 毕苏斯基的话引用自Bohdan Skaradziński, “Fenomen litewsko-białoruskich formacji Wojska Polskiego,” in Jasiewicz, Europa nie prowincjonalna, 902。又见Andrzej Nowak, Polska i trzy Rosje, Cracow:Arcana, 2001, 326-332。

[42] Jan D ąbski, Pokój ryski, Warsaw: Kulerskiego, 1931, 78; Witold Wojdylo, “Traktat w Rydze w koncepcjach politycznych obozu narodowego,” in Wojciechowski, Traktat Ryski 1921, 53-55. Krzysztof Kawalec, “Narodowa Demokracja wobec traktatu ryskiego,”同上书，31–45，提到了格拉布斯基的第二个动机。关于瓦西莱夫斯基见Barbara Stoczewska, Litwa, Białoruś, Ukraina w myśli politycznej Leona Wasilewskiego, Cracow: Księgarnia Naukowa, 1998。关于毕苏斯基和瓦西莱夫斯基，见Wasilewski, Józef Piłsudski: Jakim go znałem, Warsaw: Rój, 1935。

[43] “白俄罗斯亚”意味着俄罗斯把这片区域视为大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白俄罗斯”意味着立陶宛和罗斯大公国的后裔对这个国家的一种爱国主义观点。

[44] 我想到的是M.V. Dounar-Zapolski,Historyia Belarusi, Minsk: Belaruskaia entsyklopedia, 1994。这份手稿于1926年完成。关于苏联对农民的剥削以及波兰的民族主义问题，见George Jackson, Comintern and Peasant in East Europe, 1919–193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22, 182, 以及全书其余部分。

[45] 该书曾在共产主义波兰出版：Adam Mickiewicz,Pan Tadeusz, trans. Bronisław Taraszkiewicz, Olsztyn: Pojezierze, 1984。

[46] 白俄罗斯历史学中的一个传统就是讨论如果里加会议把所有“种族上属于

白俄罗斯人的土地”都还给苏维埃白俄罗斯亚，那么历史走向原本会如何；另一个传统是讨论如果白俄罗斯独立国家出现了，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实上，这些连可能性都算不上。本书将提出一个不那么反事实的观点，与运动过程中被接受和拒斥的主张有关。见Uladzimir Lad’iseu and Petr Br’ihadzin, “Rada BNR paslia R’izhkaha dahavora 1921 r.,” Belaruski histarychny chaso pis, 1 (1997), 48-50。

[47] 关于1992年5月15日在考纳斯的米哈乌·罗默和华沙的约瑟夫·毕苏斯基，见Anna and Andrzej Rosner, eds., Pasmo czynno ści cia ̨giem lat ida ̨ce, Warsaw: Kra ̨g, 1992, 158162；关于大屠杀，见Ezra Mendelsohn, 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52；关于1918-1920年，见Łossows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关于20世纪20年代，见Alfred Sen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thuani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5。

[48] 在维日诺的Ko ściól Akademicki有一座密茨凯维奇的小型纪念碑。

[49] Słowo (Wilno), 1 November 1924, 1.

[50] 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1809—1849），波兰浪漫主义诗人，被认为是波兰现代戏剧之父。其作品中融入了斯拉夫神话、波兰历史、神秘主义和东方元素。

[51] Piotr My ślakowski, “Losy wileńskich pomników Mickiewicza,” Biuletyn Stowarzysze nia Wspólnota Polska, October 1998.

第4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维尔纽斯之问（1939—1945）

比亚沃查维、希维特什、波纳瑞和库舍莱夫的葱茏森林啊，

你们是立陶宛大公们的朋友！

你们的绿荫曾抚平忧虑的维特勒斯和伟大的明道加斯王冠下的恐惧。[1]

还有大公盖迪米纳斯，在波纳尔山顶躺在猎人的熊皮中取暖，

倾听着睿智的利兹德伊科的歌，在维雷卡河的流水声中入梦。[2]

在梦里他看见一只铁狼。

醒来后他遵照天神的命令在森林中央建起维日诺城，

恰似在野牛、野猪和熊群中的一匹狼。

从维日诺城，一如从罗马的母狼，[3]

出现了科斯图提斯、阿尔基达斯及其子孙，[4]

他们既是出色的猎人，又是著名的骑士，

他们既能打击敌人，又能追捕野兽。

猎人的梦得以揭示未来的秘密：立陶宛永远需要她的铁和森林。

——亚当·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巴黎，1834）

致我们的兄长以色列：

在他寻求尘世的永恒福祉和万事平等时，

我们施以尊敬与友爱。

——亚当·密茨凯维奇《一套原则》（1848）

1939年9月，当纳粹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时，在深远的意义上维日诺更像是一座犹太城市维尔纳。维尔纳的犹太人身上的许多特点是当地天主教爱国者希望他们的群体能具备的。他们比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甚至波兰人更独特。尽管在维尔纳的波兰人人数更多，犹太人被认为是当时该城的第三大族群。此外，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座城市，生活在这片区域的有记载的历史则可追溯好几个世纪。年长的犹太人说俄语而不是波兰语，这是俄罗斯帝国的遗产之一。但是总体而言，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来看，犹太人历来都是各方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的妒忌对象。大多数犹太孩子从小学习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维尔纳是当时国际上的犹太文化中心。从基辅到敖德萨的波兰-苏联国界线两边的犹太人都在维尔纳学习，因此恢复了这座城市在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享有的一些地位。犹太研究学会意第绪科学院（YIVO）在1925年成立于维尔纳。优秀的意第绪语诗人，如亚伯拉罕·苏茨克弗（Abraham Sutzkever）[5]，就属于年轻的维尔纳人（Yung Vilne）这个圈子。这表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维尔纳受教育的犹太人被卷入三场“民族复兴”的竞争：散布在波兰境内的犹太大众文化；在移居巴勒斯坦运动中扩散开来的希伯来语文化；掌握本国语言、被吸收进波兰生活中的尝试。

各个年龄段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青年人，比城里其他居民更加政治化。犹太人既没有上层阶级也没有农民阶级，如此就避免了阶级冲突和不同群体的复杂地位状态，而这些正是两次大战间波兰其他政治群体试图应用团结大众的意识形态时遭遇的困扰。另一方面，犹太人完全不同意把波兰或巴勒斯坦当作某种政治角力的舞台，也不同意宗教信仰者参与或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政治。如果可能的话，城市中的犹太政治生活比波兰政治生活更碎片化。虽然这种能量和碎片化反映了一座波兰城市内的犹太人被社会孤立的状态以及不稳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犹太生活本身代表了一种巨大的成就。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民族历史学者也难以描绘出犹太文化如何留存至今，而20世纪一头栽进现代性的犹太政治使任何天主教国家的民族性都相形见绌。维尔纳是立陶宛的耶路撒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北方的耶路撒冷——这一点无须特别证明。这里曾是第二欧洲的首府之一，是以意第绪语为依托的阿什肯纳兹犹太文明的中心，在1941年前这里是一个跟从自身的发展逻辑的特殊共同体。[6]



图7：在维日诺（维尔纽斯）的罗图茨罗维广场（Plac Ratuszowy）。

还存在着另一个波兰城市维日诺。和华沙、利沃夫和克拉科夫一道，维日

诺是当时的四个波兰文明中心之一。1939年在维日诺，波兰语是权力和文化的语言，是大多数邻近地带和维日诺家庭的通用语言，也是越来越多乡村地区的通用语言。约瑟夫·毕苏斯基在1919年重建了亚当·密兹凯维奇的维日诺大学，那时距离这位诗人毕业正好有一个世纪。如同1803年和1830年之间的情形，1919年至1939年间维日诺大学以波兰语向波兰人、俄国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提供高等教育。在这段时期，大学也接受犹太学生，有时犹太学生会因此而被波兰文化同化。移民和波兰国家力量确保了在维日诺22万人左右的居民中，大部分人的自我认同是波兰人。其中一些自称波兰人的是犹太人，他们把波兰人身份视作对共和国的忠诚、对波兰文化的依恋或者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更多人成长于说白俄罗斯语的家庭，他们在学校和军队里学习波兰语，或者成年后学习波兰语（如果可以的话）。除了犹太人，在这座城市里波兰是没有民族对手的。维日诺的民族紧张状态主要来自波兰国家和当局，在毕苏斯基1935年逝世后，当局一直限制着犹太人的自由。波兰的统治也许没有受到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欢迎，但它是一种公认的秩序，在1939年波兰被入侵前一直被视为常态。



图8：两次大战之间一位农妇在维日诺（维尔纽斯）的市场上。维日诺一直是那些声称继承了立陶宛遗产之人的主要关注点，他们猜想农民会最终选择一种语言和一个国家。



图9：在历史上的立陶宛区域内的一座波兰宅邸（在今天白俄罗斯的伦纳［Lunna］）。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历史上的立陶宛区域内的社会进步涵括了波兰文化的普及。

与之相比，在两次大战之间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在维尔纽斯的存在显得微不足道。[7]《黎明》的创始人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在维尔纽斯领导着一个学术社团（Scholarly Society），直到他于1927年去世。1918年至1925年间，维尔纽斯的罗马天主教主教是一位名叫尤尔吉斯·马图拉提斯（Jurgis Matulaitis）的立陶宛人。即便这样，在该城诸多可见的文化领域中，起到维护作用的立陶宛人屈指可数。尽管维尔尼亚是白俄罗斯生活在波兰的中心，但是这只是相对而言。地方上的波兰当局侵蚀着白俄罗斯社团的建立基础，他们拒绝使用白俄罗斯语发电报，没收白俄罗斯语报纸，关闭白俄罗斯语学校。有那么一个时期，白俄罗斯文化是被允许的——如果不是被支持的话。维尔尼亚是波兰的白俄罗斯文学中心，出于实际考虑，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士都开始使用白俄罗斯语。东仪天主教会在俄罗斯帝国时期被当局清除，此时又在波兰复兴，被视为一种可能的白俄罗斯民族机构。耶稣会在17世纪早期波兰语取代斯拉夫官方语言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到了20世纪20年代，耶稣会教士发现使用白俄罗斯语很便利。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促使近代早期波兰民族性在天主教-东正教领土内兴起的一个因素是耶稣会和东仪天主教会教士们使用波兰语方言。现代教士认为白俄罗斯语方言十分有用，这也预示着现代白俄罗斯民

族诞生的可能性。[8]

维尔纽斯的外交命运十分特殊。1920年到1938年间，立陶宛和波兰还处于对维尔纽斯/维日诺的争夺战中。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立陶宛，立陶宛人被迫与他们名义上的首都隔离。立陶宛政府在迁移到考纳斯之前，切断了所有的电话线和铁路，影响颇广的战争状态阻止人与人之间产生更多联系（当然有些人持有两国护照）。[9]立陶宛国家的民族化进程将维尔纽斯变成迫切的政治考量目标，同时又将这座城市的历史和人口状态神秘化。军队在教育年轻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民族主义历史课程的熏陶下，男性文盲率从15%下降到1%。20年来立陶宛的学童们一直被灌输一个观念：维尔纽斯在种族上是立陶宛的。[10]他们在学校阅读的是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的删节译本，这个译本删去了所有指涉波兰和波兰人的地方。[11]密茨凯维奇保留下的古老传说，比如盖迪米纳斯梦到一头铁狼的故事，在独立的立陶宛的现代政治中找到了对应。“铁狼”（The Iron Wolf）是当时的一个法西斯主义阴谋组织，于1930年被取缔。维尔纽斯解放联盟（The 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Vilnius）、维尔纽斯基金会（Vilnius Foundation）和报纸《我们的维尔纽斯》（*Our Vilnius*）是立陶宛公民社会的支柱。10月9日，即泽里格斯基在1920年攻占维尔纽斯的日子，成为全国哀悼日。在整个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维尔纽斯之问在立陶宛的国内政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政治对手们互相攻击对方对波兰人心慈手软或对国际联盟太过屈服。

在国际论坛上，立陶宛领导人宣称波兰是欧洲和平最大的威胁。时任总理的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依据他自诩为原则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指望苏联与波兰的对抗能将维尔纽斯带回立陶宛。立陶宛对维尔纽斯主权诉求的法律基础是1920年与布尔什维克俄国签订的条约。1926年的不侵犯条约对立陶宛来说具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苏联承认了立陶宛对维尔纽斯的所有权声明。1927年，沃尔德马拉斯拒绝了来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特使们有关立陶宛与波兰建立外交关系的提议。同年，沃尔德马拉斯重申了他在拉脱维亚的观点，即波兰是比德国和苏联更大的威胁，他在1928年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说苏联的威胁“纯粹是理论上的”，而波兰的威胁才是“真真切切的”。[12]立陶宛所持的立场却并非基于战略失策。立陶宛领导人相信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的国家地位都处于波兰的威胁之下。他们没有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从表面来看，这是一种理性的观点。在与波兰文化的竞争中，立陶宛文化从未获胜，但立陶宛文化一直胜过俄国文化。

当沃尔德马拉斯之后向华沙倡议和平时，他发觉民意和立陶宛军队都迫切地希望让步不会发生。[13]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14]的独裁政权时期，这个问题也始终存在，那时人

们已清楚地认识到，波兰的敌人——无论是苏联还是纳粹德国——都不是立陶宛的朋友。（顺便提一下，斯梅托纳的夫人是波兰人，他和同时代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一样，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语。）斯梅托纳和众多立陶宛政治精英最后逐渐意识到，仇视波兰不能保护立陶宛国家，维尔纽斯不是外交事务中唯一的重要议题。但是立陶宛民族主义的成功却使调整立陶宛外交政策变得极为困难。对在“一战”后受教育或入伍的年轻人来说，夺回维尔纽斯是立陶宛民族主义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在下一代看来，斯梅托纳的统治是怯懦的，因为政府没有用武力夺回维尔纽斯。[15]夺回维尔纽斯的需求成为立陶宛民族主义理念中如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至于威胁到了自称是“民族之父”的那位领导人。1938年，在波兰的最后通牒压力下，立陶宛与波兰最终建立外交关系。即使是这样仅仅缔结官方外交关系的让步，也引致了当局的垮台，斯梅托纳本人便淹没在社会各界的反对浪潮中。

1939年的转变

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摧毁了波兰国家，这使得维日诺之问再次被抛到国际政治舞台上。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属条约规定，苏联和纳粹德国一致同意“立陶宛在维尔尼亚地区的利益”应被尊重。双方都希望以这座城市为条件操纵立陶宛政府。1939年9月1日德军在波兰境内的快速行进标示着维尔纽斯再次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立陶宛政府拒绝了德国关于让出这座城市和共同打击波兰的提议。英国和法国对此应当是反对的，而苏联的态度尚不明确。[16]斯梅托纳政府还考虑了一点，即短期之内德国的统治会比苏联的统治更糟；中期来看，他们认为苏联将在苏德战争中取得胜利；长期来看，如果获得维尔纽斯要牺牲的是国家的独立，那么和苏联做这笔交易更好。[17]从弱势一方的地位出发，这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考量。1939年9月19日，红军占领了维那，立陶宛驻莫斯科代表向苏联请求要回这座城市。9月27日，斯大林和时任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修改了之前的纳粹-苏联协议，这一次将立陶宛和维那置于苏联势力范围内。

和立陶宛的外交官一样，来自波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的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也声明对这座城市的所有权。由于苏德两国瓜分波兰，两次大战间波兰境内居住着说白俄罗斯语者的领土都归斯大林所有。至少在最初，声称代表波兰境内300万强大的白俄罗斯人的民族活动家是欢迎这一划分的。除此之外，他们还相信苏联的扩张能将维尔尼亚带回扩大后的白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白俄罗斯人相信自己是立陶宛大公国的继承者，他们将波兰文化视为白俄罗斯文化的对手，此外他们对维尔尼亚有着深深的眷恋，但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是来自以上认知的空想。来自波兰的白俄罗斯领导人深受来自苏联的白俄罗斯亚共产主义者的鼓舞，后者预料白

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会将维尔尼亚收入囊中。毕竟，第三国际定义的“西部白俄罗斯亚”包括维尔尼亚和维尔尼亚地区。1919年成立的“立-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定都于维尔尼亚，而这仅仅是20年前的事情。

1939年9月，所有为苏联占领维那进行的准备工作都预示着将这座城市归入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的计划。伊万·克利莫夫（Ivan Klimov）承担着负责在西部的白俄罗斯苏联政府的重任，他在当年9月初被授权宣布维尔尼亚将是西部的白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白俄罗斯亚内务人民委员部[18]（下文简称NKVD）在9月15日的会议上，将维尔尼亚视为前波兰领土的一部分，现在这座城市将被并入白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维日诺地区，白俄罗斯、波兰和犹太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在9月17日苏联摧毁波兰政府机构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苏联军队9月19日抵达维那，针对这座城市而制定的计划马上开始实施。苏联占领当局用白俄罗斯语进行宣传。有苏联赞助的报纸证明了历史上白俄罗斯对维尔尼亚的所有权声明是正当的，并且解释了白俄罗斯如何具有立陶宛大公国的特质。9月24日，克利莫夫在白俄罗斯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维尔尼亚将并入苏维埃白俄罗斯。[19]这个消息受到了致力于倡导白俄罗斯维尔尼亚理念的团体的热烈欢迎。而维尔尼亚和白俄罗斯都将属于苏联这个事实，也许在那个狂热的时刻被人们忘却了。

1918年成立的白俄罗斯共和国运气不佳，其组建者安东·卢茨克维奇也是两次大战间波兰境内的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被说服了。卢茨克维奇重要的个人成就和重大的政治失败都与维尔尼亚有关。在维尔尼亚，他以民主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开始了个人政治生涯；在维尔尼亚，他协助创办了“一战”前第一家合法的白俄罗斯语报纸，并参与编辑；在维尔尼亚，他领导的民族委员会于1918年宣布白俄罗斯独立；在维尔尼亚，他发表了自己对波兰在1921年后吞并白俄罗斯领土的抗议；在维尔尼亚，他在白俄罗斯语高中教书（直到他被波兰上级解雇）；在维尔尼亚，他领导着受过教育的白俄罗斯人的小圈子（直到他被波兰当局逮捕）；在维尔尼亚，他主管了白俄罗斯博物馆近20年；在维尔尼亚，他完成了白俄罗斯现代第一个《圣经·新约》译本。这位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前倡议者、圣经的翻译者，打心眼里厌恶波兰20年的统治——他相信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和苏维埃维尔尼亚是抚慰他那曾遭遇历史伤痛的民族的可行办法。[20]

在1939年9月末，斯大林很明显决定将维那授予立陶宛，并在立陶宛的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卢茨克维奇和其他在维尔尼亚的白俄罗斯领导人，已渐渐相信他们能接收这座城市，却猛然发现自己锒铛入狱。卢茨克维奇死于被苏联监禁期间。白俄罗斯人是斯大林这个决定之下最早的却被人遗忘

的受害者。除了白俄罗斯激进主义领导人的被捕和死亡，苏联拒绝承认白俄罗斯人对维尔尼亚的渴望还严重阻碍了白俄罗斯人民族事业的发展。首先，这意味着在维尔尼亚城市附近的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口暂时不再属于白俄罗斯民族理念的一部分。第二，立陶宛对维尔尼亚的兼并（维尔尼亚很快被并入苏维埃立陶宛）确认了这样一点：立陶宛人，而不是白俄罗斯人，才是立陶宛大公国的继承者。一个原有的政治共同体（politonym）和一个新的种族共同体（ethnonym）的融合，使任何非白俄罗斯人都看不到现代白俄罗斯和近代早期的立陶宛大公国之间的关联。1939年9月进入维尔尼亚的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者怀有极高的期望，现在他们都失望了。和19世纪东仪天主教会的神父一样，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在这座梦想中的城市里花了很多时间收集立陶宛大公国的档案文件。当斯大林把这座城市授予立陶宛时，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者不得不离开，他们带着从维尔尼亚偷来的档案前往明斯克。[21]

1939年10月1日，时任立陶宛外交部部长尤奥扎斯·乌布伊斯（Juozas Urbšys）意识到得到维尔纽斯的代价是苏联军队进驻立陶宛，而苏德在9月28日签订的条约已经将立陶宛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10月2日，立陶宛政府解散了军队。1939年10月10日，就在泽里格斯基的军队为波兰夺下维日诺的19年零1天后，乌布伊斯与苏联签订下维尔纽斯归入立陶宛的协议。换来维尔纽斯和前波兰领土（2750平方英里，45700人）的代价是2万苏联士兵驻扎在立陶宛。[22]伴随着当时突然涌现的亲苏联思潮，立陶宛领导人和民众对协议的主要反应是欣喜于维尔纽斯并入立陶宛。对苏联军力的恐惧被以下信念软化了：无论战争最后的结果如何，莫斯科都会为立陶宛保护维尔纽斯。立陶宛人认为苏联的到来能斩断维尔纽斯和波兰之间的联系，如此该地区就有被立陶宛化的可能。[23]正如我们之后会看到的，这些显然古怪的预言是建立在对波兰文化而不是对俄国文化的恐惧之上，历史将证明它们确实是准确的。虽然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有些奇怪，当时立陶宛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人赞成苏联的体制。立陶宛杰出的法学家米科拉斯·罗梅里斯即一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己在遇到苏联人之前就非常赞同苏联，无论如何在苏联革命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两者间选择，我都更偏向前者。"[24]

因此，苏联和立陶宛的利益存在交集，这暂时为独立的立陶宛带来了维尔纽斯。在仍然独立的立陶宛境内抗议的白俄罗斯人被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驱逐出境；立陶宛当局告诉流亡中的波兰政府，在整个两次大战之间立陶宛都合法拥有维尔纽斯。[25]实际的人口数据却很难被否认。当立陶宛军队在1939年10月28日进驻维尔纽斯，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没有神话中的公主，在维日诺陌生的、未知的街道上，只有说着外语的人们"。[26]这样的经历却使得知识分子们更加确信，说波兰语的人是"被波兰化的立陶宛人"，他们必须重新被立陶宛化。这成了立陶宛政策的智识基础。正如

维尔纽斯的管理者和时任总理安塔纳斯·梅尔基斯（Antanas Merkys）所说，政策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像立陶宛人那样思考”以及“把维尔纽斯地区的外国元素剔除出去”。[27]波兰人和犹太人——甚至是那些生长在这里的人——经常被剥夺立陶宛公民权。罗梅里斯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种族而非地理或政治上的分类使得对立陶宛国家的忠诚在维尔纽斯难以形成。当地的立陶宛语报纸“曝光了”1920年接受波兰统治的政治家，在1940年的新环境下这些精英被视为忠诚的立陶宛人的可能性消失了。[28]这个热诚的年轻民族的代表们，废除了成熟政体中有必要存在的一丝伪善，这些代表们在狂热之中丧失了对周遭世界的观察。当纳粹国防军占领了巴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却还在为维日诺/维尔纽斯的波兰剧院争论不休。当大量苏联军队在1940年年初进驻立陶宛，考纳斯的民族辩论还围绕着来自被瓜分的战败国波兰的威胁。[29]

1940年6月，苏联终结了立陶宛的独立。当时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6月14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组建新政府；第二天红军进入维尔纽斯。在全体惊恐的情形下，使新政体“合法化”的选举于7月举行。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立陶宛人民集团（Lithuanian People’s Bloc）宣布赢得95%的选票。8月3日，立陶宛加入苏联的“申请”被批准。到1940年8月6日，红军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接管了新的战略阵地，军队的人数更多了。在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2万到3万名立陶宛人、波兰人和犹太人驱逐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30]前总理梅尔基斯和前外交部部长乌布伊斯在1940年7月被驱逐出境，斯梅托纳早就逃走了。

斯梅托纳的立陶宛，和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一样，已经成了民族化的国家。立陶宛和波兰都力图以民族主义的精神教育国民，两国都试图使少数民族在民族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降到最小。两国对被视为本国威胁的少数民族活动家诉诸武力镇压，两国（波兰比立陶宛更甚）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都有官方倡导的反犹主义特质。然而，1939年、1940年纳粹德国和苏联造成的波兰与立陶宛的覆灭，使全然不同的民族和种族政策在两国领土上产生。纳粹和苏联做了波兰和立陶宛没做过的事情：他们基于民族或种族定义，以数以千计，甚至百万的规模展开驱逐、谋杀。纳粹和苏联政权的行为和波兰与立陶宛的性质完全不同。

很明显，这只是纳粹和苏联统治下关于波兰-立陶宛关系的一个例子。1940—1941年，苏联的政策目标是通过驱逐精英以消灭波兰和立陶宛社会。1941年后，德国针对立陶宛的波兰人的政策在残忍程度上与苏联不相上下，唯一不同的是形式。[31]纳粹政权允许立陶宛人担任安全警察（Saugumas），如此立陶宛人在维日诺攻击波兰人就变成合法的了。[32]虽然1939—1940年在独立的立陶宛也有歧视维尔纽斯的波兰人的情况，

苏联也在1940—1941年间驱逐维日诺的波兰人，立陶宛的安全警察和其德国上级在1941—1944年对维日诺的犹太人采取的措施则是直接的屠杀。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对维尔纽斯/维日诺的争夺，在1939—1941年只是零星的暴力冲突，但是在德国统治下却恶化为小规模的内战。从1943年秋天开始，波兰地下本土军队向维日诺城内及周遭地区的伪立陶宛警察部门发起攻击，解除他们的武装。立陶宛警察以处决波兰平民作为反击手段。之后，波兰人报复性地攻击了立陶宛村庄。[33]

犹太人的维尔纳的终结，1941—1944

1941年6月24日纳粹占领维尔纽斯以来，这里发生的最主要的事件就是对犹太人的大清洗。纳粹在立陶宛的政策是杀尽每一个犹太人，这一政策几乎成功了。[34]实际上，在德国占领的欧洲领土中，立陶宛是第一个发生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处决的地方。在立陶宛境内，维尔纽斯的特殊之处在于，德军进驻后，在这里的立陶宛人对波兰人的关注更甚于对犹太人的。立陶宛精英试图说服德国人：他们比波兰人更有资格运转这座城市。和在考纳斯或其他地方的立陶宛人不同，在维尔纽斯的立陶宛人认为大屠杀会动摇他们原本就不稳定的地方政权。对维尔纽斯的立陶宛人来说，波兰人的问题比犹太人的问题要重要得多。[35]

纳粹德国的“最终解决方案”开始在苏联占领了两年的土地上实施。和在东线的其他地方一样，纳粹把人们对苏联占领时期的怒气和屈辱转移到犹太人身上。[36]1941年7月，德国人开始直接以武力统治立陶宛全境。1941年7月2日，德意志帝国的9号特殊武装指挥部队（Einsatzkommando 9）抵达维尔纽斯。9号部队招募了几万名立陶宛志愿者加入，随后开始彻底消灭维尔纽斯的犹太人。1941年7月和8月，特殊武装指挥部队的德国和立陶宛士兵绑架了几千名犹太人。在波纳瑞森林（Paneriai forest）的沙坑，这些犹太人惨遭德国人和立陶宛人屠杀。大部分屠杀由立陶宛志愿者完成，他们组成了后来的德国安全警察特别行动队（Ypatingas Burys）。1941年9月，3700名犹太人被集中到一起，射杀在沙坑里。9月6日，3.8万名犹太人被塞到两个很小的犹太人区；另有6000名左右的犹太人被带到沙坑射杀。1941年10月和11月的7次行动中，超过1.2万名犹太人从犹太人区被带到沙坑射杀。到1941年底，仅仅在德军占领后的6个月内，德国人（在立陶宛人的帮助下）屠杀了大约2.17万名维尔纽斯犹太人。1941年11月后屠杀的节奏变慢了，纳粹国防军给它所需的奴隶判了死缓。1943年9月，犹太人区被拆除。其中大约1万名犹太人从犹太人区被带走，5000人死于马伊达内克（Majdanek）[37]的毒气室，好几百人在沙坑被射杀。[38]剩下的人被送到爱沙尼亚的劳动营。1939年有7万名左右的犹太人住在维尔纽斯，战争结束后幸存者仅有7000人。[39]



图10：纳粹用立陶宛语制作的宣传海报，时间可能是1941年，海报把斯

大林主义和犹太人等同起来。当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时，党卫队第一次遇到对苏联强权感到厌倦的人们。

一些犹太机构也留存下来。意第绪科学院奇迹般地迁移到纽约。但是维尔纳的犹太文明被完全破坏了，犹太文明经年累月被破坏——而非几个世纪以来的流传——成了犹太人纪念的中心主题。“年轻的维尔纳人”的几十位作家中只有三人幸存。幸存者中的一位就是诗人亚伯拉罕·苏茨克弗，他从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废墟迁移到真正的耶路撒冷，这也象征着犹太传统逐渐转移到以色列。[40]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毁灭意味着历史上的立陶宛就此终结。波纳瑞森林——“最终解决方案”开始的地方——正是密茨凯维奇在《塔杜施先生》中赞扬的波纳瑞森林。在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中，失去犹太人的立陶宛是难以想象的。



图11：维日诺犹太人在波纳瑞森林遭到屠杀，时间可能是1941年7月。

波兰人的维日诺的终结，1944—1946

就在德国人拆除犹太人区的时候，德国国防军在整个前线被迫后撤。1944年红军重返维那，此时这座城市所有权的申请者有三类：尽管在人数上变少，但依然是城市多数民族的波兰人；立陶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波兰

人、苏联人和纳粹占领维尔纽斯期间的受害者；再次获得权力的苏联人。不出意料，波兰人和立陶宛人难以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人。[41]波兰本土军队不仅为波兰独立而战，还为维日诺重归波兰而战。大多数波兰士兵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维日诺的波兰，反之亦然。因此，立陶宛人将波兰本土军视作波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42]当红军在1944年7月接近维那时，波兰本土军已经获得了城市周围的领土。波兰人对是否袭击德军在维日诺的阵地犹豫不决，然而，1944年7月13日，红军在波兰人的帮助下还是夺回了维那。苏联人随后拘禁了波兰士兵，斯大林重建苏维埃立陶宛，并再次定都于维尔纽斯。虽然波兰政治家到莫斯科乞求维日诺，但斯大林明白把这座城市给立陶宛人，他可以从中获得更多。[43]



图12：维尔纽斯的加翁庙堂（Gaon Temple）废墟，1944年。“最终解决方案”毁灭了犹太人自古就栖息其间的维尔纽斯，这里曾是“立陶宛的耶路撒冷”。

斯大林清楚这座城市在文化上属于波兰。诚然，在“最终解决方案”之后，它在“种族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波兰。他也清楚，对当地的波兰人来说，任何选择都比接受立陶宛人的统治要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44]向斯大林汇报了足够的信息。贝利亚的措辞足够清楚：“维那人民对能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反应是积极的。聚集在教堂的人民表达满意情绪的语言是波兰语，而不是立陶宛语。人民同时希望维那能并入西乌克兰或白俄罗斯，任何地方都行，除了立陶宛。”[45]虽然贝利亚从没有说过“波兰人”这个词，但很显然，在犹太人灭绝后，此时此刻城里的人民说的几乎都是波兰语。然而斯大林的政策和民族自决没有任何关系，维日诺居民的意见也无足轻重。一旦斯大林决定维尔纽斯是立陶宛的，他也就决心让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从此不再争夺这座城市。和其他苏联边境一样，在战前这里的领土属于波兰，斯大林通过种族清洗的方式彻底解决了民族问题。[46]1944年7月，新的，也更靠西边的苏联-波兰边界非正式确立，苏联马上开始在苏维埃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实施“人口交换”政策。1939—1941年，苏联的政策将精英们驱逐到东面，到苏联更深的内部；1944—1946年，苏联将波兰民族从苏联西部驱逐到波兰。在1944年到1948年间，大约有10万人登记为波兰人，离开维尔纽斯去往共产主义波兰。1944年11月，罗梅里斯注意到在短短几个月内，维尔纽斯的波兰问题“不再存在了”。[47]

在苏联重新接收维尔纽斯后，斯大林没有选择建立一个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或波兰自治共和国。他选择在1945年把波兰的边界向西推进；他选择建立一个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以维尔纽斯为首都；他选择把波兰人送到共产主义波兰。维日诺波兰知识阶层的覆灭，大大损害了波兰爱国主义中留存的联邦传统。一直以来，联邦理念的预设使以维日诺为中心的精英波兰文化有同化的力量，这种文化的吸引力与波兰受教育阶层的离开一同消散了。波兰文化在维日诺的主导地位可以追溯至1569年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建立，现在这一主导地位随着1944—1946年间的驱逐走到终点。立陶宛的波兰人发现他们的联邦理念在西面的共产主义波兰无法实现，波兰中部的许多人构想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国家。离开了他们土生土长的环境，这些波兰人发现他们无法清晰地表达一种地方爱国主义。由于共产主义波兰的审查制度，他们无法发表关于被苏联夺走的领土的动议，甚至出版回忆录也不行。他们陷入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他们抚养的孩子和在自觉“同质化”的共产主义波兰成长的年轻波兰人，在民族认同上几乎没有区别。“立陶宛”的历史感消失不见了。在一首著名的战后诗歌中，维日诺成为一座“没有名字的城市”[48]。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它的名字变成了“维尔纽斯”。

---

[1] 维特勒斯（Vytenis）于1295—1316年出任立陶宛大公。明道加斯（Mindaugas）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位立陶宛大公和唯一的立陶宛国王。

[2] 据史料记载，利兹德伊科（Lizdejko）是立陶宛最后一位多神教的大主教。

[3] 相传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和雷穆斯是被母狼哺育长大的。

[4] 科斯图提斯（Kęstutis），特罗茨克大公，1345—1382年任立陶宛大公，是盖迪米纳斯之子。阿尔基达斯（Algirdas）是科斯图提斯的兄长，盖迪米纳斯之子，于1345—1377年间与其兄联合统治立陶宛。

[5] 亚伯拉罕·苏茨克弗（1913—2010），广受赞誉的意第绪语诗人，《纽约时报》曾称他是“最伟大的大屠杀诗人”，1985年他因文学成就而成为第一位获得以色列奖的意第绪语作家。

[6] 关于这一阶段的维日诺，见Ezra Mendelsohn,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84; Jerzy Tomaszewski, ed., Najnowsze dzieje Żydów w Polsce, Warsaw: PWN, 1939, 179-198。又见Czeslaw Miłosz, Rodzinna Europa, Paris: Instytut Literacki, 1980,78-89。

[7] 1931年波兰对该城进行的人口普查发现，195100名居民中有65.9%是波兰人，28.0%是犹太人，0.9%是白俄罗斯人，0.8%是立陶宛人。立陶宛人口统计学家称当时几乎没有多少立陶宛人在这座城市里；Leonas Sabaliunas认为在1940年，这座城市及其周围5.8%的土地被立陶宛人占有了。Piotr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o ściowe na Litwie,” Przegląd Wschodni, 1, 3 (1991), 468-469.

[8] 关于白俄罗斯文化，见Nicholas Vakar,Belo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21-135; Aleksander Wabiszczewicz, “Sytuacja szkolnictwa białoruskiego na Białorusi zachodniej,” in Małgorzata Giżejewska and Tomasz Strzembosz, eds., Społeczeństwa białoruskie, litewskie i polskie na ziemiach północno-wschodnich II Rzeczypospolitej, Warsaw: ISP PAN, 1995,190, 198; Aleksiej Litwin, “Problem Bialorusi w oficjalnej polityce polskiej,”同上书，17-21。

[9] Miłosz, Rodzinna Europa, 58.

[10] Algis Kasperovičius, “Relituanizacja i powrót do macierzy,” in Robert Traba, ed., Tematy pols ko-litewskie, Olsztyn: Borussia, 1999, 103; Nerijus

Udrenas,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 State,” Masters thesis, Brandeis University, 1995, 14.

[11] Tomas Venclova, “Native Realm Revisited,”引自手稿，23, 以波兰语出版为Zeszyty Liter ackie, 70 (2000)。

[12] 引自Iver Neumann, “Poland as a Regional Great Power,” in Iver Neumann, ed.,Regional Great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2, 134-135。见M. Anysas, Der litauische-polnische Streit um das Wilnagebiet, Wurzburg: K. Triltsch, 1934, 1-2, 10; Augustin Voldemaras, La Lithuanie et ses problèmes, Paris: Mercure Universel, 1933, 15-18。

[13] Alfonsas Eidintas and Vytautas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140-141.

[14] 安塔纳斯·斯梅托纳（1874—194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立陶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立陶宛最著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之一，他于1919—1920年出任立陶宛第一任总统。

[15] Alfonsas Eidintas and Vytautas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122。

[16] David Crowe,The Baltic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83.

[17] Eidintas and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180-181.

[18] 内务人民委员部（Narodnyy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政治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

[19] 关于区域，见Marek Wierzbicki,Polacy i Białorusini w zaborze sowieckim, Warsaw: Volumen, 2000, 155-156;关于城市，见Iwanow, “Sprawa przynależno ści Wilna i problemy narodowo ściowe na Białorusi,” in Giżejewska and Strzembosz, Społeczeństwa, 85-89。

[20] Polski Słównik Biograficzny,vol. 18, Wrocław: Ossolineum, 1973, 1, 514; Anton Lutskevich, Uspaminy ab pratsy pershykh belaruskikh palitychnykh arhanizatsyi, Minsk: Belaruskaia savetskaia entsyklapedyia, 1991; Arnold McMillin, Die Literatur der Weissrussen, Giessen: Wilhelm Schmitz, 1997, 122.

[21] ReginaŽepkajte, “Okupacja Wilna przez Armię Czerwon ą,” in Giżejewska and Strzembosz, Społeczeństwa, 305.

[22] Crowe,The Baltic States, 99-106；Alan Bullock,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Knopf,1992, 645; Žepkajte, “Okupacja Wilna przez Armię Czerwon ą,”302; Algis Kasperovičius,“Stosunek władz i społeczeństwa Litwy do Polaków ne Wileńszczyzńie,” in Giżejewska and Strzembosz, Społeczeństwa, 307; Krzysztof Tarka, “Spór o Wilno,” Zeszyty Historyczne, 114 (1995), 60; Sabaliunas, Lithuania in Crisis, 151-15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根据宪法规定，首都是维尔纽斯，但立陶宛的行政中心是考纳斯。正是在考纳斯，日本副领事杉原千亩给犹太人签发了1万张签证，拯救了5000人的生命。Hillel Levine, In Search of Sugihara, New York:Free Press, 1996.

[23] Leonas Sabaliunas,Lithuania in Crisi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153;Kasperovičius, “Relituanizacja i powrót do macierzy,”108.

[24] 1941年7月9日的日记手稿藏于维尔纽斯大学图书馆手稿部，F75–13。Herector VUBR.

[25] 这项声明表面上的法律依据是1920年7月12日与布尔什维克俄罗斯达成的协议。

[26] S. Kairys, “I š Vilniaus sugrizus?” Mintis, 10, 1939, 330, cited after Kasperavičius, “Relituanizacja,”109.

[27] Sabaliunas,Lithuania in Crisis, 162. 也见Crowe, The Baltic States, 143。

[28] 1940年2月4日到3月21日的日记，见VUBR F75–13。又见Longin Tomaszewski, “Społeczeństwo Wileńszczyzny wobec władzy Litewskiej i sowieckiej,” in Giżejewska and Strzembosz, Społeczeństwa, 329;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ościowena Litwie, 1997, 151。

[29] Kasperovičius, “Stosunek władz i społeczeństwa Litwy do Polaków na Wileńszczyźnie,”313; Žepkajte,“Okupacja Wilna przez Armię Czerwon ą,”310–314.

[30] Eberhardt,Przemiany narodowościowe na Litwie, 153–154.

[31] 本书不会涉及纳粹和苏联政权的比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者的比较是联邦德国的辩论内容之一，这与第三帝国给当时的联邦德国社会留下何种遗产有关。了解历史学家的争论（Historikerstreit）的指南是Charles Maier, The Unmasterable Past,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也可参见Hans-Ulrich Wehler, Entsorgung der deutschen Vergan genheit? Munich: Beck,

1988。有用的英文文献收录在Peter Baldwin, ed., Reworking the Past,Boston: Beacon Press, 1990。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两者比较的争论转到法国，在苏联解体后，之前法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忠诚遭到质疑。特别可参阅François Furet, Le passé d'uneillusion, Paris: Calmann-Levy, 1995; 也可参见我的评论"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Charm and Power of Soviet Communism,"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6, 1 (1997), 133–144。Stéphane Courtois, ed.,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Paris: Robert Laffont, 1997）是一次国际性的努力，书中关于苏东共产主义残忍行径的案例在法国和意大利激起极大争议。法语和德语辩论可参见Le Débat, 89 (1996)。

[32] 在德国统治的管辖范围下，极端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呼吁德国人清除维尔纽斯的波兰人，之后他们失望地发现德国人有其他计划。Kasperavičius, "Relituanizacja,"114–115.

[33] Statistical Report for March 1943 (34/67), F. R1399, A1, B. 9; "Lagebericht. Wilna, IV A 1 (Gestapo)," F. R1399, A1, B. 100; "An den Herrn Höheren SS-und Polizeiführer Ostland und Russland Nord in Riga. Verhalten litauischer Sonderkampfverbände,"11 May 1944; "Lagebericht. Bandentätigkeit,"24 April 1944, F. R1399, A1, B. 100, L. 1; Report of SS Commander Titel to Jeckeln in Riga, 15 May 1944, F. R1399, A1, B. 106. 以上报告都存于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国家中央档案馆。

[34] Dina Porat, "The Holocaust in Lithuania," in David Cesarini, ed.,The Final Solution, Routledge: New York, 1994, 160.

[35] Yitzhak Arad, "The 'Final Solution' in Lithuania,"Yad Vashem Studies, 11 (1976), 241;Yitzhak Arad, Ghetto in Flames, Jerusalem: Hava, 1980, 43-48.

[36] Konrad Kweit, "Rehearsing for Murder,"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2, 1 (1998),3-26). 关于在苏联占领时期立陶宛犹太人扮演的角色，见Dov Levin, Baltic Jews under the Soviets, Jerusalem: Hebrew University 30, 43。此书作者在苏联权力空白期曾任议会代表。

[37] 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建立的集中营之一，位于今天波兰卢布林附近的马伊达内克村。

[38] Arad,Ghetto in Flames, 429-432; Marc Dvorjetski，Le Ghetto de Vil'na, Geneva: Union O.S.E., 1946; diary of Icchak Rudaszewski, Lithuania, 3 (1991), 35-49; Michael MacQueen, "The Context of Mass Destruction,"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2, 1 (1998) 27-48. 又见Knut Stang, Kollaboration und

Massenmord,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6, 73-112。

[39]　实际上的伤亡人数更多，因为在1939年到1941年间大约有1.5万名犹太人从华沙和波兰中部逃到维尔纳。其中大多数人死于立陶宛。

[40] Abraham Novershtern, “Yung Vilne,” in Yisrael Gutman, Ezra Mendelsohn, Jehuda Reinharz, and Chone Shmeruk, eds., The Jews of Polan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Hanover, Mass.: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386.

[41] Tarka, “Spór o Wilno,”83.

[42] Kasperavičius, “Relituanizacja,”117.

[43] Sovetskii faktor, 73.

[44] 拉夫连季·贝利亚（1899—1953），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45] Teczka specjalna J.W. Stalina, 48.

[46] 这个主题会在第9章做长篇讨论。

[47] 1944年11月6日日记，VUBR, f75−13。

[48] 切斯瓦夫·米沃什在1969年发表的诗歌《没有名字的城市》（“Miasto bez imienia”）中写道：“谁会纪念一座没有名字的城市？”关于立陶宛波兰人的困境，见Jerzy Surwillo的回忆：Rachunki nie zamknięte, Vilnius: Magazyn Wileński, 1992, 比如在第318页。

第5章
尾声：苏维埃立陶宛的维尔纽斯（1945—1991）

当一把鲁特琴受到重击，

琴弦听起来像曾经断裂。

在混乱的声音中，一首歌的开头响起

尽管没人希望听到结尾。

——亚当·密茨凯维奇《康拉德·瓦伦罗德》（圣彼得堡，1828）

本书的第一部分以密茨凯维奇1834年的杰作《塔杜施先生》的第一句诗开场。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句诗——“立陶宛！我的祖国！”——的含义经过三次转变，我们可以依据诗句里的三个词来阐明这三种变化。第一个转变与19世纪的民族活动家如何定义自己和他们的民族有关，即诗歌开篇的第一个词“立陶宛”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从对立陶宛大公国怀旧式的敬意到对民族国家的期望的转变。19世纪后三分之一的时段经历了与密茨凯维奇式浪漫主义相矛盾的变化，揭示出近代早期波兰理念内在的经济、社会和语言冲突，以及排外的现代民族主义解决这些冲突的可能。浪漫主义的怀旧修辞在1863年后分裂为互相矛盾的民族主义版本，这种修辞同样为现代民族主义者所用，他们热切地投入民族国家“重生”的事业中。波兰联邦主义者和白俄罗斯爱国者紧紧跟随密茨凯维奇原意的同时，19世纪末，诗人又被现代波兰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誉为民族诗人。在国际政治的残酷世界中，种族民族主义者选择了更为有效的翻译方式。粗心的读者是更好的预言家。

第二个转变冰冷地简化为人们可以将国家独立强加在民族性的理念上。这与当盼望变成了执念时所发生的一切有关，也与诗歌的第二个单词——“我”——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帝国倾覆开启了持不同民族理念者之间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竞争，即现代民族主义、近代早期联邦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在原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上，胜利者是波兰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某种程度上布尔什维克也是胜利者。在这些竞争中兴起了独立的波兰国和立陶宛国，这两个国家存在了20年，还有存在

7年的白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如我们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解决方案”和苏联的驱逐在促进人口同质化方面的所为远远超出两次大战期间的波兰和立陶宛。而苏联的战后政策驱散了近代早期联邦主义者传统最后的余烬。斯大林最重要的决定是把历史上多民族共存的维尔纽斯授予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39年在波兰治下的维日诺，立陶宛人只是城中的极少数民族，它如何在1991年成为立陶宛民族国家的首都维尔纽斯呢？破坏为重建奠定了基础。纳粹和苏联为将维尔纽斯重建为一座立陶宛城市留出了物质上和政治上的空间。随着苏联重新占领维尔纽斯，有关密茨凯维奇诗歌开篇的第三个转变也开始了，即重新定义他笔下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现代民族的意义上，维尔纽斯成了一座立陶宛城市。在苏联的统治下，立陶宛文化同化了这座密茨凯维奇曾受教育的城市，实现了立陶宛民族主义者的古老梦想。正如我们所见，我们只能在犹太文化和波兰文化在维尔纳/维日诺遭到清算的背景下来理解这一点。大约90%的维尔纳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死去，而大约80%的维日诺波兰人在战后前往波兰。苏联的总政策“重新定居”（resettlement）由地方上的立陶宛共产主义者执行。1945年5月30日，在德国投降后的几周里，立陶宛政治局决定把资源投入将波兰人从维尔纽斯赶走的行动中。[1]

维尔纽斯：一座立陶宛城市

在整个苏维埃立陶宛，除了维尔纽斯城之外，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登记为需“撤离”的波兰人真正重新定居了。立陶宛乡村地区的几万名波兰人没有被要求登记撤离，而登记前往波兰最后却被禁止离境的波兰人超过几万名。这显然是立陶宛遣送当局的一项政策，华沙的波兰共产主义者对此表示全面抗议。1945年春，波兰有大批耕地需要耕种，负责遣送事务的官员焦急地等待着从立陶宛过来的波兰农民。在一些案例中，立陶宛遣送当局要求登记撤离的个人提供显示波兰国籍的德国文件。至少，他们要求能证明波兰公民身份的证据，以匹配遣送协议的要求。然而维尔纽斯的情况完全不同。这里的立陶宛遣送当局利用苏联的总体性政策，为一个新的、属于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创造基础。在维尔纽斯，每个波兰人都被强制登记遣送，登记为波兰人的人中有80%的人确实重新定居了。[2]其结果是维日诺的去波兰化以及立陶宛民族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立陶宛民族运动一开始就把维尔纽斯视作渴求的目标。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在1905年和1918年更倾向于在维尔纽斯行动。1920年波兰占领维尔纽斯这件事占据了两次大战间立陶宛人的全部注意力。但是，从现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从城内居民的民族认同来看，维尔纽斯从来不是一座立陶宛城市。

苏联的人口普查让我们对之后发生的事有了粗略的了解。1959年，居住在

维尔纽斯的23.61万名居民中，有7.94万人（34%）告诉苏联人口普查员自己是立陶宛人，6.94万人（29%）说自己是俄国人，4.72万人（20%）说自己是波兰人，1.64万人（7%）说自己是犹太人，还有1.47万人（6%）自称为白俄罗斯人。在现代历史上，立陶宛人第一次成了维尔纽斯的多数民族，1959年的34%这个数据相对1939年的1%到2%来说有了惊人的增长。与此同时，立陶宛人的数量仅仅刚刚超过俄国人的数量，斯拉夫人（俄国人、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总数则几乎是立陶宛人的两倍。到1989年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为止，维尔纽斯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多，为57.67万人；其中29.15万名立陶宛人占全部人口的大多数，占比为50.5%。俄国人、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比例分别下降到20%、19%和5%。就算把所有斯拉夫人加在一起，现在立陶宛人还是比他们人多。[3]考虑到苏联的统治就是俄罗斯化，而且同一时期的明斯克、里加和塔林（Tallinn）都处于俄罗斯化进程中，这些数据亟须解释。

民族共产主义

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化的部分原因是苏联当局和立陶宛共产主义者之间显而易见的妥协。在20世纪40年代的后五年里，立陶宛共产主义者采取了斯大林要求的镇压、驱逐和集体化政策。立陶宛人安塔纳斯·斯涅策库斯（Antanas Sniečkus，1903—1974）从1936年起至其1974年去世，一直担任立陶宛共产党总书记。他经受住两次大战之间的阴谋、战争期间的武装斗争、战后肃清；他平安渡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轻松过渡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作为两次大战间的政治老手，他明白维尔纽斯在立陶宛民族主义中的中心地位。[4]在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反对声中，立陶宛获得了维尔纽斯，斯涅策库斯完全有理由充分利用这笔巨大的财富。在把波兰人驱逐出维尔纽斯后，我们可以推测，他和他的立陶宛同志们根本不希望自己被俄国人代替。当然，立陶宛以外的共产主义者肯定已经明白维尔纽斯对立陶宛的重要性。毕竟，在苏维埃立陶宛早期，立陶宛政党中大部分人都不是立陶宛人。[5]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巩固苏联在立陶宛的势力过程中，来自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干部支配了立陶宛政治，立陶宛人却被边缘化了。

和苏维埃拉脱维亚和苏维埃爱沙尼亚一样，苏维埃立陶宛国内允许存在说当地语言的大学。维尔纽斯的大学在16世纪是由耶稣会建立的学院，在19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受到沙皇亚历山大的支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波兰人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又以立陶宛大学的名义重新开放。1945年秋天，记录显示86.4%的入校学生为立陶宛人，只有1.6%的学生是波兰人。在战前的1938—1938学年，72.6%的学生的第一语言是波兰语，只有2.7%的学生说立陶宛语。这种彻底的翻转简直不能想象。诚然，在苏维埃立陶宛时期，三方面决定了维尔纽斯大学的民族特征比在两次大

战间的波兰时更为清晰。首先，如果86.4%的数据是准确的，这显示了当局将郊区的立陶宛人送到维尔纽斯的清晰意图。第二，两次大战期间的维日诺大学吸收同化了白俄罗斯人，战后的维尔纽斯大学却排斥他们。尽管维尔纽斯周围都是说白俄罗斯语的村庄，而且离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的距离只有40公里，但是大学里的白俄罗斯人比例一直保持在1%左右。[6]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苏联及其运转机构将一切归因为民族性。上述1937—1938年波兰的统计数据是基于两次大战间入校学生自愿上报的母语信息。而在战后的维尔纽斯大学，所有学生的苏联内部护照上都写着某一“国籍”，大学也是以此作为记录依据的。

这些制度性的变化为苏联的城市化政策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地方背景。既然维尔纽斯在战后几乎成了空城，而立陶宛农民又在城市附近，那么他们在城市中的数量必然会增加。然而苏联的城市化政策不是为了支持共和国首都的主要民族——就像立陶宛南边和北边俄罗斯化的邻国一样。看起来立陶宛在20世纪50年代缓慢的工业化为地方移民到首都提供了支持，而非泛苏联主义涌入塔林、里加和明斯克那样的情形。[7]与此同时，部分因为天主教禁止家庭计划生育或堕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立陶宛儿童的数量非常多。但是身份不能降低为生育率和人口统计学。那些乡村移民和他们的孩子把自己视为立陶宛人，这一政治现实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背景。大约400年以来，波兰文化在维日诺一直占得社会优势。在历史上立陶宛的波兰文化中心被破坏之后，这条路径现在被抹去了。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化不仅是将波兰人赶出城市，还将作为城市生活方式的波兰文化彻底根除了。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城市文明的同化，农村人口在城市中或多或少的文化优越性却开始突然显现。[8]这一情况的变化是由于当初制定规则的人名声败坏或被赶走了：在维日诺，这些人就是之前的波兰人。在1944—1946年重新定居以前，波兰人不仅在人数上占维日诺的大多数，还是诸如城市文化、高雅文化的代表。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在19世纪晚期，维那的俄国统治者惧怕波兰贵族的文化同化力量。早期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也惧怕波兰性的魅力，他们通过个人亲身经历获知这一经验，而不是从波兰人身上获知。在两次大战之间，声称立陶宛拥有维尔纽斯的立陶宛政治家们也惧怕波兰文明。1944—1946年，立陶宛共产主义者所执行的苏联重新定居政策，打破了波兰文化对维日诺几个世纪以来的控制。把维尔纽斯的波兰人赶出去，留下乡村地区的波兰人——那些理解民族性历史的人做出了这个选择。结果，立陶宛的波兰人成了他们之前从未成为的：一个由农民组成的民族。他们不仅人数更少，而且地位更低。

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20世纪50年代，立陶宛人成了他们之前从未成为的：一个栖居城市的民族。在现代历史上，他们的语言第一次在维尔纽斯成为地位的象征。维尔纽斯的社会进步不再需要波兰语了。20世纪50年

代，来自农村或小镇的立陶宛农民的孩子只要出生在维尔纽斯，都可以在城市的立陶宛学校中接受教育。在苏联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内，初级中学的数量是原先的四倍，和战前的立陶宛教育相比，苏维埃立陶宛学校事实上有更多以立陶宛语教授的课程。[9]20世纪60年代，在维尔纽斯，一位立陶宛人和一位非立陶宛人所生的孩子中，大部分年满16岁的孩子都认为自己是立陶宛人。[10]虽然维尔纽斯出现了一所立陶宛大学在历史上是件新鲜事，但之后的许多代人将对之习以为常。1989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大约10%的立陶宛人至少拥有一位非立陶宛人的父母，一些人双亲都不是立陶宛人。[11]在苏联统治下，维尔纽斯的立陶宛人身份拥有同化的力量。

立陶宛共产主义者和知识阶层分别做了妥协。曾有2万名立陶宛人武装反抗苏联统治，其中大多数人在行动中被杀害或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945年到1953年间，在苏维埃立陶宛约有12万人——占共和国人口的5%——被驱逐出境。其中有许多立陶宛优秀的作家和学者，以及当时1300名罗马天主教神父中的1000人。[12]1953年后，许多被驱逐者都回来了。他们发现这里成为以维尔纽斯为首都的苏维埃立陶宛，而维尔纽斯正在文化上逐渐转向立陶宛。斯大林去世后，立陶宛共产党内立陶宛人的比例立刻开始增加。立陶宛知识阶层接受的条件是入党以换取保留立陶宛文化的一点儿自由。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可观。立陶宛文学语言成为正确的、标准的，并被确认为一种学者语言。立陶宛诗歌和散文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维尔纽斯大学成为波罗的语研究的港湾。[13]

经久不衰的浪漫主义

这种妥协持续了数十年。到1970年为止，党内登记的立陶宛党员人数与共和国内立陶宛人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差距已不再那么大了（分别为66%和80%）。那一年，立陶宛的个人平均收入是苏联第三高的，仅次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14]在苏联规定的范围内，立陶宛共产主义者可夸口的不仅是经济发展，还有立陶宛文化的发展。因此，总书记斯涅策库斯在197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把这个民族对首都维尔纽斯的热爱与列宁1895年到访维尔纽斯联系起来。[15]关键在于，立陶宛能拥有首都全赖仁慈的共产主义政策。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确实把维尔纽斯授予了立陶宛，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能够理解什么对立陶宛来说是重要的，甚至俄语也做出了一些修改，以满足苏联对立陶宛民族性的妥协。列宁在1895年的访问中使用的俄语单词是“维那”。在俄语历史课本中，这个单词被立陶宛语单词“维尔纽斯”取代。我们已经看到了犹太语“维尔纳”和波兰语“维日诺”被突然而粗暴地中止，对白俄罗斯人的“维尔尼亚”飘忽不定的希望感到犹豫不决。在苏联统治下，俄语“维那”默默的屈服引人深思。

正如我们所见，两次大战间立陶宛政治家对俄国文化的恐惧少于对波兰文

化的恐惧。1939年立陶宛领导人还期待着苏联统治的到来可以切断其与波兰的联系，使维尔纽斯成为立陶宛的。这个应验了的预言是立陶宛人在面临重重危机时所做出的，这应该使我们认识到立陶宛民族主义并非不理性的。在战后的立陶宛，浪漫主义主张不容置疑地验证了它们在政治上的力量。战后俄语向立陶宛语低头，尤其使得我们重新审视立陶宛民族性中对语言的强调。正如我们所见，波罗的语的独特性在19世纪晚期立陶宛民族运动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两次大战间，立陶宛提高了这种语言的书写能力。在苏维埃立陶宛，立陶宛语再次成为延续古老历史的标志。斯拉夫语和波罗的语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无情的事实，而立陶宛语比斯拉夫语更纯正的观念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主张。立陶宛语和梵语关联很深的观念通过语言学令人信服的形式被证明了，这一观念至今依然作为强大的民族主义理念颇为流行。这表明了浪漫主义传统的延续性，它们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成功地传播开去，并在苏联统治下取得了最终胜利。[16]

苏联权力如何支持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正如第2章所论述的，在19世纪晚期形成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融合了德国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浪漫主义比喻，被密茨凯维奇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加以改造，在19世纪80年代被立陶宛民族活动家推翻，最后在1905年革命中被表达为一种政治观念。第3章解释了两次大战间的立陶宛民族主义如何被独立的立陶宛国家所宣传，如何聚焦波兰1920年占领了表面上属于立陶宛的维尔纽斯。1920年后，关于立陶宛近代早期的、历史的观念已全部消失。虽然还有例外，但是到1939年为止，现代、种族的国家理念在维日诺的波兰人和考纳斯的立陶宛人中间占压倒性地位。“二战”以后，立陶宛种族民族主义在苏维埃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取得胜利。

“维尔纽斯是立陶宛的，但立陶宛是俄国的”——事实上这个古老的玩笑是错误的。立陶宛是苏联的，但苏联和俄国有所不同，尤其在维尔纽斯的问题上。立陶宛浪漫主义者在19世纪的梦想被20世纪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重新诠释，这个梦想在苏联统治下实现了。中世纪和现代的混合体出现了，维尔纽斯的语言实践消弭了统治的梦想和中世纪的权力之间的裂痕。语言软化了近代早期“无国家”（statelessness）对维尔纽斯的打击，在两次大战之间，立陶宛其他地方也遭遇了这一打击。诚然，对在苏联统治下的立陶宛人来说，语言是一种显示与众不同的标志，对所有波罗的人来说亦然。同时，苏联强权允许立陶宛人在社会实践中确认一种浪漫主义的信念，即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美都保存在语言中。第一部关于立陶宛语的英文历史著作向全世界的读者传达了现代立陶宛语与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的关联，这部著作的作者是一位苏联时代的维尔纽斯大学毕业生。[17]

立陶宛和其他地方的种族民族主义轻视模棱两可的近代早期传统，赞扬有

关中世纪的纯粹和权力的幻想。在维尔纽斯，苏联破坏了近代早期遗产，这是任何立陶宛制度都办不到的。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失效了。1841年，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纳尔布特象征性地折断了他的笔以表达对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抗议；1939年，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这份终结波兰与立陶宛关系的文件上签字。1569年，近代早期欧洲最大的民族诞生了；1939年，波兰和立陶宛最后一次分裂为现代的、以种族划分的小民族。同时，苏联的统治也为立陶宛人提供了将和波兰的历史关联降到最小的机会。立陶宛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强权和立陶宛社会中斡旋，在这一极大程度的折衷方案中波兰扮演了两者共同的敌人的重要角色。斯大林以牺牲波兰为代价把领土给了苏维埃立陶宛，他和继任者们得以以现状维护者的姿态示人。[18]在整个苏联时期，立陶宛的知识阶层不断责难波兰人在1920年"占领"维尔纽斯这一事件，这一解释与苏联对波兰帝国主义的容忍底线高度一致。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立陶宛活动家大体上还是相信波兰人对维尔纽斯仍不死心，会不顾一切地把它夺回来。[19]

和苏联的其他地方一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苏维埃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是禁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立陶宛人将其重新视为民族悲剧，举行了大规模公众示威，这是勇气之举。立陶宛人把自己描绘成这些条款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忘了他们的国家是因此获得了维尔纽斯。就算说起立陶宛1939年占领维尔纽斯，他们也会将其视为"维尔纽斯的回归"。立陶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非法的，但是随后立陶宛吞并维尔纽斯却是合法的。"废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20世纪80年代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的口号。[20]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恢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维尔纽斯应该被还给波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苏联当局和立陶宛的波兰人很快就指出了这点。

名字和事态

一个世纪以来，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独立的立陶宛国家和苏维埃立陶宛不断削弱立陶宛大公国传统中固有的与波兰的关联——同时他们一直征引密茨凯维奇。立陶宛被重新定义为以维尔纽斯为中心的现代民族单位：这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观念形态，是两次大战间立陶宛的期望，而苏维埃立陶宛将其变为现实。正如我们所见，苏维埃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取得了两次大战间波兰的维日诺从未取得的成就：1984年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立陶宛发音为"密茨凯维尔西斯"）的纪念碑揭幕。对于在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20世纪80年代后五年发起的改革影响下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来说，密茨凯维尔西斯的雕像是一次鼓励。

这次运动的领导人是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21]。

他的家族历史提醒着我们近代早期和现代的立陶宛民族性之间存在怎样根本性的区别。在19世纪，兰茨贝格（Landsberg）家族和其他立陶宛上层阶层一样，投身近代早期的波兰文明中。19世纪早期，卡齐米日·兰茨贝格（Kazimierz Landsberg）在维日诺的俄罗斯帝国大学学习波兰语。和密茨凯维奇一样，他把波兰语的优越性和最终回归波兰-立陶宛王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卡齐米日·兰茨贝格在华沙参与了1830—1831年起义，反抗俄罗斯帝国的统治，正是这次起义的失败启发了密茨凯维奇写作《塔杜施先生》。我们已经知道，维日诺大学和立陶宛的波兰学校在起义后被关停了。在1831年到1836年之间，在历史上的立陶宛范围内，波兰文化的优越性仍然无可匹敌。

然而，兰茨贝格家族下一代的历史告诉我们俄国民族性政策在1863—1864年第二次起义被镇压后开始浮现出来。加布里埃尔·兰茨贝格（Gabriel Landsberg）也成长于一个说波兰语的家庭，但是和他的父亲不同，他在高中就开始学习立陶宛语。他获准到沙俄上大学；当他从莫斯科回来，他已经成为一名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分子。他与一名波兰女子结婚，他们用波兰语交流。虽然他的立陶宛语从来说得不好，但他很骄傲自己的五个孩子说得很好。1905年革命后，他最小的孩子也成年了。我们从米科拉斯·罗梅里斯的例子就已看出，正是1905年后许多立陶宛的波兰上层家庭开始认真对待现代立陶宛民族性的理念。

兰茨贝吉斯谱系的下一代人使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回想起维尔纽斯的中心位置，以及波兰在1920年夺取这座城市破坏了他们的立陶宛独立事业。加布里埃尔五个孩子里最小的孩子长大后成了建筑师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热姆卡尔尼斯（Vytautas Landsbergis-Žemkalnis，1893—1993）。他在两次大战间的不朽作品之一与维尔纽斯的盖迪米纳斯城堡（Gediminas Castle）有关。维尔纽斯曾是波兰的一部分，而这座城堡是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心向往之的地方。某种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艺术变成了生活。当苏联在1939年把维尔纽斯授予立陶宛时，兰茨贝吉斯-热姆卡尔尼斯是第一位进入盖迪米纳斯城堡的立陶宛士兵——无论如何，这大概是他告诉他儿子的故事。在1939—1940年立陶宛简短的过渡期，以及苏维埃立陶宛时期，兰茨贝吉斯-热姆卡尔尼斯致力于建设立陶宛的维尔纽斯。（顺便一提，“热姆卡尔尼斯”这个词就是“兰茨贝吉斯”的立陶宛语对应词。）今天，维尔纽斯有一条街道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他的儿子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在苏维埃立陶宛的约束下孕育了更为私人的艺术品。小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示范了立陶宛知识阶层在苏联体制内可以取得多大的成就。1955年他以钢琴家的身份从音乐学院毕业，在1969年拿到了音乐学博士学位。他执教30年，写下多部著作。他的研究领域是立陶宛艺术家的音乐和作曲家米卡尔洛尤斯·齐乌利尼斯（Mikalojus

Čiurlionis）——官方在1961年洗清了后者在斯大林时代的污名，追认其为立陶宛民族伟人。兰茨贝吉斯关于齐乌利尼斯的八本书代表了对立陶宛民族文化延续的有力贡献，当然其中也蕴含了新的东西。毕竟，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是兰茨贝吉斯家族中第一代母语为立陶宛语而非波兰语的后代。此外，米卡尔洛尤斯·齐乌利尼斯这位如今的所有立陶宛人心中的“民族艺术家”，小时候并不会说立陶宛语。齐乌利尼斯的母语是波兰语。他从妻子索菲娅·凯曼泰特（Sofija Kymantaitė，1886—1958）那里学会了立陶宛语。让我们抛开对回归大众的想象：凯曼泰特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她在克拉科夫名为“青年波兰”（Young Poland）的新派艺术圈中度过了青涩岁月。齐乌利尼斯在1905年革命后才将自己视为立陶宛人。在兰茨贝吉斯和他的学术英雄的例子中，我们必须看到民族性不是种族命运，而是在固定的历史环境中做出的政治选择。[22]

如今，这种塑造个人选择的环境与民族历史的共同迷思一道组成了一种奇怪的和谐。在立陶宛人的例子中，现代民族激进主义意味着拒绝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显而易见的历史延续，接受中世纪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迷思。这就意味着选择某个版本的密茨凯维奇，而排斥其他版本。他们不理会密茨凯维奇对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政治敬意，而其关于中世纪立陶宛大公国的浪漫主义迷思却被政治化了。兰茨贝吉斯祖先的遗产（patrimony，或者说是patrinomy——他的姓氏）让我们想到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如何被现代立陶宛民族所替代，波兰语中的政治精英理念如何被立陶宛语中的大众理念所代替。立陶宛的民族政治中包含了现代和中世纪的联盟以对抗近代早期的历史。近代早期的合法性原则、贵族家庭的权威或者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政治制度，通通被排斥了。中世纪历史的历史感和美感，给以人民的名义夺取权力的现代成果赋予了合法性。

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的名字让我们想到作为民族历史的中世纪立陶宛神话。维陶塔斯大帝（Vytautas the Great）[23]是中世纪的立陶宛大公，他坚持与波兰结盟。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立陶宛，维陶塔斯大帝被和1569年卢布林联合前的立陶宛黄金时代联系在一起，还与立陶宛收复维尔纽斯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在苏维埃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维陶塔斯大帝依然象征着反对和波兰的联系。[24]在立陶宛人从苏联统治下获得解放后，他们再次把维陶塔斯大帝提升到最高的民族英雄的地位。维陶塔斯大帝象征的民族复兴，以及恢复到一个与波兰没有关联的古老立陶宛的愿望，在政治上被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实现了。1988年，兰茨贝吉斯被选为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Sąjūdis）的领导人。1990年，他作为主席的那届议会宣布立陶宛独立。1991年，他被选为独立的立陶宛共和国议会主席，共和国首都设在维尔纽斯。同年9月，兰茨贝吉斯政府与波兰展开了外交争论，兰茨贝吉斯要求波兰接受维尔纽斯在1920—1939年属于立陶宛的事实。

这次不同寻常的外交争论源于一种特殊的历史观点，即无视立陶宛在近代早期与波兰的联系，而支持中世纪立陶宛的浪漫主义观点。这种无视代表了立陶宛民族主义，也是对波兰文化的有力回答，而每一代立陶宛民族活动家都很清楚波兰文化的影响力。甚至中世纪立陶宛的浪漫主义观点——立陶宛迷思的伊甸园——也大部分是由密茨凯维奇用波兰语优美地表达出来。本章开篇诗歌中密茨凯维奇式的英雄康拉德·瓦伦罗德，是一位来自中世纪立陶宛的骑士。他的英雄主义体现在他如何掩盖身份，在为敌人服务的岁月中等待合适的行动机会。密茨凯维奇为他最伟大的中世纪英雄人物创造的名字“格拉日娜”被立陶宛语吸收，比如兰茨贝吉斯的妻子就叫这个名字。对中世纪的强调以及对近代早期的否定与现代种族民族的扩张是一致的，事实上后者启发了前者。立陶宛语的历史感演变为立陶宛文化之美，而文化之美又演化为文化教育和普选制度的力量。当然，这些事物本身也有其力量。

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解体后立陶宛当局开始向大众传播历史迷思。两次大战间的历史课本再版，这满足了大众对历史真相的渴望，尤其是阿道法斯·沙波卡（Adolfas Šapoka）这位主流民族历史学家和迷思制造者的历史文本。甚至纳尔布特的立陶宛史著作（用波兰语写作，篇幅极长）也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立陶宛语译本。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解体后立陶宛的危险是历史迷思成为合法的政治话语，而这将阻止立陶宛政府推行理性的外交政策。对波兰文明的恐惧正好对应着民族复兴，而这将导致削弱立陶宛的国际关系的风险。最开始的信号并不鼓舞人心。兰茨贝吉斯最初对波兰的冷淡态度符合当时的民族共识，这一民族共识很快兴起，并引人瞩目地占据了不止一代人的意识。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立陶宛和波兰关系停滞不前的背景下，立陶宛学生被要求选出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事件。有一个事件比其他事件得票都高——他们选了1569年立陶宛与波兰的联合。[25]

---

[1] Włodzimierz Borodziej, Stanisław Ciesielski, Jerzy Kochanowski, “Wstęp,” in Przesiedlenie ludności polskiej 23-25; Valentinas Brandi šauskas, “Migracje i przemiany demograficzne na Litwie,” in Krzysztof Jasiewicz, ed., Europa nie prowincjonalna, Warsaw: Rytm, 1999, 1123.

[2] 关于在维尔纽斯的波兰人，Przesiedlenie ludności polskiej, 111; 关于期待波兰农民到来的波兰当局，109ff; 关乎德国文件，159; 关于立陶宛的考纳斯，361–364。

[3] Piotr Eberhardt,Przemiany narodowościowe na Litwie, Warsaw: Przegl ąd Wschodni, 1997, 167; Piotr Eberhardt, Polska ludność kresowa, Warsaw:

PWN, 1998, 114-123. Benedict Anderso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 London: Verso, 1998, 36-45，就人口普查数据提出了令人警惕的叙述。

[4] 一份官方的类回忆将这段时期视作拯救“立陶宛民族”的挣扎时期。M. Bordonaite, Tovaryshch Matas, Vilnius: Mintis, 1986, 89以及全书各处。

[5] Barbara Christophe,Staat versus Identität, Cologne: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7, 41.

[6] A. Bendzhius et al.,Istoriia Vil’niusskogo universiteta, Vilnius: Mokslas, 1979, 154, 194;Marceli Kosman, Uniwersytet Wileński 1579-1979, Wrocław: Ossolineum, 1981, 57.犹太人的比例从1939-1938年间的13%下降到1945—1946年间的6.5%，在1976-1988年间再次下降到1.6%。第一次下降的原因是90%的立陶宛犹太人死于大屠杀。第二次下降很可能反映了苏联犹太人更喜欢就读说俄罗斯语的大学。

[7] Vytautas Vaitiekūnas, “Sovietized Education in Occupied Lithuania,” in V. Stanley Vardys, ed. Lithuania under the Soviets, New York: Praeger, 1965, 186–187, 194.

[8] A.J.P. 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London: Hamilton, 1948.

[9] Vytautas Vaitiekūnas, “Sovietized Education in Occupied Lithuania,” in V. Stanley Vardys, ed. Lithuania under the Soviets, New York: Praeger, 1965, 186–187, 194.

[10] V. Stanley Vardys, “Modernization and Baltic Nationalism,”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975, 43.

[11] MarekŚliwiński and Valerijus Čekmonas, “Świadomość narodowa mieszkańców Litwy i Bialorusi,” Przegląd Wschodni, 4, 3 (1997), 585; Vesna Popovska,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Citi zenship Rights in Lithuania, Houndmills: Palgrave, 2000, 45-49.

[12] Eberhardt,Przemiany narodowościowe na Litwie, 176-179; Nicolas Werth, “Apogée et crise du goulag,” in Stéphane Courtois, ed.,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Paris: Robert Lafont, 1997, 262.

[13] Zigmas Zinkevičius, The History of the Lithuanian Language, Vilnius: Mokslo ir enciklope diju leidykla, 1996, 322—324; Misiunas and Taagepera, The Baltic States, 159-165.

[14] Vardys, “Modernization and Baltic Nationalism,”38-40;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 dowościowe na Litwie, 203.

[15] Antanas Snechkus,Sovetskaia Litva na puti rastsveta, Vilnius, 1970.

[16] 比较Leonidas Donskis, “Lithuani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和Aleksandr Dobrynin and Bronius Kuzmickas, eds., Personal Freedom and National Resurgence, Washington, D.C. Paideia, 1994, 59-74。关于这种理念的激进版本源自当代印度民族主义者，他们声称中世纪的立陶宛是一个“印度教-佛教”国家。Douglas Spitz and William Urban, “A Hindu Nationalist View of Baltic History,”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43 (1993), 297.

[17] 我想到的是Zinkevičius的History of the Lithuanian Language。

[18] Virgil Krapauskas,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in Soviet Lithuanian Historiography,”Jour nal of Baltic Studies, 23, 3 (1993), 255; Tomas Venclova, “Litwo, ojczyzno nasza,” Lithuania, 26-27 (1998), 78; Jacek Borkowicz, “Polska——Litwa,” Polska w Europie, 12 (1993), 34–35; Alicja Nagórska, “Języki——narody——kultury,” Lithuania, 5 (1991), 194; Stephen Burant and Voytek Zubek, “Eastern Europe’ Old Memories and New Realitie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7, 2 (1993), 375.

[19] Greta Lemanait ė, “Stereotyp Polaka w oczach Litwina,” in Teresa Walas, ed., Narody i ste reotypy, Cracow: Międzynarodowe Centrum Kultury, 1995, 90-94. 又见Marek Śliwiński, “Conscience nationale et la perception géopolitique des habitants de la Lithuanie,” in Pierre Allan and Jan Škaloud, eds., The Making of Democracy, Prague: Economics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4-140; Kultura ,442-443(1984), 133-135。这种观念没有积极地把和波兰人的接触联系起来：生活在波兰人之中的立陶宛人没有表达任何憎恶，而立陶宛人所处的地方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波兰人表达最强的憎恶。Śliwiński and Čekmonas, “Świadomość narodowa mieszkanńców Litwy i Białorusi,”538-585. 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调查。

[20] 数据：Alfred Erich Senn,Gorbachev’s Failure in Lithuania, New York: St. Martin’s,1995, 31。关于抗议的文件，见Izidors Vizulis, 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 of 1939, New York: Praeger, 1990。关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辩论，见Christophe, Staat versus Identität,104-122。又见V. Stanley Vardys, “Lithuanian National Politics,” Problems of Communism, July–August 1989, 54, 62; Aleksandra Niemczykowa, “Litwa na drodze do suwerenności,” Lithuania,

17(1995), 105。

[21] 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1932— ），立陶宛保守派政治家和欧洲议会议员。

[22] Vytautas Landsbergis,Lithuania: Independent Agai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关于齐乌利尼斯见A.E. Senn, “The Lithuanian Intelligentsia of the Nine- teenth Century,” in Aleksander Loit, ed., National Movements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Stockholm: Center for Baltic Studies, 1985, 314; Misiunas and Taagepera, The Baltic States, 148。又见Popovska, National Minorities, 57及全书各处；以及Vytautas Landsbergis, “Pieśń o tym, kim jesteśmy,”Lithuania, 1 (1990), 16-21。齐乌利尼斯另居他处，部分源于安塔纳斯·梵克罗瓦（Antanas Venclova）的努力。

[23] 维陶塔斯大帝，中世纪立陶宛最有名的统治者之一，享有与国王同等的权力，是他的疆土内的最高统治者，也是龙骑士团成员。在两次大战之间，独立的立陶宛树立了很多歌颂维陶塔斯大帝的纪念碑。

[24] 作为在对抗条顿骑士团的格伦瓦尔德战役（Battle of Grünwald）中的胜利者，维陶塔斯也合宜地成为“反日耳曼者”。Alvydas Nikžentaitis, “Der Vytautaskult in Litauen und seine Widerspiegelung im Denkmal,” Nordost Archiv, 6, 1 (1997), 131, 138-141. 比较Antanas Čaplinskas, Vilnius Streets, Vilnius: Charibde, 2000。

[25] Vytautas Toleikis, “Historia w szkole litewskiej w perspektywie stosunków polsko-litew-skich,” in Robert Traba, ed., Tematy polsko-litewskie, Olsztyn: Borussia, 1999, 210-212;又见Birute Vareikiene, “Od konfrontacji do zrozumienia,”同上书，216-225; Christophe, Staat versus Identität, 141–165; Adolfas Šapoka, Vilnius in the Life of Lithuania, Toronto: Lithuanian Association, 1962。

| 第二部分 |

危机四伏的乌克兰边境

第6章

近代早期的乌克兰（1569—1914）

你们夸耀说，曾经我们扳倒了波兰。

但当波兰陨落时，你们也被打败了。

父亲们的血亲分散到莫斯科和华沙，

给子孙遗留下他们的枷锁和名望！

——塔拉斯·舍甫琴科
《致死者、生者和未出生的人……》
（Viunyshcha，1845）

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通过将东斯拉夫的土地从立陶宛转到波兰，定义了什么是近代早期的乌克兰。14世纪立陶宛取得了大部分基辅罗斯的土地，基辅城在1363年归入立陶宛的统治。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大帝）于1349年占领加利西亚和利沃夫。大约200年来，包括现在我们称作乌克兰的土地在内的基辅罗斯的大部分遗产，都被立陶宛和波兰一分为二。[1]1569年之前，立陶宛拥有旧基辅公国最大的一部分，但是波兰的加利西亚（罗斯的领地）是这些领土中最发达和繁华的地区。因此，1569年卢布林联合是对旧罗斯的再次瓜分，波兰从中获益更多。立陶宛取得了更北面的斯拉夫领土，也就是今天的白俄罗斯。立陶宛向波兰割让了更南面的领土，即布拉茨拉夫（Bratslav）、基辅和沃伦（Volyn）地区，其中大部分属于今天的乌克兰。经过两个世纪，罗斯信仰东正教的贵族认为他们是立陶宛人，现在却被划到了波兰王国境内。布拉茨拉夫、基辅和沃伦被并入波兰王国的加利西亚领土，这里的主要宗教是东正教，本地方言是鲁塞尼亚语，礼拜语言是教会斯拉夫语，书写字母是西里尔字母。古罗斯的首都基辅城突然成了波兰的一部分。

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联合是渐进的、经过协商的，但乌克兰并入波兰却是由一纸公文突然决定的。立陶宛境内罗马天主教的传播起源于1386年当时的统治者接受洗礼，在1569年立陶宛与波兰联合前罗马天主教已经缓慢传播了近两个世纪。另一方面，乌克兰这片东正教土地在宗教改革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突然陷入与西方基督教的全面接触中。宗教改革标志着西

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之间力量平衡的改变。在中世纪，罗斯的东正教教士向维尔纽斯和立陶宛输出东斯拉夫的语言与文化。当波兰高雅文化逐渐主导维尔纽斯，立陶宛将乌克兰授予波兰，同时西方基督教成为宗教改革的对象时，局面发生了翻转。作为中世纪立陶宛的高雅文化发源地，乌克兰成了近代早期波兰播撒文明引导开化的目标。乌克兰给中世纪的立陶宛带来了基督教和文字；乌克兰从近代早期波兰那里收获了改革后的基督教和印刷书本。通过这些方式，1569年的改变随着立陶宛的发展继续下去，标志着中世纪罗斯的终结以及近代早期乌克兰的开始——后者作为东斯拉夫领土的一部分被并入波兰。乌克兰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称维尔纽斯是“最辉煌的城市”，其笔下的乌克兰开始受到华沙的影响。

正如中世纪的罗斯历史起始于弗拉基米尔大公（Grand Duke Volodymyr）于988年接受东正教洗礼，近代早期乌克兰的历史起始于乌克兰贵族于1569年皈依西方基督教。在16世纪的波兰，先是清教徒，之后是天主教徒，逐渐接受了文艺复兴中涌现的印刷文字、方言和论辩术。1569年后，这些知识的火花传入乌克兰，而主要的引导者就是耶稣会教士。在黑暗的天空下，这些火花尤其壮观。正当宗教改革将波兰的宗教论争推向高潮时，乌克兰的东正教经历了长期的知识衰退。它的局限在于语言本身，而这种语言是为在斯拉夫人中传播基督教东方教派而生的。传教士西里尔/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卓越创造——古教会斯拉夫语，使得基督教福音得以在东部和南部的斯拉夫土地上流传。古教会斯拉夫语尽管很好地执行了中世纪的目的，即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却无法应对近代早期的宗教改革挑战。它无法与古典模式建立关联。几个世纪过去了，它甚至无法为东正教教士之间的交流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或者是教士与教众之间的交流，在这样的想法产生之后。形形色色的斯拉夫语言出现了（或者说产生不同分支），教会斯拉夫语既丧失了它与方言天然的相似性，又失去了一种普世吸引力。到近代早期为止，教会斯拉夫语衰退为一种地方宗教语言，然而它既不能被用作当地人的谈话语言，也不能成为东正教教士之间的交流语言。[2]

16世纪，在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语言面前，东正教教会的粗陋语言相形见绌。[3]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最初试图在乌克兰的学校和出版物中使用教会斯拉夫语，之后他们意识到自己只能用波兰语表达想说的话。和其他语言不同，波兰语曾是一门发展中的语言，也是一门文化语言，适合宣传与劝服他人改变信仰。教士们在乌克兰使用波兰语不是由于民族偏见，而是为了在争夺灵魂的战争中选择适合的“武器”。教会斯拉夫语的支持者对此表示责难。沃里尼亚最伟大的君主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赞助出版了第一部教会斯拉夫语版本的完整圣经。帕姆翁·别伦达（Pamvo Berynda）出版了一部教会斯拉夫语词典。[4]彼得罗·莫希拉（Petro Mohyla）建立了一所东

正教学院，这所学院是基辅学院（Kyiv Academy）的前身。这所学院的教学语言是教会斯拉夫语，尽管所有的课本都是拉丁语的，而学生在写作时用的是波兰语。由于乌克兰教士被强制学习其他语种以及古典修辞学和论辩术，他们成了出色的教会斯拉夫语文本的翻译者，这使得他们在莫斯科更有用武之地。尽管如此，他们也发现波兰语最适合他们传教的需求。1605年后，东正教教士写作的大部分论辩小册子都是波兰语的（虽然小册子的标题、笔名和辱骂的词语常常来自拜占庭）；1620年后，东正教教士经常用波兰语签名；到了1640年后，乌克兰的大多数官方文件都是用波兰语写的。莫希拉于1647年去世，他的遗嘱也是用波兰语写的。[5]

当地东正教统治集团的一个重要回应是计划与罗马教会联合起来。1054年后，对罗马教会来说，终结东方分裂教派是最重要的任务；天主教会没有完整的解决办法，因此他们与其他教派在当地结成联盟。1569年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政治状况允许这类地方联盟的出现。莫斯科和基辅的基督教大主教教区在1458年分道扬镳，后者完全处于波兰-立陶宛王国境内。1569年新的领土边界确认后，大多数东正教的土地被归到波兰，而不是立陶宛。波兰耶稣会教士，比如彼得·斯卡加，他们支持与东正教的联盟；安东尼奥·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等罗马教皇特使向罗马教廷解释区域性联盟的可能性；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基于安全和宗教理由对此大为倡导。但是，教派联盟不是罗马或华沙的本愿。1596年的布列斯特联盟（Brest Union）起自东正教中心区域，当地主教们希望能保留他们的教堂。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普世牧首区（The Orthodox Patriarchy of Constantinople）[6]因明显依赖奥斯曼帝国的力量而名声败坏，而新的莫斯科牧首是以可疑的形式任命的。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和东正教会最高权威杰里迈亚二世（Jeremiah II）被奥斯曼人和莫斯科人监禁。由于被迫将莫斯科大主教升为牧首，杰里迈亚不得不在1588—1589年滞留在波兰的乌克兰土地上。杰里迈亚在布列斯特召集一年一度的宗教会议，这为1596年波兰-立陶宛王国境内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发布联合声明做了准备。[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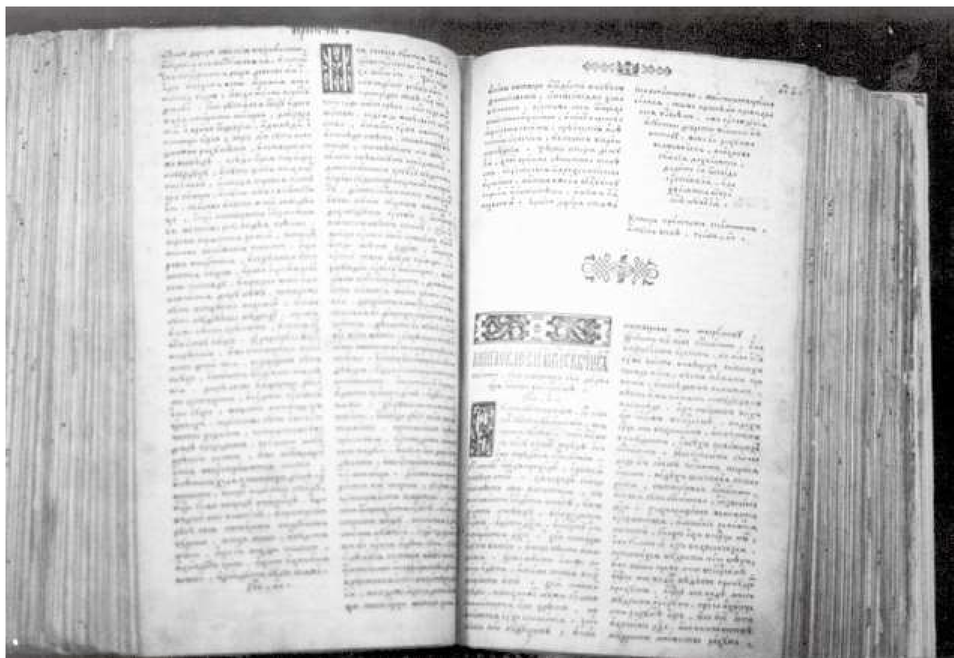


图13：出版于1581年的奥斯特罗赫圣经。近代早期的奥斯特罗赫拥有一所东正教学院、一所犹太研究学院（yeshiva）、一座清真寺和一座东仪天主教堂。今天的奥斯特罗赫是乌克兰西部罗夫诺州的一座城市。

反对者把布列斯特联盟看作消灭王国境内的东正教会的企图，事实上正是如此。毕竟，提出建立联盟的东正教主教相信他们能够加入天主教会，在保持东方教派的同时还能与更庞大的天主教派取得同等地位。梵蒂冈把联盟视作通过区域协调以终结分裂教派这一行动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声称他一定要保护的“希腊信仰”是东仪天主教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东仪天主教会是东正教会在王国境内完整合法的继承者。联盟的政治运作迫使新教徒（新教和人数更多的天主教会相比是更小的教派）和东正教徒（他们的教堂不被允许在王国内继续存在）合作。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的危机中，新教徒出于教义和仪式的原因以及政治存亡的诉求，开始赞同东正教徒。布列斯特联盟最大的反对者是沃里尼亚君主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他赞助出版了斯拉夫语的圣经。借鉴来自新教徒的理论依据（比如说教皇是反基督者），奥斯特罗日斯基利用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制度反对联盟。[8]



图14：16世纪东方教派的教堂。尼然科维奇（Niżankowice）[9]横跨西布格河（Buh river），西布格河是今天波兰和乌克兰的边界。

奥斯特罗日斯基动员了一些来自基辅和沃伦的贵族在当地议会中反对布列斯特。宗教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将一部分乌克兰贵族带进了政治领域。对信仰东正教的市民来说，布列斯特联盟意味着波兰移民对他们社会地位的威胁。在这里宗教象征着保守主义。在教区内，东仪天主教会没能联合起东正教神职人员，也没能提升东方教派的地位，如此本可以使乌克兰大部分

上层人士满足。[10]联盟引起的争议促使某种政治语汇诞生。几个世纪来，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的命名“罗斯”一直存在政治含义；如今，原本不明确的军事用语“乌克兰”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意涵，意味着波兰境内东正教徒的家园。[11]1569年卢布林联合分隔了乌克兰的东斯拉夫人与他们在立陶宛大公国北部的同胞；1596年布列斯特联盟则为这一新的领土划分提供了重新思考其政治含义的语境。布列斯特联盟没有在王国境内创造出一个可以同化东方教派的单一教会，反而带来了一个令人疑惑的处境，即乌克兰的所有天主教会因此面临政治难题。最意味深长的是改革者和农民之间存在的鸿沟，对农民来说，宗教改革和联盟的动机是完全令人费解的。

乌克兰的近代早期定义，1569—1648

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文艺复兴给波兰和立陶宛的语言问题带来了奇特又重要的解决方案。虽然1569年后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都将波兰语当作学习和政治的语言，但是长期来看，这在两国内部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在波兰，受教育的阶层放弃了拉丁语这种从外传入的政治与文学语言，转而使用波兰语这种经过编纂的方言。在立陶宛大公国，受教育的阶层从和本国方言十分相似的政府语言——斯拉夫官方语言，转换到从外传入的政治与文学语言——波兰语。白俄罗斯方言被排除在外，在与政治和文化不相关的领域，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方言还有使用。之后我们发现，当民族政治在现代渐渐转向大众政治时，波兰语的精英地位被削弱了。在乌克兰，1569年后产生的语言问题也可以用同样的答案解释：波兰语取胜了，而不是乌克兰方言的地位提升或教会斯拉夫语的复兴。虽然在波兰语言问题的解答使书写字母更接近通用语言，但在立陶宛和乌克兰，语言问题的解答使精英语言、世俗语言和教会语言拉开了与平民使用的语言之间的距离（图表1，第65页）。

宗教改革在乌克兰造成的后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和波兰贵族一样，许多乌克兰贵族也在宗教改革中遭到清除。许多乌克兰上层人士在16世纪放弃东正教，皈依新教的不同教派。和波兰的情况一样，这些乌克兰贵族的儿孙支持反宗教改革运动，并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波兰和乌克兰的贵族最终信仰了共同的宗教——罗马天主教。然而，虽然反宗教改革运动消除了波兰地主和波兰农民之间新的宗教差异，但是在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乌克兰地主和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农民之间造成了新的宗教差异。进入现代后，当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和共同的语言成为推行民族政治的平台，波兰语和罗马天主教注定会在乌克兰成为异质的存在。但是，有一种宗教同时满足了两者的需求。东仪天主教会在乌克兰幸存下来了，成为上层阶层和农民共同的小众信仰。当东正教在17世纪30年代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再次取得合法地位时，东仪天主教会[12]不再是普世的期望，而成为东方教派中很小的一个分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在合适的政治环境下，东仪天主教

会将成为现代乌克兰民族性的基础。[13]

在波兰-立陶宛王国新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近代早期的乌克兰和波兰的区别比和立陶宛的区别更大。罗马天主教很久以前就扎根在立陶宛了，是贵族和农民共同的信仰。但是，立陶宛是新王国中完全的政治参与者，而乌克兰不是。立陶宛的中层阶级可以选择是以立陶宛还是以王国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自由，但是乌克兰的中层阶级发现他们只能处于更富有、更有权力的同胞的支配下。在新王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乌克兰土地有着特定的作用。当王国成为西欧的谷物主产地，而上层阶级成功将农民捆绑在他们的土地上时，在通向财富与权力的道路上，地产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14]地产成为乌克兰被猎取的目标。

在立陶宛，上层阶级可以1569年后获得的行政权力来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立陶宛法令都是最高法律。1588年立陶宛大公国法律的颁布部分就是为了保护立陶宛地主的权利。但是乌克兰没有类似的保护机制存在。1569年后的数十年内，一些波兰家族在乌克兰取得了大量的土地，成千上万的波兰小贵族和犹太人接连为大地主工作。更少的地主拥有了更多的土地。到1658年为止，乌克兰的人口大约2%是贵族，与之相对的是当时波兰人口大约10%是贵族。[15]当地出身的乌克兰贵族从新秩序中获利最多。最富有的贵族招募了大量的波兰和犹太士兵与助手。雇用波兰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经济业务，比如出租，这使得大量土地为大农场主所有；犹太行政人员热切渴望能通过专业技能获利，于是离开波兰领土来到这里。当上层阶级雇用波兰人，犹太人取得了土地租约，信仰东正教的农民从贫困陷入赤贫。奥斯特罗赫犹太研究学院毕业生汉诺威的内森（Nathan of Hanover）是著名的年代记录者，他记录了许多流血事件，他将农民遭受的苦难与犹太人被埃及统治者所奴役相提并论。他写道，乌克兰人“被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成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奴隶或侍女……”[16]

严重的社会分层在社会高峰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化成果。波兰妇女将宫廷生活带到了乌克兰，创造了可观察和传播文化风气的社会环境。齐格蒙特一世的妻子、齐格蒙特二世的母亲、意大利公主博纳·斯福尔扎（Bona Sforza）本人及其随行人员使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果在波兰大受欢迎，一代人之后，在波兰妇女创造的颇具吸引力的宫廷中，波兰文艺复兴的成果也传到了乌克兰。1569年后的一个世纪之内，乌克兰兴起了许许多多富有的庄园，他们的护卫和波兰人一样像波兰人，甚至比波兰人还要波兰人。[17]乌克兰成为波兰高雅文化新的巅峰，但在它的阴影下潜藏着反抗。

1648年及其全部

在1569年卢布林联合与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i’s）1648年起义之间的关键的三个世代，波兰贵族进入乌克兰，乌克兰权贵也变得更像波兰人。不断增加的社会分化与新的宗教、文化分化，催生出深深的政治区分。这些分化是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宪法制度的一部分。这是由两个，而不是三个国家组成的共和国；而且它首先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因此王国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有问题，无法吸收哥萨克人的自由社群——这些武装者总体上是农民出身，而非贵族出身。1569年，波兰王国从立陶宛继承了乌克兰以及当地的哥萨克人。立陶宛此前依赖哥萨克人以抵御南部边疆的克里米亚汗国（Crimean Khanate）。波兰发现哥萨克人是极佳的军事资本，不仅在抵抗上，还包括攻击。当时波兰的骑兵队是全欧洲最好的，但骑兵队是在结束战斗时最有效率。骑兵队攻击前需要步兵队，而王国在步兵队维护费用上存在困难。[18]哥萨克人一度填补了这个缺陷。他们的价值在1601—1602年与瑞典的战争、1611—1612年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以及1621年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显现出来。波兰-立陶宛王国最辉煌的时候就是波兰和立陶宛的骑士与乌克兰哥萨克人并肩作战的时刻。当局与在军事上有作用的平民达成妥协，后者被归为合法的“登记的”哥萨克人。登记过的哥萨克人享有个人自由，但如果他们不是贵族就会被剥夺公民权。既然议会里没有哥萨克人的代表团，当局对哥萨克人的登记人数限额非常吝啬。相对的，贵族是被赋予公民权的。既然让农民绑定在自己的土地上对大贵族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而且登记为哥萨克人的农民享有权利，那么对他们来说保证登记为哥萨克人的人数很低，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经济利益。1632年后的政策把哥萨克人维持在一支小规模的边疆护卫队，只有在战时才增加他们的人数。1643年后，波兰-立陶宛王国忽视了给登记的哥萨克人支付报酬，这招致很多人的怨恨。[19]他们被动员去作战，却无人代表他们的利益。

哥萨克人无力地向议会请愿，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地位。与1569年之前立陶宛的中层阶级一样，1569年后一些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也希望能获得贵族在波兰王国内争取到的权利。但和立陶宛贵族不同，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与波兰的合作不是从平等的角度达成的，也缺少相互协商的制度平台。几个世纪以来，立陶宛上层阶级一直在观察波兰人的规范，而关于卢布林联合的协商也进行了数十年。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突然卷入与波兰习惯的直接接触，而且乌克兰的波兰和波兰性是由少数非常富有的权贵和他们的行政官员所代表的。1386年开始，天主教就慢慢进入立陶宛，对整个王国的贵族来说，他们在接受天主教之前就已经对此熟悉了。而东正教是大多数非贵族的哥萨克人唯一知道的信仰。1596年布列斯特联盟在乌克兰上层阶级中仅仅激起争论，但对大多数哥萨克人来说这似乎是完全令人震惊的。[20]尽管在17世纪20年代后，东正教再次被王国认可，哥萨克人普遍希望将东仪天主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驱逐出乌克兰。但这并不意味着哥萨克人会与复原后的基辅东正教统治集团合作，赫梅尔尼茨基

对东正教的进展毫不在意。

这意味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近代早期的乌克兰缺乏互相合作的精英。世俗的士兵捍卫东正教；波兰统治的反抗者将波兰习俗视为理所当然。乌克兰有贵族阶层，也有哥萨克军官团，这些团体相互重叠。然而，社会出身的不同依然导致了痛苦的政治分化。最富有的波兰人和波兰化的贵族主导着地方政治，并试图否认少数贵族（比如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传统权利。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约1595—1657）是一位登记在册的哥萨克人，一位波兰官员窃取了他的地产、霸占了他的爱人、谋杀了他的儿子，之后他逃往哥萨克大本营。赫梅尔尼茨基成了哥萨克人的酋长，开始谋划1648年哥萨克人的大规模起义。他是17世纪乌克兰最重要的人物，他的特例也说明了波兰体制的到来如何激怒和分化了当地贵族。使部分乌克兰贵族享受到王国内巨大权力的经济趋势，同时也增强了哥萨克人的战斗力量。当乌克兰权贵们驯化了大草原以开展谷物贸易，农民们不得不向更南面迁移，落入掠夺奴隶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领土，经常成为和哥萨克人同等的阶层。对农民们来说，比起成为权贵的农奴或成为鞑靼人的奴隶，哥萨克人的生活是更可行的选择。被波兰吞并、与天主教会联盟、登记在册的哥萨克人的挣扎以及农民变成奴隶的命运，这一切解释了为何赫梅尔尼茨基在1648年能发动一场威胁王国安危的攻击。

1654年，赫梅尔尼茨基与莫斯科公国在佩列亚斯拉夫（Pereiaslav）结盟，他的哥萨克人帮助莫斯科公国赢得了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战争。这带来了一系列浩劫，当时王国1000万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一死于这场战争，王国在欧洲的势力开始了不可逆转的衰退。波兰-乌克兰历史最终没能改变的转折点是1658—1659年的哈佳奇联盟（Union of Hadiach）。酋长伊万·沃霍夫茨基（Ivan Vyhovs’kyi，死于1664年）提议联盟，哈佳奇联盟本可以让精英的乌克兰哥萨克成为王国中的第三个民族（波兰、立陶宛和罗斯）。乌克兰本可以享受立陶宛已经获得的地位：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军队和司法制度。在这个三国组成的王国中，乌克兰东正教本可以取得与罗马天主教一致的地位。这份计划的起草者、博学的善辩者尤里·尼迈里奇（Iurii Nemyrych）已经从东仪天主教回归东正教信仰。一部分哥萨克人本可以获授爵位，享受政治权利以及统治乌克兰的特权。但是，哈佳奇联盟是共和国形式的而非民主形式的解决方案，而乌克兰人的起义是为了民主，并非为了共和国。沃霍夫茨基酋长和赫梅尔尼茨基酋长一样，在王国宫廷的共和国世界和哥萨克大草原的民主世界间左右为难。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明白妥协能得到的好处，但是他无法说服大多数哥萨克人认同他的观点。一个重要的分歧点是东仪天主教会，哥萨克人希望将其清除，而天主教会坚持说这超出了世俗权力的管辖，沃霍夫茨基提出的妥协方案并不受欢迎。沃霍夫茨基缺少权威，无法让大批没有受封爵位的哥萨克自由人服从他的提议，也缺少及时说服他们的领袖魅力。莫斯科公国重

新开始攻击波兰-立陶宛王国，并支持沃霍夫茨基的对手。沃霍夫茨基被剥夺酋长之位，逃往乌克兰。在他的命令下，哥萨克人处死了妥协案的起草者尼迈里奇。大部分哥萨克人主要关心的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与莫斯科公国、波兰和克里米亚汗国的短暂结盟只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虽然波兰-立陶宛议会接受了哈佳奇联盟，但波兰上层阶级发现酋长无法真的控制哥萨克人，而哥萨克人也无法真的控制乌克兰后，他们就对联盟失去了兴趣。[21]

1659年哈佳奇联盟的失败标志着王国黄金时代的终结，1569年卢布林联合开创的辉煌、繁荣和包容的时代结束了。[22]1569年建立的王国是威胁欧洲各强国的宗教和民族问题的独特解决方案。近代早期欧洲君主面临的问题是他们自己与民众的宗教冲突和政治忠诚。信仰路德宗或天主教的君主分裂了德国；法国发生胡格诺教徒屠杀事件；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进献礼物；甚至势力无可匹敌的西班牙也遭遇了荷兰的挑战，宗教法庭的审讯削弱了前者的实力。波兰-立陶宛却同时做到了宗教包容、制度改革和领土扩张。[23]1569年波兰-立陶宛方案是一种为了保护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贵族而诞生的共和国制度。在经济方面，王国和贵族的繁荣依靠着与西欧国家的谷物贸易，这暗示着相比别国来说波兰-立陶宛的经济落后程度不断增加，而本国农民的地位也趋于衰落。从长期来看，中央权威的缺位、城市的边缘化和落后的农村加剧了王国的灭亡。但我们也不能这样斩钉截铁：如果17世纪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有不一样的转机，如果乌克兰冲突在17世纪中叶得到了解决，也许王国有能力处理这些难题。我们所讨论的1569—1659年期间的这段历史，对王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时刻，检验它是否有能力创造、吸引和获得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的政治精英的忠诚。哈佳奇联盟的失败使这一解决方案无法被应用于乌克兰，也削弱了它在波兰和立陶宛的作用。

哥萨克人起义为波兰民族理念的未来、波兰和乌克兰民族理念扮演何种角色打上重要的烙印。在17世纪的乌克兰，人们很容易把波兰人和天主教徒等同于主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强。然而17世纪的关键不是波兰民族和乌克兰民族的冲突，而是王国的失败和寻求妥协方案的哥萨克人。1569年立陶宛找到了这种妥协方案，在1795年王国瓦解后，政治和宗教制度依然是联系地方精英和波兰文化的桥梁。而在乌克兰不存在这类政治制度，东仪天主教会的活动范围受到哥萨克人的限制。这导致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回顾往事，“波兰”和“乌克兰”在同属一个王国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注定是敌人。哥萨克酋长使用波兰货币，把波兰语当作行政语言，甚至打仗下令时也使用波兰语。17世纪中叶的协商使双方的期望都落空了，但是双方彼此理解。当王国与哥萨克人协商时，他们不需要翻译。哥萨克军官和波兰贵族（两个群体有共通之处）会说一种、两种甚至三种语言：拉丁语、波兰语和鲁塞尼亚方言

（乌克兰语）。当哥萨克人和俄国人协商时，他们需要翻译。赫梅尔尼茨基先请人把用俄国方言写的信件翻译成拉丁语，这样他才能读懂。[24]

哥萨克起义的领导人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最终成为乌克兰英雄。但是他也是波兰贵族的一员，他在耶稣会教士那里学会了拉丁语。而赫梅尔尼茨基的伟大对手雅雷马·维西尼奥维茨基（Jarema Wiśniowiecki）最终被历史塑造为一位波兰权贵。他实际上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拥有23万名农奴。但是雅雷马大公是东正教徒的后代，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哥萨克人之一的后裔。我们必须把维西尼奥维茨基视作波兰境内乌克兰问题的一部分。毕竟，正是他向波兰的贵族平等传统发起挑战，并向议会要求大公的爵位。他将任何视为自己的土地授予莫斯科公国，而他拒绝承认这对华沙来说是难解的外交难题。[25]尽管1569—1659年这段历史为之后现代民族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对乌克兰来说这是一段痛苦挣扎的历史，乌克兰人突然置身于新的王国法律、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框架内。维西尼奥维茨基和赫梅尔尼茨基被现代人视为民族领袖，因为乌克兰和王国最终辜负了彼此的期望。但这实际上是一次政治失败：据传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曾写道，“哥萨克人惩罚了贵族，因为贵族统治着穷苦百姓”。近代早期王国政治秩序的破碎孕育了现代波兰、乌克兰和俄国的起源。

立陶宛、波兰、乌克兰：俄国，1648—1772

哈佳奇联盟失败的八年后，波兰-立陶宛王国与莫斯科公国根据安得所沃条约将乌克兰沿着第聂伯河（Dnipro River）一分为二。今天，乌克兰人把1648年到1667年这段历史视为乌克兰对波兰压迫者的伟大反抗；俄罗斯人则认为这段历史是迷失的乌克兰溪流终于回归俄罗斯大河的时刻。[26]如果从莫斯科公国与西方的政治和宗教联系来看待这段历史会更有收获。哥萨克人的起义是基于王国的现实背景：反对波兰制度在乌克兰制造的不平等，并预设王国应该保护他们的权利。在波兰的统治下，从1569年到1648年的三代人之间，民主的哥萨克人拥有自由的古老观念被王国贵族拥有权利这一共和国观念所取代。哥萨克人与莫斯科公国签订的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协约中的第3条条款甚至特别指出哥萨克人将保留他们“在波兰国王统治下”享受的权利。尽管俄国人看起来和哥萨克人一样都是东正教信徒，但是他们的政治秩序是非常不同的。哥萨克人在争取的毕竟只是对东正教的包容，在一个理应保证基督教信仰拥有平等地位的制度下这种争取有合法性依据。但是，哥萨克人最终与一个教会完全臣服于国家的强权结盟。莫斯科公国监禁（有时候处决）东正教权威的传统做法，其残忍程度是波兰-立陶宛王国远远比不上的。

因此，一些乌克兰人在这种改变中受到莫斯科公国新理念的影响。莫斯科公国与基辅一同继承了在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布列斯特联盟争议中形

成的东正教教士。莫希拉的基辅学院一度成为沙皇统治领土上最大的教育机构。如同切尔尼戈夫（Chernihiv）和哈尔科夫（Kharkiv）的学院，基辅学院以巴洛克形式向成千上万的东斯拉夫学生传授经典教育，主要教学语言是拉丁语和波兰语。波兰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扬·科哈诺夫斯基（Jan Kochanowski）被当作学生写作的学习典范；波兰诗歌形式在东斯拉夫土地上盛行，莫斯科公国于18世纪完全吸收了这种形式。这些学院建立的目的是保护东正教抵御天主教的侵袭，它们与欧洲的新教联系紧密。之后的150年里，这些乌克兰学校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输送了大量的医生、记者和公务员。在17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出现大量翻译图书，这在之前从未有过。这些外语包括希腊语、拉丁语和波兰语，译者是来自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教士。[27]俄国也面临着语言的难题，俄国方言有了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和欧洲的对手。[28]通过这些途径，吞并基辅和乌克兰左岸领土后，莫斯科公国被迫开始了与欧洲的联系。

乌克兰的教士适应了宗教改革时代来自西方基督教的文化吸引力，之后他们又要面对莫斯科公国这样一个国家，以及一个与拜占庭的文化联系有限的教会，而他们却宣称要加强这种文化联系。虽然基辅的教士从没有把莫斯科看作东正教的中心，但他们很快在17世纪下半叶适应了新的政治状况。他们为尼孔牧首（Patriarch Nikon）的现代化东正教会输送人力，之后又为彼得大帝的改革提供支持。在安得所沃条约签订后，乌克兰教士开始寻求新君主的支持，通过将莫斯科公国历史重新解释为政教相连的方式，以彰显抬高自己的地位。他们在与莫斯科公国王朝的合作中就包含了编造俄国历史。一位乌克兰教士发明了基辅王位“转移”到莫斯科的理念，这个理念逐渐构成了俄国的民族主义迷思和史料编纂方法。17世纪70年代，基辅学院的教授们是新政权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通过这些方式，莫斯科公国在吸收乌克兰东部领土后，完成了从莫斯科公国有限的地理和政治上的俄国观念向包含大俄（莫斯科公国）、小俄（乌克兰）和白俄（白俄罗斯）的帝国理念的转换。[29]这些从近代早期发展起来的政治概念在现代民族主义时代有了新的意涵。

俄国、波兰：乌克兰，1772—1918

俄罗斯帝国——1721年后我们如此称呼莫斯科公国——确实囊括了两个不同的乌克兰。正如我们所知，乌克兰左岸（第聂伯河东部）在1667年安得所沃条约签署后归于俄国控制。哥萨克酋长伊万·马泽帕（Ivan Mazepa，1639—1709）及其遭到流放的继任者皮利普·奥利克（Pylyp Orlyk，1672—1742）试图依据与外国强权结盟的传统策略，保留左岸哥萨克辖区的自治权。两人都来自旧波兰-立陶宛王国，接受王国的文明与教育，他们代表了自觉以波兰-立陶宛贵族为典范的军官群体。沙皇彼得一世在与瑞典的战争中没有保护好乌克兰，马泽帕和一些哥萨克军官认为这违反了佩列亚斯

拉夫协约的条款，他们开始考虑原来试图与王国建立的哈佳奇联盟。[30]但是和波兰-立陶宛结盟的时刻已经过去了。1709年，莫斯科公国在波尔塔瓦（Poltava）对阵马泽帕的瑞典赞助者并取得胜利，这标志着哥萨克自治的终结，也是哥萨克精英融入新俄国的开端。当俄罗斯帝国取得乌克兰右岸地区时，乌克兰左岸融合俄国的进程已经进行了三代人之久。

当波兰-立陶宛王国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遭遇瓜分时，俄国取得了乌克兰右岸（第聂伯河西部）的领土。在乌克兰右岸，沙皇新设立的沃伦省、波多里亚（Podolia）省和基辅省中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是波兰贵族，十分之一人口是犹太人，剩下大多数人是说乌克兰语的农民。1830年起义后，沙皇俄国当局剥夺了大部分波兰贵族的特权，让他们从贫穷的贵族转变为贫穷的农民（即便不符合社会规则但也是合法的）。从两个方面来看，这种转变进一步使乌克兰的“波兰人”退化为“地主”。那些逃离的贵族都是大地主，在乌克兰他们就象征着波兰本身。同时，那些被剥夺地位的小贵族已经被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所同化。[31]伴随旧土地所有权而来的习俗因此终结，这使得那些权贵把他们贫穷的同胞（波兰人！）从土地上赶走；俄国权力延伸至此，使他们能凭借俄国军队来镇压乌克兰农民起义。1839年，东仪天主教会很大程度上被俄国东正教同化吸收了，如此乌克兰分化为大部分信仰东正教的信徒和小部分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信徒。1875年之前，东仪天主教会在沃里尼亚的霍尔姆主教辖区得以幸存：在这里情况更复杂，但是信仰东仪天主教的地主更认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波兰贵族，而不是信仰东正教的农民或俄国人。

1863年起义对俄罗斯帝国内部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来说是重要的民族转折点，但几乎没有给乌克兰留下任何影响。当成千上万的波兰贵族和立陶宛贵族在波兰和立陶宛中心区域参加战斗时，乌克兰的波兰地主却与俄国统治者保持合作。[32]在立陶宛，贵族们为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制度和传统而战，这在乌克兰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业，因为乌克兰没有类似的历史遗产。当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农民参与大公国的复兴，乌克兰农民更可能向沙皇警察出卖贵族密谋者，甚至与沙皇的军队一同作战。俄国将军们试图将反抗描绘成波兰人希望借此奴役乌克兰农民。尽管如此，这时在现代波兰民族和乌克兰民族之间做出清晰划分仍为时尚早。在1863年起义中，乌克兰最成功的波兰将军是埃德蒙·鲁日茨基（Edmund Różycki），他在沃里尼亚的军队称他为“父亲”（Bat’ko），军队前进作战时总是唱着乌克兰歌曲。[33]那时语言还不是区分两个民族的分界线，起义的目标是政治性的而非种族性的，一些沃里尼亚贵族甚至愿意为了重建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理想而牺牲。

尽管如此，由于不可抗拒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贵族和农民参与1863年起义的界线是乌克兰北部边界，这条边界是1569年划定的。[34]在乌克兰右

岸，曾经在17世纪激起大规模叛乱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在18世纪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下被进一步巩固，并继续由当地的波兰人管理。[35]农民起义依然时有发生，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清楚地记录下了这些起义，尽管我们并不知晓起义的规模有多大。19世纪，俄国在继承自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原始农耕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统治，这造成了一小批波兰地主和大批乌克兰农民之间无法愈合的鸿沟。1861年，农奴可以拥有个人自由，但他们不能轻易获得能生存下去的足够土地。因此，说服他们相信1863年叛乱是为了再次奴役他们并不困难。到1900年为止，沃伦省、波多利亚省和基辅省的人口中只有3%的人上报他们的第一语言是波兰语。在那时，大约4000户波兰家庭拥有的土地相当于300万刚解放的农奴拥有的土地面积。[36]

在19世纪大多数时候，这些乌克兰右岸的领土——其中大部分贵族是波兰人——不属于俄国概念里的“乌克兰”。对俄国人来说，乌克兰是左岸领土，并且已经在1667年被帝国兼并。关于乌克兰爱国主义最早的表达来自左岸的俄国臣民——来自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哈尔科夫新建立的大学。之后，乌克兰人将哈尔科夫的复兴视为消亡的哥萨克辖区（1785年为止哥萨克军官全部由俄罗斯帝国选派）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后现代化的俄罗斯帝国间的桥梁。这是政治无能的“黑暗时期”中的一束光亮。这一现代爱国主义的方案需要一个重要的匹配条件。复兴哈尔科夫的新颖之处不在于对乌克兰文化的关注，而是把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土地联系起来。广而言之，乌克兰文化是俄罗斯帝国的壁垒，提供了许多合法性迷思、民歌和民间故事，以及受过教育的公务员。1721年俄罗斯帝国建立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乌克兰为俄国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建筑师、护教者和冒险家。直到19世纪20年代开始，乌克兰的帝国服务传统才开始出现裂痕，受乌克兰文化熏陶的人们面临两难困境。官方更加严格的民族性理念迫使乌克兰人在公共服务和个人意愿之间做出选择；同时在西部诞生的大众爱国主义新理念也为乌克兰人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粗略来看，乌克兰精英为沙皇服务了那么久以至于他们在帝国首都广受欢迎，在那里俄国的多样性是受到承认的；但是当狭隘的俄国理念被加诸乌克兰时，情况就有所改变了。[37]之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不仅标志着俄国对乌克兰态度的变化，也标志着乌克兰对俄国态度的变化。

在19世纪中叶，来自左岸的防御性爱国主义混合着右岸某些地主心存的浪漫主义悔恨，在基辅汇聚形成一种类似民族性格的民粹主义。许多基辅人——他们往往是波兰人的后代——试图让乌克兰农民参与到政治中来。基辅在文化上是属于波兰的，在俄国兼并基辅两个世纪后，这里对俄国人来说依然是个谜。[38]沙皇的官员在民粹主义有用（因为觉醒的乌克兰农民将认识到自己是俄国人）还是有害（因为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有时是波兰人出身）的问题上意见不一。[39]1863年起义后，乌克兰激进主义被当作波兰阴谋的一部分受到反对。1863年7月颁布的瓦廖夫法令（Valuev

Decree）因其支持乌克兰语“以前不存在，现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而出名，并认为乌克兰语的传播应怪罪波兰人。[40]俄国人很晚才意识到乌克兰有可能作为一个民族独立于波兰和俄国，这个想法出现后又被断然否认了。1876年的埃姆斯法令（Ems Decree）禁止出版和进口乌克兰语著作，这反映了一种将语言和民族性相关联的现代现象，以及乌克兰人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新想法。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俄国是一个单一民族，所有东斯拉夫人都是俄国人，这个想法在当时占排他性地位。[41]

同一时期，俄国臣民发展出的乌克兰理念在另一个帝国找到了知音。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和俄国都有塔拉斯·舍甫琴科（1814—1861）诗歌的读者。舍甫琴科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了解维尔那和华沙；他也是一位画家，他的艺术让圣彼得堡的仰慕者帮助他赎回了自由身；他是一位自由的诗人，确立了现代乌克兰文学语言的语法和魅力。[42]舍甫琴科死后一年，农奴制被废除了，他的成就为现代乌克兰政治铺平了道路，其中文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与农民紧密关联。1876年后，俄国臣民向奥地利传播各类现代乌克兰政治。乌克兰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米哈伊洛·达拉霍曼诺夫（Mykhailo Drahomanov，1841—1895）在1876年失去基辅的大学教席后，动身去往利沃夫。乌克兰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米哈伊洛·胡舍甫茨基（Mykhailo Hrushevs’kyi，1866—1934）在1894年被利沃夫大学雇用，离开基辅。乌克兰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维亚切斯拉夫·雷平茨基（Vyacheslav Lypyns’kyi，1882—1931）在1908年移民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这个名单上还有乌克兰最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米特罗·东佐夫（Dmytro Dontsov）：他将现代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理念在20世纪的加利西亚颇有市场，加利西亚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内逐渐形成。

奥地利、波兰：乌克兰，1772—1918

关于乌克兰的概念如何成为一种现代民族政治，这个过程又为何发生在奥地利？在一开始，波兰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的统治似乎远比在俄国乌克兰的统治稳固得多。1772年和1795年奥地利夺去了部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领土——“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Galicia and Lodomeria），这里是两百多万东斯拉夫农民的故乡。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是合适的统治阶级，加利西亚处在波兰地主的控制下。尽管波兰人是加利西亚省西部地区的多数人口——克拉科夫在1846年被吞并后成为西部最大的城市——乌克兰人是东部的多数人口，在那里利沃夫是最大的城市。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期，西部人口比例大约是88%的波兰人和7.5%的犹太人，还有少数德国人和东斯拉夫人。相反，加利西亚东部人口的比例大约是65%的乌克兰人，22%的波兰人和12%的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些数据稳定保

持在以上水平。[43]我们要重新来谈加利西亚犹太人的地位。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推断乌克兰政治的起源。

最初奥地利的土地改革几乎没有改善众多乌克兰农民的境况，但是宗教改革却有着巨大的潜在重要性。1774年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44]再次命名东仪天主教会为“希腊天主”教会，与罗马和亚美尼亚天主教会地位相当。1775年，她在维也纳的巴巴罗姆神学院（Barbareum Academy）为希腊天主教会设立了14个讲学场所。她的继任者约瑟夫二世于1783年在利沃夫为希腊天主教建立了一座大神学院（General Seminary），1784年利沃夫大学开始对外开放。在1787年到1809年之间，大学下设鲁森纳姆学院（Studium Ruthenum），该学院是为那些拉丁语学得不够好以至于不能学习特定课程的希腊天主教徒开设的。[45]

被解放的、信仰希腊天主教的农民和受过教育的希腊天主教教士之间没有立刻建立关系。18世纪上半叶，希腊天主教神父自视为波兰高雅文化的继承人，与刚刚灭亡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属于不同的宗教分支。他们能做到俄罗斯帝国的同胞做不到的事情：在1795年王国灭亡后，继续保存1596年王国统治下建立的教会。当1808年他们庆祝利沃夫郊区荣升为主教区时，他们是以波兰语庆祝的。诚然，大神学院的一些学生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出版加利西亚乌克兰方言著作，但教会和国家对此都不支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基安·沙什克维奇（Markiian Shashkevych），他是世代说波兰语的贵族的后代。其他教士用德语和波兰语出版乌克兰语语法著作。[46]1848年革命第一次让那些忠于近代早期波兰传统的教士们失望了，那些和他们说着一样语言的人（波兰贵族）和忠于他们教区的人（乌克兰农民）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利益分裂。一些曾是希腊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乌克兰领导人受到奥地利官员的鼓励，提出了关于加利西亚未来的提议。

1848年革命在信仰希腊天主教的农民的帮助下被镇压后，农奴制被废除了，在奥地利议会农民的利益得以被代表，尽管十分有限。1850年颁布的帝国特许状承诺乌克兰人将得到平等对待。然而，在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没能取代波兰人成为统治阶层，波兰人很快就适应了后革命时代的环境。1849年到1895年间，加利西亚的反动政策由一位波兰伯爵阿哥诺尔·格洛霍茨基（Agenor Gołuchowski）施行，他将当地的波兰贵族安插在奥地利行政系统的关键位置上。[47]由于革命造成波兰贵族与乌克兰农民彼此对立，事后奥地利的支持又很有限，1848年后占优势地位的希腊天主教吸引了俄国的注意。在1867年左右，俄国人的呼声到达顶峰，当时维也纳在有利于波兰贵族的条件下正式授予加利西亚自治权。当然，就像1848年前说波兰语的人的祖先不是纯粹的“波兰人”，1848年后信仰希腊天主教的亲俄者也没有更像纯粹的“俄国人”。加利西亚的亲俄者争辩说当代俄语是由17世纪和18世纪乌克兰的学者建立的，因此俄语可以成为所有东斯拉夫人的

文学语言。[48]他们把东部加利西亚视为东斯拉夫民族大家族中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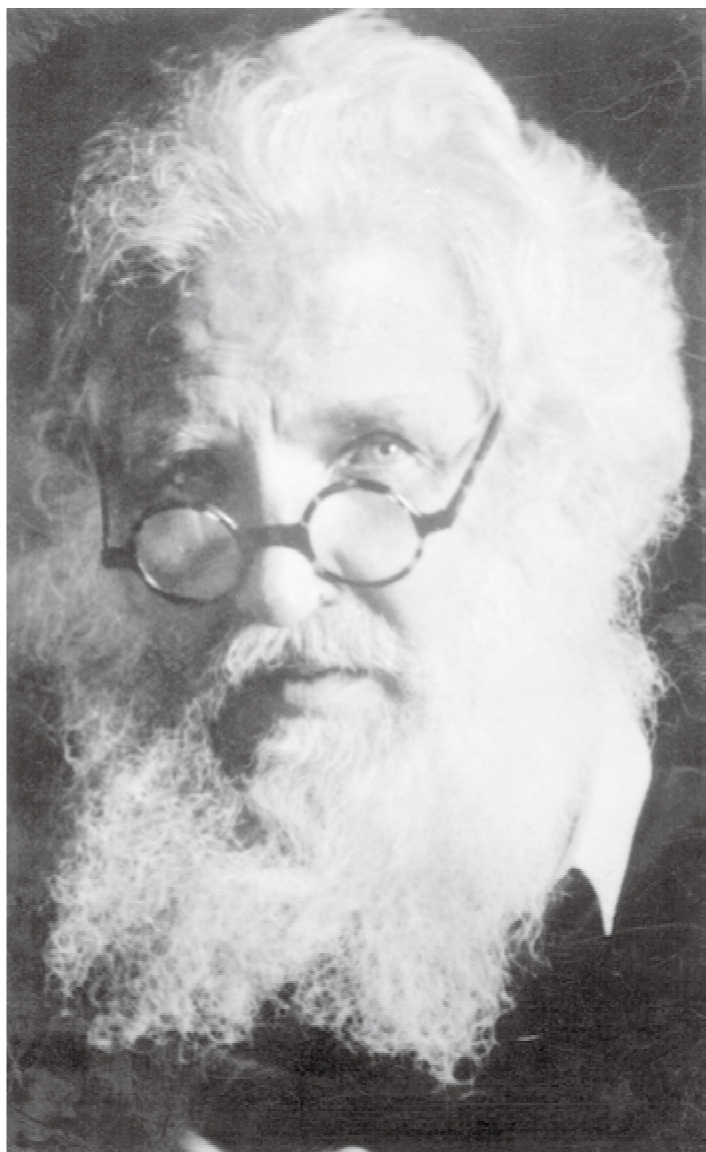


图15：安德烈·舍普季茨基，希腊天主教大主教。为将希腊天主教信仰和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政治联系起来，舍普季茨基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民族主义者”这个标签看起来不适合贴在这个拥有波兰兄弟并在“最终解决方案”时期庇护了大量犹太人的男人身上。

因为俄罗斯帝国在1875年将东仪天主教会（希腊天主教）完全驱逐出境，与俄罗斯帝国走得很近的加利西亚神父自然会与东正教保持紧密的联系。维也纳支持希腊天主教会是为了让其发挥与俄国边界上的天主教堡垒作用。1882年，一位重要的亲俄者说服一个信仰希腊天主教的村庄请求奥地利当局允许他们皈依东正教。“亲乌克兰者”，即那些提倡使用当地方言、提倡当地人要与俄国人区分开来的人，他们得到维也纳更多的支持。梵蒂冈也认为亲乌克兰比亲俄国的坏处更小，他们更偏爱亲乌克兰的神父，而非亲俄国的神父。19世纪80年代，世俗政治也受到类似的倾向影响。1879年选举后，乌克兰人在奥地利议会（Reichsrat）的代表席从17个下降到3个，许多希腊天主教精英意识到与农民阶层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其中一些人得出进一步的结论认为，当地方言——乌克兰语——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最佳手段。1889年，选举上的成功说明了乌克兰语在政治上的功用。[49]

在19世纪奥地利的庇护下，希腊天主教神父放弃使用波兰语这种加利西亚地区高雅文化的载体（时间大约是1795—1848年），转而加强与俄国的认同感以将自己与波兰人区分开（时间大约是1848—1890年），最终他们代表了被奥地利和俄国瓜分的现代“乌克兰”民族的诉求（时间是在1890年之后）。他们关注的中心从当地希腊天主教徒的宗教仪式转变为农民大众的社会处境及百万“乌克兰人”的民族公正。安德烈·舍普季茨基（Andrei Sheptyts’kyi）到1900年为止一直担任加利西亚的大主教，他关于希腊天主教作为民族教会的理念在当时很有说服力。在此之前，利奥·舍普季茨基（Leo Sheptyts’kyi）曾向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建议希腊天主教应被授予和罗马天主教同等的地位；而他著名的后代安德烈则声称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将授予300万教徒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波兰人同等的民族地位。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希腊天主教会开设了上百所学校，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语言是当地方言（乌克兰语）。在建校初始的基础上，这些学校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化。[50]作为大主教，舍普季茨基使教会本身变得民主化。

加利西亚：乌克兰（1900年前后）

这样来看，即使加利西亚亲乌克兰者比起他们将取代的亲俄国者更温和，但在本质上两者其实很相似。两者都沉湎于在语言上达成统一的梦想。亲俄国者使用的是一种混合着加利西亚方言、斯拉夫教会语言，夹杂着俄语书面语元素的奇怪语言；亲乌克兰者对更东面的方言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希望加利西亚地区的方言能成为乌克兰人的语言。亲乌克兰者和亲俄国者在领土上都雄心勃勃，两者都以未知却庞大的东斯拉夫群体作为提升信心和固化所有权声明的依据。这些相似之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许多人在从亲俄国者转变为亲乌克兰者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矛盾感。



图16：圣乔治大教堂，利沃夫。利沃夫设有天主教三个宗派的主教座堂：

希腊、罗马和亚美尼亚。这座大教堂是舍普季茨基在加利西亚的希腊天主教座堂。

对处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有雄心和理想的其他斯拉夫民族性事业来说，亲乌克兰的取向在选举上很有吸引力。19世纪出现在加利西亚的民族倾向转变，与比如说波西米亚的转变相比并非特例。[51]如同捷克人梦想着加入俄罗斯帝国，梦想着巴尔干民族的崛起以抗衡德国力量，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幻想着他们东面的邻居能帮助他们摆脱当地波兰人的统治。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以及南斯拉夫人）的理念一样，乌克兰人的理念也是一种温和的泛斯拉夫主义：这种泛斯拉夫主义和民族主义足够相似，足以赢得当地人的支持；和现实主义足够相似，足以培育对最终胜利的一些希望。

乌克兰人的理念和当时奥地利一些波兰人的企图有着家族性的相似点，这些波兰人希望加利西亚变成“波兰的皮埃蒙特”（Polish Piedmont），并最终将余下被瓜分的波兰民族统一起来。当然，意大利的撒丁-皮埃蒙特王国开启了意大利统一的进程（在1870年左右完成），早于德国的统一进程（于1871年完成）。而加利西亚地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区别在于，波兰被所有人视作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和德国人、意大利人一样有着传统的国家地位。[52]波兰人渴望重建波兰-立陶宛王国，但是曾经存在的王国已经渐渐被现代民族主义者的想象扭曲了；乌克兰人试图打破这种偏见，愈合破裂的痕迹，创造新的理念。

安德烈·舍普季茨基的波兰人出身可视作新颖的乌克兰理念的象征；他在波兰人生活中持续的存在提醒着我们，在19世纪晚期乌克兰理念的沉淀过程中波兰人扮演的重要角色。波兰人是乌克兰民族活动家的楷模、统治者和对手。波兰人的模范之处在于波兰民族似乎在奥地利境内拥有极大的自治权。而波兰人作为统治者的原因在于，这种自治权授予波兰贵族们实权：加利西亚90%以上的上层行政官位都由波兰人担任。波兰人作为对手的原因在于，波兰政治力量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关键，比如民族民主党人试图传播波兰文化，使之成为加利西亚地区的民族文化。乌克兰民族活动家要面对的不仅是波兰人组成的政府，还有一场决心创造一个波兰公民社会，并（最终）在加利西亚建立一个波兰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事实上，忠诚的波兰贵族和波兰民族主义者分属不同阵营，他们在包括乌克兰问题的许多问题上立场不同。

19世纪90年代早期，奥地利总体政策的执行者——加利西亚的波兰官员偏爱亲乌克兰者超过亲俄者。一个由波兰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决定根据乌克兰方言的正字法来规范乌克兰语，而不是亲俄者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波兰贵族控制的这个委员会任命利沃夫的新任东欧历史主席为米哈伊洛·胡舍甫茨基，后者是俄国臣民。奥地利忠诚的波兰人在利沃夫执行着奥

地利帝国的政策，而这些政策与基辅也建立了联系。在基辅，乌克兰人最主要的麻烦是俄国人的审查，而且许多亲乌克兰者都是波兰人。胡舍甫茨基是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Volodymyr Antonovych）的学生，后者是一位波兰裔乌克兰历史学家，胡舍甫茨基惊讶地发现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对乌克兰人的事业充满敌意。[53]加利西亚一次短暂的政治事态造成了他的失望，而这种失望情绪对整个乌克兰产生了长久的民族主义后果。1894年胡舍甫茨基从基辅来到利沃夫，他的到来为加利西亚的亲乌克兰倾向提供了智识上的支持。他用乌克兰语所做的讲座树立了这种语言作为学术和启蒙语言的可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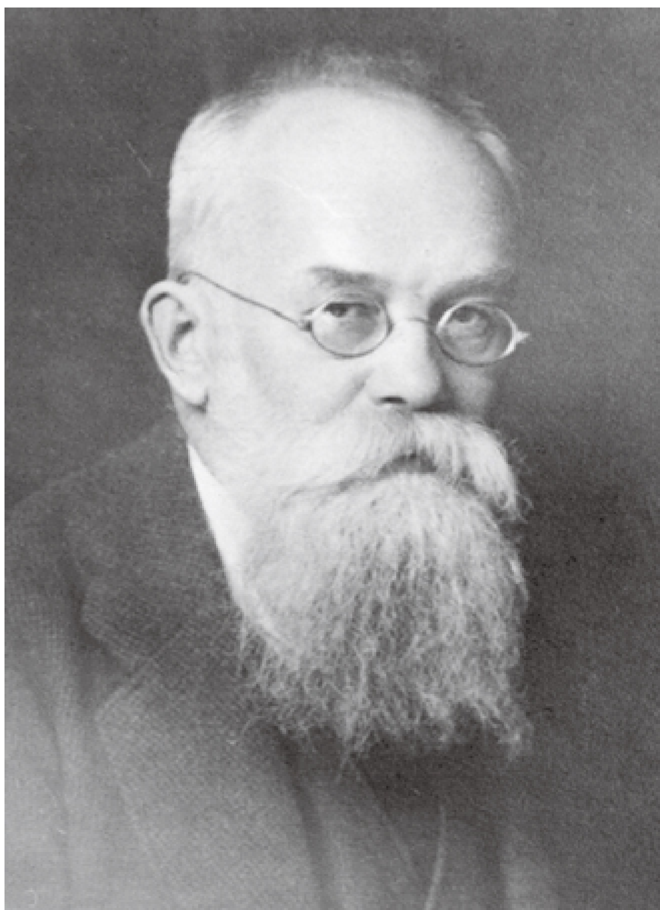


图17：米哈伊洛·胡舍甫茨基（1866—1934），历史学家。他对东欧历史的阐述虽然在乌克兰引起强烈反响，但至今还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1898年，他的著作《乌克兰-罗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的第一卷出版了，这是建构乌克兰历史叙述的最重要文本。这本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于详细阐述了乌克兰自基辅罗斯起的连贯历史。而这一成就要归功于该书使用了基辅平民主义的方法论：人民及其政体作为历史动因。通过这种形式，帝国政治的危机为利沃夫带来了一种可以抵抗任何帝国所有权声明的历史视角。胡舍甫茨基驳斥了俄国的史学编纂观，即莫斯科继承了古老的基辅传统，他为从政治上挑战俄国对整个乌克兰的所有权声明提供了基础。通过把普通民众视为历史的一部分，胡舍甫茨基削弱了传统的“历史的民族”和“非历史的民族”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波兰声称拥有加利西亚的基础。在19世纪，如果某个民族的精英们拥有一种国家传统，那么这个民族就会被视作“历史的民族”，一旦历史被重新定义，人民被纳入其中，那么加利西亚曾属于波兰领土的事实，或是乌克兰精英曾接受了波兰文明的事实就不再具有决定性。[54]胡舍甫茨基是加利西亚政治的新手，但是对当地亲波兰者的事业而言，他的著作中隐含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已经意识到，如果人民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构成，那么加利西亚东部就是乌克兰的土地。1897年发布的俄罗斯帝国人口普查使加利西亚人开始想象他们东面会出现一个面积更大的乌克兰。

虽然奥地利帝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让步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亲乌克兰的倾向，但是乌克兰民族活动家认为这些还不够。尤其是在1895年和1897年发生了声名狼藉的选举操纵丑闻后，他们渐渐从民族主义的方面来考虑，要求和对手同等的民族地位。我们已经知道，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渴望的是波兰官员已经拥有的（权力）和波兰民族主义者正在寻求的（一个大众民族）。换言之，乌克兰民族活动家的要求等同于他们看到波兰人在加利西亚取得的成功，他们的目标等同于波兰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乌克兰人对维也纳的直接要求是划分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在东部地区拥有自治权；在加利西亚和奥地利议会中拥有部分代表权；以及利沃夫大学的乌克兰化。而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乌克兰民族，并在“种族”边界内建立一个乌克兰国家。[55]这些乌克兰理念中更难实现的目标源自新一代的世俗活动家，不再只是希腊天主教神父，而是他们的子孙后代，有时候甚至还有1848年后在奥地利受教育的乌克兰农民的孩子。

如果说舍普季茨基代表了旧精英（希腊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波兰贵族）的转变，那么诗人伊万·弗兰科（Ivan Franko，1856—1916）就代表了乌克兰土生土长的新一代世俗知识分子。然而，他的家谱提醒我们种族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先是由精英建构出来，再被农民们所接受的，而精英们自己往往不能满足他们设想的民族的“种族”定义。弗兰科的父亲是村庄的铁匠，祖上是德国人；他的母亲是波兰小贵族出身。1864年，他被送到一所圣巴西勒信徒（Basilians）的德语学校，圣巴西勒信徒是希腊天主教的一个教团，他们所关心的是保留教会和西部拉丁语区域（Latin West）[56]的联

系。比起他的童年和“种族”出身，波兰文化、俄国政治和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的欧洲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更加重要。1876年，他遇见了历史学家米哈伊洛·达拉霍曼诺夫，后者是来自俄国乌克兰的流放犯，刚刚失去了他在基辅的教授职位。达拉霍曼诺夫说服如弗兰科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的亲俄国倾向应该升华为对乌克兰人民的兄弟情谊。19世纪80年代，由于被公开审讯和用波兰语写作，弗兰科成了利沃夫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90年代，他参与创立了一个农民激进政党，旨在推动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改革，以及该地区分化为东部（乌克兰的）地区和西部（波兰的）地区。1897年，他高调地宣布与波兰政治和乌克兰政治决裂（宣布前者时用德语写作，后者用波兰语写作）。弗兰科之前已是胡舍甫茨基的朋友，现在成了后者的宠儿（protégé）。1899年圣诞夜，这两人与其他新民族民主党的领导人一同发布了一份呼吁，呼吁乌克兰社会的各阶级为取得民族主权而努力。尽管弗兰科一直相信精英必须参与组织政治，他对引导精英这一理念的观点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57]

到1900年为止，弗兰科一直在宣扬乌克兰独立——在他和其他同代人所谓的“民族志的”边界内。和弗兰科一样，1900年加利西亚许多重要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早在10年前就是社会主义者了。这种现象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极其普遍，不仅仅是波兰。（波兰民族民主党创始人罗曼·德莫夫斯基，民族民主党年轻的组织者齐格蒙特·巴利茨基［Zygmunt Balicki］，以及社会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年轻时都是左翼青年。）看起来理念矛盾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即对未经尝试者的理想主义信念；而促使乌克兰活动家从社会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冲动正是和波兰人之间真实存在的竞争。受到达拉霍曼诺夫影响的乌克兰人相信乌克兰社会主义会在乌克兰人中涌现，波兰社会主义会在波兰人中涌现，以此类推。这种社会主义者对大众的信念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问题，即究竟谁是大众。如此，乌克兰和波兰“种族群体”的建构与乌克兰和波兰大众将引导革命的预言相比并没有奇怪多少，从后者中推导出前者是符合逻辑的。考虑到乌克兰人几乎全部由农民构成，因此将人民革命理念和“种族群体”的新科学理念合并在一起是很容易的。1897年俄罗斯帝国的人口普查调查了语言情况，绘制了一幅乌克兰人在加利西亚东部的辽阔地图。乌克兰“种族群体”这个概念天然地对抗着波兰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前者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复兴，后者对加利西亚所有权的诉求建立在文化而非人口基础上。[58]

在加利西亚，到1900年世俗知识分子的这些结论成为普遍共识，此时舍普季茨基开始把希腊天主教会转变为乌克兰民族复兴的民主媒介。这些可以追溯到近代早期的社会、宗教和语言上的区别，如今被活动家和教士以现代民族主义的形式重新表述出来。农民不属于近代早期王国的民族；现代乌克兰农民组成的民族，其定义将波兰人标记为剥削者和外来者。希腊天

主教会是近代早期王国的幸存者；它成了现代乌克兰民族的主要建构媒介。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逐渐成了波兰民族性及其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象征。乌克兰文学语言中的很多词汇源于乌克兰在近代早期与波兰的接触，但是编纂后的方言被所有人视为乌克兰民族语言。结果波兰语不再是文化交流的语言，它被降级为众多民族语言中的一种。

为了了解现代解释在加利西亚地区取得的胜利与立陶宛持续的历史之争之间有何区别，我们暂时回到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著作上。1900年，密茨凯维奇的诗歌被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广为引用，正如他在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之争中的影响一般。比如说，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舍普季茨基是否值得信赖心存怀疑，他们称他是“瓦伦罗德”（Wallenrod）。“瓦伦罗德”是密茨凯维奇诗歌中的英雄，起先他声称自己属于一个民族，之后他以另一个民族的名义背叛了同胞。一些乌克兰人害怕身为当地希腊天主教领袖的舍普季茨基最终会成为波兰人。在立陶宛，“瓦伦罗德”是密谋者的积极形象。在乌克兰，“瓦伦罗德”是叛徒。此外，用密茨凯维奇的“瓦伦罗德”概念来形容1900年乌克兰-波兰关系最为贴切，而他的“祖国”概念是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竞争中的关键，这两个概念是十分不同的。“祖国”暗示了复杂的忠诚问题；“瓦伦罗德”（从这个角度解释）则暗示了一种民族的本质。[59]

弗兰科对密茨凯维奇的个人态度在这一点上更加明显。弗兰科离弃了波兰文化，他拒绝与波兰人合作，而这些也集中体现于他谴责密茨凯维奇为“叛国诗人”。弗兰科没有把密茨凯维奇当作有模范作用的普遍准则的一部分，他将诗人解释为波兰民族主义的资源。这实际上是通过抛弃偶像——被波兰民族民主党所民族主义化的密茨凯维奇——而接受完整的波兰民族主义的条件，即民族是从底层开始构建的。这也意味着拒绝接受当时仍在原立陶宛土地上进行的历史对话。在立陶宛，密茨凯维奇象征着古老制度的生命力，如同《康拉德·瓦伦罗德》或其他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正如我们所知，当时正在兴起的立陶宛迷思将1569年视为立陶宛文化的终结。然而，立陶宛国家地位一直保持到1795年为止，而立陶宛重要的制度延续到了19世纪。1569年卢布林联合没有创建一种能够确保乌克兰属于王国的政治体制。总体来说，1900年的立陶宛活动家承认，必须要证明他们是历史上曾存在的民族，而且要证明民族的现代构成中的农民群体自古就属于这个政体。通过知识分子的诠释，他们把密茨凯维奇“立陶宛！我的祖国！”这句话转变为文采斯·库迪尔卡的民谣《立陶宛！我们的祖国！》。而乌克兰活动家走得更远，他们把人民本身作为历史的目标。这解决了历史冲突，也展开了更宏伟的前景。如果乌克兰就等同于它的人民，那么乌克兰人存在于哪里，乌克兰国家的版图就应该拓展到哪里。[60]

---

[1] 其他部分属于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摩尔多瓦，以及克里米亚汗国和匈牙利。

[2] 关于中世纪的不同起源，见Dimitri Obolensky,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0, 322-343; Francis Thomson, “The Corpus of Slavonic Translations Available in Muscovy,” in Boris Gasparov and Olga Raevsky-Hughes, eds., Christianity and the Eastern Slav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79-214; Nataliia Iakovenko, Narys istorii Ukrainy z naidavnishykh chasiv do kintsia XVIII stolittia, Kyiv: Heneza, 1997。

[3] 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The Coming of the Book, London: Verso, 1976 ［1958］,201-203, 248-332; Iaroslav Isaievych, Preemniki pervopechatnika, Moscow: Kniga, 1981. 关于1569年前在波兰的争论变得如何尖锐，见David Frick, Polish Sacred Philology in the Reforma tion and Counter-Re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在一个新教徒的案例中，教会斯拉夫语曾用于《圣经》的翻译：David Frick, “Szymon Budny and the Church Slavonic Bible,” in Michael Flier and Simon Karlinsky, eds., Language, Literature, Linguistics,Berkeley, Calif.: Slavic Specialties, 1987, 62-66。

[4] 帕姆翁·别伦达是一位出版商，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花了30年时间编纂这部词典。这部词典是东斯拉夫语词典中最重要的之一，收录了约7000个词条。

[5] André Martel,La langue polonaise dans les pays ruthènes, Lille: Travaux et Mémoires de l’Université de Lille, 1938, 58—66, 142, 全书值得参阅；以及Ihor Ševcenko, Byzantium and the Slavs, Cambridge, Mas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91, 170 and 670。事实上，东仪天主教会接受波兰教士比接受东正教教士更慢。根据档案，大约在1650年，波兰语成为东仪天主教会文件中的主要语言，这种主导性一直保持到1800年。更多细节已在本书图表1中展示。

[6] 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是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总主教，是东正教名义上地位最高的神职人员，也是东正教的精神领袖和主要发言人，但并无凌驾于其他牧首或自主教会之上的权威。

[7] Borys Gudziak,Crisis and Refor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9-238及全书各处；Oskar Halecki, From Florence to Brest, New York: Archon Books, 223-286, 423-433; M.O. Koialovich, Litovskaia tserkovnaia uniia, vol. 1, St. Petersburg, 1859, 166-168。

[8] 关于争论，见David Frick,Meletij Smotryc’kyj,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1-192; Francis Thompson, “Meletius Smotritsky and the Union with Rome,” in Bert Groen and Wil van den Bercken, eds., Four Hundred Years, Leuven: Peeters, 1998, 55-126;Teresa Hynczewska-Hennel,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Ukrainian Nobles and Cossacks,” in Ivo Banac and Frank Sysyn, eds., Concepts of Nationhood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Mas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86, 383-392; Michał Lesiów, “The Polish and Ukrainian Languages,” in Zvi Gitelman et al., eds., Cultures and Nation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Cambridge, Mas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2000. 397-398.关于新教徒，见George Williams, Protestants in the Ukrainian Lands of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Cambridge,Mass.: Ukrainian Studies Fund, 1988, 190, 205。

[9] 尼然科维奇是今天的乌克兰城镇，位于该国西部的利沃夫州。

[10] Sofiia Senyk, “Beresteis’ka uniia i svits’ke dukhovenstvo,” in Borys Gudziak, ed.,Berest eis’ka uniia ta vnutrishniie zhyttia Tserkvy v XVII stolitti, L’viv: L’vivs’ka bohoslovs’ka akademia, 1997, 55-66.

[11] Jerzy Boręcki, “Unia lubelska jak czynnik kształtowania się ukraińskiej świadomości narodowej,” in Jerzy Kłoczowski et al., eds., Unia lubelska i tradycje integracyjne w Europie środkowo wschodniej, Lublin: IESW, 1999, 60-78; Natalia Jakowenko, “Rus’ iak tretii chlen Rechi Pospolytoi ‘Dvokh Narodiv’ v ukrains’kii dumtsi pershoi polovyny XVII st.,”同上书，84-88; Henyk Samsonowicz, “Mieszczaństwo Rzeczypospolitej wobec Unii Brzeskiej,” in Jan Sergiusz Gajek and Stanislaw Nabywaniec, eds., Unia brzeska z perspektywy czterech stuleci, Lublin: KUL, 1998, 7380; David Saunders, “Ukrainians since 1600,” Ethnic Studies, 10 (1993), 113。

[12] 原文为“Union”，疑为作者笔误。

[13] 为了让这一点成真，东仪天主教会必须从一套亲波兰的机制转变为亲乌克兰的机制，我们应该再次回顾这个19世纪的故事。关于宗教改革以及波兰农民，见Waclaw Urban,Chłopi wobec Reformacji w Małopolsce, Cracow: PWN, 1959。

[14] 在以下这本书中，1570年是模态化的一年（modal year）：Jan Rotkowski,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Pologne avant les partages, Paris: Champion, 1927。关于对“第二次农奴制”的政治解读的批判，见Andrzej Kamiński, “Neo-serfdom in Poland-Lithuania,” Slavic Review,34, 2 (1975),

253-268。

[15] N.M. Iakovenko,Ukrains’ka shliakhta, Kyiv: Naukova Dumka, 1993, 265; 又见Kamiński,“Szlachta of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31; Frank Sysyn, Between Poland and the Ukrain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32。

[16] 汉诺威《绝望的深渊》，转引自Henry Abramson,A Prayer for the Gover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2。关于当时的巨头，请参阅Henryk Litwin, Napływ szlachty polskiej na Ukrainę 1569-1648, Warsaw: Semper, 2000; Iakovenko, Ukrains’ka shliakhta,206-207, 219; Rosman, The Lords’ Jews, 1990, 40, 85及全书各处。

[17] Ewa Wolnicz-Pawłowska, “Antroponimia polska na kresach południowo-wschodnich,”in Janusz Rieger, ed., Język polski dawnych Kresów Wschodnich, Warsaw: Semper, 1999, 211212; Martel, Langue polonaise, 200. 关于女性的教育，见Andrzej Karpiński, Kobieta w mieście polskim, Warsaw: IH PAN, 1995, 285-313; 以及Maria Bogucka, Białogłowa w dawnej Polsce,Warsaw: Trio, 1998, 167-201。

[18] 关于1569年的不协调，见Vitalii Shcherbak,Ukrains’ke kozatstvo: Formuvannia sotsi al’noho stanu, Kyiv: KM Akademia, 2000, 42及全书各处。关于战争，见Wieslaw Majewski, “The Polish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J.K. Federowicz, ed., A Republic of Nob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88。

[19] Zenon Kohut,Russian Centralism and Ukrainian Aut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4-64; Agnieszka Biedrzycka, “Zloty pokój,” Prace Historyczne, 127 (2000), 27-38.

[20] Ivan Butych, ed.,Universaly Bohdana Khmel’nytskoho, Kyiv: Al’ternatyvy, 1998, 45, 46,50, 53; Volodymyr Serhiichuk, “Kozatstvo i Uniia,” in Ryszard Luzny, Franciszek Ziejka, and Andrzej Kępinski, eds., Unia brzeska, Cracow: Universitas, 457; Borys Floria, “Natsional’no-konfesiina svidomist’ naselennia skhidnoi Ukrainy,” in Gudziak, Beresteis’ka uniia, 132; Antoni Mironiwicz, “Projekty unijne wobec Cerkwi prawosławnej w dobie ugody hadziackiej,” in Gajek and Nabywaniec, eds., Unia brzeska, 95-139.

[21] Mykhailo Hrushevs’kyi,Istoriia Ukrainy-Rusy vol. 10, New York: Knyhospilka, 1958,346-359; Tetiana Iakovleva, Hetmanshchyna v druhii

polovyni 50-kh rokiv XVII stolittia, Kyiv:Osnovy, 1998, 305-350; Andrzej Kamiński, "The Cossack Experiment in Szlachta Democracy,"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 2 (1977), 178-187.

[22] 关于包容逐渐缺失的重要思潮，见Zenon Guldon and Jacek Wijaczka, "The Accusation of Ritual Murder in Poland, 1500–1800," Polin, 10 (1997), 119-131。

[23] J. H. Elliot,Europe Divided 1559-1598, Oxford: Blackwell 2000［1968］, 154–163及全书各处。

[24] 关于财政，见Larysa Hvozdyk-Pritsak Ekonomichna i politychna viziia Bohdana Khmel'nyts'koho ta ii realizatsiia v derzhavi Viis'ko Zaporoz'ke, Kyiv: Oberehy, 1999, 101-102及全书各处；关于语言，见Omeljan Pritsak and John Reshetar, "Ukraine and the Dialectics of Nation-Building," Slavic Review, 22, 2 (1963), 18-19。关于哥萨克历史和乌克兰人的认同，见Frank Sysyn, "The Reemergence of the Ukrainian National and Cossack Mythology," Social Research, 58, 4 (1991), 845-864; Orest Subtelny, Ukrain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8, 94-95。

[25] Oskar Halecki, Przyłączenie Podlasia, Wołynia, i Kijowszczyzny do Korony w Roku 1569, Cracow: Gebethner and Wolff, 1915, 244. 传记见Jan Widacki, Kniaź Jarema, Cracow: Wydawnictwo Literackie, 1997, 11-20。关于王朝的轶事来自Iakovenko, Ukrains'ka shliakhta, 75；关于财产的轶事来自Sysyn, Between Poland and the Ukraine, 76。

[26] John Basarab,Pereiaslav 1654, Edmonton: CIUS, 1982.

[27] 关于教士团体，见O.I. Travkina,Chernihivs'kyi Kolehium 1700-1786, Chernihiv: DKP PVV, 2000, 8-41; Valeriia Nichyk, Kyievo-Mohylians'ka Akademia i nimets'ka kultura, Kyiv:Ukrainskyi Tsentr Dukhovnoi Kul'tury, 2001, 53-94。关于科哈诺夫斯基，见Paulina Lewin,"Jan Kochanowski: The Model Poet in Eastern Slavic Lecture of Poetic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Samuel Fiszman, ed., The Polish Renaissance in Its European Contex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429-443。关于翻译，见Thomson, "Slavonic Translations,"191。

[28] Bushkovitch,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arly Modern Russia," in Banac and Sysyn, Concepts of Nationhood, 355-377; Riccardo Picchio, "Guidelines fo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nguage Question

among the Slavs," in Riccardo Picchio and Harvey Goldblatt, eds., Aspects of the Slavic Language Question, 2 vols., Columbus, Ohio: Slavica, 1984, Vol. 1, 12-29; I.K.Grot, Filologicheskiie razyskaniia, St. Petersburg, 1899, 464-467.

[29] Paul Bushkovitch,Religion and Society in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K.V. Kharlampovych, Malorossiiskoe vliianie na velikorusskuiu tserkovnuiu zhizn', Kazan: Golubeva, 1914.关于一位乌克兰教士对俄国历史学的影响，这个特殊例子见Edward Keenan, The Kurbskii-Groznyi Apocryph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1-44。

[30] Orest Subtelny,The Mazepists,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1, 28. 又见Zenon Kohut,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in Banac and Sysyn, Concepts of Nationhood, 566567。

[31] Daniel Beauvois,Polacy na Ukrainie, 1831–1863, Paris: Instytut Literacki, 1987, 29-141.

[32] Daniel Beauvois,La bataille de la terre en Ukraine,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93, 22—27.

[33] Fr. Rawita-Gawro ński, Rok 1863 na Rusi, Vol. 2, L'viv: H. Altenberg, 1903, 266.

[34] 相关地图见Norman Davies,God's Playground,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355。

[35] A.I. Baranovych,Magnatskoe khoziaistvo na iuge Volyni v XVIII v.,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55, 105-166.

[36] Beauvois,La bataille de la terre, 68-71, 94. 关于舍甫琴科的历史观，见George Grabowicz, The Poet as Mythmak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82; 另外一本非常有洞见的著作是Oksana Zabuzhko, Shevchenkiv mif Ukrainy, Kyiv:Abrys, 1997, 97-142。

[37] David Saunders, The Ukrainian Impact on Russian Culture, 1750-1850, Edmonton: CIUS, 1985.

[38] Michael Hamm,Kiev,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5-81.

[39] Witold Rodkiewicz,Russian Nationality Policy, Lublin: Scientific Society of Lublin, 192-204.

[40] 这段文本复制自Paul Robert Magocsi,A History of Ukrain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369-370。

[41] 相关例子参见P.N. Batiushkov,Volyn’, Saint Petersburg: Obshchestvennaia pol’za, 1888。

[42] Pavlo Zaitsev,Taras Shevchenko, trans. George Luckyj,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43] Max Rosenfeld,Die polnische Judenfrage, Vienna: Löwit, 1918, 68; Józef Bushko,“The Consequences of Galician Autonomy after 1867,” Polin, 12 (1999), 86; Stanislaw Grodziski,“The Jewish question in Galicia,” Polin, 12 (1999), 62.

[44] 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哈布斯堡君主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统治者，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君主，统治范围覆盖奥地利、匈牙利王国、克罗地亚、米兰、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等地。

[45] Mykhailo Vozniak,Iak probudylosia ukrains’ke narodne zhyttia v Halychyni za Avstrii, L’viv: Dilo, 1924, 6-14.

[46] Stepan Shakh,O. Markiian Shashkevych ta halyts’ke vidrodzhennia, Paris: Ukrainian Christian Movement, 1961, 36; Stefan Zabrowarny, “Dzieło biskupa Jana Śnigurskiego,” in Stanisław Stępień, ed., Polska-Ukraina: 1000 lat sąsiedztwa, Przemyśl: Południowo-Wschodni Instytut Naukowy, 1996, 169-171.

[47] Vozniak,Iak probudylosia, 175–176; Antony Polonsky, “The Revolutionary Crisis of 1846–1849 and It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ineteenth-Century Galicia,” in Gitelman et al., Cultures and Nations, 443-469; Jaroslaw Hrycak, Historia Ukrainy, 1772-1999, Lublin, IEWS, 2000, 90ff.

[48] Paul Robert Magocsi,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Galicia,” in Picchioand Goldblatt, eds., Aspects of the Slavic Language Question,Vol. 2, 56-57.又见Hugo Lane,“State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 Multiethnic Contex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9, 231-234。

[49] John-Paul Himka,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ity in Galician Rus’,” in Ronald Suny and Michael Kennedy, eds., Intellectuals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N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especially 128-129, 143-145; John-Paul Himka, Religion and Nationality in Western Ukrain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0-134; Lane, “State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294-296.

[50] Mieczyslaw Adamczyk, “Szkolnictwo ludowe w greckokatolickiej diecezji przemyskiej,” in Stępień, ed., Polska-Ukraina, 162-163.

[51] Jiří Kořalka, Češi v habsburské říši a v Evropě 1815–1914, Prague: Argo, 1996, 16-82. 乌克兰人关心利沃夫的波兰文化，而捷克人希望抑制布拉格的德语。通过可靠的奥地利邮政，1900年一个捷克人写信给一个乌克兰人说：“你们在利沃夫和我们在布拉格遇到了相同的问题”。František Pastrnek to Kyryl Studnyts’kyi, 5 July 1900, in U pivstolitnykh zmahanniakh,Kyiv: Naukova dumka, 1993, 54. 又见Vozniak, Iak probudylosia, 48-54; Sto padesát let česko ukrajinských literárních styku ,̊Praha: Svět Sovětů, 1968, 5-52。

[52] Józef Chlebowczyk,On Small and Young Nations in Europe, Wroclaw: PAN, 1980, 126. 参阅Roman Rozdolski,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rans. John-Paul Himka, Glasgow:Critique Books, 1986; 比较Erica Benner, Really Existing Nationalis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3] Thomas Prymak,Mykhailo Hrushevsk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41.

[54] 加拿大的乌克兰研究学院即将出版英文版的《乌克兰-罗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

[55] Czesław Partacz, “Przyczyny i przebieg konfliktu ukraińsko-polskiego w Galicji,” Przegląd Wschodni, 2, 4 (1992-1993), 843; Ivan Rudnytsky, “The Ukrainians in Galicia under Austrian Rule,” in Andrei Markovits and Frank Sysyn, eds., Nationbuil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s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82, 60-65; Victor Hugo Lane, “Class Interest and the Shaping of a ‘Non-Historical’ Nation,” in Gitelman et al., Cultures and Nations, 383; Ivan Rudnytsky, Essays in Modern Ukrainia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56] “Latin West”和“Greek East”是用来区分希腊-罗马世界的两个术语，所谓希腊-罗马世界是指在文化上直接地、长期地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影响的地区和国家。希腊-罗马世界的东部区域的通用语是希腊语，西部区域的通用语是拉丁语。

[57] Iaroslav Hrytsak,Dukh, shcho tilo rve do boiu, L’viv: Kameniar, 1990; Prymak, Mykhailo Hrushevsky, 56-57; Solomiia Pavlychko, Dyskurs modernizmu v ukrains’kii literaturi, Kyiv:Lybid’: 1997, 9-38.

[58] Valentyna Petrova, “Utvorennia natsional’no-demokratychnoi partii v Halychyni,”Naukovi Zapysky, 5, 2 (1996), 15; Kerstin Jobst, Zwischen Nationalismus und Internationalismus, Hamburg: Dölling und Galitz Verlag, 1996, 32-51; Roman Szporluk, “Polish-Ukrainian Relations in 1918,”in Paul Latawski, 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and, 1914-1923, London: Macmillan, 1992, 46.

[59] 这首诗本身——先不谈它在圣彼得堡的出版——揭示了一种比人们通常认为密茨凯维奇所具备的对战略的理解还要微妙的理解。

[60] 比较Yaroslav Hrytsak, “A Ukrainian Answer to the Galician Triangle,”Polin, 12 (1999), 142-145, 和Oksana Zabuzhko, Filosofiia ukrainskoi idei ta ievropei’kyi kontekst, Kyiv: Osnovy,1993, 22-53。

第7章
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边缘（1914—193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似乎乌克兰人在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的事业比立陶宛人在俄罗斯帝国的事业更有可能取得成功。那时说立陶宛语的人口不到200万，而乌克兰“种族群体”的人口多达几百万。和俄罗斯帝国西北部的立陶宛人不同，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可以在议会选举中投票，可以成立合法的政治社团，可以合法出版乌克兰语出版物。哈布斯堡统治区域内的民主政治使现代民族认同变得更具体，而成人男子选举权成了乌克兰农民民族的拥护者手中的有力工具。民主实践确认了“种族”是比“传统”更有力的论据这一理念，而这侵蚀了加利西亚的波兰贵族的传统地位。当教士们将希腊天主教会转变为民族制度时，世俗精英开始提出乌克兰民族要独立。“一战”期间，奥地利与俄国兵戎相见，维也纳迫害了那些被认为是亲俄国的加利西亚人，这间接推动了乌克兰人的民族事业。身处维也纳的加利西亚乌克兰政治家支持从俄罗斯帝国划出土地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这个独立国家与刚刚获得自治的加利西亚东部地区将保持密切关系。这离公开支持所有乌克兰人生活的土地应获得独立，仅仅一步之遥。在俄国发生“二月革命”，乌克兰民族共和党在1917年早些时候于基辅发表宣言后，似乎乌克兰独立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在1917年4月加入战争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非常重视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的言论。无论哪方赢得战争，乐观主义是有据可循的，或者说看起来似乎如此。[1]

农民民族的阿喀琉斯之踵以及种族政治的弱点在于城市。任何形式的独立乌克兰国家都需要一座城市，乌克兰西部的首都本可以是利沃夫。然而，波兰人统治着利沃夫。最准确的数据是当时在利沃夫自称波兰人的人口比例超过52%，1900年奥地利的人口普查显示自称罗马天主教徒的人口比例为51.9%，此时信仰希腊天主教的波兰人很可能比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乌克兰人要多。75.4%的利沃夫居民称他们的母语是波兰语，但这个数据有过高之嫌，因为在这次普查中，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不在选项之列。在“一战”之前，利沃夫的加利西亚议会是唯一个在原波兰-立陶宛王国土地上说波兰语的议会。这座城市本身也象征着波兰文化最近取得的胜利：在前两代人的时间里，学校、大学和公共生活中的语言已经从德语变为波兰语。“一战”结束后，奥地利帝国瓦解了，波兰人深知他们在加利西亚东部地区的人数少于乌克兰人；在加利西亚东部的44个行政区内，波兰人只在一个行政区是多数人口，即利沃夫。[2]波兰人对加利西亚东部地区所有权的声明是基于他们在利沃夫的控制权，以及他们相信自己带来的文明的基

础上。[3]利沃夫既是古代波兰的遗迹，又是近代波兰政治凯旋的证明。

1918年，华沙的人们相信利沃夫是波兰城市的信念远胜于，比如说，相信维日诺是波兰城市的信念。维日诺已是所谓“立陶宛”的首都，而它与“波兰”的历史关系值得大为讨论一番。另一方面，“乌克兰”不是当初王国中的一个政治实体，而且利沃夫在历史上就被视作波兰城市。尽管这座城市在1264年是由东正教君主建立的，但是它在1349—1772年确实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在罗斯的领地范围内）。当然，1772年之后在奥地利的统治下已是沧海桑田：城市的规模增加了约6倍（从大约2万人增加到14万人），波兰精英在新的政治统治下重新确立了领导权。波兰人认为，如果在奥地利的统治下这座城市在文化上属于波兰，那么在波兰的统治下内陆地区也会在文化上认同波兰。他们相信，波兰语和罗马天主教能为加利西亚东部带去文明。虽然诸如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在内的民族民主党人设想过与俄国在东部领土上达成妥协，但是诸如约瑟夫·毕苏斯基在内的联邦主义领导人希望与乌克兰结盟一同对抗俄国，而没有任何波兰政治家能想象利沃夫不属于波兰是怎样一种情景。1919年4月，波兰选举议会一致通过：兼并整个加利西亚地区。

犹太人而非乌克兰人，是利沃夫最显著的少数族群。中世纪的加利西亚君主和波兰国王邀请犹太人进城。他们在16世纪的加利西亚城镇中繁荣发展，成为重要的城市力量。到18世纪为止，加利西亚的犹太人遵照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的特权一直保持着他们的公有生活；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他们屈服于帝国的同化政策和德语化政策。犹太人是利沃夫中产阶级和学术精英的中坚力量，也是小手工业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加利西亚1867年获得有利于波兰人的自治权后，犹太人开始在奥地利的学校里学习波兰语。1873年金融危机后，奥地利自由主义衰退，这妨碍了世俗犹太人的政治选择。1879年议会选举后，文化融合与政治合作同步进行，加利西亚的犹太代表加入议会中的波兰社团，并成为它的候选人。然而，世纪之交开始情况变得非常不同了。现代波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出现迫使世俗犹太人转向更为排外的政治理念。成年男性普选制度引入后，犹太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07年与乌克兰人结为选举同盟，这说明他们已经紧紧抓牢了民族政治的新规则。[4]在这整个时期，我们必须在奥地利多民族政体的框架内来理解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合作（之后是与乌克兰人的合作）。如果奥地利不再存在，一切会怎么样？对所有犹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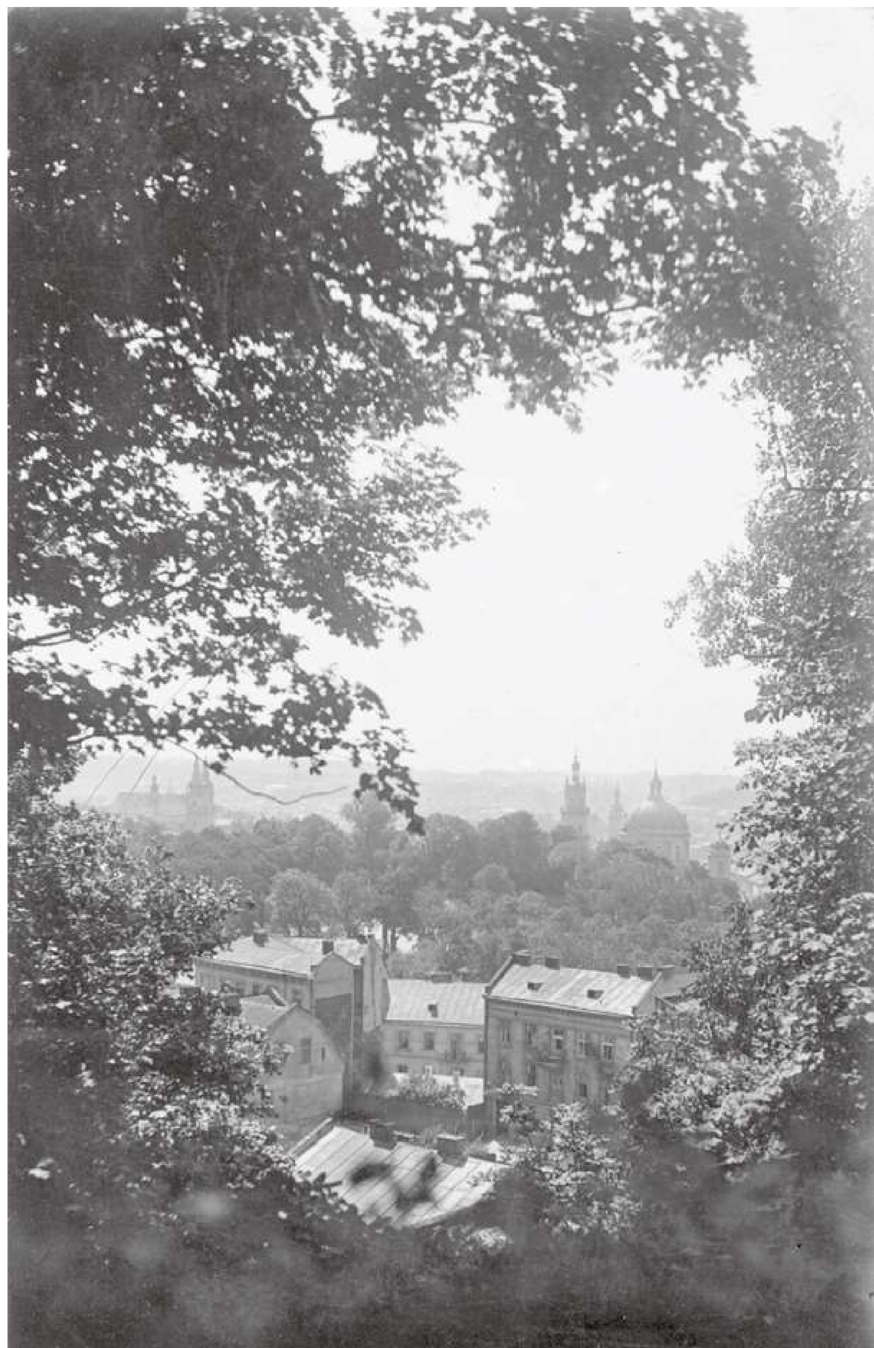


图18：利沃夫一景，这是今天属于乌克兰的利沃夫。今天利沃夫的景色与

当时基本无异。

大多数犹太人很难想象文学语言和母语方言之间的现代民族主义二重唱。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希伯来语一直是神圣的语言，而意第绪语是日常交流的语言，波兰语或德语只是商业语言。1867年宪法颁布后，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开始享有同等权利，他们自认为是最优秀的奥地利人，无论他们是否掌握波兰语或德语。况且，年轻时学习的语言不需要与成年后的工作语言保持一致。19世纪20年代，支持融入德国文化的犹太人用意第绪语表达他们的观点；70年代，提倡融入波兰人生活的犹太人用德语发表议论；9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用波兰语写作和讲演。在20世纪早期，第二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咬紧牙关把意第绪语当作政治语言，他们自己能说流利的波兰语、德语和意第绪语。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象的未来是所有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语。

甚至对犹太民族主义者来说，现代民族主义的语言-领土-国家三要素在欧洲是无法想象的。1900年，犹太人在加利西亚东部的占人口比例约为13%，犹太人在许多城镇都属于主要人口。但是，犹太人在这里以及东欧其他地方从来没有成为某一地区的多数族群，也无法考虑另建他国。甚至当奥地利的民主化进程鼓励犹太复国主义者专注于大流散（Diaspora）的政治工作，而非考虑迁移到巴勒斯坦时，领土问题仍比语言问题更难解决。就算对犹太民族主义者而言，“一战”呈现的也是风险多于机会。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白领土上的民族自决原则不适用于他们的需求：就算奥地利覆灭了，在欧洲也无法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一战”期间利沃夫大多数犹太人的目标非常保守：在和平到来前保持他们已经拥有的。

战败与乌克兰民族主义（1918—1920）

考虑到波兰人的声明和犹太人的存在，我们可以发现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活动家在1918年提出的目标的激进本质：在加利西亚地区建立一个以利沃夫为首都的乌克兰民族共和国。某种程度上，这与立陶宛活动家要建立一个定都维尔纽斯的独立立陶宛国有相似之处。但是在“一战”后的1918—1920年，弱小的立陶宛事实上受到停滞在东部的德军保护，其后波兰拯救其脱离苏联，并作为战败德国、战败苏联和武力夺走维日诺的波兰的邻居而幸存下来。相对来说，在这些斗争中几乎没有立陶宛人因此牺牲，而在1918—1920年，超过100万生活在波兰的人民丧生于国家间战争、内部分歧、党派争斗、盗贼入侵和大屠杀。

乌克兰人的期望很大，但是收获很少。地缘政治的运气比民族牺牲更重要，前者的组织动员能力超过了绝对数量。甚至当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灭亡后，乌克兰人每一平方米的领土都被波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或布尔

什维克视作他们天然应该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胜利的东欧强权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处置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是没有人在任何时候认真考虑过乌克兰的所有权声明。在1918—1920年的重要关头，他们关心的是击败或至少遏制布尔什维克俄国。协约国对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将军的白俄军队的支持排除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因为邓尼金是一位俄国民族主义者，他认为乌克兰是俄国的一部分。在邓尼金败退之后，西欧各国支持波兰作为制衡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力量，这意味着他们接受波兰对加利西亚东部地区和利沃夫的所有权声明。[5]战后两个乌克兰国家建立起来，一个国家的首都是利沃夫，另一个的首都是基辅，两国要单独面对波兰和俄国的责难。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精英在组织工作上需要投入极大的努力，但这正是他们缺乏的。定都基辅的国家因领导层意识形态的争端而分裂，因诸如军队等重要制度孱弱不堪而遭受重创，因此受到外部（和内部）军事力量的打击。[6]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在西部利沃夫建立的乌克兰共和国更成功。最戏剧性的时刻发生在1918年10月31日，当时乌克兰人占领了利沃夫的重要建筑物，11月1日波兰人发起反攻。对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来说，不幸的是波兰人能号召一支常规军队。1919年4月，约瑟夫·哈勒（Józef Haller）来自法国的军队尤其具有决定性作用。军队向东行进，穿过兹布鲁奇河（Zbruch river），1919年7月，西乌克兰共和国被击败，被迫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这场战争牺牲了1.5万名加利西亚乌克兰人，产生了一代沮丧的退伍老兵，乌克兰人由此普遍认为波兰是乌克兰的主要敌人。这场战争结束后，利沃夫和加利西亚东部归属波兰，约300万说乌克兰语的人口和100万加利西亚犹太人口组成了波兰第二共和国。[7]不幸的是，加利西亚犹太人——在奥地利废墟上兴起的少数族群——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空间。当地波兰人和波兰士兵将犹太人的中立态度和自我防御视为对乌克兰的支持。1918—1919年，波兰人对犹太人的袭击在利沃夫至少造成了70名犹太人丧生。[8]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帝国的覆灭催生了华沙、基辅和利沃夫出现的国家建构计划。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刺激了其他说乌克兰语的人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建立国家。在加利西亚约300万说乌克兰语的人口中，大约有15万人是兰科人（Lemko）：他们是生活在山丘和山脉上的东斯拉夫人，那里很快将出现新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线。1918年11月，当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利沃夫宣布独立时，兰科人另外成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在喀尔巴阡山脉贝斯基德山附近，乌克兰人的理念是异质的。当地的兰科精英是亲俄者，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土地的完整性，而不是民族忠诚。兰科行政当局起先请求俄国兼并兰科领土，之后他们又希望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兰科人觉得在所有可能的方案中被波兰兼并是最糟糕的，尤其是如果牵扯到（事实上确实如此）兰科土地会被新国界一分为二。波兰军队在1920年

春天镇压兰科“国”时正好证实了这一点。[9]兰科人的案例提醒我们，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终结后，并非所有地方都产生了民族主义，人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政治目标而不是民族独立，而且乌克兰人的运动无法穿透整个加利西亚地区。

里加协议，1921年

只有波兰东南部边界的划定使波兰人满意，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才能并肩作战，基于波兰-乌克兰争端，波兰领导人约瑟夫·毕苏斯基推迟了波乌结盟对抗俄国的计划。事实上，在波兰打败了其中一个乌克兰国之后，波兰只能和另一个国家结盟。当时机成熟后，毕苏斯基的波兰和西蒙·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10]摇摇欲坠的基辅国家的结盟太微不足道、太迟了。1920年4月，彼得留拉将乌克兰西部让给波兰，与毕苏斯基结盟对抗苏维埃俄国。从加利西亚乌克兰人的角度来看，基辅的这一行为无疑是背叛。从彼得留拉的角度来看，这是保住乌克兰腹地的国家地位的最后机会了。从毕苏斯基的角度来看，这次结盟是一个打败红军，并巩固乌克兰作为缓冲国家的地位的机会。毕苏斯基这一招有些冒险，因为波兰民族民主党人反对乌克兰独立，他们目前掌握着国家议会，东部的任何失败都能使他们获利。民族民主党的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辞去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以示对与乌克兰结盟的抗议。基辅很快在1920年5月获胜，之后很快又失败了。布尔什维克军队发起反击，逼退了波兰和乌克兰军队，并在1920年8月挺进华沙和利沃夫的郊区。

最终波兰和乌克兰军队取得了胜利，但是波兰的资源被耗尽了，波兰公众的意见分为两派，波兰当局对从战败的布尔什维克俄国吞并多少领土意见不一。正如我们所知，波兰选举议会仅代表波兰中部，而且受民族民主党的影响很深。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决定了波兰在与布尔什维克的非正式磋商中持何种立场，他支持仅仅吞并（他相信）可以被波兰民族国家同化的领土。这意味着实际上民族民主党考虑的领土是在“种族上属于波兰的”或者在“历史上属于波兰的”，后者由受波兰文化影响的众多城市构成。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代表阿道夫·约费（Adolf Joffe）很乐意为莫斯科收回被波兰军队占领的领土。1921年3月，波兰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在里加瓜分了如今属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波兰吞并了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同意承认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11]尽管没有在字面上违反与彼得留拉的乌克兰签订的结盟协约的第4条款，波兰扣留了乌克兰的盟友们，这事实上违反了第4条款的精神。

波兰赢得了两场东部战争的胜利，一场是对抗西乌克兰共和国的战争（1918—1919），第二场是对抗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战争（1919—1920），结果波兰吞并了加利西亚，以及沃里尼亚大部分区域。这是欧洲

在“一战”之后新的领土边界安排之一，东欧的特征是从大国家里划分小国家。这次的领土协议通常被认为符合《凡尔赛条约》的规定，但是武力划定东部边界这件事本身超出了协约国的控制。每当重新绘制地图后，人们必须停下来想一想新名字之前对应的名字是什么。“沃里尼亚”是中世纪公国的名字，是立陶宛大公国行政区的名字，是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波兰的领地名字，也是俄罗斯帝国辖区（gubernia）的名字。独立的波兰占据了1921年沙俄辖区的大部分而非所有土地。剩下的沃里尼亚地区又被划分，在苏维埃方面，成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基辅和文尼察（Vinnytsia）之间的几个州。1922年包括苏维埃乌克兰在内的苏联成立，这是1918—1920年建立独立乌克兰国家的企图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12]波兰没有象征性地承认“乌克兰”的地位，但是波兰有一块“沃里尼亚”领地。当我们说“沃里尼亚”，我们指的是沃伦省（Województwo Wołyńskie或Wołyń）以及波兰波利西亚领地的南部地区。

本书所说的“加利西亚”等同于乌克兰语“Halychyna”的意思，这个词语指称奥地利王室领地的东半区域，在英语中表达为“Galicia”。奥地利加利西亚没有俄国沃里尼亚辖区那样的历史延续性：它仅仅包含了奥地利在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内从波兰-立陶宛王国瓜分的领土。奥地利加利西亚包含了波兰西部的领土，那里的主要城市是克拉科夫；以及东部的领土，（通常来说）那里乡村地区的通用语是乌克兰语，城镇的通用语是意第绪语和波兰语，主要城市（利沃夫）的通用语是波兰语。在击败西乌克兰共和国之后，独立的波兰国收回了曾被奥地利夺取的加利西亚领土——东部和西部的领土，包括利沃夫和克拉科夫在内。“加利西亚”这个词在波兰文化语言中被保留下来，但没有出现在波兰地图上。波兰将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东部分成了三个领地：利沃夫、斯坦尼斯拉夫（Stanisławów）和塔尔诺波尔（Tarnopol），它们共同组成了有名的“东部小波兰”（Małopolska wschodnia）。有意思的是，在原波兰王国中这些省份在历史上都被称为“罗斯的领地”。在两次世界大战间，“东部小波兰”这三个领地（包括乌兰人继承的克拉科夫和卢布林的部分领地）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利西亚”。两次大战间生活在波兰的乌克兰人依然以“Halychyna”称呼“东部小波兰”，这两个名词我们都翻译为“加利西亚”。[13]

由于协约国的压力，波兰承诺授予之前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地区以政治自治权，但之前属于俄国的沃里尼亚地区不享有这份特权。20世纪20年代早期，波兰的政策是优待乌克兰国民，这样协约国就会认可波兰对加利西亚东部的所有权声明，1923年波兰终于如愿以偿。一开始，由于里加协议而留在苏维埃乌克兰的乌克兰人，其处境在某种意义上要好得多，但之后一落千丈。如果说波兰的民主政治是异质的、不具代表性的并最终被削弱了，那么苏维埃就是野蛮的、极权的并最终导致了大屠杀。起先，在波兰断断续续地追求“民族同化”时，苏联的政策是帮助创造一种现代的乌克兰

文化。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苏维埃乌克兰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共产党吸纳乌克兰知识分子并鼓励他们用方言进行创作。杰出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米哈伊洛·胡舍甫茨基被重新请回基辅，并在苏维埃乌克兰工作。大部分乌克兰语的书籍和报纸得以出版，大部分孩子受到乌克兰语的教育。苏维埃当局一度允许一种新的乌克兰独立东正教教会（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存在。但是当斯大林终止了乌克兰化政策、禁止新教会出现、迫害乌克兰知识分子后，这段成果丰富的平静岁月戛然而止。苏维埃乌克兰比任何苏联的欧洲领土受斯大林统治的荼毒都要深。1932—1933年，500万苏维埃乌克兰人在大饥荒（Great Famine）中死去。[14]数以万计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包括20年代文化复兴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在30年代末期的大清洗中被杀害。[15]

乌克兰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发生在乌克兰中东部（在苏联境内），但是在乌克兰西部（波兰境内），乌克兰精英移民——大多数都是加利西亚人——有时间和自由来思考他们的民族困境。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加利西亚才变成乌克兰民族主义理念的绝对的中心，自那之后乌克兰文化才开始从西部传播到东部。尽管加利西亚人心中的乌克兰理念代表了乌克兰人的普遍渴望，但那是在二三十年代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波兰拥有特殊地位的背景下产生的。20年代苏维埃乌克兰发生的乌克兰文化复兴注定是发生在国外的事情；30年代关于苏联暴行的新闻被严格压制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回想起波兰精英在战前的统治地位，他们对结盟波兰的失败感到失望，又在里加遭到背叛，并且对波兰当局日复一日的统治感到沮丧，由此他们将波兰当作乌克兰人事业的最大敌人。波兰无声地支持乌克兰中部的流亡者，他们的前任盟友就在基辅的流放队伍中，但乌克兰西部的民族主义者对此并不买账。[16]同时，对波兰的关注也让人们避开了关于苏联的广泛争议，许多乌克兰活动家将苏联视为乌克兰国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缔造者。

共产主义使用普世的语言，但共产主义者在行动上常常或多或少地围绕民族主义中心展开统治。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使用的是排他性的语言，但是民族主义本身存在几个普世的特征：原则上它认可任何群体都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民族主义从一种社会生活中培育另一种；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们带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是可以互相照搬的。我们必须对照两次大战间主要的民族主义思潮——例如意大利和德国，来理解次要的民族主义思潮——例如乌克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被分为保持现状不变的国家和想要收复失地的国家，而旨在收复失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自然会寻求后者的帮助。尤其是墨索里尼掌权意大利后，西方意识形态似乎为扭转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失败提供了一条路径。1929年，参加过西乌克兰-波兰战争的加利西亚乌克兰老兵在维也纳创立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rhanizatsiia Ukrains’kykh Natsionalistiv，下文简称OUN）。尽管组

织吸收了来自乌克兰中东部的流亡者，但是组织的定位还是以加利西亚为主的。[17]当时的政治环境激发了该组织对波兰的敌意：波兰吞并了加利西亚，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成了波兰公民。OUN成立的直接动因是加利西亚乌克兰政党在1928年波兰选举中的参与，这场选举让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为厌恶，因为它使现存国界合法化了。[18]而OUN是一个非法的、密谋的、旨在破坏现状的恐怖组织。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囊括所有乌克兰领土（广义的领土），仅接受乌克兰人民（狭义的人民）。1929年的第一次大会决定了“只有驱逐所有乌克兰土地上的侵占者，乌克兰民族才能在本国全面发展”[19]。OUN“十大指令”的最后一条十分清楚：“为了拓展乌克兰国家的实力、财富和面积，奴役外国人也在所不惜。”在领导人德米特罗·东佐夫（Dmytro Dontsov）的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一代倾心意识形态多于历史，渴望一场能建立乌克兰国家的暴力革命。事实证明，OUN对组织的关注和它的意识形态一样重要。

虽然在原则上OUN的敌人是所有拥有乌克兰人生活的土地的国家（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但它只在波兰境内发起针对波兰的行动。OUN通过谋杀愿意与波兰当局合作的、德高望重的乌克兰人，以及想要帮助乌克兰人的波兰官员，使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产生分歧，激起波兰人的报复，使自己激进的立场看起来是正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暗杀或意图暗杀至少36名乌克兰人、25名波兰人、1名犹太人和1名俄国人。在被暗杀的波兰人中有充当协调者的布罗尼斯瓦夫·皮尔拉克齐（Bronisław Pieracki）[20]和塔德乌什·霍瓦伊（Tadeusz Hołówko）[21]。[22]OUN认为他们正与波兰作战，其领导人相信要取得胜利需要盟友。OUN指望德国人的帮助，因为如果要实现在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上建立乌克兰国家的雄心壮志，德国是唯一可能的盟友。和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的法西斯运动一样，20世纪30年代OUN的领导人支持纳粹德国，并相信阿道夫·希特勒会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帮助他们。30年代末期，OUN和纳粹德国情报机构阿勃维尔（Abwehr）建立合作。

加利西亚人和沃里尼亚人，1921—1939

OUN的意识形态是一方面，乌克兰人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地位又是另一个问题。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国民中有500万人所说的是今天我们称之为乌克兰方言的语言，他们信仰希腊天主教或东正教。其中大约有300万人之前生活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他们通常信仰希腊天主教；大约200万人之前生活在俄国的沃里尼亚，他们通常信仰东正教。波兰官员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都强调加利西亚人和沃里尼亚的区别：后者认为加利西亚人是可靠的，而沃里尼亚人是宣扬民族主义的合适人选；前者认为加利西亚人是不可靠的，沃里尼亚人是政治同化的合适人选。波兰的政策是防

止“坏”加利西亚人影响到“好”沃里尼亚人。

波兰在加利西亚的政策足够严苛，防止新的敌人出现，但是这种政策远远不是那种会中断乌克兰公民社会或冲击乌克兰民族主义渴望的暴政。对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来说，最痛苦的打击是1924年“格拉布斯基法”的颁布，这部法律将所有乌克兰语学校替换为双语（主要是波兰语）学校。这是民族民主党人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的“杰作”。针对这些自里加以来接收的、易为管理的乌克兰人口，格拉布斯基希望他们的下一代就能完成同化。他的法律无疑在私立学校扔下了一枚炸弹，令乌克兰年轻人与波兰当局疏远。[23]1925年，当他的兄弟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Władysław Grabski）担任波兰总理时，时任内政部部长的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阻挠了使土地改革更加公平的努力。1926年毕苏斯基的军团原本可以划下历史转折点。自那之后“国家同化”而非“民族同化”成了波兰政策：公民的判断标准是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而非民族性。OUN将这一系列事件视作威胁，他们发动了一次迫使毕苏斯基介入的破坏行动。作为回应，同时为了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对自己偏爱的政党的支持，毕苏斯基下令发起数百次镇压式的反制行动。其中经常包括当众行刑的惩罚。[24]这种羞辱引起了持久的敌意。

沃里尼亚的挑战和加利西亚的截然不同。这里是波兰第二大地区，这里的田野、森林和沼泽几乎没有被道路和铁路破坏，镇上也没有下水道。这里最大的镇是罗夫诺（Równe），镇上4.2万总人口中的多数是犹太人。沃里尼亚近90%的居民——换言之就是除了犹太人之外的所有人——从事田野劳作（或拥有土地）。和沃里尼亚相比，加利西亚最不为人知的落后地区看起来也很欧洲、很民族。加利西亚刚刚被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战争动员起来时，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沃里尼亚是不存在民族运动的。1863年的波兰人-立陶宛人起义在沃里尼亚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共鸣，在那里波兰人更少，波兰权贵与沙皇当局达成了可接受的妥协。在立陶宛的俄国统治者所担心的波兰问题，在乌克兰似乎已经被解决了。1921年，68%的波兰沃里尼亚人被归类为乌克兰人，但是他们和另外16%被归为波兰人的人都没有显示出多少民族主义行动的倾向。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波兰人说乌克兰语，一些人之前信仰东仪天主教，现在信仰东正教。1914年以前，和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相比，在俄国沃里尼亚地区没有发生关于波兰-乌克兰的民族争论。[25]另一方面，农民（乌克兰人）起义反抗地主（波兰人）的传统已经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单就1905—1907年来说，共有703起农民暴力维护土地所有权的案件被记录在案。[26]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波兰-西乌克兰战争让沃里尼亚年轻男性接触到了更广阔的民族主义世界，农民依然没有接受1921年的土地分配方案作为普遍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地主没有被视为外来民族，故土依然是从父辈那里继承的田产，土地改革还没有和故乡联系起来。



图19：在圣巴西勒修女之家的乌克兰女学生，利沃夫，1930年6月22日。乌克兰文化在波兰的外围幸存下来。

这一切都将改变。在1922年的选举中，沃里尼亚的乌克兰人投票给了乌克兰人。但是在议会中，乌克兰代表无力完成他们被选民赋予的任务：阻止波兰移居者的殖民化进程。三个世纪以来，对土地的渴求是沃里尼亚最有意义的社会问题。波兰确实出台了土地改革，这多少终结了封建土地所有的做法。[27]1923年，波兰土地改革领导人文岑蒂·维托斯（Wincenty Witos）与民族民主党人结盟。这确保了波兰的土改政治对波兰人有利，而非对农民有利，土地改革的计划将以波兰人支持的方式来设计。如此，关于土地所有的旧问题开始与新出现的民族政治互相重叠。波兰殖民者拥有的优惠待遇和特殊信用在国家权力、语言和土地清理之间建立了联系。波兰行政管理者紧随殖民者一道出现在沃里尼亚。由于当局认为当地波兰人受教育程度不够，不足以治理沃里尼亚，当局派来了波兰中部和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波兰特权阶层的涌入产生了一种新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似乎慢慢地附加在所有波兰人身上。[28]

沃里尼亚的阶级和民族冲突正和苏联的宣传相匹配。20世纪20年代，苏联向东欧输出了一种共产主义的版本：支持农民的雄心，反对现存的民族国家。列宁的两大战术——与农民结盟、巧妙利用民族自决——在沃里尼亚

非常适合。事实上，共产国际就这些问题进行的开拓，在东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成效。波兰共产党受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控制，以至于莫斯科不得不着手调整。然而，正如任何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知，激进和未经深思的土地再分配计划是阶级构造的最好理由。沃里尼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与列宁的故乡最为匹配：土地的低生产力、自然人口的高增长率、高比例的农业人口以及对土地的广泛耕作。苏联关注波兰的土地渴望问题，这使人们不再关注苏联的实际情况，并使沃里尼亚的土地问题增添了民族色彩。宣传活动背后有武力示威作为支持：20年代初，苏联在波兰的沃里尼亚地区组织并执行了数百次针对波兰移民的武装袭击。[29]



图20：一名罗夫诺居民。这个小镇就是今天乌克兰境内的罗夫诺（Rivne）。在两次大战间的沃里尼亚，居民中大部分人是犹太人，波兰人数不断增加，而乡村地区几乎全是乌克兰人。现在沃里尼亚位于乌克兰

境内，城镇和乡村很相似。

波兰所取得的积极成就，比如说教育，在更大的政治斗争中的价值被证明是不稳定的。波兰政策孕育了第一代受教育的沃里尼亚乌克兰人。但是落后的沃里尼亚很少有工作岗位，波兰人运行着那里的行政系统，乌克兰精英几乎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当经济大萧条摧毁了波兰的农业，从沃里尼亚的土地上诞生出中产阶级的机会非常渺茫。因此，刚刚产生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基辅的共产主义者和利沃夫的民族主义者的合适选择。沃里尼亚的乌克兰人在波兰语学校里学会了阅读；他们从乌克兰中部的共产主义者和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那里学会了选择性阅读。尽管所谓的“索卡尔斯基线”划分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但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很容易就穿越了沃里尼亚；苏联煽动者在沃里尼亚东部的苏联-波兰前线来去自由，免受责罚。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给华沙带来了持续的紧张后果。在1927年的省际选举中，沃里尼亚的乌克兰人投票给左翼秘密共产党员。左翼组织了沃里尼亚大部分的公共政治示威。[30]考虑到沃里尼亚敏感的地缘政治位置，正好位于苏维埃乌克兰的西面，波兰当局需要改变政策。1928年，约瑟夫·毕苏斯基将他的老战友恩里克·约瑟夫斯基（Henryk Józewski）派去统治沃里尼亚。

顺便说一句，沃里尼亚亟待解决的谜题是作为多数人口的乌克兰人，而非少数犹太人口的忠诚问题。乌克兰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主张收复失地：前者支持苏维埃乌克兰的扩张，后者支持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沃里尼亚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温床，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为了摧毁波兰，而是离开波兰。尽管99%的沃里尼亚犹太成年人将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当作他们的母语，三分之二的犹太儿童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私立学校受教育，但我们还是能从中性或乐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31]

恩里克·约瑟夫斯基（1892—1981）是基辅一名热忱的联邦主义者的儿子，他在1919—1920年波兰-乌克兰结盟时期就在乌克兰政府中担任毕苏斯基的代理人。约瑟夫斯基支持毕苏斯基“国家同化”的政策，认为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遗产能为波兰-乌克兰合作打下基础。约瑟夫斯基有着地缘政治的视野；对波兰来说，沃里尼亚将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乌克兰形式，可以遏制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入侵。他的失败揭示了在里加协议的框架内，波兰在沃里尼亚矛盾的国家地位。约瑟夫斯基缺少来自波兰社会和乌克兰活动家的支持。前者不理解为什么波兰会支持乌克兰社会，后者希望在没有波兰干预的情况下支援乌克兰社会。尽管约瑟夫斯基希望建立一个乌克兰公民社会，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彻底消除已存在的例证。他正确地预料到乌克兰合作社和教育协会是为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打掩护，因此他彻底根除了这类组织，以国家支持的代理组织取代前者。但这样做几乎没有作用，因为即便是官方组织，也还是常常由同样的人来运

转。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波兰有限的资源只能支撑地方组织的运转，而地方组织只能由当地人运作。约瑟夫斯基更长远的希望是教育，正是他在沃里尼亚的国立学校引入了乌克兰语课程。在这一行政制度下，从波兰中部引进的教师比例不断增加，这些人对他的计划毫无耐心，对乌克兰语一无所知。约瑟夫斯基致力于使东正教乌克兰化，这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他从未因此受到他们的赞颂。最终，约瑟夫斯基在大多数波兰人希望他失败的事情上成功了，在大多数波兰人希望他成功的事情上却失败了。他成功地在沃里尼亚培育了乌克兰爱国主义，但是没有将这股新思潮与波兰的国家地位联系起来。[32]

斯大林认为约瑟夫斯基的工作颇有成果，很明显他害怕约瑟夫斯基会建立一个乌克兰的撒丁-皮埃蒙特王国，如此将使苏维埃乌克兰脱离苏联。这种多疑的恐惧——和约瑟夫斯基和毕苏斯基的初衷差不多，但完全不符合沃里尼亚的现实——可能是斯大林在1932—1933年试图以大饥荒来摧毁苏维埃乌克兰的原因之一。波兰联邦主义者一如既往地被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和华沙的民族民主党人视为敌人。民族民主党人鄙视约瑟夫斯基。他的保护者毕苏斯基在1935年去世后，约瑟夫斯基很快失去了沃里尼亚政策的控制权。军队接管了一切，他们摧毁东正教教堂、充公财产以彰显波兰的存在感。我们之后会发现，这可能在最糟糕的时刻激起了沃里尼亚乌克兰社会的反抗。[33]

波兰国家和乌克兰政治，1921—1939

对比两次大战间乌克兰和立陶宛的公民社会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们已经知道1918年乌克兰人在奥地利的运动比立陶宛人在俄国的运动更令人印象深刻。1918年后，成立后的立陶宛国家通过创造立陶宛人的民族社会改变了这一平衡。20世纪30年代，新一代受教育的立陶宛人被立陶宛国家组织化和教育化的系统所吸收；与此同时，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只有19世纪以来的社会组织、非法而无能的政党、比他们祖辈在奥地利统治下享有的更少的教育机会。加利西亚人和沃里尼亚人很相似，他们在合法政治（legal politics）领域的事业吸引力有限，在经济落后地区的事业几乎没有任何前景，到30年代为止，甚至他们的教会事业也是不稳定的。虽然在波兰国家存在期间，OUN不属于大众运动，但是波兰当局造成了一种情况，即OUN作为失意的、受过教育的乌克兰年轻人的宣泄口，其吸引力越来越大。对乌克兰年轻人来说，参与OUN的恐怖主义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参与方式——参与到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族主义的革命政治中。

乌克兰人在合法政治中被边缘化的情况很明显。虽然三分之一的波兰公民被划分为少数民族，但是没有任何少数民族代表在波兰政府中担任过部长（连地区和地方长官都没有）。几乎没有重要政治家把乌克兰人和其他少

数民族的民族渴望当回事儿，更鲜有人试图通过向乌克兰精英提供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来邀请他们成为同道者。西乌克兰的共产党在1923年成立之初就是非法的，而秘密共产党组织乌克兰农工联合会（Sel-Rob）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被禁了。这些政党由于反对波兰的国家地位而被贴上非法标签，但是它们的非法性并未失去追随者的忠诚。当时乌克兰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思潮是乌克兰民族民主联盟（Ukrains'ke Natsional'ne Demokratychne Ob'iednannia，下文简称UNDO）。虽然UNDO活动家普遍将苏维埃乌克兰视作乌克兰建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他们对苏联的着迷由于苏维埃乌克兰发生大清洗和大饥荒的新闻而减弱。从大约1935年起，UNDO开始支持波兰的国家地位。UNDO针对合法政权的新政策常常面临被波兰当局镇压的风险，而OUN则通过刺杀波兰官员蓄意挑起这类镇压。19世纪30年代晚期，在毕苏斯基去世后，波兰当局重新采用“民族同化”的政策，而且更加激进。军队的突袭、公开毒打以及焚毁教堂帮助OUN传播了这则消息：一场民族对民族的战争即将到来。

即使是在1939年，这也是一则政治讯息，而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描述。乌克兰人的恐怖主义和波兰人的报复行为仅仅和一部分人有关，还有许多区域没有受到影响。OUN激进分子认为，在波兰共和国生活的说乌克兰语的人们已经有或即将产生一种排外的民族认同。之后发生的事件让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朋友和敌人都产生了一种幻想倾向，认为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是纯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家园。正如我们所知，被社会主义、平均地权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吸引的乌克兰人比被OUN完整的民族主义思潮所吸引的乌克兰人要多得多。移居国外的退伍老兵、失意的知识分子和95%在波兰田野劳作的说乌克兰语的人之间，并没有天然的意识形态的契合之处；亲俄的传统并未终结，甚至当苏维埃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时，许多当地乌克兰活动家的希望仍未曾湮灭，他们希望俄国有一天能带来社会解放。利沃夫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中心，但是波兰语和意第绪语是这座城市的主要语言。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其他城镇中，许多乌克兰人既对民族政治不感兴趣，也没有清楚的民族认同。而许多清楚地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的人，也没有得出结论说认同乌克兰社群一定意味着对乌克兰国家的忠诚。在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系列负面联系：人们开始把对土地的饥渴和宗教迫害与波兰统治联系起来。但是OUN的民族主义对策——一个仅囊括种族上的乌克兰人的乌克兰国家，远没有深入人心。接受这种观念需要一场破坏波兰的全面战争、歪曲法律的理念、摧毁当地的社群，以及做出最糟糕的示范。这将是下面几章的主题。



图21：犹太人和天主教教徒在利沃夫市场上做买卖。



图22：在利沃夫市场上做买卖的天主教教徒和犹太人。

在这里，允许我们强调一个简单的事实：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囊括了数以百计的社群，这些社群几乎不与国家产生联系，居民们知道谁是波兰人，谁是乌克兰人，但是他们把自己的村庄和郡县看得比范围更大的民族更重要。我们来回顾一个有趣的例子，关于加利西亚的村庄多布拉茨拉切斯卡（Dobra Shl’iakhets’ka）。在这里说乌克兰语的上层贵族拥有土地和决定权。15世纪早期，当时波兰国王册封三名信仰东正教的兄弟为贵族，自此建立了一种传统，即对波兰当局的忠诚包含着抗争任何限制地方自治权的意图。在之后的每次人口普查中，他们的后代都属于波兰贵族，在19世纪的奥地利加利西亚一直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多布拉的亲乌克兰贵族依然享有财富和地位，保护着他们共同拥有的森林，把他们楚楚动人的女儿作为奖励送给村外的波兰人。村里的波兰人参加希腊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在公共场合说乌克兰语。犹太家庭经营着多布拉的旅店和贸易。1939年，多布拉既不是乌克兰人的，也不是波兰人的，更不是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它有着当地的现实状况，你可以这样理解加利西亚，这里也许正处于下几章将描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的边缘，但是还残留着早期民族性的痕迹和那时还未被抹去的古老的政治秩序概念。

---

[1] Robert Kann,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406-467; Serhii Popyk, Ukraintsi v Avstrii 1914-1918, Kyiv: Zoloti Lytavry, 1999.

[2] 这里以及之前和之后的数据引自Piotr Eberhardt,Polska ludność kresowa, Warsaw: PWN, 1998, 180, 引用Die Ergebnisse der Volkszählung vom 31.XII.1900, Vienna, 1902。

[3] 据说，一个典型的波兰人会对乌克兰人这么呼吁：“所以，你们在人数上绝对比我们多，但是这些喀尔巴阡土地上的精神和文化是我们的，而且完全是我们的。”Kazimierz Saysse-Tobyczek, Dość jużignorancji w kwestii Kresów Południowych! Warsaw, 1919, 引自Jacek Kolbuszewski, Kresy, Wrocław: Dólnośl ąskie, 1999, 236.

[4] Maurycy Horn,Żydzi na Rusi Czerwonej, Warsaw: PWN, 1975, 75-77; Rachel Menekin,“The Galician Jewish Vote in the 1873 Austrian Elections,” Polin, 12 (1999), 119; John-Paul Himka, “The Polish-Ukrainian-Jewish Relations in Austrian Galicia,”同上书，37; Edward Dubinowicz, Stanowisko ludności żydowskiej w Galicyi, L’viv: Polonia, 1907, 16-17。

[5] Oleksandr Pavliuk,Borot’ba Ukrainy za nezalezhnist i polityka C.Sh.A., Kyiv: KM Aka demia, 1996, 40-66. 又见Mark Baker, “Lewis Namier and the Problem of Eastern Galicia,” Jour 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23, 2 (1998), 59-104。

[6] John Reshetar,The Ukrain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相关的小说是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

[7] 波兰第二共和国是指“一战”和“二战”期间存在的波兰国家，其正式名称为波兰共和国。1939年8月，波兰第二共和国受到纳粹德国、苏联和斯洛伐克的入侵，并被瓜分。

[8] Antony Polonsky, “A Failed Pogrom,” in Yisrael Gutman, Ezra Mendelsohn, Jehuda Reinarz, and Chone Smeruk, eds., The Jews of Polan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Hanover, Mass.: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3.

[9] Bogdan Horbal,Działalność politycznałemków nałemkowszczyźnie 1918-1921, Wrołclaw: Arboretum, 1997.

[10] 西蒙·彼得留拉（1879—1926），乌克兰政治、军事人物，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十月革命”之后，他组织乌克兰军队与苏联红军、白军作战，意图维持乌克兰的独立自主，失败后流亡欧洲，1926年在巴黎遭暗杀身亡。

[11] 其他有说乌克兰语的人口居住的土地在罗马尼亚（布科维纳）和捷克斯

洛伐克（喀尔巴阡卢森尼亚附属区域）。关于布科维纳，见Irina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cs in Greater Roman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63-68。

[12] Richard Pipes,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49.

[13] 我们关注的是两次大战间波兰在利沃夫、斯坦尼斯拉夫、塔尔诺波尔和沃伦的领地，以及波利西亚领地南部，后者（除了利沃夫领地的最西边之外）在1945年被苏维埃乌克兰吞并，现在组成了独立的乌克兰的利沃夫、斯坦尼斯拉维夫、塔尔诺波尔、沃里尼亚和罗夫诺等各省。两次大战间波兰的卢布林和克拉科夫领地上居住着说乌克兰人的居民，在“二战”后这些地方仍有部分属于波兰，直到今天还有部分属于波兰。在1939年波兰关于领地的统计数据基础上，我们可知当时的语言比例：沃伦有68.4%说乌克兰语的人，16.2%说波兰语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有68.9%说乌克兰语的人，22.4%说波兰语的人；利沃夫有34.1%说乌克兰语的人，57.7%说波兰语的人；塔尔诺波尔有45.5%说乌克兰语的人，49.3%说波兰语的人。这些数据夸大了波兰人的数量，错误地暗示每位受访人都有明确的民族认同。利沃夫领地一直向西延伸，因此统计数据传达了错误的印象，即波兰人是利沃夫城市的主要人口。以下更正虽不完善，但很有用：Volodymyr Kubiiovych, Heohrafiia ukrain’kykh i sumezhnykh zemel’, Cracow: Ukrains’ke vydavnytstvo, 1943, 13-14, 20-29。

[14] Robert Conquest,Harvest of Sorr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 Valer’ian Pidmohyl’nyi能代表整个阶层，他的小说《地点》（Misto）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的乌克兰化政策，他在1941年被处决。我们现在重新说回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或者说“波兰的乌克兰”，这里是20世纪最后45年里乌克兰民族主义理念的核心地带。这里及第6、9章引用了重建战前苏维埃乌克兰历史的有用资料来源，包括Iuri Shapoval, UkrainaXX stolittia, Kyiv: Heneza, 2001; Iuri Shapoval, Volodymyr Prystaiko, and Vadym Zolotar’ov, Ch.K.-H.P.U.-N.K.V.D. v Ukraini, Kyiv: Abrys, 1997; P.P. Bachyns’kyi, Dokumenty trahichnoi istorii Ukrainy (1917–1927), Kyiv: Okhorona pratsi, 2000。

[16] Robert Potocki, “Polska a DC UNR,” in Iurii Slivka, ed., Deportatsii Ukraintsiv ta Poliakiv, L’viv: Misioner, 1998, 65-66.

[17] 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没能够赢得一个国家的事实，加上诸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等强有力的运动的影响，改变了德米特罗·东佐夫（Dmytro Dontsov，1883—

1973）的观点。这位前1914时代的地缘政治家成了20世纪20年代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家，他特别迷信组织。东佐夫原本是沙俄的臣民，他反对俄国对欧洲文明的野蛮态度，他把乌克兰和波兰视为欧洲的一部分，甚至把波兰当作乌克兰的榜样。

[18] Alexander Motyl,The Turn to the Right,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0, 43. 关于东佐夫，见Tomasz Stryjek, Ukraińska idea narodowa okresu międzywojennego, Wrocław: Funna, 2001, 110-190; Vasyl' Rudko, “Dontsov i Lypyns'kyi,”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9, 3-4 (1985), 477-494。

[19] Petro Mirchuk,Narys istorii orhanizatsii ukrains'kykh natsionalistiv, Munich: Ukrains'ke Vydavnytstvo, 1968, 93.

[20] 布罗尼斯瓦夫·皮尔拉克齐（1895—1934），波兰军官、政治家。他曾参与了1918—1919年波兰与乌克兰的战争，从1931年起担任内政部部长一职。

[21] 塔德乌什·霍瓦伊（1889—1931），波兰政治家、外交家、作家。他以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温和立场而著称，正因如此而在1931年被两名OUN成员暗杀。

[22] UPA上校Vasyl' Kuk回忆，诸如Holówko（于1931年被暗杀）的改革者“从意识形态上分裂了我们”，“让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他们必须被消灭。Motyka, 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35.数字引自Alexander Motyl, “Ukrainian Nationalist Political Violence in Inter-War Poland, 1921-1939,”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9, 1 (1985), 50。

[23] Stephan Horak,Poland and Her National Minorities,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69, 149. 当时的报纸保留了和书面语言的联系。Mariia Nedilia, “Ukrains'ka presa na zakhidnoukrains'kykh zemliakh,” Naukovi Zapysky, 7 (1998), 265-270.

[24] 照片见Emil Revyuk, ed.,Polish Atrocities in Ukraine, New York: United Ukrainian Organizations, 1931; V.J. Kushnir, Polish Atrocities in the West Ukraine, Prague: Nemec, 1931。

[25] Witold Rodkiewicz,Russian Nationality Policy, Lublin: Scientific Society of Lublin, 1998, 35. 在战争期间，沃里尼亚的德国人而不是当地波兰人被视为严重的威胁。1914年前，支持德国人的代价是牺牲波兰人。Eric Lohr, “Enemy Alien Politics Within the Russian Empire During World War One,”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26] Beauvois,La bataille de la terre, 137.

[27] 据一位来自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回忆，直到20世纪30年代，波兰地主依然强迫乌克兰农民遵守封建义务。II/1362/2k, Archiwum Wschodnie, Ośrodek Karta, Warsaw.

[28] Włodzimierz Mędrzecki, Województwo wołyńskie, Wrocław: Ossolineum, 1988, 25, 63, 93. 数据引自Jan Kęsik, “Województwo wołyńskie 192—1939 wświetle liczb i faktów,”Przegląd Wschodni, 4, 1(1997), 99-136。

[29] George Jackson, Comintern and Peasant in East Europ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22, 182, 189, 209. 关于苏联的掠夺，见Mykola Kuczerepa, “Polityka II Rzeczypospolitej wobec Ukraińców na Wołyniu w latach 1921-1939,” Przegląd Wschodni, 4, 1, (1997), 141-146。

[30] Janusz Radziejowsk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Western Ukraine, Edmonton: CIUS, 1983, 96-97. 关于示威，见波兰内政部民族处的秘密报告：Biblioteka Universytetu Warszawskiego,Dział rękopisów (BUWR), syg. 1550。

[31] Shmuel Spector,The 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Jerusalem: Yad Vashem, 1990, 20-21;Ezra Mendelsohn, 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20.

[32] 约瑟夫斯基的报告，见Przegląd Wschodni, 4, 1, (1997), 172—173; 选举结果见Radziejowski, Communist Party of Western Ukraine, 174—175; 关于约瑟夫斯基的出身，见Jan Kęsik,Zaufany komendanta, Wrocław: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Wrocławskiego, 1995, 1—36; 关于他对乌克兰的态度，见Henry Józewski, “Opowieść o istnieniu,” BUWR, syg. 3189, Vol. 2。

[33] Kęsik,“Województ wowołyńskie 1921—1939,”99—136; Czesław Partacz,“Polacyi Ukraińcy na Wolyniu,” Ukrainia-Polska, Koszalin: BWSH, 1999, 240–241; Ksawery Pruszyński,Podróż po Polsce, Warsaw: Czytelnik, 2000, 123—136; Ksawery Pruszyński, Niezadowoleni ientuzjaści, 339—341, 360—368. 关于斯大林的担心，见Terry Martin, “The 1932–33 Ukrainian Terror,” presentation at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Mass., 5 February 2001。

第8章

乌克兰西部的种族清洗（1939—1945）

当纳粹德国和苏联在1939年摧毁波兰时，一切都被改变了。两年来，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了波兰的领土和公民。1939年到1941年间，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有效期内，大部分波兰的乌克兰人生活在苏联的统治下，而大部分波兰人处于纳粹的统治下。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一路占领了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和苏维埃乌克兰。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波兰全境的所有公民任由希特勒摆布。纳粹德国建立了乌克兰总督辖区（［Reichskommissariat Ukraine］，包括沃里尼亚地区），但是把加利西亚归入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我们知道其管辖的波兰领土没有被第三帝国吞并）。1943年2月，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后，保卢斯（Paulus）[1]违背了希特勒的命令，在斯大林格勒投降。1943年春天，苏联红军继续防守。1944年夏天，苏联迫使德国人撤出乌克兰，并重新规划波兰-乌克兰的边界。到1945年春天，波兰全部领土和公民都处于斯大林的支配下。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遭受了三重占领：1939年被苏联占领，1941年被纳粹占领，1944年再次被苏联占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个阶段，发生在乌克兰和波兰的战争远比发生在西线的战争残酷得多。1939年到1941年间，苏联和纳粹占领者们摧毁了当地社会，流放或谋杀当地精英。1941年后，在东线的德国士兵接到指令以这片土地为生，他们被灌输斯拉夫人是低等人类（Untermenschen）的观念。和1940年的西线战役不同，1941年的东线战役表现为与低级种族的战斗。[2]1941年到1944年间，德国政权机关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些屠杀经常在当地人的眼皮底下进行（有时会得到当地人的协助）。1944年苏联卷土归来后，苏联这次的新任务是制造一个同质化的民族空间。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周围充斥着战争、占领、饥饿、报复、驱逐和种族灭绝，而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和死亡长达六年之久。

在战争期间，乌克兰和波兰经受了巨大的苦难，苏联和纳粹德国是他们共同的敌人。然而，战争没有使乌克兰人和波兰人联合起来，反而让他们全面分裂了。战前关于谁有权统治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分歧在1939年成了最尖锐的矛盾，人们因此意见不合，彼此的关系以最大的速度恶化，他们之间障碍重重，关系坏到顶点，从未如此疏离。之前的一章让我们回到初始点，这一章的目的则是说明战争如何使民族分歧成为新的民族战争。1939年前，这种关于合法统治领土的分歧只有有限的实际重要性。在战争

期间，分歧导致的争端不仅在原则上是难解的，还激起了双方对彼此的怒意。到1943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同路人认为，对波兰人实行种族清洗才能完全保证乌克兰的未来。这项计划的实施导致数十万人死亡，在更大范围的世界战争中制造了乌克兰-波兰内战，并重新改变了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关系。

1939年关于领土合法统治权的政治争端何以导致了1943年针对生活在这片领土的人们的种族清洗？这是本章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渴望纯粹的种族是一回事，但着手创造它又是另一回事。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波兰（和欧洲），关于清除民族的言论屡见不鲜，是战争使得这一计划变得合情合理，而战争的摩擦把种族清洗者带到台前。战争的三种后果可以解释这种从言论到行动的变化：（1）关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合法统治权的问题再次被提上台面；（2）斯大林和希特勒设计的大规模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实施；以及（3）对波兰和乌克兰的地方社群的清理。在我们开始叙述、解释针对来自乌克兰西部的波兰人的种族清洗之前，让我们先考虑这三个因素。

领土的合法统治权

一旦纳粹德国和苏联摧毁了波兰国家，天然有利于它的预设就不存在了，关于波兰合法性的不同意见变得重要起来。当时是1939年9月，仅仅在协约国认可波兰东部边界的16年后。参加过1918—1919年西乌克兰-波兰战争的步兵依然处于壮年。对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来说，乌克兰对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所有权声明仍有说服力。将波兰统治视为占领的人现在开始致力于在乌克兰土地上建立一个乌克兰国家。认同乌克兰文化的人的观点不那么激进，但1939年后他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波兰要重新建立对他们的统治。虽然OUN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刻，但是他们仍要面对艰巨的任务。建立国家比恢复国家要困难得多：前者的国际盟友更少，融入合法的国际政权更难，而且似乎要诉诸革命手段。正因这项任务如此艰难，它的诱惑力就更大了。由于乌克兰人（不同于波兰人）将德国视为独立道路上的盟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有和纳粹合作的政治动机。

在政治上积极的乌克兰人希望建立一个囊括前波兰领土——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新国家，而在政治上积极的波兰人希望将波兰国界恢复到1939年的情形。为了各自的目标，波兰人发现很难原谅乌克兰村民在1939年9月用面包和盐迎接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的行为。[3]在波兰总督府的辖区内，过剩的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发现记者、教师、教授和官僚等职业的收益是可见的。[4]在那些希望建立一个乌克兰国家和乌克兰民族的人眼中，乌克兰精英和德国当局的合作无疑是合理的，但在波兰抵抗者眼中这是通敌叛国。对波兰抵抗者来说，处决与德国合作的乌克兰人

比处决德国人更简单，因为这更不易导致德国人针对波兰平民的报复行动。不言而喻，对波兰抵抗运动来说把目标瞄准乌克兰通敌者比瞄准波兰同胞更简单。

通敌行为留下了长时间的污点。1939年欢迎苏联统治的乌克兰人常常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波兰人不会忘记在波兰国家灭亡时他们最初的喜悦。1941年加入纳粹入侵苏联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很快失望了，但是他们曾穿着德国军服的事实不会被轻易原谅。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只有乌克兰人和纳粹合作，尤其是在曾经的波兰东部，这里在1939年被割让给苏联、在1941年被德国人单独占领。在苏联统治的两年后，很多人都有理由把德国入侵苏联视为解放。（虽然现在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1941年夏天一些犹太人幻想着被德国统治没有苏联统治那么糟。相应地，苏联的流放政策对犹太人的影响可能比对任何人都深；当时“最终解决方案”还未开始。在苏联占领时期，数万名犹太人为逃避苏联统治而逃往德国。）对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波兰人来说，与波兰中西部的情况一样，1939—1941年屈服于苏联统治与和德国人合作从来不是同种程度的耻辱。乌克兰人被授予加利西亚当局几乎所有的职位，与之相对的是波兰人在沃里尼亚的德国行政机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5]



图23：一次企图横渡西布格河（Buh River）以逃离苏联占领区去往纳粹占领区的失败之举，时间很可能是1940年。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公民从这条

河的两边横渡到对岸，人数有数万人之多，他们相信对岸的占领政权可能没有那么糟。

部分紧张局势是随着占领而来的，另一些是由占领者激起的。两岸的占领者为了统治需要而搞分裂。[6]苏联占领当局在1939年挑起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冲突，为了制造一种“革命”局面，这场“革命”表面上使苏维埃乌克兰兼并前波兰领土变得有合法性。[7]纳粹允许乌克兰中央委员会（Ukrainian Central Committee）在克拉科夫行动，这个名义上的救济组织实际上是乌克兰政治生活的准官方中心。中央委员会的乌克兰成员希望借助德国人的力量将在乌克兰“民族志意义上的领土”上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彻底消除。[8]1941年后在沃里尼亚的德国占领者给了乌克兰人一个迫害波兰人的机会（1941—1942），之后又给了波兰人一个迫害对方的机会（1943—1944）。纳粹这些行为通常都是为了维持秩序——分裂是统治的方式，而不是目的——即便这些行为促使民族主义武装支持团体的规模扩大。实行纳粹意识形态的企图也有相似的民族主义后果。为德国人创造生存空间（Lebensraum）[9]的计划野心勃勃，令人难以置信，这造成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对立。德国人企图于1942—1943年间在扎莫希奇（Zamość）附近的乌克兰-波兰边界建立殖民地，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在其中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德国人的殖民计划旨在恶化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冲突。[10]

群体分类和清除

正如上文所说，我们不能将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对彼此的所作所为降格为仅与这两个群体相关的、不断增加的事件来看，也不能在民族主义历史叙述的范围里来理解。从根本上来看，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如何对待对方是由他们与占领者行为的关系来决定的，他们双方都是被分类的群体，并因为分类而被流放或杀害。1939年，苏联和纳粹开始给每个人分发身份证，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政策却产生了深远的后果。1939年利沃夫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人由身体、灵魂和护照组成”。我们将看到1939年颁发的身份文件经常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能否不分家。[11]在1942年“最终解决方案”实施前，纳粹根据那些怪异的、从未完成的计划使数万人从波兰占领区迁出或迁入。这些计划提供了一种模式。1941年12月，一些在波兰总督府的乌克兰活动家认为互相的种族清洗能够解决乌克兰-波兰的争端。事实上，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领袖基于“德国人的模型”向波兰人提出了未来人口交换计划。[12]苏联在1939年到1941年间流放了至少40万名波兰公民，其中犹太人和波兰人居多数，[13]大约占这些地区人口的3%。在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流放才停止。当德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苏联NKVD匆忙地处决了数千名政治犯，其中大多数人是乌克兰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将此举归咎为犹太人造成的伤害。就在这一脆弱时期，纳粹来到

了，他们将NKVD的谋杀行为视作乌克兰人对犹太人复仇的理由。非常典型地，这种宣传攻势错误却有效。[14]

1939—1941年可被视作人们普遍接受如下原则的第一阶段：个人可以被分类到不同的群体并得到相应的处置。从1941年开始，“最终解决方案”开始给大众灌输一个群体可以从生理上被清除的观念。[15]在1941年末期和整个1942年间，几千名乌克兰人作为警察参与到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最终解决方案”中。[16]“最终解决方案”就在波兰人的眼皮底下实行。[17]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发生的大屠杀，其主要事实就是对当地犹太人的冷血屠杀。在某种编年史传统中，大屠杀（希伯来语或称“Shoah”）使在欧洲延续下来的犹太历史就此终结，并为在其他地方建立犹太国家创造了条件。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观点。其他的编年史传统从一个更宏大的进步叙事中使大屠杀边缘化了，比如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叙事或民族发展的历史叙事。这些编年史传统很难识别出来，但更容易批判。为了给战时和战后东欧批判性历史做准备，我们必须和以上两种编年史传统拉开距离，在一系列事件范围内想象“最终解决方案”及其对见证或参与其中的团体的影响。

值得重申的是，1941年夏天纳粹占领沃里尼亚是三年内极权主义第二次强加于民。对许多乌克兰年轻男性来说这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但这不是他们进入政治权力的洗礼。许多在1941年加入纳粹辅警（Hilfspolizei）的乌克兰年轻人从1939年起就在苏联统治时期成为国民警卫队的成员了。他们接受了训练，将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区别视作需要民族主义来解决的阶级斗争，解决方案即流放专家阶级，其中大部分人是波兰人。这意味着从1941年起参与“最终解决方案”本身改变了合作者，将沃里尼亚的乌克兰男孩们变成了他们原本不可能成为的那种人。1941年加入德国行政当局和德国警察的乌克兰人基于以下动机行动：为了继续他们熟悉的这种职业生涯，为了对他们自己的事务施加影响力，为了盗取财产，为了杀害犹太人，为了获得个人地位，为了为之后的政治行动做准备。由于乌克兰国家是要创造出来的，而波兰国家只需复国即可，因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基于政治动机与德国人合作并鼓励乌克兰年轻人加入纳粹权力机构。然而，与纳粹合作的日常实践几乎和这个政治目标没有一点儿关系，纳粹反对这个政治目标，乌克兰人的日常工作大多与屠杀犹太人有关，而这才是纳粹的主要政策。要再次强调的是，沃里尼亚社会最大的变化是98.5%的沃里尼亚犹太人死于非命。[18]但是，我们的目标也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大屠杀对合作者的影响。纳粹不仅训练乌克兰警察如何使用武器，也教会他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党卫队用乌克兰人的语言向年轻的乌克兰新兵灌输反犹太主义。[19]了解所有这些后，大主教舍普季茨基给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20]写信，要求纳粹不要用乌克兰警察来杀害犹太人。1942年11月，舍普季茨基发出了一封主教信函《汝不可杀戮》。[21]舍普季茨基

在每个希腊天主教教堂的布道坛上传达的信息是没有一种俗世的目的能够使杀戮变得正义。



图24：两次大战间生活在奥斯特罗赫的居民。今天这个小镇属于乌克兰。

虽然在近代早期这里曾是基督教研究和争论的中心，但1941年前这里受犹太文化的影响很深。

此时，几千名乌克兰人为了甚至不是他们的事业——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犯下了政治谋杀罪。“最终解决方案”已经教会了他们通过精确的组织化和一些人枪杀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意愿来完成大规模对平民的屠杀。虽然索比堡（Sobibor）灭绝营离得很近，但是在1941年末期和整个1942年，沃里尼亚的犹太人不是被火车运往灭绝营，而是徒步到空旷的场地，他们不是被毒气杀死的，而是被子弹打死的。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一个小镇接着一个小镇，一种古老的文明从此在地球表面消失。我们再回到沃里尼亚小镇奥斯特罗赫，之前我们在讨论近代早期基督教争议时曾谈到这个小镇。这里也是历史上犹太教育的中心：1648年赫梅尔尼茨基起义使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东斯拉夫复兴就此终结，这场起义被奥斯特罗赫犹太研究学院的毕业生记录下来了。内森·汉诺威的《绝望的深渊》（*Yeven metsulah*）极有预言性。奥斯特罗赫是第一批受到“最终解决方案”波及的沃里尼亚小镇。在犹太人区建立前，镇上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在1941年末都遭到了屠杀。[22]

幸存的犹太人被限制在犹太人区里之后，德国党卫队就在乌克兰和德国警察的协助下于1942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主要行动。城市犹太人从犹太人区被驱赶到几公里外的陷阱，党卫队剥夺了他们的衣物和随身物品，强迫他们躺下，并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乌克兰警察的职责包括杀害在犹太人区拆除时试图逃跑的犹太人、试图沿路逃跑的犹太人以及在机关枪扫射下幸存的犹太人。关于在更小的镇子和村庄实施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文件相对较少，但在这些地方乌克兰警察的角色更重要。总之，大约有1.2万名乌克兰警察协助约1.4万德国警察屠杀了约20万沃里尼亚犹太人。虽然他们的行为在实际杀戮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这些乌克兰警察的劳力使沃里尼亚的大屠杀成为可能。[23]在1942年12月这一整个月，他们一直在工作。

次年春天，也就是1943年3月到4月间，这些乌克兰警察几乎全数离开了德国当局，加入支持乌克兰的团体乌克兰起义军（Ukrains’ka Povstans’ka Armiia，下文简称UPA）。[24]UPA分子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清除波兰人在沃里尼亚的存在。波兰人倾向将UPA在这场行动中的成功归咎为乌克兰人天生的残暴，但这更可能是之前累积的经验的结果。人们学会了他们被训练去做的事，而且擅长做已经做过很多次的事情。1943年大规模屠杀波兰人的乌克兰支持者遵从他们在1942年大屠杀中作为合作者时学到的策略：详细的推进计划和地点选择，行动前给当地人有说服力的保证，突然包围定居点之后从生理上消灭人类。乌克兰人从德国人那里学会了大规模屠杀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UPA种族清洗的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以及为什么1943年的沃里尼亚波兰人和1942年的沃里尼亚犹太人一样无助。乌克兰

警察在沃里尼亚的“最终解决方案”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这是反对波兰人的运动是从沃里尼亚而不是加利西亚开始的原因之一。这些将犹太人大屠杀和对波兰人的屠戮联系起来，因为它解释了沃里尼亚数万名有着种族灭绝经验的乌克兰人的存在。但是为什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决定消灭沃里尼亚的波兰人？怀揣这些计划的人是如何在1943年波兰人种族清洗中得到指挥权的？1942年，乌克兰警察按照德国人的命令屠杀犹太人；UPA的支持者几乎和前者是同一批人，他们又是受了谁的指令在1943年屠杀波兰人？

消灭公民社会

乌克兰和波兰精英的颓丧、被大批杀害，可能是造成乌克兰人-波兰人冲突的最重要原因。苏联的第一次占领（1939—1941）通过流放和谋杀精英的方式消灭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社会。波兰人和犹太人比乌克兰人更容易遭到流放和谋杀，但那时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还不多。至少有40万波兰公民被逮捕并从前波兰东部领土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最先被流放的是国家官员和专业人士，这使剩下的许多居民失去了权威人物和道德标杆。斯大林命令NKVD杀害超过20万受过教育的波兰公民，他们在1939年成为苏联红军的囚犯，其中包括大约半数的波兰军官，这其中有700~900人是犹太人，除此之外这证明了犹太波兰军官的存在。这些罪行可以和卡廷森林（Katyń Forest）惨案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前者发生在其他地方。在德国1941年入侵后，苏联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撤出，撤出前，NKVD枪杀了数万名当地的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25]1939年后，在德国方面，纳粹在波兰总督府辖区谋杀波兰知识分子，并将有嫌疑的乌克兰人投入监狱。德国人的镇压也为无法忘记的伤害创造了条件：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波兰囚监[26]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两名兄弟。[27]海乌姆（Chełm）地区的波兰人通过和德国人合作清算了乌克兰社会中的394名领袖。据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报告，这使该地区说乌克兰语的人口完成了民族化。[28]在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后，德国人逮捕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乌克兰精英，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OUN于1941年6月宣告乌克兰独立，这直接导致了数十起逮捕。在至少一个案例中，苏联支持者挑唆德国人杀害了几百名受过教育的沃里尼亚乌克兰人。[29]

尤其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对精英阶层的毁灭同时伴随着乌克兰和波兰公民社会的武装化。在战争期间，双方的权威机构不再是诸如政党或政府等政治组织，而是诸如武装游击队或自卫国民军等军事组织。[30]虽然波兰救国军（Polish Home Army）在各个方面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但是它的命令结构是很脆弱的。1943年6月，盖世太保逮捕了波兰救国军指挥官斯特凡·罗维茨基（Stefan Rowecki）将军。一些波兰武装游击队松

散地服从救国军，但代表着不同的政治思潮（比如农民部队）；另一些游击队拒绝服从救国军的命令（比如极右派的民族武装部队）。虽然波兰政府是合法的且为西方盟友承认，但是它在沃里尼亚几乎没有权威。波兰政府代表惊讶地发现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参与到德国行政机构中，他们无力阻止沃里尼亚波兰人加入德国警察。

乌克兰人的例子更加突出。没有国家来组织起一支官方军队，在这个领域中只有极右翼势力。乌克兰公民社会的政治陈述发生了快速和戏剧性的变化，这给1943年后一系列事件的方向带来重要影响。正如我们所见，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恐怖组织OUN比起民主组织UNDO来说规模更小。而当UNDO及其他乌克兰政党在战争期间自我消解后，OUN成了乌克兰西部唯一的乌克兰政治组织。1941年春天，OUN分裂为两派：班德拉派和梅尔尼科派。梅尔尼科派由更年长、受过更好教育的成员组成，斯捷潘·班德拉带领的年轻一代更渴望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1940—1941年两派的斗争使班德拉派成为民族主义领导组织。在一次同胞相残的战争中，班德拉派打败了梅尔尼科派，随后纳粹消灭了班德拉派。班德拉领导的OUN在1941年6月于基辅宣布乌克兰独立后，他被德国人逮捕了；班德拉派领导层中约有五分之四的成员在1941—1942年被德国人杀害。到了1943年，乌克兰政治愿望最强大的代表是一个恐怖组织中的极端派别，他们作为武装阴谋者被组织起来，主要由没有经验的年轻人领导。[31]

伤残的班德拉派起先由尼古拉·列别德（Mykola Lebed’）领导，之后由罗曼·舒赫维奇（Roman Shukhevych），正是他们在1943年清洗了沃里尼亚的波兰人。然而，甚至到了1943年，即使仅在沃里尼亚地区，班德拉派刚开始也不是乌克兰政治的唯一表达途径。还有两支乌克兰游击队：塔拉斯·布尔巴-博罗维茨（Taras Bul’ba-Borovets）领导的最初的UPA和OUN梅尔尼科派的士兵。布尔巴-博罗维茨是经验最丰富的游击队指挥官，他拒绝将大规模种族清洗当作波兰问题的解决方案。[32]正如我们所知，梅尔尼科派当时正处于和班德拉派的战争中。1943年初，班德拉派摧毁了这两个对手。自始至终忠诚于班德拉派的游击队员杀害了数万名可能和博罗维茨或梅尔尼科有关系的乌克兰同胞。虽然至今没人研究这个主题，但UPA在1943年杀害的乌克兰人可能和他们杀害的波兰人一样多。[33]班德拉派决心背叛和伏击乌克兰对手，该组织成功招募到前乌克兰警察，其激进目标对当地的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使班德拉派在1943年成为沃里尼亚的统治力量。

只有一支乌克兰游击队意图清洗沃里尼亚的波兰人。这支军队在世界大战期间崛起，他们的成功要归功于当时波兰军事力量的失败、种族灭绝和受创的公民社会。1943年4月，OUN班德拉派领导人尼古拉·列别德提出“要清除整片革命领土上的波兰人口”，这完全改变了乌克兰人-波兰人的关

系，当时列别德只有33岁。[34]列别德不成熟的民族主义策略由仅有种族灭绝经验的年轻人执行，这决定了沃里尼亚一系列事件的走向，为乌克兰人-波兰人战争奠定基础。尽管特定的群体凭借特定的策略更可能赢得战争，但是我们必须说，是班德拉派的领导人而不是别人做出了1943年宿命性的决定。这些决定来自某些个人在特定时刻设计出的特定战略。

乌克兰民族主义策略：OUN梅尔尼科派

在描述了当时的环境和人物后，让我们来审视这一时刻。德军败于斯大林格勒后，OUN班德拉派的种族清洗策略是旨在促进民族解放目标战略的一部分。把种族清洗看作一种策略能帮助我们将种族清洗和OUN梅尔尼科派当时的策略做对比，他们的策略是保留和德国人的合作关系。撤退的德国人现在更愿意大规模武装乌克兰人，梅尔尼科派接受了这个提议。由于受到梅尔尼科派的鼓励，并且希望避免在第三帝国工作，约有8万名乌克兰人志愿为新的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Waffen SS Division Galizien）服务。其中只有约1.16万人受过训练，德国人的问题是很难为他们找到军官。甚至连为犹太人提供庇护的大主教舍普季茨基也认为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作为未来乌克兰军队的核心是令人满意的。虽然舍普季茨基在整个成年生涯中都担任神父，但他明白建立国家的军事需求。他的兄弟帮助建立了波兰军队，并在1920年打败了西乌克兰共和国，舍普季茨基从痛苦的经验中学到：没有军队，乌克兰国家根本不可能存在。舍普季茨基对党卫队的支持迫使我们面对乌克兰战略地位的基本难题，以及那些不顾一切的手段，甚至包容一切的人也要就此说服自己。[35]

1943年冬天和1944年春天，加利西亚党卫队摧毁了几个波兰社群，就此开始它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事件是1944年2月烧毁波兰人村庄胡塔皮恩亚卡（Huta Pieniacka）并杀害了约500名村民。[36]加利西亚党卫队没有发起针对犹太人的重大行动，因为“最终解决方案”已经做过了。1942年间，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数量庞大的大部分犹太人已被谋杀，大部分沃里尼亚犹太人和一些加利西亚犹太人在家附近被个别杀害，或是在附近的森林和田野中被大规模杀害；一些加利西亚犹太人在博罗维茨（Borovetsec）、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堡和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中死去。这终结了加利西亚地区的犹太历史。不仅是像利沃夫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像布罗德（Brody）这样的小镇——这里曾是犹太人在加利西亚最大的定居点，现在却没有一个犹太人。1944年6月，红军正是在布罗德击溃了加利西亚党卫队。之后更多志愿者加入这支党卫队，重新组织起来的党卫队去镇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反德起义，希望建立乌克兰国家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外国人的命令下离开祖国，去镇压其他民族相似的反抗。很多士兵逃跑了，他们通常会加入OUN班德拉派及其创立的UPA。当德国人撤退时，OUN梅尔尼科派的合作策略也就失去了说服

力，对它的支持很快就消散不见了。安德里·梅尔尼科（Andrii Mel’nyk）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庇护者，但随后就被盖世太保逮捕了。

加利西亚党卫队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因为党卫队是希特勒政权中最恐怖的分支，也是“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执行者。从某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加利西亚党卫队可被视作乌克兰人目标的组织化具象。在今天独立的乌克兰，你可以在利沃夫关于民族建构的博物馆展览中看到加利西亚党卫队的制服。数万名加利西亚党卫队老兵自愿向德国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投降。由于波兰将军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Władysław Anders）和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的呼吁，在意大利的老兵免于被遣送回苏联。这些呼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些处于争论中的人是波兰公民。[37]由于西方盟国在战后赋予的参战者地位，加利西亚党卫队的老兵得以前往英国和加拿大，数十年来以此为他们的行为做辩护。撇开通敌和民族建构的争议不谈，加利西亚党卫队在针对波兰人的种族清洗的爆发中处于边缘地位。

乌克兰民族主义策略：OUN班德拉派

针对波兰人的清洗是OUN班德拉派的行为，在德国战败于斯大林格勒后，他们得出了和OUN梅尔尼科派完全不同的结论。梅尔尼科派看到了和德国人更富有成效的合作机会，而班德拉派觉察到独立行动的迫切需要。对班德拉派来说，重要时刻也许是1943年2月苏联游击队在沃里尼亚的活动不断增加。[38]班德拉派希望宣称他们所有人都愿意反抗德国统治，同时希望吸收那些在斯大林格勒之后可能离岗的乌克兰警察，他们决定在1943年2月展开自己的游击行动。在1943年3月，OUN班德拉派创立了UPA，旨在反抗德国人，保护乌克兰人免受苏联入侵，以及清除乌克兰境内的所有波兰人。[39]那年春天，当沃里尼亚的警察离开了他们的岗位，班德拉派从加利西亚向北方传达命令。加利西亚人成功地组建了一支由沃里尼亚人组成的军队，这是一个提前的信号，预示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完全控制了我们今天称为西乌克兰的地方。四年来，沃里尼亚一直是政治缓冲区。1939年苏联占领后，波兰针对当地东正教教会的行动才停止。苏联人动员乌克兰人参与当地政治，但强迫他们建立集体农庄。1941年德国人取代了苏联人，但是他们借乌克兰人之手继续在当地推行高压统治。正如我们所见，苏联人和纳粹培养了那些年轻的警察，他们在1943年春天成为沃里尼亚UPA的核心。沃里尼亚乌克兰人在来自波兰、来自苏联和来自纳粹的三波急速浪潮中完成了政治化。

因此，至此时为止在加利西亚比在沃里尼亚更重要的OUN班德拉派在沃里尼亚开始了主要的武装行动。尽管突然创建的UPA是立足当地的、策略性的，但它的目标是全球性和战略性的。班德拉派反对纳粹和苏联占领乌克

兰，并且得出波兰人不可能成为乌克兰国家的少数民族的重要结论。很明显，班德拉派领导人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结果将是德国和俄国双方都筋疲力尽，而乌克兰的最终敌人是复兴的波兰。[40]OUN由参加西乌克兰-波兰战争的老兵创建，而其中的班德拉派集中了曾在20世纪30年代被囚禁在波兰的别廖扎-卡图斯卡集中营的年轻人。两代人深知，一旦有机会，波兰会向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派出军队。在他们看来，乌克兰必须创建军队，在战争期间出击，以防复兴的波兰像1918年之后那样再次从波兰中部派出部队和殖民者。[41]沃里尼亚乌克兰人被说服接受了相似的逻辑。一名沃里尼亚农民很容易把波兰人视作既定的殖民者，把波兰人的财产视作最大的奖励。

流亡的波兰政府和它的地下救国军很可能在考虑相似的结局，他们正好计划了类似的攻击。[42]他们发起战争是为了让波兰共和国的边界恢复到1939年，这个目标被波兰士兵视作理所当然，也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承诺。波兰政府不相信纳粹或苏联的进攻会让东部边界的更改合法化，他们认为任何妥协都会被解读为对莫斯科的让步。[43]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是可以接受的，但只能在苏联的领土内。从波兰人的角度来看，德国和苏联的精力被耗尽可以在东部打开一个缺口，波兰部队得以恢复战前状态——正当的状态。早在1941年，波兰指挥官就向伦敦方面解释说未来针对德国的起义可能包括一场与乌克兰人争夺加利西亚——可能还有沃里尼亚——的战争，如果可能的话，这场战争应该是一次快速的“武装占领”。[44]波兰救国军关于起义反抗德国的计划，就像1942年所规划的那样，预料到了这样一场战争。[45]到了1943年，乌克兰人和纳粹德国的合作使乌克兰游击队失去了作为波兰人潜在盟友的信誉；作为战前波兰边界的捍卫者，救国军领导人几乎不能向乌克兰人提供任何好处。[46]1943年，救国军开始在加利西亚筹建（尽管不是在沃里尼亚，因为那里几乎没有波兰人）。

波兰救国军和乌克兰起义军都计划着争夺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领土的快速出击。如果当时发生了和1918—1919年相同的波兰-乌克兰常规战争，那么谁先挑起了争端就会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OUN班德拉派在1943年初设想的针对先发制人的出击不是军事行动，而是种族清洗。正如我们所知，早在战争之前OUN就接受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思想，根据这套思想，乌克兰国家需要种族上的同质化，而只有通过消除乌克兰土地上的波兰人才能赶走波兰“占领者”。班德拉派和梅尔尼科派在原则上坚信相同的理念，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班德拉派的领导层相信，在1943年这样一场行动是可行的且可取的。从班德拉派的角度来看，德国人已经毁灭了犹太人；德国人和俄国人来去无痕，但是必须通过武力把波兰人从“乌克兰的土地上”清除掉。波兰支持者们希望重建旧秩序，而乌克兰支持者们向前一步，他们为迎接新秩序做好了准备。

屠杀

1943年春天，UPA从德国人手里夺得对沃里尼亚乡村地区的控制[47]，开始谋杀和驱逐波兰人。在沃里尼亚，波兰人太弱了，以至于连考虑先发制人也做不到。1939年，波兰人在沃里尼亚人口中比例最高时有16%（约有40万人），而到了194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8%（约为20万人）。[48]他们分散在乡村各处，波兰精英已经被流放了，除了德国没有其他国家权威能保护他们，他们也没有组织起当地的游击队。OUN班德拉派UPA对付这些波兰人的决定，只能被视作对平民的种族清洗。[49]在1943年全年，UPA分队和特殊安全部队杀害了落单的波兰人，在波兰人聚居地、村庄和乌克兰人村庄集中杀害波兰人。[50]为了对规模更大的波兰定居地发起攻击，UPA游击队员动员起了当地人口。

根据众多互相印证的报告，乌克兰游击队员和他们的盟友烧毁房屋，射杀或强迫那些试图逃跑者回到火海，用镰刀和干草叉杀死在外面抓到的波兰人。挤满礼拜者的教堂被全部焚毁。游击队员展示了被斩首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被肢解的、被掏出内脏的尸体，迫使剩下的波兰人逃离。[51]在混居区，UPA安全部队警告乌克兰人先逃走，然后在第二天杀死所有剩下的人。[52]UPA偶尔会自称是苏联游击队，和/或向波兰游击队提议一起攻击德国人。他们会以此为借口召集小镇会议，之后UPA会杀死所有聚集的人群。[53]UPA内部很欢迎种族清洗的政策，沃里尼亚的农民也支持这一政策。[54]UPA给住在混居村庄或小镇的乌克兰人提供物质诱惑，诱使他们参与屠杀他们的邻居的行动。很多乌克兰人却冒着生命危险（或失去生命）警告或庇护波兰人。[55]



图25：乌克兰起义军（UPA），时间很可能是1943年。

UPA游击队、UPA安全部队和乌克兰农民针对沃里尼亚波兰人的攻击大多发生在1943年3月到4月间、7月到8月间和12月末。到1943年7月为止，UPA收编了其他在沃里尼亚的乌克兰游击队，总计有约2万部队，能够横跨广阔的领土发起攻击行动。[56]UPA最早的一期报纸就在1943年7月出版，报纸上刊载说要让滞留在乌克兰的所有波兰人“可耻地死去”。[57]UPA成功地兑现了它的威胁。从1943年7月11日晚上到7月12日早晨，在12个小时内，UPA在167个地点发起攻击。这次攻击正好在东正教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庆祝日当天，而之前一次攻击被称为“波兰佬的血腥耶稣受难日”，还有一次攻击发生在圣诞节。由于罗马天主教比东方教派早一些庆祝圣诞节，因此圣诞节有效区分开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那一天波兰人都在易燃的木质教堂里。这些教堂被夷为平地，任何想要逃出来的波兰人会遭到射杀。1943年，UPA总计屠杀了4万到6万名沃里尼亚的波兰公民。[58]1943年发生的几次攻击是沃里尼亚犹太人大屠杀的第二阶段。在1942年冬天幸存下来的极少数沃里尼亚犹太人，其中一些人和波兰农民一起躲在沃里尼亚乡村。当UPA在1943年屠戮波兰人定居点时，犹太幸存者也因此丧生。[59]

1943年8月29日，一个波兰村庄的死亡

在上千个被破坏的沃里尼亚定居点中，有一处最有代表性。尽管在一个村庄发生的事件不能代表整个屠杀的规模，但是它能提供一种比概括综述更完整的规律感和时序感。1943年，沃里尼亚沃齐米日（Włodzimierz）区的格文钦斯基（Głęboczyca）村有大约70户波兰人家。村庄在19世纪末期建立，在波兰独立建国之前，这里被俄国统治时就已是波兰村庄。和周围邻近的乌克兰村庄很像，这里既不是特别繁荣，也不是特别贫穷。这里的村民依靠和邻村的贸易为生，参加了乌克兰合作社。在1939年到1941年间，格文钦斯基抵制集体化，并因此受到当地苏联当局的惩罚。从1941年夏天开始，这个村庄被置于德国人的统治下。和在苏联占领期一样，乌克兰人继续执掌权力，他们现在是德国警察和行者官了。乌克兰人拟定了一份强制成为德国劳力的名单，并尽可能选择波兰人。因此格文钦斯基大约半数的波兰家庭失去了他们最能干的男性。在为德国当局效力的小分队中，波兰人占了大多数。1942年夏天，德国和乌克兰警察搜查并谋杀了当地大部分犹太人。犹太人被单独或分成一小群带走，然后遭到射杀，当地的天主教信徒听见了（如果不是亲睹）屠杀过程。1943年春天，当地的乌克兰警察不再为德国人服务，转而加入了森林中的UPA。这些新加入的乌克兰游击队员攻击了一处德军驻队，抢走了他们的武器。

现在UPA控制了这片区域。波兰人几乎分不清UPA和德国的统治之间有何区别，因为还是同一批人带着同样的武器在控制当地。起先，UPA在格文钦斯基的权力行使并没有多大不同，只是这种权力行使更彻底了。UPA确保波兰人没有武器，记录下每户人家的家庭成员名单，搜寻房屋以确保没有波兰人逃走。供给任务被分配给波兰家庭；给UPA基地运送物资的波兰男性常常遭到谋杀。年轻的波兰男性——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有天分的——被单独谋杀，而且他们很明显是遭折磨致死。格文钦斯基的波兰人开始听到其他定居点遭屠戮的传言，到了晚上他们能看到远处村庄的熊熊大火。他们的总体感觉是这些传言太恐怖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而且就算是真的，也不可能发生在这里。[60]1943年8月，人们希望在需要逃跑前把庄家收割完。除了人们天然地拒绝相信不可思议的事情，以及农民完成秋收的意愿，这种满怀希望的打算还有三个来源。第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遥远，交流方式也很原始，因此人们会根据个人经验来做判断。第二，在其他受到攻击的地方几乎没有幸存者，幸存下来的人也会逃到比格文钦斯基更大的定居点。第三，当地的乌克兰人向他们保证像他们一样的“好波兰人”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使用不同的说法）遭到“残杀”。

就在1943年8月29日黎明前，UPA游击队员和邻村的乌克兰人包围了格文钦斯基，开始屠杀所有村民。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被团团围住，死在无数的镰刀下。因此而警惕起来的妻子们死在子弹或农具下。屠杀造成的骚动足以让人们警惕，一些人逃走了。但至少有185名波兰人被谋杀。其中一些人被斩首，一些人被绞死，另一些人惨遭剥皮，一些人的心脏被挖出来，

另一些人被活活烧死。很多人被农具劈成碎片。还有一些人遭到了以上提到的几种、大多数甚至是所有折磨。这座村庄被完全毁灭了，今天我们找不到一点儿它存在的痕迹。[61]

报复性合作

大多数在沃里尼亚恐怖中幸存下来的波兰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所爱之人经受的暴行还历历在目，这使得数万波兰人抓住了第一次为死者复仇的机会。波兰人有时在波兰救国军的帮助下，有时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大约100个自卫前哨站。[62]波兰自卫队击退了乌克兰人的几次袭击，而在一些更大的定居点——比如胡塔·斯塔潘斯卡（Huta Stepańska）——击退比例很可观。在一些记录下来的案例中，自卫队成了波兰人和乌克兰村庄讲和的基地。一些在1942年寻求波兰人庇护的犹太人，在1943年和他们一起逃了出来，也参加了自卫队。对波兰人甚至犹太人来说，德国人控制的小镇就像是沃里尼亚夏天的沙漠中相对平静的绿洲。[63]德国当局将波兰人当作劳力驱逐到第三帝国，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完全不是一件坏事。苏联游击队在这些小镇中招募队员——那些年轻的波兰人（很可能还有一些犹太人）想要和UPA作战，但他们需要武器。可能有5000~7000名当地波兰人在苏联游击小分队中作战。[64]

1943年初，UPA同时向纳粹和波兰人发起袭击，促使后者加入了彼此的武装力量。波兰人成为德国警察以发起对乌克兰人的报复行动。当沃里尼亚乌克兰人离开德国警队加入UPA后，德国人找到波兰人替代前者。在针对波兰人的大屠杀期间，要完成这项招募任务是很容易的。比方说，德国人向逃离UPA的格文钦斯基难民提供警察的工作岗位。一名来自佐夫约卡（Zofijówka）聚居地的波兰人在沃里尼亚的相同地区加入了德国警察，和他一起加入的还有在1943年7月11—12日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110人。他回忆道：“这都是为了得到武器。”[65]约有1200名波兰人在同一时期加入德国警察，但德国人误解了这个情况，以为是从波兰总督府召集了一个波兰警察营。波兰警察——无论是当地的外地的——对乌克兰人犯下了一系列暴行。[66]在远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看来，这些波兰警察是叛徒，但是身着德国制服的波兰人向乌克兰人复仇——这是沃里尼亚乌克兰人会相信UPA关于波兰敌人的宣传的可靠原因。

当然，UPA在屠杀波兰平民之前甚至没有机会寻求德国人的帮助。我们来看看自1943年4月起的UPA报告：“在舒姆斯基（Szumski）地区的库季（Kuty）村，一个完全由波兰人组成的聚居地（有86个农场）被烧毁，居民由于和盖世太保及德国当局合作而被清除。”“韦伯斯基（Werbski）地区的波兰人聚居地诺瓦诺维卡（Nowa Nowica）有40个农场，由于该地区与德国当局合作而被烧毁。所有人口被清除。”[67]那些以波兰人通敌为理

由，在4月杀害生活在波兰定居点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乌克兰人，他们自己才离开德国警察的岗位不久。如此，他们释放了一种此前从未预料到的魔鬼的逻辑。德国人的政策是杀掉任何擅离职守的乌克兰警官的家人，并摧毁任何带着武器离岗的乌克兰警官所在的村庄。通过发动新招募的波兰警察，德国人在所有可能的地方迅速展开这种报复行动。很多脱离德国警察而加入UPA的乌克兰人失去了家园和家人，他们找到了新的理由憎恨波兰人。到1943年夏天，通过波兰合作者来展开自那年春天开始的清洗行动已成为基本政策。正如OUN班德拉派一位领导人总结1943年8月的情况时所说，德国安全部队“用波兰佬来执行他们的破坏行动，为了报复，我们要无情地摧毁他们”[68]。

对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而言，沃里尼亚发生的悲剧对他们的战争计划是一次令人费解的扰乱。屠杀是无法预料的，而沃里尼亚波兰人的反应也是他们不希望的，他们需要专注于将波兰的利益当作整体的最高准则。即便在乌克兰没有战争前线，波兰指挥部依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困境。当红军在1943年春天转而进攻，并在夏天打破了德军在库尔斯克（Kursk）的坦克防线，苏联获胜的前景要成真了。作为盟军的一员，波兰政府理应部署救国军以协助苏联的推进。作为波兰利益的代表，波兰政府希望被人认为他们在解放波兰时起了作用。然而，波兰政府被迫重新配置他们有限的资源以应对和UPA的战争。1943年7月20日，波兰救国军召集波兰自卫队，将他们置于自己的领导下。1943年7月30日，救国军号召结束对平民的屠杀，并表达他们支持乌克兰在没有波兰人口的领土上独立。但这不仅没有使杀戮停止，反而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确信种族清洗是从波兰手上夺回领土的唯一途径。1944年1月，救国军建立了第27步兵师（沃里尼亚师），由6558名强壮的士兵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先和UPA作战，再和纳粹国防军作战。[69]沃里尼亚师——波兰救国军规模最大的部队——从保护平民不受UPA屠戮的波兰自卫队吸收力量，其中也有离开德国警察岗位的前波兰警察。如果没有UPA发动的种族清洗，沃里尼亚师原本不可能组建起来。[70]虽然波兰政府下令保护平民不受伤害，但是在战场上，波兰游击队烧毁乌克兰村庄，杀害他们在沃里尼亚道路上找到的乌克兰人。[71]

虽然在UPA暴行后，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加入了德国警察、苏联游击队和波兰救国军，但是波兰人依然是UPA有效的宣传资源。沃里尼亚波兰人和波兰政府被错误但有效地和苏联与纳粹的占领联系起来。让我们看看1943年8月OUN会议上的判断：“波兰帝国主义领导层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民族自由的敌人。它试图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强行安置波兰少数民族，造成波兰大众与乌克兰民族的斗争，并且帮助德国和苏联帝国主义根除乌克兰民族。”[72]1943年间，波兰自卫队确实和苏联游击队和德国军队合作，向UPA发起过攻击。[73]但在这个地方事实是有地方原因的。总体来说，我们不能认为波兰当局和波兰军队与纳粹或苏联“帝国主义”有合作。波兰救

国军自建立起就一直与德国人作战。虽然盟军的政策令波兰军队和苏联军队合作，但是在1943年前一切合作都未达成。1943年4月，斯大林非但没有和伦敦的波兰政府展开合作，反而抓住此前苏联在卡廷对波兰军官的大规模屠杀这个借口，断绝了合作关系。如果我们考虑到乌克兰民族主义政策，UPA的控诉也没好到哪里去。至于所谓“根除”，1943年，UPA借数万名在1942年帮助纳粹根除犹太人的游击队员之手，根除了波兰人在沃里尼亚的存在。而关于通敌的问题，更好的例子肯定是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不用说在加利西亚地区波兰总督府中，乌克兰人在当地行政职位上完全的统治性优势：在1944年初，他们和波兰人的比例是346：3。[74]然而，此类声明的目的是政治鼓动，我们必须把历史判断和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人们的经验区分开来。此类宣传在这一范围内塑造了当时乌克兰人的经验。

宣传利用了语言的力量，把特殊情况概括为一般情况；也利用了人们倾向于相信和他们个人经历一致的断言这一点。种族清洗部分糟糕的后果在于，它给某种恶行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以民族的名义谋杀个人，种族清洗者不仅羞辱、激怒了幸存者，使他们民族化，也使自己族群的成员成为民族主义报复的目标。一旦复仇实施，双方的幸存者都会把对方看作侵略者，宣传者会将双方呈现为不同民族。刚开始只是一小部分人针对局部地区的攻击，由于可预知的报复、民族主义词汇和语言的力量，这场攻击会演变为一场民族对民族的战争。这不是只有学者才知道的后现代诡计，它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真相，即种族清洗在整个20世纪被滥用了。UPA也理解他们所激起的个人苦难的强度与他们的宣传所创造的社会交流密度之间的关系。[75]在苏联和纳粹占领后，宣传的需求几乎无法被忽视。一旦这些需求被满足，它们就会让种族清洗变成内战。

内战

沃里尼亚是乌克兰-波兰内战开始的地方。发生在沃里尼亚的事件揭示了波兰人报复的凶残性，这给UPA提供了向南面——加利西亚——拓展种族清洗范围的宣传素材。在西面，跨过布格河的地区，乌克兰和波兰游击队的武装冲突异常残忍，又势均力敌。1943年末，双方把战前卢布林地区东半边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摧毁了。农民部队中的波兰游击队员以暴行回应UPA的暴行。一名波兰游击队员的证词值得在此长篇引用：“我们对他们的攻击做出无情的回击，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野蛮地步。当我们占领了一个乌克兰定居点，我们有计划地把所有战斗年纪的男人找出来，把他们处死，处死的方式是让他们跑在我们前面四十步的地方，然后从背后射杀他们。这被认为是最人道的方法了。我要描述的其他小分队的行为，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用的是很残忍的报复方式。但没有人尝试阻止他们。我从没看到过我们的人用刺刀刺起一个婴儿或小孩子把他们扔向火海，但是我看到过烧焦的波兰婴儿的尸体，他们就是这样死去的。如果我们没有做过

这件事，那这就是我们唯一没有犯下的罪行了。”[76]农民部队不是唯一一支在战场上屠杀乌克兰人、和UPA作战的波兰游击队。1944年春天，波兰救国军分队出发，以保障海乌姆地区的安全，并在行进过程中烧毁了20座乌克兰村庄。[77]在卢布林和热舒夫（Rzeszów）地区，1943—1944年间，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总计杀害了对方平民约5000人。[78]

1944年1月，UPA正式在加利西亚发起了清除“西乌克兰”的波兰人的行动。1943年在沃里尼亚，UPA的行为模式似乎是毫无预警地屠村和谋杀平民，而1944年在加利西亚，UPA的行为模式有时似乎是给波兰家庭提供逃离或死亡的选择。我们来看看UPA最高指挥官向它的士兵发出的一份指令，这份指令发布于沃里尼亚大屠杀后、加利西亚种族清洗时：“我再次提醒你们，首先呼吁波兰人放弃他们的土地，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清除他们，这个顺序不能反过来。”[79]情况明显改变了，人口统计学平衡更有利于波兰人，波兰人的自卫能力更强了，再加上救国军分队的动员和转移，加利西亚的波兰平民死亡人数限制在2.5万人。UPA针对加利西亚平民的攻击依然是有组织的，也依然是野蛮的。和在沃里尼亚一样，UPA小分队通常会杀死村里的每一个村民，连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UPA安全部队会在乡村地区走动，杀害遇到的波兰家庭和个人。[80]由于双方都遭到了无法控制的种族清洗，UPA宣布是波兰人开始了双方的互相屠杀。因为沃里尼亚地区的波兰人与德国人合作的事实，因为波兰政府命令救国军与红军合作的事实，UPA把所有波兰人当作“斯大林-希特勒的密探”。UPA宣称，乌克兰民族被波兰政府和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密探“在背后捅了一刀”。[81]

1944年3月，乌克兰警察在利沃夫检查那些敢在街上走动的年轻男性的身份证（由德国人签发），一旦发现是波兰人就把他们处死。如今人们相信他们是为了盗取这些身份证，希望在红军进驻利沃夫后不会因为自己是纳粹合作者而被惩罚。[82]换言之，和纳粹合作的乌克兰人希望用德国人的身份文件冒充波兰人，以躲避苏联人的报复。无论动机是什么，这些凶手被公认为城墙内新的恐怖来源，而那里曾是波兰人最安全之处。波兰游击队员在利沃夫郊区杀死了130名乌克兰平民。在邻近的乡村，UPA继续它的战略性清洗，希望围绕在利沃夫周围的领土在种族上是乌克兰的。UPA同时致力于控制利沃夫的道路，以阻挡西面的波兰援军。到1944年6月，UPA在加利西亚的每个区屠杀波兰平民并和波兰游击队作战。当红军接近时，波兰人从村庄和小镇撤离。庞大的苏德作战前线向西面推进并穿过乌克兰，救国军和UPA的作战前线也延展了几千英里。[83]1944年夏天，当红军向加利西亚推进，全面而无情的乌克兰-波兰内战正在激烈进行中。

世界大战

对大部分人来说，军事历史是局部的，我们只能理解那些专注在局部前线

作战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不是那些专注于前进中的红军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但是，即使要理解乌克兰-波兰内战对当地造成的后果，我们也必须将这场局部战争放在世界大战的语境中。当更大规模的战争接近时，局部冲突削弱了双方的力量，使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红军到来时已四分五裂。UPA对波兰平民的攻击激起2万多波兰人拿起武器反抗乌克兰人。波兰人作为德国警察、苏联游击队员、自卫队民兵和救国军分支成员，与乌克兰人作战。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则将救国军的力量从和德国的战争中转移过来。

1944年夏天，波兰“暴风雨行动”的目的是以波兰武装力量打败德国人，然后以独立波兰代表的身份等待苏联到来。从军事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反抗德国统治的起义；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它旨在让苏联人看到一个复兴的波兰国家。在东面，“暴风雨行动”意味着确认波兰在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合法地位。正是在这里，波兰的反德国起义第一次遇到了苏联方法。在和UPA以及撤退的纳粹国防军交战，又和红军合作后，救国军的沃里尼亚第27师在1944年3月到7月间，被苏联NKVD逐渐瓦解了。在1944年整个春天，救国军第5步兵师和第14骑士团与UPA作战争夺加利西亚，以及加利西亚“王冠上的珠宝”——利沃夫。在1944年7月23日到27日间，红军在几千名救国军士兵的协助下，把纳粹国防军赶出了城市。7月29日后，迫于苏联的压力，救国军分队解散了。[84]

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没有得到完成他们计划中的战斗的机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乌克兰争夺利沃夫的战争并没有一个结果。东面的波兰救国军被消灭了，而乌克兰游击队逃走了，留待改日再战。波兰-乌克兰争端并未因此熄灭：救国军老兵在流放时逃走了，加入齐格蒙特·贝林（Zygmunt Berling）[85]领导的由苏联控制的波兰军队；之后这支军队中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波兰人继续和乌克兰游击队作战，并将乌克兰平民从共产主义波兰流放出去。一些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波兰人加入苏联NKVD特别营，迅速展开对乌克兰人的报复。而躲藏中的UPA重新出现，开始在曾经没有被波及的前线地区对波兰人进行种族清洗。[86]苏联NKVD现在是一支应被考量在内的力量了，它把波兰和乌克兰游击队当作需要被消灭的“土匪”。[87]苏联警察如何使波兰-乌克兰的内战以机制化的波兰-乌克兰种族清洗结束，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大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在国外游说人们承认西乌克兰的地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乌克兰国家几乎不抱希望。他相信苏联下一次占领西乌克兰的时间将长达几十年，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当他在1944年11月1日于利沃夫逝世时，波兰-立陶宛王国仅存的政治传统也一同消失了。无论是共产主义的波兰还是苏维埃乌克兰，都对他所代表的政治传统毫无意义。希腊天主教在苏联被禁止了。斯大林允许俄国

东正教宣称西乌克兰人是其虔诚的信徒，并召开了一次傀儡宗教会议，宣布1569年布列斯特联盟是无效的。在共产主义波兰，希腊天主教是和现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和创造它的波兰-立陶宛王国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原因，直到今天，在利沃夫和华沙都没有一条以舍普季茨基命名的街道。

---

[1] 弗里德里希·保卢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陆军将领，其后晋升为元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希特勒的军事指令致使保卢斯本人率领的第6军团伤亡惨重。1943年，保卢斯向苏联投降，其后德军开始节节败退。

[2] Omer Bartov,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1986, 103及全书各处；Truman Anderson, “Incident at Baranivka,”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1 (1999), 585—623; 关于这一文献的指导，见Rolf-Dieter Müller and Gerd Ueberschar, Hitler’s War in the East, Providence, R.I.: Berghahn Books, 1997。

[3] Jan Gross,Revolution from Abroa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31; Volodomyr Kubiiovych, Ukraintsi v Heneralnii Hubernii, Chicago: Denisiuk, 1975, 17. 两次大战间波兰的其他公民——包括白俄罗斯人和一些波兰农民——一开始也欢迎入侵波兰者。Jan Gross,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140; Marek Wierzbicki, Polacy i Białorusini w zaborze sowieckim, Warsaw: Volumen, 2000, 51.关于犹太人，见Ben-Cion Pinchuk, Shtetl Jews under Soviet Rule, Oxford: Blackwell, 5—27; David Engel, “The Wartime Journal of Calel Perechodnik,” Polin, 12 (1999), 320—321。

[4] Kubiiovych,Ukraintsi v Heneralnii Hubernii, 49, 197, 280 and passim; I. I. Il’iushyn, OUN 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v roky druhoi svitovoi viiny, Kyiv: PAN Ukrainy, 2000, 35.

[5] Ryszard Torzecki,Polacy i Ukraińcy, Warsaw: PWN, 1993, 259—260.

[6] Wołodymyr Trofymowicz, “Role Niemiec i Zwia ̨zku Sowieckiego w konflikcie ukraińskopolskim,” in 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nia, vol. 5, Warsaw: Karta, 1999, 193-220; Grzegorz Mazur, “Rola Niemiec i Zwi ązku Sowieckiego w polsko-ukraińskim kon-flikcie narodowoś ciowym,”同上书，221-234。

[7] Gross,Revolution from Abroad, 146 and 69.

[8] Kubiiovych,Ukraintsi v Heneralnii Hubernii，关于委员会的特征，见102-103; 关于让犹太人和波兰人重新定居的提议，422-423。

[9] “生存空间”是189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提出的，他利用生物学概念和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国家比拟为有生命的有机体，如同生物一样，国家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因此他认为一个健全的国家通过扩张领土来增加生存空间是必然现象。

[10] Czesław Madajczyk et al., eds., Zamojszczyzna: Sonderlaboratorium SS, Vol. 2, Warsaw: Ludowa Spółdzielnia Wydawnicza, 1977, 125, 224, and passim; Grzegorz Motyka, 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Warsaw: Volumen, 1999, 134-137.

[11] Grzegorz Hryciuk,Polacy w Lwowie 1939-1944, Warsaw: KiW, 2000, 59.

[12] 关于纳粹的种族清洗，见Christopher Browning,Nazi Policy, Jewish Workers, German Kill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5。关于德国人的模型，见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48。

[13] O.A. Gorlanov and A.B. Roginskii, “Ob arestakh v zapadn’ykh oblastiakh Belorussii i Ukrain’y v 1939-1941 gg.,” Repressii protiv poliakov i pol’skykh grazhdan, Moscow: Memorial,1997, 96及全书各处；Piotr Eberhardt, Między Rosją a Niemcami, Warsaw: PWN, 1996, 180。关于犹太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比例，见Jan Gross, Upiorna dekada, Cracow: Universitas,1998, 83。更高的估计值，见“Sprawozdanie z dyskusji dotyczaj ącej liczby obywateli polskich wywiezonych do Zwi ązku Sowieckiego w latach 1939-1041,” Studia z Dziejów Rosji i EuropyŚrodkowej, 30, 1, (1996), 117-148。根据苏联文件，最小数值330000是得到确认的；现在的问题是还有几万人或几百万人由于外界因素被驱逐，比如战犯或强迫劳动等。

[14] 关于纳粹的宣传，见Dieter Pohl,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Munich: Oldenbourg, 1996, 55-60。关于NKVD中犹太人的数量（1938—1939年在不断减少），见Nikita Petrov, Kto rukovodil NKVD, 1934-1941, Moscow: Zven’ia, 1999。又见Gross, Upiorna dekada, 80-93; Hryciuk, Polacy w Lwowie, 204-205。关于在东部波兰的另一部分，被波兰人杀害的犹太人，见Jan Gross, Neighbo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乌克兰人大屠杀，见Shmuel Spector, The Hol caust of Volhynian Jews, Jerusalem: Yad Vashem, 1990, 64-69。

[15] 关于纳粹在乌克兰的种族分类，对此敏锐的研究有：Kate Brown, “A

Biography of No Pla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9。

[16] John Armstrong,Ukrainian Nationalism, Englewood, N.J.: Ukrainian Academic Press, 1990, 162; Peter Potichnyj, "Ukrainians in World War II Military Formations,"1999, 可参阅www.infoukes.com/upa/related/military.html; 以及下方罗列的资料来源。

[17] 据一位沃里尼亚的波兰人的回忆，大屠杀"展现了波兰人的人性，或者由此而来的人性缺失"。II/1328/2k, 20, AWKW.

[18] Spector,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358.

[19] Martin Dean, "The German Gendarmerie, the Ukrainian Schutzmannschaft, and the 'Second Wave' of Jewish Killings in Occupied Ukraine," German History, 14, 2 (1996), 179.

[20] 海因里希·希姆莱（1900—1945），纳粹德国的重要政治头目，曾担任内政部长、党卫队首领，被认为对犹太人大屠杀和党卫队战争罪行负有主要责任。

[21] Paul Robert Magocsi,A History of Ukrain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632.

[22] 关于奥斯特罗赫的"最终解决方案"，见Spector,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115, 371。关于汉诺威和奥斯特罗赫，见Gershon Hundert, "The Love of Learning among Polish Jews," in Lawrence Fine, ed., Judaism in Practi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5。

[23] Spector,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172-187. 又见Martin Dean, Collaboration in the Holocaust,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 Compare Browning, Nazi Policy, 152。

[24] "Dii UPA v 1943 rotsi,"Litopys UPA, Vol. 2, 225; Herasym Khvylia, "V lavakh UPA na Volyni," in Petro Mirchuk and V. Davidenko, eds., V riadakh UPA, New York: Dnipro, 1957, 3032; Ryszard Torzecki, Polacy i Ukraińcy, Warsaw: PWN, 1993, 235, 258.

[25] Andrzej Paczkowski,Pół wieku dziejów Polski, Warsaw: PWN, 1996, 25-26.

[26] 囚监（Kapo），指被纳粹党卫队委任监督集中营的劳工工作、承担管理任务的犯人。囚监的设立降低了党卫队监工的人力需求，建立了一种受害者相互对抗的自我管理机制。

[27] 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89.

[28] O.S. Sadovyi, “Kudy priamuiut’ poliaky?”Litopys UPA, Vol. 2, 52; 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107.

[29] 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109.

[30] 见Gross,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33-139。

[31] 这次分裂是由NKVD在1938年对OUN领导人Konovalets’的暗杀造成的。根据暗杀者Pavel Sudoplatov所说，分裂OUN出于斯大林的意愿。Pavel and Anatoli Sudoplatov,Special Task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95, 7-29. 又见Wolodymyr Kosyk, L’Allemagne national-socialiste et L’Ukrain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Est Européen, 1986, 74-79, 290; Alexander Motyl, The Turn to the Right,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0, 138ff。

[32] 比较Mykola Lebed’,Ukrains’ka povstans’ka armiia, Drohobych, 1987, 53; Taras Bul’ba, Armiia bez derzhavy, L’viv: Poklyk sumlinnia, 1993, 272; 以及Petro Balei, Fronda Stepana Bandery v OUN 1940 roku, Kyiv: TeknaA/T, 1996, 141。

[33] 我们应注意到一份来自UPA安全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将一个多月里在某个沃里尼亚小型军区里的被处决者进行分类。其中共有110名受害者，最少有68人是乌克兰人。Litopys UPA, Vol. 2 (new series), 312.

[34] 列别德的提议引自Balei,Fronda Stepana Bandery v OUN 1940 roku, 141。又见OUN UPA v roky viiny, 289。

[35] 关于招募，见Armstrong,Ukrainian Nationalism, 126-132; Kosyk, L’Allemagne nation al-socialiste et l’Ukraine, 369; Torzecki, Polacy i Ukraińcy, 247。关于舍普季茨基，见Stanisław Stępień, “Stanowisko Metropolity Szeptyckiego wobec zjawiska terroru poli- tyckiego,” in Andrzej Zięba, ed., Metropolita Andrzej Szeptycki, Cracow: Polska Akademia Nauk, 1994, 110-118; Iwan Hirnyj, “Mojeświadectwo,”同上书，207-210; Bohdan Budurowycz, “Sheptyts’kyi an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after 1914,” in Paul Robert Magocsi, ed., Morality and Reality, Edmonton-CIUS, 1989, 63-64; Hansjakob Stehle, “Sheptyts’kyi and the German Regime,”同上书，127, 137; Shimon Redlich, “Sheptyts’kyi and the Jews,”同上书，145-164。

[36] Władyslaw Filar, Michał Klimecki, and Mychalo Szwahaluk, “Chronologia wydarzeń na Wołyniu i Galicji w latach 1939-1945,”未出版，

Warsaw 1999; 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124-126。

[37] Torzecki,Polacy i Ukraińcy, 252.

[38] “Postanovy III. Konferentsii Orhanizatsii Ukrains’kykh Natsionalistiv Samostiinikiv Derzhavnikiv, 17-21 livtoho 1943 r.,” OUN v svitli postanov Velykykh Zboriv, 81-83, 88. 波兰观察者们可以发现这种转变：II/1321/2k and II/1328/2k, AWKW。

[39] M. Omeliusik, “UPA na Volyni w 1943 rotsi,”Litopys UPA, Vol. 1, 23-26; Rostyslav Voloshyn, “Na shliakakh zbroinoi borot’by,”同上书，Vol. 2, 19-24; Mykola Lebed’, Ukrains’ka povstans’ka armiia, Drohobych, 1987, 53; Oleksandr Vovk, “Preface,” Litopys UPA, Vol. 2 (new series), xxxix–xl。又见Taras Bul’ba, Armiia bez derzhavy, L’viv: Poklyk sumlinnia, 1993, 272; Eksterminacja ludności polskiej na Wołyniu, 37, 71; “Niemcy a UPA: Dokumenty,” Karta, 23, 1997, 54-73; Tadeusz Piotrowski, Poland’s Holocaust,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 1998, 246-247。

[40] 从一开始，UPA在沃里尼亚的指挥官就把德国人、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人当作“乌克兰的敌人”。Volodymyr Makar, “Pivnichno-zakhidni ukrains’kizemli” (May 1943), Litopys UPA,Vol. 5, 15.

[41] 关于政治目的：“Chas ne zhde,” reprint from UPA organ Samostiinist’, 22-29 January 1944; “Politychna deklaratsia UPA,” September 1943; “Za shcho boret’sia Ukrains’ka povstancha armiia?”, August 1943; all three documents in Litopys UPA, Vol. 1, respectively 105-110, 121-126, 126-130;也见“Uvoiennomukrutizhi,”同上书，Vol.2,77–81。关于为清洗波兰人所作的战略性辩解，见For strategic justifications of the cleansing of Poles, Eksterminacja ludności polskiej na Wołyniu, 85。波兰救国军指挥官知道乌克兰人抱着“德国人可能离开，但波兰人会留下来”的态度。Grzegorz Motyka, “Od Wołynia do akcji ‘Wisła’,” Więź 473 (1998),110; Armstrong, Ukrainian Nationalism, 158.

[42] Armia Krajowa w Dokumentach, Vol. 2, 8 and 202-203.

[43] 同上书，Vol. 1, 318; “Przynależność ziem wschodnich do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zesz. A.9.V., tecz, 39; “Tajne,”3 August 1943,” zesz. A.9.V., tecz. 34, MSW, AMPN。关于波兰人离开加利西亚，见Dzieje Konfliktów,Vol. 2, 231–240。

[44] Meldunek 89, Radiogram No. M.89, L.dz. 78/42, “Meldunek specjalny——Sprawa Ukraińska,” Rówecki to Sikorski, 15 November 1941, Oddział VI,

sygn. 3.2.2.2.2, SPPL. Armia Krajowa w Dokumentach第2卷中的这份报告，第142页缺失了几行重要的文字。

[45] Armia Krajowa w Dokumentach, Vol. 2, 277-278, 328-330, 337-338.

[46] Dzieje Konfliktów,Vol. 2, 29-230; Michael Mac Queen, “The Polish Home Army and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1939-1943,”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3, 56, 60ff.; Ryszard Torzecki, “Kontakty polsko-ukraińskie w polityce polskiego rz ądu emigracyjnego i podziemia (1939–1944),” Dzieje Najnowsze, 13, 1–2, 1981, 332及全书各处。

[47] Kosyk,L’Allemagne national-socialiste et l’Ukraine, 333-339.

[48] 1931年的波兰人口普查显示，在沃伦省，有396200人的第一语言是波兰语，有356300人的信仰罗马天主教。在战争时期，这一比例所有下降的原因是1939-1941年间的大驱逐，1941—1943年德国人强迫征用劳动力，苏联人和德国人进行的处决，战斗死亡以及疾病。

[49] 人们认为，波兰人对德国人殖民化前卢布林领地以及波兰总督府的部分领地采取的行动，导致了这次种族清洗。沃里尼亚发生的清洗是一次大规模的协同行动，数万名波兰人被杀害，而曾属于前卢布林领地的海乌姆（Chełm）就有数千人死亡。

[50] 一位前UPA安全部队成员回忆起苏联审讯的总体准则：“杀光现场所有的波兰人、捷克人和犹太人。”Protokol Doprosa for I.I. Iavorskii, 14 April 1944, GARF, fond R-9478, opis 1,delo 398.

[51] 关于波兰的文件：II/36, II/2110, II/1142, II/594, II/1146, II/1172, II/2353, II/ 2660, II/2667, II/2506, II/2451, II/2451/3-8, II/2373, II/1914, II/1338/kw, II/1216, II/ 265, II/1875, AWKW。关于1943年7月的大屠杀：II/737, II/1144, II/2099, II/ 2650, II/953, II/775, AWKW。波兰人的报告，见Poselstwo RP to MSZ in London, 24 February 1944, Zespol A.9.V., tecz, 8B,AMPN。德国人的报告，见Eksterminacja ludności polskiej na Wokyniu, 34, 74; 又见Torzecki, Polacy i Ukraińcy, 262-263。苏联人的报告，见Represyvno-Karal’na Systema, 383; OUN-UPA v roky viiny, 31, 55。

[52] Protokol Doprosa for V.E. Stupak, 30 September 1944, GARF, fond R-9478, opis 1, delo 398.

[53] Ewa and Władysław Siemaszko, “Mordy ukraińskie w czasie II wojny światowej,” in Krzysztof Jasiewicz, ed., Europe nie prowincjonalna, Warsaw:

Rytm, 1999r, 1047.

[54] Litopys UPA, Vol. 2 (new series), 284ff.; Torzecki, Polacy i Ukrain´cy, 238.

[55] 在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援救波兰人的例子：II/17, II/63t, II/1914, II/2110, II/106t, II/1286/2k, II/209, II/1350/2k, II/2650, II/996, II/1216, II/1328/2k, II/737, AWKW。

[56] UPA军事力量，见Władysław Filar, “Burza” na Wolyniu, Warsaw: Rytm, 1997, 35。

[57] “Za shcho boretsia UPA,”Do zbroii, 1, 1 (July 1943), in Litopys UPA, Vol. 1 (new series), 7-8.

[58] 这一估计来自Grzegorz Hryciuk的计算：“Straty ludności na Wołyniu w latach 1941-1944,” 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nia, Vol. 5, Warsaw: Karta, 1999, 278。一位希望了解在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东部被杀害的波兰人姓名的研究者可以从以下资料开始：Archiwum Wschodnie Ośrodku “Karta,” Archiwum Głównej Komisji Badania Przeciwko Narodowi Polskiemu, Stowarzyszenie Upamiętnienia Polaków Pomordowanych na Wołyniu, Stowarzyszenie Upamiętnienia Ofiar Zbrodni Ukraińskich Nacjonalistów, and the Archiwum Środowiska Żolnierzy 27 Wołynskiej Dywizji Armii Krajowej, 以及上文和下文提到的档案或印制资料。

[59] Spector,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250-251.

[60] 比较波兰犹太人对其他城市的犹太人区被清除的反应。Calel Perechodnik,Czy ja jestem mordercą? Warsaw: Znak, 1995.

[61] II/2451/4, II/2451/5, II/2451/6, II/2451/7, AWKW; 证人之间的关系也汇集在Śladami ludobojstwa, 350-367, 379-381; 以及Świadkowie mówią, Warsaw: Światowy Zwi ązek Ż olnierzy AK, 1996, 45-48。

[62] Motyka, 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164.

[63] 关于自卫，见II/13562/kw, II/1350/2k, II/1363, II/737, AWKW。关于波兰人对乌克兰人的攻击，见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88-90。关于在潘思卡·多利纳（Pańska Dolina）的犹太人，见Olgierd Kowalski的自传，AWKW。又见下文（注释67）引用Klimecki and Strilka的文章。

[64] 这一章在波兰被遗忘了，对此赫鲁晓夫向斯大林表示否认。但是AWKW (II/1328/2k)的记录和波兰地下档案（伦敦）的AK报告记录了这件事，Jeffrey

Burds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血和泪的海洋》（A Sea of Blood and Tears）中基于苏联方面的资料对此进行讨论。这一数量估计来自Mazur, “Rola Niemiec i Związku Sowieckiego,”224。

[65] II/1877, AWKW. 有时候波兰人能得到他们要求的武器，有时候他们得不到。比较II/737, II/996, II/1371/2k II/1350/2k, II/1356/2k, AWKW。

[66] Grzegorz Motyka, “Polski policjant na Wolyniu,Karta, 24, 1998, 126-128.

[67] “Zvit pro boiovi dii UPA na Volyni,” [April 1943] ,OUN-UPA v roky viiny 309 – 312, at 311.

[68] Vasyl’ Makar, “Do pochatkiv UPA-list z Volyni,” Litopys UPA, Vol. 2, 44. 同一卷（173—174）的报告清楚地表明UPA的情报部门已经意识到把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当作德国人来对待是不正确的。关于这种报复循环，见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68。

[69] Ministerstwo Obrony Narodowej, Biuro Ministra-Wydział Polityczny, L.dz. 1900/WPol/44, London, 8 January 1944, Oddzial VI, sygn. 3.3.3.13.2 (36); Sztab Naczelnego Wodza, Oddział Specjalny, L.dz.719/Tjn.44, London, 28 January 1944, Oddzial VI, sygn. 3.3.3.13.2 (37); Sztab Naczelnego Wodza, Oddział Specjalny, L.dz.2366/tjn.43, 17 May 1943, Oddział VI, sygn. 3.1.3.3.2 (34); Sztab Naczelnego Wodza, Oddział Specjalny, L.dz.108/Tjn.44, London, 8 January 1944, Oddział VI, sygn. 3.1.1.13.2 (22), SPPL. 又见Stefan Korbonski, The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5; Mykola Syvits’kyi, “Pol’s’ko-ukrainskyi konflikt 1943-1944 rr.,” in Pol’s’ko-Ukrains’ki studii, Kyiv: Lybid’, 1993, 241-248; Agnieszka Cieślowska, Prasa okupowanego Lwowa, Warsaw: Neriton, 160-162。

[70] 沃里尼亚师的一名士兵对此很清楚：II/737, AWKW。我和其他退伍老兵的对话也证实了我的观点。

[71] Michał Klimecki, “Geneza i organizacja polskiej samoobrony na Wołyniu i w Małopolsce Wschodnej podczas II wojny światowej,” in 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nia, Vol. 4, Warsaw: Karta, 1998, 70; Roman Striłka, “Geneza polskiej samoobrony na Wołyniu i jej roli w obronie ludności polskiej,”同上书，82; Litopys UPA, Vol. 2, 192-194。

[72] Political Resolution 13, Third Extraordinary Congress of the OUN, 21–25 August 1943, in OUN v svitli postanov Velykykh Zboriv, 117–118.

[73] 相应的例子，见II/1350/2k and II/737, AWKW。

[74] Gross,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41.

[75] 关于这种密度之大，见Litopys UPA, Vol. 2 (new series), 283–289, 296–299。论据改写自Karl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66。

[76] Waldemar Lotnik,Nine Lives, London: Serif, 1999, 59.

[77] 这一地区的村庄之后向赫鲁晓夫请愿加入苏联。Etnichni mezhi i derzhavnyi kordon Ukrainy, 147-151.

[78] 这一估计引自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乌克兰人的回忆和受害者名单，见Dzieje Konfliktów,Vol. 3, 249-250。

[79] “Niemcy a UPA: Dokumenty,”71.

[80] 相关估计，见Gregorz Hryciuk, “Straty ludności w Galicji Wschodniej w latach 1941-46,” 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nia, Vol. 6, Warsaw: Karta, 2000, 294; 又见Ryszard Kotarba,“Zbrodnie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w województwie tarnopolskim,”同上书，267。关于加利西亚清洗的回忆，见II/17, II/1758/j, II/2266/p, II/94/t, II/1286/2kw, II/1322/2kw, AWKW。又见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113。

[81] Sadovyi, “Kudy priamuiut’ poliaky?”Litopys UPA, Vol. 2, 49, 57.

[82] Hryciuk,Polacy w Lwowie, 256–257.

[83] 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125-126; Povstans’ki mohyly, 144-162.

[84] Korbonski,Underground State, 158-159; Władysław Filar, “27 WDP AK w Operacji Kowelskiej,” Przegląd Wschodni, 4, 1 (1997), 217-218.

[85] 齐格蒙特·贝林（1896—1980），波兰将军和政治家。在“二战”期间，他因擅离职守而被叛死刑。当时流亡中的波兰政府推翻了这个裁决。之后他担任波兰第一人民军指挥官，并在战后的波兰政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86] Serhii Tkachov,Pol’s’ko-Ukrains’kii transfer naselennia 1944–1946rr, Ternopil’: Pidruch- nyky i Posibnyky, 1997, 123-155.

[87] NKWD o Polsce i Polakach; Vostochnaia Evropa, Vol. 1, 426及全书各处；Teczka specjalna J. W. Stalina, 248, 492, 及全书各处。

第9章

波兰东南部的种族清洗（1945—1947）

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大多数民族主义者把波兰的斯拉夫少数民族当作可同化的素材。1935年约瑟夫·毕苏斯基去世后，罗曼·德莫夫斯基的完全民族主义在政治和社会讨论中取得胜利，毕苏斯基独裁的副官们都奉行这种观念。德国和苏联的占领使解决民族问题的极端方法进入人们的视野。甚至在1943年乌克兰人开始大规模屠杀波兰人之前，一些秉持德莫夫斯基的民族民主党传统的民族主义者渴望赶走波兰土地上的每一个乌克兰人。1943年后，拥有其他政治目标的政治家也得出结论，认为驱逐是把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让渡给乌克兰人的唯一交换条件。如此，战时计划的设想是在战前波兰的边界内，把东部地区的500万乌克兰人驱逐出境，把在苏联和独立乌克兰国家的波兰人带回来。[1]类似种族纯洁性的设想迷住了被占领的东欧，那些比波兰人遭受的痛苦要少得多的民族，他们的领导人计划着完全驱逐敌对人口。比方说，民主捷克政治家们当时正向盟国征求对完全驱逐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支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相似，这股趋势吸引了整个政治光谱上的政治家，从极右翼到极左翼。波兰共产主义者曾是极端国际主义者，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默默放弃了原计划中的对少数民族的支持。[2]在波兰遭到摧毁的极端环境中，左翼和右翼碰面了。在波兰被红军占领的极端环境中，他们在莫斯科会面。

旧民族民主党人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与当时的波兰总理斯坦尼斯拉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1901—1966）、波兰代表团（代表伦敦的流亡政府）一起，在1944年8月和10月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面。格拉布斯基在1921年的里加会议中帮助波兰确认了边界，在1924年帮助制定了民族同化的政策，他希望在1944年能对重塑波兰施加影响。[3]不言而喻，斯大林当时利用了格拉布斯基，他在波兰右翼中极富权威。格拉布斯基也在利用斯大林。想一想在1921年的里加，当时格拉布斯基的个人成功建立在让渡给苏联比他们要求的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领土之上。格拉布斯基以民族民主党的传统行事，他习惯于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边界中创建一个民族，并且习惯于把德国而不是俄国看作更大的敌人。他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计划是很现实的，并称斯大林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斯大林称格拉布斯基是一位“了不起的煽动者”。[4]1944年夏天，红军已经抵达利沃夫，格拉布斯基估计可以说服斯大林在战后欧洲的地图上划定一个紧凑而同质化的波兰。事实上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关于斯大林和格拉布斯基的交锋中谁更胜一筹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评价的是20

世纪40年代末的波兰还是80年代末的波兰：在40年代末共产主义已经掌权，并且设立了相称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在80年代末的波兰，整个民族社会中几乎没有少数民族获得主权。

1944年夏天揭示了波兰左翼某种包容传统的失败，以及波兰共产主义者愿意接受波兰民族主义者长期推动的民族性观点。最重要的例子是旺达·瓦斯柳斯卡（Wanda Wasilewska，1905—1964），她是当时深受斯大林关注的波兰共产主义者。恰巧，瓦斯柳斯卡是列昂·瓦斯柳斯卡（Leon Wasilewska）的女儿，后者正是那位波兰联邦主义者，也是毕苏斯基的盟友，在1921年的里加，格拉布斯基以策略胜过他。列昂·瓦斯柳斯卡是独立的波兰的第一位外交部部长，他对民族宽容的支持为其赢得了很高的历史声望；而他的女儿——一位红军上校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妻子——在苏联制定的试图重新开始波兰和乌克兰历史的流放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斯大林把这称为“辩证法”，尽管实际上他简单地将这位父亲视作“反对我们”的人，而将他的女儿视作“支持我们”的人。[5]而1921年到1944年间传统爱国主义的崩溃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引起我们更大的兴趣。在1921年，民族主义者格拉布斯基以策略胜过那位父亲——联邦主义者瓦斯柳斯卡；在1944年民族主义者格拉布斯基的观点和共产主义者瓦斯柳斯卡的观点在功能上是一致的。如果瓦斯柳斯卡在1944年开拓的战后波兰共产主义中确实存在一种综合，那就是综合了民族民主党人传统的民族性观念和共产主义者服从苏联的传统观念。

到1944年，波兰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同意民族性存在于人民本身，而不是在精英保留的传统中。波兰政治中所有联邦、自治和包容的提议都源于一种预设，即民族群体中的精英会在理智的支配下形成一个共和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时不时地）由约瑟夫·毕苏斯基、列昂·瓦斯柳斯卡和恩里克·约瑟夫斯基所代表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遗迹，甚至在两次大战间波兰温和的大众政治中也被证明是无法维持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民族民主党人认为存在于人民中的民族性是同质化的。当然，在1944年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绝不是一种民主概念。民族性既能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体，也能让他们成为客体。如果民族性存在于人民本身，而民族问题是由于人民和领土的不匹配所造成的，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移开人民。无论是计划统治波兰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关心如何创造民族社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都认同这种论证。虽然瓦斯柳斯卡说格拉布斯基“老糊涂了”，但是他们在1944年和1945年的行动非常协调一致。格拉布斯基向斯大林提议让波兰的乌克兰人全部定居到别处；瓦斯柳斯卡签署了关于重新定居的条约；格拉布斯基为波兰政府设计了一套实施计划。瓦斯柳斯卡在莫斯科帮助“遣返”波兰人回到波兰；格拉布斯基去利沃夫敦促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接受现实，趁早离开。[6]

诚然，格拉布斯基和瓦斯柳斯卡对波兰有不同的计划。格拉布斯基希望波兰保留一定程度的主权，他在1949年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后死于波兰。瓦斯柳斯卡接受波兰成为苏联附属国的事实，从此再没有回到故乡。战后波兰政治史将在这些重要的分歧上展开。[7]在我们关于波兰民族性的历史中，关键是失去权力的右翼民族主义和获得权力的左翼共产主义者不再为一个波兰人的波兰而争论。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少数民族对左翼和右翼的意义是不同的，但它们引导着同一个政体，在其中，少数民族的存在是理所应当的。如今，它们的消失不见是理所应当的。1944年，在重要协议的所有问题隐形不见之前，在已实施的政策获得合法性之前，我们会发现一种有关民族同质性的共识的诞生。

苏联政策的民族边界

那么斯大林对波兰和乌克兰的战后政策是什么呢？斯大林在两次大战间、战时和战后的决议与文件揭示了他意识到民族主义者和人口附加在特定领土上的重要性。苏联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祖国之战”。斯大林告诉格拉布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波兰推到“斯拉夫民族”的前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会让乌克兰遇到类似的情况。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向波兰施加的民族统一主义是在种族意义上的“西白俄罗斯亚”和“西乌克兰”的框架内制定的。1939年，当苏联占领了之后成为西乌克兰的领土时，当时宣传机构无耻地声称同一血脉的兄弟团聚了，古老的乌克兰土地统一了，利沃夫是乌克兰古老的城市，等等。在1941年德国人入侵后，赫鲁晓夫告诉“伟大的乌克兰人民”，他们的选择是“一个自由的乌克兰”或“希特勒的压迫”。[8]当红军在1944年把纳粹国防军赶出乌克兰时，当乌克兰应征士兵取代了数百万伤亡士兵时，这种民族主义修辞以更强烈的形式再次出现。[9]和致力于获得种族胜利的纳粹政权进行了三年极度血腥的战争，又获知了关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地区乌克兰-波兰冲突的接连数月的报道，在这些情形的影响之下，苏联改变了对乌克兰的民族性政策。[10]到1944年为止，斯大林似乎已经得出结论，种族同质性和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约定的国家边界能使统治波兰和乌克兰变得更容易。赫鲁晓夫告知斯大林OUN和UPA的抵抗规模后，后者可能得出推论：把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还给苏维埃乌克兰或许有助于团结乌克兰民族主义阵营。[11]斯大林也许看到了一种方法，给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各自想要的东西，同时把这些东西捆绑在苏联周围。波兰人能够得到他们的“民族国家”，乌克兰人能够得到他们的“西乌克兰”，而这一切都将被记为斯大林的功绩。为了自己的利益，斯大林希望在他有机会的情况下解决掉任何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亚未解决的民族主义问题。[12]

虽然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和一些波兰共产主义者）恳求得到利沃夫，但他们没有任何得到利沃夫的可能。斯大林似乎明白把这座城市给乌克兰，而

不是波兰，能获得更多的好处。[13]此外，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曾在1939年和1941年间归入苏维埃乌克兰，而重新恢复1939—1941年边界是斯大林最明显的战争目标。波兰将成为一个非常紧凑的国家，而利沃夫和维尔纽斯将重归苏联。[14]在1943年的德黑兰，斯大林得到盟国同意，恢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约定的国界。在红军穿过原波兰-苏联边界后不久，1944年2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公开认可苏联在西部的领土野心。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丘吉尔在场时告知米科瓦伊奇克和格拉布斯基关于恢复1941年边界的《德黑兰协议》。[15]米科瓦伊奇克拒绝接受这一事态，但是斯大林已经用他自己的方式使新边界合法化了。1944年7月，斯大林和他的傀儡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了秘密协约，协约将苏联-波兰边界向西面推进，和1939年边界十分相似。[16]1944年11月，米科瓦伊奇克政府在利沃夫问题上做出让步。

在苏联方面来说，1944年的新奇之处并非把波兰领土归入苏联共和国——这是1939年的政策——而是由民族性定义的人口的交换。1944年9月，苏维埃乌克兰-波兰“撤离”协议规定波兰人和犹太人从之后变成西乌克兰的地方撤出，定居别处，而共产主义波兰的乌克兰人也要到别处定居。[17]类似的协议规定了波兰、苏维埃立陶宛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之间的人口交换。诚然，这些“遣返协议”（正如它们广为人知的那样）必须在当时普遍惯例的背景下来看待。西方盟国假设战争的结束会伴随着边界变动和大规模人口迁移。斯大林想当然地认为战争的结束会使大量德国人被驱逐，并假定他们逃离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时不会得到苏联的协助。就像他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所说的：“我们不会挡你的道，把他们都赶出去吧。”[18]

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夸大这个案例。斯大林在种族同质性上的利益是有限的。驱逐苏联境内的波兰人仅仅关乎属于1939年前的部分波兰领土上的波兰人。而向苏联的驱逐对波兰本身来说是很有限的。假如斯大林对他的新卫星国的种族纯洁性有着狂热的兴趣，那么人们也许更能理解他在战后的流放政策。毕竟，1944—1946年的罗马尼亚（有匈牙利少数民族）、捷克斯洛伐克（有匈牙利少数民族）和匈牙利（1938年后，匈牙利作为德国盟友获得了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匈牙利试图保有这些领土以保证那些国家的匈牙利人不会成为少数民族）的民族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些国家的民主和共产主义政治家也请求斯大林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斯大林似乎选择“解决”由于种族清洗而恶化的民族问题，即波兰和乌克兰的问题，而非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制造民族同质性。莫洛托夫敦促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跟随苏维埃乌克兰-波兰、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波兰和苏维埃立陶宛-波兰的重新定居的模式，但是苏联无论如何也不会强制推行这个模式。匈牙利反对迁移匈牙利少数民族，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越往南面的民族问题，斯大林想最终解决的兴趣似乎就越少。看起来斯大林总体上支持他的新卫星国是种族同质性的，但是他只在那些战

时发生过种族清洗的地方动用苏联的资源。此外，斯大林似乎认为在他活着的时候很可能再发生一次德国进攻，因此他希望彻底解决所有可能阻挡俄国、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和谐共存的问题。[19]

如此我们可以将斯大林在1944—1946年可能解决的民族问题分成四类。（1）斯大林希望解决德国问题，并且预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而解决的。在这点上他是对的。（2）斯大林用苏联资源解决立陶宛、白俄罗斯亚和乌克兰的波兰问题；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乌克兰问题。[20]（3）斯大林希望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匈牙利问题可以通过驱逐来解决，但是拒绝动用苏联部队，最终没有逼迫匈牙利合作。他同样支持波兰人和捷克人的人口交换，但是没有执行。（4）至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斯大林没有谈种族同质性，谈的是各民族间的手足情谊，甚至谈到了联邦欧洲的未来。总之，越是和1941年德国军队侵略路线相关的民族问题，斯大林就越有兴趣解决它。在考虑和俄国更相关的民族问题时，斯大林会更多引用历史资料、民族类型和民族主义推论。

在波兰共产主义者看来这已足够明显，他们在向斯大林呼吁时使用了民族主义者的论证。雅各布·伯曼（Jakub Berman，1901—1984）——一位在莫斯科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波兰政治局成员——指出新的边界和人口交换已经解决了波兰-乌克兰的民族问题，他向斯大林呼吁从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亚遣送更多波兰人回来，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波兰国家。[21]正如这所暗示的，在波兰和乌克兰的案例中，为了证明驱逐不是惩罚民族而是建立民族，斯大林的民族主义者的论证走得太远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1944年之前苏联的驱逐不能被解释为旨在巩固民族。[22]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驱逐了大量苏联公民，但这只是为了强制迁移，而不是在故土建立民族。[23]1939—1941年，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之前属于波兰的领土上，斯大林驱逐了当地的精英。然而这只是针对独立的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政策，或是针对上层阶级的政策，苏联并没有驱逐每个波兰人的打算。1944年红军重返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后，斯大林“撤退”或“遣返”所有民族人口到“他们”自己的民族故乡。他把被分类为“波兰人”的个人送到西面，送到共产主义波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就持有这种每个人身上铭刻不同民族性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政策中，民族性可以超越阶级这一点是明显的。把个人和他们的民族领土匹配起来可以为苏联带来利益，这种观念是在1944年后新出现的。

要描述苏联民族性政策的演变可能需要写另一本书了。关于在现代化的叙述中，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能否和其他欧洲国家归为一类存在很大争议，而在这个争议中民族性政策常常被当作现代化的手段。[24]从我们已有的证据来看，这是真的，但恰好是一种辩证的方式。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列宁和斯大林发展出来的对待民族性的理论方法只有一半是现代的。

它源于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Austro-Marxists）所支持的秘密党员怀旧式方法的拒绝，这种方法认定多民族的奥地利是有价值的，并将民族性视作个人偏好和地方文化的问题来对待。同时，列宁和斯大林反对现代民族性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政治主权合法性的源泉。早期布尔什维克处理民族性的方法同意民族性本质上是政治的，并且是和领土和语言有关的，但是反对其对政治垄断的宣称。在这个意义上，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的观点，民族主义是可以被用来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的。[25]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可能通过区别地方民族性和终极政治忠诚来被治理的，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20世纪20年代本土化（korenizatsiia）政策假定，在地方民族性精神中孕育出的精英能为苏联国家提供服务。

“相对而言”（Toutes proportions gardées）——这是处理民族性的现代方法，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在前面几章讨论过这个问题了。这种方法认为来自不同民族的政党和国家官员是理所应当的，但同时可以组成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单元，比如苏联（成立于1922年）。即便地方语言受到支持也经过编纂，俄语仍是苏联高级政治中的主要语言。然而，这种针对政治（political）民族性的近代早期方法，是和一种针对社会（social）民族性的现代方法结合在一起的。诸如波兰-立陶宛王国和哈布斯堡的奥地利这样的近代早期国家，它们对文化多样性做出解释，并向精英提出一种更高的政治忠诚。而苏联并非如此，它积极地为全体人民定义和创造民族性。苏联的领土被分为几个民族领土单元，境内的每位公民最终都被贴上了某一民族性的标签。现代民族主义将大众当作他们民族领土上的最高主权者，而将政治当作把这一简单观念上升到高级政治领域的事务，迫使精英对手做出更扭曲的防御，把他们压向天花板。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个精英对手。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

无论苏联政策是否实际上传播了现代民族主义，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颁布了驱逐政策，并且因为相信某些群体为了他们自己的民族背叛了苏联政权，而在乌克兰制造大饥荒。[26]然而只要驱逐的目的地是苏联境内的遥远地区，那么至少驱逐本身和原初的民族性方法是一致的。至少在原则上，惩罚是一种纠正机制。有时候，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确实在被驱逐者中创造或至少保持了苏联认同。从苏联境内驱逐人口，就像1944年之后的政策，实际上是承认失败。剥夺苏联公民权（如1944年后的政策），而不是强迫人们接受它（如1939年的政策），这意味着放弃国际主义。[27]到1944年为止，苏联政策的预设不仅是个人的政治忠诚根植于他们的民族性，还包括苏联政策无法改变这种状态。这意味着不仅要接受一个关于政治不稳定的非常现代的诊断（外来国民的存在），而且要接受一个非常现代的处方（将民族人口和民族领土匹配起来）。

1944年，苏联政策的这一重要改变使那一年波兰宣告成为一个与其同质性

的共产主义国家成为可能。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的政策起源，边界改变和人口迁移重新改变了波兰共产主义的方向。波兰共产主义者没有设定1944年边界改变和驱逐的政策，但是他们参与了这些政策的规范化和执行。驱逐是他们介入政治权力的开端，也是他们第一次和波兰社会接触。共产主义者同意成立名为“波兰爱国者联盟”（1943）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的先锋组织。在后者签署“撤离”协议并被派去统治波兰后，前者留在莫斯科帮助“撤离”波兰人。[28]留在苏联的波兰共产主义者——如瓦斯柳斯卡——致力于把人口和边界匹配起来。在波兰的波兰共产主义者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被赋予了一种从未享有的支持来源。他们第一次争辩说两次大战间的波兰是因为民族性结构而覆灭的，并提出了民族民主党人在两次大战期间提出的概念：一个“民族国家”。当战争结束了，红军把他们送上掌权之位，以建立某种和种族共产主义非常相似的体制。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乌克兰问题在波兰的种族同质化过程中更次要一些；在政治方面，它是波兰共产主义民族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超过90%曾生活在波兰新领土上的犹太人死于大屠杀。至于波兰在战争结束时从德国接收的德国居民——他们生活在波兰新的西部领土上，时任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29]在1945年5月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得不把他们赶出去，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建立在民族原则（national principle）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民族性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上。”[30]驱逐哥穆尔卡所提到的德国人，是比驱逐乌克兰人规模更大的行动，但这次行动在一年后才开始，而且是作为盟国所认可的欧洲总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把波兰方面在波兰-乌克兰边界问题上的民族化标记在1944年9月。当时波兰方面支持种族共产主义，在迁移人口中起到了直接作用，而且把自己标榜为波兰民族利益的代表。在波兰共产主义者于1945年6月和米科瓦伊奇克以及其他一些非共产主义者一起成立了“民族统一临时政府”之前，波兰共产主义者已经承担起创造一个同质化国家的责任。这给他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支持。

1944—1946年的“遣返”

1944年到1946年期间，约有78万人作为波兰人或犹太人，从苏维埃乌克兰到波兰去重新定居。在1939—1941年苏联占领和1943—1944年乌克兰发起大清洗之后，对其中多数人来说，“苏联”和“乌克兰”都没有特别正面的含义。[31]1944年夏天，许多在乌克兰的波兰人仍然相信波兰最终将重新取得或拓展其乌克兰领土，而且有关英国和美国会向苏联提条件的信念广为流传。但是苏联几个月的统治改变了许多人的想法。[32]NKVD的压迫让人联想起1939—1941年的回忆，而UPA在1943—1944年继续发动针对波兰平民的攻击。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在苏维埃乌克兰的UPA针对没有登记“遣返”的波兰人便已展开种族清洗。更可能的情况是NKVD冒充UPA小

分队破坏波兰人定居点，而且NKVD小分队很可能“非公开地”攻击波兰人。[33]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对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人的“遣返”最可能是NKVD和UPA非公开合作的成果。大量逮捕神父和主教意味着波兰社群在苏维埃乌克兰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无论是谁，不去波兰就去西伯利亚”的观点四处流传。[34]波兰政府的代表执行着他们认为是为了本国民族利益的政策，并鼓励在乌克兰的波兰人离开。[35]最终，希望留下来的波兰人被强制遣返了。甚至最顽固、最不开化的波兰农民——他们不知何故在西沃里尼亚生存下来了——也发现自己被强行遣送到波罗的海。有趣的是，苏联驱逐政策的结论是将西沃里尼亚重新定义为一个没有波兰人的地方，而这个计划是由UPA首先发起的。苏联政策是将所有波兰人从战前的波兰领土上驱逐出去，但是略过了那些居住在战前边界的苏联一端的波兰人。曾经属于波兰的沃里尼亚地区（后来成了苏维埃乌克兰的沃伦州和罗夫诺州）已经没有波兰人了；波兰人最大的聚居点在已属于苏联的沃里尼亚地区东部（这里后来成为乌克兰的日托米尔［Zhytomyr］州）。

到波兰的交通运输工具是极度原始的。出发的经历令人感到羞辱，尤其对女性来说，而在火车上度过的几周充满了疾病和死亡的风险。[36]1944年9月，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被迫成立一个传染病防治特别委员会。定居者一到达波兰就会被DDT浸透。[37]讽刺的是，这场悲剧的另一部分是由于移居波兰的计划仅限于苏维埃乌克兰在战后从波兰领土上吞并的区域，不是所有想去波兰的人都能去。即使是在这些领土上，战前的波兰公民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移居波兰。如果当时的规定针对的是人民而非波兰人和犹太人，那么数百万拥有两次大战间波兰公民权的东斯拉夫人原本可以移居波兰。这原本可以削弱这项政策的种族目的。具有决定性的是苏联在1939—1941年发布的护照，因为所有苏联护照上都有一个民族性类别。当然，一些在1944年希望被视作波兰人的人，在1939年曾希望被视作乌克兰人，因此他们护照上记录的民族性是“错误的”。[38]其他波兰人选择留下，不知为何他们逃脱了被驱逐的命运，一些人开始自称是乌克兰人。（今天我们还能找到这些人：他们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出发的长途巴士上通过母亲的波兰名字认出彼此，在利沃夫的有轨电车后座用波兰语低声交谈；在基辅的咖啡馆，当有人好奇地发现他们说出了一个波兰语鼻元音时，他们马上转换到乌克兰语。）

另一个方向的“遣返”——从波兰到苏维埃乌克兰——面临着更大的问题。诚然，更向西的新边界意味着两次大战间在波兰的大部分乌克兰公民发现他们现在在苏维埃乌克兰境内，根本无须迁移。[39]波兰给了苏联47%的战前领土，包括整个沃里尼亚的领土和几乎整个加利西亚的领土。但是即便处于更西面的位置，波兰仍然囊括了大量东南和南部尽头的领土，在那里生活的人们说着乌克兰方言，信仰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虽然波兰人谋杀了几千名生活在卢布林和热舒夫地区的乌克兰人，但是生活在这片地带

南部和山区的更多乌克兰人并未被内战波及。[40]在那些国家权力需要花更久才能到达的地方，兰科人和乌克兰人很难相信共产主义指令将对他们的利益造成损害。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这些人口通常给左翼投票，并且到了1945年年初这个时候，他们还把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甚至把苏联和一个伟大俄国的积极形象联系在一起。贝斯基德山的兰科人住在这片土地上最西面的地区。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受到战争的伤害，这些兰科人普遍认为没有理由投身于任何现代民族性。在边界变动后，兰科人大约是波兰境内说乌克兰语人口的三分之一。

似乎，一些在1944年年末接受从波兰“遣返”回苏维埃乌克兰的兰科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把苏联当成了俄罗斯民族的故乡。[41]在包容性和多元性的意义上，他们自视为俄罗斯民族家庭的一员。其中一些人也可能是以乌克兰人的身份过去的。他们很多人对看到的苏维埃乌克兰的情况感到恐怖，立刻回到了波兰。在贝斯基德山牧羊和在比如说第聂伯罗州（Dnipropetrovsk）的苏联集体农庄里工作的区别十分显著，很多在两地都有体验的人发现他们强烈地偏爱前者。这些“再次遣返者”或是拿出两次大战间波兰的文件证明，或是自称波兰人并在苏联拿到了新的文件证明。由于他们能比被从苏联驱逐出境的波兰人波兰语说得更好，这些招数常常管用。两次大战间波兰的文件证明缺少民族性类别，这个含糊的漏洞给了这些人一些选择命运的自由，也给了他们回到波兰的机会，传播苏联官员所谓针对苏联生活的“诽谤性谣言”。[4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兰科人的主要愿望是和其他喀尔巴阡山脉的斯拉夫民族留在同一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兰科人最希望的仅仅是留在他们的民族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由于1944年对苏维埃乌克兰的不信任，这个愿望在1945年初成了兰科人的普遍愿望。在这之后，波兰政权开始对整个乌克兰人和兰科人定居地带施加压力。没有登记“遣返”的年轻男性被逮捕。波兰安全部队和波兰军队开始攻击乌克兰人和兰科人的村庄。虽然兰科人和乌克兰人没法总是弄清攻击者是谁，但是他们知道攻击者是波兰人。由于兰科人被迫以乌克兰人的身份移居别处，波兰政策事实上成为乌克兰化进程的一部分。当地能区分出兰科人和乌克兰人区别的波兰官员意识到情况确实如此。他们坚持汇报兰科人对波兰国家的忠诚。[43]领地级别的官员却更加置身事外地看待这个问题。比如，克拉科夫区的领地官员认为，“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为了塑造“一个同质化的国家”的利益，如果兰科人被当作乌克兰人被驱逐离境，事情会变得最简单。[44]波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重新定居事务部长瓦尔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事实上曾下令中止强制兰科人移居。[45]和能区分两者的地方官员一样，哥穆尔卡也来自兰科人生活的领土。来自波兰第一书记的命令被忽视了，这说明驱使兰科人和乌克兰人强制移居的决定来自莫斯科，或者至少莫斯科的指令是可以这样被理解的。

“二战”欧洲战场以德国投降为止，在此后的行动中波兰共产主义部队杀害了大约4000名兰科和乌克兰平民。救国军和其他波兰游击队杀害的人数至少有数千人甚至可能达数万人之多。[46]波兰官方军队和波兰游击队本身就是彼此致命的敌人，在1945年这一整年以及1946年，他们参与了波兰国内的所有重大战争。然而，从兰科人和乌克兰人的角度来看，和官方军队及与之作战的游击队的接触显示了共产主义波兰即将发生的事件。当一个乌克兰人或兰科人的村庄被烧毁了，在村民看来，袭击者代表的波兰理想几乎毫不重要。苏联毫无吸引力，而波兰民族主义者帮助波兰共产主义者使波兰变得让人无法容忍。正如UPA帮助苏维埃乌克兰的官员驱逐波兰人，波兰游击队员帮助波兰共产主义者驱逐乌克兰人和兰科人。和在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人一样，在共产主义波兰的乌克兰人和兰科人面临着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和共产主义者的同质化政策。20.8万名登记为乌克兰人的个人在1945年1月至8月间离开了波兰。[47]想要留下来的人们还在寻找能维护他们的人。

1945年在波兰的UPA

UPA在1943年于沃里尼亚开始的种族清洗政策，在1945年成了惯例。UPA是如何渡过这种由他们协助制造的情况的？在1944年非正式的边界变更后，UPA的主要部队在苏维埃乌克兰西部与苏联部队作战，其指挥官把波兰视作外围行动区域。1945年初，雅罗斯拉夫·斯塔鲁欣（Iaroslav Starukh）在波兰新的西部边界针对其组织了一个新的UPA指挥部。1945年8月重组过程完成了，而新的苏联-波兰边界也公布了。1945年在波兰，UPA小分队的人数可能从来没有超过2400人。[48]除了一些例外，这支部队不是在1943—1944年参与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大清洗的那些士兵。在战后波兰领土上的UPA士兵大多是在1944年、1945年或1946年加入进来的，并且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作战。[49]他们在波兰更南面和更西面的地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要花更长时间来激活UPA部队。1943年，UPA在卢布林地区作战。1944年UPA出现在毕斯兹扎迪山脉（Bieszczady mountains）。在1945年秋天，德国人投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下贝斯基德山（Beskid Niski）才没有UPA的踪迹，居住在那里的兰科人对此表示不屑。

赫鲁晓夫写信告知斯大林，波兰游击队对乌克兰平民的攻击帮助UPA招募到新兵，他是正确的。[50]然而，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希望避免被驱逐到苏联。[51]在此之前，在这些领土上的很多地方，故乡和乌克兰民族主义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当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承诺能阻止驱逐，这种关联才变得显著起来。这是一条通向新的意识形态世界的通道。OUN班德拉派仍然是乌克兰民族主义中的优势力量，但在德国投降后，OUN梅尔尼科派和OUN班德拉派之间的区别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的老兵——

受到前者的支持，但受到后者的抵制——如今在当地UPA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2]这个结论能被UPA记录所证明。尼古拉·寇普多（Mykola Kopdo）在1944年从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逃走加入了UPA，他在指挥一支在波兰作战的UPA旅时阵亡。德米特罗·卡万茨基（Dmytro Karvans'kyi）是OUN梅尔尼科派中的要员，他在1944年2月逃离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加入UPA。他在指挥一支在波兰作战的UPA连队时阵亡。米哈伊洛·哈洛（Mykhailo Hal'o）是波兰东南部四个UPA营之一的指挥官，他在1944年也离开了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马里安·卢克舍维奇（Marian Lukashevich）是UPA在波兰的三个战略区域中的一个的指挥官，他也是一名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老兵。[53]无论当地乌克兰人加入UPA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是从这些军官那里得到训练。[54]换言之，共产主义波兰的种族清洗政策促使乌克兰公民加入前党卫队军官的部队。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确认和描述UPA在1945年的波兰所追求的利益。其大多数行动都是为了制止驱逐，而且在其招募宣传中，他们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能够保护乌克兰人家园的组织。[55]宣传归宣传，但是这确实说明了人们为何会加入。波兰东南部平民死亡数量的对比有助于确认UPA在此时此地的目标是抵抗和防卫，而不是种族清洗。1944年9月，就在冲破战争前线后，UPA下达命令中止“大规模反波兰人的行动”——至少在之后变成共产主义波兰的边界内。[56]尽管OUN班德拉派继续把波兰东南部视作种族上属于乌克兰的领土，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战略理由把即将保留在波兰境内领土上的波兰人清除掉。对平民的杀戮和对定居点的清算还在持续中，但是此后的攻击都是对波兰人攻击的报复。UPA指挥官反对把乌克兰人从波兰东南部驱逐到苏维埃乌克兰，并认为“遣返”是消灭在苏联劳动营的乌克兰人和毁灭乌克兰民族的手段。[57]

在这个计划中，UPA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民族性的“信息”到处存在。在决定重新定居的过程中，波兰的共产主义者官员利用了德国人的文件，文件上模糊不清的“P”和“U”帮了大忙。由于每个人都认可德国人的效率，因此人们把在文件上没有显示波兰民族性的任何人都认作事实上的乌克兰人。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波兰官员就会利用教会记录，他们遵循的逻辑是任何不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人必定是乌克兰人。UPA游击队员烧毁了这类土地清册以消除关于特定区域内谁是乌克兰人的“信息”。UPA士兵同时着手炸毁铁轨和火车头，推倒了数百英里的电话线杆（甚至可能在剩下的电话线上装了窃听器），毁坏桥梁以及暗杀负责“遣返”工作的官员。UPA烧毁了人口减少的乌克兰人村庄，防止波兰人在此定居。当波兰军队在1945年9月被派来协助重新定居工作时，UPA直接向他们发起攻击。[58]

UPA比当时任何抵抗共产主义的波兰力量都要大胆。救国军在1945年8月正式解散了，其指挥官决定未来的斗争对象是一个叫作“波兰”的共产主义

国家，西方盟国认可这个国家的边界，这个国家不会对波兰人的事业有任何帮助。救国军下属的一些部队不听从解散的命令，在之后有名的反共产主义组织“救国军——自由与独立”（Armia Krajowa——Wolnośći Niezawisłość，简称AK-WiN）中继续战斗。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相同的地缘政治事实导致UPA重新组织、改变其战略。乌克兰和波兰游击队现在绝望到认为任何对平民的继续攻击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UPA和AK-WiN在1945年春天休战。[59]到此时，乌克兰和波兰游击队只有一个共同的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开始，美国人和英国人会把共产主义赶走。

共产主义、波兰国家及其乌克兰公民，1945—1946

重新定居的政策使乌克兰人和一些兰科人加入UPA部队，也使一些当地领袖向新的中央权威提起申诉。1945年7月，一支乌克兰人代表团在华沙的公共行政部会议上捍卫他们的权利。他们得到的回应预示着接下来将发生的事。“虽然公民一致同意留在这里，但我认为这将是不可能的，”部长委员会的一位代表说，“在与苏联就建立一个基于民族志的边界达成一致后，我们倾向于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存在各种民族性的国家。”[60]“民族国家”或者说在种族上同质的国家，是两次大战间民族民主党人的代码。这是格拉布斯基一本书的标题。[61]另一方面，“存在各种民族性的国家”一直和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和犹太人自治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控制的波兰政府代表漫不经心地使用“民族国家”这个词中，可以发现一点转变。这个国家对民族性的态度并未被所有公民认可。还没有接受这一原则的说乌克兰语的人，包括亲俄的兰科人，对苏联政策和波兰民族主义和谐一致的局面感到惊讶和失望。1945年9月，来自波兰几个地区的兰科人代表写信给苏联当局，请求不被强制疏散。这些兰科人就他们的土地没有被苏联兼并而表达惋惜。他们在请愿书的最后写道：“如果苏联不想要我们的土地，那么苏联也不想要我们，所以把我们留在原来的地方吧，只要我们对你们来说不是必需的。”[62]

苏联的政策已经朝相反的方向改变了。在苏联遣返事务全权代表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yi）[63]的要求下，1945年9月波兰当局命令三个步兵师把剩下的乌克兰人驱逐到苏联。[64]其中两个步兵师的士兵中有来自沃里尼亚的波兰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针对1943年大屠杀的复仇行动。在1945年末，当波兰士兵强迫约2.3万乌克兰平民撤离这个国家时，他们杀害了几千名乌克兰平民。波兰的军队通常由红军军官率领，他们应为其中几次最恐怖的乌克兰平民大屠杀负责。这些军官在波兰军队里的军衔很高，当然他们也穿着波兰制服。（其中一些人——比如臭名昭著的斯坦尼斯拉夫·普卢托［Stanislav Pluto］上校——出身波兰人家族。更常见的情况是，苏联军官和负责将乌克兰人遣离波兰的官员有着乌克兰姓氏。）1945年年末到1946年年初，波兰军队的惯常做法是先半心半意地

袭击一个UPA小分队，摧毁一个村庄，在UPA成员逃走后杀死一些乌克兰平民，然后等待UPA作为报复破坏一个波兰村庄，以此类推，循环往复。其中有一个例子最为突出。在普卢托的命令下，波兰士兵在1946年1月25日谋杀了扎瓦卡·莫洛霍夫斯卡（Zawadka Morochowska）的平民。士兵们一共杀死了56人，其中大多数是女人、儿童和老人。他们把人活活烧死，把活人开膛破肚，用刺刀割断他们的手脚。[65]

在1946年4月，波兰当局组织了一次热舒夫团体行动，行动目标是把波兰的乌克兰人驱逐干净。有25万人被认定是乌克兰人，他们在1946年4月到6月间被迫移居到苏维埃乌克兰。在整个“遣返”阶段，即1944年10月到1946年6月，共有482661人被认定是乌克兰人，被送往苏联。大致来说，其中30万人是被迫迁徙的，10万人或是受到周围的暴力威胁，或因无家可归而迁徙，剩下的人是主动离开的。热舒夫行动造成910名乌克兰人死亡，但是几乎没有损伤UPA的组织结构。[66]行动最终的结论是，波兰的乌克兰“问题”已经解决了。

维斯瓦河行动的原则，1947

1947年年初，波兰当局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要“最终解决”乌克兰“问题”需要一项新的政策。组织1944—1946年“遣返”行动的苏联军队不太能用得上了。苏联NKVD正在撤出波兰，苏联用于遣返的基础建设也都拆除了。1946年，波兰还在抗拒遣返终结的事实，希望能从苏联那里获得最多数量的被遣返者。对此，斯大林已耗尽所有耐心。[67]这意味着今后重新定居是国内事务，正如一位在“遣返”行动中职位显要的波兰将军迅速建议的那样。“既然苏联不再带走这些人，”副参谋长斯特凡·莫索（Stefan Mossor）在1947年2月建议，“让整个收复领土上的每户人家都移居苏联是有必要的。”所谓收复领土是指波兰从德国收回的北部和西部地区。[68]1946年，针对波兰反对者的波兰共产主义军事部队，比针对乌克兰反对者的要多得多。1946—1947年的冬天，军队还被用来伪造1947年1月的议会选举结果。这些选举结果以及当月颁布的大赦，终结了波兰人武装反对波兰政权的情形。1947年波兰集结了更多波兰军队，UPA开始继续作战。

在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卡罗尔·希维尔切夫斯基（Karol Świerczewski）于3月28日被UPA暗杀后，波兰政治局立刻决定“让重新取得的领土（尤其是普鲁士北部）上的乌克兰人和民族混合家庭移居海外，防止他们组成任何紧密的团体，防止他们离国界的距离小于100公里”。[69]希维尔切夫斯基将军之死很可能为波兰当局提供了完美的行动时机，他们希望行动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当然，优先性很重要，而且我们不能确定如果3月不发生谋杀，4月将发生什么，我们也无法完全肯定苏联对这次行动的态度。波

兰的计划必须获得苏联的同意，而这个计划和苏联的惯例恰好一致。在国界线另一边的苏联当局正与UPA进行一场极度残酷的战争，并且驱逐他们的家庭成员。此外，苏联特工深度参与筹划了所谓的“维斯瓦河行动”。[70]而苏联在这次行动开端的角色依然不清晰。一位受到莫斯科信任的高阶波兰官员试图警告斯大林，让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重新定居的政策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很可能失败。惊恐于波兰政治局的突然决定，波兰遣返事务副部长在深夜直接与他的苏联联络人联系，亲自告诉对方波兰政治局在没有咨询莫斯科的情况下匆忙做出重要决定。[71]

可能——可能性甚至很大——这位苏联联络人被误导了。我们不得而知。认为波兰政策会在未经莫斯科允许的情况下颁布是很天真的；认为苏联制定了每一项政策也同样天真。我们可以从1947年三四月的政策规定中窥见端倪，政策规定苏联成员与波兰当地人在维斯瓦河行动中合作。例如，瓦茨拉夫斯基·科索夫斯基（Wacław Kossowski）中校——苏联安插在波兰总参谋部的红军军官——在3月29日建议“完全消灭在波兰东南部边界区域的残余的乌克兰人”。4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消灭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有组织抵抗的中心部门——接受了他的建议。[72]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公共安全部长斯坦尼斯拉夫·拉德凯维奇（Stanisław Radkiewicz）所做的简短报告。拉德凯维奇是两次大战间的一位波兰共产主义者，他在苏联熬过了战争，并在红军服役。当红军进入波兰时，他负责国内安全事务，在整个1945年领导着秘密警察。出席会议的还有国防部长和米哈乌·罗拉-任米尔斯基(MichałRola-Żymierski)元帅，后者是斯大林的又一位代理人。任米尔斯基曾在毕苏斯基的军团服役，在两次大战间获得将军之位，但因受到贪污指控而被开除出军队。在战争时期，他加入了由苏联赞助的波兰军队，由于斯大林的提拔，很快晋升到最高军衔。

1947年初，即使波兰军事规划者把预估数字上调了一些，他们认为“残余的乌克兰人口”最多不超过7.4万人。事实上，当时在波兰有大约20万说乌克兰语的人口（约占波兰总人口的0.8%）。[73]这个绝对数字高到能显示强制迁徙将造成多大的苦难，而相对比例却足够低，以至于令人认为乌克兰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兰科人）会威胁到波兰国家这个论断是值得商榷的。诚然一些乌克兰人在1947年是支持UPA的，但当乌克兰人被不断驱逐到苏联时，他们的支持者越来越多。而UPA的主要目标也确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即使概率很小，一些士兵依然愿意为之战斗。虽然现在OUN和UPA的领导人隐藏起他们的最终目标——在所有“民族志意义上的”乌克兰领土上建立一个乌克兰国家，也减少了对波兰军队的攻击，但是UPA和波兰国家之间基本的利益冲突是确切无疑的。[74]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迫使所有乌克兰人口移居海外只是因为与UPA的战争。1947年初，波兰政治局和总参谋部认为，除去UPA意料之中的破坏

外，乌克兰人重新定居是和他们的权利相符的。军队有两项任务。一项任务是“破坏UPA的联合”；第二项任务是实行“把所有乌克兰人疏散到东北部领土上，使他们最大程度地分散开来”。[75]波兰指挥官（包括那些向莫斯科汇报的人）明白维斯瓦河行动中包含了战斗和重新定居的任务。重新定居是针对剩下的乌克兰人，即便UPA很快保持中立了。在莫索将军看来，维斯瓦河行动的目的是“永久性解决波兰的乌克兰人问题”。[76]重新定居是为了使波兰境内不再出现乌克兰人社群，用战后共产主义者从两次大战间的民族主义者那里继承的语汇来说，战后波兰将成为一个“民族国家”。[77]

这次行动的名字暗示了重新定居任务的中心所在。维斯瓦河从克拉科夫经过华沙，抵达靠近波罗的海的格但斯克（Gdańsk），把当代波兰大致分为两半。这不是偶然的。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河流破坏了民族主义者们想象中的同质民族领土边界，波兰民族主义者要求把乌克兰人向东驱逐到兹布鲁奇河外的地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警告波兰人向西逃离到桑河（San）之外的地方。事实上，苏联的政策是在河流问题上折中，朝两个方向进行驱逐：布格河成为波兰-苏维埃乌克兰的边界，而超过100万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分别朝两个方向“撤离”。颇为讽刺的是，维斯瓦河行动正好符合这一传统。维斯瓦河规定了卢布林、热舒夫和克拉科夫领地在战后波兰的边界，这里居住着乌克兰人，他们也是从这里移居他方的。民族主义者的传统是把种族仇敌赶到河对岸，让他们“回到”敌人的民族领土，而苏联和波兰共产主义者在1944—1946年的做法后确实实施了此类方案，但是波兰政权于1947年却将境内的乌克兰公民向“错误”的方向驱逐，把他们驱逐到北部和西部，驱逐到乌克兰人从未存在的维斯瓦河岸，可以想见他们在那里将完成同化。

维斯瓦河行动的初衷是使新的波兰国家在种族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上匹配起来。1947年，随着犹太幸存者移居海外，剩下的德国人匆忙改变他们的民族性，波兰当局决定让“每个乌克兰人”重新定居。甚至是民族混合家庭、不支持UPA的社群、不认同乌克兰民族的兰科人、被授予勋章的红军老兵、在苏联受训练的党员、在1944—1946年帮助“遣返”乌克兰同胞的共产主义者，全都被强制移居。在“撤离”期间，民族性是由血统、宗教和纳粹身份文件上的“U”字母决定的。[78]这项（推行到“每个人”的）政策的目的是确保波兰“民族国家”是波兰“人民民主”的起点。

波兰共产主义政权通过“解决”波兰土地上最后一个民族问题，和乌克兰民族性做斗争而持续获得声望。自1943年波兰爱国主义者联盟建立起来，共产主义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取得民族理念的霸权；1947年1月将UPA排除民族赦免之列，以不同于起诉波兰游击队员的法律起诉乌克兰游击队员以及1947年夏天的维斯瓦河行动，这些行为的天才之处在于行为本身以种族词汇清晰地定义了这个民族社群。

维斯瓦河行动的实施，1947

莫索将军获得维斯瓦河行动的指挥权，而他在1945年才加入共产党。莫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毕苏斯基军团的一名士兵，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他是一名军事策略者。他在战前就参与了反乌克兰行动，并在1946年参加了热舒夫行动。显然，两名苏维埃波兰人筹划了针对UPA的军事行动以及军队在重新定居行动中扮演的角色：米哈乌·奇林斯基（Michał Chiliński）上校担任行动的参谋长，瓦茨瓦夫·科索夫斯基（Wacław Kossowski）中校负责领导行动每个阶段的工作。[79]步兵和国内安全部队的19335人参加了维斯瓦河行动。其中大多数人是参加过对抗波兰流亡政府的战争的老兵。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射杀其他波兰同胞，其中许多人还是他们之前的战友，人们通常会认为这些士兵必定士气低落。在维斯瓦河行动开始时，参加行动的士兵人数远远超出UPA成员人数，比例大约是20比1。[80]

莫索、科索夫斯基和奇林斯基一开始很担忧UPA造成的破坏。当1947年4月末行动在热舒夫地区开始时，莫索认为他的士兵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平平无奇。[81]波兰指挥官意识到在面对更加投入和更有经验的敌军时，包围战术不起作用，因此他们决定追捕每一支UPA分队，直到他们被逼到绝境然后被摧毁。这是苏联的一个反游击的旧策略。这个策略从来没有打败过在波兰的UPA分队，因为UPA士兵只要分成更小的小队，之后再重组就可以了，但这项策略确使乌克兰人感到绝望和筋疲力尽。当战争成为一场追捕，波兰方面的情报和苏联的反游击制度全然相似。波兰指挥官仔细地解释了如何利用警犬追踪撤退到树林中的游击队员，如何摧毁UPA士兵的加固战壕，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82]当他们在战壕中被捉到时，UPA士兵常常选择自杀而不是投降。他们这样做是遵照指令。如果他们被生擒，等待他们的必定是酷刑，这样做还能避免折磨。[83]

同时，分散任务也在进行中，先是在热舒夫领地，之后是卢布林和克拉科夫的领地。1947年4月28日之后的四个月里，参加行动的士兵将140660名被认定是乌克兰人的人从东南部驱赶到波兰北部和西部。1944—1946年的第一轮撤退和驱逐行动已经把75%留在波兰的乌克兰人赶到其他地方，1947年的维斯瓦河行动迫使剩下的四分之一乌克兰人定居别处。[84]维斯瓦河行动中的完善策略在热舒夫行动中也被使用。士兵们先把村庄包围起来，封锁住这片区域以防UPA介入，之后一位军事或安全部门的军官会朗读一份移居者名单。那些被认定是乌克兰人的人有几小时的打包时间，然后他们会被带到中介点。如果在军队包围村庄时有人想逃走，他们会被射杀。总的来说，在行动期间自主行动者很可能会被射杀。在一些案例中，波兰士兵射杀逃走的人，但在死者的口袋里却发现了写着“P”（代表波兰人）的德国身份文件。遇到那些没有男性的家庭，军队为了确定UPA士兵

的下落而折磨剩下的家庭成员。几个村庄被烧毁时，村民就在一旁看着。[85]维斯瓦河行动和热舒夫行动的区别在于，安全部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因为波兰当局现在不仅负责驱逐，还有波兰境内更复杂的重新定居任务。重新定居的终点以及各个群体之间的分散程度是依靠情报官的判断来决定的，在行动的最后，他们的同事会等待来自情报官的信封，里面有相关指令。

军事和安全部队的军官信赖当地告密者，后者揭发邻居是UPA游击队员，告密者中有波兰人也有乌克兰人。被认定是乌克兰游击队员的个人会被依法就地处决或遣送到集中营。军事法庭被赋予审判平民的权力，至少判处了175名与UPA串通的乌克兰人死刑。[86]其中大部分判决在当天就执行。约有3936名乌克兰人——包括823名妇女和儿童——被送到亚沃日诺（Jaworzno）的集中营，在战时这里附属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在那里，除了惯常的酷刑折磨，还有斑疹伤寒传染病、食物和衣物短缺。[87]数十位乌克兰人死在亚沃日诺，包括两名自杀的妇女。超过27名乌克兰人——其中大多是幼儿和老人——死于移居别处的火车上。从受压迫、被监禁、被判死刑和被杀害的人数方面来看，维斯瓦河行动是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存续期间最大规模的恐怖运动。

1947年的重新定居行动打败了波兰境内的UPA。一旦大多数乌克兰人重新定居后，反抗不仅几乎不可能，而且从本质来说也毫无意义。大多数士兵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园而战，现在他们都失去了家园。数千名希望继续反抗共产主义的人几乎没有理由在波兰继续下去。受到波兰军队无止境的追捕，UPA营队彻底溃散。[88]一些游击队员重新定居到波兰西北部；另一些在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被封锁的边境途中一路作战，最终只有几百人达到西部。不可思议的是，有数千人穿越被封锁的苏联边境与UPA大部队会合，继续战斗。UPA的溃逃标志着苏联-波兰新边界线的巩固、波兰人口的同质化和对反波兰政权武装的清算的最后一步。

第6章和第7章旨在唤起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历史延续性和现代论证；第8章和第9章描述了多民族帝国时期（1795—1918）和波兰统治的短暂时期（1918—1939）中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多项遗产的快速改造。从1939年9月到1947年9月，八年中，德国强权进驻又撤退，苏联强权两次进驻，东欧犹太文明被破坏，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互相进行种族清洗，一条长久存在的新国界分隔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维斯瓦河行动终结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历史，开创了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南部的历史。

维斯瓦河行动的结果与共产主义政权在波兰的巩固是一致的；波兰的同质化与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的建立是一致的。1947年东欧国家拒绝了马歇尔计划，拉开了丘吉尔的隐喻“铁幕”。当世界大战被“冷战”所取代，民族问题或尘埃落定，或被遗忘，或改头换面。被赶出波兰后，UPA在苏联境内

继续战斗了几乎十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尼古拉·列别德也许最应对触发波兰-乌克兰内战的沃里尼亚恐怖事件负责，他受雇于美国情报部门。[89]UPA指挥官罗门·舒克海维（Romen Shukhevyeh）死于苏维埃乌克兰的一场战斗中。新的欧洲秩序建立在以下推测之上：波兰是一个为共产主义者所统治的民族国家，将与苏联结盟。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看到，东部问题在巩固波兰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同盟的过程中——以及它们的瓦解中——扮演着特殊角色。

---

[1] “Zagadnienie Ukrai ńskie,” BUWR, syg. 155; Dzieje Konfliktów,Vol. 2, 124-130, 229-230, 234, 251-252, 279, 297-298; Ryszard Torzecki, “Kontakty polsko-ukraińskie w polityce polskiego rz ądu emigracyjnego i podziemia (1937-1944), Dzieje Najnowsze, 13, 1-2 (1981), 335-336. 关于两次大战间的背景，见Włodzimierz Mich, Obcy w polskim domu, Lublin: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Marii Curie-Skłodowskiej, 1994。

[2] Krystyna Kersten, “The Polish-Ukrainian Conflict under Communist Rule,”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73, (1996), 139. 又见Włodzimierz Borodziej, Od Poczdamu do Szklarskiej Poręby, London: Aneks, 1990, 32-77。

[3] 格拉布斯基在1926年离开了民族民主党。然而，他是民族民主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波兰右翼中的影响很大。

[4] 关于格拉布斯基在1944年8月对斯大林说的话，见Sovetskii faktor, 73-74。这些对话引用自Stanisław Grabski, Pamiętniki, Vol. 2, Warsaw: Czytelnik, 1989, 472-475。

[5] 关于瓦斯柳斯卡，见Eleonora Syzdek,Dzialalność Wandy Wasilewskiej w latach Drugiej Wojny Światowej, Warsaw: MON, 1981, “Dialectic” quotation at 68; treaty reference at 268。又见Teresa Torańska, The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216–217。瓦斯柳斯卡还是一位小说家。

[6] 关于格拉布斯卡1945年9月在利沃夫，见Teczka specjalna J. W. Stalina, 402。关于瓦斯柳斯卡对格拉布斯基的看法以及对格拉布斯基的任务的进一步分析，见Witold Wojdylo,Koncepcje społeczno-polityczne Stanisława Grabskiego, Torun: Uniwersytet Mikolaja Kopernika, 1993, 35-39。

[7] 这方面重要的例子有Andrzej Paczkowski,Pół wieku dziejów Polski, Warsaw, PWN, 1996; Krystyna Kerste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ule in Po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8] Amir Weiner,Making Sense of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52.

[9] Serguei Ekelchik,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hood under High Stalin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00, 49-58.

[10] 见报告：Deportatsiia poliakiv z Ukrainy, 1999, 24-74。

[11] 1944年3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报告，见OUN-UPA v roky viiny, 134–144。OUN班德拉派对边界安排并不满意，但尽管如此，他们也努力用负面语言描绘所得的领土。“Ukrains’kyi perets,” September 1945, in Litopys UPA, Vol. 1 (new series), 300-301.

[12] Vostochnaia Evropa, 39.

[13] Grabski,Pamiętniki, Vol. 2, 472-475.

[14] Sovetskii faktor, 23-24, 30, 41; Vojtech Mastny, 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15] Andrzej Paczkowski,Stanisław Mikołajczyk czyli klęska realisty, Warsaw: Omnipress, 1991.

[16] 这一次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在波兰境内。

[17] Ivan Kozlovs’kyi,Vstanovlennia Ukrains’ko-Pols’koho kordonu, L’viv: Kameniar, 1998.

[18] Sovetskii faktor, 208; 又见Vostochnaia Evropa, 176; Norman Naimark, Fires of Ha tr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8-112。

[19]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迁移是小规模进行的。匈牙利方面的偏好，见Sovetskii faktor, 238, 504-507; Molotov’s urgings: Vostochnaia Evropa, 429-430; 519; 斯大林关于东北欧的计划，见Sovetskii faktor, 74; 斯大林关于东南欧的计划，见Vostochnaia Evropa, 126-129,275; Sovetskii faktor, 133; 之后发生的事情，见Ivo Banac, With Stalin against Tito,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 曾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喀尔巴阡卢森尼亚附属区域现归入苏维埃乌克兰，斯大林为此提供了种族正当性。

[21] Sovetskii faktor, 371.

[22] Terry Martin, “Stalinist Forced Relocation Policies,” in Myron Weiner and Sharon Russell, eds., Moving Targets: Demography and Security, Cambridge:

Berghahn Books, 2001. 波兰机制在1935-1936年间的瓦解标志着一种把波兰人当作苏联民族敌人的新思潮产生了，但是其结果并不是驱逐每个波兰人。甚至1937—1938年的“波兰人行动”影响的也不仅是波兰人，这次行动旨在摧毁而不是巩固民族群体。在这两个例子中，波兰人依然是苏联公民，留在苏联境内。N. V. Petrov and A. B. Roginskii, “Pol’skaia operatsiia NKVD 1937-1938 gg., in Repressii protiv poliakov i pol’skykh grazhdan, Moscow: Memorial, 1997, 35.

[23]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0(1998), 813-861. 又见Robert Conquest, The Nation Killers, London, Macmillan, 1970。

[24] 参阅Rogers Brubaker,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post-Soviet Eurasia,” Theory and Society, 23 (1994), 47-48; Yuri Slezkine, “The USSR as Communal Apartment,” Slavic Review, 53, 2 (1994), 414-452; Francine Hirsh, “The Soviet Union as a Work in Progress,” Slavic Review, 56, 2 (1997), 251-278; Ronald Grigor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关于苏联早期的建构主义民族性叙述在以下这本著作中已被预测到：Hans Kohn,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Routledge,1933。常被引用的章节来自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5] 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98-405.

[26] 关于大饥荒，见Andrea Graziosi,The Great Soviet Peasant War, Cambridge, Mass.: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66-67; Terry Martin, “The 1932-33 Ukrainian Terror,”presentation at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Mass., 5 February 2001; 又见Terry Marti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27] 此类例子，见Pereselennia poliakiv ta ukraintsiv, 2000, 425-430, 679-687。

[28] 同上书，93-102。

[29]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1905—1982），曾任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后因被指责有反苏倾向而被撤职。在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他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1970年因经济政策失误而下台。

[30] Gomułka cited in Piotr Madajczyk, “Polska polityka narodowościowa

po 1945 roku," Nashe Slovo (Warsaw), 15 August 1999.在哥穆尔卡演讲的前一天，一家地方政党报刊发表了一首名为《波兰：只为波兰人》的诗歌。Gazeta Robotnicza (Katowice), 19 May 1945, in Dariusz Baliszewski and Andrzej Kunert, eds., Ilustrowany przewodnik po Polsce stalinowskiej, Warsaw: PWN 1999, 300.

[31] II/2266/p, II/1914, II1286/2kw, II/1328/2k, AWKW. See also "Biuleteny——No. 62," Zwi ązki Ziem Wschodnich Rzeczypospolitej, 15 September 1947, zesz. A.9.V., tecz, 10, MSW, AMPN. Forfigures, Deportatsii, Vol. 1, 25.

[32] 比较Pereselennia poliakiv ta ukraintsiv, 251-261和495-497。

[33] 关于UPA，见Przesiedlenie ludności polskiej, 316。当波兰人离开苏联时，NKVD失去了重要的探员。Jeffrey Burds, "AGENTURA: Soviet Informants' Networks and the Ukrainian Rebel Underground in Galici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1, 1 (1997), 89-130; 以及Pereselennia poliakiv ta ukraintsiv, 747, 789, 877, 914-917。

[34] Deportatsii poliakiv z Ukrainy, 102; Pereselennia poliakiv ta ukraintsiv, 627.

[35] 这些波兰官员是一盘更大的策略中的棋子。他们受到苏联NKVD的残酷对待，经常被捕或投入监狱。Przesiedlenie ludności polskiej, 201–203.

[36] Tkachov,Pol's'ko-Ukrains'kyi transfer naselennia 51-53, 99-122; Przesiedlenie ludnoś- ci polskiej, 384-385及全书各处。

[37] Przesiedlenie ludności polskiej, 342.

[38] Przesiedlenie ludności polskiej, 214。

[39] 在1944年7月的协议所设想的边界范围内，大约60万说乌克兰语的人占波兰人口不到3%。Repatriacja, Vol. 1, 17-18.秘密协议签署的一周前，赫鲁晓夫写信给斯大林请求把海乌姆周围的领土加到苏维埃乌克兰境内。这原本能让赫鲁晓夫夫人的出生地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40] 在这些地区，苏联当局注意到被安置的波兰人中存在民族主义思潮。Trahedia Ukrain- tsiv Pol'shchi, 128-132; Pereselennia poliakiv ta ukraintsiv, 183.

[41] II/2196p., AWKW; "Informacja z prasy ukrai ńskiej nr. 2," zesz. A.9.V., tecz. 9, MSW, AMPN; 以及下文引用的资料。

[42] 引自Pereselennia poliakiv ta ukraintsiv, 923。关于再次被遣返者，见Repatriacja, Vol. 2, 19, 125, 160; Deportatsii, Vol. 2, 16。

[43] Pereselennia poliakiv ta ukraintsiv, 797; Repatriacja, Vol. 2, 160, 180.

[44] Repatriacja, Vol. 2, 262.

[45] Repatriacja, Vol, 103-104。

[46] Repatriacja, Vol, 81-82, 94, 104-105; 估计数据来自Rafal Wnuk, "Wierzchowiny i Huta" Pols ka 1944/5, 4 (1999), 87; and Grzegorz Motyka, 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Warsaw: Volumen, 1999, 238-241。

[47] Repatriacja, Vol. 1, 85 – 87.

[48] Antoni Szcześniak and Wiesław Szota, Droga do nikąd, Warsaw: MON, 1973, 257. 这一极度重要的研究因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出版而受到影响。尽管本书呈现了证据，但是作者把乌克兰民族主义降为另一种纳粹主义。有很多理由能让这一论断变得真实可信，但是如果不摆脱这一论断，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在波兰的乌克兰游击队的动机。

[49] 关于兰科地区，见1947: Propam'iatna Knyha 13, 19, 32-33, 61, 123。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描述了为UPA服务以及对UPA的看法。这卷逐一提到了371名当地UPA士兵的名字。又见Povstans'ki mohyly中记录的507例外貌描述；以及1947年被判死刑的UPA士兵名单：UPA v svitli pols'kykh dokumentiv, 567-573。

[50] Trahedia Ukraintsiv Pol'shchi, 151. 乌克兰人的回忆，见1947: Propam'iatna Knyha, 87, 110, 190, 246。

[51] Pereselennia poliakiv ta ukraintsiv, 621-625.

[52] Misylo收集的507例UPA士兵的外貌描述中，21人曾服役于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24人曾任德国警察，6人曾服役于德意志国防军，1人曾服役于乌克兰军团（Ukrainian Le-gions）。考虑到Misylo收集的信息有限，可以肯定这些数据比例实际会更高：Povstans'ki mohyly, 29-218。加入UPA的前乌克兰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老兵，见1947: Propam'iatna Knyha, 42-43, 122; 以及Ivan Dmytryk, U lisakh Lemkivshchyny, Munich: Suchasnist, 1977, 115。

[53] Povstans'ki mohyly, 85-86, 65-69, 180-181.

[54] UPA在波兰东南部创办培训新兵和军官的学校，向其灌输他们个人的苦难是民族苦难的一部分的思想。Szcześniak and Szota, Droga do nikąd, 153-154. Povstans'ki mohyly记录中存在此类信息，显示一部分当地新兵接受了类似的训

练。

[55] Deportatsii, Vol. 2, 54-59.

[56] UPA西部指挥官Vasyl’ Sydor的命令见于基辅乌克兰国家中央档案馆，3833/2/3, 引自Grzegorz Motyka, “Ukraińskie ‘powstanie’,” Karta, 29 (1999), 65。

[57] Repatriacja, Vol. 1, 64-66; Deportatsii, Vol. 1, 471-473; Trahedia Ukraintsiv Pol’shchi, 125-128, 156-159.

[58] 火烧村庄，见1947: Propam’iatna Knyha, 165-168; II/1771, AWKW。关于军队的介入，见Repatriacja, Vol. 2, 84-87, 110-114, 170-174, Szcześniak and Szota, Droga do nikąd, 226227; 以及Motyka, 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296ff。官员遣返回国，见Repatriacja, Vol. 2, 140。

[59] 当时有一些反抗苏联军队的合作。Grzegorz Motyka and Rafał Wnuk, Pany i rezuny, Warsaw: Volumen, 1997, 76-193. UPA成员回忆与AK的合作，见1947: Propam’iatna Knyha, 144, 236; Povstans’ki mohyly, 213-214; 波兰人的报告，见Pereselennia poliakiv ta ukraintsiv, 733, 911。

[60] 这次会议，见Repatriacja, Vol. 1, 147-154。类似的请愿，见Pereselennia poliakiv ta ukraintsiv, 523-526。

[61] Stanisław Grabski, Państwo narodowe, L’viv: Igla, 1929, 164, 涉及了“民族国家”和“民族性国家”（state of nationalities）之间的对立。

[62] Trahedia Ukraintsiv Pol’shchi, 174-175.

[63] 尼古拉·波德戈尔内（1903—1983）是冷战时期的苏联政治家，曾于1957—196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5—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64] Akcja ‘Wisła,’ 15.波德戈尔内在1964年是足以推翻赫鲁晓夫的三巨头之一。他的乌克兰名字是Mykola Pidhirnyi。

[65] 关于这次事件，见Repatriacja, Vol. 2, 24, 31, 39, 43。

[66] 关于被迫移居的规模估计是基于Akcja Wisła提供的数据。又见以下关于被迫移居的乌克兰人的调查：Halyna Shcherba, “Deportatsii naselennia z pol’s’koukrains’koho pohranychchia 40-kh rokiv.” in Pol’s’ko-Ukrains’ki studii, Kyiv: Lybid’, 1993, 254。被杀害的乌克兰人估计数量来自Motyka, 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364。

[67] Sovetskii faktor, 388.共产国际主席Dmytro Manuil’s’kyi写信给政治局委员Lazar Kaganovich说，苏维埃乌克兰不应该再接受来自波兰的乌克兰人了，因为负责重新定居的机构已经被解散了，也没有更多的资金了。Trahedia Ukraintsiv Pol’shchi, 404-405.（Manuil’s’kyi恰巧是里加会议的谈判者之一，他在波兰共产党瓦解前负责监督该党，他很了解波兰，波兰语说得很好。）

[68] Akcja ‘Wisła,’ 53-54.

[69] 同上书，65。关于希维尔切夫斯基之死，见Tadeusz Pl ąskowski, “Ostatnia inspekcja Gen. broni Karola Świerczewskiego,” Wojskowy Przegląd Historyczny, 4 (1983), 96-112。官方记录是Polska Zbrojna, 21 March 1947, 1。

[70] 关于西乌克兰，见Deportatsii, Vol. 2, 64-66; Desiat’ buremnykh lit, 589; Werth, “L’envers d’une victoire,” in Stéphane Courtois, ed.,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7, 254, 264。

[71] Vostochnaia Evropa, 596-597. 那位心存疑虑的人物是瓦迪斯瓦夫·沃尔斯基（Władysław Wolski），他当时是负责遣返事务的公共行政部副部长，在1949年升为部长。

[72] Akcja ‘Wisła,’ 82-83, 84-85.

[73] 同上书，43。

[74] OUN班德拉派的目标声明，见the January 1946 “Prohramovi zasady OUN,” in OUN UPA v roky viiny, 451-463。由于现在沃里尼亚和大部分加利西亚地区归入苏联境内，存在争议的领土就是仍属于波兰的小部分加利西亚地区（热舒夫领地），以及卢布林领地和克拉科夫领地的部分区域。

[75] Akcja ‘Wisła,’ 98-99.

[76] 同上书，93。

[77] 我反对那些认为重新定居只是摧毁UPA计划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近年来最全面的研究中所持的观点。Szcześniak and Szota, Droga do nikąd. 我也质疑Tadeusz Piotrowski在以下著作中的观点，Poland’s Holocaust,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 1998, 244, 379。我也不同意相反的观点，即这些行动与UPA完全没关系。就算UPA不存在，波兰政策也会如出一辙，并受到同样的欢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要讨论“The Tragedy of the Ukrainians of Poland”而不提到发生在沃里尼亚的大屠杀是很奇怪的。Trahedia Ukraintsiv Pol’shchi.

[78] 一位波兰人回忆道把兰科人当作背叛者来对待是不公平的：II/1771, AWKW。关于第三帝国时期的身份文件（Kennkarten），见Kersten, “The Polish-

Ukrainian Conflict,”147。

[79] 1948年10月，科索夫斯基回到苏联。见Kossowski, “Sluzhebnaia kharakteristika,”15 October 1948; 以及“Charakterystyka——Służbowa,”31 March 1948, teczka personalna ppłk. Wacława Kossowskiego, CAWR。

[80] 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407.

[81] Akcja ‘Wisła,’ 210. 关于莫索的副指挥官批评他的战略，见Lech Kowalski, Generałowie, Warsaw: Pax, 1992, 100–103。

[82] Akcja ‘Wisła,’ 222–225, 279–282, 285–286. 关于安全部队，见John Micgiel, “Bandits and Reactionaries,” in Norman Naimark and Leonid Gibianskii, e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 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7, 63–111; Andrzej Paczkowski, Odsfałszowanego zwycięstwa do prawdziwej klęski, Cracow: Wydawnictwo Literackie, 1999, 36。

[83] 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368 376−377. Misylo记录了507位UPA成员的死亡，其中35人即6.9%被列为自杀。Povstans’ki mohyly, 29–218.

[84] 大约有3万到5万名乌克兰人和兰科人逃离了强制移民：一些人通过贿赂军官的方法，其他人通过藏在波兰家庭中，或者声称自己是波兰人，大约有1000人成功地说服地方当局保护他们（Bodaky, Blechnarka, Wysowa）（Conversations in Lemkowszczyzna, 23–25 July 1999）。有时候，遣返行动小组的领导人会自行决定要不要违反命令，允许不同民族通婚的夫妻、红军老兵和乌克兰人为铁路和矿井工作，以留在当地。

[85] 1947: Propam’iatna Knyha, 15, 73, 79, 142–143; Nashe Slovo (Warsaw), 3 March 1996, 3; 10 March 1996, 3; Leszek Wołosiuk, “Historia jednej fotografii,” in Włodzimierz Mokry, Problemy Ukraińców w Polsce po wysiedleńczej akcji “Wisła”1947 roku, Cracow: Szwajpolt fiol, 1997, 403– 414.

[86] 有35人以上在亚沃日诺集中营被判死刑。有一种计算称，1944年到1956年间的2810起死刑中有573名受刑者是乌克兰人。考虑到乌克兰人占人口的1%都不到，这一比例确实很高。Akcja ‘Wisła,’ 30. Misylo在UPA v svitli pols’kykh dokumentiv中收集到相关文件。关于1947年前被处决的乌克兰人，见Maria Turlejska, Te pokolenia żałobami czarne, London: Aneks, 1989, 331–337。在被迫移居的过程中死亡的582名乌克兰人名单，见Repatriac ja,Vol.2, 352–394。

[87] 波兰代理人关于对待在亚沃日诺集中营的乌克兰囚犯的报告再版于Nashe Slovo（Warsaw），1996年1月28日，1，3。又见Mokry, Problemy Ukraińców w

Polsce, 76–82; 1947: Pro pam’iatna Knyha, 49–50, 92–93; Jan Popiel, ed., “Rozmowy przeprowadzone w Dobrej,”未出版，1997; 以及一位波兰妇女的回忆录，她从西伯利亚归来，受到庇护一名UPA士兵躲避红军追捕的指控：II/53, AWKW。

[88] UPA在波兰的行动终结于1947年9月17日，当时OUN指挥官Iaroslav Starukh在他的掩蔽壕中身亡。UPA指挥官Myroslav Onyshkevich解除了士兵们的誓言。1947年末，三支小型行动队击败了继续战斗的游击队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军队持续遣送逃跑的或被遗漏的乌克兰人。1947年到1952年间，约有15万乌克兰人被迫移居。

[89] 关于在苏维埃乌克兰的UPA成员：Grzegorz Motyka, “Bieszczadzkie sotnie UPA na Ukrainie 1947–1948,” Nashe Slovo (Warsaw), 6 February 2000, 3; Burds, “Agentura,”89–130; Peter Potichnyj, “Pacification of Ukrain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1999; Desiat’ buremnykh lit; D.M. Stickles, ed., The Beria Affair, New York: Nova Science, 1992, 54 and 104. On Lebed’: Christopher Simpson, Blowback, New York: Weidenfeld and Simpson, 1988, 163–171。

第10章

尾声：共产主义和被清除的记忆（1947—1981）

1945年出现的波兰和1939年被摧毁的波兰是欧洲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战前波兰的一半领土在1939年被苏联吞并了，而德国在1945年获得了战后波兰的三分之一领土。波兰失去了维日诺和利沃夫，得到了格但斯克和弗罗茨瓦夫（Wrocław）。在战后波兰，波兰人的数量占有压倒性优势：约有97%的波兰公民的自我认同是波兰人。但是如果我们把战后波兰的国界放在战前的欧洲地图上，我们会发现1939年生活在波兰战后领土上的有四个族群：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和东斯拉夫人（乌克兰人和兰科人）。1939年，在1945年归入波兰的领土上仅有五分之三人口是波兰人。[1]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五分之三如何变成全部人口的大致概况：犹太人被谋杀，德国人被放逐，乌克兰人被驱逐出境，而苏联西部的波兰人被"遣送"回来。本章将重点关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重新定居所造成的后果，努力揭示重建波兰背后被破坏的东西。

种族清洗和社会记忆

在后来属于乌克兰西部的领土上发生的波兰人大清洗和后来的波兰东南部领土上发生的乌克兰人大清洗，终结了数千年来边陲混居的局面。自近代早期开始，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三种主要语言是乌克兰语、波兰语和意第绪语，四种主要宗教是东正教、希腊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2]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几乎被全部消灭，许多幸存者在战后移居别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继续在这些领土上栖居，但1947年开始他们第一次被"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这两个政治单元之间持续存在的边界分隔开。加利西亚人只能把俄国人视作主要的少数民族，把俄语视为权力和文化的语言。[3]在经过六个世纪来自克拉科夫、华沙和维也纳的统治，莫斯科的统治是一种新的形式。

在原本属于波兰的沃里尼亚地区，1939年时那里的波兰人约有35万人，到1947年减少到约7000人，减少了98%。在之后属于苏维埃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地区，那里有约15万人自认是波兰人，而战前这个群体有180万人，减少了92%。边界变动后留在波兰的加利西亚领土要小得多，1939年那里原有约60万说乌克兰语的人，到1947年时只剩下约3万人，减少了95%。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地区全部犹太人口中的97%在战争中死去。在沃里尼亚，这一数字高达98.5%。[4]即使考虑到每个可以想象到的限制条

件，这些变化也说明了在欧洲大片区域内剧烈的人口定居调整。1941—1944年的“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的政策，1944—1946年少数民族“撤离”是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前者推动了1943年开始的乌克兰-波兰种族战争，而后者使战争持续下去。

乌克兰人记得“波兰”政权发动的种族清洗，认为UPA是帮助他们的组织。对UPA的记忆成为战后波兰的乌克兰人重要的身份认同元素。1944—1946年从波兰被驱逐出境的大多数乌克兰人，之后在乌克兰西部定居。对他们来说，UPA也成为民族认同的公认宝库。[5]移居苏维埃乌克兰的乌克兰人有时会抱怨他们的命运被生活在波兰的乌克兰人给忘记了，后者只记得1947年和维斯瓦河行动。[6]他们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乌克兰问题不是仅仅在波兰，或者说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被“解决”了。1944年到1946年间，159241名被认定是乌克兰人的人被送往乌克兰中部或东部。323858人重新定居到乌克兰西部。[7]维斯瓦河行动迫使波兰境内140660人重新定居。在数量方面，维斯瓦河行动涉及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波兰公民，他们如同乌克兰人一样重新定居。更多人被送往乌克兰中部和东部，而不是波兰西部，他们也面临着适应新环境的问题，而且新环境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更糟糕。

留在波兰的乌克兰人铭记1947年，而从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移居别处的波兰人铭记的是1943年和1944年乌克兰游击队发动的大屠杀。诚然，UPA在1943年的沃里尼亚和1944年的加利西亚针对波兰平民的残忍大屠杀是战时最可怕的插曲之一。波兰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几乎一直将UPA视为一群凶手。幸存者发现他们四散在战后波兰，共产主义政权不承认他们的记忆，因为失去战前领土的讨论成了一个禁忌。波兰幸存者同时承受着巨大的民族屈辱，使东部文明开化的任务完全溃败，这个理念对波兰民族认同十分重要，就像国界线之于美国或帝国之于英国那样重要。

这些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记忆完全不同：他们对事件的解释相互矛盾，对英雄和恶棍的概念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表现形式是类似的：两者都在谈论生活方式遭破坏，被迫开始新生活。想一想，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回忆接连出现是何种情景。“没有人能料到这么好的一个乌克兰村庄——和乌克兰人的生活一样欣欣向荣——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以如此残忍、野蛮的方式从地球表面抹去。”“沃里尼亚燃烧着，熊熊火焰燃烧着，我现在还能看到它，无法从脑海中擦去，我忘不了。发生在沃里尼亚的事情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死去。”[8]关于1943—1947年，存在着历史分歧，关于谁挑起了争端，关于谁受苦最深，关于群体、边界和时段的定义存在不同的说法。乌克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波兰人在战后归属波兰的大部分区域内先挑起争端。波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OUN班德拉派的决定——在之后成为乌克兰西部的区域内抹去任何波兰因素——开始了整个恶性循

环。乌克兰人相信在今天的波兰领土内死去的乌克兰人比波兰人多：大约是1.1万乌克兰人和7000波兰人。波兰人则相信在所有有争议的领土上，遭杀害的波兰人人数更多：约7万波兰人和2万乌克兰人。[9]

社会记忆和现代民族性

今天，把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矛盾的记忆和当事人回忆、伤亡人数统计联系起来看，并没有使事实走样，他们矛盾的记忆符合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盛行的两种现代民族主义。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今回忆起来的可怕历史事件常常澄清了重述历史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身份。关于1947年的观点和关于1939年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在20世纪40年代相互清洗的青少年和成人常常在30年代孩提时代一同玩耍（有时这毫不夸张）。沃里尼亚波兰人“瓦尔德马·洛特尼科”（Waldemar Lotnik）在1943年末残忍的互相清洗中参与了波兰一方，他的回忆十分典型：“但是对方是与我一起度过大部分童年时代的乌克兰人，我们一起学习读写，在冬天结冰的湖面滑冰，一起发现俄国人和德国人在‘一战’时留在森林和田野里的炮弹碎片……”[10]他没有逃避，他和这些孩子在一起时肯定是说乌克兰语的。

“洛特尼科”以及其他和他一样讲述故事的人，他们的讲述方式推翻了所谓天生具备的民族特征的推测，证明对民族认同的文化定义所言不实，并警醒我们注意战前和战后对民族性解释的区别。洛特尼科——请记得，他是讲述一个十分波兰化故事的波兰人——如果不是以乌克兰语和俄语为母语的人，可能早在许多重要关头被杀死。他的回忆录标题《九条命》的意思是除了波兰语，他还说其他语言。在某个时刻，他几乎因为说波兰语时的东部口音而死，因为一个机警的红军军官听出了这点，而他正在寻找逃兵。一些在1943年九死一生的沃里尼亚波兰孩子之所以能幸存，因为他们和一起玩耍的乌克兰孩子说乌克兰语，而且在路边被陌生人拦截时能用乌克兰语说祷告词。那些希望救下波兰孩子的沃里尼亚乌克兰家庭教会他们乌克兰语的《天主经》。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宗教是认定某个民族的记号，教会有时为民族活动家提供庇护，但这是宗教第一次成为普遍社群的主要民族性标志。如果有人把现代性定义为民族性比宗教更有价值的阶段，那么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大部分地区的现代性始于20世纪40年代。

我们从幸存者的回忆录中得知这些幸存案例。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死亡事件比幸存的情况更难描述。然而，发生在1943—1944年关于弄错身份而导致死亡的案例已经足够多，我们能够确定民族性并非一目了然——即使对民族主义者而言也是如此。在基于民族基础的大规模互相屠杀的氛围里，人们因为误判而导致极度荒谬的死亡事件。1944年夏天，生活在祖布拉（Zubrza）的加利西亚村庄周围的波兰人试图通过屠杀乌克兰人向乌克兰民族复仇。村庄里的五名波兰人不相信这些无名的袭击者真的是波兰

人，当地波兰人明显认为外来武装者是UPA游击队员，他们假扮波兰人以引出村里的波兰人。按照这种解读，这五名波兰人假装自己是乌克兰人。但他们失算了：袭击者其实是波兰同胞。他们的策略很成功，波兰同胞误以为他们是乌克兰人然后杀了他们。在生死之际，刽子手和受害人都没有认出同一民族的成员。[11]

1947年，波兰东南部存在类似的身份模糊问题。维斯瓦河行动遭到控诉和抵制的原因正显示了区分战争中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简单解释是谬误的。比如说，1947年5月波兰政权制造了一支假的UPA游击队——游击队由说乌克兰语的人组成——为了把OUN领导人从他的战壕中引出来。他们安排了一次会面。但是伪装工作做得太好了，在前往会面地点的途中，这支波兰“UPA”分队被波兰安全部队误伤。顺便一提，甚至正好目睹现场的真UPA士兵也无法分辨出这支假UPA分队不是他们的人。一个月后在另一次事件中，一支真的UPA分队因为齐声唱起一首当时流行的波兰革命歌曲（“当民族开战，武器在手……”）并且唱完了波兰歌词而得以逃离波兰军队的包围。此种讽刺事件是种族清洗的产物，也证明了种族清洗是不彻底的；而种族清洗的成功将意味着这种意外不再发生。[12]

1947年维斯瓦河行动中被清洗的乌克兰人，有时波兰语说得比那些1943年在沃里尼亚被UPA清洗的波兰人还要好，但是当这些群体在波兰北部和西部的收复领土相遇时，人们通常“知道”谁是波兰人，谁是乌克兰人。[13]政治和记忆强于语言等可观察的文化特征。这并不是说兰科人和乌克兰人无法像波兰人一样逃过一劫，其中有数万人办到了。关键问题是到1947年为止，人人都接受他们的民族性是单一的、排外的，不同的人实际上属于一个民族。重新定居到波兰西部的东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常常在很多方面拥有共同点——至少和他们周围的本地人相比，但是很明显，新的“东部文化”没有出现。[14]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相似性才会显出。一个沃里尼亚波兰人回忆道，他关于乌克兰邻居唯一的好印象是对方回请圣诞节晚餐以及UPA老兵在西伯利亚的古拉格不知如何弄到的新鲜鱼。在战前，圣诞节晚餐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场合，而在20世纪30年代回请邀请很常见。直到40年代，这样诚挚的邀请才在西伯利亚重新出现。[15]

巩固后的波兰国家感到了分裂趋势，因此支持一种现代的波兰民族性概念。战后出现的混乱和流动性促使这个概念形成。当五分之一战前人口被杀害，四分之一村庄被破坏，三分之一人口重新定居或移居海外，一半的文化中心（利沃夫和维日诺）归于别国统治时，地方忠诚的价值低于预期，而近期记忆的价值则高于预期。对1945年后的详细研究说明在波兰制造一个工人阶级的过程包含了波兰工人阶级民族主义的制造。[16]而战时的个人经历为国家制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个人来说，这些经历也常常

是充足的。[17]清洗者与被清洗者都在转变，也许对两者来说没有比这更民族主义化的经历了。这些人记住了一些事，忘记了一些事，有一些伤心事，也有一些他们为之辩护的事。

简化和民族主义化

我们通过区域群体的例子可以发现现代民族性在共产主义波兰取得的胜利。“沃里尼亚人”现在被视为最直率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但1939年前的情形完全不是如此。[18]兰科人（或是他们的子孙们）现在成了波兰的乌克兰公民社群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战前也是无法想象的。民族主义现在是波兰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的主流思潮，这在之前从未发生过。想一想从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大屠杀中获益的数万名乌克兰农民，或是在维斯瓦河行动后重新定居到波兰东南部的波兰人。如今沃里尼亚的乌克兰人拒绝谈到被消灭的波兰村庄，就像如今在波兰东南部破坏乌克兰人公墓的波兰神父，他们已经抚平了历史的褶皱。

而那些满是褶皱的村庄——比如多布拉茨拉切斯卡——又遭遇了什么？在地方历史中真实存在了六个世纪后，在数十年来对现代民族性理念保持相对冷漠后，多布拉在1939年到1947年间被改变得几乎面目全非。1939—1941年，苏联驱逐了那些被指控与两次大战间波兰“合作”的乌克兰人。1942—1943年，德国人谋杀了大部分犹太人。德国人同时把乌克兰民族活动家和共产主义者送到奥斯维辛。1944—1945年，UPA杀害了不合作的乌克兰人，以及被怀疑与新政权“合作”的波兰人。1945年1月6日，一支波兰营在多布拉发现一支UPA分队，UPA成员逃走了，军队杀害了村里26名村民。1946年，苏联人迫使半数幸存者重新定居，波兰政权在1947年维斯瓦河行动中迫使另一半定居别处。80名村民被扣留在亚沃日诺的集中营；一位多布拉妇女在那里生下孩子。

多布拉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对谁是暴力施加者的定义各执一词。我们可以假定，发现因通敌而遭UPA谋杀的14岁男孩尸体的人不是同一批人。类似的例子还有那位看到波兰士兵在圣诞节那天杀害了她父亲的12岁女孩。多布拉的情况太严重了，以至于我们不能说是战争使这里变得民族化。多布拉在战前并非免于民族激进主义波及，而幸存下来的村民也并非全是乌克兰人或波兰人。我们只能谨慎地认为战争消除了近代早期那种自我认同的可能性，并激发出更现代的可能性。由于现代民族性伴随着特定的词汇，被抹去的可能性之一即我们的战后习语如何轻松地描述出那种失落的现实。今天，“波兰的”和“乌克兰的”这两个词语被强加在幸存者的故事之中，即便他们很快补充说这些词语在战前有不同的意义。[19]

和1943年在沃里尼亚被消灭的波兰定居点相比，多布拉茨拉切斯卡的可怕

命运似乎又充满诗意。想一想我们在第8章曾讨论的格文钦斯基的命运。UPA做出的杀光每个人的决定让幸存者的脑海中留下了更清晰的画面。一个来自格文钦斯基的男孩在家中的马厩里待了一夜，他在1943年8月29日黎明醒来时看到他的父亲在田里被乌克兰人包围。其中一个乌克兰人用镰刀朝他父亲（56岁）的后脑勺砍去；他父亲跪在地上，身体抽搐着向前倒，面朝土地死去了。男孩看到他的母亲（43岁）一边尖叫，一边跑向她垂死的丈夫。乌克兰人命令她停下，然后一个乌克兰人用枪瞄准后射杀了她，另一个乌克兰人用镰刀朝倒在地上的她挥去。一个格文钦斯基女孩那天早上回到家后看见邻居的脑袋滚在地上，一个孩子被柱子重击头部而死，其他村民被人用干草叉和镰刀杀死了。她哭着跑回家，发现她11岁的妹妹被殴打致死。其余家人也都死去了。[20]逃离加利西亚的波兰人都有着类似的回忆。利沃夫南面的波兰村庄胡塞科（Hucisko）在1944年4月12日被UPA摧毁。当地的一名妇女回家后发现男人们被吊死在树上，他们被人剥了皮，心脏也被掏出来。地上到处是其他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尸体被烧毁和破坏得难以辨认。她只能通过那天早些时候自己放在小儿子口袋里的面包，认出他残缺不全的尸体。[21]

就此而论，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恐怖的波兰幸存者能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做出如上区分是十分惊人的，当这些回忆录被人遗忘，他们的名字变成了数字，他们的故事也变成了历史。[22]难以磨灭的个人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了民族健忘症的一部分。[23]个人记忆其实是民族记忆的错误因素，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共同苦难——贯穿其中的迷思因此不可避免。换言之，当种族清洗的受害者保留着一种模棱两可的认同（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讲述故事时细节略有差异（常常会有这样的例子），当他们的叙述在整个民族社群中流传时，这些叙述就降格为最有共同点、最恐怖的元素。重新讲述或重新书写故事，或造成破坏，或再次提炼。诸如多布拉（如今仍然存在于波兰）等地的变化，甚至诸如格文钦斯基和胡塞科（如果存在，它们应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等被彻底抹掉的波兰定居点——它们消除了简化民族历史的障碍。

驱逐通过将民族置于地方性之上，而为迷思的产生奠定基础。人们因为纳粹和苏联在1939年后发放的身份文件上的民族性类别而遭到驱逐，尽管这些文件可能没有反映出一种现代的民族身份。尽管如此，驱逐的经验不仅能通过落实种族化，还通过社会地理（sociogeographical）后果巩固民族身份。1944—1946年间，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都被迫重新定居到从地方层面上来看是异质的区域，但这些区域在民族性层面却为他们所熟悉。一个拉脱维亚莱姆基尼人（Lemkini）在“二战”后发现自己来到了利沃夫，而她对城市生活所知甚少，但她之后就知道要在地方教堂祈祷，以及如何说乌克兰语（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位从卢茨克（L’utsk）重新定居到格但斯克的沃里尼亚波兰人可能之前从未见过大海，但是他会成为一名罗马天

主教徒，周围大部分人也能理解他所说的波兰语。在新的环境里，诸如宗教和语言等“民族”特质逐渐显现。驱逐造就了民族主义的最小公分母。

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历史

维斯瓦河行动迫使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重新定居后的几年里，波兰考古学家发现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13世纪的统治者达尼洛大公（Prince Danylo）的石棺。[24]由于挖掘工作在边界线一端的波兰国土上进行，靠近争议城市海乌姆，因此挖掘并未公开。波兰共产主义当局需要遏制过去七个世纪中“乌克兰人”定居“波兰”的观念。波兰的担忧也符合苏联的实践。毕竟，在学校的历史课本中苏联是中世纪基辅罗斯的“后裔”，而共产主义波兰是中世纪皮亚斯特王朝（Piast dynasty）[25]的“后裔”。波兰人和俄国人从小受到教育：他们的“种族群体”已经存在900年了，等待着适合的政治和领土来实现他们的“国家地位”。

现代共产主义的中世纪公国和王国“血统”使得共产主义者得以回避500年来波兰文化向东拓展（从14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事实以及波兰-立陶宛王国（1569—1795）的政治成功。对苏维埃共产主义来说，波兰-立陶宛王国是一个棘手的例子，有很多亟须废除的东西：宪法传统、代表机构、波兰人和东斯拉夫人的合作、知识分子的灵活性以及对民族性的政治包容。那些拒绝苏联对乌克兰历史的内容解读的乌克兰人常常能接受解读的形式。如果相信是乌克兰而非俄国“继承”了基辅罗斯，可能会有忽视波兰-立陶宛王国遗产的风险。当然，波兰人——认为波兰-立陶宛王国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波兰”的——也是错误的。这是近代早期欧洲最大的王国，由近代早期欧洲最庞大的公民群体所统治，是一个贵族国家。当近代早期民族性在19世纪被重建，一群现代民族主义者意图从更久远的历史中寻找不同的民族起源。这一民族主义趋势培养了20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对手。[26]

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是种族民族（ethnic nation）是稳定的共同体，具备持久的边界线以隔离现代历史中引人关注的问题。比方说，两次大战间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说波兰语的农民被乌克兰文化同化（反之亦然），其中复杂的同化模式如今只是学者专家的兴趣所在。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人总会（或至少命中注定）成为他们最终成为的人。既然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东部已经成为乌克兰西部领土，乌克兰人和波兰人都已忘记这些区域曾经有多么不同。1918年前这里被俄国-奥地利边界分隔了一个多世纪，1918年到1939年波兰人在这里实行区别政策，1939年到1941年这里因苏联和纳粹的占领政权而分裂，1941年到1944年纳粹设立乌克兰总督辖区和波兰总督府，如今这里又成为“乌克兰西部”毫无疑问的核心地带。如今，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哈布斯堡时代在利沃夫的煤气灯下唱着《我的沃里尼亚》

这首歌，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27]

从近代早期民族性到现代民族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1596年的布列斯特联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一直是对手。由于俄国和奥地利的帝国政策，希腊天主教在加利西亚东部一直占据优势，而20世纪初东正教则在沃里尼亚占统治地位。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联合给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创造了机会，他们在沃里尼亚的东正教领土上传播现代民族主义。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二战”期间取得巨大的成功。在1943年沃里尼亚发生种族清洗期间，我们必须注意到不仅有波兰人被清除，还存在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结盟对抗罗马天主教的情况。这是发生在乌克兰西部的新情况，在那里比起乌克兰民族的认同，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宗教分歧没那么重要。通过巩固民族间的现代分裂，近代早期的宗教分歧被弥合了。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波兰东南部。在近代早期王国的框架内，或是近代早期的波兰文明内，希腊天主教是罗马天主教的盟友。而当近代早期民族性屈从于现代民族性，这种结盟也随之灰飞烟灭。发生在波兰东南部的种族清洗不仅是波兰人针对乌克兰人的行动，也是罗马天主教针对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行动。战后波兰人接受了这种观念，即希腊天主教教徒和东正教教徒都是乌克兰人。例如，波兰城市普热梅希尔（Przemyśl）的大部分市民曾是希腊天主教教徒，在20世纪90年代该市市长宣称乌克兰文化对他而言比爱斯基摩文化更像外来文化。对任何知道普热梅希尔的人或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来说，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也许除了一些市民的行为之外。这些市民占领了当地的一座教堂，当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希望把这座教堂还给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占领行为的受益者——罗马天主教迦尔默罗会修道士（Carmelite monks）——之后毁坏了教堂的圆顶，声称其“东方教派”的形状破坏了普热梅希尔的“波兰”天际线。在这里，宗教又一次臣服于现代民族主义，近代早期共享的文明变得晦暗不清。哈布斯堡王朝时代留下的圆顶实际上不是参照了东方教派宗座圣殿（basilica）或爱斯基摩冰屋的样式，而是参照了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教堂。[28]

作为共产主义合法性的民族历史

我们可以从个人、城市、区域和宗教的例子中看到现代民族性的发展。例如，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的家庭忠诚于毕苏斯基联邦主义者的近代早期民族性。1947年，年轻的雅鲁泽尔斯基上尉受命在维斯瓦河行动中重新安置乌克兰人。雅鲁泽尔斯基上尉相信维斯瓦河行动是一次波兰军队保护波兰国家的行动。雅鲁泽尔斯基被灌输将UPA视作

纳粹。在整个战后期间，波兰政权通过这种关联使其针对乌克兰人的政策正当化。当然，这里面确实有些道理。沃里尼亚的UPA命令前德国警察、“最终解决方案”中的合作者去杀害波兰人。波兰的UPA吸收了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的逃兵和德国警察，他们从德国占领中学习经验。UPA附属于OUN班德拉派，后者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种族纯洁性。波兰人有理由记得这些，但是他们忘了UPA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是因为其源头仅是乌克兰，就算没有比波兰领土上的波兰机构更优越，UPA的组织和前者至少是相同的。波兰政权把乌克兰和德国联系起来，这让波兰在1947年有更好的借口再次投入“二战”。这同时掩盖了一个事实：波兰政权的修辞和政策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德国占领时期。维斯瓦河行动的指挥官莫索将军曾提到用“最终解决方案”来解决乌克兰人的问题。此外，维斯瓦河行动利用了德国人的身份文件和一个德国集中营。[29]

维斯瓦河行动意味着共产主义政权可以也确实论及一个波兰“民族国家”。虽然这样说有些不妥，但创造一个波兰人的波兰是波兰共产主义者巨大的合法性成果。[30]有四个重大改变使得波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可能的，其中大屠杀几乎不被提及，驱逐德国人被视作忠诚于苏联的理由，“遣返”是苏联的行动，而只有最后对乌克兰人的清洗是当地波兰人的成就。[31]甚至在哥穆尔卡改革期间（1956—1970），波兰政权关注的还是战时的两大敌人——德国人和乌克兰人——以及成功牵制住他们。1968年，那些哥穆尔卡的反对者和拥戴者实施了官方反犹政策。1968年11月和12月，当时主要的政治周刊为纪念波兰独立五十周年，要求全国重要的知识分子评论“模范波兰人”有何改变。没有一个评论者提问“模范波兰人”和种族波兰人之间有何本质的身份关系。只有一个人暗示，在创造种族同质化的政体过程中，有一些东西丧失了。[32]

在一代人经历了共产主义之后——大约在1970年左右——只有现代民族性的概念在波兰社会中起作用。一名波兰人是波兰公民，也是种族上的波兰人，（很可能）也是罗马天主教教徒。共产主义波兰比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做得好多了，前者通过普及教育和提高社会动员能力来传播民族理念。在一代人之后，随着政治和解的到来，德国人的威胁感在1970年左右逐渐减弱了。同时，波兰国内对乌克兰人的恐惧依然根深蒂固。诚然，官方反乌克兰意识形态的巅峰是在盖莱克（Edward Gierek）[33]时代，即20世纪70年代，此时的波兰是一个官方宣传种族同质化的国家。[34]

1980年到1981年间，盖莱克及其继任者被迫与波兰团结工会竞争，后者起先是一个独立的工会，之后成为拥有1000万成员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毫无疑问，团结工会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其领导人却对乌克兰表达了不同的态度。在言论相对自由的几个月中，知识分子提到，如果乌克兰没有独立，波兰独立也不可能。团结工会向苏联各民族致意，乌克兰国内对此姿

态表示赞许。当波兰共产主义者试图败坏团结工会的名誉，他们强调团结工会支持波兰国内的乌克兰人获得平等权利。最终，在1981年12月，戒严令击垮了团结工会。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如今成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波兰国家的首脑、波兰军队的指挥官，他下达了这个命令。在他参与维斯瓦河行动的34年后，他再次相信只有通过自我侵犯才能拯救波兰。[35]这是终结还是开始？现代波兰民族性中主要包含对乌克兰的仇视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存在团结工会的自由波兰与东部邻居保持一致吗？

---

[1] Piotr Eberhardt,Między Rosją a Niemcami, Warsaw: PWN, 1996, 109, 127.

[2] 那里人们也说德语、罗姆语（Romani）和捷克语。大多数吉普赛人被纳粹政权杀害了。在战争结束时，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大多数的德国人或逃走或被驱逐了。许多捷克人被杀害了，剩下约5.3万幸存者移民别处。关于两次大战间德国人的定居，见Hans-Jörgen Seraphim, Rodungssiedler, Berlin: Paul Parey, 1938。战后的西乌克兰接纳了来自喀尔巴阡卢森尼亚附属区域的人们，此地之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来自布科维纳（Bukovina）部分地区的人们，此地之前在罗马尼亚境内。

[3] Volodymyr Kubiiovych,Natsional’nyi sklad naselennia Radianskoi Ukrainy v svitli sovi et- s’kykh perepisiv, Paris, 1962, 5–9.

[4] 这两处数据是基于以下资料基础估计出来的：Shmuel Spector,Holocaust of Volhyn ian Jews, Jerusalem: Yad Vashem, 1990, 357−358; Dieter Pohl, Nation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Munich: Oldenbourg, 1996, 385–387; 以及Piotr Eberhardt, Polska ludność kresowa, Warsaw: PWN, 1998, 214。其他计算结果基于前两章引用的资料以及1959年起的苏联人口普查。沃里尼亚的犹太人几乎没有幸存下来的一个原因是，在苏联占领时期几乎没有犹太人被驱逐。Spector估计这一人数在500人（28）。

[5] 见人类学调查：Grzegorz Babi ński, Pogranicze polsko-ukraińskie, Cracow: Nomos, 1997, 114;社会学家Antonina Kłoskowska的调查分析，Kultury narodowe u korzeni, Warsaw: PWN, 1996, 188–189; 又见政治科学家John Armstrong的评估，见Ukrainian Nationalism, Englewood, N.J.: Ukrainian Academic Press, 219。

[6] 兰科人会议（Lemkovska Vatra）上的对话，Zdynia, Poland, 25 July 1999。

[7] 数据引自Teczka specjalna J. W. Stalina, 544。又见Deportatsii, 22–23。

[8] II/2110, AWKW;1947: Propam'iatna Knyha, 69.

[9] 基于以上所引数据估计而来。又见华沙的非政府组织Karta的计算，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 nia, vol. 8, Warsaw: Karta, 2000, 159, 以及Grzegorz Motyka的计算，“Co ma Wisła do Wołynia,” Gazeta Wyborcza, 23 March 2001。

[10] Lotnik,Nine Lives, London: Serif, 1999, 14.一部结构上类似的回忆录说明了犹太人的这种逃跑为何是不可能的。Michael Skakun, On Burning Ground,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尽管犹太人Joseph Skakun冒充波兰鞑靼人，作为劳动力逃到了德国，之后作为一个立陶宛人加入了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但他的多次角色扮演仍然揭示了犹太人面临的诸多问题。多年来，在广袤的领土上，作为一个犹太人，除了意味着被判死刑，没有其他出路。犹太人通常看上去与别人不同，说话带着特别的口音，几乎不知道关于基督教的仪式，也不知道农场上的工作或荒野中的生活，他们通常衣着显眼，几乎没有使用武器的经验。犹太男子都经历了割礼。

[11] Agnieszka Cieślowska, Prasa okupanowego Lwowa, Warsaw: Neriton, 1997, 163–164.

[12] 这些事件引自Gregorz 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Warsaw: Volumen, 1999, 456, 435 respectively。

[13] 这重复出现在许多乌克兰人的回忆中。见II/2196/p, AWKW的例子。

[14] 就像美国南部的白人和黑人移居到北部一样，明显的文化相似性却敌不过想要否认的感觉，而且这种相似性被其他身份认同的吸引力削弱了。比较Włodzimierz Odojewski, Oksana, Warsaw: Twój Styl, 1999以及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and the Fury, New York: Jonathan Cape, 1929。

[15] 这件轶事引自Grzegorz Motyka and Rafał Wnuk, Pany i rezuny, Warsaw: Volumen, 1997, 8。圣诞夜可以互相邀请是因为西方教派和东方教派的圣诞节在不同日子：12月25日和1月7日。关于圣诞夜晚餐在东部“波兰”文化中的重要性，建议参见Włodzimierz Odojewski, Zasypie wszystko, zawieje . . . Paris: Instytut Literacki, 1973。这部关于战时波兰-乌克兰关系的杰出小说亟需被翻译。对我们的分析来说，关注普遍冲突中的个人选择是很有帮助的。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低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在共产主义波兰，这本书曾是禁书。

[16] 相关证据见Padraic Kenney的社会历史著作Rebuilding Poland: Workers and Commu nists, 1945–195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 Andrzej Zięba, “Ukraińcy w oczach Polaków,” in Teresa Walas, ed., Narody i stereotypy, Cracow: Międzynarodowe Centrum Kultury, 1995, 95–104. 关于国家政策，见Danuta Sosnowska, “Stereotypy Ukrainy i Ukraińca w literaturze polskiej,”同上书，125–131; 以及Józef Lewandowski, “Polish Historical Writing on Polish-Ukrainian Relations Dur- ing World War Two,” in Peter Potichnyj, ed., Poland and Ukraine, Toronto: CIUS, 1980, 231–246。又见John Basarab, “Postwar Writings in Poland on Polish-Ukrainian Relations,”同上书，249; Roman Szporluk,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Polish-Ukrainian Relations,”同上书，223; Babiński, Pogranicze polsko-ukraińskie, 163; Stefan Kozak, “Polsko-Ukraińskie dylematy i dialogi,” Polska w Europie, 10 (1993), 46。不同的研究框架，见Philipp Ther, Deutsche und polnische Vertrieben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1998。

[18] Jan Kęsik, “Województwo wołyńskie 1921–1939 w świetle liczb i faktów,” Prze gląd Wschodni, 4, 1 (1997), 107–108.

[19] Jan Popiel, “Rozmowy przeprowadzone w Dobrej w czerwcu-lipcu 1997,”1997; 相关通信来自Jan Popiel, November 1999; 1947: Propam’iatna Knyha, 184–194; Dzieje Konfliktów,Vol. 3,249–250; Motyka, 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328。又见Babiński, Pogranicze polsko-ukraińskie, 101; Krzysztof Ślusarek, Drobna szlachta w Galicji, Cracow: Księgarnia Akademicka, 1994, 161。

[20] Respectively:Śladami ludobojstwa, 351; and II/2451/4, AWKW.

[21] II/1758j, AWKW;Śladami ludobojstwa, 473–475.

[22] 例子见II/737; II/1362/kw; II/17, AWKW。许多波兰人也提到了乌克兰人救了他们，见第8章的脚注。

[23] 参见Anna Stro ńska, Dopóki milczy Ukraina, Warsaw: Trio, 1998。

[24] Taras Kuzio,Ukraine, London: Routledge, 1998, 111. 更广泛的叙述，见P.N. Barford, The Early Slav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278ff。

[25] 皮亚斯特王朝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王朝的名字来源于传说中的波兰部族领袖车轮匠皮亚斯特。从公元962年起，王朝的统治者以大公或国王的名义统治着波兰，直到1370年王朝绝嗣。

[26] 关于波兰人和苏联人对乌克兰历史的态度，见Stephen

Velychenko,Shaping Identity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New York: St. Martin’s, 1993;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 这是我在1999年7月和2000年6月在利沃夫的经历。有一首关于沃里尼亚的波兰歌曲的歌词内容与此相似，记录于1943年逃走的波兰人的回忆录。

[28] The Eskimo remark: Babi ński, Pogranicze polsko-ukraińskie, 109. 圣特蕾莎/施洗者圣约翰的故事见Chris Hann, “Postsocialist Nationalism,” Slavic Review, 57, 4 (1998), 840–863。“保护波兰教堂”委员会的领导人的观点，见Pogranicze (Przemyśl), 24–28 (1991)。

[29] Przesiedlenie ludności polskiej, 27.

[30] Krystyna Kersten, “Forced 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sh Society in the Postwar Period,” in Philipp Ther and Ana Siljak, eds., Ethnic Cleansing in East Central Europe, 1944– 1948,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75−87.

[31] 关于种族纯粹性和共产主义者的合法化，见Jan Gross, “A Tangled Web,” in István Deák, Jan Gross, and Tony Judt, eds.,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7–114; Lukasz Hoirszowicz, “The Jewish Issue in Post-War Communist Politics,” in Abramsky et al., The Jews in Poland, 199–208; Feliks Tych, Długi cień Zagłady, Warsaw: Żydowski Instytut Historyczny, 1999, 74; Eugeniusz Mironowicz, Białorusini w Polsce, 1944–1949, Warsaw: PWN, 1993, 146–151; Andrzej Paczkowski, Od sfałszowanego zwycięstwa doprawdziwej klęski, Cracow: Wydawnictwo Literackie, 1999, 224。

[32] 这项调查名为“Przemiany Polaków”，在1968年11月9日、11月16日、11月23日、11月30日、12月7日和12月14日的《政治》（Polityka）上刊登了30份回复。Tadeusz Kotarbiński是唯一一位提到多样化的益处的人。在“不要提到犹太人”的语境中，Józef Chalabiński是唯一一位明确提到犹太人的人。应该注意到其中一些受访者争辩道，波兰社会或波兰类型的社会的概念只在战后时期成立，这种观点与我在本书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33] 爱德华·盖莱克（1913—2001），波兰共产主义政治家，于1970年取代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

[34] Mirosław Czech, Ukraińcy w Polsce, Warsaw: Zwi ązek Ukraińców w Polsce, 1993, 12, 269; Stefan Zabrowarny, “Polityka narodowościowa polskich

władz komunistycznych w kwestii ukraińskiej," in Jacek Pietraś and Andrzej Czarnocki, eds., Polityka narodowościowa państw Euro py Środkowowschodniej, Lublin: IEWS, 1993, 147; Boris Bej, "Ukraińcy w Polsce," Kultura, 429(1983), 123–126. 又见See also Marcin Król, "Komentarz,"Nowa Respublica, 54 (1993), 39。

[35] Manfred Berger,Jaruzelski, Düsseldorf: Econ Verlag, 1990, 245–248;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London: Penguin, 1999, 356–363. 雅鲁泽尔斯基的话见Stan wojenny dlaczego, Warsaw: BGW, 1992.

| 第三部分 |

重建波兰祖国

第11章
爱国的反对派和国家利益（1945—1989）

在1989年协商革命后，团结工会建立了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该政府很快制定了东部政策。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波兰和独立的立陶宛、乌克兰的关系迅速改善。立陶宛政治家渐渐把他们的西部邻居看作融入欧洲的关键，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前往华沙寻求历史和解。与立陶宛人关于维尔纽斯的争端、与乌克兰人关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争端得到了很好的处理，以至于这些争端几乎不存在了。正如我们所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打破了波兰和东部的联系，促进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也许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为90年代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也许种族清洗为民族和解提供了条件？

如果欧洲东北部不存在后共产主义纷争，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此种假设在回顾历史时才可能成立。这片区域的和平图景并非来自波兰政策所继承的秩序，而是来自波兰政策所创造的秩序。[1]波兰政策的创新之处在于理解民族主义，并且将其向区域稳定的方向引导。1989年到1991年期间，当苏联依然完整时，波兰的政策行为就好像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即将成为民族国家一般。波兰外交官补充了一个附加条件：独立意味着接受苏联时代的边界。这立刻成了对苏联消失后的未来的预言，也是为即将出现的稳定区域秩序所做的准备。这也反映了波兰在移民问题上新的重大战略，这项战略在1989年之前已经争论了15年之久。战略的起草者是耶日·吉德罗耶茨（Jerzy Giedroyc）和尤利乌什·米罗茨维奇（Juliusz Mieroszewski），他们在对波兰民族性的理解的基础上制定了战略框架。考虑到这项战略诞生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讨论的争论背景下，而战略带来的和平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因此他们对现代民族性的不同理解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

波兰国家的东部利益

耶日·吉德罗耶茨（1906—2000）——无论是因为命中注定还是个人选择——参与了两次大战间波兰遗留下来的所有东部问题。他出生于明斯克的一个旧波兰-立陶宛王国贵族家庭，那时明斯克还是沙皇俄国某个省的首府。吉德罗耶茨在莫斯科的学业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中断，之后他回到了家乡。当波兰军队和布尔什维克军队在1919年争夺沙皇俄国的西北部领土，即旧立陶宛大公国的土地时，吉德罗耶茨和他的家人离开明斯克来到

华沙。正如我们所知，联邦主义者毕苏斯基领导的军队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民族主义者格拉布斯基确立了和平。波兰的谈判者把吉德罗耶茨的家乡明斯克让给了布尔什维克俄国。和许多之前来到这里的立陶宛波兰人一样，吉德罗耶茨发现华沙贫穷而沉闷。吉德罗耶茨在大学里学习乌克兰历史和文学，他结识了当时的乌克兰民族激进主义领导人。[2]他和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人物取得联系，从信奉完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德米特罗·东佐夫到左翼民主机构UNDO的领导人瓦西里·穆德伊（Vasyl’Mudryi）。吉德罗耶茨着迷于大主教舍普季茨基，后者当时是希腊天主教教会的领袖。作为一名记者和公务员，吉德罗耶茨敦促罗马天主教会改善与舍普季茨基的希腊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国内事务方面，他主动拜访胡楚尔人（Hutsuls），后者生活在波兰东南部，是一个说乌克兰语的贫穷民族。



图26：耶日·吉德罗耶茨（1906—2000），波兰知识分子和大战略家，为波兰政治思想重新确立方向。摄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巴黎。

吉德罗耶茨受到信奉完整民族主义的民族民主党人的排斥，被毕苏斯基及其怀旧式的波兰民族性所吸引。作为毕苏斯基的下一代人，吉德罗耶茨也是一个对乌克兰感兴趣的立陶宛波兰人。和毕苏斯基一样，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其最高目标是波兰的国家地位，从不将波兰社会的民族主义和波兰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对吉德罗耶茨来说，波兰人的历史附属物和其

他民族性，只有在与波兰国家建立联系时才是重要的。因为吉德罗耶茨相信少数民族会毁灭波兰，他务实地得出结论：波兰国家必须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民族期望。其中尤其涉及恪守之前的承诺，即使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获得政治自治权。总体而言，为了确认波兰国家将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以及地方民族主义者不会提出反对波兰国家的论据，这需要与所有少数民族做出约定。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缺少一项针对东部少数民族的总体政策，但还是有波兰人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吉德罗耶茨和沃里尼亚长官恩里克·约瑟夫斯基。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在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上的民族矛盾，导致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发生大规模的血腥种族清洗。而战后又发生了大规模驱逐，波兰失去了两座最重要的城市：利沃夫和维日诺。吉德罗耶茨在战时依然保持了对东部问题的兴趣，和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其他民族代表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在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的波兰军队中完成服役后，他前往巴黎，在那里建立了一所文学机构并创办了其评论刊物《文化》（*Kultura*）。1947年到1989年间，《文化》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波兰移民出版物。吉德罗耶茨很有可能是40年来波兰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由于他对待移民的特殊方式，他在波兰国内影响力巨大。远在巴黎的吉德罗耶茨意图影响共产主义波兰的国内政治，而不是在国外创造一个波兰的代替物。如此，他与当时的大多数波兰海外移民不同，后者寻求维持两次大战间波兰的政治机构（当时流亡伦敦）。出于思乡的原因，许多在伦敦的波兰人不明白为何要批评旧秩序或放弃割让给苏联的领土。[3]吉德罗耶茨相信一个新的独立波兰国家与复兴两次大战间的波兰是不同的，为此应该立刻着手准备。他理解“二战”在未解决波兰东部问题的情况下终结了，并致力于建立一个能让未来的波兰统治者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的平台。尽管吉德罗耶茨很少写作，他在编辑《文化》时的抉择勾画出他的东部政策。[4]

《文化》将战后波兰的东部边界视作未来波兰国家主权的东部前线。这个结论似乎合乎常识，但在波兰人中产生了争议，东欧移民也认为此举不同寻常。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定了这条边界线，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再次确认了这条边界线，波兰人将此视为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外交背叛。吉德罗耶茨的创新在于他没有把这些领土视为割让给苏联的波兰领土，而认为这些有争议的领土能满足波兰民族之外民族的需求。虽然由于红军的胜利和斯大林的选择，利沃夫和维日诺现在成了别国的领土，《文化》分别将其视为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立陶宛的一部分，并最终分析认为它们属于乌克兰和立陶宛。[5]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1973年到1974年，吉德罗耶茨最亲密的合作者尤利乌什·米罗茨维奇（1906—1986）为未来的波兰主权提供了东部大战略的理论证明。最重要的事务依然是未来波兰国家的利益，而引导性的设想是战时做出的某种改变不应被修改。长久以来，吉德罗耶茨坚决主张挑战目前的领土边界对波兰没有任何好处；米罗茨维奇试图证明波兰人能从维持目前边界中获利。他提议，立陶宛民族、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应在各自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变得强大，其共和国包括1945年从波兰获得的领土。他主张未来的波兰主权应该支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国家的独立。这一对波兰外交政策的建议包含了一种预言：波兰主权国家很快会兴起，它必须面对独立的东部邻居。米罗茨维奇是为数不多的做出正确预言的政治学生之一，他写道："东欧和苏联在20世纪都将迎来民族的春天。"[6]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种观点看起来很浪漫主义。当时苏联是超级核大国，很可能在"冷战"中获胜。波兰是苏联的卫星国，1968年和1970年发生的最近的两次动乱都被共产主义政权轻松地镇压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其境内的少数异见者不断遭到骚扰。苏联传统的强大军事力量正集中在争议区域。然而，苏联最终的命运已经清晰可见，国际关系中的现实（the real）不仅包括某一时刻的状态，还包括该状态接下来会向何处发展，理解多种发展方向是可能的，以及认识到个人会基于不同理念迫使状态朝着某一方向而非其他方向发展。现实主义（Realism）作为一种分析模型必须是务实的，但同时它必须包含（除非为了避免自相矛盾）符合实用主义的目标意识以及可通过务实手段达到的目的。这些目的自身并非现实的，它们无法从目前的世界中产生，而必须从个人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意识中产生。失去理念支撑的利益是前后矛盾的。

因而，表面上看起来是理想主义的其内核可能是现实主义的。米罗茨维奇关于苏联命运的判断是正确的，关于波兰提前需要东部政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他对波兰未来利益的考量——正因其目标和手段如此清晰——跳出了旧波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两难境地。他并未依据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自与波兰民族的传统关系来看待这三个国家，而是在未来波兰国家安全的语境下来看待它们。米罗茨维奇想象了这个波兰国家的地缘政治处境，他预期可能的威胁会来自（1）一个独立的俄国；（2）波兰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米罗茨维奇害怕波兰与俄国的矛盾——而非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矛盾——会催生俄国民族主义和波兰民族主义的有害面。米罗茨维奇的计划不是向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表达同情，而是一项防止领土争端、使俄国和波兰民族主义转变方向的计划。他注意到在苏联内部建立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为这一战略创造了智识开端。因为这三者可以被视为政治单位，他认为可能说

服波兰人相信这些苏维埃共和国离民族国家只有一步之遥。卫星国波兰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类比并不贴切，但是在苏联的结构内，这种类比是可能的。因为这三个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国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波兰在地图上是可见的，因此在未来的民族国家秩序中主张保留现存边界线是可能的。[7]

从他对俄国中心地位的承认以及他对苏联组织结构的理解，可以推出的结论是：被米罗茨维奇称为“ULB”（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国家是保障未来波兰主权的关键。如果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国家有能力保全自身，它们就能使古老的波兰-俄国之争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波兰的利益正在于提高这些国家幸存的可能性。同时米罗茨维奇认为调整东部领土不符合波兰的利益，这种调整领土的倡议将使下一代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民族精英变得疏离。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主张，波兰人不仅应该立刻放弃收复东部失地的计划，还要支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的独立国家梦想。尽管这个结论出自现实考虑，米罗茨维奇认为它也能为波兰外交政策增加道德维度。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这种道德维度可能鼓舞波兰人去行动。

波兰传统与《文化》计划

联邦主义。吉德罗耶茨出生于明斯克，米罗茨维奇在加利西亚度过了青年岁月，因此我们很容易将《文化》计划视作毕苏斯基以及更早的密茨凯维奇所主张的近代早期精英爱国主义的延续。吉德罗耶茨确实从小敬佩毕苏斯基，而米罗茨维奇相信密茨凯维奇比同时代的波兰人更能理解自由的含义。但是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与近代早期传统不同的现代形式。密茨凯维奇怀念波兰-立陶宛王国，而王国时期的民族性和今天的含义完全不同；毕苏斯基希望建立一个由波兰高雅文化粘合起来的联邦。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帮助波兰人为迎接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世界做好准备。米罗茨维奇设想独立的波兰将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也会成为民族国家。他蔑视对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思旧，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怀念难以引起共鸣，而是他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这种怀念只会被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爱国者视为帝国主义。当他意识到，一旦人们决心把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作平等的民族，而不是波兰国家传统的斑斓附属物，那么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遗产就会不攻自破。

我们已经知道，立陶宛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认为波兰-立陶宛王国毒害了立陶宛文化这一观点上，而乌克兰民族主义理想化了针对王国的叛乱。波兰人自己则倾向用现代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因此会认为东部领土是历史上就属于他们的领土。[8]所有的这些解读错得如

此离谱以至于没有任何学术妥协能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但是，一旦人们接受了多民族的政治原则，这些民族主义观点就能被放在一系列平行的民族历史解读中。这就是米罗茨维奇的提议。在他的观念中，对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国民的同情在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中表现得十分含蓄，而这种同情已成为对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的基本尊重。波兰联邦主义者的预设是波兰文化在东部具有优越性，而米罗茨维奇对不同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精英表示欢迎。波兰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而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年轻的民族——无论其历史价值如何——这种观点在政治中是不被接纳的。取代它的是用一般现在时态表达的提议，即这四类国民是值得拥有国家的民族。《文化》计划可视作升级后的联邦主义：假设一个人承认和东部邻居合作的关键资格其实是建立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问题，而获得这些国家认可的前提是波兰放弃原有联邦视角中的领土雄心和文明所有权声称。联邦主义采纳的是近代早期的民族性。《文化》计划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适应。

民族主义。把波兰视作众多现代民族中的一个，其实并无任何新意：这是民族民主党人的前提。类似的，放弃东部领土的建议也无创新之处。1921年民族民主党人格拉布斯基在里加与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中放弃了明斯克、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和别尔基切夫，并在1944年和斯大林讨论后，敦促波兰人从利沃夫撤离，这就是格拉布斯基当时努力的方向。民族民主党人认为东部领土可以给俄国，以换取俄国精英的青睐。民族民主党把现代民族的分类引入波兰政治生活，但是将俄国人和波兰人视作华沙和莫斯科之间仅存的民族。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被当作人口原材料或干脆被彻底无视。在民族民主党人看来，波兰精英应该越过人群的重重阻碍，和俄国对手达成妥协。虽然这种观点总是被塑造为现实主义，但实际上是由民族偏见和民族战略所决定的。由于预设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不可能创造独立的国家，民族民主党人被其现实主义的框架牢牢束缚。“现代波兰人”通过把现代性和波兰性联系起来，揭示了这种政治视角的传统局限。

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吸收了波兰民族主义的这一面，在1945年后主张和苏联达成的现状是符合波兰民族利益的。米罗茨维奇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大战略指出，应该永久承认目前的边界并废弃波兰的东部任务。但是和两次大战间波兰的民族民主党人及其战后共产主义继承者相比，米罗茨维奇的创新有三点。最明显的一点是，他推断波兰会重获主权，苏联将最终崩溃。第二，他建议为了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利益，而不是俄国人的利益（这是民族民主党人的传统）或苏联人的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传统）放弃部分领土。第三，他认为莫斯科精英的态度是阴晴不定的，但可以被波兰政策所影响。影响他们态度的最好方式不是授予俄国人他们渴求的东西。独立波兰的领导人保护波兰安全的上策是放弃领土所有权声

明——无论俄国是否做了相同的事情——并支持波兰和俄国之间的民族国家。这表现为对俄罗斯民族的尊重。



图27：最后一期《文化》出版于2000年10月。就像耶日·吉德罗耶茨许诺的那样，只有当他去世了，这份月刊才会停刊。

《文化》综合了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传统和德莫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传统，呈现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计划，未来的状态是共产主义东欧的民族将作为独立国家迈入当代国际体系。《文化》从毕苏斯基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归入浪漫主义的类别——尽管《文化》将

此用于实际用途。《文化》从德莫夫斯基那里得出了现实主义原则，但反对德莫夫斯基不切实际的倾向，即以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为代价与莫斯科达成妥协。《文化》从斯大林和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建立战后秩序的实践中得到启示：在民族标准上划定的国家边界具有持久性和吸引力。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的智慧成就在于将对国界线的承认和共产主义崩溃的预言结合起来，并构想出在这种情况下波兰需要新的大战略。他们的理论成就在于清晰地证明了这种战略的必要性，并勾勒出它的轮廓。他们的政治成就在于这一计划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1989年革命前，那些之后将举足轻重的波兰人对此计划已习以为常。

波兰政治与《文化》计划

战后的波兰移民认为《文化》计划是异端。在西欧的绝大部分波兰移民相信利沃夫和维日诺必须重返波兰。在1989年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解散之前，它的官方立场都是波兰应该重新商榷东部边界。这种立场根植于理想主义的信念，即波兰受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不公正对待，在“二战”中被灭国，在雅尔塔被盟军出卖，多年来受到共产主义的压迫，因此波兰理应在未来的欧洲规划中讨回公道。《文化》计划也面临知识分子的反对，这些反对者自称是现实主义者，把俄国视为东部唯一的强权。他们对因感情因素而重获领土并不（必然地）感兴趣，这些现实主义者争辩称独立的波兰国家能够通过和俄国达成协议——越过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使本国利益得到最好的保护。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斯特凡·基谢列夫斯基（Stefan Kisielewski，1911—1991），他是战后波兰最受尊敬的散文作家之一。和主张在战后秩序中恢复失地的理想主义者不同，这些现实主义者所持有的和解主义（accomodationism）解释了战后秩序的一些基本变化，并且寻求与那些逐渐适应这些变化的波兰国内的波兰人建立沟通。和现实主义者的和解主义类似，《文化》计划也从利益出发，因此可以在争论的平台出现时理性辩论。[9]

即便在共产主义波兰，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波兰共产主义经验中一个重要的特质是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团体可以对社会施加广泛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波兰反对派在东欧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为共产主义改革、经济低迷和历史不公正以及其他问题提供了讨论的平台。波兰反对派横贯四个方面：从时间上来看，这种讨论和辩论事实上能够推动进步；从广度上来看，这些讨论涉及了数万人（在团结工会时期）或者说数百万人；从长度上来看，许多相互竞争的组织也参与其中；从深度上来看，许多个人都过着反对派的生活，有空间来思考未来波兰主权的各个方面。[10]例如波格丹·博鲁塞维奇（Bogdan Borusewicz，1949— ）、亚采可·库容（Jacek Kuroń，1934—2004）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1947— ），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都关注东部政策，1980—1981年在团结

工会内部名声大噪，在1989年后的民主波兰中占有主导地位。他们不是异见者——如同在苏联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而是反对者、大潮流的代表。

20世纪70年代，米罗茨维奇在波兰反对派中的影响力清晰可见。1976年，波兰独立协约（Polskie Porozumienie Niepodległościowe）发布了一份计划，其东部政策紧跟《文化》。1977年起，工人防卫委员会（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简称KOR）的报刊对东面的邻国予以密切关注，而其下属的一份信息公报刊登了一份呼吁与乌克兰和解的公开信。到1980年为止，波兰反对派知识分子明显达成了支持《文化》计划的共识，而这些知识分子在团结工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1]《文化》计划出现在巴黎，但它与波兰的政治、宗教和学术的重要趋势保持一致。《文化》计划始于某种假定——这种假定由波兰政权亲自推广，即波兰的边界就在现存之处。某些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和世俗知识分子关系密切，比如卡罗尔·沃伊蒂瓦主教（Karol Wojtyła），他于1978年成为大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一直传播波兰在过去的东部争端中也负有责任的观念，并强调和东部邻国和解的必要性。1972年，扬·杰贾（Jan Zieja）神父向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传达了“我们原谅并希望被原谅”的讯息。[12]与此同时，经过审查的（合法的）波兰编年史打破了共产主义强加在乌克兰研究上的一些限制，而未经审查的（非法的）历史著作不仅向共产主义政策的公正性提出质疑，更向整个波兰东部扩张的传统提出质疑。[13]

1980年和1981年，作为拥有千万成员的群众运动（其中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党员），团结工会为支持《文化》计划的精英们提供了达成共识的平台，而《文化》计划在整个波兰社会被视为民族解放计划的一部分。关于波兰反对派以及波兰社会和东部邻国的反对运动有诸多共同点的观念广为流传。相当数量的波兰人认为他们目前的东部邻居和他们是平等的，这在现代波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团结工会的媒体发布的重要文章和诸如库容等团结工会领袖的讲话，都表达了这种新的观念，最终在1981年的团结工会议会决议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团结工会发布的《给东欧劳动人民的一封信》面向的不是苏联的无产阶级，而是苏联内部各民族。在当时这一举动异常地、过分地、愚蠢地大胆。当然，团结工会时期形成的讨论自由在各东部邻国的状况是不同的。几乎没人提到白俄罗斯。波兰人发现同情立陶宛人比同情乌克兰人更让人感到称意，尽管乌克兰反对派比立陶宛人更受团结工会模式的吸引。[14]对很多重要的乌克兰思想家和活动家来说，《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了一种新的波兰模式，这种模式在1980年的团结工会中得到了印证。[15]

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于1981年12月强制推行军事法以镇压团结工会后，更多反对派出版物指出了波兰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

系问题。在一些文章中，团结工会的落败被视为波兰人需要与东部（和南部）邻国结盟的证明。最彻底的爱国者——独立波兰联盟（Konfederacja Polski Niepodległej，简称KPN）——将东部邻国视为和波兰享有同等地位。1987年，“自由与和平”（Wolność i Pokój）的年轻激进主义者们签署了对维斯瓦河行动表示强烈谴责的宣言，并要求波兰社会包容乌克兰人。其他地下组织在互相认同既定边界的基础上，开创了和立陶宛、乌克兰反对组织以及移民团体的对话机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米罗茨维奇提出的论据被更细致和深入地思考。及至1989年，和东部邻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渴望反映出许多反对派的观点，也成为被那些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视为政治正确的观点。多亏了《文化》计划、历史修正主义、地下出版物和团结工会，波兰共识不仅反对恢复失地，而且支持东部邻国的独立。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政治理念，在80年代成了一种新的政治传统。[16]

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文化》计划

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是左翼人士，他们相信在波兰重获完整的主权后，国内的共产主义将有所改善。他们的东部计划对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亚当·米奇尼克，吉德罗耶茨对他极为崇敬——很有吸引力。米奇尼克当时是团结工会的领军人物，1989年后他编辑了波兰最重要的报纸。然而《文化》理念的主导权不仅被诸如米奇尼克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还被那些认为自己是最初的、最重要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波兰反对派所接受。许多波兰右翼人士在70年代经历了《文化》、在80年代经历了团结工会，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东部邻国的独立对波兰是有利的。比如说格热戈日·科斯切娃-佐尔巴斯（Grzegorz Kostrzewa-Zorbas，1958— ）当时是波兰右翼反对派，但是他为《文化》相关理念的传播做了很多贡献。1985—1989年，他编辑了一份非法出版物《新联盟》，致力于传播以下观念，即未来的东欧将出现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自由合作。科斯切娃-佐尔巴斯为团结工会的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他在1989年写了一份粗略勾勒波兰第一阶段东部政策的备忘录。20世纪90年代初，科斯切娃-佐尔巴斯和米奇尼克——两人在其他事情上几乎没有达成共识——在实施和普及针对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友好外交政策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激进的世俗波兰爱国者都加入了独立波兰联盟。他们在70年代把波兰独立直接提上反对派的议事日程，当时大多数反对派认为这种直接的做法是没有帮助的。他们的领袖莱谢克·莫丘尔斯基（Leszek Moczulski，1938—）认为波兰东部邻国的爱国主义和他本人的爱国主义一样值得赞扬，并设想独立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未来会和波兰一起加入波罗的海到黑海联邦（Baltic-to-Black Sea federation）。由于对波兰现在的东部邻国的尊重，这个预言值得注意。尽管莫丘尔斯基将他自

己定义为遵循毕苏斯基传统的联邦主义者，但是他和毕苏斯基不同，他在论及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时，把它们视作和波兰有着相同意义的民族。莫丘尔斯基并没有将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当作波兰帝国主义的基础，他对波兰东部邻国的民族精英的恐惧非常敏感。虽然1989年后作为国会议员的莫丘尔斯基因反复无常而臭名昭著，但是他支持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友好政策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17]

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媒体为与波兰东部邻国——尤其是乌克兰——达成和解的事业做出了实际的贡献。[18]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些罗马天主教活动家在1989年后重提乌克兰人种族清洗波兰人的事件，并将波兰的少数民族政策和邻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相提并论（所谓“互惠”）。但即便在波兰右翼阵营中，他们也是少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不到罗马天主教统治阶层的支持。总体而言，波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非常关心波兰的东部邻国。虽然波兰人对他们的教宗的关注是不牢靠的，这仍然给波兰境内对罗马天主教的接纳态度设立了限制。再没有主张波兰权利的政治力量全面仇视波兰的东部邻国。和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相比——当时罗马天主教和民族民主党人有很强的联系，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了。

在1989年革命后的东欧，不稳定的民族主义往往不是世俗爱国者或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成果，而是试图维持地位的前共产主义者的成果。[19]就算不是全部，大多数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东欧的暴力冲突都是由那些曾在共产主义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政治领导人发起的。这一点不仅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车臣的战争中得到验证，还适用于在这片区域的选举中，为了得到选票而操纵民族问题的行为。[20]在这里，波兰也是特殊的例子。波兰共产党人在1947年对乌克兰人的种族清洗中已经解决了最后的重大民族问题。这使得任何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伪装者都无法把一个实际存在的少数民族当作一种威胁或替罪羔羊。此外，波兰反对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规模也创造了某种特殊的共产主义政党。该政党允许一些附属机构举行民主选举，并且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精英，改革的时机成熟后，人们期望他们能代替雅鲁泽尔斯基和他那代人。同时，其中许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作为反对派也在阅读相同的非法出版物，尤其是《文化》。关于乌克兰的文章给了年轻而富有野心的共产主义者亚历山大·克瓦斯涅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1954— ）许多值得深省的启发。[21]

1989年6月的选举让由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在同年8月上台掌权，波兰共产党继续面对改革自身的挑战。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前领导人克瓦斯涅斯基在转型关头接管了共产党。1990年1月，波兰共产党不仅更换了领导人，还换了名字和纲领。[22]在克瓦斯涅斯基的带领下，1993年的议会选举后社会主义者再次掌权。克瓦斯涅斯基在1995年被选为波兰总统，并在

2000年再次当选。波兰的后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就依靠他们的竞选活动和纲领中的民族主义。在这点上他们不仅和整个东欧的后共产主义政党（尤其是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有所区别，而且和1989年之前的波兰共产党也有所区别。波兰共产主义传统上是反乌克兰的，波兰后共产主义（克瓦斯涅斯基作为其化身）务实地走了亲乌克兰路线。诚然，在1995年当选总统后，克瓦斯涅斯基主导了和乌克兰的历史和解。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文化》在这一连串事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克瓦斯涅斯基和吉德罗耶茨来往通信，并前往巴黎对他表示敬意。

这意味着《文化》和团结工会之间存在重要联系。正如波兰共产党的转型来自它在20世纪80年代和团结工会的竞争，波兰社会主义者也继续推行团结工会政府在90年代的外交政策。当社会主义者重新掌权后，他们也享受着和统一的德国之间友好的关系。在1989年，团结工会政府面临的是一幅不甚激动人心的图景：统一的德国所推行的东部政策远远没有波兰的政策令人宽慰。

---

[1] 1989年，观察家们对波兰与其东部邻国的关系并不感到乐观。见Daniel Nelson, “Europe’s Unstable East,” Foreign Policy, 82, 1991, 137–158;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1 (1990), 5–56; Andrew Michta, East Central Europe after the Warsaw Pac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2, 82; Józef Lewandowski, “Między Sanem a Zbruczem,” Kultura 519 (1990), 128–134; Józef Darski, Ukraina, Warsaw: Sorograf, 1993, 69; Yaroslav Bilinsky, “Basic Factors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Ukraine,” in S. Frederick Starr, ed., The Legacy of Histor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174, 186。

[2] 当时在华沙大学有乌克兰历史的讲座，华沙有乌克兰研究学会，这些不重要的提示物提醒着1920年波兰-乌克兰的结盟历史。这个学会出版了《塔杜施先生》的第一部乌克兰语版本（译者是Maksym Ryl’s’kyi）。

[3] 很多的伦敦移民者来自割让给苏联的东部领土，因此他们心怀家仇国恨。当然，吉德罗耶茨的出生地明斯克也在1921年的里加会议上被波兰民族主义者免费赠给布尔什维克俄国。这一点也许影响了他对1944年后波兰民族主义者针对利沃夫和维日诺的游说运动的态度。

[4] 事实引自Jerzy Giedroyc,Autobiografia na cztery r ęece,Warsaw: Czytelnik, 1996; Jerzy Giedroyc的采访，见Maisons-Laffitte, France, 7 November 1998。关于他的影响力，见Andrzej Friszke, Opozycja polityczna w PRL, London: Aneks, 1994, 242，以及下文引用的《文化》在当时的地位。

[5] 在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的担忧让位给当时建立一个中欧联邦的计划。然而，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文化》开始关注共产主义失败以及苏联解体后欧洲的地缘政治问题。Janusz Korek, Paradoksy paryskiej Kultury,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98, 93–96; Marek Suszko, “Kultura and European Unification, 1948–1953,” Polish Review, 45, 2 (2000), 183–195.

[6] 以下章节涉及尤利乌什·米罗茨维奇的文章：“Polska ‘Ostpolitik,’”和“Rosyjski‘Kompleks Polski’ i ULB,” in Materiały do refleksji i zadumy, Paris; Instytut Literacki, 1976,110–122, 175–186。又见他的“ABC polityki Kultury,” in Zdzisław Kudelski, Spotkania z parys ka ˛ Kulturą, Warsaw: Pomost 1995, 131–144; Krzysztof Kopczyński, Przed przystankiem niepodległo ści, Warsaw: Więz ˙, 1990, 11; 以及Rafał Habielski, “Realizm, wizje, i sny romantyków,” in Juliusz Mieroszewski, Finał klasycznej Europy, Lublin: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Marii Curie-Skłodowskiej, esp. 50。对比Adam Bromke, Idealism vs. Re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7] 历史学家Roman Szporluk大约在同一时期对同一问题产生了关注，见1971年、1973年和1975年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再版为以下著作的前三章：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Hoov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Timothy Snyder,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since 1989: National Narratives in Relations among Belarus, Lithuania, Poland, and Ukraine,”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4, 3 (1998), 1–24.

[9] 关于现实主义者，见Stanisław Bieleń, “Kierunki polityki wschodniej III Rzeczypospolitej,” in Patrząc na wschód, Warsaw: Centrum Badań Wschodnich, 1997, 12。关于流亡政府，见Radio Free Europe Report, 7 September 1990。

[10] 关于团结工会之前的时期，见Friszke,Opozycja; Andrzej Paczkowski, Pół wieku dziejów Polski, Warsaw: PWN, 1996; Grzegorz Ekiert,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关于团结工会，见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1999; Roman Laba, The Roots of Solida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Jan Kubik, The Power of Symbols against the Symbols of Power, University Park: 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Michael Bernhard, “Reinterpreting Solidarity,” Studies in Compara tive Communism, 24, 3 (1991), 313 – 330; David Mason, “Solidarity as a New Social Movemen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1, 1 (1989), 41–58。

[11] 关于波兰独立协约的计划以及工人防卫委员会的出版物，见Friszke,Opozycja, 423, 491–493。关于公开信，见Jan Lózef Lipski, K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387. 又见Antoni Kamiński and Jerzy Kozakiewicz, Stosunki Polsko-Ukraińskie, Warsaw: ISP PAN, 1997, 5; Ilya Prizel, “The Influence of Ethnicity on Foreign Policy,” in Roman Szporluk,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108; Polityka (Warsaw), 7 March 1998, 42。

[12] Jacek Kurón,Wiara i wina, London: Aneks, 1989, 347–349.

[13] 关于经过审查的（合法的）编年史，见I.T. Lisevych, “Ukrains’ko-pols’ke kulturne spivrobitnytstvo v 70-kh rokakh,” Mizhnarodni zv’iazky Ukrainy, 4 (1993), 58–68; L.O. Zashkil’niak, “Ukraina i ukrains’ko-pols’ki vidnosyny u pisliavoiennii pols’kii istoriohrafii,”同上书，145–156. 重要的未经审查的（非法的）文本是Kazimierz Podlaski ［Bohdan Skaradziński］,“Bialorusini——Litwini——Ukraińcy: Nasi wrogowie czy bracia?” and Tadeusz Olszański, “Notatnik bieszczadzki”。

[14] 关于团结工会时期的乌克兰问题，见Iurii Zaitsev, “Pol’s’ka opozytsiia 1970 – 80 rokiv pro zasady ukrains’ko-pols’koho porozuminnia,” in Iurii Slivka, ed., Deportatsii ukraintsiv ta poliakiv, L’viv: NAN Ukrainy, 1998, 54; Taras Kuzio, “The Polish Opposition and the Ukrainian Question,”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12, 2 (1987), 51; Friszke, Opozycja, 321; Mirosław Czech, Ukraińcy w Polsce, Warsaw: Zwi ązek Ukraińców w Polsce, 1993, 269; Garton Ash, Polish Revolution, 133。

[15] 见Bohdan Osadczuk, Iaroslav Hrytsak, Myroslav Popovych, Ivan Dziuba, Mykola Zhulyns’kyi, Miroslaw Czech和Roman Szporluk的回忆：Nashe Slovo (Warsaw), 8 October 2000。

[16] 关于独立波兰联盟见下文。The declaration of Wolność i Pokój in Stosunki Polsko Ukraińskie 1917–1947, Warsaw: Perturbancii, 1990, 122–123. 涉及这些问题的出版物包括：Karta, Znak, Spotkania, Obóz, Międzymorze, and Nowa Koalicja。一份重要的文件是［Zdzislaw Najder et al.］, “Polska-Ukraina,” internal position paper, Polskie Porozumienie Niepodległościowe, November 1981。见Krzysztofłabęd ź, Spory wokół zagadnień programowych w publikacjach opozycji politycznej w Polsce, Cracow: Księgarnia Akademicka,

1997, 181–187; Jerzy Pomianowski, Ruski miesiąc z hakiem, Wrocław: Wydawnictwo Dolnośl ąskie, 1997, 47; Józef Darski, “Kronika białoruska,” Kultura, 471 (1986), 96; Jan 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 Kultura, 602 (1997), 37–38。

[17] Antoni Dudek and Maciej Gawlikowski,Leszek Moczulski bez wahania, Cracow: Krakowski Instytut Wydawniczy, 1993, 268; Życie Przemyskie, 29 April 1992, 1, 3;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 z 25 posiedzienia Sejmu Rzeczypospolitej,6 July 1994, 13–14 (hereafter session (25) in parentheses); 同上书 (31), 13 October 1994, 113。

[18] Stefan Kozak, “Polsko-Ukrai ńskie dylematy i dialogi,” Polska w Europe, 10 (January 1993), 47.

[19] Milada Vachudová and Timothy Snyder, “Are Transitions Transitory?”East European Poli tics and Societies, 9, 1 (1997), 1–35.

[20] 这逆转了古老的东欧和中欧的模式。两次大战间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是前社会主义者。而在后共产主义时期，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是前共产主义者。

[21] Interview with Aleksander Kwaśniewski, Warsaw, Poland, 17 May 1999; interview with Jerzy Giedroyc, Maisons-Laffitte, France, 7 November 1998; also Gazeta Wyborcza, 3–4 January 1998, 10.

[22] Anna Grzymala-Busse, “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fter 1989,”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第12章

标准的民族国家
（1989—1991）

五分之一的波兰公民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波茨坦协定》的规定下，波兰接收了广袤的德国领土，驱逐数百万德国人。20世纪50年代，对德国收复失地的恐惧激发了对波兰共产主义政权以及对与苏联结盟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由于波兰主教向德国主教传达和解的讯息等原因，波兰政权被谴责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尽管1970年西德-波兰协约签署后，波兰公众对德国的态度有所好转，波兰人仍然相信德国人一有机会就会重申领土所有权。由于西德政府的合法地位——波兰人怕他们无法代表未来的统一德国——以及西德被驱逐者的游说，这种恐惧持续存在。那些被驱逐者是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下文简称CSU）的主要力量，CSU是时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简称CDU）的姐妹党。在波兰于1989年8月重新取得国家主权后，一年多来波兰领导人和波兰公众对德国统一的担忧多于对苏联反应的担忧。[1]

1989年，波兰内部的政治变革逐步推进，很多进步措施得到了波兰共产主义者的认可，一些措施也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 ）的谅解。在1988年12月的联合国讲话上，戈尔巴乔夫发出信号：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可以自行选择国内政治路线。由于1988年8月大罢工的影响，波兰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开始讨论和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1943— ）举行圆桌会谈的可能性。1989年2月，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话信以为真，同意与当时的非法工会——团结工会——的代表开始磋商。1989年4月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在同年6月举行议会选举。选举被操纵了，以确保共产党及其传统盟友在下议院（the Sejm）取得多数。但是团结工会在大众投票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他们赢得了下议院每一个有竞争可能的席位（包括在上议院取得了100个席位中的99个），并达成共识：共产主义者缺乏统治的授权。团结工会的决定性胜利出乎双方的意料。

1989年8月，在共产主义者建立政府失败后，下议院通过了由长期的罗马天主教反对者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1927—2013）领导的联盟。自共产主义统治建立后，这是东欧地区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很快会追随这个先例。每一步都或多或少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从戈尔巴乔夫的联合国讲

话到波兰人的圆桌会议，从圆桌会议到被操纵的选举，从被操纵的选举到团结工会的胜利，从共产主义在波兰的终结到共产主义在整个东欧的终结。1989年，人们普遍没有料到东欧卫星国的革命会引起苏维埃立陶宛和苏维埃乌克兰的民族运动，并因此加速了苏联的灭亡。事实上，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终结使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变成唾手可得的目标。1989年到1991年是一段奇特的薄暮时期，我们很难在回顾往事时将其准确定位。基于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记住东欧各国获得主权比苏联瓦解要早两年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的波兰主权国家和苏联是对方的政策目标。1989年，戈尔巴乔夫原本可以公开提出他反对波兰获得主权。但是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戈尔巴乔夫对马佐维耶茨基说："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我希望你能成功。"[2]

德国进入欧洲

和戈尔巴乔夫的声明不同，西德的反应是威胁性的。在团结工会于1989年6月的选举中取得胜利后，西德财政部部长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质疑波兰西部边界的合法性。在马佐维耶茨基的非共产主义政府于1989年8月建立后，科尔总理宣布德国问题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议程中。1989年11月，科尔前往华沙以缓和恐惧，但是他选错了时机。尽管科尔私下保证他会在合适的时机确认德国-波兰边界，但出于选举需要，他不敢公开重申此类言论。在拉齐维乌宫（RadziwiłłPalace）的一次晚餐中，科尔获悉柏林墙已经倒塌。那天他和莱赫·瓦文萨、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以及布洛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的会谈突然中断，当时盖雷梅克正打算向他解释为什么波兰人害怕德国统一，随后科尔马上飞回柏林，立刻着手统一政策。

科尔关于统一的"十点计划"里没有提到边界问题。这带来了两个隐忧：首先统一的德国可能向波兰要回"二战"后失去的领土；其次新欧洲将和两次大战间的欧洲一样，东部和西部的外交规则截然不同。波兰人还记得"一战"后的大量移民保障了德国与法国的西部边界，但其与波兰的东部边界尚未确定。在"二战"后，这类和平的移居并未出现，而且西德保留了在移民情况出现时最后决定东部边界的权利。在柏林墙倒塌后，波兰人不仅要关心现存的边界会不会得到确认，还要关心德国会不会同他们来确认。波兰人害怕德国与苏联关于边界的协议会将东欧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并重新确定苏联在波兰的统治地位。[3]

第二年——从1989年11月到1990年11月——东德和西德的政治中心围绕着统一进程，而波兰的外交政策着重于把德国问题抑制在德国国内。虽然波兰官员（不同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试图减缓德国统一进程，但他们试图把统一和最终确定边界问题

联系起来。他们手上几乎没有好牌。尽管波兰军队在“二战”时与盟军并肩作战，但1944年后苏联就已占领波兰，波兰在诸如雅尔塔和波茨坦等决定欧洲未来的战后会议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由于德国统一被视为未完成的战后解决方案中的最后一章，德国统一由两个德国来协商安排，并经过四个战时盟国（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同意。尽管波兰表示抗议，但在1990年2月举行的“2＋4”协商中，波兰并未受邀。

波兰的立场是波兰-德国边界要在德国统一前就重新确认；德国的立场是边界条约的磋商要等到统一完成后再进行。事实上，1990年3月科尔总理表示，如果波兰同意保护德国少数民族并放弃未来向德国索赔，那么德国会承认现存边界。由于波兰在战时损失巨大，而且西德将波兰排除在和平解决方案之外，这一点似乎非常过分。西德的盟友也反对西德的立场。1990年春天，马佐维耶茨基总理重申在波兰和德国边界板上钉钉之前，他不希望苏联军队离开波兰。波兰甚至提议苏联军队留在未来的统一德国的东部地区。这一度是苏联的立场，但是戈尔巴乔夫很快被说服了。在任何情况下，波兰和苏联的利益协调都是有限的。甚至在1990年2月，波兰外交部部长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茨维奇（Krzysztof Skubiszewski，1926—2010）向德国人清楚表明，波兰不希望统一德国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波兰不接受统一德国成为北约的一员。在科尔于1990年6月在高加索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之前，苏联一直反对统一德国加入北约。

1990年6月，事情变得很明朗了，德国马克和美国的参与不仅能促成德国统一，还能保证统一德国成为北约的一员，波兰的立场就不言而喻了。向苏联献殷勤已无必要——西德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只是利用苏联将波兰人排除在外——重要的是确保美国人理解边界问题。美国人提出的“九点保障”和科尔的“十点计划”不同，其中提到维护现存边界。在美国人看来，现存的东德-波兰边界将成为未来的德国-波兰边界。波兰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6月12日参加了第三阶段的“2＋4”会谈。虽然斯库比斯茨维奇处于弱势，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处于强势，但他们的立场总体上是相同的：德国重新统一是大势所趋，但实现统一必须先解决“二战”后未完成的问题，并且使新德国和欧洲及大西洋组织团结起来。“2＋4”条约的第一项条款于1990年9月在莫斯科签署，条款确认西德与东德的外部边界将成为统一德国的边界。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统一。斯库比斯茨维奇和根舍于1990年11月14日签署波兰-德国边界条约。[4]波兰虽然在统一之前签订边界条约的战斗中落败，但在无条件承认现存边界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东部和西部

第二天，即1990年11月15日，苏联和波兰代表第一次会面讨论苏联军队

撤出波兰的事宜。1990年年末，天平两边的重量开始起变化，刻度值完全相反。波兰和统一德国的关系迅速升温，和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一旦波兰达成了西部边界合法化的目的，德国就成了“欧洲”；而波兰和苏联的利益产生分歧，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完全倒塌，苏联成了“俄罗斯”。[5]在波恩成为一个更大的国家的首都后，波兰对它的恐惧有所减少，而当莫斯科成为一个更小的国家的首都后，波兰对它的恐惧增加了。这种转变在波兰人中非常明显，波兰的东部邻国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要议题。

1991年1月，飞往莫斯科协商军队撤离的波兰官员受到了苏联驻波兰军队指挥官维克托·杜比宁将军的欢迎——一场冗长的发言。“曾击败过德国人，从未战败过的自豪的苏联军队，”他告诉他们，“将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时机，迎着展开的横幅，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离开波兰，如果任何人对此存疑，军队无法向波兰人民负责。”那位将军有多浮夸，这个波兰人就有多墨守成规：让苏联代表惊讶的是，波兰外交官指出1955年签订的《华沙条约》——该条约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事实上并未给苏联军队驻扎在波兰领土提供任何支持。在双方交换意见或者说是世界观后，疲倦的波兰谈判者回到华沙，他们的飞机在维尔纽斯加燃料。就在他们靠近立陶宛首都时，他们被告知要一路飞回华沙。他们透过机窗看到了理由：维尔纽斯燃起熊熊大火，苏联特别部队正向这里发起攻击。[6]

就在华沙和莫斯科开始撤军谈判时，华沙计划改善与苏联各独立共和国及其国内反共产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关系。自始至终，波恩都将莫斯科作为其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伙伴，而华沙一开始就和它直接的东部邻国交战。这第一次标志着除了传统的势力均衡的考量外，还有其他东西引导着波兰的东部外交政策，波兰外交正在实施前一章所说的大战略。和戈尔巴乔夫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波兰官员对他关于苏联各组成国之间关系民主化的言论信以为真，他们继以推论这种民主化可能走向何方。甚至当波兰寻求让苏联军队离开波兰领土时，波兰还推行了一项基于苏联可能很快不存在的政策，这一政策的预设是波兰可以优先重构与俄罗斯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分歧。

德国问题一直作为背景存在。当波兰把注意力转向东部邻国时，调整和德国关系的经验也影响着波兰针对东部邻国的政策。波兰关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立场与德国关于波兰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很相似：和德国一样，“二战”后波兰的领土也纳入东部邻国，那里是数百万东部被驱逐者及其后代的家园，因此波兰认为有义务保护东部少数民族。当然，“二战”时，波兰不是侵略者而是受害者，但是生活在波兰原东部边界地区的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把波兰视为维尔纽斯和利沃夫的侵略者。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波兰人依然害怕德国人有收复失地的意愿，这种与德国的类比可以作为针对波兰东部邻国的温和政策的支持依据。波兰外交官告诉国

内评论员，波兰向东部邻国要求的东西应该和波兰准备给德国的东西一样少。主张收复失地的德国人促使斯库比斯茨维奇做出如上论证，前者对波兰的东部政策表现出公开的兴趣。那些德国外交官也是如此，他们参照了波兰关于在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的立场，将其当作德国关于在波兰的德国少数民族的立场。至少在一个例子里，德国人利用了波兰的立场文件以为扩大在波兰的德国人的权利辩护。[7]

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茨维奇首先和德国人谈判，然后和东部邻国谈判，但历史经常无声地略过这类人物。他在他从事的任何工作上都取得成功，他的成功带来了和平。原本根本指望不了这类声明可以建立在德国统一的和平进程的基础上。考虑到西欧人的关注和美国人的参与，无论波兰的政策如何，德国统一都将以一种负责的形式推进，这几乎是肯定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库比斯茨维奇，他是国际法教授，写过一本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书，他耐心而坚定地追寻着一个精准的目标，最终目标实现了。和西德的接触说明斯库比斯茨维奇也将某些特质带到了波兰与东部邻国的关系中，此外还有团结工会和波兰新民主政府内部的传统智慧。斯库比斯茨维奇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和莱赫·瓦文萨担任总统时期负责外交政策，所有他供职过的总理都全力支持他，他的观点是重要的观点。和“一战”后的情况不同，当时波兰的早期东部政策由议会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外交官在里加做决定，1989年后波兰的东部政策则被牢牢把握在专业人士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精英在东部政策上产生分歧：一些人希望创建一个联邦，其他人希望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只吸收那些可以被同化的领土。斯库比斯茨维奇面前没有这些分歧。反对派团结工会现在上台掌权，他们吸收了《文化》的东部计划，即波兰不应改变它的东部边界，波兰能从支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中获利，以及波兰爱国者应该把立陶宛爱国者、白俄罗斯爱国者和乌克兰爱国者视为与自己相平等。虽然斯库比斯茨维奇也从其他传统中得到启发，他认同关于大战略的共识，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他也认可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的一些基本假设，即最高的价值是波兰国家，而不是波兰民族，可供参考的框架不是来自过去的，而是来自未来的。[8]他更喜欢用“国家利益”这个词而不是“民族利益”，他引用历史是为了澄清国家利益，绝非民族渴望。他的口头禅是“民族利益与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另一句口头禅是：“历史不是也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现实观中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也不能决定它的形成。欧洲在不断变化。”[9]

提到欧洲，这说明了斯库比斯茨维奇在《文化》的东部计划中增加的两个主要的知识因素之一。斯库比斯茨维奇欣赏欧洲理念的力量，以及欧洲机构的吸引力，这一点（必须支持）完全被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忽略了，尽管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其中一人住在巴黎，另一人住在伦敦。当与统

一德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时，斯库比斯茨维奇对东部解决方案的务实表述从表达对德国收复失地的担忧转向有实际意义的主张，即波兰如果要加入西欧机构，必须解决好它的东部问题。斯库比斯茨维奇牢牢把握住国际法的实际重要性，将其作为有效地采取目前模糊行动的一种方式，以及彻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的第一步。这是斯库比斯茨维奇的第二个知识贡献，也是《文化》计划中所缺少的。

另外三个贡献更为实用。首先是有原则的耐心，这种风格在1989年前已经开始培养，这使得斯库比斯茨维奇在担任外交部部长时，即便胜利在望，也能时刻谨记他的最终目标。这当然是一位优秀外交官的基本品质，但是在共产主义东欧，能培养出这种素质的环境不是特别好。[10]第二个实用的品质是他独立完成艰难任务的能力。运行从共产主义者手中继承下来的外交部，在后勤方面是一个挑战，斯库比斯茨维奇任期中的一幅日常画面是他在商业航班上写自己的演讲稿。第三个品质是明智地选择同僚。耶日·马卡奇克（Jerzy Makarczyk）负责欧洲和区域政策，在重要时期，他短时间内取得了众多成果。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格热戈日·科斯切娃-佐尔巴斯设想了一种针对波兰东部邻国的“双轨”政策，他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在他的任期内，斯库比斯茨维奇的外交部雇用了300名新职员。[11]这看上去像行政琐事，但是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政治中，受训练的职员的效用、招募以及安置常常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正在考虑的政策如同波兰的东部“双轨”政策一样精细时，以上事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双轨制

波兰东部政策的双轨指的是：（1）在莫斯科的苏联中央政府；（2）欧洲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尤其是俄罗斯联邦、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斯库比斯茨维奇相信苏联很快会瓦解，他解释说波兰政策仅仅反映了苏联内部的变化。与莫斯科的苏联政权的关系包括了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以及苏联撤军问题。波兰政策放在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上的注意力比放在中央政府上的注意力要多。波兰针对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准备工作包括确认准官方边界、外交联系常规化以及在一系列声明中建立友邻关系的准则。波兰把苏维埃共和国当作国际法上的完整主体，值得报以同等的伦理和法律关注。甚至在斯库比斯茨维奇前往苏联之前，他断言称，“在很多区域，我们和不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类似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完全独立和至高无上的”。当时，他的政策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和苏维埃共和国系统接触的政策。[12]

立陶宛是一个特例。苏联没有依据法律兼并立陶宛，在苏联解体前（1990年3月）立陶宛已经正式宣布独立，而且它的独立要求触发了散居在立陶宛的大量波兰人关于收复失地的声明。1991年8月，波兰正式承认立陶宛

独立，它是第二个（在冰岛之后）承认的国家。在此前两年，斯库比斯茨维奇就说过立陶宛的渴望应该按照国际法予以实现。[13]1989年到1991年间，在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代表要求领域自治，对波兰国家的努力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波兰国家和此类声明保持距离。科斯切娃-佐尔巴斯在1989年10月的备忘录中声称波兰国家的唯一伙伴是立陶宛的反对团体——民主改革运动（Sąjūdis），所以波兰不应该证明立陶宛人对波兰收复失地的恐惧是正确的。科斯切娃-佐尔巴斯相信立陶宛人对波兰的恐惧比波兰人对德国的恐惧更有正当性——他在波兰和德国签署边界条约前一年就把这个论断落于书面。[14]斯库比斯茨维奇坚持宣称波兰没有任何针对立陶宛或任何东部邻国的领土所有权要求，并且告诉主张修改边界的倡议者们他们选择的道路只会导致血腥的战争，并激起德国人对西部领土的要求。[15]

尽管立陶宛与众不同，但是立陶宛的案例强调了重要的一点：双轨政策把波兰国家真正的对话者视作邻近的民族国家。当时任匈牙利总理约瑟夫·安托尔（József Antall）自称散居在外的匈牙利人的总理时，当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利用塞族人在科索沃的困境以攫取权力时，波兰当局把波兰少数民族的问题当作依据国际法和伦理标准来解决的民族国家之间的问题。把波兰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做对比并不牵强。诚然，匈牙利在1920年的特里亚农（Trianon）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1989年有200万匈牙利人住在邻国。虽然波兰得到了西部领土的补偿，但在1945年它几乎失去了一半的领土，包括四座重要城市中的两座。1989年，超过100万波兰人留在波兰的东部邻国，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靠近波兰东北部边界的条状区域内。[16]苏联境内一半波兰人居住在距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200英里处。我们可以在立陶宛首都周围（包括首都在内）勾勒出一片很大的地区，其中多数人口自认为是波兰人。波兰，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不同，它将邻国置于散居波兰人之前。1990年和1991年，相比做出明确要求的波兰少数民族，波兰倾向和民族国家立陶宛打交道，而此时立陶宛的地位还未合法化。其中显示出大战略的迹象，大战略把世界理解为由民族国家组成的。

第三条轨道

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第二条轨道”的联系是存在无可争辩的法律依据的。这些共和国是苏联宪法创造出的合法实体，戈尔巴乔夫鼓励它们获得自治。当时甚至有一种感觉是斯库比斯茨维奇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居民当作“民族”，这与苏联的总体做法是一致的。毕竟，苏联是一个有许多民族性共存的国家，根据不同的民族分为每个领土单位，每位公民的护照上都要写明属于哪个民族。然而，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民族政策从未设想过各共和国脱离的可能性。因此波兰东部政策“第三条轨道”的合法性

就更微弱了，“第三条轨道”指引导波兰前反对派（如今在华沙的掌权者）与乌克兰人和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寻求获得民族独立，摧毁苏联）建立联系。1989年和1991年间，波兰东部政策的非正式的第三条轨道以公报的形式提供了关于如何支持民族主义反对派的信息，并为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10月出访“苏联、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做准备。事实上，在斯库比斯茨维奇先前为德国问题费神时（1989年秋天到1990年秋天），第三条轨道（反对派）取代了第二条轨道（共和国），并为第二条轨道的成功——这是三条轨道中最成功的——奠定了基础。

这一情况发生在乌克兰，而非俄罗斯、白俄罗斯或立陶宛。波兰反对派和俄罗斯异见者之间的关系是疏远而断断续续的，无论如何此前没有人像俄罗斯民族反对组织那样怀有“脱离”苏联的期望。类似的，出于不同的原因，波兰也没有白俄罗斯对话者。白俄罗斯民族运动规模很小，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历史的、象征性的，波兰人对此说不了也做不了什么。团结工会的前辈对立陶宛的民主改革运动最有热情，但是立陶宛反对派认为波兰人想要占领他们的国家和首都维尔纽斯。[17]立陶宛活动家的判断是正确的，波兰人对立陶宛的友爱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把立陶宛看作“年轻的兄弟”，但立陶宛活动家错误地把波兰的文化自信和收复失地的计划联系起来。立陶宛活动家把波兰文化视为对本民族的更大威胁，1991年后持有这种传统的主导性立场的人才逐渐承认政治合作的价值。

在乌克兰的民族运动中，团结工会的运动家们发现了一个成熟的、有意愿的对话者——乌克兰人民运动（Rukh）。[18]在乌克兰，民族运动强大到可以考虑独立的问题，但又弱小到亟需盟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很成功，那些组织起乌克兰人民运动的西乌克兰爱国者的新观念由此加深：俄罗斯——而非波兰——才是乌克兰民族的巨大威胁。[19]苏联的统治巩固了波兰在立陶宛爱国者心中的民族敌人的形象，却迫使那些看着乌克兰民族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枯萎的乌克兰人重新思考。乌克兰的波兰少数民族虽然大致上和立陶宛的波兰人一样人数众多，但相对而言占比要小得多。当有敌意的波兰组织正式宣布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开始自治，远离民族首都基辅的西乌克兰的波兰人转而支持乌克兰民族运动。在立陶宛的波兰人很少受到立陶宛文化的同化，而在乌克兰的波兰人却说乌克兰语。基于以上原因，乌克兰反对派比立陶宛人更易接受《文化》和团结工会，也更愿意把波兰视为正面的模范。[20]

波兰外交的第三条轨道提供了一种适时的确认。当波兰在1989年8月获得完整国家主权时，乌克兰人对这个西部邻国的尊敬达到了顶峰。1989年9月，团结工会的一名代表参加了乌克兰人民运动的成立大会，亚当·米奇尼克在凌晨两点从一处讲台向挤满了人的大礼堂发来贺电：“在这个你们民族重生的时刻，我们非常高兴，为此你们已经经受了太多的审判、集中营

和苦难，以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子孙的生命为代价，团结工会和你们站在一起，波兰和你们站在一起。愿命运向你们微笑，愿上帝赐予你们力量。自由、民主和公正的乌克兰万岁！”他的讲话、团结工会的横幅以及波兰国旗受到了热烈欢迎。[21]事实上，正是这些开创了波兰东部政策的第三条轨道，乌克兰活动家看到了拥有一个西部盟友的可能性，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反波兰思潮在政治上开始出现时就被边缘化。在1989年和1990年，主要的乌克兰反对派和团结工会成员多次见面，后者现在决定着波兰政策，对独立的波兰和苏维埃乌克兰采取的官方行动表示普遍认同。作为双轨政策的重头戏，这就是为何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出访苏联时，会在乌克兰取得最大的成功。[22]

1990年10月的基辅

1990年10月，斯库比斯茨维奇在基辅与乌克兰外交部部长安纳托利·兹连科（Anatolii Zlenko）签订了“国家与国家”的声明，声明包括承诺互不侵犯、接受既有边界以及双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斯库比斯茨维奇和兹连科强调波兰和乌克兰将像“主权国家那样”行事。波兰代表带来了乌克兰语翻译，而非俄语翻译，这一举动受到了广泛赞赏。此后，波兰和乌克兰为以作为国际认可的主权国家的形式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而做准备，这意味着他们在为乌克兰独立和苏联终结做准备。[23]在1991年8月的莫斯科政变失败后，波兰和乌克兰交换了永久代表，波兰签署了一份宣言，表示愿与乌克兰签订国家条约。（1991年8月1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敦促乌克兰继续留在苏联。）当1991年12月全民公投确认乌克兰独立后，波兰是第一个正式承认乌克兰共和国的国家。通过第三条轨道的联系，斯库比斯茨维奇和波兰政府明白这种姿态是需要的。波兰很快承认乌克兰，这一点超出乌克兰爱国者的预期，为此驻莫斯科的波兰大使受到苏联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的召见，美国也对此表示不赞同。这为波兰与乌克兰两国未来出乎意料的良好关系创造了条件。[24]

波兰政策间接支持了乌克兰的公民理念——这是支持乌克兰和平独立、苏联和平解体的因素。考虑到乌克兰的多民族历史、规模庞大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以及不断回响的苏联历史，某些西乌克兰活动家推进了这种关于乌克兰民族的公民的和领土的理念。这种方法使得民族独立在1990年和1991年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传遍整个乌克兰，这种政治理念受到文化诉求、经济诉求和地方精英利益诉求的支持，环境也赋予其正当性。乌克兰运动在1989年和1990年逐渐明朗化，但支持这种公民方式的共识尚未达成。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波兰对乌克兰民族活动家的支持，以及波兰对现存边界的认同。当西德领导人没有公开表示保留与波兰主权国的现存边界时，波兰的第一届民主政府向还未取得主权的乌克兰表达了无条件的保证。波兰

政策在处理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比美国和西方列强更果决，而且在边界的基本问题上比西部邻国更慷慨。如果团结工会在1989年8月没有掌权，如果米奇尼克和其他人没有在1989年9月前往乌克兰，反波兰的情绪会得到更多共鸣。如果波兰采取对乌克兰的仇视政策，一些西乌克兰活动家就会从民族构建的公民性计划上分心，而且他们推行的民族主义对基辅精英和大部分说俄语的乌克兰人的吸引力会更小。如果波兰倡导关于边界问题的和平变革，就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当时所做的，那么西乌克兰活动家的能量会被转移到别处。结果，波兰的安抚政策使乌克兰人民运动成了中立性的运动，受到广泛支持，赢得了全国性辩论，因此也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乌克兰人民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时采取的公民性路径导致大量乌克兰人在1991年12月投票支持独立。

乌克兰人民运动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西乌克兰人的政治技巧——包括某些乌克兰共产主义者。1990年到1991年，乌克兰民族活动家预感到变革的风向，但是乌克兰共产主义者追踪到了航行的轨道。没有乌克兰人民运动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1934— ）的合作，这艘船不可能靠岸。克拉夫丘克圆滑的“主权”支持确保西乌克兰人的观点可以在整个乌克兰变成现实，而他的政治天赋让其他乌克兰人把独立视作自然和有益的事情。他认识到乌克兰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前任书记，他在20世纪80年代奉命解决乌克兰民族主义，他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沃里尼亚人——这使他在不会引发民族冲突的情况下利用了爱国主义。[25]如果波兰政策没有那么高调地向乌克兰示好，保守的共产主义者原本会将波兰作为反对独立的有力论据：乌克兰需要莫斯科的支持以对抗波兰。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夫丘克联合支持独立的精英、东部和中部乌克兰选民的努力，以及他竞选总统的努力（全民公投和总统选举都在1991年12月举行）很可能都会失败。[26]

从外交政策到国内政治的争论都将以更开阔的形式重塑。多亏了波兰政策，在现代历史上乌克兰第一次只有一个民族敌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如同波兰人和德国人，乌克兰人一直以来害怕被包围。从1667年在安得所沃被瓜分，到1921年在里加被瓜分，似乎波兰和俄国一直在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来谋求合作。1990年秋天的外交奇迹是德国统一的形式降低了波兰人的恐惧，而波兰独立的形式降低了乌克兰人的恐惧。波兰政策的勇气之处以及它预先谋划的迹象在于，波兰与德国完成和解之前已经向乌克兰敞开大门。斯库比斯茨维奇到访基辅，在德国-波兰边界条约签订之前他再次就边界问题安抚乌克兰。波兰政策解除了乌克兰传统的包围困境，因此削弱了乌克兰极左人士的防备，为乌克兰民族右翼人士输送能量。这一切促成了乌克兰独立的政治协商以及苏联和平解体。也许和同时代更为人所知的事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在莫斯科的权力斗争——相比，乌克兰-波兰的约定对事件进程的推动同样重要。

1990年10月的莫斯科

斯库比斯茨维奇1990年10月到访莫斯科是一次暂时的成功。斯库比斯茨维奇煞费苦心地把“苏联日”和“俄罗斯联邦日”分开，同样关注俄罗斯当局和苏联当局。斯库比斯茨维奇和俄罗斯当局签署了一份宣言，这是俄罗斯联邦第一次和外部国家签署的官方文件。[27]波兰-苏联正在进行的协商是关于一份新的国家条约和苏联从波兰撤军的协议。1990年12月，波兰把苏联撤军和德国权利转移给苏联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安全条款”，该条款禁止波兰加入任何联盟（除了苏联），禁止波兰和外国情报机构合作（除了苏联情报机构），或允许外国军队（除了红军）驻扎在波兰领土上。关于权利转让的争议解决了，关于安全条款的争议被撤销了。在1991年12月10日，波兰和苏联起草了一份条约，双方就苏联撤军的具体日期达成一致。[28]但这些协议是不可能被实施的，因为苏联在当月末就解体了。

俄罗斯联邦成了苏联的继承国。友好的波兰严肃对待俄罗斯联邦这件事几乎毫无用处，在苏联解体后，每个人都必须把俄罗斯联邦当回事了。由于俄罗斯联邦没有一个单独的共和国共产党，因此俄罗斯没有“民族共产主义者”作为积极的协商伙伴（如同乌克兰那样）或领导民族运动（如同立陶宛那样），或者把波兰视为反对派-政权关系和民主转型的楷模。几乎没有俄罗斯民族活动家认为苏联解体对他们的民族有积极影响，他们的定位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活动家的偏好格格不入。[29]俄罗斯异见者们认为他们从波兰那里学不到什么，反对派之间几乎没有友好往来的传统。因此波兰东部政策的第二条、第三条轨道对与新的俄罗斯国家的关系几乎没有帮助。

另一方面，第一条轨道（和莫斯科中心的关系）却成功了，因为国家间条约和撤军协议都是与苏联中央政权谈判的。1992年5月，波兰很快和俄罗斯联邦签署了这两项新条约。这些谈判以一种更快的节奏再次重复，所有步骤都在前一轮谈判中出现过：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夸耀，俄罗斯外交部提出的“安全条款”，最后以接近波兰谈判立场的结果结束。1992年10月，最后一批俄罗斯野外作战部队离开波兰。[30]尽管俄罗斯-波兰关系的未来几乎没有任何有前景的迹象，但是1990年到1991年间的双轨政策已经实现了合法基础、政治动力和1992年未解决问题的快速谈判先例。考虑到俄罗斯-波兰关系此后只会不断恶化，这种解决问题的迅速显得尤为重要。

1990年10月的明斯克

1990年10月到访明斯克是一次惨败，斯库比斯茨维奇发现自己身处多边历史问题的包围中，而这正是他设计的原初民族国家间达成不拖泥带水的

双边约定所要避免的。当时，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向立陶宛施压，要求其撤回独立宣言，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是其帮凶。我们已经知道维尔尼亚/维尔那/维尔纽斯是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历来争夺的目标，因此我们能理解这种战略的基础。由于斯大林在“二战”时的政策，苏维埃立陶宛获得了首都维尔纽斯。当立陶宛在1990年3月宣布独立时，戈尔巴乔夫威胁要把维尔纽斯给其他国家，立陶宛人把这话当真了。白俄罗斯共产党支持苏联当局的这种操纵手段。1990年3月29日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后，白俄罗斯政治局宣布倘若立陶宛坚持独立，苏维埃白俄罗斯亚会争夺维尔尼亚的所有权。[31]

白俄罗斯官方的收复失地思潮支持苏联政策，而这正符合一种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历史解读观点：白俄罗斯从未参与到将波兰领土转移给立陶宛的协议中，因此在新思维改革（perestroika）的情况下，白俄罗斯无须被此束缚。白俄罗斯的收复失地思潮与白俄罗斯的自我认知产生共鸣，即定都于维尔尼亚的、重生的立陶宛大公国。当时主要的白俄罗斯活动家回想起19世纪的维尔尼亚，那里是白俄罗斯民族运动的发祥地，而两次大战间的维尔尼亚是白俄罗斯政治先辈的家园。他们设想，白俄罗斯独立象征着立陶宛大公国复国，因此维尔尼亚会“回归”白俄罗斯。1989年，白俄罗斯人民阵线（Belarusian Popular Front）应立陶宛民主改革运动的邀请在维尔尼亚召开成立大会，但他们让立陶宛东道主大失所望，称这里是白俄罗斯的首都。1990年夏天，白俄罗斯反对派中的重要人物向立陶宛民族活动家提议建立联邦，而后者对此不感兴趣。[32]

波兰外交部部长1990年10月到访明斯克引起了一场历史争论的浪潮。白俄罗斯共产主义当局告诉斯库比斯茨维奇，由于白俄罗斯没有参与战后的条约，因此无权签署确认1945年边界的条约。尽管波兰是唯一一个有兴趣支持白俄罗斯独立的主权国家，白俄罗斯反对派当时依然被困在历史论证中无法自拔。白俄罗斯爱国者抱怨波兰国内（不存在的）针对白俄罗斯人的“恐怖活动”，谈到波兰国内在“种族上”属于白俄罗斯的领土，并提议和平领土调整以应对这一“种族”现实。同时，他们害怕波兰会对斯大林从波兰剥削的土地提出所有权声明，那些土地在“二战”末期被授予苏维埃白俄罗斯。虽然苏维埃立陶宛接收了维尔纽斯，但是苏维埃白俄罗斯在1945年接收了更多曾属于波兰的领土。大多数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相信在立陶宛的波兰人实际上是白俄罗斯人，他们必须恢复真实的民族身份，而最佳选择是在一个复兴的立陶宛大公国内——这个国家将包含白俄罗斯的全部领土、立陶宛的全部领土和波兰的部分领土。[33]

立陶宛大公国的理念当然是一个迷思，但是这是一个长久存在的迷思，和白俄罗斯邻国的现代民族主义相比，这种迷思包含的矛盾更少。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继承了这种始于立陶宛大公国覆灭后的传统，密茨凯维奇的浪

漫主义诗歌将该传统延续下去，而当联邦主义试图收编这种近代早期的民族性理念失败后，这种传统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逐渐覆灭。1921年，这种传统在波兰失败了，当时毕苏斯基无法获得联邦所需要的领土，而民主制度支持一种更简单的波兰民族主义。在两次大战间，这种传统让在波兰的白俄罗斯人失望了，维尔尼亚的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受到波兰政策的阻碍和歧视。当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者无法让维尔尼亚加入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时，这种传统于1939年到1945年间再次失败。1990年后，它在明斯克也注定失败，因为白俄罗斯的邻国拒绝了联邦的提议，而白俄罗斯选民对精英联邦主义者的理念无动于衷。

苏联力量的削弱以及对苏联背信弃义的发现没有立刻创造出一个现代白俄罗斯民族。白俄罗斯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泽农·帕兹亚克（Zenon Pazniak，1944— ）在库罗帕提（Kuropaty）发现大量公墓，在那里，苏联NKVD在1937年到1941年间杀死了至少10万名平民。1988年，库罗帕提尸体挖掘工作启动，这是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奠基的时刻。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翻过这一页难解和痛苦的历史，并从复兴大公国的失败尝试中得出教训，在不完善的边界线内以民族国家机能的现代理念为基础重新自我定位。波兰政策提供了时间，以及一个范本。斯库比斯茨维奇紧守底线，即边界问题不在讨论范围内，在讨论历史问题之前必须先规范现存的领土状态。波兰政策支持一个现代的白俄罗斯民族国家，而这种理念的白俄罗斯支持者人数寥寥。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是保守政党当局和怀旧的爱国反对派的家园，是原初民族国家的拙劣模仿者，而后者才是波兰双轨政策要建立联系的对象。虽然白俄罗斯共产主义当局的政策符合精英民族反对派的观点，但这一政策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敦促下执行的，和大众压力毫无关系。1990年，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在影响白俄罗斯或苏联政策方面毫无作用。1990年10月，波兰外交官离开时带着如此印象：白俄罗斯政党仅仅遵从莫斯科的指示，国内的民族活动家只是它的木偶剧场中的道具。之后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种观点。在1991年8月莫斯科政变失败后，在1991年9月立陶宛独立获得普遍承认后，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摆脱了原先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的要求，接受波兰提出的发布共同宣言的提议。该宣言于1991年10月签署，这是白俄罗斯的第一个国际政治行动。[34]

波兰立陶宛人？

和白俄罗斯不同，立陶宛在1990年是有组织的、受欢迎的民族反对派的家园。立陶宛民主改革运动受到了广泛支持，能够支配立陶宛的政治议程，控制住民族议会，并宣布民族独立。新的立陶宛领导人对苏维埃立陶宛的领土问题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这些领土现在是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主权领土。正如我们已知，维尔纽斯及其周边领土在两次大战间还不属于立陶宛。斯大林把两次大战间波兰的东北部分别划给苏维埃立陶宛和苏维埃白

俄罗斯亚，立陶宛得到了维尔纽斯的奖励。1944年到1946年，大部分波兰人离开了维日诺，但是波兰人在之后苏维埃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和沙尔奇宁凯（Šalčininkai）地区牢牢成为大多数（根据1989年的苏联人口普查，波兰人在这两个区域的比例是63.8%和79.8%）。在立陶宛-白俄罗斯亚边界的另一边，波兰人也是多数民族。诚然，苏联（总面积达2227.2万平方公里）至少有50%的波兰人生活在两个小共和国交界处3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苏联有一半的波兰人生活在苏联千分之一的领土上，这些领土在“二战”前属于波兰，而且这些领土都处于敏感的边界区域——双重敏感之处在于立陶宛首都边界线距离白俄罗斯仅有40公里。

苏联的政策使得苏维埃立陶宛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境内各有明显的波兰少数民族。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波兰人忙于应对当地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移民，而且不被允许在波兰语学校学习。[35]因此，在白俄罗斯的波兰人学习俄语——一门能提高社会地位的语言——而不是掌握波兰书面语言或白俄罗斯书面语言。在20世纪90年代，大概有十分之一的白俄罗斯波兰人在家说波兰语。在苏维埃立陶宛，情况大为不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禁止波兰语教学，而在苏维埃立陶宛的波兰人可以选择以波兰语、俄语或立陶宛语进行学习。由于对波兰人来说，立陶宛语比俄语难得多，而且在苏联境内俄语是权力的语言，因此波兰人避免选择立陶宛语学校。立陶宛语学校和大学复制并批准了波罗的海/斯拉夫语言的学科分支，在两种群体之间设置了清晰的社会屏障，给两类可能与众不同的政治精英贴上不同的标签。[36]尽管立陶宛语是苏维埃立陶宛的政治语言，但1989年在苏维埃立陶宛的波兰人中少于六分之一的人会说立陶宛语。[37]

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当地的民族主义很弱小，战后的俄罗斯化政策很成功。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的波兰人把俄罗斯化——而非当地民族主义——视作主要威胁，他们对白俄罗斯民族的理念态度友善。[38]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比起那些有地位的民族，波兰人更不可能加入共产党。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苏维埃白俄罗斯的波兰人是最不值得信任的民族，在“二战”后他们只能被同化。立陶宛人的情况不同。在这里当地的民族主义很强大，而俄罗斯化政策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在立陶宛的波兰人与在白俄罗斯的波兰人不同，前者害怕当地民族主义更甚于俄罗斯化。立陶宛的波兰人回想起1939—1940年立陶宛人的直接统治，伴随立陶宛官员的还有德国在1941—1944年的占领，1945年后他们又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苏联统治的限制，经历了类似立陶宛化的政策。立陶宛的波兰人仍然把在他们土地上的立陶宛存在视为异类，对立陶宛人的反感要比对俄国人的反感[39]深得多。在苏维埃立陶宛的波兰人比立陶宛人更可能加入共产党。在苏维埃白俄罗斯的波兰人被认为不如有地位的民族可靠，而在苏维埃立陶宛的波兰人被认为更可靠。关键不在于波兰人和共产主义达成了妥协而立陶宛人没有，关键在于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在苏维埃立陶宛内部达成了不同的民

族妥协，而苏联政权可以用其中一种来压制另一种。

在苏维埃立陶宛内部，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的潜在对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显现，这部分是因为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和苏联当局的设计，但部分也出于意外。立陶宛民族主义者赢得一席之地后，他们称立陶宛的波兰人是“波兰化的立陶宛人”，独立的立陶宛国家可以恢复他们的民族本质。立陶宛语言法规定非政府机构在日常运营中要使用立陶宛语，这使那些对立陶宛独立反而无动于衷的波兰人感到厌烦。使用波兰姓氏遇到了新的麻烦，人们认为波兰性本身被犯罪化了。波兰人有理由预料那些以两次大战间的波兰文件为基础的财产声明在土地改革中会受到区别对待。到1990年为止，当地波兰人认为立陶宛民族运动的目标是迫使他们在同化和移民间做出选择，这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判断。[40]和1940年的情形相似，1990年在维尔纽斯地区的立陶宛政策几乎没有给立陶宛政治认同——而非种族认同——留下任何空间。

在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苏联中央政府开始动员当地波兰人。立陶宛余下地区面临经济禁运令，而波兰人为多数民族的地区则收到了苏联运来的货物。莫斯科威胁要分割立陶宛，波兰人组织和波兰多数民族的地区则宣布领土自治。立陶宛人对波兰少数民族领导人的怀疑是正确的，其中大部分人在为苏联克格勃（KGB，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41]但是自治确实受到欢迎，因为当地波兰人真的害怕立陶宛民族主义，而且因为当地精英能够向波兰人呼吁一种波兰性的设想，许多人真诚地相信这种设想。此时，一种纯粹的波兰种族民族主义出现了，随之而来的还有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一直根深蒂固的理念：最好的波兰人留在了他们的立陶宛故乡。1939年，联邦主义的理念几乎完全覆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分类化和驱逐，以及立陶宛民族主义将其永远埋葬。

在华沙，立陶宛大公国的传统也基本被遗忘了，民族的语言定义获得胜利。波兰共产主义政权从继承中世纪皮亚斯特王朝中获得合法性，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东部领土成了苏联历史的一部分。对抗共产主义的政治手段利用了这个错误。1989年前，波兰反对派和《文化》的努力没有直接让波兰-立陶宛王国重回波兰历史，而是以波兰的模式对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进行了比较性的民族主义解读。他们推进了一种在历史上犹疑不定、在政治上宽宏大量的多民族主义，承认其他现代民族的存在及遗产。他们试图把关于波兰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性的普遍信念转变为支持邻近民族成为国家的预设。现代民族主义者的理念认为立陶宛民族国家是原立陶宛大公国的复兴版本，这种理念在维尔纽斯和华沙都占了上风。20世纪关于维日诺的争论看起来不过是一场误解，而在立陶宛的波兰人对领土的渴望似乎是不合逻辑，也不合法的。在之前的几章中，我们分辨了传统和历史，并且论证了要忘记一个人的传统，必先重建他的历史。[42]

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民族和解：在民族之间达成妥协之前，每个民族必须将他者也视为民族，它们在形式上是平等的。民族必须——这是最低要求——接受其他民族也有自身的历史。

把大规模民族（mass nation）视作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把民族国家视作历史单元——这种做法会边缘化那些民族碰巧和国家不匹配的人。在波兰的波兰人认为立陶宛的波兰人是落后的乡巴佬，上了苏联的当。科斯切娃-佐尔巴斯——波兰爱国者和波兰东部政策的贡献者——称在立陶宛主张自治的波兰人是“有波兰血统的苏联人”。[43]不会有比这更明确的民族社群排斥了！尽管科斯切娃-佐尔巴斯在加入波兰外交部之前已经写好这篇文章了，但在他第一次向议会提交双轨政策备忘录前的一个月，这篇文章才出现。团结工会的农村代表给立陶宛的波兰农民写了一封公开信，称支持苏联政权是可耻的。波兰的主流日报嘲笑那些宣布领土自治的波兰少数民族，他们问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的太平洋海岸线也是波兰的？[44]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和总统瓦文萨反对这些领土要求，提议在立陶宛的波兰人应该把他们自己看作未来的立陶宛民族国家的公民。[45]

尽管当时存在这些分歧，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共享着同一种历史范式。双方都声称是曾经存在的国家的后裔，他们把那些国家的历史改编为适应当代情况的版本。波兰和立陶宛在知识上瓜分了立陶宛大公国，立陶宛人宣称对大公国及其中世纪历史拥有所有权，波兰人则宣称对皮亚斯特王国拥有所有权。诚然，波兰人错误地把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视为波兰的国家，但是立陶宛人也错误地认为王国时期意味着立陶宛文明的终结。波兰的东部政策是基于东部存在潜在的民族国家这个事实，而事实上立陶宛人把民族国家视为他们的命运，这个念头比任何邻国都要强烈。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波兰-立陶宛关系虽然有着不祥的开端，却在20世纪90年代末渐入佳境。

1991年1月

然而，20世纪90年代始，依然存在许多现代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肃清。立陶宛民族活动家认为，对一个被重重包围的立陶宛国家来说，“波兰”少数民族和“波兰”国家的联合太过强大，以至于不能在短期内胜过他们。立陶宛人缺少与团结工会及新波兰精英打交道的经验，因此他们把在立陶宛的波兰人作为整体波兰人的代表，认为新的波兰主权国家本质上是立陶宛波兰少数民族的盟友，也是莫斯科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者的伙伴。

1991年1月，苏联特别部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的电视大楼，有13人遇害，数百人受伤，苏联当局、立陶宛爱国者、波兰少数民族和波兰国家——这四方的立场分歧成为焦点。苏联官员提出要分裂立陶宛，让苏维埃白俄罗斯

亚和波兰少数民族作为接收维尔纽斯及周边地区的合适人选。[46]宣扬国家独立的立陶宛爱国者督促国内少数民族支持他们共同的事业。议会发起一项针对独立的全民公投，得到了90%立陶宛选民的支持（其中86%有资格投票）。议会还许诺为波兰少数民族设立一个行政单位。这个从未实现的诺言并不能满足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当立陶宛危机持续发酵，在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那里的选举领导层以及立陶宛波兰人联合会的领袖们竭力提出领土要求。1991年5月，当地波兰官员组成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该计划的要求远远超出了领土自治：一个“维日诺-波兰民族-领土当局”。其最高权威机构是当地议会，其领土只受当地议会统治，当地有自己的旗帜和军队，其居民将拥有三重公民身份：立陶宛人、维尔纽斯人，以及波兰人或苏联人。以上是独立宣言的全部意图和主张。[47]

波兰方面谴责使用武力，和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保持距离，并最大程度地支持立陶宛独立，尽管可能并没有官方认可。波兰上议院和下议院的一份联合声明清楚地比较了波兰和立陶宛的历史。[48]波兰政府召回驻莫斯科大使，要求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讨论莫斯科的攻击事件，并邀请立陶宛代表出席会议。[49]1991年2月，90%受访的波兰公民支持立陶宛独立：和当月立陶宛全民公投中支持独立的立陶宛公民的比例恰好一致。[50]至少有1.5万名波兰人上街游行抗议莫斯科的武力行动：在华沙到处可以看到立陶宛国旗，尤其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在波兰全国，人们在卡车里装满医疗用品和食物，然后驶向维尔纽斯。[51]在维尔纽斯，被围困在议会大楼里的立陶宛代表欢迎团结工会活动家的到来，后者现在是波兰议员，他们带来了波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维尔纽斯，波兰主要报纸的编辑亚当·米奇尼克高喊“自由的立陶宛万岁”。在维尔纽斯，波兰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亚采可·库容说只要有需要，他会一直留在立陶宛议会里，他准备死在那里。[52]这些都不是空话，1991年1月，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立陶宛政府已经为流亡华沙制定好计划。时任外交部部长阿尔吉尔达斯·绍达尔加斯（Algirdas Saudargas，1948— ）负责这个令人气馁的任务，波兰议会为他所奋斗的事业和勇气喝彩叫好。[53]

1990年到1991年间，波兰和立陶宛的关系远比和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或乌克兰的关系要亲密得多。同时，波兰没有与立陶宛签署任何国家宣言，也没有对未解决的波兰少数民族问题表示异议。为政治关系奠定合法基础的努力失败了，之后这些失败会显得举足轻重。然而，在其他方面，双轨政策让波兰官员认识到波兰邻国的历史忧虑，他们开始理解为何现代波兰国家会被视为帝国主义历史的继承者。[54]一旦波兰的东部邻国在1991年末赢得独立，与立陶宛的分歧就会占据重要地位。在苏联解体后，对维尔纽斯的争夺历史成为立陶宛外交的主要关注点。结果，在危机期间波兰对立陶宛的支持只达到了立陶宛活动家的最低期望，就彻底消除对波

兰的恐惧而言，这还远远不够。由于对波兰的恐惧本质上是对波兰文化的恐惧，华沙的政治倡议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有了波兰的政治支持，当时主要的立陶宛官员还是会谈到波兰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谈到波兰入侵立陶宛的可能性，谈到俄罗斯-波兰的共同统治地位。立陶宛政策要求波兰不仅要纠正历史，还要在当下善意行事。1992年到1993年间，立陶宛人要求波兰就1920年“占领”维尔纽斯表示歉意，波兰人拒绝讨论历史；波兰人要求赋予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以政治权利，却遭到立陶宛人干涉国内事务的指责。

这说明波兰的双轨制东部政策——将东部邻国视为平等的民族国家——有其局限性。一旦波兰的东部邻国成为事实上的民族国家，这项政策就被废弃了。平等的民族国家必须拥有平等的民族历史，应该享有平等尊重，而且所有民族国家必须自行决定国内政策，无论有没有遭到邻国的反对。因此，关于历史和少数民族的争论需要不同的裁定标准，而不是依照主权国家的权利——这是1990年到1991年波兰东部政策的默认基础。从1992年年初开始，斯库比斯茨维奇清楚地表明“欧洲标准”政策是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双轨政策增强了波兰东部国家的力量，因此促成了它们的独立。欧洲标准政策增强了欧洲法律规范的清晰度，因此促使这些规范传入前苏联地区。换言之，当波兰面对苏联共和国时，它把后者当作民族国家；在面对后苏联民族国家时，它把他们当作欧洲融合的伙伴。而只有当波兰自身不再被看作民族传统的继承者，而是作为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种政策才能奏效。

---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律立场，见Documentation Relating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Policy of Détente, Bonn: Press Office of the FRG, 1974, 16, 27。被驱逐的领导人的观点，见Herbert Hupka, Unruhiges Gewissen, Vienna: Langen Müller, 1994, 433ff.; Herbert Czaja, Unter wegs zum kleinste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Josef Knecht, 1996, 753ff.。波兰民意调查引文见下。

[2] 引自Gazeta Wyborcza, 27 November 1989, 1。又见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1, 80。参见Jacques Lévesque, The Enigma of 198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10–119。

[3] 关于科尔出访华沙，见Horst Telchik,329 Tage, Berlin: Siedler, 1991, 13–15; Helmut Kohl, Ich wollte Deutschlands Einheit, Berlin: Ullstein, 1996, 125–127; Bronisław Geremek, Rok 1989, Warsaw: Plejada, 1990, 327; Philip Zelikow and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2。魏格尔的话引自Krzysztof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i odzyskanie niepodległości, Warsaw:

Interpress, 1997, 16 n. 1。

[4] Timothy Garton Ash,In Europe's Na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230, 353–354; Zelikow and Rice, Germany Unified,132–133, 220–221; Telchik, 329 Tage, 132, 184, 296–297; Gazeta Wyborcza, 8 February 1990, 7; 9 February 1990, 7; 22 February 1990, 1; 2 March 1990, 1; 15 March 1990, 1; Krzysztof Skubiszewski, “Poland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lliance 1989–1990,”in Jörn Ipsen, ed., Recht——Staat——Gemeinwohl, Cologne: Heymann, 2001;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29–34;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28), 26 April 1990, 8–10.

[5] Wlodzimierz Derczy ński and Robert Draczyk, Stosunek Polaków do innych narodowości, Warsaw: CBOS, August 1996, 29.

[6] 关于磋商的提议，见Antoni Dudek,Pierwsze lata III Rzeczypospolitej 1989 – 1995, Cracow: Geo, 1997, 70; Grzegorz Kostrzewa-Zorbas, “The Russian Troop Withdrawal from Poland,”in Allan Goodman, ed., The Diplomatic Record, 1992–1993,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122–123。关于维尔纽斯大火，见Grzegorz Kostrzewa-Zorbas, “Imperium kontratukuje,” in Jacek Kurski and Piotr Semka, interviewers, Lewy czerwcowy, Warsaw: Editions Spotkania, 1993, 159–162。

[7] 关于波兰人对德国人的恐惧，“Security for Europe Project Final Report,” Providence, R.I.: CFPD, 1993, 15。1992年5月的调查，见Życie Warszawy, 1 August 1992, 23. Hupka's query in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75。关于德国外交官，同上书，140。

[8] 引自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茨维奇的通信，7 December 2000, 8 – 9。这在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379 – 395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了。又见Ilya Prizel, “Warsaw's Ostpolitik,” in Ilya Prizel and Andrew Michta, eds., Polish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ed,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96 – 98。

[9] 分别引自：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14), 8 May 1992, 193;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29。

[10] 1968年，斯库比斯茨维奇曾批评波兰参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政权的反犹太人政策；1980年他加入了团结工会。然而，在1986年到1989年间，他加入了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顾问委员会。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波兰总统直到1990年，1989年时对两个阵营来说，斯库比斯茨维奇的职业生涯使其成为外交部部长的合适人选。

[11] 关于斯库比斯茨维奇，见Polityka (Warsaw), 27 October 1990。关于后勤工作，见Gazeta Wyborcza, 9–10 June 1990; 引自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茨维奇的通信，7 December 2000, 10。

[12] 一个例外是匈牙利与苏维埃乌克兰的约定，这出于匈牙利对在乌克兰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担心。斯库比斯茨维奇的话引自Polityka zagraniczna, 74。斯库比斯茨维奇的政策特征，见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51), 14 February 1991, 22; Polityka zagraniczna, 271; 以及下一个脚注中引用的资料。双轨政策备忘录：Grzegorz Kostrzewa-Zorbas, "Tezy do polskiej polityki wschodniej u progu lat dziewiędziesi ątych,"22 March 1990。关于备忘录与政策的关系：见格热戈日·科斯切娃-佐尔巴斯的通信，27 February 1998，又见Geremek, Rok 1989, 338; Gazeta Wyborcza, 13–14 January 1990, 5–6; Rzeczpospolita, 14 January 1994, 22。

[13]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28), 26 April 1990, 15; and 65, 27 June 1991, 20.

[14] Grzegorz Kostrzewa-Zorbas,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提交给波兰上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华沙的公民议员会议（Obywatelski Klub Parlamentarny），1989年10月23日。

[15] Skubiszewski,Polityka zagraniczna, 71, 96. 批评见Adam Chajewski, "Polityka polska wobec Litwy w latach 1989–1994," Arcana, 1, 7, (1996), 97。

[16] Timothy Snyder, "The Poles," in Charles King and Neil Melvin, eds., Nations Abroa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186–187.

[17] 关于与民主改革运动的接触，见Chajewski, "Polityka polska wobec Litwy,"95; Jan 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 Kultura, 602 (1997), 46; "Materiały okr ągłego stołu litewskopolskiego," Lithuania, 9–10 (1993–1994), 16; Jerzy Marek Nowakowski, "Polska——Litwa, Polska w Europie, 2 (1990), 64。

[18] "Rukh"和"Sąjūdis"分别是乌克兰语和立陶宛语中"运动"的意思，因此很难准确地、适宜地翻译过来。

[19] Myroslav Shkandrij, "Literary Politics and Literary Debates in Ukraine 1971–1981," in Bohdan Krawchenko, ed., Ukraine after Shelest, Edmonton: CIUS, 1983, 55 – 68; Roman Solchanyk, "Politic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Post-Shelest Period,"同上书，14–17。

[20] 见Bohdan Osadczuk, Iaroslav Hrytsak, Myroslav Popovych, Ivan Dziuba, Mykola Zhulyns'kyi, Miroslaw Czech和Roman Szporluk的回忆：Nashe Slovo (Warsaw), 8 October 2000。

[21] 米奇尼克的话引自Mirosław Czech, Ukraińcy w Polsce, Warsaw: Zwi ązek Ukraińców w Polsce, 1993, 16; 对此的回应：Roman Solchanyk, Ukraine: From Chernobyl to Sovereign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59; Ivan Drach, Roman Szporluk, 以及Mark Kramer曾与我讨论过米奇尼克的演讲。

[22] Interview with Jerzy Kozakiewicz, Warsaw, 4 March 1997; Iurii Zaitsev, "Pol's'ka opozytsiia 1970–80 rokiv pro zasady ukrains'ko-pols'koho prozuminnia," in Iurii Zaitsev, ed., Deportatsii ukraintsiv ta poliakiv, L'viv: NAN Ukrainy, 1998, 56–63; Antoni Kamiński and Jerzy Kozakiewicz, Stosunki polsko-ukraińskie, Warsaw: Instytut Spraw Publicznych, 1997, 20; Czech, Ukraińcy w Polsce, 1822; Gazeta Wyborcza, 8 May 1990, 6.

[23] Interview with Jacek Czaputowicz, Warsaw, 9 September 1997; Stephen Bura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Regional Context: Poland and its Eastern Neighbors," Europe-Asia Studies, 45, 3 (1993), 409; Gazeta Wyborcza, 18 October 1990, 6.

[24] Interview with Jerzy Kozakiewicz, Warsaw, 4 March 1997; Skubiszewski,Polityka za graniczna, 273–274;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 (14), 8 May 1992, 196; Jan de Weydenthal,"Polish-Ukrainian Rapprochement," RFE/RL Research Report, 28 February 1992, 26; Czech,Ukraińcy w Polse, 47; Kamiński and Kozakiewicz, Stosunki polsko-ukraińskie, 21–22; Nashe Slovo(Warsaw), 13 December 1992, 1–2.

[25] Andrew Wilson,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 Alexander Motyl and Bohdan Kravchenko, "Ukraine,"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ew States New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5–249; Roman Szporluk, "Reflections on Ukraine after 1994," Harriman Review, 7, 7–9 (1994), 1–10; Wiktor Nebożenko, "Ukraińska opinia publiczna o polityce zagranicznej," Polska w Europie, 15 (1994), 149–162.

[27] 波兰得到俄罗斯联邦的保证：俄罗斯不会让德国人定居在波罗的海的加里宁格勒州，在"二战"后，苏联从德国那里拿走了这部分领土。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272–273.

[28] Kostrzewa-Zorbas, “Russian Troop Withdrawal,”121–125;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 granicznej 1991, 80 – 81;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2, 189; Dudek, Pierwszelata III Rzeczypospolitej, 255.

[29] Yitzhak Brudny,Reinventing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2以及全书各处。

[30] Wojciech Roszkowski, “Polska,” in Marek Beylin, ed.,Europa środkowo-wschodnia 1992, Warsaw: ISP, 1993, 273; 关于1992年5月的条约，见Kostrzewa-Zorbas, “Russian Troop Withdrawal,”132。

[31] Kultura, 512 (1990), 87–88; Stephen Burant, “Belarus and the Belarusian Irredenta in Lithuania,” Nationalities Papers, 25, 4 (1995), 645; Alfred Erich Senn, Gorbachev’s Failure in Lithua nia,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73, 115.

[32] 关于1989年，见Algimantas Prazauskas, “The Influence of Ethnicity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Western Littoral States,” in Roman Szporluk,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165。关于1990年，见Kultura, 517 (1990), 120。

[33] 关于这次访问，见interview with Jacek Czaputowicz, 9 September 1997,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272; Tadeusz Gawin, Ojcowizna, Hrodna: Fundacja Pomocy Szkołom Polskim, 1993, 65; Gazeta Wyborcza, 16 October 1990, 1; 18 October 1990, 6; 22 November 1990, 6; Kultura, 519 (1990), 102–106; 同上书，560 (1994), 19。关于领土和少数民族，见“Interview with Vintsuk Vyachorka,” Uncaptive Minds, fall 1991, 39–49; Kultura, 505 (1989), 106–107; RFE/ RL Research Report, 1, 37 (18 September 1992), 41–45。

[34] Gazeta Wyborcza, 4 September 1991, 6; Kultura, 560 (1994), 19; Moscow Interfax in English, 10 October 1991, in FBIS-SOV, 11 October 1991, 63; Moscow Tass in English, 11 October 1991, 同上书，17 October 1991, 76; Le Monde, 8–9 March 1992, in FIBS-EEU, 10 April 1992, 25–28; Jan Zaprudnik, Belaru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3, 216。

[35] Zdzisław Winnicki, “Polacy na Białorusi,” in Jacek Pietraś and Andrzej Czarnocki, eds., Polityka narodowościowa państw Europy Środkowowschodniej, Lublin: IEWS, 1993, 199.

[36] Juozis Lakis,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of Lithuania,”Inter national Sociology, 10, 2 (1995), 179–180. 1953年，有2.7万名学生在波兰语学校上学或在非波兰语学校学习波兰语。到198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0133名。Grzegorz Błaszczyk, “Polacy na Litwie,” Przegląd Wschodni, 1, 1 (1991), 156.

[37]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ościowe na Litwie,”478.

[38] Thomas Szayna, “Ethnic Poles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Rand Report, August 1993, 35.

[39] Jacek Kuśmierz, “Między ‘wschodem’ a ‘zachodem,’” Przegląd Wschodni, 1, 3 (1991), 512– 513; Lech Mróz, “Problemy etniczne w Litwie wschodniej,”同上书，496; Szayna, “Ethnic Poles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vii。

[40] Senn,Lithuania Awakening, 99; Vesna Popovski,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Citizenship Rights in Lithuania, Houndmills: Palgrove, 2000, 132–133; Piotrłossowski, “The Polish Minority in Lithuania,”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 1–2 (1992), 83; Kultura, 499 (1989), 106–112;Chajewski, “PolitykapolskawobecLitwy,”96; Gazeta Wyborcza, 27 September 1989, 6.

[41] 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41–44;Gazeta Wyborcza, 5 October 1990, 6.

[42] 正如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所说：“遗忘、犯下历史错误，这对创造一个民族来说至关重要。”Qu’est-ce qu’une nation? Paris: Calmann-Levy, 1882. 又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199–201。

[43] Grzegorz Kostrzewa, “Stare i nowe,”Gazeta Wyborcza, 22 September 1989, 6.

[44] 信件见Gazeta Wyborcza, 15–17 September 1989, 2。Vladivostok mockery同上书，8–10 September 1989, 1. 又见同上书，11 September 1989, 6; 5 June 1990, 6。

[45] “Aide Mémoire w sprawie potrzeb mniejszości polskiej w Republice Litewskiej,” Pol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6 November 1990. 领土自治运动在西方没有受到关注正是因为它缺少（用Rogers Brubaker的术语来说）一个“民族化的外部家园”来支持它的领土要求。Nationalism Refram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主张自治者的要求，见Nasza Gazeta (Vilnius), 22 October 1989, 3; 22 October 1989, 1; 8 November 1989, 1, 3; 4 December 1989, 2; 8 April 1990, 1–2; 23 April 1990, 2; 13 May 1990, 1; 3 June 1990, 2; 15 October 1990, 2。

[46] Senn,Gorbachev's Failure, 145; 又见脚注516。

[47] Gazeta Wyborcza, 23 May 1991, 7; 18 January 1992, 1; Rzeczpospolita, 11–12 April 1992, 7; Chajewski, "Polityka polska wobec Litwy,"102.

[48]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49), 11 January 1991, 111.

[49] Timothy Snyder, "National Myth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and and Lithuania, 1989–1994,"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9, 2 (1995), 318–319; Gazeta Wyborcza, 14 January1991, 3.

[50] RFE Daily Report, 20 February 1992.

[51] Gazeta Wyborcza, 12–13 January 1991, 1; 15 January 1991, 1; 21 January 1991, 11.

[52] 同上书，14 January 1991, 1; 15 January 1991, 1; 18 January 1991, 3; Leszek Jesie ń, personal communication, 9 April 2000。

[53] 同上书，12–13 January 1991, 1; 14 January 1991, 3。

[54] Compare F. Stephen Larrabee,ca, Calif: RAND, 1993, 11–12. East European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Santa Moni

第13章

欧洲标准和波兰利益（1992—1993）

在《塔杜施先生》中名为《鼓动与围猎》的一章里，密茨凯维奇赞美了立陶宛的比亚沃查维森林，这里是古代大公爵们的狩猎场。1991年12月8日，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Stanislau Shushkevich）、鲍里斯·叶利钦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终结了苏联69年的历史。这三位共和国领导人是苏联的创始成员代表，他们宣布苏联不再是国际法的主体。苏联解体确立了民族国家遍及原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整个领土。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以及立陶宛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一道形成新东欧。这五个国家共有的地方——诸如比亚沃查维/别洛韦日——会遭遇什么？波兰，这个在苏联解体前的边界保守主义拥护者会对东部邻国的最后瓦解做出何种反应？

1989—1991年波兰的双轨政策当时似乎是乌托邦式的（但很实用），因为在几乎没人认为苏联会解体时，它就和几个苏联共和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92—1993年的欧洲标准新政策看起来也是乌托邦式的（但也很实用），因为波兰利用了西方机构的吸引力，而当时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机构会扩张。直到1993年，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还是拒绝支持向东扩张的政策。北约的地位没有那么绝对，但是在这段时期也没有提出增加东部盟友的提议。然而，波兰在西方机构扩张中的规范性参与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延续——规范性参与终结苏联的延续。双轨政策推动了东欧民族国家的创建，而欧洲标准政策改善了这些国家间的关系。

以欧洲的名义

为了理解欧洲标准政策的动因，我们必须从波兰利益开始讲起。波兰首要的东部利益是东部邻国不能阻碍波兰与西方的融合。1992年和1993年，波兰的后团结工会政府的第一要务是加入欧盟和北约。[1]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深知和东部邻国的嫌隙将成为阻止波兰进入这些机构的理由，他寻求通过尽快处理关系的方式阻止这些困难出现。波兰的第二种东部利益是维护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国家。这是对未来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最好防御。波兰的第三种东部利益是保护在苏联的波兰少数民族，其中大多数人在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尽管在短时期内波兰人在东部的待遇问题占据波兰国内政治的中心，但是在外交政策中这个问题和重返欧洲、东部邻国独立相比始终居于次要地位。这三大利益——融入西

方、巩固东部、保护少数民族——将通过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国家条约形式得到进一步促进。这些条约基于1990年和1991年与苏维埃共和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即在双轨政策时期，这些条约也包括波兰外交官所谓的“欧洲标准”。

“欧洲标准”意味着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波兰对任何东部邻国的领土都没有提出所有权声明，并希望东部邻国也放弃此类针对波兰的要求。波兰将设法保护那些居住在其他民族国家的波兰公民，但是反对波兰全体少数民族寻求领土自治的努力。同样，波兰会给予境内的少数民族同等权利，但是反对他们提出任何领土要求。这些原则也被运用在条约协商中。承认波兰东部邻国以及确认既有边界不会成为协商少数民族权利的筹码。和西德不同，波兰立刻无条件确认了既有边界。

这一路径的三种含义很快显而易见。首先，这项政策的重要范畴是国家及其公民，而不是民族及其成员。正如斯库比斯茨维奇所说：“少数民族权利并非特殊权利，而是少数民族成员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利用这些权利和自由，国家有义务确保少数民族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平等地位。这是国家内部的平等——对全体人民一视同仁，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群体。”[2]第二，这项政策基于国际法，并非基于对历史的民族主义解读。斯库比斯茨维奇态度明确：“历史不是，也不能成为个人如何看待如今现实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形成如今现实的决定性因素。”[3]欧洲标准政策并不理会以各个受虐待的少数民族的名义，或设计不佳的边界问题的名义提出的特殊主张，即各个国家在现有边界内立刻达成全面的法律协议。第三，这是一项关于自愿欧洲化的政策。比起等待欧洲介入，这项政策试图在欧洲意识到存在分歧之前先抑制分歧，而且在其他选择明朗化之前就在东欧引入欧洲规范。[4]关键是“鼓励我们的东部邻国理解，那些多年来我们视为指导的欧洲模型或标准，也应该在他们的新国家中实现”。核心问题是“欧洲对待少数民族权利的标准”。[5]

波兰在引入规范的同时也在界定规范。严格说来，当时并没有针对少数民族的欧洲标准。尤其在1991年夏天南斯拉夫战争开始后，欧洲机构向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提出了逐渐清晰的目标。然而这些规范性目标并不能简单地体现在欧盟内部盛行的标准上。少数民族权利的概念是极富争议的：欧洲主要成员国的宪法对少数民族存在这一问题十分不利。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哥本哈根文件中的呼吁，被引为1991年德国-波兰条约中少数民族权利条款的“标准”来源之一。波兰企图以该条约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激烈辩论中挖掘出一个清晰的立场。按照这项政策，少数民族把自身定义为一个特定群体，他们在文化和领土权利上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些都是波兰提出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波兰与德国的磋商中逐渐成形——波兰当时处于弱势。波兰之后与东部邻国的

磋商中也运用了这些概念，此时波兰处于强势地位。在主张呼吁一系列逐渐被接受的“欧洲标准”时，波兰事实上巩固了这些标准。这种方法必定得到了波兰西部邻国的同意。关于领土完整问题也是如此。诚然，欧洲国家和组织会对国家边界变动持保留意见，但因为德国统一，西德称波兰边界先于统一的声明，爱尔兰关于收复失地的宪法，西班牙亲欧政党野心勃勃的领土计划，英国、爱尔兰以及英国-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的争议，使得欧洲国家和组织很难提出一种清晰的边界“标准”。但是，战后的一般惯例已经足够清楚，而且人们希望东欧保持稳定的期望更加清晰——特别是在1991年6月的南斯拉夫战争开始后。斯库比斯茨维奇认为让东欧国家被接纳为欧洲国家的最佳方式是避免领土争端，他是对的。

“欧洲标准”标志着波兰与欧洲最重要的国家间缔结的最重要的协议：德国-波兰的边界条约（1990年11月）以及两国的睦邻条约（1991年6月）。[6]斯库比斯茨维奇确保了波兰不会对东部邻国要求什么，也不希望德国对波兰要求什么。通过再次确认波兰和德国的边界，斯库比斯茨维奇清楚地表明波兰不会向东部邻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波兰政策将在波兰的德国少数民族与波兰公民一视同仁，这形成了一种境地，即如果波兰在东部邻国对待波兰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提出比这更多的要求，那将是非常尴尬的。波兰驻立陶宛大使回想起他应对当地波兰少数民族的抱怨：“在我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总是问自己，作为一名波兰官员，我会如何应对德国驻波兰代表的抱怨。”[7]德国的例子也有积极的一面。总体来说，波兰的东部政策对“欧洲”的运用和德国的波兰政策对“欧洲”的运用是相似的。在两个例子中，对欧洲未来的许诺和20世纪的民族矛盾是相悖的，“欧洲”提供了促使国家和解的理念和修辞。[8]

欧洲标准是一种标准吗？

“欧洲标准”的理念预设通往欧洲的道路上布满了指示牌，某些路径是必须被采纳的，另一些则必须被规避，此外波兰握有地图，是一个可靠的向导。波兰对东部邻国如是说，如果你们像我们一样遵从欧洲标准，你们就会和我们一样将来加入欧洲。这个观点对波兰邻国的国内政治界很有效果，考虑到这些国内政界的参与者渴望重返欧洲，而且他们认为波兰在这条路上比他们走得更远。当然，波兰主动提出确认现存边界、互相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这对波兰自身来说也有吸引力，而且一个实际的因素是快速提交的条约草案加速了磋商进程。这一切似乎只是应对国际环境的规范和理性的反应。要弄清楚这个政策路径的特别之处，比较波兰的东方政策和同时代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也许会有帮助。

1.欧洲标准政策把少数民族权利视为他国的公民文化权利，该权利可列入国际条约中。外部仲裁者的产生——被编入条约的“欧洲标准”——总体上

避免了出现在该地区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以牙还牙式的陷阱。

2.欧洲标准政策强调对主权国家来说，少数民族的命运是一个国内议题，少数民族属于该国公民，而其他路径意味着向邻国的主权提出质疑。匈牙利在修辞上扩大了其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把1990年在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乌克兰的匈牙利人口都包括进来。俄罗斯代表苏联各加盟国的浮夸言论吓坏了邻国。代表塞尔维亚种族的南斯拉夫激进主义导致四次战争发生，北约两次介入，造成超过100万的难民以及几万人死亡。

3.类似地，欧洲标准政策排除了少数民族问题的领土解决方案。这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白俄罗斯的早期立场有所不同，它们认为和平修改边界是可能的；这和俄罗斯支持武装占领摩尔多瓦部分领土不同；这和叶利钦早先暗示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未定不同；这和俄罗斯议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认为乌克兰必须把克里米亚还给俄罗斯的态度也不同。欧洲标准政策和南斯拉夫的武力纠正边界政策有最明显的不同。

4.欧洲标准政策企图在欧洲机构意识到潜在问题之前就引入欧洲规范。波兰和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形成显著对比，这两个国家等着欧洲方面的压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1995年的巴黎会议），强迫它们解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歧；和南斯拉夫也不同，后者在90年代中后期击退了北约的干预；和俄罗斯相比，后者无视西方机构的偏袒，发起了两次针对车臣极度野蛮的战争，定期入侵高加索地区，并占领了摩尔多瓦部分领土。

5.欧洲标准政策企图让历史远离外交。虽然很多局外人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知道1389年科索沃战争，但是很少人了解1386年波兰和立陶宛的王朝联合。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让公众开始关注40年代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但是40年代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同样野蛮和普遍的种族清洗一直是专家的研究课题。

从基本原理来看，波兰的政策路径和俄罗斯的大相径庭，后者认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迷途的“俄罗斯”土地，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基辅罗斯的“后代”。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根本没有历史基础：在基辅罗斯瓦解后，现代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立陶宛大公国（1289—1795）和波兰-立陶宛王国（1569—1795）的部分领土。几百年来，如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曾是立陶宛大公国或波兰-立陶宛王国境内的罗斯。莫斯科公国（1721年后被称为俄罗斯帝国，1922年后被称为苏联）确实慢慢横跨罗斯的土地，但是直到1667年莫斯科才开始统治基辅，这已是基辅罗斯灭亡后的4个多世纪；利沃夫直到1939年才被莫斯科统治，这已是基辅罗斯灭亡的7个世纪后。维尔纽斯和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Volodomyr Volyns’kyi）是中世纪罗斯使用的斯拉夫官方语言的重要发源地，在两次世界大战间这两座城市属于波兰。它们今天分别是独立的立陶宛的首都和乌克兰西部的城市。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后代”和外交相关，波兰外交官和俄罗斯外交官一样有权利来谈“家族纽带”。事实上，波兰避免了这种元历史，把东部邻国当作平等的民族国家。

以上是欧洲标准政策要避免的五大陷阱。为了理解这种脚踏实地的价值，我们应该牢记在本书第1章到第10章中了解到的内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或塞尔维亚人一样，和他们的邻国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关系；在20世纪这种历史关系包含公开的复仇主义、正式的战争状态以及大规模种族清洗；而且关于战争和不公正的记忆在波兰东部邻国的精英们和波兰人民心中占有重要地位。确实，当波兰的东部邻国在1991年赢得独立时，苏联-波兰边界两边的领导人、外交官和公民只是旧事重提而已。在苏联解体后，不顾突然复兴的民族主义要求——关于有争议的立陶宛祖国和被包围的乌克兰腹地——欧洲标准政策开始推行。这项政策的成功不能让我们忽略那些挑战确实存在的事实。

乌克兰，1992—1993

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没人忘记20世纪40年代发生过的大规模种族清洗。乌克兰游击队给波兰平民造成了恐怖记忆，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强迫乌克兰人定居别处，这也给乌克兰人的记忆蒙上了可怕的阴影，波兰东部政策针对的区域由此产生了一种怀疑的氛围。如今来自乌克兰的波兰人和来自波兰的乌克兰人可以自由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并否认另一方的故事）。密探们到处售卖关于种族清洗的可怕故事，并配上照片，在这些故事中一方是无辜的，另一方则是罪人。在波兰，调查显示波兰人对乌克兰人的恐惧更甚于对俄罗斯人或德国人的恐惧。在普热梅希尔——这里在20世纪40年代曾发生过恐怖的波兰-乌克兰内战，一群波兰人声称对一处曾属于乌克兰人的教堂拥有所有权，他们成功地无视了波兰教宗的公开愿望。1991年，UPA兄弟会在乌克兰西部开始建立，波兰司法部长提出UPA在沃里尼亚的种族清洗应该归入反人类罪，和斯大林主义罪犯所应受到的审判一样。[9]乌克兰民族活动家肯定会反对，他们为UPA感到骄傲，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比对波兰人的所作所为知道得更多。同时，波兰国内的乌克兰人组织运动要求当局对1947年被迫移民做出赔偿。他们的要求包括现在的波兰民主国家为维斯瓦河行动道歉，该行动是由共产主义政权在1947年发动的重新定居行动。乌克兰的民族活动家支持他们的要求。

事实上，波兰上议院在1990年6月已就此道歉。波兰代表感到失望，因为乌克兰议会在1990年10月的回复中没有对1943年的沃里尼亚恐怖事件做出相同的致歉。[10]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一个新的波兰主权国家为前任共产主义政府的行为致歉，比一个新的乌克兰独立国家为游击队的行为致歉更容易。这就是说，乌克兰议会的回复看起来在说斯大林主义应该对降

临在双方的灾难负责，每个记得UPA所作所为的波兰人都不能接受这种描述。乌克兰人想知道为什么波兰下议院没有联合致歉，那是因为在1990年下议院还不是完全民主的，仍然被前共产主义者们所主导，他们不愿意批评20世纪40年代的政策。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就是参加维斯瓦河行动的老兵！1992年，乌克兰外交又重提波兰为维斯瓦河行动道歉的问题。[11]

波兰的欧洲标准政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起作用的。它起作用不是因为企图解决这些历史分歧，而是因为它假设一份合法的协议应该优先于处理历史问题。法律如何能在变化多端的历史分歧中找到政治牵引呢？乌克兰民族活动家通常是那些来自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的人，他们亲眼看见或听闻过“二战”中乌克兰-波兰的争端，有些还是OUN成员或UPA士兵的后代。正如最后一章将谈到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接受“法律先于历史”的前提是因为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和团结工会的联系，以及1989年后和新波兰的联系。那些记得20世纪40年代血腥事件的西乌克兰人正是那些把波兰视为通往欧洲未来的道路的人。[12]1989—1991年参与非正式的第三轨道联系的乌克兰人中有未来的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驻波兰大使、独立后乌克兰的第一届政府顾问、利沃夫市长以及乌克兰人民运动最初的两位领导人。比方说，伊万·德拉奇（Ivan Drach）曾是乌克兰独立前乌克兰人民运动的领袖，之后他负责海外乌克兰人政策。就在独立前，他解释说：“我们想走波兰的道路。我们知道通往欧洲的道路（也许这让我们和立陶宛有所不同）确实是由波兰带领的。”加利西亚人德米特罗·帕夫雷奇科（Dmytro Pavlychko）之后成为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他在独立前说服民族激进主义同伴们，波兰已经改变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13]

就20世纪40年代的问题，1992年5月的波兰-乌克兰条约没有提到也没有达成一致。1992年9月17日—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纪念日——经历了一场关于维斯瓦河行动的激烈争论后乌克兰议会批准了这项条约。帕夫雷奇科最后发言，他争论说如果因为历史分歧而阻碍两国开始友好关系，这正说明了“一种低等的政治文化”[14]。关于谁应该为20世纪40年代的种族清洗道歉的争议依然存在：在波兰总理汉娜·苏霍茨卡（Hanna Suchocka，1946— ）1993年1月到访基辅时（“总理先生，我并没有说过波兰政府会谴责维斯瓦河行动。我是说波兰政府会客观地解释维斯瓦河行动的问题，我也希望你，总理先生，能在对待乌克兰西部的沃里尼亚波兰人问题上表现尊重”），在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主席在2月来到克拉科夫时（“我们永远不相信苏联历史学家散布的关于UPA的谎言和诽谤”）。[15]这些后来发生的事很好地证明了历史争论如何揭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波兰人同意这种观点，即“发生在沃里尼亚的事”远远比维斯瓦河行动要糟糕。西乌克兰人和乌克兰人民运动则表达了他们对在波兰的乌克兰少数民族的担心，对

官方能为1947年强制迁徙乌克兰人道歉的渴望，以及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对波兰人在利沃夫的复兴感到恐惧。乌克兰活动家感谢波兰对乌克兰独立的支持，希望和波兰的条约能帮助乌克兰重返欧洲，他们认为历史问题没有国家安全重要。[16]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承认波兰是乌克兰回到欧洲的途径。按他的说法，1992年5月签署的条约让波兰成为比俄罗斯更重要的伙伴。波兰总统瓦文萨用更微妙的语言指出，这份条约对三方都很重要。[17]

在华沙-基辅-莫斯科的轴心，一些基本共识确实达成了。华沙承认乌克兰的地位，确认了乌克兰的西部边界，继以传达出波兰是东欧的一个既存力量，而且少数民族问题不会成为介入乌克兰事务的借口。俄罗斯政策刚好相反，叶利钦表示必须重新划定乌克兰的边界，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生活的俄罗斯人是俄罗斯精英政治所关心的重要议题。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生活的俄罗斯人希望与俄罗斯统一，俄罗斯议会很快宣布克里米亚港口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是俄罗斯城市。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官方声明的主旨改变了1992年的局势，这是这两个国家独立的第一年。困惑的俄罗斯政治家不习惯把乌克兰当作一个截然不同的实体，他们拒绝认真对待乌克兰独立这件事。[18]

1992年末，克拉夫丘克决心加紧与波兰联盟以反对俄罗斯在东欧的统治地位，乌克兰可能用它从苏联继承过来的武器提供核保护伞。当时，除了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核武器。1993年春天，乌克兰提出了一个“波罗的海到黑海协定”（Baltic-to-Black Sea Pact），该协定将促成乌克兰与波兰之间的核伙伴关系。这个长期受到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欢迎的想法并非仅仅出于平衡俄罗斯力量的考虑。它还旨在保持俄罗斯统治（这并不受欢迎）和欧洲融合（这需要多年时间）之间中间地带的稳定。该协定参考了在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波兰和乌克兰的共同经验，毕竟这是一个夹在西欧和沙俄之间的大国。[19]

正如我们所知，波兰外交的核心是民族国家，而诉诸波兰-立陶宛王国是没有说服力的。俄罗斯的挑衅对波兰国家地位来说是不利的威胁，波兰政策对乌克兰很友好，但是远没有到支持克拉夫丘克这个愿望的地步。波兰确实向西方国家解释过为什么乌克兰独立对欧洲稳定是重要的，以及为什么乌克兰犹豫要不要把核武器交给俄罗斯。1993年4月，波兰总统瓦文萨和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向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提起这些议题。尽管波兰支持乌克兰独立，也解释了乌克兰的利益，但是波兰同时希望乌克兰能解除核武器。波兰同意与乌克兰达成军事合作，前提是乌克兰并不指向俄罗斯。针对俄罗斯-乌克兰分歧，波兰的政策是不偏不倚的，尽管斯库比斯茨维奇曾明确地谴责俄罗斯议会的领土要求。[20]

20世纪90年代初，波兰和乌克兰都因为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而受到牵

制。波兰财政部部长宣布俄罗斯-乌克兰争端可能限制给波兰的燃气供应，这个可能性让他“感到恐惧”。1993年8月，波兰同意帮助俄罗斯建造一条绕开乌克兰的西欧燃气管道。大约在同一时间，波兰当局逮捕了一名乌克兰安全局少校，指控其从事间谍活动，叶利钦（临时）同意北约扩张，乌克兰人开始害怕俄罗斯-波兰轴心。[21]到1993年年末，波兰和乌克兰发现两国关系中的限制不是关于乌克兰-波兰边陲的分歧，而是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利益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乌克兰历史节点上乌克兰-波兰战争的先例被打破了，而关于东欧地缘政治的基本共识的新惯例已经建起。

白俄罗斯，1992—1993

波兰1989年后的乌克兰政策，在不顾20世纪40年代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历史争议的情况下成功了，类似地，纵使出现了新的维尔纽斯/维尔尼亚/维日诺争端，波兰1989年后的白俄罗斯政策也成功了。1991年和1992年，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四分五裂，外交部部长一边推进针对立陶宛的领土要求，议会议长一边撤回这些要求。外交部部长彼得·克劳先卡（Petr Krauchanka）得到了白俄罗斯小型民族主义运动的有条件支持，该运动认为在立陶宛的波兰人是白俄罗斯人，1945年维尔尼亚被从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排除出去是一个错误，独立的白俄罗斯要尽快纠正这个错误。[22]1992年，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被民族独立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支持，在政治上也几无经验。议会议长斯坦尼斯劳斯·舒什克维奇（Stanislau Shushkevich）是一个少见的人物：他是一位白俄罗斯爱国者，相信实现白俄罗斯利益的最佳途径是在现有边界内、作为白俄罗斯民族国家融入欧洲机构。因此他向立陶宛人保证不会提领土要求，而且把波兰当作通往欧洲的最可行路径。[23]

舒什克维奇的主要抗议是白俄罗斯农民因为罗马天主教会变得波兰化。波兰神父用波兰语布道，并用波兰民族象征装饰他们的教堂。[24]白俄罗斯人口中五分之一——1000万人——是罗马天主教教徒。传统上，罗马天主教在白俄罗斯被认为是“波兰人的信仰”，但是罗马天主教家庭培育了历史上大多数优秀的白俄罗斯活动家。他们面对的问题是，要让罗马天主教教徒相信他们也是白俄罗斯人，而不是波兰人或“来自这里”的波兰人。罗马天主教神父在反宗教改革之后一直享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白俄罗斯独立后的特殊情况下，争议之处在于罗马天主教教徒是选择自我认同为白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1992年初，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波兰神父严加管束。[25]对梵蒂冈来说这成了一个问题，这意味着白俄罗斯人的担忧并不是真的关于少数民族之类的问题。尽管当时大概有21.5万白俄罗斯人在波兰，有41.7万波兰人在白俄罗斯，但问题不是这些少数民族形成了某些政治团体或提出了有争议的要求。问题是罗马天主教教徒在未来的某个节点会如何认同他们自己。就像舒什克维奇理解的那样，白俄罗斯人和说白俄罗斯语

的人仍然在经历从近代早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如同我们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看到的那样。[26]

白俄罗斯爱国者的其他忧虑已经被世俗因素消解了。1991年10月签署的波兰-白俄罗斯共同宣言减少了关于波兰会对白俄罗斯领土宣示主权的担忧，也标志着白俄罗斯人不会再对波兰领土宣示主权。同时，立陶宛人的努力让白俄罗斯人的复仇主义软化了。立陶宛历史学家和白俄罗斯同行进行了一次对话，内容关于立陶宛大公国的继承问题。这些讨论产生了一个观念，大公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继承者，即现代白俄罗斯国和现代立陶宛国。换言之，立陶宛人帮助白俄罗斯人从对大公国更具历史准确性的理解（面积广袤、多民族共存、领土模糊）转变为和现代国家更为一致的理解（面积小、单一民族、领土有限）。为了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变得不那么危险，近代早期的白俄罗斯民族迷思必须变得不那么真实。虽然立陶宛大公国仍然是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的整体回忆，但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不再相信白俄罗斯的领土必须拓展到包括维尔尼亚的地方。[27]

1992年，伴随着白俄罗斯独立来临，波兰的东部政策给重要邻国白俄罗斯提供了一份条约，条约内容包括确认现存边界以及确立明确的少数民族权利原则。所有的重要当事人都能接受这些提议：修正主义者、外交部部长克劳先卡，坚定的议长舒什克维奇以及共产主义者、白俄罗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切（Viacheslau Kiebich）。条约在1992年4月签署后，波兰总理扬·奥尔谢夫斯基（Jan Olszewski，1930—2019）做了一番看似无伤大雅的讲话，他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可以作为本地区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模范。"[28]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波兰和白俄罗斯就确认了两国边界，这个简单的事实对该地区而言非常重要。它向明斯克传达了民族国家建立的规范，确认继承而来的边界的规范，并且预示了波兰不参与任何白俄罗斯针对立陶宛的收复失地行为。它也向立陶宛人传达了信息，波兰不会对1939年失去的东北部大部分领土宣誓所有权。最重要的是，这向俄罗斯人表明收复失地的倾向将不会赢得任何西方合作者。1992年年中，华沙合法确认了93%的东部边界（5月与俄罗斯确认了206公里，5月与乌克兰确认了428公里，6月与白俄罗斯确认了605公里，还剩有待与立陶宛确认的91公里），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波兰没有兴趣向东拓展。通过这些方式，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快速签署的条约实现了《文化》曾提出的东部计划。

斯库比斯茨维奇对《文化》大战略的主要贡献是利用"欧洲标准"让波兰规范向东部传播。当舒什克维奇于1992年6月在华沙签署了白俄罗斯-波兰条约时，他把和波兰的关系与白俄罗斯的入欧命运联系起来，接受欧洲标准是少数民族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之后，白俄罗斯的第一个驻外大使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华沙。[29]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波兰向舒什克维奇和

与之想法相似的白俄罗斯人提供了一扇西方之窗，帮助白俄罗斯加入区域性机制，并开创了军事合作。波兰官员意识到两大吸引力——对民族国家地位和通往欧洲的支持——的脆弱性；当舒什克维奇的地位被削弱了，白俄罗斯向东部倾斜时，他们感到担忧。1992年11月，波兰总理苏霍茨卡在访问明斯克时直接挑明了问题："波兰对白俄罗斯的独立感兴趣，希望成为连接白俄罗斯和欧洲的因素之一。"[30]这是不明智的说法，却是症结所在。在1991年8月莫斯科政变未遂后，保守的白俄罗斯共产党宣布共和国独立，以保护本国地位不受莫斯科改革者的影响，这让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享受到一些显而易见的影响力。白俄罗斯活动家给新国家赋予了一种民族主义形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控制国家机构，更不用说赢得人民的支持了。他们只有大约30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些令人气馁的任务。白俄罗斯的民主让民族性问题搁置了。1994年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a）通过直接选举成为白俄罗斯总统，他的当选终结了和波兰富有成果的合作，并开始了苏联式的独裁统治。波兰针对白俄罗斯的欧洲标准政策的永久成功在于，及早创建了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的法律框架。

立陶宛，1992—1993

波兰与立陶宛关于维尔纽斯的历史争议最为尖锐。在第3、4、5章中，我们留意到波兰占领维日诺后两国在1920年到1938年间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当斯大林在1939年把这座城市给了立陶宛之后，波兰政府勃然大怒；1944—1946年间，波兰人的维日诺不再存在；在苏联统治下，维尔纽斯开始立陶宛化。我们也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立陶宛民族运动、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苏联中央当局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都在争夺维尔纽斯地区。波兰国家（作为事实上在1939年丧失这些领土的实体的继承者）是唯一声明放弃领土所有权的一方。1991年8月的莫斯科叛乱让五方竞争者中又少了两方：莫斯科不再进行操纵，明斯克的地位也改变了。同时，政变把波兰少数民族、波兰国家和立陶宛民族运动的紧张状态推至最高点。

波兰少数民族的几位领导人把1991年8月的政变视为苏联的复兴，并计划着他们对立陶宛的复仇。[31]他们没有得到波兰的支持。1991年8月26日，波兰政府正式承认立陶宛独立。9月4日，立陶宛政府解散了波兰人占主要人口的地区的政府。9月14日，立陶宛和波兰关于共同宣言的磋商再次失败。波兰坚持要求允许立陶宛的波兰人选出新的地方政府以替代亲苏精英；立陶宛当局要求无限期保留立陶宛官员统治维尔纽斯和沙尔奇宁凯地区的权利。在立陶宛人占主要人口的地区，当局允许他们选出自己的地区政府，而维尔纽斯和沙尔奇宁凯地区的行政管理是和别处分开的。兰茨贝吉斯现在是立陶宛议会的议长，也是立陶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谈到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32]。

只有立陶宛人承诺在维尔纽斯和沙尔奇宁凯地区举行选举，斯库比斯茨维奇才同意到维尔纽斯签署两国友好关系宣言。在维尔纽斯签署该宣言揭示了斯库比斯茨维奇的艰难立场。他白费心力，同时受到立陶宛右翼和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的攻击。立陶宛议员发起请愿，抗议共同宣言“使侵略合法化”，因为宣言没有谴责波兰军队在1920年占领维尔纽斯。[33]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证明一旦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所持有的历史主张进入政治层面，会引起另一方何种意想不到的反应。波兰人回想起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让波兰失去了维日诺，包括立陶宛人在内的所有人将其视为侵略。因此如果有人真的在意不要“使侵略合法化”，那么他不得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确立的所有边界发出质疑。当然，这样做就意味着维尔纽斯是波兰的合法领土。把“1920年”从历史的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来，立陶宛右翼无意中把“1939年”也释放出来了。波兰激进主义者宣称斯库比斯茨维奇由于避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手无寸铁，他是“一路跪着”来到维日诺的。[34]另有人写道，波兰政府“甘愿拿在立陶宛的波兰人权利做利益交换”[35]。

斯库比斯茨维奇没有任凭这场历史争论传播到波兰，而是敦促立陶宛代表不要只想到过去，要想一想未来，并重申他保证波兰不会提出领土所有权要求，也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位泽里格斯基将军。[36]他直接提到在1920年占领维日诺的波兰将军，是有意证明他意识到立陶宛的历史忧虑，也有意安抚他们。然而，立陶宛执意要求波兰就1920年提出正式道歉。这对波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反对通过外交修改历史的考虑，部分原因是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诠释是带有偏见的，还有部分原因是在立陶宛的波兰人的财产权利有赖于两次大战间的文件的合法性。更本质的原因是，任何国家只要承认它之前的边界是非法的，这将开启外界提出各种领土所有权要求的可能性，为本国和邻国创造一个危险的先例。比方说，如果波兰彻底放弃它在两次大战间对维日诺的合法领土要求，那么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就有针对当代立陶宛国家的进一步论据。显然，对立陶宛人来说，波兰彻底放弃以往对维尔纽斯的所有权要求，将自动确认立陶宛的所有权。但是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不会这么看待这个问题。

说明立陶宛人对1920年事件的解释在历史层面上是错误的，这并不怎么有趣。1920年，维尔纽斯根本不是一座在种族上属于立陶宛的城市，而它被排除在立陶宛之外使得立陶宛在两次大战间成为一个拥有小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1939年的独立立陶宛以及1945年的苏维埃立陶宛把这座城市归功于斯大林。在这座城市的主要社区、犹太人和波兰人都被毁灭之后，大约到1980年为止，维尔纽斯在苏联统治下其人口变为立陶宛人。（1941年，波纳尔森林——密茨凯维奇杜撰说这是维尔纽斯的起源——成为维尔纽斯的犹太人在被谋杀前的最后栖息地。）立陶宛民族主义者把这些深层的转变视为维尔纽斯的“回归”，他们可以宣称维尔纽斯从来都是一

座立陶宛城市。当民族产生时，它们开始建构历史，破坏那些学者感兴趣的传统，而实际发生的事件进程将不得不重新构建。这说明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观点。波兰就1920年所做的任何道歉都是毫无逻辑的，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时，双方之中没有任何人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追溯到1920年，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完全明白维尔纽斯几乎没有立陶宛人。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所有权宣称是历史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人们恐怕是通过两次大战间和苏维埃立陶宛的教育政策才“认识到”当维尔纽斯在1920年被波兰占领时是一座种族上属于立陶宛的城市。类似地，1920年毕苏斯基和泽里格斯基不是作为波兰民族主义者、立陶宛的敌人，而是作为波兰的立陶宛人来兼并维日诺的。他们的行动根据的不是“种族”民族国家的范式，而是设想立陶宛大公国能够以联邦的形式再次复兴。70年后，他们当时的动机和身份都被遗忘了，由于波兰更大的民族胜败的叙事而变得模糊不清。1920年到1992年间，国家的种族概念在立陶宛和波兰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到20世纪90年代，独立的立陶宛和波兰可以自由地再次处理维尔纽斯问题，每个人都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推论出发。然而，从这样的理解中至少可以推出两个不同的结论。一方面，这符合对国际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理解，20世纪末的国际法概念和欧洲合作使这种理解变得温和。这是斯库比斯茨维奇的路径。另一方面，对那些接受单一民族的现代原则的人来说，一个国家能够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他们对自身历史的解释。单一民族历史一旦被引入政治的世界，一定会召集邻国民族历史的幽灵（doppelgänger）。立陶宛的外交政策目的在于让波兰人舍弃他们对1920年的（错误）理解，并接受立陶宛（更加错误）的理解。斯库比斯茨维奇拒绝这个路径，他继续从未来的角度把民族国家当作国家来看，而非从历史的角度把它们当作民族来看，并且给波兰的东部邻国提供了一副欧洲未来的图景。这确实奏效了，但是这次斯库比斯茨维奇需要来自欧洲的推力。

北约

1993年8月24日晚，醉醺醺的鲍里斯·叶利钦在华沙以书面形式宣布波兰加入北约不会损害俄罗斯联邦的利益。虽然第二天叶利钦看起来有些后悔，并且之后在莫斯科收回了这个说法，但这开启了关于北约扩大的国际辩论。正如很多立陶宛政治家很快注意到的，波兰加入北约会让立陶宛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块微小的缓冲区。由于此时俄罗斯军队已经撤出立陶宛，立陶宛发现本国的联盟政策有了更多的操纵空间。选择北约重新改变了立陶宛精英的观点，他们抛弃了对波兰的历史所有权要求。立陶宛社会主义者（前共产主义者）自1992年11月起就在政府中任职，他们反对北约扩张，但是支持和波兰重新接触。他们的领导人、时任总统阿尔吉尔

达斯·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1932—2010）倡导与俄罗斯和西方保持同等的距离。立陶宛民族主义政党现在是反对党，他们支持北约扩张，但是反对和波兰重新接触。1993年10月，右翼就北约问题向社会主义者总统施压，同时要求社会主义政府再次推行对波兰少数民族的直接统治，强迫波兰为1920年道歉。1993年11月，争论再次升级，一些民族主义政治家认为要两者兼得是很困难的。1993年12月13日，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i）[37]在俄罗斯杜马选举中的表现及时提醒世人，国际政治关乎生存也关乎威望。12月29日，立陶宛议会建议政府申请成为北约成员。1994年1月4日，总统布拉藻斯卡斯遵从了这个建议。[38]

即便在一个俄罗斯看起来更具威胁，而北约似乎更受欢迎的世界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对波兰依然意见分裂。1991年之前，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家跨过了这道门槛——波兰应该被视为一个友好的国家，而非敌对国家——而1993年年末的立陶宛民族主义活动家还未跨过去。前民主改革运动的活动家们也形成了分裂。对于不谴责泽里格斯基而和波兰缔结条约的希求，兰茨贝吉斯直到1993年年底才改变主意。民主改革运动第二重要的活动家罗穆亚尔达斯·奥佐拉斯（Romualdas Ozolas，1939—2015）和当时的保守党领导人兰茨贝吉斯一样，反对在新形势下和波兰缔结条约。奥佐拉斯是一位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他在1990年编辑民主改革运动的报纸，却同时坐在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席位上。在立陶宛独立后，他对波兰少数民族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并利用这个议题成为立陶宛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当立陶宛和波兰签署一项没有提及泽里格斯基的条约时，奥佐拉斯宣称波兰把立陶宛看成一个“半主权国家”。他称这项条约是“一次战略性失败”[39]。

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群体是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逐渐从战略方面思考，而且有和波兰接触的经验。这些人在1991年对波兰充满怀疑且无人屈服，在1993年之前他们却改变了主意，当时机到来时迈出了通往合作的一步。一个关键的例子是奥德留斯·布特克维丘斯（Audrius Butkevičius）[40]。作为立陶宛民族运动中非暴力抵抗的协调人、立陶宛未被承认前的全国国防局局长、独立的立陶宛国防部长，他从保存立陶宛国家的角度思考许久。他从典型的立陶宛人角度看待1920年发生的事件，他在任职之初把波兰视为威胁。1991年11月，当时仍有3.5万名苏联军人驻扎在立陶宛，布特克维丘斯当时已经称波兰是“对立陶宛安全的最大威胁”。与波兰政策和北约打交道的经验改变了他的想法。到1993年7月为止，在接受了一批波兰赠予的武器后，布特克维丘斯称这一举动是“最能显示诚意的姿态”[41]。当北约问题在1993年8月末公开时，布特克维丘斯建议立陶宛和波兰一起申请成为北约成员国。他同时亲波兰和亲北约的立场获得胜利，当时公众和大多数右翼（反对党）是反波兰但亲北约的，而大多数左翼

（执政党）是亲波兰但反北约的。

一旦这一立场成为共识，所有条约谈判中的困难很快消解了。尤其是左翼领导人、时任总统布拉藻斯卡斯，他在1994年4月签署条约的仪式上回忆起立陶宛版本的战前历史，以此安抚兰茨贝吉斯和右翼人士。历史争论尘埃落定的同时，他们企图微妙地转变历史争论的意义。他们谈到了未来的历史学家的观点，谈到了“二战”后欧洲取得了和解，谈到了拥有悲惨历史的弱小民族间的争吵如何吸引了外部强权的注意。[42]这种修辞显示并影响了新的立陶宛国家的政策转变。独立的立陶宛国家历史上第一次把未来的国家利益置于历史上的民族利益之前。波兰耐心处理立陶宛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及有幸得到的欧洲机构的支持，加快了这一进程。1994年10月，立陶宛议会批准了条约91-19-8，同一天的稍早时候波兰议会以295比0的票数通过了这一条约。

波兰，1992—1993

波兰的一致投票令人瞩目。此前，立陶宛一直追求一种针对波兰的特殊外交政策；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的命运在议会引起了右翼和左翼的兴趣；波兰彻底放弃了针对立陶宛的波兰人的特殊地位的要求；波兰最终确定了苏联创造的东部边界；波兰彻底放弃了对维日诺的一切所有权要求。295比0的投票及之后的长时间站立鼓掌证明了在波兰议会，广泛的、深思熟虑的政治考量胜过爱国主义怀旧情结，证明了波兰人的怀旧情感已被引导为对现代立陶宛的支持。这是由斯库比斯茨维奇实施的《文化》大战略的一部分。

1989年到1993年之间，斯库比斯茨维奇在中间偏右的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四年里，他只丢掉过一次议会选票，那次投票的议题并无实际重要性。如果仅仅说斯库比斯茨维奇经历了三次全国选举，历任四届联合政府，这低估了他极度变化莫测的工作环境。就此而论，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的普遍绝缘性令人瞩目。[43]考虑到在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议会中，关于重新与波兰接触的讨论都曾引起争议，波兰本身在实施双轨政策和欧洲标准政策时没有遇到意味深长的议会反对，这是非凡的成就。波兰人忘记的历史并不比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或白俄罗斯人多，乌克兰依然是波兰邻国中最恐慌的一个，波兰学童依然对《塔杜施先生》的第一句话“立陶宛！我的祖国！”熟记于心。[44]

事实上，东部政策和国内政治的分离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利益和民族记忆之间的不同。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也分裂成了竞争党派，但80年代与东部邻国休戚与共的传统保留了下来。[45]1989年到1993年间所有执政的中右翼后团结工会政党都接受了这一共识，除了基督教-民

族联盟（Christian-National Union），后者在1991年获得了8.7%的选票，直到1993年起开始参与执政。这个政党的议员和部长是唯一质疑斯库比斯茨维奇的东部政策的一群人。基督教-民族联盟的政治家主张在与东部邻国的关系中“互惠互利”：波兰应以国外的波兰少数民族的处境比波兰的少数民族的处境糟糕为由要求让步；波兰应该搁置与乌克兰的外交关系，直到乌克兰为20世纪40年代UPA的行动做出道歉。[46]这些明显违反了欧洲标准政策。[47]

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是平等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存在符合波兰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应该先于历史分歧，波兰在要求对方道歉的同时也应该道歉，这些概念是议会辩论的重点。如果议员的祖先来自波兰丧失的东部领土，且他基于个人经历对这些领土做出特别的要求，这样的情况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总体而言，波兰右翼支持波兰东部邻国的独立。[48]尽管下议院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缓慢，亚采可·库容（当时在波兰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充当了少数民族利益的非正式代表。[49]必要时，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就把东部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当作西部政策的自然产物来对待。当波兰议会施压要求进一步保护海外的波兰少数民族时，斯库比斯茨维奇斥责他们不明白欧洲的标准。因为加入欧洲机构是大多数政治派别共同的愿望，而且这个论据对1992年到1993年间团结工会政府中的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部长都很有效。[50]

斯库比斯茨维奇享有五位总理和两位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莱赫·瓦文萨的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在1990年12月之前一直担任总统，他不仅是一位在1981年实施戒严的共产主义将军，在1947年强制要求乌克兰人重新定居的行动中，他还是参与的士兵之一。在他任内，他在波兰外交政策上的中立态度是他对1989年后波兰民主的突出贡献之一。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莱赫·瓦文萨在雅鲁泽尔斯基之后一直担任总统，直至斯库比斯茨维奇的任期结束。虽然瓦文萨曾提议组织“第二个北约”阻碍了斯库比斯茨维奇的工作，而且他和莫斯科的接触一直不顺利，但是他从没有利用过任何可能削弱后者的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议题。瓦文萨一直致力于让乌克兰议题远离国内选举，在1989年重要的议会选举中，他支持一位乌克兰候选人，作为一名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后者一直在打民族主义牌。在出访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时，瓦文萨总统强调波兰没有领土所有权的要求，并告诉当地的波兰少数民族，要把自己看作他们生活的国家的公民。[51]而在后共产主义欧洲，别国的总统——以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最为突出——利用边界议题和流散议题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虽然斯库比斯茨维奇并不是一位克里斯马式的人物，没有一家主要媒体把他当成攻击的目标，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的东部政策是受到媒体支持的。《选举报》（*Gazeta Wyborcza*）一开始在1989年是团结工会的

选举通讯，之后成为波兰最受欢迎的报纸。它的主编亚当·米奇尼克是耶日·吉德罗耶茨的伙伴，是《文化》计划的学生，也是乌克兰和立陶宛民族运动的朋友。作为波兰媒体的领导人物，他支持妥协与原谅。虽然米奇尼克的方法经常遭到驳斥，他的报纸设定了辩论的界限。除了媒体，罗马天主教会也支持东部政策。比如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号召信徒为领土而战，而波兰教会则追求一种更为和平的事业。诚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罗马天主教教区摧毁了在波兰东南部剩余的乌克兰定居点，而且广受欢迎的神职人员在布道坛和广播中散播反犹和排外的思想。但是，波兰教会最终的领袖——在教会层级中和信徒心中——是波兰教宗卡罗尔·沃伊蒂瓦，即若望·保禄二世。沃伊蒂瓦和米奇尼克一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东部和解。尽管人们并非一直听从，但他始终耐心地传播关于爱和包容的讯息。作为第一位斯拉夫教宗，作为第一位用立陶宛语、白俄罗斯语、俄语和乌克兰语（还有波兰语）布道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做出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但不可能被误解的表率。

1993年年末，在斯库比斯茨维奇任期结束时，东部大战略的精英共识已成为大众的智慧，波兰人区分了已经丧失的民族领土和当下的国家利益。[52]在政策正确的情况下，波兰社会中大部分人怀念立陶宛祖国，担心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们最关心的是波兰本国的安全。这种态度的巩固与现代波兰民族性的多样化所取得的成功是一致的，这种民族性不仅关注波兰力量的延伸，波兰文化的传播或波兰国家的复兴，还关注在现有边界下如何保存波兰这个民族国家。

---

[1] 1993年之前，欧盟（EU）一直被称作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为了避免混淆，我在全书中都使用“欧盟”。直到1992年，波兰才清楚表明要加入北约的愿望，而且总理扬·奥尔谢夫斯基和汉娜·苏霍茨卡一直比斯库比斯茨维奇更自由地讨论这个问题。最早在1991年（如果之前没有的话）波兰加入北约就成为波兰与西方伙伴的对话议题。

[2] Krzysztof Skubiszewski,Polityka zagraniczna i odzyskanie niepodległosci, Warsaw: Interpress, 1997, 205.

[3] Krzysztof Skubiszewski,Polityka zagraniczna i odzyskanie niepodległosci, Warsaw: Interpress, 29。

[4] 关于政策的基本声明，见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 (14), 8 May 1992, 152–159;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274, 282, 299–308。又见波兰大使在1992年到1997年间的观点，见Jan 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 Kultura, 602 (1997), 46; Žilvinas Norkunas, “Steering the Middle Course,”

Lithuania in the World, 4, 2 (1996), 18–23; 以及下任外交部部长Andrzej Olechowski的讲话：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20), 12 May 1994, 27。

[5] “Polska——Ukraina——Bialorus,”Polska w Europie, 12 (1993), 111–112.

[6] 后者在1990年哥本哈根声明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内容中被清晰陈述。Vertrag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Republik Polen über gute Nachbarschaft und freund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17 June 1991, article 20, available at www.auswaertiges-amt.de.

[7] Polityka (Warsaw), 3 February 1996, 40. 又见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126, 206;´Miroslaw Czech, Ukraińcy w Polsce, Warsaw: Zwia ̨zek Ukrain ców w Polsce, 1993, 278。

[8] Hans-Dietrich Genscher,Rebuilding a House Divided,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1998, 525; Helmut Kohl, Ich wollte Deutschlands Einheit, Berlin: Ullstein, 1996, 446– 447. 关于1991年德国-波兰条约中的“欧洲”特征，见Dieter Bingen, Die Polenpolitik der Bonner Republik von Adenauer bis Kohl, Baden-Baden: Nomos, 1998, 292–306。大致可参见Timothy Garton Ash, In Europe’s Na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9] Czech,Ukraińcy w Polsce, 34;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85. But see also Kultura, 542 (1992), 119–122. 关于波兰人对邻国的担心见下文的资料来源。

[10] 波兰的道歉和乌克兰的回应，见Czech,Ukraińcy w Polsce, 130–131。

[11]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2, 140.

[12] Dmytro Pavlychko的评价，见Holos Ukrainy (Kyiv), 13 February 1992, 5; interview with Ivan Drach, Kyiv, 27 May 1997。

[13] 引自Bura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Regional Context: Poland and its Eastern Neighbors,” Europe-Asia Studies, 45, 3 (1993), 410。

[14] “Shosta sesiia Verkhovnoi Rady Ukrainy, 12 sklykannia,”Biuletyn 5, 1992, 36 – 56.

[15] 分别引用自Hanna Suchocka, Dmytro Pavlychko, Hennadii Udovenko：Władysław Gill and Norbert Gill, Stusunki Polski z Ukrain ą,Toruń: Marszalek, 1994, 28; Kultura, 547 (1993), 92–93; Życie Przemyskie, 17 March 1993, 1, 3。又见Holos Ukrainy (Kyiv), 14 January 1993, 2。

[16] 见the resolution “Kontseptsiia Derzhavotvorennia v Ukraini,” from the Rukh congress of 4 December 1992; 以及Literaturna Ukraina, 17 December 1992; Kultura 528 (1991), 80–81。

[17] Holos Ukrainy (Kyiv), 20 May 1992, 1–2; Warsaw Radio Warszawa Network, 18 May 1992, in FBIS-EEU, 19 May 1992, 8; Izvestia, 19 May 1992, 5,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49, 20 (1992), 24–25; Bohdan Osadczuk, “Od Belwederu do Kamieńca Podolskiego,” Kultura, 538 – 539 (1992), 140.

[18] 见以下声明文集中的例子：A Russia That We . . ., Kyiv: UCIPR, 1993。

[19] “To strengthen Regional Secur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Ukrainian Embassy in Warsaw, 22 April 1993; ［Dmytro Pavlychko］, “Oświadczenie,” Kultura, 537 (1992), 90 – 91.又见Ivan Drach, Polityka, Kyiv: Ukraina, 1997, 197; Larrabee, East European Security, 19, 108–109; Antoni Kamiński and Jerzy Kozakiewicz, Stosunki polsko-ukraińskie Warsaw: Instytat Spraw Publicznych, 1997, 30–31;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177。

[20] 关于各方对协定的反应，见Stephen Burant, “Ukraine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in Lubomyr Hajda, ed., Ukraine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2。波兰对乌克兰政策的解释：Kultura, 568 – 569 (1995), 41; Skubiszewski, Poliyka zagraniczna,282。同等距离：Jan de Weydenthal, “Economic Issues Dominate Poland’s Eastern Policy,” RFE/ RL Research Report, 2, 10 (5 March 1993), 24; Warsaw TVP, 13 January 1993, in FBIS-EEU, 14 January 1993, 28; RFE Daily Report, 4 February 1993。

[21] 不久，华沙为了支持乌克兰修改了立场，背弃了与莫斯科的协定。2000年，波兰的能源政策比乌克兰的能源政策都更有利于乌克兰；2001年这种姿态很难维持下去。当历史的这一卷被翻过后，这些议题还是没有重新得到解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会成为欧洲安全的重要方面。对燃气争议的担心：RFE Daily Report, 3 April 1992; 关于乌克兰的能源问题和外交政策，见Arkady Torits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Foreign Policy in Post-Soviet Successor Stat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1999. “Anti-Ukrainian act”: Stephen Burant,“Poland’s Eastern Policy, 1990–1995,”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43, 2 (1996), 52. Major Lysenko: Burant, “Ukraine and East Central Europe,”55。

[22] 关于克劳先卡：Gazeta Wyborcza, 28 July 1997, 16; Jacek Gorzkowski, “Litwa,” in Marek Beylin, ed., EuropaŚrodkowo-Wschodnia 1992, Warsaw: ISP,

1993, 252; Kultura, 535 (1992), 102–106; 关于知识分子们，见Stephen Burant, “Belarus and the Belarusian Irredenta in Lithuania,” Nationalities Papers, 25, 4 (1995), 646 – 647。

[23] 关于舒什克维奇：Siergiej Owsiannik and Jelena Striełkowa, Władza i społeczeństwo, Warsaw: Presspublica, 1998, 64 – 96; 关于立陶宛：Gorzkowski, “Litwa,”253。

[24] Tadeusz Gawin,Ojcowizna, Hrodna: Fundacja Pomocy Szkołom Polskim, 1993, 127– 128; Stanisław Bieleń, “Kierunki polityki wschodniej III Rzeczypospolitej,” in Patrząc na wschód, Warsaw: Centrum Badań Wschodnich, 1997, 35; “Polska——Ukraina——Białorus,”140; Thomas Szayna,“Ethnic Poles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Rand Report, August 1993, 42.

[25] 通过与当代白俄罗斯边界相匹配，重新划定主教教区的边界；以及通过挑选出对白俄罗斯问题更敏锐的大主教的方式。

[26] 早期有一些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讨论，比如：Narodnaia gazeta (Minsk), 4 January 1992, 1; 12 February 1992, 1。对1992年波兰国内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估计引自Piotr Eberhardt, Między Rosją i Niemcami, Warsaw: PWN, 1996, 131。在白俄罗斯的波兰少数民族的人数计算是根据1989年苏联的人口普查和1999年白俄罗斯的人口普查结果。

[27] Kathleen Mihailisko, “Security Issues in Ukraine and Belarus,” in Regina Owen Carp, 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9–230; Burant, “Belarusian Irredenta,”645 – 648.

[28] Warsaw PAP, 24 April 1992, in FBIS-EEU, 28 April 1992, 15.

[29] Bura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407;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2, 147.

[30] 引自Tadeusz Kosobudzki, “Stracone szansy,”Kultura, 560 (1994), 20; 又见Warsaw PAP, 19 November 1992, in FBIS-EEU, 19 November 1992, 16; RFE Daily Report, 23 November 1992。

[31] Interview with Czesław Okińczyc, Vilnius, 7 April 1994; 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50.

[32] Gazeta Wyborcza, 14–15 September 1991, 1; 16 September, 17; 兰茨贝吉斯的话引自24 September 1991, 6。在兰茨贝吉斯转机途径华沙时，这两人曾非正式会面。

[33] Tass World Service, 12 January 1992,SWB/SU, 14 January 1992; PAP, 14 January 1992, SWB/SU, 16 January 1992.

[34] Warsaw PAP, 15 January 1992, in FBIS-EEU, 22 January 1992, 20.

[35] Timothy Snyder, “National Myth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and and Lithuania, 1989–1994,”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9, 2 (1995) 326–331; 原文引自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52。

[36] Skubiszewski,Polityka zagraniczna, 191–193.

[37]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1946— ）是俄罗斯政治家，于1990年创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以极端民族主义主张闻名。在1993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自由民主党取得23%的得票率，日里诺夫斯基欲冲击总统职位，对时任总统叶利钦造成不小的冲击。

[38] Vilnius Radio, 3 September 1993, in FBIS-SOV, 8 September 1993, 105; Rzeczpospoli ta, 16–17 October 1993, 9; Tallinn BNS, 21 October 1993, in FBIS-SOV, 22, October 1993, 88; Dokumentation Ostmitteleuropa, 20, 1–2 (April 1994), 116–119.

[39] Gazeta Wyborcza, 27 April 1994, 1. 关于他对波兰文化的历史观点，见Barbara Christophe, Staat versus Identität, Cologne: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7, 234–236。

[40] 奥德留斯·布特克维丘斯（1960— ）是立陶宛政治家，他是立陶宛民主改革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立陶宛政治犯和被驱逐者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

[41] 原文引自Warsaw Słowo Powszechne, FBIS-SOV, 27 November 1991, 36; RFE Daily Report, 27 July 1993。又见Audrius Butkevicius, “The Baltic Region,” NATO Review, 41, 1 (1993), 7–11。1994年，当加入北约成为立陶宛国家政策后，他似乎改变了关于北约扩张的看法。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对立陶宛国家利益的观点变得不明晰了，当时他被指控在担任议员时收受贿赂，而他指控兰茨贝吉斯为克格勃工作。在这里提到具体某人并非为了制造英雄，而是为了描述国内政治中的战略决议。

[42] Snyder, “National Myths,”334. 在斯库比斯茨维奇任期结束后，与立陶宛达成共识的特殊任务是瓦文萨的副手Andrzej Zakrzewski以及波兰首席代表Iwo Byczewski促成的。今天我们仍可把这视为1989—1993年的成就之一。

[43] Louisa Vint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1989–1993,” in Ilya Prizel and Andrew Michta, eds., Polish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ed,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24;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3–1994, 18.

[44] 公众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看法：Grzegorz Babi ński, Pogranicze polsko-ukraiń- skie, Cracow: Nomos, 1997, 166–168; Andrzej Zie ̧ba, “Ukraińcy w oczach Polaków,” in Teresa Walas, ed., Narody i stereotypy, Cracow: Międzynarodowe Centrum Kultury, 1995, 97–98; Antonina Kłoskowska, Kultury narodowe u korzeni, Warsaw: PWN, 1996, 196; Warsaw PAP, 14 February 1992, in FBIS-EEU, 18 February 1992, 31; Życie Warszawy, 1 August 1992, 23。又见Marek Skórka,“Wspólne s ąsiedztwo czy nie chciani intruzi?” Więź, 473 (1998), 70 – 81。

[45] 关于这一传统如何被保留下来的一个信号是当时右翼激进工会“战斗的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 Walcz ąca）进入国际政治舞台时依照一份亲乌克兰的指南，其中的行动包括为维斯瓦河行动道歉。Stosunki Polsko Ukraińskie 1917–1947, Warsaw: Perturbancii, 1990.

[46] Jacek Raciborski,Polskie wybory, Warsaw: Scholar, 1997, 42; Kultura, 520 – 521 (1991), 145; Gazeta Wyborcza, 9 September 1991, 1;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2, 20;Prizel, “Warsaw’s Ostpolitik,” in Prizel and Michta, Polish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ed, 112; Rzeczpospolita, 15 January 1994, 22; Gazeta Wyborcza, 11 January 1994, 3.

[47] 另一个大的例外是波兰上议院对一个名为波兰人共同体（Polish Community）的组织的资助，该组织反对斯库比斯茨维奇的政策，其反对方式是物质援助声称代表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的组织，无论该组织有着怎样的政治目的。这个群体中的波兰活动家认为波兰应该把波兰少数民族的利益放在与东部民族国家的友好关系之上。Interview with Agnieszka Panecka, Warsaw, 27 February 1998; Andrzej Stelmachowski, “O debacie,” Wspólnota Polska, 58 (April 1997), 39. 又见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 and Natalla Piatrowicz, “Katolicyzm na Białorusi,” Więź, 467 (1997), 83.

[48] 这个论断基于1989—1994年的议会记录。关于右翼，见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 (51), 14 February 1991, 15–54; (14), 8 May 1992, 152–199; (31), 13 October 1994, 108–114。

[49] 之后，因为他扮演的这个角色，乌克兰授予他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勋章（Order of Prince Iaroslav the Wise）。Polityka i kul’tura (Kyiv), 10–16 September 1999, 38–39.

[50] 正如他对上议院所说的：“让我们回想起许多政治家已经遗忘的、目前还未记起的事情：一个和东部邻国没有建立起规范的、良好的和友善的国家关系的波兰，算不上西方世界的伙伴。”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247.

[51] Lech Wałęsa, “List do wyborców,”27 April 1989; Literaturna Ukraina (Kyiv), 3 June 1993, 1; 27 May 1993, 2; Lithuania, 11–12 (1994), 140–141; Moscow Itar-Tass, 29 June 1993, in FBIS SOV, 30 June 1993, 64; Kultura, 550–551 (1993), 106–113.

[52] “Security for Europe Project Final Report,”15; 以及K łoskowska, Kultury narodowe u korzeni, 386。

第14章

尾声：回到欧洲

除了波兰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与德国的和解以及国内改革，它的东部政策也为融入欧洲和大西洋组织铺平了道路。北约接纳新成员的第一个明确信号是1994年1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出访布拉格。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秋天开始为北约扩张奔走造势。1994年12月在德国埃森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盟公开表示考虑向东扩张。这两个例子都表明，波兰会是第一批获准加入的国家之一。西方重新定义了波兰的国际地位，这也改变了它在东方的形象。1989年到1991年间，当波兰向东部邻国提议和解时，所有国家都很有兴趣。1992年到1993年间，当波兰提出欧洲标准政策时，一些国家更有兴趣。在1994年后，当波兰不得不向它的邻国推出欧洲本身，这种分裂扩大了。在波兰的东部邻国中，那些心怀欧洲梦想、或多或少已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国家（立陶宛和乌克兰）表现得很积极，而那些还没有符合这个标准的国家（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则表现消极。这些不同的定位是由于这四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情况不同，而波兰和其他外部因素所能施加的影响有所减少。[1]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欧洲历史上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当时波兰外交官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解放和发展模式也适用于他们的邻国。当议题的中心是国家主权时，波兰确实提供了类似的榜样。而当议题成为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成功与否时，波兰的类推作用就削弱了。[2]1994年到1997年间，波兰的后共产主义政府没能成功地应对这些改变，这也限制了1997年后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团结工会政府的影响力。[3]1994年后，波兰的东部政策成了西部政策的附加物。这种路径存在的问题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最为明显。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

1993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俄罗斯在波兰的形象。叶利钦总统在8月宽恕了波兰成为北约候选国一事，但他在9月就改变了想法。10月，他的军队向俄罗斯杜马发起攻击。这引起了波兰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者的注意，他们刚刚赢得了一场民主选举，即将组建议会多数党。12月，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民族主义者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赢得超过任何党派的票数。日里诺夫斯基以反波兰言论闻名（例如“北约的娼妓”，有着刺激人心的作用，这可能是他自创的说法）。这一事件引起了波兰全社会的关注。1994年1月，70%受调查的波兰人相信俄罗斯对波兰已构成军事威胁，这是1989年以来数据最高的一次，而且（第一次）远远高出针对乌

克兰的同样数据。[4]

叶利钦的俄罗斯从来没有针对波兰的具体政策，而是在北约宣传战的修辞分类下来对待波兰。莫斯科基本上一直无视华沙，直到事情变得明朗化：即使俄罗斯反对，北约也会扩张。1998年4月30日，美国参议院表示赞成北约扩张并提供建议后，俄罗斯的态度才发生了改变。当时，俄罗斯-波兰关系一度恢复了生机。波兰外交部部长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ław Geremek，1932—2008）和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西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在1998年的莫斯科受到了隆重的欢迎。[5]2000年，俄罗斯外交部部长首次出访华沙。叶利钦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2年到波兰旅行。在俄罗斯，反对北约扩张成了精英关注的问题，而非民众的焦点，所以对俄罗斯当局来说这样的一百八十度态度转变是毫不费力的。北约扩张甚至没有改变俄罗斯民众对美国称赞的态度。[6]俄罗斯选民没有对波兰或它加入北约采取敌对态度。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人认为波兰是东欧最稳定的国家，而且令人震惊的是56%的俄罗斯人认为波兰应该受邀调停俄罗斯联邦中的种族冲突。[7]波兰的东部政策和在国内取得的成功，改变了俄罗斯人的观点。

和莫斯科官方一样，明斯克官方也排斥波兰在1994年后的提议。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这位做出妥协的白俄罗斯爱国者——受到了强权的逼迫。甚至在他担任议会议长期间，大多数政策也是共产主义者、时任总理克比切制定的，当时全国主要的报纸名为“苏维埃白俄罗斯亚”，而且地方的克格勃不仅像克格勃那样行事，人们依然称呼它为克格勃。[8]舒什克维奇和克比切，以及民族活动家泽农·帕兹亚克在1994年7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被年轻而缺少经验的反腐活动家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击败。这是民主的杰作：卢卡申科不是来自共产主义集团的候选人，他决定性地击败了克比切、舒什克维奇和帕兹亚克，这说明白俄罗斯人想要的是新人。

卢卡申科总统摧毁了民主机制以及年轻的白俄罗斯国家的民族象征。1995年4月，他把民族主义代表从议会中驱逐出去，他怂恿剩下的议员批准和俄罗斯的条约，并邀请俄罗斯来保护本国与波兰的边界。1995年5月，他赢得了全民公投，使俄语成为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并且把白俄罗斯民族象征从国徽中移去。他的保镖把总统府邸中的白俄罗斯颜色全部除去了，把国旗撕成碎片，并将其当作纪念品一样分发出去。1996年11月，卢卡申科又在一次全民公投中获胜，因此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并使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失去权力。这次举行公投的情形很可笑，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发起联合呼吁。然而，公投结果反映，大多数白俄罗斯人更渴望有一个新苏联秩序。卢卡申科俄罗斯化的国内政策没有让他成为一个俄罗斯人，但给有抱负的白俄罗斯爱国者造成了巨大的难题。当他被选上总统时，80%的一年级学生学习的是白俄罗斯语；3年后，这个数据下滑到

7%。[9]10年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只剩下一所白俄罗斯语学校。

这位总统粉饰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禁止使用后苏联时期印刷的课本，撕毁白俄罗斯公司与西方投资者的合同，而且“唾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会带领我的人民走向那个文明世界”，因为“白俄罗斯的价值观和西方的价值观没有任何共同点”。他称白俄罗斯爱国者是“法西斯主义者”，那种人“会闯入你家，强奸你的妻子和女儿”。他把反对者关进监狱，之后使他们一个个消失。[10]他作为一个“东正教无神论者”诉诸宗教主题，反对外来的“西方影响”——如罗马天主教，这是200万即五分之一白俄罗斯人的信仰。卢卡申科把波兰描绘成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威胁，一个北约的前锋。他宣称团结工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策划一起针对明斯克的政变。他承诺不会让西部白俄罗斯——那里集中了波兰少数民族——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并宣称由于波兰人的入侵，白俄罗斯与俄罗斯有必要组成斯拉夫联盟。[11]卢卡申科的外交政策是亲俄罗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希望从与俄罗斯的结盟的想法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

相比国家层面，波兰的政策与社会层面建立了更多的密切关系。陷入困境的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持反波兰的立场，在10年后转而支持波兰。波兰的榜样教会反对派从拯救民族国家的角度去思考，而非从复兴历史共同体的角度去思考。在1997年团结工会重新执政后，华沙和白俄罗斯反对派往来密切，试图以此避免白俄罗斯官方被欧洲孤立的局面。波兰回归了1989—1991年间的双轨政策，但这次的对象不是整个苏联，而是白俄罗斯。其中也包括了不显眼的第三轨——非正式联系，参与的有资深团结工会活动家和几十个新的波兰非政府组织。上一次白俄罗斯活动家对此曾表示怀疑，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提议受到了欢迎。[12]至于他们在巩固白俄罗斯民族性上有没有作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波兰与白俄罗斯

虽然大多数白俄罗斯人不接受民族理念的现代形式，但这种形式在未来取得政治上的成功是必然可能的。就算俄语是权威和文化的语言，白俄罗斯人也不是俄罗斯人。根据1989年的苏联人口普查，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有78%的成年人自称是白俄罗斯人，13%的成年人自称是俄罗斯人，4%的成年人自称是波兰人。1999年卢卡申科政权发起的人口普查显示，自称是白俄罗斯人的人口比例上升到81%，而自称是俄罗斯人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1%。自称是波兰人的比例保持不变。[13]这不是因为白俄罗斯人的自我认同，而是他们认为“书面语言-民间语言”与“语言-民族国家”的现代结合变得异质化了。我们已经注意到白俄罗斯民族政治中的一些限制。自19世纪以来，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自视为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中心、语言和传

统的继承者。正如我们所知，立陶宛和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还有沙俄统治者与苏维埃国家把大公国的传统改变得面目全非了。也许在今天我们称为白俄罗斯的土地上，大公国的传统被改变得最少。但对传统的忠实性确实是个问题。

民族主义自称是关于连续性的。事实上，民族主义必须对近代早期的政治传统做出足够激进的重构，以使大众理解并产生加入这个被重新定义的政治社群的愿望。民族主义者坚称，原有的种族群体变成了现代民族，但是白俄罗斯的例子证明政治行动必须重写政治传统，因为“种族群体”和“现代民族”的概念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相信有“种族群体”，我们必须接受白俄罗斯人是立陶宛大公国的“主要种族群体”这个论断。1795年，立陶宛大公国的大部分人口所说的语言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白俄罗斯方言。1895年，沙俄境内的五个白俄罗斯省中的大部分人口所说的也是这种语言，1995年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也是如此。然而，这个“群体”从来不是现代民族政治的媒介。现代的立陶宛和波兰民族主义者向我们展示，在他们改变了大公国的遗产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改变范围内获得成功。他们认为“立陶宛”这个名字徒然无效，这无疑证明了现代民族主义混合了敬畏和遗忘的特质。20世纪90年代末，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重新向民族国家定位，对接续了几代的近代早期立陶宛传统而言，这预示着不良的前景，但对近代早期立陶宛领土上出现的第三次现代民族主义来说，这预示了光明的前景。在这里，立陶宛和波兰的现代民族主义都获得了成功，白俄罗斯的现代民族主义也终将成功。

政治行动需要正确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20世纪90年代的白俄罗斯活动家曾不合潮流地说过，白俄罗斯民族“失去”了一些有利条件，比如大公国在16世纪的独立，18世纪的斯拉夫官方语言，19世纪的东仪天主教教会和密茨凯维奇的诗歌，20世纪的维尔尼亚以及“立陶宛”这个名字。如果我们舍弃目的论，留下偶然性——舍弃“糟糕”这个词，留下“运气”这个词——我们会发现那些不受民族主义活动家和当地人控制的事件所具有的重要性。在巩固现代白俄罗斯民族主义下的理念、运动或国家不受支持的环境中，这些“损失”就是那些关键节点。然而，最矛盾的“损失”是民族主义活动家会提起的：白俄罗斯没有享受到分裂的好处。

民族历史将分裂呈现为对民族主体的肢解。事实上，因国家边界而产生争论的民族主义活动家享有某些优势。分裂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即一个帝国可以用一种民族运动对抗另一种民族运动，但意料之外的结果就是民族运动因此蓬勃发展。分裂让来自不同帝国、相同民族的活动家们共享一种理念。一个帝国内的某一民族运动可能复制另一种民族运动的策略，然后这些策略能够跨越边界，成为各民族的共同策略。正如我们所知，19世纪的帝国在划分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时，考虑到了移民间的交流、眼界的一致

性以及书籍走私的因素。在19世纪，现在的白俄罗斯属于沙皇俄国。20世纪，白俄罗斯只分裂了20年：在两次世界大战间被波兰和苏联分裂。即便斯大林消灭了白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波兰关闭了所有的白俄罗斯语学校，这次分裂仍然是民族主义取得成就的时刻。

现代民族性包含了书面语言和方言的结合，在东欧这意味着对农民的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这种结合的场所就是那座城市，这是一个天然的、不断壮大的民族首都。1920年，波兰在与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战争中获胜，白俄罗斯人渴望的首都维尔尼亚成了波兰城市维日诺；1945年，斯大林把这座城市授予苏维埃立陶宛，它成了立陶宛城市维尔纽斯。白俄罗斯人最终的首都是明斯克，从历史上来说，这座城市在民族事业方面没有维尔尼亚重要，1921年波兰拒绝将其纳入领土，因此明斯克成了苏联的领土。在苏联的统治下，明斯克成了一座规模不定的白俄罗斯城市，在“二战”后这里成为俄罗斯化的发源地。白俄罗斯活动家强烈地怀念中等规模的城市，它们是民族复兴——尚未准备好在“被摧毁的”首都进行——的试验场。现在民族性也预设了一个民族的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独特的高雅文化和一个独特的名字。本书第1部分已经证明，近代早期的政治术语“立陶宛”成了一个现代种族术语，而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成了现代波兰民族主义和立陶宛民族主义（程度更轻一些）的吟游诗人。20世纪90年代的卢卡申科政权乐于把密茨凯维奇作为一个含糊的白俄罗斯人物来纪念，就像苏联政权曾说他是普希金的和劳苦大众的朋友。明斯克（错误地）把密茨凯维奇呈现为一个现代白俄罗斯人，就像今天华沙或维尔纽斯那样（错误地）把密茨凯维奇描绘成现代波兰人或立陶宛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已经到来了。

制度环境创造出的精英们，巧妙地操纵历史，以此建立现代民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阻碍白俄罗斯民族复兴的最严重的障碍：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白俄罗斯受到破坏的程度。到1945年为止，1941年曾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的领土上生活的居民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德国人摧毁了明斯克，摧毁了当地的大学和科学院。明斯克是在俄罗斯化时期被重建起来的，战后其令人惊讶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亲俄首都。只有一个朝着相反方向的显著动作：1945年，白俄罗斯兼并了前波兰的领土。[14]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向西部的拓展，包围了几百万有着不同政治经历的人口，以及成千上万名和传统制度有着独特联系的人。例如，东仪天主教教会是在1596年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中建立起来的。尽管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不存在东仪天主教教会，但是它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已经被再次重建起来了。1945年后，上万名来自白俄罗斯西部的新东仪天主教教会信徒成为苏联公民。就像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许多白俄罗斯活动家具有罗马天主教教徒的背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白俄罗斯活动家与这些前波兰领土有所关联。白俄罗斯民

族阵线的领导人帕兹亚克，他的祖父是两次大战间在波兰城市维日诺积极活动的白俄罗斯政治家。帕兹亚克的祖父也是死于库罗帕提和类似地点的数万名白俄罗斯人之一。帕兹亚克的白俄罗斯民族主义理念与一种精英传统是一致的，但对在苏联学校受教育的白俄罗斯人来说，这种理念却是异质的。[15]

在这里，比较苏维埃白俄罗斯和苏维埃立陶宛是有启发意义的。战后苏联的政策允许一个种族意义上的立陶宛民族存在，但迫使其竞争对手——白俄罗斯人的概念——趋向衰亡。就在战后，一名两次大战间的立陶宛共产主义者掌握了苏维埃立陶宛的支配权，一所立陶宛语大学在维尔纽斯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共产党被俄罗斯化，战争苦难成为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的标准历史基础。到1970年为止，当立陶宛历史的现代叙述已经完全制度化了，民族历史几乎从白俄罗斯课程中消失了。到1980年为止，维尔纽斯的大多数学校都在教授立陶宛语，而明斯克没有一所学校在教授白俄罗斯语。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戈尔巴乔夫时代，伴随着一些基本事实的发现——被NKVD杀害的白俄罗斯人的死亡废墟被挖掘出来——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开始了。立陶宛历史的基本事实在很久之前就被整个立陶宛社会理解了。在那时，白俄罗斯继承自立陶宛大公国的叙述，只是很少部分受过教育的精英的认知领域。而立陶宛的叙述版本为大多数立陶宛人所知。[16]

如果现代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到来了，它很可能会包含关于立陶宛大公国的虚构概念。这个古老的理念必须被重建，以便解释大部分白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以及关于苏联历史的记忆。类似的综合——就像密茨凯维奇被塑造成了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象征着白俄罗斯民族理念的现代流变。一些长期的趋势也支持这种可能性。偶然的历史事实能够阻碍民族运动，反之它们也能促成民族运动。1922年，苏维埃白俄罗斯的领土只有窄窄的一小片，在1923年、1924年、1926年和1939年不断扩大。结果，独立的白俄罗斯拥有充沛的、连贯的边界线。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独立的白俄罗斯拥有主权国家的大部分象征。在许多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白俄罗斯比乌克兰和俄罗斯运行得更好。尽管卢卡申科是一个奇怪的独裁者，他厌恶白俄罗斯爱国主义，承诺要把他的国家与俄罗斯合并起来，事实上在他的任期内反而保存了白俄罗斯国家主权。第一次，独立的白俄罗斯的年轻人成年了，旅行者们手持白俄罗斯护照。此一次，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设想为了一个崛起的民族赢得一个国家。独立的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都支持白俄罗斯的国家地位，这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俄罗斯没有断然介入以及白俄罗斯民族的出现，这两个因素也不能排除在外。

立陶宛、波兰与欧洲

在20世纪90年代，立陶宛人逐渐把波兰视为现代国家，而不是在民族重生的时代那个拥有致命吸引力的文明。这是波兰政治成功的代价：波兰文化——近代早期在东欧的许多地区被视为极高的成就，整个19世纪东欧的独特性象征——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这是现代波兰民族主义偶然内生的困境。波兰文明的历史吸引力是它的精英特质；在使波兰性成为大众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者破坏了它的历史吸引力。波兰文化可以在横向层面上具有吸引力——对邻国的精英而言，也可以在垂直层面上具有新引力——对农民和工人而言，但是它不能同时具备两种维度的吸引力。通过避免20世纪90年代的几次危机，波兰东部政策使得这种长期趋势固定下来。

1994年立陶宛和波兰批准了两国条约后，两国政治关系迅速改善。一旦要求波兰为1920年占领维尔纽斯道歉的议题不再存在于议程中，很明显波兰和立陶宛便没有其他战略性分歧了。立陶宛的右翼和左翼把波兰视为通往欧洲的道路，所有的立陶宛政府官员和总统也持此观点。立陶宛和波兰的议会、政府和总统使共同委员会机制化。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事件从制度上被解决了，波兰方面一直声称欧洲标准和波兰的价值观可以帮助立陶宛融入欧洲。通过这些方式，立陶宛和波兰接近了欧盟有关优先解决争端的特质，两国都已申请加入欧盟。波兰而不是立陶宛跻身第一波协商国家行列。波兰（而不是立陶宛）将成为北约扩张纳入的第一批国家，这个趋势在1995年到1997年间变得更加明显，波兰的“欧洲”影响变得更强了。一份1998年的报纸头条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个议题：《关于北约和签证办理，妻子们应该做些什么？》[17]答案是：立陶宛语和波兰语有不同的阴性词后缀；在立陶宛的波兰人希望波兰语后缀能出现在诸如护照等官方文件上，但立陶宛政府拒绝了；之后由于与北约和欧盟的关系更紧密，波兰运用了它的“欧洲”影响力。

波兰的要求处于1994年条约中列举的文化权利范围内。波兰官员强调他们把在立陶宛的波兰人视为立陶宛公民。因为对立陶宛来说，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资格太有价值了，而且波兰在国际论坛中对立陶宛获得成员国资格的支持如此直接，波兰人对少数民族的有限支持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怨恨。[18]立陶宛总统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早在1996年就表示，现在立陶宛与波兰的关系处于现代国家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立陶宛右翼重新执政，他们对待波兰的态度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非常不同。正是那位曾主导要求波兰道歉的政策的外交部部长，此时称波兰是立陶宛“最重要的战略伙伴”。[19]在这10年结束前，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亲自表示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的卢布林联合是一次积极的事件，是“立陶宛-波兰实用主义”的例证。[20]正如我们所知，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整个20世纪90年代，立陶宛民族主义活动家一直把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描绘为立陶宛民族的墓碑。当时最重要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做出了这番新的解释，这暗示了一种更

加稳固的立陶宛认同。从历史方面来看，波兰不再是一个怀有敌意的民族；从国家利益方面来看，波兰是一个邻国。经过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的任务和传统精英文化的颠覆，这些都让位给现代政治家的任务和对现有国家制度的保护。

乌克兰、波兰和欧洲

波兰与乌克兰的和解令人惊叹。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在乌克兰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波兰的意见。当然，大多数波兰人从和西乌克兰的接触中产生了对乌克兰的强硬观点，而中部、东部和南部的乌克兰人对波兰则从没有类似的观点。乌克兰的面积和法国一样大，有5000万居民，在整个20世纪迷失于苦难的历史中。虽然在本书第8章到第10章讨论过的可怕的民族冲突，对西乌克兰人来说非常重要，但对大约80%的乌克兰人来说，他们对此没有印象。毕竟，比起1933年的大饥荒和“二战”中可怕的平民和军队伤亡，20世纪40年代的种族清洗属于次要事件。然而，波兰在基辅精英中的正面形象还是一个新的发展，我们很容易将此追溯到波兰政策的源头上。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西乌克兰爱国者们的态度逆转，他们的人数太少以至于不能持续地决定政策走向，但他们的人数又足够妨碍与其直接相关的政策。乌克兰右翼甚至极右翼中的大多数人，很快确信波兰是帮助乌克兰独立的盟友。[21]

对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及其爱国的顾问们来说，1993年和1994年令人失望，很明显波兰不会成为字面意义上的盟友，而且后共产主义的波兰政府（1993—1997）在与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保持一致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1994年，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取代了克拉夫丘克，人们普遍期待乌克兰将重新制定针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结果，库奇马在第一个任期内（1994—1997）继续推行与西方机构一体化的外交政策。在乌克兰，融入欧盟的政策非常受欢迎，但融入北约的政策非常不得人心；库奇马政权一开始高调地追求第一个目标，然后低调地追求第二个目标。[22]碰巧的是，从克拉夫丘克到库奇马的权力更迭伴随着美国针对乌克兰政策的重要转变。1994年1月，美国-乌克兰-俄罗斯的三方声明为乌克兰将所有核武器转让给俄罗斯奠定基础，由此移除了美国支持乌克兰的主要障碍。支持乌克兰国家地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1994年1月，北约宣布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该计划旨在安抚申请成为北约成员的东欧国家以及莫斯科的反对者，但该计划并没有减缓对北约扩张的争论。然而，在1994年，由于波兰的东部政策已在实施中，该计划为波兰赢得了西方的赞同。波兰向乌克兰提供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的军事合作，这是乌克兰的邻国中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计划是建立乌克兰-波兰维和部队，这个计划在1995年提

出，在1997年部队已成规模并于2000年由北约派遣到科索沃。乌克兰总统库奇马针对波兰的第一项重要提议是在1996年6月支持波兰加入北约。在华沙，他宣称“我们并非将北约看作防御性联盟，而是将其看作一套联合民主国家的共同安全机制”，他强调在“北约扩张中没有看到任何对乌克兰的威胁”。[23]之后，波兰支持北约与乌克兰签署特别宪章，沿着这一思路，俄罗斯也接受了同样的宪章。1997年7月9日，北约-乌克兰宪章正式签署。[24]第二天，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波兰即将成为北约成员国祝贺华沙街头的欢呼人群。

自1995年起，波兰总统克瓦西涅夫斯基和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共同主导了乌克兰与波兰的正式历史和解。他们的重大成就是1997年5月在基辅签署的和解宣言。宣言列举了一方对另一方曾犯下的错误，包括维斯瓦河行动和沃里尼亚恐怖事件，表达了相互原谅的需要。[25]克瓦西涅夫斯基和库奇马定期在重要的历史遗址会面，象征着他们试图解开纠缠不清的历史谜团。他们在基辅的一处公墓敬献花环，1918年至1919年中与西乌克兰共和国战斗的波兰士兵被埋葬在那里；他们为一座纪念碑揭幕，以纪念在20世纪40年代被囚禁在亚沃日诺集中营的乌克兰人；他们在哈尔科夫的宗教仪式上掷下奠基石，在那里安息着斯大林下令谋杀的波兰士兵；他们悼念乌克兰民族共和国的乌克兰士兵，后者在1919—1920年抵御布尔什维克俄国、保卫乌克兰和波兰独立的战争中死去。

基辅的批评者坚持认为这样的和解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波兰和乌克兰的国家关系一直很好。这种观点忽视了西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存在的争议，这种争议可能妨碍政治和解。华沙的批评者认为个人不能裁决历史和解，总统会面对改变公众观点成效甚微。[26]当然，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20世纪90年代初，解决历史问题更直接的尝试曾以惨败告终。如果乌克兰或波兰选择以立陶宛强调20年代历史的方式，来强调40年代的历史，那么两国间的政治谅解会推迟好多年，而政治谅解当时对两国的主权和安全都很重要。1991年和1992年，关于40年代互相施行种族清洗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很快被解决，然而在历史议题达成一致之前，两国关系依然能确立下来。正是因为维斯瓦河行动和沃里尼亚恐怖事件在90年代初期的两国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90年代末期两位总统才能在坚实的法律契约和政治协议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在90年代的前五年中，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已经同意为了国家安全的共同利益，“把历史留给历史学家”。在后五年中，在历史和解、边界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都解决了之后，关于历史的讨论证明了波兰-乌克兰邦交友好的程度有多深。

自1996年起，总统会面异乎寻常的频率、严肃性和礼仪性向国内政治参与者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如果别有用心地利用历史，他们将一无所获。[27]即使是分量最轻的姿态也有着深厚的力量。当克瓦西涅夫斯基提到他

和库奇马会面太频繁了，以至于他的妻子都有些嫉妒了，他实际上在提醒波兰人，他妻子的家人在沃里尼亚遭遇UPA清洗，而这种和解的筹划意味着铭记这段历史。当他提到他的乌克兰政策受到了岳父的认可，他是要让一代人的苦难记忆服务于未来安全。[28]（同样，克瓦西涅夫斯基在哈尔科夫喝醉的事实削弱了他试图传达一种和解的历史观点的努力。）当他的历史和解的提议开始推行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1995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波兰人对德国人的同情从1993年的23%上升为1996年的43%，对乌克兰人的同情则从12%上升为16%。[29]正如亚采可·库容在1997年描述精英观念时所说："如果你让一位普通的波兰知识分子和一位普通的德国知识分子坐在一张桌子上，要求他们就波兰-德国历史达成一致，他们能做到这点。当然他们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达成一致的立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你让一位普通的波兰知识分子和一位普通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坐在一起，他们会告诉对方的不同历史版本是矛盾的、不可调和的。"[30]确实是矛盾的，但真的不可调和吗？到1999年为止，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字面意义上，历史和解都是可能的。

主要的分歧还是关于20世纪40年代的种族清洗。正如我们所知，这些事件对促进现代民族性在波兰和西乌克兰的传播有重要作用。毕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实施的种族清洗促使波兰救国军在1943年成立了沃里尼亚分队。1947年，波兰的共产主义政权迫使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定居别处。我们已经讨论过沃里尼亚的波兰人、波兰的乌克兰人，他们是最显然由于战争和种族清洗而被民族主义化的一群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波兰，沃里尼亚救国军分队的退伍老兵组成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是最关心保留1943年沃里尼亚大屠杀记忆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而波兰的乌克兰人联合会（Union of Ukrainians）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让在1947年失去家园的乌克兰人获得赔偿。这些是（共同的）清洗受害者和清洗者（个例）中的特殊利益群体。如果说这些群体对历史、正义的要求和政治进程持有相反的观点，这是一种礼貌的轻描淡写。[31]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两类群体不可能让那些安于波兰东部政策的陈词滥调的历史学家聚集起来，即所谓"把历史留给历史学家"。事实上，波兰的救国军国际联合会（World Union of Home Army Soldiers）和乌克兰人联合会正是这么做的，他们找到那些历史学家，让他们写下种族互相清洗的历史——这段最难写的历史。那些被招募的历史学家来自那些不以温和路线著称的机构：位于华沙的波兰军队历史协会（1945—1947年，波兰军队实施了种族清洗），以及位于卢茨克的沃里尼亚州立大学（那里是1943年乌克兰叛乱分子实施清洗的中心地带）。双方对抗的地点是学术会议上。这两个非政府组织和这两个学识渊博的国家机构组织了一系列关于乌克兰-波兰关系的研讨会。研讨会的安排中有比较环节：每个讨论议题都有一名波兰学者和一名乌克兰学者陈述一系列论文，他们的论文章节并列发表在一

起。在每个研讨阶段最后，双方的所有历史学家会签署一份双语联合声明，列举意见一致与意见分歧之处。[32]尽管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合作安排的议程也让所有人感到丧气，但是最后的产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优于任何一方自行研究、发表的成果。乌克兰历史学家逐渐以不同的角度看待1943—1944年的历史，波兰历史学家看待1945—1947年的历史也是如此。

欧洲的民族

历史是一项需要人类付出努力的事业，但人们常常出于民族动机而书写历史。为了让历史成为学术研究，历史必须被从这种局限中解放出来。波兰-乌克兰历史的合作研究意味着密涅瓦的猫头鹰即将起飞，至少在欧洲的某一部分，某个历史时代就要过去了。波兰人和其他人相信在1989年后他们在继续前进，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想象欧洲的未来，并就欧洲对波兰的东部邻国在21世纪意味着什么做出一些审慎的预测，可能是有益的。

波兰在1989年到1991年间推行的东部政策与西欧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出于国家利益的理由，这是一个新生的主权民族国家的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希望推行的政策，以此在苏联领土上促进民族国家的构建。波兰在1992年到1993年间的东部政策仅仅间接地依靠西欧。波兰外交官向他们的东部邻国提出了“欧洲标准”。这是为了防止任何在西方面前有损波兰形象的问题出现，是为了提高波兰在东欧的地位，是为了证明东部邻国的国内选民在波兰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支持态度是正当的。本质上，1994年后波兰的东部政策或多或少明智地重新定位了欧洲机构授予波兰的影响力，而波兰当时即将加入这些机构。由于1994年后波兰被认为会先于立陶宛和乌克兰加入西欧机构，对波兰的成功感兴趣的立陶宛和乌克兰精英开始关注波兰。1999年3月，波兰正式加入北约。尽管围绕这一事件以及可预见的北约的进一步扩张充满了怨恨的辩论，对波兰及其东部邻国来说，更重要的下一步是加入欧盟。

“重返欧洲”——共产主义的对手和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的改革者们经常使用的这个标语是一句矛盾的修辞。共产主义被强加在东欧土地上之前的那个欧洲，在1989年已经死去了。除了最顽固的怀旧者之外，对其他人来说，回到两次大战间的欧洲的观念经不起多少考验。1989年后，东欧人所说的“重返欧洲”不是指重新回到过去，而是跃向战后西欧取得的成就，跃向欧洲的共同文化所提供的信念。至此为止，从1957年的《罗马条约》到1989年的东欧革命，欧洲融合的机制性计划在此期间大踏步前进。东欧国家期待立刻参与那些经年累月累积起来的规范和实践。在1989年到1999年间，欧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波兰和其他东欧候选国争相展示它们的成员国资格时，欧盟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的外部边界和共同货币的政治与经

济共同体。波兰期待在2004年欧盟下一次扩张时被接纳，立陶宛在那时应该也已就位。尽管如此，它们的东部邻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基本上在2040年前都没有机会加入欧盟。[33]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想象，在波兰与立陶宛即将成为欧盟的东部成员国之前的时间里会发生什么。[34]

在20世纪90年代初，看起来欧盟面临着快速扩张或继续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选择。事实上，扩张花费了太多时间，这让统一货币成为既成事实。与此同时，欧盟结构的又一个基本变化也在进行中。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本国改革，而欧盟正在消除阻碍成员国内部流动的最后障碍，相应创造出一种强硬的外部边界。申根机制旨在允许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自然该机制会集中关注欧盟外部边界上的警察力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巩固了这一机制。这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一点。本书的第一、二部分阐述了在民族重建和民族和解的过程中，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建立联系的重要性。正如我们在第三部分所看到的，类似的联系在《文化》大战略的详细阐述，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民族和解以及苏联和平解体中也同样重要。由于欧盟扩张会危害到东欧精英进入波兰，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当波兰加入欧盟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公民会发现他们从象征意义上和实际意义上都与“欧洲”分离了。[35]20世纪90年代间，每年有800万俄罗斯公民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前往波兰，之后他们会发现这条路被堵死了。无论他们有没有把波兰看作一个典范，这种无法自由前往的经验让人灰心丧气，也许还会让人蒙羞。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的深深隔离也会有助于卢卡申科的独裁政府，或其他类似的独裁政府。白俄罗斯商人——唯一从卢卡申科那里夺得让步的群体——会发现他们和市场隔离了。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白俄罗斯商人都和波兰有联系，并由此与自由贸易和民主体制的广阔世界有了联系。[36]让白俄罗斯人远离波兰意味着消除了白俄罗斯的某种民主可能性。

1997年，乌克兰和波兰提出了一种免签证机制。在一个公共机构能够运行、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大斯拉夫国家，乌克兰人的经验对为乌克兰改革提供社会支持有着重要价值。[37]乌克兰的国家建设计划是21世纪欧洲安全的关键；结构性错误包括行政和经济改革的缺位，以及薄弱的法律管辖。因此，这一波兰-乌克兰的联系对整个欧洲都极为重要。波兰外交部部长盖雷梅克在1997年到访基辅——先于他首次到访布鲁塞尔——时对此立场明确。[38]在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和2001年，波兰抵住了欧盟要求废除与乌克兰的免签证机制的压力，波兰声称当它正式加入欧盟时会达到这些约束要求。这是后团结工会政府以及克瓦斯涅斯基总统的东部政策的延续，该政策更看重乌克兰而非欧盟成员国（与波兰公众）的偏好。[39]然而一旦波兰真的加入欧盟，它与乌克兰的特殊约定也将走到尽头。卢布林和布列斯特，这两个波兰近代早期历史上与东部邻国建立伟大的政治与宗教联盟的地点，今天只剩下卢布林一处，另一处在波兰东部边界线的另一

端。当波兰的边界和欧盟的边界保持一致，欧盟会给它新的东部邻国提供些什么？

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梦想着有一天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在波乌边界建立的警卫岗会像法国-德国边界的警卫岗那样被遗弃。[40]也许有一天，事情会如他所愿。眼下，这些警卫岗象征着波兰加入欧盟的决心，决心使欧盟的外部边界从奥得河（Oder）变成位于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布格河。尽管波兰能够推迟实施欧盟建议的时间，但是在加入欧盟之前它必须证明其自身机制的正当性。就像国界线在失效前必须被划定、区分和守卫，波兰在能够加入欧盟前必须证明它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在"重返欧洲"的过程中，波兰不仅会就其西部政策，也会就其东部政策得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在支持东部邻国的主权、传播欧洲规范继而传递欧洲影响力的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的波兰表现得就像一个有着确定的利益和目标的主权民族国家。通过接受和提出某种特定的东北欧民族国家的典范，波兰创造出能使其加入欧盟的条件。在寻求加入欧盟的过程中，波兰将成为那些在国家权力的传统领域中让渡主权的民族国家之一。

这本书始于欧洲历史上的某个相似时刻：1569年卢布林联合。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华沙和维尔纽斯在卢布林让渡了国家主权，建立了波兰-立陶宛王国。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在领土、野心和在欧洲的重要性方面比今天这两个继承了相同名字的小民族国家要伟大得多。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公民认为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政治秩序。他们的共和政体体现了民主实践、公民权利、宗教包容和宪法统治，这些现在被视为欧洲最优秀的品质；他们的共和政体也创造或保存了语言、宗教以及如今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神话。近代早期王国的吸引力更多与政治理念有关，而非与具体的机制，这也是在政体灭亡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它依然存有吸引力的原因。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欧盟，我们也可以做出类似的评价：它的吸引力不在于欧盟的所有法律条文（acquis communautaire）、法律与实践主体，而在于它的随机应变、声誉以及文明。它同样是一个精英计划，体现了复合机制中引人瞩目的政治理念。当波兰和立陶宛加入了欧盟，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人也会受到欧洲民族理念的吸引。欧盟的东扩政策——一项明智而高贵的政策——就欧洲东部边界提出了问题，而非解决了问题。

---

[1] 关于东欧的国内政治和欧盟的影响力，见Milada Anna Vachudová, "The Systemic and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East European Foreign Polic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1997。

[2] Klaus Bachmann, "Nasza i wasza wolność," Rzeczpospolita, 6 January

2001.

[3] 外交部部长Andrzej Olechowski曾试图在1994年重新与东部邻国建立联系，但遭到时任总理Waldemar Pawlak的阻拦。

[4] Gazeta Wyborcza, 3 January 1994, 2.

[5] 同上书，6 March 1998, 3; 15 March 1998, 6; 1 July 1998, 1;Segodnia, 30 June 1998, 2; Kommersant Daily, 30 June 1998, 2; Russkii Telegraf, 30 June 1998。关于北约扩张的结果，见Stephen Burant,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48, 2 (2001), 25– 41。

[6] 民意调查数据来自Yuri Levada, “After the Thaw,”Wilson Quarterly, 55, 2, (2001), 78。

[7] Gazeta Wyborcza, 26 June 1998, 1.

[8] Ustina Markus, “Belarus: You Can’t Go Home Again?”Current History, 113, 585 (1994), 337–341.

[9] Minsk News, 2 November 1997, 1.

[10] 引文来自：(IMF) Marek Karp,Gazeta Wyborcza, 26–27 July 1997, 16–17 Rzeczpospolita, 2 January 1997, 6; (wives) Rzeczpospolita, 6 August 1996, 23。又见Gazeta Wyborcza, 17 August 1995, 9; Minsk News, 22 December 1997, 3; Gazeta Wyborcza, 18 July 1997, 12; Siarhej Ausiannik and Ałena Strałkowa, “Białoruś,” in Europa Środkowo-wschod- nia, Warsaw: ISP PAN, 2000, 27。又见David Marples, Belarus, Amsterdam: Harwood, 1999, 90 – 91。

[11] M. Koszelew, “Polacy w oczach Bialorusinów,”Dzieje Najnowsze, 27, 2 (1995), 81–93; Natalla Piatrowicz, “Katolicyzm na Białorusi,” Więź, 467 (1997), 81–92; Ryszard Radzik, “Ruski i Pan-asymetria stereotypu,” Europa Środkowo-wschodnia, 63–80; Uładzimier Padhol, “W oczach‘sowka,’”同上书，53–62; Minsk News, 17–23 March 1998, 3. 白俄罗斯人确实把波兰视为资本主义西方的一部分。Marek Śliwiński and Valerijus Čekmonas, “Świadomość narodowa mieszkańców Litwy i Białorusi,” Przegląd Wschodni, 4, 3 (1997), 572.

[12] Interview with Stanislau Shushkevich, 8 December 1996; “Chronicle, March 1995–February 1997,” Pol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sk News, 10–16 February 1998, 1; GazetaWy borcza, 6 February 1998, 8; Głos znad Niemna (Hrodna), 16–22 January 1995, 1.

[13] Itogi perepisi naseleniia Respubliki Belarus 1999 goda, Minsk:

Ministerstvo Statistiki, 2000.大约有15%在护照上写着“白俄罗斯人”的受访者称他们是俄罗斯人，而10%在护照上写着“白俄罗斯人”的受访者自称白俄罗斯人。Śliwiński and Čekmonas, “Świadomość narodowa mieszkańców Litwy i Białorusi,”574.

[14] Roman Szporluk的一个研究主题，参见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2000)的第4章和第9章。

[15] 关于战时的损失：Marceli Kosman,Historia Białorusi, Wrocław: Ossolineum, 1979, 350; Piotr Eberhardt, Między Rosją a Niemcami, Warsaw: PWN, 1996, 185。关于新东仪天主教会：Siarhej Abłamiejka, “Problem statystyki parafii neounickich na terenie Zachodniej Białorusi,” in Jan Sergiusz Gajek and Stanisłow Nabywaniec, eds., Unia Brzeska z perspektiwy czterech stuleci, Lublin: KUL, 1998, 213。关于城市化：Chauncy Harris, Cities of the Soviet Union, Chicago: McNally, 1970, 322。关于帕兹亚克，见Jan Zaprudnik, Belaru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3, 168; 以及Włodzimierz Pawluczuk, “Białoruś i sprawa polska,” Kultura, 634 (2000), 112–113。

[16] Steven Guthier, “The Belorussian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Assimilation,”Soviet Studies, 29, 2 (1977), 281; Nicholas Vakar, Belo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216–219; David Marples, Belarus, London: Macmillan, 1996, 30–31; Zaprudnik, Belarus, 107; Lilia Diamieszka, “Takie ksi ążki powinny być trzymane w wyj ątkowo dobrze zamkniętych szafach,” in Inna Białoruś, Warsaw: CSM, 1999, 29.

[17] Gazeta Wyborcza, 28 April 1998, 4. 又见“Polska polityka zagraniczna w 1996 roku,” Pol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97; Jo źef Oleksy, “Toast at the Official Dinner Given in his Honour by Mr. Adolfas Slezivicius,”16 September 1995; Gazeta Wyborcza, 28 January 1998, 2, 5。

[18] 少数民族组织关于领土自治的要求一直得不到华沙的注意，华沙认为维尔纽斯的领土自治问题没有那么具有威胁性。Wanda Marcinkiewicz, “Kronika litewska 1997,” Lithuania,26–27 (1998), 234.

[19] Rzeczpospolita, 12 April 1996, 6; 15 January 1996, 6; OMRI Daily Digest, 7 January 1997.

[20] 见他在哈佛大学的讲话，14 November 2000。

[21] 关于右翼，见Ukrains’ka Respub’likans’ka Partia, Kyiv: Fond Demokratii, 1996; Narod nyi Ruch Ukrainy, Kyiv: Fond Demokratii, 1996;

Ukraina: Stanovlennia Demokratii, Kyiv: Ahentsvo Ukraina, 1997, 292; Ukrains’ka Natsional’na Asambleia, Kyiv: Ahentsvo Ukraina, 1998, 23。关于乌克兰人的整体情况，可比较Wiktor Nebożenko, “Ukraińska opinia publiczna o polityce zagranicznej,” Polska w Europie, 15 (July–August 1994), 159, 以及Evhen Golovakha and Ilko Kucheriv, “NATO and Public Opinion in Ukraine,” Political Portrait of Ukraine, 8 (1997), 63。具体分析，见Jarosław Hrycak, “Jeszcze raz o stosunku Ukraińców do Polaków,” Więż, 473 (1993),15–32; Olga Iwaniak, “Zamożniejsi kuzyni,” Rzeczpospolita, 22 May 1997, 6。

[22] Interview with Anton Buteiko, 9 March 1999, Cambridge, Mass.;Polityka i kul’tura (Kyiv), 10–16 December 1999, 10.

[23] Holos Ukrainy (Kyiv), 29 June 1996, 1.

[24] Kultura, 586–587 (1996), 153–157; Antoni Kamiński and Jerzy Kozakiewicz, Stosun ki polsko-ukraińskie, Warsaw: Instytut Spraw Dublicznych, 1997; Wladisław Gill and Norbert Gill, Stusunki Polskiz Ukrainą,Toruń: Marszalek, 1994, 33;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5, 123;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6, 136; Rzeczpospolita, 26 March 1997, 7.

[25] 文本见Rzeczpospolita, 22 May 1997, 6; in English in Tadeusz Piotrowski, ed., Genocide and Rescue in Wołyn,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0, 255–256。又见Den’ (Kyiv), 24 May 1997, 4; Nashe Slovo (Warsaw), 14 April 1996, 2。

[26] Anatolii Martsynovs’kyi, “Prymyrennia davno prymyrenykh,”Holos Ukrainy (Kyiv), 22 May 1997, 7; Iuri Andrukhovych的论文也值得参阅。用波兰语表述得最清晰的批评文章的作者是德国人Klaus Bachmann，见Polska kaczka——europejski staw, Warsaw: CSM, 1999, 106及全书各处。

[27] 乌克兰议会的重要性更少一些，而且议会的约束永远比不上立陶宛和波兰的水平。Interview with Borys Andresiuk, Cambridge, Mass., 25 September 2000.

[28] Interview with Aleksander Kwaśniewski, 17 May 1999, Warsaw, Poland.

[29] Włodzimierz Derczyński and Robert Draczyk, “Stosunek Polaków do innych naro-dowości,” Warsaw: CBOS, August 1996, 29.

[30] Gazeta Wyborcza,13–14 September 1997, 12–13.

[31] 见Chris Hann, “Postsocialist Nationalism,”Slavic Review, 57, 4 (1998), 840–863; Polityka (Warsaw), 14 December 1996, 87; OMRI Daily Digest, 10 October 1996。

[32] 波兰语版的最初7卷是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nia, Warsaw: Karta, 1998–2000; 乌克兰语版是Ukraina——Pol’shcha: Vazhki pytannia。我参加了1999年和2000年的第6和第8次会议。

[33] 波兰与立陶宛在2004年加入欧盟，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至今没有加入欧盟。

[34] Peter Andreas and Timothy Snyder, eds.,The Wall Around the West,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35] 相关的欧盟文件：Treaty of Amsterdam, Conferenc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States, Brussels, 23 September 1997; 关于德国的担心，见Gazeta Wyborc za, 4 February 1998, 6; 5 February 1998, 1。

[36] Minsk News, 3–9 February 1998, 3; 10–16 March 1998, 1; Gazeta Wyborcza, 11 March 1998, 7.

[37] Den’ (Kyiv), 2 February 1999, 7; Yaroslav Hrytsak, “National Identities in Post-Soviet Ukraine,” in Zvi Gitelman, et al., eds., Cultures and Nation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as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200 , 274.

[38] Gazeta Wyborcza, 15–16 November 1997, 6. 乌克兰外交部部长把欧盟的外部边界视作新“铁幕”有些夸张了，但确实使得人们关注起欧洲政策给欧盟东部邻国和欧洲本身带来的影响。在1999年3月29日的华沙，乌克兰外交部部长Borys Tarasiuk出席关于欧洲融合的首届波兰-乌克兰会议。

[39] Gazeta Wyborcza, 28 April 1998, 7; Macieja Falkowska, Społeczeństwo polskie wobec wschodniej polityki wizowej, gospodarczej, i kulturalnej, Warsaw: CBOS, February 1995, 19–31.

[40] Vysokyi zamok (L’viv), 9–16 January 1999, 1.

致谢

我在一座图书馆的窗边座位写完了这本书的导论。当我写导论时，我听到了一些熟悉的鸟鸣，一声接着一声。我转过身看见一只褐噪鸫栖息在窗台外，它透过玻璃窗看着我。褐噪鸫是一种善于模仿的鸟类，这只褐噪鸫知道六首歌。它重复每首歌的乐句正好两遍，它从曲库的头唱到尾，唱起了来自森林和海滨的旋律。它站在离我一英尺远的地方。当我提起笔准备记下它的歌曲时，它郑重地向我告别，然后飞走了。

以下是我的郑重告别。这本书从牛津开始，到耶鲁为止，在此过程中一些人一直密切关注着，其中有Timothy Garton Ash和Thomas W. Simons Jr.。我的初始方法受到了Leszek Kołakowski的影响，之后是Isaiah Berlin。刚开始，我在历史、神话和政策间建立联系的努力受到了Stephen Peter Rosen的鼓励，之后Richard Smoke也给予我鼓励。Roman Szporluk、Andrzej Walicki和Piotr Wandycz多年来向我提出了坚定的批评意见。一些朋友和同事阅读过完整的草稿，其中有Stephen Burant、Jeremy King、Eric Lohr、Stuart Rachels、Oxana Shevel和Kieran Williams。Andrzej Paczkowski、Mary Elise Sarotte、Milada Anna Vachudová和Tomas Venclova就手稿的大部分内容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我要感谢以下所有悉心阅读过某一章的人：Chris Boyer、David Brandenberger、Kate Brown、Peter Holquist、Yaroslav Isaievich、Victor Hugo Lane、Terry Martin、Grzegorz Motyka、Richard Turits、Nerijus Udrenas、Theodore Weeks、Rafał Wnuk和Larry Wolff。在某些疑难问题上，我获得了Laura Belin、Audrey Helfant Budding、Michael Flier、Yaroslav Hrytsak、Katarzyna Jesień、Joshua Katz、Edward Keenan和Mark Kramer的帮助。Keith Darden、Władysław Filar、Chris Hann、Ihor Il’iushyn、Jeffrey Kopstein、Grzegorz Kostrzewa-Zorbas、Dmitry Koublitsky、Leszek Jesień、Michael MacQueen、Paweł Świeboda和Jason Wittenberg为我提供了想法和资源。我要特别提到Jeffrey Burds和Jagoda Hernik Spalińska，他们慷慨地分享了自己的研究。Peter Andreas、Aaron Belkin、John Czaplicka、Norman Davies和Volodymyr Dibrova向我提供了一些富有成果的调查方向，之后是Jerzy Giedroyc、Jerzy Jedlicki、Tony Judt、Charles Maier、Sean Pollack、Antony Polonsky、Peter Potichnyj和Veljko Vujaćič。

我从我的研讨课学生的反馈中受益良多，他们是Serhyi Bilenky、Steven Seegel、Anna Sluz和Steven Swerdlow。总的来说，在公众演讲之后，我的构想有了显著的提高，我很幸运能有机会与感兴趣的听众讨论这部著

作。我想感谢在哈佛大学参与12场研讨会的与会者们，在维也纳的人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参与三场研讨会的与会者们，在牛津大学参与三场研讨会的与会者们（一场在万灵学院，一场在圣安东尼学院），在弗吉尼亚大学参与两场研讨会的与会者们。我也想感谢那些在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欧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出席讲座的人们；还有那些出席了由欧洲学院（Kolegium Europejskie）在华沙组织的政策会议、由东西方研究所（East West Institute）在基辅组织的政策会议、由欧洲——大西洋中心（Euro-Atlantic Center）在基希讷乌组织的政策会议以及由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在华盛顿组织的政策会议的与会者们。波兰救国军国际联合会和乌克兰人联合会友善地允许我列席在伦贝尔弗图区（Rembertów）的波兰军人学院举行的波兰-乌克兰会议。两位同意接受采访的受访者已经在脚注中提及，他们非常和蔼。Jonathan Brent、Larisa Heimert和Margaret Otzel充满勇气地承担了出版本书的任务；我尤其感谢Gavin Lewis的细心编辑。关于本书中事实的准确性以及全部的阐述，我全权负责。

如果没有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和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的开放式书库，本书不可能成为现在的形式。同时，我对那些使本书插图得以呈现的机构表示感谢。图15、16、17、18、19和25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乌克兰研究协会参考图书馆的馈赠。图19复制的照片来自斯蒂芬尼亚·哈伊钦作品集（Stephania Halychyn Collection），其他照片来自博赫丹·克拉齐夫作品集（Bohdan Krawciw Collection）。要感谢Robert De Lossa、Daria Yurchuk和Ksenya Kiebuzinski帮忙复制这些照片。图10、11、12、20、21、23和24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馈赠。其中，图10、20和24来源于犹太研究学会意第绪科学院，图23来源于波兰军队博物馆（Muzeum Wojska Polskiego），图10来源于立陶宛国家中央档案馆，图12来源于George Kaddish。我要感谢那些将照片捐赠给博物馆的人们，以及帮助促进照片进一步使用的博物馆。图3、4、5、9、14和22是美国摄影师Louise Arner Boyd的作品，这些照片是来自纽约美国地理协会的馈赠。华沙的国立博物馆（Muzeum Narodowe）允许我使用Jerzy Hoppen（图6）、Edmund Zdanowski和Boleslawa Zdanowska（图7、8）在两次大战间的维尔纽斯拍摄的照片。图26复制自Jerzy Giedroyc和Krzysztof Pomian的作品《两双手的自传》（*Autobiografia na cztery ręc*, Warsaw: Czytelnik, 1996），均获得巴黎文学协会（Instytut Literacki）的使用授权。图1是Frantsysk Skaryna木刻作品的复制品，由Liavon Tsimafeevich Barazna完成；Jan Zaprudnik和Adam Maldzis回答了关于这件作品的问题。图13是一本奥斯特罗赫圣经的照片，得到了乌克兰的切尔尼希夫历史博物馆（Chernihiv Museum of History）的使用授权。所有

地图由托帕斯地图公司的Jonathan Wyss绘制。

我在牛津、巴黎、维也纳和布拉格期间构思了这本书；在华沙、维尔纽斯、明斯克、基辅和沿着国界线的地方进行研究；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写作；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完成。我感谢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 Board）、人文科学研究所、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奥林战略研究所（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和哈佛国际与地区研究学会（Harvard Academy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的资金支持。我在哈佛期间，Samuel Huntington主持最后两所机构，我能度过这硕果累累的三年有赖他的好意与包容。还要感谢哈佛学会的Chet Haskell、Beth Hastie和Ira Kukin的工作。哈佛大学欧洲中心、麻省理工-麦伦的强制移民计划（MIT-Mellon Project on Forced Migration）以及乌克兰研究协会不时地给予我资金补助。如果没有旅行并沿途受到款待，这本书根本无法写成，特别感谢基辅的Larysa Shevel和Serhyi Shevel，华沙的Agnieszka Waśkiewicz和Andrzej Waśkiewicz。这本书的完成还有赖于那些供我阅读、写作和斟酌措辞的公共场所。我想念剑桥的潘普洛纳咖啡馆、维也纳的博物馆、布拉格的“斯拉维亚”、华沙的“新世界”和巴黎的“圣米歇尔”（我相信这家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深夜黑咖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 /（美）蒂莫西·斯奈德 (Timothy Snyder)著；潘梦琦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1（2020.5重印）
书名原文: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ISBN 978-7-305-22164-4
I. ①民… II. ①蒂… ②潘… III. ①民族历史 - 研究 - 欧洲 - 1569-1999 IV. ①K5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8187号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by Timothy Snyder
Copyright © 2003 by Yale Univers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
著者 ［美］蒂莫西·斯奈德
译者 潘梦琦
策划人 严搏非
责任编辑 卢文婷
特约编辑 张祝馨 杨揄熹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字数 302千
版次 2020年1月第1版
ISBN 978-7-305-22164-4
版权登记号：图字10-2019-278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西方的困局

ZERBRICHT DER WESTEN?

Über die gegenwärtige Krise in Europa und Amerika

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

[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著　童欣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导言

第1章 欧洲的价值抑或西方的价值？

第2章 超越民族国家抑或成为诸民族之上的拱顶石？

第3章 一个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欧洲吗？

第4章 缺少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

第5章 谁代表欧洲讲话？

第6章 欧洲vs美国？

第7章 德意志问题又来了？

第8章 作为避难所的欧洲？

第9章 多重性的联合？

第10章 英国脱欧将带来什么？

第11章 美国将向何处去？

第12章 欧盟会崩溃吗？

第13章 西方会分裂吗？

第14章 结论：一个面临考验的时代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一段续记

致谢

译后记

导言

本书要讨论的是近年来欧盟、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大西洋两岸的整个西方世界所陷入的危机状态。因此，我把它看作2015年初出版的拙作《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Geschichte des Westens*）第四卷（即最后一卷）《当前时代》的接续，那本书主要讨论的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到2014年导致后冷战秩序崩溃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间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发生的事情。

当我于2015年10月开始新书的写作时，似乎距离本书重点讨论的一些事件多少还有些遥远，这包括2016年6月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同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和2017年5月的法国总统选举。在2015年秋季就已经显露无遗的是欧盟的危机状态，更准确地说，这场危机是由好几个单独的危机构成的，其中包括诞生于1992年初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Vertrag von Maastricht）的欧盟机构如今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和信任危机，欧元区危机（其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成员国没有共同的预算体系），以及欧盟与某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危机——有些国家自称“非自由的民主国家”，并因此而不认同包括1993年哥本哈根入盟标准在内的欧盟基本价值观。

2015年秋天，由于难民危机以及德国这个联盟中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因其应对此危机的政策而遭到的孤立，欧盟内部离心力量也在加剧。难民危机也是导致“英国脱欧”的因素之一，这一点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而且它也同样导致了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内部民族主义兼民粹主义势力的增强。早在2015年之前，国际社会就曾热烈地讨论过是否存在一个“新的德国问题”，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之后真的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百年难题了吗？而2015年发生的这些事，又重新让关于德国的自我定位和德国在欧洲的角色的讨论变得激烈起来，而且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场辩论将很快结束。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表明，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是欧洲同时也是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这场大选揭示出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其部分原因要去久远的历史中寻找线索。一些原因是美国历史的特殊性，另外一些则是欧洲国家通过自身的经历就可以理解的。对“精英”、“建制派”和“政界”的不信任，是大西洋两岸都存在的一种现象。民粹主义运动所动摇的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西方世界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

奉行激进民族主义的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第45

任美国总统一事，标志着美欧关系出现了一道自1945年以来的最深的裂痕。到目前为止，当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争论某些根本性问题时，可以认为他们的争论是对那些共同价值理念的不同阐释。今后还是不是这样，就不好说了。唐纳德·特朗普一直到现在都并不怎么珍视那些美国赖以建国的价值理念，比如不可剥夺的人权、法治、拥有“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机制的分权体制和代议制民主。他的政策甚至动摇了西方价值规范——这一规范形成于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两次大革命，即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自那之后它就成为西方民主政体必须参照的准绳。

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世界是否会分裂？就在人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旧大陆”上正在讨论欧盟是否能避免解体，在重大问题上是否还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很显然，欧盟既无法在政治上也无法在军事上取代美国。不过，若是齐心协力，欧洲民主国家却可能在特朗普当政的年代为西方的价值留下火种。若是它们有此担当，它们就不会孤单。世界上一切从西方民主制度的原则中汲取力量的人都会是它们的盟友，而这样的人在美国尤为众多。

第1章

欧洲的价值抑或西方的价值？

“欧洲价值”或“欧洲的价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即使在日常对话中我们也常喜欢谈起。可事实上，这个概念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从未建立起一个价值共同体。此外，这里还有另一个与之纠缠不清的概念——“西方的价值”。维也纳历史学家格拉尔德·施图尔茨（Gerald Stourzh）的一句话或许能点明二者之间的区别：“欧洲并不等于西方，西方的范围要大过欧洲，欧洲的范围也超越了西方。”[1]

西方曾是欧洲的某个部分，这部分欧洲在中世纪（在某些国家还不止这个时段）时视罗马为自己的精神中心——也就是说它们属于西方教会。只有这部分欧洲经历过前现代[2]时期的两种分权形式：它初步地分开了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Geistlicher und weltlicher Gewalt），也分开了君王权力与其他各阶层的权力（ständischer Gewalt）[3]。围绕着属灵与世俗权力的划分产生的，是11世纪下半叶和12世纪前25年发生的权力争斗——这场冲突的一方是意欲改革的罗马天主教会[4]，另一方是神圣罗马帝国萨利安王朝的皇帝、法兰西国王和英格兰国王。表面上，双方争的是究竟谁有权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但实质上双方争的是：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场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宗教首领与人间帝王之间达成了历史性的妥协：1122年，由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Papst Calixt II）的使节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Heinrich V）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Wormser Konkordat）。没有任何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一方面教会从此完全独立于德意志的王权或皇权，另一方面世俗权力也借此宣示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并且有机会在今后的岁月里寻机扩大。

在中世纪，君王与各阶层之间分权的标志性日期是1215年6月15日。这一天，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甸上，因去年在法国布汶战役中惨败而人望尽失的英格兰国王“无地约翰”，被迫承认造反的男爵们在《大宪章》中提出的自由权利，这也就给他自己的王权戴上了枷锁。从此这位国王将受到以下约束：若是没有他的封臣代表整个国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同意，就不能征税；除非经过同等级之人的合法判决及本地法律允许，任何自由人都不应被捉拿或被剥夺产业。

《大宪章》本身并不意味着国王与其封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就此终结。但百

年之后人们可以认定：下层贵族［即“乡绅”（gentry）］和城市市民是这场争斗最大的获益者。人们普遍承认“议会”（Parlament，这个名称可以一直追溯到13世纪中叶）是国家的代表。从15世纪中叶开始，来自各郡的代表和平民组成的下议院与国内贵胄组成的上议院形成了两个界限分明的机构。其实自那时起，下议院所掌握的权力就比上议院大。

1215年在英格兰发生的事件深深影响了今后的世界。这主要是因为，在欧洲，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宪政发展拥有如英格兰一样的高度连续性。然而，并不是只有英吉利海峡西岸的统治者才需要获得本国内部有声望和势力的贵族、乡绅们持续不断的支持，因为君王们的宝座时时都处于其他一些有资格竞争王权和法统之人的觊觎之下。而且，并不是只有英格兰的贵族、乡绅们才会在待价而沽时趁机提出自己的要求：用正式文件来确认他们的权利，并成立相应的机构来确保他们能参与统治。于是，在中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类似的协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于西方的欧洲各国（europäischen Okzident[5]）的土地上。

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君王权力与各阶层权力的分离，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从那个结束权力纷争的历史性妥协中释放出的力量，给西方带来了长久的影响。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分离，引发两套大相径庭却又都源自罗马法的司法体系的产生：一套是诞生于1140年前后，其标志是汇集了教法或教会法的《教会法汇要》（Decretum Gratiani）；另一套是几乎同时诞生的新的世俗法律——这些法律依据的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于公元6世纪下令编纂（后又在1080年前后被重新发现）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它们在中世纪晚期传遍欧洲（准确地说是传遍属于西方的欧洲），并在所到之地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理性化浪潮。

司法的系统化首先在教会中发生。如果没有11世纪末从神学中发展出来的“法学”，那么世俗世界的司法系统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如果没有司法的系统化，就不会有现代国家。吊诡的是，第一个显现这一关联的案例，正是由对权力极为渴望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apst Gregor VII）在1075年所颁布的《教皇敕令》（Dictatus Papae）[6]里创造出的“教会国家”（der Kirchenstaat）的概念。他所发起的这场“教皇革命”［博物历史学家欧根·罗森施托克-胡塞（Eugen Rosenstock-Huessy）之语］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7]教会中出现的宪法雏形为世俗统治中的宪法雏形树立了范例。伴随着各国内部的现代国家架构发展成形，一个欧洲的多国体系也应运而生。君王与各阶层人士之间的分权正与此相关。

就像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欣策（Otto Hintze）在1931年所说的那样，这正是“西方国家的分权宪法中所带有的二元精神”。[8]这种二元性，早在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分离时就存在了。无论是在世俗的领域还是在教会的领域

中，凡是执行的权力在一边，而建议、监督、立法的权力在另一边的场景，都体现出这种二元性。这种二元性还成对地出现在庄园经济与农民经济、中世纪城市与封建领地、伙伴式的共治（如行会或大学）与官僚层级的统治之间。如果要为此时的西方找一个最突出的标志，那应该就是：内心之中的二元主义精神——它包含了多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和市民社会的萌芽。

当然，若没有基督教中的古老渊源的话，西方历史中这两次标志性的分权也不大可能发生：基督教早就把神权法和世俗法分为了两个类别。根据福音传播者马太和马可的记载，有一天，法利赛人的追随者和依附于罗马的统治者希律·安提帕斯（Herodes Antipas）的追随者一起向耶稣这个实实在在传神之道的人，提出了一个暗藏陷阱的问题：是否认为人们向恺撒（即罗马皇帝）纳税是应该的。如果耶稣说不应该，那就意味着鼓动叛乱；如果说应该，则意味着支持罗马人的外来统治——这必让他人心丧尽。所以无论耶稣怎么回答，都意味着在政治上亮明立场，也意味着一个识别敌我关系的决断。由于耶稣并不想这样作答，他选择了一个辩证的答案。他要来一枚罗马钱币，在确认那上面印的是皇帝提比略（Tiberius）的头像之后，他回答说："这样，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9]

上帝与恺撒在这里是并置的，但说话人与他们之间并不是等距离的关系，也就是说亲疏有别，而且二者的地位也绝对不相同。毫无疑问，回答问题者将上帝放在了绝对优先的位置。但耶稣的回答同时也拒绝了某种神权统治或祭司统治。上帝的统治与世俗统治之间的分离，对后者既意味着限制也意味着肯定：说是限制，是因为这让它不能再插手宗教领域；说是肯定，是因为这就承认了世俗权力的独立性。这当然还不算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但是这个回答带出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中所包含着的关于政教分离的逻辑最终带来世界的世俗化和人的解放。[10]

千年之后，有一部分基督徒从耶稣所发展出来的这个基本区分之中引申出了一个结果：将属灵权力的机构与世俗权力分离。这些基督徒属于拉丁教会或者说西方教会，那里有许多国王，但只有一位教皇。在起初属于拜占庭后来又属于莫斯科的东部教会那里，从未发生过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东正教的欧洲不知道什么"政教分离"，人们带着挑衅口吻谈及的"政教合一"体制（Cäsaropapismus）——由一个人兼任教会领袖和国家领袖——其实会让教会臣服于君王。

同样，在东部教会的区域内也发展不出那些影响西方的其他二元性：没有领主与封臣之间相互交换誓言的关系，没有君王权力与其他各阶层的权力的划分，伙伴式的共治与官僚层级的统治、庄园经济与农民经济、自治的城市与贵族的采邑——所有这些区分均不存在。当然，东欧和南欧之所以

走上了一条与属于西方的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可能与长期遭受异族统治有关：蒙古人曾统治今俄罗斯所在区域，奥斯曼帝国曾统治巴尔干和罗马尼亚，而后面这个例子正好说明，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分离才是欧洲的“根本性差别”。

只有从属于西方教会的那部分欧洲，才有保证个人自由和团体自由的体制性条件，于是只有在那里才能出现理性的神学，以及其他理性的学术——如法学和哲学，而且理性主义精神还推动了其他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只有在西方教会的范围内，一种有条理的质疑才能产生出精神上的生产力——尽管教会严厉地打击这种生产力，却已无力消灭它。只有在西方，才诞生了市民阶层（Bürgertum），无数敢于冒险的商人和企业家由此涌现出来。只有在这里，才可能出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规模空前的解放运动——它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宗教改革，一直发展到启蒙运动——正是这些解放运动塑造了今天西方现代社会的样子。

这其中的启蒙运动，并非凭空出现的“宇宙大爆炸”。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并非像它的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地狱里涌出来的。启蒙运动有它的前史，其中基督教在教会法与世俗法分离方面的特征几乎完全符合中世纪的“二元主义精神”。“二元主义精神”适用于思想史的道理，也适用于权力分离的历史。在往昔的政教分离、王权与各阶层权力分离的基础之上，现代的权力分化呼之欲出，这正是法国的国家学思想家夏尔·德·塞孔达（Charles de Secondat），即孟德斯鸠男爵1748年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论证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分立。[11]

孟德斯鸠以欧洲大陆的绝对主义王权为对立面所构造出来的理论模型，可以解释英国宪政史中众多事件的结果，而且特别能够解释1688—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发生的事情。而孟德斯鸠的书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所造成的反响，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烈。在曾跨越过北大西洋的欧洲移民们反抗英国人的激烈斗争中，在他们拒绝英国国教会的行动中，在他们反抗他们所不愿意服从的统治时，这本《论法的精神》都大大增加了这群人的底气。据此，“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即：只有那些有权利将自己的代表送进伦敦下议院的人，才可以被抽税）这个原则不应该仅仅只在母国有效，而应该同样也适用于13个造反的北美殖民地。

1776年6月12日，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所有人都是生来同样自由与独立的，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当他们组成一个社会时，他们不能凭任何契约剥夺其后裔的这些权利；也就是说，享受生活与自由的权利，包括获取与拥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12]这掷地有声的豪言开启了宣示人权的历史。紧随其后的，是14条彰显人民主权的条款，其中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三权分立，还有其他一些最为紧要的自由权利，如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13]

1776年7月4日，13个殖民地共同组建的大陆会议公布了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秉承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精神，这篇宣言在开头就写明了那些不可剥夺的人权："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14][15]

北美的起义者们无疑是人权事务方面的先驱，但这些被弗吉尼亚和其他加盟州印在纸面上的基本原则，很快就渡过北大西洋来到了欧洲。若说起在法国为这些原则而奔走的人，当首推（在独立战争中站在美国人一边对英国作战的）拉斐德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和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编写者之一、《独立宣言》草稿的主笔人、后来的第三任美国总统，他在1785—1789年担任美国驻巴黎特使）。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拉斐德侯爵就在杰斐逊的积极支持下起草了自己的人权宣言，这份文件由国民会议于1789年8月26日通过，成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这是欧洲的第一份人权宣言，它比《独立宣言》更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在保障自由权和财产权方面要远超过那海外的先驱。[16]于是，最迟在1789年之后，保障这些不可剥夺的人权已经成为大西洋两岸共同的事业。人权与法治、三权分立、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民主一起，成了西方的准则，所有国家——只要它不只是在纸面上认同1776年和1789年革命的理念和宣言的政治成就——都要为之而奋斗。

接受还是拒绝这个准则？这两者之间的争斗构成了一部历史，无论是新的历史还是旧的历史，欧洲的西方史和海外的西方史（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历史）都成了这部历史的一部分。有些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属于西方，却反对人权宣言的某些政治成果——比如不可剥夺的人权、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德国曾是这类国家中的一员，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之后，它才不再拒绝这些西方的政治理念。

还有意大利，它也是1945年之后才建立起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而葡萄牙和西班牙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战胜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兼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之后，才步入此行列。直到1989年的"和平革命"[17]之后，西方世界内部关于"是接受还是拒绝1776年和1789年的政治理念"的争论才算是暂时告一段落。这场革命让那片本来属于传统西方，却在1945年因雅尔塔会议的决定而被划入苏联统治范围之内的地域又重新拥抱了西方的政治文化：这为欧洲历史画上了一个大大的休止符，而且是自法国大革命以

来的200年里最大的一个。

西方的准则从来都不是在描绘西方的现实。在第一批《人权宣言》的起草人里就有奴隶主，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其中之一。有些人的人权长期得不到承认，来自“黑非洲”[18]的奴隶和印第安原住民都属于这个群体。如果谈到公民权，那么妇女和劳工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个群体。西方的历史，同时也暴露了与自己所持价值的冲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罪行账簿”上的主要部分。

但这几个《人权宣言》本身比那些抱有各种大男子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的起草者要明智得多。那些部分地或完全地被从人权的适用人群中排除的人，还是能将这些宣言引为依据，而且他们一直坚持不懈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因此，西方的历史也可以被看作一部逐步学习的历史，人们通过自我纠错和建设性的自我批评来学习。换句话说，这个准则带来了一个向准则看齐的过程。

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因为人权中的“人”理应指的是全人类。这一点在1948年12月10日之后就更加无可置疑了，因为这一天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强调了这一权利的普世性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性。[19]当然，只要仍有许多国家觉得自己不受这项宣言的束缚，这个起源于西方的标准的全球化就依然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西方的（也就是大西洋两岸的）特性，就是所有那些沿着18世纪末的政治理念的发展的总和。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西方的价值得以从中生发的）“根源”的话，那就是上文中耶稣把上帝的领域与恺撒的领域分开的那句话。在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中，并没有类似的“经典名言”。中世纪的政教分离、王权与各阶层权力的分离正是基于耶稣那句“经典名言”而实现的，只有在欧洲属于西方的地区才发生了这样的权力分离。这两大权力分离又推动了现代分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分立）的诞生，从而也为法治和人权、公民权的产生创造出一个坚实的框架。这些权利首先被宣布于北美殖民地的土地上，接着它们又从那里来到了欧洲。欧盟及其成员国现在所称的“它们的”价值，其实与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西方的价值联系在一起。而现在，这样的联系已经扩展到全世界。

---

[1] Gerald Stourzh, Statt eines Vorworts: Europa, aber wo liegt es?, in: ders. (Hg.),*Annäherung an eine europä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Wien 2002, S. XI.

[2] “前现代”（vormoderne）是欧洲历史中的一个概念，一般指从中世纪开端到1800年前后的这段时间。——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

注）

[3] 由于作者在下文中举出的事例是《大宪章》的签署，所以此处译作“君王权力与贵族权力的划分”或许更好理解。但将“ständischer Gewalt”简单理解为“贵族权力”是不准确的。在中世纪历史的语境下，德文“Stand”指的是每个人的“阶层本位”。工匠、农民都是有“本位”的，尽管其“本位”要比贵族低，但就像贵族比君王的“本位”低一样，这种“低”并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权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权利”。所以，“ständischer Gewalt”并不仅仅属于贵族，也属于其他各阶层的人——《大宪章》中所称的“自由人”。由此可知，这个“西方”的平民与中国古代自秦汉而下的“编户民”有根本的区别。

[4] “Reformpapsttum”指的是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运动。这里指的是11世纪的改革运动，主要目标是针对世俗王权争取教会的独立性。教会史上，还有一次更有名的16世纪的“Reformpapsttum”，指的是既在天主教内部产生又因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刺激而加速的天主教改革运动，主要目标是要坚持天主教传统，同时清除内部腐败，以应对新教的挑战。

[5] 作者特别用“Okzident”一词来代指“西方”。历史中，该词虽可泛指“西方”“欧洲”，但更偏重于代指以下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即由灭亡了古罗马帝国且后来又皈依了基督教的日耳曼蛮族各支系所建立的欧洲国家，而把中欧、东欧和东南欧（更不用说俄罗斯）排除在外。

[6] 《教皇敕令》是一份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签署的27条应属教皇之权力的文件。这份文件是否由教皇本人写就或口授，尚有一定争议。它具备了宪法文件的雏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12条——“教皇可以罢免皇帝”。

[7] Eugen Rosenstock-Huessy, Die europäischen Revolutionen und der Charakter der Nationen, *Stuttgart* 1963 (Jena 1931), S. 131 ff.

[8] Otto Hintze, Weltgeschichtliche Bedingungen der Repräsentativverfassung (1931),in: ders., Staat und Verfassung.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zur allgemein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Bd. 1), Göttingen 1970, S.140-185 (169).

[9] Matthäus 22, 15-22; Markus 12, 13-17; ferner Lukas 20, 22-26.

[10]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1: Von den Anfängen i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2016, S. 34 f.

[11] Montesquieu, Vom Geist der Gesetze, 2 Bde., übersetzt u. hg. v. Ernst Forsthoff,Tübingen 1992².

[12] 译文来自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美国历史文件选集》1985年版，第18—19页；转引自楚树龙、唐虹主编：《政治学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Ernst Fraenkel, Das amerikanische Regierungssystem. Eine politologische Analyse. Quellenbuch, Köln 1962², S. 26 f.

[14] Ebd., S. 28-31.

[15] 译文来自任东来《独立宣言》中译稿，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688412.html，访问时间：2018年3月18日。

[16] Europäische Geschichte. Quellen und Materialien, hg. v. Hagen Schulze u. Ina Ulrike Paul, München 1994, S. 533 f.

[17] 1989年，从年初的莱比锡抗议到11月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政府没有使用武力镇压市民的抗议活动，直到自身走向崩溃，德国人习惯将这一个过程称为“和平革命”。

[18] “黑非洲”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19] *Die Allgemeine Erklärung der Menschenrechte*. http://www.ohchr.org/EN/UDHR/Documents/UDHR_Translations/ger.pdf.

第2章

超越民族国家抑或成为诸民族之上的拱顶石[1]？

1988年，有位雄心勃勃的德国政治家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出版了一本名为《未来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 der Zukunft*）的书。在这位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萨尔州长会议主席的政治家出版的书中有一章名叫《超越民族国家》（“Die Überwindung des Nationalstaates”）。在这一章的结尾，他写道：“恰恰由于我们德国人还未能实现国家统一，恰恰因为我们德国人对某种丑恶的民族主义有过糟糕透顶的经历，所以我们才会比别的民族更容易彻底地放弃民族国家体制。这是因为，其他民族国家的建设（即将或早已）与民主的社会秩序相融合。而鉴于我们德国那段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再没有谁比我们更应该去充当欧洲超国家联合进程的推动者了。”[2]

这段话，不大可能在原联邦德国之外的任何地方引起舆论注目。[3]但若是真的引起注意了，可能就会有人问：这个结论是否真的是清算德国历史罪责的一种大胆说法？这是不是宿命论的一个变种？其实，拉方丹的这段诡辩的言辞会让人感觉到，这是早期教会四大神父之一安布罗斯（Ambrosius）“因罪蒙福”学说的世俗版本：正因我犯下大错，反倒使我走上了圣洁之路。[4]可是欧洲国家很可能会把由德国发出的“超越国家”的呼吁看作是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新把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主权都曾经受到过希特勒“第三帝国”的侵害，而且其中还有些国家早在德意志帝国或普鲁士称霸时就遭过罪了。

当时的德国还处于1945年之后的分裂状态，并不像欧共体的其他成员国那样是民族国家。1976年，波恩的政治学家兼当代史学者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称为“民族国家中的后民族民主政体”，同时这也契合整整一代联邦德国知识分子的认知。[5]当布拉赫作为五卷本《联邦德国史》（*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作者于1986年再次重复这个论断之后，这个概念开始变得广为人知。[6]不过，直到尤尔根·哈贝马斯1998年在给自己的一套政论文章起名时，用了“后民族国家的聚合体”之后，它才真正成为政治中的关键词。哈贝马斯在大量文章中使用这个词，是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全球化时代西方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当下的发展阶段。[7]

此时（1998年），处于这个特别聚合体中的联邦德国早在8年前就已不复存在了。德国已经重新统一，又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尽管是以一种从前没有出现过的形态。那时它与所有欧盟成员国一样，作为一个“后经典形态”时代的民族国家，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自己的部分国家权力，或是将这一部分主权让渡给各类超国家的机构。[8]不过，把联邦德国说成是“后民族国家的”未免会引起争议。照这个说法，联邦德国就可以单方面代表德国人在本民族历史中的发展阶段，而不需过问另一个德国人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的情况了。对联邦德国的特殊结果而言，“后民族国家的聚合体”这个概念给人的感觉是由结果倒推出来的。它没有进行国家间的对比，也不是从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这个事实在德国人的讨论中总是被忽视。

今天，如果要在欧盟内部进行这样的实证研究，那么除了德国，很可能只有两个国家勉勉强强能符合“后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至少在“政治类别”这个范畴内）：比利时和卢森堡。前者，是因为其国民不怎么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民族，而且其国民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后者，是因为欧盟内部增值税税率使得这个最小的成员国成了众多重要机构的所在地[9]，同时它还是德、法之间“天生的”中介。而在其他欧盟成员国，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在大多数国民那里都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后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这些地方或多或少都会让人疑惑不解。

在欧洲统一运动的早期阶段（二战结束次年），曾有过一种将欧洲诸国组合成一个跨越政治阵营边界的大联邦的想法，那时的社会民众对这个想法的支持度是最高的。在那时的各个“党派集团”中，基督教民主党系的党派是最赞成欧洲一体化的，它们站在天主教保守主义者的对立面，支持现代民族国家彻底的世俗性质。联邦德国成立后不久，第一任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以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为起点的西欧一体化项目。可是，1954年8月主政波恩的阿登纳尝到了重大挫折的滋味，因为法国的国民议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关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条约，而且这也意味着，一张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蓝图就此作废，这是民族主义在法国复兴的标志。

依然在前行的，是煤钢共同体六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从煤钢领域拓展至其他领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1957年，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当上了当年成立的、囊括了欧洲所有经济部门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首任委员会主席。而哈尔斯坦此前的职位，一直是波恩政府外交部的国务秘书。有像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梅纳塞（Robert Menasse）这样激进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写信给哈尔斯坦，陈述自己取消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看法。他非但没有证据证明哈尔斯坦当面对他说过的那些话（“欧洲的理念是取消民族”，“欧洲统一进程的目标是超越民族

国家”，“目标是而且继续是：超越民族，组织一个后民族时代的欧洲”），而且他所举出的两个场合上哈尔斯坦讲话的意思还前后矛盾。[10]

1958年3月19日，当哈尔斯坦这位新就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他的首次演讲时，他把欧洲经济共同体描述为一个“由列国组成的具有强烈联邦色彩的共同体”。1964年10月15日，在罗马召开的全欧会议（Europäischen Gemeindetag）上，尽管他对旧式的民族国家主权的理念和“民族国家今日的政治形式”表示了否定，但他也表达了他的推论：“现存的政治秩序将会消解，一个欧洲的超级民族国家将取而代之。”他觉得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欧洲各民族的力量之源，使之变得更加生机勃勃”。[11]

对哈尔斯坦而言，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终点”的问题是不难回答的：他把欧洲经济共同体称作“尚未完成的联邦国家”——他虽未明说，实际上却是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成了榜样。[12]在这个问题上，夏尔·戴高乐成了他最强劲的对手，这位二战时期前“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1944年6月法国解放之后的首任政府首脑，在1958年5月又作为总理重新掌权，并在1959年1月8日作为总统执掌了自己亲手缔造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62年5月15日在令人永远难忘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斥责了这个欧洲超国家组织的始作俑者，并把这个组织称作乌托邦般的架构。戴高乐认为，欧洲只能够建立在行动、权威和责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列国的基础之上。“眼下，没有国家的欧洲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将这座大厦建立在现实情况的坚固基础之上；在付出了辛劳之后，或许有一天，我们能步入《一千零一夜》的童话之中。”[1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戴高乐这个“列国的欧洲”的理念若是没有英国相助是实现不了的，而英国恰恰是这位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拼命也要拦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并没有那位直到1969年4月才离职的前总统那样强烈的反英立场。蓬皮杜没有再像前任那样行使否决权，而且还在1971年5月与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取得共识，在未来尽可能用政府间的合作来取代越过民族国家政府的合作，而且还要让巴黎与伦敦密切协作，以便制衡欧共体中那个不但在经济上领先，而且政治上也越来越自信的成员国：联邦德国。[14]

英国与爱尔兰、丹麦一起，于1973年1月1日加入了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是1967年由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一起升级而成的）。这三个国家尽管都对参与共同市场饶有兴致，但都对超国家的西欧一体化进程不感兴趣。怀有同样心思的，是1981年及1986年加入欧共体的地中海三国：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

当冷战于1989年至1991年走向终结时，不难预计，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还远未结束。欧共体弥补了许多成员国现在已经难以独自应付的工作，正如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米尔沃德（Alan Milward）所言，欧共体已经成了其成员国的救星。[15]但是，民族国家在社会保障、法治秩序、日常的生活和交往中仍然履行着广泛的职责。而且在冷战结束25年之后，民族归属感的增长要比“欧洲人”认同感的增长强劲得多。即便在联邦德国地区也是这样——而德国的这个部分，原本是“将欧洲视为新祖国”思想的发源地之一。

曾几何时，那些西欧一体化的先锋越来越一致地认为：通过持续的融合过程，应该能在旧大陆根除20世纪将欧洲推向自我毁灭边缘的民族主义。在这个世纪接近尾声时，西欧民主国家已经在和平协作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它们之间爆发战争变成了不可想象之事，而且谁要是还拿民族主义那一套说事，简直就是自讨没趣。

但民族主义并不是在全欧洲的所有地方都被抛到了脑后。早在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就已经显示出，铁托（Tito）元帅去世（1980年）之后的共产主义制度无力化解部分加盟共和国[16]之间的民族冲突。在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当地的领导人、党的总书记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几乎在转眼之间就用一种鼓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取代了作为融合策略的共产主义。在克罗地亚，事情并无二致；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也依样画葫芦。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地区接二连三的战争和种族灭绝式的杀戮，为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仅见。

“民族国家，在经历了1989—1990年的欧洲革命之后走向了复兴”，这是安德雷亚斯·勒德（Andreas Rödder）的著作《21.0—关于当下的一部简史》（*21.0: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Gegenwart*）之中的金句。[17]原本统一的南斯拉夫解体分裂出了一堆种族相对单一的国家（只有波黑例外），苏联也解体了，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这些都成了这一判断的例证。非但如此，就连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在1989年至1991年剧变中领土未发生变化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经历了民族国家架构上质的变化：1991年华沙条约体系解体之后，这些国家从1968年勃列日涅夫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的境地走出，获得了完全的主权，现在也能够自由决定是否加入西方的联盟体系了。

从欧盟内部看，2004—2014年共有9个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和2个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入盟。这些国家大多都来自中东欧和东南欧，它们不出意料地特别珍视它们刚刚获得的主权，也对将主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机构一事充满怀疑。在保障其外部安全方面，他们更

信赖的不是欧盟，而是美国和北约——他们通通在1999—2009年加入了北约。因此，欧盟扩张的速度比深化的速度要快太多了，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深化自然就更多地意味着提升共同体的机构效率并加速其决策过程，同时还包括提升内部的团结和成员国相互之间的信任。

欧盟东扩之前，就已在1995年吸纳了3个中立国（奥地利、瑞典、芬兰），若是没有东西方冲突的结束，此事也断不可能发生。“1989年剧变”的后果，使得北约和欧盟当时的成员国必须面对早已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认识，即历史上西方的东部边界并未止步于大西洋同盟的范围，而是囊括了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欧盟也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重新认识自己。在2004年5月1日的“扩盟大爆炸”（big bang）之后，它在吸纳了8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也吸纳了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这些国家在20世纪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一些国家受到自由生活和市场经济极深的影响，而另一些国家曾被打上“专政”和“计划经济”的烙印。

其实西欧的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独裁统治，它们既曾在二战中沦陷于德国的占领之下，也曾受制于本国的威权或极权政权。而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国家，则为未来欧盟的集体记忆带来了“左”的专政和“右”的独裁。确切地说，它们的这些经历现在已经成了需要全体成员共同面对、认识和反思的历史。

在1989年之前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后民族时代”欧洲的人，必会对这数年剧变的后果感到深深的愤懑。这些后果让一些西方的，也就是联邦德国的历史诠释和现代诠释中的地方本位主义显现了出来。另一方面，所有那些曾经强调历史传统（更不用说民族传统）的力量牢不可破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已获证实。德国中世纪学专家赫尔曼·亨佩尔（Hermann Heimpel）说过：“在历史上，是诸民族的存在使欧洲成为欧洲。”[18]这当然是极端的说法。因为正如我们所见，欧洲（更准确地说，是“拉丁化的”欧洲）还有许多其他的共同点和特性。[19]但这些特征之一无疑就是众多的民族，以及旧大陆上与诸民族相伴生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参差多样。

另一个特征是地区特殊性，这无论在一国疆域之内还是跨越国界的地区都存在。这也是欧洲不得不处理的一份遗产。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Vertrag von Lissaben）被许多人视为《欧洲宪法条约》（Europäischen Verfassungsvertrages）的替代品，后者本来更加野心勃勃，却在2005年初的两次全民公决（法国和荷兰）中惨遭否决。该条约已经从制度上考虑到了一国之内的和跨国的地区主义问题，为此它预先设计了一个地区事务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一样隶属于欧洲议会。当涉及跨越边境协作事务时，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将听取该委员会的意见。

“诸民族一直彼此征战不休，各个地区一直苦苦忍受，它们联合在一起，永远守护着自家的特质，地区是自我认同的命根。”罗伯特·梅纳塞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话。[20]可是，若站在“各地区的欧洲”的立场去反对“诸民族的欧洲”就太荒谬了，也太危险了。若真这么干，则会马上刺激一系列的地区分裂运动：比如苏格兰的、弗拉芒的、加泰罗尼亚的，或是尤为好斗的巴斯克的运动，并因此导致众多欧盟成员国出现斗争问题。其中的巴斯克运动特别能说明这一潜在的危险性，地区运动并不一定是和平的——更不用说在现存更大一级的单位[21]解体之后经济上会遇到的不利处境了。一个追求超越民族的欧盟，可能会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而通过接手那些民族国家无法胜任的任务，它倒可成为位于诸民族之上的拱顶石。欧盟所要遵循的是辅助性原则[22]，当然到目前为止这更多地只停留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之中。按此原则，只有当某个低一级的单位力量不足时，其更高一级的单位才能将工作接管过来。这就为建立“越来越紧密的联盟”的理念设立了边界——该理念早在1957年就写进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Römischen Verträgen）中。此外，这也说明那些依然身为“条约主人”（“Herren der Verträge”）[23]的成员国决不想把自己变成多余之物。

---

[1] 拱顶石（Gewölbe，英语：keystone），又名拱心石。拱顶多见于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在拱顶这种建筑形式中，最顶端要有一个石块使得各个方向上的石头相契并承受其压力。作者以“拱顶石”隐喻自己心目中欧盟所应当扮演的角色。

[2] Oskar Lafontaine, *Die Gesellschaft der Zukunft. Reformpolitik in einer veränderten Welt*, Hamburg 1988, S. 188 f.

[3] “旧联邦共和国”（alte Bundesrepublik），指在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之前的联邦德国。

[4] Ernst Dassmann, Ambrosius, in: *Teologische Realenzyklopädie*, Bd. 2, New York 1978, S. 362-385.

[5] 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deutsche Diktatur. Entstehung, Struktur, Fol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Köln 1979[6], S. 544（第五版后记）。

[6] Ders., Politik und Zeitgeist. Tendenzen der siebziger Jahre, in: ders. u. a., *Republik im Wandel 1969-1974. Die Ära Brandt (=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V/1), Stuttgart 1986, S. 285-406 (405 f.).

[7] Jürgen Habermas, 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und die Zukunft der Demokratie,in: ders., *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Politische Essays*, Frankfurt

1998, S.91-169.

[8] “后经典形态民族国家”（postklassischer Nationalstaat）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Heinrich August Winkler,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München 2005[4], S. 12。

[9] 卢森堡的增值税税率一直为欧盟最低。

[10] 上面这段哈尔斯坦的话出自Ulrike Guérot und Robert Menasse, Es lebe die europäische Republik,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24. 3. 2013; 第二段引文出自Robert Menasse, *Heimat ist die schönste Utopie. Reden (wir) über Europa*, Berlin 2014, S. 144; 第三段出自ders., *Kurze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Zukunft. Oder warum wir erringen müssen, was wir geerbt: Das Europa der Regionen*,in: www.eurozine. com/articles/2015-07-17-menasse-de.html。

[11] Walter Hallstein, Vor de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Konstituierende Sitzung, 19.3. 1958, in: ders., *Europäische Reden*. Hg. v. Tomas Oppermann, Stuttgart 1979,S. 48-52 (49); ders., Die Einheit der europäischen Aktion, VII: Europäischer Gemeindetag, Rom 15. 10. 1964, ebd., S. 485-498 (488-496).

[12] Ders., *Der unvollendete Bundesstaat. Europäische Erfahrungen und Erkenntnisse, Düsseldorf,* 1969.

[13] Zit. bei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3: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5[2], S. 363.

[14] Zit. bei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3, 565.

[15] Alan Milward, *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 Berkeley 1992 (446 f.).

[16] 1963—1991年，南斯拉夫的正式名称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45—1963年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由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组成。参照对苏联国家体系译法的习惯，本文将组成该联邦的共和国译为“加盟共和国”。

[17] Andreas Rödder, *21.0: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5, S.212.

[18] Hermann Heimpel, Entwurf einer deutschen Geschichte, in: ders., *Der Mensch in seiner Gegenwart. Acht historische Essays,* Göttingen 1957[2], S. 162-195 (175).

[19] Hermann Heimpel, Entwurf einer deutschen Geschichte, in: ders., *Der Mensch in seiner Gegenwart. Acht historische Essays,* Göttingen 1957[2].原文第17页。

[20] Menasse, *Heimat,* S. 80.

[21] “单位”（Einheit），或“统一体”，这里指的是民族国家。

[22] “辅助性原则”的本来意义来自天主教的宗教社会学，它主张只要个体或小社会团体有能力，就应由其承担责任和完成任务，大社会团体或国家不要干预，除非是在个体或小社会团体不能解决问题之时。这一原则运用到欧盟意味着：只有当欧盟成员国不能足够好地承担某项任务且只有欧盟介入才能更好地完成该项任务时，欧洲联盟才能介入与参与。该解释引自连玉如：《再论“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刊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第9—24页，此处在第18页。

[23] “条约主人”特指欧盟成员国。由于关于欧盟体系的核心决定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方能生效，所以人们将这些成员国称为“条约主人”。相应地，欧盟委员会被称为“条约的守护人”。

第3章

一个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欧洲吗？

这一幕发生在1963年9月12日：在出席与土耳其签订《联系国协定》（Assoziierungsabkommen）的仪式上，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首任主席瓦尔特·哈尔斯坦在安卡拉发表了一番讲话。其中的一句，燃起了东道主炽热的期望："终有一日，我们能走完最后一步，让土耳其成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1]

哈尔斯坦的讲话是对《联系国协定》第28条的一个非常宽泛的解释。这一条的原文是："一旦协定的运行使如下条件具备时，即土耳其能够完全承担共同体成立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时，签约方将评估土耳其加入共同体的可能性。"[2]

在随后的25年里，在土耳其所发生之事并不太符合1963年的乐观期望。仅1971年和1981年，土耳其军方就发动了两次政变。军方一再保证土耳其会继续向欧洲共同体靠近，但却难以让布鲁塞尔信服。1982年，土耳其在22年内发生了第三次政变之后，欧共体委员会暂时中止了《联系国协定》。1987年，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领导下的民选政府提交了一份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的申请，但被欧共体委员会以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侧畔之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尚不稳定为由拒绝了。不过，欧共体委员会让1963年的协议于1988年再次生效，并且强调了继续开展合作的意愿。

1993年6月，在丹麦首都，由欧共体升级而成的欧洲联盟峰会发布了衡量一国家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该标准包括：有稳定的民主和法治秩序、保障人权、尊重少数族群的权利、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有竞争力，并且完全认同欧盟这个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各个目标。[3]

哥本哈根标准成了欧盟东扩的准绳，但它却在安卡拉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土耳其政府觉得，这些在自己已经成为"联系国"之后30年才颁布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自己，可又改变不了欧盟的规定。1996年初，欧盟与土耳其关于关税同盟的条约生效。同年，欧盟虽然宣布土耳其是一个潜在的入盟候选国，但却没有像对待中东欧国家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那样授予其正式的候选国身份。安卡拉对此的反应是于1997年12月中断了与欧盟的关系。

1999年底，事情出现了转机。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盟国家及政府首脑峰会

上，土耳其被授予了入盟候选国身份。这是美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的结果：克林顿总统出于地缘战略的考量，希望看到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能与欧洲紧密联合起来；愈演愈烈的恐怖活动也是其考量中的一个因素。华盛顿的压力之所以能起作用，首先要归功于德国1998年10月刚刚上台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领导的红绿联合政府[4]。施罗德与其前任——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不同，对土耳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一事并没有坚定地持保留态度。对组成联合政府的两党而言，更有一个国内政治方面去回应安卡拉入盟渴望的原因：社民党（Sozialdemokraten）和绿党很可能考虑到德国的土耳其裔选民会因此倾向选择它们，而非那些C字打头的党派[5]。

土耳其为了呼应赫尔辛基会议所给出的信号，施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其中包括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解放公民权利，集会、抗议的权利。这些改革又使欧盟在2002年12月的哥本哈根峰会上决定为接下来的进程给出一个时间表：只要土耳其在2004年12月前满足成为一个成员国所需的政治条件，届时即开启入盟谈判。在安卡拉，自2002年11月后掌权的是温和派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该党主席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从2003年3月起出任国家总理，并继续推行了其前任穆斯塔法·比伦特·埃杰维特（Mustafa Bülent Ecevit）的改革路线。在埃尔多安政府治下，连战争时期的死刑也被废除了，而且还废除了酷刑并取消了警务人员免受惩处的特权，进一步巩固了集会与抗议自由，同时至少在书面上禁止了对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歧视。

2004年12月17日，欧洲理事会积极评价了埃尔多安政府的改革政策，因此决定向欧盟委员会建议：如果土耳其的革新过程继续下去，并且其人权状况持续得到改善，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满足了入盟所需的政治标准，并可以于2005年10月3日开启入盟谈判。另一个条件是土耳其需要签署一项1963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的《联系国协定》的“附加议定书”，与此相关的是关税同盟要扩展到新近入盟的10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土耳其尚未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埃尔多安于2005年7月接受了这项要求，但有所保留的是声称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上承认（希腊裔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欧盟25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接受了土耳其总理的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声明，以便在欧盟“路线图”中的最后期限——2005年10月3日——这一天展开入盟谈判。

在还没有进行一场关于赞成还是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大辩论之前，新千年之初的这些计划就开始实施了。但从2002年秋季开始，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当然，这些声音都出现在欧洲大陆——英国早就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因为这样一来伦敦就更有把握拒绝欧盟内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在法国，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总统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支

持者，尽管其所在党派“人民运动联盟”（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简称UMP）对此有强烈的保留意见。在德国，联盟党反对这个让土耳其成为正式成员国的计划。奥地利人民党和法国的人民运动联盟也持相同观点。它们所宣传的是名为“特殊伙伴关系”的替代方案。该方案所吸纳的建议，最早出现在2002年11月的《时代周报》（*Die Zeit*）上的一篇文章之中。[6][7]

除了希拉克之外，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领导人还有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以及欧盟委员会负责成员国扩充问题的德国社民党人京特·费尔霍伊根（Günter Verheugen）。在施罗德的回忆录中，他简明扼要地讲出了他赞成土耳其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的主要理由。施罗德把土耳其入盟的战略意义看得比这个国家从1963年起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后来的欧盟的政治承诺更加重要。“土耳其连接欧亚的独特地缘政治位置，它对欧洲能源安全的意义，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分量，将使欧盟获益良多。此外，一个深深嵌入欧盟的土耳其还能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8]

对与土耳其之间的入盟谈判持批评态度的有：奥地利联邦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Wolfgang Schüssel）、荷兰首相扬·彼得·巴尔克嫩德（Jan Peter Balkenende）和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他们并没有否认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侧畔之国极高的战略意义，但却对欧盟过度扩张的危险提出了警告。其中一些人认为，单单土耳其对伊斯兰世界的那种犹豫、暧昧的态度，就足以令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欧盟将它拒之门外。另一些人则强调凯末尔主义在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面的遗产，凯末尔主义是建国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的政治主张。这些批评者认为土耳其是一个以独立自主而骄傲的国家，所以很难指望其能心甘情愿地满足“哥本哈根入盟标准”的要求：这个标准会要求它与一个政治性联盟合作，而在该联盟中主权越来越以联合的形式行使，或被让渡给一个超国家机构。

批评者们还认为，由于土耳其强劲的人口增长，德国将很快被挤下最大欧盟成员国的位置，于是这个共同体的性质会因此而被彻底改变：与成为日益紧密的联盟的构想越来越远，而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和平淡无奇的自由贸易区。有鉴于此，2005年10月开始的入盟谈判不但如欧盟一方所言是“结局不定”的，而且也是“选项不定”的——这意味着，其目标除了实现正式入盟外，实现“特殊伙伴关系”也是一种选择。“特殊伙伴关系”是一种欧盟和土耳其能在谈判中实现谅解的基础之上的“升级版联系国”方案。这种可能性也以某种隐而不彰的形式，被纳入了入盟谈判的内容之中。

在经济领域，入盟候选国土耳其的表现令其欧洲伙伴们十分满意。2004—2006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8.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5300欧元增加到了6000欧元。这几年，土耳其的财政赤字平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3%，显著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所规定的3%。不过在2005年10月入盟谈判开启之后，埃尔多安政府的政治改革却明显滞后。欧盟委员会2006年的报告指出了土耳其在废除酷刑方面的不足、军人操控政治的弊病和对言论自由权的保障不力。

欧盟特别尖锐地批评了《刑法法典》（Strafgesetzbuch）第301条。一再有人因为宣称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是种族灭绝行为，或是因为指责土耳其在这一事件中犯有反人类罪行，而因刑法的这一条款被控告和宣判。2005年10月，亚美尼亚裔的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 Dink）就因为触犯这一条而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期执行）。2007年10月，即丁克遭一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之后9个月，他的儿子阿拉特（Arat）又因为同一条款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无缓期）。仅2006年一年，就有超过800起触犯《刑法法典》第301条的案件。在2008年4月颁布的新修订的《刑法法典》中，“土耳其特性”（Türkentum）的概念被换成了“土耳其民族”（türkische Nation），而且将最高刑期降为2年。欧盟委员会有种种理由认为，土耳其言论依然不自由，而且非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宗教自由也几乎没有改善。

除此之外，入盟谈判中的另一个大的阻碍是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态度。自1974年以来，塞浦路斯分裂成了分属希腊裔和土耳其裔的两个部分。从2004年起属希腊裔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已经是欧盟成员国，但土耳其依旧拒绝对它的船只、飞机开放自己的港口和机场。而且，虽然与塞浦路斯相关的附加条件在1963年《联系国协定》之上的“附加议定书”已经过埃尔多安同意，安卡拉的议会却坚决不予批准。因此，欧盟在2006年12月决定暂停谈判中的8个主题，其中包括“商品自由流动”、“自由定居”、“关税同盟”和“外交关系”。到这时为止，仅有1个主题（关于科学和研究）的谈判得以完成。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在开始后一年就卡在了死胡同里。

在随后的十来年中，谈判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土耳其，埃尔多安执政越久，他政策中专制的、伊斯兰的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就越强。这位总理采取了与以色列相冲突的政策。他不是与欧盟增进关系，而是与阿拉伯世界中的逊尼派“主流”拉近距离。他的优先目标一目了然：确保土耳其作为地区性强国的地位。这个目标与欧盟的期待完全不能相容——欧盟期待它能准备好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主权，或是把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

在内政方面，土耳其至少从2012年开始已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言论自由和抗议自由因此而受到威胁。据报刊报道，在2012年3月共有104名记者被关进土耳其监狱，其中有64人是库尔德人。据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统计，在2013年夏天镇压抗议（人们反对在受欢迎的盖齐公园中施工）的警察行动中，有8000多人受伤，3人丧命。

2014年3月，埃尔多安下令屏蔽了短消息发布平台“推特”。在此之前，有人在该平台发布了窃听到的总理电话，从而证实了这位政府首脑和他的一个儿子牵涉到一桩盘根错节的腐败丑闻之中。然而，埃尔多安却并不愿意放弃他的目标：在2014年夏天的第一轮直选中竞争国家总统的位置。7月1日，他被正义与发展党推举为候选人。8月10日，埃尔多安在第一轮选战中赢得了52%的选票，从而获得了绝对多数。在自己的战略目标上，这位选战的胜利者不容出现丝毫游移，他所追求的是建立类似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制度—— 一个土耳其的总统制国家。[9]

但并非所有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都认同这样一个更替体制的目标。在2015年6月7日的国会选举中，这个一直单独执政的党仅获得了41%的选票，从而失去了绝对多数。而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简称HDP）所获的选票则上升至13%。[10]埃尔多安将其所在党派的失败视为个人的耻辱（尽管作为总统他有义务保持党派中立），并决定放弃即将开始的与国会中诸党派进行的联盟谈判，而宣布于2015年11月1日举行新的大选。

总统利用这个间隔期，完全改变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从2013年开始的与库尔德地下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简称PKK，土耳其官方一直称其为“恐怖组织”）举行的会谈宣告破裂。土耳其空军开始密集轰炸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阵地，其猛烈程度大大超过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打击——尽管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将“伊斯兰国”称作（也确实当作）叙利亚内战中的头号敌人。

从2011年起，叙利亚内战所造成的难民就把土耳其当成了逃难的主要目的地。据估计，到2015年秋天其人数已达200万人。正是这段时间里，土耳其设法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转移到最近的希腊岛屿上去，这样一来他们踏上欧盟的土地就不再有任何障碍了——其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难民会浩浩荡荡地沿着“巴尔干路线”一直走到中欧和北欧，特别是德国。所以，在选战后期的那些日子里，欧盟委员会和德国都试图说服埃尔多安在难民问题上采取一种合作的政策。同样是为此目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于2015年10月18日亲自拜访埃尔多安——而土耳其的反对党则批评她这样做是在选举中为总统的党派站台。

这些努力尚未取得具体的成果。但其代价却很明显——这位总统对于在尚需详细讨论的难民问题上提供协助一事已经开始要价。除了要求欧盟大力支持土耳其在照顾叙利亚难民方面的人道主义举措之外，还要求加快入盟谈判的进程，并增加了土耳其人免签入欧的希求。

然而，对执行严厉的反库尔德工人党路线的埃尔多安而言，2015年11月1日举行的第二次议会选举的结果很可能要比他与德国女总理的对话重要得多。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了49.5%的选票，从而夺回了绝对多数，而人民民

主党和奉行极右路线的民族运动党（简称MHP）则惨遭失败。尽管正义与发展党尚未掌握足以修宪的多数选票（五分之三），但这位总统离他建立总统制国家的目标确确实实近了一大步。

不久之后，土耳其离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目标也越来越近了。2015年11月29日，参加欧盟与土耳其峰会的达武特奥卢（Davutoğlu）总理获得了欧盟的承诺，欧盟许诺会在不久的将来把与经济和货币相关的第15个（总共35个）主题加入入盟谈判中。欧盟从这项让步得到的回报是：土耳其愿意切实有效地阻止难民潮涌向欧洲，并且还会接收那些非法越境进入欧盟区域的第三国公民。

可是，土耳其究竟是不是还在认真努力地加入欧盟，还需要打上一个大问号。2016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提及。其政治领导人对7月15、16日的未遂军事政变的反应，构成了一个转向威权主义的转折点。同样，若是参照1993年“哥本哈根标准”所写明的法治国家标准，这个转折点也意味着法治程度的大幅倒退。支持正义与发展党的民众所要求的，且获埃尔多安支持的恢复死刑的做法，将会立刻导致入盟谈判中断：在这一点上，欧盟委员会讲得十分清楚。

在欧盟为土耳其许下成为正式成员国的愿景时，其实一直都在用愿望引领自己的思维。那种认为凯末尔的继承者们会在短短数年之内就接受“哥本哈根标准”中西方价值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mus）的表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这位新土耳其的国父，一直想让他的国家彻底实现现代化，并且掌握欧洲的各项成果——只要这些成果与他对现代性的威权主义的理解相符合；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一西方价值规范的核心——却并不在其中。而不管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多安与世俗主义者凯末尔在其他方面的区别有多么大，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这位现代土耳其之父的传统。

对欧盟而言，从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中所学到的教训是：地缘战略上的扩张是有其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其所触及的国家在政治上和价值规范上的身份认同。一种无视这个道理的扩张政策并不会让共同体变得更强大，恰恰相反，它会让欧盟变得空洞并走向毁灭。

---

[1] Walter Hallstein, Assoziation der Türkei, in: ders., *Europäische Reden*. Hg. v. Tomas Oppermann, Stuttgart 1974, S. 438-440 (440).

[2]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uri＝CELEX:21964A1229(01).

[3]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fortan: Geschichte IV):Die Zeit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6^{3}, S. 34 f.

[4] “红绿联合政府”，指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以红色为党派主打色）和绿党（主张环保，以绿色为党派主打色）组成的联合政府。

[5] C字打头的党派，指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CSU），这两党一直都共同进退，所以又合称为联盟党，以黑色为党派主打色。

[6] Ders., Grenzen der Erweiterung: Plädoyer für eine privilegierte Mitgliedschaft mit der Türkei, in: ders., *Zerreißproben. Deutschland, Europa und der Westen. Interventionen 1990 bis 2015,* München 2015, S. 130-134（最初以编辑的标题“Wir erweitern uns zu Tode”发表于*Die Zeit,* Nr. 46, 7. 11. 2002）。

[7] 本书的作者正是该替代方案的提出者。

[8] Gerhard Schröder, *Entscheidungen. Mein Leben in der Politik,* Hamburg 2006, S.356.

[9] Zum Vorstehenden: Winkler, *Geschichte IV*（注释3），S. 285 ff., 496 f.; Claus Leggewie (Hg.), *Die Türkei und Europa. Die Positionen,* Frankfurt 2004。

[10] 按照土耳其法律，一个政党只有在得到10%以上选票后才有机会进入国会，所以这次选举对人民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第4章

缺少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

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欧元是德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这样就不能改变法国反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想法。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早在1988年夏天，欧洲共同体就已经开始为创建一个经济兼货币同盟做准备——而这个构想又可以追溯到一个早得多的项目，即1970年以卢森堡总理皮埃尔·维尔纳（Pierre Werner）的名字命名的“维尔纳计划”（Werner-Plan）。一年之后的1989年6月底，欧盟的马德里峰会做出决定：从1990年7月1日起迈出该计划的第一步。

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西欧已经有了共同的货币政策。1972年4月，欧共体成员国建立了所谓的“货币队列”，这意味着它们彼此之间要就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浮动区间达成共识。当1973年3月创立了近三十年且由美国主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联邦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丹麦协商一致：让它们的货币共同对美元“浮动”，但同时又在彼此的货币之间维持固定汇率。不过，1974年初法国就退出了这个紧密的货币同盟。到了1979年，1972年的“货币队列”解散而且升级成了“欧洲货币体系”（简称EWS）——它借助“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简称ECU）而构成了一个自洽的货币兑换体系。这个新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是固定但略有弹性的汇率，其狭窄的浮动区间是增减0.225%以内。英国没有参加欧洲货币体系。

这个新体系的推动者是法国的自由派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和德国的社民党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季斯卡·德斯坦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欧洲货币体系来结束法国的通货膨胀。令施密特感兴趣的是抑制因美元下跌而导致的德国马克升值，否则联邦德国的出口和竞争力会被拖累。但波恩与巴黎之间的分歧仍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法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贬值，而德国马克则持续升值——季斯卡·德斯坦的继任者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认为，这样一种发展状况对法兰西的荣誉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在他看来，要除去这个弊病，必须把德国马克——他在1988年8月的法国部长会议上称其为“德国的原子弹”——升格为一种欧洲的共同货币。[1]

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之际，密特朗万分紧张。民主德国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如此一来“德意志问题”又必将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

之中。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11月28日把《十点声明》（Zehn-Punkte-Erklärung）提交联邦议会之前，没有跟法国也没有跟任何西方大国商量过。而且他还在这份声明中把国家的重新统一当作目标，这一点让法国总统很生气。两天之后，密特朗警告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如果波恩准备凭一己之力在德意志问题上蛮干，那么他甚至有可能去召集包括苏联人在内的欧洲列强来对德国采取共同行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做的那样。[2]

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得到德国马克的支撑，而德国马克又有联邦德国强盛的经济做担保，这将会顺理成章地给欧洲降下一个霸权力量——密特朗害怕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一恐惧也主导了他的德国政策和欧洲政策。如果转从积极的一面看，那么这意味着联邦德国若是能声明，引入欧洲共同货币要优先于欧洲的政治统一——让欧洲共同货币拥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法国就不会反对它的东部邻居再度统一。

从前，赫尔穆特·科尔从未怀疑过：欧洲的货币统一和政治统一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样一个一揽子计划不仅是他个人的信念，同时也是联邦德国欧洲主义的核心。然而，密特朗的态度却渐渐令他改变了想法。科尔不想让德——法关系的裂痕阻碍德国的统一，于是他在1989年12月5日让步了——几天后欧共体就要在斯特拉斯堡召开峰会。在一封致法国总统的信中，科尔赞成于次年年底召开一次有关经济联盟和货币联盟的政府会议。12月8日，欧洲理事会就此方案达成一致。

四个半月之后的1990年4月21日，欧共体的外交部长们在都柏林决定：在举行关于货币同盟的政府会议的同时，再举行一个推进创建政治同盟进程的会议。这样一来，欧洲的货币统一和政治统一这两件原准备一起办的事，就变成了两件同时推进但分别办理的事。这是波恩为了法国能同意德国统一而付出的代价。[3]

联邦德国转变其路线的意义高得难以估价：早在1989年11月27日科尔就已在给密特朗的信中指出，鉴于一些欧洲国家的财政赤字依然很高（这其中也包括法国，但他没有点明），他请求到1990年底再决定是否召集一场筹备货币联盟的政府会议。但密特朗的威胁起了作用，事实上科尔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很快就不再提他关于稳定性的论点了。如果说科尔总理此前一直主要在联邦德国宣传他的“加冕论”的话，从现在起他的想法已经接近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主席领导下的欧盟委员会所钟爱的“创造论”。[4]按“加冕论”，货币统一是完成欧洲政治统一的最后一步（即“加冕”）；“创造论”则认为：货币的统一会为政治统一创造条件。

但那时候科尔似乎还没想到，他的路线转向意味着组建政治联盟的进程会

无限期地延宕下去。直到1991年11月6日，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获通过的数周前，他还在向联邦议会宣称“那种认为可以在没有持久政治联盟的情况下组建货币联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这是从当代历史——而且不单单是德国历史——中得出的教训。[5]然而，科尔总理在这里所表达的其实只是一个愿望。但事实上，事情自1990年12月两个政府会议（一个讨论经济及货币同盟，另一个讨论政治同盟问题）同时分别召开之后就已经偏离方向，一年之后，它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后续付出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挽回。

如果狭义地就货币联盟的设计而言，1992年2月7日在马斯特里赫特庄严签署的关于欧洲联盟的条约所依照的主要是德国的设想：欧洲中央银行（简称EZB）应该像德国联邦银行那样独立。国债应该受到严格控制：预算和实际的财政赤字一般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价格计算）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只有当成员国在支出、通货膨胀率、利率和财政赤字方面严格遵守1979年商定的趋同标准，并且在这些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的情况下，才能按照计划，最迟于1999年初开始进入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此后，“主权债务”原则继续适用：违约风险由各国承担；根据“不救助”原则，各国对其他国家的债务不承担责任，英国有权不参与第三阶段。

当货币联盟已呈现清晰的轮廓时，各成员国在政治联盟方面基本上毫无进展。对于“政治联盟”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巴黎与波恩之间尚有分歧。德国方面倾向于按联邦制结构理解——不过也没有去精确地定义这具体是什么意思，而法国人则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个主权国家们在其中进行更密切合作的结构。对英国人来说，“联邦制”是一个根本就不能提的词。丹麦人的想法也基本类似于英国人。

经过长期谈判，各国首脑终于认可了其实早在1957年《罗马条约》序言中就已经宣布过的“越来越紧密的联盟”的目标和辅助性原则（按此原则，只有当某个低一级单位的力量不足以完成其任务时，更高一级的单位才能将工作接管过来）。除国家公民身份之外，还出现了联盟公民身份，根据居住地原则，它关系到社区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新成立的地区委员会，赋予了地区和地方当局维护自己利益的机会。根据“共同决定程序”，欧洲议会在一系列事项上对欧洲理事会[6]的提议拥有不同级别的否决权。此外，欧盟委员会的任命也必须取得欧洲议会的同意。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欧洲共同体变成了欧洲联盟。从此，欧盟为其三大“支柱”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空间或者说共同的穹顶，这三大支柱是：欧洲共同体、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简称GASP）、司法及内政合作。只有第一根支柱有超国家合作的特性，它是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共同体各项条约的基础上达成新的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共识。而第二根和第三根支

柱只涉及“尚未纳入共同体范围的”领域，或者说只是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7]

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已于1990年1月1日开始了。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成员国之间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成员国货币政策的趋近。1994年1月1日开始的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创建欧洲中央银行（于1998年7月1日开始正式运行）。按计划，第三阶段最晚不迟于1999年1月1日开始，此后各国尚保留的货币政策手段将全部移交给共同体。把1999年1月1日确定为进入第三阶段的“最后期限”，是联邦总理科尔在德国联邦银行对此表示严重忧虑的情况下，对弗朗索瓦·密特朗所做的一个政治让步。

绝大多数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专家都对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协议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早在1992年就已经指出：欧洲货币联盟所囊括的是一个高度异质的经济空间。在此空间内，那些能力更强的国家，传统上有好的财政纪律和稳定的币值，而那些能力较弱的国家却并非如此——这些弱国比其他国家更习惯于放纵通货膨胀和债务堆积。[8]

在牛津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于1995年12月接受《明镜》（*Spiegel*）周刊采访时说：“货币联盟这项工程想把德国的行为方式教给其他国家，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想要像德国一样行事。对意大利而言，偶尔货币贬值，比死守着固定汇率更有用；对法国来说，更多的政府开支比严格遵守主要由德国奉行的财政平衡标准更有意义。”[9] 1998年初，有15位德国经济学家表达了比较委婉的看法：虽说拥有一种共同货币是必要的，但这来得太早，因为并非所有成员国都达到了趋同标准。[10]

到这时为止，这些受到评论家批评的差异性是通过各国本币的升值和贬值体现出来的，而且也因此得到控制。但从1998年开始，较弱的经济体只能通过降低工资、薪金和社会福利等“内部贬值”的方式，或是通过或多或少地“加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所规定的稳定标准来寻找出路。1996年12月在都柏林签署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再一次修订和细化了《马约》的标准。它规定各国每年的财政赤字[11]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得超过3%，这个上限只有在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下降3%以上时才能超过。如果某国强行违反稳定标准，那么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就可以在取得三分之二多数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制裁。

对经济和财政上较弱的欧元国家而言，欧洲共同货币的引入意味着更低的利率，这会在更大程度上诱使国家和非国家的经济主体增加借贷。届时，一个欧洲的货币同盟必须保持物价稳定以提升竞争压力，并且加重对企业

违规行为的惩罚。为了应对这些危险，不仅需要严格监管欧洲的银行，还需要真正的财政联盟，最终还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和持久的政治联盟，该联盟要协调各成员国的预算、财政和经济政策，并在必要的时候能以自行启动的制裁去强制执行协调。然而，这样一个方案却缺乏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欧洲诸国的政府必须能够意识到它是必不可少的。

1997—1998年，当货币同盟第三阶段的脚步日益临近，觉得越来越紧张的并不止德国。在这之前的几年里，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在想方设法去满足《马约》所设定的条件。不过，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欧盟“令人担心的孩子”（即使不算马上要详谈的特例——希腊）的国债率都远远超过商定的60%；而且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大利的财政赤字都居高不下。在那几年，意大利政府靠所谓的“欧元税”的帮忙，把财政赤字率从1995年的7.5%降到了1997年的2.5%和1998年的2.7%。而这（暂时性的）“欧元税”，其实就是对出售国家黄金储备所得的利润征税，是彻头彻尾的人为操纵。

在德国，即便是像萨克森州州长[12]库尔特·比登科普夫（Kurt Biedenkopf）这样科尔总理著名的党内伙伴，也认为应当推迟引入货币联盟的时间，因为在原定时间点上还有许多未来欧元区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13]但此时的赫尔穆特·科尔在政治联盟一事上的决心已经远不如20世纪90年代初，他坚持要把1999年1月1日引入共同货币的事情在1998年大选之前敲定，并使之不可逆转。这样一来，他可能的继任者，社民党人格哈德·施罗德也就无从再改弦更张。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施罗德，曾在1998年3月26日接受《图片报》（*Bild*）采访时将欧元称作“带病的早产儿”。[14]在科尔离职7年后的2005年4月，卢森堡总理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庆祝科尔75岁生日的宴会上，回顾了这位德国前总理在欧洲共同货币诞生中的角色。他说“在那一刻如果没有科尔”，现在就根本不会有欧元。[15]

当欧元于1999年1月1日成为非现金流通中的支付手段时，15个欧盟成员国中只有11个参与其中。英国始终坚持其“不参与”（opt-out）的立场；瑞典和丹麦保留了自己的决定权。在2000年夏天丹麦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多数民众（53%）反对欧元。3年之后的2003年夏天，有56%的瑞典公民在全民公决的投票中反对引入共同货币。希腊则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排除在外：它的经济数据不过关。希腊的国债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9.7%，财政赤字率高达6%，通货膨胀率高达5.5%，这让它根本没有可能成为欧元区成员。

然而2000年，希腊成功地让经济与货币联盟接纳了它。这样一来，在2002年1月1日欧元开始以硬币和纸币的形式进入流通之际，欧盟中就能有12个成员国参与其中了。鉴于欧盟专门负责统计的机构欧洲统计局

（Eurostat）也未对此发表异议，各国的财政部长以至国家和政府首脑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去质疑希腊数据的正确性了。

2004年11月，当保守的希腊新民主党（Nea Dimokratia）胜选之后8个月，该党的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Kostas Karamanlis）政府承认：上一届的康斯坦丁诺斯·西米蒂斯（Konstantinos Simitis）的社会主义派[16]政府向欧盟提交了虚假的数据。在作为参考年份的1999年，其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远高于所允许的上限。为了将这个数字美化至1.8%，有很大一部分军费开支没有纳入财政赤字的计算之中。希腊加入货币联盟，是一桩国家欺诈事件。在该国获准成为成员国之后，欺诈还在继续。雅典从纽约的投资银行高盛那里获得了一笔秘密贷款，这使希腊能在表面上大幅削减其美元和日元债务。凭着这份“优质服务”，高盛赚了3亿美元。[17]

当希腊在1981年带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加入欧共体时，应该感谢那种由来已久的，自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时期就开始出现的亲希腊情绪，法国前总统季斯卡·德斯坦还曾在1981年这样说过：“人们可不能让柏拉图去踢乙级联赛。”[18]当时还有一种观点也深受欢迎：由于希腊曾是欧洲民主的摇篮，所以欧洲有义务对希腊表示感激——可如果人们能看到雅典的集会式民主仅代表了多么少的人口，看到当时的政治程序中真实的权力关系，看到古典时期的希腊有多么缺乏人权，就会发觉这只是个神话！[19]

在2000年前后，这股亲希腊情绪的效应依然不可阻挡。考虑到希腊行政部门是出了名的不靠谱，其他欧洲国家和欧盟本应该批判性地看待所谓的赤字下降才是，结果它们竟然坐视不管——接纳希腊入盟意味着所有参与其中的政府和机构在政治上的无能。而且，这次显现出的无能尤甚于1996—1997年的那一次——容忍意大利在财政数据上耍手段。

然而，若是将此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之下观察，那么让希腊成为第12个欧元区国家的决定就不那么出格了。欧元之所以能诞生，靠的就是各国对“政治优先”原则的自愿认同。根据该原则，政治上的考虑应永远优先于经济上的考虑。在德国，按此原则确定优先性的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红绿联合政府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因为是其相信了希腊的数据，并且支持了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愿望。

会动脑筋的不光是希腊，2000年之后，连那些欧盟的“老成员”也展现出了各种既能突破《马约》中所商定之限制，又能规避因此而可能导致的制裁的方法和套路。首开先例的是德国。红绿联合政府以“议程2010”为题自2003年起在德国推行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福利改革，成了施罗德总理为超过3%上限所寻找的借口。其实德国早在2002年就突破了这个标尺；2004年，其财政赤字率已达3.8%，次年为3.7%。到了2004年12月，为了逃避欧盟委员会威胁要启动的赤字调查程序，柏林才宣布会在2005年把财

政赤字率降到2.9%。

但在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密切磋商之后，施罗德违背了这个诺言。法国对“软化”《马约》中各种严格限制同样抱有兴趣。早在2003年，柏林和巴黎就阻止了欧盟委员会以发“蓝皮书”的方式向那些突破了“3%标准”的欧元区国家警示预算纪律的打算。欧盟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此行事，鼓励了其他成员国纷起效尤。不过，施罗德认为这回突破规则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他相信，严格的政策议程会阻止德国人得寸进尺。希拉克就用不上这个理由了：法国放弃了那些本来与德国的方案也只是略有些相似的改革。

如果说2002年是12国组成的货币联盟把欧元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而2009年该联盟的成员已达16个。斯洛文尼亚于2007年加入，随后是2008年的塞浦路斯和马耳他、2009年的斯洛伐克、2011年的爱沙尼亚、2014年的拉脱维亚和2015年的立陶宛。2001—2007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是1.96%，这低于欧盟（2.18%）和美国（2.41%）的数据。在1999年开局时，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是1.18：1，明显高于汇兑平价（Parität）。在2001年其对美元的汇率暂时跌至1：0.87，随后又在2008年升至1：1.59。在之后几年中，欧元汇率剧烈震动，并于2015年底再次停留在与美元的汇兑平价上下。

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无情地暴露了许多欧洲经济体的弱点。虽然德国从红绿联合时代的改革中获益，并在货物出口和资本出口方面都出现了高额顺差，但欧元区许多国家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爱尔兰和西班牙，2007年之前的“好年景”膨胀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了；葡萄牙也开始尝到了其大手大脚又漏洞百出的基础设施政策的后果。

希腊的情况最为严峻：国内两大政党以裙带关系组织的权贵经济；两党都将公共服务部门看成为自己的（大多在专业上不合格的）追随者提供饭碗的机构；臃肿不堪的军事机关；古旧的土地登记体系；船主和东正教会（它同时还是除国家之外该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事实上根本就不交税；司法和征税机关的低效；系统性逃税并非巨富们的专利，而是遍及多个社会阶层的行为——对所有这些弊病，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长久以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09年底，希腊的公共债务率几乎达到130%，比欧盟标准（60%）高出2倍有余；到2013年7月，其债务率已攀升至160%。共同体的一系列“救援方案”已从2010年起开始实施，但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改善。2011年开始的“债务减记”——私人债权人放弃一部分对希腊债权——也同样没什么效果。

为了希腊，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将“不救助”原则抛到了一边，因为它们担心希腊债务危机会蔓延到其他地中海国家。这些令人担忧的国家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塞浦路斯之外，还有包括2012年公共债务率已达127%的意

大利——这已远远高于《马约》所规定的上限。就连法国，也经常不遵守布鲁塞尔关于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的规定。

如果地中海国家的病态发展存在一个共同原因的话，那就是与欧元相伴生的低利率。低利率有利于那些在财政上拖拖拉拉的做法——尤其是在社会福利分配的领域。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没有去推行已被耽误的结构性改革，却长期奉行一种让其所占有的财富保值、增值的政策，而这些财富凭其自身的力量本来是挣不来的。

欧盟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双管齐下。由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符合德国想法的要求：削减公共支出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使国债率和预算赤字率低于上限。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了宽松银根的政策（Politik des billigen Geldes），还几乎不加掩饰地实行了其实被《马约》禁止的直接金融资助政策（Staatsfinanzierung）[20]。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于2012年7月26日在伦敦举行的全球投资会议上的承诺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他表示欧元是不可逆转的，还一字一句地说了下面的话："欧洲央行准备利用其授权范围之内的一切必要手段去捍卫欧元。而且请相信我，这肯定够了。"[21]

德拉吉的这个戏法吓跑了金融投机市场上那些试图做空欧元的势力，在这方面他干得很成功。然而欧洲央行的那些货币再保险计划，无论是债券购买计划[22]、量化宽松（QE），还是其他一些干预方案，都有其副作用。因为它们稀释了欧盟向陷入危机的国家所施加的改革压力。不过，欧盟新设立的以严苛的义务作为救助前提条件的"援助计划"（Rettungsschirmes），还是在一些早早接受紧缩财政开支要求的国家取得了预期效果：爱尔兰和葡萄牙在恢复稳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即便在速度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当然其付出的代价是高企的（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失业率。西班牙的情况也与之类似，由此避免了正式地将自己暂时置于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方代表组成的援助机构的"支配"之下。

即便是希腊，也在获得债务减记之后于2014年成功地缩小了预算赤字，但这一成功没有持续很久。在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社会主义左派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于2015年1月底赢得大选，并且与极右的独立希腊人党（Unabhängigen Griechen）组成联合政府之后，开启了一段以希腊政府为一方，以欧盟和德国政府为另一方的冲突时期。冲突的高潮是齐普拉斯政府发起的一项反对履行紧缩和改革义务的全民公决，欧盟要求将这些义务作为第三次援助协议的前提条件。结果，2015年6月5日反对改革的人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胜利——有61.3%的希腊人支持他们。

“希腊退出欧元区”（Grexit）看上去近在眼前了，这意味着希腊要退出欧元区并重新用原来的本币：德拉克马。这个结局之所以（至少是暂时）得以避免，主要是因为齐普拉斯在几天之后又让步了，他接受了布鲁塞尔方面的大部分要求，并且在反对党的帮助下通过了改革法案。为了挫败其党内反对派的声势，这位希腊总理最终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2015年9月20日举行的大选让激进左翼联盟再次成为最强大的政党。现在，由于这个执政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它可以顺利地重组2月建立的“左-右联盟”。

然而，在2015年秋天，希腊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解除。特别是雅典还在欧盟的容忍之下不断向后拖延那些“令人不快”的改革时间：比如农业税改革和退休系统改革（包括推迟退休年龄、降低退休金）。至于国有资产私有化，希腊早就表现出它不会按欧盟所要求的速度和规模去办。正因为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向雅典提供资金援助的事也悬而未决。

直到2016年5月才取得如下进展：在希腊国会通过决议大幅削减养老金，进行所得税改革，并按照欧盟的要求建立了一个自动启动的机制——如果预算目标无法实现，福利和薪水将进一步降低。此后，货币联盟的财政部长们才同意用2012年底建立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äischen Stabilitätsmechanismus）中的基金（即“援助计划”）再给予雅典103亿欧元的信用额度。是否进行下一步的援助，要看该国的财政是否进一步稳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意进行任何的债务减记。欧元集团决定在短期内只试图改善债务管理；如果2018年救援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示基本赞成此方案。

2016年5月的决定仅能让希腊的危机有所缓解，而且整个货币联盟的危机也远没有得到解决。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大成员国之间，对稳定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存在分歧。对柏林而言，财政的稳定性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但巴黎和罗马更加看重经济增长。欧盟和货币联盟在此期间一再努力让其成员国遵守更加严格预算纪律，但无论是在欧盟的28个成员国，还是在欧元区的19个成员国之间，都无法达成一个可执行的共识。这些努力中的一个高峰是2013年1月的财政公约，由于没有英国和捷克的参与，此公约只能作为国家间协议来签署，所以（暂时）还不是欧盟法案。

2011年12月14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院宣布，财政和稳定联盟是消除“欧元与生俱来的错误”从而完成经济和货币联盟的一个机会。她还说，“真正的政治联盟的前景”正在形成轮廓。[23]欧元具有“先天缺陷”的这个看法，在今天的德国基本上是无可争议的。历史学家安德雷亚斯·勒德甚至提到（这是）一种“结构性错误”。[24]对经济学家汉斯-维尔纳·辛恩（Hans-Werner Sinn）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没有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是行不通的。”[25]柏林的这位女总理期待从这份财政公约中能够生长出一个政治联盟来，但这个愿望目前尚未实现。

还有一个愿望同样没有实现：那些赞成共同货币的人期待欧元能有助于消弭各成员国民族之间的对立，能唤起一种“我们都是欧洲人”的感觉。然而，欧元区的危机却更多地让各民族间的仇恨和成见死灰复燃：当德国的街头小报在煽动人们反对那些“懒惰的希腊人”时，希腊的报纸却试图唤起人们对纳粹时代和二战中德国战争罪行的回忆；在塞浦路斯、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

批评德国和布鲁塞尔的财政紧缩政策的声音不只出现在那些该政策所涉及的国家，而且也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是美国，批评者包括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而且就像紧缩政策最先见效的伊比利亚半岛各国所表现出的那样，反对的声音也从未消失，德国和欧盟委员会所倡导的路线最遭人诟病之处就是高企的青年失业率。

柏林和布鲁塞尔有充分的理由坚持它们的立场，即拥有自助的意愿是外部援助起效的必要先决条件，结构性弊病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堆积新的国债来解决。然而，倡议节俭的呼声也并非没有片面性。要是在施行财政紧缩政策的同时，一直努力地推进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那么实现拥有竞争力的目标之前的“饥渴期”就有可能缩短。此外，人们必须再次提醒德国：其出口虽然繁荣，可是在此期间它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忽视也广遭诟病。如此安排优先次序对欧洲不利，而从长远看对德国也同样不利。

货币联盟的参与者最终是否达成共识，让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之间实现富有成效的平衡，我们尚无从知晓。只要不存在这种基本共识，事情发展就很难像人们一直以来所设想的那样——一体化进程向财政联盟乃至政治联盟的方向发展。单方面的让步，例如满足对“欧洲债券”需求，或是由共同体出面为欧洲各银行提供再担保（Rücklagensicherung），将强化形成一个共同债务联盟和转移债务联盟[26]的趋势，那就会使那些经济和财政上更强的国家不堪重负，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就是在拿本国民众对“欧洲工程”的支持——同时也是拿整个货币联盟的命运——打赌。自2014年的“政治化”（待稍后讨论）以来，欧盟委员会越来越倾向于宽容地处理那些一再或多或少地违背稳定性标准的政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摸着石头过河”（muddling through，也可以说是“得过且过”）的政策在近期会有什么改变。

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再去谈什么从货币联盟发展到政治联盟的目标了。2013年7月初，荷兰政府在每个可能的政策领域都与“越来越紧密的联盟”的计划背离。该政府的格言也在这时出了名：“任何东西，只要有可能，就搞民族的；万不得已时，才搞欧洲的。”[27]

此后不久，在德国联邦议院的竞选活动达到高潮时，德国总理在2013年8月13日的一次采访中发表了与转变立场之后的荷兰政府非常相似的看法。“更加欧洲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将民族国家政府的权责转移给欧洲政府，要是我方在行动中更严格、更紧密地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我方也可以变得更为欧洲化。”安格拉·默克尔还进一步表示，她认为欧盟将某些权责交还给成员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8]她与英国路线的接近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位女总理的设想中，她是否转换路线，取决于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首相是否能让英国留在欧洲联盟之内。

这位德国政府首脑在2013年8月的谈话记录所说的，与其说是理论假设，倒不如说是对事态的描述：她强调欧洲国家在“尚未纳入共同体范围内的”政策领域展开合作的重要性，并且最后还认为这些领域比已经一体化的（或者说已经“共同体化的”）部门更为重要。按这个观点，欧洲理事会是一个比欧盟委员会或欧洲议会更重要的机构。在欧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中，恐怕不会有人反对这一说法。根据这个判断而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盟只能是民族国家们的邦联，而不是一个像1945年以后热情拥护西欧一体化的人所想象的那种联邦。

德国在2013年夏天对情况的判断就是这么现实，人们并不能在其中为货币联盟的未来找到答案。人们也依然不知道，希腊能否长久保持欧元区成员的身份。人们甚至不能肯定共同货币会不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欧元区国家不能就其预算、财政和经济政策的长期协调达成共识的话。

另一方面，可以预见的是，加强政府间的合作会遭到这样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身处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之中，因为欧洲理事会的重要性在上升而感觉自己的地位在下降。欧盟正面临考验，可能会遭遇一场宪法危机。

---

[1] Jacques Attali, *Verbatim.* Bd. 3: Chronique des années 1988-1991, Paris 1995, S.74.

[2] Hans-Dietrich Genscher, *Erinnerungen*, Berlin 1995, S. 677 ff.; Hans-Peter Schwarz, *Helmut Kohl.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München 2012, S. 559 f.;David Marsh, *Der Euro.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neuen Weltwährung*（英文原版出版于New Haven 2009）, Hamburg 2009, S. 195 ff。

[3] Andreas Rödder, *21.0.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5, S.287 ff.

[4] Andreas Rödder, *21.0.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5, 原文第281页。

[5]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2. Wahlperiode, 53. Sitzung, 6.11. 1991, S. 4367.

[6] 请读者注意区分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欧洲联盟各领导机构因其中文名称相似而容易混淆，粗略地说：欧洲理事会（Europäischer Rat；英文：European Council）是各成员国首脑一起开的高峰会，所以相当于欧洲的“总统”；欧盟委员会（Europäische Kommission；英文：European Commission）是欧盟的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政府”；欧盟理事会（Ra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英文：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由各成员国相关领域的部长组成，相当于上议院（也可以说是“部长会议”）；欧洲议会（Europäisches Parlament；英文：European Parliament）由欧盟公民直接选出，席位大体按人口分配，相当于下议院。特别容易与上述四大欧盟组织混淆的还有一个欧洲委员会（Der Europarat；英文Council of Europe），拥有包括俄罗斯在内的47个成员国的欧洲委员会不是欧盟组织，它是一个成立于1949年并致力于在欧洲范围内维护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组织，下文多次提到的“威尼斯委员会”即隶属于该组织。

[7]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fortan: Geschichte IV):Die Zeit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6³, S. 20 ff.

[8] Barry Eichengreen, *Should the Maastricht Treaty Be Saved?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r. 74, Princeton 1992.

[9] «Alle Eier in einem Korb». Lord Ralf Dahrendorf über die Gefahren der Währungsunion und die Krise Europas (Interview), in: *Der Spiegel*, Nr. 50, 11. 12.1995.

[10] Der Euro kommt zu früh.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nehmen Stellung zur geplanten Europäischen Währungsunio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9. 2.1998.

[11] 此处“财政赤字”的原文是“Neuverschuldung”，可直译“新增债务”，但在此处与“财政赤字”是一个意思，而且译为“财政赤字”在上下文中显得更连贯。下同。

[12] “州长”一词，原文是“总理”（Ministerpräsident）。在实行联邦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联邦州有较大自治权，各州首脑称“总理”，对州议会负责。为了与联邦总理相区别，本书译文按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的习惯译为“州长”，但其实际职权与直接对本州选民负责的美国“州长”并不完全一样。

[13] «Was wir tun, ist abwegig» (Interview mit Kurt Biedenkopf), in: *Der Spiegel,* Nr.31, 28. 7. 1997.

[14] Winkler, *Geschichte IV* （注释6）, S. 155。

[15] Schwarz, *Helmut Kohl* （注释2）, S. 802。

[16] 康斯坦丁诺斯·西米蒂斯所在党派的正式名称叫“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简称“泛希社运”。

[17] Winkler, *Geschichte IV* （注释6）, S. 157。

[18] Yves Clarisse, *La Grèce et l'Union européenne, un mariage de déraison.* Reuters,12. 10. 2011.

[19] Wilfried Nippel, *Antike oder moderne Freiheit? Die Begründung der Demokratie in Athen und in der Neuzeit,* Frankfurt 2008, bes. S. 11 ff.

[20] 直接金融资助政策是货币政策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直接从中央银行得到金融资助，而无须支付任何回报。作者在这里提到的“直接金融资助政策”可能就指的是下文的“债券购买计划”（OMT）。二战后，联邦德国对这类极易引发通货膨胀的政策一向深恶痛绝。

[21] Winkler, *Geschichte IV*（注释6）, S. 240 ff., 377 ff., 400 ff. (Zitat Draghi: 421)。关于欧洲央行的政策的诸问题，参见Hans-Werner Sinn, *Der schwarze Juni. Brexit, Flüchtlingswelle, Euro-Desaster-Wie die Neugründung Europas gelingt*, Freiburg 2016, S. 203 ff。

[22] 债券购买计划，即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OMT），也称“直接货币交易计划”。根据该计划，欧洲央行会在二级主权债券市场上购买符合特定要求的欧元区成员国所发行的债券。

[23]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7. Wahlperiode, 148. Sitzung 14. 12. 2001, S. 17685.

[24] Rödder, 21.0（注释3）, S. 336。

[25] Hans-Werner Sinn, *Der Euro. Von der Friedensidee zum Zankapfel,* München2015, S. 453.

[26] 这里的“共同债务联盟和转移债务联盟”（Schulden- und Transferunion）的意思，应该是说把货币联盟变成一个“一国欠债，共同还债”的“大锅饭”联盟。

[27] Europa nur wenn möglich,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 7. 2013.

[28] 德国凤凰电视台（Phoenix）和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对总

理的采访，见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Medienmonitoring Presse/TV/Hörfunk, 13. 8. 2013。

第5章

谁代表欧洲讲话？

曾长期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可能会对那个与他有关的笑话不以为然：当他想与欧洲对话时，他并不知道该拨哪一个电话号码。[1]对于这个已经变得越来越现实的问题，理论上存在着多种可能：可以打给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也可以打给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2]，或是打给轮值国家的政府领导人，抑或打给欧洲议会议长，说不定还可以打给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事实上，一直到现在欧盟都没有这样一个电话号码，将来大概也不会有。

欧洲各大党派以及一些较小的党派都有意愿去澄清欧洲内部的权力问题，于是在2014年5月举行的第八届欧洲议会直选之前，它们先后决定派出自己的“领头候选人”参加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竞选活动。首先做出选择的是欧洲社会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他们推选德国联邦议院议员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为欧洲议会主席。统一在欧洲人民党（Europäischen Volkspartei，简称EVP）旗下的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保守党派则需要更多时间。尽管德国的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一直受到瞩目，但最终成为他们的“领头候选人”的是“欧元集团”（即货币联盟财政部长会议）的前领袖，长期担任卢森堡总理的让-克劳德·容克。容克在2013年7月因“情报局事件”[3]而必须启动新的选举，而后他和他的党派退出了政府。自由党、绿党和左翼党也提名了“领头候选人”。

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条约》的一项规定激发了设置“领头候选人”制度[4]的想法：根据第17条第7款的规定，欧洲理事会将在“参考”（berücksichtigt）推选的结果的情况下，向欧洲议会提交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的建议人选。这并不是说，各国首脑有法律义务推荐多数党的领头候选人，不过也确实让获得议会多数的政党在此事上有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影响力。

各政党派系并没有为此事而发动一场政治上的大众动员。只有在两个最有希望的申请人的祖国（即卢森堡和德国），或许还有奥地利，才让人感到这件新鲜事的气氛。英国的想法是让最强的候选人通过某种机制自动成为委员会主席，但该想法遭到各党派一致反对。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东欧和东南欧新成员国对此事或是持冷淡的保留立场，或是漠不关心。所以说，无论哪个党派在选举中胜出，若要从欧盟公民对其领头候选人的选举结果中去理解他们的想法，都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

2014年5月22日至25日的选举投票率为42.54%，略低于2009年的43%。基督教民主党和保守党组成的党团以29.4%的得票率领先于社会党团（得票率25.4%）。到5月27日为止，一直由赞成欧洲一体化的党团组成的议会主席团对此事的说明是：现在，容克为了当选委员会主席务必要获得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对容克而言，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人的想法就比他的党内伙伴更具决定性了，而社会民主党的想法是让委员会主席对欧洲议会负责[5]，同时还想让马丁·舒尔茨成为其他欧盟高级职位的候选人。而保守派党团对容克的保留态度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到目前为止，容克所代表的是“原先的”欧洲计划和“继续按老方针办”的政策，可是这些想法在欧盟进一步扩容之后不再是那么理所当然和不言自明的了。另一个原因是，卢森堡正是在容克担任财长及总理期间发展成了避税天堂。[6]

欧洲议会寻求更大的权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自1976年以来，它已由直选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获得了相当大的职权。1992年的《马约》授予欧洲议会对欧洲理事会倡议的否决权。此外，欧盟委员会的任命现在也要经过欧洲议会的批准。《阿姆斯特丹条约》又将欧洲议会在立法方面的职权予以扩大。1998年底，欧洲议会拒绝通过卢森堡人雅克·桑特（Jacques Santer）领导的欧盟委员会1996年预算减负方案，这是因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有很大的腐败嫌疑。1999年3月，由欧洲议会设立的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指出，还有多名委员存在管理不善和欺诈的行为。由于所涉及的几名委员拒绝辞职，整个委员会只好在3月16日集体辞职——这是欧洲议会的一个胜利，议员们有权为此感到骄傲。

因此，欧洲议会的目标非常清楚：缩小基于直接选举而获得的合法性与仍然不够强大的实权之间的差距。关于让委员会的委员们对欧洲议会负责（这正是倾向于欧洲一体化的议会多数派想要实现的目标）一事我还想多说一句：即便在欧洲议会的控制权还没有扩大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在处理债务危机时的行为也已经高度政治化了。然而，与从前一样，现在欧盟最重要的机构仍然是欧洲理事会。自2008年以来，欧洲理事会一直在进一步扩大其作为集体危机管理者的影响力。如果有人想探寻欧洲议会巨大力量的来源，就会发现只有一个基于议会的民主合法性的委员会才能成为理事会的强大对手，并在某些令人不放心的情况下确保欧盟的整体利益能被放在成员国各自的特殊利益之上。

《里斯本条约》对于任命委员会主席的规定，尚有可阐释的空间。比如，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并没有义务向欧洲议会举荐那位在议会选举中胜出的候选人。不过，虽说欧洲理事会内部对容克这一人选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多数都同意让这位前卢森堡总理担任委员会主席一职。由英国、瑞典和匈牙利的保守派政府首脑戴维·卡梅伦、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和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以及右翼荷兰首相马克·吕特

（Mark Rutte）组成的少数派，对容克这个“欧洲一体化”的热衷者都持有程度不一的保留意见。与此同时，从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也传来了反对意见：对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而言，容克看起来就像是僵硬的“紧缩政策”的代言人，而罗马是坚决反对该政策的。

尽管在欧洲议会中已有足够的多数支持容克，但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不愿意在6月27日欧洲大选后第一次会议上冒险一试。于是，为了（至少部分地）打消反对者们的异议，必须进行一系列费尽周折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比利时前总理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在理事会中的多数国家首脑认可了西北欧国家对减少集中主义（Zentralismus）和增加竞争性的要求，又认可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地中海国家加大对未来投资的要求之后，任命容克的议案才终于在2014年6月27日的投票中得以通过。除了卡梅伦和欧尔班的两票反对之外，其他都接受了容克。在英国首脑的坚持之下，默克尔不得不在投票进行之前明确保证：提名容克的这套程序将不会成为2019年之后（即下次欧洲选举之后）的成例。

在幕后，容克被告知他将支持欧盟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在6月27日做出的决定——“共同体在变革时期的战略议程”。不管怎么说，获得议会多数对这位欧洲人民党推举的候选人而言自然是没有问题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基督教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后者将支持现任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连任这一职位［尽管这一承诺将依惯例只在立法机构任期的前半程（即两年半）有效——这是由于欧洲人民党的压力］。自由党和绿党并不是“布鲁塞尔大联合”（或者说“斯特拉斯堡大联合”）[7]的正式组成部分。但很显然，只要新一届委员会依旧宣称自己反对已经变得强大起来的反欧盟势力，这两个党就会一直支持容克主导的委员会。

如此一来，7月15日批准容克当选为委员会主席的表决也就是走一个过场了：共有422名议员投了赞成票，250名议员反对他。不过，要组建这个新的委员会却是一件十分伤脑筋的事情。特别富有争议的是中东欧国家所提出的一些人选。比如，刚刚卸任的斯洛文尼亚总理阿伦卡·布拉图舍克（Alenka Bratušek）就提名她自己担任委员会委员——在这件事上欧洲议会的抗议成功了：它迫使这位候选人放弃提名，但它未能阻止曾在2006年因涉嫌贪腐而受到调查的捷克人薇拉·尧罗娃（Věra Jourová）当上司法委员。同样，它也未能阻止匈牙利外交部长蒂博尔·瑙夫拉奇契（Tibor Navracsics）成为负责教育、文化和青年事务的委员，尽管此人在当司法部长的时候曾经限制过言论自由。而且后来容克还曾考虑过让他负责公民权事务，但因为欧洲议会和舆论界的一再反对而作罢。在2014年10月22日，新一届委员会在欧洲议会的表决中获得多数（423票赞成、209票反对、67票弃权），于是它得以在11月1日准时开始履职。

从表面上看，欧洲议会是2014年秋天这场与欧洲理事会的权力角逐中的胜利者。议会事实上是取得了对委员会高层的决定权，但这一胜利果实能保持多久却不好说。谁又能保证，各成员国会一直甘心让自己提名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权利始终受到束缚呢？因此，议会和理事会之间的权力角逐还远未结束。

由容克领导的新一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他们将自己视作“政治的委员会”。他们想要掌控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方向和速度，并以此来弥补因成员国已经无心于一体化而造成的动力不足。在2015年围绕“是否将希腊保留在欧元区内的问题”而起的争论中，容克一再对希腊政府首脑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表示理解，并且无视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和欧元集团主席、荷兰财政部长杰洛·戴松布伦（Jeroen Dijsselbloem）的意见。此二人与欧元区国家的多数财长都认为，要是希腊拒不执行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建议的改革，那么“希腊退出欧元区”将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最后事情还是朝着容克设想的方向走，因为安格拉·默克尔为了不跟法国产生冲突而转身站到了他这一边。

在欧盟经济、金融和税收事务委员，前法国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的主持下，新一届委员会心知肚明地、很“政治”地对待那些未遵守《马约》财政稳定规则的国家（其中包括法国和意大利），也就是说对它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态度很快就让人们起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难道不是充当诸条约的守护者吗？这个委员会是在认认真真地承担它的任务吗？

各成员国很快对此做出反应。2015年夏天，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建议从机构上把委员会的政治任务与其作为诸条约（包括竞争法、内部市场条约和财政稳定协议）守护者的核心任务分离开。德国政府发展了这一构想，并在2015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支持在欧盟委员会不同任务之间建立“隔离墙”。

对此，容克立即予以愤怒的回击。2015年12月15日，他在欧洲议会上抨击了“某些”成员国试图削弱欧盟委员会对共同经济和预算政策规则监督权的企图，称这些国家想把委员会的这部分功能交给一个“技术统治论者的代理机构”。他认为，欧盟的经济政策调控“不仅是与规定和百分比，而且与人和他们所面临的抉择相关”。若是要加强欧盟委员会的政治作用，就需要强化欧洲议会的控制力。这个议会也是欧元区的议会，所以“一切使这个议会更强大的东西，也会让欧盟委员会更强大”。[8]

想让欧洲议会也决定欧元区的相关事务——这个要求并不新鲜，坐在斯特拉斯堡的议员们早就多次提到它了。然而，在欧元区这个想法却几乎没有

任何赞成者。即便是从民主的立法机构的角度看，这个念头也太具争议性了。坐在欧洲议会中的议员来自28个国家，这其中的一些新成员国并不是货币联盟的成员。那么，来自这些新成员国的议员本没有权利参与关于货币问题的决议，因为对他们而言欧元虽然名义上是整个欧盟的货币，但实际上对他们的祖国而言却是一种外国货币。反过来说，那些欧元区国家完全有理由反对那些不属于欧元区国家的议员掺和进来，甚至在议会形成多数，从而去决定那些仅仅与欧元区国家相关的问题。因此，更符合逻辑的办法无疑是法国和德国政府所想出的点子：为欧元区单独创建一个民意代表机构，其代表由货币联盟成员国在欧洲议会中的议员构成。

欧洲议会之所以这么有底气，主要是因为它来自直选。不过，若是考虑到它为了避免那些欧盟中最小的成员国成为被边缘化的装饰物，而给这些国家分配了超出其人口比例的议员名额，那么这个议会在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无疑会发生动摇：一个来自马耳他的欧洲议会议员代表了7万人，而一个来自德国的议员却代表了近83万人。假设欧洲议会的席位严格按照人口比例分配，同时又保证所有国家都拥有合适的代表席位，那么它必须得有好几千名议员。但这样一个议会是根本无法工作的。所以，斯特拉斯堡的这个议会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在代表性上的瑕疵进行辩护——只是请不要说它与民族国家的议会拥有同样的民主合法性以及相应的权力。

对那位不太受欢迎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居伊·伏思达（Guy Verhofstadt）而言，这个瑕疵根本算不了什么。作为比利时1999—2008年的总理和欧洲自由党在2014年所提名的领头候选人，他在2012年的一篇政治宣言《为了欧罗巴！》（“Für Europa!”）中宣称：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比各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整个欧洲理事会都更具有民主合法性。他说欧洲的核心并不在于构成它的那些国家，而在于它所拥有的那些公民。“‘民族国家的欧洲’已是昨夜星辰，指引不了未来的道路。”[9]

与从前一样，各成员国的公民们可不这么看。自1979年的第一次直选以来，欧洲大选的投票率持续下滑：从1979年的62%，一直降到上文提到过的42.5%（2014年5月）。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大选的投票率要高得多。各民族国家才是更重要的政治“家园”，身处于其中的国家公民更有休戚与共的感觉，这比他们对欧盟的归属感更强烈。

这并不是欧洲议会的错，欧盟早就难以唤起激情了，人们对它提不起兴趣甚至常常觉得反感。此事也不能全怪被骂成技术专制的欧盟委员会。常年以来，有许多重要的决定都没有交付民族国家的议会和舆论以进行充分的讨论，而是由各国的国家及政府首脑关起门来商量好之后，再作为既成事实予以推行（在1999年12月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决定授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地位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结果，人们就越来越觉得“布鲁塞尔”成了卡尔·马克思口中那个“孤立的行政权力”[10]——马克思在1852年创造了

这个概念，用以描绘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即后来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III）］治下的权力结构。[11]

公民们觉得欧洲一体化是一个不接地气的、纯属精英的项目——这个现象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它已经渗透了所谓的“欧元疑虑”和“欧元沮丧”之中，而且还时常投射在民粹主义者对欧盟的抗议之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2009年6月的一场关于《里斯本条约》的判决中试图阻止这个离心的过程，其做法是以“议会对一体化的责任”这个关键词来支持德国联邦议院对欧洲政策的共同决策权[12]。德国联邦议院接受了这一提议并通过了相关法律。自那之后，联邦议院中关于欧洲问题的讨论成了国会大厦内最为激烈的辩论。若论重新唤起德国公众对欧洲问题的关注，这件事倒真是功不可没。

可是，欧洲一体化工程的合法性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这一政策并未使一体化工程赢得多数公民的支持。”曾担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专家迪特尔·格林（Dieter Grimm）下了这样的判断。在格林看来，欧洲一体化之所以合法性不足，其根源在于欧洲法院的司法权。欧洲法院通过1963年的范·昂卢斯案（Van Gend &Loos）和1964年的寇斯塔案（Costa／ENEL）的两个奠基性的判决推动了一体化。在前一个案件中，它判定在成员国境内可以直接援引欧共体法律，也就是说可以用于国内法庭的诉讼。在后一案件中，欧洲法院的解释是：欧共体法律不但可以被直接援引，而且其效力还优先于国内法律，甚至优先于该国宪法。[13]

虽说各成员国依旧是“条约的主人”，但这些条约借由欧洲法院的司法权已经扮演了宪法的角色。按格林的说法，如今“在通过缔结条约和举行会议推进政治一体化之外，又出现了另一条小道——欧洲司法权，即通过对条约进行阐释来超越各成员国的多元司法的欧洲司法一体化”。这样一来，构成诸条约基础的一个根本原则——约束性单独赋权原则[14]——就发生了动摇，最后甚至遭到毁弃。《马约》授予欧洲议会的“共同决策权”[15]，意味着其“合法性从一元转向二元”，也就是说，本来欧盟合法性来自各个成员国政权自身的民主性和合法性，现在其合法性在来自各成员国合法性的同时，也来自直选产生的欧洲议会。但欧洲议会还是缺少大多数民族国家议会所享有的那种合法性威望。欧洲的语言众多，而跨国媒体不足，因此形成一个欧洲的公共舆论空间难上加难。欧洲的各“政党系”与真正的政党相比，既缺乏相对统一的顶层架构也缺乏共同目标。欧盟公民的法律角色是一种假设而不是一个现实——《马约》没有解决这个困境，却加深了其中的矛盾。

因此，完全按照议会内阁制构建欧盟不但不会增强其民主合法性，反而还会削弱它。这同时也是因为欧盟委员会自身的一体化方案与以前一样，依然与欧洲议会并不相干。迪特尔·格林由此认为：欧盟民主合法性问题的症

结在于“欧盟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欧盟政治机关及各成员国的意愿之间彼此孤立”。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诸条约的“宪法化”，产生了当时几乎没有人预见到的效果：“写进宪法的内容越多，政治运作的空间就越小。凡是由宪法规定的内容，就不在政治决定的范围之内了。”[16]

因此，格林的想法是将占了《里斯本条约》大半篇幅的、关于欧盟运作方式那些不符合宪法形式的规定降格为普通法律，从而扩大政治运作的空间——这是由他在进行了清晰的分析之后所得出的一个逻辑结论，但实际操作起来无异于将欧盟推倒重来。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退而求其次的结论：决不可再以减少民主为代价来推进一体化。在任何一个成员国，若是没有源自主权的、明确的、具有合法性的支持，要实质性地推进一体化（“从国家联盟到联邦”）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德国，根据联邦宪法法院关于《里斯本条约》的裁决，要进行这样一种实质性推进就需要一部新的宪法。根据《基本法》第146条，这部新宪法必须由德国人民自由决定：要么举行一次关于宪法的全民公决，要么举行一次产生制宪国民大会的选举。

然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成员国，都无法期望在可预见的未来使权责从民族国家层面转移到欧洲层面。只要诸民族国家的民主合法性还比欧盟高不少，那么就只能先由它们来代表欧洲讲话（它们则由欧洲理事会来代表）。不过，鉴于2008年之后的危机年代里欧盟28国内部出现的深刻分歧，这几乎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17]

---

[1] Vanessa Gera, *Kissinger calling Europe quote not likely his,* in: 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12/06/27/kissinger-says-calling-europequotenot-likely-his, 27. 6. 2012.

[2] 2009年以前欧洲理事会实行轮值主席国制，每个国家任期半年。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欧洲理事会设立常任主席（ständiger Präsident）一职，任期两年半。

[3] 2013年7月11日，容克因为涉嫌透过国家安全机构来搜集特定人物资料而宣布辞去卢森堡总理一职，并提前举行大选。容克从1995年开始担任卢森堡总理直至2013年卸任，执政18年有余。

[4] 2009年以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由欧洲理事会直接任命。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委员会主席由“领头候选人”制度产生：欧洲议会的每个党团［或者说由政治主张接近的党派构成的“政党系”（Parteifamilien）］都推出一个“领头候选人”以充当欧洲议会选举中代表该党团的领头人物，同时充当竞选宣传

时的聚焦点。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欧洲理事会一般都会任命最终获得议会多数的党团的“领头候选人”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简而言之，是更大限度地模仿内阁制共和国（比如德国）的形式：议会至上，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决定总理并组阁。

[5] “让委员会主席对欧洲议会负责”，原文直译是“让委员会主席一职议会化”。也就是前一个译注所说的：模仿议会至上的内阁制共和国的形式。

[6]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München 2016³, S. 538 ff.

[7] 欧洲议会相当于欧盟的“下议院”，欧盟委员会相当于“政府”或“内阁”，容克所任的委员会主席一职相当于“总理”，组建欧盟委员会就相当于“组阁”，下文中的“某某委员”就相当于“某某部长”，所以作者将联邦德国政治术语“大联合”（Große Koalition）用在了此处，指议会中最大的两个党联合而形成的多数派。自由党和绿党在这里的角色，相当于支持政府的反对党。欧洲议会设在斯特拉斯堡（该地也因此而被称为欧盟的“第二首都”，欧洲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等机构也设在此处），不过每个月只在这里举行4天会议，其他主要事务仍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处理。

[8] Juncker sucht Konflikt mit Schäubl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6. 12.2015.

[9] Guy Verhofstadt, Für Europa! Ein Manifest, in: Daniel Cohn-Bendit/Guy Verhofstadt, *Für Europa*（荷兰文原版出版于Antwerpen 2012），München 2012, S.7-68 (52, 57)。

[10]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7章中写道：“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11] Karl Marx,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1852),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erlin 1959 ff., Bd. 8, S. 11-207 (204).

[12] 这里的“共同决策权”（Mitspracherecht）应该指的是德国联邦议院（下议院）与德国行政机构在欧洲政策上的“共同决策权”。下文中的“共同决策权”指的是欧洲议会与欧洲理事会的“共同决策权”。

[13] 法学界将它们概括为欧共体法的“直接效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direct effect）和“最高效力原则”（the supremacy of the community law）。

[14] “约束性单独赋权原则”（das Prinzip der begrenzten Einzelermächtigung，英语：“The principle of conferral”）是欧盟法律的基石之一。其主要内容是：欧盟本身没有设立和改变权责（Kompetenz；英语：competence）的权利，欧盟所有的权责都来自其成员国在条约中的赋权。换句话说，欧盟的一切权利都必须要在条约中找到明确的根据，而条约没有规定的领域仍然属于各成员国的治权范围。

[15] 《马约》规定，在大市场、科研、泛欧运输网络、消费者保护、教育、文化及卫生等领域，欧洲议会与欧洲理事会拥有“共同决策权”。《阿姆斯特丹条约》生效后，欧洲议会的共同决策权从原来的15个领域扩展到38个领域，包括就业政策、社会政策、海关、环境保护、海洋事务等方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特拉斯堡总领事馆网站，http://strasbourg.china-consulate.org/chn/ozjg/t114657.htm，引用时间：2016-6-25。

[16] Dieter Grimm, Europa ja-aber welches?, in: ders., *Europa ja-aber welches? Zur Verfassung der europäischen Demokratie,* München 2016, S. 9-28. (10, 13, 18f.). J. H. H. Weiler早在格林之前就谈过欧盟条约的宪法化问题，见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in: *The Yale Law Review 100* (1991), No. 8: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Law (June), S. 2403-2483。关于欧洲法院1963年和1964年的判决的意义，还可参见Luuk van Middelaar, *Vom Kontinent zur Union. Gegenwart und Geschichte des vereinten Europa* （荷兰文原版出版于Groningen 2009）,Berlin 2016, S. 98 f。

[17] 我也修正了我自己曾经的乐观预期，当时我曾认为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可能会使欧盟向联邦的方向发生质的跃进，参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Vom Staatenverbund zur Föderatio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3. 06.2013。关于此问题亦可参见Peter Graf Kielmansegg, *Wohin des Wegs, Europa? Beiträge zu einer überfälligen Debatte*, Baden-Baden 2015。

第6章

欧洲vs美国？

就在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1]之后不久，年轻的法国法官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与好友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一起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他们向司法部请假旅行的正式理由是要进行有关判决执行问题的研究。但实际上，托克维尔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建立起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个人判断，并据此撰写一本书。他此次旅行研究的成果即为四卷本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头两卷出版于1835年。

美国与欧洲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求解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托克维尔所认定的首要区别，是政治与宗教在美国及欧洲的不同关系。在他看来，英、美文明的特征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元素的产物。这两种元素在其他地方总是争斗不休，而在美国却能相得益彰，并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在这里，我说的是宗教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

这位自由派贵族对美国的描绘，恰好是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反面——启蒙运动在这些地方都要经过艰苦的，甚至是革命的斗争才得以完成。“在美国，正是宗教引领了启蒙（‘lumières’在法文原文中既有‘照亮’也有‘启蒙’的意思）。正是通过恪守上帝的律法，而使人类得以自由……这个宗教将资产阶级的自由看作对人类发展可能性的高贵表达，而且把政治领域视为造物主保留给理智活动的领地。这个宗教在保留给自己的地盘上是自由、强大和满意的，它知道，它的王国正因此而稳固，在此地它依靠自己的力量统治，而决不依赖其他任何势力的支持。而在‘自由’看来，这个宗教正是其童年的摇篮，是其权利的神圣来源，是其斗争和胜利的引路人。自由将这宗教视为风俗的守护者，又把风俗看成法律的保证和自身生存的保障。”[2]

在写下这几行文字时，托克维尔所想到的是清教徒留下的遗产。这些人在17世纪初乘着“五月花号”和其他船只从英格兰驶向“新大陆”，为的是逃避英国国教教会的压迫。他们对信仰自由的追求，是对其他自由权利和共治权利追求的源泉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源泉。这些开路者还从英格兰带来了“无代表权不纳税”的原则、由议会决定税收和举行投票的权利——这些都是在他们的祖国已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但英王却不愿意在北美殖民地施行。对英格兰人来说习以为常的事务还有无司法指令不得被随意逮捕的权利（由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案》保证），与此类似的还有“制衡”的传统，以防止某些国家权力被垄断。

对日后的美国而言，欧洲所赋予的遗产并不仅仅只有马萨诸塞州和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所具有的激进加尔文主义，同样从旧大陆持续不断地传来的还有知识界的思潮。对启蒙思想而言，北大西洋算不上什么障碍。自然神论正是如此传来的，它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就放手任其运行，并不会有一位“人格神”插手某个人或整个人类的生活。这样一种宗教观念在弗吉尼亚种植园殖民地广为流传，这一带正是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家乡。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3]在其1952年出版的《美国历史的讽刺》（*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一书中，将新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和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称为深刻影响了新大陆居民早期历史的两大宗教——道德传统。“无论我们这个民族是从马萨诸塞州的还是从弗吉尼亚州的观念中继承了更多的精神遗产，我们都于此时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意识，从而分化成了一个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民族——上帝要用这个民族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开端。”[4]

这种认为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乃上帝之选民的想法，早已由马萨诸塞湾殖民公司的首任长官约翰·温斯罗普[5]于1630年在从英格兰驶向美洲的“阿拉贝拉号”（Arabella）的甲板布道中表达过了。温斯罗普提醒他的听众，他们自己应该意识到，他们很快将建造一座万民瞩目的“山巅之城”。这位世俗布道者所描绘的图景出自“登山宝训”。据《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在山上对众人讲完虔信者的诸种福分之后，以此语收束：“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6]

现在人们称之为“美国例外论”的思想，其实自有其宗教根源。作为一种有政治色彩的神学观念，由上帝拣选“救世民族”的这个神话有多种用途。[7]它构成了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鼓吹“美国帝国主义”的阿尔伯特·J. 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的精神内核。这位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在1900年1月9日的演讲中，以上帝之名宣扬美国有领导世界的权利：“神已从万民之中挑选出美利坚人民作为他的选民，预备让他们来领导世界的重生[8]。这是美国的神圣使命……”[9]无论是否诉诸上帝的召唤，这种自己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信念都是存在的。就好像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7年4月2日对德意志帝国的宣战声明中所讲的那样，此使命就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民主制度得以安生的地方。[10]而且在21世纪初，还有一位继承了威尔逊职位的号称“基督再世”的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牢牢认定他的国家负有神圣历史使命，要在“反恐战争”中打败世界各地的邪恶势力。[11]

不过，今天的美国从殖民地时期继承的宗教遗产并非只有早已世俗化了的使命观念。其他遗产，还包括了自由教会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教会的拒绝，以及基督教观念对美国政治文化的长期浸润。一个公开的不可知论者（更不用说无神论者）去竞选总统的事，直到今天都不可想象。与欧洲，特别

是与世俗化的法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政治语言中充满了带有宗教色彩的说法。法国总统们常常喜欢用“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结束其演讲，而美国总统们用的总是“上帝保佑美国”。

今日大西洋两岸的差异，可追溯到17、18世纪的早期历史。在这方面，托克维尔特别强调了构成政治体制的方式和方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体系都是在社会上层开始生发，然后逐渐地、不完整地向下面的社会层级传递。但是在美国，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社区的形成先于各县，各县先于各州，各州先于联邦。”[12]

托克维尔于1830—1831年游历美国时正值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当政，他在此感受到的自由和平等的水平要高于欧洲，《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将这归因于此地并无享有特权的贵族。他说美国人“从来就不知道奴才与主子之间的区别。而且，由于他们相互之间既不彼此害怕，也不彼此憎恶，所以他们也从来不需要一位统治者来逐条处理他们之间的事务。美国人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已经从英国贵族那里拿来了个人权利的理念和热爱地方自由的思想，而他们能保有两者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和贵族进行战斗”。[13]

托克维尔讲出此言约120年后，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称美国之所以在19、20世纪与欧洲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最具决定性的原因正是美国没有封建传统。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恰恰是与贵族及其特权之间泾渭分明的区别唤起了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这种区别成了他们身份的标记，他们由此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不能享受特权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因此“第三等级”实际上也承担了为市民阶层以下的各社会阶层发声的使命。

对此发出最强烈抗议的是19世纪出现的劳动者的代表，他们已经在与资产阶级的战斗中决定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从封建时代的传统中找到了团结联合的形式。在美国，由于并不存在拥有特权的贵族，所以也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市民阶层意识，于是也就没有无产者的阶级觉悟。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哈茨在他的结论中如是说：“美国这种既没有封建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传统的独特发展路径并非一种巧合。遍布于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有隐而不彰的渊源，人们可以在封建社会的习俗中找到它。是‘旧制度’启发了卢梭，然后这二者又一起启发了马克思。”[14]

哈茨这番机智的分析并不只是恰好回答了德国国民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在其著作的标题中提出的著名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5]他同时还为大西洋两岸在福利国家政策上的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在欧洲，19世纪由国家施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是继承自

近代早期绝对主义王权的“善政”传统：对拿破仑三世而言是这样，对俾斯麦（Bismarck）来说也并无二致——他将自称为“乞丐们的国王”的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βe）[16]视为自己的榜样。[17]美国并没有这样一条绵延不断的线索。相反，在那里口耳相传的是自力更生的精神，就像他们在开拓者时代所践行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也开始在美国建立起一套有国家干预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快他就不得不回击那些说他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的指责。[18] 80年后，受到右翼民粹主义的茶党支持的保守共和党人，又将一样的标签贴到了推行全民法定医保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身上，同样意在诋毁他的声誉。[19]

欧洲绝对主义的另一份遗产是“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马克斯·韦伯将这一垄断视为现代国家体制的首要特征。[20]在美国的开拓者社会中，发展出这样一种无远弗届的国家权力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持有武器的权利被视作个人自由的保证。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还保障人民有备有及佩带武器之权利，而且其理由是“一支组织良好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国家（Staat）[21]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一个修正案至今仍是武器拥有者强大的联盟——美国全国长枪协会——的立身之本，正是它使得该协会能一再阻挠美国总统们一切想要管制武器的尝试。同样泥古不化的，是美国许多州对死刑的坚持。这里起作用的，是对于报复一事的《旧约》式的肤浅理解[22]——这显现出：在美国，人权和民主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程度比欧洲要轻，因为在欧洲的某些国家，死刑甚至早在二战结束后就已经被废除了。

欧洲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把美国视为“文明世界”中与自己等量齐观的伙伴。在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与旧大陆之间的关系都显得暧昧不清：美国看上去有无限的可能，每个人都有向上爬的机会，拥有大胆的商业精神，是个令人钦佩的、享有民主的自由国家；但在文化上，欧洲却总是把美国想象为粗野、蛮荒的开拓者之地。

直到19世纪末，这种想法才有所转变。物质上的丰富、政治上权势的扩张、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智识上的潜力、美国社会中的现代性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大令人畏惧的工业强国的事实，都会让人在冷静的思考之后将欧洲人的自负抛到九霄云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至少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已经不分彼此，同被视为“西方”的一部分。自美国于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法国和美国更加感觉到它们在政治上拥有基本的共识：这三个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大国都把自己视作文明进步的捍卫者，共同反对奉行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

德国尽管在1918年战败之后也拥有了一种民主制度，但正是这种情形让这个新开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由战败而得来的民主，使德国滋长了对西方的深深恨意——对美国恨得尤深：因为正是这个鼓吹威尔逊民主和民族自决的国家让一种“城下之盟”成为可能。1933年到1945年的“德意志灾难”[23]之中的桩桩件件，可以说是德国拒斥西方政治思想的高峰，这是德国在20世纪对西方的第二次拒绝，而且这一次失败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连德国人也能完全接受这样的洞见了：西方已经超越了一切差异构建起了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如果欧洲还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依赖美国。

但自二战结束以来，某种暧昧不清的东西也附着在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之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反美利坚主义”很突出地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倾向——美国被斥责为文化扁平化和大众化的渊薮。而到了1945年之后，“抨击美国”一事的主导力量转移到了左翼一侧：并非只有共产主义阵营才将美国骂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人们普遍对美国技术的效率之高，美国通俗文化的吸引力之巨感到惊讶，这种吸引力从好莱坞电影、漫画［如《捣蛋鬼》（*The Katzenjammer Kids*）、《超人》、《米老鼠》、《唐老鸭》］毫无间隙地延伸至国民饮料可口可乐和流行音乐——美国简直就是“摩登”的化身。[24]

从政治方面看，英国在传统上与美国的关系最为紧密。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起，这位当年的殖民霸主与美国存在“特殊关系”的想法就已经在大英帝国找到了土壤。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理念业已成为英国的国家智慧中根深蒂固的部分。相反，美国最早的盟友法国只能很不情愿地回忆起：美国才是首倡人权的先驱，同时美国还是那个在20世纪两次帮法国彻底打败德国的国家。法国在夏尔·戴高乐总统的带领下用尽一切手段重新树立起本国已被挫伤的骄傲，并竭力避免让人觉得美国可以在大西洋同盟的框架内向法国随意发号施令。法国于1966年退出北约的军事组织一事（但并没有退出同盟本身），正是这种意图摆脱束缚的尝试的高峰。

在阿登纳时代，联邦德国已经变成了美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友中最亲近它的国家。当时，美国的和解意愿是西方战胜国中最强的，而且远超他国。在与东方阵营于世界政治角逐的过程中，美国第一个认识到联邦德国作为伙伴的价值，并因此给了被分隔在国家西部的德国人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对联邦德国的自由、福祉和安全来说，再也没有比跨大西洋西方联盟的领袖更可靠的担保人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形象”发生了变化。越南战争使得美国在大多数年轻人眼中成了一个重蹈法国覆辙的，用残酷的战争阻挠越共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霸权。在联邦德国是这样，在西欧是这样，在美国自身的学生反对派那里也是这样——这群人正是1968年抗议方式的发明者。在这段充满传奇魅力的岁月中，跨国的造反运动反对年青一代所怀疑的一切，

因为这些东西显得有权威、有压迫感。而他们要特别反对的，正是那个在东南亚穷兵黩武，并以这种方式挥霍了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权威地位的超级大国。越南战争在1973年至1975年以越共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终，这对西方的霸权而言是一个道德上的打击，并令其久久不能恢复元气。

在越战结束之后的40年里，相较共和党出身的美国总统，欧洲人对民主党出身的美国总统的评价基本上更为友好。民主党人被认为是相对进步的，而共和党人则被认为是保守的，或是反动的。1981年至1989年领导美国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尤其遭旧大陆的左翼政治人士憎恶，因为他采取了露骨的反共修辞和激进的军备战略。直到他在其第二任期内转而与苏联的改革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成为系统性裁减军备计划的伙伴之后，欧洲人才开始赞许他对解决东西方冲突问题所做出的贡献。

共和党人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借由他在1989—1990年支持德国重新统一所赢得的声誉，甚至获得了那些先前一度怀疑他的人的支持。而他的那位以社会改革者和谦逊的外交家面目出现的后继者，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则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受到了惊人的欢迎。时至2001年1月，当那位1989—1993年间的总统的儿子、共和党人小布什入主白宫，并在政府的关键岗位上安排许多来自“新保守主义”阵营的特别右倾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时，西欧的公共舆论认为一个大西洋两岸发生冲突的新时代即将出现——他们肯定不会失望。

的确，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唤起了所有的西方国家要与美国团结一致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北约国家一致同意打击庇护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根本前提。可是，当小布什准备于2002年发动一场针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战争时，却引发了跨大西洋联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小布什谴责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的不义之举，指责他不但违背了自己在核不扩散条约中的义务，而且还藏匿和生产生化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即使美国并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部分北约成员国（其中包括英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1999年才加入的由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而来的新成员：波兰、捷克、匈牙利）也决定站在美国一边；但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则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对于盟友中的这些不同意见，小布什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借2003年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将这些“说不”者蔑称为“旧欧洲”，同时又把加入了“意志联盟”的伙伴称为“新欧洲”以示欢迎——这其中还包括一些正在申请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和南欧国家。[25]

美国国防部长的这番言论首先在法国和德国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应《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请求，有20位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对此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其中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依照这些德国哲人的论断，拉姆斯菲尔德在欧洲遭受到批评是因为他“背叛了美国自身在18世纪所拥抱的理想。《人权宣言》、联合国的人权政策和国际法上的诸多革新，都是由启蒙运动的精神所生发出来的。今天，这种精神和这些革新更能在欧洲找到共鸣，而不是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暮气沉沉的所谓‘新世界’”。[26]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论断更能显现出大西洋两岸的分歧之严重了。

对于欧洲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国际法方面的要求，小布什早已于2002年6月1日（“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9个月）在西点军校进行的一场演讲中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宣称，“采取‘单边行动’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和守护国民的生命”是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一项主权——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联合国宪章》所允许的行使自卫权的前提：受到直接的、紧迫的威胁。

这一说法，已经表达了“布什主义”的要旨，该主义的最终定本出现在2002年9月17日由总统宣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中。美国不会让其敌人先发制人——在这个口号之下，这份文件记录了美国要实施到那时为止最为强烈的单边强权政策的意愿。若是顺着这位安全战略起草人的逻辑讲下去，那就是说，尽管一切国家都是有主权的，但美国比其他国家更有主权。这就不单对其潜在对手，而同时也对其欧洲盟友构成了挑战，但小布什及其顾问觉得这种局面可以接受。

让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在欧洲和美国国内都遭受尖锐批评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对国际法的公开蔑视和基于这种蔑视而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些批评指向整个“反恐战争”：比如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的虐囚事件、位于境外的不受司法管辖的拘押营（如在古巴的关塔那摩）、镇压性的法律［如2001年10月通过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以及国土安全部（NSA）在国内外广泛的电子监控活动。

在美国，主要是独立知识分子在抗议美国政府政策对国际法的破坏和总统行政权的系统性扩张。与这些人的态度相反，参议院、众议院对这些行为并无异议，总是让政府所谋求的立法提案和新的法案得以通过，连许多民主党人也投了赞成票。在欧洲，与小布什政府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少数政府（包括德、法两国政府）的事情。2003年1月底，旧大陆上的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反对即将进行的伊拉克战争的群众集会。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反对北约改装中程导弹系统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如果不是自1945年以来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话。[27]

面对欧洲对自己入侵行动的批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很淡定。政治评论

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3年出版的《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28]一书中写道：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欧洲之间出现了一种力量平衡。其中，欧洲是一个后现代的乐园。“欧洲人已经脱离了无法无天的霍布斯世界，进入了永久和平[29]的康德世界中。”相反，美国则依旧停留在“普世性民族主义中独一无二的美国模式”之中。书中还说，在小布什的时代，“西方”作为一个与外交政策紧密相连的概念已经丧失其意义。“美国在9月11日这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它只是找回了它自己。”因此，曾经的西方阵营之内并不一定会发生“文化冲突”，但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必须使自己适应美利坚霸权这个新的现实。[30]

早在一年之前，卡根就曾在《政治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上为他关于大西洋两岸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的思考做过画龙点睛式的总结：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这是一个挑衅，却影响不小。[31]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而言，要摆脱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这个挑衅式的攻击并不太难，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随时都准备用军事手段捍卫其利益。相反，德国十分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过去在军事方面的表现，所以就一直维护着一种“军事上内敛的文化”：这种政策虽没有形成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但每当联邦国防军要在“区外”（“out of area”，即在北约成员国的国境之外）行动时，就会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而且还必须得到联邦议会的授权。[32]总的说来，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区域内的军事任务已经大幅缩减，在公共讨论中几乎不存在对外部威胁的感受。尽管人们一再强调欧盟应该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但在实践层面这依然与从前一样受到成员国固有主权的阻碍。所以，从根本上讲，人们并不能说卡根的总结是错的。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结束于2009年），大西洋两岸关系跌入了前所未见的低谷。全欧洲的人都觉得继续维持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身上，奥巴马在2002年10月曾经作为民主党的参议员向伊拉克战争投出了反对票。这些希望中的大部分最后都以失望告终：由于国会中强硬的反对派和某些州的反对，奥巴马无法像他在竞选中承诺的那样关闭关塔那摩拘押营。他扩大了已饱受争议的武装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规模——尽管这一再导致无辜平民丧生；他同意延长小布什执政期间通过的国内各种严厉限制自由的法案，同时还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对重要的盟友实施电子监控——有段时间监控对象甚至包括德国总理。国家安全已经被排在了个人自由和国际法之前：这种优先性出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地狱般的体验，但它也激起了最亲美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

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对奥巴马的总统生涯给予更为友善的评价，而且主

要基于其内政方面的原因——虽不限于此。在他的第二任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已经可以确定，他将步入美国总统中的伟大改革家的行列。首先是“奥巴马医改计划”（Obamacare）这个全民法定医疗保险应该可以被称为历史性的社会进步，还有他针对无限制武器贩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他为了消除女性在酬劳上所受到的性别歧视的努力，他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这些都在欧洲获得嘉许。

在外交方面，奥巴马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以避免军事冲突而与前任总统拉开距离。这突出表现在自2011年夏天以来都处于沸腾状态的叙利亚内战问题上：美国为避免与俄罗斯发生重大冲突，一直小心翼翼地分配给予各个反对派集团的军事支援。要知道，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Wladimir Putin）是叙利亚巴沙尔·H.阿萨德（Baschar Hafiz al-Assad）除伊朗之外最重要的保护人。

由于阿富汗自身的安全力量尚不足以压制实力已经增强的塔利班，奥巴马不得不推迟原计划在2014年底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及其盟友）的战斗部队的时间表。但是在政治局势同样极端不稳定的伊拉克，美国却不只是像原计划那样在2011年底撤出战斗部队，而是撤出了全部军事人员。其理由是，由小布什在2006年扶植为伊拉克总理的什叶派政治家努里·马利基（Nuri al-Maliki）未能保证为美军士兵提供美国政府所要求的刑罚豁免权。接下来，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内战式的冲突造成了随之而来的混乱，这使得奥巴马的撤军命令很快就被公认为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

2011年对利比亚内战半心半意的干涉行动同样影响深远。直到最后一刻，美国才在法国和英国的压力下让步，在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决议的保证下，支持利比亚的叛乱者，并参与对卡扎菲政权政府军驻扎地班加西（Bengasi）据点的空中打击行动之中，而且还在其他地点对卡扎菲支持者的阵地实施了军事打击。美国在3月24日就宣布，空军的战斗行动将于4月3日结束，而且只有在北约通过决议的时候才再度实施。

从3月底起，盟军（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了弃权票的德国并不在其中）开始致力于颠覆政权，而这已经超出了联合国决议的范围。8月底，叛乱者攻占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10月底，独裁者成了叛乱者私刑的牺牲品。但利比亚并没有恢复平静：动荡和无政府的状态一直在持续；包括苏特（Sirte）在内一些城市成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据点。无论是美国还是其欧洲盟友，在做出发起军事攻击的决定时都未曾想到，竟然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法国）在向利比亚叛乱者提供武器时的慷慨程度超出了安理会的要求，这在3年之后成为普京总统违反国际法的借口——尽管他的违法方式要野蛮得多。2014年3月他吞并了克里米亚（Krim），这

里原本自1991年以来都是乌克兰的一个自治共和国。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最东边的顿巴斯地区（Donbass）毫无顾忌地入侵。西方的应对手段是经济制裁。美国将调解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冲突的外交工作留给了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

2014年，奥巴马已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改变中东[33]政策。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行动在当地造成了某种权力真空，这一点为此间战斗力最凶悍的逊尼派恐怖军事集团“伊斯兰国”（IS）所利用。“伊斯兰国”不但在伊拉克也在叙利亚攻城略地，这使得美国政府于2014年6月向满目疮痍的伊拉克派出了300名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并且还向波斯湾派遣了“老布什号”航母，用以保护美国公民和机构。8月，美军战机首次空袭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据点，自9月起也开始袭击其在叙利亚的据点。美国的欧洲盟友（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也参与了在这两国进行的空袭行动。但奥巴马拒绝动用地面部队；这个层面的战斗被交给了“伊斯兰国”的伊斯兰敌人——主要是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的佩什梅格部队（Peschmerga）。[34]

批评总统的人认定奥巴马打击“伊斯兰国”的热情来得太迟，而且总是犹豫不决。这的确是事实。但奥巴马所做的事依然可以说是出于这样一种洞见：如果不想让中东陷入混乱，美国就不得不担负起世界政治中更大的责任，即便因此而激起本国的舆论争议也在所不惜。同样是出于这种信念，美国令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作为代表，与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德国一起同伊朗进行核技术谈判。该谈判最终于2015年取得了成功：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e Atombehörde）对其核设施进行为期15年的管控，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这些核设施不被用于军事。后续谈判的结果之一，是美国和欧盟从2016年1月17起取消了自2007年起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当时的理由是伊朗违反了1968年缔结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on-Proliferations-Vertrag）。

如果要结束叙利亚内战，缺少德黑兰的建设性贡献是不可想象的，上述谈判的成功因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是伊朗，还是它的逊尼派死对头沙特阿拉伯，抑或是俄罗斯都确定了结束叙利亚内战这个目标，但它就像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局——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于2015年12月18日一致通过的决议，就叙利亚问题展开的和平对话本应该是能取得成果的，但就是完全谈不拢。

到2016年的头两个月，导致困局的问题终于水落石出，大家知道了谁才是最善于将美国从中东撤军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为己所用的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他手下的空军将炸弹精确地投掷到“最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阵地上，从而协助阿萨德政权占领了大量地盘——特别是阿勒颇（Aleppo）及其周边地区。同时，俄罗斯也由此赢得了现代战略术语中的所谓“以激化得统御”[35]的优势。普京的算计一目了然：西方国家很可能被迫放弃对

已被大大削弱的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支持，并转而接受与“相比之下不那么浑蛋”的阿萨德结成联盟，以对抗“伊斯兰国”和属于基地组织分支的另一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Al-Nusra-Front）。

201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玛丽·诺兰（Mary Nolan）的一本名为《跨大西洋的世纪》（*The Transatlantic Century*）的书。她在书中抛出的命题是：这个“跨大西洋的世纪”（即“漫长的20世纪”[36]）已经终结了。在她看来，划定这段时期的标志是：自19世纪末以来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37]这显然是在强调21世纪的头十年里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裂痕。

若把诺兰的命题仅仅当作对小布什时代的反映，或许过于草率。2009年11月，奥巴马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峰会上谈到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奥巴马本人一语双关地称自己为“美国的第一个太平洋总统”（他出生于夏威夷）。这位总统2011年11月17日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议会宣告了一项“重要的重心转移”：美国于十多年里在中东经历了两场血腥的战争之后，将要把它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潜力巨大的亚太地区。他称他的国家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并且宣布：21世纪的亚太，美国将无所不在。[38]

但奥巴马并没有说要进行一次“离开欧洲而转赴太平洋地区”的全面战略转向。美国在亚太地区没有如其欧洲盟友那般的伙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与美国结盟的，但无论是这两国之一还是它们加起来，都远不能企及欧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分量。日本与美国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但只要这个东亚的天皇之国依旧留有激进民族主义的烙印，依旧对西方的普世主义价值若即若离，那么它也同样不能像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实质上成为美国的伙伴。

为了突出西方（主要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1990年称这是历史上的“单极时刻”。[39]超级大国美国拥有绝对霸权的时间是短暂的：这个霸权因小布什企图追求其所谓的国家利益而终结。在克劳萨默的说法提出20年之后，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N. 哈斯（Richard N. Haass）将“无极化”称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这个世界将受到十多个行动方的影响，其中的每一个都拥有不同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中国（美国最大的债主）、印度和巴西都被算作新的“全球玩家”；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内政稳定，对外野心勃勃。西方明显已经丧失权柄，小布什那个因得胜而喜气洋洋的年代只是一个苦涩的回忆。诚如哈斯所言，这个世界现在处于“国际关系中的‘后大西洋时代’”。[40]

不管我们的说法是“无极化”，还是一种新的、带有某种对抗性的“多极化”，有一些事实是不变的：西方位于大西洋两岸的两个部分——北美和欧洲——又重新接近起来。这其中一个契机是“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另一个是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在2014年以后，那种相互需要的感觉又重新袭来。当欧盟因不断加剧的欧元区危机而抱团取暖时，当中东欧的几个国家转入非自由化的秩序时，当各国在难民、避难问题和在英国脱欧公投的负面后果上的根本性分歧减弱时，大西洋同盟保持了自己的凝聚力。在得知本国的情报机构也不忌讳对亲密盟友实施电子监控之后，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行为的怒火也有所消退。当人们意识到唯有同美国紧密合作才有可能有效地防范恐怖行径后，对北大西洋彼岸的这个魁梧伙伴的猜忌也就渐渐消去了。

不料，2016年的总统竞选大战又重新勾起了欧洲人对美国的怀疑：这次选战以前所未有的剧烈方式大大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并造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极化。激进的民族主义兼民粹主义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令奉行自由主义的欧洲大惊失色。不过，我们会专用一章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41] 2016年底，已经确定无疑的是：跨大西洋关系将再一次面临严峻考验。

---

[1] 波旁王室在复辟之后倒行逆施，查理十世上台后更是推行了一系列限制言论自由和限制中产阶级选民资格的反动改革，因此招致市民阶层的不满并爆发七月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继承王位，他随后推行了大量自由主义的措施，史称“七月王朝”（1830—1848）。

[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2 Bde., Paris 1990, Bd. 1, S.35 (Bd. 1 von 1835, Kap. 2). 德文译本：Über die Demokratie in Amerika, 2 Bde.,Zürich 1987。

[3]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美国新教神学家。二战后他极力主张美国遏制苏联的扩张，为美国的反共政策辩护，是在美国政府和民间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代思想巨擘。

[4] Reinhold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52, S. 22-24.

[5] 约翰·温斯罗普（1588—1649）是一位英格兰的贵族兼律师，毕业于剑桥大学。他购买了新成立的马萨诸塞公司的股票并被选为总裁，而该公司于1629年初获得了在新英格兰开辟殖民地的特许状。从1630年开始他带领大量清教徒到北美洲，并成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并在之后的20年中4次担任该殖民地的总督，其思想和实践活动深刻影响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初创时期的发展。

[6] Perry Miller and Tomas H. Johnson (eds.), *The Puritans*. Überarb. Ausgabe, Bd. 1,New York 1963^{2}, S. 63-70. 此引文出自*Matthäus* 5, 14（《马太福音5:14》）。

[7] Ernest Lee Tuveson, *Redeemer Nation. The Idea of America's Millennial Role*,Chicago 1968.

[8] “重生”（或“再次出生”，Wiedergeburt）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面对前来问道的尼哥底母，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3:3》）

[9]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1: Von den Anfängen i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fortan: Geschichte I), München 2016^{5}, S. 964 ff.

[10] Ders.,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2: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fortan: GeschichteII), München 2016^{3}, S. 53 f.

[11] Ders.,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 (fortan: Geschichte IV), München 2016^{3}, S. 205 ff.

[12] Tocqueville, *Démocratie* (Anm. 1), Bd. 1, S. 33 (Bd. 1 von 1835, Kap. 2).

[13] Ebd., Bd. 2, S. 248 (Bd. 4 von 1840, Kap. 4).

[14]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55, S. 3 ff. (6; 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15] Werner Sombart, *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en Sozialismus?*,Tübingen 1906.

[16] 腓特烈大帝，即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原为神圣罗马帝国边陲的一个不太大的国家，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继承了祖父和父亲努力的成果之后，以其文治武功（特别是赢得西里西亚战争和七年战争），使得普鲁士在18世纪末成为欧洲列强之一，所以德国人专称之为“大王”。

[17] Hans Rothfels, *Bismarck und der Staat. Ausgewählte Dokumente*, Stuttgart, 1953^{2},S. 319 f.［Rede im preußischen Abgeordnetenhaus, 15. 2. 1865（1865年2月15日在普鲁士议会的演讲）。］

[18] Winkler, Geschichte II (Anm. 6), S. 643 ff.

[19] Ders., *Geschichte IV* (Anm. 7), S. 361 f., 374.

[20]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ß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Studienausgabe, hg. v. Johannes Winckelmann, 1. Halbbd., Köln 1956, S. 39.

[21] 德文的Staat与英文的state在一般情况下是同义词。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宪法的语境下，“free state”指的是“自由州”，第二修正案本来就有以民兵保卫州权，防范联邦权力侵犯的用意。但在本文的语境中，这一段的前半部分一直在谈国家体制（Staatlichkeit）和国家权力，考虑到作者意欲进行对比的思路，暂且将本句中的“Staat”翻译为“国家”，唯请读者留心。

[22] 见《出埃及记21:23-25》：“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23] “德意志灾难”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一本著作的书名，有何兆武所译的中译本（书名是《德国的浩劫》）。

[24] 以下这篇论文对此有一个总结：Jessica C. E. Gienow-Hecht, Always Blame the Americans: Anti-Americanism i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2006), S. 1067-1091。

[25] Winkler, *Geschichte IV* (Anm. 7), S. 219.

[26] Ebd., S. 221.

[27] Ebd., S. 214 ff.

[28] 目前的中译本有：《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肖蓉、魏红霞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刘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作者在第20注给出的书名显示，这本书德文版的书名被译成了“Macht und Ohnmacht. Amerika und Europa in der neuen Weltordnung”，即《强而有力与软弱无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

[29] 德国哲学家康德著有《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一文。

[30] Robert Kagan, *Macht und Ohnmacht. Amerika und Europa in der neuen Weltordnung* (amerik. Orig.: New York 2003), Berlin 2003, S. 68, 89, 98, 101, 114,121.

[31] Ders., Power and Weakness, in: *Policy Review* 113 (2002), S. 3-28.

[32] Winkler, *Geschichte IV* (Anm. 7), S. 28 f. 更详细的讨论，见本书第100页。

[33] 原文为“Nahe Osten”，直译是“近东”。在德语世界中，“近东”指的是从土耳其、埃及到伊拉克这部分地区，“中东”指从伊朗到阿富汗的地区，“远东”即是东亚。由于中国读者已经习惯英语中的“中东”概念，所以在此处将“Nahe Osten”译为“中东”，下同。

[34] 佩什梅格，意为“面对死亡的人”，又译为“自由斗士”，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的军队。由于伊拉克宪法规定伊拉克陆军不得进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所以佩什梅格以及其他库尔德安全附属机构负责库尔德地区的安全事务。

[35] “以激化得统御”（Eskalationsdominanz）是这样一种策略：通过破坏秩序或威胁破坏秩序，迫使对手投鼠忌器，从而在某一地区或谈判中取得优势的策略。通俗地说，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36] 这样说的意思，是将“20世纪”的时间范围拓展至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著名说法正好相反：霍布斯鲍姆将近现代总结为“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年）和“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年）。

[37] Mary Nolan, *The Transatlantic Century. Europe and America 1890-2010*,Cambridge, 2012, bes. S. 7 ff., 356 ff.

[38] Winkler, *Geschichte IV* (Anm. 7), S. 366 f.

[39]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in: Foreign Affair 70 (1990/91),Nr. 1, S. 23-33.

[40] Richard N. Haass, Die Doktrin der Restauration. Wie Amerika seine Führungsmacht im 21. Jahrhundert sichern kann,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67(2012), Nr. 1, S. 70-77 (70 f.).

[41] 对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大战更详细的讨论，见本书原文第239页。

第7章
德意志问题又来了？

德意志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它是拿破仑1806年强行解散神圣罗马帝国的后果。更确切地说，自那之后出现了三个德意志问题。人们争论不休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哪儿才是德国，它的边界在何处，它管辖着哪些地方？第二个问题是：统一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第三个问题：德国真的像人们一直认定的那样，是欧洲安全或者说欧洲均势的一个威胁吗？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数年前刚解体的旧帝国的替代品：德意志邦联（der Deutsche Bund）。这个新邦联的任务是给德意志诸侯和各自由城市一个共同的政治平台——这种结构既能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使他们松散地聚合在一起，又不会妨碍他们行使各自的主权。[1]

德意志邦联要想顺利运行，有三个必要条件：其一，德意志空间内的两强——奥地利和普鲁士，相互间必须保持极大的克制；其二，所谓的“第三个德国”或“特利亚斯”（die Trias）[2]——境内其他的中、小邦国——多少应该团结起来代表其整体利益；其三，德意志邦联应该为自由思想留下成长的时间。然而，在德意志邦联之内，只有从1815年到1866年的“德意志双雄之战”前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因1848—1849年革命而有所中断）才暂时具备前两个条件，而且它们在1850年之后也已呈现出越来越不稳固的态势。至于说第三个条件，则从来也没有具备过。

1848年革命源自一场反对那些拒绝自由和统一的德意志诸侯的运动。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想要实现的，是比1789年法国的革命者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法国的革命者是想把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建立在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而“1848年的那代人”的目标有两个：他们要让（轮廓已变得更加清晰的）德意志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宪政国家。他们忍不住想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却力不能逮。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这场运动的推动者们都觉得一个统一的德国毫无疑问地应该包括讲德语的奥地利。而直到1848年末才有人意识到，统一是不可能在大德意志框架内实现的，它只有在普鲁士统领下的、不包括奥地利的小德意志框架内才能实现。然而，当有人有此觉悟时，实施这样一个妥协性方案的时机早已错过：普鲁士的反革命势力已经变得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来自霍亨索伦（Hohenzollernkrone）家族的国王与法兰克福的国民大会之间早已无法再达成一致。

俾斯麦用以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小德意志方案”是一次经典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该方案由三次战争构成：1864年德意志邦联与丹麦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以及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此三战以普鲁士的方式回答了1848年提出的统一问题。但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自由问题，却远没有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尽管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其前身北德意志联邦始于1867年）推行了在当时非常民主的成年男子普选制度——以至于当时的德国甚至被视为比英国和比利时更为进步的模范君主立宪制国家，但这个帝国却根本没有一个必须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只是在“一战”军事失败的阴影下，德国才于1918年以“十月改革”的形式施行了议会制。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德国的民主化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先实现民主化的是选举权，而政府系统则过了很久才在有限的意义上实现了民主化。

对在1918—1919年革命中诞生的魏玛共和国（Republik Ven Weimar）而言，议会民主制与战败同时发生的这个事实是德国民主政体的第一个沉重负担。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德国在战争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挪用过来，继续宣称要用“1914年的德意志精神”对抗1789年“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理念。这些“德意志精神”包括：捍卫德意志军国主义和“民族共同体”，支持一个强大且崇尚社会公正的国家——一些教授甚至将这些东西称为“德意志社会主义”。[3]

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平步青云的极右翼党派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的领袖[4]，事实上是德国民主化不同步的获益者。在脆弱的议会民主制失败，并在1930年转变为一种半威权的总统制之后，此人可以在两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一个是普遍存在的、对议会民主制的愤恨，而且此时民主制仅存一个门面；与此同时，人民从俾斯麦时代起就部分得到的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因政府已经在1930年至1933年以紧急法令的方式或多或少地被取消了。

纳粹党统治时期是德国最拒斥西方价值规范的年代，它否定了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念。直到德国迎来了自己在20世纪的第二次（这次是彻彻底底的）战败，而且俾斯麦所创建的那个统一的德国也灰飞烟灭之后，新的观念转化才得以在1945年之后启程。在德国靠西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在后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现了第二个议会民主政体——这一次是一个能可靠运转且有自卫能力的民主[5]制度。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1986年在“历史学家之争”[6]达到白热化之际，谈及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事件的唯一性时所说的：“联邦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地开放”是长期学习和争论之后的结果。[7]而在德意志的另一部分土地尚在专制统治下，在1989年的“和平革命”到来之前，这样一种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好感是无法想象的。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民主德国的

政治环境彻底改变了，于是这种好感也传到了德国东部。

只要德国还是分裂的，人们就会觉得这一状况不但是欧洲，也是全球“东”“西”势力之间维持均势的保证。联邦德国坚定地将自己与欧洲共同体和北约绑在一起，而民主德国也如此看待自己与经济互助会和华约的关系。在这种局面下，分裂的德国不会对外部世界构成威胁。但在1989年秋天民主德国崩溃，并且一个统一的德国再次出现之后，警报声就响彻许多欧洲国家首都的上空。

1871年2月9日，就在俾斯麦建立其帝国之后不久，英国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保守党人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把德——法战争称为“比法国大革命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它彻底摧毁了“均势”。[8]俾斯麦凭借其远见，设法用旨在保证维持现状的外交政策否定迪斯雷利的这个判断，但随后那位热爱冒险的威廉二世却更多地证实了这个判断。1989年至1990年，欧洲均势再次地动山摇，无论是像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女政治家，还是像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的男政治家，都为此而忧心忡忡。

只有外交方面的巨大努力，才能消除德国邻国因德国问题突然回到国际政治议程之中而引发的担忧。美国从一开始就认为，解决这个由德国统一导致的疑难的必要条件是让整个德国都从属于跨大西洋联盟。苏联愿意在此事上让步，是因为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弱点：如果莫斯科不允许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改革后的）北约成员国，那么它就不能再指望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的全面援助。此时参与的各方都很清楚，重新统一只有在1945年的边界之内才能实现，因此波兰的西部边界——奥得-尼斯河（Oder und Görlitzer Neiβe）一线——必须成为统一后德国东边的最终边界。1990年11月14日由两个德国与二战的四大战胜国在华沙签订的《二加四条约》（Zwei-plus-Vier-Vertrag）[9]和另行签订的德国与波兰之间的边界条约（deutsch-polnischen Grenzvertrag），正是照此办理的。

在1990年10月3日于柏林爱乐音乐厅举行的庆祝德国重新统一仪式上，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用下面这几个简短的句子就将庆典与这个历史性的地点[10]联系了起来：“头一次，我们德国人没有再给欧洲的议事日程制造争议焦点。我们的统一是和平商定的，没有强迫任何人。这统一是全欧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此进程的目标是为各民族带来自由，以及为我们这个大陆带来新的和平秩序……今天，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在欧洲的位置已获承认……历史上头一次，整个德国都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拥有了稳固的位置。”[11]

魏茨泽克口中的全欧历史进程，在1990年9月21日来自34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简称“欧安会”）并签署《巴黎宪章》（Charta von Paris）时暂告一段落，出席会议的首脑包括美国总统老布什

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凡签署参与该宪章的国家，都有义务“致力于建立、巩固和加强民主制度，并视之为本国唯一的政府形式”，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在签署《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2]15年后，各国决定深化各级磋商。为此，它们将设立一个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外长理事会。[13]

随着德国的重新统一，自19世纪初以来的德意志问题在全部三个层面上都获得了解决。首先，可以毫无争议地确定德国的边界所在，划定有哪些地方是属于德国的国土。由此证明了俾斯麦的小德意志方案是行得通的——尽管此时的领土比1871年时又小了许多。其次，与俾斯麦的帝国不同的是，这次统一和自由得以同时实现。最后，威胁欧洲安全的德意志问题也不复存在了：德国是北约成员国，永远放弃了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还在全德范围内大幅裁减联邦国防军，这使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另一份约定并非“二加四谈判”的内容，却是赫尔穆特·科尔总理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另行商议的结果——联邦德国愿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前就承担一项致力于构建欧洲新均势的义务：这就是上文已经详谈过的德国政府在欧洲政治与货币统一一揽子计划上的让步。[14]法国的忧虑在于，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在稳定的德国马克的支撑下迟早会将欧洲置于它的霸权之下，为了减轻法国的顾虑，科尔愿意在两个分别进行的两国政府会谈中把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问题分开来讨论。由此才有可能诞生1992年初生效并成为单一货币的基础的《马约》，但德国政府曾寄予厚望的欧洲政治统一进程却并不能因此条约而取得大幅度的进展。坦率地说，以此方案解决德国问题，使欧洲问题成了悬案。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德意志问题自1990年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之后就被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了。大约十年之后，当奥地利人民党主席沃尔夫冈·许塞尔于2000年2月与克恩滕州（Kärnten）州长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领导下的（通常被认为是鼓吹“大德意志”的）极右党派奥地利自由党（FPÖ）组成了联合政府，法国社会学家埃玛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于此时抛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德意志问题又来了！[15]正是这样的氛围，使欧盟在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压力下对奥地利实施了制裁。

2004年，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F. 绍博（Stephen F. Szabo）在谈到德国在格哈德·施罗德和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领导下的红绿联合政府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说不”一事时，说这是一个新的德国问题。[16]不过这一次德国并不孤立。雅克·希拉克的那个“不”字说得与德国同样坚决，而且法国的这个“不”对美国而言更有分量，因为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从而可以用否决美国或美、英提案的方式威胁华盛顿。

又过了大约十年，新一轮针对德国的权力及其对权力的理解方式的批评声再次响起。引燃这场争议的火星，是德国在（2007—2008年源于美国的）国际债务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红绿联合政府施行的“议程2010”改革，德国在世界经济的动荡中变得更强大了。而且德国还愿意帮助欧元区内陷入危机的国家，其方法是在与欧盟委员会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引导这些国家进行影响深远的结构性改革。但这样的立场不但在那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而且也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遭遇恶评，这些人觉得德国人因为自己在历史上曾遭受过通货膨胀，所以现在要采取不惜损害第三方的紧缩政策，结果对欧洲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下面这类责难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有人说德国之所以要采用如此严格的货币稳定政策，最终是为了创立一个“以周边为腹地的德意志帝国”——如此耸人听闻的说法来自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17]英国历史学家兼政论家提摩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绝对不是德国的敌人，但他在2013年夏季谈起了“新的德国问题”，这给了他的爱尔兰同行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一个启发，让后者开始谈论“新德国问题的时代”。[18]当被诅咒的“紧缩政策”开始在地中海国家以经济略有增长和失业人数略有下降的形式显示出初步成果之后，对德国的批评声才稍微减弱了些。与此同时，不少人终于认识到：创建一种欧洲共同货币而不同时成立一个以政治联盟为内核的财政联盟，是欧元的结构性缺陷。[19]

另一种对德国处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批评就很难反驳了，因为它涉及外交和安全政策。2011年3月17日，在利比亚内战趋于白热化之际，安理会通过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动议，其内容是阻止利比亚政府军对班加西守军的屠杀威胁。在投弃权票的几个大国中，德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站在了一起——这样一种自我边缘化的行为在德国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出现，它引来了美国及其他西欧盟友对德国铺天盖地的批评。这些国家觉得德国人在军事领域所提倡的“克制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克制文化”这个说法来自1992年至1998年任外交部长的自由民主党人克劳斯·金克尔（Klaus Kinkel）］。在许多具体的事例中，这样一种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许多德国评论员也曾发出过同样的指责。[20]

这种在西方经常被当作新“德意志道路”（这次却是和平主义道路）的东西，不但与德国（或者说两个德国）战后45年未获得完整的国家主权的经历有关（同时它们还把最高安全责任托付给盟友），而且同样也与那段既影响深远又充满争议的1933—1945年的德国历史（特别是二战中的那段历史）有关。这段经历引起了这样一种说法：由于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德国有义务奉行无条件放弃武力的政策——包括不参与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行动，除非纯粹是为了保卫国土和盟友。

1995年，在联邦议院关于是否应该派遣联邦国防军保护波黑平民的辩论中，这种想法成为掌握议会多数的社民党人和绿党联盟者的论点，他们自然少不了提到大屠杀的教训。3年之后，就在社民党和绿党联盟在1998年的大选中大胜后不久，这两个党却批准了另外一项北约在科索沃（Kosovo）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他们这次也重提了奥斯维辛（Auschwitz），但重提它的意思是想强调一种责任：不能对严重侵犯人权之事袖手旁观。自那之后，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特别是屠杀犹太人一事，就很少再被提起了。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每一次将大屠杀一事工具性地使用以服务于眼前的政治目的，都会有使这件事庸俗化的危险。有些人试图从纳粹反人类罪行的独特性中获得一种权利：我们可以对其他的反人类罪行视而不见——庸俗化，而且这种策略会使德国遭到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孤立。

近年来，德国已经被多次要求在更大程度上“领导”欧洲。其中特别振聋发聩的声音来自2011年11月28日波兰外长拉多斯拉夫·西科尔斯基（Radosław Sikorski）在柏林发表的演讲。他称德国是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同时还说，作为一个波兰人，比德国的势力更令他害怕的是德国的无所作为。[21]英国杂志《经济学人》（*Economist*）在2013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政治学家威廉·E. 佩特森（William E.Paterson）所创造的一个概念，称德国是“欧洲不情愿称霸的霸主”。该文作者桑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点明了法国与德国在经济实力上史无前例的差距和法国在改革方面的滞后，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当北京和华盛顿问‘欧洲将向何处去’时，其实是在问‘德国人现在想干什么’。”[22]

“霸权”这个概念，既不符合欧洲联盟这样一个国家联盟（Staaten-verbunde）[23]的理想，也不符合现实。与此类似的是“敏感的霸主”（因其过去的经历而畏首畏尾）——这是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24]用以描述当今德国的概念。只要一想到，如今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德国国内，对德国历史的批评一直有增无减，人们就会觉得“霸主”这个概念也很值得商榷。[25]德国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所有企图都会落空，而且还会毁掉整个共同体。

另一个提法更有说服力。这就是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26]1951年在描绘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在欧洲的地位时所用的概念——“半拉子霸权”[27]。[28]伦敦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主任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在他2014年末出版的著作《德国霸权的悖论》（*The Paradox of German Power*）中又把这个概念用到了德国身上，多米尼克·格佩特（Dominik Geppert）[29]的做法也是这样。这二人认为，与那个处于中间状态的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一样，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对“均势”而言太强大了，但又没有强大到足以行使霸权的份上。昆德纳尼所谈的是德国在

地缘经济学意义上的“半拉子霸权”，他认为德国问题以一种地缘经济问题的形态又重新出现了。他觉得，现在德国的力量是一种杂糅了经济上的强权和军事上的自我约束的罕见混合物。他还认为德国在欧洲正越来越（自信地）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欧洲之外却不愿放手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在多数时候也缺乏价值规范方面的考量——比如要不要重视人权。[30]

在与欧盟内部的权力关系相关联的问题上，很少有“德国问题又重新出现”的说法。在那儿，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不是德国的政策，而是法国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一拖再拖的结构性改革。这些问题更多显现出的是欧洲问题悬而未决。这样说是因为，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以后，就算是有了欧洲财政稳定机制、财政稳定协议和银行联盟，欧洲货币联盟向财政联盟的发展几乎毫无进展，而未完成的政治联盟就更无人提及了。

仅仅指出欧洲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并不能就此驳斥德国问题再度归来（或者说“新德国问题”）的命题。昆德纳尼引述的证据包括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关于一条特殊的“德意志道路”的声明，而更有说服力的，是他引述了大量2014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期间，有着特殊关系的俄、德两国之间的相互许诺。[31]在最新的东、西方冲突中，有些说法真的很难让人忽略：有人说德国在俄罗斯与美国之间采取的某种形式的等距离外交，还有人说德国要在西方国家与俄罗斯联邦之间扮演斡旋者的角色。这些说法有时会在欧盟和北约的中东欧成员国那里引起这样一种疑心：德国人所声明的“与西方结盟”在国内真的像人们长期以为的那样没有争议吗？不过，没有人能够指责柏林的官方政策含糊不清。与以前一样，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都是：面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欧盟和北约必须团结一致。如果谈德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根本没有理由扯出一个“新德国问题”。

在1989—1990年的划时代转折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西方至少应暂时放弃如下奢望，不应再坚信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个横跨三大洲的自由空间将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现在还在我们手中的果实，是改变了雅尔塔体系后的秩序，传统西方被划分为自由和不自由区域的分裂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为了保住这一成果，欧盟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在外交与安全领域中用一个声音说话。

除了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之外，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蔓延，以及部分由此而产生的涌入欧洲的难民潮，都表明欧洲人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是多么紧迫的事情。近来，难民问题已成为考验共同体牢固程度的试金石。德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是饱受争议的角色，这些争议引发了关于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新讨论。而这将是下一章的话题。

[1] 关于此问题和后面的问题可参考：Heinrich August Winkler, Von der deutschen zur europäischen Frage. Gedanken zu einem Jahrhundertproblem,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3 (2015), S. 473-486。

[2] “特利亚斯”，原文是“die Trias”，以拉丁文“三”（tria）为词根，代指由中、小邦国构成的“第三个德国”。

[3] 作者在这里显然指的是维尔纳·桑巴特教授。该教授年轻时同情社会主义运动并因此而受到帝国政府的压制，到了“一战”前却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并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的口号。参见桑巴特著：《德意志社会主义》（Deutscher Sozialismus），杨树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作者在此处是一语双关，因为“领袖”（Führer）也是后来纳粹德国时期对希特勒的官方敬称，一般译作“元首”。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Nazi），旧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误，因为根据纳粹党的主张（种族主义、“民族共同体”）以及使用时的语境，可判定其中的“national”侧重于指民族而非国家。

[5] “有自卫能力的民主”，原文是“abwehrbereite Demokratie”，这是德国政治学和宪法学中的一个术语，有时候也写作“Streitbare Demokratie”（直译是“战斗性民主”）。它的意思是：德国的法学家们在总结了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之后，决定让《基本法》（即宪法）赋予德国政府、议会和法院特别的权力和责任，以对抗那些企图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势力，并规定即使这样的势力获得议会多数也不可以废除《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等）。因此，与魏玛共和国以消极的、价值中立的立场去看待各种“主义”不同的是，联邦共和国有权主动打击国内的极端思想，所以才称其为“有自卫能力的民主”或“战斗性民主”。

[6] “历史学家之争”是1986—1987年主要爆发于联邦德国不同政治立场的历史学家之间（也牵涉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一场争论。其中，右翼保守主义人士认为对纳粹暴行的历史书写应该予以修正，应去掉各类“政治正确”的说法，站在德国人的立场而不是那些二战胜利者的立场上去审视这段历史，并且认为纳粹的暴行起因于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防卫过当”；而左派历史学家认为右翼保守主义人士企图将纳粹的罪行相对化，实质上是在为纳粹罪行进行辩护，是值得警惕的现象。他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行的严重性是否独一无二。除了对历史事实的争论外，双方还围绕历史研究在政治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以及爱国主义、学术自由和辩论规则等问题展开争论。参见范丁梁：

《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7] Jürgen Habermas, 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 in: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 1987, S. 62-76 (75).

[8] 引文源自Walter Bußmann (Hg.), *Bismarck im Urteil der Zeitgenossen und der Nachwelt*, Stuttgart 1956², S. 28。

[9] 即《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

[10] 柏林爱乐音乐厅位于波茨坦广场，紧邻昔日东、西柏林的分界线——柏林墙。

[11]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I, Bd. 8b, Bonn 1991, S. 717-731.

[12] 1975年8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共37个国家（包括美国、苏联、加拿大，以及除阿尔巴尼亚和安道尔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签署了《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 of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其主要内容是：签约国应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并和平解决争端，建立互信，加强经贸、科技合作，尊重包括移民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内的人权。

[13] Karl Kaiser, *Deutschlands Weigerung. Die internationalen Aspekte. Mit den wichtigsten Dokumenten. Bearb. v. Klaus Becker*, Bergisch Gladbach 1991, S. 368375.

[14] Karl Kaiser, *Deutschlands Weigerung. Die internationalen Aspekte. Mit den wichtigsten Dokumenten. Bearb. v. Klaus Becker*, Bergisch Gladbach 1991，原文第45页。

[15] Die deutsche Frage ist wieder off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6. 2.2000.

[16] Stephen F. Szabo, *Parting Ways. The Crisis in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Washington D. C. 2004, S. 149 ff.

[17] George Soros, Remarks delivered at the Festival of Economics, in: http://www.georgesoros.com./essays/remarks_at_the_festival_of_economics_trento_italy/, 2.6. 2012.

[18] Timothy Garton Ash, The new German Question,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8. 2013; Brendan Simms, *Kampf um die Vorherrschaft. Eine*

deutsche Geschichte（英文原版出版于London 2013）, München 2014, S. 20（书的前言讨论了德意志问题）。

[19] Timothy Garton Ash, The new German Question,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8. 2013; Brendan Simms, *Kampf um die Vorherrschaft. Eine deutsche Geschichte*（英文原版出版于London 2013）, München 2014，原文第53页。

[20]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München 2016³, S. 448 ff. Zu Kinkels Formel: ebd. S. 28 f.

[21] Polen und die Zukunf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n: *Die Welt*, 29. 11. 2011.

[22] Zanny Minton Beddoes, Europe's Reluctant Hegemon, in: *The Economist*, 15.6. 2013; William E. Paterson, The Reluctant Hegemon? Germany Moves Centre Sta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9 (2011).Annual Review, S. 57-75.

[23] "'国家联盟'是一个新创造的德语复合词，由'复数的国家'（Staaten）与'联盟'（Verbund）两个独立词语相加而成……在英语等其他语种中没有相应的表述。这个复合词的最大优点是整合了欧盟自身已有的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两大属性，'Union'一词无法体现这一点。"引自连玉如：《再论"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刊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第17页。

[24]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是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以研究政治思想史和战争理论著称。国内译有他的《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李维、范鸿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25] Herfried Münkler, *Macht in der Mitte. Die neuen Aufgaben Deutschlands in Europa*, Hamburg 2015, S. 174 ff.

[26] 路德维希·德约出生于柯尼斯堡，是20世纪前半叶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家，亦在世界史学界享有盛誉。曾担任过霍亨索伦王朝档案馆和德国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历史杂志》的主编。国内译有他的《脆弱的平衡》（时殷弘转译自英文译本，德文原版的标题是《均势还是霸权：对晚近国际关系史中一个基本问题的观察》）。

[27] 德约所说的"半拉子霸权"指的是在法国新败的情况下，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上已显得如此之强大，足够被英国和俄国视作一种重大威胁，但作为霸主，德国的力量又如此不足，以至于完全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欧洲大陆。

[28] Ludwig Dehio, Deutschland und die Epoche der Weltkriege, in: ders.,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1955, S. 9-36 (15).

[29] 多米尼克·格佩特，德国历史学家，主张未来的欧盟应发展为一个高于自由贸易区的国家联盟，而不是发展成一个联邦，由此一来德国的强势地位也能够得到中和。注释17中所引用的他的著作可译为：《同一个欧洲？这根本不存在——论欧元的致命破坏力》。

[30] Hans Kundnani, *The Paradox of German Power*, London 2014, S. 8, 14 f., 107, 德语译本的名称是：Ausgabe: German Power. Das Paradox der deutschen Stärke,München 2016; Dominik Geppert, *Ein Europa, das es nicht gibt. Die fatale Sprengkraft des Euro*, Berlin 2013, S. 122 ff. (123)。“地缘经济学”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Edward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90, S. 17-24。

[31] Kundnani, Paradox（注释17）, S. 100 ff。

第8章

作为避难所的欧洲？

自古以来，一切历史都是移民者的历史。这个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即使到了近代，也有许多国家完全因移民运动才得以诞生。美国是这样，加拿大、拉美国家，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这样。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古老的欧洲国家并非典型的移民社会。在20世纪的下半叶，英国、法国、荷兰这些曾经的殖民大国经历了一场来自它们原先的殖民地的移民大潮。其中流向法国的移民还有些来自阿尔及利亚——那儿直到1962年还是法国的组成部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招徕来自南欧和土耳其的“客籍劳工”作为劳动力，这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土耳其人）并未如波恩政府所想的那样只是暂时在德国打工，而是长久地在此地定居了。另一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在招徕规模小得多的外国劳动力，这些“合同制劳工”绝大多数都来自越南和莫桑比克。而其他与苏联结盟的欧洲国家几乎都没有引入移民。

从20世纪80年代起，进入联邦德国的第三世界难民数量开始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中欧和南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数也开始增长。1989—1990年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这使西欧（特别是德国）遭遇了一场全新的移民潮。对联邦德国而言，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大量涌入的，不但有来自民主德国的移居者，而且还有越来越多（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之后）来自罗马尼亚的罗姆人（Roma）[1]——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证实自己在母国作为少数民族而受到了歧视。在这种背景下，联邦德国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就一直存在的纷纷扰扰的争议在1989—1990年剧变之后不久变得更加激烈了。这一争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德国是否还应该保留关于庇护权的规定——德国1949年的《基本法》第16条第2款第2句规定，“受政治迫害者享有庇护权”。

作为立法机关的制宪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 Rat）[2]，在成立3周之后就于1948年9月23日举行的原则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处理了关于庇护权的问题。在起草委员会的草案上，相应的条款写的还是：“政治上受迫害者，在通行国际法的框架内享有庇护权。”对于这样一个约束，作为原则问题委员会主席、基民盟党人、国家法及国际法专家的赫尔曼·冯·曼戈尔特（Hermann von Mangoldt）给出的理由是：“这样我们就不用顾虑通行国际法规定之外的情况了。”他的原话还有：“我们是一个弱国，没有资源提供更多的保护；我们不能去做那些我们自己没有相应资源来保证能做成的事情。”但按照同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同为国际法教授的社民党人卡洛·施

密德（Carlo Schmid）的意见，在另一处（后来的第25条）将国际法的一般规定解释为联邦法律的一部分之后，曼戈尔特赞成的那个约束就被放弃了。

“受政治迫害者享有庇护权”这句话让制宪委员会踏进了司法中的新领域。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都将庇护权仅仅视为受国家保障的权利，而唯有联邦德国的宪法立法者把政治庇护当作一项主体性[3]的个人基本权利。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眼中的“庇护”，是1933年后其他国家对德国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制宪委员会成员者）所提供的保护，这些德国人由于种族、政治和世界观方面的原因而被纳粹德国政府迫害（或至少是大加歧视）。在“第三帝国”崩溃之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政治迫害也导致了这种“庇护”的出现。[4]

42年之后，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发言人表示，1948—1949年的这个规定已经过时，亟待修改。1990年3月1日，该州向联邦参议院提交了一份关于修改《基本法》的法律提案。此提案认为《基本法》第16条第2款第2句应该删去，并代之以下列规定：“1.受政治迫害者将按照《庇护法》受到保护。2.接受庇护的决定和驳回庇护请求之后中止居留的措施，都可以经由法律途径或替代性法律途径在一个由联邦众议院任命的独立的申诉委员会接受审查。3.为防止对公共福利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可以在接纳受政治迫害者时对其人数和来源国进行限制。”[5]

那时，巴伐利亚州政府几乎完全没有希望将这个建议付诸实践。执政的自由民主派的联盟党（CDU/CSU）和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一起否决了来自慕尼黑的动议。而且绿党、民主社会主义党（die 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6]、基督教教会和人权组织也都反对这个动议。然而，当申请庇护者（特别是来自罗马尼亚和被内战蹂躏的黎巴嫩的申请者）的数量在1990年迅速上升时（1989年全年的申请人数为12万，而1990年从1月到7月的人数已达10万），就连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们也开始积极要求修改庇护权的相关条款了：起先是萨尔州长，曾当过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的奥斯卡·拉方丹有此想法；紧接着，社民党的副主席，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州长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也用明显更为谨慎的方式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这两个州的政府并不主张取消主体性庇护权，而是支持对其加以限制。拉方丹还认为，对那些在自己的国家并未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不宜再承认其庇护权。[7]

使这样一种主张限制庇护权的路线得以实现的，主要是1992年4月爆发的波黑内战和由此而引发的涌向中欧的难民潮：1992年，在德国申请避难的人数达到了43.8万，而其中仅有4.3%的人被确认为受政治迫害者。当时，德国收留了涌入欧盟的避难申请者中的近五分之四（78%），大多数观察

家都将此归因于1949年之后联邦德国所提供的特别慷慨的庇护权利。一种以“大规模滥用庇护权”为关键句的声音开始在德国广为流传。受其影响，自1992年秋天起发生了针对庇护申请者和其他外国人（特别是土耳其人）的暴力行为——这主要发生在原民主德国地区，但在一些老联邦州（原联邦德国地区）也有出现。从1990年到1993年，至少有49人（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在德国遭右翼极端分子杀害。

对庇护权的第一个限制是1992年6月的《庇护促进法》（Asylbeschleunigungsgesetz），它在1993年7月1日与修改后的《基本法》庇护权条款一起生效。《基本法》第16条第2款第2句被改成了第16A条第1款，而后面的4个条款大大限制了这项权利：来自欧盟成员国或其他安全的第三国[8]的人不可以援引庇护权。将一个非欧盟国家认定为安全的第三国，需要联邦参议院通过立法批准。认定申请者的来源国一事，也应依照这一程序。

尽管联邦宪法法院于1996年5月裁定1993年对庇护权的这项修改符合宪法，但此事在德国政治中仍不乏争议。新的16A条虽然至少是在形式上挽救了1949年的庇护权，但它为了这样做也让另一方（即安全的第三国）付出了代价。回顾往事，有些自我反思的问题早就应该提出：联邦德国的立法者是否因为许下了德国能力范围之外的承诺，才在无视自己人告诫的情况下把“受政治迫害者享有庇护权”这句话以毫无约束的形式写进《基本法》的呢？到了1993年，为什么不能诚实地回到1948年的原稿（“在通行国际法的框架内”）或是选择另一种表述方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据其接纳能力和令来者融入社会的能力，为受政治迫害者提供庇护权”呢？自然，这样一种理性地回到1948年所选择的在庇护权一事上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办法，是注定无法取得修改宪法所需的多数的。于是，就出现了1993年这种貌似妥协的结果。

在《基本法》中的庇护权条款被修改4年之后，1990年6月欧盟成员国签署的国际法条约——《都柏林条例》（Dubliner Übereinkommen），于1997年9月1日正式生效了。该条例规定，难民只能在其进欧盟时（有据可查的）最先踏入的那个国家申请庇护；只有在这个国家才能执行庇护程序。2003年的“都柏林条例第二版”和2013年的“都柏林条例第三版”，更加细致地规定了负责审核避难申请的国家做出决定时的程序和标准。在2004年5月1日的“扩盟大爆炸”——欧盟的第一轮东扩——之后，如果严格执行《都柏林条例》的话，想要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难民就只剩下一条路：坐飞机——而且还要闯过1993年引入的“机场审查程序”这一关（这是一个在机场中转区域审核其庇护申请身份的程序）。

在波黑内战于1995年结束之后，来自那里的难民数量迅速下降。越来越多来自亚、非国家的人因其所受的贫穷和战乱而来到欧洲。这些人若要走陆

路，需借道土耳其朝希腊或保加利亚方向进发，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大力支持这两国关闭它们与土耳其之间边界的原因。横渡地中海的海路远比陆路凶险，同时也更加难以控制，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取径此道。因此，若是按照《都柏林条例》，除了希腊之外的主要难民接纳国应该还有意大利、马耳他和西班牙。在欧盟的支持下，西班牙试图用环绕其北非海外属地的、高高的铁丝网来挡住难民潮，它的两个海外属地——休达（Ceuta）和梅利利亚（Melilla）——都被摩洛哥领土所包围。此外，西班牙还与西非国家达成了协议（用支付大量金钱的方式换得保证），从而使“船民”无法从西非到达加那利群岛。事实上，西班牙以这种方式成功地遏制了流入本国的难民潮。

2002年7月，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打击非法移民和滥用庇护权。受到该法律威胁的，不仅是那些采用违法方式以不适合出海的船只从北非驶向意大利的难民，还有所有在海难时帮助难民的渔民和船长。并以罚款或监禁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惩治。对助人者而言，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完全丧失赖以为生的物资。如果把从来都不受干预的帮助行为看成一种罪行，那么这部新法律就是在把帮助等同于协助犯罪，而且把那些依从《新约》中好撒玛利亚人比喻[9]的人都当成罪犯。

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难民潮不但将欧盟国家，也将整个西方社会都置于几乎不能解脱的道德两难困境：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在人道主义信条与国家理性之间进行权衡，这种国家理性会优先考虑控制疆界，保障国家安全，保护物质和文化财产，以及保持各种“生活方式”。一般而言，权衡之后的决定都偏向于控制疆界和保障安全。为了拦住来自拉丁美洲的难民，美国自2006年起就强化了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管理，此外还加大了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自2010年以来，澳大利亚故意为男性难民建造设备简陋的收容站，并于2010年首次与邻近的太平洋国家（如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商定，让它们安排接收澳大利亚不想要的难民。在2013年的选战中，保守派的自由党人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承诺在中途就拦截从印度尼西亚到澳大利亚的救生船并强制其回转——最终他赢得了大选。

直到2013年10月初，欧洲人才开始重新思考难民问题，其契机是有300多名来自非洲的“船民”因船难而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Lampedusa）海岸外的地中海上丧生，而有些近处的渔船本可以救起他们。在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领导下的意大利政府彻底改变了贝卢斯科尼时代的难民政策。以“我们的海洋”行动为标志，意大利海军从2013年10月起一直在有目的地搜救遭遇海难的难民。“我们的海洋”行动拯救了超过15万人的生命。当意大利出于运行成本的原因于2014年11月中止这项行动时，肯定能预料到遇难者的人数会因此而上升。这是由于接替“我们的海洋”行动的是欧

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的“海螺行动”，而后者的活动半径要远小于“我们的海洋”。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边境管理局这个项目的实际任务是阻止非法移民。[10]

早在2014年底就可以确定，欧盟也无法解决西方在难民问题上遇到的道德困境。虽然它承担了比美国（当然还有澳大利亚）更多的人道主义责任，但要让欧盟在自己的土地上解决那些难民来源地的问题是不可能的。那些因母国的内战和独裁压迫而试图逃往欧洲的人，也会在不同程度上遇到那些因贫困而逃难的难民所遇到的问题。1951年《日内瓦难民公约》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不能将难民驱逐到因难民的种族、宗教、国籍、从属于特定社会团体及其政治信仰而使他们的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国家。但如果来自此类国家的大量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到来，那么《日内瓦难民公约》和欧盟的相关法律条款可能就要变成一纸空文了。2015年，当难民问题上升为欧洲政治中压倒一切的话题时，就极富戏剧性地展现了这种情况。

导致2014年和2015年大量难民涌向欧洲的根本原因是叙利亚的内战。2016年初，联合国估计，叙利亚内战产生的难民数量在本国有650万，在邻国有450万，共计1100万。此时，在土耳其登记的叙利亚难民有250万，在黎巴嫩有110万，在约旦有63.5万。这些难民占到了黎巴嫩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约旦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土耳其人口的3.5%。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几乎不可能获得工作许可证，在约旦虽有可能但极为困难，土耳其则从2016年初开始向因内战而背井离乡的叙利亚人开放其劳工市场。

位于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营的生活条件非常糟糕，这主要是因为欧盟和联合国难民署因许多会员国不按时缴费而难以兑现其援助承诺。2015年7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迫不得已将住在黎巴嫩和约旦的叙利亚难民每月27美元的食品券减半。这同样是因为某些会员国没有履行自己的缴费义务。

起初，欧洲国家只接收了小部分叙利亚内战所产生的难民。从2014年起，到欧洲寻求保护的叙利亚人数量开始激增。他们在偷渡组织的协助下乘坐充气船和其他几乎没有海上航行能力的船只从土耳其海岸前往附近的希腊岛屿，如科斯岛（Kos）、莱斯沃斯岛（Lesbos）、莱罗斯岛（Leros）、萨摩斯岛（Samos）和希俄斯岛（Chios），再从那里被带往大陆上的希腊。他们在未受希腊警方阻拦的情况下，从那里借道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向奥地利、德国和瑞典方向前进——所谓的“巴尔干路线”。到2015年9月初为止，这条路线一直是要经过匈牙利的。匈牙利于2015年夏天起，实质上对难民关闭了本国对塞尔维亚的边界之后（不久后又封闭了对克罗地亚的边界），逃难路线也改了道。现在它经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通向奥

地利和德国。

在2015年春季已经可以预见到，该年在德国寻求庇护的人数将远远超过前一年。2014年3月，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收到9839份寻求庇护的初步申请。2015年3月收到的申请有28 681份，是去年同期的近3倍。由于移民和难民局的人员配置不足以迅速处理庇护申请，潜在的难民数量一直比已收到申请数量要多得多。

除了瑞典和奥地利之外，德国对来自危机国家的移民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这是由于德国繁荣的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有其保护难民权利的名声。偷渡网络的组织者在互联网上把德国描绘成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国家，说这个国家会给每个到达该国的难民一笔“欢迎费”，还会马上给他们一份工作。

德国方面显然低估了这种宣传的影响。无论如何，这种宣传已经在全球起到了指引方向的作用。2015年5月，联邦内政部预计难民总量将达45万，到2015年8月19日，内政部根据每日近7000人的非法入境量将预计人数提升到80万以上。在多个联邦州（特别是东部诸州），一再发生针对难民的骚乱和针对庇护者收容所的袭击事件；在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特州和图林根州，仇视外国人的言论越来越多；其间，属于民族保守派并信奉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即AfD，简称“选择党”）也越来越频繁地作为组织者登上前台。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因走访了萨克森州海登瑙地区的一处难民之家，就在8月28日被一群仇外分子骂作“国族的背叛者”。8月31日，在默克尔总理的夏季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她将难民问题称作举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并于此时说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口号：“我们能办到。”[11]

在不久之前的8月25日，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声明：那些因叙利亚内战而产生的难民不必再逐个接受核查，更确切地说，只要他们已经在奥地利或匈牙利登记过就可以成为庇护申请者。这就使得大量因《都柏林条例》而无权申请庇护的人暂时摆脱了这项规定的约束（按规定，来自一个欧盟国家或一个安全的第三国的难民无权在德国申请庇护）。从此叙利亚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定，一旦他们抵达德国领土，就不会再被递解至奥地利、匈牙利或其他欧盟国家。当然，其实从2011年开始已经不再把难民递解至希腊了——希腊是来自中东的难民踏上的第一个欧盟国家（而且它还属于免签证的申根区域）。按照欧盟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标准，难民在希腊的居住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欧洲人权法院于2011年1月、欧洲法院于2011年12月宣布将难民驱逐到希腊是非法的。

就在这时，匈牙利变成了“巴尔干路线”的瓶颈。从2015年6月开始，匈牙利用铁丝网封闭了接临塞尔维亚的边界——它所遵循的原则，其实与之前

的西班牙、保加利亚和希腊并无二致：确保那条自身与非欧盟国家接壤的陆地边界（也就是共同体的外部边界）不受侵犯。然而，布鲁塞尔对上述四国做法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唯有匈牙利的行动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了（尽管是有所保留的）批评。

或许这与匈牙利不在欧洲边缘而在欧洲中部有关，这种地理区位导致匈牙利吸引了（比西班牙在北非的海外属地）更多的公众关注。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匈牙利奉行民族保守的政府首脑维克多·欧尔班坚决推行非自由主义政策，在欧盟创始成员那里早就有一个“坏名声”。在某种程度上，匈牙利的边境安全措施抵消了另一个欧盟成员国希腊的违规行为：雅典一直坚决拒绝登记从土耳其抵达附近希腊岛屿的难民。相反，希腊政府允许难民们在进入比雷埃夫斯港后乘坐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前往马其顿边境，并从那里踏上前往中欧的旅途。对此欧盟委员会没有进行干涉，可能是因为其负责难民问题的委员季米特里斯·阿夫拉莫普洛斯（Dimitris Avramopoulos）恰好是希腊人。布鲁塞尔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自然会造成后果：难民问题的压力会一直朝着欧洲的中心地带转移——先压向匈牙利，再从那儿压向奥地利和德国。[12]

2015年夏天，尽管匈牙利还允许费尽艰辛穿过边境的难民登记（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之间的边境已经变得越来越难通过），但却尽可能地让他们滞留在边境线附近，或是火车站布达佩斯东站的居留区域内。8月27日，在奥地利布尔根兰州附近的布达佩斯-维也纳高速公路的一个停车场内，发现了71名难民的遗体，他们是被装在一辆由国际偷渡组织用以非法越境的冷藏卡车里而来到此地的，此后他们在被司机遗弃的这辆卡车内窒息而死。此事震惊了整个世界。

9月初，电视里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难民从布达佩斯沿高速公路步行走向奥地利边境的画面。9月1日，一些列车尚可以通过边境，但欧尔班政府第二天就阻止其通行。9月4日晚，奥地利总理维尔纳·法伊曼（Werner Faymann）在一次电话通话中向德国总理施压，希望允许来自匈牙利的那些未登记难民进入奥地利和德国，并由两国共同承担负担。默克尔向她最重要的两位社民党内阁成员征求建议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此二人分别是社民党主席、联邦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和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默克尔打给联盟伙伴、基督教社会联盟党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的电话却没有打通。然而，她还是在午夜之前告诉法伊曼：她同意他的建议。

与此同时，在得知两位总理的商议结果之前，维克多·欧尔班已下令使用火车将难民运往奥地利。在维也纳，难民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不久后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慕尼黑和其他德国城市。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尽其所能地

提供帮助，为的是让人们忘记那些仇外暴徒，也忘记难民庇护所被烧毁的画面。他们显现出，还存在另外一个更好的德国：一个拥有“欢迎文化”的国度。很快，德国的女总理就成为此文化的化身，而且还不仅仅在自己的国家是如此。起因是在安格拉·默克尔于9月10日访问柏林市斯潘道区的一处难民之家时，有几张她与叙利亚难民的“自拍照”流传出来。这些照片在数秒之内就传遍了整个世界。同时，这些照片也通过智能手机来到了正需要看到它们的人眼前——这些人就是身处叙利亚的难民的亲朋好友，或是在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的难民。“默克尔妈妈”成了展现德国乐于助人精神的一座圣像。[13]

虽然人们能够理解，对两位总理而言，做出为难民开放奥地利和德国边境的决定是在紧急状态下的破例之举——这项举措使得难民们得以沿“巴尔干路线”前往中欧，但把这些决定告知公众的方式实在太过随意。而当那些难民不再通过匈牙利，而是穿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来到奥地利，并从那里去往德国时，这一失误也未得到纠正。接下来需要完成的事情，是两国总理要尽全力争取议会［即德国的联邦议院和奥地利国民议会（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rat）[14]］批准他们的决定。默克尔和法伊曼本应该立即把设想的措施通知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为代表的欧盟，并使欧盟认可自己的努力，从而为争取一个解决难民问题的欧洲方案赢得时间。他们却没有这样做，犯下了一个战略性错误。同时，他们本应该建议欧盟尽快就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召开紧急峰会，但柏林和维也纳的政府都没有提出这样的动议。

还有，鉴于9月4日深夜里的决定在欧洲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其实下一步就应该与周边国家的政府进行磋商。由于所有这些事都没有做，难免就让欧洲人产生了德—奥想要联合起来进行非多边行动的印象。对德国的利益而言，它比奥地利更需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出现。每一个旁观的人，都不会对柏林的行为所唤起或者说重新激起的敌意感到意外。

在德国（而且不仅在德国），人们纷纷揣测德国总理在2015年9月4日深夜里决定开放德、奥边界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除了总理期待在事后得到民众和媒体的广泛认可之外，最显而易见的那个答案很可能就是她的真正动机：出于人道考虑。到目前为止，安格拉·默克尔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完全务实的、有意“不讲意识形态的”女政治家，她治国一向“如履薄冰”[15]：在她做出决定之前，会考虑各种可能的后果，也就是说她总是“瞻前顾后”。但许多观察家会忽视她坚定的宗教信仰，以及她在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成长于民主德国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之中的大背景。在9月4日这一天到来之前，她的宗教信仰与她作为总理的职务之间从未发生过冲突，但如果她在那个深夜拒绝了奥地利总理的急迫请求，就很可能会发生这种冲突。

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接受维也纳方面的冒险提议，而在于应该在整个欧盟的框架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给予那些当时被困在匈牙利的难民以临时入境许可，从而尽可能避免德—奥非多边行动的各种缺点——这些缺点都再明白不过了。在外交上德国必须估计到，如果德国试图向其他成员国强加一个它们本不会同意的解决方案，那么此举会让德国在欧盟内部受到众多国家的孤立。在内政上，此举意味着要保证长期实行一种人道主义的庇护政策所需的各种条件——其中包括对能力界限的重视：客观上德国对难民的接受能力和融合能力是有限的，主观上德国民众接收难民的热情也是有限的。在难民问题上对德国搞特殊化，很可能会对德国社会支持庇护政策的意愿产生负面影响：政府不可能指望让德国人担负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担负的重担之后，还能长期获得大多数德国国民的支持。

9月4日仓促达成的德奥协议，并不是导致从土耳其涌向中欧的难民潮的起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难民的逃难行动早就开始了。然而，无论是默克尔总理在2015年9月4日到5日的决定，还是反复提到的《基本法》上那句在司法上有争议的（无论如何是极易被误解的）、关于在德国的庇护权的规定，都没有设定一个上限。这使得这个决定和这一规定会被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的难民营以及亚洲、非洲的许多其他危机国家视为德国的邀请函，从而使这些地方的人去追随那些已经启程前往德国或已经抵达德国的人。同样值得商榷的是默克尔的声明，她说，反正全方位把守德国边境也是不可能的——这只能理解为她想辞职——因为这会被人看作在承认国家的无能，事实上，不久之后人们也是这样理解的。

在之后的日子里，默克尔总理一再指出：只有遭政治迫害者才可以拥有庇护权，单有改善生活的愿望并不能满足《日内瓦难民公约》获得法定难民身份的条件。此外，她还在2015年10月15日的政府声明中谈到递解无权在欧盟获得保护的人的必要性。[16]尽管如此，她的这些谈及限制问题的讲话所产生的公共影响，却远远不及不带限定条件的“我们能办到”的口号和那句关于庇护权的条文。

不过，德国之所以会有一种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格外慷慨的“形象”，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总理和她的政府。绿党和左翼党这两个反对党，一般都比默克尔的执政盟友更加支持她的难民政策。此间奇事还有：社民党令人生疑地紧跟在总理的背后，比总理自己的党（基民盟）靠得还要近；还有那位出了名的对移民问题颇有微词，而且近来越来越喜欢批评默克尔的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霍斯特·泽霍费尔，竟对此事一声不吭。绿党的议会党团主席之一卡特林·戈林-埃卡特（Katrin Göring-Eckardt）于2015年9月9日在联邦议院高呼德国是“在乐于助人和发扬人道之爱方面的世界冠军”——这本来是对成千上万参与难民救助的志愿者的赞扬，但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德国在道德上自吹自擂。[17]

同样有可能遭到误解的是“欢迎难民”字样的标语牌。当难民们乘着一列列火车到达时，在许多德国火车站都会看到这样的标语。这标语所要传递的信息，本来只是针对本国排外主义者的一种表态。然而，这样的字牌所描绘出的景象，同时也鼓励了各地的难民，让那些尚在犹豫是否踏上这漫漫长途的人下定决心朝德国进发。

在2015年秋天，在德国人（特别是那些政治态度中间偏左的人）中间蔓延着这样一种感觉：自己的祖国在经历了可怕的迷途和灾难之后，终于在道德上成熟、高尚了。在老联邦州早就有一种想法：与激进民族主义的传统决裂。某些自诩进步的圈子里萌发了一种践行超越民族的或“后民族”理念的使命意识——这简直与追求一种德国的道德霸权毫无二致。这类自以为成功的、对纳粹德国历史的反思还有另外一个变种：人们可把它称作战后分裂的德国社会所造就的一种特殊的和平主义道德。这种对绝对和平的要求是“第三帝国”过分使用暴力的后果，可它竟发展到了放弃参加人道主义干预或阻止反人类罪行的程度——而当德国因此被所有盟友孤立时，也可以说这种和平主义道德也走上了又一条特殊道路。[18]

与德国历史中最可怕的一章进行自我批评式的抗争构成了德国政治文化的底色。尽管为本民族辩护的反向思潮也会一再出现，但通常对它们的公开反击总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这类思想冲突的出现总能被当成需要继续反思的证据。据说，一旦德国缺少自我批评的反思意识，它就不再是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了。当然，自我批评也会一下子反转成自以为是，或者至少反转成一种“作秀”般的自我意识。在德国这个例子中，出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已经从自己的过往中学到了如此之多的教训，所以现在德国可以在道德上为其他国家指点迷津了。

在2015年德国关于难民和庇护问题的讨论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种诡辩式的戏法：其中一例是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福音派主教马库斯·德勒格（Markus Dröge）2015年圣诞节在柏林的《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这句话在我们这个国家特别振聋发聩……与我们自身罪孽历史的反复纠缠，明显让我们变得更敏感了。那些在不堪忍受的状态下历经了长途跋涉的人，来到了曾许下诺言的人们面前——辗转、流亡和驱逐的画面与‘再也不要重演！’的誓言合在一起，勾起了我们的集体记忆……2015年终将被铭记，因为德国在这一年有了全新的形象。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在实践中运用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了。这是一段解放自我、鼓舞人心的体验。这些经历开启了自我塑造的多种可能……”[19]

在一个季度之后，基民盟政治家、联邦劳工部前部长诺贝特·布吕姆（Norbert Blüm)发表了非常相似的看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德国人都让人类感到恐怖，”他在2016年3月底写给《时代周报》的一篇文章中

写道，“我们的名字曾与种族清洗和大屠杀联系在一起。令我欣喜的是，我们忽然以人类之友的形象站在了世界面前。如果包括‘选择党’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令我的国家放弃友善，我将为它而感到骄傲。”[20]

德国人喜欢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这已经不是什么洞见了，但也从来没有过时。从自悔到自负，有时只有一小步。正是关于难民危机的激烈辩论的这一特征，在我们的邻国那里引发了一个问题：现在欧洲是不是进入了一个由“德国人的不确定性”主导的新阶段？想要在其他国家找到一种在难民和庇护问题上像德国一样的热情，必是水中捞月。正相反，自2015年夏季以来德国就陷入了某种形式的孤立之中，这样的情形在德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1919年10月，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演讲《以政治为志业》（Politik als Beruf）中用下面的方式区分了两个平行的概念，即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秉持“信念伦理”者依其习俗或宗教信条行事，而且不能以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来加以阻止；相反，秉持“责任伦理”者所考虑的是“自己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可以预见的）后果负责”。[21]在德国和国际上关于2015年德国的庇护和难民政策的讨论中，这一对概念一再被提及。比如荷兰政治学家、荷兰工党的理论大脑勒内·库佩鲁斯（René Cuperus）就说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在2016年2月初发表于《南德意志报》专栏上的一篇文章中质问：“原本如此谨慎小心的默克尔竟然违背马克斯·韦伯的精神，匆匆忙忙地将信念伦理置于责任伦理之上。难道说，德国为了永远反省其历史，为了弥补战争罪责，就要拿本国的社会稳定来冒险吗？”[22]

有人认为默克尔总理在2015年夏天对难民问题如此行事（也）是出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这种观点肯定是对的；也有人认为她这样做是考虑到德国罪责深重的历史而感觉本国应负有特殊的责任，也完全有可能就是这样；但是，在9月4日深夜，她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安格拉·默克尔及其幕僚担心匈牙利营地中的警察与难民之间会发生流血冲突，这样一来在德国（但并不限于德国）就会传来愤怒的呼声，同时人们还会指责：要是德国和奥地利再慷慨一些，就可以阻止流血事件发生。

自2015年9月中旬以来，由于匈牙利—塞尔维亚边界关闭，难民不能再借道匈牙利，但可以通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涌入奥地利和德国。但这可能会引出另一种担忧，即德国封闭边境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申根国家斯洛文尼亚开始，“巴尔干路线”上的国家一个接一个面对往回涌的难民潮，这会影响它们国内政治的稳定，或许还会使它们与邻国发生冲突——这幅图景难道不应该被预料到吗？希腊作为此链条中的最后一环早已经因难民危机而不堪重负，却不得不承受难民潮回流的最终后果——这一

困境有可能会击垮这个本已陷入危机的国家。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在沿着“巴尔干路线”通向爱琴海的这条线上，人道主义灾难几乎不可避免——而同时又会发生另一场挫败：自1995年以来出现的申根区将会崩溃，在这个包括大多数欧盟国家和几个其他国家的广大空间内，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将不复存在。与欧元一样，申根区早已是新欧洲的一个象征：在这儿，你能借由畅通无阻的旅行而体会到自由；在这儿，将欧洲凝聚在一起的共同性，战胜了民族国家边界上的拦路杆和关税处。一旦申根区倾覆，欧盟内部的团结就会受到威胁。一旦德国封闭边境的举动导致了这样的后果（以及其他各种后果），德国搞不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从安格拉·默克尔总理的许多言论中都可以推断出，她一直对这个危险保持警觉。

如果德国和奥地利对难民封闭其边界，这一系列事件的确有可能发生。但所缺乏的是必要的平衡性措施，因而缺乏矫正措施，即对完全开放德奥边境之后很有可能出现的后果应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当时就可以预见到的是，欧洲内部会越来越孤立德国，而且欧盟内部会在难民问题上产生分歧。还可以预见到，欧洲大陆上的难民潮肯定会助长英国国内的脱欧势力，并且还会催生欧盟其他成员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

内政方面，在2015年夏天就应该可以预见到，众多的难民会使德国社会在政治上趋于极化，并且会为像“选择党”这样顽固的右翼势力带来新的拥护者。不难预见的情况还有：这会增大社区和各个城市的困难，因为它们要让大量的难民至少暂时安顿下来；此外，还将会面临德国社会如何融合这些几乎全是穆斯林的移民人口的问题。这些人大多来自父权制的、蔑视妇女的、反同性恋的和盛行威权主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针对异教徒（特别是犹太人）的仇恨横行无忌；而且还有不少人来自“正在失败”或“已经失败的国家”——在那儿以暴力方式解决矛盾冲突乃是一种日常秩序。然而，在德国的政治中却看不到类似的因素发挥过什么影响。仅从2015年秋季德国对德—奥措施可能导致后果的思考看，那只是一种选择性的（而且太碎片化、太投机的）思考，完全比不上事后人们为安格拉·默克尔所想出的通盘计划——就像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所做的那样。[23]

默克尔总理自2015年9月之后就一再承诺会有一个解决难民问题的“欧洲方案”，该方案理应包含两个要求：一个“公正的”在欧盟内部分配难民方案和对共同体边界的有效控制。但从2016年初的情况看，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难以实现。由欧盟委员会在2015年5月首次提议，9月起草完成并在部长理事会经有效多数通过的一个配额规则——旨在减轻希腊和意大利负担，可悲地失败了。到2016年2月为止，在16万尚未被分配的难民中仅有不到500人抵达了理应被分配到的国家。所规划的8个用于接收、登记并分配滞留于希腊及意大利的难民的“热点站”，到2016年1月也仅有2个可供使

用。

不管怎样，英国、爱尔兰和丹麦早在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就确保了自己可以不参与难民政策的权利，而且准备在万不得已时也仅让少量难民进入本国。法国看上去也难以再接纳更多的穆斯林移民了：2015年的巴黎恐袭事件、恐怖分子血洗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事件、1月袭击巴黎犹太人超市事件、11月共致死130人的暗杀事件，统统都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2016年2月13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年会上，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确定：法国将只能接收欧盟委员会自2015年9月以来试图分配给诸国的16万难民中的3万人。因此，法国将不会再参与由德国总理所推动的难民数额分配方案。

而同样令德国沮丧的是，还有两个原本一直比较支持德国的难民及庇护政策的国家，开始越来越将本国的政策向着在欧洲占据“主流”的隔离政策修正。首先，是长期以来自视为“道德巨人”的瑞典转向了（若按人口比例算，瑞典在2014年所接收的难民人数要超过德国）。斯德哥尔摩的红绿联盟少数派政府[24]于2015年11月24日表示，难民潮已让这个王国不堪重负，因此必须放弃目前这种慷慨的难民政策，并执行更加严格的庇护法。紧接着，从1954年起就已经弃用的厄勒海峡大桥边境检查站又在2016年1月初重新恢复使用——尽管这对瑞典和丹麦都是一个麻烦的，特别是对经济不利的措施。哥本哈根对此的回应是，立即开始尝试恢复丹麦与德国边境上的入境检查站。此后，涌向瑞典的难民人数骤降。2016年1月底，斯德哥尔摩宣布驱逐了约8万名没有政治庇护资格或没有难民法律身份的移民。

奥地利曾是德国在难民政策上的盟友。但2016年1月20日，社会民主党总理维尔纳·法伊曼领导下的红黑联合政府[25]在奥地利人民党的压力下为接收难民设置了一个“不断降低的”天花板。2016年，维也纳希望最多接纳大约37 500名寻求庇护者，而且到2019年这一数字应该降至20 000。（实际上，2015年奥地利接收了约9万名难民。）在这次声明后不久，奥地利于2月中旬宣布将重新开始在本国与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接壤的边境实施严格的边境管制。2月17日，内政部长约翰娜·米克尔-莱特纳（Johanna Mikl-Leitner）宣布，她的国家从即时起每天只接收80名难民，而且对想去德国的难民，奥地利每天的处理量也不会超过3200例。

奥地利外长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与约翰娜·米克尔-莱特纳都来自奥地利人民党，他在不久之前就是封闭东南边界方案的支持者：首先是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协调一致，然后关闭马其顿与希腊之间的边界。这个策略也得到了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四个成员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积极支持和宣传——该集团在2016年2月14日于布拉格举行的周年纪念会议达成此共识（该集团因其首次会议于1991年2月在匈

牙利的维谢格拉德城堡举行而得名）。可预见的后果是，这将导致难民被积压在希腊，不过这一方案的支持者表示接受这样的后果，这个支持者群体还包括应邀参加布拉格会议的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国家领导人。大约就在此时，传来了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开始用高高的铁丝网控制本国与希腊边境的消息。

波兰这个维谢格拉德集团中最大的国家在2015年的选举之后政府更迭，由唐纳德·图斯克奉行自由保守主义的公民纲领党所领导的政府，被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奉行民族保守主义的法律与公正党（以下简称“法公党”）取代了。[26]卡钦斯基与匈牙利同样奉行民族保守主义的维克多·欧尔班和斯洛伐克名义上属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总理罗伯特·菲科（Robert Fico）一起，领导着中东欧和东南欧“拒绝阵线”——这些国家的想法是，最好能拒绝任何难民进入本国（如果实在要进，也绝对不能有穆斯林）。在2015年12月17日至18日举行的欧盟布鲁塞尔峰会上，匈牙利和波兰一起反对这样一项决议，决议内容是欧盟边境管理局今后在未经受影响的成员国授权的情况下，也有权采取强制措施以确保欧盟的对外边界安全。布达佩斯和华沙选择保留主权的后果是，关于欧盟边境管理局事务的表决将被推迟至2016年6月。

欧盟为保障外部边境而在地中海的另一侧寻找合作伙伴的进程，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事实证明，联合国想要建立一个能够弥合托卜鲁克（Tobruk）和的黎波里这两个对峙政权进而统一的利比亚政府，是极为困难的。这使得欧盟为了递解难民和打击在利比亚也变得日益猖獗的“伊斯兰国”而寻求合作时，找不到一个合法的“对等的接洽方”。

在欧盟委员会和德国总理与土耳其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意大利提出了以下条件：意大利不会支付欧盟为照顾叙利亚内战难民而许诺给土耳其的30亿欧元中的相应份额，除非欧盟委员会同时承诺这部分金额不会被归入意大利预算赤字。2016年2月初，意大利的伦齐总理才表示这一先决条件已被满足，于是第一期30亿欧元付款的重要障碍这才得以排除。

到此时为止，土耳其所承诺的加强对地中海沿岸的控制，并没有多大进展：在2015年至2016年之交的冬季，每天仍有数千难民抵达希腊附近的岛屿，仅1月就有约7万人。2016年2月11日，土耳其最终同意了北约的一项海上任务，该任务旨在协助希腊和土耳其监控其爱琴海上的边界并打击偷渡者。安卡拉甚至还承诺，将那些被北约盟友的船只定位的难民船带回土耳其海岸，并接回从土耳其非法离境的难民——即使这些难民已经成功登上希腊岛屿。不过，这一承诺是与欧盟要帮土耳其减少大量叙利亚内战难民人数的意愿联系在一起的。欧盟能否在2015年11月底兑现所许下的诺言，此刻尚难见分晓。

根据官方说法，2015年全年共有89万难民抵达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的报告称，2015年共收到44.2万份庇护申请，2014年收到17.3万份。在申请者的来源国中，2015年叙利亚以36%的比例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是阿尔巴尼亚（12%），然后是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朗（都在7%左右）。在德国于2015年10月宣布西巴尔干诸国为安全国家，并将越来越多来自西巴尔干诸国的申请者驱逐出境之后，来自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移民者数量骤减。而来自中东，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马格里布国家[27]的人数所占的比例上升。2015年12月，叙利亚依然是最主要的难民来源国，其次是伊拉克，排第三的是阿富汗。

在由2015年迈入2016年时，德国人的救助热情依旧高涨，参加义务工作的志愿者的数量和激情同从前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人们也普遍认为2016年再接受100万甚至更多的难民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是西巴尔干国家的，还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移民都难以让人理解，因为在他们之中能被确认为政治避难者或战争难民的比例很低。年轻的北非男性性侵妇女（绝非仅有臭名昭著的2015年平安夜性侵事件，也绝非仅有受世界瞩目的科隆性侵事件）和偷盗行为以高于平均水平的程度频繁曝光，这对德国人对移民的一般观感产生了极大影响。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联邦政府的难民政策越来越不满，执政联盟[28]中的两党（特别是联盟党）的支持率下降，选择党的支持率迅速上升。曾几何时，德国被人视为几乎“不存在民粹主义”的地方，因而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相比显得与众不同，但这样一个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

德国有各种理由意识到自己在难民问题上受到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孤立，但其根由却藏在眼下危机的后面。在过去的数年中，柏林也不买欧盟共同庇护政策的账。因“船民”而产生的负担起先主要是由意大利，然后由希腊担负，那时候德国并没有向两国伸出援助之手，而且还拒绝分担难民。2015年夏末，发生了德国和奥地利在没有得到欧盟和其他邻国同意的情况下对难民开放边境的事，使这些难民可以沿“巴尔干路线”直抵中欧。若是没有当初发生的那些事，如今德国人呼唤团结时所得到的回应说不定也不会如此惨淡。

可是，德国在2015年所遇到的情况还有：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承认庇护权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德国当初自认为在这方面它已成为欧洲的典范，那么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幻象。要是欧盟没有因为庇护和难民问题而崩溃的话，它应该从自己的这个最大的成员国身上吸取教训：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领域，既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其他人要求过高。

2016年2月18日至1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原计划为解决难民问题拿出一个欧盟与土耳其的共同方案，确切地说，是为那些从土耳其经爱琴

海来到欧洲的难民找到一个解决方案。2月17日在安卡拉发生的造成29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的恐怖袭击事件，让安排好的计划落了空。由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不得不暂时取消他对布鲁塞尔的访问，难民问题只好被推迟到3月7日的特别峰会上去讨论。

在此期间，马其顿在与奥地利及其他西巴尔干国家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在与接壤希腊的边境上造成了既成事实：把“巴尔干路线”给堵上了。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每天仅有数百名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被允许穿过马其顿；从3月初开始，在那些叙利亚内战难民中，也只允许来自尚在激战中的阿勒颇的难民通过边境，而那些来自首都大马士革的则不行。2月27日，基于美国外长克里（Kerry）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Lawrow）之间的磋商，叙利亚实现了停火。马其顿政府[29]对此的反应是完全封闭边境，因为首次出现了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希望。

而对那些并非来自叙利亚或伊拉克的人而言，此后就没有机会再使用之前一直通行的“巴尔干路线”去往那几乎所有人都想去的地方：德国。因此，那些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马格里布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移民就被堵上了。由于马其顿的这些措施，从2月底开始希腊一侧有大批难民聚集在边境附近的伊多梅尼（Idomeni），其人数到3月初已达13 000。据雅典方面的消息，这段时间整个希腊的难民总数为33 000，而据国际红十字会估计有5万人。2月29日，在伊多梅尼发生了大量人员冲击边境铁丝网的事件，马其顿警察用催泪弹予以回击。3月3日，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在雅典向所有潜在的“经济移民”[30]发出了一项强烈请求：不要再往欧洲来，不要相信偷渡组织者虚幻的承诺，不要再拿自己的金钱和生命冒险。[31]尽管马其顿人和其他西巴尔干国家的严厉措施在欧盟受到了批评，但此时越来越清楚的是，大多数成员国都乐于见到关闭边境的效果——封住“巴尔干路线”。

态度最为纠结的是德国。一方面，联邦总理不支持维也纳及其盟友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她又拒绝（再像2015年9月4日德、奥达成一致时那样）接收聚集在希腊的难民，也就是说拒绝再继续施行一种为难民开门的“曲线政策”。德国给人留下的这种两面派的印象是遮不住的：柏林既羞于承认“巴尔干路线”这一政策的失败，却又赞许封闭边境的成果——总理实现了大幅降低难民人数的承诺。事实上，从3月的第一天开始，每日通过德、奥边境进入德国的难民就再没有超过500人。[32]

安格拉·默克尔试图通过封闭欧盟和申根区的外部边境来解决这种矛盾性，即主张封闭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海上边境，而不是马其顿与希腊之间的边境。可是土耳其却违背其2015年11月的承诺，从那时到现在，它在阻挡移民穿越爱琴海方面几乎什么也没做。而且土耳其政府在布鲁塞尔特别峰会之后没几天就干出了这样的事：支持一桩极有问题的判决：用警察手段

查封了该国最大的日报《时代报》（*Zaman*）——这是一份与该国总统埃尔多安为敌，亲近流亡美国的伊斯兰阿訇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的报纸。此举与欧盟承诺加强和加速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一事（这也是土耳其所追求的目标）颇不协调；与此类似的，是土耳其政府于国际妇女节前夕（3月6日）在伊斯坦布尔用橡皮子弹镇压了妇女们的示威活动。除此之外，土耳其领导人还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残酷打击被归类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工人党——许多观察家认为这项政策恐怕会为涌向欧洲的移民潮添加新的动力。

德国总理能否在欧盟贯彻自己的路线竟取决于这样一个国家，同时她又有许多正当的理由一直不愿意让土耳其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这个矛盾几乎无法化解。由维也纳牵头的国家集团的立场与德国相反，但其弱点在于，它们的政策可能会导致已经饱受危机之苦的希腊彻底崩溃，使其沦为一个“失败国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拒绝在布鲁塞尔特别峰会的闭幕文件中，像唐纳德·图斯克所起草的草案那样，把封闭“巴尔干路线”当作一个事实确认下来。当然，这样的确认也可以被解读为：这就是证据，欧盟认为默克尔迄今为止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是失败的——总理本人不可能赞同这样的解读。

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在欧洲理事会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都充满自信。他向与会的欧洲政治家们提出，以后土耳其可以接回所有非法抵达欧盟成员国的移民，只要欧盟答应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在这些乘坐（非法的）叙利亚难民小舟的人被送回土耳其的同时，应接收同等数量的来自土耳其的叙利亚内战难民[33]；第二，在已经商定的30亿欧元之外，还要在2018年之前再给土耳其30亿欧元以缓解难民营中的困难；第三，在2016年底之前给予土耳其公民免签证待遇；第四，开启更多领域的谈判，为土耳其的入盟谈判注入新的活力。达武特奥卢的提议是在前一天晚上与默克尔和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一起商定的，此举让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觉得遭遇了一场突然袭击。

特别峰会在午夜后不久就结束了，没有产生具体的（更不用说明确的）决议。在会议的闭幕公报中，没有明确说明“巴尔干路线”已经封闭。公报中所用的说法是：沿西巴尔干路线运动的非正常移民潮“现在已经结束”。在这一点上，默克尔总理在欧洲理事会多数成员［其中包括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反对的情况下贯彻了自己的意志。然而，公报对事实本身，即希腊与马其顿之间边境的封闭，却不置一词。对于希腊安置和关照难民方面的负担，欧盟承诺用援助来补偿。[34]

然而，那个与达武特奥卢私下磋商的成果——默克尔大力支持的《欧盟-土耳其行动计划》，因为一系列尚不明确的要点直到3月7日都未能在国家及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或者说大家还不愿意让它通过。安格拉·默克尔在

会议闭幕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会议评价是“值得欢迎的”。不过这只是会议的特点之一，她真正想说的是：欧洲理事会实质性地前进了一步。她说“许多人”都觉得此次会谈取得了一个“突破”，同时她也得出一个结论：并非每个人都这样认为。[35]

事实上，许多事情尚不明确，首先是如何在欧盟内部分配从土耳其接收的难民，以及如何分担为安卡拉提供的总额为60亿欧元的资助款项。这些和其他一些“细节”应在后一周（17日至18日）的下一次定期峰会上讨论。有一些成员国（其中包括法国）对给予土耳其人免签待遇还有很大顾虑，这是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需要大伤脑筋的一个问题。3月8日，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伊兹密尔（Izmir）会面，就未来在递解难民方面的双边合作进行磋商。

对德国政府的立场而言，布鲁塞尔特别峰会未能实现所期待的“重大突破”。联盟党和社民党也对默克尔越来越倾向于对威权统治的土耳其做出重大让步的表现提出了质疑。不过，会议总算产生了一个带有总理的“德国特色”的遏制非法移民的计划，而且人们还寄希望于该计划能为显著减少难民人数做出贡献，并降低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择党的吸引力——选择党在这段时间里将反移民斗争当成自己的主要任务，而且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专门从事抗议的党。在举行峰会之间的那个周日（3月6日），选择党在黑森州的地方选举中获得了11.9%的选票，这使它在当地上升为仅次于基民盟和社民党之后的第三大党，把绿党挤到了老四的位置上。民调还预计，3月13日在萨克森-安哈特州、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三个州举行的选举中，选择党也将获得相当多的选票。“建制派”诸党完全有理由对“超级星期日”[36]感到焦虑。

事实是，选择党在3月13日的选举中在这三个州全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萨克森-安哈特州是24.3%，在巴登-符腾堡州是15.1%，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是12.6%。由此，它在萨克森-安哈特州上升为第二大党，在其他两个州都是第三大党。在所有这三个州中，基民盟的主要候选人或明或暗地与本党主席兼联邦总理的难民政策划清界限，以便阻止选民倒向右翼，但这种做法显然也疏远了许多支持者。在巴登-符腾堡州，绿党得益于州长温弗里德·克雷奇曼（Winfried Kretschmann）的个人声望。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同样深受选民欢迎的州长马卢·德赖尔（Malu Dreyer）帮助她的社民党以微弱优势获胜，不过社民党在另外两个州都遭受了惨重损失。在全部三个州，先前执政的党都遭遇了挫折，萨克森-安哈特的基民盟和社民党联盟、巴登-符腾堡州的绿党和社民党联盟、莱茵兰-普法尔茨的社民党和绿党联盟，都失去了议会多数。总的来说，这次选举可以视作在柏林执政的联盟党-社民党大联合政府的一次“惨败”，同时也证明支持安格拉·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的力量正在消退——在她自己党内追随者中尤其如此。

2016年3月18日，即此次德国三州选举5天之后，欧盟各国首脑又在布鲁塞尔与土耳其开始了新一轮谈判。这次会谈整合了3月11日至12日的峰会上讨论过的各类方案的基本立场。要想在2016年7月底之前施行免签待遇，安卡拉还必须满足欧盟的72项法律和技术方面的要求。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达武特奥卢总理承诺：只要欧盟能确保从土耳其接走同样数目的难民（以72 000名为上限）——难民还在用非常规的手段从土耳其前往希腊，土耳其将从3月20日起就开始接回那些非法从安纳托利亚来到希腊周边岛屿的难民。要是这些难民在希腊没有申请庇护，他们就丧失了返回欧盟的权利。

在德国政府（尤其是基民盟）方面，这项协议被视为联邦总理的巨大成功。这种看法当然也不能说错，但的确很不完整：在布鲁塞尔能取得这项成功，主要靠的是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对希腊及欧盟施加的压力。同时，也应归功于马其顿不再让移民通过边境的措施。这些才是难民数量下降（不过他们到了4月依然还在德奥边境出现）和横渡爱琴海而来的“船民”持续减少的决定性原因。

2016年4月4日星期一，商量好的移民置换开始了：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上的大约200名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摩洛哥的难民被送回土耳其；从土耳其空运来的第一批来自叙利亚的战争难民也抵达了德国和荷兰，此外又有339名“船民”从安纳托利亚来到了希腊岛屿。在这几天之后，再没有进行过从希腊递解难民回土耳其的行动，因为在此期间许多在希腊的难民递交了庇护申请[37]，这样一来就需要审核他们的申请。鉴于小小的希腊庇护管理机构已经因此不堪重负，欧盟的其他成员国都慷慨地向雅典承诺提供人员支持。可事实上，到2016年4月初为止，这些所承诺的人员中仅有很小一部分抵达了希腊——一共应来400人（翻译另算），但只来了32人。

土耳其《反恐法》的出现，迅速成为伊斯坦布尔与布鲁塞尔之间最严重的争议问题，因为该法随时都可以被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当成对付那些它不喜欢的批评者的武器。修改法律以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这本来就是土耳其想要获得免签待遇就必须满足的72个条件之一。埃尔多安拒绝了这项要求，并且还在5月23日在安卡拉举行的联合国“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与德国总理的一场谈话中明确表示决不会让步，如此一来，在2016年7月1日开始施行免签待遇一事就彻底没戏了。

而且，也不能期望土耳其的态度能在短时间内向自由化方向转变。相反，许多事情都显示这个国家正变得越来越专制。5月底，议会以足以修宪的多数废除了所有议员的免受检察官调查的豁免权——这项措施其实是专门针对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议员的。此后不久，相对独立的政府领导人达武特奥卢被解职，接替他的是曾担任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后来一直担任

交通部长的比纳利·耶伊尔德勒姆（Binali Yildirim）——此人是一个无条件忠于埃尔多安的政客。他的首要任务，是促使土耳其政体转变成总统制。与此同时，新闻自由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5月初，有两名独立报纸《共和报》（*Cumhuriyet*）的记者在一场埃尔多安亲自过问的审判中，被以泄密罪一审判处多年徒刑。

2016年6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几乎一致通过了一项2015年就计划过，但后来又因顾虑德土关系而推迟表决的决议：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定性为种族灭绝，并且在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罪责同时，也将其最重要的盟友德意志帝国列为帮凶。在投票之前，埃尔多安严厉警告德国不要迈出这一步，并威胁说，若联邦议院通过这一提案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当决议在柏林通过之后，土耳其大使被召回安卡拉。在耶伊尔德勒姆总理做出这个相对适度的反应之后，埃尔多安总统于6月5日大肆攻击那些有土耳其血统而又对此决议投下赞成票的德国联邦议院议员：他说他们的血液已经腐化了，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分子在德国安插的黑手。[38]其中一些议员，包括绿党主席杰姆·厄兹代米尔（CemÖzdemir），在6月初多次受到来自匿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死亡威胁；此后，他们得到德国安全部门的人身保护。土耳其官方施加在所谓“叛徒”——这些人只是坚信在诚实面对本民族历史之后所释放出力量——身上的仇恨，反映出它仍拒绝面对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即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

6月6日，从安卡拉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那份难民协议还需要在内阁通过才算数；也就是说，批准这份协议的过程还没有完结。对这一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要退出已经达成的协议），欧盟没有理睬。从3月到6月初，土耳其仅从欧盟国家接走了441名难民。这同时也因为，希腊政府和法院几乎没有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递解回土耳其。在5月底、6月初，每日平均有48名移民从土耳其抵达希腊岛屿。在“巴尔干路线”已封闭的情况下，《欧盟-土耳其协议》达到了一种恫吓的作用。在2016年夏初，欧盟被埃尔多安政治勒索的风险较一个季度之前小了不少。

一个月之后，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又迎来一个新的大危机。2016年7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一部分军人在经过精心策划之后发动了一场以捍卫人权和民主为由的军事政变。埃尔多安总统的拥护者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他们的支持下，埃尔多安在24小时之内镇压了此次颠覆活动。

政变次日，不但有数千名军官和士兵被逮捕，而且还有五分之一的法官和检察官被停职，上万名公职人员（即教授和教师）被解雇、停职，甚至逮捕，批评政府的私立中学、大学以及非国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被吊销执照。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在没有新指令之前不得离开土耳其。埃尔多安和

正发党声称现移居美国的阿訇费图拉·居伦是此次政变的真正主谋，而上述这些人都被怀疑为居伦的同情者。土耳其总统在声明中称议会应该重新引入死刑，这一声明立即引起了布鲁塞尔和柏林的驳斥，称这样的修宪行动与欧盟成员国的身份水火不容。

土耳其从7月20日晚上起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行政部门将拥有近乎独裁的全权。尽管这些措施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但在议会，总统的党派掌控着绝对多数。而向宪法法院申诉却是不可能的。为了压制来自宪法机构的反抗，总统刚镇压完政变就下令逮捕了两位他不喜欢的法官。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可以放手对付持反对意见的媒体：于是7月27日有45家报纸、15家杂志、29家出版社、23家广播电台和16家电视台被关闭。对这场埃尔多安的“反向政变”（大家普遍这么看），欧盟仅予以有限的抗议：欧盟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被这位反复无常的总统当作退出“难民协议”的借口。

那些坐镇欧洲各国首都的人都很清楚，即便真的能封闭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流民路线，移民问题也远远没有解决。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从利比亚到意大利的难民数量会大大增加。大家一直存有希望：欧洲联盟能很快与利比亚某个有合法性的对等谈判方就递解难民达成协议。3月底，受到西方民主国家部分承认，并受到的黎波里和托卜鲁克这两个对峙政权至少部分承认的，由法耶兹·萨拉杰（Fajis al-Sarradsch）[39]领导的总统委员会，由海路从突尼斯来到了的黎波里附近的阿布西塔海军基地，并将这里作为自己的临时驻地。4月6日，在国际法意义上未受承认的的黎波里政权的领导人先是抗议这一行为，然后宣布他的内阁辞职；两天之后，利比亚的声明又变得暧昧起来。萨拉杰的这个有抱负的团结政府很可能会与欧盟就难民问题进行合作：因为利比亚的温和力量迫切需要西方的援助来打击“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在这个北非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基地，并一直在持续扩张。

然而，尽管作为联合国特别斡旋代表的德国外交家马丁·科布勒（Martin Kobler）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说服这个新成立的团结政府更多地关心一下自己的国家，他无法阻止来自“强人”哈利法·哈夫塔（Khalifa Haftar）将军的顽固阻挠——这位将军得到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俄罗斯的支持。2016年5月16日，包括美国、俄罗斯及其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马格里布国家在内的21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外长会议，计划对萨拉杰政府放松自2011年开始实施的武器禁运。但只要这个团结政府一天不享有实权，那么实现该承诺的前景就跟美国和欧盟援助一样都是空中楼阁。[40]

组织偷渡的犯罪分子利用利比亚的权力真空，从2016年初就开始增加转运人数，用简陋的木船和橡皮船把那些想去意大利的人送出海。全靠欧盟的

船只（“索菲亚”行动）、意大利的海岸警备队、各类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一些志愿者的帮助，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才得以抵达意大利的港口；从2016年1月到5月底，总人数共计3.4万。然而，有数以千计的人试图横渡地中海却最终葬身鱼腹：2016年的头5个月，遇难者已经超过2000人。这样的人间惨剧看不到尽头。于是，即使在“巴尔干路线”被封闭之后，移民运动带来的问题依旧是欧洲联盟所面临的最大的人道主义挑战。

从2015年夏天起，几乎没有人再谈及德国领导人了。在难民问题上，德国使自己受到严重孤立，即便其他成员国以及欧盟委员会也拿不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长期战略。德国的左派在庇护权一事上执着于信念伦理而非责任伦理，这在置身事外的观察家眼中并不是什么怪事。真正奇怪的是：一向以务实著称的默克尔总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依此等路线行事，并且她在党内得到的支持竟然多过反对。

作为教派联合体的联盟党被人视为德国的保守党，但若是与德意志帝国时代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保守党派相比，则它代表的是一种——简单粗暴地说——“漂白过的”保守主义。与1933年之前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该党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而一直是一个亲欧洲的政党，是的，自阿登纳当政时起就是一个在德国的欧洲党。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基民盟所有那些还称得上保守的政治面貌都变得更加模糊——因而也形成了选择党企图闯入的政治真空。

作为联盟党执政盟友的社民党多少也陷入了这个两难困境之中，它总不能站在比联盟党更“右”的位置上吧。该党领导层的摇摆不定，反映的是党内不同成员对难民问题的不同想法：与那些所谓的基层党员不同的是，大部分坐在联邦议院中的党员怀疑如此众多的难民真的能够融入德国社会——可是这份疑心与该党必须坚持团结“英特纳雄耐尔”传统又是相互矛盾的。左翼党内也面临着与此类似的矛盾。绿党在所有政党中最坚定地倡导“后物质主义氛围”，在执着于信念方面，它不愿让任何党派超过自己。可在难民问题上，党内“现实派”（Realos）与“初心派”（Fundis）[41]之间的老冲突又重新浮现出来。

“欧洲不可由柏林来统治”——这就是英国政治学家汉斯·昆德纳尼的结论（而且主要指的是难民危机中的问题），他将它写在其著作《德国霸权的悖论》一书2015年10月德文版后记中。[42]德国政治家们一直声称要注意让德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利益保持一致，若以此标准衡量，2015年夏季和秋季德国政府的言行完全与此相悖。联邦政府的特立独行特别受到反对派和部分媒体的欢迎，因为它证明了德国在难民问题上道德超群，而且至少是含蓄地显出其他国家都偏离正路。然而，从邻国传来的反馈几乎全都是负面的。拼命用德国的想法为全欧制定难民政策，的确是棋差一着，在由

2015年迈入2016年之后，这一点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

[1] 罗姆人，即“吉卜赛人”（在俄罗斯被称作“茨冈人”），旧时欧洲人认为罗姆人来自埃及，故而称他们为“吉卜赛人”（“吉卜赛”是“埃及”的音变）。现在，多数罗姆人认为“吉卜赛人”这个名称有歧视意义，所以并不使用。

[2] “Parlamentarische Rat”直译是“议会委员会”，在中文里尚无统一的译名，其他译法有“制宪国会”“国会参议院”等。由于“Parlamentarische Rat”是专门为起草作为联邦德国宪法的《基本法》而成立的，为突出这一特性，译者选择“制宪委员会”这个译名。制宪委员会仅有来自西部三国占领区的65名代表（另有来自西柏林的5名没有投票权的代表），难以称其为“国会”；当时尚无众议院，也就谈不上“参议院”（不过它也确实构成了后来联邦参议院的雏形）。

[3] “主体性的个人基本权利”，原文是“ein subjektives individuelles Grundrecht”。从上下文看，这里的“主体性”指的是庇护权以被迫害人为主体（只要被迫害，就有权被庇护），而接纳国不可借故推诿或挑肥拣瘦。

[4] *Der Parlamentarische Rat 1948-1949. Akten und Protokolle. Bd.* 5/1.: Ausschußfür Grundsatzfragen, bearb. v. Eberhard Pikart u. Wolfram Werner, Boppard 1993,S. 841 f.

[5] Bundesrat. Drucksache 175/90, 1. 3. 1990: Gesetzesantrag des Freistaates Bayern.

[6] 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主要成员来自前民主德国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后来从该党中又分化出今天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左翼党（Die Linke）。

[7] Asylrecht: «Oskar quält sich», in: *Der Spiegel,* Nr. 32, 6. 8. 1990; Letztes Paradies,ebd., Nr. 34, 20. 8. 1990.关于1990年之后围绕着庇护权的辩论，可参见Ulrich Herbert, *Geschichte der Ausländerpolitik in Deutschland. Saisonarbeiter, Zwangsarbeiter, Gastarbeiter, Flüchtlinge,* München 2001, S. 286 ff。

[8] “第三国”指的是“欧盟之外的某国”，其算法是：德国算“第一国”，另一个欧盟成员国算“第二国”。

[9] “好撒玛利亚人比喻”出自《路加福音》（10: 31-32），主要讲的是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有犹太人素日尊重的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但他们不闻不问。唯有一个平日里被犹太人鄙视的撒玛利亚人在路过时不顾隔阂，动了慈心照应他，还在需要离开时出钱把犹太人送进旅店。耶稣用这个寓言

说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该寓言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影响是，许多国家制定了《好撒玛利亚人法》，用以保护做好事的人。（此译注参考了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10]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fortan: Geschichte IV), München 2016³, S. 254.

[11] Die Sommerpressekonferenz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31. 8. 2015, https: 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Mitschrift/Pressekonferenzen/2015/08/2015-08-31ok-merkel.html.

[12] Karl Kopp, Flüchtlinge-griechisches Problem und europäische Herausforderung,in: Ulf Dieter Klemm/Wolfgang Schultheiß (Hg.), *Die Krise in Griechenland. Ursprünge, Verlauf, Folgen,* Bonn 2015, S. 269-282; Laurence Norman, EUKommission Critical of Hungary's Anti-Migrant-Fence, in: *Wall Street Journal,*18. 6. 2015. https://www.wsj.com/articles/eu-commissioncritical-of-hungarysanti-migrant-fence-14 34629337; *Parlamentary questions. European Parliament.*E-012956/15/E-013094/15. 22. 12. 2015 (Antwort des Flüchtlingskommissars Dimitris Avramopoulos).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AllAnswers.do?reference＝E-2015-012956&language＝EN. 关于匈牙利的国内政局的发展过程，见原文148页前后。

[13] Stefan Aust u. a., Herbst der Kanzlerin, Geschichte eines Staatsversagens, in: *Die Welt,* 9. 11. 2015; Georg Blume u. a., 4.-6. September 2015: Was geschah an diesem Wochenende wirklich?, in: *Die Zeit,* Nr. 35, 18. 8. 2016; Merkel und die Flüchtlinge.Weiß sie, was sie tut?, ebd., Nr. 38, 16. 9. 2015; Stephan Löwenstein und Eckart Lohse,Überroll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9. 2016; Rudolph Jula, Der vierte September, in: *Cicero,* Heft 9 (September), 2016, S. 18-26. 关于对德国难民政策批评的概述，参见Robin Alexander, *Die Getriebenen. Merkel und die Flüchtlingspolitik: Report aus dem Innern der Macht,* München 2017, S. 11 ff.; Hans-Peter Schwarz,*Die neue Völkerwanderung nach Europa. Über den Verlust politischer Kontrolle und moralischer Gewissheiten,* München 2017, bes. S. 127 ff.; Alexander Betts und Paul Collier, *Gestrandet. Warum unsere Flüchtlingspolitik allen schadet-und was jetzt zu tun ist* (engl. Orig.: London 2017), München 2017, S. 94 ff。

[14] 奥地利国民议会是奥地利的下议院，由全国公民直选产生；在奥地利起到上议院作用的是联邦议会（Bundesrat）。

[15] 这里“如履薄冰”的原文是“‘auf Sicht’regierte”（直译是“小心统治”），这个用法化用自驾驶汽车时的术语“Auf Sicht fahren”（小心驾驶），指的是司机在通过路口或危险地段时应仔细确认行车路线安全。

[16]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8. Wahlperiode,* 130. Sitzung,15. 10. 2015, S. 12556-12558. 关于默克尔对难民问题的立场，特别可参看她在德国电视一台（ARD）的访谈节目“安娜·威尔”（Anne Will）中的发言，2015年10月8日。

[17]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8. Wahlperiode,* 120. Sitzung, 9.9. 2015, S. 11614.

[18]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01.

[19] «2015 hat Deutschland ein neues Gesicht gezeigt». Bischof Markus Dröge über die Flüchtlingskrise, in: *Der Tagesspiegel*, 24. 12. 2015.

[20] Norbert Blüm, Ich will euch Nachricht geben, in: *Die Zeit*, Nr. 14, 23. 3. 2016.

[21] Max Weber, Politik als Beruf (Oktober 1919), in: ders.,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Neu hg. v.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1958², S. 493-548 (539 f.).

[22] René Cuperus, Helles Land, dunkles Land,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5. 2. 2016.

[23] Herfried Münkler, Europa wird flexibler werden oder untergehen (Interview), in: *Tages Anzeiger* (Zürich), 29. 12. 2015; ders., Wie ahnungslos kluge Leute doch sein können, in: Die Zeit, Nr. 7, 11. 2. 2016; ders., Weiß er, was er will? Ebd.,Nr. 12, 10. 3. 2016.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ders. und Marina Münkler, Die neuen Deutschen. Das Land vor seiner Zukunft, Berlin 2016。

[24] “红绿联盟少数派政府”指的是由瑞典的传统左派社会民主党、左翼党和倡导环境保护的绿党结成的执政联盟。在2014年秋天的大选中，由于大量社会民主党的下层选民出于对难民潮的厌恶而改投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的票，使得执政联盟丧失了议会多数，成了少数派政府。

[25] 奥地利红黑联合政府中的“红”指的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奉行民主社会主义；“黑”指的是奥地利人民党（ÖVP），奉行基督教价值观和中间偏右的保守主义。这两个党在2008年的奥地利大选中得票最多，它们在经过艰苦的谈判之后组成了大联合政府。

[26] 公民纲领党（Platforma Obywatelska，缩写为PO）是波兰中间偏右自由保守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rawo i Sprawiedliwość，缩写为PiS）是波兰右翼保守主义政党，倾向于天主教会。

[27] 马格里布国家，即埃及以西的北非诸国，主要是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28] “执政联盟”，指的是由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

[29] 此处的原文是“Skopje”，即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作者用以代指马其顿政府。

[30] “经济移民”，指那些家乡没有战乱却为了改善生活水平而设法前往发达国家的人。

[31] «Do not come to Europe». Donald Tusk warns economic migrant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mar/03/Donald-tusk-economics.

[32] Pressekonferenz mit dem kroat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Tihomir Oreś-ković, Berlin, 1. 3. 2016. https://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DE/Mitschrift/Pressekonferenzen/2016/03/2016-03-01-pk merkel-oreskovic.html.

[33] 这是《欧盟-土耳其行动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条，也被称作“移民置换”。依此条款，进入欧盟的难民数量一个也不会少，但欧盟的逻辑是：这样就可以接收更多真正的叙利亚内战难民，而把那些来自其他国家、因经济原因而来到欧盟的非法移民送到土耳其。

[34] Erklärung der Staats-und Regierungschefs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8. 3. 2016.http://www.consilium.europa.eu/de/press/press-releases/2016/03/07-euturkeymeeting-statement/.

[35] Pressekonferenzen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zum Treffen der EU-Staatsund Regierungschefs mit der Türkei und anschließenden Sondertreffen der Mitglieder des Europäischen Rates.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Mitschrift/pressekonferenzen/2016/03/2016-03-08-merkel-bruessel.html.

[36] 即选举日，借用了美国大选“超级星期二”的说法。

[37] 这其中有个缘故：绝大多数难民原本想在德国或北欧等“条件更好”的国家递交庇护申请，所以到达希腊以后一直不交。但在欧盟和土耳其达成交换难民的协议之后，再不交庇护申请就会被遣返到土耳其，所以大量难民改变策略，很快都在希腊递交了庇护申请。

[38] Reinhard Müller, Erdoğans Blu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7. 6. 2016.

[39] 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败亡之后，利比亚成立了过渡政府。由于世俗派与伊斯兰派之间的矛盾，2014年内战再起，两派都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世俗派政府在托卜鲁克（领袖是军事强人哈利法·哈夫塔），伊斯兰派政府在的黎波里。联合国介入之后，内战中的各方（两个政府都派了代表）于2015年12月17日在摩洛哥签订了《利比亚政治协议》（Libyan Political Agreement），都同意组建“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Accord），由萨拉杰担任会议主席（即总统）的总统委员会（Präsidentschaftsrat；英文：Presidential Council)领导。

[40] Marco Keilbarth, Ein Land ohne Staat. In Libyen drohen ein Bürgerkrieg und der Rückfall in vorkoloniale Zeiten,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71 (2016), Nr. 4 (Juli/August), S. 28-33; Ulrich Schmid, Konflikt in Libyen. Der umworbene Herr Haftar,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Internetausgabe, 11. 7. 2016. https:/www.nzz.ch/international/nahost-und-afrika/konflikt-in-libyen-derumworbene-herr-h aftarld.104962; ders., Khalifa Haftars einflussreiche Rolle in Libyen. Die Rückkehreines Warlords, ebd., 19. 9. 2016. https:/www.nzz. ch/ international/nahostund-afrika/portraet-des-warlord-haftar-in-libyenwird-der-bock-zum-gaertnerld.117409.

[41] “Fundis”亦可译作“原教旨派”，但绿党不是宗教党，译作“初心派”更合适。

[42] Hans *Kundnani, German Power. Das Paradox der deutschen Stärke* (engl. Orig.:Oxford 2015), München 2016, S. 181.

第9章
多重性的联合？

老是听人说，从前的欧洲什么事情都简单。这里的“从前”，大概指的是“六国欧洲”时代的美好旧时光。这六国最初于1952年组成欧洲煤钢共同体，后来又在1957年组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当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低地三国[1]的确在根本问题上拥有更多共识，尤其是在通过不断前进的一体化来“建立更紧密的共同体”方面，比1973年加上了西北欧三国（英国、爱尔兰、丹麦）之后要齐心得多。至于几十年后的扩容，即2004年到2013年的东扩之后，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与1945年后西欧一体化的先行者们紧密相连的，是今天可以被人称作共同“叙事”的东西：一个关于二战教训的宏大故事。构成故事核心的是这样一个想法：“欧洲人之间再也不要发生战争了！”在过分的民族主义把旧大陆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之后，欧洲意识到了是他们的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传统在最深处将欧洲人连在一起——这传统被看作西欧战后民主政体的共同基础。欧洲若是还想在世界上扮演正面角色，如果还想在两侧的美、苏两强之间站稳脚跟，就必须要有一个紧密的、尽可能与联邦相似的共同组织。这就是当时那一批政治家的信条，其中有法国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德国的康纳德·阿登纳、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和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这些都是1945年之后在各自国家当轴秉政之人。

不过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就出现过一些已经多次提到的非常热衷于民族主义的政治家。[2]他们在法国的保守态度特别顽固。比如，1954年8月巴黎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务一体化的项目，等到1944年的“解放者”戴高乐将军于1958年重新掌权之后法国的态度就更趋保守了。

然而，即使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没有被第五共和国取代，欧共体内部依然会发生冲突。联邦德国出口工业的利益与法国农业的利益截然不同，即便是德国农场主与法国农场主的利益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戴高乐却在1965年7月初把一场关于农产品共同价格的争吵推向了顶峰：他召回了欧共体机构中的法国代表。这一“空椅子策略”直到1966年1月达成“卢森堡妥协方案”后才告结束。在该方案中各方就农业财政补助的时间表和建立关税同盟取得了共识，同时还商定以后在奉行多数决定原则的部长理事会中如有争执不下的问题，将遵循“停止争吵，接受分歧”的原则。法国贯彻了自己的主张，此后只要涉及一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会议就要一直开到所有

与会者达成一致意见为止。从此，一致同意原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已不可改易。[3]

不难预见，欧洲共同体中的国家越多，平衡各方利益就越难。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戴高乐一直反对欧共体接纳英国（在他当政期间他做到了）。法国总统职位的第三个继任者，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89年6月下了决心）把创造一种共同货币当成巩固欧洲团结和抑制德国经济及财政强势的手段。可这两个愿望都落了空：联邦德国在完成统一和放弃德国马克之后，依然可以用欧元施展它在经济上的强势，而共同货币远不能如其创立者所希望的那样——弥合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

在2008年的金融及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到处都在议论欧元区内部的某种“南北对立”。所谓的“北方”，指的是那些出色地遵守了预算纪律并且始终留意自身偿债能力的国家。而那些所谓的“南方”国家则对预算纪律和国债的不断累积满不在乎。一般而言，这里的“南方”首先指的是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国家，宽泛点儿说也包括法国。属于“北方”的是德国、奥地利、荷兰、卢森堡、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至于地理上的“反例”，一方有马耳他，它像“北方国家”一样行事；另一方有比利时和爱尔兰，它们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如同两个“南方国家”。同时，与从前一样，这一分野中还有一个只在大而化之的层面上称得上正确的宗教社会学分野：“南方国家”主要受天主教影响，“北方国家”主要受新教影响。同样引人联想的，还有天主教普遍乐观的生活情绪和新教普遍严肃的态度。

心存怀疑者会觉得欧元区内包含了太多异质元素，以至于很难长期保持稳定。相反，共同货币的先锋们却并不那么在乎成员国各异的历史背景：他们把宝押在全体参与者的热情上，相信这些国家会因此遵守在预算赤字和国债方面已经商量好的规矩——事实很快证明这不过是个幻想。在引入欧元近两年之后，整合各国预算、财政和经济政策工程的竣工日还是遥遥无期：那个能让偏好节俭者和偏好增长者停止无效争论的历史性妥协，依旧难觅踪影。[4]

就在欧元区内南北对立的危机日益显露之际，难民危机又将欧洲联盟内部经久不衰的“东西对立”揭示出来。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称为“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全都有过大量移民涌入的体验，这些移民不只来自其他欧洲国家，而且也来自远在天边的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相反，那些原属东方阵营的国家坚持将移民潮挡在门外；它们从前是向外移民，而非接纳移民的社会。其中最大的国家——波兰，只是在1945年之后通过强制驱逐和重新安置之后，才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5]双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各种局限性，今天依然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即今天的捷克共和国）。

波罗的海三国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这三个国家自1940年被苏联吞并之后直到1990—1991年一直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各自都有数量可观的俄罗斯民族（拉脱维亚有29%、爱沙尼亚有26%、立陶宛有6%），这些人都是在三国失去独立之后才迁入的。中东欧和东南欧诸国的意图是：保住自己的民族身份并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刚刚失而复得的主权——基于这个意图，它们联合了起来，同时这也是这些国家在2004—2013年加入欧盟时的指导思想。

这些欧盟“新人”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都拒绝接受来自欧洲之外的难民。不过其间也有些许差异：前南斯拉夫联盟国家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比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表现得更为合作。波兰直到2015年政府更迭之后才发生转变，其政府从自由保守派变成了民族保守派，从而加入了“强硬派”的阵营。同样，由此构成的所谓“东欧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可是这个完全违背历史而且实属冷战遗物的概念在西方依然很受欢迎。在文化和地理的意义上，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才是东欧国家。2004年成为欧盟成员国的那8个欧洲大陆国家其实是中欧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受西方教会和拉丁文化——传统西方（alten Okzidents）——影响的欧洲的一部分。这些国家通过共同的法律传统和彼此之间以及与传统西方国家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而联结在一起。然而，拜占庭和东正教影响下的东欧和东南欧，在很早的时候就与拉丁欧洲分道扬镳了。

因此，这并非偶然：当欧盟在2007年接纳两个受东正教影响的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时，共同体所遭遇的麻烦比3年前接纳8个中东欧国家时要大得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不但比欧盟在第一轮东扩时接纳的国家穷得多，而且腐败程度和有组织犯罪的发生率也高出一大截。被欧盟委员会一再斥责的弊病之一是这些地方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其实在共产党掌权时就是如此。然而，法治传统的薄弱有其更为深远的根源：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希腊也与之类似）无缘浸润西方中世纪的分权传统，即那种将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分开，同时也将君王权力与其他各阶层的权力分开的传统；同样，它们也未能在近代早期经历文艺复兴这段在西方历史上打下烙印的解放历程。2007年的这群“新人”，更多地继承的是东正教和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正是这份遗产令其通向现代西方的道路变得更加难行。[6]

时至2008年，即两国加入欧盟整一年之后，它们还是缺乏与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做斗争的动力，这导致欧盟委员会取消了数百万援助金额，还使得德国和法国拒绝将它们纳入申根区。在罗马尼亚，新的社会民主党总理维克托·蓬塔（Victor Ponta）在2012年夏天挑起了与欧盟的冲突：他通过议员们的一项决议，暂时中止了保守派总统特拉扬·伯塞斯库（Traian Băsescu）的职务，并通过紧急命令修改了宪法，通过一次全民公决来罢

免总统而使程序变得更加容易——该程序原本所需的50%登记选民的投票率不再是必要条件。欧盟委员会强令投票率标准回到旧的规定，并因而导致了此次公投失败。由此，蓬塔必须与伯塞斯库继续“同床异梦”，但他还是继续推进他削弱分权体制和“把法官都弄成自己人”[7]的政策。尽管检察官对他提出了洗钱和逃税的指控，蓬塔还是在他的“左派”议员的议会多数支持下，直到2015年11月初还端坐在政府首脑的位置上。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国内政治的发展情况让作为“条约的守护人”的欧盟委员会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力量头痛不已，可欧盟中这样令人头痛的“新”成员并不止它们两个。2010年之后，有一个位于中欧东部并且无疑属于传统欧洲的国家持续霸占了各大报刊的头条：匈牙利。2010年4月，曾在1998年至2002年担任总理的维克多·欧尔班领导下的民族保守主义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以下简称“青民盟”）在议会选举中大胜：获得了近53%的选票和三分之二的议员席位。欧尔班与他第一次执政时一样，利用匈牙利签过的《特里亚农条约》为他的“大匈牙利”的说法造势——这个1920年的条约让匈牙利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历史疆土。他还用限制性立法来打击自由派和左翼媒体的影响，并且在一切可能的时候促成对自己有利的人员变动。2011年4月发布的新宪法写入一系列有争议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在宪法法院也遭到诟病，但新宪法规定修正案只能经由三分之二多数废除。新宪法的序言将圣斯蒂芬王冠[8]提升为匈牙利主权的真正承载者和国家连续性的象征。随之而来的是一部有助于确保青民盟掌控权力的选举法和一项旨在将中央银行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法案。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压力下，欧尔班不得不收回部分新法案。但这样的事能发生，完全是因为该国政府首脑只能靠欧盟的援助来延缓其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

为了使司法机构（特别是宪法法院）归顺，欧尔班在2012年3月让270名年长的法官提前退休，由那些看上去不会反对政府的年轻人取而代之。尽管欧洲法院于2012年11月做出的裁决，迫使欧尔班政府至少部分地撤销了这一措施，但用青民盟追随者置换掉宪法法院那些任期已满的法官的行动并未改变。通过修改宪法，议会还剥夺了总统审查法律合宪性的权力，并限制了他核准法律是否以正确方式正式生效的审查权。与此相伴随的还有：用鲜明的反自由主义文化政策破坏“制衡”原则，其中还包括在文化生活中压制自由派和左倾的犹太人。在2014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虽然总理的党所获的选票比2010年选举时少了8%，但由于选举法的变化，仍占据了近三分之二的议会席位。

毫无疑问，欧尔班一定会把他的保守主义革命当作长期努力的方向坚持到底。2014年7月26日，欧尔班在罗马尼亚伯伊莱图什纳德（Băile Tuşnad）的一场颇受关注的演讲中称：他要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匈牙利知

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夏季学院，为的是将匈牙利转变为一个“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要把“自由民主”抛诸脑后，而自视为“非自由的国家”。被他奉为榜样的国家有：新加坡、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他说这些国家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们没有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模式的引导。[9]

欧尔班对自由西方的攻击越来越类似于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一种相似性也在匈牙利总理2014年7月26日的演讲中被正式提到了。若是将欧尔班所建立的秩序称作独裁或威权主义政权，那也太过分了。由于他在物质上极为依赖欧盟的援助，所以他一直小心翼翼，生怕引发事端使欧盟与之决裂。至于说他到2015年为止所建立的这一套制度究竟是什么，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Berliner Stiftung für Wissenschaft and Politik）的一位名叫凯-欧拉夫·朗（Kai-Olaf Lang）的专家在2015年1月给出了恰如其分的描述：“这是一种与竞争性民主体制对立和对抗性的体制，在其中，权力高度集中，而宪法法院的管辖权则被削弱。”[10]

2010年至2014年，欧盟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几次干预，主要应归功于敏捷的属卢森堡基督教民主党的欧盟委员会司法委员维维亚娜·雷丁（Viviane Reding）的主动性。但是，欧洲议会中两个最大的党团却对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强烈反应。事情危急时，维克多·欧尔班可以依靠其所属的政党派系——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以应付来自左翼的攻击。而对维克托·蓬塔而言，则可以依仗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的团结精神。

如果到了一方涉嫌违反1993年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或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的地步时，就主要应由欧盟委员会出面负责。而当2014年欧洲选举的结果使欧盟委员会高层已经实质上对议会负责之后，委员会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政府首脑的指责大为减少了。很有可能，这就是蓬塔和欧尔班所属的欧洲议会中两大党团有所顾忌而导致的后果。只要委员会还拥有议会中这两个最重要党团的支持，他们就几乎可以不用理睬关于他们没有尽到“条约守护人”责任的指责。

欧盟对欧尔班的袒护，可能增加了匈牙利问题蔓延的风险。匈牙利推广民族保守主义的成果，给波兰法公党党魁、2006年至2007年的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卡钦斯基已经多次公开表示，要让华沙成为“维斯瓦河之滨的布达佩斯”。在“他的”候选人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于2015年5月总统选举中胜出，以及法公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他即于同年10月开始与欧尔班密切合作。当然，这些都仅限于内政方面。在外交上，这两位政治家的区别十分明显：欧尔班不但为“普京主义”着迷，而且还是在外交上亲俄的鼓吹者，并且主张欧盟取消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对俄实施的制裁。卡钦斯基则正好相反，一

直都是个货真价实的“厌俄分子”。他甚至怀疑俄罗斯领导人是造成2010年4月斯摩棱斯克飞机失事事件的幕后黑手——他的双胞胎兄弟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正是在那次事故中丧生的。法公党阵营还指责空难发生时的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及其自由保守主义的公民论坛（Bürgerplattform）掩盖了事件真相。

但让法公党赢得选举的主要是其社会福利方面的承诺，而不是其民族主义的口号。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提高最低工资、儿童补助金（低收入家庭从第一个孩子开始领，其他家庭有两个孩子后开始领），为7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障，以及将以税收支撑的健康保障来代替健康保险体系。尽管从哪里弄钱来支撑这些承诺一直都是个问题，但对许多自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分子”转型过程的牺牲品的人而言，法公党喊出的这些直击人心的口号已经足以收割他们的选票。

新一届波兰政府的首脑并非卡钦斯基，而是那时还不为人所知的贝娅塔·希德沃（Beata Szydło），这位于2015年11月16日就任的新总理没有浪费一点儿时间，立即就在波兰完成了民族保守主义的转向。12月2日，法公党凭借自己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令波兰下议院选出了5位宪法法院法官。反对党的抗议十分激烈，因为早在这一年10月，当时占据议会多数的公民论坛及其盟友已经使下议院选出了5位法官，而杜达总统却一直没有让他们宣誓就职。而等到新法官被选出后，他却马上让他们宣誓就职：其中4人在12月4日到5日的夜间就已经宣誓；12月8日举行了第五位新法官的宣誓仪式——第一轮宣誓时她受到了阻拦。在此期间，宪法法院于12月3日做出了一项裁决：上一届众议院只能选出3位法官，其余2位新法官需由新一届众议院选出。宪法法院只接受了2位由新一届众议院有权选出的法官。因此，这时宪法法院法定应有的15名法官中，经正确程序选出，宣誓且被接受宣誓的，只有12名。

对法公党政府而言，新法官的选举和宣誓只是限制宪法法院权力的步骤之一。12月22日，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宪法法院法规的修正案，两天后此议案在参议院也获通过。它规定，自此之后宪法法院的活动必须有13～15位法官在场的情况下完成（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有8位，即多数法官到场即可）。任何决定都必须在三分之二多数（而不是之前的简单多数）之下通过。以后，所有案件都需按立案的时间先后顺序处理，也就是说不再考虑这些争议问题的重要性差异。此外，在提交案件和宣布判决之间的时间应为3到6个月。至于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宪法法院究竟还能不能正常运作，不只反对党和大部分公共舆论在追问，其实每一个中立的观察家也不得不去想一想。

同样在公众间引发激烈争议的，是希德沃政府企图将公法媒体[11]（包括广播和电视台）置于其掌控之下。2005年12月30日，法公党议员占据多

数的波兰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律修正案（数日之后参议院也通过了），它规定：公法媒体的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不由各州的广播电视委员会多数票决，而是由财政部长直接任命。现任的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成员，在新法生效之后即丧失其席位。新法通过之后，反对党和记者协会立即予以猛烈抨击。四大公法电视台的台长宣布辞职，免得到时被解雇。欧盟委员会要求波兰政府应注意新的媒体法案与欧盟法律规定的一致性。

在2015年秋天政府更迭之后的几个月里，波兰看上去正在踏上成为第二个匈牙利的路。不过，在这两个中东欧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欧尔班的青民盟有着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且在议会中拥有三分之二多数，而卡钦斯基的法公党在2015年10月的选举中仅获得了37.6%的选票，只是因为波兰选举法的独特性才在议会席位上获得绝对多数。在匈牙利，议会中的社会党和自由党等反对党自2006年9月以来已经彻底名誉扫地。这是因为那位2004年至2009年任总理的久尔恰尼·费伦茨（Gyurcsány Ferenc）在2006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以一种比较通俗的方式承认他向民众隐瞒了经济情况的严重性，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民众。[12]

虽然唐纳德·图斯克及其继任者埃娃·科帕奇（Ewa Kopacz）的波兰公民论坛可能因为治国时太爱出风头，并且过于忽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苦恼而受到指责，但不善管理经济和腐败的恶名不会落在这个如今已经成该国第二大党的政党头上。此外，与匈牙利相比，波兰有更加富有战斗性的自由派媒体和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其中最出众的是新成立的“捍卫民主委员会”。自2015年12月以来，这个委员会已经多次组织上万人在华沙和其他大城市的大街上游行示威，目的是抗议削弱宪法法院的权力和媒体的多样性。还有，在波兰没有任何形式的反欧口号：这里比其他新成员国都更支持欧盟。

新波兰政府的批评者的优势在于，与匈牙利的青民盟不同，法公党并不属于保守派和基督教民主派，即不属于欧洲人民党的政党系，而是属于欧洲保守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13]的小团体，亦可与英国的保守党归为一类。这使欧洲人民党和在欧洲议会占据多数的亲欧盟议员更容易去尖锐地批评法公党政府，而不是欧尔班的青民盟。2016年1月13日，负责法治问题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荷兰社民党人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告知：委员会根据2014年3月通过的“法治国家基本评价机制”，将对波兰启动保护其法治国家属性的程序。据称，该程序将审核法治是否处在危险中，并且还会敦促波兰政府做出改变。

此前，众所周知的是，波兰外交部于2015年12月24日要求欧洲委员会对宪法管辖权改革进行评估——这是威尼斯委员会[14]的管辖范围。威尼斯委员会由独立专家小组组成，成立于1990年3月，专门负责讨论中东欧和东南欧那些刚刚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的宪法政治问题。但在布鲁塞尔和斯

特拉斯堡讨论和筹备的那些内容，对波兰政府和议会的行动毫无影响：1月底波兰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让司法部长接受总检察长的职权，从而用这种方式将检察官们置于两院掌控之下。

2月26日，威尼斯委员会完成了一份阶段性报告。这份报告送交了欧洲委员会全部47个成员国，之后又被转递到波兰最大的自由派报纸《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那里，并在几天后刊登了出来——这又引发了针对司法部长兹比格涅夫·焦布罗（Zbigniew Ziobro）的新一轮愤怒的抗议。报告中，5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法官得出的结论是：新一届的波兰众议院没有权利阻止上一届众议院选出的3位宪法法院法官履职。那部关于宪法法院的新法律也遭到拒绝：它被认为对法治、人权和民主体制的运行能力造成了威胁，因为它既不能再保障法院公平审理的权利，也不能保证法院监督国家立法时顾及人权的能力。报告的评估人特别批评了法案中对裁决时所需法定人数的提高、裁决时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以后处理案件是按提交顺序而不是重要性排序等方面。其结论非常清楚：这部法律是不合法的，因此必须废除。

2016年3月9日，距离这份报告经非官方渠道发布已一周半，波兰宪法法院以9：2的票数通过判决：那部关于宪法法院改革的法案违宪，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对此，希德沃政府在自己的官方通报中指出，这份判决是违法的，并据此不承认其法律效力。两天之后的3月11日，威尼斯委员会的6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法官拿出了一致通过的最终报告。这份报告在对事情的评判方面与之前专家们的阶段性报告并没有多大区别。该报告要求波兰政府放弃一切削弱宪法法院的企图，否则民主、人权和法治都会被破坏。报告认为波兰政府拒绝公布宪法法院的最新判决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举动，将会加深宪法危机。因此报告要求波兰政府立即公布判决并承认其效力。

欧洲委员会总秘书长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ørn Jagland）和欧盟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在4月4日访问了华沙。但希德沃政府并不打算让步。4月6日，世人已经知道，波兰司法部长焦布罗在给宪法法院院长安杰伊·热普林斯基（Andrzej Rzepliński）的一封信中否定了法院的一切合法性，并且警告各位法官：如果他们再进行之前那样的判决，将会遭到何种后果。波兰司法部副部长帕特里克·亚基（Patryk Jaki）在4月7日再次强调，不会公布宪法法院的判决。同时，他透露了未来的修宪计划：它将使议会在三分之二多数赞成的情况下否决宪法法院的判决。

2016年5月，冲突达到了高潮。5月18日，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波兰政府不纠正其在宪法法院引发争议的态度，欧盟将进一步对波兰采取措施。欧盟在采取相应措施前留给波兰的时限为5月23日前。不久之后，布鲁塞尔方面用严肃的口吻在公共媒体上劝希德沃总理做出以下让步：应让经正当程序选出的法官宣誓就职，并且在政府公报上正式发布宪法法院的判

决。而法公党阵营则立即抗议布鲁塞尔的草率，并坚称波兰决不会向最后的通牒屈服。

在幕后，谈判也在同一时间继续进行着。5月23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闪电访问”了华沙。然而，无论是蒂默曼斯此次与希德沃总理和司法部长焦布罗之间的谈话，还是之后一周他给这位波兰女总理打的电话，都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6月1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给这位女总理写了一封警告信，其中谈到了从法治的观点看，对宪法法院管辖权的改革应该处理哪些问题。信中限波兰政府在两周之内答复。

因此，欧盟委员会此时仍处于法治国家基本评价机制的第一阶段，即“评估阶段”。只有当这一阶段结束之后，委员会才会对成员国开启第二阶段：“劝告阶段”。如果届时的措施都没能取得委员会所预期的效果，那么时限一到就有可能会进入带有“后续手段”的第三阶段，即开启《里斯本条约》中所预先规定的“制裁阶段”。

欧盟委员会如此慎重，可能是因为布鲁塞尔方面不想在6月23日英国即将举行“是否脱离欧盟”公投之前与波兰爆发争吵。此外人们早就知道，《里斯本条约》第七条所规定的直至取消投票权的制裁，在此次波兰事件中只是一个空洞的威胁。实施相应措施的前提条件是欧洲理事会成员一致同意：涉事国严重且持续地伤害了欧盟所秉持的价值。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早已放出话来，他是不会同意采取这样的步骤的。

华沙当局在耗时间。2016年12月19日被视为“反对派”的宪法法院院长热普林斯基将退休。占据议会多数的法公党打的算盘是，他的继任者可能会比他“更合作一些”。如果真的能把欧盟委员会耗到选新院长的时候，那就算赚到不少了。看起来，卡钦斯基阵营无论如何都不会害怕在那之前与布鲁塞尔斗上一局。

6月1日，蒂默曼斯给波兰政府的那个两周的限期已然过去，波兰方面却没有任何表示。倒是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尼尔斯·穆伊兹尼克斯（Nils Muižnieks）在6月中旬评论一份官方报告的精神时的一番话引起了轰动。他谈及了波兰“法治的朽坏”，并且指出波兰政府在执行宪法法院判决和接受威尼斯委员会的劝告方面负有责任。波兰政府驳斥了报告中的说法，并且称这位专员的言论是片面和不公正的。从6月23日英国全民公投的那一天起，波兰的宪法争议暂时从头条新闻中消失了。英国公民们投票决定脱离欧盟的结果对波兰有着特殊的影响：有大约85万波兰公民生活在英国，他们大多都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而现在则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英国公投两周之后的7月7日，波兰众议院以238票赞成一读通过了关于宪法法院的新法律草案，据说这是顶着欧洲委员会、欧盟委员会，甚至美国

国务院的严厉反对而通过的。这个时间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几天之后，华沙就要迎接来参加北约峰会的极重要的贵宾：奥巴马总统。

占议会多数的法公党投票通过的议案，不但根据自由派反对党的意见，而且还根据独立观察家们的意见进行了一些粉饰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宪法法院判决将不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了。取而代之的规定是，如果以后15位法官中有4位提出要求，那么判决的生效时间可以连续两次被推迟2个月。政府的意图是明显的：跟政府方面一条心的法官将因此获得某种悬置判决的否决权。那位兼任了总检察长的司法部长，也有了新的阻挠手段。按规定，某些特定的判决只有在总检察长到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所以他若是想阻挠某项判决生效，只要远远躲开就行了——这就使得分权的理念陷入了荒唐的境地。

面对这种情况，欧盟委员会给出了强硬的回应。它在该法案通过7月27日向波兰政府发出了限期3个月的最后通牒：如果届时宪法法院的工作权限还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得以恢复，将有可能采取剥夺波兰投票权的措施。对一个成员国发出施加制裁的警告，这在欧洲联盟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5]

2015年，急速右转的欧洲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并非只有波兰一个。在11月8日举行的克罗地亚议会选举中，由信奉民族保守主义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缩写为HDZ，以下简称“民共体”）领导的“克罗地亚爱国联盟”成了第一大政治势力。与主张改革运动的“桥党”（Most，以下称“克桥党”）[16]联合之后，民共体终于可以在12月组成一个以无党派企业家蒂霍米尔·奥雷什科维奇（Tihomir Orešković）为总理的联合政府。新内阁中富有争议的成员是文化部长兹拉特科·哈桑贝戈维奇（Zlatko Hasanbegović），此人是民共体内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因为为1941年至1945年的乌斯塔沙法西斯主义政权辩护而出名。上任伊始，他就撤销了扶助独立媒体的委员会。对哈桑贝戈维奇的任命与新一届波兰政府对国防部长安东尼·马切雷维奇（Antoni Macierewicz）的任命一样，受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批评。马切雷维奇在发言中曾多次提到《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kolle der Weisen von Zion*）[17]——这是一本由俄国反犹分子在20世纪初炮制的一本伪书，其中列举了犹太人用阴谋诡计统治全球的计划。除了波兰和匈牙利之外，现在克罗地亚也越来越被称作这样一类欧盟新成员中的一个：人们不清楚，这些国家今后的右倾化进程会将它们带向何方？

2016年6月3日，克罗地亚的执政联盟解体了。起因是出现了对副总理兼民共体主席托米斯拉夫·卡拉马尔科（Tomislav Karamarko）的妻子涉嫌腐败的指控。而此人拒绝接受克桥党主席博若·彼得罗夫（Božo Petrov）和（不久后）奥雷什科维奇总理提出的辞职要求。于是，民共体想与克桥

党合作，共同提出对总理的不信任案。6月15日，卡拉马尔科终于放弃了内阁中的位置。数日之后，议会发起了对总理的不信任案，最终导致整个政府辞职。克罗地亚的女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ć）在与各政党谈话之后得出结论，目前已经不可能再形成另一个议会多数，唯有举行新的大选。6月20日，经151票中的125票赞成，克罗地亚议会（der Sabor）自行解散。新的大选日期被定在9月11日。[18]

自2016年3月5日之后，斯洛伐克也可以列入那些不可逆转的右倾化的国家了。这一天举行的议会选举在国外也备受瞩目，这主要是因为斯洛伐克即将在下半年成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罗伯尔特·菲科（Robert Fico）总理的党［社会民主-方向党（Smer-SD），以下简称“方向党”］属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党派系，因想在选战中让排外的右翼政党失去支持[19]，于是将这些右翼政党描绘成想要全面封堵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的样子。

但菲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方向党的得票率从2012年上一次选举时的44.4%跌到了此次的28.3%。虽然它仍然是第一大党，但失去了议会中的绝对多数。本次选举的赢家是各右翼党派。欧洲议会议员理查德·苏利克（Richard Sulík）领导的激进的反欧盟党派自由与团结党，得票率从5.9%上升至12.1%，成为议会中第二大议会党团。公开的民族主义团体和抗议性党派都赢得了很多选票。极右分子马里安·科特勒巴（Marian Kotleba）领导的信奉新法西斯主义的“我们的斯洛伐克”党（LS-NS）的得票率从8%上升到14%，另一个极右组织斯洛伐克民族党（SNS）取得了8.6%的选票，并以此得到了国民议会中的15个席位，而基督教民主派和其他温和派政党则失去了许多席位。

在近两周之后，新的执政联盟形成了。它由方向党和近来变得温和一点儿的斯洛伐克民族党、斯洛伐克桥党（Most-Híd——一个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党，以下简称“斯桥党”）和自由派政党组成，这些党拥有议会150席中的81席——凑足了议会多数。这个不久后要成为欧洲理事会主席国的国家，总算由此而在国内政治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

欧盟因这些东面的成员国（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而遭遇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在欧盟东扩之前从未有过原则性的争议问题，现在有了不同的回答：民主是否只能存在于自由和多元主义的意识之中？当然，在实践中，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下的意大利早已遭到人们的质疑：自由和多元主义真的在所有成员国都受到了绝对的保护吗？在接受打上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烙印的西方政治文化方面，那些曾经被共产党政权统治过的新成员国，比老成员国要晚得多。唯有那个在1993年分成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

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有资格声称自己曾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长时间地经历过代议制民主，直到代议制民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1939年被纳粹德国摧毁为止。其他国家当时都很快拥有了自己的专制政权。匈牙利在1919—1920年直接从苏维埃共和国（Rätesystem）变成了一个由霍尔蒂海军上将（Admiral Horthy）领导的右翼专制政权——这样一位政治人与1926年后新独立的波兰的“强人”毕苏茨基元帅（Marschall Piłsudski）一样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他们两人分别出自维克多·欧尔班的国家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国家。

与一战之后的情况不同的是，在共产党统治结束之后，并没有一个中东欧和东南欧的欧盟成员国马上公开转为专制政权。很明显，加入欧盟让这些成员国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温和性。任何一种与专制传统相衔接，或是建立独裁政府的尝试，都可能导致与欧盟的决裂——这一风险，是任何一个中东欧和东南欧政府的领导人都不愿意承担的。但在赤裸裸的专制与刚刚及格的民主体制之间，还有一片灰色地带——而这是欧盟可以插手的地方，若不然，它也就没有资格再称自己为一个因价值观而凝结的共同体了。欧盟内部关于民主争论，以及同时牵涉的关于移民、难民问题的争议，揭示出了一个在西方长期以来被有意忽视的现象——“共时性中的非共时性”。[20]在欧盟中，出自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的各种观念，彼此之间相互碰撞。当西欧的各民主政体在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具有“文化多样性”，至少是越来越具有种族多样性的时候，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仍处在一种与在西方发生的“全球化”相隔绝的状态中。

对中东欧和东南欧人而言，那场1989—1990年的历史性转折意味着自己的民族认同终于有了自由发展的机会，这在当初共产党的统治下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是不可想象的。当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现代跨大西洋的“西方”的一部分时，他们却对这件“新鲜事”感到陌生：这个西方跟他们之前所想象的那个西方不一样。这个西方，被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比较保守的国民和政治家）视为好不容易才取得的国家独立的威胁，有些人甚至觉得欧盟是那种强加于人的国际主义新形式。在德国于新千年伊始（2000年1月1日）施行的新《国籍法》中，国族认定将不再与“血统-文化-语言”的认定相关，而且按西方的共识将国族视为“因政治意愿而结合的共同体”。但此时的中东欧和东南欧人还在沿用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那套“文化民族国家”的看法。按照那位出生于布拉格的法国政治学家兼评论家雅克·鲁普尼克（Jacques Rupnik）的说法，这里的人“通过语言、文化以及经常用宗教”来认定自身身份，并自视为“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是基督教文明对抗外来威胁的‘堡垒’”。[21]

当然，若是将二者并置为心胸狭窄、民族主义的东方与拥有世界公民精神

的西方，则是一幅粗糙、失真的画面。一方面，中东欧大城市（无论是布拉格、华沙还是布达佩斯）中的知识精英完全清楚世界主义政治的传统；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去民族主义化”并没有在整个社会中完成，而只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生活在城市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和那些政治、经济精英。至于德国旧联邦州的“后民族主义”特别道路的发展，已经在另一处谈过了。[22]在欧盟内几乎所有的“西方”成员国，倒退的、民族主义的、仇外的政党都甚嚣尘上——这样一种局面，与中东欧和东南欧民族主义的复兴一样，也是一种对全球化的抗议。

那种在西方常见的左-右对立的政党格局，在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却总是不能长久地保持。那些在1989—1990年剧变后自称为社会主义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党派，几乎在各国都是由当初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转变而来的，因此很容易声名狼藉。组建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困难重重，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20世纪70年代缓和政策的重要推动者的德国社民党，在之后的数十年里仅与华约国家内部的民权组织保持着十分疏远的联系，并且它还曾把波兰的独立工会“团结工会”看成其实现“集体安全”的稳定政策的威胁。另一个原因是：1989年之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团体，既有自由派的，也有保守派的，但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

1989—1990年之后，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党的压倒性优势，促进了各个后共产主义社会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en）意义上的转变。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决裂越彻底，尽可能快地赶上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机会就越大——曾于1991—1997年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理，并于2003—2013年任捷克总统的公民民主党（Demokratischen Bürgerpartei，ODS）主席的政治家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长时间担任斯洛伐克总理的米库拉什·祖林达（Mikuláš Dzurinda），波兰财政部长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决策者遵循的都是这条路线。在匈牙利，前改革派共产党人霍恩·久洛（Horn Gyula）领导下的社会党-自由党执政联盟从1994年起，也推行了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相似的激进紧缩路线。

总的来说，中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比地中海区域的欧盟老成员要好得多。对这些国家来说，物资匮乏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让它们得以与那些施行紧缩政策就意味着虚假福利下降的国家区别开来——说那是“虚假”福利，是因为最迟从引入欧元开始，这些福利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根本不是这些国家自己能够负担的，而是靠货币联盟中那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的信用才得以支撑。由此，欧盟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异，开始被北部与南部之间的经济差距所覆盖。[23]

与东部的那些成员国一样，北方的成员国也未能对欧盟形成一个整体做出

多少贡献。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之前，芬兰都仅拥有有限的主权——它在1948年4月的一份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中背负了如下义务：奉行亲苏联的外交政策，在两国中任何一国遭遇外敌入侵时两国应互相支援。芬兰在1992年1月与俄罗斯联邦的一份条约中寻回了自己的独立。其中，双方只是规定：若两国之一遭到第三国入侵，对方不许帮助入侵者。

1995年1月1日，芬兰与另外两个中立国——瑞典和奥地利——一起加入了欧盟。不过，加入欧盟对芬兰的意义比对任何一个北欧国家都要大。与丹麦和瑞典这两个分别于1994年和1995年加入欧盟的国家不同的是，芬兰没有要求任何特别安排，直接于1999年成为欧元区成员。那个名叫“芬兰人党”（后来又改名为“正统芬兰人党”）的右翼民粹主义党派也诞生在这里。正统芬兰人党在2015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7.7%的选票，并且参与了由保守党领导的政府，拿下了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国防部长以及社会与健康部长的职位。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由挪威、瑞典和丹麦三国组成，也并非铁板一块。将这三国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有亲缘关系的语言、政治文化中的相似性，还有这三个君主国的一部分地区都或长或短地有一段共同经历的历史（丹麦的部分地区和瑞典南部地区，还有1814年至1905年的瑞典和挪威）。[24]相对而言，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就要薄弱得多了。欧盟并不能在任何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建立团结一致或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同样，这三国的政治道路也十分不同。

其中，挪威对欧盟最为疏远。挪威政府曾于1967年与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一起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但在1972年9月的一次全民公决中，有53.5%的投票者反对加入，当时特别引发争议的是欧共体通过的《渔业法》。两年后人们发现挪威海岸附近蕴藏着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这更强化了许多挪威人对布鲁塞尔的反对意见。在1994年11月举行的另一次全民公决中，由52.2%的投票者形成的多数派再次反对加入欧盟。与1972年一样，也是相对不太富裕的农村地区（即北部地区）的人反对，而奥斯陆周边东南地区的人赞成加入。

丹麦自1974年以来就是欧盟成员国，却在1992年6月的一次全民公决中以50.7%的多数拒绝加入《马约》。直到欧盟提出妥协之后，丹麦人才以56.7%的多数在1993年5月的第二次全民公投中赞成了修改之后的诸项条约。这项妥协允许丹麦在联盟活动的下列领域中有“不参与”（opt-outs）的权利——司法及内政政策的一部分（含庇护权）、共同货币项目，并拥有自主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此后，仇视外来移民及社会融合计划的丹麦人民党对丹麦内政的影响与日俱增。在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该党以21.1%的得票率稳居资产阶级政党中的第一位，并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全国第二大党。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首相领

导下的自由党少数派内阁需仰仗丹麦人民党的善意才组阁成功，其境况与他们上一次执政时并不相同。丹麦人民党的下一个目标，是通过取消某些特定的社会福利政策而尽可能地使丹麦在移民者眼中丧失吸引力——事实上这个政策完全成功了。

与丹麦不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瑞典长久以来就已成为全世界寻求庇护者的家园。2015年的难民潮带来了近16万份庇护申请，从而引起了前文中提到的转变：瑞典开始大范围地对没有庇护资格和没有证明文件的难民封闭边境。斯特凡·勒文（Stefan Löfven）首相领导下的社民党和绿党少数派政府，面临着属于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党派的瑞典民主党的吸引力不断攀升的压力。瑞典民主党在2014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为12.9%，而且根据这几年的民意调查估计现在会有20%的支持率。强化与丹麦毗邻的海上边境控制显示出瑞典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跌入低谷：这两个国家极少出现这样相互不信任的情况。

当英国保守党领导人戴维·卡梅伦在2010年5月6日的下议院选举结束几天之后，出席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的峰会时，他很清楚，他迟早都必须兑现他在英国大选时最轰动的承诺：举行一次关于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内部的全民公决。早在35年前的1975年，同一主题的全民公决已经在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任上举行过一次了。在政府与欧洲共同体重新谈判并就一些经济政策问题达成妥协之后，那次公投以三分之二多数（67.2%）支持英国留在欧共体内。新一轮的公投是卡梅伦为赢得党内强大的反欧盟派的支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认为不这样做他根本住不进唐宁街10号。保守党领导人不得不一再对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领导下的亲欧盟的自由党保证，英国会在欧盟中起到积极作用，以换取自由党同意：今后如不经过全民公决批准，将不再向欧洲联盟让渡任何主权。

直到两年半之后，戴维·卡梅伦才在2013年1月23日的伦敦主题演讲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他对未来英国与欧盟关系的看法。首相在讲话中称，既要重视本党内部的反欧盟势力，也要照顾到亲欧盟的政治盟友，因此这只不过是一个“和稀泥”的讲话。卡梅伦赞扬了欧洲共同市场的成就，称自己决不是一个想拉起城门吊桥的孤立主义者。相反，他说他要努力为英国和欧盟拿出更好的方案。他谈到了欧洲的竞争力危机，以及缺乏一种对欧盟决议的民主的问责制度。面对各成员国间的利益分化，他呼吁更多的灵活性，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共同体的一些权责还给各个国家。为了2015年的下议院选举，他宣布保守党请求进行一场全民公决，其主题是“去或留？”的问题。如果关于新条约的谈判取得成果，他觉得英国人会想留在欧盟。由此，卡梅伦对于欧盟改革和英国继续留在欧盟的条件已经被摆在了桌面上。[25]

一直以来，英国都对自己欧洲共同体成员的身份疑虑重重，或者说早就对自己之于欧洲的政治归属存在疑问。一方面是地理上“位于欧洲”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属于欧洲”，或者说在政治上成为欧洲的一部分的问题。英国的岛国地位一次又一次地发挥作用，让它能抵挡来自大陆国家的入侵者：无论这挑战是来自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还是法国的波旁王朝和拿破仑，或是德国的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最符合英国利益的情况，是大陆上形成大致的“均势”，因为这样就能防止那些更大的国家取得霸权地位。即便当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46年9月19日在苏黎世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建立“欧罗巴合众国”时，当他建议建立作为这个合众国基础的德法伙伴关系（英国和英联邦并不属于这个架构，但也作为朋友和赞助者与之紧密相连）时，保持大陆上的力量平衡也是这位前保守党首相念念不忘之事。[26]

依此逻辑，充满疑虑的英国也没有参与1957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然而，与伦敦所期望的相反，而且与那个由英国推动的、在1960年初成立的、雄心小得多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以下简称：欧自联）不同，欧洲共同市场发展得十分成功，以至于令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回转心意：他们相信加入欧共体在经济上的好处更大，于是于1961年8月申请加入。但直到最坚决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离开政治舞台3年之后的1972年，英国才得以加入。[27]即便是在那之后，英国与欧洲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磕磕绊绊。接着1975年的再谈判和第一次全民公投的是1984年围绕着“英国回扣”[28]的争吵——这场争吵以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成功地大幅减少了英国对欧共体缴纳的会费而告终。当卡梅伦于2013年初重新将英国是否留在欧盟的问题提出来时，他是可以继承一种老传统的。

对他的要求而言，英国首相可能能够把达成共识的希望主要放在那些与“布鲁塞尔”的价值观有一定距离的国家身上：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尤其是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以及2015年政府更迭之后的波兰，甚至还有瑞典、丹麦和荷兰。荷兰政府在2013年7月呼吁应强化对“辅助性原则”的重视，根据该原则，只有民族国家难以更好地治理时，欧盟才能参与治理。一个月后，德国总理也提倡加强政府间合作，这意味着不再坚持“超国家一体化应具有优先性”的立场。[29]卡梅伦的主题演讲在法国、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都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人们指责伦敦政府领导人想要的是一种“在欧洲点菜”的状态，用德语说就是“樱桃只看好的摘”，也就是说只想要欧盟中的特权，而不愿承担欧盟的义务。

在英伦三岛内部，最反对英国脱离欧盟的当属苏格兰。在2014年9月举行的一次苏格兰全民公投中，多数投票者（55.3%）赞成保留与英格兰的联

盟。不过大部分观察家都同意，如果伦敦与布鲁塞尔决裂，就可能会引起下一场引发苏格兰独立并使苏格兰加入欧盟的公投。英国最大的两个党——保守党和工党，在是否脱离欧盟问题上的意见并不一致。自由党是坚定的亲欧派政党，正如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Ukip）是坚定的反欧派政党一样。在商业界和金融界是一片亲欧的声音：在这儿，欧洲共同市场的好处是留在欧盟内部的决定性理由。大部分街头通俗报纸和默多克集团的报纸［《太阳报》（*Sun*）、《泰晤士报》（*Times*）和《周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都持反欧立场，这早已广为人知。

在2015年5月7日的下议院选举之后，保守党占据绝对多数的席位。这一胜利使得卡梅伦能够认真地开始实施他“欧盟改革与全民公决”计划。2016年初，他成功地与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进行了谈判，在进行了多轮双边对话之后，他们达成了一致。在2016年2月18—19日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妥协方案被定了下来——一共包括四个“篮子”。第一个篮子里装着对首相最重要的让步：在一定条件下，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求职者在4年内不能获得英国给予低收入者的工资补贴。这样一种特殊安排的限期为7年，而且只对英国生效。此外，只要来自欧盟内部的外国人子女是住在其来源国而不是英国，英国（以及其他任何成员国）就可以调整付给他们的子女津贴，以便与其来源国较低的生活费用相适应。

第二个篮子保证了英国可以不参与今后的政治一体化的权利。欧盟方面承诺，未来的新立法不会再像《罗马条约》的序言中说的那样，以建立“一个欧洲各民族的越来越紧密的联盟”为基础。各国议会的角色应该得到加强。如果议会有55%的成员同意在12周之内援引辅助性原则反对欧盟委员会的立法提案，那么该问题就应该被迅速转入欧盟部长会议的议事日程。在欧盟委员会处理这些问题之前，成员国不应继续讨论该提案。

在第三个篮子里，欧盟承诺，不属于货币联盟的成员国不应因欧元区国家的决定而处于不利地位。非欧元区国家则承诺，不阻挠货币联盟的进一步深化。最后，欧盟在第四个篮子中答应以具体步骤简化行政程序，并且改善欧洲经济的竞争力。

在戴维·卡梅伦看来，他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将使他能够成为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盟一方的领袖。如普遍期待的那样，他把公投日定在了2016年6月23日。然而，在2月21日星期天召开的一次内阁特别会议上，内阁成员们的想法并不一致。在29名内阁大臣中，有6名反对，其中有卡梅伦在政治上和私人关系上都特别亲近的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几天后，反对者中又增加了很受欢迎的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此人是卡梅伦在保守党内的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观察家们估计，共有100～150位保守党下议院议员（即议会党团中的三分

之一到一半），在之后的几个月中会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在布鲁塞尔峰会一周之后进行的民调显示，赞成“脱欧”的意见稍稍领先。对卡梅伦而言，他即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场生死考验。[30]

与保守党类似，工党内部也存在分歧。不管是不是半心半意，该党的大部分下议院议员当然还是支持比较左倾的党魁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留在欧盟内的意见。但该党也有少数党员支持出生于巴伐利亚的下议院议员吉塞拉·斯图尔特（Gisela Stuart）[31]“英国脱欧”的主张，即退出欧盟。斯图尔特甚至还领导着一个鼓吹英国与欧洲联盟相分离的党外运动。

4月初，“脱欧”的阵营得到了两个互不相干的事件的助力。在这段时间里，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的荷兰于4月6日举行了一场“参考性的”（也就是说对政府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全民公决。其主题是：作为欧盟28个成员国中唯一没有批准（之前已经在法律上生效的）欧盟与乌克兰之间的协助协定的国家，政府是否应该批准该协定。结果很清楚：多数投票者（61%）说“不”。当然，这次投票的投票率仅仅是刚刚超过下限（30%），而且这个结果还得益于那些支持批准者非其本意的助攻——这些人公开宣称更好的办法是抵制这种公投式民主的实践。很显然，这次公投的推动者主要想表达的是对欧盟的不信任，事实上与跟乌克兰的协助协定的关系并不那么大。整个欧洲也正是在这层意思上解读这次公投结果的，而且右翼民粹主义的英国独立党更是大肆庆祝。该党认为荷兰反欧盟势力的胜利，乃是6月23日本党大可期望的胜利的一个吉兆。

就在荷兰公投的第二天，戴维·卡梅伦首相不得不应付一桩倒霉事：根据《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北德意志广播电台（Norddeutschem Rundfunk）和联邦德国广播电台（Westdeutschem Rundfunk），以及约有来自80个国家的400名记者参与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一系列调查和揭露，几天以前，人们已经知道卡梅伦2010年去世的父亲，即股票经纪人伊恩·卡梅伦（Ian Cameron），在“避税天堂”巴拿马成立过一家“空壳公司”（Briefkastenfirma，直译：“信箱公司”），并因此卷入了关于“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的全球性丑闻——“巴拿马文件”是在巴拿马注册的莫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Mossack Fonseca）的账簿。卡梅伦不得不在多次躲躲闪闪的说明之后承认，他到2010年1月为止（就是说就在他当选政府首脑前不久）在他父亲在巴哈马建立的离岸投资基金中拥有价值1.4万英镑的股份。他说自那之后他一直都足额纳税，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但他的这个保证并不足以化解他迟来的坦白给自己形象所带来的致命的负面影响。

同样给他带来负面影响的还有卡梅伦4月9日公布的报税表。报税表显示

出，在2010年之后他除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30万英镑的遗产之外，还从他母亲那里接受了两次现金赠款（每次各10万英镑）——而按照英国法律，一次继承31.5万英镑以上的遗产就要交遗产税。戴维·卡梅伦是“留欧派”阵营的代表，凡是有损于他的事情，“脱欧派”都会加以利用。他们赢得6月公投的可能性在4月的前半个月里大大增加了。

不久之后，“留欧”阵营从外部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4月22日，访问伦敦的奥巴马总统警告说，如果英国脱离欧盟，它就不得不排队等候与美国的贸易协定。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何塞·安赫尔·古里亚（José Ángel Gurría）几天后也为英国人算了一笔账，到2020年为止，每一个英国家庭将为英国退出欧洲联盟付出2200英镑（合2773欧元）的代价。5月底在日本伊势-志摩举行的七国集团（G7）国家领导人会议上，与会者警告英国脱欧会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月17日也用类似但更加郑重的语气表态：英国脱离欧盟还会威胁到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

布鲁塞尔方面表示，英国若是想像“脱欧派”所设想的那样脱欧后再重新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将需要经过多年的谈判，而且即便像挪威那样谈判成功，也要对欧盟付出重金，还要承担遵守欧盟规定的义务——包括开放劳动力市场。最耸人听闻的表态来自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他在6月13日对德国的通俗报纸《图片报》说，英国脱欧将“不但是毁灭欧盟，也是毁灭整个西方政治文明的开端”。

鉴于欧盟是英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出口和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都接近50%，所以反对英国脱欧的经济理由是很有分量的。而那个“脱欧阵营”，比如“黄色报刊”（yellow-press）[32]和默多克集团的报纸，则用制造恐慌的策略来应对：最后一周的鼓动，就是专门针对普遍存在的、对来自欧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规模移民失去控制的恐惧而设计的。而且，其中还反复指称卡梅伦根本无法兑现把移民数量大幅降至每年10万人的承诺。

首相卡梅伦一再警告，如果退出欧盟，将可能导致英国的分裂——苏格兰会独立出去。这并非英国脱欧对自身统一造成的唯一威胁。如果爱尔兰共和国与北爱尔兰之间的边界成了欧盟的外部边境的话，那么在这条边境上就将实施人员及货物管制。替代方案是，阿尔斯特（Ulster）[33]的居民若想去英国的其他地方，就需要接受边境检查。

6月16日，恰在公投一周之前，一场政治谋杀的新闻震惊了英伦三岛。在英国北部的西约克郡[34]，衷心亲欧的41岁的工党议员海伦·乔安娜·考克斯（Helen Joanne Cox）在与她的选区选民进行对话之后，被一名52岁男子用刀和枪击造成重伤，不久后不治身亡。据目击者称，行凶者是一名与激

进右翼圈子有联系的精神明显有问题的英国人，并且他还在袭击时高喊“英国优先！”（“英国优先！”是一个以此命名的极端党派的口号。）英国留欧的赞成派和反对派都立刻决定停止3天的宣传造势活动；卡梅伦首相和反对党领袖科尔宾与下议院的其他成员一起于次日参加了在利兹附近的出事现场伯斯托尔举行的追悼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次袭击将会帮“留欧”阵营一把。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前几天“脱欧派”将获胜的民调结果还曾导致英镑和股价下跌，现在的走势又立即翻转了过来。6月16日之后，连在博彩投注点下注的人也是大部分赌英国脱欧不会成功。

2016年6月23日，终于到了见真章的时刻。与最后一次民调和赌徒们的预测相反，英国人以微弱多数（51.9%）赞成退出欧盟。赞成留欧的票共占48.1%。投票率为72%，高于2015年5月的下议院选举（66.1%）。引人注目的是地区间的差异。“脱欧派”仅在英格兰（53.4%）和威尔士（52.5%）占有多数。在苏格兰（62%）和北爱尔兰（55.8%），“留欧派”都占据优势。在伦敦，大部分人（59.9%）也支持英国留在欧盟。至于英国的王家殖民地直布罗陀，则对“留欧”表示出了更加强烈的意愿（95.9%）。

对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表明，英国“留欧派”与“脱欧派”之间的分野跟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在年龄小于45岁的英国人中，有更多的“留欧派”而不是“脱欧派”，而对那些年纪较大的人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最亲欧的是18～24岁的人（73%），最不赞成留欧的是65岁以上的人（40%）。但在投票率方面，高龄投票者（超过90%）要超过那些年轻人（超过70%）。学生、学者和“过得不错的人”比工人和其他“小老百姓”更踊跃地投票支持留在欧盟；大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和小城镇居民更赞成留欧。“脱欧派”的平均年收入为18 000英镑，“留欧派”为32 000英镑（按2016年6月28日的汇率换算分别是21 630欧元和38 460欧元）。[35]不出意料的是，凡是那些在撒切尔时代去工业化严重的经济落后地区和有“被抛离”感的人群都特别支持脱欧派。

英国公投的结果一出来，法国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和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这些大陆上的反欧盟政客就欢呼起来。此二人都明确表示，一旦他们能够做主，他们也会在自己的国家举行关于是否留在欧盟的公民投票。而在布鲁塞尔和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首都，传出的都是不安的声音；在柏林，这种惶恐不定的情绪自然比巴黎更盛。当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和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都纷纷催促英国政府尽快完成脱欧手续的时候，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对伦敦施加太大的压力。从欧洲的“联邦主义者”那里传来的呼声，是要留下的27个成员国或至少是货币同盟成员国进一步深化一体化进程。与他们意见不一的“现实主义者”却把英

国脱欧公投视为一个警告：在他们看来，欧盟应该正视坚守欧洲统一计划与相当一部分联盟成员意愿脱节的深层原因，而不能仅仅用“现在更要越挫越勇”的固执心态去面对英国的抗议式公投。

戴维·卡梅伦是这次公投的最大输家——他看上去像是一位波拿巴式的“全民公决派”（appel au peuple）[36]人士，他在6月24日早上发布的声明称，他在到10月为止的短暂过渡时期之后，将不再担任首相一职。因此保守党大会需要决定谁是他的继任者，而按《里斯本条约》第50条应就脱离欧盟而进行一系列谈判，将交由下一届政府来进行。在工党方面，出现了反对党主席、老社会主义者杰里米·科尔宾的活动，许多人指责他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时不够积极而且说服力不足。影子内阁[37]中负责外交政策的影子部长希拉里·本（Hilary Benn）不再信任科尔宾，并因此愤而辞职，影子内阁中的大部分成员愿与他保持团结，于是也纷纷辞职。6月28日工党议员们以五分之四的多数通过了对科尔宾这位党内基层力量代表者的不信任案。[38]

鲍里斯·约翰逊是“脱欧派”阵营中一位特别积极的代表，但在“那一天之后”他说话的语气就缓和下来。他说英国永远与欧洲连在一起，在公投之后并不会立刻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不用急着申请退出（“没必要启动第50条”）。从金融市场对公投结果的反应，人们能够意会为何这些“主张脱欧者”现在的言行如此低调：英镑已跌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仅仅是伦敦，而且是所有股票交易所的部分股票都在公投后的第二天出现暴跌，首当其冲的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票。人们普遍认为，法兰克福将在未来取代伦敦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负责金融市场方面的欧盟委员并曾为“留欧派”积极拉票的英国人乔纳森·希尔（Jonathan Hill），在6月24日即宣布辞职。3天后，即6月27日，信誉评级机构惠誉国际（Fitch）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不再给予英国最高信用评级：英国的信用评级被下调两级，降至AA。

然而，让“主张脱欧者”难以尽情享受胜利喜悦的，并非仅有物质方面的原因。6月24日，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谈起了苏格兰再次举行独立公投的可能性。这里是全英国对脱欧公投最失望的地方；“脱欧派”没有在任何一个选区取得多数。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再举行一场公投则苏格兰很可能会独立。而且爱丁堡也讨论过，苏格兰议会是否对英国退出欧盟拥有否决权——尽管还不清楚这样的决定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果。

早在5月，当民调显示“留欧派”会以微弱优势获胜时，一名右翼极端主义者兼脱欧活动家就在互联网上发起过一个争取再次公投的行动。根据这一意见，公投的结果只有在超过75%的合格选民参与投票，并且获胜一方拥有60%的多数票时才具有约束力。而在“脱欧派”成功之后，又有许多“留欧

派”响应这一动议。到6月26日为止，已经有300多万名支持者参与——不过他们并不都是英国人。

6月27日，首相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迹象再次表明，大家对在4天前英国人所做出的这个决定都感到茫然。绝大多数英国人和欧洲大陆上的人一样，都觉得卡梅伦这回可“输惨了”：他玩了一把“全梭”[39]，然后输个精光。他搞公投的理由完全是战术性的：他想令本党之内的疑欧派满意，又想把英国独立党的支持者抢过来。他的党内竞争对手鲍里斯·约翰逊所玩的游戏也同样危险：估计约翰逊并非真的有如此想法，只是出于仕途上的考虑，才把宝押到英国脱欧之上，然而在此之后他却无法掩饰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保守党内部对于他是不是接替卡梅伦合适人选也一直有很大分歧。

卡梅伦和约翰逊是保守派“上流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这类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同时也都曾是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40]的会员——这是个成立于1780年的、仅有少数人能参加的餐饮社团。这两人都轻率地出于党派的或个人的动机，而拿自己国家的命运冒险，这是他们把自己的党派乃至整个英国都置于危机状态中的核心原因。这个诞生了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还不到万不得已时，就动用了全民公决这样的最后手段，同时又故意无视这一手段的危险：这样一种决断并非出于对某一方案之利弊的冷静权衡，而是出于个人好恶的情感，也就是说是在“跟着感觉走”[41]。在英国脱欧公投一事中，怀旧情绪的感召力起了很大作用。2016年6月23日有种得到宣扬的信念称：只要脱离欧盟，英国就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威胁，特别是那些来自“东欧”和“第三世界”的移民，并且英国就能从此夺回并更好地维护其自1973年1月1日加入欧洲共同体之后就一步步失去了的政治独立性。

俗话说得好，内疚总是短暂的。像约翰逊这样“脱欧主张者”中的领袖人物觉得，要是能在与欧盟分离之后继续保留在共同市场之内却不用再付出人员自由流动和会费的代价，也是不错并可以期待的结果。在公投之后，卡梅伦也发表了相应的评论。两人似乎都认为，在伦敦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提交其退盟申请之前，英国人可以与欧盟就未来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达成一致。

布鲁塞尔和柏林的方针接踵而至。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于6月28日告诉欧洲议会，他已经禁止委员会成员在英国提交脱欧申请之前与英方代表进行任何会谈。默克尔总理于同一天在联邦议院的发言与容克的精神完全一致：谁要是离开了欧盟大家庭，就不能指望既已摆脱了义务，却依然保有特权；按照“樱桃只看好的摘”的原则来进行谈判是行不通的。同在6月28日，当卡梅伦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与其他国家首脑碰面时，得到的是一样的信息。次日，剩下的27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在讨论如

何处理这个新情况，只是还没有形成决议。

6月30日中午12点，报名接替卡梅伦担任保守党领袖（同时也成为首相）的截止时间到了。果决的内政大臣特雷莎·梅（Theresa May）是一个严格限制移民政策的支持者，她此前虽从属于“留欧”阵营（尽管十分低调），但在表示愿意参与竞争时也受到了欢迎。接下来，能源国务大臣安德拉·利德森（Andrea Leadsom）成为候选人并不出人意料，她在公投前十分坚决地站在“脱欧派”一边。让人大吃一惊的反而是司法部长迈克尔·戈夫的申请，作为“主张脱欧者”，他曾是鲍里斯·约翰逊的亲密战友，然而后者现在却手足无措，既不能整合保守党、履行首相职责，也不知道该如何将英国带出欧盟。不过，真正具有轰动效应还是约翰逊自己的声明：在与党内伙伴交谈并审慎考虑议会中的情况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不是领导即将展开的与欧盟谈判的合适人选。

显然，约翰逊的误判不但使他没有做好与欧盟谈判的准备，而且也使他丧失了领导保守党的机会。与党内情况不同，在下议院“留欧派”占多数，而且戈夫突然袭击式地宣布参选不但使约翰逊难以战胜人望甚高的特雷莎·梅，而且让他泄了气。戴维·卡梅伦与鲍里斯·约翰逊之间这场持续多年的争夺保守党党魁之位的权力斗争，在“对决”之后却是一个双输的结局：首相和他最可怕的党内挑战者都出局了。

那时，工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尚未结束：工党党魁科尔宾凭借着他在2015年9月的党内投票中所获得的民主授权，拒绝像下议院党团绝大多数党员要求的那样就此辞职。科尔宾所体现出的是英国怀旧病的左翼形态。如果说英国脱欧的支持者所代表的，是那种对恢复他们所认为的美好旧日时光——据说那时英国还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向往，那么帮助工党党魁在2015年9月的党内选举中赢得了大部分党员和工会的那种保守态度，显露出的则是一种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公正永恒追求的信念——这套价值体系曾经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的乐观主义而被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领导下的“新工党”所抛弃。

公投过去一周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似乎跟之前一样模糊。早在英国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时，它就只想享受共同市场带来的好处，而从来不愿意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让渡主权，或是将部分主权交给超国家机构，更不用说伦敦不愿履行成员国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在围绕着英国脱欧的争斗中，两位最重要的主角间的关系同样暧昧不清。长期以来，戴维·卡梅伦一直试图从对欧盟的批评中获益，直到公投快要开始之前，他才匆忙变成了主张捍卫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的人。而直到2016年初，鲍里斯·约翰逊与其说是疑欧派，还不如说是亲欧派，结果他为了尽可能争取到继任首相的机会，突然一下当上了“脱欧派”的领袖。可他其实并不相信自己这一边会赢，也从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相反，他的如意算盘是：在“留欧

派”以微弱优势取胜之后，失望的“脱欧派”会在争夺卡梅伦继任者的斗争中支持自己。

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如果不是约翰逊这样一个人的热情鼓动，脱欧派可能不会拥有这场险胜。他退出保守党党魁人选的竞争，不但对“英国脱欧派”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把他的弃权当作临阵脱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让整个运动陷入了可疑的境地。更可疑的是，英国独立党党魁奈杰尔·法拉杰（Nigel Farage），这个一直把英国退出欧洲联盟视为目标之一的人，也于7月4日宣布结束政治生涯。

在“留欧”阵营中，7月2日至3日的周末过后，越来越多的人在考虑让下议院不承认6月23日的投票结果，或是让下议院决议举行第二次公投，以便修改第一次公投的结果。同时被讨论的问题还有是否提前举行新一轮大选，如果这场大选带有了某种事实上的对英国是否留在欧盟进行表决的性质，那么它将有可能为“留欧”赋予合法性。自由民主党人甚至在公投几天之后就已经宣称，如果依他们的主张进行新一轮大选的话，他们将成为那个亲欧盟的党派。

不过事情发展几乎是覆水难收，7月11日至13日，事态很快得到澄清：英国脱欧一事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再动摇。7月11日，与特雷莎·梅一起接受保守党下议院党团提名的议员安德拉·利德森出人意料地撤出了对保守党党魁和首相位置的争夺，这样一来现任内政大臣就成了唯一一位党内投票通过并且还留在名单中的候选人。同日，保守党党务委员会任命特雷莎·梅为党主席。两天后，卡梅伦辞去政府首相一职——这比他原计划的早了不少。伊丽莎白女王随即任命特雷莎·梅为新一任首相。她的政府工作所要遵循的原则看上去十分清晰：“英国脱欧，退了就是退了，而且我们还要退得富有成效。”

继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后的第二位女首相于7月13日就其内政目标所发表的声明，听起来更像来自工党而非“托利党人”，而且显然也是为了打动那些先前主要给反对党投票的选民。特雷莎·梅控诉了英国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在这方面，她提到穷人死得比中等收入者要早得多，工人子弟念大学的比例比其他社会阶层的人要少得多，女人们得到的薪酬比男人少，黑人比白人受到司法部门更严苛的对待，然后她宣布要在“更好的不列颠”（better Britain）的口号下实现社会和解的目标。她特别强调了其所在党派的全称——保守与统一党（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并发誓要让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在联合王国中结成团结的联盟。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个重要内阁职位的任命：新任外交大臣是英国脱欧运动中的“明星”——鲍里斯·约翰逊；领导新成立的“脱欧部”的是长年为英国脱欧而奋斗的老党员戴维·戴维斯；出自同一阵营的还有保守党的前任主席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他将领导新成立的国际贸易部。这三个

任命全都具有信号效果。特雷莎·梅想让分裂中的保守党重新凝聚起来并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政府的头号任务是如何在面对剩下的欧盟国家和整个世界时引导英国的“国家利益”。[42]而对欧盟而言，没有理由再怀疑2016年6月23日的决断已经一锤定音。

---

[1] “低地三国”，原文是“drei Benelux-Staaten”，也就是“Belgien, Niederlande, Luxemburg”（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的缩写。

[2] Hans Kundnani, *German Power. Das Paradox der deutschen Stärke,* 15ff.

[3] Gerhard Brunn, *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 von 1945 bis heute,* Stuttgart 2009³,S. 144 ff.; Winfried Loth, Europas Einigung. Eine unvollendete Geschichte,Frankfurt 2014, S. 134 ff.; Kiran Klaus Patel, Europäisierung wider Willen.*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r Agrarintegration der EWG 1955-1973,*München 2009, S. 289 ff.

[4] Gerhard Brunn, *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 von 1945 bis heute,* Stuttgart 2009³,S. 144 ff.; Winfried Loth, *Europas Einigung. Eine unvollendete Geschichte,*Frankfurt 2014, S. 134 ff.; Kiran Klaus Patel, *Europäisierung wider Willen.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r Agrarintegration der EWG 1955-1973,*München 2009, 原文159页前后。

[5] 二战后，根据美国默许的苏联与英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波兰将一部分领土转给乌克兰（即转给苏联），同时从德国取得一部分领土作为“补偿”。德国被割让的这部分土地是原来的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二战结束后，在这些土地上生活的德意志人与生活在波兰的德裔居民一起被强制驱逐出境，总数有上千万人。而波兰由此大致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6] Gerhard Brunn, *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 von 1945 bis heute,* Stuttgart 2009³,S. 144 ff.; Winfried Loth, Europas Einigung. Eine unvollendete Geschichte,Frankfurt 2014, S. 134 ff.; Kiran Klaus Patel, Europäisierung wider Willen.*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r Agrarintegration der EWG 1955-1973,*München 2009, 原文17页前后。

[7] 原文是“Gleichschaltung der Justiz”，直译是“司法的同质化”。“Gleichschaltung”是描述纳粹统治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一种由党来领导一切的统治形式或向该目标推进的实施过程。

[8] 又称“圣冠”或“圣伊什特万的王冠”，得名自11世纪的匈牙利国王斯蒂芬一世。相传这顶糅合了拜占庭、希腊和拉丁元素的圣冠千年来世代相传，成为匈牙

利国家的象征。

[9]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fortan: Geschichte IV), München 20163, S. 423 ff. (zu Orbáns Rede vom 26. 7.2014: 425).

[10] Kai-Olaf Lang, *Ungarn: Demokratischer Staatsumbau oder Autokratie? Innere Merkmale und außenpolitische Folgen des Systems Orbán,* SWP-Aktuell 6, Januar 2015, S. 1-8（引文在原文第3页）。

[11] 德语中的“公法媒体”指的是这样一类媒体：它属于全体公民（而不是属于官方），并且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任何政党、政府和企业都不能对其节目施加影响，通常向听众和观众收取费用来维持经营。对公法媒体的监督由多个不同机构而不是一个机构进行，这样才能使公法广播、电视台的独立性得到保障。参见乌尔丽克·凯泽（Ulrike Kaiser）：《独立于国家——公法媒体的原则》，《德国之声》2008年10月9日。

[12] 匈牙利人名在母语中一般把姓放在前面，名放在后面。本译文为保持西文人名的一致性，在标注匈牙利人原名时皆按英文人名习惯把姓放在后面。德文原文没有保持一致性，比如在此处依匈牙利文写的是“Ferenc Gyurcsány”，但前文介绍欧尔班时写的又是“Viktor Orbán”（依匈牙利文应该是“Orbán Viktor”）。2006年9月，费伦茨在当年5月26日在执政的社会党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被曝光，他在讲话中承认，为了赢得选举，执政党和政府不断向选民撒谎。

[13] 这里的“欧洲保守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指的是不愿意欧盟进一步向欧洲一体化方向迈进的人。

[14] 威尼斯委员会是欧洲委员会的一个咨询机构，它的官方名称是“欧洲法治民主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但因其开会地点在威尼斯而常被人称作“威尼斯委员会”。

[15] Vera Trappmann, Polnische Zerreißproben. Rechtsstaatlichkeit, Demokratie und Protest, in: *Mittelweg 36. Zeitschrift des Hamburger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25* (2016), Heft 3 (Juni/Juli), S. 59-81; Reinhold Vetter, *Nationalismus im Osten Europas* . Was Kaczyński und Orbán mit Le Pen und Wilders verbindet, Berlin 2017; ders., Brüder im Geiste. Was Kaczy ń ski und Orbán verbindet und wie die EU damit umgehen sollte,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71(2016), Heft 2 (März/April), S. 25-33; ders., Gezeitenwechsel. Polens Rechte erobern die ganze Macht, in: Osteuropa 66 (2016), Heft 1-2, S. 19-36; Kai Olaf Lang, Zwischen Rückbesinnung und Erneuerung. Polens PiS und Ungarns Fidesz

im Vergleich, ebd., S. 61-78; Adam Krzeminski, Lingua tertii reipublicae.Sprache und Weltbild der PiS, ebd., S. 119-130; Polen: Europarats Kommissar sieht Rechtsstaat in Gefahr, Euronews, http://de.euronews. com/2016/06/16/poleneuroparats-kommissar-sieht-rechtsstaat-in-gefahr; Brüssel: Rechtsstaat in Polen gefährde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8. 7. 2016; Warschau geht auf Kritiker zu,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8. 7. 2016. 关于波兰宪法冲突的进一步发展，见本书原文第277页。

[16] “桥党”是克罗地亚政坛第三大党，“Most”是克罗地亚语“桥”的意思。中东欧和东南欧不少国家（比如匈牙利、斯洛伐克）都有“桥党”，一般都主张睦邻友好和多民族和平共处。所以称克罗地亚的桥党为“克桥党”。

[17] 中文也译作《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或《锡安长老议定书》。此书在20世纪初仅在俄国传播，十月革命后随外逃的俄国贵族而传遍西方，后又经过希特勒政权的大肆宣传，遂成为20世纪各种阴谋论（特别是“共济会阴谋”）的一大源头。

[18] 关于克罗地亚国内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见本书原文第269页前后。

[19] 原文是“den Wind aus den Segeln zu nehmen”（直译：“夺走其帆上的风”）。

[20] 关于这个概念的历史，参见：Achim Landwehr, Von der «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9* (2012), S. 1-34。

[21] Jacques Rupnik, Das andere Europa. Die Flüchtlingskrise und der neue Identitätsdiskurs, in: *Lettre international,* Winter 2015, S. 26-28 (28).

[22] Jacques Rupnik, Das andere Europa. Die Flüchtlingskrise und der neue Identitätsdiskurs, in: *Lettre international,* Winter 2015,原文第23页。

[23] 作为概述，参见Philipp Ter, *Die neue Ordnung auf dem alten Kontinent. Eine Geschichte des neoliberalen Europa,* Berlin 2014; Vetter, Nationalismus（见注释7）。

[24] 斯堪的纳维亚人能够理解彼此的标准语言。1397年至1523年，由斯堪的纳维亚的丹麦、瑞典（包括芬兰）和挪威为主组成共主邦联-卡尔马联合（Kalmarunionen）。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根据1814年《基尔条约》，参加了反法联盟的瑞典可从丹麦手中获得挪威，但是挪威乘机宣布独立并颁布了宪法。瑞典于此时发动了一场短暂的战争，打败挪威并使之臣服于瑞典国王，由此成立了

由瑞典主导的“瑞典－挪威共主邦联”，直至1905年该邦联解散。（此译注参考了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25] Winkler, *Geschichte IV*（见注释5）, S. 387 f。

[26] Ders.,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3: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5², S. 77 f.

[27] Ders.,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3: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5²,原文第27页。

[28] 在那时的欧共体开支中，农业补贴占了很大比例。由于英国从欧共体那里获得的农业补贴要比法国等国少得多，英国感到自己在这方面吃了亏，以至于撒切尔夫人在布鲁塞尔吼出了一句：“I want my money back！”（我想要回我的钱。）双方谈判后，欧共体同意英国每年从其缴纳的金额中得到一定比例的返回款，即所谓的“英国回扣”。参见袁杰：《英国脱欧将会两败俱伤》，http://www.20qu.com/jingxuan/2016/331/1418190.html，访问日期：2018-07-28。

[29] Ders.,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3: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5²,原文第59页。

[30] Jochen Buchsteiner, Zwischen beiden Welt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2. 2. 2016.

[31] 吉塞拉·斯图尔特本是联邦德国人，后入籍英国并成为议员。

[32] 这里的“黄色报刊”与前面的“通俗报纸”一样，指的是那些以耸人听闻、夸张低俗为能事，但在新闻专业性方面声誉欠佳的报刊。这些报刊中经常会有色情内容，但这不是重点所在。“通俗报纸”的原文是“Boulevardblatt”（直译：街头报纸），但并不能说是“街头小报”，事实上《图片报》这一类大型“Boulevardblatt”的发行量要远远超过严肃、高品质的报刊（如《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

[33] 阿尔斯特位于北爱尔兰。

[34] 原文写的是“约克郡”（Yorkshire），有误，应为“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

[35] 按2016年6月28日的汇率（1英镑＝8.7855元）换算，分别相当于人民币158 139元和281 136元。

[36] “appel au peuple”是法语“诉诸人民”的意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早期（19世纪七八十年代），议会中活跃着一股试图通过全民

公决的方式复辟波拿巴王朝的势力，并自称为“全民公决派”（appel au peuple）。

[37]　所谓“影子内阁”是指施行内阁制民主的国家的在野党为日后执政而预先在党内选出的内阁人选，他们通常都是议员，一般都会跟现任内阁唱反调。

[38]　但在此党内不信任案通过后，科尔宾拒不辞职，所以工党只能重启一轮党魁选举。在9月24日的选举中，科尔宾凭借党内“草根”阶层的支持以61.8%的得票率再次当选党魁。

[39] 译文中“全梭”的原文是“va banque”，这是流行于17—19世纪的赌博游戏菲罗（Faro）中的一个术语，直译是“见银行”，它的意思是拿出自己的全部筹码与“银行”（相当于庄家）对赌，如果赢了就筹码翻倍，输了就输个精光。这与梭哈中的“全梭”并不完全一样，但用于借喻是相通的。

[40]　布灵顿俱乐部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成员人数为15~70，几乎都是王室、勋贵子弟和其他一些精英私立中学的毕业生。其活动不大为人所知，但肯定包括聚餐、滥饮和恶作剧。

[41]　“跟着感觉走”的原文是“aus dem Bauch heraus”（直译：从肚子里出来），是德语中一句形容“凭感觉”“凭直觉”的词语。

[42] Barack Obama: Brexit would put UK ‹back of the queue› for trade talks, in: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apr/22/barack-obama-brexituk-backof-queue-for-trad e-talks; To Brexit or not to Brexit: A Taxing Decision, in: http:http://www.oecd.org/fr/economie/to-brexit-or-not-to-brexita-taxing-decision.htm; Brexit would pose ‹serious risk› to global growth, say G7 leaders, in: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may/27/brexitwould-pose-a serious-risk-toglobal-growth-say-g7-leaders; EU-Ratspräsident Donald Tusk über die BrexitGefahr/«Unsere Feinde würden Champagner trinken», in: www.bild.de/politikausland-donald-tusk-unsere-feinde-werdenchampagner-trinken-46262 200.bild.html; Boris Johnson's Brexit Victory Speech: Full Transcript, in: Europe.newsweek.com.24. 6. 2016; Adam Soboczynski, Der neue Bonapartismus,in: *Die Zeit*, Nr. 14. 7. 2016 (zum bonapartistischen Charakter des britischen Referendums); Teresa May soll am Mittwoch britische Premierministerin werden,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2. 7. 2016; Teresa May soll am Mittwoch britische Premierministerin werd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2. 7.2016; https://www. gov.uk/government/speeches/statement-from-the-new-primeminister-theresa-may.

第10章

英国脱欧将带来什么？

对欧盟而言，2016年6月23日的英国公投是一次深刻的危机。能与此事的震撼性相提并论的，在此之前只有3件事：2005年5月底、6月初，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投拒绝了欧盟宪法条约；1965年下半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锁闭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事，即所谓的“空椅子策略”；1954年8月末，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御共同体条约，并导致建立更紧密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计划受挫。

在之前的事件中，坚定的拥护者们总是用不断推进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说明，西欧的超国家融合从来就是在危机中进行的，而且这些危机最终都会“让欧洲更加紧密”。到了2016年夏天，已经很少听见这样的观点了。早在这之前，就有人怀疑欧共体的成长会带来一个统一的内部市场，现在这种怀疑依然成立。

经济上的融合通过其成就赋予自己合法性，同时也帮助了那些支持一体化政策的政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体系大大推进了一体化进程，这改变了许多事——如果说不是改变一切的话。前联邦宪法法院法官迪特尔·格林断定：“1992年的《马约》在实现某一程度的一体化时，并没有询问各成员国公民的意见……在一体化方面，《马约》前进了一大步；可是在认可度方面，却是退步了。它标志着欧洲统一计划在公开性的设置方面发生了一个转折。《马约》让人们对欧盟的认可度下降了。从长远看，《马约》促进了反欧党派的发展，使得这些党派得以跻身欧洲议会，这促使亲欧议会党团必须采用组建大联盟的方式来对付它们。”[1]

《马约》带来了一个至今无法解决的矛盾：创建了一种共同货币，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共同财政构架。一边是传统上有严格财政纪律的国家，另一边是对此没有那么重视的国家。货币联盟制定的规矩来自前者的设想，却让后者感觉实在是做不到。后果就是：欧元，并没有像其赞成者所期待的那样拉近各国民众之间的距离，反而引起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同样未能实现的还有另一个愿望：这就是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计划，他企图通过把德国马克并入共同货币的方式，来约束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的力量。

英国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货币联盟，但真正让欧盟在英国名声扫地的，还是欧元区自2008年经济动荡之后所陷入的危机。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布鲁塞尔的行政机构权力不断增长，欧洲议会想要拥有一个“真正的”议会所

具备的权利行事，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误解。与2015年的难民危机相关的，是德国的难民政策和“欢迎文化”给许多不列颠人带来了深深的刺激。英国脱欧运动的诉求不仅在于其反对来自欧盟东部成员国的移民，而且（特别是在运动的最后阶段）也是害怕英伦三岛被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移民浪潮所吞没。无论人们如何衡量其他个别因素对2016年6月23日公投结果的影响，“英国脱欧支持者”的成功都少不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因素。

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并不单因为它是个有着传奇般“光荣孤立”历史的岛国。那些主张“离开”欧盟的人所斥责的许多事，在许多成员国的民粹主义那里也能听到相同或相似的声音，有一些在那些关心且支持欧洲统一的人那里也能听到。让最后一部分人不安的是：许多在布鲁塞尔做出的决定，民主合法性实在太弱，在没有得到成员国的主权拥有者（即其人民）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将权力从民族国家层面转移到了共同体层面。以减少民主为代价来实现“更统一的欧洲”，长久以来，精英们的欧洲计划都是按这个模式发展的，由此也引起了人们的冷漠和厌恶。

自2016年6月23日之后，“亲欧”和支持欧盟就更没有从前那般天经地义了。要知道，一旦英国从共同体退出，那就意味着对欧洲的政治文化影响最大的那个国家要离开了。它是分权制、“代议制政府”、“法治”、“制衡”制度的祖国，同时还是拥有最佳全球网络和最富于外交经验的欧盟成员国，此外它还与法国比肩，是联盟中的两个军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人们可以预见，一个没有英国的欧盟，其大西洋特性和自由贸易的主张会比现在弱，而大陆特性和贸易保护主义会变强。经济和财政本来就很强的德国在欧盟的力量权重会增加，但同时地中海国家对德国的压力也会增大，它们会试图让德国偏离条约中已经定好的规则，因为在它们看来，德国的路线过于死板。对德国而言，英国是一直保持市场竞争力方面的同盟。英国退出之后，德国恐怕更难以像现在这样，在面对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不同意见时坚持自己的立场。

英国与欧盟的分离现在已不可逆转，这就让大西洋联盟的价值凸显了出来——大多数欧盟成员国都加入了北约（尽管不是全部）。作为共同的安全政策的平台，北约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很可能在将来被更多地利用。外交政策将再次成为伦敦与柏林，或巴黎与伦敦之间双边交流中极为重要的内容。鉴于法国的经济实力不强，未来在华盛顿、伦敦和柏林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跨大西洋权力三角。不过，可以想见的还有另一方面的发展。英国出于对自身主权的骄傲，一向反对一个共同的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现在它退出欧盟了，那么阻挠其他成员国在外交、安全领域进行更紧密合作的障碍也就消失了。但与此同时，欧盟能投入军事方面的总体资金也减少了，这一情况让英国脱欧所带来的好处也变得有限。

在英国人公投做出脱欧决定之后，欧洲大陆上免不了要响起“现在总算好

了”的声音。在这方面，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西格马尔·加布里尔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称要把欧盟委员会建成一个“真正的欧洲政府”。法国外长让-马克·埃罗（Jean-Marc Ayrault）和德国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声称要朝着政治联盟的方向继续前进。施泰因迈尔还于6月25日在柏林召集了一场欧洲经济共同体6个创始会员国的外长会议，以讨论英国公投之后的形势，但这却招致不少新成员国（即波罗的海三国）的不满。[2]

坚定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如比利时前总理、现在欧洲议会中的自由党议员居伊·伏思达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强化“联盟方式”，并且继续让欧盟机构朝着联邦方向发展。在德国，几乎就在英国公投的同时，政治学家乌尔丽克·盖罗（Ulrike Guérot）出版了一本书，力主解构民族国家，组建地区间网络，并最迟于2045年5月8日成立欧洲共和国。书中常常提到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梅纳塞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她是从梅纳塞那里获得了这个“政治乌托邦”的原动力。然而，书中却没有提到梅纳塞的如下建议：在过渡时期应放弃民族国家的民主制度，而采用一种由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实行的开明专制。[3]

有些人觉得大多数欧洲人已经准备好，甚至渴望为了一种各地之间和欧洲内部亲密无间的“自己人”感觉，而放弃自身的民族身份。对此，人们或许可以耸耸肩然后走开。但在“政界”，那种利用脱欧公投的契机来推进一体化的愿望影响甚大，令人无法回避。然而，要质疑这一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却十分简单。在英国退出之后还留在欧盟的27国之中，还有更多的国家坚决拒绝将主权继续交付共同体，其中包括荷兰、丹麦和瑞典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还有一些以维克多·欧尔班的匈牙利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波兰为代表的“非自由的民主”国家，不同意1993年的哥本哈根标准和2009年《里斯本条约》的部分条款。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欧盟跟从前一样无法达成最基本的共识（比如分配内战难民和政治庇护者的问题）。要让这个国际联盟在这样的基础上向一个政治联盟乃至一个联邦的方向继续前进，无异于痴人说梦。

乍一看，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建议似乎更现实一些，他主张不是让欧盟27国，而是让货币联盟内的19国在组织机构上向一体化的更高层面迈进，从而实现人们所追求的“核心欧洲”。[4]但即使是在这个团体之中，也缺乏那种更紧密的、共同决策所需要的规范共识。比如，斯洛伐克是欧洲共同难民政策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又如，斯洛文尼亚在2016年夏季发生了一场政府的行政权与中央银行的金融权之间的权力斗争，这让欧盟委员会深感忧虑。

与此相关的，是让人心烦的“北方佬”与“南方佬”之间的分歧，它们争论什么才是国家债务与经济增长的正确关系，双方的领头人分别是德国和法

国。只要在核心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那么一个由欧元区国家构成的核心欧洲就无法想象。只要诸国在预算、财政和经济政策等领域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在缺乏这个牢固基础的情况下奢谈一种共同的社会政策（欧洲失业保险、部分国债的共同分担）是无法想象的。那些国债高企的国家，只有在自己承诺更可靠且不可逆的金融稳定性的情况下，才能期待让那些财政情况稳定的欧元区国家继续伸手援助。如果放弃这种一揽子计划的形式，就可能意味着抽去了“互惠思想”的基础，而这一思想正是实现团结最重要的条件。

现在，即使欧元区也成不了“核心欧洲”的核心，而且也很难再找到另一个。1957年组成欧洲经济共同体的6个创始会员国无论如何也充当不了核心，因为在一些根本的财政和经济政策问题上，以及在更高程度的一体化是否可取的问题上，它们之间难以达成更多共识。此外，这6个国家间更紧密的联合，将意味着西欧与东欧的一次新的分裂，也就是说让1989年历史转折之后的无数心血付诸东流。而且说来说去，德法两国如果不首先达成一致，那么在任何一个领域加强一体化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两国协商好之前，所有在机构层面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愿景都是空中楼阁。

2016年夏季没有留给欧洲大陆人太多时间来反思英国脱欧的长期影响。其他事件很快引起普遍关注：首先是法国和德国遭遇了新的恐怖主义袭击，然后是7月15日土耳其发生那次失败的军事政变后，其国内外政策的巨大变化，以及俄罗斯作为近东和中东的政治、军事行动方日益增长的重要性。7月14日是法国国庆假日，这天深夜，一名曾在法国获得过临时居住和工作许可证的突尼斯人，在尼斯（Nizza）的滨海大道上用他驾驶的卡车袭击在那里庆祝的人群。袭击共造成85人遇难，400多人受伤，有些人伤势严重。为此，法国国民议会于7月19日将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施行的紧急状态又延长了半年。

在尼斯的袭击发生4天之后，一名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在从特罗伊赫特林根（Treuchtlingen）到维尔茨堡（Würzburg）的区域火车上用斧头和刀袭击了一些乘客；在这次袭击事件中，有4人受重伤，袭击者被警方击毙。7月23日，一名来自叙利亚的被拒绝入境的难民，在弗兰肯行政区的安斯巴赫进行了自杀式袭击，造成15人重伤。7月26日，袭击者攻击了鲁昂附近的小镇圣艾蒂安-迪鲁弗雷（Saint-Étienne-du-Rouvray）的教堂，杀害了85岁的神父雅克·阿梅尔（Jacques Hamel），并重伤了一名修女。在所有4起案件中，“伊斯兰国”都承认是自己发动的袭击。

自7月中旬以来，土耳其也几乎每天都登上新闻头条。埃尔多安总统反击那批试图颠覆政权的军事人员的做法——在军队、国家机关、司法、教育、经济和媒体领域进行清洗。这场清洗是如此之广泛，以至于在很短的

时间内就让一场悄悄进行的政变改变了性质。[5]土耳其越来越朝着正发党强人个人独裁的方向前进，随之而来是专制总统制度与其真实的或假想的敌人之间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在外交方面，埃尔多安所进行的路线调整也毫不逊色，特别是调整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自从2015年11月底土耳其空军在叙利亚边境附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飞机以后，俄土一直处于“冷战”状态。2016年8月9日，埃尔多安在圣彼得堡会见了普京，为的是使双边关系全面正常化——这一举措看上去成功了。

不久之后，土耳其总统宣布他同样致力于大力改善与伊朗的关系。鉴于伊朗和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H. 阿萨德的两个最亲密的盟友，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土耳其即将重新评估其对叙利亚的政策。土耳其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与阿萨德达成协议，并且比以前更加坚定地投入与“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去。“伊斯兰国”是土耳其众多恐怖袭击事件的凶手，其中很可能包括发生在8月21日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加济安泰普（Gaziantep）一次婚礼聚会上特别血腥的恐袭事件。当时共有54人殒命，其中包括许多儿童。8月20日耶伊尔德勒姆总理向记者们宣布，他的政府觉得让阿萨德成为叙利亚在过渡时期的领导人是可以接受的，从而证实了上文对土耳其的推想。

埃尔多安并不想让他的路线转化为被西方理解的一种决裂。就在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访问安卡拉的那一天——8月24日，土耳其开始了精心准备的空袭行动，而且还同反政府的叙利亚自由军和美军紧密配合，展开了名为“幼发拉底河之盾”的地面进攻，打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的阵地。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土耳其用比此前更可信的方式表明了自己身处西方的“反‘伊斯兰国’阵营”之中。不过更重要的是，埃尔多安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军事组织“人民保卫部队”（YPG）赶出了其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阵地。该组织与在土耳其活动的库尔德人党派“库尔德工人党”（PKK）有极为紧密的关系，而库尔德工人党已被土耳其和北约国家归类为恐怖组织。土耳其阻止“人民保卫部队”在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地带建立一个拥有封闭领土、自治，一旦有可能甚至还要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努力，并且要在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地带建立一个缓冲区域。

美国用以支持土耳其的进攻（只要土耳其对付的是“伊斯兰国”）不但有军事上的空中打击，而且还向其库尔德盟友发出了最后通牒，命其撤出幼发拉底河东岸地区，否则将中止与“人民保卫部队”的合作。8月24—25日，在土耳其坦克和美国空军的大力协助下，叙利亚自由军将“伊斯兰国”赶出了主要由叙利亚阿拉伯人居住的边境城市贾拉布鲁斯（Dscharabulus）——对恐怖组织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所控制的领土都在持续收缩。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土耳其轰炸了“人民保卫部队”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阵地，以迫使其撤出阵地。这样一来它就让美国陷入了极为尴尬的两难境

地：“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越是发展为一场土耳其与美国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盟友之间的军事冲突，美国在与“伊斯兰国”作战中，就越难以协调自己与双方的关系。与土耳其相关的，还有其越来越强烈地请求引渡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訇费图拉·居伦——此人原先是埃尔多安的盟友，后来反目成仇。美国副总统拜登在8月24日与耶伊尔德勒姆总理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拒绝了这个要求，其理由是任何美国总统都不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此权力只属于美国法院。

若是没有上述那些与普京之间达成的安排，埃尔多安恐怕不太敢下令让土耳其部队在叙利亚领土上动武。在那之前的几天里，“人民保卫部队”与阿萨德的军队之间发生了几次冲突，而这两个对头本来一直处于某种默契地互不进攻的状态。这些冲突同样也弱化了土耳其军事行动的后果。阿萨德尽管抗议土耳其的行动，但他其实可以看到，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新的合作关系将大大增加他掌控大部分叙利亚领土的机会。

土耳其转换路线之后的赢家，肯定还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就在他与土耳其和解的同时，他也加强了与伊朗的合作。对不少观察家而言，一个新的“莫斯科-德黑兰-安卡拉力量三角”已经呼之欲出。俄罗斯借此填补了中东的战略真空，造成这真空的，是奥巴马政府2011年仓促从伊拉克撤军及其对叙利亚内战举棋不定的态度。

在另一处危机地带的表现，同样也表明了普京的确是政治棋盘上的大师：在此期间他没有根据2015年2月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Minsker Waffenstillstandsabkommen）［第二版明斯克协议（Minsk II）］做任何部署来为平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创造条件。2016年7月到8月，亲俄分离主义者与乌克兰联盟之间的流血冲突再次大量增加。在明斯克商量好的从顿巴斯“前线”撤出重武器的协议，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没有怎么执行。由于俄罗斯不愿意减少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军事存在，基辅的国民大会就据此阻挠东部选举法案通过，而该法案正是在明斯克协商好的、在东乌克兰进行社区选举的基础。这个反击正好给普京提供了机会，把乌克兰和西方民主社会谴责他的话奉还给基辅：不根据明斯克协议为实现长期停火创造条件。这样发展下去，2016年夏天在乌克兰实现和平已无可能。

8月22日，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那不勒斯海湾沿岸的意大利“朱塞佩·加里波第号”（Giuseppe Garibaldi）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会面，以商讨欧洲联盟在英国公投之后的形势，并且为9月将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6]举行的欧盟峰会做准备。这已是三人在6月23日公投之后的第二次会面。早在公投之后4天，默克尔就请他们到柏林进行了一场关于应对危机的对话。

三人的第二场会面，被东道主赋予了一重象征性的意义：与会的国家及政府首脑访问了那不勒斯附近的小岛文托泰内（Ventotene），这里曾是法西斯政权关押政治犯的地方。犯人中的一位正是欧洲共产主义者、杰出的阿尔捷罗·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他是1941年写成并很快被流传到罗马的《文托泰内宣言》（*Manifesto di Ventotene*）的主要作者。该宣言热情地支持解体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代之以欧洲联邦，而且作者还在同年写了一本研究报告，名为《欧罗巴合众国与各种政治趋势》（*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 und die verschiedenen politischen Tendenzen*）。[7]根据他的遗愿，斯皮内利于1986年被安葬在文托泰内。奥朗德、默克尔和伦齐拜访了他的墓地，至少对意大利总理而言，这代表了对“欧洲价值观和文化”的一次新的认可——这样一个欧洲视“让世界更美好”为己任。[8]

会谈地点的选择也同样具有象征意义。那艘以意大利独立战争战士和民族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命名的航空母舰，本来是要参加欧盟边境管理局在地中海的巡航，用以阻止偷渡者的。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有效地保护共同外部边界。在这一点上，三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意见完全一致。但涉及那些跨越地中海到达欧洲的难民的分配问题时，意见仍与从前一样有分歧。越接近2017年春季的总统大选，法国就越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也就是说不会接纳更多移民。

在另一个问题上，奥朗德和伦齐倒是心心相印：德国应该放弃其“紧缩政策”，并同意为了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增加公共债务。该意见遭到了默克尔的反对，这倒不仅仅是因为2017年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如果对条约中已经商定好的稳定性标准松口，将遭到所有实行预算纪律的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且这还会削弱货币联盟乃至欧盟的凝聚力。在“加里波第号”上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总理指明了欧盟委员会的责任和稳定性协议留给欧盟成员国的空间。然而，默克尔强调共同体的权责的事实表明，她并没有坚决反对“布鲁塞尔”[9]对条约进行弹性解释。

人们普遍认为，伦齐呼吁加强欧洲共同性，主要是为了意大利债务的共同化——这并非毫无根据。意大利的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3%，在欧盟中仅次于希腊；与2013年相比，其国债甚至还上升了4个百分点。与欧盟委员会商量好的把预算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的目标几乎从来实现不了。意大利经济也停滞不前，2016年第二季度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为零。

此外还有银行业危机，世界上最古老的银行——意大利锡耶纳银行（Banca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已成为其象征：2011年至2014年，它一共亏损了146亿欧元。与其他银行一样，不良贷款是导致其衰弱的主要原因。所有意大利银行合在一起，2015年的不良贷款共计2100亿欧元。这还不算总数为1500亿欧元的所谓“问题贷款”。为了保护为数众多

的“小”储户，伦齐政府试图用国家资金救助银行。然而，按照欧盟现行的银行业条例，只有在“为了避免对某一成员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破坏，而需维持金融稳定”的情况下，才允许国家对银行进行补贴。[10]

伦齐或许希望奥朗德和默克尔能理解他。2016年底意大利举行了全民公决，事关是否在实质上废除比较烦琐的两院议会制度——这是这位年轻总理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他曾威胁，如果这项重要的宪法修正案被否决，他就会辞职——鉴于悲观的民调结果，他在三人峰会上对这项声明的态度又有所回转。然而，欧盟及其成员国有理由担心伦齐在公投中失败。如果以荒唐的五星运动为首的民粹势力在意大利获胜并站稳脚跟，那么不单是欧元会被其推翻，而且整个欧盟都会陷入险境。

花言巧语的拒绝姿态、激情洋溢的陈词滥调和喋喋不休地重复文托泰内的欧洲神话，都解决不了意大利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坚定地推进由伦齐开创的改革进程来解决。伦齐试图讲述的欧洲新“故事”，实际上是老故事，而且几乎无法在面对具体挑战时给出具体答案。这样一种补救性的、运用象征手段的政策唯一能做的，是去减少日益增长的、对欧洲统一计划的不信任。如果伦齐的意图是将意大利变成由欧盟里国土和经济总量最大的三个国家组成的非正式欧盟执委会中的成员，那么8月22日的会面也不会实现这一目标：对欧盟其余的成员国而言，没有人愿意服从这种“集体领导”。

跟意大利一样，法国也在抱怨欧盟的稳定性条例。而且它也与其地中海邻国一样，从欧盟的慷慨大方之中获益良多。这份慷慨来自让-克劳德·容克手下的那个“政治性委员会”和负责经济和财政的委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其手法是对欧盟相关规则进行阐释。莫斯科维奇还曾在2012年至2014年担任法国的财政部长，法国在这段时间里以及在此之后都无法实现既定的缩减赤字的目标。2016年其财政赤字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4%，也就是说再次高于“马斯特里赫特上限”所规定的3%。根据迄今为止的经验看，法国为2017年定下的2.7%的目标多半也难以实现。[11]

由此，法国政府给出的在2015年到2017年减少500亿欧元国债的承诺也落了空。该政府在2017年选举年宣布提高56亿欧元预算开支，但这一开销并没有完全通过相应的节约计划来解决。法国政府的负债率已达97.5%，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第二高（最高的时候是2015年第二季度，达到了97.7%）。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7%，比德国高出了13个百分点。让现任总统和现政府感到安慰的是失业率略有下降，从2016年1月的10.2%降到了4月、5月间的9.9%。

瓦尔斯（Valls）[12]政府只有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之后，才能在劳动力市

场推进改革。它要对付的是左派工会和大部分学术界青年的持续抗议，这些人要求的是轻松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和严格的解聘条件。由于众多社会党议员不愿意支持政府的改革计划，政府无法在议会中争取到多数。于是内阁行使了第五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3款所赋予的专制权力：如果政府宣布某一法案的生效是出于国家预算或资助社会安全方面的迫切需要，那么国民大会只有采用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的方式才能阻止该法案生效。由于社会党议员的数目还不够发动不信任案，所以瓦尔斯政府最终还是赢了这一局。

与法国相比，2016年夏天的西班牙政局就特别让人看不清了。在2015年12月20日的议会大选中，产生了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总理领导下的保守的人民党（Partido Popular，简称PP）政府。该党虽然再次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却丧失了议会多数——这也与其一系列的投机腐败丑闻有关。作为反对党的工社党（PSOE）[13]也丢失了选票，他们同样需要跟己方的一系列腐败做斗争。相反，两个新成立的党派，左翼民粹的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中文直译：“我们能”）和自由派的公民党（Ciudadanos）都斩获颇多。保守派想要组建一个大联盟政府的愿望被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领导的工社党干脆地拒绝了，工社党的盟友社会民主力量党和公民党则主要陷入与工社党的内斗之中。于是拉霍伊依旧在看守政府中留任。

然后，西班牙在2016年6月26日举行了新的大选。人民党（PP）所获选票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了33%；工社党也有所进展，22.7%；社会民主力量党和公民党不得不有些损失，分别获得了21.1%和13.1%的选票。桑切斯始终拒绝与保守派合作，这使他与他的前辈、工社党前主席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和何塞·萨帕特罗（José Zapatero）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拉霍伊可以在与公民党联合的基础上勉强组建一个弱势的保守派政府，但两党加起来也只占到了全部350个议席中的169个，离取得绝对多数的176席还差7个席位。

要在第一轮总理选举获胜，必须要取得绝对多数。8月31日总理选举开始，拉霍伊没有取得所需的176票，而仅获得170票，有一位加那利联盟（Coalición Canaria）的议员投了他一票。按规定第二轮总理选举最早可在48小时后举行，只要获得相对多数就能当选。但拉霍伊连相对多数也没拿到——选举的结果与两天前一模一样。根据宪法，要在两个月之后才能再次举行总理选举。如果那时候还选不出，就不得不再次举行新的大选——那可是在圣诞节期间。

看守政府的时间拖得越久，该国的经济问题就会变得越严重。各项法案都无法通过，而且2017年的预算计划也无法通过。尽管西班牙在2016年夏天迎来了一波旅游热潮（这是因为恐怖主义袭扰了许多国家，其中许多原

先都是度假热点，比如德国、英国和北欧国家），但系统性地解决西班牙经济中的结构性难题一直都遥遥无期。这是因为，这里不存在一个能让自己的改革方案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政府。

9月底，一部分工社党领导人开始反对佩德罗·桑切斯的不妥协路线。在工社党党代表大会的最高委员会中，多数委员于10月1日投票反对党主席，阿斯图里亚（Asturien）地区的主席哈维尔·费尔南德斯（Javier Fernández）将担任委员会的领导人。这一决定落实于10月23日。联盟委员会以139票对96票通过了决议，决定在关于看守总理信任问题的投票中投弃权票。10月29日，拉霍伊在国会举行的第二轮决选中拿到了170张赞成票、111张反对票和68张来自工社党议会党团的弃权票。虽说这只是一个相对多数，保守党政府会因此在推行改革计划时缩手缩脚，但至少西班牙总算是避免了大家都担心的2016年圣诞节大选。

在此前的几年中，拉霍伊政府的紧缩路线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该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15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2%，在2016年也高于其他陷入危机的国家。2016年第一季度，其0.8%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于欧元区0.6%的平均水平。失业率已经从2012年8月的25.1%下降到了2016年6月的19.9%。2015年的预算赤字率为5.1%，高于跟欧盟委员会商定的最大限额：4.1%（当然也高于《马约》所规定的3%）。其国债从2013年第二季度的占国内生产总值91.9%上升到了2016年第一季度的100.5%。欧盟委员会本来完全有理由因西班牙未能在减少债务和财政赤字方面执行更严格的纪律而对其实施制裁，但顾及该国2016年夏天呈白热化的政治局势而放弃了各类惩罚，并给予西班牙一年宽限以使其实现所承诺的稳定财政的目标。

欧盟委员会对葡萄牙同样“慷慨”。2015年11月底，也就是10月4日议会选举后的七个半星期，以前的保守党和社会党人组成的大联盟已经被安东尼奥·科斯塔（António Costa）领导下的社会党少数派政府取代，后者还融合了共产党主导的左翼集团。为了取得激进左派在议会中的支持，政府除了其他事项外，还保证提高最低工资、恢复已被削减的公务员工资和退休金、恢复公务员领域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恢复一些曾被取消的节假日，甚至还要扭转之前内阁所推行的私有化政策。

在负债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8.9%的情况下，葡萄牙的2016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3%，低于2015年同期的水平。其失业率略有下降：从2015年10月的12.4%降到了2016年6月的11.1%。2015年的财政赤字率为4.4%，根据葡萄牙财政部的估计，2016年会降低到2.5%，但在野的保守党声称真实的数字是3%（最后证实降到了2%）。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对葡萄牙社会党人偏离整改路线表示忧虑，但跟对待西班牙一样，首先考虑的不是制裁。这样的慷慨之举同样主要是出于维护其国内政治稳定的愿

望。

希腊依旧深陷危机之中。其国家负债率是欧盟国家中最高的，在2016年第一季度达到了176.3%。这只比2014年第二季度的高点——181.8%——下降了一点点。其财政赤字率的数据在剧烈波动：2015年第四季度是14%，2016年第一季度是2.8%。其经济在2015年缩水了0.2%；2016估计欧元区国家的经济会下降0.6%。希腊2016年4—5月的失业率为23.5%，仅比2015年10—11月下降了1%。2016年6月，25岁以下青年人的失业率为50.3%，跟以前一样，远高于其他陷入危机的国家：西班牙（43.9%）、意大利（39.2%）和葡萄牙（26.3%）。

部分基于宪法的原因，部分因为妥协案的影响，船东和东正教会在税收方面享有的特权事实上依然没有被撼动——其中教会还是希腊仅次于国家的第二大地产主。民族民粹主义独立希腊人党是左翼民粹主义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议会中的盟友，该党担保这样不被撼动的情况将不会改变。希腊军方要感谢的同样也是这个党，因为是它让希腊的军费开支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8%，这是所有欧盟国家中最高的，在北约国家中也仅次于美国——对于此事，激进左翼联盟从来不敢公开指责。

2016年5月8—9日，希腊议会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法案：削减退休金，并以此来满足从欧洲援助基金（ESM）申请继续借债103亿欧元的条件。然而，在2018年希腊的改革计划取得成功之前，货币联盟内的财政部长们不想谈论雅典所要求的大规模债务减记。

2016年8月，距离上一次欧洲援助行动刚刚3个月，欧盟委员会又不得不为希腊操心了。起因是最高法院检察官克塞妮·迪米特里乌（Xeni Dimitriou）引起轰动的做法：她控告具有国际声望的安德烈亚斯·乔治乌（Andreas Georgiou），后者曾在2010年到2015年掌管国家统计局。乔治乌一上任，就公布了修正过的国债和财政赤字数据，这样一来就将其前任的造假行为公之于众了。检察官控告他伪造数据和叛国罪。此外还说乔治乌不负责任地大肆渲染希腊经济的状况，从而使经济形势更趋恶化。

对此，布鲁塞尔的反应很快：负责社会事务的委员玛丽安娜·蒂森（Marianne Thyssen）在致希腊财政部长的一封信中表示，委员会完全相信乔治乌所给出的数字，而且希腊有义务让自己的行政机构和司法系统继续去政治化，若不然，将在本年进行的对援助计划的第二次审核中考虑此问题；欧盟成员国必须由此决定是否还能继续提供援助贷款。[14]如果说要找出一个证据，证明欧盟与希腊之间不同的政治文化是导致两者之间持续冲突的更深层的原因，那么这位检察长对待前希腊统计局负责人的做法就是最好的证据。

由于持续不振的经济形势，激进左翼联盟和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总理在2016年初秋已经不再拥有2015年那般广泛的民众支持了。在此时的民调中，执政的左翼党远远落后于保守党。当齐普拉斯邀请欧洲地中海区域内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于9月9日齐聚雅典参加地区峰会时，很可能是希望借助外交方面的荣光来提振他业已下降的民望。事实上，意大利、塞浦路斯、马耳他和葡萄牙的首脑，还有法国总统奥朗德，都来到了希腊首都。只有西班牙看守政府总理拉霍伊因为缺乏明确的政治授权而让一位国务秘书代他前来。

对与会者而言，在拒绝继续施行“紧缩政策”和在债务问题执行明显更具弹性的政策方面达成一致并没有什么困难。然而，此次雅典会议的参与者却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伦齐依然认为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在飞回罗马的飞机上，他向意大利记者们表示：由于弗朗索瓦·奥朗德的前来，南方国家现在终于可以集体发声。“现在我们的人很多而且可能会生气……现在已经成了一场运动，意大利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还说，现在承受压力的是德国人了。返回意大利之后，伦齐又重复了他的观点：现在德国代表的那个有规则的欧洲，正在与“有理想、有社会关怀和有美感的欧洲”（即“有价值观的欧洲”）发生冲突。

雅典的地区性峰会之后，财政稳定的国家与陷入债务危机国家之间的鸿沟简直变得深不见底。但很显然，英国脱欧增强了南方国家的信心。英国离开欧盟之后，主张提升竞争力的阵营必然被削弱，而南方国家会受到鼓舞，从而决定以后不再屈从于布鲁塞尔和柏林的“紧缩专政”。很明显，这对欧元区的危机而言会意味着什么：欧元区有患上慢性病的危险。[15]

在2016年9月16日召开的布拉迪斯拉发峰会之前，由于英国不参加非正式讨论，安格拉·默克尔完成了一连串堪称马拉松的会谈。8月24日至26日在那不勒斯海湾与奥朗德和伦齐进行了三人会晤之后，默克尔又访问了塔林（Talinn）[16]、布拉格和华沙。在波兰首都，她会见了所有4个维谢格拉德集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政府首脑。8月26日晚，在联邦政府的宾馆，即勃兰登堡州的梅瑟贝格宫，默克尔总理会见了荷兰、芬兰、瑞典和丹麦的总理；次日又与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的政府首脑举行了会谈。

会谈的内容几乎不为人知。不过，德国总理与大多数其他国家领导人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却难以掩饰。尤其是那些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坚决反对制定一个固定的分配额度，而且也决不愿承诺接受穆斯林难民。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和布达佩斯，默克尔被看作导致穆斯林大规模移民欧洲的始作俑者，因而也要为英国脱欧担负连带责任。在捷克首都，甚至因为她的到来而出现了反对她的抗议活动。

在与欧盟“老成员”的协商中，德国总理在难民分配问题上几乎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支持。意大利是一个例外，该国在2016年负担了来自北非的移民（主要来自利比亚和埃及）——从2016年1月到8月，约有12万人通过这条路线来到了欧洲。不过，法国仍拒绝来自意大利的难民过境。毫无疑问，如果主要的移民路线从意大利——法国边境转移到布伦纳，奥地利也会照此办理。在布拉迪斯拉发首脑会议上，就难民分配达成协议已无可能。

在另一个领域，即内部和外部安全方面，各国达成了影响深远的一致想法。无可争议的是，除了在内部反恐方面进行更多合作，欧洲联盟必须比以前更有效地保护其外部边界。波兰和匈牙利甚至呼唤建立“欧洲军”——这个超国家架构的要求听上去真稀奇，要知道这两个国家可是一向抵制共同体的影响，而且一向主张伸张民族国家主权的。过去，英国一直反对任何有关军队欧洲化的事物。而当“脱欧派”在6月23日的公投中取胜后，至少在这个领域要推进“欧洲一体化”应该是更容易些了。

2016年夏天，货币联盟和欧盟在未来的规范性身份依然存在争议。各国在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这就使得货币联盟19个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无法获得长期保障。在欧盟27国内部，坚持遵守1993年哥本哈根标准的“老成员”与“新成员”之间，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哥本哈根标准要求尊重人权、权力分立和法治，而“新成员”（如匈牙利和近来的波兰）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并因此而让这些国家的法治变得可疑。只要存在这种根本性的思想分歧，欧盟发展成任何形式的政治联盟都是不可能的。

在2016年暑期休会的日子里，从欧盟委员会那里没有再传来关于共同体近期及远期发展的展望，连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也没有相应的表示。安格拉·默克尔在布拉迪斯拉发峰会前几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的多次对话再次表明，英国脱欧投票后，欧洲机构之间的重心继续沿着之前一直存在的那个趋势发展：重心逐渐偏离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转到欧洲理事会和成员国那里。德国在其中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已不必细说。但同时可以看到，德国在难民困境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是多么孤立：这个结果，又一次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表明了德国人在2015年9月一意孤行的后果。

8月31日，也就是那场喊出了“我们能办到”口号的传奇性记者招待会举办整整一年之后，德国总理进行了小心翼翼的自我批评。在《南德意志报》对她的一次采访之中，她谈到了德国难民政策的错误。她特别提到，太晚才对难民问题和“一个全欧共同解决方案”的紧迫性加以重视。当2004年到2005年许多难民前往西班牙和其他有欧盟边境的国家时，德国让那些直接受到德国影响的国家自行“处理此事”，并且当时德国自己也反对按配额分

配难民。而且对“保护外部边境”这个议题，德国也没有足够的认同，并且反对欧盟边境管理局对自身主权的限制。[17]

总理的自我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回避了德国难民政策中最富争议的一项：2015年8月至9月间的决断。这次采访对解决长期以来欧洲在难民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起任何作用。但就在同一天，8月31日，安格拉·默克尔在一场于意大利北部的马拉内罗（Maranello）举行的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政府会议上表示，非法移民潮必须被阻止。[18]次日，从联盟党议会党团一次非公开会议中传出消息，总理说要强制遣返无资格受庇护的移民，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让民众支持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难民提供援助。[19]

9月4日，德国举行了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州的地方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尽管选票有所流失，但仍以30.6%的得票率成为最大党，并让埃尔温·泽勒林（Erwin Sellering）当上了州总理。而该州困难重重的大联盟中的小伙伴基民盟只获得了19%的选票，排在选择党的后面。选择党得票率高达20.8%，成了第二大党。由于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州是总理的“政治家乡”——她的联邦议院选区就在这里，基民盟的糟糕表现因此而激起了广泛关注。难民问题不单是选择党用于煽动民意的主要话题，甚至是整个选战的主题。选举结果导致的后果是让选战在很大程度上极端化。次日，远在中国杭州参加G20峰会的安格拉·默克尔表示对这个位于德国东北部的这个州选举惨败承担部分责任，但她同时也强调，她现在依然认为自己在难民政策上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基民盟内部，几乎没有人对总理的自我辩护提出异议。而在其执政大联盟的盟友社民党那里，却可以看到试图倒阁的运动。社民党主席、经济部长加布里尔批评联盟党缺乏在社区层面执行难民救助行动的热情，却多次谈到德国容纳难民人数的上限。

毫不出人意料的是，对安格拉·默克尔的政策最严厉的批评来自慕尼黑。基督教社会联盟党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霍斯特·泽霍费尔认为，选择党在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州选举中的胜利给联盟党[20]在2017年9月的联邦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蒙上了阴影。他称联盟党的处境“极度危险”，并且称基督教社会联盟党是否支持默克尔再次成为候选人这事还说不准。基社盟理事会9月8日的一篇文章要求以法案的形式为接收难民设置上限：每年不得超过20万人。这部《移民限制法》指出相对于其他移民，来自“我们欧洲基督教文化圈的”移民应优先予以接收；应尽一切可能，禁止接收穿全身罩袍的穆斯林妇女。这表明，在难民问题上，柏林的大联盟内部已经不再有共识了。因此，在9月11日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主席的例行聚会上，这个话题被避开了——这是一个清楚的信号：2017年的联邦议院选举大战已经开打了。[21]

就在欧盟27国的布拉迪斯拉发峰会召开之前几天，卢森堡外长、社会党人让·阿塞尔博恩（Jean Asselborn）9月13日接受德国的一家日报《世界报》（*Die Welt*）采访时的言论又引来广泛关注。在访谈中，他斥责维克多·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政府的难民政策。他说，匈牙利对待难民简直像对待一群野兽，几乎就差“下令开枪”了。“像匈牙利这样对战争难民竖起铁丝网的国家，或是妨碍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国家，都应该暂时（或有必要时永久）开除出欧盟。”[22]匈牙利外长彼得·西亚尔托（Péter Szijjártó）[23]反击说，由此可见阿塞尔博恩不在值得严肃对待的外交官之列。其他欧盟国家的代表表示，对他们而言，还不具备开除一个成员国的法律条件，而且还谈到与匈牙利这样的一个麻烦的伙伴也有必要保持对话。[24]

9月14日，即让·阿塞尔博恩发表其言论一天之后，另一个卢森堡人——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上做了他本年度的《关于欧盟处境的报告》。他说欧盟现在“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难民危机是让人对欧洲留下负面印象的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欧盟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还说，委员会对英国公投的结果表示遗憾，但也表示尊重，即使在此之后，欧盟的地位也不会因此受到威胁。而今后的几个月，将决定欧洲是否还能联合在一起。

容克特别关注社会、经济和技术领域。他说欧洲必须是一个有社会关怀的欧洲，它不能是一个让青年人失业的大陆。它必须设法增加工作岗位，而且未来也要有能力缔结商约。这需要提振经济，也需要将2014年启动的投资计划（即所谓“容克基金”）所投入的资金从3150亿欧元增加到6300亿欧元。要完成这样一个数字化的共同市场，必须推动超高速的5G移动网络的建设。此外，这位欧盟委员会主席还宣布了一项对叙利亚的和平倡议和一项对非洲及其他难民来源国的投资计划，并且还介绍了由法国和德国主推的承担军事任务的欧洲联合司令部项目。他认为欧盟必须首先在军事和防御恐怖袭击领域紧密合作。“我们必须担负起保护我们的利益和‘欧洲生活方式’的责任。”[25]容克这番混杂了批评诊断和乐观展望的讲话赢得了欧洲议会多数议员的热烈掌声。媒体对此反响一般，但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友好的评论。

在布拉迪斯拉发的非正式（因为英国没有参加）会晤上，所有可能激化冲突的议题都被避开了。这些议题包括：波兰和匈牙利国内的宪法政治争议、在分配难民方面确定有约束性的配额、在削减国债方面坚持《马约》标准。但在非官方层面，对这3个问题却有所触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表示，承认维谢格拉德集团所宣称的“灵活的”或者说“有效的团结”，这说的是加强保卫欧盟外部边境的工作，或是对难民来源国的人道主义援助，或是用一种自愿的难民接收方式代替规定好的配

额。然而，对于没有明确放弃难民配额一事，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还是在事后发表了严厉批评。他的意大利同行马泰奥·伦齐也再次公开表示不满，因为会议没有按他的愿望取消由柏林和布鲁塞尔推行的“紧缩政策”。

9月16日会议中的积极部分，是与“布拉迪斯拉发路线图”联系在一起的《布拉迪斯拉发宣言》（Erklärung von Bratislava）。27个欧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实现以下目标：进一步减少非正规渠道移民的数量，完全控制欧盟的外部边界，返回“申根”——开放的内部边界，以及就长期移民政策和对责任与团结原则的方向达成共识。

更具体地说，与会者呼吁执行《欧盟-土耳其协议》。该协议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共同努力，确保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边界，并与其他“前线国家”保持团结——这主要指的是希腊和意大利。到2016年底，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应能够快速且有效地应对挑战。与第三国签订条约以减少非法移民潮的安排，也应在2016年底前完成。峰会在反恐方面也有相似的期望。此外还有，应在12月的欧盟峰会上通过关于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决议。

在会议闭幕时，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面向所有与会者发言，其中特别强调，以后再也不会像2015年那样让移民情况失控。欧盟在斯洛伐克首都所显现出的形象，是一个为追求经济利益、加强保卫外部边界和更好地协调加强内部安全工作而努力的共同体。[26]然而，27国的欧盟不再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各国在对1993年哥本哈根标准的解释方面和移民问题的团结方面的分歧太大了。

2016年9月18日，即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两天之后和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选举两周之后，德国又举行了一次选举：柏林地区的议员选举。在此地两个执政党（社民党和基民盟）再次流失大量选票，而且损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两党联合起来都无法取得议会多数（社民党的得票率从28.3%下降到21.6%，联盟党从23.3%下降到17.6%）。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选择党的战果与预期的一样好，拿下了14.2%的选票。对基民盟而言，这次选举与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的那次不同（那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大联合政府），它将失去在政府中的权力。很快，仅在第一次试探之后局面就很清楚了：新的参议院将以红-红-绿联盟为基础，即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之间的联盟。

柏林大选后的第二天，默克尔总理以基民盟主席的身份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她在这次发布会上所做的自我批评远远超过以往。她谈到了自己希望时光倒流。她承认了在难民政策上的失误，并承认在将难民分配到安全的第三国方面，德国和她本人长期以来都太依赖《都柏林条例》。就像她在

接受《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采访（采访内容人们在两天前就知道了）时那样，尽管她没有否定她自2015年夏天以来最出名的那句话（“我们能办到！”），但在她最近的这次坦白中，她承认这个口号包含了太多内容，以至于变得“空洞”了，还有些人甚至会感到受到了挑衅，这也是为什么她觉得“最好不要再重复”这句话的原因。

总理最振聋发聩的话，是那句“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足够严格的控制了”。不过，这并不是说她对自己让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进入德国的决定感到后悔。如果听下去，会发现总理所批评的是正确政策的“执行偏差”所带来的未能预见的副作用。对于没有取得欧盟和邻国的一致意见一事，默克尔谈得很少，她同样也没有怎么强调时间紧迫的人道主义救援要求是导致她疏忽的原因。这样一来，人们依然不清楚，总理在那时是否知道她的发言会使德国边境门户洞开。

承认错误可能有助于弥合安格拉·默克尔与基社盟以及本党党员之间的裂痕。但总理本人和德国政治整体上自2015年后陷入的这场信任危机，却不可能因此解除。当然，人们已经不能指望从她那里听到更多的自我批评，假如真的继续深挖下去，她总理的位置怕是坐不稳了。[27]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默克尔修正其路线的工作早就在进行了。她竭尽全力遏制移民潮涌入德国。2016年春，她尚在批评“西巴尔干路线”被阻塞。而在9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她第一次承认，难民人数的迅速减少不但是她积极推动欧盟与土耳其之间的“交易”的结果，同时也是位于东南欧和中东欧的马其顿-希腊边境关闭的结果。她应奥地利总理克里斯蒂安·克恩（Christian Kern）之邀前往维也纳参加了西巴尔干地区会议，更加表现出她的这一新判断。克恩是2016年从他的社会民主党党内伙伴维尔纳·法伊曼手中接班的。与这两国总理对话的人是希腊、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的政府首脑，以及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和欧盟难民事务专员季米特里斯·阿夫拉莫普洛斯。

正如图斯克特别强调的，各国在维也纳所达成的共识是：“巴尔干路线”必须完全和永久地关闭。德国总理用相对精确的数字证明，这条路线尚未被完全封闭：自2016年3月以来，已有5万人经过这条路线来到德国，有1.8万人去往奥地利。对于维克多·欧尔班要令匈牙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边境无法穿过的设想，德国方面也没有任何异议；同样，德国也没有否认这位匈牙利总理所提到的，他的国家每年要为维护边境花费10亿欧元的事实——而这其实是帮了奥地利和德国一个大忙。其实，欧尔班所理解的“灵活的团结”，指的正是这个。

针对“团结一致”，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当然要为自己辩护，而且

他得到了默克尔的保证，德国每个月都会从希腊和意大利接收数百名抵达那里的移民。而且，在遣返非法抵达人员方面，希腊政府也将得到比从前更有效的支持：“那些按人道主义观点并不应该留在欧洲的人，应该被送回自己的国家。”[28]但默克尔却并不理会齐普拉斯关于制定严格的分配份额的要求。显然，这段时间德国政府的路线变更已经影响到了这个领域，几个月前德国在此问题所受到的孤立依然引人注目。在这个问题上，默克尔总理应该能确定，德国会得到布鲁塞尔方面的支持。

英国公投已经结束3个月了，人们依然不清楚联合王国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按照《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出欧盟。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可以肯定，这件事在2016年之内是不会发生的。英国媒体猜测，谈判可能要到2017年底或2018年初才会开始——根据欧盟法律，该谈判时长不得超过2年。直到10月2日特雷莎·梅才在伯明翰的保守党大会上揭开了这个谜团：她宣布，脱欧申请最迟将于2017年3月底递交。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延迟，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支持英国脱欧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政府各部门远远没有那么多熟悉事务的专家去处理那么多与欧盟委员会和各国进行谈判所需要的材料，在脱欧之后，英国必须与这些国家一一缔结贸易条约。此外，在与欧盟的关系方面，保守党政府内部还有意见分歧：联合王国应该继续留在共同市场内部吗？如果是，那它准备同意欧洲联盟在劳动者自由迁徙问题上的要求了吗？或者，英国应该仅与欧盟签下自由贸易协定，然后像一个主权国家那样拿回其边境控制的无限自主权？[29]

同样，在欧洲大陆这一侧，对于未来与英国的关系也存在许多差异极大的想象。欧盟委员会被看作“强硬”路线的捍卫者：绝对不允许英国既从欧洲这块蛋糕上拈去葡萄干（即获得共同市场的入场券），而又在劳动力自由迁徙的领域坚持其特殊的主权立场。不然，其他一些属于“净贡献国”的欧盟成员国依葫芦画瓢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国家包括荷兰、丹麦、瑞典和芬兰）。

与此相反的立场，则来自所谓的“布吕格尔集团”（Bruegel Gruppe）2016年8月底的一篇文章。该集团是一个由5位经济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组成的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其中包括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基民盟议员诺贝特·勒特根（Norbert Röttgen）和布鲁塞尔经济学家安德烈·萨皮尔（André Sapir）。文章鼓吹一个由几个同心圆圈子组成的欧洲，欧盟是其核心，并且与欧洲经济空间中那些不属于欧盟的国家结成一种新型的“大陆伙伴关系”，除英国外，这些国家还包括冰岛、挪威和列支敦士登，或许有一天还会包括土耳其、乌克兰和北非诸国。除了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许多理由让欧洲联盟把英国视为一个特别重要的

伙伴，因此“惩罚”英国的想法是要不得的。恰恰相反，应该尽可能与不列颠人处好关系，并继续允许他们进入共同市场。

布吕格尔集团认为，为了得到这些好处，英国人跟挪威人和瑞士人一样，也得“付钱”，即依然充当“净贡献国”，但这些作者似乎不需要对此进行论证。据说，与挪威（总体上已接受欧盟规则体系）和瑞士（已通过众多单独条约让欧盟法律与国内法衔接）不同的是，英国在外交、政治和军事上有着突出的重要性，因而就可以不承担完全开放劳动力市场的义务，而可以享受通过条约协商的份额来实施管理的好处。

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英国人为自由进入共同市场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够高了：脱欧之后，英国失去了直接影响欧盟规则制定的机会。该文为英国想的出路是，可能可以通过在“大陆伙伴关系”中的政府间合作来影响欧盟的立法。对欧洲联盟而言，“大陆伙伴关系”的巨大好处是它可以成为一个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论坛，靠这个地方，欧盟可以与英国进行许多紧密的合作。[30]

把英国看作欧盟这个“更紧密的联盟”的某种“外部联盟”，这样的想法有许多可取之处：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如此显而易见，因此有理由去寻求一种让双方都感觉适度亲密的组织形式。但反对布吕格尔集团提议的理由也着实不少。挪威和瑞士的例子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它们在进入共同市场时有许多严格限制，这与英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在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原则上对英国妥协，那就会误导欧盟中那些经济较强的成员国打起走英国道路的心思。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有发生雪崩效应的危险：那些留下来的“强国”肯定会担心那些“弱国”弄出一个“多数专政”——这样一种态势，会为它们提供一个退出共同体的有说服力的理由。可事情真要是这样发展下去，欧盟就死定了，英国脱欧一事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欧盟灭亡的开端。所以，关于英国脱欧问题的另外一种解决方案更可能成为现实：欧盟与英国签订慷慨的自由贸易协定，并签署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保持紧密合作的协议。

2016年9月27日的布拉迪斯拉发，欧盟28国国防部长在英国公投之后的首次共同声明中，就肯定了在这一领域有达成共识的必要性。英国政府的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Michael Fallon）在会前就公开表示，他的政府坚决反对匈牙利和波兰所说的那种“欧洲军”，因为这会造成“重复性工作”并会架空北约。对此，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立刻公开回应称，这里要谈的不是欧洲军，而是更紧密的欧洲合作；凡是能增强欧洲防务的事情，也必将增强整个西方联盟的防务——这一立场获得了北约秘书长、前挪威总理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和欧盟委员会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

（Federica Mogherini）的赞同。就像之前27国领导人在布拉迪斯拉发所协商的一样，欧盟各国国防部长根据《欧盟条约》第42条第6款拟订在军事领域进行“持续结构性合作”。所以参与方应该都清楚，这一合作要到英国退出欧盟之后才会有具体的实施。[31]

经济方面，2016年秋天的形势表明，对英国人来说脱欧并不像悲观的人所担忧的那样难以应付。经济状况在经历了公投的震撼之后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证券市场甚至还在秋天创出新高。不过，那些领头的企业却另有看法。由咨询公司毕马威国际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英国的大企业中有四分之三在考虑将自己的厂址或重要的分厂迁移到国外，因为它们担心真正完成脱欧之后将面临的困难。《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9月底的一篇报道称，金融服务人员担心他们今后不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在“资深金融客”之中，对“硬脱欧”的恐惧情绪不断滋长。[32]

对“硬脱欧”方案，即英国同时退出共同市场，到这时为止只有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和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谈起过。不过到了10月初，情况就明朗了，在此期间，英国首相也决定要走这条路了。在保守党大会上，特雷莎·梅主张全面夺回联合王国的主权。她甚至应该感谢她的前任戴维·卡梅伦，因为卡梅伦是如此相信不列颠人民的判断力，以至于拒绝了下议院可以对公投结果再次表决的权利。自此之后，特雷莎·梅的口号“脱欧就是脱欧”就不再只是个空泛的口号了。[33]

2016年10月20—21日，英国公投之后的第二次欧盟例行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这同时也是特雷莎·梅担任英国首相之后参加的第一个欧盟峰会。然而，此次会议的焦点却并不是未来英国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保护外部边境以及阻止来自地中海的非法移民入境。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欧洲联盟应该如何应对叙利亚军队严重的战争罪行，这些罪行是叙军在其盟友俄罗斯的支持下在阿勒颇的战斗中犯下的，而且罪行还在继续。一方面，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都主张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已经存在的制裁是因为2014年俄吞并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冲突而宣布的）；另一方面，匈牙利、希腊和意大利都不希望对俄罗斯政府过于严厉。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妥协方案，而它已经无法掩饰一个事实：共同体的外交一致性已经越来越弱。按该方案，欧盟各国虽然谴责了叙利亚及其盟友攻击阿勒颇平民的行为，但所持的态度却是：若不停止此恶行，将有可能采取各种手段。[34]

与会的各国领导人还一致同意，于下周（10月27日）在布鲁塞尔隆重签署已经谈了长达7年之久的一个贸易协定：与加拿大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简称CETA）。欧盟与美国也为一个贸易协定谈了很久（即《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

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与美国不同的是，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社会自由派政府领导下的加拿大在所有争议点上都与欧洲人达成了妥协——这些争议点包括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和仲裁问题。因此，即使是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有成百上千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和《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抗议者走上街头的国家，也在敦促尽早签署这项此间已进行了许多补充和精确化处理的条约。

从前，签订贸易条约是属于欧洲联盟的职权。只有签订“混合协定”，即会涉及各成员国的职权时，才需要在欧洲议会批准之后，再经过各民族国家议会批准相关条约。在《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问题上，欧盟委员会本来在内部法律中认为这应该作为“纯粹的”欧盟协定来处理。但德国政治家们（例如联邦经济部长、社民党主席西格马尔·加布里尔和巴伐利亚州总理、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费尔）又一次要求本国议会参与其中，并最终在布鲁塞尔实现了这个愿望：欧盟委员会于2016年6月将《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作为“混合协定”处理，后果是该条约还需要各国议会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由于有那么一个成员国——联邦制的比利时——规定地方议会在缔结贸易协定时也有广泛的参与权，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单单一个地方议会就能阻止《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生效。

偏偏这种情况就在2016年10月出现了。几乎就在西格马尔·加布里尔与加拿大政府进行单独谈判并相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时候，首府位于比利时那慕尔（Namur）的瓦隆大区（Wallonien）地方议会出来按下了暂停键。然而，瓦隆大区议会的反抗清楚地表明，与欧洲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其反对《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当然也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的根本动机是：害怕可能只符合大工业和农业康采恩利益的自由贸易，害怕本国议会的民主合法性被国际仲裁法庭取代，害怕转基因食品的胜利进军，害怕无休止的全球化。

瓦隆大区原先的支柱是煤炭和钢铁，而如今却充斥着工业废墟、高失业率和几乎没有竞争力的农业，并且还感觉受到富裕的弗兰德地区的鄙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弗拉芒的自治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在1970年之后的数十年中推动比利时实现激进的联邦化，从而使得每个地区都拥有了参与决策的权利，这才让瓦隆大区的社会党总理保罗·马涅特（Paul Magnette）在获得当地议会大比例多数和布鲁塞尔地方议会的支持下，于10月21日对《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签署和临时生效[35]行使了否决权。他这样做，不但让赞成签约的自由党人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领导下的比利时中央政府，也让整个欧盟颜面无光。要知道，贸易政策是欧盟职权中最核心的部分，现在欧盟却没有能力把事情办下去。而且其签约对象是加拿大，这可是一个大西洋彼岸的西方国家，它一向为自己受欧洲

文化影响更深而且不同于南方那个强大的邻居（美国）而自豪。

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与加拿大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之间的非正式“后续谈判”也未能取得积极成果：马涅特拒绝在加拿大政府所设定的“最后期限”10月24日星期一之前，劝说那慕尔的议会同意对《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批准。布鲁塞尔地方政府也支持这一立场。尽管米歇尔总理依然无法让比利时批准这项文件，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图斯克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是商定，将于10月27日按计划签署条约，同时也给瓦隆人更多时间对《全面经济贸易协定》进行讨论和表决。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谈判需要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10月27日早晨，欧盟-加拿大峰会不得不无限期推迟。几小时之后，夏尔·米歇尔宣布对话取得了成功。为了让瓦隆人同意《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临时生效，比利时政府又添上了三个保证。第一，在条约临时生效期间（也就是欧盟部长会议和欧洲议会批准但各成员国议会尚未批准的那段时间内）进行评估，看看《全面经济贸易协定》是否对经济和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影响的确很大，那么比利时就有权不批准条约。第二，要比现在更有效地确保针对投资者的仲裁法庭法官的独立性。第三，由于农业会因加拿大的进口陷入无法竞争的状态，将会通过针对这一劣势的补贴来保护农业——这是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妥协，欧盟决不可对此掉以轻心。

比利时政府的补充声明不但需要比利时地方议会的批准，而且还需要得到其他27个欧盟成员国的同意，此事在10月28日星期五午夜终于完成。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发表简短声明，对此表示理解。在早就有多数议员支持《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欧洲议会，一切都不会有悬念（后来，在2017年2月15日的表决中，条约在408票赞成、254票反对、33票弃权的情况下得以通过）。接下来，诸条约的签字仪式在推迟了3天之后，于10月30日星期天在布鲁塞尔举行。让-克劳德·容克借此机会树立了一个根本标准：以后一切要与欧盟签订的贸易条约，都必须参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标准。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已经性命无忧了。在荷兰，自由贸易的反对者们在10月底宣布，准备发动一场全民公决来反对与加拿大的条约。在德国，尽管联邦宪法法院在10月13日的一份关于多项宪法申诉的快速判决中准许联邦政府让《全面经济贸易协定》暂时生效，但其最终判决将取决于对该条约合宪性的检查。而且，是不是所有成员国的议会都会批准《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也还说不准。就德国而言，大致可以估计赞成批准条约的议员在联邦众议院中占绝大多数。但联邦参议院能否批准（如果相关法案被视为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话），可就不得而知了。

比利时内部对通过条约的抵抗，以及欧盟-加拿大峰会最终不得不改期，都

沉重打击了欧盟的声誉。如果这个共同体在与加拿大这样一个文化相近的伙伴缔结贸易条约时都困难重重，甚至还有可能缔结不了，那么它在全球展开活动时究竟还有什么执行力？就连许多从前一直都把欧洲一体化视作一路凯歌的人，现在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需要面对的指责是：他为什么要在诸成员国巨大的，但却是反条约的压力下，把《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划分为“混合协定”，以至于非要取得各国议会的同意不可？反过来，批评也可以指向各国政府，比如上面提到的德国政府，为什么要坚持条约的批准需经过所有成员国议会同意？这些政府削弱了共同体最根本的职权，即缔结商约的权利，这才导致了《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危机。

事实上，新型自由贸易条约中所包含的合法性问题早就不能忽视了。这种新型商业协定超越了传统的进出口领域，而广泛地延伸到国内政治的结构性权利之中，或者说触碰到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假如欧盟坚持要单独处理此事，那么那些反全球化的公民运动就会被驱赶到从根本上反对这个共同体的立场上去。许多对《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指责也是有道理的（当然，这也适用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它们指向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激进市场主义，该主义在许多国家动摇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任。承担这些批评的是贾斯汀·特鲁多领导下的加拿大政府，这是该条约最终得以通过的决定性原因。如果欧盟委员会不准备把《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作为“混合协定”处理，这种情况将不大可能出现。

欧盟委员会因2016年10月以戏剧性方式遭遇的CETA危机而损失了信誉，为此它自己要承担很大责任。在谈判贸易条约方面，它花了太长时间就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行秘密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而这段时间里质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反对者越来越多。当然，这些人早已不仅仅反对欧盟委员会，而是也反对各成员国的议会和政府。

反《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和反《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运动的活跃分子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背景，有些来自左翼，有些来自右翼，有些出自绿党的环保运动，有些出自工会。其中许多人都把自己视为真实民意的代表，从而（至少是暗示性地）质疑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荷兰这样的成员国竟可以用全民公决的办法处理国际条约（而且还是在投票率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况下），这无疑意味着向公投的压力投降。比利时的极端联邦化也有相似的效果：在紧要关头，却无力捍卫民族国家的行动力。

在贸易政策方面，《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危机的高潮也带来一个学习的过程：让-克劳德·容克宣布在未来的条约中，将明确区分共同体的责任和各成员国的责任。这只能说明，欧盟想要把精力集中在传统的贸易条约所涉及的对象上，即进出口领域。而那些涉及国内法律问题，则交由各成员国去批准，或至少是拥有深度参与决策的权利。如果这成为现实，将推动职

权重新回到各成员国手中，同时也是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辅助性原则。继英国公投之后，围绕着《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争斗是2016年的第二场危机，它们都让欧洲联盟不得不放弃“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36]

2016年11月3日，英国最重要的高等地方法院（即管辖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伦敦高等法院）的一个判决又让舆论大吃一惊，并被普遍认为是特雷莎·梅政府和“脱欧派”的一个失败之举：根据该判决，在没有得到下议院的批准之前，退出欧盟将无法实现。法庭和提起诉讼的原告引发了一轮国民的愤怒。《每日邮报》（*Daily Mail*）在封面发表了一幅图片，在几位参与审判的头戴假发、身穿红色罩袍的法官旁边标上了“人民公敌”的字样。政府对判决的反应平静，并宣布会到最高法院反击高等法院的判决。当时估计，最高法院将在2017年1月宣判。按照唐宁街的想法，这个时间点将不会影响预定计划，最迟将于2017年3月底向布鲁塞尔提交脱欧申请。[37]

伦敦高等法院的判决公布近3周之后，内阁中的少数“留欧派”代表之一、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于11月23日对下议院和英国媒体宣布了自6月公投以来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事实。他痛陈英国经济生产力低下、以基础设施落后而闻名，而且其他大城市在福利方面与伦敦之间有巨大的落差。2016年3月发布的预测所说2017年和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和2.1%，这时被他分别调低至1.4%和1.7%。

相反，这位财政大臣将对2017年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从2.3%调高至3%。其前任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定下的在2021年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已经谈不上了，哈蒙德预计新增国债将比原计划（本来正在削减）超出560亿英镑（相当于664.3亿欧元）——按照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这个估计还是太过乐观了。仅在2016年，哈蒙德估计还要增加680亿英镑的债务，这比3月预计的要多出将近130亿英镑。

那些在“脱欧派”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小人物”试图用以下声明让财政大臣冷静下来：政府已经将最低工资提高了30便士，即从7.2英镑提到了7.5英镑（相当于8.75欧元），而且还新设立了一个数十亿英镑的投资项目，为的是提供让大家买得起的房产。就在哈蒙德的下议院演讲之前两天，首相已经宣布要大幅降低企业税，以应对工厂外迁的危险。不过，特雷莎·梅政府究竟能不能用这些措施让人们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变得乐观起来，依旧不得而知。公投后的次月，即2016年7月，有42%的家庭明显看淡未来的经济形势；到了11月，这一比例上升至49%。[38]

针对英国未来政策方向依然存在的不确定性，特雷莎·梅于2017年1月18日在伦敦的兰开斯特府举办了一场释明根本原则的演讲。其核心内容是，她的政府已经决定“硬脱欧”，也就是说将让英国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她说，

政府这样做就是不想为“半脱不脱”付出代价，因为政府不准备继续施行现存的欧盟内部人员自由通行的政策。英国将尝试与欧洲联盟订立一项“勇敢且高要求”的自由贸易条约，并重视与欧盟的友谊和建设性伙伴关系。特雷莎·梅称，英国与欧盟拥有同样的价值观。然而，对共同体的超国家机构她却不屑一顾。据她说，这些不符合英国的政治传统和生活方式。

引人注目的是，这位保守党的政府首脑强调了她对自由贸易的信念和本国国际主义（嗯，还是全球视野）的未来道路——连演讲所选用的口号都是“一个全球性的英国”。她所讲的，听上去好像是在说，她相信只有当英国人从布鲁塞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实现“光荣孤立”之后，英国才会回归帝国时代的伟大。她向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这“四个族群”保证，他们将参与同欧盟的谈判；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将保持开放，“共同旅行区”将保留。谈判的结果将先呈交下议院，然后再递交欧洲议会——这个让步让一些观察家感到惊讶。

绝大多数英国人都对兰开斯特府的演讲反应良好，这首先应归功于首相的表述：她保证，未来英国将绝对自主地决定，想要接纳多少以及接纳哪些移民。不同的意见来自反对党：自由民主党主席蒂姆·法隆（Tim Farron）指责首相的决定是一个“拆台式的脱欧”；工党主席杰里米·科尔宾责备首相，称其退出欧洲共同市场的决定是将本国经济的未来置于危险的境地。爱丁堡的议会干脆拒绝了这次演讲的说法：该议会支持苏格兰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之中。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表示，在特雷莎·梅的讲话之后，将很有可能举行一次新的苏格兰独立公投。

布鲁塞尔对此反应平静。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对英国首相澄清众多问题这一举动表示欢迎，但同时也说，提交脱欧申请之后的谈判将是异常艰难的。与之前一样，其原则就是与英国达成的这项“交易”既要公平，又不能太有吸引力，否则其他一些受到刺激的国家会纷起效仿。至于英国威胁称一旦不能与欧盟达成一致就会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避税天堂，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必太当真。英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如此之高，以至于几乎无法再进行大规模减税了。此外，在出口方面，相对于欧盟对英国的依赖，英国对欧盟的依赖性要高得多。让对方看到自己手上的牌是不明智的——在这一战术思想上，伦敦与布鲁塞尔并无二致。[39]

欧盟及各成员国的领导人都在推测，英国决心在脱欧谈判中走“强硬路线”可能与白宫在2017年1月20日易主有关。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多次对英国脱欧表示支持，而且还在胜选之后宣布他将很快与英国缔结一项自由贸易条约。尽管美国在英国外贸中的比重比欧盟低得多，但这表明英国有希望也在其他领域与美国重塑它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1月15日，英国人抵制了一场由法国发起的中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调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次日，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在匈牙利和爱沙尼亚外长的支持下，阻挠了欧盟外长对巴黎决议的支持声明。这表明，英国的外事领导人已经完全站到了一直格外表示亲以色列的特朗普的路线上。那些曾经期待欧盟与英国在外交方面还能继续保持合作的人，现在最好不要再抱有这种指望。

就在英国首相阐明路线的演讲过去约一周之后，伦敦的最高法院于1月24日宣布了对以下事项的判决：按照《里斯本条约》第50条，政府是否有权自主决定脱欧申请中的立场？是否需要先取得议会的批准？法庭陈述了英国的宪法传统，并依此强化了议会的权利：相关申请在得到议会两院批准之前不得提交。不过，法庭认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方议会的批准并不是必需的。

对一直不认同在脱欧申请一事上需要取得下议院同意的特雷莎·梅政府而言，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这个政府依然战斗力旺盛，它宣布能保障英国按第50条提交申请的法律草案的筹备工作进行顺利。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下议院的投票，但这场投票几乎不会否决全民公投的有效性。不过，政府依然需要提防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自由民主党和工党的企图，因为其会要求政府在与欧洲联盟的谈判中加入某些特定的条件，而且会用这种方式让政府偏离自己“硬脱欧”的既定方针。苏格兰地方政府对最高法院没有授予爱丁堡的议会共同决定权感到失望。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表示，一天比一天清楚了，苏格兰的呼声求告无门。这不是在宣布一次新的独立公投，但从政府首脑的立场看，离做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更近了。[40]

为了保证其时间表不受影响（脱欧程序最迟于2017年3月开始），特雷莎·梅政府在最高法院宣判之后两天（1月26日）就拿出了其所要求的法律草案。它就只有一句话：“首相可以按照联合王国的意图提交申请，按照《欧洲联盟条约》第50条第2项内容退出欧盟。”保守党在下议院的党团主席戴维·利丁顿（David Lidington）表示，他准备让这一提案在政府所希望的时间（2月8日）通过。在下议院通过后，提案还要交上议院讨论。在那儿，反对意见估计会更多。但如果下议院已经接受该提案，上议院也不大可能否决它。

下议院对脱欧法案的三读和表决于2月9日举行。在拒绝了所有修改意见之后，政府的提案最终获得494张赞成票和122张反对票。如果不是工党领导层要求议员们投赞成票的话，投票结果不会显得这么一边倒。工党党团这样要求的理由是，大多数工党获胜的选区在2016年6月23日的公投中都投了“脱欧派”的票。不过，还是有52名工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大约占其议会党团的三分之一。上议院于2月底、3月初处理了脱欧提案，并在表决中

以多数通过了两点补充：第一，政府应该首先保证330万正生活在英国的欧盟国家公民的居留权，并保证这一点与脱欧谈判的结果无关；第二，上议院推动一项立法，令谈判结果必须取得议会两院的批准。3月13日，下议院拒绝了这两项要求，并且批准法案以其原先内容形式通过。当天夜里，上议院放弃继续跟下议院“打乒乓球”并接受了后者的决议。如此，特雷莎·梅政府按《欧洲联盟条约》第50条向布鲁塞尔提交申请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不过，3月13日最抓人眼球的事件并不是英国议会两院的表决，而是苏格兰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宣布，将在2018年底或2019年初举行一次新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其理由是，特雷莎·梅政府所追求的“硬脱欧”将给苏格兰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可是由此引发的苏格兰人隐忧却在伦敦求告无门。斯特金认为，如果苏格兰能在英国脱欧之前决定独立，就能保住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其实这个想法几乎得不到布鲁塞尔的赞同。不过，不同于2014年9月按苏格兰民族党意愿举行的那次，一次新的公投并不容易。民调显示，有52%的苏格兰人赞同留在联合王国之内。同时，特雷莎·梅的反应是坚决拒绝妮古拉·斯特金的挑战。然而，苏格兰地方政府的最新动议，已经明显增加了英国政府在与欧盟谈判时来自国内政治的压力——至少，斯特金已经可以把这一成功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了。

3月28日，爱丁堡议会在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以69票对59票通过了地方政府关于举行一次新的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申请。一天前，斯特金试图让首相同意在英国脱欧谈判结束之前进行民族自决，但徒劳无功。要让特雷莎·梅在这个问题上松口，几乎是不可能的。

3月29日，英国驻欧盟大使蒂姆·巴罗（Tim Barrow）向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提交了英国首相的信，此信即是英国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出欧洲联盟的申请。特雷莎·梅在信中强调，英国正在脱离的是欧盟，而不是欧洲。同一天，如同她在信中所解释的，她在下议院也表示，自己的国家想与欧洲联盟建立一种新的、深入的伙伴关系。她说，恰恰是在这个时代，世界更加需要欧盟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这句话，引来了亲欧的自由民主党人和其他反对党议员讽刺性地冷笑。

在提交脱欧申请的这个当口，特雷莎·梅关于未来与欧盟关系的表述与以往明显不同。从前，她的说法是：“对英国来说，与其达成一个坏交易，不如根本不达成交易。”与首相的最新表态相比，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的说法显得更加露骨，他说就算英国与欧盟之间完全没有贸易协定，那也“完全无所谓”——用英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卡罗琳·费尔贝恩（Carolyn Fairbairn）的话说，这种想法是一种“会在多个领域造成混乱的毒药”。事实上，如果谈判失败，那么就会采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比如，对汽车的进口关税最高可收10%。繁荣的英国汽车工业有超过一半的

配件需要进口，四分之三的产品需要出口，如果照此规则办理将会造成一场灾难。所以，“不达成交易”会是“最坏的情况”。

根据《里斯本条约》，脱欧谈判应在2年之内完成。而人们预先就可以想见，这场与欧盟的谈判将会格外复杂。欧盟方面估测，英国为其已尽的义务所付出的代价是大约600亿欧元，其中包括英国应支付的欧盟官员养老金的份额和尚未结项的欧盟计划（比如机构和研究项目）。英国则认为，远不应该有这么多。

若真如英国首相在她3月29日的下议院演讲中所说的，要在2年之内，不但谈好脱欧条件，而且还要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那可真是一个极具野心的大工程。在欧盟总部，人们会记得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谈了7年之久（尚待各成员国批准）。对英国而言，假如欧盟与英国的谈判在2018年秋季之前完成，那么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欧盟27国的议会批准。不过，这样一个时间表，没有几个观察家认为是能够实现的。

英国首相可能会期待，如果英国在安全政策方面和欧盟合作的话，那么欧盟或许就会在贸易政策上让步。她还希望脱欧条件谈判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能够同时进行。然而，她可能并不能确定欧盟也有同样的想法。同样不能依仗的是英国经济在2016年第4季度意想不到的强劲增长（约0.7%），因为难以预计退出欧盟对它的实际影响究竟是什么。相反，冷静的观察者都认为，“脱欧派”这一次玩的“全梭”将把英国带入近来历史中最危险的一个篇章。首相大人及其政府成员试图展现出来的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根本无法掩饰这一点。[41]

在向布鲁塞尔提交脱欧申请近3周之后，特雷莎·梅于4月18日用她就任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内政决定让舆论大吃一惊：政府建议于2017年6月8日提前举行下议院改选。由此，梅完成了一次战术转化——在此之前，她的目标一直是不提前结束立法机构的任期，而瞄准2020年年初的例行选举。

从特雷莎·梅的角度看，新选举的时机是有利的：根据民意调查，保守党比内部争吵激烈的工党领先19至21个百分点。如果要让首相的党派在选举中大幅领先，首相必须站在本党的强硬“脱欧派”和英国独立党的对立面，同时也反对舆论和议会中那些坚决亲欧的议员，而且也免不了要对欧盟更加强硬。此外，首相还赢得了时间：她将有更大的机会在2019年退出欧洲联盟的负面效果出现时保住政治地位，并能在2022年新一轮议会选举之前稳坐首相的位置。

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认为首相的改弦更张不值得信赖，但却赞成举行新一轮大选。而且他还声明，工党将为一种有社会关怀的条约式脱欧而奋

斗。自由民主党也显得比较高兴。作为一个坚定亲欧的党派，该党声称要在提前举行的新一轮选举中引领那些曾经投票给保守党或工党的“留欧派”，以及那些“硬脱欧”的反对者。几乎可以肯定，6月8日的选举将不会是一次反对英国脱欧的“半全民公决”。但英国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完全有可能因此而发生重大改变。

4月19日，下议院对政府要于5月3日解散下议院的提案进行投票，结果不仅达到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且几乎是一致通过（522票赞成、13票反对）。人民这个主权者，再次掌握了英国近期发展的政治决定权。但与2016年6月23日的投票不同的是，这次英国人所要求的，是通过经典的、符合本国宪法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是全民公决，而是代议制——授权给议会和受多数议员信任的政府。

当然，梅在4月18日的决定还是会带有一种全民共同决定的色彩。这位首相是因为保守党党魁卸任而不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她请求她的国民以民主的方式给予她全面的信任。因为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她都需要这样的支持，从而让其常规政策和特别关注的脱欧政策的施行看上去都有民意的支持。这正是下议院在2017年6月8日提前举行选举的真正原因。[42]

---

[1] Dieter Grimm, Auf der Suche nach Akzeptanz. Über Legitimationsressourc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n: ders., *Europa ja-aber welches? Zur Verfassung der europäischen Demokratie,* München 2016, S. 29-47 (31).

[2] *Europa neu gründen.* Von Sigmar Gabriel und Martin Schulz (24. 06. 2016),https://www.spd.de/fileadmin/Dokumente/Sonstiges_Papiere_et_al_/PK_Europa_Paper.pdf.

[3] Die immer engere Unio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3. 6. 2016 (zu Verhofstadts Vorschlägen); Ulrike Guérot, *Warum Europa eine Republik werden muss! Eine politische Utopie,* Bonn 2016; Robert Menasse, *Der Europäische Landbote. Die Wut der Bürger und der Friede Europas oder warum die geschenkte Demokratie einer erkämpften weichen muss,* Wien 2012, S. 18 ff., 98.

[4] Die Spieler treten ab. Kerneuropa als Rettung: Ein Gespräch mit Jürgen Habermas über den Brexit und die Eurokrise, in: *Die Zeit,* Nr. 29, 7. 7. 2016.

[5] 关于2016年7月15日的军事政变，参见本书原文第192页前后。

[6] 布拉迪斯拉发是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

[7] Walter Lipgens, *Die Anfänge der europäischen Einigungspolitik 1945-1950. 1. Teil: 1945-1947,* Stuttgart 1977, S. 111 ff.

[8] Jörg Bremer, Matteo Renzi und der Gefangene von Ventoten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8. 8. 2016.

[9] 此处的"布鲁塞尔"代指欧盟委员会。

[10] Italien bastelt an Staatshilfe für Banken, ebd., 6. 7. 2016.

[11] Frankreich gibt sein Sparziel auf, ebd., 7. 7. 2016.

[12] 指出身社会党的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

[13]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简称工社党（PSOE）。

[14] Die EU vertraut dem griechischen Chefstatistiker, ebd., 25. 8. 2016.

[15] Renzi wechselt an die Seite von Tsipras, ebd., 12. 9. 2016; Pour Alexis Tsipras,«L'Europe est menacée de décomposition», in: *Le Monde,* 8. 9. 2016. http://www.lemonde.fr/europe/article/2016/09/08/pour-alexis-tsipras-l-europe-estmenacee-de decomposition_4994342_3214.html; Hans-Jürgen Schlamp, Die neue Macht des«Club Med», in: *Spiegel online,* 12. 9. 2016.

[16] 爱沙尼亚首都。

[17] «Deutschland wird Deutschland bleib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1. 8. 2016.

[18] «Werden auf digitalen Binnenmarkt drängen», https://www.bundeskanzlerin. de/Content/DE/Reiseberichte/2016-08-31-deutsch-italienische-konsultationen. html.

[19] Merkel sieht Rückführung nicht schutzbedürftiger Migranten als vorrangige Angelegenheit. Deutschlandfunk, 5. 9. 2016 (Nachrichten vom 1. 9. 2016).

[20] 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两党联盟组成。

[21] Gabriel fordert Obergrenzen für Integratio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8. 8. 2016;«Lage für die Union ist höchst bedrohlich», ebd., 6. 9. 2016; Vier Seiten mit Subtext, ebd., 9. 9. 2016.

[22] «Das kann doch nicht Europa sein!», in: *Die Welt,* 13. 9. 2016.

[23] 中国一般按匈牙利习惯译作西亚尔托·彼得。

[24] Asselborn fordert Ausschluss Ungarns aus der EU, in: *Fran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4. 9. 2016.

[25]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16: Towards a better Europe-a Europe that protects,empower and defends. Strasbourg, 14. September 2016 (Authorized version).

[26] European Council. The President. Press EN. The Bratislava Roadmap. Bratislava,16 september 2016. Remarks by President Donald Tusk after the Bratislava summit. Statement and Remarks. 518/16. 16/09/2016. 关于哥本哈根标准，见本书原文第34页。

[27] Günter Bannas, Zeitreise statt Leerformel,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 9. 2016; Nico Fried, Wie noch nie,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0. 9. 2016; 4.-6. September 2015: Was geschah an diesem Wochenende wirklich?, in: *Die Zeit,*Nr. 35 (18. 8. 2016); Das Märchen eines Sommers, in: *Der Spiegel,* Nr. 33 (13. 8.2016); Premium: Angela Merkel und Nicola Leibinger Kammüller, «Da muss man Flagge zeigen» (Interview), in: *Wirtschaftswoche,* 26.9,2016. 关于默克尔2015年夏天的政策见本书原文第113页前后。

[28] Die Bundesregierung: Merkel beim Westbalkan-Treffen. Illegalität bekämpfen, Legalität stärken.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Reiseberichte/2016-09-21-wien.html; Cathrin Kahlweit, Definitionen von Solidaritä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6. 9. 2016.

[29] Jon Henley, Brexit means Brexit ... but the big question is when?, in: *The Guardian,* 22. 8.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aug/22/brexitmeans-brexit-when-is-big-question.

[30] Jean Pisani-Ferry, Norbert Röttgen, André Sapir, Paul Tucker, Guntram B. Wolff, Europe after Brexit: A proposal for a continental Partnership. 25. 8.2016; Binnenmarkt ohne Freizügigkeit. Einflussreiche Ökonomen schlagen eine ‹kontinentale Partnerschaft› für Großbritannien vo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0. 8. 2016.

[31] Michael Stabenow, Verteidigung in Zeiten des Brexit, ebd., 28. 9. 2016.

[32] Viele britische Firmen erwägen Umzu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7. 9.

2016; City of London fears May government is shifting towards ‹hard› Brexit, in: *Financial Times,* 25. 9. 2016.

[33] Christian Zaschke. Teresa May und ihr Lieblingssatz, in: *Süddeutsche Zeitung,*4. 10. 2016; Jochen Buchsteiner, Die Intelligenz des britischen Volkes,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4. 10. 2016; Teresa May: Pounding home the Message, in: *Financial Times,* 7. 10.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b4a9ae848c9a-11e6-8cb7-e7ada1d123b1?mhq5,＝e3; Te Guardian view on the Brexit debate:parliament must be heard, in: *The Guardian,* 13. 10. 2016.

[34] European Council. Brussels, 21. October 2016. EUCO 31/16: From: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To: Delegations. 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20 and 21 October 2016)-conclusions.

[35] 在同意视《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为“混合协定”的同时，欧盟委员会又决定：在各国议会最终批准该协定之前，协定最快将于2017年初便进入临时运行期，而这期间将有90%的协定条款开始实施。

[36] Hendrik Kafsack, TTIP war von Anfang an umstrittener als Ceta,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6. 9. 2016; ders., Europäisches Trauerspiel, ebd., 29. 10.2016; Nikolaus Piper, Traumpartner Kanada,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5./16. 10.2016; Tomas Kirchner, Widerstand der Abgehängten, ebd., 24. 10. 2016; Daniel Brössler, Weg frei für Handelspakt mit Kanada, ebd., 28. 10. 2016. JunckersÄußerungen in der ARD: tagesschau.de, 30. 10. 2016. https://www.tagesschau.de/multimedia/sendung/ts-16691.html.

[37] Jochen Buchsteiner, Der große Grab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5.11. 2016; Gina Tomas, Britische Grenzüberschreitung, ebd., 16. 11. 2016; Stefan Kornelius, Zurück in Mutterns Schoß,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7. 11. 2016.

[38] Philip Hammond’s autumn statement is a welcome reality check.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6/nov/23/philip-hammonds-autumnstatement welcome-reality-check-brexit; Brexit: Mindestlohn und Folgen mildern. 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brexit-mindestlohn-soll-folgenmildern-a-1122646.html; Brexit reißt Loch in den Staatshaushal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 11. 2016.

[39] UK cosying up to Trump over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say EU ministers, in:The Guardian, 16. 1. 2017; Te observer view on Teresa May’s

Brexit speech.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jan/22/who-willfght-theresamay-brexit-folly; What Teresa May means by Brexit, in: *The Times,* 17. 1. 2017;Jochen Buchsteiner, Britanniens neue Härt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8. 1. 2017; ders., Wohlgefallen in Downing Street, ebd., 19. 1. 2017; Christian Zaschke, Freunde bleib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8. 1. 2017; «Sehr, sehr, sehr schwierig», ebd., Die Rede Mays in: time. com/4636141/ theresa-may-brexitspeech-transcript.

[40] George Packer, Brexit bill likely to face biggest trials in House of Lords;in: *Financial Times,* 26. 1. 2017; Jochen Buchsteiner, Kein zurück mehr,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5. 1. 2017; Reinhard Müller, Im Namen des Volkes-aber unabhängig, ebd.; Brexit-Gesetz eingebracht, ebd., 2. 1. 2017.

[41] Jochen Buchsteiner, Wem man trauen soll,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2. 2017; ders., Kurz vor der Klippe, ebd., 18. 2. 2017; ders., Nur ein halber Sieg,ebd., 15. 3. 2017; Brüssel schickt eine Rechnung über 60 Milliarden Euro, ebd., 29.3. 2017; Marcus Teurer und Hendrik Kafsack, Der Brexitkönnte jeden Briten fast 5000 Euro im Jahr kosten, ebd.; Christian Zaschke, Ping-Pong ums Bleiberecht, in:*Süddeutsche Zeitung,* 28. 2. 2017; Daniel Brössler, Die Uhr tickt, ebd., 8. 3. 2017;ders., Die Lords stellen sich quer, ebd., 9. 3. 2017; Peter Walker, Government has not assessed impact of leaving EU with no deal, in: 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mar/15/brexitgovernment-assessed-impact-leaving-eu-deal-daviddavis; Heather Stewart, Teresa May rejects Nicola Sturgeon's referendum demand,in: 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 mar/16/theresa-may-rejects-nicolasturgeons-scottishreferendum-demand; Te observer view on triggering article 50, in: https://www.theguardian.com/ commentisfree/2017/mar/26/observereditorial-triggering-of-article-50-jeopardises-60-years-of-unparalleled-peace. Der Brief Mays an Tusk, 29. 3. 201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rimeministers-letter-to-donald-tusk-triggering-article-50.

[42] Francis Elliott und Sam Coates, May heads for election landslide, in: *The Times,*19. 4. 2017; Anushka Asthana and Peter Walker, May: give me my mandate, in:*The Guardian,* 19. 4. 2017; Jon Stone and Joe Watts, MPs vote to approve Teresa May's plans for snap general election, in: *The Independent,* 20. 4. 2017; General election 2017: Corbyn and May clash over ‹trust›. http:// www.bbc.com/news/uk-politics-39636466; Alexander Menden, Perfektes

Timin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9. 4. 2017; Jochen Buchsteiner, Mays großes Wagnis, ebd.; ders.,Frische Luft und gute Aussicht, ebd., 20. 4. 2017; Albert Funk, May Day im Juni,in: *Der Tagesspiegel,* 20. 4. 2017. Mays Erklärung zur Neuwahl: Teresa May on calling an early election: full statement. http://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elections/2017/04/theresamay-calling-early-election-full-statement.

第11章

美国将向何处去？

2016年4月，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名为《奥巴马主义》（The Obama Doctrine）的长篇文章，其内容同一系列与这位美国总统的深入访谈有关。该文的要点是谈美国一般性的国际角色，特别是美国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戈德堡所展示出的（包括奥巴马自己所展现的）总统形象是：奥巴马会仔细斟酌其外交决定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免像其前任小布什那样留下一些难以善后的祸根（比如2003年出兵伊拉克）。

2012年8月20日，奥巴马给叙利亚总统巴沙尔·H.阿萨德画了一道“红线”，警告他不可动用化学武器。几乎就在整整一年之后，2013年8月21日反叛者控制的地区遭受了大规模毒气攻击，毫无疑问这笔账被算在了叙利亚政府军的头上。但与全世界，特别是华盛顿的“鹰派”（甚至国务卿约翰·克里也是其中一员）所期待的不同：奥巴马并没有用武力说话，没有动用美国空军和导弹攻击阿萨德。

2014年8月30日，奥巴马明确拒绝了一切因“红线”这个词而激化事态的可能（用“红线”这个词时未经深思，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疏忽）。就在奥巴马的众多批评者咬死这个决定是这位总统在外交上的“原罪”时，对他自己来说，2014年8月30日在某种意义是解放了他自己的一天——这一天他与华盛顿的主流意见决裂了。否则，为了他自己说话算话，美国将在紧急情况下再次陷入一场前景不明的战争。

如果直接卷入叙利亚内战，那这将成为美国在还没开始多长时间的21世纪里，继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之后，在伊斯兰国家参与的第四场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小布什开打的。而利比亚战争是奥巴马自己于2011年3月发动的，他在英、法两国和本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压力下，在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下同意采取干预行动。不过，当时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政府真正清楚应如何处理与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政权的关系，那时候军事行动的直接目标是阻止政府军对班加西守卫者的大屠杀。

当独裁者被杀害之后，利比亚陷入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这为“伊斯兰国”的渗透创造了机会。在叙利亚，美国无法阻止接受其军事援助的温和反对派叙利亚自由军去跟恐怖主义者合作——比如其合作对象，原名努斯

拉阵线的征服沙姆阵线（Jabhat Fateh al-Sham），其实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美国直接攻击阿萨德政权所要冒的风险，不只会跟该政权的保护者俄罗斯、伊朗发生冲突，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大马士革的政权更迭可能会让激进分子获益。

在奥巴马看来，如果美国进行一场针对阿萨德治下之叙利亚的战争，几乎就跟针对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的战争一样明显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整体上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已有所减少，而且这些年美国对该地区的石油也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依赖了。奥巴马并不害怕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消解美国的霸权，他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在经济方面太虚弱，而且早就有在战略上过分扩张的危险。

然而，俄罗斯对比邻自己的东欧地区就不这么看了。在这里，就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东乌克兰进行混合型战争所显示出的那样，俄罗斯政府用了比在叙利亚多得多的手段来实现近来所谓的“以激化得统御”。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都不是北约成员国，而且与前任总统不同，奥巴马也不打算承诺今后让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欧洲联盟所关心的是以某种形式在乌克兰东部实现和平。普京应该不会对美国履行北约成员国义务的决心有丝毫怀疑。如果真有一条不带“如果”“然而”等词修饰的“红线”，那就是这一条了。而这也是“奥巴马主义”的一部分，总统在他与杰弗里·戈德堡的谈话中阐明了这一点。[1]

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即最后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奥巴马的表现完全不像一只“跛脚鸭”[2]。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他在外交方面（至少是其中的某些领域）的表现。在本书的其他地方已经提到，2016年1月，自1995年开始的对伊朗的制裁停止了。[3]3月，这位总统为美国与古巴之间近60年的对抗画上了休止符：他赴哈瓦那（Havanna）国事访问，在那儿与国家兼政府首脑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的谈话，很可能会开启一个合作的新时代［劳尔的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是2008年初退休的］。2016年，由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也在伊拉克取得了成功。2015年、2016年之交，拉马迪（Ramadi）被攻下；接着费卢杰（Falludscha）也在6月被拿下；2016年10月中旬，伊拉克政府军、逊尼派武装和库尔德联盟的佩什梅格武装开始向“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的重镇摩苏尔（Mossul）突击——这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同样被打退了：2016年3月底，曾被圣战运动分子大肆破坏的历史古城帕尔米拉（Palmyra）被政府军攻下（尽管只是暂时拿下）；8月，库尔德联盟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曼比季（Manbidsch）；10月，叙利亚自由军占领了被神话传说笼罩的达比克（Dabiq）[4]。不过，世界舆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争战不休并让平民百姓饱受折磨的阿勒颇。在那儿，政府军、“温和”反对派和曾经的“努斯拉阵

线”混战在一起。国际社会协商的停火往往只在短时间内有效。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阿萨德的空军率先攻击医院、学校、供水系统和其他民用设施，置西方民主国家的反对和激烈抗议于不顾。

在利比亚，俄罗斯也扮演着拆台者的角色。普京一边倒地把宝押在执掌托卜鲁克政权的哈夫塔将军身上，这位将军坚决拒绝与受到联合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的的黎波里统一政府合作。不过，就如同对待叙利亚问题一样，奥巴马在利比亚也拒绝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他的继任者承担长期义务的措施。

在外贸领域，这位总统也费了一番力气，但未能取得重大成果。2016年2月签署的充满自由贸易精神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遭到参与者甚众的贸易保护主义联合阵线的反对，连那些美国总统职位最有力的竞争者也加入了该阵线。《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当然，这份协定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也同样充满争议。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美国谈判代表对欧洲人在环境和消费者保护、工人利益，以及特别重要投资者保护和仲裁法庭适用性方面[5]的顾虑丝毫不妥协——这样一种态度与加拿大人在《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相关的类似谈判中友好协商的态度截然不同。到2016年秋天，已经可以确定无疑，关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的谈判不可能再如奥巴马所愿在其任期内达成协议了。

在美国民主内，争取成为其继承人的斗争早就开始了。2015年4月，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再次参加总统竞选。她是美国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妻子、纽约州2001年至2009年的参议员，2008年她在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失败，后又于2009年至2013年担任国务卿。很快，她就有了竞争者。一个月后，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个自称美国参议院中唯一的社会主义者，也宣布将角逐合众国的最高职位。

当时已经73岁的桑德斯出生于犹太移民家庭，比希拉里·克林顿大6岁的他看上去明显像一个政界的局外人。但他却凭借对私人财富分配极度不平等的攻击，对银行和大型商业集团垄断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斥责，赢得了大量在校学生和青年工人的支持。他批评希拉里·克林顿与“华尔街”的各家银行走得太近，而且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不少“罪孽”——比如投票支持发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其支持者的欢呼声中，桑德斯说美国需要一场革命，而他就是要领导这场革命。在党内初选中，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州、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的胜利引起了全国和国际上的瞩目，但最突出的是他在密歇根州的胜利，因为民调早就预言希拉里[6]将在该州取胜。

对希拉里·克林顿尤为不利的是，许多美国人几乎条件反射似的不信任她。

她被看作是非常聪明，但也极有事业野心的女性，同时人们觉得她不正直，并且很贪财。她卸任后，演讲的报酬高得令人咂舌。另一项对她的指责是，她在担任国务卿时曾经照顾过由她和她丈夫创立的克林顿基金会。

杀伤力更大的是，另一件发生在利比亚内战中的事件：2012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追随者冲击了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并杀害了在场的美国大使和另外两位美国公民。人们指责希拉里失职，因为她作为国务卿，未能在高危地带有效地保护外交人员。为此，希拉里不得不于2015年10月在一场长达8小时的听证会中为自己辩护——问询她的是一个专门为调查此问题而组建的国会委员会。然而，这次问询给她带来了一直未能摆脱的伤害。

她在国务院任职期间最糟糕的事情是，她用自己的私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而且还用它发送了一些需要保密的信息。联邦调查局（简称FBI）在深入调查该事件之后，于2016年7月最终得出结论：尽管希拉里的做法的确粗心大意，但没有证据表明她有犯罪行为，因此也没有理由提起公诉。不过，这个结论当然阻止不了她的国内政敌把这个“电子邮件事件”当作未来选战中的一大话题。

当民主党于7月底在费城召开党代表大会时，在此期间已经明显“左转”了的希拉里所吸引的代表显著多于桑德斯，而且由民主党委员会所指定的“超级代表”大多支持希拉里。在经过了长达两周的犹豫之后，桑德斯最终表示支持希拉里，这让他的许多激进的追随者感到失望。2016年7月26日，希拉里·克林顿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由她推荐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蒂姆·凯恩（Tim Kaine）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在共和党方面，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斗争更加激烈。2015年6月16日，69岁的前纽约房地产商、赌场经营者、电视制片人、真人秀明星兼亿万富翁的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参加竞选。多亏了多位调查记者的探访，此时人们早已知道特朗普是靠无所顾忌的办事方式来积累财富的：他与那些跟美国或俄罗斯黑手党关系密切的律师、承包商、工会大佬、投资人和赌博投机商都有生意往来；他在雇用工人时系统性地钻法律的空子，而且他的商业帝国还几次濒于破产，只是由于当时政府机构、检察官和法院的过分宽大，他才逃过一劫。尽管其形象如此可疑，又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并曾在党派立场上多次改换门庭，特朗普还是在党内初选中将其他竞争者抛在了后面——这些竞争者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Jeb Bush），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 Rubio）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

显然，对“老大党”（Grand Old Party，共和党的代称）的支持者而言，特朗普关于少数族裔的肆无忌惮的煽动言论，对女权文化整体性的负面评

价，以及对美国的可靠伙伴们的轻视，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他称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为犯罪分子、走私分子和强奸犯，许诺要在靠墨西哥的边境竖起一面高墙，同时还要禁止穆斯林入境。

他质疑美国对欧洲的北约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同盟义务，他觉得这些国家对自身的国防做得不够；他甚至说这些盟友昏聩，尖刻地攻击安格拉·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多次表现出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钦佩，甚至并没有明确表示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违反国际法的。他还想取消2014年1月与伊朗达成的综合性协议——该协议将有可能解决多年来围绕核问题的争端。

特朗普质疑地球变暖与二氧化碳废气的排放有关，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根本不是人类造成的。相反，他认为这是中国在造谣，其目的是伤害美国的工业，他还声称将退出2015年12月由奥巴马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Pariser Klimaschutzabkommen）。

在经济政策方面，他要对内推行超自由主义政策，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他要大力放松奥巴马时代针对银行业、采煤业、油气工业的种种管制。他说，将不会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中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谈判。特朗普许诺，各类贸易条约都要重新审核［头一个就是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看看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他还宣称，要将那些已经搬到国外（比如墨西哥或中国）的工厂搬回美国，而且还将打造一个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项目并以此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统摄这一切的口号是“美国优先”，他用的是当年反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一群孤立主义者的口号，也借用了1940年7月成立的极右翼且越来越反犹的“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的名字。

共和党建制派的知名人物，如曾参加过总统竞选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尽管都试图与特朗普的粗鲁表现和煽动性口号拉开距离，但他们都无法让本党大众接受一位更好的候选人。2016年7月18日至21日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特朗普获得了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与他一起获胜的还有他的竞选搭档，超级保守的、信仰福音派教义的印第安纳州州长迈克·彭斯（Mike Pence）。非常保守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是这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当他5月在印第安纳州的初选中失利后，他拒绝劝说他的支持者转而支持特朗普参选时，他不得不面对一片嘘声。直到9月底，克鲁兹才公开宣布加入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7]

在两个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中，还从未出现过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

者”。不过，这种民粹主义并不是美国政治中的新现象。早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就出现过这个概念，与之相连的是1892年成立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这个带有农村和小城市特色的党反对金本位，主张施行特别严格移民准入政策、更多的直接民主，支持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国有化，这是一个反智、反城市，常常也反犹的党派。

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描述的，这类“原初民粹主义者”（Urpopulisten）的乌托邦并不在未来，而在过去。后来延续这条路线的还有某些激进的“反新政分子”，如围绕在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Huey Long）周围的“分享我们的财富俱乐部”；20世纪30年代围绕在用广播布道的天主教神父查尔斯·库格林（Charles Coughlin）周围的全国社会正义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1968年代表独立党（Independent Party）参加总统竞选的老种族主义者、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为本党夺下了13.5%的选票；接下来还有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出现的超级保守的茶党（Tea Party），该党在此期间赢得了广泛支持并影响了共和党的纲领和代表。[8]

特朗普凭借其攻击性的语言和直截了当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首先赢得了那些感觉自己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在被社会“抛离”的白人群体。这些人觉得自己被“华盛顿”、“精英”和“建制派”（Establishment）鄙视了，而且那些“精英”并没有认真地关心自己的担忧。这些人就是那些没有取得大学学位以及因为整个地区的去工业化进程而丢了工作或害怕丢掉工作的美国人。但向特朗普欢呼的，并非只有这些贫困的美国人。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也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且家境优渥的公民，他们大多是共和党的铁杆选民，饱受保守主义熏陶。他们对现存秩序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在他们看来，这种秩序威胁着美国的自我认同和主权——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他们易于相信右翼的阴谋论，也会让他们坚定地捍卫不受限制的私人持枪权。[9]

当美国的选战于2016年秋季进入“白热化”阶段之后，整个美国社会呈现出深度分裂的状态。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也从未在美国选战中见过如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说中那般简单粗糙的语言，也未见过其支持者那般程度的仇恨：几乎在每一场选民见面会上，这些人都齐声高呼把民主党的女候选人关进监狱（“把她关起来”）。

特朗普在言论中表现出了对女性和残疾人的轻视。在一次与希拉里·克林顿的电视辩论中，他指责这位女对手可能对她丈夫不忠，这大约是对录音带事件实施的报复：2016年10月初，一卷包含特朗普在2005年关于女性的下流言论的录音带曝光。此外，民主党人还找出了证据，证明特朗普这位亿万富翁有整整18年一直在利用现存的法律漏洞不缴联邦所得税。

10月19日，在特朗普与他所谓的“恶心的女人”进行了第三场（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并指责深度腐化的希拉里、民主党和媒体系统性地操纵总统选举之后，他声称如果竞选失败，他不一定会承认这个结果——由此美国选战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美国的政治文化此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以至于共和党内部普遍达成共识：本党并不一定要为本党指定候选人的所有言论辩护。

10月28日，联邦调查局扔下了一枚“炸弹”（尽管司法部极力请求不要这样做）：前共和党人、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告诉国会（等同于告诉了公众），他的部门又发现了一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可用于判定她是否有犯罪行为。这些有疑问的邮件来自一台民主党国会议员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和他的妻子胡默·阿贝丁（Huma Abedin）合用的电脑，后者是希拉里亲密的合作伙伴。（这对夫妇在此期间已经因为韦纳的出轨事件曝光而离婚了。）

科米没有透露关于邮件内容的任何信息。他说他也无法判断这些邮件的意义。愤怒的民主党人认为联邦调查局在“希拉里邮件事件”中的情报政策违背了法律条文，因为法律规定联邦调查局不可以干预正在进行中的选举。如果说截止到此时的大部分民调都显示希拉里大幅领先特朗普的话，那么现在其领先优势已缩小到了数个百分点之内。

10月31日，民主党人不得不接受一个新的打击：网络平台维基解密曝光了2016年夏季初选时的一段插曲（长期以来，维基解密都被怀疑接受了俄罗斯特工的支持并受其操纵）。据称，在希拉里与其党内对手伯尼·桑德斯的一场电视辩论之前，一位在美国有线电视公司工作的专家至少将一个问题事先透露给了希拉里，而且该问题后来也在电视辩论中出现了，这让希拉里在面对其竞争者时获得了部分优势。不管这份最新爆料的背景如何，其目的都十分明显：把希拉里的选举搞砸，帮特朗普获胜。

11月6日，即大选投票日之前两天，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再次发言。对新发现的希拉里所收发邮件的调查，并没有得出任何与7月不同的结论：这位前国务卿的行为是很粗心大意，但并没有犯罪。此后，警方中止了“电子邮件事件”的调查。特朗普立刻就说，这是因为一个有操纵能力的体系在支持希拉里。虽然民主党候选人的民调成绩有所回升，但有数百万美国人已经投出了选票——他们中的许多人所依据的正是科米10月28日的“爆料”。

那些几乎全都预言希拉里·克林顿将险胜的大选专家，至少有一点没有说错：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确比共和党候选人多得了280万张选票，在有效选票中她得了48.2%，特朗普得了46.1%。然而，一锤定音的是选举

人票。在12月19日举行的选举人投票中，希拉里获得227票，特朗普获得304票——比当选总统所需要的票数多了34票。他能取得这样的优势，是因为他赢下了大多数“摇摆州”，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艾奥瓦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希拉里赢下了美国东北部海岸和整个西海岸这些民主党的票仓，却不足以扭转大局。大选的投票率为55.4%，创下自1996年以来的新低。

美国大选普选票中的多数之所以有可能与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中的多数产生重大差异，是因为宪法所规定的选举方法有利于地广人稀的州，而不利于人口稠密的州。因此，在州权专家和政治学学者那里，对此一直有激烈的争论；然而，取消这一选举方法却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此外，引入选举人机制并不是制度性扭曲投票人意愿的唯一可能方式。另一种主要的方法是，共和党人在其所控制的州内推行精心设计过的选区划分，好让自己的党从中获益。这一“重新分配多数项目”（Redistricting Majority Project）的方式只不过是19世纪初有名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10]的一个现代变种：与19世纪的用法一样，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这种技巧被用以增添本党所不喜欢的群体（比如非洲裔美国人）在实际投票中的困难。

第一份选情分析证实了观察家们在选战时已经注意到的事实：特朗普能在“摇摆州”取得决定性的选票优势，要感谢的是以往主要把票投给民主党的白人劳工群体。特别显著地转向共和党候选人的地区——中西部那些完成了工业化的“锈带”和阿巴拉契亚山脉附近（常常是已经关停了）的煤矿区域。受教育水平越低，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越高。但根据收入金字塔排出的选票分布与之相反，在高收入群体中特朗普的得票稍稍领先，而在低工资群体和低收入的自由职业者中希拉里得票领先。希拉里·克林顿是第一位有望成为总统的女性，这个事实并没有在大多数白人女性那里让她获得支持，只有那些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女性才倾向于支持她。大多数参加了投票的黑人和“拉美裔”支持希拉里，不过，特朗普从这些人那里获得的选票要超过2008年和2012年那两次奥巴马胜选的总统大选中的共和党候选人——这也是支持选举人团分配选票的一个原因。

特朗普的胜选与之前的选战一样，清楚地显现了横贯美国社会的裂痕。这主要不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裂，而是内地与大城市、定居已久者与新移民、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保守的美国人与宽泛意义上的自由派美国人之间的分裂。2016年11月8日的选举是一场围绕文化霸权的斗争。在美国，过去40年里知识界争议的焦点与其他西方社会一样，关注的都是一些“后物质主义”的议题：个人的完全解放，消灭各种形式的歧视，支持性向、种族和文化——宗教方面的少数派群体构建“多样性”乃至自己的“身份政治”的权利。特朗普胜选之后，许多自由派人士反省，自己是不是忽视了

某些同样重要的东西：感同身受的能力，以及理解那些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的人的感受。

这部分美国社会，或者简单说就是“锈带”，如果民主党精心筹备选举的话，这部分人是可能争取的对象，它与南方诸州的那条长期支持共和党的“圣经带”完全不同。这两个地区都投了特朗普的票，这既是抗议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一次“文化反击”；既是物质发展上落后的美国人的一次呐喊，也是保守派美国人的一次起义，因为奥巴马时代就意味着对一切喜爱和珍视保守势力者的拒绝——这类保守思想中的一条就是：处于美国权力之巅的应该是一个白种男人，而不应该是非洲裔美国人或女人。希拉里·克林顿很爱鄙视这个向着特朗普欢呼的驳杂联盟，她把她竞争对手的一半追随者统称为“可悲之人”，这是她在整场选举中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这使得这群从长期看并非同心同德的人，彼此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11]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这场剧变发生之前，系统性地在宣传战场上出击的不但有像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这样的右翼电视台，还有专门在所谓的“社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的“回音室”内故意制造假新闻的运动——后者与独立的、具有批判性的媒体不同，它们专门影响某一被分割出来的用户群体。例如，在选战的“白热化阶段”，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英国大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帮助下，以专业的操控手法对非洲裔美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数字化“加工”——这群人因其固有特征而被认为是希拉里的潜在支持者。该手法是向这些人传播经过精心设计的、他们喜欢看的信息，促使他们抵制这场选举。这一电子操控手法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让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成为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警示标志——它警告人们，如果“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疏离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美国出现的趋势也会出现在其他地方。

在欧洲联盟的诸创始国，“建制派”的民主党派和大部分报纸，都与美国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媒体一样，难以理解美国的选举结果。11月9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用罕见的坦率言辞表达了她的担忧。她提醒，德国与美国因共同的价值观而联合在一起，其中包括民主、自由，无论一个人的出生地、宗教、性别、性取向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尊重此人的尊严，而且默克尔还提议“在这些基础之上”与特朗普紧密合作。对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评论说：还从没有一位当选总统需要这样的提醒。这份报纸还把德国女总理说成唐纳德·特朗普胜选之后“自由西方的最后捍卫者”。[12]

不过，在另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特朗普会听到满意和友好的声音。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对英美关系的这一新篇章感到高兴，他称这一关系

是“十年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联盟”。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把特朗普与自己为“非自由的民主”而进行的奋斗联系起来，他于11月9日称这是一个“大喜讯”，并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一直都还活着。”另外一份类似的格外热情的祝贺来自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Miloš Zeman），他也是早在选战期间就把宝押在了特朗普的党一边。

同样欢欣鼓舞的，还有西欧极右派的领导者们。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主席、总统候选人马琳·勒庞祝贺特朗普和“自由的美国人民”在11月8日的决定。荷兰自由党（PW）主席基尔特·威尔德斯评论说：“美国人民夺回了自己的国家。”特朗普的前辈、前英国独立党主席奈杰尔·法拉杰现在红得发紫，其所获殊荣是成了第一位受到“新当选总统”（President-elect）[13]接见的欧洲政治家。不久之后特朗普表示，希望英国人能让法拉杰成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令人惊讶的是，有一些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党派也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做出了积极评价。首先，称赞他的当选有利于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搞好关系。其次，也称他所宣布的大型投资项目将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德国左翼党的议会党团主席之一萨赫拉·瓦根内克特（Sahra Wagenknecht）在11月23日的德国联邦议院预算辩论中称，相比于大联盟的紧缩政策而言，这是一种更好的做法。[14]

这位“新当选总统”在选举之后所传递出的信息，只有一部分是用来平息他所引起的忧虑的。11月10日，与奥巴马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交谈之后，特朗普第一次表示了对这位现任总统的尊敬，称他是一个“好人”；他同时还表示不会完全废弃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而只是想修正它。几天之后，特朗普又谈到，他当总统后不会因“电子邮件事件”而起诉希拉里·克林顿，这一点在11月9日希拉里向他的胜选表示祝贺之后特朗普立刻就告诉她了。关于在靠墨西哥的边境建一面大墙的说法，他的表态也软化了：他说可能会在某些地点布置铁丝网。他也放低了关于驱逐非法入境者的态度，降低了预期数量。

这位当选总统在11月22日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视频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要退出《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即TTP，奥巴马已经签署，但国会尚未批准）；此外，他还明确重申了“美国优先”的根本原则。某些签约方，尤其是日本，对此表示震惊。许多人担心，接下来中国会全力取代美国刚刚放弃的亚太地区角色。

特朗普的第一批人事任命名单，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右”。他选了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担任首席战略顾问，此人在2016年夏天之前一直是投资银行高盛的高管，之后他成为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最重要的选战助手。同时，他还是激进民族主义网站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老板，该网站是一个超保守主义的茶党和极右的“另类右

翼”（Alternative Right，简称AltRight）的网络平台。几乎跟班农一样“右”的亚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JeffSessions），被特朗普选为司法部长。此人是坚决的反堕胎人士，还曾对种族主义组织“三K党”（Ku-Klux-Klan）表示过同情。安全顾问人选是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此人是一位退役的将军，普遍认为他是伊斯兰的敌人，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朋友。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身上同样贴着“非常非常右”的标签，这位国会议员兼超保守的茶党的代理人也是副总统迈克·彭斯极为信任的人。与上述人选相反，特朗普策略性地任命共和党主席莱因霍尔德·理查德·普里巴斯（Reinhold Richard Priebus）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白宫幕僚长，作为相对温和的共和党建制派的代表。

接下来，11月底的一些人事任命与特朗普在选战时期贬斥“建制派”的说法很不相符。将担任财政部长的是新当选总统多年的老朋友，曾在选战中担任财务总监的银行家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此人在高盛长期任高管，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将担任经济部长的是特朗普的另一位早期支持者，亿万富翁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此人的财富来自对纺织和钢铁企业的资产重组。教育部长的候选人贝齐·德沃（Betsy DeVos）也是一位亿万富翁，她非常保守并且推崇私立学校。交通运输部部长[15]应该会属于出生于中国台湾的赵小兰（Elaine Chao），她的丈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是共和党的参议院领袖。

对于国防部长和国务卿的任命会特别让人悬心。12月2日，“新当选总统”表示他决定让退役的四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绰号“疯狗”）执掌五角大楼。马蒂斯曾参加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后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被认为是具有战略头脑的保守派，但缺乏外交方面的经验。与特朗普在选战期间的言论不同，马蒂斯说他反对任何形式的酷刑。他的另一个与当选总统相左的观点是，他依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不过这两人一致认为伊朗不可信任，而且与德黑兰缔结的核协议靠不住。

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曾经一度被认为有望担任国务卿。然而，由于罗姆尼在选战中反对过特朗普，“新当选总统”的这一斟酌中的人选遭到了党内右翼的激烈反对，并最终作罢。12月13日，特朗普提名石油集团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的老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出任国务院未来的领导人。亿万富翁蒂勒森没有什么从政经验，但与俄罗斯和普京总统都有极好的关系，普京还曾在2013年因他为双边经济关系所做的贡献而授予他“友谊勋章”。对包括2008年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在内的一些共和党参议员而言，蒂勒森与俄罗斯之间的生意往来和他对西方对俄经济制裁的批评，都足以令人对这项任命的后果感到警

惕。此外，批评者还指出，即将举行的关于蒂勒森的参议院听证会的结果还尚不可知。欧洲联盟，而且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也有同样的忧虑：对那些感觉自己正受到俄罗斯侵略性政策威胁的国家而言，一个亲俄的美国总统再配上一个亲俄的国务卿实在是一个让人极为沮丧的组合。

但唐纳德·特朗普对这些看法无动于衷，而且他也不会让美国国内的批评扭转他亲俄的态度。中情局在12月初向新闻界透露，根据其情报，俄罗斯通过黑客攻击手段干预了美国大选，目的是诋毁民主党候选人，并帮助共和党候选人取胜。对此，特朗普指责驻外情报机构并不专业，他还提出：正是中情局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导致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而他，特朗普，作为总统无意定期接受情报机构提交例行报告。[16]

特朗普对俄罗斯显现得非常亲善，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就多少有点不怀好意。12月2日，这位新当选的总统与蔡英文通了电话。这是1996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Bob Dole）谋划的结果，多尔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台湾地区充当说客。特朗普心里清楚，他的这通电话打破了几十年的禁忌：他以此动摇了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自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宣布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来就已实施，并得到此后历任美国总统的遵循。

特朗普打算与北京在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上讨价还价。12月12日，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让美国继续遵循该政策，就需要“在其他方面达成交易”。他想表达的意思，首先是要中国降低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和其他课税——这个意图立即被中国领导人坚决地回绝了。与他对中国的公开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宣布将任命有亲华形象的艾奥瓦州共和党州长特里·布兰德斯塔德（Terry Brandstad）担任驻华大使——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位老朋友。批评家们不禁再次质疑这位未来的总统在政治上的判断力，不知道他和他身边的那些顾问究竟对美国总体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那个远东大国的关系的复杂程度是否有最基本的认识。[17]

这位“新当选总统”对中东问题更熟悉吗？看上去同样让人悬心。12月16日，特朗普宣布了他所设想的驻以色列大使人选：他的顾问、律师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此人是一个正统派犹太人，支持以色列在其所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政策。弗里德曼马上抓住特朗普在选战时的承诺，宣布他将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Tel Aviv）迁移到现在在法理上依然处于分治状态的耶路撒冷（Jerusalem）。此言一出，立刻受到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Netanjahu）为首的以色列右翼势力的热烈欢迎。而巴勒斯坦方面则由此判断，美国放弃了“两国方案”并且开始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于是，这位新总统还未上任，就撕开了中东冲

突中的一块伤疤。

到了2016年底，即将登场的特朗普内阁的社会成分已经一清二楚了：这是一个由亿万富翁、千万富翁、将军、经理人和银行家组成的政府。考虑到特朗普曾在选战期间对华尔街的痛斥，不由得让人对其中来自投资银行高盛的经理人比例之高而感到吃惊：除了首席顾问斯蒂芬·班农之外，还有首席经济顾问格雷·科恩（Gray Cohn）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事后看来，那些选战期间的民粹主义口号不过是存心虚晃一枪。美国多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像特朗普政府所组建的这么“资本主义”、这么“上流社会”的内阁了。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曾说要向建制派宣战，可现在看来，他只不过是用高度保守的建制派替换掉了那些自由主义的建制派。显然，特朗普合作者的政务经验是可有可无的。他所看重的，是能让经济实力增值的经验和执行军事命令的经验。

对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能出现混杂的危险，这位“新当选总统”没有显出丝毫担心。如果他选来担任国务卿的那个人要跟某些意欲挑战美国的国家打交道，而“此人的”公司正好在这些国家有巨额投资，那么他会如何行事呢？未来的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会做出违背银行界利益的决定吗？那可是他们“起家”的地方。

其实总统本人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他将他的猛犸集团的领导权以“毫无保留地信任”的方式托付给了他的三个儿子，但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这远不足以阻止公私利益的混杂。特朗普在众多国家有商业利益，这也让人有理由猜测，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这位总统的决策。在11月23日一次详尽的访谈中，《纽约时报》的编辑向特朗普提出了这些问题，特朗普说了很多，却难以让人信服。

2017年1月9日和11日，特朗普宣称他做出了两个决定（但却依旧算不上“建立可信形象的措施”）：第一个，任命他女儿伊万卡的丈夫、纽约地产商贾里德·库什纳为他的“高级顾问”（Senior Adviser）；第二个，把他的大集团公司“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sation）转变成一个基金会，并由他的儿子埃里克（Eric）和唐纳德（Donald）打理。特朗普承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不跟儿子们谈生意上的事；库什纳也表示，自己将完全从他的公司经营之中退出。但是，这些口头承诺并不能消除人们对生活中实际情况的怀疑。特朗普及其部长们未能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与美国的政治利益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这将是新一届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18]

在白宫进行权力交接前的最后一周里，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由尚在任总统和新当选总统构成的“双头统治”。早在在任总统与大选的胜利者在对华政策方面各行其是的时候，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了。但在任总统并不亏欠其继任者任何东西。12月20日，为了防止唐纳德·特朗普的能源政策

可以预见的对环境的破坏，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总统行政令，禁止在阿拉斯加的近海水域进行原油钻探——对于这项措施，他可以从艾森豪威尔时代颁布的一项法令［1953年通过《外大陆架土地法》（Outer Continental Shelf Lands Act）］得到支持。但很明显，特朗普将竭尽全力让这一措施失效。

还有一件更令人吃惊的事：对联合国安理会12月23日的一项敦促以色列中止在其占领的地区实施移民政策的决议，奥巴马放弃对其行使否决权。这份决议案最初是由埃及发起的，但在特朗普与埃及的塞西（Sisi）总统通电话之后，埃及又撤回了提案，而安理会的其他几个成员国（马来西亚、塞内加尔、新西兰和委内瑞拉）又重新发起提案。

这是美国第一次在面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时放弃行使否决权，而且也是安理会表决时唯一一个投弃权票的国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国务卿克里长期以来所捍卫的路线。这位国务院的领导人在12月28日用一篇讨论原则问题的演讲强化了该决议的内容，在演讲中他特意告诫以色列：应从自身利益考虑，在“两国方案”的框架下致力于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而不是继续制造冲突。特朗普的反应却显示出这个分裂的政府即将转变路线——他在推特上要以色列保持“强硬”并等待自己的任期到来。

同样，这位“新当选总统”也明确表示不赞成奥巴马12月29日做出的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决定，奥巴马此举是为了报复人们所猜测的俄罗斯在总统大选期间对美实施的黑客攻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本已声称要用驱逐美国外交官的方式实施报复（这也是各方意料之中的事），但被普京叫停了。这位俄罗斯总统这时把希望完全放在了公开怀疑黑客攻击是俄罗斯所为的特朗普身上，而特朗普也正好可以把普京的克制反应当作自身政治智慧的明证。

2017年1月6日，美国的情报部门拿出了关于大选中黑客对民主党实施攻击的最终报告。报告基本证实，攻击的发起者来自俄罗斯的最高层，也就是说来自普京。报告称，普京的目的是降低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的机会，并帮助共和党候选人获胜。尽管特朗普在此前一直怀疑俄罗斯干预大选的真实性，并且为此还曾引用维基解密创立者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话，他现在也只得承认或许有过这样的尝试，但依然称这些尝试对大选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对于这件事，他说他的对手们发动了一场“政治猎巫”[19]。

在外贸政策领域，特朗普表现得好像他已经是在任总统。他要求像通用和福特这样的美国汽车集团不要到墨西哥开设新厂，并要把相应的工厂设在美国。他威胁，如果这些公司拒绝这样做，他将对从墨西哥进口的小轿车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在福特公司那里，这位新当选总统的施压奏效了：

福特放弃了在墨西哥建厂的计划，承诺转而在美国追加投资。事实上，这次结构调整本已计划了很长时间。

1月6日，特朗普又搞了个大新闻：他像往常一样，在推特上用最后通牒式的口吻要求日本的丰田汽车集团不要按原定意图在墨西哥投资，而应该到美国投资。结果，丰田马上推掉了自己在墨西哥投资的修改方案，并宣布要在美国新投资100亿美元。从意大利与美国合资的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集团那里，人们听到消息，该集团正在酝酿大力削减自身在墨西哥的汽车产量，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完全停产。

对美国的这个拉丁美洲邻居而言，特朗普的这些威胁是致命的。多年来，墨西哥一直深陷在与毒枭们内战般的斗争之中；该国因为严重的腐败丑闻和最近一段时间内席卷全国的抗议汽油涨价运动而动荡不已；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个国家现在是一个“正在走向失败的国家”。墨西哥的货币“比索”（Peso）一直在贬值：从特朗普2016年11月8日胜选到2017年1月10日，已经跌了16%。如果特朗普将他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民族主义设想完全贯彻下去，那么墨西哥迟早都会迎来一场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崩溃——最终，这对与之比邻而居的美国而言也将是一场噩梦。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长期后果在2017年初已经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美国优先”这一口号所带来的路线方针，不仅会重创美国的贸易伙伴和世界经济，连美国自己也将深受其害。墨西哥这个案例就是不祥之兆：根据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ashingtoner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研究，2011年墨西哥的工厂在生产中使用了1400亿美元的来自美国的零部件，与此对应的是，美国的工人在生产中使用了1110亿美元进口墨西哥的零部件。威尔逊中心的结论是，如果美国突然中断与墨西哥的贸易，将损失约50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首都的另外一家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估算结果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每年使20.3万个工作岗位被转移至墨西哥，但同时也在美国创造18.8万个就业岗位。总之，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

1月11日，纽约那栋特朗普大厦的大厅内被无数面美国国旗装饰了起来，特朗普在这里召开了他早就（从2016年7月起）说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除了把个人商业利益与总统职位切割开来的话题之外，他还不得不详细回应数小时之前刚刚爆出的新闻：据说俄罗斯的情报机构为了败坏他的名声收集了一些材料，并且随时可能把它们透露出去。其中包括2013年11月莫斯科一家宾馆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采集的特朗普的录像，当时特朗普正为了他发起的环球小姐竞选而奔走；此外他还谈到了灰色的商业活动，以及特别引人瞩目的新闻：据称他的总统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特务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与这些新闻相关的还有前英国特工克里斯托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的报告，此人在俄罗斯的情报圈子内有很多人脉，而且在他的美国同行那里也有很高的声望。给他布置任务的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对手——因为特朗普以前是民主党人。美国的情报部门觉得自己无力验证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不过也会足够认真地对待它们，以便在1月初向奥巴马、特朗普和其他8名重要的国会议员报告。至于媒体是如何打听到这份报告的，还不得而知。

在谈到这些“假新闻”时，特朗普一直怒不可遏。他说，要是美国的情报部门让这份报告泄露出来，那就是一种人们在纳粹德国时代见识过的污蔑伎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还谈到了他要在靠墨西哥的边境上修墙的想法，而且指出不管以什么方式，这修墙的经费都必须由墨西哥来承担。他尖锐批评了美国的制药公司，因为在过去的一些年里，这些公司通过跨国并购将自己法律上的注册地址改到了国外；他要求这些制药企业迁回美国，由此在新闻发布会举行之时就在股票市场上给全世界的制药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关于对俄关系，他表示，如果普京喜欢他唐纳德·特朗普，那对美国而言也不是一个劣势，而是一个优势。他说，像2016年大选期间那样的由克里姆林宫操纵的黑客攻击以后不会再有了，因为在他特朗普执政之后，普京会重新开始尊重美国。

在国内问题方面，这位“新当选总统”将奥巴马引入的医疗保险（“奥巴马医保”）称之为他不得不尽快终结的一场“灾难”。但他对此却没有更详细的阐述，同样暂付阙如的是他对经济政策的具体想法。传统上，以前的总统都会公开自己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但特朗普却拒绝这样做，他的理由是除了记者没人会关心这些东西。在无数到场支持者的欢呼声中，他拒绝给予那些来自批评他的媒体（比如世界知名的CNN电视台）的记者提问的机会。那些曾经期待特朗普有能力在上任之后把选战中的那一套抛诸脑后的人，现在失望了：1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让美国和全世界看到了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之后将会呈现出的样子。

就其继任者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天晚上，巴拉克·奥巴马在他的政治故乡芝加哥与自己的支持者们告别。理所当然地，他在总结其8年任期时给出了正面评价。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提到，当美国和世界在2008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他成功地与之进行了斗争；除掉了全世界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他提到了与伊朗签订核协议的重要意义，与古巴关系的缓和，以及大量减少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他提及了他的医疗改革，并声称他会公开支持一切改进“奥巴马医保”的建设性意见。他传递给下一任总统的信息是：不要把每一个经济问题都视为在工作的白人中产阶级与苟且偷生的少数族裔之间的斗争，这样做会危害社会的凝聚力。

“是的，我们办到了”——奥巴马对着鼓掌欢呼的人群呼喊，这回应了他2008年的竞选口号“是的，我们可以”，这也让人暂时忘记了那些他没有办成的事情：他承诺过要关闭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但被国会阻挠了；整体上，他没能为中东带来和平，特别是没能平息巴以之间的冲突；他也没有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这一分裂在2016年的大选中显露无遗。在芝加哥，奥巴马也没有提到他那些错误的决定：比如2011年过快地从伊拉克撤出了几乎全部军队；同年，在没有准备好后续方案的情况下，临时决定干涉利比亚；还有，2012年8月他向叙利亚的阿萨德发出警告，令其不要跨过使用毒气的“红线”——这个警告被阿萨德无视了，但奥巴马什么也没有做。

不过，尽管他在有些方面失败了，但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第44任总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对许多人而言，这些事在其任期开始时已经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他在全世界面前显现出，美国并非只有他的前任总统小布什展现出的那般帝国主义的傲慢模样，美国还有另外一面，在那一面里有1776年建国者的理想——不可剥夺的人权、法治和“制衡”的分权体制。至于说他的后继者，那个被选举人团于2016年12月19日选定的人，是否还能在某种程度上珍视这些西方共同的根本价值，就只有天知道了。正因为如此，许多观察家事先就将奥巴马与特朗普之间的权力交接视为美国历史——其实也是整个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1]

1月10日之后，特朗普所任命的各部部长和其他重要岗位的候选人，都必须在参议院的相关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让参议员们和在电视上旁观“听证”的公众们感到吃惊的是，大多数候选人都与特朗普在选战中的（而且在那之后依然坚持的）立场保持了明显的距离。被任命为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勒森，竭力摆脱他在人们眼中的是“普京通”的这个并无贬义的印象。尽管他还是不愿意把普京归类为“战争罪犯”，但他承认俄罗斯在叙利亚轰炸平民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国际法。

蒂勒森把俄罗斯称作美国的“威胁”，并且认为吞并克里米亚是非法的。他说，俄罗斯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作为国务卿，他不会放纵俄罗斯的扩张企图。欧洲盟友们对俄罗斯的担心是合理的，在北约的框架内，美国所承担的共同防御的义务是无可置疑的。

有望执掌五角大楼的曾经的将军詹姆斯·马蒂斯指责普京意欲分裂北约。虽然他与特朗普一样认为与俄罗斯合作是必要的，但也认为一旦美国进入不可能与俄罗斯合作的领域，也只能与之对抗。最重要的是，认清美国所要打交道的普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面对俄罗斯，有必要采取一种威慑政策。美国政府必须准备好，在出现相应情况时与盟友们一起采取外交乃至军事措施。

其他的候选人也纷纷试图与未来的总统拉开距离。应该会担任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反对特朗普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要求。同样，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的迈克·蓬佩奥拒绝应用“坐水凳”（Waterboarding）[22]这类手段来对付恐怖主义，这就与特朗普此前的暧昧说法产生了矛盾。特别引起关注的是，未来的国土安全部部长，曾经的将军约翰·凯利（John Kelly），他说在靠墨西哥的边境建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并不能阻止非法入境。

由特朗普选出的这些未来的同事在听证会上所显示出的意见分歧，对这位“新当选总统”来说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很明显，当他公布这些人事任命时，他并不知道这类分歧的存在。现在，人们知道，他与蒂勒森在此前从未谈过俄罗斯问题。就算这些候选人的许多表述只是战术性的动作，为的是让那些参议员放心，但出现这种情况仍然预示着：在这届新政府中，总统与政府成员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一个行政机构能统一行动所必需的。

特朗普试图对这些分歧轻描淡写：他说他的同事都是独立的人，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一定是他的观点；如果出现疑问，他们可以给他打电话。但他难以消除的印象是：他的众多决定缺乏系统性的准备，并且没有取得必需的基本共识。正像他的无数对手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他真的是个政治门外汉。所谓的无与伦比的个性，只是唐纳德·特朗普自己无限的自负：这个发现足以令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感到不安。

如果还需要什么来证明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本来就不愿意当“政客”，乃至“政治家”的话，那么1月16日见报的，他所同时接受的英国《泰晤士报》和德国《图片报》的采访又是一个证据。他称北约是“陈腐”的，又说它现在还是很重要的。他指责北约在反恐斗争上不利，还说（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欧洲的这些盟友对自己的防御做得太少，其生存依赖美国的付出。他高度评价英国的脱欧，甚至显露出他将欢迎其他国家效仿英国的做法；至于欧盟是合是散，他完全无所谓。尽管特朗普说他很尊敬（个人还很喜欢）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但他把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称作灾难性的错误；同时他还威胁，如果像宝马这样的德国汽车公司把准备卖到美国市场的汽车放到墨西哥去生产，就将对其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在谈到他未来的那些部长在诸多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时，他觉得那是小事一桩。显然，他确信即便出现游移不定的情况，总统的意志也一定会贯彻下去。[23]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宣誓，之后的就职演说意图不在于和解，而在于推进政治极化。这场演说听上去完全不像是“总统的”口气，却仿佛是选战的延续。新总统在这篇不长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篇幅去攻击上一届政府的政策。他说华盛顿的一个小集团用美国人民的血汗

发家致富了，而且从来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使权力。现在他特朗普来了，将会把权力归还给美国人民，归还给那些“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在一切领域，都会遵循“美国优先”的口号。他说美国过去让其他国家富裕了起来，却忽视了自身的发展。从现在起，美国将拿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强化自己的边界。

特朗普呼吁他的同胞购买美国货，并且只雇用美国人。美国将不再允许其他国家把国防责任转嫁给美国，为此他还威胁要撤回美国士兵。他宣布，要把恐怖分子从地球上消灭掉，却没有谈包括对俄关系在内的外交问题。他心目中的听众是且仅是他的选民。对这位总统而言，另外一个美国仿佛并不存在，而且他对其他国家也不感兴趣，除非这些国家要么在他看来会威胁到美国，要么在剥削美国，要么有机会跟美国达成一笔“交易”。

成百上千的支持者热情地向着特朗普欢呼。但航拍显示，聚集在国家广场前的人，比8年前巴拉克·奥巴马就职时要少得多。当美国媒体公布这一事实时，特朗普指责这是虚假的报道。他在1月21日在中情局总部演讲时还说，他陷入了与媒体的“战争”之中，而且记者绝对是世界上最不体面的一群人。他的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声称，还从未有一位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有如此大规模的公众参加；他威胁那些对此持异议的媒体将为此而付出代价。特朗普的女顾问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面对一位言及此事的记者时，用“另类事实”一词来为新闻发言人辩护。

特朗普的国内的反对者在1月20日星期五和接下来的周末也出现在了华盛顿，而且其人数比特朗普的支持者明显多得多。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和平示威，但有时也使用暴力。他们以此来反对那个被少数美国人选上美国最高权力宝座的人——也因此使他成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这些反对者并不把特朗普看作“他们的”总统。在其他美国大城市，以及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也都借着白宫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时间点举行反对特朗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而且在他就职演说的次日，抗议尤为众多：因为1月21日这天妇女联盟呼吁全世界抗议这位出了名的反对女权的总统。

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对这位新总统首次演讲的反应要么是显露出不快的沉默，要么是冷淡的客套。真正欣喜若狂的，只有那些欧洲的右翼党派，他们的党魁（法国的马琳·勒庞、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德国的弗劳克·彼得里）于1月21日出席了在科布伦茨（Koblenz）举行的民族主义者大会。他们欢庆特朗普的美利坚民族主义为欧洲诸民族树立了榜样。

特朗普在他履职第一天所推行的政策与美国一直以来的政策之间的裂痕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国会山的演讲，没有一个字谈到不可剥夺的人权，而这

正是美国在1776年立国的标志。特朗普没有谈到任何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责任和美国应对其欧洲盟友以及全世界的自由之友所尽的义务。对理解总统的施政方针而言，他保持沉默的部分与他大声说出的部分一样显著。

在伍德罗·威尔逊治下的美国于“一战”后介入欧洲并为中欧的民主铺平道路百年之后，美国第45任总统对本国与欧洲民主国家出于内部理念而结成的最紧密的同盟明显不感兴趣。美国1945年之后的政策使之与欧洲之间结成的种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对特朗普而言显然毫无意义。在他看来，一个分裂的欧洲比一个统一的欧洲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他眼里，能与之平等交流的伙伴并不是大西洋彼岸的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而是想象中的那些执掌大国的强人——俄罗斯的普京算是头一个。当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新的、充满冲突的时代到来时，欧洲可要小心了。[24]

---

[1] Jeffrey Goldberg, Te Obama Doctrine, in: *The Atlantic 317* (2016), No. 3 (April),S. 70-91.

[2] “跛脚鸭”指任期将满又不再参与下届竞选的政治家（也包括国会）在临近任期结束时的状态，在此期间此类人员或机构的政治能力将大打折扣。

[3] Jeffrey Goldberg, Te Obama Doctrine, 88.

[4] 达比克之说带有神话色彩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在《言行录》（Hadith，又称《圣训》）中预言，达比克将成为世界末日到来前穆斯林“哈里发国”大军与非穆斯林之间一场大战的战场。正因为如此，“伊斯兰国”（IS）的官方月刊也被命名为《达比克》。

[5] 美国更倾向于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ISDS）来解决贸易纠纷。该机制颠覆了传统国际法上争端解决程序仅适用于国家之间纠纷的惯例，如果外国投资者的权益遭受东道国不法措施的侵害，将不再只能寻求母国的外交保护，而是能作为争端一方与东道国在仲裁庭对簿公堂。欧盟不愿意承认该机制的适用性，要求用新的司法体系（比如专门法院）解决贸易纠纷。

[6] 此处的原文是“克林顿”而不是“希拉里”（除非格外想显示“亲热”，西方人在正式场合一般称姓不称名），但考虑到中文世界已经习惯用“克林顿”代指“比尔·克林顿”，用“希拉里”代指“希拉里·克林顿”，译文还是依此习惯进行了改动，下同。

[7] Ronald Brownstein and Leah Askarinam, The Tipping Points of the 2016 Election, in: *The Atlantic,* 25. 10.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

archive/2016/10/the-tipping-points-of-the-2016-electio n/505238/; Nikolaus Piper, Kurzer Boom mit Langzeitschäden,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72 (2017),Nr. 1 (Januar/Februar), S. 14-19. Zum Werdegang von Donald Trump: David Cay Johnston, *Die Akte Trump* (amerik. Orig.: Brooklyn, New York 2016), Wels bei Salzburg 2016. 关于《跨太平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全面经济贸易协定》见本书原文第219页前后。

[8]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R.,* New York 1955, S. 35ff. (62); Ronald F.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Harvard Kennedy School. RWP 16-026, August 2016. 关于反新政运动，参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2: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 1945,* München 2016³, S. 650 ff.; 关于乔治·华莱士，参见ders.,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3: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6², S. 517 f。

[9] Michael C. Dorf, Does Trump Express What Republicans Secretly Think? http://www.newsweek.com/does-trump-express-what-republicans-secretlythink-510958;Michael Kazin, Crowd Pleaser, in: *The New York Times,* 27. 3. 16.

[10] “杰利蝾螈”是一个源自美国的政治术语。181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将某一选区划分成不寻常的蝾螈（salamander）状，以让民主共和党得胜。格里的政敌于是将格里（Gerry）与蝾螈的字尾（mander）组合成“gerrymandering”，用来影射为照顾党派利益，不公平划分选区的方式。参见维基百科相关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2%91%E5%88%A9%E8%A0%91%E8%9E%88，引用日期：2018年11月11日。

[11] Amanda Taub, Behind the Gathering Turmoil, a Crisis of White Identi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2. 11. 2016; Mark Lilla, 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in: ebd., 20. 11.2016; Winand von Petersdorf, Das Paradox von Iowa und Michiga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11. 2016; Gunnar Heinsohn, Der weiße Arbeiter wählte Trump, ebd., 19. 11. 2016; Ijoma Mangold, Die liberale Gesellschaft und die irre Suche nach ihren Freunden, in: *Die Zeit,* Nr. 50, 1. 12. 2016. Zu Clintons Äußerung über die«erbärmlichen» Anhänger Trumps: George Friedmann, Die Rache der Erbärmlichen,in: *Cicero*, Heft 12 (Dezember), 2016, S. 19-22.

[12] Robert Birnbaum, Das politische Berlin hat es kalt erwischt, in: *Der Tagesspiegel,* 10.11. 2016（默克尔的话出自此文）；The World Waits and Wonders About Donald Trump, in: *New York* Times, 11. 11. 2016; As Obama Exits World Stage, Angela Merkel May Be the Liberal West's Last Defender, ebd., 12. 11. 2016。

[13] “President-elect”指的是新近胜选，但尚未就任的美国总统。

[14] Die Zitate von Orbán, Le Pen und Wilders nach Spiegel Online, *Zeit Online,* 9. 11. 2016, von Johnson nach BBC News UK, 9. 11. 2016. Wagenknechts Rede vom 23. 11. 2016 in: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8. Wahlperiode,202. Sitzung, S. 20159-20165.

[15] 此处的原文是“基础建设部部长”（Ministerin für Infrastruktur），但若是根据英文“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原名应该译为“交通运输部部长”。

[16] Michael M. Grynbaum and John Herrman, Breitbart Gains Voice in White House,in: *The New York Times,* 14. 11. 2016; David Nakamura and Greg Miller, Trump,CIA on collision course over Russia's role in U. S. election, in: *The Washington Post,* 10. 12.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cia-oncollision-course-over-russias-role-in-us-election/2016/12/10/ad01556c-bf0111e6-91ee 1adddfe36cbe_story.html?utm_term=.6f.c898bbd0b3; Winand von Petersdorff, Trumps Mann fürs Finanzministerium,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Zeitung,* 1. 12. 2016; Kerstin Kohlenberg, Die dunkle Seite der Macht, in: *Die Zeit,*Nr. 48, 17. 11. 2016.

[17] Julie Hirschfeld Davis and Eric Lipton, Dole was Agent for Taiwan Aides in Trump's Call, in: *The New York Times,* 14. 11. 2016; Petra Kolonka, Was kostet ein China?,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3. 12. 2016; Peking: Amerika muss bei der Ein-China-Politik bleiben, ebd.

[18] Die Interessen des Donald Trump,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6. 11.2016; Hubert Welzel, Drei parallele Univers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9. 11.2016; Donald Trump's New York Times Interview: Full Transcript, 23. 11. 2016.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3/us/politics/trumpnew-york-times-interviewtranscript. html.

[19] 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中，“猎巫”指的是“政治迫害”：因政治或道德上的偏见而搜索和指控与本群体有差异的人，而且如同历史上的猎巫一般以成见和不公

正对待被指控的人。

[20] Putins Gespür für Donald Trump,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4.12. 2016; Sicherheitsrat fordert Ende des Siedlungsbaus, ebd., 24. 12. 2016;Mexiko sucht Dialog mit Trump, ebd., 6. 1. 2017; Kursverluste bei Toyota nach Trumps Twitter-Meldung, ebd., 7. 1. 2017; Geheimdienste bekräftigen Moskaus Verantwortung für Hackerangriffe, ebd.; Julian Hass, Schlag und Gegenschlag, in:*Süddeutsche Zeitung,* 24. 12. 2016; Peter Münch, Verflossene Freundschaft, ebd., 29. 12. 2016; Stephan Radomsky, Michigang statt Mexiko, ebd., 4. 1. 2017; Tomas Fromm, Trumps Twitter-Ökonomie, ebd., 5. 1. 2017; Tomas Seibert, Trumps Nebenregierung, in: *Der Tagesspiegel,* 3012.2016; Christoph von Marschall,Obama errichtet Verteidigungsgräben, ebd., 3. 1. 2017.

[21] Donald Trump's New's Conference: Full transcript and Video.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11/us/politics/trump-press-conference-transcript.html;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Farewell Addres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ce/2017/01/10/remarks-president-farewelladdress (Obama,Chicago, 10. 1. 2017); Hubert Wetzel, Goldene Zeit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12. 1. 2017; Tobias Matern, Das Ende vom Ziel, ebd.; Hubert Wetzel u. a.,#Fuck You Very Much, ebd., 13. 1. 2017; Trump: Russland steckt hinter den Hackerangriff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 1. 2017; Andreas Ross,Konspiratives Kompromatkonvulut, ebd.; Trumps Rede schickt nicht nur den Peso auf Talfahrt, ebd., 13. 1. 2017; Matthias Rüb, Das Land hinter der Mauer, ebd.

[22] “坐水凳”是水刑的一种。拷问者会让被拷问者躺在一张脚部略高于头部的长凳上并固定其双手双脚，然后在被拷问者的头部盖上布，接着在其头部持续浇水，如此会让被拷问者产生溺水的错觉而心生恐惧。“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中情局曾多次使用此方法审问基地组织成员。

[23] Andreas Ross, Alle gegen Trump,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4. 1. 2017;Sacha Batthany, Soviel Distanz wie möglich,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4. 1. 2017.Das Doppelinterview von Donald Trump mit Michael Gove und Kai Dieckmann,in: *The Sunday Times,* 15. 1. 2017, *Bild,* 16. 1. 2017.

[24] Te Inaugural Address. https://www.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 Marc Fischer, A sharp break with the past, as well as his party, in: *The Washington Post,*21. 1. 2017; What President Trump Doesn't Get About America, in: *The New York Times,* 21. 1. 2017; Trump's missed opportunity, in: *The Boston*

Globe, 21. 1.2017; Max Boots, Pax Americana on its last legs, in: *The Los Angeles Times,* 22. 1.2017; Bertram Eisenhauer, Der Siegertyp,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1. 2017; Trump beschwört den Protektionismus, ebd.

第12章

欧盟会崩溃吗？

2009年9月11日，克罗地亚举行了10个月内的第二场大选。6月，执政的中右翼联盟（Mitte-Rechts-Koalition）发生分裂，从而导致议会选举提前举行。在此次选举中，以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Kroatische Demokratische Gemeinschaft，缩写为HDZ，以下简称“民共体”）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保守阵营赢得了61席，明显领先于社会民主党人领军的国民阵营，后者只拿到了54席。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民共体会再次与温和保守的改革党派克桥党组成执政联盟。民共体此时的党魁是安德烈·普连科维奇，人们普遍认为他比他主张民粹主义的前任托米斯拉夫·卡拉马尔科（Tomislav Karamarko）显得温和一些。然而，现在要说克罗地亚整体上已回归“中间路线”还为时过早。曾担任过文化部长的兹拉特科·哈桑贝戈维奇（Zlatko Hasanbegović）还在该党的主席团中，这可是一个极端的、亲法西斯主义的和可疑的民族主义者。况且，即便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曾担任过总理的佐兰·米拉诺维奇（Zoran Milanović），也在选战中使用了大量极端民族主义的攻击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的口号。

大选结束约4周之后，新的政治联盟“成立”了。除了民共体和克桥党的议员之外，联盟中还有克罗地亚农民党（HSS）和少数民族的议员，这样一来，该联盟应该可以取得稳定的议会多数。10月20日，这个联盟把普连科维奇选为总理；这甚至是克罗地亚1991年宣布独立以来所出现的最大规模的议会多数。与之前的政府不同，这届内阁中不再有极端民族主义者。由兹拉特科·哈桑贝戈维奇这样的右翼所鼓吹和推动的文化斗争，显然已经告一段落。普连科维奇甚至在1月底宣布，他的政府将立场坚定地批判法西斯主义的乌斯塔沙政权（Ustascha-Regime）[1]——在此之前，这个犯下了累累罪行的政权还没有被彻底清算过，而且哈桑贝戈维奇还曾为之辩护。由此可见，克罗地亚没有滑向那个“非自由的民主”的阵营。对欧盟而言，来自萨格勒布（Zagreb）[2]的消息基本上是正面的。[3]

在另外一个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2016年9月因在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简称RS）[4]举行的分裂性公投引起了舆论的瞩目。根据1995年的《代顿协议》（Abkommen von Dayton），这个主要由塞尔维亚人居住的部分国家“实体”中，占有新成立

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49%的领土（剩下的领土分给了由波斯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统治的波黑联邦）。9月25日，塞族共和国按照政府和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总理的意愿举行了全民公决，公决需处理的问题是：今后是否把每年的1月9日命名为“塞族共和国日”并且举行庆祝。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全国宪法法院称这次公投违宪，因为所选择的这个日期会让人想起1992年1月9日非法成立的塞族共和国，以及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那场血腥的“种族清洗”，而且还会因此对本国的其他民族构成歧视。尽管如此，塞族共和国的政府和议会还是冲破禁令：公投的参与者们（投票率为55.8%）几乎以全票通过（99.8%）的形式批准了这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宣示。他们这样投票，最终意味着塞族共和国与这个小小的多民族国家的决裂；而且这也违背了“代顿精神”——要知道，正是靠着这一精神才有可能在21年前终结那场发生在20世纪末欧洲的可怕内战。公投的时间点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投票是为下周日（10月2日）举行的地区选举做动员。这天，到处都能看到民族主义团体，不仅在塞族共和国是这样，而且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人的那部分国家“实体”中也是这样。[5]

在一周之后的2016年10月2日，举行了另一场远比塞族共和国的公投更加吸引欧洲媒体瞩目的公投。在匈牙利，维克多·欧尔班政府让国民就以下问题投票：“您是否愿意让欧盟拥有如下权利：即使在我国议会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把非匈牙利公民强制性地分配到我国定居？”在匈牙利，多数人的意见结果其实是毫无悬念的。各种民调都显示，80%以上的人反对承担接纳移民的义务。因此，这次公投只不过是为了给政府的政策加上民意的背书，同时也是展示给欧洲其他国家的反移民势力的一个信号。

所以在10月2日的公投中，有98%的投票者按维克多·欧尔班的意思选了“不”也就丝毫不让人惊讶了；然而，尽管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宣传，还是没能让公投的投票率超过宪法所规定的50%的门槛——这倒让人很意外。由于仅有43.3%有投票权的人走向投票箱，这次公投失败了。欧尔班试图淡化这场失败并且忽略这个让人失望的结果，依旧宣布按照多数意愿添加宪法修正案。可以肯定的是，匈牙利政府不会改变反对移民（特别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的立场。不过，此事还是让这位心高气傲的总理丢了不少面子。在欧洲联盟，人们也因此而感到一丝宽慰：匈牙利人毕竟没有让维克多·欧尔班的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

对这位总理而言，下一个失败也接踵而至：11月8日，政府要求按照那场已经失败的公投来修改宪法的提案，以2票之差未能达到修宪所必须达到的三分之二多数；其提案的内容是限制欧盟向匈牙利分派非欧盟公民的移

民。欧尔班本来指望激进右翼党派尤比克党（Jobbik）[6]会投赞成票，但该党主席沃纳·加博尔（Vona Gábor）却反过来要求政府保证将来不再向任何富有的外国人发放居留许可，即使这些人愿意购买匈牙利的国债券。由于欧尔班不愿做出这一让步，尤比克党与左翼反对党反对这个宪法修正案，哪怕该法案“本身”是完全符合激进右翼心意的。

当然，这样的打击对欧尔班来说算不了什么。2016年匈牙利人所经历的可不是只有政府的失败，还经历了一场新的管制过程，对它除了“更加严酷的舆论一致化”（Gleichschaltung）[7]之外无可形容。欧尔班政府已经将一连串私人媒体纳入政府控制的企业手中，连此前一直属于外国投资者的媒体也不例外。

这一个过程的高潮是《人民自由报》（*Népszabadság*）的关停。这份发行量最大的跨区域报纸原是共产党机关报，1990年之后成了独立的左翼自由派报纸，而且一再揭露政治丑闻。由于读者群一再缩减，这份报纸最终成了控股方瑞士荣格出版社（Verlagshaus Ringier）手中的亏本买卖。在一场冗长的谈判之后，该报被卖给了一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寡头，后者于2016年10月8日将它关停。关于此事，从欧盟委员会那里得不到任何信息，似乎人们对此并不关心，也不曾留意过事态的发展。[8]

同样，欧盟面对波兰不断瓦解的法治也束手无策。2016年10月14日，欧洲委员会下属的威尼斯委员会拿出了一份关于波兰宪法法院冲突的新报告。该报告称，尽管波兰下议院新通过的宪法法院改革法案在某些地方比2015年12月22日的初稿要好一些，但其中的一些规定依然明显违背了法治的原则。比如该法案规定，在有争议的案件中，只要（15位法官中的）4位法官就可以行使否决权，让案件推迟6个月再审。而且，司法部长还可以直接用缺席的方式阻挠法庭运转。委员会报告提到的另一条款，使该法案有可能让总理在选举宪法法院院长时发挥决定性作用。[9]

10月27日，欧盟委员会于7月27日就此事向波兰政府发出的为期3个月的最后通牒已经到期了。然而在一周之后，专门负责法治问题的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只是在采访中用加以警告的方式附带提及了波兰的问题。这就给波兰政府总理贝娅塔·希德沃壮了胆，让她敢于继续推动波兰向“非自由的民主”方向转型。

新的《游行示威法》就是这类努力之一，它规定在一日之内只能有一个团体举行示威活动，而且教会和国家机构还拥有优先权，哪怕它们登记得晚一些。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可以用这个办法阻止任何不讨自己喜欢的抗议活动。民主运动人士和反对党号召大家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12月13日举行抗议集会——此日正值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实施戒严

35周年。[10]全国有数千人响应了这一号召，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无力阻止该法案通过。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继续按自己的意愿改造宪法法院。按照该法案，一旦现任宪法法院院长的位置空缺，将不再像之前规定的那样在选出新院长之前由副院长代行其职责，而是由高级司法和律政机构任职时间最长的法官代理。其意图十分明显：现在那位坚定的自由派院长安杰伊·热普林斯基将于2016年12月退休，接任者将不再是他（同属自由派）的副手，而是一位在2015年底由法公党占据多数的波兰下议院推选出的女法官尤利娅·普日文布斯卡（Julia Przyłębska）。而且，估计这位法官还会让另外3位去年12月占据议会多数的政府违反当时法律选出的法官（“备选者”）参与审判，而这些人在热普林斯基当主席时是根本没有参与权的。事情若如卡钦斯基阵营所计划的那般发展下去，那么亲法公党的法官就会由4位增加到7位。这虽然还未占据多数，但通过进一步修改法案，以后应该只要（15人中的）5位法官就足以向总理建议法院院长的人选。

12月14日，弗兰斯·蒂默曼斯在欧洲议会就波兰的新情况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该国的状况并未改善；新通过的7个规定会激化“法治危机”；若要强化民主，议会中的多数派应该认识到法治的边界所在。可直到这一天，蒂默曼斯依然没有讲明，波兰领导人如此违背法治的根本原则，究竟会引发委员会采取怎样的措施。

蒂默曼斯的这番讲话刚过去两天，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党就显示出他们对这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告诫有多么不屑一顾。12月16日，波兰下议院不但通过了2017年的财政预算，而且还通过了多数派政府提出的一项法案，旨在限制对议会活动的自由报道。以后，对于国民代表辩论的声、像报道只能通过由政府控制的内部电视频道进行，而且报道不能直接在下议院进行，而必须去另外的“媒体中心”，这样就限制了记者与议员或部长的联系。

反对党议员和在场的媒体代表共同抗议这一新的压迫行径；愤怒的议员们占领了讲台和主席台，示威者们把下议院大楼占据了好几个小时，当局不得不出动大量警察以中止他们的阻挠活动。而与此同时，占据议会多数的法公党离开了被反对党占领的议会大厅，在另一个大厅中通过了2017年预算案——这是一次挑衅，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不合法。为此，反对党议员请求总统杜达斡旋多数党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争端。12月20日，占据多数的法公党撤回了关于议会报道新办法的提案，但依然坚持在反常状态下通过的预算案的有效性。对于这一挑战，自由派反对党现代党和公民论坛宣布，它们将把从12月16日开始的对议会大厅的“占领”坚持下去，直到2017年1月11日下一次例行会议开幕。

在此前一天，执政党在自己最关心的控制宪法法院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当现任院长安杰伊·热普林斯基因年龄于12月19日退休之后，执政党将有希望在不久之后把这个波兰最高等级的法院变成有利于推行本党政策的工具。总统杜达在此期间已经按照占据议会多数的法公党的新决议，任命受政府操控的女法官尤利娅·普日文布斯卡为院长。

如果卡钦斯基和他的政治伙伴们曾相信欧盟现在会对波兰的宪法冲突袖手旁观的话，那么他们在12月21日可是领到了教训。欧盟委员会由其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出面向波兰宣布了一个于2017年2月21日到期的新“解释期限”。他说，尽管7月底所提到的某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核心问题依然存在。此外，蒂默曼斯还对接任法院院长的规定提出了警告。他宣布接下来还有谈判解决的可能，但如果不愿谈判，就将进入制裁程序。

制裁程序的最后一环是按照《里斯本条约》第7条剥夺投票权，当然这需要欧洲理事会内的所有国家（制裁所针对的国家不算在内）一致投票同意方可执行。鉴于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已经公开宣布将在这一投票中行使否决权，波兰政府方面不但对这个“最后手段”毫不畏惧，而且还把蒂默曼斯的威胁当作一把没有锋刃的剑。不过，在走到剥夺投票权这一步之前，可能还会有许多让波兰领导人不快的事情出现。如果他们真要不管不顾地走上这条路，那么他们就要冒着使波兰在欧盟内部进一步受到孤立的危险，而且作为一个不愿合作的成员国，波兰还有可能在共同体内让自己陷入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劣势。

无论在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于2015年秋夺回国家权力之前还是之后，他都反复提到，他认为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是他的榜样。同样，匈牙利的这位政府首脑也在宣传中坦率地把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党魁树立为“非自由的民主”典范。在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上，与2010年4月就重掌政府的欧尔班相比，卡钦斯基这几年的步伐要快多了。意味深长的是，这一显著区别在2016年12月吸引了波兰社会学家兼评论家斯拉沃米尔·谢拉科夫斯基（Sławomir Sierakowski）的注意。他说，欧尔班就好像一个玩世不恭者，随时都做好了走实用主义路线的准备；而卡钦斯基则如同一位幻想家，把实用主义路线看作软弱的标志，因此在他的党内，那些务实的政治家都有被他当成叛徒的危险。

谢拉科夫斯基认为，对卡钦斯基这样的政治家而言，这样一种心理缺陷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一个幻想家每时每刻都有能力违背自身和本国的利益行事。“他总是游走在政治自杀的边缘。在最近的这次（围绕着议会活动自由报道权的）冲突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是第一次真正尝试自杀。”不过，到2016年末，再指望卡钦斯基的学习能力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实，他以后还能不能像从前一样全面掌控他自己的党都成问题。因此，波兰宪法冲突的最终结局也同样扑朔迷离。[11]

在2016年底的欧洲联盟之中，即将到来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无疑是将在2017年春天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大有希望进入第二轮决选的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早已确定要代表她的党参选。社会党方面则到12月1日都尚不清楚，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是否会再次角逐这一最高职位。如果是的话，就意味着接下来他将参加社会党人的初选，但大幅下降的民众支持率让他力不从心。在民调中表现更好的曼努埃尔·瓦尔斯总理，对成为候选人明显有更大的兴趣。被视为进步主义改革家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早在11月16日就正式宣布参加竞选，此人在2016年4月创立了自己的党——“前进运动”（En marche），后来还在8月底辞去了瓦尔斯政府中的经济部长一职。除他之外，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左翼的候选人还有6个。其中有曾担任部长的社会党人阿诺·蒙特布尔格（Arnaud Montebourg）和伯努瓦·哈莫（Benoît Hamon），以及2012年参选的左翼党（Parti de gauche）党魁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

第五共和国奠基人戴高乐所属的党自2015年以来已经由“人民运动联盟”改名为“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该党决定用一个新办法来提名候选人：推举候选人的初选不但本党党员可以参加，而且一切认同共和党纲领并愿意交纳2欧元的人都可以参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的目光聚焦在两位候选人身上：一个是于2007年至2012年担任总统的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另一个是现任波尔多市市长，并于1995年至1997年在前总统雅克·希拉克手下担任总理的阿兰·朱佩（Alain Juppé）。萨科齐试图让自己的政治立场显得偏右，尤其反对政治伊斯兰主义和虔信派穆斯林，并希望这能成为打赢国民阵线的最好办法，而朱佩则以温和改革派的形象来拉票：他主张把退休年龄从63岁推迟到65岁，降低企业税，改革学校和监狱系统。

大部分民调都显示朱佩远远领先于萨科齐。然而，就在第一轮初选的前几天——11月17日，三位共和党候选人最后一次举行电视辩论的时候，另一位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却异军突起并领先于朱佩。菲永在希拉克手下先后担任过劳工部长和教育部长，并且在2007年至2012年萨科齐当政期间担任总理。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方面的声誉：菲永宣称要裁减50万公务员岗位并由此大幅削减国家支出；取消每周35小时工作制，把公共机构的工作时间提升至每周39小时；大力削减劳工权利，包括取消对解雇的限制。他自称支持法国的天主教传统，认同关于婚姻、家庭和祖国的传统观念；他虽然不会推翻奥朗德任内所引入的“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力主取消同性伴侣们的领养权；他赞成与俄罗斯接近并取消从2014年底开始的对俄经济制裁，主张通过加强国家层面合作的办法来进一步整合欧盟；而且，他在所有人面前都显示出，他才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最忠实的戴高乐主义者”。

在11月20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菲永、朱佩和萨科齐分别赢得了44%、29%和21%的选票。对此萨科齐表示他将从激烈的政治活动中退出，并建议他的支持者在第二轮决选中投菲永的票。朱佩没能在之后与菲永的电视辩论中遏制住后者的势头，11月27日的第二轮投票结果一目了然：在有效选票中，菲永得票率66.5%，朱佩得票率33.5%。

许多观察家认为，与初选中胜出的那位共和党候选人相比，其实朱佩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决选[12]中战胜勒庞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因为他能吸引中间选民和左翼选民的票。在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议题上，国民阵线此时主张强调社会关怀，甚至具有社会主义的面貌，这样的主张更容易打动陷入分化的左翼中那些失望的选民，并促使他们投票给勒庞，而不是投给那位在经济问题上奉行超自由主义的菲永。话又说回来，由于菲永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保守态度和亲天主教会的立场，他很有希望在那帮“老法国人”（France Profonde）[13]中挖走勒庞的选票，而这种能力是朱佩这样的自由派候选人所不具备的。无论如何，对共和党的支持者而言，候选人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让一个人在初选中独领风骚，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在一个人的背后了。[14]

2016年12月4日的晚上，欧洲的温和左翼和中右翼政治力量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在这一天，奥地利和意大利举行了两场激动人心的投票。在意大利举行的是一场关于修宪的全民公决，起因是马泰奥·伦齐总理想用公投为自己的政策背书。在奥地利，人们不得不对同年5月20日举行的第二轮决选进行重新投票，这一决定是由宪法法院做出的，其理由是计算邮寄选票的程序有瑕疵。在5月的选举中，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第二的绿党前主席亚历山大·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以3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属右翼民粹派的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在此次重新选举中，他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强调与欧盟亲善的范德贝伦获得了53.8%的选票，而他那位右翼的竞争对手仅拿到了46.2%。从绿党、社民党到自由党再到基督教民主党，欧洲联盟中的各大“政党系”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民粹主义的势头终于第一次被打了下去。[15]

在意大利，投票站直到晚上11点才关闭，比奥地利晚了5个小时。由伦齐推动的宪法改革，早在几周前就成了热议的对象。意大利的《1947年宪法》建立在“完全的两院制”之上。众议院和参议院都由国民直接投票选出，只不过参议员的选举要“以地区为基础”（第57条）。在职权方面，两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进行立法工作，这一再导致立法进程的延宕，有时候甚至完全进行不下去。

此次改革的目标是把参议院转变成某种联邦宪法机构性质的代表各地区的议院。它将不再由国民直接选出，而是由74个地区议会的代表和21个关键

地区的市长组成。其议员的人数将从315名削减至100名，其中有5名议员跟现在一样是由共和国总统任命的终身议员。考虑到意大利参众两院议员的津贴是全欧洲最高的，如果参议院真的能完成这番大变革，还能大幅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修宪的其他内容还涉及全民公决的举行办法和旨在加强代议制民主的一些措施。

在经过艰难的辩论之后，参众两院最终批准了宪法改革方案——按照宪法第157条，只要有绝对多数议员赞成即可，如果要求三分之二多数的话，那全民公决就很难举行了。全民公决要求在3个月内有参议院或众议院五分之一的议员或50万选民，或五分之一的地方议会提出申请。即使没有这样的申请，伦齐总理依然先期决定举行公投。他表示如果公投结果为“否”，他就宣布辞职，由此他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与这次公投捆绑在了一起。

事实很快证明，这样的捆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伦齐这样做，相当于把无数反对他的人都动员起来，一起为一个“否”而努力。这些反对者有的来自激进右翼的北方联盟（Lega Nord），有的来自以前电视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为首的“五星运动”，其中还有本来一直支持改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甚至还有自己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阵营中唱反调的人：比如前总理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 D’Alema）和前党主席皮埃尔·路易吉·贝尔萨尼（Pier Luigi Bersani）。他们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整场改革只会引起行政权的上升（现在马泰奥·伦齐就是行政权的化身），反而会削弱整个民主制度。也许，有许多人就是这样想的。但也有一些人，或是因为对现任总理的政策不满，或是不管什么原因就是想看到他失败，也会以防止共和国变专制为借口而投下反对票。

对政府阵营和伦齐自己来说，只能指出现行体制不容忽视的弊病，再讲明改革失败将会带来的危险：如果对国家稳定的信心受挫，那么意大利的国债利率就会继续上升，这可能导致银行业失去迅速复苏的希望，特别是面临破产威胁的意大利锡耶纳银行的情况会继续恶化；这还会削弱意大利在欧盟中的地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伦齐提到，围绕在贝佩·格里洛周围的民粹主义力量正在接近权力中枢，对此人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意大利有可能退出欧元区，甚至完全退出欧盟。按这个说法，如果伦齐在12月4日失败，那么不只意大利，而且整个欧盟都会陷入混乱。

然而，这些警告只是徒费口舌。晚上11点之后不久，计票结果显示“否”的投票数取得了非常明显的优势，这跟民意研究者此前对伦齐预言的一模一样。这场改革的反对者以59%对41%的得票率压倒了支持者。伦齐信守诺言，次日即向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提交了辞呈。总统请求他等到2017年财政预算案通过之后再离职，这意味着伦齐至少还能多任职些时日。

“否”战胜了“是”，这是全民公决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否定性力量的合力所产生的结果，而这种合力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反对改革的力量在意大利南部（Mezzogiorno）、西西里岛和撒丁岛（Inseln Sizilien und Sardinien）这样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占上风，但同样也在富庶的北意大利相当强大——这里是北方联盟的老巢；而在托斯卡纳大区（Toscana）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Emilia-Romagna），唯一坚定支持改革公投的党——伦齐的民主党——力量特别强大；支持改革的还有主要讲德语的南蒂罗尔地区（Gebiete Südtirols），这里的人们希望修宪能巩固该地的自治。在包括罗马在内的大城市，“是”与“否”的分野常常根据社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来划线；仅有少数大城市［米兰（Mailand）、博洛尼亚（Bologna）和佛罗伦萨（Florenz）］明显赞成改革。年龄在55岁以上的意大利人普遍比年龄在18～35岁的同胞更倾向于反对改革，而后者才是受到失业问题重创的世代。唯一能使所有反对改革者取得共识的方面是，对马泰奥·伦齐的政策及其个人的不信任，然而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对伦齐的不信任已经与对所有建制派政党的不信任，乃至对整个政治体制的不信任混合在一起了。

理论上，这次宪法改革纯属意大利内政。可是来自由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组成的反改革阵线的最强烈的呼声，却把反改革的斗争与反欧盟的议题紧密连接了起来。此外，贝佩·格里洛还倡议举行一次“是否继续留在欧元区”的全民公决。最新的民调显示，这类意见并非没有市场：2016年11月，赞成继续留在欧盟的意大利人仅有极微弱的优势（51%）。

这样看来，这场反改革阵营的胜利也是欧洲联盟的失败，而且是自6月23日“脱欧派”在英国脱欧公投中取胜后，欧盟在2016年遭遇的第二场大败。来自欧盟的信息显然不如民粹主义者的话语动听，而且使12月4日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意大利是欧洲共同体的创始国，而且几十年来一直都被看作特别亲欧的会员国。伦齐是一个多年未见的，最敢于锐意改革的意大利总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尽管这场改革尚未达到欧盟对这位充满活力的年轻总理的期许，但它还是保证了意大利努力提升竞争力的趋势。

每当伦齐故意不承认导致本国经济停滞的真正原因时，他也总是毫无顾忌地用煽动性的口吻攻击欧盟委员会和德国。而且在这次公投之前，他也用发放价格不菲的“选举礼品”的方式继续推高了早已过度扩张的国债：其中包括提高公务员工资、给每个孕妇发800欧元补贴、给每个18岁的青年发一张“文化支票”。尽管如此，与该国国内政坛上那些反对他的人相比，他在欧盟中依然被视作欧洲一体化的朋友，一个多多少少为意大利考虑的欧洲公民。而在他离职之后意大利会变成怎样，会有怎样的欧洲政策，就只有天知道了。

12月7日，参议院批准了此前众议院已经通过的2017年财政预算案。同日，伦齐宣布辞职。12月11日，马塔雷拉总统委托此前一直担任外交部长的民主党人保罗·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组阁，并授权此政府一直工作到2018年初——其常规法定执政期限到期为止。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强烈反对国家元首的这个指令，这两个党都主张尽快举行新一轮大选，其理由是12月4日已经推翻了此前的一切政策。

当然，要举行大选无论如何还要先扫除一个障碍：伴随着修宪的失败，参议院选举法也作废了，后继法律必须与众议院选举法相兼容。真蒂洛尼组建的这个政府，从人事方面看就是一个没有伦齐的伦齐内阁，因此一旦新选举法颁布是存活不了多久的。此外，要求举行新大选的压力太大了。组建一个新内阁似乎能够保证今后一段时间里意大利政策的连续性。但这场大选，无论是在2017年举行，还是拖到2018年初举行，都会有让五星运动这类势力问鼎权力的危险，这种情况势必将极大地动摇欧洲联盟的基础。[16]

12月15日—16日，欧洲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了2016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阿勒颇平民所遭受的可怕苦难，在这儿，受到俄罗斯空军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民兵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攻占了反政府联盟据守的最后一个街区——对联合国、西方国家联盟和欧洲联盟而言，这一人道主义悲剧证实了自己的无能。与会者对此事没有做出具体的决议，同样也没有对欧洲难民政策改革做出决议——这一议题被推迟到了2017年的夏天。

峰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尽管埃尔多安总统在国内实行越来越严重的镇压政策，但还是应该坚守与土耳其达成的难民合作协定。在荷兰政府的推动下，会议通过了一项与乌克兰合作协定的补充声明，该声明允许荷兰忽略4月“参考性”公投的结果而批准该条约。尽管包括斯洛伐克、匈牙利、希腊和意大利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对此表示忧虑，欧洲理事会最终还是延长了自2014年3月起因吞并克里米亚一事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时间。

普京总统大概会对此决议感到失望，不过他有理由期待欧盟内部反对制裁的呼声会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响亮。11月13日，在经济上，特别是在能源供应上非常依赖俄罗斯的保加利亚举行了总统选举，亲俄并公开反对制裁的社会党候选人、退役将军鲁门·拉德夫（Rumen Radew），战胜了比较保守的纹章党[17]的女候选人、议会主席泽茨卡·佐奇赫娃（Zezka Zatschewa），紧接着佐奇赫娃最重要的支持者鲍里斯索乌（Borissow）总理宣布全体内阁辞职。新一轮议会选举预计将于2017年3月提前举行。而在那时人们自然无法预知议会选举的结果，同样无从揣测的是，拉德夫是否真的会大幅改变保加利亚的政治路线——在选举期间他清楚地表达过对欧盟和北约的支持。

在其邻国罗马尼亚，亲俄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了12月11日的议会选举：尽管该党的一些头面人物有腐败和选举舞弊的丑闻缠身，该党还是和其自由派的小搭档自由民主联盟（ALDE）一起掌握了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可以预见，社会党人索林·格林代亚努（Sorin Grindeanu）领导下的新政府将比现在执政的、由独立专家组成的过渡内阁更多地考虑到俄罗斯的利益。

在保加利亚举行选举的同一天，摩尔多瓦也在2016年11月13日举行了总统选举——这是一个欧盟于2014年与之达成过援助协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亲俄候选人社会主义者党主席伊戈尔·多东（Igor Dodon）以52%对48%的得票率优势，战胜了亲欧洲的候选人马娅·桑杜（Maia Sandu）。观察家们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对猖獗腐败的抗议，因为腐败的主要受益者和保护伞都是亲欧政党。

而另一个东南欧的欧盟候选国黑山的局势发展，恐怕会让普京皱起眉头。到目前为止，这个巴尔干国家在长期执政的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Đjukanović）总理的领导下一直奉行亲西方的路线；2015年12月，北约正式邀请该国加入大西洋联盟。2016年9月，该国爆出了一个由激进的塞族民族主义者和俄罗斯右翼激进分子策划的政变计划，据称还牵涉前情报部门人员。在10月16日的议会选举中，久卡诺维奇的党尽管在选票上告负，但依然是该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小党的支持下重新组建政府。

对俄罗斯而言，重塑与土耳其的关系在战略上无疑要比黑山的事情重要得多，而且土耳其还是一个自2005年起就与欧盟展开入盟谈判的国家。自2016年7月15日那次失败的军事政变之后，总统埃尔多安执行着越来越强硬的专制路线；到这年年底，已经有3.8万人被捕，10万人被开除公职。12月10日，分离运动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一次血腥袭击，造成44人死亡（其中包括36名警察），在这之后政府逮捕了59名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议员中的12人，其中包括反对党领导人。欧洲议会以土耳其的法治愈加退步为由，通过了一个对各国政府并无约束力的决议：暂停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直至另行通知。土耳其政府对此表示愤怒，但丝毫没有停下将土耳其变成一个总统专制国家的脚步。

2016年，土耳其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则完全不同。自8月初埃尔多安与普京在圣彼得堡会晤之后，俄罗斯与土耳其的立场在原来有争议的叙利亚问题上也开始趋近。阿勒颇于12月中旬陷落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和土耳其的外长聚到了一起——拿下此城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最重要的盟友俄罗斯和伊朗而言（与对他自己一样）都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成就。这场会晤于12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就在一天前，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被一名土耳其警察杀害。与会者表示，叙利亚冲突亟须一个“政治性”解决方案，并决定从2017年初开始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谈

判。次日，俄罗斯和土耳其在阿萨德政权和温和派反政府组织之间就在叙利亚实现停火问题进行斡旋。停火将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共同保证下，于12月30日午夜生效。联合国和美国有意识地没有参与这份停火协议。

2017年1月20日白宫易主之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变化，在2016年底还难以看明白。但根据唐纳德·特朗普在选战期间的言论，以及这位“新当选总统”的公开声明和先期公布的个人决定，还是可以推测：让美国政府与俄国政府结成某种战略性伙伴关系，是这位新总统在外交方面的优先事务。在欧盟方面，普京不但可以把东南欧这些亲俄政治家和政党的胜选看作自己的成功，而且对脱欧公投也可以此观之——此事削弱了欧盟，同时也让人无心再管克里米亚。

对于欧洲将在2017年上半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选择，这位俄罗斯总统也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在年初的法国“总统选举”中，两位亲俄的政治家（保守派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和国民阵线领袖马琳·勒庞）都很有希望进入第二轮决选。属于亲俄派的还有荷兰民粹主义者基尔特·威尔德斯，民调显示他在2017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也大有胜算。无论如何，弗拉基米尔·普京都是国际局势的赢家之一，而他本人一直都是局势发展的深度参与者。而且他大概还会期待，2017年也是属于他的一年。[18]

在2016年的最后两周内，德国遭遇了两起恐怖袭击：12月19日傍晚快8点的时候，一辆波兰牌照的大挂车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冲进了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19]前方的布莱特沙伊德广场（Breitscheidplatz）。这场袭击明显以7月14日的尼斯滨海大道袭击为榜样，共造成12人丧生，50余人受伤——其中许多人伤势严重。袭击者在数小时之前在柏林劫持了这辆大挂车，车上的司机波兰人卢卡什·乌尔班（Lukasz Urban）被控制，后来被枪杀。这辆大卡车在袭击地点行驶了七八十米后，这辆车内置的自动刹车系统使得它无法再行动，此后凶手成功逃脱。

次日，“伊斯兰国”宣布对此事件负责。安全部门的调查结果是，1992年出生于突尼斯的阿尼斯·阿姆里（Anis Amri）制造了这起事件。此人为了逃避在本国的牢狱之灾，于2011年逃到意大利，然后又在那儿因重罪（其中包括在接待中心纵火）被判处4年监禁。刑满后，他紧接着就被驱逐出境。而当突尼斯拒绝接纳他时，他被勒令离开意大利，之后被释放。不久后，他成功地借道瑞士非法进入德国，在那里他提交了一份政治庇护申请并在2016年夏天被驳回。然而，将他遣送回故乡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因为这名庇护申请者没有证件，而补办证件的事情又因突尼斯否认此人是本国公民而拖延了下来。

自2016年2月以来，阿尼斯·阿姆里先后用了14个不同的名字，他先去了巴登-符腾堡州，后来又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柏林之间交替居住。他通过贩毒赚钱，并生活在一种激进的萨拉菲主义（Salafismus）[20]的环境中，位于德国掌握的约550名“伊斯兰国危险分子”的名单之列。安全部门甚至发现了一些他预备从事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暴力行动的迹象：他已经自学了制造管状炸弹和炸药的知识，并且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然而，柏林的总检察长却因为没有具体的疑点，而在2016年9月21日结束对他的监视。几周之后，他就不见了。

2016年10月当上了“伊斯兰国”“外籍战士”的阿姆里，在制造了柏林恐袭之后还有4天可活。他经由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逃向北意大利。12月23日凌晨，当警察在米兰北部的工业城市塞斯托-圣乔凡尼（Sesto San Giovanni）的火车站广场前进行一次例行证件检查时，他马上用手枪向警官们射击，并在击伤了一名警察后被警方击毙。阿尼斯·阿姆里的死讯传出之后，“伊斯兰国”立即公开了一段视频，在其中，这位柏林恐袭的制造者宣布自己加入恐怖组织，宣誓向“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al-Baghdadi）效忠，并誓死对欧洲的“十字军”复仇。

这次袭击在德国激起了对欧洲及德国反恐工作有效性的广泛讨论。凶犯阿姆里曾在意大利服刑的事，德国安全部门直到此人被释放之后2个月才知晓。在德国，尽管阿姆里已经被归类为“危险分子”，他依然能在各联邦州之间自由穿行。他还可以从德国前往瑞士——他的手枪显然就是在那儿搞到的，他就是用这把枪杀死了12月19日被劫持的波兰挂车司机。当柏林检察官于2016年9月中止对他的监视时，并不知道就在2天之前，摩洛哥的国内情报机构已经向德国的新闻机构提供了关于这个突尼斯人危险性的新证据。2016年10月，突尼斯方面已表示，可以在不监禁阿姆里的情况下为他补办证件。

不出所料，选择党马上借12月19日的袭击事件在政治上大做文章：还在19日当晚，他们就恶毒地喊出了遇难者是“默克尔所杀之人”的口号。当然，关于申根区外部边境和德国边境失去控制的后果的讨论早已进行很久了，而且这种讨论也是必要的。在柏林的大联盟内部，首先是联盟党（而且特别是其中的基民盟）把在2016年底之后加强国内安全的议题推向前台。

就在数周之前的2016年11月20日，安格拉·默克尔已经宣布她将在2017年9月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再次（即第四次）竞争联邦总理的职位。她从12月6日在埃森（Essen）举行的基民盟党代会重选党主席的过程中应该可以感觉到，她的难民政策在本党之内存在争议：这天她在党代表中的得票率是89.5%，比2014年下降了7.2个百分点。与2015年夏末及秋季相比，她的政府在涉及移民问题的实际政治操作中早就打了许多折扣，但总理在

公开表态时依然与从前一样，不愿给人留下自行改正错误的印象，也不愿承认自己的疏忽和错误决定。许多观察家越来越怀疑，在2017年的选举中她的这套办法行得通。[21]

另一个德国政党——绿党——通过邮寄选票初选的方式，为本党确定两位参加联邦议院选举的候选人。竞争者包括绿党的联合主席之一杰姆·厄兹代米尔及议会党团的两位联合主席卡特林·约英-埃卡特（Katrin Göring-Eckardt）和安东·霍夫赖特（Anton Hofreiter），还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党主席、环境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由于绿党的党章规定，党的两位联合领导人中至少要有一名女性，那么属于党内右翼或者说“现实派”的卡特林·约英-埃卡特事实上已经赢定了。而属于“现实派”的厄兹代米尔和哈贝克，将与属于“初心派”或者说左翼的霍夫赖特争夺男性候选人的位置。

1月18日，结果揭晓。厄兹代米尔得票率为35.96%，以75票的极微弱优势战胜了哈贝克（35.74%），霍夫赖特（26.19%）则远远地排在后面。卡特林·约英-埃卡特得票率为70.63%。倘若党内左翼在竞争男性候选人的环节中胜出，那么就有更大的可能出现一个与社民党和左翼党组成的联盟——“红-红-绿”联盟。而现在“现实派”的胜出则标志着绿党成员们更倾向于一个与联盟党组成的“黑-绿”联盟，如果这样还不足以形成议会多数而且自民党（FDP）能重回联邦议院[22]的话，那么他们还会支持一个“牙买加方案”[23]：一个由基民盟/基社盟、绿党加自民党组成的联盟。

作为联盟党当下的执政伙伴，社民党原计划于2017年1月29日公开自己的候选人。就在这之前5天，《明星》（*Stern*）杂志对西格马尔·加布里尔的专访于1月24日出人意料地刊载了出来。在采访中，加布里尔表示将辞去党主席的职位，并且不会参加总理竞选。对这两个位置，他都推荐了于1月18日卸任欧洲议会主席的马丁·舒尔茨。1月24日晚上，社民党主席团批准了他的推荐。加布里尔还表示，想辞去经济部长一职而转任外交部长。现任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是执政联盟共同支持的德国总统候选人，以取代早在2016年6月初就表示因年龄不再连任联邦总统一职的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新的经济部长将由以前的司法部长布丽吉特·齐普里斯（Brigitte Zypries）担任。

让加布里尔做出这个意外决定的原因，是糟糕的民调结果。在“星期日提问”中，社民党的得票率才刚刚到20%（所提的问题是：“假如下周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您会选哪个党派？”）。加布里尔个人的受欢迎程度一再远远地落后于安格拉·默克尔。哪怕是社民党的支持者，也乐见默克尔而不是加布里尔当总理。但如果选项换成了“舒尔茨还是默克尔”，那么舒尔茨还是遥遥领先。

从民调结果看，舒尔茨是社民党所能推举出的最受民众欢迎的总理候选人。除了其他条件之外，他还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而该州将于2017年5月举行州议会选举——这使他与其他可以想见的总理候选人相比，在面对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这位即使在社民党外也享有声望的汉堡市市长时，也拥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马丁·舒尔茨与奥拉夫·肖尔茨一样属于“右翼”社民党人，但舒尔茨却远比肖尔茨更受到社民党左翼和青年党员的拥护。与加布里尔相比，舒尔茨的优势在于他没有入阁，所以他在与国内政坛的主要竞争对手联盟党的斗争中，比已经加入大联盟政府的人更能放开手脚。当然，舒尔茨的声望不是作为德国政治家，而是作为欧洲政治家积攒起来的。他良好的民调结果是否能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展现出来，自然还有待观察。

1月25日，舒尔茨在社民党议会党团的热烈欢迎中宣布，他决定“无论局势如何变化”都会代表社民党竞选总理。两天之后，加布里尔作为外交部长、齐普里斯作为经济部长在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又两天之后，1月29日，社民党党委会批准了主席团提案，提名马丁·舒尔茨为党主席和总理候选人。对党主席的正式选举，于3月19日在柏林召开的特别党代会上举行。在会上，舒尔茨从代表手中获得了党史中前所未见的100%的赞成票。在接下来选他成为总理候选人的过程中，同样既没有反对票，也没有弃权票。

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党改换党魁，并不意味着它在党派联盟方面提前做出了什么决定。在官方层面上，社民党人一直说任何选择都有可能。根据2017年初的民调，该党左翼所期待的“红-红-绿”联盟在议会中无法取得多数。此外，这样一个联盟在外交政策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左翼党的目标之一是让德国退出北约，而对社民党人和大多数绿党党员来说，确保德国的北约成员国身份是必须做的事。过去数年间的经历，使得任何一派社民党人都不想再（与联盟党）组建一个新的大联盟。但也并不是说，组建新联盟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如果联盟党依然是最强的政治势力，以至于一个由社民党领导的政府无论如何都无法取得议会多数（“红-红-绿”不行，社民党联合自民党、绿党的“交通灯方案”也不行），而联盟党又无法与其他政党组成联盟（就是说既无法单独与绿党联盟，也无法与绿党加自民党联盟），那么就只好将2005—2009年和2013—2017年这几年中的联盟再组建一次——最后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这两个“大”党无法舍弃的。[24]
有那么一个党派，是所有政党在讨论结盟对象时都不予考虑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尽管在2017年初已经可以确定该党在9月将以两位数的得票率进入第19届联邦议院，但鉴于其高调的民族主义，反欧盟、反欧元的纲领和煽动行为，依然不会有任何党派考虑与它结盟。选择党的联合主席之一弗劳克·彼得里（Frauke Petry）于1月在科布伦茨的民族主义政党大会上与法国国民阵线的马琳·勒庞和荷兰自由党的基尔特·

威尔德斯会晤，结果引发了本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彼得里的批评者认为，选择党的党主席与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同台出现会伤害选择党，因为国民阵线的诉求还是“社会主义式”的。

彼得里还要求将图林根州的党主席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开除出党，此人于2017年1月17日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演讲中说德国的纪念政策应该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同时还暗示性地提到了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他说德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自己首都的心脏地带竖立耻辱纪念碑”的民族。尽管党委会多数成员都同意彼得里的看法，认为赫克的极右口号会吓坏中产阶级选民，从而伤害选择党，但还是仅启动了党内的训诫程序。

到目前为止，选择党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对联盟党、社民党和左翼党失望的选民。该党包括像赫克在内的一些右翼领导人还认为，选择党很有希望赢得更多极右翼的德国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NPD）的选民选票。（2017年1月17日，联邦参议院一项查禁该党的申请被联邦宪法法院否决，其理由是：尽管德国民族民主党的行动违背宪法，但因其选民和席位稀少，不会对德国的自由民主秩序构成威胁。）

彼得里首次想要把赫克开除出党时，没有在党委会找到足够的赞同者，这足以表明党内（尤其是德国东部各州的党委）对此人的支持力量有多么强。不过，2月13日，彼得里还是在一种法律意见（赫克与希特勒言辞之间的相似性）的支持下，让党委会内三分之二多数委员同意启动把这名图林根州党主席开除出党的程序。而赫克警告说，这项决议有令本党陷入分裂的危险。

开除赫克的程序可能要走好几个月，而且结果并不确定。选择党领导层中的多数派与少数派在战术方面的分歧是否会降低该党在2017年竞选活动中取胜的机会，尚不可知。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会使该党更容易既吸引民族保守主义的选民，又吸引激进右翼的选民。无论如何，仍然可以猜想到选择党将进入下一届联邦议院，从而使其他政党组建一个有执行能力的联盟变得难上加难。[25]

法国在2017年初已经完全进入了总统大选季，两轮选举分别于4月23日和5月7日举行。作为第一轮选举中的热门人选，国民阵线主席马琳·勒庞于2月4日在里昂被正式推举为总统候选人。起先，在莫斯科注册的第一捷克-俄罗斯银行（Ersten Tschechisch-Russischen Bank）曾答应给予国民阵线2000万欧元的贷款，而现在这家银行已破产，该款项也被俄罗斯中央银行（Russischen Zentralbank）撤回。而勒庞在12月已因为为国民阵线争取

俄罗斯的资金援助而上了头条新闻。1月初，当勒庞以2014年3月的那场有争议的公投[26]为由称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为“非法”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在尝试对莫斯科的贷款决策施加有利于己方的影响。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国民阵线主席于2017年1月12日受邀拜访了纽约的特朗普大厦。她虽然没能见到唐纳德·特朗普本人，没能和他最亲密的顾问进行磋商，但勒庞与这位“新当选总统”的老朋友、专门负责与欧洲右翼联系的意大利商人圭多·隆巴尔迪（Guido Lombardi）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这次会面所传递出的信息显而易见：欧洲最强大的民族民粹主义党派的领导人展现了她与未来的美国权力核心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美国那里同样也是位民族民粹主义的总统。

1月24日，马琳·勒庞估计会觉得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法国的讽刺刊物《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发表了一篇报道，指责勒庞在总统竞选中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涉嫌私用公款。报道称菲永的妻子佩内洛普在没有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多年（1998—2002年）间断断续续地领走了50万欧元。这个丑闻的要点并非国会议员为自己的家属安排工作——这在法国司空见惯而且是合法的，而在于佩内洛普完全是在吃空饷。弗朗索瓦·菲永坚决否认了这一点，并提到这是一场敌视女性的运动。但财务检察官认为此事极为重要，值得展开调查。[27]

至于社会党是否能够从共和党候选人卷入的这件事中得益，这时还未知。12月1日，弗朗索瓦·奥朗德因对自己的民调结果失望而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位自行放弃连任的总统。他的继任者将经由与共和党方式类似的初选产生：除了党员之外，一切对该党抱有好感的，并且愿意象征性地缴纳1欧元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个初选。在1月22日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率领先的两位候选人是建设部前部长伯努瓦·哈莫（36.35%）和12月辞职的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31.11%）。

由于居于第三位的党内左翼代言人、经济部前部长阿诺·蒙特布尔格（得票率17.5%）要求他的追随者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同属左翼的哈莫，这让哈莫成了最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事实上他也在1月29日取得了一场大胜：哈莫得票率为58.7%，瓦尔斯得票率为41.3%。在初选期间，哈莫主张为所有18岁以上的法国人提供750欧元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一要求被务实的改革者瓦尔斯认为是无法负担的，他称这对法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危险的乌托邦。初选的结果意味着社会党猛烈地向左摆动，同时也是在向奥朗德总统和瓦尔斯的继任者贝尔纳德·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领导的政府政策宣战。

当然，哈莫接班奥朗德当总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他甚至连进入第二轮决选都勉强。在民调排名中，两位没有参加过社会党初选的候选人，即

经济部前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左翼党主席梅朗雄，显然排在社会党的所有候选人之上。如果不是哈莫，而是瓦尔斯赢得了第二轮初选，那么他对马克龙和菲永而言将是一个更危险的对手。

在总统选举的早期阶段，最出人意料的角色当属无党派的马克龙。到1月中旬，由他创建的“前进运动”在全法国聚集、注册了14.7万名支持者。他的演讲集会极为火爆。他攻击那些“政府机关”丧失了一切革新的意愿。马克龙强烈支持对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系统进行彻底改革，赞成加强欧盟，并尽可能构建紧密的德法合作关系，此外他还对德国总理的难民政策抱有好感。他说他将在3月公布一个更加详尽的计划。在1月中旬的民意调查中，马克龙以20%的得票率排在勒庞（26%）和菲永（25%）的后面，位居第三。

正当民众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指责发酵之际，马克龙也受到了滥用公款指控：有两位记者在他们的书中宣称，马克龙在2016年8月辞去经济部长职位前，已将部里的预算用去了80%，而且其中有12万欧元的花费至少是部分地服务于他自己竞选总统的目的。马克龙称这一指责为诽谤，并将该书的作者们告上了法庭。由于在某一政府部门的工作与该部部长党派性的政治动机之间实在难以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这两位记者的指控遭到了普遍的质疑。

就在《鸭鸣报》爆料菲永后一周，该刊物于2月1日又追加了一篇报道：据称，佩内洛普·菲永作为她丈夫在议会中的协作者和国民大会中的后备议员一共得到了90万欧元的酬劳。此外，弗朗索瓦·菲永还因为一份可疑的顾问合同拿到了20万欧元的酬劳，而且他作为参议员还把他的尚在大学念法律的女儿玛丽、儿子查理聘为“助手”，从而使两人（在可能并未从事相关工作的情况下）总共获得了8.3万欧元的工资。几乎就在同时，财务检察部门也宣布他们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展到菲永的儿子和女儿。2月2日，法国电视二台的一个节目公布了一段2007年《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对出生于威尔士的佩内洛普·菲永的采访录像。佩内洛普在这段采访中称，她从未担任过其丈夫的助手。

弗朗索瓦·菲永依然表示这是他的政治对手，甚至是政府圈子想要抹黑他的活动，并强调只有在他被起诉的情况下，他才会退出总统竞选。然而，在2月初的民调中，他已经首次落在了马克龙的后面。民调结果是：第一轮选举最受欢迎候选人马琳·勒庞得票率为26%～27%，马克龙得票率为22%～23%；菲永得票率为19%～20%。同期的另一项民调显示，有61%的法国人要求菲永放弃竞选。到了这个时候，共和党内部也第一次出现了要菲永退出竞选的声音，有人认为他可能已经变成了保守派阵营的负担。菲永本人尽管于2月6日为自己雇用家庭成员的事情公开道了歉，但还是坚称此事在当时并不违法，同时他也依然拒绝退出竞选。[28]

在某些2004年或2007年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中，从2017年初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偏离联盟内自由主义“主流”的“民粹”或“非自由的民主”的倾向。在波兰，政府与反对党之间最初似乎还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1月9日，希德沃政府撤回了饱受争议的媒体管理法提案——该提案极大地限制了媒体对议会工作的报道。3天后，反对党议员对下议院议事大厅的占领宣告结束，他们是从12月16日起因反对该提案而开始这次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然而，在执政多数派于12月16日在非常规情况下通过的预算计划的合法性问题上，法公党阵营并不退让。反对党曾请求杜达总统调停此事，但他于1月14日签署了2017年预算案。

反对党已经不可能指望从宪法法院获得公正了。在服从于法公党的女法官尤利娅·普日文布斯卡于2016年12月底取代自由派法院院长安杰伊·热普林斯基之后，并且在另一位自由派法官也宣布退休之后，法院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做出反对政府的裁决。在新的一年开始后，民族保守派排挤反对党的势力增强了：法公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于1月中旬宣布了一项法案：所有市长、区长和其他由选举产生的社区或地区官员最多只能再参加一次选举，也就是说只能连任一次——这个新办法是专门针对自由派（大多深受爱戴）的现任官员的。

议会中的反对派则太不团结，以至于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议会之外的保卫民主委员会（KOD）组织了大多数针对法公党政策的抗议活动，却因为其主席马特乌什·基约夫斯基（Mateusz Kijowski）而陷入困顿。基约夫斯基这位总是把无私奉献挂在嘴边的电脑专家不得不承认，他的家族公司因提供互联网服务而得到了2.1万欧元。他对自己将保卫民主委员会拖入危机的事情表示道歉，但却拒绝辞职。

反对党也很难期待从外部获得援助。尽管欧盟委员会要求波兰在2个月内恢复宪法法院合宪性的最后通牒到2月底才到期，但在新年伊始之际，早已没有多少波兰人觉得波兰政府会对欧盟服软。还有些人希望有部分法公党党员（甚至包括杜达总统这样的领导层人员）不再无条件地服从卡钦斯基的指令，而到目前为止，这也纯属幻想。现在，波兰的局势发展正朝着“非自由的民主”的方向不断前进着。[29]首先提出“非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的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也在新的一年里尽一切努力巩固着这种统治形式。他现在要集中火力对付令全球专制政府都头疼且加以打击的对手：追求实现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NGO）。与他的偶像弗拉基米尔·普京相似，欧尔班也把这类机构的工作人员贬斥为受雇用的间谍，称他们从国外意图伤害国家利益的人以及国际金融财团的手中获得“贿赂”。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青民盟政府的头号打击对象是出生于匈牙利、现在定居美国的亿万富翁兼慈善家乔治·索罗斯。此人强烈批评其家乡的专制化趋

势，并资助了如“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和赫尔辛基委员会（Helsinki-Komitee）这样的自由派机构。索罗斯除了与欧尔班作对之外，也把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视为追求独裁的代表而与之斗争——这一点令匈牙利的政府首脑十分开心。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期待他要求各NGO［其中包括“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领导人公布其财产关系的计划将获得来自华盛顿的赞同，同时其政府对国际自由派“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的宣传战加大火力的做法也会获得青睐。特朗普在还是“新当选总统”的时候就邀请他访问白宫，这着实让他受宠若惊。从长期看，特朗普显然会将欧尔班视为他在欧盟内部的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普京在2017年2月2日（两年内）第二次访问了布达佩斯，对普京而言，欧尔班大概早已是令人愉快的伙伴了。[30]

匈牙利的东南欧邻国罗马尼亚的自由派力量也在2017年初陷于防守状态。社民党在2016年12月在议会选举中取胜之后，有德国血统、本身属于自由派的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Klaus Johannis），任命最大党派的政治家索林·格林代亚努为总理。然而，对社民党人而言，格林代亚努只是暂时帮助社民党主席利维乌·德拉格内亚（Liviu Dragnea）占住这个政府首脑的职位。而德拉格内亚之所以按现行法律不能担当总理，是因为他在2016年因竞选舞弊而被判处了2年徒刑，此外还因为滥用职权而接受审判。

为了让德拉格内亚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当上总理，格林代亚努领导的由社民党与自由民主联盟（ALDE）组成的联合内阁准备放宽《反腐败法》的规定：以后，如果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小于20万列伊（相当于4.45万欧元），将免于刑事处罚（德拉格内亚的涉案金额估计为10万列伊）。约翰尼斯于1月18日亲自造访内阁，得以让这项法案推迟发布。布加勒斯特（Bukarest）当天就出现了反对政府做法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月22日星期天，包括总统约翰尼斯在内的约2万人参加了相同主题（未经申报）的游行示威活动。

对此，政府的反应是宣布启动罢免总统的程序——这样的做法在2012年有过先例：当时，（后来因腐败而判刑的）社民党总理维克托·蓬塔发起了一项旨在罢免保守派总统特拉扬·伯塞斯库的全民公决，尽管公决取得了多数赞成的结果，但由于没有达到宪法所规定的50%投票率底线，所以作废了。1月24日，约翰尼斯针对此事告诉议会，他根据宪法第90条发布了一项全民问卷，问民众：在罗马尼亚，针对腐败和滥用职权的斗争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在这方面，格林代亚努可没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1月底，司法部长弗洛林·约尔达凯（Florin Iordache）宣布就内阁的大规模大赦项目进行公开磋商。根据这项计划，所有被判处5年以下徒刑的人都将被释放，以便缓

解监狱中过于拥挤的状况。而实际上，政府的首要目的是要为本党被捕的党员脱罪。

1月29日，布加勒斯特再次爆发了反对执政联盟偏袒腐败政治家的示威。据估计，参加者有5万人。在听取公民社会代表的意见后，司法部长宣布将于次日对草拟的议案进行某些修改，但并没有说修改哪些地方。1月31日，政府通过发布紧急命令的方式实施了大赦——这样一种挑衅立即在布加勒斯特引发了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随后抗议活动也出现在其他城市。2月2日，在罗马尼亚首都自1989年以来最大的抗议示威中出现了流氓分子的骚乱活动，据称这些人是为政府办事的“煽动分子”。在此之前，商务部长弗洛林·日亚努（Florin Jianu）已经出于对大赦的抗议而宣布辞职，总统约翰尼斯也在宪法法院起诉政府，希望能用这种方式废除政府的命令。

2012年，欧盟的卢森堡基督教民主党司法委员维维亚娜·雷丁曾经把与罗马尼亚的腐败做斗争当作自己的分内之事，可是与那次不同的是，欧盟在2017年初却长期保持沉默。雷丁的继任者，捷克人薇拉·尧罗娃觉得没有必要干预罗马尼亚总统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尧罗娃是一位出身于以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为核心的右翼民粹政党“是的2011”（ANO）的政客——这个巴比什也曾在2006年因腐败嫌疑而接受调查。而且尧罗娃也从来没有表示过，一旦某个“新”成员国违反了法治秩序的根本原则时应该怎么办。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此同样没有发表任何看法。负责法治问题的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于2017年1月25日发表了一份例行声明，确认罗马尼亚在打击腐败和确保司法独立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提到，罗马尼亚在2007年加入欧洲联盟时所开启的进程（“对罗马尼亚司法改革和反腐败的合作与核查机制”）是否还能在本届委员会任期之内（至2019年）完成，将取决于罗马尼亚方面。他认为，如果该国迅速且不走样地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并且避免让已经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那么完成进程就是可能的。从布鲁塞尔的这份声明中，很难读出对格林代亚努政府袒护腐败及滥用职权的斥责，至多只有温和的警告。

直到2月2日的紧急命令发布之后，欧盟委员会的态度才变得更加明确。在同一天，容克和蒂默曼斯都警告罗马尼亚政府：反腐败的斗争决不可放松；并且两人都对罗马尼亚局势的新发展表示担忧。蒂默曼斯还在2月2日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用下列语句强调了警告的严肃性：如果大赦生效，那将有可能影响欧盟对罗马尼亚的拨款。如此一来，罗马尼亚的国家和宪法危机终于上升到了欧洲层面。

2月5日，格林代亚努政府撤回了紧急命令，并宣布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

议问题。但示威活动还在继续。抗议者的目标现在已经变成了要求由社民党和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下台，因为从到目前为止的经验看，难以指望其与腐败和滥用职权进行坚决的斗争。2月8日，反对党在议会提交的不信任案未能通过，因为至少需要232票赞成才能推翻政府，而其仅获得了161票。约翰尼斯总统究竟何时才会下令用全民公决的方式与腐败做斗争，还难以知晓。命令发布的时间必须由格林代亚努政府决定，而该政府并没有兴趣参与其中。[31]

2017年1月18日，欧洲议会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在这一天，其上议院主席、德国社民党人马丁·舒尔茨的第二个任期宣告结束。在舒尔茨之前，欧洲议会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权力意识如此清醒的主席。他是欧洲社民党和社会党在2014年选举中共同推举的“领头候选人”，自那一年开始，他与卢森堡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让-克劳德·容克合作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不久后两人的名字就在布鲁塞尔被合称为“舒容”。舒、容二人代表了社民党与基民党之间的非正式大联盟，实际上，自由党和绿党也加入了这个旨在遏制来自左边或右边的反欧盟势力及民粹主义势力的大联盟。

2014年，通过将基民党“领头候选人”容克设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形式，委员会领导层实现了实质上的议会化，这两个机构（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相对于欧洲理事会的地位上升了。如我们已经看见的，这个委员会自然越来越像一个“政治”委员会，而忽略了它最初作为诸条约看护人的任务；同时，这个议会也越来越脱离一直以来作为委员会监控者的角色。这对这两个机构和欧洲联盟整体的公共形象来说都是不利的：可是在2017年初的布鲁塞尔，这个事实却无人谈及。

然而，欧洲议会党团为舒尔茨安排后继者的方式，却并不利于巩固欧盟的合法性。基民党从2014年起与社民党达成谅解，将在5年法定任期的后半段由基民党这个议会中的最强的党团推举主席。即便是在容克的劝说之下，基民党也不愿意放弃这一权利。若按着容克的意思，他倒是很愿意为权力平衡，襄助舒尔茨第二次连任。现在的结果是，这两个最大的党团推举了一系列“竞选人”：代表基民党和保守党参加竞选主席的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常年的盟友、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的创始人之一、工业巨子安东尼奥·塔亚尼（Antonio Tajani），代表社民党和社会党的是他们的议会党团主席、意大利人詹尼·皮泰拉（Gianni Pittella）。在自由党的候选人、曾经的比利时首相居伊·伏思达为了塔亚尼的利益而退出选举之后，塔亚尼最终在第二轮决选中战胜了皮泰拉。

塔亚尼应该能想到，与舒尔茨所领导的机构相比，他的机构的代表性和行动力都要弱一些。容克在1月18日傍晚谈到，以后与议会的合作将变得更加艰难。但他并不愿意承认，曾存在于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大联盟关

系真的已告终结。他认为，鉴于敌视欧盟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挑战，欧洲议会内部那些原则上向往融合的力量别无选择，至少在那些“大”问题上只能继续保持合作。但委员会同时也应该预见到，会有更多的批评和矛盾。由此，议会议长的换届或许能让议会重新理解自己的本来角色，这样的任务比2014年之后执行的那些政策要更加现实。

2017年1月23日，就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议长换届之后几天，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公开了一封该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写给两位本国同胞的短札。两位收信人都是由五星运动推举的国会议员：马尔科·瓦利（Marco Valli）和马尔科·赞尼（Marco Zanni）。之所以会出现这封不同寻常的信，是因为五星运动的领导人贝佩·格里洛在意大利2016年12月举行的宪法公决前一周承诺：如果他的党执政，就将举行一次决定意大利是否留在欧元区的全民公决。德拉吉在信中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若一国决意脱离欧元体系，则该国的国家银行必须结清欠欧洲央行的权益或负债。”

对意大利而言，这意味着退出货币联盟之后该国政府必须向欧元系统支付3586亿欧元（按照2016年11月的数据计算）——这就是其他国家支援意大利这个欧元区伙伴的金额。德拉吉想给这两位五星运动的议员传递的信息，对欧元区内其他高负债国家的民粹主义者也同样有效：退出货币联盟的代价是如此之高昂，以至于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都不会做此设想。国家破产，也是可能的后果之一。[32]

一方的负债，就是另一方的权益。据法兰克福的德国联邦银行计算，所谓的“第二目标系统”（Target2-System）的总额已达7540亿欧元。常年担任慕尼黑经济研究所（Münchner 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所长的汉斯-维尔纳·辛恩早就一再指出，这个系统自身带有固有的危险。如果说多个乃至所有欧盟内陷入危机的国家突然崩溃的可能性还很小，那么德拉吉的信至少表明了一件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欧元区的长期稳定依然遥遥无期。只不过，与其他政治领域在2017年初所集中爆发出的离心危机相比，欧元的危机还不那么显眼罢了。[33]

---

[1] 乌斯塔沙政权是一个成立于1929年，旨在让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该组织信奉种族主义，主动投靠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在二战中残酷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并在战争中被盟军粉碎。但由于该组织带有民族主义和反共的性质，又在克罗地亚独立之后受到右翼势力的崇拜。

[2] 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的首都。

[3] Kroatische Konservative bejubeln das «Projekt Plenkovic»,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3. 9. 2016; Regierung ohne Nationalisten, ebd., 21. 10. 2016;Kroatien arbeitet Historie auf,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7. 1. 2017. 关于克罗地亚2016年的政治危机，参见本书原文第160页前后。

[4] 塞族共和国（也译作斯普斯卡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共和国（Republika Srbija）不是一回事。按照《代顿协议》，主权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两个政治实体，分别为占有51%领土的波黑联邦（即穆克联邦）和占有49%领土的塞族共和国。这两个政治实体都有各自的总统、议会、中央银行、军队和警察部队。塞尔维亚共和国是另外一个由前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国家。

[5] Michael Martens, Provokation Nationalfeiertag,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7. 9. 2016.

[6] 尤比克党（全称是JOBBIK Magyarországért Mozgalom，即“为了更好的匈牙利”）的党员以青年人为主，党主席是沃纳·加博尔（Gábor是姓，所以在匈牙利他被称作加博尔·沃纳）。

[7] 又译为“清一色化”，是德国人在描述纳粹政权（以及其他极权政府）时常用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政府控制舆论和言论，强令媒体只能成为政府的耳目喉舌。

[8] Stephan Löwenstein, Die Ungarn und die unterschätzte Gefahr des Frettchens, ebd., 30. 9. 2016; ders., Abhängig. Der unga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schafft sich eine genehme Zeitungslandschaft, ebd., 8. 11. 2016; ders., Blaues Auge für Orbán,9. 11. 2016; Pressefreiheit zu verkaufen, in: taz.de, 4. 9. 2012. http://www. taz.de/!5084844/. Zur Reaktion der EU: Bloomberg.com/10. 10. 2016.

[9] Council of Europ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 (Venice Commission). Opinion 860/2016. Venice, 14 Octobre 2016. CDL-AD (2016) 026.

[10] 1981年12月13日，因团结工会运动在波兰蓬勃发展，刚于1981年10月开始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戒严令。此前，雅鲁泽尔斯基曾长期担任波兰国防部长（1968年4月至1983年11月）。1990年，雅鲁泽尔斯基把总统职位让给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于是波兰成了第一个“改旗易帜”的东欧国家。

[11] Maximilian Steinbeis, Hat die EU das Kräftemessen mit Polen bereits

verloren?,in: http://verfassungsblog.de/hat-die-eu-das-kraeftemessen-mit-polenbereitsverloren/; Konrad Schuller, Kampf um die Herrschaft des Recht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6. 12. 2016 (hier die Zitate von Timmermans); EUKommission verschärft Kritik an Polens Regierung, ebd., 22. 12. 2016; Daniel Brössler, Polens Parallelwel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1. 12. 2016; PiS gibt nach,in: *Der Tagesspiegel,* 21. 12. 2016; Slawomir Sierakowski, Die Schwächen der Fanatiker, in: *Die Zeit,* Nr. 53, 21. 12. 2016. 关于波兰到秋季为止的局势发展，见本书原文第151页前后。

[12] 按照法国总统选举的规则，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率超过50%，将举行针对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选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的第二轮投票。由于第二轮投票几乎总会发生，所以政论家们会格外关注候选人在这一“关键投票”中的潜力。

[13] 法语中的“profonde”与英语中的“profound”同源，所以直译是“深法国人”（英语的对译是“Deep France”），指的主要是那些生活在“外省”、农村，深受天主教文化熏陶，反对巴黎开明思想的保守居民。与此对应的，英语中也有“Deep England”（推崇自治和田园文化的英国人）、“Deep South”（美国那些在南北战争前属于蓄奴州的地区）等说法。

[14] Mathieu Goar, Le programme de François Fillon: fonctionnaires, retraites, TVA, education, famille ..., in: Le Monde, 21. 11. 2016. http://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16/11/21/francois-f llon-un-programme-economiquementliberalsocialement-traditionnel-et prorusse_5034888_823448.html; Maxime Vaudano, Adrien Sénécat et Laura Motet, Ce qui différencie les programmes de f llon et Juppé, ebd. http://www.lemonde.fr/les-decodeurs/article/2016/11/21/primaire-de-la-droite-ce-qui-differencie-f llon-et-juppe-dans-leurs programmes_50348204355770.html; Michael Wiegel, François der Bekenne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6. 11. 2016; Leo Klimm, Das Fillon-Paradox, in: Süddeutsche Zeitung,25.11.2016.

[15] Wider das Wiener Establishmen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12. 2016;Konrad Paul Liessmann, Beschworene Staatskrisen, ebd., Cathrin Kahlweit,Weltuntergang Österreichs verschob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6. 12. 2016.

[16] Paul Blocker, *«Vote Yes for a Safe Italy» or «Vote No to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Italian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between Majoritarianism and Civil Resistance.* VB.http://verfassungsblog.de/italy-constitution-referendum-

renziblokker/; Italy votes 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Economist,* 26. 11. 2016.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710809/; Oliver Meiler, Absurdes Kammerspiel, in: *Süddeutsche Zeitung,*3./4.2016; Tobias Piller, Die Arroganz ist sein Defizi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12. 2016; ders., Italien entfernt sich von Europa, ebd., 6. 12. 2016; Jörg Bremer, Lieber Löwe als Schaf, ebd., 8. 12. 2016; Nando Pagnoncelli, Elettori pd fedeli, centristi divisi, in: *Corriere della Sera,* 5. 12. 2016. http://www.corriere.it/referendum-costituzionale-2016/notizie/referendum-costituzionale-2016-elettoripd-fedelicentristi-divisi-16bfef7e-bb31-11e6-8d3b-c05118807aea.shtml; Massimo Gianni, Se il voto diventa un rito cannibale, in: *La Republica,* 8. 12. 2016. http://www.repubblica.it/politica/2016/12/08/news/se_il_voto_diventa un_rito_cannibale-153 685884/. 关于此次公投的前史，参见本书原文第167页前后。

[17] 该党的全称是“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缩写是GERB，正好是保加利亚语“纹章”的意思，所以被称为“纹章党”。

[18] Florian Hassel, Regierungskrise in Bulgari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15. 11. 2016; ders., Der gekaufte Staat, ebd., 22. 11. 2016; Reinhard Veser,Der General,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5. 11. 2016; ders., Ein mutmaßlicher Putsch und eine russische Spur, ebd., 22. 2. 2017; Sozialdemokraten gewinnen Wahl in Rumänien, ebd., 13. 12. 2016; Russland, Iran und Türkei wollen in Syrien vermitteln, ebd., 21. 12. 2016; Kareem Shaheen u. a., Turkey threatens to end refugee deal in row over EU accession, in: *The Guardian,* 25.11.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nov/25/turkey-threatens-endrefugee-deal-row-e u accession-erdogan. 关于普京是如何对付欧洲及欧盟的，可参见: Manfred Quring, *Putins russische Welt. Wie der Kreml Europa spaltet,*Berlin 2017。关于荷兰2016年4月的全民公决，参见本书原文第172页；关于普京与埃尔多安在2016年8月的会面见本书原文第192页；关于对尼斯的恐袭见原文第191页。

[19] 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是柏林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位于繁华的选侯堤大街一侧。在二战中教堂的主体部分被摧毁，战后柏林人保留了剩余部分的残破状态，作为对历史的纪念。

[20] 萨拉菲主义是宗教激进主义的一种，其名称来源于“虔诚的祖先”（al-salaf al-salih），主张严格效法先知穆罕默德和他早期的追随者，支持实施“伊斯兰教法”（Sharia）。

[21] Hans Leyendecker u. a., Gefährder,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2. 12.

2016; Lena Kampf u. a., Das darf nicht wahr sein, ebd., 23. 12. 2016; Georg Mascolo, Der Gefährder, ebd., 4. 1. 2017; Jasper von Altenbockum u. a., Der hochmobile Islamis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3. 12. 2016; Mohamed Amjahid u. a.,«Ein Anschlag ist zu erwarten», in: *Die Zeit,* Nr. 15, 6. 4. 2017.

[22] 作者这样说，是因为按照联邦德国法律，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的党派才有资格进入议院，而自民党（党团标志为黄色）在上一次的选举中没有达标。

[23]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牙买加国旗的图案是"黑绿黄"组合。

[24] 最后成为现实的，正是这样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25] Annett Meiritz, Özdemirs Wackelpartie, in: *Spiegel Online,* 18. 1. 2017.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buendnis-90-die-gruenen-cemoezdemir spitzenkandidat-das-bedeutet-die-urwahl-a-1130510.html; Christoph Dieckmann,Nach mir die Zukunft. Sigmar Gabriel geht, Martin Schulz komm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5. 1. 2017; Matthias Meissner, Der totale Höcke, in: *Der Tagesspiegel,*19. 1. 2017; Führende AfD-Politiker warnen vor Spaltung ihrer Partei,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4. 2. 2017.

[26] 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政府于发起了一场公投，让克里米亚居民决定是否从乌克兰独立并且加入俄罗斯联邦。16日的投票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约97%）选民赞成脱乌入俄。大部分西方国家和乌克兰临时政府拒绝承认此公投的合法性。

[27] Helene Fouquet u. a., Le Pen Struggling to Fund French Race as Russian Bank Fails, in: *Bloomberg Politics,* 22.12.16.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12-22/le-pen-struggling-to-fund-french-race-after-russianbackerfails; L'annexion de la Crimée par la Russie n'est «pas illegale» pour Marine Le Pen, in: http://www.bfmtv.com/politique/l-annexion-de-la-crimeepar-la-russie-nest-pas-illegale-pour-marine-le-pen-1077194.html; Terence Dopp u. a., France's Le Pen Generates a Stir with Stop at Trump Tower, in: *Bloomberg Politics*.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1-12/le-penin-new-york-for unannounced-visit-during-french-race.

[28] Alexandre Lemarié et Matthieu Goar, En meeting à Paris, François Fillon défend son épouse et crie au complot, in: *Le Monde,* 29. 1. 2017; Maxime Tandonnet,François Fillon: le nouveau paria de la République, in: *Le Figaro,* 20.

1. 2017;Christian Wernicke, Aufmarsch der Tronfolger,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2. 1.2017; ders., Penny und das Liebe Geld, ebd., 26. 1. 2017; Ärger um Macron, ebd.;Michaela Wiegel, Riss durch die Partei,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4.1. 2017; dies., Der Ehefrauenförderer, ebd., 26. 1. 2017; dies., Durch die Finger geronnen, ebd., 2. 2. 2017. 关于共和党内的初选见本书原文第241页前后。

[29] Moralisierer mit Makel,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0. 1. 2017; Konrad Schuller, Aus der Tiefe der Geschichte, ebd., 13. 1. 2017; Florian Hassel, Auftakt im Chao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2. 1. 2017; ders., Die Opposition unwählbar machen, ebd., 18. 1. 2017; Christoph von Marschall, Zwei Vaterländer, zwei Patriotismen, in: *Der Tagesspiegel,* 8. 1. 2017; Albrecht Meier, Die Ohnmächtigen,ebd., 24. 1. 2017. Zur Entwicklung des polnischen Verfassungskonflikts bis Ende Dezember 2016 siehe oben S. 272 ff. 关于2016年12月底前波兰宪法冲突的发展进程，见本书原文第272页前后。

[30] Cathrin Kahlweit, Feldzug gegen die Zivilgesellschaf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12. 1. 2017, Stephan Löwenstein, Der entfesselte Orbá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4. 1. 2017.

[31] Karl-Peter Schwarz, Im Sumpf von Bukares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7. 1. 2017; Rumänen demonstrieren gegen Regierungspläne, ebd., 20.1. 2017; Johannis droht in Rumänien Amtsenthebungsverfahren, ebd., 24. 1.2017; Rumänien setzt seinen exzellenten Ruf aufs Spiel, ebd., 26. 1. 2017; Neue Anhänger für Johanni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6. 1. 2017; Florian Hassel,Unschuldig, weil mächtig, ebd., 31. 1. 2017; ders., Rumänien in Aufruhr, ebd.,3. 2. 2017; Tousands rally in Romania against plan to pardon, in: DW. http://www.dw.com/en/thousands-rally-in-romania-against-plan to-pardon-prisoners/a-37323326. 关于薇拉·尧罗娃见本书原文第66页，关于试图罢免伯塞斯库的过程见本书原文第148页。

[32] Zwei Italiener kämpfen in Brüssel,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7. 1. 2017; Daniel Brössler/Tomas Kirchner, Europäische Erbstreitigkeiten, ebd., 18. 1. 2017; Daniel Brössler, Der Anti-Schulz ebd, m 19. 1. 2017; Markus Grabitz, Machtpoker bis zum Schluss, in: *Der Tagesspiegel,* 18. 1. 2017; Zeitenwende im EU-Parlament,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9. 1. 2017.

[33] Cerstin Gammelin, Draghis Warnun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4. 1. 2017; dies.,Warnen reicht nicht, ebd., 25. 1. 2017; Draghi: Land muss bei

Austritt seine Target Schuld zahl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5. 1. 2017. Zum Target System: Hans-Werner Sinn, *Der Euro. Von der Friedensidee zum Zankapfel* (engl.Orig.: Oxford 2014), München 2015, S. 279 ff. 关于2014年欧盟委员会领导机制在事实上的议会化，见本书原文第63页前后。

第13章

西方会分裂吗？

在唐纳德·特朗普任职的前4周里，这位美国的新总统几乎天天都登上新闻头条，并且常常还引来人们的愤怒。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上台后的首批行政令之一，就是部分废除奥巴马医保。紧接着，他又于1月23日兑现了他在竞选中的承诺，废除了在奥巴马任期内已经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此举惹恼了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国。次日，这位总统又重启了被奥巴马叫停的两条有争议的输油管线的建设，结果引起了环保主义者和受影响的印第安原住民的抗议。

1月25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准备在靠墨西哥的边境处建墙。据称，这座为防止非法移民而建的墙将耗资400亿美元，此笔钱先由美国方面承担，但晚些时候将会让墨西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还回来。特朗普发推特表示，假如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不愿负担这笔钱，他也可以取消原定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墨西哥总统放弃了这次会面。对此特朗普表示，将对墨西哥的商品征收20%的惩罚性关税。[1]

特朗普宣誓就职一周后，就干了他任期内的第一件引发国际轰动的事。1月27日，他发布了一条立即生效的入境禁止令，针对的是7个伊斯兰国家的公民（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索马里和苏丹）。对叙利亚人而言，该入境限制是没有时限的，对其他6国人而言，限制令的有效期为4个月。可作为例外处理的，只有受歧视的宗教少数派——这显然是在为这些国家的基督徒考虑。据称，之所以一定要颁布这项规定，是为了帮美国把恐怖分子挡在国门之外。可说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某些特别具有“恐怖嫌疑”的伊斯兰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基斯坦）却不在入境限制的名单上呢？有些评论家揣测，总统有意识地挑出名单上这几个国家，是因为特朗普集团在那些地方没有商业利益。

这一“穆斯林禁令”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抗议的浪潮。在美国本土，无数城市都爆发了反对总统最新措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美国的各大国际机场，总统的禁令引起了混乱。一些持有有效护照的人被拒绝入境，或是被拒绝登机；众多家庭因此而被拆散；上万名“绿卡”持有者也被拦了下来，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多年；此外，还有一些常年为美军工作（比如充当翻译）的伊拉克人也被波及。这项总统令显然已经过于任性，以至

于纽约的联邦法官安·唐纳利（Ann Donnelly）在禁令签发的次日就接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申请，给予所有被波及的、滞留于美国机场的7国民众以临时居留许可，并禁止遣返他们——采取这项举措的理由是：如果不这样做，总统的命令可能会带来无法修复的伤害。

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在西雅图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则更进了一步：2月3日，他称特朗普的行政令违宪，因为他歧视穆斯林并因此而侵犯了宗教信仰的基本权利。为此，该禁令在审判情况变化之前暂时失去了法律效力。政府方面正式反对这项诉讼，但负责此案的旧金山联邦法院于2月5日同意了一审的判决，并使总统首度遭受重大挫折。特朗普先是宣布要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不久之后又发布了一个新的、经过斟酌修改之后的旅行禁令。他的第一反应是称西雅图的联邦法官为一个“所谓的法官”，并说这位法官的决定是“可笑的”，这使得连被普遍认为是非常保守的共和派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也站出来批评了他。而特朗普在几天前（1月31日）才刚刚公开提名这位戈萨奇成为填补最高法院已经空缺了1年的席位的候选人。[2]

特朗普在2月3日所做的事没有“穆斯林禁令”那么显眼，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是日，他试图让国会放松奥巴马总统对银行业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限制。这项限制是为了保护银行业免受无监管的金融衍生品的负面影响的伤害。其主要内容，即是国会2010年7月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和补充性的《柯林斯修正案》（Collins Amendment），该修正案考虑了在巴塞尔（Basel）制定的关于银行间国际清算的规则——其中规定了银行最低限度的自有准备金［《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3]

共和党人不能够阻止《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但之后却在该法案生效后的实施过程中设置了许多障碍，以至于尽管人们难以对这份早已被国会千方百计削弱过的法案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奥巴马政府的管制成果比预想的更少。直到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2013年12月，一份限制银行从事自营证券业务和参与对冲基金的法案才生效。而这项法案现在也面临调整。事实上，连同该法案一起被抛弃的是奥巴马治下的美国从雷曼兄弟集团破产案中学到的全部教训——雷曼兄弟曾是美国第4大投资银行，它在2008年9月的崩溃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4]

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个星期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令人摸不着头脑。与他在竞选时期的承诺相符的是，总统于2月3日启动了针对25个伊朗单位和机构的立即生效的制裁，以作为对伊朗政府试射火箭的回应（这次试射有可能是被掩盖起来的建立核武装的准备工作）。但与特朗普一直以来的言

论相矛盾的是新政府对俄罗斯的公开声明。2月2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Nikki Haley）在安理会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政策；她说，只有当俄罗斯结束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占领，并且把该半岛的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之后，才会停止从2014年开始的制裁。2月15日，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明确表示，总统已经对俄罗斯讲得很清楚，取消制裁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俄罗斯必须缓和其针对乌克兰的政策，而且必须把克里米亚交还给乌克兰。

在其他领域，特朗普也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方针。1月29日，他在接受一家基督教电视台基督教广播网（CBN）的采访时表示，（他在选举时期承诺过的）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一事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对要办成此事必须要研究那么多的细节问题而感到吃惊，而这些工作完全不适合他。在不久之后的2月10日，他在接受以色列的日报《今日以色列报》（*Israel Hayom*）采访时首次表示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扩建定居点政策的担忧：“这样的土地是有限的，每次定居时占去一点，剩下的地域就会少一点。”2月10日，特朗普首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据他说，通话是“非常亲切友好的”。应中国国家主席的愿望，特朗普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5]

特朗普的立场变化是否与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有关？这还不好说。在华盛顿以及世界各大城市，人们都在猜测：谁会对总统施加这样的影响？他最信得过哪位顾问？最常在答案中被提及的，是他的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和他最重要的演讲撰稿人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人们认为正是此人撰写了1月20日的那篇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就职演说。总统甚至允许班农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会议，要知道总参谋长和情报协调官都不曾拥有这项特权。鉴于班农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被视为极右派，有内部人士从特朗普将他任命为该委员会固定成员的决定中推测，特朗普更加倚重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委员会，而是更能印证他自己的设想，并能尽可能为复杂问题提供简单答案的人。另一件能说明班农影响力的事情，是他能够为另一位信奉“美国优先”方针的极保守的知识分子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谋得一个负责联络工作的重要职位。[6]

新政府在各部部长层面显得比其最高机关（白宫）更加务实。面对来自欧洲的访客，如德国外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及其同事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他们各自的“对口官员”雷克斯·蒂勒森和詹姆斯·马蒂斯都强调了美国对盟友不可动摇的忠诚。马蒂斯2月1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上也做了类似的声明。3天后副总统迈克·彭斯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安全年会上，要求欧洲伙伴们最迟在2017年底践行它们在2014年威尔士北约峰会上做出的承诺：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事实上，当

年商定的是在2024年之前朝着这个目标“靠近”。）彭斯说，如果欧洲人不理会这个要求，美国将削减其在欧洲的军事投入。

在特朗普任职的第1周，他唯一亲自接见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是特雷莎·梅。这位英国首相在白宫听到的，是对“脱欧派”的鼓励。为了取悦自己的访客，特朗普表达了迅速达成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愿望，并以此说明英、美两国之间“特殊关系”的光明前景。在会晤前一天，梅在费城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表示：两国都在致力于变革自身，两国有望再次携手同行。

英国首相回国之后，不得不面对过于巴结特朗普的指责，而在那些需要明确反对特朗普的地方（比如对于酷刑的可接受性），她却没有说话。还有人警告她不要重蹈其前任托尼·布莱尔覆辙，后者曾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完全依从了美国总统（当然是另一位总统，小布什）。令大多数英国公众感到愤慨的是，梅邀请特朗普在不久的将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个决定一再使首相遭到抗议，共有180万人在网上签名请愿：请把特朗普挡在国门之外。同时，此事也在下议院引发了激烈的辩论。[7]

2月14日，特朗普失去了领导团队中的首位成员：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揭露，弗林在12月29日（也就是说还在奥巴马当政时期）多次与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Sergej Kisljak）通电话，讨论未来的总统特朗普取消美国最近因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而对其采取的制裁问题，弗林谈及了美国官方政策的细节并因此被认为违法。在面对副总统彭斯时，他否认曾经谈及取消制裁的话题，但后来有一段录音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证明弗林的话是谎言。

早在弗林被迫辞职之前数周，特朗普已经通过司法部了解到了事件的全过程，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甚至一直把他的副总统蒙在鼓里。自2月中旬起，华盛顿的人们已经开始谈论总统与其副手之间的信任危机，以及特朗普那些最亲密助手之间的权力斗争。在他的“穆斯林禁令”被独立的法庭中止之后，如此迅速地失去他最重要的顾问之一，成了这位刚刚宣誓就职的总统不得不面对的第二个重大挫折。

各方都非常尊重的三星将军兼拿到博士学位的历史学家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erbert Raymond McMaster）迅速被任命为弗林的继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林离职事件就此画上了句号。人们所讨论的中心话题是：特朗普在选战中的高级助手与俄国情报部门的代表究竟谈了些什么。人们之所以觉得存在这番谈话，是因为从2月中旬起《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先后爆料。虽然目前尚不能坐实特朗普的助手曾经参与过俄罗斯（以捧特朗普、打压希拉里为目的）干涉美国选举的过程，但其中的重重疑云还远未廓清。特朗普本人依旧坚决否认曾经与俄国有过任何形式的联系。这时，不但有民主党人，而且有共和党的头面人物开始支持对

特朗普阵营的“通俄”事件展开国会调查。2月还没过完，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已经开始了相关侦讯。

某些观察家认为，新近从尼基·黑利和肖恩·斯派塞口中说出的对俄政策之所以如此严厉，根源在于特朗普希望扭转他多少受普京操纵的印象——有此印象的人不在少数。然而，政府对俄国的态度并不一以贯之。国务卿蒂勒森于2月15日在波恩举行的G20外长会议上谈及了乌克兰问题（他在会上刚刚见过他的俄国同行拉夫罗夫），尽管他要求坚决遵守致力于实现东乌克兰地区和平的《明斯克停火协议》，但却绝口不提把克里米亚归还给乌克兰的（会被莫斯科立即拒绝的）要求。3天后，副总统彭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当着拉夫罗夫的面表示，俄罗斯将为自己的政策付出代价——这只能理解为：对美国政府而言，改善与俄国的关系尚不是优先目标。

以2017年2月15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来访为契机，特朗普在另一个外交问题上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新看法：在调解巴以冲突的问题上，他告别了美国一直奉行的，而且认为是唯一可行的“两国方案”，转而表示他完全可以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合并成一个国家。他没有说还有哪些他认为可行的方案，因而也对根本问题不置一词。根本问题是：如果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作为平等的公民生活在一国之内，那么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犹太国家了——这对以色列民族主义者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不给予巴勒斯坦人完全的公民权，那么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了，而变成了一个专制的、施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权。如果特朗普所声称的政策转向延续下去，那么得益的将是以色列的强硬派，在美国这位新总统仅做温和告诫的情况下，他们会继续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建造，并以此来进一步缩小巴勒斯坦人的领土。

那些以前怀疑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总统施加了巨大影响的人（库什纳是一个亲近以色列右翼和内塔尼亚胡的纽约正统派犹太人），会觉得此事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但无从知晓特朗普的此次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将采取新的中东政策。次日，即2月16日，尼基·黑利就此事表态：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两国方案”，而且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过。于是全世界都要开始猜谜了：到底谁的话算数？是总统呢，还是他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在2月15日登上媒体头条的，还有安德鲁·普兹德（Andrew Puzder）退出任职程序的消息，特朗普本来是要安排他就任劳工部长一职的。普兹德在政治上是个有争议的人选，因为他作为一家快餐连锁店的老板反对提升极低的最低工资和加班费。参议院在举行听证会之后发现，他长年雇用一名在美国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家政服务员。保守的共和党人讨厌他，是因为他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持有相对宽松的立场。最终，他赶在参议院正式否决他之前退出了。而特朗普为教育部选择的部长候选人贝齐·德沃能在参议

院涉险过关，全靠副总统彭斯行使了自己打破僵局的特别决定权——因为任命部长的争议而弄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前所未见。

面对最近的这些挫折，特朗普的反应是于2月16日召开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指责一大批媒体是制造系统性谎言的先锋，还指控它们泄露机密。他否认白宫内部一片混乱，反而称他的政府运转得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次日，他又在推特上发文，说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和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新闻电视台（News）、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样的电视台都是“制造假新闻的媒体”，他还说这样的媒体不是他个人的敌人，而是“美国人民的一个敌人”。他的这番话，又让约翰·麦凯恩这样的共和党参议员和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发表了与他拉开距离的评论。

2月18日，面对他在佛罗里达州的热情支持者，特朗普在演讲中用模糊的语句谈起：前一天晚上在瑞典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但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在瑞典政府向美国提交申诉之后，特朗普把责任推给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关于瑞典移民的一个报道，不过该报道并未提到最近发生了恐袭事件。在特朗普履职4周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在政治上的可预见性越来越怀疑。[8]

2017年2月2日到3日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Valletta）召开的（部分正式又部分非正式的）欧盟峰会上，美国的总统换届并非正式议题之一，但却是最重要的非正式议题。1月31日，在旨在讨论欧洲联盟未来的27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因为英国缺席）上的致辞中，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用罕见的直白言辞将美国新政府“令人不安的表态”列为现在欧盟的重大地缘政治威胁之一，而且还说：“特别是华盛顿的权力交接令欧洲联盟陷入了新的困境，因为新一届政府动摇了美国过去70年来的外交政策。”（与此并列的重大地缘政治威胁还有：越来越相信自身道路的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性政策，以及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战争、无政府状态和恐怖主义。）图斯克以美洲开拓者约翰·迪金森1768年写就的《自由之歌》（*Liberty Song*）中的口号收束：“我们联合则存，分裂则亡。”

马耳他峰会的重点议题是确保欧盟的共同外部边界，尤其是与利比亚的合作问题。2016年，通过地中海中部路线登陆意大利而来到欧洲的18.1万人中，有多达90%的人都是从利比亚出发的；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四千五百多人因乘坐不适合出海的船而丧生。欧盟内部对移民分配问题的分歧非常大，但诸国在拒绝非法偷渡者入境方面，在封闭致命的穿越地中海的北非路线方面，以及在按照欧盟的人道主义要求、运用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

民组织（IOM）的工作网络在当地建立难民接收机构方面，同样也有强烈共识。

利比亚问题的特殊性，在于该国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并能有效运作的政府。根据2016年3月的消息，在由联合国建立的、在法耶兹·萨拉杰总理领导的“统一政府”之下，尽管各方已经签约保证和衷共济，并且同意在克里特岛（Kreta）训练利比亚海岸警卫队，但是萨拉杰政府仅能控制首都的黎波里附近相对狭小的区域，只是在这年夏天才又攻占了此前一直是“伊斯兰国”盘踞地的港口城市苏尔特（Sirte）。在该国的其他地方，都是相互敌对的军阀们说了算。在东部掌权的是托卜鲁克受到国际承认的议会，更确切地说是与议会合作并受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俄罗斯支持的哈利法·哈夫塔将军，这股军事势力在2016年9月后已经控制了重要的石油出口港拉斯拉努夫（Ras Lanuf）和艾西达（Es Sider）。

据欧盟所知，2017年初在整个利比亚共有约90万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客籍劳工或移民；据称其中至少有35万有意前往欧洲（另一些人估计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几乎所有来自援助机构的报道都表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些容纳了成百上千人的自行建立的难民营的情况都是灾难性的。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把人从意大利遣返回利比亚的行动就难以想象。因此，在瓦莱塔通过的关于在移民问题上加强与北非国家合作的愿景中涉及利比亚的部分，暂时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2月中旬，即欧盟举行马耳他峰会近2周之后，从开罗传来了一个带给人一丝希望的消息：在埃及军队的斡旋之下，法耶兹·萨拉杰总理与哈利法·哈夫塔将军在未直接见面的谈判中，就利比亚国家新秩序的远景计划达成了一致。按照该计划，萨拉杰政府的国家委员会将与托卜鲁克的国会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其使命是起草利比亚宪法，并且负责实现联合国于2015年12月通过的《斯基拉特和平协议》。同时，的黎波里和托卜鲁克这两大权力中心应就一个过渡政府内阁达成一致，并最迟于2018年2月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但该协议并没有说清楚，哈夫塔将军会在过渡时期以及在那之后扮演什么角色。这份在开罗达成的协议怎样落实，将取决于埃及、阿联酋和俄罗斯会对那位倔强的将军施加何种压力。

开罗的谈判才过去2周半，人们即看到达成的一致其实建立在流沙之上。在3月第一个星期的周末，以伊斯兰营为主力的部队将哈夫塔将军的部队赶出了具有战略价值的出海口拉斯拉努夫和艾西达。的黎波里的萨拉杰政府表示他们与这场战斗无关，但却从伊斯兰营手中接管了这两个油港。伊斯兰营方面宣称，接下来他们要把哈夫塔的军队赶出班加西。托卜鲁克的那个与哈夫塔结盟的议会对此的回应是：退出《斯基拉特和平协议》，单方面宣布于2018年初举行新一轮大选，并且宣布不承认萨拉杰政府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忠于哈夫塔的部队在班加西附近向伊斯兰营发起了攻击。

托卜鲁克与的黎波里这两大争权阵营之间的仇隙，已经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在北非国家中，让欧盟计划中的难民接收营方案陷入困境的，并不只有一个利比亚。2月14日，突尼斯总理尤素福·沙海德（Youssef Chahed）在访问柏林时表示，他的国家已经挤满了大量来自利比亚的难民，并且还要照顾他们，因此难以再建立新的营地。本来默克尔总理要在2月21日为同一话题出访阿尔及利亚，却由于该国总统布特弗利卡（Bouteflika）临时告病而不能成行。

2月17日，有500名（3天后又有350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从摩洛哥翻过了高高的铁丝网，进入了西班牙的北非海外属地。西班牙政府马上表示，他们推测摩洛哥未阻拦这次越境行动的动机是想给西班牙和欧盟施加压力，以便在移民问题上达成一笔对自己更有利的“交易”——摩洛哥政府驳斥了这个猜测。根据德国安全部门的内部估计，此时约有660万来自非洲或中东的人在欧洲周边游荡，他们都想尽快进入欧洲。[9]

2017年2月，几乎就在移民问题发酵的同时，欧元区危机又重新回到了欧洲政治的议事日程之中。具体而言，是救助希腊计划的一笔贷款的偿付出了问题——希腊政府本应该于2016年7月偿付这笔70亿欧元的贷款。另一个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还会继续参与救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进行债务减记（损失由欧洲债权人承担）——不管其他国是什么态度，德国都会坚决反对这个要求，直至援引《马约》之中“不救助”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三次救援希腊的计划中向救助者承诺的是：从2018年起，希腊的财政预算应实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毛盈余”（即不考虑利息和偿付的财政盈余）——现在，该组织已经觉得这不太现实。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一步紧缩财政，多数欧元区财长都支持这样做，但齐普拉斯政府却断然拒绝。特别有争议的部分，是缩减养老金和降低所得税的免税额。根据齐普拉斯的说法，他不得不考虑到，他的政治联盟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岌岌可危的多数。而如果他拒绝进一步改革，那就难保自己的国家不被欧元区开除。在新一轮大选中，齐普拉斯有下台的危险：各类民调都显示，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领导下的属于保守派的“新民主党”（Nea Dimokratia）明显领先于属左翼民粹主义的激进左翼联盟。

2月20日，欧元区各国财长再次与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人员赶赴雅典，以争取与希腊达成可能的共识。正如欧元集团主席、荷兰财政部长杰洛·戴松布伦所强调的，目前最紧要的还不是以恢复竞争力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所需要的那样大力紧缩；欧元集团以及其他机构都认

为，最要紧的是降低所得税的免税额：目前8636欧元的免税额使得约半数希腊人不用为收入缴税。但降低免税额将会增加低收入者的负担，从而导致激进左翼联盟在大选中失败——这也是为什么齐普拉斯政府会坚决反对任何变革。

退休金问题也是同样道理。在希腊的年度财政负担中，有10%要拿出来填补退休金系统的缺口；而此项开支比例的欧洲平均水平是2.5%。让债权人感到不满的还有：公务员的工资和退休金在公共开支中占的比例过高。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改革，似乎就不可能产生预算盈余，而这样的盈余已被债权人视为同意重新审核该国的债务可持续性的先决条件。2月22日之后，齐普拉斯已经不能指望近期会出现债务减记了：这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柏林表示，现在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债务减记。2天后，齐普拉斯表示，他将与债权国据理力争，直至3月20日。[10]

在2017年初让货币联盟内其他国家操心的，并非只有希腊这一个欧元区国家。在过去的一年里，意大利无意减少其负债。自2014年以来，其负债率一直在131.9%~133%，相当于《马约》所规定的60%标准的2倍还多。2015年4月，伦齐政府的财政计划曾经设定了到2019年把负债率降到120%以下的目标，可一年之后就向上调整了数字，并于2016年10月再次调整为：到2019年降到126%以下。然而，连这个新的、非常有限的目标，也早就显得遥不可及了。

财政部长帕多安（Padoan）——他也在接替伦齐的保罗·真蒂洛尼内阁中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于2月初拒绝了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让意大利削减0.2%（或者说34亿欧元）预算赤字的要求。他的回应是，他希望目前不要在这些领域采取措施，但他会在4月将减少常规开支、提高烟草和石油税纳入中期财政计划。

这时还不清楚，在4月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意大利的国内政局会如何发展。自2016年12月的全民公决否定了宪法改革之后，包括北方联盟、五星运动乃至伦齐的民主党之内的许多党派都要求尽快举行新一轮大选。2017年1月24日，宪法法院宣布现行的选举法——《意大利法》（Italicum），在涉及参议院的地方违宪。不过，选举法的缺失还不是举行新大选的唯一障碍。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认为人们所谈论的这场新大选将是一次危险的冒险，于是他动用自己的影响，以求真蒂洛尼政府一直执政到2018年初举行常规议会选举为止。其实，所有已当选的议员（其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民主党）也都对新大选不感兴趣——他们2013年才取得这些席位，只有把议员当到2017年9月才有获得养老金的资格。

2月19日，伦齐辞去了民主党主席一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告别政坛，

而是为了迫使本党召开一次全党大会并初选主席。这种办法，让他在党内左翼（和前共产主义的）的那些没有想到这么早就要面对权力竞争的对手陷入被动（这些对手包括前党魁皮埃尔·路易吉·贝尔萨尼和前总理马西莫·达莱马）。对人们所谈论的新一轮议会选举，伦齐现在已开始保持沉默。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和五星运动的支持率都在30%左右，也就是说都低于40%这个神奇数字——按照现行的选举法《意大利法》，达到这个数字的最大党可以享有取得绝对多数席位的特别权利。现在，伦齐的目的显然是先把本党拉到自己身后，并且让本党在民调中拥有领先于贝佩·格里洛的民粹运动党的明显优势，然后再力图借选举令自己重回权力中枢。

伦齐不会不知道他的举动有可能会分裂民主党，但他觉得可以接受这个结果。但在2月25日事情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在贝尔萨尼和达莱马的支持下，前议会党团主席罗伯托·斯佩兰扎（Roberto Speranza）、托斯卡纳大区党主席恩里科·罗西（Enrico Rossi）、工会领袖吉列尔莫·埃皮法尼（Guglielmo Epifani）和其他民主党左翼代表人物一起，试图效法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在罗马创立了“民主与进步运动”。有38位民主党众议员和12位民主党参议员宣布改投新党。此时，民主党人尚不知道这会对选情产生多大的影响。初步估计，支持率的波动会在2～8个百分点。而要是伦齐的党失去3个百分点以上的支持率，它就有可能落后于五星运动：要知道，在民主党分裂之前它的支持率（31%）只比五星运动（28%）高3个点。

在经历了2016年12月的政府更迭后，意大利的经济形势和财政状况并没有好转。2017年2月16日，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它授权真蒂洛尼政府动用200亿欧元拯救银行业。当债台高筑的意大利锡耶纳银行在自由市场上募集50亿欧元以充盈资本的努力失败之后，仅这一家银行估计就需要80亿欧元。专家们怀疑，众议院批准政府动用的那些款项，可能根本不足以填补意大利各银行自身资本的缺口。

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市场上意大利国债的风险溢价上升了2%——这表明投资人越来越紧张。不久之后，加拿大的信用评级机构多美年债券评级服务（DBRS）去掉了意大利信用评级中的A，而且多美年债券评级服务已经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大型信用评级机构了。欧盟委员会还因意大利削减国债不利而威胁要对其实施惩罚。鉴于最新民调显示拒绝欧元的意大利人口比率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46%～48%，尤其是考虑到实施这一惩罚的时间点与意大利议会选举开始的时间可能重合，那么它将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意大利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9%，远低于欧盟28国的平均值（1.9%）。意大利一直都是一个陷入危机的国家，马泰奥·伦齐在2月中旬把这个事实归咎于自2012年起实施的严格的财政纪律。其实，经济停滞的

肇因在意大利内部，可无论是这位前总理还是“政坛”上的其他人物都拒绝正视这一点。[11]

2017年2月17日，欧盟委员会于2016年12月给波兰开出的按法治原则调整宪法法院秩序的2个月最后期限到期了。对于布鲁塞尔的要求，波兰政府一直没有给予任何答复。2月21日，出现了一封波兰外长维托尔德·瓦什济科夫斯基（Witold Waszczykowski）写给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的信，而蒂默曼斯早在2月17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就与这位波兰外交的首席代表有过一次激烈的舌战。

瓦什济科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说：波兰不存在法治问题，其分权机制运行良好，所以没有理由对波兰的民主说三道四；蒂默曼斯的说法有其政治动机，这样干是为了羞辱某个成员国。写信人对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的回答是，一旦涉及法治性问题，委员会就是政治上的色盲。要是某一个成员国的法治情况遭到怀疑，那么这对其他所有成员国而言都是一个问题。在一国成了欧盟成员之后，事情就只能这样理解。然而，人们难以指望波兰的这个问题能有一个迅速的决断——2月22日，委员会主席容克的一位发言人声称，现在做决定还为时过早。

波兰的民族保守政府公开宣称，自己在与欧盟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时的宪法法院已经被纳入政府控制之下。法公党阵营坚决否认自己采取了违背宪法的手段。同时，司法部长兹比格涅夫·焦布洛（Zbigniew Ziobro）又给了司法独立新的一击：司法部又制定了3个法案，旨在把最高法院法官和其他下层法院法官都置于司法部和掌控了议会多数的政府之下。

焦布洛的这些新措施的要点在于改革全国法官委员会（KRS）。该委员会一直由17名高级法官、6名议员、司法部长和1名总统代表组成。这些法官是由法官大会选举出来的：全国法官委员会有权决定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全国法官的任免；它通过监察和其他措施来维护法院的独立性。如果按照司法部长的意思办，那么全国法官委员会将由下议院主席提名，并由议会多数选出。

此外，新措施还要将全国法官委员会分成两个小组，第一个由15名法官组成，第二个由6名议员、司法部长、总统代表和2名法官组成。这种做法，无异于要把议会多数派的否决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其可以否决自己不喜欢的法官或监管。根据新措施，以后只有在全国法官委员会的这两个小组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对任命新法官和实质性事务做出决定。被任命的新法官，将无一例外地毕业于受司法部控制的法律学校。本来，出类拔萃的法学教授、律师和检察官都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焦布洛的改革

法案生效之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这位司法部长为了尽可能迅速、完全地将司法机构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试图推迟更换约500名地方法官，直至新法律通过。由焦布洛选出的500人已经于2017年11月开始工作，但他们要等到4年后，在司法部对其工作做出正面评价之后才能被任命为法官。一个新的特别纪律小组将对已经宣誓就职的法官实施控制，该小组的总检察长由司法部长亲自兼任。

焦布洛的计划引起了波兰独立法官们的愤怒。最高法院院长马乌戈热塔·格斯多夫（Małgorzata Gersdorf）在1月底的一次高级法官聚会上宣布："我们可以凭借我们宪法第2条来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奠定坚实基础"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必须为法律和法律的尊严，为每一寸正义而战斗"；而且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法公党的反应很迅猛：3月2日，一个由该执政党的50名议员组成的集团表示他们已经向宪法法院提交了罢免马乌戈热塔·格斯多夫的请求。据他们说，2014年对最高法院院长的任免是有问题的；在她任期内进行的所有判决都必须推翻。

该国的公民社会团体还一再向欧洲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请愿，希望它们不要再让波兰的法治受到新的伤害。然而，从波兰政府控制其宪法法院的过程看，很难让人对布鲁塞尔抱有什么希望。欧盟委员会只会一再拖延时间，而且就算欧洲理事会建议实施制裁（唯一适用的措施是暂停该国的投票权），也会因为匈牙利的否决权而失败。这些年来，在与中东欧的"非自由的民主"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欧盟的表现实在是乏善可陈。[12]

自3月初起，法国的总统大选看起来已经完全成了右翼候选人马琳·勒庞与社会自由派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之间的一场"对决"。3月2日，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在巴黎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他当着约400名记者宣布，他所追求的是一场对该国的全面、激进的改革。除了其他措施之外，他还声称要整合多轨运行的退休金系统、改革失业保险和职业教育体系，让劳动力市场更自由，松动关于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施行更灵活的退休年龄制度，削减12万个公务员岗位并同时新增4000个教师岗位和1万个警察岗位；而且还会减轻企业和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的税负。

马克龙表示自己是一位亲欧政治家。他赞成一个拥有不同发展速度的欧洲、一个深化合作的货币联盟、一个拥有独立财政并共同承担负债的欧元区，以及独立的欧洲防务政策和全欧盟统一的边防警察。其政策的核心是重新加强法、德关系。他认为，法国必须向德国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并且说服这位莱茵河右岸的邻居加入一个克服欧洲经济增长不均衡的共同投资计划。他关于"买欧洲货法案"的想法，听上去就像是那位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新总统想法的翻版：在公务采购中将优先考虑欧洲供

应商，欧洲之外的供应商要享受这样的待遇，必须有一半以上的产品是在欧洲生产的。

马克龙的纲领主要针对的是中间选民，不过也同样兼顾温和的左翼及右翼选民。这时，他的“前进运动”已经登记了超过20万的支持者，这个数字几乎与共和党相当，而且是国民阵线的2倍。当然，“前进运动”还远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派——马克龙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真的当上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他就需要马上解决它。倘若在新选出的国民大会中，他得不到一个可靠的多数派的支持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去推行一套改革方案。[13]

同样是在3月2日，正当马克龙公布其纲领时，欧洲议会遵从法国司法机构的要求，（尽管只是部分地）解除了马琳·勒庞的豁免权。法国司法机构指控这位国民阵线主席非法传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暴力图片，其中包括一位美国记者在2014年被斩首的图片。欧洲议会的这个决定，将使得法国的执法机构得以因此事而审讯勒庞。目前，在涉及其他类型的犯罪时，勒庞还是享有议员豁免权的保护。欧盟反欺诈委员会（OLAF）指责这位女政治家让自己的同事侵吞欧盟财产，其手法是让她的助手用这些钱在法国为国民阵线从事党务工作。此外，在法国还有人怀疑勒庞在作为欧洲议会议员的财产声明中，部分隐瞒了其所拥有的不动产的价值。国民阵线的这位女党魁将这一切都斥责为政敌的政治手段，而且这套说法在她的支持者那里也很吃得开——无论是法国司法机构还是欧盟反欺诈委员会的调查都没有对她的受欢迎程度产生负面影响。

共和党的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也有官司缠身。基于他妻子佩内洛普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吃空饷”的嫌疑，财务检察官展开了初步问讯，其结果是3位调查法官于2月24日起开始调查，并将于3月15日展开正式的刑事程序。这位保守派的候选人本来已于1月底宣布退出竞选，但现在他已将那些话抛诸脑后。他说这是红色法官和作为流言制造机的媒体的一次合谋，是一次政治谋杀；而且还有一些共和党议员掩人耳目地扮成“人民”的样子以民粹主义的伎俩反对他，所以他要骂这些人为“叛徒”。虽然他在人权广场上的一次演讲中承认他不该安排自己的妻子当助手，而且他应该早点把这些讲出来而不该犹豫不决，但是他坚持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他在从初选中脱颖而出之后就担负着全体法国人的希望。

这时的共和党已经有些乱了阵脚。无数菲永的支持者都开始与他划清界限，其中包括他的竞选经理、他的新闻发言人、他的外交事务顾问和200多名议员，这些人大多都要求他放弃竞选。许多人怂恿在第二轮初选中失利的阿兰·朱佩出来取代菲永角逐总统宝座。不过这位波尔多市市长在3月6日坚决表示他不会响应这样的呼声。他谈到了共和党现在已经因为菲永的行为而走进了死胡同，而且还指出法国正陷入一场道德危机。他认为法国

生病了，法国虽然看得到改革的必要性，但就是无法推行改革。鉴于他在2004年那场导致他被判监视居住18个月的党内财务丑闻中的角色，他承认他担不起引领法国人进行这场深刻变革的重担。

数小时后，共和党的领导层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菲永也列席其中。会议的结论是：全体党员都支持本党所选出的候选人——这其实是在没有其他选项的情况下宣示团结。如果民调的预测正确，那么朱佩完全有机会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并在第二轮决选中击败勒庞。而所有的民调都认为，如果共和党人支持菲永，那么马克龙会在第一轮选举中领先菲永（甚至有一个民调显示他会领先勒庞）；而且马克龙和勒庞进入第二轮决选的态势几乎已成定局。更令这样的局面不可动摇的是，不久前，民主运动党主席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宣布为了马克龙的利益而放弃竞选。

与此相反，左派的力量相对而言难以集中到一处。参加总统竞选的不但有社会党的伯努瓦·哈莫，还有左翼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民调显示，哈莫在3月初的支持率在13%～14%，梅朗雄约为12%。这两位候选人都是欧盟及其紧缩政策的批评者；梅朗雄更进一步，在其共同承担负债和取消欧洲央行独立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他甚至不排除退出欧洲联盟的选项。

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位左派候选人都没有希望进入第二轮决选——这个局面与2002年很相似。当年，社会党候选人、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即因左派的分裂而没能进入决定性的第二轮决选。那次进入第二轮的，是让-玛丽·勒庞（马琳·勒庞的父亲）和保守派的在任总统雅克·希拉克，这让后者决定性地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任期。由此看来，2017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之一已经确定无疑了：法国左派的危机将在此后大大加剧。[14]

在法国之外，在3月的前半个月占据新闻头条的并不是围绕着爱丽舍宫的争斗，而是另一个话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了自己主推的宪法改革而进行的对外宣传。按照正发党建立专制总统国家的时间表，将于2017年4月16日对此进行全民公决。为了让在欧盟国家生活的土耳其公民投赞成票，土耳其的部长们从2月起就在诸多欧洲国家穿行。耶伊尔德勒姆总理将他旅行的起点选在德国，这里生活着140万有投票权的土耳其人。他于2月18日在上议院进行了一次演说，受到了埃尔多安支持者的狂热欢迎。

3月2日，巴登小城加格瑙（Gaggenau）的市长出于安全原因禁止了一场私人申报的活动——土耳其司法部长贝基尔·博兹达（Behir Bozdağ）的演说。这位部长因此取消了与德国司法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的会

晤，并把其演讲被禁一事称为“法西斯行为”。还有其他一些城市也出于跟加格瑙一样的理由禁止了土耳其政府官员发表演讲的集会，这些集会的发起人并没有对德国方面讲清楚拟演讲的土耳其政府官员的实际目的。不过，有些地方也允许土耳其部长进行演说，比如土耳其经济部长尼哈特·泽伊贝克奇（Nihat Zeybekçi）就于3月6日在科隆发表了演讲。

3月5日，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说中指责德国人，说他们现在的做法与之前的纳粹分子没有什么区别。在同一天的另一场演说中，土耳其总统宣布，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明天就要来德国，要是他被禁止入境或被禁止演讲，那他就“发动一场起义”。

3月7日，在汉堡的土耳其总领事馆，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完全是在埃尔多安所暗示的意义上对着数百名本国同胞使用了“第三帝国”一词。次日，他与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见了面，后者反对这样用“纳粹比喻”，但没起什么作用。在要求释放德国日报《世界报》驻安卡拉记者一事上，德国方面的态度同样无足轻重。具有德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记者德尼兹·于杰尔（Deniz Yücel），在2月底因为所谓的“为恐怖组织（这指的是库尔德工人党）进行宣传并煽动民众暴乱”而被拘留审讯，此事让德国人非常愤怒。埃尔多安全然不顾各方抗议，一再称于杰尔是个恐怖分子兼德国间谍。他还在3月15日的一次电视讲话中斥责默克尔是恐怖分子的庇护者。

从这时候开始，土耳其的全民公决运动早就不再是仅涉及德、土两国之间关系的事件了。2月27日，奥地利外长塞巴斯蒂安·库尔茨表示奥地利不欢迎参与修宪的土耳其政府成员。3月11日，荷兰政府拒绝给予载有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的飞机降落的许可，恰武什奥卢原计划到该国说服住在鹿特丹的同胞在公投中投赞成票。在这次事件中，土方也同样没有告知地方当局举行活动的实际目的。

就在同一天傍晚，土耳其家庭部部长法蒂玛·贝图尔·萨扬·卡亚（Fatma Betül Sayan Kaya）坐汽车从德国“微服”前往鹿特丹，为的是在那儿的土耳其总领事馆对正发党的支持者发表演说。但就在她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她被警察拦下并被强制送回德国，最终从德国飞回了土耳其。次日，埃尔多安又开始谴责荷兰政府，称其仿效纳粹和法西斯的行为。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称荷兰为“法西斯主义的首都”，不久后他与土耳其欧洲部部长厄梅尔·切利克（Ömer Çelik）一样开始质疑与欧盟进行的“难民交易”。土耳其与荷兰的关系降至冰点，甚至连3月11日当天不在土耳其的荷兰驻土大使都被禁止再次入境。

土耳其的激烈反应使得一些欧洲国家站出来表达自己对荷兰的支持。丹麦政府请求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在目前的局势下推迟原定于3月20日

的访问。德国总理也同样发表了支持荷兰的声明。安格拉·默克尔提醒土耳其，荷兰曾遭纳粹荼毒至深。总理府主任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表示，德国政府在法律上有权阻止土耳其政府代表在此地的选举造势行为，并且不排除行使这一权利的可能性。

埃尔多安采取这种应对策略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欧洲国家继续阻止土耳其的部长前去为投票做宣传，这类宣传在海外土耳其人中的效果反而会比从国内派人过去演讲更好。埃尔多安关心的是欧洲的反应所带来的动员和凝聚效应，他把这些效应理解成故意施加于土耳其的轻蔑和歧视。事实上，除了亲库尔德人的党派以外，各反对党也站在总统和政府一边。如果说此前的民调显示公投中准备投反对票的人稍占多数，现在——至少按正发党的说法——想投赞成票的人已居多。

到目前为止，埃尔多安想必会对自己针锋相对策略的成果感到满意。不过，他又进一步推动了冲突的升级。3月17日，他号召在欧洲生活的土耳其人："别只生3个了，要生就生5个孩子，欧洲的未来是你们的！"3月20日，他指名道姓地责难德国总理，说她采用的是"纳粹的做法"。他说，欧洲可能会因此重新修建集中营和毒气室，只是"她"可能还不敢。当德国联邦新闻官布鲁诺·卡尔（Bruno Kahl）在3月19日的一次采访中质疑土耳其政府关于居伦运动是2016年7月政变的幕后推手的说法时，土耳其国防部长菲克里·厄舍克（Fikri Işik）反过来质疑：德国特工是不是真的没有参与煽动政变呢？

3月21日，埃尔多安称欧盟整体上是"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和野蛮的"，还宣称将在公投之后重新检视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正发党在德国的后援组织宣布，在公投前将不再安排土耳其政治家到德国进行投票的拉票工作。这很可能是土耳其总统对德国的警告做出的反应，如果土耳其政府继续用拿纳粹打比方的做法诋毁现在的德国，那么德国不但可能继续禁止正发党代表来演讲，而且可能会收回土耳其在德国各大城市建立地方投票站的许可。或许，埃尔多安现在也觉得他的挑衅策略已经达到了预期的动员海外土耳其人的目的，以后只要在国内攻击一下德国和欧盟就行了。[15]

在2017年的3月，受投票气氛主导的并非只有土耳其政治。荷兰政府之所以对来自安卡拉的挑衅反应如此强烈，同样与选举日期临近有关：3月15日要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伊斯兰、反移民、反欧盟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基尔特·威尔德斯非常有希望在选举中胜出；他的自由党得票将在20%左右，明显超过现在执政的由首相马克·吕特领衔的右翼自由派政党自由民主人民党（VVD）。在这一年里，对每一个把来自其他文化（特别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源源不断的移民视作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威胁的荷兰人而

言，威尔德斯已经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同时，这批荷兰人觉得欧盟是一个人们无从认识、无法控制的强权，这个强权总想要越来越紧地管控自己的成员国，甚至使之丧失自主权。

自2012年以来，执政的右翼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用来应对民族民粹主义挑战的方法是：他们放弃了“越来越紧密的同盟”的口号，转而于2014年7月讲明了以下原则——只有在民族国家应付不了的地方，才需要在欧洲层面实施治理。在2017年选战期间，吕特以前所未见的尖刻言辞要求已定居荷兰的移民和在荷兰的外国人要么就全面、完整地适应荷兰的生活方式，要么就离开这个国家。在他1月23日以报纸广告的形式发布的一封致全体荷兰人的公开信中有一句最后通牒般的话，其口气简直登峰造极：“你要规规矩矩做人，否则就滚蛋！”

吕特受到了其执政伙伴的严厉批评。劳工部长洛德韦克·阿斯切（Lodewijk Asscher，他同时也是工党推举的领头候选人）称自己的政府首脑的样子是“照着民粹主义者描出的蹩足形象”。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西布兰德·布马（Sybrand Buma）说正在发生一场难以置信的“剧变”；现任内阁的做法使得这个国家的“公共道德已然沉沦”。然而，大多数荷兰政党都反对不加控制地移民。同样，它们大多也反对继续将国家主权交托给欧洲联盟。强调对移民和欧盟友好的只有耶西·克拉韦尔（Jesse Klaver）领导的绿色左翼党，该党在年青一代的荷兰人中颇受欢迎。

吕特关于反击土耳其挑起荷兰内部权力斗争的企图的决定，几乎受到了所有党派的欢迎。很明显，这位首相是希望从他那些民粹主义对手那儿夺走公众的关注[16]，不过他的支持率还是在不断地增长。3月15日，吕特成了选举的胜利者。他的自由民主人民党得票率为21.3%，尽管比2012年少了5.3%，但还是保住了最强党派的地位。威尔德斯的自由党的得票率增加了3个百分点，但依然因得票率13.1%而远远地落在第2位。基督教民主党（12.4%）和左翼自由派的“D66”[17]（12.2%）的得票率也上升了（曾经分别为3.9%和4.2%）。同样，绿色左翼党也因增加了6.8个百分点而得票率为9.1%。选举最大的输家是工党，作为执政联盟中的成员，也为支持吕特严厉的紧缩政策付出了代价：其得票率比五年前下降了19.1%，仅剩下5.7%。这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了81%，是过去30年来最高的。

人们在选举之前就可以预见到，这次的组阁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现在，由右翼自由派和工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已经失去了议会中的多数。观察家们估计，需要由4个党派在右翼自由派领导下完成组阁，而且说不定还要把绿色左翼党加进来。但鉴于左、右翼党派之间的巨大分歧，这样一个组合可能会很成问题。实际上所有的党派都坚决拒绝威尔德斯的党入阁，即使在选举之后它们的态度也没有丝毫变化。

在得知选举结果之后，让荷兰及其欧洲邻国们长出一口气的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得票比预计的少得多（之前人们对此很是担心）。在属右翼民粹派的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在2016年12月的联邦总统选举中失利之后，2017年3月的这场荷兰选举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所遭遇的第2个沉重打击。如果说这些人将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和11月的特朗普胜选视作他们的胜利的话，那么他们也把奥地利和荷兰的选举视为他们的失败。自由派和亲欧势力开始更加相信，接下来法国人会在2017年4月和5月的总统选举中阻击民族主义者的势头。

当然，欧洲力量在荷兰的胜利所带来的欢乐还是不会太长久，要知道不仅是吕特的右翼自由派，而且是该国几乎所有的党派都早就开始反对“更紧密的同盟”，它们转而支持将欧洲层面的职权拿回到民族国家层面来，它们所想要的“欧洲项目”首先是各民族国家政府之间更加深入的合作。在移民事务方面，荷兰政府的立场也是高度现实性的。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荷兰一再触碰到自身接收和容纳能力的极限。因此多数人都反对缺乏控制的移民再继续进行下去。假如吕特不考虑这种非常普遍的态度，那么在议会选举中胜出的很有可能就不是他，而是威尔德斯了。然而，威尔德斯还远远未被打垮：自由民主人民党已经能将他们的议员席位从15席增加到了20席，而且还从荷兰的第三大党升格成了第二大党。[18]

越临近2017年3月25日，这个纪念日就越是能引发对欧洲联盟之未来的讨论。60年前的这一天，各国签订了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罗马条约》。欧盟成员国将于此日一起在罗马欢庆和纪念这一成果，并且表达各自对未来的欧洲计划的看法。

3月1日，欧盟委员会希望用一本《关于欧洲未来的白皮书》（Weiβbuch zur Zukunft Europas）来为这场讨论提供框架。全书共分5个部分，展望了欧盟在2025年的样子。第1部分的口号是“继续前进”，或者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瞄准的目标是逐步实现“更紧密的同盟”。第2部分的主题是共同市场，对此欧盟已经考虑到，各成员国能达成共识的政策领域可能会越来越少。第3部分的口号是“谁要得更多，就做得更多”，陈述的是一个存在速度[19]差异的欧洲。第4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少数比一直以来的预期发展得更快的领域。第5部分更多的是联邦主义者的畅想：各成员国会在越来越多的政策领域共享职权和资源，并做出共同的决定。

该书论及不同速度的欧洲的第3部分特别务实——其实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同样都多次谈到过不同速度的欧洲。但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会强烈反对这种看法，其觉得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乃是一种歧视。该集团在3月2日发表的共同声明中称：赞同继续发展共同市场（特别是在数字化革命和能源供应领

域），认可共同防护欧盟的外部边界和防备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最后还强调了在民族国家层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进行民主化控制的必要性。来自布鲁塞尔的回应是，在起草罗马峰会的共同声明时会考虑这些特别看重主权的中东欧国家的看法。现在人们放弃了“多重速度”的欧洲的说法，改称“不同步调”的欧洲，但其实谈的都是一回事。

正如该书第4部分所预见的，在个别政策领域，无论是“老成员”还是维谢格拉德集团都会赞成欧洲联盟的集中化。在保卫共同边境安全领域尤其如此。3月6日，欧盟27国的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就组建一个负责境外任务的中央指挥部达成了一致。欧盟为了避免给人以欲与北约争锋的印象，特意没有使用“总司令部”这个名称。据该计划的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称，其目标并非组建一支欧洲陆军，但部队会有一个能有效执行军事任务的规模。至少在这一点上，欧盟27国能完全达成一致。

在欧盟各国外长和防长于布鲁塞尔会面3日之后，欧盟各国以及英国的领导人也在同一地点碰面，以共同磋商一些不那么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安全与防务（比如阻止来自北非和亚洲的非法移民入境）。其中的27个国家在会前就已经达成一致，再度选举唐纳德·图斯克为欧洲理事会主席，让他完成为期两年半的第二任期。唯一的例外是那个图斯克于2007年至2014年担任总理的国家：波兰。

波兰之所以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产生这样的分歧，是因为法公党党魁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对图斯克抱有深深的敌意。波兰总理贝娅塔·希德沃提议，由相对不太知名的亚采克·萨里尤兹-沃尔斯基（Jacek Saryusz-Wolski）接替图斯克成为欧洲理事会主席（此人是欧洲议会里欧洲人民党党团内的波兰籍议员，本身隶属于“公民论坛”），但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表示支持。希德沃的回应是阻挠峰会通过闭幕宣言，结果大家不得不放弃由理事会主席公开宣读闭幕宣言的仪式。波兰的政治家们早就因图斯克是“听命于默克尔的候选人”的而看不上他，现在更是把他的再度当选称作“德国的独裁”。

这次挫折中尤为让波兰政府伤心的地方，是连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同意图斯克连任。本来，卡钦斯基治下的波兰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内的其他国家在守卫民族国家主权和坚决拒绝接受移民的问题上一向都意见一致。在捷克，特别坚决地奉行民族民粹主义路线的是前社民党人米洛什·泽曼总统和以安德烈·巴比什为核心的右翼民粹政党“是的2011”——巴比什自2013年起一直在由社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在斯洛伐克，包括名义上[20]的社民党人罗伯尔特·菲科在内的所有党派都奉行这样的路线。

匈牙利的民族保守政府领导人维克多·欧尔班乃是中东欧“非自由的民主”先锋，他在2017年初推出了一项法案，目的是把移民放到靠近塞尔维亚边境的集装箱营地（Container-Lagern）里圈禁起来，结果引发了联合国难民救助机构和人权组织的强烈抗议，但维谢格拉德集团内的其他国家却纷纷表示理解。3月28日，这项圈禁法案生效了。不过早在1天前，欧洲人权法院临时禁止了将布达佩斯附近的8位少年和1位孕妇送到该营地的行动，并因此而给该法律今后的适用性设置了一些限制。为此，匈牙利青民盟的议会党团主席威胁要让匈牙利退出《欧洲人权公约》（Europäischen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但欧洲法院并没有更改自己的判决。

欧尔班、泽曼和菲科在一个关键的外交问题上与卡钦斯基有分歧：这位波兰法公党党魁极其反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而其他三人则强调对俄亲善。所以，维谢格拉德集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只不过它们在这方面的矛盾并未像有关图斯克再度当选的矛盾那样充分暴露出来。眼下还不确定的是，如果欧盟委员会因波兰政府无视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的态度而执意操控宪法法院一事，建议欧洲理事会对波兰实施制裁，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会做何反应。反正匈牙利是早就站在了波兰一边：欧尔班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不会同意暂时取消波兰的投票权——由于此事必须获得欧洲理事会全体通过一致方可施行，所以也就不可能通过了。不过这位匈牙利总理的态度倒也符合逻辑：他自己早已把包括宪法法院在内的司法独立机制置于囊中，以至于匈牙利已经没有什么有效的分权制度可言。[21]

就在罗马纪念峰会召开前几日，欧盟6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马耳他）和瑞士以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的内政部长们于3月20日在罗马会晤，目的是尽可能进一步阻止从非洲涌向欧洲的移民潮。临时参加“合作方”对话的还有利比亚统一政府领导人法耶兹·萨拉杰。他给会议的发起人、意大利内政部长马尔科·明尼蒂（Marco Minniti）递上了一份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的需求清单：为了阻止移民穿越地中海中间的路线，特别需要救生艇、直升机、越野车、通讯和雷达设备。满足这些要求总共需要约8亿欧元，这比萨拉杰之前跟欧盟报过的数目（2亿欧元）高出了一大截。

同时，跟萨拉杰政府进行磋商到底能有多大用，依旧是个未知数。就在不久之前，的黎波里和托卜鲁克这一对利比亚势不两立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相互和解的前景又再次破灭了。这既是因为最近在的黎波里又新出现了与反政府分子的激烈冲突，同样也因为连此前相对平静的米苏拉塔区（Misrata）也出现了权力斗争。统一政府一直没有树立权威，它既没有执行力又腐败。欧洲联盟的利益所在是显而易见的：它希望来自非洲的移民最起码能在利比亚海岸被拦截住，以免他们踏上危及生命的、向欧洲偷渡的旅程，并且欧盟能建立监控犯罪分子的机制。然而，如果利比亚的国家

权力还是像这个所谓的被人们不恰当地称作“统一政府”的黎波里政权一样虚弱，那么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就依旧很成问题。[22]

庆祝《罗马条约》签订60周年的大会都快要开始了，但人们还不知道“英国离开”之后的欧盟27国领导人究竟能不能按计划一起在展望欧盟未来的宣言上签字。波兰政府因唐纳德·图斯克再度当选理事会主席一事，还在生那些国家的气。该国与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过从甚密的国防部长安东尼·马切雷维奇在此时对图斯克这位曾经的总理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与2010年4月的斯莫棱斯克坠机事件有关。那次坠机导致当时的总统莱赫·卡钦斯基（他是雅罗斯瓦夫的双胞胎兄弟）丧生。贝娅塔·希德沃总理已经威胁要抵制这次的罗马声明，只是在教皇弗朗西斯与之进行了私人密谈之后才听劝作罢。本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宣言草稿也很有意见，最后终于用添加关于跟失业问题做斗争的内容的办法及时解决了。3月25日，所有领导人都签署了宣言——该宣言在唐纳德·图斯克、让-克劳德·容克和欧洲议会主席安东尼奥·塔亚尼的领导下于数周前起草完成，并获得了所有成员国的同意。

这份《罗马宣言》称欧盟是一个“独特的，拥有共同组织机构和鲜明价值取向的同盟，是一个珍视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共同体”。“不同速度的欧洲”在宣言中用精挑细选的字句表述如下：“像我们过去已经做到的那样，当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时，我们将共同行动（如有必要会有不同的方式和力度）；这一切会与诸条约保持一致，而且对今后想加入进来的人，大门永远敞开。我们的联盟是统一的和不可分的。”

该宣言把“重视国际规则的、有效的且可持续的移民政策”，保卫共同边境，反恐斗争和打击有组织犯罪，降低失业率和犯罪率，解决人们贫困和被社会边缘化的问题，通过投资来推动连续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进行结构改革并完善经济和货币改革，以及强化共同的安全和防务工作等“罗马议程”作为共同目标。分裂和争吵是不应景的，《罗马宣言》对法治问题、司法机构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相关分权体制问题，以及警惕中东欧国家“非自由的民主”的问题都避而不谈。“我们幸而能合为一体”，这话听上去与十年前的《柏林宣言》（Erklärung von Berlin）一模一样。“欧罗巴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好歹把价值观上不容否认的根本分歧掩饰过去了，宣言的起草者和签署者都为此感到无比欣慰。能把事情办得这么和谐，这已是欧盟27国在2017年初所能奢望的极限。

伴随着庆典的，是支持和反对欧盟的示威活动。在罗马反对欧盟的主要是批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左派；按计划在罗马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城市支持共同体的是新近于2016年11月在法兰克福兴起的跨党派运动：“欧洲脉动”（Pulse of Europe）。后者致力于捍卫欧洲一体化思想，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击国家领导人身后的民族主义分子，并且已经对欧洲议会内和议会

外的民粹主义分子宣战。很可能是民族主义在2016年的两次重大胜利（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激发了成千上万人产生了公开发声的热情，他们支持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欧洲，当然，他们在2017年初的集合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安排。除了奥地利的联邦总统选举跟荷兰的议会选举之外，“欧洲脉动”的出现同样是一个标志，它们都显现出右翼那种用“极度简化特征”得来的吸引力已经越过峰值开始走下坡路了。

2017年3月29日，在罗马峰会举行4天后，英国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提出的离开欧洲联盟的申请到了布鲁塞尔。由于这个日期是早在3月中旬就定好的，所以欧盟有时间做好后面的准备。按计划，4月29日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特别峰会以决定后续程序的基本事项，5月底或6月初将开始正式谈判。除此之外，正如图斯克3月31日所讲明白的，会先谈英国脱欧的条件，再谈未来欧盟与英国的关系（这个顺序与英国所期待的不同）。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欧洲联盟都将根据当时的条件与共同体内的第三大经济体最终告别。[23]

2017年3月26日，即罗马峰会的次日，保加利亚举行了因总理博伊科·鲍里索夫（Boyko Borissow）为2016年11月总统大选的结果辞职而不得不提前进行的大选。鲍里索夫所在的党，保守的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Gerb，以下简称“公民党”），与2014年10月的那次大选一样取得了32.7%的选票。这样一来，其得票率就比选票大幅增长的社会党（27.2%）要高得多了。之前公民党最重要的执政伙伴——右翼自由派改革联盟仅拿到了3.1%的选票，连《选举法》所规定的4%的进入议会门槛都没有达到，所以鲍里索夫只得再重新寻找能构成议会多数的伙伴。最理想的联盟对象应该是“爱国者联盟”（Linie die Vereinigten Patrioten），这个民族主义的、部分观点极右的党取得了9.1%的选票；另一个潜在的结盟对象是得票率4.15%的“意志党”（Partei Wolja）——它由对政治甚为热心的大企业家韦塞林克·马雷斯基（Wesselin Mareschki）组建。

公民党的胜利显然与它坚决的亲欧和亲西方的态度有关，该党最大的竞争对手保加利亚社会党（Bulgarischen Sozialistischen Partei）坚决拒绝这样的标签——它以坚定亲俄而闻名。不过，鲍里索夫潜在的盟友们（特别是爱国者联盟）也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很有好感，在面对未来的总理时，它们肯定会为自己的支持开出高高的价码。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根本不用去想的——社会党人早已断然拒绝跟公民党组成“大联盟”。

很明显，普京更愿意看到社会党人获胜。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保加利亚议会选举结果感到失望的外国领导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支持在保加利亚生活的土耳其裔居民的党（Dost），可是该党还是只拿到了2.9%的选票，连议会也进不去。因此，作为少数民族的土耳其裔所

依靠的发声渠道就只能还是“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die Bewegung für Rechte und Freiheiten），不过该党早就因彻底腐败而臭名昭著了（得票率近9%）。

如果鲍里索夫无法取得议会多数，那么他就只好去试着与他的政敌社会党人科内利亚·尼诺瓦（Kornelia Ninova）共同组阁。要是这样也不行，就将重新再提前举行大选。由于保加利亚将于2018年上半年担任欧盟的理事会轮值主席国，鲍里索夫极有可能愿意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自己能尽快成为一个能运转的内阁的首脑。

5月初，事情有了进展：鲍里索夫与爱国者联盟组成了执政联盟。从前的共产党特工，现在亲俄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保加利亚民族运动”（IMRO）的党魁克拉斯西米尔·卡拉卡特尚诺夫（Krassimir Karakatschanow）当上了国防部长，同时还兼任负责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副总理（副总理共有4个）。公开的种族主义者，曾把吉卜赛人称作“野猴子”的“拯救保加利亚国民阵线”（Nationalen Front für die Rettung Bulgariens）主席瓦莱里·西梅奥诺夫（Walerij Simeonow），成了另一个负责经济与人口政策的副总理。作为政治联盟的一部分，以著名的反犹主义者沃伦·西多罗夫（Wolen Sidorow）为核心的阿塔卡党（Ataka Partei）是爱国者联盟中的另外一个亲俄政党，该党经常因为对土耳其穆斯林的攻击而上新闻。

与2014年的那次选举不同，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公民党也属于该党团）没有对极右党派联盟的行为发出严厉警告。鲍里索夫保证，他与他的执政伙伴已经协商好，保加利亚将奉行亲西方的路线，并巩固自身作为欧盟及北约成员国的地位。至于说布鲁塞尔对这份保证能信几分，就不得而知了。[24]

2017年4月2日，就在保加利亚议会选举1周之后，其邻国塞尔维亚举行了总统大选。最热门的候选人是总理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这个曾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ěvić）的内阁中担任情报部长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现在已经改换了支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纲领，但仍旧十分重视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武契奇不但掌控着由他领导的民族保守主义的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而且还掌握着情报机构和大部分媒体。人们普遍认为，若是他从竞选中胜出并接替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Tomislav Nikolić）成为总统，他将会在新内阁中安插更具代理人性质的人选以扩张权力，并会任命一位亲信为总理一职的接班人，也就是说让该国悄悄发生了一场转向总统制的宪法变革。4月2日的选举结果一目了然，省去了决选的麻烦：武契奇获得了55%的选票，其他候选人中表现最好的是前人权活动家萨沙·扬科维奇（Saša Janković），得票率16.4%。

欧盟诸国普遍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塞尔维亚的入盟谈判已从2014年开始）。然而，4月2日之后，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塞尔维亚城市举行了长达数周的反武契奇示威活动，他们指责武契奇系统性地操纵了选举，布鲁塞尔则对这一切保持沉默。武契奇主张塞尔维亚奉行亲欧路线，但同时他也很想让塞尔维亚的舆论保持传统的亲俄气氛。大家指望这位未来的总统能稳定塞尔维亚政局，这对阻止那些想继续前往临近欧盟国家的移民而言尤为关键。至于武契奇并不会真正反腐以及他治下的媒体弊病丛生，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重要，也没什么人关心了。

在相对稳定这一点上，塞尔维亚已经比另一个从前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国家——马其顿——强得多了。2016年12月11日的议会选举之后，马其顿的执政党民族保守主义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VMRO）与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之间就陷入了僵局。借由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Edi Rama）的穿针引线，马其顿社民党党魁佐兰·扎埃夫（Zoran Zaev）成功地在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诸党的协助下确保了议会多数。但在现任总理尼古拉·格鲁埃夫斯基（Nikola Gruevski）的压力下，同属民族保守主义党派的总统格奥尔基·伊万诺夫（Gjorge Ivanov）拒绝任命扎埃夫为总理。

总统否决此任命的公开理由是（格鲁埃夫斯基也同意）：如果像社民党人那样退让，允许（只有在部分国土上通行的）阿尔巴尼亚语成为全马其顿的第二官方语言，就将危及国家的主权和统一——这会使国家动乱甚至陷入内战。不过观察家认为，语言问题并不是民族保守派阻止民主交接的唯一原因。现政府所关心的问题显然还有：不再延长调查窃听丑闻的特别检察官的特别权限（2017年5月到期）——该丑闻已经开始牵涉格鲁埃夫斯基。

马其顿自2005年起就是欧盟候选国了。一直到2017年，希腊始终在阻碍入盟谈判开始，因为它认为“马其顿”这个国名侵犯了希腊同名省份的权利（出于同样的原因，联合国从1993年起一直称马其顿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简称FYROM，这个名称后来也被欧盟采纳）。欧盟在该国首都斯科普里（Skopje）的影响力比在塞尔维亚要小得多：2017年3月，总统伊万诺夫以日程紧张为由，拒绝了欧盟扩盟专员约翰尼斯·哈恩（Johannes Hahn）的谈判请求。4月底，现任总理的那些民族主义追随者冲击议会，意图阻止新出现的社民党——阿尔巴尼亚党多数派选出议长。此举导致包括扎埃夫在内的多名议员受伤。5月17日，伊万诺夫最终还是不得不任命扎埃夫为政府总理。为了平息这场危机，总统还是需要欧盟的帮助。

然而，鉴于马其顿通过封闭本国与希腊（即巴尔干路线）的边境而在2016年初的难民危机中所显现出的战略意义，可以预见欧盟在未来将会尽一切努力保持这个巴尔干国家的稳定。一如既往，这取决于这些想加入欧盟的

国家的政治成熟程度：只要它们位于巴尔干路线之上，此时的它们就对欧盟有重要意义——这可是它们可以打的一张牌。[25]

在所有的欧盟入盟候选国中，土耳其总是麻烦最多的那个。但即便如此，该国与欧盟的关系也从未像2017年前4个月那样紧张：在这段时间里，这个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国家正陷于宪法改革的斗争之中，斗争的目的是按照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意愿，使土耳其在不久前尚可勉强运转的议会制转变为专制总统制，为此而进行的全民公决将于4月16日举行。

最迟在2016年7月那场失败的军事政变过去之后，人们已经很难再说土耳其的政治辩论是“自由的”了。总统、政府和正发党，已经意图把这场草率的政变当作借口搞起了自己的“政变”——借此多次延长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尽管尚未完全）被政府收编了；大多数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议员被撤销免遭逮捕的政治豁免权；军方遭到大规模“清洗”；上万名不讨政府喜欢的教授、公务员、检察官、法官被解雇，其中有很多不经庭审就被投入监狱。独立的记者、知识分子、作家受到进一步羞辱和迫害。谁要是鼓吹在公投时“说不”，马上就会被指为“叛国者”。自2016年的盛夏以来，土耳其就一直被这样的严肃气氛所笼罩。

按照土耳其司法部的说法，所要进行的这次宪法改革将强化分权制度。事实上它仅仅强化了一项权力：属于总统的权力。今后，总统将不必像现在这样中断与某一政党的关系，因此他将有机会把自己的“政治家族”一直引向最高国家机关。他可以用政府的个人联盟来取代从前总理的作用，而总理府也和部长理事会一样不再是自主的机关。总统有权在议会的法定期限到达之前就解散它。未来，议会和总统选举将每隔5年同时举行。总统可以连任一届，如果是提前举行的总统和议会大选，则可以连任两届。

按照修改之后的宪法，议会将失去批准和监督部长们的权利，他们将全部由总统任命和罢免。总统令能替代法律。如果总统行使否决权，议会只有用绝对多数才能将之推翻。如若总统触犯刑法，只有在五分之三的议员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司法程序。据说，法院将会是独立的和超党派的。然而，由于总统、司法部长和议会多数党在最重要的法院法官、检察官委员会的人事设置上拥有决定权，他们自然会对法院有巨大的影响力。总统可以依据其喜好任命代理人，也可随意将他们解职。他可以任命和罢免任何公务员，是土耳其官僚机构的实际首脑，同时也依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西方民主国家中也有总统制政权，其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元首。可是，正如美国和法国等不同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能正常运作的议会、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以新闻自由的形式存在的强大的“第四权力”和一系列得到保障的基本权利，构成了该体制中的制衡力量。根据欧洲委员会下

属的威尼斯委员会判断，修订后的土耳其宪法草案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规定了这些“制衡”措施。这次修宪进一步限制了该宪法中原本就不完整的分权和法治，而遵循了一种总统专政的内在逻辑：埃尔多安的坚定支持者尽管否认这样一种看法，但他们其实对此保持沉默。

支持选“是”总统所在的党派，即“温和的”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掀起了巨大的宣传攻势。但即使是在该党的干部、党员和支持者中，也有不少人对权力过分集中于埃尔多安手中这一事实感到不安。属于中左派的共和人民党（CHP）的领袖想要联合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HDP）一起选“否”。在其主席德夫莱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领导之下的极右党派“国民运动”（MHP）在修宪一事上站在埃尔多安一边。有一部分坚决反对引入总统制的少数派议员脱离了本党，但在为选“否”造势的运动中格外积极。这部分人的代表梅拉尔·阿克谢内尔（Meral Akşener）曾在1997—1998年短暂地担任过内政部长，并因其口才和亲和力而被视为埃尔多安的强劲对手。修宪公投之前数周，民调显示赞成和反对修宪的阵营大体上势均力敌。

在为公投造势的最后阶段，埃尔多安宣布了继续举行下一场公投的可能性。他说，如果在议会不能以修宪所需的多数通过恢复死刑的决议，那么他将让人民来做出决定。他还暗示，说不定会举行一场对欧盟关系的公投。这位总统在4月14日表示，只要他还是国家元首，那么拥有德国-土耳其双重国籍的记者德尼兹·于杰尔就不会被释放和被送往德国。而且一切因有恐怖活动嫌疑而被逮捕的德国-土耳其双重国籍者都将照此办理。埃尔多安为自己的这一立场找到的理由是：德国方面并没有把持有土耳其护照的恐怖活动嫌疑人交给土耳其。在公投举行前一天，《法兰克福汇报》碰巧在报道一名拥有土耳其-库尔德血统的德国人在伊斯坦布尔被捕一事时用了如下标题：“埃尔多安的人质”（Erdoğans Geiseln）。至少，土耳其总统总算是没有再掺和到此事的审判之中——要知道，在是否释放被捕的批评家的事情上，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最高权威。

正如之前的民调所预测的那样，在2017年4月16日举行的公投中两种意见的得票率非常接近：有51.4%的投票者赞成修宪，即赞成埃尔多安搞的总统制；有48.6%的人投了反对票。土耳其社会由此分裂成了两个规模相当又彼此敌对的阵营，胜利的一方并不在乎国家转入威权体制，失败的一方将继续反对埃尔多安攫取权力的进程。那些居住在欧洲的海外土耳其人对埃尔多安的支持力度要大得多：住在法国的土耳其人有近65%支持他，在德国的有63%，而在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其支持率甚至超过了70%。

作为国际观察组织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和欧洲委员会认为，正在实施的紧急状态限制了基本权利的履行；在计票方面，高级选举委员会也存在违法操作：将一些缺少法定公章的信封和选票也计为有效。反对

党估计，没有盖公章的选票有250万张之多，而且还认为计票中存在很多其他不规范行为，乃至舞弊行为，这些情况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尤为严重；他们要求重新计票，也就是说让这次公投的结果作废。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投反对票的地区，有数万名公民用抗议集会的方式支持这一要求。

埃尔多安对自己这场险胜的反应，并不是去修建一座通向投反对票的土耳其人的和解之桥，而是宣布，他很快会为恢复死刑而提出一项动议。次日，政府决定将紧急状态再延长3个月。议会于4月19日批准了这项措施。

埃尔多安很清楚，一旦恢复死刑，欧盟就将中断入盟谈判，但他还是迈出了这强硬的一步，因为民调结果早就显示这样干是获支持的。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保守党派和基民盟还在土耳其公投结果出来之前就被认为在土耳其放弃加入欧盟一事上负有一定责任：有人说，这些中间偏右的党派其实从来就不想让土耳其加入欧盟，它们只是违心地或是假装同意举行入盟谈判，以便延缓埃尔多安近年来推行的专制政策——此人最初充满改革的意愿，继而却对欧盟感到失望。

事实上，导致自2005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几乎停滞不前的是其他一些原因：正如欧盟委员会每年的进展报告所显示的，埃尔多安政府所进行的政府改革远远达不到欧盟的期望；在开启正式谈判这个阶段性目标实现之后，土耳其政府就懈怠了，在言论及宗教自由和司法改革领域尤其如此。此外，塞浦路斯分裂问题上，土耳其方面一直不愿履行对欧盟所许下的承诺；土耳其议会甚至坚决不愿意通过一份埃尔多安已经同意的关于1963年9月《联系国协定》的附加议定书。

至于说现在把跟土耳其的关系搞得这么僵，欧盟自身当然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早在当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首任委员会主席瓦尔特·哈尔斯坦与土耳其缔结《联系国协定》时，其态度并非出于一种冷静的观察，却是在表述一种愿景：把正式成员国身份当作完成所期望条件的奖品。这种看法实在是太不现实了，因为欧洲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是以反对民族主义为其根基的，而土耳其却从未想过与其激进的民族主义告别——从国父凯末尔的时代开始，民族主义在土耳其就已经具有了一种国民宗教的特征。

如果对欧洲共同体，特别是由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转变而成的欧洲联盟而言，也有一种国民宗教的话，那么它就是西方跨大西洋民主政体共同的政治文化。对国父凯末尔及其后继者而言，毫无保留地对这种文化敞开大门，并不是“一战”后开始在土耳其推行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多安当然也不例外。自21世纪初以来，那些基于地缘战略因素主张让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人支持与土耳其政府保持紧密关系。尽管如此，欧盟也不可能让一个不满足欧盟成员规范条件的国家成为正式

成员国——除非欧盟愿意背弃自我认同，或愿意退回自由贸易区的形态。在让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一事上，还从未有人公开从这一“哲学层面”讨论问题——这正是那些支持土耳其入盟并与之谈判的人的关键性错误。

公投结束之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那些本来一直支持土耳其入盟的中左派政党开始要求立即中止入盟谈判。而大多数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反应则非常保守，它们这样做自有道理。尽管布鲁塞尔方面早就多次表示过，重新引入死刑就意味着入盟谈判的终结，但若因埃尔多安的仓促决定而给他一个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借口，也是不明智的。反正，只要土耳其转变为专制总统制，它就肯定不再有机会成为欧盟成员国了。既然如此，欧盟不如等到下一次例行峰会的时候再正式宣布自己的立场。[26]

美国几乎是在接连不断的“号外新闻”之中度过2017年春天的，因为他们的第45任总统差不多每天都会来这么一出。2月28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国会宣读了他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与人们以往对他的观感相比，此文的语调倒显得有些温和。不过，特朗普所说的是一如既往的民族主义和“右翼”那一套。他强调了他“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说法，并再次宣称他很快就要在美、墨边境建造一面大墙，用以阻止毒品和犯罪。他宣布，自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美国已经失去四分之一的工业工作岗位，自中国于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失去了6万家工厂。他说“自由的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特朗普重提其竞选期间说过的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问题。他重申要用更好的医疗保障置换奥巴马医保，为企业和中产阶级减税，还要大幅提高国防开支。热烈的掌声一直伴随着总统的演讲，当然，掌声几乎都来自共和党人。

谁要是相信特朗普在参众两院议员们面前露面之后就会变得温文尔雅，那他很快就会失望。3月4日，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称他曾导致自己在胜选之前不久在特朗普大厦内遭到窃听。特朗普把自己所指控的这则丑闻与1974年导致理查德·尼克松遭弹劾并下台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并且还把奥巴马称作“坏人（或病人）”。不管是特朗普，还是他的白宫幕僚都没有为这位总统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而情报部门的反应则让人吃惊。3月20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S. 罗杰斯（Michael S. Rogers）告诉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并不存在这样的非法行动。在此之前，奥巴马的发言人已经对特朗普的指控提出抗议，但特朗普却并不准备收回自己所说的话。

这段时间缠上特朗普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人们经常怀疑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的密切关系——情报机构和媒体也正在调查这件事。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在3月初被迫承认他在竞选期间曾两次与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交谈。而在之前的参

议院听证会上，塞申斯曾发誓他在竞选活动中与俄罗斯政府圈子不曾有过任何联系。现在他断言，在与基斯利亚克谈话时，他的身份是参议员而不是特朗普的竞选助手；而且他们所谈的也不是跟选举有关的事情，而是外交问题，即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问题。为了避免更多指责，这位司法部长宣布在“通俄”一事上避嫌：未来对他家所进行的调查将不在他的管辖之下。

塞申斯的战术性撤退并不能消弭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与俄国情报机构秘密勾结的传言。人们推测和调查的重点越来越集中到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身上，此人是特朗普的第一任竞选经理和首席策略顾问，直到2016年8月卸任。他干不下去的原因，正是由于他常年为2014年2月逃亡出来的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Janukowitsch）提供高价顾问服务的事情曝光了。根据美联社（Nachrichtenagentur Associated Press）3月底的报道，马纳福特一直与普京交际圈中的亿万富翁奥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过从甚密，并参与了为克里姆林宫而进行的秘密战略计划，旨在打击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的反俄反对党。那些认为马纳福特曾充当俄罗斯在美国的利益代理人的猜测或许离事实不远，但尚未有坚实的证据。特朗普的另一位曾经的同伴，仅工作了不长时间就于2月中旬就离职了的迈克尔·弗林，在3月31日向联邦调查局和国会的情报委员会表示，愿意成为特朗普阵营涉嫌与俄罗斯联络一事中的关键证人，以换取自己免受处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接受了这个建议，不过这也让人们更加对特朗普的断言起疑心：他说关于他跟俄罗斯的各种关系的报道都是“假新闻”。

3月6日，正如几周前宣布过的那样，总统又拿出一份经过修订的为期4个月的入境禁令。与前一版被法官指为违宪的1月28日总统令相比，新版限制的不再是7个伊斯兰国家，而是6个：与美国一起打击“伊斯兰国”的盟友伊拉克已不在其中。此外，该规定在生效前有10天的警告期，而且不再适用于有双重国籍和持有居留许可或有效签证的人。其他例外情况包括：商务人士和为美军工作过的人员（例如口译员），以及医疗上的紧急情况。

把之前的禁令变得温和一些，其实是想让批评者们找不到理由，但这个目的并未实现。应夏威夷州总检察官的要求，一位美国的联邦法官先是于3月15日临时阻止了这条本应于3月16日生效的法令，后又于3月30日无限期阻止其生效，其理由是总统的这条命令违背了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从而也就违反了宪法。另有13个联邦州也赞同这一说法。特朗普再次对司法机构大发脾气，他开始上诉并声称：如有必要，他将把关于入境禁令的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在选战期间，特朗普把取消奥巴马医改看得至少与穆斯林旅行禁令一样重要。3月7日，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保罗·瑞恩（Paul Ryan）提交了他的全民

医疗保健法案草案。共和党人废除了奥巴马针对逃避保险义务的美国人的惩罚性税收。替代方案是：如果有些人有一段时间没有参保，后来又想参保，则他们的保费会上涨。同样，大公司也被免除了向员工提供健康保险的义务。新版本健康保险的其他变化将使年轻人的保费下降，而老年人的保费上升。对于为穷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27]，联邦政府只会再提供3年的补助金——有好几位共和党州长对此决定提出过紧急警告。

这一改革对财政的影响尚不明朗。3月14日，超脱于党派之外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表示，根据他们的计算，到2018年底将有1400万美国人失去健康保险，到2026年这一数字甚至会上升至2400万。在取消对医疗补助Medicaid的联邦拨款之后，联邦政府能在未来10年节省3370亿美元。由于这些新的变化，保险经费池内的风险构成将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年轻人的参保人数如预期中那般下降，而老年人的人数上升，那么这时的保费将比一直施行奥巴马医保要高得多——这一发展趋势与共和党头面人物们的计算背道而驰。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这个分析加重了一些共和党参、众议员和州长的担忧，因为他们将马上面临新法案所引发的一个大概率的后果：那些来自贫穷的和年老的选民对这个夺取他们健康保险的党派的抗议。反对该法案的阻力，也来自一部分保守的共和党人，他们预计瑞恩的草案仍然会为医疗保健行业提供过高的补贴，所以单单取消奥巴马医保是远远不够的。总而言之，执政党内的保留意见如此之强，以致根本拿不出一个能确保议会多数的草案文本。来自特朗普身边"首席战略家"斯蒂芬·班农以及特朗普本人强大却粗鲁的心理压力，也未能使反对者转变想法。为了避免一场确定无疑的失败，3月24日，在由保罗·瑞恩代表的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们设置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几分钟，总统批准了推迟投票的建议。民主党人欢呼起来："特朗普医保"的挫折是这位总统迄今为止最惨重的失败。

尽管显得有些荒唐，但特朗普还是声称这次提案失败应该由民主党人负责；他同时又向反对党提出要求，要他们不要把一场超越党派利益的医疗改革搞砸，并且还表示希望看着奥巴马医保自己崩溃。他打电话叫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告诉他们自己很高兴能摆脱医疗方面的麻烦事，因为现在他可以转向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了：税收和商业。不过，无论他怎么像往常一样为自己的失误寻找借口，这次还是让他自己十分自负的伟大"谈判专家"的形象大打折扣。据一项布隆伯格民意调查（Bloomberg-Umfrage）显示，这份特朗普-瑞恩法案的受欢迎程度极低，仅有17%。这位总统必须清楚，在心怀不满的人中有许多是他曾经的选民。[28]

比推翻奥巴马医保更受关注的，是特朗普承诺大规模清除之前的环保法

规，这些法规与前任总统支持水压层岩气和减少采煤的政策相关。为了特意彰显他对阿巴拉契亚山区煤炭工人的同情，总统邀请其中的几位成员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并让他们参加了他3月28日签署相关行政令的电视直播。但导致煤炭产量下降的并不是严格的排放规定，主要是来自廉价的石油、天然气或是已经有许多环保人士致力于推进的可再生能源的竞争。环保人士们马上开始抗议总统反生态的政策，但总统对此完全不屑一顾。特朗普尚未说明他是否会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位总统治下的美国对这项2015年11月达成的、关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协议已经不在乎了。

在修改环保政策的总统令发布2天之后，又有两条关于把贸易政策建立在新的——据说是更“公平”（faire）的基础之上的总统行政令出台。在第一条总统令中，特朗普要求贸易部在90天内评测与重要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重点是那些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国家。第二条总统令授权美国行政部门自行征收已经施行的惩罚性关税的权利。同时商务部表示，这其中也涉及德国钢铁企业［例如萨尔茨吉特有限公司（Salzgitter AG）］的惩罚性关税，据说这些涉及的公司以倾销价格在美国售卖产品。德国外交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警告华盛顿方面：这一结论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计算方法，将为美国企业创造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面目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特朗普在这段时间里关注的另外一次重心转移则更加重要：他决心要让美国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强大，因此他特别重视核导弹，并且再次展现出他对常规外交手段的忽视。当五角大楼欣喜于得到540亿美元的附加预算拨款时，外交部的预算则被砍去了将近三分之一。在2017年春天，华盛顿的许多部门中都有空缺的职位，但没有一个部门像国务院这样，在奥巴马与特朗普进行权力交接之后有这么多工作人员离职或被解雇。3月底，国务卿的两个副手的位置，以及许多秘书职位和不计其数的其他重要岗位上都还无人任职。经费被削减得尤其厉害的部门是发展援助部门，还有资助科学和艺术的部门。很显然，这位新总统对“软实力”并不太感兴趣。

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特朗普把与重要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3月17日，他第一次在白宫与到访的安格拉·默克尔进行了两人之间的私密谈话，随后两人又参加包括德国大企业的代表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谈话内容包括特朗普一再批评的德国对美国出口中的高顺差问题。美国总统与德国总理之间的互动气氛还算正常，没什么不友好的地方。可是德国访团前脚刚走，这位总统就在推特上发文，称德国联邦政府在国防领域欠美国“一大笔钱”。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于3月17日—18日在巴登-巴登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上让东道主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很是难堪，因为姆努钦拒绝签署一份关于自由贸易的

闭幕宣言。美国媒体把这次会议看作美欧关系的一道裂痕。[29]

就在美国在贸易政策问题上几乎要与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行动方陷入冲突的时候，在东亚，朝鲜与邻国韩国以及日本之间越来越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而且这势必波及韩、日两国的保护者：美国。在之前的几年中，朝鲜在射程更远并可装载核弹头的导弹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3月初，有4枚导弹射入日本海；4月5日，朝鲜再次试射了一枚中程导弹，其弹道最终也指向日本海。美国的专家据此推测，朝鲜能够在数年之内令其远程导弹的射程覆盖旧金山、洛杉矶和美国西海岸的其他城市。

4月6日，就在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高尔夫球俱乐部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与2016年选战期间相比，此时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换了一个腔调，变得友好多了。

依据中美两国发表的共同声明，双方在贸易关系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尚不清楚谈话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意见是否更加接近了。特朗普说会谈的气氛很好，而且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起了非常棒的私人关系。中国领导人强调了想要合作的愿望，并邀请特朗普在不久后回访中国。中国领导人一行刚刚离开，美国就加大了对朝鲜的压力。白宫表示，一支以“卡尔·文森号”（Garl Vinson）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美国舰队正从新加坡驶往朝鲜半岛——这份表态很快将被看作一种催促。[30]

就在中美峰会举行的时候，美国展开了一项军事行动：4月6日—7日夜间，特朗普命令两艘位于地中海的美国驱逐舰用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政府位于霍姆斯东南的军用机场沙伊拉特（Al Schairat）；有21架战斗机被摧毁。根据美国军方的消息，3天前受命用化学武器攻击反对派在西北省份伊德利卜省（Idlib）的据点汗-舍洪（Chan Sheichun）的战机正是从这个军事基地起飞的。在那次袭击中共有超过80人死亡，其中包括幼小的儿童；共546人受伤。因美国的导弹袭击而丧生的共有16人，其中有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9个平民。

在美国对沙伊拉特发动攻击之前，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一场会议。会上，俄罗斯动用否决权阻止了美、英、法三国联合提出的提案，该提案要求阿萨德政权对动用禁用的化学武器负责，并最后一次要求其与联合国开展广泛合作。特朗普早在4月4日就曾表示，那些被毒气杀死的人（尤其是那些“美丽的婴儿”）的图片，让他彻底改变了对阿萨德的看法。据说，这是因为阿萨德不但越过了红线，而且是越过了“很多很多条红线”。这番表态与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前一周的（应该也是特朗普批准的）立场完全不同，当时蒂勒森说阿萨德今后的命运应该由叙利亚人民来决定，美国并不急于让他下台。

在袭击叙利亚政府军队的基地后，特朗普马上在电视上讲话，向美国人民说明了他行动的正当性。他说，阿萨德所使用这些致命的神经毒气，将使这些无助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窒息而死。“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死亡。甚至有一些极为美丽的婴儿也被这次可怕的野蛮攻击杀死。”他认为美国攻击这些发动化学武器攻击的机场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这有利于阻止这些致命的化学武器的使用和扩散，并对这样的行为施加威慑。由于使用了这种违禁武器，叙利亚违背了《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义务，并且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呼吁。因此，多年来想要改变阿萨德行为的尝试完完全全失败了。难民危机会因此而进一步加剧。该地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一个威胁。这位总统向“一切文明国家”发出呼吁，希望大家与美国一道阻止屠杀和流血事件，并终结各式各样的恐怖主义。

确有可能，那些被杀害的和受重伤的叙利亚儿童的电视画面真的使特朗普深受震动。这个动机应该不是编出来的。但特朗普必须预想到，如果在他油然而生的愤怒之后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那么他将不只在本国，而且也在全世界面前失去信誉。纯粹的口头抗议活动能对阿萨德和普京产生什么效果，是不难想象的，而其对北京、平壤和德黑兰的影响也可以此类推。

不过，展现美国的强大应该也能让特朗普在国内政治中得分。如果他在面对叙利亚独裁者的时候能做出决断，在他自己看来这就比奥巴马要强了。前一任总统的许多民主党同僚也指责他在面对阿萨德的罪行（尤其是对使用毒气）做出反应时过于软弱。特朗普因其发动导弹攻击和演讲而赢得的两党一致的赞许，也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外交立场上的强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分散人们对他近几周内政受挫的注意力——如果特朗普在2017年4月初完全没有这样想过，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从国际法上看，由于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美国也因此违背了安理会2013年9月23日通过的（与叙利亚相关的）2118号决议。然而，安理会这个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多年来在处理与叙利亚相关的问题时实际上已经陷入瘫痪状态，这是因为俄罗斯一直在用自己的否决权维护阿萨德，从而阻碍了联合国行使其保护最基本人权的责任。美国在为自己对沙伊拉特机场的攻击辩护时，称这是依照国际惯例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且在这方面也与其大西洋联盟中最重要的欧洲伙伴达成了一致。这些盟友觉得美国的导弹攻击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尤其是德国）认为，这应该只是一场一次性的行动。

此外，美国为了避免对阿萨德政权保护者——俄罗斯带来附加伤害，已经在巡航导弹攻击开始之前告知了俄方。俄罗斯的反应看上去很强烈：称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国际法，而且整个行动都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借口之上，从而对两国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造成了很大损害。但是，俄罗斯在事情发生

之后的实际动作却显得比较温和：暂时中止之前已经多方协商好的、关于在叙利亚空域活动的协议，宣布向地中海派遣两艘战舰。在安理会的另一次会议上，这两个大国再次爆发激烈的意见冲突，俄罗斯代表指责美方没有为他们对叙利亚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

执行4月6日至7日军事行动的方式，明显带有两位将军的作风：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与此同时，后者还有能力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在他的坚持下，总统中止了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从一开始就极具争议的成员资格。尽管班农尚未因此被罢黜，但特朗普的这个决定明显意味着让他降了级。在华盛顿，麦克马斯特的成功被认为代表着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重新回归专业化。

总统在公开场合为攻击沙伊拉特机场辩护的方式和方法，其实很可能会让班农和党内的极右派感到不舒服。接着，特朗普在4月6日的电视讲话中表达了如下愿望："只要美国坚持正义，人们最终将迎来和平与和谐"，他不仅为美国也为整个世界祈祷上帝的护佑。这听上去就不符合"美国优先"那套说辞了，反而更像之前总统们的普世主义论调，而激进右翼分子正是如此评论的。所以"另类右翼"（Alt-Right）阵营的智囊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说，他不确定他是否还能继续支持特朗普。右翼评论员安·库尔特（Ann Coulter）建议特朗普在美国建立安全区域，以保护美国人免受非法移民的暴力侵害，而不是去关照叙利亚。在极右翼的网络论坛上，总统被骂为"叛徒"和"骗子"。根据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选民中有83%认同他4月6日的决定，11%不认同，6%的人觉得说不清。

在军事打击结束后的那个周末，美国政府在谈论其未来的叙利亚政策时有些矛盾。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称，让阿萨德倒台是美国的当务之急之一，并表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打击大马士革政权。前几天也刚刚放过狠话的国务卿蒂勒森，现在说话却更加谨慎起来，他说比推翻阿萨德更重要的是与"伊斯兰国"的斗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俄罗斯的批评：他说该国"无能"，因为它没能阻止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并且应当为平民的死亡担负部分责任。让蒂勒森的这番话格外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他早就已经定下要在几天之后出访俄罗斯，而且这还是新一届美国政府成员第一次访俄。[31]

在访问俄罗斯之前，蒂勒森于4月10日—11日在意大利卢卡（Lucca）参加了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他在参观发生过1944年8月党卫军屠杀事件的斯塔泽马村（Sant’Anna di Stazzema）的遗址纪念馆时的表态非常重要。他承认美国作为一个维护全球秩序的大国的作用："我们再次承诺，我们的目标是将世界上所有对无辜者犯下罪行的人绳之以法。"如果这一表态是经过特朗普同意的，那么它将标志着美国现行政策在转变——这显然是因为这位总统既不希望在本国，也不希望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视为"纸老虎"。不

过，说这是一次“战略转换”，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人们既看不出特朗普之前的外交战略到底是什么，也看不明白现在的策略。

蒂勒森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的外交部长都一致同意：应避免叙利亚的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而且应采取谈判手段结束内战。这位美国国务卿表示，阿萨德家族不应在该国的未来中占据位置，因此各方应就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达成共识，并且商讨出一个过渡方案。这一表态，为他与拉夫罗夫外长以及可能与普京总统发生的会谈中最重要的任务勾勒出了框架。七国集团对他的支持是否能够帮到他，还有待观察。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曾提议从2014年起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但在卢卡的会上却无人响应，这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总是一个积极的消息。

根据蒂勒森自己所描述的部分信息，他4月12日访问莫斯科时的谈判是在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他在卢卡公开要求俄罗斯做出决断——要么支持阿萨德，要么跟美国合作——这被俄国政府理解为最后通牒。在谈判开始之前，俄罗斯的电视台播出了一段对普京的采访，他说在工作层面（即在军事领域）上，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互信关系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对于在汗-舍洪发生的袭击事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表示：要么就是炸弹落到了叛军的毒气仓库，要么这整件事都是西方在演戏。

拉夫罗夫与蒂勒森之间的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普京与蒂勒森原定的简短对话却谈了两个多小时，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不过，后面这场谈话也没有取得突破。在随后举行的两位外交部长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蒂勒森说现在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低谷。

尽管如此，蒂勒森的访问并非毫无成果。俄方宣布，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条件下，美、俄将重新达成避免在叙利亚领空发生冲突的协议。此外，双方还一致同意组建一个促进两国政府间对话的工作团队。至于蒂勒森是否为俄罗斯放弃阿萨德开出过什么条件，则莫斯科和华盛顿方面都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几乎就在蒂勒森与普京会谈的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举行了一场会议。会上，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一项动议：谴责发生在汗-舍洪的毒气袭击事件，并责成叙利亚政府对国际调查人员开放所有军事基地。俄罗斯的否决权再次让决议流产——自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这已经是第八次了。

不久之后，美国总统接待了北约秘书长、挪威前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随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称西方国家联盟是和平与安全不可缺少的堡垒。他明确地与自己先前的论断拉开了距离，再也不说北约“已经过时”了。据他说，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当然，北约成员必须履行其义务，增加国防开支（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他还希望北约今后能

够更多地参与伊拉克的反恐斗争。这一点与他在选战期间的表态也存在明显的矛盾，但他却满不在乎。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就没办法达成好的“交易”。

4月13日，即与斯托尔滕贝格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美国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阿富汗东南部第一次使用了目前最大的非核武器炸弹，即11吨重的“炸弹之母”GBU-43，目的是摧毁“伊斯兰国”据点中的坑道体系。据阿富汗传来的消息，共有90多名“伊斯兰国”战士丧生。这次行动的军事意义尚有争议：最重要的是此次攻击让人们看到，对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而言，消灭最危险恐怖组织军事仍是其首要目标。

然而，这并非投放“炸弹之母”的唯一目的。在用导弹袭击了沙伊拉特之后，4月13日的行动再次展现了这位新总统在任何他觉得合适时间都可以用强硬的军事手段实现美国目标的决心。被点名的人中一定少不了金正恩。特朗普虽然否认了全国广播公司关于他正计划如果朝鲜进行新的核试验，就对朝鲜使用常规武器打击的消息；但与此同时，国防部则称他们正在考虑把军事行动作为选项之一，只是不会公开谈及。很快，北京和莫斯科都提出警告，称事态不可再进一步升级。

2017年4月19日，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口中的那个“无敌舰队”（他在4月11日就是这样称呼“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的）并没有像白宫发言人斯宾塞所说的那样从新加坡前往朝鲜半岛，而是在朝着与朝鲜半岛相反的方向前进，目的是去参加早就计划好的与澳大利亚海军在印度洋进行的演习。直到4月底，该舰队才到达朝鲜半岛海域。

显然，在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沟通问题。这结果对政府而言是一个耻辱。相比之下，朝鲜于4月16日为庆祝金正恩祖父、建国者金日成105岁冥诞而进行的最新一次导弹试验在发射后不久就以失败而告终，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当天，特朗普的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表示，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要在军事冲突的门槛下行动的时期，因此要避免在跟无法预测的平壤政权打交道时发生最坏的事情。这明显是一个冲突降级的时期：目前，美国估计是不会发动预防性打击了。不过，美国依然继续向金正恩发出警告。4月底，第七舰队参加了在韩国海岸附近进行的演习。装备有巡航导弹的潜艇也被派往这一区域。几乎与此同时，富有争议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ttitude Area Defense，简称Thaad）开始在韩国部署。

在另外一个危机地区，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也不期而至：4月20日，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虽说也严厉地批评了2015年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因为该协议无法实现其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目标，仅能延缓其发展；但蒂

勒森并没有收回国务院前一天声明，该声明称伊朗到目前为止遵守了协议中的条款。蒂勒森强硬的言辞显然是为了安抚共和党内的强硬派，而美国政府的实际操作其实相当谨慎。

最能贯彻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的仍然是贸易领域。4月18日，他签署了一项名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法令。它指示所有政府机构，在权衡时将美国产品放在优先地位，并且未来将收紧对外国高素质技术人员的入境签证。美国商会和众多企业协会立即警告说，依这项法令所采取的政策肯定会对涉及进出口的行业和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唯一支持该法令的，是过去从保护主义措施中获益最多的钢铁行业。在2017年4月中旬，我们还很难判断特朗普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他的意图。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无疑是向他的核心选民证明：他仍在全力兑现他在选战期间的承诺。[32]

2017年3月和4月，欧洲在短短3周之内经历了发生在两个首都的两次恐怖袭击。就在英国向布鲁塞尔提交脱欧申请一周前的3月22日，有一个来自伯明翰、有多次犯罪记录，并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人，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故意将自己的汽车撞向行人，共造成5人死亡，40多人受伤（其中有些是重伤）。随后他又驾车冲向议会大厦，并在那儿用刀杀死一名警察，最后被其他警察击毙。

当时正在下议院参与辩论的首相特雷莎·梅被迅速带回她的官邸——唐宁街10号；许多国会议员与他们的同事、政府官员以及来参观议会的人都被疏散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直到晚上才被允许离开。这次袭击发生的日期并不是随意挑选的：2017年3月22日，正值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发生造成32人丧生的恐袭事件一周年。在伦敦恐袭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英国警方逮捕了多名袭击者的熟人。但警方的最终结论是，这是一起由个人发起的袭击事件。尽管“伊斯兰国”马上就宣布自己是此次行动的发起者，但按照安全部门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袭击者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有联系。

另一起恐袭事件就不同了。4月7日，一名男子驾驶一辆偷来的大挂车撞进了斯德哥尔摩最著名的商业街之一，共造成4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还有儿童。此人与制造伦敦恐袭的人一样，显然把2016年7月的尼斯恐袭和12月的柏林恐袭当成了榜样。撞人之后，他在把车开进了皇后大街商场的一个入口后逃逸，但在当天晚上就被抓获。这是一个服从于“伊斯兰国”的39岁乌兹别克斯坦人，在自己的庇护申请于2016年底被相关部门拒绝后他就隐藏了起来。4月8日，警方把无法将此人抓捕并遣返的原因归结于臭名昭著的偷渡问题。

根据袭击发生数日之后曝光的消息，在瑞典，应遣返的外国人有大约1万人，但仅有350间牢房可供使用。当地人一直都强烈反对大规模的证件检查，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措施是种族主义和歧视性的，所以大规模证件管制无法实施。由绿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少数派政府的首脑、首相斯特凡·勒文在袭击发生之后宣布要增设1万个警察岗位，但很多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一公共服务部门的薪资不高，而且还有许多教育系统的岗位都招不到人。人们普遍认为，奉行种族主义的瑞典民主党将因此次袭击事件在政治上获益，该党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社民党的第二大党派。激进右翼反对党的主席伊默·奥克松（Jimmie Åkesson）在事发之后马上就称这是一起“重大丑闻”。

在伦敦和斯德哥尔摩事件之间，差一点还会发生另一场恐怖袭击：3月23日（即威斯敏斯特冲撞事件的次日），比利时警察逮捕了一名39岁突尼斯裔法国人，因为他在内城的商业街中驾车高速行驶。后来，检察官在车中发现了刀剑类武器、一把霰弹枪和一些装满汽油的罐子。而在警察最终阻止这起袭击企图之前，路上的行人及时跳到了街边。

4月的前两个星期，在俄罗斯和两个伊斯兰国家发生了比在欧盟区域内的恐袭更为骇人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圣彼得堡，一位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在一次地铁内的袭击中造成15人死亡。在埃及，4月9日“棕枝主日”[33]这一天，“伊斯兰国”的自杀式袭击者先是在位于开罗以南约120千米处的坦塔市（Tanta）对正在举行宗教仪式的基督徒发动袭击，随后又在亚历山大发动袭击，共造成至少45人死亡。总统塞西的政府于次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不到一周后的4月15日，在位于叙利亚北部的拉希丁（Raschidin）发生了一起针对来自反政府地区什叶派居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当时，这些人正在一个公交站等车，计划前往由政府军控制的叙利亚地区的一个转运点。袭击中，共有包括68名儿童在内的126人丧生。很有可能，这次袭击是狂热的逊尼派分子所为。这时，所谓的“文明世界”依然同以前面对其他恐袭事件时一样，仅能表达一些毫无用处的愤怒。[34]

欧洲联盟在2017年春季算是取得了一个成果。在历经了艰难的谈判之后，欧元区各国财长于4月6日在马耳他的瓦莱塔与希腊就改革计划中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该计划使得希腊可以从欧洲援助项目中获得新的资金，用于偿付将于7月到期的74亿欧元的旧债，同时还可以获得金额相近的新贷款。按照这份协议，希腊将在2019年和2020年进一步实施改革，财政紧缩的数额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为了持久地改善财政状况，2019年将实施退休体系改革，2020年将进行降低所得税免征额的改革。应德国的强烈要求，关于进一步减免债务的问题，将在完成2018年的贷款计划之后再决定。

跟以前一样，欧元区财长们预计希腊将在2018年实现财政盈余，即在不算债务的情况下拥有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算盈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觉得这个估计太过于乐观（事实上，欧洲统计局在4月24日表示，希腊在2016年已经实现了高得多的财政盈余，即国内生产总值的4.2%），该组织对于是否继续参与今后的贷款救助计划，尚未表态。在2017年初，无论是对欧元集团，还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言，讨论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例如公务员的专业化或建立有效的土地登记，都是不现实的。在希腊问题上，这些所谓的“机构”只能小心行事。

此时，财政政策上的分歧不仅存在于欧元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同样也存在于欧盟内部：在欧盟委员会与德国之间。负责货币联盟的委员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在瓦莱塔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欧元区未来发展的思考，由于这些需要对欧洲条约进行修改，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行的。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最坚决反对的，是东布罗夫斯基斯关于欧元区进行联合预算的提议，该提议将鼓励对危机国家的投资，并最终建立一套失业保险体系。这个计划势必将扩大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职权，而这在德国很可能需要召集联邦宪法法院审议——这也是德国政府对此计划反应冷淡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朔伊布勒所追求的东西与此恰恰相反。这位德国财长想要取消欧盟委员会监督预算的权力，并将它移交给作为安全网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欧洲稳定机制曾经是一个协调欧元区政府间工作的机构，因此这样的监督权一直在各国财长手中，并间接掌握在各国议会手中。朔伊布勒的远期目标是要把这个欧洲安全网改造成一个欧洲的货币基金，即它原先的样子。这样的改造不仅仅是为了德国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在货币联盟中充当支柱的那些欧元区国家的财政稳定。德国政府的设想还考虑到：无论“更加紧密的欧洲”以何种可能的方式实现，这都需要一种能起作用的民主合法性。让朔伊布勒与东布罗夫斯基斯之间争执不下的，远远不止组织架构中的那些细节：背后的原因是关于欧洲联盟未来发展的根本性分歧。[35]

与东布罗夫斯基斯跟朔伊布勒之间的纷争相比，在这段时间里，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与其全球知名的严厉批评家乔治·索罗斯之间的冲突在欧洲吸引了多得多的注意力。索罗斯1930年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早已移民美国并充当金融经纪人。两人冲突的焦点是索罗斯1991年在布达佩斯创建并在开始的时候单独资助的欧洲中央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CEU），该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但长期以来都因其自由主义的理念而让欧尔班感到芒刺在背。

为此，匈牙利政府于2017年3月底提出了一项针对《高校法》的补充条例。从形式上看，该条例涉及20多所大学，但其实针对的就是欧洲中央大

学一家。根据这一条例，以后由欧盟之外的赞助者资助的国际大学必须与本国签订双边协议，而且这样的大学必须有一个固定法人，然而这两样东西欧洲中央大学都没有。数万名愤怒的抗议者举行的示威活动和国际上的抗议行动都没有起什么作用：4月4日，在社会党人离开表决大厅以示抗议之后，匈牙利议会以126票对38票通过这项法案。

面对欧尔班对政治自由的最新打击，欧盟发出的声音十分微弱。来自捷克的欧盟司法专员薇拉·尧罗娃在4月10日表示，她认为行政步骤、针对违反条约行为的调查，或是欧盟委员会的其他措施都不会有太大帮助；重要的是，当地人要自己发出声音。2天后，负责法治问题的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对记者们讲得更清楚些，但即使他的话也听上去出人意料地平静。他想向维克多·欧尔班提出的问题是："您还有和我们一样的价值观吗？"在他看来，尽管匈牙利的整体局势也让人担忧，但与波兰不同的是，匈牙利的法治并没有受到系统性威胁。他觉得欧尔班与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不同在于欧尔班还愿意与委员会进行对话。蒂默曼斯表示，到4月底才能决定是否最终对匈牙利采取法律行动。

4月26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告知大家，委员会将以这部新颁布的高校法令开启针对匈牙利违反条约行为的调查。该法律有多个方面违反欧洲法律，即违反了特定的共同市场规定，侵犯了服务与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教育法。此外，该教育法还损害了写在欧盟基础条约之中的企业自由，并且与国际商业协定相冲突。

针对匈牙利违反条约行为的调查已经有很多了；其中尚有70项正在进行，而那些已经结束的调查大多也没起什么效果。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次对"索罗斯法"（Lex Soros）的调查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但这一次，欧尔班至少在受到了同系政党（Parteifamilie）[36]的批评之后表现出让步。当他于4月26日在欧洲议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强烈地批评了索罗斯之后，他在3天后的为布鲁塞尔欧盟特别峰会而召开的欧洲人民党会议上保证：会考虑欧盟委员会的想法。[37]

在波兰，对司法机构的强迫性一致化仍在进行。4月5日，波兰众议院一次通过了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该法案的目的是使立法部门让出任命和提拔各级法院法官的决定权，并且剥夺那些独立专业司法组织的权力——迄今为止它们在该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前文已经说过，按照宪法，应该由国家法律委员会提名法官人选，而以后则只能由议会所指派的人当法官了。据司法部的一位代表称，这是在用真正的人民的权力取代法院的统治。包括欧洲委员会的人权委员会在内的国际组织代表的抗议活动、4月20日波兰法官半小时的集体罢工，以及反对党铺天盖地的批评，都没有起多大作用。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是毫无意义的：现在在那里掌权的正是法公党的法官。

在其他领域，法公党也在扩张势力。自从2015年的权力交接以来，根据极右翼的国防部长安东尼·马切雷维奇自己的说法，他已经换掉了五分之四的军官和十分之九的总参谋部成员。2017年1月底，总参谋部部长米奇斯瓦夫·戈楚尔（Mieczysław Gocuł）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辞职。根据军队内部人士估计，有50~120个将军的职位空缺，据波兰《政治周刊》（*Polytika*）报道，波兰驻北约的职位也有16个空缺。2017年3月底，马切雷维奇宣布波兰退出由法国和德国组建的欧洲军。

为了强化军队，这位部长还承诺在军中组建一支对他负责的5万人的准军事"领土防卫队"——专家们完全不赞同这一想法。这位国防部长显然是想尽可能地让波兰军队从超国家层面的各类联系中摆脱出来，哪怕这样在军队中施行重新民族国家化的做法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军队的专业化水平也在所不惜。据波兰《政治周刊》报道，这样做带来的风险也令波兰的盟友们感到不安：据英国外交部门的情报显示，波兰军队内的大量裁员使得俄罗斯情报部门开始动心思，让大量俄方人员向波兰政府内渗透。

法公党政府的内政、外交路线已在波兰群众中引起越来越大的不快。在4月底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前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的党——"自由公民论坛"的支持率（31%），自2015年权力交接以来第一次领先于卡钦斯基的法公党（29%）。4月中旬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表明，50%的人希望看到图斯克担任总统，而选择现任总统杜达的只有45%：这标志着者卡钦斯基领导的这场反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的运动失败了。鉴于2019年将要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这样的民调结果对法公党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另一方面，波兰和欧洲的自由派势力则受到了鼓舞。

4月21日，欧盟委员会针对波兰政府对宪法法院的专制化改革的最后通牒所提出的期限已过。可是，从布鲁塞尔却没有传来任何下文。由于匈牙利会行使否决权，所以大家都知道，剥夺波兰投票权的提案是肯定通不过的。或许还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曾告诉委员会，他们十分不情愿与波兰政府发生冲突。这其中的背景是，对他们而言，保证欧盟27国在英国脱欧谈判中尽可能地团结一致是最大的利益所在；此外，他们关注的是加强在防务、外部边境安全和反恐等领域进行合作这样的优先目标。然而，现在欧盟委员会一直这么一言不发着实令人尴尬。但是，如果欧盟只能靠口头抗议来应对违反法治信条这种有悖基本原则的行为，显然就很难说它严肃认真地对待了它发誓捍卫的价值观。如此一来，欧盟就变成了某个因项目而临时聚合起来的组织，而让欧洲统一计划中的那些基本原则沦落到遭人质疑的境地。[38]

欧盟委员会之所以于4月26日发表一篇社会政治宣言，可能是因为感觉到了自己在合法性方面的瑕疵。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发表的"反思性论文"中的"20点"应该是将3月25日罗马峰会上关于社会问题的认识细化了。

在此精神下，这些文章涉及的是欧盟公民的受教育权、公平工资、最低收入、养老途径和机会平等问题。但文章作者详细谈到的，只有父母的育儿假这一个议题。至于应对社会政策负完全责任的各成员国如何去响应他的这些号召，那就是各国自己的事情了。欧盟难以为自己描绘的美景做些什么。多数评论都对此抱以冰冷的语调或嘲讽的声音。委员会的这份声明，被看作原形毕露：这只不过是一种为了洗刷欧盟冷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代理人形象的公关套路，那种形象正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给它戴上的帽子。

4月29日，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特别峰会，其目的是确定英国脱欧谈判的主要原则。很少会有一个话题，让与会各国如此迅速地团结起来。仅仅15分钟后，图斯克主席即总结出讨论结果：只有在关于英国脱欧条件的谈判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的情况下，欧盟才会跟英国谈未来的各项关系，即订立一项新的自由贸易条约。第一轮谈判的重点，是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和居住在欧盟国家的英国公民的权利。此外，英国还必须把自己对欧盟应承担的财政义务结清。在这方面，委员会主席再次提到了这笔钱的总数，约为600亿欧元。

英国政府那边一直怀疑，27国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团结一致到底能维持多久。无论如何，伦敦并不想放弃与个别成员国私下进行交易的希望。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施加压力：它拒绝欧盟2020年之前的多年度财政计划审查，这也就停止了给对抗青年失业、欧洲共同边境安全的建设、难民援助和研究基金的数十亿欧元的资金来源。在4月26日特雷莎·梅邀请让-克劳德·容克的晚宴中，双方谈得很不愉快。容克后来对女主人说，当他离开唐宁街的时候，自己的疑虑比刚来时多了10倍。由于委员会主席交际圈子中某些人的泄露，几天后公众就知道双方的这些不快了。

在布鲁塞尔，人们担心英国的压力会在众议院选举后保持不变。可能正因为如此，英国对欧盟的支付义务才被非正式地从600亿欧元提高到1000亿欧元——这不仅引发了海峡对岸的一场愤怒的风暴，而且给了女首相以严厉批评容克的理由。为此，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呼吁双方给事态降温。欧洲联盟和英国能否在计划的两年内就共存与合作取得一致呢？离英国脱欧谈判开始只有几个星期了，人们对此依然全无头绪。[39]

2017年春季，欧洲政坛的重头戏无疑是法国总统大选。在离4月23日举行第一轮投票不到数周的时候，11名候选人中最有希望的那几个因各自不同的原因都上了头条新闻。国民阵线的候选人马琳·勒庞引起关注的方式是于3月24日接受普京总统的邀请赴克里姆林宫做客，而且还于4月10日否认法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被驱逐的事负有共同责任。早已丑闻缠身

的共和党的候选人菲永，再一次因为巴黎一家男装店专门送给他两件昂贵的定制西服的报道，和一位黎巴嫩商人付钱请他安排其与普京对话的报道而陷入尴尬的境地。被归类为社会自由派的无党派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正越来越多地承载着社会党右翼以及社会党改革派的希望，这些人中有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巴黎前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Bertrand Delanoë）和约40位国民议会议员——这些人觉得社会党的官方候选人伯努瓦·哈莫太左、太教条，以至于无法与右翼党派的候选人抗衡。最大一条新闻来自前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3月29日的一个声明：他说他将在第一轮投票中把票投给马克龙，因为只有此人能在第二轮决选中击败勒庞。

不过，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多轮电视辩论中，几位迄今为止最热门的候选人却没能吸引多少目光，倒是那位极左的冷门候选人——曾经的托洛茨基派、现在的“第六共和国”先驱让-吕克·梅朗雄，唤起了被他称为“不屈的法兰西”（La France insoumise）的运动。梅朗雄欲以其雄辩口才推进的计划被很多人看作纸上谈兵的乌托邦，但却在他那些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追随者中引燃了激情：一个总额达1000亿欧元的赤字财政综合计划、高额最低工资和退休金、对年收入超过40万欧元者课以掠夺性的所得税、废除总统制、让法国退出北约、大幅度地修改欧盟诸项条约（如果法国修不了约那就退出欧盟）。与之相比，同样属于左派的哈莫所要求的那些东西都成了小儿科。

在民调结果中，梅朗雄明显比哈莫更受欢迎。在4月中旬，大选的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还是马克龙和勒庞之间的对决。然而，菲永和梅朗雄也有机会进入决选阶段，如果那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场“极端分子之间的对决”，即极左派对战极右派。而哈莫则被认为是第一个“出局”的人。

马克龙依然被大多数人看作最有可能赢得第二轮决选的人，他一再宣称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要把其他政治阵营最好的东西都融入自己的“前进运动”中去。他以此说服了广泛的社会中间力量，而为那些有明确意识形态偏好者所拒绝。对于瓦尔斯这样的社会党人的支持，他仅仅只是有条件地表示欢迎，当奥朗德的政敌菲永称总统试图抹黑自己时，马克龙甚至与自己昔日的“老板”拉开距离。而且就算对他一再奉之为经济政策榜样的德国，他也在第一轮投票开始前几天转了口风：他说这位东边的邻居从欧元区的不平衡之中获益，而且赚取了高额的贸易顺差，但这既有损于欧元区，也不利于德国本国的经济，因此是不可忍受的，必须平衡一下。但跟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马克龙没有说这到底是要做什么。

4月19日（5天后就是第一轮投票的日期），警察在马赛逮捕了两名触犯了多项刑法的伊斯兰分子——其中有一个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法国人，他们有实施炸弹袭击的重大嫌疑。某些迹象表明，袭击的目标可能是政治伊斯

兰主义的强烈反对者：弗朗索瓦·菲永。而安全部门未能阻止次日傍晚发生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袭击事件，当时几位总统候选人正在电视上进行他们的最后一次辩论。袭击者是一个名叫卡里姆（Karim C）的39岁阿拉伯裔法国公民，他在离开自己的汽车后朝一辆警用大巴中的乘客开枪扫射，共造成1名警察死亡、2名警察及1位德国路人受伤，随后卡里姆也被其他警察击毙。

次日，“伊斯兰国”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但现有证据还远远不能证实这名袭击者真的是代表某个恐怖主义组织行事：卡里姆先前就曾经因为企图行刺警察而被拘禁多年，2017年2月，他又因威胁谋杀一名警察而再次被捕，但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

显然，4月20日的袭击事件很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完全可以不那么冒昧地推测，特别拥护法律与秩序的温和右翼和极右翼的候选人（即菲永和勒庞）将最有可能从袭击事件中获益。这两人马上宣布，一旦赢得大选，就会以最严厉的方式开展反恐斗争，并且快速增设警察岗位：菲永说要增加1万人，勒庞说要增加1.5万人。国民阵线的这位女候选人还要求法国立刻退出申根区，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要求修改相关条约。马克龙也强调加强警务工作，但同时也呼吁法国人不要陷入恐慌之中。属于社会党的总理贝尔纳德·卡泽纳夫则指责右翼候选人企图利用袭击事件攫取权力，而且用以下事实反击了菲永：在菲永当总理的2007年至2012年，在国内安全领域一共裁减了1.3万个岗位。[40]

不过，第一轮投票的结果还是与巴黎爆炸案发生前几天的预测基本一致。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得票率24%，马琳·勒庞21.3%，弗朗索瓦·菲永20%，让-吕克·梅朗雄19.6%，伯努瓦·哈莫6.4%。这样一来，左派和右派的两个大党（即社会党和继承戴高乐衣钵的共和党）双双在第二轮决选之前就被淘汰出局，这在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共和党人不得不为选战期间重创了其候选人道德和政治可信度的丑闻付出代价，同时他们也在为2007—2012年尼古拉斯·萨科齐当政期间乏善可陈的政绩买单。社会党人则迎来了为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曾经得到过的那份幸运付出代价的时候，自夏尔·戴高乐于1958年下台以来，奥朗德是历届法国总统中执行力最差的，而且也缺乏襄助本党候选人的能力。原先那些社会党的选民成群结队地转向马克龙和梅朗雄，而共和党的选民则大量转向马克龙或勒庞。

让-吕克·梅朗雄相对意义上的成功表明，仍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左翼选民池——当然，单单倚靠他们不足以赢得选举。马琳·勒庞帮国民阵线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她将这个党从其创立者、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让-玛丽·勒庞所造就的亲法西斯主义和仇视同性恋的恶名中解放了出来；自2015年8月将父亲开除出党以来，她已经成功完成了这次切割。通过对国民阵线的现代化改造，她使该党对那些她父亲几乎无法触及的社会阶层而言成了

一种可能的选择，这些社会阶层包括：信奉民族保守主义的公民、身处法国北部法兰西“锈带”的工厂工人——这些工人从前都投共产党的票。跟围绕在梅朗雄周围的激进左翼一样，国民阵线不仅赞同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这样社会主义要求，而且也同意其贸易保护主义、对欧盟的敌视，同样反对“资本主义的”德国在欧盟中的主导权。如果人们算一下，就会发现两大反欧盟党派的选票加起来超过了41%——这个发现，可能会让那些欧洲自由主义者因马克龙的成功而产生的快乐打个折扣。

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揭示了法国社会深刻的分裂。该国西部，即从大西洋沿岸直至中央高原地区比较倾向于支持马克龙，巴黎和其他大都会，以及东南部的罗纳省（Rhône）、伊泽尔省（Isère）、萨瓦省（Savoie）和上阿尔卑斯省（Hautes-Alpes）等地方的情形也是如此。勒庞则在北部的工业区、除了第戎（Dijon）附近的蔚蓝海岸（Côte d’Or）之外的东部农业区、地中海沿岸及其腹地和科西嘉岛（Korsika）取得了胜利。在18～24岁的法国年轻人中梅朗雄最受欢迎，而在35～55岁的人那里勒庞位居第一。马克龙则在25～34岁的人群中力拔头筹。60～69岁的老年人几乎将他们的支持均分给了马克龙和菲永。马克龙支持者的平均学历，要比勒庞支持者的平均学历高得多。国民阵线的主席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正如她4月23日对着欢呼的追随者所宣布的：她是人民的候选人，是那个将法国从傲慢的精英手中解放出来的人。她所指的精英的代表，就是她最大的政敌：那个毕业于号称“国家干部摇篮”的国家行政学院（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ENA）的前银行家、前部长——马克龙。

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意味着第五共和国传统的政党制度正在继续走向崩溃。共和党人希望通过不断革新来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弊病。深度分裂的社会党几乎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解体的阴影笼罩着全党。党内右翼想要重新组建一个社会民主党，这些人准备与以马克龙为核心的社会自由主义阵营密切合作（也许还会与之合并），作为未来总统多数派的一部分。党内中间派想继续把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聚合在一个党内，而党内左翼则与在第一轮选举中支持哈莫的绿党接近。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激进左派，这些人相信围绕在梅朗雄身边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些人很快就需要做决定：6月11日和18日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对于5月7日的第二轮决选，起初是共和党和社会党的候选人，然后是这些党自己放出了信号：反对勒庞，支持马克龙。相反，梅朗雄则让他的支持者自行决定是否参加选举和支持什么人。

在第一轮选举中最成功的那位候选人将会面临双重挑战，既要全力争取在第二轮决选中获胜，又要把自己发起的运动转型成一个强大的政党，以使之能够尽可能争取更多的选区，并且在那之后也能形成有工作能力的总统多数派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从未

出现过的左右联盟。这种变化会增强议会的力量——这可是一个需要各方进行反思的系统性变革，它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政治开端。

马克龙在第一轮胜利之后发表的几个声明听起来好像他确信5月7日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他那位国民阵线的女对手则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被击败。这一点，在第一轮投票后3天在马克龙的故乡亚眠（Amiens）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个法国北部的城市，最热门的地方话题是美国家用电器制造商“惠而浦”的子公司即将关闭。该公司宣布，由于成本原因，工厂将于2018年6月将其生产线迁至波兰。该工厂的290名员工随后进行了罢工。

4月26日，马克龙来到亚眠，在工商业协会的驻地与工会代表讨论工厂及其全体员工的未来。最初并没有拜访正在罢工的“惠而浦”员工的计划。与此同时，这段时间一直默默无闻的马琳·勒庞突然出现在工厂大门口，称自己这是在“深入群众”，并对着欢呼的罢工工人宣布，如果她赢得总统选举，就决不会允许“惠而浦”像这样关闭工厂；而如果按照马克龙的模式去搞，还会有数百万工人丢掉饭碗。

有鉴于此，马克龙也决定与工人们对话。迎接他的是刺耳的口哨声和嘘声，但大家还是听完了他的演讲。马克龙谈到可能会对该公司的管理层实施制裁，但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同时他还警告大家，不要相信那种法国可以脱离全球化的幻想。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是损失无数个由外国（特别是美国）投资者所创造的工作岗位。用这些话，马克龙是无法说服亚眠的罢工者的。不过罢工者的发言人最终还是表示了对这位候选人的尊敬，因为他有勇气在工人们面前发表这番演讲。马克龙在返乡之旅中得到的教训很简单：他和他的支持者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赢得决选。[41]

在两轮法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期间，还有一个神奇的日期：2017年4月29日——这是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100天的日子。如果有人持续关注他的推特信息，会发现特朗普本人并没有赋予这个纪念日什么意义。事实上，他自己很清楚，在过去14周里他几乎没有成功践行任何一项竞选承诺。

他提名的候选人尼尔·戈萨奇在4月被选为最高法院法官无疑算是一个胜利，但参议院内的民主党人对戈萨奇抵制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共和党人不得不先改变议事规则，以便有可能让参议员们能以简单多数原则选出保守派法官：他们在选法官的程序中排除了“冗长辩论”（Filibuster）——这项权利本来属于参议院中拥有41名议员以上的少数派，他们可以用拖长发言时间的方式延迟乃至阻挠法案通过。因为戈萨奇只有49岁，所以他很有希望在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继续留在最高法院并参与判决。

在特朗普优先要办的实事方面，特朗普发表的声明或以总统行政令方式所发布的指示几乎都没有什么效果。他曾试图阻止或至少严格限制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人入境，但两次都因法院否决而失败。就在他执政百日纪念日之前几天，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联邦法官推翻了另一项总统行政令，该命令称：如果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庇护城市”（sanctuary cities）不在逮捕或驱逐非法入境美国的外国人方面配合联邦政府的工作，就停止联邦政府对这些地方的拨款。

在4月的最后一周，特朗普发现他已经不可能迅速办成在墨西哥的边界上建墙这个他最热衷的项目了。其原因是，一直没能为这个估计要花700亿美元的项目找到资金。4月30日临时国家预算就会到期，而且共和党内所谓的“赤字鹰派”也不愿意同意进一步增加政府债务。特朗普提出的通过进口关税来获取对应资金的方式不但遭到了美国大企业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在政府内部受到抵制，这让总统最终只能放弃这个想法。

假如特朗普不退让，那么他就根本没有把握在批准预算的问题上获得议会多数。其后果可能会是“政府关门”——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将会停止运转，2013年10月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就曾让奥巴马陷入这样的境地。为了避免在特朗普当政百日之际出现这样的尴尬，总统倾向于先暂缓修墙。

5月1日，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在预算案上达成了妥协，使该草案很有可能可以得到所需的60名参议员的支持。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取得了成功，联邦环保部门、医学研究和基础设施的资金被削减的程度减小了许多，同时军费开支的增长也没有像特朗普所追求的那样多。在与墨西哥接壤处建墙的资金没有获得批准，而是改为拨款15亿美元改善边境安全。

减税是大规模税务改革的一部分。特朗普无论如何也要赶在4月29日之前向公众展示这次税改的雏形，以此来掩饰另一项重大改革项目（即取消奥巴马医保）的暂时失败。他终于赶在4月26日，即他向他的经济顾问格雷·科恩和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提交说明的那一天宣布了这一计划。这份尚不明确的计划中的重点是将企业税从35%降低到15%。这不但会使各大企业因税率降低而获益，同时受益的还有以个人身份经营或合伙运营的律师、对冲基金经理、税务和投资顾问等一直需要缴纳高额所得税的群体。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9.6%降至35%；另外的6档税率被改为25%和10%两档。之前针对20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替代性最小税额已被取消。以后抵税的途径将大幅减少：只有按揭贷款的利息、购买私人养老金计划和慈善捐款可以抵税。

这场由特朗普的顾问提议并且令总统本人自鸣得意的税改，可能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税制改革。它是一个符合富豪和超级富豪心愿的方案——

这些人很可能想变得更加富有。收入较低的人也可以从有利于他们的减税中受益，但这些人也是带有特朗普风格的共和党经济和金融政策另一个主要目标的最大受害者——除了军备以外的一切公共开支均被削减。

大规模减税会带来怎样的财政效果，现在还不确定。虽然姆努钦保证税改能够极大地释放经济活力，从而促进税收总额增加，但其实谁也保证不了这一设想的可靠性。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分析，鉴于美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减税更有可能导致进口增加。可以预期的结果是利率上升、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美元汇率升值，而这又会导致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并致使美国的贸易平衡进一步恶化——这与特朗普所保证的东西恰好相反。

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总统是否能战胜国会的阻挠，实现他的税制改革。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若依照4月26日文件，这项政策会在全世界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特朗普把美国变成了英国海峡群岛（britischen Kanalinseln）[42]、卢森堡、马耳他、巴哈马或巴拿马那样的避税天堂，那么就可以预期，会发生一场世界各国竞相降低企业税的竞赛。这样一来，相关国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公共投资、其他社会（特别是福利）开支都会受到影响。此外，还有导致世界经济投机性过热的危险。因此其他国家只能希望特朗普的税改会由于国会的反对而作罢。

就贸易政策而言，总统在他执政的前100天里，远没有兑现他上任前夸下的海口。尽管他已于1月底宣布退出尚未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还是愿意于4月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进行谈判。他于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访期间领会到，不可能由两国首脑谈出一个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贸易政策是欧盟的职权范围）之后，他甚至不排除缔结一个新版本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的可能性。不过，从中并不能得出他已经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的结论。4月底，美国对（接受国家补贴的）加拿大软木进口征收了20%的惩罚性关税。但这与以往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就事实而言甚至是合理的。

到目前为止，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还算比较“传统”。尽管特朗普在选战期间一再向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表示敬意，但与俄罗斯的“蜜月”并没有出现，反而与从前被他妖魔化的中国有了一段“蜜月”。特朗普已经修正了他对北约和欧盟的批评态度，最近他又称欧盟已经从英国脱欧之中吸取了教训。那位他曾在选战期间猛烈抨击过的德国总理，现在成了他经常喜欢打电话咨询问题的欧洲伙伴。

在世界政治的热点地区，特朗普的存在感比他的前任要强。在美国的导弹攻击了叙利亚用以对叛乱地区发动毒气袭击的军用机场之后，并且在对朝

鲜再次发出严重警告之后，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形象再次树立起来。其实，特朗普的做法并没有明显偏离此前的共和党总统和大多数民主党总统的行为模式。倒是在巴拉克·奥巴马当政的那8年里，美国对干预世界政治保持的克制态度显得那么“不同寻常”。

但特朗普的路线修正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转向了一种长期稳定的、拥有确定原则的外交政策。4月29日，在他入主白宫百日之际，他给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打了一通电话，用他的话说，两人“相谈甚欢”。杜特尔特自2016年6月上台以来，用给警察下格杀令的方式发动了一场针对毒品犯罪的血腥战争。早在他担任达沃市（Davao）市长期间，他就曾组织过针对毒贩和吸毒成瘾者的流动行刑队，甚至亲自动手杀人。5月底，对于菲律宾总统“针对毒品难题难以置信的处理方式”，特朗普甚至明确表示钦佩。在进行了那一番愉快的对话之后，他荣幸地邀请杜特尔特造访白宫。

2天后，特朗普宣布他对于即将与朝鲜国家主席金正恩举行的会面感到“很荣幸”。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4月中旬利用全民公决将土耳其转变为专制的总统制时，他是除了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之外唯一一个对此表示祝贺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纽约时报》的自由派评论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在评价特朗普这种和其他一些姿态时说，总统的这种毫无原则的外交政策已经摧毁了“整个国家的良知”——就特朗普的秉性而言，他可能完全无法理解这一断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他真的看到此评论的话）。

外交政策部分“恢复正常”的迹象，也显现在特朗普身边人物的势力变化之中。取代那位不靠谱的普京说客迈克尔·弗林而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是能冷静谋划的且极为专业的将军：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极右的“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自打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大不如前。特朗普甚至公开说班农只是他许多顾问中的一个。他暗示，在权衡抉择的时候，他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建议对他来说至少与他正式首席战略顾问的话一样重要。但班农还远远没有丧失权力。他把自己塑造成了特朗普最核心选民的代言人，只等哪天总统再次举起“美国优先”的大旗，他势必重受重用。

在那两场被班农拖进的权力测试之中，特朗普一直没占到什么便宜——不管是围绕着“穆斯林禁令”的争执，还是关于废除奥巴马医保的问题，都是如此。在这两件事中，“制衡原则”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在“穆斯林禁令”的争议中以独立司法和独立媒体的形式显现，在医改争议中以国会的形式出现。班农和特朗普从这些经历中吸取教训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可以预见未来还会有冲突发生。

根据2017年4月下旬的最新民调，有52%的美国人反对特朗普的政策。在

所有执政百日时进行的民调中，特朗普是历届总统里支持率最低的。但在大多数曾在2016年11月8日投票给他的人中，他依然深受爱戴。他们还是没有看穿，能从他的政策获益的只有那些富裕乃至极度富有的美国人，而不是那些来自“锈带”的怒气冲冲的投票者。

很有可能，特朗普当政的这几年并不会动摇美国的民主。美国的公民社会深深植根于其与生俱来的宪政爱国主义。它是不那么容易被专制化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中，美国对反自由主义运动的抵抗力比某些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和德国）要强得多。然而，随着这位纽约亿万富豪的当选和其2017年1月20日之后的执政，美国的道德权威不免深受打击。特朗普依然跟从前一样具有不可预测性，而且也很难辨识出其行为背后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现在，唯愿那些能理性思考的顾问的影响力足够大，以便多多少少能弥补第45任总统的狂妄自大所造成的缺陷。[43]

大约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决选之前一周，马琳·勒庞搞了一个大动作：4月29日，她与第一轮选举中的“资产阶级”的总统候选人（在4月23日得票率为4.7%）、国家保守主义的“法国崛起党”（Debout la France）党魁尼古拉·杜邦-艾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一起登台亮相。勒庞称她为这位巴黎南边耶尔市（Yerres）的市长转投她的阵营而感到荣幸，她说她会成为其新伙伴，并宣布一旦自己被选为总统，就任命他当总理。此外，她也不再坚持此前要求迅速退出欧元区的立场（本来该要求也不太受欢迎）：向新货币过渡并非其经济政策的先决条件。她甚至建议欧元与法郎并行：需要进行国际贸易的大企业使用欧洲共同货币，本国货币则用于日常商业活动。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并没有从左派阵营中得到类似的支持。在一项对让-吕克·梅朗雄领导的“不屈的法兰西”运动的约45万支持者的内部调查中，只有34.8%的人支持社会自由派候选人。36%的人支持提交空白或无效选票，29%不会参加第二轮决选。因此，在“选勒庞，还是选马克龙”的问题上，几乎三分之二的激进左翼支持者的态度实际上是中立的，这再次表明这些人并不反对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左派工会“劳动者大联盟”（CGT）和“工人力量”（Force Ouvrière）那里，它们虽然像梅朗雄一样反对勒庞，但并不支持马克龙。只有温和的“法国工人民主联盟”（CFDT）才愿意选择“前进运动”的领袖。这与十多年前发生的一幕截然不同，2002年5月5日，当雅克·希拉克要与让-玛丽·勒庞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对决时，法国的左派事实上决定呼吁大家支持保守派候选人连任，结果希拉克以82.2%的得票率在决选中大幅领先。

5月3日，马克龙和勒庞进行了一场电视辩论，在第一轮与第二轮总统选举之间唯一的一场辩论成为法国这两位领先候选人之间最为激烈的对抗。勒

庞指责马克龙是资本的候选人，是默克尔的工具和残酷的全球化的支持者。马克龙称他的女对手是煽动恐惧和仇恨的骗子，却拿不出任何现实的方案，而且也不配当法国的总统。只有这位前经济部长进行了扎实的论证，这使得民调中有超过60%的法国人表示马克龙才是这场争吵的胜利者。这与决选之前的预测相似：62%的人支持马克龙，38%支持勒庞。

正式的选举活动于5月5日星期五的午夜结束。在此之后，不仅各候选人和各政党，而且各媒体都有法定的保持沉默的义务。在这个关键时间到来之前数小时，马克龙团队报告：出现了一场针对“前进运动”大规模且有组织的黑客攻击行动。美国的一个激进右翼的网络论坛，以及晚些时候的维基解密网站，都公开了数以万计的文件，据马克龙身边的人说，这些文件大部分是真的，但也有一些是伪造的。发起这次攻击的同样是俄罗斯情报部门操控的骇客小组APT28— 一年前该小组曾公开过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以阻止她当选美国总统。[44]

第二轮决选的结果与民调的预测非常吻合：在有效选票中，马克龙得票率66.1%，勒庞33.9%。共有25.4%的人没有参加选举，这个比例是1969年以来最高的。400万有选举权的法国人投出了无效选票，这也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选举研究者发现，从第一轮投票到第二轮投票，有52%原菲永的支持者把票投给了马克龙，52%原梅朗雄和71%哈莫的支持者改投马克龙。勒庞获得了原菲永支持者中的20%、7%梅朗雄支持者和2%哈莫支持者的选票。在那些未参加投票和投无效票的选民中，属于菲永阵营的有32%，属于梅朗雄和哈莫选民的分别占41%和27%。

在法国版图上，马克龙在多数省份的优势都是压倒性的。勒庞只征服了西北部的两个省份：加来海峡省（Pas-de-Calais，52.1%）和埃纳省（Aisne，52.9%）。作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39岁的马克龙在巴黎（89.7%）和海外法国人中（89.3%）的成绩最佳。他在法国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优势，显然比在东部和东南部更大。除了工人群体之外，他在其他社会集团的选民中都是胜利者。有56%的工人投了勒庞的票，而在那些艰难维持生计的人中，支持勒庞的竟达到了69%。总体上看，国民阵线的女候选人在农村地区比在城市要更加成功。马克龙在退休者和年轻的法国人中更受欢迎。在法国的中年人里，勒庞与马克龙的得票比例相差没有那么悬殊。第二轮选举的结果是如此明显：这位决选的胜利者将执掌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

马克龙知道他的胜利并不那么绝对。对于那些为了避免法国沦陷于极右派手中而退而求其次选择他的人，他在5月7日傍晚于卢浮宫内院的玻璃金字塔前发表的演讲中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他甚至说他尊重另外那三分之一选择了国民阵线候选人的法国选民的“愤怒、恐惧和疑虑”，并且还承诺，在未来的5年里他将尽一切努力消除那些让这些人这次选择“走极端”的因

素。

那位被击败的女候选人尽管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她已经成功地使自己的得票数远远超过其父亲在2002年决选中的票数。当年，仅有六分之一的法国人投票给国民阵线，而这次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支持者。倘若马克龙失败，马琳·勒庞将大有希望赢得2022年的总统选举。

正如马克龙自己所言，他面临着“巨量的”任务。他必须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特别是25岁以下年轻法国人的失业问题），欲达此目的就必须使已经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这意味着要松动严苛的解雇保护条例、创造新岗位、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职业培训体系。

必须要让每周工作时间有更大的弹性（也就是说让企业可以协商而不必死守每周35小时工作制），要彻底重组臃肿又低效的公共服务，要改革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在那些“问题城区”，还要重组失业保险系统并降低企业税——马克龙希望最后这项措施能够提升法国经济的竞争力。在应对这一系列问题之前，“前进运动”先得转型为“共和前进党”，以使之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成为该国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这项工作绝对不轻松，仅这就已经构成了对这位选举胜利者及其支持者的巨大挑战。

几乎在每一项他所追求的改革背后，这位新总统都不得不预见到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那些没有给他投票或仅是极不情愿地给他投了票的法国人，这些人有可能会让他在国民大会的选举中受到第一个重大挫折。选举当天晚上发生在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的激进左翼反全球化分子的暴力骚乱，以及次日左派工会反对以任何形式削减社会福利的示威活动，都是未来激烈斗争的预演。那是让-吕克·梅朗雄的法国，他们拒绝5月7日多数人投票的结果——正是这部分法国左派才让奥朗德时代的改革成绩如此贫乏，同时也让马克龙所面临的改革变得如此之紧迫。

在布鲁塞尔和欧盟成员国们的首都，在数周前一再出现一种冷静的观察家们并不会怀疑的说法：如果马琳·勒庞获胜，那就意味着欧元和欧盟的终结。不过，那位社会自由派的候选人在选战期间针对欧元区未来所发表的言论，有很多也远非欧洲的共识。马克龙的建议包括：为欧元区建立一个代议制机构，为货币联盟编制特别预算，为19个成员国设立一个共同的财政部长，未来的债务有一部分将由那些为欧元区的共同投资提供资金的成员国共同承担。那些有着严格财政纪律的国家（特别是德国），会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最后一项要求。因此，很难指望未来的欧洲政坛会一团和气，更可能出现的是围绕着改革针锋相对的激烈争吵，这些改革既关乎法国，也关乎货币联盟的利益，只能期望尽可能不要发展到修改已生效条约的地步。

与2012年奥朗德刚刚就任总统时不同，5年后的欧洲涌动着一个德国与法国之间达成“历史性妥协”的希望：在严格的财政纪律与持续性的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之间形成一个建设性的平衡。人们相信马克龙能够着手进行法国所亟须的改革，以便摆脱停滞状态。人们期待德国不再否认正统的紧缩政策会强化经济周期的作用，同时当有改革意愿的法国临时且“有条件地”偏离《马约》标准时，能更加宽容。在这方面，欧盟委员会几乎用不着人提醒。过去，即使某些违反已商定条约的国家仅有微弱的改革意愿，它也愿意放它们一马。

建立一种严格却不抑制增长，相反促进增长的纪律——如果欧盟内部的两个最大经济体能够就这一理念达成共识，那么货币联盟长期稳定以及欧盟得到巩固的希望就会大大增加。除经济领域外，还有很多事务有赖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这两者彼此协作，并且与欧盟内的其他自由民主政体团结一致，就能有效地对抗中东欧和东南欧的那些变种的威权政体，而不是仅能强调自己的抗议，或是把这些问题留给犹豫不决的欧盟委员会。这些话对欧洲成立，对整个西方世界也同样有效：在面对唐纳德·特朗普治下美国这一民族兼民粹主义强权的时候，德国和法国越是能紧密合作，欧洲才越有机会说“不”。

2017年5月7日的历史意义在于：欧洲和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世界获得了一个机会。人们是否能把握住这个机会，首先取决于那个色子被掷下的地方：法国。[45]

---

[1] Trump erlässt Dekret für Mauerbau zu Mexiko,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6. 1. 2017; Trump treibt Mexiko in die Enge, ebd., 27. 1. 2017; Donald Trump’s Mexico Tantrum, in: *The New York Times*, 27. 1. 2017.

[2] Claus Hulverscheidt u. a., Und raus bist du,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0. 1. 2017;Andreas Ross, Mit Handschellen ins Land der Freihei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0. 1. 2017; Declan Wash, Many in the Muslim World See a Provocation:Islam Itself a Problem, in: *The New York Times*, 28. 1. 2017; Donald Trump’s Cowardly Ban, ebd., 30. 1. 2017.

[3] 1988年7月通过的《巴塞尔协议》全称是《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它是全球银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监管标准之一。2004年的《新巴塞尔协议》（又称《巴塞尔协议II》）进一步提高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这项协议仍然存在巨大漏洞。2010年9月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I》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特别注意防范某些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4] Trump will Zügel für Banken locker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5. 1.2017; Harald Freiberger, Die Rückkehr der Zockerei, in: *Süddeutsche Zeitung,*4./5. 2. 2017. Zum Dodd-Frank-Gesetz und zum Collins Amendment: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 (fortan:Geschichte IV), München 20153, S. 359 f.

[5] Tomas Seibert, Auf Schlingerkurs, in: *Der Tagesspiegel,* 4. 2. 2017 (zum CBNInterview); Peter Münch, Totale Blockade,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3. 2.2017 (zum Interview mit Israel Hajom); Trump bekräftigt Ein-China Politik,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2. 2017.

[6] Roland Lindner, Donald Trumps Ideologi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1.1. 2017; Hubert Wetzel, Das Schwarze Hau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6. 2. 2017;Tomas Meyer, Der Legionär, ebd., 10. 2. 2017 (über Michael Anton); Christoph von Marschall, Fürsten der Finsternis, in: *Der Tagesspiegel,* 1. 2. 2017.

[7] Tomas Seibert, «Die Chance, wieder gemeinsam zu führen», in: *Der Tagesspiegel,*28. 1. 2017; Jochen Buchsteiner, Du hast in mir einen Freund,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9. 1. 2017; Gideon Rachman, Donald Trump is a disaster for Brexit, in: *The Financial Times,* 30. 1. 2017; The Observer view on Britain's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 https://www.theguardian. Com/ commentisfree/2017/jan/29/observer-view-britain-america-theresamay-donald-trump.

[8] Andreas Ross, Der größte Frieden und eine Menge Lieb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7. 2. 2017; ders., Einer gegen alle, ebd., 18. 2. 2017; Jochen Stahnke, Ein Staat-zwei Staaten-drei Fragezeichen, ebd.; Willkommen bei der Trump-Show,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8./19. 2. 2017; Michael S. Schmidt et al.,Trump Campaign Aides Had Repeated Contacts With Russian Intelligence, in: *The New York Times,* 14. 2. 2017; Nicholas Kristof, What Did Trump Know, and When Did He Know it, ebd., 15. 2. 2017; E. J. Dionne Jr., The hard truth: Trump is unfit, in: *The Washington Post,* 16. 2. 2017.

[9]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Letter by President Donald Tusk to the EU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on the future of the EU before the Malta summit.European Council. The President. Press Release 35/17. 31/01/2017; Malta Declaration by the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the external aspects of migration: addressing the Central Mediterranean route. European Council. The President. Press Release 43/17. 03/02/2017; D. Brössler/T.

Kirchner, Warme Worte für Liby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 2. 2017; A. Bachstein/M. Baumstieger, Anarchie, die die Schwächsten trifft, ebd., 4./5. 2. 2017; Tomas Kirchner, Nur die Wirklichkeit stört, ebd.; Paul-Anton Krüger, Deal ohne Handschlag, ebd., 17. 2.2017; Markus Grabitz, Schotten dicht, in: *Der Tagesspiegel,* 4. 2. 2017; Albrecht Meier, Der schwache Mann von Tripolis, ebd.; Tomas Urban, Hunderte erreichen Ceuta,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1. 2. 2017; ders., Vor dem Zaun, ebd.; Paul Anton Krüger, Kampf ums Öl, ebd., 10. 3. 2017; Geheim-Papier der deutschen Sicherheitsbehörden verrät: So viele Flüchtlinge wollen nach Europa, in: Bild,20. 2. 2017; Tom Stevenson, Flip-Flops and Kalashnikovs,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 3. 2017. Zur Entwicklung in Libyen vor 2017 siehe oben S. 139 ff.

[10] Mark Schieritz, Ruiniert durch Schulden?, in: *Die Zeit,* Nr. 8, 6. 2. 2017; Neuer Nervenkrieg um Griechenlands Zukunf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0. 2. 2017; Michael Martens, Grexit reloaded, ebd., 21. 2. 2017; Kurswechsel im Griechenland-Programm, ebd.; Die Hälfte der Griechen muss keine Steuern zahlen, ebd.; Alexander Mühlauer, Für Schäuble ist ein gutes Ende in Sicht,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1. 2. 2017; Albrecht Meier, Weniger sparen, mehr reformieren, in: *Der Tagesspiegel,* 21. 2. 2017; ders., Rechnung mit Lagarde, ebd.,23. 2. 2017. 关于希腊危机，参见本书原文第51及56页前后。

[11] Italien gegen Haushaltskorrektur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2.2017; Renzi: Fiskalpakt beenden, ebd., 14. 2. 2017; Tobias Piller, Italiens Weg ins Schlaraffenland, ebd., 15. 2. 2017; Das italienische Parlament billigt die Bankenrettung, ebd., 17. 2. 2017; Jörg Bremer, Angriff von links, 27. 2. 2017;Ulrike Sauer, In Schieflage,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3. 2. 2017; Oliver Meiler,Renzi strebt zur Macht, die Partei auseinander, ebd., 20. 2. 2017. 关于宪法公投，见本书原文第280页。

[12] Warschau: EU-Kommission stigmatisiert Pol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2. 2. 2017; Polens Oberstes Gericht im Visier, ebd., 3. 3. 2017; Daniel Brössler und Florian Hassel, Scharfe Worte, aus Höflichkeit, in: Süddeutsche*Zeitung,* 22. 2. 2017 (Zitate Gersdorf); Ungarn ausgebremst, ebd., 29. 3. 2017;Stefan Ulrich, Tyrannei der Mehrheit, ebd. 关于波兰司法危机在2016年12月的激化，见本书原文第272页前后。

[13] Présidentielle 2017: le programme d’Emmanuel Macron. http://www.cnewsmatin.fr/france/2017-06-05/presidentielle-2017-le-programme-

demmanuelmacron-744341; Macron will Aufträge bevorzugt an Europäer vergeben,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3. 2017; Leo Klimm u. Christian Wernicke,In Bewegun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 3. 2017; Tanja Kuchenbecker,Französischer Zweikampf, in: *Der Tagesspiegel,* 3. 3. 2017.

[14] Alain Juppé: «Je ne serai pas candidate à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in:Le Monde, 6. 3. 2017. http://www.lemonde.fr/election-presidentielle-2017/article/2017/03/06/alain-juppe-je-ne-serai-pas-candidat-a-la-presidence-delarepublique_5089857_4854003.html; Stefan Ulrich, Die Unberührbare, in:*Süddeutsche Zeitung,* 24. 2. 2017; Christian Wernicke, Frankreichs Justiz im Wahlkampf, ebd., 27. 2. 2017; Le Pen verliert Immunität, ebd., 3. 2. 2017; Stefan Ulrich, Reife Republik, ebd., 6. 3. 2017; Christian Wernicke, Zu spät, ebd., 7.3. 2017; Fillon: Komplott der Presse und der «roten Richte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4. 3. 2017; Michaela Wiegel, Hier steht er und will nicht anders, ebd., 6. 3. 2017; dies., Keine Rettung aus dem republikanischen Schlamassel, ebd., 7. 3. 2017.

[15] Michael Martens, Hoffen auf das Volk,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4. 1. 2017; Bülent Mumay, Der Fall Deniz Yücel, ebd., 23. 2. 2017; ders., Der deutsche Feind, ebd., 9. 3. 2017, Michael Martens u. Michael Stabenow, Er kennt keine Europäer mehr, nur noch Faschisten, ebd., 13. 3. 2017; Rainer Hermann,Türkisches Sultanat, ebd., 15. 3. 2017; Erdoğan: Macht nicht drei, sondern fünf Kinder, ebd., 18. 3. 2017; D. Brössler u. a., «Warum verstecken Sie Terroristen?»,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4. 3. 2017; Robert Birnbaum, Schlagabtausch, in: Der Tagesspiegel, 7. 3. 2017; Jürgen Hoffmann, «Systema tische Gegnerschaft zur Türkei», ebd., 8. 3. 2017, Hans Donath, Zu den Grenzen, ebd., 9. 3. 2017; Lizzy van Winsen, Vom Weglacher zum Hardliner, ebd., 15. 3. 2017; Neue Erdoğan Attacke: Nazi-Vorwurf persönlich gegen Merkel. www.tagesschau.de/ausland/erdogan-beschimpfungen-merkel-101.html; Erdoğans Äußerungen über einen möglichen Auftritt in Deutschland: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erdogan-522.html, 5. 3. 2017.

[16] “夺走公众的关注”的原文是“Donner zu stehlen”，直译是“窃取雷声”。

[17] “D66”的全称是“Democraten 66”，中文一般翻译为“六六民主党”，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18] Wilders rückt die Niederlande in den Blick,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0. 1. 2017; Michael Stabenow, Die neue Härte, ebd., 26. 1. 2017（所引

用的吕特、阿斯切和布马的言论出自这篇文章）; Erleichterung über die Wahl in Holland,ebd., 17. 3. 2017; Tomas Kirchner, Die Freude des Dauerlächler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7. 3. 2017。

[19] 更准确地说，这里的“速度”应该指的是一国能接受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速度，而不是一国的发展速度。后文中的英文词“pace”（步调）的确是一个更好的表述。

[20] 本书作者所在的德国，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更不用说是党魁）支持民族、民粹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作者称菲科只是个“名义上”（nominell）的社民党人。

[21]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Weißbuch zur Zukunft Europas. Die EU der 27 im Jahr 2025-Überlegungen und Szenarien,* Brüssel, 1. März 2017; Polish Presidency of the Visegrad Group. July 2016-June 2017. Joint Statement of the Heads of Governments of the V4 Countries «Strong Europe-Union of Action and Trust Input to Rome Declaration 2017 (2. 3. 2017); Conclusio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9 March 2017 (OR.EN); D. Brössler u. a., Hass auf Tusk, in:*Süddeutsche Zeitung,* 10. 3. 2017; Stefan Ulrich, Allein gegen alle, ebd.; Daniel Brössler u. Alexander Mühlauer, Deutschland plus 26, ebd.; 11./12. 3. 2017;Alexander Mühlauer, Die feinen Unterschiede, ebd., 18./19. 3. 2013; Hendrik Kafsack u. Michael Stabenow, Warschau allein in Europa,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3. 2017; Stephan Löwenstein u. Konrad Schuller, Zwei Konterrevolutionäre, ebd., 16. 3. 2017; Jacques Schuster, Ungarn ist in der Flüchtlingsfrage ehrlicher als wir (8. 3. 2017), in: *Welt.* N 24. https://www.welt.de/debatte/kommentare/article162656936/Ungarn-ist-in der-Fluechtlingsfrage-ehrl icher-als-wir.html. 对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概述见Reinhold Vetter, *Nationalismus im Osten Europas* . Was Kaczyński und Orbán mit Le Pen und Wilders verbindet, Berlin 2017; Kai-Olaf Lang, Differenzieren und kooperieren. Die Višegrad Staaten bleiben für die deutsche Europapolitik trotz Differenzen relevant.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Aktuell, März 2017。

[22] Christoph Ehrhardt, Land der vielen Regierungschef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 3. 2017; Libyen fordert Rettungsboote von Europa, ebd.; Oliver Meiler, Die Schwierigkeit heißt Liby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1. 3. 2017. 关于的黎波里和托卜鲁克两个政权在2017年2月所达成的协议的失败，参见本书原文第319页前后。

[23] Erklärung der führenden Vertreter von 27 Mitgliedstaaten und des

Europäischen Rates,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Erklärung von Rom. Rom, den 25. März 2017 (OR. EN); Konrad Schuller, Landesverräter und Mythenzerstöre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3. 3. 2017 (zur Strafanzeige Macierewicz'gegen Tusk); «Erklärung von Rom» betont Einhe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bd., 25. 3. 2017; Michael Stabenow, Sehnsucht nach dem Tal der Tränen, ebd., 27. 3. 2017.

[24] Michael Martens, Aller guten Dinge sind drei,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8. 3. 2017; Sieg der EU-Freunde in Bulgarien freut die Börse, ebd.; Rassisten, ein kommunistischer Agent und eine proeuropäische Partei, ebd.; 5. 5. 2017; Florian Hassel, Mehr oder weniger in Russland,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3. 3. 2017;ders., Nationalistischer und populistischer, ebd., 28. 3. 2017; ders., Rechtsruck in Bulgarien, ebd., 4. 5. 2017.

[25] Reinhard Veser, Werben um die Minderhei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3. 2017; «Staatsstreich» in Mazedonien, ebd., 3. 3. 2017, Michael Martens, In den Wirren Skopjes, ebd., 432017; ders., Vučić beerdigt vom Totengräber, ebd.,1. 4. 2017; ders., Die Stabilokraten des Balkans, ebd., 4. 3. 2017; Warnung vor Machtkonzentration in Serbien, ebd.; Nada Pantel, Terapie des starken Mannes,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2. 4. 2017; dies., Die serbische Siegesfaust, ebd., 4. 4.2017.

[26] Christian Rumpf, Die geplante Verfassungsänderung (24. 3. 2017). RRLex7 Rumpf Rechtsanwälte. http://www.tuerkei-recht.de/downloads/Verfassungsaenderung.pdf;Mike Szymanski; Mehr Macht für den Präsident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0.3. 2017; ders., Tage der Wölf n, ebd., 10. 4. 2017; ders., Schatten des Verdachts,ebd., 19. 4. 2017; Erdoğan: Deutsche kommen nicht bald frei,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4. 2017; Michael Martens, Erdoğans Geiseln, ebd.;Erdoğan weist Kritik an Referendum zurück, ebd., 18. 4. 2017; Rainer Hermann,Strategie aufgegangen, ebd.; Michael Martens, Sieg voller Ungereimtheiten,ebd.; Erdoğan lehnt Auslieferung Yücels strikt ab, in: *Der Tagesspiegel,* 15. 4.2017, «Auslandstürken stimmten für Erdoğan», in: *Die Presse,* http://diepresse.com/home/ausland/aussenpolitik/5202311/Auslandstuerken-stimmten-fuer Erdogan. Turkey referendum: Key reactions.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615403. 关于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史，参见本书原文第33页前后。

[27] Medicaid，美国华人一般称之为“白卡”。

[28] Donald Trump's Congress speech (full text). http://edition.cnn.com/2017/02/28/politics/donald-trump-speech-transcript-full-text/index.html; Nicholas Kristof,Connecting Trump's Dots to Russia, in: *The New York Times,* 9. 3. 2017;ders.,There's a Smell of Treason in the Air, ebd., 22. 3. 2017; Andrew E. Kramer,Trump Campaign Ex-Chief Faces New Allegations in Ukraine about Payments, ebd., 21. 3. 2017; Andreas Ross, Felsenfest überzeug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6. 3. 2017; Obamacare wird abgeschafft, ebd., 8. 3. 2017; Millionen Amerikaner verlieren Versicherungsschutz, ebd., 15. 3. 2017; Winand von Petersdorff, Das Trumpcare-Desaster, ebd., 27. 3. 2017; Stefan Kornelius, Die guten Kontakte des Sergej Kisljak,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4. 3. 2017; Herbert Wetzel, Rumpelstiltskin, ebd., 27. 3. 2017; Christoph von Marschall, Nach der Niederlage, in: *Der Tagesspiegel,* 28. 3. 2017. *Zu Verbindungen von Manaforts Geschäftspartner Deripaska zu Gennadi Petrow, dem Paten der Tambower Mafa: Manfred Quiring, Putins russische Welt. Wie der Kreml Europa spaltet,* Berlin2017, S. 28 f. Zur Watergate-Affäre: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Westens,* Bd. 3: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5[2], S. 607 ff.

[29] Angela Merkel visit: Trump welcomes chancellor after bashing her on campaign trail-http://edition.cnn.com/2017/03/16/politics/angela-merkeldonald-trumpwashington-visit/index.html; Mark Landler, Merkel Meets Trump, the Defender Versus the Disrupter, in: *The New York Times,* 18. 3. 2017; Damian Paletta, White House rejects trade statement, in: *The Washington Post on Sunday,* 19. 3. 2017;Nico Fried, Dankeschön mit langer Rechnun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0. 3. 2017; Stefan Kornelius, Fossil trifft Fossil, ebd., 20. 3. 2017; Majid Sattar, Auf der Suche nach Gemeinsamkeit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8. 3. 2017;Amerika bestraft deutsche Stahlunternehmen, ebd., 1. 4. 2017; Kerstin Kohlenberg,Zimmer frei, in: *Die Zeit,* Nr. 14, 30. 3. 2017.

[30] Klaus Larres, Ein Hauch von Realität: Trump und Xi Jinping bringen die amerikan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auf Normalmaß. http://www.euractiv.de/section/eu aussenpolitik/opinion/usa-und-china-ein-hauch-vonrealitaet/; Winand von Petersdorff, Alles ist angerichtet für einen Handelskrieg, in: Frankfurter*Allgemeine Zeitung,* 5. 4. 2017; Pjönjang testet Mittelstreckenraketen, ebd., 6.4. 2017; Wieder ein Zeichen militärischer Entschlossenheit, ebd., 10. 4. 2017;Stefan Kornelius, Er will nur bluff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4. 4. 2017; Kai Strittmatter, Bemüht freundlich, ebd., 8./9. 4. 2017.

[31] Jabin Botsford, For Trump's philosophy an early test, in: *The Washington Post,*6. 4. 2017; Downsizing Mr. Bannon, The New York Times, 6. 4. 2017; After the Airstrikes on Syrien, What's next?, ebd., 7. 4. 2017; Neil MacFarquhar, U. S.Attack on Syria Cements Kremlin's Embrace of Assad, ebd., 8. 4. 2017; Samuel Moyn und Stephen Wertheim, The Long Road to Trump's War, ebd., 10. 4. 2017;David E. Sanger, Tillerson Halts Any Thawing of Russia Ties, ebd., 11. 4. 2017;Christoph Ehrhardt u. a., Begrenzter Schlag,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8. 4. 2017; Majid Sattar, Noch keine Strategie, ebd.; Simon Riesche, Plötzlich wieder Weltpolizist, ebd., 11. 4. 2017 (hier die Zitate von Spicer und Coulter sowie die Umfrageergebnisse); Christoph von Marshall, Schlag auf Schlag, in: *Der Tagesspiegel* , 8. 4. 2017; Sacha Batthyany, Eine kurze Romanze, ebd., 11. 4. 2017 (zu Tillerson und Russland). Trump zum Giftgasangriff auf Chan Sheichun, 5. 4.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ce/2017/04/05/remarks-presidenttrumpand-his-maje sty-king-abdullah-ii-jordan-joint. Trumps Fernsehrede vom 6. 4. 2017: https:// 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ce/2017/04/06/statementpresident-trump syria. 关于国际惯例和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参见Matthias Herdegen, *Völkerrecht,* München 2000, S. 129 ff. Zur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Winkler, *Geschichte IV* (Anm. 3), S. 186 ff。

[32] Peter Baker, Trump Learns Simple Issues Are Rarely so, in: *The New York Times,* 14. 4.2017; ders., Only Thing Different About NATO is President's Opinion of it, ebd.; David E. Sanger und William J. Broad, U. S. Faces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Slow Motion,ebd., 17. 4. 2017 (hier das Zitat McMasters); Gardiner Harris, Tillerson Toughens Tone Over Iran Nuclear Agreement, ebd., 20. 4. 2017; Patti Waldmeir und Shawn Donnan,Donald Trump signs ‹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 order, in: *Financial Times,* 18. 4.2017; Washington bekennt sich zur Rolle der globalen Ordnungsmach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4. 2017; Frederike Böger, Bombe mit Signalwirkung, ebd., 15.4. 2017; Tillerson kritisiert Atomabkommen mit Iran scharf, ebd., 21. 4. 2017; Putin beschwert sich über Trump,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3./14. 4. 2017; Sacha Batthyany,Militärisches Muskelspiel, ebd., 15./16./17. 4. 2017; Putin lässt kein Ultimatum stellen,in: Spiegel Online, 12. 4. 2017; Trump nennt NATO «nicht länger obsolet», ebd., 13. 4.2017; Tillerson sieht amerikanisch-russische

Beziehungen auf dem Tiefpunkt, in: *Die Welt,* 13. 4. 2017. 特朗普在与斯托尔滕贝格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言论见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ce/2017/04/12/joint-press-conferencepresident-tru mp-and-nato-secretary-general。关于特朗普将北约描述为过时之物，参见本书原文第241页。

[33] 基督教节日，据《圣经·新约》记载，基督耶稣在这一天骑驴荣入圣城，受到民众手持棕榈树枝欢呼的礼遇。

[34] Jochen Buchsteiner, Wir haben keine Angs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 3. 2017; Tomas Kirchner, Polizei stoppt möglichen Attentäter in Antwerpen, in:*Süddeutsche Zeitung,* 24. 3. 2017; Silke Bigalke, Untergetaucht und radikalisiert,ebd., 11. 4. 2017 (Zitat Åkeson); Hans Leyendecker und Georg Mascolo, Im Dunkeln,ebd., 15./16./17. 4. 2017; Karin Häggmark, Der Terror erreicht Stockholm, in: *Der Tagesspiegel,* 8. 4. 2017; dies., Ein Land rückt zusammen, ebd., 10. 4. 2017; IS greift Kopten an, ebd., 10. 4. 2017; dies., Schwedische Sicherheiten, 13. 4. 2017; Weiteres Opfer des U-Bahn-Anschlags gestorben, in: *Spiegel Online,* 12. 4. 2017. 关于尼斯和柏林的恐袭事件，见本书原文第191、288页。

[35] Grundsatzeinigung mit Griechenland,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8.4. 2017; Schäuble erteilt Eurohaushalt eine Absage, ebd., 10. 4. 2017; Tobias Piller, Athen führt die Gläubiger an der Nase herum, ebd., 12. 4. 2017; Cerstin Gammelin und Alexander Mühlauer, Schirmherrschaf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7. 4. 2017; Alexander Mühlauer, Der Sommer kann kommen, ebd., 8./9. 4. 2017; René Höltschi, Eurostat-Daten zu den Staatsf nanzen: Griechenland übertrifft das Haushaltsziel massiv, in: *Neue Züricher Zeitung*, 25. 4. 2017.

[36] 在欧洲议会中，欧尔班的青民盟属于保守派的欧洲人民党政党系，因此欧洲人民党既对其有所庇护，同时也有所约束。

[37] Cathrin Kahlweit, Orbáns nächstes Ziel,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0. 3. 2017;ders., Nein zur Wissenschaft, ebd., 5. 4. 2017; Orbáns Stimme gegen die Freiheit, ebd., 6. 4. 2017; Daniel Brössler, Orbán Grenzen setzen, ebd., 7. 4.2017; Cathrin Kahlweit, Proteste in Ungarn, ebd., 11. 4. 2017; A. Mühlauer,P. Munzinger, Ungarn wird Fall für Brüssel, ebd., 13./14. 4. 2017 (hier die Zitate von Timmermans); Martin Schulze Wessel, Orbáns Ethnisierung des Bildungswesen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5. 4. 2017; EU-Kommissarin gegen Vertragsverletzungsverfahren, ebd., 11. 4. 2017; Brüssel prüft weitere Schritte gegen Ungarn, ebd., 13. 4. 2017; Reinhard Veser, Orbán auf der roten

Linie, ebd., 27. 4. 2017; Silviu Mihai, Orbán rechnet mit seinem Hauptfeind ab,in: *Der Tagesspiegel,* 5. 4. 2017; Markus Grabitz, Ungarns Populisten werden zur Belastung, ebd., 7. 4. 2017; EU leitet neues Verfahren gegen Ungarn ein.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7-04/eu-kommission leitetvertragsverletzungsverf ahren-gegen-ungarn-ein.

[38] Konrad Schuller, Kampf der Gerichtsokrati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4. 4. 2017; Tusks Popularität in Polen steigt, ebd., 28. 4. 2017; Paul Flückinger,Polen baut Armeespitze fast komplett um, in: *Der Tagesspiegel*, 7. 4. 2017; Florian Hassel, Kahlschlag in Polens Militär,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8./9. 4. 2017 (hier Zitate von «Polityka»); Matthias Krupa u. a., Wie gefährlich sind diese Männer für Europa, Herr Timmermans? in: *Die Zeit,* Nr. 19, 4. 5. 2017. 关于波兰的司法改革，亦参见本书原文第327页。

[39] Vier Minuten Sozialunio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7. 4. 2017; Jochen Buchsteiner und Hendrik Kafsack, Nicht irgendein Drittstaat, ebd., 2. 5. 2017;Tomas Gutschker, Das Brexit-Dinne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30. 4. 2017; Stefanie Bolzen u. a., Ein Dinner mit Vorgeschmack auf eine Schlammschlacht, in: *Die Welt,* 3. 5. 2017; Tomas Kirchner, Im sozialen Gewand,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7. 4. 2017; ders. und Christian Zaschke, Nach dem Dinner die Details, ebd., 3. 5. 2017; Tomas Kirchner und Alexander Mühlauer,Hart, aber verbindlich, ebd., 4. 5. 2017. Die Brüssler Erklärung vom 29. 4. 2017:Europäischer Rat. Brüssel, vom 29. 4. 2017 (DR.en).EuroXT2004/17.BXT10.CoEur.Coach.2: Außerordentliche Tagung des Europäischen Rates (Artikel 50) (29.April 2017)-Leitlinien.

[40] Ulrich Fichtner, Julia Amalia Heyer, Außer Atem, in: *Der Spiegel,* Nr. 16,15. 4. 2017 (Umfrageergebnisse); Albrecht Meier, Links, rechts, egal, in: *Der Tagesspiegel*, 8. 4. 2017; Neue Vorwürfe gegen Fillo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3. 3. 2017; Michaela Wiegel, Das Kalkül des Tabubruchs, ebd., 12. 4.2017; Macron: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 Stärke ist «nicht tragbar», ebd., 18. 4. 2017; Michaela Wiegel, Dichter Nebel in Paris, ebd., 19. 4. 2017; dies., Aus tiefem Hass auf die Polizei, ebd., 22. 4. 2017; dies., Der Wahlkämpfer, ebd. (über Cazeneuve); Christian Wernicke, Links überhol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1. 4.2017; Cédric Pietralunga und Bastien Bonnefous, Valls choisit Macron, quitte à faire imploser le Parti socialiste, in: Le Monde, 30. 3. 2017; Un attentat déjoué à le vielle du premier tour, ebd., 20. 4. 2017; Attaque terroriste sur les

Champs-Élysées,in: *Le Figaro,* 21. 4. 2017. 关于法国维希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参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2: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 1945,* München 2016³, S. 1026 ff。

[41] Le refus du Front National, in: *Le Monde,* 24. 4. 2017; Jérôme Fenoglio, Les risques d'une explosion, ebd., 25. 4. 2017; Macron-Le Pen: les deux France,ebd.; Bastien Bonnefous, Avis de gros temps au Parti socialiste, ebd., 26. 4.2017; Matthieu Goar et Alexandre Lemarié, La droite repousse l'heure du bilan, ebd., 26. 4. 2017; Jean Baptiste Garat, Macron-Le Pen: un nouveau séisme, in: *Le Figaro,* 24. 4. 2017; Alexis Brézet, Un immense gâchis, ebd., 25. 4.2017; Sophie de Ravinel, Le PS s'interroge sur sa place après les législatives, ebd.,26. 4. 2017; Guillaume Gendron, Whirlpool. La bataille d'Amiens, in: *Libération,*27. 4. 2017; Michael Wiegel, Feindseligkeiten beim Marktbummel,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5. 4. 2017; Christian Schubert, Der Blitzaufsteiger ist noch nicht am Ziel, ebd.; ders., Macron und die Wette auf die radikalen Mitte,ebd.; Michaela Wiegel, Die Kandidaten des Volkes, ebd., 27. 4. 2017; Macron im industriepolitischen Stresstest, ebd.; Stefan Ulrich, Der lange Marsch, in:*Süddeutsche Zeitung,* 25. 4. 2017; Philip Kuhn, Gespaltene Gesellschaft, in: *Die Welt,* 25. 4. 2017; Tomas Schmid, Macrons Titanenaufgabe, ebd.

[42] 英国海峡群岛是靠近法国诺曼底的一些海岛，它们并不属于英国（联合王国），但其宗主权直属于英国王室，是英国王室属地（Crown Dependencies）。

[43] Mr. Trump's Shambles of a Trade Policy, in: *The New York Times,* 26. 4. 2017;Mr. Trump's Comic Tax Plan, ebd., 27. 4. 2017; Nicolas Kristof, Tis isn't Tax Policies. It's a Heist, ebd.; Juli Hirschfeld Davis and Patricia Cohen, Trump Plans Would Shift Trillions to the Wealthiest, ebd., 27. 4. 2017; Roger Cohen, «America first» Has Not Upended the World. Except It Has, ebd., 3. 5. 2017; Mr. Trump Embraces Another Despot, ebd.; Stephan Beutelsbacher, Die Realität nach dem Steuerhype, in: *Die Welt,* 28. 4. 2017; Trump will die Steuern radikal senken,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7. 4. 2017; Winand von Petersdorff, Hundert Tag, ebd., 28. 4. 2017; Clemens Wergin, Von der Realität eingeholt, ebd., 29. 4.2017; Sebastian Jannasch, «Er wird nach Schuldigen suchen». US-Ökonom Barry Eichengreen über Trumps Wirtschaftspolitik,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 5. 2017;Christoph von Marschall, Trumps große Woche, in: *Der*

Tagesspiegel, 24. 4.2017; ders., Geschrumpftes Gespenst, ebd., 28. 4. 2017; Petra Pinzler und Mark Schieritz, TTIP. Das umstrittene Handelsabkommen galt als beerdigt. Nun könnte es ausgerechnet Donald Trump wiederbeleben, in: *Die Zeit,* Nr. 18, 27. 4. 2017.

[44] Dominique Albertini u. a., Avec Le Pen, l'impossible débat, in: *Libération,* 4. 5.2017; Guillaume Tabard, La candidate de l'indignation, le candidat des solutions,in: *Le Figaro,* 4. 5. 2017; Michaela Wiegel, Die Kunst der Entteufelung,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 5. 2017; Le Pen schwächt Anti Euro-Kurs ab,ebd., 2. 5. 2017; Andreas Ross, Plaudern über Kim Jong-un, ebd., 26. 5. 2017(zum Telefonat Trump-Duterte); Leo Klimm, Kampf der Weltanschauungen, in:*Süddeutsche Zeitung,* 3. 5. 2017; Andrian Kreye, Endziel Chaos (Interview mit Laura Galante), ebd., 8. 5. 2017.

[45] Bastien Bonnefous u. a., Macron triomphe et doit réconcilier un pays divisé, in: Le Monde, 4. 5. 2017; Mathilde Siraud, La grande implosion du Parti Socialiste, in:*Le Figaro,* 10. 5. 2017; Laurent Joffrin, Une dette envers le peule, in: Libération,8. 5. 2017; Sylvie Kauffmann, France Still Waits for a Revolution's Outcome, in:*The New York Times,* 9. 5. 2017; 4,2 Millionen Franzosen wählen ungültig, in:*Süddeutsche Zeitung*.de, 8. 5. 2017. http://www.sueddeutsche. de/politik/wahlin-frankreich-millionen-franzosen-waehlen-ungueltig-1.3495396; Leo Klimm,Mission Mehrhei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9. 5. 2017; ders. und Christian Wernicke, Allons Allemands, ebd.; Zwischen Paris und Berlin droht ein Streit um Europapolitik,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9. 5. 2017; Christian Schubert,Frankreichs großes Experiment, ebd.; Torsten Krauel, Hoffnung für Europas Club der Hoffnungslosen, in: Die Welt, 9. 5. 2017. 关于马克龙在卢浮宫前的演讲：Macron au Louvre: «La tâche sera dure, mais je vous dirai la vérité». http://www.lemonde.fr/electionpresidentielle-2017/article/2017/05/07/emmanuel-macron-je me-battrai-contre-les-divisions-qui-nous-minent_5123867_4854003.html。

第14章

结论：一个面临考验的时代

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正处于退守状态。对它的威胁不但来自外部的专制政体，同时威胁也来自内部——那些民粹主义的运动和政党声称它们才是民主的真正代表，因为它们，并且只有它们才为“人民”说话。民粹主义运动惯于从那些被“建制派”民主政党推诿、掩盖或没能很好解决的难题中获益。凡是能被阐释为“政界人士”或“精英”的傲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脱节、“上层”与“下层”的疏离的东西，它们都加以利用。

在美国或法国这样的总统制民主政体中，行政权独大的威胁特别大，所以民粹主义运动在这样的国家可能比议会制民主国家会更有机会。但即使是在议会民主制政体中，也有一些这样自认为是“人民”唯一正统代言人的运动或政党得势。民粹主义者不但在那些日益贫乏的社会阶层中取得过成功——那些穷人视自己为全球化、数字化（或大规模运用机器人）的牺牲品，同时他们也受到某些衣食无忧之辈的欢迎，这些人讨厌自由主义的“时代精神”，他们感觉自己被排斥到了社会主流对话之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那些文化知识受到了挑战。如果民粹主义者的批评只是一些指责，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成功。可是他们的批评事实上包含着扭曲和误导，并且用“极度简化特征”的方式唤起人们的本能反应，因此才得以大行其道。

就欧洲而言，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国政治学者兼评论家雅克·鲁普尼克在2016年谈及“自由主义周期的结束”，在他看来本次周期开始于1989—1991年的剧变。[1]鲁普尼克主要讨论的是两个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在近年来掌权的中东欧国家：匈牙利和波兰，现在它们正以“非自由的民主”政体自居。这两个国家都有深厚的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传统，这在其政治领袖维克多·欧尔班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身上都有体现，而且二人还有意唤醒此传统。

然而，鲁普尼克强调得很对：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带有民粹性质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全欧的现象。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出现于整个西方民主世界中的现象。在美国，自由主义危机出现得比欧洲更早，从小布什总统因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而大规模限制个人权利和法治保障的时候就开始了。总体上看，西方民主政体本身造成这批民粹主义造反者反对现存政治制度，有几个更深层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之后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平衡，在那之后的30年里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为了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利不断放宽各项管制措施，1989年划时代剧变之

后的全球化浪潮，以及让传统媒体一步步丧失重要性的互联网革命，还有在信息不足的社交网络中可能产生的“回音室效应”——如果没有这些，攻击性的民粹主义将很难受到欢迎。[2]

美国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根据自己的研究，总结并批评了他所称的“过渡全球化”中的根本特征（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它的回应）：“对全球市场的监督力度十分虚弱，从而导致其动荡、低效且缺乏民主监督。”[3]

然而，民粹主义者所宣传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正确答案。贸易保护主义的拒斥政策不但会伤害别国，迟早也会有损于那些试图从国际竞争中抽身的国家——它们的竞争力会因此而越来越弱。

当然，民粹主义者对这样的论点并不感兴趣。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都依赖于民族主义可能会带来的补偿效应。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卡茨（Daniel Katz）早在1940年就进行的研究，民族主义可以给个人提供一种“额外心理收入”，将它作为补偿，人所拿到的真金白银即便更少也可能会心甘情愿。民族主义还能让仇恨和敌意投射到“外部群体”中去；还能用集体性的成功体验来补偿个人所遭受的挫折；同时它还有助于将个人的欲望和冲动转移到集体的符号上去。[4]

但若只是把民族国家简单地看作万恶之源，那么这种错误的想法就跟任何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一样危险和具有欺骗性。至少在欧洲，经典的主权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欧洲联盟的成员国都是后经典时代的民族国家，它们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一起共同行使一部分主权，并且把另一部分主权交给像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这样的超国家联盟机构。但即使在欧盟中，民族国家也依然是法治、社会福利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唯一制度框架，即使这样的发展从不曾达到完美的境界。

作为退回到传统主权民族国家的坚定鼓吹者，右翼民粹主义者却极少谈法治。而在社会福利问题上，一类民粹主义者倒向新自由主义，另一类倒向国家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者大多把民主简化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要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都更愿意施行直接民主，或者说公投民主，而非代议制民主。然而，西方民主政体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作为人民主权意志的多数派意志自由地表达，它是一套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规范等先决条件相联系的政府形式。只有当一个地方拥有多元化的市民社会，具有百家争鸣的舆论环境，有进行对话并和平解决利益争端的政治文化，并且尊重法治、不可剥夺的人权、少数派的权利、三权分立（包括司法独立），能自由选出民意代表并尊重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则，民主制度才能在此处发展起来。

民粹主义者所赞许的直接民主，可以（特别是在地方或地域层面）补充而不是取代议会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定形式。而且，与代议制民主相比，它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多数选民愿意，可以把议会多数派或政府选下去，但取消全民公决的结果则要困难得多。

赞成更多直接民主的人大多也主张更低的投票人数门槛。但参与全民公决的人数越少，其公投结果的民主合法性就越弱。在公投过程中，常常有一些只因为共同拥有否定意见而聚集在一起的力量，但它们却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长期协作。全民公决只能选择“是”或“否”。而法律草案往往会在议会里的小组和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得到修改，它们有可能会被换成一种妥协方案，或是被纠正和改进。直接民主有其意义，它需要并突显了人民的“制宪权”。但在平时的立法活动中，代议制民主远比公投式民主要优越。

“自由且世俗化的国家本身并不能保证其赖以存在的条件”，这是德国宪法法院法官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弗尔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经常被引用的一句判词。[5]西方民主政体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也与此相关，其中的一些国家已经不再有意识地（因此也就没有能力）在内部和外部捍卫西方社会的成果。这种广泛存在的无意识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光是民粹主义者，而是还有许多“建制派”民主主义者也倾向于把“少数服从多数”当作民主的精髓。

美国总统们就特别受这种简化过的“民主”概念的影响，因而积极向那些根本没有为这种复杂并需要一系列先决条件的政府形式做好准备的社会输出“民主”。（在小布什总统领导下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正是这种错误中最糟糕的例子之一。）在那些多数派的意志不能通过宪政的“制衡”加以限制的地方，还有那些把妥协的能力视为示弱而不视作美德的地方，自由选举也有可能为某种形式的独裁铺路：这是一个基本的受人类学式的现实主义影响的洞见，描述自由的“代议制政府”的经典作家如约翰·洛克、孟德斯鸠、《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们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无一不遵从其教导，而且所有西方宪法都会试图将这一认识纳入考量之内。

如果西方真有某一个成就够得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头，那么它一定是“不可剥夺的人权”——说它具有普世性并不意味着它是在描述现实状态，也不意味着它是历史的某个拥有内在发展逻辑的目标，它指的是一种权利，一种任何人都拥有的权利，与此人的肤色、性别、年龄、文化修养、国籍、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或性取向统统无关。在这方面，人们可以援引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当然，这并不是直接生效的国家法律。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联合国，都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普世人权。200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

大会首脑峰会通过关于“保护基本人权的责任”的决议，它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最基本的人权，甚至国家本身就是侵害者，那么国际社会有义务（在必要时采取军事手段）实施干预——但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种假设，只有当没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用否决权阻挠这样的决定时，它才有实施的可能。[6]

西方民主国家也可以并应该倡导自己的原则。它们也可以并应该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与在专制国家中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运动和个人团结在一起。它们越是认真地对待这些原则，它们越是严格地起诉自身内部侵犯人权的行为，它们就越是显得可以信赖。但有一件事它们是做不得的：不该许诺自己不能兑现的东西。如果西方国家经过事前的仔细斟酌后发现，对外干预有可能在世界上导致不应该发生或是无法接受的政治后果，那就不该干预；同时，西方国家也不应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它们有能力在自己的领土上让所有无法在本国享受人权的人获得人权。

给予受政治迫害者以庇护权是所有遵守通行国际法原则国家的一项义务。庇护权在通行国际法和“不得强人所难”的通行准则范围内有效。该准则的意思是：任何人所承担的义务，都不应超出其能力。一国接收并融合难民的能力，正是该国给予庇护权的限度，任何无视这一限度的国家必将动摇其国本。撇开“庇护权”不谈，可以说离开某个国家是一个人（在道德层面上）理应具有的权利。然而，一个人移居到某个特定国家的权利是不存在的。

西方民主国家最好的办法是尽力通过优先照顾贫困国家利益的外贸和经济发展政策来消除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移民的根源。如果没有有效的生育控制、系统的反腐斗争、贯彻“优良治理”的基本原则，来自外部的帮助就无法带来持续的改善。一项发展援助措施，如果不把辅助该国自立发展当作主要任务，就很难实现其目标。

对那些因内战和独裁而造成的难民而言，在其来源地帮助他们是最有效的。正如英国移民研究专家亚历山大·贝茨（Alexander Betts）和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所建议的，西方民主国家推动的特别经济区不仅有利于难民，也有利于接收难民的国家。而且这种方式还可以防止精英们向西方国家移民——这一危险会导致内战国家失去战后重建所急需的人力资源。

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建制派”民主政党在处理与大规模移民相关的难题上令自身失去了信用，民粹主义运动的勃兴正是该现象的后果。这其中既包括融合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移民时的失误，也包括有意或无意间给人造成的一种印象：似乎本国有接收移民的无限可能性。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不仅是保持诚实的需要，也是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这样做需要反对那种伦理思想上的利他主义，因为有这种思想的人会

拒绝质疑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而民粹主义分子则会坐收渔利。[7]

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隔阂，或者说孤立的行政权[8]的出现，是民粹主义者特别喜欢在宣传中加以利用的现象，要观察这幅景象，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去看看欧洲联盟的领导层。尽管也存在欧洲议会，但它并不是英国下议院、德国联邦议院或法国国民议会那样的民意代表机构，因为它并不是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选出来的。如果把民族国家所遵循的原则也应用于欧洲议会选举，那这个议会就根本无法工作了。那样的话，为了让所有成员国（哪怕是最小的那个）的人口都按比例获得代表，议员必须得有好几千人才行。

像马耳他、卢森堡或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在分配议员名额时有优待，而像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大一些的国家则要吃亏，这样的现状不是谁有意为之，而是不得不然。但这一方案的后果就是民主合法性上的瑕疵。此缺陷还造成全欧党派目前只能在形式上存在，而且一种全欧的公共空间也只能初现端倪。欧洲议会选举中众所周知的低投票率并非事出无因。

与欧洲议会相比，欧盟委员会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孤立的机构。它像一个国家的政府那样拥有很多职权，但却没有像欧盟各成员国的政府那样有相应的议会对其进行约束。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所引入的全欧各政党推举“领头候选人”的制度，虽然实现了委员会领导机构事实上的议会化——最成功的候选人，欧洲人民党的让-克劳德·容克被欧洲理事会定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但这场悄悄进行的宪法性变革并没有带来更多的透明度和民主，欧盟委员会变得更“政治化”了，却因此而忽视自身应充当欧盟条约守护人的本职任务。议会多数为保卫“他们的”委员会而与疑欧派或民粹主义的反对派做斗争，却无力摆脱那种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指责：议会对委员会的监督并不充分。人们比从前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布鲁塞尔是在跟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打交道。

与此同时，各成员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之间的隔阂也在增大，而且作为委员会“政治化”的直接后果，那些较大的成员国还会感觉它是在“篡夺权力”。各成员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声称自己是以更民主的方式获得授权的：它们必须（尽管程度不同）对一个经过自由选举的民意代表机构负责。因此，这些政府对欧洲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对于那些日益独立化的欧盟机构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要让各国议会更多地参与欧洲的决策或许耗费时日，但快速却缺乏足够民主程序支持的决策将进一步加剧合法性危机和信任危机，欧盟自1992年通过《马约》拥有了更多职权之后就一直处于这样的危机之中。

同时，这也是目前尚未克服的另一场欧洲危机——货币联盟的危机——的原因。现在，人们已经将在创建共同货币的同时没有实现财政和政治联盟

看作欧元设计上的致命失误。欧元区将拥有严格预算纪律的国家和那些习惯于在公共财政上采取相对宽松政策的国家聚合到了一起。正是由于这些历史传统上的差异，货币联盟并没有像原先所希望的那样使欧洲各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是重新激起了各种老旧的民族偏见和仇恨。[9]

喜欢存钱的国家与喜欢花钱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是德国、荷兰、芬兰和中东欧国家，另一方是包括法国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就法国而言，2017年5月的总统选举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当选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所制订的结构性改革计划旨在使法国再次具有竞争力，使其能“与德国比肩”，并最终解决公共债务过高的问题。如果马克龙真的开启了他所追求的革新进程，那么他将为法、德两国在财政和经济政策上达成一致做出决定性贡献，因为一直以来，这样的一致都难以实现。着眼于长远发展的严格财政纪律与重视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之间的结合并非不可能，但这需要所有的参与者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进行利益平衡的准备，这样才能产生实现它所需要的智慧。

马克龙所提出的“重建”欧元区和整个欧盟将是一个长期项目。如果英国仍然是欧盟的正式成员国，法国总统所期望的修改欧盟条约事实上就是不可能的，即便在英国完成脱欧之后，修约也要花费很大力气。不过，加深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其实也可以通过各国政府间的协议来加以规范。比如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所建议的欧洲货币基金或许就能够为欧元区的共同创新项目在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执行政府间协议，还可以让货币联盟内部的各国议会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制度化，若有可能甚至可以成立一个欧元区民意代表机构的联合委员会，因为它能够增加欧元区共同项目在民意方面的合法性。相比之下，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由欧洲议会来监督欧元区的方案与代议制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如果全部欧盟成员国的议员都参与货币联盟的财政政策的决策，那就意味着，来自财政状况优良的国家的议员们可能会被来自其他国家的议员们用多数票压倒，而即使后面这些议员并不都来自欧元区国家，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共同货币不会因此而稳定下来，反而会不断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要重组货币联盟需要所有欧元区国家的参与，就是说也包括债台高筑而且最迟于2018年初就要举行新一轮大选的意大利，在那儿，以曾经的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为核心并且在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之间来回摆动的“五星运动”的民调结果很好。尚难有答案的问题还包括：希腊能否长久地解决财政难题？所以说，德、法之间的协议必不可少，但也只不过是重建欧元区并使之恢复稳定的第一步。

改革欧盟跟改革货币联盟一样困难。欧盟27国尚未克服英国脱欧公投所带

来的困难，同时也没能解决欧盟机构的合法性危机和欧元区危机——这一危机始终都是欧盟27国共同的危机。此外还有另一场危机，它与前两个危机一样都称得上是一个考验：欧盟在处理与维克多·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治下的波兰的关系时所遭遇的危机，因为这两个成员国放弃了欧盟带有规范性的基本共识，并且一再动摇“分权原则”这一法治的核心要素。

本来，欧洲联盟可以因匈、波两国严重违反欧盟规范性原则，根据《里斯本条约》第7条的规定剥夺它们的投票权，但在这个具体案例中，执行这项制裁的一个前提条件让规定变成了一纸空文：执行这样的措施必须经过除直接被涉及的国家之外的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由于匈牙利已承诺支持波兰（反过来，波兰也会力挺匈牙利），现在剥夺投票权这件武器已经变成了一把没有锋刃的剑。其他的成员国并没有兴趣陷入与波兰和匈牙利的长期冲突之中，本应担负责任的欧盟委员会不愿将制裁波兰、匈牙利的提案交到欧洲理事会，因为它知道自己没有胜算同时也畏惧失败。结果与中东欧的这些“非自由的民主政体”的价值观冲突就此拖延下来，拖得时间越长，对欧洲联盟共同价值基础的伤害就越持久。

到目前为止，从外部看，27国的欧盟对英国脱欧公投危机应对得不错：它们依旧联合在一起；没有一个成员国起而效仿英国。甚至，共同体在某些领域联合得更加紧密了。欧盟准备在未来成立一个防务同盟，在维护共同边境（特别是地中海内的海上边境）的安全和反恐方面进行更加有效的协作。各成员国也达成一致，将继续发展内部共同市场。然而，欧盟的规范性身份认同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由于对一些成员国的变相专制制度的容忍，欧盟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的誓言已经越来越沦为一句起修辞作用的空洞套话——这简直就是在自欺欺人。

只有无条件认同《里斯本条约》里的基本价值的那些联盟成员国才能革新欧盟，这些基本价值包括尊重人的尊严，尊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捍卫包括少数族裔个人权利在内的人权。同时，也不应该有任何东西阻碍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地相互协调和更加紧密的合作。

这样一个服膺规范性价值的核心欧洲不应造成欧洲内部的一种新的“东、西分裂”。例如，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方向就与维克多·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治下的波兰有根本性的差异。在法治和民主方面，它们的立场比2004年以后加入欧盟的一些国家要更加接近欧洲联盟的诸创始国。欧洲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国家必须发起倡议，并使之能够引导“非自由的民主国家”中的反对派力量。这样一个非正式联盟传递给专制政策辩护者的声音一定要响亮——“非自由的民主”是个自相矛盾的东西。谁宣传这样的东西，谁就在破坏西方世界流传下来的规矩。

自由民主国家需要比以前更密切合作的领域，并不仅限于欧盟的框架之内。它们同样应该在北约这样做，在那儿有那么一个成员国远比匈牙利和波兰更加背弃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土耳其。鉴于西方民主国家已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防御状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全球范围内，与所有不光在言辞上，同时也在实践中按照人权、法治和代议制民主的规则行事的国家进行合作。在环保和贸易这类问题上，可以与非民主的大国设立一些实现专门目的的组织合作作为补充，但这决不能取代基于规范性价值所建立的同盟。

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之所以成为当务之急，同样也是因为美国这个跨大西洋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领导力量自身也正陷入一场严重的认同危机和系统性危机之中。在2017年1月20日之后，执掌美国的是一个不再珍视本国遗产中规范性价值的人。唐纳德·特朗普的那个“美国优先”的口号是对美国1776年赖以建国的那些普世价值的拒绝。美国的第45任总统尽管已经收回了他在选战期间对北约和欧盟的大部分批评，但即使在他的共和党同僚们看来他现在也是不可预测的人物，简直就是一个安全隐患。他被指责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有着可疑的关系，他漫不经心地处理机密情报和干预司法。随着一位特别调查员接受任命，对“特朗普团队”在2016年选举期间的“通俄”嫌疑进行调查，2017年5月中旬，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他与第二任期时的理查德·尼克松相提并论，并且开始讨论弹劾总统的可能性。美国已经出现了总统危机的苗头，其结果尚无法预见。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表明，美国民主应该能通过这场考验。司法机构和媒体依然保持独立；无论在美国的街头或在广场，还是在“社交媒体”上，那些批评总统的人并没有沉默，反而十分踊跃；在国会中阻击特朗普的不仅有作为反对党的民主党人，而且还有一些为祖国的未来忧心忡忡的共和党人。对美国的盟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与美国政府中那些可预测和可靠的成员建立联系——他们与总统本人完全不同。

假如欧洲联盟真的拥有在重要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能力，那么它就可以成为跨大西洋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矫正器。但欧盟远没有这样的本事。只要还有个别成员国觉得唐纳德·特朗普对政治秩序的看法比那些欧盟创始国看法更为亲切，还有个别成员国甚至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赞赏有加，那么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就只能局限于自身的边界之内。即便是在边界之内，一切也都还要看自由民主国家们是否能够合作。凡是在27国欧盟的框架内无法协调一致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都有赖于“意志联盟”来促成。应该说，一切都发端于德国与法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2017年5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之后，形成这一局面的希望比此前大了一些。

有一个欧盟成员国受英国脱欧的影响最大：德国。德国是欧洲大陆上与英国经济关系最紧密的国家，英国从德国进口的商品比从其他任何欧盟国家

进口的都多。反过来，德国也是从英国进口最多商品的欧盟国家。

在欧盟内部事关秩序原则的问题上，德国总是可以指望英国的支持——这两个国家都属于“自由派集团”。有了英国，再加上原先的“马克集团”（即引入欧元之前锚定德国马克的几个国家：荷兰、奥地利和芬兰），就能够在部长会议中形成一个可以阻止表决的少数派（45%的欧盟成员国，35%的欧盟人口）。英国离开欧盟之后，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相反，同样也能够形成可以阻止表决的少数派的“地中海集团”则壮大起来。今后，在“自由派”与“保护主义派”的争论之中，后者的形势会变得更为有利。英国脱欧之后，从表面上看，德国因其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分量在欧盟内领导地位会更加突出，但其实英国脱离欧盟一事最大的输家就是德国。[10]

27国欧盟对德国的期望很高。长久以来，不但其他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还有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很多经济学家都呼吁通过更多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提高工资以拉动内需来减少那“臭名昭著”的德国出口盈余。德国确实存在着阻碍投资的因素。当然，这主要不是由缺乏公共投资所致，更多的是相关部门的人员裁减所引起的规划能力不足的后果。

其实，假如不是因为从欧元的低汇率中获益的话，德国的顺差本不会这么高：这是欧洲央行推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德国方面至少在形式上批评了这样的做法。（仅做形式上的批评，是因为欧洲央行的这项政策给德国的财政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大大降低其债务利息，而这对德国的储户而言效果则恰恰相反。）国内外对德国落后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教育设施和数字通信设备，以及相对疲软的国内市场持续不断地批评终于起了作用：近期，公共投资、工资和个人消费已经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即有所上升），尽管进展缓慢。

除了要求修正德国经济的出口能力之外，还有人呼吁德国应对欧盟中那些能力不强的国家予以更多的支持：地中海沿岸国家（常以意大利为首，弗朗索瓦·奥朗德治下的法国也经常掺和）声称，鉴于德国从共同货币中获益最多，它应该对那些因为严格遵守《马约》预算政策而受损的国家表现得更加慷慨，这些国家已经进入了失业率（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率）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中。要赤字财政下的经济增长，而不要紧缩财政政策——“负债国”的这个要求使它们陷入了与“北方国家”（比如德国）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不过这正好反驳了“德国是从欧元中获益最多的国家”的说法。[11]

强调财政纪律的人常常忽视或不愿承认“纯粹的”紧缩政策所带来的顺周期效应，在这方面，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而且不光来自那里）的批评还是合理的。但是，一个不尊重既定条约而随意引入新规则的货币联盟是不会持久的。它可以使已经被证明过于僵化的规则变得更有弹性（欧盟已多次

这样做），但它不可以为了短期的经济目标而进行政治投机——从长期看，这样非但帮不了那些涉及的国家，反而会伤害它们，因为这会使它们的债务负担更重，无法解决这些国家经济困难的深层次问题。

当一个成员国总算开始着手进行旨在提高其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同时也开始重视其财政纪律时，货币联盟总是愿意展现出更多的弹性。谁愿意朝着这个建议的方向调整自己的政策，谁才有资格向伙伴国家索取帮助。真正的团结意味着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而且只有存在自助意愿的时候，这些呼唤团结的国家的政府才能让本国的议会和民众在政治上理解：援助在具体的情况下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必需的。

近年来，对德国的批评不仅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关，德国政府被扣上霸权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帽子与其2015年以来处置难民危机的做法有很大关系。尽管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外国政治家称赞德国总理同意成千上万的移民入境德国的决定，并且向众多德国人的人道主义热情致敬，但包括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另一些政治家也在谈论默克尔危险的单干行为和德国在道德上的自负。

德国的单干行为，或更确切地说，是德国和奥地利共同进行的非多边行为，指的是两国在2015年9月4日晚决定批准被匈牙利截住的移民进入奥地利，并由此入境德国。这样一个决定在做出前没有与欧洲联盟或其他邻国商量，而且对于安格拉·默克尔与她的奥地利同行维尔纳·法伊曼在电话中达成一致的方案，柏林总理府显然没有考虑对其后果战略性的、长远的效应。

这个仓促决定惠及的那些想要离开匈牙利却离不开的人的救援行动在人道方面多么有道理，开放德国边境数月之久的做法就多么成问题。这样做的影响远远超出德国的预期。中东欧的邻国与德国不同，那里缺乏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生活的体验，因此产生了对德国这种自行其是态度的反感，并且从此下定决心不参与由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推动的、解决难民危机的全欧共同方案。在英国，脱欧的鼓吹者从普遍的恐惧心理中得利，因为德国的态度让一些人觉得移民潮将很快到达英国。在德国本国，民族民粹主义的“选择党”势力大增。[12]

德国在邻国面前以其道德水平而狂傲自负——这样的指责不仅适用于联邦政府和执政阵营，甚至适用于以绿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和包括公共媒体在内的大部分德国媒体。除了对移民特别高涨的援助热情所体现出的“欢迎文化”之外，在2015年9月4日之后的几周内德国还经历了不理智的自我吹捧，其中还夹杂着对邻国所谓硬心肠行为居高临下的，而且常常是鄙视性的评价。在为德国的难民政策辩护的声音中有时还能听见这样的看法：德国那罪恶深重的历史终于有了一些有益的后果，它现在已经可以当其他欧

洲国家的榜样了。

把德国当作欧洲的道德领袖，觉得本国有一种不便说出口的充当道德权威的权利：这就是这种新的、呈现出模糊的“左派”面貌的布道意识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影响还不局限于德国。这样做造成的后果包括德国因难民问题而受到孤立，以及人们会怀疑德国真的有能力履行它时常承诺的对欧洲的责任。因此，德国从2015年所经历的事情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任何道德上的傲慢。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在人道主义领域比其他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做得更多。鉴于这个国家本来就需要移民，它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劳动力市场的需要，通过简化现代移民法来引入合法移民。但德国决不可自视高于其他国家，这个来自德国历史的教训从来都没有过时。[13]

难民危机留下的另一个教训是，德国应该停止在涉及整个欧洲的问题上单干。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之后，在欧洲政治中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了。与法国一道，德国可以推进货币联盟和欧洲联盟的改革，哪怕有个别成员国并不准备在一开始就追随“两巨头”。与法国联合在一起，德国可以在英国脱欧后努力使欧盟与英国尽可能保持密切的关系。有了法国这个同盟，德国最终能为北约安然通过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考验做出贡献，这考验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

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可以独善其身。如果它们将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不但能改善旧大陆上的这些国家在面对其他奉行专制秩序的国际行动方时的政治和经济态势，而且还能增强欧洲内部坚持自由的、多元的、非暴力的和尊重人权及公民权的民主制度时的自信力——使其能够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时捍卫民主这样一种政府体制，因为它是大西洋两岸两次大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最有价值的遗产。如今，分布于全球的西方世界除了欧洲的一大部分之外，还有包括位于北美洲、澳洲的带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烙印的民主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这个西方世界早已度过了在全球影响力上的巅峰时刻。现在，它还能不能在全球辐射自己的规范性价值体系，完全取决于西方世界自己。

---

[1] Jaques Rupnik, Illiberale Demokratie. Das europäische Dilemma und das Ende des liberalen Zyklus, in: *Lettre International,* Herbst 2016, S. 11-15 (14).

[2] Philip Mirowski and Dieter Plehwe (eds.), *The Road from Mont Pèlerin. The Making of the Neoliberal Tought Collective,* Cambridge 2009; Anselm Doering Manteuffel/Lutz Raphael, Nach dem Boom. Perspektiven auf die Zeitgeschichte seit 1970, Göttingen 20102; Pierre Rosanvallon, *Die Gesellschaft der Gleichen*(frz.

Orig.: Paris 2011), Hamburg 2011, S. 247 ff.; Hartmut Kaelble, Mehr*Reichtum, mehr Armut. Soziale Ungleichheit in Europa vom 20.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Frankfurt* 2017, S. 163 ff.

[3] Dani Rodrik, *Das Globalisierungsparadox. Die Demokratie und die Zukunft der Weltwirtschaft* (amerikan. Orig.: Princeton 2011), München 2011, S. 9 ff. (17 f.).

[4] Daniel Katz, The Psychologie of Nationalism, in: J. P. Guilford (ed.), *Field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1940›*, 1948², S. 163-181 (165).

[5]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Die Entstehung des Staates als Vorgang der Säkularisation, in: *Staat, Gesellschaft, Freiheit,* Berlin 1976, S. 42-64 (60).

[6]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63, S. 187 ff.

[7] Paul Collier, *Exodus. Warum wir Einwanderung neu regeln sollten* (engl. Orig.:London 2013), München 2014; Alexander Betts/Paul Collier, Gestrandet.*Warum unsere Flüchtlingspolitik allen schadet-und was jetzt zu tun ist* (engl.Orig.: London 2017), München 2017; Ruud Koopmans, *Assimilation oder Multikulturalismus? Bedingungen gelungener Integration,* Münster 2017; Stefan Luft, Die Flüchtlingskrise. Ursachen, Konfl ikte, Folgen, München 2016; Julian Nida-Rümelin, *Über Grenzen denken. Eine Ethik der Migration,* Hamburg 2017;Udo Di Fabio, *Schwankender Westen. Wie sich ein Gesellschaftsmodell neu* erfinden muss München 2015.

[8] “孤立的行政权”（verselbständigte Exekutivgewalt）——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创造的概念，用以描述一种与授权者相分离的行政权。详见本书原文第69页（即边码），下同。

[9] Markus Brunnenmaier, Harold James, Pierre Landau, *The Euro and the Battle of Ideas,* Princeton 2016, S. 40 ff.; Martin Winter, Ende einer Illusion. Europa*zwischen Anspruch, Wunsch und Wirklichkeit,* München 2016, S. 45 ff.; Tomas Schmid, Europa ist tot, es lebe Europa! Eine Weltmacht muss sich neu erfinden, München 2016, S. 163 ff.

[10] Hans-Werner Sinn, *Der Schwarze Juni. Brexit, Flüchtlingswelle, Euro-Desaster Wie die Neugründung Europas gelingt,* Freiburg 2016.

[11] Johannes Becker/Clemens Fuest, *Der Odysseuskomplex. Ein*

pragmatischer Vorschlag zur Lösung der Eurokrise, München 2017, S. 279 ff.

[12] Robin Alexander, *Die Getriebenen. Merkel und die Flüchtlingspolitik: Report aus dem Inneren der Macht,* München 2017; Betts/Collier, Gestrandet（同本章注释7）,S. 93 ff.; Hans-Peter Schwarz, Die neue Völkerwanderung nach Europa. Über den Verlust politischer Kontrolle und moralischer Gewissheiten, München 2017。亦见本书原文第116页前后。

[13]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as Undenkbare denk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8. 9. 2015; ders., Wer hat die Deutschen zu Richtern der Nationen bestell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2. 12. 2015; ders., Es gibt kein deutsches Moralmonopol, in: *Die Zeit,* Nr. 18, 21. 4. 2016.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一段续记

前文已经讲到了2017年5月。最后的两个时事节点是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满百日和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决选。在那之后，历史一直在大西洋两岸继续前进。

从5月19日到27日，美国第45任总统进行了他的首次海外之旅。他出访的首站是沙特阿拉伯，在那儿等待他签字的是一笔1000亿美元的“军火生意”，而他也在沙特与伊朗的对峙中毫无保留地站在了瓦哈比派的王国[1]一边。他出访的第二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但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他什么都没说。第三站他前往罗马拜会了教皇方济各，可以看出二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分歧不小。在第四站布鲁塞尔，特朗普利用与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机会猛烈攻击德国，指责德国通过其对外出口（特别是汽车出口）伤害了美国经济。在北约的新总部，他攻击了28个成员国中的23个盟友，理由是这些盟友在履行防务责任方面不够上心，或者说是在靠着美国纳税人的钱生活，而且欠美国数十亿美元。而对于涉及共同防御承诺的《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2]，他在讲话中却只字不提：全世界还未曾见过大西洋同盟出现这样大的裂痕。

特朗普此行的高潮是5月26日和27日在西西里岛陶尔米纳（Taormina）举行的7个民主工业国的首脑峰会——G7峰会。在此地，特朗普又一次选择对抗。他阻挠了G7峰会关于执行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的决议，该决议旨在加强为避免全球变暖而减排温室气体的努力。在需要美国为来自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非洲饥荒地区）的移民压力做出建设性贡献时，他拒绝让美国为此承担义务，在这一点上他惹恼了其他与会国：加拿大、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尤其是作为东道国的意大利。特朗普基于其对“不公平的贸易实践”的看法，对其他六国所希望的开放市场并没有多少认同，因而陶尔米纳会议未能明确地否定贸易保护主义。7国达成的共识是继续执行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开始的对俄制裁。另一个能广泛达成一致的领域是，在与恐怖主义的战斗中加强合作——在5月22日“伊斯兰国”在曼彻斯特的一个流行音乐会上以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22人死亡之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提出将这个议题加入会议议程。

借由布鲁塞尔和陶尔米纳的峰会，“美国优先”终于渗入了跨大西洋政治之中。这在欧洲引起的反响几乎全是负面的。参加基民盟大会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于5月25日在慕尼黑特伍德林区（München-Trudering）的一个大型啤酒帐篷内愤然宣布：我们可以依靠别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欧洲一定要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世界舆论认为，默克尔的这番表态

是一个明证，看来特朗普的欧洲之旅的确把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低谷。[3]

如果特朗普是想用出访来摆脱纠缠不休的总统危机的话，那看来是想错了：为弄清特朗普团队“通俄”一事而进行的调查丝毫没有停滞，在这个过程中，总统的女婿兼最重要的顾问贾里德·库什纳逐渐成为焦点。5月底，人们知道在2016年11月的总统选举之后，库什纳曾在与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进行秘密会谈中试图建立特朗普与普京之间的秘密联络渠道。

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人正在越来越多地讨论特朗普集团与俄罗斯黑手党代理人之间长期存在的商业关系，以及20世纪90年代身份不明的俄罗斯投资客让特朗普免于破产的神秘救助。当然，这样的“联系”与俄罗斯为特朗普而干涉美国总统大选一事之间的关系还不清楚。在总统出国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媒体报道了曾于5月9日因调查“通俄门”而被特朗普解职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准备就同一话题在国会为此专设的委员会做证的消息。因此，可以预见还有更多的事情会被揭露出来。[4]

2017年6月1日，即特朗普从欧洲回来5天之后，他在白宫的玫瑰园一群特意挑选过的听众面前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必须避免该条约的结果伤害到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工人；这样的条约只会让中国、印度等国获得崛起的好处，而对美国而言只有诸如失去就业机会、工资下降、工厂关停和产量持续下降等害处。关于该协议对美国的伤害，特朗普还把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会（Grünen Klimafonds der Vereinten Nationen）给予那些受全球变暖伤害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的援助也算了进来，他说相应的花销将令美国损失大量财富。或许令人欣慰的是，这位总统也谈到了要拿出一份新的气候保护协定，一份“公平的交易”。不过，特朗普在他的演讲中对“气候变化”只字未提。

总统的这番退约演讲，明显带有其首席策略顾问、信奉“美国优先”的斯蒂芬·班农的痕迹，此人当天就显眼地坐在听众的第一排。相反，那些曾告诫唐纳德·特朗普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一事上要谨慎的顾问则没有到场，其中包括首席经济顾问格雷·科恩、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以及那些美国宪法中从未见过的头衔的拥有者：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他的妻子、总统女儿伊万卡·特朗普。一些美国大型工业企业明确警告过唐纳德·特朗普，不要在气候政策问题上与国际社会决裂。欧洲联盟的结论是，到2020年，美国无论如何都将受到《巴黎气候协定》中国际法义务的约束。然而这都没有什么用。特朗普所关心的是，让他的核心选民们看到，他履行其核心竞选承诺和在未来克服一切阻力为美国利益争取优先地位的决心。[5]

在对《巴黎气候协定》说“不”这件事上，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少。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华盛顿州在内的许多联邦州和包括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和老工业城市匹兹堡在内的80多个地区，都很快宣布继续坚守2015年底达成的这项国际协议中的环保目标。多数大企业认为特朗普的举动是个致命的错误。民调的结果则更一目了然：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拒绝退出《巴黎气候协定》。[6]

在美国之外，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愤怒。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当天就做出回应，明确拒绝重新谈判气候变化协定。次日，欧盟也给出了相同的回答。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全球竞争对手的中国和俄罗斯立即保证它们与美国不同，会继续留在自己在巴黎签署的协定之内。对这两个国家而言，特朗普因其环保政策而在西方世界打进的这枚楔子是极其有用的。作为欧盟及欧洲各国首屈一指的化石能源供应方，俄罗斯欢迎所有能削弱北约团结的事情；2017年正在力推其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中国也从中看到了机会，此事能使其显示出自己不仅在自由贸易方面是欧盟的伙伴，而且在环保领域也是如此。[7]特朗普的玫瑰园演讲让美国的自我孤立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点：如果要为美国告别“跨大西洋关系的世纪”找出一个标志性的日期，那就是2017年6月1日。[8]

在欧洲，2017年6月8日是早已备受关注的日子：在这一天将举行由特雷莎·梅政府决定进行的下议院选举。选举研究者们早就预言，这将是一次执政的保守党大胜而工党惨败的选举。然而，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周里，保守党的领先优势变得越来越小。

大多数观察家都把这个惊人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保守党竞选纲领中的一点：老年人接受护理服务的费用问题。一方面，原本财产在23 250英镑以下的老年公民能够享受护理服务费用豁免，现在这个标准被提升到了10万英镑；但另一方面，预计要将私人住宅或私人房产纳入财产计算之中，这将导致遗嘱受益人有（部分地）丧失财产的危险——这项规定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保守党下令将其撤回。然而，这对特雷莎·梅精心打造的社会“形象”而言已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现任首相的民调结果不利的另一个因素是，她坚决拒绝与其他党派的候选人（特别是工党的杰里米·科尔宾）进行电视辩论。6月3日，3名携带刀具的恐怖主义分子借助一辆送货车在伦敦发起恐袭，共造成8人死亡、48人受伤，其中有些人伤势严重。这是自3月22日伦敦恐袭和5月22日曼彻斯特恐袭之后，英国在不到3个月内发生的第3起恐怖袭击事件。科尔宾指责特雷莎·梅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大幅裁减警务人员——6年间裁减了1.9万人，他甚至在6月3日的恐袭发生之后要求首相辞职。

工党领袖科尔宾对国内安全问题的激烈批评，是否能让该党在选举前的最

后几天里利用这个保守党的传统优势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反超，看来还很成问题。保守党人对工党将伦敦恐袭滥用于党派倾轧非常生气，并且还反唇相讥：正是科尔宾拒绝了保守党提出的所有反恐法案。此外，他们还指责这位工党领袖从来都未能就他慷慨的社会福利承诺（包括取消学费）如何获得资助的问题提供任何具体答案。在竞选的最后阶段，保守党又把英国脱欧问题摆到了中心位置，指出这是一件只有保守党才能办成的事。

6月8日的选举是特雷莎·梅完全按照自己的主张举行的，可是其结果却是她政治上的一次惨败。她不但没能扩大绝对多数，反而失去了它。尽管保守党仍然是第一大党，但其议员数量从330席下降到了317席，因此仍然低于保守党单独组建政府所需要的326席这个神奇数字。为了在"悬置议会"中获取超过必要席位的支持，首相不得不努力与民主联盟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结成联盟，或者说达成彼此能相容的协议，这是一个属于北爱尔兰新教徒的极端保守的党，它拿下了10个议员席位并且很快就宣布愿意与保守党进行谈判。

这次选举相对意义上的赢家是工党，它拿下了262个席位，比之前增加了32席（按百分比计算，它获得了42.4%的席位，比保守党落后2.4个百分点）。工党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因其立场比较左倾而在党内颇具争议的现任党主席杰里米·科尔宾，他与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那位民主党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很像，后者在争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过程中赢得了大部分青年学生的支持。在年轻的工党选民中，还有许多人在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在一年前的"脱欧公投"中加入"留欧派"阵营。与工党不同的是，全英国的活跃政党中唯一一个坚定亲欧的党——自由民主党的得票情况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所获议席从9个上升到了12个，但所获选票还略微下降了一点儿（约0.5%）。

选举的输家还有妮古拉·斯特金的苏格兰民族党，失去了21个议员席位。英国独立党失去了在下议院中仅有的一个席位，得票率从近11%下降到可怜巴巴的1.85%。该党唯一的"大事"已经随着英国脱欧公投而去；这个既缺乏实际"要务"又陷入分裂的党，几乎没有存活下去的可能。然而，特雷莎·梅并不可能继续违背自己的竞选口号而提出原先英国独立党的支持者所主张的"硬脱欧"，否则她必将惹恼本党的新搭档：民主联盟党早就公开支持"软脱欧"，因为其特别想让阿尔斯特与作为欧盟成员国的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境交通能够享受一种尽可能宽松的管理。

正如戴维·卡梅伦决定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全民公决一样，特雷莎·梅决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也是一着险棋，而且两人都赌输了。即将于2017年6月19日开始的与欧洲联盟的脱欧谈判中，特雷莎·梅的处境不是更有利了，而是更不利了。而且，对她的首相位置而言也是如此。内阁内外，她的党内反对者数量可观。她的位置从未像6月8日以后那样不稳。在伦敦，有人开

始预测唐宁街将在秋季易主，并且很快会举行新的选举。

保守党与来自阿尔斯特的民主联盟党之间的谈判比预想的要艰难得多。当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6月21日在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成员们面前发表由首相起草的“女王的演讲”——一篇简短的政府声明时，此事尚未有结果。次日，特雷莎·梅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首脑峰会上承诺：所有在某个待定的时间点后在英国生活5年以上的欧盟公民，都将继续享有由英国法院做出保证的居住权。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立即表示，这一政策距离欧盟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

6月26日，保守党与民主联盟党的谈判终于结束了。其成果是一份相互容忍的协定。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党承诺，支持梅政府在英国脱欧、国家预算、财政政策方面的立法活动，并且会阻止不信任案通过，其他方面的问题会根据具体情况与保守党协商。民主联盟党所得到的回报是，给阿尔斯特带来了10亿英镑的新增财政资助。

不过这份协议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因为贝尔法斯特（Belfast）[9]的那个由新教徒的党和天主教徒的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已经于2017年3月底垮台了。如果对立的双方不能就一个联合政府达成一致并拟出一个如1998年4月商定的《耶稣受难日协定》（Karfreitagsabkommen）[10]那样的文件，那就会像2002年至2007年那样开启“直接统治”的时代——行政权力被交还给英国内阁，而内阁将负责保证自身政策在宗教上的中立性。

在6月21日批准政府计划时，保守党的少数派政府在得到了民主联盟党的10票支持之后，于6月29日在下议院形成了一个323对309的多数。然而，鉴于议会难分伯仲的力量对比，只有极少观察家预言现任内阁会存在很长时间：特雷莎·梅已被人看作临时首相了。[11]2017年6月11日，即英国议会选举后的第三天，法国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无可置疑的赢家是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2016年4月才刚刚创立的党——“共和前进党”（La République en marche，LREM），该党与其盟友“民主运动”（MoDem）一起拿下了32.3%的选票。远远跟在它们后面的是保守派的共和党（21.6%），然后是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13.2%）、与共产党人结盟的梅朗雄的“不屈的法兰西”（11.0%）和社会党（9.5%）。这次选举48.7%的投票率创下了历史新低。观察家们把这归咎于选举日那炙热的阳光和连续举行两轮总统选举所带来的疲惫，但也怀疑有许多法国人在通过拒绝参与选举来表达他们对现有政策、新旧总统的不满。不管是什么原因，事实是有选举权的法国人投票支持马克龙阵营的人连六分之一都不到。

议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看上去像一场因选票进行的革命：法兰西决然抛弃第五共和国的政党结构，跟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前5年干了同样的事

情。戴高乐主义留下的遗产——共和党，尽管尼古拉斯·萨科齐的政绩令人失望，尽管该党的第一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因自身错误而受到指责，它还是第二大党，也还有再度革新的可能。相比之下，社会党的处境令人绝望。该党所受到的惩罚来自奥朗德时代党内的总矛盾：有改革倾向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自由派与恪守教条的社会党人之间的矛盾；此外，还要受到梅朗雄的极左党派的瓦解。国民阵线远远落后于其在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成绩，这是因为其领导人马琳·勒庞在与马克龙的电视辩论中说得实在太露骨，而且她对欧元的拒绝也难以得到大多数法国人的认同。

共和前进党的候选人有一大半都没有参加过议会，这些新人只是勉强聚集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理念之下。他们以后能否像预期中那样变成一个新的、带有社会自由派特征的多数派，仍有待观察。无论如何，融合都将是艰难的，在此过程中，这个“社会自由派特征”还是来自之前那些政党定下的基调。

在第一轮投票中，只有4个选区的候选人拿下了绝对多数，并且所获选票超过了有选举权人数的25%。在第二轮投票中，拿到相对多数票就足以获胜，这通常意味着排名最靠前的两位候选人进行一次决选。6月11日，只有一个选区出现了两个以上的党派获得12.5%选票的情况，因此根据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会有不止两名候选人参选。那些在选举中失败的政党，尤其是共和党，都有意图在决选中成为总统所属党派的强大对手。但从对选举的预测结果看，这一想法实现的希望不大。人们普遍预计，在总共577个议员席位中，共和前进党能拿下四百多席。

不过，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倒并没有出现如此一边倒的结果。共和前进党独自拿下了306席，加上“民主运动”则一共有350席。不过，这已经让总统的阵营不但拥有十分坚实的绝对多数，而且还拥有了足以修宪的五分之三多数（尽管只是刚刚过线）。其他各党所取得的席位并不像之前所预计的那样少：共和党及其盟友一共获得137席，在上一届议会中还拥有280名议员的第一大党社会党这次的成绩是45席，梅朗雄的左翼政党27席，国民阵线8席。极右翼所赢下的那些选区也正好是之前支持马琳·勒庞的选区。然而，国民阵线还是远远没能达到组建议会党团所需的15席的门槛。6月18日选举的投票率比一周前更低，仅有42.64%。

马克龙总统早在国民议会选举之前就宣布，他就职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就是改革劳动力市场法规，特别是要放松严苛的解雇条件，并且会先与工会进行对话。有共产主义背景的工会“劳动者大联盟”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会“工人力量”对此的回应是：要创造一个“火热的秋天”。

事实上，那些选举的获胜者必须从一开始就预计到，由于议会中的多数态势十分稳固，抗议活动很快会从国民议会转移到街头。同样可以预见的

是，总统及其阵营的反对者会拿极低的投票率来说事：指责政府所有不受欢迎的改革步骤都缺乏民主合法性——尽管政府的党在6月18日拿到了41.7%的选票，但这等于说在有投票权的法国人中支持它的人连五分之一都不到。有一个常常听到的说法并不过时：法国人虽然擅长搞革命，但却不善于进行改革。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之后，向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化方向革新法国社会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紧接着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后的是第一次政府危机。法国司法部门已经开始调查欧洲议会中“民主运动”的议员，因为他们涉嫌将欧盟资金用于法国国内的党务活动，此后该党的三位部长辞职，其中包括党主席、司法部长弗朗索瓦·贝鲁和国防部长西尔维·古拉尔（Sylvie Goulard）。他们的继任者被认为政治色彩并不明显。最终由前共和党人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牵头组成的内阁中含有7位无党派专业人士、4位来自社会党的部长、3位来自社会自由派政党，还有3位来自共和党。这届菲利普政府中的男女数量正好相等：在30位部长和国务秘书中各占15名。

6月22日和23日，马克龙总统首次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大部分时间英国都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由于前一天包括慕尼黑的《南德意志报》在内的一些欧洲报刊发表了一篇对马克龙的访谈，于是他成了全场关注的焦点。他在那次访谈中猛烈批评中东欧的“非自由的民主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他说，既从欧盟拿钱，又不尊重其价值观，这很荒唐；欧洲可不是一个超市，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马克龙与维谢格拉德集团（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并不能化解双方的根本性分歧。

不过，27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防务政策和确保外部边界安全的领域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同意设立一个用于资助军事科研和军备合作的欧洲防务基金。此次峰会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安格拉·默克尔为代表的法、德之间的紧密合作。观察家们认为，在法国的政府更迭之后，欧洲联盟又渐渐有了新的自信。[12]

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进行接触的事件在6月7日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天，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了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的一份书面声明，内容是总统多次试图说服科米，让他停止在“通俄”一事上继续对曾短期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将军进行调查。次日，许多电视频道实况转播了科米参加参议院的听证会：从这位联邦调查局前局长宣誓开始，一共进行了一个小时。在那之后，舆论界展开了自己的非官方调查。

根据科米的陈述，特朗普在多次谈话之中，特别是在2017年1月27日的白

宫晚宴上要求他停止对弗林的调查。之后总统还非常想确保对“通俄”事件的调查不会牵涉他本人身上（科米说他可以保证）。特朗普称赞了他的工作，并说还想让他继续留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不过同时也表达了想让科米向他特朗普“效忠”的愿望。科米对此的理解是，总统想以联邦调查局局长不换人为条件让他对其个人“效忠”——科米拒绝了这个交易，接着他就在5月9日被突然解职了。在这之后，特朗普在公开表态时所说的科米不称职且得不到联邦警察的信任等，据科米看来都是借口，或者说都是谎言。正是这些指责让科米在参议院的公开听证会上多次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个人。

法律上在讨论这一事件时的关键问题是：特朗普在与科米的谈话中是否在故意尝试妨碍司法。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就牵涉了一项足以激起弹劾的罪行。有好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强烈否认存在这样的主观意图。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保罗·瑞恩的说法听上去有些怪异，他说特朗普初来乍到，对当总统的一些陈规惯例尚未充分了解。特朗普本人先让他的律师反驳了科米的说法，为的是在不久之后将科米斥责为撒谎的一方。

在6月9日与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首次明确承认《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义务，并再次明确否认他曾敦促科米结束对弗林的调查。在回答一名记者关于他是否愿意用宣誓做证的方式来强调他对“俄罗斯事件”的陈述时，他回答他“百分之百”愿意这么干：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陈述，如果负责调查该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罗伯特·穆勒或是参议院回头抓住这句话，那它就有可能是总统的一个隐患。[13]

5天后的6月14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负责“通俄事件”的特别调查员正在调查总统本人，因为其涉嫌妨碍司法。与此同时，来自美国首都的传言称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雇穆勒［5月17日任命他的并不是司法部长塞申斯，而是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因为塞申斯一开始就宣布要在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联系一事的调查中避嫌］。人们立即将此事与“水门事件”相提并论：1973年10月20日，尼克松总统解除了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的职务，继而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及副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辞职以示抗议——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作“星期六大屠杀”。10个月后的1974年8月9日，尼克松为避免遭受弹劾而主动辞职。

特朗普再次愤怒地驳斥了对他的一切指责，并且再次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猎巫活动。然而他并没有开除穆勒，可能是尼克松的教训在阻止他走出这一步。于是，“通俄事件”继续如他曾对科米提过的那样，成了他任职总统期间的一块不散的阴云。司法部长塞申斯在6月14日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宣誓做证时，拒绝回答任何涉及他与特朗普之间对话内容

的问题。就任总统5个月之后，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前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晦暗不明。随着针对他个人的刑事调查的展开，美国的总统危机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不过，特朗普的那些自由派的反对者并没有理由太过乐观。只要共和党人还站在总统一边，弹劾程序就遥遥无期。6月26日还发生了一件令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大为欢欣鼓舞的事情，尽管这只是一个阶段性胜利：最高法院裁定，曾被多名联邦法官宣布违宪的修订版“穆斯林禁令”的部分内容，可以在满足某些限制性条件的情况下暂时生效：对6个主要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而言，除非他们已经拿到签证，或是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在美国有亲属或工作关系，否则从6月29日起将在3个月的时间内被禁止入境美国。

人们并不清楚2017年秋天将要做出的终审判决是否能符合白宫的期望。不过，特朗普的反对者们（比如民主党人）这时已经会用一个他们中许多人都曾经忘却的美德来武装自己：他们必须学会在行事时有战略上的耐心。[14]

2017年7月7日至8日，世界主要工业国和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为参加G20会议而齐聚汉堡，唐纳德·特朗普名义上只是与会的众多领导人之一，但事实上他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和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一起构成了三个众人瞩目的最具争议的人物。在这位美国总统抵达德国的汉萨同盟城市（即汉堡）之前，他先于7月6日作为“三海倡议”的荣誉嘉宾访问了华沙。“三海倡议”是由波兰总统安德烈·杜达召集的会议，这个名称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个民族主义计划相关的会议，该会议共有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12个中东欧、东南欧的欧盟国家参加。

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首都相比，特朗普期待自己能在华沙受到热情友好的招待，因为他并不想去指责为走极右路线而破坏法治的波兰领导层。此外，他完全满足了东道主的期望：在1944年华沙起义牺牲烈士纪念碑前的公开演讲中，他首次发誓要捍卫西方社会的团结及其不可动摇的价值观；他赞扬了波兰光荣的历史，并向所有北约成员国保证了美国不可动摇的团结和支持，而且还再次呼吁盟友在防务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同时还强烈谴责了俄罗斯“破坏稳定”（他的原话）的政策。

特朗普在全波兰千万兴奋的法公党支持者的欢呼声中所描绘的“西方”的样子，完全符合波兰领导人的胃口。总统援引了上帝和民族认同、个人自由和家庭等价值元素。他虽然也提到了法治，但没有讲分权制度和司法独立。在这一层意义上，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及其追随者也愿意醉心于特朗普提出的“强大的欧洲”。这显然不是在说欧盟的那个自由的欧洲，而是一

个愿意接纳中东欧的那些“非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欧洲。[15]

7月7日在汉堡，特朗普终于第一次遇见了他前一天在华沙毫不含糊地批评过的那个人：普京。根据双方事后的说法，会面的气氛是富于建设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友好的。特朗普特别关心的是，普京以后应约束与黑客攻击相关的行动。他向对方提出建议，共同成立一支美、俄“网络安全部队”。当这个消息不久后传到华盛顿，立刻在国会引发了一场超越两党的愤怒浪潮。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将这一想法比作跟叙利亚的阿萨德共建一支“化学武器部队”。对总统而言特别倒霉的是，《纽约时报》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揭露了一件发生在2016年6月9日的事：小特朗普、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他在争取共和党候选人提名期间的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在这一天与据说跟克里姆林宫有密切联系的俄罗斯律师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见了面，美方的这几位谈话者所期望得到的是能够让希拉里·克林顿惹上麻烦的材料。在如此局面下特朗普别无他法，只得又迂回着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建议。

被国际舆论视为特朗普与普京之间谈话的积极成果的，是一项由国务卿蒂勒森和拉夫罗夫提出的在叙利亚南部实现停火的协议，这份于7月9日生效的协议包括为平民建立一条“人道主义走廊”，并得到美国、俄罗斯和约旦的保证。事实上，这项协议先前就已经在约旦首都安曼达成，只是到了汉堡才以两位总统的名义正式公布于众。

在特朗普与普京的谈话中，发生在乌克兰的混合型战争究竟占什么分量仍不清楚。不过，观察家们从美国前北约大使库尔特·福尔克尔（Kurt Volker）任命基辅特使一事中可以看出，仅在“诺曼底组合”（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部来处理这场冲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默克尔和马克龙得以在汉堡的三人聚会上劝说普京，使其同意与他们以及可以通过电话联络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Poroschenko）一起，尽快就进一步落实2015年2月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进行磋商。那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完全可以想象，接下来华盛顿、巴黎和柏林的政府都会争相与他联络。

不过，更加吸引媒体广泛关注的，还不是峰会上的正式谈判和两方或三方国家首脑的会晤，而是犹如内战一般的街头斗争场面：有数千使用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来自全欧的左翼极端分子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汉堡内城的部分地段一时间成了无法无天的场所；在珊泽区（Schanzenviertel），无人干涉的纵火和劫掠持续了数小时之久；有数百名警察和数目不详的示威者受伤。这使那些用非暴力方式批判全球化的抗议者的声音完全被掩盖了，而且德国和其他国家都开始讨论，是不是以后就不要在西方的大城市举办G20峰会这样重大的国际活动。

会议本身倒并没有受到血腥暴乱的干扰。在形成共同的闭幕宣言方面，德

方运作的空间很大，因为它一直能享受到意见一致的欧盟的支持。在东道主安格拉·默克尔的指示下，德方决定后退一步，让这份文件在气候变化这一特别有争议的问题上不仅写下各方的共识，同时也记下各方的分歧。当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与会国都声明《巴黎气候协定》不可逆转时，美国固执地坚持它可以在比现在更清洁、更高效的情况下使用化石能源的权利，并且要通过技术出口来帮助那些同样愿意这样做的国家。但其他19个国家全都不为所动，坚持肯定《巴黎气候协定》。埃尔多安总统于峰会闭幕数小时之后在汉堡宣布土耳其不主张修改气候议定书。因为它担心自己不能再如愿以偿地被划为新兴国家，而被升级为工业国——被算成要“出钱”的国家。

另一个有重大争议的问题——贸易政策，在这方面各方费了半天劲也只达成了形式上的妥协。这20个与会国都认可自由贸易，并承诺与“包括一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斗争。可是美国坚持认为，要在声明中明确承认“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的地位”。所有与会国自然都清楚，美国政府这样做是在为其（比如针对钢铁行业的）惩罚性关税确立依据。

相比之下，参与谈判的各方在以下各方面达成一致就容易多了：金融市场监管，打击恐怖主义，走私和贩卖人口，建立与非洲的伙伴关系，改善妇女参与经济生活的条件。一项由世界银行创建的，旨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女企业家进行资助的基金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承诺。不过与会国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严肃地对待这些承诺，肯定还有待观察。

考虑到此次峰会所面临的挑战之大，它所实现的成果虽不多，却也还是远远超乎悲观主义者的预期。之所以能取得这些积极成果，主要靠的是西方民主世界中自由派的三大主力共同努力——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汉堡，这三个人组成的集团构成了进步势力的核心。如果说2017年G20峰会上有什么新东西超出了那份闭幕宣言四平八稳的措辞，那应该就是这个新的跨大西洋核心小组的互相合作给人们带来的希望。

汉堡的会晤，决不意味着欧洲和世界已经走出了那段数年来被危机所震撼的过渡时代。俄罗斯于2014年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吞并克里米亚，宣告持续了25年的后冷战时代结束了。2015年，欧洲（特别是德国）经历了移民危机的一个暂时性的高潮。2016年发生的事还有：英国的脱欧公投、土耳其的政变和反向政变、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被选为总统。而在2017年的上半年，又出现了两件标志着自由派胜利、民粹主义者失败的事件：荷兰和法国的选举。2017年的G20峰会在历史上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事情刚刚发生之时还无人能够预言。尽管如此，在这次会议上，有意识地捍卫西方价值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而且来自欧洲联盟的与会

国也确实在用一个声音说话，这对所有认识到民族主义复兴之危险的人来说都算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16]

---

[1] 指沙特，作者这样称呼是因为奉行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派与沙特王室和沙特建国史有极其紧密的联系。

[2] 《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又称“共同防御条款”，其内容是：任何针对北约成员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攻击。

[3] «Die Kanzlerin hat die Nase voll», in: *Spiegel Online,* 29. 05. 2017. http://www. spiegel.de/politik/ausland/donald-trump-internationale-pressestimmen-zu-europar eise-und-angela-merkel-a-1149631.html; «Ein enormer Wandel der politischen Rhetorik», in: *Zeit Online,* 29. 05. 2017. http://www.zeit. de/politik/2017-05/angela-merkel-presseschau-usa-g7-gipfel; Johannes Leithäuser, Lange Tage der Irritation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0. 05. 2017; Daniel Brössler und Robert Rossmann, In aller Freundschaf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0. 5. 2017.

[4] Here's A Closer Look At Donald Trump's Disturbingly Deep Ties To Russia, in:http://fortune.com/2017/05/17/donald-trump-russia-2.

[5]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For Immediate Release. June 1, 2017.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Paris Climate record, Rose Garden.

[6] Andreas Ross, Befreiung aus dem Komplot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 6. 2017; Trump bringt die Wirtschaft gegen sich auf, ebd.; Susan E. Rice, To Be Great, America Must Be Good, in: *The New York Times,* 3. 6. 2017; Paul Krugman,Making Inorance Great Again, ebd., 5. 6. 2017.

[7] Erich Vad, Bündnis ohne Kraft, in: *Cicero,* Juni 2017, S. 59-65; Daniel Pelletier und Maximilian Probst, Welt in Bewegun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6. 6. 2017(zu Russlands energiepolitischer Bedeutung für die EU); Petra Kolonko, Seide und Zemen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5. 2017; Der Welthandel soll über Chinas Seidenstraße rollen, ebd.

[8] Zum Begriff «transatlantisches Jahrhundert»: Mary Nolan, *The Transatlantic Century. Europe and America 1890-2010,* Cambridge 2012. 相关内容亦见本书原文第89页前后。

[9] 贝尔法斯特，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首府。

[10] 又称《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成果。

[11] George Parker, British election results: May's gamble backfires, in: *Financial Times,* 9. 6. 2017; Polly Toynbee, Let's whoop at the failure of May's miserabilism. Optimism trumped austerity, in: *The Guardian,* 9. 6. 2017; Jochen Buchsteiner, Völlig verzock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0. 6. 2017;Tusk: Britisches Angebot «unter unseren Erwartungen», ebd., 24. 6. 2017. Zum«Karfreitagsabkommen» von 1998: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简称: Geschichte IV）, München 2016³,S. 122 f。

[12] Guillaume Tabard, Une nette vistoire mais pas une France macronisée, in: *Le Figaro*, 12. 6. 2017; Cédric Pietralunga/Solenn de Royer, Majorité absolue et victoire relative pour Macron, in: *Le Monde,* 20.6.17; Christian Wernicke, «Der Anfang einer Renaissance»,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2. 6. 2017 (Inter view mit Macron); D. Brössler u. a., Die Macron-Formel wirkt, ebd. 24./25. 6. 2017. Zum Zusammenbruch des italienischen Parteiensystems seit 1992: Winkler, *Geschichte IV*（见注释7）, S. 80 ff。

[13] Michael S. Schmidt and Matt Apuzzo, Comey Didn't Want To Be Alone With President He Told Sessions, in: *The New York Times,* 7. 6. 2017; Charles M. Blow,The Resistance: Impeachment Anxiety, ebd., 12. 6. 2017; Jim Rutenberg, Unlike in Watergate, Media Offers a Choice of Facts, ebd., 12. 6. 2017; Hubert Wetzel, Zahlta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9. 6. 2017.

[14] Charles M. Blow, Te Resistance: Impeachment Anxie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12. 6. 2017; Michael S. Schmidt and Matt Apuzzo, Mueller's Moves Point to Inquiry Aimed at Trump, ebd., 15. 6. 2017; Jennifer Rubin, Jeff Sessions wilts in the hot seat, in: The Washington Post, 13. 6. 2017; Offenbar Ermittlungen gegen Trump persönlich,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6. 6. 2017; Reymer Klüver, Sieg mit Fußnot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8. 6. 2017. Zum «Saturday Night Massacre» und zur Watergate-Affäre: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3: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5², S. 608 ff.

[15] Trump prangert «destabilisierendes» Verhalten Russlands a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7. 7. 2017; Konrad Schuller, Die Vermessung des

Westens, ebd.;Reinhard Veser, Zwischen drei Meeren, ebd., 8. 7. 2017; Daniel Brössler und Florian Hassel, Mit Liebe-und Sinn fürs Geschäf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7. 7. 2017; Rick Lyman, Right-Tilting Poland Welcomes Trump as Europe Watches Warily, in: *The New York Times,* 5. 7. 2017. 关于华沙起义，参见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2: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1945,* München 2016[3], S. 1074 ff。

[16] Robert Birnbaum und Juliane Schäuble, Gipfel der Politik-und der Gewalt, in: *Der Tagesspiegel,* 8. 7. 2017; Albert Funk, Geschminkter Dissens, ebd., 9. 7. 2017;Cerstin Gammelin, Eins zu Neunzeh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8./9. 7. 2017;Stefan Ullrich, Notfalls ohne USA, ebd., 10. 7. 2017; Trump und Putin vereinbaren Waffenstillstand im Südwesten Syrien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8. 7.2017; Trump: Keine Einheit für Cybersicherheit mit Moskau, ebd., 11. 7. 2017;Trump Team Met Russian Offering Dirt on Clint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10.7. 2017. Die Abschlusserklärung der G20: G20 Leaders'Declaration. Shaping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https://www. g20.org/ gipfeldokumente/G20-leadersdeclaration.pdf. Zum Minsker Abkommen («Minsk II») siehe oben S. 194 f.

致谢

我应该好好感谢大家。我首先想对我的妻子说声谢谢。在我完成了拙作四卷本《西方通史》之后，是她鼓励、启发我接着写正在发生的历史。当然，这些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可能有一个暂时的结论，由于现在还拿不到第一手资料，或者纯粹就是因为时间离得太近，所下的结论日后被推翻的风险很大。我的妻子一直与我讨论着书中的提问、论点和表述方式。要是没有她，就不会有这本书。

我还应该感谢这一年来为我的工作提供资助的机构和人士：阿尔弗雷德·海尔豪森协会（Alfred Herrhausen Gesellschaft）、汉斯·林吉尔（Hans Ringier）基金会，还有恩斯特·普林茨·比龙·冯·柯兰（Ernst Prinz Biron von Curland）和班克豪斯·梅茨勒（Bankhaus Metzler）。是他们给了我经费，这才让我有钱付给常年为我提供优质服务的工作人员，如莫妮卡·罗布托伊舍（Monika Roßteuscher）硕士和为我工作的学生：安杰洛·达本多（Angelo D’Abundo）、瑟伦·布兰德斯（Sören Brandes）、索菲·根斯克（Sophie Genske）和塔贝亚·纳萨罗夫（Tabea Nasaroff）。我衷心感谢他们各自为完成本书所做出的贡献。我还想感谢加布里埃莱·梅茨勒（Gabriele Metzler）、比尔吉特·阿施曼（Birgit Aschmann）和汉内斯·格兰迪茨（Hannes Grandits），以及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系的尼娜·克雷默（Nina Kremer）等诸位教授对我书写计划在行政方面的支持和各方面的照顾。我特别要感谢历史系，在我于2007年基本退出教学岗位之后，系里依然为我保留了办公室和相应的技术设备，这对我的工作而言是极大的支持。跟我之前的书一样，将我的手写草稿转化为打印稿的工作也是由格蕾琴·泽豪森（Gretchen Seehausen）女士完成的。这本书多么有赖于她一如既往的细心工作，只有我知道。

与贝克出版社（Verlag C. H. Beck）的再次合作还是那么温暖和放心，25年来我已经对此习以为常。总编辑杰特拉夫·费尔肯（Detlef Felken）从我下笔写第1章开始，就一直在用他睿智的评论陪伴和帮助我。在校对阶段，扬纳·勒施（Janna Rösch）女士也同样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讨论对象。亚历山大·戈勒（Alexander Goller）为我核实了日期和事实。我要向上述诸位表达我衷心的谢意。

柏林，2017年7月初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译后记

如果要推举一位当代最著名的德国近现代史教授，本书的作者温克勒将是必不可少的候选人。这位今日的柏林洪堡大学教授于1938年出生在康德的故乡柯尼斯堡。他未满周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既毁灭了德国也夺走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一位历史学教授的女儿，于1944年带着5岁的儿子离开了后来被改名为“加里宁格勒”的故乡，与1200万东普鲁士难民一起向德国西部辗转前行。或许，这段经历正是温克勒写出成名作《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德意志史》的缘起。

“西方”始终是温克勒一系列作品的中心。在他看来，德国近现代史的主要情节就是：德国人极不情愿走上那条已打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烙印的西方道路，数次企图踏上“德意志特殊道路”，却一再被碰得头破血流，并最终才在二战之后完全地融入西方（民主德国部分则要等到1991年），并服膺于以人权、代议制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规范”。冷战结束之后，这些西方价值看似有望在不久后成为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但历史的发展永远不会是一条直线。

在本书中，温克勒主要从欧洲的视角审视西方世界近年来所遭遇的一系列危机：“希腊-欧元危机”“波匈-法治危机”“美国-同盟危机”。

“希腊-欧元危机”本来用一句话就能概括：财政纪律不严的欧元区国家希腊因为发放了与本国生产力不匹配的福利而欠下巨额国债，结果无力偿债而导致欧元动荡。但温克勒追溯到了更为深层次的历史脉络：有欧元才会有欧元危机，而欧元之所以会在约20年前诞生，源于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想要打消法国对德国重新统一的疑虑，故而决定让货币联盟比政治联盟先行一步。法国之所以有疑虑，又源自困扰了欧洲和世界近200年的“德国问题”。

“波匈-法治危机”表面上看只是波兰、匈牙利两国的领导人对法治的理解与欧盟委员会不同，这两个国家处于“传统西方”范围之内，却又在近代长期缺乏成为民族国家的条件，这段“缺课”的经历造成了两国现任领导人和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西方价值”的隔阂。

“美国-同盟危机”看似自特朗普胜选之后才突然出现，但其实也能从百年前的“美国例外论”和“山巅之城”的想象那里找到线索。但特朗普当选总统一事带给西方世界的震撼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带有民粹性质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去预判这位美国总统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还不如巩固德法轴心，以尽可能摆脱对

美国的依赖。

西方会分裂吗？阴云密布，但希望尚存。和许多高明的历史学家一样，作者在大部分时候都将自己的意见隐藏在了叙事之中。我的理解是：他主张欧盟暂时先保持退守的姿态，以保持内部团结和保存西方文明的火种为要务，而不是去应付那些虽有人道主义要求但却力不能逮的事务。待到这场寒冬过去，春暖花开之时，欧洲再继续把西方价值观传播给全世界愿意接受它的人。当然，如何衡量“力所能及”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连温克勒自己也批评德国在干涉欧洲之外的人道主义灾难时太过于消极。因此，还是请好学深思的读者们沿着作者所烛照的道路继续探索吧。

译书的这一年，正是小儿书向从出生到周岁的一年，忙乱可想而知。有时他向我爬过来，或是蹒跚走来，我也只好朝他摆摆手，继续专注于书稿。但如果不是家人前来抱起，他一定会继续抓住我的腿，猴上身来，把温克勒教授的大作直接放进嘴里品尝。幸好，家人为我分担了很多辛劳。所以我特别想在此对我的妻子、父母和岳父母表达谢意，没有他们相助，这项工作是无法完成的。

上海，2018年3月6日
童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著
; 童欣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217-0963-6
I. ①西… II . ①海… ②童… III . ①世界史 - 现代史 - 研究 IV. ①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 第185556号

Zerbricht Der Westen? by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 Verlag C.H.Beck oHG, München 201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
著者：［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译者：童欣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90千字
版次：2019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549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963-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欧洲

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新锐历史学家重磅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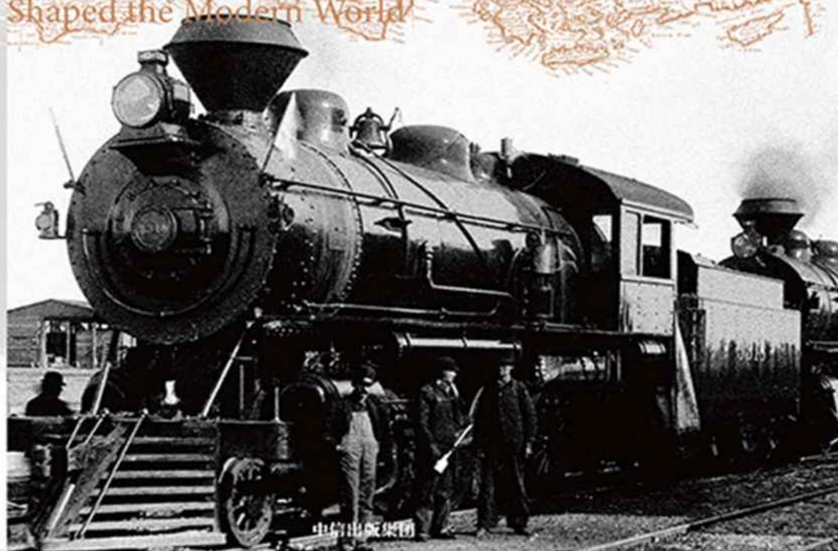
欧洲文明
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为什么是欧洲文明，
而不是任何其他文明获得了全球霸权并塑造了现代世界？
以整体性视角剖解西方文明
追寻过去，思考未来

EUROPA

How Europe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西] 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 著
Julio Crespo MacLennan
黄锦桂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欧罗巴：从神话传说到真实世界 文艺复兴带来欧洲文明的兴旺

第二章 有多远走多远 地理大发现奠定欧洲霸权的基础

第三章 世界还不够大 欧洲帝国崛起

第四章 反抗帝国的革命 革命时代对欧洲帝国和西方世界的影响

第五章 宏伟的东方梦 欧洲扩张对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影响

第六章 寻找 更美好的世界 移民潮传扬欧洲文化与价值观

第七章 权力与荣光 欧洲霸权的黄金时代

第八章 第一道 和最后一道文明锋线 以文明、基督教与帝国利益之名争夺非洲

第九章 撼动世界的两次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开启后欧洲时代

第十章 离乡去国，远走他方 迁徙与流亡的欧洲知识分子对全球的影响

第十一章 探索真理 欧洲帝国的遗风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影响世界

第十二章 欧洲梦 组建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欧洲联盟

结语 全球文明的支柱

致谢

参考文献

序

作为一位研究欧洲历史的学者，我经常在思考，什么是欧洲？乍看起来，这不是问题，只要我们找出地图，就可以知道欧洲的方位，回答欧洲有多少国家，面积有多大，以及欧洲的自然面貌等等。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现欧洲的话，可以看到，不仅有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欧洲，还有“欧盟”这一政治意义上的欧洲，以及“欧元区”这一经济意义上的欧洲，等等。但这样对欧洲的理解不免碎片化，也缺失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而麦克伦南的这本书则从文明的视角来理解，将欧洲视为一个有着共同理念和价值观的文明共同体，形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特性。

就欧洲文明的特性而言，诚如本书作者所说，这种文明的统一性体现在欧洲形成了民主制度，以及能使民主制正常运行的诸多理念，包括法治、三权分立、议会制度以及保障人权。作为一种国家类型，民族国家也是欧洲非常重要的一种政治创造。欧洲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市场经济，全世界都不可抗拒地卷入其中，因为这是交换产品、创造财富的最佳方式。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福祉，其中，更高效的农耕方法为迅速增加的人口提供了食物，有效防止了饥荒的发生；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产品和资本更快速地交换和流动；现代医学治愈了许多疾病，人类的平均寿命普遍提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在作者看来，从政治、经济、社会到科学等方面，欧洲都在自己的空间中造就了同质性的文明。

应该看到，这一同质性文明是在历史进程中，特别是从15世纪后渐趋形成的，并在19世纪最终成型。其间历经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英国和法国的社会革命与工业革命等，可以说，时间性是理解欧洲文明的重要视角，没有几个世纪的积累沉淀以及各方力量的博弈，就无法形成文明的特性。欧洲文明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同样，支撑欧洲文明运转的社会条件也是在历史中培育而成。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从真正理解欧洲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所具有的感召与示范性力量。

不仅如此，欧洲文明也在空间的扩展中强化了自身的这一特性，成为犹如作者所说的“全球文明的支柱”。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欧洲文明不再被理解为是诸多文明类型中的一种，而是具有全球性。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奔走于世界各地，不仅创造了丰硕的财富，还对世界有着巨大的改造能力，让全世界走向文明。而文明的这一全球性特质也是本书着力表述的主题。当然也应该看到，就其过程而言，这是用“血与火”的方式扩展

着文明的空间边界，并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创造出了“文明与野蛮”这一两分的话语体系，欧洲是“文明”的，而非欧洲地区则是“野蛮”的，从而为其殖民统治构建起合法依据。从此，全球既被欧洲文明所浸润，也被划定分属为不同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退。对此，作者在书中用了很多篇幅来描述和思考欧洲文明扩张这一历史进程，这自然也会激发我们对此深深的思考，并思考如何理解欧洲文明的全球性。

实际上，这种“血与火”并非限定在欧洲与非欧洲的关系之中，也体现在欧洲文明内部，且不说近代早期宗教迫害的暴力杀戮，人类恐怕永远不能忘记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痛。直到现在欧洲的学者都在不断进行反思，为什么在一个“文明”的欧洲内部却发生了如此残暴的野蛮行径，国家成为大屠杀的发动者和执行者，每个国家的人民也都不惜为国捐躯，变成了“帮凶”。历史学家从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入手解析，认为恰恰是作为欧洲文明内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成了推动战争的强劲动力。

正像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文明正在经受考验”。好在欧洲文明具有内在的反思性力量，痛定思痛，欧洲终于在战争的废墟上再次重建起了“文明”，迎来了“文明”的再度复兴。回顾这一“血与火”的历程，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欧洲文明那种内在的张力，那种野蛮与文明的彼此转化，以及“历史的终结”会在何处。对此，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对世界文明的考察报告指出，无论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以及对它自己的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恶，欧洲都给全人类献上了最大的礼物——文明。也如这本书作者所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革命时代到欧洲一体化，欧洲创造了能够释放人类最非凡创造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使文明发展到最高形式，为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欧洲的历史糅合了光耀和阴影、胜利和悲歌，是指引人类的一盏明灯。这也是本书作者引以为豪的，以及写作此书的目的：“长久以来，欧洲一直没有一部宏大的记述，展示欧盟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剖析欧洲在现代史中的角色和意义，以及杰出的欧洲人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缺。”

从15世纪以来的全球历史进程来看，这无疑是对这段历史的精辟概括，欧洲文明塑造了现代世界，欧洲文明引领着世界前行。但在今天，放眼全球，我想到了法国学者保尔·瓦莱里所说的，欧洲是人类的一块宝地、一颗明珠，是巨人的头脑，但是它会一直保持这一地位吗？从全球的视角来看，面对如今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下降，以至于2020年2月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就是“西方缺失”。欧洲文明未来究竟走向何方，是否还能引领全球？是像作者那样满怀乐观，还是令人忧心焦虑？但无论如何，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重回欧洲文明的历史，探索文明的内涵，思考文明的起落，我们才能找到左右

文明未来走向的丰富资源，从而回应“在21世纪的世界，欧洲肩负怎样的使命？”这一问题。我想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和在此时间阅读欧洲历史所具有的意义。

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20年5月

前言

过去几年对欧洲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时期。全球金融危机对欧盟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欧元区的财政问题非常严重，许多观察家甚至预测作为欧洲统一货币的欧元很快会崩溃。欧洲人不得不学会在各种紧缩计划下生活，降低生活标准。叙利亚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使得欧洲的移民问题更加严峻。当欧盟经济终于出现复苏迹象时，欧盟又遭遇了一个严峻挑战：英国脱欧。英国人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不仅意味着欧盟将失去4个主要经济体中的一个，还暗含着一个更大的危机：如果欧洲各国的公民都有机会通过公投来决定自己的国家是否留在欧盟，他们是否也会投出否决票？若真如此，欧洲一体化就可能会被一个强劲的对手打败——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正是最初催生欧盟的力量。

过去10年里，关于欧洲的悲观预言甚嚣尘上，而且这种观点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广为传播。每当欧盟成员国政府和机构遇到某个问题，欧盟注定消亡的陈词滥调就会被重新提起，这种论调认为欧洲整体上与这个世界越来越脱节，这个世界未来将由美国和中国主宰。

然而，最近的这场危机并非只发生在欧洲，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从历史的视角看，这场危机并不特别严重。对这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大陆来说，要控制过去几年间出现的问题似乎并不难。欧洲拥有的资产是其他政权或文明难以匹敌的，其最重要的财富正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足以确立欧洲在21世纪的重要角色，本书要阐述的一个事实就是——欧洲塑造了现代世界。

本书适合全世界对历史怀有热忱和好奇心，渴望获得新知，并且不想被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各种信息混淆视听的读者，尤其适合那些想要寻求这几个问题答案的人：欧洲曾为我们做过什么？哪些历史趋势能够解释现状？当代社会的基本要素来自哪里？

本书旨在阐释16—20世纪欧洲主宰世界400多年的原因，欧洲对其他大陆和欧洲以外的人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欧洲霸权带来的诸多后果。

对世界的好奇心，对扩张和征服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需求让欧洲取得了远超自己想象的成就。在欧洲霸权的巅峰时期，西班牙帝国统治的疆域横跨美洲大陆，那时的西班牙是真正的“日不落帝国”；葡萄牙崛起后，成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都拥有领土的强大帝国；大英帝国在20世纪初达到鼎盛期，占有全球1/4疆土，统治的人口超过当时全球人口的1/5。在同一时期，法国统治的领土也非常辽阔，几乎覆盖了一半非洲大陆。在扩张领

土方面，俄国不甘人后，其边境不断向外拓展，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6。荷兰人在17世纪建立的帝国虽然领土面积不大，但也足以让这个小国成为经济霸主。

领土扩张只是欧洲建立世界霸权的一个维度。许多现代国家都是依据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创建的，政治影响力是欧洲霸权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欧洲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经济力量是欧洲霸权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因为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巨量自然资源是欧洲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欧洲国家还成功创建了全球市场。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在文化维度上也获得了霸主地位。欧洲国家的扩张使西方文化在全球盛行，基督教广泛传播，使欧洲获得了精神霸权。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认为传播基督教是其帝国扩张的最主要、最正当的理由之一，而承担这项任务的是传教士。

人口大迁徙是欧洲能够在上述各维度建立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欧洲国家的扩张过程中，欧洲人向外移民并定居到其他大陆，尤其是美洲。欧洲帝国之所以能够威势远播，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欧洲人对迁徙拥有热情并创建了移民关系网，这种热情在19—20世纪间发生的大规模移民潮中尤其突出。

帝国主义和欧洲的殖民扩张不仅被那些深受其害的殖民地人民批判，也被欧洲人诟病，包括那些受益于殖民统治的人。因为这种模式总让人想到欧洲强国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碾压，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和种族灭绝。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也与欧洲的扩张密切相关。

不幸的是，历史表明，这样的恶行普遍存在，并非欧洲独有。这种恶行在欧洲霸权时代之前已经存在，在此之后也将继续存在。尽管如此，欧洲帝国的历史无疑充斥着血腥、屈服、剥削、屈辱、苦难和不公。本书将关注这些应予正视的历史，并揭露这些罪行的始作俑者。

另一方面，本书将检视欧洲帝国的扩张和欧洲的发展经验对现代社会做出的贡献。不可否认欧洲在许多方面造福了全人类。在这份功绩单中，最值得称赞的是欧洲推广了能够赋予公民更多权利的民主制，以及能使民主制正常运行的诸多理念，包括法治、三权分立、议会制、人人平等，以及人权。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来说，民族国家是欧洲非常重要的一种政治创造。欧洲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创建了市场经济。全世界都不可抗拒地卷入其中，因为这是交换产品、创造财富的最佳方式。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福祉，其中，更高效的农耕方法为迅速增加的人口提供了食物，有效防止了饥荒的发生；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产品和资本更快速地交换和流动；现代医学治愈了许多疾病，人类的平均寿命普遍提高。

总之，这本书是一部关于欧洲的史诗。在欧洲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欧洲几个重要的帝国既受钦佩也被鄙视。人们对欧洲人传播的思想理念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从几个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殖民帝国、企业项目、公民迁徙等方面来探究其扩张过程，分析人类历史上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欧洲人是如何走向全球的，我们将回顾当时一些历史名人的生活和工作，包括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家，埃南多·科尔特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等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还有詹姆斯·库克船长、罗伯特·克莱夫、赛希尔·罗兹等英国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以及来自法国、荷兰、俄国等地的著名人物。

同时，本书也记述了包括士兵、公务员、移民、寻宝者、囚犯和流亡者在内的，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故乡去往其他大陆的名不见经传的欧洲人的经历。此外，本书还将论及欧洲帝国与被它征服的其他民族间的对抗以及文化冲突（其中一些民族已灭绝）。本书还将盘点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诞生的一些文学巨著。

欧洲帝国的崛起塑造了现代世界，欧洲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同样也影响了世界，本书在最后几章讨论了这个话题，检视帝国主义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如何终结欧洲霸权时代，当帝国主义发展到极致时，给欧洲强国带来的影响，以及后殖民世界的诞生。欧洲的政治遗产影响巨大，但也引发了很多争议。最后，我们将讨论欧洲在二战后的自我重塑，欧洲的统一进程及其社会内部组织如何使欧洲人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引领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

关于欧洲霸权时代及欧洲帝国的著述很多。如果不是受益于我在参考书目中列出的那些作品，我无法完成本书。不过，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重要影响的作品却非常罕见。之所以存在这样大的空白，有一个解释是，对帝国扩张或全球霸权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基本上都是从国家的角度而不是全欧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的。

在几十年之前，欧洲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深深的裂痕，历史遗留的敌对情绪仍然处处可见。这也是欧洲的作家和读者一般很少有兴趣超越自己国家的历史经验去看欧洲历史的原因之一。幸运的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外国历史，并取得了巨大进展，为欧洲历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深，在学术领域更加如此，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有不少关于欧洲当代历史佳作的原因，这些佳作让我们能够越过国界和心理界线，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另一方面，很少有历史学家尝试对比欧洲各国向世界各地扩张的经验，这是个挑战性很大的课题。毫无疑问，曾经的敌对和战争留下了惨痛的后果，影响深远，使得一些国家和人民把那些分离因素看得比聚合因素更重

要。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家从各自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文明，这一点法国尤为突出。这些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自己是伟大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并不很清楚他们也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欧洲是一个地理名词，是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文化参考，仅此而已。

但是在现代欧洲——尤其是欧盟，欧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加，“欧洲人”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我们需要一部著作向欧洲人解释他们共有的历史和文化，这有助于他们了解欧洲在世界历史上的角色及欧洲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对今天的欧洲来说，这非常重要，因为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讨论能够捍卫欧盟利益的全球战略。

目前，这一需求更加急迫。在过去几年里，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盟发展进程陷入混乱，全球经济危机令欧洲备受打击。欧洲的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无视欧盟的存在，他们主张的是那些在20世纪上半叶摧毁了欧洲的观念。恐怖主义打破了欧洲几个国家首都的和平，威胁到民众的安全，恐怖袭击变得越来越频繁；欧洲无法同化大规模的移民，移民的涌入削弱了欧洲社会原有的价值观。也许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接受自己的历史，欧洲以外的国家也需要认清其与欧洲关系的性质。

欧洲各国之间曾经战火纷飞，国界线布满铁丝网，但现在，人口、服务和资本在欧洲各国间自由流动，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以跨越更大的空间，远远超出个人所属的国家。我的情况就很突出。我的家庭背景让我在两个历史上相互对立的国家——西班牙和英国长大。从小学到大学，我周围一直有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同学。我妻子的父母分别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我们在家里讲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我的孩子有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的血统，他们在这三种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显而易见，对我来说，对我的孩子来说（他们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清晰地界定了我们的身份。

这种欧洲身份以及我与几个欧洲国家的亲缘关系在我的学术轨迹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一直对比较历史学非常感兴趣，我不仅研究英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我最了解的国家，还研究其他欧洲大国。当我在这些国家穿行时，我不断问自己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以及它们共有的历史对当前欧洲造成的影响。

和许多欧洲人一样，我总是在远离旧大陆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欧洲人身份。写这本书的想法源起于过去10年里我在全球各地的旅行。当我在圣卢西亚的海滩上，在哈瓦那旧城的咖啡馆里，当我沿着波士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优美的林荫大道漫步，或是在从德里开往斋浦尔的火车上时，这些地方的欧洲遗迹让我想到了许多问题，我努力寻找它们的答案。

这本书的写作采用了编年法和主题法。第一章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是欧洲文明而不是其他文明获得了全球霸权并塑造了现代世界？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欧洲经历过文艺复兴。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知识型社会、科学、经验主义和市场经济都开始萌发，进入早期的发展阶段，使欧洲具备了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大优势。

对地球尽头的好奇心，对找到贸易路线，实现发财梦的渴望，以及那个时代航海家和探险家的冒险精神，这些因素使得一些欧洲强国从16世纪起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二章探讨欧洲航海家如何奠定欧洲扩张时代的基础，以及其中最重要的探险家——哥伦布如何因为发现美洲而彻底改变了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命运。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率先开始向外扩张，瓜分了新世界，在那里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不久之后，英国、法国和荷兰也开始建立海外帝国。紧随这些大西洋强国之后的是其他欧洲王国，比如丹麦和瑞典也走上了帝国扩张之路。在另一方向，俄国也在向东扩张，建立庞大的帝国。第三章深入探究了欧洲国家的扩张过程，并回答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这些国家创建了什么样的帝国？驱动它们扩张的动因中有多少相同因素？它们如何成功控制和管理如此广阔的领土？最后一个问题是：帝国扩张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利益？又如何影响了国际关系？

革命对欧洲帝国及其殖民地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第四章专门讨论这个主题。法国大革命撼动了欧洲世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1775年爆发了独立战争，旧政权开始瓦解。第四章分析了美国的成立带来的冲击，以及启蒙思想对这个伟大国家开国元勋们的影响，并阐述了革命浪潮是如何传遍美洲大陆的。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也因此分崩离析。第四章还分析了革命时代带来的巨大变化，例如，奴隶制被废除，一个新的大西洋世界被建立起来。

欧洲帝国在亚洲的扩张对欧洲获得全球霸权非常关键。第五章重点讨论了这一主题，梳理印度被几个欧洲帝国殖民和统治，最后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印度次大陆对大英帝国也造成了影响。此外，这一章详述了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入侵，最后是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事件：日本明治维新后崛起为强国。

要理解欧洲帝国扩张带来的影响，移民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因此，第六章专门讨论欧洲人移民到世界各地的潮流。我们将看到，如果不去研究欧洲人的迁徙及其建立的移民网络，就无法理解美国、阿根廷等美洲国家的发展。

第七章指出，19世纪是欧洲的黄金时代。帝国扩张和工业革命是欧洲帝国

获得巨量财富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所有领域都在发展的时代，欧洲伟大的智力创造催生出广受全球钦羡的新生活方式。当今世界所有主要的政治思想都诞生于欧洲。这一章还探讨了欧洲在19世纪的技术创新对全球的影响。

非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受到欧洲扩张的影响，不过，在第八章中可以看到，19世纪末，欧洲列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瓜分了非洲大陆。对非洲的争夺刺激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决定了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未来。

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以最具破坏力的方式影响了世界。第九章剖析了欧洲为什么发动这两次大战，因为战争总是使敌我双方两败俱伤。此外，第九章还讲述了世界各国是如何被卷入战争的，以及世界大战如何提前终结了欧洲霸权时代。

欧洲人有一个影响其他国家的方式很出人意料——流亡。第十章讨论了这个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政治、种族或宗教迫害迫使一些国家的公民离开自己的国家，犹太人就是如此。因此，本章深入考察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发展，及以色列的建立。这一章也详述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外流，以及那个时代欧洲人才流失造成的后果。

殖民帝国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第十一章讨论了这一主题，探讨了第三世界的崛起以及它们受前宗主国和欧洲文化影响的程度，这一章解析了对第三世界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苏联的兴衰，以及共产主义这个在20世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意识形态。

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欧洲如何通过创建欧盟和提出欧洲梦实现战后重生，并诠释了福利国家能够成为现实的原因及其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此外，这一章分析了欧洲一体化如何成功避免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推动了各国的一体化进程，使欧洲在全球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影响。欧盟虽然存在种种缺陷和内部危机，但仍然具有左右21世纪全球趋势的能力。

持续了400多年的欧洲霸权最终导致了什么结果？欧洲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如果不去理解欧洲的历史，我们是否能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世界？在21世纪的世界，欧洲肩负怎样的使命？这本书将引领读者穿越人类历史上最引人入胜的5个世纪，找到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

第一章

欧罗巴：
从神话传说到真实世界

文艺复兴带来
欧洲文明的兴旺

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所有民族都没有向外扩张或传播其文明的能力。欧洲大陆幅员并不广阔，其东部与亚洲接壤，边界也不十分清晰明确，法国诗人瓦莱里曾把欧洲称为“亚洲大陆的岬角”。欧洲的名字来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欧罗巴，她是克里特王米诺斯的母亲，聪明貌美的欧罗巴，被爱慕她的宙斯带到爱琴海东岸，宙斯用她的名字命名了那一片大陆。从此，希腊人把自己的领地称为爱琴海以西的欧罗巴，以此与位于爱琴海东岸，曾属于古希腊的小亚细亚区分开来。欧洲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8世纪，当时横跨欧洲中西部的查理曼帝国在其历史记录中使用了这个词。但是欧洲人普遍到13世纪才开始用欧洲来指称自己所在的大陆。此前，欧洲通常被称为基督教王国。[1]

欧洲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遗产，欧洲民族各有特色，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使他们凝聚起来。外来威胁和入侵可以形塑族群的身份认同，加强族群之间的凝聚力。对欧洲人来说，伊斯兰国家的兴起和侵犯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认同感，意识到自己属于基督教世界。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基督徒保卫东罗马帝国，抵抗土耳其人的侵略。那场战役之后，发生了三次载入史册的十字军东征。基督徒远征到基督教的起源地——耶路撒冷，保卫这座他们心中的圣城。尽管十字军东征胜败参半，但是这些远征大大提高了欧洲人民对欧洲的认同感，加强了他们捍卫自己信仰和领土的决心，坚决抵制伊斯兰国家或其他文明的入侵。在那个时期，欧洲的基督徒还只能自卫，不具备向外扩张的能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拉伯文明比欧洲的基督教文明要强悍得多，有更大的可能向外扩张。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呼吁阿拉伯人向外传播伊斯兰教义，同化异教徒。在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阿拉伯人遵循他的教诲，在632年开始向外征服和扩张。他们从阿拉伯半岛出发，在634年攻占叙利亚，664年占领波斯，在穆罕默德·本·卡西姆的率领下，阿拉伯人在715年成功入侵印度，并接着从那里跨过印度洋继续向东扩张，到14世纪时，伊斯兰教已在马来半岛扎下根基。

678年，伊斯兰国家的海盗甚至还在古代中国的南部沿海地区（今天的广东省）大肆劫掠，威胁到这个文明古国。

伊斯兰教在传遍整个北非之后开始进入欧洲，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最大威胁。到8世纪，伊斯兰军队已经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并威

胁要通过高卢继续入侵北欧。爱德华·吉本在其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探讨了一个问题：如果伊斯兰军队北进成功，会对欧洲文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旦他们到达比利牛斯山，就可以很轻松地一路向北，直抵苏格兰。那么，“现在牛津大学的课堂里可能在讲授《古兰经》”。

阿拉伯帝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扩张，主要是因为他们实现了经济中兴，这是从地中海辉煌的罗马帝国继承来的。在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斯，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留下的灿烂文明让入侵的摩尔人大受裨益，重现了昔日的繁华盛景。科尔多瓦是当时一流的学习中心。阿拉伯帝国得以扩张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技术。阿拉伯人发明了星盘和象限仪，可用于天文导航，阿拉伯人还发明了三角形船帆，取代了罗马人使用的传统方形帆，让船能够逆风而行，横渡地中海和印度洋到达远东地区。第三个关键因素显然是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穆斯林和基督徒一样，坚信只有他们的宗教才是正道，他们将传教视为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到13世纪，基督徒从摩尔人手中夺回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然而200年后，伊斯兰势力又从东方向欧洲渗入。1453年，奥斯曼帝国入侵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向西推进，直到1529年苏莱曼一世在夺取维也纳的战役中失利，伊斯兰军队入侵欧洲的节奏才得到遏制。同时，伊斯兰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526年，泽希尔·艾丁和巴布尔（其远祖是帖木儿帝国的国王帖木儿）率领穆斯林雇佣军占领了印度的德里，并在那里开疆建国，即莫卧儿帝国，巴布尔是这个帝国的首任君主，这奠定了伊斯兰帝国的基础，他们很快就统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8—12世纪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伊斯兰教成功控制了欧洲，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整个欧洲基本上都归顺了伊斯兰教的利益需要和价值观，穆斯林统辖的疆域横跨亚洲、欧洲、非洲，包括马格里布[2]以及远东地区。阿拉伯人不仅传播伊斯兰教，也发展贸易，世界各地的人和物品因此流动起来。阿拉伯商人从远东地区把香料、丝绸、胡椒和珍珠运到欧洲，第一批到达欧洲的非洲奴隶也是他们运来的。

阿拉伯人还积极推动古希腊知识的传播。在科尔多瓦，博学的安达卢西亚人阿威罗伊让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再次兴盛起来。

阿拉伯数字是阿拉伯人传承最久的遗产之一。这一计数体系通过西班牙传入欧洲。1202年，意大利比萨的列奥纳多（即数学家斐波那契）在其《计算之书》中谈到，阿拉伯计数系统优于罗马计数系统，思路更清晰。在欧洲人采用阿拉伯计数系统之后，这一计数系统也逐渐流传到其他地区。

在欧洲处于中世纪时，古代中国文明也比欧洲文明强大得多。14世纪初，马可·波罗的游记让欧洲人首次知道了中国（当时的中国处于元朝时期），

其中一篇游记描述道，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多得不可计数，连宫殿都是用黄金建造的。从那时起，有关中国的传闻传遍了整个欧洲，欧洲人开始知道中国这个遥远的文明国度不仅比欧洲更富裕，而且在各方面都更加先进。

在欧洲四分五裂的时候，中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强国，中国皇帝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这个国家是由真正的精英集团管理的，这些精英通过一系列选拔性考试进入官员阶层。在13世纪的中国约有一万个这样的精英家族。他们不仅是国家的栋梁，也宣传有关社会等级、公共秩序的价值观和儒家伦理，这有力地加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凝聚力。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遥遥领先于欧洲。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高炉炼铁技术；中国人使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时间比欧洲早近1 000年；火药也是中国人的发明，并被他们率先应用到大炮上，使中国人在几个世纪内拥有不可挑战的军事优势。14世纪，明朝建立，那时的中国统治着几乎和欧洲大陆一样大的领土，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到喜马拉雅山再到东南亚热带丛林的广袤地区，到处都有中国人活动的足迹。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当时就是世界之最，中国在16世纪时的人口数量已超过1亿，是欧洲的两倍。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文明，而且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所以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心王）国”。

这种自认为位于世界中心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向外探索的兴趣。尽管如此，中国在15世纪早期也开启了一项非凡的航海计划。1420年，明朝水师拥有的船只达1 350艘，他们在15世纪上半叶已经发现了南太平洋的很多地方，在1414年还到达了位于非洲东海岸的马林迪镇。[3]在过去几年间，关于中国人早于欧洲人几十年发现美洲的观点得到一些研究人员的支持，并受到广泛关注，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国具有先于欧洲探索和发现新世界并从中获利的所有必要条件，但是历史并没有沿这条轨迹发展。1436年，明朝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造船并解散了大部分水师。之所以采取这一极端措施，是因为蒙古在明朝边境构成入侵威胁。因此，明朝皇帝决定集中力量防守北部疆界，放弃了前途并不明朗的海上扩张计划。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中国这个最先进的文明体系开始背对世界，发展陷入停滞，一个本可能称霸世界的帝国逐渐变成欧洲大国劫掠的目标。

欧洲在数百年间都落后于中国，也缺乏伊斯兰文明的扩张能力。相对来说，欧洲的面积更小，文明较为落后。欧洲之所以能够实现华丽转身，变成一个影响全世界的文明体系，关键在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运动，它激发了方方面面的新发现，并让人类最终发现了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文艺复兴形塑了一种新思维方式，使欧洲文明脱颖

而出、一骑绝尘，领先于所有其他文明。文艺复兴使欧洲人得以把知识和文化用于自我改进、成长和对外扩张，并推动科学发明和技术革新，使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文明发展到新高度。这一文化运动使所有知识领域都发生了变革，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艺复兴在13世纪末兴起于意大利，到16世纪时已蔓延到欧洲大多数国家，因此，意大利可称为现代欧洲之母。意大利具备开启这一新时代的先天优势。首先，意大利人民生活在伟大的古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意大利人熟悉拉丁语，能够解读史籍中关于罗马—希腊文明的所有内容。其次，教皇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成为连接这个古老文明和新兴欧洲文明之间的桥梁。16世纪时，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委托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绘制巨作，决心再现古罗马建筑和艺术的辉煌。文艺复兴运动主要发生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繁华的贸易城市，那里金融精英云集，他们愿意投资艺术项目。后来，意大利人才辈出，精英云集，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人物都汇集在意大利的这些城市，意大利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欧洲各地富有雄心和冒险精神的人，意大利半岛的文明也随之传播开来。

彼特拉克是14世纪意大利的诗人和学者，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试图复兴璀璨的罗马文化，这些灿烂的文化遗产在欧洲的黑暗时代都被埋没了，“黑暗时代”这个词语正是彼特拉克提出的，他也被视为人文主义之父。受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思想启发，彼特拉克将人置于万物的中心，而不仅仅是被神的意志或自然力量驱使的一个对象。

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在1493年出版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论人的尊严》。书中深化了人性这一概念，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价值。[4]

学习知识是文艺复兴的精髓，它奠定了欧洲知识型社会的基础。从中世纪早期起，博洛尼亚、萨拉曼卡、牛津、剑桥、巴黎、海德堡等地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大学，这里产生了第一批专职从事学习和独立思考的教师和学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宗教和政治的压力，对欧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精英们逐渐接受“知识是人类进步和繁荣的关键”这一理念。这个时代开始培养新型人才：人们在青年时期前接受教育，获得相应的智力训练，服务社会最重要的行业。就这样，大学教育成为欧洲文明超越其他文明的关键因素之一。

鼓励批判性思维的经院哲学开始在欧洲第一批大学中传播，其信奉者到各地旅行，相互认识并交流思想。全球第一批大学以及最著名的学者就用这种方式推动、完成了欧洲思想的传播，在这些学者中，最伟大的是进一步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的伊拉斯谟。1466年，伊拉斯谟出生于鹿特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巴塞尔，但他经常到伦敦和剑桥旅行，所以自称“世界

公民”。作为一名牧师，他痛斥天主教的迷信和腐败行径，主张用科学方法学习神学，这引领了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新趋势。1508年，伊拉斯谟所著的《箴言录》出版，这本书中汇集了希腊语和拉丁文的经典谚语，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畅销书。许多广为人知的谚语都出自这本书，例如“在盲人国度里，独眼人就是王者”“生命不息，希望常在”。这些古训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都是伊拉斯谟的功劳，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以著书立说为生的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及其孕育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名人提出了一个新思维框架，现代欧洲文明开始形成。宗教信仰逐渐远离迷信，变得更加理性；传统得以复兴，并与各种创新和谐并存；对探索精神的推崇带来了许多伟大的科学突破。最重要的是，人文主义使人们越来越坚信，人类可以掌控这个世界，人类生命的所有领域都可以得到控制和改善。

人文主义造就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非凡的艺术作品，例如佛罗伦萨的圣器收藏室、罗马的西斯廷教堂以及《蒙娜丽莎》。它们的建造者和作者，布鲁内莱斯基、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获得了行业内前所未有的盛誉，名扬天下。从那时起，艺术家开始被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行业，得到社会的尊重。这一理念在西方文明中很重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2017年，遗失已久的达·芬奇画作《拯救者蒙迪》（*Salvator Mundi*）在佳得士拍卖行以4.5亿美元售出，创造了新纪录，就是一个实际的例证。

在文艺复兴时代，技术进步至关重要。威尼斯人在1300年左右发明了凸面玻璃镜。一个世纪之后，镜子迅速传遍整个欧洲。镜子价格不菲，最初只有帝王和贵族用得起，他们愿意支付大量金钱购买镜子，因为有了它，他们就拥有一种特权——看清自己。在镜子被发明出来之前，人们只能通过铜镜或其他金属面甚至水面看到自己隐约的影像。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主要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获得自我认知。镜子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自我认同，让人们能够看清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正确地认识自我，这也是新个人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个人都拥有姓名是古罗马的一个习俗，但是只有皇室和贵族将这一习俗保持到中世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开始既有姓也有名。从13世纪起，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人们开始把名字中的第二个字、绰号或者家乡名用作自己的姓，并代代相传。自此以后，对个人和家庭身份的识别对欧洲所有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名字和适当的身份标识不再是国王、贵族或教皇的特权。

14世纪的欧洲还有一项重大发明：时钟。尽管在其他文明地区的人也已经研究出计量时间的方法，例如中国有日晷，但是在精确度和有效性方面都比不上欧洲的时钟。从那时起，欧洲所有城市都以有一座钟为荣，钟通常挂在市政厅的正立面或教堂的塔楼里。时钟提醒人们时间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能够帮助人们完善计划、提高生产力。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

利十三世改进了从恺撒大帝时代以来一直使用的恺撒历法，推出格里高利历法，进一步提高了时间计量的精度，格里高利历法最终成为标准的国际公历。从那时起，时间可以像年龄一样被有效计量。

15世纪，有几个重要发明推动了世界变革：印刷术、火药和罗盘。哲学家培根把它们称为改变世界的三大发明。

1440年前后，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美因茨的金匠约翰·古腾堡发明了一种活字印刷机，里面的金属字母模块可以移动和替换。在那之前，欧洲人一直使用类似中国刻板印刷的方法。古腾堡发明的这种印刷机可以按需多次使用字母模块，这使印刷大量书籍、杂志和报纸成为可能，印刷机成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工具。通过这种方式，知识能够传播给人民大众。在文化史上，这项发明的意义仅次于文字本身。

1455年，古腾堡着手测试他这项发明的有效性，他印刷了每个虔诚的基督徒都想读的一本书——《圣经》。但是古腾堡印刷的《圣经》是拉丁语版，只有接受过教育的精英才能读懂。欧洲各地的人希望能读到他们母语版本的《圣经》，这带来了印刷业真正的突破。1466年，第一本德语版《圣经》出版，随后，欧洲其他主要语言版本的《圣经》也陆续面世。这在出版界产生了雪球效应。当人们购买母语版本的《圣经》时，也会想读其他内容的书。从15世纪末起，人们对图书的需求稳步增长，出版业应运而生。

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社会效益，推动了科学进步。正因为有出版业的发展，哥白尼在1543年出版的著作《天体运行论》才得以被科学界广泛阅读。教会的审查能力远远跟不上书籍传播科学思想的速度。

印刷术的发展还有助于扫盲。大量知识通过书本传播，阅读被视为人人都应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因此，识字的人越来越多，识字的人一多，人们就更加注重书面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从15世纪早期起，大多数欧洲的政府部门开始保存个人的出生、婚姻和死亡记录，这也提高了个人的自我认同感。印刷术的发展还带来了一个不太明显的结果——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也得到改善。欧洲女性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文明地区的女性，像卡斯提尔王国[5]的伊莎贝拉女王、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以及卡泰丽娜·丝佛札这样拥有权位的女性在中国和印度完全不可想象，更不用说伊斯兰世界了。但是即便如此，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仍然认为女性不如男性。书籍数量的激增和知识的传播逐渐改变了这种情况，女性（当然是指少数可以读书的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学习机会，有才华的女性还有机会写书出书。从16世纪起，欧洲开始出现女作家。

火药的重要性虽然比不上印刷术，但是确实对欧洲崛起并屹立于世界起到了关键作用。火药很有可能是从中国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东欧的。15世纪末，欧洲军队想减轻大炮的重量，使其便于运输，提高进攻效率，所以开始尝试在移动火炮中使用火药。火药的巨大威力在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入侵意大利时首次展现出来。装备了轻型机动青铜野战排炮的法国军队可以说是第一支现代军队，这种野战排炮发射出的是铁炮弹而不是石块，能摧毁它瞄准的每一座城堡，自此，一个新战争时代开启了。从此，城墙不再坚不可摧，城市再也无法依赖城墙保证安全。

磁罗盘是这个时期的另一项伟大的技术创新。和火药一样，罗盘也来自东方，因为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早已开始使用罗盘。但是，欧洲的罗盘更加先进。14世纪时，欧洲人在传统的罗盘上增加了一根悬浮针。这种磁罗盘在一个世纪后开始被广泛使用，到15世纪末，欧洲的水手依靠磁罗盘航行到了其他地区的人都无法到达的远方。磁罗盘不仅是一个工具，还传播了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激励人们冒险进入海洋，寻找未知的远方大陆。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和专家对地球的形状和大小有不同的解释，也提到其他大陆存在的可能性。从那时起，欧洲人掌握了更加先进的地理知识和制图知识。

1375年，一所位于马略卡岛的制图学校绘制出《加泰罗尼亚地图集》，这一版的地图有一个重大的改进：修正了印度的形状。那时的欧洲人给每个大陆命名——后来全球都知道了这些名字：亚洲（Asia）是希腊神话中俄刻阿诺斯王女儿的名字；欧罗巴（Europa）是阿革诺耳王女儿的名字；非洲（Africa）原是罗马人对突尼斯的称呼，从14世纪起，开始被用来指称整个非洲大陆。

1406年，托勒密的论文《地理学》被贾科莫·迪卡斯佩里亚翻译成拉丁语，“地球是圆的”这一观点逐渐被科学界接受。这篇文章还引发了关于“在已知世界之外有什么”的辩论。在这一领域特别有影响力的是法国宇宙学家皮埃尔·德·阿伊，他在1410年出版了《世界的样子》，支持世界不对称理论，并认为世界上有四大洲。这一观点在15世纪末开始广泛传播，涌现出一些相关的书籍。从此，许多欧洲的水手开始苦苦思索如何到达未知地域，以实现快速致富的目标，最终掀起了第一波远洋航行的浪潮，欧洲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

在15世纪，欧洲开始出现现代国家。这主要归功于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现代政治学之父。他曾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高级官员，也曾在罗马任外交官。1513年，他的巨著《君主论》出版。在被派驻罗马期间，马基雅维利目睹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及其儿子恺撒·博尔吉亚的野蛮统治，深受影响，并将其见闻反映到了这

部著作里。本质上，《君主论》是一本关于如何获取和巩固政治权力的指南。作为第一个政治领域的经验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表现为依据，提出建议："对君主来说，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更安全，但应避免被人憎恨。"[6]这些名言使这本书成为传世经典，从亨利八世到拿破仑、斯大林，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不仅阅读《君主论》，还把它当作指导自己事业的参考书。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历史上引起争论最多的著作之一，因为它的解读极为开放，令人无法确定它是对权力越位的讽刺，还是为潜在的国家治理者提供良方妙策，指导他们如何运用和行使权力。马基雅维利因为在书中为政治活动中的欺诈和不道德行为辩护而受到批评，但是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卢梭等哲学家都对这部作品钦佩不已，因为它描绘出了国家治理中的真实情景，并揭示出独裁的诸多缺陷。最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对现代政治理论做了两个重要贡献：首先，政治家及其决定对人民的生活有深刻影响；其次，他定义了国家这个概念，即在某一领土范围内，由一个政府统治的有组织的共同体。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并非是神定的结果，社会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人们认识到需要通过法律和条例来治理社区，确保公众利益不会受到个人野心或冲动的危害。

经济发展对欧洲在这个时期的转型起到了主导作用。如果没有银行家和富有慈善家的捐助，文艺复兴就不可能发生，无法开启这个创造美和人类知识体系迅速扩展的时代。13—15世纪，欧洲的金融界经历了重大转变，奠定了今天市场经济的基础。推动金融体系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些因素来自东方。斐波那契研究了阿拉伯数字，并把它引入《计算之书》，在1202年出版。此举将十进制计数法引入欧洲，用阿拉伯数字和十进制计算不仅比使用罗马数字更容易，而且还可以应用到商业簿记中。[7]

我们所知道的银行业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这一深受东方影响的贸易中心成为理想的世界借贷试验田。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塑造出西方文学中最著名的债主——威尼斯商人，一定曾受到这座城市的启发。在威尼斯，放贷人进一步发展了"信用"的概念，并基于此实现社会财富增值，变成银行家。现代银行业出现的一大障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谴责通过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行为。但精明的放贷人改用了一个更巧妙的方式来获取这份利益，他们把贷款利息称为"自由裁量权"，补偿放贷的风险。威尼斯首先出现了"银行家"这一称呼，因为他们在集市寻找顾客时，坐在桌前的长凳上（意大利语里"凳子"的发音与"银行"相同）。银行家和商人们很快开始使用热那亚通行的复式记账法记录借方和贷方明细，大大提高了会计的效率。这一方法后来被普遍使用。

有一个家族在经营借贷方面天赋异禀，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金融家族，这就是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最初在佛罗伦萨从事外汇交易和放债

生意，乔瓦尼·美第奇的客户中有几个红衣主教。在西方教会大分裂时期，乔瓦尼打赌说教皇会回到罗马。教皇马丁五世给了乔瓦尼回报，他任命乔瓦尼为教皇的银行家，打理教皇的金融业务。在整个15世纪，教皇需要更多的收益来加强权力和影响力。投资教皇的愿望和需求是一项极有利可图的业务，美第奇家族因此一跃成为意大利银行业的首富。在乔瓦尼把生意交给他的长子科西莫时，他已经在威尼斯和罗马设立了分行，后来又在日内瓦、伦敦和阿维尼翁开设分行。美第奇家族是第一个不通过战争、联姻、承袭获得贵族地位的家族，他们的路径是——商业。美第奇家族也是慈善事业的先驱，他们赞助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杰出的艺术作品，帮助营造出一种社会氛围，推动艺术和人文主义的蓬勃发展。

真正展现出金钱在现代社会中的力量的是雅各布·富格尔，他被称为全世界第一个现代资本家。富格尔的父辈是德国商人，经营纺织业发了大财，这佐证了在文艺复兴时期，金钱能够迅速改变社会地位。雅各布·富格尔比美第奇家族技高一筹，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国王查理五世的银行家。查理五世同时继承了西班牙的王位，是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众所周知，没有我，陛下您也许就得不到皇冠。”富格尔在写给查理五世的信中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说的话毫不夸张，他不仅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崛起提供了全部资助，而且还资助了从战争到城堡建设等各种巩固哈布斯堡家族权力的计划。就这样，富格尔创造出“主权债务”这种现代国家融资的基本工具，后来这成为众多政府领导人的噩梦。

富格尔可被视为最早的风险投资家之一——为有风险但也有潜在利润的想法提供资金，以换取这份事业的一定份额。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正是采取了这种融资方式。[8]富格尔与这些成功的生意人、航海家、探险家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对欧洲的崛起至关重要，正因为有这种合作，欧洲人才得以发现未知世界。

美第奇、富格尔等家族是通过金融手段成功跻身上流社会、获得权力的典型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各国人民都在学习如何在贸易或金融领域谋生，并通过金钱提高社会地位。金钱是一个伟大的平衡力量，不同的社会阶层通过它建立起简单的买卖或借贷关系，使封建制度（在封建社会，下层阶级几乎不可能提高地位）逐渐转变为由市场经济规则主导的社会制度。于是，欧洲越来越多的财富猎手不仅谋划在自己的国家赚钱，也特别渴望去闯荡世界、寻找财富、开拓新市场。最终，他们打开了新贸易路线，改变了欧洲的命运。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运动导致了一场对欧洲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宗教改革。1517年，维滕贝格的神学教授、教士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谴责天主教会的腐败行为。《九十五条论纲》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它批评教会推销赎罪券，路德称这“只是

一个赚钱的伎俩”，并提出了一些令教会不快的问题，比如教皇有多少基督徒的美德？既然只有上帝才能宽恕人的罪恶，教皇又怎么有资格宽恕人的罪恶呢？

《九十五条论纲》发表后成为禁书，路德被教皇逐出教门。然而对教会的批评声此伏彼起，宗教改革运动迅速传遍欧洲。各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和书籍使人们能够直接获得知识，开始独立思考，因此，宗教改革运动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当欧洲的一些君主开始支持新教时，就到了宗教改革的关键期。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宣布自己是英格兰的基督教教会领袖，拒绝服从天主教教会权威。不久之后，丹麦也效仿英国，不再服从天主教教会的领导。

宗教改革引发了教会分裂，这导致了长达100年的战争和迫害。基督教教派原来已有天主教和东正教，新教的兴起又增加了一个基督教教派。

自此，基督教不再是凝聚欧洲的一种力量。人们不再用基督教世界指代他们共同居住、生活的地域，而用欧洲这一概念替代，天主教、新教或新教的某个分支（以及东部的东正教）成为定义欧洲王国和国家的关键因素之一。宗教改革使北欧一些王国不再承认教皇，这对现代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订，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几个路德派诸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间的对抗。他们按照“国王裁定宗教”的准则缔结和平协议，正式承认每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权为其人民选择信仰。这一条约让信奉新教的统治者获得了权力和独立地位，对现代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信奉不同教派的国家之间的深度较量成为现代世界的重头戏。在信奉新教的北欧国家为脱离天主教而奋斗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对创造财富的渴望，节俭、勤奋之风开始兴起——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此定义新教伦理。为了对抗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开始自我改革和振兴，耶稣会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耶稣会由西班牙巴斯克的依纳爵·罗耀拉教士在1534年创立，其成员是天主教内部的精英，专注于教育和传教活动。在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耶稣会遍布世界各地，致力于传播基督教和教导年轻人。与此同时，新教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由于各国竞相获得权力和影响力，欧洲大陆深度分裂。它们不仅争夺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也抢占在其他地区的霸权（后面章节会详述），成为后来几个世纪里欧洲不断影响和改造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

科学革命对塑造现代世界观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哥白尼率先突破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框架，开启了现代的大门。

哥白尼1473年出生于普鲁士，这位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终其一生

都致力于证明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不是人们一直认为的地球。1543年，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出版，科学界与宗教界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斗争由此展开。数十年后，博学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把哥白尼提出的模型和科学思想发展到新高度，伽利略因为捍卫哥白尼的理论被天主教宗教法庭判处软禁，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继续自己的非凡事业，伽利略被誉为“天文学之父”，他还是最早使用反射望远镜的科学家之一，并用自己制造的反射望远镜来观察恒星，他也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破性贡献。

英国科学家牛顿将这场科学革命推向高潮。牛顿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巨著，提出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其后300年，被物理学界奉为真理。除了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这三位科学革命中最知名的人物之外，在整个17世纪，还有许多人物在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化学和地质学等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

这个时代的欧洲科学家也为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做出了贡献：既然宗教和科学不能互容，那就必须分开。这一原则还延伸到国家事务和政治领域，最终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特点。

这一时期，欧洲开始出现第一批科学院，传播自由、独立思考的观念。第一家科学院创建于1652年，是德国利奥波第那科学院。接着，英国皇家学会在1660年创建于伦敦；1666年，法国科学院成立。如果没有在17世纪哲学思潮中产生的新科学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之父培根是这种科学方法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认为科学必须以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作为理论的例证。这种想法在现在看来很寻常，但在当时非常前沿。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将理性作为检验知识的主要依据。《方法论》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他开辟了探索真理的新途径。笛卡儿提出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成为西方世界每个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内容，是“无可争议的真理”的例证。这让笛卡儿获得了“现代西方哲学之父”的称号。

哲学家奠定了现代科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的基础，其他一些人则在构想新政府形式，这对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516年，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书中虚构了一个拥有完美政府形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财产为人民所共有，无论男女都能接受教育，政府能宽容所有宗教。《乌托邦》是16世纪中叶欧洲的畅销书，这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探索理想的政府形式，这样的探索在西方国家一直延续至今。莫尔首次构想出一个没有私人财产的社会模式。

100多年后的1651年，另一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利维

坦》问世。霍布斯在书中为专制制度辩护。在英国内战期间，霍布斯目睹和经历了各种混乱和恐怖。受此影响，他认为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是缺乏强大政府的后果，所以他认为国王应该行使权力，而且应该没有任何限制，这样才能统治人民。他用利维坦（“一种威力无比的海兽”）来比喻专制国家，并把专制视为防止战争和保障社会稳定的唯一解决方案。尽管信奉个人自由的人很不喜欢这本书，但是霍布斯的这部著作孕育了社会契约理论，因此他也被视为政治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当哲学家们思索理想社会形态和国家的作用时，一些作家开始摆脱思想束缚，释放想象力，写出文学名著，欧洲的国家文学开始出现。意大利文学是文艺复兴的另一个伟大产物。但丁率先使用方言写成其代表作《神曲》。从那以后，作家们开始使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拉丁语写作。在新型印刷技术的推动下，16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国家文学的全面繁荣。通俗文学的流行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特征。诗歌和戏剧是最受欢迎的文学体裁，英国的克里斯托弗·马洛、莎士比亚以及法国的莫里哀、让·拉辛都在文学领域取得了极大成功。回忆录和传记也很受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个人主义。1566年，佛罗伦萨艺术家本韦努托·切利尼的《切利尼自传》出版，形成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很能打动读者：简述一个人的生活，并阐释其意义。从那时起，很多名人会留下肖像供后人缅怀，更聪明的人则会写回忆录。

1604年，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出版，并立即取得了成功，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很多语言。《堂吉诃德》是一种新文学体裁——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最终成为现代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杰出的小说是欧洲对世界现代思想造成影响的重要载体。

在科学革命的背景下，欧洲开始了军事革命。结果，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知识大大发展，使它们得以在20世纪之前称霸世界。技术进步大大改善了火药武器和其他军事工具。瑞典在火炮技术方面独占鳌头；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法国的步兵装备了刺刀，法国军队继而获得了压倒性优势；英国重点提高其海军能力，最终称霸海洋。英国船只继承了西班牙大帆船的设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英国船只更快更轻，还有充足的空间可以携带更重的枪炮。英国造出了第一批大型战舰，其竞争对手纷纷效仿。

技术革新带动了军事技术的根本性变革。长矛等武器被箭和步枪取代，火药成为决定一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武器，欧洲的军队规模大幅增长，1600—170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军队的规模增加了5倍有余。[9]

如果没有财富的增长以及更强、更高效的国家机构，就不可能有如此大幅度的军队规模的增加。军队需要资金支撑，因此国家必须在更广的范围内

征税。军方的迫切需求既促进了欧洲国家现代政府组织的形成，也催生出常设议会，因为君主需要向贵族和教会说明征税和战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军事革命就以这种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国家的诞生。

17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够在整体上获得巨大的武器优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这一时期，这个大陆只在1669—1671年这三年里没有发生战争，在其余时间里，大多数欧洲民族都在交战，而军事创新和军队规模能够决定战争的输赢。17世纪末，欧洲哪个国家的军队最强？这很难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欧洲国家的军队比其他文明地区的军队强得多。这种实力在1683年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围攻维也纳时得到充分展现。在这场战役中，波兰和德国的6.8万人的联合部队毫不费力地击败了土耳其人的15万大军。在1697年9月11日的森塔战役中，2万多土耳其人战死，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扩张的野心。304年后，臭名昭著的“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实施恐怖袭击，这绝非巧合，因为恐怖分子希望在这一天重创西方霸权。

文艺复兴改变了欧洲的命运，使它从一个相对落后、内向、忙于抵御来自东方或南方入侵的文明发展成一个能够自我保护、成就斐然，向全世界扩张的文明。

13—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把个体视为社会的中心，激起了人们无止境的好奇心，最终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现代思想应运而生，欧洲涌现出前所未有的知识创新潮流和创造性，这使欧洲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都一骑绝尘，无人可比。

市场经济、国家和知识型社会是文艺复兴的三大产物，欧洲人凭此获得了领先于其他文明的优势。这一切导致欧洲在15世纪中叶进入了地理探索的新时代，而正是因为1492年一个意外的地理发现，欧洲强国的权力和影响力扩张到了它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

---

[1] Norman Davies，*Europe: A History* (Oxford，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 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意为“阿拉伯西方”，原指非洲西北部一带，后来成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的代称。——编者注

[3] John Keay，*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2008).

[4] Jacques Barzun，*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A Cultural History of Europe* (St. Louis: Turtleback Books，2001)

[5] 卡斯提尔王国，中世纪时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欧洲王国，1479年，卡斯提尔王国与阿拉贡王国统一为西班牙王国。——编者注

[6] Niccolò Machiavelli，*The Prince*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2011).

[7] Niall Ferguson，*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2008).

[8] Greg Steinmetz, *The Richest man who Ever Lived: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cob Fugger* (New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9] Geoffrey Parker，*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 1800*(Cambridge，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第二章

有多远走多远

地理大发现奠定欧洲霸权的基础

1492年10月12日，三艘卡拉维尔帆船在哥伦布的率领下从欧洲出发向西航行，经过漫长的69天后，哥伦布与船员登上一座无名岛，他们欣喜若狂，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路线，他们追逐的名望和财富梦马上都能实现了。其实，哥伦布的发现远比他以为的重要，因为他找到的并不是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路线，而是一个新大陆。

在世界历史上，像发现美洲的这个日期这样具有深远意义的日子寥寥无几。发现新大陆开启了欧洲的扩张时代，欧洲将在后来的几个世纪内独享世界霸权。这个日期还标志着近代的开始——欧洲在这个时代奠定了现代全球文明的基础。

哥伦布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非凡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他的智慧、毅力和知识，也归功于卡斯提尔王国的支持。卡斯提尔国王胸怀开疆辟土的大志，敢于支持这位意大利热那亚水手提出的诱人而极具风险的计划。可见，发现新大陆的背后是治国才能、互利互惠、技术创新和人类的好奇心等因素的相互叠加与影响，这是由文艺复兴这个非凡的时代带来的。但是，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其他文明首先发现了美洲这样一个辽阔的大陆呢？

和其他大洲相比，欧洲幅员不算辽阔，动植物和矿产资源也不算丰富。但是，欧洲拥有一项很重要的资产，平衡了这些明显的地理劣势，使欧洲能够争夺世界霸权：欧洲在航海方面有悠久的传统，超过其他所有文明。从古代起，欧洲有许多民族就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海地区生存和繁衍，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以及阿拉贡、葡萄牙等王国的繁荣都是海上贸易网发展的结果。数百年来，这些地区的人民一直在地中海及附近海域航行，以此为生。到15世纪，许多欧洲民族都渴望进一步向外拓展。因此，地理大发现注定在欧洲发生。

小小的葡萄牙王国一马当先，成为欧洲扩张运动的先行者。论繁华和强盛，葡萄牙比不上法国、英国或任一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国，但是葡萄牙具有更高的统一性和凝聚力。葡萄牙西部是绵延的大西洋海岸，南部比其他王国更靠近非洲海岸。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葡萄牙能够率先开启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还拥有悠久的航海传统，15世纪时其造船和航海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卡拉维尔帆船正是葡萄牙人的发明，这种船更轻，机动性更高，速度更快，能让水手们到达更远的地方。在若昂一世统治期间，葡萄牙在1415年率先进入非洲，占领了非洲北海岸的休达，并在那里建立了

定居点。葡萄牙希望这块毗邻直布罗陀海峡的战略飞地能够加强自己与热那亚、威尼斯等地中海商业城市对峙的能力。此后不久，葡萄牙在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岛等岛屿建立了以农业为主的殖民地。而这只是一个浩大的扩张进程的开始——葡萄牙还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建立定居点，拓展欧洲的地平线，彻底改变葡萄牙和欧洲的命运。

葡萄牙之所以能够崛起，主要得益于若昂一世的儿子亨利王子的锐意进取。他常被称为航海家亨利，尽管他几乎从未离开过葡萄牙。亨利王子是现代欧洲皇室成员的典型代表：他有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血统，还拥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良好教养，他爱国并且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同于寻常的欧洲皇室成员，亨利王子对不能吸引统治家族的商业世界异常感兴趣。他以一个现代商人的热忱支持葡萄牙在世界各地的探险扩张活动，比如他资助了去往亚速尔群岛以南的远征航行，这主要出于商业考虑，他想从香料贸易中获利，寻找新贸易路线。同时，远航也有宗教和战略的考虑，亨利王子想了解伊斯兰世界到底有多大，希望把它们都变成基督教王国，并找到能够结成同盟的基督教王国。

1434年，葡萄牙人成功到达非洲西部的博哈多尔角附近；1444年，努诺·特里斯唐抵达塞内加尔河；不久之后，迪尼什·迪亚斯占领了佛得角这一非常重要的殖民地。随后，亨利王子得到教皇的批准，被承认享有葡萄牙发现的所有土地的主权。

葡萄牙的海上探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还得到了教皇的认可。所以，在1460年亨利王子去世后，葡萄牙王室继续大力支持探索项目。

1469年，被称为“非洲人”的阿方索五世将贸易和开采权授予商人费尔南多·戈麦斯，条件是他每年必须开拓100里格[1]的领土。戈麦斯履行了承诺，于1470年抵达加纳黄金海岸。1481年，迪亚哥·德·阿赞布若向非洲西海岸出发，并在那里建立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陆的第一个殖民地——圣豪尔赫·德·拉米拉。有两名水手参加了阿赞布若的这次航行，几年后他们的名声远远超过了阿赞布若，他们就是迪亚士和哥伦布。在阿赞布若之后，迪奥戈·康完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穿越非洲之旅，他深入这个未知的黑暗大陆的核心地带，来到刚果河河口，在今天的安哥拉首次与遥远的刚果王国建立了联系。就这样，葡萄牙在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开始形成。[2]

1487年，葡萄牙水手迪亚士立下了欧洲探险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他成功穿过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成为开拓这条路线的第一人。因为缺水以及在漫长旅程中接连不断的恐怖经历，迪亚士不得不放弃前进并返航，他未能到达他的目的地印度，但是他在1488年以凯旋的姿态回到里斯本，给葡萄牙王室带去了他开辟了从非洲大陆南端直通印度的新航线的好消息。[3]

葡萄牙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捷足先登，其近邻卡斯提尔王国也迅速跟进，依靠航海家的超强本领，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哥伦布。

哥伦布是谁？他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伟人，他的发现还深刻影响了后代，启发了大量文学作品的创作。他自己也留下了几部关于远航的著述。然而，关于哥伦布一生中的某些阶段一直存在争论，包括他的出生时间和地点。他的儿子费迪南德在撰写他的传记时并未说明他的出生地点，这引发了多种猜测。欧洲有几个民族都称哥伦布是他们那里的人，有的说哥伦布来自马略卡岛，有的说是加泰罗尼亚，有的说是希腊，甚至还有的说是法国、苏格兰、波兰，还有相关资料说他是犹太人。但是，几位最有声望的哥伦布传记作家都认为他在1453年出生于热那亚的一个下层家庭。[4]作为一个织布工的儿子，哥伦布虽然学习热情很高，却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有宏大的梦想，他想要给那个时代留下深刻印记，所以他决定做水手，因为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仅有的几个能让他爬上更高社会阶层并实现梦想的职业之一。

哥伦布记述说，他“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航行”，因此，到30岁时，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南到几内亚海岸，北到冰岛，他都留下过足迹。和同时代的许多水手一样，他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大西洋的西边有什么？他对地理学兴趣浓厚，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揭开世界奥秘的一个途径。

哥伦布熟知关于地球形状的科学理论，这是当时的水手们在港口附近的小酒馆见面时经常谈论的话题。哥伦布深受皮埃尔·戴利的《理想世界论》的影响，这本书支持“世界是不对称的、世界上有四大洲”的论点。凭借这些知识与作为水手的直觉，哥伦布得出一个结论：向西航行可能可以到达亚洲海岸，更确切地说，可以到达当时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国”的日本。

在筹划了一个大胆、冒险的计划之后，哥伦布需要找到愿意资助他实现这个计划的国家。那时的水手和艺术家在寻求经济援助方面并没有对国家的限制或偏见。欧洲的大国都能够赞助这一发现之旅，因为它们都有扩张的企图，也有非常相似的文明理念，并且都想将这一理念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主要的赞助国有葡萄牙、卡斯提尔、法国和英国。葡萄牙是航海时代的先锋，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海上强国，因此找葡萄牙资助，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于是，这位热那亚水手前往位于里斯本的葡萄牙王室，却被若昂二世拒绝了——他认为哥伦布对这一高风险项目要求的回报太高。在与葡萄牙王室谈崩之后，哥伦布开始考虑获得其他王室资助的可能性，他甚至还想到了他的出生地热那亚，但是他最后把眼光投向了葡萄牙的近邻——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卡斯提尔王国，这不仅因为卡斯提尔王国紧挨着葡萄牙，更因为它的国王是年轻而富有智慧的伊莎贝拉女王，她与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国王联姻，雄心勃勃，渴望扩大疆域，因此哥伦布认为她支持自己计划的可能性很大。

哥伦布来到卡斯提尔王国，这位眼光远大、语气傲慢的外国人一开始没能打动卡斯提尔王室，然而，他的坚持不懈最终让他得偿所愿。1492年，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军队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块穆斯林的领土。不久之后，哥伦布被召唤到格拉纳达这个穆斯林皇宫所在的城市，在那里，伊莎贝拉女王决定接受这个热那亚水手提出的计划，尽管她的顾问团都以缄默表示反对。伊莎贝拉女王答应了哥伦布的所有要求：在被征服的地区，授予哥伦布将军头衔和总督职位；哥伦布和他的后代获得所得利益的10%（他最初要求25%）。虽然哥伦布的要价不低，但必须考虑到，在这一冒险之旅中，他和他大多数的跟随者都投入了自己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

为什么伊莎贝拉女王决定支持哥伦布呢？攻克并夺回格拉纳达带来的巨大成就感一定是影响因素之一，在这一场胜利之后，女王征服新土地、扩张王国、传播基督教的梦想开始膨胀。如果哥伦布的航行能够成功，卡斯提尔获得的利益将非同小可，因此，尽管顾问团不赞成，这个天主教王国的女王还是做出了决定：值得冒这个险。

另一方面，资助哥伦布的航行对卡斯提尔王室来说并不构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虽然有传言说伊莎贝拉女王为此典当了一些珠宝，但是事实是，资金并非来自王室金库，而是来自船主比森特·亚涅斯·平松和他的兄弟们。平松兄弟不仅为这次伟大的冒险之旅提供了资金，而且亲自参加了航行。比森特·亚涅斯·平松是“平塔号”的船长，这是组成哥伦布船队的三艘帆船之一。

至于船员，哥伦布很难找到志愿者参加如此危险的航行，由于这是探索之旅，所以也不允许征用士兵或招募民众。最终，王室承诺监狱里的囚犯，如果参加这次高风险的航行，就赦免他们的罪行。就这样，哥伦布在囚徒中招募到了帮手。

1492年8月3日，三艘名留史册的帆船从安达卢西亚的帕洛斯港启航。哥伦布有记录航程的习惯，这使我们得以了解这次漫长的发现之旅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哥伦布内心的想法和恐惧。[5]在大西洋航行了几周之后，哥伦布遇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期：一些船员开始不满和抱怨，他们担心这个外国指挥官带他们驶向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死亡。有好几次哥伦布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以防止船上发生暴动。船员们的担忧无可厚非，因为哥伦布是基于直觉以及他自己理解的、尚未被证实的科学理论拟定的航行路线。

同年10月12日，哥伦布和他的船队终于看到了陆地——这片陆地后来被称为新大陆。他们很快登上了这一即将改变欧洲命运的大陆。那是一座位于今天巴哈马群岛的小岛，被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据历史记载，正是在这

座小岛上，欧洲白人和美洲大陆的原住民首次相遇。从那时起，美洲的原住民开始被称为印第安人，因为哥伦布坚持认为自己到达的地方是印度。

在最初的三个月里，哥伦布探索了他发现的这片土地。他将一座岛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现在这座岛上有两个国家，多米尼加和海地），并在那里建造了拉纳维达堡（意为圣诞节城）。这是欧洲人在新大陆建立的第一个定居点。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凯旋，返回西班牙南部的帕洛斯港，不久后，他在巴塞罗那被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接见。哥伦布带了几个印第安人，几只鹦鹉和一些黄金珠子到王室，证明他到达的地方能够带来非常可观的财富。哥伦布回到欧洲后，他发现新大陆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西欧。不过，关于哥伦布探索的范围有很多争议。在王室成员中，有几个人认为这个热那亚水手不过是发现了加那利群岛西部的几个岛屿，算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尽管如此，对伊莎贝拉女王来说，哥伦布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她兑现承诺，给予了哥伦布当初要求的所有奖励。哥伦布的发现让他那些关于财富、光荣以及建立强大家族的梦想都一一实现。

1493年9月25日，哥伦布第二次开启了去往新大陆的航程。这次这位海军上将的航行路线偏南了一点，最终到达了今天委内瑞拉的海岸，并穿越了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奥里诺科河是美洲最大的河流之一。哥伦布被这看上去无边无际的陆地深深震撼，在8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下了人类探险史上最重要的一句话："我相信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无人知晓的大陆。"[6]虽然他仍然认为此前发现的岛屿属于亚洲，但是在航行经过委内瑞拉辽阔的海岸之后，他得出了结论：他到达的是一个新大陆。

在伊莎贝拉女王的授权下，哥伦布后来又两次启程前往新大陆。在1502年的最后一次航行中，他来到中美洲的地峡，又从那里前往位于今天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之间的维拉瓜省。这个地区金矿资源特别丰富，他计划多带一些贵重金属回西班牙，以说服所有反对他的人，让他们相信新世界光明的财富前景。但是热带气候阻挡了他的归途，风暴使这支探险队的一些成员再也没能踏上这个前途无量的大陆，有一艘船失踪，船队在牙买加沿海海域遭遇海难。此外，哥伦布还不得不击退岛上原住民的袭击，解决船员暴动的问题。尽管千难万险，哥伦布仍然探察了美洲中部和北部的海岸，证实了从今天的洪都拉斯到巴西之间是一片广袤的陆地。所有这些都再次验证了他的结论：他发现的是一个新大陆。

在完成最后一次新大陆之旅，返回西班牙后不久，哥伦布于1506年去世。那时，他已经很富有，他的家族也已成功跻身卡斯提尔王国的贵族阶层，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地理发现没有得到充分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地理发现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20世纪初，哥伦布抵达美洲的日期10月12日，被正式定为西班牙国庆日，以此向这位改变西班牙命运，使

西班牙变成全球性帝国的英雄致敬。早在西班牙之前，有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一直将10月12日定为“比赛日”，并举行庆祝活动，后来更名为“西班牙语节”。不过，在拉丁美洲的许多民众看来，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这一天并不值得纪念。委内瑞拉在2002年将这一天更名为“人民抵抗纪念日”，以纪念当地人民对哥伦布带来的欧洲殖民行为的抵御。

在北美洲，美国每年都会在“哥伦布日”纪念这位来自热那亚的航海家，意大利裔社区的庆祝活动尤为热烈，一个热那亚人发现了美洲，他们为此感到自豪（还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哥伦比亚）。然而，由于我们稍后会提到的一些原因，美洲大陆的名字并非源自热那亚的航海家哥伦布，而是源自佛罗伦萨的冒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尽管他作为水手和探险家的天赋都远不及哥伦布，而且晚了好几年才到达新大陆。最近有些人企图诋毁哥伦布，把屠杀美洲原住民的罪名推到他头上，但是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是，哥伦布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远见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奠定了当代全球化的基础。

发现美洲后，西班牙获益颇丰，葡萄牙也不甘其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一个决定激怒了葡萄牙国王：教皇认可了卡斯提尔王国对新大陆的主权，但葡萄牙国王认为葡萄牙才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领航者。为了结束这两个伊比利亚王国之间的争端，1494年6月7日，《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签署，确定了亚速尔群岛和伊斯帕尼奥拉岛之间的分界线，并规定这条分界线以西的地区属于西班牙，分界线以东的地区属于葡萄牙。就这样，新大陆的主权归属被教皇认可，形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新大陆的双寡头格局。葡萄牙不仅得到了新大陆的许多领地，而且有一个葡萄牙人在1498年又有一个新发现，其重要性几乎能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对东西方文明的关系来说尤为重要——他发现了绕过非洲边界去往印度的航线。

1497年7月8日，一位名叫达·伽马的水手开始了历史上最令人神往、最重要的一次航行。达·伽马大约在1469年出生于具有伟大航海传统的城市锡尼什，他的父亲很有影响力，向当时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提出了航行到印度的计划，达·伽马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这项任务。

达·伽马率领4艘船从葡萄牙出发，在海上航行了96天，这创造了当时的纪录，这期间他没有看到任何陆地，终于，在1497年11月7日，达·伽马到达了南非海岸，他把眼前的海域命名为圣赫勒拿湾。1499年1月，达·伽马成功驶过险象环生的好望角，他的运气比迪亚士等先行者更好，他带领船队从那里驶入此前欧洲人完全不了解的水域。今天的纳塔尔正是达·伽马在圣诞节驶过其海岸时取的名字。

1498年3月2日，达·伽马的船队抵达莫桑比克。达·伽马惊奇地发现那里的人是混血儿，而且说阿拉伯语。一个月后，达·伽马一行到达今天肯尼亚的

蒙巴萨，但是那里的原住民非常敌视他们，他们不得不赶紧离开，船队沿着海岸一路向北，直到4月23日抵达马林迪。这个宁静小镇的建筑都是白色的，当地的首领（被当地人称为raja）在海港欢迎了他们，作为回报，达·伽马热情邀请他检阅葡萄牙船队。在马林迪，达·伽马一行发现了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人，对兼职传教的他们来说，这是振奋人心的事。

接着，达·伽马的船队从马林迪驶向阿拉伯海，经过3个星期漫无边际的海上航行，达·伽马和他的船员们成为有史以来首批看到印度次大陆西南海岸的欧洲人。[7]

在航行了整整10个半月后，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船队在卡利卡特下锚，他们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上等种姓家族奈尔斯（Nairs）也参加了盛大的列队欢迎仪式。达·伽马很快被卡利卡特的最高统治者接见，达·伽马代表曼努埃尔国王送给扎莫林王室几件礼物，包括布、帽子、几桶油和一木桶蜂蜜，但这些礼物并没能吸引卡利卡特的统治者及其随从。在达·伽马到达印度之后的几百年里，初到亚洲的欧洲人都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西方产品并不受亚洲人青睐。印度人要求达·伽马用通用货币黄金支付关税，达·伽马觉得受到了冒犯，从此与当地人的关系紧张起来。虽然与卡利卡特开展贸易关系的谈判并不顺利，但是离开印度时达·伽马还是很满意，因为他发现印度市场很有前途。

达·伽马的船队用132天回到了里斯本，这一段旅程极其危险和艰难，夺去了近一半船员的生命。当他们最终回到葡萄牙时，不仅带回了找到通往印度航线的好消息，而且他们带回的货物价值超出远征成本好几倍。达·伽马和哥伦布一样得到了回报，他获得了印度洋海军上将的头衔。[8]达·伽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葡萄牙完成了从王国到帝国的蜕变，使葡萄牙明确了自己在全球的力量。从那时起，曼努埃尔国王的称号就改成了“葡萄牙—阿尔加维联合王国国王、几内亚之王，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者、领航人和商业之王”。

在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航线之后，葡萄牙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在这些遥远的土地上建立第一批定居点。1500年3月9日，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由13艘船组成的新船队前往印度，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担任队长，不过他此行的使命不是探险而是征服。与卡布拉尔同行的有航海家迪亚士，他负责在今天莫桑比克境内的索法拉建立商业定居点。由于一些意料之外的原因，这次远征的结果与预期完全不同，在欧洲的扩张史上造成了深远影响。卡布拉尔最初决定向西南方向航行，但是洋流和一场巨大的暴风雨让他偏离了航线，1500年4月22日，他无意中来到美洲大陆海岸的一个未知地区——卡布拉尔把它称为韦拉克鲁斯。[9]卡布拉尔的船队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这些居民还帮助他们探索了这一地区，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结果令卡布拉尔很沮丧，他们重新调整航线驶向了

印度。卡布拉尔并没有重视他这一载入史册的发现，只是派出一艘船回到里斯本，报告有韦拉克鲁斯这个地方。

1501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佛罗伦萨航海家和商人亚美利哥航行前往卡布拉尔发现的海岸。亚美利哥在1492年移居到当时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塞维利亚，在那里他获得了他一生中的绝好机会：前往新世界。[10]亚美利哥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他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完成哥伦布未竟的事业，即找到去往印度的西部航线。1499年，亚美利哥搭乘西班牙征服者阿隆索·德·奥赫达船长的船前往新大陆。在这次航行中，他们到达了现在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海岸，发现当地人的小屋都建在水上。亚美利哥想到威尼斯，就说服奥赫达把这片土地命名为委内瑞拉，意为小威尼斯。

亚美利哥此前已经成功完成了卡斯提尔国王指派的多项航海任务，是一个拥有良好声誉的航海家，这次应葡萄牙国王的征召，他将完成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使命。1501—1502年，亚美利哥乘船沿今天的巴西海岸航行，直至抵达西班牙人曾到过的拉普拉塔河。这个佛罗伦萨人写道："除了一望无际的腐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回到里斯本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他曾效劳过的美第奇家族，信中说，他远征时穿越的地方是一个新大陆。

亚美利哥在这封私人信件里的话深深影响了新大陆的历史，因为这封信被传到地图制作人马丁·瓦尔德泽米勒手里，他在1507年出版了新的世界地图，航海者们最新的发现都被描绘其中。瓦尔德泽米勒认为这个新大陆应该被称作亚美利哥（America），以纪念那个确定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的人。[11]他不希望减损哥伦布的名誉，但是哥伦布曾一度认为自己发现的地方属于亚洲，而不是像亚美利哥那样认为那是一个新的大洲。几年后，事实更加清晰了：哥伦布和亚美利哥发现的显然是同一大陆的不同地区。于是，瓦尔德泽米勒想纠正这个命名的错误，在1513年出版的地图里，他想把新大陆更名为"未知世界"，但为时已晚，因为亚美利哥这个名字已经在大西洋两岸传开，尽管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仍然用新世界或印度来指称新大陆，但是大多数西方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们都把这片新大陆称为亚美利哥。就这样，亚美利哥名扬天下——不是因为他在探险方面的成就，而是得益于宣传的力量。

在欧洲商人眼里，新大陆东海岸盛产的巴西红木（因今天的巴西而得名）特别有吸引力。1503年，有6艘船在贡萨洛·科埃略的率领下从里斯本起航前往美洲，亚美利哥担任其中一艘船的船长，船队中有两艘船在返航时装满了这种美丽的硬红木。后来这种木材在旧大陆（即欧洲）越来越受追捧。

尽管巴西红木生长在葡萄牙的领地内，但其贸易并没有被葡萄牙垄断。在

第一艘葡萄牙船只抵达美洲的同时，一位名叫保罗米尔·德贡尼维尔的法国人和卡布拉尔一样意外到达了巴西海岸，运了一船这种令人垂涎的硬木回到法国。他的成功激发了许多欧洲商人向这个地区派出探险队，他们大多从翁弗勒尔港和迪耶普港出发去往巴西。就这样，法国人开始进入巴西，怯生生地开始了其海外扩张。

尽管欧洲对巴西红木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葡萄牙对自己的美洲领地关注很少，总认为那里远不如亚洲重要。但是，当法国船只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巴西海岸时，葡萄牙国王改变了主意：为了捍卫领地，必须发展美洲的殖民地。

1526年，一个由6艘军舰组成的葡萄牙航海队从里斯本出发驶往美洲，在靠近巴西海岸时，它们击沉了3艘法国船只。5年后，另外5艘船在马丁·阿丰索·德索萨的指挥下启航，在伯南布哥建立了欧洲最早的殖民地之一。就这样，葡萄牙最大、最宝贵的殖民地——巴西的历史正式开始了。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率先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建立定居点，继而扩大在美洲大陆上的地盘。西班牙征服者最著名的冒险之旅即将在美洲大陆上展开，一群勇士不仅为其王室征服了大片的土地，还继续开拓探索，获得了许多非凡的新发现。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就是这群勇士中的一个。

1501年，巴尔沃亚移居到西班牙在美洲的第一个大殖民地——伊斯帕尼奥拉岛。1509年，他决定参加前往新安达卢西亚（位于现在的哥伦比亚）的探险。出色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使他很快成为探险队的领导者之一。到达美洲大陆后，巴尔沃亚多次带队击败当地的原住民，在美洲大陆上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殖民地——圣玛丽亚，他还被任命为维拉瓜的市长和总督。但是他更愿意做一个征服者，而不是一个统治者。1513年，他率领探险队再次远征巴拿马地峡，去寻找黄金和能够建立新殖民点的地方。

巴尔沃亚到达某地时，听说向南还有另一片海，那里可能有很多黄金。于是，他在1513年9月1日带领190个西班牙人和几个知道那个地方的原住民踏上了征途。9月25日，他爬上一座山，想从高处更清晰地观察那个地区，到达山顶时，他第一次看到了那片此前欧洲人完全不了解的海域。3天之后，他和其他探险人员一起登上海滩，代表卡斯提尔王国占领了这片无名的海域，并将其命名为“南海”。

这一发现拉开了欧洲人探索太平洋的大幕。在这次探险中，巴尔沃亚还发现了一些地方有黄金，他把这些地方命名为珍珠群岛。1514年1月，巴尔沃亚带着大量的战利品回到圣玛丽亚，并派遣一名特使带着许多财宝返回西班牙，向西班牙王室报告发现新海域的消息。

发现新海域的消息促使查理五世又派出了一支由1 500名男子和17艘船组成的远征队，这是当时被派往美洲的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探险队。同时，查理五世还委任远征队的总指挥佩德罗·阿里亚斯·达维拉（通常被称为佩德拉里亚斯）为新殖民地的总督。

巴尔沃亚听说自己将不得不服从新总督，非常失望。不过西班牙王室决定奖励他的杰出成就，授予他“南海”司令和巴拿马—科布总督的荣誉头衔。

在西班牙征服者之间，通过消灭对手巩固自己权力的情况并不鲜见。佩德拉里亚斯从一开始就不信任巴尔沃亚，他派出一小队人马，在士兵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带领下以叛国罪和图谋在“南海”建立独立政权的罪名逮捕了巴尔沃亚，并判处他死刑。“我忠诚为国王服务，只想为他扩大领土”，巴尔沃亚在被行刑时大声喊道。[12]这个发现了太平洋的欧洲人就这样惨淡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面章节将谈到，在巴尔沃亚死后，皮萨罗因征服印加帝国而名留史册。）

在除去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后，佩德拉里亚斯在1519年8月15日建立了巴拿马城，这里成为西班牙殖民地。尽管他恶毒地结束了巴尔沃亚的生命，但仍然追认巴尔沃亚为总督。无论怎样，历史给予了巴尔沃亚应得的回报——他被当作一个伟大的发现者为人所铭记，在巴拿马尤其如此，他的名字被刻在巴拿马的街道、纪念碑甚至官方货币上。

与此同时，寻找通往亚洲的西部航线仍然是地理大发现时代一个未实现的目标。最终，西班牙和葡萄牙以特殊的方式联合起来，一起实现了这一目标。1518年，葡萄牙船长麦哲伦构想出一个航行计划，想寻找能从大西洋通往“南海”的海峡，然后从那里去往盛产香料的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但是麦哲伦和葡萄牙国王关系不好，所以他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得到了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率领5艘船和约250名士兵出发。[13]巴斯克[14]水手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担任航海长。麦哲伦的船员中有15个葡萄牙人，有1/3不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国王提供了超过80%的探险费用，所以这次航行可以视为西班牙王室的风险投资，而西班牙国王提供的费用大多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黄金。

在驶向南大西洋的漫长航程中，麦哲伦花了很大力气平息了一次暴动。终于，他驶过美洲大陆的南部海岸，进入了一个后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穿过这个风急浪高的海峡后，他在9月28日驶入一片风平浪静的海域，麦哲伦欣喜万分，把这片海域命名为太平洋。

麦哲伦带着船队继续前进，驶过今天的智利海岸，然后转向西北，去探索未知的太平洋。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地狱之旅，因为他们淡水用尽，粮食储备不足。幸运的是，他们最终在1521年3月成功抵达日本南部的马里亚

纳群岛。30年前哥伦布的梦想就这样被麦哲伦实现了。在马里亚纳群岛休整恢复后，麦哲伦的船队又驶向后来被称为菲律宾的群岛。在其中一座岛上，麦哲伦与祖布国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使他变成了基督徒。为了让祖布国王高兴，麦哲伦答应帮他对抗邻国部落。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决定，因为麦哲伦的慷慨承诺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部落交战中麦哲伦被敌方杀死。不过，麦哲伦的行为证明了欧洲对外扩张并非只会给当地人带去灾难，而且欧洲人也不是只顾念自身的利益。

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接过麦哲伦的职责，成功完成了这次航行，但船队付出了很大代价。船队启航时共有5艘船，回师西班牙南部加的斯港时只剩下一艘。那天是1522年9月6日，船上只剩下18名船员。西班牙国王亲自给这些巴斯克水手颁发徽章，徽章上地球的下面刻着一句铭文——“你是环行地球的第一勇士”。环球航行这一伟大的壮举终于证实了“地球是圆的”这一理论，欧洲通向太平洋的航线终于打通了！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声夺人，甚至是在教皇的认可下瓜分了美洲。对此，欧洲其他竞争对手的反应是什么呢？虽然那个时代的通信条件很差，但是哥伦布的几次航行以及卡斯提尔王国和葡萄牙发现新大陆和新航线等消息还是很快传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些消息在西欧各港口的水手之间口耳相传，各王国的大使、特使和间谍也各司其职，上报可能会威胁到其王国利益的卡斯提尔王国和葡萄牙的扩张计划。新世界激发了所有欧洲强国的航海家、财富猎人、君主和政治家的想象力。于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王国很快就在其探险和殖民活动中遇到了竞争对手。

和西班牙帝国一样，英国、法国的扩张最初也和意大利航海家有关。这毫不奇怪，因为在发现新大陆这一成就中，做出最重大贡献的都是意大利人。几百年来，热那亚、威尼斯等城邦国家的公民在地中海的贸易活动中创造了财富，他们拥有不同凡响的、代代相传的航海传统和强大的开拓精神。但是从15世纪后期开始，开发新市场的机会不再在地中海，而是在大西洋，向外寻找新贸易路线的计划必须有大西洋强国的支持才能完成。这就是为什么哥伦布、亚美利哥等意大利航海家都要接近西欧王室，因为只有它们具备从大西洋向外扩张的能力。

乔瓦尼·卡博托（或称约翰·卡博特）和哥伦布很相似。他在1450年左右出生，目前尚不清楚他的出生地是热那亚还是加埃塔。在很年轻的时候，卡博托搬到威尼斯，开始做生意。后来，他在15世纪90年代移居到瓦伦西亚，在那里听说同乡哥伦布的壮举后，决心投身航海事业，立志要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更快捷的航线，那时已经发现的北部航线路程十分遥远。

但是，卡斯提尔王室和葡萄牙王室对卡博托的提议都不感兴趣，因此他在1495年永久移居到英格兰。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英格兰国王亨

利七世一直热衷于促进英格兰与几个意大利城市的贸易关系，他也很了解意大利航海家对伊比利亚两个王国的非凡贡献。在亨利七世听到卡博托的航海计划后，便立即委托他执行计划，亨利七世给了他5艘船，并允许他挂英格兰国旗航行，而且卡博托可以招募水手，没有数量限制。

卡博托的第一次航行失败了，因为船员的问题，他被迫从冰岛返回。尽管如此，一年后的1497年5月，卡博托再次启航，这次他只有一艘“马修号”和18名船员。几周后，“马修号”到达纽芬兰海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艘到达美洲的船只。[15]卡博托上岸后只是简单地看了看，他认为这是蒙古大汗的地盘。8月9日，卡博托返回英格兰，国王给予他的奖赏非常慷慨：一大笔钱和海军上将的称号，最重要的是，授权他再次启航。1498年，卡博托再次出发，但这次航行给他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他的船没能返航，可能在格陵兰岛遇难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欧洲水手在穿越大西洋时遭遇了和卡博托一样的悲惨结局。尽管卡博托和他的船员在1497年登陆加拿大海岸的确切位置尚不清楚，但是他发现了从英国通往北美的路线，这是大英帝国诞生的基础，因此，卡博托给英国和欧洲历史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

几年后，1508年，卡博托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卡博托肩负同样的使命率领一支探险队进入美洲。人们普遍认为是他发现了哈得孙湾的入口，但这仅仅是他杰出职业生涯的开始。英格兰王室无法独占塞巴斯蒂安·卡博托，他后来也服务于卡斯提尔王国，查理五世给他提供了更多机会，任命他为都督，并在1525年交给他两项重要任务：确立《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规定的分界线的确切位置；前往卡斯提尔王国一直渴望占有的亚洲的摩鹿加群岛。塞巴斯蒂安·卡博托甚至还和威尼斯密谋，计划带领一支探险队去中国。这展现出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它们竞相招募最杰出的人才，支持雄心勃勃的探险计划。

事实上，塞巴斯蒂安·卡博托在接近职业生涯尾声时收到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的一份邀请，并奉召回到英格兰。爱德华六世对开辟贸易路线和创建殖民地非常感兴趣。于是，卡博托开启了最后一项重大航海计划：联合休·威洛比爵士和理查德·钱塞勒成立一家公司，去开辟一条经北极通往亚洲的贸易路线——这个想法奇妙无比，因为当时那个地区对欧洲人来说完全是未知的，完全没有被探索过。

1553年，有3艘船在威洛比和钱塞勒的指挥下起航。威洛比带着两艘船进入北极水域，但是他们被困在冬天的拉普兰，最终都死在那里（他们不是最后一批死于探索北极的英国人）。

钱塞勒的运气稍微好一些。他设法先到了位于阿尔汉格尔的一个小渔村，然后改走陆路，最终抵达莫斯科。俄国沙皇伊凡四世亲自接见了这位勇敢

的英国人，并授权他的公司在俄国开展商贸活动——当时英格兰及其他西欧国家对俄国几乎一无所知。钱塞勒回到英格兰时，说服卡博托把公司改组为莫斯科公司。钱塞勒不幸在1555年第二次去往莫斯科的返程中死去，但是他的事业后继有人，莫斯科公司为英国商人打开了一个高收益的市场，直到俄国革命爆发这家公司才关闭。

同样，法国也受益于意大利航海家的杰出才智。来自佛罗伦萨的水手乔瓦尼·达·韦拉扎诺在法国迪耶普定居，声名远播。他和同时代的大航海家一样，也想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西部航线。1523年，韦拉扎诺终于获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支持，并在第二年启航。尽管没有达成预定目标，但是韦拉扎诺是穿行北美东海岸的第一人，他穿越了从现在的缅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广大海域——他称这一地区为弗朗西斯卡。一年后，韦拉扎诺第二次驶往美洲，无意中到达了巴西海岸，他在返回法国时把第一批巴西红木运到欧洲。[16]韦拉扎诺在第三次前往美洲的航行中遇难，他在加勒比海的海岛上停留时被原住民袭击致死。在他的带领下，法国逐渐开始向全世界扩张。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对美洲非常感兴趣，全力推动法国航海和殖民事业的发展。他了解到除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英国也开始在新大陆有所斩获。通往新大陆的贸易路线不仅意味着任何一个欧洲大国都无法忽视的能力和声望，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财源。弗朗索瓦一世认为法国应该开拓通往美洲的西北路线，他把开拓这条路线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名叫雅克·卡蒂埃的法国人。

1534年，卡蒂埃带着两艘船出发，到达纽芬兰后，进入了一个海湾，他将其命名为圣劳伦斯湾。据历史记载，卡蒂埃和他的船员是首批见到纽芬兰当地人的欧洲人，在从当地人那里学到“kanata”（意为“小村庄”）这个词后，卡蒂埃就用“Kanata”或“Canada”来称呼整个地区。[17]结果，这个词流传开来，最后成为一个北美大国的国名——加拿大。虽然卡蒂埃到达北美时已是16世纪30年代，但他仍然犯了一个和哥伦布相同的错误，他以为自己到达的地方是亚洲东海岸。

卡蒂埃带领船员们安顿下来，并在落脚地放置了一个十字架，代表法国国王占领了这片土地。1541年，弗朗索瓦一世任命卡蒂埃为新领地的都督，派他去那里殖民，并传播天主教。这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新领地时的举措如出一辙。

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人已经成为海上探险角力场中的一支劲旅，越来越多的英国人都有能力、有决心在这个地理大发现时代放手一搏，因此英国不再需要招揽外国人才。沃尔特·雷利正是这样的一个探险家。1584年，他计划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殖民地，并取名为弗吉尼亚，以此

向“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致敬。雷利还设法筹集资金并招募定居者。但是，因为项目过于庞大，最终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雷利被西班牙关于黄金城的传说吸引，1595年，他带领一支远征队到达现在的圭亚那，穿过奥里诺科河，深入西班牙帝国的领地。他把这次冒险经历写入了《圭亚那发现记》，这本书在他回到英国后出版。在书中，雷利写到他发现了神秘的黄金城。然而，他提出进一步探索和殖民圭亚那的计划没有得到王室支持，因为那势必会导致英国与西班牙发生冲突。几年后，雷利再次带队前往圭亚那探险，触怒了一心谋求和平，避免与西班牙针锋相对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最终雷利被捕并被处死。

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著名的私掠船船长、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海上探险让英国大获其利。德雷克之所以能够名留史册，既因为他在1588年指挥英格兰舰队重创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并对西班牙帝国发起多次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也因为他是完成环球航行的第一个英国人，是继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之后第二个环球航行的欧洲人。

1577年，伊丽莎白一世派德雷克去美洲太平洋沿岸劫掠西班牙的财物。德雷克带领5艘船启航，船员在美洲中南部西海岸的不同地方上岸，不仅有许多重大的地理发现，还俘获、打劫了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船只，大发横财。1579年，德雷克抵达今天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并代表女王宣称这片土地为英国所有，并称之为新阿尔比恩。[18]

接着，德雷克的远征队从加利福尼亚出发，最终到达太平洋西南部的摩鹿加群岛，然后从那里沿南非边境、经由好望角于1580年回到英格兰。

德雷克一路搜集的香料和财富多得惊人，他上交给女王的50%的份额就超过了王室全年的收入。德雷克不仅为英国王室带回了可观的财富，更为英国开辟了太平洋上的新航路。此后，没有一个英国人可以匹敌德雷克的成就，直到200年后，库克船长再次拓宽了英国的地平线。

当西欧几个领先的王国劈波斩浪，在新大陆各有斩获时，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荷兰也在崛起，并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对手。同样拥有悠久航海历史和商业传统的荷兰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繁荣的关键在于海洋。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16世纪中叶就已经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港口。在这一背景下，荷兰出现了一些伟大的、引领荷兰扩张的航海家，林斯霍滕就是其中之一。1580年，年轻的水手林斯霍滕前往里斯本打拼，据称，他在那里获得了关于海上贸易路线方面的机密信息，并凭此闯进由葡萄牙独霸的领地。1583年，林斯霍滕率领荷兰远征队第一次去远东，并在印度停留，开辟了荷兰在亚洲的第一块飞地。[19]他还因为写作而名声大噪。1596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如何环行世界的海上航行手册

《路线》，书中还介绍了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这不仅对野心勃勃的商人和水手非常有用，也让人们通过生动的描述了解世界另一端的人和事。后来，荷兰制图师兼水手威廉·杨松打开了欧洲航海史的新篇章。1606年，他率领一支探险队从新几内亚海岸出发去寻找新贸易路线，风把他们带到了现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海岸。就这样，他们成为有历史记载以来第一批踏上澳大利亚土地的欧洲人。这片荒芜的土地并没有给杨松留下多深的印象，他在报告中也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发现感到激动。因此，荷兰人错失了率先殖民大洋洲的机会。将近两个世纪之后的1770年，詹姆斯·库克船长来到澳大利亚南部，以英国王室的名义占领了它，才开始了欧洲人在这座偏远岛屿的殖民进程。

当荷兰人在亚洲旗开得胜时，一个英国人为荷兰在新大陆开辟出一块新领地。亨利·哈得孙的航海生涯开始于英国，他服务于莫斯科公司。由于他拥有丰富的在波罗的海航行的经验，1609年，他被当时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选中去寻找从欧洲通往亚洲的东北路线。哈得孙通过波罗的海后，他决定不再向千里冰封的水域前行，而是调转船头，冒险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西北航路。就这样，在到达已经被英国人占据的科德角后，哈得孙继续向南，发现了曼哈顿岛——几个世纪之后，这里出现了一座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大城市。然后，哈得孙驶过最终以他名字命名的河流。几年后，荷兰人在这里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贸易站，荷兰成为新大陆的殖民大国之一。

詹姆斯·库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他代表英国国王占领了澳大利亚南部。关于自己的职业目标，他曾写道："不仅要比以前所有的航海家走得更远，也要走到我认为人能到达的最远处。"在此前近3个世纪里，胸怀同样目标的欧洲航海家们的重大地理发现奠定了欧洲世界霸主地位的基础。[20]

对世界地理的好奇心，敢于冒险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以及不断改进的航行技术——所有这些因素使欧洲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独领风骚。葡萄牙作为先锋，占领了非洲的战略飞地，开启了这一时代，并最终发现了新大陆和新海域。最重要的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使西班牙成为第一个全球性帝国。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其他几个欧洲强国也在航海家的帮助下，走上同样的海外扩张之路，在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建起各自的殖民地。

"立下汗马功劳的是冒险家，而不是伟大帝国的君主。"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哥伦布、达·伽马这样的冒险家以及本章提到的其他航海家，支持这些航海家的国家在现代历史中的角色会截然不同，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家不会有如此杰出的成就。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正因为这些航海家开辟出海外扩张之路，使整个欧洲获得了领先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欧洲文明也得以广泛传播。

[1] 里格，一个古老的长度单位，在陆地上，1里格约为4.8千米。——编者注

[2]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ory of Portuga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3] Roger Crowley, *Conquerors: How Portugal Forged the First Global Empi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5).

[4]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Columbu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Fernandéz-Armesto, *Columbus*.

[6] Fernandéz-Armesto, *Columbus*.

[7] E.G Ravenstein,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London, 1497–19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8] Ravenstein,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London, 1497–1999*.

[9] Martin Page, *First Global Village, How Portugal Changed the World* (Lisbon Casa das Letras,2002).

[10]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Amerigo: The Man Who Gave His Name to America* (New York:Random House, 2006).

[11] Fernández-Armesto, *Amerigo*.

[12] Salvador de Madariaga, *El Auge y el Ocaso del 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 (Madrid: Espasa Calpe, 1977).

[13] de Madariaga, *El Auge y el Ocaso del 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c*

[14] 巴斯克人是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和法国边界地带的南欧民族。——编者注

[15] 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The New World*, vol. II (London:Cassell, 1957).

[16]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 (Oxford,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7]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18]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19]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Millennium: 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New York:Scribner, 1995), p. 230.

[20] Fernández-Armesto, *Millennium*, p. 636.

第三章

世界还不够大

欧洲帝国崛起

1516年，一位年轻的王子从根特[1]来到西班牙北部，他被加冕为卡斯提尔王国、阿拉贡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国王，他还将统治低地国家（欧洲西北沿海三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统称）、奥地利、波希米亚以及其帝国在美洲迅速扩张的领地。3年后，他成为神圣罗马皇帝，他就是查理五世。查理五世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君主，他身体里流淌着卡斯提尔、阿拉贡、佛兰芒、德国和勃艮第人的血液，除了当时国家的官方语言拉丁语外，他还熟练掌握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一位西班牙主教称颂查理五世为“众王之王”和“世界皇帝”。顶着这些盛名同时还拥有巨量财富的查理五世打心底里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子，其使命是让全世界都信奉天主教，实现君主制。这一信念使他在整个执政期内一直与新教改革做斗争。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忠于父亲的目标，最终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腓力二世军服徽章上的铭文准确概括了他的个性和成就：更进一步。1540年，腓力二世戴上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两顶王冠，这是他统治时期的光辉业绩之一。为了纪念这一盛事，王室铸造了一枚勋章，上面刻着“世界还不够大”，这准确地概括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宏伟梦想。

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并非欧洲唯一放眼全球的王室家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开疆拓土，缔造庞大的海外帝国时，它们在西欧的几个邻国也紧紧跟随这一扩张潮流，尽管这些国家起初的规模更小。这些王国的国王和统治精英有很多理由去征服新领地并进行殖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获得财富的捷径，在发现新大陆之后，这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对英国、荷兰和法国来说，建立帝国似乎是抗衡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霸权的唯一方式。新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占领新世界又增加了一层宗教原因——罗马教皇把整个美洲全部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天主教王国，征服新领地可以打破教皇设定的格局。不过，西欧的政治角逐和宗教冲突并非驱动欧洲王国扩张的全部力量。

早期在新大陆建立的定居点和殖民扩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两个王国的君主确立的扩张主义精神。前面的章节曾提到，葡萄牙的若昂一世和亨利王子对地理大发现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葡萄牙人奠定了欧洲向全球扩张的基础。

从15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在亚速尔群岛和中非地区建立的殖民网络开始创造利润。葡萄牙建立这些海外据点的初衷并非要吸引移民、建成殖民地，而是创建商贸基地。早期的殖民冒险活动使两个产业兴盛起来，对葡

萄牙和其他大西洋强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个产业是制糖业。制糖业兴起于马德拉群岛，而后很快传到加那利群岛，荷兰的贸易商将这一产业推广到全欧洲。16世纪初，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者将甘蔗带到他们在新大陆的领地，制糖业开始在美洲迅速蔓延开来。

殖民地的许多产业都需要大量劳力，制糖业也不例外。这直接推动了另一个利润同样丰厚的产业的萌芽和发展，这一产业将受到极大质疑——这就是奴隶贸易。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地区发现了一种商品，数量很大，而且全世界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是非洲人。葡萄牙人可以从非洲部落购买甚至绑架黑人，然后将他们运到里斯本或其他港口出售。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这种行为非常可耻，令人无法接受。不过，在西方文明和其他人类文明中，从远古时代起一直存在奴隶制，其合理性在当时并未受到道德或伦理方面的质疑。亚里士多德曾写道："人分为两种，主人和奴隶。"而且只要奴隶不是基督徒，基督教教会也不谴责奴隶制。随着欧洲向外扩张，奴隶贸易成为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因为没有奴隶，殖民者占领的土地就无法开发。在所有沦为奴隶的种族中，非洲人遭受的苦难最多，可以说是万民涂炭。

第一批非洲奴隶于1441年抵达里斯本。1448年，约1 000名奴隶到达葡萄牙及其辖下的群岛。[2]从那时起，一船一船的奴隶越来越频繁地被运到葡萄牙的领地。这些不幸的非洲人大多数在种植园做工，有一些分散在其他行业，还有一些在里斯本从事家庭服务。与葡萄牙毗邻的卡斯提尔王国、阿拉贡王国以及稍远一点的意大利半岛也开始需要奴隶。但是，与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及其后裔所需要的奴隶数量相比，这些地方的需求量很小。

同时，与葡萄牙邻近的王国也开始进入非同一般的扩张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国。推动这一惊人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卡斯提尔王国的伊莎贝拉女王在1469年嫁给了阿拉贡的斐迪南国王，这场联姻的意义远超两个王国的合并。

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国王拥有非凡的军事天赋，而且特别擅长政治和外交，通过子女们的联姻，他打造出几个王朝之间的联盟，决定了此后数个欧洲国家的未来。伊莎贝拉出身不高，本不可能成为卡斯提尔王国的女王，但她凭借智慧以及与贵族的联盟成为一国之主。她要为自己的王国实现最宏大的目标，所以她热心支持海外扩张计划。征服加那利群岛是卡斯提尔王国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其海外扩张的第一个里程碑。

1492年，这两个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取得的成就对西班牙和欧洲历史造成了重大影响，他们攻破格拉纳达王国，终结了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一历史性事件对后来500年里欧洲的宗教性质产生了深刻影

响。在1925年阿尔巴尼亚建国之前，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穆斯林占多数的独立国家。[3]从摩尔人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标志着基督教的全面胜利，主导西班牙王室300多年的扩张主义思想再次兴盛，这也壮大了伊莎贝拉女王的胆略。她在遗嘱中写到，要征服北非，传播基督教。不过，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使她的王国扩张到她从未想到的地方。

发现新大陆的消息没有激发卡斯提尔王室成员的兴趣，但是伊莎贝拉女王全力支持所有在美洲的探险和殖民项目，并说服大家，这是王国实现扩张的关键。

然而，哥伦布前往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第一个定居点并担任总督的经历充分展现出欧洲在新大陆殖民的复杂性。哥伦布第二次前往新大陆时被封为海军上将，随行人员有1 200人。这表明西班牙决意要在新领地建立永久定居点。然而，哥伦布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发现当地人已经摧毁了他此前建好的堡垒，他留下的小分队成员全部都被杀害了。这是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冲突的开始：欧洲人妄想把自己的传统强加到这块新发现的大陆上，但当地人拒绝服从，更不用说拱手让出自己的家园了。

应该怎样对待原住民？哥伦布的想法非常明确：把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原住民阿拉瓦克人变成基督徒，因为传播基督教是卡斯提尔王国开疆拓土的一大目标。对那些过于野蛮、难以归顺基督教的食人族部落，以及拒绝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人，哥伦布就把他们当奴隶对待。总体上，哥伦布对待原住民很残酷，甚至令早期的传教士都感到愤怒，这也埋下了内部冲突的隐患。[4]

哥伦布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必须按照卡斯提尔王国的法律治理这个定居点。但是，他既没有能力激励手下在热带气候里完成土地开发的艰巨任务，也没有办法压制那些到新世界只想发财，不想顺从任何权威的人。在哥伦布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后不久，他的队伍中就爆发了一场叛乱，而他无法恢复秩序。于是，卡斯提尔王室采取了一个极端措施：派出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亚接替哥伦布的总督职位。

在16世纪初，种植园和矿藏开采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主要的财富来源，但是劳动力稀缺是一个严重问题，西班牙人最初招募的印第安人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根据西班牙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记载，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约有25万印第安人，到1517年只剩下1.4万。[5]造成印第安人近乎灭绝的主要原因既有欧洲人对他们的虐待，还有欧洲人带去的传染病。面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西班牙征服者决定进口非洲奴隶。1501年，第一批非洲奴隶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由此开启了非洲人在美洲大陆的历史。[6]

1509年，哥伦布的儿子迭戈被任命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总督。在他的强化治理下，伊斯帕尼奥拉岛成为西班牙王国一个稳定发展的殖民地。于是，征服者们开始继续向加勒比地区扩张。胡安·庞塞·德·莱昂征服了波多黎各岛，很快又发现了佛罗里达半岛。他派遣迭戈·贝拉斯克斯·德·奎利亚尔带队远征古巴岛，后来古巴成为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殖民地。

卡斯提尔王国在美洲的殖民计划与时俱进，同时，王室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监督和控制那些在殖民地代表王室的定居者。1503年，贸易厅在塞维利亚成立，负责管理和促进美洲的商贸和航行活动。伊莎贝拉女王去世后，她的丈夫斐迪南国王于1511年创建了“印第安委员会”，负责策划和向国王提出管理新大陆的政策，并监督管理与印第安人有关的所有事宜，其职能范围很广：从任命总督和新大陆政府的高层职位到核验移民许可证，无所不包。斐迪南国王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实现了扩张，并成功奠定了西班牙帝国的政府管理结构，使西班牙中央政府对领地的监控优于其他欧洲帝国。帝国监管需要多个政府机构协同以及庞大的、分散在海外领地的王室雇员网络。在西班牙王国迅速扩张的进程中，这些都达到了斐迪南国王设定的目标。

在查理五世统治期间，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帝国规模超过了当时所有国家。这主要得益于两个雄心勃勃的冒险家和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由科尔特斯领导的征服墨西哥的战争无疑是一大历史壮举。科尔特斯屡战屡胜、侵城掠地，占领了大片领土，他因此成为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征服者之一。作为几座城市的创建人和总督，科尔特斯开拓了西班牙帝国最大、最富饶的总督区——新西班牙。在他的统率下，欧洲人首次与美洲的阿兹特克人相遇并战胜和驯服了他们，科尔特斯还开创了种族通婚的先河，后来，跨种族通婚在墨西哥成为主流，墨西哥也成为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科尔特斯雄心万丈、成就非凡，他忠于国王，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残忍、嗜血、贪婪。这些优点和缺点让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伟大象征之一。20世纪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样描述科尔特斯：“你可能不会爱慕他，但是你不可能不佩服他。”

科尔特斯出生在西班牙南部一个贵族家庭，他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当过公证员，但很快就辞职，转而投入征服者的行列，并于1502年抵达新大陆。1511年，科尔特斯参加了征服古巴岛的战斗，7年后，科尔特斯被委任负责一个小船队，帮助在墨西哥海岸失事的远征队，正是在那里，他发现了创造历史的机会。

1519年科尔特斯跟随一支远征队从古巴出发前往尤卡坦半岛，这支远征队

由20艘船、580人、16匹马和10门大炮组成，[7]在今天的塔瓦斯科与玛雅人展开了第一场较量。玛雅人战败，科尔特斯宣布他们成为西班牙国王的臣民。玛雅人赠予了科尔特斯一些礼物，其中包括受洗后改名为唐娜玛丽娜的马琳奇，她后来作为翻译，帮助西班牙帝国征服了阿兹特克人。这位美丽的女士是科尔特斯最有名的情人，他们的孩子马丁·科尔特斯是这片土地上第一批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后代之一。科尔特斯建立了韦拉克鲁斯市，并公然反抗古巴总督，宣称自己是新领地的都督。

科尔特斯的目标是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比当时大多数欧洲城市都大的特诺奇蒂特兰。在征战途中，科尔特斯发现阿兹特克与邻国不睦，于是就与它们结成联盟，借此加强自己的攻势。最后，他接见了阿兹特克帝国的信使，使者向他传达了阿兹特克国王欢迎他进城的消息。

1519年11月11日，科尔特斯与蒙特祖马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成为后来许多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蒙特祖马原以为西班牙人是被驱逐的纳瓦人的后裔，在听了科尔特斯的解释后，蒙特祖马同意他的族人归顺西班牙，做西班牙国王的臣民。[8]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帝国这么容易被征服。当然，西班牙人刻意误解了蒙特祖马的意思，因为他这么明显的自愿臣服可能不过只是一种礼节。在成为西班牙的臣民后不久，蒙特祖马就被西班牙国王囚禁起来。

尽管科尔特斯非常轻易地占领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但他面临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这位征服者不仅要与印第安人交战，还要与西班牙人交手。1520年1月，古巴总督委拉斯开兹以科尔特斯抗命擅行为由，派遣了一支探险队逮捕科尔特斯，这引发了西班牙人之间在美洲的第一场战争。结果，科尔特斯打败了总督。在结束这场与自己同胞的战斗后，科尔特斯回到特诺奇蒂特兰，去应对由库奥赫特莫克王子领导的抗战。在墨西哥传说中，6月30日晚被称为“悲痛之夜”。这一夜，由科尔特斯领导的西班牙征服者遭遇了最彻底的失败，被迫撤到邻近的西班牙领地。但一年后的1521年8月13日，科尔特斯带着主要从原住民中招募的两万名勇士卷土重来，彻底消灭了阿兹特克帝国。西班牙有一部关于美洲的经典作品记述了这一历史性过程：《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作者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正是科尔特斯这支远征队的成员。

科尔特斯的战绩使查理五世成为拥有美洲大陆上最大领土的君主，而科尔特斯也获得了新西班牙总督和都督的封号。

16世纪30年代，科尔特斯又为西班牙帝国做出了另一项伟大贡献。他开始征战今天的危地马拉，并建立了瓜达拉哈拉、奇瓦瓦、萨莫拉、梅里达和巴利亚多利德等城市，还探索了加利福尼亚半岛。1540年，他前往西班牙，想让王室支持他实施更多的冒险计划，但是常见的一幕发生了，他雄

心勃勃的征服计划与西班牙王室的狭隘心态和短浅目光格格不入。他在1547年即将返回新西班牙时去世，此时，他已经是新西班牙的传奇人物。

科尔特斯为西班牙帝国的扩张做出了巨大贡献，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从今天的危地马拉一直蔓延至加利福尼亚。另一位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也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他重现了科尔特斯的辉煌成就，征服了另一个伟大的美洲帝国——印加帝国。

皮萨罗的童年和青年期比其他西班牙征服者艰难得多，他是一个西班牙贵族的私生子，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早年以养猪为生，可以说人生的前景很暗淡，因此有关新大陆的新闻很快吸引了他，他决定去新大陆谋求发展。于是，他和科尔特斯一样，在1502年跟随尼古拉斯·德·奥万多的远征船队来到美洲。

皮萨罗很快就在美洲大陆找到了发财的机会。他加入阿隆索·德·奥赫达的探险队，穿越了现在的哥伦比亚和中美洲。在那里，他构想出一个更加雄心勃勃，可以让他名利双收的计划：征服秘鲁。

1524年，皮萨罗与迭戈·德·阿尔马格罗以及来自巴拿马的修士埃尔南多·德·卢克结盟，一起探索美洲西海岸。1524—1528年，由皮萨罗领导的两次探险都没有成功，但是他获得了很多关于辽阔而富裕的印加帝国的信息。1529年，皮萨罗决定去西班牙寻求国王查理五世的支持，以实现征服印加帝国的雄伟计划。皮萨罗如愿以偿，被委任为新领地的总督和都督。1531年，他带着由180名成员和37匹马组成的队伍向秘鲁进发。[9]

皮萨罗率领的这支征服印加帝国的队伍虽然规模小，但有一个优势：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一样，没有抵抗入侵。1532年皮萨罗进入印加帝国，在卡哈马卡市受到阿塔瓦尔帕皇帝接见。阿塔瓦尔帕并不像科尔特斯遇到的阿兹特克皇帝一样顺从，当皮萨罗要求他臣服查理五世并信仰基督教时，他拒绝了。于是，皮萨罗决定把阿塔瓦尔帕囚禁起来，并在一年后以图谋反抗西班牙人的叛乱罪将他处死。

皮萨罗是应用马基雅维利主义（权术和谋略）的天才，他非常会利用印加精英内部的矛盾。通过和长期与印加皇帝对峙的印加贵族结盟，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位于今天的秘鲁）。在这一征服行动成功后，他任命盟友曼科·卡帕克为新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力量，他还任命自己的哥哥胡安·皮萨罗为库斯科总督，并迎娶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的女儿。他们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弗朗西斯卡·皮萨罗，是秘鲁第一个异族通婚的后代。[10]

和哥伦布、巴尔沃亚和科尔特斯一样，皮萨罗的对手不仅有美洲的原住

民，还有其他西班牙人。为了夺取库斯科，阿尔马格罗与皮萨罗的对峙上升到动武的地步，在1538年的拉斯萨利纳斯之战中，皮萨罗赢了，阿尔马格罗则被处决。此后，皮萨罗专注于管理自己征服的领地，建立了秘鲁的首都利马市，并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宫殿。尽管皮萨罗成功征服和管理了印加帝国，他的丰功伟绩最终还是覆灭于西班牙人之手。阿尔马格罗的儿子率领支持者们采取了报复行动，在1541年6月26日这一天冲进皮萨罗的宫殿，结束了他的生命。

当皮萨罗和其他探险者征战印加帝国时，西班牙帝国也在向南美扩张。西班牙的征服者们考虑到两个因素，决定先拿下普拉塔河的周边地区。首先，他们认为那里非常富裕，其次，他们要防止葡萄牙人向那里进军。1534年，一位名叫佩德罗·德·门多萨的士兵获得西班牙皇室许可，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该地区。他建造了布宜艾利圣母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字正是出自这里。

1541年，另一位西班牙征服者，曾在皮萨罗手下效命的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将矛头指向了被印第安人称为“Chili”的地区——智利的国名由此而来。巴尔迪维亚带着仅有110人的队伍为西班牙帝国开辟出这片新领土，建立了圣地亚哥市。不久之后，皮萨罗的另一个手下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也向北进军，在今天的厄瓜多尔建立了瓜亚基尔定居点。新西班牙继续向北开拓疆土。1565年，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正式占领了后来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半岛，并建立了欧洲人在今天美国的第一个定居点圣奥古斯丁，后来这里发展成圣奥古斯丁市。[11]

在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探索和征服活动为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和荣耀，远远超出他们当初最狂热的幻想。就这样，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在美洲已经拥有从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到阿根廷的广袤土地，奠定了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帝国的基础。

尽管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占领了美洲的很多土地，但是因为缺乏人力资源，他们控制领土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很多被占领的地方是雨林、沙漠、无人居住的山区和原住民区，把定居点发展成城市，开垦肥沃的土地、开发资源，巩固与当地人的和谐关系，这些都是巨大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第一批定居者的生活尤其艰辛。

美洲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来自哪里？卡斯提尔王室资助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所以不难推测美洲第一批殖民者来自卡斯提尔王国，尤其是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这两个地区，这里也是科尔特斯、皮萨罗和巴尔沃亚的出生地。他们大多出身小贵族或者小康的平民家庭，穷人除非做贵族的仆人，否则根本无法前往新大陆。尽管如此，不久之后，西班牙的贵族和贫民都开始出现在美洲，既有阿拉贡和纳瓦拉的王室成员，也有赤贫阶层

的人。

1502年，在尼古拉斯·德·奥万多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第一批来到岛上的移民中只有300名幸存下来。因此，奥万多带来的2 500个移民对殖民地未来能否兴旺发展非常关键。[12]大多数来到新大陆的人都是孤身前来，没有携带家眷，也不打算在那里长久居住。这些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移民不同于来自北欧的移民，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一旦挣到足够的钱，就尽快回去。1517年，西班牙法官阿隆索·德·苏亚索在圣多明各写信给西班牙国王，信中提到西班牙移民的问题在于男性大多没有结婚，所以不愿定居。他建议从其他基督教国家吸引更多移民前往殖民地定居。[13]

许多欧洲人参与了西班牙征服美洲的过程，其意义远超人们的认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迅速传遍欧洲大陆，吸引了许多欧洲人前往新大陆。除西班牙人以外，去美洲的欧洲人有很多来自哥伦布的家乡热那亚，这并非巧合。正如奥瓦多在1504年给西班牙国王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加勒比地区与西班牙之间的商贸往来掌控在热那亚人和外国人手中。许多热那亚人在美洲定居下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例如，热那亚的金融大亨热罗尼莫·格里尔马迪在1508—1515年间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他把家族生意扩张到古巴和美洲大陆。[14]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在其著作《西印度通志与自然志》中谈到美洲形形色色的来客，在圣多明各，人们能听到“所有基督教国家的语言，有意大利语、德语、苏格兰方言、英语、法语、匈牙利语、波兰语、希腊语、葡萄牙语，还有亚洲、非洲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各种语言”。在跟随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的队伍中，有超过10%的人来自葡萄牙、热那亚、荷兰和希腊。在佩德罗·德·门多萨的远征队中，约有100个德国人和比利时人。

欧洲多国的移民不仅加入了西班牙征服美洲的事业，也开始冒险投资这片土地的发展。为了吸引私人资本投资新大陆，伊比利亚半岛以外的投资也被引入西班牙帝国。查理五世鼓励德国的金融家投资新大陆，1528年，他与德国的韦尔泽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多从事银行业）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委内瑞拉探索、发展和定居。韦尔泽家族派出的第一批定居者在1529年抵达美洲，致力于开发奥里诺科河流域。韦尔泽家族还和其他德国生意伙伴合作，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开办工厂。[15]16世纪早期的欧洲首富、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也从投资美洲的项目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16]

至于殖民者从事的职业，西班牙人一直被描述为对黄金有无限贪欲的征服者，但这并不是全部。西班牙殖民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监护征赋制，即卡斯提尔王室将一片土地或一个村庄连带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授予殖民者。这有双重目标：激励殖民者定居和开拓土地，使印第安人变为基督徒。[17]但是这一封建制度会让印第安人过上欧洲农民那种并不值得羡慕

的生活，而且实际情况更糟糕，因为许多殖民者并不履行其义务，只是把印第安人当作奴隶驱使。结果，监护征赋制成为征服美洲过程中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最终在17世纪中叶被废除。

大多数征服者来到新大陆后不久就意识到，要想兴旺发达，唯一的途径是耕种土地。于是，他们开始将耕作方法和家畜引入美洲。西班牙人带去了马和狗，奶牛、猪、鸡、鹅和其他动物也纷纷从欧洲乡野被带到美洲，养殖业开始扩大。科尔特斯还引入了葡萄园、糖和丝绸。后来，不论西班牙人在哪里定居，小麦和甘蔗种植园就传播到哪里。西班牙人引进的养殖和农业耕作方法为许多美洲原住民提供了新谋生途径，彻底解决了许多地区的饥荒问题。[18]关于征服者破坏美洲原住民生活的著述颇多，然而，在西班牙人将这些耕作方法和家畜带到美洲后，他们也拯救了当地人的生命，并帮助印第安人发展自己的家园，但相关著作却少之又少。

另一个吸引移民的职业是殖民地的政府部门。西班牙需要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控制领地，这离不开广泛分布的王室雇员网络以及贸易、防御网点。说西班牙征服了美洲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西班牙王室始终没有派出军队去征服那片土地。虽然远征队的领导者通常是职业军人，但是士兵都是从殖民地的定居者中招募的，他们以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和发展为目标。

葡萄牙在美洲的发展由于几方面的原因而不同于西班牙。在卡斯提尔王国积极在新大陆建立定居点时，葡萄牙致力于建设贸易站点网络。在葡萄牙人看来，殖民亚洲的吸引力远超殖民新大陆，因为在亚洲更有利可图。葡萄牙人先在印度的果阿和马六甲建立了据点，并于1554年在中国澳门建立了贸易基地，迎来了在亚洲迅速扩张的时期，也成为第一个进入封闭的中国市场的欧洲强国。由于葡萄牙王室看到了在亚洲扩张的前景，所以巴西海岸就被置于次要位置了。

1523年，葡萄牙将其在巴西海岸的领土划成7个都督区，王室希望各区负责人能够设法整合所有定居点。然而事实并没有如此发展。在7个区里，只有4个朝这个方向发展，主要原因是缺少定居者。到16世纪中叶，最繁华的塞古鲁港、伊利乌斯、圣维森特和伯南布哥4个区，总共只有不到600名定居者（不包括奴隶和当地人）。居住在海岸地区的欧洲人口总数不到1万。[19]

巴西之所以无法吸引移民，有一个原因是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相比，巴西没有黄金、白银和丰富的物产，巴西的定居者除了耕种土地，别无选择，烟草、棉花和甘蔗是这里的主要产品。

巴西海岸各区的都督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王室担心这些领地的继承人最终会反叛，或者领地会落入西班牙帝国手中，所以在1548年，葡萄牙对

殖民地的管理机构进行了根本性改革：解散所有世袭区，任命一位总督代表王室管理殖民地。1549年，第一任巴西总督托梅·德·索萨抵达巴伊亚。从那时起，这一殖民地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托梅·德·索萨受命建造圣萨尔瓦多，葡萄牙派来3 000人作为第一批居民。[20]圣萨尔瓦多很快发展成对制糖业和奴隶贸易非常重要的港口，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一直是美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另一位在巴西建设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的总督是梅姆·德萨。他在1567年将法国人逐离了巴西海岸，并建立了里约热内卢。[21]

1578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一世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合法的继承人。结果，他的侄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被加冕为葡萄牙国王。腓力二世从1556年继承西班牙王位以来，一直致力于扩大帝国疆域，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他不满于帝国在美洲的发展，在1564年派遣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率领探险队去往南亚。莱加斯皮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并用国王的名字将那里命名为菲律宾。从那时起，腓力二世统治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帝国；几年后，他继承了葡萄牙的王冠，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由于卡斯提尔王国和葡萄牙历来互为对手，而且葡萄牙的精英们对腓力二世继承葡萄牙王位的反应并不积极，因此腓力二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目的是让葡萄牙的精英阶层看到这是两个国家的联盟，而不是卡斯提尔王国接管了葡萄牙，他还确保葡萄牙对其殖民地保持百分之百的自治和控制权。腓力二世甚至还考虑将首都迁到里斯本，因为在葡萄牙与西班牙融合之后，里斯本已成为大西洋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但是卡斯提尔王国的臣民显然完全不接受他的这一想法，因此迁都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腓力二世与他的父亲查理五世很不同。他非常清楚，巩固哈布斯堡君主政权的关键在于新大陆领地的扩张。因此，他特别重视改善殖民地的管理。在他统治期间，新大陆建立了诸多西班牙帝国总督区，葡萄牙帝国也稳步扩张，他对此没有进行任何干涉。这是伊比利亚半岛两大王国联盟得以持续80年的原因之一。在腓力二世的统治期内，美洲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代名词，意味着财富和权力，吸引了最雄心勃勃和最具冒险精神的人。

在16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建立帝国似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王国的特权。不要忘记，教皇在1494年已经通过《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认可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美洲，其他大国进入这片土地就是违抗了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教皇。第一个公然违抗教皇权威的欧洲君主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他统治英国期间，许多方面都创造了历史，在谈论英国疆土时，他开始公开使用“帝国”这个词。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宣布英国为帝国，以此表明他不会效忠教皇，也不会允许教皇意志最坚定的支持者——哈布斯堡的君主对此施加干涉。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同样对教皇偏袒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王国感到不满，为了保护法国利

益，他起初寻求与亨利八世结盟，后来甚至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大帝签署盟约。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国王做出这样的决定，引发了很大争议，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利益高于宗教信仰。

当英国和法国君主利用外交手段保护其王国不受伊比利亚半岛两个王国扩张的影响时，其他实力一般的欧洲国家正通过各种诡计在新大陆分享财富。

对于不附属于伊比利亚半岛两个王国的国家来说，要想在新大陆获利，最快捷、最简单的方法是海上劫掠。起初，法国的海盗船横行，拦截西班牙和葡萄牙从美洲运往欧洲的黄金、白银和其他珍宝。有许多海盗来自法国迪耶普，其中特别有名的是让·弗勒，他截获了两艘科尔特斯从美洲发往西班牙的船只，上边满载着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后获得的宝物。其他欧洲国家也竞相效仿，用同样的方法攫取来自新大陆的财富。

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通过使海盗合法化来劫掠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天主教帝国的战利品，以此提高自己的收益。英国著名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和约翰·霍金斯都通过海盗活动大获其利。在第一次去往加勒比海的航行中，约翰·霍金斯袭击了一艘满载奴隶的葡萄牙船，他在加勒比地区将这些奴隶售出，从中获得了丰厚利润，这也使他成为自己家乡——普利茅斯的首富。霍金斯也是往来于欧洲、非洲、美洲奴隶贸易黑三角的先驱。几年后，他第二次去往加勒比地区。据称，这次航行使他变成英国首富。[22]

在这一时期，英国人急于寻找能够与新大陆匹敌的新市场，最终他们把目光锁定在远东。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签署了一道王室法令，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不仅是在欧洲与印度间开展贸易的先驱，也是欧洲殖民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这一创新的体制引入私人投资，有力促进了英国国家经济发展。作家理查德·哈克卢特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他以《英格兰民族重要的航海、航行和发现》这部书而闻名。他在书中呼吁新教国家建立殖民地，以抗衡天主教在新大陆的影响。后来，哈克卢特将自己的这一倡导付诸实践，成立了弗吉尼亚公司，并以建立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定居点为目标。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派出第一支由3艘船、105人组成的远征队，远征队在克里斯托弗·纽波特的率领下抵达新大陆，在今天的弗吉尼亚州建成了詹姆斯敦，奠定了英国在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的基础。几十年后，这里成为英属美洲殖民地中人口最多、最繁荣的地方。

英国殖民美洲的最初阶段非常艰难。第一批殖民者到达美洲一年后，有一半死于疾病、寒冷和饥饿，剩下的一半得益于约翰·史密斯船长的严格纪律而幸存下来，约翰·史密斯因此成为殖民地的领导人。初到美洲的英国殖民者不同于在金银资源丰富的地区找到大量财富的西班牙征服者，他们除了

开垦土地，别无生存之路。后来，在这一批定居者中，约翰·罗尔夫决定尝试种植烟草，此后，英国殖民地的经济才逐渐好转。

烟草最初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入欧洲，于是，欧洲人染上了吸烟的习惯，而后烟草又流传到其他地方。把烟草带入英国的人据说是沃尔特·雷利。从17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吸烟成瘾。因此，约翰·罗尔夫想到要在詹姆斯敦种烟草，事实证明这个主意非常成功，烟草从此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主要出口产品。罗尔夫不仅在烟草种植业中赚到第一桶金，也被视为这个产业的先驱，对英国在美洲以及后来美国的发展都很重要。

烟草出口创造的利润以及约翰·史密斯实施的严厉纪律使詹姆斯敦殖民地的情形开始好转，并开始扩张到邻近的地区。1614年，约翰·史密斯返回英格兰，第一次谈到新英格兰（今天美国的东北部地区）的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这两个地方，[23]并出版了著作《新英格兰概述》。这本书把新英格兰描述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每个定居者都有地可耕并能迅速致富。

相对来说，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早期殖民进程遇到的挑战没有在美洲大陆那么大，但获利却更多。1605—1628年，英国占领了圣卢西亚、格拉纳达、巴巴多斯、圣基茨和尼维斯等岛屿，特别重要的是，英国在1655年占领了此前一直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牙买加，后来牙买加成为英国在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领地。来到这些天堂一般的岛屿的第一批定居者主要靠种植甘蔗谋生，奴隶们在种植园里劳作。邻近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也一样。欧洲对糖的需求激增，加勒比殖民地的种植园可获的利润非常高，使得这一地区在殖民初期比北美更吸引移民。

海外殖民也是缓解英国宗教斗争的一个方法。前文说过，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对抗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此外，新教内部的不同分支之间也存在冲突。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清教徒被逐出英国教会，许多清教徒决定移居海外，他们认为这是坚守信仰的唯一出路——他们后来被称为“清教徒前辈移民”。1620年，102名清教徒搭乘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五月花号”来到美国东海岸，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登陆，从此定居下来。经过多次讨论和争辩之后，他们签署了《五月花公约》这份历史性文件，设定了群体治理的规则，还同意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领导人。

搭乘“五月花号”抵达美洲的清教徒建立的殖民地是欧洲在北美的第一批殖民地之一，也是最富传奇色彩的殖民地之一。它象征着移民的勤劳和牺牲精神，以及美国建国的主要原则：工作、家庭、财产、民主政府、宗教信仰、自由。

整个16世纪，英国在北美的领地范围因为宗教等原因继续扩大。新教和天主教的不同分支之间充满了相互对抗的气氛。为了恪守信仰，许多人选择

追随清教徒前辈移民的足迹，移民到北美洲。

1629年，在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政治人物乔治·卡尔弗特的要求下，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颁布了一道特许令，允许其在美洲建立一个天主教徒殖民地，让在欧洲受新教徒迫害的天主教徒前往定居。于是，马里兰州殖民地出现了。1681年，贵格会[24]的哲学家、建造商、推动信仰自由的先行者威廉·佩恩要求国王查理二世特批他一块北美土地，他要在那里建立一个所有基督徒都可以享受信仰自由的殖民地。查理二世批给威廉·佩恩1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主之一，他将这片土地称为宾夕法尼亚。英国王室要求获得宾夕法尼亚所有金银矿1/5的收益，但事实令他们大失所望——宾夕法尼亚的金属矿藏非常稀少。

威廉·佩恩拥有对这片土地的绝对权力，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想法开发这一殖民地。信仰自由是这一殖民地的一大原则，所以，这里不仅吸引了贵格会的创始人和教徒，还吸引了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等教派的信徒。这里的移民也不仅来自不列颠群岛，还有的来自芬兰、荷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这里后，定居者能够获得土地，因此这一殖民地越来越受到欧洲人的青睐。1700年，宾夕法尼亚已有18万居民。[25]

威廉·佩恩还创建了宾夕法尼亚的州府费城——也称“兄弟之爱城”。佩恩开拓的这片土地与英国在美洲的第一批殖民地形成鲜明对比。在第一批殖民地充斥着对立和对抗，而宾夕法尼亚以民主原则为基础，提倡互相团结，这里成了融合欧洲不同宗教信仰的“熔炉”——这正是未来美国的特点。

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早期定居者绝大多数来自英国。由于土地充足、劳力短缺，劳工契约应运而生。没有经济能力移民的人可以通过无报酬为雇主工作几年的方式来到美洲。这种临时用工制使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也能来到美洲，因此很受欢迎，17世纪新大陆的白人移民中，约有一半都是契约劳工。

对许多契约劳工和大多数早期定居者来说，移民美洲的长远回报是他们能够成为地主，因为土地是主要的，而且往往是唯一的财富来源。这些地主被统称为种植园主。同时代的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后获得了“西班牙征服者”的威武称号，相比之下，种植园主的头衔则毫无光彩。英国人梦想能像西班牙征服者一样在南美洲发财，在北美洲找到金银矿藏，但是这并没有实现，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耕种土地谋生。然而，这最初的不得已而为之最终让他们因祸得福，因为这奠定了一个高度繁荣的经济体的基础。后面的章节将深入讨论这一话题。

17世纪欧洲殖民扩张的另一支劲旅是荷兰。16世纪末，荷兰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一小片领地，自然资源匮乏，仅有200万人口。然而，航海

探险将使荷兰变成一个殖民大国，并最终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1568年，低地国家的七个省联合反抗腓力二世，最终导致了一场持续80多年的独立战争。这场战争与新教改革密切相关，因为新教成了荷兰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这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摆脱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帝国。这场战争促使许多新教徒离开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佛兰德斯，从安特卫普迁往阿姆斯特丹的移民特别多。由于有许多安特卫普的成功商人来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很快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大部分移民都意识到，创造财富和保持独立的关键是发展海外贸易。[26]荷兰扩张的先驱者林斯霍滕非常认同这一观点。

1580年，还是年轻水手的林斯霍滕移居到里斯本，在葡萄牙帝国的亚洲领地任职，为果阿大主教做会计工作。回到荷兰后，他出版了两本书，这对打破葡萄牙对远东贸易的垄断有重要作用。他的《东印度航海记》记述了关于海上航线和印度的关键信息，激发了荷兰人和英国人远征亚洲的野心。

1594年，9个荷兰商人联合成立了“远方公司”，以开拓荷兰在亚洲的贸易市场。几年后，由神职人员、贵族和市民代表组成的荷兰三级会议做出决定：这家私人公司应该得到更多的官方支持和更好的组织管理。就这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成立，负责拓展荷兰在亚洲的殖民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可被视为历史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它被授予绝对权力，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定居点，甚至可以在它认为必要时使用武力。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成立的这一年开始在海外安营扎寨，首先在锡兰落脚。彼得·布思上将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首任总督。虽然他的权力远远比不上西班牙的总督，但这个头衔表现出荷兰对这个职位的高度重视。第四任总督扬·皮得松·库恩占领了雅加达。这座城市在1621年被更名为巴达维亚，成为荷兰帝国在亚洲的首府。

从占领巴达维亚开始，荷兰商人和水手成功颠覆了被葡萄牙控制的摩鹿加群岛在香料贸易中的霸权地位，同时，荷兰还挑战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巴达维亚成为荷兰建立亚洲贸易网的战略核心点。

荷兰在新大陆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1621年，荷兰议会正式批准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允许它垄断荷兰在美洲东部海岸的贸易并建立殖民地。[27]1624年，一艘船载着30个荷兰家庭来到美洲，在今天的奥尔巴尼（美国纽约州首府）创建了第一个荷兰殖民地——奥兰治堡。这个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彼得·米纽伊特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大大推动了殖民地的扩张：从原住民手里买下一座名为曼哈顿的岛屿。关于米纽伊特付了多少钱买下这座在几个世纪后成为纽约市中心和全球最著名的摩天大楼所在地

的岛屿，有许多猜测。根据美国的记载，荷兰方面的资料提到当时是以物易物，给出的货物价值60荷兰盾，合28美元。[28]荷兰在那里建起了新阿姆斯特丹，起初约有270个荷兰移民，后来这一殖民地稳步发展，最终成为北美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荷兰西印度公司威胁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利益。1628年，荷兰水手皮特·海恩袭击了西班牙舰队，并掠走了舰队的所有财物，荷兰西印度公司得以向其股东支付70%的股息。两年后，荷兰西印度公司占领了葡萄牙的定居点伯南布哥。那时，荷兰在加勒比地区已经占领了圣马丁岛、阿鲁巴岛、库拉索岛和博奈尔岛，打造出荷兰美洲帝国的雏形。

就这样，欧洲北部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展现了自己成为一个帝国的能力，这极大地影响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强国在海外扩张的利益。

荷兰不仅在40年里缔造了一个殖民帝国，而且荷兰从中获得的利益超过其他所有殖民国家。通过授予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商业垄断的权力，荷兰联省共和国获得支持并得以创立，而他们的活动资金是由这些公司的股东提供的。荷兰帝国以这种方式获得公共计划的融资，并且没有给纳税人带来负担。在阿姆斯特丹和荷兰大部分地区，人们非凡的进取精神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荷兰的资本主义不仅推动了帝国建立，还在北海地区开疆拓土、扩张国界。1590—1640年，一项由大量投资支持的尖端技术的发明使荷兰得以在北海填海造地，增加了约20万英亩土地。来自阿姆斯特丹的123名投资人开始在这片曾是一片汪洋的土地上建设农场和牧场，他们从建成的207座农场中赚取了大量财富。荷兰为世界上许多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匮乏的小国和城邦树立了一个榜样。

荷兰不仅在新领地获得巨大利益，还在全球创建了迅速扩张的市场。阿姆斯特丹成为17世纪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是贵金属交易的主要市场。荷兰商人坐镇首都，成功控制着非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荷兰成为为西印度群岛提供非洲劳工的主要供应国，荷兰商人从美洲运来一船又一船的糖和烟草，销往欧洲大陆。这些商品的大买家有普鲁士、丹麦、瑞典和俄国。

17世纪，荷兰率先开始了欧洲国家在非洲大陆的殖民过程，但是这和欧洲人在其他地区的扩张一样，并未经过精心的规划。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扫平了进军亚洲的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只有一样无法克服——坏血病。这种因人体缺乏摄入水果和蔬菜引起的疾病在荷兰人去往亚洲的长途航程中造成了许多伤亡，因此，他们决定在好望角海岸建一个驿站，以便去往东印度群岛的舰队在那里停留，并获得新鲜补给。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船长扬·范里贝克带着3艘船、82个男人、8个女人（包括他的妻子）来到好望角，并在那里建起一座堡垒。他发现南非海岸潜力巨大，于是要求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些自由定居者过去。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不十分在意这片偏远的土地，但还是在1657年派出了第一批员工在南非定居。这些定居者耕种开普敦周边的土地需要雇用更多的劳力。于是，第一批奴隶也在1657年分别从巴达维亚和马达加斯加被运抵开普敦。

不久，这些新的定居者开始向北方寻找可耕地，引发了与科伊人（即霍屯督人）部落的第一场冲突。1659年，科伊人反抗白人殖民者的起义失败，他们被迫搬离世代居住的土地。这成为南非白人与黑人冲突的开始，持续了300多年，给双方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1662年，范里贝克被任命为巴达维亚总督，他离开南非时，留下了134名官员、35名男性定居者、15名妇女、22名儿童和180名奴隶。但是，这只是南非殖民地发展的开端。当时法国国王对新教徒的镇压政策引发了大约30万胡格诺派教徒离开法国，其中许多人来到荷兰定居。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邀约：把他们送往南非并赐予他们土地，但他们需要对荷兰保持忠诚。1688年，第一批布尔人（荷兰语中指农民）抵达南非。[29]这些虔诚而勤劳的新教徒在非洲定居下来，决心建设能够恪守其宗教信仰的家园。

范里贝克在南非时，正是荷兰王室的实力达到巅峰的时期。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结束了荷兰与西班牙间持续了80年的战争和由宗教纠纷引起的欧洲大国之间的三十年战争。自此荷兰被公认为独立国家，瑞士也成为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国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促成了以尊重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欧洲就这样创造出了一个构成此后国际关系本质的新词：民族国家。

17世纪中叶，年轻的荷兰展现出民族国家蓬勃发展的优势和原则，是全球民族国家的榜样。从海外领地获得的财富让荷兰最终摆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荷兰建成的贸易网让他们最终超越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法国的情形怎样呢？在西班牙崛起之前，法国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王国，16世纪初，法国也加入了海外扩张的竞赛，在美洲小打小闹地开始一些入侵活动，最终在17世纪成为四大殖民强国之一。

16世纪初，从雅克·卡蒂埃的时代起，法国人开始在北美海岸沿岸进行捕捞活动，并与当地人进行皮革买卖。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要想从这个大陆获益，必须建立永久性定居点。

水手兼探险家萨米埃尔·德尚普兰负责在北美建立法属殖民地。他首先巡航了东部海岸，而后在1605年参与了欧洲人在北佛罗里达第一个永久定居点——波特罗亚尔的建设。不久之后，他成功劝服与他同在波特罗亚尔的路易·埃贝尔，携家带口在加拿大海岸定居下来。1608年，尚普兰得到国王亨利四世的同意后，在路易·埃贝尔定居的领地内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从那时起，魁北克（在印第安语中的意思是“河流变窄的地方”）成为法属北美殖民地“新法兰西”的中心。3年后，尚普兰在蒙特利尔岛建立了一个皮毛贸易基地，后来发展成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30]

法国王室在创建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特殊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法国统治者亨利四世、路易十三，以及最了解如何捍卫法国利益的红衣主教黎塞留都参与其中。从1624年起，直到1642年去世，黎塞留一直是路易十三的首相，他把法国从君主制转变成伟大的中央集权制，他提出的各项倡议对法国的崛起至为关键。

黎塞留的主要目标是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力量，为此，他决定不仅要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权力，还要缔造海外帝国体系。因此，除了支持萨米埃尔·德尚普兰的各项计划之外，黎塞留还在1627年创建了新法兰西公司，以促进法国在美洲的贸易和殖民进程。[31]新法兰西公司用的是100名私人投资者的资金创建的，因此也被称为“百联公司”。黎塞留是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国家利益等其他原因，黎塞留一直密切关注新法兰西公司的发展。

同时，黎塞留也积极推动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进程。1635年，在他的力促之下，另一家大公司，美洲岛屿公司成立，黎塞留也是该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在这些事件的推动下，皮埃尔·贝兰·德斯南布克和法国其他的冒险家代表法国逐渐占领了圣基茨、马提尼克、瓜达卢佩、托尔图加和玛丽—加朗特等岛屿。

路易十四在位时间很长，最初的几年正逢法国的黄金时代。那时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好的军队和高效的中央集权体制。法国成功地成为欧洲强国之首，辉煌的王宫和蓬勃发展的文化使法语成为欧洲每个杰出政治家或文化人都应当掌握的外交语言。就这样，法国拥有了向全球扩张的所有必要条件。

自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在辉煌的凡尔赛皇宫中遥望世界，他对殖民冒险没有太多热情。在他看来，维持法国霸权的关键在欧洲大陆，谁能主宰欧洲，谁就能统治世界。不过，他的宰相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非常热衷于向海外扩张，他也是说服路易十四建立帝国的主要推手之一。

在路易十四执掌权杖时期，法国建成了其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殖民帝国。

1659年，来自迪耶普的水手们在塞内加尔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基地，并命名为圣路易。这是欧洲人在西非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对法国经济很重要，法国在这里获得了橡胶、象牙、黄金、宝石和奴隶等宝贵资源和财富。

1659年，路易十四推动在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建立圣多明各殖民地——几十年前法国海盗曾来过这里。从经济角度看，在这里建立殖民地的想法非常不错，因为这是主要的产糖地之一。

法国的最后一项殖民成就是在太阳王统治期间成功扩张到了亚洲。1675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法国人的商船先到了马达加斯加，然后从那里驶向印度，建立了法国在亚洲的第一批贸易基地。

法国王室不仅直接推动了海外殖民进程，还成功统领和严格监督着海外领地的发展。这主要归功于柯尔贝尔——他的名字随着“柯尔贝尔主义”载入史册。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应该实施监督权，确保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国家利益，柯尔贝尔曾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殖民地必须服务于王国，产业发展不能脱离法国的控制。”

为了确保王室能够密切监督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法国在1663年成立了“新法兰西主权参事会”，最重要的是，设立了新法兰西总督这一新职位——和西班牙帝国一样，法国委任了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担任总督，代表国王管理殖民地。

新法兰西的第一任总督让·塔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促进法属美洲领地的发展与繁荣。“国王的女儿”计划让他名声大噪——900名年轻女性被送到新法兰西，嫁给定居者。他希望这有助于繁衍后代，实现法国殖民地迫切需要的人口增长。[32]

与西班牙、葡萄牙曾经遇到的困难一样，法国也难以让殖民地保有足够的人口，法国王室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未来的法国公民中有不少人可能不是白人。于是，通婚得以推行。新法兰西公司的章程规定，法国定居者的后裔只要接受洗礼，都视同法国公民。后来，法国政府进一步鼓励法国定居者与原住民组成家庭，繁衍后代。然而，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更加野蛮、顽固，而且人口更少，所以法属美洲殖民地的混血人口没有西属和葡属的美洲殖民地的人口那么多。

尽管法国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繁衍，但人口的增长速度令人失望：1660年，新法兰西有约8 000居民，到1700年，总定居人数还不到1.7万人。与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24万白人移民相比，这一数字小得不值一提。[33]尽管法国殖民地的人口数量远多于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王国，但是法国很难让法国人移居到殖民地。许多欧洲人基于经济、

宗教或个人原因希望去美洲开始新生活，但是对法国人来说，这些似乎都不足以让他们移民。

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相比，法属美洲殖民地有一些先天不足，所以很少有法国人愿意去那里定居。首先，新法兰西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很严酷；其次，那里的“封建地主”制度并没有产生预期结果。这种制度几乎就是封建租地制，新法兰西公司把土地给地主，作为回报，地主负责寻找定居者，并支付他们到美洲的旅费。这些定居者到达美洲之后，必须向地主支付租金，而且每年为其工作一段时间。该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定居者对地主的义务使他们无法获得更好的发展。法国政府的强势构成了另一个阻碍发展的因素，总督享有绝对权力，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提高税收或征召定居者去守卫殖民地。

欧洲人之所以要移民到美洲，一大动机正是想摆脱欧洲国家的政治和行政控制。英国殖民地的定居者感到从过去的许多义务中解脱了出来，还可以通过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殖民地议会影响英国政府。但这一切在法国殖民地并没有发生，这里的移民同样受制于法国的等级制。

宗教徒与普通的法国公民不同，他们移居美洲的动力很大，尤其是耶稣会教徒。耶稣会在宣传基督教和法属美洲殖民地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探险家路易·若利埃和罗伯特·德拉萨尔都是耶稣会士，他们在抵达美洲之后通过皮草贸易谋生。若利埃在与当地人的频繁接触中，听到他们提到一条叫密西西比的大河，若利埃沿着这条河向上游探索，德拉萨尔则走得更远。

莫霍克部落的原住民告诉德拉萨尔，有一条名叫俄亥俄的大河，他便开始探寻这条河流。德拉萨尔深受当时航海神话的影响，希望能沿俄亥俄河到达太平洋，从那里找到一条通向中国的西部航线。很快，他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因此成功探索了北美五大湖地区。不久之后，他划着独木舟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宣布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法国所有，并将这一地区命名为路易斯安那。在最后一次远征中，德拉萨尔在今天的得克萨斯州建立了圣路易斯。

德拉萨尔对法国在美洲扩张的贡献最大，在北美，从今天的加拿大一直延伸到加勒比海的大片领土都得到了巩固。从今天的伊利诺伊州到俄亥俄州一带都特别适合发展皮草贸易；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财富；路易斯安那的气候条件很好，适宜发展农业，种植甘蔗、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

在德拉萨尔之后，伟大的冒险家们开始在已发现的领土上殖民。伊贝维尔在1699年建立了路易斯安那殖民地；他的兄弟边维尔在1718年建立了新

奥尔良。1701年，安东尼·莫特·卡迪亚克在今天的密歇根州建立了位于五大湖地区的底特律，这是另一个重大的殖民成就。[34]

到路易十四的统治后期，法国在北美建立了许多城市，占领了从底特律到新奥尔良的大片领土，成功缔造了欧洲国家在北美的最大殖民地。

欧洲国家竞相在北美扩张领地，竞争加剧，各国力量此消彼长。以英国为例，大英帝国的大幅扩张侵占了荷兰和法国在北美的利益。

与欧洲帝国扩张密切相关的是重商主义政策，其基础是禁止殖民地与竞争国进行贸易，当外国人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他们便设置关税保护国内市场。英国果断采取措施，保护其不断扩大的市场，这导致了第一次英荷战争在1652年爆发。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英国在英属领海拦截荷兰船只，荷兰被打败并被迫遵守英国的航海法案。但是这并没有结束两国之间的领土冲突。1664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决定入侵新阿姆斯特丹，以此终结与荷兰的争端。由约克公爵率领的英国军队大胜，并正式把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纽约，从那时起，这一荷兰殖民地上的居民变成了英国臣民。

将荷兰逐出北美之后，英国在北美建立了13个殖民地，建成了一个殖民帝国。但是，英国与法国因殖民地边界的分歧在1754年爆发了一场冲突，史称“法国印第安人战争”。

这场英国与法国间的殖民战争加剧了欧洲强国之间的紧张关系。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英国、葡萄牙、普鲁士结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瑞典缔结的联盟相对抗，参与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球性冲突。一些历史学家把这场战争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全世界有四大洲卷入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8世纪，欧洲的利益网络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七年战争的每个参战国拓张领土的野心都不再限于欧洲大陆。

法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1763年签订的《巴黎和约》使英国获得法属北美殖民地，法国不再是殖民大国。在北美，除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几乎整个新法兰西的领地都被割让给英国，路易斯安那则被割让给西班牙。英国还成功把法国赶出了印度，开启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霸权时代——这块土地对大英帝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英国赢得七年战争主要依靠两个因素。第一是海军霸权。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期开始，英国就认识到海军力量是保护不列颠群岛安全和推动英国向外扩张的关键。1755年，英国首相[35]威廉·皮特开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将英国舰队的规模扩大到法国舰队的两倍。第二是金融霸权。威廉三世统治时期，英国开始效仿荷兰，通过出售债券获得战争融资。就这样，英国政府具备了强大的筹集资金的能力，而法国一旦国库空

虚，就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

殖民扩张的成果和战场上的胜利使英国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全球大国的角色。“大英帝国”这个词从18世纪中叶起，尤其是在七年战争之后开始出现。在1707年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合并后，乔治三世继位之前，“大英帝国”还只是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政治联盟的代称。到18世纪下半叶，由于海外领地不断增加，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开始将由英国统治的所有领地统称为“大英帝国”。

随着海外帝国的疆域越来越大，英国政府和英国王室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来巩固对殖民地的统治，确保管理更有效。英国殖民地总督是一个关键职位，和西班牙总督、法国总督一样，英国总督在其所辖领地拥有绝对权力，担任殖民地总督是获得利益和提高社会地位的绝好机会，总督因而成为一个备受尊崇的职位。

然而，英国殖民地的总督并没有西班牙总督那么隆重华丽的排场，也没有那么多可行使权力的方式。西属美洲殖民地政府通过提炼贵金属获得财富，并对教会和印第安人征税。英属美洲殖民政府则没有这些资源，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英国定居者。为了增加税收，维持法律和治安，英国人在殖民地采用英国本土的做法，实行郡制，并引入旧式的英国警长制。但是，当殖民地居民被迫纳税给殖民地政府时，他们要求殖民地政府考虑他们对如何花费税收的意见。由殖民者代表组成的地方议会成为早期英属美洲殖民地很有影响力的机构。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殖民地人民与英国王室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

海上力量、军队和财富等因素相互叠加，使一些欧洲强国能够通过蚕食其他国家的利益来扩张自己的力量。但事情并不总能如愿，世界上还有许多未开发的地区，占领这些地方不必触犯竞争对手的利益。因此，欧洲人继续投资探索活动，组织发现之旅。

葡萄牙在17—18世纪探索了今天巴西广阔且难以深入的丛林地带，领土逐渐扩大。这主要归功于殖民地定居者为了向巴西内部开拓而组成的准军事团体——“旗兵”（bandeirantes）。他们最重大的成就是在1693年在今天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发现了黄金和钻石。从此，这个偏远的地方变成葡萄牙美洲帝国的新经济中心，吸引了大批移民。[36]

法国的探索之旅也收益颇多，弥补了七年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1766年，法国海军上将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上将带领探险队环游世界，最终在塔希提岛登陆，法国开始对南太平洋地区造成影响。对英国来说，影响最大的探索之旅是由詹姆斯·库克船长领导的，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

和许多出身低微的欧洲人一样，詹姆斯·库克十几岁时就加入了商贸船队，这是摆脱贫穷和平庸的唯一道路。七年战争期间，库克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是一个很出色的水手和制图师，这为他带来了很好的声誉，使他得以参加跨越太平洋的三次航行——这几次航行因为在科学和地缘政治领域造成的重要影响而载入史册。1768年，库克受英国皇家学会委托，带领船队远征南太平洋，到达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库克代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占领了这片土地，奠定了英国在这个地区殖民扩张的基础。

殖民其他大陆和占领偏远地区并不只是欧洲强国的目标，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也加入了殖民者的队伍，并颇有建树。

挪威、丹麦和瑞典开始尝试向北拓展边界，但是那里的冰川经年不化，严寒的气候显然不适宜居住。所以它们不满足于只向北方发展，也开始在美洲和其他大陆开展殖民冒险活动。

那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文明发展的程度还比不上拉丁美洲，但是严酷的环境使那里的人民锤炼出了更高的韧性。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被积雪覆盖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伟大的征服精神，向外扩张的理念深入人心。这种精神气质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就有充分展现。

维京人有着非凡的航海传统。考古遗物证明，维京人可能早已到达过北美海岸，但他们从未意识到那是一个新大陆。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背景，挪威、丹麦和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王国能够在欧洲强国的扩张中分得一杯羹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在苏格兰、爱尔兰、冰岛甚至格陵兰岛定居下来，挪威依赖这一北部定居点网络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霸主。但是到16世纪后，丹麦成了在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瑞典、挪威和丹麦曾在14—16世纪共同建立了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共主邦联卡马尔联盟，然而瑞典不满于丹麦的主导地位，使得这一联盟在16世纪瓦解。不过，丹麦反对挪威独立，丹麦议会在1536年正式与挪威合并，从那时起，挪威的海外领地都直接由丹麦控制。

与挪威合并之后的丹麦也被称为丹麦帝国（或丹麦—挪威联合王国），这个信奉新教的联合王国为巩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付出了许多努力。由于瑞典和德国的反对，丹麦没能在波罗的海实现霸权，但在海外扩张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丹麦帝国的建立是另一个由水手、冒险家、私人投资者与王室紧密合作并实现扩张的实例。在克里斯蒂安四世统治期间，丹麦东印度公司正式获得了在亚洲开展贸易的权力。1620年，丹麦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南部的特兰奎

巴建立了第一个据点，后来还在印度次大陆开拓了一些小块的飞地。在前往亚洲的途中，丹麦还在中非海岸，即现在的加纳建起多个据点。

在丹麦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地区是加勒比地区。丹麦西印度公司在那里占领了几个小岛，后来被称为安的列斯群岛。与其他欧洲帝国一样，丹麦在这一地区的主要产业是糖和棉花。

这些热带地区虽然存在不少挑战，但是相比之下，原属于挪威的北部领地的形势更为严峻。一小群斯堪的纳维亚人从16世纪起在冰岛定居，然而，严酷的生存条件使得人口无法稳定增长，在18世纪，冰岛约有1/3的居民死于一种天花病毒。

格陵兰岛的殖民进程更加艰难。1721年，路德派传教士汉斯·埃格德在丹麦帝国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授权下，建立了定居点戈特霍布，意思是“美好的希望”，后来这里成了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在丹麦民众看来，搬到这个不宜居住的地方是一种惩罚，因此，最初的移民里有一些是刑满释放的囚犯，他们被迫前往格陵兰岛。虽然困难重重、条件恶劣，但是这个主要由因纽特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组成的定居点到现在仍然十分活跃。

在丹麦建立海外帝国的同时，它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竞争对手瑞典也在崛起。瑞典在中世纪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强国，17世纪中叶，在古斯塔夫二世·阿多夫统治时期，瑞典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征服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很多地区，在战争结束时，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让瑞典获得了今天德国境内的很多土地。

瑞典一边在欧洲开疆拓土，一边建立海外帝国。1638年，来自瑞典的第一批定居者在今天的特拉华州建立了定居点，几百名瑞典人和芬兰人移居到这里，这一定居点迅速发展起来，并被命名为“新瑞典”。[37]17世纪50年代，瑞典在中非建起了一些据点，也被称作瑞属黄金海岸。然而，瑞典的海外扩张期非常短暂。后来，荷兰入侵新瑞典，把新瑞典并入了新阿姆斯特丹。丹麦人把瑞典人赶出了中非，并侵占了黄金海岸。几十年后，瑞典在北欧的霸权地位受到另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挑战——俄国。

1700年，俄国、丹麦、普鲁士、波兰立陶宛联邦和萨克森王国组成反瑞联盟，在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的领导下发起了旨在终结瑞典北欧霸权地位的战争，史称“大北方战争”。最终，瑞典战败，除了芬兰和波美拉尼亚外，瑞典几乎丧失了多年扩张中得到的所有领地。

反瑞联盟的成员国瓜分了瑞典帝国的领地，最大的受益者是俄国，它得到了瑞士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领地和出海口。这是世界史上最非凡的领土扩张过程之一，也是欧洲崛起的重要篇章之一。

俄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过程并不简单，这主要是因为它位于欧洲的东部，在这里，欧洲与亚洲只隔着一道乌拉尔山脉，历史上不断受到蒙古人和鞑靼人的袭击和劫掠。俄国曾经也是强大的蒙古帝国对外扩张的受害者。蒙古人从13世纪成吉思汗时代起成功征服了大片领土，建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直到14世纪蒙古帝国开始衰落之后，俄国才逐渐脱离被征服的苦难。

15世纪，莫斯科大公国开始兴盛起来。在伊凡三世统治期间，莫斯科大公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三倍，蒙古人被迫从这里撤出。东正教会在莫斯科设立了主教席位，加强了东正教与莫斯科大公国王室之间紧密的联盟关系。

1453年，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陷落，最后一位东正教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去世，从此莫斯科成了东正教的中枢，莫斯科也常被称为第三罗马，俄国的君主开始被称为沙皇——这一称号来自恺撒大帝的名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承认伊凡三世为皇帝——此前伊凡三世的称号是俄罗斯王子。伊凡三世地位的改变深刻影响了伊凡三世继任者的命运，他的孙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加冕为俄国沙皇的君主，即伊凡四世。然而伊凡四世生性残忍、品行低劣，也被称为伊凡雷帝。成为沙皇的伊凡四世决心要确保皇帝不只是一个象征性头衔，而是要治理一个帝国。所以，伊凡四世在整个统治期内都投身于帝国建设的大业。

伊凡四世对俄国历史的理解很简单：俄国一直受到东方外族的侵略，直到莫斯科大公国变得强大，并开始向被敌人控制的地区扩张，才结束了被侵略的命运。因此，伊凡四世得出结论，俄国强盛的关键在于向东扩张。

沙皇的权力依靠两股力量的支持。第一股力量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他们因为开疆拓土的功绩和对沙皇的忠诚而被赐予土地。第二股力量是哥萨克人。“哥萨克”一词来自土耳其语，意思是自由人。哥萨克人最初是生活在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的猎人部落，他们既是伟大的骑兵和勇士，也是许多欧亚人的梦魇，哥萨克人除狩猎之外，以掠夺为生，是俄国扩张主义的象征。拿破仑入侵俄国时说得很清楚：“哥萨克人是最出色的轻装部队。如果我的军队里有哥萨克人，我就能征服全世界。”

伊凡四世是第一个认识到向亚洲东扩的关键在于与哥萨克人结盟的沙皇，他与哥萨克人达成协议，任命哥萨克人为俄国的先锋部队，作为回报，沙皇赏赐给他们金钱并准许他们掠夺被征服的领土。在与哥萨克人结盟后，伊凡四世开始了野心勃勃的征战。

1552年，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伊凡四世成功征服了喀山，蒙古人被赶走。这次胜利打破了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征服喀山使俄国首次吞并了非斯拉夫国家。为了控制喀山，伊凡四世驱逐了这里的大部分穆斯林人口，

并遣送了许多俄国商人和工匠到这个城市定居。[38]

在征服喀山之后，伊凡四世的下一个目标是阿斯特拉罕，他如愿以偿，俄国的边界延伸到里海。攻占阿斯特拉罕汗国后，俄国又成功控制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这片广阔土地上的财富使俄国贵族的财富大大增长，其中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受益最多。沙皇把乌拉尔地区的大片土地都赐给了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使其成为俄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贵族之一。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不仅是最大的地主，也积极参与实业活动，他们大规模地把俄国人迁到人烟稀少的地区，并鼓励移民建立定居点。移民带来的结果之一是文明被带到了欧亚之间的这片不毛之地。

在占领西伯利亚的大业中，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也一马当先。位于北亚，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在俄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快到1577年的时候，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委任哥萨克人叶尔马克·季莫费耶夫维奇保护其土地，抵御西伯利亚汗国可汗库楚姆的袭击。1588年，叶尔马克带领一支哥萨克军队远征西伯利亚，目的是一劳永逸地击败那里的敌对部落。[39]

这次远征使俄国人开始探索西伯利亚。1582年，叶尔马克攻克了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都喀什里克。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上，哥萨克人在1585年建起托博尔斯克，这座城市成了西伯利亚事实上的都城。在同一年，叶尔马克终于找到了库楚姆，但库楚姆趁夜偷袭了俄国军队，叶尔马克在伏击中丧生，没能实现抓住库楚姆的夙愿。但是，作为探索西伯利亚的先驱，叶尔马克名留史册，他的冒险经历成为许多俄国歌曲和编年史的灵感来源。

叶尔马克探索了西伯利亚的几大河流，打开了俄国人进入这片地区的通道。伊凡四世极其关注哥萨克人攻克的土地，并支持俄国人征战西伯利亚。1598年，库楚姆最终战败，这一地区被穆斯林统治的阶段也结束了。随着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变成了沙皇的臣民。俄国从最初的斯拉夫人的联盟成功发展成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

伊凡四世深刻影响了俄国的命运。他雄韬伟略，使自己的王国发展为控制欧亚大陆的大帝国。然而，伊凡四世缔造的帝国过于依赖他的个人权威，缺少能够保证帝国持续发展的体制或政府体系。在伊凡四世去世之后，俄国经历了长期的不稳定和无数因争夺王位而起的斗争。1613年，俄国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胜出，被加冕为俄国新沙皇。米哈伊尔一世结束了俄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开创了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实现了俄国的统一，使俄罗斯帝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伟大帝国。[40]

在整个18世纪，俄国人迅速向东方挺进，进入亚洲并进行殖民统治。最重

要的是，西伯利亚变成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欧洲人也开始了解这片未知的天地。

征服西伯利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哥萨克人再次起到关键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杰米德·皮安达。根据西伯利亚编年史，1620年，皮安达一行去往西伯利亚狩猎探险，想在那里开展皮毛交易。皮安达是第一个沿通古斯河到达世界最大河流之一——勒拿河的俄国人，他还与居住在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建立了联系。紧随皮安达之后，俄国军队开始进入西伯利亚并建造堡垒，确保这些地区臣服于沙皇统治。1627年，皮安达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起一个据点，接着又在勒拿河畔建起了另一个据点。10年后，这支部队首次到达贝加尔湖。1648年，一支探险队来到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就这样，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帝国的边界从东欧扩张到远东地区。

俄罗斯帝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张，不仅是因为沙皇野心勃勃，也得益于俄国人民共同的决心，他们要在几代人都未曾了解的黑暗之地扎下根。和大西洋沿岸的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在草创时期依靠的也是那些财富猎手和冒险家。西伯利亚最初的主要财源是皮毛交易，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动物。于是，皮毛交易成为俄国18世纪最重要的产业。从17世纪起，俄国的皮草需求突然增长，与19世纪美国的淘金热一样，这使许多人冒险进入草原，寻找这种利润越来越大的商品。对沙皇来说，西伯利亚的皮毛是重要的财富来源，其重要性几乎与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藏一样。因此，与西班牙国王一样，沙皇收取皮毛贸易一定比例的利润。此外，沙皇还要求已经臣服的西伯利亚原住民缴纳皮草税。

出于种种原因，俄国在西伯利亚巩固主权并强迫当地人纳税的过程比大西洋帝国更加容易。首先，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地区人口稀少，尚未开化，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俄国入侵。其次，由于皮毛资源丰富，所以沙皇要求收缴的税款对当地人来说并不是太大的负担。最后，西伯利亚原住民通常不会被当作廉价劳工。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被征服的西伯利亚人不愿意成为俄国的臣民，而且越往东，这种抵抗力量越强。布里亚特人和科里亚克人为了争取独立与俄国开战，直到最终被俄国人的武力打败。

俄国向东方殖民扩张的另一个巨大优势是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这与大西洋帝国很不同。欧洲强国竞相在美洲和其他大陆侵占土地，经常发生冲突，但它们都没有对北亚表现出任何兴趣，俄国得以独自任意地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驰骋。

但是，俄国在向南西伯利亚推进时遇到了挑战，这里有两个强国：蒙古和明朝。从17世纪开始，蒙古和明朝的坚决抵抗限制了俄罗斯帝国向东南的拓张。

1600年时，俄国的领土为210万平方英里，一个世纪后，其国土面积增加到590万平方英里，还野心勃勃地想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41]通过建造定居点占领土地并不是很困难，真正的挑战是在这些土地上殖民，管理殖民地并从中榨取财富。

尽管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地区对俄国来说就是黄金国，但是在那些为了寻找财富而到这里冒险的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在这些看上去非常不宜居的地方定居下来。虽然西伯利亚南部土地肥沃，吸引了不少俄国农民，但总体上，这片广阔的土地非常缺少移民，这是俄国面临的一大问题，也是这一地区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根据1740年的一份人口普查，当年西伯利亚男性人口仅有40万。[42]

俄罗斯帝国不仅在陆地上向亚洲扩张，也像其他欧洲大国一样，通过海洋扩张领土。沙皇彼得大帝在去世前曾派遣丹麦水手维图斯·白令去探索西伯利亚的东部边界。

1741年，白令率领600多人的远征队出发，他此行的目的是绘制东西伯利亚的地图并航行到北美洲。白令的远征队发现了阿拉斯加海岸。白令在这次航行中死去，他并不知道自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穿过白令海峡（这个海峡用他的名字命名）前往美洲的探险家，他的这一发现使俄罗斯帝国在美洲大陆占领了大片土地。

在俄罗斯帝国发展的过程中，凯瑟琳大帝的功绩尤为引人注目。在她统治期间，俄国征服了广阔的领土，夺得奥斯曼帝国和波兰近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43]还成功占领了克里米亚，以及今天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周边的大片土地。凯瑟琳大帝极其重视向高加索地区扩张，制定了攻打奥斯曼帝国的计划，最终把土耳其人赶出了君士坦丁堡。尼古拉斯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年）是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扩张的巅峰时期，沙皇统治的领土横跨三大洲，覆盖了地球约1/6的陆地。

在进入大航海时代300年后，这些欧洲强国都成功缔造了自己的帝国，疆域横跨五大洲。这场史无前例的征服和殖民运动有多重动机，攫取财富显然是一个共同目的，此外还有侵占领土后得到的权力和荣耀。竞争是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不要忘记，正因为卡斯提尔王国想要努力赶超葡萄牙，才发现了新大陆；而英国和法国与伊比利亚半岛两个强国的竞争和摩擦也是它们打开海外市场和向外殖民的主要动因。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和俄国因为处在极端不利环境下，面对生存的压力，因此也要向外扩张。对它们来说，占领其他国家或族群的领土既能解决许多生存问题，也是繁荣兴旺的唯一途径。

当然，欧洲强国的帝国建设战略存在很大差异。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往往依靠皇室的支持（但也有例外）；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主要通过股份公司和私人计划建立定居点，而后获得皇室认可，这些计划由想从中牟利的公民出钱投资。不过，不论是西班牙的征服者或是其他国家的先驱者、种植园主、定居者或哥萨克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国家向外扩张的先行者，奋不顾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这项冒险事业中。

欧洲帝国崛起带来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大西洋世界。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来到美洲，英国、法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紧随其后。在伊比利亚半岛与中美洲之间的第一条贸易路线建立起来后，欧洲人逐渐向美洲大陆的南北方向扩展，到17世纪末，西欧的主要港口以及非洲海岸的一些飞地都整合到了大西洋贸易网里。自此，大西洋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欧洲的殖民强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前文已经谈到，殖民美洲不仅仅是开发市场这么简单，还需要建立有人居住的定居点。最初，移民的规模并不大，但最后发展成大规模的迁徙——后面的章节将详细探讨这一话题。这些定居点的建立使欧洲各个帝国的习俗、社会制度、语言和宗教得以传播，西方文化在美洲深深扎根，坚不可摧。

在15世纪之前，西方世界面对东方的扩张一直处于下风。这一情势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彻底扭转。从那一年起，欧洲开始掌握主动权，欧洲国家得以在一个广阔的大陆扩张并传播其信仰。地理大发现的最终结果是，西方文化在大西洋两岸都落地生根并繁盛起来。

欧洲帝国的崛起使得欧洲在后来的4个多世纪内称霸全球。欧洲列强建立的遍布世界各地的贸易网不仅让它们获得了经济利益，也使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帝国的崛起也对欧洲人的集体心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欧洲人总体上越来越相信其强大和繁荣的关键在于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

---

[1] 根特市，现为比利时的一个自治市，东弗兰德省省会。——编者注

[2] Hugh Thomas，*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1440–1870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7).

[3]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1492: The Year the Modern World Began* (San Francisco: Harper One，2009).

[4] Bartolomé de las Casas，*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1999).

[5] de las Casas，*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6] Thomas，*The Slave Trade.*

[7] Hugh Thomas，*The Conquest of Mexico* (London: Hutchinson，1993).

[8] Thomas，*The Conquest of Mexico.*

[9] de Madariaga，*Imperio Español en America*

[10] de Madariaga，*Imperio Español en America*

[11]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Our America*: *A Hispan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W.W. Norton，2014)，p. 28.

[12] Henry Kamen，*Empire: 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1492–1763*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2004)

[13] Kamen，*Empire*.

[14] Kamen，*Empire*.

[15] Kamen，*Empire*.

[16] Steinmetz，*The Richest Man Who Ever Lived.*

[17] de Madariaga，*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c*

[18] de Madariaga，*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c*

[19] E. Bradford Burns，*A History of Brazi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20] Burns，*History of Brazil.*

[21] Burns，*History of Brazil.*

[22] Arthur Herman，*To Rule the Waves: How the British Navy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4).

[23] John H. Elliott，*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24] 贵格会又名教友派、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下的一个分支。——编者注

[25] Kathleen Burk，*Old World*，*New World: The Story of Britain and America* (London: Abacus，2007).

[26] Jonathan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Greatness*，*and Fall*，

1477–1806 (Oxford，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7]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

[28] Burk, *Old World, New World.*

[29] Martin Meredith，*The Fortunes of Africa: A 5000-Year History of Wealth，Greed，and Endeavo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04).

[30] Samuel de Champlain，*Le Voyages de Samuel de Champlain au Canada，de 1603 à 1618* (London:Forgotten Books，2017).

[31] Raymonde Litalien and Denis Vaugeois，eds.，*Champlain: The Birth of French America*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4).

[32] W. J. Eccles，*The French in North America，1500–1783*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

[33] *A History of Canada's Population*: www.statcan.ge.ca

[34] Eccles，*French in North America.*

[35] 威廉·皮特是英国第一代查塔姆伯爵，辉格党首相，七年战争中英国的实际领导人。英国首相的称谓与地位由威廉·皮特的儿子小威廉·皮特在1783年正式确定，1937年《国王大臣法》正式在法律上确认了首相的称谓。——编者注

[36] Burns，*History of Brazil.*

[37] Morison，*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38] Geoffrey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 A History*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9]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

[40] Simon Sebag Montefiore，*The Romanovs: 1613–1918* (New York: Alfred A. Knopf，2016).

[41] 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1400–2000*，(London:Bloomsbury，2008).

[42]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

[43] Montefiore，*The Romanovs.*

第四章

反抗帝国的革命

革命时代对欧洲帝国和西方世界的影响

革命是现代欧洲的伟大产物之一。

欧洲之所以能够通过对外扩张获益，正是革命的结果——一些诞生于欧洲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已传遍世界各地。在欧洲近代史中，“革命”一词频频出现，它不仅指欧洲那些突如其来的政治变革，也涵盖所有影响人们生活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革命绝非仅仅指那些引发政权更替的政治动荡，以及最终导致政府制度颠覆，或是彻底动摇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的革新。最重要的是，革命必须有能够改变人民价值观的新思想做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国大革命具备了革命的全部现代含义：它让法国的旧秩序戛然而止，迎来一个革命性的新时代，并彻底改变了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塔列兰曾说过：“没有在1789年以前生活过的人根本不懂得生命的快乐。”法国大革命后，塔列兰继续在政府部门任职，担任拿破仑的外交大臣，政绩斐然，但是，他的这句话充满了怀旧意味，表露出他对随着法国大革命消逝的旧式贵族田园生活的无比留恋。

“骑士时代一去不返，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精于算计的小人时代来临，欧洲的荣光灰飞烟灭。”爱尔兰保守派作家埃德蒙·柏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写到。而拥护革命的人则认为，革命提供了一个创造更美好世界的良机。《法国大革命：一部历史》的作者托马斯·卡莱尔将法国大革命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篇”。

“要想征服，我们必须先有胆量。”法国大革命领袖乔治·雅克·丹东号召说。最能代表革命价值观的拿破仑非常清楚革命这个词的含义：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各行各业对“所有人才开放，不受出身高低的限制”。拿破仑留下了一句传世名言：在这个社会里，公民可以向上到达与其才能和志向相应的社会阶层，不会因为垄断世袭的特权或积累太多财富的封闭精英集团设置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无法企及目标。这些革命信条具有普适性，因此拿破仑希望建立一个帝国，把这些理念传播到欧洲和全世界。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因为在他倒台之后，欧洲大陆破旧立新，旧世界在革命群众和拿破仑的军队面前倾覆瓦解，一去不回。

法国大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激起的剧变也影响到大西洋彼岸的美洲，导致伊比利亚半岛两个王国和法国的美洲殖民地解体。这也是一个大事件的长

期结果——1776年美国革命爆发，拉开了革命时代的大幕。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13个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定居者就开始公然反抗欧洲旧政权，他们不仅想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还想建立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践行民主代表制的新社会，这些原则后来也彻底改变了欧洲。英属美洲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这场冲突是怎么开始的？那些来自欧洲的思想为什么能够在美国大获成功？

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出现的问题与对峙。七年战争以英国打败法国告终，战后，英国王室对美洲的13个殖民地采取了非常不得人心的措施，他们先是标明了殖民地的边界和印第安人的领地，为了免生事端，英国在1763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严禁占领印第安人的地盘。但殖民地的居民无法接受这一禁令，因为这等于设定了他们可拥有的土地面积的上限。因此，许多人拒绝遵守这一法令，继续向印第安人的领地扩张。其中有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地主名叫乔治·华盛顿——他在几年后名扬天下。华盛顿认为这项法令不过是“安抚印第安人的权宜之计”，只要“印第安人不反对我们占领他们的土地”，法令就自然无效。[1]

不过，殖民地居民与英国王室对立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土地，而是征税。七年战争让英国的国债翻番，税收也因此急剧上升，13个殖民地的居民更是不堪忍受，而英国政府认为，这些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也是英国臣民，有义务分担英国政府的治理和国防费用。

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面向美洲13个殖民地居民的直接征税法案——《印花税法案》。该法案规定，所有贸易商必须为通过海关发运的所有产品支付印花税。对此，殖民地怨声载道，而且因为害怕被报复，很少有税官敢强行征收税款，所以根本收不上来。殖民地人民的愤怒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殖民地人民有什么权利？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无代表不纳税”成为殖民地议会捍卫自身权利的主要口号。当时欧洲正处于启蒙时代，西方世界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正在讨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英国难以驳回殖民地人民的这一要求。虽然英国判定美洲殖民地的居民必须履行和英国本土臣民相同的财政义务，却没有给予他们和不列颠群岛公民一样的权利——他们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1765年，科学家、政治家、记者、外交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同时也是北美13个殖民地未来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受殖民地人民之托前往伦敦，向英国下议院阐述必须废除这项法案的理由。富兰克林在议会申辩道，如果不投票否决这项税收法案，殖民地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叛。下议院接受了他的雄辩，然而英国王室却丝毫不肯退让，坚持增加美洲居民的财政负担，拒绝给予他们要求的议会代表权，并在1767年又推出了针对基本产品的新税项，其中包括旨在保护东印度公司专卖权，防止北美走私的臭名昭

著的《茶税法》。这让殖民地民众怒火中烧，许多人不仅拒绝纳税，还直接向英国政府发出挑战。

1773年12月16日，北美洲殖民地商人的代表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运到北美倾销的茶叶运回英国，因为殖民地居民本就反对这家公司垄断北美的茶叶生意，更不可能为对他们来说完全无利可图的茶叶纳税。在英国政府拒绝他们的要求后，波士顿的抗议者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停泊在港口的运茶船，将船上的茶叶抛入海里，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北美13个殖民地对英国统治的全面反抗。

波士顿倾茶事件后，为了惩戒殖民地的叛乱，英国政府通过了“强制法令”[2]，决定在东印度公司得到赔偿之前封闭波士顿港口。这些法令明显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激起了他们的联合反抗，并直接导致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1774年9月，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召开联合会议，要求英国取消这些惩罚性法令。至此，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到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时，大多数殖民地的代表都投票赞成通过武力进行抗争。

在欧洲帝国的殖民史上，这并非第一起殖民地反抗事件。事实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曾数次爆发叛乱，但都被武力成功压制了下去，葡萄牙也是如此。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反抗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多个方面的因素，西方历史的进程也因此被改变。

1776年1月，激进派记者、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出版了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他用所有人都能读懂的浅白语言解释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必须与英国王室决裂并争取独立的诸多理由。这本小册子迅速成为畅销书，这反映出寻求独立的观点大得人心。但是，并非所有殖民地的人民都认同必须和英国王室断绝关系。比如，在魁北克和佛罗里达的动员就失败了。据估计，至少有20%的白人和大多数非白人居民支持英国。[3]尽管如此，从1776年初起，追求独立成了13个殖民地代表的共同目标。1776年7月4日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大陆会议上的大多数代表投出赞同票，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美利坚合众国。

独立战争爆发后，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在1775年6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任命乔治·华盛顿为美军总司令。华盛顿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曾参加过七年战争，他领导的弗吉尼亚军团是美国第一支正规军。华盛顿丰富的经验使他能够成功组建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殖民地军队与英国正规军队正面交战。不过，北美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击败英国，不仅仅是因为华盛顿杰出的领导才能和他率领的军队实现独立的决心，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即其他欧洲强国的支持。

对法国来说，美国独立战争带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既可以报复英国，一雪七年战争的战败之耻，又可以削弱英国的军事实力。1776年2月6日，法国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认美国独立，并承诺为其提供军事支持，促进与这个新国家的贸易。在法国站到英国对立面之后不久，又有其他欧洲强国加入了与英国对立的阵营，它们也想利用独立战争的契机削弱大英帝国的势力，从中渔利。西班牙起初担心美国的反叛之风会蔓延到美洲其他的殖民地，所以没有公开支持。但是，如果把英国赶出北美，会有利于西班牙帝国的利益。因此，西班牙最终决定与法国结盟，一起对抗英国。荷兰也积极助力13个殖民地寻求独立，因为英国夺走了荷兰在美洲的领地新阿姆斯特丹（即纽约）。在这三个欧洲强国的支持下，乔治·华盛顿率领部队打败英国，创建美国。

1783年，《巴黎条约》签署，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这个新国家北连加拿大，南到佛罗里达，西至密西西比河。就这样，英国失去了帝国的半壁江山，还不得不割让一部分佛罗里达的领地给西班牙，并把米诺卡岛还给西班牙。法国也得到了赔偿，赢回多巴哥的殖民地，夺回了塞内加尔。《巴黎条约》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美国诞生了。

作为美洲大陆上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美国并非只是一个由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新国家，因为美国建国正是对欧洲的统治思想和陈规的一种违抗。

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国家将这场战争称为“美国独立战争”，而在大西洋彼岸，它被称为“美国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仅是为争取独立而战，更是要创建一个和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国度，用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这个新社会将克服旧社会的缺陷和不公正，新社会的公民可以自由做事、实现梦想、和睦共处，革除所有造成压迫和权力滥用的因素。

激起美国革命的思想来自哪里？美国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英属美洲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和原则与英国王室发生冲突，并最终导致对峙。但是，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看，是欧洲的启蒙思想启发了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他们因此创建了美国，后来他们都被称为美国的缔造者或国父。

北美13个殖民地政治圈和知识分子圈内的启蒙运动深受英国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约翰·洛克、培根和休谟等著名思想家。尊重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等美国社会的思想支柱，以及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思想都源自他们。

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曾说过，他的政治灵感主要来自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家，特别是洛克。杰斐逊认为洛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4]杰斐逊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受到欧洲扩张主义精神的影响，他的一句名言是：希望美国成为“自由帝国”。这听

起来很像是欧洲帝国主义理想的另一个版本——美国的国父们梦想着开拓这个年轻国家的边界，坚信他们的疆界推进到哪里，哪里就能获得自由，蓬勃发展。

“宪法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指南。”华盛顿的这句名言显然也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也因此受到欧洲当时最顶尖思想家的欢迎。华盛顿决定战争一结束，就放弃指挥官的职位，回归乡里，不利用总司令的位置来夺取权力。这令许多欧洲的观察家刮目相看，充分体现出启蒙思想对这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将军的深刻影响。华盛顿认为，军队应该永远服务国家，民主制度应该明确权力的界限。

北美13个殖民地在伦敦的发言人、第一位美国驻法国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将美国精神定义为：“节俭、勤勉的开创精神，平等、自治、团体精神等民主思想，特别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或宗教压迫。”[5]

在宗教方面，启蒙思想家对教会权力的批判（特别是伏尔泰病态的反宗教主义）在经过了更长时间之后才被北美虔诚的清教徒接受。但是，这让美国的缔造者们坚定了一个信念：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是国家进步的关键。美国第四任总统、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詹姆斯·麦迪逊曾说过：“在所有财产中，良心是最神圣的。”

在美国革命中形成了一些文本，明显受到了启蒙时代（托马斯·潘恩把它定义为理性时代）的影响，后来这些文本成为美洲、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范本，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启发了许多宪政主义者和政治领袖。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最广为人知的英文格言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句格言。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曾说过，这句铿锵有力的话并非他的独创，而是《独立宣言》所有起草人的共同感受和建言。

美国革命的另一个硕果是1787年9月17日通过的《美国宪法》。它明确规定了美国民主的法则以及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的权力，值得称誉的是，《美国宪法》有7个条款的文字极为简明，所有公民都能看懂。迄今为止，这部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术语的成文宪法一直是美国政府执政的依据和准绳，也是后来许多国家制定宪法的重要参考文件。

对大英帝国来说，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损失，还有破坏性的影响。在签署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之后，谢尔本伯爵政

府倒台，国王乔治三世考虑退位。在心理上，英国人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接受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这一事实，并仍把美国视为英国的殖民地，以轻蔑甚至仇恨的心态看待那里的人。传记作者詹姆斯·博斯韦尔曾记录塞缪尔·约翰逊说过的一句话："我愿意爱全人类，但是美国人除外。"[6]这种态度在当时的英国司空见惯。

为了弥补失去北美市场垄断权的亏损，英国政府对美国进行报复：禁止美国商船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进行贸易，这对处于发展初期的美国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害。两国之间水火不容的态势持续了很长时间，在1812年到达顶点：美国向英国宣战，两个国家又在北美打了两年仗。[7]但是，物极必反，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英美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并在1820年迎来明显的转折。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弥合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冲突。从18世纪后期开始，美国的出口产品有一半以上发往英国，两国的商业交易在整个19世纪一直稳步增长。

并非所有英国人都以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为憾。英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从国家利益角度考虑，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让英国因祸得福。著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支持这种观点。早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他就一直催促英国政府放弃北美殖民地。亚当·斯密在17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北美殖民地的经济产出不高，还需要无休止的支出，寥寥无几的经济收益根本不足以平衡英国政府为解决问题付出的代价。[8]

这位著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将美国经验总结为，如果殖民地需要输入人口并让其臣服英国，最终会得不偿失；只有以商业往来为基础的贸易殖民才值得付出努力。英国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爱德华·吉本也因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而如释重负，英国前首相威廉·皮特也同样如此。

在欧洲国家努力接受美洲大陆出现了第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时，在欧洲大陆也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撼动了欧洲社会的支柱，还对欧洲未来的全球角色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以及法国与旧制度决裂的导火索已有许多著述。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孕育出启蒙思想的欧洲社会一直沿袭君主制和封建制度，财富和权力集中在贵族和神职人员手中。但是这能持续多久呢？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执政期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原因，封建制度难以为继。三十年战争使法国债台高筑，这个国家在战后的30年里陷入了严重危机。虽然贵族和神职人员能够免税，但是广大人民承受的财务压力不断增加，就这样，绝大多数穷人，特别是农民，已难以忍受艰辛的生活。

震荡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7月14日爆发。巴黎群众攻占了象征封建

专治的巴士底狱。随后，许多支撑欧洲君主制和政治制度的思想和信念分崩离析。在欧洲历史上，人民群众从来没有以如此大的力量和决心反抗统治者，也从未取得过这样的成功。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令全欧洲的权贵胆战，穷人和被压迫的阶层则深受鼓舞。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大多数法国人民已经贫困交加，一无所有，所以走上街头、反抗当权者对他们来说是最后的选择。在后来的200年间，1789年法国发生的这一幕在欧洲其他地方数次重演，每次人民都面临同样的贫穷和绝望，而政府却冷漠无能。

法国大革命的第二幕是法国新国民议会废除了维护贵族和神职人员社会顶层地位的封建制度。此后不久，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这是一份真正的革命性文件，其内容受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启发，《人权宣言》界定了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应该遵循的原则。《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是拉法耶特侯爵，他是一个不因循守旧的贵族，他有一段特殊的经历，1777年，拉法耶特横渡大西洋，加入美国军队，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拉法耶特出任国民自卫军司令，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

《人权宣言》的第一条是，“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上”。第二条是，“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

这一纲领性文件阐述了人民主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法治国家等术语。虽然《人权宣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随后几十年的革命里并未被真正应用，但它仍然是每个推翻旧政权的民主运动必须参考的关键文本。就这样，法国由一个君权神授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人民主权国家，至少在理论上，法国政府必须依据《1793年宪法》（即《雅各宾宪法》）通过普选产生。

在这次革命中，人权和公民权被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这后来也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格言。

法国大革命的第三幕是雅各宾专政下的恐怖统治。1793年6月24日，法国国民公会通过了新宪法，法国从君主制国家变成共和国，宪法规定政府必须通过普选产生。在这一巨变发生时，激进的共和主义雅各宾派与开明的君主主义吉伦特派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最终雅各宾派通过大规模屠杀和暴力强势上位。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记述，这场屠杀可能造成了约4万人死亡。在这一血腥时期，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曾说过：“恐怖是迅速、严厉、不可动摇的正义。”在人类发明的所有砍头工具中，断头台可能是其中最高效的，这也成为这个时期令人难忘的一个标志。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在巴黎革命广场被推上断头台，成千上万的法国公民目睹了他们的国王与旧体制一起灭亡。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紧随其后，殒命于断头台。同样被斩首的还有许多法国公民，不仅有贵族和神职人员，也有各行各业的民众——他们被控反革命罪，其实有些完全是政治清洗的受害者。罗伯斯庇尔也死于他用来摧毁对手的断头台。

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震惊了整个欧洲，革命蜕变为屠杀，暴力和政治迫害的恶性循环让寄希望于这场革命的人大失所望。保守的观察家将法国的这些恐怖事件当作他们反对革命的实证，他们认为革命势必会带来混乱和死亡，最终只会出现一个更不公平的政治制度。

法国大革命的第四幕是革命战争。大革命后，许多支持君主制的代表人物被流放，他们给几个欧洲国家施加压力，希望它们能干预、阻止法国大革命。一些欧洲国家的君主为防止法国大革命蔓延到自己的国家，开始考虑入侵法国，其中奥地利的行动尤为突出。法国决定先发制人，在1794年4月向奥地利宣战，欧洲开始了漫长的战争时代，参战国的未来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深刻影响。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奇领袖开始崭露锋芒，他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是法国战争和革命的产物，他在军事上取得的丰功伟绩使他开始掌控权力，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的胜利。虽然拿破仑在入侵俄国和西班牙时曾犯过错误，但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缺乏真正的领袖人物，拿破仑正好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

在率领法国军队打败奥地利后，拿破仑建立了极高的威望。他在1798年开始践行一项由他自己策划的艰巨任务：远征埃及，并从埃及向波斯进军，以切断英国通往印度的路线，削弱英国实力。占领埃及还能弥补法国丢失美洲殖民地的损失。

远征埃及对拿破仑的一生影响深远。这位拥有凌云壮志的将军极其钦佩亚历山大大帝，他梦想能缔造一个从埃及延伸到远东的帝国。“欧洲只是弹丸之地，所有伟大的成就和荣耀都来自亚洲。”拿破仑曾这样说。

在打败统治埃及的马穆鲁克[9]后，拿破仑开始致力于在埃及传播西方文明的精髓以及革命原则。为此，拿破仑把法学家、政府管理人员、科学家和艺术家带到埃及，他们在建立现代埃及的过程中各尽其力，使埃及在许多方面都深受法国的影响。

拿破仑向埃及人民传递的信息是，他来到埃及，是为了把埃及人民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享有法国主张的人权。拿破仑以忠于革命精神为己任，没有像过去的欧洲帝国那样，强迫当地人成为基督徒。相

反，他非常尊重伊斯兰文化和埃及人的信仰。

拿破仑随即启动了侵略叙利亚的计划，以加强他在中东的地位，并从中东向印度或君士坦丁堡进发，终结奥斯曼帝国。然而，事实证明这项计划过于宏大。在海上，英国海军将领霍拉肖·纳尔逊率领英国舰队在地中海伺机而动，使拿破仑陷在埃及无法出海；在陆地上，土耳其军队成功拦阻了法军。最终，拿破仑认识到自己的未来还是在欧洲，于是，他在1799年班师回到巴黎。两年后，开罗被英军征服。如果拿破仑建立埃及帝国的计划成功了，法国和中东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尽管如此，他在埃及的冒险行动也深刻影响了法国和欧洲。由拿破仑创建的埃及研究院让欧洲人开始热衷于研究古埃及文明和在该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从那时起，西方人关于人类早期文明的知识迅速传播开来。

回到巴黎后，拿破仑迅速崛起，缔造了一个与其野心相匹配的政权和帝国。拿破仑不满足于被称为国家元首，在他的主导下，1804年，教皇庇护七世加冕他为法国皇帝。随着法国在欧洲不断扩张，拿破仑扶持自己的几个兄弟取代被废黜的王室，约瑟夫·波拿巴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路易·波拿巴当上了荷兰的国王，杰罗姆·波拿巴成为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还有一些法国将军被加冕为那不勒斯、瑞典等王国的国王。

就这样，一个来自科西嘉的小兵，说着带外地口音的法语，坐在路易十四及其继任者的宝座上，他的家人都成了波拿巴王朝的统治者，充分展示出法国大革命在几年内给法国带来的剧变和进步。对许多人来说，拿破仑代表着平等和任人唯贤的原则，取代了此前的君权神授制；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拿破仑称帝是倒行逆施，是1793年大革命中建立的共和原则和革命精神的倒退。另一方面，对所有在大革命中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来说，拿破仑是魔鬼和篡位者，颠覆了他们心中最神圣的事物和整个生活体系。拿破仑从伊比利亚半岛一路向俄国扩张，打造出一个伟大的跨国联盟，但也积累了很多劲敌，并最终被他们推翻。

拿破仑率领他的庞大军团不断取得胜利，在1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成功征服了除不列颠群岛之外的整个欧洲。拿破仑的目标是将整个欧洲大陆统一在法国领导之下，统一实行以法国大革命思想和他理解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政府制度。然而，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拿破仑犯了几个战略性的错误。拿破仑未能攻克西班牙的游击队和俄国的严冬，也没能准确估计反法联盟的力量和影响。1814年3月31日，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的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就此谢幕。但拿破仑仍有许多支持者，使他在逃离厄尔巴岛后重掌权力，再次挑战其他欧洲国家。但是这一次，英国的威灵顿将军率领欧洲军队在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最终击败了拿破仑。

拿破仑战败后，波旁家族和其他被波拿巴家族推翻的王室家族复辟，从流放地回到巴黎的君主想把一切都变回革命以前的样子。但是，大革命的思潮已经深入人心，全世界都已为之大变，重建旧政权如同煎水作冰，路易十八和其他几个国王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他会被人们铭记，不是因为他战功赫赫，而是因为《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10] 1804年生效的《法国民法典》是根据法国大革命思想编写的新民法典，取代了此前各种混乱且相互矛盾的律法。《法国民法典》在语言的清晰度和简洁性上都优于此前的所有律法，使普通公民也能够懂法。《法国民法典》的成功执行不仅使其在法国被沿用至今，也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典。被拿破仑占领的大多数国家都使用这部民法典，后来各国的民法典都明显受到其启发和影响。拉丁美洲几个国家的法典以其为范本，中东国家的政府在使伊斯兰法现代化时，也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文件。拿破仑确实是一个军事奇才，但最终影响了现代世界的，是《法国民法典》。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如拿破仑所愿对北非和亚洲产生影响，但确实大大影响了美洲。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改变了欧洲帝国在美洲殖民地的地位，但是真正改变殖民地命运、加速其终结的却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圣多明各是美洲率先实现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地方。

圣多明各的种植园使它成为法国获利最高的殖民地。在大革命爆发前，英国和法国所需的60%的咖啡和40%的糖都出自这里。[11]这离不开150多万非洲奴隶的辛勤劳作，他们占圣多明各人口的85%，其余2%是已经获得了自由的黑人和混血儿，由白人地主和管理人员组成的精英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作为圣多明各的少数群体，白人时刻都生活在有色人种反叛的恐惧中。米拉波伯爵在访问该殖民地时曾说：“这里的白人就像睡在维苏威火山脚下。”[12]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消息让圣多明各的白人精英欢欣鼓舞。许多人认为，他们摆脱法国税收和重商主义律法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有人甚至想到了独立。然而，除了白人以外，圣多明各的有色人种也决定要好好利用发生在巴黎的这场巨变。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让正在巴黎的文森特·奥热感到惊讶。奥热来自一个富裕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他是个混血儿，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像他一样的自由的有色人种争取平等的机会。他回到圣多明各，领导了一场起义，最后被逮捕并处决。但这只是黑人争取权利的开端。1791年8月21日，圣多明各的奴隶武装起义，殖民地爆发内战。最终，巴黎方面决定让

步，立法会承认所有自由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

然而，这一法国殖民地的主权却动荡不定。1793年英国和法国爆发战争，岛上的白人精英和英国谈判，改变了圣多明各的主权归属。为了打击他们的背叛，法国政府只得以自由为筹码，换得奴隶的支持。

1793年，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法国国民公会废除了奴隶制，法国成为第一个将蓄奴认定为违法行为的欧洲国家。虽然这似乎是法国政府为了维持主权而孤注一掷的做法，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反奴隶制的呼声就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支持者。1788年，“黑人之友”社团在法国成立，目标是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一些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也是这个社团的成员，包括孔多塞和法国大革命领袖拉法耶特。从1789年开始，反奴隶制运动越来越受到认同，尽管这可能影响到法国殖民地的利益。事实上，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雅各宾派认为，如果非要实行奴隶制才能维护殖民地的利益，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放弃殖民地。

在奴隶制被废除后，海地奴隶起义的领袖图森·路维杜尔与法国政府合作赶走了勾结岛上白人、入侵圣多明各的英国军队。路维杜尔曾是奴隶，拥有出色的军事和政治天赋，在成功驱逐英军之后，他宣布自己是新总督，并成功任用有色人种精英取代白人精英。路维杜尔没有满足于这些成就，1801年，他起草了一份宪法，赋予殖民地完全的自治权，并自封为终身总督。

路维杜尔的崛起，以及圣多明各的奴隶获得自由，对法国其他殖民地和整个加勒比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实行奴隶制的美国南部地区对此也很恐慌。在巴黎，管理国家的精英阶层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拿破仑本人也渴望恢复大革命前制糖业的兴旺，希望对殖民地施加干预。在这些因素驱动之下，法国军队在1802年再次征服了圣多明各，路维杜尔被捕并被驱逐到法国，不久后死在那里。

在重新占领圣多明各之后，法国想再度实行奴隶制，使奴隶在种植园劳作。然而，路维杜尔在离开圣多明各前曾经警告过当地人法国复辟奴隶制的可能性，实现自由的运动在这个殖民地已深入人心，奴隶们宁可死也不愿意失去自由，所以法国未能实现这一目标。让—雅克·德萨林领导殖民地人民起义，最终击败了法国人。

在赶走法国人之后，德萨林在1804年宣布圣多明各独立，并将国名改为海地——这个名字来自阿拉瓦克语，意为“多山的地方”。在拿破仑加冕为皇帝的同一年，德萨林也自立为海地皇帝。但是他的帝王梦很短暂，他在1806年死于谋杀。然后，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北方由独裁的君主制政府统治，南方则成立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的海地政治一直不稳定，冲突不

断、极度贫困。尽管如此，这个全球第一个由黑人担任领导人的共和国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美洲各殖民地寻求独立的榜样，激发了黑人和混血人种的平权斗争。

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以及海地独立等事件促使法国人重新思考他们的全球角色以及建立殖民地的必要性。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塔列兰在法国大革命后不久担任法国外交大臣，开始了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他在1797年出版了《论撤出殖民地的诸多裨益》，吹响了反对殖民的号角，因为殖民意味着要迁移人口，建设定居点。塔列兰在书中写道，北美13个殖民地最初的居民是“无产业、无领导、无道德约束的三无个体”，爆发叛乱是在劫难逃。此外，他对英国在印度的经验大加赞赏。英国在印度通过商业手段和雇用当地人获得财富，“给他们报酬但没有把他们变成奴隶”。塔列兰认为这是未来殖民的方向，因为这在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之间创建出一种合作关系，生产效率高得多。

法国海军与殖民地部长皮埃尔–维克托·马卢埃的观点和塔列兰相似，在反思美国独立战争后，马卢埃认为从长远看，即使殖民地的居民认同同一种文化，法国也必须通过不断的战争和压迫才能保有殖民地。

1789年前大行其道的殖民帝国主义开始分崩离析，加上海地独立的影响，拿破仑决定放弃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与他从欧洲获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相比，美洲殖民地不仅生产力较低，而且问题重重。因此，1803年，拿破仑决定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在拿破仑执政期间，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缩小，但是因为法国当时占领了西班牙，所以法国拥有和间接控制的美洲殖民地仍然是最大的。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是拿破仑的盟友，但是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公然违抗拿破仑的命令。拿破仑利用这对父子之间的斗争，在1808年将他们两人分别召至巴约讷，成功让他们同意把西班牙的王位禅让给自己的兄弟约瑟夫·波拿巴。就这样，波拿巴家族不仅取代了统治西班牙的波旁家族，也获得了西班牙殖民地的主权——至少许多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人是这么理解的。西班牙政府羸弱、政治不稳定，殖民地的人们害怕被法国统治，加上广为传播的法国大革命思想，这些因素相互叠加，激发了一股独立运动的浪潮，几乎遍及整个西班牙帝国。

在19世纪初，西班牙帝国的境况如何？独立运动取得了多大进展？

西班牙帝国在18世纪末以前一直运行良好，总体上很繁荣，18世纪下半叶尤其如此。西班牙帝国极具韧性，无论是大国地位被削弱，还是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进攻下被迫割让领地，或是西班牙王室的重重问题，甚至马德里皇宫里的阴谋诡计、权力斗争，政府高层的极度腐败，都没能使西班

牙帝国瓦解。

18世纪，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腓力五世执政期间，西班牙进行了波旁改革，革新了西班牙的政府体系，提高了管理效率，并增强了西班牙所有领地的凝聚力。

这一改革使庞大的秘鲁总督辖区（从现在的委内瑞拉一直延伸到阿根廷）分裂了。1717年，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成立，1767年，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成立。总督辖区之下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古巴、智利、波多黎各等都督区。就这样，集中在利马和墨西哥这两个西属美洲殖民地都城的权力分散到不同城市。

1717年，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两个重要行政机构中央贸易局和西印度事务委员会被搬到加的斯，就这样，西班牙和美洲的商业交易中心转移到了这个古老的海港城市。西班牙希望通过这些改变更直接地控制其帝国版图，实施更高效的管理。（不要忘记，实行君主制的西班牙并非把美洲领地视为殖民地，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下属王国，所以西班牙管理其美洲殖民地的方式与管理西班牙王国的方式十分相似。）

西属美洲殖民地在与其他大国的几次冲突中毫发无损地保留下来。1668年西班牙签署《里斯本条约》，自腓力二世时期起兼并了葡萄牙的西班牙帝国承认葡萄牙独立，此后，葡萄牙在美洲因为殖民地的边界问题与西班牙发生了几起冲突，有几次还引发了战争。

普雷特河总督区与巴西总督区之间的边界争议尤其激烈。1688年，葡萄牙在今天的乌拉圭建立了萨克拉门托殖民地，西班牙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座城市建在属于西班牙的领土上，因此西班牙人决定占领它并将其改名为罗萨里奥。不过不久之后，西班牙又把它还给葡萄牙。这座城市的主权多次易手，直到1777年，两国终于决定结束近3个世纪的领土争端，签订了《圣伊尔德丰索条约》，萨克拉门托被确定为西班牙的领地，西班牙则在巴西总督区的领土问题上做出退让。

西班牙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英国，因为英国不仅垂涎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而且英国的海军比西班牙更强。1739年，“詹金斯的耳朵战争”爆发，西班牙帝国原本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但是结果恰恰相反。在1741年的卡塔赫纳战役中，西班牙军队在海军上将布拉斯·德勒苏的指挥下，成功击退了英军的入侵，英军惨败。

这场胜利对西班牙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证实了西班牙拥有捍卫其帝国的能力（且远超出英国的预估），也大大提升了西班牙帝国的地位。在18世纪后来的几十年里，西班牙继续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只有俄罗斯帝

国的陆地面积能够与之匹敌。

西班牙一边打造促进帝国和平、繁荣发展的环境，一边继续探索世界、发展科学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卡洛斯三世执政时，他一直热切地推动科研发展，在西班牙帝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察，其中以西班牙海军军官、探险家亚历山德罗·马拉斯皮纳领衔的项目最为宏大。1781年，马拉斯皮纳带领水手和科学家开始环游世界，想要寻找一条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东北通道，这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梦想。马拉斯皮纳的发现对当时世界地理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关于美洲大陆的部分。

尽管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是西班牙仍然要面对很多内部问题，这威胁到其美洲殖民地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面对西班牙这一外来文明，美洲原住民一直抗争不断，这是令西班牙总督头痛的问题根源，特别是秘鲁总督辖区，那里的大多数人口都不是白人。1780年，自诩为秘鲁国王图帕克·阿马鲁后裔的孔多尔坎基领导了一场起义（主要的支持者为印加人）[13]，目的是反抗西班牙的统治。相比之下，更让人担忧的是克里奥尔人[14]的精英阶层的反叛。

与法国、英国一样，西班牙的重商主义和旨在盘剥美洲利益的商业活动在定居美洲的殖民者心中造成极大怨恨。克里奥尔人认为，西班牙的官僚体制和财政规则威胁到他们的利益，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让他们无法在自由的贸易环境下开展更大的项目。

克里奥尔人对西班牙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低于那些管理他们的西班牙精英阶层，而且他们无法捍卫自己的利益或积极参与殖民地的治理和管理。于是，和18世纪末英属美洲的居民一样，这些西班牙的海外臣民越来越觉得，如果能够自治，就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西班牙对殖民地施加的政治控制和财政压力不断增加，许多殖民地人民奋起抗争。到18世纪后半叶，西班牙越来越难镇压殖民地起义。由于税收增加，基多在1765年也发生了叛乱，其他殖民地也因税收增加而义愤难平。

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西班牙的殖民地反抗运动的诉求已不再限于要求更多权利或更少税收，他们的目标是实现自治。1798年，委内瑞拉爆发了两次起义，领导者分别是瓜尔和埃斯帕尼亚，这是委内瑞拉追求独立的开端。[15]曼努埃尔·瓜尔是一名步兵军官；何塞·玛利亚·埃斯帕尼亚是一名公务员。他们分别在瓜伊拉和加拉加斯领导起义，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支持。他们的目标是赶走西班牙统治者，建立一个可以实现自由贸易和生产的体系，最终建成加拉加斯、马拉开波、库马纳和圭亚那4地的政治治理联盟。

在西班牙，敏锐的观察家们时刻关注着美洲殖民地的变化，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殖民地制度的缺陷和殖民地人民越来越强烈的独立诉求。

阿兰达伯爵在卡洛斯四世执政初期担任西班牙外交大臣，他的决定对西班牙帝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作为一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杰出政治家，阿兰达决定将耶稣会从西班牙驱逐出去。自从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到美洲，他们就已经在美洲斩获了很多权力。例如，瓜拉尼耶稣会传教区就是瓜拉尼部落的耶稣会教士和当地部落共同建立的定居点。耶稣会不仅宣扬基督教，也积极促进农业、畜牧业和工匠制造业的发展，可以说他们成功打造了一个工业和农业帝国。

耶稣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在18世纪的许多国家政府的眼里，它是一个潜在威胁。西班牙担心耶稣会在美洲的权力进一步扩张后，最终会导致一些殖民地独立，比如在今天的巴拉圭，耶稣会的力量就特别强大。

1766年，耶稣会被逐出西班牙。伏尔泰对此评论，只要有6个像阿兰达这样的人，就可以实现西班牙的全面复兴。[16]

阿兰达是值得纪念的人物，他预见到西班牙帝国可能会瓦解的前景，并建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避免西班牙人与克里奥尔精英间发生对抗，因为这样西属美洲殖民地可能会步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后尘。在担任驻巴黎大使时，阿兰达代表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巴黎和约》的谈判，见证了美国的独立和崛起。这给阿兰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担心美国独立很快会影响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因此他撰写了一份著名的报告给卡洛斯三世，在报告里他说：

“陛下必须放弃在美洲大陆的所有殖民地，只保留北部的古巴岛和波多黎各岛，以及南部的个别岛屿，作为西班牙的商贸基地。要实现这个大计划，维护西班牙的利益，陛下应当派三位王子去美洲担任墨西哥、秘鲁和美洲大陆的国王，陛下自己必须加冕为皇帝。”[17]

如果西班牙国王采纳了阿兰达的建议，就可以避免后来10多年中此起彼伏的独立运动，而且作为所有讲西班牙语国家的母国，西班牙的声望将会增加，波旁家族则可能成为开创新型帝国的先驱。但是因为两大障碍，阿兰达的建议并未被采纳：首先，西班牙国王不愿派出三个儿子前往美洲，承担创建新王国的风险，因为万一他们死了，西班牙的王位就会无人继承；其次，放弃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殖民地是任何一个国王都不能触犯的原则性问题。就这样，波旁家族的统治者宁可像英国汉诺威王朝那样失去美洲的殖民地，也不愿听取阿兰达的明智建议。

阿兰达并不是唯一一个向西班牙王室提出警告的人，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

国大革命爆发后，西班牙帝国面临重重问题。1794年，亚历山德罗·马拉斯皮纳环游世界归来后向西班牙王室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包括对西班牙帝国政治形势的分析。这位探险家目睹了独立运动的日益普及，建议西班牙王室做出让步，给予殖民地广泛的自治权，特别是给予美洲大陆的殖民地自治权，并建立一个通过商业和经济纽带连接的国家联盟。[18]但是，西班牙政府丝毫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并认为在革命时期，这样做既不合时宜也很危险。

对那些希望摆脱西班牙帝国统治的人来说，美国独立战争提供了实现独立的典范，法国大革命提供了创建理想社会的思想源泉。但是引发西属美洲殖民地武装反抗的导火索却是拿破仑入侵西班牙。

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总督认为效忠西班牙国王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但是他们并不忠于夺得西班牙王位的约瑟夫·波拿巴，在他们眼里，波拿巴只是一个篡位者。这是克里奥尔人对1808年发生在西班牙的政权更迭的理解，因此，实现自治变得名正言顺。西班牙帝国范围内的第一个自治执行委员会成立于墨西哥城，主要职责是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管理工作，这得到了总督何塞·伊图里加雷的支持。随后，蒙得维的亚自治执行委员会在普雷特河总督辖区成立，紧接着是拉巴斯和基多的自治执行委员会成立。他们不仅仅要求独立，也对西班牙易主表示抗议。实际上，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许多起义都是以斐迪南七世的名义发起的，但是这些起义都导致了一个结果：殖民地人民要自己处理事务的坚定决心被唤醒。

在西班牙，自由主义开始抬头，西班牙人一边与拿破仑的军队作战，一边着力建立一个新政府体系，以此维持帝国的统一。1810年，西班牙制宪议会在加的斯成立；1812年，西班牙《1812年宪法》通过，从此，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新的自由政体，尤其关注大西洋彼岸美洲殖民地上公民的诉求。事实上，“自由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当时的西班牙，后来才逐渐传到欧洲其他地方，最后成为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词汇之一。[19]

在加的斯通过的《1812年宪法》规定，“西班牙是两个半球上西班牙人的联盟”，给予“从美洲到亚洲所有西班牙王国和省份”与西班牙本土相同的权利。无论是欧洲人的后代，还是原住民或混血儿，都是西班牙帝国的公民，都有权选举代表参加两院制议会这一新的立法机构。自由主义规则使西班牙帝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欧洲帝国历史上第一次让整个帝国的公民都享有历史性的平等机遇，可以在联合选举中投票选出自己的代表。

《1812年宪法》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影响巨大，但是它的自由主义精神和给予美洲人民同等权利的意愿还不够强烈。在第一批被选出的104个议会代表中，只有28个是美洲人，而美洲人的数量比欧洲人多500多万。[20]这是克里奥尔人不满的诸多原因之一，美洲的精英们因此更加坚定了要实现

独立的目标。

1811年5月15日，普雷特河流域的瓜拉尼耶稣会传教区宣布独立，后来又成立了巴拉圭共和国。两个月后，委内瑞拉都督区宣布独立，昆迪纳马卡和卡塔赫纳紧随其后。独立浪潮迅速蔓延，几年内，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节节胜利，势不可当。

这些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希望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建立哪种国家？参照什么意识形态和模式？

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出身相同，都来自与西班牙和欧洲关系密切的精英阶层，所以他们能够接触到启蒙思想和18世纪末欧洲的革命精神。

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是西属美洲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几个先驱之一。他出生于1750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加入了西班牙军队，曾被派到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与英国作战，见证了美国独立的历史性时刻。几年后，米兰达作为革命军总指挥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因此，他也许是把革命精神带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最合适人选。在参加了两次伟大的革命之后，米兰达开始专注于他一生的伟大计划：推动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米兰达的目标是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领土上创建一个伟大帝国——哥伦比亚。米兰达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革命领袖不同，他不是共和主义者，他想创建统一的哥伦比亚，由一个世袭皇帝来做印加人的君主，安抚和领导原住民，新的政府则由这个新美洲帝国的臣民选出的两院制议会代表投票选举。

1806年，米兰达在英国的支持下来到委内瑞拉，领导了一场独立运动，以失败告终。4年后，他在伦敦见到了另一位伟大的委内瑞拉独立运动领导人——西蒙·玻利瓦尔。玻利瓦尔劝米兰达回到家乡，开展独立运动。1812年，米兰达成为委内瑞拉第一任总统，拥有近乎独裁的权力，但这个新共和国还得和西班牙军队交战。在米兰达率领人民为委内瑞拉的独立与西班牙军队作战时，玻利瓦尔出卖了他，并把他交给了西班牙军队。[21]米兰达惨死在西班牙的监狱里，成为委内瑞拉独立事业的烈士。

在米兰达死后，玻利瓦尔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出生在加拉加斯的一个贵族家庭，在马德里接受教育，曾短暂地住在巴黎，深受革命理想的影响。从1812年起，玻利瓦尔领导了一场巩固委内瑞拉独立地位的新革命，因此他也被称为“解放者”。

玻利瓦尔的梦想和米兰达非常相似：将西班牙在美洲的所有领地都统一到一个大联邦之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领导了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解放斗争，使这一辖区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后，玻利瓦尔

宣布成为包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在内的大哥伦比亚总统。

在取得这一非凡成就后不久，玻利瓦尔会见了另一位著名的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领导人：何塞·德·圣马丁。圣马丁有着和其他西班牙裔美洲领袖相似的教育经历，在西班牙军队的成绩可圈可点，并曾与拿破仑军队交战。他领导的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始于共济会，共济会在革命时代累积权力，积极推进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解放，成为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可靠支持者。[22]

1812年，圣马丁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领导了一场最终导致普雷特河总督辖区独立的运动。他还组建了一支军队，在1817年越过安第斯山脉，帮助智利独立运动领导人贝尔纳多·奥希金斯驱逐保皇派势力。因此，圣马丁也被称为智利和阿根廷的独立之父。

1822年，玻利瓦尔和圣马丁这两个“解放者”在瓜亚基尔见面，共同会晤的还有另一位著名的独立运动领导人——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他们这次会面是为了策划秘鲁解放运动，但是在谈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未来走向时，他们的意见发生分歧。圣马丁赞成让欧洲王子统治独立的新国家，但是这与委内瑞拉领导人玻利瓦尔的计划水火不容。最后，圣马丁决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去了欧洲，并在那里终老。就这样，玻利瓦尔成为独立运动唯一的领导者，并成功地在独立战争的最后阶段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玻利瓦尔在1824年的阿亚库乔战役中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最后一支西班牙军队被打败。这次胜利之后，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两个新共和国成立（玻利维亚化用了玻利瓦尔的名字，以纪念这位领导人），玻利瓦尔同时担任这两个国家的总统。

虽然玻利瓦尔对北美的共和制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称颂不已，但是他似乎并不认为这适用于南美洲。1815年，玻利瓦尔写道，西属美洲殖民地应该采取“不是最好，但是最可能成功的政府制度”。[23]他认为要在权威与民主间做出折中的选择，最终他采用了独裁制度，终身担任总统并世袭职位。玻利瓦尔想通过征服来实现统一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梦想，走拿破仑的路，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主张的恺撒式权术和威权主义终结了他的野心，因为在所有被征服的领土上，都有影响力巨大的寡头集团和领导人渴望捍卫自己的利益，不愿放弃权力。就这样，伟大的西属美洲联邦并没有成立，而是出现了18个独立共和国。玻利瓦尔死前悲叹：“美洲根本无法管治，献身革命就好像在海里耕耘，终是一无所获。”尽管如此，玻利瓦尔的独裁主义后继有人，甚至到现在也不乏追随者，他们压迫受苦的大众，并把这解释为革命。

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独立运动路线稍有不同：这里的独立运动开始得较晚，而且并不是由精英策划的起义，而是由原住民和穷人反抗克里奥尔寡头集团的社会革命。在这种背景下，克里奥尔人虽然也希望实现独立，但更倾向于支持西班牙王室。墨西哥的独立路线更保守，因为墨西哥精英阶层深受天主教教会影响，不愿接受西班牙的自由宪法。为了维护传统秩序，他们提出独立，并继续奉斐迪南七世为国王，但是被西班牙议会拒绝了。1822年5月22日，克里奥尔人宣布其杰出的领袖阿古斯汀·德·伊图尔维德为墨西哥皇帝。然而，墨西哥帝国的寿命很短，一年之后阿古斯汀一世就被推翻，1824年，墨西哥合众国宣告成立。

失去美洲的多个殖民地对西班牙帝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美国独立后的英国一样，西班牙也有很多年拒绝接受失去美洲殖民地的事实，也不把美洲的国家当作完全独立的国家。不过，西班牙逐渐与从前的臣民实现和解，这主要是因为在1824年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关系中断后，重建这一关系的压力不断增加，而且西班牙还需要维持剩下的殖民地。

在最后一场独立战役结束后，大西洋两岸的商贸交易在短短几年内就再次繁盛起来，但是在西班牙商人向美洲销售产品时，承受了自由市场的竞争压力，因为美国和英国的售价更低。

西班牙在美洲留下的影响最持久的遗产是文化。事实上，“西属美洲”这个词是由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率先引入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认可了西班牙对这些新国家的影响。所有诞生在西属美洲的新国家都宣布自己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各国政府确定所有教育机构都用西班牙语授课。这些措施有助于加强国家的凝聚力，尤其是一些新国家有大量原住民，他们与克里奥尔精英阶层及欧洲裔人口接触很少。这也使西班牙语成为西属美洲的通用语，从阿根廷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辽阔土地上，人们都说着西班牙语。

在战争的伤口愈合后，西属美洲共同的语言以及其他方面的文化联系都对西班牙特别有利，可以强化西班牙作为这些新国家的母国的角色，美洲的精英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对此都能接受。但是西班牙和旧属地之间之所以能够跨越大西洋保持联系，最重要的因素是西班牙人不断移民去往这些旧殖民地，在19世纪下半叶尤其多。

至于葡属美洲殖民地，它在革命时代的命运和西属美洲殖民地一样，只是过程没有那么激烈，伤亡也没有那么大。

在拿破仑军队接管伊比利亚半岛后，葡萄牙王室逃亡到巴西，国王若昂六世在里约热内卢定居，这座城市成为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新首都，巴西逐渐成为葡萄牙帝国的中枢。1821年，若昂六世返回里斯

本，巴西便不再是葡萄牙帝国的核心，但是巴西的精英阶层和许多定居巴西的葡萄牙移民拒绝失去这一地位，他们害怕事情变得更糟糕，害怕巴西会沦为依附于葡萄牙的殖民地。若昂六世在离开葡萄牙时，把自己的儿子佩德罗一世留在那里，担任那里的摄政王。这位年轻的王子将巴西和葡萄牙之间的对抗视为创建新帝国的机会。

在“不独立，毋宁死”的呼声下，佩德罗一世勇敢地领导了巴西国家主义运动，当地人出于感恩，在1822年10月12日推举他为巴西皇帝。[24]就这样，巴西在同一个家族王朝的统治下，成为独立国家。尽管佩德罗一世在即位的最初几年内为巴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与克里奥尔人及他们的共和主义的精神冲突不断，无法巩固自己的权力，佩德罗一世于1831年退位，他的儿子佩德罗二世成为巴西皇帝。事实证明，佩德罗二世是个高效的统治者，他在动荡中成功统一了巴西，但是他和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最终没能挺过巴西的政治动荡。1889年，巴西合众国宣告成立。

革命深深地改变了欧洲，时局不可能回到许多君主和政治家怀念的过去；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不断深入欧洲社会的各方面。革命爆发之后，另一种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民族主义。拥有同一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人们渴望成立自己的国家。从19世纪20年代起，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激发革命运动的两大热词。

革命时代并未随着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闭幕，它释放出来的变革力量继续改变着欧洲的政治体系，也越来越影响到其他西方国家。1830年，法国爆发了反对国王查理十世的七月革命，引发了一系列推翻政权的革命，欧洲版图为之大变。法国成立七月王朝，路易·菲利浦继承王位，实行君主立宪制。

1830年，还有一个新国家成立——比利时，同样实行君主立宪制。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支持和欧洲各国的广泛同情下，希腊也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欧洲人普遍认为，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象征和民主的摇篮，希腊必须挣脱奥斯曼帝国的锁链，获得自由。

不到20年后，欧洲又爆发了一波革命浪潮。1848年欧洲革命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让大多数欧洲国家甚至一些南美国家都陷入了近一年的混乱中。从伦敦到华沙，各大城市的人们走上街头，对抗政府。他们的诉求纷繁不一：有些人要求国家独立，有些人要求建立民主制度或更多的权利，还有一些人要求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同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革命者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的第一句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欧洲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对叛乱分子做出多大退让就恢复了秩序，但是这场革命给政府和政治精英敲响了警钟：如果忽视人民的要求，后果会很严重。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诞生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有两个深深改变了欧洲国家的政府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第一个伟大的思想是：政府必须表达人民的意愿。于是，代议制传遍了欧洲。俄国是个例外，那里的旧政权和专制政体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并导致了严重后果。

民主代议制的原则以及独立战争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帝国的统治方式。殖民地的居民应被视为公民而不仅仅是臣民；在殖民地，除了原始、尚未开化的土著，其余居民都应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管理；所有通过武力和压迫手段维持的帝国都注定将走向灭亡。

第二个伟大的思想是：将人人平等视为一项人权原则。于是，欧洲帝国主义之耻——奴隶制被取缔了。法国是第一个正式废除奴隶制的欧洲国家，但奴隶制在法国的一些殖民地仍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英国紧随其后，在政治家和慈善家威廉·威尔伯福斯的努力下，英国议会于1807年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废除奴隶贸易法案》，1833年英国彻底废除了奴隶制。西班牙在1811年废除奴隶制，但是其殖民地伊斯帕尼奥拉岛、波多黎各和古巴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取缔奴隶制。荷兰帝国的奴隶制一直持续到1863年。葡萄牙在1869年成为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欧洲国家，但直到1875年，葡萄牙才真正在其帝国范围内正式废除这一制度。[25]在19世纪最初的30年里，“蓄奴是不可接受的”这一原则在欧洲的影响变得更加深入，然而，俄国再次成为例外，在那里，农奴制一直持续到1861年。

废除奴隶制的运动在美洲的新国家发展得更慢，在那些农业生产需要依赖奴隶劳工的地方尤其如此。在美国，尽管开国元勋热忱地宣扬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但是人们却认为这一原则只适用于白人，直到1865年，这一原则才开始适用于黑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奴隶制终于被废除。巴西的奴隶制一直延续到1888年。在奴隶制被废除后，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就开始了：这是延续了300多年的奴隶制留下的问题，成为欧洲帝国主义最具争议的方面。

随着独立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在美洲涌现，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淡和疏远。从美国独立战争起，美洲和欧洲的关系一直笼罩在互不信任、怨恨和复仇的阴影里，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负面情绪才消失。

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出了“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即著名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声明，美国无意干涉欧洲事务，但是如果任何欧洲人企图殖民美洲或者干涉美洲事务，美国将视其为侵略美国。当时，追求独立的革命浪潮正席卷西属和葡属美洲殖民地，美国提出门罗主义，旨在阻止欧洲强国利用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解体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向美洲扩张。

门罗主义展现出美国从《独立宣言》颁布以来自信心的大幅增长，也显示出美国这个雄心勃勃的大国和曾经的欧洲强国一样，希望划分自己的影响区域。同时，门罗主义也表达出一种从19世纪初开始影响美国的主流思想：美国主义。这是一种身份认同，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美洲大陆的子民，而不是欧洲人的后代，一旦有欧洲强国胆敢占领美国公民认为属于他们的合法土地，他们就会反抗。

尽管美国和美洲其他的新国家都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对欧洲扩张主义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自己不想扩张或成为帝国。就美国而言，事实很快就清楚地表明，杰斐逊宣称的“自由帝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

在美国成立后，这个曾经的殖民地扩张领土的渴望越来越明显。在美国建国后的几十年内，美国的疆界大大外扩。最初，美国人从法国和西班牙那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后来用征服和归顺等不太规范的方法获得了墨西哥的一些领土。1846年，美国在得克萨斯对墨西哥开战，美国不仅保住了这片领土，还夺取了墨西哥里奥格兰德以北的所有领土。在完成了南部扩张之后，美国开始集中精力西征，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美国人的开拓精神，成为数代美国人的象征。西扩之后，美国的边境线蔓延到太平洋海岸。1867年，美国与俄国进行了一桩大宗领土交易：买进阿拉斯加。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幅员之辽阔，令历史上许多欧洲帝国都望尘莫及。

其他美洲国家也继承了欧洲人的这种扩张精神。巴西也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美洲国家，1822年，巴西帝国成立的理由很充分。巴西的扩张令葡萄牙很担心，葡萄牙怕巴西会蚕食自己在非洲和大西洋的殖民地。但是巴西并没有落入建立海外帝国的窠臼，因为佩德罗一世早就说过：“对我们来说，巴西已经足够大和富有了。”[26]

巴西人也有与美国人类似的开拓精神，尽管亚马孙丛林的挑战比美国西部平原大得多。同样，潘帕斯草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阿根廷人、完成内部殖民进程的智利人、通过印第安人领土向南向北扩张的墨西哥人身上都体现出这种开拓精神。欧洲人从1492年开始的征服美洲的梦想，在19世纪和20世纪时，由他们在美洲的子孙后代实现了。

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在欧洲因为旧政权势力的重重阻挠而举步维艰，但在美国却发展迅猛。美国忠于宪法原则，在19世纪初已奠定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模式，以包括大多数白人公民在内的广泛普选制为基础，通过分权制衡防止出现欧洲那样的权力滥用。最重要的是，美国建起一种令人艳羡的社会模式，出身和背景截然不同的公民都能够和谐共居，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1831年，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受政府委托撰写一份关于美国监狱系统的报告，因此前往美国考察。但这份报告只是这位法国贵族为了在这个年轻的美洲国家住一段时间的托词，他想要分析在他看来非常有吸引力的美国政治和社会体制。这次旅行的成果是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不仅在欧洲和美国广为传播，对西方政治思想也影响深远。

托克维尔在书中解释了美国民主的运作方式以及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够建立这种优于所有欧洲国家体制的制度。在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看来，美国民主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社会完美地结合了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托克维尔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成功预测了美国和俄国将会因为不同的原因崛起为世界大国。欧洲读者觉得读托克维尔的这本书像是经历了一次未来之旅，令人着迷，因为它不仅告诫欧洲人美国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高，而且那里出现的民主社会最终会来到古老的欧洲。托克维尔解释说："统治美国社会的民主制正迅速向欧洲发展。"[27]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对民主和革命价值观的体验更加痛苦。历次战争和政治动荡制造了独裁、专治和寡头政权，使拉丁美洲的境况与北美洲截然不同。同样曾经是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地，为什么西属和葡属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比不上北美呢？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著述，但是常常被过于简单的理论、模式化的观念甚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神话束缚，人们常常认为北美人民天生具有构建民主、稳定社会的能力，与西班牙语世界的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拉丁美洲和北美之间确实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拉丁美洲的新国家是在19世纪最先进的宪法之一——西班牙《1812年宪法》的影响下诞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是克里奥尔精英阶层宣示和追求的目标，而且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进步，尽管19世纪的拉丁美洲和伊比利亚半岛一样，总体上政局不稳。

在革命时代，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这4个帝国的许多殖民地纷纷解体。这些欧洲强国不仅失去了在美洲大陆的大半领地，还需面对美国人崭新的身份认同，英国人不允许欧洲国家在大西洋彼岸施加任何形式的霸权。在新成立的国家中，捍卫自由和独立原则的美国成为保卫美洲领土及其势力范围的中坚力量。

这个时代取得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奴隶贸易被大多数欧洲帝国禁止，奴隶制被废除。公民权利、人人平等、代议制等新思想与征服、归顺的殖民规则格格不入，因此，欧洲强国面临来自其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压力，这种压力越来越大，要求欧洲国家重新考虑对海外领地的管理方式。

尽管革命时代让欧洲帝国失去了很多海外领地，却没有使欧洲衰落。相反，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推动了欧洲社会发展，提高了它们的活

力、开拓和冒险精神以及和平解决内部冲突和公民问题的能力。维护自由、社会阶层流动和任人唯贤的体制不断发展，权利和机会平等成为所有良好社会的愿望。事实上，19世纪在议会民主制方面取得更大进展的国家最终都在政治和经济发展上出类拔萃，这并非巧合。革命使西方文明迎来了黄金时代，欧洲在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都达到巅峰，西方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拉得更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在欧洲人接受、吸收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同时，另一场更安静的，暴力和冲突更少的，但是影响深远的革命即将开始，这就是工业革命。蒸汽机、纺织机、使用煤炭、铸铁工艺的创新……所有这些发明和技术创新都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之间，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对个人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铁路彻底改变了交通运输，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这是这场革命最重要的两大结果。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使英国获得了超越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获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远超美洲殖民地，并赋予了殖民地全新的含义：它们既是基本商品的来源地，也是英国工厂产品的新市场。

工业革命迅速蔓延到西欧和大西洋彼岸。在西半球，美国一马当先，从19世纪后期起成为工业大国之一。工业化很快成为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代名词，不能工业化的国家都会陷入发展停滞和落后。工业革命弥合了美国和欧洲之间因美国独立战争导致的诸多误解，美国市场对欧洲工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美国企业家也主动接近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期望从那里获得创新技术和风险投资，并学习产业培育和创造财富的思想。

最后，革命时代的另一个意义是造就了大西洋共同体，这对欧洲和美国来说同样重要。大西洋共同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那时第一批欧洲人抵达美洲并定居下来。但是，美洲殖民地只是欧洲强国的附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辖他们的中央政府。当历史进入19世纪，美洲涌现出许多独立国家，欧洲与美洲之间形成了一种日益相互尊重和相互依赖的新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被称为大西洋共同体。虽然美国的开国元勋希望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旧欧洲的社会，但启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原则都源自欧洲。至于拉丁美洲，它们一心想摆脱殖民帝国的统治。虽然在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本土文化和某些地区的原住民对美洲人新的身份认同有一定影响，但是，在美洲形成的新社会都受到欧洲社会模式的启发，克里奥尔精英群体所珍视的文化和价值观也都来自欧洲的殖民大国。

独立后的美洲国家的精英依然将欧洲视为各方面的学习榜样，同时也是身份认同的参照，美洲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变化仍然有欧洲留下的痕迹。欧洲国家仍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美洲国家，但也会给予肯定。美国民主制度成为伟大的典范，令欧洲的旧政治体制改革受益

良多。巴西作为新帝国让葡萄牙在几十年里既着迷又担忧，阿根廷与西班牙的关系也如出一辙。

最重要的是，在欧洲人眼里，美国以及几乎所有美洲国家都变成了机遇之地——在那里，人们可以实现在本国无法实现的梦想。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贸易和欧洲人向美洲移民有力巩固了这一横跨大西洋的共同体，使欧洲在霸权时代生机勃勃。

从革命时代开始，革命与传统间的角力就没有停止过，这对欧洲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欧洲帝国不得不面对旧秩序解体引起的大量领土损失和政治动荡。但是，欧洲并未因此被削弱，相反，欧洲文明被注入了新活力，从而能够以最不同寻常的方式继续重塑这个世界。

---

[1] Burk，*Old World*，*New World.*

[2] “强制法令”包括《波士顿港口法案》《马萨诸塞政府法案》《司法管理法例》《驻营条例》。——编者注

[3] Burk，*Old World*，*New World.*

[4] Jon Meacham，*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2012).

[5] Benjamin Franklin，*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Henry Holt，1916).

[6] James Boswell，*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New York: Penguin，2008).

[7] 1812年战争，是在1812—1815年英美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又称第二次独立战争。——编者注

[8]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Bantam Classics，2008)

[9] 马穆鲁克原意为奴隶，在13—16世纪，是统治埃及的强大军事集团。——编者注

[10] Andrew Roberts，*Napoleon the Great* (London: Allen Lane，2014).

[11] Paul Butel，*Histoire des Antilles français*，*XVIIe–XXe siècle* (Paris: Parrin，2002).

[12] C.L.R. James，*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York: Vintage，1963).

[13] 孔多尔坎基的母亲为图帕克·阿马鲁的后裔。——编者注

[14] 克里奥尔人，西班牙语意为“土生者”，指出生于拉丁美洲的白人，以及白人或克里奥尔人与印第安人生的混血儿。——编者注

[15] Manuel Lucena Giraldo，*Naciones de Rebeldes* (Madrid: Taurus，2010).

[16] Salvador de Madariaga,*Espaňna,Ensayo* de Historia Cantemporánea (Madrid Espasa-Calpé,1979),p.103

[17] Ricardo García Carcel，*La Herencia del Pasado*，*las Memorias Históricas de Españ*，*Barcelona*，*Galaxia* (Gutenberg，2011).

[18] Giraldo，*Naciones de Rebeldes.*

[19] Raymond Carr，*Spain 1808-1975* (Oxford，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0] Carr，*Spain 1808–1975*

[21] Manuel Lucena Giraldo，*Francisco de Miranda La Aventura de la Política* (Madrid: Edaf，1990).

[22] Niall Ferguson，*The Square and the Tower* (Allen Lane，2017)，p. 109.

[23] Salvador de Madariaga，*Bolivar* (London: Hollis and Carter，1952).

[24] Burns，E. Bradford *A History of Brazi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25] Thomas，*The Slave Trade.*

[26] Roderick Barman，*Brazil: The Forging of a Nation*，*1798–185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7]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2003).

第五章

宏伟的东方梦

欧洲扩张对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影响

早在欧洲帝国出现前很久，亚洲就已经出现了帝国。在近东，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出人类最早的文明，波斯人在那里建立了非凡的帝国大业；在远东，耸立着一个文明大国——中国。这两个文明以及亚洲的其他民族通过人类历史上第一条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互相连通，中国和日本的丝绸等产品通过这条贸易路线运入地中海地区，后来丝绸之路逐渐发展成东西方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1]

哥伦布一生中有很多年都在寻找通往亚洲的西部航线，理由很简单：亚洲大陆意味着财富，只要发现一条通向其中一个地区的新路线，就有望获得极高的回报。对欧洲人来说，近东虽然有财富，但好像很难得到，因为它们掌控在与基督教世界为敌的阿拉伯帝国手中；而远东，在欧洲人的想象里蕴藏着世界上最多的财富。

发现美洲及随后的殖民活动虽然在一时间内消减了欧洲人对亚洲的兴趣，但是，亚洲仍然散发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从16世纪起，欧洲人陆续来到亚洲，他们发现，这片遥远土地上的财富和贸易机会的丰富程度和传说中的很一致。然而事实证明，在亚洲榨取财富、定居，建立凌驾于当地人民之上的欧洲霸权，比在美洲困难得多，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

欧洲人来到亚洲，激起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亚洲，这种冲突并不总以欧洲人的胜利告终。欧洲人发现，有数千年历史的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明博大精深，中国和日本的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比欧洲更先进。这两个国家认为自己的文明最先进，很引以为豪，而且也拥有足够的能力、财富和方法抵御外来入侵。然而，欧洲人来到亚洲最终还是对它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葡萄牙人作为航海时代的先驱再次一马当先，为欧洲强国打通了通往亚洲的路线。达·伽马于1499年抵达印度西海岸，葡萄牙人紧接着就探索了印度海岸，并创建了第一个定居点，由此开始了欧洲人殖民亚洲的进程。

1505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任命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为新成立的葡萄牙印度公司总督，负责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事务，并促进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两年后，葡萄牙水手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接任总督职位，他征服了果阿，并巧妙利用邻近王国之间的争斗加强了葡萄牙的统治地位，开始在该地区开展贸易活动。从此，印度各地区都可见葡萄牙人，持续了

4个多世纪。

在葡萄牙人巩固了对果阿的统治后不久，1511年，阿尔布开克派出一支船队去往马六甲。这座城市位于现在的马来西亚，是亚洲大陆的主要交通枢纽之一，占领马六甲意味着控制了亚洲市场的入口。为此，阿尔布开克攻占了马六甲，下令建造法摩沙城堡，并将葡萄牙帝国在远东的首都设在马六甲。[2]

控制香料交易路线是获得亚洲霸权的关键，为此，葡萄牙人必须进入中国。1513年，阿尔布开克派遣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去中国[3]，希望与这个天朝大国建立贸易关系。佩雷斯特雷洛是哥伦布妻子的堂兄，他实现了哥伦布的梦想，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海岸的欧洲人。[4]佩雷斯特雷洛的同胞若热·阿尔瓦雷斯到达了北部海岸，并在不久后来到香港。在初步接触中国文明之后，1517年，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出使中国，他的任务是建立两国之间的正式关系，开展商贸往来。但是，他一直等到1521年才被召见，在北京紫禁城见到了明朝至高无上的皇帝。

安德拉德克服了漫长的等待，等来的却是整个外交使团灾难性的结局。就在安德拉德即将被接见时，马六甲前苏丹的一封信抵达明朝皇宫，痛陈葡萄牙人如何把他赶出自己的王国。这让明朝官员对葡萄牙人仅有的一点同情心完全消失，葡萄牙外交使团的所有成员，包括安德拉德都被关入监狱，随后被处决。此后，明朝政府严禁本国人与葡萄牙人开展贸易。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其他欧洲国家也发现很难接近这个文明古国，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被断然拒绝或强制驱逐。

然而，明朝政府的禁令没能阻止葡萄牙人，许多葡萄牙商船依然把商品走私到明朝境内，还有一些商品成功进入了日本港口。要想从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市场获利，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连通各地的地区性基地。最终，澳门被葡萄牙人选中，因为明朝皇帝允许外国人进入这个半岛和当地人进行交易。但是葡萄牙人想更进一步，他们想在澳门永久定居。坚持多年之后，葡萄牙人终于在1554年得到明朝政府的许可，允许他们在澳门建立一个定居点，但葡萄牙人付出的代价也不低：他们必须向明朝皇帝进贡，而且必须遵从明朝政府的规定。从1573年起，明朝政府要求葡萄牙每年缴纳地租，而且居住在澳门葡萄牙定居点的中国人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尽管那里的官方管理机构隶属于葡萄牙。

葡萄牙人在澳门售卖欧洲的羊毛、金亚麻、棉花、印度鸦片、摩鹿加群岛的香料，甚至还有来自非洲的象牙；他们从中国买走丝绸、瓷器、黄金和铜，还与日本这个特别封闭的市场建立了贸易关系。在所有交易中，白银贸易令他们俯拾仰取，大获其利。

白银是中国最需要的金属，在中国，白银的价格是欧洲和日本的两倍。澳门商人用从西属美洲殖民地运到欧洲的大量白银（特别是1545年发现的波托西银矿的白银）和中国人做生意，他们还从日本和西属菲律宾殖民地进口白银，这种贵金属被从西属美洲殖民地一船一船地运到菲律宾。

在葡萄牙人建立定居点10年后，澳门发展成一个大贸易中心，吸引了来自葡萄牙、中国和亚洲各地的商人。1565年，这座城市有约1 000名葡萄牙人和数百名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的定居者。[5]许多葡萄牙人带着他们的马来西亚妻子从马六甲来到这里，还有一些葡萄牙人娶了日本女人并把她们带到澳门。因此，在早期的澳门居民中，混血人口很多。

葡萄牙增加亚洲定居点人口的唯一方法是使葡萄牙人与其他族群通婚。在果阿，葡萄牙王室授予与当地女性成婚的葡萄牙定居者土地——当然，婚姻必须恪守天主教的规定，因为传播基督教是葡萄牙殖民印度的目标之一。

第一批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中有不少传教士，他们分属不同的教会团体：方济各会、奥古斯丁教团、多明我会、耶稣会。它们在当时的中国推广基督教，耶稣会取得的成果尤其突出。1575年，教皇设置了澳门主教，管辖当时的中国、日本和朝鲜教区，澳门成为基督教进入这些亚洲国家的门户。

澳门是葡萄牙在亚洲占领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城市。葡萄牙的势力在几十年内成功地从印度扩张到中国，抢占了亚洲市场，几乎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因为当时在亚洲的欧洲强国除了葡萄牙之外，只有西班牙。

1564年，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征服菲律宾，自此，西班牙帝国的疆域横跨全球。莱加斯皮在亚洲的传奇经历是西班牙征服时代留下的伟大成就之一。莱加斯皮在菲律宾群岛遇到了一些土著部落以及来自中国、日本的海盗，最终他到达了一个名叫梅尼拉特的穆斯林飞地，莱加斯皮在那里创建了马尼拉——这座城市后来成为西班牙帝国在远东的新首都。莱加斯皮一直留在他征服的领土上，与各种逆境斗争，直到1572年去世。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去世前不久，西班牙国王签署了一纸委任书，任命他为菲律宾的总督和大都督。

在占领菲律宾之后，西班牙征服者开始梦想迎接下一个更大的挑战：征服中国。莱加斯皮从马尼拉写信给腓力二世，提议建造6艘大帆船："航行到达中国海岸，进入中国大陆。"在随后几年里，西班牙官员和传教士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信息。西班牙传教士在信中说，中国人民"完全不好战"，还暗示应鼓励与中国妇女通婚，说她们"大多很美丽，且进退有度"。[6]在他们看来，加勒比地区是西班牙攻克美洲大陆的基地，

而菲律宾的作用正好相当于加勒比地区，是西班牙在亚洲开疆拓土，进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跳板。然而，当时腓力二世正面临西班牙帝国的重重问题，腾不出手实施这么宏大的冒险计划。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是西班牙帝国的未竟之梦。

1574年，西班牙设立菲律宾都督区，隶属于新西班牙总督辖区，菲律宾都督区包括帕劳群岛、关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这些地方都是西班牙在向亚洲扩张的过程中攻占的地盘。

在菲律宾，西班牙在早期采用了和管理美洲殖民地相似的方法：西班牙征服者通过传统的监护征赋制获得土地，当地人为他们耕种土地并缴纳保护费和洗礼费。尽管腓力二世向莱加斯皮下令，明确要求在菲律宾殖民过程中“不得有暴力和不公正”，但是和美洲的情形一样，监护征赋制很容易被滥用，甚至发生了把菲律宾劳工变为奴隶的情况。

万幸的是，西班牙的第一批传教士大胆干预和帮助菲律宾劳工，使得监护征赋制在16世纪末日渐式微。奥古斯丁会教士不仅向当地政府指出奴隶制的罪恶，弗雷·胡安·阿尔瓦还在1570年写信给新西班牙总督，力陈奴隶制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3年后，奥古斯丁会的教士直接致函腓力二世，建议解放菲律宾的奴隶。终于，西班牙王室在1574年11月7日颁发法令，明确废除菲律宾群岛的奴隶制。1581年，菲律宾教区第一任主教弗雷·多明戈·德·萨拉萨尔抵达菲律宾，把王室的法令当面交给总督，强令他释放所有被奴役的菲律宾人和其他奴隶。[7]腓力二世的这道法令不容轻视，因为这使菲律宾比其他欧洲帝国的殖民地早300年取缔了奴隶制，成为一个先例，尽管西班牙帝国内部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监护征赋制在菲律宾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移民数量越来越多。中国商人把丝绸、瓷器和其他奢侈品运抵马尼拉，西班牙人可以购买并出口到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与中国人做生意比耕种土地的利润高得多，而且，许多中国人愿意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农民、工匠、销售或提供其他西班牙殖民者需要的服务。西班牙政府从这些贸易中征收的税款已成为该殖民地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为了连通亚洲的菲律宾群岛和美洲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马尼拉大帆船于1565年问世，每年横渡太平洋两次，从阿卡普尔科驶向马尼拉，中途停靠关岛。这种大帆船实现了哥伦布打开海路及从与亚洲的贸易中获利的旧梦。马尼拉大帆船运送的货物不仅有中国和日本的丝绸、瓷器、披肩、手杖等远东地区的特色产品，也有来自印度的棉服，甚至波斯的地毯，当然还有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白银，因为亚洲国家对它的需求很大。就这样，西班牙在已有的几条连通美洲的航线之外，又增添了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为菲律宾开辟了在后来3个世纪内连接外部世界的主通道。

这条贸易路线在1814年因墨西哥独立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菲律宾经济损失严重，在商业活动的收益急剧下降后，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不得不重操旧业，依赖早在16世纪就被弃置一旁，利润低得多的农业生产。

菲律宾打开了西班牙进入亚洲的大门，这个市场吸引力巨大，但是由于远隔重洋，未知因素太多，西班牙人并不太愿意冒险前往亚洲。除了被派到亚洲殖民地政府或防务部门工作的一些人之外，很少有西班牙人想去亚洲赚大钱。此外，西班牙人与当地人很少通婚，所以在亚洲，西班牙语没能像在美洲那样广为流传。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通婚组建的家庭都集中住在马尼拉，所以在菲律宾首都和主要城市中心之外，西班牙文化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然而，殖民地政府规定，所有居民都必须用西班牙人能懂的姓名进行登记，所以，当地人口中出现了大量西班牙名字。

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后，在最初几十年里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中，传教士占的比例很高。到16世纪末，菲律宾有300多名来自方济会、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和耶稣会等教会团体的教士，他们在菲律宾群岛迅速传播基督教，建造教堂，推动教育。1595年，耶稣会创建圣伊尔德丰索学院，为马尼拉的精英阶层提供教育服务。圣托马斯大学创建于1611年，是亚洲的第一所大学。这些举措在菲律宾精英阶层中特别有影响力，而他们将影响这个地方的未来。19世纪涌现出许多人物，西班牙文化在菲律宾统治阶级和少数知识分子身上留下了印记，其中作家何塞·黎刹被称为热带的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加尔多斯是19世纪西班牙的著名作家）。

虽然腓力二世拥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两顶王冠，但这并不意味着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关系会发生重大改变，因为腓力二世的计划是尊重和维持双方自治。因此，这两个帝国在亚洲大陆并没有成为对手，它们遇到的不稳定力量是另一个新闯入的欧洲强国——荷兰。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国家议会从成立起就决定要创建荷兰海外帝国，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贸易、增加收益，并决定将亚洲定位为荷兰海外帝国的主要基地。荷兰虽然不能像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主导国际秩序，但荷兰拥有实现目标的重要资源：欧洲最好的金融体系、伟大的开创精神以及反击西班牙君主制的强烈愿望。

在荷兰公司首次进入亚洲后，荷兰政府认识到，要在这个大陆缔造一个帝国，就必须联合荷兰的商业力量。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成立。从一开始，这家公司就依靠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以及充分的军事保障打开通往亚洲的道路，强悍地出现在亚洲人和亚洲的其他欧洲人面前。

要在亚洲建立荷兰帝国意味着要赶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抢夺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荷兰来到东南亚的第一批船队正是这样做的，它们袭击了所

有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两个帝国的船只，重创了西班牙的舰队。在荷兰来到亚洲几年后，西班牙用一个多世纪建成的无敌舰队损失大半。荷兰船队借助武力旗开得胜，从1609年起，荷兰人沿着从摩鹿加群岛到爪哇万丹，从婆罗洲到日本的航线轻松地开展贸易活动。

在成功闯入亚洲市场后，荷兰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管理其亚洲领地的基地，一直被葡萄牙占领的马六甲对荷兰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但是在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扬·彼得松·库恩入侵了今天的雅加达，把这个地方的名字改为巴达维亚，并决定把荷兰帝国在亚洲的首都设在那里。[8]

短短几年之后，荷兰人成功赶走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被边缘化。但另一方面，英国成为荷兰更危险的利益竞争对手。第一批英国商人与荷兰人同时抵达亚洲，在前文曾提到，英国也采用了与荷兰同样的方法，成立了一家公司负责东印度的贸易事务。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第一次到亚洲时，它们停泊在红海和印度的港口，在那里售卖棉花，换取万丹和摩鹿加群岛的香料——因为香料和胡椒的利润最高。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万丹的利益冲突势如水火，在1618年差点儿发展成战争。

为了防止两国在亚洲兵戎相见，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三级议会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共同组建一支由10艘船组成的舰队，袭击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队，分享香料贸易的利益。但是，这项合作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方面，英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履行这一协议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另一方面，1623年，几个英国人被荷兰人杀害，双方的合作戛然而止。荷兰人虽然在17世纪成功主宰了胡椒和香料市场，但是他们无法削弱英国的竞争力。

荷兰在万丹建立了东南亚基地，随后也成功进入印度。1614年，荷兰接受了正在抵抗葡萄牙入侵的莫卧儿皇帝的邀请，在印度次大陆西部的苏拉特开设了一家工厂。借助这一飞地，荷兰在棉花市场中兴盛起来。

荷兰人在亚洲的第三大愿望是像葡萄牙一样，在中国建立一个基地。但是，荷兰的海上优势在陆地上毫无用处。关于荷兰人如何残酷对待葡萄牙人和任何阻挡他们的亚洲人的传闻也传到了中国，当时的明朝政府禁止荷兰人靠近海岸。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科恩派出一支舰队攻打澳门，明朝政府帮助葡萄牙人将其击退。但是，荷兰人成功占领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岛建造的两座堡垒，荷兰人不仅在那里建起繁荣的糖业交易市场，还成功从那里渗入日本市场，并把葡萄牙人赶出了日本市场。

荷兰充分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亚洲的战略实力，继续通过掠夺葡萄牙

的利益实现扩张。1637年，葡萄牙在锡兰的殖民地发生内乱，荷兰人趁机入侵；不久后又攻击了葡萄牙最宝贵的领地马六甲。尽管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在1641年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通过谈判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荷兰人彻底把葡萄牙人从这些殖民地驱赶了出去，葡萄牙在亚洲只剩下果阿和澳门两个殖民地。

荷兰以牺牲葡萄牙为代价迅速缔造了自己的亚洲帝国，这说明一个欧洲强国只要海上力量足够强大，并且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可以实现扩张。而葡萄牙殖民地的经历说明，如果没有坚实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一个国家的对外扩张将是十分脆弱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小舰队可以在短短几天内终结几十年间累积的殖民成果。

荷兰不仅要在亚洲建立商业帝国，还要建立永久定居的殖民地。虽然苏拉特定居点因为莫卧儿皇帝慷慨赐予的土地而有所发展，但是荷兰人对冒险去印度并不感兴趣，所以苏拉特始终没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荷兰的另一个重大计划是允许荷兰人在殖民地定居并独立开展贸易活动，但这又引出一个严重问题：这些独立贸易商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甚至与荷兰的竞争对手联合开展业务。荷兰帝国的殖民过程展示出欧洲国家在亚洲殖民的难度。

荷兰帝国殖民亚洲的过程有一点与其他欧洲强国非常不同：荷兰没有传播基督教的热情。荷兰归正会的代表们搭乘荷兰的首批商船抵达亚洲，但是他们的主要使命是照顾同胞的精神健康，而且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们没有类似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天主教传教士的独立地位，无法像他们一样推广基督教。荷兰人来到亚洲，不仅完全没有为基督教的扩张做贡献，还起到了反作用，他们巩固了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信仰。荷兰人袭击穆斯林的商船和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村庄，迫使伊斯兰教徒凝聚起来，共同抵制欧洲人的入侵。

英国东印度公司起初并没有荷兰东印度公司那么富有，英国政府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也远不及荷兰政府，因为那时英国王室对殖民北美的兴趣远高于殖民亚洲。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在亚洲大陆成功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对后来大英帝国的发展极为重要。

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支去往亚洲的远征队于1601年从英国起航，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做了两年生意，然后满载胡椒返回英国，赚取了巨大利润。第二次航行更加成功，英国船队从亚洲带回了胡椒、丁香和肉豆蔻。这家公司获得的利益抵消了英荷之间因利益冲突引发的问题。

16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三次派出船队去往亚洲，船队驶向印度西部，停靠在苏拉特。船长威廉·霍金斯请求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接见他。贾汉吉

尔非常支持本国人民与其他民族开展贸易，并为此提供便利条件，他批准英国人在苏拉特建立一个贸易基地。

16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印度东部的默苏利珀德姆市建立了贸易关系并良好运行了20多年。16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弗朗西斯·戴请求莫卧儿皇帝允许他们到岸上定居。获得批准后，弗朗西斯·戴立即下令建造了圣乔治堡。就这样，英国人建立了在印度次大陆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在印度北部，英国商人分别在1633年和1650年建立了巴拉索尔和恒河边的胡格里贸易基地。

1668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凯瑟琳公主，葡萄牙将统治了数十年的孟买城作为公主的嫁妆送给查理二世，于是，孟买变成英国的领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立即占据了这座杂乱的城市。当时，孟买的贸易活动比英国在印度的其他殖民地的贸易活动少得多，但后来孟买发展成了亚洲的一座大城市。

英国东印度公司继续在印度扩张。英国人先在孟加拉建立防御工事，并从那里向加尔各答扩展，并于1697年在加尔各答建造了威廉堡。贸易在这座城市迅速发展，加尔各答最终成为英国在印度最重要的殖民地。

在苏拉特，英国东印度公司先创建了一个贸易基地，在1612年建起第一个堡垒。1634年，莫卧儿皇帝亲切接见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并邀请他们继续与他的子民进行贸易。从那时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收益激增。1639年，马德拉斯贸易基地建成；1668年，孟买商业基地（即葡萄牙凯瑟琳公主的嫁妆）建成；1690年，加尔各答基地建成。

英国王室一直支持东印度公司，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支持的力度更大。在此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大大增加，可以占领领土、铸造钱币、设置堡垒、指挥军队、开战或议和，公司拥有领地的民事和刑事管辖权，其最高领导人被称为总督。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棉花、丝绸、香料、茶叶以及许多其他印度产品运到英国，巨利滚滚而来。到18世纪末，这家公司的股东获得的股息高达25%。[9]伦敦的政治和金融精英圈都风传该公司股东如何快速获利，从印度返回的水手们也讲述着那个遥远世界的很多故事。从那时起，印度成为那些想获得财富的英国人最想去的地方之一。

英国与印度的贸易让英国人形成了一个习惯，最终成为英国的一个文化特色：喝茶。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到英国的诸多物品之一，最终成为最受英国人欢迎的商品之一。英国的凯瑟琳王后来自葡萄牙，那里早就有商人从亚洲进口茶叶，所以她在葡萄牙已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在嫁给查理二

世后，她把喝茶的习惯带到了英国王室。起初，英国只有贵族和精英阶层喝茶，由于茶叶有放松身心的效果，所以医生也开始推荐病人喝茶。

1660年，塞缪尔·佩皮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点了一杯茶，这是一种我从没喝过的中国饮料。"[10]然而，几十年后，茶在整个不列颠群岛已经非常普及，成为所有阶层的英国人都十分喜爱的一种饮品。饮茶还带动了西印度群岛贸易利益的增长，因为英国人流行在茶里加糖，这让英国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的收益也成倍增长。就这样，每一杯茶都让英国人享受到在世界两个不同大陆——亚洲和美洲殖民的好处。

在整个18世纪，欧洲人接连不断地来到亚洲。荷兰人和英国人紧跟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亚洲，甚至后来居上，成功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赶出了他们已经占据的地盘。当英国人在印度立足时，荷兰已经控制了印度尼西亚从巴达维亚到马六甲的贸易航线，以及通往日本的海上航线。尽管如此，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强国与亚洲的联系仍然非常坚固且持久。从殖民历史来看，西班牙殖民菲律宾的时间是最长的，甚至比葡萄牙殖民果阿和澳门的时间更长。此外，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活动使得欧洲的影响开始渗入神秘的中国和日本。

17世纪的法国显然对亚洲也感兴趣。在路易十三统治期间，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黎塞留了解到竞争对手通过各自的印度公司在亚洲取得了发展，于是力主在1642年成立法国东印度公司，不久之后黎塞留便去世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次远征不是很成功。1668年，他们在印度东南部的苏拉特建造了第一座堡垒，但荷兰人把他们赶了出去。在金登讷格尔，经孟加拉行政长官易卜拉欣汗许可，法国人在1673年建起一个贸易站。这是法国在印度的第一个正式殖民地。此后不久，法国东印度公司代表与位于印度次大陆东南部的比贾布尔王国的苏丹签订协议，得到了一些领地，在那里建成朋迪榭里殖民地——这是法国在印度维持得最久的一个殖民地。这两块飞地让法国成功进入亚洲，坐收其利。

当欧洲强国跨过重洋到达亚洲时，另一个强国正从北边侵入亚洲大陆，并侵占了很多土地——这就是俄国。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俄国人如何在16世纪扩张到乌拉尔山脉的另一侧。在征服西伯利亚之后，俄国在亚洲统治了大片领土，许多亚洲人变成了俄国那个白皮肤、信仰基督教的皇帝的臣民，俄语也开始影响中国边境地区。对俄国来说，殖民亚洲的目的并不仅限于发展贸易，更重要的是让俄国人在亚洲永久定居，使俄国文化在亚洲深深扎根。

西伯利亚地广人稀，俄国人率先向那里殖民，在时间上遥遥领先于亚洲各民族。在向南扩张时，俄国碰上了另一个伟大的亚洲帝国：波斯。1555年，俄国在征服阿斯特拉罕之后占据了里海的入海口，也就是得到了进入

波斯帝国的通道。俄国和波斯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于是俄国沙皇和波斯沙阿之间达成和解，双方同意促进商贸交流，一条财源滚滚的贸易路线就这样出现了，俄国的皮毛、波斯的丝绸和地毯等特色产品往来其间，络绎不绝。到16世纪末，两国间的贸易形成了一种和平关系，但是由于俄国没有放弃向里海地区扩张，所以这种和平关系在18世纪后期被迅速打破。后面的章节将细述其中缘由。

俄国向里海地区的扩张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向东南方向发展时遇到的挑战要大得多，因为那里靠近明朝的领土。1628年，哥萨克人在胆大无畏的叶罗费·哈巴罗夫的率领下来到叶尼塞河和通古斯河流域，又从那里继续向前，最后到达黑龙江和太平洋。黑龙江是明朝北部的自然疆界，哥萨克人利用明朝崩溃后政局不稳的机会，跨过了这一边界，在这片比西伯利亚更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哈巴罗夫宣布俄国享有黑龙江地区的主权，并遵照莫斯科的命令，宣称那里的人为俄国臣民，对他们进行征税。显然，这令当地人很怨愤。

俄国人在黑龙江并没能停留多久。几年后，满族人建立了清朝，在恢复政治秩序之后，清朝决定收复这块被“西方鬼子”占领的领土。1685年，清朝军队攻克了俄国在黑龙江地区建立的几大据点，迫使他们与清政府谈判。1689年，两国签署《尼布楚条约》，俄国人撤出黑龙江。作为交换条件，俄国人可以沿色楞格河与清朝臣民进行贸易。《尼布楚条约》还规定，俄国贸易使团的头领必须尊重清朝皇帝，遵守清朝祖制，跪拜清朝皇帝。[11]就这样，古代中国人成功拦阻了另一个欧洲强国的进犯，再次表明中华文明决不会屈服于其他文明。

欧洲强国想扩大亚洲定居点的理由很充分。在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的大多数地方，欧洲人必须经过长期殖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新市场，然后才能繁盛起来。而一踏上亚洲大陆，这里的财富似乎就唾手可得。亚洲不仅有最古老的贸易路线和大量西方需要的商品，这里还有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18世纪初，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几位历史学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当时莫卧儿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4。[12]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由满族王朝统治的中国。当时的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各有1亿多人口。

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分别诞生于恒河和黄河。出土文物表明，那里的居民早已发展出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的城市和风俗令欧洲人着迷，他们的宫殿和珍宝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他们的军队威震四方。自中世纪起，来到遥远东方的欧洲人意识到，东方文明在很多方面比自己的文明更优越、更伟大。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在其1608年出版的《海洋

自由论》中写道："亚洲国家一直有自己的国王、政府、法律和司法系统。"因此，欧洲人在接近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时非常谨慎，他们在亚洲殖民的方法也和在其他地方大不相同。

在亚洲，最能获利的地方无疑是印度。在英国、法国和葡萄牙之后，瑞典和荷兰也来到印度，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基地。英国和法国早期的定居点很快发展成重要港口和城市飞地。被法国统治的金登讷格尔成为为孟加拉最重要的口岸，朋迪榭里发展成一座以法国建筑风格为特色的繁华城市。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的贸易基地中，孟买和加尔各答飞速发展，都发展成非凡的特大城市。但是，作为在印度次大陆殖民的两大欧洲强国，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在印度所有领地的总人口都没有超过1.5万。[13]然而，尽管在印度的欧洲人只是少数，而且仅以商贸为目标，但是莫卧儿帝国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给欧洲强国提供了巩固实力的绝好机会。

巴布尔在16世纪初创立了莫卧儿帝国，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族在两个世纪里一脉相传，不断开疆拓土，但是莫卧儿帝国从18世纪中叶开始衰败。波斯国王利用这一变故，入侵莫卧儿帝国北部。在印度中部，信奉印度教的马拉塔邦反叛，莫卧儿帝国的军队被迫从这里撤出，马拉塔邦的军队向孟加拉进军，威胁到孟买和马德拉斯等城市。欧洲人如果想保有自己的地盘，就很难保持中立。荷兰决定放弃印度的领地；葡萄牙的军队则守在果阿，保卫自己的定居点；而法国和英国则相反，决定利用烽烟四起的混乱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地盘。

法国在印度的总督杜布雷认为，从他1720年到达金登讷格尔开始，印度一直处于战争中，这是法国取代莫卧儿帝国，夺得印度霸权的最好机会。为了扩大法国的领地，杜布雷与几个当地君主国的君主谈判并达成协议。奥地利王位继承争夺战恰在此时爆发，法国和英国因此陷入敌对状态。这给杜布雷送来一个正当理由，开始放手除掉其实现目标的另一个障碍：英国。

法国军队在1746年夺取了马德拉斯和圣大卫堡。在奥地利王位争夺战结束后签订的《亚琛条约》规定，法国应将这些领土还给英国，但是杜布雷拒绝执行。这导致法国与英国在随后几年里发生了几次对抗，最后法国政府不堪争议不断、难以驾驭的杜布雷及其造成的种种问题，决定免去他的总督职位，并在1754年强迫他离开印度。

接着，欧洲七年战争爆发，英法再次处于交战状态，又引发了双方在印度的对峙。孟加拉的新君主西拉杰·道拉听闻七年战争的消息后，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把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赶出去。1754年，道拉率先发起攻占加尔各答的战役。法国选择与孟加拉君主联盟，认为这是把英国人逐出印度的契机。然而，最终的结果与孟加拉和法国的期望截然相反。尽管英国东印度

公司几乎没有军队可保卫其领地，但是罗伯特·克莱夫总督很好地利用了仅有的资源，并以非凡的战略能力成功收复加尔各答。然后，克莱夫把法国人赶出了金登讷格尔，并最终在普拉西击败了道拉的部队。

普拉西战役因为决定了谁是印度的主宰者而载入史册。[14]七年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巴黎和约》规定，法国人可以继续留在朋迪榭里，但是从那时起，任何国家都无法再挑战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霸权，大英帝国在美洲殖民地面临统治危机，却奠定了新帝国的根基。

普拉西大捷开启了罗伯特·克莱夫的好运：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任命他为孟加拉的总督。在印度，英国的统治区和平且繁荣，而其他地区则一片混乱。这一事实最终让莫卧儿皇帝向克莱夫提议，请英国负责莫卧儿帝国其他地方的开发和管理——这些地区几乎囊括了整个印度北部地区。这样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实实在在地控制了印度辽阔的领土。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业务范围变得如此广大，英国政府已无法仅仅将其视为一个贸易公司，而且伦敦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英国政府取缔该公司对印度领土的管理权。于是，1773年，英国议会做出裁定，由政府任命一名总督坐镇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的总部，管理英国在印度的所有领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沃伦·黑斯廷斯当选，成为代表英国王室管理印度次大陆的首任长官，这一职位存在了多年。就这样，英国王室变成了印度的统治者，用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英国在不经意间获得了一个帝国”。[15]

在英国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印度的一切都岌岌可危之前，英国政府并没有计划要管理印度。但是正如克莱夫在议会上说的：“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拥有的帝国比任何欧洲王国都大，他们的收入高达400万英镑。”[16]英国政府不能无视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他们决定改变定位，从商人转变成一个新帝国的建设者。

成功控制印度使英国获得了超越其他欧洲强国的巨大优势。从18世纪中叶起，有两个原因导致了香料贸易的下降：其一，香料越来越少被用作食品防腐剂；其二，甜味产品越来越受欢迎。这一市场变化重创了非常依赖香料贸易的荷兰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损失也很大。而英国的贸易因为印度却变得更加兴盛。自17世纪起，印度一直是棉纺织品的主要产地，此外还有丝绸、大米和其他农产品，而且人们对茶叶甚至鸦片的需求也不断上升，这让英国获利颇丰。

从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起，英国的风险投资人、投机者和财富猎手就越来越关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军队和王室代表都成了暴发户。这些在印度发了财的人被统称为“Nabobs”（富豪），这些新贵都野心

勃勃，在印度和英国的影响力相当大，因此引起不少争议。

在沃伦·黑斯廷斯担任总督期间，印度的腐败和治理不善开始引起英国政府的关注，伦敦的政界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黑斯廷斯在1785年返回英格兰时，被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指控，说他玷污了英国人的品格，侵犯了印度人的权利，黑斯廷斯因此受到审判。尽管黑斯廷斯被宣判无罪，但是英国政府决定，此后应该由旧贵族的知名人物担任印度总督一职，因为他们理应不会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接受这一职位。此外，旧贵族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社会地位高，能赢得印度统治精英和贫困大众的尊敬。第一个担任总督职位的是第一代康沃利斯侯爵——查尔斯·康沃利斯。在他之后，有很多英国的大贵族、政治家和军队指挥官担任过这一职务，手握管理印度的大权。

应该如何管理这片广袤、神秘和遥远的领地呢？埃德蒙·伯克对传闻中英国人对印度人民的掠夺和虐待深感震惊，他认为有一点毋庸置疑："必须采用和欧洲相同的法律治理印度，欧洲、非洲和亚洲以至全人类都应遵循同样的原则，即根植在我们心中的公平原则和人道原则。"[17]但是，如果根据英国民主原则、启蒙运动哲学以及西方世界盛行的思想治理印度次大陆，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印度文明是一个迷人而神秘的东方文明，由不同的古王国和土邦组成，人口和种族众多，有300多种方言，崇拜的神灵达数百万种。在18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印度人以种姓制度为基础对社会进行分层很不公平，在欧洲人看来，印度的大多数习俗和信仰很愚昧。如果强行把西方世界的一套搬到印度，注定会失败，导致的问题甚至会比现在的问题还多。英国人没有这么做，而是采用了一种更不易察觉的殖民方法——和印度人共居，把对印度人民以及印度统治者的干涉降到最低。

英国与莫卧儿皇帝和各王国的君主签署了一个协议，规定英国人有留在印度的权力，但英国总督必须尊重这些君主并尊重印度人的风俗习惯，除了外交政策和防务外，绝不干涉其他事宜，总体目标是维护印度的法律和秩序，促进商业活动发展，推动社会的繁荣兴盛。就这样，英国在印度开始了"不列颠治世"，其目标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和平共处、共同富强。然而，这一协议在实际执行中遇到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它要求英国和印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互尊重。沃伦·黑斯廷斯的接班人发现，既要维护法律和秩序，又要不干涉对印度人民的管理，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

自16世纪欧洲强国来到印度起，它们占领的殖民地就一直在缓慢但持续地扩大，但是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只有葡萄牙在澳门建立了永久定居点。在18世纪末，英国决定加强与这个伟大东方文明的关系，但事实是，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清朝时期的中国人很乐意把茶叶卖给英国人，也授权

给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开展各种贸易活动，但是让他们眼里的西方野蛮人渗入中国人的领地和文明，则是另一码事情。

1792年9月，英国乔治三世派出一个商贸特使团前往中国，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大门，为英国牟利。这个使团由700人组成，包括外交官、军人、商人、科学家、一个钟表匠、一个园丁和5个德国乐师。他们乘坐3艘船来到中国，船上装满了最能体现西方先进科技的物品：望远镜、手表、气压计、武器，甚至还有一个热气球。英国想用这些出色的人才和非凡的技术创新说服乾隆皇帝与西方开展贸易。马戛尔尼勋爵被任命为这个特使团的团长，英国政府许诺这位狡猾的外交官，如果他能在中国成功建立英国使馆，英国会给予他荣誉和丰厚的经济回报。

虽然英国人为这次重要的出访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是结果却一败涂地。在英国代表团到达中国后，受到清政府官员不算热情的接待，此外，马戛尔尼还收到清朝皇帝的一纸诏书，其中写道："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任何东西。"[18]更糟糕的是，马戛尔尼拒绝遵守传统礼节向清朝皇帝磕头行礼，提出除非清朝官员同样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照片磕头行礼，他才能这样做。然而，即使顺从清廷的要求也不会使结果有任何不同，因为在英国使团之后，荷兰使团也来到中国，他们表示愿意向皇帝磕头，而且遵照规定，该磕多少就磕多少，但是他们和英国人一样空手而归。古代中国人仍然相信自己的国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应该恭顺地跪拜他们，从清朝的皇帝到官员都认为与西方的贸易不能以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古代中国的精英坚信，闭关自守对于维护其灿烂的文明至关重要。为了阻挡北方民族入侵，古代中国人建造了长城。在他们眼里，通过海路接近他们的西方列强同样是威胁，尽管西方国家在一开始提出的是和平交易。因此，清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防止清朝臣民和欧洲人接触，以免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闭关锁国导致近代中国开始在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上落后于西方，最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伏尔泰极其赞赏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他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18世纪时中国在科学方面的发展还不如12世纪时的欧洲？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人为拒绝西方国家的要求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对英国来说，与当时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个很大的问题。英国商人购买中国的茶叶，却没办法向中国市场出口任何商品。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也同样沮丧，因为清政府严格控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规定外国人只能在澳门和广州港活动。但是，这一局面被鸦片贸易彻底改变。

鸦片最初由西班牙人出口到中国，同时进入中国的还有西班牙帝国的其他产品，如烟草和玉米。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印度出口鸦片，中国的走私者把鸦片售往全国各地，最后，鸦片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舶来品，就好像

英国人最喜欢茶一样。[19]但是，这种令人上瘾的药物很快被中国人痛恨。1838年，道光帝决定采取严厉措施禁烟。在广东的英国商人被迫交出所有船货，拒绝交的则被关入大牢。清朝军队也在国际水域拦截英国船只，销毁船上的鸦片。清朝皇帝并不害怕报复，因为他认为英国人离不开中国的茶叶。但是这一次，英国毫不犹豫地动用海军还击。

1840年，英国舰队抵达中国海岸，以明显的军事优势攻克了广东。遭受大败和重大损失的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并开放广州、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这几个地方不受限制地进行贸易活动。就这样，英国人终于打开了亚洲市场最后一道防线的大门。他们在中国的这场胜利也让其他西方国家受益。两年后，法国和美国也与中国签署了条约，它们被允许在中国的港口开展贸易。

英国国内对赢得鸦片战争的反响不一，诸党派各执一词。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后来担任首相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认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没有任何正当性。但是英国保守党坚持认为，这场战争必不可少，既终结了中英贸易逆差，也将中国纳入了世界贸易体系。而在中国人看来，这场战争不过是英国人为了入侵中国寻找的借口而已。没过多久，中国与英国又发生了另一场冲突。

1856年，清朝官员在广州以走私罪抓捕了一艘商船的全体船员。英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船员，因为这艘船挂着英国国旗。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被视为违反《南京条约》的事件。一年后，英国举行选举，由帕默斯顿领导的保守党获得了大多数投票，这位首相正是当初派出舰队去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挥戈，使用武力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

与此同时，中国与法国也发生了冲突。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清朝官员处决，即马神父事件。结果，法国政府决定联合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和美国也参与了进来，美国的一艘军舰介入了这场短暂战争。这次战争的爆发原因与第一次鸦片战争非常相似，但是这一次，中国面对的是西方联盟，它们决心要打败清朝军队并获得利益。

不出所料，西方联军在交锋中轻松占得了上风，双方交战一年后，清朝皇帝很不情愿地与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签署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10个通商口岸，与西方国家开展贸易活动。此外，这4个国家还获得了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权力。此前，北京一直是一座封闭的城市，不对外开放。

俄国一直谋求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所以立即抓住这一机会迫使清政府签署了《瑷珲条约》，修改了双方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把中国的边界推到黑龙江以南，这更有利于俄国。在得到

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领土后，1860年俄国在那里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这座城市对俄国在太平洋地区获利非常重要，成为西方影响世界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欧洲国家领土扩张的顶峰。40多年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通了莫斯科和海参崴。欧洲人从陆路快速、安全地到达亚洲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但是中国人并不甘于接受西方列强强加给他们的条款，清政府派出军队去港口阻击西方军队的入侵，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清军败得更彻底，英法联军横扫紫禁城，咸丰皇帝被迫逃离。1860年，他的弟弟恭亲王代表清政府签署了《北京条约》。这一条约比此前的所有条约更加不利于中国，它要求清政府认可此前条约中割让土地给西方列强的条款，还要求清廷向英国和法国支付经济补偿，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接受宗教自由化和鸦片贸易合法化。

“毫无疑问，在1860这一年，中国这个曾经的伟大文明被西方彻底打败，备受屈辱。”中国历史学家徐中约写道。[20]近代中国的失败可以视为长期与世界进步趋势想隔绝的必然结果。当年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时要展示先进产品和技术，乾隆皇帝不屑一顾，拒绝与他眼中的低级文明开展交易，这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几十年后，中国人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文明脆弱衰败、不堪一击——这是数百年来被英法等工业强国认为最先进的文明。但是，面对西方世界强大的影响力、军事力量和技术优势，中国人仍然拒绝服输，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仍将继续。

当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在中国占据上风时，位于亚洲大陆另一侧的一个伟大文明也在衰落——波斯。17世纪中叶，波斯成功抵挡了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扩张，甚至还征服了新领地。1795年，波斯王朝的军队入侵格鲁吉亚，并洗劫了第比利斯。波斯新国王法塔赫-阿里沙·卡扎尔在与英国结盟后，更加无所畏惧，决心要把俄国人赶出高加索地区。1804年，俄国和波斯间的战争全面爆发。年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此战爆发前三年刚刚登上王位，决心要把俄国疆域的边界向波斯推进。最终，俄国战胜，1813年双方签订了《古利斯坦和约》，今天的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和格鲁吉亚东部都划归俄罗斯帝国。波斯国王为报仇雪恨，1826年又与俄国打了一仗，但是这次波斯败得更惨，丢失了更多领土，包括现在的亚美尼亚。

欧洲帝国主义强国为了争权夺利，争先恐后地侵占亚洲的土地，这和美洲以及其他大陆发生的情况一样。英国之所以入侵阿富汗，主要目的是要阻止俄国人进入这个酋长国，因为那样最终会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利益。1838年，英国军队入侵阿富汗，因怀疑巴拉克宰王朝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汗与俄国结盟，英国人废黜了他，并启用他的前任，亲英的舒亚·沙阿·杜拉尼。但是事实证明，英国不可能再缔造一个亲英的阿富汗酋长国，英军

驻扎阿富汗引起当地人民的极大不满，两年后爆发了一场暴乱。在这场阿富汗人民保卫伊斯兰的抵抗战中，英国不仅被迫撤军，而且还将面对其帝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英军撤退时，遭到阿富汗部落的伏击和大规模屠杀。最初进入阿富汗的英军有近2万人，最终只有一个人在这次撤退中幸存下来并回到英国，这个人是军医威廉·布赖登。[21]

为了报仇雪恨、寻求赔偿，英国在1878年再次入侵阿富汗。英国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阿富汗会被俄国控制。这一次，英国大体实现了目标，强行与阿富汗签订条约，规定阿富汗统治者谢尔·阿里汗将该国的外交事务交给大英帝国，只保留其内部主权。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阿富汗人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已经表现出他们是最不屈不挠的民族。这一点后来多次被印证，在20—21世纪入侵阿富汗的其他西方国家发现，任何要占领这片荒芜之地、干扰其居民习俗的企图在长期看都注定会迎来失败的结局。

在亚洲殖民地的政策中，英国有一个绝对的优先事项：不让俄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接近印度边界。然而，英国在印度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并非来自其他国家，而是来自印度人民。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严重威胁到英国的统治地位，爆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在英国军队服役的印度士兵的不满情绪。

在19世纪中叶，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约有20万印度士兵，而英国士兵只有4万人。[22]所以，印度的法律和秩序取决于这一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忠诚度。尽管英国政府根据印度习俗修改了军纪，但是印度士兵还是因为种种原因积累了许多不满。来自较高种姓的士兵拒绝与低种姓的同胞住在一起；印度士兵感到被歧视，因为英国人更容易受提拔。最糟糕的是，穆斯林士兵和印度教士兵被要求咬掉步枪子弹的纸匣——据说这些枪支弹药用教徒禁食之物当润滑油，因此引起了极大的愤恨。

这个问题比军队叛乱严重得多，印度几个地区的君主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决定借此机会解救自己，摆脱英国统治。英国并没有完全履行与印度签订的关于政府责任的协议，尽管英国也做出了妥协，同意不干涉印度的风俗，但还是禁止那些被认为不文明的传统，比如童婚、丈夫死后寡妇自焚殉夫。

此外，经济是印度人起义的另一重要原因。为了平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预算和对军队的资助，英国政府向印度人征税，这让印度人很不满，也影响到印度各邦国的财政制度。因此，在这次起义中，几个土邦形成了联合，不同社会背景的印度人全都加入，涉及范围极广，有些印度历史学家把这次起义称为“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

交战双方实施了许多暴力和暴行，最终英国占了上风，将起义镇压了下去。为重建秩序，英国立即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流放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巴哈杜尔·沙阿·扎法尔，因为他图谋把英国人逐出印度后恢复莫卧儿王朝的财富与权利。

这场起义促使英国人开始思考，为防止印度发生更多动荡，英国政府决定做出一些改变。185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解散，其权力转移给英国王室。英国任命一位总督，代表王室与印度的562个土邦打交道，英国政府则承诺会尊重它们的独立地位。这些土邦占有印度40%的领土和25%的人口，因此，印度次大陆还有很大一部分在英国的控制范围之外（防务和外交除外）。[23]其余地区由总督代表印度总督区和"印度办公室"这个新机构管理。在这个新管理体系中，英国王室还承诺不干涉印度的道德和宗教事务，尤其是那些可能被印度人理解为西方化的事情。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结果是：英属印度正式诞生。从此，印度被比喻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英属印度的边界远远超出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还包括缅甸、锡兰，甚至新加坡在19世纪中叶也被正式纳入其中。英属印度是一个首府在加尔各答的大帝国。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英国迎来了在印度的黄金时代。印度开始工业化，技术迅速更新。19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建设穿越英属印度的铁路，到20世纪初，印度拥有全球第四大铁路网。[24]他们还修建了道路和桥梁，并引入电报。19世纪末，印度的邮政系统可以说是亚洲最好的。这些巨变和发展大大提高了印度人的流动性，他们过去一直因为地理、宗教、语言和文化等因素被深度割裂。

英属印度的管理者推动在城市中心建立新型印度公民社会，中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属印度还效仿英国，在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建起了大学，城市精英在那里接受教育，学习从功利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西方政治和哲学新思想。英属印度采用英国公学体系，为地主阶级的孩子们建立学校。印度精英阶层中最富有的家庭，尤其是贵族和王室家庭，形成了把孩子送到英国顶级公学接受教育的传统，其中有些孩子甚至可以去牛津或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完成学业后，他们会回到印度，服务于世袭的土邦王朝，来自资产阶级的人则从事自由职业、商业或担任管理职务。那个时代的印度人如果想要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和改善经济状况，就必须在英国人创办的机构学习或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英语这门语言。

英语不仅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也是印度工商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沟通语言。英语的普及不仅是因为这是殖民国的语言，也因为英语很快就成为印度次大陆从北到南，所有社会高层的唯一的通用语言。

1877年，在痴迷东方文明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提议下，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从后来几十年里印度王公和土邦代表满怀热情地参加英国皇家仪式的事实来看，印度人对这位从未访问过印度的新女皇满意度很高。

尽管如此，英属印度的黄金时期也有黑暗面，印度百姓尤其受苦。尽管官方宣布帝国的所有臣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在英属印度，正如乔治·奥威尔的那句名言所说的，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待遇差异非常大，同在政府和军队服务，印度人晋升要难得多，而且最高职位总是由英国人掌控。例如，1909年印度文职机构共有1 244名工作人员，其中只有65个印度人。即使铁路服务对英国人不太有吸引力，印度人也只占有其中10%的领导职位。[25]

种族歧视是英属印度争议不断的一个问题。英国人的社交俱乐部只接受白人，这令印度人极其愤慨。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司法歧视。1883年，印度总督里彭提出修改法律，目的是让印度法官可以起诉英国公民，但他最终妥协，只增加印度法官的人数。[26]

英国的士兵、公务员以及渴望异国经历的政客都想去印度任职。印度总督的职位非常显赫，是最雄心勃勃、最有冒险精神的英国政客的终极梦想，因为印度总督不仅拥有非同小可的权力，还能享受到只有欧洲王室才能拥有的奢华和财富。除了更高的薪水和生活水平，印度还意味着更有乐趣的生活，从狩猎派对到马球比赛，再到西姆拉市的夏季假期，这一切正如19世纪的英国作家詹姆斯·穆勒在《印度史》中所写："印度是英国上流社会庞大的露天娱乐系统。"显然，享有许多特权和补贴的英国人很难记起维多利亚女王的要求——在印度，所有臣民平等。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说法更有感染力："由于一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英国肩负起管理印度的责任。"[27]

英国当然不是19世纪唯一在亚洲创建殖民地的欧洲大国。法国虽然在18世纪几乎失去了在亚洲的所有权力，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法属印度支那的建立让法国重返亚洲，再次获得了影响力。

法国进入越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法国人到越南的目的并非贸易或军事入侵，法国传教士率先来到这里。1615年，河内建立了第一个耶稣会传教团，法国神父亚历山大·罗德在那里特别有影响力，在他的推动下，巴黎外交使团协会成立。这是一个传教组织，在随后两个世纪里活跃于东南亚。为了保护基督教使团（不是为了扩张领土），法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

1857年，两名西班牙传教士被越南的嗣德皇帝下令处决。这一事件的结果

是，法国将军黎峨率领法西联合讨伐远征队，最终占领了西贡。

尽管黎峨的任务是保护传教士而不是殖民越南，但是法国对亚洲的政策在1862年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拿破仑三世决心在全世界扩张法国的权力，于是，法国决定利用法国军队在西贡的有利条件，建立法国的新亚洲帝国。为此，法国政府向越南皇帝施加压力，逼迫他允许法国人进入安南、东京湾（今天的北部湾），并割让交趾支那。

和欧洲列强在其他地方的经历一样，法国之所以能在越南立足并扩大影响力，也是东南亚国家之间对抗的结果。柬埔寨国王诺罗敦长期以来一直努力阻止强大的敌人越南和暹罗瓜分他的小王国。法国进入这个地区后，柬埔寨国王从中看到了解决方案，他主动邀请法国皇帝到他的王国，建议把柬埔寨变成受法国保护的附属国，许多柬埔寨人都支持这个疯狂的决定，认为与其看着自己的国家被邻国割占，不如交给一个欧洲强国来控制。但是法国在接受这一提议时，要求控制柬埔寨的财政。

法国的下一个扩张目标引起了更多冲突，因为它位于越南北部的东京湾，属于清朝的控制范围，清政府发出警告说，它不会容忍任何欧洲国家进入这个领地。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虽然法国军队最终战胜，但是过程十分艰辛，而且这场战争使法国损失巨大，导致法国总理茹费理辞职。由于这场战争的代价高得出乎意料，法国国民大会提议撤出越南。如果这个提议通过了，越南的历史无疑会大大改变。

法国谨慎地进入亚洲，最终却演变成一场艰苦的殖民战争。正因为这样，法国决定要巩固其在亚洲的帝国。1887年，法属印度支那诞生，其范围包括今天的越南和柬埔寨，尽管中法战争留下了创伤，但法国并没有停止在该地区的扩张。法国想吞并老挝，这导致了法国在1893年与该地区另一个强国（暹罗王国）交战。暹罗本希望英国能够帮助阻止法国向老挝推进，因为缅甸（已被大英帝国控制）与老挝和暹罗都接壤。但是英国人不愿意为了一个亚洲小国与法国对抗，承诺会要求法国尊重暹罗的独立地位。于是，法国与暹罗打了一场实力不对等的仗，法国战胜后统一了法属印度支那，成为对亚洲影响第二大的西方强国。

到19世纪末，欧洲国家已经在亚洲站稳脚跟，他们通过殖民地、保护国、商贸基地、宗教使团等方式成功渗入神秘而遥远的亚洲世界。但是有一个国家在很长时间之内坚决抵制西方的渗透——日本，尽管它最终西化得最彻底。

日本在几个世纪之内一直保持独立，坚决抵制西方的影响。耶稣会教士在16世纪开始在日本传教，但是一个世纪之后，他们被驱逐出境，而且受他们影响，皈依基督教的人遭到迫害。欧洲商人努力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

但发现这比在中国更困难，因为代表天皇统治这个国家的幕府并不信任欧洲人，他们担心这些看起来善意的商人是欧洲武装力量的前锋。只有荷兰商人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长崎港建立了贸易站。

日本最终在19世纪对西方开放贸易，但这不是欧洲施加压力的结果，而是在美国的胁迫之下不得已而为之。1853年，美国海军马修·佩里将军率领几艘护卫舰抵达日本的一个港口，威胁说，除非日本接受他的要求，与美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否则他将率领舰队攻打日本。一年后，《神奈川条约》签订，日本人接受了佩里所有大胆的要求。在这次经典的炮舰外交之后，英国、法国和俄国也与日本签署了类似的协议。

对西方国家来到自己的家园，日本人的反应与中国人截然不同。1868年明治天皇收复权力，终结了幕府将军的封建霸权。日本精英得出结论：不要拒绝西方文化，因为它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最好是接纳它并把它融入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不同寻常的实用主义是为了自卫，因为日本人意识到，只有西化，才能缩小与美国、俄国等军事和技术强国的差距。

在强势推进西化、工业化，使用新装备武装军队之后，日本也强大起来，日本热切渴望扩张，甚至成为欧洲国家在亚洲最强的对手。1894年，日本迈出了建立新帝国的第一步：为了占领朝鲜，日本与中国发生了武装冲突。在打败、压制住中国之后，俄国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下一个障碍。

19世纪末，日本决定加入帝国联盟——在此之前，该联盟的成员都是欧洲强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没有限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但是，这一决定使日本与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冲突，后果很严重。本书的第九章将深入探讨这一话题。

义和团运动标志着欧洲国家在亚洲4个世纪扩张过程中的高潮。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接受19世纪中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署的条约，因此，中国人民一直对欧洲人抱有敌意。1900年，民间组织义和拳（义和团的前身）发动了一场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清朝皇太后慈禧利用这一事件向西方列强宣战，所有外国使领馆都被清军和义和团围困了55天。

中国人这次反抗西方势力的努力导致欧洲国家在亚洲结成了当时最大的军事联盟。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美国、日本都派出军队。一支由2万名士兵组成的联军部队攻占了北京城，中国人再次被打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正式结束了这场动乱，清政府被判赔偿被义和团侵犯的8个国家，这不仅令中国人深受欺辱，也使这个国家财殚力痛，实力大大削弱。

义和团运动再次证实了欧洲强国的力量，即使中国这样古老而强大的文明也无法与之抗衡，至少在军事力量上是如此。日本被纳入西方联盟，这一事实证明，要想与欧洲强国势均力敌，唯一的办法是紧跟其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发展趋势。

历经4个世纪的发展后，亚洲这个大陆终于成为欧洲帝国及其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欧洲强国成为全球性帝国。亚洲是所有欧洲航海家和财富猎手的梦想，那里有古老的文明，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市场繁荣，世界上很多财富都汇集在那里。在很大程度上，亚洲是欧洲帝国政府内部反对殖民的人寻求的一种方案，因为在亚洲国家，不需要宗主国大量输出人口，就能够建起商业帝国。尽管如此，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构建商业帝国不可能与殖民活动彻底脱离，要想聚敛这里的财富，就必须在这块土地上建立定居点。

只要有机会，欧洲国家都会选择扩张领地，在亚洲也不例外。因此，那些最初的小贸易点最终都发展成大型殖民地。欧洲人来到这里，不仅对欧洲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人的饮食、社会习惯和文化也深受熏染。

在殖民史上，最激烈的文明冲突发生在亚洲。东西方在此相遇，后果各不相同。印度虽然也冲突不断，但印度人和英国人总体以和平共居为主，这给印度和英国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共居也出现在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和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西方人在中国的遭遇很不同。中国人总是拒绝西方的影响，但欧洲人通过武力打破了中国遗世独立的状态。然而，即使这样，除了在澳门和香港的殖民地之外，欧洲人在中国的影响力仍然微不足道，而且欧洲人在中国人心中种下了很大的愤恨，这种愤恨的深刻影响一直延续至21世纪。日本与亚洲其他的国家非常不同，在与西方文明相遇后，日本不仅没有失去主权，还借助欧洲强国和自己的改革计划，成长为一个强国。亚洲还有一些地方在欧洲文明入侵时保持了独立，包括波斯、蒙古和泰国。佛陀曾说过：“万法唯心造，诸相由心生。”面对西方人的入侵，亚洲各民族表现出的态度似乎都受到这一思想的深刻影响。尽管亚洲人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欧洲人改变了，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以及诠释世界的方式。有时候，那些引发文明剧烈冲突的因素也会带来东西方文明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在21世纪变得特别密集和深入。

---

[1] Peter Frankopan，*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2017).

[2] Crowley，*Conquerors.*

[3] 中国在当时处于明朝统治时期（1368—1644年）。

[4] Crowley，*Conquerors.*

[5] Crowley，*Conquerors.*

[6] Hugh Thomas，*World Without End: Spain，Philip II，and the First Global Empire* (London:Allen Lane，2014).

[7] Thomas，*World Without End.*

[8]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

[9] Lawrence James，*Raj: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Abacus，1997).

[10] Samuel Pepys，*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2003).

[11]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

[12] David 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London: Abacus，1998).

[13] James Mill，*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vol. 1 (London: Baldwin，Cradock & Joy，1817).

[14] James，*Raj.*

[15] John Robert 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Sydney: Wentworth Press，2016).

[16] James，*Raj.*

[17] Jim McCue，*Edmund Burke and Our Present Discontents* (London: Claridge Press，1997).

[18] Alain Peyrefitte，*The Immobile Empire* (New York: Vintage，2013).

[19] Julia Lovell，*The Opium War: Drugs，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Picador，2011).

[20] Immanuel C. Y. 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1] William Dalrymple，*Return of a King: The Battle for Afghanistan，1839–42* (London: Bloomsbury，2013).

[22] James , *Raj*.

[23] Dominique Lapierre and Larry Collins , *Freedom at Midnight: How England Gave Away an Empi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1975).

[24] James , *Raj*.

[25] James , *Raj*.

[26] James , *Raj*.

[27] Lapierre and Collins , *Freedom at Midnight*.

第六章

寻找
更美好的世界

移民潮传扬
欧洲文化与价值观

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建立史上最大的帝国，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是最坚定的移民。欧洲的水手、商人和士兵在世界各地开疆辟土，但真正决定这些地方命运，在那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的，却是移民。如果没有欧洲各国民众的大规模移民，这些欧洲强国就不可能聚沙成塔地建成这么大的帝国，西方文明也就不会如此持久地影响世界。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向外移民的数量一直在增长，其中大多数去了美洲，还有一部分去了非洲和大洋洲，在亚洲定居的较少。因此，全世界许多地方甚至每个大陆上都有许多来自欧洲的白人。这些白皮肤的定居者带着他们的文化在异域生根发芽，在一些地方，欧洲文化甚至完全取代了以前存在的文化。白人的宗教以及他们的政府系统、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也传遍全球，殖民地的城市有许多用欧洲已有的地名或参照其文化象征来命名：新西班牙、新英格兰、新法兰西、新喀里多尼亚、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宗主国的翻版。

16—20世纪，欧洲的移民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潮。欧洲人离开自己出生地的原因多种多样：贫穷、饥荒、政治迫害、宗教迫害、想圆发财梦，或者仅仅是希望生活得更好，这和其他民族的移民动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有一点不同必须强调，并非所有欧洲人都是自愿移民，在常规移民之外，还存在强迫移民和流亡。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方世界充满了发展机会，在这样一个时期，把个人的全部财富花在一张返程遥遥无期的单程票上，去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国家，实在是草率鲁莽，甚至是疯狂的。然而，有许多代的欧洲人，尤其是大西洋沿岸的居民，确实曾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押在一张移民证上。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就在西行的船上。大多数移民非常贫穷，甚至无法支付自己的旅费，他们往往会选择风险更大的方法，只为登船，启航去往远方。移民的命运各有不同，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欧洲移民的优势在于，他们移居的地方大多是他们祖辈的殖民地，或者曾被其祖国占领过，而且他们赶上了欧洲稳步发展的时代。

在发现美洲某个地方后，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宗主国才能将足够数量的移民移往新的定居点。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帝国率先殖民，最初的想法是要从海外领地获得财富，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而绝不是把那里当作理想的移民目的地（有多重原因，其中之一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的人口都不多）。新世界适合具有冒险精神的征服者以及虔诚的传教士，不适合普通人。正因为如此，哥伦布当初很难招揽到船员和他一起横渡大西洋。然

而，当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财富首次被带回伊比利亚半岛，当关于黄金国的神话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梦想着到大西洋的彼岸开始新生活。

在刚开始，海外移民数量不多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国家对谁可以移民到新大陆制定了很高的标准。最初只有卡斯提尔王国的公民才能前往西印度群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还有一个阻碍因素是航行的成本。横渡大西洋每个人需要花销20多个达克特[1]，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根本无力承担。

为了跟踪和记录移民情况，卡斯提尔王国在塞维利亚成立了贸易厅，要求每个去往新世界的人都必须在那里登记。贸易厅的档案显示，在整个16世纪，卡斯提尔王国约有5.6万移民。[2]但是，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到实际到达美洲人数的1/5，因为许多人没有遵守规定通过这个系统去往美洲，而是直接横渡了大西洋。根据最近的估计，1500—1650年，约有43.7万西班牙人到达新大陆；1500—1700年，有10万葡萄牙人来到美洲。[3]不仅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人开始移民到新大陆，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也纷纷移居美洲，特别是意大利、法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城市居民。

18世纪末，西班牙有800万居民，而葡萄牙只有100万，伊比利亚半岛的人口比西欧其他地区少得多。如果说历史规律是人口压力往往会推动对外扩张以疏散人口，那么这两个国家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航行费用以及新世界的各种风险和危险都令人望而却步。对欧洲最贫穷的人来说，他们很难在塞维利亚或萨拉曼卡这样的城市谋生，这在弗朗西斯科·德·克韦多、洛佩·德·维加等西班牙黄金时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描述。但即便如此，绝大多数人还是宁可在故土忍饥挨饿，也不愿意冒险去西印度群岛，面对那里的各种危险。

虽然前文提到的移民数字很大，但是和他们要去居住的那片广袤土地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另一个问题是，从欧洲去往美洲的移民很少带着家人一同前往，已婚的也少见夫妻同行，那些敢于踏上冒险之旅的人往往会单独前往，因为他们希望有一天能重返家园。于是，跨种族通婚在西班牙大多数定居点，尤其是在新西班牙和秘鲁这两个总督辖区非常盛行。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和皮萨罗都留下了混血后裔，很多西班牙男人效仿他们，一些人效仿皮萨罗，按照基督徒的标准正式迎娶当地妇女为妻；另一些人则和科尔特斯一样，只与当地妇女保持着散漫的男女关系。在新西班牙及其他定居点，白人与原住民结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混血后代，这些混血儿在当地传统习俗和西方文化的双重熏染下长大。

对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来说，他们移民的动机远大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公民。15世纪末，英格兰人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对最贫穷的人来说，去美洲的

吸引力越来越大。在英格兰，农村既苦又没有工作机会，所以人们涌入城市。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但绝大多数人都挤在贫民窟，生活条件恶劣，健康条件很差。在英格兰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渺茫，移民美洲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哪怕去往那里的旅程很危险，前景也不确定。1607年，通过弗吉尼亚公司去往北美洲的105人建立了在北美移民史上极为重要的詹姆斯敦定居点。3年后，这105个先行者中只有61人还活着，但他们成功生存下来，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

除了贫穷，欧洲人移民美洲的另一个原因是宗教迫害。1620年，历史上著名的“五月花号”载着102名清教徒前往美洲，他们都是因信仰被迫害或被边缘化的公民。这些清教徒移民们建立了普利茅斯。之后，因宗教原因创建的殖民地还有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等。对那些到美洲寻求财富或好运的人来说，信仰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月花号”协会在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声望很高、外人无法进入的有传承性质的组织，只有那些能证明其先祖是清教徒移民的人才能够入会。根据美国官方历史记载，欧洲第一批定居者带来了后来成为美国象征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原则。因此，“五月花号”协会的成员深感自豪。

英国人在北美东海岸建立的第一批定居点不仅人口稀少，而且死亡率很高。可怕的印第安人、艰辛的长途航行、北美的天气，这些因素令许多人殒命。1607—1622年，有1.5万欧洲移民抵达弗吉尼亚，但只有2 000人幸存下来。[4]因此，美洲的定居点在初期必须依靠源源不断的移民才能延续下去。

移民美洲的主要障碍是航行成本，不论是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无不如此。在17世纪早期，横渡大西洋至少需要8周，除了必需品外，每个人还需要5英镑才能抵达美洲。[5]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卖掉个人的所有财物，才能凑出这笔旅费，而且往往还不够，许多人都需要他人的资助才能登船。

高昂的旅费使得许多移民采用了卖身为契约奴的方法，即当移民到达美洲后，通过做几年工来偿还航程的费用。在引入非洲奴隶之前，美洲殖民地都是白人奴隶耕种土地和做工，他们推动了殖民地初期的经济发展。在17世纪，60%的移民都是通过某种劳役合同去往英国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的。[6]合同约定的条件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做4年或5年的苦工。对大多数人来说，签订劳役合同意味着为了最终成为自由工人，他们愿意做几年奴隶。

毫无疑问，移民的一个巨大动力是将来能在北美东海岸拥有自己的一片沃土。1618年，“人头权”制度开始实施，每个定居者能获得40公顷土地，而

且每多带一个人，还能额外得到100公顷土地。尽管在新英格兰当地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生规划，但是因为害怕新大陆的危险，初期移民非常少。为了促进移民，英国甚至还制作了宣传手册，例如，在1630年出版的《新英格兰的种植园》中写道："这里需要诚实的基督徒，带着你们的马、牛和羊来吧，来开垦这块肥沃高产的土地……" [7]这样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17世纪30年代的大迁徙。在这次大迁徙中，6.9万英国人越过大西洋到北美定居，但其中在新英格兰定居的只有2.1万人。[8]因为携带家眷的移民比例大大增加，所以从17世纪中叶起，移民中女性的人数已足够保证人口数量的稳定。

第一批殖民者在北美东海岸建立的定居点在风俗、制度和组织方面和英国非常相似。在大片的农场和种植园中，点缀着波士顿、纽波特、查尔斯敦等小城镇。它们的建筑也和英国建筑相似，只有完全平行和垂直的街道设计是这里的创新。

前文曾经提到，早期定居者的主要谋生方式是获得土地、耕种土地。获得并积攒土地是东海岸定居者的共同愿望，因此从殖民早期起，向西扩张的压力很大。北美不是能够一夜暴富的地方，定居者必须经过多年辛勤劳作，做出很多牺牲之后，才能兴盛起来。

对英国移民而言，加勒比地区是比北美更有赚头的选择。糖是大英帝国最赚钱的商品，而西印度群岛是糖产地。英国人对糖的需求一直稳步增长，到18世纪，糖在英国进口货物中占了1/5。[9]和北美殖民地的主要产品烟草相比，糖的需求量和价格都更高。1714—1773年，加勒比地区小小的圣基茨和尼维斯殖民地对英国出口的货物量是纽约的3倍。[10]因此，加勒比地区对第一批移民更有吸引力，但是有一个事实很少有人知道：17世纪，确实大部分英国移民（超过60%）去了西印度群岛，然而，到18世纪，去往加勒比地区的移民数量急剧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非洲奴隶取代了白人劳工，另一方面，热带气候造成的高死亡率令人望而生畏，没有那么多人敢冒险前往加勒比地区。

英国和卡斯提尔王国不同，英国政府没有限制哪些人可以移民，对谁能乘坐英国的船只也没有严格的筛选标准。因此，移民大潮很快蔓延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威尔士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的生活条件往往比英格兰更严酷。18世纪从不列颠群岛去往美国的移民大多都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爱尔兰人中，更多是来自北爱尔兰的人，人数远超苏格兰人，来自南爱尔兰的移民数量也在快速增加。在1701—1780年这80年间，2/5的英国移民都是爱尔兰人。[11]

苏格兰的生活条件比英格兰艰难得多，农村和高地地区尤其艰苦。这形成了苏格兰人艰苦奋斗和敢于闯荡的性格，使他们成为出色的移民。"逾山

越海”是苏格兰最大的家族——麦克唐纳家族的座右铭，形象地总结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苏格兰人的精神。许多苏格兰人在16世纪移民到北爱尔兰，接着又大规模移民到美洲，但一些极端的批评者将这视为一场灾祸。

在1746年的卡洛登战役后，苏格兰的森林被毁，高地地区的土地租户被驱逐，最重要的是，家族制被废除。所有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导致苏格兰从18世纪中叶起外迁的移民数量猛增。塞缪尔·约翰逊在1775年出版的《苏格兰西部诸岛纪游》中写道，大多数苏格兰人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因此，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把未来寄托在去往美洲的船上。在整个19世纪，苏格兰移民人数持续增加，移民到加拿大的尤其多。在19世纪上半叶，在定居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英国人中，59%是苏格兰人。去往美国的苏格兰移民也越来越多，在1890年到达美国的移民中，有25万多人的出生地是苏格兰。[12]移民潮给苏格兰文学留下了深重的痕迹。1880年，伟大的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出版了《业余移民》一书。他基于自己从苏格兰到加利福尼亚的旅程写下这部回忆录，生动详细地记述了19世纪苏格兰海外移民的经历。

对那些习惯了苏格兰农村艰苦生活的人来说，北美的生活条件上了一个大台阶，所以他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父母就是移居美国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

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也是苏格兰血统，尽管隔得更远。不仅不少美国高层政治家是苏格兰姓氏，美国的工业巨头中也不乏苏格兰人。著名钢铁大亨安德鲁·卡耐基正是其中之一。卡耐基在1835年出生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匹兹堡时才12岁，他引领了19世纪后期钢铁业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他结束职业生涯时，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在卡耐基退出钢铁业、投身慈善事业后，他的影响一样巨大，他投资建立了3 000家公共图书馆，还向教育、文化和科学机构捐赠了大笔资金，这些机构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在凯尔特移民中，最出色的无疑是爱尔兰人。欧洲没有哪个民族的移民动机比爱尔兰人更强烈。爱尔兰人不仅像苏格兰人一样受苦于穷困的生活和贫瘠的土地，来自英国人的压迫，以及宗教和政治等原因也迫使他们离开家园。事实上，当爱尔兰被英格兰殖民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扩张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之一。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法律禁止爱尔兰天主教徒拥有土地和履行公职。爱尔兰人在自己的家园被边缘化，这是他们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爱尔兰人经常哀叹他们的国家离英国太近。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拥有一个地理上的优势，爱尔兰是最靠近北美东海岸的欧洲国家。从18世纪开始，在大西洋西岸定居的爱尔兰移民人数持续增长，没有亲戚在美国的爱尔兰家庭越来越少。这种家庭关系网使爱尔兰人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特别是波士顿。2001年，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说，在精

神上，爱尔兰距离波士顿比柏林更近。过去3个世纪的情况确实如此。

从18世纪起，不仅爱尔兰和不列颠群岛的人移民到北美，其他欧洲民族也开始移居美洲。关于大西洋另一侧的消息迅速传遍欧洲大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的未来在美国。英国在美洲的第一批殖民地向所有愿意在那里定居和工作的欧洲移民开放，对英国或爱尔兰以外的欧洲人来说，除了起初不会说英语的劣势，不存在任何妨碍他们移民的不利因素。就荷兰人而言，他们和英国人差不多时间来到北美，荷兰殖民者在1614年建立了奥兰治堡，之后，有30个荷兰家庭去往新阿姆斯特丹定居。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荷兰西印度公司授予定居北美的荷兰移民哈得孙河两岸的土地，荷兰移民潮由此兴起。在当时抵达美国的移民中有一个范布伦家族，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正是这个家族的后裔。罗斯福家族也是如此，他们不仅在两个世纪后变得十分富裕，还成为美国最杰出的政治家族之一，这个家族诞生了两位伟大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到17世纪中叶，新阿姆斯特丹有8 000名荷兰居民。瑞典人则在特拉华州创建了一个小殖民地，约有50个家庭定居，但后来这里被荷兰强占了。1664年英国征服了新阿姆斯特丹，把这一定居点改称为新约克（纽约），主权的变更被当地居民默认和接受。就这样，欧洲各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向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输入人口。

在北美的殖民进程刚开始时，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我们此前曾提到，尽管法国王室努力通过多种方法推动法国人移民海外，但是很少有法国人愿意迁往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就16世纪和17世纪的法国而言，只有冒险者和传教士愿意去殖民地，并没有多少家庭想通过移民来提高生活质量。正因为这个原因，18世纪初，新法兰西的人口极其少，甚至不到英国13个殖民地人口的1/10。但是，确实有法国人因为宗教原因移居美国。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因为信仰新教受到迫害，而且法国政府还禁止他们去新法兰西定居。于是，他们转向说英语的美国东海岸，尤其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

下一波抵达北美的最大的欧洲族群是德国人。在最开始时，德国各君主国面临与英国类似的问题，移民对民众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德国没有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到1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1683年，德国律师弗兰兹·丹尼尔·帕斯托留斯抵达宾夕法尼亚，代表一群渴望离开欧洲的贵格会教徒买下了1.5万英亩土地，在那里建起日耳曼敦。尽管这里隶属于英国殖民地，但是盛行德国风俗，帕斯托留斯的余生都在那里度过，直到去世。第一批到达北美的德国家庭将他们的定居点改造成一个与德国城镇非常相似的繁华城市，经济以纺织工业为主。

1714年，德意志汉诺威王朝选帝侯乔治一世登上英国王位，从此，英国王

室大力推动德国人向英属美洲殖民地移民，约1.4万德国人从英国出发抵达美洲。[13]整个18世纪，美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公司，专门为德国移民赴美提供资金。英国议会的数据表明，1716年，宾夕法尼亚的人口中有1/3是德国人。还有许多德国人定居在纽约，他们创建了曼海姆、奥本海姆和赫基默等城市。在弗吉尼亚，德国人定居在日耳曼纳，专门从事铁器买卖；而马里兰则吸引了许多德国天主教徒。

这波大规模移民使德语成为英属殖民地的第二大语言，德国社区迅速兴起，为英属美洲殖民地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德国移民中的成功典范无疑是1784年抵达纽约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这位聪明、雄心勃勃的德国商人专营皮革生意，也投资其他利润丰厚的行当，例如纽约的房地产。在阿斯特的经营下，他的公司大盈其利，他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千万富翁，在1848年去世时，阿斯特是美国首富。此后，阿斯特家族在大西洋两岸的商业圈和政治圈都很有影响力。在英国，阿斯特家族最知名的家族成员之一是南希·阿斯特，阿斯特子爵迎娶了这位出生在美国的名媛，她后来成为英国下议院的第一位女议员。

许多人认为，既然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不断发展，欧洲的移民人数不断增加，那么欧洲文化理所当然是美洲的主流文化。然而，最初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一个事实是：16—18世纪，横渡大西洋的大多数人并非来自欧洲，而是非洲。

从16世纪开始，移民美洲的非洲奴隶迅速增加。起初，西班牙在古巴殖民地和伊斯帕尼奥拉殖民地使用奴隶，后来巴西的种植园也需要大量的奴隶。从此，使用非洲奴隶这一习惯传遍了欧洲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最后传到北美洲。那里的种植园发展以及殖民地的经济都非常依赖来自非洲的劳动力，因此殖民地对非洲奴隶的需求迅速增长，美洲的白人越来越离不开黑人。

到18世纪末，有150万欧洲人移民到美洲，但是被转运到美洲的黑人数量是这个数字的4倍。[14]1589—1820年，在远渡大西洋的移民中，超过70%是非洲人。据计算，从1600年到19世纪末，共有1 200多万非洲奴隶被运送到美洲。[15]黑人移民之所以这么多，不仅是因为美洲对非洲奴隶需求大，也因为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高，而且生育率很低。为了维持稳定的黑人人口数量，就需要不断运送非洲奴隶到美洲。

16—18世纪，新世界的黑人人口多于白人，因此，不仅欧洲文化，非洲文化也在美洲传播开来。黑人被迫生活在由白人主导的世界里，不再说他们的母语，基督教取代了他们原先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的姓名也被奴隶主改变。尽管如此，非洲文化最初在所有种植园和其他黑人聚集地都清晰可见，人们能感受到他们的音乐、美食、信仰以及言谈中的非洲特色。奴隶

制废除后，一些殖民地的非洲文化日渐凸显。在巴西，黑人对流行文化和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响很大；在今天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苏里南及圭亚那海岸，特别是在黑人人口占多数的加勒比群岛上，非洲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尤其明显，到现在仍然如此。

如果美洲的黑人和白人人口数量占比保持不变，那么在大西洋文明里，非洲文化会占据半壁江山。然而，19世纪的人口变化使黑人被边缘化。一方面，1807年奴隶贸易被禁止后，非洲奴隶不再被运送到美洲，另一方面，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白人移民浪潮在19世纪涌向美洲。从那时起，黑人在许多地方不再是多数群体，甚至成为少数民族，在美国尤其如此。最终，大西洋文明演变成西方文明，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把大西洋文明称为“西方白人文化的别名”。[16]

1798年，英国教士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出版，这是西方世界关于人口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马尔萨斯在书中分析了人口增加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并警告人口不断增加会产生负面作用，对英国和所有国家造成破坏性影响。马尔萨斯解释道，人口增长后，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劳动力增加，这会导致工资降低；另一个更有破坏力的后果是粮食短缺，因为农业和畜牧业的产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一旦达到一个临界点，前者就不能满足后者的需要。

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后果的理论对正处于黄金时期的英国影响很大。因此，英国在1800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英国约有1 000万人口。尽管马尔萨斯的预言从未成为现实——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形，但是它确实有助于提高当时人们对人口增长的威胁的认识。马尔萨斯指出，战争、瘟疫和饥荒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方式，不太痛苦的替代方法是控制生育。这在当时只能通过单身或延迟婚龄来实现。而阻止人口意外增加的第三个方法是移民。因此，英国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都积极推动移民，尤其是那些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可以把多余人口输送过去。事实上，由于环境所迫，底层群体不得不移民，与贫困有关的问题减少，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马尔萨斯预言的噩梦就这样被驱散了。

即使不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少欧洲人也很清楚人口过剩会引发问题。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少、食品短缺，因此农村人口会向城市迁移，但许多人的境况并未好转。老一代工人只能忍受暗淡的前景，而19世纪出生的人拥有一个新优势：移民机会更多。

欧洲移民最喜欢的目的地是美国。有几个欧洲国家已经有移民定居在这个国家，因此进一步推高了19世纪欧洲的移民潮。而且美国是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对许多非殖民大国的民众来说特别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美国需要移民刺激经济发展，需要有人去耕耘广阔的领土，而且在美国，一个

人兴旺发达的机会比其他所有地方都多。

尽管英国人有机会移民到大英帝国的许多地方，但是在整个19世纪，他们不断移民到美国，尤其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

在19世纪，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人数一直在增长。爱尔兰人的叛逆天性使他们自然被美国这个成功摆脱英国统治的国家吸引。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对爱尔兰人来说，美国不仅是一个机会之地，而且能让他们从爱尔兰人最痛苦的经历——马铃薯枯萎病带来的灾难中恢复和振兴起来。1845年的马铃薯枯萎病引发的大饥荒使爱尔兰失去了近1/4人口，陷入了数十年的经济危机。在马铃薯枯萎病后的10年大饥荒中，近200万爱尔兰人离开家园，其中大多数人移民去了美国。

1850年，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爱尔兰人占了人口的1/4。[17]初到美国的他们要面对很多问题，比如英国人对爱尔兰人，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富人对穷人的欺凌和偏见，爱尔兰人很被排挤，谋生并不那么容易。尽管美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平等，而且平等主义是这个国家引以为荣的政治基石，但是并非所有移民都平等，欧洲不同民族之间的争斗在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仍然存在。尽管如此，爱尔兰人仍然稳扎稳打，逐渐克服了所有障碍，最终登临美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顶峰。帕特里克·肯尼迪正是在马铃薯枯萎病后10年间离开爱尔兰的移民之一，他来自韦克斯福德郡，1849年在波士顿定居下来，做鞣皮工谋生。他的儿子帕特里克·约瑟夫·肯尼迪虽然出生于这个低微的家庭，但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这还只是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政治圈崛起的开始。

另一支欧洲移民大军是德国人。19世纪40年代的危机和1848年革命促使德国人大规模离开家园。在接下来的10年里，约有100万德国人来到美国，在他们祖先建造的城市以及美国各地定居下来，纽约就有不少德国人。1867年，美国第一个社会党成立，人们感受到革命流亡者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随后几年间，有更多德国移民来到美国；19世纪80年代，又有100万德国人进入美国。密尔沃基和辛辛那提成为美国两大德国文化中心。德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工业精神使一些德国移民走上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成功之路，成为美国的商界精英。

瑞典是另一个重要的移民国家，在19世纪向北美输出了100多万移民。1820—1900年，约75万挪威人离开家园移民到北美，相当于其人口的4/5；荷兰移出的人口约为35万。[18]总体上，继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之后，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最欢迎来自欧洲新教国家的移民。事实上，除了英国之外，美国还在3个国家设立了专门促进移民的机构：德国、瑞典和挪威。

美国对天主教徒的偏见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共和党要求限制爱尔兰和德国天主教徒移民，以此维护美国大多数人认同的文化。

尽管法国也有很具吸引力的殖民地，但不少法国人也被美国的机会吸引，有些法国人还通过加拿大来到美国。19世纪，约有70万法国人定居美国。[19]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潮开始涌现。在意大利，城乡人口爆炸，生活条件下降引发了那个世纪末的一波移民潮，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美国。在19世纪最后10年里，有70多万意大利人进入美国。同一时期，希腊人也开始移往北美，甚至一直被巴西吸引的葡萄牙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以及其他东欧人，甚至俄国人也因为想要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开始移民美国。

俄国人有很多机会在其辽阔的帝国内部迁徙，但是这并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或政治压力，因此，人们更愿意移往美国。美国边境管制的数据表明，从19世纪到20世纪头10年之间，有300多万俄国人来到这个国家。[20]俄国移民中有很多犹太人，尤其是1881年后，由于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1881—1914年，有200万犹太人移民到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俄国。[21]

不管对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还是其他西欧民族来说，横穿大西洋都是一次价格不菲、风险重重的冒险之旅，对波兰人和俄国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的居住地距离美国主要港口很远，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越过大西洋，去南美需要的时间更长。装载移民的船只往往非常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因此移民必须有极好的体魄和忍受困境的能力。1710年，一艘载有2810名德国人的船暴发了伤寒，导致446人死亡。死亡和疾病缠绕着越洋的船员和旅客，到达目的地的人数总是少于登船的人数。

幸运的是，从19世纪初开始，移民的航行条件开始改善。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很快被应用于海运，螺旋桨推动、金属船体的轮船取代了传统的帆船，这种轮船的体积更大，舒适度也有所提高，而且海军公司专门设计出可以装载数百个乘客、跨洋远行的船。这些变化带来了一个结果，远洋班轮时代开启了。从19世纪中叶起，巨型班轮越来越多，越洋航程的时间缩短，旅程变得更加舒适，最重要的一点是：航行的成本降低了很多。

19世纪的跨洋轮船对欧洲的意义几乎等同于15世纪的卡拉维尔帆船。卡拉维尔帆船使发现美洲成为可能，而跨洋轮船使大规模移民可以到达美国和地球上任何地方。没有跨洋轮船，西方文明就无法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

跨洋轮船还改善了欧洲与美洲之间的总体关系，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开始变得非常特殊。班轮越来越高频率地越过大

西洋来到美国，船上既有很多移民，也有许多英国商人前往美国寻找机会。美国有很多商业机会，铁路是其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铁路发展得非常迅速，铁路里程数比全欧洲还多，而且英国和荷兰、德国一样，在美国的铁路产业投入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从此，英国贵族与美国精英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家族之间的联姻越来越多，而此前这种婚姻会令英国上层阶级哗然。特别著名的联姻包括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与马尔伯勒公爵，还有伦道夫·丘吉尔与一个纽约股票经纪人的女儿珍妮·杰尔姆的婚姻，他们的长子温斯顿·丘吉尔后来成为英美关系的一个伟大象征。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充分反映出大西洋两岸关系在大迁徙世纪的演变。狄更斯曾两次前往美国，他的作品在那里很受欢迎。他在《美国札记》和《马丁·翟述伟》里记述了他对美国的印象，虽然多数不太正面。

对19世纪英美关系最为详细和微妙的描述来自波士顿作家亨利·詹姆斯，他在作品中反映出英美既相互钦佩，又存在嫌隙和历史偏见。詹姆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两个国家，最后入籍英国，成为英国公民。

如果没有大幅的人口增长，美国就不可能在19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扩张领土。

在这方面，欧洲的移民潮起到了关键作用。来自不同地方的欧洲人陆续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家，从美国东海岸的大城市到最偏远的地方，都有欧洲人安家落户。从19世纪中叶起，欧洲移民成为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力量，使美国在20世纪初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北美洲另一个主要的移民目的地是加拿大。19世纪初的加拿大和现在一样，是全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也是土地最肥沃、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整个19世纪，英国都积极促进其民众向北美13个殖民地移民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另一个被称为“大迁徙”的集中移民期是1815—1850年。在此期间，有8万英国人来到加拿大。[22]这次移民潮对加拿大的文化影响相当大，因为此前，加拿大来自法国的移民最多，但从此法国人却变成了少数族群。对英国人的不满使得许多说法语的移民开始从魁北克移往美国。

1851年，加拿大西海岸发现了黄金，引发了欧洲和美国移民的涌入。一年后，为了防止美国吞并不列颠哥伦比亚，英国正式宣布该省为英国殖民地，对其拥有主权。虽然淘金潮没有持续多久，但吸引了足够多的人口来到这个偏远地区，使这里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

这次大迁徙有助于英国巩固对加拿大这一独立性很高的殖民地的主权。

1838年，英国加拿大总督德拉姆伯爵提交了一份报告，对大英帝国这一领地的未来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份报告中，他建议为所有加拿大领地设立一个大自治议会，这样，殖民地既获得了独立，又能确保他们忠诚于英国。德拉姆似乎从北美13个州殖民地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为了不重蹈覆辙，防止再次出现那样的武装冲突，导致加拿大脱离英国，他提交了这份报告，这对加拿大的发展意义重大。

尽管大迁徙在加拿大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移民的数量相对如此广阔的领土来说仍然微不足道。1871年，加拿大大约只有350万人口。因此，加拿大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和中欧吸引移民，对他们宣传加拿大，声称那里是“最后、最好的西部地区”，使许多欧洲人相信加拿大是优于美国的更好选择。这次宣传活动之后，越来越多不同欧洲国家的人来到加拿大定居。

移民有助于加强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联系。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这里也有类似美国梦的梦想。两个伊比利亚帝国的美洲殖民地独立并不意味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结束了对它们的影响。事实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大潮出现在拉丁美洲国家独立之后。

西班牙与英国、德国不同，并没有多余的人口可以移民到美洲，然而，对19世纪的许多西班牙人来说，有同样的经济动机走上移民之路。西班牙以农业经济为主，很多人都面临农村的诸多问题。除了贵族和小资产阶级之外，其余阶层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机会就是移民。

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西班牙人只能移民到西班牙帝国残存的几个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当时古巴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殖民地，吸引的人数最多。在去往加勒比海岛的移民中，最杰出的是科米利亚斯侯爵——安东尼奥·洛佩斯。

安东尼奥·洛佩斯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在古巴做工，在积累了足够资金后，他创建了一家运输公司，稳扎稳打，最终控制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之间大部分的跨洋运输业务。他用自己的财富将各种工商业务引入西班牙的殖民地。洛佩斯还创建了一家殖民地银行，并进军烟草行业，成立了菲律宾烟草总公司，几经扩大后成为西班牙第一家跨国公司。洛佩斯突出的商业成就得到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赞赏，并用洛佩斯在西班牙北部老家的地名“科米利亚斯”封他为科米利亚斯侯爵。洛佩斯还在西班牙老家创办了一所大学。

科米利亚斯侯爵是在南美成功发财后回到西班牙的杰出典型。那些在美洲发了财的人被西班牙人称为“来自印第安的人”，他们对西班牙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北部的许多地区都可以

看到他们留下的遗迹和影响。在重返家园后，这些“来自印第安的人”建起殖民地风格的豪宅，一些富裕的人还会捐款给公益事业。这些榜样激励了许多想要寻求更好生活的西班牙年轻人。因此，“来自印第安的人”在殖民时代和后来的西班牙都是成功的代名词，从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到皮奥·巴罗哈，有几位伟大的西班牙现代小说家都在作品中展现出这一特点。

在西班牙北部桑坦德镇的一条街上，有一块科米利亚斯侯爵创立的跨大西洋公司的旧牌匾，上边写着每月去往哈瓦那、韦拉克鲁斯、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班轮信息。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到20世纪中叶，这个省的许多居民登上其中一艘船，带着寻求更好生活的希望起航——希望是移民的主要动力和支柱。在西班牙北部的其他港口以及巴塞罗那、加的斯、加那利群岛，一艘艘轮船装满了工人。当时人们用“去美洲”（do the Americas）来描述这一常见的景象。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西班牙迎来了更大的移民潮，并持续到20世纪。1882—1935年，约有400万西班牙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23]古巴是最吸引西班牙移民的目的地，直到1898年古巴脱离西班牙的控制。除了古巴，西班牙移民还很钟爱阿根廷，然后是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巴西也是西班牙人的选择之一。

只有15%的西班牙移民选择去往美洲以外的目的地，其中大多数去了菲律宾，不太喜欢冒险的西班牙人则选择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西班牙移民和北欧移民的不同之处在于，许多西班牙人并不认为移民是永久性的事情，他们希望在实现目标后尽快回到西班牙。事实上，在1882—1935年离开西班牙的移民中，有57%回到了西班牙。还有很多临时移民，古巴和巴西有很多农村地区，不少西班牙农民在收获季节前往那里做工，然后就返回。

葡萄牙人也表现出非凡的迁徙精神，最受葡萄牙人欢迎的目的地是葡萄牙帝国的明珠——巴西。在18世纪之前，巴西对葡萄牙人的吸引力并不大。但在18世纪，巴西发现了黄金，于是移民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在那个时期来到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以及其他遍布巴西海岸的小定居点，葡萄牙语被强制规定为这一殖民地的官方语言。不过，巴西和美洲其他地区一样，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迎来了移民大潮。

当时巴西刚独立不久，但是这一突破性政治事件并没有阻碍葡萄牙人前往这个年轻的国家，也没有影响巴西与葡萄牙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起初，葡萄牙移民来到巴西的主要城市定居，而后，移民们开始去往农村，因为那时奴隶制被废除，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激增，许多葡萄牙农民也踏上冒险之旅，去美洲的种植园做工。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共有30多万

葡萄牙人移民到巴西。

巴西也吸引了不少德国移民。1820年，几个德国家庭和一些瑞士定居者创建了新弗里堡。巴西独立后，巴西帝国皇帝佩德罗一世的皇后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公主，此后巴西对德国移民开放，尤其是南里奥格兰德州。从那时到19世纪末，巴西的德国人口不断增加。和北美洲一样，德国人也用德国地名命名他们的新家园，包括新弗里堡和亚马孙河沿岸的定居点。

然而，到19世纪末，巴西最多的欧洲移民却是意大利人。意大利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意大利人来说，巴西是继美国和阿根廷之后的第三个热门移民目的地。1876—1920年，约有220万意大利人进入巴西，他们很容易地融入当地，移民的第二代就认同自己是巴西人，意大利人对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影响巨大。在今天巴西的白人中，约有1/3的人的先祖来自意大利。

除葡萄牙、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之外，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也被巴西吸引，特别是来自波兰、奥地利、乌克兰和俄国的移民。欧洲不同民族和文化在圣保罗和其他巴西的主要城市里并存不悖，也与非洲文化和美洲的印第安文化长期兼容并立。

对欧洲移民来说，阿根廷非常特殊。这个崛起于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国家成了美洲大陆最大的国家之一，阿根廷开国领袖圣马丁及其继任者们将首都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面临征服这片广袤土地、引入人口、治理国家的重重挑战。有几个美洲国家也表现出美国的拓荒精神，阿根廷表现得尤其明显。

19世纪30年代，阿根廷总统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开始了巴塔哥尼亚运动：占领巴塔哥尼亚高原和潘帕斯草原的土地，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并把居住在这里的土著部落赶走。40年后，罗萨斯又发动了征服荒漠运动，旨在占领巴塔哥尼亚，并遏制智利。在这次征服运动中波及的印第安人都被阿根廷的军队驱逐和消灭殆尽。

19世纪的阿根廷成为最吸引欧洲移民的国家之一，而且，阿根廷政府非常积极地吸引欧洲移民，甚至将此写入在1853年通过的阿根廷宪法：“政府将积极吸纳欧洲移民。”胡安·鲍蒂斯塔·阿尔韦蒂对这部宪法内容的影响很大，他出版了一本书，描述如何组建阿根廷共和国，阐述道：“让文明人移居过来是一种文明行为——文明人指来自文明的欧洲的人。”[24]阿尔韦蒂在另外几部作品中也强调阿根廷不仅应该敞开国门欢迎欧洲移民，而且还需对文明程度不同的欧洲人进行区分，坚持优先吸纳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国家的移民。虽然移居阿根廷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很多，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所有国家都有移民来到阿根廷，其中

既有阿尔韦蒂所希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人，也有文盲，甚至来自奥斯曼帝国的移民也漂洋过海，来到阿根廷的港口。

阿根廷可能是最积极吸引欧洲移民的美洲国家，不仅在欧洲最重要的城市开设代理机构，资助贫穷的移民，让他们能够去阿根廷，还积极推动他们向阿根廷最偏远的地区移民。这些努力卓有成效。1869年，阿根廷的人口是180万，其中有16万是新近抵达的欧洲人；到1895年，阿根廷人口增加到395万4 911人。几十年过去后，在1930年，阿根廷移民有633万，其中有300多万永久定居下来，其余则是这个国家的流动人口。[25]

在定居阿根廷的移民中，最初来到这里的西班牙人的移民历史最长，其次是从19世纪中叶起来到阿根廷的英国人。英国的投资推动了阿根廷的发展，特别是铁路这一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在新移民中，英国人不仅最富裕，也赢得了阿根廷人的尊敬。英国的风俗习惯也在这里扎下了根，尤其是马球和足球等运动和社交习惯。阿根廷的爱尔兰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马铃薯枯萎病引发饥荒之后。阿根廷的法国移民也不少，法国投资商的数量仅次于英国。但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阿根廷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南欧、中欧和东欧。

不过，来到的阿根廷的移民主力显然是意大利人。阿根廷在1869年开展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意大利人占阿根廷移民人口的33%。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到1895年，阿根廷有近50万意大利居民，占移民人口的48%。[26]尽管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穷人，但是工商界、政治和文化领域很快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从最不起眼的地区到最排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其他重要城市，意大利人的影响力都显而易见，给阿根廷人的身份认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阿根廷的西班牙移民也不少。1880—1914年，有140万西班牙人在阿根廷定居，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加利西亚——因此在阿根廷，西班牙人也被称为加利西亚人。也有俄国人移民到阿根廷，增加了这个国家欧洲文化的多样性。来自伏尔加地区、有日耳曼血统的俄国人率先来到阿根廷，定居在潘帕斯草原。但是，到19世纪末，俄国人大量涌入。此后，乌克兰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中欧国家的移民也纷纷到达这个南美大国。

和去往美国的俄国移民一样，在阿根廷的俄国移民中，犹太人的比例也很高，许多犹太人通过莫里斯·德·赫希男爵的帮助来到阿根廷。这位有日耳曼血统的犹太企业家、慈善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一个犹太人社区，还在阿根廷的农村地区兴建了不少犹太人定居点。

阿根廷内部的殖民过程充满了冒险、忍耐、幻想，甚至疯狂。尤利乌斯·波珀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位现代的征服者去火地岛殖民时，发现那里有丰富

的金矿，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名为“亚特兰大”的定居点，专门做黄金生意，并在那个偏远的地方建起一个由他的私人军队控制的小帝国。但是真正让波珀名入史册的是在他指挥下，这个偏远地区的土著部落全部被灭绝了。还有不少来到阿根廷的移民在短时间内暴富的故事，比如意大利银行的创建人、拉普拉塔河的发现者安东尼奥·德沃托。这个意大利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建了一个用他名字命名的城区。

阿根廷的欧洲特色很鲜明，这或许是因为那里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欧洲人，其他种族人口的占比比其他美洲国家要小得多。白人定居者来到这里之后，潘帕斯、巴塔哥尼亚和阿根廷北部地区的大多数土著人口都被驱离或消灭。至于非洲人，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直到18世纪才出现了大量非洲奴隶，而他们很多人或离开或被消灭，剩下的寥寥无几。对阿根廷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的差别，阿根廷大作家博尔赫斯诠释得很到位：“秘鲁人是印加人的子孙，墨西哥人是阿兹特克人的后代，阿根廷人则是船客的后裔。”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欧洲特征最显著，这对阿根廷的整体建设影响很大。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说过，这座美丽的城市很像一个帝国的首都。游客在这里会想到巴黎、马德里、米兰以及其他欧洲城市，这是复制欧洲城市氛围复制得最好的美洲城市之一。

到19世纪末，在阿根廷几乎能见到所有欧洲国家的移民。不断涌入的欧洲人让阿根廷与旧大陆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欧洲移民在刚到达时，心里还记挂着大西洋彼岸的祖国，但他们很快被同化。阿根廷的全国义务教育计划，以及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为所有新移民提供的多种机会，使移民的第二代就成为忠于新家园的阿根廷人。正如有爱尔兰血统的阿根廷参议员爱德华多·凯西所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伟大的国家，相比之下，欧洲不值一提。”[27]对那些在祖国始终无法飞黄腾达的欧洲人来说，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好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因此，第一代和第二代阿根廷人很引以为豪。

尽管欧洲移民喜欢去美洲，但是随着各欧洲帝国的扩张，出现了不少其他选择。其中，澳大利亚是最远、最神秘的地方之一。

1788年1月19日，一支船队押送737名囚犯抵达今天悉尼附近的植物学湾，这批囚犯成了大英帝国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第一批定居者。1788—1853年，约12.3万名男性和2.5万名女性被判流放澳大利亚，[28]罪名多种多样，最多的是侵犯财产罪、政治犯。在被放逐到澳大利亚的犯人里，有1/4是爱尔兰人。这个由英国囚犯建立的国家有一点很不同寻常：大多数居民都是英国王室的忠诚臣民，他们在澳大利亚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

让澳大利亚发生转变的是在1809—1821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督的拉克伦·麦夸里。[29]

麦夸里认为，将囚犯流放到澳大利亚是为了给犯人提供一个赎罪的机会，而不是为了惩罚。为此，他决定让这些囚犯建设悉尼市。在麦考里任内，悉尼变成了一座典范的殖民城市，囚犯们建造出优美的建筑，在大洋洲重现了西方的古典建筑。最重要的是，麦夸里积极鼓励犯人们成为优秀公民，甚至给予那些服刑期满的人12公顷土地。这些人定居下来后，有的做了农民或牧民，还有不少被禁止返回英国的人在悉尼开办企业，其中最出色的或许是塞缪尔·特里。这个来自曼彻斯特的小偷通过经营旅馆和典当业务，成为19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的首富。在澳大利亚，服刑期满的罪犯得到了最好的重返社会的机会。因此，对许多被判入狱的人来说，被判流放澳大利亚从一个令人恐惧的惩罚变成了理想的去处。

1823年，澳大利亚自由公民的数量超过了囚犯，但是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英国人仍然很少，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距离英国太远，英国人更愿意去美国和加拿大，去北美的成本也更低。但是1851年出现了一个转机。这一年，悉尼西南部的维多利亚省发现了黄金。于是，移民迅速涌入，10年间，澳大利亚的居民从约40万猛增至115万，定居维多利亚省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8%上升到47%。[30]从哥伦布到达美洲起，事实多次证明，对欧洲人来说，只要有黄金，任何地方都不远。但是发现金子的只是少数幸运者，澳大利亚定居者的主业是畜牧养殖，尤其是养羊。与美洲土著一样，英国定居者对澳大利亚土著的伤害不浅。英国人带来了多种对土著居民很致命的疾病，造成他们的人口急剧下降，最后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少数族群。定居者还占据大片土地发展牲畜业和农业，使当地人的自然栖息地锐减。

英国殖民大洋洲另一个岛国——新西兰的方法很不同，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是这一殖民进程的主要推手。这位富有的英国企业家深受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理论影响，认为殖民是解决英国大城市人口过剩和贫困问题的方案，他希望创建一个新殖民体系。韦克菲尔德的计划是：创建一家公司，占领并开发土地，然后与企业家、工匠和工人签订协议，建设殖民地。为此，新西兰公司成立了，并在1839年派出第一批船只，开始向新西兰的岛屿殖民。

但是，韦克菲尔德没有获得任何政界人物的支持。为了防止这家公司惹出祸端，也为了防止在海岸附近游弋的法国和美国捕鲸船侵犯英国利益，英国王室最终做出正式占领新西兰的决定。做出这样决定的另一层原因是英国政府要避免与毛利人发生冲突。所有和他们接触过的欧洲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好战的民族。

1840年，英国王室与毛利人签署了《怀唐伊条约》，毛利人认可英国派一位总督去新西兰，英国承认新西兰的土地是毛利人的财产，而且毛利人享有与英国公民相同的权利。尽管这个条约似乎厘清了双方的关系，但是毛利人对条约有不同的理解。毛利人期望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然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毛利人的家园，占据他们的土地，这让他们很愤怒。

英国政府通过经济补偿取缔了新西兰公司的权力之后，开始跟踪和记录到达新西兰的英国定居者人数。1871年，新西兰只有3.7万定居者来自英国，到20世纪初，这个数字增长了3倍。[31]移民中很大一部分是苏格兰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移民都是英国人，新西兰也吸引了来自中欧的移民，尤其是奥匈帝国。在新西兰殖民地正式创建20年后，其大部分人口都是白人。

从19世纪起，另一个越来越吸引欧洲移民的目的地是南非。尽管距离遥远，但是南非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其广阔的领土上几乎无人居住，为具有开拓精神的定居者提供了许多机会，而且从那里似乎可以向北无限扩张，整个非洲大陆仍然有待发现和探索。19世纪早期，南非第一批欧洲移民的后裔——2万名布尔人大获其利，他们已把南非当作自己的家园，难以与英国定居者分享这一天堂般的地方，所以发生了几场冲突。

1815年荷兰割让了开普敦之后，英国政府把南非视为另一个转移国内人口的理想目的地。1820年，第一批英国人抵达南非，5 000名定居者到达开普敦，决心在那里安家立业。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冲突不断，导致欧洲人开始首次大规模进入非洲大陆腹地。1835—1843年发生了南非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民族大迁徙，约1.5万布尔人家庭启程去往开普敦以北的地区，他们想在那里建立新定居点，实现自治。

对英国人或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来说，跑那么远去靠种田或养牛为生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真正能吸引他们的是找寻黄金或贵金属。因此，在发现黄金和钻石后，南非的命运大变。开普敦殖民地以北首次发现黄金和钻石的消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英国移民；南非金伯利市发现了最大的钻石矿和金矿，于是，这里的人口在19世纪70年代大幅增长，到1873年，居民数量已高达4万，是南非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城市。[32]钻石让塞西尔·罗得斯和他的商业伙伴戴比尔斯公司变成巨富，南非也成为大英帝国最繁荣的殖民地之一。

欧洲人感觉到，除了南非，整个非洲大陆总体上很仇视移民。从葡萄牙率先占领安哥拉，到欧洲各国争夺领地，在欧洲人殖民非洲的过程中，并没有足够的人口移民到非洲。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例外。在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后，恢复了南欧与北非之间从罗马时代起中断的关系，阿尔及利亚成为非常吸引欧洲农民的好地方，到20世纪初，

在阿尔及利亚定居的欧洲人多达15万，不仅有法国人，还有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而且这一数字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直持续增加。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移民大潮中，有一小部分意大利人去了突尼斯，而一些西班牙人则选择在附近的摩洛哥定居下来。

对欧洲移民来说，亚洲大陆比非洲更难以渗透。除了俄国成功在欧亚大草原和西伯利亚殖民之外，没有其他大国真有兴趣或者说没有能力派遣大队人马在亚洲长久定居。

英国从未将印度视为移民的目的地。虽然印度被称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但是英属印度是一个遥远且复杂的世界，对普通英国家庭来说，根本无法在那里长久定居。英国人认为他们的使命是治理、管理这个地方，并从中创造和谋取财富，而不是向这个已经有众多各色土著人口的国度移民。186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印度，有125 945个英国人，其中84 083人是军人，[33]其余大部分是就职于不同殖民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只有很小一部分居民涉足工商业或一些自由职业。由此可见，在印度的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与殖民地管理有关。

然而，经过几百年的殖民之后，出现了英裔印度人——在印度出生的英国人，或者是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生命时期的英国人，因此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份认同不完全是英国人。第一代罗伯茨伯爵乔治·罗伯茨将军就是英裔印度人。罗伯茨在1832年出生于印度坎普尔，父亲是一名在印度服役的陆军军官，他一生的戎马生涯基本都在印度。英裔印度人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吉卜林。1865年，吉卜林出生于孟买一个因职业原因移民到印度的中产阶级家庭。虽然他也在英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去过大英帝国很多地方，但是他的出生地印度让他度过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童年，赋予他灵感，使他创作出许多非常著名的作品。

对一些英国士兵、公务员或外交官来说，由于任职原因，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亚洲。他们可能被派往印度、缅甸、锡兰、新加坡或香港，许多人在不同地方轮换岗位，最后成为亚洲专家。正如痴迷东方文明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在他的小说《坦克雷德》中所说：“东方是一个职业。”许多人一辈子都在亚洲工作。

在东方，一个做出了杰出成就的先驱是新加坡的奠基人——斯坦福德·莱佛士，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是在1819年创建了新加坡这座城市。莱佛士在到达马来西亚后担任槟城总督的助理，在1805年开始致力于扩大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领地，他用了很多时间研究那里的人民和文化，最终开启了爪哇的历史。[34]

香港殖民地的历史与英国王室代表相关，比如哈里·巴夏礼。巴夏礼于

1841年来到中国，在中国担任了20多年高级外交官后，他又被派到日本和韩国任职。香港九龙的巴夏礼街即以他的名字命名，足见他的影响力。

作为香港近邻的澳门，从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人就来到这里，后来这里出现了土生的葡人，即那些被葡萄牙王室派驻澳门的官员的后裔，通常是混血葡萄牙公民。他们很珍视自己的葡萄牙人身份，尽管他们很可能一生都在亚洲度过。

在西属菲律宾殖民地，西班牙移民的人数一直不多，除了那些被派驻到那里担任公职的人之外，很少有西班牙人愿意冒险前往这么遥远的地方。尽管如此，安东尼奥·德·阿亚拉等西班牙移民的杰出成就深刻影响了菲律宾群岛的经济发展史。阿亚拉在19世纪30年代与德国实业家安德烈亚斯·佐贝尔合作开办企业，阿亚拉公司由此诞生。这家公司目前已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企业集团之一，阿亚拉家族后代的影响力非常大。

移民与欧洲帝国的扩张形影相随，使得殖民成为人口迁移的同义词，这些移民及其后裔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使西方文化在世界很多地方成为主流。欧洲强国的海外帝国将它们的影响力传播到各大洲，尤其是美洲和大洋洲，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的人口很少。16—18世纪，欧洲帝国将其文化传播到很多地方，但是欧洲没有足够的人口移居到所有领地。这一情形在19世纪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19世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都发生了人口爆炸，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不仅改善了旅行条件，也改善了这个星球上偏远地区的居住条件。

欧洲的移民潮从19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为欧洲帝国扩张增添了特殊意义，并使欧洲的影响力传播到殖民地之外。绝大多数欧洲移民在美洲定居下来，对这个大陆很多地方——从加拿大到阿根廷的发展居功至伟。如果没有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就无法实现领土扩张，也不可能有强劲的发展，在1900年后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没有欧洲人的贡献，美国就不可能具备超级大国的价值和地位。同样，欧洲移民也有助于加强从西班牙、葡萄牙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国家的身份认同，尤其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欧洲向北美和南美移民还催生出大西洋新文明，使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大西洋两岸的互动。

---

[1]　达克特是在1284—1840年意大利威尼斯铸造发行的金币，在当时的欧洲各国流通。——编者注

[2]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3] Kamen, *Empire.*

[4] John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6]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7]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8]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9]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Penguin, 1986).

[10]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11]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4).

[12] Ferguson, *Empire.*

[13] Burk, *Old World, New World.*

[14] Fernández-Armesto, *Civilizations.*

[15] Thomas, *The Slave Trade.*

[16] Fernández-Armesto, *Civilizations.*

[17] Thomas J.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An Ethnic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18]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19]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20] Stephen Birmingham, *"The Rest of Us": The Rise of America's Eastern European Jews* (Boston:Little, Brown, 1984).

[21] Birmingham, *"The Rest of Us".*

[22]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23] Raymond Carr, *Spain 1808—1975*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82).

[24] Maria Saenz Quesada, *La Argentina: Historia del País y de su Gente*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2001).

[25] Saenz Quesada, *La Argentina.*

[26] Saenz Quesada, *La Argentina.*

[27] Saenz Quesada, *La Argentina.*

[28] 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The Great Democracies,* vol. IV(London: Cassell, 1982).

[29]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30]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31]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32]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33] James, *Raj.*

[34] Victoria Glendinning, *Raffles and the Golden Opportunity*(London: Profile Books, 2012).

第七章

权力与荣光

欧洲霸权的黄金时代

19世纪是欧洲的鼎盛期，欧洲文明登上权力的顶峰，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影响力远播到这个星球上最偏僻的地方。在这100年里，欧洲的科技突飞猛进，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欧洲强国扩张成全球性殖民帝国。在工业发展和帝国扩张的背景下，欧洲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成为世界的智识中心，诞生了诸多政治思想，改变了全世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文化产业应运而生，娱乐、陶冶了人们的身心，启迪、丰富了人们的思想。

这个以改善和进步为特色的时代的终极成果是欧洲化的生活方式。这成为进步、卓越和最高文明的代名词，美洲和西方其他国家为之折服，纷纷在自己的国家复制这种生活方式。其他文明的精英不仅从善如流，选择欧洲的生活方式，还努力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他们认为欧洲化是成功的关键。

“欧洲的进步”这个词必须谨慎使用，因为很显然，欧洲强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差异。但是即便如此，欧洲各国人民都有一种共同的进取精神和优人一等的气势。欧洲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盖世之功和主宰世界的能力，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人如此，移民或被派往国外的欧洲人更加如此。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欧洲的黄金时代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14年。和平是欧洲盛世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1814—1815年，打败拿破仑的反法同盟在维也纳会议上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欧洲大陆20多年的动乱期，确保欧洲的长久和平。维也纳会议之后出现了欧洲协调机制，这个争端解决体系致力于保持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这4个主要战胜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其主要倡导者是梅特涅王子，他代表奥地利组织了维也纳会议，期望通过定期会议维持奥地利与其他强国之间的权力平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梅特涅王子也决心抵制革命运动，遏制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但是，批评派认为欧洲协调没有进步意义，因为它最终没能阻止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尽管如此，欧洲协调确实实现了它的主要目标——欧洲得以维持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尽管在此期间个别国家也发生了革命和战争，但整体而言，欧洲的和平局势一直持续到1914年。和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哲学家康德的欧洲永久和平之梦似乎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各国之间可以和平地进行贸易，梅特涅王子因此成为19世纪继拿破仑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有几位政治家都受到他的启

迪，特别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以这位奥地利王子和维也纳会议的制度为题，并学以致用，在冷战时期充分运用了梅特涅王子的均势原则。[1]

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欧洲自查理曼帝国崩塌以来最具普世性的国际秩序，在欧洲内部产生了一种共识：在现有秩序内的和平演变比其他所有方案更可取；维护制度比解决内部可能出现的任何单个争端更加重要；争端应该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解决。

欧洲黄金时代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是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新技术改良了制造流程，工业革命所及之处都迅速工业化，农村变为城市。在这场革命的最初阶段，主要受益者显然是革命的始发地英国，其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不久之后，西欧的几个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也加入这场革命。工业国家不仅技术先进，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变得异常富裕。在整个19世纪，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与非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1870—1913年，西欧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3%。欧洲的工业化带动了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资源向美国输出，引发和推动了那里的工业革命。

欧洲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欧洲国家继续在全球扩张，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上升。从15世纪起，欧洲人开始探索这个世界，到19世纪，这一进程大大加快。科学和技术进步让欧洲人能够突破各种限制，山高水远不再是阻碍，他们能够深入原来无法进入的地方。此前几乎未被探索的非洲大陆被欧洲人打开，欧洲强国迅速瓜分了这个大陆。与此同时，欧洲的殖民帝国也继续向其他大陆扩张。英国人到达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时，法国人来到了东南亚，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殖民进程迎来了突破性转机。世界贸易网也得到空前发展，中国和日本被纳入这个体系，自由贸易的原则被不断推广，市场经济迅速巩固。在此过程中，欧洲变得更加强大，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来影响和塑造这个世界。

19世纪是欧洲的黄金时代，也是英国的巅峰世纪。欧洲之所以能够影响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的丰功伟业。

从滑铁卢战役到1901年的布尔战争，英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打造出一种广受赞誉的社会模式。

1825年，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发明了铁路机车，这也许是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因为这是火车的前身，而火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交通方式。几年后，工程史上最具独创性的人物之一——布律内尔设计出了第一个铁路系统，并建造了连接伦敦和威尔士的大西部铁路网。铁路网迅速覆

盖了整个英伦三岛，还传播至大英帝国的许多殖民地。印度很快就拥有了亚洲最好的铁路系统，从欧洲南部到拉丁美洲，到处都有英国的铁路公司在铺设铁路。从这时开始直到20世纪初，英国的银行及其日益精密的金融系统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的铁路项目提供资助，推动英国铁路走向世界。英国还出口建造铁路的材料。从19世纪中叶起，铁路运输网是全世界所有希望实现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国家必须建造的基础设施。这项伟大的发明使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收获了丰厚的利益。英国不仅是蒸汽机的主要出口国，还是工业时代各种工具的主要出口国，包括纺织设备，英国也是纺织业和重工业的先驱。

英国实现了一项最重要的经济原则：自由贸易，这对其经济以及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重商主义被摒弃，自由贸易取而代之。1846年，英国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对进口粮食征收高额关税的《谷物法》被废止。从此，英国市场开放，成为不受任何限制的竞争市场，英国的谷物价格下跌，食品种类变得更加丰富。许多产品在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后，都实现了价格下降、收益增长。两位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为自由贸易理念做出了贡献：亚当·斯密阐述了劳动分工的巨大优势；大卫·李嘉图则阐释了贸易理论。

推动落实自由贸易的是制造商和自由党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科布登在1838年联合其他力量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目的是废除主要保护地主利益的《谷物法》。不仅在英国，科布登也在欧洲和美国推广自由贸易，他认为自由贸易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它能团结世人，把全世界变得像一个国家，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最佳方法。"

帕默斯顿勋爵很支持自由贸易，他认为商业是"文明的最佳先锋，能让人类更快乐、更明智、更好。"这为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提供了理由：强迫中国开放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因为任何政权都无权拒绝自由贸易带给人民的好处。

1860年，《科布登—希瓦利埃条约》签署，英国和法国同意取消英法之间的贸易关税。这一构成自由经济学实质的理念终于开花结果。从1860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前，自由贸易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英国出口工业产品和技术，不仅不断从中获益，也让全世界获得了这些产品和技术。食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大幅降低，极大地提高了英国人的生活水平。

1851年，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主持下，万国工业展览会在伦敦水晶宫开幕。水晶宫本身就展示了最先进的科技，因为它使用了各种精良的工业技艺，使用预制的铁部件和玻璃制成。作为领先的工业强国，英国贡献出一半国内生产的铁、煤和棉布参加这次展会。[2]从那时起，英国被称为世界工

厂。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主要商品是工业产品，所以英国的财富与日俱增。1870—1900年，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均产出增长率高达500%。[3]

在那几十年里，英国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英国文学巨匠狄更斯在他那些闻名世界的小说中写出了大多数英国人的窘境，他们往往贫困不堪，饱受社会不公以及艰辛生活的折磨。1801—1851年，英国的人口从800万增长到1 500多万，很多人都到新出现的工业城镇找工作，希望过上比在农村更好的生活。在此期间，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的人口翻了两番；格拉斯哥和布拉德福德的人口增长了8倍。1851年，英国成为全球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些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面临的问题启发了整整一代思想家、社会改革者和政治家，他们提出的改善社会的思想和建议，不仅改变了英国，最终也改变了全世界。

接下来是边沁的时代。边沁是现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他对功利的定义是：一个行动中产生的所有快乐的总和减去这项行动参与者的痛苦后的得数。他主张以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幸福作为道德和立法的基础。慈善企业家罗伯特·欧文力主推广合作社、工厂规章制度和工会，他想要改变人类社会。出身农民家庭的政论家威廉·科贝特发起改革议会和反对《谷物法》的运动，他认为这是农村贫困的根源。

英国的黄金时代即维多利亚时代。严格地说，是1837—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在长达64年的统治期内，维多利亚女王使君主制得到长足发展，盛极一时。她巩固了君主立宪制这一政治体制，打造了稳定的政局，维多利亚女王成为所有欧洲王室家族的族长，对传播这种政府模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在她毕生的努力下，英国王室声望日隆，君主立宪制举世闻名。维多利亚女王严格按照《经济学人》编辑白哲特对君主立宪制的定义治理国家：“君主应超越私利和党派之争，其权利和义务包括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鼓励政府和警告政府。”

在现代史上，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强有力的词汇，因为在这个时代，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价值观总体上有些相互矛盾，但它们又相互糅合、交相作用，缔造了一个非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英国人相信进步，否则快速的工业化不可能发生；不过同时他们也相信传统，因此一些旧风俗得以在几十年的巨变中保存下来。1894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英国国家名胜古迹信托就是一个实例。当时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化威胁到乡村房屋和文化遗产，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它们。到20世纪，这一组织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文化遗产管理组织。

“自由”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标志，他们认为自己向来自由，从未像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那样受苦于暴政。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工业国家中，英国的中央政府机构最小。这也巩固了人民对王室和议会的

尊重，因为它们象征着英国的自由传统。“得体”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身份认同的第二个标志。英国人努力提升自尊，推进构建一个值得被人尊敬的公民社会。在这一时期，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著的《自己拯救自己》成为畅销书，英国的慈善事业前所未有地遍地开花。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信奉宗教，那些不信宗教的人至少也认同新教徒、清教徒的伦理标准，因此自我约束和勤俭蔚然成风。

在政府制度方面，维多利亚时代，位于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和上议院奠定了两院制的基础，开创了广受推崇的民主制的先河。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英国的议会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当时足以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事实证明，这样的政府在当时能够规避革命带来的动荡，推行重要的渐进式改革，捍卫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两党制和轮流执政实现了这些目标。托利党代表传统，自由党代表变革，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是两党著名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性格和背景相差很大，但都坚定地拥护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格莱斯顿是虔诚的教徒，深信社会进步；迪斯累里热爱传统和个人自由。迪斯累里出生在犹太人家庭，但他取得了杰出的政治成就，这一事实说明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开放程度，这在当时的大部分欧洲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拿破仑时代之后，英国外交政策可以用帕麦斯顿的一句名言来概括：“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获取这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帕麦斯顿担任了英国的外交大臣和首相，积极践行了他这句话蕴含的理念。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很好的实例，这场战争的起因是英国反对其前盟友俄国扩张到克里米亚。

英国政府还表示，无论英国公民在哪里，英国政府都会坚决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1850年的大卫·帕西菲科事件佐证了这一点。大卫·帕西菲科是葡萄牙裔犹太人，曾担任葡萄牙驻雅典的领事。他的房子在反犹太人的游行示威中被恶意破坏，但是希腊政府拒绝赔偿。由于当时帕西菲科已经加入英国国籍，作为英国公民，他转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帕麦斯顿派出一支皇家海军中队，对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实施封锁。于是，希腊政府让步，同意立即解决帕西菲科的索赔问题。为证明这次行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帕麦斯顿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我是罗马公民。”在演讲中，他解释必须不遗余力地捍卫世界各地英国公民的利益，和罗马帝国捍卫罗马公民的利益一样。不久之后，这一捍卫英国人利益的原则在国际交往中再次被应用：英国派出皇家海军前往中国，鸦片战争爆发。

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其基本原则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好的方法是避免与其他欧洲国家结盟或发生冲突，集中力量扩大英国在全世界的利益。这一政策使大英帝国更加强盛，向全世界扩

张，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走上巅峰。

英国历史学家西利这样描述大英帝国的崛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帝国事务成为英国政府的核心工作。迪斯累里是第一个专注于拓展大英帝国边界的首相。在他的主导下，英国购买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最终使埃及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迪斯累里还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使英国占领了塞浦路斯，成功阻绝了俄国向那里推进的企图。在俄国图谋接管阿富汗之前，迪斯累里命令英国军队进军这个国家。

迪斯累里相信大英帝国代表着正义的力量，他决心让英国公民了解这一点，他提议加冕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这在英国引起很大争议，因为许多成长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秉持着朴素的道德观，在他们看来，这一提议是被异国神话激起的不必要的想法。但是，英国首相想通过这种途径告诉英国人民：你们的女王管辖着地球上最大的帝国，在加冕为女皇之后，女皇—女王的称号能够匹敌俄国的沙皇、德意志的皇帝、奥地利的皇帝。深受女王喜爱的迪斯累里实现了这一目标，从此英国君主完全清楚了帝国的职责，维多利亚女王的继承人因此增添了一项义务——访问印度和大英帝国的主要殖民地。

迪斯累里感到帝国主义事业越来越深入民心，但这也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事业——英国在南非陷入战争，在阿富汗遭遇重重困难，这使保守党在1880年的选举中落败。如果说开拓疆土的行动让保守党付出了落选的高昂代价，那么撤退付出的代价则更高，首相格莱斯顿很快就见证了这一幕。这位自由党的首相一直被动地接受帝国主义，在掌权后并不愿意继续推行保守党的对外扩张政策，1885年，格莱斯顿做出了撤出苏丹的决定。然而撤退行动十分困难，被委任为总督的戈登将军在撤退中被英国政府抛弃，听任其自生自灭。对此，英国舆论认为这侮辱了英国的国家尊严，格莱斯顿政府不得不提前解散。

大英帝国疆域广阔，各地文化习俗千差万别，对这些地区进行组织和管理成为英国政治工作的中心。英国确立了一个稳固且高度协同的管理机制，由少数经过专门训练的公务员精英负责维系英国遍布全球的殖民地的法律和秩序。数代英国专业精英在英国顶尖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深受帝国主义精神浸染，对帝国事业抱有很高的热情。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包括戈登和丘吉尔，他们都清楚，在殖民地军团任职能获得快速升迁的机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大多选择入职印度办事处或其他殖民部门，希望被派往某个令人向往的殖民地。作为英国政府外派的工作人员，他们不仅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而且还能生活得更舒适有趣。殖民地的最高职位是总督，英国雄心勃勃的公务员梦寐以求能升迁到这一高位，尤其是英国在1858年新设立了印度事务大臣职位，高于此前的总督。

英国之所以授予印度最高长官这一高得夸张的头衔，是为了方便这位官员代表英国王室处理印度邦国的主权事务。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有些地方的文明在西方人看来很落后，而有些地方，来自欧洲的定居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两者的治理差异很大。更不好管理的是后者，因为他们更叛逆，要求拥有自治权。于是，“自治领”这一特殊的体制应运而生。自治领除了外交和国防政策之外，其他事务均可自治。1867年，加拿大成为第一个自治领；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也相继成为自治领。1884年，在罗斯伯里勋爵访问澳大利亚时，用“英联邦”称呼大英帝国。不久之后，这个词在1887年的一次大会上开始使用，主要指白人自治领。自治领的设立使大英帝国的几个殖民地成为近乎独立的国家，但这也使大英帝国在其臣民中保持了声望，并得以长久传承；执政精英也得以传播民主、法治、市场经济以及他们认为的英国先进文明。

1885年，激进的自由党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加入保守党的政府，他认为英国政治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管理这个全球最大的帝国，所以他要求担任此前一直被忽视的职位：殖民事务大臣。他很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小国时代已经过去，帝国时代已经来临。”当然，在所有帝国中，他坚信大英帝国的角色很特殊，代表着一股正义的力量。“仅仅占领这个世界的大片领土是不够的，必须能够充分利用它们。”[4]因此，他认为大英帝国应该改变模式，组成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联盟，在英国制定的原则下开展和平交易。尽管如此，张伯伦还是抓住一切机会向非洲扩张。

到19世纪末，帝国事业深得民心，大英帝国继续扩张。索尔兹伯里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15年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认为自己并非帝国主义者。话虽如此，在他三次担任首相期间，英国在非洲又开拓出一个新殖民地。他曾这样向法国大使介绍英国的非洲政策：“越吃胃口越好。”捍卫大英帝国意味着要尽可能向外扩张。索尔兹伯里抱怨说，为了防止火星占领月球，他的顾问们会建议吞并月球。结果，英国统治了1/4的地球，管辖的人口约4.5亿，相当于当时全世界人口的1/5。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帝国统治过这么多人口。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大国，处于黄金期的英国既受人羡慕也招来不少嫉恨。运输和通信技术使这个全球性帝国造成的外部影响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当时的英国被视为主导世界的欧洲文明的领袖。

英国人被视为世界的贵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大英帝国之外也广受崇拜和效仿。英国绅士的穿衣习惯和高标准的行为准则也成为榜样，整个西方世界以及其他地区受过教育的男性都纷纷效仿。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养成了英国人的习惯，比如喝茶和做英式运动，少数幸运的富人还仿

照英式建筑，建造出宏伟的庄园。

所有这些对英国人的自我认知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帝国主义的拥趸、商人塞西尔·罗兹说："生为英国人，就是中了一张人生的彩票。"约瑟夫·张伯伦说："我认为不列颠民族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统治民族。"英国人的自信和对自己文明的自豪感使英国在这个时期的扩张更广。

在这个欧洲的辉煌时代，另一个伟大的主角无疑是法国。尽管法国在1815年及随后的政治动荡中落败，但是在整个19世纪，法国也到达其权力的高峰，增强了欧洲对世界的影响力。

法国大革命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遗产，塑造了欧洲、西方以及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区分政治意识形态的"右派"和"左派"。从1789年起，法国国民大会的成员分为两组，支持革命的被称为"运动党"，坐在左边；支持国王的被称为"秩序党"，坐在右边。从此，左派意味着信奉启蒙运动的原则，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欧洲革命都是受此启迪。

左派人士认为，所有人都平等，政府应该确保机会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到严格执行。他们还认为，如果社会的财富和权力掌握在少数特权人群的手里，那么消除贫困、消灭压迫的努力会被压制。因此，国家有权通过税收甚至没收私有财产的方法重新分配财富。左派认为科学和技术有利于社会进步，宗教信仰和古老的传统都不应妨碍社会的真正进步。

另一方面，右派人士不相信平等，他们认为天性和社会使每个人都与众不同。因此，应该维持社会的等级结构，顶层是王室、贵族以及自古以来就代表上帝和智慧的教会。在实施任何变革之前，应该维护法律、秩序和传统，私有财产也应该受到尊重。只要社会有爱心，就能够摆脱贫困。

1830—1848年，路易·菲利普的君主制政权进行了一次勇敢的尝试，将左派的新理念引入保守的政权机制。拿破仑三世声称忠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最终取代了路易·菲利普成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19世纪法国最成功、最长久的政权，总统必须经选举当选，既缔造了共和国，也保留了君主制时的宏伟盛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为共和国的典范，后来许多共和政体都借鉴了这一模式。

19世纪的法国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权更替，但所有政权都有一个共同点：决心扩大法国的影响力。1830年，法国开始殖民阿尔及利亚，随后开展了更多勇敢的征服行动。

1848年，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4

年后他加封自己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作为波拿巴家族中的杰出人物，拿破仑三世相信法国代表了最高的文明水平，因此必须向外扩张，既然不能像他叔叔一样在欧洲拓宽疆界，他就把目标转向海外。

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1848—1870年），法国在三个大陆都建立了新殖民地：亚洲的法属印度支那、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拿破仑三世甚至企图在墨西哥建立一个新帝国，填补西班牙留下的空白。1861年，墨西哥总统贝尼多·华莱士未能偿还法国的贷款，拿破仑三世认为这侵犯了法国的利益，以此为借口入侵墨西哥，宣布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墨西哥皇帝。法国占据墨西哥的时间很短暂，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更是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在1870年被墨西哥叛军处决。在那10年间，法国人创造出“拉丁美洲”这个词，用来指称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的国家，拉丁美洲取代了此前伊比利亚的美洲或西属美洲的说法。最终，这个名称被所有美洲人采用，并逐渐被其他地方的人接受和使用。

苏伊士运河的建成是法国国际声望的另一个标志。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莱赛普负责这一连通地中海与红海的浩大工程，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落成。莱赛普想重现这一壮举，开通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1879年，巴拿马运河项目动工。

1870年，法国与德国因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属问题发生争端，普法战争爆发，法国被打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虽然法国的新政权对外宣称，法国对对外扩张的热情不高，但事实是，在此期间，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最为迅猛。

1871—1900年，法国的殖民地面积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5]在广占土地之外，法国还建造了很多海军基地，分布于从亚洲西贡到非洲达喀尔的殖民地。殖民地对法国经济具有关键作用，既是法国出口产品的新市场，也为法国正在发展的工业提供了原材料。阿尔及利亚农民的耕地从1830年到19世纪末增加了3倍；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出现了类似的农业增长。巴黎银行向北非的法国定居者发放贷款，帮助他们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结果，从20世纪初起，该地区成为农产品主要产地之一，出口也稳步增长。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定居者将这一殖民地变成大米和橡胶的主产地之一。

法国不仅从殖民地获得了财富，也从法国公司创建的商业网络获益。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法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迅速扩大，巴黎成为继伦敦之后的欧洲第二大金融中心，国际业务量最大。

拿破仑三世时期设立了一个殖民地管理部门，随着帝国扩张，其职责也相应增加。1858年，殖民地部成立，同时，因为阿尔及利亚的特殊性，法国

政府专门设立了阿尔及利亚部。拿破仑三世在1860年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宣称自己既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皇帝，也是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的皇帝。在此期间，只要殖民地的公民讲法语并放弃那些被法国列为非法的习俗，比如一夫多妻制，他们就有权获得法国国籍。法国还承认了法属殖民地与第三国进行贸易的权利，这已经完全不同于殖民地时代的主导观念，那时，大多数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只能将产品出口到宗主国的其他殖民地。[6]

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起，法国的殖民事业就深受哲学家圣西门的意识形态影响，即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主张工业化应基于社会需要，应扩大组织，这样富人可以资助穷人。在这个意义上，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殖民能够帮助最落后的土著民族。一些名人和政要受圣西门思想的启发，同时也出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同情和关切，开始推动阿尔及利亚和北非的重要项目。企业家普罗斯珀·昂方坦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了建造苏伊士运河的想法。

殖民地及殖民地管理部门是法兰西帝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初，殖民事业很不受欢迎，尤其受保守派的反对。在他们看来，法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为未来复仇做准备。因此，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军队现代化是重中之重，殖民事业毫无用处，不仅分散国家的精力和力量，还会让法国陷入贫困。1884年，右派参议员布罗伊公爵曾说："殖民地会分散宗主国的力量，削弱而非壮大它们的实力。"[7]

另一方面，自由党和左派政治家很支持殖民主义。他们认为，这是最崇高的事业，一个国家强大的关键就在于占领殖民地。法国共和党政治家茹费里是殖民扩张的热心支持者，茹费理在1880年担任法国总理后开始执行新殖民政策，征服了突尼斯，奠定了法属非洲帝国的基础。1885年，茹费里向法国议会解释为什么要推进殖民化："开诚布公地说，优秀种族对劣等种族具有责任和权利，应该教化他们。"[8]

在19世纪70年代初，一群法国的知名人士为促进殖民大业创建了"殖民党"。殖民党认为，作为一个提倡人权的国家，法国也应该在殖民地推行这一原则，法国扩张到其他大陆能够帮助解放那些被压迫的人民，打击原始主义，让他们和法国人一样生活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之下。

从文化角度看，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20世纪初是法国的黄金时代，也被称为"美好年代"。在这个时代，法国最伟大壮丽的象征是巴黎。雨果、左拉等19世纪的作家都深受这座城市启发，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著名的城市规划师奥斯曼男爵设计了巴黎新城区，华丽的建筑和宽直的街道令巴黎面貌一新，世界各地的城市纷纷模仿其现代主义风格。

巴黎这座“光明之城”在1889年和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大放异彩。1889年的世博会恰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主旨是展示科学技术进步，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这一非同凡响的建筑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程技术，成为法国的独特名片，人们甚至将它与狄德罗所著的《科学、美术与工艺百科全书》相提并论——它们的基础都是理性严谨、人力劳动、多种能源并用。

1900年世博会的主题是展示巴黎这座文明世界的首善之都以及现代文明的优势，突出教化世界的使命。“巴黎是世界的中心，地球的其他地方只是它的郊区。”18世纪法国古典喜剧泰斗皮埃尔·德·马里沃写道。进入20世纪后，这座光明之城变得更加灿烂辉煌。“美好年代”的巴黎成为世界之都，没有任何城市获得过这一称誉。

1871年，出现了一个与英法这两个欧洲帝国分庭抗礼的强劲对手：德国。此前，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直到1871年才完成了统一。对德皇威廉一世来说，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转折点，他宣称德意志不仅是一个新的统一国家，而且是一个新帝国——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第一帝国像一个巨人般出现在世界强国之林，仅就规模而言，它就足以震慑近邻。德国在很多方面都很“巨大”：1871年时有4 000万人口，到1914年，人口增长到6 800万，是欧洲除俄国之外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德国的公民教育水平很高，因此，德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迅速扩大。德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快速工业化。1870—1914年，德国的金属产量增加了12倍，超过英国、法国、俄国金属产量的总和。德国的煤炭产量在30年中增加了5倍，工业制成品的产量增加了4倍，出口额增加了3倍。[9]著名的家族企业克虏伯专门生产金属和武器，是20世纪初欧洲最大的企业。西门子、AEG等大公司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这些数字令其他国家无法企及，使德国在1914年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

俾斯麦是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的首任宰相，掌管这个国家20年，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家。1862年，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俾斯麦宣称将通过铁与血统一德意志。在这一目标实现后，他成为德意志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和19世纪德国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俾斯麦通过战争成功扫除了所有反对德意志统一的力量。令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欣慰的是，在实现这一目标后，俾斯麦宣布德意志已经满足，不会采取更多行动。

许多德国人并不赞同俾斯麦的这一立场，他们认为德国迎来了历史性机会，应该问鼎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不应放走向外扩张权力、统治欧洲和世界的机会。但是，德国面临的问题是，对外扩张势必会导致战争，而且向其他大陆扩张并不容易，因为很多地方已经是其他欧洲强国的殖民地。

在殖民游说团体和公众要求德国占领更多领地的压力之下，此前一直不愿抢占殖民地的俾斯麦首相改变了对外政策。1885年，俾斯麦下令在非洲兴建殖民地，后来德国在太平洋地区也建立了一些飞地。但是这些殖民地对德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来说太小了，完全不能满足其权力欲望。威廉二世连连哀叹，德国的殖民开始得太晚，最理想的地方都已经被其他国家占领。

威廉二世比威廉一世野心更大，但他不够谨慎。他认为德国应该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突破欧洲狭窄范围的限制向外发展。1898年，威廉二世紧锣密鼓地启动了一项海军建设计划，当时排名世界第六的德国海军在短短几年内上升为世界第二。这一计划的负责人、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认为，海外征服和自然法则一样无法抗拒；1899年，时任德国外交部次长伯恩哈德·冯·比洛宣告说：“我们无法接受任何外国势力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被瓜分了。”

德国的扩张主义者和政府上层渴望实现世界霸权，这不仅是德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果，长久以来，德国国内的思潮也酝酿和推动着这一趋势。

1832年，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出版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战争论》。在这部作品中，他反思了战争技术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他的理论可以总结为一句格言：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个政治工具，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战争论》通常被认为是战争的辩护词，它没有从伦理角度质疑发起战争是否正确，也没有从道德角度批判战争造成的苦难和伤亡。100多年以来，《战争论》不仅在德国获得高度评价，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广受好评。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这部作品钦服不已，它为如何通过战争实现政治目标提供了指导。推动德国崛起为欧洲第一强国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也深受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影响。

19世纪的德国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对整个欧洲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哲学家尼采的影响特别大，他引导人们理解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主流思维方式，为帝国主义辩解。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作品中，尼采解释说，人类分为两种：奴隶和主人，两者的道德观完全不同。主人总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欣赏更高更强的力量和所有向强的事物。奴隶则相反，具有温顺和服从等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典型美德。尼采认为，上帝已死，因此有必要用新的基督教价值观替代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传统价值观培养奴性，而新价值观能培养他所说的“超人”。

许多追求霸权和统治弱小民族的人在气质上都接近尼采所诠释的超人。但是，如果把德国崛起时期的思想简单地归纳为以上提到的关于战争或超人的思想，则有失公允。在欧洲思想和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德国天才留下的痕迹。19世纪的德国还诞生了其他很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例如黑格尔和

叔本华。

浪漫主义是19世纪初最重要的文化运动之一，它引导人们欣赏自然之美，将情感的价值放在理性之上。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文学天才，世界将会大不一样。在18世纪，古典音乐家主要是莫扎特等奥地利人，到19世纪，他们就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等德国音乐家取代。

意大利王国经历了与德国相似的过程。意大利王国在宣布统一后，在1871年定都于罗马。意大利在19世纪最伟大、最浪漫的事业之一是意大利复兴运动，其宗旨是实现意大利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一些思想迥异的意大利名人都参与其中，例如朱塞佩·加里波第，他是一个信仰革命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想把意大利变成民主共和国；最终领导意大利实现统一的是一个信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人物——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被誉为“现代意大利之父”的加富尔将意大利定义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由埃马努埃莱二世统领。

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使奥地利损失惨重。哈布斯堡王朝北部和南部的很多领地都被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王国夺走。梅特涅王子最终未能阻止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扩张，奥地利这个古老帝国大受冲击，在欧洲的权威也大大降低。不过，奥地利虽然因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损失了许多领土，但同时也受益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成功将疆域扩张到今天的希腊边境。就这样，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中心建成了自己的帝国，奥匈帝国统治着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虽然管理困难，但其统治一直持续到1918年。因此，奥地利是欧洲帝国中的特例，是唯一未曾想到欧洲大陆之外占领土地的国家。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国成了一个欧洲强国。彼得大帝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经过4个世纪的扩张，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也成为人口大国，1890年，俄国有1.16亿人口。俄国还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有上百万士兵，同时有500万预备役人员。在国际关系中，国土面积和人口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俄国的角色变得举足轻重。

在打败拿破仑的战争中，俄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俄国人可以底气十足地面对欧洲其他强国。181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称为欧洲的救世主，这并不夸张。亚历山大一世在维也纳会议上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巩固俄国在波兰的权力。尽管俄国已经统治了地球1/6的面积，但是俄国沙皇仍想进一步扩展疆界。

俄国特别留意没落中的奥斯曼帝国，并主动掌控机会。1853年，法国和俄国因为在由谁守护圣地耶路撒冷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而爆发了一场冲突，当时耶路撒冷属于奥斯曼帝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决定派出部队到奥斯曼的

地盘攻占耶路撒冷。法国和英国想阻拦俄国的疯狂计划，于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国战败，自取其辱。然而，俄国并没有因此打消扩张领土的梦想，其与欧洲强国间的摩擦还将继续。

俄罗斯帝国是19世纪两项伟大发明——火车和电报的最大受益国。火车和电报有效提高了这个庞大帝国的通信效率，沙皇政府得以从莫斯科更密切地控制领地。然而，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仅有这两项进入了俄国，因为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与欧洲其他强国不同，实际上并没有工业化，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

由沙皇领导的俄国精英阶层认为俄国是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俄国人在19世纪为西方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杰出人才的成就在整个西方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如此，事实证明，俄国并未接受也未引入推动19世纪的欧洲发展的思想。俄国有两个思想派别：西方派认为俄国应该开放，接受欧洲的思想；斯拉夫派则坚决捍卫俄国的纯洁性，拒绝模仿外国。西方派是文化界的主力，但在政治领域的权力却很少。虽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更偏向自由，但是整体上，所有沙皇都顽固地捍卫专制，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

帝国主义在欧洲其他国家被视为繁荣和高效治理的代名词，但是俄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形，其主要特征仍然是专制和停滞不前。

在新兴强国集中力量扩张并不断获得新领地的同时，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衰落的老帝国也努力维护他们在过去的辉煌时代留下的殖民地。贸易仍然是荷兰的主要收入来源。从16世纪起，贸易就为荷兰创造了极大财富。荷兰在19世纪末也进行了工业革命，并取得了成功。西班牙和葡萄牙却错过了这场影响遍及西欧的工业革命。19世纪的西班牙是唯一不断在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挣扎的国家，这极大损害了西班牙的利益。尽管如此，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此前它们曾占据的领地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这两个帝国都坚守着剩余的领地，所以它们仍然名列帝国主义强国。

显然，19世纪的欧洲有赢家也有输家，有的国家在崛起，有的国家在没落，还有一些国家大肆攫取他国的利益。但是，欧洲之所以能够迎来这个黄金时代，欧洲人民之所以能够打造出这个非凡的时代并从中获益，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关键因素是金融。在这个黄金时代，金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它，工业革命就无法取得如此大的进展，欧洲人也就无法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远方。

银行家和企业家都清楚，没有钱，就无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完成帝国主义事业。欧洲金融机构建立了遍布全球的网络，并根据欧洲的法律法规制定运营规则。这使得市场经济前所未有地扩展开来，到19世纪末，全世界都被统一到同一个商业体系中。

欧洲的银行从全球商业投资中获得了巨量财富，发展速度空前，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最好的例证，这个家族由于其泛欧洲的经营视野而声名鹊起。18世纪中叶，犹太典当商梅耶·罗斯柴尔德决定在法兰克福扩大银行业务，于是他把他的4个儿子分别派往欧洲4个主要城市：维也纳、伦敦、巴黎和那不勒斯。从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依靠自己的代理商和信使网络，比竞争对手更快获得这几个城市的相关信息，在金银贸易中一枝独秀。[10]最著名的事迹是：1814年6月19日，内森·罗斯柴尔德租用了一艘特殊的游艇，早于竞争对手几小时得到了滑铁卢战役的消息，在股市大赚一笔，创造了纪录。

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业务扩大到金融服务、房地产和采矿等领域。最重要的是，到18世纪末期，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贷款，以满足其和平时期的投资以及战时所需的资金。因此，到19世纪初，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拥有全球最多的私人财富，而且强大到能够决定欧洲各国是战是和。拜伦在其诗作《唐璜》中描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力，称其为“欧洲的真正主人”，能够控制欧洲的权力平衡，它提供的贷款既能创建一个新国家，也能推翻旧权力。

在创建了国际银行业模式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在伦敦及其他欧洲城市推进大项目，如为建造苏伊士运河提供资金，为英国大亨罗得斯在南非雄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提供融资服务，包括创建戴比尔斯公司和建立罗得西亚殖民地。[11]

19世纪初，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它的地位甚至比这更重要，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称伦敦为全球霸权城市——这是前所未有的，直到1920年纽约才取代了伦敦的这一角色。作为全球最大帝国和最强工业国的首都，伦敦自然拥有不可比拟的价值。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银行都把它们的总部设在面积仅为1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里，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也在那里。这些机构在英国空前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英国的资本从19世纪中叶起流向全球各地。1860年，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1870—1914年，英国的外贸量增长了3倍。[12]

尽管伦敦的金融霸权地位牢不可拔，但是在欧洲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米兰等城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的资金不仅流向欧洲大陆和各帝国殖民地的项目，也为除此以外的世界提供融资，例如美国就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欧洲资本还

帮助了许多新兴经济体，阿根廷是最好的例证：1870—1900年，欧洲在那里的投资增加了10倍，大大推动了阿根廷的发展，使它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列。[13]巴西、墨西哥等国家也受益匪浅。欧洲资本也改变了在地球另一端的日本，还推动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复兴，贝鲁特等城市因此迅速崛起。出口资本意味着在世界各地建立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等现代金融机构。就这样，欧洲企业家和金融机构成功将市场经济推向全世界。

欧洲推行市场经济的结果是，1840—1913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10倍。这个非同小可的数字后来只被1948—1971年这段战后和平时期的贸易额超越。这个时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南北半球间的洲际贸易额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这一比例比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达到最高峰时的比例更高。

第二个关键因素，或许是欧洲能实现时代霸权的最重要因素——技术。蒸汽轮船和铁路是工业革命的两大标志。工业革命之所以影响巨大，一个原因是它带来了交通革命。在铁路机车和铁轨出现之前，海上交通是缔造全球帝国的关键。火车为地面扩张和控制无法从海上到达的广阔领土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我们前面提到，英国不仅在其帝国范围内建设铁路路线，还向美国和埃及等许多国家出口铁路技术，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俄国这个陆上帝国尤其受益于铁路。铁路连通了俄国许多相隔遥远的领地，此前俄罗斯帝国一直缺失的内部凝聚力逐渐形成和加强。1881年，跨里海铁路投入运行，偏远、冲突不断的里海地区不再与世隔绝。1891年，俄国开启了一项更艰巨的工程——建设著名的西伯利亚铁路。这是铁路史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西伯利亚铁路在1904年完工，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其他历史上一直因地理因素被分隔的欧亚城市终于被连通起来。从那时起，只需7天，就可以从莫斯科到达太平洋沿岸，俄国欧亚领地之间的商贸活动和人员流动不断增加。

法国利用火车控制辽阔的非洲殖民地；德国利用铁路培育和发展国外市场，柏林—巴格达铁路于1903年开工。德国人希望通过这条路线连通巴格达，因为他们计划在那里建设一个港口。这条铁路穿越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地区，也符合土耳其人的利益。但这令英国及其他欧洲帝国很担心，不过因为这一项目过于宏大，直到1940年才完工。

火车改变了欧洲社会，全世界也渐渐为之改变。大大小小的城市被这种快速和相对安全的交通工具连通，这也改变了欧洲国家的组织方式以及城乡生活。火车推动了标准化计时，因为火车严格按照时间表运行，判断其效率的标准是是否能准时到达目的地，所以，所有搭乘火车的人必须守时，而这多亏了19世纪欧洲的另一项伟大的发明——怀表。从15世纪起，欧洲

人一直使用机械钟，但是它不能像怀表一样时刻提醒人们时间在流逝，必须管理日常生活。怀表主要的出产国最初是瑞士，后来法国和英国也开始生产怀表。起初怀表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但是到19世纪就逐渐大众化。20世纪初，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欧洲人都会随身携带一个怀表。美国是另一个怀表生产大国，还使怀表传遍了整个美洲。怀表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也是其最成功的出口产品之一，在19世纪末，这一计时工具也开始被其他文明的人们使用。

电报也在19世纪出现，人们发送的讯息几乎能立即被对方收到。伏特、奥斯特等几位欧洲科学家为这项发明做出了贡献。1837年，威廉·库克和查尔斯·惠斯通获得第一台商用电报机的专利，并将其安装在伦敦的尤斯顿和卡姆登。1844年，陆地电报开始使用；1851年，第一条水下电缆穿过英吉利海峡；1866年迎来了重大突破，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建成。30年后，全世界都被电报网连接起来。

电报被喻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虽然有些夸张，因为它并没有像21世纪的互联网那样改变普通人的生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它是全球通信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管理模式。这项新技术使指挥海外军队的将领以及代表国家的大使能够立即将新情况上报政府并接收命令，他们的权力和自主权也因此大大被削弱了。电报大大提高了欧洲国家政府控制海外领地的能力，而且欧洲各个维度的扩张也大受裨益。

推广电报业意味着要实施一个巨大的工程：在全世界铺设电缆。1865年，海底电缆的总长度为4 400公里，到1903年，已增长到40.63万公里。在长途电话出现之前，一直是电报的时代。电报为改变人们生活的两项发明奠定了基础。1876年，苏格兰发明家贝尔申请了电话专利；不久后美国人爱迪生申请了白炽电灯泡的专利，他起初是一名电报工，后来爱迪生还发明了留声机。

电报让人们能够立即获悉世界另一个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意识到其中商机的是德国企业家保罗·尤利乌斯·路透。1851年，路透在伦敦创办了全世界第一家新闻社，售卖由电报传送的最新消息。最初业务只涉及商业新闻，服务对象是能够从中获益的银行和经纪公司。但是很快，多家报社开始订购这一服务，于是，路透社开始提供各种新闻信息。随着电报技术在全球发展，路透社开设了许多分社，率先报道林肯被暗杀的消息的媒体正是路透社。到19世纪60年代，路透社已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业。从此，报纸开始每天竞相发布世界新闻，有的报社甚至更进一步，认为不仅要报道当地和本国发生的大事，报道国际事件也是其职责所在。这就意味着不仅要依赖路透社这样的新闻社，还要派记者去新闻的发生地。驻外记者由此诞生，全球新闻的时代开始了。

同时代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摄影术。1839年，法国艺术家路易·达盖尔发明达盖尔银版法，开启了摄影时代。很少有发明能像摄影这样影响人们的个人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受。在摄影术问世之前，个人或家庭肖像画一直是少数富人的特权。摄影术让普通人也负担得起，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和现实环境。在那之前，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人们只能通过艺术家的绘画感受艺术家对绘制对象的主观认识，而相机可以客观地反映出镜头前的实景。摄影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拓宽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成为新闻和出版物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不必旅行就能通过照片看到其他国家，了解那些伟大的城市、异国的传统风俗，大开眼界，这也让人们更了解身边的不公正，例如贫民区的生活条件、街头乞讨的儿童。关于战争的残酷，过去人们都是通过幸存者才能了解到。有了摄影术之后，人们能从照片看到战争真实的样子，感受其灾难性后果。第一场保有照片证据的战争是美国的南北战争。

在照片出现几十年后，电影机问世了。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放映机并获得了专利，这是一部胶片电影机。不久后，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工厂的大门》在巴黎放映，第七种艺术就这样诞生了。电影艺术引人入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到20世纪20年代，电影在美国发展成一个产业，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在这之前，欧洲人在19世纪末就发现了它的潜力，他们拍摄的第一个大型活动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禧》。

19世纪，欧洲还有一项发明是内燃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世界。几位欧洲科学家从18世纪起就为这项发明做出了贡献，但最终是德国人真正将内燃机投入实际应用。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获得现代汽油发动机前身的专利，卡尔·本茨获得了第一辆商用汽车的专利。他们很快创建了两大汽车品牌：梅赛德斯和戴姆勒。此后不久，法国工业家被这个新兴产业的光明前景吸引，出现了施耐德、标致、米其林和雷诺等厂家，它们是20世纪初汽车市场的领军企业，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出现之前，法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20世纪初，英国的劳斯莱斯、宾利、奥斯汀和罗孚等汽车品牌横空出世，成为汽车业强劲的竞争对手。

科技进步也影响武器工业，进一步加强了欧洲的军事优势。机枪能够高速射击和装弹，在杀伤力方面有显著提升。1884年，在英国出生的美国发明家海勒姆·马克沁获得了第一款全自动机枪——马克沁机枪的专利，它每分钟可发射600发子弹。

马克沁机枪在大英国帝国的扩张中大显身手，特别是在非洲。英国殖民部队在罗得西亚的第一次马塔贝列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700名英国士兵成功打退了5 000多个马塔贝列勇士的突袭，他们只用4门马克沁机枪就杀死了1 500多名敌军，而英军只有4人受伤。这幕屠杀土著的场景后来在当

地人反抗欧洲人的殖民战争中多次重演。马克沁机枪的出现说明，在非洲以及任何殖民地，只要动用武力，欧洲人总是稳操胜券。数年后，出生在法国的英国诗人希莱尔·贝洛克这样写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英国维克斯公司购买了马克沁机枪后，在1896年推出了改进版：维克斯机枪。从此，现代武器的破坏力越来越强。这起初有利于维持欧洲霸权，但是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从长期来看并非如此。

政治是这个黄金时代的主旋律。欧洲根据自己的政治优先事项排序来塑造世界，它们的政治制度成功出口，19世纪的标志性思想和政治信条广受欢迎。正是在这个时期，民主制开始被西方世界视为最好的政府制度。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的大选中落败时说的一句话广为人知："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好的一种制度。"

英国是最成功的民主制出口国，其两党两院制启示了美国，使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发展成世界民主制的桥头堡。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人将民主制推广到大英帝国的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获得大英帝国内部半独立地位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坚定的民主制国家。南非也采用民主制，但只适用于白人，他们对有色人口的隔离政策备受争议，阻碍了民主制的发展。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是，民主制在说英语的国家或者最初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的国家发展得更好。这一趋势在20世纪更加明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家的政治都很稳定。

英国的政治思想和体制也启发了许多欧洲国家。英国政府精心谋划维多利亚女王子孙的联姻，使君主立宪制在欧洲推行开来，比利时、保加利亚、希腊都采用了这一体制。英国的民主模式带来了稳定和成功，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德国和意大利在统一后也采用了君主立宪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经历了很多政治动荡之后也采纳了这一模式。另一方面，法国在几次尝试建立君主立宪制失败后，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先锋。在欧洲，俄国是唯一没有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俄国沙皇依然顽固地坚持独裁统治，最终落得悲惨的下场。

那么，欧洲人的民主制属于什么类型呢？在两党制、依宪立法、选举产生政府的表象背后，公民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投票权决定了民主制是否确实存在。

虽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政府宣布赋予男性公民普选权，但是并没有付诸实施。这一原则也写入了美国宪法，但是没有具体规定谁有投票权，直到南北战争后才明确为白人公民。

1830年，民主制的摇篮希腊成为第一个承认所有男性拥有普选权的欧洲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后，法国和瑞士认可了男性的普选权。西班牙于1869年认可这一原则，之后是德国。到20世纪初，“男性普选权是真民主的必要条件”这一原则被俄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认可。英国在这方面也落后一些。在1867年改革后，英国还只有2/3的选民拥有投票权，到1918年，英国实行了真正的普选，包括女性在内的公民都获得普选权。英国女性因为妇女参政运动成为争取女性普选权的先驱，但是事实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英国之前就已经赋予女性普选权，而且芬兰早在1906年就率先赋予所有公民投票权。

赋予全体公民投票权并不一定就有意义，除非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接受过最基本的教育，能够获得信息并独立思考。因此，扫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71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率先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奥匈帝国在1778年也对此进行效仿。美国受此启发，1852年在马萨诸塞州开始推行义务教育。西班牙和意大利在19世纪50年代也效仿了这一做法；英国在1870年开始为5—10岁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法国在1881年推出同样的举措。到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视没有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为欠发达的标志。但是挑战更大的是义务教育法的执行。到20世纪初，南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文盲率仍然很高，欧洲工业国和农业国公民的识字率差距也很大。但是最重要的是，欧洲已经认可了一个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没有接受教育，任何社会都不能被称为先进发达的社会。

传统社会有3个“国民等级”：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英国的上议院代表来自前两个阶层，下议院则代表平民。不少欧洲国家都有上议院、下议院之分，由此诞生了西方民主制的基石——两院制。但到1787年，事情发生了变化。埃德蒙·伯克抬起头，看着下议院的新闻记者席说：“那是第四个等级，比前三个等级的这些代表都重要。”

欧洲在17世纪出现第一批杂志期刊，新闻业由此诞生并传承至今。18世纪，报纸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使新闻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9世纪，新闻业进一步发展，成为民主制的一大支柱。

19世纪是报纸的黄金时代。技术进步改善了印刷和发行方法，新闻得以迅速发布。随着文盲率下降，读者人数稳步增加，一些国家的公民选举权稳步扩大，这就意味着更多有投票权的公民需要了解相关情况。政党和压力集团[14]也创办自己的报纸，发布他们对现实的看法，捍卫自己的社会利益。

在这一时期，报纸的力量变得很强大，甚至能够引发战争或推翻政府。在

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力巨大，被视为国家政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泰晤士报》的成功使这个名字很快传遍世界，很多地方的报纸都据此取名：《印度时报》《纽约时报》《开普时报》、瑞士的《时报》、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报》、哥伦比亚的《时代报》，等等。

报业崛起使新闻业成为一个受人尊重、很有影响力的职业，但是记者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应该被给予多大的自由度？新闻自由是一场漫长的斗争，因为它意味着要挑战政府、教会和既得利益群体。“只要不伤害其他人，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自由主义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论自由》的作者约翰·穆勒在书中写道。这个理念在民主国家广为接受，新闻自由成为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

新闻业的繁荣极大地提升了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他们成为社会中的重要人物——这成为欧洲社会的特征，后来其他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这种转变。“知识分子”这个词特指那些致力于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并提出改进建议的人。从19世纪初起，欧洲社会越来越开放，能够包容人们发表和宣传他们的想法。从改革者到乌托邦主义者，知识分子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以至他们被称为新贵族。大知识分子圣西门曾说，他们就像新的神职人员，正在取代启蒙运动之前的教会代表。[15]在俄国，知识分子奠定了革命运动的基础，他们认为自己是现有世界的批评者——这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预见到了还未成型的未来世界。

在后拿破仑时代，欧洲是意识形态的温床，这里诞生的诸多政治思想体系启发了全世界大多数政党的组建，其中许多政党一直活跃至今。因此，要想了解当代复杂的政治学，必须先了解欧洲知识分子的历史。欧洲的这些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欧洲人在寻求自由。欧洲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压迫着他们的东西：民族、国家、统治者、地主、社会阶级体系，还有贫穷。他们和自己的祖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觉得自由伸手可及，而且发生改变是可能的，他们能够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中。

在19世纪的思想中，自由主义锋芒毕露。这种政治哲学以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理念为基础，这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第一个自由派政治集团出现在西班牙——自由党人。他们在1812年撰写了一部宪法，尽管最终失败了，但《1812年宪法》启迪了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的自由运动。[16]另一个自由主义分支发源于英国，倡导经济自由和公民自由，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包括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以及约翰·穆勒等哲学家。

工业革命初期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条件激发了左派人士的革命思想。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是圣西门；法国哲学家傅

立叶和英国社会改革家欧文倡导国有制、政府管理生产资料、公平分配收入等理念，他们希望最终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革命思想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标志着最具革命精神的思想，共产主义的问世。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出版了他的遗作《资本论》，起初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读过这本书。那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它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并将启示统治全球1/3人口的政治制度。

无政府主义最初受到蒲鲁东哲学的启发，这种政治哲学的目标是建立没有国家或官方机构管理的自治社会。俄国的革命者巴枯宁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创立了集体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各种所有制。

尽管左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所有左派的意识形态有一个相同的愿望：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1864年，各国工人代表在伦敦组建了国际工人联合会，两年后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国际。从那时起，工人运动逐步向全世界扩散。

同时，另一个意识形态在欧洲渐入人心，这就是和平主义。从早期的基督徒时代开始，许多欧洲思想家就明确反对战争，到19世纪，他们开始形成组织。1816年，英国慈善家威廉·艾伦成立了“全球永久和平促进会”。1843年，亨利·理查德在伦敦召集了第一次国际性的和平大会。不过相比之下，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和平与自由大会的国际影响力更大。和平主义者逐渐形成了有影响力的跨国游说团体，1889年的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吸引了310名活动家参加。和平主义得到了托尔斯泰等大知识分子的支持。1894年，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出版，他在书中解释了他的和平主义信仰。印度圣雄甘地深受这本书的影响，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主要就是受其启发。

如果说根除战争不现实，那么至少应该减轻参战人员的痛苦。秉承这样的宗旨，第一个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红十字会在欧洲出现了。红十字会的创建人是瑞士商人迪南。1859年，他目睹了索尔费里诺之战中成千上万的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等死。186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目标是保护冲突中的受难者，包括战争中的伤员、战犯和难民。第一次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后不久，36个国家的代表同意遵守规则，规定医护人员可以佩戴红十字的臂章救助伤员。从那时起，在大多数武装冲突中都出现了红十字会的身影。

在欧洲，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并激发出各种革命思想，许多塑造政治和社会框架的信仰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59年，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这是科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一本书，

进化生物学由此创立。这本书中的观点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都是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一代一代进化而来，否定了《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和地球上所有物种来源的解释。

达尔文的理论严重挑战了基督教和所有认为人起源于神的宗教，因此，达尔文被基督徒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就不足为奇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启迪了19世纪后期非常有影响力的几种思潮，虽然他从没有对任何源于他的理论表达过赞同。

英国科学家高尔顿是达尔文的表兄弟，他在阅读了《物种起源》之后得出结论：有一种遗传因子让一些人兴盛、另一些人衰败。高尔顿首创了"优生学"这个词，旨在改善人类的基因构成。在实际中，这意味着鼓励那些被认为健康和基因质量好的人结婚生子，禁止那些基因不健康或不被需要的人繁殖，甚至对他们实施绝育。优生学很受欧洲许多立法者欢迎，他们认为这是解决充斥在工人居住区的犯罪行为的好办法，这在20世纪初的美国尤其盛行。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读了《物种起源》之后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认为所有物种都努力生存，但只有那些足够健康且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才能生存下来并变得更强大，而那些不够健康或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则会退化，甚至灭绝。这一自然规律被用于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时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些人之所以能发财、成功，是因为他们发展出了更强的能力，能够应对社会变化并从中受益；他们是最适应环境的人并因此成为享有特权的精英。根据这种思想逻辑，立法扶助弱者和穷人或者重新分配少数富人的财富会打乱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不利于国家利益。

信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特别适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一些国家能够积累财富和权力，成为大国，而另一些国家因为不能适应环境而衰败，最终被最强大的国家统治，甚至瓦解。这个理论也能够解释帝国主义，证明它的正当性。欧洲强国之所以能一直向外扩张，创建伟大的帝国，是因为它们比其他文明更强大、更有能力。因为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所以欧洲人会统治世界其他地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还解释了欧洲内部的斗争：英国和法国通过侵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利益成为大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没有适应变化的能力而没落。德国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飞速崛起，因为它比所有竞争对手都更能适应环境变化。

从欧洲殖民早期起，欧洲人及其后裔中广泛存在种族偏见，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此提供了支持性解释。这一思潮对西方政治的影响很大，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甚至更久远。

1853年，法国外交家、作家阿瑟·德·戈比诺的《人种不平等论》出版。他在书中分析了在三个种族的历史：欧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得出“历史源自与白色人种的接触”的结论。在白色人种内部，戈比诺认为雅利安人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他还将一些国家和文明的衰落归因于跨种族通婚。

戈比诺的这本书在欧洲和美洲的知识分子中广受好评，被视为对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与今天不同，在那时认为白种人更优越不会引发任何争议。“肩负起白人的重负，派出你们最优秀的后代。”吉卜林在1898年的一首诗中写道，敦促美洲人要像英国人和欧洲其他强国的公民一样担起帝国的重任——好像白人天生负有统治其他人种的责任。对欧洲和其他大陆的许多人来说，白人更优越的观点似乎能解释为什么白人社会与其他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标准方面的差距会如此巨大，而且，相信白种人更优越与人人平等的思想并不抵触，因为平等原则不适用于其他种族。马克思曾经寄了一份未完成的《资本论》给达尔文，他对进化论大加赞赏。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曾说过：“一切都是种族问题，这是唯一的真相。”

欧洲文明光耀夺目，影响力覆盖全球，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本书提到的所有人以及一些天赋异禀的天才都为璀璨的欧洲文化增添了光彩，使得欧洲文化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和极大的吸引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文化不仅渗透到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在欧洲帝国范围之外，也有许多人自愿接受它的影响。

在后拿破仑时代，欧洲人总体上对自己历史和遗产感到特别自豪，许多国家着手组织编撰集体历史。许多欧洲国家的档案馆和大多数国家图书馆正是建于此时，博物馆也是19世纪欧洲的一个创举，专门保存和展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百科全书这一启蒙运动时代的产物到百年之后，在这个时代才开始兴盛。从此，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有一套多卷丛书，声称浓缩了通用知识。世界博览会的数量激增，展示的内容也不仅限于科技进步，还有推动这些进步的文化。

现代大学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在这个时代，大学成为公民社会发展和培育职业精英的基础公共机构。最重要的是，它使知识成为进步的标志。

欧洲国家创建大学，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古代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也早已发展出类似的机构，主要作用是教导年轻人、传播知识、举行高层次的知识辩论。欧洲的大学在19世纪的发展方式决定了当代大学的形态，并成为发达社会的一大支柱。严格地说，大学是一个提供教学和研究设施、可以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

欧洲大学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其独立性。古代中国的教育机构受到国家控制；伊斯兰国家的大学教育机构则被宗教控制，但在欧洲，大学是独立

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不同之处，因为大学是一个思想自由、研究不受外部压力干扰和影响的机构。这使学者的社会作用开始上升。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大学教授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传播最高级的知识，并从完全独立的立场、以批判的态度看待社会问题。[17]

欧洲大学崛起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是财富。欧洲社会已经意识到大学的重要性，所以有许多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都为其提供资助。欧洲大学崛起的第三个决定性因素是专业化。欧洲的大学经历了所有知识领域不断专业化和细化的过程。在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卡尔·里特尔的影响下，地理学在19世纪30年代成为大学学习和研究的一个科学学科。知识渊博的洪堡也推动了植物学、地质学以及气候学、海洋学和鸟类学等科学分支的专业化。[18]他被誉为“现代地理学之父”，可谓实至名归。

还有许多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下，经济学系首先在英国建立。人类学、考古学和社会学也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成为独立的实证学科分支。这对科学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科学家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自学成才的业余爱好者，而是有固定薪酬的专业人士。

大学成为提供智力训练的机构，也是社交、性格形成、发现自我的地方，年轻人在中学毕业之后和职业生涯开始之前，在这里度过几年。大学生成为一个新社会群体，他们普遍有叛逆精神，希望尝试新思想，想要寻找更美好的世界，倾向于质疑传承下来的智慧。如果没有大学生，就不可能有欧洲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以及19世纪发生的许多政治变革。

欧洲大学的模式输出到欧洲以外并取得了成功。美国和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采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模式，那些在19世纪创建的大学也继续被沿用。拉丁美洲的大学受到西班牙建于中世纪的萨拉曼卡大学的影响很大，那些刚独立的国家的文化精英一直与萨拉曼卡大学保持学术联系。法国的综合大学和高等专业学院的模式也很有吸引力，专门为未来的公务员和政治精英提供教育服务。德国的大学如柏林大学等成为培养专业精英的现代机构，成为亚洲和中东地区效仿的榜样。东京大学和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受到法国和德国大学的启发，效仿了它们的模式。[19]

随着知识体系不断发展，致力于获取知识的人员的专业化给欧洲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民众的教育程度和各方面的素质都大大提高，知识开始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基石。随着知识体系的扩展，推广知识的人成为相应领域的专家，对那些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进行奖励的现象日益普遍。

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和文学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发，几年后又增设了经济奖和和平奖。诺贝尔奖由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他通过发明炸药积累了巨额财富。临终时，他不希望人们只记得他对军火工业的贡献，决定用他的财富设立一个国际奖项，奖励那些“为人类创造了最大利益”的人。诺贝尔奖很快被国际公认为各学科的最高奖项，全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学者和作家都渴望获得这顶桂冠。不久，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为杰出的艺术成就和科学成就颁发奖项。

在欧洲社会付出更大努力培育民众的智力的同时，也开始强壮民众的身体。体育运动开始在欧洲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空闲时参加或观看体育运动。

英国人推动了体育运动的繁荣和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这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时间参与体育运动或观看体育比赛。英国人把他们的体育运动带到欧洲其他国家、殖民地以及其他地方，成效显著。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和文化的仰慕和赞赏非常有助于英国体育运动的推广。板球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很快成为人们热爱的运动。橄榄球出现在19世纪中叶，主要是英国公立学校的一个运动项目，后来被成功引入大英帝国的所有自治领、美国顶尖的中学和大学，以及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马球成为印度、阿根廷和伊朗的国球。从15世纪起英国皇宫里开始打网球，到19世纪，传统网球发展为草地网球，19世纪末网球在各大洲的精英群体中流行开来。1877年，全英俱乐部开设温布尔顿草地网球锦标赛，不久之后向全世界开放，成为第一个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没有任何一项运动的国际影响力比得上足球。现代足球在19世纪中叶出现，比赛规则从那时起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这一运动在欧洲普及后，英格兰足球协会筹划设立一个国际机构，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足球协会协调相关事宜。1904年，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在巴黎成立。从那时起，足球运动稳步发展，最终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团体运动。

在所有运动项目都向外传播的时候，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想法在英国受到推崇。与此同时，希腊人也开始小规模地恢复古希腊曾经举办过的奥运会。法国教育家顾拜旦在参加了几次比赛后，组织成立了国际奥委会，负责每4年在一个国家组织举办一次奥运会。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雅典举办，有14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了这次体育盛会，全球最重要的体育赛事由此诞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欧洲人越来越富裕，也有时间花钱。欧洲开始出口新型产品，并取得极大成功。餐厅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代餐厅起源于18世纪的巴黎，它是当时遍布巴黎各地的小吃店、小旅店和小酒馆的进阶版。每

家餐厅都有一个负责制定特色菜单的厨师，并有关于预订餐位、餐厅社交的一套礼节规则。百货公司是另一个例子，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商业。消费者希望在同一个建筑里看到所有物品被漂亮地展示出来，而且没有存货限制。1796年，历史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哈丁豪厄尔（Harding Howell & Co.）在伦敦开业。百货公司严重依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所以它是工业化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于19世纪50年代在巴黎开业。19世纪80年代，查尔斯·迪格比·哈罗德开始经营一家介于精品店与俱乐部之间的百货商店。哈罗德很快就遇到了竞争对手，即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商家都尝试复制这种消费主义模式。

欧洲人还是服饰潮流的引领者，不仅主导了西方世界人们的穿着方式，而且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不少人都将欧洲的穿着习惯视为文明和进步的象征。英国人在这方面的影响最大。英国绅士有一种优雅和成熟的气派，广受赞赏。人们都渴望穿伦敦裁缝做的衣服，或者仿制伦敦知名的裁缝街——萨维尔街的西服。巴黎则主导了女性时装的潮流。总体上，欧洲资产阶级的领带、白色衣领、双排扣长礼服以及深色西装成为国际化的穿着标准，世界各地的文明人都选择穿这些服装。

在拉丁美洲，克里奥尔人中的上层精英遵守以前大都市人的穿衣标准，穿着暗色、贴身的套装是他们区别于落后土著和农民的一种方式。从墨西哥到智利，原住民的穿着成为落后的象征，在城市地区尤其如此。因此，即使身处热带气候地区，人们也穿深色西服。

全世界许多地方的本土居民也开始改穿西式服装，特别是那些就职于欧洲国家管理部门的人以及自由职业者，全部都改变了穿衣方式。印度圣雄甘地在年轻时曾是一个律师，在他决定穿土布衣物前，也曾自豪地穿上带有白色细条纹的暗色西装，并佩戴着领带和金链手表。埃及君主伊斯梅尔帕夏的穿着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在拉各斯等非洲殖民地，当地的上层非洲人，特别是基督徒，在去教堂时会遵循欧洲最严格的礼仪法则。

许多国家的新兴资产阶级都模仿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欧洲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征也开始国际化。使用金属餐具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这一习惯没能影响中国和日本。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古文明国度，刀叉并未能进入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而日本人则拒绝使用椅子。但是总体上，西方人生活习惯的全球化是欧洲霸权的另一个例证。

列车、远洋班轮和电报提高了国际通信的速度，由此出现了一个迫切需要：建立计量时间的统一标准。移居到加拿大的苏格兰工程师桑福德·弗莱明可以说是全球标准时间之父。弗莱明在1876年错过了爱尔兰的一趟火车，因为列车时间表错将上午的出发时间印成了下午。于是，他提议全世界建立统一的一天24小时计时制。弗莱明的这一建议使他被誉为最成功的

全球化者。

1884年，在华盛顿举办的国际经度会议上，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了今天仍在使用的世界统一时间，将全世界分为24个时区。这次会议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将哪个地方设置为“零时区”。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所在的位置一直以来被水手用作零度经线；新西兰政府早在1868年就已率先使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不久之后，加拿大和美国也根据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设定了自己的时间。尽管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反对英国在这个重要的事情上占据霸权地位，但是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的位置最终被全世界认定为本初子午线。

欧洲人也决定了如何记录一年中的每一天。在对恺撒的儒略历进行修订之后，格里高利历问世，到16世纪末已传遍整个欧洲。欧洲帝国通过殖民把这种纪年法带到其他大陆，到19世纪时已成为使用最广的纪年法。有一些国家采用格里高利历，不是因为有殖民帝国施加压力，而是因为它很精确。例如，日本早于俄国近半个世纪引入格里高利历，而俄国直到1916年才放弃了儒略历，土耳其则在1927年才开始采用格里高利历。

欧洲人一直是探索世界的先驱，全球各大洲、海洋和许多地区的名称都是欧洲人确定的，他们还制作了第一批被广泛使用的世界地图。全世界有许多地区的名字都来自欧洲的词语。19世纪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开始使用“拉丁美洲”这个词，此前那里一直被称为西属美洲或伊比利亚的美洲。改称拉丁美洲的目的是用“泛拉丁主义”取代“泛西班牙主义”，这个词最终被逐渐接受。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的地区被统称为“东方”，这个东方世界包括土耳其、阿拉伯地区和波斯。而广阔的东方地区又被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远东包括中国、日本和离欧洲最远的几个国家。逐渐地，这些词语变成了世界通用词。

起初最成功的语言传播者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新独立国家的克里奥尔人精英决心巩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并确保土著会说官方语言。这使得这两种语言在美洲快速传播开来。

从18世纪起，法语成为外交语言，是西方世界受过精英教育的阶层主要学习的外语。法国殖民扩张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法语在19世纪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法国在所有殖民地都教当地民众法语，而且法国政府规定，必须掌握法语才能获得法国国籍，这使得法语传播更广了。19世纪初期，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只有魁北克地区和三个加勒比小岛使用法语。一个世纪之后，法语是非洲大陆使用最广的欧洲语言。由于法国在全球范围殖民，五大洲都有说法语的社区。

法国文化的声望很高，连俄国贵族间交流也说法语。虽然俄语的传播范围很广，但经常被低估。在19世纪，俄语成为跨越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帝国的官方语言。

不过，在这个时期，没有任何语言的传播比得上英语，英语是第一种真正的全球性语言。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创建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行政结构，英语成为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官方语言。不仅在殖民地政府部门工作的印度中产阶级使用英语，印度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也用英语和外部世界沟通。由于英国的殖民扩张，许多其他地区也开始使用英语。在埃及，说阿拉伯语的精英开始满怀热情地学习英语，把这视为进步和现代的象征。在非洲大陆另一端的开普殖民地，英语的风头盖过了那里曾使用的一种欧洲语言——南非荷兰语。英语的传播不仅得益于英国殖民扩张，也得益于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人大规模移民到美国，使这个国家成了英语人口增加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在殖民地之外的世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学习一门欧洲语言，或者至少应翻译欧洲最重要的作品。这种压力不断增加，在日本尤其如此。在中国，除了学习汉语、满语和蒙语这三种清朝的官方语言，人们从未感受到学习外语的必要性。但是，这一切从1862年慢慢开始改变。这一年，京师同文馆创建，这是北京第一所西式教育机构。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阶层传统上学习法语，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土耳其与德国关系加强，德语成为主要外语。

城市当然不是欧洲人的发明。当希腊城邦出现时，其他文明也已经有类似的城市生活形式。但是19世纪的欧洲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文明，带来了城市发展和扩张的新模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欧洲国家从17世纪开始创建殖民城市，这些城市成为支撑其经济实力的支柱。在殖民时代结束后，许多殖民城市发展成大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在美洲，纽约、多伦多、墨西哥城、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是欧洲人创建的，后来都成为各个国家最大的城市或主要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他一些城市也遵循了类似的发展趋势，从殖民地发展成大港口和贸易中心。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这样的城市有很多，例如加尔各答、孟买、墨尔本和香港。卡萨布兰卡和西贡等法国的殖民城市变成了大港口；荷兰帝国的殖民城市雅加达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随着全球贸易速度的加快，这些城市都受益匪浅，贸易和出口也不断增长。

欧洲在这个时候创造了建造现代大城市的模式，后来这个模式被复制到其他大陆。这个新的城市模式最初出现在英国，英国也是第一个城市化的国家。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使伦敦变成了一座特大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也成为19世纪中叶的大工业城市。前文提到，新城市居民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劳动力的涌入远远超出了城市规划，贫民窟只有简易住

房，却要容纳大批贫穷的移民。此外，污物带来了卫生问题和流行病蔓延的风险。污浊的气味和噪声使伦敦许多地区都不宜居住，加之没有适当的建筑规划，使整个环境产生了一种混乱和丑陋感，令居住其中的人们深感沮丧。狄更斯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了这种新城市文明中的可怕生活；恩格斯等改革者也谴责这种生活的不公正；托克维尔则把这种城市生活模式总结为文明向野蛮的倒退。

不过，在另一方面，立法、科学和技术相结合，解决了新城市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不断改进着城市发展模式。

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彻底改变了城市生活，实现了城市公共交通的革命性转变，这就是地下交通。1863年，第一条地铁线路在伦敦开通，这被《泰晤士报》誉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工程成就”。地下铁路的诞生源自查尔斯·皮尔逊的远见卓识，这一史诗般的工程结合了铁路系统与隧道技术。1890年，电力牵引取代蒸汽机为地铁提供动力，地铁变得更快更洁净。人们可以乘坐地铁安全高速地出行，伦敦的居民不仅能快速穿过市区，也能从郊区来到市中心。地铁的发明为城市向农村扩展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使每天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通勤成为可能。

地铁这种革命性的运输技术很快传到欧洲和美洲的各大城市。1896年，布达佩斯开始地下工程；4年后，巴黎开通了地下列车系统，并正式将其命名为地铁（Metro）——这成为地下铁路在世界各地的通用名称。地铁线路继续在其他欧洲城市蔓延，甚至很快跨过大西洋来到美国。纽约在1904年建成了第一条地铁线路，布宜诺斯艾利斯则在1913年开通了地铁。

地下交通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城市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出现在欧洲的现代文明城市新模式还包括一系列市政设施，如街道硬铺装、主要区域的照明设备、饮用水系统、排水系统、消防队、警察局和专业的城市管理部门。这一城市模式传遍了美洲和一些殖民地城市。但是不同寻常的是，一些非西方、非殖民地的国家也自愿采纳这一模式，重塑其城市发展。东京、首尔以及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和贝鲁特无不如此。北京、开罗和德黑兰等古老帝国的城市在19世纪后期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造，部分采用了西方现代城市的发展模式。

在探索世界方面，欧洲国家在帝国主义黄金时代取得了更加突出的进展。科学和技术进步使探险者能够到达地球上最偏远的地区。19世纪50年代，英国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一行人穿越了非洲内陆。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人就想深入最后一个未曾涉足的大陆腹地，他们的好奇心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满足。

还需要探索什么呢？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可以满足人

类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帮助人类了解自然栖息地？技术创新提供了哪些进一步探索的机会？欧洲巅峰时期的科学家、航海家和探险家提出了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完成先辈在400年前大航海时代未竟的任务是他们的责任所在，义不容辞。

文学作品在刺激欧洲人的探险热情和探索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起，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凭借他的科幻冒险小说闻名。《八十天环游地球》讲述英国绅士菲利亚·福格在短短80天内完成了环游地球的非凡旅程。这个异想天开的故事因为苏伊士运河这样重大的工程和便捷的交通工具而变得更可信。《海底两万里》是凡尔纳另一本备受好评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里，凡尔纳讲述了尼摩船长驾驶着“鹦鹉螺号”潜艇在没有任何政府监管的海洋里漫游，探索了人类知之甚少的海底世界。令人惊讶的是，凡尔纳在小说中描述的潜艇是电力驱动的，而且能够进行高级的海洋生物研究，这些技术远远超前于凡尔纳所在的时代。在《地心游记》里，凡尔纳进一步发挥想象力，讲述一个科学家从火山内部进入地心的旅程，这比“鹦鹉螺号”的海底漫游凶险得多，凡尔纳在作品中推测了如果人类可以到达地心，在我们的星球内部可能会看见什么。

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写出了《时间机器》《隐身人》和《星际战争》等小说，为当时的科幻小说再添重彩。儒勒·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这样的作家取得的文学成就反映出人们普遍渴望了解科学技术进步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新视野。

在19世纪晚期，欧洲各国又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科学探索和地理探险。

这种文化背景设定了极地探险的英雄时代的基调。极地探险的目标是到达北极和南极，并探索南极洲。南极洲气候严寒，长年被冰雪覆盖，人类难以深入其腹地，也无法居住在那里。探索两极的时代之所以被冠以英雄之名，是因为对那些敢于踏上危险旅程，愿意承受其中苦难的人来说，我们只能用英雄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这些英雄的主要目标是成为地球上到达北极和南极的第一人，此外还有不同的科学目标。他们探索了整个南极洲的海岸线，并绘制成图。

“需要男人参加危险旅程。工资低、严寒，长时间漆黑一片。不一定能安全返回。如果能成功，可获得荣誉和认可。”

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广告竟然收到了5 000多人反馈，这说明当时欧洲盛行勇敢无私的冒险精神。

1901年，罗伯特·斯科特船长第一次远征南极的目标是到达南极点。斯科

特是到达南极这场竞赛的主要竞争者之一，为此他又在1911年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南极，但最后他被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击败。从成就来看，阿蒙森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极地探险家，因为他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斯科特和他的船员在远征南极的返程中死于低温症。

另一位伟大的极地探险家是爱尔兰的欧内斯特·沙克尔顿。1914年，他率领一支探险队从海上穿过南极。这三位伟大的探险家书写了伟大的地理探险史的最后一个篇章，从15世纪起，由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开启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至此画上了句号。

20世纪初探索南极和北极的竞赛成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尾声。在人类到达南极和北极后，地球上就再也没有未被发现的大片土地。欧洲人完成了从15世纪开始的发现和探索世界的旅程。

经过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欧洲享受到这个改良和进步的时代带来的诸多益处，到19世纪末，欧洲人感到自己处于文明之巅，他们认为欧洲文明比任何其他文明都伟大。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开始塑造的现代世界到这时已经成熟，并向全球扩散。欧洲人通过贸易、移民和知识交流建立的人脉网络遍及全球，欧洲的资金在其中起着引领作用。在这个网络中交织了三个因素：帝国主义、市场经济、技术。欧洲的技术发明不仅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也增进了各种形式的人际关系和联系。

到19世纪末，已经明显可以察觉到出现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大分流”[20]。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变得非常富有；欧洲与北美的联系使美国和加拿大同样走上了工业化之路，成为这个高级俱乐部的成员；在西方世界之外的日本因为与欧洲接触，也被纳入工业精英国的圈子。这些国家的财富和生活标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从那时起，这个由三个不同大陆的主要工业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将引领全球经济的增长，成为所有想要寻求财富和繁荣的国家的榜样。

---

[1]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London: Simon & Shuster, 1994).

[2]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3]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4] Churchill,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5] Denise Bouch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aris: Fayard, 1991).

[6] Bouch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7] Bouch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8] Bouch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Fontana Press, 1989).

[10] Niall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Money Prophets, 1798—1848* (London: Penguin, 1999).

[11]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Money Prophets, 1798–1848.*

[12] James Foreman-Peck, *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1850*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83).

[13] Foreman-Peck, *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14] 压力集团是西方政治中通过经济等手段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编者注

[15] 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From Marx, Tolstoy & Sartre & Chomsky* (London: Harper Perennial,2007).

[16] Carr, *Spain 1808–1975.*

[17] Jurgen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19]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20] “大分流”理论由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提出，对19世纪后东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分化做了详细的比较研究。——编者注

第八章

第一道和最后一道文明锋线

以文明、基督教与帝国利益之名争夺非洲

非洲是欧洲人在航海大发现时代穿越的第一道锋线。自古以来，北非一直是地中海文明的自然扩张区，吸引着财富猎手、商人冒险家和征服者。从罗马帝国吞并北非部分地区起，在欧洲民族中就开始流传关于这个广袤的异域大陆的消息。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曾写道："在非洲，总能遇见新东西。"在近代早期，当欧洲人发现这片永远沐浴着阳光的大陆时，欢欣无比。莎士比亚曾在《亨利四世》中写道："我说的是非洲金色的喜悦。"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首先占领了非洲。然而，除了南非以及非洲北部和西北部海岸的一些飞地之外，非洲大陆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被深入探索。非洲常被欧洲人称为"黑暗大陆"，因为对欧洲人来说，它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危险。非洲幅员广阔无比，热带雨林无边无际，动植物群中似乎隐藏着危险，对欧洲人来说，非洲腹地深不可测。然而，欧洲人在好奇心、渴望财富、传播文明等多种因素人驱动下，曾征服过其他看上去和非洲一样危险和充满敌意的大陆，所以，19世纪初，欧洲人准备深入非洲大陆，尽管起初他们根本看不出非洲最终会在帝国主义时代发挥多么重大的作用。

早在欧洲人以极快的速度占据几乎整个非洲大陆之前，部分非洲居民就受到欧洲扩张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影响，这就是奴隶交易。奴隶制对非洲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几百年来阿拉伯人一直在他们疆域的南部抓捕奴隶。此外，非洲的弱势部族也一直被强大的部落控制和奴役。但是，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从16世纪起，因为欧洲人认为非洲人是美洲种植园的理想劳工，于是西非海岸的大批黑人开始被迫成为大西洋三角贸易的商品。欧洲商人的非洲之行可以获得三重利润：离开欧洲时，他们带着亚麻布、布料、金属器皿、珠串、白兰地、葡萄酒和枪支出发到非洲；到非洲后，欧洲商人将商船装满奴隶，运到加勒比地区或巴西出售；最后再在那里装上烟草、糖和朗姆酒运回欧洲。

奴隶贸易最初由葡萄牙人控制，主要集中在其西非海岸的飞地，到17世纪末，英国人、丹麦人和瑞典人也想从中分一杯羹，纷纷在非洲黄金海岸建起堡垒。起初，最重要的奴隶运送港口是罗安达。据计算，在持续了3个半世纪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约有280万非洲奴隶从罗安达港启程，被贩运到美洲。[1]与此同时，其他奴隶贩子在贝宁的沿海地区建起了港口，那里的奴隶供应量极其充足，因此贝宁湾也被称为"奴隶海岸"。（第四大

奴隶贩运地是黄金海岸，从18世纪起成为主要的奴隶来源地之一。）当时一位英国奴隶贩子写道：“贩卖奴隶是国王、富人和一流商人的生意。”不仅欧洲人从奴隶交易中牟利，有些非洲部落也出卖族人，从中获得巨额利润，甚至在奴隶贸易被禁止时，他们还深以为憾。

在奴隶贸易结束几十年后，欧洲强国把注意力集中到非洲，最初的目的是想深入探索这个大陆，但是它们的目标很快升级，想要打开整个非洲大陆，将其纳入世界贸易网络和文明世界。欧洲对未开发的非洲腹地突然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一位苏格兰传教士，他因探险经历闻名遐迩，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人物之一，他就是利文斯通。[2]1818年，利文斯通出生在一个贫穷而虔诚的苏格兰基督徒家庭，他虽然学的是医学，但是传教士的天职决定了他的命运。毕业后，他被伦敦宣道会派往南非。年轻的利文斯通深信，基督教和商业双管齐下，是消除非洲罪恶的方案，这将铲除根深蒂固的奴隶贸易，让非洲人摆脱贫困和落后。利文斯通带着妻子和孩子在非洲一个小村庄定居下来，但是传教士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令他感到沮丧，他决定向非洲北部探索更远的未知地区。他是第一个看到维多利亚瀑布的欧洲人——他用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命名了这个瀑布，以表达对女王的敬意。最重要的是，他成功打开了通往非洲腹地的道路。

1857年，利文斯通回到英国，出版了一本书，讲述他探索非洲的经历，唤起了公众对非洲的兴趣。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他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带领一支探险队寻找通往非洲内陆的水上路线。不幸的是，这一目标没能实现。探险队用5年时间探索了赞比西河周边地区，在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之后，不得不放弃这一探险行动。1866年，利文斯通和几位专家从桑给巴尔出发，去探寻尼罗河的源头。虽然他们未能找到尼罗河的发源地，但是发现了另一条非洲大河——刚果河。此后不久，利文斯通被远征队的所有成员遗弃，与文明世界失去了联系，许多人认为他已经死了。那时，英国民众对这位苏格兰探险家的兴趣非常高，因此《纽约先驱论坛报》委托一位名叫亨利·莫顿·斯坦利的记者前往非洲，去寻找利文斯通，并为这家报纸撰写冒险故事。1871年10月26日，斯坦利奇迹般地在坦噶尼喀湖附近的一个村庄找到了利文斯通。于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新闻报道诞生了：“我猜他是——利文斯通博士”。这篇报道描述了他们相遇的过程。这令整个西方世界都被非洲吸引，并激励了几代探险家深入非洲内部。

利文斯通拒绝和斯坦利一起返回英格兰，他留在非洲继续寻找尼罗河的源头，直到1873年死于疟疾。他创造了一个传奇，死后得到了最高礼遇，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利文斯通将一生贡献给将“基督教、商贸和文明”引入非洲的崇高事业。这三个词被刻在维多利亚瀑布旁缅怀他的纪念碑上，概括了他一生的使命，

也启示着今天的人们。从利文斯通受欢迎的程度来看，他无疑让大众对非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去世后，他的几位崇拜者继承了他的探索使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斯坦利。

《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每日电讯报》资助斯坦利探索从刚果河通往大海的路线。1874年，他带领300多人的远征队出发，其中大多数是当地的搬运工。[3]面对非洲部落，利文斯通采用的方法是激发他们的善良，赢得他们的钦佩。但是斯坦利完全不同，他是一个严格的远征队领队，毫不犹豫地对违抗他的人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并且铲除了那些给他带来困难的人。有一次，他对一个拒绝协助远征队的部落实施报复，并且在报纸的报道中承认他杀害了35个男人。许多读者对此感到愤慨，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外交部表达抗议，认为这种残酷行为有悖于英国文明教化的使命。斯坦利从未表示过忏悔，因为他相信，要想在非洲丛林中生存，必须使用一种超越文明辞令和基督教原则的专横手段。斯坦利最终实现了远征的目标，但花费了两年多时间，而且在途中损失了2/3的人手。回到伦敦后，斯坦利向大众强调了这次远征的成就和功劳，并讲述了非洲内陆隐藏的财富，他坚持利文斯通的立场，认为英国应该承担打开非洲大陆、开展贸易和传播基督教的责任。但令他失望的是，英国政府似乎不愿意听他的宣讲。

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对非洲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保护通往印度的航线。然而，一起事件使局势迅速改变，1867年，在金伯利发现了黄金和钻石，南非成为一个非常吸引欧洲移民的目的地。从那时起，英国的财富猎人迅速涌入开普敦，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向北方进发，不可避免地与当地人以及自17世纪起定居在这里的布尔人发生冲突。1874年，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被英国政府派任为南非高级专员，他负责向非洲引入联邦政府模式，像卡纳冯爵士完成加拿大联邦化一样，把当地人和布尔人联合起来。但这引发了两次战争，第一次战争是英国人对祖鲁人开战，祖鲁国王塞奇瓦约拒绝接受弗里尔关于建立联邦制的最后通牒，于是弗里尔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就派出部队进攻祖鲁。

这是在欧洲人深入非洲大陆之后与非洲人之间首次爆发战争，起初祖鲁人赢得了一场胜利，引起很大的骚动，尤其是法国，因为有一个亡者是加入英军参战的波拿巴王朝的继承人。但是，形势很快扭转，英国获得罗克渡口战役大捷，不到150名英国士兵成功击退了4 000多祖鲁人的进攻，成为大英帝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这次战役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被拍成一部电影《祖鲁战争》，还捧红了演员迈克尔·凯恩。事实证明，只要拥有现代技术，少数训练有素、协调一致的士兵就能征服和统治非洲人，哪怕他们人数很多。

另一方面，布尔人成功阻挠了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企图。当时的英

国首相格莱斯顿一直不愿意让英国政府纠缠于殖民事务，所以在1879年签署了一个和约，接受布尔人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进行自治。但这只是英国与布尔人冲突的开始，后来的事实证明，布尔人比任何非洲民族都更有抗争精神，不甘被大英帝国统治。

通往印度的航线具有非同小可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因此英国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埃及。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路线是从地中海进入印度洋的最短航线，这对英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因此英国政府极为关注苏伊士运河的建造，想获得建造这个大工程的权利。但随着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莱赛普被授权建造运河，法国最终赢得了建造权。然而，为了建造苏伊士运河，埃及苏丹伊斯梅尔从欧洲几家银行借了巨额贷款，无力偿还，在大幅增加国内税收后，依然无法还清，这使得他在埃及大失人心。1869年，在苏伊士运河启用后不久，伊斯梅尔别无选择，只能出售埃及在运河项目中占有的股份。英国政府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买进了埃及的股份。于是，英国与法国共同拥有这条运河。从此，英国对埃及的干预一直在增强，先是控制住这个国家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然后着力于遏制法国对埃及的领导作用。1882年埃及爆发了一场民族起义，英国和法国都派出部队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被英军轰炸。起义最终失败，埃及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非洲为欧洲的大国提供了扩张机会，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也不想错失良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比任何君主都更热衷于探听远征队穿越非洲的消息。早在1865年登上王位时，他就设定了个人目标：提高这个被强大邻国包围的小王国的声望。他认定去非洲占领殖民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但是，比利时政府和整个比利时社会都没有殖民野心，因为比利时的工业发展已经让这个国家很富裕，他们怀疑殖民非洲只会不断引来烦扰，耗费无数钱财，却不能带来额外的价值。于是，利奥波德二世决定用自己的钱实现殖民野心，毕竟，他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投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让他的财富翻了几番。

作为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决定利用他君主的威望打开非洲腹地，开辟殖民地。1876年，他在布鲁塞尔的宫殿里召集了一次会议，欧洲最负盛名的地理学专家和探险家都受邀参会。在欢迎致辞中，利奥波德二世特别谨慎地强调欧洲负有把文明带到非洲大陆的慈善责任，并谈到这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推进，取得无愧于那个世纪的进步。在这次会后，国际非洲协会成立，由比利时国王主持，欧洲国家则各自成立分会。当时并没有明确欧洲国家如何分割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因此帝国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成功实现了目标，欧洲帝国接受了协同力量共同开发非洲的理念。在费迪南·德莱赛普看来，这是他们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

利奥波德二世成功把自己与开辟非洲、把文明带到非洲的崇高事业联系起

来，以至英国人认为他是完成利文斯通未竟使命的最佳人选。尽管这位比利时国王很谨慎地避免流露出殖民野心，但是显然，他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比利时在殖民非洲的过程中分一杯羹。他在给比利时驻伦敦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不想失去分得非洲大蛋糕的大好机会。"[4]

虽然利奥波德二世有足够的钱可用于实现殖民目标，但是比利时政府并不支持他，所以他需要一位能够到达非洲核心地区、以他之名占领土地的探险家。斯坦利是不二人选。听说英国政府无意在斯坦利探索的地区建保护国，这位比利时国王异常兴奋。如果英国对打开非洲腹地和把西方文明带到那里不感兴趣，这就给他和比利时带来了机会。斯坦利被英国政府拒绝后，在1878年很高兴地签署了一份5年期的合同——合同约定，他将为比利时国王服务，在非洲开设医院和科学站，建设连通刚果的道路。很快他又有了更多重要的目标。

在比利时国王开启殖民冒险计划时，已在北非活跃很久的法国也在迅速扩张，速度远远超出了预期。从1830年起，法国人不断移民到阿尔及利亚，使这里稳步发展成法兰西帝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立足之后，向整个北非扩张的野心与日俱增。1881年，法国政府以突尼斯入侵阿尔及利亚为借口，向突尼斯派兵并将其变成法国的保护国。

与此同时，年轻的探险家布拉柴正在穿越非洲中部，扩张法国领地。他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法国殖民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布拉柴是典型的跨国成长的欧洲人。他出生于一个意大利贵族家庭，在法国接受教育，曾在法国政府任职。布拉柴家族人才辈出，茹费理和莱昂·甘必大等法国政治家都是他的亲戚。凭借这样的关系，他从法国政府的殖民部门成功筹集到1万法郎，用于首次穿越非洲的探险之旅。

布拉柴从今天的加蓬海岸开始第一次远征，在那里他遇到了统治那片土地和大湖的国王马可可。他成功说服马可可国王签署了一项协议，约定国王把国家主权转让给法国，允许法国在那里建造定居点，法国则回报给国王的子民贸易利益。布拉柴成功打开了刚果的大门，在那里创建了法国殖民地，成为比利时的代表——斯坦利的最强竞争对手。这两个探险家竞相争夺刚果的殖民地，几乎引发法国和比利时之间的外交冲突。

1882年，布拉柴回到巴黎，试图说服法国政府在加蓬确立法国主权，这既是人道主义事业，也有经济和政治利益可图。他的要求得到了法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因为他的非洲历险经历让他声望日隆。这位年轻的意大利贵族代表了殖民主义的浪漫精神，与斯坦利那种更加物质化和粗鄙的严苛形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媒体称布拉柴为"和平的征服者"和"自由的使者"，因为他成功与非洲人建立了友好对话，使他们相信西方文明会给他们带去益处，造福他们的人民。

1883年，布拉柴以殖民地总督的身份回到加蓬，负责在那里建立法国殖民地。从那时开始，法国在非洲的地盘逐渐扩大，最终成为非洲最大的殖民帝国。但斯坦利并没有真正输掉这场比赛。利奥波德二世决定创建“国际刚果协会”，目的是在斯坦利代表他占据的地盘上建起刚果自由邦。这位国王秉承他的慈善目标，承诺将推动欧洲公司之间的业务，共同开发这个偏远的地方，他还告知大家，他会放弃在那里所有的经济活动。此外，他还承诺，一旦刚果自由邦能够自立，他就会让它独立。但是，面对疑心重重的欧洲强国，这位比利时国王要不断说服它们相信他的诚意。

起初，德国在非洲不是其他欧洲帝国的对手，统一了德国，使德国发展成全世界最强大国家之一的俾斯麦认为，殖民地只会分神分力，百无一用。

虽然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这样看待殖民地，但是10年之后，时过境迁。欧洲国家的非洲争夺赛愈演愈烈，欧洲殖民者纷纷占领非洲土地。德国人民也在反思：既然我们想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要袖手旁观，放走占领非洲大陆的大好机会呢？他们感到德国应该立即开始征服非洲，否则就会错失时机。因此，1884年5月，德国首相下令在非洲的喀麦隆、多哥等地挂起德国国旗。在占领了这些地方后，德国也开始建立海外帝国，规模是其欧洲领土的5倍。

德国加入非洲殖民竞赛时，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因为争夺地盘发生争端。为了避免这种紧张局势因为德国的加入进一步加剧，1884—1885年，俾斯麦在柏林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即柏林会议），讨论非洲的未来。会议的总体目标与比利时国王大致相同：促进非洲文明发展，开发非洲大陆腹地，开展贸易。为了避免未来发生争端，与会代表通过了三个重要决定：刚果是自由贸易区；尼日尔河开放，自由通行；“有效占领”原则，即各国在兼并领土时必须遵循所有欧洲国家都接受的条件。

柏林会议也被称为西非会议，被认为是非洲争夺战的起点。其实这一争夺战早已开始，无论这次会议召开与否，瓜分非洲的争夺战都会越来越激烈。这次会议的积极意义在于想殖民非洲的大国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参会的政治家都同意按照利文斯通的理想殖民非洲，向那里输出贸易、基督教和文明。如果这位苏格兰传教士看到他的理想被这些欧洲政府延续，应该很欣慰吧！尽管这些政治家的主要动机是民族主义和经济野心。

柏林会议最初的大赢家似乎是利奥波德二世，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强国都认可他创建刚果自由邦的宏伟计划。不久之后，这个起初面积只有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地扩大到230万平方公里，比利时得到了比本土面积大75倍的殖民地。[5]利奥波德二世统治的不再是一个小国，这位比利时国王终于率先进入非洲腹地，比利时也因此进入殖民大国之列。然而，开辟非

洲、向那里输出文明远不是利奥波德二世承诺的那种慈善和文明行为。

德国在非洲的领地也大大扩张。1885年3月3日，在柏林会议结束几天后，探险家卡尔·彼得斯创建的“德意志殖民协会”得到了帝国特许令，被允许在东非建立保护国。这一消息令英国政府特别担忧，因为这证实了他们的疑惧：俾斯麦开始在非洲释放他的扩张主义热情，而英国似乎失去了对非洲的影响力。在柏林会议结束前，1885年1月3日，英国人在喀土穆溃不成军，著名的查尔斯·戈登将军惨死在那里。

戈登将军通常被称为“喀土穆的戈登”，是英国殖民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戈登将军是具备维多利亚时代美德的代表人物，他与利文斯通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深信英国应该向非洲扩张，履行向那里推广文明的使命。他们都憎恶奴隶制，是打击非洲奴隶贸易的标志性人物。

英国驻埃及总督一直渴望吸引欧洲人才，戈登将军在中国一战成名后，于1874年来到开罗，受命率领埃及部队向苏丹开进。完成任务后，戈登将军被任命为苏丹总督。他担任苏丹总督多年，不仅解决了苏丹人对埃及军队的抗争，而且在那片广阔的领土上建立起很高的威信和影响力。尽管奴隶贸易对苏丹的经济非常重要，但是他奋力铲除这一产业。戈登将军还打击腐败，废除酷刑和公开鞭刑，大大提高了苏丹政府的治理水平。然而，戈登将军的工作吃力不讨好，他与当地精英不断博弈，但当地人的思想太落后，需要改变。为此他殚精竭虑、筋疲力尽，于1880年辞职回到英国。那时，戈登将军在埃及和英国都被视为圣人，他与苏丹人民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并克服重重困难，着力于把欧洲的现代化文明引入苏丹，使这一进程取得了巨大进展。

尽管戈登将军努力将欧洲文明引入苏丹，但是其影响并没能持续多久。在他离开后不久，苏丹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掌控。他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预言中的救世主马赫迪，他憎恨苏丹总督及其随从人员，把他们视为欧洲的异教徒，并领导伊斯兰起义，反抗英国对苏丹的统治和影响。这些状况经英国媒体报道后，引起公众一片哗然，英国人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派戈登将军回到苏丹。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最终同意派遣戈登将军，但是任务仅限于率领英军及相关人员撤出喀土穆。在戈登将军抵达喀土穆后便遭到艾哈迈德的突袭，戈登将军组织平民撤离，保护他们免受袭击和伤害，他自己则和军队一起留下来面对敌人。戈登将军要求英国政府派军队增援，守卫喀土穆，但是英国政府很不情愿派遣人马，增援部队姗姗来迟。戈登将军最终在和艾哈迈德军队作战时英勇牺牲，艾哈迈德命令把他的头割下并挂在树上，让苏丹人看看殖民者的下场，一逞复仇之心。

戈登将军的悲惨结局及英军战败的消息令英国人义愤填膺。维多利亚女王

对首相格莱斯顿抛弃这样一个民族英雄，任其在极度艰难的境况中自生自灭表示失望。这场危机表明，英国公民并非都不愿意支持英国在非洲有风险的军事行动，相反，如果他们认为必须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文明，就会要求政府做出更多干预。在危机中，格莱斯顿没能看清这点，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也因此中止。他的继任者显然比他更明智，因为在随后20年里，英国在非洲不断扩张。

在喀土穆遭遇失败后，英国政府更加重视在非洲的财富猎人和定居者，开始听取他们关于在非洲什么地区建立影响的建议。乔治·陶布曼·戈尔迪爵士是一个老成的生意人，他正是英国政府需要的人。他成立了一家公司，在法国和德国力争控制的尼日尔河周边地区做生意。1886年，皇家尼日利亚公司在西非正式成立。[6]

英国占领东非的行动更果断。蒙巴萨港位于通往印度的航线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很高的战略意义。英国的财富猎人和探险者在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乞力马扎罗山，那里肥沃的土地令人难忘。苏格兰商人威廉·麦金农在印度洋开拓贸易路线，发了大财，他与桑给巴尔的国王达成协议，获得了在这个王国做生意的许可。于是，英国政府在1888年给麦金农颁发执照，创建英国东非公司。英国政府之所以支持麦金农的决定，并不是被他的倡议打动，而是因为德国，德国的卡尔·彼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如果英国政府不采取行动，德国将管控整个东非地区。

正如欧洲殖民史上，尤其是在英国殖民史中曾经发生的一样，贸易经常是占领的前奏。设立贸易公司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好方法，但总是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正式的殖民占领。皇家尼日利亚公司也是如此，1900年，该公司正式被英国政府收购，英国在该地区建立保护国，尼日利亚成了大英帝国在西非的主要基地。

欧洲国家的政府有时也会干预和解决贸易公司造成的问题。英国东非公司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探险家、殖民地行政官弗雷德里克·卢格德在向乌干达扩张的过程中，经济损失惨重，还与当地部落发生了几次冲突。于是，英国政府在1894年对此进行干预，宣布乌干达及其周边地区为英国的保护国，正式称其为英属东非。1905年，英国确立内罗毕为英属东非的首都，詹姆斯·萨德勒上校被派任为英属东非总督。从那时起，今天的肯尼亚成为英国人最爱任职的殖民地之一。

英国的对非政策以及那个时代的扩张主义都与罗得斯息息相关。在去非洲大陆寻找财富的欧洲人中，他是最成功的生意人、矿业巨头和帝国主义政治家。早在童年时代，罗得斯就有很多宏伟的梦想，相信自己有做大事的使命。他的非凡成就为他赢得了“巨人”的称号。

19世纪70年代，南非已成为吸引欧洲扩张的新黄金国。罗得斯出生在哈福德郡一个牧师家里，19世纪60年代他刚十几岁，被家人送往南非，在纳塔尔省帮他哥哥在农场里干活。1871年，罗得斯兄弟放弃了种植园，来到金伯利开始做钻石贸易——这很快成为殖民地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罗得斯是一位谈判高手和工作狂，他终生未婚，因为他说自己没有时间结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下，罗得斯用17年时间收购钻石矿场的小型出口业务，他的终极目标是垄断钻石出口。1888年，他实现了这一目标，创建了戴比尔斯公司，富甲一方。

罗得斯点石成金，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他也是在南非开拓大英帝国疆土的先行者。“如果有上帝，他一定希望我把非洲变成英伦红——越红越好。”[7]这句话暴露了他的救世主心态。1883年，罗得斯提出一项向北扩张的计划，图谋把大英帝国的边界北扩到中非地区。他解释说，领土扩张能让开普殖民地成为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把文明传播到非洲的中心地带。但罗得斯的扩张计划遇到了一大障碍，开普殖民地没有办法资助这么宏大的计划。不过，对一个从未因缺钱而被难住的人来说，这也算不上障碍。罗得斯提议由英国政府支持成立一家新公司。于是，英国南非公司诞生了。罗得斯的扩张计划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需要获得当地原住民的许可，他的解决方法很老套，再次强迫当地人接受欧洲人闯入他们的家园。

1890年，罗得斯在成为开普殖民地总理后不久，派出了一支由200个欧洲人组成的远征队从开普敦前往马绍纳兰。他们到那里后，每人都得到了3 000英亩土地，开始新生活。这200名去往新领地的殖民者是罗得斯精心挑选的，有农民、工程师、矿工、猎人和一些传教士。与50年前布尔人的大迁徙不同，这次的殖民行动没有妇女和儿童一同前往，先行者在新领地定居之后，他们的家人才去团聚。这个新殖民地用罗得斯的名字命名为罗得西亚，位于今天的津巴布韦。

罗得斯还想彻底解决布尔人对大英帝国的抵制。为此，他开启了一个危险的计划，即“詹姆森袭击事件”，他鼓动德兰士瓦的英国工人反抗布尔人，殖民地的行政官利安德·詹姆森以此为由出兵，趁势占领了这一地区。然而，1895年12月，这场叛乱在爆发一个月后就失败了，罗得斯被迫辞去开普殖民地总理的职务。

詹姆森袭击计划的失败一直萦绕在罗得斯的心头，直到他在1902年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死于心脏病。“这么多事情要做，而做成的却这么少！”罗得斯在死之前哀叹道。[8]对一个在短暂生命中取得显赫成就的人来说，这样的评论有些讽刺。很少有欧洲人像他这样给非洲留下了深刻印记，尽管他带来的大部分影响都很有争议，凸显了殖民主义最负面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些问题都一直困扰着南非。罗得斯没能终结布尔人对英国人的反抗，反而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严重，他把原住民等同为应该被剥夺选举权的儿童，

导致种族分离，最终形成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他创建的戴比尔斯公司成为行业巨头，存续至今，但钻石贸易是非洲一个备受争议的行业。不过，罗得斯用自己的财富启动了第一个国际奖学金计划。来自非洲的少数民族学生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学生都受这一计划的资助来到牛津大学学习，因此罗得斯的财富也对许多人有积极影响。

意大利是非洲争夺战中的另一支劲旅。意大利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了统一，从此进入黄金时期。非洲给意大利带来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意大利人可以通过征服非洲创建一个自古罗马时代结束之后没能再现的帝国。和德国的俾斯麦一样，意大利首相加富尔之所以加入在非洲的冒险，不仅仅是为野心驱使，更是因为现实政治所迫。他意识到，要赢得欧洲强国的地位，必须要占据殖民地。

在法国吞并突尼斯后不久，意大利开始殖民冒险。因为突尼斯有不少意大利定居者，所以罗马的殖民游说团体向政府施压，要求占领一个地区，让意大利人迁居过去。为了避免因为非洲利益与英国产生冲突，意大利人先和英国政府进行秘密谈判，然后占领了第一批殖民地，包括红海地区厄立特里亚的马萨瓦港和现在的索马里。不满于这些收获的意大利政府将目光投向埃塞俄比亚。1887年，殖民非洲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决定通过和平方式扩大领地。1889年，他与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孟尼利克二世谈判签署了《乌西阿利条约》，约定意大利把红海地区的领地割让给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则同意把自己的国家变成意大利的保护国。这是意大利版本的解释，但是埃塞俄比亚的翻译版本却不是这么说的。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及其政府人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条约会把他们变成意大利的臣民，所以拒绝接受。面对这一挫败，意大利政府选择武装干预，但是事实很快让他们对这个决定后悔不已。

这场冲突展示出殖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与殖民埃塞俄比亚这个古老的基督教王国完全不同。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不仅在人数上多于意大利军队，而且他们从欧洲进口了现代武器，成功击退了意大利的攻击，迫使意军撤至厄立特里亚。

被埃塞俄比亚击败对意大利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因此辞职，作为意大利非洲之角帝国的构筑者，他的职业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而孟尼利克二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欣喜，因为这个胜绩让全世界都知道，埃塞俄比亚是能够击败欧洲强国的，不会屈从于殖民地的地位。

孟尼利克二世在1891年说：“如果远方的大国有瓜分非洲的想法，我不会袖手旁观，因为埃塞俄比亚在异教徒的包围中已经顽强走过了1 400多年，是一个坚实的基督教岛国。”[9]

这场战争在欧洲和非洲都引起了很大的骚动。欧洲人被非洲人打败了，打破了当时流行的白人种族最优的说法。一些非洲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这场战争是非洲独立运动的开始。虽然这种诠释有点夸张，因为仅凭埃塞俄比亚一例无法推断非洲这个多元化的大陆上各不相同的情况，而且19世纪末几乎还没出现过独立运动。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意大利战败给欧洲人敲响了殖民非洲的警钟。欧洲各国政府做出创建帝国和分割领土的决定并不难，但是只有冒险进入非洲大陆的探险家、传教士和贸易商才真正知道，无论外来文明有多优越，当地居民大多都不会屈服于征服者。

如果瓜分非洲的依据是在非洲的经验，那么葡萄牙会获得最大的份额。但是，19世纪末，欧洲扩张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而葡萄牙正在衰落，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葡萄牙没有再去争夺更多的非洲领地，而是集中力量保住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这两个占据已久的重要领地。

在欧洲人探索非洲腹地过程中，葡萄牙人秉承悠久的探险传统，再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亚历山大·德塞尔帕·平托。平托是第4个从东到西横穿非洲的探险者，被葡萄牙任命为莫桑比克总督——这是葡萄牙帝国第二大的殖民地。平托提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想吞并莫桑比克与安哥拉之间的领土，把葡萄牙的领地连成一片。然而，这一愿景与大英帝国连通开普敦和开罗的计划相冲突，英国的“双开计划”更大，罗得斯是这一计划的主要推动人。尽管英国政府对罗得斯的这项计划没有兴趣，但是他下定决心要阻止葡萄牙扩张，以免英国利益受损。于是，1890年1月，英国政府向葡萄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退出后来被称为罗得西亚的地区。此后不久，葡英两国签署《伦敦条约》，确定了葡萄牙殖民地的范围，即今天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英国的最后通牒充分表明，强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国，这造成葡萄牙政局动荡，政府因此倒台，象征着伟大葡萄牙帝国的君主制走入穷途末路。

第六个占领了部分非洲领土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但是面积并不大。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早在15世纪就进入非洲，在北非占有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飞地，并且时至今日这里仍然属于西班牙。西班牙在19世纪失去了辽阔的美洲殖民地，因此，尽管西班牙国内问题不少，一些西班牙征服者还是渴望在非洲获得新领地。

18世纪时，西班牙人在西非中部海岸的费尔南多波岛（即比奥科岛）建起一座堡垒，在19世纪60年代，西班牙从这里扩张到非洲大陆，创建了西属几内亚这个小殖民地。1884年，西班牙在布朗角和博哈多尔角之间的沿海地区建立了一个更大的贸易站，并在柏林会议上获得正式认可，这里后来成为西属撒哈拉。西班牙在非洲的最后一块领地位于摩洛哥的北部，这里

成了西班牙的保护国。与西属美洲相比，西班牙在非洲的领地不大，但足以让它继续保持帝国的地位。

到19世纪末，非洲争夺战越发激烈，因为所有在非洲拥有领土的欧洲强国都想在这个大陆被完全瓜分之前拿走自己的那块“大蛋糕”（利奥波德二世率先使用了这个词）。于是，英国决定要再次征服苏丹，其中有战略的原因和安全的考虑。一方面，艾哈迈德的伊斯兰政权威胁到整个埃及，并危及英国在那里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个决定也有复仇的成分，因为戈登将军在1885年在喀土穆被斩首，给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留下了一道深重的伤疤。

1896年，身经百战的赫伯特·基钦纳将军受命率领英国—埃及联军前往苏丹，并在乌姆杜尔曼战役中大展雄风，凭欧洲的军事优势和现代武器取得了胜利。马克沁机枪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项伟大的军事发明使得英国部队以寡胜多，重创艾哈迈德的军队，造成对方多达1.2万人死亡。自从英国人开始在非洲使用这种武器，就稳赢不输，任何公开与英国开战的非洲部落都没有丝毫获胜的可能。关于这种机枪杀伤力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非洲，对这种武器的恐惧也有助于维持许多殖民地的和平。

这次历史性胜利使英国再次控制了苏丹的绝大部分地区，英国想继续向南扩张，实现连通开普敦和开罗的双开计划。但问题是，英国的殖民游说团体希望英国国旗从北向南插遍整个非洲，而法国人也希望从塞内加尔到红海都飘扬着法国的三色国旗，打造出一个宏伟的帝国。因此，这两个帝国不可避免地会在拓张之路上狭路相逢，只有一方能够获胜，实现自己的目标。1898年，这两个帝国的交界地——法绍达见证了这一交汇时刻。法国政府在布拉柴维尔派出一支远征军，在简—巴普迪斯特·马尔尚上校的率领下占领了法绍达，此举是为了防止英国吞并整个苏丹。在法国军队占领法绍达之后，英国政府命令基钦纳将军向这座城市进发，希望借此明确：英国绝不容忍法国的这一吞并行为。

英国的警告令法国公众非常愤慨，但是法国政府认为不值得为这座荒芜的小城与英国开战。于是法军遵命撤出法绍达，英法两国达成一致，将法绍达和尼罗河定为两大帝国的界线。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决心利用这次冲突，结束法英之间的对峙。[10]他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英法两国在1904年签署了《英法协约》，约定法国允许英国人在埃及自由行动，同样，英国允许法国人在摩洛哥拥有同样的权利。但是这引起这两个帝国最危险的对手——德国的抗议。为此，欧洲诸国在西班牙南部的阿尔赫西拉斯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西班牙利用德国反对法国的机会，占领了摩洛哥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最终在摩洛哥苏丹的默认下，法国和西班牙瓜分了这个王国。但很不幸的是，欧洲列强对摩洛哥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就此结束。

1911年，摩洛哥爆发了一场反抗苏丹的起义，法国出兵恢复了秩序。德国也做出了反应，向阿加迪尔港派出了一艘炮舰。这是一次刻意的挑衅性行动，威廉二世想借此表达对法国控制摩洛哥的不满，同时也考验一下英法关系的牢固程度。[11]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因为法国和英国政府都不愿意因为摩洛哥与德国交战，所以这场危机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法国割让一块在中非的领地给德国。

虽然欧洲国家友好解决了上述所有冲突，但这些事实表明，在短短几十年内，非洲已经成为欧洲帝国竞相扩张和对抗的新场所。到19世纪末，欧洲实现了把文明带到非洲的目标，这给非洲人民同时带去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此外，大国之间的对抗和紧张的外交关系也被带到了非洲。在标志着非洲争夺战开启的柏林会议结束几年后，非洲大陆被纳入了欧洲人从1492年起创建的全球贸易和殖民地网络。

从19世纪中叶起，欧洲产生了许多关于非洲的文学作品。非洲大陆在全世界的形象以及许多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大多都是由那个时期在欧洲出版的文学作品传达出来的。欧洲旅游文学历史悠久，在对外扩张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非洲更加丰富了这种文学创作。

非洲第一位伟大的现代记录者是利文斯通，他关于非洲的记录影响了全欧洲。1857年，他的第一本书《南非传教旅行考察记》出版。利文斯通记录和传递出他对非洲的多重印象，核心是美——那里植被保存完好，郁郁葱葱。在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会打雷的烟雾”——维多利亚瀑布时，他写道：“这么优美的场景一定曾吸引过天使的目光。”利文斯通的记述中表达出发现自然天堂的兴奋感，还描述了非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也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证据，记录了在非洲发生的种种恐怖行径，例如约400名非洲人在卢阿拉巴河的河岸上被奴隶贩子屠杀；奴隶的尸体不断被扔进拉那巴河，甚至阻塞了河流，使他乘坐的轮船无法通行。利文斯通在作品中谴责了在非洲发生的这些可耻行为，尤其是奴隶贸易，并警告穿过热带丛林会遭遇各种危险，包括最终夺去他生命的疟疾等致命疾病。

这位著名的探险家活着时没能看到他的作品、旅行日记和信函出版并取得巨大成功，最大的受益者是斯坦利——他当之无愧，因为正是他在英国和美国媒体上发布的文章使利文斯通成为国际名人，他的著作《我如何找到利文斯通》成为大西洋两岸的畅销书。作为一名探险家，斯坦利的非凡经历为《穿过黑暗大陆》等作品提供了灵感，他记述的非洲比利文斯通笔下的非洲更残酷，甚至被他同时代的人指责过于“野蛮”。他写道：“野蛮人只尊重力量、权力、勇气和决定。”另一方面，他赞颂非洲人极致的美，这在当时的欧洲人中极其罕见。

1885年，亨利·赖德·哈格德出版了《所罗门王的宝藏》，这是第一部非洲题材的探险类小说。哈格德曾担任英国纳塔尔殖民地总督的秘书，他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创作出这部著名的小说，讲述一群英国人在非洲核心地带寻找传说中的宝藏的故事。这部作品囊括了一部成功冒险小说的所有关键因素：穿过一个被传说中的国王诅咒过的非洲丛林，竞相寻找被隐藏起来的宝藏，不友好的本土部落，甚至还有与当地人的浪漫关系。这本书出版后大获成功，甚至因此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即以异域和未知地区为背景的小说。当时的许多作家都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包括英国文学巨匠吉卜林、托马斯·哈代，以及许多其他欧洲作家。

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也激发出大量文学作品，丘吉尔的《河上的战争》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身为骑兵军官的丘吉尔参加了英军与艾哈迈德军队的交战，他在他的作品里讲述了这次战争的经过，广受好评，丘吉尔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政治家，因此这本书有很多语言的版本。书中不仅生动记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乌姆杜尔曼战役，也展现出丘吉尔的帝国信念，这对他后来执政的影响很大。在书中，大英帝国被描述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在非洲的扩张不仅为当地人带去了和平与稳定，也使那些落后的族群可以与现代世界接轨，变得富裕起来。关于敌人的文化和伊斯兰信仰，这位未来的政治家写道：“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逆行力量。”并警告说，伊斯兰教徒激进好战，总想改变他人的信仰。另一方面，这位年轻的军官也被战争的残酷震惊，他认为帝国扩张不能忽视人道主义，并严厉批评了对敌人不人道的屠杀以及基钦纳将军的残酷行为。

到19世纪晚期，非洲成为全欧洲的文学创作主题。痴迷土耳其和东方世界的法国著名水手兼作家皮埃尔·洛蒂完成了一本关于摩洛哥的游记，在他去这个国家旅行不久后，1890年，《在摩洛哥》出版。在德语作品中，《廷巴克图》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地质学家奥斯卡·伦茨写的一部编年史，他和西班牙探险家克里斯托瓦尔·贝尼特斯，都是首批到达廷巴克图的欧洲人。在葡萄牙，亚历山大·德塞尔帕·平托出版了《我如何穿过非洲》，书中讲述了他的经历。

欧洲的报纸也纷纷刊登穿越非洲的故事，使这种新文学题材变得更加普及，唤起欧洲和美国读者对那个神秘大陆的兴趣。大报社的编辑们发现，连载远征非洲的故事能增加报纸的销售量。《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斯坦利按时间顺序记载的探险记录，被许多欧洲报纸效仿。所有报社都清楚，非洲能提供无穷无尽的新闻和故事，因此值得被放在头条的位置。痴迷非洲的读者形形色色，既有每天在俱乐部或豪宅里读报的富人和成功人士，也有在小酒馆和公交车上浏览报纸的底层工人。有人想在报纸上寻找挣钱的办法和机会，有人寻找移民的目的地，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还有一些人渴望了解异域未知的生活方式，但绝大多数只是把这当作娱乐，调

节单调的生活。

19世纪后期的欧洲文学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引导、塑造了欧洲人对非洲的认知呢？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故事和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描绘了非洲的大体形象：这是一个幅员辽阔、复杂多样的大陆，气候对欧洲人来说不太适宜，居住在那里的原始民族往往很冷漠，而且敌视文明世界的人。撰写这些非洲题材文章的人都坚信欧洲文明是最优秀的，把知识和科学引入非洲能够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问过一个基本问题：他们是否真的有权利去统治其他国家的土地，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居住环境？整个19世纪，所有殖民大国都没能产生一个类似西班牙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12]的人物。

作家们勾画出的非洲部落形象多种多样。利文斯通描述了一群“高贵的野蛮人”，说非洲人善良、友好而谦卑，只要给予他们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有望成为很好的基督徒，适应更好的生活方式。亨利·赖德·哈格德在他的知名小说中也这么描述非洲人，说他们有许多美德，如勇敢、忠诚、感受能力强。他非常喜欢非洲女性，甚至大胆描述了一个英国男人和非洲一个部落的年轻女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这挑战了殖民国家禁止本国人与非洲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对非洲人持有积极看法的作家只是少数。

大多数作家，如斯坦利都坚持使用“蛮族”“野人”和“愚昧无知”等词语描述非洲人，并力证使用暴力是管教非洲人和赢得他们尊敬的唯一途径。

那个时代书写非洲故事的人总体上都坚信教化非洲人是欧洲人的使命，传播基督教、贸易和文明是他们去非洲的最重要且正当的理由。显然，持有这种想法的欧洲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但是不久之后，睿智的观察者们对欧洲人传播基督教、贸易和文明所采用的方法感到震惊和反感，开始质疑欧洲文化，因此出现了一种批判这种文明现象的文学。

虽然所有欧洲国家进入非洲的目的都是开发非洲大陆，传播基督教、贸易和文明，但他们的方法千差万别，导致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从基督教诞生起，非洲就有基督徒。科普特人和其他信仰基督教的种族把这一宗教传播到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尽管伊斯兰教从公元8世纪起在非洲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基督教仍然延续下来。欧洲人殖民非洲提供了向整个大陆传播基督教的绝好机会。伊斯兰教虽然在北非根深蒂固，但是很难在撒哈拉以南以及其大本营以外的地区发展信徒。相比之下，基督教的影响大得多。欧洲人在非洲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之一正是基督教信仰，从南非到刚果、从安哥拉到肯尼亚，都是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

基督教传教士的生活充满了危险和牺牲，和那些追寻财富的人不同，他们

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但确实有精神上的回报——自己的信仰被从未听说过福音的人接受，他们愿意放弃自己从前的信仰和观念习俗，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基督教传教士能成功呢？主要原因是他们能提供改善当地人生活水平的方案，甚至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尤其是奴隶问题。[13]从远古时代开始，奴隶贸易一直是伊斯兰世界利润丰厚的行当，阿拉伯商人组织远征队，去非洲内陆抓捕当地部落的男人，把他们变成奴隶。因此，非洲人既害怕又憎恶阿拉伯商人。欧洲人承诺要废除奴隶制，与阿拉伯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如此，布拉柴被称为解放者，发动反奴隶制运动的戈登将军在喀土穆大受欢迎。阿拉伯人一直推行奴隶制，而欧洲人在长达3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也从中受益，但最终决定要废除它。这有力地推动了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

在欧洲人在非洲建立定居点或保护国之后，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团就接踵而至。传教士与非洲人建立起密切关系，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还做他们的教师或医生，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因此赢得了许多非洲人的信任，许多非洲人改信基督教，哪怕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与他们的习俗不完全相容。

为了发展贸易，葡萄牙早在15世纪就在非洲建立了第一批定居点，并把它们变成保护国和殖民地，财富猎人成功说服了政府，使葡萄牙政府相信非洲大陆蕴藏着巨大的财富。许多非洲君主和领导人为了开展商贸活动，允许欧洲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定居，因为欧洲人承诺会创造财富。然而财富并不总能到非洲人手中，有时他们甚至完全被欺骗了。

对财富猎人来说，非洲和美洲、亚洲一样，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财富，那里能出产各种各样的产品，从香料到木材，从食品到珍奇动物，以及各类商品、矿产和宝石，无所不有。非洲比美洲和亚洲更落后，所以欧洲人深入非洲内陆更为艰难，但他们付出的热忱不亚于在美洲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

南非的土地特别适宜发展农业和牲畜业，但是当在这个地区发现了黄金和钻石后，这里就成为欧洲财富猎人最喜欢的地方，他们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在中非，欧洲人很快在刚果和其他地方建起木材、矿产和橡胶的开采点；在北非，矿产资源是财富的主要来源，欧洲人到达这里后，农业和香料贸易开始蓬勃发展。非洲向世界开放贸易的结果是，开普敦、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达喀尔、卡萨布兰卡、丹吉尔、的黎波里、亚历山大港等都发展成商贸活动非常活跃的大城市。

此外，从利文斯通到利奥波德二世，欧洲人都希望打开非洲大陆，把它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但是这并非总能给当地人带来好处。开发非洲巨大的财富资源、发展市场经济都需要劳动力，非洲人恰恰成为被需要的劳动力，但他们大多备受屈辱。尽管欧洲国家内部严格禁止奴隶制，而且一些帝国

也设定了在非洲取缔奴隶制的目标，但许多欧洲定居者仍然强迫非洲部落的人做工，他们的劳动条件并不比奴隶强。欧洲人渴望在非洲获得财富，而且在非洲“山高皇帝远”，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制约他们，他们能对非洲人施加各种虐待。最不可原谅的案例发生在刚果自由邦，利奥波德二世把“工作和进步”作为其发展箴言，事实却是莫大的讽刺。橡胶是刚果自由邦的主要出口产品，而且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满足需求，当地人被迫像奴隶一样工作，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那些没能完成橡胶收集定额的人会被处死，或者他们自己以及直系亲属的手脚会被砍断。传教士和政府官员发现，在有些村庄，大部分居民因为被残害而四肢不全，村民对此很不满，因而发起抗议。1904年，英国外交官罗杰·凯斯门特发表了一份报告，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刚果自由邦也因此被钉在了非洲殖民史的耻辱柱上。[14]除了刚果自由邦这一极端情况外，还存在许多因为贸易引发的侵权行为。因此，许多非洲人很怀疑开放非洲大陆，把非洲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是否能给非洲人带来所谓的好处。

如果说将商贸活动并未能造福大多数非洲人，那么非洲的动植物得到的益处就更少。远在第一批欧洲定居者到来之前，非洲就有象牙交易，但是随着欧洲强国竞相占领非洲土地，象牙的交易量迅速上升，并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象牙成为奢侈品行业的重要产品，流向全球最富裕的地区。它被用于制作钢琴的琴键、台球以及各种能让人联想到异国财富的装饰品。欧洲人并不是第一批动物终结者，因为早在殖民时代之前，大象已在北非灭绝，但是欧洲人来到非洲，使南非以及西非部分地区的大象也绝迹了。其他非洲动物也同样受到影响，犀牛因为犀牛角的价值而被猎杀，在20世纪初变成了濒危物种。欧洲人创建了一个专营鸵鸟羽毛、兽皮、动物的角、标本等动物产品的市场，催生了一个新职业——专业猎人。他们取代了数百年来一直和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处的游猎—采集者。猎人们携带步枪，万无一失，狩猎成了一个安全且利润丰厚的职业。南非猎人考克曼称，在19世纪70年代，他有一年杀死了108头狮子。狩猎派对成为大多数欧洲殖民地越来越流行的活动，对野生动物产生了毁灭性影响。

一队猎人，傲气十足的白人在前面，当地的搬运工扛着象牙和非洲大型动物的尸体跟在后面——这是欧洲殖民地最常见的场景之一。南非因拥有非洲大陆最好的猎场而闻名，那里举办的狩猎派对经常有欧洲显贵的身影——甚至有皇室成员，他们去那里享受杀死动物的乐趣。到20世纪初，南非广阔的草原上再也看不到野生动物四处游走的景象。野生动物似乎在非洲北部更安全，特别是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因为欧洲入侵者手中的步枪打不到它们。但是，迟早它们会面临同样的危险。非洲一旦打开大门，那里所有的物品都能找到市场。

要把欧洲文明引入非洲，就要占领非洲，这意味着向这个大陆移民。对欧

洲人来说，虽然非洲的吸引力从没有美洲那么大，但是在设立殖民地之后，那里就会出现欧洲人。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不仅吸引了法国人，也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好去处。1879年，法属阿尔及利亚约有25万欧洲定居者，他们主要从事农业。[15]非洲最吸引欧洲移民的目的地无疑是南非，特别是在金伯利发现钻石之后。在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有5万多新移民抵达南非。190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开普殖民地的白人人口为579 741人。[16]罗得西亚很快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约有20万欧洲人。葡萄牙难以激励葡萄牙人移民到非洲殖民地，在非洲的葡萄牙人不到10万。德国在推动向德属殖民地移民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德国移民数量在1913年达到峰值时也只有19 679人。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做法不同，欧洲人没有考虑通过与非洲人通婚来促进人口增长。德国政府在1905年明确禁止德国人与非洲人结婚。其他殖民国家虽然没有立法明确禁止异族通婚，但是欧洲所有殖民地都遵循这一行为准则，所以没有出现混血人口。

欧洲人相信欧洲文明最优越，他们根据具体地区以及不同的指导原则和战略，采取不同的方法把欧洲文明引入非洲。在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北非，欧洲人必须学会与阿拉伯文明共处，他们深知干涉伊斯兰习俗很容易导致叛乱。因此，欧洲人通过最少的规则促进贸易联系，维持那里的法律和秩序。在摩洛哥的丹吉尔，欧洲人与当地文化和谐共处成为典型。在20世纪初，丹吉尔约有4万人口，其中约有2万穆斯林，1万犹太人，还有9 000多个欧洲人。这3个群体在丹吉尔创造出大量财富，使丹吉尔呈现出一种大都会的氛围。亚历山大港是北非的一个主要港口，在欧洲人来到这里后，它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在1882年被英国轰炸之后，亚历山大港被改造成大型贸易枢纽，吸引了移居到附近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其城市文化更多受到欧洲文明而不是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港有9万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这里的外国人口猛增到150万。[17]但是，丹吉尔和亚历山大港等城市属于例外，因为其他非洲殖民地总体上都遵守欧洲移民和当地人分离的规则。与众不同的是，法国主张殖民地的臣民为法国公民，享有与法国公民相同的权利。[18]所以，法国允许所有能说法语、遵守法国习俗的非洲臣民获得法国国籍。

在欧洲人看来，整个非洲殖民地，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部落过于原始，无法引入欧洲文明。更极端的欧洲人认为那里的非洲人只能被用作劳力，甚至没必要存在，可以消灭掉。在这方面，刚果自由邦臭名昭著。罗杰·凯斯门特的报告指出，当地人口锐减主要有4个原因：任意开战滥杀无辜、饥饿、出生率降低和疾病。虽然非洲人的死亡人数不可能准确计算，但是据估计，由殖民者造成的恶劣生活条件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多达1 000万。约瑟夫·康拉德描述说，这是人类良知史上最无耻的劫掠。[19]

在德属西南非洲，另一个非洲本土族群遭到残酷灭绝。1904年，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因反抗德国殖民者发起叛乱，结果无数人因此死亡。德皇威廉二世的反应极其凶猛，他采取的惩罚措施被称为“恺撒的第一次战争”。洛塔·冯·特罗塔将军被威廉二世任命为此殖民地的都督，受令严惩这些部落，“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德军把赫雷罗人困在沙漠中，许多人饥渴而死，而投降的人则被关入集中营。191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被德军镇压后，纳马族人只有不到一半人存活下来，赫雷罗族人只有1/4存活。这次镇压事件后来被列入20世纪最早的种族灭绝行为之一，德国以这种方式将种族灭绝策略引入了非洲。后来，这一做法在二战中再次重演，使得20世纪的历史与悲惨的种族灭绝紧密联系起来。

不过另一方面，欧洲人将科学和医学引入了非洲。非洲的第一批医院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是为了保护欧洲定居者而建，主要是防治热带疾病，热带疾病使欧洲人一直无法深入撒哈拉以南地区，大大影响了殖民进程。因此，引入医学必不可少，非洲人也从中受益。现代医学把非洲人从各种疾病中拯救出来，包括霍乱、天花、麻风病、肺结核以及其他当时欧洲的常见病，还包括黄热病、疟疾等热带疾病。所有殖民大国都推行了疫苗接种，不过功效各有高低。1904年，法国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法律被推广到法属殖民地，但在非洲农村地区显然难以执行。所有欧洲殖民国家都在其非洲殖民地推行了这一措施。虽然其有效性难以评估，但对当地人来说，现代医学是欧洲人带给非洲的最持久的积极影响之一，非洲人口因此在20世纪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教育是欧洲人引入的另一个重要的文明元素，对非洲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没有教育，所谓的教化使命就不存在，而且这也是推广宗主国语言和价值观的最佳方式。法国政府在殖民地引入法国的教育制度，令他们特别骄傲的是，到20世纪初，所有法属非洲殖民地都开办了高级中学。英国和其他殖民国家由传教士完成了教育使命。但是，上学的非洲人所占的比例仍然不高，撒哈拉以南地区尤其低。一方面是因为欧洲殖民精英往往不愿意向非洲人提供教育机会，另一方面，非洲人有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白人的教育”。

虽然位于摩洛哥菲斯的古兰经学院和廷巴克图大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但非洲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欧洲人引进的。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创建于1829年，是非洲第一所欧洲风格的大学。同时，西非的塞拉利昂大学也是推行现代教育的先锋。创建于19世纪的几个教育机构在1909年组成了阿尔及尔大学。

虽然只有很小比例的非洲人得益于欧洲人引入的教育系统，但受到欧洲教育和文化的影响，他们掌握了非常强大的沟通工具——语言。法语在法属殖民地的传播效率非常高，到20世纪初已成为所有法属殖民地的通用语，

但阿尔及利亚和说阿拉伯语的殖民地除外，因为在那些地方，法国人与阿拉伯人共居。英语在英属东非和西非殖民地也广为传播。南非把英语与南非荷兰语并列为官方语言。同样，葡萄牙语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也表现出强大的韧性，西班牙语甚至影响到赤道几内亚人。德国和意大利也在各自的非洲领地推广各自的语言，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欧洲文明中的另一个主要元素在非洲大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交通系统。没有交通系统，欧洲人就不可能殖民非洲。在所有运输工具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工业革命的伟大象征——火车。

1854年，埃及的帕夏主持建成非洲第一条铁路线，他想引进欧洲技术，推进整个埃及的现代化。在随后几十年中，欧洲人占领了更多地盘，铁路网络也逐渐扩大。1860年，开普殖民地开通第一条铁路线，到19世纪末，南非所有主要城市以及罗得西亚都开通了铁路。虽然英国因为横亘在其领地中间的德属东非殖民地没能实现通过铁路连接开普敦和开罗，但最终在1897年，铁路连通了喀土穆。4年后，蒙巴萨和维多利亚湖地区也连入铁路网。与此同时，法国的铁路建设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虽然地理条件非常差，但是从达喀尔到尼日尔的铁路最终在1924年完工。19世纪中叶，欧洲人把汽船这个重要的交通工具带到非洲，尼罗河和刚果河等大河从此像高速公路一样，使欧洲人能够从水路深入非洲核心地带。

最后，欧洲人还奠定了非洲城市文明的基础，这塑造了现代非洲的形态。在南非，欧洲人建造了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三大城市，它们的设计理念和灵感都来自西方城市。开普敦、德班和金伯利成为19世纪末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大城市。内罗毕原先只是个沼泽地，英国定居者在那里建造了一个物流中心，支持乌干达的铁路建设，后来内罗毕发展为英属东非殖民地的首府，并最终成为东非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在法国向非洲大陆腹地扩张过程中，位于非洲中部的布拉柴维尔是一座重要城市，可以与刚果自由邦的首府利奥波德维尔相提并论。（在后来的去殖民化过程中，利奥波德维尔这个来自比利时国王的名字被取缔，这座城市被重新命名为金沙萨，后来发展成非洲大都市之一。）此外，开罗、的黎波里、拉巴特、卡萨布兰卡等古老的非洲城市也在发展，投资者、建筑师和欧洲建造商重塑了它们的结构。城市文明的特征是城市价值观优于农村价值观。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些价值观在非洲这个此前几乎没有任何城市文明的大陆上稳步发展。

非洲是欧洲探索世界的最后一道锋线，也是受到欧洲影响的最后一个大陆（南极洲除外）。在这个边界线被打开后，欧洲开始向全世界传播现代化潮流。在利文斯通第一次前往非洲40年后，欧洲大国几乎控制了整个非洲大陆。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保持独立，其余都是被欧洲控制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在历史上，人类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占领这么多的土地。

成为欧洲的后院对非洲大陆影响深远。从1492年开始，欧洲国家一直在构建和扩张帝国体系与全球经济体系。非洲成为这一体系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地接受欧洲文化的熏染。从那时起，从属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宗主国的非洲人民一直生活在由欧洲国家引入的新文明之中。

从19世纪90年代起，在欧洲大陆以及欧洲帝国殖民地曾发生过的争霸战也在非洲展开，清晰地反映出欧洲强国之间的平衡态势。从殖民地的规模来看，英国和法国是非洲争夺战的最大受益者，其次是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胸怀大志的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在这片大陆上获得了领地，因此成功保住了帝国的地位。而比利时这个小小的工业国家因为在刚果的成功冒险而崛起为帝国。

为什么欧洲人几乎占领了整个非洲呢？是为了实现利文斯通的愿望，向非洲传播文明吗？还是因为经济雄心或者民族主义的期望？有一点似乎很明确，欧洲政府与普通欧洲人有一点不同：在决定占领非洲殖民地时，国家利益高于任何其他的考虑。事实上，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欧洲国家之所以决定占领某个地区，常常只是因为怕被竞争对手抢占。

为了让欧洲国家的殖民行为合乎情理，教化非洲、输入文明的说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殖民帝国往往不能实现这些承诺，结果不仅当地人反抗，欧洲人也因为大多数非洲人拒绝接受欧洲文明而越来越失望。欧洲在20世纪初期将变革和现代化的力量带到非洲，从那时起，非洲人不得不学会忍耐，接受所有变化，在外来文化与自己民族传统和习俗并存的环境中生存发展。

---

[1] Thomas, *The Slave Trade.*

[2] Ronald Robinson, J. Gallagher, and A.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IB Tauris, 1965).

[3] Stanley, Henry.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Travels, 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London: Wordsworth, 2010).

[4] Thomas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The White Man's Conquest of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1876 to 1912*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5]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6]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7] Anthony Thomas, *Rhodes: The Race for Africa* (Thomas Dunne Books, 1997).

[8] Thomas, *Rhodes*.

[9]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10] Eugene Rogan, *The Arabs* (Penguin, 2012), p. 165.

[11] Rogan, *The Arabs.*

[12]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其著作《西印度毁灭述略》中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的暴行。——编者注

[13] A. Hastings, *The Church in Africa, 145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 Mario Vargas Llosa, *The Feast of the Celt* (Faber & Faber, 2012).

[15] Meredith, *The Fortunes of Africa*.

[16] Meredith, *The Fortunes of Africa.*

[17] Meredith, *The Fortunes of Africa.*

[18] Christopher Harrison,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1860–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9] Harrison,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1860–1960.*

第九章

撼动世界的两次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开启后欧洲时代

1900年，欧洲文明发展到巅峰——这个文明中的每个人都沐浴着由知识领域成就带来的荣光，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和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写道，欧洲人生活在一个绝对安全的黄金时代。他把这个时期称为理性时代，因为没人想发动战争、革命或叛乱，任何激进和暴力元素似乎都不存在。欧洲令世界各地的人们钦佩和羡慕，甚至那些反对欧洲扩张或自认为是这种扩张的受害者的人也不例外。

然而，仅仅14年之后，欧洲大陆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大的战争，欧洲文明取得的大部分成就被削弱，还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以政治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愤怒为特征，最终发展成一场更加野蛮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1914—1945年，欧洲和世界陷入全面战争，人类的破坏能力登峰造极。

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看起来还那么和平、文明的欧洲大陆呢？欧洲人为什么会两次发动造成如此多苦难和自我毁灭的战争呢？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已有不少著述。这次战争开启了欧洲持续30多年的黑暗时代，可以视为新帝国主义时代的转折点。从1870年起，欧洲国家又开始了一场空前的海外领地争夺赛，非洲和太平洋地区是主要竞技场。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也加入了这场角逐。结果，竞争、不信任和嫉恨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

20世纪早期的全球秩序可以总结为，英国位于世界霸权的顶端，缔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其文明模式影响了很多地方。坐拥这样睥睨天下的优势，英国的目标是保持权力平衡，防止任何竞争对手侵害自己的利益。法国也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也同样希望保持权力平衡，但同时在巧妙地寻找机会，谋求从英国获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德国是新殖民大国，在20世纪初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是德国的殖民帝国规模不够大，因此迫切希望打破既有秩序，图谋超越英国和法国。另一方面，俄国不再认为英国是最危险的对手，开始担心野心勃勃的德国在其边境上的动作及后果；奥匈帝国面临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挑战，虽然统治者极力维系帝国统治，但难度很大；意大利希望进一步扩张，但遭遇了法国设置的重重障碍，深怀不满。同时，美国占领了西班牙的最后一批美洲殖民地，也成为大国，而日本在急切地寻找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机

会。

到20世纪初，世界上已经没有未被占据的领土，然而欧洲帝国扩张的渴望仍无法被满足。于是，国际秩序变成一场零和游戏，在日益紧张的关系和互相怨恨的气氛中，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创建了一系列联盟，但是他们遵循的外交原则却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德国是这个复杂联盟体系的第一个支柱。德国宰相俾斯麦希望与奥匈帝国缔结新的防御同盟，加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奥匈帝国则希望通过与德国结盟来保护自己，免受俄国的干扰。这两个国家一拍即合，在1879年结成防御同盟。3年后，意大利加入同盟。当时意大利刚把在突尼斯的领地割让给法国，决定寻求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保护，以图报复。于是，三国同盟诞生了，俾斯麦这个狡猾政治家的图谋得逞。

最能直接感受到三国同盟威胁的是法国和俄国。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国和俄国的独裁政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两国政府很快就决定结为联盟，因为这有利于彼此的利益。1894年，俄国沙皇和法国总统签署了军事协定，缔交法俄同盟，约定如果一方受到德奥意防御同盟的袭击，另一方将给予支持。

受这两个联盟影响最大的国家是英国，因为它被孤立在外，很危险。因此，1902年，英国政府决定与同为俄国敌手的亚洲强国日本结成防御联盟，并很快开始在欧洲寻找盟友，以应对德国的威胁。1904年，英国与法国签署《英法协约》，正式结束了两国之间持续几百年的敌对关系。促动这两个国家克服分歧、同意在受攻击时互相支持的主要原因，来自它们对德国的共同恐惧。

此外，为了自卫并抵御德国，英国和俄国也克服了敌对关系，在1907年签署了《英俄条约》。就这样，三国协约诞生了，英国、俄国和法国相互约定，在遇到外部入侵时相互支持。

缔结联盟是通过外交方法避免战争，保持欧洲和世界各地区力量平衡的传统方法。两个强国之间签订联盟协议，可以警告第三个强国，侵犯联盟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但是到20世纪初，欧洲强国都想争夺欧洲霸权，联盟从一种威慑的力量变成导火索，可能导致规模更大的战争。

前面章节曾提到，面对殖民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尤其是抢夺非洲领地时，欧洲强国都选择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它们似乎都认同，无论殖民地的领土多么重要，都不值得为此与另一个大国开战。但是欧洲大陆的领土之争就不同了。

1912年，希腊、保加利亚、黑山和塞尔维亚组成巴尔干同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想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巴尔干同盟轻松击败了土耳其军队，1913年5月，双方签署和平条约，约定奥斯曼帝国放弃君士坦丁堡西部的几乎所有领土。然而，巴尔干同盟成员国之间在如何分配获得的领土上难以达成共识，从而引发了一场新战争，保加利亚宣布对巴尔干同盟的其他成员国开战，最终赢家是塞尔维亚和希腊。

面对这场发生在欧洲中心的大冲突，各个强国的态度怎样呢？俄国认为这是彻底推翻奥斯曼帝国的机会，所以全力支持塞尔维亚；得到支持的塞尔维亚有恃无恐，对奥匈帝国提出各种要求；英国和法国同情希腊；德国则越来越担心它的旧盟友奥斯曼帝国被打败，于是先给保加利亚补偿，然后在第二次交战后与其变成盟友。就这样，因大国扩张引发的紧张关系在东欧累积。

加深了欧洲扩张主义危机的另一个因素是王朝之间的竞争。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一个令人欢欣的巧合——大多数国家执政的君主都是亲戚。德皇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娶的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维多利亚女王因此被称为“欧洲的祖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威廉二世、乔治五世和尼古拉二世在往来信函中以表兄弟互称，保持着诚挚的关系。确实，欧洲帝国之间的对立可以当作一场家庭纠纷来解决，这本应是确保欧洲和平的另一种方式，也是欧洲在位君主们天生的优势。然而事实证明，现实与设想大相径庭。历史上很少有人能获得威廉二世那么多的财富和那么大的权力。在他被加冕为皇帝时，不仅继承了位于波茨坦的一幢富丽堂皇的官邸，还承袭了德国周围近30座城堡和宅第，他可以乘坐自己的火车去那些地方。威廉二世还有一艘名为“霍亨索伦”的游艇，上面有约300名船员。此外，他还拥有最好的乡村庄园，在狩猎季节，他曾在一周内猎杀1 000头动物。然而，这一切似乎都不能弥补他的痛苦——他统治的帝国和他的堂兄威尔士亲王所继承的帝国相比，太弱小了。

在威廉二世统治期间，他一直集中力量想要超越英国，使德国发展成主导世界的强国。在意识到帝国的未来取决于海上力量后，他决定要建设一支比英国海军更强大的德国海军。这引发了一场军备竞赛，英国政府的领导人和英王乔治五世据此得出结论，只有打一仗才能阻止他的表兄。

在这场战争的起因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通过恐怖主义促进民族主义。1914年6月28日，一位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在萨拉热窝谋杀了奥匈帝国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普林西普想通过这次谋杀结束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的统治，但他的行动造成的后果远不止于此——他挑起了一场战争，导致奥匈帝国灭亡、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告终。没有任何恐怖主义行动产生过这么深远的影响。

1914年．欧洲弥漫着极端爱国主义和怨恨的情绪，各国缔结的联盟不仅没能避免战争，反而导致了战争爆发。1914年6月29日，为了报复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杀，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盟国德国立即下令动员军队。法国担心德国再次入侵，也动员了自己的军队。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英国要求德国保证比利时中立，德国拒绝了。结果，英国在8月4日宣战，其盟友日本也被拖入战争。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之后，欧洲强国终于兵戎相见。但是这场欧洲强国之间的战争不仅在欧洲大陆开打，从欧洲各国交战的那一刻起，各帝国的殖民地和领地也陷入了对抗。这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冲击。日本因为和英国结盟被卷入战争，远东成为另一个战区。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现象，所有文明都曾从中受益或受害，但只有欧洲人把一场武装冲突扩大成全球大战，影响了全世界。

帝国主义时代之所以会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大国并不害怕战争的后果，它们都希望能浑水摸鱼，从中牟取利益。在1914年宣战的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在战争文化中长大的，在他们看来，就像克劳塞维茨的著名理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延续，是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国家之间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分歧时，就可以诉诸战争。

因此，在1914年7月战争爆发时，欧洲甚至弥漫着一种乐观、欢欣鼓舞的气氛。所有参战国的年轻人听从号召，参军备战——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背景，满怀热情，因为他们被灌输的理念是，为国参战既是责任，也是荣誉。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短战，所以许多士兵走上前线，把这当作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可以调剂一下单调的日常生活，并希望在圣诞节前得胜归来。

军事战略家们（尤其是德国的军事战略家）的预测非常乐观，认为赢得这场战争易如反掌，甚至只需短短几周。德国的战略以施利芬计划为主，是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将军提出的一套作战方法。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德国对法国展开快攻，对俄国采取防御策略。但是这一计划失败了，两军僵持了多年。

战略家们不仅没能准确预测战争的时长，也没能预见现代军事技术带来的影响。技术进步大大增强了武器的破坏力，步枪、机枪和新型坦克大大增强了军队的作战力量，可以大规模歼灭敌军。飞机给现代战争引入了一个新的交战维度，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空袭，战争的破坏性变得更强。这带来的结果是，战场不再限于前线，城市也变成了战地。德国的齐柏林飞艇轰炸了英格兰南部的城市，潜艇则从海底发起攻击。这场战争中还使用了化学武器。德国率先把氯气用于战争，致命光气和芥子气的杀伤力更

强，能致人失明，而交战双方都使用了这些气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被称为“大战争”，原因显而易见。或许称为帝国之战更合适，因为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加入了这场冲突，有些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帝国，有些则是为了阻止或者预防对手损害自己的利益。在那之前，欧洲国家间交战从未将所有属地的臣民卷入其中。但是这一次，各大帝国的所有臣民，无论是欧洲的还是其他大陆的，都无一幸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动员的军队共约有6 200万人，其中，欧洲以外地区的军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帝国内部也存在紧张关系，但是战争在各殖民地激起了爱国热情，加强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团结，在整个殖民世界，包括那些支持独立运动的殖民地都和宗主国团结一致，忠心耿耿。年轻士兵被灌输的思想是，他们将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为帝国服役，能够为这项崇高的事业做贡献是无上的光荣。[1]

非洲和其他殖民地一样，也卷入了这场战争。尽管许多殖民地的定居者认为他们与这场战争的起因毫不相关，但都忠实地履行动员令。欧洲国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在战争爆发后，又开始图谋占领对手的领地。为此，非洲人被征募参战。殖民国家征召了200多万非洲人，有的作为士兵参战，有的做搬运工或劳工。[2]

尽管非洲的作战规模比欧洲小得多，但是几乎整个非洲大陆都史无前例地陷入战争状态。虽然德国在非洲造成的影响显然小于英法两国，但是在保罗·冯—福尔贝克将军的领导下，德军成功地牵制了敌军，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双方都采用了焦土战术，村庄和农作物被摧毁，农村地区受害不浅。因此，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许多欧洲殖民者开始质疑他们到非洲的初衷——使非洲变得开放，引入商贸和文明，事实显然有悖于这些目标。

“我们在身后留下了被毁的农田和被洗劫过的军火库，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面临饥荒。”德国医生路德维希·德佩写道。“我们不再是文化的传播者，我们走过的道路上布满了死亡、劫掠和十室九空的村庄。”[3]

非洲人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参战，也加入了中东和欧洲的战争。法国和比利时的西线战场有15万非洲人；[4]在法国军队中，一个来自摩洛哥的军团还获得了法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

在英属印度，这场战争不仅得到印度土邦君主的支持，而且与英国政府担心的完全相反，许多主张结束殖民统治的人也纷纷支持战争。当时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目标是获得地方自治，他们支持英国打这场战争，希望战后能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在战争期间，被动员参军的印度人数量比英国人更多。100多万印度军队驻扎在从德属东非到中东、再到西线战场的不同战

区。

印度门是英属印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建于1931年，纪念约74 187名为大英帝国牺牲了生命的印度士兵。[5]

大英帝国的白人自治领也各尽其职，为战争做出了贡献。加拿大共招募了63万人入伍，其中许多人赶赴西线战场。战争爆发后不久，新西兰的军队占领了德国在萨摩亚的殖民地，澳大利亚的军队则袭击了德属新几内亚。

随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卷入，这场战争真正演变成全球性战争。对日本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在亚太地区大展拳脚的大好机会。1914年8月27日，在英国支持下，日本海军无视中国的中立立场，封锁了山东胶州湾。随后，又占领了德国从1897年起在中国建立的基地和港口城市青岛。接着，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仅要求控制山东和德国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还要求掌控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

当日本狮子大开口提出这些要求时，近代中国正处于最糟糕的历史时期，风雨飘摇、国无宁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从17世纪起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灭亡。在混乱局势中，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这激怒了中国民众，国民党的创建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实行总统制。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并自封为皇帝。一年后，在政治动荡中，中国再次组建了共和政府。段祺瑞领导的亲日派势力强大，而德国秘密支持以张勋为首的保皇派，他们在1917年发动政变，想阻止段祺瑞掌权。政变失败后，段祺瑞以此事件为由，在1917年4月向德国宣战，这不仅是为了报复德国，也是希望借此为中国赢得战后谈判桌上的一席之地，并拒绝日本提出的要求。

约有14万中国男子被征募到劳工军团，在一战期间和战后为西线战场的英军和法军提供支持。[6]

这场由欧洲人发动的战争影响波及全球，最终因为美国的干预迎来了转折点。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参战决议。美国之所以决定参战，主要原因是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卢西塔尼亚号”远洋客轮。但是，美国的最终目标远不止是报复德国。威尔逊总统在对德宣战演讲中说，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让民主可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世界”。但是赢得美国公众的舆论支持相当困难，因为美国不少公民有德国血统，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广泛支持华盛顿和其他开国元勋早就确立的，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一个原则——远离欧洲的纠纷。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已经被打破。为了把西班牙这个曾经的欧洲强国逐出其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殖民地，美国在

1898年对西班牙宣战，并在战胜后正式吞并了波多黎各，占领了菲律宾。美国声称不会像欧洲列强那样去海外开拓殖民地，美国认为占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是给这些地区带去民主和进步，因此是正当合理的。这也符合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的要求，这个精英团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其领导人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等杰出人物。西奥多·罗斯福认为，美国应该加强与大西洋彼岸国家的合作，捍卫共同的利益和文化。这形成了一种亲英的干涉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在美国占据了上风。

美国调动了400万军人，其中200万人在法国领土上作战。[7]美国的军事干预成为当代历史的转折点。尽管美国没有正式加入协约国，只是单方面与德国作战，但是它为英国、法国等赢得这场战争提供了决定性援助。在一锤定音地决定了欧洲的命运之后，美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作为一个强大的战胜国，美国进一步巩固了新的大国角色，赢得了战后时代的重要地位。

参战国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到底想打出什么结果呢？除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每个参战国的领导人都解释说，开战是因为最神圣的价值观受到了威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是英国政府授予勇敢士兵的最高奖项，上面刻着“捍卫文明的伟大战争”。在法国和比利时，人们也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护文明。同样，德国和奥匈帝国也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文明。那么，文明到底是什么？许多人目睹了战争期间的诸多暴行，战争吞噬了那么多年轻人的生命，他们扪心自问，文明的意义在于挑起这样一场毁灭性战争，造成如此多的苦难吗？

还有一些人试图寻求安慰，他们认为不论这场战争多野蛮、破坏性多大，都将是最后一战。英国作家E. H.卡尔在1914年写道，这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参战人员纷纷用这句话开解自己遭受的苦难。但是多年之后的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没能结束人类的战争，于是这句话经常被讽刺性地引用。

一战期间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描写人们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感受到的失望和愤慨，对引发这场战争的国家进行谴责。西班牙小说家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首批记述战争的残酷与恐怖的作家之一，他在1916年出版了《启示录的四骑士》。这部小说很快成为国际畅销书，书中讲述了一个兴旺的法德家族的悲剧，这个成员遍布世界的家族最终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小说揭示了一战对欧洲社会的毁灭性影响。

威尔弗雷德·欧文是战争年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打破了欧洲诗歌歌颂爱国主义和勇敢士兵的传统，转而关注骇人听闻的战壕生活以及战争给那一代人造成的创伤，欧文最终也死在前线。几年后，出现了几部伟大的小说，包括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西线无

战事》，都描述了战争的恐惧、痛苦以及幸存者的空虚感。然而，德国出现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潮，它美化战争，认为战争是有意义的经历，能够启发和发展人的性格。德国军官恩斯特·荣格回忆战争的作品《钢铁风暴》就是最好的例子。

早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社会主义者、工会运动以及左派各个分支的成员就把这场战争称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被派到前线，与另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兄弟交战，保卫的却是他们的老板和资本主义的利益。1914年8月，他们游行示威，反对征兵，希望工人阶级能够听从他们的呼吁，避免战争爆发。但是他们失败了，许多欧洲的工人都在责任感甚至热情的驱动下加入了军队。尽管如此，反战情绪越来越强，逃兵不断增加，俄国等备战不足的国家尤其如此。

在遭受一战重创的国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沙皇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在位期间犯下了许多错误，而最严重的无疑是在技术和经济层面都没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把这个国家带入了战争。到1917年，俄国的情势变得难以为继，前线是备战不足、濒临崩溃的军队，后方城市缺少食物，饥荒肆虐。1917年2月，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统治了俄国300多年并建成庞大帝国的王朝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坚持认为，俄国必须把这场仗继续打下去，他拒绝退出一战。结果，民众的普遍不满并没有得到平息。

当大多数人失无可失的时候，他们即使走上街头、推翻现有秩序也不会遭受更多损失，这时肯定会发生革命。这正是1917年夏天俄国的情况。德国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对流亡在瑞士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列宁做出了特别安排，他们让列宁乘坐一列密封的专用火车穿过德国，前往俄国。到达俄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员开启了一项计划，为赢得民众支持，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其中一个大受欢迎的口号是，结束战争，土地归农民，权力归苏维埃（工人委员会）。

1917年10月，当代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与一支反叛政府的军队联盟，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软弱无能、不得民心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党获得权力后不久，负责外交的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约定苏维埃俄国割让芬兰、波兰、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其他一些领土给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虽然这些条款令俄国备受屈辱，割让领土令人难以接受，但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结束那场怨声载道的战争，集中精力开展布尔什维克的大业：革命。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将首次变成现实。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盟国战败收场。这场战争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毁灭性影响，欧洲的黄金时代画上了戏剧性的句号。1914年战争

爆发时，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说：“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我们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它们再次被点亮。”从1918年起，欧洲人目睹了这一忧伤的预言变成悲凉的事实，而且从1918年开始，欧洲旧时代的许多特征很快都消失了。

一战中的死亡人数是人类此前所有战争中最多的。新的军事技术大幅增加了死亡人数。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法国和德国死亡的士兵人数达到97.6万；在同一年英军与德军对战的索姆河战役中，伤亡总数达到121.92万。到一战结束时，伤亡人数达到耸人听闻的3 800万：1 700万人死亡，2 000万人受伤。在1 700万死者中，约有700万平民。

在停战后不久，德皇威廉二世退位，流亡国外。随后奥匈帝国的皇帝查尔斯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就这样，战争令霍亨索伦、哈布斯堡、罗曼诺夫这三大欧洲王朝失去了王权。奥斯曼帝国被击败后，苏丹也不得不放弃王位。这是一战带来的一个莫大讽刺：几个帝国为了扩大和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加入了这场战争，结果一无所得，走向灭亡。

最重要的是，一战重塑了世界秩序。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与战败国的和约条款和持久和平所需的条件。巴黎和会一共邀请了32个国家以及几个民族的代表参加，4个与会大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推动了会议成果的达成，它们的代表被称为“四巨头”——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法国总统乔治·克列孟梭、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和美国总统威尔逊。

欧洲历史上曾多次举办过和平会议，但这次规模最大。维也纳会议只有欧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主要讨论影响欧洲大陆的问题。而1919年巴黎和会的和平缔造者们的决定将影响整个世界，奠定了持续至今的国际关系格局。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外交官、律师和经济学家等在6个月的时间里一起研究制定新世界秩序的计划。最终有些帝国被正式扫除出局，一些国家的疆土扩大了，国家边界被重新划定，新国家的出现往往会减损其他国家的利益，各民族的权利终于得到承认。巴黎和会不仅讨论了政治问题，也研究了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妇女权利、劳资关系、种族关系、少数民族的权利。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写道，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那里的和平缔造者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权力。[8]

这次和会标志着欧洲时代结束，美国作为一个决心塑造国际关系的大国登上了世界舞台。作为打败德国的协约国的成员，日本在这次会议上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欧洲强国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的不仅有帮助它们赢得这场战争的国家，还有许多新国家，它们从此拥有独立的地位和权利，对新世界秩序产生影响。英国的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都是在这时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获得了代表权。甚至印度也获得了

这一权利，但印度在会议之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治权。中国也派出代表团参会，结束了隔绝于国际事务之外的传统。巴西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派出代表参加国际会议。爱尔兰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越南人，这些抱负远大的民族都派出了代表参加巴黎和会。

1918年12月，美国威尔逊总统的欧洲之旅开创了新历史。首先，他是第一位在任期间前往欧洲的美国总统；[9]更重要的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非欧洲的大国决定由欧洲国家发起的战争的和约条款。从那时起，美国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最重要的全球调停人之一。在离开华盛顿前，威尔逊总统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阐述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他认为这是实现和平的基础。其中一些要点对国际关系影响很大：禁止秘密外交；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消除经济壁垒，促进自由贸易；殖民应考虑到“有关人群的利益”。最后，十四点计划还提议建立一个国际联盟，负责维护世界和平，确保所有国家的独立地位。

协约国毫无争议地接受了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以及他在大会上的领导地位。这不仅是承认美国帮他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也认识到并承认了一个事实：在这场战争之后，欧洲不再具备统治世界的能力和道德力量。在前线发生了那样的屠杀之后，欧洲人再也无法自信地谈论他们在世界上的文明使命，与美国分享这一使命的时候到了——毕竟美国也是欧洲文明的一个分支。

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标志着旧世界秩序被判处死刑，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被清算，英国、法国和日本是受益方。作为侵略者，德国需要支付高额赔款，但一直没有全额偿付。亨利·基辛格曾点评说，这个条约既惩罚过严，没有调节的余地，又过于宽容，不能阻止德国死灰复燃。[10]德意志帝国覆灭，在领土方面，最大的受益者是英国。德属东非和德属西非都被并入大英帝国，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英国连通开普敦和开罗的帝国梦想变成了现实。

奥斯曼帝国解体让英国和法国受益匪浅。奥斯曼帝国长期被称为“欧洲病夫”，英法两国早就想乘虚而入，但都不想再次激起彼此间的对抗。1916年，两国签署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主要约定了如果赢得这场战争，双方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1919年，实施该协议的时候到了。

英国的目标是控制靠近苏伊士运河的巴勒斯坦以及石油资源丰富的摩苏尔地区，因为那时石油已经很重要。法国则把目光投向了黎巴嫩和叙利亚。

批评欧洲介入中东事务的人士经常引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之间的一段对话，在对话中，双方轻松友好地分配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好吧，”克列孟梭说，“我们现在讨论什么？”

“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劳合·乔治回答道。

克列孟梭：“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劳合·乔治：“我想要摩苏尔。”

克列孟梭：“它是你的了。还要哪里？”

劳合·乔治：“我还想要耶路撒冷。”

随后，劳合·乔治承诺将支持法国对黎巴嫩海岸和叙利亚内陆地区的控制权，而且摩苏尔的石油，法国也有一份。

巴黎和会期间，一大争端根源是解放阿拉伯世界。1916年6月8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麦加的侯赛因·伊本·阿里领导了一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目标是把阿拉伯人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侯赛因·伊本·阿里宣布自己为阿拉伯王国的国王。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T. 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在这次起义中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劳伦斯精通阿拉伯语，曾在中东地区做过考古学家。1914年，他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因为英国决定支持这次起义，劳伦斯负责联系起义的领导人。在几次军事行动中，劳伦斯扮演了近乎英雄的角色，满怀热忱地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大业，成为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传奇人物。[11] 他不仅是阿拉伯人最好的欧洲朋友，也是欧洲的忠实使节。

阿拉伯的劳伦斯为阿拉伯人在1918年攻占大马士革做出了突出贡献，阿拉伯起义至此达到高潮。在劳伦斯的构想中，大马士革将成为新阿拉伯王国的首都，他也曾这样承诺阿拉伯的领导人。但是，英国和法国却另有打算，这让他感到失望和尴尬。1920年3月，侯赛因·伊本·阿里的儿子费萨尔被宣布为叙利亚国王，但在短短一个月之后，他就被法国军队驱逐。在法国的监督下，叙利亚共和国不久之后宣告成立。黎巴嫩是法国建立的另一个共和国。英国则更倾向于在新殖民地建立君主立宪制政权。

一战结束后，侯赛因·伊本·阿里的大阿拉伯帝国梦破灭了，因为协约国只愿意承认他是汉志王国的国王。为了补偿他，英国政府大力支持哈希姆王朝在该地区的利益，让他的儿子阿卜杜拉做外约旦的国王、费萨尔做伊拉克的国王。

战争结束时，英国人把外约旦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形成“外约旦酋长国”，由阿卜杜拉统治。阿布杜拉很传统，但比他父亲更有远见，也更务实，他是第一个采用君主立宪制的阿拉伯领导人。

英国一手创建了伊拉克王国，英国人希望此举能同时满足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希望和哈希姆王朝的野心，并捍卫英国的利益。于是，在历史上因为地理和历史因素一直分离的民族被统一到一个国家里，人口约一半是阿拉伯人，其余是库尔德人和亚述人。他们中有大约一半人是什叶派穆斯林，但是掌管这个国家的精英却是逊尼派穆斯林。费萨尔在阿拉伯起义中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成为统治伊拉克的国王。在这个国家成立后不久，这里就发现了巨大的油田。尽管费萨尔努力将所有伊拉克人都团结在君主立宪制政权下，但是由于内部动荡不定，这个政权最终在1958年的一场政变中垮台。这仅仅是伊拉克问题的开始。

在英国的中东领地，巴勒斯坦的冲突最为突出。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发表《贝尔福宣言》，承诺英国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清楚，有英国的支持，犹太人的复国梦一定会实现。但是阿拉伯人却认为受到了欺辱，一个欧洲大国提出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国家，却不考虑居住在那里的大多数人的意愿。汉志王国国王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以示抗议。就这样，世界上最难解决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冲突。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决心把希腊的边界扩张到君士坦丁堡和整个小亚细亚，收复近3 000年前古希腊曾经拥有的沿海地区。法国和英国都有古希腊情节，所以支持希腊的主张。这也是为了使欧洲和基督教世界一雪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陷的历史耻辱。1920年，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色佛尔条约》，通过了大希腊的构想以及其他历史性决定，例如建立亚美尼亚国家和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所有这些决定都将占据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土耳其人的国家会变成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一个小国。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条约遭到土耳其人的反对和抗议，为了抵制协约国清算奥斯曼帝国的决定，土耳其独立战争爆发，土耳其民族运动应时而生。凯末尔将军率领土耳其军队，以非凡的军事才能成功击败了法国、希腊和亚美尼亚联军。国际社会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土耳其人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事实。

然而，成立于1923年的土耳其共和国并不想恢复旧时的奥斯曼帝国，而是要变成一个现代欧洲国家。土耳其不再受东方和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开始接受欧洲和西方文化。引导这一非同寻常的变革的正是凯末尔，他后来被称为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有一双锐利的蓝眼睛，总是穿着西装，不仅是现代世俗土耳其的象征，也是所有希望接受欧洲文化、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榜样。

凯末尔革命始于1919年，穆罕默德六世被废黜后，延续了5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西式共和国。凯末尔认为伊斯兰教严重阻碍了土耳其的进步，所以凯末尔的第一批改革措施就着力于消除

伊斯兰教的影响。1924年，伊斯兰法庭被关闭，此后不久，哈里发王权被废止，凯末尔政府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制定了土耳其民法典。[12]

凯末尔的另一个决定是，土耳其人应该用现代欧洲的服装取代伊斯兰传统着装。1925年，凯末尔发起“帽子革命”，要求把传统的伊斯兰红圆男帽替换成西式帽子，凯末尔称之为“文明国家的头饰”。同时，女性也被鼓励抛弃面纱，穿欧式衣服。在土耳其，伊斯兰文化被根除得很彻底，甚至书面土耳其语的新字母表都是拉丁语字母表而不是以阿拉伯语的字素为基础。从那时起，土耳其的孩子们学习用拉丁字母书写，而不用阿拉伯语。[13]

到1938年凯末尔去世时，土耳其的文化和社会已经显著欧化，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出现，他们接受的是凯末尔主义的教育；土耳其军队非常忠实地捍卫凯末尔的遗产，确保土耳其共和国继续保持世俗政权和欧洲特色。

《凡尔赛和约》让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也经历了重大变化。这个区域的大赢家无疑是日本，尽管巴黎和会的最终结果令日本人感到失望。由西园寺公望代表的日本是巴黎和会上实力排名第五的国家，与会的其他大国十分清楚日本在亚洲地区的贡献，决意巩固日本在远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因此，日本代表团要求拥有德属太平洋岛屿以及中国山东半岛的主权。

中国也认为自己为协约国取胜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战结束后，上海和中国其他所有大城市都喜庆停战协议签订，中华民国陆征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巴黎，他们希望，作为大国的盟友，中国的领土主权可以得到承认。陆征祥要求欧洲帝国停止入侵中国，废除与中国签订的领土租赁协议，基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的民族自决原则，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日本对山东的主张。

该奖励中国还是日本？巴黎和会上的大国显然选择了后者。它们认为，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日本就是协约国的忠实盟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已经是一个强国。所以，牺牲德国和中国的利益，予以日本扩张的权利名正言顺，而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积弱不振、四分五裂的国家。

日本代表团还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种族平等条款，要求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加入这个条款，宣布所有种族都平等。这个善意的提议看似特别有利于殖民地，却是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的，日本希望凭借这一条，获得和欧洲大国及美国一样的地位，被平等对待。

但是，在1919年谈种族平等引发了很大争议，包括“四巨头”在内的许多人都不认同这一观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坚决反对日本的这个提议，担心日本会以此为借口，扩张到它们的势力范围，成为日本向它们地盘移民的正当理由。最终，该条款并未被纳入《国际联盟盟约》。日本代表团对此

感到很失望，认为虽然日本为新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但仍然被大国轻视。为表达抗议，日本代表团当即离开巴黎。巴黎和会的这次决议使日本人心生怨恨，导致一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抬头，日本政府从此拒绝与西方合作。

另一方面，巴黎和会的结果也令中国极为愤怒，会后，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团认为："允许外国继续控制山东，等于是把一把匕首继续插在中国的心脏上。"[14]因此，中国代表团没有签署《凡尔赛和约》就离开了巴黎。中国民众对政府极度失望，对西方羞辱中国极度愤慨，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

种族间的仇恨制造了大量受害者，一些国家被控诉推行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行动。在奥斯曼帝国，有100多万亚美尼亚人丧生于土耳其人驱逐亚美尼亚人的政策；[15]俄国大肆迫害犹太人，从前奥匈帝国的部分族群也难逃厄运。

更糟糕的是，停战协议并未能结束欧洲的暴力冲突。一战结束后，欧洲大陆有几个地方依然冲突不断，其中最血腥残暴的地方是俄国。革命激起革命"红军"和维护旧政权的"白军"之间的内战，持续了5年之久。这个时期的俄国兵荒马乱，死亡人数难以统计，据计算，死于前线作战、处决和蔓延全国的饥荒的有300多万人，还有大量人口失踪。在这场冲突结束后，约700万名俄国孤儿流落街头。

在1914年前，绝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欧洲各国的文明，他们总体上也以自己的国家为傲，深信欧洲的价值观。但是，从1914年起，不少人开始对这个不断引发深重灾难、战争、冲突的文明失去信心。1918年，许多士兵回到家园，回归平民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甚至非常痛苦，对战败国的士兵来说尤其如此。由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也带来了政治危机，因为公民普遍不再相信自己的领导人和政治制度，公民质疑他们所属社会的价值观。这为承诺建立新社会的新政治运动提供了土壤，除共产主义外，从20世纪20年代起，另一场运动吸引了大众：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图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普遍的不满情绪，推出一种替代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和自由民主的方案。1919年，曾经参加一战，最初是意大利社会党成员的墨索里尼创建了武装组织"战斗的法西斯"，反对革命运动，谴责它们挑起社会混乱，赢得了广泛支持，尤其是实业家和地主。受此鼓舞，1921年，墨索里尼创建了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

法西斯党的主要特点是强悍的右翼民族主义，它认为是自由民主造成了共产主义威胁，而这种软弱和过时的意识形态是欧洲衰落的罪魁祸首。法西

斯党主张建立一党制政府，由法西斯党负责确立国家利益。在经济政策方面，以国家资本主义和专制取代自由贸易，促进自给自足；在外交政策方面，推行帝国主义，提议建立新的罗马帝国，使意大利变成地中海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国。

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率领著名的黑衫军进入罗马，未参加选举就夺得了政权。意大利国王决定，鉴于墨索里尼的实力和声望，最好的选择是让他组建政府。于是欧洲第一个法西斯政府诞生，墨索里尼领导的极权主义政权取得稳步发展，其特征包括国家对社会的绝对支配权，政府严格控制媒体，对新闻进行审查，使所有其他政党非法化，迫害和消除所有反对意见。

通过镇压，法西斯政党强制推行法律、维护秩序，提高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重建了对未来的信心，因此法西斯主义在一战后的许多欧洲人看来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模式。20世纪20年代，在几个国家出现了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翻版，崇拜墨索里尼及其理念的人数激增。

1919年，一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前参战人员加入了温和的德国工人党，但是这个党名不副实，狂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年轻的希特勒履历平平，没人能看出他会有光明的政治前途。在一战期间，他起初是一个平庸的艺术家，勉强糊口，后来到德军服役，成为一名下士。他认为参战是他最伟大的经历。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特别能吸引观众，他在痛斥那些“德国的敌人”时，能成功激起听众的义愤之情，使人们热烈响应他提出的改变国家的建议。

1920年，希特勒所在的政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纳粹党。不久之后，他成为这个党的领袖，他对那些他认为造成德国失败的政客（共产党人和犹太人）的批评吸引了广大背景各不相同的公众，横跨工人阶级、武装部队和富有的实业家等各个行业。1923年，希特勒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在慕尼黑策划一场政变，他像他所崇拜的墨索里尼在罗马所做的那样，列队走过柏林。然而，政变失败，希特勒被判处5年监禁。但这仅仅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

法西斯模式在另一个国家也得到了支持——西班牙。当时，阿方索十三世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面临严重危机，工人阶级运动风起云涌，议会制度腐败低效，民众越来越需要一个能把国家带回正轨的铁腕人物。在这种情势下，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在1923年发动政变，夺得了政权。但是他的独裁统治只是为了在短期内重建秩序，确保西班牙恢复君主立宪制。在意识形态上，德里维拉是一个保守的军官，他很钦佩墨索里尼及其政府的许多政策，比如国家计划经济、社团主义和新闻审查制度。葡萄牙也走了同样的道路。1926年，一场政变给统治了葡萄牙16年，政局和民主制

一直脆弱不稳的葡萄牙第一共和国画上了句号，葡萄牙军队发动政变，建立了新独裁政权。

1929年，美国发生股灾，法西斯主义进一步扩张。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发生灾难性的崩盘，股价暴跌，欧洲股市也遭受巨大损失。西方世界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戏剧性地戛然而止，整个世界陷入大萧条——在这场十几年的危机中，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大规模失业和工业产出大幅下降的痛苦之中。

1929年的经济危机表明，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梅特涅曾说过："巴黎打个喷嚏，欧洲就会感冒"，以此说明巴黎这座城市是欧洲大陆的核心和灵魂。但是到20世纪，这个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由纽约代替，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20世纪30年代，欧洲把经济霸权拱让给美国，这是导致欧洲人集体愤怒的另一个原因。大萧条使欧洲人更加不相信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化了一个观点——资本主义行不通，社会不能听由反复无常、随心所欲的投机者和市场摆布。

苏联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这使得共产主义更受欢迎。当欧洲各国政府努力减缓大萧条的冲击和影响时，苏联在斯大林强有力的领导下迅速发展为工业强国。自由民主似乎弱不能守，无法阻挡共产主义的崛起，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提出由国家调控经济，封闭国家边界，提高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降低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它还表现出坚决扭转整个欧洲衰退趋势的决心，通过给人们灌输思想，让人们找到意义和方向，恢复民族自豪感。法西斯主义还拥有阻止共产主义崛起的准军事力量，通过暴力手段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

被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停滞困扰的德国很快成为纳粹党扩张的温床。希特勒抨击那些背叛了德国利益的政客，以及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他指责犹太人应为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所有罪恶负责。他的这些批判意见越来越能引起普通选民的共鸣。1932年，纳粹党成为德国国会中最大的政党。1933年，希特勒宣布担任德国总理。不久之后，德国的其他政党都被取缔，魏玛共和国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取代。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悖论之一——地球上最先进的，文化和教养最好的民族之一，诞生了贝多芬、歌德、叔本华等著名人物的德意志民族，最终把国家权力交给了希特勒。德国和整个欧洲至今仍在承受这一矛盾带来的后果。

纳粹主义是一种改良的、更激进的法西斯主义。施密特等理论家主张国家利益凌驾于法治之上，新政权采用了他们的倡议，想把德国统一在希特勒的"一个领袖，一种群众，一个国家"的口号之下。在纳粹德国，私营企业可以继续存在，但必须由国家严格监控；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有效利用媒体，彻底压制言论自由；所有违背纳粹主义精神的东西都被清除。

这个政权的文化政策在1933年的一场公开焚书运动中展露无遗，所有被视作反德的书籍全被烧毁；被禁作家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亨利希·曼、海涅等。海涅曾预言："烧书的地方，最终会烧人。"

纳粹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种族主义。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种理论，即德国人是雅利安人的主要代表，这个种族优于其他所有种族，处于统治地位。为了保护这个种族的纯洁性，必须清除所有能使其堕落的因素，比如犹太人，德国政府为此通过了专项法案。希特勒凭借1935年的《纽伦堡法令》，开始实施激进的迫害和消灭在德犹太人的政策。

种族主义与"生存空间"（lebensraum）这个词密切相关。希特勒认为德国应该占领更多领土来安置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意味着不仅要恢复德国第一帝国的疆域，还要征服东欧的土地，让劣等斯拉夫民族臣服于雅利安的霸权。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党的妄想和野心很快引发了20世纪初以来未曾有过的紧张国际局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样，认为有必要扩张领土，还承诺要有所建树，让意大利拥有可以比肩罗马帝国的辉煌。因此，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和非洲都采取激进的扩张政策。

1936年，意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爆发了一场冲突，墨索里尼以此为借口入侵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来说，赢得这场战争非常关键，因为40年前意大利图谋扩张到这个古老的非洲王国时，曾被打败。在入侵后一个月内，意军成功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被迫流亡海外。意大利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在罗马的奎里纳莱宫阳台上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墨索里尼在他身边向群众发表讲话，他说在意大利3 000年的历史中，这是最辉煌的时刻之一："意大利终于有自己的帝国了！"。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旗开得胜，取得了成功，对外投射出强大高效的正面形象，因此它们的影响力在欧洲不断扩大。葡萄牙总理萨拉查创建了一党制的、极为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权，赋予国家领导人独裁权力。西班牙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付出的代价高得多。

1936年7月18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起义军推翻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随后西班牙陷入痛苦的内战。佛朗哥领导的民族主义军队立即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只有苏联这个正式盟友。为了帮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阻止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和整个欧洲的发展，西方世界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由共产国际组建的国际纵队。就这样，西班牙的内战演变成一场国际冲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一次短兵相接。佛朗哥取得了胜利，法西斯—纳粹轴心赢得一局。严格地说，佛朗哥的意识形态属于天主教和保守派，但他的政权在头10年里显然受到两个盟国政治理

念的影响。

与此同时，希特勒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加强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创建德意志第三帝国也取得了进展，希特勒坚信德意志第三帝国将延续千年，是千秋大业。1936年，他下令占领莱茵兰，而该地区已经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约定完成了非军事化。两年后，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宣告两个德语国家合二为一。接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成为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

面对纳粹主义的扩张，应该怎么应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是欧洲公共舆论的一大焦点问题。在英国、法国以及欧洲其他民主国家，绥靖政策占了上风。英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甚至同情希特勒，认为只有纳粹主义才有能力对抗共产主义。人们还认为，一旦纳粹德国占领了德语地区，就会停止扩张。这是英法两国领导人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上见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时的真实想法。英国与法国急于避免战争，所以允许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地区。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峰会结束后宣布，（他赢得了）“不失体面的和平。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然而，他很快自取其辱，因为纳粹德国在1939年3月全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接着，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军队入侵波兰。英国随即向德国宣战，法国支持英国，意大利加入德国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去20多年，欧洲再次陷入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5年后，欧洲的冲突导致了另一场世界大战，这次战争甚至比上一次更持久、破坏力更大，对全球的影响也更大。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有少数民族和国家没有遭受破坏性影响，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幸运者大大减少。瑞士、葡萄牙、土耳其和西班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立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在欧洲以外，只有阿富汗是绝对的中立国。除了这几个中立国，世界上所有国家不是积极参战，就是被占领，甚至有时兼而有之。拉丁美洲的几个共和国也加入同盟国，反抗轴心国，不过它们大多数是在战争后期才象征性地加入，没有实际投入军队力量。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从斯大林格勒到缅甸，从北非到诺曼底，从菲律宾到夏威夷，人们每天通过报纸或电台关注最新战况，对那些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战役的发生地耳熟能详。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堂世界地理课。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本可以速战速决——如果德国的军事策略和计划能够奏效。这一次，德国军队在西线迅速取得了胜利，并在6周内成功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但是，他们低估了英国。

1940年5月，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丘吉尔一直警

告，与纳粹德国的交战不可避免，欧洲民主国家应当尽快勇敢地对抗希特勒，否则会为时过晚。这种态度和观点在绥靖政策占上风的时候非常不受欢迎——直到诸多事件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但是纳粹—法西斯已经攻城略地，英国独自抵抗似乎很不现实。丘吉尔内阁的几位成员认为，最谨慎的选择是与德国和解，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只要它承诺不干涉大英帝国。但是这样就意味着要放弃欧洲的自由民主和英国传统上一直努力捍卫的价值观。丘吉尔确信，纳粹胜利则意味着文明的终结，“人类黑暗、可悲的罪行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毒暴君。”他如此描述法西斯政权。因此，除了血战到底，别无选择，尽管这位首相起初拿不出什么来对抗在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的德国军队，他只有他在一次著名演讲中所说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1940年6月，为了迫使英国屈服，希特勒对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在他认为英国实力被大大削弱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延长战争。这个决定对德国人来说很惨痛，这意味着要开辟东线战场。6月22日，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启动。希特勒想通过这次行动巩固德意志第三帝国，击败共产主义。然而，尽管德军最初取得了成功，但是很快，他们和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一样意识到，在冬季，辽阔的俄罗斯冻原根本无法征服。从那时起，德意志第三帝国开始体会到过度扩张的苦果，德军不得不双线作战。

欧洲国家交战，几个国家被德国打败的事实为德国的盟友日本提供了机会，它可以趁机占据那些被打败的国家在亚洲的领地。几十年来，日本一直效仿西方的发展和扩张模式，现在，作为轴心国的盟友，它要巩固在亚洲的霸权。美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大障碍。于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了美军的珍珠港基地，这直接导致美国政府决定参战，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对日本宣战。为了支持日本，德国向美国宣战。就这样，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一场全球性战争。欧洲人一直要向全球传播文明，却不止一次把区域性冲突扩散到全世界。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盟军获胜的关键因素。丘吉尔得知美国向日本宣战后的评论一语中的：“我们已经赢了。”

丘吉尔和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都清楚，没有美国的支持，他们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美国为盟国提供了战胜轴心国所需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欧洲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战后主导新世界格局的是美国，而不是古老的欧洲强国。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个月，美国已经在和英国讨论战后世界秩序的问题。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与罗斯福在纽芬兰海岸会晤，两位政治家联

合发表《大西洋宪章》，阐述了他们在后纳粹时代将遵循的政策。在核心原则中，有一条是两国都不再开疆拓土，领土的问题应尊重相关人民的意愿，而且认可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其他要点包括同意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全球经济合作、航行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大西洋宪章》是一项协议，希望以欧洲殖民扩张以来一直推崇的理念和原则为基础，建立世界新秩序。另一方面，丘吉尔接受了新国际秩序，神圣的大英帝国和其他欧洲帝国将不复存在，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帝国将不得不放弃统治其他大陆人民的特权和从海外领地获得经济利益的专有权。

盟军战胜轴心国，离不开巨大的协调工作，许多人为此牺牲了生命。从欧洲国家殖民美洲开始，大西洋世界从未有1942—1945年这一时期团结一致。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法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并肩作战，赢得了这场战争。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盟军打开了西线战场，从此希特勒统治欧洲的时代进入尾声。与此同时，苏联在东线击退了德军，许多苏联人为此付出了生命。1945年4月30日，盟军进入柏林，希特勒自杀。就在两天前，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他们的死亡以及这两个国家的正式投降标志着纳粹法西斯时代结束了。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因为日本还没有战败。1945年8月，为了迫使日本投降，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同时开启了原子能时代。

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最大，人类的破坏能力在这场冲突中登峰造极。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死亡人数，6 000多万人在这场冲突中失去了生命，但准确数字无法确知。根据一些统计数据，如果把因为饥荒和与战争相关的疾病死亡的人也包括进来，这个数字会上升到8 000多万。仅仅苏联的死亡人数就高达2 700万。斯大林曾评论，为了打败纳粹，“英国人贡献了时间，美国人贡献了金钱，苏联人贡献了热血。”德国和波兰分别有近800万和600万人死去。在欧洲之外，世界各地的伤亡都很惨重。美国有41.9万人死亡；日本则有310多万人死亡。[16]欧洲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也伤亡惨重。英属印度的死亡人数约为260万；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死亡人数约为350万；法属印度支那的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在这场战争中，平民受害者的数量远远高于军队；城市、乡村和军事基地、战场一样，也成为敌方的打击目标；妇女、儿童、老人和士兵一样，死于战争。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写道，在二战中，任何人都无法幸免。[17]

战争释放出的破坏力量不断升级，使得使用原子弹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个由美国人执行的行动最初由欧洲人发起，也得益于来自欧洲的美国科技人

才，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和匈牙利核物理学家齐拉德一起签署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建议美国开始研究原子能，否则这项研究很可能被德国拔得头筹，那会对盟军造成灾难性影响。1945年，美国进入核时代，人类的杀戮和毁灭能力达到上限，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因为从那时起，战争变成了自我毁灭。

在这场战争中，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严重，这也是死亡人数如此高的原因之一。集中营最初由欧洲人在殖民战争中使用，欧洲人把它当作一种隔绝和控制大量敌人的有效方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党把集中营变成了灭绝营，把那些不受他们认可的民族关在里面，用最快、最复杂的屠杀手段（如毒气室）去大规模杀害他们。奥斯威辛、毛特豪森、达豪和其他纳粹集中营都实施了这些方法，它们成为人性残忍的象征。在这场战争中，犹太人是种族灭绝的主要受害者，约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迫害，其中大多数死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德国及任何被德国征服的领土上灭绝犹太人。大屠杀采用了最残暴的方法，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反犹太主义达到巅峰。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决定彻底终结欧洲的犹太人——他们做到了，一个事实是，在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乌克兰以及其他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完全消失了。

1945年，当死亡集中营被解放时，全世界才知道了大屠杀的存在。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一些纳粹领导人因为反人类罪被绳之以法。在人类历史上，种族灭绝曾多次发生，但是从没有以这样的形式发生过。大屠杀给人类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曾经支持纳粹党的德国人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无论他们是否自愿，他们都助长了这种恐怖行径。大屠杀让全体欧洲人都经受了精神创伤，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在文明和各方面都发展到最高形式的大陆怎么可能会退化到这么野蛮的程度？德国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是大屠杀的一名幸存者，她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恶之平庸”[18]。人类——尤其是欧洲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下了很多被摧毁的城市。德累斯顿被盟军彻底炸毁，战后城市的断壁残垣令人印象深刻；还有12个德国大城市同样被摧毁；在明斯克、基辅和华沙等城市，很难找到一座完好的建筑；法国沿海城市勒阿弗尔和卡昂同样被毁坏；英国的考文垂等其他工业城市也未能幸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800万人被运到德国做奴工，1945年后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乌克兰和波兰、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间都有人口流动。可以预见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德国人在战后被强制要求回到他们的祖国。

从1945年开始，欧洲经历了再次民族化的过程。1945年后，除了南斯拉夫，欧洲国家的民族变得更加单一，他们固守边境，不被鼓励去往邻国。各国都自我孤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产品、思想和人的交流都降到最低。20世纪早期的欧洲是斯蒂芬·茨威格在其回忆录里渴望的昨日世界，那时，欧洲人不必出示护照就能越过国界，自由地从里斯本到华沙，从都柏林到雅典。这样的世界在1914—1945年间消亡了。从那时起，欧洲各国实施严格的边境控制，彼此间缺乏信任，欧洲人越来越难以穿越自己的大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人开创出的开放社会已经完全消失。

从1914年开始，欧洲国家沿着国界不断分化，1945年迎来了最大的分裂——欧洲大陆分裂成两个阵营。战争使西方民主国家和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结成了不太稳定的联盟，目的是击败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但是，一旦希特勒被打败，这个自由民主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联盟就走到了尽头，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决心要在他战争期间占领的地方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这些国家都有苏联军队驻扎，斯大林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布尔什维克把革命传播到全世界的理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斯大林说："每个国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制度推广到自己军队能到达的地方。"[19]

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会晤，讨论战后欧洲的未来，丘吉尔对斯大林获得的权力感到震惊。盟军赢得了二战，但欧洲国家付出的代价是一半欧洲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影响范围。这里出现了二战的一大悖论：英国是因为决心捍卫波兰的独立而对抗德国，导致冲突爆发，但最终却允许苏联控制这个国家。1946年，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说："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这象征欧洲分裂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在苏联主导下的共产主义集团，另一个是以市场经济和民主为特点的西方集团，后者将得到美国的支持。

二战结束也标志着欧洲不再拥有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美国在1900年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945年，世界经济霸权正式从欧洲转向美国。战争毁掉了欧洲，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经济元气都被耗尽。

二战的经济影响可以概括为欧洲经济被部分摧毁。战胜国和战败国的经济都被这场近6年的战争消损殆尽。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的影响最严重，因为德国工业产出的很大一部分都被用为战争赔偿。然而，德国的工业赔偿远不能帮助其他欧洲国家复苏经济。只要对比一下英国、法国任何一座城市的战前战后状况，就足以了解这些国家被战争摧毁的程度。

1944年，在美国的主导下，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44个国家参会并通过了构建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1945年后，英镑迅速被美元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要求解放市场，开放殖民帝国已建立的

经济集团。因此，英镑和欧洲强国的货币在其殖民地的特权时代就此终结。二战结束后不久，凯恩斯被英国政府派往华盛顿，商议从美国获得一笔贷款，用于重振英国经济。这一旅程成为一个明确的标志：经济世界的霸权已经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在战后的衰落尤为明显。除了失去世界霸权之外，欧洲还分裂成两个新阵营，即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

1945年，联合国诞生，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有5个国家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欧洲大国主宰国际关系的时代彻底结束。在独享5个世纪的世界霸权之后，欧洲迎来了与其他国家分享全球霸权的时代。

关于这两场战争的著述汗牛充栋。关于这两次发生在近代欧洲黑暗时代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已有深入分析，但是，还有一大问题尚未得到梳理和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战和二战为什么开始，而是为什么没有被预见和预防？为什么欧洲人没能预料到战争的破坏性影响？

---

[1] Max Hastings, *Catastrophe 1914: Europe Goes to War* (William Collins, 1914).

[2] Meredith, *Fortunes of Africa,* p. 495.

[3] Meredith, *The fortunes of Africa.*

[4] Meredith, *The fortunes of Africa.*

[5] James, *Raj.*

[6] Alex Calvo and Bao Qiaoni, *Forgotten Voices from the Great War: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13(49).

[7]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8* (Penguin, 2005), p. 691.

[8] Margaret Macmillan,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9] Macmillan, *Paris 1919.*

[10]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14–1922* (New York: Henry Holt, 1989).

[11] T. E. Lawrence, *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Radford, Va.: Wilder,

2011).

[12] Patrick Kinross, *Ataturk: The Rebirth of a Nation* (London: Phoenix, 1993).

[13] Kinross, *Ataturk*.

[14] Mamillan, *Peacemakers*.

[15] Taner Akçam, *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7).

[16] Antony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2).

[17]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

[18] 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对命令的绝对服从，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编者注

[19]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15).

第十章

离乡去国，
远走他方

迁徙与流亡的欧洲知识分子对全球的影响

在20世纪上半叶，移民仍然是大多数欧洲人的基本需求。从苏联到葡萄牙，从挪威到希腊，许多欧洲人离开自己的出生地，远渡重洋，到另一个大陆度过一段时光甚至整个余生。移民成为欧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19世纪后几十年里席卷整个欧洲的移民潮在1910—1920年达到高潮，移民潮在一些国家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下半叶。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欧洲人不断增加，大大增强了欧洲文化在一些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在这一时期，推动大规模迁徙的力量却不同于此前几百年——许多人并非因为经济压力离开自己的家园，而是由于宗教、种族和政治原因。

19世纪的欧洲建立了代议制和民主政府，文明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欧洲人开始享有法治，公民自由言论、出版和集会的权利得到保障。移居到其他大陆的欧洲人将这一文明理念传播到他们经停的各地。

另一方面，虽然自由文明取得了发展，但是从19世纪末起，其他社会运动和思想也开始影响欧洲，最终挑战了欧洲文明的本质，对20世纪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前文谈到，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交织，成为推动19世纪政治变革的一大力量，后来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民族主义理论家以历史、语言、种族、宗教等因素定义民族认同，非常排外，倡导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性，抵制外来影响。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对主流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保护本地民族的纯正性、抗拒劣等种族污染的呼声越来越大，许多欧洲人对此深信不疑。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催生出政坛左右两派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所有这些现象相互叠加的结果是，许多欧洲人在20世纪头几十年里被迫背井离乡。最糟糕的是，他们当时往往并不觉得自己正在离开一个伟大的文明，而是庆幸自己逃离了野蛮。

1886年，法国给美国赠送了一件礼物——自由女神像，以此表达法国对美国这个伟大国家的钦慕以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此，当所有移民进入纽约港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雕像，其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设计师的预想，自由女神像成为一个全球性标志，象征了来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对美国的期望——自由。生活的自由、工作的自由、实现梦想的自由，以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必再恐惧政治迫害、种族迫害或宗教迫害。

美国早在1900年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需要劳动力来保持其非

凡的增长，也需要移民居住到其广阔的领土上。在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和社会明显更欢迎来自欧洲的移民，国家边界向欧洲人开放，同时，有时却将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拒之门外。[1]从墨西哥越过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拉丁美洲移民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甚至来自波多黎各的人也很难融入美国人的圈子——虽然他们是正式的美国公民。那些穿过美国边境的亚洲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中国人尤其如此。188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切斯特·艾伦·阿瑟签署了《排华法案》，严令禁止中国人进入美国。该法案直到1943年才废止。

美国被公认为最好的机会之地，其边界完全向欧洲人开放，因此，去往美国的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埃利斯岛是美国最繁忙的海关办事处所在地，在1910—1920年移民数量达到峰值的10年间，有200多万意大利人、150万瑞典人和挪威人经由这里进入美国。[2]同时，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移民也急剧增长。爱尔兰人延续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移民潮，不停地移民到美国。

面临数量巨大的欧洲移民，美国政府变得越来越挑剔，开始从大量申请入境的移民中选择自己所需的移民类型。1917年的一项法律禁止文盲移民美国；1924年的一项法律特别不利于南欧人和东欧人，美国政府对那里的移民数量设置了最高配额。毕竟，美国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建立的国家，统治精英们认为，如果来自天主教或东正教国家的意大利人、波兰人不断增加，会威胁到美国人未来的身份认同。虽然美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实施了各种限制措施，但欧洲移民最想去的目的地仍然是美国。当然，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因为美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都向欧洲人开放。

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移民越来越心仪由欧洲人建立的、人口稀少的大国。对英国人，尤其是苏格兰人来说，加拿大非常有吸引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除美国之外的好去处，爱尔兰人越来越热衷于移民到这里。巴西不再只是葡萄牙移民的目的地，它开始接受来自更多欧洲国家的移民。邻近的阿根廷也成为移民的天堂。对这些国家而言，欧洲人的涌入既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也巩固了这些国家身份认同中作为欧洲分支的特性。

在这些接受移民的国家中，阿根廷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在20世纪初，它是人均财富排名全球第十的富裕国家，发展前景一片光明。这一非凡的成就离不开欧洲移民。阿根廷政府早在19世纪中叶就积极促进欧洲人向阿根廷移民，从那时起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一艘艘船满载着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络绎不绝地抵达阿根廷港口。移民数量巨大，在20世纪2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中，有一半是出生在外国的移民，大多数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其中在1901—1910年这10年间抵达阿根廷的移民约有50

万。[3]随着阿根廷是机会之地的消息传遍欧洲，欧洲其他国家去往阿根廷的移民也开始增加。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这位年轻的希腊商人在20世纪20年代渴望离开自己的国家，去他乡寻找财富，他最终选择了阿根廷。他成功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烟草行业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奠定了在20年后成为全球富豪的基础。

欧洲人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始于19世纪中叶，从此，欧洲移民建立起遍布世界各地的关系网，加强了欧洲与其他大陆之间的联系。移民与留在祖国的家庭保持联系，为后来到达的新移民铺平了道路，使他们到异国他乡定居的过程更加顺畅。就这样，欧洲移民成为在其他大陆推广欧洲文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不论他们定居在哪里，一旦达到一定规模，欧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就会在那里落地生根。

最成功的欧洲移民关系网无疑是定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籍爱尔兰人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4]爱尔兰人不断移民到美国，数量稳步增加，他们逐渐不再是贫困的代名词，也不再被边缘化，而是成为一个强大、有影响力的族群。第三代美国人阿尔·史密斯被称为20世纪初美籍爱尔兰人的发言人，他力陈爱尔兰人的选票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曾4次当选纽约州的州长，并在1928年成为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迎来其政治生涯的巅峰。

爱尔兰裔美国人之间的通婚也有助于爱尔兰人扩大他们在20世纪美国的影响力。菲茨杰拉德家族和肯尼迪家族联姻就是最好的例子。肯尼迪家族最杰出的成员是约翰·肯尼迪，他是美国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他的父亲是身价数百万美元的约瑟夫·肯尼迪，他对美国媒体把他的家族称为爱尔兰人耿耿于怀。“要怎么做才能成为美国人？”作为波士顿人，他代表第三代出生在美国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发出了抗议。[5]当然，这对肯尼迪家族并不是一个障碍，他们最终登顶美国社会，令美国人民钦慕不已，他们称肯尼迪家族是美国的“皇室”。

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行为模式与爱尔兰裔美国人相似。意大利裔美国人在纽约最为强势，这使得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能够轻松在此定居和谋生。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国人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是纽约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市长之一，这标志着意大利裔美国人成功融入美国权力圈。但是从负面角度看，臭名昭著的意大利黑手党，如阿尔·卡彭等公众熟知的黑帮人物，使得人员、资金、违禁品和家族世仇也在意大利和美国之间快速流动与蔓延。

在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移民关系网加强了这个地区在20世纪与伊比利亚半岛的联系，大大缓解了它们在国际上的政治对抗。古巴这颗昔日西班牙帝国的明珠在1902年独立后继续吸引了大批西班牙移民。安赫尔·卡斯特罗的生平经历表明，尽管古巴官方有不少反对西班牙的言论，但

西班牙人很容易在那里立足并兴盛发达。安赫尔·卡斯特罗是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省的农民，1898年，安赫尔·卡斯特罗首次前往古巴，加入西班牙军队，与叛乱分子交战。1905年，他回到加勒比海岛，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成为一个富有的地主。他的生平直至他死后才为公众所知，因为他的儿子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了20世纪50年代的古巴革命，是20世纪拉丁美洲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20世纪60年代以后，墨西哥成为欧洲移民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法国人对墨西哥尤为热衷，因为拿破仑三世曾在这里开展了殖民冒险活动。20世纪初，墨西哥的欧洲移民主要是西班牙人，到30年代后期尤其如此——因为西班牙发生内战，而墨西哥政府支持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墨西哥接收了许多流亡的西班牙人。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生活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他们大多数都很容易地安顿下来，开始在墨西哥的新生活，甚至兴盛发达起来。其中他们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是西班牙企业家和慈善家埃乌拉里奥·费雷尔，他和许多在西班牙内战后被迫流亡的西班牙人一样，在1940年来到墨西哥。几年后，他创建了一家名为“费雷尔”的宣传公司，后来发展成墨西哥最大的公司之一。在致富之后，费雷尔成为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慈善家，推动了大西洋两岸文化项目发展，他的原籍国西班牙给他颁发了多项奖章。

和埃乌拉里奥·费雷尔一样，许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移居美洲，成为最后一代“去美洲”的欧洲人——“去美洲”之风始于18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与先辈移民一样，他们中有些人成为幸运儿。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移民来到美洲，为加强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提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西班牙语世界重要性的认识。

20世纪，在欧洲大陆以外的欧洲人引起举世瞩目——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移民，而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几项非凡的成就。在15世纪，欧洲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开启了大航海时代；4个世纪之后，这种好奇心继续让他们创造出卓越的成绩。20世纪初，欧洲探险家征服了北极和南极。在到达地球上最冷的两极地区之后，他们将目光投向全球最高的山峰。数百年来，攀登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一直是挑战人类能力极限的壮举，这在1953年终于成为事实。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率领的英国探险队在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的帮助下，成功登上了全世界的最高峰。当太阳在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落下，当欧洲霸权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时，登顶珠穆朗玛峰为欧洲持续5个世纪的探索时代奏响了雄浑的终曲。

20世纪初，一些痴迷古文明的欧洲旅行家为考古学做出了巨大贡献。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贵族和业余埃及古物学家卡纳文勋爵的资助下，开始挖掘开罗的帝王谷。1920年，卡特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图

坦卡蒙墓，这是所有埃及法老墓葬中保存最完好的陵墓。这一发现惊动了世界，大大提高了整个西方对古埃及和考古学的兴趣。

赫赫有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也因为考古来到近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劳伦斯正在大马士革从事考古研究。从那时起，他凭借对阿拉伯人民的热忱和了解，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成为对现代阿拉伯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有一个德国人和劳伦斯很相似——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莱奥·维克托·弗罗贝纽斯。他承担了一项很冒险的任务：在苏丹和埃及策划反抗英国统治的阿拉伯起义（与劳伦斯不同的是，他失败了）。弗罗贝纽斯多次在非洲探险，对民族学和考古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人们铭记。在1904年的刚果探险之后，他力主非洲亚特兰蒂斯说——这是一个远古时代在南非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他的研究得到非洲人的广泛褒扬，因为这有助于恢复非洲人的尊严和身份，与欧洲殖民统治时期把非洲人视为低等种族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20世纪初欧洲移民潮中另一个重大的变化趋势是，不仅穷人和无名小辈移民到其他大陆，在遥远的外国定居，许多知识分子和贵族也开始向外国移民。

在20世纪之前，经济窘困是推动欧洲人向其他大陆大规模移民的主因，所以移民中绝大多数是穷人。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欧洲知名人物决定离开欧洲，到其他国家定居。吸引他们的不仅是一些国家有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异域的生活经历也极其重要。

1912年，因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而闻名于世的西班牙作家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决定移居阿根廷，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圈成为一个成功的公众演说家。伊巴涅斯决定在阿根廷境内的潘帕斯草原创建一个专门种植水稻的农业殖民地。他把这个殖民地命名为新瓦伦西亚，以此纪念他在西班牙的家乡。他雇用了许多来自瓦伦西亚的移民，但是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以惨败告终，到1914年，他几乎一文不名，不得不回到欧洲。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他创建的这个阿根廷殖民地成功了，因为它被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大米市场。

另一位著名作家是丹麦的卡琳·布利克森男爵夫人，她更加广为人知的是她的笔名伊萨克·迪内森。1914年，她随丈夫汉斯·布利克森男爵移居到英国在东非的殖民地，在那里建设一座咖啡种植园。从经济角度看，种植园破产了，这段冒险完全失败，卡琳·布利克森不得不在1931年返回祖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独特的体验为她创作《走出非洲》提供了基础——这部回忆录的开篇第一句就很引人入胜：“在非洲的恩贡山脚下，我

曾有一个农场。”她以非凡的才华讲述了欧洲人在非洲感受到的自由感，非洲人的生活节奏以及一碧万顷的大自然带来的愉悦。她笔下的这种天堂般的生活是在殖民主义鼎盛时期少数在非洲的欧洲冒险家和乡绅才能享受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中上阶层，那些最具冒险精神、不拘陈规的人开始风行去远离欧洲的地方定居，法国人和英国人尤其如此。这种自愿的流亡可能与战争和战后几年的冲突氛围有关，许多人厌倦了欧洲这个旧大陆的政治斗争和苦难，希望去寻找更加振奋人心、更和谐的生活。

1926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离开家园，在长途跋涉一年多后到达非洲殖民地。这次经历让他写成了《刚果之行》。他以动人的笔触讲述了在非洲腹地的见闻。和其他了解这一地区的欧洲作家一样，纪德对所见所闻感到震惊，在作品中严厉批判了殖民主义，谴责殖民者对当地人民的剥削以及法国公司对他们的虐待行为。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缅甸的一段生活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期的创作。奥威尔在1899年出生于印度，缅甸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他在1922年进入英属印度的警察部门，并被派往缅甸任职5年。这段当警察的艰难经历激发他写出了小说《猎象记》，并于1936年出版。他在这部作品里讲述了他作为警察，不得不去执行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包括镇压那些憎恨殖民政府的人。在西方批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作品中，这是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白人一旦变成暴君，就毁掉了自己的自由。”这位著名作家写道。

旅行和在欧洲以外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的休闲方式很快在欧洲富人中流行开来。早在这个时代之前，这种经历就被视为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在18—19世纪的英格兰，大游学是年轻贵族的时尚选择，他们往往去欧洲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到20世纪，大游学的地理范围扩展到欧洲大陆以外，耶路撒冷、开罗、亚历山大和丹吉尔是希望体验东方魅力的年轻人最愿意造访的目的地。还有一些人远行到印度、远东，甚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欧洲人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区殖民之后，依然保有一份好奇心，想去了解各地特色。但是，这些游学者与殖民时代早期的冒险者几乎没有共同点，因为他们会精心规划路线，住最好的酒店，而且一旦遇到麻烦，总有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来帮助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享有更好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旅行更快捷、更安全。

1872年，托迈酷客旅行社在英国创立，专门为出国旅行提供服务，多年来几乎垄断了这一市场，甚至德皇威廉二世在1898年也是通过他们的服务完成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旅行社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涌现，市场迅速扩张，出国旅游成为激情和优越地位的象征，也是人口不

断增长的欧洲的生存需求。这为将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产业奠定了基础——旅游业。

与这些出国休闲旅游或自我流放到国外的欧洲人截然不同，20世纪最值得关注的欧洲移民是因为宗教迫害而背井离乡的。在猎巫行动、宗教裁判所、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数百年争斗之后，世俗主义取得了很大发展，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能够实现信仰自由。然而，在19世纪，宗教迫害是欧洲出现移民大潮的主要原因之一。

反犹太主义在欧洲一直存在。从中世纪开始，犹太人被几个欧洲国家驱逐，被迫迁往这个大陆的其他国家。他们大多能与邻近的基督徒和平共处，在新地方安顿并发展起来。然而，从19世纪后期起，几个国家的反犹太主义愈演愈烈。从俄国驱逐犹太人的大屠杀到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各种冲突促使犹太人认清一个事实，尽管他们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欧洲，但是他们在这个大陆的未来非常不确定。因此，在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去往美国的移民大潮中，犹太人的数量激增。1880—1920年，有200多万犹太人移民到美国。[6]但是，彻底改变欧洲和世界各地犹太人命运的是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出版的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犹太国》。

赫茨尔在1860年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人的中产家庭，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他在维也纳定居下来，以新闻记者和文学评论家为业。他没有宗教信仰，也不要求妻子和孩子遵守犹太习俗。从外表和生活方式来看，他与维也纳的其他中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横扫奥地利和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的反犹太主义浪潮使他开始反思犹太人在欧洲大陆的身份问题。

1895年，在法国军队服役的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诬告为德国进行间谍活动，被判处叛国罪和监禁，当时赫茨尔正在巴黎。在德雷福斯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赫茨尔感受到法国人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情绪，这让他确信欧洲永远不会完全接受犹太人，只有建立一个真正的犹太国，犹太人的未来才能得到保障。但是，在哪里建立这个国家呢？他在《犹太国》里提出，犹太人应该回到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最初来自那里。

赫茨尔并非第一个提出建立犹太国的人。犹太人中一直存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传统，他们认为犹太人要回到以色列的锡安山。“明年我们就在耶路撒冷过节了。”很久以来，犹太人在每年赎罪日或逾越节等传统节日时都会这么说。到19世纪，许多人都倡议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定居。1836年，来自普鲁士的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联系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特非奥里家族（后者是定居在伦敦的犹太金融家族），期望他们对建立犹太国提供经济援助。[7]有了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开始渐渐增加。不过，大大推动犹太复国主义发展，使它成为一场影响欧洲的运动的是赫茨尔。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赫茨尔担任主席。从那时起，在他坚定不移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援助，其中不仅有犹太人和同情他们的人，甚至还有一直反对犹太人的人。

由于当时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赫茨尔决定向一个有足够权威的人申请援助，希望获得他的正式支持，通过这位权威人物向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提议一起合作建立犹太国。赫茨尔找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非常喜欢这个提议，因为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去除“我帝国寄生虫”的大好机会（他曾这样描述在德国的犹太人）。[8]于是，他在1898年去往耶路撒冷时，中途在君士坦丁堡停留，向奥斯曼帝国苏丹提出了这个建议。然而，不出意料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拒绝就放弃他帝国的任何一部分进行谈判，无论这部分有多小。“犹太人可以省下几百万了。如果我的帝国分裂了，他们也许不用花钱就能得到巴勒斯坦。但是除非我们死了，奥斯曼帝国才可能分裂。”[9]这位苏丹愤怒地回答道。

在赫茨尔努力说服富人和权贵的同时，许多姓名不详的犹太人也开始移民到巴勒斯坦，这奠定了他们未来国家的基础。1883年，约有2.5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20世纪初，巴勒斯坦45.3万居民中有2.8万犹太人。在那些年里，犹太人迅速分散到巴勒斯坦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由于俄国反犹太人的示威活动不断扩散，几艘船满载着犹太人离开敖德萨港驶往他们的圣地。其中一条船的乘客是一群拥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世俗信仰的犹太人，他们已经创建了“犹太国家基金会”，计划购买距离耶路撒冷约50英里，当时属于阿拉伯人的雅法港沙丘上的一块土地。1909年，他们在那里建起一座城市，取名为特拉维夫，意思是“春天之山”。特拉维夫由在欧洲接受过专业培训的移民建筑师设计，德国包豪斯建筑学派的影响特别明显，几十年后，这座城市成为欧洲现代主义风格的典范。这座城市不仅建筑风格别具一格，而且其奠基人秉持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中一个名叫大卫·本—古里安的年轻人后来在犹太教徒和中东政治圈中影响特别大。

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表态使赫茨尔在巴勒斯坦建犹太国的计划困难重重，不得不搁浅。他开始寻找替代方案，在无所不能的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影响下，1903年，英国政府提出在乌干达建立犹太国。赫茨尔接受了这个提议，认为在非洲的中心地带会比在巴勒斯坦这个犹太人的发源地更容易实现他的梦想。但是，不久之后他意外地死于心脏病，乌干达计划未能真正启动。

在赫茨尔去世几年后，哈伊姆·魏茨曼采取了几步非常重要的行动，有力地推动了犹太人的建国大业。魏茨曼出生在俄国，在俄国开始驱逐犹太人时

他先逃到德国，后来转移到英格兰，在那里做药剂师。他是一个好战的锡安主义者（即犹太复国主义），力主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并得到了很多伦敦人的支持，包括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贝尔福在1918年承诺要支持这项伟业。魏茨曼还与在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英国人——阿拉伯的劳伦斯讨论了他的梦想。劳伦斯原则上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他觉得犹太人建国有利于阿拉伯世界：“我认为犹太人会带去西方的影响，这对中东国家非常重要。”[10]

1918年6月，劳伦斯同意带着魏茨曼一起穿越他非常熟悉的阿拉伯沙漠，把魏茨曼介绍给阿拉伯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即未来的伊拉克国王——费萨尔王子。费萨尔接受了犹太人建国的目标，但他认为范围要限定在叙利亚王国境内——他想要统治那里。就这样，魏茨曼不仅得到了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支持，更难得的是，他得到了阿拉伯世界主要人物的支持。

魏茨曼在其他重要领域也取得了进展，奠定了未来犹太国的基础。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计划把西方知识引入巴勒斯坦。他比喻说：“犹太国没有大学，就像摩纳哥没有赌场。”1918年7月18日，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一神论宗教代表和城市政要的见证下，魏茨曼为一座建筑铺下第一块基石，这就是希伯来大学。

从1920年起，巴勒斯坦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人口稳步增长。在《贝尔福宣言》发布之后，1917—1925年，约有9万犹太人抵达巴勒斯坦。1924—1925年，8.2万犹太人逃离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来到巴勒斯坦。[11]1933年，纳粹党统治德国，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

许多犹太人意识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并非一场短暂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事态比这严重得多，所以他们决定尽快离开欧洲，以免为时太晚。1933年，3.7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12]迅速增加的移民改变了那里的人口构成，犹太人开始成为巴勒斯坦人口中的大多数。到1936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达到10万，而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总人口只有6万。这时阿拉伯人开始反对犹太人在他们认为完全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上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巴勒斯坦骚乱不断，英国政府不得不撤销原先支持在此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并在1939年宣布支持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治理巴勒斯坦，还设置了犹太移民人数的上限。对在欧洲的犹太人来说，英国的这份宣告来得不是时候，因为纳粹的军队已在欧洲大多数地方横行，并实施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样一来，犹太人只有通过两种办法才能避免被送往集中营：藏起来或逃跑。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集中力量帮助犹太人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约600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命的消息震惊了全

世界，对建立犹太国的国际支持因此空前增长。大卫·本—古里安成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向英国政府施压，希望尽快建立犹太国，并取消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在本—古里安之前，由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激进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争取犹太人的权利。

和大多数锡安主义领导人一样，梅纳赫姆·贝京出生在俄国，他在战争期间经受了更多犹太人被镇压的恐惧。虽然他在纳粹的迫害中幸存下来，却被苏联人逮捕。他从苏联逃往巴勒斯坦，最终在1942年抵达那里。在经历了种种磨难，终于到达圣地之后，贝京决心不再被动地等待英国的支持，而是采取主动措施，推动建立犹太国。作为地下锡安主义组织伊尔贡的成员，他在1946年负责下令轰炸英国政府位于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总部，造成91人死亡。几个月后，英国政府宣布放弃巴勒斯坦，把该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联合国。

在英国决定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后，犹太人的建国梦终于实现了。1948年5月14日，大卫·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同一天，他被任命为总理，魏茨曼任总统。在建国的最初3年里，以色列的人口翻了一番，主要是涌入的欧洲移民。大多数移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有20多万犹太人从波兰和苏联移居到以色列。195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回归法》，赋予全世界犹太人回到这个新国家和成为以色列公民的权利。

以色列建国可以视为欧洲向外扩张的最后一个阶段。但是，抵达这片土地的犹太人与前4个世纪中代表各帝国在世界各地定居的欧洲人共同点很少，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移民或殖民者，而是一群最终得以聚集到祖先发源地的人，他们大多为自己永远离开了欧洲而庆幸。尽管如此，这个犹太国家的创建人来自欧洲，他们在欧洲文化的熏染下长大，受到欧洲社会模式启发。那些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犹太人读的都是欧洲的大学，他们在那里获得了关于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思想，并在以色列付诸实施。因此，以色列是一个诞生在中东地区的，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的西方国家。

当许多欧洲的犹太人因为宗教迫害向外移民时，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欧洲还因为政治迫害的蔓延使许多知名人士开始流亡。

从19世纪开始，俄国的移民数量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有增无减，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建立也引发了流亡潮。许多公民，特别是上层社会的人为了谋生而远走他国。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1917年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后掌俄国。他的经历集中体现出流亡的俄国人面临的艰辛生活。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克伦斯基意识到，如果他落入革命者手中，一定会被处决。所以他设法藏匿起来，不久之后离开俄国前往巴黎，在那里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1940

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克伦斯基被迫再次寻找避难所。这次他觉得该永远离开欧洲，所以和妻子一起移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许多俄国人都走上了类似克伦斯基的道路，既有带着所剩不多的珠宝和财物逃离的贵族，也有只求活着离开的底层农民。俄国的革命和内战持续到1921年，在此期间，大约有200万人离开了俄国。[13]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认为自己是流亡者，其他人则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谋生的地方而移民，大多数人是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原因离开俄国。1917年后，巴黎、伦敦等城市的俄国人数量迅速增长，但更多的俄国人最终选择了美洲作为目的地，因为那里不像欧洲这么动荡，有开始新生活的机会。

美国显然是大多数俄国人首选的目的地，阿根廷和加拿大也很受欢迎。这些国家已经形成许多俄国人社群，他们在革命之前已经组织起来，目的是保持他们的文化特色。1933年，一群流亡的贵族成立了俄罗斯贵族协会，每年组织一次舞会，受到在纽约的俄国贵族欢迎。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俄国人的社群越来越政治化，常常成为苏联境外反对苏共政权的堡垒。1970年，克伦斯基去世，但是纽约所有的俄罗斯教堂都拒绝为他安排葬礼，因为教徒们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能胜利，他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拒绝为他提供埋葬地。结果，他的尸体不得不运往伦敦。

尽管最初的俄国流亡者是布尔什维克反对者的代名词，但是革命很快开始出现内部纷争。斯大林上台后，他的竞争对手也开始逃离莫斯科，其中最著名的是托洛茨基。这位苏联的前领导人在1929年开始流亡，第一站去往哈萨克斯坦，然后是土耳其，最后于1937年在墨西哥定居。但是，这个遥远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安全。1940年，托洛茨基被杀害。

来自俄国的流亡者不断流向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批判在苏联发生的事情。被流放的不同政见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索尔仁尼琴。他在1974年到达美国，此后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苏联解体。在他离开的同年，他的朋友、著名音乐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托罗波维奇也离开了苏联，开始流亡。尽管在美国的流亡者无法影响到苏联国内的人，但他们在全球更广的层面上产生影响，成为苏联政权强大的敌人。索尔仁尼琴尤其如此，他在美国能通过所有必要的方式推广他的文学作品，传播他对苏联政府的看法。

苏联在中欧和东欧建起了卫星国，那里也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因政治原因被迫流亡。捷克作家乔瑟夫·史考弗瑞奇就是这种情况，他是著名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也是后来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所属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群体的发言人之一。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史考弗瑞奇带着妻子逃往加拿大，在那里度过余生。

另一个著名的来自东欧的流亡者是金融家、慈善家和政治活动家乔治·索罗斯。1930年，索罗斯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家庭，在1947年，他随家人移民到英格兰，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远离匈牙利，他才能开创与他志向相匹配的事业。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完成学业，并在1956年搬到纽约，在那里开始了他辉煌的金融生涯，成为巨富。几十年后，他捐出自己的财富，用于促进东欧社会的发展。

除了苏联和部分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20世纪还有几个欧洲国家也发生了流亡。随着法西斯主义和独裁政权的兴起，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亡者不断增加。意大利在1922年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墨索里尼加强了对意大利社会的控制，流亡到瑞士、法国等国家的意大利人数量激增，流亡到美国的意大利人更是不胜枚举。政治家、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外交官卡洛·斯福尔扎等名人都选择流亡美国，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在反法西斯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葡萄牙，萨拉查的独裁统治引发了文化界和政界一些重要人物的外流。他们中许多人最初选择去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但是随着西欧政局恶化，巴西成为他们主要的目的地。葡萄牙共和国前总统贝尔纳迪诺·马查多也流亡到巴西，他和其他著名的政治家一起，把这个葡萄牙帝国的前殖民地变成了反对萨拉查政权的核心基地。

在20世纪欧洲的流亡史上，西班牙的位置非常特殊。西班牙内战是当代欧洲破坏性最强的事件之一，最后，西班牙国民军取胜，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解体，佛朗哥施行独裁统治，这引发了一大波流亡。

西班牙人的流亡始于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因为儿童会受到战争的影响，西班牙共和党计划疏散儿童，以免他们遭受战争的恐怖影响，西班牙共和党与不同的国家签订协议，约两万儿童被疏散到法国，约3 000儿童去了苏联。对去苏联的这群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因为二战期间他们不得不住在苏联，极少有人能再回到自己的祖国。

随着西班牙国民军逐渐占据上风，逃离西班牙的人数不断上升。1939年的数据表明，起初，绝大多数西班牙流亡者逃往法国，约有44万西班牙人。他们中许多人在20世纪40年代返回西班牙。但是还有约22万西班牙人永久流亡国外，没有再回到祖国，[14]其中绝大多数人移民到美洲，特别是墨西哥和阿根廷。

对西班牙流亡者来说，墨西哥非常重要。墨西哥政府从1936年起向西班牙共和党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并且在西班牙内战后仍然继续这种支援，因此西班牙的流亡政府最初设在墨西哥城，据说这个国家的西班牙流亡者人数是最多的。1939—1942年，2.5万西班牙人抵达墨西哥，墨西哥也因此成为佛朗哥政权的批判者的聚集地之一。

内战让西班牙文化的白银时代落下了帷幕。从文化角度看，白银时代是西班牙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西班牙内战使得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纷纷被迫流亡，一些人流亡到巴黎和牛津，如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还有一些人前往拉丁美洲，主要是阿根廷。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有一段时间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那里有许多崇拜者，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决定返回西班牙。而作家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和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在阿根廷一直住到20世纪50年代末。作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和历史学家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在阿根廷一直待到佛朗哥政权垮台。这么多西班牙文化名人之所以选择流亡到阿根廷，是因为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那里有高学历的精英，还有大量机会。而西班牙流亡者的到来也极大地丰富了阿根廷的文化生活。

西班牙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也为墨西哥增色不少，包括著名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他在墨西哥执导了不少著名电影，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留下了持久的影响。还有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也接收了许多西班牙流亡者，包括智利、委内瑞拉、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远离自己的家乡是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出生于科尔多瓦的哲学家塞涅卡在流亡科西嘉时写到。然而，对大多数流亡美洲的西班牙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绝非无法忍受，他们在新世界的生活大大抚慰了他们曾在西班牙遭受的痛苦。他们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兴盛起来，因为战争让他们知道了自己的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文化亲缘使他们能够在移居国轻松定居，有些人还与当地人结婚生子。西班牙内战最有名的受害者之一，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曾说，西班牙人在去美洲之前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许多流亡者感到，在与这个曾属于西班牙帝国的新世界相遇之后，他们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他们流亡到那里，加强了西班牙语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此前100多年里它们已经日渐疏远。

纳粹德国引发了欧洲的另一波流亡潮。自从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纳粹党在德国掌权的那一天起，在德国的犹太人以及所有反对新政权的德国公民都感到自己的未来危若累卵。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其他极权主义政权一样，非常清晰地声明，任何不公开支持它的人都会被视为帝国的敌人。

希特勒崛起、第三帝国建立，这成为许多德国人长期流亡的开始。在第一批决定离开家园的人中，有一个极负盛名的德国人，他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33年4月，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在美国讲课时收到一个消息，德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犹太人担任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任何官方职位，他的名字出现在新闻公布的政府敌对分子名单里。从那一刻起，这位科学家

知道自己在德国的生活已经结束。返回欧洲后，爱因斯坦暂住在英国，等待移民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给他提供职位后，爱因斯坦越过大西洋，定居在美国新泽西州，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即使在纳粹政府垮台之后，爱因斯坦对德国的敌意仍然不减，拒绝与任何德国机构重建关系。科学界和文化界的许多人都效仿爱因斯坦，走上了流亡之路。面对旧欧洲的动荡，只有新世界能提供和平、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不仅犹太人选择流亡，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也选择逃离自己的祖国。1933年，德国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焚书运动，纳粹政府想通过这项运动消灭他们认为属于犹太人的思想和反德国的思想。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到托马斯·曼、亨利希·曼、斯蒂芬·茨威格和弗洛伊德等当代作家的作品，都被付之一炬。不久之后，绝大多数被焚毁的著作的作者都离开了德国。

托马斯·曼先去了瑞士，然后在1939年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他把美国称为“外国的家园”。战争结束后，托马斯·曼回到欧洲，但他选择在瑞士苏黎世定居，再没回到他出生的德国。他的兄弟亨利希·曼没等自己的书被烧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先在几个欧洲国家流浪了一段时间，然后移民到美国，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著名的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的经历非常具有戏剧色彩。当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时，他正住在那里。他先逃往英格兰，但是像许多因纳粹而流亡的人一样，他很快就决定离开这个冲突不断的旧大陆。1940年，这位奥地利作家抵达美国。但是当时美国正准备加入战争，这总让他想起刚逃离的欧洲。因此他被拉丁美洲吸引，于1941年移居到巴西。

斯蒂芬·茨威格对巴西很着迷。广阔的南美乡村给了他灵感，他在这里写出了《巴西：未来之国》。

在这本书中，这个因旧欧洲崩塌而烦忧不断的作者描述了那片热带土地上的快乐，那里没有旧世界的冲突，这是一个富裕且机会很多的国家，就像是一个改进版的西方文明世界。然而，他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他在巴西的快乐生活，另一方面却因目睹自己出生地的文化被毁，欧洲因战争衰落而悲伤不已。最终，他在1942年选择了自杀。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随着纳粹德国不断扩张，欧洲流亡者的人数迅速增加。德国入侵法国后，欧洲大陆的最后一个自由堡垒——巴黎也沦陷了。巴黎被占领后，许多法国名人如戴高乐和雷蒙·阿隆都搬到了伦敦。许多来巴黎躲避极权主义的欧洲人断定，只有去大西洋彼岸，才能真正安全。

几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从被纳粹占领的法国逃往美国。著名的犹

太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成功逃出集中营，在她的丈夫、马克思主义诗人海因里希·布吕赫的陪同下于1941年来到美国。意大利外交官、反法西斯政治家卡罗·斯福尔扎在20世纪20年代流亡到巴黎，在1940年决定移民美国。奥地利政治家和作家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也是如此。因纳粹扩张而流亡的科学家和政治人物很多，还包括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埃里克·弗洛姆、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等。

许多杰出的欧洲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定居到美国的几个大城市，促使美国不同的政治群体开始讨论欧洲的未来。1943年，以促进欧洲一体化为目标的国际泛欧联盟创建人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决定充分利用他流亡纽约的时机，在那里主持一次大会，讨论欧洲一体化这个宏大的议题。参加那次大会的有政治家、学者和流亡作家，包括托马斯·曼、卡罗·斯福尔扎、希腊政治家索福克勒斯·韦尼泽洛斯以及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奥托·冯·哈布斯堡。几位美国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所有来自欧洲的流亡者有一个共同点：战争使他们远离自己的祖国，因此他们都支持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的这一构想，1922年，国际泛欧联盟成立。奥托·冯·哈布斯堡信奉欧洲主义，他一直认为欧洲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战争是旧大陆衰落的主要原因。因此，要结束这种下行趋势，欧洲各国就必须联合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美的大学成为学习和研究欧洲过去与未来的中心，有许多欧洲人在这些大学的院系任职。美国大学热烈欢迎欧洲的科学家、学者、作家和政治家，这激励了许多人前往美国，他们有些人在美国永久定居。

除了前文提到的爱因斯坦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大多数流亡美国的作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与美国的大学或多或少有合作。托马斯·曼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汉娜·阿伦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等一流学府讲课，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在纽约大学授课。西班牙杰出的生物学家塞韦罗·奥乔亚与一所美国大学签订了合同，在那里他的职业生涯得到充分发展，他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塞韦罗·奥乔亚并非个例，从20世纪30年代起，几个欧洲国家的科学家不断向美国移民，他们都在美国取得了不凡的职业成就。

虽然没有政治原因迫使英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但也有一些学者决定去美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因为那里的大学比在纳粹轰炸下艰难生存的英国大学更有吸引力。1940年，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离开英国，二战期间他在纽约各个学术中心讲学并与他们开展合作。

美国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一直与欧洲的大学保持稳固的关系，许多美国大学，特别是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样最负盛名的超一流

大学，从成立之初就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榜样，而且它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20世纪中叶起，美国的大学开始超越欧洲的大学，成为吸纳英才的中心。北美最好的大学比欧洲的大学财力更加雄厚，竞争力越来越强，它们打破了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的政治、宗教、种族偏见，海纳百川，对所有人才开放。美国很知道如何利用时机。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界的欧洲名人选择移民到美国，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以及开展研究、发展知识所必需的条件。他们中许多人在美国如鱼得水，决定留在那里发展自己的事业。

欧洲流亡的人才被美国吸引，加快了西方的科学和知识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占据了国际大学排行榜的前几名，超过了大多数欧洲大学。美国大学的研究中心取得了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尽管他们往往是后来才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欧洲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314个美国人中，有94人出生在欧洲，[15]其中还有许多人是第一代美国人，他们的父母是来自欧洲的移民。

不仅美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受益于来自欧洲的知识分子，美国文化总体上也因来自欧洲的流亡者而受益匪浅。库尔特·魏尔等剧作家和乔治·巴兰钦等舞蹈家、编导丰富了美国的表演艺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阿图尔·鲁宾斯坦等伟大的音乐家在移民美国后创作出许多不朽的杰作。

欧洲人才对快速发展的美国电影业影响尤其巨大。卓别林、希区柯克、奥黛丽·赫本和伊丽莎白·泰勒等导演和演员对好莱坞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人的贡献也非同一般，比利·怀尔德、弗里兹·朗、恩斯特·刘别谦和大明星玛琳·黛德丽都来自德国。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由欧洲极权主义和政治迫害引发的欧洲人才流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仍在继续。当时，虽然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政治迫害已经结束，但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无法与美国开展科学竞赛，而且欧洲人才外流已经让它们失去了大量人才。一方面是战后欧洲实力匮乏，无法吸引最有才华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另一方面是美国继续敞开大门，向欧洲移民提供他们在原籍国缺乏的一切，包括经济激励和获得职业发展的机会。结果，美国成为有才华和抱负的人最青睐的目的地，美国社会各界都因此获益颇丰。

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领先是实现世界霸权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欧洲统治世界的时代，欧洲国家一直拥有这些优势，但最终在20世纪失去了这种优势，世界霸权地位让给了美国。对旧大陆来说，唯一的安慰是，和欧洲劳工为美国变成经济大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样，欧洲人才流向美国，使美国登上了科学和技术的顶峰，为美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

纪后来被称为“美国世纪”。

欧洲移民，尤其是移往美国的移民一直有增无减，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最后一波移民潮谱成了欧洲国家向外扩张的终曲，欧洲霸权已经日薄西山，这个时候欧洲移民去往其他大陆，能够加强欧洲的影响，传播西方文化。

然而，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移民潮象征着欧洲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大力量，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移民潮就不能被如此诠释。因为大规模移民既发生在爱尔兰、波兰等贫穷国家，也发生在英国、德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这么多欧洲国家的公民希望移往其他大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欧洲的经济正陷入停滞，他们的社会不再有发展机会。而新世界的年轻社会百业待兴，隐藏着各种好机会，新世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以及欧洲人最喜欢的目的地，美国。早在经济数据证实这一点之前，无数移民似乎都已经猜到了20世纪将是美国世纪，西方世界的中心将转移到北美。

20世纪欧洲的宗教和种族迫害导致了移民潮，这削弱了欧洲的力量，最终成为其衰落的标志。对犹太人的迫害引发了犹太复国运动，几个欧洲国家因此流失了金融、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除了犹太人外流之后留下的真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也使欧洲文化的许多成就受到质疑。如此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动发生在这个诞生人权理念的大陆上，这是这个先进社会开始退化的一种迹象。

至于由政治原因导致的移民潮，有几个国家将承受知识分子外流的后果——欧洲人才的流亡，给这些国家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文化真空，给这个民主的摇篮和启蒙运动的诞生地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

[1]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2]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3] Quesada, *La Argentina.*

[4] Michael Coffey, *The Irish in America* (New York: Hyperion, 1997).

[5] Peter Collier and David Horowitz, *The Kennedys: An American Drama* (M W Books, 1984).

[6] Birmingham, *“The Rest of Us.”*

[7] Simon Sebag Montefiore, *Jerusalem: The Biography* (New York: Knopf,

2011).

[8] Montefiore, *Jerusalem*, p. 376.

[9] Montefiore, *Jerusalem.*

[10] Montefiore*, Jerusalem.*

[11]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8).

[12] Gilbert*, Israel.*

[13]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1996).

[14] Henry Kamen, *The Disinherited: Exile and the Making of Spanish Culture, 1492—1975* (London:Allen Lane, 2007).

[15] nobelprize.org.

第十一章

探索真理

欧洲帝国的遗风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影响世界

1929年，圣雄甘地决定像西方人一样写自传。他说："在东方，没有人做这种事情。"他更深层的动机并非仅仅是讲述他如何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而是要揭示自己灵性的觉醒和激发他不断寻求真理的历程。因此，他把这部自传取名为《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在这本书出版20年后，印度独立，甘地成为那些寻求印度独立，想摆脱欧洲帝国统治的人的引路明灯。但是真理——甘地热切追求的真理，导致一些人对后殖民世界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将看到，许多独立运动领导人理想中的社会与已经深受欧洲文化影响的现实世界往往会发生冲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殖民帝国开始分崩离析，30年后几乎完全消失。这个去殖民化过程的吊诡之处在于，它并非殖民地反抗或独立运动的结果，而是因为欧洲以及西方世界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要求终结殖民主义，引起了公共舆论的广泛关注。

1902年5月31日，《弗里尼欣和约》签订，英布战争结束。在近3年的交战后，英国人赢得了这场战争，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的主权划归英国。但是，英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打败布尔人，英国军队不仅采用了焦土战术，甚至还使用了集中营——这是20世纪战争和极权主义恐怖统治最邪恶的象征之一。西班牙在古巴战争期间率先采用了集中营，1898年美国在菲律宾也采用了这一手段，但这两次都是针对叛乱分子，而英国却用集中营来对付普通布尔人。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布尔人深受过度拥挤和营养不良之苦，许多人死于传染病。关于集中营可怕的生活条件的消息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广泛愤怒和自由党的谴责。于是，政府指定自由党和力主女权的米利森特·福塞特领导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确认，约有2万布尔人死于集中营，占囚犯总数的30%。

《弗里尼欣和约》的条款并非对所有布尔人来说都是不利的，因为他们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仅仅9年后，南非成为英国的自治领，由一位前布尔将军领导。英国为打赢这场战争付出了高昂代价，但结果是，大英帝国必须给予大多数人民很高的自治权，才能在20世纪继续存在下去。英布战争后，在19世纪撼动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影响殖民世界。从那时起，英国和其他欧洲帝国不得不密切关注民族运动，并学会与它并存，以求生存。

欧洲人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和反帝国主义活动家的言论大大削弱了殖民帝国的声誉和内部凝聚力。1904年，《凯斯门特报告》在英国出版，这一报告的作者罗杰·凯斯门特是一名出生在爱尔兰的英国外交官，在殖民地有丰富经验。作为英国驻刚果自由邦的领事，凯斯门特目睹了比利时人对原住民实施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凯斯门特与他在刚果结交的记者E. D. 莫雷尔，一起组建了“刚果改革协会”，莫雷尔一直在英国媒体上严厉谴责刚果人权状况，希望吸引人们关注刚果人的处境。“刚果改革协会”赢得的第一个重大进展就是英国政府命令凯斯门特对此开展调查。

凯斯门特交给英国议会的《凯斯门特报告》详细揭露了刚果自由邦的殖民者对当地人的虐待和伤害，包括对非洲人实施奴役、截肢和酷刑，他断定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不仅通过占有这块土地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而且还允许殖民者对当地人采取暴力，甚至谋杀他们，这造成了刚果人的大量死伤。[1]

面对这份报告，欧洲的殖民帝国没有保持沉默和冷漠旁观，而是积极推动刚果自由邦解散。英国首相将这份报告发给比利时总理，以及在1885年在柏林会议上签署了《总决议书》的，同意瓜分非洲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坚持下，比利时政府下令组建一个独立的研究委员会。最后，比利时政府于1908年宣布接管刚果自由邦。自此，刚果正式成为比利时的殖民地，被称为“比利时的刚果”，由比利时政府直接管理。

凯斯门特从此被称为“人权报告之父”。在担任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时，他继续谴责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暴行，他在巴西调查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活动，发表了一份与前一份报告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描述了秘鲁亚马孙公司对普图马约部落的暴行。最终，秘鲁亚马孙公司被指控对当地人实施奴役和种族灭绝，于1913年被关闭。

从20世纪早期起，文化界和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展开严厉批评，有力地扭转了公共舆论，反殖民主义蔚然成风。伟大的英籍波兰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是其中的突出代表。1902年，他根据自己在刚果自由邦的经历创作并出版了《黑暗的心》。这部被称为西方文学杰作之一的小说讲述了查尔斯·马洛的冒险经历，唤起人们对殖民主义的恐惧，在书中，查尔斯·马洛是一个英国水手，被一家比利时公司招募，负责通过非洲中心地带的一条河流运输象牙。约瑟夫·康拉德在这部小说中还刻画了另一个人物，法国商人库尔茨先生，他是腐败、不道德的典范，去刚果的欧洲人被视为有库尔茨先生的这些特点。这部小说让人们认识到，欧洲人自称把文明带入非洲，事实上却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如英国的柯南道尔、法国的阿纳托尔·法朗士，也通过他们的作品与媒体合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摇旗呐喊。在学术界，反

帝作品开始激增，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影响力尤为突出。他通过写作反对英布战争和侵犯他人的爱国主义，霍布森在1902年出版了《帝国主义》。在这部著作里，霍布森解释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市场扩张和经济扩张，需要殖民地的新市场，最终导致了帝国主义。而整个系统都建立在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利益的基础上，所以非常不道德。

霍布森批判帝国主义的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毫无疑问，反帝国主义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左翼思想的主要流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迅速传播。

共产主义之父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罪恶，解释资本主义终将失败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规律。然而，他们的分析基于他们所了解的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却没有分析资本主义对殖民世界的影响。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都持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向其他大陆传播欧洲文明有助于帮助那里的人民摆脱落后和被压迫的境地。然而，在20世纪，他们的追随者对欧洲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扩张的看法完全不同。

列宁是马克思最杰出的追随者之一，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革命家，终生致力于推动共产主义革命。他不仅是革命者，也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霍布森一样，列宁把20世纪的资本主义解释为大国通过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全球现象。在这位俄国革命者看来，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

1917年，列宁出版了一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在书中阐述道，帝国的公司在当地市场聚敛了不少财富之后要把它们投资出去，因此必须占有殖民地，以这种方式创造出新市场。在此过程中，帝国成为传播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殖民地复制了相同的剥削制度：当地人被拥有土地、公司和生产资料的寡头剥削，而文化和种族差异导致了更严重的虐待和迫害。列宁的观点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当时，包括殖民地独立运动在内的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人们在寻求能替代殖民秩序的新秩序。

另一个严厉批判帝国主义的左派思潮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巴枯宁、彼得·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会推动一种不好的社会秩序向前发展。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巴枯宁说：“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有做自己的权力。”这个原则后来激起了许多反抗帝国主义的起义。对宣称“财产就是盗窃”的蒲鲁东来说，殖民主义是一个系统，欧洲人通过它向其他大陆传播

西方社会的财产法律——但西方社会已经因此腐朽。克鲁泡特金认为，帝国主义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对抗和角逐的最高形式，这阻碍了人们期望的集体制，使人与人相互合作的理想社会无法兴起。

无政府主义者急于摧毁既有秩序，严重威胁到许多大国的稳定。他们采用谋杀国家元首和权力最高代表的策略，并取得了很大成功，无政府主义的恐怖行动导致欧洲和美国的诸多重要领导人死亡，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西班牙总统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到美国总统林肯和威廉·麦金莱，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些谋杀大多改变了历史进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帝国的领导人意识到有许多因素威胁到它们的地位，既有新兴大国，也有领地内的独立运动，还有提出替代性政体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他们最大的恐惧依然来自其他帝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多次面对与其他种族和文化的对峙之后，欧洲人仍然最害怕自己人——尽管他们属于同一种族，拥有同样的西方文化和相同的文明理念。对欧洲强国来说，最大的威胁往往是接壤的邻国，所以它们认为劲敌并不在遥远的地方，而是就在欧洲大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欧洲帝国全部瓦解。从1947年起，欧洲人逐步放弃了占据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投入了无数人力、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本的领地。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大多通过谈判、签订友好协议，和平地转移权力，结束了殖民统治。在精心计划的仪式上，前殖民宗主国与新独立国家的最高政要相互表达尊重，而且两国之间往往会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对欧洲帝国来说，最难的事情是接受失去曾经给他们带来财富、权力和帝国地位的殖民地这一事实，尽管有时候，一些领地的去殖民化实际上减轻了宗主国的负担。

在20世纪40年代初，人们很难预见到殖民帝国会迅速消失，其中一个原因是除了印度等少数殖民地外，大多数殖民地还没有充分的独立愿望。而且，英国、法国这两个最强大的宗主国是二战的战胜国——战争常见的结果是，战胜国会以牺牲战败国为代价扩张领地。当然，战败国不会自愿放弃领土。

了解去殖民化过程的关键在于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特别是地缘政治利益，以及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对抗苏联的心态。

去殖民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在1919年提出的一项自决原则。在美国干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得以获胜。美国政府认为，和平及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应该是美国的原则，而不是欧洲的扩张野心——这已经造成了太多的冲突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决原则被用于重构欧洲

版图。尽管许多民族依据这个原则组成了国家，但是结局并不是都很好。无论怎样，这一原则没有对殖民帝国产生直接影响。

自决原则在大英帝国应用后，第一个受害者是爱尔兰。数百年来，爱尔兰人一直反抗英国的统治。1921年，爱尔兰自由邦宣布成立，同时，位于爱尔兰北部的6个郡，旧称阿尔斯特的地区却决定其主权继续归属英国。就这样，自决原则将爱尔兰岛一分为二，这表现了自决原则可能引发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大英帝国的另一个领地，埃及的独立运动成功了。在他们持续反抗了3年后，英国政府于1922年决定让这个保护国独立。英国其他的殖民地的治理与一战前一样，但印度独立运动的大潮高涨，那里的法律和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这在后面章节将有讨论。

在殖民世界的其他地方，欧洲国家的影响没有发生变化，摩洛哥除外。1922年，反殖民主义领导人克里姆领导里夫人起义，反抗西班牙人的统治。在里夫共和国宣布成立后，西班牙一直无法恢复对这个保护国的控制权，直到1926年，法国—西班牙的一支联合远征队终于击败了克里姆。

1929年10月以后，殖民地世界的局势发生巨变。华尔街股市的崩溃引发了整个西方世界及殖民地的危机。许多商品和殖民地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许多行业陷入崩溃，许多地方的人民陷入贫困。结果，在殖民地，原先只是把支持或容忍欧洲殖民当作权宜之计的人这时突然起而反抗了。

1931年，英国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条例》，英联邦正式成立，条例确定英国及其自治领都是“大英帝国内的自治主体，彼此权利平等，互不隶属，只是名义上都效忠于英国王室”。成立英联邦看上去是一个理想的方式，既给予自治领独立地位，同时又保持彼此的经济联系以及它们对英联邦元首的忠诚。但是，只有那些居民大多数是英国移民的地方获得了自治领地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纽芬兰、南非以及爱尔兰自由邦。其他殖民地都没能成为自治领，包括印度，尽管这可能是唯一能阻止印度人民支持完全独立的途径。

印度独立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1885年，已经退休的英属印度文官阿伦·奥克塔维安·休姆和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创建了印度国大党，他想借此搭建一个促进英属印度改革的公民平台和政治平台。国大党最初只有72人，后来关心印度殖民地状态的印度中产阶级逐渐被吸引。国大党从来没有表达过要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其主要目标是要让英国兑现承诺：英属印度是为了印度人的利益而存在，作为英国的臣民，印度人应该采用民主制度治理这个国家，否则印度就会成为另一个亚洲专制政权。

支持这种先进思想的人分布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以及英属印度的其他大城市里，他们是成功的新资产阶级，大多在英国和英国人创立的机构接受过教育，他们非常了解西方文化，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以及由其滋生出的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思潮。他们认为自己是印度整体利益的最佳代表，而且认为作为英国王室的优秀臣民，他们应该坚决捍卫这些利益。

到20世纪初，印度国大党变成一个群众党，吸引了背景各不相同的公民，并形成了类似西方大政党的结构。其最初目标是获得类似英联邦白人自治领的待遇，实现印度内部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王室拒绝给予印度自治权，国大党大多数党员对此非常失望，开始支持完全独立。在这一背景下，律师、和平主义者甘地当选总统。这个谦逊的小个子男人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也是20世纪印度最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使印度摆脱殖民统治的关键人物，也是非暴力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是印度人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正因为这样，甘地被称为圣雄，意思是“伟大的灵魂”。

年轻的甘地是英属印度打造出的模范公民。他在1869年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后去伦敦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移民到南非担任律师。作为大英帝国精英统治的产物，甘地有充分的理由忠于女王和大英帝国。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南非的经历，他仍然会是英国的好臣民。甘地在南非时惊愕地发现，那里的印度人和黑人都遭受种族歧视。有一次，他因为拒绝从已经买了票的头等车厢挪到专为有色人种服务的三等车厢而被赶下火车。在这次创伤性经历之后，甘地成为大英帝国和欧洲殖民统治的敌人。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他把余生贡献给这个国家的独立事业。他不再穿西装，而是穿上白色长袍，凉鞋也成为他反殖民斗争的主要标志之一。作为和平主义者，甘地拒绝使用暴力手段实现目标，他成功地通过和平手段，将非暴力不合作确立为印度国大党争取独立的方法。

印度没能获得内部自治权，也没能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因此，1929年，在尼赫鲁担任国大党主席期间，印度国大党宣布独立是其官方目标，非暴力不合作与和平抵抗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结果，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已经无法控制印度。然而，英国政府仍然拒绝放弃这颗大英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

在殖民世界的其他地方，虽然没有什么组织比得上印度国大党，但是确实也有地方精英和印度中产阶级一样，接受过欧洲国家最好的教育，他们认为自己和殖民地的统治者一样有能力，可以自我管理。但是他们还缺乏争取独立的意愿和能力，因为殖民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并未现出衰退趋势。相反，日本在1931年入侵中国满洲里，意大利在193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殖民趋势似乎仍在继续扩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有两大因

素阻碍了独立事业的发展。首先，殖民地对欧洲国家非常有用。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帝国控制了地球上1/3的土地，有殖民地的支持，它们的力量就强大得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英国在二战中得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部队的支持，印度派出了250万大军。其次，战争在各帝国激发出一种爱国主义和团结意识，殖民地的臣民也受到感染。

但是，从1942年起，形势已经很明朗，只要盟国赢得战争，欧洲帝国就注定会消失。我在前文中曾提到，1941年，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首次会见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丘吉尔迫切希望说服美国加入战争，站在英国这边。但他也意识到，这意味着要接受美国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后，《大西洋宪章》签署，其中一个要点是，两个缔约国同意不从这场战争中寻求领土收益。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一致认为，领土变更必须考虑到居民的利益，而且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

这份协议更多地反映的是北美而不是英国勾画的国际关系远景。罗斯福总统严厉批评了欧洲的殖民主义，并利用他的优势地位要求欧洲国家允许殖民地独立，于是帝国解体。丘吉尔急于表明英国的立场与美国完全一致——美国是他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他不想冒犯美国总统，所以接受了罗斯福提出的条件。

在这次历史性会晤之后，英国首相接受自决原则这件事引发了许多辩论。在丘吉尔回到伦敦后，被问到关于殖民地达成了什么协议时，他故意淡化了它的重要性，在谈自决问题时只提到了欧洲。[2]毕竟，丘吉尔曾说过，他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解散而成为英国首相的。但是，《大西洋宪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从美国加入战争的那一刻起，因为美国会要求按照它拟定的条件来实现和平。

在人类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战争——二战结束后，不同于传统的战胜国，英国和法国的处境非常不稳定，不但没有获得任何领土，而且它们很快就决定，不能坚守殖民帝国不放，英国与法国在新世界秩序中属于少数派，因此更难赢得支持。在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中，英国和法国占据了5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中的2个，另外3个分别是美国、苏联和中国，这3个国家的共同目标很少，但在新世界秩序中，它们都决心不给欧洲殖民帝国留任何余地。因此，丘吉尔把他的战争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取名为“胜利和悲剧”。

去殖民化因为两个事实率先从亚洲开始，第一，那里的独立运动取得了更大进展；第二，欧洲国家在几次交战中曾被日本打败。一旦殖民地的人民

看到欧洲人被击败，就不愿意再回到被欧洲人统治的生活。

1945年9月，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法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印度支那后，不得不从美国发放的贷款中调拨部分资金，用于向越南派兵，他们陷入了一场非常复杂的战争。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也面临同样曲折和不确定的命运。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领导人苏加诺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得到荷兰殖民地居民的广泛支持。虽然荷兰在东南亚有14万军队，但是荷兰政府决定把军事力量用在保卫这个地区的其余殖民地上。

和法国、荷兰对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的态度相比，英国对印度的态度更加务实，英国人决定最好是体面地结束在那里的殖民统治，而不是诉诸武力。对于印度，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曾评论说："只要统治着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旦失去它，我们会立即降为三流国家。"丘吉尔曾在下议院说："失去印度，对我们来说会是致命一击，从此，我们肯定会萎缩成一个小国。"[3] 尽管如此，他的继任者、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毫不犹豫地启动了放弃这颗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的计划，否则可能为时太晚。艾德礼任命蒙巴顿勋爵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这位享有盛誉的海军司令与英国王室有亲戚关系，他肩负的使命很微妙：和平地结束英国对印度次大陆300多年的统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印度国大党提出支援英国，条件是在战争结束后获得独立地位。但是英国政府拒绝了。从那时起，英国就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警察的强势镇压来制约独立运动。尽管甘地的追随者以和平方式抗争，但是其他独立运动团体支持武装斗争。到1945年，英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违抗4亿人的独立意愿。

作为英属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的使命不仅包括通过谈判确定如何结束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还包括监管从英属印度独立出来的两个新国家。从1940年起，印度穆斯林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一直要求由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单独成立一个国家。尽管甘地反对，但是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的其他领导人接受了按照宗教划分两国的方案。最困难的是怎么约定两个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印度独立法》授权从未到过印度的英国律师西里尔·拉德克里夫完成这项划定国界线的任务。他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划出巴基斯坦的边界，同时尽可能把印度教和锡克教的教徒留给印度。1947年8月14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立，随后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波及1 400万人。印度各地的穆斯林去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则前往印度。这条边界线几乎把旁遮普邦和孟加拉邦分裂为两半，最糟糕的是在此过程中引发了宗教团体之间的暴力事件，造成100多万人死亡，1 000万人被撵出家园。[4]虽然蒙巴顿成功完成了结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使命，但不论是他、尼赫鲁还是真纳都没有能够

阻止印度独立后的血战以及宗教和种族之间的仇恨。

1948年，在印度宣布独立后不久，圣雄甘地被印度的民族主义分子杀害。从那时起，他的非暴力主义在从英属印度独立出来的两个国家几乎消失了。1947年以后，印巴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个世纪以来因反抗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死亡人数，这摧毁了印巴关系，两国的冲突一直延续至今。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将面临成为新民族国家的重大挑战，包括要合并在英属印度时期实际上独立的王国，把法国的殖民地和飞地并入印度，合并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巴基斯坦由两部分构成：西巴基斯坦位于印度以北，东巴基斯坦在孟加拉邦——这注定会引发激烈冲突。1971年，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发起独立战争，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尼赫鲁、真纳等人的国家梦实现了，但是大英帝国统治下的盛世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却一去不返。

在结束对印度殖民地的统治后不久，英国人也撤出了巴勒斯坦，如释重负。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1917年宣布支持犹太人建国，英国成为第一个正式支持建立犹太国的国家。另一方面，阿拉伯的劳伦斯不断向阿拉伯人灌输建立自己国家的梦想。他们设想的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折中方案，都在巴勒斯坦建立新国家。但是这给这个地区和整个中东地区的英国人带来了许多问题。

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迅速增加，巴勒斯坦的纠纷越来越多。1936年爆发了一场阿拉伯人的叛乱（即巴勒斯坦人民起义），英国随即撤销了当初承诺支持建立犹太国的决定。而且，在纳粹迫害犹太人期间，英国为了防止与阿拉伯人发生冲突限制犹太人移民，这一立场被所有受到影响的人视为不人道。在大屠杀的残酷细节暴露之后，英国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面对这种困境，英国政府宣布希望结束其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并按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建议，希望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划分领土的艰巨任务转交给联合国。这加快了巴勒斯坦的分裂和以色列成立的过程。在以色列成立后，阿拉伯联盟成员（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埃及、黎巴嫩）立即向这个新国家宣战，以色列迅速占据上风——这只是以色列努力生存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一场重大冲突就这样开启了。

英国把关于以色列建国的所有责任都转交给了联合国。但是，对阿拉伯人来说，殖民帝国、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对在（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新国家都负有责任。从殖民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也不太支持以色列，因为它们认为以色列是西方世界在中东地区的代表。

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欧洲人并非都是自愿撤出殖民地的，有时是被强制

驱逐。在印度尼西亚，荷兰人与苏加诺的独立运动部队苦战了4年，徒劳无果，不得不撤离。1949年，荷兰女王朱丽安娜亲自把印度尼西亚的主权交给了对手苏加诺。

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苦撑了更久。1949年后，胡志明的部队得到了强大的新中国的支持。

在中国诞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表明，共产主义不仅会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在工业国家取得胜利，在农业国家也可能取胜。毛泽东不仅坚定地主张去殖民化，而且也愿意帮助反抗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农民运动。

在中国的支持下，胡志明的部队躲进越南的丛林中，法国人根本无法打败他们。而且，这场战争在法国越来越不得民心，法国左翼有很多人支持胡志明，认为他是正义事业的斗士。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1954年，法国政府就从印度支那撤军开始与越南共产党谈判，其结果深受朝鲜战争结果的影响，朝鲜分裂成由共产党执政的朝鲜和继续得到美国扶持的韩国。同样，越南也分裂成由胡志明控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由吴廷琰控制，得到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在持续了9年的冲突之后，法国终于把与越南的共产主义势力作战的责任转交给美国，而美国最终也无法打赢这场战争。

去殖民化迅速改变了1945年之前以欧洲霸权为特征的世界秩序。20世纪50年代，一些曾是殖民地的国家开始组织起来，捍卫它们在国际上的利益。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就是一例。26个去殖民化的国家召集了这次会议。除了东道主国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尼赫鲁代表印度出席会议，中国也派出周恩来总理参会。与会代表都同意，殖民地是一个应尽快根除的罪恶。大会还谴责了西方列强，敦促曾被殖民的所有国家都远离它们。尼赫鲁担任不结盟国家的发言人，谴责大西洋联盟是“殖民主义最强大的保护者”，还警告说，加入这个组织是亚洲和非洲国家无法容忍的耻辱。在与会代表中，有一个人似乎特别关注这个话题，他就是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

早在去殖民化运动开始之前，埃及就已经独立。1956年，埃及勇敢地顶住英法两国的压力，迫使它们撤出埃及。由此，埃及树立了一个坚持原则、战胜欧洲强国的榜样。

苏伊士运河是殖民扩张的一大象征，埃及独立后，苏伊士运河仍然被法国和英国掌控。纳赛尔掌权后不久，把这两个国家的人从埃及赶了出去。1954年，因为埃及与苏联的关系日益密切，美国拒绝向埃及提供贷款。于是，纳赛尔决定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苏伊士运河危机成为英国和法国的一大耻辱，因为这表明它们不再是强大

的帝国。在面临可能危害它们在世界各地利益的危机时，所有殖民大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都会采用武力来对付冒犯帝国利益、财产或其在国外的公民的反对力量。当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时，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法国总理居伊·摩勒也和他们的前任们一样，面临威胁帝国利益的危机。然而，1956年已经进入去殖民化时代，从前的策略由于几方面的原因不再适用。第一，在新世界秩序里，从前的殖民地和欧洲帝国在利益上完全平等。第二，欧洲帝国不再统治和主导世界。第三，在法国和英国之上，还有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决意要阻止这场冲突，它们认为这是殖民时代的遗害。

英国与法国在1956年难以战胜埃及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再也无法赢得国内公民的支持。此前，英法两国的公民在新闻的感召下，要求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的荣誉。但是在1956年，情况完全反转。英国舆论严厉批评英国政府卷入战争，英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并不公正。法国舆论也极度分化。在战后时代，大多数欧洲人还没有忘记战争带来的伤痛，不再相信使用武力的效率。

埃及最终赢得了苏伊士运河的全部主权，这极大地鼓舞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它们也开始敢于面对殖民大国，捍卫自己的利益。摩洛哥在1956年从法国独立出来后，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宣称对与摩洛哥接壤的几个西班牙领地拥有主权。1956年，摩洛哥伊夫尼爆发了一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穆罕默德五世派出军队进入该城。1958年，西班牙和法国联手，协调双方的军队发起攻势，西班牙成功收复那里的殖民地，又维持了几年。

法国有充分理由协助西班牙反击摩洛哥。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仅仅一年后，更多阿拉伯人的反抗事件爆发，使得法国更加难以坚守它最钟爱的一个殖民地：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对法国来说地位非常特殊，很多法国人已经移居到这个北非沿海地区，把它变成了非洲大陆上的小法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阿尔及利亚人口中占多数的穆斯林的代表提出独立请求，但地中海两岸的法国人对此都不予理会。1946年，法兰西联盟成立，法属阿尔及利亚被并入法国，法国政府希望以此表明它并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5]但是，这一措施也未能平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要求。

1954年，为了赢得独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发动武装斗争。起初看起来只是一场地方叛乱的事件很快升级为去殖民化时代的一场大战，法国军队陷入了与阿尔及利亚境内不同群体的交战。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改变了法国舆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态度，最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全力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是造成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垮台的主因之一。此后，戴高乐再次掌权，他被法国政界视为保住阿尔及利亚的希望。“法属阿尔及利亚万岁！”这位将军在1958年访问那片土地时高呼道。然而，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坦承，从一开始，他对法国保住阿尔及利亚的态度就很悲观。[6]

1960年，哈罗德·麦克米伦接替安东尼·艾登就任英国首相，他在南非议会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演讲，“改变之风正吹遍这个大陆。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民族意识都在不断增长，这是一个政治事实。”这篇“改变之风”的演讲标志着英国决定依循新的时代精神，让英属非洲殖民地独立。这次演讲使英国成为去殖民化的先锋，其他欧洲大国不得不效仿英国，否则前景不妙。不久后，戴高乐总统宣称自己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这位法兰西帝国曾经的忠实卫士明白，在去殖民化时代，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势不可当，如果逆势而为，法国政府必将付出很高的代价。

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达成协议后，1962年6月，阿尔及利亚人民就是否独立进行公民投票，绝大多数人赞成。法国把这个国家的权力交给艾哈迈德·本·贝拉。这个阿尔及利亚的传统主义者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之一，他的第一语言是法语。在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后，有近100万人立即离开了阿尔及利亚，返回法国，这个新阿拉伯国家因此经受了严重的人才和经济损失。

法属阿尔及利亚成为历史，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其他殖民地也逐渐消失。法国和其他殖民大国一样，起初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领地的去殖民化持保留态度，认为那里的居民还没做好建立独立国家的准备。尽管如此，到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也选择了顺应去殖民化的趋势。

1958年8月，戴高乐访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他在布拉柴维尔承诺说，所有法国殖民地都有机会选择独立或归属法国。由于绝大多数殖民地更倾向于独立，所以法国政府启动了快速去殖民化的计划。1960年，从毛里塔尼亚到乍得，从马里到马达加斯加，法国殖民地纷纷独立。

深受法国影响的比利时在同一年结束了在非洲的殖民冒险。多年来，比利时人一直拒绝考虑退出他们唯一的殖民地，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比利时政府的态度改变了。在帕特里斯·卢蒙巴的领导下，刚果民族运动党争取独立的斗争越来越强劲。1959年，利奥波德维尔（后改名为金沙萨）爆发叛乱，造成数百人死亡。比利时政府决定尽快让殖民地独立，以免卷入殖民地战争。

1960年6月，刚果举行独立仪式。此时，殖民者和殖民地原住民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有明显分歧。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很不明智地向他的祖父利奥

波德二世致敬，而利奥波德二世给这个殖民地留下了太多苦难的回忆。卢蒙巴在发言中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严厉批判了殖民主义强加给当地人民的苦难。

尽管比利时需要确保刚果和平过渡，但是在移交权力几天后，刚果就爆发了反抗，全国陷入混乱。刚果的局势非常紧张，以至联合国出面，才撤出了原计划在刚果独立后继续留在那里的8万比利时人。此后不久，卢蒙巴也被杀害。蒙博托·塞塞·塞科接过卢蒙巴的权力，建立了典型的一党制政府——这种模式后来成为非洲大陆的主流。1971年，刚果改名为扎伊尔共和国，民族主义和对殖民象征物的敌视使得刚果的外国公司和外国人都被迫离开，整个国家陷入贫困。这个国家还发生了严重的行政混乱和腐败。1960年，比利时人离开刚果后，在政府的1 000多个领导职位中，只有30名大学毕业生。[7]这个空白极难填补。

与此同时，大英帝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也在消失。加纳在1957年独立。3年后，尼日利亚和其他英属西非殖民地独立。英属东非殖民地的去殖民化过程更加复杂，尤其是肯尼亚。在此前几十年中，它已成为白人定居者最喜爱的地方。

为了应对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肯尼亚殖民地建立了议会，所有种族都有代表：黑人、阿拉伯人、印第安人和白人——但是白人占据了大部分席位。这种依照种族分配代表配额的民主制毫无意义，反而激起有色人种的愤慨，还导致基库尤部落一群反殖民主义的自由斗士发动了茅茅运动。为回应茅茅运动，英国政府在1952年宣布进入非常状态。要恢复这个殖民地的秩序，只有采取非常不得人心的措施，比如像英布战争一样，通过集中营控制参加叛乱的人。尽管当地白人坚持认为这些措施非常合理，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意为了保住肯尼亚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1960年，独立谈判开始。乔莫·肯雅塔是这个英属殖民地的代表，他也是肯尼亚国父，是后殖民时代的伟大领导人之一。

南欧国家整顿其殖民地的速度稍慢于北欧国家。刚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渴望在后法西斯时代增强对欧洲的影响力，所以相对较快地处理了殖民地事务。而西班牙、葡萄牙，尤其是葡萄牙，则用了更长的时间才放弃殖民地。

佛朗哥将军以非常务实的态度处理去殖民化事务。他不希望西班牙卷入殖民地的冲突，所以在1968年，西班牙准予赤道几内亚独立，一年后伊夫尼也被交还给摩洛哥。1975年，暮年的佛朗哥在西属撒哈拉目睹了“绿色进军”的爆发（由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发起的大型游行示威）。西班牙政府担心摩洛哥国内局势，所以开始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谈判，最终在1976年放弃了西属撒哈拉。而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想获得西撒哈拉领土的愿望

也受挫，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主张西撒哈拉完全独立。就这样，不仅欧洲大国受到自决原则的制约，那些依据此原则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出来的新国家同样受制于这一原则，这成为去殖民化过程中爆发许多领土冲突的肇因之一。

在萨拉查独裁统治下的葡萄牙出于几方面的原因拒绝让任何殖民地独立。对萨拉查来说，这是一种威望的象征，可以平衡当时葡萄牙这个昔日强国正在被边缘化的痛苦。有一次，萨拉查总统被问及他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去殖民化计划，他回答说，大概要到500年后才可能考虑。

然而，在去殖民化的大潮中，葡萄牙资源短缺，需要维持的殖民地又极其广阔，这个挑战非常大。1961年，印度政府下令占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葡萄牙除了抗议之外无计可施。在失利之后，葡萄牙决定加强对非洲殖民地的控制，特别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安哥拉共有约500万人口，包括50万欧洲人。20世纪60年代，那里发现了油田，这更加坚定了萨拉查政权保住这个殖民地的决心。但是安哥拉反殖民运动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活动使这一目标越来越难实现。莫桑比克的情况也很相似。为了维持这些地区的法律和秩序，葡萄牙不断增加那里的驻军人数，到60年代末，每4名葡萄牙军人中就有一个驻扎在非洲殖民地。

葡萄牙军队不满于驻扎在非洲殖民地，这是1974年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康乃馨革命）的一大原因，葡萄牙的独裁统治终结，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将军的临时政府开始着手推动去殖民化，但这个过程很不顺利。葡萄牙军队撤出后，约100万葡萄牙人离开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人撤出后，安哥拉的对立派系之间爆发内战；莫桑比克和几内亚因为革命游击队的活动陷入混乱状态。[8]

从20世纪中叶起，民族主义思想在非洲迅速蔓延，成为支持殖民地独立运动的主要思想。非洲人和19世纪的欧洲人一样，基于语言、文化、宗教、种族等因素，在建立国家的同时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认同。除了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之外，非洲白人也想把自己确定为一个民族，白人民族主义成为非洲冲突的另一个根源。

布尔人是非洲的第一批欧洲定居者，两个世纪以来，他们发展出南非白人的民族主义，这使他们凝聚成一个民族，共同面对环伺南非的外来人口和敌对人群。布尔人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们认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包括一些关键的区分要素，如白种人、南非语、新教信仰以及某些保守习俗，这让他们把自己定义为被上帝选择的人。所有这些身份标志不仅使他们有别于南非的其他种族，也使他们不同于英国人。

南非的民族主义导致南非政府建立了颇受争议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个制度把白人和黑人、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隔开，允许只占人口少数的白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和特权。

在去殖民化时代，属于少数派的非洲白人只能通过镇压来维护种族隔离制度。1960年，南非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平息反抗种族隔离的运动。在一次示威中，有60多人被警察打死。大多数反抗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都被关进监狱，其中有一位年轻律师名叫纳尔逊·曼德拉。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不仅使南非与邻国发生冲突，也引起英联邦的反对。所有英联邦国家都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南非政府的反应是宣布退出英联邦。1961年，南非宣称自己是一个与英国王室没有任何正式联系的共和国。毕竟，布尔人认为他们是第一批受害于英国殖民主义的非洲人，应该利用去殖民化运动的时机，切断与英国的关联。

非洲白人民族主义也导致另一个国家独立——罗得西亚。在塞西尔·罗得斯创建的这个殖民地上，只有不到10%的人口是白人，但是他们也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这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很大麻烦。1965年，白人民族主义党派，罗得西亚阵线的领袖伊恩·史密斯宣布希望使罗得西亚独立，但是英国政府要求他建立真正的民主制，让黑人和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罗得西亚阵线拒绝接受平等主义的民主制，因为白人只是少数派，那样白人会失去一切权力。于是伊恩·史密斯在1966年单方面宣布罗得西亚独立。自美国独立以来，这是另一个公然反抗英国政府的殖民地。事实上，伊恩·史密斯本人也提到了美国这个先例，以此证明他的决定合情合理。

英国的公共舆论基本支持罗得西亚白人维护他们文化和传统的愿望，但是哈罗德·威尔逊首相不愿意违背去殖民化的精神去容忍一个种族主义政权。因此，他决定对罗得西亚实施经济制裁。

对刚独立的罗得西亚来说，生存的主要障碍来自邻国和国际社会——联合国谴责它，只有南非承认它。不过伊恩·史密斯政府最不稳定的因素还是来自内部，少数白人民族主义者与罗伯特·穆加贝以及其他原住民团体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后者得到了邻国的支持，到70年代末，伊恩·史密斯看到自己的政权无法再继续下去，于是和穆加贝就重建罗得西亚进行谈判。而后津巴布韦在1980年正式成立，成立后不久就进行了全民选举，黑人和白人公民享有同样的投票权，穆加贝当选这个新国家（90%以上为有色人种）的总统。

在去殖民化的大潮中，伊恩·史密斯想让非洲白人继续受益和享受特权，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挑衅，最终成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湮没在排山倒海的反对力量中。在黑人的非洲，没有白人民族主义者的位置。

在罗得西亚的白人失败之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很快也步其后尘。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西欧国家给南非施压，要求南非终结种族主义政权。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少数白人长期以来把南非建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邻国的富裕、繁荣的国家，成就可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和西方的公共舆论看来，忽视人权的种族主义政权是不可接受的。

在联合国的经济制裁和西方政府施加的压力下，南非政府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并在1991年举行了第一次普选。所有公民都参加了选举，纳尔逊·曼德拉成为南非这个多种族国家的第一任黑人总统。

非洲的去殖民化是欧洲帝国衰落的最后一个篇章。欧洲国家创建了巨大的殖民帝国，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分布在各处的零星飞地。这些飞地的居民大多通过自决原则，选择继续保留旧宗主国的主权，不愿意被声称对它们拥有主权的邻国吞并。

殖民帝国留下的一些领地也引发了冲突。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总统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为争夺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向英国宣战。这些岛屿离阿根廷很近，所以阿根廷宣称拥有它们的主权。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不顾美国的建议，派出皇家海军，经过短战，收复了这些岛屿的统治权。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失败的耻辱。然而，在加尔铁里的独裁统治结束后，阿根廷的民主政府仍然声称拥有福克兰群岛的主权。

西班牙也不得不面对摩洛哥对休达和梅利利亚的领土要求——它们早在摩洛哥这个国家出现之前就一直是西班牙的飞地。一些非洲国家质疑加那利群岛是否应该属于西班牙，但无济于事，因为这一次，自决原则有利于西班牙。

但有一个地方，欧洲人毫无可能继续留在那里——香港。香港是大英帝国的成就之一，是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清政府后建立的殖民地，对英国的商业利益非常重要。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这座城市不断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制造业和金融中心之一，与新加坡一样，香港为亚洲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香港与其他欧洲殖民地的区别在于，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99年的租赁协议，才得到这座城市。

对中国人来说，香港象征着欧洲殖民主义对中国的羞辱。因此，中国外交部要求，在1997年租约到期后立即恢复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这次自决原则毫无用武之地，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和容忍香港的殖民地状态，而英国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力量采用武力来保住香港。

在1997年租约到期时，香港举行了历史性的主权交接仪式。查尔斯王子、英国首相布莱尔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贵宾参加了这一仪式。当英国的米字旗降下时，英国结束了在中国数百年的盘桓，而中国向成为全球强国又迈进了一步。

澳门是欧洲人在中国建立的另一个殖民地，其结局和香港很相似。葡萄牙人从未与中国签署有关租赁期限的协议，理论上可以无限期地占领这个城市。但是，在“康乃馨革命”之后，葡萄牙重新建立起民主制，政府决定通过谈判把澳门归还给中国。中葡双方同意，在1999年，葡萄牙将结束对澳门400年的殖民统治，而且和香港一样，澳门也适用“一国两制”原则，这可以让澳门人民延续以前的做事方式和生活方式。就这样，1999年，葡萄牙转交了澳门的主权，没有给当地人造成巨大影响。

后殖民世界被称为第三世界，因为它既不属于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第一世界，也不属于与苏联保持一致的第二世界。但是，令美国及前殖民帝国沮丧的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两极对抗中并不一定中立，而是成为冷战的另一个战场。

社会主义国家批判殖民主义，这使许多后殖民世界的领导人自然而然地支持苏联和中国。苏联经过工业化和现代化，快速改变了国家面貌。这种发展模式成为许多贫穷落后的殖民地想要效仿的榜样。

去殖民化为苏联和中国发展共产主义提供了绝好的机会。[9]越南是最明显的例子。胡志明在中国的支持下，打赢了与法国和美国的战争。苏联为非洲的共产党、反抗殖民主义革命团体、独立后的政府以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内战中的革命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刚果和贝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曼德拉领导的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当时的南非当权者认为，终结种族隔离会使南非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冷战时期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都实施“反共”外交政策，它们支持扎伊尔的蒙博托等非洲独裁者。第三世界有不少国家没有被共产主义模式吸引，但它们也并不一定赞成民主制。1947年后，全世界民族国家的数量急剧增长，但是民主国家的数量并没有如同西方国家所期望的那样，出现同比例的增加。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体制？后殖民世界的领导人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

就印度而言，国大党这个民主党派已经有长期的经验，明确宣布未来的印度是伟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独立后，这个人口数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对在英国读过大学的尼赫鲁、甘地以及其他来

自中产阶级的印度领导人来说，民主是唯一合法和可接受的政府制度。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同样致力于建立民主制，但是军政府在1958年接管了巴基斯坦的民主政府，最终产生了多数主义的伊斯兰民主制，完全不同于印度的自由民主模式。民主制在印度尼西亚只维持了几年，因为苏加诺总统认为它不利于了国家利益，他在1958年用专制政权取代了民主制。

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可以说是唯一实行民主制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大多建立了君主制政权或一党制政权，由通过政变执掌权力的强者统治。埃及的纳赛尔成为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领导人的榜样。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仅实际上不存在民主制，而且大多数国家的专制政权在暴力政变或部落战争中不断更迭，往往是最残暴的独裁者得以掌权。乌干达第一任国家元首伊迪·阿明以无情独裁者的形象闻名世界。在他掌权的9年中，他侵犯了所有人权，造成至少25万人死亡。

在所有非洲独裁者中，最奢侈的无疑是中非共和国总统让—贝德尔·博卡萨。他曾在法国陆军服役，在1966年发动一场政变后，博卡萨成为中非共和国绝对的独裁者，统治这个国家达13年。他不满于终生总统的权力，在1977年决定加冕自己为皇帝。为此，他举办了一个非常奢靡的仪式，花掉了国家整整一年的预算。他的反共立场赢得了法国的支持，但是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对自己与这位独裁者的友好关系感到懊悔，在1979年派出军队协助推翻博萨卡的野蛮专政——这被称为法国的最后一次殖民探险。

另一个典型的非洲独裁者是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蒙博托建立了盗贼官僚政权，不仅聚敛了巨量财富，而且他对卢旺达胡图族的支持也导致了现代史上最恶劣的种族灭绝——卢旺达大屠杀，胡图人在卢旺达对图西人实施了残酷的种族灭绝，造成近100万人死亡。这导致了一场破坏性更大的冲突：第一次刚果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蒙博托政权被入侵的卢旺达部队推翻。民族对抗又导致了第二次刚果战争，约20个代表不同派系的武装群体加入战争，9个非洲国家卷入其中，因此这次战争也被称为“非洲的世界大战”。2002年，各方签署了和平协议，并组建了一个过渡政府，负责恢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稳定（在1971年，蒙博托将刚果国名改为扎伊尔共和国）。这场战争造成550多万人死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死伤最多的一次战争。[10]

在后殖民时代的最初几十年里，非洲大陆遭受的恐怖与凯斯门特在20世纪初所谴责的恐怖行径不相上下。约瑟夫·康拉德曾把非洲大陆称为“距离文明最远的一个点”。一个世纪后，它仍然没有真正缩小与文明的距离。

文化和身份认同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往往存在争议。独立运动领导人利用历史和当地习俗这些非常有用的工具确定新国家的特征，塑造凝聚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作品被用来颂扬过去的辉煌。和欧洲领导人一样，这些前欧洲帝国殖民地的领导人也将历史、文化、宗教甚至种族特征视为民族自豪的标志。他们的民族凝聚力往往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形成，敌方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被拒绝。因此，许多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发起了去西方化的运动，目的是根除旧殖民帝国的影响并消灭它们的权力象征。在这方面，最激进的是柬埔寨的独裁者波尔波特，他在反对西方和资本主义的运动中甚至禁止使用西方医学。

尽管如此，后殖民时代的民族认同并非总能强大到能根除殖民地的影响或取缔欧洲人的习俗。圣雄甘地呼吁印度人恢复当地习俗，拒绝所有从西方进口的东西，找到印度人的灵魂。尼赫鲁则对坚持印度古老的传统很警惕，因为它使许多人陷入贫穷。他倾向于工业化和世俗化，跟上现代化的趋势，在印度实现西方世界那样的繁荣和进步。[11]

但是，有一个英国文化因素非常重要并且很实用，印度人根本无法抗拒，那就是英语。大部分印度人的母语是印地语，有近1/4的印度人说这种语言。但英语是印度唯一通用的沟通语言，所以印度宪法确定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官方语言。1965年，想要清除英语，让印地语成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少数族裔的代表拒绝接受。印度人即使不懂印地语，也可以担任高层的政治和管理职位，但是如果不懂英语，则毫无可能。巴基斯坦独立后，英语在这个国家同样具有很强的活力，英语与乌尔都语都成为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在新加坡，英语是通用语，学校、行政机构和法院都使用英语。对香港来说，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的法定语言。

在加勒比地区，英语仍然是官方语言。异乎寻常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也广泛使用英语。从尼日利亚到肯尼亚，从塞拉利昂到南非，英语不仅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而且实际上成了通用语言，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工商界尤其如此。在尼日利亚，英语特别有用，因为住在一起的不同部落没有任何通用的语言。

在前法属殖民地，法语和阿拉伯语被确定为北非的官方语言，非洲南部地区也把法语和其他当地语言并列为官方语言。由于政治、外交和工商活动都使用法语，所以法语成为个人自我提升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工具，所有受过教育的家庭都会教孩子讲法语。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在更名为扎伊尔后，主要城市都用非洲名称，以加强当地特色，消除殖民的遗留影响。尽管如此，法语仍然是当地人唯一的通用语言，与当地语言并列为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

葡萄牙曾经的非洲殖民地也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甚至前西班牙殖民地赤道几内亚也以西班牙语为通用语。西斯内罗斯主教曾对卡斯提尔王国的伊莎贝拉女王说，西班牙语和帝国同在。这不仅在西班牙帝国成为现实，在其他欧洲帝国曾经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去殖民化对此没有产生影响。在欧洲对世界的影响中，语言是最不可磨灭的标志之一。

在习俗、社会习惯和礼仪方面，去殖民化运动的领导人都希望捍卫和传承自己民族的习俗，但他们也无法完全消除殖民者留下的影响。就穿着而言，虽然苏加诺、尼赫鲁和蒙博托选择穿民族服装，但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和突尼斯的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穿西装；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则把西服与民族服饰中的帽子结合起来。在工商界和外交界则盛行西方礼仪和服装。在欧洲国家建立的国际机构中，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都身着西服，遵守西方礼仪，因为这是唯一真正的国际礼仪。

欧洲的影响还隐藏在所有国家的组织架构中——国家议会和地方议会、司法系统和国家法院、学校和大学、武警和军队。后殖民国家的军队体现出前宗主国的持续性影响。这些国家军队的制服、等级结构和纪律基本上都和曾经统治甚至镇压他们的宗主国军队相同。不少国家出现了军事独裁统治，军队成为这些新国家和政权的支柱，这也和欧洲过去的传统一样。经历了战争的欧洲对军队的角色非常谨慎，而且欧洲公民倾向于拒绝接受军事价值。但是在后殖民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军国主义非常盛行。

许多新成立的国家在文化价值和道德态度方面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殖民统治结束后，大多数基督教使团并没有终止传教的使命。在加勒比地区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基督教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信仰。传教也是欧洲人向殖民世界传播其信念的非常重要的渠道。

然而，去殖民化带来了一个重大变化，伊斯兰教开始兴起。在阿拉伯世界和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身份认同，也是抵制殖民影响，与全球西方主流文化斗争的手段。宗教激进主义在部分伊斯兰国家崛起。此外，改宗运动也很盛行。阿拉伯国家付出极大努力，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推广伊斯兰教，他们试图将伊斯兰教描述为非洲真正的宗教，以区别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基督教。这导致许多非洲人选择《古兰经》而放弃了《圣经》。伊斯兰教还吸引了许多反对世俗主义、现代化和西方特色发展道路的人。[12]

政治上的独立比经济领域的独立容易得多。大多数后殖民国家非常依赖与前宗主国的经济联系，它们不可能切断这种关系，否则就会面临破产。英联邦和法兰西共同体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并促进旧帝国成员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联系，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在后殖民时代，虽然每个去殖民化的国家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与任何国家开展贸易，但是殖民

统治的影响仍然很强大，与欧洲公司、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保持联系对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要真正清除前欧洲宗主国的经济影响，唯一的办法是采取极端措施，把欧洲国家的资产收为国有，并驱逐其代表。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尝试了这个办法并取得了成功，如埃及的纳赛尔。但是，另外一些国家为此付出了代价，国家陷入贫困，比如扎伊尔。在去殖民化早期，另一个流行的做法是没收白人地主的土地。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都采用了这个办法，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大规模推行了这一方法，并得到整个第三世界的支持，他们视此为匡扶正义——100年前白人占领了非洲人的土地，现在应该还给非洲人。

虽然西欧国家与它们曾经的殖民地之间在某些情况下依然保持强大的经济联系，但也出现了许多竞争对手，尤其是美国。去殖民化为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曾经被欧洲帝国控制的地区商机遍布。从20世纪50年代起，北美的跨国公司持续增加，美国各种令人向往的产品进一步扩大了西方的影响，在旧殖民地最偏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和可口可乐。

另一方面，石油使欧洲国家越来越依赖它们曾经的殖民地。虽然工业强国已经在发展的第一阶段实现自给自足，但是20世纪出现的新技术终结了能源独立。汽油成为运输业必不可少的能源，带动了消费社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黑金时代”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在此之前，这些国家的资源非常稀少。事实上，全世界80%的石油储量都在中东地区，这让中东国家获得了不同一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非洲的尼日利亚、安哥拉以及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文莱来说，石油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也是它们对外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

1960年，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委内瑞拉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主要目标是调控石油价格和保护它们的共同利益。对西方国家来说，石油是其经济的致命弱点，尤其是西欧，因为那里没有石油。对进口石油的极度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国家对石油输出国所在的中东地区的政策。

去殖民化加剧了南北半球之间的分化。南北半球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更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包括石油生产国都有一个共同点：经济不发达。当然，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明显是例外，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都与北半球的国家相当。但其余国家（甚至包括石油生产国）的经济都不发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有一些地方极端贫困。

从殖民帝国独立出来的许多国家很贫穷，经济前景不佳，这一事实引发了大量对欧洲帝国和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上欧洲人移民到非洲是为了把文明带到那里，促进那里的发展。可是这个崇高的理想怎么变样了？贫困不是殖民失败最有力的证据吗？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公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公共舆论也越来越批判殖民主义的消极影响。

欧洲国家的代表们回应了这些批评意见，他们认为去殖民化进行得太快，而且两个新出现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压。他们还指出，作为独立国家，一些新国家缺乏必要的经济能力和政治成熟度，更不用说实现繁荣发展了。欧洲人以及许多在欧洲国家生活或做生意的人常用一个比喻形容这种情况：一个小孩子被赋予一个成年人的责任，但是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为此，欧洲的决策者总体上有一种负疚感。

为了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南北半球之间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发达国家开始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援助计划逐步增加，从经济援助到人道主义援助，有时还包括国防援助。欧洲强国、美国和苏联向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国家提供帮助。西欧国家的援助重点是它们曾经的殖民地；美国的援助目标则定位在反共的盟国；苏联则将援助计划的重点放在其卫星国以及有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就这样，各国援助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想借此疏解因殖民的不利影响导致的负疚感，有的是为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标。对所有援助方而言，这是对外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们相互竞争，期望施加最大的影响。

对外援助的成效差异很大。如果说人道主义援助在帮助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经济援助的有效性非常值得商榷。主要挑战是如何确保援助资金能够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中，不被低效的政府管理机制或腐败官僚不当使用。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瑞士银行账户中有大量财富，大部分都来自他国援助该国发展的基金。英裔匈牙利经济学家彼得·鲍尔曾评论说，对外援助是把富裕国家穷人的钱转交给贫穷国家的富人的好方法。

对曾是殖民地的每个国家来说，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欧洲国家实践过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大举开采自然资源。结果，从殖民时代开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断恶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这一理念迅速传遍去殖民化后的所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从加尔各答到马尼拉，从开罗到拉各斯，涌现出大量人口稠密的城市。这些城市将重现西方国家在工业时代初期曾经出现的问题——但这次规模更大，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的管控措施更少。过度拥挤且环境恶劣的城区和棚户区、剥夺工人权利、疾病、婴儿

高死亡率、交通混乱、黑社会、腐败、违法犯罪、青少年犯罪——所有这些罪恶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城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就农村而言，去殖民化不仅没能恢复那里的生态，而且往往还有反作用。殖民地独立后，那里的人民继承了欧洲人开发农业、畜牧业和林业的方法，继续用同样的方式开发土地。在许多野生区，对动植物群的破坏仍在继续。欧洲定居者把狩猎变成了一项运动和生意，在非洲和印度尤其典型。孟加拉虎、狮子、犀牛、大象以及其他许多珍奇动物都变成了备受推崇的、可供炫耀的战利品；利润丰厚的全球市场催生出销售皮革和象牙的生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发财过度开采动物资源，导致一些物种濒临灭绝。最终，西方国家开始谴责这一做法，并在国际上禁止了象牙贸易。但是，非洲国家往往缺乏执行这一禁令和阻止偷猎的手段。

在帝国主义时代，为经济目的开发利用大自然资源的行为在西方世界广为接受，所有文明社会都不反对这种行为。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们，不论是尼赫鲁、费迪南德·马科斯，还是苏丹·夏赫里尔都继承了这一观念，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认为这是实现繁荣的最佳方法。但是，在欧洲人开采地球资源的时候，地球资源看上去无穷无尽，而且可用的技术手段还不太发达。但到20世纪下半叶，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决定通过开采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时候，地球资源已经越来越有限。在20世纪之前，大自然可以从欧洲殖民运动造成的损害中自我修复过来，但是几十年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欧洲国家曾经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未必行得通。

在欧洲帝国的衰落和解体过程中，有一个了不起的幸存者：苏联。俄罗斯帝国几乎和西班牙、葡萄牙同时开始向外扩张，而且在20世纪，在欧洲所有帝国解体很久之后，它仍然在扩大疆界。自决原则没有影响到苏联，而且在二战后，欧洲大国也没有要求在被苏联占据的领地上推行去殖民化。其中的原因很明显，苏联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殖民帝国。此外，那时斯大林刚打败纳粹德国，苏联红军驻守在整个东欧地区，正处于权力巅峰时期，他不会放弃一寸苏联领土。列宁已经预料到这个问题，所以在推翻沙皇统治后，将俄罗斯帝国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列宁猛烈批判殖民主义，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从未认识到，俄罗斯帝国也是它们的产物。

苏联不仅在二战之后保住了强大的联盟，而且通过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在第三世界宣传共产主义而发展壮大。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然后是古巴。在非洲和亚洲，苏联一边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力量，一边采用传统的武装入侵手段扩大影响。1980年，苏军占领阿富汗就是这种情况。

在欧洲向外扩张建立的所有帝国中，苏联的崩溃方式最出人预料，而且最快。在1980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时，没有人敢预测这个国家会在11年后解体。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两个月后，中欧和东欧部分国家的政权垮台。民众的不满像点着的火药一样，愈演愈烈。

1989年，波兰和罗马尼亚爆发革命，不仅把东欧国家制度的巨大问题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苏联政府的弱点和低效也暴露无遗。当苏联政府放弃调用军队应对任何东欧国家的叛乱时，在它统治下的人民开始意识到，摆脱克里姆林宫原来一点都不难。一旦政府出现明显的疲弱迹象，任何国家都无法长存下去，苏联尤其如此。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动了改革，但是，和改革派政治家常有的遭遇一样，他最终被自己发起的变革推翻了。[13]

东欧剧变后，戈尔巴乔夫想要进行改革，保持苏联统一，但最终他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苏联的瓦解始于1991年夏季，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宣告独立。12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竞争对手，新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总统叶利钦签署《别洛韦日协定》，苏联分解为数个独立的共和国：南部有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高加索地区有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东欧有摩尔多瓦；北方出现了两个大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并没有随之改变，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高加索地区的车臣人争取独立，俄罗斯拒绝了这一要求，导致了两次战争和一次大规模的恐怖威胁。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边界冲突导致两国在2008年爆发战争。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意义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随着这个超级大国的消失，冷战也随之结束，造就苏联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国际影响力日趋式微。这个出现在欧洲的伟大的意识形态在1917年后演变成革命思想，影响遍布世界各地，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它也迎来了危机。

俄国十月革命15年后，苏联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工业强国之一；1945年，又一个10年后，它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可以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是，它瓦解的速度比所有欧洲帝国都快。1980年，苏联达到最巅峰时期；11年后，苏联完全解体。

关于苏联取得的成就有很多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消灭了文盲，在沙皇统治时期这个国家有80%以上的人无法读写。苏联让所有国民都享

有受教育、住房和健康的权利，尽管后两项的质量往往不太稳定——这个问题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20年里尤其突出。在促进平等、消除因财富和社会背景造成的社会差异方面，苏联比其他国家都走得更远。

另一方面，苏联时期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部分持不同政见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于欧洲，但它从未真正在欧洲生根发芽。共产主义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不相容。正因如此，共产主义革命最初只能在俄国取得成功，在中欧和东欧最后都失败了。

另一方面，从共产主义在其他大陆，尤其是在亚洲的成功来看，这是欧洲在20世纪输出的最成功的意识形态。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伟大的文明古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为这一意识形态增加了巨大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吸取教训，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经济转型，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激励了邻国越南，越南也开始逐渐开放市场和旅游。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政权也同样出现了动荡。从60年代起，古巴的共产主义政权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魅力和苏联的援助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在苏联的经济援助结束后，古巴进入了艰难时期。

殖民帝国的解体速度比1945年时预期的快得多。总体而言，从宗主国的角度看，这个过程进行得很和平。帝国历史上从没有欧洲国家这样的先例，它们在战后自愿解散自己的帝国。当然，如果它们坚持保留殖民地，大多也会前景暗淡。

1991年以后，把所有国家划分为三个世界已经意义不大。原先属于第二世界的俄罗斯尝试建立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开始接近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个指代所有距离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很远的国家的术语也过时了，至少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苏联解体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所有在苏联模式中寻找灵感的国家都进入了关键阶段。

随着欧洲殖民帝国消失，世界主权国家数量大幅增加。非洲在1920年只有两个独立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超过了50个。在帝国拆分的过程中，欧洲人在17世纪发明的“民族国家”概念大行其道，在后殖民世界，形成民族和组建国家的进程往往非常复杂。后殖民世界发生了许多动荡，由此造成的死亡有时比帝国时期更多，在印度、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都是如此。

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第三种声音——第三世界的声音。它的主要特点是强烈的反欧洲和反西方的感情。在苏美主导世界的两极时代，第三世界的国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但是两个超级大国和西欧国家都竞相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所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时期成为它们的棋子。

苏联解体后，把世界分成三个集团的结构随之终结。从那时起，我们无法再按照三个世界的框架讨论世界格局，而是把全世界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者主要指老牌欧洲强国，后者包括大多数前殖民地。要成为发达国家，必须遵循欧洲国家和西方世界设立的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体制和政治稳定——这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解读。不少国家决心追随这些趋势，最终成功融入世界，成为全球繁荣的一分子。因此，欧洲帝国的遗风并未随着其解体而结束，而是在后殖民时代仍然继续影响着这个世界。

---

[1] Séamas Ó Síocháin, Roger Casement: Imperialist, Rebel, Revolutionary (Dublin: Lilliput Press,2008).

[2] Roy Jenkins, Churchill: *A Bi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1).

[3] Jenkins, *Churchill.*

[4] Alex Von Tunzelmann, *Indian Summe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d of an Empire* (New York:Henry Holt, 2007).

[5] Harrison,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6]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7] Martin Meredith, *Fortunes of Africa: A 5,000 Year History of Wealth, Greed and Endeavour*(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14).

[8] Meredith, *Fortunes of Africa: A 5,000 Year History of Wealth, Greed and Endeavour*.

[9] 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Vintage, 2010).

[10]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11] Ramanchand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NewYork: Picador, 2008).

[12] Paul Nugent, *Africa Since Independence* (Palgrave, 2004).

[13]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第十二章

欧洲梦

组建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欧洲联盟

1914—1945年，欧洲经历了历史上最可怕的噩梦，欧洲文明几乎被摧毁。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实现了最不寻常的梦想——欧洲联盟问世。

1945年，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战争摧毁了欧洲。必须根除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果断处理好引发战争的民族主义。二战后的欧洲分成两大集团，分别依赖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这个事实导致了一个结论，欧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要恢复欧洲经济以及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只有一个途径——组建超国家联合体。也就是说思维应突破国家框架，代之以欧洲框架。

欧洲联合的想法由来已久。从18世纪起，一些哲学家、文学家，甚至一些政治家都认为，欧洲划分为民族国家仅仅考虑了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欧洲文化和文明是超越民族的。哲学家康德在其作品《永久和平论》中提出欧洲应该是一个国家联邦，各个国家不需要常备军队，彼此愉快地开展贸易，而不是陷入徒劳无益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联合的想法不再是空想，而是已经赢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1923年，奥地利哲学家和政治家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凯勒奇出版了《泛欧论》，他在书中提出欧洲联合的计划。1926年，泛欧运动在维也纳举行第一次大会，出席会议的有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名人。

从1945年开始，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合不再仅仅是理想，而成为一种必要，这被视为西欧国家从战后惨态中重新崛起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建设欧罗巴合众国！”丘吉尔在1946年苏黎世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中表态说。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宣布支持欧洲联合，大大促进了这项事业的发展。两年后，丘吉尔受邀担任由新欧洲运动组织的一次欧洲大会的主席，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启动欧洲一体化进程。[1]

丘吉尔参加的这次1948年在海牙举办的历史性会议取得了成功。这次会议共有来自16个国家的750名代表参会，包括康拉德·阿登纳等政治家以及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等未来的政府首脑。参会的还有让·莫内、保罗—亨利·斯巴克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等后来被称为欧洲之父的领导人。这次大会讨论了关于如何促进欧洲统一的基本思想，最重要的是起到了催化作用。从那时起，欧洲的政治和外交精英开始将欧洲大陆的

未来与欧洲统一联系在一起。[2]

在通过一些决议后不久，促进欧洲统一的机构开始出现。1949年，欧洲委员会成立，这是第一个泛欧机构，尽管它还没有实权。不久，布鲁日学院（即欧洲学院）成立，这是第一个泛欧研究生中心，旨在将新一代欧洲大学毕业生培养成建设统一后的欧洲的主力军。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战后重建与欧洲经济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向受战争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其中一个条件是，接受援助的欧洲国家必须努力推进与美国更密切的经济合作。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诞生。

不久后，欧洲一体化进入基础阶段。让·莫内这位法国商人和政治家以“欧盟之父”的美誉名垂历史，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合并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和钢铁行业，由一个超国家的部门管理。这样，法国和德国的这两个行业不仅会因为合并而受益于规模经济，迅速提升生产能力，而且肯定能够终结两国交战的风险。因为煤炭和钢铁是当时发动战争所必需的两种基本产品，如果把它们置于一个超国家部门之下进行管理，国家间就不太可能发生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并非闻名遐迩的战时领导人或传奇人物，而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幕后工作者。

让·莫内正是其中典范。这个平凡的法国人原是葡萄酒商人，从未被选任公职。但是，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法国政府服务，协调盟军的战事行动。这一经历使他获得了推动政府间合作的远见，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的认识都达不到这个层次。[3]

让·莫内必须充分说服法国政府官员，让他们相信与过去的敌人结成非传统联盟是一件好事。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舒曼认识到这种结盟的历史重要性，并在1950年5月9日发表了著名的《舒曼宣言》，他宣布：“欧洲的建设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按照某种总体规划进行。它将建立在坚实的成就之上，首先要创建实际的团结。”

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同样热衷于这个倡议，深知要克服当时所说的“德国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属于欧洲的德国。因此，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他完全支持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将推动构建欧洲联邦。[4]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也被《舒曼宣言》吸引，决定把自己国家的煤炭和钢铁工业与法国和德国合并在一起。就这样，6个欧洲国家在

1951年创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

1957年3月25日，欧洲一体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罗马条约》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还出现了“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约定彼此之间不设任何贸易壁垒，并对其他国家执行同样的外贸关税。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不仅集中协调主要工业和经济，而且开启了政治统一的进程。为了监督这一进程，欧洲国家设立了4个超国家机构：其一，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其二，代表各国政府的部长理事会；其三，欧洲议会；其四，欧洲法院。这4个超国家机构负责落实欧洲共同体的各项决定，发挥控制作用，并根据欧洲共同体法律进行立法，这些法律将优先于成员国的国家法律。就这样，欧洲出现了一个在国家之上的超国家实体，这是欧洲史和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欧洲经济共同体之所以能在最初阶段取得成功，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经济环境特别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和建立关税同盟。从1950年开始，西欧经济从战后废墟中崛起，迎来了“丰裕时代”，西欧经济实现了持续20多年的空前、辉煌的增长。[5]1957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次保守党集会上这样描述蓬勃发展的英国经济和美好生活：“我们的人民，大多数过上了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这种乐观的评价在当时的西欧领导人中很常见，战后经济繁荣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仅在10年前，这个大陆几乎被战争摧毁。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马歇尔计划奠定了西欧经济复苏的基础。1948年之后，美国向欧洲国家注入资金，使它们迅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马歇尔计划使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产品和服务增长了25%，[6]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欧洲的工业产出已经比二战爆发时高出30%。这些非凡的数字不仅造就了欧洲社会的丰裕，而且影响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马歇尔计划有双重目标：防止受援国因为经济危机转向共产主义；继续向西欧出口美国的产品——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都在那里。因此，西欧的经济繁荣对美国来说必不可少。

战后的经济繁荣充实了西欧国家的财政，并推动了福利国家的诞生和发展——福利国家是欧洲对现代世界的又一项重大贡献，在现代欧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国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俾斯麦为了防止因社会主义引发社会动乱，在19世纪80年代推出了第一个老年社会保险制度。从20世纪20年代起，法西斯政权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不过，奠定欧洲目前这种福利国家形式的是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在1942年发表的这份报告指出社会的五大痼疾：肮脏、无知、贫困、懒惰、

疾病，他认为国家应该使用通过税收筹集来的公共资金解决这五大问题，确保所有公民能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同时，应促进机会均等，消除因财富、社会环境、健康等不公造成的不利影响。

1948年，英国推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费的全面医疗保健服务。在同样的原则下，英国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费教育，向所有工人提供失业补贴，保障工人在65岁以后或不再适合工作时拥有领取养老金的权利。福利国家制度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开始影响西欧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发达工业国家提供的条件比南欧国家更好，所有西欧国家政府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一个原则：公民必须享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失业补贴和养老金，国家负有确保有足够的公共资金投入其中的责任。

福利国家无疑是战后时代西欧国家的一大成就，反映出国家对“所有公民平等”这一原则的响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补救办法，可以终结欧洲普遍存在的与贫穷有关的罪恶。从那时起，工人区和农民区极度贫困的现象一去不返。欧洲创建出一种更加平等的新社会模式，没有人因为贫穷被排除在外。福利国家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消除贫困和促进社会平等方面成绩显著。不久，西欧的这一社会模式在全球产生了吸引力。起初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能力复制这种模式，因为它需要国家的经济非常繁荣，而且各方面协调良好。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在努力建设公平社会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都受到西欧国家这一模式的启发。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公民不仅受益于福利国家，技术进步也使他们的生活更轻松、更愉快。冰箱和洗衣机等发明改变了家庭生活；电视进入欧洲人的家庭，成为一个重要的娱乐工具；从20世纪50年代起，即使经济条件稍差的欧洲人也买得起汽车。汽车彻底改变了交通方式，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因此开始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还得益于消费信贷，这是消费社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在这种新社会模式中，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可以满足大量物质需求的能力之上。

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中产阶级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个社会阶层最初出现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他们的特点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中从事重要的职业并获得了成功。中产阶级的数量、财富和政治权力不断增长，促发了一场持久的社会革命。北美成功地再现了这个现象。中产阶级提高了社会活力，是一支促进社会稳定的力量，他们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创造了不少财富，这些都是他们成功的因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中产阶级因为工会运动而穷困潦倒、名誉扫地，马克思主义理论广为流传，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并认为他们会随着必定要灭亡的资本主义一起消失。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产阶级明显复苏。这不仅是因为经济繁荣以

及由此带来的乐观情绪，与中产阶级规模的大大增长也有关。传统上，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小。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免费教育使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可以从事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的工作；平等主义和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中产阶级的覆盖面更广，其数量和开放程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这成为西欧国家的一个稳定因素，外部观察家们对此赞赏有加。许多国家的政府因此致力于缔造稳固的中产阶级结构。

从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的艺术界和文化界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复兴。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传遍欧洲的一条新原则：国家有责任利用公共资金在公民中推进文化发展。这让歌剧、戏剧等各种层次的文化活动都获益良多，英国著名剧作家劳伦斯·奥利弗的戏剧和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现代主义作品非常红火。196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任命小说家、知识分子安德烈·马尔罗为文化部部长。这个政治职位在西方政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人们认为文化非常重要，不能简单地任由市场力量或大众口味左右。文化是文明社会的支柱，不仅能增益公民的智识，也是一个能产生大量财富的产业。西欧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向世界传递这个信息。从那时起，许多国家在这个理念的激发下，努力发展艺术，加强文化传承。

正是在这个时期，巴黎再次成为伟大的文化之都，萨特、波伏娃和加缪等著名作家都在这一时期到达其艺术生涯的巅峰。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成为新的文化思潮，共产主义仍然吸引着毕加索和萨特等名人。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是一种世俗宗教。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后斯大林主义时代，欧洲又出现了一些影响极大的共产主义批评家，雷蒙·阿隆、卡尔·波普尔和以赛亚·伯林的影响越来越广。反对核扩散的斗争吸引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许多杰出人物，包括罗素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欧知识分子引领了和平主义的新潮流，警告核时代军国主义的危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经预言，欧洲的资本主义会终结，资本主义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已经过去，即将进入最终阶段。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欧的经济状况与这一预言并不相符。市场经济复苏，而且各方面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活力。当东欧面临经济紧缩、物资匮乏时，西欧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在这种有利的大背景下，欧洲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1960年，英国和其他6个希望促进欧洲自由贸易的国家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作为欧共体的补充——因为有些国家对任何形式的超国家统一都不感兴趣，拒绝加入欧共体。但它们可以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而且对这个组织期望很高。1961年底，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明确认识到，英国不能继续置身于欧共体之外，因为英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都加入了这个组织。1961年12

月，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这一举措大大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因为这清楚地表明，欧共体所倡导的超国家统一将成为主流。不过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还需等待批准。1962年1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要否决英国的申请，因为他认为，英国并不是真正对这个组织感兴趣，而是要当“美国的特洛伊木马”。[7]

戴高乐不仅阻止了欧共体的第一次扩大，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哈尔斯坦在欧洲一体化的模式上意见相左。哈尔斯坦主张通过改革加强欧共体的执行力并实现预算独立，为此他建议扩大欧洲议会的预算权，尤其赞成部长理事会引入多数通过制。这些想法让戴高乐很恼火，因为他坚信欧洲只可能是由国家组成的大欧洲，任何建立超国家机构的企图都会挑战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必须加以阻止。在1962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对欧盟委员会进行了口头攻击，嘲笑哈尔斯坦的计划，还嘲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是没有国籍的人，说他们使用的专家术语是“胡言乱语”。戴高乐说：“当今，只有一个由国家组成的欧洲，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欧洲。当然，欧洲还有神话、文学和盛大的舞会。”[8]

1965年，戴高乐的“国家—欧洲”理念与哈尔斯坦的“超国家欧洲”理念之间的冲突达到临界点，当时哈尔斯坦提议部长理事会的表决机制从全体通过制改为多数通过制。这意味着，少数派的成员国将不得不接受多数派成员国的决定。戴高乐认为这触犯了法国的国家利益，宣布法国代表不会参加下一届部长理事会，引发了“空椅子危机”。一年后，欧共体成员国达成“卢森堡妥协”，解决了欧共体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协议规定，当成员国认为某个议题对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时，可以使用实际上的否决权。这基本上是同意保留分歧。

戴高乐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直到他辞职后才得到解决。1973年，欧共体终于扩大了，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就在此时，石油危机使西方世界陷入衰退，20多年稳定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政府都忙于应对通胀和失业问题，欧洲一体化几乎没有进展。

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促进欧洲的政治统一，欧共体成员国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欧洲议会是大欧洲主义者的梦想，欧洲议会创建于1958年，其议员由欧共体成员国议会指派。最初它只是一个协商会议，几乎没有立法权，其成员也不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欧洲一体化，认为这是精英主义的阴谋，因为他们没有询问成员国公民的意见就建立了欧共体。解决民主缺失的方法是举行普选，选举欧洲议会代表。最终，这个决定在1979年付诸实施。

1979年，欧共体9个成员国进行了第一次欧洲议会代表普选。和国家或地区选举一样，由成员国的公民选出代表。就这样，有史以来第一个超国家

议会第一次通过选举产生了。欧洲已经发明了一种广受欢迎的制度——民主，以及该制度的主要运行机构——国家议会。这一次，欧洲又创造了一个新机构：超国家议会。它的诞生证明了民主不仅可以在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实现，还可以在超国家层面上实行，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体制、法律框架以及同样的民主文化。

在第一次普选出欧洲议会的同一年，让·莫内去世。他在欧共体成员国被尊称为欧洲之父，在去世前几年他出版了一部回忆录，成为宝贵的资料，帮助人们理解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创新思想以及欧共体的发展过程。在他的不懈努力中，贯穿了两个主要思想：欧洲要建立在实际成就的基础上，而不是停留在愿景和概论中；欧共体要持久，关键在于共同的机制，而不是政府间合作。让·莫内认为，只有通过机制化的经验知识库和共同价值观，人类才能积累智慧，并传给子孙后代。[9]

让·莫内知道一些政治家和国家不愿意支持他关于的欧洲统一理念。他曾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很清楚英国政府最初不愿加入欧共体的原因。但英国的实用主义也让他坚信，只要能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组织，英国一定会在欧共体中发挥主导作用。“我们不是要创建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是要团结人民。”[10]这句话很好地表达出了让·莫内欧洲梦的精髓。

20世纪80年代是欧洲一体化的黄金十年，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促进了这种进步。首先，西方经济复苏，政府能够专注于推进大计划；其次则是欧洲领导人杰出的政治领导力。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都是坚定不移的欧洲主义者，法德轴心主导了欧共体的发展。在这10年间，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是该机构最成功的主席，他决心把欧共体转变成能够使欧洲发挥全球影响的组织。

1980年，希腊加入欧共体；5年后，西班牙和葡萄牙被接纳为成员国。有了12个成员国的欧共体开始进一步推动经济一体化：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向前一步，建立单一市场。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签订，欧共体正式启动新的单一市场计划。从此，欧共体成员国的公民享有4项自由：商品流动自由、人员流动自由、提供服务的自由、资本流动自由。

在《单一欧洲法案》签署几个月后，1987年5月29日，欧共体的旗帜第一次伴随着贝多芬的《欢乐颂》在布鲁塞尔升起。从此，在欧共体的官方机构都可以看到这个在深蓝色背景上由12颗五角星围成一圈的旗帜。这些举措是为了建立起“人民的欧洲”形象。欧洲的大众一直把欧共体视为由政治领导人议定，由公务人员执行的政治经济决议机构，对它的认同感很低，甚至带有怀疑情绪地称其为“商人的欧洲”。因此，有必要提高欧共体对大众的感召力。在这方面，一个机构的徽标、旗子、歌曲等符号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欧共体还向成员国公民签发了新护照。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要让成

员国的公民像认同自己的国家一样，对这个代表他们的超国家机构产生认同感。

《单一欧洲法案》出台后，欧共体开始实施一些重要计划，促进各成员国公民之间的社会一体化，推行欧洲社会基金等福利国家计划。欧共体不仅要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还要缩小欧洲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为此，欧共体创建了结构基金和凝聚基金，向欠发达区域发放资金，改善其基础设施和经济。

当西欧国家享受繁荣，向统一迈进时，东欧正在经历剧变。在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集团内部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危机的出现推动了这个进程。1985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并敦促苏联集团的国家也实施类似的改革。与此同时，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运动迅速增加，它们的共同目标是终结共产主义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

1989年11月9日，全世界通过广播见证了柏林墙倒塌，柏林市民推倒了这堵标志着欧洲一分为二的墙，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引发了更多不寻常的事件。柏林墙倒塌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欧洲许多国家的政权在短短两个月内倒台。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经过非暴力革命，和平过渡。但是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前政权的终结方式则较为艰难和痛苦。苏联的政权在此后又持续了一年，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恢复了“俄罗斯”的旧名，也恢复了在十月革命前的许多身份认同，包括圣彼得堡这个城市的名字以及亲欧的感情。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天里，戈尔巴乔夫谈道：“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俄罗斯和所有欧洲国家都属于这个大家庭。”

1945年以来，欧洲同时存在着两种发展模式：西方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东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苏联解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西方模式的影响力更大，更加成功。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曾指出，美国总统里根对苏联集团的蔑视和对抗策略，加速了共产主义的终结。但是苏联集团消失后，欧洲强国和欧共体必须迅速行动，抓住这个难得的契机，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扩大影响。二战后40多年来，欧洲人一直觉得欧洲是“被绑架的西方”——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这样描述道。因此，他们特别珍惜欧共体这个自由和繁荣的象征。

西方国家决定支持两德统一。1990年，欧洲理事会在柏林举行会议，决定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纳入欧共体。另一个问题的挑战更大：如何帮助部分欧洲国家过渡到民主制，如何回应它们加入欧共体的愿望。所有这些问题使欧共体确信必须加速欧洲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为能够应对后苏联时代挑战的全球行动者。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的通过是欧洲一体化的转折点，该条约提出了确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并且引入了建立政治联盟所必需的机构和政治改革，其总目标是为欧洲的统一进程做好最后阶段的准备，最终使欧洲成为全球舞台上的关键角色。从那时起，欧共体更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这个新名字也希望向各成员国公民灌输一种团结感，就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感受一样。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启了构建欧洲货币联盟和使用单一货币的进程，造就了欧洲经济统一的巅峰。统一货币的优点包括：为欧盟内部贸易消除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使跨国旅行更便利；增强对抗通货膨胀的能力；在国际关系中形成统一的欧洲身份认同。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货币是国家主权最有力的象征之一，在怀疑论者看来，一个国家的货币被欧洲统一的货币取代，与其说是出于经济目的，不如说是为了政治目的——要实现欧洲统一的乌托邦梦。玛格丽特·撒切尔是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因为反对单一货币，她成为欧元怀疑论者中最突出的代表——这些人或反对欧洲超国家层面的一体化，或对推进欧洲统一的机构持怀疑态度。

金融与货币联盟意味着使用德国马克的经济强国与希腊等最贫穷的欧洲国家将使用同一种货币，只有实力强的经济体补贴实力较弱的经济体，并严格控制其货币政策，这项试验才可能成功。因此，欧洲理事会宣布，只有在通货膨胀、利率、预算赤字等方面符合标准的国家才能加入。

2002年，欧元正式开始流通。在符合标准的15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开始使用这种新货币。英国、丹麦和瑞典决定不参与这个项目，希腊于2001年获准加入欧元区。欧盟在法兰克福设立了一个中央银行，它和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样，负责欧元的发行和制定货币政策。尽管所有不看好欧元的人都曾预言，一旦欧元开始流通，就会出现管理混乱和经济崩溃，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欧洲最古老的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共用一种货币。

使用单一货币是欧洲一体化的一大进步，欧元的流通进一步深化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情形一样，货币统一增强了欧盟公民的认同感，周游欧盟国家不再需要兑换货币，用同一种货币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贸易是革命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欧洲内部人员和资本的流动。

最重要的是，使用单一货币标志着欧盟这个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诞生。欧元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之一，可以与日元、美元匹敌。1945—2002年，美元一直是世界经济市场的主导货币，但从欧元诞生开始，美元受到了挑战。

欧元之所以从诞生之初就威胁到美元的主导地位，有几重原因。首先，欧元有最强大的商业力量支持——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有近5亿消费者，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名列当时世界上12个最大的经济体，它们都使用这种货币。其次，欧元区国家受益于在几个世纪的扩张中建立起来的国际网络。最后，欧盟成功合并了欧洲的主要经济体，实现了让此前互为对手的国家使用单一货币的目标。这些成就使欧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不久，欧元成为与美元竞争的另一种储备货币。从2002年开始，全世界约有150个国家将其货币汇率与一个参考货币锁定，其中51%的国家将欧元定为参考货币。2003年，俄罗斯的欧元储备增加了25%，中国也完成了相似的操作。美元霸权的更大威胁来自一个传言：欧佩克国家考虑转用欧元标定石油价格。[11]相对于欧元来说，美元的疲软是导致一些欧佩克国家考虑此举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政治原因，大多数欧佩克国家更倾向于推动欧元主导世界经济，而不是美元。

不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欧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多数欧盟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再由各国央行制定，而是由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制定，这一事实有力地加强了欧盟的凝聚力及其全球角色。

在使用单一货币成为现实的同时，欧盟也在为其历史上最大的扩张做准备。从欧洲一体化初期开始，就一直有许多国家申请加入欧盟。这也许是欧盟成功的最好证明。与最高级的私人俱乐部一样，欧盟也有很长的潜在会员候补名单，而且欧盟有权力设定非常高的会员标准来筛选候选者。到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12个成员国的欧盟准备把规模扩大一倍。从申请量来看，欧盟的成员国可能发展到30个，覆盖5亿多人口。

接受前苏联集团的国家加入欧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不仅经济比欧盟成员国差，它们的社会制度往往也不太一样。1993年，“哥本哈根标准”出台，确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的标准，包括民主制度、人权和有效的市场经济等。1995—2013年，共有16个国家达到了这些标准，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保加利亚和捷克，以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等地中海岛国。2013年，欧盟最后一次扩充了成员国。

随着欧盟的边界拓展到俄罗斯边境和黑海，一个尚未明确的地理问题亟待回答：欧洲的东部边界在哪里？欧盟是否应该接纳那些领地不全在欧洲的国家？在1987年摩洛哥申请加入欧共体时，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当时摩洛哥被拒绝加入，理由是它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当时欧共体第一次援引了《罗马条约》的条款，只有欧洲国家才有资格成为欧共体成员。此后不久，土耳其申请加入欧共体，起初也被驳回，但后来欧盟又接受土耳其为欧盟候选国，再次引发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因为从地理和文化角度

看，并不能确定土耳其是否是欧洲国家，而且土耳其是否达到民主制的标准，是否具备这一资格也引起了许多怀疑，特别是那时土耳其正从凯末尔主义转向威权主义。

俄罗斯能加入欧盟吗？这个横跨欧亚的大国显然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因此这个问题并不紧要。但是，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在地理上位于欧洲，显然是可能申请加入欧盟的潜在候选国。这意味着在2013年已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可能会继续扩大，成员国的数量可能增加到30个以上。

在最后一次增加成员国时，欧盟的疆界已经覆盖了欧洲大陆的很多地方，其范围比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以及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更大。从古罗马到纳粹德国，一些统治者梦想要统治整个欧洲，但他们都没能实现目标。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和议会代表离实现这一梦想越来越近，最不寻常的是，历史上的欧洲帝国都图谋征服欧洲却从未成功，而欧盟没有给欧洲人施加任何压力，和平地达到了目标——欧盟对欧洲人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不仅得益于欧盟的发展，也是欧洲经济圈不断扩大的结果，许多国家因为欧洲的投资、经济合作、经济外援而面貌一新，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欧盟及其价值观的影响。

二战后，欧洲各国领导人一直担心欧洲会很不舒服地被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地区利益，却没有全球性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共体的领导人并没有就制定全球性政策达成共识，也没有相应的机制。从20世纪70年代起，欧共体内部开始实施第一批措施，开始塑造其全球角色。“欧洲政治合作”计划启动，欧共体成员国的外交部部长定期举行会议，就国际事务中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一机制使欧共体能够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非民主政权实施制裁，也非常有效地促进了这3个国家向民主制过渡，因为它们都希望加入欧共体。欧共体还谴责利比亚等国家的行为。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欧盟才确立了真正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配备了相应的机构和代表。[12]

《阿姆斯特丹条约》确立了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位。西班牙的哈维尔·索拉纳被任命为第一位高级代表。2009年，欧洲对外行动署成立，这是一个新的欧洲外交机构。传言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这样问：“如果我想和欧洲对话，该打电话给谁？”——这凸显了欧盟缺乏机制化领导和代表的问题。在设置了这个新机构和新职位后，欧盟终于有了国际政策方面的代表。

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项目的致命弱点在于缺乏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

这个问题在南斯拉夫战争中暴露无遗。1992年，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以及其他同属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开战。这是当代欧洲历史上最可耻的时刻之一，因为欧洲大陆再次发生了种族清洗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丑恶行径。最后，美国和北约出面，终结了这场战争。在结束科索沃战争的过程中，北约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99年，北约轰炸科索沃，成功迫使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军队撤离。

在经历这些冲突事件之后，欧洲领导人决心设立一个军事部门，建立一支能够干预和防止武装冲突失控的快速反应部队。2003年，“欧洲安全策略”通过，口号是“一个安全的欧洲，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目标是“人道主义干预”，并据此向海外派军。2003年，欧盟派出多支部队前往马其顿，防止那里的冲突升级成另一场民族战争，避免在此前10年里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一幕重演。美国和北约在成功干预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之后，北约在2004年将波斯尼亚的控制权移交给欧盟。同年，欧盟部队被派往更遥远的地方。为响应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欧盟派出1 400名士兵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13]欧盟出兵的理由是通过军队行动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欧盟没有只关注自身利益，派遣军队也不是为了保护欧洲的海外资产或重大经济利益，而是专注于国际和解与保护人权。

尽管欧盟一直在努力组建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但是欧盟向海外派遣的总兵力上限是8.5万人，与美国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因为美国可以轻松地向任何需要的地方派出40万军人。然而，这并不会影响欧盟的有效防务政策，或是坚守欧洲的原则和利益。对欧盟决策者来说，欧洲要为21世纪的防务和安全做好准备，在新世纪，不会再打传统的战争，所以传统的大型部队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出现的世界新秩序中，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支持它们的流氓国家，以及它们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施扩张计划的野心。小型但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以及情报部门的支持是欧洲防务政策成功的关键——情报部门拥有应对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时代其他威胁的最先进的技术。

进入21世纪后，欧盟的防务政策似乎越来越不同于美国的政策。2004年，美国以独裁者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进攻。这不仅导致欧洲和美国意见相左，也造成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据此把欧洲划分为新欧洲（支持战争的国家）和旧欧洲（不支持战争的国家）。欧盟对这种情况没有进行干预，那些支持美国的欧盟成员国，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波兰都以单个国家的身份参与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这是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对部分欧洲国家不愿使用武力言简意赅的解释。[14]无论美国多么坚持对流氓国家进行预防性攻击是一种自卫策略，欧盟仍然坚持，只有在需要捍卫欧盟的决议、推行国际法时，才会采

用军事干预。

欧洲的防务政策背后有很多厌战情绪。数百年来，如果战争是一门艺术，欧洲人已经成为这门艺术的大师，欧洲人比其他大陆的人更饱尝战争的苦果。他们觉得与其信服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不如享有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因此，欧洲更加明确了21世纪的一种趋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不再相信战争是解决冲突的合法方式。

最重要的是，欧盟在21世纪初超越了传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创新的方式对世界施加影响。欧盟在世界上奠定了重要的商业地位后，欧盟领导人开始运用更复杂的机制来影响其他国家。2004年，欧盟成员国又一次大幅增加，欧盟通过了“欧洲睦邻政策”，旨在促进欧盟与邻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包括那些位于北非、中东和东欧的邻国。这一政策的总体目标是缩小欧盟与邻国在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防止富裕的欧洲与贫穷、不稳定的邻国之间出现分裂。通过与邻国签署广泛的协议，欧盟希望能够与邻近国家培育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它们各方面的发展。那些与欧盟建立牢固联系的国家将被给予合作伙伴的地位和待遇，包括免关税进入欧洲的单一市场。其他国家则只能得到某种财政援助。与邻国签署的所有协议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它们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改善法治和人权状况。

2011年，欧盟委员会宣布了更加宏大的新欧洲睦邻政策。尽管这一政策推出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它有超过12亿欧元的资金做后盾，总投入达到70亿欧元左右。这个新政策强调要用更多的资金换取更多的改革，使受援国更有动力改进民主制度。

援助计划使欧盟的影响更深更广。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欧洲对欠发达国家或处于困境的人民的援助一直在增长，这也许是出于对前殖民地的一种责任感，或者是对殖民主义造成的不利影响问心有愧。这也可以视为一种自卫机制，因为改善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条件能够防止因大规模移民造成的问题。援助计划不仅在政府间签订协议后通过官方渠道进行，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欧盟在其成员国的影响下，承担起援助责任，成为全球最大的援助提供者。2000年，欧盟在贝宁的科托努市签署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援助计划，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79个国家从中受益。欧盟也深知，援助资金往往并不能全部到达受援者手中，导致援助计划不能产生预期的影响。所以，欧盟与受援国签署全面伙伴关系协定，以确保援助的有效性，使发展计划得到遵守。欧盟的援助计划在目标上也实现了突破，不再仅仅聚焦于消除贫困，更把它与促进可持续发展，促使民主和区域一体化等更广泛、长远的目标联系起来。

2013年，一项新的援助计划——“变革议程”启动，重点目标是扶助世界上

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确定具体的援助项目，并与联合国当时正在讨论的一个千年目标挂钩。欧盟通过这个新援助计划帮助了49个国家，其中大部分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些援助项目缓解了一些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从埃塞俄比亚和萨赫勒地区的大干旱到叙利亚、马里的武装冲突，这些地区的人们都受益匪浅。

欧洲睦邻政策以及各项援助计划大大提升了欧盟在欧洲经济圈的影响。欧洲经济圈包括全世界明显受到欧洲影响的100多个国家，包括所有以欧盟为重要贸易伙伴的国家，以及那些依赖欧盟信贷或外援的国家，欧盟是主导其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外部力量。[15]欧盟的世界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独创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不断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世界的经济合作协议猛增，显然是受到欧盟的启发。1991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签署《亚松森条约》，建立了南方共同市场，其目标是在成员国范围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统一对外关税。这和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做的如出一辙。南方共同市场很快在南美洲扩大，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苏里南都成为它的联系国。

1994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目标是建立一个三国贸易集团，应对欧洲单一市场的挑战。早在北美之前，加勒比地区为了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在1973年建立了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南方共同市场不同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种纯粹的经济协议，其目标还包括促进政治一体化。其条约中有一项民主条款，在打击拉丁美洲的独裁倾向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7年，委内瑞拉因为建立独裁政权被取消了成员资格。

亚洲也在向同样的方向发展。1967年，5个东南亚国家组成了地区性政府间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2007年，其成员国同意东盟向类似欧盟的政治联盟靠拢。另一方面，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5个国家也建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21世纪，世界上最落后的大陆也在发展区域一体化。2001年，55个国家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了非洲联盟，主要目标是加速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2004年，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开罗峰会上，其成员国的代表们讨论成立阿拉伯联邦的计划，旨在把所有阿拉伯国家合并为一个政治联盟。他们还讨论了泛阿拉伯议会和单一货币计划。

上述各个区域组织虽然目标各不相同，有的仅仅想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有的考虑在超国家层面实现政治统一，但它们都受到欧洲模式的启发——正是因为欧盟取得了成功，它们才向这个方向发展。

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一样，区域一体化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因为每个成员国都越来越离不开它。当然，许多区域组织也许会像过去的王国和帝国一样崩溃或解体，但是大多数都将长期存在，因为这是它们在21世纪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

欧洲在约500年前创建了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逐渐扩展，先蔓延到整个欧洲，然后是美洲，到20世纪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要素。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唯一能引人关注、赢得国际尊重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家。在20世纪，欧洲又创建了一种在民族国家之上的新政治组织。欧盟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之上的国家，或者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系列由共同机构统治的国家。

当然，由区域组织组成的世界不一定比国家组成的世界更好。内向型区域集团彼此之间发动商业战争，可能会导致严重冲突，就像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一样。但这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类型。欧盟奠定的是一个促进地区合作、创造财富的模式，推动了全球的发展和繁荣。它还树立了一个榜样，示范如何应对新千年的巨大挑战，如保护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应对全球变暖——民族国家极难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欧盟之所以能够成为激励和影响众多国家的典范，原因之一在于其成员国的社会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欧倡导和推行一种社会模式，将个人主义、个人自由这两个西方生活方式的支柱与消除贫困、促进平等相结合。这要归功于福利国家的发展。前文曾谈到，福利国家机制在50年代取得了初步成功后，在欧洲稳步发展，使政治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欧洲梦变为现实。[16]

在20世纪中叶之前，唯一具有足够吸引力，能够被称为“梦”的社会模式是美国梦。美国梦的信念基石是：任何生活在美国的公民都能实现个人抱负——通常是获得财富或物质财产；美国公民不论来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或种族，只要努力工作，有成功的决心，就能实现美国梦。美国梦吸引了数百万移民来到美国，成为践行美国生活方式的支柱，这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赏和羡慕，为美国发展成全球最大经济体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也实现了杰斐逊为美国勾画的愿景——成为一个自由的帝国。

到20世纪末，西方世界又出现了一个新梦想——欧洲梦。欧洲梦的第一个思想基础是，所有公民，不论来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或种族，都可以在欧洲社会中实现他们的梦想，而且还可以享受到这个社会高品质的、安全的生活。美国梦与财富有关，欧洲梦则与生活质量有关，它的指向是，生活中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物质财富来衡量，比如享受休闲、丰富的文化生活以及重要的自我变革。此外，享受健康的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感到安全也都是欧洲梦的重要因素，因为如果犯罪得不到控制，社会关系紧

张，公民就不敢去城市街道自由行走。欧洲梦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是，每个公民在社会中都有一席之地，无论一个人成功与否，都会得到关照。欧洲的社会模式构建了一张安全网，使公民能够得到最低生活标准的保障。欧洲梦把公民从陷入困境的噩梦中解放出来，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到福利国家的保障。

美国梦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就很突出，而欧洲梦则创造出更和谐的社会，防止社会贫富分化，避免人们落入一种被戏称为“老鼠赛跑”的生活方式——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做着压力很大、毫无意义的工作。欧洲梦使人们认识到，经济不能以无限的物质增长和开采有限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必须力促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欧洲梦的核心价值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这增强了欧盟的全球影响力。各国政府都在研究欧洲的社会模式及其依赖的价值观，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复制这种模式。当然，和福利国家模式一样，许多国家并没有负担欧洲梦的能力，但是它仍被视为一种长期的渴望和目标。

欧洲梦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证据是移民。在20世纪以前，欧洲人一直移民到其他大陆。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欧洲人不再移往其他大陆，欧洲大陆开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起初，只有那些西欧工业强国和最富裕的国家吸引移民，但是随着欧洲国家普遍变得富有，加上欧盟公民身份的优势，欧洲大陆各处的移民激增。到21世纪早期，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15个国家的移民人口比例超过10%。2010—2013年，每年约有140万移民来到欧盟国家。2016年，有2 070万非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在欧盟生活。[17]

另一方面，欧盟在21世纪初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挑战。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欧洲的经济，甚至撼动了金融机构和政治机构的支柱。这场自1929年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后来逐步升级为国际银行业的重大危机。金融界日益宽松的管制助长了企业的贪婪，加上宽松信贷泛滥，是引发危机的两大主因。欧洲人在这方面尤其脆弱，因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导致这一结果的文化中。自50年代以来，欧洲人已经习惯了依靠信用卡的生活，政府也支持这种负债文化，以实现福利国家所承诺的一切。欧洲的政党相互竞争，推出各种政府计划，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养老保障、学校和医疗系统。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政府财政赤字，直到国家债务过高，难以为继。希腊的情况尤其糟糕，引发了欧元区的危机，严重威胁到欧洲货币联盟的存续。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以及所有经济大国都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经济相互依存，如果欧元消失，可能会导致一场新的全球危机。欧盟不仅是美国和日本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也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这4个新兴国家刚实现工业化，将在

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它们都得益于与欧洲的商业交易，也都持有欧元的外汇储备，尤其是中国。如果欧元崩溃，失去一个超过5亿消费者、拥有世界上最强购买力的市场，世界经济的前景无疑令人惶恐不安。随着欧元区度过金融风暴，不仅欧洲人民松了一口气，各经济大国也都如释重负。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欧洲梦不利的一面——它严重依赖高水平的政府支出，但是这并非总可以持续，福利国家也难以为继。在欧洲历史上，国家负债并不是新鲜事。快速浏览一下欧洲的金融史就会发现，负债与大国衰退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在1557—1697年破产了14次；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当时的法国政府需要用62%的预算来偿还债务；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为一个帝国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当时英国需要花约44%的财政预算支付债务利息。欧洲政府和私人的债务都在增加，而经济增长速度却在下降。欧元区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4%，80年代则下降到2.4%，到90年代下降到2.2%，在2001年和2009年，经济增长率仅为1.1%。[18]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在危机爆发之前，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决策者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欧盟的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为25.8%，社会福利支出的全球占比为50%，而人口占比仅为7%。[19]整个欧洲似乎都被福利账单淹没了。尽管如此，欧洲各国人民总体上并不想改变现状。

负债和依赖国家提供所有的基本生存需要，这种文化也最终造成了危机。21世纪初的欧洲人与他们的祖先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没有养成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的习惯，也没有为了更好的生活做出牺牲的精神，他们只是抓住那些政府再也负担不起的特权不放。欧洲的公共舆论常常讨论公民的权利，却不谈他们的义务。如果公民更多关心的是获取个人利益而不是做出贡献，任何文明都注定要崩溃。

欧洲梦也受到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以发展多元文化为荣，吸引了大量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移民到欧洲，他们愉快地与欧洲本土居民共处。但是，多元文化主义的神话在宗教恐怖主义面前破灭了。

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基地组织”为了让西方世界臣服，在欧洲各地发起恐怖主义活动。2004年，马德里发生毁灭性的恐怖袭击，192人死亡；一年后，伦敦受到袭击。然后，自称“伊斯兰国”的“圣战”组织“达伊沙”成功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在欧洲主要城市（尤其是巴黎）杀害了无数无辜者。

令人惊讶的是，在欧洲被捕的大多数与宗教恐怖主义有关的人并不是最近才来到欧洲的外国人，而是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后代。他们在欧洲出生和长大，但是他们不像第一代移民那样，对欢迎他们的欧洲国家心存感激，而是排斥欧洲文化。恐怖分子就是从他们中间招募的。在欧洲崛起、夺得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欧洲人曾与许多敌人作战，但是现在敌人就在欧洲内部。

欧元区发生经济危机，中东地区的难民为了逃离宗教恐怖主义涌入欧洲，这严重削弱了欧盟的声望，甚至使欧盟岌岌可危。欧盟成为欧洲各国发生的所有问题的替罪羊，各国的公投使得情势进一步恶化。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就欧盟制宪进行公投。结果，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用同一部宪法管理几个民族国家的努力就这样失败了。

欧盟生存的最大威胁无疑来自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大多数英国公民投票反对继续留在欧盟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消息。英国是欧盟三大经济体之一，在塑造现代欧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英国却决定退出欧盟。这一事实违背了欧洲团结的精神，并磨灭了欧盟的许多成就。

“但是它是动的”，这句话出自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这是他在17世纪时，被教皇强迫放弃地球绕着不动的太阳旋转的主张时说的。同样，在经历了所有逆势之后，欧盟可以说是“失去了10年”，但是它仍在前进，尽管所有末日预言家都急于宣布它已死亡。

在经历全球经济危机和美国越来越趋向孤立主义的时候，欧盟继续以全球重要角色的身份表现出影响世界的决心，特别是当它认定的价值观在其边界之外受到挑战时。“阿拉伯之春”和2011年爆发的利比亚内战都属于这种情况。欧洲人民对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大潮给予支持。这一系列革命被称为“阿拉伯之春”，是借用欧洲历史上对几次重大革命的比喻，例如1848年的欧洲革命被称为“民族的春天”，还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1989年的东欧革命。在最近这次事件中，由社交媒体推动的民众起义迅速从突尼斯蔓延到叙利亚，从埃及蔓延到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有的国家还推翻了独裁政权。在利比亚，卡扎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异见，导致内战爆发。

欧盟本可以选择和其他大国（包括美国）一样冷眼旁观，或者只通过支持反叛力量进行介入。但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更主动，他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被允许对利比亚采取干预行动。最后，欧盟联军领导了针对卡扎菲的军事行动，几个月后，卡扎菲的独裁政权被推翻。这是欧洲在联合国支持下进行的正确、有效的干预。卡扎菲政权曾是西方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它的倒台让利比亚有机会走向民主和法治。

2012年，欧元区正在经历金融风暴，欧盟因“60多年来为促进欧洲的和平与和解、民主与人权做出的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21世纪，欧洲和世界上的许多人认为和平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是一项不菲的成就，也一直是欧盟政策的基石——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丘吉尔在战后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说，欧洲应该“像今天的瑞士一样自由、快乐”。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欧洲人似乎一直在遵循丘吉尔的建议。纵观历史，瑞士总能巧妙地远离所有欧洲战争，致力于创建繁荣的社会，让这个社会中的公民感到自由和快乐。从50年代起，欧洲的国家，无论大小，似乎都受到瑞士的鼓舞，努力奠定“和平”和“内部发展”这两个铸就公民幸福的基石。

在欧洲人向世界各地扩张5个多世纪后，哥伦布、达·伽马和库克的精神以及他们开拓新视野的愿望似乎都消失了。曾经指导腓力二世、威廉二世等帝王外交政策的理念在现在的政策制定者眼里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他们建立世界帝国和捍卫国家利益的愿望——不论这些地方有多远。相反，他们专注于建设城市中心和大型购物中心，聚焦于防止内部挑战，因为那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与欧洲历史上的航海家、传教士、帝国主义政治家以及激励了几代人，靠自我奋斗致富的移民相比，现在的欧洲人似乎更像伏尔泰那句名言所说的，“种自己的田要紧”。欧洲人认为，在这个很大程度上由他们塑造的现代世界中，他们的作用更多在于内部发展，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为世界树立榜样。

在新兴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全球化世界中，欧洲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有广泛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虽然整个地球都开放了旅游业，但很高比例的游客最喜欢的目的地仍然是欧洲。在最吸引游客的10个国家中，有5个是欧洲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在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20个艺术博物馆中，有14个在欧洲；在全球排名前980名的大学中，有400所是欧洲大学，在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欧洲大学，尤其是英国的大学总是与美国的大学一起名列前茅。

这些事实也表明，欧盟已经具备成为新型权力领导者，对当今世界施加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被称为软实力。政治学家约瑟夫·奈首创了这个词，用来形容通过感召力和吸引力来塑造他人行为的能力。这种施加影响的方式比传统的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更微妙、更有效。有几家智库基于影响力和全球分布分析了各国和各组织机构的软实力，欧盟排名最高，而且在前10强中，有6个是欧洲国家。

因此，进入21世纪后，欧盟继续影响、塑造着全世界。这个由几个曾经的

强国组成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壮志得酬，不再像新兴国家那样热衷于竞争，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以和平与稳定为主的世界秩序。事实证明，欧盟拥有全球良知，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的行为，积极应对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变暖等重大挑战。欧盟发展成了一种引领变革的力量，以有效的方式促进变革。欧洲通过欧盟继续积极地影响世界。

---

[1] Jenkins, *Churchill*.

[2] Judt, *Postwar*.

[3] François Duchêne, *Jean Monnet: The First Statesman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W.W.Norton, 1994).

[4] Charles Williams,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Hoboken, N.J.: Wiley, 2000).

[5]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Wars: A Personal View* (London: Sinclair Stephenson, 1994).

[6] Galbraith,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Wars*.

[7] William Hitchcock,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a Divided Continent 1945 to the Present* (London: Profile, 2004).

[8] Hitchcock,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a Divided Continent 1945 to the Present*.

[9] Jean Monnet, *Memoires* (New York: Knopf, 1978)

[10] Monnet, *Memoires*.

[11] Mark Leonard.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Madrid: Taurus, 2006) .

[12] Hitchcock,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13] Leonard,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14] Robert Kagan,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Versus Europ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Atlantic Books, 2003).

[15] Leonard,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16] Jeremy Rifkin, *The European Dream: How Europe's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Quietly Eclipsing the American Dream*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05).

[17] eu.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

[18]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2008).

[19] eu.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

结 语

全球文明的支柱

从埃尔南·科尔特斯与阿兹特克的统治者蒙特祖玛的第一次相遇，以及马戛尔尼与中国的乾隆皇帝的第一次相遇以来，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使朝鲜的统治者金正恩不屈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成为西方世界的挑战，全世界文明之间的潜在冲突仍然因为一个正悄然超越所有文明的全球文明而得到缓解。

全球文明出现在21世纪，它的许多成员分布于世界各地，然而他们不会承认自己属于这个文明，因为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仍然觉得自己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和许多其他特点都不同于其他民族。即便如此，在现代社会，各文明彼此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有很多共同之处。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之下，并从中得到日常生活的许多必需品。他们居住的房子以及周围的城市景观都是现代技术和设计的产物——在世界各地都能获得这些技术和技能。他们的日常经历也非常相似，全球性的公司和品牌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日常需求，养成了他们的消费习惯，甚至还为他们提供休闲活动。全球文明融合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标志是，不同文明的成员读过同样的书，看过同样的电影，甚至支持同一支足球队。

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来自不同文明的人能够和平交流、相互学习，通过学习对方的历史和思想，丰富彼此的生活。旅行服务逐步向大多数公民开放，使他们能够去其他国家，与全球文明的其他成员互动。掌握英语和其他全球化的欧洲语言也有助于这种交流互动。

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事实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全球文明的一员：我们都通过互联网这个共同的途径获得信息，学习知识的方法也非常相似。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主要归功于美国。我们知道的主要互联网商业品牌都来自北美：微软、戴尔、苹果、谷歌、脸书、推特等。但是，开启互联网时代大门的是欧洲人，欧洲开创了这个现代化的时代，并创造了使这种非凡的文明融合成为可能的思考方法。

全球文明的成员生活在同一个国际社会中，联合国有各个国家的代表——他们根据联合国各机构制定的条例制定各自的规则，而欧洲的思想在这些组织中具有相当大的分量。自由民主不仅成为传播最广的政治制度，而且与其他体制相比赢得了更多国际社会的尊重。诞生于欧洲的法治、新闻自由和人权等理念也赢得了全球的广泛支持。

世界各地的地理课和导游用的地图是欧洲人首先绘制出来的。在最常见的版本中，欧洲大陆出现在地图的正中间，周围是地球的其他地方。其他大洲将此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投射，其实这是因为欧洲人率先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对制图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其他文明的好奇心一直是欧洲各族人民的共同特点之一，他们的探索并非始于15世纪，而是始于远古时代。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将希腊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归因于一种冒险精神和对发现的渴望——这是其他民族所缺少的。“每年我们都派出船只前往非洲，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付出巨大的代价，目的就是要问那里的人，你们是谁？你们用什么法律？你们说什么语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派船过来问我们这些问题。”

每个欧洲帝国都在他们建立的殖民地留下了重要的标志和影响，包括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此外，殖民帝国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对从各殖民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第一批移民的个人主义、社群意识和参与政府事务的决心奠定了美国建国时坚实的民主制度。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定居者有共同的特点，因此英国的民主传统和民主制度也在这几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得到展现。伊比利亚帝国的特点是政府的等级制和官僚结构，公民参与政治的余地很小。因此，拉丁美洲国家在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法国倡导公民理念，理论上所有公民无论来自什么种族或背景都是平等的，但是从法属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总体上都与拉丁美洲国家存在类似的问题。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它把独裁制和半封建制传遍了所有殖民地。

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在美洲殖民地促进异族通婚，使印第安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共存。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情况则大为不同，那里的第一批定居者把印第安人驱逐到西部，最后他们几乎完全灭绝。

因此，我们能看到欧洲帝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本书中谈到了帝国之间的种种差异，但是它们又都明显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所有大国在扩张中都意识到自己代表着欧洲文明，也深信自己是这一文明的最好代表，因此他们认为，占领的领土越多，对全人类的益处就越大。

殖民帝国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因此，许多商业路线被开创出来，把欧洲的主要城市和世界其他地方连接起来。在此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各大洲得以发展。为了管理和规范殖民地经济，还必须建立法律制度，这使得基于罗马法或英国判例法的欧洲司法制度传至各殖民地，法治成为欧洲最重要的

输出品之一。各大帝国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欧洲人创建了市场和各种网络，依靠指南针、印刷机、铁路和电报等科技进步，欧洲人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道路。

欧洲帝国的殖民地也反映出欧洲的文化、思想和信仰，尤其是基督教。在伊比利亚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十字架是非常重要的符号。在俄罗斯帝国，每一个定居点都会建造一座教堂。在大英帝国，信仰基督教更多是定居者个人的事情，殖民政府并不负责，但是即便如此，基督教也在殖民地造成了极大影响。欧洲帝国的教会——无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教都利用帝国扩张的机会传播福音。基督教的传教士使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之一，在教化各地人民、传播欧洲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所有帝国，包括那些提倡异族通婚的帝国都相信白人更优越。这种信念解释了为什么殖民世界发生了那么多暴行，它为虐待、杀戮和种族灭绝提供了借口，也是宣扬奴隶制并把这种祸害变成有利可图的国际生意的借口。

另一方面，正是通过欧洲国家建立的帝国和网络，那些最重要的、决定现代世界进步的思想才得以传播。其中人人平等是一个基本观点，与种族、政治或宗教无关。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关于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思想彻底改变了欧洲和殖民世界，最终导致奴隶制被废除。使奴隶贸易全球化的欧洲最终禁止和取缔了奴隶贸易，并将这一禁律强加给其他文明。

公民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是导致帝国解体和新国家独立的两大意识形态支柱，这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在去殖民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国家。不仅遭受殖民主义之苦的人认为殖民不公平、不道德，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到罗伯斯庇尔等殖民国家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有这样的想法。从18世纪开始，欧洲培养了许多独立运动领袖，塑造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尼赫鲁，许多现代国家的领导人都从欧洲获得了思想，明确了自己要建立的国家和社会类型。在起草宪法、建立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式方面，欧洲也提供了主要的思想体系。从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所有思想都诞生于欧洲，通过各帝国在殖民过程中打开的渠道传遍整个地球。欧洲也率先开始工业化和现代化，并逐渐影响全世界。

欧洲人一直是历史上最坚决的移民，欧洲帝国的扩张及其遗产使这成为可能。欧洲人大量移往其帝国的殖民地以及从中独立出来的国家，尤其是美洲。美洲最大的国家到处都有欧洲人——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如此突出，与大西洋彼岸的联系也不会如此紧密。美国更加如此。

在帝国史上，欧洲时代的结束非常反常，因为终结欧洲霸权的并非外敌入侵，也不是新文化势力，而是欧洲民族之间的冲突，这是导致欧洲霸权时

代戛然而止的主因。在1870—1914年发生的欧洲霸权之争可以解释为，欧洲国家想一决高低，以决定一旦它们几个国家成功控制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哪个国家能够无可争议地行使世界霸权。它们只关心来自其他欧洲强国的竞争，好像只有欧洲国家拥有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发起挑战和反抗，但是它们没有认识到欧洲霸权也可能受到来自欧洲大陆之外的新兴大国的威胁，这些国家也遵循同样的发展趋势。事实上，在欧洲大陆以外，唯一成功击败过欧洲强国并实现扩张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西化的日本。前者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力克西班牙，后者在1904年打败了俄罗斯。如果不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欧洲时代和欧洲帝国会持续得更久。

20世纪早期，独立运动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动摇欧洲帝国（印度和爱尔兰除外）。欧洲在15世纪没有任何预兆地飞速崛起，同样，在20世纪初，人们完全想不到欧洲会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突然衰落。

但是，欧洲国家与其殖民地的关系并没有随着民族独立而结束，这在本书中有所论及。欧洲与后帝国时代的诸多国家之间的联系仍然非常牢固和紧密，首先是因为欧洲文化的影响，其次得益于经济和贸易联系，最后是前殖民地居民的外移。后帝国时代的欧洲是不同文化共存的典范，这是开放社会必有的特征之一。

在过去500年里，如果所有欧洲人都留在自己的祖国，世界历史可能会和平很多，许多冲突和许多人的苦难可能都会幸免。但是，如果欧洲文明没有扩张，历史也可能会更加动荡不安。所有文明都具有扩张的本能，如果欧洲人没有先到先占，世界上许多地区可能会被其他民族占领。

如果美洲大陆被中国人、日本人或者阿拉伯人殖民，它会如何发展？如果非洲不是被欧洲列强瓜分，而是被北边的阿拉伯人接管，那么这个大陆会有怎样的现代史？如果蒙古人能够固守其帝国和权力，一直坚持到现代，欧亚大陆会怎样发展？假设印度被另一个亚洲国家而不是英国殖民，或者如果印度自己的一个民族成功占领了印度次大陆……显然，如果是这样，包括欧洲在内的各个文明的历史都将有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当前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观也会大不相同。

近5个世纪的欧洲霸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欧洲衰落，让位给美国。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最初的建设者和定居者大多是欧洲人，他们受到诞生于欧洲的诸多思想启发。但是，美国人一直拒绝被看作一个帝国，也不愿意被视为有帝国的扩张野心。他们倾向于简单地把美国看作拥有各方面丰富资源的伟大国家，并成功晋级为超级大国。和黄金时代的欧洲国家一样，美国也一直信奉一个原则：扩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有利于这个星球上的人民，可以创建托马斯·杰斐逊所渴望的“自由帝国”，因此，美国政府

和军队都必须履行霸权国家的义务，就像过去伟大的欧洲帝国为其霸权所付出的努力一样。

美国为延续西方霸权做出了贡献。然而，当世界贸易的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超级大国衰落的迹象隐约可见时，“后西方时代”这个词开始出现。这个若隐若现的后西方时代并非是由一个新的非西方超级大国控制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文明能够统治其他文明。在这个时代，合作与互动取代了过去的竞争与对抗，成为必然的选择，因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且它们拥有相同的知识和几乎相同的技术来应对问题。

今天国际社会的核心要素以及主要架构都来自欧洲，首先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其次是民主，再次是法治、新闻自由和人权等使得各项机制能够正常运行的要素，最后是科技进步。这些思想也已成为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思想，但对他们来说，这些思想是外来的。世界上其他地方越采纳西方的技术、原则和思想，欧洲的影响力就越强大。当然，现在还有国家和民族拒绝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坚持迷信和传统而不是科学和实证主义，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们往往只是少数派，而且无法让它们的选择成为国际主流。

在全球文明中，欧洲文化的优势和影响力大于所有其他文化。人文主义把人放在一切事物的中心，这存在于每一个取得进步的社会中；实证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大学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项伟大发明，在19世纪后已成为全世界教育年轻人的机构；只有欧洲产生了全球语言。在国际语言中，使用英语的广泛程度首屈一指，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等全球语言都发源于欧洲。从穿西装打领带，在餐桌上用刀叉吃饭，到选用座椅，欧洲的习俗和礼仪盛行，在国际领域尤其如此。支撑全球文明的柱石都来自欧洲。

因此，欧洲是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要参照。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里，超过2/3的国家在其历史的某个阶段曾隶属于欧洲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在全球文明中的角色相当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在欧洲文明中的地位。欧洲人如果不溯源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无法理解自己的历史。同样，生活在当今世界文明中的人们需要参照欧洲或某个欧洲帝国的情况，才能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有些人可能会为欧洲的遗留影响感到骄傲，有一些人可能会抗拒甚至厌恶，但是，无论他们是否喜欢，离开欧洲的贡献，就无法实现今天的全球文明。欧洲的社会模式曾激发无数钦羡，使许多国家的政府竞相模仿。其他国家的人民会继续参照欧洲模式，从中汲取灵感，克服他们的政治或经济挑战，迈向现代化。

最后，欧洲不仅诞生了民族国家，也创建了一种超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体

化模式，在全球化时代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21世纪初，世界秩序越来越多极，美国已经放弃了超级大国的许多责任，特朗普总统违弃了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杰斐逊原则和威尔逊原则。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决心以牺牲西方为代价，巩固自己的全球角色；当世界陷入无序，当现行的国际规则似乎不再适用时，一些小国也浑水摸鱼，从中渔利。锐实力（Sharp Power）在崛起，威权国家借此胁迫其他国家，操纵国外舆论。在这样的世界，欧洲的角色极其重要。这个世界能发展到今天，欧洲比任何其他国家或文明的贡献都更大，因此它不仅有继续影响这个世界的道义责任，也有强大的实力实现这种影响。

欧盟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全球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欧盟成员国名列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20强，人类发展指数名列前茅。在经历了极端民族主义的苦难之后，欧盟创立了最具创新性的国家间一体化模式，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形成。在欧洲人不得不捍卫他们对世界的积极影响之际，这种身份认同尤为重要。

欧盟知足知止，其成员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力量主导这个世界，也不再想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化。它们希望为自己和世界做一些更有用的事情，确保为全球文明带来真正进步的思想和原则能够发扬光大。欧盟是最能够制止世界秩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力量，避免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现有大国，最终陷入战争。诚然，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想要征服他国领土，但是它们会征服其他国家的市场和人民的思想。21世纪不一定会发生公开的战争，但是世界秩序很容易蜕变成激烈的竞争模式，陷入混乱的局势，这会削弱这个全球时代的许多成就。

欧盟一直致力于维护以和平与合作为主的世界秩序，对21世纪最严峻的挑战表现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决心，并积极应对全球变暖、国际恐怖主义以及与贫穷和不发达相关的问题。

当前世界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人民政府的民主在几个国家退化成暴民政治或暴民统治，不同的政党派别为了追逐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地获得更多选票，这通常违背了法治，甚至更糟糕，牺牲了真相。新闻自由被虚假新闻破坏，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在这方面，欧洲再次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那就是保持它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民主以及使民主有效运作的社会模式。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革命时代到欧洲一体化，欧洲创造了能够释放人类非凡创造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使文明发展到最高形式，为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欧洲的历史糅合了光耀和阴影、胜利和悲歌，是指引人类的一盏明灯。

长久以来，欧洲一直没有一部宏大的记述，展示欧盟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剖析欧洲在现代史中的角色和意义，以及杰出的欧洲人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缺。

致谢

我想对几位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人表示感谢。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查理·瓦伊尼，他以出色的技能和专业精神代理我的作品。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一直向我提供宝贵的建议。其次，我想感谢克莱本·汉考克，他为我争取到飞马出版社（Pegasus Books）编辑本书的特权。我还要感谢杰茜卡·凯斯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最后，感谢洲际文学代理公司（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的尼基·肯尼迪和她的同事们，感谢他们努力把这本书推向国际，甚至远到中国。

为了帮助我抓住欧洲霸权时代这个宏大主题的要旨，几位学术界的同事不吝贡献他们的智慧，丰富了我的想法。特别感谢休·托马斯勋爵，他对他审阅的几个章节提出了中肯的评论。能从他的智慧和历史观中获益是一大幸事，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谨以此书怀念他。

我的父母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并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建设性评论。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她忠诚、忍耐，而且以她的幽默方式包容我的文学职业。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孩子们，爱德华多和桑德拉，他们是我的骄傲和快乐，他们的热情、鼓励和好奇精神极大地鼓动了我。撰写这本书的一个好处就是我能在家里和他们一起度过许多个夜晚，他们也因此比大多数同龄人更了解自己的欧洲之根。

参考文献

Abernethy, David B. *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1415–198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kçam, Taner. *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7).

Archdeacon, Thomas J. *Becoming American: An Ethnic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Aron, Raymond. *Penser la guerre: Clausewitz; l'age europeen*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2017).

———.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Ansprenger, Franz. *The Dissolution of Colonial Empires* (London: Routledge,1989).

Armitage, David. *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arzun, Jacques. *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A Cultural History of Europe* (St. Louis: Turtleback Books, 2001).

Beevor, Antony.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2).

Beasley, William.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Birmingham, Stephen. *"The Rest of Us": The Rise of America's Eastern European Jew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4).

Blixen, Karen. *Out of Africa* (London: Penguin, 1990).

Bouche, Denis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aris: Fayard, 1991).

Braudel, Fernand.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Penguin, 1991).

Brook, Timothy.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London: Vintage, 2008).

Burckhardt, Jacob.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Whitefish, Mont.:Kessinger, 2010).

Burk, Kathleen. *Old World, New World: The Story of Britain and America* (London:Abacus, 2007).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Oxford, England: Oxford World Classics, 2009).

Burns, E. Bradford. *A History of Brazi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Butel, Paul. *Histoire des Antilles francais, XVIIe-XXe siècle* (Paris: Parrin, 2002).

Carr, Raymond. *Spain 1808–1975*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Carlyle, Thoma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Oxford, England: Oxford World Classics, 2000).

Casas, Bartolomé de las.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NewYork: Penguin Classics, 1999).

Calvo, Alex & Qiaoni, Bao. *Forgotten Voices from the Great War:* The Chinese La bour Corp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13(49).

Chamberlain, M. E. *Decolonization: The Fall of the European Empires* (Hoboken,N.J.: Wiley-Blackwell, 1999).

Champlain, Samuel de. *Le Voyages de Samuel de Champlain au Canada, de 1603 à 1618*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7)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de. *Memories* d'outre tombe (Paris: Grasset, 1996).

Churchill, Winston.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Vols. II and III(London: Cassell, 1982)

———. *My African Journey* (London: Standard Publications, 2007).

———. *The River War* (London: Standard Publications, 2007).

———.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8*, Penguin, 2005

———.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VI: Triumph and Traged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5).

Clark, Kenneth. *Civilization: A Personal View*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0).

Clarke, Pe. *The Last Thousand Day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the Pax Americana* (London: Penguin, 2008).

Clausewitz, Carl von. *On War*, (Oxford, England: Oxford World Classics, 2008).

Coffey, Michael. *The Irish in America* (New York: Hyperion, 1997).

Collier, Peter & David Horowitz. *The Kennedys: An American Drama*, (M W Books, 1984).

Conrad, Joseph. *Heart of Darkness* (London: Penguin, 1994).

———. *Nostromo* (London: Penguin, 1994).

———. *Lord Jim* (London: Penguin, 1994).

Condorcet, Nicolas de.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irit humain. Ouvres completes* (Paris: Nabu Press, 2010).

———. *Re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Ouvres completes* (Paris: Nabu Press,2010).

Cook, James. *The Voyages of Captain Cook* (London: Wordsworth Classics, 1999).

Cooper, Robert. *The Post 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 (London: Demos,1996).

Cole, Juan. *Napoleon's Egypt: Invading the Middle Ea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Crowley, Roger. *Conquerors: How Portugal Forged the First Global Empi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5).

Darlymple, William. *Return of a King: The Battle for Afghanistan, 1839–42* (London:Bloomsbury, 2013).

Darwin, John. *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London: Bloomsbury, 2008).

Davies, Norman.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Diaz del Castillo, Bernal. *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 (London: Penguin, 2003).

Dickens, Charles. *American Note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4).

———. *Martin Chuzzlewit*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4).

Duchêne, François. *Jean Monnet: The First Statesman of Interdependence* (NewYork: W.W. Norton, 1994).

Dunn, Mary. *William Penn: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Eccles, W. J. *The French in North America, 1500–1783*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lliott, John H.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El Viejo Mundo y el Nuevo (1492–1650)*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2000). Ferguson, Niall.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Money Prophets, 1798–1848* (London:Penguin, 1999).

———.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4).

———.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London: Penguin, 2001).

———.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8)

———.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Penguin, 2011).

———. *The square and the Tower,* (London: Allen Lane, 2017)

Fernández-Armesto, Felipe. *Millennium: 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NewYork: Scribner, 1995).

———. *Civilizations: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NewYork: Free Press, 2001).

———. *Columbus*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The Americas: The History of a Hemisphe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3).

———. *Amerigo: The Man Who Gave His Name to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 *1492: The Year the World Began* (San Francisco: Harper One, 2009).

Ferro, Marc. *Colonization: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Fieldhouse, D. K.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Figes, Orlando. *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96).

———.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2002).

Flynn, Dennys, Giráldez, Arturo Von Glahn, Richard.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1800* (London: Ashgate, 2003).

Forastié, Jean. *Les Trente Glorieuses, ou la Revolution Invisible de 1946 à 1975*

(Paris: Poche, 2011).

Foreman-Peck, Ja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1850 (London: Harvester, 1993).

Franklin, Benjam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Henry Holt, 1916).

Frankopan, Peter . *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2017).

Frieden, Jeffry. *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York: W.W. Norton, 2006).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Penguin,2012).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New York: Penguin, 1963).

———.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Wars: A Personal View* (London: Sinclair Stephenson, 1994).

Gandhi, Mohandas. *An Autobiography or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London: Penguin, 2000).

Games, Alison. *Migr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García Cárcel, Ricardo. *La Herencia del Pasado, las Memorias Historicas de Es pana*, (Barcelona, Galaxia Gutenberg, 2011).

Gibbon, Edwar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Penguin,1998).

Giddens, Anthony. *Europe in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06).

Gide, André. *Voyage au Congo* (Paris: Poche, 2007).

Gilbert, Martin.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8).

Glendinning, Victoria. *Raffles and the Golden Opportunity* (London: Profile Books,2012).

Glover, Jonathan. *Humanity: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Cape, 1999).

Goldstone, Jack. *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Boston:McGraw-Hill, 2009).

Gobineau, Joseph Arthur. *Essai sur l'inegalite des Races Humaines* (Paris: General Books, 2012).

Grotius, Hugo. *The Free Sea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11).

Guha, Ramachandr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New York: Picador, 2008).

Haggard, H. Rider. *King Solomon's Mines* (London: Penguin, 1996).

Halkuyt, Richard.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 Nabu Press, 2011).

Harrison, Christopher.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1860-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Hastings, Adrian. *The Church in Africa, 145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Hastings, Max. *Catastrophe 1914: Europe Goes to War*. William Collins, 1914 .

Havard, Gilles. *Histoire de l'Amerique* Française (Paris: Flamarion, 2008).

Herman, Arthur. *To Rule the Waves: How the British Navy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4).

Hitchcock, William.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a Divided Continent 1945 to the Present* (London: Profile, 2004).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Michel Joseph, 1975).

———.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2).

———.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4).

Hobson, J. A. *Imperialism: A Stud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7).

Hobston, Joh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olland, R. F.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1981* (London: Palgrave, 1985).

Hosking, Geoffrey.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A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Hsu, C. Y. Immanuel.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Israel, Jonathan.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James, CLR.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NewYork: Vintage, 1963).

James, Lawrence. *Raj: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Abacus, 1997).

Jenkins, Roy. *Churchill: A Biography* (New York: Plume, 2002).

Johnson, Paul. *Intellectuals, From Marx, Tolstoy* & *Sartre* & *Chomsky* (London:Harper Perennial, 2007).

Judt, Tony.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 *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William Heinneman, 2008).

Kagan, Robert.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Versus Europ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 *The Return and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London: Atlantic Books,2008).

Kaldor, Mary. *The Disintegrating West* (London: Hill and Wang, 1978).

Kamen, Henry. *Empire: 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 1492–1763* (New York:Harper Perennial, 2004).

———. *The Disinherited: Exile and the Making of Spanish Culture, 1492–1975*(London: Allen Lane, 2007).

———. *Early Modern European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Keay, Joh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8)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Fontana Press, 1989).

Kissinger, Henry. *Diplomacy*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94).

———. *On China* (London: Penguin, 2012).

———. *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London: Penguin, 2016).

Klein, Herbert. *A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Landes, Davi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London: Abacus, 1998).

Lapierre, Dominique and Collins, Larry. *Freedom at Midnight: How England Gave Away an Empi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5)

———. *O Jerusale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Lawrence, T. E. *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Radford, Va.: Wilder, 2011).

Lenin, Vladimir Ilyich.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London:Penguin, 2010).

Leonard, Mark.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Madrid: Taurus,

2006).

Lévy, Bernard-Henri.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e*(Paris: Grasset, 1991).

Litalien, Raymonde. *Champlain: The Birth of French America* (Montreal: Mc

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Livingstone, Davi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London,PQ Books).

Loti, Pierre. *Au Maroc* (Paris: Broché, 2000).

Lovell, Julia. *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 (NewYork: Grove Press, 2007).

———.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York: Picador, 2011).

Lucena Giraldo, Manuel. *Naciones de rebeldes* (Madrid: Taurus, 2010).

———. *Francisco de Miranda La aventura de la política* (Madrid: Edaf, 1990).

Lynch, John.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New York: W.W. Norton, 1986).

McCue, Jim. *Edmund Burke* & *Our Present Discontents* (London: Claridge Press,1997).

Machiavelli, Niccolò. *The Prince*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11).

Macmillan, Margaret.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Random House, 2001).

Madariaga, Salvador de. *Hernán Cortes* (Madrid: Espasa, 1977).

———. *Bolivar* (London: Hollis and Carter, 1952).

———. *De Colon a Bolivar* (Madrid: Espasa, 1981).

———. *El Auge y el Ocaso del 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 (Madrid: Espasa-

Calpe, 1977).

———. *Espana, Ensayo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Espasa*-Calpé, 1979.

Malthus, Thoma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Penguin,2012).

Marrus, Michael Robert.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zower, M.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enguin,2008).

McCue, Jim. *Edmund Burke and Our Present Discontents* (London: Claridge Press,1997)

McNeill, John Robert. *Atlantic Empires of France and Spain: Louisbourg and Havana, 1700–176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McNeill, W. H.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Mintz, Sidney W.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York: Penguin, 1986).

Mill, James.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vol. 1 (London: Baldwin, Cradock & Joy,1817).

Monnet, Jean. *Memoires* (New York: Knopf, 1978).

Montesquieu, Charles de. *Persian Letters* (New York: Penguin, 1973).

Morison, Samuel Eliot.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orris, Ian.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London: Profile, 2010).

Nugent, Paul. *Africa Since Independence* (Palgrave, 2004).

Nietzsche, Friederich. *Thus Spoke Zarathustra* (New York: Sterling,

2012).

Oates, Charles G. *Matabeleland and the Victoria Falls: Th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Frank Oates, 1873–1875* (London: Jeppestown Press, 2007).

O'Brien, Patrick & Prados de la Escosura, Leandro.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from the Conquest of Ceuta, 1415, to the Treaty of Lusaka, 1974* (Madrid: Revista de Historia Economica, 1998; vol. 16, no. 1).

Oliveira Marques, A. H de. *History of Portug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Orwell, George. *Shooting an Elephant* (London: Penguin, 1950).

Osborne, Roger. *Civilization: A New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Pegasus, 2008).

Osterhammel, Jurg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Page, Martin. *First Global Village, How Portugal Changed the World* (Lisbon: Casadas Letras, 2002).

Paine, Thomas. *Common Sense* (London: Penguin, 2004).

Stéphane Courtois, et al.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rekh, Bhikhu. *Colonialism, Tradition, and Reform: An Analysis of Gandhi's Political Discourse* (London: Sage, 1999).

Pakenham, Thomas.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The White Man's Conquest of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1876 to 1912*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arker, Geoffrey.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pys, Samuel.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eyrefitte, Alain. *The Immobile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2013).

Pocock, Tom. *Battle for Empire: The Very First World War, 1756–63* (London: Michael O'Mara, 1998).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aleigh, Sir Walter. *The Discovery of Guiana* (Whitefish, Montana: Kessinger,2009).

Ravenstein, E.G. *A Journey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2–149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eid, T. 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The New Superpower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Supremacy* (London: Penguin, 2004).

Reynolds, David. *One World Divisible: A Global History Since 1945* (London, W.W.Norton, 2000).

Riendeau, Roger. *A Brief History of Canada* (Markham, Ontario: Fitzhenry & Whiteside, 2007).

Rifkin, Jeremy. *The European Dream: How Europe's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Quietly Eclipsing the American* Dream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05).

Roberts, Andrew. *Napoleon the Great* (London: Allen Lane, 2016).

Robinson, Ronald, J. Gallagher, and A.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IB Tauris, 1965).

Rogan, Eugene. *The Arabs: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2009).

———.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Basic, 2015).

Russell, Bertrand.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Union Paperbacks,1987).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London: Penguin,1978).

———.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Vintage, 1994).

Saenz de Quesada, Maria. *La Argentina: Historia del País y de su Gente*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2001).

Sassoon, Donald. *The Culture of the Europeans: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London:Harper Collins, 2006).

Sebag-Montefiore, Simon. *Jerusalem: The Biography* (New York: Knopf, 2011).

———. *The Romanovs: 1613–1918*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6).

Seeley, John Robert.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Bantam, 2003).

Spengler, Oswal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Knopf, 1926).

Síocháin, Séamas Ó. *Roger Casement: Imperialist, Rebel, Revolutionary* (Dublin:Lilliput Press, 2008).

Stanley, Henry.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Travels, 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 Including Four Months' Residence with Dr. Livingstone,* (London: Wordsworth, 2010).

———.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Or, The Sources of the Nile Around the Great Lakes of Equatorial Africa and Down the Livingstone River to the Atlantic Ocean* (London: Adamant, 2000).

Taylor, A.J.P.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Europe: Grandeur and Decline* (London: Penguin, 1985).

Tocqueville, Alexis de. *The Ancien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88).

———.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2003).

Thomas, Anthony. *Rhodes: The Race for Africa* (Thomas Dunne Books,

1997).

Thomas, Hugh. *Rivers of Gold: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from Columbus to Magell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 *The Golden Age: The Spanish Empire of Charles V* (New York: Penguin,2011).

———. *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 *The Conquest of Mexico* (London: Hutchinson, 1993).

Tunzelmann, Alex Von. *Indian Summe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d of an Empire*(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Vargas Llosa, Mario. *The Celt's Dream*, Faber & Faber, 2012.

Wasserstein, Bernard.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Europe in Our Time*(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Watson, Peter. *Ideas: A History of Thought and Invention, from Fire to Freud*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 *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Harper Perennial 2002).

———. *The German Genius: Europe's Third Renaissance,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2010).

Whitaker, Arthur.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dea: Its Rise and Decline* (London: Forgotten, 2017).

Williams, Charles.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Hoboken, N.J.: Wiley, 2000).

Zakaria, Fareed.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2008).

Zeldin, Theodore. *France, 1848–1945: Politics and Anger*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Zweig, Stefan. *The World of Yesterday*, (London: Pushkin Press, 2015).

———. *Messages from a Lost World: Europe on the Brink* (London: Pushkin Press,2011.

———. *Brazil: A Land of the Future*, (Riverside, Calif.: Ariadne,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著；黄锦桂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8
书名原文： Europa：How Europe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ISBN 978-7-5217-1952-9
I. ①欧… II. ①胡… ②黄… III.①欧洲 - 历史IV. ①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99412号

EUROPA: How Europe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Copyright © 2018 by Julio Crespo MacLenna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Viney Agency acting in conjunction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著者：［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
译者：黄锦桂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80千字
版次：2020年8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4273
书号：ISBN 978–7–5217–1952–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帝国与蛮族

EMPIRES and BARBARIANS

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BIRTH of EUROPE

罗马史诗三部曲
THE ROME TRILOGY
VOL.III

PETER HEATHER

[英] 彼得·希瑟——著

任颂华——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引子

第一章 移民和蛮族

欧洲的居民

关于人口迁移的大讨论

人口迁移和入侵

第二章 全球化与日耳曼人

日耳曼欧洲的转变

战士、国王和经济

和罗马的关系

全球化

第三章 条条大路通罗马？

从波罗的海到黑海

移民和日耳曼人

掠夺的浪潮

第四章 移民和边境的崩溃

“曾是战士”

民族迁徙

为生存而战

第五章 匈人的迁徙

“万恶之源”

部落的聚集
帝国与身份
移民与帝国
第六章 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精英转移还是民族大迁徙？
精英与大众
法兰克人和罗马高卢
大规模迁徙和社会压力
第七章 新欧洲
帝国陨落
新秩序
系统的崩溃和欧洲的诞生
第八章 斯拉夫欧洲的创生
寻找斯拉夫人
欧洲的斯拉夫化
移民和斯拉夫人
移民与斯拉夫欧洲
第九章 维京人的大迁徙
维京人和西欧[2]
俄罗斯的维京人
移民潮
维京人的扩张
移民与发展
第十章 第一个欧洲联盟

政治与发展
国家的崛起
同等政治体与边缘区
第十一章 移民的终结与欧洲的诞生
移民
移民与发展
帝国的牛顿第三定律？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参考书目

前言

写这本书真的是花了我太长的时间。我签下最早那份合同时，我的儿子威廉还没出世。而这本书最终出版之时，他已经要参加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GCSE）的考试了（也就是说他已经16岁了，如果你不熟悉英国教育体系的话……）。写这本书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同时也在做别的事情，但这个项目本身就占用了4个独立的学术假期，比我在其他任何事情上花费的时间都要多，这确实反映出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本书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需要参考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文献。其中一些领域，特别是斯拉夫历史和考古学，我绝对不敢说自己已完全掌握，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领域的重要学者长期以来都将他们重要的论点以西欧语言发表。在这里以及接下来许多方面的学术讨论中，我往往会闯进一些少有前人涉足的领域。当然，这是本书花了这么长时间的第二个原因。

但是，以全面比较的方式来探讨方方面面的历史是这个项目设计的核心。我最初设想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论述第一千年中蛮族欧洲的转变。首先，在我看来，第一千年上半叶处于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社会，第一千年下半叶处于法兰克和拜占庭帝国边缘的斯拉夫社会，二者的发展模式相似。这肯定不是偶然。其次，从前的学者往往过度强调第一千年里蛮族迁徙现象的重要性，而一些现代学者在我看来有些矫枉过正，对蛮族迁徙的作用过于轻视了。为了帮自己思考第一千年中的人口迁移问题，阅读更现代、记录也更完善的人口迁移案例似乎是个好主意。而通过这样的阅读，本书的轮廓得以成形。在阅读研究人口迁徙的比较文献时，我渐渐意识到：首先，人口迁移的模式和形式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模式密切相关；其次，所在的政治环境对人口迁移模式和形式的塑造有决定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意识到，我一开始打算从两条线入手来研究第一千年的蛮族欧洲，但实际上它们根本不是独立的两条线，而是一个更广泛的转变过程中相互依赖的两方面。第一千年的蛮族迁徙模式必然会受到同一时期蛮族社会中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影响，也在这些社会与当时帝国势力往来的过程中得到塑造。这是本书的核心论点，它只能从本书最终采用的广泛比较方法中产生。当然，读者可以判断采用这种策略的总体收获是否能够弥补其在细节方面的不足。

另外，我想在这里带着巨大的喜悦和感激，为我多年来进行这个项目时得到的所有帮助献上感谢。我受到了不少机构的直接帮助。耶鲁大学的古典学系和历史学系是我在1999—2000年的庇护所，在那里，我获得了许多关于现代人口迁移模式的知识，尽管理解得不是那么全面。英国艺术与人

文研究理事会（AHRC）在2004年秋季给了我一个学期的额外学术假，我总共休了8个月的假，本书后面大部分章节的草稿都是在此期间写成的。学术假期间，我也在华盛顿特区敦巴顿橡树园研究中心非常宜人的环境中度过了一段日子，能在那里工作非常好，周围有很多书和激励我的伙伴。我十分感谢研究中心的主任和董事会成员邀请我在2004年秋季学期成为那里的访问学者。凭借在AHRC的迁徙与离散族群项目下获得的一笔小额资助，我在2005年春季和夏季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人口迁移和第一千年的研讨会，我自己收获非常大，希望对其他参与者来说也是如此。

过去16年中，我在学术方面承蒙许多人的帮助，在此无法一一感谢。在我思考这个主题的最初几年里，我有幸受邀参加由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罗马世界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项目中的一个分组。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体验，当时和之后交流的想法和信息对我的帮助难以言表。我要特别感谢普热梅斯瓦夫·乌尔班奇克（Przemysław Urbanczyk），他后来邀请我去波兰，使我对中世纪早期斯拉夫人的理解不至于停留在十分肤浅的层面。另外，我还要感谢所有参加AHRC资助的人口迁移研讨会的人，他们使研讨会成为激发思考的愉快经历。在众多用思想和著作一路上给我启发和帮助的学者中，我特别感谢保罗·巴福德（Paul Barford）、安杰伊·布科（Andrzej Buko）、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戴维·顿维尔（David Dumville）、盖伊·哈尔索尔（Guy Halsall）、沃尔夫冈·豪布里希斯（Wolfgang Haubrichs）、洛特·海蒂格（Lotte Hedeager）、阿格纳尔·黑尔加松（Agnar Helgason），克里斯蒂安·吕布克（Christian Lübke）、沃尔特·波尔（Walter Pohl）、马克·休金（Mark Shchukin）、马克·托马斯（Mark Thomas）、布莱恩·沃德·珀金斯（Bryan Ward Perkins）、麦克·惠特比（Mike Whitby）、马克·惠托（Mark Whittow）、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伊安·伍德（Ian Wood）和阿列克斯·伍尔夫（Alex Woolf）。给予我帮助的远远不只有这几位学者，但我在学术上大大受惠于他人的工作，这份名单至少是一个缩影。

在更直接的层面上，我要感谢我的编辑乔治娜·莫莉（Georgina Morley），我的文字编辑休·菲尔波特（Sue Philpott）和尼克·德·索莫吉（Nick de Somogyi），以及我的编辑主管塔尼娅·亚当斯（Tania Adams）。他们付出了辛劳，为这个项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非常感谢他们发现和纠正了不一致、不正确和不恰当之处。当然，书中若还留有不一致、不正确和不恰当的地方，那都是我自己的责任。我还要感谢尼尔·麦克林恩（Neil McLynn）和其他各位朋友及同事，他们审阅了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各版草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耐心、鼓励和纠正。像往常一样，我也欠家里每个人的情，在过去几个月里，非常感谢你们的包容。邦戈

（Bongo）和图其（Tookey）耐心地容忍我不带它们锻炼，威廉和纳撒尼尔慷慨地宽恕了我的分心和暴躁脾气。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妻子盖尔（Gail），除了大量的后勤和感情支持，她也在本书出版的最后几个阶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得到的恩惠难以衡量，为此我愿回报以最多的爱和感恩。

引子

882年夏天，在靠近匈牙利平原的地方（多瑙河在此地流经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脉），摩拉维亚公爵（Duke of the Moravians）斯瓦托普鲁克（Zwentibald，或作Svatopluk）和他的手下抓住了弗林哈（Werinhar），“恩格尔沙克（Engelschalk）三个儿子中的第二个，还有他们的亲戚威兹洛伯爵（Count Wezzilo），割下了他们的右手和舌头，更可怕的是还割下了他们的生殖器，而且割到一点（生殖器的）痕迹都看不到”。在公元第一千年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中，这一事件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

首先，摩拉维亚人是说斯拉夫语的。摩拉维亚位于多瑙河以北，大部分位于现斯洛伐克境内。在现代人看来，说斯拉夫语的人在中欧的这个地区占大多数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他们如今仍在当地占大多数。但是，从第一千年之初到接下来的整整500年里，斯洛伐克和它周围的许多地方都在讲日耳曼语的人的控制之下。说斯拉夫语的摩拉维亚人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事件本身也值得注意。尽管描述这一事件的是一位并非摩拉维亚人的法兰克评论家，尽管造成的伤害令人发指，但我们的这位评论家对斯拉夫人并非丝毫不能理解。我们得知，摩拉维亚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是为了先发制人，也是为了血债血偿。说是血债血偿，是因为弗林哈的父亲恩格尔沙克和他的叔叔威廉之前管理这段边境属于法兰克的那一边时，对摩拉维亚人也施以暴力。这次行动也是先发制人，摩拉维亚人想要阻止恩格尔沙克的儿子们从一个新任命的人手中抢走原本属于他们父亲的职位。摩拉维亚人的行动肯定是残暴的，但他们不是毫无来由就施暴的野蛮人，即便是法兰克评论家，也能意识到残暴背后有着明确而连贯的行动计划。摩拉维亚人希望边界地区属于他们的那部分能按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运作。考古证据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要求。摩拉维亚是在第一千年晚期出现的第一个有一定规模和凝聚力的斯拉夫国家，其物质遗存令人印象深刻。在其首都米库勒茨采（Mikulčiče），发掘者发现了一系列巨石建成的围墙，以及占地400平方米的宏伟教堂的遗迹，其规模不比当时欧洲任何其他地方（哪怕是被认为更先进的地区）的任何建筑小。[1]在第一千年这个大背景下，这就更不寻常了。公元元年时，摩拉维亚还处在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而且摩拉维亚人的组织方式通常只是小型酋邦，也没有建造过什么比大一点的木屋更了不起的东西。

就这样，9世纪晚期的一次边境事件完美捕捉到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公元第一千年中蛮族欧洲的根本性转变。本书使用的“蛮族”一词意义非常特

殊，只包含最初那个希腊单词barbaros的部分含义。对希腊人以及后来罗马帝国的人来说，“蛮族”有非常明确的“低等”的意思，从道德到餐桌礼仪，蛮族的一切都低人一等。它意味着对立面，“他者”，是罗马帝国一统之下地中海文明帝国的反面。我所说的“蛮族”则有限定的含义，并没有道德意味。本书所说的“蛮族欧洲”，指的是位于东方和北方的非罗马、非帝国的世界。尽管地中海地区从哲学到工程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惊人的成熟高度，但那也是为了取乐就可以将人投喂给野兽的世界，因此，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在道德方面比较帝国的欧洲与非帝国的欧洲。

我们的故事从公元元年开始，当时欧洲各地的情况有巨大的反差。新近统一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圈子孕育了一个政治成熟、经济先进、文化繁荣的文明。这个世界有哲学、银行、职业军队、文学、令人惊叹的建筑和垃圾收集系统。在欧洲其他地方，只有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的某些地方开始按照更接近于地中海的节奏前进，其他地区的居民仍然是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政治单元的规模也很小。这些地区大部分由说日耳曼语的人统治，他们有一些铁制工具和武器，但一般都用木头，文化水平很低，也没有石头建筑。越往东，社会就越简单：铁制工具更缺，农业生产效率更低，人口密度更小。事实上，这是古代亚欧大陆西部的世界秩序：占主导地位的地中海圈支配着未开发的北部腹地。

时间推进一千年后，世界变了。说斯拉夫语的人取代了说日耳曼语的人，成为蛮族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力量，一些说日耳曼语的人在欧洲其他一些地方取代了罗马人和凯尔特人；更为根本的是，地中海的统治地位已被打破。从政治上讲，这是由于从前的北部腹地出现了更大和更稳定的国家组织（比如摩拉维亚），但这种模式并不局限于政治。公元1000年的时候，地中海地区的许多文化模式——尤其是基督教、文学和石头建筑——已经在向北和向东传播。大体上，欧洲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组织模式正朝着同质化的方向发展。正是这些新的国家和文化结构永久性地打破了地中海主导的古老世界秩序。蛮族欧洲不再野蛮。古代的世界秩序让位于新的文化和政治模式，而这些模式才是现代欧洲模式更直接的先驱。

这种大规模权力转移的总体意义体现在，许多现代欧洲国家在书写自身历史时，都会（多少有些牵强地）回溯到某个建立于公元第一千年中晚期的政治共同体。有些情况下，这种回溯相当勉强，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绝对无法将国家传说进一步回溯到公元元年或更早。从深层次的意义上讲，第一千年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确实见证了现代欧洲诞生的阵痛。因为在根本上，与其说欧洲是个地理现象，不如说是文化、经济和政治现象。从地理角度来说，欧洲只是亚欧大陆的西部。赋予欧洲真正历史身份的是以下这种情形：产生了一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相互往来的社会，社会间往来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各个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相似之处；而真正的相似

性首次出现，是第一千年中蛮族欧洲转型的直接后果。

这是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关键时期，正因如此，它长期以来吸引着学者和公众的关注。各种版本的粗疏叙事认为，当初先民们已经建立了民族共同体，这也是学校里通常教授的内容。自公共教育普及以来，现代欧洲人多多少少都对自己国家的传说有些了解。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情况开始复杂起来。

直到最近，学者和大众对这个时期的理解仍然是，有这样或那样一批移民，在第一千年的不同阶段突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在第一千年的中间时段，讲日耳曼语的移民摧毁了罗马帝国，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若干先祖国家。他们之后是更多的日耳曼人，以及作用更突出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活动在欧洲的国家拼图板上又放进了许多块拼图。这个时期结束时，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欧亚草原的更多移民完成了拼图。对细节的争论虽然很激烈，但没有人怀疑，男女老少的大规模迁徙在欧洲创生的传说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大概在上一代学者中，围绕这些主流观念的学术共识就已破裂，因为事实证明这样的论述过于简单。虽然没有出现新的综述，但各种各样研究带来的总体效果是，人们现在认为，至少在一些现代欧洲国家的先祖国成形于第一千年的过程中，人口迁移起到的作用远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大。比方说，现在经常有人主张，在过去被认为是大规模迁徙的过程中，实际上参与迁徙的只有少数人，甚至没有。过去人们认为，人数众多的一个又一个社会群体在第一千年的欧洲版图上定期迁徙，但最近人们描绘出的图景是，真正迁徙的人很少，许多人聚集在这些迁徙者的文化旗帜之下，获得了新的群体身份。这些研究暗示，在公元元年后的一千年里，与人口迁移相比，欧洲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对蛮族欧洲重组的作用重要得多。

本书的根本目标是提供关于欧洲诞生的综述——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综述；本书将充分采纳修正观点中所有的积极方面，同时避免其陷阱。正如上文中那桩摩拉维亚逸事有力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在第一千年的故事中，从前不发达的蛮族欧洲地区的国家形成，也就是更大、更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的发展，至少和人口迁移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从该结论可知，正是因为如摩拉维亚这样的实体在横跨欧洲北部的政治格局中出现，以地中海为根基的国家才不再能像罗马帝国在一千年前所做的那样行使跨区域霸权。尽管如此，我们切勿急于采纳人们的身份不断变化、只有少数人迁徙的观点。本研究将证明，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不是去否定人口迁移（有的移民人群的规模相当大），而是以蛮族欧洲当时发生的种种变革为背景，去分析人口迁移的不同模式。

总的来说，本书想实现的，不仅仅是将某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重新放回第一千年重要现象的列表，把它们简单地放在其他变革的旁边。本书试图论证的是，有可能构建一种类似于统一场论的理论，来解释蛮族欧洲更大范围内的转变。仔细观察可知，如果要更好地理解第一千年中的国家形成和具体的人口迁移形式，就不应把它们当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变化，而应该视其为对同一组刺激做出的不同反应。两种变化回应的都是第一千年开始时欧洲较发达地区和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在我看来，两种变化都有助于减少这种不平等。人口迁移与国家形成是密切相关的现象。它们摧毁了地中海主导的古代世界秩序，奠定了现代欧洲的基石。

---

[1] 关于此次事件，见*Annal of Fulda* 882；关于考古，见Poulik (1986)。

第一章

移民和蛮族

1994年4月，约25万人从非洲中东部的卢旺达逃往邻国坦桑尼亚。次年7月，在他们之后进入扎伊尔的人数高达惊人的100万。他们都想逃离杀戮的狂潮，而引发这些杀戮的，是一次算得上当代最黑暗的得逞的暗杀。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e'nal Habyarimana）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yamira）乘坐的飞机试图在卢旺达首都着陆时坠毁，二人丧生。此次谋杀一下子让这一地区的两位温和派领袖不再能够发声。卢旺达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中其他的温和派声音也被迅速压制。杀戮开始了，不仅出现在城镇，也出现在农村。据联合国估计，仅在4月份就有10万人被杀，总共有约100万人死于屠杀。逃命是唯一的办法，4月和7月，卢旺达的男女老少纷纷逃离。难民们大部分的财产留在了国内，无法稳妥获得品质有保证的食物和饮水。结果可想而知。7月份逃亡扎伊尔之后的1个月内，有5万名难民死亡；接近10万人（总死亡人数的1/10）死于霍乱和痢疾。

近期因政治危机而出现移民的情况有不少，卢旺达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没过多久，75万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逃往邻国，这同样是对不断升级的暴力的反应。但是，大举逃离危险只是移民的原因之一。更多的人通过移民搬到“更富裕”的国家，将移民当作提高生活质量的策略。这种现象遍布全球。20世纪80年代，20万人离开了总人口350万的爱尔兰共和国，大多数去了经济上更具活力的欧洲地区；尽管后来有不少人又回归祖国，因为随着爱尔兰经济的蓬勃发展，爱尔兰也成了劳工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在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经济移民更为普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中，目前有1 500万人在中东，1 500万人在南亚和东南亚，1 500万人在北美，1 300万人在西欧。移民人数简直是天文数字，造成这种惊人现象的是巨大的财富不平等。比方说，孟加拉国的人均收入仅为日本普遍收入的百分之一。这意味着在日本打工的孟加拉人，即便其工资只是日本人平均工资的一半，赚到相当于在孟加拉国两年的收入也只需要用两周。政治暴力加上经济不平等，使各种形式的移民成为现代世界的重要现象。

过去也差不多如此。“人类的历史就是移民的历史。”[1]这句话算是老生常谈，但正如大多数老生常谈一样，它大致是正确的。这是现有的人类进化证据的基本含义：不同的原始人种在非洲大陆这个有利环境中进化，随后利用其额外脑力提供的适应性技能，在地球上大部分陆地环境中定居。从本质上讲，世界各地的人都是移民及寻求庇护者的后代。

上一个千年记录下来的历史中，也有许多移民的例子。其中一些的记录非常详尽，特别是源自欧洲内部的移民。当然，现代美国是移民创造的。1820—1940年，有多达6 000万欧洲人移民海外，其中3 800万人到了北美。如今，仍有一波接一波的移民潮涌向美国，特别是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可见美国的移民故事远没有结束。16世纪，有25万人从西班牙移民到新世界，17世纪上半叶又有20万这样的移民。在这两个世纪，分别有8万名和50万名英国人勇敢地渡过了北大西洋。再之前的文献就比较杂乱了，但移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中世纪盛期，仅在12世纪，就有20万讲日耳曼语的农民移居至易北河（Elbe）以东，在荷尔斯泰因、西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边境地区占领土地。[2]

欧洲的居民

本书关注的是更遥远的过去：公元第一千年的欧洲。这是一个介于历史和史前之间的世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书面历史资料，另一方面是通过专归考古学家研究的物质遗存。证据的广度及复杂程度对研究构成了挑战，但毫无疑问，在公元元年之后的一千年里，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在欧洲边界内频繁进行。考虑到移民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整体角色，当时没有出现形形色色的移民才奇怪。1—2世纪，罗马人走出意大利，为西欧大部分地区带去了城镇生活的乐趣和集中供暖。但长久以来，被视为第一千年的根本特征的是欧洲帝国边界之外的所谓蛮族迁徙。

这些蛮族是什么人？基督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住在哪里，生活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蛮族欧洲

公元第一千年开始时，帝国欧洲（可以定义为罗马军团所及之处）的范围从南部的地中海盆地开始，一直向北延伸到（广义上的）多瑙河，向东延伸到莱茵河。在此疆域之外的是欧洲的蛮族，他们占据了欧洲中部的一些高地和大欧洲平原（欧洲四大地理区域中最大的一个）的大部分地区（地图1）。但是，这个广大地区的统一性在于地质结构而不是人文地理。虽然整个区域的土壤都以重黏土为主，但各地的气候和植被有显著区别，农业潜力因种植季节和土壤基本肥力的不同而不同。西部地区，特别是不列颠南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受大西洋天气系统的控制，冬季温暖湿润，夏季相对凉爽，同时还有充足的降雨——为什么是英国人发明了板球这种唯一无法在雨中进行的比赛，仍然是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平原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更接近大陆性气候，冬季更寒冷，夏季更炎热、更干燥。越往东，冬季平均气温就越低，夏季降水则是越往东南方向越少。历史回顾

表明，这对农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农业技术有限的前现代时期。在东南部，即使是乌克兰著名的肥沃黑土地区，生产力也受到夏季降雨量低的限制，定居点只能围绕河谷建立。在北部和东部，冬季的寒冷造成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寒冷，构成欧洲平原大部分地区自然植被特征的落叶和混合落叶针叶林无法在这些地方生长，取而代之的先是纯松柏科的针叶林，然后是北极苔原。在欧洲部分地区，远古的土壤中积聚了足够的腐殖质，使一般的耕作成为可能，而这种景观大体上可以说止步于混合林地带的北部边界。

公元第一千年之初，这片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依旧树木繁茂，而北欧在开发出全部农业潜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因为树木，还因为土壤。北欧平原厚厚的黏土土壤有高产的潜力，但需要重犁来维持其肥力：所需的犁不仅要能切出沟，还要能将土壤翻过来，这样杂草和作物残茬就能在土壤中腐烂，养分供下一个种植季利用。在中世纪盛期，这个问题由“卡鲁卡”（carruca）——一种最多可由八头牛拖拉的四轮包铁犁——解决了。但在第一千年之初，欧洲大多数蛮族所做的不过是在土壤表面扒拉而已——请从字面意义理解“扒拉”。所以要说的话，那时欧洲平原的居民靠耕种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人口分布在绿色“海洋”中一个个孤立的耕种“岛屿”上。

地中海地区评论家对自身的兴趣总是比对边境之外的蛮族“他者”更大，但即使是他们也认识到，越往西，这样的种植岛屿就越多，人口也越密集。更具体地说，他们将大欧洲平原的蛮族分为日耳曼人（Germani）和斯基泰人（Scythians）。此前曾有凯尔特人（Celts或Keltoi），但之前属于凯尔特人的西欧和中南欧地区大多已被罗马人的进攻吞噬。在第一千年开始时，这些地区已经走上拉丁化的非蛮族轨道，有了城镇和垃圾收集系统。考古证据表明，帝国欧洲新边界的设立不仅仅是一次意外。前罗马时期凯尔特人的物质文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尤其以精美的金属制品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凯尔特人定居点在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普遍展现出成熟：别的不说，他们有用先进的转轮技术制作的陶器，一大批通常有围墙的定居点（所谓的oppida），他们还大量使用铁制工具，形成了生产力相对强大的农业。[3]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日耳曼人留下的物质遗产就没有那么丰富和发达了。在日耳曼欧洲地区的典型发现包括火葬用的骨灰瓮（但陪葬品很少或几乎没有）、靠手工而不是转轮制造的陶器，而复杂的金属制品和设防的定居点则完全没有。在日耳曼人主导的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也不怎么高。当然，正是因为日耳曼欧洲的经济所产生的剩余农产品少于邻近的凯尔特地区，日耳曼人才养不起那么多能够制造复杂金属制品的专门工匠和艺术家。而尽管在整体战略上，罗马人从未将目标设定为仅仅吞并凯尔特

欧洲，但对数次征服企图的记述表明，战场上的罗马指挥官最终意识到，经济欠发达的日耳曼欧洲不值得费力去征服。传统说法强调，罗马之所以未能征服日耳曼人（我们如今通常这样称呼那些讲日耳曼语的人），是因为后者在公元7年于条顿堡森林会战（Teutoburger Wald）中击溃了瓦卢斯（Varus）的三个军团。但实际情况没那么戏剧化。接下来的几年中，罗马人针对此次失败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胜利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征服日耳曼欧洲后可能带来的税收，既不足以收回征服的成本，也无法支撑随后的驻军费用。

结果就是在公元元年后不久，罗马任由各个说日耳曼语的群体控制了莱茵河和维斯瓦河（Vistula）之间大片的欧洲地区（地图1）。这些日耳曼人的主要社会单元和政治单元都很小。1世纪的塔西佗（Tacitus）和2世纪的托勒密（Ptolemy）列出的日耳曼群体的名单令人眼花缭乱，数量多到只能在地图上大致绘出。尽管如此，关键点很明确：既然有这么多政治单元（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其为“部落”，但这个词带有很多可能不恰当的既有观念），各个单元的规模肯定都非常小。

这片地区并不总是日耳曼人的专属领地，甚至也许没有被他们长期占有过。希腊罗马的文献表明日耳曼欧洲的范围时有扩大，不过几乎没有提供相关过程的细节。例如，公元前3世纪末，说日耳曼语的巴斯塔奈人（Bastarnae）移居喀尔巴阡山脉的东南面，成为黑海西北部的统治力量。大约在进入公元第一千年之际，说日耳曼语的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将凯尔特波伊人（Celtic Boii）逐出了波希米亚高地的盆地。因此，我们所说的日耳曼欧洲，实际上是日耳曼人统治下的欧洲地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广袤地区中的所有人口（其中一些是新近在战争中被征服的）在信念系统、社会实践等文化方面是同质的，甚至也没有理由认为该地区的人必然使用相同的语言。[4]

“斯基泰”是古希腊古罗马地理学家使用的一个泛称，指的是北欧平原东部的居民，其分布范围从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脉边缘开始，延伸到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地区。（地图1）在希腊的地理和人种学传统中，这里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寒冷的荒野，住着原始的“他者”，恰与希腊文明形成鲜明对照。人们说，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居于这个世界的居民都在实施：刺瞎、猎头、剥皮、文身，甚至饮用不掺水的葡萄酒。实际上，该术语所涉的领土包含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从大欧洲平原东部缓缓向南流动的大河形成的河谷中，至少是在由林侵草原区域标出的温带地区内，可以找到经营良好的农业村落。在南部，是更为干燥的草原地带景观，广阔的草原为游牧部落提供了天然的家园。更向北和更向东，本来就不怎么密集的农业系统逐渐消失，将苍茫大地留给了北极圈的狩猎采集者。[5]

在这些不同的人口群体中，游牧民族将在我们关于公元第一千年蛮族欧洲

转型的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只是间接作用，所以没有必要详细讨论游牧民族的世界。我只想说，这一时期开始之前很久，游牧民族就在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面和黑海北面游荡了。从地质学角度来看，这部分地区仍属于欧洲平原，但普遍缺乏夏季降雨，因此难以或根本无法发展农业。在顿河以东，由于没有足够的降雨，农业只能依靠灌溉，但是在古代，灌溉技术没有传到这些地区，因此这里的土地保留了自然植被，也就是草原。在顿河以西，一些河谷地区有足够的农业用水，但这些河谷很靠近一大片仍是天然草原地貌的区域，该区域就在黑海沿岸的内陆。因此，也许并不奇怪，在古代，游牧民族和偏向定居的农业部落往往轮流统治这片土地。公元元年前后，在公元前3世纪进入该地区的说日耳曼语的巴斯塔奈人和佩乌契尼人（Peucini）仍然统治着这里，但他们的统治即将被游牧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推翻，后者在公元1世纪横扫了整个地区。[6]

在林侵草原以北，北欧平原的东部是一片片针叶林越发茂盛的区域。这里的冬季平均气温更低，土壤腐殖质更少，农业条件更差。这是地中海地区的人在公元第一千年伊始鲜有了解的世界。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中，塔西佗将狩猎采集者芬尼人（Fenni，芬兰人Finns）置于遥远的北方，将另一群体威尼蒂人（Veneti或Venethi）置于芬尼人和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边缘的日耳曼佩乌契尼人之间：

> 威尼蒂人从萨尔马提亚人那里习得了不少风俗，因为在掠夺进程中，他们在耸立于佩乌契尼人和芬尼人之间的所有森林和山丘中穿越。尽管如此，将他们归类为日耳曼人更恰当，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房屋，携带盾牌，也喜欢快速步行。

稍早时候的普林尼（Pliny）也听说过威尼蒂人（他称其为Venedae），但没有写下更详细的信息，甚至2世纪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了解，只知道他们中一些群体的名称。这一区域比更远的区域也就少那么一点点神秘感，传说更远区域的人“面目是人，身体四肢却和野兽一样”。

公元元年前后，东欧这些树木繁茂、森林覆盖的地区的居民如何生活，从考古学证据看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塔西佗就固定定居点做出的评论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农民的世界，但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简单，发展程度比西边日耳曼欧洲的主流物质文化还要低。事实上，遗存下来的陶器、工具和定居点简单到无法按照风格甚至年代分类，公元第一千年上半叶，这些方面的变化极其缓慢。考古证据表明，这是一个由孤立的小型农业定居点组成的世界，其生存水平低于日耳曼人，几乎没有剩余产品的迹象，与南方富裕的地中海世界也没有贸易联系。这些住在森林中的威尼蒂人的种族和语言特征引起了很多讨论，不少讨论集中在他们与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的

关系（如果有点关系的话）上；公元500年以后，讲斯拉夫语者在欧洲历史上变得非常突出。我们在第八章还会讨论这个问题，而如果想在公元元年找到斯拉夫人（或者他们最直接的祖先）的踪迹，那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在这些大欧洲平原最东端的简单农业群体中。[7]

因此，稍加简化后，可以将公元第一千年开始时的蛮族欧洲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最西边和最接近地中海的地区是最发达的，具有最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其陶器和金属制品已经相当丰富和复杂。这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由说凯尔特语的人控制，大部分地区刚刚被纳入罗马统治之下。往东一些是日耳曼人主导的欧洲，那里的农业生产不那么集约，也因此缺乏相应的丰富物质文化。日耳曼欧洲农业生产的集约程度还是比东欧森林地区要高，后者的物质文化只有与农业水平相对应的极少量遗存。这个简要的综述里并没有什么真正有争议的内容——也许除了在哪里能找到斯拉夫人之外。引起巨大争论的问题是：在接下来一千年蛮族欧洲惊人的转变进程中，移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蛮族迁徙和公元第一千年

所有人都承认，公元第一千年，蛮族欧洲内外出现了一些人口迁移。但人口迁移情况整体如何，如今引起了很大争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认为人口迁移是蛮族欧洲转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是塑造第一千年独特形态的中心力量。4—5世纪的大规模日耳曼移民摧毁了罗马帝国西部，在北方建立了新的语言和文化模式。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来自黑海北部沿岸地区的哥特人（Goths）在35年间（376—411年）分三个阶段，向法国西南部挺进了2 000多千米。来自中欧的汪达尔人（Vandals）差不多走了这个距离的两倍，他们越过地中海，同样分三个阶段，来到了罗马控制下北非地区的中部行省。这次迁移花了差不多33年（约406—439年），其中包括在西班牙的长期停留（411—约430年）。也正是在这几个世纪中，随着来自丹麦和德意志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到来，不列颠群岛的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斯拉夫移民的作用可以说更为重要。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问题总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不管他们来自哪里，毫无疑问的事实是，6世纪时还少有人知的讲斯拉夫语者，在接下来的200年里进入了中欧和东欧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中有很大一部分曾被讲日耳曼语者统治，因此斯拉夫人的崛起表明，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变化出现了。它创造了现代欧洲的第三个主要语言区域（另两个是罗曼语区和日耳曼语区），而这三个区域间的边界自创建以来几乎没有变化。9—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为一个千年来的大迁徙画上了句号。大西洋上，冰岛和法罗群岛第一次有人定居，而西欧的维京移民则在英格兰建立了丹麦律法区（Danelaw），在欧洲大陆建立了诺

曼底公国（Duchy of Normandy）。再往东，另一批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在创建第一个罗斯国家基辅罗斯（Kievan）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基辅罗斯的边界划定了沿用至现代的欧洲边界。[8]

关于这些移民群体和它们的重要性，没有哪个看法得到过普遍接受。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许多细节一直并将继续有很大争议。但在1945年之前，欧洲的学派都坚信蛮族迁徙对第一千年的欧洲历史发挥了巨大的塑造作用。在最宏观的层面上也确实如此。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被视为确立了现代欧洲的主要语言种类：罗曼语、日耳曼语和斯拉夫语。而人们认为，人口迁移在更精微的层面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某几群移民被认为奠定了英格兰、法国、波兰和俄罗斯等长期存在、疆域广阔的政治实体的基础，更不用说那些在19—20世纪从欧洲的多民族帝国中获得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惊人比例的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将自己独特身份的起源追溯到第一千年的移民。这种对过去的共同想象被近来的学术界称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对细节的争论从未停止，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欧洲的许多群体认为，自己的独特身份扎根于从公元第一千年的某次人口迁移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9]

对参与迁徙的人口单元的性质，这样的叙事有自己的看法。许多迁徙并没有很好的史料记录，有些根本没有记录。但已有的历史资料确实有时会谈到成年男女和儿童组成的人数众多的紧密群体，这些人经过深思熟虑，从一个栖息地迁至另一个栖息地。这类信息引起了共鸣。如果移民群体预示着大事件，从它们中间将产生一批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保持独特性，最终必然发展为现代欧洲民族的实体，那么人们自然容易认为，所有的移民都是前面所说的那样。因此，第一千年的所有移民群体，无论是否有记录，都被视为在文化上独特、在生物学上能够自我繁衍的大型人口群体，这类群体有幸不受移民过程的影响，从地图上的A点移动到B点。这些古代的先民必须人口众多，而且足够独特，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会繁衍出这么多追求政治自决的现代后人。如此构想的迁移过程可以用一个类比来描述：在台球桌上滚动的台球。受某种力量的驱动，台球会从桌上的一个地方滚到另一个地方（移民出发地的人口过剩往往是可能的原因），但运动结束时，台球除了所处的位置不同外，跟原来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看法最常用于描述参与了4—6世纪移民的日耳曼群体，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用在了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身上。现代斯拉夫群体［如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地亚人（Croats）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等］都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第一千年时那些凝聚在一起的移民群体。[10]

这个对第一千年的描述，本身属于试图概述史前时代欧洲人口分布的更宏大的叙事。公元元年的时候，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多少有了书面记录。而对更遥远过去的重建则完全依赖于考古证据，并且（在1945

年以前）往往被写成一个接一个“先进”群体先后主导欧洲的历史。石器时代晚期的第一批农民从东方来，取代了狩猎采集者；使用铜器的人群取代了使用石器的人群；使用青铜器的人群又取代了使用铜器的人群；最后，铁器时代和公元第一千年到来了。我们不必关心这个大局的细节，但要了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从某些第一千年的文本中了解到的一种人口迁移模式——男人女人带着儿童，结成有凝聚力的团体，有意识地迁徙并占领土地——被整个套用到了更远的过去，用以解释来自史前欧洲考古遗迹的发展模式。正是出于这种对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自以为是的了解，最开始的农民，以及后来用铜器、用青铜和用铁器的人才被看作依次迁入并先后接管欧洲的外来人口。[11]在这个关于欧洲人口的宏大叙事中，公元第一千年代表了一个结尾和一个开端：说它是结尾，是因为自上个冰期以来，一拨又一拨移民塑造了整个欧洲的历史，此类移民中的最后一批就是在这个时期到来的；说它是开端，则是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居住在欧洲土地上的就是诸多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实体，也就是基本不受进一步人口迁移影响的群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从这一时期，还可以总结出一种人口迁移模型，用以梳理欧洲的整个历史。正是因为该模型应用得非常广，后来学术界的反应才会如此激烈。

关于人口迁移的大讨论

1945年以后，人口迁移驱动着欧洲历史的叙事不再被视为确凿无误，许多关键要素受到了质疑。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这种叙事基本还是主流；但特别是在讲英语的学术界，人口迁移已被降级为历史剧本中的一个龙套角色，由内部驱动的转型才是剧本中的主角。这场思想革命相当激烈，深刻影响了近来人们对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看法，因此，如果不了解其主要纲领，就难以理解本书之后的内容。一个关键的起始点是，对于人类如何聚集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社会单元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全新的理解。

身份危机

对人口迁移问题的思考竟然以群体身份作为第一个要点，这似乎有点奇怪。但关于欧洲历史的传统宏大叙事意味着人口迁移和身份密不可分，至少在公元第一千年中如此。基本原因有两个。首先，为这种叙事提供动力的人口迁移台球模型假定，人类总是结合成由男人、女人和儿童构成的紧密群体，该群体基本对外人封闭，通过同族婚姻（嫁娶的人都已经是该群体的成员）繁衍。其次，根据群体身份长期都在起作用这个本质上相同的观点，第一千年的移民群体与现代欧洲那些与之有相似名称的国家之间存在直接而切实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波兰人是斯拉夫波兰人（Slavic

Polani）的直系后裔，英格兰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直系后裔，等等。民族身份是古老不变的“事实”，而因为古老，民族身份具备了可以超越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形式的合法性。在不以民族作为政治组织主要模式的国家，必然有其他一些通过非法使用武力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例如中欧和东欧的古老多民族帝国），而这些结构必须被推翻。事实证明，这两种假设都是有缺陷的。

纳粹的暴行是促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固有观念的一大原因。民族始终存在，是组织起大型人类共同体的最正确的方式，这种固有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民族主义高峰期。在纳粹手中，这些观念直接导致了对“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主张——该主张基于古代日耳曼人曾控制多少欧洲地区提出；在此基础上，纳粹又加上了所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建立了恐怖的死亡集中营。历史学家可能无论如何都会在某个时候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失控的民族主义的暴行刺激他们尽快做出纠正性的反思。进一步的研究证明以下说法站不住脚：说同族语言的古代人和现代人有着具延续性的共同政治身份。19世纪欧洲出现的那种民族身份是在那个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什么一度被淹没，后来重新浮出水面的东西。如果18—19世纪没有出现大众传播手段，就完全不可能将数量庞大且地理位置分散的人口结合成民族共同体。举例说，在没有运河、铁路和报纸，“country”的含义还是“郡”而非“国家”的时代，绝大部分不列颠人根本无法产生现代的那种群体认同。现代民族主义的创造也需要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参与，他们编纂了民族词典，确定了民族服装，收集了民族舞蹈和民间故事——当时这些用来“衡量”种族（我总觉得这些人有点像《丁丁历险记》中的那位卡尔库鲁斯教授）。然后，同一批人拟定教育方案，巩固他们已经认定的民族文化元素，使之成为可以在学校传授并自我复制的文化情结；在大众基础教育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欧洲迅速普及的时代，民族主义文化情结通过学校教育传播给了更多的人。民族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故事，也在上一两代学者中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而我们的观点很简单：欧洲人口并没有从公元第一千年开始，就分成了明确知道自己民族归属，并以此为基础生活和行事的一个个群体。不能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强加到久远的过去。[12]

在人们重新审视民族主义现象的同时，社会科学学者通过研究个体如何产生群体认同，认同的程度有多深，得出了同样具有革命性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颠覆性研究。他调查了身份如何在缅甸北部山区发挥作用。利奇证明，个人的群体身份并不必然随可衡量的文化特征的变化而变化，无论这些文化特征是物质的（例如房屋或陶器类型）还是非物质的（共有的社会价值观、信念体系等）。共有一套可衡量的文化特征（包括语言这个民族主义时代群体认同的伟大象征）的人可以认为自己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而文化特征

不同的人也可能自认为属于同一个群体。因此，从根本上说，身份只是感知，关乎个人在脑海中对自己身份的感知，以及别人对他或她身份的感知，而不是一张可衡量特征构成的清单。文化特征可以表达身份，但并不能定义身份。苏格兰人可能会穿短裙，但即使他不穿，也还是苏格兰人。

正如大量进一步工作所证实的那样，在研究构成人类群体身份的纽带方面，这是一种与“二战”之前的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全新观点。1945年以前，身份被视为一种不变的、给定的东西，是所有人生活的决定性方面。但是，受到利奇工作启发而进行的研究表明，个人的群体身份可以且确实会发生变化，而且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群体身份，甚至可以视情况选择对自己有好处的身份。我们生活在后民族主义的世界中，因此并不像60多年前的人那样觉得上述说法惊世骇俗。我的儿子将拥有美国和英国的护照，而在1991年以前，持英美两国护照的人必须在18岁时选择其中一个国籍（那时，美国公民能拥有的另一重国籍只能是以色列或爱尔兰国籍——这个组合真有趣）；欧洲共同体公民既有本国国籍身份，也有欧洲共同体身份。群体身份不再像以往那样被视为生活选择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有时会降级为比较次要的角色。例如，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于1969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在第一千年研究中特别有影响力。这些论文展现的总体观点是，身份只不过是个人晋升的策略。不同情况下最有利的群体身份是不同的，个人可以视情况改变自己所忠于的身份。按照巴斯在这些论文的引言中做出的著名判断，群体身份必须被理解为“转瞬即逝的情境建构（situational construct），而不是坚实持久的事实”。[13]

这项工作之后，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一生不变的基本身份了。曾经，那种观点在民族主义时代无法撼动，也是支撑第一千年（事实上还要算上更远的过去）欧洲发展宏大叙事的人口迁移模式背后的基本假设。人口迁移的台球模型做出绝对化的假设：移民以完整的社会群体为单位迁移，移民群体对外人封闭并通过同族婚姻自我繁衍，还拥有明显不同于迁移过程中遇到的其他群体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点部分基于某些历史文本，但大部分基于有关人类群体组织方式的主流观念，因为历史文本确实很少，文本之间的年代间隔也很远。民族主义关于群体身份的假设一旦站不住脚，以该假设为基础的旧有宏大叙事就免不了要遭受批评。

新千年？

从后民族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遥远的欧洲历史，考古学家在这方面先行一步。欧洲考古学的传统方法是在特定区域内，对大致相同时期的考古发现进行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模式匹配，继而标记出不同的子区域，也就是“文

化”。最初，这种文化的定义往往基于陶器类型，因为陶器碎片本身非常坚硬，也相对容易找到。但是，不管是哪些方面的相似性，埋葬习俗也好，房屋类型也好，还是金属制品或别的什么，原则上都可以拿来用，而且学者们也一直在用。随着考古学在19世纪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兴起，很快出现了这样的经验事实：在具有考古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区域之间有时可以划出边界。在那样的学术和政治背景下（当时仍是欧洲民族主义的高峰期），将地图上标记出的文化等同于古代“民族”，这样的诱惑很难抗拒，毕竟这些“民族”都被认为应该拥有自己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如果你够走运、研究的历史时期足够晚，你甚至可以根据历史文本（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的信息来命名你在地下发现的文化的承载者。

这种做法如今通常被称为“文化历史”，它的发展与活跃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v Kossinna）有很大关系。他的方法比我们有时理解的要复杂一点。他并没有说所有具有考古相似性的区域都等同于彼此独立的古代民族。他主张，只有在不同的考古区域之间可以画出清晰的界线，而且界线内部区域的相似性足够显著、足够独特时，上述等式才能成立。但是，“清晰”“显著”“独特”这样的术语总会引起争论，而且那个时代考古调查的基本假设是：你通常会发现遗存整齐地依照不同的“文化”堆在一起，而这些文化是“民族”的遗物。

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科辛纳的“文化历史”支撑着宏大叙事的大部分内容。把考古文化等同于“民族”的人，往往会去用人口迁移来解释重大的考古变化。如果将每一组独特的物质遗存（考古学“文化”）都等同于一个古代“民族”（“民族”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那么当既有的遗存模式发生改变时，很自然就会想到这是受了新的“民族”的影响。既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如果突然在一种“文化”之上发现另一种新的“文化”，就难免认为这必然意味着一个“民族”取代了另一个。因此，人口迁移，特别是一个群体被另一个群体大规模替代的那种人口迁移，往往被用来解释在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变化。用现代的说法（相关术语当时还没创造出来），欧洲的人口格局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种族清洗过程中形成的；这样的设想被形象地称为“侵略假说”历史观。[14]

对群体身份的新认识深刻影响了旧的知识结构。一旦不再假设物质遗存是古代“民族”打包留下的“文化”，物质遗存就越看越不像“文化”了。随着所发现的材料越来越多，已有的发现受到更严格的检视，人们注意到，许多所谓不同文化之间的界线其实并不清晰，而在所谓同一文化内部，也发现了重要的局部差异，说明这种文化内部并不同质。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虽然有时相似性模式确实存在（而且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通常意味着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有一点很清楚：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简单规则（例如“文化”=“民族”）。任何一种相似和差异模式的具体意义，实际上取决

于它在哪些地方相似和不同。可观察到的考古“文化”既可能是某个社会经济互动区域的物质遗存，也可能是有着共同宗教信仰（例如丧葬仪式相似）的区域的物质遗存，甚至可能是某个政治联盟区域的物质遗存（可以说科辛纳就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可以这样总结两种方法的差异：科辛纳认为考古文化是实体（“民族”）的遗存，但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是互动体系的遗存，而且，具体是什么样的互动，在不同情况下也不尽相同。[15]

如果以这种方式重新审视文化的本质，考古学家就有机会证明，物质文化方面的哪怕是很重大的变化，也有可能是外部入侵之外的原因造成的。既然可观察到的考古相似性模式可能由多种原因促成，包括贸易、社会互动、共同的宗教信仰等等，那么所观察到的变化就有可能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出现变化造成的。出现变化，未必是因为有新的社会群体到来，而可能是因为原有的系统有了重大变化。实际上，由于侵略假说本身在学术上有局限性，此前又被当作单一的变化模式应用于过多的地方，再加上对群体身份的新见解的影响，英语世界中整整一代的考古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摒弃了侵略假说的原则，而其他地方的许多考古学家随后也这么做了。

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抛开侵略假说，去寻找其他类型的解释。新方法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削弱了传统宏大叙事中的大部分内容。直到1960年前后，对欧洲史前史的描绘还停留在这样一幅画面：一群接一群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农业或冶金）新技能来控制土地，赶出在他们之前到来的那群人。而如今，青铜器时代和罗马铁器时代（大约是公元前的最后两个千年）之间的中西欧社会的大部分演变，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无须借助大规模人口迁移和种族清洗的模型。欧洲的历史图景不再是一批侵略者取代另一批侵略者，而是人们学习新技能，渐渐发展出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16]

这场学术革命中，还有一个因素深刻影响了近来研究公元第一千年欧洲历史的方法。在摆脱文化历史和侵略假说那一度未受质疑的暴政的过程中，一些考古学家（特别是在英国和北美）几乎将人口迁移排除在重大变革背后的推动力量之外。从科辛纳的概念紧身衣中挣脱出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人决定再也不想和人口迁移有任何关系。对这些考古学家来说，人口迁移论与先前本学科知识发展不那么先进的一个时代相关，当时的学者认为考古学从属于历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史料支持人口迁移的台球模型。如果文化被认为是“民族”，就有可能将史前考古学转变成准历史叙事：民族X取代了民族Y，诸如此类。

因此，在一些考古学家心目中，关于过往的模型，只要是牵涉到人口迁移的，就是头脑简单。正如近来一部介绍中世纪早期墓地的著作所说，避免

用人口迁移来解释考古变化“是抛弃了一个往往毫无根据的简单化假设，以便用关于那个时期的更精细的解释来代替”。注意这里的用词，特别是“简单化”和“毫无根据”（由人口迁移论主导的世界）与“更精细”（任何其他类型的解释）之间的对比。它响亮清晰地传递出了信息：任何研究考古学上可观察到的人造物类型或习俗的地理变迁的人，如果想要对过去进行“精细”或“复杂”的描述，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回避人口迁移这个因素。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人口迁移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占据压倒性的统治地位，但现在已成为考古学解释里的大恶魔。[17]

如此重大的认知转变势必对历史学家如何理解第一千年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千年的考古证据始终非常重要，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也一直在考虑身份大讨论的意义。历史思考方式转变的另一重要里程碑，也是后来所有身份认同研究及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研究方法的起点，是德国学者莱因哈德·文斯库斯（Reinhard Wenskus）于1961年出版的著作《部落的建立和结合》（*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该书表示，你只需读一读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甚至都不需要读太多，就能知道有一些日耳曼群体被完全消灭，一些新的群体得以创立。当你检视4—6世纪大迁徙的情况时，不连续性的证据只会成倍增加。正如我们稍后将详细探讨的那样，处于这一时代中罗马帝国继承国核心的所有日耳曼群体，包括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等，都可以被证明为全新的政治单元。这些单元在行进中创立，许多都在一路上吸纳背景多种多样的新成员，而新成员中的一些甚至不讲日耳曼语。因此，日耳曼人在第一千年中形成的政治单元不是具有连续历史的封闭群体，而是可以被创造和被摧毁的实体，视乎历史情境，其规模会扩大也会缩小。自那之后，对群体身份可能如何对第一千年的日耳曼人起作用、可能起到多大作用有了很多讨论，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再讨论相关论点，但后来的所有讨论都接受了文斯库斯的基本观察并以其为出发点。[18]

这些观察对理解日耳曼移民产生了深远的连锁影响。当你突然在位置B而不是位置A遭遇了X群体时，根据群体身份封闭不变的旧观点，最自然的结论就是整个群体发生了迁徙；而如果群体身份是可塑可变的，那么原则上只需要少数甚至极少数群体X里的人迁徙就能实现上述效果，这一小部分人将成为一个核心，一路上吸引不同背景的人群。就这样，“台球论”逐渐被“雪球论”取代。很多人认为，情况不是一个个由男人、女人、儿童组成的紧密大规模群体下定决心穿越欧洲大陆，而是人口群体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开始是小群体，可能主要由战士组成，他们获得成功后，在一路上吸引了大量的新人。

这种关于第一千年蛮族欧洲历史证据的后民族主义解读，与同时席卷了考古学的新见解有着相似但独立的根源。但考古学家的新观念十分激进，推

动人们着手改写根据史料构造出来的蛮族迁徙故事。如今一些历史学家确信，过去绝不可能有大型混合移民单元，因此他们认为，少数支持存在这种移民单元的史料，也就是侵略假说模型的来源，一定是出了错。有人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史料被“迁徙”这个主题（topos）感染了，这种文化反射使得地中海作家将迁徙中的所有野蛮人都描述为“民族”，而无论该群体的真实性质如何。原先，欧洲历史被认为由长距离、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推动，而现在人们开始认为，推动历史的是小规模的群体，它们在迁移过程中获得了新成员。人口迁移——虽然现在几乎不使用这个词——显然还是故事的一部分，但人们开始认为参与迁徙的人群规模并没有从前设想的那么大，因此关键的历史进程不再是迁徙本身，而是迁徙开始之后获得新成员的过程。[19]

一个绝妙的对称出现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迫使考古学服从历史的要求，考古学上的文化被理解为“民族”，而得自公元第一千年史料的一种人口迁移模式，则将这些文化的发展塞进了一个不时发生大规模人口迁移和种族清洗的历史叙事。而现在，同一批史料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则是因为考古学家激烈反对文化历史及相应的侵略假说，从而引发了对传统人口迁移模式的抗拒。历史学曾引导考古学，如今考古学则引领着历史学。在这个过程中，欧洲早期的历史不再被理解为由外部移民驱动，而是被理解为一个主要涉及内部发展的故事：迁徙的人很少，但很多人受这些少数人的刺激，适应了后者的生活方式。这个模式就其本身而言很漂亮。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50年前处境的镜像面。但是，这样一个很不错的对称和学术上的进步，是不是令人信服的历史呢？在公元第一千年的蛮族欧洲史中，人口迁移真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龙套角色吗？

人口迁移和入侵

侵略假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再也不想把史前和第一千年的欧洲史，理解成一系列古老“民族”通过大规模迁徙和种族清洗的组合，来获取想要的生存空间了。这么说吧，这样的组合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至少传统宏大叙事中的种族清洗元素据我所知在史料中找不到支持。但是，侵略假说的消亡并不意味着人口迁移已完全从故事中消失——它也不可能消失。即使你接受地中海作家深受迁徙主题影响的说法，他们的文化幻想也必须以某种人口运动为基础，而一些考古证据同样说明人类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迁徙。因此，人们开始使用两种模型来替代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侵略假说模型。

第一种是“推进浪潮”（wave of advance）模型。它适用于小型移民单元，针对外来人群如何接管当地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该模型曾用于说明新石器时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如何散布到欧洲各地，并展示了即使是通过

个体的无定向迁徙，农业人口也可能最终支配这片大陆上所有合适的土地。根据这个模型，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并没有大批到来并通过侵略驱逐狩猎采集者；实际情形是，和狩猎采集者相比，农民有能力生产多得多的食物，人口增长也快得多，长此以往，农耕人口就淹没了狩猎采集人口。随着个体的农民逐渐成熟，四处寻找自己的土地，农业人口从最靠近第一块农田的地方开始，填满了这个大陆。该模型描述的是一种小规模、家庭式或家族式的迁徙，迁徙人群在无意间接管了土地，而因为这样的性质，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原本住在那里的一些狩猎采集者可能也自己学会了农业技能。对于那些试图摆脱充斥着大规模迁徙和群体征服的世界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吸引力呢？[20]

第二种模型“精英转移”（elite transfer）的应用范围更广，因此在考古学家中更受欢迎。该模型认为，闯入者人数并不是很多，但他们用了侵略性的方式，靠征服取得土地。之后，入侵者会赶走目标社会中掌权的那些精英，接替他们统治当地，而创造了原先那些精英（如今他们已被放逐或贬抑）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会受到影响。中世纪历史上这一现象的典型例子是在英格兰发生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由于《土地调查清册》（*Domesday Book*，又称《末日审判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在11世纪后期的英格兰，有数千个持有土地的诺曼家庭取代了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后者的人数只是略多一些）。该模型描绘的人口迁移图景也远不如侵略假说所设想的那么激烈。它保留了侵略假说中的意向性和一些暴力成分，但因为只涉及一群精英取代另一群精英，而且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保持不变，所以比起作为旧模型中心的种族清洗，这个过程不那么令人反感。由于只有一小部分精英被替换，所以产生的后果不那么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那么重要——毕竟，既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就像诺曼征服时期的英格兰那样。[21]

因此，针对侵略假说过分简化的问题，学术界的回应是提出两种模型，这两种模型用各自的方式将人口迁移的重要性降到最低——或是减少可能参与迁徙的人数，降低暴力程度，贬低其影响力，或是提出迁移加侵略的意图其实并不明确或未必存在。比起侵略假说，这两种模型显然更符合如下对群体身份的看法：紧密的大型人口群体不可能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有意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虽然这两种模型明显更成熟，也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步伐，但即使将这两个模型结合在一起，也不足以构成研究第一千年欧洲人口迁移问题的合适方法。仅用这两个模型提供的框架来讨论，将带来三个具体问题和一个一般问题。

被误解的身份？

第一个问题的根源是，研究公元第一千年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热切接受

人类不总是组织成内部繁衍、对外封闭的群体的观点（而且我认为，他们也决心永远摆脱纳粹时代的可憎观念），因此，对于当代探讨身份问题的社会科学文献，他们往往只关注其中的一半。在利奇、巴斯等人关注群体行为，观察到个人会根据眼下利益改变效忠对象的同时，另一组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对个体行为的密切观察。这些人有时被称为“原生论者”（primordialists），因为他们认为群体隶属关系始终是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其中一些研究得出了似乎与利奇和巴斯不同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继承下来的群体认同感显然不能被随意操纵，而是会将个体限制在与其眼下利益相悖的行为模式中。外表、言语（无论是语言还是方言）、社会实践、道德价值观和对过去的理解，这些方面的差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强大的障碍，阻止个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改变群体归属。[22]

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但在我看来，它们不是。它们实际上是一系列可能性中的两个极端。根据具体情况，尤其是在历史上，继承而来的群体身份对个人施加的约束力可能强也可能弱，号召力也相应较大或较小。这与能观察到的现实也是一致的。就现在更大的群体身份而言，当代关于欧盟的讨论中，涉及“不列颠性”（Britishness）的言论能在英国激起强烈的共鸣，相比之下，“卢森堡性”（Luxembourgeoisness）这样的言论在其本国（卢森堡位于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之间）激起的共鸣就小得多。在个人层面也是如此：不管是哪个较大群体，其成员在忠诚度方面都是有个体差异的。我要强调的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群体身份是人们生活中有时更强大、有时更软弱的力量，并不会与巴斯所说的产生真正的矛盾（尽管他可能认为会产生矛盾）。巴斯的名言是身份必须被理解为“情境建构”。这说得很公道，但关键在于不是所有的情境都一样。部分因为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不以阶级为基础的身份（群体身份肯定不是，除非每个成员的地位都一样）必然是“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影响，部分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局面，巴斯强调且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形成弱群体归属的情形。但即便从他自己措辞的逻辑上看，其他能产生更强的群体归属的情况也是有的，而所谓的原生论者已经探索了其中的一些情况。

两种完全不同的约束都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存在非正式的约束，这牵涉到什么样的食物、服装乃至道德价值是“正常的”。研究表明，个体在幼年时就被烙上了许多这类由群体定义的特征，这当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们有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个体若不处于自己社会的规范之中，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以至于无法在其他社会中自在生活。另一方面，改变身份也会遭遇很多正式的障碍，这些障碍有时会与前面说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一同发挥作用。作为个人，理论上你可以宣称拥有任何一种身份，但它未必会获得承认。在现代社会，群体成员身份通常意味着有一本合适的护照，而在那之前得满足获得该护照的条件。当然了，过去没有护照，但一些古

代社会是会认真监管成员身份的。例如，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权利受到严格保护，还建立了一整套官僚机构来监管个人的权利要求。希腊城邦此前采用过类似的策略。这种通过官僚机构来管理的方法有赖于识文断字的能力，但并无理由认为没有文字的古代社会在某些条件下就不能严格地控制成员资格。群体成员的身份也可以有不同的级别。在现代社会，美国和德国会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接受大批外国劳工，但不一定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利。在我看来，这才是全面理解身份问题的关键。如果完整的群体成员身份能带来某种法律或物质利益（换句话说，一系列有价值的权利），那么可想而知，它会受到严格的控制。[23]

因此，从身份辩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比我们有时意识到的还要复杂。对出生在根本谈不上简单的背景之中的人来说，群体身份是分层的。一个人可以有家庭、家族、城镇、郡县、国家，以及如今的国际组织归属（如欧盟公民身份），也有自己的生活选择，比如完全搬到其他地方生活，声称自己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但是，他或她提出的任何主张都必须得到承认，而根据具体情况，这些可能的归属关系会对这个人施加或强或弱的限制。从本质上讲，巴斯的名言做出了一种虚假的对照。所有群体身份都是“情境建构”，它们被创造出来，发生变化，也可以完全消失，只是有些建构更“转瞬即逝”。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当今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研究方法的第一个潜在问题。这些方法所依赖的假设是，大群体的身份认同总是比较弱，但这只是对身份辩论的片面理解。如果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先入为主地采取某种立场或，是认为身份认同的力量很强（民族主义时代），或是认为它很弱（目前正形成的共识），我们就会忽视或找理由无视与我们立场相反的证据。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愿意在重新审视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证据时，不去预设所讨论的人口群体必然如当今某些片面理解群体身份问题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很弱的约束力。

英语国家的一些考古学家强烈反对将人口迁移当作历史变化的可能动因，并因此拒绝接受可能反映人口迁移作用的考古发现，这造成了第二个问题。现代世界中，一个社会群体整体迁移的情况并不常见，而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也是如此。事实上，很少或根本没有第一千年存在种族清洗的证据。因此就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而言，几乎总是部分人口从A点迁移到B点，而原本在B点居住的人会有至少一部分留下来。唯一的例外是冰岛，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到达那里时，冰岛还无人居住。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期望发现整个物质文化的完整转移。旧的物质文化中只有某些元素有可能被带到B点，就是那些对实际参与迁徙的移民子群体来说也许具有特别意义的元素。而B点的一些或大部分原有的物质文化可能会继续存在，迁入群体和原住群体的交往则可能

产生一些全新的物品或实践。换句话说，可能反映第一千年众多迁移过程的考古发现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仅凭考古发现，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当时发生了人口迁移。[24]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如果说明可能存在人口迁移的考古证据是模棱两可的而不是确定的，那就这样吧，总比用一系列实际上不存在的入侵故事来填补欧洲历史好一些。但如果认为谈到存在人口迁移就是“简单化”和“毫无根据”，就会造成问题了。如果你用这种思维框架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无法不带偏见地处理证据的模糊性问题。如果你正在研究的考古变化与人口迁移过程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那么重要的是照实表达，既不夸大也不贬抑。但由于考古学家刚刚经历了与人口迁移论的这场闹剧式离婚，一些人非常倾向于将人口迁移完全排除出关于过去的叙述（至少在英国和北美如此）。[25]在一些小圈子里，光是提出某个可以观察到的变化可能是在没有人口迁移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变化无须移民就能发生的说法就会被当成经过确证的事实。许多人口迁移过程在考古发现上的体现只能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只要够巧妙，就总有办法不通过人口迁移来解释考古学上发现的几乎所有变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如此解释。应该做的，不是因为有模糊的地方就认定不存在人口迁移，而是接受存在模糊之处这个事实，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特别是有没有恰当的历史证据，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不管是以群体身份认同总是很弱为前提，来估计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规模，还是因为只有模棱两可的考古证据就认为人口迁移不存在或不重要，都不是保险的做法。我们看到的这两个问题又产生了第三个问题。有时，人们会用“迁徙主题”的概念（地中海作者在文化反射的引导下，会将任何迁徙中的蛮族视为“民族”）来证明，一些关于大型、紧密、混合移民群体的历史证据并不可靠。然而，到目前为止，说“迁徙主题”普遍存在只是一种断言，并没有任何经过恰当论证的证据。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个概念颇有道理，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群体认同的强度不足以产生史料中体现的那种大规模人口迁移的观念，也因为如前所述，可能反映人口迁移的考古发现往往模棱两可。但是，如果考古发现的模糊性必然存在，如果所有第一千年群体的认同都必然很弱的这种想法并不保险，那么这两点为所谓迁徙主题存在提供的支持就不太站得住脚了。因此，有必要在下文中逐一审视有关大型群体迁移的历史记录，以判断轻易否定相关记录是否合理。

即使只有这三个问题，也足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问题了。但是，当前研究该主题的方法需要全面更新，还有第四个理由，这个理由涉及的范围更广。

移民与发展

关于人口迁徙的比较研究有悠久的传统。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从原本简单的模型开始，已经发展出了更复杂、更有趣的模型，特别是在上一代学者当中。一开始，学者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经济动机，将其视为解释人口流动的最重要因素。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非常成功地证明进入美国的外来移民与其商业周期呈正相关。[26]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研究与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已经有了一些互动。例如，在考虑因果关系时，“推力”和“拉力”的概念（“推力”是迁出地的坏处，“拉力”是迁入地的好处）早就进入了学术词汇。同样进入学术视野的还有，信息准确对人口的迁徙流动至关重要，大规模迁徙开始前，有时会先让一小群人打头阵（“侦察员”），这些人的经验能为后续行动增加动力。但这些观念只不过是移民比较研究的冰山一角，而一般而言，研究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学者很少利用比较研究的文献。[27]

出现这样的遗漏很奇怪，因为比较文献提供了大量有据可查的案例分析，可以用来与第一千年的证据比较，并显然有潜力跳出“推进浪潮”和“精英转移”的限制，拓展迁移模型的范围。最近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例子，包括经济因素驱动的人口流动，从每个人都自己做决定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流动是无组织的。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随着那些已经到达目的地的人群的人口增长，这样的流动会将人口散布到整个区域，哪怕区域像美国一样大。从20世纪的历史上，我们还能看到一个重要的移民理由：政治冲突。个人为逃离施加迫害的政权而成为难民的情况非常普遍，但政治动乱可能催生更集中的移民潮。近年来最可怕的例子是本章开头提到的卢旺达，但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前南斯拉夫发生过种族清洗，1973年沙特阿拉伯在3个月内驱逐了8.8万名外国人，“二战”结束时中东欧有2 500万难民流动，巴勒斯坦难民仍然流离失所。

除了拓展基本的学术参考框架，比较文献还表明，在第一千年的研究中，还应该就人口迁移过程提出更加细致的问题。近代早期和现代的个案研究都没有发现A地所有的人口集体迁移到B地的情况。迁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局限于某些子群体的活动，这能让我们问出一系列能带来成果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些人留在家乡，让处境多少相似的另外一些人决定迁移？为了解这一现象而进行的工作已经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模式。经济移民——至少就第一批移民而言——往往比较年轻，通常是男性，而且在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中算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会进行迁徙的往往是本来就在流动的人群。进一步研究发现，来到纽约的荷兰移民中有一半在之前就已经移民过一次——从欧洲其他地区移民到荷兰。同样，早期参与建立北美殖民地的“爱尔兰人”中，有很多出生在苏格兰家庭里，这些家庭的上一代才移居爱尔兰。[28]因此，应该以内部人口变动的既有模式为背景，来理解较长距离的迁徙。生活在人口变动区域的人，更有可能加入较长距离的迁徙。

而在这些多样化的参与模式中，迁徙的决定也不是仅靠所谓理性经济计算做出的。其他因素会使个人的思维过程复杂化。有关预计目的地和抵达路线的信息是一个关键变量。只有当路线以及可能成为新家之处的优缺点被大众理解时，前往新目的地的大规模迁徙才能启动。在那个阶段之前，“渠道化”（channelled）移民相应更常见。在这种模式下，来自范围相对有限的迁出地区的人口群体到达迁入地后，又聚在了一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似乎是可获得的信息有限，也和移民迁出地的人口能提供的社会支持种类有关。毫不意外，交通费用也会进入潜在移民的计算，心理成本也很重要。在新地方生活是否有疏离感，连接个人与亲友的情感纽带是否遭到破坏，都会影响是否迁徙，以及迁徙后是否留在当地的决定。因此，在有完善记录的人口流动中，大量移民返乡是重要的特征。[29]

除了这些因素外，移民潮还可能受到出发地或目的地（或两地）政治结构的干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多多少少叫停了自“二战”以来持续从第三世界特定地区流入的合法劳工移民。这一决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经济考虑，因为工业界仍然希望移民提供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但政府在意的是平息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对移民社区的敌意。事实上，移民还是会从原先的源头继续流入，但形式已经大为不同，移民前来的理由是与家人团聚，而不是作为新的外来劳工。移民的性别和年龄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的移民不再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男子，而是妇女和长者——先前移民的妻子和需要他们赡养的父母。这只是一般规则的一个例子，表明政治结构决定了潜在移民做决定时的选项。[30]

针对人口迁移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估量某次人口迁移的重要性，移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侵略假说的影响，对第一千年背景下此类问题的讨论往往与移民数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说的是“大规模人口迁移”，还是更接近于精英转移的较小规模的现象？人口迁移的重要性则会根据移民群体的规模大小而上调或下调。但第一千年的史料里就算有数字，也不是无可置疑的数据，因此这类讨论难免经常陷入僵局。比较移民研究文献普遍从相对意义而非统计学意义上定义“大规模迁移”，这种定义的适用范围更广。到底什么才算是“大规模”迁移？到来的移民群体占迁入地人口的10%能算吗？还是要20%、40%，或者别的什么比例才算？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从所有参与者的角度考虑人口迁移的影响。理论上，参与某次人口迁移的人可能只相当于其目的地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在出发地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大。因此，从迁入地原有人群的角度看是精英转移的人口迁移，对移民自身来说可能是一个更为重大的人口现象。为了将这些情况考虑在内并避免纠结于数字，移民研究将“大规模”移民定义为这样一种人口流动（无论人数有多少），它改变了出发地和目的地之一或两地的人口空间分布，或者给两地之一或两地“带来了政治或社会制度的冲击”。[31]

但这并不是说，得自近现代的信息和见解就自动适用于第一千年。移民研究通常探讨的是（基本属于同时代的）20世纪的例子，或是欧洲人在美洲定居的例子，包括16—18世纪对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第一阶段殖民，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涌向北美的移民大潮。[32]这些社会与第一千年的欧洲存在重大的结构差异。第一千年时，欧洲的经济本质上是农业性的，农业产出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当时没有大规模生产，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的移民劳工模式——首先是工业化欧洲吸收农业化欧洲的劳工移民，然后是从欧洲之外吸收劳工——根本不适用。[33]第一千年的欧洲人口也比近现代欧洲少很多；迟至1800年，欧洲国家的政府还倾向于控制对外移民，而不是限制对内移民。第一千年的国家（我们姑且认为存在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官僚机构也不那么发达，因此它们显然不像近现代的国家那样有制定和执行移民政策的能力。

交通和可获得信息的情况也一样。第一千年有交通也有信息，但与现代世界相比，交通成本高得多。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经济统计数据也许是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最高价格法》（*Edict on Maximum Prices*，自约公元300年开始）中的记录：每运载50罗马里，一车小麦的成本就翻一番。只要交通仍然昂贵（直到19世纪后期依然如此），对考虑移民的人来说就会是很大的问题，尽管有时可以通过国家援助来消除这个问题。[34]在文字出现之前或无文字的世界中，信息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递（与有文字社会的情况大不相同），传递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于有着大众媒体的世界，因此，考虑移民的人很难收集到有关可能目的地的信息。在中世纪盛期，通过指定的代理人开展招募活动，有时能克服这样的局限；但在第一千年中，影响信息流动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35]尽管如此，现代移民研究至少贡献了一系列新的主题和更详细的问题，有助于推动第一千年人口迁徙研究超越传统的侵略假说模型，甚至超越当前学界对该模型的回应。

而在什么带来了人口迁徙这个问题上，现代世界对我们这些与第一千年纠缠的人最有启发。在个体移民的层面上，比较分析早已不限于列出“推”和“拉”的因素了。移民按基本动机分有两种：比较自愿的受经济因素驱动的移民，以及不那么自愿的政治移民。但经济移民和政治移民之间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一个看起来受经济因素驱动的决定，其背后的理由可能是政治因素，因为政治歧视可能导致获取资源和工作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反过来也一样，看上去出于政治动机的迁徙决定可能与经济动机绑在一起，哪怕二者的关系没有几任英国内政大臣认为的那么密切。不管怎么说，经济压力可以和政治压力一样产生制约。看着你的家人因为得不到土地或工作而饿死，这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这些复杂性意味着，对于一个考虑移民的人的决策过程，我们不光要从推力和拉力因素入手分析，还要建立一个坐标系，一条轴上是“经济”和“政治”，另一条轴上是“自愿”和“非自愿”，而个人的动机通常是这四个要素的复杂组合。[36]一般而

言，潜在的移民可以被理解为面临一种投资选择。移民的决定涉及各种初始成本，包括交通、找工作期间的收入损失、离开亲人和熟人产生的心理压力，这些必须与去往预计目的地可能获得的长期收益放在一起权衡。根据各自的计算，个人可能选择离开或留下，或者离开一段时间，以期获得足够的收益，使返乡后的生活更加舒适（这是移民返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所有这些都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但在宏观层面，移民研究还有更深刻的教益。尤其是因为政治无论如何都不容易与经济分离，经济原因仍然是移民的基本触发因素之一。事实一次次表明，两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自然资源可获得性的差异会促进移民流动，只要迁入群体认为可以从迁入地获得的有价值资源更多。这是“世界体系论”的基本结论，该理论研究经济上较发达的中心与欠发达的边缘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人口迁移往往被证明是这种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37]

这一关键的观察结果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要想比较好地研究任何时代的人口迁移，就需要结合一般性的分析（例如可能带来人口迁移的基本经济背景）和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解答：到底有谁加入了这次人口迁移，为什么加入，这个过程是如何开始和发展的？[38]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受侵略假说的影响，传统上研究第一千年时，会在社会转型的内部动力（如经济和政治发展）和移民的外来影响之间划清界限。在解释从出土的历史遗迹中观察到的变化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那一代或几代考古学家认为，内部变革是与移民进行生存斗争的结果。考虑到这样的学术背景，从移民研究中能得出的最基本的教训是，这种明确划分的做法是错误的。决定移民模式的首先是当时发展模式的不平等，移民模式也会随发展模式而变化；发展模式既是移民模式进一步转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移民和内部转型不是两种互相冲突的解释方法，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第一千年的传统看法产生了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经过一千年的入侵和种族清洗，一个多少可辨的欧洲从地中海主导的古代世界秩序中产生了。新的信息，以及特别是对群体身份和人口迁移的新理解，已经有效地摧毁了这一图景。现在是时候用新的图景取而代之了。本书试图迎接的正是这一挑战。本书最主要的论点是，移民和发展不是相互冲突的两种解释，而是需要放在一起考虑。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现象，只有合在一起，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地中海对北方和东方蛮族的统治如何被打破，一个可辨的欧洲又如何从古代世界秩序的废墟中出现。

---

[1] Bohning (1978), 11.

[2] 当代证据的有用总结，见Salt and Clout (1976); King (1993); Collinson (1994), 1—7, 27—40; Holmes (1996); Cohen (1995), (1996), (1997), (2008); Vertovec and Cohen(1999)。Canny (1994) 介绍了近代早期移民的证据。20万说日耳曼语的农民，见Kuhn (1963), (1973); Bartlett (1993), 144—5；背景介绍可见Phillips (1988),(1994)。

[3] 有关前罗马时期凯尔特人的世界的介绍，可以参见Cunliffe and Rowley (1976);Cunliffe (1997); James (1999等。实际上，凯尔特文化和设防定居点文化（Oppida culture）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罗马的征服实际上也只是刚刚越过了其边界。见Heather (2005), 49—58。

[4] 对早期日耳曼世界的有用介绍，见Hachmann (1971); Todd (1975), (1992); Krüger(1976), vol. 1; Pohl (2000)。但要注意，这些文献中的一些往往极力避免讨论维斯瓦河周围以及更往东地区的日耳曼群体；这是纳粹时期之后的一种神经过敏，因为在纳粹时期，古代说日耳曼语的人曾经统治这些地方的事实被用来作为领土侵略的借口。

[5] 最近的一篇优秀引介，见Batty (2007)；关于斯基泰在形成希腊世界观中所扮演的更广泛的文化角色，见Braund (2005)。

[6] Khazanov (1984)对草原世界做了精彩的介绍。

[7] 塔西佗的引文见Tacitus, *Germania* 46.2（之后的事，参照46.4）；另见Pliny,*Natural History* 4.97; Ptolemy, *Geography* 3.5.1 and 7。有关这些区域的地理和考古发现的古代社会经济模式，见Dolukhanov (1996)。在俄罗斯的森林区域内，许多河流的名称实际上源于波罗的语（Balt）而非斯拉夫语，包括公元1000年时斯拉夫人将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因此，目前还不清楚塔西佗的威尼蒂人说的是斯拉夫语、波罗的语，还是这两种语言的某种先祖语言（见本书第八章）。

[8] 游牧民族也发挥了作用：匈人（Huns）加速了罗马帝国的陨落，阿瓦尔人（Avars）促进了中欧和东欧的斯拉夫化，马扎尔人（Magyars）和保加尔人（Bulgars）为两个重要的政治实体奠定了基础，这两个政治实体的悠久历史与现代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密不可分。

[9] 关于民族主义兴起之文化意义的文献现在很多，但如果只看简述的话，请参阅Gellner (1983); Anderson (1991) ; Geary (2002)。

[10] 在近代早期和现代的作品中，日耳曼移民往往被描述成家庭团体，而更接近那个时代的罗马史料虽然对移民记述很少，但有时也会提到有妇女及儿童与战士一起迁移。（我在这里进行了简化，实际的证据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讨论。）研究罗马帝国崩溃的学者分成两大派，一派认为日耳曼入侵是帝国崩溃的原因，

一派认为是其结果。对不同观点的有用概述，见Demandt (1984)和Ward Perkins(2005)。至于斯拉夫人，有一派观点试图表明自青铜时代以来，有一个分布于整个中欧和东欧、讲斯拉夫语的庞大人群（只是已不为人知），但相关证据不能令人信服（见本书第八章）。有关维京研究的传统方法的有用综述，见Sawyer(1962), chapter 1。由于民族主义冲突，人们淡化了所谓的“诺曼派”（Normanist）观点，即维京人建立了第一个俄罗斯国家：见Melnikova (1996), chapter 1（另见本书第九章）。

[11] Childe (1926), (1927).

[12] 见前注9。就连认为在民族主义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某些地方有可能出现了相对固定、涉及人数较多的群体身份的人[如Smith (1986)]也接受这一基本观点。

[13] Leach (1954). “转瞬即逝的情境建构”：见Barth (1969), 9。年代近一些的综述见Bentley (1987); Kivisto (1989); Bacall (1991)。

[14] 这个假说在科辛纳自己的作品中已有体现，特别是Kossinna (1928)。该假说在戈登·蔡尔德（Gordon Childe）同样有影响力的作品中更为突出（见前注11），他概括了科辛纳的许多想法，同时放弃了后者对北欧种族优越性的一些假设。有关科辛纳的影响，请参阅Chapman and Dolukhanov (1993), 1—5; Renfrew and Bahn (1991)等。

[15] 有关这些学术发展的概述，请参阅Shennan (1989); Renfrew and Bahn (1991);Chapman and Dolukhanov (1993), 6—25（其中包括对两位作者关注点差异的有用叙述）; Ucko (1995)。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工作，尤其是Hodder (1982)和Hodder (1991)，特别有助于恢复“物质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模式有时能反映出人类组织的重要方面”这一观点。

[16] Clark (1996)代表了远离侵略假说的关键转折点。关于在那之后学者们尝试过的种种解释性假说，例子请参见Renfrew and Bahn (1991)；Preucel and Hodder(1996)；Hodder and Hutson (2003)。

[17] Halsall (1995b), 61；另参见他的进一步评论：“（侵略假说）在今天的考古界很少得到信任。它太简单化，相当于是断言19世纪从新古典主义到新哥特式建筑的变化，或是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艺术的变化，是侵略的结果”（第57页）。对人口迁移论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样的说法非常普遍。另外一个例子是尼古拉斯·海厄姆（Nicholas Higham）在Hines (1997), 179中的评论，他夸赞不用人口迁移论，而用其他方法重新解释一系列遗迹的做法，认为新的解释“更复杂”。所讨论的问题见Hines (1984)。

[18] Wenskus (1961); 其他可参阅文献包括Wolfram (1988)关于哥特人、Pohl (1988)关于阿瓦尔人的著作。

[19] Geary (1985)和Geary (1988)是从这个角度写成的介绍性文章，Halsall (2007)对4—6世纪做了全面研究。Amory (1997)和Kulikowski (2002)重点研究了迁徙主题。

[20] 在“推进浪潮”模型中，最著名的见Renfrew (1987)，第1—2章，第4章（总结以前的方法）和第6章（模型本身）。

[21] 关于“精英转移”的详细案例分析，见本书第六章。

[22] 见前注13。Smith (1986)探讨了这种更加固定的群体身份观的一些历史应用；Bentley (1987), 25—55使用布尔迪厄（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概念作为理论方法的基础，以了解身份如何通过社会植入其中的个体。在谈到阻止个人过于轻易地改变群体身份的各种差异（宗教、语言、社会价值观等）时，“原生论者”的说法听起来似乎仍然停留在1945年以前的学术界中，仍在列清单、做勾选框。但是在原生论者看来，决定身份的并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是个体对它们的反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身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并不是群体归属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在北爱尔兰，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同样的宗教差异成了集体忠诚的重要象征。不是在框中勾选的项目，而是个人对该项目的反应决定了个人的群体归属。

[23] 关于希腊人和罗马人，见Sherwin-White (1973)。Halsall (1999)反对我早些时候使用的这个类比，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外籍劳工（Gastarbeiter）和没有绿卡的移民在他们所居住的社会中根本不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也没有看到大量证据证明，即使在第一千年，群体身份有时也是复杂文化背景下权利差异的基础：见本书第五章。他也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古怪的观点，即西罗马各个部分的蛮族征服者在分发经济资产时，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声称自己可以分一杯羹。见Heather (2008b)。

[24] 参见Antony (1990), 895—9；Antony (1992)指出，这些修正后的理解出现后，许多旧的理论讨论就过时了，后者预设考古发现与人口迁移有很高的相关性。

[25] Härke (1998), 25—42很好地分析了哪些当代考古学流派更愿意接受人口迁移是变革的可能驱动力，哪些流派对此持轻视态度。英国拒绝人口迁移论的“非迁移说”(immobilism)与苏联和丹麦的学派类似，德国学派仍将人口迁移作为其基本范式之一。

[26] Jerome (1926).

[27] 例如，最近有一本500页厚的关于西罗马陨落前后人口迁移活动的书，满足于借鉴若干为考古学家而写的概述，而不是参考一手文献：Halsall (2007), 417—22。相比之下，同一本书花了一整章的篇幅讨论群体身份问题，并深入（且有洞见地）参考了专业文献。

[28] 关于爱尔兰和荷兰移民，请参阅Bailyn (1994), 1—2。关于现代实例中的总体模式，见Fielding (1993a); King (1993), 23—4; Rystad (1996), 560—1。历史上的相似例子，参见Canny (1994)，尤其是第278—80页（有完整参考文献）。

[29] 关于成本的计算，见Rystad (1996), 560—1；Collinson (1994), 1—7（两本书都附上了进一步参考文献，很有帮助）。关于移民返乡，请参阅Gould (1980)；Kuhrt (1984)等。

[30] 关于西欧移民政策变化及其整体影响的评论，见Cohen (1997)；King (1993),36—7；Fielding (1993b)；Collinson (1994), chapter 4；Rystad (1996), 557—62；Cohen (2008)。显然，近年来欧盟扩大后，东欧移民大量涌入。

[31] “带来……冲击”: King and Oberg (1993), 2。有关大规模迁移的定性界定的一般讨论，见King and Oberg (1993), 1—4；Fielding (1993a)等。

[32] 不过也有关于中世纪盛期的讨论，见Phillips (1988), (1994); Bartlett (1993),144—5。

[33] 20世纪90年代，人们讨论了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技术的终结可能会如何影响未来的移民流动，见Fielding (1993a)。我们现在知道部分答案了，例如，熟练劳动力被吸引到西欧，而中东地区对大规模劳动力的需求继续快速增长，见Cohen (2008)。

[34] 关于西班牙向新世界的移民，以及英国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请参阅Sanchez-Albornoz (1994); Borrie (1994), 45ff。开往澳大利亚的囚犯船是另一种非自愿的国家援助计划。

[35] Bartlett (1993), 134—8.

[36] 针对动机的一般性讨论中，有用的参考资料有Fielding (1993a)；Collinson (1994),esp. 1—7；Voets et al. (1995), esp. 1—10；Rystad (1996)；Vertovec and Cohen (1999)；Cohen (2008)。以下文章做了一些案例分析：Atalik and Beeley, Cavaco, Montanari and Cortese, Oberg and Boubnova, in King (1993).

[37] 见Cohen (1996), (2008)等。

[38] 例见Rystad (1996), 560—1; Bailyn (1994), 4—5。

第二章
全球化与日耳曼人

公元357年夏，由阿勒曼尼（Alamanni）诸王率领的一支庞大的日耳曼军队集结在如今斯特拉斯堡市附近的莱茵河西岸（属于罗马的那一侧）。在留存下来的罗马帝国晚期（约公元275年之后）最详细的历史叙述中，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做了如下描述：

> 所有这些好战和野蛮的部落都由克诺多马里斯（Chnodomarius）和塞拉皮奥（Serapio）领导，这两位国王比其他所有掌权者的地位都高。克诺多马里斯实际上可耻地煽动了整个骚乱。他骑马行在左翼之前，头盔上有火焰色的羽状饰物……他是勇猛的士兵，也是熟练的将军，比其他所有人都优秀。右翼由塞拉皮奥率领……他父亲是克诺多马里斯的兄弟梅德里克斯（Mederichus）……多年来一直作为人质被羁押在高卢……跟随他们的是权势低一等的国王，他们有五人，还有十名王公（regales）和一大队贵族（optimates），加上从各个国家征募的3.5万名军人，其中部分是为了钱而打仗，部分是根据协议来用服务回报。

日耳曼阿勒曼尼人在罗马帝国后期统治着罗马莱茵河边境的南段，阿米阿努斯的描述非常好地体现了他们中缺乏统一王权的情形。在此基础上，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自1世纪——塔西佗那时写下了他著名的《日耳曼尼亚志》——以来，日耳曼世界几乎没有变化。哪怕只是匆匆浏览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在政治方面，当时的日耳曼世界极为支离破碎。他的作品——这方面后来也得到了2世纪托勒密《地理学指南》（*Geography*）的有力支持——记录了太多主要政治单元的名字，总数远远超过50个，无法一一列举。处理这些名字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们放在地图上。虽然各个单元的地理位置只能靠大致估计，但是地图能让人对日耳曼人政治上的分裂程度有比较好的把握（地图2）。[1]然而，仔细考察就可以知道，仅仅因为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有很多国王，就认为自1世纪以来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变化，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日耳曼欧洲的转变

只需快速浏览4世纪中叶日耳曼欧洲的态势图，就可以看出变化之大；布局和塔西佗时代相比大不一样（地图3）。东南部的局面已完全不同，在喀尔巴阡山脉之内、周围和东面，各个哥特群体兴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西部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塔西佗和托勒密所知的众多较小单元，已经被四个较大的群体取代，它们占据了罗马莱茵河边境和附近的土地：边境上的是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Franks），在他们后面的是萨克森人和勃艮第人（Burgundians）。在试图了解这些4世纪实体的运作时，我们像往常一样遇到了困难：罗马作者们普遍对“蛮族”事务缺乏兴趣。幸好还有阿米阿努斯，因为他，相比起其他群体，我们掌握了更多与阿勒曼尼人有关的证据。而正如阿米阿努斯的叙述所表明的那样，阿勒曼尼人的政治是复杂的。

政治的变化

阿米阿努斯的历史著作相当详细地介绍了354—378年的情况，在存留下来的书卷里，他并没有分析阿勒曼尼人的政治如何运作，也没有分析维护统治者权力的体制结构。他多少算是连贯地记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阿勒曼尼联盟（这个称呼比较好）的运作情况。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塔西佗时代以来，莱茵河边境地区这一部分的日耳曼政治出现了两个根本转变。首先，也是毫无争议的一点是，组成阿勒曼尼联盟的各个群体，也就是在国王和王公的率领下出现在斯特拉斯堡，阿米阿努斯在其他地方也多有论述的群体，其结构比1世纪时更为稳固。塔西佗的作品，不仅仅是《日耳曼尼亚志》，还要算上《编年史》（*Annals*）和《历史》（*Histories*）中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1世纪时差不多同一片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大量信息。那时，一些日耳曼群体，例如乌昔鄙夷人（Usipii）和邓克特累人（Tenchteri），没有国王也能过得很好：在必要时，由领头人（拉丁文为principes）组成的寡头集团开会讨论事项，形成集体政策。即使有人在某个群体中获得了国王的权力，他的权威也会遭遇反抗，而且往往不能长久，他无法将权力传递给指定的儿子或继承人。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日耳曼政治中两位占统治地位的君王是克鲁西人（Cherusci）中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马科曼尼人中的马罗博杜斯（Maroboduus）。阿米尼乌斯的统治时间非常短。他之所以能获得统治地位，是因为他领导了那场著名的反抗，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森林之战中击溃了瓦卢斯的3个军团，但他只是克鲁西人几个领袖中的一个。胜利让他在一小段时间里拥有了优势，但别人的反对一直存在，尤其是赛吉斯特（Segestes），他也是克鲁西人的领袖，还协助了罗马人。事实上，阿米尼乌斯在于公元19年因一部分族人加害而去世之前就已失去了权力。马罗博杜斯的统治根基比较深，但最终被罗马和内部竞争对手破坏，因此在塔西佗的时代，也就是1世纪和2世纪之交，马科曼尼人不再由马罗博杜斯的后人统治。[2]

相比之下，4世纪阿勒曼尼人的政治生活是围绕国王（reges）和王公展开的。我们手头的证据表明，阿米阿努斯称为阿勒曼尼亚（Alamannia）的地区被划分为一系列的子区域（在日耳曼语中可能已经被称为“gau”），其中每一个（或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区域都由国王（rex）或者王公（regalis）统治。这种王权似乎至少一部分可以继承，不一定是从父亲到儿子这么简单的模式，也有可能是在王族成员中继承。在斯特拉斯堡时的主要领袖克诺多马里斯和塞拉皮奥是叔侄关系，而塞拉皮奥的父亲梅德里克斯地位重要，很长时间里都在罗马充当人质。在罗马期间，梅德里克斯开始崇拜埃及神塞拉皮斯（Serapis），并因此给儿子取了一个明显非日耳曼的名字。在阿米阿努斯的描述中，我们还见到了一对父子：瓦多马里乌斯（Vadomarius）和威蒂卡比乌斯（Vithicabius），他们相继当上国王。要注意，不能一概而论，阿勒曼尼的国王是有可能被推翻的。一位叫冈德马杜斯（Gundomadus）的国王被自己的追随者杀死，只因为他不愿加入前往斯特拉斯堡战斗的军队。国王之外的一些人在阿勒曼尼社会中也很重要。阿米阿努斯也提到了参加战斗的贵族。不管怎么说，比起罗马帝国早期，4世纪时，阿勒曼尼人的国王势力更大，地位也更稳固。[3]

其次，和1世纪时相比，4世纪的阿勒曼尼联盟更像是一个坚实的政治实体。这个观点的争议要大一些，因为我们看到，阿勒曼尼并不是那种只有一个不受挑战的统治者的中心化实体。整个4世纪，阿勒曼尼亚都没有过只有一个国王的情况。而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本身完全有能力建起更大的联盟，并将一些较小的主要政治单元纳入其中。因此，一些学者而认为，证据不足以支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观点。但是，1世纪的超部落联盟要么是主要行使宗教职能的长久（但并非不变的）联盟，要么是持续时间非常短的政治性联盟。塔西佗提到了3个“宗教联盟”（除了各自的宗教信仰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的部落结成的群体）：离海最近的印盖窝内斯（Ingvaeones）、内陆的厄尔密诺内斯（Herminones）和西边的伊斯泰窝内斯（Istvaeones）。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但我不想低估它们对早期日耳曼世界的重要性，因为托勒密也知道它们，这意味着这些联盟从1世纪存续到了2世纪。但关于罗马对该地区试图进行的和实际进行的征服的叙述表明，宗教联盟从未成为应对外部入侵的政治或军事基础。无论其地位如何，哪怕它在别的领域很重要，宗教联盟都不是重要的政治组织。当以政治联盟的形式抵抗罗马或（在稍早时期）试图进入凯尔特人之地扩张日耳曼人的地盘时，联盟是围绕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人组织起来的：恺撒时期的阿里奥威斯特斯（Ariovistus），罗马计划征服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地区时的阿米尼乌斯和马罗博杜斯，或者是后来组织大型起义的巴达威人（Batavian）领袖尤里乌斯·西威利斯（Julius Civilis）。这些领袖都通过个人魅力、劝说和恐吓组织起了大型联盟，以广大的日耳曼世界为兵员基础，也就是从塔西佗和后来的托勒密列出的许多小政治单元中招募战士。然而，这些联盟无一例外，都在领袖失败后崩溃了，而且之后再也没

有人说起过。马罗博杜斯联盟的持续时间比其他的长，但即使如此，在他死后联盟也很快解体了。[4]

在联盟整体的稳定性这个层面上，1世纪和4世纪的比较很说明问题。斯特拉斯堡战役的结果是阿勒曼尼人惨败：

> 经此一役，罗马方面有243名士兵和43名高级军官阵亡……但在阿勒曼尼人这边，有6 000具尸体躺在阵地上，还有大量无法估计人数的死者被河水（莱茵河）卷走了。

在他试图逃回河对岸时，克诺多马里斯被俘。尤利安（Julian，又称背教者尤利安）以他堂兄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二世（Augustus Constantius II）的名义在西方统治，然后利用胜利将他自己定的条件强加给幸存下来的那些阿勒曼尼人的国王。事实上，克诺多马里斯之所以能如此自由地组织起他的部队，是因为罗马内战先造成了莱茵河边境地区的权力真空。尽管如此——这是4世纪与1世纪完全不同的地方，克诺多马里斯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以他为首的联盟被彻底破坏，而1世纪阿米尼乌斯和马罗博杜斯失败后，以他们为首的联盟就崩溃了。不仅是参与战斗的许多较小的阿勒曼尼国王在尤利安的外交手腕下保住了王位，而且在战斗结束后不到10年，就出现了瓦多马里乌斯这个让罗马人头疼的新领袖。这个威胁通过暗杀瓦多马里乌斯解除了，但随后又出现了第三位：马克里阿努斯（Macrianus）。在阿米阿努斯笔下，尤利安之后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三次试图抓捕、暗杀马克里阿努斯，但最终由于更东边事件的压力，皇帝让步了。罗马人和阿勒曼尼人在莱茵河中碰面，举行水上峰会，皇帝承认了马克里阿努斯在阿勒曼尼人中的卓越地位。[5]即便是重大军事失败，也不足以摧毁更大的阿勒曼尼联盟，这和1世纪的情况不同。

可见，和1世纪的联盟相比，4世纪的联盟能带来更稳固的政治身份，因为联盟不会随着某个人职业生涯的起伏而起落。随着情况的变化，一个区域内会有这个或那个国王崛起，但不管个人的政治生涯如何变化，联盟整体几乎不受影响。阿米阿努斯留下的一些信息也表明了这些纽带的力量，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国王冈德马杜斯因为没有和大部队一起去斯特拉斯堡而被他自己的一部分追随者推翻了。至少对这些人来说，有的时候，群体身份比自己对国王的忠诚更能决定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为。阿米阿努斯没有告诉我们群体身份是如何起作用的。但他确实提到，阿勒曼尼国王彼此设宴款待，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至少让一些国王联合在一起参加了斯特拉斯堡战役。如果能知道协议和王室宴请的细节，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但很可惜，阿米阿努斯没有提供我们想要的信息。

像许多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联盟一样，阿勒曼尼可能有一套既定的政治和外交惯例，它定义各个国王是上位王还是下位王，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下位王对上位王效忠并承担一些义务，同时对自己的领地保有直接的日常控制权。在这些系统中，政治连续性不可能是绝对的。没有哪个上位王可以完全复制或直接继承前任的权力模式；但只要确立了新的等级，不同地位的国王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众人都接受的关系，可以用来协调和界定（高等级的和低等级的）双方在新协议中的权利。在我看来，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中，显然有这样一个系统在运作，其总体重要性的一个可见标记是罗马外交政策在边境这一部分的“形态”。每当罗马人的注意力被分散——通常是因为阿米阿努斯时代罗马帝国的波斯前线上发生了事件，就会适时出现一位阿勒曼尼人的上位王；而罗马对莱茵河区域政策的主要方向，就成了消灭在这个上位王统治时期出现的继承人。[6]

可惜，关于是否有类似的系统在莱茵河边境的其他大型实体——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勃艮第人——中运作，阿米阿努斯没有给我们任何提示。和他们的阿勒曼尼邻居一样，4世纪的法兰克人肯定有众多的国王，但我们对他们如何行动了解得不够多，无从得知法兰克政治身份是否可以在重大失败后继续充当集体行动的基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所有4世纪的日耳曼群体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300年前的日耳曼群体也是一样，根据塔西佗的记录，一些群体有国王，一些则没有。特温吉（Tervingi）是一个哥特人主导的联盟，在罗马欧洲边境喀尔巴阡山脉的另一端，也就是极东端活动；这个联盟可以证明，更广泛和政治上更稳固的群体身份并不只在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中有。特温吉人是罗马的日耳曼邻居里，另一个和阿勒曼尼人一样有大量相关信息存世的群体。

在政治运作和持久性方面，特温吉联盟显示出3个与阿勒曼尼联盟非常相似，但与所有1世纪联盟都差别很大的特征。首先，从约330年到约370年，特温吉的中央控制权似乎在同一个王朝中至少传承了3代，国王的正式头衔是“士师”（judge）。可见，与阿勒曼尼各区中国王的情况相比，特温吉所在的东日耳曼世界中，权力世袭程度更高。其次，和阿勒曼尼人的情况一样，特温吉士师们统治着一个联盟，其中有不少国王和王公。第三，特温吉联盟被足够强大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哪怕经历重大失败也能保留下来。据我们所知，特温吉联盟最早登台是在4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对其造成了重大打击。而不仅特温吉联盟没有解散，当时主导联盟的王朝还保住了权力，并在一代人之后策划推翻君士坦丁强加的条款中最不合理的那些方面。[7]需要强调的是，在4世纪的日耳曼实体中，我们只对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这两个有所了解，我们不能断定这个时期的每个大型日耳曼群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然而，这两个案例提供了极好的证据，证明和300年前同一个地区相比，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出现了范围更大、更有凝聚力的群体身份认同。

这是如何产生的呢？

军事王权的兴起

这是一个没法直接讲述的故事。1世纪到4世纪这段时间里没留下任何重要的相关叙事资料，也就无从对这一关键中间期里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关系做详细描述。即使是2世纪马科曼尼人战争这么大的动乱，也只能靠零碎的证据来重构。不管怎么说，恐怕没有哪个罗马历史学家，包括作品已散佚的，能写出时间跨度那么大的作品，体现出以阿勒曼尼联盟和同时代的特温吉联盟为完成标志的长期转变。1世纪的资料记载了部落之间的大量权力斗争，甚至有整个部落被创建、被摧毁的事。例如，巴达威人最初是卡狄人（Chatti）的一个分支，而罗马的观察者目睹了卜茹克特累（Bructeri）的毁灭，塔西佗记载了卡狄人和厄门杜里人（Hermenduri）之间的殊死斗争，以及被流放而不幸失去土地的安普希瓦力人（Ampsivarii）的最终消亡。[8]部落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有发生但频率不高，很有名的一次是阿米尼乌斯和赛吉斯特为控制克鲁西而进行的斗争。但从这些零散信息中，你看不出日耳曼的政治结构正朝规模更大、凝聚力更强的方向发展。关于促使那类政治结构出现的种种过程，最具戏剧性的线索来自一个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

1955年，一群丹麦工人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南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地区的哈泽斯莱乌（Haderslev）挖排水沟。但他们不久就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因为他们在所挖的一小段排水沟里发现了一堆金属物品，有600件之多，很多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他们挖沟的低洼草地在古代是一个湖泊，不过算不上特别深。在接下来的9年中，人们对1 700平方米的草地进行了精心挖掘，出土了一系列惊人发现，竟然还有一艘船的残骸。所有这些物品都在罗马时期的不同阶段被倾倒在湖中。物品聚在一起的情况表明，有些物品是从袋子或篮子中成堆倒出来的。这绝不是第一个出土的日耳曼倾倒场。19世纪后期，北欧，特别是丹麦的一系列沼泽地中出土了类似的物品。但艾斯博尔沼泽（Ejsbøl Mose）——前述哈泽斯莱乌遗址的名称——是这些地点中第一个使用现代考古方法挖掘的。这让我们有可能回答早期挖掘中没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倾倒场中堆积的物品，是连续多次，每次倾倒少量物品的结果，还是次数较少，但每次都倾倒大量物品的行为的产物？

通过对地层细节的仔细观察，我们得到了清晰明确的答案。在艾斯博尔沼泽找到的物品是在不同时间分多次倾倒进来的，但偶尔会有一次性倒入大量物品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挖掘者发现，有一堆物品是同批倾倒进来的，那是一支约200人的小型军队的所有军事装备，它们在公元300年左右的某个时候被一次性沉入水中。这些装备包括数百件物品，被证明

属于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且有明确领导层级的军队。军队里有近200名长矛兵，每人都持有带倒钩的投掷标枪和用于刺杀的长矛；挖掘者发现了193个带倒钩的矛头和另外187个无倒钩的矛头。约三分之一的军人还有随身武器。挖掘者发现了63个腰带扣，以及原本佩在腰带上的60把剑和62把小刀。军队由10位或更多骑马的指挥官领导。出土物品还包括10根缰绳和7套马刺。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装备在沉入湖中之前都已被仪式性地摧毁。剑全被折弯，许多木头碎片来自被砸碎的长矛。这一过程中明显存在暴力，看到这些残骸，我们不禁联想起史料中偶有记载的种种仪式行为，比如将敌人的武器作为贡品献给神灵。[9]一两名骑马者可能徒步逃脱，少了的马刺或许只是丢了。但可以说，挖掘者发现的是4世纪初一场久被遗忘、完全没有记录的歼灭之战（Vernichtungsschlacht）中被消灭的军队的最后遗留物。

作为考古现场，艾斯博尔沼泽太棒了，但这些发现还有更广泛的意义。从中得出的清晰景象——一支专业、组织良好、有完整从属结构的军队——与大量文献证据吻合，也就是说到了4世纪，日耳曼的王室领袖（国王）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固定军事组织，而且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斯特拉斯堡战役后，罗马人最终将克诺多马里斯逼入窘境，当时他的随从们和领袖一样投降了。巧的是，他们也是200人。这些随从显然有军事职能，但一些难得的证据证实了我们原本只能假设的东西，也就是他们也被当作社会权力的工具。4世纪70年代早期，特温吉人的领袖决定试着统一他们臣民的信仰，于是随从们被派往各个哥特村庄去要求那里的人服从。这里的关键是，根据塔西佗的记载，1世纪时不存在这种机构；当时有随从和战队，但不是固定的，重要领袖只是偶尔收到自愿捐赠的食物，提供给为其服务的人。考古发现的1世纪物品中，也没有艾斯博尔沼泽出土的那种专业、多样化的武器。在1世纪和4世纪之间的两个世纪，日耳曼国王逐渐获得了全新的固定军事力量。[10]当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与塔西佗时代的国王相比，4世纪资料中提到的这些国王在日耳曼社会结构中占据了更稳固、更重要的地位。

明确表明这一发展的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出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人文领域中，比较语言学更具异国情调，要求也比较高。它研究的是词语和语义的语言学起源，以及它们在不同语族间的演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所有日耳曼语言中表示“国王”或“领袖”的词都派生自三个词根：thiudans（人民的统治者）、truthin和kuning。其中，thiudans肯定是最古老的，只有它在其他印欧语系语言中有对应词；然而，它在日耳曼语族不同分支中的分布模式说明，到了罗马时代晚期，这个词用得越来越少，甚至已经没有人用了，取而代之的是truthin。kuning这个词是后来才流行

开来的。值得注意的是，truthin最初的意思是“战队的领袖”，但到了罗马时代晚期，该词已经成为日耳曼世界各处指代“国王”或“领袖”的主要用词。这不仅仅是改了个名字那么简单。thiudans意为“人民的统治者”，所谓军事职能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甚至都不算太重要的部分。塔西佗描述1世纪日耳曼社会的名言“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说的似乎就是这样的情况。到了4世纪，指代领袖的新术语表明这种区别已经消失，军事指挥成为当时日耳曼领袖的主要职能。用语的变化再好不过地表明，新类型领袖在罗马时代晚期出现这一现象非常重要；这样的领袖身居高位、权柄煊赫，只因有一支固定的战士部队听命于他。[11]考古学、文献资料和语言学加在一起，为我们揭示了4世纪那种更为坚实的王权形式的根源。

在1世纪和4世纪之间发生的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一类军事领袖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军事力量，利用它拉开了自己与其他人在社会权力方面的距离。不用多想就能知道，这不可能是个你好我好的过程，毕竟有一小群精英正忙于宣称自己拥有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的地位。当然，这可能是以艾斯博尔沼泽武器倾倒事件为顶峰的一系列事件的背景。考古学家发现的是一整队军事随从的武器。而武器被摧毁得如此彻底，曾挥舞这些武器的人的命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建立社会统治地位时，新的军事国王下了很大的赌注，而艾斯博尔沼泽提醒人们，每一个成功的群体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失败的群体。对这样的失败本身，马上可以想象到两个可能的场景。因艾斯博尔沼泽而无意中在后世留名的战士群体败于一个敌对的战队之手，也可能是被一群不那么军事化的日耳曼平民击溃的（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欣赏战士领袖想要的那种统治）。用好莱坞电影来打比方，一种情景是《教父》（*Godfather*）——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王用这片古老的湖泊向所有对手发出消息，警告“你们也有可能最终与鱼儿同眠”（在此情形下，水里的是淡水鱼）；另一种情景是《七侠荡寇志》（*The Magnificent Seve*）——一群农民具备了足够的战斗力，足以消灭至少一支掠夺成性的战队。虽然难以确证，但从被毁物品体现的愤怒上看，当时的情景可能更接近尤·伯连纳（Yul Brynner）演的《七侠荡寇志》，而不是阿尔·帕西诺（Al Pacino）演的《教父》，因为我们从后来的一些事件中知道，获胜的战队领袖倾向于吸收被打败对手的军队以增强自己的实力。[12]不过这只是细节。最根本的一点是，在军事国王崛起的漫长过程中，暴力必然时有发生；不同战队的领袖间会发生冲突，这类领袖和他们想要控制的人之间也会爆发冲突。

扩张和发展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维护在艾斯博尔沼泽被摧毁或克诺多马里斯雇用的那种军事随从队伍，花费会非常高。职业军人自己不生产食物，他们

需要给养。我们知道种种与日耳曼战队有关联的证据，必须承认，它们大多出自后来的英雄史诗，但阿米阿努斯的提示，以及人类学家研究过的记录更完善的类似例子可以从侧面支持；这些证据表明，这些军人需要的确实是英雄级别的供养：大量的烤肉和酒类，就像好莱坞大片《贝奥武夫》（*Beowulf*）中展现的那样。军事装备也不便宜。必须指出，在艾斯博尔沼泽没有发现护身铠甲，而这是古代和中世纪最昂贵的个人军事装备。例如，阿米阿努斯评论说，克诺多马里斯身披铠甲，很容易在战场上认出他来。这表明即使在4世纪，一般日耳曼战士也穿不起铠甲。不过，艾斯博尔沼泽发现的那支部队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剑，其余大部分战士的标志性装备也是由技能熟练的工匠用昂贵的原材料制成的。[13]换句话说，随从使新的军事国王成为4世纪日耳曼土地上的强势人物，但其出现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经济需要发展到能够产生多余的食品和/或其他形式的可流通财富的程度；其次，国王必须能够将这些盈余或其中很大一部分转为自己所用。

这一简单的观察对我们理解历史是有意义的。直到公元元年，整个日耳曼欧洲都没有足够的粮食盈余，也缺乏其他形式的可流通财富。故事要从农业生产说起。日耳曼欧洲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实际上第一千年罗马治下的欧洲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都是如此。然而，不同类型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有高有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考古研究表明，在罗马帝国是其西面及南面最近的邻居的400年间，日耳曼欧洲经历了自己的农业革命。

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莱茵河以东的农业实践基本是“粗放的”，也就是说不属于“集约型”。粗放型农业产量很低，养活同样数量的人口单元需要更大面积的土地。这种农业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定居点往往规模较小，分散在各地，存续不会超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基本上，日耳曼欧洲的人口没有或者说没有必要保持土壤肥力，使任何一年中的作物产量都能达到最大，或者持续使用同一片土地而不是短期或中期使用。一旦产出开始下降，降到他们认为可接受的水平以下，他们就会转移到一个新的区域。支持这种解释的证据有很多种形式。

在欧洲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能看到从前广泛流行的“凯尔特田地”（Celtic fiel）系统的边界——石墙。这些石墙是用耕种过程中从田地里清除出来的碎石头建造的。这些田地非常大，反映出需要大量土地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运作。已知的定居模式证实了这一点。在1945年之前，被认定为1—2世纪的日耳曼定居点的地方不多；研究早期日耳曼人，主要是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他们的墓地。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定居点与墓地的比例为7比1，而且还在增加；但早期出现失衡的原因也比较清楚了。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些早期定居点都很小，存续时间很短。因为知道定居点用不了多久，所以居民们不会投入太多时间精力建设定居点。因此，定居点

的总数很大，但也很难在一开始就被发现。关于当时通用的农业技术，只有侥幸留存下来的一点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证明了上述观点。例如，在现代捷克的奥德里（Odry），日耳曼时期的墓地得到了精心挖掘，它就建在一块古老的“凯尔特田地”之上。在其中一个出土的坟墓中，人们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犁地和施肥手段的证据。它们都很原始。犁地的方法是交叉浅耕。这意味着土壤不会被翻起来，杂草和作物残茬也就不会在土壤中腐烂并为土壤提供重要的养分（尤其是氮）。证据体现的唯一额外施肥方式是加了一些灰。仅仅采用这些技术，土壤肥力不可能长久维持。[14]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荷兰和德国沿海的沼泽地区开始，人们发现了日耳曼农业实践在罗马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确凿证据。当时，因为对艾斯博尔沼泽的挖掘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考古学家的兴趣普遍转向了定居点，考古技术也发展到了可以获得真正有用的结果的程度。对早期日耳曼人定居点的第一次重大发掘，集中于这些沿海地区特有的人造土丘——在荷兰语中称为terpen，德语中称为Wierde。这样的土丘是连续多年在同一块本来很低洼的土地上定居形成的。经过许多年，腐烂的垃圾、建房屋的木材和其他废弃物品使定居区的地平面上升了。这些遗址于是成为考古发掘的自然目标，不过当地农民早就意识到这些土丘是由肥沃的表土堆起来的，因此在考古学家到来之前，许多土丘已经被全部或部分刨走了。

在一个考古界内赫赫有名但外界知之甚少的地方——费德森丘（Feddersen Wierde），考古学家做了十分细致的工作。在近10年的时间里（1955年到1963年），人们进行了认真的分层挖掘，确定了该定居点的完整演变过程。该定居点落成于1世纪中叶，有5个家庭在此定居。他们最多可能有50人，从事混合农业，还在养牛上下了不少功夫。从第一阶段建造的畜栏数量来看，这最初的5个家庭拥有大约100头奶牛。但这只是开始。这个定居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继续发展，在3世纪晚期达到最大规模，那时，它有多达300名居民，而这些居民拥有超过450头奶牛。学者详细研究了此地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键在于定居点的规模和延续时间，这些能间接反映出农业实践的变革。如果还是实行早期日耳曼世界那种古老而粗放的农业制度，那实在难以想象这么多人能在几百年的时间中如此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如果还采用古老的制度，生产就不可能那么集约，土壤肥力也不会保持。费德森丘之所以能如此发展，是因为那里的居民采用了集约型的农业制度，因此可以更好地增加田地土壤的肥力，并让密度高得多的人群生存好几代。我们无法重构这一农业革命的全部细节，但它肯定涉及更有效地利用所有牲畜的粪便来维持耕地的肥力。[15]

不应该轻率地认为这个例子代表了普遍的情况，同样，没有理由认为费德森丘——其基础是整合程度较高的畜牧业和种植业——是日耳曼农业集约

化的唯一模式。而对大量其他罗马时期定居点的发掘表明，费德森丘绝不是农村发展的孤例。和费德森丘差不多一样知名的是威斯特（Wijster），它也在日耳曼尼亚西北部。在威斯特，最初有一个家庭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开始耕种。现代农民刨走了不少土，威斯特的大部分被破坏得太严重，无法很好地进行考古挖掘；但我们知道的是，到了4世纪，这个原本只有一个家庭的地方已经发展为一个大面积的定居点，为至少五六十个家庭提供栖息地。他们忙于开发附近德伦特河（River Drenthe）河口之上的那些易于耕作的沙质土壤。在莱茵河边境以外地区出土的其他罗马时期大型定居点包括霍德（Hodde）、佛巴斯（Vorbasse）、金德卢普（Ginderup）、玛丽斯敏得（Mariesminde）和诺里弗杨德（Norre Fjand）。

我们对其他地方情况的了解并不是那么全面，也不很清楚农业集约化的确切模式，但已知的信息足以证明，日耳曼农村的发展是罗马时期的普遍现象。至于现在德国的中部地区，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之外的古代日耳曼尼亚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其定居模式发展的细节我们了解得比较少；当然，没有理由认为各处的农业实践同时发生了改变。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地区都发现了足够大的定居点：例如，位于柏林以西50千米处的巴霍斯特（Barhorst）曾有30个家庭定居，在更遥远的东南方，发现了4世纪的许多大型定居点，采用的是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霍夫（Cernjachov）系统。这表明在罗马帝国时代，日耳曼人主导的欧洲发展出了集约化程度更高的农业制度。一些独立发现的农业器具说明了同样的情况，铁犁头和犁刀的出土表明，4世纪的人可以更有效地翻土。定居点的规模更大，延续时间更长，也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使用了更有效的耕作器具，这些都说明，公元后的最初的几个世纪中，日耳曼欧洲的农业实践发生了重大变革，尽管其技术相对于边境另一侧的罗马而言，专业化程度还差得很远。[16]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观察。首先，这场农业生产革命必然带来粮食生产的大幅增加，这有助于解释新兴的军事国王如何供养随从。在农业革命发生之前，很难想象落后的日耳曼农业经济能产出足够的剩余粮食来支撑4世纪那种规模的固定职业战士群体。其次，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说，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意味着日耳曼欧洲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呈指数增长。我们没法对人口增量给出一个数字，但正如人口统计学家告诉我们的，食物供应永远是限制人口规模的关键因素之一。日耳曼农业革命使得粮食供应量大幅增加，人口必然相应增长。人口膨胀也体现在其他证据中。对整个罗马帝国时期都存在的日耳曼人的墓地，考古学家在充分注意到地层的前提下进行了挖掘，他们发现在这些区域中，3世纪和4世纪埋葬的人口数量高于之前的200年。花粉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这一发展。在公元后最初的4个世纪中，谷类作物产生的花粉比例增加，而草和树木的花粉比例降低，这是

农业集约化的又一证据。[17]

农业产出的大幅增长不仅是随从们给养的来源，也必定是这一时期日耳曼社会新财富的一个基本来源——最能体现新财富的，是随从们昂贵的军事装备。多出来的食物可以换成其他想要的物品。不过，虽然农业可能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新财富的唯一来源。近年来出现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后最初的4个世纪中，日耳曼欧洲的整体经济财富之所以大幅增加，是因为生产明显走向多样化，食品之外一系列其他商品的交换也有所增加。

金属生产及其后续加工的证据充分揭示了这一经济领域有着类似的扩张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现代波兰境内的两个主要生产中心——圣十字山（Świętokrzyskie Mountain）和马佐夫舍（Mazovia）南部——据估计在罗马帝国时期生产了超过800万千克的生铁，开采量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也大大增加。金属加工的证据比较零碎，但同样说明问题。出自艾斯博尔沼泽的60把剑第一次出土时，人们认为这是到当时为止在一个空间里发现的最了不起的一批罗马剑。更详细的分析表明，尽管这些剑有着罗马样式，但它们实际上是在日耳曼欧洲制造的复制品。可见，到公元300年左右，已经至少有一个中心能够以相当大的规模生产标准化的军事装备，而已知的更早时代的日耳曼剑都是个别人的作品。[18]

贵金属加工的证据同样引人注目。19世纪后期，在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Pietroasa）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金银器皿。大部分物品的制作时间可以追溯到5世纪，但至少有一件银餐盘制于4世纪，而且是在罗马帝国以外的日耳曼欧洲制作的。在4世纪的日耳曼遗址中已经发现了制作这类物品的模具，罗马帝国时期，由贵金属制成的个人饰品的总体水平也有了提升。到了4世纪，复杂的银质扣针（fibula）——一种安全别针，日耳曼人习惯用它来固定衣物——已经相当普遍，至少在阿勒曼尼一个王国的所在地发现了生产它们的作坊的遗址。而在1—2世纪，扣针通常由青铜或铁制成。3世纪中叶，日耳曼陶器的生产方式开始改变。3—4世纪，日耳曼陶匠开始使用转轮制作陶器（但未必是所有地方的陶匠在同一时间开始使用轮子）。这一发展与大大改进的烧窑技术相结合，使陶罐能在高得多的温度下烧制，日耳曼欧洲因而可以广泛使用质量显著提高的陶器。改用转轮制作陶器不仅有助于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还带来了更大规模、更商业化的生产。在某些地区，转型是彻底的。在4世纪黑海以北由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霍夫世界，用转轮制作餐具已经成为常规（不过锅仍然是手工制作的），而且与罗马帝国行省制作的餐具几乎无法区分。相比之下，同时期的阿勒曼尼人在一些地方尝试用转轮制作用具，但尝试的时间不长，范围也不广。这或许是因为与哥特同行相比，阿勒曼尼陶匠要面临来自罗马的更严酷也更直接的竞争。但在罗马时代晚期之前，在日耳曼人居住地发现的高质量转轮制品无一例外都是从罗马输入的，所以即使是这种程度的

经济发展，也代表着重大的转变。[19]

金属加工和陶器生产显然是非农业经济的主要领域，人们既生产昂贵的物品，也生产更便宜、使用范围更广的物品。在后期日耳曼经济的其他领域，也可以看到越来越专业的生产方法，其中一些也是全新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玻璃生产。4世纪之前，在非罗马欧洲发现的所有玻璃都产自罗马，是从边境那一边输入的。但是在公元30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腹地的科马罗夫（Komarov）建起了一个玻璃生产中心，其产品在中欧和东欧得到了广泛使用（地图3）。从发现玻璃的各种环境看，玻璃是精英用品，往往是地位的象征。玻璃生产业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玻璃制品肯定是当地经济的极有价值的补充。在4世纪由哥特人统治的土地上，考古挖掘发现了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有意思的例子。在如今罗马尼亚的巴拉德——瓦莱亚塞亚卡（Barlad-Valea Seaca），调查人员发现了至少16个小屋，都用于生产当时墓葬中的一个常见物品——鹿角制成的梳子。一些日耳曼群体使用发型来表示政治归属并展示地位。最著名的例子是塔西佗描述的所谓苏维汇（Suebic）结，一个早期日耳曼人的头骨上就有一个保存完好的苏维汇结。在这样的背景下，梳子自然是一种重要的个人财产。在小屋内，发现了各个生产阶段的梳子部件，为我们揭示了整个制作过程。在本例中，似乎整个定居点都在专门从事同一样重要物品的制作。[20]

也就是说，到了罗马帝国末期，日耳曼欧洲经济中不光是农业生产，其他领域也都开始繁荣——当然是相对而言。在整个地区，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见证了爆炸式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同当今的全球化一样，和新财富至少一样重要的，是个不那么让人愉快的历史现象——财富的分配非常不平等。日耳曼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赢家和明显的输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军事国王及其随从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越发紧密。不仅仅是食物，生产出来的许多物品都被新兴的军事国王和他们的武装随从消费了。显然，铁是铁制武器所必需的，而至少有一些玻璃、贵金属物品和更高质量的陶器是为他们制作的。所有这些物品都出现在墓葬中，通过仔细分析可以证明，这些物品属于罗马时代晚期的日耳曼社会精英。[21]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战士、国王和经济

19世纪的人对早期日耳曼社会的看法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彼时，民族主义热情高涨，有人以此为框架，提出了早期日耳曼Freiheit（自由）的概念：公元前的日耳曼尼亚是自由平等的高贵野蛮人构成的世界，没有中间的贵族，国王直接对自由民组成的大会负责。这种观念是错的。即使在塔西佗的时代，日耳曼社会也有奴隶，不过这些奴隶经营自己的农场并交出

部分农产品，而不是作为他人地产上失去自由的劳动力而受到更严密的统治。尽管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中，日耳曼世界的物质遗存并没有展示出明显的地位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即使在一个物质简单的文化中（公元前3世纪，有社会地位的中北欧日耳曼人的最重要标记是，穿衣服时加上一个稍微华丽一些的扣针），地位的差异也会带来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哪怕不能通过拥有华丽物品来体现，只要更高的地位意味着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不需太多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有更大的可能性把基因传递下去，社会地位的差距就是非常真实的。事实上，我认为塔西佗作品中体现的地位差异对1世纪的日耳曼世界来说恐怕不是全新的，即使这样的地位差异很难通过那之前几百年里留下了考古痕迹的物品来得到判定。[22]

话虽如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原本就有的不平等，其程度在罗马帝国时期越来越深了。我们已经见到了其中一些证据。从新财富中得利的包括新兴的军事国王和他们的随从（至少是发了财的那些随从）。从考古学来看，他们的兴起反映在丧葬实践和定居点遗址这两个方面。陪葬品的奢华程度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一般说来，真正豪华的坟墓（在德语文献中称为Fürstengräber，“王公墓葬”）会形成墓葬群，按时间先后是1世纪末的吕布索（Lübsow）墓葬群，以及3世纪末的洛伊纳——哈斯莱本（Leuna Hassleben）墓葬群。显然，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只存在于这些时段里是不可信的。有人认为，豪华墓葬的出现可能标志着社会压力加剧的时期，当时有一批新的人对较高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主张——当然，提出主张的是操办葬礼的人，而不是死者自己。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丧葬实践的改变肯定反映了新财富的影响。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之前，日耳曼人的丧葬仪式似乎都差不多，在当时的火葬墓地中发现的典型物件，也就是一件手工制作的小陶器，偶尔加上一些个人物品。相比之下，在罗马时期，不仅有极其豪华的王公墓葬群，而且数量不算少的其他墓葬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随葬品，男性的墓葬中通常包括武器，而女性的墓葬中通常包含珠宝。在日耳曼欧洲的部分地区，特别是在波兰，在坟墓旁立碑是表明地位的另一策略；墓葬群周围会垒起石头形成坟冈，单个的墓葬则通过立起石碑（stelae）来展现特殊地位。例如，在位于奥德里的维尔巴克（Wielbark）墓地中找到了500座平坦的墓葬和29座坟冈。[23]

关于定居点的考古发现通常也能反映当时发生的种种变化。阿勒曼尼国王和王公处于社会顶端，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居所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其中最著名的是乌拉赫（Urach）的圆山（Runder Berg），那里曾是阿勒曼尼人的地盘。3世纪末或4世纪初，这个山顶区域长不超过70米，宽不超过50米，周围是用结实木料筑成的壁垒。区域内有许多木结构建筑，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大宴会厅，可能用于宴请随从和其他国王。较低的斜坡上是其他建筑物，包括工匠作坊和可能是其他仆人住宅的建筑。比起一般的农

村，这个地方的外来罗马陶器和其他精美产品的集中程度要高一些。日耳曼尼亚境内还没有发现过罗马时期之前的大型住所，而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大型住所变得相当普遍。还是在费德森丘，2世纪村庄里的一栋房子虽然没有那么宏伟，但与其他房子相比显得特别突出。它比其他房子大得多，周围是木栅栏。挖掘者认为这是当地头人的住所。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发现了特别大的房屋，例如位于柏林东南30千米处，靠近威塞尔（Wesel）和卡布洛（Kablow）的哈尔登（Haldern）；所有这些房屋都建于罗马时期。阿勒曼尼人的领地被考察得很透彻，在那里已经找到不下62座不同类型的精英住宅，它们都建于4世纪和5世纪，其中有10座经过了挖掘；在日耳曼欧洲各地，甚至东至黑海以北由哥特人统治的地区，都发现了类似的居住区，只是还未进行深入研究。[24]

总体情况已经够清楚了。定居点和随葬品说明社会不平等越发严重，而且不需要太多思考就能看出，拥有军事力量可以让国王乃至他们的随从获得特权，从新财富中分得比其他人更多的一份。直接的结果是，到了4世纪，日耳曼世界的社会分层比1世纪时更加明确，至少在某些地方，政治组织的结构也更加稳定。事实上，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是非常自然的。对人类社会组织演变模式的比较研究早已证明，阶级界定和国家形成是不可分割的。但在4世纪，这种不平等带来的影响有多深远？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主导了这个地区的新政治实体？它们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国家”吗？

给人类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分类有着悠久复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他之前的人。在现代，它从马克思、恩格斯赋予国家及其演变的意义中得到了全新的动力。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家是社会、政治和法律结构的总和及保障，任何时期的统治阶级都会通过国家来控制当时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古代世界中的土地，近现代的重工业，当今的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严酷的现实总是隐藏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外衣下。社会精英告诉其他人，国家为了他们所有人的利益而存在；但如果你看得够透彻，就会发现国家是在维持特权阶层的权力。最近的研究远远超出了这种马克思主义框架，一批复杂的文献专门分析早期的国家形式，用诸如“部落”、“简单的酋长国”、“复杂的酋长国”和“早期国家”等术语来标记其大小和复杂程度。但是我们不用太在意如何在这个范围内定位4世纪时的阿勒曼尼和哥特联盟；我们可以更好地综合利用这些文献，找出四个关键的考察点，来帮助理解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25]

第一个考察点很明显：规模。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政治系统中，人口在什么数量级？第二，它采用什么样的政府系统？是否有官僚或政府官员，他们使用什么技术实施了什么样的权力？第三个考察点是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的社会分层。无论你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为何如此做出的判断，特定类型的政治制度就是往往与特定类型的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如果经济

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盈余以供养不事农业生产的官员，就无法支撑起一个大型、中央化的政府系统。[26]至于第四也是最后一个考察点，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关系。统治者如何选出，如何获得合法性，通过什么机制创造和维持权威？具体说，这个考察点关注的是武力和同意之间的平衡，以及统治者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回报他们的子民（不管给的是什么），并为自己得到经济等方面的支持找到理由。[27]

鉴于现有证据的性质，从这4个考察点中的哪一个入手研究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都不容易。证据通常很少，即便有的话也主要是与阿勒曼尼联盟和哥特特温吉联盟有关的证据，而能不能通过对这两个实体的研究来形成一般化的结论也是个问题。但至少这两个实例代表了4世纪日耳曼人可能做到的事情的限度，并且两者之间（以及与更广泛的证据间）有足够的联系点，表明根据这两个联盟的能力和运作模式得出更一般化的结论，是合理的。

权力与国王

在规模问题上，证据很不理想。但是，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联盟肯定都有军事能力，处于服役年龄段的年轻人超过1万人。阿米阿努斯告诉我们，克诺多马里斯为斯特拉斯堡战役聚集了一支3.5万人的军队。这些军人不都是阿勒曼尼人，而且罗马人记录的关于蛮族的数字总是值得怀疑——尽管在此例中，数字不算太离谱。罗马军队的数量为1.2万，这个数字相对可靠，能印证克诺多马里斯部队的数量级超过1万。4世纪，罗马人相对于日耳曼人的战术优势仍然相当大，特别是因为（正如前文所说）后者通常没有护身铠甲。因此，克诺多马里斯应该不会在完全没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开战。特温吉军队的数字不那么容易得出，但特温吉联盟至少有3次派遣3 000人的分遣队参与罗马对波斯的战争。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到其总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一。特温吉也强大到足以逃过皇帝瓦伦斯（Valens）367—369年为期3年的敌对。我是这么理解的：阿米阿努斯在暗示，即使在联盟内部出现分裂之后，其中较大的一支也能在战场上投入至少1万名战士。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联盟可以投入远超1万名，可能多至2万名的战士。当然，对这些联盟人口总数的估计，取决于你认为战士可能占多大比例。通常会把战士人数至少乘以4或5，这意味着整个群体的人口规模在5万到10万之间。要我说的话，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这些联盟的总人数。[28]

我们现有的罗马史料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去总结使这些联盟运作起来的政府结构。因此，这些政府的能力，只能主要从系统能做出怎样的行政行为来推断，本研究就会采用这种方法。在某些领域，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联盟展示了很强的能力。至少可以说的是，面对罗马的力量，两个联盟都有维护

自己领土空间的观念。当领土面临罗马极富侵略性的干涉时，阿勒曼尼和特温吉的领袖分别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中的船上与罗马皇帝举行了峰会；峰会富有象征意义地宣布，河道标志着他们的领地与帝国之间的明确边界。至于其他地方的边界，也就是和其他日耳曼人领地间的边界，是不是（在感觉上和实际上）也定义得如此明确，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完全有可能如此。例如，德涅斯特河似乎被用作特温吉人和邻近的哥特群体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之间的界河。阿勒曼尼人和他们的勃艮第邻居之间敌意很深，足以让我们认为双方——正如阿米阿努斯记载的那样——认真地定义了各自的领土。按照阿米阿努斯的说法，他们随手使用了一些之前就有的罗马边界标记来定义他们领土的界限。[29]

在他们的领土内，至少作为对罗马压力的回应，日耳曼领袖有时会有在一定程度上统一文化的雄心。例如，4世纪罗马对多瑙河地区的文化霸权，时常表现为试图将基督教传播到邻近地区。在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特温吉的领导层至少两次对此坚决抵制。先是348年，罗马的基督教传教士被驱逐；然后是369年以后，哥特基督徒不断受到逼迫，甚至遭到处决，殉道者的数量不可小觑。这表明，哥特特温吉联盟的领地观不仅表现在经济和军事上，也在文化上有积极表现。[30]

此外，各个领袖的行动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制度化的权力。我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证据表明特温吉人中产生了明确的军事义务。我们看到，特温吉联盟3次派出军事分遣队参与罗马的波斯战争。参战的人从罗马帝国获得了一些经济补偿，但总的来说，证据表明这种服务——要知道，是在1 500千米以外的边境上提供服务——是一种强加的义务，人们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服务必然是哥特领袖一有能力就会想办法去除的一个附庸条款。尽管如此，特温吉的领袖能把分遣队组织起来，就说明他们不仅能找出需要服兵役的人，还能迫使他们上战场。阿勒曼尼联盟偶尔也提供分遣队为罗马服务，但我们能知道的细节很少，而且阿勒曼尼分遣队去的地方要近得多。有趣的是，日耳曼语中通常用来描述“服兵役”的词借自拉丁语，这或许表明此类从罗马帝国传递而来的命令，在那些被迫提供分遣队的日耳曼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义务兵役制度。[31]

阿勒曼尼和特温吉的领导层也得到了获取基本经济支持的权利，其形式可能是对农业生产征税。这方面的权利是供养国王军事随从的必要条件。到了4世纪，已经没有哪个国王能像1世纪的国王那样，仅靠纯粹自愿捐赠的食品来供养其专职随从了。从罗马进口的商品范围很广，包括4世纪精英居住地遗址上发现的那种葡萄酒双耳瓶，这也说明国王会取走一定比例的基本生产物，用于交换罗马的商品供自己使用。但日耳曼领袖应该至少还有另外一种获得经济支持的主要方式。如前所述，到了4世纪，与罗马帝国的跨境贸易已成为重要的现象。罗马当局肯定对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征收

了关税，而日耳曼国王也极有可能这么做了。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阿勒曼尼或特温吉联盟征收了关税，但边境地区其他的日耳曼国王早在1世纪时就已经这样做了。当时，马科曼尼的国王瓦尼乌斯（Vannius）的财富肯定与出现在他宫廷中的罗马商人有关，而4世纪的国王们不这么做是不大可能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贸易及贸易规则会在特温吉领袖与东罗马的外交谈判中占据突出地位，也很难解释是什么让克诺多马里斯富有到雇得起雇佣军，作为他召集到斯特拉斯堡的其他部队的补充。[32]

这两个联盟也有权要求至少部分人口提供劳动服务。阿勒曼尼国王可以动员劳动力建造他们自己带防御工事的住地（如圆山），而如果不得不尽一些外交义务（比如尤利安皇帝在斯特拉斯堡之役后强加给他们的条约），他们也可以组织劳动力为罗马服务。同样，特温吉人的士师试图通过建造一套坚固的防御工事来抵挡匈人（Hunnic）在4世纪70年代发起的侵略——阿米阿努斯称之为阿塔纳里克（Athanaric）之“墙”。特温吉人当时可能是在尝试修复阿鲁塔努斯河（River Alutanus）上的古老罗马防线，但最后没有成功。不过，能去尝试这样一个工程，说明征用劳役的权利已经确立，像圆山这样的哥特精英居住地等有形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33]在罗马帝国以及后来那些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西罗马继承国中，劳役通常只是较卑微的那部分人口的义务，也就是不服兵役的那部分人。没有证据表明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联盟也是如此，但可能性很大。

因此，在某些关键领域，4世纪的日耳曼领袖拥有完备的权利。他们可以规定兵役、劳役，还能规定征收的农产品的比例，然后让子民（也许是人口中的不同部分）来尽这些义务。尽管我们现有的资料没怎么记载这样的事，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有权参与解决我们所谓的法律纠纷——当然，是在比较重要的子民遇到法律争议的时候。不管是哪里的哪个领袖，只要他有些能力，就都不会缺少在解决纠纷方面的权威，因此，认为特温吉和阿勒曼尼的领袖也有这种权威，应该不会错。[34]至于这些权利实际上是如何行使的，就我们所知，这两个联盟没有明确的官僚机构。没有资料提及4世纪日耳曼世界的官僚，尽管国王肯定有自己的官员，而国王做出索求的时候，也很少或根本没有通过正式的书面行政体系。4世纪的日耳曼人已经知道多种书写方式。如尼文（Runes）已经开始使用，有些日耳曼人能很好地用拉丁文写作。而到了4世纪中期，出于基督教传教的需要，人们忙于将哥特文转变为书面语言——这是第一个转变成书面语言的日耳曼语言。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读写能力用在了征收和缴纳农产品形式的收入的过程中。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征收是个随意的过程。至于征收是如何不通过书面而常规化进行的，我们可以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行政管理的一些最早证据中找到线索。治理这一7世纪农业经济的方式，是划分出

几个较大的税收区，各个区每年都必须贡献一定数量可用作食物的农产品。该系统要奏效，就需要在一开始做详尽的调查来将农村分区，还需要货物仓储空间，以及用于跟踪交货情况的理货系统，但不需要太多官员，官员也不需要识多少字。实际上，这种从农村经济中获取收入的简单机制在其他不少地方也能见到，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做法超出了特温吉人和阿勒曼尼人的能力。[35]如前所述，阿勒曼尼的领土已被分为几个区（Gaue），财政可能是这些区的职能之一。当然，在阿勒曼尼，存在多个国王，其中许多控制着自己的区。可想而知，这种环境下所有征收都首先由这些区级国王进行，也受他们支配，尽管他们可能不得不将一部分收入上交给某个上位王。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和许多其他中世纪早期的环境中，财政制度的主要目标是食物，而不是其他一些更容易交换的财富形式。学术文献中所说的“王室巡游”（royal itineration）是财政制度运作的核心。国王、国王的主要顾问和专职随并不在一个固定的宫廷里工作，而是定期在王国内巡游，在一些指定的地点驻留。这些驻留点也是收集当地食物的中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基于食物的税制固有的物流问题——食物的体积和重量都很大，货币相比之下就轻便许多。食物山不到国王这边来，国王就到食物山那边去。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4世纪的日耳曼国王进行了巡游，但巡游是获得食物供应的很方便的手段，因此理论上，他们有可能采取这种做法。罗马人不容易预测到他们要打击的阿勒曼尼国王可能在什么地方，这也许说明阿勒曼尼国王有巡游的行为。如果巡游系统存在，一个相关的观察结果显然是会有很多王室中心，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勒曼尼有很多这样的中心。阿勒曼尼的区不超过25个，最多有25个国王，但我们已经发现了62个精英居住地，都是山丘堡垒，而书面资料还提到有其他位于低地的堡垒（但至今未被发现）。[36]

国家与社会

上述经济发展对社会权力在日耳曼人中的扩散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很难全面估计，但可以初步看出两方面明确影响。农业生产集约化，经济的其他部门至少有了一定程度的多样化，因此日耳曼欧洲的总人口肯定在罗马帝国时期显著增加了，但国王和军队从额外产生的财富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而要了解随之而来的社会权力再分配就比较困难了。事实上有一系列证据表明，不应夸大整体变革的程度。文字和考古证据都表明，国王及其随从之外的人在4世纪的日耳曼社会中仍然很重要。

一部分证据描写了日耳曼人的政治行为。正如研究罗马帝国眼中的蛮族的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所说，阿米阿努斯的描述隐隐指出，国王不能随意差遣战士，而必须“敦促”和“说服”他们去遵

守自己的政策。另外，前文谈到的那位阿勒曼尼国王，只因为没有响应克诺多马里斯的号召，就被自己追随者推翻了。阿米阿努斯明确指出，这是他所在区域的“人民”（plebs, populus）行动的结果。这里的“人民”指的可能只是一个由王室随从构成的有限政治世界（虽然阿米阿努斯的用词不是那个意思），但斯特拉斯堡之役涉及的军事政治社群远远超出了这些社会圈子。聚集在那里的阿勒曼尼军队据说有3.5万人，战士人数肯定远远超过1万名。主要国王们的随从只有几百人。阿米阿努斯提到因斯特拉斯堡之役而聚集在一起的有16位国王和王公，就算他们每人有200个随从（尽管大多数国王的随从数量肯定更少，因为克诺多马里斯是他们中间最强大的国王），打仗的随从加起来也只有3 200名。参与军事行动的显然不仅仅是国王和少量专职的随从，参战似乎也不是什么崇高社会地位的象征。从考古发现来看，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死者随葬品数量增加的现象，并不局限于极少数豪华的王公墓葬。除了这些特殊的墓葬，还发现了大量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墓葬，以及相当多有少量个人物品的坟墓，随葬的物品通常是陶器，以及前面提过的某种类型的武器（男性墓葬）和珠宝（女性墓葬）。罗马帝国晚期，武器陪葬的情况显著增加，虽然不是在整个日耳曼尼亚地区都发现了这个情况，但确实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男子的生活中，军事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也呼应了随从兴起的现象。但是，这类墓葬的总数很大，可见除了国王和随从，还有其他人也走上了这条路，以维持或者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37]

6世纪和7世纪的大量法律证据有可能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这些文本或法典由西罗马的继承国编纂，是完整描述日耳曼人统治的社会中社会分类运作方式的最早资料。从文本编纂的年代看，它们反映的都是西罗马崩溃之后日耳曼社会的情况，这些社会已然经过了一个与从前罗马帝国残留的经济、政府和社会制度互动的阶段；因此，显然很难用这些资料来阐明4世纪日耳曼社会的情形。但是（这是普遍的共识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后续的互动只会加剧日耳曼世界原本就有的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因为接管原罗马领土的过程让国王及其直接支持者获得了更多超出平等份额的财富。也就是说，这些后来的法律资料会低估不直接服务于国王的社会群体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当作指引，推测出4世纪日耳曼社会中可能存在的不平等的最大程度。

这些法律资料对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的描述惊人一致。国王自然地位特殊，而为国王服务通常也会提升服务者的地位。此外，这些法典经常提到一个贵族阶级。可以合理地认为，4世纪国王和随从的世界中，也可能有与之类似的群体。但所有的法典（我们确实见到了来自大量继承国的法律条文）都提到了一个地位在贵族之下的自由民（freeman）阶级，自由民仍有相当多的权利和义务。自由民阶级之下，是永久获得自由的被释奴（permanent freedman）和奴隶这两个阶级。自由民通常要服兵役（事

实上许多被释奴也要服兵役，但奴隶不用）；在法律纠纷案件中，自由民的证词可获信赖；他们的地位受到一系列措施的保护，以防止奴隶和被释奴未经许可越界。[38]

19世纪对日耳曼社会的浪漫主义想象夸大了自由民阶级的重要性。例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占男性人口的大多数；而鉴于他们显然拥有特权地位，我敢打赌他们只是少数。享有特权的永远只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一些来自东哥特和伦巴第的不那么充分的证据表示，6世纪携带武器的男性群体中，可能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自由民（奴隶不算在内，因为他们不携带武器）。自由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显然只会更小。但自由民也不是法律书写者臆造出来的。在后罗马时代的西方各地都有自由民，从法律实践方面的证据看，自由民是当地社会重要的行动者，一些关于日耳曼人主导的群体与东罗马交战的叙述中也提到了自由民。[39]如果经历了罗马财富进一步涌入、不平等现象加剧过程的继承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在未曾经历该过程的4世纪日耳曼社会中，自由民的地位极有可能更加重要。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认为，罗马时期的社会分层加剧后，日耳曼社会中重要的社会政治阶层就只剩下一小群国王和随从。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维持着或发展出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特权。他们可能是考古上新发现的一些3—4世纪日耳曼尼亚村庄里宽敞舒适的长屋（longhouse）的主人，也可能是大量虽有随葬品但称不上奢华的墓葬的墓主。

对4世纪日耳曼社会分层的这一描述相当复杂，显然会影响我们要分析的最后一个关键领域——日耳曼政治中约束与共识之间的平衡。

存在某种程度约束的证据很明确。国王有武士随从。通过使用这些随从，他们获得了具有一定世袭性质的地位。这些随从也可以行使更大范围的职能，充当社会执法者，前述特温吉人迫害基督徒时就是这样；当时，迫害政策是违背一般村民的愿望的。[40]前文提到，特温吉的领袖也可以征募军事分遣队，要求分遣队艰难跋涉，参加罗马对波斯的战争。军事国王并不总是在众人共同的拥戴下崛起的，艾斯博尔沼泽发现的武器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但是，国王和随从的权势并没有完全盖过一个人数更多的特权阶级（自由民？），因此至少在有些时候，国王的政策需要考虑到这个在总人口中占比更大的特权阶级，还需要获得他们的广泛支持。我们知道，政策不受欢迎的国王是可能被推翻的。推翻那个不愿加入克诺多马里斯队伍的阿勒曼尼国王的可能是他自己的随从，但更可能是他自己领地中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特温吉旧统治王朝的最后一名成员阿塔纳里克在加强防御工事时被推翻，因为人们反对他提出的打击匈人威胁的方法，反对最终升级为政治分歧。[41]这两个事件凸显了新军事国王的权力所受到的明显限制。

我们无法对这个主题做非常详尽的探索，但从史料中确实能看出一些协调和施加这类限制的机制。首先，我们不应该把自由民和国王随从分得太清楚。有大量证据表明，日耳曼社会是基于年龄群（age sets）运作的，男女都是如此，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明确标志出个人生命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权利和责任。例如，老年人哪怕地位再高，都不会有武器随葬，这说明军事义务有年龄上限。就女性而言，法律证据表明，各个地位群体中社会价值最高的是育龄妇女。同样，青春期之前的儿童的墓葬似乎很少与成年人的墓葬放在一起，这再次暗示年龄和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42]光凭现有资料不足以进行彻底的探索，但应该很有可能的是，至少有一些男性自由民在年轻时照惯例当过国王的武士随从。

自由民农民和国王随从的世界之间可能还有其他联系，但我们对此了解不足。村庄肯定为国王和随从提供了经济支持，而人们想必也会期望国王不仅为直接随从，也为更广泛的自由民阶层举行定期宴会。如果这种宴会始终常规举办，国王和自由民之间就有可能建立起持续到4世纪的互惠关系。而在某些地方，此类行为在后来更不平等的日耳曼人统治的继承国中仍可以见到，因此罗马帝国晚期存在这种行为就更有可能了。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英格兰，人们有时会期望正在巡游的国王用更多的宴请来展示“国王到此”带来的好处，以回报提供食物的村民；这样的宴会为许多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交流提供了场合。如果只看规模，阿勒曼尼的各个区域都很小，各区的国王基本不可能与其他人隔绝，我认为宴会和类似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很可能长期以来都是日耳曼世界的一个特征，因为在很多类似的环境中都找到了这样的活动。[43]

集会可能也对限制国王权力起了重要作用。罗马帝国早期的日耳曼政治单元一般通过会议来运作。会议上，人们就群体的政策辩论并做出决策。塔西佗的作品非常强调这个机构，而它显然不仅仅是他一直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我注意到，现有的1世纪和2世纪的记录十分零碎，但记下了多个不同场合发生的事件，说明当时有如下情况：作为对某次造反的惩罚，或者是为了防止造反，集会要么被罗马当局禁止，要么只能在有罗马观察员在场时举行。4世纪的证据并没有说明这种集会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了下去，但当时肯定有村民集会；特温吉人376年到罗马帝国寻求庇护的决定，应该是在一次有社会地位重要的人出席的大规模集会上，经过长时间辩论后做出的。继承国法典设计的争端解决程序也说明，出于法律目的，定期集会是必要的。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4世纪的各个联盟内部一直存在一种集会结构，作为进一步限制国王专断权力的手段。[44]

也没有证据表明日耳曼国王能推广足以确立其统治权的意识形态。比方说，有的人认为，国王们会给自己加上神圣的光环，表明自己的部落独得神灵恩宠，使他人很难挑战自己的王权；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几乎没有证

据支撑。日耳曼语中描述“国王”的3个主要单词中没有哪个是有神圣意涵的。前文提过的那几个词的含义都非常务实，分别是“人民的统治者”、“战队的统治者”和“联盟的统治者”。日耳曼国王肯定利用了受神恩宠的概念，也就是heilag，它在不同的日耳曼语言中有派生词，但它是一种事后（post de facto）的概念，要通过实践才能确立。如果你赢得了战斗并因此获得了权力，那么你就能证明自己是神圣（heilag）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称神圣就能自动获得权力或防止其他人挑战你的权威——被挑战者往往面临毁灭性的结果，正如叙事证据一再表明的那样。而篡位者只要成功，就能证明自己是神圣的。

强调某个王朝进行神授统治的例子倒是有一个，可以在狄奥多里克（Theoderic）的宫廷宣传中找到。他是6世纪早期意大利东哥特人阿马立王朝（Amal）的领袖，他统治的国家属于西罗马的第一代继承国。对狄奥多里克王朝的这种看法直接写在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的《信札》（*Variae*）中，间接反映在约达尼斯（Jordanes）的《哥特史》（*Getica*）中。但如果将这种宣称与阿马立王朝的实际历史对比，就能得到很有启发意义的结果。直到差不多狄奥多里克之前的那一代，阿马立家族才在哥特世界中掌握了大权（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细介绍），而狄奥多里克去世后，没有合适男性继承人的阿马立王朝很快就解体了。狄奥多里克用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特别是对意大利的征服——证明自己是神圣的，但这不足以保护王朝免受不称职继承人的影响。狄奥多里克为确保他未成年的孙子继承王位而做的宣传，也仅仅是宣传而已。[45]

有关年龄群、宴请义务、会议和有限王权意识形态的证据都非常零碎，只能让我们看到日耳曼人实际政治生活的一点皮毛。然而，主旨是很明确的。尽管新的精英利用罗马时期的经济发展来提升社会地位，并至少在日耳曼欧洲的某些地区为4世纪时更大、更稳定的政治单元做了铺垫，但我们不能夸大他们的权力。在国王和随从的圈子之外，一个范围更广的社会群体仍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非常重要，并且必然会参与政治进程。尤其是，这个群体的人数大大超过国王随从，因此如果要采取大型军事行动，就必须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无论如何，如我们所见，自由民和武士随从可能已经有了种种关联。

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说，要创建罗马帝国晚期那种规模更大的新联盟，就需要获得这个范围更广的社会群体的某种同意。阿米阿努斯的作品里有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阿勒曼尼国王试图在斯特拉斯堡之役前与联盟保持距离，结果招致了死亡。并不是所有1世纪的旧政治联盟都在3—4世纪新联盟创建的过程中被摧毁，这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我们只有关于法兰克人的明确证据。罗马帝国后期的资料表明，一些旧的政治单元（具体说是卡狄、巴达威、卜茹克特累和安普希瓦力）被纳入了法兰克联盟。显然，这

个过程肯定不是旧单元投票加入新的区域联盟那么简单，因为也出现了新的单元，比如阿米阿努斯提过的萨利（Salii）；但该过程也不是完全没有延续性。[46]

从比较文献的角度来看，4世纪的联盟介于“早期国家”和“复杂酋长国”之间。根据通常的标准，这些联盟太大、太稳定，社会分化程度太高，不能被归类为“部落”或“简单酋长国”。仔细看的话，早期国家和复杂酋长国之间的差异基本只是程度上的，前者的组织性、稳定性和权力等略强一些。有关4世纪联盟的证据很少，难以做出更精确的判断，而从仅有的那些证据中，有时还能得出彼此矛盾的结论。例如，从治理能力和所建立的王朝权力（特别是在特温吉人中间）看，这些联盟很像国家，但它们缺乏专门的王室官员，也没有证据表明相对广泛的社会精英群体（自由民？）保留了下来，从这些方面看，联盟更接近复杂的酋长国。但我们不必执着于这个问题。重要的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给日耳曼社会（至少在其最接近罗马边境的部分地区）带来了一种新的联合因素，使其能够召集成千上万的人去行使某些职能。从政治上看，这些新结构建立在旧结构的基础上，有的纳入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社会单元，但它们的力量和稳固性表明，其与旧时代的日耳曼极为不同。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是什么启动了支撑起联盟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到底是如何带来新的政治结构的？

和罗马的关系

公元30年左右，罗马商人加吉里乌斯·塞肯得斯（Gargilius Secundus）从一个名叫斯泰鲁斯（Stelus）的男子手中买了一头奶牛。斯泰鲁斯不是罗马人，住在莱茵河对面如今的荷兰小镇弗拉讷克（Franeker）附近。这笔交易花费了115银努米（nummi），并由两位罗马百夫长见证，记录恰好留存了下来。一位现代的评论者认为这笔交易很“平凡”，确实如此：它规模小，无足轻重。这样的交易在罗马的欧洲边境肯定发生过上千次。这么认为的理由很简单。大量的罗马士兵驻扎在帝国边境，尤其是在帝国早期，但后期也是如此。他们就代表着巨大的经济需求。1世纪，仅在莱茵河北部地区的卡纳内菲特人（Cananifates）地盘上，就驻扎有大约2.2万名罗马士兵（包括军团士兵和辅助部队人员），而本地的卡纳内菲特人只有1.4万名左右。后者不可能满足罗马士兵对食品、饲料和天然材料（如建筑和烹饪用的木材，以及皮革）的需求。一个军团有5 000人，每天需要大约7 500千克的谷物和450千克的饲料，一个月下来就是225吨谷物和13.5吨饲料。士兵所需有一部分是由帝国中心直接提供的，但这样很麻烦，还有物流方面的问题。帝国当局更愿意支付现金，让当地供应商去满足部队的要求。[47]

贸易和控制

因此，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帝国边境地区都对各种初级农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有充分理由认为非罗马的供应商在满足这一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世纪，情况仍然如此，在这方面，阿米阿努斯作品中描写阿勒曼尼人的章节依然值得注意。在斯特拉斯堡取得胜利之后，皇帝尤利安可以对落败的阿勒曼尼诸王提出任何要求。条约的细节不尽相同，但都要求获得食品、建筑用木料等原材料，以及重建工程所需的运输车和劳动力。获胜的尤利安想得到这些物资，只要征用就行了，但即使在不太有利的情况下，罗马军队也需要这些物资，这种时候就要付钱了。无论付不付钱，对周边的日耳曼人来说，罗马军队始终是经济需求的来源。

尤利安的条约中提到的所有物品都无法通过考古发现。日耳曼人种植的小麦、砍伐的木材、加工的皮革、建造的建筑，这些痕迹都找不到，因为它们无法留存到今天。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间接体现在了（前文提过的）罗马时期日耳曼欧洲农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中。多出来的食物中有一部分被新兴的国王和随从消耗了，还有一部分由日耳曼尼亚不断增加的人口消耗，但罗马军队是促进生产的进一步（或许也是最初的）刺激。首先，罗马人到达日耳曼边境并提出要求的时间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时间重合。最早有新村庄（如费德森丘和威斯特）出现的地区，都可以相对容易地将农产品通过水路运到莱茵河河口，然后顺流而上送至沿河的军事驻地。正如最近的文献正确强调的那样，也正如所有罗马边境地区的情况表明的那样，边境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接触区，而不像我们可能一开始以为的那样，是隔开帝国和它周边邻居的分界线。[48]

就日耳曼而言，罗马不仅是额外经济需求的来源，而且也是使农业集约化成为可能的一些想法和技术的来源。在威斯特和费德森丘，产量提高似乎是由于人们更加系统地整合了耕作农业和畜牧农业，使用动物粪便来维持田地的肥力。更一般地说，它涉及更复杂的耕作技术和设备的使用。这些想法在何处传播以及如何传播仍有待研究，但早在这些技术传播到日耳曼之前，罗马欧洲和拉坦诺欧洲（La Tène，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世纪吞并了该文化的大部分领地——见第一章）就广泛使用更有效的犁和整合度更高的综合农作制了，这些技术可能激发了日耳曼农业革命。

罗马世界也需要日耳曼尼亚生产的其他商品。从偶尔出现的外来词中可以看出几种产品，文献中也有提及。用于填充枕头的鹅毛和某几种红色染发剂就是其中两种产品。但比它们重要得多的是另外两种，可能是三种（算上不太确定的铁的话）原料。没有具体证据表明有大量生铁从日耳曼欧洲南部和西部边境运输到罗马世界。但是波兰两个主要生产点产出的铁远远超过当地需要的用量。也许，这些铁只是在日耳曼世界中流通，但加工它

们以满足罗马的需求也完全可以想象。其他两种重要材料则肯定会从日耳曼世界输入。第一种是琥珀，这种硬化的树脂附在原本沉在水里的树上，和树一起被冲到波罗的海的海岸上。表示“琥珀”的词是拉丁文从日耳曼语借来的少数外来词之一。我们知道罗马人对这种产品很有兴趣，喜欢用琥珀来制造珠宝。在尼禄（Nero）时代，元老院甚至派了一个使团，去北方调查琥珀的起源。从波罗的海开始的贸易路线有两条。主要的一条路线是一路向南直达多瑙河中游位于卡农图姆（Carnuntum）的军事要塞，另一条路线经喀尔巴阡山东麓抵达黑海的港口（地图2）。这些路线是罗马作家熟知的。[49]

尽管现有史料较少提到对日耳曼人力的需求，但它至少与对琥珀的需求同样重要。有两种主要形式的人力需求。首先，罗马军队总是需要招募新兵。所谓罗马军队的蛮族化曾被认为是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观点充其量是部分错误的。从奥古斯都时代起，至少一半的军队，也就是所有的辅助部队，士兵不是罗马人，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从日耳曼世界招募来的。帝国末期，军事单元的分类发生了变化，公民组成的军团和非公民组成的辅助部队之间的区别部分消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4世纪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人比例比从前更高，或军队因有日耳曼人而不再那么可靠——无论如何，一般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军团的招募人员可能有一段时间无视了只应招募公民的要求。因此，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对日耳曼兵员的需求都很大，从许多碑文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我们从叙事资料中知道，招募的日耳曼士兵分两种。有些人自愿参军，希望在罗马军队中走上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职业道路。但许多人只是因为别无选择。对此，阿米阿努斯也说得很明确。他记录下的帝国与不同蛮族群体间和平条约中，大部分都有强制征兵的条款。打了败仗之后，你不仅需要提供劳动力和食品以求重获帝国的青睐，还必须让一部分年轻人去罗马军队中服役。[50]

日耳曼尼亚的人力还以另一种形式进入帝国：奴隶。对于罗马时代奴隶贸易的运作情况，我们并没有记述详细的史料可用，现有史料比不上阿拉伯作家对阿拉伯帝国9—10世纪奴隶贸易的记述（第十章）。因此，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奴隶贩子都有谁，他们通常在什么地方购买奴隶，也不知道后来日耳曼尼亚是不是有大的奴隶市场，用于将奴隶卖给中间商或者直接卖给罗马商人。但是，奴隶贸易在罗马时代一直都有，其重要性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日耳曼语中有一系列术语派生自拉丁文mango，后成为表示交易和商人的基本词干。但拉丁文中的mango不是指一般的商人，而是特指奴隶贩子。因此，欧洲那些说日耳曼语的人最先遇到，或许也是最常遇到的罗马商人应该就是这些人口贩子。[51]

总的来说，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公元元年前后，罗马帝国的欧洲边界向北扩张，突然给日耳曼世界带来了和富裕得多的罗马帝国做生意的机会，

这大大刺激了日耳曼尼亚的经济，使其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里获得显著发展。根据恺撒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说法，当时的日耳曼人对和罗马商人做生意没什么兴趣，他们允许罗马人进入自己的地盘，只是希望罗马人把战利品卖给他们。如果这是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实际情形，那么事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到1世纪末，莱茵河边境的贸易已经普遍到了河东的日耳曼部落用罗马第纳里（denarii）来交易的地步。事实上，在日耳曼发现的大部分罗马时代的银（比如精致的银扣针），可能是把这种罗马银币熔了以后得来的，而很多这种钱币在4世纪时仍在流通。虽然不是每个边境群体与帝国的贸易关系都密切到要用罗马钱币（我们稍后再谈为何如此），但在帝国存续期间，这样的情况肯定时常出现。使用罗马钱币的现象通常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相当靠近边境的地区在某个阶段集中了较大数量的低价值罗马硬币。比如4世纪时莱茵河东面一些古老的罗马道路附近的地区，这些道路当时还属于阿格里-戴可美特（Agri Decumates）这个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间的三角形区域，由阿勒曼尼人控制；又比如多瑙河更往东一些，与罗马行省上默西亚（Moesia Superior）接壤的区域。[52]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整个罗马时期，帝国的近邻都希望获得与帝国商人交易的特权，此类特权罗马通常严格控制。即使在4世纪的哥特特温吉人想切断与帝国的大部分联系的时候，最终达成的协议里还是规定了两个贸易中心将继续运作。大量考古证据证实了文字资料给人的印象。对1—4世纪日耳曼遗址进行的主要考古发掘大多发现了各类罗马物品。

这些发现有明显的年代模式和地理模式。比方说，在日耳曼尼亚境内众多离边界线很近的地区（最远的距防线100千米），发现了大量1—2世纪的罗马货物，这些货物出现在定居点中，也被陪葬在墓中。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罗马钱币外，还出土了大量精美陶器（terra sigillata）、青铜饰品和玻璃。再比方说，在韦斯特里希（Westrich）遗址的1—2世纪断层，挖掘出来的陶器和金属制品中有三分之一是罗马制造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不过，这种模式虽然在某些地方很常见，但并不适用于莱茵河和威悉河（Weser）之间的莱茵河北部边境地区，此地这个时间段的罗马物品不那么丰富。离开紧邻边界的地区来到易北河区域，模式又略有不同。这里有大量的罗马货物，但往往集中在特定区域。例如，位于现在图林根州的萨勒河（River Saale）区域集中了数量惊人的罗马货物。在波希米亚（今捷克共和国的中心地带）的易北河上游支流，以及易北河下游、威悉河中下游（都位于现在的下萨克森州）附近发现了其他的集中地。另一个确定的集中地在北海沿岸。在离边境更远的地方，罗马物品的量比较小，但仍有一些可识别的集中地，如波兰南部的雅库索维斯（Jakuszowice），斯堪的纳维亚的古默/伦德堡（Gudme/Lundeborg）村落群，以及丹麦东部。[53]笼统地说，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在公元元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

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是购买大量有吸引力的罗马进口产品。但是，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集中地呢？

部分答案在于物流。一车小麦每运输50罗马里，价格就要翻一番，可见前现代时期的陆路运输是多么困难和昂贵。因此，陶器、青铜器和玻璃等价值相对低的物品只能运往比较近的地方，除非有水运或者其他降低费用的手段。于是，只在与边境直接接触的区域出土了罗马物品也就不奇怪了。运输也可以解释一些更特殊的现象。可以走水路运输，很可能是费德森丘这样比较远的地方能参与供应边境罗马军队的原因，而从钱币的分布看，阿格里-戴可美特的古罗马道路网也许仍对4世纪的贸易有促进作用，即使在该区域落入阿勒曼尼人之手以后。但是，物流不能解释一切。

另一方面的解释涉及日耳曼世界具体的贸易机制，以及交换而来的罗马商品在日耳曼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恺撒所写的属实，那么最初是有一些日耳曼人抵制同帝国进行贸易的。但这种抵制情绪很快就被完全化解了，拥有罗马商品反而与高贵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了一起。分析较奢华墓葬中发现的物品类型可知，从1世纪后期开始，下面3种东西经常同时出现在奢华墓葬里：大量当地制造的日常物品、显然很昂贵的当地制品（如武器和珠宝），以及从罗马进口的物品。可见，从罗马进口的商品很快成为展示卓越社会地位的必备之物。这并不奇怪。罗马进口品具有异国情调，必须通过向罗马商人支付什么东西才能获得，因此，这些东西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优越感。这也是我们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的另一个方面。与当今的全球化一样，并不是人人都从古代日耳曼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了同等的好处，获利的主要是国王及其随从；因此可想而知，他们手里的罗马进口产品肯定更多。

这一点值得深思。虽然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没什么特别，但它揭示了新交换网络运作方式的重要方面。稍微想一想就能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明国王及其随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利润加以组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国王拥有军事力量，因此能从新产生的农业剩余产品中抽取一部分。然后，国王不仅可以用它们来供养随从，还能将其用于交换，从罗马世界获得贵金属钱币、葡萄酒和橄榄油，或者他们想要的任何其他东西。

如果要确保获取其他新贸易形式中的大部分利润，军事力量也至关重要。想想奴隶贸易吧。没有人自愿当奴隶。得有人在日耳曼社会中将他们聚集起来并卖给罗马商人，这个过程不可能和平。顺便提一下，奴隶贸易也可能是艾斯博尔沼泽那些随从被杀的背景。如果他们从事奴隶贸易，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这么有系统地在他们身上发泄愤怒了。即使是琥珀贸易，也不是那种可以靠在波罗的海岸边徘徊，捡起夜晚被冲上岸来的琥珀就完成的温和过程。近年来，波兰北部最令人吃惊的发现之一是一系列

长达数千米的木质堤道，这些堤道在波罗的海附近的沼泽地区连成了一个道路网络。碳14和年轮学证明，这些是在公元元年前后铺成的，在之后的200年中也经常得到维护。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这些堤道是为琥珀路线的北端服务的。但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换句话说，这一定对修堤道的人来说非常值得，才会让他们如此费心费力。作为努力的回报，他们想必以某种过路费的形式分得了不少贸易利润。值得注意的是，日耳曼语中表示“过路费”的词是一个来自拉丁语的外来词，这说明在帝国成为他们的近邻之前，日耳曼人并没有这个概念。当然，如果能从贸易中分得这么大一份利润，其他人也一定会想参与修建堤道的活动。在这方面，军事力量也很重要。靠着军事力量，你可以强迫那些地位较低的人去建造和维护堤道，也可以防止其他武装团体接管这个显然很不错的小小收入来源。[54]

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鼓吹“涓滴效应”（trickle-down theory），与这种陈词滥调的主张相反，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好事，至少不是当然的好事。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社会财富的增加引发了激烈的争夺，有时还涉及严重的暴力，因为很多人都想获得对这些财富的超比例控制权。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区，不利影响也许不那么严重。众所周知，很难对农产品征税，而且不管怎么说，想要更高的产出，就需要充足的劳动力——至少耕作农业是这样，因此，国王和战队（其中一些人可能是从富裕的农民中招募的）也许不会提出太苛刻的要求。然而，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对处在弱势的人来说非常糟糕：奴隶显然是受经济发展之害的人，不过我还想到了铁矿，因为至少在罗马世界，被定罪流放到矿山无异于极刑。即使对社会顶层的人来说，控制新财富的斗争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艾斯博尔沼泽是北欧沼泽地中的30多个武器堆积地之一，大部分武器是在公元200—400年间被放入的——可想而知，日耳曼世界围绕新财富产生的暴力有多严重。此外，没有理由认为只有碰巧有可以用来处置战败者的沼泽和湖泊的地区发生了斗争。塔西佗提到一个1世纪的献祭仪式，需要将死者和他们的武器吊在树上，而如此放置的武器是没法保存下来，然后被考古学家发现的。我倾向于认为，表明暴力竞争存在的直接证据之所以限于北海周边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的日耳曼人因近水而特别好斗，而是因为相关证据偶然保存了下来。[55]

在试图了解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日耳曼社会的转变时，探讨其与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并不是什么新想法。但是，有理由相信，贸易本身并不构成足以带来这种转变的机制，毕竟并不是各地都有大量的罗马货物。但如果我们不仅考虑新的财富流本身，还将后续争夺财富控制权的斗争考虑在内，此类贸易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就会更有说服力。真正起到变革作用的是这种连锁效应，而不仅仅是新财富的存在。日耳曼世界的各个群体争夺对利润的控制权，对新出现的财富做出了动态反应，促进了它们所在世界社会

政治结构的重塑。

讨论中的这一额外方面与后殖民研究领域中被贴上“能动性”（agency）这一通用标签的论点颇为相似。要点在于，从前的分析（“殖民”分析而不是“后殖民”分析）过于消极地看待较发达社会对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的影响。“能动性”理论（对究竟什么是“能动性”，学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的基本观点是，在面对外部刺激时，土著群体会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按照自己的优先级，抓住某些（而不是另一些）可能性。就我们讨论的主题而言，与罗马接触而产生的经济机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而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抓住了这些机会。一些群体学会了扩大农业生产，一些出口铁或琥珀，还有一些群体开展起奴隶贸易。随之而来的是不平等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为4世纪更大的政治联盟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也反映在考古所见罗马商品的零散分布中。在直到易北河的中间区域中出现的那些罗马物品集聚处应该是日耳曼群体建的，这些群体能够支配从罗马帝国流出的某些新财富，并用这些财富来购买考古学家发现的那些物品。例如，9—10世纪时奴隶贸易的受益者，在考古学上可以通过其交易的成果辨认出来，历史文本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但罗马时代不是这样）。因此，将同样的原则应用在罗马帝国周围的日耳曼人身上也是合理的。[56]但在我看来，即使算上当地人对新财富做出的动态反应，也远远不足以概括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世界转型中起到的作用。为此，我们还需要探索帝国是如何保持其边境的长期稳定的。

管理附属国的艺术

1967年，人们在靠近古罗马城市纳美顿［Civitas Nemetum，如今的施派尔（Speyer）］的莱茵河流域挖砾石的时候，发现了从一幢罗马别墅中劫掠而来的战利品。接下来16年的仔细挖掘为我们重构了整个故事。之所以在那里有这些发现，是因为在3世纪末，一些阿勒曼尼袭击者试图将他们的战利品运回莱茵河对岸，但他们的船被罗马巡逻船伏击并击沉。罗马巡逻船被称为lusoriae，是轻型的桨式战舰，船上有撞角，船员装备精良。边境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但袭击者试图带回家的东西很不寻常。他们居然带着重达700千克的战利品，装在三四辆推车里，准备用筏运到莱茵河东岸。经过仔细检查，人们发现这些战利品可能是一整幢罗马别墅中的全部物品。袭击者对他们能找到的每件金属制品都感兴趣。这批战利品中只缺了昂贵而结实的银器和高价值的个人珠宝。要么房屋的男女主人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带着细软逃离，要么这些高价值的战利品是另外运送的。但在推车中，有数量可观的银餐盘、整套厨房设备（包括51口锅、25个盆碗和20个铁勺）、大量的农具（从修枝镰到铁砧的各种东西，多到足以经营一个大型农场）、别墅神龛里的一些祭品，还有39枚质量很好的银币。[57]

这批非比寻常的物品的性质清楚表明，帝国在处理边境关系时要面对棘手的问题。蛮族袭击者对金银感兴趣，这个我们都能想到。多年来，在不少罗马时代的贮藏处都发现了掠夺来的昂贵物品。但是，蛮族想要的远不只有这些。由于日耳曼世界的经济发展远不如罗马世界，前述所有物品袭击者都能用得上，他们也可以将其出售给他人——阿勒曼尼农民、主妇，甚至可以卖给阿勒曼尼匠人进行再加工。这可能是出土物品中最能体现一般袭击者劫掠目标的一批了。而历史资料清楚表明，劫掠（通常规模小于这次对别墅进行的惊人扫荡）在罗马边境无处不在。

在1世纪的不同时间，各个军团的推进大致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停了下来，但这并不意味可以对边境之外的土地放任自流。出现越境袭击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的地区相邻自然会有的现象。帝国也没有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突然从攻击转为防守。边境安全需要更加积极主动的反应。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帝国在欧洲边境地区保持着总体军事优势，并以侵略性的外交作为辅助。这些政策有效地将那些最近的邻国转变成了附属国。[58]

罗马帝国在存续期间使用的方法一直变化不大，也对日耳曼世界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阿米阿努斯记下了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对358—359年多瑙河中游出现的问题的反应，这是4世纪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和他之前的皇帝一样，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跨出的第一步是建立军事优势。春分刚过，趁敌方认为自己仍然安全，他在多瑙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出其不意地攻击萨尔马提亚人。战况惨烈：

> 好多人怕得挪不动步子，被纷纷砍倒；那些跑得够快得以逃生的人，只能藏在阴暗的山谷中，看着他们的国家毁于刀剑。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军事行动很快打击到了邻近的夸迪人（Quadi）和该地区所有其他的边境群体。然后，皇帝利用这种军事优势来敲定他希望能延续下去的外交协议。这些群体及其领袖一个接一个前来（或者被迫前来）听候皇帝的裁决。

并非所有群体都得到同样的对待。皇帝对其中一些还是比较优待的。萨尔马提亚王公齐扎斯（Zizais）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

> 一见到皇帝，他就将武器扔到一边，整个人趴到地上，仿佛一具死尸。他在应该提出恳求的时候，因恐惧而无法发声，这激起了更大的同情；不过，经过多次尝试，他抽泣着说出了一点请求。

蛮族应该对罗马的神授权威表示服从，齐扎斯很清楚这一点，罗马钱币和纪念碑上的蛮族画像强调的也是如此。所描绘的蛮族总是顺从地躺在画面的底部，通常是在皇帝脚下。这位萨尔马提亚人很可能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采取那种做法，也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决定恢复齐扎斯的追随者的政治独立（他们在不平等的联盟中是下级伙伴的角色），将这位王公升格为独立的国王。事实上，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当时最关注的是，如何按照最符合罗马利益的方式，重新安排在边境这一地区运作的政治联盟系统。也就是说，要瓦解会对罗马产生威胁的过大联盟。齐扎斯得到的东西，其他人失去了。夸迪人的国王阿拉哈利乌斯（Araharius）虽然抗议，但仍失去了下位王萨尔马提亚国王乌萨法（Usafer）对他的服从，后者像齐扎斯一样恢复了独立地位。有时，罗马的干涉要暴力得多。在阿米阿努斯的叙述所涵盖的24年中，罗马有3次采用了另一种策略：皇帝邀请可能造成问题的边境国王用晚餐，然后把他们要么杀掉，要么绑架起来。[59]

除政治重组外，罗马还推行了多种措施，确保帝国刚刚付出的军事努力获得经济回报，再加上一些约束，保证在军团撤离后新的协议能得到实施。有些是标准的措施，比如从臣服于皇帝的群体中抽调年轻男子进入军队服役。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日耳曼年轻人在罗马帝国存续期间进入罗马军队的几种方式之一。帝国还要求各个群体交出人质，人质通常是地位很高的年轻人。人质在罗马帝国其实并没有被视为囚犯，但有的人质在协议破裂时会被处决。罗马俘虏也都被送回帝国。在其他方面，协议的细节有所不同。取决于皇帝认为一开始造成麻烦的各个群体应该负多少责任，有的群体会被要求提供劳动力、原材料和食物，有的群体则会被授予有特权的贸易地位。此外，外交补贴是罗马的常用外交武器。过去的一些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给蛮族领袖钱是罗马后期军事衰弱的标志。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称这种补贴为“海外援助”。罗马帝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外交补贴的做法，即使是在罗马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例如，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击败阿勒曼尼人以后，还给被打败的国王发放年度补贴。原因很简单：补贴能帮助刚刚与罗马达成协议的国王巩固地位。这么看来，补贴是很好的投资。[60]

除了所有这些外交细节之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干预体现了另一层关注。出于两个原因，帝国不希望离边境最近的腹地变得过于拥挤。首先，这将意味着太多群体有机会袭击罗马领土。其次，种种上位王、下位王关系的建立和重组表明，边境群体之间政治竞争不断，一旦有更多的群体参与这场游戏，它们的地位之争就可能演变成在罗马土地上实施的暴力。有鉴于此，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他的顾问最终决定，在新的协议中加入一个关键内容，就是让萨尔马提亚群体利米刚特（Limigantes，也是一个联盟）离开最靠近罗马的边境地区。这不是利米刚特人的意愿，因此需要进

一步的军事恐吓，罗马也这么做了。利米刚特的两个子群体阿米森斯（Amicenses）和皮肯斯（Picenses）遭到了残暴对待，其他人屈服了，同意离开。这一地区看上去正走向和平，但并非如此。一年后的359年，一些利米刚特人回来了，说他们更愿意进入帝国，成为纳税的进贡国，而不是继续生活在指定给他们的远离边境的土地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费解。阿米阿努斯将一切归咎于利米刚特人的背信弃义。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萨尔马提亚人获准越河进入帝国疆域，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则带着他的军队回到了该地区。然后，在关键时刻出了问题。萨尔马提亚人没有投降，反而袭击了皇帝——阿米阿努斯是这么说的，而罗马人的回应是：

> 我们的军队急切地冲向前去，渴望着……在奸诈的敌人身上发泄愤怒。他们一路砍杀，从活着的、垂死的和已死的敌人身上践踏过去，毫不怜悯；他们的双手还未浸润屠杀野蛮人的鲜血，敌人的尸体就已堆积成山。

利米刚特人也许确实背信弃义，或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想要明确表示，自己的命令必须得到遵守——或者，同样可能的是，悲剧是由不信任和混乱造成的。但在历史上，罗马帝国有时的确会吸纳帝国之外的人口群体，这是一种边境管理的技术。帝国后续可以获得的收益（新的纳税人、潜在的兵员等）肯定在考虑范围之内，但这种做法也有防止因边境过于拥挤而形成威胁的作用。[61]

这套方法应用得非常普遍。偶尔的重大军事干预使确立区域范围内的外交协议成为可能。这种协议会打破有威胁的联盟，找出朋友并给予奖励，同时惩罚敌人。为确保新协议不仅仅在短期内被遵守，罗马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惩罚性军事行动和收押人质来造成恐慌，另一方面则用海外援助和贸易特权来给某些群体一些甜头。这些方法很有效，但肯定不完美。方法有多成功（从罗马角度看），可以用外交协议的预期有效时间来衡量。据我估算，4世纪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每次重大军事干预后产生的外交协议，平均持续时间为20—25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相对于投入的军事力量，这样的回报可能是公平的，也是能合理预期到的。然而，重要的是明白，维持整个系统的是偶尔但果断的罗马军事行动。边境群体是罗马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但条款和条件并不是双方自由协商决定的。罗马一直使用武力维持自己的优势。

罗马的外交方法本身很吸引人，也有相应的学术文献。它们推动了日耳曼社会的转型。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远离罗马边境

的人口在这个故事中有活跃的能动性。罗马外交当然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直接影响，但这不是全部。整个4世纪，日耳曼境内的群体和个人以各种方式回应罗马的种种对外政策，这种反应与帝国一开始的干预同样重要。

多年来，罗马外交中一个方面所具有的变革潜力得到了相应的重视，那就是年度补贴。补贴不仅可以是现金或金条，也可以是高价值的罗马商品，如精美的珠宝或华丽的布料。拜占庭时代，有时会用目标经济区无法获得的食品来当补贴，在之前的时代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前面提过，补贴的目的是增强某个比较听话的边境国王的力量，使他认识到维持边境和平对他有利。补贴往往会增强现有的王权。但有必要认识到，与琥珀和奴隶贸易一样，外交补贴对日耳曼世界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新财富。而和贸易利润的情形一样，新财富的出现引发了潜在接受者之间的竞争。失去补贴可能是利米刚特人不愿远离边境的一个原因，也是从（罗马人眼中的）上位国被降格为下位国的额外不利后果。当然，年度补贴缩水或档次降低都可能导致危机，瓦伦提尼安一世364年单方面减少给阿勒曼尼人的补贴就带来了危机。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有的群体进入边境地区，正是为了取代当前接受补贴的那个群体，自己获得补贴。因此，对补贴控制权的争夺放大了补贴带来变革的效力。这也意味着罗马有时只能把补贴赠予它无力控制的斗争中胜出的一方。[62]

但补贴只是罗马外交战略的一部分，战略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例子是定期的军事干涉。在4世纪，平均下来基本每一代人的时间里都要在边境的各段进行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干涉的形式通常是烧毁可以找到的一切，直到当地国王进入帝国领地表示臣服，然后就可以采取外交手段，重新分配补贴了。这种焦土式干涉造成的经济影响值得仔细研究。当然，我们没有来自4世纪的确切信息，但中世纪遭受类似恐怖侵害的地区的资产记录是个值得注意的类比。例如，约克大主教的土地在14世纪遭到苏格兰人的越境袭击，其记录表明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税收水平（税收收入能比较好地反映“产出”）。这是因为袭击者除了劫掠很容易替代的可移动物品外，还瞄准了农业资本项目，比如非常昂贵的耕畜（中世纪的耕畜相当于现在的拖拉机），更不用说住房和其他大件物品了。重建所有这些的成本很高，收入减少持续了20年以上。

如果在看待罗马边境策略模式时也把这种经济效应考虑在内，就会发现，特别是在冲突相当普遍的时期和地区，生活在罗马帝国周围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这一点从考古记录里也可以看出。例如，罗马帝国早期，一些边境地区的罗马输入品很丰富，但莱茵河-威悉河地区却是一个例外。在那里发现的罗马输入品很少，而直到2世纪后期，定居点的人口密度都不怎么高。这反映了该地区众多群体和帝国之间的敌意。莱茵河-威悉河是克鲁西人的核心区域，也是阿米尼乌斯叛军的心脏地带——这些叛军在公元9年

的条顿堡森林会战中击溃了瓦卢斯的军团。5世纪，西罗马其他地方的经济每况愈下的时候，有经济扩张迹象的一个西方地区似乎是阿勒曼尼人的领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那里的森林被砍伐，农业和定居点有所扩张，可见人口也出现了扩张。在我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西罗马权力衰弱，无法每过一代人就烧毁阿勒曼尼村庄一次，也不再定期窃取后者的剩余农产品。还是在5世纪，阿勒曼尼人之间明显的政治统一趋势达到了顶峰，最终出现了单一的、不受挑战的国王。前文提过，罗马对抗这种趋势的干涉手段是定期消灭新出现的主导人物，但罗马的干涉已不再有效，因此出现上述情况并不奇怪。[63]

我们也应该从阿勒曼尼（或边境附属国整体）的角度来考虑罗马外交策略的前述方面和其他方面。经常破坏村庄只会引起仇恨，阿米阿努斯也经常提到边境另一边对罗马的不满。事实上，即使是罗马干涉中不那么暴力的方面也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而输家肯定满怀怨恨。齐扎斯很擅长的那种在公开仪式上的卑躬屈膝，对需要这样向罗马表示臣服的人来说肯定算不上愉快。虽说齐扎斯获得政治独立的地位也许会很高兴，但他从前的上位王失去了对齐扎斯追随者的原有权力，只会非常恼火。阿米阿努斯还提到了一位从前的上位王阿拉哈利乌斯，他失去臣民后很愤怒。此外，帝国偶尔也会决定，不让某些蛮族群体（比如利米刚特）在早已立足的地方继续生活，而且我们也知道，帝国乐于使用恐吓来执行这样的决定。这只是阿米阿努斯笔下罗马人采取的一系列高压行动之一。例如，前面提到，瓦伦提尼安一世自己单方面改变了协议，未经协商就降低了赠予阿勒曼尼领袖的年度礼物的价值，他还在之前商定不可修建防御工事的地方建了工事。资料中还有一些暗示，表明皇帝为了保证人们足够服从，会随意改变自己在某个地区的“青睐盟友”。最狠的是，皇帝们乐于指示他人去消灭那些构成太大威胁的边境国王。从这些做法中，可以清楚看出罗马边境管理的情况：焚烧邻近村庄，加上一系列进攻性的外交策略——其中不乏暗杀。

如果你从非罗马人的角度看待所有这一切，那么显然就要将罗马的压迫性统治考虑在内。在历史叙述中，许多被统治者的怨恨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在最低层次上，边境群体显然很愿意从事小规模和大规模盗窃。越境袭击是常有的事，当然也代表了另一种从罗马流出、会引发争夺的新财富，而对这一财富的控制可能改变日耳曼世界的政治。怨恨更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不少后来建立王朝的族群都想发动更大规模的叛乱，比如1世纪的阿米尼乌斯（直接起因是税收要求），以及4世纪的克诺多马里斯——前文提过，人民的情绪如此高涨，当时在任的国王冈德马杜斯因为拒绝参与行动而被赶下了台。

因此，在试图理解这一时期日耳曼社会的转型时，罗马粗暴的军事和外交侵略带来的延续4个世纪的敌意是要考虑的一大因素。

对于罗马时期日耳曼的军事化（武器储备的增加可以证明），最近出现了两种解释。一是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在罗马辅助部队中服役，二是罗马在莱茵河以东的军事行动提升了战士的地位。我们注意到，尽管这是对罗马权势的两种反应，一种是抓住机会，另一种是应对威胁，但两种解释远非不能兼容。日耳曼人口中的不同部分，甚至同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肯定都会从这两方面做出反应。[64]我只强调，必须认真研究针对罗马权力的负面反应，承认其在巩固政治中的作用。

我们看到，军事化远远不只是用武器为死者陪葬。罗马时期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领导语言，强调了战争的重要性。统治者成了真正的战争领袖，而这种转变不是单靠武力实现的。罗马时代晚期的日耳曼政治共同体里，除了国王和他们的直接随从，还有许多人，而且以军事王权兴起为代表的政治巩固进程需要这个（自由民？）社群的同意才能启动。这里，同时存在积极面和消极面。很多人认为，能采取有效军事行动的国王更有可能赢得罗马人的认可，成为与之进行边境业务的好伙伴，从而获得有价值的补贴和赠予。但这样的人，比如阿塔纳里克和马克里阿努斯，自然也更有能力抵制罗马帝国蛮横的要求和入侵。在我看来，这两个人既表明了反罗马情绪的重要性，也反映了4世纪时表达不满情绪的限度。两人都通过抵制罗马入侵在自己的社会中获得了尊重和权力，但是当帝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让步并提出比较好的条件时，两人都愿意与帝国交易。[65]他们的经历生动地说明，即使是日耳曼政治集权进程的主要受益者，也不得不一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

全球化

与罗马的多层面接触推动了日耳曼世界的转型，不同层面的接触同时发生，经常互相重合。边境的经济需求，可能还要结合技巧和技术的转移，刺激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而这是所有其他变化的根基。许多人在罗马的辅助部队中服役，他们回家时带着工资或退休金；而至少在与罗马有着和平关系的地方和时期，罗马钱币成了鼓励交换的有效机制。新的贸易网络形成，也许带来了铁矿石交易，奴隶和琥珀的大量交易则肯定存在。与这些新财富在日耳曼世界中流动起来一样重要的事实是，奴隶和琥珀贸易需要更复杂的组织形式。情况不是罗马买家遇见日耳曼生产者这么简单。北部的琥珀路线和暴力的奴隶交易网络都表明，新的财富对日耳曼社会的冲击并不温和，也不是雨露均沾。特定的群体通常以军事方式组织，从军团推进到莱茵河和多瑙河带来的新机会中获取超比例的好处。外交和政治接触也促成了新的财富流动，国王通过他们的随从组织起军事力量，从额外的贸易权和年度补贴中获得超比例的收益。

与帝国的一系列其他接触也推动了变革。获取年度补贴也有代价，年度补

贴是罗马管理边境的技艺之一。日耳曼的边境群体除了获得补贴之外，有时还会遭受来自帝国的大规模军事攻击。他们也感受到干涉性操纵的分量，罗马的操纵决定了他们在哪里生活、可以与谁结盟、接受谁的统治。罗马经常向他们索取商品、服务甚至人力。他们的公共生活以公开、屈辱地顺从罗马权威为前提。这些附属国的怨恨表现为随处可见的小规模越境袭击。在我看来，此类袭击的更深远影响是使这一时期日耳曼兴起的新型军事王权获得了合法性，从而为新联盟获得更强的政治凝聚力奠定了基础。军事国王有能力从自己的社会中攫取更多的资源，从新的财富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但他们也更能保护追随者，使他们免受帝国的过度干涉。

换句话说，日耳曼世界及其帝国邻居之间的“积极”和“消极”接触（当然这么说总会有这个问题：积极和消极是从谁的角度判断的？），总的效果是一样的。双方关系加深的同时，各自的政治巩固进程也得到推动。实际上，这可以说是一种早期全球化。一个完全不发达，仅能维持生计，生产、贸易、社会分层基本单一的农业经济体，突然与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结构强大的罗马帝国走到了一起。于是，新的财富，加上争夺新财富、抵抗罗马侵略的斗争，产生了更明确的社会分层，新的政治实体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罗马帝国后期的新日耳曼尼亚，是由帝国的行为和当地人对帝国的回应共同塑造的。

当然，前罗马时期的日耳曼社会也不是什么原始幸福的乐土。我们已经看到，早在罗马军团从地中海边缘向外推进之前，在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中北欧亚斯托夫（Jastorf）文化区，与主要由凯尔特人统治的西欧拉坦诺文化区之间，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就已存在。我们也看到，在军团来到门口之前，相对不发达的亚斯托夫社会就已开始自我重组，为的是从更发达的拉坦诺邻居那里获取更多的财富。从阿里奥威斯特斯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相邻社会财富水平相差极大会产生怎样的变革性影响，而这些影响在罗马人来到之前就在发挥作用了。但是，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拉坦诺欧洲被经济上更富裕、政治上更统一、军事上更强大的罗马帝国所取代。于是，不管是一开始的外部刺激，还是对这些刺激的内部反应（“能动性”），其力量都显著加强。

即使罗马人没有到来，日耳曼人内部的普遍差距最终也有可能产生更大、更稳固的政治单元。但是，与帝国的积极往来使这一过程缩短了好几百年。而说到与帝国接触如何改变了古代日耳曼尼亚，这些还不是故事的全貌。我们还需要探索日耳曼社会的某些角落里，与社会和政治转型同时出现的移民现象。

---

[1] Ammianus 16.12.23—6。有关确定这些早期政治单元地点的尝试，请参

阅Krüger(1976—83), vol. 1, 44—55, 202—19。从1世纪到4世纪几乎没有变化的观点，例子见James (1989), 42，遵循Thompson (1965) 40的看法。

[2] 关于阿米尼乌斯和马罗博杜斯的文献汗牛充栋，介绍性的著作请参阅Krüger(1976—83), vol 1，374—412；Pohl (2000), 21—4。关于早期王权及普遍缺乏王权的情况，见Green (1998), chapter 7。关于马罗博杜斯缺乏继承人，请参阅Tacitus,*Germania* 42。

[3] 克诺多马里斯、塞拉皮奥和梅德里克斯：见Ammianus 16.12.23—6；瓦多马里乌斯和威蒂卡比乌斯：见Ammianus 27.10.3—4；冈德马杜斯：见Ammianus 16.12.17。贵族：见Ammianus 16.12.23—6。绝大多数研究该领域的学者都会接受这种世袭区域王权的观点：例见Pohl (2000), 29—30, 102ff.; Drinkwater (200）,117ff（附有完整参考文献）。阿勒曼尼人中一些旧群体的名称（Brisigavi，Bucinobantes，Lentienses）流传下来，成为现代地名（Breisgau，Buchengau，Linzgau）。

[4] 有关1世纪和2世纪的联盟，参见Tacitus, *Germania* 38—40（论苏维汇人）等。涉及总体的评论，可参阅的包括Hachmann (1971), 81ff.; Krüger (197—83), vol 1,1, 374—412；Pohl (2000), 65f。例如，尤里乌斯·西威利斯的起义联合了巴达威人、弗里斯兰人（Frisians）、卡纳内菲特人（Caninefates），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和邓克特累人（Tacitus, *Histories* 4.18; 21），但在他失势后联盟没能存续。

[5] “经此一役……”：Ammianus 16.12.60。对尤利安外交手腕的叙述见Ammianus 17.1, 17.6, 17.10及18.2。瓦多马里乌斯：见Ammianus 21.3—4。马克里阿努斯：见Ammianus 28.5, 29.4, 30.3。

[6] 中世纪早期的爱尔兰和英格兰分别提供了较明确和较不明确的例子：例如，Binchy (1970a)和Bassett (1989)中的论文做了介绍。我在这里采取了和德语国家学者的极简路线极为不同的看法，该路线由Humver (1998) 和Drinkwater(2007), 121ff提供了完整的介绍，他们认为4世纪的阿勒曼尼没有统一的意愿，虽然学者也承认，一旦罗马的操纵在5世纪消失，统一就发生了。

[7] 参见Wolfram (1988), 62ff，以及Heather (1991), 97ff中的进一步论证，反对的是如Thompson (1966), 43—55等的观点；参照Thompson (1965), 29—41。三代人是：阿利阿里库斯（Ariaricus，332年开始执政），阿利阿里库斯一个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儿子，以及这个儿子的儿子阿塔纳里克（Athanaric）。对哥特与罗马关系的这种重构——仍与Thompson (1966) 的观点不同——见Heather (1991),107—21。其他人会对当时哥特与罗马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人怀

疑特温吉联盟在受君士坦丁打击后继续存在，“士师”的地位得以保留。

[8] 巴达威，见Tacitus, *Histories* 4.12; *Germania* 29。卡狄、卜茹克特累和安普希瓦力，见Tacitus, *Annals* 58; *Germania* 33。厄门杜里，见Tacitus, *Annals* 13.57。

[9] 关于艾斯博尔沼泽，见Ørsnes (1963)。打败敌人后用其武器献祭的记载，见Caesar, *Gallic War* 6.17; Tacitus, *Annals* 13.57。

[10] 克诺多马里斯，见Ammianus 16.12.60。Drinkwater (2007), 120—1假设国王克诺多马里斯和他的3个朋友各有50个随从，而不是他一人拥有200个，但如果是这样，很难明白为什么他是国王。特温吉，见*Passion of St Saba*。关于随从及相关背景，可参阅资料包括Hedeager (1987)；Todd (1992), 29ff（附参考资料）。与罗马帝国早期公共机构的对比非常鲜明：见Thompson (1965), 29ff。

[11] 见Green (1998), chapter 7; cf. Wolfram (1997), chapter 1; Pohl (2000), 66ff。“他们的国王……”：Tacitus, *Germania* 7 (‘reges ex nobilitate duces ex virtute sumunt’).

[12] 见第六章，克洛维（Clovis）的崛起。但是，克洛维在罗马土地上活动，他可以支撑起一支大得多的随从队伍，而鉴于日耳曼的经济发展情况（见下文），日耳曼领袖难以建立大型随从队伍。

[13] 关于克诺多马里斯的铠甲，见Ammianus 16.12.25；我们后文会再谈到剑。

[14] 关于奥德里，见Kmiecinski (1968)。在这些日耳曼人居住的东部地区，墓地比1—2世纪任何定居点保留的时间都更长，墓地周围有大型的石头圈却几乎没有坟茔。可以合理地推测，这说明是墓地而不是定居点为社交聚会提供了场地。

[15] 最完整的讨论见Haarnagel (1979)。

[16] 关于威斯特，见Van Es (1967)。更笼统的相关研究见Krüger (1976—83，可比对第1卷第11章与第2卷第5章）；Myhre (1978); Steuer (1982), 258ff.; Hedeager(1988), (1992), 193ff.; Todd (1992), chapter。关于边境另一侧的罗马，有用的讨论见Carroll (2001), chapter 4。

[17] Goffart (2006), 2—32反对基于约达尼斯著名的《哥特史》（*Jordanes, Getica* 4.25）的老派假设，即整个日耳曼尼亚，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是各个族群的发源地，那里不断产生后来入侵罗马帝国的民族，直到罗马帝国被推翻。他评论老派历史编纂学还比较公允，但他没有讨论具体的考古证据。

[18] 见Urbanczyk (1997b)。

[19] 关于彼得罗阿萨宝藏，见Harhoiu (1977)。关于在圆山（Runder Berg）的扣针制作（见后注24），见Christlein (1978), 43—7, 171。关于陶器，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第3章（切尔尼亚霍夫）；Drinkwater (2007), 89—93；更多背景信息参见Krüger (1976—83), vol. 2, 123ff。

[20] 关于玻璃，见Rau (1972)。关于梳子，见Palade (1966)。

[21] 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础的是Steuer (1982)。

[22] 有关历史编纂学的介绍，见Thompson (1965)。我倾向于这种观点：通过手工制品来衡量社会地位的做法，很可能让我们误以为人类历史上平等遭到侵蚀（如果人类平等曾经存在过的话）是很晚才有的事，其实不然。

[23] 有用的概述，见Thompson (1965), chapters 1—2；Todd (1992), chapter 2；更详细的讨论，见Gebuhr (1974)；Hedeager (1987), (1988), (1992), chapters 2—3；Hedeager and Kristiansen (1981)；Steuer (1982), 212ff；Pearson (1989)。关于奥德里，见前注14。

[24] 关于圆山，见Christlein (1978)；Siegmund (1998)；另参见Brachmann (1993),29—42；Drinkwater (2007), 93—106指出，肯定还有其他的低地阿勒曼尼精英领地，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关于费德森丘，见Haarnagel (1979)。关于哥特地区，见Heather (1996), 70ff（附有参考书目）。更一般性的讨论，见Krüger (1976—83),vol. 2, 81—90；Hedeager (1988), (1992), chapter 4；Todd (1992), chapter 6；Pohl(2000)。

[25] 两个经典和极具影响力的总体叙述是Fried (1967)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以及Service (1975) 采用的更乐观的路线。这些研究为后来对中间社会（非常小的和更现代的社会之间的社会）更详细的研究设定了框架。我所说的四个考察点取材自以下文献：Claessen and Skalnik (1978), Claessen and van de Velde (1987);Skalnik (1989); Earle (1991); Claessen and Oosten (1996).

[26] 参见前注。不管是采用Service的观点（国家在此过程中能更有效地完成更广泛的功能），还是采用Fried不那么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官僚机构的增长引发权力结构的进一步固化），这点都是正确的。

[27] 这里的关键词是“互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交换对彼此有价值的东西。这很可能不是（也不需要是）公平的交换，但交换行为本身就值得尊重。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行为，那就毫无尊严可谈。

[28] 阿勒曼尼：见Ammianus 16.12。特温吉：见Heather (1991), 109（关于

公元376年之前，基于Ammianus 20.8.1, 23.2.7, and 26.10.3），146。Drinkwater (2007), 142—4认为在斯特拉斯堡，阿勒曼尼人及其盟友有1.5万名。基于他之前的假设，即阿勒曼尼人没有对罗马边境的安全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他一直压低阿勒曼尼人的数量。我认为，这是一个循环论证，没有说服力：见Heather (2008a)。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社会拥有奴隶，而奴隶通常不用服兵役。我们不知道奴隶的占比，但很可能他们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只计算战士的人数就会低估这些社会中年轻成年男子的人数。

[29] 关于水上峰会，见Ammianus 27.5.9（参见Themistius, 10），30.3.4—6。关于勃艮第和阿勒曼尼的边界，见Ammianus 28.5.11。

[30] 有关证据的介绍，见Heather & Matthews (1991), chapter 5。

[31] 关于哥特分遣队，见前注28，Heather (1991), 107ff中提到关键的一点，即罗马在外交方面占上风时，有时会强迫哥特人提供军事服务。关于阿勒曼尼分遣队，见Heather (2001)。关于源自拉丁文的外来词，见Green (1998), chapter 11。

[32] 瓦尼乌斯，见Tacitus, *Annals* 12.25。关于哥特人居住地的罗马进口商品，见Heather (1996), 70—2。关于贸易和外交，见Heather (1991), 109。当然，克诺多马里斯开出的条件可能是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而不是直接付钱。

[33] 有关阿塔纳里克之“墙”，见Ammianus 31.3.8以及Heather (1996), 100中的鉴定。有关圆山和其他住地，见前注24。

[34] 基于对前注25中引用的文献的搜寻。哪怕中世纪以无能著称的爱尔兰国王——被已故的帕特里克·沃莫尔德（Patrick Wormald）精妙地讽刺为“祭司般的蔬菜”——都会行使解决争端的权利。在著名的爱尔兰国王手册（*Crith Gablach*）中，专门规定了一天来让国王行使这个职能：见Binchy (1970b)；比照Wormald (1986)。

[35] 有关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税收系统的介绍，见Campbell (2000)；Blair (1994)。这样的安排在从未落入罗马统治的不列颠地区也能找到：见Barrow (1973)。

[36] 罗马人试图绑架一位阿勒曼尼国王时遇到了困难，可见阿勒曼尼国王并不是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的：见Ammianus 29.4.2ff。研究巡游的著作非常多，Charles Edwards (1989)做了很好的介绍。

[37] 见Thompson (1966)；参见Heather (1991)，177ff（附有完整的参考文献）。关于冈德马杜斯，见前注3。即使接受Drinkwater (2007), 142—4的假设，

即有24个阿勒曼尼区域国王，他们的武士随从也不会超过4 800人。关于随葬品的范围，可参阅的著作如Steuer (1982); Weski (1982); Harke (1992)。关于完全没有随葬品的墓葬，可参阅的包括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62，其中有一些来自哥特人统治地区的例子。

[38] 浏览来自西哥特、法兰克、伦巴第、勃艮第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相关法律资料可知，这一群体相当重要；来自“小一些”的政治实体（如图林根、巴伐利亚及阿勒曼尼亚）的史料也提到了自由民。

[39] 关于自由民与奴隶的比例，参见Heather (1996), 324—5，参照Procopius, *War* 3.8.12（在一支哥特军队中，1名精英配4名下属）；8.26.12（在伦巴第军队中接近1比1）。有关这场战争，见Heather (1996)，特别是附录I（收集了罗马叙事资料中提到的两类战士的证据）。特许状方面的证据，见Wickham (1992);(2005), part 3。后罗马社会并没有立即落入规模小得多的土地精英的统治，他们可以被看作公元800年及之后加洛林时期的统治力量。关于土地资产的增长，见本书第六章；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和法兰克北部贵族/士绅统治的基础；更多背景，见Wickham (2005), part 2。

[40] 村民们至少试图保护过他们中间的基督徒：见*Passion of St Saba* 4.4；Heather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 4。

[41] 见Ammianus 31.3.8。

[42] 从法律文献中可以看出，社会价值随年龄变化很大，众所周知育龄妇女的社会价值最高，但年龄对男人来说显然也很重要，例如，老年人的随葬品是马刺而不是武器，这表明军事义务存在年龄限制：见Hedeager (1988)。儿童有时不会埋葬在墓地中：例如，Siegmund (1998), 179ff。

[43] 关于宴会作为“互惠”一部分的重要性（见前注27），见Earle (1984), (1991)。Thompson (1965)讨论了1世纪的证据。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观念和现实，见Charles-Edwards (1989); Campbell (2000), chapter 8。

[44] 关于罗马帝国早期，见Thompson (1965), 37ff。关于罗马对集会的控制，见Dio 72.19.2；73.2.1—4。关于4世纪村民聚会，见*Passion of St Saba*；参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 4。关于决定进入帝国，见Ammianus 31.3.8: ‘diuque deliberans’（见本书第四章）。Thompson (1965), (1966)强调4世纪的资料（基本上是指阿米阿努斯）没有提到哥特人和别的日耳曼人中有常设的议会。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察结果，但不意味着议会就不存在。

[45] 研究神圣王权的文献汗牛充栋，可以参考的著作包括Wenskus (1961)和Wolfram (1994)。但是“神圣”（heilag）这个术语和概念是很清楚的：见

Green(1998), chapter 7中的语言学证据；参见Pohl (2000) and Moisl (1981)中的实际应用。有关阿马立王朝实际的（而不是编造的）历史，见Heather (1991), chapters 1—2, and part 3; Heather (1996), chapters 6, 8 and 9。

[46] 见Gregory of Tours，*Histories* 2.9；Ammianus 20.10也提到了卡狄。萨利：见Ammianus 17.8；参见James (1988), chapter 1; Wieczorek (1997) 中的相关论文，以及大量可能相关的二次文献。建立阿勒曼尼的政治过程应该不至于完全不同。旧的名称都没有留存到4世纪，但联盟似乎确实是逐渐建立起来的。例如，在3世纪，尤辛吉（Iuthingi，本身是一个新名称）似乎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但到了4世纪，它就成了更大联盟的一部分了：见Drinkwater (2007)，63ff。

[47] 关于加吉里乌斯的牛，见Boeles (1951), 130，插图16，引自Geary (1988), 3；军团需求的计算来自Elton (1996)。

[48] 尤利安的条约在Heather (2001)中有更详细的讨论。关于边界及其运作的一般情况，见Whittaker (1994); Elton (1996); Wells (1999), chapter 6; Carroll (2001)，后两本书更关注莱茵河罗马的那一边。

[49] 关于外来词和贸易，见Green (1998), 186f. and chapter 12。关于铁的生产，见Urbanczyk (1997b); 更一般的介绍参见Krüger (1976—83), vol. 2, 157ff。

[50] 关于强制征兵，见Heather (2001)。

[51] 见Green (1998), chapter 12。

[52] Caesar, *Gallic War* 4.2; Tacitus, *Germania* 5（但塔西佗注意到，内陆的日耳曼群体仍然不认为罗马银币有价值）；参见Green (1998), chapter 12。关于4世纪货币的集中，见Drinkwater (2007), 128—35；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91—3.

[53] 关于特温吉和贸易，见Themistius, *Orations* 10，以及Heather (1991), 107ff的评论。关于罗马进口商品及其模式的一般介绍，见Eggers (1951); Hedeager (1988);von Schnurbein (1995); Wells (1999), chapter 10; Drinkwater (2007), 34ff。

[54] 关于罗马货物和社会地位，见Steuer (1982)。关于琥珀堤道，见Urbanczyk(1997b)。关于过路费，见Green (1998)。

[55] 见Caesar, *Gallic War* 6.17；Tacitus, *Annals* 13.57。有关沼泽地堆积，见Orsnes(1963), (1968)；Ilkjaer and Lonstrup (1983)；Ilkjaer (1995)；更一般的评论，见Hedeager (1987)；Steuer (1998)；Muller-Wille (1999), 41—63。

[56] 对贸易重要性的深思熟虑的分析，见Fulford (1985)。关于9世纪和10世纪的受益人，见本书第十章。有关“能动性”的介绍及更具体的问题，见Wilson(2008）。

[57] 此次发现的详细报告，见Kunzl (1993)；英文的概要见Painter (1994)。

[58] 更详细的叙述（附有完整参考书目），见Heather (2001)。

[59] Ammianus 17.12—13，以及Heather (2001)。关于清除有威胁的领袖，见Ammianus 21.4.1—5; 27.10.3; 29. 4.2 ff.; 29.6.5; 30.1.1—21。

[60] 有关扣押人质的理由，见Braund (1984)。在补贴方面，Klose (1934)收集了早期的证据，Heather (2001)收集了帝国后期的证据。

[61] “我们的军队急切地冲向前去……”，见Ammianus 19.11。关于重新安置和驱逐之间平衡的更多讨论见本书第三章，并参考如Heather (1991)，第4章中罗马的标准移民政策；关于罗马在建立其日耳曼边境时，对附近人群进行有组织重组的情况，见Carroll (2001), 29ff。

[62] 瓦伦提尼安一世削减赠予：见Ammianus 26.5; 27.1。有关评论见Heather (2001)；以及Drinkwater (2007), chapter 8（他试图证明阿勒曼尼从来不曾是威胁，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害的。）

[63] 有关莱茵河和威悉河，见Drinkwater (2007)，38—9。关于阿勒曼尼亚5世纪的经济扩张，见ibid., 355—44。

[64] 见Wells (1999)，chapters 10—11，它遵循von Schnurbein (1995)，强调了2世纪中期之后日耳曼环境中罗马武器输入的增加。

[65] 阿塔纳里克，见Ammianus 27.5；马克里阿努斯，见Ammianus 30.3。这两个人面对的皇帝都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压力，瓦伦提尼安的问题在多瑙河中游，瓦伦斯要对付的则是波斯，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 2。

第三章

条条大路通罗马？

172年的夏天，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困境。自166年以来，战火就一直在罗马的欧洲边境燃烧，特别是在奥勒留如今卷入的多瑙河中游地区。此前，他的一名主要指挥官——近卫军长官文德克斯（Vindex）在与波希米亚的日耳曼马科曼尼人作战时，死在了多瑙河以北。皇帝亲自领导了罗马对斯洛伐克夸迪人的第二次攻击。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罗马人在敌国领土上行军，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全副武装地保持战斗队形。夸迪人了解地形，也知道罗马人即将到来。他们没有开火，而是诱敌深入，让罗马人远离补给车队。然后，夸迪人收网了。罗马军队没有补给，也没有水；夸迪人就在他们周围，根本不用出战：

> 罗马人又热又渴，夸迪人希望能轻松地拿下（罗马人）。于是他们在各处布置了守卫，把罗马人围住，不让他们去任何地方取水；因为蛮族有着绝对的数量优势。因此，罗马人因疲劳、受伤、太阳的灼烧和口渴而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他们既不能战斗也不能撤退，只能站成队形……炎热使他们萎靡不振。

情况实在糟糕，灾难眼看着就要到来——

> 突然，天空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至——这不能不说是天意……一开始，所有人都抬起头来，用嘴接雨水喝；然后有些人拿出盾牌和头盔接水。他们不光自己畅饮，还给他们的马匹喝水。而蛮族开始向他们冲锋时，罗马人且饮且战。

雨水使罗马人精神振奋，也迫使夸迪人出战，因为已经没有靠干渴和中暑而让罗马人投降的希望了。雷电——据说其中一些闪电击中了蛮族——清理了现场，皇帝从陷阱中脱身，他的军队完好无损，圆满取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

拯救了马可·奥勒留的暴雨神迹此后广为人知，被古代人视为神眷顾罗马帝国的又一证据。神力来自何处也有争议。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将此次神迹归功于埃及法师阿努菲斯（Arnuphis）的努

力，但基督教作者称，来自叙利亚的一支基督徒军团的祈祷奏了效。不管是谁的功劳，暴雨让皇帝脱身，他对此感激不尽。他连战连捷，恢复了罗马欧洲边境的秩序，尽管这用去了2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剩余时间。在帝国首都，皇帝立起了庆功柱。这次暴雨神迹和其他战争中事件的场景刻在庆功柱上，永传于世。[1]可是，马可·奥勒留皇帝为什么会陷入这场生死之战呢？

从波罗的海到黑海

1世纪，罗马停止了向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温带地区的扩张，莱茵河和多瑙河沿线大致标出了此时的边境，但帝国并没有进入纯粹的防御模式。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罗马利用总体军事优势和侵略性外交，将离边境最近的政治实体变成了罗马的附属国。袭击、威胁、军事示威和蛮族臣服是这场大戏中的标准项目，但正面对抗还是极为少见。过往的严酷经历让蛮族深刻地记住了教训：与技术占优的罗马军队公开冲突通常以灾难告终。到2世纪中叶，马科曼尼和夸迪作为边境附属国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00年，这让我们更难理解那场几乎让马可·奥勒留丧命的战争。为什么经过差不多100年的小摩擦之后，长期以来的附属国现在却试图在全面的军事冲突中消灭皇帝和他的军队呢？

暴雨神迹发生在一系列动乱之中，这些动乱统称为马科曼尼人战争（Marcomannic War）。但除了波希米亚的马科曼尼人之外，战争还涉及许多其他群体，尽管前者确实是战争中一些最著名插曲的主角。战争过程也没那么容易重构。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原本写下了对此次战争的完整描述，包括相当多的详尽细节，但他的作品只留下了一些残篇，而其他资料非常有限。结果，我们只能看到一系列独立的事件，彼此之间的关联往往不明确。最重要的是，与战争规模及根本原因相关的问题尤其令人费解。我们的罗马资料自然集中笔墨在边境地区的暴力，以及它蔓延到帝国的方式上。然而，历史和考古资料清楚表明，破坏边境地区稳定的一个因素是新的日耳曼外来群体的到来。

马科曼尼人战争

马可·奥勒留于161年登基，他在统治初期主要处理罗马美索不达米亚边境来自帕提亚人（Parthian）的威胁。这些年里，在别的措施之外，他还不得不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调动了整整3个军团（应该有1.8万人）到东部，但到了2世纪60年代中期，麻烦开始在西部酝酿。据报道，在166—167年的冬天，6 000名伦巴第人（Langobardi）和乌比人（Ubii）袭击了罗马行省潘诺尼亚（Pannonia），即现在匈牙利的多瑙河以南，以及喀尔

巴阡山脉以南和以西的地区。虽然袭击者被击退，但多瑙河中游这一地区仍然麻烦不断。168年，该地区长期以来的罗马附属国马科曼尼和维克图阿里（Victuali）要求进入帝国。上一章说过，境外群体要求被纳入帝国并非闻所未闻，有时这样的要求也会得到批准。然而，皇帝拒绝了这一次的请求。也许皇帝无法在军事上控制局势，但他下定决心要获得军事控制。

170年，皇帝在潘诺尼亚集结部队。资料中有一些线索，表明皇帝此时考虑正式吞并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领土。但他因此采取的军事行动遭遇了惨败。罗马军队被马科曼尼人包围，而由于一路上许多要塞的兵力被调去实施进攻，狂暴的蛮族军队得以突进意大利本土。乌代尔佐（Uderzo）被洗劫，阿奎莱亚（Aquileia）被围困。罗马治下的意大利遭受了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入侵者直到171年年底才被完全击退。与此同时，整个多瑙河流域都弥漫着不安。游牧的萨尔马提亚艾兹吉斯（Iazyges）人和日耳曼夸迪人在喀尔巴阡山脉西部的多瑙河中游平原上制造麻烦，还有两个汪达尔群体阿斯丁格（Astingi）和拉克林吉（Lacringi）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Dacia）北部边境造成威胁（地图4）。来自达契亚东北部的科斯特博赛（Costoboci）人也袭击了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他们大概是沿喀尔巴阡山脉东部而不是西部的山坡向南推进的。此时，莱茵河北部边境也遭受着严重的袭击。皇帝不得不去对付种种威胁，报复计划因而延后，直到172年，马可·奥勒留才恢复了攻势。经过在多瑙河中游的两年激战（其间发生了暴雨神迹），皇帝终于让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艾兹吉斯人臣服。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大平原恢复了和平；在2世纪70年代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帝采取了军事和外交的综合对策，意在像以往一样，将眼前的军事胜利转变为更持久的和平。[2]

狄奥·卡西乌斯作品留下的片段对此有所提及，但并不全面。但两个世纪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同一地区实施的策略与之惊人相似。有敌意的国王被比较顺从的国王取代，特别是在夸迪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中——他们推翻了皇帝之前提名的国王［分别是福提乌斯（Furtius）和赞提克斯（Zanticus）］，公开对抗帝国。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被迫接受在其土地上建起一系列堡垒并在其中驻扎2万名罗马士兵的条件。当然，所有这些再次说明，成为罗马的附庸虽然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和好处，但这通常不是自由选择的。一些群体（如阿斯丁格）获准搬到新的领地上，另一些群体（如夸迪）则不能，有些群体甚至被纳入帝国［多达3 000名纳累喜人（Naristi］。一切都要看皇帝的意愿，看他认为什么最符合帝国的利益。纳累喜是个比马科曼尼小得多的群体，而马可·奥勒留当时已经获得了军事胜利，可以随意定条件，所以这一次，他很乐意接受这个群体。同样，一个群体的交易特权是授予还是取消，视乎皇帝认为它忠不忠诚。不同规模

的中立区域重新建立起来。例如，危险的萨尔马提亚艾兹吉斯人就像358年的利米刚特人一样被迫搬离，新地方到河流的距离是老地方的两倍。如果皇帝觉得什么地方特别可疑，就会在那里设立罗马要塞，并禁止部落召开常规集会来处理政治事务。秩序恢复、更顺从的国王权威巩固后，管控就会放松。艾兹吉斯人最终获准返回旧的中立区，也可以穿过罗马的达契亚行省与他们的萨尔马提亚同胞罗克索拉尼人（Roxolani）恢复正常关系。因此，以马可·奥勒留影响深远的军事行动为基础，建起了一个外交协议和联盟的复杂网络，这与长久以来罗马管理附属国的方法是一致的。正如狄奥·卡西乌斯评论的那样，马可·奥勒留面对的问题很大（比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358年面临的问题要大得多），直到180年去世都没能完成这项工作。[3]

但我们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开始是什么造成了麻烦？

一份主要资料认为，根本原因是欧洲中北部几个日耳曼群体的一系列扩张活动，包括人口迁移：

> 不光是维克图阿里人和马科曼尼人搅乱了一切，还有其他部落伺机而动。那些部落被更远的蛮族驱赶而不得不撤离，如果不能被罗马和平接纳，就准备进攻意大利。

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中，这段文字自然被人拿来做文章，认为这证明马科曼尼人战争标志着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大规模迁徙的第一阶段，而这样的移民最终摧毁了罗马帝国。但这段摘录来自疑点颇多的《罗马君王传》（*Historia Augusta*）。虽然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特别是更久远的2世纪历史，但总的来说其文本是伪造的：它很可能是公元400年前后罗马的一位元老院成员写下的，而不是像它宣称的那样成书于公元300年前后。我们无法判断这本书里哪些说法可信，因为很难分辨哪些是基于真实信息的内容，哪些只不过是作者的杜撰。如下一章所示，在公元400年前后写作的人，是知道当时一个逃离“更远的蛮族”的例子的：大量哥特人在匈人的追赶下逃入帝国。因此，完全有理由怀疑，《罗马君王传》里所说的事并不是马可·奥勒留面临的问题的真正起源。最近一位评论家认为，应该全盘否定书中对战争起因及影响的看法。按照这种观点，应将4世纪的所有观念放在一边。不应将马科曼尼人战争视为终将淹没整个罗马世界的日耳曼海啸的第一波。情况恰恰相反：刚刚结束了帕提亚战争的马可·奥勒留希望重新建立罗马在其欧洲边境的权威，从边境东边撤军后，袭击数量有所增加，但并没有超出正常范围。也就是说，皇帝想要发动的反击（换句话说是罗马的侵略）来势汹汹，这才让边境燃起战火。恐慌之下，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率先发动了攻击。[4]

这一重构在某些方面是公允的。当然有必要警惕可能的时代错误，但对罗马侵略的恐惧肯定是蛮族考量时的一个因素。罗马希望凭借军事优势对边境事务发号施令，而蛮族附属国也不指望帝国会认为任何报复是“公平的”或“相称的”。皇帝需要让人看到他对蛮族强硬，对蛮族的事业强硬。尽管如此，要说2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我是不能同意的。说马科曼尼人战争是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主义发动的伟大反击的开始，这样的理解太简单了，但说它只是正常的边界冲突，同样是简单化的看法。即使将它与4世纪战争那些可能误导人的相似之处放在一边，马科曼尼人战争所涉边境冲突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从对因果关系的重构看，当时确实有主要力量参与了这场战争。

首先是规模。袭击的地理范围非常大。2世纪70年代初期，莱茵河北部边境、多瑙河中游平原，以及达契亚的北部和东部边缘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这几乎就是罗马的整个欧洲边境了。1世纪时，哪怕是最严重的动乱，都不会同时影响莱茵河和多瑙河中游地区以外的地区。这次的危机也显然不同于4世纪时因克诺多马里斯的雄心而引起的危机。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克诺多马里斯也只是扰乱了一小段边境。此外，马科曼尼人战争前前后后大概打了15年。4世纪大部分有记录可查的边境冲突，延续最多也就两三年，就连牵涉到克诺多马里斯的冲突也没有超过5年。因此，地理范围和持续时间都足以说明，这场战争非同一般。

关于这场战争，最难把握的是数字。这15年里，有多少人参与其中？直接证据很少。我们唯一知道的数字来自狄奥·卡西乌斯的作品，他说有6 000名伦巴第人和乌比人参加了对潘诺尼亚最初的攻击。如果这个数字正确，那么这支军队的规模就算比较大的了，但还算不上庞大（比方说，和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阿勒曼尼人的数量相比）。其他资料中的证据要么隐晦要么模糊。至少在多瑙河中游的一部分战役中，出战的罗马军队人数显然很多；而在开始大反攻之时，马可·奥勒留召集了两个新的军团（1.2万人）。

一些地方遭受的损害也很严重，不仅是意大利，莱茵河下游边境以西也是如此，从比利时海岸到索姆河（Somme），塔文纳［Tarvenna，即泰鲁阿讷［Thérouanne）］、巴格库姆［Bagacum，即巴韦（Bavay）］和萨马罗布里瓦［Samarobriva，即亚眠（Amiens）］等罗马城市被夷为平地。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数量多到足以杀死一名长官并严重威胁皇帝的生命，这也表明当时发生了重大战争。马可·奥勒留获胜后，为自己在罗马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同样说明这场战争不容小觑。这个纪念碑肯定有自我美化的宣传作用，但之前的纪念碑，比如图拉真（Trajan）纪念碑，是用来宣扬重大战争的胜利的（图拉真纪念碑是征服达契亚之后立的）。马可·奥勒留立起这么大的纪念碑而没有招来讽刺，这也很说明问

题。对决意坚持军事行动规模不大的人而言，找理由认为其中某个证据不成立还勉强可行，但这些证据全部加起来，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罗马人和他们蛮族邻居的关系而言，马科曼尼人战争绝非平常。[5]

地理上的迁移（有时显然是移民）是又一证明，它是此次战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副题。情况与1世纪的边境冲突也明显不同。例如，攻击潘诺尼亚而引发战争的伦巴第人和乌比人，显然从易北河下游向南迁徙了约800千米；而塔西佗在1世纪末、托勒密在2世纪中期（距马科曼尼人战争爆发只有半代人的时间）写作的时候，这两个群体还在易北河下游地区。他们向南迁徙的过程没有留下记录，但最自然的路线是沿易北河（欧洲中部南北向的一条主要河流）而下前往波希米亚，然后经过摩拉瓦（Morava）山谷来到多瑙河中游平原（地图4）。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是沿着中欧的一条大道前行，这条大道250年前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也走过。我们不清楚这些伦巴第人和乌比人是打算带着战利品回家的掠夺者，还是打算去边境地区定居的入侵者。其他一些群体永久迁移的意图则明确一些。这次战争期间也向南迁移的汪达尔群体就是如此。这些汪达尔人从波兰中部出发走了一小段路，并与罗马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谋，企图夺取达契亚边境科斯特博赛人的领土。前文提过，作为化解危机的举措，罗马接纳了纳累喜人进入帝国，而马科曼尼人和维克图阿里人早先曾要求得到同样的对待。并非所有群体都想迁到罗马边境地区。奥勒留皇帝曾坚决阻止夸迪人整体向北迁移，进入易北河中游塞姆诺奈人（Semnones）的地盘。[6]

重要的是别走极端。所有这些都不代表从北方涌来的蛮族迁徙潮势不可当，而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艾兹吉斯人肯定利用即将出现的麻烦攫取了财富。一些外来者进入边境地带只是为了劫掠。即便如此，仍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边境地区的日耳曼群体大多是半臣服于帝国的附属王国，而不是帝国的死敌，它们至少部分因为侵略性群体的到来而被卷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如它们所说）确实需要罗马的援助。马科曼尼国王巴罗马里乌斯（Ballomarius）曾代表11个边境群体向皇帝马可·奥勒留进言，这些群体惯常定居的地方如今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7]如果我们不得不在此抛开马科曼尼人战争（1970年以前的学者恐怕只能如此），那可能会很有趣，但最终会感到挫败。光看历史资料，我们感受不到当时的场面有多大，而奥勒留与马科曼尼人、夸迪人的争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在上一代学者活跃的年代，发现了大量新的考古证据，大大增加了我们对2世纪日耳曼尼亚北部发生的事件的认识。

这一证据的发现，算是冷战的一个迷人的副产品。1939年之前，在中欧和东欧挖掘了许多遗址，但在战争的大火中，许多出土物品都丢失了；战后的学者只好从头开始。当时大部分的动力、人力和资金来自一个特别的圈

子：苏联阵营中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设法将两种表面上不相容的关注点结合起来。一方面，这些国家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希望证明现在的居民是从前原住居民的最新后裔，而那些原住居民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光荣地占据着同一块领土。另一方面，人们想要证明，19世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勾勒出的古代历史发展进程是正确的，这个关注点要合理一些。但事实上，我们前面提过，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认同是一种虚假意识。基于这两个原因，对远古时代的调查在这些国家蔚然成风，形成了一个有国家赞助的庞大增长型行业。现在回头看，这些工作产生的一些出版物，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意识形态的色彩太重了。但是，有许多学者不肯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去迎合官方希望看到的那种历史，他们对官方路线或是敷衍或是无视，坚持自己的研究。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他们也在所有新发现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东欧学者已经基本可以自由地做研究了。[8]

一个直接的成果是，对罗马时期日耳曼人统治下欧洲的主要物质文化系统有了更清晰的描述，特别是将波兰北部的维尔巴克文化与其南部近邻普热沃斯克（Przeworsk）文化明确区别开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发现了普热沃斯克文化，也做了相对充分的研究。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陶罐装饰、武器构造等细节上的差异，以及更宏观层面上的区别，将两者区分开来。维尔巴克的男性从来没有武器陪葬，而普热沃斯克的男性通常有。维尔巴克的墓葬经常是火葬和土葬的混合，而普热沃斯克只有火葬。这种差异表明两种文化的来世观念有本质区别。

这些鉴定对马科曼尼人战争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大量的新发现让我们有可能建立起更可靠的考古测年系统。科辛纳这位令人敬畏的文化历史创始人从两个要素的交集入手。首先，他和同伴确立的原则是，用样式演变来确定某个“文化”的相对年代。他们认为，外观设计更成熟、装饰形式更复杂的物品，其年代要晚于具有较简单外观或装饰的同种物品，这么设想后来证明是合理的。原则上，这种方法可以用于任何类型的物品，但该方法最初主要应用于陶器。然后，早期的研究人员尝试利用偶然发现的年代比较容易确定的物品（通常是日耳曼遗址中的罗马硬币），来将先后出现的样式排列在更精确的年代表中。如果一枚公元169年的硬币与某类陶器一起被发现，那么该类型陶器的年代就会定在169年前后。虽然这样做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可定年物品从制作出来到最终被放在人们发现它的地方，之间隔了多久只能靠猜；从中得出的结论有的还错到离谱，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优质的1—2世纪罗马银币，到了4世纪仍在蛮族欧洲广泛流通。

1970年后，可供学者们研究的物质遗存越来越多，将上述基本方法用到这些材料上以后，他们确立了范围广得多的物品的样式演变顺序，包括武

器、带扣、珠宝、梳子等。这样，确定所发现物品的年代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因为可以不必基于在同一处发现的所有物质遗存，而是仅仅基于一件物品来确定年代。于是，这些日耳曼人主导的主要文化系统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往往通过某种武器类型及有关联的胸针、带扣、罐子、梳子形式来定义。这样一来，也就更容易辨别出产生于较早的时期，但后来的人仍在使用的物品了，而在以前，如果较晚近的墓葬中出现了这类物品，是会让定年变得很不可靠的。[9]

所有这一切都与马科曼尼人战争有关，因为近期的研究表明，大约从2世纪中期开始，在现在波兰的这片土地上，日耳曼人或日耳曼人主导的物质文化的结构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说，维尔巴克文化系统开始从波美拉尼亚向南扩展，进入大波兰北部［在诺泰奇河（Noteć）和瓦尔塔河（Warta）之间］，并从东南方向穿过维斯瓦河进入马佐夫舍（地图4）。从前，这一系列遗址背后的人口群体的身份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它可能与极为敏感的斯拉夫起源问题有关；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在1—2世纪，维尔巴克文化所包含的区域由哥特人、鲁吉人（Rugi）和其他日耳曼人统治，即使其人口一开始（或者说后来也）不是都说日耳曼语。但维尔巴克文化从约150年开始扩展进入的那些新领地就不同了，从之前人口的物质遗存看，那里原本属于普热沃斯克系统。传统上认为，该系统和汪达尔人有关，但肯定也包括了其他人口群体。像大多数这类文化区域一样，它面积广大，可能包括了塔西佗和托勒密提到的几个1—2世纪时的小型日耳曼群体。

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具体细节的甄别，而是维尔巴克在扩张这一基本事实。年代方面的巧合让人无法忽视。维尔巴克的扩张（说明波兰北部发生了某种重大动荡）与马科曼尼人战争差不多同时发生。二者必然有某种联系，罗马资料中记载的边境骚动也与一系列更广泛、影响了日耳曼欧洲更多部分的骚动有关。考古证据无法明确这种联系是不是因果关系。即便使用改进的样式年表，也只能将遗存的年代定到差不多25年的范围之内，没法更精确，而相邻阶段之间总有相当大的年代重叠。在本例中，25年的区间太大了，大到维尔巴克的扩张既可能是马科曼尼人战争的原因，也可能是其结果。要更明确的话，只能依靠更精确的碳14或年轮学定年。这些证据肯定会出现，但目前我们只能暂时搁置这个问题。[10]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应该如何构想维尔巴克系统扩张背后的人类历史。考古区域是系统的物质遗存，不是物件的遗存。因此一个系统扩张到其他地理区域，使另一个系统消亡，并不一定意味着征服行为（但科辛纳肯定会这么想）。原则上，扩张可能是多种发展的结果，其中肯定有征服或吞并，但还有贸易模式、信仰结构等的扩张。本例中很明确的是，在维尔巴克的扩张中，原有的普热沃斯克人口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新的维尔巴克文化规

范，而不是被维尔巴克移民完全取代。在一些墓地，可以看到维尔巴克形态的墓葬直接取代了之前普热沃斯克形态的墓葬，没有过渡阶段，墓地使用方面也没有明显的停顿迹象。因此，可能是普热沃斯克人群采用了新的维尔巴克丧葬习俗，不用武器随葬，实行土葬，想必也接受了这种习俗背后的信仰模式。但即使这种程度的改变也不是无端发生的。一定发生了什么，让这些普热沃斯克人改变了长久以来的生活（或者不如说是死亡方面的）习惯。考古证据没有说这可能是什么。在我看来，某种新的政治势力是最有可能的答案，因为即使是文化模仿，通常也是随政治声望而来的。

与文化适应同样重要并同时起作用的是，维尔巴克的扩张从波兰北部向南带去了一些人口。历史资料对此有所反映。例如，公元200年前后，罗马军队可以从达契亚边境招募哥特人——古老的维尔巴克群体之一。而在100年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哥特人的地盘离边境太远。考古材料本身也极具启发性。自公元元年开始，维尔巴克遗址的总体密度一直在快速增长。在1—2世纪，各个定居点使用的时间很短，相对来说投入使用很快，停止使用也很快，这反映出人口只能在短期内维持土壤的肥力。在更宏观的层面也有规律可循。公元元年后，维尔巴克地区内有人使用的定居点总数一直在增加，每25年为一阶段。从表面上看，这说明人口在增长，这既有助于解释向喀尔巴阡山脉的南迁（这让罗马人能够招募到哥特人新兵），也可以解释维尔巴克人为什么会让波兰中部的近邻普热沃斯克人感到压力。我们看到，日耳曼欧洲的农业生产证据确实表明这里的人口在罗马帝国时期大幅增长，因此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维尔巴克人口的不断增长可能迫使一些普热沃斯克人面临选择：是被吸收进维尔巴克系统，还是另找地盘？[11]

当然，我们还想知道更多。特别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无法确定维尔巴克扩张和马可·奥勒留在边境遭遇困境孰先孰后。不过，历史和考古学在此结合得很好，两者都表明这场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非比寻常，而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从远处而来、侵入边境地区的人口群体扮演的角色。能表明马科曼尼人战争涉及大批迁徙人口的，不是只有《罗马君王传》中那些相当有问题的证据。狄奥·卡西乌斯的《罗马史》中更可靠的片段也提到了这样的情况，维尔巴克的扩张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发生的事的另一个方面。所有这些足以表明，马科曼尼人战争不能被理解为只是比平常的边境争端略微暴力一些而已。而如果我们去看3世纪的情况（此时维尔巴克的扩张来势汹汹，而更多的日耳曼移民完全改变了罗马的边疆世界），马科曼尼人战争的分水岭意义就更明确了。

去往黑海及更远之处

马可·奥勒留采取的对策有效解除了2世纪60年代的眼下危机，而且在差不

多两代人的时间里，使罗马欧洲边境得享安宁。但进入3世纪后，罗马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此时，萨珊（Sasanian）王朝兴起，以近东（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和伊朗）为基础崛起为可与罗马抗衡的超级大国，对罗马来说问题严重了起来。萨珊人是最大的威胁，他们击溃了三位罗马皇帝的军队，甚至俘获了其中的第三位皇帝瓦勒良（Valerian）。他们用锁链押着瓦勒良去见萨珊人的“众王之王”（Shah-an-shah）沙普尔一世（Shapur I）。瓦勒良死后，萨珊人剥了他的皮作为战利品。这一新的威胁自然迫使罗马把军事资源调到东边。我们必须在这一背景下审视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发生的事情。如果萨珊人没有在此时突然闯入历史，罗马在3世纪欧洲的对手们就不可能如此自由地行动。[12]

在西欧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的边境地区，3世纪的危机牵涉到规模不大的人口迁移和规模大得多的政治重组。我们在上一章研究的新日耳曼联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阿勒曼尼联盟在213年首次成为罗马的敌人，当时的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对其发动了惩罚性的或者说是先发制人的行动。可能在那时，阿勒曼尼人就已构成了威胁，但我们的有限资料表明，从3世纪30年代开始，威胁急剧增加。阿勒曼尼人在242年发动了一场特别大的进攻，而类似的袭击可能持续到了到3世纪四五十年代——虽然重构这一图景的基础只能是一些零散的历史和考古证据，以及最重要的硬币证据，因为没有连续的叙事资料留存下来。但最晚到260年，阿勒曼尼人和该地区的其他群体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有些群体获得了罗马的补助。在美因茨出土的一个祭坛很有名，它说明罗马发动了一次反击，救回了数千名因某次蛮族袭击意大利而被俘的罗马人。最令人瞩目的是，261年左右（罗马是不会把自己的失败到处说的），所谓的阿格里-戴可美特地区（它从1世纪初开始就被罗马占据）被彻底遗弃（地图5）。

据我们所知，这并不是阿勒曼尼人征服的结果，而更可能是当时西方的皇帝波斯杜穆斯（Postumus）的决定，他决定从该地区撤出急需的军队来保卫战略意义更大的地区。不管怎么说，这证明了边境地区的压力有多大，而撤军并没有解决问题。3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中期，阿勒曼尼人的更多袭击被记录下来，对此我们有生动的证据：13个不幸的人被残忍地杀害、肢解、剥去了一部分皮肤，然后遗体被扔到他们在雷根斯堡-哈丁的农场的井里。到了四帝共治（Tetrarchs）和君士坦丁大帝治下的3世纪末和4世纪初，在罗马采取了更多军事行动后，新边境的形势才最终稳定下来，此后才有了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那种更为稳定的4世纪附属国关系。[13]

虽然这次危机的一大诱因是日耳曼社会整体发展、新政治联盟出现带来的额外军事力量，但两次人口迁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罗马撤军后，阿勒曼尼人进入了阿格里-戴可美特，整个4世纪，他们在此幸福生活。他们并不是从远处来的。在3世纪当一个阿勒曼尼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

有不少争议，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来自阿格里-戴可美特的所有物质证据，包括珠宝、陶器类型和埋葬方式，都表明此地新来的日耳曼主人原本住在不太远的地方，就在所谓的易北河-日耳曼三角洲那一带，也就是易北河以西，南至波希米亚，北到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那片土地（地图5）。

其次，4世纪，就在阿勒曼尼人的后方，但仍然在罗马外交不时能触及的范围内，勃艮第人定下了自己的地盘。与罗马帝国晚期才出现的阿勒曼尼人不同，勃艮第人在1—2世纪就已经为塔西佗和托勒密所知。当时他们在更东边（现在是波兰领土）占领了土地。他们一度是汪达尔世界的成员，生活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也就是说，4世纪的时候，一些勃艮第人向西迁移了约500千米。历史证据表明，此时他们定居在美因河中游的某处，这也得到一些考古证据的证实。物质证据不多，但在差不多同一地区出土了一批随葬的剑。在这些坟墓中发现的物品类似于早先在日耳曼东部地区发现的物品，与来自易北河-日耳曼三角洲的群体的物品截然不同。但我们需要承认证据有限。直到3世纪甚至更晚，东日耳曼人一般都会将死者火化，而美因河发现的剑是土葬的随葬品。历史证据还将4世纪的勃艮第人明确定位在科赫（Kocher）河谷，但那里没有出土东日耳曼的物品。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显然有过迁徙，但其性质、规模和因果关系还需要认真研究。[14]

3世纪莱茵河流域的危机已经够严重了，更东边地区的行动则更具爆炸性。马科曼尼人战争主要在多瑙河中游平原上展开，但这一次，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与黑海北岸接壤的广阔土地上。战争始于238年。据记录，一些哥特人在多瑙河流入黑海的地点附近向希斯特里亚（Histria）发起攻击（地图6）。随后是一系列主要由哥特人向罗马帝国发起的攻击；所有攻击都在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之间的多瑙河下游边境发起。我们无法完整重构这些攻击的过程，只知道攻击在250年左右达到了顶峰。249年，巴尔干东部城市马西安诺堡（Marcianople）被阿盖斯（Argaith）和刚特里克（Guntheric）的哥特追随者洗劫一空，暴力迅速升级。

250年春天，另一位哥特领袖刻尼瓦（Cniva）突破了罗马边境，在位于欧斯库斯（Oescus）的古老军团堡垒那里渡过了多瑙河，那是多瑙河上最方便的渡口。然后，他进入了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带，拿下了巴尔干山脉南部的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polis，现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并在那里过冬。第二年，皇帝德西乌斯（Decius）试图拦截当时正在撤退的哥特人，但他本人在阿伯里图斯（Abrittus）阵亡。[15]这真是场大灾难。某种程度上，它比更有名的条顿堡森林会战失利还要糟糕。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在位的皇帝在与蛮族的战斗中丧命。然而换个

角度看，情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严重。德西乌斯去世时，帝国正经历巨大的内部政治动荡，这是敌对的萨珊帝国兴起，在罗马体系内激起的巨大危机的连锁反应。德西乌斯统治的只是罗马欧洲和北非的一部分，带去作战的部队只是帝国军队的一小部分。这是一次重大失败，但部队损失并不大，不至于威胁帝国的完整。随后发生的事件也表明了这一点。253年和254年，多瑙河流域又发生了攻击，但没有什么效果；哥特人随后放弃了沿多瑙河攻击的做法。我们可以自然得出结论：德西乌斯的继任者已成功将其封闭。

不久，不同群体组成的袭击队伍从另一条线路发起攻击，他们连续三年（255—257年）乘船渡过黑海，进入小亚细亚。[16]第一次远征以黑海东南岸的皮提乌斯（Pityus）为目标，但没有成功。第二次远征中，他们成功洗劫了上一年的目标和特拉佩祖斯［Trapezus，现在的特拉布宗（Trabzon）］。我们的主要资料称发起这些袭击的人为“Boranoi”，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只是“北方人”。257年的第三次远征似乎规模更大，显然有哥特人加入，比提尼亚（Bithynia）和普罗彭提斯（Propontis）被毁，卡尔西登（Chalcedon）、尼科美底亚（Nicomedia）、尼西亚（Nicaea）、阿帕梅亚（Apamea）和普吕萨（Prusa）等城市遭到了破坏。接着我们的资料出现了缺口，尽管资料有各种问题，但这可能反映出攻击停止了或者强度降低了；然后在268年，一支庞大的海上远征军离开了黑海北岸。这支军队中有一部分是哥特人，但也包括其他一些日耳曼人，特别要提到的是赫鲁利人（Heruli）。新的远征军并没有直接渡过黑海，而是沿着北部和西部海岸移动，始终在陆地附近，一路上袭击沿海城市，比如安奇阿卢斯（Anchialus）。他们也攻击托米（Tomi）、马西安诺堡、基齐库斯（Cyzicus）和拜占庭等城市，但被击退了。然后，侵袭者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进入爱琴海（Aegean）。来自北方的海上袭击者第一次闯入罗马的地中海“内湖”。在此地，远征军分作三大群体，分别袭击了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附近的北巴尔干地区、阿提卡（Attica），以及小亚细亚的沿海腹地。皇帝加里努斯（Gallienus）在巴尔干地区发起反击，但269年重创袭击巴尔干的那一群体的，是他的继任者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克劳狄因其战绩而赢得了绰号“哥特库斯”（Gothicus，意为“打败哥特人的人”）。历史学家德克西普斯（Dexippus）等人在雅典周围率军对抗赫鲁利人；而由首领雷斯帕（Respa）、维杜克（Veduc）和特鲁拉（Thuruar）率领的第三队人马最终在269年被驱回黑海，但他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破坏。罗得岛、塞浦路斯岛以及大陆上的西代（Side）城和伊利昂（Ilium）城遭到破坏。此次袭击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损失应该是以弗所（Ephesus）的狄安娜神庙被毁。[17]

罗马的反应非常激烈。这几个群体都被打败了，而且再也没能通过达达尼

尔海峡发起重大的进攻。与德西乌斯战败后的多瑙河流域一样，我们只能推测，攻击线路已通过有效对策封锁。但是，哥特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270年，又发生了越过多瑙河的攻击，安奇阿卢斯和尼科波利斯（Nicopolis）遭到洗劫。不过，新皇帝奥勒良（Aurelian）随后在271年带着部队来到多瑙河以北，彻底打败了名叫卡纳包得斯（Cannabaudes）的哥特领袖——据说此人要为最近的暴乱负责。奥勒良的反击将新的威胁扼杀在萌芽状态。3世纪70年代中期，又发生了一些海上袭击，本都（Pontus）更是遭到洗劫，但再没有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巴尔干半岛的袭击了。皇帝击败哥特人带来了一些慰藉，他还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组织了特兰西瓦尼亚达契亚的有计划撤离。[18]

与在西部阿格里-戴可美特进行的类似撤离一样，关于放弃达契亚的过程，我们只有很少的信息。但叙事证据和钱币库都表明，3世纪的攻击大多绕过了达契亚的边境而进入巴尔干半岛，或者越过黑海进入小亚细亚，而没有直接影响该省本身。因此，这样的撤离似乎更多是出于战略设计，而不是因直接的军事灾难而仓皇撤退。奥勒良可能多少考虑过缩短边境线。达契亚是多瑙河以北的突出部分，需要在三面进行防卫。撤离达契亚后，罗马在东南欧的边境线可以缩短差不多800千米。达契亚还可以充当给讨厌的外来者的新奖品，让忙于争夺的他们不至于进一步攻击罗马领土。欧特罗庇厄斯（Eutropius）在4世纪写道，达契亚“现在”（369年）被泰法尔人（Taifali）、维克图阿里人和特温吉人割据。奥勒良将军事成功与战略撤离相结合，消除了越境攻击的大部分动力，但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的多瑙河边境才能完全恢复秩序。[19]和莱茵河流域一样，直到四帝和君士坦丁大帝发动进一步军事行动后，哥特人和其他族群才接受了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那种半附属国身份。

但是，在3世纪的行动中如此重要的哥特人到底是什么人？罗马帝国东欧边境的大规模骚乱持续了两三代人的时间，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毋庸置疑的是，哥特人统治的出现表明，罗马帝国在多瑙河下游边境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出现了重大变化。在1—2世纪，罗马主要面对的是讲波斯语的游牧萨尔马提亚人和定居的达契亚人。到了4世纪，被称为“哥特人”的群体已成为罗马在该地区军事和外交行动的焦点。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哥特特温吉人成了帝国在多瑙河下游地区之外的主要附属国。我们刚刚概述的事件也表明，在这中间的一个世纪里，帝国受到的跨境军事威胁和跨海军事威胁大幅增加。1—2世纪时，那种经达契亚、跨过黑海或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而来的攻击是闻所未闻的。

对于这些情况，传统上会认为，日耳曼移民是这场战略革命的关键因素。1—2世纪，黑海以北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哥特人”，该地区会被提到的部落只有萨尔马提亚人和达契亚人。我们听说的当时唯一一个哥特群体居住

在波兰北部。那么，移民论就是一锤定音了吗？不完全是。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Michael Kulikowski）最近提出，对黑海以北形势发展的传统观点是“受制于文本”造成的假象。库利科夫斯基本人不是考古学家，但这是从考古学家的行话中借来的术语，用于描述这样一种情况：一心希望考古学发现符合现有的历史证据，因而对考古证据做出扭曲的解释。就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而言，现有的3世纪史料远非完善，有一本6世纪的《哥特史》，作者是个叫约达尼斯的人，书里写到哥特人在一个叫菲利默的国王（King Filimer）的统治期间迁移到黑海。库利科夫斯基认为，这个说法不仅本身不可信，而且还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其他证据的看法造成了不当影响。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一陈述，其他考古和历史证据根本不会让任何人想到有人口迁徙这件事。3世纪的麻烦、4世纪哥特人统治的兴起，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人口迁徙，而在于该地区既有人口在社会政治方面的重组，这一重组和催生罗马后期西部的新日耳曼联盟的重组大致相同。[20]他说得对吗？

他的论点有两个可信的方面。首先，没有人怀疑社会经济和政治重组，即“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4世纪的哥特特温吉人有复杂的联盟政治结构、成熟的社会等级制度，其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形态也远远超出了1世纪时日耳曼尼亚的常态。他们的政治结构基于世袭权力，而且相当稳固，经受得住重大失败的考验，还能形成连贯的策略来扭转最坏的后果。其次，库利科夫斯基说得对，我们根本不该相信约达尼斯。约达尼斯的写作时间在事件发生300年后，他对4世纪哥特世界的看法可以说是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一点我们很快会详细讨论。[21]如果他对4世纪哥特历史的看法错得如此离谱，那他对3世纪的描述也同样值得怀疑——哪怕我们没有足够的当时资料，没法系统判断。但是，即使我们认可这两方面观点，仍然有足够的高质量证据表明，来自北方的日耳曼移民是3世纪战略革命的一个主要因素。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罗马在多瑙河下游边境地区面对的力量与从前不同了，这种变化远不是换了个标签这么简单。1—2世纪，喀尔巴阡山脉的东部山麓——如今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被许多达契亚群体占据。图拉真征服特兰西瓦尼亚时，这些群体并未直接受到罗马的统治。3世纪，它们之中形成了某种政治统一，后来被统称为卡皮人（Carpi）。紧邻黑海北部的主要萨尔马提亚群体是罗克索拉尼人，1世纪初，该群体和艾兹吉斯人一起打破了讲日耳曼语的巴斯塔奈人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随后，艾兹吉斯人迁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罗克索拉尼人则留在了东边，统治着本都的古老希腊城市（该城市在3世纪还保有一些独立性）。图拉真征服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后，萨尔马提亚人和达契亚人成了至少半臣服于罗马的附属群体，虽说没有被正式纳入帝国。因此，哥特人和其他讲日耳曼语者突然在该地区占

据统治地位，代表着重大的文化转变。而毫无疑问的是，此地的新哥特主人说的是日耳曼语。乌尔菲拉（Ulfil）为其中一些人翻译了哥特语《圣经》，他是哥特人在小亚细亚俘虏的罗马人的后代，这本《圣经》的日耳曼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哥特人的出现，意味着罗马东北边境地区的势力在肤色和身份上都有了重大的变化。[22]

当然，并不是说这是讲日耳曼语者首次在该地区成为统治阶层。在第一千年开始时被萨尔马提亚人征服的巴斯塔奈人也是日耳曼人。所以理论上说，是有可能把3世纪黑海以北哥特人统治的兴起，解释为1世纪处于臣服地位的那些日耳曼群体的重新崛起的。不过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新的日耳曼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达契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统治的时期，被称为哥特人——也可以说是“Gothones”或“Guthones”——的群体远远地居住在西北方的土地上，靠近波罗的海。塔西佗在1世纪末说它们居住在那里，托勒密在2世纪中期也是这么说，托勒密明确地说哥特人是居住在维斯瓦河河口的群体之一。尽管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音译不尽相同，但是语文学家们毫不怀疑，“哥特”就是那个3世纪时突然从波兰北部迁移到黑海的群体的名字。哥特人不是个例。在我们的资料和学术讨论中，涉及哥特人的内容很多，但其他日耳曼群体也参与了这一行动。赫鲁利人我们在前面提过了，另外，3世纪后期和4世纪早期的资料记载，喀尔巴阡山脉及其周围存在说日耳曼语的格皮德人（Gepids）、汪达尔人、泰法尔人和鲁吉人。鲁吉人和哥特人一样，在塔西佗时代住在波罗的海沿岸，而同一时期汪达尔人最有可能居住的地方是波兰中北部，在哥特人和鲁吉人的南边。汪达尔人和鲁吉人与哥特人同时在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出现，说明这些群体经过了大规模的迁徙，所有人都从波兰向南和向东迁到了本都。塔西佗没有提到赫鲁利人，但在4—5世纪，第二个非多瑙河流域的赫鲁利群体又定居在遥远的西北方向，这也意味着多瑙河流域的赫鲁利人可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迁徙到了那里。格皮德人和泰法尔人与赫鲁利人一样，在3世纪末首次出现在资料里。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再讨论这些“新”日耳曼群体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还想了解更多信息。历史证据尽管有明显的不足，但总体上倾向于支持，一波日耳曼扩张浪潮——大致从西北向东南迁移——促使奥勒良改变战略，放弃特兰西瓦尼亚高地。这样的结论只能靠推断得出。当时的罗马资料没有明确描述日耳曼人迁徙的情况，只谈到了其影响——这些新群体越过罗马边境发起的攻击。如果“哥特”是唯一一个在这些年中改变位置的欧洲中北部日耳曼群体名，那么还有可能说这不过是名称偶然相同，但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并不是只有“哥特”。既然如此，没有理由不接受历史证据表明的情况。1世纪时萨尔马提亚游牧民族到来的影响在3世纪得到了翻转，日耳曼人对喀尔巴阡山脉以东的统治曾因巴斯塔奈人及其

盟友被推翻而丧失，而3世纪哥特人、鲁吉人、赫鲁利人和其他说日耳曼语的群体的迁徙则恢复了这样的统治。[23]

这一过渡性的结论得到更广意义上的两方面历史证据的支持。首先，黑海以北哥特力量的崛起最终迫使一些原本住在那里的群体完全撤离该地区。我们很快就会详细讨论的是，在公元290年后大约25年的时间里，大量（但不是所有）来自喀尔巴阡山麓的说达契亚语的卡皮人被纳入罗马帝国。他们出走，有可能是因为本地群体之间竞争加剧，但更有可能是大规模日耳曼移民到来的结果。其次，卡皮人出走后，新的哥特群体进入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和以东的平原，但仍保持高度流动性。4世纪30年代，哥特特温吉人曾计划带着所有家当搬到多瑙河中游地区，从4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与同为哥特人的格鲁森尼人一起搬迁到罗马帝国的新家（下一章会讨论）。他们在一次迁徙后继续保持流动性，这很值得注意，因为如我们所见，比较研究一致表明，迁徙是一种在特定人群中建立起来的文化习惯。发现4世纪的哥特人仍具有流动性后，我们就更有理由接受他们或他们的祖先在3世纪也具有流动性的证据了。这两方面本身并非无可置疑，但都强化了相关历史证据，表明哥特移民在重塑3世纪黑海以北战略形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4]

此外，冷战留下的考古遗产让我们的讨论得以突破历史资料的限制。在约公元150年和3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维尔巴克文化系统再次扩张，先是大规模向东南进入波来希［Polesie，普里佩特沼泽，（Pripet Marshes）］和波德拉谢（Podlachia），然后进入沃里尼亚（Volhynia）和乌克兰北部。以地理范围来看，马科曼尼人战争前后出现的早期维尔巴克扩张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这段时间里，波美拉尼亚西部的维尔巴克定居点和墓地不再有人使用，也就是说，维尔巴克群体的中心发生了很大的迁移（地图6）。考虑到新近在黑海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日耳曼群体中，哥特人，可能至少还有鲁吉人，都源于1—2世纪的维尔巴克系统，上述发现实际上很能说明某些最终来到黑海的日耳曼人可能采取了怎样的路线。一条定年大致正确的维尔巴克墓葬带从维斯瓦河上游一直向南延伸到德涅斯特河（Dniester）上游（地图6）。这在年代方面肯定与238年哥特袭击者突然出现在希斯特里亚城外关系密切。[25]

然而，这一时期本都北部在考古上真正引人注目的发展并不是维尔巴克系统本身的进一步传播，而是一系列融合了维尔巴克特征的新文化系统的产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尔尼亚霍夫系统，截至4世纪中叶，该系统已经遍布多瑙河和顿河之间的广袤区域（地图6）。这又是一个例子：文化系统的年代和身份在以往曾有很多争议，但其基本特征如今已得到确定。已经发现了5 000多个定居点，发掘出许多混合了火葬和土葬的大型墓地，从遗存看，该系统无疑从3世纪下半叶一直繁荣到公元400年（或者略晚一

些）。在年代和地理位置方面，该系统的遗存与（可靠的同时代资料描述的）罗马时代晚期哥特人的统治是吻合的；如今普遍认为，该系统可以反映哥特人（可能也包括其他讲日耳曼语者）在黑海以北创造的世界。

这一新系统的某些要素与它西北面的维尔巴克系统的要素相似甚至相同，但重要的是认识到维尔巴克系统自身仍在延续；根本不存在完全撤离波兰北部这种事。一些陶器是相同的，手工制作的维尔巴克碗形陶器在早期切尔尼亚霍夫地层特别多见。另外，扣针类型和女性服装的风格（两肩处佩有成对的扣针）与维尔巴克地区发现的多有相似。一些房屋类型，特别是人类和动物共居的长屋（德语是Wohnstallhäuser），在两个系统的至少某些区域中都很常见。虽然目前还没有全面的比较研究，但很引人注目的是，将维尔巴克墓地和中北欧相邻地区墓地区别开来的两种风俗，也能在切尔尼亚霍夫区域中找到。两个系统的葬仪都是土葬和火葬并存的。另外，维尔巴克地区的人并没有将武器（或任何其他铁制物品）与男性死者一起埋葬的习惯，切尔尼亚霍夫葬仪也是如此。

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其他特征则起源于别处。虽然在早期经常使用手工制作的维尔巴克陶器，但更为复杂的轮制陶器（有点像罗马行省的陶器）很快成为该系统的特征。除了肯定起源于由日耳曼主导的中北欧文化的长屋，许多切尔尼亚霍夫地区还有一种常见房屋，就是下沉式或半下沉的小屋（德语为Grübenhaus）。后面那种小屋一直是喀尔巴阡山脉东麓及更远地区的特色，在1—2世纪的维尔巴克或任何其他日耳曼北部定居点都没有发现这样的建筑。考古挖掘者偶尔还会在切尔尼亚霍夫墓地内发现萨尔马提亚墓葬的一个特有做法：在坟墓内的架子上放置物品。显然，在因北方日耳曼人向黑海迁移而形成的新混合体中，一个萨尔马提亚人口群体始终扮演着角色。[26]

对这些遗存的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争议。1906年，第一批切尔尼亚霍夫的物品刚出土，人们就发现它们与中北欧典型的日耳曼物品颇为相似，特别是在金属做工方面，而识别出维尔巴克系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很快，这些物品与历史资料中的哥特人迁徙联系在了一起，还在纳粹时代被用来扭曲地证明侵占东欧领土是合理的。纳粹官员甚至还用哥特大英雄的名字来重新命名黑海地区的城镇，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要改名为“狄奥多里克港”（Theoderichshafen；狄奥多里克是5—6世纪时的伟大哥特领袖。见第七章）。简言之，“侵略假说”被生生套用到了这些物质遗存上。既然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边都发现了同类型的金属制品，那么来自波罗的海的人群必然取代了后者，驱逐了原本住在黑海边的人——公平地说，这一观点在卡皮人离开的记录中得到了一些支持。

但即使抛开政治不谈，如此看待这么复杂的证据也太简单化了。虽然切尔

尼亚霍夫系统的遗存中有清楚的维尔巴克印记，但也包括了很多非维尔巴克的元素。而物品和习俗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不通过大量人口流动的机制（人口迁移）也可以实现。物品可以交易，技术和习俗既可以被采用，也可以独立发展出来。尽管切尔尼亚霍夫系统与其维尔巴克邻居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该系统的建立本身不能证明发生过人口迁徙。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反迁徙论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如果没有约达尼斯对哥特人迁徙的记录，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遗存之间可见的相似之处并不足以让人想到移民。

但在我看来，即使排除了约达尼斯的文字，还是有足够的历史证据支持人口迁徙是改造本都沿海地区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而且，考古证据比反迁徙论文献所主张的更具说服力。在查看物质遗存之前，应该先知道我们可能会找到什么。除非你想研究的是入侵人口将原住人口几乎全部赶走或者某地第一次有人定居这么罕见的情形，否则人口迁移留下的考古痕迹是不会太明确的。在移民与原住居民混居的情况下，移民的物质文化中只会有少数或极少数要素进入新的地方，也就是那些有意和无意中与深入人心的信仰或行为模式相关的要素。在其他生活领域，移民很可能会顺手接受本地文化的要素（许多现代移民就是如此），或成为移民人口和当地人口碰撞后形成的新文化聚合体中无法单独识别的成员。简而言之，你能找到的反映人口迁移的考古证据必然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光凭考古证据模糊这一点，是无法证明人口迁移不存在的。

但就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个例子而言，说明存在人口迁徙的考古证据实际上颇为扎实。我必须补充一句，这不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对材料进行过详细研究的上一代专家的一致判定。值得强调的是，这些专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私念。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人物是卡齐米日·戈德洛夫斯基（Kazimierz Godlowski）和马克·休金，前者是波兰人，后者是俄罗斯人。早年间，两人都不得不与管理知识分子的官僚机构艰苦斗争，这些机构坚持着与他们观点迥异的看法。戈德洛夫斯基的工作有助于破除旧的正统观念（我们在第八章还会讨论），即“隐藏的”（submerged）的斯拉夫人一直占据着波兰领土。休金则最终将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年代确定到3世纪晚期和4世纪，并由此将它与哥特人联系起来，而这又与苏联官方确立的意见相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官方都决意将遗存中相对先进的部分定为属于早期斯拉夫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夸大讲日耳曼语者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作用，是根本不符合波兰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利益的，因此，这不可能是戈德洛夫斯基和休金为自身利益而玩起的学术游戏。他们一致断言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系统之间有着深层联系，其原因并不难想到。

如果比较1—2世纪发展起来的维尔巴克系统与3世纪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

和黑海以北产生的新系统，我们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不是几件物品转移或几样技术传播这么简单，明显得多的文化特征表现出了相似，包括体现社会规范（女性服装）、社会经济生活策略（长屋）乃至深层信仰体系（葬仪）的习俗。同样惊人的是，维尔巴克的陶器在切尔尼亚霍夫发展的早期阶段无处不在，而且维尔巴克系统在前几代人的时间里沿东南方向急剧扩张，一直扩张到将出现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地区的边界。[27]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无事可做了。比方说，如果能有一本全面的专著来比较两个系统的墓地中火葬与土葬的普遍程度，并适当关注区域差异，那就太好了。我还希望最终能有一部专著，详细讨论切尔尼亚霍夫系统广袤疆域内不同区域的不同农业策略。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长屋？下沉式的小屋又在哪里流行？考虑到在积累起大量信息前，人口迁移往往只以"渠道化"的形式进行，我想，前述两种研究思路可能有助于确定移民更为集中的地方，并通过推理找出原住居民人数占优的其他地区。然而，即使只凭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两个系统间的相似之处也足够突出和深入，可以得出考古材料确实支持了历史证据的结论，也就是说，来自西北方向的移民的确在3世纪黑海北部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马科曼尼人战争一样，3世纪人口迁移的证据基础并非完美，个别证据的可信程度也会受到质疑。尽管如此，考虑到那些表明移民关键作用的历史和考古证据，彻底的反迁徙论解读只能是诡辩。总的来说，我们已经可以认定，大致顺罗马帝国沿河边境而来的日耳曼移民从2世纪中叶开始发挥作用，扰乱了蛮族欧洲的既有局面，并在3世纪加强了势头。西部有一些移民，东部移民更多，这两个地区的移民现象与其他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同时发生，而这些变革产生了4世纪日耳曼尼亚的新联盟。但接受这个观点后，更多的问题随之到来。人口迁移有多种形式，迁移的原因也有许多，而且可能相互关联。3世纪日耳曼人口迁移的性质和规模怎样？具体过程如何？归根到底，人口迁移是什么引起的呢？

移民和日耳曼人

关于与马科曼尼人战争相关的人口流动的细节，并没有同时代的史料保存下来，不过6世纪约达尼斯的《哥特史》中确实有一段叙述，提到了3世纪的哥特移民。约达尼斯本人有一部分哥特血统。他描述了哥特人向黑海的迁移：

> 此时人口大大增加，加达里克（Gadaric）的儿子菲利默在位……他决定让哥特军人及家眷离开（波罗的海附近的）那个区域。为了寻找合适的家园和宜人的地方，他们来到了斯基泰的土地，在他们的语言

> 中叫“艾乌姆”（Oium）。他们欣喜地看到此地有大量财富。据说在一半的军队到达后，他们过河的桥梁彻底倒塌，之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渡河往来。据说这个地方被沼泽地和一个环形的深渊包围。大自然造成这种双重障碍，使人难以进入此地。即使在今天，邻近的人们还可能会听到牛的低哞，甚至可能发现人类的痕迹——如果我们相信旅行者说的故事的话，但是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远远地听到这些声音的。据说这部分越过河并与菲利默一起进入艾乌姆的哥特人拥有了想要的土地；他们很快遭遇了斯帕里（Spali）人，与他们战斗，最后赢得了胜利。然后，胜利者匆匆赶往斯基泰最边缘的地方，也就是黑海附近。[28]

约达尼斯在此描述的，简直是侵略假说的一个教科书式例子。一位国王和一群人集体搬到新地方，击败原住居民并占有了土地。这些将近300年后写下的话，与3世纪的现实有多大关系呢？

人口迁移过程

从存留下来的年代比较接近的史料看，当时的迁徙过程比约达尼斯在晚得多的时代描述的要复杂得多。首先，参与迁徙的是一系列日耳曼群体，而不仅仅是哥特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与约达尼斯描绘的有很大不同），不管是哥特人还是迁徙的其他参与者，都不像约达尼斯所写的那样以一位国王加一个民族的模式，作为团结紧密的群体一起迁徙。事实上，哥特人的迁移最能体现这一点，相关的同时代证据也最完整。资料告诉我们，哥特群体以不同方式生活在广阔的地理区域内：从多瑙河河口德西乌斯皇帝阵亡的地方，到克里米亚（之间距离近1 000千米）及更远处的陆地和海洋。他们的行动高度分散，相应地有一系列哥特领袖：刻尼瓦、阿盖斯、刚特里克、雷斯帕、维杜克、特鲁拉和卡纳包得斯。有些群体彼此结成同盟，但可靠的同时代资料中没有提到有谁是全部哥特人的国王，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没有提到约达尼斯笔下的菲利默。[29]

3世纪这些群体的分头行动，最终产生的并不是一个4世纪的哥特王国（如果是一次组织良好的土地掠夺行动，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而是好几个。受约达尼斯的影响，人们常常认为我们讨论的事件在黑海以北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哥特政治实体：西哥特人（Visigoths）和东哥特人（Ostrogoths）。但约达尼斯是把6世纪的哥特政治模式套用到4世纪了。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在5世纪建立了西罗马的继承国，可以证明，这两个群体都是5世纪在罗马的眼皮底下和罗马的土地上新形成的，我们之后会再讨论。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资料，让我们可以看到4世纪哥特人统治之下本都以北的世界的全景——总不能事事如意。但是，在公元375年之后

的差不多50年里，当时的历史资料中出现了至少6个独立行动的大型哥特人群体。每个群体都可能源自一个政治独立的4世纪哥特单元；也就是说，那次迁徙产生了6个甚至更多个哥特政治实体，而不是只有两个。3世纪的哥特人分头独立行动，的确可能形成多个实体。在这一点上，和哥特人有关的记录最多，但它也适用于其他群体。在268—269年的海上大突袭中，赫鲁利人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小组，一组在阿提卡与哥特人合作，另一组在马其顿围攻塞萨洛尼基。3世纪的人口迁移根本不像约达尼斯"一位国王、一个民族、一次移动"的公式那么简单。[30]

3世纪的模式在另一个层面上背离了侵略假说模型：从前不为人知的日耳曼群体首次出现在史料中。赫鲁利人、格皮德人和泰法尔人都是在3世纪甚至4世纪初的史料中首次亮相的。这些群体也有可能之前就存在，只是被忽略了；但是，列出名称并不是什么难事，1世纪塔西佗和2世纪托勒密的列表又似乎相当完整，因此有理由认为，史料中没有提及那些群体，这一点值得关注。在种种动荡中，有新的日耳曼群体被创造出来也不奇怪。正是在这个时期，阿勒曼尼和尤吞吉（Iuthungi）这两个新的群体出现在西部，我们也知道，日耳曼群体就是起起落落的。像所有人类组织一样，这些群体可以被创造，也可以被摧毁。从我们拥有的资料看，罗马时期日耳曼的政治模式似乎非常多变。例如，在1世纪，塔西佗描述了巴达威的建立。巴达威人最早是卡狄人的一个分支，后来脱离大群体，有了自己的名称，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塔西佗的作品还提到了其他三个群体在不同时期消亡的过程：安普希瓦力、卡狄（这表明巴达威脱离卡狄有多么明智）和卜茹克特累。因此，可以合理推断，格皮德、赫鲁利和泰法尔是3世纪新出现的群体。[31]

事实上，就算是在约达尼斯的作品里，也能看到这一更为复杂现实的痕迹。他对哥特移民的所有描述中，社会政治分裂这一主题都很突出。菲利默迁徙时，一座桥倒塌了，将一些哥特人和大部队隔开。他还提到过之前的一次哥特人迁徙，当时是从斯堪的纳维亚来了三艘船。那次也有一艘船掉了队，而约达尼斯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此次掉队，才产生了格皮德人。尽管极端怀疑的观点在某些圈子中相当流行，但实际上这两个故事很可能是与哥特口述历史相呼应的（哪怕隔了一层）。这样说的话，那些历史虽然往往将人口迁徙描述为国王和民族的迁徙，但也多少记录下了更深层的现实：人口迁移的核心特征是政治上的不连续性，而不是整个已有的社会单元简单地从A点转移到B点。[32]

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考古证据也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虽然可以合理地认为，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系统之间的广泛相似性说明两者间有大量人口迁移，但维尔巴克系统本身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到5世纪都继续存在，基本还是在切尔尼亚霍夫领地西北的老地方。考古学家也发现了

一些过渡性的物质文化系统，地理位置介于两者之间。人们仍在讨论，这些系统究竟是完全独立于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两大系统存在，还是其中一个系统的变体；我们还应注意，不要马上将这些文化系统和3—4世纪资料中提到名字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物质文化边界可能是政治边界的反映，但正如我们所见，不能认为一定如此。无论如何解释——也有可能在经过仔细考察后，整个切尔尼亚霍夫系统最终会被重新划分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区域群体，马斯旺门兹（Masłomecz，形成于约180—220年）、鲁兹坎坎（Ruzycankan）和沃里尼亚（形成于约220—260年）等群体都非常清楚地表明，移民产生的与新的政治秩序相呼应的物质文化，很明显不是单一的。并非所有参与南迁的维尔巴克群体结果都相同。有些群体走上了参与创建切尔尼亚霍夫系统和其他新群体的道路，有些群体换了环境，但多少保留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有些群体则选择不迁徙。[33]

因此，3世纪人口迁移的主体不是整个人口群体，而是一系列子群体，各个子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运作，和许多现代移民的模式很像（见第一章）。与马科曼尼人战争相关的一些迁移可能也类似。显然，不是所有伦巴第人都参与了引发战争的对潘诺尼亚的攻击。大约350年后，也就是公元500年前后，伦巴第人才大量移居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这块地方；在那之前，大部分人可能一直居住在易北河北部地区。3世纪西部的日耳曼移民基本上也是如此。相关的叙事证据更少，但考古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阿格里-戴可美特并不是被一举占领的。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4世纪阿勒曼尼的政治权力仍然处于分散状态，这可能反映了群体分批进入新领地的移民早期阶段。在罗马人于公元260年前后放弃这片土地后不久，似乎有群体迁了进去，但在其他地方，迁入过程要慢得多。例如，在美因河中游地区，要到4世纪初，也就是差不多两代人之后，易北河-日耳曼物品才取代了莱茵-威悉物品。[34]因此，3世纪时，东部和西部迁徙的群体是分散、多样的，并没有“整个”民族大规模占领土地的事发生。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描述那些参与迁徙的人口群体呢？

一些移民小群体是急于建功的战队：在一个特别著名的战士的领导下，由几百名年轻人组成的较小的群体。建立小型的有组织武装团体（比如因艾斯博尔沼泽遗址而为后人所知的那个小队）是罗马时期日耳曼社会的一个特征。一些战队由国王领导，另一些战队的成员则关系较为平等。因此，如果一些考古遗存暗示有此类战队参与了3世纪的迁徙，我们不用感到奇怪。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出土了切尔尼亚霍夫时代早期的一些墓地——科济亚-雅西（Cozia-Iasi）、托迪热尼（Todireni）和布拉尼斯特（Braniste），这些墓地不同于切尔尼亚霍夫和维尔巴克的墓地，死者有武器陪葬。从其他的陪葬品看，埋葬在这些墓地里的人是从北方来的日耳曼入侵者。但墓葬中有武器随葬，表明这些群体起源于维尔巴克系统之外，可能来自南边的普热沃斯克地区。这些墓地都不大，与寻求财富的小

型普热沃斯克武装团体的形象吻合。[35]对于沿维斯瓦河上游和德涅斯特河延伸的维尔巴克墓葬带，如果可以全面考察墓葬主人的年龄和性别，会非常有意思。这样的研究应该能反映出，在这类小型的移民子群体中，都是某个年龄段和某个性别的人较多，而不像常规群体那样各种年龄性别的人都分布得比较平均。西方的迁徙情况应该基本类似，毕竟阿格里-戴可美特也不是被一举占领的。

但不是所有3世纪的活动都可以通过几百个人组成的小群体来解释。不管皇帝德西乌斯的统治范围多么有限，如果哥特领袖刻尼瓦只拥有数百名而不是数千名武装随从，他都不可能击败德西乌斯。据说哥特人和赫鲁利人被克劳狄二世在塞萨洛尼基击败时，损失了数千人。你当然可以怀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和确切性，但克劳狄二世显然是打了一场很大的仗；至于268—269年的海上突袭（前述的遭遇战是其中一部分），倘若攻击方没有那种损失数千人仍能打仗的兵力的话，是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的。[36]来自马科曼尼人战争的证据是相似的。一些行动可以用战队来解释，但不是全部。例如，狄奥·卡西乌斯写道，伦巴第人和乌比人第一次向潘诺尼亚发起进攻时，召集了6 000名男子；而夸迪人为了摆脱奥勒留皇帝的惩罚性限制，一度打算“整体迁移到塞姆诺奈人的土地”上，此地在易北河和奥得河的更北面。[37]罗马人用自己的反制措施阻止了夸迪人的计划。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打算出发前往北方，但证据明确表明，数千人的日耳曼群体当时正考虑出发上路。

在迁徙的日耳曼人中，至少某些群体人数很多，这也可以从它们迁入地发生的事上看出来。例如，哥特人和其他跋涉到黑海的人并不是与世隔绝的。238年，哥特人攻击希斯特里亚以后，罗马人答应给这些攻击者年度补贴，条件是他们退出城市并释放俘虏。这引起了当地卡皮人的抗议，他们说自己比哥特人“更强大”。我们知道，卡皮这个群体是一群所谓自由的达契亚人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摩尔达维亚腹地建立起来的，属于半臣服的附属国，但从未受到帝国的正式统治。哥特人和其他讲日耳曼语者扩张进入边境地区，与这些达契亚群体产生了竞争。渐渐地，该地区哥特人的力量越来越大，卡皮人则日益衰弱。最后，卡皮人完全落败。他们完全失去了政治独立性，很多人——按照罗马的资料说有数十万人——在公元300年前后被重新安置在帝国境内。[38]我们当然还是可以质疑数字的精确性，但总体情况是毋庸置疑的。从4世纪初开始，卡皮不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迁到了多瑙河以南。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讲日耳曼语的哥特人取代了原来住在那里的说达契亚语者，成为喀尔巴阡体系的主导力量。

我们知道，对于边境地区的竞争，帝国有个固定的应对方式，就是将一些受到惊吓的移民纳入帝国。接纳纳累喜人就是马科曼尼人战争解决方案的

一部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359年时也打算这样对待一些利米刚特人。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公元300年前后将大量卡皮人从边境地区撤出，是为了解决3世纪出现的新问题。卡皮人不是唯一的输家。更往东，日耳曼移民征服了萨尔马提亚王国和本都的古老希腊城市，他们到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帝国撤离了特兰西瓦尼亚高地。[39]不是所有的卡皮人都迁移到了多瑙河以南，特兰西瓦尼亚以及本都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原住居民仍然留在原地。不管怎么说，大规模的重新安置和对该地区战略局势的彻底重塑都表明，罗马现有的边境安全措施已经被说日耳曼语的外来人口的大举入侵破坏了。总而言之，我们所说的这些日耳曼群体，是可以随时将数千人投入战场的群体。只有几百人的群体恐怕永远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西方的模式并不完全相同。没有如此大规模冲突的记录，而且由于阿勒曼尼人在阿格里-戴可美特占有了被遗弃的领土，他们并没有那种要逐出现有住民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行动的规模都非常小。在阿格里-戴可美特之外，阿勒曼尼人给住在当地的其他日耳曼群体施加了压力，其中就有最终在美因河中游输给阿勒曼尼人的莱茵-威悉群体。这可能也需要更统一的群体行动。同样（我们稍后详细讨论），前来的勃艮第人数量够多，可以保留自己独特的东日耳曼方言。另外，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在4世纪时常相互竞争，这样的竞争可能在3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促进阿勒曼尼人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群体行动的另一个因素——这也完全符合我们掌握的关于阿勒曼尼人群体动态的证据。

阿勒曼尼联盟是经过漫长的政治过程才形成的。例如，3世纪的资料第一次提到阿勒曼尼联盟时，尤吞吉人还不在联盟之内。但到了4世纪中期，他们就已进入联盟，控制着若干区域中的一个，而这些区域之间往往有上位王和下位王的协议（第二章）。这个过程始于3世纪早期。一度流行一种主张，就是第一份提到阿勒曼尼联盟的材料不会早于3世纪90年代。若果真如此，那么自然应该认为，3世纪时对莱茵河这个地区的袭击和土地掠夺是由独立的战队进行的，这些战队夺取阿格里-戴可美特后才开始建立更大的团体结构。但是，这个年代定得太晚了。早在213年，皇帝卡拉卡拉就在与阿勒曼尼人作战了。虽然此时的阿勒曼尼联盟还没有接纳那些将在4世纪成为其一部分的子群体，但这确实说明联盟在3世纪初已经开始了重大的政治重组；因此，即便是这个时候的阿勒曼尼联盟，也不仅仅是一些战队的集合。[40]既然如此，西方的情况可能与同时期喀尔巴阡东面的情况非常相似，参与行动的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群体，当然也包括战队。

实际上，这些武装扩张的模式大概可以用一个更普遍的逻辑来解释，因为东方的证据在一些关键方面让人联想到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西欧的扩张，关于那次扩张的记录比较详细。一开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行动规模也很小。被记录下来的最早事件仅涉及3船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于790年

左右在英格兰南部海岸造成了麻烦。小规模行动持续了1.5代人的时间，但从9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较大的联盟战队开始在西部水域活动，行动的规模变大了；有些联盟由“国王”或“伯爵”（jarl）率领，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本来就很有地位。结盟的趋势在9世纪60年代的“大军时代”达到顶峰，当时几个较大的群体开始以新的方式结合，以实现那些需要更强的兵力才能达到的目的。就维京人而言，他们的目标是击败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克王国的军队。所有这些都让人想起3世纪日耳曼人的扩张模式。日耳曼群体的扩张也很可能是从小规模袭击开始的，但洗劫罗马城市、击败罗马皇帝、夺取既有边境附属国的资产都需要更强的兵力，因此像维京人的情形一样，新的联盟在日耳曼移民中形成，以便为新的冒险提供相应规模的力量。[41]

我们仍要详细研究的问题是，在扩张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日耳曼移民群体中妇女和儿童所占的比例有多大。维尔巴克系统对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一个显著影响正是在女性服装（至少是女性殡葬服装）方面。如前所述，在这两个文化中，女性的衣服都用风格类似的两个扣针扣起，每个肩膀上有一个，还有相同样式的项链和腰带。3世纪之前，喀尔巴阡山脉的达契亚语群体中找不到这种着装方式。如果没有大量女性（也因此包括儿童）走上南迁的道路，我们很难相信会发生如此惊人的转变。这一点得到如下事实的证明：在3世纪中叶到4世纪晚期的几代人的时间里，这些移民中至少哥特人还在继续说日耳曼语。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以及特别是在10世纪对俄罗斯的入侵，主要是通过小群小群的武装男性完成的，如果日耳曼群体迁徙的方式也和他们一样，那么就像维京时期在罗斯发生的那样，移民会很快采用迁入地原住人口的语言。但是，乌尔菲拉的哥特语《圣经》清楚表明，3世纪的人口迁徙之后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4世纪中期，乌尔菲拉在哥特特温吉人中工作，此时距他们出发向黑海迁徙已经有100年了，移民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仍然是日耳曼语。[42]要是没有哥特母亲将哥特语教给孩子，上述情况就不可能出现。

其他几次人口迁徙的证据更少。但即使在马科曼尼人战争时期，有限的证据也表明一些移民群体中有妇女和儿童。幸运的是，这些证据来自狄奥·卡西乌斯而不是《罗马君王传》，所以可信度比较高。例如，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试图迁移到塞姆诺奈人的土地上未果，当时是全部人口（希腊语pandemei）都打算迁徙。更明确的一个证据是，阿斯丁格汪达尔人在试图夺取之前属于科斯特博赛这个自由达契亚群体的土地时，曾经提出谈判，希望当地一位罗马指挥官能保护他们中间的妇女和儿童。后一项证据更是让我们看到，马科曼尼人战争不可能只涉及年轻男子。[43]

可惜，3世纪西方的相关历史证据非常含糊，以至于最近一位评论家断言，类似行动都是由男性组成的小规模战队执行的，这应该是“常识”。但

在阿格里-戴可美特一些早期的女性和儿童墓室中，发现了外来的易北河-日耳曼物件，因此出于谨慎，不该做上述断言。目前尚不清楚“战队”的兵力是否够强，我们恐怕也不应该一看到“阿勒曼尼”这个标签（哪怕是早期），就认为它指的是联盟性质的政治实体。更正面的证据是，勃艮第人和哥特人都能在长时间内保留自己的语言。有明确证据表明，勃艮第方言具有东日耳曼特性，但证据实际上来自5世纪末，来自西罗马崩塌过程中在罗讷河（Rhône）河谷一带兴起的独立勃艮第王国。也就是说，尽管在西方生活了200年，勃艮第人仍设法保留了他们的独特方言。就像哥特特温吉人的语言模式一样，如果没有至少一些包括妇女儿童的“完整”社会群体从奥得河东部进入美因河流域，这是不可想象的。[44]关于3世纪西方人口迁徙的描述很少，我们必须因此更加谨慎。将当时只有战队在行动的说法当作“常识”，和用侵略假说解释一切没有太大区别，毕竟我们有来自当时东方的明确证据，表明那里的人口迁移模式多种多样。来自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的证据各有不同，但都让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2—3世纪的日耳曼移民群体中，有的是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因此，如果要说阿勒曼尼移民中没有妇女儿童，我会非常犹豫。

至于总共有多少人参与了迁徙，我们无法估计。这方面的数据非常少，最多只能用来猜测受马科曼尼人战争和3世纪日耳曼扩张影响的原住居民的人口规模。但在面对这种证据僵局的时候，比较研究中使用的对大规模迁徙的定性界定就派上用场了。历次人口迁徙对迁入地“政治制度的冲击”非常明确。特别是在3世纪，罗马帝国放弃了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许多卡皮人被逐出了长期居住的家园后进入帝国。留下来的卡皮人，以及独立的萨尔马提亚诸王国和本都沿海北部的希腊城市，最终都臣服于由迁入的讲日耳曼语者创建的新政治体系。从约公元300年开始，日耳曼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就很明确了，他们能建立统治，是数千人，甚至很可能上万人带着武器迁徙的结果。根据如今移民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定性而非定量定义，这显然就是“大规模”移民。当然，在西方也是如此。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的到来，阿格里-戴可美特的撤离，莱茵-威悉群体统治的推翻，甚至早期的纳累喜移民，都必然是发生在受影响地区的重大事件。[45]

这些事件对移民自身也很重要。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新的政治结构形成，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群体。罗马的资料自然关注蔓延到罗马土地上的暴力事件，包括城市被劫掠、越过黑海的袭击，以及卡皮等群体的流离失所。但是，原住群体被征服之后，另一个时有暴力出现的过程展开了，因为各批移民需要在自己人当中确立新的政治秩序。公元300年前后的罗马资料顺便提到了当时在达契亚定居的移民群体间的竞争。[46]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可能就是特温吉联盟，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联盟中一系列国王听命于执政的“士师”。我猜测这些国王出自原本彼此独立的移民群体，通过某些手段，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同意臣服于特温吉统治王

朝。约达尼斯笔下那种整个民族从波罗的海迁移到黑海的图景太过简单，忽视了各个层面的复杂性。

当然，关于2世纪和3世纪的这些移民，有很多情况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当时的情况肯定是人口分批次迁徙，而不是侵略假说模型设想的那种一次性迁徙。某些行动，特别是早期阶段的行动，可能是由战队执行的。但光靠战队的力量还不足以实现见于史料的那些更有雄心的活动，例如永久吞并土地，以及与罗马帝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战斗。某些情况下，人口迁移带来了语言和物质文化模式的转移，这说明一些大型移民群体里不仅有男性，还有妇女和儿童。有些情形确实让人联想起传统的侵略假说，特别是讲日耳曼语者在黑海地区的扩张过程。他们带着武器而来，最终造成大量原住居民外流。日耳曼人对黑海地区的占领过程不像旧的侵略假说那么简单，也不像精英转移那样清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许可以用经过修改的侵略假说模型来描述：移民不是整批涌入，而是小批流入并渐渐发展出势力，大部分原住居民仍留在原地，但人数众多的混合移民群体已经有力地宣告自己成为此地政治上的新主人。

然而，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当时的人口迁徙，就需要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些移民流？为什么移民都朝着罗马边界的方向行进？我们得到的结论，即参与迁徙的有时是混合的人口群体，又带出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在政治动机占主导的时候，现代的确有大型混合群体移民的情况，但此类移民的形式是无组织的难民潮，没有政治领袖，也没有政治方向。在接受大型、混合，以及尤其是有组织的移民群体的证据之前，还有必要回应基于“常识”的反对意见，即扩张活动通常只涉及完全由男人组成的战队。对于为什么一些日耳曼移民群体在试图控制新土地的过程中既派出了战士，也带上了妇女和儿童，有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

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

移民大致朝罗马边境的方向流动，以移民接管的土地计，东方的移民取得了更引人注目的成果。至于移民流动的方向，可以通过在现代移民中起重要作用的两大因素来理解：“信息场域”（fields of information），以及由政治结构创造的整体环境。信息场域在西方起到的作用不需多说，因为阿勒曼尼人不用迁徙太远的距离就能进入阿格里-戴可美特。可以想见，他们此前就已了解或很快就了解了这个迁入地。但是东日耳曼人长途跋涉需要更多的解释。他们对本都以北到底有多少了解？

从波兰中部和北部的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地区到黑海有一条最直接的路线，那就是经喀尔巴阡山脉的外沿，穿过维斯瓦河上游和德涅斯特河河

谷。前文提过，一条经过定年的维尔巴克墓葬带证明这是移民走过的路线。这是中东欧的一条天然通道，而且在公元元年前后的几百年里，交通一直非常繁忙。当时，它是连接地中海世界和波罗的海沿岸琥珀出产地的两大枢纽之一。我们之前说过，地中海世界的珠宝业很看重这种浸没于水中的硬化树脂，它也是日耳曼尼亚的主要出口物之一。因此在这个时代，大量商人沿着这条哥特人迁移的主要路线来来往往，一些维尔巴克人实际上参与了贸易，建造和维护了一系列靠近波罗的海的木桥和堤道。[47]因此，2世纪末和3世纪来自中北欧的日耳曼移民可以利用有关喀尔巴阡山脉南部和东部土地的巨大信息库，并得知有什么可能的路线通往那里。因为有琥珀贸易，他们对这条路线非常熟悉，对路线另一端的社会和环境也有所了解。不过我认为，进一步分析考古证据后，很可能会发现这些东部日耳曼人一开始的迁移是渠道化的，在全面了解该地区的情况之前，他们都聚集在本都北部有限的几个迁入地。

一进入黑海地区，更多的信息场域就开始发挥作用。移民们很快了解到，袭击经济更发达的罗马帝国有可能带来丰厚的收益，他们也知道几条可以发动此类袭击的路线。其中一些路线他们可能已经走过，因为早在他们于238年攻击希斯特里亚之前，就有哥特人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并抗击波斯人了。希斯特里亚袭击发生前30年的一段铭文说明，驻防阿拉伯半岛的罗马军队中就可能有哥特士兵。但是在他们到达之前，移民不可能了解地中海东部及其腹地的地理信息，也不知道黑海对面就是小亚细亚北部那富饶的沿海地区。这些信息很快为移民所知。从3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渡过黑海发动海上袭击。他们所需的情报来自哪里毫无疑问。历史资料明确指出，黑海北岸希腊城市的许多居民是航海专家，他们为这些远征提供了船只和水手。不难想象，他们也从那些居民口中得知，谁能穿过这200多千米、将本都南岸和北岸隔开的开放海域，谁就有可能靠袭击获得丰厚的利润。[48]

3世纪移民的选择既受到与琥珀贸易路线有关的信息的影响，也受到周围世界政治结构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在现代世界中，移民受国家干预；国家通过护照、边境管制和移民政策来引导、鼓励或限制移民流动。古代国家的结构没那么复杂，但罗马帝国在接纳移民群体时确实应用了移民政策，显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3世纪日耳曼移民的流动。

2世纪中叶开始从日耳曼中北欧向外扩张的，不是只有维尔巴克群体。从更西边的易北河河口出发的伦巴第人和乌比人敲响了标志着马科曼尼人战争开始的钟声。我们知道，维尔巴克系统之外的日耳曼尼亚在3世纪仍然活跃。来自易北河三角洲的阿勒曼尼人和来自更东边的勃艮第人，他们的迁徙在重塑莱茵河边境地区的地缘政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时其他日耳曼群体正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扩张。在3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由

日耳曼人统治的罗马欧洲边境地区，其战略形势都以大致相似的方式得到了重构。罗马的战略地位在东方和西方都越来越糟。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移民因素都与更广泛的政治变革一同起作用。在西部，政治重组占主导地位，也最显眼，重组的结果是出现了新的法兰克和阿勒曼尼联盟。而在东部，移民因素占主导地位，因为日耳曼人扩张占据了广袤的土地，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变迁。在他们位于黑海北部的新世界中，移民创造了比欧洲中北部有过的政治结构都更大、更复杂的政治结构。

因素虽然大体相似，但给东西方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大片土地落入讲日耳曼语者的控制或霸权之下，产生了大量新的政治单元。在西方，日耳曼人领土的地理扩张仅限于阿格里-戴可美特，政治转型径直向联盟的方向推进，而不像黑海以北的政治进程那么多样化。之所以有这样完全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日耳曼人在西方的扩张与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发生了直接碰撞。3世纪，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不时陷入混乱，这主要是因为波斯萨珊王朝崛起，罗马不得不耗费大量资源，在东部重新部署。这让时时想着扩张的日耳曼群体在3世纪中期看到了大量短期获利的机会，但从长远来看，罗马帝国的结构是持久的。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大幅增加税收是重要的一步），罗马找到了足够的资源来遏制波斯的威胁，日耳曼人也因此难以大举西扩。简而言之，由于罗马军队及其防御工事的力量，日耳曼人在西方的扩张只获得了少量新领土，大部分精力则用于内部政治重组和短期的越境攻击。黑海以北发生的事不能在西方重现；黑海以北各罗马附属国的权力结构更为分散，日耳曼移民得以在广大地区创造新的霸权。罗马帝国可能没有可以颁发护照的官僚机构，但其边境结构起了很大作用，东欧和西欧虽然都面对爆炸性的移民和政治重组，却因此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49]

从现代移民研究的角度审视，这些迁移路线和迁移产生的不同结果是完全说得通的。但仍存在两大问题。是什么让这么多欧洲日耳曼人在此时走上了迁徙的道路？我们如何解释移民群体中看似反常的特征，也就是如证据表明的，有一些大型的混合社会群体参与了迁徙？

缺少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理解移民动机的最大阻碍。我们不能像近年来的移民研究那样以个案研究为基础讨论，因为没有这样的个案。但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坐标系来理解移民的动机，一条轴上是“经济”和“政治”，另一条轴上是“自愿”和“非自愿”。四个参数组合起来，或许能够概括绝大部分情况。也就是说，一些人移民主要是出于自愿的经济方面的动机，而对另一些移民来说，非自愿的政治方面的动机占主导地位。即使我们做不到我们想要的那种细致程度，采用这种方法仍然是一种高效的前进方式。

全面来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移民非自愿地受了政治因素

的驱动。我们所说的当然不是像20世纪90年代初卢旺达难民那种规模的政治难民。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2世纪末和3世纪日耳曼尼亚的一大特征是暴力政治竞争加剧，丹麦和其他沼泽地区出土的相对集中的武器堆积点可以证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3世纪的原始丹麦人特别好斗；更有可能的是，和其他地方相比，那些沼泽地更好、更多地保存了暴力增多的证据。至少，如果暴力程度没有升级，很难想象那些更看重领袖军事能力的新的政治联盟会在那个时候出现。而考虑到这样的背景，面对旧日耳曼地区越来越危险的生活环境，没人想到要迁移到新地方才奇怪。资源就那么多，竞争却越来越激烈，这始终是迁移的一个主要原因。[50]但是，如果政治竞争升级能部分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日耳曼人走上了迁徙之路，那么更为积极的经济动机则有助于解释迁徙的主要地理方向。

我们在第一章中提过，考古研究发现，除了少数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物品外，罗马时代初期的日耳曼世界只有一种简单的物质文化：陶器用手工制作，很少有贵金属，以物质形式来彰显身份地位的方法比较有限。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随着日耳曼世界开始接触地中海区域较发达的经济体，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边境产生了许多新的财富流动，这些财富来自新的贸易联系、外交补贴和越境袭击带来的回报。然而，关键是，这些新财富的收益并不是在社会上平均分配的：某些阶层获得了高得不成比例的收益。收益在地理上的分配也不平均。紧邻罗马帝国边界线居住的日耳曼群体，有多得多的机会与罗马帝国接触并获得财富。

外交补贴只付给靠近边境定居的群体。例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君士坦提乌斯对边境政策做出了调整，他调整涉及的范围最远到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当然，最远处离边境肯定不止几千米，但应该不会超过他的军团两到三天的行军路程，所以可能会有100千米。虽然不是只有边境上的人才会发起越境袭击，但显然他们这么做更容易。农产品和其他原材料贸易也是如此。从运输物流的角度看，边境地区的人向罗马士兵（需求的基本来源）提供产品要容易得多。但不应夸大边境的作用。像费德森丘这样水运便捷的村庄也可以从罗马的需求中获益，而且，一些高价值的交易网络（如奴隶或琥珀交易网络）也深入了日耳曼尼亚内陆。比如，一般认为是那些掠夺成性的内陆日耳曼人为获得奴隶而发起了最初的袭击，而维尔巴克堤道表明，波兰北部有些人因琥珀路线而获利颇丰。尽管如此，财富流动产生的利润大部分或全部流入了边境地区；即使长途贸易也必须最终借助边境上的中间人——至少，国王们会在边界处收取过路费。马科曼尼的国王瓦尼乌斯让日耳曼商人带着要卖给罗马商人的货物进入他的国土，然后收取过路费，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看得到。靠垄断赚钱真是太美妙了，大概正因如此，罗马帝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外交协议才会格外强调贸易安排。

近来对边境特别是罗马边境的研究强调指出，有必要是将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这样的设施当作在边境两侧延伸了一段距离的文化和经济接触区的中心，而不是排他性的防线。这么做的一个结果是，最近的分析倾向于低估边境沿线和越境发生的暴力和冲突。这种分析自然说出了很重要的真相，但不是关于边境局势的全部真相。虽然边境两边的人口彼此间有种种接触，但他们不会只是待在自己小小的边境舒适区里轻松自在，而不受更广阔世界的影响。

边境一侧的因素可能破坏边境和睦共存的节律，比如罗马皇帝对声望的需要。4世纪60年代后期，瓦伦提尼安一世想向他那些拥有土地的纳税人表明他对蛮族很强硬。于是，他减少了对阿勒曼尼国王的年度赠予，结果是灾难性的。这些国王会将获得的赠予转送给追随者，以维持自己的声望，因此瓦伦提尼安一世的节约措施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威。结果，一股暴力浪潮破坏了莱茵河边境的阿勒曼尼地区的稳定。[51]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是，不在罗马这一侧的边境地带原本就有不稳定的趋势。不稳定的原因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情况直接相关。这些边境地区与更发达的罗马世界有着密切联系，有机会获得一系列新的财富。于是，日耳曼尼亚出现了双速发展的情况：越靠近罗马边境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越高、速度越快；越远离罗马边境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越低、速度越慢。结果就是边境地区和日耳曼内陆之间的财富差距迅速拉开。在我看来，这种不平等是2—3世纪移民潮的另一个关键动机。发展不平等的现象带来人口迁移，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来自远边缘区的武装团体伺机而动，也想获得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那些能带来利润的机会。

这种趋势早在1世纪就出现了。前面提过1世纪的附属国国王瓦尼乌斯，他在1世纪上半叶享受罗马的补贴，从住在他王国里的罗马商人身上获取财富，日子一直过得很舒适。但这种幸福的状况最终在公元50年时被打破了，他的财富遭到来自边境地区之外的一群日耳曼人的洗劫，他们组建了一支有足够力量的远征队，夺取了他的资产。[52]在3世纪的所有事件中，都可以看到或推测出同样的基本动机——夺取边境地区的财富。例如，黑海地区到处是看得见又搬得走的战利品。奢华的个人墓葬里满是贵金属，这是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本都北部萨尔马提亚王国的考古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此多的财富就像是一块磁铁，吸引着哥特人和其他人，他们通过琥珀路线上人员和信息的定期流通得知了这种情况。日耳曼移民一来，就用种种方法来最大限度地攫取这些财富。[53]

出现在黑海地区的第一批武装哥特人不仅在238年劫掠了其中一个城市希斯特里亚，还承诺如果他们获得罗马的年度补贴，就会维持和平。[54]这个群体显然清楚与罗马帝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常规收入。袭击也是如此：无论是袭击巴尔干半岛还是跨过黑海袭击，其动机都是获得

能带得走的财富，包括人力和财物。这体现在那里新建立的日耳曼人统治的王国的遗存中，这些遗存见于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系统，和维尔巴克系统的遗存相比，贵金属要多得多。银扣针在3世纪末和4世纪的切尔尼亚霍夫遗存中相当普遍，但很少在1世纪和2世纪的维尔巴克墓葬中发现。切尔尼亚霍夫的定居点和墓葬遗存中，罗马陶器也特别常见，包括精致的餐具，以及本来装有葡萄酒或橄榄油的双耳瓶的残片。因此，尽管我们没有从哥特人内部或者个人角度来陈述移民动机的材料，但我确信他们组织成武装团体，正是为了获得边境地区的财富。边境地区与罗马世界的种种接触，不仅使它比日耳曼内陆更加富裕，也使边境地区成为其他内陆群体的自然目标，后者组织起来，为的是分一杯羹。

因此，我们所讨论的3世纪移民既有基本出于自愿的经济动机，也深受政治因素驱动。这里说的政治动机，不是现代难民的那种负面政治动机，而是一种更“积极”的掠夺性动机（用“积极”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想染指罗马世界边缘日耳曼人主导的社会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光靠某些人站出来要求分到一份，好像移民劳工去现代经济体的工业或服务业找工作一样，是行不通的。日耳曼世界的新财富不是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厂中产生的，而是产生于附属国国王的宫廷，这些国王通过与罗马打交道获得收益，然后将其重新分配给自己的关键支持者。这些国王在一开始就获得了补贴、过路费、军事服务的报酬，（非常有可能）还瓜分了越境袭击的收获。一些移民可能设法成了国王的随从，但这并不代表对移民劳工有大量需求。随从不会太多，而且不管怎么说都只需要军事专家。对于较大的移民群体来说，想让新财富的主人把它们交出来，唯一的方法是武装起足够的人，去推翻某个附属国的国王，然后控制他的收入。3世纪，许多移民抓住了东西方出现的机会，许多附属国的国王都被推翻，罗马欧洲边界沿线的政治地理迥异于前。

日耳曼移民先驱？

这一点很重要，它解释了为什么在2世纪后期和3世纪，虽然日耳曼的人口流动主要出于自愿，受经济动机驱动，但有时大型移民单元也会参与迁徙。这与现代世界中类似的自愿人口流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现代社会的移民单元往往很小，只是一个人或者再加上几个同伴。这看似矛盾，但可以用经济环境的根本差异来解释。现代移民流动实际上是由摆在他们面前的那种经济机会——对个体工人的大量需求——决定的。同样的原则适用于罗马帝国时期，但当时经济机会的性质不同。在现代世界中，移民可以通过在工厂或服务行业工作来获得经济发展产生的财富中的合理份额。但在2—3世纪，要想成功，就得成为在罗马边境上占据有利可图角落的附属国的领袖或军事精英。因此，即便是出于自愿并主要受经济动机驱动，当时的移民单元有时也需要具备相当大的规模才能成功。从罗马最早向莱茵河

与多瑙河进军起，边境沿线所有具备吸引力的地方都已有人占据。如果你是一个局外人，但想要加入这个有利可图的边境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足够的武力闯入，赶走现在的住户。来自边境地区以外的掠夺性活动一开始可能只是小规模的袭击，比如1世纪对瓦尼乌斯发起的进攻（虽然看起来也相当有规模）；但如果你想永久占领一个地区，就需要数千人的兵力，而不是数百人。[55]

这可以解释那些古老移民群体中另一个看起来异常的现象（虽然有点矛盾）：妇女和儿童有时与男性战士一起前往边境地带。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军事力量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有可能接管边境附近某个能创造收入的地方。如上一章所说，在罗马时代的日耳曼尼亚，召集起几百人的战队很容易。但派几百人去袭击还行，却不可能带来3世纪罗马欧洲边境沿线发生的那种结构性变化，即到处都有新的移民附属国取代现有的王国。按照当时日耳曼尼亚主流的发展水平，如果要实施更高级别的军事行动（比如征服行动），国王就不仅得说服他们的随从，还得说服大量的武装自由民参加远征。我们知道，此时的社会还没有完全被国王和他们的随从统治，只动员起随从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克诺多马里斯在斯特拉斯堡只召集了阿勒曼尼的国王们和他们的随从，他连一点赢面都不会有。

这是理解3世纪日耳曼移民表面上的特异之处的重点。可用剩余财富的规模在结构上限制了随从的规模。因此如果想要成事，就需要招募大量自由民，而历次远征中都至少有一些家庭参与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如果这些远征是那种去了就不会回来的长途跋涉（比如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人从波兰迁至黑海地区），就肯定会有家庭参与（就像马科曼尼人战争中的汪达尔人一样）。[56]由于侵略假说在过去用得实在太多太滥，现在有不少人，特别是考古学家，不愿意认为混合群体有可能会以接管新领地为目的，大批出发。这些人认为，把过去的任何一个事件描述成侵略假说的那种图景，都是站不住脚的，哪怕有当时的和基本可靠的资料记录了这样的图景；这种负面反应根深蒂固，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现代世界中是有类似的现象的。

1800年左右，有大约4万个布尔（Boer）移民家庭在好望角腹地定居点的范围内耕种，这些定居点最初由荷兰人于1652年建立。这些家庭之间大多有姻亲关系。但在19世纪初，英帝国主义的财政和文化压力开始形成，布尔人开始寻找新的居住地。布尔的群体组织结构没有达到政府的级别，但已经足以成立一个委员会（Commissie）并派出侦察人员去核实邻近地区是否有农作的潜力了。一队人马去了如今的纳米比亚，带回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但是另一队人马——由21名男子和1名女子组成——沿着索特潘斯山（Soutpansberg）行进，发现北德兰士瓦（Transvaal）和纳塔尔（Natal）颇有潜力。于是，各个群体聚在一起，以每天10—15千米的速

度向北前进。一开始是50到100个家庭为一组，每个家庭都带着他们的牲畜，赶着装有各种日常用品的牛拉大车。1836年2月，亨德里克·波特希特（Hendrik Potgieter）带着200人和60辆大车出发，紧随其后的是规模差不多的其他群体：约翰内斯·范伦斯堡（Johannes van Rensburg）及19个家庭，路易斯·特雷加（Louis Tregardt）及7个家庭［其中包括87岁的丹尼尔·普费弗（Daniel Pfeffe），他要负责队伍中34个孩子的教育］，安德里斯·比勒陀利乌斯（Andries Pretorius）带了60辆运货车，赫特·马里兹（Gert Maritz）和皮特·雷提夫（Piet Retief）各带100辆。所有这些群体均是男女老幼都有的。

除了牧草质量之外，侦察人员还回报说有大片无主之地，这对布尔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判断。在他们的目标区域有两个强大的军事王国——姆济利卡齐（Mzilikazi）的马塔贝勒（Matabele）王国和丁冈（Dingane）的祖鲁（Zulu）国。他们可不打算让布尔人予取予求。一开始，双方尝试谈判。某次谈判中要达成某个所谓的土地赠予协议，却导致皮特·雷提夫死于丁冈之手，这一事件很著名。第二晚，丁冈发起袭击，杀死了500名移民，其中包括56名妇女和185名儿童。布尔领袖下定决心要粉碎这些国王的权力。于是他们重新组织，建立更大的打击力量，无情地摧毁了敌人的势力。移民拥有一项重大的技术优势：5英尺（1英尺≈0.3米）长的燧发枪。他们可以骑在马上，在一分钟内射击好几次。所以，数量相对较少的布尔部队就能造成严重损伤。即使在袭击姆济利卡齐的主要政治中心时，也只要几百个布尔人就能杀死3 000名马塔贝勒人，并将国王的牛棚化为灰烬，同时自己毫发无损。在火器面前，丁冈的祖鲁人也是毫无反抗之力。这些军事上的成功鼓励更多的移民出走，离开英国人的统治，最终有1.2万人离开了好望角。

除了技术优势（只要数量相对少的布尔人就可以打大仗）之外，这里发生的事情与记录中表明的3世纪黑海以北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也包括9世纪维京人在西部活动的情况）是一致的。获得资本财富，也就是控制土地，需要克服巨大的政治阻碍。明确这一点后，寻求财富的小群体入侵者将自己重组为更大的群体。最初移民的和平流动迅速转变为刻意的武装掠夺，也很说明问题。现代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完全有能力组织成具有足够能力来攫取他人资产的武装团体，并且确实有时把迁徙当作手段。同样重要的是，布尔移民单元的活动明显有军事性质，但除了男子以外，总是包含妇女和儿童。3世纪的材料表明至少有一些日耳曼群体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不仅表明武装的混合群体理论上可能存在（有些人因为非常反感侵略假说而怀疑这种可能性），而且还凸显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一个意在掠夺土地的集团的军事能力并不仅仅依赖于专业军人，还要依赖那些也参加战斗的自耕农，那么所有加入迁徙潮的农民都会带着他们的家人。布尔人从小就受骑马和射击的训练，妇女也是如此，即使男人不在也

完全可以打仗；正是靠着这样的军事能力，他们制服了马塔贝勒人和祖鲁人。我们知道，2世纪和3世纪的日耳曼尼亚有一些军事随从，但人数并不多，而日耳曼人在面对卡皮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时，并没有像火器那样的巨大军事优势，因此，靠武力进入本都北部的日耳曼群体的规模需要远远大于布尔突击队。因此，他们必须招募在日耳曼社会中占比更大的自由民战士兼农民，这些人自然会带上他们的家人。

如果远征想要成功，领袖就得把招募的条件放得很宽，以吸引自由民战士。那个古老时代的相关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过程可能类似于哥特领袖狄奥多里克在470年前后组织第一次重大军事远征的经过：

> 狄奥多里克已经成人，因为他已年满十八，告别了少年青葱。于是他从父亲的旧部中召集了一些人，带上了自己的朋友。他的追随者差不多有6 000名。[57]

这次远征不是一次单程旅行，所以没有理由带上家人；但它表明，即使在5世纪，想动员一支有规模的力量，也需要在随从之外向更广泛的日耳曼社会阶层招人。然而，要完整解释2—3世纪的现象，特别是自由民和他们的妻子出于什么考量才会接受劝说，加入前往黑海的武装远征，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固有的流动性，这个因素也在现代移民个案研究中得到了揭示。

普热沃斯克和维尔巴克地区的人口和当时的其他日耳曼尼亚居民一样，实行混合农业。如塔西佗所说，也在对一些定居点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的是，牛是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但谷物是主食，谷物生产是经济活动的基石。日耳曼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他们不会像当时的草原游牧民那样，在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间来回放牧。但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许多日耳曼社会，当然也包括维尔巴克地区的那些社会，缺乏必要的农业专业知识，耕地的土壤肥力只能维持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因此，从中长期看，他们是会改换定居点的。人们离开土壤肥力枯竭的地区，在前行的路上建立新的定居点。和这一点相吻合的是，在维尔巴克地区，墓地不仅是死者的安息所，也为生者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聚集场地。墓地的使用年限要长得多——奥德里的墓地差不多用了200年，而在此期间，许多定居点建立起来，又被废弃了；甚至，墓地也可能有社群生活中心的功能。例如，公元200年以前的维尔巴克墓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墓地里有一大圈石头，石圈中没有墓葬，但有的地方会在中央竖起一根柱子。考古学家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些石圈标出了举行会议的公共空间。即便如此，维尔巴克人口显然是会定期迁居的。[58]

这跟我们讨论的问题很有关系，因为比较研究反复证明，已经具有流动性的人口更容易采取移民这种生活策略。这甚至适用于跨代的情形。从统计数据来看，移民的子女和孙子孙女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迁居。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内的人群准备从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地区跋涉到黑海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无法长期维持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壤肥力，因此早就有了通过迁居策略来让日子过得更好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迁居策略落实为跨越较长距离的有条理迁徙，并不是太大的改变，改变程度和17世纪的英国农民从农村进入城镇再决定乘船前往美洲差不多。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也确实是重大的改变。

在公元200年之前，也许是因为人口稍有增加——这是根据每一代人用到的定居点数量判断出来的，维尔巴克群体采取稳定而不引人注目的迁徙形式，向南进入原本属于普热沃斯克文化的地区。维尔巴克扩张的这一阶段与“推进浪潮”模型吻合。人口缓慢增加，向南迁移是个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大规模定向迁移的结果。向北迁移受到波罗的海的限制，而无论如何，离远古冰川留在南部海岸的沙质岩石沉积物越远，土壤肥力就越高。随后跋涉到黑海则是完全不同的举动。所涉及的距离要长得多，迁徙所用的时间则较短。2世纪的扩张用50—75年的时间向东南方向移动了300千米左右。发生在3世纪的迁徙在相同的时间内跨越了1 000多千米。因此，这第二次迁徙，或者说同一次迁徙的第二阶段，显然更有方向性，也必须如此。

也许是人口稍有膨胀引起的定居点平稳迁移，现在成了为经济利益而蓄意武装侵入其他政治环境的行动。这方面与布尔人的历史惊人相似。从1652年建立第一个定居点到1800年，因为人口增长（例如，路易斯·特雷加的4个妻子为他生了17个孩子），个别定居者家庭从好望角向北迁移，一直到了800千米之外的奥兰治河（Orange River）——最初的边界。这也符合“推进浪潮”模型。后来，面对英国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负面刺激，布尔人越过奥兰治河继续迁移，这次迁移建基于原本的迁移传统，但很快被引导并加速发展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移民单元变得更大，人口流动在遭遇抵抗时迅速演变为军事掠夺。3世纪的日耳曼人也类似，他们在本都北部变换目的地时需要仔细计划。个别日耳曼家庭从北方迁移到黑海地区时，就算有吞并土地的念头，肯定也会一无所获。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建立军事霸权需要仔细的规划和大量的人口，哪怕这些人口来自一系列彼此独立的远征队伍，而不是传统侵略假说所设想的一个“民族”。

掠夺的浪潮

关于2—3世纪的移民潮，一定还有很多事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光凭现有证据，我们无法详细探索具体的触发因素，无从知道哪些人在邻居还留

在家中时就打算走上迁徙之路，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但证据足以表明，移民是改变罗马欧洲边界的一个主要因素。“发展”——促使帝国晚期新联盟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也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以反迁徙论的立场解读证据，就不得不无视大量考古和历史证据，而且根本无法解释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边境上罗马主要合作伙伴的文化转变。再往西的地方，人口迁徙的作用没那么显著，但在阿勒曼尼人占领阿格里-戴可美特和大量勃艮第人到达美因河流域这两件事上，仍能看到其作用。

证据还确立了人口迁移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人口迁移和发展并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是不同的解释方法，而是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层面上交织在一起。首先，日耳曼社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根本原因。发展既可能是人口迁移的消极因素，通过加剧内部竞争促使一些人去其他地方寻求更安全的家园，也可能是人口迁移的积极因素，比如，与罗马帝国接壤的边境地区的新财富，会鼓励远边缘区（outer periphery）的群体迁入并取代现有的群体。与罗马帝国的接触大大促进了日耳曼尼亚的发展，但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地域差异；而就像在现代世界中一样，巨大的财富差异会刺激人口迁移。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新财富的机制，即成为罗马在某个边境地区的优先合作伙伴，也解释了由此产生的迁移潮中的一些古怪之处。这几百年间的人口迁移不像传统侵略假说构想的那样简单。许多独立的远征队伍（其中只有一些具有一定规模）推进了人口迁移。移民迁入后，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岸的大部分原住人口仍然留在原地。因此，当时并没有发生整个人口单元从A点迁移到B点并进行种族清洗这样的事。但是，为了取代别的群体成为罗马的优先合作伙伴，从而获得边境地区的新财富，有时候是需要组建起大型军事力量，来推翻现有的政治秩序的。因此，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移民单元必须既有规模，又有武装。

第三，雄心勃勃的国王想要从边缘地区迁移到边境地区，但光靠军事随从不能组织起足够的军事力量；正因如此，迁徙中一些较大的群体才会包含妇女和儿童。这种人口迁徙的形式既不是推进浪潮，也不是精英转移。家庭组成的小型群体在随意迁移的过程中，会被卡皮人、萨尔马提亚人或者莱茵-威悉的日耳曼人轻易消灭，而只靠随从组建起战队的国王无法赢得必打之大仗的胜利。

罗马帝国时代早期的日耳曼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凸显人口迁移和发展间基本联系的另一种移民模式，还开启了最终将抹平公元第一千年之初欧洲各地巨大发展差异的进程。在直接受罗马控制的地区以外，日耳曼社会与罗马帝国在各个层面上的接触释放出种种力量，这些力量累积起来，最终改变了日耳曼社会。4世纪时，更成体系的政治结构控制了更多的人口。这些力量在边境的作用最显著，但对边境之外的地区也

有一些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琥珀、奴隶贸易等经济网络的范围很广。更重要的是，沿着罗马帝国的边界，出现了一个比较富裕的近边缘区（inner periphery），让更外围地区的群体有了向内进行掠夺性迁移的倾向。因此，最终将打破地中海主导地位的大范围转型过程，影响的不是只有罗马欧洲边境附属国所在的狭长地带。然而，即使到了罗马帝国晚期，欧洲中东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也没有受影响；这种状况的改变要等到4世纪，2—3世纪移民潮形成的附属国新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的时候。到目前为止，人口迁移对发展起的还是次要作用，但情况很快就将不同。匈人的时代到来了。

---

[1] “罗马人又热又渴……”：见Dio 32. 8—10。

[2] 很好的介绍，见Birley (1966), chapters 6—8, with Appendix III；另可参见Böhme(1975)。

[3] 见Dio 72.20.1—2（军队的驻防）；72.11—12, 72.20.2, 72.21（分别是阿斯丁格、夸迪和纳累喜的迁移）；72.15, 72.16.1—2, 72.19.2, 73.3.1—2（贸易特权和中立区）;72.19.2, 73.2.1—4（集会）。

[4] “不光是维克图阿里人……”，见*Historia Augusta*: Marcus Aurelius 14.1；关于该文本欺骗性的介绍，见Syme (1968), (1971a), (1971b)。关于罗马的侵略，见Drinkwater (2007), 28—32，他还考虑了瘟疫以及马可·奥勒留的责任感可能带来的影响。

[5] 关于莱茵河边境的破坏，见Carroll (2001), 138；另外，关于军团及马可·奥勒留的自我纪念，参见Birley（见前注2）。也可参见本书第二章注28。

[6] 关于1世纪伦巴第人的家园，见Tacitus, *Germania* 40。这一队6 000人显然是一个群体；5世纪，又一批伦巴第人追随他们往南迁移（见本书第五章）。后来那些伦巴第人从波希米亚的临时定居点侵入了多瑙河中游部分地区，但不知道这个2世纪的群体是否也是如此。有关永久性迁徙的参考，请参见前注3。

[7] 见Dio 72.3.1a。

[8] 见如Barford (2001)，引言和第1章。

[9] 该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来自已故的卡齐米日·戈德洛夫斯基（Kazimierz Godlowski），特别是他对罗马时期欧洲中北部的整体研究，见Godlowski(1970)。Shchukin (1990)以戈德洛夫斯基的开创性工作为基础，做了很好的概述。在细节上仍然会有争论，而更多的“文化”及“文化”中的各阶段都已有了更精确、更确定的年代。在最早的时候，只有罗马硬币能为可靠的年表给出指

示。1945年以来，人们更好地理解了罗马轮制陶器的发展顺序，其中包括精陶（餐具）和双耳瓶（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储藏罐）。两种后来的技术使定年更精确：碳14（会给出年代范围）和年轮学（它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一棵树是什么时候被砍倒的）。结合戈德洛夫斯基的一般方法，这些技术进步产生的大量知识足以让从前的学者惊讶莫名。

[10] 在定年的专业术语中，这一扩张发生在罗马铁器时代的B2, B2/C1a。本书的这几个段落提炼了两个重要文献集中的信息，即*Peregrinatio Gothica* 1和2；参见Shchukin (2005)。

[11] 更完整的讨论，见Heather (1996), 35—8。古典资料中有零碎的证据，表明哥特群体在向南、向东迁移：见Batty (2007), 384—7。

[12] 相关文献非常丰富。简要介绍（附有完整的参考书目）见Heather (2005),chapter 2。

[13] 近期的综合研究（附有完整的参考书目），见Drinkwater (2007), chapter 2。（注意他在第43—45页的重要论点，即在3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一个名为阿勒曼尼的部落已经明确存在。我们后面会再讨论这点。）关于残酷的暴力，见ibid.,78f.（还有更多例子）；Carroll (2001), chapter 9。

[14] 有关阿勒曼尼的起源，见Drinkwater (2007), 48f., 108—16（附有完整参考书目）。

[15] 阿盖斯和刚特里克：见Jordanes, *Getica* 16.91（参见*Historia Augusta*: Gordian 31.1中的“Argunt”，可能是把两人当作了一人）。刻尼瓦：见Zosimus 1.23;Jordanes, *Getica* 18.101—3; Zonaras, *Chronicle* 12.20。

[16] 主要来源是Zosimus 1.31—5。另外的来源和评论，见Paschoud (1971—89), vol. 1,pp. 152ff., n. 59f。

[17] Zosimus 1.42—3, 46，with Paschoud (1971—1989), vol. 1, pp. 159ff. n. 70ff.

[18] *Historia Augusta:* Aurelian 22.2. 没有证据表明他和一代人之前在同一区域统治的刻尼瓦有关联：见前注15。关于其他3世纪的进攻，见Batty (2007), 387—95。

[19] Eutropius, *Breviarium* 8.2.

[20] 关于提到哥特人的1—2世纪文献，见Tacitus, *Germania* 43—4；Strabo, *Geography* 7.1.3 (‘Butones’)；Ptolemy, *Geography* 3.5.8。Kulikowski (2007), chapters 3—4；参见Jordanes, *Getica* 4.25—8（关于菲利默，见本书第144—145

页）。

[21] 更多有关特温吉的细节，见本书第二章。约达尼斯的时代错误，首先在Heather(1991), chapters 1—2中证明（我在库利科夫斯基之后，表明了我的怀疑）。

[22] 关于1—2世纪的情况，见Shchukin (1990)；关于各种巴斯塔奈、萨尔马提亚和达契亚人群体（附有完整参考资料，注意，有的地方出于政治需要曲解了材料），参见Batty (2007), 353ff。关于乌尔菲拉和他的《圣经》，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s 5—7。

[23] 1、2世纪哥特人的位置，见前注20。鲁吉人，见Tacitus, *Germania* 44。汪达尔人，见Courtois (1955), chapter 1。（库利科夫斯基并未讨论这一更广范围内的证据。）

[24] 卡皮人：见后注。关于4世纪30年代，见*Anonymous Valesianus* I.6.30.376，chapter 4。

[25] 用术语说，这些转变发生在B2—C1a/b这一时段。更完整的讨论，见Heather(1996), 43—50，基于前注9中提到的材料，现在更有Shchukin (2005)的补充。Kulikowski (2007), 60ff整体上忽略了考古证据的重要性，没有讨论维尔巴克扩张这一现象。

[26] 关于该材料的引介，见Kazanski (1991)；Shchukin (2005)，更完整的文献列表见Heather (1996)，47—50。

[27] 见Kazanski (1991); Heather (1996), 47—50; Shchukin (2005)。

[28] Jordanes, *Getica* 4.25—8.

[29] Jordanes, *Getica* 16—17.90—100记录了阿马立国王奥斯托哥塔（Ostrogotha）在3世纪的胜利。但这位国王根本是神话人物，他被虚构出来是为了解释东哥特人（Ostrogoths）名称的由来，然后他的名字被加进了已知的历史事件：见Heather(1991), 22—3, 368。

[30] 更多细节见Heather (1991), chapter 1 and 84—9。

[31] 巴达威：见Tacitus, *Histories* 4.12, *Germania* 29。卡狄、安普希瓦力、卜茹克特累：见Tacitus, *Annals* 58, *Germania* 33。

[32] 菲利默迁徙时的分离见第144—145页引文。Berig: *Getica* 4.25—6 with 17.94—5.Goffart (1988), 84f有意挑战《哥特史》里有很多哥特口述史内容的传统说法，这是合理的，但可能有些过头：见Heather (1991), 5—6, 57—8, 61—2。

[33] 可参阅Borodzej et al. (1989); Kokowski (1995); Shchukin (2005)等。

[34] 见Drinkwater (2007), chapter 2 and 85—9（附参考资料）。

[35] 见Ionita (1976)。

[36] 有关赫鲁利人的伤亡，见George Syncellus, *Chronicle*, ed. Bonn, I.717。关于爱琴海远征军的其他数据（2 000艘船和32万名男子），见*Historia Augusta:*Claudius 8.1。据说卡纳包得斯的失败造成5 000名哥特人死亡：*Historia Augusta:* Aurelius 22.2。这些材料大部分源于德克西普斯在当时的陈述。如果参照维京人的行动方式，有人可能会认为，是较小的群体先实施了初步行动，行动大获成功后，更大的群体才参与进来。然而，3世纪的证据并不足以说明当时有这样的先后发展。有关规模的进一步评论，见Batty (2007), 390ff。

[37] 伦巴第人：见Dio 72.1.9。夸迪人：见Dio 72.20.2（明确地说pandemei，“所有人”）。

[38] 卡皮人的反对，见Peter the Patrician fr. 8。卡皮人出走进入罗马境内，见Aurelius Victor, *Caesars* 39.43；*Consularia Constantinopolitana*, s.a. 295。更多背景，见Bichir (1976), chapter 14。在皇帝加莱里乌斯（Galerius）治下（293—311年），对卡皮人总共发起了六次军事行动。

[39] 关于那些希腊城市，Minns (1913)和Rostovzeff (1922的经典著作仍然很重要。对之后获得的考古证据的介绍，见Batty (2007), 284—9（附有参考文献）。

[40] Drinkwater (2007), 43—5正确地拒绝了最近那种认为阿勒曼尼在3世纪90年代之前不存在的潮流；但他试图主张，3世纪所有行动的主体，包括占领阿格里-戴可美特的行动在内，都是战队，这个论点没有说服力。

[41] 见第九章。

[42] 女性殡葬服装见前注26。有关哥特语《圣经》的介绍，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s 5—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初的北欧留里克（Rurikid）王朝，它迅速采用了斯拉夫语名字（见第十章）。另见本书第六章，该章讨论了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时期的语言学证据。

[43] 夸迪：见Dio 72.20.2。阿斯丁格汪达尔：见Dio 72. 12.1。

[44] “常识”：见Drinkwater (2007), 48。有关勃艮第人的语言学证据，见Haubrichs(2003)。

[45] 有关“大规模”移民的定性界定，请参见本书第44—45页。如果“大规

模”听起来太接近侵略假说，那么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也许可以用“重要的”？），但在第一千年研究中采用符合专门移民研究规范的术语肯定是有好处的。

[46] *Panegyrici Latini* 3 [11].16—18.

[47] 见本书第二章。

[48] 关于军事铭文，见Speidel (1977), 716—18；参见Batty (2007), 384—7。关于船只，见Zosimus 1.32.2—3。

[49] 因此，我主张，虽然“互动”主题近年来已成为边境研究的一个特征——如Whittaker (1994); Elton (1996)，但也应该去研究边境地区同样真实存在的军事功能。

[50] 奇怪的是，Drinkwater (2007), 48—50虽然接受了日耳曼世界内部竞争加剧的证据，却拒绝承认这会促使群体逃离逐渐加剧的生存威胁，从而增加罗马边境和其他地区的压力。Wells (1999), chapter 9与此类似，也一样奇怪地用“内因”来解释，试图在边境地区，特别是罗马这一边的边境地区内部找到3世纪骚乱的原因。

[51] Ammianus 26.5, 27.1；参见Drinkwater (2007), chapter 8。

[52] Tacitus, *Annals* 12.25.

[53] 参见，如Anokhin (1980); Frolova (1983); Raev (1986)。

[54] Peter the Patrician fr. 8.

[55] 罗马边境管理的节奏也许促进了这个过程。罗马人所做的是定期疏散边境地区的人口，以减少过度拥挤的情况，降低发生暴力的可能性（见本书第102—103页）。但这只会使远边缘区的群体更容易集结起足够多的人，推翻现有的罗马附属国。

[56]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121—122页。无论怎样，我都坚定主张，自由民和随从群体不大可能是泾渭分明的。

[57] Jordanes, *Getica* 55.282 (‘ascitis certis ex satellitibus patris et ex populo amatores sibi clientesque consocians’).

[58] 参考资料见前注10，以及Kmiecinski (1968)对奥德里的论述。有时人们会用“半游牧”之类的术语来描述这种情况，但我认为这是有误导性的。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从事混合农业的人口，他们会畜养很多动物，也可能用牛来衡量财富，但同时从事大量耕种，即使他们缺乏让土地长期保持肥力的技术。

第四章
移民和边境的崩溃

大概是在376年夏末的时候，一大批哥特特温吉人来到多瑙河北岸寻求庇护。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特温吉都是帝国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主要附属国。这些人由阿拉维乌斯（Alavivus）和弗里提根（Fritigern）领导，两人此前与特温吉联盟的大首领阿塔纳里克分道扬镳。同是哥特人的格鲁森尼人原本住在离边境更远的地方，在德涅斯特河东边，他们紧随特温吉人而来。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都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南面和东面定居了至少三代人的时间。他们突然向多瑙河迁移，显然是因为所在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动荡。经过一番思考，东罗马皇帝瓦伦斯决定允许特温吉人进入帝国，帮他们渡过多瑙河，但他决定不接纳格鲁森尼人。然而，格鲁森尼人很快找到了办法，在没有帮助和许可的情况下渡过了河，很快，更多的群体不请自来：377年是泰法尔人加上一些匈人和阿兰人（Alans），378年来了更多的阿兰人，379年，罗马在多瑙河中游的一些萨尔马提亚附属国的人也来了。特温吉、泰法尔和萨尔马提亚这些比较近的长期附属国，格鲁森尼和阿兰等远一些的附属国，加上之前不为人知的匈人入侵者，几方为控制罗马东欧边境以北地区而互相争斗，战火蔓延到了帝国的领土上。

376年后大约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在罗马中欧边境以外的地区，也就是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多瑙河中游盆地，现有秩序同样遭遇了大崩溃。可能有许多规模较小的群体也参与了，但最主要的蛮族群体有四个。首先，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率领一个以哥特人为主的群体，在405—406年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随后在406年年底，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组成混合部队，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一路破坏直到西班牙。不久，匈人和斯基里人（Sciri）的混合部队进入东罗马的巴尔干半岛，拿下了达契亚省的马尔蒂斯堡（Castra Martis）。最后，勃艮第人绕过他们的西方邻居阿勒曼尼人，在施派尔和沃尔姆斯（Worms）附近的莱茵河流域定居。我们不知道勃艮第人定居的确切时间，但应该是在406年到413年之间。从4世纪的角度看，这是多个群体的混合：已经建立起来的边境附属国（苏维汇）、偶尔出现在罗马外交网中的群体（勃艮第和汪达尔），以及多瑙河中游的完全的局外人（阿兰）。[1]

从罗马的角度看，东欧和中欧边境的连续崩溃还不是苦难的结束。376年渡过多瑙河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最终在382年与罗马达成了某种和平。之前的6年，罗马人和他们展开大战，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378年8月9日，蛮族杀死了瓦伦斯皇帝，消灭了他三分之二的野战部队。从395年

开始，其中一些人——到底有多少人我们稍后再谈——聚集到阿拉里克（Alaric）及其继任者麾下。这支部队先在巴尔干半岛周围移动，然后进入意大利——而且是两次进入，最后到达高卢。这一次，他们通过另一项协议从418年开始扎根在阿基坦（Aquitaine）。这个定居点最终发展成了西哥特王国——西罗马的第一代继承国之一。在欧洲中部边境崩溃时聚在一起的一些群体也表现出持续迁移的能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些409年定居在西班牙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20年后乘船前往北非，在那里最终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勃艮第人也继续迁移，只是没那么戏剧化。在匈人手下遭受重创后，许多群体在5世纪30年代后期由罗马重新安置在日内瓦湖周围。而从这个定居点开始，最终形成了西罗马的第三个继承国。

有些情况下，迁徙的距离非常长。从黑海西北角到阿基坦的直线距离大约是2 500千米，但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长途跋涉中走的并不是直线。汪达尔人从斯洛伐克或附近地区前往突尼斯，途经西班牙和摩洛哥，迁徙距离接近4 000千米，而和他们一起的阿兰人走得还要远。公元376年之前，顿河是黑海以北阿兰人领土的西部边界，从那里到迦太基的距离是惊人的5 000千米，他们也许是一路磕磕绊绊着去的。

根据关于公元第一千年的传统叙事，罗马欧洲边境及更远地区的这些动荡事件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的开端。Völkerwanderung的字面意思是“民族大迁徙”（即使并非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说日耳曼语）。根据这样的说法，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其他许多群体（后面两章会讨论）的群体认同早已形成，他们男女老幼一起，以紧密团队的形式从一块领地迁移到另一个领地。在迁移过程中，他们摧毁了罗马帝国在西欧的势力；有些人还将此描述为从公元9年开始的斗争的终局。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的联盟在条顿堡森林会战中击败了瓦卢斯和他的三个军团。如果这个故事还不够宏大，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人们对欧洲的创生的理解中，与罗马边境崩溃有关的事件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这些群体似乎是整个民族一起迁移，这种模式被整个套用到了欧洲史前史上，人们完全用人口迁移、侵略和“种族清洗”来解释那段古老的历史。因此，罗马晚期的边境入侵是个关键的测试案例。侵入边境的，到底是不是包括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的大型人口群体？

“曾是战士”

一些当时的资料提到哥特人于376年来到多瑙河。所有资料都认为，这是因为在欧洲边缘出现了一支新的力量：神秘的匈人（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匈人的情况）。一份资料甚至写出了聚集在河岸上的哥特难民的人数：20万人，男女老幼都有。然而，我们对当时事件的了解基本来自一位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对于哥特人的失败和随后前往罗马边

境的过程，只有他写下了比较具体的细节。例如，他（也只有他）告诉我们，多瑙河岸边一度有三个独立的哥特群体，还有一些非哥特人的群体。同样，只有阿米阿努斯的叙述谈到格鲁森尼人在两位国王去世后如何做出搬迁的决定，以及特温吉联盟如何因不同派别应对匈人的方法不同而分裂。除了这些细节之外，阿米阿努斯的作品和其他资料一样，明确写到了两种情况。首先，有大量哥特人来到河边。他没说有多少人（实际上他说的是人太多，数不过来），但是他记录了皇帝瓦伦斯在阿德里安堡（Hadrianople）作战时，得到的情报是对手有1万人。皇帝也知道，这只是哥特人此时散布在巴尔干地区的总兵力的一部分。其次，这些战士来的时候带上了妻儿。[2]

没有哪位罗马帝国晚期的评论家会去精确描述任何蛮族移民群体——比方说，八成的男性移民带着家人一起出发，但阿米阿努斯清楚地知道，迁徙行动由武装起来的男性移民驱动，他们带着家人，财物装在车中。有几次，车队被用作移动要塞（就像布尔人那样），拉成一个防御性的临时阵地，可见车队规模必然很大。如前所述，历史学家经常用战士数量乘以5来算总人口数，当然这只是猜测。但不管你乘以几，2万甚至更多的战士再加上他们的家人，迁徙的人肯定有好几万。阿米阿努斯虽然明确地说并非每个移民都是几大哥特群体的成员，但据他记载，两大哥特群体（376年进入帝国的特温吉和格鲁森尼）很有政治凝聚力。在多瑙河岸边，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各自作为一个整体和罗马谈判，后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保持联合行动。

如果我们把阿米阿努斯关于376年的种种描述放到一起，就会知道为什么现代学者如此犹豫了：哥特人群体中男女老幼都有，人数有好几万，他们来是为了逃脱匈人的追赶，他们作为整体和罗马打交道。这一切实在太像老旧的侵略假说：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行动有明确的方向，侵略和逃离侵略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与3世纪和维京时期的掠夺性移民潮不同，在现代那些资料完备的移民案例中，则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情形。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还能相信阿米阿努斯笔下如此清晰的画面吗？

在古典传统中写作的古代历史学家，其作品的可信度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判断的。当时，历史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虽然其目的是真实，但所追求的不一定是字面意义上的真实。可以想见，当时的历史作品会追求艺术效果，这有娱乐受众的考虑，但也可以用来揭示关于人和事的更深层次真相。我们所了解的阿米阿努斯很有意思。在他的《历史》的最后，他写下了一行令人难忘、基本准确（但比较有限）的自我描述：“曾是战士的希腊人。”（miles quondam et Graecus.）他出生在东罗马的安条克（Antioch），那里主要讲希腊语。进入军队之前，他显然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文学方面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军队中，他升任中级军官，成为将

军的副官。他多次参加战斗，执行秘密任务——有一次是深入波斯边境，还有一次是暗杀一名篡位者。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未实际指挥过部队。罗马最后一位异教徒皇帝“背教者”尤利安死后，阿米阿努斯在4世纪60年代中期离开了军队，而他本人也不是基督徒。除此之外，他没有告诉我们太多自己的情况，也没有说出书写历史的目的，只是提到了他离开军队，最终在4世纪80年代后期移居罗马前访问过的几个地方。4世纪90年代早期，他在罗马写完了《历史》一书。

关于这位历史学家和他著作的研究文献数量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两点。首先，在声称想要获得真相的同时，阿米阿努斯并不反对用些文学手法来传达他心目中的真相，有时甚至会回避一些事。在他自己的一生中，身边的一个重大文化现象是帝国逐步基督教化，但他在自己的文本中对此能不提就不提，甚至可能用宗教宽容的幌子来掩饰自己对基督教的厌恶。他处理其他问题的时候可能也用了处理宗教问题的方式，但坦率多了。[3]但不管怎么说，吉本（Gibbon）认为阿米阿努斯是“最忠实的指路者”。吉本不傻，而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要点可以支持吉本的判断。我们大可以说，在罗马帝国晚期（也基本可以说整个罗马时期）留存下来的记述中，阿米阿努斯的叙述最详细、信息最丰富。我们已经看到他对哥特人的叙述在其他很多方面是正确的：在叙述同一件事的时候，他文本的详尽程度完全压倒了其他留存下来的资料。如此丰富的知识部分来自他自己的经验（例如，他详细写下了自己执行秘密任务的经过，写得很有意思，他还参加了尤利安未能获胜的波斯战役），部分来自消息灵通的参与者［比如退休的宫廷太监欧克里斯（Eucherius）］，另外，他还参考了档案资料。他在一处提到，有一个“更秘密”的档案他没办法看到；也就是说，另一些档案他是看过的。而在另一处，他透露说，在写关于军事人员的事的时候，他通常会去浏览他们职业生涯的官方记录。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也成功地证明，阿米阿努斯的叙述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阅读罗马军官和下属指挥官往来文件的基础之上。[4]换句话说，虽然是用了文学手法，也有刻意的回避，但阿米阿努斯的确是在从事类似于现代历史研究的事情，否则他的叙述中是不可能有那么多细节的。因此，对阿米阿努斯可不可靠这个问题不能简单作答，要视具体段落的情况而定。

在376年发生的事件上，阿米阿努斯的可信度近来遭到两次攻击，一次很严重，另一次只是稍好一些。最重要的是，有人认为他对376年事件的描述有点像传统的侵略假说，是因为他（以及写得不如他详细的其他作者）忍不住要用那种方式来描述事件。据说，接受古典教育的作家有着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蛮族”是以“民族”——相互关联的“血缘群体”——形式迁徙的；因此，他们下意识地把行进在罗马土地上的所有外来者都描述成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迁徙主题”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因此他们无法精确描述迁移中的蛮族的特征。其次，有人认为阿米阿努斯强调匈人是哥特人

来到多瑙河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是错误的。据说事实上，是罗马的行动破坏了哥特附属国世界的稳定，从而让匈人进入新的领土，因此匈人并不是我们资料所描绘的那种凶狠的外来入侵者。[5]这些批评很重要，但是不是有说服力？阿米阿努斯是否对匈人起了多大作用有误解？而他将376年的事件描述为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规模行动，是不是因为他缺受限于观念而不得不如此？

从我们的资料看，有时的确有充分理由认为，一些作者心中是有某种“迁徙主题”的。6世纪的约达尼斯将3世纪哥特人迁徙到黑海地区描述为一个“民族”在迁移，但年代更接近3世纪的资料中描绘的现实要复杂得多。9世纪对4—5世纪伦巴第人迁移的记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之后会看到。不过，对于阿米阿努斯笔下的376年事件，我们该怎么看呢？

在本例中，再用迁徙主题来解释恐怕说不过去。首先，虽然那只是一个脚注，但若说阿米阿努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本能，把特温吉人或者格鲁森尼人设想为（“血缘群体”意义上的）“民族”，我是看不出来的。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分析它们。他感兴趣的是这些群体作为军事和政治集体具有怎样的力量，以及它们对罗马的安全可能造成什么威胁；这也基本上是从帝国视角看待蛮族的记述所关心的。这些群体运作的细节并不是他的关注点。特温吉人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一个封闭、生物学上自我繁衍的群体，其成员差不多共有一个独特的文化身份。在罗马帝国早期，社会分化就已存在于日耳曼世界，并在随后的300年中迅速加剧（第二章）。我们所知的罗马晚期的所有日耳曼群体，作战时都会带上等级不同的两组战士，而这两组人对群体身份的认同有很大差别。这些群体中可能还有不允许参战的奴隶。阿米阿努斯没有探讨这个方面，肯定是限制了我们对特温吉人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讨论所有进行迁徙的外来者群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模型。更重要的是，从他的《历史》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完全有能力区分迁移中不同类型的蛮族。

例如，在《历史》一书的不同章节中，我们见到蛮族战队在罗马土地上从事着攫取财富的常规消遣。阿米阿努斯总是会指出这些群体是战队，有时还会说某个战队里有几百人。他显然有办法区分哪些群体是战队，哪些是大规模的混合人口群体。考虑到战队和376年多瑙河边的哥特群体规模悬殊，这也许并不奇怪。因此，他对斯特拉斯堡战役的描述（见第二章）就更相关了。参加这场战役的（至少据阿米阿努斯说）有克诺多马里斯麾下的3万多名阿勒曼尼人及其盟友，而且他们都在罗马的土地上。这支队伍的规模很大，但阿米阿努斯非常清楚这是一次试图进一步侵吞罗马领土的军事行动，而且队伍中只有男性。他还清楚地区分了克诺多马里斯组织军队时用的各种招募手段。许多人是战斗中出场的各位阿勒曼尼国王的追随者，但有些人是推翻自己的国王后出战的，还有些则是为此战而雇的雇佣

兵。[6]由此可见，虽然参与行动的蛮族人数众多，但阿米阿努斯没有受到“蛮族部队等于迁徙民族”这一下意识反应的影响。

仔细审视他对哥特人出现在边境时多瑙河以北发生的事的记录，这一点就更明显了。例如，在他笔下，那些渡过多瑙河准备去往阿德里安堡的外来者，并不都带着家人。377年秋天，哥特人遇到了麻烦，他们被困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粮食供应即将告罄。为了战胜扼守巴尔干山脉通路不让他们通过的罗马驻军，哥特人招募了匈人和阿兰人的混合部队前来帮忙，并向他们许诺了大量的战利品。这个策略奏效了。这里的要点有二。首先，如果一支队伍中混合了不同政治单元的人（而不是一个“民族”），阿米阿努斯是看得出来的，比如这支匈人和阿兰人的混合部队。其次，虽然他们是在罗马土地上行动的蛮族人，但阿米阿努斯并没有提到还有妇女和儿童同他们一起。在阿米阿努斯看来，这只是一支在紧张局势下对哥特人有用的混合雇佣兵战队罢了。[7]

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将特温吉人描述成一个从家乡一路顺畅迁到罗马边境的“民族”。376年，特温吉人是分两批来到多瑙河的，因为其内部发生了分裂。由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率领的群体人数较多，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层，决定不接受阿塔纳里克的领导，而是到罗马帝国寻求庇护。另一个群体规模较小，但人数也不少，这群人随后在阿塔纳里克的指挥下到了河边。在河边，最初也想寻求庇护的阿塔纳里克做出了另一种选择。阿米阿努斯明确将特温吉人描述为陷入危机的政治联盟，而不是团结一致上路的“民族”。[8]他不仅能描述不同类型的蛮族群体，包括人数非常多的那些，还详细描述了处于危机中的哥特人的情况，可见，阿米阿努斯这位希腊士兵非常有经验，也有足够的信息来为我们明确且准确地描述多瑙河畔发生的事件。他告诉我们一群又一群哥特人带着家人大批涌入时，完全不像是受了某种文化主题的影响。在《历史》的其他部分，他还提到一些非常大的蛮族群体以很不相同的方式在罗马的土地上迁移。他如此描述376年的事件是有意为之，而不是因为他脑中只有这么一种模型。现在，这一点似乎多少被接受了。即使在一般而言对大规模迁徙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中，也只有一个人试图质疑阿米阿努斯提到的数字，他只是断言阿米阿努斯受迁徙主题的影响，但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论证。[9]因此总的来说，阿米阿努斯可能的确很了解自己所写的主题。

质疑阿米阿努斯可信度的人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强调匈人是这些人流离失所的首要原因。这种质疑源于君士坦丁堡的索克拉蒂斯（Socrates Scholasticus）所著《教会史》（*Church History*）里的一段记载，索克拉蒂斯认为阿塔纳里克联盟不是在376年面对匈人袭击时分裂的，而是早在369年，瓦伦斯对特温吉人的战争结束后就分裂了。按照索克拉蒂斯的说法，弗里提根在战争结束之后脱离了阿塔纳里克的领导。在此基础上，盖

伊·哈尔索尔最近主张，哥特人来到多瑙河，最终应该归因于瓦伦斯而非匈人，因为瓦伦斯的军事行动使阿塔纳里克和格鲁森尼人经历了失败，撼动了罗马在多瑙河下游的附属国，正是这种混乱让匈人有机会进入哥特领土。这种观点与传统看法向左。传统上认为，匈人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外来者，其迁徙入侵摧毁了黑海以北既有的政治秩序。[10]

显然，索克拉蒂斯的记载与阿米阿努斯的描述格格不入。对特温吉联盟何时分裂、如何分裂，两位历史学家的理解完全不同。而这是哈尔索尔论证的根本问题。索克拉蒂斯的作品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因为作品的大部分内容与基督教会的发展有关。其他事件他只是偶尔附带提到，而且不会讲什么细节。索克拉蒂斯对4世纪哥特人的整体了解应该远不如阿米阿努斯。此外，索克拉蒂斯是5世纪中期在君士坦丁堡写作的，因此他描述的并不是与他同时代的事件。因此，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仅凭索克拉蒂斯的一份孤立记载，就去纠正与事件同时代的阿米阿努斯写下的十分具体的描述，这在方法论上是不合理的，除非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但实际上并没有。事实上，仔细审视就能发现，索克拉蒂斯的记载，其实是阿米阿努斯笔下哥特-罗马关系的混乱版本（有些事件的先后顺序搞错了）；反过来不成立，因为阿米阿努斯的作品中有大量索克拉蒂斯作品里没有的细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瓦伦斯对阿塔纳里克的战争最终陷入僵局，可能还增加了这位哥特领袖的声望，因为他受邀参加皇帝在河上举行的峰会，得到极大的尊重。这场冲突给多瑙河以北的稳定带来的影响，肯定比不上4世纪30年代早期君士坦丁皇帝大胜特温吉人的影响，而当时匈人还未出现。[11]因此，前述两种质疑阿米阿努斯可信度的论点都站不住脚。我们可以合理地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376年夏，外来的匈人发起侵略，哥特人以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的形式走上了迁徙之路。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怎样将阿米阿努斯描述的迁徙现象与近现代世界中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模式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376年迁徙的规模和特征与现代的个案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合拍。这是因为如阿米阿努斯和其他资料一致记载的那样，哥特人来到多瑙河边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的、消极的。匈人正在破坏整个本都北部地区的稳定，哥特人希望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如阿米阿努斯所说：

> （哥特人）认为色雷斯是个合适的避难所，原因有二：那里的土壤非常肥沃，而且，多瑙河汹涌的洪水将这片区域与正经历外族战争的战场隔开了。[12]

阿米阿努斯指出，哥特人有两个动机：罗马领土的吸引力，以及想要逃离多瑙河以北不安全生活的愿望。

我们先看第二个动机。政治原因（换句话说就是恐惧）带来的人口迁移，通常是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的迁徙：1994年的卢旺达，一个月内有25万人迁移，另一个月内该数字高达100万。376年，哥特人迁徙的政治动机十分强烈，所以其规模不是问题。然而，这次迁徙与现代类似的移民活动的差异在于组织程度，哥特人的组织程度体现在至少三个主要的哥特人群体中。这并不是否认（实际上反倒承认了）多瑙河以北有大量零散的难民，而是说除了他们，罗马人还要面对三个相当有凝聚力的群体：特温吉人内部分裂形成的两个群体，以及格鲁森尼人。这与所有现代的人口迁徙都不一样。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中欧，还是时间上更近的卢旺达和科索沃，政治难民的洪流都表现为许多人纷纷逃命，他们之中并无组织。难民进入营地后，在一部分人中间可能会出现领导结构和组织，但现代世界从未出现过阿米阿努斯描述的那种有序疏散的例子。我们应该相信他吗？

我还是认为，一般而言我们应该相信他。考虑到背景的差别，376年的事件与现代大规模人口迁移之间的差异是可以解释的。例如，哥特人迁徙的奇特之处，可以用376年时哥特人所面临的匈人威胁来解释。在现代的描述中，哥特人往往是惊慌失措的难民，拼命要逃离紧追不舍的匈人大部队。主要的权威资料在描写哥特人到达多瑙河的情景时，都渲染恐慌和失败的气氛，从而为前述观点提供了不少依据。历史学家索西穆斯（Zosimus）可以代表许多人的看法：

> （匈人）前进，冲锋，然后适时后撤，他们骑在马背上射箭，大行杀戮。他们不断如此，将（哥特人）逼入了绝境。活下来的哥特人不得不离开已落入匈人之手的家园，逃到多瑙河彼岸，乞求皇帝收留。[13]

然而，阿米阿努斯记下来的细节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匈人首先袭击了说波斯语的游牧阿兰人——他们住在顿河另一边，在哥特人的东边。匈人吸纳一些阿兰人后，袭击了格鲁森尼人。经过激烈的斗争，格鲁森尼人的首领艾莫纳里克（Ermenaric）和威提莫（Vithimer）阵亡，于是格鲁森尼人决定西撤，就这样进入了特温吉联盟的领土。联盟领袖阿塔纳里克向德涅斯特河挺进。不用说，有关匈人的报告和一大群外乡哥特人如今在他边境上扎营的事实都让他忧心忡忡。匈人发动的一次突袭迫使他回到喀尔巴阡山脉，他试图在那里建起一条防线来保护领地。阿米阿努斯对地理的描述总是含含糊糊，不过还是有可能推断出，这条防线应该是用废弃的罗马防御工事改建的，这些防御工事（limes transalutanus）曾用于保护多瑙河以北的原罗马达契亚地区。但更多的匈人袭击破坏了特温吉人对阿塔纳里克领导能力的集体信任，导致“大多数”特温吉人离开阿塔纳里克，前

往罗马帝国寻求庇护。仍在撤退的格鲁森尼人加入了他们——格鲁森尼人寻求庇护的想法似乎是从特温吉人那里学来的。[14]

这些事件的展开花了多长时间？人们通常认为，匈人对哥特人的攻击是“突然”发生的，而且不管是明说还是暗示，事件发生的时间范围总是被压缩在一年多一点。但一些叙述细节表明并非如此。格鲁森尼两位国王中的艾莫纳里克抵抗匈人“很长时间”（diu），而威提莫抵抗了“一段时间”（aliquantisper），抵抗期间，发生了“多次交战”（multas clades）。这些都不是明确的时间标志，但“很长时间”的抵抗更可能是以年计而非以月计的。此外，哥特人来到多瑙河的时候，匈人并没有紧跟在后面。哥特人可以耐心地坐在河边，派出一位使节前去拜谒瓦伦斯皇帝并递送庇护申请。但瓦伦斯当时在1 500千米之外的安条克，而走陆路的话，使节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些都表明，376年的多瑙河附近并没有大量匈人出现，哪怕特温吉人刚刚遭受了匈人发起的两次大规模袭击。

随后发生的事件也大致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事件表明直到400年左右，许多匈人仍在黑海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大多数现代的重构倾向于认为匈人在376年或那之后不久横扫而来，最西达喀尔巴阡山脉甚至更远。然而在395年，匈人大举袭击罗马帝国，而这么大规模的袭击还是第一次；他们选择跨越高加索山脉，而不是渡过多瑙河。人们认为，这是个狡猾的计划：匈人带着他们的马长途跋涉，从多瑙河基地沿着黑海北岸行进了数千千米。但是，这太荒唐了：等不到开始袭击，马匹和人早就筋疲力尽了。这次袭击真正表明的是，迟至395年，大多数匈人仍然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东边活动，可能主要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地区（地图7）。其他可靠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更多的哥特人（不是376年时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和其他非匈人在罗马帝国多瑙河下游边境是抵抗帝国的主要力量，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386年，也就是最初那批哥特人迁徙10年之后，甚至更晚。[15]虽然匈人确实在黑海北部引起了革命——哥特人于376年来到多瑙河边正是这一革命的体现，但那时并没有大批匈人向西走得那么远。换句话说，与通常想象的不同，特温吉人并不会马上面对匈人的如潮箭矢，而且确实有机会对他们周围发生的混乱做出更加谨慎的反应。[16]

但如果特温吉人有时间组织阿米阿努斯描述的那种有序疏散，那么是否可以合理推断他们这样做了？能组织有序疏散，意味着他们有一个力量足够也连贯一致的决策机构来制订和推行计划，这就带出了关于政治能力和群体认同强度的问题。其他证据表明，特温吉的领导层有能力做出“重大”决策。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联盟成功地维持了对罗马的一贯政策，特别是他们作为附属国可以容忍的臣服程度。这甚至延展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政策，要组织起对哥特基督徒的迫害，因为这个新来的宗教与帝国的文化统治有关。由此看来，特温吉人的认同强度足以让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去应

对匈人构成的新威胁，这种设想本身而言没什么不合理的。

这些决定究竟如何做出，又由谁做出，取决于当时哥特社会中社会权力的分布情况。具体地说，社会分层的程度和阶层之间“差距”的程度将决定决策过程会涉及谁、以何种方式涉及。在社会阶层的顶端，阿塔纳里克、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等领导者——在我们的文本中被称为“士师”或“国王”——会积极倡导特定的政策；但如第二章所述，一个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群体对上级提出的建议享有某种集体否决权，因此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至少扮演了被动的角色。阿米阿努斯叙事中的一些内容表明事实确实如此。他们花了不少时间讨论要不要进入罗马帝国。阿米阿努斯写的是diuque deliberans：他们“考虑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辩论可能也很激烈。他们来到多瑙河以南后，特温吉的新领导层一再“敦促”和“说服”民众接受特定的政策路线，而不是简单地发布命令。[17]

当然，这不是说特温吉人统治地区中的所有人口都参与了决策。考古遗存和历史资料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着复杂文化的世界。日耳曼移民的军事力量创造了它，也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导。但是，尽管公元300年左右卡皮人逃到了罗马的土地上，但大部分原来住在那里的群体——达契亚人、萨尔马提亚人等等——仍留在原处，受哥特人统治。事实上，最难回答的问题是，3世纪人口迁移带来的日耳曼精英和残留的原住群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难以在考古证据中将两者区分开来，所以目前的假设似乎是这两个群体在社会政治和地理方面都迅速融合在一起了。但如此假设既非必要，也不太可能成立。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主观的，内在于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彼此的关系中，物质文化的相似性与此并不相干。物质文化可能反映群体认同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支持，但研究的所有例子都只涉及一两个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特定物品，而不是广泛的、地区性的人工制品集聚。而要确定哪些物品是重要的，则需要精确的民族志信息。[18]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遗存普遍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独立各异的群体身份。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不要忘了整体的历史背景。哥特人和其他在3世纪进入黑海地区的日耳曼移民通过征服赢得了地位，开始享受边境地区的财富。鉴于这种背景，他们与被征服者之间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应该不会那么快消除，哪怕两者之间没有样貌特征上的差异——大迁徙之后，布尔人和他们的新邻人之间正是因为样貌特征不同而产生了隔离。因为日耳曼人是征服者，所以日耳曼身份意味着更高的地位，如果允许原先住在那里的群体跨过这样的地位界限，就有可能威胁到移民的特权地位。简而言之，那是一种类似殖民地的环境，闯入的精英们有现实理由来保护他们的特权，以防其受到原住群体的侵蚀。从对3世纪罗马俘虏的处置方式上可以看出，4世纪的哥特世界确实以这种方式运作。乌尔菲拉是罗马俘虏的后

代，俘虏们显然获准建立了一个基督教会，教会在俘虏和俘虏的后代中持续运作了好几代人的时间。另外，乌尔菲拉在347年或348年被逐出哥特领土时，俘虏后代中的许多人与他同行，可见，他们很有可能在哥特人的领地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想来也是低一等的社群（否则他们就不会离开了）。[19]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在这个时代其他复合的蛮族国家形态中，都可以发现这种被征服者的自治。

这并不是说，在原先住在那里的群体中，就没有一个人或一批人能跨过障碍，融入来到此地的哥特人的社会，获得较高的地位。军队的兵员需求很可能会促成一些比较平等的联盟，比如377年罗马土地上哥特人与一些匈人和阿兰人之间的联盟。一些原住群体也可能有机会获得低等级战士（被释奴？）这样的过渡地位。这些人可以参战，地位比奴隶高得多，但其人身仍然依附于某些自由民。但总的来说，由于身份认同和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整合绝不可能自动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376年的事件，就会看到特温吉人做出决策时肯定会涉及自由民阶级，因为提出政策的人需要赢得支持。参加疏散行动的应该包括自由民和被释奴，因为正是这两个阶层为群体提供了军事能力，其他迁徙的哥特群体中则有一些低等级的战士。[20]即便如此，我怀疑许多原住群体可能没有参加迁徙，文献和考古证据似乎也如此暗示。一份历史资料提到376年后多瑙河北部的“卡皮-达契亚人”（Carpo-Dacians），而当时统治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特温吉人已经离开，切尔尼亚霍夫的定居点和墓地并没有在当时突然停止使用的迹象。[21]我自己能做的最好猜测是，特温吉复合的社会政治世界中有一群说日耳曼语的哥特精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3世纪移民的后代，各种来源的被释奴与奴隶紧紧依附于他们。与这个“哥特人的世界”并存的，还有不少早先住在该地区的群体传承下来的社群。他们肯定已经臣服于哥特人，应该也会给哥特人纳贡，但可能基本保持日常自治，不太可能参与376年的撤离。

简而言之，我们对特温吉联盟形象的重构，特别是它有能力在强势的罗马面前维护自身的军事、政治、文化的形象，基本上符合如下观点：担起领导职责的政治团体——需要获得武装自由民，也许还有被释奴的支持的“国王”们——是有可能参与阿米阿努斯笔下的那种决策过程的。阿米阿努斯的记载细节丰富，他所描述的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实现的成分，因此，我们应该大致接受他的说法。而先假设日耳曼世界中的群体认同有局限性，再据此驳斥阿米阿努斯的叙述，这不太站得住脚。此类质疑往往基于对近来群体认同辩论的片面解读，而更广泛的证据则表明特温吉的高层至少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足以实现阿米阿努斯所描述的那种决策过程。

但即使只是简单浏览移民研究这个学科的成果，我们也能意识到，如果想真正理解这一行动，就需要提出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面对匈人引

发的危机，376年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会做出迁移的决定？他们又为什么会决定越过罗马边境？阿米阿努斯没有给出进一步的细节，因此我们不能指望重构多瑙河以北那次剑拔弩张的会议上讨论的一切。但是，移民研究揭示了影响移民决策的各种因素，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观察结果。

特温吉人用迁移来应对危机，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我们知道，特温吉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阶层主要是讲日耳曼语的移民的后代，那些移民于3世纪在黑海地区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比较移民研究一再证明，移民习惯往往会在人口群体中得到加强。前文提过，自己有过迁徙经历的老一代人会向他们的后代传递这样的期许：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条件更好的地方。从罗马的角度看，主要与3世纪相关的喧嚣一直持续到4世纪，影响着边境之外的土地。公元300年以后，特温吉人才完全控制了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区，而该地区之前是卡皮人的领地。约290—310年，罗马运送了若干个这样的群体到多瑙河南岸，特温吉人正是因此得以进入上述地区。但即使到了4世纪30年代，特温吉人还在继续迁移。332年，他们开始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活动，进入了一些邻近的萨尔马提亚人的领土，但罗马的军事行动迫使他们返回多瑙河下游地区。参与4世纪30年代早期事件的一些人在376年的时候应该还活着，因此靠迁徙来解决重大问题的想法，无疑是存在于特温吉精英的心中的。[22]

移民研究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信息场域，活跃的信息场域显然起了重要作用，让特温吉人决定去帝国之内而不是其他地方寻找新的领地。显然，特温吉人对他们强大的邻居非常了解；从4世纪20年代开始，特温吉就是半臣服于罗马的附属国。这必然影响了他们对目的地的选择。[23]不过，对于他们眼中选择罗马的好处，有必要做一些思考。在罗马帝国面前，哥特人表现出难民的姿态，表示愿意为罗马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庇护。但是，特温吉人深知，帝国对如何安置移民早有政策。他们知道公元300年左右卡皮人是如何得到重新安置的，也见过4世纪30年代对萨尔马提亚人的进一步重新安置。重新安置的条款可能很苛刻，也可能很慷慨，未必都是惩罚性的，但所有的重新安置都是在罗马军事统治的明确背景下进行的。但是，这个先决条件并不适用于376年。特温吉人寻求庇护时，瓦伦斯皇帝正陷在和波斯的长期复杂争端里——这个争端还是皇帝自己挑起来的。他所有的进攻部队都在东部疲于奔命。

因此，罗马人和哥特人的动机都很不简单。几分不同的资料一致表示，瓦伦斯见到前来多瑙河的哥特人非常高兴，认为他们是新兵的现成来源。但在罗马帝国的宣传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皇帝制定政策时绝不可能听命于蛮族；因此，资料记载的这种喜悦必然只是宣传。两个主要边境，一个陷入敌对，另一个失去政治稳定，只有笨蛋在此情此景下才会高兴。而瓦伦斯

虽说不怎么样，但还不至于笨到这个程度。[24]事实上，他制定了审慎的政策，可见并没有大喜过望这样的事。他并没有让所有请求庇护但未曾臣服的哥特人进入，而是只接纳了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率领下的特温吉人。瓦伦斯还在巴尔干地区部署了所有可用的部队，以阻挡阿拉特乌斯（Alatheus）和萨弗拉克斯（Saphrax）率领下的格鲁森尼人。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去阻挡所有哥特人，只能尽量减少损失。[25]

至于特温吉人，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很清楚瓦伦斯的情况。边境附属国很擅长解读罗马部队重新部署意味着什么——例如，军队从多瑙河调到幼发拉底河，就是在准备对波斯采取敌对行动。边境接触区的消息总是很灵通。阿米阿努斯讲过一个关于阿勒曼尼人的故事，很有名。376年，阿勒曼尼人怀疑多瑙河更东边的地方出现了麻烦，因为罗马军队不断被调离他们的前线，然后一位有着阿勒曼尼血统的罗马卫兵退役回家，证实了他们的猜测。[26]就算特温吉人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揣测到瓦伦斯的想法，但有两个迹象表示，他们想要的很可能远不只是帝国通常会给移民的臣属地位。据阿米阿努斯记载，首先，他们要求得到“色雷斯的一部分”，不光是为了逃离匈人，也因为那里土地肥沃。我们知道，进入罗马的移民通常会被打散成小型的团体，去往罗马指派的地方。但特温吉人有更主动的想法。

想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考虑罗马及其周围的经济发展模式。哥特人和3世纪的其他日耳曼移民之所以迁入黑海地区，是因为那里属于罗马帝国的近边缘区，经济上的吸引力更大。这些移民在那里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但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经济剩余更多。一来到帝国边境地区，就可以感受到这些财富：城镇、防御工事、军队，甚至别墅。而我们之前看到，所有这些往往会吸引越境的袭击者。因此，阿米阿努斯说罗马的财富是哥特人的动机之一，是完全合理的。这也让人想起现代的个案研究。现代移民很少有不考虑经济因素的，即便他们移民主要是出于非自愿的政治动机。当然，这也意味着376年的哥特人不只是难民——因为他们有分享罗马财富的野心，所以长期来看必然会与罗马国家发生冲突，尽管瓦伦斯当时实在无法从波斯抽身，去和特温吉人计较。

表明特温吉领袖有更大的野心，也很清楚可能的后果的第二个迹象，是他们得知瓦伦斯最终决定接纳他们，但不接纳格鲁森尼人后的反应。阿米阿努斯告诉我们，他们不仅为自己的好运而欢欣鼓舞，还继续与格鲁森尼人保持联系，以期采取联合行动。[27]可见，特温吉领袖极可能有一个需要两个群体协调行动才能实现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至于他们具体有哪些野心，我们只能猜测。但特温吉的精英是3世纪移民的后代，那些移民曾目睹罗马出于压力而撤离旧行省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他们通过长期信息场域而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看法，自己对罗马附属国的情况则有直接的体

验，也许正是这些让他们在376年夏天将目光投向了罗马帝国。他们表现出难民的样子，但可能早已暗暗期待帝国有一天会从色雷斯撤出，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一块丰饶的土地——而且，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帝国的近边缘区还要高。

难怪讨论花了很长时间：迁到罗马的领土上，同时不甘于臣服，这样的举动简直危险重重。瓦伦斯的军队也许在376年夏天忙得顾不上他们，但不会一直如此，而且，特温吉人是见识过罗马军队的力量的：4世纪30年代，罗马军队迫使他们离开属于他们邻居萨尔马提亚人的土地，罗马还不时调用特温吉人组成罗马辅助部队；从4世纪60年代开始，特温吉人只能靠逃跑来避免被罗马人彻底击败。当然，所有这一切强调的是，尽管有明显的经济吸引力，但在帝国内寻求庇护的这种策略，只有在移民有能力组建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奏效。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他们就不可能抵挡罗马或早或迟必然发起的军事反击。因此，由于罗马国家拥有强大的力量，移民单元必然需要采取那样的形式，这也完全符合比较移民研究揭示的另一个关键点。

既有的政治结构始终是决定移民活动性质的关键因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4世纪的日耳曼国王只养得起数百人的专业军队。如此规模的部队在罗马皇帝面前不会有任何胜算，因为罗马皇帝拥有一支旨在恢复“正常”移民模式的野战部队。小型移民部队最好的出路是受雇于罗马军队，加入待遇还不错的辅助单元，在其他时候进入帝国的一些哥特群体似乎就走上了这条路。[28]但是，要想实现哥特人在376年的野心，特温吉的领袖就需要哥特社会中更多军事力量的帮助，也就是自由民和依附于自由民的被释奴——如果我对这两个战士阶层的定位正确的话。不过，具体用什么名称无关紧要。关键是，他们需要大量的战士，而且就像3世纪时一样，需要到专业军事随从之外去招募士兵。

结果就和3世纪时一样，移民单元除了战士，还包括了妇女和儿童。376年的哥特人就像从波兰到黑海的3世纪移民一样，开始了单程旅行。如果把家人留在身后会怎样？不存在这种选项。把家属留在家乡，等于把他们暴露在被匈人掠夺的危险中。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女性和男性一样早就习惯了迁移，他们都记得自己的先人当年做出的生活选择。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日耳曼经济的发展程度不足以养活足够数量没有经济负担的职业军人，让他们单凭自己的力量与罗马较量。

因此，细看之下，376年特温吉人的迁移就不那么像传统的侵略假说构想的图景了。迁移的决定导致联盟分裂，而且，从3世纪他们在黑海地区这一角确立的统治模式看，讲日耳曼语的精英决定迁徙，并不会导致此地空无一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社会分层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社会层次：自由民，被释奴，融入“哥特”家庭的奴隶，也许还

要加上基本自治的纳贡者。国王和更广泛的（自由民？）精英是这个文化复合体中的统治群体，总人口中有很多成员未必与前者的社会政治结构有紧密联系，也就不会加入这一移民浪潮。[29]但说来说去，没有理由怀疑阿米阿努斯的根本前提，即这个特温吉精英群体有多达数万人。这一记载不仅本身前后一致，得到了其他资料的证实，而且用可观察到的人类移民模式的基本原则来解释也说得通。

这个结论本身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鉴于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文本质量较高，376年的事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测试案例，说明了罗马帝国晚期牵涉到日耳曼群体但记录不那么完整的事件中，还可能存在怎样的情况。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这一时期所有的迁徙形式都相同，有些显然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376年是传统的“大迁徙”的第一回合，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它见证了一场大规模的迁徙，一场不是由一个“民族”，而是由一大批凝聚力很强的人进行的迁徙。为我们描绘这幅画卷的是当时一位很有见识的人，他显然不受有关蛮族迁徙的意识形态盲区的影响。鉴于哥特世界的历史本身就产生于向黑海地区的迁移，考虑到政治权力和军事能力在当时日耳曼社会中的分布情况，以上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除了3世纪常见的从小规模活动开始逐渐壮大的掠夺性移民，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种形式的掠夺性移民（对哥特人来说是部分掠夺性移民）：大规模混合群体。在考虑罗马边境崩溃的第二阶段时，这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结论，需要牢记。

民族迁徙

匈人入侵的连锁反应破坏了罗马东欧边境的安全，此后大概30年，罗马的中欧边境也陷入了类似的混乱局面。376年的时候只有一次穿越边境的重大行动。但第二次的危机不同，它有好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首先，在405—406年，日耳曼国王拉达盖苏斯带领一支似乎大多由哥特人组成的庞大部队进入了意大利。资料很零碎，但我们知道这些入侵者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西面而非东面，因为他们通过意大利东面的阿尔卑斯路线进入意大利，没有经过巴尔干半岛。与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不同，拉达盖苏斯根本没有停下来请求许可。他完全就是个不请自来的入侵者。[30]

其次，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支庞大的蛮族群体从拉达盖苏斯军队出发地附近启程，但这些人沿着多瑙河上游向西走，而不是像拉达盖苏斯一样向南穿越阿尔卑斯山脉。这个群体中大部分是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但也包括了一些人数较少的小群体。汪达尔人［有两个独立的群体：阿斯丁格和西林格（Silingi）］401—402年已经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地方，就在罗马的瑞提亚（Raetia，现代瑞士的一部分）对面。直到约370年，原本是草原游牧民的讲波斯语的阿兰人才占据了顿河以东的土

地。不过，苏维汇人的身份更成问题。这个名词出现在帝国早期的罗马资料中，但未见于约150年到400年之间的资料。它很可能指的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中的一些人，他们在罗马帝国早期形成了旧的苏维汇联盟并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定居——注意这也是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更多的苏维汇人显然在5世纪时占领了同一地区，并且正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于358年发现的那样，这些民族的多位国王常常彼此结成暂时的政治联盟。借助这些来源极为不同的人力，这支联合部队最终武力穿越莱茵河上游边境，进入罗马领土。传统上认为，这发生在406年12月31日。[31]

接着，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次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入侵。407—408年，上述队伍渡过莱茵河后不久，由匈人乌尔丁（Uldin）领导的一支匈人和斯基里人的部队入侵多瑙河下游边境地区的东罗马领土。乌尔丁曾是罗马盟友，从约400年起在河流以北定居。然后，到了413年，勃艮第人从莱茵河往西推进了较短但仍相当可观的距离。3—4世纪，勃艮第人在阿勒曼尼人东面的美因河流域建立了权力基础。在406年到413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他们绕过了自己的老邻居，在如今沃尔姆斯和施派尔的罗马边境线西侧安了身。这表示他们进行了一次距离4世纪时住所约150千米的迁移（地图8）。[32]

留存下来的关于第二次边境崩溃的信息远不如第一次（约376—380年）那么有启发性，因为现存史料的质量没有可以与阿米阿努斯的作品比肩的。假如完整保存下来，兴许受雇于君士坦丁堡的底比斯的奥林匹多罗斯（Olympiodorus of Thebes）的《历史》一书可以透露不少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但很可惜，留存下来的只有从约408年开始到410年8月罗马被洗劫这段时间里的叙述（不过这一段还算完整）。[33]作品对边境崩溃的一些后果提出了极好的见解，但没有讨论崩溃的源头。因此，历史辩论基本集中在边境上一开始发生了什么，这并非偶然。不过，近来的讨论在各方间建立了一些共识，使辩论更集中在那些有分歧的地方。

传统上，所有这些入侵都被视为“民族大迁徙”的一部分。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都是“民族”，包括男女老少，人口众多。这些群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总有点说不清，但肯定有数万人。据记载，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甚至在渡过莱茵河之前就与法兰克人苦战了一场，损失了2万名战士。考虑到战士与总人口的比例通常被认为是1比5，这意味着仅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总人口就远远超过10万（因为他们显然没有被法兰克人彻底歼灭）。还有两份资料称，汪达尔-阿兰联盟以及勃艮第人可以投入的战士数量分别是7万和8万，而追随拉达盖苏斯的总人数应该以10万计。[34]

如今没人相信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他们真实的军事力量。事实证明，勃艮第人从来都不过是二流的势力，而如果有一支8万人的军队，勃艮第人将非常强大；根据另一份资料，8万是勃艮第人的总人口数。[35]但大家的基本

共识是，这些入侵群体的军队必定有相当规模，其中几个都能各自部署超过1万人的战士队伍，就和376年哥特人的两个主要群体一样。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如何能在罗马帝国造成那种程度的破坏了，而更明确的数字也确认了这一点。

在罗马方面，对抗所有这些入侵者的累积效应体现在约420年时的军队编制文件（distributio numerorun）中。如琼斯（A. H. M.Jones）证明的那样，这份文件表明，西罗马野战军中有80个军团（接近总数的50%）在395年到410年间被彻底摧毁。这些兵力一部分是在内战中损失的（我们很快会谈到这个），但大部分损失是在与405—406年后到来的不同入侵者作战时遭受的。更具体地说，斯提利科（Stilicho）这位西罗马的军事总指挥和事实上的统治者光是为了攻打拉达盖苏斯，就不得不组建30个兵团（numeri）的队伍，应该超过1.5万人。奥林匹多罗斯的《历史》留存下来的一段残篇也对此有记录：击败哥特人拉达盖苏斯后，斯提利科从这位哥特领袖的追随者中征募了1.2万名比较优秀的战士到罗马军队中去，这证明此次入侵的人数远远超过了1万人，甚至说有2万人也是可信的。[36]

说到渡过莱茵河的联盟，维塔的维克托（Victor of Vita）提供的一个数字需要慎重考虑。按照他的记录，联盟中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进入北非时，分成70组行进，每一组理论上有1 000人（不是1 000名战士），这样一来，总人口规模就是7万人；不过维克托还写道，这是其领袖——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想出的计谋，为的是让外人觉得这个群体要比实际上大得多。维克托是一名北非主教，他的写作时间在盖萨里克于439年占领迦太基之后的几十年，但他的主要受众是那些不得不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生活在一起的北非人。因此，有理由认为他了解自己所说的事，也知道如何在当时合理的范围内表达观点。那批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总人口超过5万人（夸大的成分考虑在内），也就是说有超过1万名战士，而在向北非进军之前，他们在西班牙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样看来，这个群体406年渡过莱茵河时，规模应该还要大不少，特别是当时苏维汇人也在群体之中。[37]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争论的地方，但对于这个群体的活动的叙述，以及关于罗马反击和群体规模的证据，这些方面的观点相当一致。欧洲中部边境崩溃牵涉到的单元中，至少有两个单元可以投入2万名战士（也许还可以略多一些），这似乎已被广泛接受。[38]

迁移中的这些队伍规模很大，但很明显，它们不是传统上说的“民族”那么简单。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组成的是一个全新的联盟，而不是一个民族。苏维汇人这个群体也是如此。而汪达尔人一开始有两个不同的子单元：西林格和阿斯丁格。西林格人、阿斯丁格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一开始都有各自的国王。拉达盖苏斯的队伍同样可能是一个新的联盟，尽管他似乎是联盟唯一的国王，由乌尔丁带进帝国的匈人和斯基里人也是后376

年时代的新政治单元。[39]

不同类型的资料都多次明确提到有妇女和儿童，足以证明他们也在队伍中。拉达盖苏斯的一些追随者后来被征入罗马军队，据说，他们的妻儿留在许多意大利城市中当人质。至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我们没有与他们最早渡过莱茵河同时期的证据，但是5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在高卢采取行动的一组阿兰人中，确实有妇女和儿童随军。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429年移居北非时，肯定是以混合队伍的形式行动的。妇女（以及她们的子女）可能是406年以后才加入的，有些也的确如此；但是，似乎没必要把妇女儿童的存在解释得这么复杂，而且这个解释也说不太通，尤其是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明确的证据——特别是那些如今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与376年事件相关的证据——证明，日耳曼人和阿兰人群体在迁移时有时会带上家庭。这样的话，406年的队伍中完全有可能包括妇女和儿童。而有的资料说8万人是勃艮第人的总数，有的说仅仅是战士的数量，可见这个群体中可能也有妇女儿童。即使它们不是古代的“民族”，证据也充分表明，我们应当将它们视为数万人组成的混合群体。[40]

还有两点也获得了普遍接受。首先，尽管他们侵入罗马的路径不同——拉达盖苏斯进入意大利，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一路来到莱茵河上游并渡了河，乌尔丁进入巴尔干北部，但将所有参与者视为一个集群并没有错。因为虽然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但所有人在发起袭击之前，都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今匈牙利的多瑙河中游平原上或平原周围。

其次，这些人离开之后不久，大量匈人首先进入了多瑙河中游的同一地区。人们一度认为“匈人风暴”（Hunnensturm）早在376年就席卷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但这一方面是基于对罗马诗人克劳狄安（Claudian）的误读——他只提到395年匈人的袭击经由高加索山脉，而不是跨过多瑙河（与有些人的看法相反），另一方面是由于误以为匈人领袖乌尔丁卷入了405—408年的事件。乌尔丁显然不那么重要，并不是匈人阿提拉（Attila）那个层次的征服者。证据表明匈人的主体直到约400年还留在黑海北面和东面；而最晚到411年或412年（也可能是410年），许多人已经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定居了。[41]这些获得公认的观点放在一起，很好地勾勒出罗马中欧边界在5世纪头10年崩溃后给我们带来的历史问题。所有人都同意，参与这次行动的侵略性军事力量规模很大，大部分人同意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危机的中心在匈牙利大平原上，不久之后匈人就来到了大平原。虽然这些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入侵的根本原因仍然存在争议。

1995年，我提出，卷入405—408年危机的大部分蛮族群体来自多瑙河中游，匈人是不久之后在那里以大数量出现的第一个群体。之后，我继续论证说，罗马中欧边境的崩溃最好理解为376年事件的重演，只是这次是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西面而不是东面。鉴于这次迁徙的移民单元与前一次性质

相似，再考虑到匈人进军欧洲的具体时间，我认为，405—408年的危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罗马的其他一些蛮族邻居宁愿冒险进入罗马帝国，也不愿面对与匈人打交道的不确定性，这有点像376年哥特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的选择。换句话说，这场危机的根本源头在罗马之外，是蛮族地区的发展引发的。[42]

近来的两项研究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认为危机的主因在罗马世界内部，一方面是罗马对外来者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带来的政治混乱。在他的《蛮族潮》（*Barbarian Tides*）中，沃尔特·戈法特（Walter Goffar）认为，君士坦丁堡有可能支持拉达盖苏斯入侵意大利，以便分散斯提利科的精力，因为此时的斯提利科有将巴尔干部分地区［东罗马的伊利里库姆（Illyricum）］从东罗马控制下夺走的野心——这一地区传统上属于西罗马，但当时在东罗马的统治之下。他还进一步主张，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匈人，而是蛮族对罗马政策看法的改变，以及罗马实际力量的变化。一方面，376年越过多瑙河的哥特人一直获准作为半自治的政治团体生活在罗马土地上，这在蛮族地区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其他边境群体的成员看到，他们是有可能进入经济上更发达的帝国领土，而不必放弃他们的群体身份和凝聚力的。这些蛮族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西罗马正走向衰弱，或者看上去如此：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于395年去世后，帝国的东西两半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分离，由不同的幕僚以狄奥多西两个未成年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东罗马的皇帝是阿卡狄乌斯（Arcadius），西罗马的是霍诺留（Honorius，但实际统治的是斯提利科）。外来者群体因此感到可以利用帝国的不统一来增加在罗马土地上繁荣和生存的可能性。[43]

盖伊·哈尔索尔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论点。他认为4世纪末的两个篡位皇帝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Magus Maximus，383—387年在位）和欧根尼乌斯（Eugenius，392—394年在位）为了和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内战，抽调了莱茵河西北边境的罗马部队，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这些冲突让西罗马的部队损失很大，特别是在394年的冷河之役（Battle of the Frigidus）中。斯提利科将军在395年实际控制西罗马之后，并没有着手恢复罗马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局势，因为他更关心与君士坦丁堡的竞争对手斗争，以控制整个帝国。因此到了5世纪初，莱茵河上的防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蛮族附属国国王的善意；除此之外，罗马国家控制力减弱还体现在欧根尼乌斯394年倒台后特里尔铸币厂（Trier mint）被关闭，以及将高卢行省的首府从特里尔改为南边的阿尔勒（Arles）。在哈尔索尔看来，这种削减对405—408年的危机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从欧根尼乌斯的时代开始，罗马西北部一些地方的硬币流通就被打断了，而哈尔索尔认为，情况甚至恶化到影响了几百年来半臣服的帝国附属国一直享受的外交补贴，补贴出现了减少甚至中断。这些领袖的政治权力结构因此受到威胁，因此从405

年起干脆带着追随者迁移到了罗马的领土上，以夺取自己掌权所需的财富。在戈法特和哈尔索尔看来，帝国内部的进程促使多瑙河中游的蛮族迁移到罗马的土地上，留下了权力真空，匈人随之而来。[44]

这些研究指出的因素中，的确有一些在危机展开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有一批明确的证据表明，382年授予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的有利条款，改变了蛮族对能通过谈判从罗马那里拿到怎样的好处的看法。4世纪90年代后期，一个名叫特里毕吉德（Tribigild）的人率领一些结盟的哥特军队在小亚细亚起义，他最初可能就是利用了服务于罗马的其他蛮族的怨恨，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如此好的条件。同样，昔兰尼的塞内西乌斯（Synesius of Cyrene）在399年称，由于382年的条约（特别是397年阿拉里克和欧特罗庇厄斯之间进一步谈判后修订的条约），还有至少一队的外来者要求以类似的条件进入帝国。[45]帝国东西两半之间的分裂使得帝国无法协调反应。我们看到，从405年秋天开始，西方的实际统治者斯提利科与君士坦丁堡在控制伊利里库姆上产生了争议，甚至不惜以开战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西罗马中欧边境开始崩溃时，是不能指望东罗马施以援手的——至少在斯提利科于408年夏天下台前都是如此。在那之后，才有了一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此时，蛮族已经在西罗马土地上建立了势力。[46]

然而，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君士坦丁堡方面鼓励过拉达盖苏斯进攻意大利。东西罗马之间的分歧只能解释危机的后续过程——特别是为什么在409年之前东罗马没有援助，而不能解释为什么蛮族一开始会越过边境。蛮族认知的变化也不足以解释这种决定。尽管拉达盖苏斯的部队在前一年夏天遭到灭顶之灾，但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仍然在406年12月31日越过了莱茵河。虽然花了一段时间，但斯提利科最终组建了一支足够强大的罗马军队抵抗拉达盖苏斯，结果是罗马大获全胜。拉达盖苏斯本人被捕并被处决，大量（据报道有1.2万名）身份较高的战士被招募进罗马的辅助部队，而他们众多地位较低也更不幸的同胞被卖为奴隶，奴隶市场的价格被打压到了低点。[47]很明显，5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西罗马并不打算给谁382年哥特人获得的那种待遇。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仍然决定渡过莱茵河，这说明在他们的想法中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不管是什么因素，我相当确信，哈尔索尔提出的罗马从西北撤军并不是答案。一方面，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确实发生了这种撤军，已有的证据基本是默证。许多评论者将高卢行省的首府迁往阿尔勒的日期定在405年之后，认为它是莱茵河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起因。[48]此外，还有足够的罗马军队留在西北部，使另一个西罗马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Constantine III）得以发动政变，406年年初，他从不列颠来到阿尔卑斯山，409年几乎完全统治了西罗马。即便外交补贴中断起了什么作用，入侵的也不是受其影响的蛮族（而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补贴是否中断了：这同样只有默证）。我

们知道，罗马外交补贴首先给了边境地区的主要蛮族群体，即西罗马边境上的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萨尔马提亚人。405—408年的入侵基本不涉及这些边境蛮族。莱茵河联盟的苏维汇人可能属于这一类（如果他们真的就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只是换了一个名字），但其他所有群体要么来自东部（莱茵河联盟中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和阿兰人），远远超出了帝国西部外交网络的范围，要么来自主要边境附属国背后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两个汪达尔人群体）。如果补贴中断，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但他们显然留在了原地。[49]

这个论点可以再进一步，但要说罗马势力从西北撤出引发了405—408年的边境崩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些入侵中的第一次，即拉达盖苏斯于405—406年发起的攻击，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西北部。拉达盖苏斯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北部，但不可能认为此地的中央皇权有任何削弱。事实上，从西北部撤军只会增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如果西北部罗马力量的削弱是导致405—408年入侵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第一次入侵的目标是另一个方向呢？

在我看来，去看究竟是哪些蛮族涉入了危机会更有启发。可用的资料不足以让我们重建4世纪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详细情况图，但我们可以画出基本的轮廓：多瑙河湾部以北和以西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来自蒂萨河（River Tisza）两岸的不同群体［利米刚特人和阿格拉刚特人（Argaragantes）］的萨尔马提亚人。更往北，还有汪达尔人和其他日耳曼群体，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影响到4世纪的边境行动。[50]如果将这样的分布与405年后该地区出现的入侵者对比，那么很明显，多瑙河中游在罗马中欧边境崩溃之前，就已经见证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和人口动荡。

405—408年的事件发生之前，汪达尔人在401—402年冬天首次引起了斯提利科的警觉。他们在附近的出现对瑞提亚（差不多就是罗马时期的瑞士）的和平产生了一些威胁。这一地区在4世纪中期显然不是他们的家园，当时他们住在西北方向差不多600千米之外的蒂萨河北部地区和斯洛伐克，在多瑙河中部平原和原罗马行省达契亚的边缘。[51]他们最初搬迁到瑞提亚边界的举动虽然无法与后来挺近西班牙和北非相比，但本身确实是一个重大行动。

拉达盖苏斯的联盟（其中肯定包括一些哥特人）应该是从喀尔巴阡山脉的西边入侵意大利的，这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从4世纪开始为人所知的众多哥特群体中的一个或几个，应该已经被招进了拉达盖苏斯追随者中的哥特分队。但当时没有哥特人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阿兰人的情况也类似：历史资料明确指出，在混合入侵部队渡过莱茵河时，阿兰人是其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到405年时，已有不少阿兰人前来占领了喀尔

巴阡山脉以西的领土。但同样，4世纪时没有阿兰人居住在这个地区。一直到约370年，阿兰人最西的落脚处离那里还有1 500千米，在东边，顿河的另一边。[52]从4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不同的阿兰子群体（他们的政治结构中似乎包含了许多自治程度颇高的单元）跟随撤退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向西移动。一群阿兰人与一些匈人结盟，于377年秋天加入了罗马巴尔干半岛上的哥特人，甚至参加了阿德里安堡之役。378年夏天，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在巴尔干西北部遭遇了更多的阿兰人，380年，他将同样数量或更多的阿兰人招入了西罗马野战部队。[53]之后的事态趋于平静（至少在我们的资料中），但向西迁移的阿兰人是376年后第一次边境危机的主要部分，至于为什么到406年的时候，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有那么多的阿兰人，只能用他们后来继续向西迁移来解释。乌尔丁的混合军事力量（他们也从多瑙河中游附近的某个地方进入达契亚）包括了匈人和斯基里人，这也能支持上述结论。[54]4世纪的时候，哪怕是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东部边缘，这些群体都不为人知。因此，在涉入405—408年危机的群体中，勃艮第人和苏维汇人（如果后者确实就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这种在多瑙河中游以及周边地区长期定居的群体，基本上属于少数派。

在罗马边境的腹地，这种程度的人口迁移是相当不正常的。罗马人通常非常严格地控制边境地区的群体迁移。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359年，萨尔马提亚一个小群体（利米刚特）的成员回到他们前一年被驱逐出的多瑙河中游边境区域，而光是这么一个群体就让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果断做出了反应，因为他担心边境以外的骚乱会蔓延到罗马的领土上。[55]405—408年的危机爆发之前，大批新的群体出现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相比之下，约50年前君士坦提乌斯面临的扰乱就不算什么了。两个规模相当大的汪达尔群体、非常多的阿兰人、拉达盖苏斯联盟中的哥特人，还有乌尔丁率领的匈人和斯基里人，都是多瑙河中游的新来者。因此，西罗马在405—408年面临的边境渗透是边境以外同样甚至更大规模危机的产物。那里一定发生了重大事件，才让所有这些群体迁居到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然后才如更多史料记载的那样迁移到罗马的土地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与罗马帝国内部发展有关的因素都没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405—408年的危机爆发之前，多瑙河中游地区集中了大量武装群体和他们的家属，尽管这些因素肯定有助于解释后来发生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在409年或410年以前，西罗马都没有得到东罗马的帮助，为什么通过高卢进攻被证明比入侵意大利更好。我在1995年提出，匈人进入欧洲的第二阶段活动促使这些群体聚在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我个人认为，这仍然是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不仅匈人向欧洲中心迁移的时间与多瑙河中游平原那些入侵者离开的时间对得上，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匈人的移民模式提供了两个进一步的佐证。首先，匈人自己有迫切的理由要进入中欧，他们去那里，不太可能仅仅是因为汪达尔人和其他人离开并留下

了权力真空。其次，考虑到匈人是如何处置那些挡了他们道的邻居的，这些邻居很有理由逃离。因此，匈人行动中心的第二次西迁，即从黑海迁到多瑙河中游（这显然在5世纪初期发生了），很可能带来了405—408年危机酝酿阶段的场面：可能成为匈人新臣属的群体纷纷逃离。这不仅是喀尔巴阡山脉西面出现移民的最简单解释，也是最合乎逻辑、最有说服力的。其他解释完全无法说明405—408年的大部分入侵者为什么一开始会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

鉴于这场危机很可能是376年危机的重演——只是这次是在喀尔巴阡山脉西面而不是东面，史料描写的第二次迁移的具体过程与376年有相似之处也就不奇怪了。第二波移民潮中的很多群体和之前4世纪的哥特人一样，本身就有迁徙的历史。看上去唯一的例外是苏维汇人（我们仍假设这个术语指的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几个子群体），他们在加入渡过莱茵河的行动之前哪儿都没有去。而阿兰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但对此还需要多说两句。通常认为游牧民会随机进行长距离迁移，但事实上他们通常只是往来于固定的夏季和冬季牧场之间。这与4世纪末和5世纪初的那种地理迁移完全不同，当时家庭和畜群不得不离开长期定居的地方，迁移数百千米。2世纪末和3世纪的哥特人本身具有的迁徙能力可能也在这次迁居中起了作用，哥特人之所以习惯迁徙，是因为他们的农业经济并不像现代农业那样依附于特定的土地。不管怎么说，参与莱茵河渡河的各个阿兰人群体来到多瑙河中游（406年事件的起点）之前，经历过一次从顿河以东开始的长途跋涉，可见他们中间已经形成了迁徙而不仅仅是游牧的习惯。[56]

拉达盖苏斯的哥特人也是如此。他们是3世纪黑海迁徙产生的另一支日耳曼人主导的军事力量，其经历可能与从前的特温吉人有相似之处。4世纪的时候，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没有哥特人的踪迹，因此在那次后来证明不幸的意大利之行以前不久，拉达盖苏斯的哥特追随者肯定有过至少一次从本都到多瑙河中游的迁徙。汪达尔人并不像3世纪的哥特人走得那么远，但是从马科曼尼人战争时期开始，他们的控制范围得以延伸，从波兰北部和中部向南延伸到特兰西瓦尼亚高地的原罗马达契亚部分地区。他们也必然先从这个区域向西迁移到了阿尔卑斯山脉的边缘，有资料在402年记下了他们在那里的活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第二轮大迁徙的群体本来就有迁移习惯，这些人更有可能通过再次迁移来应对重大的威胁和机遇。

同样，这些后来的移民的种种动机，可能也类似于376年哥特人迁徙的动机。但我们无从得知他们面临的威胁有多么紧迫，因为不能确定匈人大规模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的日期。他们是不是需要比376年的特温吉人更快地离开旧的住地，我们并不清楚，但不管怎样，他们迁移主要都是出于消极的政治动机。他们也在寻找更安全的新家园。当然，大量哥特人、阿兰人和汪达尔人涌入多瑙河中游平原，哪怕没有匈人的压力，这件事本身也

足以在该地区内造成政治问题。如果一个相对较小的萨尔马提亚群体在359年重返边境地区就足以破坏稳定，那么大量外来者的涌入必然会造成政治混乱。

但与376年时的情况一样，这并不意味着移民们没有想到他们有组织地迁移到罗马土地上之后，有可能得到经济和其他收益。如果来自匈人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搬走，那么就像在376年一样，意识到搬到帝国会有好处的移民就会把目光投向帝国。还有两点观察值得一提。首先，在帝国之外找到一个新家并不容易。例如，376年的时候，有一小群特温吉人撤离多瑙河后没有试图进入罗马，他们迁移到特兰西瓦尼亚高地或高地的西部边缘。但是为了保住这块新领土，他们不得不驱逐一些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萨尔马提亚人，这些萨尔马提亚人则涌到了罗马的土地上。[57]我们也看到，406年在前往莱茵河的途中，汪达尔人与一些法兰克人发生了激烈冲突，据说他们损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万人——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其视为对艰苦战争的真实回忆。日耳曼尼亚并不是到处都有肥沃的土地等着让人来占领，既然无论搬到哪里都要苦战，那还不如去罗马帝国，毕竟那里的经济更发达。另外，就像376年的特温吉人一样，第二批移民中的大多数对帝国有足够的了解，知道这些潜在的好处。换句话说，由于存在一个活跃的信息场域，这批后来的移民讨论后倾向于迁往帝国，和376年时一样，经济掠夺的希望和对匈人的真正恐惧同时起了作用。其次，如前文所述，376年的哥特人后来在罗马土地上作为半自治单元生存了下来，有理由认为这是5世纪初流离失所的群体选择罗马的又一原因。

然而，这些移民群体都知道其在罗马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的雄心会遭遇重重阻力。哪怕有过怀疑，拉达盖苏斯军队的命运也足以将其打消。既然希望迁移过去之后，罗马帝国会做出对他们有利的让步，那么各个群体就都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又和376年一样）他们必须招募自由民（或阿兰人中对应阶层的人）。[58]出于与376年（以及3世纪后期的日耳曼人扩张和9世纪的维京人扩张）同样的理由，唯一可行的移民单元是超过1万名战士再加上家眷组成的队伍。这些移民深知他们的行动是危险的，这点可以从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组成的一些联盟看出来。在乌尔丁失败之后，被卖为奴隶或不得不给别人充当隶农（coloni）的斯基里步兵可能别无选择，而有关拉达盖苏斯追随者的资料质量不高，难以得出结论。[59]但是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大规模联盟是一个全新的群体组合，这些群体在4世纪时彼此甚至不是近邻。此时的联盟显然仍很松散，但即使是这种程度的合作，也需要大量的斡旋。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是正确的举动。有一个说法认为，有相当多的西林格汪达尔人留在原地，如今的西里西亚（Silesia）就从他们得名。一个更可信的说法是，406年迁移的那部分苏维汇人到达西班牙西北部之后很久，还有大量的苏维汇人仍然居住在多瑙河中游地区。

帝国对这些新移民的抵触坚定而彻底，其中一些人不得不改变一开始的策略。东罗马的谈判代表在没有交战的情况下成功策反了乌尔丁的一些关键支持者，乌尔丁的力量被外交手段瓦解。这些人想必在罗马军队中获得了诱人的地位，而许多不那么幸运的斯基里人只能在罗马人的地产上受人奴役。拉达盖苏斯军队的命运与此类似。他的一些地位较高的支持者弃了船，和罗马做了一笔交易，被选入罗马的军队。但是这一次的规模不一样了。被征召加入斯提利科军队的1.2万名拉达盖苏斯“最好的”战士可能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加入规模较大的移民群体，对他们最终与罗马当局达成交易会很有帮助。但同样可能的是，直到斯提利科和他的野战部队压近，他们见识到罗马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后，才想到了换边的策略。[60]

与376年渡过多瑙河的迁移一样，与罗马中欧边境崩溃相关的人口迁移和传统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景象仅有部分相符。在405—408年的危机中，确实有大量混合群体越过边界，但其原因更多在于帝国外部的因素，而不是帝国内部的情况。虽然其中一些群体的组织程度很高，不像现代世界中有时出现的那种难民潮，但这些群体的活动往往可以用现代移民模式背后的原则来解释，尤其是消极和积极动机的组合，以及现有政治结构和信息流动产生的巨大影响。不过，这些群体只是复杂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参与行动的一些群体似乎确实有悠久的历史，阿斯丁格汪达尔人就曾出现在2世纪的马科曼尼人战争中。但与罗马帝国晚期的所有日耳曼群体一样，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彼此之间和与罗马之间的互动很多，也因此经历了转型，群体中包含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权利。群体内部的关系因随后形成的群体间联盟而更为复杂，例如为了更好地在罗马土地上生存而形成的两个独立汪达尔群体的联盟，以及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联盟。因此，和传统的图景相比，迁徙群体的规模要大得多，还出现了新的政治关系，甚至还有巨大的文化差异（比如讲波斯语的游牧阿兰人）。即便某些组成单元已彼此建立联系，越过边境的实体仍是临时的政治联盟，而不是长期存在的人口群体。

因此，难怪罗马当局能通过打击要害来摧毁一些联盟，尤其突出的是，罗马将拉达盖苏斯和乌尔丁军事追随者中的精英吸引到自己一方，打压那些群体的领袖，牺牲地位较低的普通士兵的利益。但是，社会复杂性和即兴联盟自然产生的内部不统一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能够在与罗马进行最初接触后幸存下来的群体还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重复这种迁徙过程的能力。

为生存而战

两次边境崩溃的时候，进入帝国的所有主要群体都有着相似的历史。在最初（绝大部分不请自来[61]）对罗马领土的渗透之后，是一段武装斗争的

时期。这些蛮族群体要迫使帝国接受，它们不可战胜，不会接受罗马通常强加给移民的那种征服加融合的政策。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最初的斗争持续了大约6年，直到与罗马达成382年10月3日生效的和平协议。帝国愿意接受这样的协议完全是因为哥特人的军事能力，特别是他们连续击败了两位罗马皇帝——最著名的当然是378年8月9日在阿德里安堡击败了瓦伦斯，然后是380年夏天在马其顿击败了狄奥多西一世。其他较小的移民群体——泰法尔人、萨尔马提亚人和孤立的哥特人子群体——没能通过最初的军事考验，因而受到了严苛的对待。他们失败后完全失去了群体身份，群体的成员都被分配给罗马地主充当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62]

405—408年危机涉及的移民群体也有类似的历史。这些人同样不请自来，也要为开辟新的家园而战斗。有些人失败了。我们看到，乌尔丁和拉达盖苏斯的许多追随者遭遇了厄运，他们或是被杀，或是作为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被分配出去，尽管每个群体中都有一些成员设法与罗马当局达成了交易。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要更幸运一些。在高卢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后，409年或410年，他们强行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罗马的西班牙，在那里寻找新的机遇。在最初越境6年后的412年，他们瓜分了行省的大片土地。西林格汪达尔人占领了贝提卡（Baetica），阿斯丁格汪达尔人占领了加利西亚（Gallaecia）大部，苏维汇人占领了加利西亚的西北部，而阿兰人作为当时军队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拿下了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和卡塔根尼斯（Carthaginensis）这些更富裕的省份（地图9）。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割据得到了罗马中央当局的批准，但它似乎代表了一种比单纯的劫掠更有序的经济剥削方式。[63]无论是376年还是406年，从入侵到最终定居下来之间的时间间隔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像这样带着武装、不请自来的大规模移民群体，是不可能与迁入地的已有人口立刻达成妥协的。

然而需要解释的是，这两组移民分别在382年和412年定居下来后，为什么隔了一段时间后再次上路。传统上认为，哥特人382年定居巴尔干半岛，395年在阿拉里克的领导下公开叛乱，并在接下来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带着他们的家人和庞大的车队在希腊漫游。他们向南到达雅典，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然后又往北走，到了亚得里亚海边的伊庇鲁斯（Epirus）。经过短暂的休整，他们在401—402年进入意大利，而后又回到巴尔干半岛，直到408年再度启程向西，在意大利从408年待到411年，最终到达高卢并定居下来。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差不多：在西班牙持续到429年的停留不过是个插曲，之后他们乘船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并向东行进，分两个阶段向罗马北非最富裕的省份前进。他们在437年通过条约在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Numidia）暂时获得了一些土地，然后在两年后攻陷迦太基及周围的一些行省，建立了更永久的家园。

长期来看，这些逃离匈人的群体表现出走走停停的迁徙模式。在过去，人们一直都认为第二次迁移的群体和最初越境迁移的是同一个，叙事上的间隔并不算什么障碍。然而，近来有人提出，第二次迁移的不是最初跨越边境时的那种混合人口群体，而更像是军队；这次迁移的队伍本质上完全不同，是正在成形的战队，只从原来的移民中吸收了少量的人力。最欢迎这种说法的，是那些坚信古代社会单元不可能有很强的群体身份认同的人，他们认为像376年和405—408年的入侵者这样的群体，是不可能经过长时间多次动荡后还团结在一起的。[64]

那么，这次迁徙的是军队还是族群？移民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汪达尔人、哥特人和其他群体这种持续的流动性吗？

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居然有这么大的分歧，可见相关的资料并不完备。不过，与公元382年后的哥特人有关的资料比较全面，至少某些年份的资料比较多，因此哥特人的这段历史可以充当测试案例。就哥特人而言，首先要问的是：那些在395年追随阿拉里克造反的人，是否能代表根据382年条约定居下来的所有或大多数哥特人？过去从未有人怀疑这点，但近来蛮族身份变动不居的新观点被许多人接受，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要求：证明382年与罗马议和的哥特人和追随阿拉里克叛乱的哥特人是同一群。有办法证明吗？

简单来说，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哪个罗马的评论家列出阿拉里克在395年召集的究竟是哪些人，也没有人具体描写他如何调动支持他的力量。当然，那是公元第一千年中期，资料不全并不奇怪，重要的是，不要不切实际地追求确定性，然后再以无法确定为借口，拒绝实际上很合理的一种可能性，即参加阿拉里克395年暴动的，就是382年签了条约的哥特人。这并不是说所有按照条约定居下来的人必然参与了暴动，而是说根据382年协议定居下来的哥特人与阿拉里克最早的一批追随者之间有足够的重合度。

该论点首先得到了质量较高的原始资料的佐证。第一，对于此次叛乱，同时代的两位年代早、问题少、彼此独立的罗马评论家——西罗马的克劳狄安和君士坦丁堡的塞内西乌斯——都做了记载。他们明确指出，追随阿拉里克反叛的人就是382年的那群哥特人。如果要否定他们的记录，就得合理说明，为什么这两位分处东西罗马，受众和写作目的都不同的评论家，要去曲解那次行动；但目前还没有找到这种理由。[65]此外，这一本身就很可信的基本结论还有进一步的佐证。近年来，有人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索西穆斯的一段记述来否定塞内西乌斯和克劳狄安的记载。索西穆斯记载，阿拉里克最早在与欧根尼乌斯作战时就发动过叛乱，因为狄奥多西一世只让他指挥一些蛮族辅助部队，而没有把他当作真正的罗马指挥官。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他原本的野心与382年那批哥特人无关，395年的叛乱也是

如此。这种说法有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6世纪的索西穆斯显然是搞错了与阿拉里克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欧纳皮乌斯（Eunapius）的记述。根据年代晚得多，问题也很多的索西穆斯的三行文字（的确只有三行），去否定与阿拉里克同时代的克劳狄安和塞内西乌斯，而且没有进一步论证他们为什么都以同样的方式曲解了阿拉里克的行动，这种方法论怎么说都是站不住脚的。[66]第二，将阿拉里克改写成只对罗马有野心的人，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阿拉里克发动反叛后仅4年，出身蛮族的东罗马将军盖纳斯（Gainas）抓住一些哥特辅助部队反叛的机会，自己获取了在君士坦丁堡的权力。索西穆斯笔下的阿拉里克也是类似的人物（那些采取这条论证路线的人也承认这一点），但是，那两位作者中的塞内西乌斯并没有在准确描述盖纳斯的行为方面遇到什么障碍（克劳狄安则根本没有提到盖纳斯）。[67]如果说，塞内西乌斯虽然对盖纳斯怀有敌意，但还是照实记录了他的行动，那么塞内西乌斯和克劳狄安有什么理由去曲解阿拉里克的行动呢？第三，我们可以肯定，追随阿拉里克的从一开始就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至少有1万名战士，因为在395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迎战一支完整的罗马野战部队了。我们如果不接受克劳狄安和塞内西乌斯告诉我们的事情，也就是阿拉里克领导的是那些缔约后反叛的哥特人，就得为这么庞大的军队另找来源。这不容易做到，因为东西罗马的野战军现在都归西罗马将军斯提利科指挥。[68]

第二个佐证简单说就是，可以合理地认为，在从382年到叛乱发生的这段中间期里，382年的哥特人保持了稳定的政治认同，足以最终发起叛乱。这个“中间期”只有13年。这段时间足够让一代人成熟起来，但许多在382年活跃的成年人在395年仍然活跃。尽管我们对许多细节一无所知，但382年条约的关键是允许相关的哥特人继续享有前所未有的自治——当时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认可这一点。虽然这些哥特人发起了叛乱，还造成一位皇帝死亡，但他们并没有被打散后分派到帝国各地，这就是为什么泰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这位狄奥多西皇帝的发言人和宣传者，必须竭尽全力才能让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接受和平协议。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认为，仅仅13年后，这批哥特人再次合作，采取了行动。[69]

原本的这份和约在哥特与罗马的关系中留下了两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两个问题因395年阿拉里克的叛乱而越发凸显。首先，在382年的和约中，罗马人没有承认谁是全体哥特人的领袖。这符合罗马的一贯政策，即限制可能构成威胁的群体的政治凝聚力——如我们所见，这也是4世纪时对待阿勒曼尼上位王的标准政策。此外，特温吉和格鲁森尼联盟内部的发展也限制了凝聚力。两个联盟进入罗马领土的决定都伴随着高层的政治动荡，现有的领袖或是阵亡，或被推翻。[70]在阿德里安堡之役前，弗里提根曾试图上位，我们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382年之后斗争仍在继续，阿拉里克

为获得对哥特人的整体领导权而不得不战胜一个个对手。他的地位很可能在394年或395年得到了提升。虽然更多地要归因于索西穆斯对欧纳皮乌斯作品的篡改，但阿拉里克一开始确实可能更想在罗马谋求发展。但是，他最终选择在哥特人中发展势力，而且有一个很好的（间接）证据，证明他这么做时至少挤掉了一个竞争对手。阿拉里克后来的生涯，以及他的姻亲和继任者阿陶尔夫（Athaulf）的生涯，受到了萨卢斯（Sarus）这位出身哥特的罗马将军的干扰。萨卢斯发起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为的是破坏阿拉里克和阿陶尔夫与（萨卢斯所效力的）西罗马可能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值得注意的是，萨卢斯的兄弟塞尔吉里（Sergeric）后来发动了一场政变，杀掉了阿陶尔夫及其直系亲属，自己成为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的首领，但在位时间不长。可见，萨卢斯显然来自庞大的家族，有实力竞争哥特人的总体领导权，而他无情的敌意则暗示，正是因为阿拉里克崛起，他才会离开哥特人去为罗马效力。[71]

此外，阿拉里克在哥特人中能取得更大范围的政治成功，与他对待382年条约的第二个未决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也就是半自治的哥特人对罗马帝国负有何种军事义务这个问题。如前文所述，在加给外来者的和约中，罗马通常会规定外来群体需要为罗马军队提供壮丁。382年的和约也可能有此规定，因此罗马正规军中才会有哥特人的辅助部队。但和332年多瑙河以北的特温吉人的情况一样，条约还规定，针对特定的军事行动，哥特人还应提供不定期的军事服务，派出规模更大、自主领导的分遣队。来自特温吉的分遣队曾在332—360年间四度出战，帮助罗马对抗波斯，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与哥特人签订的条约中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要求他们派兵参加狄奥多西与西罗马篡位者马克西穆斯和欧根尼乌斯的两次内战。[72]

有可信的证据表明哥特人对这样的军事义务很不满。在针对两名篡位者的军事行动中，缔约哥特人的参与总有反叛相伴。狄奥多西第二次向哥特人寻求援助时，哥特领导层就如何回复发生了激烈争论。[73]哥特部队在第二次远征中的命运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问题。在394年9月的冷河之役中，哥特人第一天就被派到了前线，而且伤亡惨重。当时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评论说，这场战役见证了狄奥多西的两次胜利：一次是战胜了篡位者欧根尼乌斯，另一次是战胜了哥特人。考虑到罗马帝国容忍哥特人的半自治地位只是因为无法彻底打败他们，这样的伤亡的确有可能改变罗马和哥特之间的权力平衡，让罗马人有机会改写条款。因此，毫不奇怪，几乎是刚从冷河之役回到家乡——应该是在394—395年的冬天，缔约的哥特人就造了反，他们的领袖决心改写382年的条款。[74]

条约里很多我们想了解的内容，以及它规定的哥特与罗马关系的模式，都已无法还原了。但正如许多外交协议一样，它显然是一种妥协方案，将一些更有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完全合理地假设，阿拉

里克在395年叛乱的本质与两位同时代评论家的描述相符。阿拉里克率领382年缔约的大群哥特人造反，该条约让他们有足够的自治权，能够通过集体行动改写他们的协议条款，而冷河之役的伤亡给了他们非常现实的不满理由。这个过渡性结论引出了另一组问题。为什么哥特人为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而发动叛乱，会带来进一步的人口迁徙？毕竟，不用拉家带口，也不用带着所有家当再次上路，他们也完全可以造反啊。[75]

原因之一肯定在于他们已经建立的移民习惯。从历史上看，这一人口群体总是通过搬到新地方来解决问题。这个群体曾在3世纪从波兰迁往黑海，在4世纪初迁入瓦拉几亚，在4世纪30年代试图迁至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最终在376年渡过了多瑙河；他们对如何实现大规模、长距离迁移了如指掌，也随时准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而376年渡过多瑙河的人中，肯定有一些在395年仍然健在。但即使是一直有迁移习惯的群体，也不会在没有很好理由的情况下随便迁移，而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叛乱之后的迁移，则有助于实施改写382年和约中他们不满意的条款的策略。

迁移的动机之一很简单，就是沿途劫掠罗马的社区。395年的时候，阿拉里克是新上位的哥特领袖，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这可以通过带领追随者走上充满财富的路途来实现；史料将哥特人缓慢向南推进至希腊境内和周边的过程描述为一场大范围的劫掠，而我们也没理由认为其中有欺骗的成分。[76]但劫掠只是他们的目的之一。阿拉里克还需要迫使罗马接受有利于哥特人的条约修订。大多数史料不涉及这些谈判的实质性内容，但通过记录得比较详细的资料（比如阿拉里克408—410年第二次逗留意大利期间的资料），我们发现，关键的问题是阿拉里克希望自己的领导地位获得完全的承认，这种承认可能体现在授予阿拉里克某种罗马官职，罗马给予哥特人一定的经济支持，帮哥特人找到一个适合定居的地方。这些诉求背后的重点是，哥特人希望罗马无条件承认自己作为罗马领土上半自治群体的基本权利。382年时，罗马当局显然也在暗自祈愿。帝国发言人泰米斯提乌斯于383年1月在元老院面前为该条约辩护时，以如此陈词结束演讲：期望有朝一日，所有独立的哥特身份终将消失。[77]

在达成长久的和平协议之前，哥特人提出种种条件，罗马帝国在谈判时肯定极为不情愿，因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一直拥有足够的军事霸权，不需要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某个蛮族力量长期共存。因此，赢得罗马的让步绝不是容易的事，这也是有着更好记录的外交事件文献一再表明的。408—410年间，有好几次，阿拉里克几乎达成了协议，但都因帝国不妥协而失败。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众所周知他将要求降到最低，而直到连这点要求都遭到拒绝后，他才允许自己的部队洗劫罗马。这次人口迁移的目的，一是对帝国资产造成损害从而迫使帝国达成协议，二是让哥特人搬到最有机会实现长期外交胜利的地方。阿拉里克395—397年在希腊逗

留，为的是迫使东罗马与其谈判，最终他成功了。397年，以太监欧特罗庇厄斯为首的君士坦丁堡当局和他达成了不错的协议。但是，帝国的一些精英圈子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让步，这也是导致欧特罗庇厄斯在399年倒台的问题之一。随后的一系列政权一致决心不和阿拉里克谈判，所做出的让步也都被撤回。[78]东罗马关上了大门，促使阿拉里克启动下一次迁徙：401—402年，哥特人第一次入侵意大利。这是在通过进一步迁徙来迫使西罗马达成协议。但是，斯提利科靠军事力量挡住了阿拉里克前进的脚步，陷入困境的哥特人回到巴尔干半岛，而无论是西罗马还是东罗马都不愿谈判。

只有外来因素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斯提利科的中欧边境岌岌可危，这位西罗马大将军急需兵员。他已经在401—402的冬天领教了汪达尔人对瑞提亚的威胁，知道多瑙河中游的局势一触即发，因为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等群体为逃离匈人，都迁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因此，斯提利科开始考虑与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结盟。[79]斯提利科最终在408年夏天被废时——主要是因为他没能处理好从405年开始撕裂西罗马的入侵和篡位的复杂局面，阿拉里克已经与他达成谅解，正将自己的追随者推回通往意大利的路上，显然是要去收回应得的东西。更根本的是，与东罗马相比，西罗马目前的混乱局面让阿拉里克更有可能在那里达成合适的交易。

哥特人在接下来的3年里留在意大利，有几次几乎和罗马达成了协议。但帝国总是不愿妥协，他们最终失去了耐心。哥特人现在的领袖是阿拉里克的姻亲和继承者阿陶尔夫。在他的率领下，哥特人前往高卢，这次还是为了占据有利的位置，以迫使罗马与之达成长久的协定。最后，在416年到418年之间，新协议浮出水面。哥特人在阿基坦的加龙河（Garonne）河谷得到了一片富饶的土地，可以耕种和定居，那里比巴尔干的任何地方都富裕得多，距离意大利北部的帝国权力中心还更远，而且，他们的领袖得到了罗马的完全认可。但他们在罗马国家的政治结构中既没有得到金钱，也没有获得任何高级职位，而这些原本都在阿拉里克于408—410年间提出的最有野心的计划之中。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他们被放逐到了罗马世界的边缘。哥特人同意像以前一样偶尔为罗马帝国战斗，还受雇在西班牙抵抗莱茵河的入侵者。[80]

虽说从现代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很奇怪，但395年之后阿拉里克的追随者们断断续续迁移，有其自身的逻辑。无论是这一切，还是418年的最终协议，都无法表明阿拉里克的核心支持者不是382年的那批哥特人。他们一直试图迫使罗马帝国或至少帝国的一半与之达成长久的协议，而他们不断迁移，则是为了进入有助于谈判达成合理协议的政治和地理环境。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还是罗马国家结构对哥特移民过程施加的无法逃脱的影响。在约20年的漫长迁移过程中，哥特人不断调整，只为获得足够的影响

力来迫使帝国改变数百年来的政策。最终，是405—408年的危机，还有莱茵河入侵者在西班牙实施的吞并，才让西罗马当局接受了哥特人的推进。

在该协议出现的过程中，一个新情况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哥特人那从巴尔干到阿基坦的漫长旅途中，有几段时间不短的相对稳定期：397—401年和402—407年在巴尔干地区，408—411年在意大利，412—415年在高卢南部。总共算来，从最初的叛乱到最后定居在加龙河河谷，前后经历了20多年，但其中也许只有大约5年半的时间用于长途迁徙。不管怎么说，这是极其严峻的考验，也是压力重重的时期。而且，你一定想象得到，从起点到终点，阿拉里克的队伍肯定不会保持原样。事后看来，我们知道这次长途跋涉得到了不错的结果。但是面对旅途的艰难和粮食的短缺（特别是410—411年在意大利，414—415年在高卢），以及罗马随时可能发动的反击（尤其是在395年、397年，以及402年内两次与罗马野战军对抗），哥特人并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否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虽然较早的时候，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阿拉里克的队伍从一开始就是那样，但最近的说法正确地强调，阿拉里克队伍的成员在395年和418年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认为阿拉里克比较可能成功的追随者多，队伍规模就大；看好阿拉里克的人少，队伍规模就小。如今这已是普遍看法了。实际上，体现成员数量稳步增长的证据远远优于体现其数量下降的证据。仔细检索资料后，我们发现少数地位很高的人在哥特群体中时常出现的政治权力斗争里落败后，会转而效忠罗马，可能还带着自己的军事随从。前面提过的萨卢斯和弗拉维塔斯（Fravittas）就属于这一类，可能还要算上一个叫莫达雷斯（Modares）的人。不过这些人是非常特别的一类，不能说明群体中有成员大量流失的情况。另外，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份提到阿拉里克失去支持的资料出自一个罗马政治化妆师之手，他为斯提利科效力，由于斯提利科没能在402年的战争中击败哥特人，此人需要竭力挽回他雇主的声誉。他声称阿拉里克的追随者成群结队地抛弃了他，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81]

虽然如此，但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身份认同出现了变化。首先，376年的移民来到多瑙河边时，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分，在我看来到395年时已经消失，另一种看法认为是在408年前消失的。但区分消失的时间只是细节问题。在多瑙河以北的时候，格鲁森尼和特温吉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渡过多瑙河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两个群体间的区别就消失了。[82]两个群体合为一个，随后规模有所扩大。在罗马之外，阿拉里克于409年获得了两股增援力量。斯提利科被推翻后，意大利罗马军队中一支重要的蛮族部队加入了阿拉里克的队伍，这支部队与斯提利科有密切的联盟关系，士兵的家属留

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却在一场大屠杀中被残酷杀害。非常有可能的是，这些人中有很多在仅仅4年前追随拉达盖苏斯来到意大利，然后在那场导致他们前领袖倒台而死亡的外交阴谋中投向了罗马。在罗马之外，很多奴隶加入了阿拉里克的哥特人队伍。我怀疑很多奴隶源自同一批人，因为拉达盖苏斯那些比较不幸的追随者在406年被当作奴隶出卖。但毫无疑问，还有各种不同来源的人。[83]这已经远远不是第一章中谈到的那种传统台球模型能够解释的了。

也就是说，在阿拉里克的生涯中，一个大得多的新政治单元在395年之后的新一轮迁徙中被仓促建立了起来。在我看来，其中原因其实很简单，哪怕我们没有记载这个过程背后谈判情况的资料。斯提利科的前军事盟友加入阿拉里克的队伍，只是因为罗马的敌意。他们一度认为当罗马的盟友很有前途，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抛弃了拉达盖苏斯。斯提利科向他们提出的条件很有吸引力，也许类似于欧特罗庇厄斯在397年给阿拉里克的条件。但斯提利科倒台后，罗马人对“蛮族”的固有敌意释放出来，蛮族士兵的家人遭到袭击，因此，这些人的想法改变了。而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联合起来的先决条件，也是在他们从376年起对罗马帝国采取的联合行动中创造出来的。这个过程也不顺利。两个群体在阿德里安堡共同获得胜利之后，于379—380的冬天再次分裂，主要是因为联合部队的给养问题多多，但也可能是因为两群人的领袖互不相让——任何联合都会遇到这种情况。[84]但显然，这个新的、更大的军事政治实体主要是为抵挡罗马的势力而组建的，如果没有帝国的压力，它肯定不会出现。罗马政治结构的裂缝引导了哥特人在395年和418年之间做出的举动，来自罗马军事力量的压力也促使一些原本彼此独立的移民群体为了生存而联合起来。从不少补充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未能吸取教训的群体遭受了怎样的后果。在阿德里安堡之战中，孤立的哥特袭击部队遭到摧毁，而脱离大部队自己行动的小群体则被制服，不得不接受罗马通常给蛮族群体的那些条件，定居下来。[85]蛮族群体想在罗马领土上兴旺，唯一的办法是联合形成具有足够规模和足够政治凝聚力的实体，以防被罗马帝国各个击破。

因此，阿拉里克的哥特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行动中会出现临时的群体身份。这支队伍的成员似乎大多数是哥特人，但即使在4世纪确实存在共同的哥特文化认同（也许是有的），它也不是获得群体身份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些匈人应该是在新群体内获得了永久的成员身份，而在罗马之外加入阿拉里克的奴隶源自何处根本就是个谜。[86]但即便是其中的哥特分遣队，在进入罗马的土地前也没有在同一个政治单元中一起行动过。正因为有罗马的军事压力，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才会在阿德里安堡联合起来，拉达盖苏斯那批比较幸运的追随者才会认为自己最初选择罗马是错误的，换到阿拉里克麾下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在帝国边界的另一侧，罗马人的攻击既不那么激烈也不持久，不至于促使这么

大规模的群体形成；但在罗马的土地上，所有这些哥特人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生存。事实上，这是一种经典模式。外部压力往往是活跃群体身份认同的必要催化剂。

在统一之前，群体间如何谈判，我们不得而知。但考虑到之前各自独立的政治经历，谈判肯定不会容易——被迫离开这个群体去为罗马效力的高地位哥特人数量不少，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正因如此，外部压力才成为群体形成的关键，而这并不意味着后来在战火中形成的群体认同从本质上说是脆弱的。如果认同真的那么脆弱，罗马早就将这个群体瓦解了（就像对付乌尔丁和拉达盖苏斯的部队一样）；而这个群体尽管后来遭遇了外交挫折、饥荒，又失去了最初的领袖，却仍然保持联合的状态。这一点是罗马最终愿意达成协议的第二个原因。5世纪的第二个10年，聚集在高卢的哥特力量空前庞大，而且在与罗马的持续冲突中，形成了从前哥特政治单元所无的空前凝聚力。[87]罗马在418年时被迫承认有必要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阿拉里克创建的力量已经强大到无法摧毁。

因此，尽管证据存在种种问题，但我们最好将从阿拉里克起兵反叛到418年于阿基坦达成解决方案之间的行动理解为，376年的移民再次上路，寻求更美好的未来，途中，一些405—408年的移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们之前讨论这一时期的日耳曼社会时说过，军人和民众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在经济和政治结构只能支持有限数量的职业战士的社会里，凡是要动员大规模武装力量的事业，都难免需要自由民及其家属的参与。为了有机会取得成功，阿拉里克不得不说服大量的哥特人，让他们相信再次出发迁居他处有好处。但我们也看到，如果这些移民要实现目标，就需要从范围更大的支持者中招募人手。由此产生的新的政治认同，可能部分建立在各哥特群体文化相似性的基础之上，但文化相似并不是关键。汪达尔-阿兰联盟表明，背景完全不同的群体，也可以组成政治身份认同很强的实体。比文化相似性更重要的，是罗马帝国这个敌对势力。

我认为，上述分析很好地解释了行动的种种奇怪之处，而其他论点是做不到的。行动中体现的复杂的政治议程，以及特别是阿拉里克要求有一个定居区域的做法，并不符合雇佣军团的模式。如果说参与行动的只有雇佣兵和军团，就得回答阿拉里克能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职业战士这个难题。

这里的很多要点也适用于另一批多次迁徙的人：406年的莱茵河入侵者。可以放心，说到他们412年定居西班牙之后的历史，我们不会再重复“军人还是民众”的讨论了。还讨论这个问题未免太浪费读者的耐心，而且相关资料也不怎么有用。因此，你对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的理解，往往会影响你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理解。这么说吧，我们手上有一份基本与所记载事件同时代的详细资料，多少算是权威，其中确实写到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拉家带口地前往北非。[88]因此，出于我们在讨论哥特人的例子

时谈到的那些原因，我们没什么理由去怀疑这种说法。

在其他更具体的方面，哥特人和莱茵河入侵者的移民过程更符合比较移民研究的预期。物流问题在决定个人如何行动方面起了关键作用。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带着庞大的车队上路，因此只能走陆路，使用罗马的公路网，而这极大限制了可选路线的范围，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也迫使（比方说）哥特人在395—397年采取那样的往返路线。无法确保海上运输也扼杀了阿拉里克在410年秋天洗劫罗马之后将部队运往北非的计划，最终，罗马人将他的部队封锁在高卢南部并切断其粮食供给。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陆地上也是带着车队迁徙的，但最终决定渡海进入北非时比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做得更好，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有更多时间准备。阿拉里克考虑迁往北非，是在他围攻罗马却没能得到想要的外交协议之后。但他在短短几个月后的410年夏末秋初就放弃了计划。相比之下，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各处活动了十几年，然后才渡海前往北非。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必要的航运，而且与410年的阿拉里克不同的是，429年时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不需要面对帝国迫在眉睫的反击。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分批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船只，因为留下来的人在等待渡海时没有被袭击的危险。

信息场域也发挥了作用。哥特人曾参与对抗两个西罗马篡位者，这为他们后来入侵西罗马做了铺垫。在那之前，他们对欧洲地理的了解微乎其微，也不了解北意大利那些相对富饶也易受攻击的土地离他们的巴尔干领地有多近。410年洗劫罗马前后，他们在意大利待了3年，这无疑也让他们有可能考虑前往高卢。对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406年时，他们显然知道罗马的莱茵河边境在哪个地方，但对西班牙在哪里只有最模糊的认识，也许完全不知道从西班牙南端到摩洛哥只需一小段路程。他们在西班牙停留了很久，不仅有充分的时间安排航运（这样的安排肯定借助了当地罗马商人的力量），还可以收集基本信息（可能也是从罗马商人那里），这使向北非迁移成为可能。事实上，为了准备那次决定命运的渡海，他们尝试了几次海上冒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425年对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发动的海上袭击。[89]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多次迁徙的动机，在比较研究的视角下也说得通。这个合并后的群体离开西班牙去往北非的许多理由，与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离开巴尔干半岛进入西罗马的理由一样。他们当然对该地区的财富感兴趣。罗马北非的中部行省——努米底亚、拜萨西恩（Byzacena）、普罗康苏拉里斯（Proconsularis）——是罗马城的粮仓，北非商人将商品带到地中海广大地区，特别是卖到西班牙（如北非陶器的分布模式所示）。这肯定会激起汪达尔人攫取北非的兴趣。此外，北非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个更安全的地方。哥特人通过不断迁徙来让罗马做出外交

让步，而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直到离开西班牙，都没有与西罗马中央当局达成任何条约。这在409年时并不重要，因为当时西罗马正忙着对付阿拉里克和一连串的篡位者。然而到了5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西罗马已经重获稳定，篡位者被镇压，哥特人则通过新条约加入。此时，莱茵河入侵者成为头号公敌，帝国军队和哥特部队（罗马帝国想从哥特人那里得到的正是这样的军事援助）联合起来，在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他们的惩罚性军事行动。416—418年，西林格汪达尔人和阿兰人遭受重大打击，被迫放弃他们的独立行省，幸存者接受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领导。5世纪20年代，西罗马中央的政治稳定再次崩溃，压力再次缓和，但喘息之机只是暂时的。

因此，除了财富之外，北非还为幸存下来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提供了更大的安全保障。一旦在那里定居，帝国未来就只有可能从海上对其发起攻击，而比起陆地行动，海上军事行动的难度呈指数级增加，后续事件也表明确实如此。从5世纪4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帝国3次向北非派出大规模远征军，但都以失败告终。[90]像哥特人一样，莱茵河入侵者既有政治动机，又有经济动机，而且也和哥特人一样，他们通过不断迁徙来在罗马帝国政治和军事结构的裂缝中寻求安全和繁荣。多次大规模迁徙是罗马领土上蛮族群体持续存在的根本，认为其无关紧要的说法完全不可信。

说到莱茵河入侵者，与阿拉里克的哥特人一样，他们群体身份的发展从修正观点看经历了不少过程。439年占领迦太基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不能简单等同于莱茵河边的那群人；在那之前，群体的成员们在罗马土地上挣扎求生，各个群体的身份都经过了重新协商。就莱茵河入侵者而言，重组的进程更为深入。阿拉里克的队伍——至少在精英层面——似乎主要由哥特人组成，莱茵河入侵者的组成则非常不同。两大汪达尔人群体——阿斯丁格人和西林格人——可能在文化上有些相似的地方，但苏维汇人是来自不同地区的讲日耳曼语者；在406年的队伍中占比最大的阿兰人是讲波斯语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如今是盟友的日耳曼农业群体完全不同。406年，这支队伍只是非常松散的联盟，正如他们412年在西班牙的大割据表明的那样——这些群体跟随各自的领袖，占领了不同的行省。

促成该群体更紧密联合的因素，与促成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统一的因素相同。又一次，罗马帝国这一敌对势力向许多入侵者表明，共同行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武力的威胁：哥特-罗马联合行动无情地摧毁了西林格汪达尔人（他们的国王在失败后被带到了拉韦纳），毁掉了阿兰人的独立（他们的国王阵亡后，剩余的人只能投靠阿斯丁格人并接受其领导）。在没有罗马军事威胁的时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出现联合；而即使面对罗马的压力，也不是所有的入侵者都加入了新联盟。阿斯丁格的君王后来试图用武力控制苏维汇人，但后者抵挡住了。还

有一些阿兰人倾向于留在原地接受罗马统治，最终在高卢定居。[91]

就这样，面对罗马帝国的敌意，希望保持独立的人们开始就原先的群体身份重新协商，以创建规模更大、更具凝聚力、更有可能在罗马土地上生存下来的群体。因此，除了迁徙，群体身份的一种特殊演化对外来蛮族的生存能力也至关重要。

重构他们376年和405—408年的迁徙故事需要进行很多工作。好在这些移民的部分历史得到了相当好的记录，他们的迁徙过程是一个关键的测试案例，我们也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就不再赘述了。他们的历史表明，进入罗马帝国的移民有可能（有时确实也会）有组织地大批到来，其中不仅有军事人员，还有他们的家属。如果他们不甘于沦为罗马的炮灰或农业劳动力，就必须以这种移民单元的形式进入罗马。只有通过招募军事随从之外的人力，才有可能组织起足够大的队伍，在远征时获得成功。同样重要的是，更好的证据表明，这些移民有可能并且确实进行了多次迁徙。绝大多数群体在进入罗马领土之前就有了迁移传统。他们不断迁移，也在罗马的压力下就群体身份不断协商——群体总人数因而稳步增加。迁移和身份调整双管齐下，这是在罗马土地上生存下来的长期战略。

但是，即便需要重新拾起被修正论者摒弃的观点，去主张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不仅是376年之后30年的重大主题，而且与上一章中谈到的动力不断增长的人口流动同为第一千年的重要移民现象，这种迁徙的图景也不是传统上设想的那样。越境进入帝国的各个群体来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已经很复杂的蛮族世界。它们不是“民族”，至少不是那种文化上同质、彼此多少地位相当、离开后出发地就空无一人的人口群体。尽管如此，从两种意义上说，这仍是大规模人口迁移。这类移民群体哪怕只有一个精英，也会包含大量自由民战士和他们的亲属，因而主要移民群体的总人数可达数万人。从移民研究的定性定义上看，这样的迁徙也是大规模的，因为移民在出发地和迁入地（或两者之一）造成了明显的政治冲击。摧毁罗马东欧和中欧边境的移民很快积累起如下成就：在战场上杀死了一位皇帝，消灭了他的军队；用武力逆转了帝国通常对移民的政策；攫取了一些关键省份，使其不再受帝国的完全控制。他们留在身后的土地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正是这个主题：罗马边境之外的大迁徙。

---

[1]　4世纪后期的这些动荡事件之前，阿兰人的领土以顿河为西部边界。这使阿兰能刚好成为罗马多瑙河下游边境的外围附属国，尤其是因为帝国与克里米亚南部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说到405—408年影响了多瑙河中游边境地区的动乱，阿兰人只能算是完全的局外人。

[2] 对危机的相同看法，见Ammianus 31; Eunapius frr.（以及Zosimus 4.20.3

ff，它在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完全依赖于Eunapius）；Socrate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4.34;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6.37等史料。20万的总人数是Eunapius fr 42的说法，该史料的叙述通常比较模糊和夸张，本身不大可信：见Paschoud（1971—89）, vol. 2, 376 n. 143。但这个数字一些人是接受的，例如Lenski (2002), 354—5（附有参考文献）。1万名战士，见Ammianus 31.12.3；这可能只是特温吉战士的人数：见Heather (1991), 139。关于车队，见Ammianus 31.7, 31.11.4—5,31.12.1ff。关于家属，见Ammianus 31.4.1.ff.; Zosimus 4.20.等。

[3] Matthews (1989) 强调了阿米阿努斯的文学手法，Barnes (1998) 则强调阿米阿努斯并不坦率。这两项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分歧，但都强调对阿米阿努斯的作品不能简简单单地去解读。进一步的评论，请参阅Drijvers＆Hunt (1999); G.Kelly (2008)。

[4] 关于"更秘密"的档案，见Ammianus 14.9.1。关于职业生涯档案，见Ammianus 28.1.30。关于军事文件，见Sabbah (1978)。

[5] 关于迁徙主题，见Kulikowski (2002)。关于因果关系，见Halsall (2007), chapter 6。

[6] 关于迁徙行动，见本书第144、129页。阿米阿努斯论战队：见14.4; 17.2; 27.2;28.5。阿米阿努斯论斯特拉斯堡：16.12.7; 31.8.3.

[7] 有人把这支雇佣兵援军与和特温吉人一起来的格鲁森尼人混淆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见Heather (1991), 144—5以及附录B。

[8] 特温吉人的分裂，见Ammianus 31.3.8ff.; 31.4.1。格鲁森尼人似乎也出现了分裂。有一个叫法诺比乌斯（Farnobius）的领袖和他的追随者跟随大部队渡过了多瑙河，但之后的命运和其他人完全不同：见Ammianus 31.4.12; 31.9.3—4。

[9] 只有Kulikowski (2002)真的敢于暗示阿米阿努斯的描述完全是误导，但即便是他，也在Kulikowski (2007), 123ff中基本放弃了原来的观点。虽然他希望证明哥特群体没有什么凝聚力，但他仍然接受了这个观点：哥特人的混合群体人口"至少以数万计，可能还多得多"（p. 130）。在其他反迁徙论者中，Halsall (2007)认为可能有超过1万名战士，混合群体总人数有4万人；而Goffart (1981), (2006并未详细讨论过376年的事件。

[10] 见Halsall (2007), 170ff，他借鉴了Lenski (1995)对Socrate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4.33的分析。

[11] 因此，我现在还是认可我自己在Heather (1986)中提出的"阿米阿努斯与索克拉蒂斯"问题的分析。哈尔索尔希望避开一系列使掠夺性移民成为因果关系中

心的事件，这似乎是他反对年代更接近、记录更详细的阿米阿努斯，偏向年代更晚、记录更简略的索克拉蒂斯的根本理由，但他并没有给出基于历史证据的充分理由。我认为，这属于用先入之见来给不合理的方法论找根据。

[12] Ammianus 31.3.8.

[13] Zosimus 4.20.4—5.

[14] Ammianus 31.3.2—8.

[15] 有关高加索突袭，见Maenchen-Helfen (1973), 51—9（认为他们来自多瑙河）。有关383年多瑙河以北的其他哥特人，见(Arimer) Achelis (1900)；以及(Odotheus) Zosimus 4.35.1, 4.37—9。

[16] 一些匈人群体确实在405—408年之前在更往西的地方活动，但在公元400年之前，这样的匈人数量相当少：377年秋天加入多瑙河以南的哥特人的雇佣兵（见前注7），还有4世纪80年代在瑞提亚发现的另一个匈人/阿兰人的战队（Ambrose, *Epistolae* 25）。从约400年开始，乌尔丁（Uldin）的力量显然比较大，但即使是他的队伍，在405—408之后到达多瑙河中部的匈人部队面前也相形见绌：见本书第五章。总的来说，所有这些都表明，376年的行动更接近恺撒笔下公元前1世纪中期莱茵河以西邓克特累人和乌昔鄙夷人的活动。当时发生的是一系列规模较小的袭击和攻击，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入侵，使莱茵河以东的人认为住在那里不再安全：见Caesar, *Gallic War* 4.1。

[17] 关于讨论，见Ammianus 31.3.8。关于说服，见Heather (1991), 176—7,179—80。

[18] 关于考古学和群体认同，请参见本书第一章。切尔尼亚霍夫文化中，我觉得有可能区分出移民群体的物品是骨梳，某种形式的扣针，北欧、日耳曼长屋类型。遗憾的是，这些物品的详细分布图尚未得到绘制。

[19] 关于乌尔菲拉的介绍，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 3。我怀疑另一种观点——迅速的社会融合——有一厢情愿的成分，主要是出于对纳粹时代的恐怖的反应，不愿意接受相对有紧密关联的人口群体中会有这样的不平等关系。希特勒的宣传机构利用罗马帝国晚期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群体的东扩，为第三帝国的恶毒行为辩护：见Wolfram (1988), chapter 1。但是，如果我们试图按我们的愿望而不是合理证据来重构过去，那么谴责纳粹暴行这个值得称许的决心反而会带来混乱的思考。

[20] 关于阿德里安堡战役的记载没有特别提及战士的不同等级，但确有证据表明，不同等级的战士见于拉达盖苏斯405年的部队（Olympiodorus fr 9）、阿马

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的东哥特（见本书第五章），以及后来的东哥特法律。另外，《罗马君王传》生动地记录了3世纪大量哥特移民带着家眷和奴隶行进的情景，这些记录可能是基于4世纪的事件而写的（*Historia Augusta*, Claudius 6. 6, 8.2；参见本书第三章）。我认为，处境艰难的特温吉人在多瑙河岸边为换取食物而卖给罗马人当奴隶的，很可能就是这些低等级战士：见Ammianus 31.4.11.

[21] 关于卡皮-达契亚，见Zosimus 4.34.6。关于切尔尼亚霍夫的延续，见Kazanski(1991)。

[22] 关于卡皮人，见本书第三章。关于萨尔马提亚人的迁徙，见*Anonymous Valesianus* 6.31。

[23] 关于4世纪的哥特人，见本书第二章。有关信息的观点也适用于阿塔纳里克领导少数人进入萨尔马提亚领土的行动：特温吉人全体在332年也尝试这么做过，但遇到了罗马人的反击，只好作罢（见前注22）。

[24] Noel Lenski (2002), 182ff., 325f试图证明，哥特人到来，瓦伦斯认为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兵员，因此决定攻打波斯。我认为这个论点没有说服力，我仍确信哥特危机让瓦伦斯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见Heather（1991），128ff。

[25] Kulikowski (2007) 123ff暗示，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是分头来到多瑙河并请求庇护的，所以瓦伦斯需要先后做出决定，但这不符合阿米阿努斯的记载（31.4.12—13; 31.5.2—3）。

[26] Ammianus 31.10；参见更宽泛的边境研究，如Whittaker (1994)。

[27] Ammianus 31.5.3—4。也可能只是罗马人多疑了，但我不这么认为。

[28] 比如，苏利达斯（Sueridas）和科利亚斯（Colias）率领的哥特人（Ammianus 31.6.1），也许还有霍塔里乌斯（Hortarius）率领的阿勒曼尼单元（Ammianus 29.4.7）。

[29] 我怀疑（但没法证明），对于那些只对哥特人进贡，但在其他方面基本享有独立的原住群体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有关匈人和它的不同臣民间的类似关系，见本书第五章。

[30] 完整的参考资料，见*PLRE* 2, 934。

[31] 关于瑞提亚的汪达尔人，见Caudian, *Gothic War* 278—81, 363—5, 400—4, 414—29。关于苏维汇人的身份，见Goffart (2006), 8—3，他认为是马科曼尼人/夸迪人，这种观点最有可能成立。越过莱茵河的日期一般定在406年12月31日，是根据Prosper, *Chronicle* AP 379；说编年史作者也许指的是405年12月31日的论点，见Kulikowski (2000a), 328—9。不过根据Birley (2005), 455—60的反

驳，Kulikowski (2007), 217 n.37的说法似乎不那么确定。

[32] 关于乌尔丁，见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9.25.1—7；*Codex Theodosianus* 5.6.3。关于勃艮第人，见Demougeot (1979), 432; 491—3。

[33] 关于奥林匹多罗斯，首先见Matthews (1970)，进一步的讨论见Blockley (1981),(1983)。

[34] 汪达尔人的损失，见Gregory of Tours 2.29。1比5的比例是常用的做法，见Schmidt (1933), 286, 293。有关汪达尔/阿兰的数字，见Procopius, *Wars* 3.5.18—19；Victor of Vit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1.2。有关勃艮第的数字，见Orosius 7.32.11。关于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人数，见前注30。

[35] Jerome, *Chronicle* 2389 (= 371 AD).

[36] 关于那份编制文件及其重要性，见Jones (1964), Appendix III。Jones的论点没有受到Kulikowski (2000b)的影响，因为该观点来自《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中两个日期明确的段落的对比：约395年时的东部野战军和约420年时的西部野战军。关于30个兵团，见Zosimus 5.26.4。关于拉达盖苏斯的1.2万名追随者，见Olympiodorus fr. 9。

[37] Victor of Vit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1.2。因此，我比Goffart (1980), Appendix A更信任维克托的观点。

[38] 例如，Halsall (2007), 206认为拉达盖苏斯率领着“一支大型部队”，将渡过莱茵河的队伍形容为“庞大”（p. 211）。只有Drinkwater (2007)，特别是其中的323—4才认为战队就足以解释这样的行动。

[39] Zosimus 5.26.3认为拉达盖苏斯在攻击意大利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招募（但我有点怀疑他是将拉达盖苏斯和渡过莱茵河的队伍弄混了）。*Codex Theodosianus*5.6.3明确指出，乌尔丁的追随者是匈人和斯基里人的混合，也就是说那是376年后出现的一个新联盟。

[40] 关于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见Zosimus 5.35.5—6。在高卢的阿兰人，见Paulinusof Pella, *Eucharisticon* 377—9。关于北非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见Victor of Vita,*History of Persecution* 1.2。关于勃艮第人，参见前注34和35；还应当考虑到，该部落能在迁移过程中保留他们的东日耳曼方言，见本书第三章。没有人怀疑阿米阿努斯的记载，即376年哥特人来到时也带着妇女和儿童（31.3—4），所以日耳曼人和阿兰人武装部队可能携带家属的基本原则似乎也成立。但Drinkwater (1998)持相反观点，他断言，尤其是在273年，认为只有战士参与行动才是合理的，这一说法并未引起关注。参见Drinkwater (2007)，323—4。

[41] 危机起源于多瑙河中游，此后那里出现了匈人，这两个观点都是Heather(1995a)首先提出的，现已被普遍接受：见如Goffart (2006), chapter 5; Halsall(2007), 206ff。克劳狄安的一个关键段落被误读为指的是多瑙河上的匈人，见*Against Rufinu* ii. 26ff（特别是36f。）。

[42] Heather (1995a).

[43] Goffart (2006), chapter，特别是75—8（危机后不久匈人出现在多瑙河中游）；78—80（拉达盖苏斯）；94—5（哥特人来到罗马土地上并生存下来，凝聚力没有受到太多影响，这在其他群体中带来了连锁反应）。

[44] Halsall (2007), 195—212；参见Halsall (2005)，特别是补贴中断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45] 关于特里毕吉德，见Heather (1988)；Synesius, *De Regno* 19—21。

[46] 来自东罗马的首批实实在在的援助是4 000名士兵，他们于409—410年来到了拉韦纳（Ravenna）：见Zosimus 6.8。

[47] 关于奴隶，见Orosius 7.37.13ff。

[48] 通常认为应对此次迁移负责的要么是君士坦丁三世，要么是君士坦提乌斯三世（Flavius Constantius）：见Chastagnol (1973)；参见Kulikowski (2000a)。Halsall(2007), 209对此提出质疑，但没有提出具体证据来反驳。

[49] 关于君士坦丁三世，见Zosimus 6.1，其中明确表明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军队已经充分联合起来支持他，将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赶入西班牙，将篡位者带向了帝国：见Matthews (1975), 312ff。关于罗马外交中补贴的一般作用，见Heather (2001)。

[50] 相关的资料，首先是Ammianus 17.12—13；*Anonymous Valesianus* 6.31—2。有关4世纪汪达尔的近期讨论，见Goffart (2006), 8—7，他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有证据表明他们住在西里西亚（Silesia），蒂萨河上游。

[51] 关于瑞提亚地区的汪达尔人，见前注31。关于他们在4世纪时的位置，见前注50。

[52] 关于4世纪的哥特人，见Heather (1991), chapter 3。关于阿兰人，见Goffart(2006), 89—90，以及Ammianus 31.3.1，根据阿米阿努斯的记载，375年前后，最西边的阿兰人群体被称为“顿河人”（Tanaites）。

[53] 关于377年的阿兰人，见Ammianus 31.8.4ff，以及Heather (1991), 144—5 and Appendix B；关于378年，见Ammianus 31.11.16。他们被征召加入罗马

军队，见Zosimus 4.35.2。

[54] 乌尔丁追随者的身份来自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9.25.1—7以及*Codex Theodosianus* 5.6.3。

[55] Ammianus 17.12—13（君士坦提乌斯358年的安排）；19.11.1—3（利米刚特人359年回归）。

[56] 游牧经济中固有的周期性迁移与“真正”的人口迁移间的区别，见本书第243—248页。

[57] Ammianus 31.4.13；我认为这些是在狄奥多西登上帝位之前被击败的萨尔马提亚人：见Theodoret, *Historia Ecclesiastica* 5.5; *Panegyrici Latini* 12(2).12.9—10。

[58] 阿兰人经济有游牧特征，从理论上说，他们的社会结构有可能与以农业为主的日耳曼人（如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不同；Ammianus 31.2.25有此暗示，说得比较笼统。

[59] 关于斯基里人，见*Codex Theodosianus* 5.6.3。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中，地位较高的一些被召入罗马军队，其他许多士兵则被卖为奴隶；命运的反差可能表明后者在是否要参与行动这点上别无选择。

[60] 关于乌尔丁的部队，见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9.25.1—7；以及*Codex Theodosianus* 5.6.3。拉达盖苏斯：见Olympiodorus fr. 9，其中提到那些“最好的”士兵，而Orosius 7.37.13ff的记载则不同，那里记录了被卖为奴的普通士兵的悲惨命运。“最好的”一词，原文是Olympiodorus用到的“optimates”，有时optimates被翻译为“贵族”，但不可能有那么多贵族，所以这个词只可能是指更高级别的战士：见本书第二章。渡过莱茵河的群体和勃艮第人中间的精英，他们不像拉达盖苏斯或乌尔丁那样面临罗马强大而迅捷的反击，所以没有脱离移民大众的明显倾向。

[61] 唯一可以说是接受了邀请的群体是特温吉人，他们在376年受到瓦伦斯的邀请。但在我看来，当时的瓦伦斯其实也没有别的选择。

[62] 参见Heather (1991), chapter 5, and Appendix B。我不相信格拉提安皇帝在380年夏天与格鲁森尼人达成了单独的和平协议。我们很清楚，罗马传统政策的这种调整只影响了特定的哥特人：见Stallknecht（1969）。Kulikowski (2002)和Halsall (2007), 180ff最近试图主张，382年的时候，罗马没有批准任何不寻常的政策，但这一论点经不起推敲：见Heather (forthcoming)。

[63] 当地的罗马地主很可能会与侵略者达成协议，以防止其财产受到缺乏组

织，因此更具破坏性的攻击。参见Hydatius, *Chronicle* 41 [49]：特定的入侵者群体在特定行省落脚，因此西班牙行省议会有可能负责与罗马行省这一边谈判。

[64] 参见如Kulikowski (2002)；Halsall (2007), chapters 7—8。

[65] Claudian, *De Bell. Get.* 166ff., 610f（写作年代定为402年）；Synesius, *De Regno* 19—21（写作年代定为399年），以及Heather (1988)。Kulikowski (2002)和Halsall (2007), 189—94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认为这两位罗马作者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曲解事实。

[66] Zosimus 5.5.4。Liebeschuetz (1992); Kulikowski (2002); Halsall (2007), 191—4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偏重篇幅短、较为混乱，而且和所记载事件不在一个时代的索西穆斯的记录，轻视与事件发生时年代更接近的资料（即使这意味着对阿拉里克的职业生涯采取略有不同的解读）。索西穆斯的问题很多，包括将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之间的两次战役（395年和397年）混为一谈，他还把两个资料来源——欧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多罗斯的作品——合到了一起，从而抹去了阿拉里克的哥特人10年的历史[Zosimus 5.26.1：见Heather (1991), 210]。因此，说索西穆斯没有真正掌握阿拉里克的职业生涯，还是说得轻的。

[67] 盖纳斯的行动在Synesius, *De Providentia*中得到很好的描述，虽然这样的描述肯定带有敌意；参见Cameron and Long (1993)。

[68] 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Liebeschuetz (1992) 认为阿拉里克在395年仅仅领导着一两个哥特辅助兵团的看法是错误的。Halsall (2007), 192—3试图避开这个问题，他一直拒绝接受该部队与382年的哥特人有重合，但同时认为阿拉里克的武装追随者数量一定很多，他们主要是哥特人并来自巴尔干半岛。而接受后面那些观点，实际上离阿拉里克领导382年的哥特人反叛这个结论就不远了。他拒绝这一结论是因为他不相信382年确立了授予哥特人自治权的条约，但请见注69。

[69] Themistius, *Orations* 16.211。除泰米斯提乌斯的作品之外，可以说明哥特人直到约390年甚至更晚都还享有自治的不仅有赞同狄奥多西及其和约的资料，如Pacatus, *Panegyrici Latini* 12.(2).22.3—5（其中哥特人被描述为服务于狄奥多西的外来群体之一），还有对此表示不赞同的资料，如Synesius, *De Regno* 19—21 [Heather (1988)对此有评论]。Halsall (2007), 180—4提出奇怪的主张，表示没有证据说明382年时哥特人获准继续享有自治；他似乎没有仔细阅读泰米斯提乌斯演讲的结尾。参见Kulikowski (2002)。

[70] 罗马对待领袖的政策，见Heather (2001)。不管是最早的领袖（阿塔纳里克、艾莫纳里克家族）还是他们的直接继任者（弗里提根、阿拉特乌斯和萨弗拉克斯），都没能在376—382年的斗争中活下来：更多细节，见Heather

(1991),188—92。

[71] 弗里提根：见Ammianus 31.12.8—9，以及Heather (1991), 175—6,179—80。弗拉维塔斯（Fravittas）和埃留尔夫（Eriulph）之间的纷争是382年后的争夺的最好例子。两人各领导了一派，对哥特与罗马孰先孰后持不同观点：见Eunapius fr.59，Zosimus 4.56在概述Eunapius fr. 59时写出了事件发生的时间。进一步的讨论，请参阅Heather (1991), 190—1。狄奥多西应该举办过宴会，让Halsall (2007),188—9的论点难以成立，Halsall认为，阿拉里克不可能是带领382年的哥特人造反的领袖，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在382年以后，哥特人的社会政治等级继续保留下来（Halsall没有讨论这一事件）。有关萨卢斯和塞尔吉里的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Heather (1991), 197—8。Kulikowski (2002)和Halsall (2007)都没有讨论它可能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希望获得罗马对他领袖地位的认可，是阿拉里克一再要求罗马帝国授予其将军头衔的原因，当然可能还要算上连带的给他的随从们的报酬。但请注意，将军头衔是可选的额外项，为了达成协议他可以放弃这个要求：见Heather (1991), chapter 6。

[72] Kulikowski (2002)——Halsall (2007), 187—9基本追随他的观点——否认在条约签订的382年和阿拉里克发动叛乱的395年之间，哥特人提供了大规模的军事服务；但其论证过程诡辩的成分太多，不能令人信服。*Panegryrici Latini* 12.(2)32.3—5暗示，主要的哥特分遣队很可能只是为对抗马克西穆斯而招募来的（特别是Pacatus明确评论道，将哥特人留在身后是危险的），而Eunapius fr. 55和Zosimus 4.45.3注意到马克西穆斯试图破坏被招进军队的哥特人的忠诚，这再次暗示有些事情很不寻常。一系列资料都写到有大量哥特人参与对抗欧根尼乌斯的军事行动（Zosimus 4.58；John of Antioch fr. 187；Orosius 7.37.19），而狄奥多西为哥特领袖举办宴会（见注71）时，正在考虑如何回复欧根尼乌斯的使节（Zosimus 4.56）。在我看来，宴会可能是为确保哥特人参与而采取的第一步行动。

[73] 关于马克西穆斯的叛乱，见Eunapius fr. 55；Zosimus 4.45.3,48—9。当然，阿拉里克对抗欧根尼乌斯之后领导了叛乱。Kulikowski (2002) 和Halsall (2007), 187—93的论点既没有评论马克西穆斯的叛乱，也没有评论宴会上的争吵发生的时间所表明的意义。

[74] Orosius 7.35.19（伤亡人数在Zosimus 4.58得到确认）。Kulikowski (2002) 和Halsall (2007), 187—93都没有讨论哥特叛乱的背景。

[75] 最近，我们在北爱尔兰的“耶稣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也称贝尔法斯特协议）中看到了这种外交战略的一个成功范例，一个失败的案例是“奥斯陆中东问题协定”（Oslo Accords on the Middle East）。

[76] Zosimus 5.5.5ff.

[77] Themistius, *Orations* 16.211.c—d.

[78] 我们尚不清楚，这在短期内是否会对阿拉里克在伊利里库姆的地位造成任何实际影响；作为该地的指挥官，他或许能够保持对权力杠杆的控制。

[79] 关于该论点的更多细节，见Heather (forthcoming)。

[80] 更多细节参见Heather (1991), chapter 6。

[81] 弗拉维塔斯、萨卢斯和莫达雷斯：见*PLRE* 1, 605；372—3。关于402年的战役，见Claudian, *VI cons. Hon.* 229ff；参见Cameron (1970), 186—7。

[82] 之所以说“消失”，是因为在所有讨论376年事件的资料中，只有阿米阿努斯知道最初有两个独立的哥特群体。在我看来，格鲁森尼人和特温吉人都根据382年条约得到了安置，而两个群体都参与了阿拉里克在395年的叛乱，而且肯定是联合起来的。另一种观点是，联合发生在408年阿拉里克将其姻亲阿陶尔夫从潘诺尼亚招来时：见Zosimus 5.37.1ff。

[83] Zosimus 5.35.5—6. *Pace* Kulikowski (2002)，如果他们不属于斯提利科征召的那批1.2万名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的话，很难想象为罗马效力的这一大批蛮族战士是从哪里来的：见Olympiodorus fr. 9。

[84] Heather (1991), 151ff试图解开Zosimus的困惑。

[85] 几个哥特小群体被Frigeidus（Ammianus 31.9），Sebastianus（Ammianus 31.11）以及Modares（Zosimus 4.25）分别击败。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个完整的列表。关于该过程的一般性论述，见Heather (1991), 213—14, 223—4, 314ff。

[86] Zosimus 5.45.3；参见Liebeschuetz (1990), 75ff.; Kulikowski (2002。

[87] 想说清这支哥特力量到底有多大，基本只能靠猜测。不过，如果4世纪哥特单元的兵力是大约1万人，那么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队伍能投入的战士数量至少是2万，总数可能在3万到4万之间。

[88] Victor of Vit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s* 1.2.

[89] Hydatius, *Chronicle* 77 [86].

[90] 5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见Hydatius, *Chronicle* 59—60 [67—8]；5世纪20年代：见ibid. 69 [77]；5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见Heather (2005), 289ff. and 390f。

[91] 苏维汇人：见Hydatius, *Chronicle* 63 [71]。阿兰人：见Bachrach (1973) 的简明列表。

第五章

匈人的迁徙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混乱从君士坦丁堡一直蔓延到巴黎，然后在453年，匈人阿提拉因为夜夜当新郎而暴毙。喝了一两杯酒之后，这位大征服者回房睡觉，却因为一根血管爆裂而死亡。第二天一早，人们找到了他的尸体，新娘蜷缩在旁边，已经吓坏了。他的暴毙开启了他的儿子们对权力的疯狂争夺，争夺很快升级为全面的内战。之后，情况发生了更危险的变化。阿提拉的帝国不仅包括匈人，还有大量非匈人的臣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认识到，内战是他们摆脱匈人控制的机会。领导叛乱的是格皮德人中一位名叫阿尔德里克（Arderic）的国王。结果是一场发生在454年的重大战役，地点在原罗马潘诺尼亚省的内达奥河（River Nedao，不清楚具体位置）。

> 阿提拉控制下的各部落间激烈交锋。王国和人民分裂出去，一个整体分裂成许多部分，各自为政。由于首领死去，他们疯狂地互相攻击……于是，最勇敢的部落支离破碎……只见哥特人挺起长矛，格皮德人挥舞长剑，鲁吉人折断刺入身体的长枪，苏维汇人徒步，匈人弯弓，阿兰人的主战部队是重装战士，赫鲁利人则用轻装武士。[1]

这段叙述很有名，尽管修辞色彩大于写实，但它点出了本章的核心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匈人的崛起引发了两次向罗马帝国境内的大规模迁徙。从表面上看，在边境之外，匈人崛起也带来了重要的人口迁移。首先，是匈人自己。376年罗马东欧边境崩溃之前，他们在黑海东北面，高加索对面的某个地方生活。但是罗马的潘诺尼亚行省——内达奥河战役发生的地方——包括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匈牙利大平原的东南边缘，而阿提拉帝国的中心在距离高加索数千千米的多瑙河中游地区。与此同时，正如对战役的描述所示，匈人从不孤军作战。4世纪70年代，他们第一次攻击黑海以北的哥特人时，讲波斯语的阿兰游牧民也参与其中，乌尔丁的部队中包括讲日耳曼语的斯基里人，而东罗马军队在427年将其他匈人赶出潘诺尼亚后，还要重新安置匈人的大量哥特盟友。一代人的时间之后，阿提拉的帝国又合并了至少3个哥特群体，其帝国中的其他群体还包括讲日耳曼语的格皮德人、鲁吉人、苏维汇人（应该是406年留下的那些）、斯基里人、赫鲁利人，当然还有讲波斯语的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2]450年前后，这些

非匈人中的绝大部分和匈人一样住在多瑙河中游。但是其中许多群体在4世纪时不曾占有多瑙河中游的土地，在6世纪时也不占有这片地区。匈人不光是自己向西迁徙，进入了欧洲的心脏地带，而且似乎以某种方式促使许多在阿提拉帝国崩溃后离开的群体聚到了匈牙利大平原上。

即便是对中欧匈人时期如此简略的概述，也显然能引发关于人口迁徙的问题。首先，是什么将匈人带到了欧洲的中心，他们自己的迁徙过程采取了什么形式？其次我们该如何理解涉及阿提拉帝国中其他群体的人口迁移？是精英转移，还是更大规模的迁移？

“万恶之源”

在本书论及的所有移民中，匈人也许是最神秘的。他们自己什么都没有写下，但公元第一千年的群体可能都是如此。更大的问题是，直到阿提拉兴起（5世纪40年代），或者说直到他兴起前几十年（5世纪20年代），就连罗马的资料对匈人都甚少提及。那时，匈人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约370年时截然不同——那时黑海以北的地区首次感受到了匈人袭击的压力。缺乏信息的原因不难推断。从罗马的角度来看，376—380年和405—408年的危机，都源自匈人将其他群体推过帝国边境。这些外来群体随后对罗马领土造成了巨大破坏，罗马评论家自然会更关注它们，而不是一开始引起问题的匈人。

结果，我们对匈人的了解少得可怜。我们甚至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语言。我们手上的语言学证据大部分是阿提拉时代的人名——匈人统治者及其追随者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原因本章稍后讨论），日耳曼语已经成为匈人帝国的通用语言，许多记录下来的名字要么肯定是，要么很可能是日耳曼语名字——所以这对我们没有帮助。有人说匈人讲波斯语，也有人说他们讲突厥语或芬兰-乌戈尔语［Finno-Ugrian，比如后来的马扎尔语（Magyars）］，但事实是我们不知道匈人说的是什么语言，而且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3]关于匈人迁徙的动机和形式，直接证据同样有限。阿米阿努斯认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万恶之源……我认为就是如此。匈人……在亚速海之外冰封海洋附近居住的匈人，极为野蛮。”他们就是如此凶悍，四处袭击就是他们的本性。其他资料也将匈人描写得十分残暴。索西穆斯借鉴之前的历史学家欧纳皮乌斯的说法，描写了匈人第一次袭击哥特人时造成的恐慌，而6世纪的约达尼斯将匈人写成被驱逐的哥特女巫和邪灵的后代。[4]真想就此打住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想为4世纪末和5世纪初匈人的迁移进程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就需要进一步分析。

我们所知道的是，最初，匈人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这片广袤的土

地横跨数千千米，从欧洲边缘一直延伸到中国的西部边界。这里夏季降雨少，特征植被是草，因而比起自己的邻居，草原上的人口更依赖于放牧；但是，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同，这些人也会从事一些耕作，还与更偏向定居的人口有经济往来，以弥补粮食的不足——毕竟粮食构成了他们的大部分主食。匈人被认为是游牧民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首次遇到他们是在顿河以东，顿河是一条分界线，其东边的平均降雨量过低，无法在没有灌溉的情况下广泛从事耕种农业，二是因为阿米阿努斯对他们做出的著名描述。吉本很喜欢这个描述，其中用到的词语非常令人回味：[5]

> 他们的生活方式实在是粗糙。他们不会用火，不会给食物调味，只吃野生植物的根和半熟的肉，什么动物的肉都吃，而且只会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稍微加热一下。他们没有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屋……在他们中间连用茅草覆盖的小屋都找不到。他们在山间和林中漫游，从出生起就习惯了寒冷和饥渴……他们穿上脏兮兮的衣服以后就不再脱下，也不知道更换，直到衣服穿烂……他们不会犁地，连犁都没有握过。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家庭，没有法律，没有固定的生活方式，而是像难民一样住进大车到处流浪。就在这样的大车里，女人们制作脏兮兮的衣服，与丈夫交配，生下孩子并将他们养大。没有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们的母亲在一个地方受孕，在另一个地方生下他们，在更远的地方把他们养大。

这样的形象颇具浪漫色彩，但很可惜，能从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匈人始终在随意迁徙——是一个深深的误解。

事实上，光是看上面这段描述，就能发现一些问题。阿米阿努斯和其他古典历史学家一样，在引入有意思的新角色时往往会写一些题外话；而在4世纪，大家对这样的内容有很高的期待。受众想看的是华丽的修辞描写和对古典作品的旁征博引。阿米阿努斯关于匈人的题外话没有让人失望。但除了充满修辞和引用，它还有一个更明显的问题。在《历史》的存世章节里，阿米阿努斯向读者介绍了阿兰人、萨拉森阿拉伯人（Saracen Arabs）和匈人这三个游牧群体，而介绍每个群体时说的题外话都差不多，只有一些细节不一样。仿佛阿米阿努斯有本“游牧民族题外话指南”，需要用的时候调出来就好。我们不禁要问：将各个版本区别开来的那些细节有多可信？阿米阿努斯讲了些关于匈人政治领导层的事，很有意思，我们之后会谈；此外，他还描写匈人如何把肉放在鞍下加工。20世纪20年代，一位现代人类学家兼历史学家发现蒙古人会做同样的事，而在那之前，人们还以为匈人这么做是在用错误的方法治疗坐鞍痛。所以，也许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对待阿米阿努斯说的一些事情。他描写萨拉森人时谈到的少数细节之一是萨拉森男女都非常享受性生活，这让人不禁想搞清楚他是怎么知道的。

但总的来说，无论描写的是来自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边缘的沙漠阿拉伯人，还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讲波斯语的阿兰人，或是讲突厥语或芬兰-乌戈尔语的匈人，所用的词句都差不多，这足以让我们警觉，也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6]

最近人类学家收集的有关游牧生活方式的比较证据证实了这些猜疑。当然，游牧群体几乎都不一样。草场和牲畜类型的不同，可能会带来实践和组织上的巨大差异。但游牧群体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游牧群体通常不会随意移动，也不会长距离迁徙——长途迁徙对人和牲畜来说都是不利的。例如，20世纪对欧亚游牧群体的直接观察表明，游牧民通常每年两次在固定的夏季和冬季放牧区之间移动，迁移的距离有限。以哈萨克人为例，在斯大林让其定居下来之前，他们迁移的距离大约是75千米。到达放牧区后，牧民分成小组，赶着牧群缓慢绕圈行进，彼此保持距离，以便让牧草有时间生长。与此同时，群体中的其他人在固定的营地中生活，有些甚至种植庄稼。在这个制度中，迁徙是为了在两片草场之间往来，因为单凭一片草场不足以获得全年的草料。通常，夏季牧场位于冬季太冷，因而不适合牧草生长的山地；冬季牧场位于距离不算太远的低地，这样的地方夏季的日照和降雨量不足，限制了放牧。游牧可以说是将这样的两个地方连接到了一起，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放牧区。在这样的机制下，迁移有明确的目的，不可能是随意而为。游牧生存方式还是很脆弱，高度依赖显然是边缘地带的降雨；而如果不了解潜在目的地的承载能力，或者不清楚那里已经确立的放牧权（这点同样重要），就走向未知的地区，结果就可能是经济上的灾难。[7]

由此可见，匈人侵入黑海东北面阿兰人主导的世界，然后又进入欧洲的中心，并不像J. B. 贝利（J. B. Bury）在20世纪20年代的著名讲演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其游牧经济的自然延伸。匈人并不是在欧亚大草原上闲逛，然后碰巧来到黑海以北的草原西部边缘并喜欢上了这里。匈人将他们的活动中心分两个阶段向西迁移，两阶段之间隔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其中必有原因，相关的决定肯定也经过了仔细考量。对于要采取的行动，既要考虑潜在的收益，也要考虑其风险，比如，在新的目的地有可能无法为自己的牲畜找到足够的放牧场地，或者更可能的是不能取得对这些场地的权利。[8]

至于匈人向西迁徙的原因，答案就没那么简单了。罗马的资料几乎没用。阿米阿努斯说袭击其他蛮族对于匈人这一超级蛮族来说很自然，这个观点也没什么帮助。不过从现有证据看，可能有三个因素在促进匈人群体向西迁徙方面起了作用，其中两个是可能因素，另一个则更为确定。可能因素之一是气候变化。公元400年左右，西欧气候宜人，夏季长而炎热，阳光充足。但对西欧而言很好的气候，对顿河以外的世界却不那么有利。那样的气候意味着夏季降雨少，牧草无法生长。因此，草原游牧群体围绕牧区

的竞争自然越发激烈。至于会发生什么，现代世界有一个令人难受的参照例子：达尔富尔（Darfur）冲突的核心是苏丹游牧民被赶出他们从前的家园，因为全球变暖把牧场变成了沙漠。然而，将这一论点应用到4世纪的麻烦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可能知道4世纪的气候变化实际上有多严重或多有限。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在没有这些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推测气候的影响相当小。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看到，公元第一千年中后期，一系列游牧群体出现在欧亚大草原上，还有更多群体随后出现，由此可见，欧亚游牧民并没有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而就算匈人面临生态压力，他们也有可能朝几个方向迁徙，就像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遇到匈人威胁时一样。气候变化因素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向西迁移。

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政治革命。公元第一千年末期，至少有两个游牧群体跟随匈人走出草原进入欧洲，它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受到了东方其他游牧群体的政治和军事压力。6世纪的阿瓦尔人（Avars）试图逃离西突厥帝国，9世纪的马扎尔人则因佩切涅格人（Petchenegs）的袭击而从黑海以北迁移到匈牙利大平原。在无法得知4世纪欧亚草原西部具体情形的情况下，说匈人不可能面临这种压力并不明智。[9]

即使我们认为，匈人迁移的消极动机源自气候和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在这些因素之外，无疑还有一些积极理由促使匈人向西迁移，这也是众多移民潮所证明的。罗马资料描述了匈人给帝国外围边缘带来的最初影响，没有具体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后来的材料很有启发性。从约390年开始，特别是5世纪20年代以后，匈人参与了与罗马世界有关的种种活动。有时，他们对罗马发起突袭。一支针对东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大型袭击队伍在395年通过高加索，而此时匈人的主体还未迁移到中欧；有迹象表明这段时期里还发生了一些较小规模的袭击。有时，匈人作为雇佣兵为罗马帝国效力。早在4世纪80年代，一队匈人和阿兰人的活动就引发了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和篡位者马克西穆斯之间的外交冲突。在5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在他不明智地入侵东罗马的达契亚之前，乌尔丁为斯提利科提供过军事援助。从大约410年开始，随着匈人大量涌入中欧，雇佣军服务达到了顶峰。5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他们可能为西罗马事实上的统治者君士坦提乌斯三世（Flavius Constantius）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持，但要到埃提乌斯（Aetius）的时代，也就是从5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才成为西罗马的重要屏障。埃提乌斯不仅利用他们的支持来保证自己的权力不受罗马人对手的挑战，而且还通过他们遏制如今已在西罗马领土上定居下来的其他蛮族的野心——最突出的一次是在5世纪30年代通过军事行动压制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阿提拉时代，匈人势力大为扩张，他们终于从发起袭击和提供雇佣军服务转向了大规模入侵。匈人在442年和447年两次大举袭击东罗马巴尔干地区，然后在451年和452年入侵了高卢和意大利。[10]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从地中海罗马世界发达得多的经济体内攫取更多的财富，只是方法不同。突袭显然是为了劫掠拿得走的金银珠宝和其他可流通的战利品，而财富也是匈人提供雇佣军服务的动机。虽然埃提乌斯与匈人有关系——他作为人质在匈人中待了3年，但如果没有慷慨的酬金，匈人也不会为他而战。甚至阿提拉的入侵也是为了钱。对于袭击之前和之后的外交接触，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阿提拉最关心的始终是他可以获得多少外交补贴。他对额外领土和其他类型的收益没有太多兴趣。[11]如果说匈人对罗马帝国地中海区域的这种基本态度，也适用于4世纪70年代（并没有什么不适用的明确理由），那么匈人分两阶段向西迁移的决定就完全说得通了。离位于意大利北部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世界的政治中心越近，从罗马财富中分得一份的机会就越多。换句话说，匈人的行为很像3世纪的哥特人和其他主要讲日耳曼语的掠夺者：他们的迁徙是对财富极大不平等的回应。和哥特人一样，他们是要从帝国欠发达的外围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转移到更富裕、离帝国中心更近的区域——在那里，军事力量够强的群体有各种各样的发财机会，而匈人的军事力量显然很强。

关于匈人迁移群体的性质的发展，还是可以说出一些有用的看法的。关于匈人移民单元的规模，并没有哪份资料给出数据，但所有当时的证据都表明，最初向本都北部的扩张主要是通过战队——全由男性战士组成的小型队伍——完成的。格鲁森尼人的国王威提莫之死促使哥特人在376年向多瑙河迁移，威提莫曾与阿兰人发生多次小冲突（multas clades），这些阿兰人是被匈人赶到他的王国中的。由此可见，虽然各次交锋总体而言极大地影响了稳定，但单次交锋的规模都不大。阿米阿努斯写到威提莫雇了一些匈人来帮他击退阿兰人。有些人认为这里是抄写时出了错，但这么说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一记录符合多个小规模战队基本独立行动的情况。威提莫的前任艾莫纳里克能够抵抗匈人“很长时间”（diu），这也表明实际发生的是一系列较小规模的交战，而不是严密策划的对抗。而罗马的东欧边境崩溃之时，匈人也是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策略来追求利益的。

根据资料记载，匈人除了为威提莫作战外，还袭击特温吉人的土地（两次），与一些阿兰人一起当雇佣兵，在377年与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一起在多瑙河以南对抗罗马，4世纪80年代初，匈人牵头，拉着卡皮-达契亚人从多瑙河以北向帝国发起袭击。[12]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做了这些事的是彼此独立的匈人群体，而不是出现在不同地方的同一个群体，上述这些行动也没有哪一个需要大规模的军队。事实上，阿米阿努斯在他的题外话中就提到，这个时代的匈人不是由国王统治，而是由“临时的领袖”统治。这是一个有点含糊的用语，其含义引起了很多争议，但它符合匈人分成小规模独立单元的图景。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时代并没有哪个匈人领袖重要到留下了名字。[13]这让人想起，6世纪斯拉夫人和9世纪维京人袭击的第一阶段都是小规模袭击。而斯拉夫人和维京人领袖的名字，直到发动袭击

的群体规模扩大后，才出现在记录中。

376—380年危机背后的匈人扩张可能是由战队驱动的，而在一代人之后，罗马中欧边境的崩溃则见证了更大规模的移民。在第二次危机之前，已经有资料提到在帝国边缘行动的匈人群体的规模在扩大。400年前后，当时罗马的资料终于提到了一位匈人领袖的名字，他就是乌尔丁。他势力很大，不时为帝国提供军事援助，其追随者中有匈人也有斯基里人。虽然偶尔会吹嘘他的势力范围从日出之地延伸到日落之处，但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正确认识了他的实力。在他的主要追随者抛弃他后，不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他夺取东罗马领土的企图就破灭了；从那以后，他消失在了历史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不再见于史料。这样的职业生涯，可配不上“阿提拉的先行者”这个称号。在我看来，乌尔丁从盟友到入侵者的突然转变，只能说明他的权力基础还不够稳固，经受不住从约410年开始在那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匈人群体的冲击，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新来的群体规模更大、组织得更好；否则乌尔丁的突然转变就太莫名其妙了。[14]

这方面的证据很明确。东罗马外交官兼历史学家奥林匹多罗斯在411—412年访问新近来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匈人时，发现他们由多个等级不同的国王统治。在他到访之时，匈人在中欧出现不过几年，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大量独立战队组织为如此复杂的政治结构的；而事实上，有记录表明5世纪另一草原游牧民族阿卡齐里人（Akatziri）中存在类似的系统。因此，匈人向西迁移的第二阶段非常有可能是由奥林匹多罗斯遇到的国王们领导的。确实，考虑到匈人在迁移过程中从多瑙河中游赶出了数万名日耳曼人和其他人，光凭一系列独立的战队恐怕很难集结起足够的力量来接管这一地区。国王的存在表明，完成从黑海东北面向匈牙利大平原的迁移的社会单元，显然比先前造成376—380年危机的战队规模更大、更有组织。[15]

因此，总体而言，有证据表明匈人迁移到欧洲的模式和前文所说的3世纪模式类似，该模式在9世纪将再次出现。迁移最初的驱动力来自急于建功的战队，在那么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定要迁移的打算。而一旦事实证明战队的行动可以带来大量财富，规模更大、更有组织的群体就会参与进来，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新的群体可能会以控制财富所在地区为目标。匈人后来的行动表明，多瑙河中游地区之所以吸引他们，不是因为那里有发展农业的潜力（农业潜力是英格兰在9世纪吸引丹麦人、在11世纪吸引诺曼人的原因），而是因为该地与罗马世界有种种紧密联系，有助于他们攫取更多的财富。结果，来自黑海以北的小规模袭击演变成动力稳定增加的人口流动，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群体的迁移，因为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控制匈牙利大平原，从而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

我们无从得知参与这两个主要迁移阶段的匈人群体到底规模如何。在370

年前后的第一阶段迁移中，匈人战队和离开家乡的阿兰人联合行动，破坏了哥特政治单元的稳定，而这类哥特单元能投入的总兵力也许有1万。但是，很难由此推断出发起攻击的匈人部队有多少人，原因有两个。首先，匈人的袭击是间接的。破坏黑海以北政治稳定的是长期以来的多次袭击和小规模进攻，而不是正面的对抗，最终让哥特格鲁森尼人做出在375—376年迁移的重要决定的，不是匈人本身，而是匈人在阿兰人中造成的动乱。因此，情况肯定不是人数够多的匈人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击败了1万名哥特人。其次，与19世纪的布尔人一样，匈人在军事硬件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他们的特征武器之一是在草原上早已为人所知的复合反曲弓。然而，和他们以前在欧亚草原西部使用的弓相比，他们现在用的弓更长：最长的有150厘米，而不是常规的100厘米。因此，他们的打击范围更大，从罗马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其威力。这些记载称，匈人自己在哥特对手的射程之外，却可以摧毁哥特对手的部队。匈人的另一个特征武器是长马刀，一旦敌人的队形被打散，他们就可以在近距离交锋时用马刀出色地完成扫荡。[16]但弓箭究竟给匈人带来了多大优势并不明确。燧发步枪使得布尔迁徙者能对抗10倍于自己数量的对手。数百名突击队员可以击败数千名祖鲁人和马塔贝勒人，自己则几乎毫发无伤。如果匈人武器的优势有那么大的话，不到1 000人的匈人队伍就足以击溃整个哥特附属国。但即使是匈人的长弓也不会有步枪那么大的优势。

至于匈人国王带到匈牙利大平原上的较大部队规模有多大，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参考蒙古人的情况，每个匈人战士都需要有很多匹马才能保持全速移动。这或许可以间接表明匈人部队可能的总体规模，因为据计算，匈牙利大平原可以放牧不超过15万匹马。推算回来的话，这么多的马匹可以服务于1.5万—3万名匈人战士。这个结论完全合理，但显然也不过是猜测。在缺乏更多资料的情况下，我的猜测是，约370年时的扩张性袭击显然是由数百名战士组成的战队进行的，并没有直接挑战哥特附属国的全部力量，5世纪初进入中欧的大规模群体是该地区某个拥有1万—2万名战士的队伍，但这仅仅是猜测。

在无法精确估计匈人数量的情况下，比较移民文献确实能就匈人向中欧的扩张给我们一些提示。行动的第一阶段让我们联想起，在一些记录得比较好的移民活动中，往往是先有“侦察”的行为，前去侦察的人回来后再向更多的人说明搬家的好处。虽然匈人迁徙的第二阶段——大型匈人群体的整体移民——在现代世界中找不到对应，但它符合这样一个通用的基本原则：移民单元的规模和性质应该能让它在迁徙发生的环境中实现获取财富的任务。出于我们之前看到过的原因，匈人最终进行的大规模掠夺性移民必然涉及妇女和儿童。在军事行动也带有移民意图的情况下，大型军队中那些非职业军人的众多家属不可留在后方，否则他们的安全就无法保证。此外，与前面提到的其他移民一样，匈人已经有了迁徙的传统。而由种种

比较证据可知，迁徙传统肯定有助于他们下定决心：既然罗马世界有那么多潜在的收益，不如就拔营出发，离罗马近一些。游牧群体通常一年迁徙两次，这意味着匈人比一般群体更有能力组织大规模迁移。

与罗马土地上哥特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情况一样，匈人进入欧洲的两个主要阶段间隔了相当一段时间，另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匈人从黑海以北地区驱走哥特人和阿兰人后，面对新出现的机会，需要获得相应的地理知识。从这个角度看，395年匈人通过高加索发起的对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大规模袭击可以看成他们的一个学习过程。袭击带来了巨大的动荡，许多罗马资料中都有相关记载，毕竟一群袭击者甚至接近了圣地（Holy Land）。但是，袭击者损失惨重，再也没有重复这样的实验。[17]这并不表示匈人自己认为这次袭击大获成功；袭击的损失很可能促使他们最终决定向西进入匈牙利平原，而不是往其他方向迁徙。而这次迁徙所需的地理知识，无疑积累自公元405年之前较小规模匈人群体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活动，比如4世纪80年代的匈人雇佣兵的活动，以及乌尔丁率领下匈人的活动。

此外，和其他许多群体的情况一样，迁移过程在匈人内部引发了重大的社会政治重组。上文提到，奥林匹多罗斯在411—412年访问匈人群体时，所看到是基于等级不同的国王形成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非常适合游牧社会。游牧经济的组织形式意味着人口需要相对分散。带着畜群的人口如果挤在一起，就会导致过度放牧和经济灾难。与此同时，子群体需要有自己的组织来处理争端之类的问题，而整个大的群体在必要时又需要一致行动，特别是在需要保护所有人赖以生存的放牧权利的时候。因此，游牧社会的合理政治形式是组织良好的分权而不是集权，而国王分等的制度很适合这种政治形式。[18]

但是，当另一位东罗马历史学家和外交官，著名的普里斯库斯（Priscus）在阿提拉时期的5世纪40年代中期访问匈人时，由不同等级的国王构成的体系已经消失。阿提拉被许多大人物包围，而虽然他最初与他的兄弟分享权力，但那时已经见不到别的王室成员了。至于国王分等制度废除的过程，并没有资料记录，但是阿提拉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发生外交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者向重要的匈人流亡者提供保护。[19]因此，我认为阿提拉这一支——最晚到他叔叔鲁阿（Rua）掌权的5世纪30年代——驱逐或废黜了其他国王。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经历了这样的政治进程，东哥特人和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的法兰克人也会经历。

这一切都与迁徙有关，原因如下。大体上说，在这几个群体中，都是一位领袖垄断了过去由几位领袖分有的政治支持。那名成功的领袖需要掌握前所未有的财富，才能在资助竞赛中击败竞争对手，把对手的支持者抢过来，从而迫使对手要么离开群体，要么接受低于国王的低等地位。对匈人

而言，新财富来自他们能与罗马帝国发展出的新关系带来的利润。袭击、雇佣兵服务加外交补贴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不择手段地掌控利润分配是通往政治胜利的捷径。匈人迁徙到多瑙河中游，政治革命随之而来，尽管这肯定不属于他们迁移时设想的目标。

因此，根据移民研究使用的定性定义，匈人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进入欧洲，无疑是大规模迁徙。虽然匈人迁徙的势头是逐渐增加的，并不是一下子大批涌入，但匈人在黑海以北和中欧显然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冲击。事实上，最终改变匈人内部政治结构的冲击也同样强大。我们无法确定匈人行动的触发因素，也就难以做进一步分析。罗马的资料强调他们行动的偶然性，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漫游的猎人们在沼泽中跌跌撞撞，突然见到了富饶的土地。但这只是一个故事，而且与阿米阿努斯的大多数题外话一样，是在经典作品中有先例的故事。[20]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也许可以认为，罗马帝国边缘地区的财富首先吸引了匈人袭击者，此后匈人迁移的势头才稳步增加。我们日后如能获得关于气候变化或政治发展的新资料，可能就会修正这一看法，重新考虑前述种种因素所占的比重。但目前来看，帝国边缘地区财富的吸引力似乎是重要的因素。

然而，匈人时代的移民不仅影响了匈人自己，也影响了阿提拉帝国中的众多群体。从各方面证据看，匈人统治时期迁入多瑙河中游的许多其他群体，其迁移动机和过程都与匈人有很大差异。

部落的聚集

在阿提拉的非匈人子民中，格皮德人、苏维汇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在4世纪时就占领了多瑙河中游的土地，那是在匈人进入欧洲之前很久。阿米阿努斯记述358年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干预该地区的过程时，提到了苏维汇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其他资料称格皮德人居住在该地区东部边缘，在原罗马达契亚行省（今罗马尼亚）西北面的土地上。在阿提拉时代，它们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势力完全不值一提。然而，阿提拉帝国中大多数非匈人群体的情况并非如此。4世纪时，哥特人和阿兰人的领地显然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东面而不是西面，赫鲁利人、鲁吉人和斯基里人大概也是如此。至于赫鲁利人、鲁吉人和斯基里人的地理位置，最容易确定的是赫鲁利人，虽然4世纪的资料没有提到他们，但我们知道他们在3世纪时占据了黑海以北的土地。关于斯基里人位置的证据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在380年左右，该群体的名称首次出现在罗马资料中时，斯基里人与匈人联合袭击了罗马的多瑙河下游（而不是中游）的边境地区，由此可以推测，斯基里人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我们没有关于3世纪或4世纪时鲁吉人的明确信息，但他们像哥特人一样，1—2世纪时属于维尔巴克系统。而资料提到，5世纪时，鲁吉人（又是和哥特人一起）出现在多瑙河中游地区，显然，鲁吉人

有可能在3世纪时像哥特人一样往东南方向迁移，来到了黑海。[21]也就是说，和哥特人及阿兰人一样，斯基里人、鲁吉人和赫鲁利人可能都在4世纪末或5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迁到了喀尔巴阡山脉的西面，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

事实上，我们有更多关于阿提拉帝国中哥特人的信息。哥特人分为若干群体。其中一个由阿马立家族及其对手统治，根据同时代的资料，该群体在5世纪60年代初获得了突出的独立地位。第二个群体在5世纪60年代中期由一个名叫比格里斯（Bigelis）的男子领导，而第三个群体直到5世纪60年代后期还受到阿提拉的儿子丹吉兹克（Dengizich）的严密控制。其中一些哥特群体，比如拉达盖苏斯405年率领的哥特人，可能在匈人于410年左右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建立统治地位之前就进入了该地区。其他一些群体可能在匈人势力最大的时候被迫迁移到那里。还有一些群体也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根据约达尼斯的说法，阿马立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在阿提拉去世后的5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才移居至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尽管这群人在5世纪40年代承认了阿提拉的领导权。[22]和哥特人有关的证据除了暗示他们有过迁徙之外，还给了我们一个重要提醒：资料中提到的匈人治下的各个群体，本身可能都分为多个独立的团体，相应而言，这些团体向西转移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历史可能更为复杂。

匈人的崛起似乎让大量人口离乡背井迁移到多瑙河中游，而匈人势力的终结则引发了更长时期内人口的来来往往。早期迁出人群中比较突出的是匈人自己。本章开头提到，格皮德人在内达奥河战役中获胜，在那之后，越来越多之前从属于阿提拉的群体获得了独立，匈人帝国的军事实力急剧下降，以至于到了5世纪60年代后期，阿提拉的两个幸存的儿子——丹吉兹克和赫尔纳克（Hernac）——得出了多瑙河以北的生活过于危险的结论。因此，他们打算去东罗马寻找新的地盘。赫尔纳克受到了接纳，带着追随者在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得到了土地，丹吉兹克却在469年败给了东罗马军队，被杀后，他的头颅被挂在君士坦丁堡示众。到了470年，也就是在阿提拉去世17年后，匈人已经不再是泛多瑙河世界的一支独立势力：这真是极具戏剧性的历史进程。事实上，在丹吉兹克和赫尔纳克决定迁往多瑙河以南之前不久，其他一些难民群体这么做了。不同的资料提到了两群在466年左右侵入东罗马的人，一群人是由名为霍米达克（Hormidac）的领袖率领的匈人，另一群是比格里斯领导的哥特人。[23]我们不清楚这些行动的具体背景，但当时阿提拉帝国的不同人口群体显然试图逃离多瑙河中游地区的战斗。

阿提拉死后，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人口也不是只有迁出。约达尼斯约550年在君士坦丁堡写下了相关记录，据他说，直到5世纪50年代中期，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群体才迁到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此时的领袖是一个叫瓦拉

米尔（Valamer）的人。然而，这个故事最早写下来，可能是在6世纪20年代，在瓦拉米尔的侄子、东哥特意大利的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宫廷中。出生于5世纪50年代中期的狄奥多里克此时已年过七旬，这确实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但约达尼斯对瓦拉米尔的早期职业生涯似乎没什么把握（我们将在稍后讨论），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24]但如果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是后来者，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在5世纪60年代的争斗中，往往是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其他群体——尤其是斯基里人、苏维汇人、鲁吉人和格皮德人——联合起来对抗哥特人。尽管如此，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更多的人迁出了。没能掌控这场竞争性冲突是匈人决定去罗马帝国寻求庇护的根本原因，而出于同样的道理，在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手下遭遇第二次重大失败后，大量斯基里人——其中最出名的是被击败的斯基里国王艾德科（Edeco）的儿子奥多亚塞（Odovacar）——于469—470年进入了西罗马。接下来离开该地区的是哥特人自己。还是按照约达尼斯的说法，在潘诺尼亚的波利亚河（Bolia）边（我们也不知道该河流的准确位置），阿马立家族率领下的哥特人在血腥的战斗中击败了对手的盟军，然后在473年或474年进入了东罗马巴尔干半岛。这开启了为期15年的巴尔干间歇期。在此期间，狄奥多里克上台执政。他接替了他的父亲狄奥德米尔（Thiudimer）——狄奥德米尔的哥哥瓦拉米尔在与斯基里人交战时丧生，狄奥德米尔继承了对该群体的控制权。哥特人最终在488年秋天离开了巴尔干，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们进入意大利，创建了东哥特王国。[25]

匈人的衰落、斯基里人的毁灭和哥特人的离去都不足以结束对多瑙河中游地区控制权的争夺。473年或474年的时候，该地区还有三股主要势力：鲁吉人、赫鲁利人和格皮德人。下一个遭受严重损失的是鲁吉王国。鲁吉人定居在多瑙河以北如今的下奥地利地区，河对岸是从前的罗马行省诺里库姆（Noricum），他们惹怒了从476年开始统治者意大利的奥多亚塞。486年，奥多亚塞往多瑙河以北派遣了一支大规模远征军，击败了鲁吉人，杀死了他们的国王费勒修斯（Feletheus）。这是独立鲁吉王国的终结——尽管费勒修斯的儿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带领一群幸存者向南逃到巴尔干半岛，并在487年或488年臣服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他们随后加入了东哥特王国向意大利的进军。[26]

鲁吉王国灭亡后，多瑙河中游的主要力量只剩下赫鲁利人和格皮德人了，但来自波希米亚和易北河中游地区的伦巴第群体开始向南迁移进入该地区，他们最先进入的是以前由鲁吉人统治的土地。1世纪时，伦巴第人活动的核心地带位于易北河下游，就在日德兰半岛的南面。关于将他们在5世纪后期带到下奥地利的那次迁徙（地图10），存世的书面记录在9世纪（事件发生几百年后）才成文，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细节，显然不是基于任何权威的历史记录。关于伦巴第人向南方的推进，我们掌握的第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日期是由罗马资料提供的，资料称，他们趁奥多亚塞摧毁鲁

吉人后留下权力真空，在488—489年进入下奥地利。到下奥地利后，伦巴第人的力量显然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增长。首先在508年，他们的部队击溃了赫鲁利人。根据后来的那份文献资料，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苏维汇人的残部也被击败，不得不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伦巴第人力量的第二次扩张是在他们占领多瑙河以南原罗马潘诺尼亚行省的时候。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只知道这可能发生在6世纪20年代到6世纪40年代之间，但整体模式是很清楚的。伦巴第人从易北河沿岸地区以及邻近的波希米亚开始缓缓渗透，到6世纪中，伦巴第人已成为多瑙河中游西部地区的主导力量。[27]在更东边定居的格皮德人现在是他们的强大对手。

至于赫鲁利人，508年的失利导致其队伍立刻出现分裂。一个子群体整体离开了多瑙河，最终落脚在极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第二个子群体先是向格皮德人寻求避难，但是格皮德人提出的要求太过严苛，于是他们很快在东罗马找到了另一个避难所。6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的某个时候，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将多瑙河沿岸的土地授予了他们。他们一直在那里待到6世纪40年代，直到自己王室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不知怎的，他们知道另一群赫鲁利人最终去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于是派遣了一个使团去寻找合适的君主。然而，回程花了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他们首选的候选人在返回多瑙河的途中死去，于是，查士丁尼皇帝根据留下的人自己的要求在此期间挑选了一名新的统治者。斯堪的纳维亚使团终于回归时，内战爆发了，多瑙河地区的赫鲁利人再次分裂，一支队伍留在东罗马，另一支队伍回到了格皮德人中间。在随后伦巴第人和格皮德人的战争中，拜占庭派遣一些留下的赫鲁利人为伦巴第人提供军事支援。在战场上，这些人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从前的同胞——后者现在为格皮德人而战。[28]

然而，赫鲁利人的命运只不过是一个插曲。随着伦巴第势力的增长，由匈人崛起引发的多瑙河中游革命最终落幕。这个过程细节非常复杂，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从匈人约410年时第一次进入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开始，到508年赫鲁利人被打败为止。然而，从种种相关资料看，所发生的事件有明显的逻辑。首先是在匈人的策划下，多瑙河中游平原上集结了大量武装力量，接着在阿提拉去世后，其帝国内的各个群体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持续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一些军事力量离开了该地区，于是，多瑙河中游的格局从匈人时代的各股势力彼此接近，演变成6世纪的伦巴第人和格皮德人划分势力范围。然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与这些过程相关的人口迁移活动：主要是匈人势力增长后该地区的人口迁入，以及阿提拉去世后的人口迁出，尽管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可能）和伦巴第人（肯定）是重要的例外。[29]没有人会否认出现了人口流动，但人口流动的性质和规模争议很大。

在关于这些事件的传统叙述中，我们的资料中所用的标签——哥特人、鲁吉人、赫鲁利人、斯基里人等等——给人的印象是这些群体都是“民族”：如前所述，“民族”指的是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紧密人群，人们共有一套独特的文化规范，群体基本对外人封闭，通常是在群体内部通婚而繁衍后代。于是，与阿提拉匈人帝国兴衰相关的不同阶段的移民活动被视为“民族大迁徙”的一部分。然而，与这些迁移活动相关的历史证据相当有限。我们看到，即使这些移民直接影响了罗马世界，罗马历史学家对蛮族迁徙的描述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与匈人帝国有关的大多数人口流动都在罗马境外展开，详细证据自然更少。我们通常只能在资料中看到，有个A群体从X点移动到了Y点，有时甚至连这一点都不明显；对迁移的人口单元的构成则根本没有记录。

既然史料如此沉默，那么要估计这些人口流动（精确说的话，是记录下来的名称的变迁）的规模和性质，首先要看我们总体上怎么理解这些标签所代表的群体的性质。也就是说，匈人帝国内部的人口迁移问题与我们激烈争论的蛮族群体身份认同问题密切相关。如果你认为标签所代表的人口单元都有强烈的群体认同，那么你估计的约410—508年流入和流出匈牙利大平原的移民的数量就会比较大。而如果你认为群体认同只不过是蛮族为眼前的方便可以采用或放弃的标签，那么这些标签在欧洲各地的移动就没有太多人口统计学的意义。当然，可能不是什么意义都没有，因为标签移动位置肯定需要有人迁徙，但未必需要大量人员迁移。如果标签“起作用”（也就是说，实现了人们认为有用的功能），那么进行迁移的一部分人很快可以在目的地集合起新人。那么，关于阿提拉时代群体的凝聚力或身份认同，现有的证据能说明些什么呢？

帝国与身份

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曾随使团访问匈人，他根据亲眼所见写道，在阿提拉的营地中，有个看起来很像富有的匈人的人突然用希腊语向他打招呼，“此人衣着体面，头发修剪得很短”。在普里斯库斯的询问之下，该男子向普里斯库斯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 他是讲希腊语的罗马商人，来自多瑙河畔的维米纳库姆城（Viminacium）……
>
> 城市被蛮族占领后，他失去了财富……被分配给奥尼吉修斯（Onegesius，阿提拉的重要心腹之一）为奴，因为在阿提拉之后，各领袖……从富人中挑选自己的俘虏。在后来与罗马人和阿卡齐里人的战斗中，他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并根据（匈人的）法律将战利品交

给主人，自己获得了自由。他娶了一个蛮族妻子，生了孩子，还能与奥尼吉修斯共餐，他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好。

这位变成匈人战士的罗马商人是个教科书般的例子，体现了目前阿提拉帝国中群体认同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群体认同的可塑性极高。体现这一观点的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的生平。奥多亚塞的父亲艾德科（如果这两个艾德科是同一个人的话——这种可能性颇高）首次见于史料时，是阿提拉的心腹之一，身份与庇护那位前罗马商人的奥尼吉修斯一样。艾德科令人称奇的地方是，在阿提拉去世后，他成了斯基里人的国王，但他自己不是斯基里人。他能对王位提出要求，可能是因为他娶了一名地位很高的斯基里女人，因为据说他的孩子奥多亚塞和奥诺弗斯（Onoulphous）的母亲是斯基里人。而艾德科本人则被认为是匈人或图林根人（Thuringian）。显然，这两个人的生平故事说明，阿提拉的帝国是既有的群体身份的熔炉。该论点也有更普遍的证据支持。阿提拉许多亲信的名字实际上是日耳曼名字，而不是匈人的名字。奥尼吉修斯和艾德科显然如此，而另外两个人贝里库斯（Berichus）和斯克塔斯（Scottas）应该也是如此。史料中出现的阿提拉及其兄弟布莱达（Bleda）的名字也是日耳曼名字。我们知道，日耳曼语是阿提拉帝国的通用语言，因为其子民中有许多日耳曼人，其数量远多于匈人这个核心群体。[30]因此，所有的历史证据都表明，在匈人治下的多瑙河中游地区，文化是多元的。

匈人的考古遗存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自1945年以来，近两代人的工作挖掘出大量匈人统治时期的遗存，这些遗存主要来自对匈牙利大平原上墓地的挖掘。考古还发现了一些宝库。但这些是不是“真正意义上”匈人的遗存还很难判断。包括黑海以北的伏尔加草原在内，考古学家总共鉴定出不超过200个可能属于匈人的墓葬。这样的墓葬里往往有长弓，有不同于标准欧洲服装的服饰，能看到某种颅骨变形的情况（一些匈人会在婴儿头骨定型前束缚婴儿的头部，形成细长的头型），还可能发现一种特殊的大锅。这种墓葬的数量很少。要么是匈人的墓葬方式往往不会留下考古痕迹，要么需要另行解释为何匈人的遗存这么少。然而，在5世纪中期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至少看起来像是）属于匈人的日耳曼子民的遗存。将这些遗存标记为日耳曼物品有几个理由。这些物品的标志性特征，匈人到来之前，罗马帝国晚期中东欧由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人统治的区域中的常见物品也有。所发现的这些5世纪的物品来自一系列年代有先后的考古地层，其中可以看到被称为“多瑙河风格”的日耳曼墓葬。[31]

葬仪采用土葬而不是火葬，[32]其特征物品大量出现在数量较少的奢华墓葬中。其他许多墓葬中则很少或根本没有随葬品。物品包括个人装饰物，比如半圆形的大胸针、板扣、带有多面体吊坠的耳环、金项链；武器和军事装备也很常见，比如带金属贴花的马鞍、骑兵用的长剑、箭矢。遗存也

反映出一些特殊的仪式。例如，将打破的金属镜子与死者一起下葬的做法相当普遍。在坟墓中发现的物品的种类、下葬的方式，以及也许最重要的，女性穿衣的方式（两边肩膀处各用一个安全别针——扣针——收拢，再用另一个扣针在身前扣上外衣），都直接源自4世纪日耳曼遗存体现的一般模式。5世纪阿提拉的广大子民吸收并发展了这些特征。因此，仅根据考古遗存是无法区分开匈人统治的不同日耳曼群体的。[33]就像那位商人和艾德科的生平所表明的，无法进一步细分的日耳曼物质文化在阿提拉帝国中广泛传播，说明这个帝国是个文化大熔炉。融合甚至可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之所以较难找到5世纪的匈人墓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匈人不仅学会了日耳曼语，还开始像他们的日耳曼子民一样穿着。

毫无疑问，阿提拉帝国内有不少人忙着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以期在政治状况和机遇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获得成功。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和考古证据表明这个多元文化帝国内的群体身份有着无限的可塑性。基本上，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被带入匈人轨道的人都成了匈人。不管是最早的核心游牧群体，还是扩充了阿提拉帝国人力的主要讲日耳曼语的群体，都获得了匈人的群体身份；阿提拉去世后，这些人再次调整自己的身份，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在5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获得了独立。[34]我毫不怀疑这种模式适用于某些人和某些群体，但它忽视了大量的历史证据，而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并不能自由选择最有利于自己获得物质财富的群体身份，匈人帝国的结构对此有明确限制。

首先，有必要再考虑一下普里斯库斯提到的那位罗马商人的经历。他的成功之路始于在战斗中为新主人效力，用战利品换得了自由。尽管阿提拉在5世纪40年代打的胜仗肯定带来了大量战利品，但有多少罗马俘虏能像那位商人一样成功呢？肯定不会太多。奥尼吉修斯的餐桌恐怕容不下很多受到青睐的前俘虏。而缺乏战斗经验的罗马俘虏，又有多少具备那种能力和运气，能在战斗中幸存下来？普里斯库斯还记录了一桩逸事，比较少被人提到。它讲的是另外两名俘虏的命运，这两人同样被匈人军队抽调入伍，他们为了报仇，趁乱杀死了主人。最后，他们被绞死了。[35]恐怕这种不太和谐的事态，而不是普里斯库斯笔下那名商人的幸福结局，才是主奴关系的主流。

此外，这些故事说的都是被个别俘虏的罗马人。阿提拉统治的大多数非匈人群体是一群人一起被并入该帝国的。大量历史证据表明，这些人身处的关系模式无法轻松带来大规模的身份转变。首先，匈人帝国不是人们自愿加入的帝国。这方面的证据充足且一致。非匈人是在征服和威胁之下加入帝国的。阿提拉时代匈人手下的最后的受害者阿卡齐里人就是如此。当然会用一些外交手段，但关键信息是明确的：“阿提拉立刻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部队，消灭了一些人，迫使剩下的人臣服。”显然，正是为了避免类似

的命运，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才在376年夏天来到多瑙河。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阿提拉的子民不是自愿加入的臣民，而是没来得及逃跑的人。[36]显然，匈人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不怎么和谐。更广泛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

想理解匈人帝国，关键要认识到它从一开始就不稳定。学者很少关注这个方面，因为现有的叙述资料基本来自普里斯库斯，而他描写的是5世纪40年代阿提拉治下处于最辉煌时期的匈人帝国。然而，如果你稍微扩大一下视野，就会发现许多表明帝国不稳定的证据。匈人统治的许多群体是被迫加入匈人帝国的，因此罗马人能鼓励这些群体脱离匈人帝国（很多人早就准备好一有机会就逃跑了），从而不断削弱匈人的势力。当然，失去了一部分臣民正是乌尔丁在408—409年被击败的原因，但我们不知道当时罗马人是不是利用了匈人主人和非匈人子民之间的裂痕。

其他证据就更清晰了。比如，5世纪20年代东罗马将匈人从潘诺尼亚赶走时，策反了大量匈人控制下的哥特人。这些哥特人被迁移到色雷斯，从此之后似乎一直忠诚地为东罗马军队效力。[37]还有一些臣民则自发行动：

> 鲁阿做匈人的国王时，居住在多瑙河周围的阿米尔祖里人（Amilzuri）、伊提马里人（Itimari）、腾所里人（Tounsoures）、博斯基人（Boisci）和其他部落纷纷逃离，加入罗马人那一边作战。[38]

这些事件发生在5世纪30年代末，当时阿提拉的叔叔鲁阿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即使是这么大的成功，即使这些臣民随后可从战利品中分得一份，也不足以让他们保持平静。毕竟可想而知，新统治开始的时候总是特别有张力：

> （于440年前后开始统治时，）阿提拉、布莱达已经与罗马人讲和，他们率部队穿过斯基泰，征服了那里的部落，并向索罗格西人（Sorogsi）宣战。[39]

对新统治者而言，确立自己在匈人中第一号人物的地位之后，显然有必要重申自己对臣属群体的统治权。事实上，匈人领袖竭力防止罗马人挑起麻烦。在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阿提拉和布莱达强迫东罗马同意“在匈人准备开战时，（东罗马）不应与任何蛮族群体联合对抗匈人”。[40]

由此看来，阿提拉去世后，匈人与其臣属群体之间爆发的大规模冲突不是偶然发生的例外，而是源自匈人帝国内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普里斯库斯访问阿提拉帝国后，描绘了其内部的和平宁静的景象，但这种画面很误导人。帝国通过征服而建立，借助恐吓来维持，而离开它的唯一方式——就像阿提拉去世后的众多事件所表明的——就是自己杀出一条路来。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敌意为何如此持久？答案可以在普里斯库斯历史著作的另一片段中寻找，该片段谈及丹吉兹克于467—468年对东罗马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此时距这位历史学家访问阿提拉的朝廷已有差不多20年。该片段记录了哥特人和匈人混合部队中不同的分遣队如何在罗马间谍的挑拨下发生内斗。此人提醒哥特分遣队，匈人通常是如何对待哥特人的：

> 这些人不关心农业，却像狼一样发起攻击，抢走哥特人的粮食，结果，哥特人仍是他们的奴隶，还得自己忍受粮食短缺。[41]

当然，匈人所做的远不只是夺走哥特人的粮食。匈人还要求臣属群体为他们作战。虽然普里斯库斯笔下那位变身为匈人的商人日子过得很好，但像他那样的只是少数。如前文所述，在作战时，很少有罗马平民俘虏能发挥什么作用，而他们为匈人作战的伤亡可能是巨大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匈人帝国的一部分是很糟糕的经历：先是军事征服，后是经济剥削，还得不时被调去为阿提拉作战。

同样重要的是，匈人帝国缺乏密切管理子民事务的治理能力（这与罗马帝国显然有很大不同）。众所周知，匈人的官僚机构中有名文书是罗马人（他是西罗马事实上的统治者埃提乌斯派去的），还有一名罗马俘虏，可以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写信。可见在实践中，即使在被征服之后，各个臣属群体基本上仍需自己管理自己的日常事务。这并不是说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例如，在征服阿卡齐里人后，阿提拉任命了他自己的一个儿子来监督活下来的首领们，还杀掉了几个敢于反抗的首领。前述片段中提到，一些哥特人在467—468年加入丹吉兹克的入侵军队，他们仍有各自的首领，但并没有领导他们整体的领袖。而据我们所知，3世纪和5世纪之间所有独立的哥特群体，即使在权力分享的情况下（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群体一开始的时候是兄弟分享权力），也都有一个地位突出的领袖，可见，匈人的监管很可能是为了防止被他们击败的大规模臣属群体中出现统一的领袖。[42]匈人和早先的罗马人出于同样的目的采取了这种策略。罗马人将其用在帝国之外的阿勒曼尼人身上，也用在382年与帝国内部的哥特人签订的条约中。如果可以防止出现领导整个群体的领袖，就能挑起群体内部的政治竞争，让它没那么容易发起有效反抗。

类似结论也能从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政治历史中得出。约达尼斯留给我们的故事表明，瓦拉米尔在哥特人中为首的地位并不是继承来的。要获得这样的地位，他需要积极压制敌对战队的领导者，还要尽可能将落败对手的追随者吸引过来为己所用。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不明，但似乎更可能是在阿提拉去世之后而不是之前发生的，因为在那之后，形成了一个强大到足以独立行事的哥特群体，而这正是匈人试图用管理策略来避免的情况。经过这种程度的联合之后，这些哥特人才有了足够的力量入侵多瑙河中游地区，或者要求君士坦丁堡承认他们的独立。[43]如果哥特人的情况也适用于匈人的其他臣属群体，那么就能解释为什么匈人力量崩溃后，斯基里人必须从阿提拉的主要追随者中寻找自己的国王了。

于是，在阿提拉帝国的盛世景象之外，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帝国固有的不稳定性。匈人和罗马人不一样。罗马人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将子民，至少是其中那些拥有土地的精英，转变为完整意义上的罗马公民，征服后那种紧张对立的氛围因此消散；但是，匈人缺乏能直接管理他们子民的官僚体系。事实上，我怀疑匈人对不同群体统治和干涉的程度有很大差异。例如，格皮德人在阿提拉去世时似乎已经有了一个领导他们全体的领袖，也许正因如此，格皮德人才能第一个主张独立。其他群体，比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都得先在5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设立一位全体领袖，才有办法挑战匈人的霸权。还有一些群体，比如在468年时仍然由丹吉兹克统治的哥特人，则始终没能推翻匈人的霸权。[44]

如果史料的质量更好，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匈人帝国在453年之后像洋葱一样被层层剥开。不同层次的臣属群体先后宣布独立，匈人之前控制程度低的群体先独立，控制程度高的群体后独立。这里起作用是两个可能相互关联的关键变量，一是臣属群体的政治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留，二是这些群体与匈人帝国的心脏地带——阿提拉扎营并接待普里斯库斯使团的地方——相距多远。在营地附近定居的一些群体被严密控制，统一领导权的苗头一出现就被扑灭。其他群体在更远的地方定居，保留了更多原本的政治结构，受控也不那么严密。在阿提拉时代，法兰克人和阿卡齐里人的地盘分别是距匈人帝国心脏地带最远的和最近的。我们听说阿提拉曾试图干涉法兰克人的一次继承纠纷，所以即使莱茵河北部也不是完全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而阿卡齐里人就定居在黑海以北的某个地方。在这两地之间，图林根人、哥特人、格皮德人、苏维汇人、斯基里人、赫鲁利人、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都听命于阿提拉，只是程度不同。[45]

还有一个让情况更复杂的因素值得在此一提。我们没有关于阿提拉帝国的详细信息，但一份可靠的拜占庭资料记录了两个世纪后游牧的阿瓦尔人的帝国中地位等级的情况，可供比较。资料讲述了一群东罗马俘虏的故事。他们被从家乡带到北方，在从前的罗马城市西尔米乌姆（Sirmium）附近

定居下来，给阿瓦尔人当奴隶。他们的地位渐渐提升，成为帝国内的自由民（但仍处于从属地位），还获准建立自己的政治领导层。[46]重要的是，不要因为缺乏同样高质量的资料，就不去考虑这样的可能性。阿提拉的帝国里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在享有完整权利的匈人和匈人的奴隶之间，有一个中间阶层。不过应该强调的是，即使他们的地位后来提高了，这些俘虏及其后代对阿瓦尔人的事业也没有投入到无条件参与的程度。机会一来，他们就会摆脱阿瓦尔人的控制。

上述种种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匈人帝国内群体身份认同的运作方式。群体身份认同并非始终不变。普里斯库斯笔下那位前罗马商人的经历表明，特别成功的奴隶有可能跨越地位和身份的鸿沟，在匈人中获得完全自由的地位。但是，最初那群核心的匈人也在经历群体身份认同的重大变化。我之前提过，据我们所知，这些匈人原本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对级别不同的国王的直接效忠，这些国王的联盟创造了更大的群体，但随着鲁阿和阿提拉王朝的崛起，这些较低级别的身份认同被随之而来的政治重组一扫而空。其他一些有着更好文献记录的游牧群体也受类似过程的影响，它们生活在欧亚大草原的西部边缘以及更远的地方。例如，被称为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的11世纪群体并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实体，而是一大群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暂时联合在取得了惊人成功的塞尔柱部族麾下，该部族胜过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征服了近东大部分地区。[47]这样戏剧化的政治过程即使在核心支持者中也很可能产生赢家和输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迹象表明，帝国开始崩溃时候，一些匈人群体更愿意把赌注押在阿提拉儿子之外的领袖身上。

在匈人的臣属群体中，至少有一些经历了更戏剧化的重组过程。作为它们的新领主，匈人一直从最高的政治层级干涉它们的事务，不让受管理最严格的群体中出现能领导整个群体的人。阿提拉似乎招募了有着不同背景的助手，这些人的一部分工作可能就是监管臣属群体——如前文所述，这些群体的地位可能有高有低，尽管我们缺乏匈人时期的详细证据。这么做非常明智。阿提拉管理着一个主要由多少具自治权的臣属群体组成的帝国，需要忠诚的下属来管理它们的事务或监督管理事务的人。在与阿提拉帝国巅峰期相关的考古地层中发现的黄金反映了同样的策略。发现的黄金数量相当多，但可能仅仅代表最初存放的黄金的一小部分。我们无从得知居住在匈牙利平原上的人在几百年里发现和回收了多少黄金。应该强调的是，匈人时期之前的日耳曼考古遗址中很少能发现黄金，因此阿提拉洗劫罗马世界时肯定获得了极多的新财富。除了军事统治，阿提拉显然还会把与罗马人交战时获得的战利品分配出去，好让臣属群体的领袖更愿意接受他的统治，就像罗马人也会分发年度补贴给他们击败或征服的蛮族领袖一样。[48]

来自蛮族世界各地，特别是讲日耳曼语地区的军事力量纷纷聚集在匈牙利

大平原，将此地变成了一个文化熔炉，但这给大型群体身份认同的解体造成了障碍。匈人征服哥特人、格皮德人、赫鲁利人等等群体，是为了利用和剥削这些臣属群体的军事和经济潜力。如果所有这些人都能像那位前罗马商人一样完全获得自由匈人的待遇，那么他们获得如此特权后，就会要求更好的待遇，就像那位商人得到的那样。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匈人最初的征服就得不偿失了。匈人帝国当然是多元文化的，但是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群体身份并不具有无限可塑性，也没那么容易被侵蚀。因为匈人地位更高，所以帝国的多元文化特性实际上相当于围绕匈人身份设置了障碍。匈人缺乏官僚能力，因而臣属群体至少保留了中层领袖，从而巩固了能维持现有群体身份的结构。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忍受的剥削使他们有动力去维持这些身份，因为唯有凭借这样的身份，他们才能推翻匈人的统治，或是逃到罗马帝国，或是在适当时候通过武力重获政治独立——而对一个支离破碎、失去集体行动能力的群体而言，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旧的身份认同不会在匈人统治下轻易消失。

还必须强调的是，历史证据所描绘的匈人帝国——其内部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紧张关系而四分五裂——与考古证据体现的并无矛盾，即使你确实认为与匈人相关的考古痕迹之所以少，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之前和他们的日耳曼子民联系在一起的葬仪。事实上，讨论考古证据时，有时会出现一些方法论混淆。如今，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抛弃了文化历史，所有人都很清楚，不能假定每个群体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物质文化。但有时人们认为，如果分布在某区域内的物质文化没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该区域中就不可能有明确不同的身份认同。然而，这只是把文化历史背后的错误假设——不同的群体应该具有不同的物质文化——反过来用了。如果某区域内物质文化的差异未必代表不同的政治身份认同，那么物质文化没有差异也不能说明那里人的政治身份都一样。身份认同不是物质文化结构，而是心理和政治结构——个人主张自己的身份，而群体也愿意承认这样的主张。因此，考古证据对身份辩论而言意义非常有限，除非是特殊情况，比如其他方面的资料告诉我们某个物品具有特殊意义。在匈人治下的欧洲，人们的物质文化大体相同，但重要的地位差异和不同的群体身份仍然存在。[49]

崩溃的认同

在关于匈人帝国创建和维持的证据之外，对其崩溃过程的叙述再度表明帝国内部的那些身份认同有多么重要，即便这些认同还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阿提拉去世后，帝国的臣属群体靠军事力量宣布独立，帝国被从内部摧毁。如果这些人当初都自愿成为匈人，也得到平等的对待，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们集体行动，从罗马帝国中攫取了巨量黄金，这些黄

金后来在多瑙河中游的墓葬中被人发现。这种程度的劫掠是他们独立行动时办不到的——早期日耳曼遗址中一般看不到黄金，而在匈人激发的联合崩溃后，东罗马在5世纪后期重新控制了巴尔干地区。[50]实际上，非匈人为从匈人统治下逃脱而投入了大量精力，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在匈人帝国中地位较低，饱受剥削，遭受的损失远超过能从帝国得到的好处——匈人帝国整体的掠夺能力更强，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分到一些财富。阿提拉之死带来了机会，这些群体很快争先恐后地宣布独立。

和当初被纳入匈人帝国时一样，脱离匈人控制的过程促使群体身份发生了改变。如果所有或者大部分臣属群体被并入匈人帝国后都无法建立统领整个群体的领导层，那么阿提拉去世后，在他曾经统治的疆域各处，肯定会出现将艾德科和斯基里人联合起来的那种争权夺利的事。瓦拉米尔肯定需要先击败其他统治者，才能将一部分哥特人联合起来（就是后来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而且很可能得从非哥特人中招兵买马。除了在5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作为匈人帝国继承国出现的有名字的大型人口单元外，我们的史料还提到了不少规模较小的群体，如普里斯库斯著作残篇中提到的索罗格西人、阿米尔祖里人、伊提马里人、腾所里人和博斯基人。匈人帝国崩溃后，其中一些群体进入罗马的领土，而当罗马帝国重新安置它们时，它们行动的混乱之处就表现出来了，约达尼斯写道：

> 萨尔马提亚人、塞曼德里人（Cemandri）和一部分匈人住在马尔蒂斯堡……斯基里人、萨达加里人（Sadagarii）和一部分阿兰人……得到了小斯基泰和下默西亚……而鲁吉人和其他一些群体要求定居在拜泽（Bizye）和阿卡狄奥波利斯（Arcadiopolis）。阿提拉的小儿子赫尔纳克和追随者选择在小斯基泰最边远的地方定居。埃姆奈祖（Emnetzur）和与他同族的乌尔金都（Ultzindur）拿下了达契亚的欧斯库斯（Oescus）、乌图斯（Utus）和阿尔慕斯（Almus）。[51]

上述群体各自分到了一个或几个位于巴尔干半岛北部的拜占庭军事基地，可见它们本身的规模不是太大。类似的群体可能被纳入了匈人帝国崩溃后出现的较大的王国。比方说，6世纪40年代，在追随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进入意大利的人的后代中，就有比提古热（Bittigure）匈人。比提古热匈人在5世纪60年代被阿提拉的儿子征用，以对抗狄奥多里克的伯父瓦拉米尔，而在此期间，他们肯定改变了政治效忠对象。[52]当然，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过好几次，而在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重新洗牌显然是可能的。

鲁吉人的命运基本是上述情况在较长时期中较大规模的版本。他们建立了匈人帝国最初的继承国之一，但在奥多亚塞摧毁了他们的独立后，他们又

投靠了狄奥多里克。格皮德人和伦巴第人继承了这个传统，继续招揽各部落的残余。战败的赫鲁利人加入了格皮德人（虽然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满意自己得到的条件），而在伦巴第人于6世纪60年代末离开意大利时，按照助祭保罗（Paul the Deacon）的说法，是带上了苏维汇人、赫鲁利人、格皮德人、巴伐利亚人（Bavarians）、保加尔人（Bulgars）、阿瓦尔人、萨克森人、哥特人和图灵根人。这个名单上，至少前三个群体曾在后匈人时代的多瑙河中游地区游荡。[53]阿提拉去世后，继承国建立带来的政治认同调整不可低估。有些继承国，甚至也许所有继承国都不是文化上同质、对外人封闭、通过内部通婚繁衍的群体，而是由都想脱离匈人控制的各方残余拼接而成的新王国。即便是在阿提拉活着的时候就不怎么受匈人控制，也有自己的国王的格皮德人，在匈人帝国崩溃后，也可能会招募新人。而像斯基里人和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这样的群体更是如此，他们直到此时才统一或重新统一起来。虽然缺乏相关信息，但鲁吉人、苏维汇人和赫鲁利人等其他群体的起源也完全可能一样混乱。

从“民族”这个词传统上的另一层重要意义上说，这些王国也不是民族。前文谈过，经济复杂性在300年间不断增加，带来或大大加剧了日耳曼世界的社会不平等。在原本臣属于阿提拉的群体里，有明确证据表明，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中有两类地位不同的战士，可能一类是自由民，一类是被释奴。在阿提拉的儿子们放弃这场斗争后才靠武力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伦巴第人，他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理解群体身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只有地位较高的战士才能从所属群体的存在中充分受益，他们拥有群体赋予的权利和特权，因此，恐怕只有他们是完全忠于这个群体身份的。这个维度的重要性体现在历史叙述中。拜占庭征服东哥特意大利时，在一场战斗中，达尔马提亚（Dalmatia）一支哥特人部队中所有地位较高的战士都被杀死，剩下的地位较低的战士立即投降了。根据普罗柯比（Procopius）对那场战争的叙述，地位较高的战士的伤亡往往引起哥特人的恐慌和失望。[54]

因此，至少可以说，在匈人帝国之后出现的较大实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它们文化上不同质，等级上不平等，它们是政治联盟和地位各异的人组成的复合体，不仅有两类战士，还可能包括了没有武器的奴隶。不过，我们也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在摒弃将这些实体视为完全封闭的人口群体的旧观点后，就走向反面，认为它们仅仅是为了方便而设的标签，没有内部结构，也不稳定。在此无法充分展开讨论，但有必要提到两个重要结论。首先，群体身份并不依赖于王室。一类研究认为，王室相当于社会黏合剂，将临时凑在一起的非常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造成他们同属一个族群的表象。伦巴第人从不同的家族而非独一的王室中选择国王，甚至某些时期里没有国王，但还是继续作为伦巴第人存在。众所周知但有时会被忽略的一点是，从证据看，哥特人的情况比我们

最开始认为的还要与之类似。6世纪20年代，瓦拉米尔长寿的侄子狄奥多里克为了帮助自己未成年的外孙对抗家族内外的一系列竞争对手并获得意大利王位，发起了大量宣传，强调自己的家族是独一的王室，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有资格统治这些哥特人。卡西奥多罗斯还从哥特人历史的角度帮他“证明”了这一点，方法是编一个家谱，写上狄奥多里克的外孙是家族王权的第17代传人。但是国王总是会说这种不能够相信的话，我们尤其不该相信他；如果拿当时的史料来比对，就会知道狄奥多里克宣称的那种历史站不住脚。卡西奥多罗斯的阿马立族谱也是哥特人的口述历史和罗马人的书面历史拼凑起来的，还有来自《圣经》的一些灵感。事实上，可能从约450年开始，阿马立家族才对这些哥特人逐步建立起了统治权。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一旦狄奥多里克这一脉未能出现一个合适的男性继承人，这一支就直接被砍断了：他的外甥狄奥达哈德（Theodahad）在536年因领导失误而被谋杀，而这距离狄奥多里克这位伟大的国王去世仅仅10年。[55]

其次，虽然后阿提拉时代的政治进程混乱不堪，但从中产生的一些较大群体的身份认同也不是那么容易破坏。例如，尽管在487—488年加入了狄奥多里克追随者的行列，但鲁吉人在接下来两代人的时间里仍然保持独立，直到约540年，他们仍是意大利土地上可以辨认的群体。同样，虽然赫鲁利人经历了种种艰辛和分裂，于508年败在伦巴第人手中，但在那之后4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仍保留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没有这种身份认同，他们就不可能去向北迁移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同胞那里寻找传统统治家族的领导者。[56]从历史来判断，鲁吉人和赫鲁利人都是“中等规模”的实体。这两个群体的军事力量显然不如哥特人、伦巴第人或格皮德人联盟，后面那些力量较强的联盟形成了延续时间长得多的政治实体，并最终将鲁吉人和赫鲁利人吸纳进来。关于鲁吉人和赫鲁利人的证据都受到了质疑。赫鲁利人派使团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行动被认为是“童话故事”，而鲁吉人在540年的重新出现被视为仅仅是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发明，据说普罗柯比倾向于把见到的每一个蛮族群体都当成一个“民族”，因此我们不该相信他。关于上述赫鲁利人和鲁吉人行动的详细记录，都只见于一份史料，因此质疑其有效性很容易。但是，这样的质疑是否有实质证据支撑呢？

我认为没有。以赫鲁利人为例，对他们向斯堪的纳维亚派出使团过程的详细叙述，是关于他们被伦巴第人击败之后的命运的完整讲述的一部分。赫鲁利人命运故事的其他部分在别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而普罗柯比总体上描述的是赫鲁利人身份实际上遭到了破坏。当赫鲁利人的两支队伍终于相互开战的时候（549年，一支为格皮德人作战，另一支（通过东罗马）为伦巴第人作战）结论必然是，“赫鲁利人”这个标签已经不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了。这段叙述完全合理，没有不一致或明显的错误。当然我们还想知道些别的，但这段叙述已经符合古代和中世纪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基

本可信度标准了。同样，说到鲁吉人，不同的资料记录了在狄奥多里克5世纪90年代早期征服意大利期间，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谋划的。他们两次改换立场，先是加入奥多亚塞，后又回到哥特人一边。因此，在意大利被征服之后，他们（或其中一部分）还将鲁吉人身份保存了一代人左右的时间，这并不奇怪。

怀疑这两个故事的唯一理由是，它们不符合那些提出质疑的现代学者对身份问题的先入之见。这些学者深受巴斯思想的影响，认为第一千年中期的日耳曼群体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群体认同。但我们知道，巴斯代表的只是现代身份认同研究中的一条路线，而相关研究并没有为群体认同具有高度可塑性这个先入之见提供压倒性的支持。根据情况（个人情境结构的具体性质），群体认同可以更弱或更强，而在鲁吉人的例子中，普罗柯比甚至写出了他们维持群体身份的机制，即自愿不与其他群体的人通婚。[57]鉴于其一致性和细节，我很乐意接受证据告诉我们的内容。赫鲁利人和鲁吉人可能不是19世纪经典意义上的“民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赫鲁利人或鲁吉人拥有强大的文化共性（但公平地说，也没有证据说他们没有），阿提拉帝国崩溃时，他们也可能通过不同的结盟方式吸收了其他群体的人。这两个群体肯定也像这个时期我们所知的其他日耳曼群体一样，有明显的地位等级区隔。但不管怎么说，赫鲁利人和鲁吉人的群体认同能够对大量成员施加强有力的控制。

规模较小、不那么多样化的群体中存在这种情况比较容易想象，但一些较大群体的身份认同似乎也是如此。536年，拜占庭人决定征服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他们的到来让一系列子群体临阵变节；这些子群体更愿意与入侵者和平相处，而不是继续向哥特人效忠。一份存世的莎草纸文本很好地描绘了一个叫冈迪拉斯（Gundilas）的哥特庄园主的困境。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随着战事的起伏而来来回回不断改变站队，拼命想要保住自己的土地。但是，变节者和冈迪拉斯的行为并不能代表狄奥多里克的支持者及其后代对拜占庭入侵的反应，否则在接下来的20年里，哥特人就不会为维持政治独立而战，毕竟，拜占庭人还向他们提出一项和平协议，表示只要他们愿意臣服，就能保留自己的土地。从普罗柯比的叙述和更广泛的证据中真正能得出的结论是，在战争过程中，地位较高的战士这一最在意哥特群体身份的核心团体被逐渐摧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战争中丧命。[58]维持群体身份对这些人最有利，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愿意为此而战。我认为，无论是在哥特人中还是在当时的其他日耳曼群体中，地位较高的战士很可能都是群体认同的真正基石，群体的相对稳固程度取决于这类人的忠诚程度和态度。当然，即使是这些地位较高的人，也不都对群体怀有同等程度的忠诚。现代世界中不存在所有人都忠于所在群体的情况，古代世界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同。

毫无疑问，即使在精英战士的层面，匈人帝国的兴衰也带来了群体身份的重大改变。第一波身份改变的潮流源自征服及相应的控制机制，特别是镇压具有威胁的大领主。第二波身份改变的潮流出现在阿提拉死后，一些原本的臣属群体汇聚起了足以摆脱匈人控制的军事力量，各群体纷纷重组。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过程从根本上削弱了匈人和其子民之间的区别。大致维持这种区别显然对匈人有利，尽管阿提拉通过针对性的劝诱而谨慎培养了一批顺从或半顺从的臣属统治者来管理各自的群体。如果没有这样的区别，一开始征服这些臣属群体所带来的好处很快就会消失，而不管怎么说，一些可能更边缘的群体（如格皮德人）确实完好地保留了自己的王权。可见，在这种结构中，整体改变群体认同是会遇到明显障碍的。但即便继承国因此看起来更像联盟而不是“民族”，其创造的身份更明显是政治身份而不是文化身份，它们还是在由大量支持者组成的核心人群中建立起了牢固的群体认同——这么判断的根据是，需要大范围的军事行动才能摧毁这样的认同，而且即使在遭遇重大失败后，这样的认同还能延续几代人。

这至少是可以从历史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我们没有很好的理由对此不予采信。这段叙述所依赖的证据能够通过所有对可信度的常规检验，拒绝它的唯一理由是先入为主地假设5世纪的认同不会如此运作。但对群体身份认同的现代理解并不能支持这种假设；事实上，现代研究表明，群体身份认同很可能是分层运作的，个人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来根据情况改变效忠的对象。即使群体的成员不属于文化同质的“民族”，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群体的名称，这些名称之下集合了大量人口。这进而表明，这些群体随着匈人帝国的兴衰而进出多瑙河中游地区时，应该产生了大量的人口迁移活动。我们可获得的当时的资料有限，但证实了这一想法。

阿提拉治下的群体

关于迁移中的蛮族的高质量历史证据，大多数还是和哥特人有关——这次是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阿提拉去世后不久，在三兄弟中的老大瓦拉米尔的领导下，他们突然出现在了多瑙河中游的历史进程中。有必要详细探讨关于这些哥特人的证据，因为他们的情况是比较可靠的基准，我们能够以此为参照，考察其他只被简略提及的人口迁移事件。事实上，这群哥特人是在阿提拉去世后才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还是说他们在5世纪50年代中后期突然崛起是因为匈人控制崩溃后，瓦拉米尔联合了若干已经定居在多瑙河中游的独立哥特战队，对比尚无定论。但不管怎么说，473年，在波利亚河战役中取得巨大胜利后不久，这群哥特人从潘诺尼亚出发

前往东罗马的巴尔干诸行省，现在的领袖是三兄弟中的老二狄奥德米尔。接下来的6年中，在一系列复杂政治计谋的作用下，他们多次长途跋涉。最初，这群人从巴拉顿湖（Lake Balaton）地区出发，行走约1 000千米来到塞萨洛尼基以西的埃欧达亚（Eordaia）。此时，狄奥德米尔去世，领导权移交给他的儿子狄奥多里克。475—476年，他们继续行走了600多千米，来到多瑙河上的诺瓦埃（Novae），然后又从多瑙河出发走了800千米，途经君士坦丁堡，479年，他们拿下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迪拉基乌姆（Dyrrhachium）要塞港。

非拉铁非的马尔库斯（Malchus of Philadelphia）这位当时的历史学家详细记录了狄奥多里克接下来与东罗马之间的谈判，我们从中了解到，离开潘诺尼亚6年来，这个群体走过了约2 500千米的距离。谈判过程中，哥特人的领袖向君士坦丁堡方面的特使阿达曼提乌斯（Adamantius）提出，自己可以派6 000名精挑细选的战士去参加将来的一系列行动。这显然不是他的武装部队的总人数，因为非战斗人员留在了迪拉基乌姆，需要至少2 000人的驻军防卫。因此，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兵力应该是1万人或稍多一点。也是在这些谈判中，狄奥多里克提到他的队伍中“有大量非战斗人员”，随后前往意大利时，这支队伍也包含了许多妇女儿童。阿马立家族领导的这群哥特人也许不是19世纪意义上的“民族”，但这群人作为一个数万人的大规模混合群体进入了巴尔干半岛，这类似于早先在376年穿越多瑙河的哥特群体或参与406年渡过莱茵河行动的大规模群体。[59]

一项关于在意大利的哥特人身份的重要研究（狄奥多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之后去意大利建立了王国）否定了上述核心观点。该研究称，该群体中存在妇女和儿童的记载只见于一位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作品，而此人的证据受到了经典迁徙主题的污染。狄奥多里克的队伍并不是一群逃离后匈人时代多瑙河中游混乱局面的有凝聚力的难民，而是在巴尔干地区滚雪球形成的一个新群体，主要由东罗马军队的不同成员构成，基本上是男性战士。然而，一系列的资料都提到狄奥多里克那具有极高机动性的队伍中包含大量妇女儿童：不光是普罗柯比，还有与狄奥多里克同时代的一名致颂词者，此人在507年与一些18年前才长途跋涉而来的人交谈时说起了这种情况，此外，也写于狄奥多里克治下的意大利的一部意大利圣徒生平中也提到了这一点。[60]因此，对普罗柯比记载的指责就像对阿米阿努斯对376年事件的描述的指责一样，并不令人信服。事实上，和阿米阿努斯一样，普罗柯比显然有能力描述不同类型的蛮族活动。他并没有将所记录的迁移中的蛮族都描述为在进行人口迁徙的“民族”。例如，他经常提到斯拉夫人和其他全由男性组成的袭击战队。我们也知道，和376年的哥特人一样，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行动时是带着庞大的车队的。狄奥多里克和阿达曼提乌斯谈判时，一支罗马军队在车队抵达迪拉基乌姆这一安全位置之前，突袭了这支行动缓慢、落在后面的队

伍，扣押了2 000辆运货车。这支庞大的附属队伍里想必有妇女和儿童，运送着各种财物，可能还有谷种和农业装备。因为所有在巴尔干地区和狄奥多里克打交道的拜占庭谈判代表都认为，无论达成怎样的政治解决方案，方案中都得保留将无人居住的农地授予狄奥多里克率领的哥特人。[61]虽然还谈不上是“民族”，但这些哥特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混合人口群体，可以合理推测这些人闲时为农、战时为兵。最近的一些研究质疑了同一群男子既能为农也能为兵的观点，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见，鉴于当时日耳曼社会的普遍经济发展水平只能供养数量有限的职业战士，这是完全合理的。在那个时代，日耳曼群体要想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必须从军事随从以外更广的社会阶层中招募兵员，既招募拥有土地和家庭的人，也招募相对无牵无挂的年轻人。在无法供养大型职业军队的农业社会中，出现农民战士（如布尔人中的那些）是很自然的结果。

然而即便这些也不是狄奥多里克带到意大利的队伍的全貌。在巴尔干半岛逗留期间，他吸纳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新队伍，这些人来自一个不同的哥特群体。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于473年到达罗马巴尔干半岛之前，那个群体已经在色雷斯定居一段时间了。具体时间有多长目前还有争议。这些色雷斯哥特人的起源并不明确，可能是几批不同的移民进入罗马巴尔干半岛后形成的。早在5世纪20年代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因为罗马的军事行动让多瑙河中游的众多哥特人摆脱了匈人的统治。这些哥特人被重新安置在色雷斯，而前述另一支哥特力量在470年前后已站稳脚跟的地方就是色雷斯。当然，从最初的定居到色雷斯哥特人以一支独立力量的面目出现在史料中，之间隔了两代人的时间。

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如果上述两者有联系，就意味着定居下来的那些哥特人在这约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着某种群体身份，但在此期间他们似乎没有自己的国王。我们所知的第一位色雷斯哥特人的国王是在5世纪70年代早期才确立权威的，当时色雷斯哥特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庇护人阿斯帕（Aspar）将军被谋杀，于是他们发动了起义。但在阿斯帕被杀之前，色雷斯哥特人享有“同盟者”（foederati）的特殊地位。这个称号的意义在于，它只授予那些因受偏爱而在被纳入东罗马军队时仍能保持内部凝聚力的群体。从5世纪20年代到约470年，巴尔干地区的罗马军队中有许多哥特人和哥特名字的将军，这表明5世纪70年代的色雷斯哥特人的确和之前定居下来的人有某种联系。不过，阿提拉的帝国里还有其他哥特群体，帝国的崩溃促使其中一些迁入了东罗马。5世纪60年代中期，比格里斯率领的哥特部队在东罗马领土上落败，幸存者（也许还有其他未被提及的人）很可能被纳入了东罗马现有的哥特部队。也没有必要认定所有色雷斯“哥特人”都是真正的哥特人，即使当时的资料将其描述为如此。[62]

无论其起源如何，到了5世纪70年代初斯，色雷斯哥特人都成了巴尔干军

队中的一个独特群体，而且带着自己的妇女和儿童。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有超过1万名战士。478年，他们的领袖——不巧也叫狄奥多里克，但人们通常用绰号“斯特拉波”（Strabo，“斜视者”）称呼他——从君士坦丁堡支取了1.3万人的薪水和给养。这支队伍的凝聚力很强，能够选出自己的领袖去与罗马谈判，并成为罗马信赖的盟友。获得大额补贴（每年910千克黄金）后，他们在帝国首都附近定居，与那里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关系密切。大统领（magister militum）和贵族阿斯帕在471年以前是他们的政治庇护人，他是权力掮客和造王者，在457年将皇帝利奥一世（Leo I）扶上了宝座。阿斯帕在君士坦丁堡一直握有实权，利奥一世忍无可忍，终于在471年安排谋杀阿斯帕，以夺回政治上的独立——利奥一世因此被称为“屠夫”。色雷斯哥特人与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的密切关系表明，他们是东罗马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起义应该是因为阿斯帕被杀让他们的特权地位岌岌可危。但阿斯帕去世后，斯特拉波仍与皇帝的家族成员保持联系，并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其他支持者那里了解到朝廷的情况。色雷斯哥特人显然融入了东罗马政体，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其中一些人从5世纪20年代开始就是有特权的军人了。[63]

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刚来到巴尔干地区的时候，引发了一场三方冲突，两个哥特群体围绕东罗马的宫廷展开了地位之争。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在483年或484年组织暗杀斯特拉波的儿子雷西塔克（Recitach），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雷西塔克当时刚被选为新的色雷斯哥特人领袖，而他父亲的结局同样悲惨：斯特拉波被马从背上甩了下来，不巧落在了一根长矛上。雷西塔克一死，大多数色雷斯哥特人就投靠了狄奥多里克。现有史料对这种情况并没有明说——涉及这一时期的东罗马史书，存世的只有中世纪的人做的一些摘录，而相关的残篇只记录了暗杀，没有记录其后果；但是，作为独立群体的色雷斯哥特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历史记录中消失的，只有少数拒绝投靠阿马立家族的人在6世纪时仍留在东罗马。推动两个群体整合的另一个理由是，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对抗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政策向来是让这些人互相争斗，然后再清理散兵游勇。联合产生了意义重大的结果。从关于两支队伍各自规模的证据来看，联合使狄奥多里克的队伍多了1万名男子，他麾下的哥特军人数量差不多翻了一番；后来在意大利的哥特军队的规模应该在2万人以上。[64]

因此，谋杀雷西塔克促成了惊人的融合进程。狄奥多里克的伯父瓦拉米尔是家族中第一个通过杀戮、征服、驱逐敌对的哥特战队领袖来获得非凡地位的人，他以此将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统一起来：在哥特人迁移到潘诺尼亚之前的乌克兰，或在阿提拉死后的多瑙河中游（如果这些哥特人已经在那里定居的话），他都用了这样的策略。没有哪个战队拥有超过1 000名的战斗人员，甚至也许只有几百人。在伯父和侄子两代人的努力下，阿马立家族从许多战队领袖中的一个，一跃成为指挥超过2万名战士

的卓越哥特国王。在488年秋天启程前往意大利的正是这支规模已大大增加的队伍，队伍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运货车队，总计5万到10万人。

当然，你可能还有更多想知道的事情，但对于第一千年中叶来说，有这些证据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它还为我们考察随匈人帝国兴衰而进出多瑙河中游的其他力量提供了一些参考；很明显，在这一时期迁移的其他人口群体中没有哪一个的规模比得上这支真正可怕的力量。对于那些原本臣属于匈人，后来在5世纪60年代进入罗马帝国的较小群体（霍米达克、比格里斯的队伍，以及阿提拉两个幸存儿子领导的军事力量），史料没有提供相关数据。但其他群体都未能获得狄奥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所享有的独立地位，许多群体最终分散为多瑙河边境各处的小群体。这类群体恐怕最多只能派出一两千人作战，其中大多数也许只能召集几百人。[65]

赫鲁利人和鲁吉人的失败使人口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比较大的力量，但比起狄奥多里克的力量还差得很远。对于阿提拉死后发生的事件，我们能找到的另一个看似合理的数字来自549年。格皮德人和拜占庭各自的赫鲁利盟友在那一年的战斗中相遇，两支队伍分别有1 500人和3 000人。因此，赫鲁利人的第二次分裂应该是在549年之前；前面提过，第一次分裂后，一批数量不明的赫鲁利人去到了斯堪的纳维亚。而留在多瑙河区域的两个赫鲁利人群体，应该都不会愿意投入全部的兵力为他人作战。因此，在分裂发生之前，在伦巴第人手下受到重创之前，赫鲁利人应该能投入5 000到10 000名战士作战，也许只比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略弱一点——当然这是在狄奥多里克吸纳色雷斯哥特人之前。我们没有关于鲁吉人的任何数据，但是他们后来被奥多亚塞彻底击败，可见在多瑙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鲁吉人只是中等的角色，也许是一支和赫鲁利人规模相当或略小一些的力量。[66]

这个时代来来往往的群体中，最难确定行踪的是伦巴第人。伦巴第人最终主导了多瑙河中游地区，这是很明确的，但这一发展背后的历史进程并不明确。后来的伦巴第资料写道，在一个又一个国王的领导下，伦巴第人夺取了鲁吉人的王国，又占领了潘诺尼亚，当然，早先那些使他们远离易北河河口的行动也是在国王率领下的侵略——侵略假说又出现了。然而，所有同时代的证据都表明，当时的伦巴第王室并没有太大的权威。伦巴第人移居意大利后，次级领袖谋杀了国王，在没有中央王权的情况下运作了10年。因此，中层领袖独立的倡议很可能在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行动的早期阶段。就像约达尼斯对3世纪哥特人扩张的描述一样，后来的伦巴第资料肯定受到了迁徙主题的影响，将行动重新描述为一个国王率领下一个民族的一次迁徙。[67]

另一方面，伦巴第人从易北河南下迁移，迁入地都不是完全的权力真空。他们来到赫鲁利人的土地上时，要正面对抗的力量可不容小觑。因此，伦

巴第人扩张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过程可能类似于3世纪日耳曼人向黑海的扩张（第三章）。虽说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不同的群体分别迁移，其中一些或大部分可能规模很小，但移民也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形成更大的群体来打大仗。换句话说，它看起来是一种经典模式的另一个例子，其他例子包括3世纪的哥特人、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19世纪的布尔人：最早一批进入新土地的入侵者获得成功，从而鼓励了其他人，更高地位的领袖最终带着更多的追随者进入了战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无从得知这些行动涉及的总人数，甚至不知道参与行动的主要是全由男性组成的战队，还是也包括妇女和儿童的群体。伦巴第人6世纪60年代前往意大利时肯定是举家搬迁的，而至少从508年击败赫鲁利人开始，伦巴第人就拥有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们集结的军事力量想必超出了职业军事随从的范围。如果是这样，那么混合社会群体就在伦巴第人的扩张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扩张的最早阶段之外。

与伦巴第人迁徙有关的考古证据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罗马时代晚期，波希米亚的特征葬仪是土葬。然而，4世纪末和5世纪初，那里出现了一些火葬墓地，与在北方伦巴第人起源地（易北河北部流域，以及哈茨山、阿尔特马克和梅克伦堡地区北部）发现的墓葬相似。这些与众不同的墓地固然可能是一些原本住在波希米亚的人决定将死者火化的结果，但考虑到5世纪末确实有不少伦巴第人来到了多瑙河中游，这些墓地更可能是他们迁移路线的提示。[68]这称不上是压倒性的证据，但正如前文所述，考古发现基本不可能提供完全明确的人口迁移证据。易北河北部流域人口群体的物质文化彼此太过相似，无法明确体现出区域内短距离的人口流动，因此我们无从得知第一批进入波希米亚的北方入侵者来自何处。而且不管怎么说，移民群体都很可能有从整个地区招募人员。

伦巴第人掌权之后多瑙河中游的考古证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足够清楚的：在6世纪的进程中，以原罗马潘诺尼亚行省为中心，一系列年代明确的遗迹分布在历史记载中所说伦巴第人统治的地区。这些遗迹无疑体现出伦巴第王国的存在。然而，与多瑙河中游的其他遗迹相比，特别是与历史资料中说的格皮德人统治地区的遗迹相比，它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不是说伦巴第王国与其对手格皮德人的王国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这种相似之处真正表明的是，6世纪伦巴第人的物质文化与5世纪匈人的物质文化遵循了类似的轨迹。随着时间推移，伦巴第物质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独特性，完全适应了多瑙河中游的规范；这或许也能印证这种观点：考古学上很难看到能体现阿提拉时代匈人活动的遗迹，是因为他们也采用了新的物质文化规范。就伦巴第人而言，他们原本使用火葬，后来采用了新的习俗，将未经火化的尸体下葬，墓地大致东西向成行排列（德语是Reihengräber）。伦巴第妇女衣服的样式（至少是她们入葬时的衣服）和多瑙河地区的其他人一样，两肩各佩一枚扣针。罗马帝国早期，易北河北部群体手工制作的陶

器有各自独特的设计，可以相互区分；但后来，样式相当统一的多瑙河中游轮制陶器取而代之。我们最多只能说（这也与现代民族志研究的类似例子一致），从银扣针的样式上，能看出物主是忠于伦巴第人还是忠于格皮德人，因为我们发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样式，分别分布在多瑙河中游平原的两个部分。[69]

匈人帝国兴衰的过程也穿插着一系列人口迁移现象。其中一些迁徙行动由人口集中的大规模群体完成，比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473年，数万人离开匈牙利前往巴尔干半岛，他们可能就是约20年前从乌克兰迁到匈牙利的那群人；488年，一个更大的群体从巴尔干出发前往意大利——算上色雷斯哥特人和鲁吉难民的话，人数接近10万。参与迁徙的还有一些人口较少的群体，它们在导致旧霸权解体的战争中失利，沦为难民，这方面的代表是5世纪60年代的匈人和斯基里人、5世纪80年代的鲁吉人，以及508年以后的多个赫鲁利人群体。此外，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中，也出现了我们在前文看到的掠夺性人口移民，那就是伦巴第人的迁徙。

虽然历史资料没能提供多少有用的数据，但至少根据比较移民分析中使用的定性定义，进出多瑙河中游地区的武装移民活动多属于大规模人口迁移。5世纪上半叶，阿提拉治下部落聚集所带来的整体“冲击”，在考古学上表现为人称“多瑙河样式”的遗存，在叙事记录方面体现于匈人集结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向地中海发起攻击。在匈人统治下，该地区产生了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而这代表了进一步的冲击。这一摇摇欲坠的结构要靠通过战争和恐吓从罗马得来的黄金润滑才能运作。匈人利用战争和战争带来的利益，通过恐吓和奖励的有力组合来管束自己治下的武装群体。政治乃至文化上的混乱显而易见。

匈人帝国崩溃时代的许多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的人口迁移，从定性意义上说也属于大规模迁徙。奥多亚塞的介入对鲁吉人来说是巨大的政治冲击，因为这次介入摧毁了鲁吉人的王国，幸存者不得不两次走上跋涉之路，每次都要行走数百千米。他们先是在罗马巴尔干地区加入了狄奥多里克，然后跟着他的车队来到意大利。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早先的介入对斯基里人产生了类似影响。遭遇这些失败后，并不是所有的斯基里人和鲁吉人都离开了多瑙河中游地区，但他们已经失去了独立性，还有不少斯基里人前往意大利参军，改变了当地军事力量的平衡。因此，一旦时机成熟，奥多亚塞就成了意大利土地上第一个罗马继承国的实际统治者。伦巴第人来到多瑙河中游也对赫鲁利人造成了冲击，赫鲁利人的独立和团结也被摧毁，许多人不得不离开。虽然就我们讨论各个群体而言，几乎没有可用的数据，但它们都是拥有可观军事力量的群体，在因匈人帝国兴衰而迁徙的过程中，它们促成了当地政治体系的重大调整，影响范围不仅限于多瑙河中游地区，还包括邻近和略远一些的巴尔干地区、黑海北岸，甚至意大

利。我们现有的详细叙事证据大体印证了分析匈人帝国群体认同运作方式得出的结论。史料中的那些群体标签代表着能有效运作的人口群体，其中一些包含了数万人。匈人在中欧统治的兴衰引发了众多混乱事件，破坏了这些人的生活，许多人因此出发上路，远离是非之地。

可以观察到几种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既有集中的大规模间歇性迁移，也有延续时间更长的人口流动，但许多迁移活动超出了“推进浪潮”或“精英转移”模型所设定的界限。关于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迁徙有详细的记录，虽然并不是所有迁移活动都有这样的记录，但很明显，无论是以距离、暴力程度还是失去政治独立来衡量，许多迁移活动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从移民的角度看，大部分行动也是更绝对的意义上的“大规模”行动。如我们所见，有良好（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鲁吉人）或合理（赫鲁利人、匈人、伦巴第人）的证据证明，许多移民群体包括了男人、女人和儿童。有些群体，例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人数可达数万；而很多时候，是群体内的大量成员作为关系紧密的团体一起迁移，比如376年和405/406年的迁移。[70]没有哪个参与迁徙的群体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而且有很多证据表明，迁徙过程会导致移民群体分裂，因为移民们需要做出极其困难的决定，这也是比较移民研究文献所揭示的。例如，一些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473年拒绝向南进入罗马巴尔干半岛，他们更愿意跟随狄奥德米尔的弟弟维迪米尔（Vidimer）。他们向西迁移，最终被吸收入西哥特王国。同样，并非所有巴尔干地区的哥特人都乐意在489年与狄奥多里克一起前往意大利。有些人更愿意忠于拜占庭。赫鲁利人的多次分裂很有说服力地表明做出迁移的决定到底有多难，分裂之后，一些赫鲁利人去了斯堪的纳维亚，而另一些则根据战争的结果和未来主人给出的条件，臣服于格皮德人或东罗马。[71]尽管证据存在各种问题，但从匈人帝国的兴衰中能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是：罗马帝国以外的移民现象与带来376—380年和405—408年危机的移民现象一样重要。

方法与手段

上述人口迁移活动中，有一些采取了迥异于现代世界移民的形式，其原因和第一千年背景下出现此类人口迁移现象的原因相似，无须再做详尽讨论。举例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先是在473年进入东罗马的巴尔干，然后又在488—489年进入意大利，两次迁移都有充分的经济动机，也是自愿的。他们第一次迁移是为了挤掉色雷斯哥特人，自己成为君士坦丁堡青睐的盟友，以占有色雷斯哥特人一度享有的利益。别的好处不说，光是色雷斯哥特人每年获得的补贴就有数千千克黄金，而远在潘诺尼亚的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拿到的补贴只有几百千克。同样，狄奥多里克率领队伍移居意大利，是为了以奥多亚塞以及仍在运作的罗马财政结构为代价，来让自己和追随者富起来。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建造的不少建筑和许

多其他纪念碑现在还能看到，充分说明了6世纪初意大利的统治者能够获得多少可支配收入。他还将一些税收收入重新利用起来，为他重要的哥特追随者们创造了有薪水的职位——肯定是为了确保得到他们的政治支持。然而，这两种获取经济利益的策略要想奏效，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改变现有的政治局面——首先要说服皇帝利奥选择新的哥特盟友，然后是击败奥多亚塞的军队。当然，对付奥多亚塞还涉及一个额外的政治维度，因为狄奥多里克和皇帝芝诺（Zeno）的关系已陷入僵局。两人谁都不信任对方，而一系列的对抗表明，两人都不能轻易地除掉对方。[72]这样的人口迁徙，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是很难分开的，而要想有机会成功，狄奥多里克必须有一支大军。正如我们之前所见，那个时代非罗马欧洲的经济所能支持的职业战士，其数量不足以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此，自由民及其家属对行动而言不可或缺。

伦巴第人扩张背后的动机很相似。据我们所知，他们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不是因为受到了威胁，而是被该地区的财富所吸引。长期以来，多瑙河中游都属于罗马帝国的近边缘区，财富和发展水平在1—4世纪中稳步增长，远超过易北河河口的任何地区。全盛时期的阿提拉帝国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匈人时期多瑙河中游墓葬中的黄金数量，在日耳曼世界中是前所未有的。而墓葬中的黄金肯定只是总量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黄金都藏在当时统治该地区的国王的国库中。哪怕没有明确的证据，我们也能想到伦巴第移民会想从这些战利品中分一杯羹，更何况阿提拉死后，君士坦丁堡仍在支付外交补贴，只是金额较小。但要想分得财富，自然需要投入大量兵力去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换句话说，去打败赫鲁利人。虽然伦巴第人向南的渗透在一开始可能只以战队形式进行，但最迟到他们离开鲁吉人王国的时候，伦巴第人和其他加入迁徙的移民就得将自己改造为更有凝聚力的团体，只有这样才有办法摧毁赫鲁利人的王国。[73]这样的迁移尽管很大程度上出于经济动机，也是自愿的，但总是具有政治考量。移民们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在即将开展的行动获得成功？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移民活动几乎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斯基里人、鲁吉人、赫鲁利人和匈人都有过受极为消极的政治因素刺激而不得不离开现有领土的时候：斯基里人、鲁吉人、赫鲁利人分别被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奥多亚塞和伦巴第人击败，匈人则是原有的优势地位不断受到侵蚀，直到难以为继。在每一例中，军事上的失利都摧毁了该群体维持独立的能力，不过这些战争失利者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灾难。鲁吉人和赫鲁利人整体（或其中大部分人）迁移到了不同的地区，而斯基里人似乎分解成了多个小群体，各自为自己的未来谈判。《圣塞韦里努斯生平》（*The Life of St Severinus*）中提到有一小群斯基里人（不是主要力量）前往意大利。人们注意到这个群体，只是因为奥多亚塞是其中一员。[74]后阿提拉时代匈人的迁移可能结合了政治和经济动机。如我们所见，5世纪60年代中期，匈

人中比较小的群体和阿提拉幸存儿子率领的两个较大的群体向东罗马寻求庇护。经济因素有助于他们选定迁移的方向，但不是他们一开始决定迁移的原因。

罗马士兵仍然可以获得的报酬和其他奖励可能是众多斯基里人和其他人最终迁往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主要原因。大群的鲁吉人、赫鲁利人以及匈人（有时不止一个群体）也在失败后要么被迫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要么与其他国家建立从属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史料中并未明确提及，但影响了他们对移民方向的选择。赫鲁利人受不了格皮德人的统治，于是投靠拜占庭，直到因继承权爆发的内战将他们进一步分裂，一些赫鲁利人重投格皮德人。显然，接受这些难民的主人（无论是东罗马人还是格皮德人）期望他们为自己作战，难民们似乎也很乐意这么做，可见作战并非赫鲁利人不满格皮德人统治的根本原因。难民也可能被期望提供某种经济贡献，但也许不像他们以前向匈人支付的那么多。或许，鲁吉人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那里得到了更好的条件。虽然他们在狄奥多里克征服意大利期间一度转投奥多亚塞，但很快就回到了狄奥多里克一边，似乎满足于成为东哥特王国的一部分，直到540年，可见比起赫鲁利人，鲁吉人对现状要满意一些。[75]

很可惜，我们不知道阿提拉的儿子丹吉兹克和赫尔纳克想从君士坦丁堡那里得到怎样的条件。他们前往东罗马领土之前，曾要求皇帝利奥允许他们进入罗马市场。匈人政治霸权的衰败应该在5世纪60年代中期就产生了经济后果，因为不同的臣属群体取得独立后停止了纳贡，而投靠君士坦丁堡这个选项最终对地位受侵蚀的匈人产生了吸引力。这一举动给阿提拉的其中一个儿子带来了灾难。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拜占庭可能认为丹吉兹克的队伍是个威胁，而赫尔纳克的不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赫尔纳克似乎满足于在罗马帝国中获得非常有限的领土，就在多布罗加（Dobruja）以北的边境，所以也许丹吉兹克要求的太多了。[76]但是，对所有这些群体来说，失败都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些人成了政治难民，不得不接受地位更高的伙伴提出的恼人条款。至少，失败剥夺了他们以前作为地方统治力量获得的所有收入，至少对投靠格皮德人的赫鲁利人而言，他们现在不得向“主人”上交额外的供奉。此外，他们还得提供军事服务。虽然不可能详细研究他们的动机，但这些移民的动机中显然交织着经济和政治因素，可想而知，自愿移民中经济因素占主导，而非自愿移民中政治因素占主导。但即使是自愿的移民，为了获得他们看中的财富，也必须将政治环境重塑得有利于自己，因此他们需要以庞大而有凝聚力的群体的形式迁徙。这些移民群体的规模和性质也许与现代移民不同，但两类移民的动机同样是复杂的。

匈人时代移民活动的其他方面让我们想起了现代的例子。这一时期，已有

迁移习惯的人口群体非常容易将移民当作一种策略。在最终迁移到意大利之前不久，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才从喀尔巴阡山脉的东面移到西面，又向南迁移至东罗马的巴尔干半岛，并继续保持高度的流动性。在那里，这个群体又迁移了超过1 500千米，因为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为取代色雷斯哥特人成为罗马帝国的盟友，在政治和地理上都采取了迂回曲折的路线。虽然我们手上相关的具体信息要少得多，但最终定居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伦巴第人似乎也是如此。我们对他们迁徙的具体时间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通过某种方法从易北河出发最终到达那里，几乎可以肯定中间有几次过渡性迁徙（也许可以称之为在迁徙过程中的暂停），使他们能以波希米亚为跳板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匈人帝国消亡后的主要输家——匈人自己，还有鲁吉人、斯基里人和赫鲁利人——也是一样。同样，即使不能还原每个群体迁移的细节，我们也知道这些群体都在4世纪末或5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进入了多瑙河中游地区，然后在两代人，至多三代人（赫鲁利人的情况）之后离开。将移民当作策略的观念在这些群体中根深蒂固，是一种存储在集体记忆中的反射，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调用。这类群体会用迁移来对种种刺激做出回应，而没有迁移传统的群体不大可能如此。

在决定迁移方向的时候，信息场域显然很重要。在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各次迁徙中，信息明显是关键的一环。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当了10年人质，人质生涯在他18岁时（472年前后）结束。他回归得正是时候，还带回了两个消息：色雷斯哥特人因为与朝廷有联系而获得了大量财富；他们正在造反，因为皇帝利奥暗杀了他们的庇护者阿斯帕。不到一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就向南迁移，试图取代色雷斯哥特人成为君士坦丁堡偏爱的哥特盟友，这绝非巧合。后来，狄奥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显然具备了充分的地理和政治知识，足以想到下一步可以去往意大利，而这些知识从何而来也许无须过多解释。他们在潘诺尼亚的老家就在通往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东部山口附近，而意大利北部的统治者奥多亚塞是阿马立家族宿敌的后代。早在479年，在他率领大部队迁移到那里之前10年，狄奥多里克就向君士坦丁堡的使者阿达曼提乌斯（当时他们在迪拉基乌姆要塞港外谈判）提出，自己可以带领一些部队去意大利参加联合远征，推翻奥多亚塞。[77]

其他受匈人力量崩溃刺激而产生的人口迁移，也大多有明显活跃的信息场域在起作用。例如，在邻近的波希米亚定居的伦巴第群体想必看到了奥多亚塞破坏鲁吉王国后造成的权力真空，意识到自己可以乘虚而入。同样，451年袭击意大利的阿提拉军队中有斯基里人，他们像狄奥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一样定居在进军路线附近。当然，先接受格皮德人统治，又接受拜占庭统治的赫鲁利人留在了这个他们已定居至少50年的地区，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也了解自己决定采取的行动意味着什么。还有两个更有意

思的案例：鲁吉人和其他离散的赫鲁利人。王国于487年被奥多亚塞摧毁后，鲁吉人不知用什么方法知道了狄奥多里克的所在。不过，狄奥多里克在东罗马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终在484年被任命为执政官，所以他那些不太远的邻居知道他在巴尔干地区的确切行踪也许并不奇怪。那些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赫鲁利人的情况更值得注意。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并不清楚他们失败后向北方出发时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你也许以为他们不知道，然而，那些留在多瑙河的赫鲁利人在20年后需要找一个有王室血统的人继位时，却还能找到这批出走的人——尽管此时两群人已经相隔了大约1 800千米。向北迁移的赫鲁利人在出发之前，可能已经和一些人有过接触或得到了相关知识，意识到可以将斯堪的纳维亚作为目的地，而这些信息，留在多瑙河附近的人也是知道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个群体可能在分开后尚有一些联系。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国王拉尼的罗道夫（Rodulf of the Rani），他后来在意大利狄奥多里克的宫廷中避难。像这样的小插曲告诉我们，切不可低估旧罗马边境之外的知识流通。[78]

然而，只有在大规模人口转移可行的情况下，知识才会转化为实际行动。古代资料能提供的相关信息通常很少，但我们知道一些移民活动是由运输物流决定的。像4世纪90年代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一样，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带着庞大的车队迁徙。东罗马在479年扣押的2 000辆哥特运货车可能只是车队的一部分。此次袭击发生在狄奥多里克吸纳色雷斯哥特人之前，因此联合后出发前往意大利的哥特人（加上鲁吉人）的车队将更加壮观。2 000辆运货车排成一列纵队的话，总长将超过15千米。身后拖了这么个大尾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多山的巴尔干地区行进时，自然只能借助罗马的公路网。我们正好也知道，他们在473年的首次行进利用了从奈苏斯（Naissus）到塞萨洛尼基的军事大道的两条可用岔路；他们后来在478—479年从君士坦丁堡郊外向西撤退时走的是厄纳齐雅大道（Via Egnatia）。可以推测，他们在此期间和随后的所有迁移都是沿罗马交通干线进行的。此外，用车队来运送财产和非战斗人员的不太可能只有哥特人。事实上有足够的参考资料表明，前述移民群体都采用了这样的运输方式。[79]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也体现在现代的例子上），移民活动刻上了既有政治结构的烙印。一开始，是崛起的匈人力量将那些军事力量强大的群体聚集在多瑙河中游地区，这些群体要么是被匈人带到那里，要么是试图逃避匈人却没能成功。如果没有匈人势力的约束，这些军事群体也不会在彼此这么接近的状态下共存——阿提拉一死，激烈竞争就爆发了。东罗马作为有凝聚力的国家继续存在，这也塑造了移民活动。例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因此决定向南进入东罗马巴尔干地区。此地物产并不富饶——例如，与哥特人离开的原潘诺尼亚行省相比，其农业生产力没有那么高。但

是，地势崎岖的巴尔干半岛仍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与君士坦丁堡离得够近，哥特人可以向君士坦丁堡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将从更富裕的埃及和近东领土获得的税收分一部分出来给哥特人。政治结构也决定了这些哥特人最终选择的目的地。要不是西罗马消亡，他们就不可能在意大利半岛上建立独立的王国，东罗马皇帝芝诺也不会鼓励狄奥多里克这么做。伦巴第人也是一样：如果匈人帝国继续存在，他们就不可能进入多瑙河中游。

前文谈过，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时髦的看法，认为匈人帝国的兴衰表明这一时期的群体认同具有高度可塑性，而且这一过程很少涉及人口迁移。在这个领域，证据基础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扎实，但是有足够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两个观点都需要修改。首先，历史证据清楚表明，加入匈人帝国不等于成为匈人。匈人帝国是一个本质上不平等的非自愿联盟。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加入其中的非匈人都是被迫的，他们受到系统化的剥削，最终努力摆脱了匈人统治。考虑到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加入匈人帝国不会瓦解这些较大的群体认同了。对匈人而言，维持这些认同对他们有利，因为成为匈人就等于获得了特权地位；而从臣属群体的角度看，坚持保有较大的群体认同有助于他们在机会成熟时摆脱匈人的统治。

就史料中提到的许多群体而言，相关的信息不够充分，而关于另一些群体（特别是伦巴第人）的信息更是严重不足；但前述关于认同的观点可以从信息比较充分的记录中得到印证，例如帝国创造和毁灭过程中的移民活动。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一直被描述为大规模的混合人口群体，其中包括1万多名战士和他们的家眷，还有几千辆运货车组成的车队随行。这样的描述源自当时的各种史料，不同史料的记载一致而且详尽。这也是他们的国王在意大利的宫廷里描绘的形象。任何证据都可以反驳，但反驳的出发点必须合理。而在本例中，反对意见主要基于对研究群体认同运作方式的现代学术文献的片面解读。宽泛地说，匈人帝国带来的人口效应是将大量军事化群体吸收到中欧的核心地带，这些群体有的在匈人积累权力的时候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在匈人力量崩溃后前来。匈人势力的约束力消失后，如此集中的军事能力一定会引发激烈的竞争，使较小的实体失去独立性，但总体上的影响是促使许多当初迅速进入该地区的群体迅速离开。

乍一看，在这些迁移活动中，发展程度不同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在3世纪日耳曼人的扩张中那么明显。本章研究的大多数迁移活动初看之下都是政治因素驱动的，与匈人帝国的建立或崩溃有关。但第一印象可能会出错。正是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匈人才会在多瑙河中游地区搭建自己的战争机器。这个基地位置便利，匈人可以从那里发起突袭，勒索保护费，拿到一部分罗马帝国通过税收体系征集的地中海财富。而普里斯库斯为我们详细记录的阿提拉的要求，实际上都和金钱有关系。如果没有来自罗马的财富，匈人的战争机器就无法运行。阿提拉去世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决定了

想退出竞争的各个群体的行动方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人向南移动，他们仍受地中海地区财富的吸引，但政治结构也在起作用。如果一个群体想要向南和向东迁移，进入拜占庭帝国并长期留下，就得像阿提拉的最后一个儿子和一些从前附属于阿提拉的较小群体那样，接受被打散后失去政治独立的命运，毕竟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实力基本没有受损。狄奥多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数量很多，在短期内足以在那里生存，但还不足以迫使君士坦丁堡与他们达成持久协议，这个看似异常的情况其实印证了我们的观点。

至于那些更有雄心的人，南方和西方才是该去的方向。在之前的年代，西罗马边境防御工事和驻守边境的军队曾是向西移民的障碍，但现在障碍已被移除。3世纪的时候，日耳曼群体向东进发并成为黑海以北地区的统治力量（第四章），这种模式没有再现。匈人帝国时期，不时有大批战士带着家眷挤在欧洲中部和南部的道路上。差不多同一时间，不同类型的移民影响着罗马帝国的西北边缘。在我们对传统上说的民族大迁徙的考察中，接下来要关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

---

[1] Jordanes, *Getica* 50.261—2.

[2] 乌尔丁率领的匈人和斯基里人：见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9.5; *Codex Theodosianus* 5.6.3。427年时匈人的哥特子民：见Theophanes AM 5931；参见Procopius, *Wars* 3.2.39—40，以及Croke (1977)。时间可能是421年或427年。对阿提拉子民情况的最好概述是Pohl (1980)。

[3] 见Maenchen-Helfen (1973), chapters 8—9。他也指出，像阿提拉这样的领袖很可能有一个匈人语言的“本名”，加上一个日耳曼绰号；在日耳曼语中，“阿提拉”的意思是“小父亲”。

[4] Ammianus 31.2.1—2; Zosimus 4.20.3—5 (cf. Eunapius fr. 42); Jordanes, *Getica* 24.121-2.

[5] Ammianus 31.2.3ff

[6] 关于阿兰人的题外话，见Ammianus 31.2；关于萨拉森人的题外话，见Ammianus 14.4。在探讨这一材料时，Maenchen-Helfen (1945) 的观点比Thompson (1995) 更有批判性，虽然是Maenchen-Helfen注意到肉被放在了马鞍之下。进一步的评论以及近期的参考书目，见G. Kelly (2008), chapter 2。

[7] 关于游牧的一些基本情况，特别是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群体，见Cribb (1991);Khazanov (1984); Krader (1963); Sinor (1977), (1990)。

[8] Bury (1928).

[9] 阿瓦尔人：见Pohl (1988)。马扎尔人：见Bakony (1999)。

[10] 一般性描述，见Thompson (1995)；Maenchen-Helfen (1973)；参见Heather (1995a)对匈人与埃提乌斯关系的论述。

[11] 在普里斯库斯（Priscus）作品的残篇非常明确地写道，阿提拉对额外领土带来的收益基本不感兴趣。

[12] 376年以前的匈人：见Ammianus 31.3。377年时的匈人和阿兰人：见Ammianus 31.8.4ff。匈人和卡皮-达契亚人：见Zosimus 4.35.6。

[13] “临时的领袖”：见Ammianus 31.2.7。约达尼斯确实提到这个时期一位名叫巴朗伯（Balamber）的匈人国王，但相关事件实际发生在450年前后，巴朗伯其实是哥特国王瓦拉米尔（Valamer）：见Heather (1989)。

[14] 乌尔丁：见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9.5，进一步的评论和完整的参考资料见Heather (1995a)。维京时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第一阶段小规模扩张的领袖，很快被带着大批移民前来的重要领袖推翻：见本书第九章。

[15] Olympiodorus fr. 19；参见Priscus fr. 11.2, p. 259（有关阿卡齐里）。

[16] 关于匈人的弓箭，见Heather (2005), 154—8，附有进一步参考资料。

[17] 基于匈牙利大平原放牧空间的一些计算，参见Lindner (1981)。395年的大袭击，见Maenchen-Helfen (1973), 51—9。

[18] 关于游牧民族分权的一般讨论，见前注7引用的文献。

[19] 见Heather (2005), 325ff，有完整的参考书目。

[20] Procopius, *Wars* 8.5似乎间接保存了与所记录事件同时代的欧纳皮乌斯最初讲述的故事，而后者的故事则基于Herodotus 5.9 [关于昔恭纳伊人（Sigynnae）]。

[21] 3世纪的赫鲁利人，见本书第三章。斯基里人：见Zosimus 4.35.6。鲁吉人：见Tacitus, *Germania* 43。关于他们可能出现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哪些地方，见Pohl (1980)。

[22] 我们之后会详细讨论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群体。比格里斯：见Jordanes,*Romana* 336。有关在丹吉兹克领导下的第三个群体，见Priscus fr. 49。

[23] 丹吉兹克：见*PLRE* 2, 354—5。赫尔纳克：见Jordanes, *Getica* 50.266，以及*PLRE* 2, 400—1。霍米达克：见*PLRE* 2, 571。比格里斯：见前注。

[24] Jordanes, *Getica* 50.264。Pohl（1980）出于折中，认为此时由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只可能从特兰西瓦尼亚出发迁移。关于约达尼斯存世的《哥特史》与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所写的哥特历史之间有什么关系，学者们有很多讨论。我们知道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史是在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宫廷中写就的。在我看来，文本证据确实表明约达尼斯在写作时使用了卡西奥多罗斯的文本（正如他声明的那样），并且我发现，反对这一点的种种阴谋论实在不能令人信服：见Heather (1991), chapter 2; Heather (1993)。对于年代这么晚的哥特人向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迁移，相关的考古证据并不明确。Kazanski (1991) 提出切尔尼亚霍夫文化迟至约450年才消亡，但这与人们通常所持的观点相悖，而且该论点可以说是循环论证，因为它以约达尼斯的记载为基础，约达尼斯称此时喀尔巴阡山脉以东仍然有哥特人。

[25] 奥多亚塞：见*PLRE* 2, 791—3。有关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冒险，见Heather (1991), part 3。

[26] 完整的参考资料，见*PLRE* 2, 457 and 484—5。

[27] 严格来说，伦巴第人应该被称为朗格巴第人（Langobards）。文中所说的叙述资料是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1.19。现代的评论，见Christie(1995); Jarnut (2003); Pohl and Erhart (2005)等。

[28] Procopius, *Wars* 6.14—15。参见Pohl (1980)：考古证据表明，格皮德人此时正慢慢地向南扩张进入特兰西瓦尼亚。

[29] 早期的一个例外是427年从匈人统治中获救的哥特人：见前注2。我们很快会看到，色雷斯哥特人可能也是如此。格皮德人在该地区扩张势力：见前注28。

[30] "他是讲希腊语的罗马商人……"：见Priscus fr. 11.2.422—35。艾德科：见*PLRE* 2, 385—6。

[31] 可以通过佩戴扣针的方式来推测出人们的衣着，而在大部分墓葬中，服饰里能保留下来的也就是扣针了。无法通过考古发现的原因可能很戏剧化（尸体被暴露在外经受风吹日晒或被野兽啃食），可能平淡无奇（火葬然后撒掉骨灰），也有可能是形成了不用可定年的物品随葬的风俗（人口改信基督教后欧洲北部的中世纪墓葬往往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定年）。将匈人统治的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各个考古地层区分开来的，是大致相同的墓葬品在装饰上的一些细微改变。按年代先后（不同地层的年代有重叠），这些地层分别是维拉方塔纳（Villafontana）层、上锡本布洛涅（Untersiebenbrunn）层和多摩罗斯普斯塔/巴克索达斯（Domolospuszta / Bacsordas）层。相关资料的介绍，见

Bierbrauer(1980), (1989); Kazanski (1991); Tejral (1999)。Wolfram (1985)中有精美的插图。

[32] 中欧的许多日耳曼群体在1世纪到3世纪都采取火葬，但在匈人到来前夕，土葬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33] 然而，历史资料偶尔能提供足够的信息，配合考古证据的话，是可以识别出一些群体的。

[34] 最近的研究见Halsall (2007), 474—5；有关阿瓦尔帝国的类似观点，见Pohl(1988)，以及Pohl (2003)。

[35] Priscus fr. 14.

[36] Priscus fr. 11.2, p. 259。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见本书第四章；乌尔丁战败后，斯基里人的地位变得更低，受到了更严苛的对待：见前注2。

[37] 参考资料见前注。

[38] Priscus fr. 2, p. 225.

[39] Priscus fr. 2, p. 227.

[40] Priscus fr. 2, p. 227.

[41] Priscus fr. 49.

[42] 罗马人向阿提拉派了不少文书。一个名叫卢斯迪修斯（Rusticius）的俘虏写了封奇怪的信（Priscus fr.14, p. 289）。这一政府机器可以记下哪些王公叛变而逃到了罗马，也可以记录臣属群体所需的供应，但也仅限于此了。阿卡齐里：见Priscus fr. 11.2, p. 259。哥特人：见Priscus fr. 49。

[43] 见Jordanes, *Getica* 48.246—51，以及Heather (1989), (1996), 113—17, 125—6。

[44] 格皮德人：见Jordanes, *Getica* 50.260—1.

[45] 法兰克人：见Priscus：fr. 20.3。阿卡齐里人：见前注42。在居于两者之间的臣属群体中，受统治程度最深的应该是Priscus fr. 49提到的哥特人，上文已有引述；受统治程度最浅的是格皮德人，他们带头发动了反对阿提拉儿子的起义（见前注44）。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瓦拉米尔领导的潘诺尼亚哥特人：见前注43。

[46]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II.5.

[47] 参见如Agadshanow (1994)。

[48] 进一步的讨论见Heather (2005), 324ff，附有参考资料。

[49]　我们看到，现代人类学证据表明，一般只能发现极少数物品有表示群体身份的作用，但这不代表群体身份不是真实存在的：见本书第39—40页，特别参考了Hodder (1982)。

[50]　阿提拉可以获得数千千克黄金的年度补贴，而一般而言，即使是一个算得上成功的匈人后继群体（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也只能获得300千克的黄金：见Priscus fr. 37。

[51] Jordanes, *Getica* 50.265—6。约达尼斯本人来自这个巴尔干军事区，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的分类是正确的。这些定居行为具体发生在5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的哪些时间，我们并不清楚：不过赫尔纳克定居的时间可以明确，是在5世纪60年代末。这些也可能都是465年之后匈人力量解体过程的一部分，在此期间，比格里斯和霍米达克进入罗马领土。赫尔纳克愿意分解自己的权力基础，可能也因此得到了比丹吉兹克好的待遇（见前注23）。

[52] Jordanes, *Getica* 53.272; cf. Agathias 2.13.1ff

[53]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2.26ff；参见Jarnut (2003)。不管是保罗的叙述还是其他早期伦巴第文本，都提到胜利的一方会将更多战士纳入群体，但不一定都给他们平等待遇：参见*Origo Gentis Langobardorum* 2（作为aldii，“半自由人”）；*History of Lombards* 1.20,1.27,5.29。

[54] 哥特人：见Heather (1996), Appendix 1。伦巴第人：见前书，参见前注53。另见本书第二章。

[55] 伦巴第人：见Jarnut (2003)，他认为伦巴第人的国王可能只是领导远征的暂时领袖。哥特人：见Heather (1989), (1996), chapters 8—9。

[56] 在487年加入狄奥多里克的鲁吉人：见John of Antioch fr. 214.7；他们在541年仍可辨认：见Procopius, *Wars* 7.2.1ff（哥特人占领意大利期间，他们两次改变了立场）。赫鲁利人：见Procopius, *Wars* 6.14—15。

[57] 对关于赫鲁利人的描述提出怀疑的是Goffart (1988), 84f；对关于鲁吉人的叙述提出怀疑的是Halsall (1999)。现代学界群体身份研究的总体情况，参见本书第一章。

[58] 冈迪拉斯莎草纸文本是Amory (1997) 观点的核心（Amory的译文见该书附录1）。但请参见Heather (1996), chapter 9, and Appendix 1, (2003)。

[59] Malchus fr. 20, p. 446.215ff（6 000人），p. 440.83ff（非战斗人员和辎重）。参见Jordanes, *Getica* 55.281—2（狄奥多里克之前的远征也用了6 000

人，那是他作为人质被扣押在君士坦丁堡而最终返乡后，为了表现自己的气概而发动的远征）。更多评论，见Heather (1991), chapter 7。

[60] 见Amory (1997)；除了Procopius，*Wars* 5.1.6ff之外，也参见Ennodius, *Panegyric on Theoderic* 26—7以及*Life of Epiphanius* 118—19（参考111—12）。

[61] 东罗马通过突袭扣押了2 000辆运货车（Malchus fr. 20），但没有迹象表明车队里只有这么多车。哥特人拿到了“无主”之地，可见他们自己会耕种，狄奥多里克与君士坦丁堡代表之间的种种谈判也体现了这一点：Malchus fr. 18.3, p.430.5ff；fr. 20, p. 438.55ff., p. 446.199f；参见Heather (1991), 244ff。

[62] 更完整的讨论和完整的参考资料，见Heather (1991), 259—63；比格里斯，见前注22。

[63] 有关1.3万人的薪水和给养，以及每年910千克黄金，见Malchus fr. 18.4, p.434.12ff. and fr. 2, p. 408.22。全面的讨论和参考资料，见Heather (1991), 253—6。

[64] 斯特拉波之死和雷西塔克被杀，见John of Antioch fr. 211.4 and fr. 214.3。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的部队，见Hannestad (1960)。完整的讨论，见Heather (1991),300—3。

[65] 参考资料请见前注22及23。

[66] 549年赫鲁利人的数量：见Procopius, *Wars* 7.34.42—3。普遍认为，赫鲁利人比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少，因为后者被描绘为在后阿提拉时代多瑙河中游平原的竞争中取得了大胜。但是，我们仅有的相关资料是约达尼斯的作品，很可能的情况是，狄奥多里克吸纳色雷斯哥特人之后，他的队伍才成了超级势力。

[67] 迁徙主题在助祭保罗的《伦巴第人史》（*History of the Lombards*）中随处可见：伊伯（Ibor）和阿吉奥（Agio）兄弟俩领导了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的第一次迁移，阿吉蒙德（Agilmund）领导了第二次迁移，进入波希米亚，戈多（Godo）带他们进入鲁吉王国，塔坨（Tato）与赫鲁利人作战，瓦科（Wacho）领导了对潘诺尼亚部分地区的兼并。现代学者的评论，参见前注27中引用的作品。

[68] 特别参见Jarnut (2003)，其中有参考资料。关于早期伦巴第人的国王从本质上说只是远征的领袖的观点（见前注55），参见Christie (1995), 14—20。

[69] 见Curta (2001), 190—204，以及该书中的图18。

[70] 东哥特人、赫鲁利人、匈人、鲁吉人和伦巴第人群体都有过这种大规模

迁徙的情况。伦巴第人的迁徙很可能一开始是小规模移民潮，然后出于正面对抗赫鲁利人的需要，重组成大规模移民的形式。这方面类似于3世纪的哥特人：见本书第三章。

[71] 维迪米尔：见Jordanes, *Getica* 56.283—4。Procopius, *Wars* 1.8.3明确地提到色雷斯哥特人中有两人——贝萨斯（Bessas）和戈迪吉斯克鲁斯（Godigisclus）——没有追随狄奥多里克；另外一些反对者，见Heather (1991), 302。

[72] 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5世纪60年代每年收到136千克的黄金（Priscus fr.37），而色雷斯联盟能得到910千克（见前注63）。关于狄奥多里克以及意大利的财富，见Heather (1995b)。

[73] 匈人产生的财富，见前注31。然而，考虑到伦巴第群体的政治结构看起来并不集中，因此伦巴第人向多瑙河以南进一步扩张进入原罗马潘诺尼亚行省时，采取的形式可能还是移民潮，而不是统一的定向迁移。

[74] *Life of Severinus* 6.6.

[75] 参考资料见前注56。不过，考虑到狄奥多里克之后的成功，鲁吉人在此事上可能没有真正的选择权。

[76] 关于市场，见Priscus fr. 46。其他参考资料，见前注23。

[77] 关于狄奥多里克的人质生涯及其终结，见Heather (1991), 264—5。他在479年提到意大利，见Malchus fr. 20。

[78] 拉尼的罗道夫：见Jordanes, *Getica* 3.24。

[79] 473年迁徙的路线：见Jordanes, *Getica* 56.285—6。

第六章

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精英转移还是民族大迁徙？

410年左右，不列颠诸行省退出了罗马体系。接下来的近200年，它们基本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正确地称这段时间为不列颠历史上“失落的世纪”。[1]它们在600年前后回到了舞台上，此时不列颠低地（基本上是现代英格兰所覆盖的区域，是从前罗马行省的中心地带）的大部分富饶农田似乎已落入外来入侵者之手。讲日耳曼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取代了讲凯尔特语和拉丁语的当地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200年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漫游在北海的另一边。而在同一段时间里，罗马的高卢行省遭遇了类似的命运，落入讲日耳曼语的法兰克人之手，受这些入侵者的政治统治，而法兰克人先前只出没在莱茵河以东。高卢的文化变迁远不如英吉利海峡以北那么彻底。6世纪时，卢瓦尔河以南地区许多罗马精英的后裔仍享受着他们的祖先在帝国统治下积累的土地，那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基本保留了罗马式的风格。然而即使在高卢，巴黎盆地以北也出现了大不相同的情况。在那里，日耳曼语言向西扩散，排挤了拉丁语和凯尔特语，从历史和考古证据看，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罗马士绅和贵族在公元600年后仍存在于该地区。

盎格鲁-撒克逊人夺下不列颠低地，法兰克人占领高卢北部，关于这两件事，有一系列问题可以问。在罗马世界西北角发生的政治和文化变化中，人口迁移起的作用有多大，采取了什么形式？过去人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的扩张是罗马帝国末期“民族大迁徙”这个泛日耳曼现象在西部的表现。近来，人们则认为它们体现了更有限的人口迁移模型——精英转移。第一章提过，精英转移的经典原型是11世纪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事情经过在《土地调查清册》中得到了全面记载，该书记下了诺曼人到达［确切地说是在1066年1月5日，用书中动人的语言说就是“爱德华国王（忏悔者）生活过的日子，也是他去世的日子”］之前以及20年后，谁在英格兰拥有哪片土地。证据很明确：到来的诺曼人数量虽然不多，但已经具有政治影响力，他们在这些年里成了英格兰新的地主阶级。这种有限形式的人口迁移能否令人满意地解释5世纪和6世纪不列颠低地和高卢北部的变迁？从比较的视野看，答案是否定的，而将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案例放在一起研究（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分开研究），就能看到其中的原因。

精英与大众

移民在将罗马的不列颠转变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应该没什么疑问，但具体发挥了多大作用，人们的看法相当不同。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至少在英格兰，大量移民可以说完全取代了当地源于凯尔特人的罗马不列颠人，就算有幸存者，他们也被向西赶到了威尔士、德文和康沃尔，或是海那一边的布列塔尼。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甚至后来的学童在成长过程中都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始于肯特的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此后高奏凯歌一路向前推进。这种对过去的观点主要基于幸存的叙事资料，特别是基尔达斯（Gildas）的《不列颠的毁灭》（*Ruin of Britain*）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这些史料总是被认为过于肤浅，但从中可以看出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和凯尔特当地人之间持续的敌意，以及入侵者最终的成功。到了1900年，上述观点得到了更多证据的支持：语言和地名。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现代英格兰的绝大多数地名派生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说的日耳曼语，而不是罗马不列颠人说的凯尔特语，后者在现代英语中也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凯尔特语的词根只能在一些主要河流的名称中找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铁路大建设为该论点提供了第三方面支持。随着铁路支线的扩展，19世纪后期出土的一系列墓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从欧洲大陆来的入侵者带来了后罗马时期的物质文化，而与幸存罗马不列颠人口有关的证据非常少。根据传统观点，盎格鲁-撒克逊人实施了非常有效的“种族清洗”——虽然当时这个词还没造出来。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广泛的共识已经裂解为有时显得刻薄的分歧。现在没有人相信当时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也没有人相信绝对没有移民。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见解有很多，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许多历史学家和一些考古学家认为，5—6世纪不列颠低地的盎格鲁-撒克逊化显然是通过带有敌意的占领实现的，占领者包括来自德意志北部和低地国家的大量移民。而另一组人的意见是，实施这一过程的是数量少得多的欧洲大陆移民，其文化规范在当地既有人口中广泛传播，当地人也基本自愿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也就是说，先是精英转移，后是文化模仿。认可该观点的有一些历史学家，但更多的是考古学家，对从前文化历史中固有的大规模迁徙模式的拒绝显然影响他们很深。[2]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分歧？

争论的根源

正如本书探讨的许多主题领域一样，在这方面，摒弃民族主义史观可以产生深远的解放效应。现在没有人会认为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一直敌对，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事实上，公元

600年后的史料显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不同王国之间的斗争并不比它们和罗马不列颠人的斗争少，有时盎格鲁-撒克逊人甚至会与后者结盟来对抗自己的同胞。在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西部和北部，区域间差异很大。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是，学者通过周密分析立石铭文使用的语言，揭示出在5—6世纪，不列颠西部有相当数量幸存下来的罗马精英，他们说的是罗曼语，而他们北边的不列颠伙伴讲的是凯尔特语。[3]

世界观的改变让我们能以新的方式审视现有证据，而知识方面的新进展也推动了对证据的重新解释。过去50年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我们对罗马不列颠的具体发展程度掌握得更好了。通过研究地表收集的陶器碎片并有策略地选择挖掘地点，人们发现罗马不列颠晚期的人口数量实际上非常大。我们无法得到确定的数字（最近的估计在300万到700万之间，误差幅度很大），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4世纪对英格兰乡村的开发程度比那之后到14世纪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深。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罗马不列颠是一潭死水，但并非如此，它是罗马帝国中繁荣发展的区域。因此，虽然当年洛因（H. R. Loyn）写道，“深入了解就会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过程更像是人类对抗森林的传奇，而不是撒克逊人对抗凯尔特人的故事”，但现在，入侵者能将几乎所有罗马不列颠人都驱赶向西的看法已经很难站住脚了。[4]

现代英格兰的地名绝大多数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该事实也得到了重新诠释。人们发现，其中大部分地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该地几百年后形成的，当时农村定居点的结构才最终固定下来。关键的情况是地产（庄园）和村庄相继出现，而这一发展在公元800以后才起步，一直进行到11世纪。那时，盎格鲁-撒克逊语成为有地阶级中的主流语言已有很长时间，新的地产得到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名称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由于这个命名过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初定居下来后的两三百年才发生，地名就很难证明原来住在那里的凯尔特人和罗马人曾被大批日耳曼定居者全部驱赶出去了。从定居到命名，中间隔了超过两个世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足够让日耳曼语通过文化同化过程在原住人口中传播了。[5]

对当时情况的上述三种新见解，几乎每个人都会接受。盎格鲁-撒克逊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也足够明确。不列颠低地（基本上就是现在的英格兰）在约350年时是罗马世界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但是在600年时由讲日耳曼语的精英统治，这些精英认为自己的祖先在350—6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从欧洲大陆而来。然而，移民在所有这些事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当地原住人口是如何离开的，这些都是争论很激烈的问题。

分歧这么大，可见现有证据严重不足。第一个关键问题是，400年前后，罗马不列颠的状态究竟如何？很少有人怀疑它在50年前就已经蓬勃发展了。诚然，那里的城镇居民并不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热衷于对公共纪念

建筑进行私人投资，但这是帝国晚期罗马世界的普遍现象，应该从当地精英生活模式转变的角度来理解，而不应该像从前不少学者那样认为这仅仅是经济现象。

有必要停一下谈一谈这个论点。4世纪时，罗马地主精英的生活模式从以家乡为中心明确转变成为帝国服务。他们之前自己出钱在城镇建造公共纪念建筑，完全是为了在当地赢得权力。但到了4世纪，这种做法就失去了吸引力。为了解决一系列被统称为“3世纪危机”的问题（其中最棘手的是波斯崛起为超级大国），罗马帝国没收了所有当地的资金，而从前正是因为有这些资金，当地罗马精英才会把在家乡赢得权力当作值得追求的目标。到了4世纪，在家乡行使权力要担负很大的责任，可支配的钱却少了很多。现在只有在帝国而不是在家乡服务的人才能体验到花纳税人钱的乐趣。不出意料，帝国各地的罗马精英都合理地改变了他们的消费优先级。精英们不再用投资来争取在家乡的权力，而是越来越多地投资于自己的孩子，帮助他们适应帝国的官僚机构并在其中进一步攀升。城镇的形象因此受到影响，但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现象，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经济危机迹象。[6]

罗马不列颠乡村的证据符合这一整体模式。4世纪，不列颠的别墅发展空前，处处展现出资财丰厚。别墅经过翻修，尤其突出的是带图案的彩色马赛克取代了黑白几何图形的马赛克，此外还出现了私人的基督教礼拜堂。在过去，这可以用彩色电视机的出现来类比，但离彩电问世已经过去了很久，我的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电视曾经只有黑白两色。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乡村繁荣在多大程度上持续到了公元400年。例如，发掘出来135个内有罗马钱币的不列颠别墅，其中65个里边只有约公元360年以前的钱币。这是意味着不列颠的别墅经济——在衡量罗马行省的总体状况方面，这个指标比城镇更可靠——在那时开始衰落，还是说，只不过是钱币流通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钱币从来都不是罗马经济交换的核心特征）？

一些人主张，当时出现了很大的混乱，近来的一个史学趋势就是强调“系统崩溃”（考古学行话）。这种观点认为，到400年时，罗马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系统在不列颠都失效了，因此罗马不列颠的消亡是出于内部原因，随后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只是来到了一个多少可称为权力真空的地方。罗马正规军看起来在4世纪90年代撤出了哈德良长城一线，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论点。堡垒仍有人驻守，但与罗马正规军有关的那几类金属制品从那以后仅见于不列颠低地，有人因此认为，是一些独立的当地首领接管了这些边境堡垒。然而，源自堡垒的证据含糊不清，而罗马不列颠在400年前后的总体状况确实取决于别墅经济崩溃何时开始。无法确定准确的年代成了一个问题。如果别墅经济在4世纪后期解体，那么所谓罗马不列颠

的终结就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毫无关系。但如果别墅经济解体于410年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更有可能要为此负责。[7]

如果我们想知道在这个有争议的开端之后，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就会发现相关证据的质量更加糟糕。历史资料特别匮乏。由多少算是同时代的不列颠当地人写成的书只有一本——修士基尔达斯写的《不列颠的毁灭》。他写作的确切年代还有争议，但肯定是在5世纪晚期到6世纪中叶之间。然而，这本书的一大问题是，基尔达斯想写的不是历史，而是要献给自己时代的不列颠国王的道德手册，他不时利用过去的事件来说明他对当下的看法。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理出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的叙事大纲，但往好里说，相关信息也只是零星、不完整的——实际上，对于应该如何理解那本书，已经有人提出了非常不同的建议。[8]欧洲大陆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些差不多同时期发生在不列颠的事情，可以作为对基尔达斯作品的补充，另有一些年代很晚、非常零散的资料汇编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里。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一些记述可能反映了实际事件。书中大部分条目与国王和他们的征服有关，其中一些可能是根据大致准确的回忆写下的。所记录的一些事件从地形上看也非常合理，特别是577年的德哈姆（Deorham）战役。据说这场战役使得格洛斯特（Gloucester）、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和巴思（Bath）落入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手。去现场（就是巴思郊外德哈姆公园的那片土地）看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它地势极高，俯瞰周围的土地。但总的来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录既有限又有问题。它实际上只谈及韦塞克斯（Wessex）、肯特（Kent）和苏塞克斯（Sussex）三个王国，这些王国后来被纳入9世纪时阿尔弗雷德大王（King Alfred the Great）的疆域，而在其庇护下，该文本才能以其现存的形式流传下来。从埃塞克斯（Essex）到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后来构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的大片地区，要么在编年史中只有很少的记载［麦西亚（Mercia）和诺森布里亚］，要么根本没有记载（埃塞克斯），而且这部编年史竟然几乎没有细节。很多地方只有年份没有事件，在写到事件的地方，也只有寥寥几笔。我教课的时候，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关于5—6世纪的所有记录翻译成现代英语后打印出来，用一张A4纸的正反面就够了，而且字也不需要挤在一起。这本书列出了一系列相互间没什么关联的事件，连一段完整的叙事都没有。此外，文本的形式和年代问题都表明，有时，那些历史（很可能是口头历史）上伟大英雄的事迹发生在何时只能靠猜测。5—6世纪欧洲大陆一些同样参考了口述传统的资料中也有此类猜测，而且猜测并非全无道理。例如，可以通过王室都有的家谱和国王名单推断出大致的年表，再根据这个年表来为保存下来的记忆中与某个人有关的事件排序（比如国王赢得的战争）。[9]然而，这些只是猜测，不是确定的知识，而且《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信息实在匮乏，因此它用处有限。[10]公元600年前后，

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了不列颠，对于在那之后的盎格鲁-撒克逊历史，我们知道得要多一些。比德（Bede）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详细的历史记载实际上是从约公元600年开始的，关于那之后发生的事，比德保留了大量的独立信息；而对于那之前的事，他还是基本依赖基尔达斯的叙述，我们今天依然只能如此。

考古材料似乎更有分量。大量关于罗马不列颠的信息得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大约3万个墓葬。不过，这些墓地里葬着5世纪中叶到7世纪后期的10到15代人，而对于这段时期里不列颠低地的人口，保守的估计也从没低于过100万。因此，即使是这么多的墓葬，也只是原始人口的一小部分样本。还有两个问题增加了解释的难度。首先，定年根本说不上精确。约公元400年之后，不再有罗马钱币进口到不列颠。能用到科学定年（碳14或年轮学）的情况很少，因为很多墓葬发掘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方法。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年代需要根据随葬品的风格样式来确定。正如我们在其他情况下所看到的，这样的方法可以将墓葬年代确定到一个25年左右的范围内，这总比没法定年好得多。但如果想将一系列考古资料与已知的历史记载联系起来，那么25年的范围可能就不够精确，无法确定某一批墓葬是出现在某组事件之前还是之后。[11]

第二个问题更为根本。这些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墓葬有两种基本形式。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小型土葬墓，其中一些有丰富的随葬品。再往东，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部分地区和东北沿海地区，发掘出了数量相对少的大型火葬墓（地图11）。火葬墓的归因没有什么疑问。火葬习惯对于晚期罗马不列颠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而无论是墓葬形式还是在火化后保留下来的可识别物体，在4世纪和5世纪初的日德兰半岛东南部都有明确的先例。因此，来自日德兰地区的讲日耳曼语的移民形成了英格兰东部的火葬墓地，对此没有什么疑问。[12]

土葬墓的问题则比较多。首先，这类墓葬中有许多是没有随葬品的。这些人是谁？他们是比较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留下来的罗马不列颠人（他们的标准葬仪确实是没有随葬品的土葬），还是说，只不过是一些不想用随葬品的人？同样，虽然在有随葬品的坟墓中发现的许多物品（扣针、袖扣、武器等）无疑是讲日耳曼语的欧洲大陆人口最先制造和使用的，但并非所有物品都是如此。而总体上说，这些物品在英格兰的出现和传播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口迁移的有效指标。与英格兰东部的火葬仪式不同，在土葬墓中发现的服饰并不是从讲日耳曼语的欧洲大陆的某处一下子传过来的。某几类物品的组合最终局限于英格兰的特定区域，但其中许多物品起源于日耳曼尼亚的不同地区。例如，袖扣成为早期生活在沃什（Wash）内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独特服饰元素，而尽管他们穿的衣服基本源自不同的地区，袖扣此前只见于挪威西部的部分地区。[13]换句话说，在不列

颠低地发生的事，和产生了所谓阿提拉帝国的多瑙河风格的发展过程有点像（第五章）。在5世纪的不列颠低地，盎格鲁-撒克逊特有的新服饰组合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来源。

如果服饰和习惯可以在不同的日耳曼移民群体之间传播，那么它们也有可能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群体传播到罗马不列颠本地人群中。人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接受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观点我们现在都能接受。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旧的身份认同松动的时候，5—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和罗马不列颠当地人都面临这样的情况。新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分界与不列颠既有的政治结构不同，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分界是从欧洲大陆迁移过来的。众所周知，具有不列颠名字的人——塞狄克（Cerdic）和西恩里克（Cynric）——出现在韦塞克斯王室中，而7世纪末韦塞克斯王国的《伊尼法典》（*Ine's Law*）明确提到，当时有许多地主祖上是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本地人。可见，韦塞克斯很可能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罗马不列颠人复杂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而不仅仅是日耳曼人征服的产物。位于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沃珀顿（Warperton）墓地是迄今为止独有的例证，在这片墓地上，可以见到从罗马晚期式到撒克逊式墓葬的发展过程。这也说明当时可能出现了文化同化。而且，许多土葬墓地还继续使用了200年，从5世纪到6世纪和7世纪，而在此期间移民和本地人之间必然有了很大程度的融合，因此，欧洲大陆式样的服饰恐怕不能很好地说明穿戴这类服饰的人来自哪里。[14]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范围和性质这一关键问题，现有的考古学和文献证据都不足以给出明确的答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填补这一空白的新方法和新资料。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和同位素分析开辟了新的方向，但两者都无法轻易解决我们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是否可以从5—6世纪的骨骼（保存于通常潮湿的不列颠环境）中提取古人的DNA。一切都没有定论，而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探索不那么直接的路线。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现代英格兰男性Y染色体内特定基因组合的分布。这可能非常有用。Y染色体一代一代由父亲传递给儿子，其中一个基因组合可能可以关联到第一千年中叶从欧洲北部迁移到不列颠低地的入侵人口群体。这种基因组合在现代英国人中广泛分布，在75%或更多的样本中都能找到。

但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个令人兴奋的新证据？一开始，研究人员主张，他们的发现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看法，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期间发生了类似于种族清洗的事情，该基因组合在现代人口中75%的分布，说明5—6世纪时有75%的本地男性被替代。然而，无论以什么标准评判，盎格鲁-撒克逊的男性野心家们都是这片土地上的新精英，他们能获得更多的食物，接触女性的机会也更多，因此，他们显然比本地的罗马不列颠男性更

有可能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最近由同一批研究人员建立的数学模型表明，要产生特定基因组合在现代英格兰男性人口有75%分布的结果，外来男性群体所需的繁殖优势不用很大，入侵者群体一开始的人数只需达到5—6世纪本地群体的10%～15%就可以了。因此，不必多说，现代DNA证据并不能判定当时的情况究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大规模迁移，还是精英转移加后续效仿。[15]

尽管同位素分析产生了一些吸引人的个别结果，但其作用整体看来恐怕并不比DNA分析大。这项技术的工作原理是，牙齿中所含的矿物质能标示出这个人的成长地，矿物质通过牙齿主人在童年或少年时期喝的水沉淀在牙齿中。其中一些化学特征可以判定为属于某些在地质上独特的区域。因此，你有可能判断一个身着盎格鲁-撒克逊服装下葬的人是真的来自欧洲大陆，还是只是一个变换了身份的罗马不列颠人。然而，问题在于该技术仅适用于第一代移民。两个真正的日德兰半岛人渡过北海后生下的孩子，绝对会长出东盎格利亚人的牙齿。因此，同位素分析若要得出哪怕笼统的结论，都需要大量昂贵的采样和大量非常精确的时序判定。而就算是第一代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后代也会有着不列颠人的牙齿，同位素分析要得出结论恐怕很难。因此目前来说，对于大规模迁徙和精英转移之间的学术僵局，同位素和DNA分析都难以提供解决方法，而这个僵局源自史料和考古证据的不足。[16]

可见，现有的资料带来了一个学术问题，却没有提供明显的解决方案。史料证据太单薄，没能令人信服地描绘出5—6世纪不列颠低地的情况，而物质文化的重大转变可以有大规模入侵或大规模文化效仿两种解释。而对晚期罗马不列颠的新认识表明，该行省人口太多，根本没有可能进行种族清洗，但是从公元600年后的语言学证据看，当地人口对（诞生于不列颠古典时代晚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日耳曼语言的影响非常小。探讨显然陷入了僵局，但如果我们先考虑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潮本身的证据而不是其对不列颠的影响，再用比较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大规模迁徙与精英转移的问题，就有可能打破传统的障碍。

撒克逊人的到来

比德8世纪初写于贾罗（Jarrow）修道院的历史作品，为Adventus Saxonum——撒克逊入侵者来到不列颠——提供了两个日期。第一个日期是446年，所根据的是基尔达斯关于不列颠人向埃提乌斯请求帝国援助的记录。埃提乌斯是5世纪中叶西罗马事实上的统治者，当时他“第三次当执政官”。基尔达斯没有记下此次请求的日期，但比德可以查阅罗马执政官的名单，该名单告诉他埃提乌斯第三次当上执政官是在446年。比德给出的另一个日期是约450—455年，来自他那个时代肯特王朝的一个传说，

即王朝的创始人在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和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共同执政时期，于不列颠东南角确立了自己的地位。[17]然而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且不论规模如何，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不列颠低地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起源的唯一记载来自基尔达斯的《不列颠的毁灭》。书中称，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的起因是不列颠行省退出罗马帝国体制后，皮克特人（Picts）和斯科特人（Scots）（分别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对不列颠发起了大规模攻击。关于细节有很多争议，但其他当时的资料告诉我们，406年左右，不列颠的罗马军队已经拥立了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后者将部队转移到高卢以对抗莱茵河入侵者。最终，也许是在409年，不列颠各省再次起义，似乎摆脱了篡位者的控制。不久之后，他们可能收到也可能没收到西罗马皇帝霍诺留的一封信，告诉他们得自己负责防御。然而，到了这个地步，这封信只不过是在法律上（de jure）承认了事实上（de facto）的情况。霍诺留无能为力，不列颠人则落入了后罗马的境地中。[18]

基尔达斯似乎是从这里开始记述的。已经独立的罗马不列颠人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

> 于是，他们召集了一个委员会，讨论怎样才能最好地对抗连番残酷的入侵和掠夺……然后，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加上骄傲的君主都瞎了眼；他们为我们的土地寻找的……守卫是……凶猛的撒克逊人……一群幼狮从蛮族母狮的巢穴中冲了出来，坐着三艘龙骨船（keel）——他们这么称呼战船……收到君主的命令后，他们首先在岛屿东侧磨尖了可怕的利爪，表面上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而战，而实际上是为了对抗它。母狮看到第一支队伍已经获得成功，就马上派出了狗群，数量更多……（终于撒克逊人）抱怨他们每月的津贴不足……称如果得不到更多的报酬，就要撕毁协议并劫掠整个岛屿。他们一点也不拖延，将威胁立即付诸行动……这些不敬的东部人燃起熊熊大火，火焰从东海岸一直蔓延到西海岸。大火摧毁了城镇和乡村，而且燃起后经久不灭，直到几乎烧毁了整个岛屿的表面，用它狂暴的红舌蹂躏着西海岸。

尽管基尔达斯告诉我们，这些失败导致许多不列颠人要么向侵略者投降而成为奴隶，要么逃往海外，但罗马不列颠并没有就此消亡。即使埃提乌斯拒绝了罗马不列颠人向帝国求援的最后请求，他们还在继续抵抗。他们中间著名的奥勒留·安布罗修（Aurelius Ambrosius）——神话人物亚瑟王的历史原型——组织了一次反击，最终不列颠人在围攻（如今无法定位的）

巴顿山（Badon Hill）时取得了大胜。此后，繁荣重新回到了岛上，幸福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基尔达斯写书的时候。[19]

从现代历史学家的角度看，基尔达斯作品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年代不精确。他笔下的那些事件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基尔达斯完全没有提到委员会最初向撒克逊雇佣军发出那带来厄运的邀请是在什么时候。比德显然认为，从邀请到起义到后来的一系列行动都是短时间内先后展开的，他因此将撒克逊人到来的时间定在了446年，其根据是不列颠人在混乱中向埃提乌斯求援时，他正第三次担任执政官。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撒克逊人到来的时间这么定太晚了，因为据当时比较有质量的资料记录，撒克逊人在410年前后已经对不列颠发起了几次大规模进攻。那样的话，和比德所认为的相比，最初请求雇佣军援助的时间可能会早一代人左右，这也符合基尔达斯的实际措辞。这样一来，基尔达斯之后的陈述就可以理解成是对较长时间内发生的事件的概述。基尔达斯笔下的事件前后跨越了比较长的时期，这个观点也符合以下事实：在英格兰，可确定年代的最早的撒克逊遗存属于5世纪30年代。[20]

至于使战火“从东海岸一直蔓延到西海岸”的撒克逊人叛乱，确定其年代的最佳参考可能是一份欧洲大陆的资料，即所谓的452年的《高卢编年史》（*Gallic Chronicle*，叫这个名字是为了迎合学术幻想，因为它于452年在高卢成书）。根据此书的记载，不列颠在441—442年落入撒克逊人之手。这一编年史在其所记载的事件发生仅仅10年后写成，而我们也知道罗马不列颠人和罗马高卢人在409年之后仍然有不少接触（我们接下来会谈），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份相当不错的证据。当然，构建事件还有其他可能的方式，但将基尔达斯笔下的雇佣军叛乱与5世纪40年代早期的混乱联系起来似乎是最自然的。到了5世纪60年代，至少有一位重要的不列颠领袖在高卢北部的卢瓦尔河地区发展事业，这与基尔达斯笔下一些不列颠人逃到海外的情况是吻合的。即使你否认这层联系，根据《高卢编年史》，5世纪中叶也还是撒克逊人大举入侵和不列颠人遭遇灾难的时期。[21]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基尔达斯这段历史附记的尾声异常高调，而这也是他的文本有时被认为是后期伪作的原因之一。多亏了奥勒留·安布罗修，罗马不列颠人最终获得了成功。虽然无法得到详细的地理位置，但基尔达斯总的意思是，在巴顿山之役胜利之后的40年和平中，撒克逊人的活动范围最多只在岛屿的东端。大多数历史学家将这一和平时期的年代确定在480年到550年之间。[22]

不过，比德在更详细的历史叙述的开篇写到597年罗马使团来到了肯特，当时几乎整个不列颠低地都处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控制之下。要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在6世纪中后期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要么是基尔达斯对罗马不列颠人大获成功的记载实际上是误导。我们手头的证据表明是第一个原

因。毕竟《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到韦塞克斯在6世纪末有一个重要的扩张阶段。在查乌林（Ceawlin）和他侄子切奥尔伍尔夫（Ceolwulf）的领导下，德文和萨默塞特的大片土地首次落入盎格鲁-撒克逊人手中。尽管文本存在问题，但反映后期重要扩张阶段的内容可能保留了下来。而比德笔下控制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大多数王室家族似乎出自同一个祖先，其全盛时期可以追溯到6世纪的最后25年，但不会比这更早。[23]这再次表明在基尔达斯完成写作后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欧洲大陆的证据增加了该论点的分量，证据表明撒克逊/萨克森人在6世纪仍保持高度的流动性。6世纪中期，据说有2万人之众的一群萨克森人向南迁移，最终参加了伦巴第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另一批人差不多与此同时（6世纪60年代）在卢瓦尔河河口建立了一个飞地。[24]这一无懈可击的证据表明撒克逊/萨克森人家乡的人口迁移不断，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时还有更多的撒克逊/萨克森人走在前往不列颠的道路上。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影响也见于后期的一些考古资料。5世纪后期，斯堪的纳维亚和东盎格利亚之间建立了某种接触，很可能是从挪威来了一批新的移民，而且有一些理由认为东盎格利亚的王室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事实上，比德的记载通常与考古证据相符。他提到进入不列颠的日耳曼移民来源非常广泛：不仅有他在《英吉利教会史》第一卷中提到的盎格鲁人、撒克逊/萨克森人和朱特人，还有弗里斯兰人、鲁吉人、丹麦人和其他人。[25]以盎格鲁-撒克逊人土葬形式进行的葬礼，其频率也从5世纪后期开始增加：从约500年时的每四年一次，到约600年时的每两三年一次。[26]这可能是因为罗马不列颠人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规范，可能是因为移民数量自然增长，也可能是出于别的原因。不管怎么说，6世纪末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撬动了在巴顿山之战后建立的权力平衡，使之有利于讲日耳曼语的移民，或者至少有利于他们的文化形式占据主导地位。来自欧洲大陆的持续移民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

虽然证据很少也很难获得，但现有证据表明，5—6世纪欧洲大陆向不列颠的人口迁移采取了移民持续流动的形式，类似于3世纪向南进入黑海的日耳曼人或4—5世纪进入多瑙河中游的伦巴第人（第三和第五章），还有9世纪时进入西部的维京人，而不像376年那样一群人集中起来一次涌入。这样的人口流动至少从约410年持续到了575年，但实际的持续时间可能比这样的估算长得多。从欧洲大陆向不列颠的人口迁移可能断断续续，至少会随着与罗马不列颠当地人冲突的程度高低而消长。除非基尔达斯严重歪曲了奥勒留·安布罗修的职业生涯（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会这样做，因为他的不列颠政治受众是知道这些事的，歪曲事件会破坏他的可信度），在不列颠人取得巴顿山胜利后，不列颠对移民的吸引力必然大不如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图尔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和普罗柯比的记载，6世纪上半叶，来自英吉利海峡北部的讲日耳曼语者出现在了欧洲大

陆的法兰克人中间。可见这个时期（根据大多数年表，这是在巴顿山战役之后）甚至出现了一些反向移民。[27]此外，不管是根据比德对移民起源的历史记述，还是根据在移民中传播的物质文化的不同地理源头都能看出，移民显然来自广泛的地理区域。

这么长时间的人口流动中，移民总数到底有多少，我们无法从资料中得知。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单个的移民群体的规模可能基本比较小。按照基尔达斯的说法，最初的雇佣兵只用三条船就装下了，因此可能只有100多人。然而，“三条船”也可能只是民间传说的母题，并不是所有群体的规模都只有那么小。[28]在欧洲大陆，萨克森群体在5—6世纪迁徙，其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可能有2万人，而且显然包括妇女和儿童；一些较大的群体可能来到了不列颠。例如，和英格兰南部较小的土葬墓地相比，英格兰东部的大型火葬墓地看起来像是更为统一的移民群体的遗存，但这些墓地肯定不是埋葬2万人的地点。移民也可能不得不应对性质发生变化的不列颠抵抗力量。这是基尔达斯叙事总结的核心主旨，他也以此为基础批评当时的事态——当年，奥勒留·安布罗修将大量不列颠当地人团结起来，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力量来抵抗撒克逊人，但这种优势现在因为那些不如他的继承人内斗而消失殆尽。当然，移民必然要对安布罗修的成功做出某种回应，派出更多力量去对抗安布罗修组织起来反抗的不列颠人。因此，即使一开始只有小股的移民，不列颠人团结一致的反抗也会迫使他们改组成更大的部队。

没有任何叙事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移民潮起起伏伏的景象，但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统治家族到达英格兰的时间很晚（600年前后或者更晚），与上述景象相符，可能也说明的确有这种情况。也许这些领袖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力量进一步统一起来，再次扭转了战争局势，使之有利于己方。如果情况大致如此，那么这种移民流动的图景是有不少类似的例子的。如我们所见，为了克服障碍或者实现更有野心的目标，移民潮会演化出新的形式，从3世纪的哥特人到9世纪的维京人再到19世纪的布尔人，这样的改变是共同的主线。当然，群体认同总会在面临冲突时形成并加强（第一章）。但我们不应该夸大较为统一的罗马不列颠的军事力量。撒克逊人在不列颠遇到的对手，其力量远比不上欧洲大陆移民在罗马土地上遇到的西罗马军事力量。因此，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约600年接管这里时，建立的是多个较小的王国，至少有10个，也可能更多。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各个新王国的兵力加起来，远不是几艘船可以装下的，但他们在不列颠并没有很大的威胁要去对付，因而没有动力去实现政治统一；而政治统一对于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或东哥特人来说是必要的，他们若想在所在地生存发展，就需要数以万计的兵力。[29]

妇女儿童肯定也参与了人口迁移。第一批雇佣兵可能都是男性，但从墓地

中出土了不少源自欧洲大陆日耳曼文化的女性服饰（最特别的还是扣针）。一些物件有可能是在没有女性随军的情况下来到不列颠的，它们是为撒克逊/萨克森入侵者的罗马不列颠新娘准备的；但是，认为队伍中完全没有女性的看法似乎相当牵强，尤其是因为欧洲大陆的萨克森移民群体肯定带着妇女和儿童同行。迁移到不列颠的撒克逊/萨克森群体可能以男性为主，原因有两个。首先还是因为一些行动的规模较小。在奥勒留·安布罗修的时代之前，入侵的撒克逊/萨克森领袖只要有数百名军事随从，就足以在不列颠境内开辟基地。在这种情况下，领袖们基本或根本没有必要在更大范围内招募追随者，因此参与迁移的男性有家庭成员的可能性较小。第二个原因在于运输。这一时期的大规模陆上移民（至少是有历史记载的那些）要用包括数千辆运货车的大型车队运送行李和身体较弱的人，这肯定非常麻烦，而将家眷、家畜和行李运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到达不列颠，难度就更大了。运送非战斗人员不仅需要额外的船只，还会产生许多其他费用。

尽管如此，比较研究的证据表明，我们不应夸大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无懈可击的DNA证据表明，9—10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将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妇女，还有一些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北部和西部岛屿的妇女带到了冰岛。大约三分之一的现代冰岛女性的DNA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而即使当时的情况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先渡过北海来到不列颠北部的岛屿或大陆，他们的后代再去往冰岛，这也只能说明不列颠最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中有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女性。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不列颠群岛北部，再从那里迁往冰岛，这些9—10世纪的活动和5—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渡海迁往不列颠南部的行动相比，路途更远，更困难，代价也更高。而不列颠南部随后语言变化的程度，如果没有大量女性存在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将在稍后细谈这个问题。在没有撒克逊人的文法学校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日耳曼母亲将日耳曼语教给自己的孩子，移民的日耳曼语言就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基本不受当地不列颠凯尔特语言的影响。[30]

对于5—6世纪迁入不列颠低地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总体规模，还存在不少争议，但我们对人口迁移的性质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那是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人口的长期流动。由于史料稀缺，我们无法确知他们迁徙的原因，但可以有把握地说，移民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获得罗马不列颠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产生的财富。基尔达斯的记载也是如此暗示的。在他看来，最初的撒克逊雇佣军是为了财富才来到英格兰的。而发现自己无法榨取更多金钱后，他们就发起了叛乱和洗劫，劫掠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31]取得统治地位后，他们接着控制了整片地区以确保长期繁荣，因为土地是这个以农业为主的世界中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400年的时候，罗马不列颠的经济发展程度未必超过其在4世纪中叶的高峰，但无论如何都比北海另一边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乡村世界发达。事实上，我们有无懈可

击的证据表明，罗马不列颠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大海另一边欠发达地区的日耳曼人。

至少从3世纪中叶开始，撒克逊/萨克森海盗就在寻找穿越北海到达不列颠低地的方法。虽然这方面的记载很少——阿米阿努斯还算详细地记录了萨克森人对高卢北部发起的一次重大海上袭击，但没有记录对不列颠的任何袭击，但我们有很不错的间接证据证明，撒克逊/萨克森的海上袭击者在4世纪对罗马不列颠的地主构成了威胁。从3世纪末开始，罗马中央当局对英吉利海峡两岸和不列颠东部海岸线的军队统一指挥。指挥官派遣了海军舰队和卫戍部队，修建了一系列坚固的防御工事，其中一些在撒克逊人占领不列颠后还保留下来。波特切斯特（Portchester，就在如今的朴次茅斯郊外）的大规模防御工事非常壮观，到中世纪甚至拿破仑战争时期都还能起到不少作用——拿破仑战争时期，它是关押法国水手的监狱。这一整套军队和军备被称为“litus Saxonum”（撒克逊海岸）——设计它是为了对抗谁显而易见。罗马人居然费心维持这种程度的军事投资，表明撒克逊/萨克森人的海上袭击虽然通常规模不大，但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32]

5—6世纪的人口迁移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发生的，次要的动机有充分时间来发挥作用。北海的海平面上升，威胁到欧洲大陆一些群体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些人可能更愿意搬迁。有不少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沿海村庄——包括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人造土丘——在这一时期被人遗弃了。事实上，发生遗弃的范围非常广：从弗里西亚（Frisia）海岸到易北河-威悉河地区，再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曾有些人因此认为海平面上升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的根本原因，但这夸大了海平面上升的作用。有许多移民迁入的英格兰东部也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且，最终在5世纪末6世纪初，萨克森沿海地区之外的大量土地也被放弃了。可见，海平面上升最多只能算次要因素。到了6世纪，墨洛温王朝法兰克人的力量开始侵入萨克森人的家园。正是这个政治因素促使最终加入伦巴第人的那2万名萨克森人离开，在法兰克人的压力之下，其他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加入他们在北海那边的同伴。尽管如此，大体出于自愿的经济动机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移民的主要原因，因为移民早在法兰克人成为一个考量因素之前就开始了。这也是其基本性质所表明的。[33]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突然涌入一大批移民，这说明经济吸引力的稳定拉力比重大政治危机（比如在376年推动哥特人跨过多瑙河的那场政治危机）的作用更大。

“撒克逊海岸”的存在也表明，400年的时候，不列颠低地和日耳曼尼亚北部之间已经有了人口流动所需的活跃信息场域。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利用了已知的路线，某种程度上只是延续了之前日耳曼人在这个方向上的扩张。3—4世纪的撒克逊/萨克森袭击者都知道罗马不列颠的财富，他们无疑掌

握了有关沿海和北海水域的大量信息，也知道抵达目标地区的最佳路线。他们应该也对内陆地区颇为了解，因为通往不列颠内陆的所有河流都可以帮助他们通过船只发起攻击。第一千年的船只很小，能够沿河深入内陆，而不是只能通行于沿海地区。由基尔达斯的记述可知，进入5世纪后，这一信息资源库继续扩大，很像支撑现代移民流动的知识库。如基尔达斯所写，第一批撒克逊/萨克森人很可能只是雇佣军，他们前来帮助受劫掠所苦的雇主防御。3世纪末出现过类似情况，不列颠一名篡位的罗马指挥官卡劳修斯（Carausius）原本被派去与萨克森和法兰克海盗作战，却将一些萨克森人编入了自己的部队。这样的事在后来的维京时期也相当普遍。陆上的军队很难对抗海上的突袭者。雇佣军发了财的消息吸引其他人来到北海的不列颠一侧，加入他们。这不一定是基尔达斯认为的复杂阴暗的计谋。最初的雇佣兵可能是真心受雇，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随着信息场域的扩大，他们有了更大的野心，或者说有着更大野心的撒克逊/萨克森新群体看到了大规模扩张的机会，然后采取了行动。这就像维京时期的小规模袭击者最终被追随者更多、更重要的领袖取代一样。[34]

进入5世纪后，将撒克逊/萨克森人的袭击变成撒克逊/萨克森人的移民的，不是新获得的关于不列颠低地的地理信息，而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和战略形势有了重大改变。只要不列颠仍然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欧洲大陆来的撒克逊/萨克森人吞并其土地资产的尝试都注定失败。撒克逊海岸的力量足以对付那些不能知难而退的袭击者：而这正是阿米阿努斯时代出现在高卢的那些萨克森袭击者遭受的命运。而一旦不列颠脱离罗马体系，对其的劫掠就可以大大超出打了就跑的程度，而且有此野心的不仅仅是撒克逊/萨克森人。正如基尔达斯的记载和其他证据证实的那样，众多袭击者，甚至是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分别是斯科特人和皮克特人），都排着队来夺取自己的一份。[35]发达的罗马式经济体带来的拉力是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动因，而且和我们所研究的其他移民潮一样，政治与经济因素的交融再清楚不过。只有掌握政治控制权，撒克逊/萨克森移民才能获得不列颠低地的财富，而这只有在不列颠失去了罗马保护伞后才有可能。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者也许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才意识到他们觊觎的不列颠如今变得多么脆弱。我们看到，在约410年时，袭击似乎已经开始，但直到约440年，情况才变得非常恶劣——至少这是欧洲大陆观察家的说法。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段时间让盎格鲁-撒克逊人要么意识到之前阻挡他们全面扩张的障碍已不复存在，要么发展出新的野心，不再满足于发起袭击，而要彻底吞并。

当时的政治结构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影响了行动。与当时欧洲大陆的人口迁移现象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徙过程的特别之处是有大量证据表明有小规模的活动。如我们所见，到了600年，移民流动最终形成了一系列较小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罗马不列颠世界也是如此，那里在政治上支离破

碎，至少在奥勒留·安布罗修之后的时代是这样。观察到这种模式后，最近的一项研究提出疑问：为什么5世纪的欧洲大陆几乎没有这种局部接管权力的情况？奥勒留·安布罗修，以及基尔达斯的时代统治康沃尔和威尔士的小王国都是这种接管的例子。[36]

这一奇怪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使迁移队伍中的性别比例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但影响远不仅限于此。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不列颠时只能采取人口长期流动的形式，而不能一次性大举入侵，是因为他们无法一次运送大量人口穿越北海。在一个方面，证据是模棱两可的。我们不知道5世纪日德兰半岛的人口是否使用带帆的船只，而靠桨推进的船只能单程运送大量乘客，因为船上的空间基本上只够搭载桨手。但在英吉利海峡罗马一边的港口附近就能找到帆船，并且有理由认为这些船长收钱后将更多的撒克逊/萨克森人带到了不列颠（就像其他船长在3世纪载着哥特人和其他人渡过了黑海，在429年载着汪达尔-阿兰联盟的人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一样）。我们知道，其他撒克逊/萨克森人此时推进到了卢瓦尔河，这可是一段很长的航行。因此，比航行问题更重要的是，能用的船都很小，而且数量有限。19世纪末跨洋的客轮出现之前，跨越大西洋的现代移民只能一小批一小批地迁移，同理，从交通运输角度看，不可能出现大量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起迁移到不列颠海岸的情况。[37]

同时，政治环境在形塑不列颠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大陆，移民不得不大批聚在一起行动，因为无论是在罗马帝国的权势下生存，还是逃离匈人的控制，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不列颠就没有这样的限制。罗马各行省的地方政府都以城市领土（civitas）为基础运作，尤其是在税收方面，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似乎延续了这种运作方式。看起来，给盎格鲁-撒克逊雇佣兵的钱，就是从不用再交给罗马帝国的城市税收收入中拿出来的。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林赛、肯特这些最东端（地图11），因此也可能是最早的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其边界可能与城市边界大致重合，这表明它们可能是由接管了相应城市的移民建立起来的，接管时城市仍在运作。但这些城市的领土并不是很大，不可能养得起大型武装部队。这种状况应该是在奥勒留·安布罗修的时代发展出来的。也许就是从这时起，如果想在组织程度更高的罗马不列颠土地上拿到一片不列颠低地的土地，就得召集一支更大的移民部队。不过，没有哪位6世纪罗马不列颠国王的兵力能达到罗马帝国或匈人阿提拉的帝国那样的规模，因此在罗马不列颠生存需要的军队的量级要小得多，而且，不列颠的军事政治单元都存续不了太久。基尔达斯称，自己写作的原因之一是他这一代的政治领袖（他指出了五位国王的名字）为琐事争吵，浪费了安布罗修的遗产。[38]

因此，根据我们现有的重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徙并不是“民族大迁徙”，也不同于那种大规模迁徙加种族清洗的传统文化历史模式。他们的

迁徙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并不像比德“撒克逊人的到来”所暗示的那样是单一的事件。参与迁徙的许多群体可能规模很小，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但遇到阻碍后，群体的规模应该有所扩大。妇女和儿童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希望从不列颠低地发达的农业经济中获利是迁徙的动机，但一些次要因素至少在一些时候影响了人口的流动速度；政治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只有控制这片土地，才能完整地获取不列颠的财富。因此，尽管缺乏信息，但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不列颠低地时显然采取了掠夺性人口流动的形式。而且，正如关于移民的比较研究文献所揭示的，可用信息、交通运输情况、政治和战略环境等因素也有着深远影响。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又怎么说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移模式究竟是不是精英转移？

模仿的局限

有必要先明确问题在哪里。根据经典的精英转移/文化模仿模型，来到不列颠的日耳曼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部分或全部取代了罗马不列颠当地的地主精英。当地仍有大量罗马不列颠人，其数量远远超过移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吸收了移民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直到移民和本地人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所描绘的基本情况是，绝大多数罗马不列颠人自愿改变群体身份而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该模型意在指出，只要有少量盎格鲁-撒克逊移民跨过北海，就可以合理地解释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大规模日耳曼转向。人们往往借助该模型提出一种观点，即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其实并不算是重大变革的主要推动者。根据此类论点，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前罗马不列颠发生的事（例如罗马结构的崩溃），以及当地人对他们到来的反应（当地人自愿决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至少与移民潮本身一样重要。可见，该模型及其变体都是针对以往对侵略假说的滥用而提出的。[39]

该论点的另一方面就比较难定义了，因为现在没有人相信来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消灭或驱逐了几乎所有的当地居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规模”迁移也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它现在实际上被定义为精英转移模型的对立面。基本的意思是，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数量太多，不能再被归类为贵族精英，而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是他们，而不是当地居民的自由选择，带来了不列颠低地的文化变迁和其他变革。因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数量，以及他们与当地居民关系的整体性质，是论点的核心。罗马不列颠人可以自主选择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做出何种回应吗？还是说，移民们具有很强的侵略性，而且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其中数量似乎更成问题，因为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资料里没有明确的信息。对于400年时罗马不列颠本土人口的数量，现有资料中只有很粗略的估计，而关于

后来盎格鲁-撒克逊人移民潮规模的数据则几乎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执着于精确的数字，就能找到更有成效的方式。

我们可以从5—6世纪的乡村结构革命着手。晚期的罗马不列颠被分为许多大中型庄园，其中不少围绕着别墅——乡村大宅兼地产中心——运作。与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的土地分配不均，大量土地掌握在数量较少的地主手中。到了600年前后，这种地产分配方式已被另一种基础完全不同的分配方式取代。不光是所有的别墅都不再使用，而且庄园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只有一两个案例能说明从前罗马庄园的边界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仍然有效，但相关证据并不可靠。实际上，农村的经济地图已经重新绘制过了。600年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为征税而划定了较大的区域，但大部分农业活动是围绕比从前的罗马别墅小得多的单元组织起来的；直到9世纪，有中心化组织的大型庄园才重新出现在英格兰乡村。这些属于第一批采邑，采邑在《土地调查清册》的时代成了乡村的主要特征。[40]

显而易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接管并不是简单的精英转移，不能参照500年后诺曼人征服的经典模式。黑斯廷斯之役后20年，也就是《土地调查清册》中记录的信息得到收集之时，本地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已经失去了地位，其土地被转移到征服者威廉的主要追随者，也就是所谓的直属封臣（tenants-in-chief）手中。这个过程向下延伸到地方精英（士绅）一级，因为直属封臣接着将自己得到的大量土地上的经济权利转授给自己的追随者，让他们获得财富。这个衍生的过程与征服者威廉一开始对其直属封臣的馈赠一样具有政治必要性，因为多亏了这些人的忠诚服务，征服才得以成功，而他们自然会期望分享联合军事行动带来的财富。结果，盎格鲁-撒克逊士绅和贵族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有些人成了他们从前所拥有的土地上的租户。

但该过程的一个核心特征是，财产转移并没有扰乱现有的地产界限，也没有改变庄园经济的运营模式。庄园仍作为农业单元继续运作，但细节上有了一些变化，有理由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农民的地位大大降低了。然而从根本上说，庄园的地产边界和农村经济的一般运作并没有受到诺曼人大胜后财产权大规模转移的干扰。这是诺曼征服者能得到的最好的经济结果。庄园的主要活动是集中劳动力耕作，也就是种植粮食，但它仍然需要牧场和林地来供养地产运作所需的牲畜和人口。对这些安排的任何干扰都会降低农业产量，减少新业主的收入。[41]

相比之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在5—6世纪的接管并未带来如此明显的财产转移。新的盎格鲁-撒克逊地主精英并不是简单地占有现有的别墅地产，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最好的选择。与11世纪的庄园一样，罗马世界中的别墅地产是综合农业单元，其产出为非常富有的农村地主阶级提供了财

富。改变别墅边界扰乱了农村经济的实际运作，也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过程导致农村产出大幅下降。虽然即使放弃了一些边缘地区，整体的种植面积也没有明显变化（通过花粉分析证明），但更复杂的地产结构无法再起作用。例如，在泰晤士河多切斯特一带，一些罗马时代的排水系统到了撒克逊时期就不再有人维护，较为简陋的“浅耕犁”则基本取代了之前使用的罗马式重型犁。重型犁是昂贵的资本设备，因为犁地需要挽畜，而挽畜过冬需要足够的备用饲料，生产这些饲料是有成本的。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较小农业单元即使想，恐怕也负担不起重型犁。[42]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罗马不列颠的旧城镇连一点残存的城市特征都没法保留。不管怎么说，它们并不是工业生产的中心，而是“农业城镇”，其存在是为了在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中实现某些功能，而作为回报，农村的一些粮食富余流入城镇并养活了城镇人口。如果你扰乱了农村经济的组织，特别是简化了其功能，减少了总产出，你就破坏了城市的根基，因此这样的城镇在后罗马时代消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一些城镇保留了行政作用，因为那里建起了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宫。[43]这就带来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时要打破现有的罗马地产结构，即便这么做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

有人试图从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前的不列颠内部发展中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有些人认为，索西穆斯笔下的409年不列颠叛乱属于农民起义，它不仅摆脱了罗马中央的控制，而且推翻了别墅地主阶级的社会统治。当然，别墅肯定会是这类起义的牺牲品。最近，盖伊·哈尔索尔主张，不列颠低地别墅庄园结构的崩溃是它与帝国系统分离的直接后果——当初这种结构是在帝国系统的庇护下出现的；但他提出的事件发展顺序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别墅所有者之所以社会地位很高，是因为他们与帝国建立了关系，而这些联系在410年之后被切断后，他们要维持精英地位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从前，他们用自己庄园中产生的利润来建造和装修精致的别墅，用其他方式来显示阔气，交换罗马制造的贵重物品（地中海食品、精美陶器等等）；而现在，他们必须在本地分配财富，通过馈赠来建立支持者网络。这些网络在结构上取代了帝国，允许地主在新的条件下保持地位，但相对昂贵，地主很少或根本没有盈余来像从前那样摆阔。结果，别墅和原有交易模式很快就消失了，而不列颠低地的地主开始在葬仪（“有随葬品的土葬”）上攀比，他们举行豪华的葬礼，用很多华丽的服饰随葬，为的是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44]

而农民起义的论点就不那么可信了。虽然很混乱，但当时的西罗马几乎没有农民起义的迹象。不过，在中央帝国权力机构无法响应当地需求的地方，许多地方精英把权力握在了自己的手中。409年左右，君士坦丁三世早已放弃了他的不列颠基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这两地，他试图一边取代霍诺留皇帝，一边对付现在已经定居在比利牛斯山脉

南部的莱茵河入侵者。我在这方面完全赞同哈尔索尔的观点，认为不列颠的叛乱更有可能是那种常见的叛乱，因君士坦丁三世的疏忽而起，而不是任何意义上反罗马的社会革命。同样重要的是，《欧塞尔的圣日耳曼努斯生平》（*Life of St Germanus of Auxerre*）描写了一个明显是罗马人长相的不列颠低地精英如何向仍在罗马治下的欧洲大陆求助，以对抗5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入侵者和异端。直到5世纪，罗曼语（简化了的拉丁语）仍然是不列颠低地政治生活的口头语言。我也倾向于认为，基尔达斯关于不列颠向罗马统治者埃提乌斯（“三任执政官”）寻求帮助的著名记载是有据可查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不列颠仍有一个心向罗马的罗马化地主阶级，而且那里直到5世纪40年代还保留着一些罗马式的结构。因此，阶级冲突的观点没有什么吸引力。[45]

哈尔索尔的内部系统崩溃论更能解释5世纪不列颠低地转型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现象，即别墅消失，带有随葬品的土葬开始流行。而我们在评估该论点时，有必要先谈谈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哈尔索尔，他认为在解释考古变化时回避移民“只不过是抛弃了一个往往毫无根据的简单化假设，以便用关于那个时期的更精细的解释来代替”。他对不列颠低地发展的解释完全符合这种世界观，因为他认为这些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别墅消失是因为不列颠低地社会内部的危机，该危机也带来了相互攀比的昂贵丧葬活动，而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其中没有起太多作用。但是，尽管侵略假说在过去肯定是被滥用了，但先入为主地否认移民的作用也有问题。这么做的危险在于，只要能使历史的聚光灯远离移民，任何观点，无论其学术水平和其他水平如何，都会得到信徒的同意。[46]而我认为，如果你不怕被当作头脑简单的迁徙论者，那么对别墅的消失其实有一种更直观的解释，而我们不应忘却简明以及奥卡姆剃刀的好处。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替代解释也更好地考虑到了所有可用的资料。

首先，在5世纪的情况下，哈尔索尔描绘的图景——别墅因完全内在于不列颠的政治进程而逐渐消亡——未必适用于409年之后的几十年。根据452年的《高卢编年史》，撒克逊人的进攻在410年左右就已开始，而别墅——富人们孤立的乡间大宅——不但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非常显眼。第二章描述过阿勒曼尼袭击者从其中一幢别墅中劫掠的战利品；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袭击者没能将战利品带过莱茵河。更一般地说，罗马边境上不管是哪个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那里的别墅都是最先遭受损失的。[47]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外部攻击的任何升级都会马上影响别墅网络。在我看来，409年之后，不太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不受外部攻击影响的内部侵蚀过程缓慢展开。

同样重要的是，除了别墅网络的崩溃和有随葬品的土葬的兴起，还有别的现象需要解释。哈尔索尔的论点（或任何版本的内部系统崩溃论）很难解

释随5—6世纪社会经济革命而来的文化变革的程度。不光是不列颠低地的别墅庄园消失了，而且到了600年，该地区讲拉丁语的基督教精英已经被讲日耳曼语的非基督徒取代。哈尔索尔当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承认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才能解释这些转变，尽管他没有提出可以解释这种情况的机制，而且总体上试图将移民与他认为更根本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脱钩。然而，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文化变革的深刻程度。

坟墓中的随葬品大多数是日耳曼式样的，但这只是日耳曼化的一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书面语言保留在公元600年之后到诺曼征服期间的一系列文本中，惊人之处在于它基本没有受到当地不列颠凯尔特语的影响。外来词很少而且相隔时间很远，凯尔特语对其语法结构几乎没有影响。这揭示了重要的事：到600年时，不列颠低地新兴地主精英所说的各种方言（该语言现有的书面形式以此为基础）不仅完全是日耳曼语，而且与不列颠本土的凯尔特语毫无接触。那个时代，语言在家庭中传承，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母亲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这就是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中必然包括大量妇女的原因之一。顺便提一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晚期，移民带来大规模语言变化的情况只有在参与迁徙的是农民群体（即便是一小群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时才会出现，而从来没有在类似诺曼征服的那种小规模贵族精英转移时发生。[48]

同样激烈的文化转型也表现在其他领域。罗马社会首先分为自由民和奴隶阶级，自由民又分为honestiores（上层）和humiliores（下层）。上层自由民基本相当于有地阶级。根据我们的资料，在约公元600年之后出现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和罗马系统一样有自由民和奴隶的分类，但还有第三类人：半自由或“被释奴”的阶级，这群人不是奴隶，但世世代代依附于自由民阶级成员。自由民阶级被细分为wergilds（偿命金）不同的等级（“偿命金”代表这个人的社会价值，我们稍后还会讨论），但所有人都被认为是地主，或者至少是土地保有者。后罗马时期欧洲大陆上所有日耳曼群体中都发现了这样的三重社会分类，而永久被释奴的概念对罗马社会来说非常陌生，因为在罗马，被释奴的后代将成为完全的自由民。因此，前面那种划分社会阶级的方法很可能起源于日耳曼移民。不是完全不能想象后罗马时代这些日耳曼人主导的社会各自发展出了三类人的划分，但这种可能性不大。[49]

将这些文化转变充分考虑在内，我们就能重新定义问题了。显然，我们需要解释5—6世纪时为什么别墅庄园网络会崩溃，内有日耳曼服饰和武器的墓葬会出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解释为什么600年前后的新精英讲的是未受凯尔特语影响的日耳曼语，为什么社会按照日耳曼的方式重新组织。对于上述现象，有一个对别墅经济结构崩溃的更为简单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会带来年代问题，而且能解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我们可以先仔细考察精英转移的经典案例，即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如《土地调查清册》展现的那样，11世纪，各个庄园易手，但既有的庄园网络没有受到干扰——对整体经济和各庄园的所有者来说，这是最佳结果。但诺曼人的征服能以这种方式运作，只是因为到来的诺曼精英的数量正好，他们能占有现有的庄园网络，而不必再分割庄园。《土地调查清册》提供了一些细节。截至1066年，英格兰乡村约有9 500个庄园，诺曼人定居下来后，将其所有权重新分配了给大约5 000个新到来的精英家庭。1086年的时候，国王、国王的直属封臣和各种教会机构各自拥有许多庄园，但剩下的庄园的数量还是足以让新精英中的每个成员都获得自己的资产。但是，如果征服者威廉的亲信支持者太多，没法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庄园，会怎么样？如果征服者威廉身后有1.5万名，或者哪怕只有1万名足够重要的支持者，每人都要求获得新征服王国中的财产权益作为奖赏，会怎么样？那样的话，奖励那些让威廉取得英格兰农业资产控制权的支持者，这方面的政治需要就会压倒经济考虑，保持高生产力的庄园网络不受影响也就不再重要了。不能满足最重要支持者期望的国王和领主通常不会长久在位。（在黄金和土地两方面馈赠上的）慷慨大方被视为中世纪早期领主的主要美德，不是没有原因的。[50]如果到来的诺曼精英的数量多到已有的庄园结构无法容纳，那么出于政治原因，即便以牺牲经济为代价，也得进一步分割庄园。诺曼征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到来的精英和可用的农业生产单元在规模上大致匹配。

相比之下，同样复杂和富有生产力的罗马别墅网络没能免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干扰，这一事实很说明问题。其实对新移民来说，保持现有农业生产单元不变更简单，在经济上也更有好处。不列颠低地新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税收来源将是更有生产力的农村经济，新的精英各自获得的土地资产也会更有价值。但比起这两个方面，奖励忠诚的支持者更为重要。在征服之后的那些年里，奖励忠心服务者的需要必然驱动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吞并土地。事实上，国王寻找可用作奖赏的土地的能力，始终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长期发展的关键动力。7世纪，最终成为前维京时代的大国的，是3个有办法扩张到开放边界，也因而有土地来吸引更多战士的王国（韦塞克斯、麦西亚和诺森布里亚）。[51]尽管经济成本很高，但5世纪的农村还是得到了彻底重组，可见这片土地上要容纳的盎格鲁-撒克逊追随者的数量太大，无法一对一地取代原先的罗马地主。

对低地不列颠别墅地产解体的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我们掌握的4世纪末罗马和日耳曼世界的普遍发展模式。虽然罗马和日耳曼世界都是农业经济，但二者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罗马世界（包括其不列颠行省）的精英阶层人数较少，相对富裕，而日耳曼经济所能支撑的则是不那么富裕，但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精英阶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潮将前述第二类精英带入了第一类精英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新的精英不得不有所妥协。盎

格鲁-撒克逊领袖出于政治原因必须奖励忠诚提供军事服务的追随者，因此旧的社会经济秩序最终是需要重组的。何时以及如何重组的细节尚不清楚。可以想见，一些罗马人的庄园在撒克逊时期之初仍在运作。一开始，移民可能还愿意靠分配现有庄园的出产来生活。但一旦移民人数增加，有了永久控制土地的意识，他们就会要求在资本来源中分得一份，于是，现有的地产边界需要重绘，总体产出也就持续下降。[52]近年来津巴布韦对“白人”农场进行了划分，已经证明分片后各部分的总产出不如分片前的整体产出，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类比。

很难说这批新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究竟比原先的罗马精英多出多少。在罗马时代和庄园化的中世纪，地主和无地农民的比例估计最多为1比10，而且实际比例可能低得多。现在很少有人会赞同弗兰克·斯滕顿（Frank Stenton）爵士的看法，即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几乎完全由自由的农民战士组成，但如我们所见，罗马时代晚期，社会和经济权力广泛分布于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中。庄园化和人数较少的社会精英阶层的产生（相当于重建了使规模更小的罗马上层阶级得以存续的那种社会经济结构）要到8世纪才开始。有人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5—7世纪墓葬中的武器，实际上可能是宣告自由民身份的手段，因为武器随葬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表明战士身份。如果是这样的话，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的自由民可能占男性人口的将近一半，因为差不多一半的男性墓主有某种类型的武器随葬。然而，来自6世纪欧洲大陆的证据表明，那里的自由阶级人口可能占总人口的1/5到1/3，相比之下，自由民占人口一半这个比例是很高的。要么也许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结构更平等，要么可能是居于中间的半自由阶级也承担一些军事义务，也用武器随葬。[53]无论是什么原因，罗马精英和日耳曼精英在规模上的差距都是很明显的。

由此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不列颠低地的过程是一种精英转移。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即使在罗马不列颠的人口结构崩溃后，移民与原有居民的比例最多也不会超过1比4，不可能出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说的那类种族清洗。[54]以数量而言，移民比当地人少得多，公元60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全面的基因混合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与诺曼征服的比较很有启发意义。不同于诺曼征服者，5—6世纪的新日耳曼精英人数太多，无法被纳入现有的社会经济框架，因此必须彻底重组基本的生产方式。虽然移民都占少数，但我们必须仔细区分这种两种产生了截然不同结果的情况。把二者都归为“精英转移”会造成分析上的混乱，让人忽视一些关键的特性和差异。

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掌控乡村后，当地的罗马不列颠人在选择命运方面有多大的自由呢？现在没有人会认为，仅仅因为他们种族不同，本地罗马不列颠人

和外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就必然存在敌意。本地人口自愿改换身份认同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更具体地说，正如我们所见，7世纪的《伊尼法典》表明，直到7世纪90年代，韦塞克斯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地主精英中还有罗马不列颠人。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至少一些罗马不列颠地主成了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重要随员。但是，在考虑这种情况有多普遍时，有必要牢记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的基本目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活动从一开始的袭击和提供雇佣兵服务，发展到对地产的完全吞并，这实际上相当于与后罗马不列颠幸存的地主精英直接争夺对财富生产手段的控制权。我们不一定非要假设所有罗马不列颠地主都没有挺过一开始的大灾难，但基尔达斯描绘的暴力和恐怖景象也不纯粹是想象。土地掠夺可不是什么愉快的过程，即使是诺曼人相对平和的掠夺，在某些地方也是非常野蛮的，尤其是在1069—1070冬季臭名昭著的北方行动（Harrying of the North）中，粮仓被有意销毁，造成数万人死亡。[55]

也有必要想想本土的地主精英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在7世纪的韦塞克斯保住地位。这些非撒克逊人的地主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关注。7世纪，韦塞克斯向西扩张，进入不列颠西部。这些不列颠地主究竟是最近加入王国的人，还是来自汉普郡或威尔特郡的早已精通生存之道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就算这些人的土地没有马上被夺走，根据《伊尼法典》，他们的社会价值（以偿命金来衡量）也只有财富水平相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偿命金是社会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解决争端时计算各种补偿的基础。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财富相当的移民和本土地主在偿命金上的差异，可能造成了在最初的暴力冲击后幸存的非盎格鲁-撒克逊地主的最终消亡。在偿命金不同的情况下，当移民和本土地主陷入纷争时，就算法庭的判决公平（移民和本土地主胜诉的案例数量相等），财富也会渐渐从本地人转移到移民手中。移民的偿命金更高，同样的罪行，移民作为受害者时收到的赔偿金比作为加害者时付出的赔偿金要多一倍。[56]

这个证据更为具体，但也只是证实了我们能从政治背景中做出的推断。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不列颠低地的不同地区建立主导地位后，本地地主有充分的理由去跨越政治与种族的鸿沟而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这个方法，他们才有希望保持那种在罗马时代赋予他们权势的不平等资产分配。然而，他们想这么做，不代表就能这么做。外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领袖（在所能控制的范围内）[57]完全有理由禁止本地人如此改换身份，至少不能让大批的本地人这么做，因为他们需要奖励自己的军事追随者。比起罗马不列颠的地主，这些追随者对新国王的政治重要性要高得多，因为国王掌权靠的是他们。不幸的是，众多例子表明，智人真的很喜欢掠夺，为了攫取他人的财富，他们不惜组织并实施暴力。即使本地地主设法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产，但正如《伊尼法典》所示，未来会怎样

是无法保证的。

相比之下，外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罗马不列颠社会中的无地成员之间就没有那种程度的竞争，因为后者并不拥有移民想要夺取的资产。尽管我不相信当时发生了农民起义，但无地阶级与别墅拥有者的确不会有太多共同利益，因为后者是依靠前者的劳动果实生活的特权精英。因此，本地的无地者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被接纳为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然而，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如愿。正如前文中那位匈人帝国中罗马商人的经历所示，允许原本属于从属群体的人进入统治阶层，必然意味着给他们更好的待遇：显然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想跨越阶级界限。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旦从属群体成员的地位提升，统治阶级就无法像以前一样剥削他们，因此，对地位提升总有种种限制。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刚取得不列颠低地肥沃可耕地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需要从地位低的群体中调集大量人手，来承担耕作农业中繁重的体力劳动，毕竟当时还没有发明拖拉机。因此，虽然和拥有土地的同胞相比，罗马不列颠的无地人员与移民没有那么激烈的利益冲突，但移民还是有充分理由不让他们大批加入不列颠低地的新精英阶层。事实上，法律和特许状表明，在新形成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中，大量的奴隶和半自由民对社会结构至关重要。我认为，不列颠低地大部分无地的本地人都被绑在了从属地位上，尽管偶尔会有人像那位变成了匈人战士的罗马商人一样成功晋升。

从这个角度来看，盎格鲁-撒克逊语未受本地人影响一事就有了更大的意义。由于语言是在家庭内部而不是通过正规教育传授的，因此从公元600年开始，不列颠语对新统治精英使用的日耳曼语基本没有影响，这很说明问题。如果这群精英中有大量变成撒克逊人的不列颠人，那么撒克逊人的通用语言肯定会受本地语言的影响。而影响如此之小，就表明新的精英阶层主要由移民组成。[58]

除非你打定主意要证明移民从来都不是重大改变的推动者，否则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总体结论：5—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改变不列颠低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直到400年，罗马帝国体系还塑造着这片土地的形态，而将其与帝国体系脱钩，必然会改变它的历史轨迹。人数较少、相对富裕的别墅主曾受惠于帝国体系，而一旦切断了与罗马的联系，这些人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在我看来，与罗马世界其他地方的庄园主一样，如果要对付的只是不列颠各行省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那么他们是有足够的社会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的。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问题。不列颠的邻居们深知不列颠是多么富有，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袭击不列颠。一旦罗马中央的保护被撤回，别墅主在面对皮克特人、斯科特人或者盎格鲁-撒克逊人时就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维护自己那非常不平等的资产份额。

另外，即使有更好的关于别墅社会解体的年代证据，可以说明罗马社会在撒克逊人大举攻击之前就已崩溃，也只会部分改变上述图景。首先（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述），罗马不列颠的地主阶级之所以被其罗马母船抛弃，是因为其他移民在405年之后侵入西罗马的大陆领土，破坏了帝国的中央结构。而且更具体地说，不列颠后来发生的事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移决定的：人数较少的本地精英群体被人数较多的外来精英群体取代，不列颠低地在语言等方面发生重大文化变革，进入了日耳曼化的轨道。可见，本地人口在这几个世纪中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实在有限。

因此，从根本上说，精英转移加文化模仿的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们所见低地不列颠在400—600年间的转变。但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该地时，也没有大规模取代原本的居民。在决定如何将其重新归类时，探讨在高卢北部同时展开的类似变化会有帮助。与高卢北部相关的考古证据基本比较新，更清楚地展现了本地社会在像罗马不列颠人那样面临外来的土地掠夺者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法兰克人和罗马高卢

学者们对“撒克逊人的到来”有不同的看法，法兰克势力入侵罗马高卢的行为也带来了类似的学术问题。历史资料（关于法兰克人的史料质量要高一些）表明，差不多就在法兰克人于莱茵河以西建立自己势力的时候，卢瓦尔河以北的广大高卢地区采用了新的葬仪。在高卢和其他地方，罗马式葬仪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成为没有随葬品的土葬。但到了500年前后，高卢地区各处突然出现了陪葬品丰富的墓葬，而大多数坟墓多少会有一些物品随葬。通常，男性的陪葬品是武器和个人物品，女性的陪葬品则包括大量首饰，其种类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不列颠低地墓葬中的首饰没什么不同（地图12）。和英吉利海峡以北一样，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看到的情况，能否用精英转移及随后的文化模仿来合理解释？

墨洛温人的进军

墨洛温王朝治下法兰克势力的兴起本质上是罗马帝国崩溃引起的现象。“法兰克”这个词在3世纪末首次见于史料（和“阿勒曼尼”一样），但后来记述3世纪早期危机的资料认为法兰克人起了重要作用，而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说法。目前不清楚的是，在罗马帝国晚期资料中被贴上“法兰克人”标签的那些子群体［安普希瓦力、卜茹克特累、查图阿里（Chattuarii）、沙马维（Chamavi）、萨利，见第二章］是否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这些群体住得很近，必然有政治关联，甚至可能像当时的阿勒曼尼人一样，在势力很大的领袖之下有过结成真正联盟的时

候。但资料并没有提供确证，主要是因为阿米阿努斯对他们的描写不如对阿勒曼尼人的多。当时，和罗马欧洲边境地区的许多日耳曼群体一样，不同的法兰克人群体都是罗马帝国的半臣服附属群体。法兰克人经常被招募进罗马军队，有些人升到高级将领的位置，整支的辅助部队也偶尔会参加战役。然而，罗马帝国也需要不时发起军事行动，以免法兰克人劫掠帝国过于成功、过于频繁；帝国还需要防备法兰克人借机吞并领土。比方说，在击败阿勒曼尼人克诺多马里斯之后，尤利安皇帝不得不去抵挡试图进入罗马领土的萨利安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59]随着西罗马在5世纪衰落下去，原本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法兰克人乘势而上。从5世纪60年代起，在衰落的西罗马发生的诸多事件中，法兰克人扮演了更突出、更多样的角色。也就是在此时，由一个叫希尔德里克（Childeric）的人领导的一个法兰克群体出现在舞台上。

希尔德里克的父亲，被称为墨洛维（Merovech），是墨洛温王朝的缔造者，王朝也固他得名，但所有的资料都说他是海怪的后代。甚至希尔德里克的生涯也充满了疑问。他在当今比利时图尔奈的坟墓是欧洲考古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坟墓的封土在1653年5月被打开时，挖掘者发现了一堆令人称奇的黄金和珠宝，其中包括一个印章戒指，上面刻着墓主的名字Childeric regis（希尔德里克王），免去了我们的猜测。后来在1831年，许多物品被从展示柜中盗走，但在物品出土后的两年内，人们已经记录下非常详尽的细节，尽管有的细节是错的——特别出名的一个是希尔德里克的扣针被认为是笔。令人唏嘘的是，如今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勋章馆（Cabinet des Médailles）只能看到原始宝藏剩下的一小部分。令人称奇的是，最近对墓地的再次挖掘显示，除了大量黄金之外，与希尔德里克一起下葬的还有3个独立墓坑中的至少21匹马。随葬品中包括了那些不走运的马身上的一些金饰。在第一次挖掘中发现的一些金饰造成了历史上的另一次大乌龙。在拿破仑时代，人们根据一位很有想象力的挖掘者的说法，认为它们来自一件华丽的王袍。于是，这位科西嘉皇帝让人制作了一件有类似装饰设计的袍子，用于他在1801年的皇帝加冕典礼。[60]

希尔德里克的坟墓十分奢华，说明他是很有势力的军阀，但还是留有许多疑问，特别是在与历史资料对比的时候。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其中包括他曾因勾引了太多追随者的妻女而被流放8年之久。抛开他个人生活的复杂性不谈，这些小故事表明他的职业生涯与5世纪60年代罗马帝国势力在高卢地区的垂死挣扎联系在一起。那时，帝国的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大部分税收基础的控制权，衰落不可挽回。在高卢，这表现为帝国不仅越发难以控制自己的军队指挥官，也难以控制已经在那里定居的各种外来群体（比如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因此，希尔德里克才会在463年率领一支法兰克人的分遣队，为高卢罗马军队的指挥官埃吉迪乌斯（Aegidius）效力，而后者正与西哥特人作战。然而，帝国解体的过

程很复杂，西哥特人其实是与在意大利的帝国中央当局结盟，反对造反的埃吉迪乌斯。那么，希尔德里克到底是不是忠于帝国？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另外，他显然没有统治过超过一个法兰克群体，而即使到了下一代，法兰克人也还是分成许多独立的战队。

史料没有告诉我们希尔德里克最初的力量基础是什么。他是向罗马帝国出售战队服务的法兰克王公吗？还是说，他的生涯更符合罗马的模式，罗马衰落的年月里，他在莱茵河的罗马军队中逐步晋升？关于他职业生涯的另一个重大疑问是：他在5世纪60年代还是埃吉迪乌斯的下级盟友，而在去世之前，他已经统治着罗马高卢大片地区，这是如何办到的？他死后不久，兰斯（Rheims）主教雷米吉乌斯（Remigius）写信给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兼继承人克洛维（Clovis），将希尔德里克描述为原罗马行省下贝尔吉卡（Belgica Inferior）的统治者。因为有这个描述，加上他安息在比利时，传统上认为希尔德里克的势力源自北方。但根据我们手头有限的5世纪60年代的资料，他的势力在南方，而且更多是在罗马军事环境中形成的。最近有人提出，他的权力其实来自从前帝国的野战军，帝国中央对野战军的控制最终崩溃后，他掌握了这一重要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当然是可能的，但那样的话，他最终葬在比利时就有点奇怪了。如果说他是法兰克战队的领袖，这也与证据相容，在还能获回报的时候，他在罗马政治中玩弄权术，而一旦帝国不再对高卢的政治生活有意义，他就回归法兰克人主导的政治环境。同时期的勃艮第国王贡多巴德（Gundobad）也走上了同样的职业轨道。但不管是哪种上升路径，我们都必须承认希尔德里克是非常成功的军事领袖，他从罗马势力崩溃后的高卢脱颖而出，指挥原罗马力量中最大的残余部队之一，我们的资料中提到，当时指挥着其他部队的还有埃吉迪乌斯的儿子兼继承人沙格里乌斯（Syagrius），以及阿博加斯特（Arbogast）和保罗（Paul）两位伯爵。[61]

尽管希尔德里克非常成功，但在他儿子的统治下，法兰克人的历史才真正发生了变化。教科书里会写，克洛维的在位时间是约482年到511年，但能确定的只有他去世的时间。要推断出他的即位时间，只能依靠6世纪后期历史学家图尔的格雷戈里描写克洛维统治时的年代标记，但这些标记并不可信。

克洛维职业生涯的轮廓非常清晰，但具体细节有很多争议。传统上认为，克洛维即位后不久就击败了沙格里乌斯（他应该是继承了埃吉迪乌斯之前领地的剩余部分），将领土扩展到巴黎，远远超出了下贝尔吉卡的范围。此次胜利一直是克洛维故事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多少资料支持。图尔的格雷戈里是唯一记载此事的作者，他说胜利是485—486年取得的。近来，围绕这件事产生了争议，争议特别大的是沙格里乌斯治下的领土面积。而虽然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格雷戈里的年表（我们稍后还会讨论），但这场战

役本身很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过。[62]至于此次战役和克洛维其他战役的总体影响，人们就没有太大疑问了。克洛维于511年去世，在那之前，他从西哥特人那里夺取了西南高卢的大部分地区，将勃艮第人置于法兰克人的霸权之下，并在莱茵河东岸大举扩张，特别要说的是阿勒曼尼人也接受了他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法兰克人的世界被彻底改变。克洛维不仅征服了大片原属罗马的领土，而且还消灭了许多敌对的法兰克国王。图尔的格雷戈里提到了七个人：西吉贝尔特（Sigibert）和他的儿子克洛德里克（Chloderic），他们的根据地在科隆；查拉里克（Chararic）和他的儿子；以及拉格纳查（Ragnachar）和他的两个兄弟里夏（Richar）和里格诺莫（Rignomer），他们的势力范围在康布雷和勒芒。还有一处提到“其他亲属”，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拥有独立权力基础的统治者。法兰克世界原本是许多独立的王公瓜分政治权力，现在则处于一个君主无可争议的统治之下。格雷戈里细心地注意到，处决每一个竞争对手后，克洛维都会将其追随者和财富加进自己的权力基础。[63]

法兰克人的政治重组具体发生在何时并不清楚。同样，唯一的叙述来自格雷戈里。格雷戈里在克洛维去世60多年后开始写作，显然是从各种资料来源中拼凑出了克洛维的故事，很多时候，他不得不猜测相关事件的年代。其他资料充分证明西哥特人军事行动的时间是507年，但其他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得到独立资料来源的确认。格雷戈里对克洛维军事扩张过程的整体描述很值得怀疑，特别是因为他把克洛维统治时期的主要军事行动以5年为间隔整齐排列。当然，也可能情况的确如此，但看起来应该是格雷戈里（也可能是后来的窜改者）将事件均匀地排列开了。对格雷戈里的怀疑还有更具体的理由。克洛维对阿勒曼尼人的大胜被格雷戈里安排在其统治的第15年（496年），但根据与克洛维同时代的资料，克洛维在大约10年后才大败阿勒曼尼人。当然，克洛维可能发动了两场军事行动，但如果只有一场行动的话，那一定是格雷戈里搞错了时间。他对克洛维改信天主教的描述也存在争议。格雷戈里将克洛维改信放在他对信奉阿里乌派（Arian）基督教的西哥特人发动袭击之前，从而将这场战役描绘成一场由天主教发起，又因上帝赐福而获胜的征讨。另一份当时的资料则将洗礼放在了这次胜利之后，并暗示克洛维至少考虑过改信阿里乌派。[64]

同样，克洛维消灭其法兰克竞争对手的时间传统上定在508年前后，因为格雷戈里将所有这些杀戮都放在克洛维击败西哥特人后。这当然有可能，但同样可能的是，竞争对手们是克洛维在整个生涯中分阶段消灭的。例如，据说克洛维消灭查拉里克的借口是后者未能帮助他对抗沙格里乌斯。但沙格里乌斯在约486年时已被击败（必须承认，格雷戈里是这种说法的唯一来源），要说克洛维等了20多年才消灭不履行义务的人就很奇怪了。而如果克洛维没有先通过吸收其他战队来增强自己的势力基础，恐怕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组织起足够的军事力量连续击败阿勒曼尼人和西哥特人。这

是我自己对真实情况的最好猜测。不管怎么说，总体情况还是很清楚的。克洛维所实现的，类似于瓦拉米尔和狄奥多里克在东哥特人中达成的成就（第五章）；克洛维一边吞并从前罗马帝国的大片领土，一边将原本独立的法兰克战队联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极为强大的西罗马继承国。[65]

在这一进程中，法兰克移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分裂的王国

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都表明，6世纪的法兰克王国内大致以卢瓦尔河为界，分出了两个区域。河的南边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罗马传统。许多从前的罗马地主家庭保留了自己的庄园，文化和价值观也大多保存下来。在图尔的格雷戈里和维南提乌斯·福图纳图斯（Venantius Fortunatus，此人与克洛维隔了一代人）笔下，这些人讲拉丁语，知道自己有罗马元老院的传承，对罗马文化保持兴趣。这并不是说新王国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比方说，他们不可能再走帝国政府中的职业官僚之路，而是要努力在克洛维及其墨洛温继任者的宫廷中取得成功，宫廷决定谁能获得世俗和教会的重要职位。经济情况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例如，马赛取代了阿尔勒，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主要转运港。尽管如此，卢瓦尔河以南入侵蛮族的定居点似乎很少：在夏朗德（Charente）可能有一两个，在阿基坦接近西哥特人居住地的地方也有一两个。除此之外，根据考古发现，那里还是延续后罗马时期的通用做法，墓葬中没有随葬品，总体物质文化也是后罗马时期的。几乎没有法兰克移民的迹象，甚至都没有达到诺曼征服时那种精英转移的水平，罗马时期当地政治、社会和行政生活的基本单元——城市和地主——保留了下来。[66]

在卢瓦尔河以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400年到6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当地的生活完全脱离了罗马时代确立的规范，其物质文化与我们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见到的别无二致。和在不列颠低地一样，作为罗马统治坚定象征的城市消失了。没有证据表明6世纪时此地的兵役组织像王国其他地方那样，以城市分遣队为基础。社会和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法律资料反映了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的社会重构，社会划分为自由民、永久被释奴和奴隶三个群体。应当记住，被释奴这个阶级是罗马世界所没有的。还有许多定性的证据表明，罗马时代那种范围很窄的贵族被扎根不那么深、人数更多的社会精英所取代——这方面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也很像。举例说，法律资料并没有用不同的偿命金来区别人数众多的自由民和人数较少的贵族；在关于6世纪事件的大量叙述中，图尔的格雷戈里并没有称任何北方的大人物为“贵族”（但对于卢瓦尔河以南许多出身于从前罗马家族的人，他会说他们是“贵族”）；而真正的贵族阶层实施社会经济统治的基础——聚集在一起的大面积地产，则直到

7世纪才重新出现在这个地区。而在那之前，“别墅”（villa）指的仅仅是某个地理区域，而不是一个中心化运作的农业生产单元。[67]

这并不意味着北方地区不同人群的财富没有显著差异，也不能说当地的旧罗马精英完全消失了。一直到7世纪，原罗马行省首府特里尔的大地主们还坚持要在铭文中自称“元老院成员”。墨洛温时代早期一名幸存的罗马地主还留下了遗嘱，此人就是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他在克洛维即位后写去的贺信为我们了解墨洛温王朝的兴起提供了关键信息。但特里尔显然是个特例。在其周围地区发现了超过800份铭文，占后罗马时代北高卢铭文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北高卢其他从前的罗马城市里都没有这种程度的发现。虽然雷米吉乌斯的遗嘱足以证明有些罗马精英幸存了下来，但也可以看出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地主，既比不上4世纪的罗马地主，也比不上7世纪及之后的法兰克地主。

这些证据与整体图景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高卢北部的社会结构要到公元600年以后才会由人数较少的贵族精英主宰，而不像卢瓦尔河以南的地区，那里旧罗马贵族的后裔仍然把持高位。文化上的不连续性也很突出。在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从罗马时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主教继承有过中断（地图12）。因此，在这些地方，必然有一个异教盛行，或者至少是基督教传播中断的时期。与此同时，语言也在变化。日耳曼方言在原罗马帝国的莱茵河边境以西越发流行。[68]

卢瓦尔河以北的物质文化也与王国的南部地区有很大不同。5世纪末和6世纪，带有随葬品（有时还很奢华）的土葬流行开来，取代了罗马式葬仪。男性的随葬品不仅有私人物品，还有武器：通常是长剑（spatha）、标枪（angon）、斧头（francisca）和盾牌（保存下来的往往只有盾牌中心的锥形饰钉）。女性入葬时穿戴整齐，戴着珠宝，衣服在两肩处用扣针固定。扣针通常镶在珐琅框里，根据人们的喜好嵌入不那么昂贵的宝石。这原本是罗马式的装饰，但在蛮族欧洲广泛流行，成为在匈人帝国内演化而成的“多瑙河风格”的特征元素。就连埋葬地点都变了。6世纪许多带有随葬品的新墓葬都远离旧有的居住地，坟墓成行排列（德语中的Reihengräber，“行列式墓地”，就是由此而来）。[69]从这些集中排列的墓葬看，比较分散的农村人口中可能出现了某种共同体意识，情况有点像东盎格利亚的大型火葬墓地。所有这些清楚表明，一种新的非罗马的社会秩序已经形成，它显然迥异于旧有的秩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高卢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在3世纪末的袭击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西罗马大部不同，这里一些地方的农村似乎没能恢复繁荣。但这只是莱茵河下游以西相对有限的区域的情况。相比之下，在整个4世纪，特里尔和整个摩泽尔河河谷都是在城镇、乡村、文化等方面蓬勃发展的罗马传统的中心。特里尔这座城市在许多年里都是帝国的首都。在皮卡第（Picardy）西北部

更远处，似乎也有活跃的别墅文化在3世纪的灾难后幸存下来，边境则继续由大量防御工事和大批军队严加守卫。虽然3世纪的危机造成了一些持久的破坏，但莱茵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整个地区并没有被帝国放弃，大部分地方的人仍然过着罗马式的生活。[70]因此，在建立新秩序之前，还需要先推翻这个地区罗马生活的基本结构。

有人认为，一些证据表明，一批前墨洛温时代的法兰克移民直接促成了这些领地上帝国结构的解体。对该地区一些罗马晚期墓地的挖掘工作发现了一批约350年到450年间的有随葬品的土葬坟墓。与墨洛温时期的土葬坟墓不同，这些早期的土葬坟墓数量较少，在墓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墓地中大量的坟墓里完全没有随葬品。在有随葬品的墓葬中，占大多数的男性墓葬有武器和罗马军用腰带随葬；少数女性与男性同葬，陪葬品包括珠宝和个人物品（如玻璃和陶器）。这些墓葬最初由汉斯-约阿希姆·维尔纳（Hans-Joachim Werner）认定为属于同一个群体。他认为这批坟墓的墓主是史料中所记在3世纪90年代被强制安置在罗马领土上的法兰克人，这些人被称为laeti（军户）。他还提出，这些人和他们的后裔一直保持独特性，从而促成了后来克洛维时期法兰克人对该地区的征服；这些坟墓表明，法兰克人定居的第一阶段破坏了罗马生活的常规模式。然而正如伯梅（H.-W. Böhme）指出的，这些坟墓的年代距史料中那些军户定居下来已经过了一两代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墓主的地位相当高，而军户甚至连完全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因此，伯梅提出，墓主应该是被称为foederati（联盟者）的地位较高的蛮族移民，这就将他们与4世纪获得罗马高级军衔的一系列法兰克军官联系在了一起。[71]他主张，坟墓主人的地位比那些法兰克军官略低一些。不管怎么说，伯梅还是认为这些墓葬与一群重要的法兰克移民有关系。

但近来，哈尔索尔提出，这些坟墓可能根本不属于移民。他的理由颇为充分：罗马帝国晚期，边境以外的法兰克人并不采用带陪葬品的土葬。事实上，在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的联盟核心地区，是找不到约350年到450年（实际上还要早一些）这段时间里的法兰克人墓地的。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发掘工作足可说明，问题不在于证据缺失。几乎可以肯定，法兰克人采用的葬仪使他们的墓葬无法通过考古挖掘发现，他们很可能是将死者火化后抛撒了骨灰。而且，罗马领土上男性墓葬中随葬的腰带和武器都是罗马制造的。哈尔索尔主张，认为用武器陪葬是日耳曼风俗的观点犯了年代错误，是把后来墨洛温时期的做法（那时的法兰克世界流行起带随葬品的土葬）套进了之前的时代。4—5世纪这批带随葬品的土葬墓并不能表明墓主是非罗马人，而是反映出一种互相攀比的新丧葬习俗正在该地区未来的社会领导阶层中传播。随着从前受益于帝国的人能从帝国那里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人们竞相主张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为优越，而使用随葬品的新葬仪就产生于这个过程。[72]这个论点显然和讨论5世纪不列颠葬仪时用的论点

很相似，但在高卢，在大规模法兰克移民到来之前很久，新的葬仪就已存在。

总体来看，两种解释都不是很有说服力。这些坟墓的发现地很不一样，有的在军事设施附近，有的在乡村，有的在城市墓地中，可见以这种方式被埋葬的人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群体，而是在不同环境中生活的个体。因此，很难认为他们是法兰克人的“第五纵队”。墓葬的年代和男性墓葬陪葬品的性质也表明，墓主基本上是在罗马帝国结构内生活的人，而不是反抗这些结构的人。但社会压力论也不完全令人信服。毕竟，带陪葬品的坟墓出现的时间太早（约350年），没法与罗马帝国权力在该地区的衰落联系到一起，即便是哈尔索尔，也不会认为帝国势力衰落早于4世纪80年代末，而我和其他人会把势力衰落的时间定到405—408年的危机之后。

而且，这类墓葬数量不多，而如果它们是社会攀比过程的产物，那攀比也太低调了。女性和男性葬在一起的情况说明，一些墓主可能是日耳曼移民（不一定是法兰克人）。不是每个男性都有女性同葬，但在皮卡第，有女性同葬的男性墓主达到了一半，这个比例很好。虽然男性墓主的随葬品无疑是罗马制造的，但与他们相伴的女人入葬时却戴着“图图鲁斯”（tutulus）式样的扣针，这种扣针只在这里和易北河下游一批奢华的日耳曼墓葬中有，而后者远在莱茵河以外的萨克森王国。在易北河一带发现的扣针大多只是与高卢北部发现的略有不同，后者的年代可能更早。扣针不足以让我们认定这些墓葬是日耳曼人的，毕竟边境以外的日耳曼精英也经常采用罗马风尚。但是至少在目前，对于这些更技术性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定论，而就算这种扣针被证明是非罗马式的，这些墓葬的墓主也有可能是在罗马系统中过得不错的移民。不管怎么说，哈尔索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两点：第一，这些墓葬与后来墨洛温时代的丧葬习俗没有明显的关系；第二，即使这些墓葬是日耳曼式的，它们也不足以说明在罗马帝国晚期，莱茵河和卢瓦尔河之间有为克洛维后来的胜利铺了路的大规模法兰克人定居点。[73]

6世纪时墨洛温王国内的南北分裂恐怕不能归因于罗马帝国晚期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兰克人定居点，但部分原因可以从该地区5世纪的政治史中找到，法兰克人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说罗马力量在405—408年危机之前就大规模撤出了该地，这样的观点和说罗马力量早就撤出不列颠一样缺乏说服力。[74]但是，西罗马的权力基础因入侵加篡夺遭到破坏后，至少高卢北部的部分地区开始和帝国的另一个边缘地区不列颠一样，感到自己失去了保护。因此，阿莫里卡（Armorica，高卢西北部，今布列塔尼）和不列颠一样在409—410年发生了叛乱，或许也是为了摆脱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的控制。不列颠在这时永久脱离了罗马帝国，高卢则不同，在5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最初危机最糟糕的时刻过去后，人们努力将高卢北部重新带

回帝国的保护伞下。5世纪上半叶，帝国不时付出努力，维持对卢瓦尔河以北的控制，包括对分裂群体采取直接干预的行动，在该地区保留一些罗马正规军，并时而配置一些非正规军。[75]

但从长远来看，帝国在高卢北部建立权威的种种努力不断受到405—408年危机连锁效应的破坏。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帝国中央逐渐失去了对其主要收入来源地的控制，而失去收入，也就失去了维持大规模兵力并控制地方指挥官的能力。直接后果是帝国无法再保护罗马平民生活所依赖的关键结构。5世纪50年代中期，危机加剧，阿提拉帝国崩溃后的混乱更是雪上加霜（见第五章）——这也是希尔德里克在5世纪60年代崛起的背景。就这样，高卢北部经过漫长而激烈的政治过程，从罗马的过去走向了法兰克的未来。该过程始于406年12月31日的莱茵河渡河事件，直到克洛维在500年前后的十几年里巩固了权力之后，才算真正结束。在此期间，该地区出现了众多逐鹿者：罗马中央当局、当地人自己结成群体［通常以3世纪反抗群体的名字巴高达（Bagaudae）命名］、蛮族入侵者和定居者，以及最终出现的法兰克军队。这个过程也充满暴力。不用怀疑，该地区的罗马地主精英肯定经历了巨大的破坏。他们的别墅奢华而脆弱，和罗马军队无法再保护的其他地方一样，别墅网络在帝国崩溃的过程中瓦解了。[76]

在上述进程中，法兰克人起了不少作用，但他们的作用不是最主要的。如前文所述，直到这个进程快结束的5世纪60年代，法兰克人的力量才比较突出。这种模式与低地不列颠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不列颠，帝国的保护力量不管在哪里撤出，盎格鲁-撒克逊袭击者、雇佣军和移民都会很快跟上，直接取代原有的罗马地主。因此，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情况不同，我们不能简单指责法兰克人破坏了卢瓦尔河以北的罗马式生活，这样的破坏早在法兰克人在军事上崛起之前就开始了。实际上，罗马帝国干预法兰克政治，可能是为了防止形成更大、更危险的联盟，就像干预阿勒曼尼政治一样（见第二章），因此，法兰克人的统一应该是后罗马时期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帝国维持原有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克洛维的职业生涯就不可能起步。[77]但是，如果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高卢北部罗马式生活的衰落与此地法兰克势力的崛起关系不大，那么法兰克移民在墨洛温王朝治下的6世纪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头骨与石棺

考古证据对解答这个问题而言很重要。图尔的格雷戈里没有谈到法兰克人定居的问题，而就考古发现而言，我们需要面对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和探讨不列颠低地的情况时一样。高卢北部新丧葬习俗出现和法兰克势力崛起的时间吻合，但是不是每个有随葬品的人都是法兰克移民？如果是，那么当

时的情况就比较接近“民族大迁徙”，因为高卢北部和东部广泛分布着行列式墓地，墓中都有随葬品（地图12）。[78]

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很多尝试。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调查人员确信，可以靠研究头骨形状来解决问题。他们提出，本地凯尔特人是短头颅（圆头，brachycephalic），而日耳曼移民是长头颅（dolichocephalic）。还有些学者关注葬仪的细节，他们认为使用石棺是罗马人特有的习俗，不用物品随葬的坟墓（大多数行列式墓地中都有一些这样的坟墓）也被认为是罗马人的。可惜，这些老办法都不起作用。颅骨形状的种族差异没那么简单，还有明确记录表明在石棺中发现了法兰克人。没有随葬品的墓穴也不能说明什么。这种墓穴明显集中在行列式墓地的边缘，而现代挖掘方法已经证明，此类墓地是从中间开始用，然后扩展至外围的。有没有随葬品其实跟坟墓的年代有关系。从7世纪开始（使用时间更长的盎格鲁-撒克逊土葬墓地也是如此），坟墓中的陪葬品明显越来越少（可能是因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直到回归罗马帝国晚期那种不用随葬品的葬仪。[79]

尽管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区分罗马人和法兰克人，但有一些非常可靠的证据表明，6世纪一些有武器陪葬的人是本地的高卢罗马人。德国北部莱茵河下游克雷费尔德-格乐普（Krefeld-Gellep）的墓地经过精心挖掘，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此地是从罗马时代晚期到墨洛温时期一直在使用的少数埋葬点之一。公元500年前后，在靠近已有的罗马时代晚期墓地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有丰富随葬品的坟墓，另一块墓地从此启用，那里集中了不少带随葬品的墨洛温式坟墓。然而，第二块墓地的开放并未导致第一块关闭。第一块墓地的变化更引人注目，有随葬品的土葬（标准的墨洛温式做法，男性用武器、女性用珠宝随葬）很快也成为这里的常规模式。最初的挖掘者和后来的评论者都得出了显然正确的结论：使用第一块墓地的罗马时代末期或后罗马时期的人口，接受了以第二块墓地中奢华墓葬为代表的新的文化范式。这正是精英模仿的好例子。在克雷费尔德-格乐普体现得很明确的这种情况可能在高卢北部各处也有，其他一些地方原有的罗马时代晚期墓地完全被行列式墓地取代，因此展现不出类似的文化演化过程。在使用新的行列式墓地的人口中，肯定有一些是高卢罗马人的后代，他们适应了墨洛温时代的新规范。[80]

在至少能部分反映该进程的另一组证据中，所涉及的墓地都是先有一个特别豪华的墓葬，然后才投入使用的，就像克雷费尔德-格乐普的第二个墓地一样。得益于对墨洛温物质文化年代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精心研究，一系列遗址中都发现了上述模式：阿登高地（Ardennes）的梅济耶尔（Mézières）、默兹河（Meuse）河畔的拉瓦埃（Lavoye）、普莱（Pry）、古特林根（Gutlingen）、洛林（Lorraine）地区的查乌利（Chaouilley）、鲁本纳（Rübenach）、埃鲁维莱特（Héruvillette）和

贝尔伯宁（Bale Berning）。认为这些墓地中许多墓葬的墓主是法兰克移民，这个想法很有诱惑力，但不能想当然。这已在卡尔瓦多斯（Calvados）的弗莱诺维尔（Frénouville）得到证实。表现为独特颅骨缝的遗传标记说明，有随葬品的土葬出现之后，那里的人口和这种丧葬形式出现之前的人口基本是同一批，尽管采用新葬仪的坟墓都位于一块全新的墨洛温时代墓地上。看起来，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是由一个精英家族传入弗莱诺维尔的，这家人在新的墓地上“首创”了随葬品丰富的坟墓。而到了6世纪中叶，这种丧葬形式已经在本地人中传开，这些人现在也开始使用新的墓地。[81]因此，有无懈可击的证据表明，有随葬品的土葬这种新风俗之所以能在高卢北部广泛传播，是因为本地的高卢罗马人积极采用了这种习俗。

但是，这种葬仪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会被采用？我们知道，现代考古学理论中的一派倾向于将随葬品相对丰富的墓葬群解释为社会不安全感和攀比的证据。因为地位不明确，所以这些家庭想在邻居面前炫耀攀比。就我们讨论的例子而言，当时的情况显然有可能是这样。我们看到，墨洛温王国崛起后，社会地位的规则和之前罗马统治时期的完全不同，显然可能引发社会竞争。[82]但这不是唯一可能成立的解释，甚至称不上是最有说服力的。比如卢瓦尔河以南的社会秩序也经过了重组，但这并没有引发在墓葬上的攀比。你可以合理反驳说，这是因为那里维系旧精英社会地位的要素基本保存了下来，他们没有必要攀比；但是，社会压力论还可以用更重要的观点来反驳。最重要的是，布局齐整的行列式墓地看起来更像是高度组织化的公共空间，而不是进行社会攀比的场所。从墓地中精心排列的墓葬看，葬礼很有可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监管。这在随葬品上的确有所体现：几类死者的随葬品比其他人多，比如青壮年男性和育龄女性。有人提出可能是这些死者在活着的时候压力更大，但法律条文告诉我们，当时是偿命金最风行的时候，而这也可能是关键点。

更一般地说，法律证据确实表明，墨洛温社会里有界限明确的地位群体，即自由民、被释奴和奴隶（以地位为基础，再根据年龄做调整，可以得出这个人的确切价值），各群体有明确的职能。例如，自由民和被释奴可以应征入伍，但奴隶就不能行使这种被视为地位更高者专有的职能。还有些法律条文规定，一个人晋升到高一等的地位群体时要举行公开仪式，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社群的规模都小到每个人都相互认识。[83]这些观察结果提示我们去从另一个方向上解释：埋葬男性死者，特别是用武器陪葬时，肯定会有彰显其地位的意思，但在极度封闭的小规模农村社会中，宣称某人拥有比实际情况更高的地位并不容易。

因此，社会压力论绝非不证自明，而关于随葬品风俗传播的现有证据表明，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多少保留了社会压力的因素。在有随葬

品的墨洛温墓葬中，最奢华、最古老的是希尔德里克的墓。他下葬（481年或482年）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系列豪华但没有那么奢华的墓葬，它们被称为弗隆海姆-古特林根（Flonheim-Gutlingen）墓葬群（名字有点拗口）。这些墓葬的确切年代都没法断定。在风格方面，墓葬中的随葬品与希尔德里克的非常相似，因此墓主下葬的年代应该也差不多。但它们位于原罗马行省下贝尔吉卡的范围之外，而传统上认为，下贝尔吉卡是希尔德里克留给克洛维的遗产。从表面上看，这些人至少在克洛维最初的征战中追随了他，但这也可能是循环论证，因为希尔德里克的领土范围可能超出了下贝尔吉卡。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墓显然都是在5世纪的最后25年间落成的。[84]

新丧葬习俗进一步传播的年代则没有疑问。在前述墓葬之后，很快出现了一系列虽说不那么豪华，但随葬品也不少的墓葬，也就是赖纳·克里斯特莱恩（Rainer Christlein）所谓的C组墓葬（Group C burials）——这个术语也不怎么有趣，但至少念起来比较容易。这些墓葬从年代和性质上都介于以下两者之间5世纪末的少量奢华墓葬，以及墨洛温时期随葬品较少的大量墓葬——后者应该是在6世纪而非5世纪末落成的，而且落成时间更可能是6世纪的第二个25年而非第一个。[85]总的来说，从墓葬的年代看，这种丧葬习俗的传播普及，要归因于希尔德里克及其亲信的奢华葬礼带来的涓滴效应。从前，法兰克人会在火化死者后抛撒骨灰，新的葬仪则非常不同，因此它要花差不多50年的时间才能在大众中站住脚也就不奇怪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模仿其领导者的做法（当然他们的墓葬没有那么奢华），墨洛温人的土葬发展了起来，这种观点似乎很合理。当然，这种效应很常见，但不足以充分解释这种现象。就希尔德里克的墓葬而言，举行风光大葬的想法可能衍生自阿提拉帝国全盛时期形成的多瑙河风格丧葬习俗。5世纪之前，日耳曼世界中偶尔会出现豪华墓葬群，但在法兰克地区一个也没有。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匈人帝国是个分水岭，从此重要人物死后得到厚葬。匈人时代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埋进地里的黄金的数量空前巨大。法兰克人不是受匈人控制最严密的，但他们也在阿提拉的势力范围之内，阿提拉干涉了法兰克人的一次继位纠纷，多瑙河风格也确实改变了蛮族的丧葬习惯。

从那以后一直到6世纪，厚葬领袖的做法被广泛采用。也难怪阿提拉之后那一代的法兰克领袖会采用罗马帝国之外欧洲最伟大帝国的做法。希尔德里克和克洛维——克洛维有可能安排了他父亲的葬礼——致力于改变法兰克政治的性质，这也是事实。两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推广匈人的做法，以表明或宣称希尔德里克绝非一般的法兰克统治者。无疑，克洛维为希尔德里克安排的变革性葬礼中有攀比展示的成分。事实上，如果弗隆海姆-古特林根墓葬不是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稍晚于希尔德里克墓葬，而是与之年代相

同，那么这种展示的竞争性会更强，因为那些墓葬的墓主可能是希尔德里克的对手，而不是他的随从。

至于这一习俗为什么后来会往社会下层传播，解释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显而易见的推力之一，是克洛维惊人的征服事业带给法兰克社会的新财富，而在他儿子们统治的时期，扩张也在继续进行。在这种背景下，也许可以合理地认为，年代较晚但仍然比较豪华的C组墓葬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这些墓主大概是中间层的领袖，他们的家人想跟随他们国王开创的风潮，以此显示死者的地位很高。这可能跟社会竞争也有关系，因为克洛维的征服使许多新财富流入新贵手中，赢家可能会借着墓葬来炫耀。接着，这种做法逐渐推广到普通得多的社会阶层，征服带来的财富向下渗透，在这些阶层中产生了想要炫耀自己的赢家，也许还有一些竭力掩盖自己失败的输家。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新秩序最终巩固，6世纪中叶那种看起来更稳定的行列式墓地出现之前。

不过，这个过程花了点时间。新的丧葬习俗得到确立是在约公元525年之后，当时距希尔德里克去世已近半个世纪，这段时间里，还有其他因素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基督教传来后，火葬习俗被视为不合理，很快就消失了。基督教虽然6世纪初期才开始在法兰克人中传播，但可能也在推动土葬方面起了作用，即使这与墓葬中展示的财富无关。[86]

从希尔德里克的墓葬到6世纪第二个25年的那些墓葬，墓主的社会地位是越来越低的。可见，新的葬仪应该和法兰克人势力的崛起，特别是和征服带来的财富所引发的攀比有直接的联系。使用随葬品的土葬习俗的传播，有很强的文化适应的成分——本地高卢罗马人显然接受了这种新的习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很少或没有法兰克移民进入高卢北部，也不意味着新仪式的传播完全与移民无关。我们反而完全有理由认为移民到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规模相当可观，在传播新的葬仪方面发挥了重要和直接的作用。

法兰克人在莱茵河西部移民的证据既有很具体的，也有很笼统的。在此有必要仔细研究克雷费尔德-格乐普的情况。如果本地人继续使用原来的那块墓地（情况似乎确实如此），那么关键问题就是：第二块墓地中埋葬着什么人？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是从使用第二块墓地的人传到使用第一块墓地的人当中的。考古发掘表明，使用第二块墓地的很可能是一群法兰克移民。在其他一些新的行列式墓地的中心地带，最早的那些豪华墓葬的墓主可能也是法兰克移民精英，当地的农村社会正围绕着这些法兰克人新获得的社会权力重塑，因此才有了埋葬地点改变、随葬品习俗得到采纳的事。初看之下，考古证据把我们带回了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遇到的僵局。一方面，新的丧葬习俗来自新的法兰克移民精英引发的涓滴效应。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本地人口接受了这种习俗，这在克雷费尔德-格乐普尤为明

显。而如果没有像克雷费尔德-格乐普和弗莱诺维尔那么明确的考古证据，我们是无法区分法兰克人和高卢罗马人后代的墓葬的。墓主既可能是法兰克人，也可能是高卢罗马人，还有可能两者都是，因为当时肯定有通婚的情况。但是，我们还可以把论证推进一步。

如果移民的唯一证据是在几个新的行列式墓地中心有一些随葬品丰富的墓葬，那么法兰克人迁移到高卢北部的过程可能会被认为是精英转移加文化模仿。但事实上，有很好的证据表明，上述文化适应过程的基础是规模大得多的移民潮。在此有必要谈一谈墨洛温王国各地总的延续和变化模式。我们看到，在卢瓦尔河以南发现了一些带随葬品的墓葬。但在这些地区，新的习俗还没有扎根，本地人口都坚持原有的丧葬习俗。因此，在整个法兰克王国境内，采用新的葬仪不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仅仅把零散的法兰克人丢到高卢，是远不足以让所有人都接受用武器和其他贵重物品随葬这个新观念的。

理论上，新的习俗在北方而非南方流行可能有好几种原因，但行列式墓地与法兰克人定居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一样，语言学证据在此也至关重要。笼统地说，法兰克移民带来的整体影响是将使用日耳曼语的地区的界限从莱茵河边境向西移动了100至200千米（地图1）。但这是一个复杂过程的最终结果，不是在公元500年前后一下子发生的。首先，法兰克移民似乎形成了多个相互关联的语言岛。即使在日耳曼语最终占主导的地区，一些在罗马时代比较重要的地方直到9世纪仍然通行罗曼语，特别是亚琛（Aachen）、普吕姆（Prüm）和罗马故都特里尔。地名证据则表明，比起如今的语言界限，讲日耳曼语的社群最初分布范围的界限要更往西。巴黎西北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都有日耳曼语地名，可见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一些讲日耳曼语的精英肯定在这些地区留了下来，而且停留时间长到能给最终出现的永久定居点命名（地图12）。比起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在高卢北部，多少称得上永久性的村庄和庄园出现得比较早，在7世纪而非8世纪就有了，因此零星的日耳曼地名未必能说明语言被保留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有一个世纪左右。[87]尽管如此，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一样，这些日耳曼语言岛只可能是除男人之外也包括妇女儿童的移民群体创建的，尽管使用日耳曼语范围的界限向西拓展得有限，大致表明了哪里才是法兰克人定居点最密集的地方。

虽然没有具体的历史证据，但这些移民迁至莱茵河以西的过程，很可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往英格兰的过程颇为相似。虽然高卢北部肯定算不上罗马帝国最富有的地区，但总体说来，它的经济比莱茵河以东的非罗马领土更发达。简单地说，克洛维取得胜利后，法兰克人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比起家乡，他们能在新征服的地盘上攫取更多的土地。这并不是说莱

茵河以东的土地上人口过剩（1065年的诺曼底也不是人口过剩），而只是说军事上的胜利带来了攫取财富的诱人机会，克洛维的追随者们也自认为应当得到财富。克洛维的统治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其追随者更认为自己理当获得巨大回报。他们不满足于从劫掠来的财物中分得一份，而是想要土地资产（罗马帝国的其他继承国中也出现了类似要求，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这些要求是必须满足的。[88]实际上，如果要求没能充分得到满足，追随者完全有可能转去跟随别的领袖。在我看来，高卢北部各地行列式墓地中那些最早的豪华墓葬，很可能是在考古学上反映了克洛维（可能还有他的继承者）的忠实追随者们得到的奖赏。

就像不列颠低地吸引着盎格鲁-撒克逊人，早在罗马帝国崩溃、法兰克人定居点能够建立之前，高卢北部的土地和财富就吸引着邻近的法兰克人。从3世纪开始，法兰克人就在莱茵河北部越境袭击，而在政治环境有利的情况下，整群的法兰克人会尝试吞并领土。例如，4世纪50年代发生过一桩著名事件，皇帝尤利安不得不驱逐在罗马内战中趁机控制了科隆及周边地区的法兰克群体。其中一些法兰克人声称他们受萨克森人袭击，成了难民，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有政治动机，但从越境袭击的悠久历史来看，罗马财富的吸引力实在明显。[89]此外，启动移民潮所需的信息场域已足够强大，高卢北部对前来的法兰克人而言绝不是什么“未识之地”（terra incognita）。

从史料中看不出这些法兰克移民单元的具体规模。语言变化的程度和持续时间表明，很多移民单元中包括妇女，应该也有孩童。如果移民的动机是获得政治奖赏（基本上就是如此），那么组成这些移民单元的很可能就是即将得到奖赏的战士，还有他们的家眷亲友。但是，正如后来维京丹麦律法区的相关证据所示，组成移民单元的也可能不是核心家庭，而是群体。维京人的整个战队似乎都和直接领导者周围的追随者一起定居下了来，法兰克移民也可能是这种情况。例如，有法律条文规定，被释奴永远依附于特定的自由民，因此自由民及其半自由的依附者可能会作为一个群体来迁移。地位更高的领主及其自由民随从（以及作为自由民随从的被释奴）可能也是如此。

语言岛大概就是这些移民群体定居后形成的。在移民集中的地区，最终会出现全面的语言变化；而在移民不那么集中的地方，他们的语言影响力只体现于日耳曼语地名。但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有所不同的是，法兰克人似乎在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之后才开始迁徙，而且高卢罗马人中好像也没有奥勒留·安布罗修这样的人物。因此，法兰克移民单元的规模可能比较小，政治结构对移民过程的影响也很明显。与诺曼征服的相似之处也表明，法兰克人攫取土地的过程不大可能完全受控于国王。从《土地调查清册》中就可以看出1066年以后的20年里有多少未经许可的侵占。可以合理认为，做

这项调查的原因之一是，在这20年的放任自流后，1086年时的威廉根本不清楚他的追随者中谁占有了什么。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法兰克人入侵高卢北部的过程视为非随机形式的推进浪潮，入侵者们在高卢罗马乡村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来占领。[90]

从现有的材料看，有许多问题无法解答，但大规模法兰克移民（尽管单个移民单元的规模可能很小）的证据是无懈可击的。就我们研究的问题而言，重要的是有足够证据表明移民与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的确立有明确关联。某种程度上，最初那些豪华墓葬和随葬品习俗在特定地方传播之间的关联可作为这方面的证据。更一般地说，在没有移民的地方，比如卢瓦尔河以南，就见不到行列式墓地。然而，认定行列式墓地和法兰克人移民之间有关，与用社会压力来解释新的丧葬习俗并不全然矛盾，还能用来改进这种论点。法兰克人（以及类似情形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诺曼人）移民以获得新财富为动机，说明社会压力至少在两个层面上起了实质性作用。

首先，克洛维和他儿子的法兰克追随者内部竞争激烈，都想分得更多的战利品（1066年后，威廉的追随者也是如此）。相关各方都很焦虑，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想到了模仿他们领袖在后阿提拉时代的做法，通过用大量的财物给死者陪葬来炫耀。其次，本地人口的压力也很大，他们遭到这些外来精英的入侵，还被纳入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强加给他们的社会秩序以三个等级及相应的权利责任为基础。法兰克人势不可当，社会重新洗牌，因此身处其中的本地居民需要根据新的游戏规则，想办法获得最好的结果。显然，如果你周围有法兰克精英，最好是去讨好他们，弗莱诺维尔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你也可以去谈判，到法兰克新统治者那里争取尽可能高的地位。不管怎么做，压力都会很大，在法兰克人炫耀自己征服得来的财富时，本地人也会努力去吸收在法兰克人中间流行的文化和其他规范。

就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和行列式墓地的出现而言，移民和社会压力两种解释并不冲突。法兰克人迁移的过程产生了竞争和社会压力，表现为人们广泛采纳起源于匈人帝国多瑙河风格的丧葬风俗。但这只是开始。谈判结束，谁是自由民、谁是被释奴、谁是奴隶确定下来后，新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巩固，正如行列式墓地和法律证据所示。

尽管史料有种种问题，但法兰克王国的创建涉及两个甚至更可能是三个层次的移民。卢瓦尔河以南很少有移民。那里只建立了几个要塞，虽然此地精英的生活呼应了法兰克国王的新要求，但文化和社会经济变化的程度有限。卢瓦尔河以北的情况则非常不同，尽管语言证据表明这个区域还需细分。在莱茵河和新的日耳曼语/罗曼语边界之间，移民比更往西的地方要多，长远看来，西边的移民只影响了几个地名。然而在高卢北部的两个地区，变化的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情况不是精英替代，而是像盎格

鲁-撒克逊人接管罗马不列颠时那样，重新定义了精英地位及其依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结构。本地居民的后代中，有些人能进入上层，但变革的革命性并没有因此减少，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一切都要归因于法兰克人那带来了大量移民的政治扩张。

大规模迁徙和社会压力

不管是法兰克人向高卢东北部的扩张，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列颠低地的接管，都不符合Völkerwanderung（民族大迁徙）的字面意思。既然它们都称不上“民族”（Völker），也就没有什么民族迁徙了。人们一度认为，迁徙过程在不列颠和卢瓦尔河以北的一些地区引发了类似于种族清洗的行动，但其实并非如此；公元600年的时候，这些前罗马行省中已经形成了新的种族混合体，而许多本地的罗马不列颠人和高卢罗马人显然是在其中的。这些种族混合体到600年时出现在了这些前罗马行省中。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在之前的两个世纪里，这两个地区的确出现了大量移民，无论移民人数具体有多少，他们都在几乎所有层面上带来了重大变化，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格局、行政组织，以及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的迁徙放在一起研究，一大好处是可以看出精英转移概念的局限性和滥用概念的危险。英格兰的诺曼征服是一种情况，外来的移民精英和当地已有的精英社会经济结构愉快共存；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要求获得回报的移民数量很大，足以引发社会及经济秩序的重大重组。这两种情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即便卢瓦尔河以北和哈德良长城以南这两个地方的移民只在人口中占少数，也不会改变上述结论。在这两个地方，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其影响远不仅仅是诺曼征服后那种简单的精英替代。

这引发了一个（也许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用哪些标签来表述这些情况最合适？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观点，但我认为，最好是只用“精英转移”来形容新移民的统治不会引发社会经济秩序重大重组的情况（比如诺曼征服）。这样一来，可以形容另一种情况（移民引发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重建）的标签就是“大规模迁徙”（mass migration）了。可能会有人担心这是开倒车，但其实传统侵略假说里那种会带来彻底人口替代的大规模迁徙已不再有人相信；因此，我们可以将“大规模”当作目前尚无精确定义的术语来使用。它还能与比较移民研究中对大规模迁徙的定性定义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所有社会层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都得到重塑，无论文化背景如何，所涉及的移民数量有多少，这都是巨大的冲击。

然而，比选择哪个标签更重要的是以下结论：就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样的情况而言，在讨论重大的文化变革（包括采用新葬仪等物质文化

方面的变革）时，移民并不是社会压力论之外的另一种解释。葬仪和社会压力之间的所谓对应关系并不总是成立，每个案例都需要仔细研究。不管是通常没有随葬品的墓地中出现的带随葬品的墓葬，还是行列式墓地等规整环境中通常带随葬品的墓葬，都不像是反映了社会压力。法兰克人方面的证据之所以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方面的证据好很多，是因为近来挖掘出了许多法兰克人的墓葬（最近对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墓葬的挖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得益于这些挖掘工作，我们能更彻底地探讨为什么他们一开始会选择用各样物品来随葬；在我看来，这正是需要用社会压力和移民一起来解释的问题。富有的外来者到来后，本地人开始使用新的墓地、采用外来者的葬仪，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免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的地主精英进城（确切地说是进村）后带来了问题，采用新葬仪是本地人（部分自愿，部分非自愿）对此做出的反应。

当然，这只是一种模型，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在克雷费尔德-格乐普，移民和本地人的墓地似乎始终是分开的，但本地人还是受到遵从的压力，与移民在文化上保持了一致。而法兰克人在征服之后才开始定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则在战争过程中就开始了，这在不同地方可能带来了相当不同的结果。与法兰克人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其他本地群体持续冲突，被征服的本地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而且前文提过，充分的语言证据说明，到了公元600年左右，不列颠低地的新地主精英还是以移民为主。

抛开这些特殊点不谈，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在很多方面体现并发展了本书探讨的多个主题。交通运输（盎格鲁-撒克逊人是首个通过海运移民的例子）和活跃的信息场域对形成这两次移民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证据体现了人口迁徙与发展模式的相互作用，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结构起到的重大作用。可以认为，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徙是调整不平等发展模式的机制。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之处的西欧虽然也发生了经济转型，但还是远远落后于附近属于帝国的区域，因此后者的财富有巨大的吸引力。与现代经济不同的是，当时的财富主要由农业活动产生，移民劳工也得不到高薪或高地位的工作——在莱茵河以西当农民和在更远的东部当农民一样无趣。因此，除了少数几个在罗马军队中占据高位的人之外，大多数外来者主要靠定期劫掠动产来取得财富。罗马帝国时期，这些财富一直处于军队和防御工事的保护之下。不列颠低地和高卢东北部在5世纪脱离中央帝国的控制后，外来者攫取资产的能力不再受帝国机构的限制，一段时间后，劫掠演变成了以夺取地产为目标的掠夺性移民。

因此，发展的不平等是这两次移民的最深层原因。但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并没有造成罗马中央控制的崩溃，而是控制崩溃的结果。他

们分别来到高卢北部和不列颠的时候，都破坏了当地留有的原先罗马行省的结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因为帝国无法在其边境保持足够的力量，才让这些罗马行省成了移民觊觎的对象。

但是，更大的图景是怎样的？将关注的范围扩大，移民在西罗马的崩溃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既然移民和发展模式紧密相关（本章内容对此有所体现），帝国的崩溃对（匈人时代之前的罗马及邻近地区）既有的不平等发展模式产生了什么影响？

---

[1] Campbell (1982), chapter 2。

[2] 从Freeman (1888)到Stenton (1971) 都持传统观点，认为当时出现了大规模迁徙。该观点一直有人挑战，而Higham (1992) 和Halsall (2007, esp. 357—68)代表了近年来认为移民人数较少的观点。近来认为当时发生了大规模迁徙的包括Campbell (1982), Härke (1992), Welch (1992)。Hills (2003)代表了一些新一代考古学家采用的移民人数很少的立场。Ward Perkins (2000)对各种观点做了很好的介绍。

[3] 见Woolf (2003)。

[4] H. R. Loyn，引自P. Sawyer (1978)。关于罗马不列颠的最好介绍还是Esmonde Cleary (1989)。

[5] 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以及地名发展的综述，见Hooke (1998)。

[6] 见Heather (1994)。

[7] Esmonde-Cleary (1989)对罗马不列颠的终结有很平衡的见解，Halsall (2007), 79—81, 357ff也是如此。对系统崩溃文献的介绍，参见Faulkner (2000); Jones (1996);Higham (1992)等。Dark (2002)的观点与此相悖。

[8] 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是Halsall (2007), 519ff，他提到了一些其他看法。

[9] 关于这些材料的介绍，见Dumville (1977)。

[10] Campbell (1982), chapter 2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清楚的介绍。

[11] 有关该材料的有用介绍，见Campbell (1982), chapter 2; Arnold (1997); Welch(1992)。

[12] 即使是哈尔索尔这样一位总体上持反迁徙论观点的学者，也很接受这一点，见Halsall (1995b), (2007), 357ff。

[13] 参见如Arnold (1997), 21ff。

[14] 《伊尼法典》24.2（参见23.3）；参见Arnold (1997), 26ff，以及关于沃珀顿的讨论。

[15] 例如，可以比较Weale et al. (2002)和Thomas et al. (2006)。被抽样的现代男性人群与他们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先祖居住在同一个区域。

[16] 因此，另一种思路采取了比较间接的方式，试图识别和分析5—7世纪土葬墓地中出土的遗骸中的“表观遗传”特征。这些特征反映的不是饮食或环境，而是遗传基因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揭示出，有武器陪葬的人的身高明显高于没有武器陪葬的人。人们还在争论，身高差异是应该用基因来解释（说明有武器陪葬的人属于入侵群体），还是应该用饮食差异等因素来解释，目前尚未得出确切结论：见Härke (1989), (1990)。

[17] 446年，见Bed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14；5.23, 24（根据Gildas, *Ruin of Britain* 20）。450年，见*The Greater Chronicle*, year of the world 4410；肯特王朝的创立者亨吉斯特和霍萨的到来，参见*Anglo-Saxon Chronicle* (449 AD)。

[18] 409年之前的事情都比较清楚，Zosimus 6.5记录了不列颠人409年的起义。真正的分歧从Zosimus 6.10开始，传统上将其解释为霍诺留告诉不列颠各省要自己负责防御，不过其文本已经损坏。这些事件的介绍和史料编纂，请参阅Salway (2001）。

[19] Gildas, *Ruin of Britain* 23—6.

[20] 关于410年前后撒克逊人的攻击，见452年的*Gallic Chronicle*（尽管该编年史并不都会把事件和具体年份联系起来）。关于可确定年代的最早遗存，见Welch(1992), chapter 8。Halsall (2007）的附录试图将这些事件的时间跨度进一步抻长，认为基尔达斯没点出名字的那位发出邀请的君主——通常认为是后罗马时代的人物——实际上是篡位者马克西穆斯（383—387年在位），而且是马克西穆斯将第一批撒克逊雇佣兵带到了不列颠。这么解释也不是完全不通，但并不是最自然的解释，所以还是不能下判断。Halsall基于第一种假设而建立的进一步论证是不可信的：见后注44和46。

[21] 基尔达斯写道，罗马不列颠人最后一次向中央帝国政府发出吁请的时候，埃提乌斯第三次当（或当过）执政官（446年或之后）。这可能进一步确证5世纪40年代是灾难重重的时代。在卢瓦河的不列颠领袖是利奥塔姆斯（Riotamus）：见*PLRE* 2, 945。

[22] 见Campbell (1982), chapter 2; Higham (1994)；Halsall (2007), Appendix。

[23] 见Dumville (1977)。

[24]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es* 4.42；参见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2.6ff。

[25] Bed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15（盎格鲁人、撒克逊/萨克森人和朱特人）；5.9（其他人）。

[26] Higham (1992), 180—1.

[27]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es* 5.26, 10.9；Procopius, *Wars* 8.20.8—10；特别参见Woolf(2003)。

[28] 比较出名的是，据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哥特移民也用了三条船：Jordanes,*Getica* 1.25, 17.95。

[29] 见本书第四章。

[30] 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DNA证据，见本书第九章。

[31] Gildas, *Ruin of Britain* 23—6.

[32] 关于撒克逊/萨克森人对高卢的袭击：见Ammianus 28.5。对"撒克逊海岸"的介绍，见Johnston (1977); Rudkin (1986)。

[33] 关于海平面上升，见Halsall (2007), 383ff中的精彩讨论。关于法兰克人的压力，见Gregory of Tours, *Histories* 4.10, 14。

[34] 卡劳修斯：见*PLRE* 1, 180。关于维京时期的相似现象，见本书第九章。

[35] Gildas, *Ruin of Britain* 20。虽然史料证据很少，但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爱尔兰人）侵入不列颠西部的考古证据无可辩驳。近期的精彩记述见Charles-Edwards(2003），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1。

[36] 见Woolf (2003), 345f.。

[37] 关于航海证据，见Jones （1996），不过他的讨论既没有涉及罗马船只，也没有谈到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长期内持续流动的情况。关于哥特人和黑海、汪达尔人和北非，见本书第四章。

[38] 有关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Dark (2002)；Woolf (2003)。

[39] 见如Higham (1992)；Halsall (1995a), (2007), 357ff。

[40] 精彩概述见Hooke (1998)。

[41] 相关概览包括Hooke （1998)；Williams （1991)。精彩的案例分析见

Baxter (2007),chapter 7。关于农民地位的降低，见Faith (1997), chapter 8。

[42] 关于该问题的介绍，见Hooke (1997)；Powlesland (1997)。

[43] 见Esmonde-Cleary (1989), 144—54；参见Loseby (2000) and Halsall (2007), 358f.中关于在后罗马时期建立城市的尝试的内容，两书均有参考资料。

[44] 关于农民起义，见如Jones (1996)；参见Halsall (2007), 360ff。

[45] Constantius, *Life of St Germanus* 13—18, 25—7。关于说罗曼语的精英，见前注3。著名的兰达夫（Llandaf）特许状可能进一步说明了后罗马时期的延续性，尽管对此有争议：见Davies (1978)。

[46] “只不过是抛弃了……”：见Halsall (1995), 61。讨论移民时，这种区别开“之前”和“之后”的方法的态度很常见。另一个例子见Hines (1997), 179中Higham的评论，该评论称赞Hines (1984)对一些遗存的重新解释“更复杂”，因为在讨论中剔除了通常认为移民起到的作用。该书第160页和第192页中有两个例子，说明包括哈尔索尔在内的一些学者因为决心最小化移民的重要性，而在处理证据时做出了方法论上有瑕疵的选择。

[47] 有许多类似的例子，近来关于巴尔干地区罗马结构衰落的概述，见Heather(2007）。

[48] 参见Woolf (2007), 123ff中的文献综述，其中除了别的文献外，还借鉴了Denison (1993)和Hall (1983)，它们有效反驳了Preussler (1956)和Proussa (1990)在古英语中寻找凯尔特语影响的尝试。关于后来中世纪语言变化的例子，见Bartlett (1993）, 111ff。

[49] 另见本书第二章。

[50] 这清楚体现在各类文献资料中，从历史叙事中对个体国王的批评到英雄诗歌背后的价值体系。关于一个人一生中有可能获得的土地和金钱，介绍见Charles Edwards (1989)；Campbell (2000), chapter 10。

[51] 对前维京时代大国的一般性介绍，请参阅Campbell (1982), chapters 3—4。

[52] 见Hooke (1998), chapter 3; Powlesland (1997); Esmonde-Cleary (1989)。

[53] 关于武器陪葬，见Härke (1989), (1990)。与欧洲大陆的对照，见本书第二章。

[54] Ward Perkins (2000).

[55] 见Kapelle (1979)。

[56] Woolf (2007), 127ff.

[57] 即使是诺曼征服之后的土地掠夺也不受征服者威廉的控制，尽管他的权威相对而言大一些。明确谁拥有什么的需要是编纂《土地调查清册》的原因之一：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1085年。我认为，考虑到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中央权威比11世纪的诺曼人弱得多，而且他们是在取得众多小战役的胜利后（而不是在获得像黑斯廷斯之役那样的一场决定性胜利后）零敲碎打地掠夺土地，因此5—6世纪的土地掠夺过程肯定无比混乱。

[58] 这也是Woolf (2007)的结论，当然也是所有不试图贬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重要性的研究的结论。

[59] 尤利安和法兰克人：见Ammianus 17.8.3—5。但这是孤立事件，不能说明法兰克人是否有阿勒曼尼人的那种联盟机制，尽管这当然是可能的。关于早期法兰克历史和考古的介绍，见Zollner (1970); Perin (1987); James (1988); Ament (1996);Reichmann (1996); R. Kaiser (1997)。

[60] 关于希尔德里克坟墓的材料和评论，见Perin and Kazanski (1996); Halsall (2001)。

[61] 有关希尔德里克的职业生涯，见*PLRE* 2, 285—6，以及参考资料。Halsall (2001),(2007), 269—71, 303—6支持“罗马的”克洛维的说法。关于贡多巴德，见*PLRE* 2,524—5。

[62] James (1988)引发了争议，Perin (1996)；MacGeorge (2002)提出反驳。

[63]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es* 2.40—2。

[64] 关于克洛维改变信仰的时间的争议，见Shanzer and Wood (2002)，关于其生涯的更一般讨论，见Wood (1985); Halsall (2001)。

[65] 关于狄奥多里克和阿马立家族类似的崛起过程，见本书第五章。

[66] 见Halsall (2007), 346f。关于马赛的崛起，见Loseby (1992), (1998)。

[67] 一般性的介绍见Halsall (2007)，347ff。Halsall (1995a)讨论了7世纪高卢北部真正贵族所赖的土地基础再次出现的情况。

[68] 关于特里尔的铭文，见Handley (2001), (2003)。关于雷米吉乌斯，见Castellanos(2000）。关于更广泛的文化变迁，特别是语言变化，见Haubrichs（1996）。关于法国北部教会结构，特别是主教教区的破坏，见

Theuws和Hiddinck（1996），66f.。

[69] 近期的概述见Perin and Feffer (1987), vol. 2; Wieczorek et al. (1997。

[70] 关于乡村定居点的介绍，见Van Ossel (1992); Van Ossel and Ouzoulias (2000);Lewitt (1991)。

[71] Werner (1950); Böhme (1974)。史料中提到的法兰克军官中，比较显赫的有弗劳马里乌斯（Fraomarius）、埃洛科斯（Erocus）、西尔瓦努斯（Silvanus）、马洛鲍德斯（Mallobaudes）、鲍托（Bauto）、阿博加斯特（Arbogast）。

[72] Halsall (2007), 152—61及参考资料。这个论点首先在Halsall (1992)中提出。Reichmann (1996), 61—4讨论了墨洛温王朝兴起之前法兰克群体的丧葬习惯。

[73] 关于"图图鲁斯"扣针，见Halsall (2007), 157—9；参见Böhme (1974)。此外，正如哈尔索尔注意到的，即使确定扣针有日耳曼起源，仍需要解释为什么墓葬中会有武器，因为那样的话，用武器随葬就成了罗马土地上采用的"新"习惯。

[74] 见本书第五章及前文。

[75] 关于阿莫里卡叛乱：见Zosimus 6.5。关于5世纪第二个10年：见Exsuperantius,*PLRE* 2, 448。后续历史见MacGeorge (2002)。

[76] Van Dam (1985), 16—20,25f.; Drinkwater (1989), (1992); Minor (1996)对巴高达现象持有略为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不再使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而是从当地群体如何应对罗马中央控制瓦解的角度来思考。

[77] 关于针对阿勒曼尼上位王的政策，见本书第二章。

[78] 概述见前注69。

[79] James (1988)探讨了该项研究的历史。

[80] Pirling (1966)以及Pirling and Siepen (2003)概述了正在进行的调查。

[81] James (1988), 25—8调查了这个风俗，对该风俗的讨论也贯穿于Werner (1935)；Bohner (1958)；Perin (1980)。弗莱诺维尔是Buchet的研究对象：见James (1988),110f.。有用的综述见Perin (1987), 138ff。

[82] 见本书"分裂的王国"这一小节。

[83] 有关"社会压力"解释，见Halsall (2007), 350ff。

[84] 传统的论点，见Perin (1996) 或Wieczorek (1996)；对其的批判，见

Halsall(2007), 269f.。

[85] 参考资料见前注69。

[86] 英格兰火葬的终结，见Welch (1992)等。

[87] 近来的精彩概述，见Haubrichs (1996)。关于先前出现的结构化地产，见Halsall(1995a)。

[88] 我将在下一章继续讨论这个更大的问题。

[89] Ammianus 17.8.3—5.

[90] 见Holt (1987)。

第七章
新欧洲

476年，也就是哥特人第一次向东罗马统治者请求庇护的100年后，东罗马还在继续经营，巴尔干半岛大部、小亚细亚、近东、埃及和昔兰尼加（Cyrenaica）都属于这个统一的国家。匈人帝国崩溃后，一些移民设法进入东罗马的巴尔干地区，但大部分接受了罗马帝国惯常的条件，被纳入了帝国体系。他们很可能保留了程度比较低的自治，但488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离开巴尔干前往意大利后，移民在巴尔干的军事力量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对中央帝国的控制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政治或军事威胁。

西罗马故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4世纪时，西罗马仍统治着从哈德良长城到北非阿特拉斯山脉的传统领土，和过去的350年一样——如果不考虑不列颠，那就是和过去的450年一样。而到了公元500年，这种长期存在的统一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继承国，除了不列颠群岛西部的一些小国，大多数继承国都是围绕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这些军事力量的前身在公元376年之前生活在帝国边境之外。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以从前罗马北非最富有的那些行省为中心建国，苏维汇人在西班牙西北部建立了另一个王国，西哥特人在高卢西南部和西班牙其他地区建立了第三个国家，而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勃艮第人在高卢东南部、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阿马立家族领导的东哥特人在意大利，也都建立了国家。

本书关注人口迁徙和发展，而无意全面探索西罗马的崩塌。罗马帝国500年历史中的内部演变，以及这样的演变如何导致帝国最终崩塌，都不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倒是应该梳理一下之前三章探讨的移民现象，看它们如何促成了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传统上认为，这些来自边境以外，后来建立王国的群体是“民族”，也就是文化同质的实体，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成员，具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基本上通过族内通婚而不是接纳外人来繁衍后代。浪漫主义的视野给这一行动添上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些建立王国的群体大多说日耳曼语。只要你愿意去一厢情愿地相信，就可以认为5世纪是日耳曼人400年来反抗罗马人压迫的高潮，反抗的起点是公元7年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森林会战中击溃瓦卢斯和他的军团。

最近的修正观点试图在若干关键领域推翻这种解释。首先，建立王国的群体不是“民族”，只是临时的人力联盟，既没有文化同质性，也没有强烈的认同感。其次，持修正观点的人因而认为，联盟中的人力主要是男人。其中可能有一些妇女，但不是很多，这些群体更像是军队而非民族。比较激

进的修正观点甚至主张，现有的罗马资料受到了迁徙主题的影响，将进入罗马领土的所有外来者都当成了“民族”。不那么激进的观点则认为，虽然一些蛮族参与了迁徙，但考虑到这些蛮族群体缺乏将成员凝聚起来的强有力群体身份，当时的情况更可能是少数人开始迁徙之后，人力以新的领袖为中心聚集了起来。第三，这个时期，罗马人和外来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敌意；将西罗马陨落过程形容为“惊人平静”的观点很有影响力。罗马人明显愿意与外来者达成协议，而外来者也无意摧毁罗马国家。帝国并不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毁于暴力灾难，而是消失于混合了偶然与共识的过程，蛮族外来者受邀入境，一些较大的罗马地主最终更愿意与蛮族达成协议，而不是继续给帝国缴纳用于帝国军队的税款。[1]

那么，根据关于西罗马陨落的传统观点和修正观点，4世纪末和5世纪的移民是如何形成的？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罗马帝国的崩溃对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的转型（换句话说就是发展）有什么影响？

帝国陨落

一些修正观点颇有道理。蛮族并没有阴谋推翻罗马帝国。我们一直在研究的移民绝大多数并没有越过边境，也没有刻意为此行军数百千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移民也是彼此独立行动，既可能和帝国作战，也可能互相争斗。5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西哥特人很乐意受雇于罗马，在西班牙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作战；5世纪20年代，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则向他们昔日的苏维汇盟友开战。后来，法兰克人与西哥特人作战，征服意大利时的作战对象则是阿马立家族领导的东哥特人，以及阿提拉帝国崩溃后被纳入奥多亚塞军队的各种难民。晚至465年，英吉利海峡以南的大多数群体仍不觉得西罗马即将终结。即使到了这么晚的时候，这些群体的政治议程还主要是与末期的西罗马建立有利的联盟，同时阻止其他群体这样做。[2]还有很多证据表明移民领袖和罗马精英形成了新的政治联系，跨越了罗马和蛮族之间的古老分歧。早在5世纪的第二个10年，接替阿拉里克成为西哥特联盟领导人的阿陶尔夫就为自己在高卢的事业争取罗马人的支持；汪达尔人征服北非时，也带上了一些西班牙罗马人。此类联盟一直延续到476年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被废，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可能建立于5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哥特人、勃艮第人和高卢罗马贵族试图依托阿维图斯（Eparchius Avitus）建立自己的帝国政权。[3]不过，修正观点的其他要素就不那么可信了。

我们时代的和平？

基于这些现象，所谓西罗马由一个统一帝国向多个继承国的转变基本上是

和平过程的观点，首先与证据不符。该观点最初的前提——最终建立继承国的外来群体一开始是受邀入境的——建立在很不可靠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罗马官员邀请了拉达盖苏斯的哥特人、莱茵河入侵者（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勃艮第人或匈人。换句话说，约405—408年的危机牵涉到的每群入侵者都是不请自来的，都遭遇了全力抵抗。约375—380年的早期边境危机涉及的其他规模较小的群体也是如此，比如泰法尔人、法诺比乌斯（Farnobius）率领的哥特人、萨尔马提亚人，以及在377秋天与反叛的哥特人结盟的匈人和阿兰人。情况类似的还有阿拉特乌斯和萨弗拉克斯率领的格鲁森尼人，这是376年夏末或秋初渡过多瑙河的两个主要哥特群体之一。这群人最初被排除在外，但他们利用罗马帝国和哥特特温吉人之间紧张局势带来的机会，渡过了多瑙河。

唯一真正获得允许后才进入帝国的外来者是哥特特温吉人，但当时的皇帝瓦伦斯可能也别无选择。376年夏天，哥特人抵达多瑙河并要求庇护时，皇帝正全力投入与波斯的战争。在一处边境作战的时候，只有笨蛋才会放任另一处重要边境起火。据一份史料记载，一番激烈辩论之后，帝国才做出了接纳特温吉人的决定，而且这在当时更像是控制损失的手段。皇帝兵力不足，无法同时对付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他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接纳一群人，排除另一群人。可以为证的是，皇帝实施了种种应急计划来消除特温吉人可能造成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对粮食供应采取战略控制，在出现问题时下令攻击特温吉人的领袖。在4世纪（以及之前），皇帝的确会不时从哥特人和其他附属国里招募分遣队为自己作战，甚至包括打内战的时候，但罗马人并不会因此允许大批武装人员永久进入罗马境内——这可比从边境之外招募武装部队，战争结束后再送他们回家危险多了。[4]

考虑到4世纪后期和5世纪越境进入帝国的蛮族群体显然不是罗马邀请的，有人针对405—408年的危机提出了复杂一些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帝国放松对相关边境的控制，从而发出了邀请的暗示。这有点像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的论点：英国出于经济考虑拆解一度巡航于南大西洋的“奋进号”扫雷舰，阿根廷的加尔铁里（Galtieri）军政府将其解读为英国不会阻止阿根廷接管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迹象。将这种类比应用于405—408年的危机会形成一个更可能成立也更有趣的论点，但论点并不是很有说服力。据说，触发蛮族入侵的因素是罗马军队从高卢北部边境地区撤出，罗马终止或大幅减少了给边境附属国的补贴。但问题在于，405—408年的入侵者大部分并不像补贴的主要受益者那样生活在紧邻帝国的边境地区，而是来自边境地区以外，有的甚至住得很远，比如阿兰人。不列颠和高卢北部的罗马军队并不少，凭借这些军队，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在409—410年秋冬几乎控制了整个西罗马。而且不管怎么说，第一次攻击（由拉达盖苏斯发起）的目标并不是据说已半

撤军的区域。简言之，没有理由认为空前的蛮族入侵潮与罗马明言或暗示的邀请有关。外来者使用暴力，自作主张地进入了罗马境内。[5]

最初的入侵后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同。从376年哥特人来到多瑙河到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被废，这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政治变动，没有哪次的根本目的是推翻帝国。但所有这些过程都涉及入侵者和罗马帝国间往往规模不小的定期暴力对抗。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100年间的政治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抗罗马当局，以免其在接触伊始就破坏群体的独立性。这是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376年到382年之间所做的。对那些在406年渡过莱茵河的群体而言，要在与罗马（及西哥特人）部署在西班牙的部队的最初冲突中活下来，军事力量和远遁北非的能力至关重要。勃艮第人在5世纪30年代似乎是得到同意后迁入了罗马领土，但这发生在他们被匈人击溃之后，而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似乎支持了这些袭击。

上述群体在第一次遭遇罗马力量后幸存了下来，而其他许多群体则没能如此。一些哥特子群体在376年到382年间被各个击破；拉达盖苏斯的部队在405年整个解体，许多成员被卖为奴隶，一些幸存者后来重新加入了阿拉里克的队伍。我们之前也看到，莱茵河入侵者同样在416—418年间遭受了重大伤亡，以至于三个先前独立的群体——阿斯丁格汪达尔人、西林格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合并成了一个。无论你怎么看，在与罗马帝国的初次相遇中幸存下来都并非易事。根据我的统计，从376年到最终在高卢定居的418年，联合起来形成西哥特的哥特人经历了11次大型战役和众多小型战役。[6]

总体的暴力程度对第一阶段人口迁移的两个具体特征至关重要。首先，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移民群体往往多次迁移。持续迁移是一种生存策略，这些群体要么以此促使罗马帝国妥协（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从巴尔干经意大利到高卢的行动就是如此），要么移居到更安全、更繁荣的地方，在那里继续对抗帝国（汪达尔联盟移居北非）。其次，如果没有这种程度的暴力，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没有持续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这么多的移民群体会结成数量较少但规模较大的联盟共同行动。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东哥特人等在罗马土地上形成的新政治单元，都是更有能力对抗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更大单元，其成员既能生存下来，也能获得更有利的条件。[7]

更多的暴力对移民政治活动的第二阶段至关重要：一旦最初的生存有了保障，就要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地位。两个阶段往往互相渗透，因为即使是376年的第一批哥特移民，他们进入帝国也不是只为了生存，而是还有别的野心；但移民的第二阶段还是很有特点，值得单独列出。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罗马与蛮族外交关系框架的出现，有了这样的框架，就不会出现毁灭

特定移民群体的事了。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而言，第二阶段开始于395年到418年间的某个时候，也明显体现在该群体之后与罗马帝国的外交接触中。从418年开始，外交的重点是西哥特人将以什么条件占据多大的领土，而不再是他们的存在是否应该得到容忍。即便如此，第二阶段仍是军事冲突不断：首先是在高卢南部，5世纪20—30年代，阿尔勒这个地区首府成了哥特人的目标；然后，5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卢瓦尔河和直布罗陀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冲突，当时尤里克（Euric，467—484年在位）领导的哥特人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独立王国。相比之下，汪达尔-阿兰联盟在5世纪40年代中期才进入第二阶段，当时，西罗马被迫承认联盟对北非的征服，而事实上该联盟的第二阶段并不像西哥特人的相应阶段那样稳定。西罗马在垂死挣扎之际，还在461年和468年两次试图夺回汪达尔王国。至于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并无必要正面对抗罗马帝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直接进入了第二阶段。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暴力的推动下，用征服和征用来追求他们的野心。[8]

现在让我们切换到罗马帝国的视角。移民暴力与西罗马崩溃之间的联系再直接不过。简单来说，罗马对一个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征税，以维持其军队和其他机构。经济还有其他部门，但农业占帝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会低于80%，许多学者认为比例还要高。在这种情况下，移民的活动直接影响了帝国税收，继而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生存能力。每当一片领土落入移民群体之手（例如西班牙各行省在5世纪第二个10年被莱茵河入侵者占领），能为国库做出贡献的土地就少了一块。此外，行省若是陷入冲突，哪怕没有被彻底征服，也将无力支付税款。罗马城周围的行省只被阿拉里克领导的哥特人占领了两年，而那之后的近十年里，这些行省缴的税都只有正常税率的七分之一。两个北非省份也获得了类似的减免，这两个省不属于5世纪40年代的汪达尔-阿兰王国，但在40年代中期被汪达尔人-阿兰人占领了3年。因此，也许可以大致认为，那些经历重大战争的行省的税款减少了七分之六。[9]

算一算有多少失去和受损的省份——它们可是西罗马的土地税基，你就会知道移民带来的问题有多么严重。早在420年，不列颠就完全摆脱了罗马中央的控制，授予西哥特人的加龙河河谷也是如此。此外，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被莱茵河入侵者占领或争夺，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西哥特人408—410年间的停留而遭受破坏。所有这些损失导致的税收减少完美体现于罗马晚期的军官与文官名册《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名册列出了5世纪20年代初的西罗马军队。建立于395年的野战军团中，大约有一半在这二十几年间被摧毁了。而此时加入军团的替代部队中有一半以上（97支队伍中的62支）只不过是在名义上升级为野战军的卫戍部队。不仅野战军受损后没有得到高质量部队的补充，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其他部队代替升了级的卫戍部队履行职责。军队的质量

和数量都急剧下降，这是帝国税基受到侵蚀带来的直接影响。[10]

更糟的还在后头。到了445年，西罗马最富裕的行省——北非的努米底亚、拜萨西恩和普罗康苏拉里斯——已经臣服于汪达尔人，潘诺尼亚（如今的匈牙利）的一部分归了匈人，勃艮第人和其他一些阿兰人则在5世纪30年代中期得到了高卢的小片地区。到了这个地步，西罗马近50%的税基已被侵蚀，资金即将耗尽。可想而知，当时的西罗马立法者会抱怨地主不愿缴纳税款，也会试图收回既有税收优惠。地主不愿缴税显然是一个重要现象，特别是因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此时不得不提高税率。此外，西罗马也在发明新的税种。但是，如果因此就说富人不愿纳税是西罗马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有人这么认为），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在帝国政治中，富人和有关系的人始终享有税收特权：你的朋友支持你赢得权力，原因之一是你能让他们富起来。这种现象之所以在5世纪40年代异常突出，是因为许多行省已落入移民之手或者因战争而遭受损失，西罗马的收入减少到了危险的低水平。[11]

罗马帝国遭受军事损失，政治能力也下降了，新的战略形势由此产生，移民得以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并从5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急剧扩张。这个时候，西罗马军队由于税收下降而陷入贫困，境况大不如前，面对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人（特别是刚开始或快完成在西罗马故地上建立权力基础的工作的法兰克人），西罗马没有丝毫胜算。从对税收乃至帝国军事机构的影响来看，武装外来移民和西罗马崩溃的直接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5世纪后，本地的罗马贵族越来越倾向于跟不同的移民达成交易，而这一趋势和贵族不愿缴纳高额税款一样，只是罗马帝国崩溃过程中一个非常次要的现象。同样，我们应该把这些交易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参与其中的本地贵族基本上是地主，他们的地产（财富的基本来源）大部分位于同一个地方，这些有形资产无法迁移。因此，如果地产所在的地方被划入了某个移民群体不断扩大的势力范围，地主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他们要么与移民领袖达成和解（如果可能的话），要么就有可能失去作为他们所有财富和地位来源的土地。这样的和解不会自动发生。我们看到，在不列颠低地，原先的罗马地主阶级完全无法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后幸存下来。[12]

认为西罗马的终结是个基本和平的过程，本地精英不再继续参与国家核心结构的决定推动，这种观点无法令人信服。恰恰相反，5世纪的种种政治进程都是通过暴力实现的。这些精英被夹在中间，别无选择，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只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与来到他们土地上的新势力达成和解。在这里，我们有时会忽视罗马中央政府和本地罗马地主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别。只看后者的话，是可以记录下许多和解的事件的。然而，之所以

会有这些事件，是因为移民群体先凭武力越过了边境，西罗马就此失去了税基，不再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像样的军队，各行省的地主因此被彻底地暴露在蛮族面前。

了解蛮族

论及4世纪末和5世纪的移民时，一些修正观点还是颇有道理的。这些群体大多是新的政治实体，而不是“民族”。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克洛维领导的法兰克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联盟，还有西班牙的苏维汇人，所有这些都是在迁移过程中创立的新实体。征服不列颠期间，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所有建立了西罗马继承国的群体中，只有勃艮第人比较特殊，尚无明确证据表明该群体中出现了重大的社会政治重组，不过这更可能是因为我们现有的信息不足，而不是因为勃艮第人在5世纪经历了平稳过渡——实际上，勃艮第人经历过不少起落。[13]

移民群体固然称不上“民族”，但如果要反过来主张同样简单化的观点，说它们只是如鬼火般时有时无、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规模实体的话，这也与证据不符。许多群体的规模都不小。我们现有的那些还算可信的数据表明（其可信度由这些群体有能力对抗罗马野战军主力得到确证），其中最大的群体能够投入1万多，有时超过2万的战斗人员，尤其是在5世纪的合并进程启动之后。在这些大型集团中，群体身份起作用的方式并不像传统民族主义正统观念想象的那样简单。就连战斗人员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至少在较大的联盟中，战士中有两个不同的地位群体，而且很可能有第三个群体（非军事化的奴隶）。我们不可能知道其中有多少奴隶，但人数应该不会少。一些建立王国的群体甚至跨越了重大的文化界限，说日耳曼语的汪达尔人和原本讲波斯语的游牧阿兰人的长期联盟就是典型的例子。406年12月31日之前，汪达尔人在多瑙河中游遇到阿兰人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那肯定非比寻常，值得我们深思。[14]

这些事实毫无疑问，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新的群体身份毫无意义。新群体中有地位较低的战士和奴隶，可见不是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全面参与。这些地位较低的人也不像地位较高的战士对群体有那么深的认同。但是，完全参与也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特权。统治家族换得太快，很难将群体身份描述为对某个王朝的短期忠诚。推翻最后一位阿马立家族的统治者后，东哥特人还是保留了原有的身份。我认为，在此期间定义和重新定义群体身份的主要推手和受益者，正是地位较高的战士群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人可能占到了武装男性的1/5到1/3。尽管身份需要定期调整（也许主要是政治上而非文化方面的调整），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人构建的群体身份很容易被破坏。最近有人主张，在较大的群体中，东哥特人并没有在493年之后从意大利的土地上轻易消失；而在较小的群体中，赫鲁利人和鲁吉人以

不同方式表现出了哪怕在重大失利后也还能继续存在的能力。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但移民群体不仅有可观的规模，而且具有相当大的结构韧性。而这个时代特有的暴力程度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5]

社会科学家刚开始思考群体身份时，普遍假定人口群体由于地理区隔而在政治和文化上变得彼此不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个重大进步是，人们认识到活跃的群体身份往往产生于恰恰相反的情境，即表现为竞争的紧张接触。

发展出群体身份，通常意味着加入某个有能力保护一系列利益的实体。对4世纪末和5世纪的事件稍加回顾就能发现，暴力——竞争性接触的象征——促成了身份的调整，继而形成了能建立王国的新的蛮族联盟。一些新的身份（特别是西哥特人和汪达尔-阿兰联盟的身份）是在需要依靠更大的群体来在罗马土地上生存的移民中产生的，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对抗罗马帝国为避免外来者集聚构成威胁而制定的传统政策。另一些身份诞生于阿提拉帝国崩溃之后，这个帝国的崩溃也引发了激烈的竞争：因匈人而聚集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众多武装群体彼此相争。还有一些身份在希望接管崩溃中的西罗马的土地资产的群体中形成。最初为生存而联合的西哥特人和汪达尔-阿兰联盟正好可以玩这个更有利可图的游戏，而又有一些新的群体为了参与这场抢地运动而形成，其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东哥特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进入不列颠低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属于这一类，只是规模较小。

所有这些新的群体身份都诞生于暴力，虽然是新近调整的产物，但它们相当持久，至少在地位较高的战士（他们是新群体追求的野心的主要受益者）中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即便是地位较高的战士，都同样认同新的身份，也不是说这样的身份就牢不可破。现代的群体身份也一样。但是，在4世纪末和5世纪出现的群体身份是真正的政治现象，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王朝幻想。[16]

相应来说，这些群体迁移时阵仗很大。前文谈过，有些很有分量、不容忽视的历史证据表明，当时有一些大规模的混合人口群体带着庞大的车队上路。阿米阿努斯对376年的哥特人的描写尤为详尽，他描述了不同蛮族群体的活动，我们不应认为这是受了迁徙主题的影响。正如修正后的群体身份概念所示，建立王国的庞大人群在从A点迁移到B点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影响。这些群体一路上吸收额外的人力，将他们酌情分配到群体中的各个岗位上：在日耳曼人主导的群体中，这些人应该或是以自由人身份成为地位较高的战士，或是以被释奴身份成为地位较低的战士，或是充当不拿武器的奴隶。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他们的迁移只是规模较小的现象。这与当今的移民单元肯定有所不同，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大规模混合人群的形式迁移是很合理的，因为那时非罗马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他们要进行

的又是这样不容易的迁徙。

从叙事中，可以看出三种主要的移民类型。第一类是在匈人力量崛起时，因领地受到直接或间接威胁而越境进入帝国的外来者混合群体。376年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属于此类，我认为405—406年拉达盖苏斯领导下入侵意大利的哥特人，以及不久之后渡过莱茵河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也属于这一类。如前文所述，这两波移民潮中的许多不同支流最终重组为两个大型联盟：西哥特联盟和汪达尔-阿兰联盟。每个联盟都有能力在战场上投入一两万名战士，也都包含妇女和儿童，更别说奴隶了。所有这些群体的移民动机本质上都是政治的和消极的，那就是对匈人的担心；但随着接触越来越多，他们也开始计算在罗马领土上占据有利可图的位置需要付出些什么。组成西哥特联盟的群体从乌克兰经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迁往法国南部，还有些群体从中欧（而阿兰人是从更远的东部）经西班牙迁往北非，这些都是长途迁移的壮观例子。他们的跋涉采用间隔迁徙的形式，两次迁徙间有相当长的停顿，而不是连续迁移，因为移民是不断发展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时间上的间隔也反映了跋涉的距离，因为每次出发之前，都需要获得可以迁往的地点的信息。来自现代匈牙利或附近地区的汪达尔人最初出发时，肯定对如何从西班牙去到北非一无所知，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可以这么做。[17]

第二类群体因阿提拉死后的混乱而迁出匈人帝国心脏地带——多瑙河中游地区，不少群体中也包括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些群体的规模相当大。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来自潘诺尼亚，有1万多名战斗人员，此外还有妇女和儿童。加入意大利军队或阿马立车队的苏维汇人、赫鲁利人和鲁吉人肯定各自都召集了至少几千名战士，其中至少赫鲁利人和鲁吉人也带着妇女儿童一起迁移。[18]这些群体的动机同样有一部分是政治的、消极的，那就是对匈人帝国崩溃后相互竞争的其他群体的忌惮。迁徙也有很浓的机会主义色彩。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精心计算后，决定先去东罗马领土，再与色雷斯哥特人联合起来，前往意大利。两次迁移都不仅是为了逃离眼下的局限和困难，也至少在同等程度上是为了去目的地追求更大的繁荣。与第一类群体相比，第二类群体的机会主义色彩更重，迁徙的距离则较短。狄奥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从匈牙利到塞萨洛尼基、君士坦丁堡、阿尔巴尼亚，再到意大利的长征很了不起，但与汪达尔人史诗般的跋涉或西哥特人经历的考验和苦难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分别向高卢东北部和不列颠低地迁移，采取了第三种形式，尽管两者之间有明显差异。这类群体迁移的距离更短，移民单元通常更小一些。考古证据表明，罗马高卢地区法兰克人定居点最密集的地方，离他们之前的定居点也就100千米左右。盎格鲁-撒克逊群体固然必须越过英吉利海峡和/或北海，但这样的迁移距离也不算长。第三类群

体的迁移动机也不同。当时的北海可能侵蚀了一些大陆沿海地区，使一些长期以来用于耕种的土地无法再用。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的动机是积极的、掠夺性的。罗马帝国失去对高卢和不列颠的有效控制后，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随之而来。此前，碍于罗马帝国的军队、舰队和防御工事，这两个群体除了突袭之外不能有别的作为。这两次迁移都在相当近的地方填补了权力真空，目标地区较发达的经济和更容易获得的土地财富很有吸引力。因此，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单元不需要像前两类群体那么大，尽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群体应该比法兰克人的大一些，毕竟他们在不列颠的征服和定居是同时发生的。当然，这两股移民潮除了战士，还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些动机积极的扩张主要由较小的单元迁移较短的距离后实施，与人口规模更大、动机更复杂的群体的长距离大迁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

美丽新世界

所有这些移民在他们创建的新王国的人口中都占少数。在那些长途迁移后形成的王国中，移民的人数很少。东哥特人大约有数万，但再怎么多也不会超过10万——当然如果奴隶人数比较多，这个估计可能偏低。[20]通常认为晚期罗马意大利的人口为几百万。出于讨论的目的，我们暂且将其估计为500万，那样的话东哥特移民将不超过总人口的2%。不管你怎么摆弄这些数字，基本比例都不会有太大变化。东哥特移民只给后罗马时期意大利的总人口带来了很少的增长。汪达尔-阿兰联盟和勃艮第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与东哥特王国比起来，这两股势力建立的似乎只能算二流国家（勃艮第人的国家肯定是二流的）。从意大利人、北非人和高卢人的角度看，这些移民潮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精英替代，充其量只是部分精英替代。在新移民创建的王国中，许多具有罗马血统的本地地主保留了原有的地位，罗马文化，以及甚至一些政府机构都得以保留。高卢和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尽管起源不同，但也属于这一类。哥特人最初于418年定居在加龙河河谷之时，对当地人口增加的贡献肯定更大，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少数。尤里克创建的王国更大，范围从卢瓦尔河到直布罗陀，哥特移民在其中占的比例很可能比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意大利所占的比例还要小。

高卢北部，特别是东北部的法兰克人，以及后来成为英格兰的地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虽是少数，但流入后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要大一些。但即使这样，他们在所在地区人口中占的比例恐怕也不会超过10%太多，而且这种比例在某些地方可能要低得多。在高卢和不列颠，特别是在高卢，6世纪下半叶的新地主精英中可能有一些是从前高卢罗马人和罗马不列颠人的后代。但这不应妨碍我们认识到，高卢东北部和不列颠低地的情况截然

不同于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和高卢其他地区的情形。在罗马的西北部故地，精英阶层及其文化规范在400—600年之间被完全重塑，而从前的别墅地产被分割成不同大小的地块后，作为精英身份基础的土地资产得到了彻底的重新分配。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的移民给本地人带来的，也许只是相对无关痛痒的部分精英替代，而法兰克移民之于高卢东北部、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之于不列颠低地，则是引发深刻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化的大规模迁徙。将上述不同类型的案例与以诺曼征服为代表的完全精英替代放在一起，就能看出有三类情况：部分精英替代、不影响主要社会经济结构的精英替代，以及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规模迁徙。

但即使只讨论部分精英替代的情况，也还是要考虑4世纪末到6世纪初的人口迁移（既有个体迁移，也有集体的大规模迁移）处在何种水平这个问题。首先，这段时期内的移民摧毁了历史悠久的罗马帝国大厦，至少摧毁了西罗马的那一部分。帝国始终受到其经济、政治和行政限制的束缚，但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如果没有大批武装移民进入帝国而产生新的离心力，帝国会在5世纪灭亡。移民作为整体肯定“做出了贡献”（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妥当），给罗马世界或至少其核心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冲击，尽管帝国崩塌后，有一些罗马地主未受影响，某些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罗马机构也保留了下来。罗马帝国是一个强大的有机体，在500年的时间里塑造着四境之内的文化、宗教、法律、土地所有权等方方面面。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因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摇摇欲坠，通信和官僚技术实在有限，无法对各地实施有效的日常控制。然而，帝国的结构长期以来为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模式演变设定了宏观条件。要完整列举的话，需要另写一本书，但帝国的影响包括：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和由国家构建的运输系统决定了经济互动的模式，其法律结构定义了财产所有权，也就定义了社会地位，其职业架构（要求精英具备成熟的读写能力）支撑起整个教育系统，等等。甚至宗教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决定。随着基督教在4世纪和5世纪发展为大众宗教，教会的权力结构与帝国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考虑到所有这些，帝国灭亡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从此西欧的地方社会和文化将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我们会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简要做些探讨。[21]根据移民研究使用的定性概念，总的来说，匈人时代的人口迁移在各方面都称得上大规模迁徙。

根据同样的定性定义，从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低地的影响上看，他们的迁移也算得上大规模迁徙，只是影响范围较为局限。从零开始在入侵的精英中重新分配这些地区的土地资源，带来了许多文化、经济和政治变革，“大规模”的标签因而也适用。在其他只发生了部分精英替代的继承国中，本地人遭受的冲击要小得多，但仍有一些经济资产被转移了。前几代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土地资产从以前的罗马所有者手里转移到了至少一些移民的手中（就好像不列颠和高卢北部的情况）。

研究蛮族问题的上一代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修正，这也呼应了当时弱化西罗马陨落重要性的普遍趋势。修正论者认为，至少在一开始，外来的蛮族获得的回报并不是从罗马人手中夺来的土地，而是这些土地产生的一部分税收，而这种交换不至于像夺取土地那样引起那么多摩擦。[22]本书篇幅有限，无法详细讨论与该问题有关的技术证据，但我认为修正论的观点仍未得到充分证明。各地存在重大差异，有的地方可能采用了调整税制的措施。尽管如此，我很肯定，在所有主要的继承国中，土地资产转移都是新近占据统治地位的移民获利的核心手段——最近对修正论观点的调整也多少承认了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每个移民群体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同样多的报酬，有些成员甚至什么报酬也没有。诺曼征服的相关记载比较详细，可以作为类比。《土地调查清册》表明，威廉那些比较重要的支持者得到的报酬比地位较低的同伴要高得多，而许多普通的诺曼士兵根本没有得到土地。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般来说，移民得到的回报与他们原本在群体中的地位是对应的。但是，即使一开始只有地位最高的人能获得丰厚的赏赐，他们接下来也需要去回报自己的主要支持者（就像1066年后直属封臣所做的那样）。在4世纪末到5世纪的移民群体中，国王直接赐予的土地奖赏也许只能达到高级别战士阶层（自由民？）的领袖这一级，尽管按照诺曼征服的模式，地位略低一些的成员，以及部分甚至全部低级别战士都可能从自己追随的高级别战士那里得到一些东西。[23]详细证据还表明，在部分精英转移形成的王国内，土地转移仅限于特定地区。

尽管汪达尔-阿兰联盟拿下了罗马北非最富有的省份（普罗康苏拉里斯、拜萨西恩和努米底亚），给整个地区的政治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但只有部分地区经历了较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冲击。征服此地之后，盖萨里克驱逐了一些较大的罗马地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以奖励他的重要追随者。但是，这种地方层面的破坏只发生在普罗康苏拉里斯。在拜萨西恩和努米底亚，本地地主似乎没受什么影响；他们所受的冲击也仅仅是新王国的中央政治体系开始了运作。普罗康苏拉里斯的大部分土地归不在当地的意大利罗马元老院家族所有，因此在这里夺取土地不会引起太大的政治敌意，付出的代价估计是最小的。从战略上讲，普罗康苏拉里斯也面向着西西里和意大利——罗马可能发起重大反攻的地方。[24]

阿马立家族领导的东哥特人拿下意大利和汪达尔-阿兰联盟拿下北非一样，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但所造成的社会震动也许没那么大，因为总体而言，狄奥多里克在新王国里采取了安抚原先的罗马地主的政策，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征服的时候，他一度以剥夺土地来威胁不支持自己的罗马人。但征服之后，他在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与他们交好，许多人在他治下保留了自己的精英地位。狄奥多里克似乎和盖萨里克

一样，把丰厚的土地资产和分享年度贡物的权利赐给了重要的追随者，但并没有采取在普罗康苏拉里斯的那种强征手段。

哥特人的定居点集中在意大利半岛的三个区域［亚得里亚海沿岸、拉韦纳和罗马之间的皮切努姆（Picenum）和萨谟奈（Samnium），意大利北部平原西北面的利古里亚（Liguria），以及东部的威尼托（Veneto）］。这些区域中发生转移的应该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可能公共和私有的土地都包括在内。以往从事农作的佃农们很可能没受什么影响。据我们所知，这些转移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混乱。事实上，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王国面积够大，要找到所需的地产也许比在小王国里容易一些。不管怎么说，迁徙而来的哥特军事精英确实形成了新的政治主导力量。一些罗马精英参与了宫廷政治，但从现有的叙事资料判断，哥特移民在王位继承、开战等关键政治领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东哥特人拿下意大利似乎只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尽管其政治影响要大得多。[25]

西哥特和勃艮第王国的情形也类似，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勃艮第王国颁布的法律规定，受影响的罗马地主必须交出三分之二的地产，西哥特王国的规定则是三分之一。相关证据同样需要仔细讨论，本书不做展开，但一个特别相关的因素是，5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西哥特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从卢瓦尔河两岸一直到直布罗陀海峡的范围。换句话说，它比以罗讷河河谷为中心的勃艮第王国大很多倍。略加思考就能理解，较小的王国中土地资产有限，需要更多依靠征用来满足新近到来的外来者。但除了这方面的不同，有证据表明在不列颠和高卢东北以外的其他地区，情况都大致相似。在所有通过部分精英替代建立的继承国中，移民都带来了足够瞩目的政治冲击，毕竟领土易手了，但只有少数地区的本地人口会认为这些移民是“大规模”的——在这些地区，大量土地移交到移民手中，比如普罗康苏拉里斯和东哥特王国的三个定居点群。至于西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我们最多只能基于地名和/或考古证据来猜测定居点最密集的地方是哪里。[26]

另外，从移民自身的角度看，“精英转移”（不管是不是部分转移）之类的简明术语远不足以体现他们行动的性质。就算他们最终成功定居并发展起来，他们之前也经历了颠沛流离，留下了创伤。406—439年，汪达尔-阿兰联盟分两个阶段迁徙，先是从匈牙利大平原迁移到西班牙南部（2 500千米），然后又向南和向西迁移了1 800千米，最后才夺取了迦太基——这需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当然在那之前，联盟中的阿兰人在约370年到406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从顿河以东出发，向西跋涉2 000千米，才到了匈牙利大平原。如此远距离的迁徙，对群体中较弱的成员（老弱病残）是极大的折磨，而且迁徙往往采用大跳跃的形式：从顿河到匈牙利，从匈牙利到西班牙，还有（可能磨难稍小一些的）从西班牙到北非。每次这样痛苦

的“跳跃”都会带来重大损失。总体而言，这样的旅行甚至可能破坏群体的年龄结构，因为老年人和年幼者的死亡会超出正常比例。被迫长途跋涉的现代政治移民往往筋疲力尽，很多人集中在一起又容易诱发疾病，因此这样的旅程常常是致命的。1994年来自卢旺达的难民中有近10%——数量达到惊人的10万人——在逃亡路上死于霍乱和痢疾。公元第一千年的大多数移民可能计划得更周全，准备得更好，但考虑到现代的情况，我们恐怕不能低估迁徙本身造成的损失。

与罗马的冲突大大增加了损失。例如，移民最初渡过莱茵河时，高卢和西班牙本地居民遭受的损失可能比移民遭受的更大。但是，前面提过，罗马在5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末期发起反击，摧毁了两个自主汪达尔群体中的一个（西林格），阿兰人（当时是入侵者中最强大的）受到重大打击，只能臣服于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领导。从仅有的一点资料看，汪达尔-阿兰联盟后来征战北非时可能没有遭遇同等规模的损失，但至少在早期，战斗还是很艰苦的。[27]面对迁徙的漫漫长路、激烈的军事冲突，移民的身心受尽折磨，就算他们最终能在罗马北非最富庶的省份中成为新的精英，创伤也难以抹去。

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的情况也类似。我们特别来看一下最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一惊人的成就让他们获得了此地的财富，而他们也乐于享用。初看起来，他们的迁徙似乎没有造成太大创伤，但在473年到489年之间，他们（至少是最初由阿马立家族领导的潘诺尼亚群体）向南跋涉了近1 000千米才从匈牙利到达色萨利（Thessaly）。到了476年，他们向东北前进了500千米，来到多瑙河岸边。然后在478年和479年，他们又迁移了1 200千米，先向南迁至君士坦丁堡，然后又向西行进，（经塞萨洛尼基）到达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迪拉基乌姆。与东罗马在482/483年达成协议后，他们似乎被安置在东北600千米处，再次回到多瑙河岸边。然后在5世纪80年代中期，一支哥特分遣队为芝诺皇帝效力，攻打小亚细亚的篡位者伊卢斯（Illus）（往返各1100千米）；接着，整群哥特人先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距多瑙河400千米），又跋涉1 500千米前往意大利。如果约达尼斯的记载可信，那么在所有这些迁徙之前，还有一次5世纪50年代中期的迁移，当时是从喀尔巴阡山脉东麓迁徙到西麓，距离是700千米。

冲突是少不了的。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没有遭受汪达尔-阿兰联盟在西班牙经历的那种失败，但是他们与东罗马人、色雷斯哥特人（一开始）、篡位者伊卢斯打了很多场仗——473—474年，476—478年，478—482年（在479年时失去了整个车队），484年，486—487年，还有489—491年。总而言之，创伤是很严重的。

西哥特人的迁徙距离与东哥特人（从东喀尔巴阡山脉到高卢西南）的相

似，他们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勃艮第人的行动比较保守：从德意志南部迁往莱茵河，然后向南进入日内瓦湖及更远的地区。但是，虽然他们没有在长途跋涉上受苦，却遭受了大得多的损失，尤其是在5世纪30年代被匈人统治期间。所有移民的生活方式都陷入了混乱，而不管从罗马的角度怎么看，移民们所经历都只能描述为大规模迁徙。[28]

移民与发展

罗马帝国崩溃期间，移民与主流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深层次的。显然，对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两个短距离迁徙的群体而言，罗马行省经济产生的财富是巨大的拉力。4世纪时就有了为防御他们而建造的工事，可见财富差距从莱茵河和北海另一边发出召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旦罗马帝国的中央权力瓦解，事情就自然发生了。一度被武力驱逐出罗马领土的外来军事力量，如今控制了附近更发达的经济区，而后来发生的事就尽人皆知了。

发展上的差异也部分解释了长距离移民做出的选择。他们的动机通常很复杂，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他们经常迁往自己缺乏直接了解的地区，那里罗马帝国的力量依然活跃，因此他们要面对大得多的军事威胁。对他们而言，做出迁徙的决定需要非同寻常的刺激因素，也就是围绕匈人帝国兴衰的戏剧性事件产生的刺激。在由匈人引发的最初两股移民潮（分别是375—380年和405—408年）中，迁徙动机——逃避匈人统治的愿望——是政治的、消极的。匈人帝国解体后，迁徙的动机仍具政治性，但比之前的要积极。他们朝罗马领土进发，是为了从那里的大量财富中分得更大的份额，5世纪70年代，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迁徙受此动机驱动，稍后的伦巴第群体也是。但即使是早先在375—380年和405—408年迁徙的移民，他们也一定程度上受到罗马财富的吸引。匈人的侵略可能促使他们决定离开家园，但他们既可以去罗马帝国之内，也可以去帝国之外寻找新的住所。多数人选择进入帝国，这反映出罗马财富的巨大吸引力。可以合理地认为，该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帝国边界之外的蛮族以移民为手段，试图从帝国境内欧洲发达地区的经济财富中分一杯羹。[29]

同样重要的是，普遍的发展水平至少可以解释长距离迁徙的移民单元看似奇特的性质。由于当时的非罗马欧洲社会只能投入数百名职业战士，因此任何涉及罗马国家的迁徙都得带上妇女和儿童。和更早的时期一样，要想为如此雄心勃勃的行动召集足够的军事力量，就只能扩大招募范围，而一些武装人员肯定会带着家眷同行。蛮族欧洲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征也促使家庭加入迁徙队伍。在蛮族欧洲，至少是在奥得河以东（属于普热沃斯克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圈）的日耳曼群体中间，主流农耕制度决定了中欧和东南欧的人口有改变定居点的习惯。过一代人就换一个定居点，以寻找更

肥沃的土地，这样的迁移显然完全不同于4—5世纪的那些重大移民事件。但比较移民研究表明，经常改换定居点会让他们更容易被说服，从而加入有望通向罗马领土的有组织大规模远征。

我认为，移民与发展间的关系还在另一个层面上深刻影响了迁移行动。375—380年和405—408年的首批长距离移民中，一些人之所以能在罗马土地上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快速调整身份认同，组建罗马帝国难以摧毁的大型群体。376年夏天出现在多瑙河边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原本各自的规模就不小，在两年后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显然也很走运。那个时代没有其他对抗能产生这样一边倒的结果，它为哥特人带来了喘息的空间，也就是382年条约赋予他们的半自治身份。当时，罗马仍希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凭武力重新谈判，使条款更符合罗马的传统移民政策。挫败罗马希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阿拉里克统治时期促成的联合，也就是376年最初的哥特群体与拉达盖苏斯后来攻打意大利时的幸存者之间的联合，西哥特人由此诞生。418年，罗马与这支壮大了的力量谈判，在达成的条约中被迫承认，自己不可能摧毁眼前这个统一、自治、居住在罗马境内的哥特群体。类似的联合进程也促成了汪达尔-阿兰联盟和阿马立家族领导下东哥特人的生存和繁荣。就上述群体而言，如果没有实现联合，罗马帝国就可以对较小的群体各个击破——当时许多小群体的命运就是如此。要想生存下去，移民就必须有能力重组为能投入一两万甚至更多兵力的实体。[30]

也就是说，第二章中讨论的日耳曼社会的长期转型与4—5世纪的迁徙大有关系。如果匈人在1世纪而不是4世纪到来，将当时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那些日耳曼群体撵走，那么情况会大不相同。由于1世纪日耳曼世界的主要政治单元规模较小，如果要创建能召集2万甚至更多战士的实体，就得把大量政治单元卷入极为复杂的政治调整过程，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组成5世纪那些创建王国的群体的，不会超过6个政治单元，有时只需要三四个。那时，组成群体的基础单元规模已经够大，应付罗马帝国所需的2万多名战士更容易召集。而如果想在1世纪集结这么多目标一致的日耳曼战士，可能就得联合十几个规模较小但竞争激烈的单元，那样的话，政治问题就会非常严重。

话虽如此，4世纪末和5世纪移民的政治联合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创建王国的每个新的超级群体都由四五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都有自己既有的领袖。也就是说，新联盟中总会有四五个潜在的领导人，他们中只能留下一个，其余的都得以某种方式淘汰掉。迫于罗马的暴力威胁，人们普遍认为建立新联盟是必要的，一些潜在的竞争者似乎也愿意为此退出竞争。在东哥特人中，胡尼蒙德（Hunimund）的儿子格西蒙德（Gesimund或Gensemund）这位独立的哥特战队领袖被人铭记，因为他决定支持狄奥多里克的阿马立王朝，而不是自己上位。不过，其他的竞争者就没有那么顺

从了，得采取手段压制。胡尼蒙德家族的其他成员极力主张领导权，阿马立家族不仅要对付他们，还得击败另一位哥特国王维尼塔里乌斯（Vinitharius），这个群体在472—473年进入东罗马后，阿马立家族还要对付色雷斯哥特人的首领特里亚里乌斯（Triarius）家族。克洛维则至少消灭了7个敌对国王，才统一了法兰克人。至于其他一些新的联盟，我们无法研究其领导权争斗的细节，但争斗肯定发生了。[31]

此外，这些新统一起来的超级群体间的权力斗争本身也和发展模式相互作用，因为斗争也有赖于能从罗马得到的资源。罗马边境之外的蛮族政治单元规模较小不是偶然，而是结构性的，反映出国王可用来再分配的财富数量有限——国王靠这个在追随者中建立忠诚；而我们也知道，就连这些财富也大多来自罗马。但是，罗马土地上可以直接或间接攫取的更多财富使蛮族政治有了更多可能性，蛮族领袖能够怀柔并控制更多的追随者。经过审视，唯一一个像反例的例子其实并非反例。古典时代晚期，罗马帝国之外的欧洲出现了一个大型的跨区域大国：5世纪的阿提拉匈人帝国。但即使是这个帝国也无法靠非罗马经济产生的资源维系。它依靠掠夺和索贡，获得了大量来自罗马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流一旦切断，匈人帝国就崩溃了。非罗马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本身维持不了有能力在罗马故地上建立继承国的政治结构。[32]

因此，当蛮族因匈人逼近或罗马帝国衰落而迁移的时候，发展程度上的普遍差异会让大多数人西迁和南迁，迁徙单元本身的性质也受此影响。当然，现代移民研究告诉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很自然。我们看到，移民模式与不平等发展的模式密切相关。但是，4世纪末和5世纪的人口迁徙不仅反映了欧洲不同地区既有的发展不平等，还带来了重大的调整。不同的移民群体合并为能够建立国家的超级群体，这是一大变化，整个欧洲大地也经历了重大变革。

新秩序

510年左右，统治意大利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写信给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

> 您（阿纳斯塔修斯）为全天下的国度增色，是整个世界的有益捍卫者。为此，所有其他统治者都应以崇敬的态度仰视您：首先是我们（狄奥多里克）凭借神的帮助，在您的国家里学到了如何平等地治理罗马人。我们的王国是对您王国的模仿，以您的善意为榜样，是对唯一的帝国的复制。

这看起来是赤裸裸的谄媚，其实并非如此。507—508年，阿纳斯塔修斯的舰队一直在袭击意大利东部的沿海地带，皇帝还为法兰克人攻击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狄奥多里克主要盟友之一）提供了外交支持。可见，这封信真正的重要部分是接下来的几行：

> 时至今日，我们跟随着您而超越了其他所有国家……我们认为，两个国家既已宣布在先代国王之下结为一体，不仅因彼此之爱相连，更因竭力互助而联结，您不会愿意承受两国间的不和之痛。愿罗马王国中永远只有一个意志，只有一个目标。

狄奥多里克一开始的奉承引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论点，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相当于一份提出要求的外交照会。换种说法，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东罗马完全是神所命定的公正典范，我全然效法；因此，我是世上除您以外唯一正当合法的罗马统治者，并且像您一样，高于所有其他继承国的国王。您应该与我，而不是与法兰克人结盟。"他提出如此自负的主张，倒也没有太大问题。他最终度过了507—508年的危机，地位大大提升。法兰克人在507年的武伊勒（Vouillé）战役中摧毁了西哥特王国，但东罗马的海上袭击并没有阻止狄奥多里克在废墟中崛起。从511年开始，他成了西哥特王国和东哥特王国的唯一统治者，王国疆域包括了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南部。他还统治着原罗马巴尔干的一部分地区，对勃艮第王国和汪达尔王国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外交霸权，还掌管着一直延伸到日耳曼尼亚西部图林根的联盟体系。鼎盛时期，他支配着地中海西部，统治着西罗马故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疆域。正如信中所暗示的，他的统治风格也完全是罗马式的。他建造了罗马式的宫殿，在其中举行罗马式的典礼，维护公共设施，甚至资助了拉丁语和文学的教学。信号再明确不过了。一位罗马元老院成员在题词中称他为"奥古斯都"，这可是所有头衔中最有帝王气的一个。[33]

面对狄奥多里克的壮举，你可能会觉得，西罗马落入边境之外侵略性军事力量的手中，也许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这么想是可以理解的。在6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也就是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黜40年后，统治西欧的仍是以地中海为基础的帝国势力。似乎看不出大厦已由新人接管的迹象。但外表是骗人的。狄奥多里克所复辟的那个以地中海为基础的西方帝国，后来证明只是昙花一现。在第一千年的后半叶，西方的皇权中心根本不在地中海，而在更北的地方。

法兰克人的帝国

初看之下，法兰克人通过一系列完全偶然的事件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王权。

狄奥多里克526年去世后，发生了继承危机，他在地中海地区建立的哥特帝国没能扛过去。当时，狄奥多里克的帝国没能按他意愿维持，东哥特部分和西哥特部分再次分裂，分别由他不同的孙子统治。从536年开始的20年战争则使哥特势力接过西方帝国薪火的希望彻底落空，当时，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治下的东罗马摧毁了东哥特王国，就像它在6世纪30年代初摧毁了汪达尔王国一样。查士丁尼一开始决定发动西方战役，也有很强的偶然因素，在那之前，他在与波斯的战争中失利，亟须一场胜利来巩固他日渐下降的声望。然而仔细审视就能发现，狄奥多里克帝国的失败实际上反映了欧洲范围内力量平衡的根本变化，而这样的变化是蛮族欧洲500年发展与罗马帝国崩溃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文谈过，4世纪末，大迁徙时代开始之前，欧洲各地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多瑙河以南和莱茵河以西是罗马帝国的领土，那里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有最发达的交换系统，能够供应城镇的需要，支撑短距离和长距离贸易，那里的地主精英人数相对少，也相对富裕，国家机构握有真正的权力。有了这些，就能调动帝国领土上的资源，来办成维系职业军队、实施大型建筑计划、供养政府官僚等大事。紧邻罗马领土的是近边缘区，半臣服的附属国所在的地方。这些附属国从帝国那里得到大量贸易特权和外交补贴，但会受到政治干预，而且理论上要向帝国提供服务，特别是军事和经济服务，而帝国也可以定期要求它们服务。

这些附属国属于广义上的帝国体系，但它们与帝国的关系总是磕磕碰碰。它们经常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为的是从与罗马的密切关系中尽可能多地攫取经济利益，同时减少与之相伴的剥削。我们看到，帝国会定期向它们开战，让它们少拿好处、多承担义务。这个边缘区通过与帝国的互动（贸易、袭击和外交）来获得新财富，新财富大大推动了政治转型。统治者如果想控制因紧邻帝国而获得的所有新财富，就得扩充军事力量，而额外的财富使之成为可能。不过，同意这个因素也起了作用，因为如果这些领袖有更大的权力，支持者就可以指望他们去抵御帝国的干涉。以上种种使近边缘区的政治组织发展为更大、更有力的实体，3世纪罗马帝国欧洲边境全线都出现了新的联盟，就是该过程总体效应的体现。

在近边缘区之外，也就是离罗马帝国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一个远边缘区。这里的人通常只与帝国有间接联系，但他们出产原材料和其他资源，将其通过近边缘区运入帝国。就这样，在与罗马帝国的500年互动中流入蛮族欧洲的经济利益中，他们也分了一杯羹。远边缘区和近边缘区在政治转型方面也有共同点，特别是那里的人会定期组织起来，以控制更接近边界的地区的更多财富。一开始是1世纪时的劫掠，然后是在2世纪的马科曼尼人战争中，更大规模的人群以军事组织的形式从外向内转移，而最明显的是哥特人等群体在3世纪从远边缘区向罗马领土的扩张。

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两个区域也可能有重叠的地方。除了从外到内的周期性人口入侵，罗马的外交接触一定程度上还扩展到了最内圈以外。例如，我们知道在4世纪，罗马帝国不时会跟美因河河谷的勃艮第人打交道——比起罗马帝国莱茵河南部边界附近阿勒曼尼人，这些勃艮第人的居住地更“靠外”。不过，远边缘区的外部边界相当容易确定。在维斯瓦河以东或俄罗斯南部森林草原带以北的考古遗迹中，没有迹象表明在此期间相关地区的人与罗马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地图2）。直到罗马晚期，这片广阔土地上的大多数人仍保留着早在公元前就有的非常简单的铁器时代农业生活方式。

因此，宽泛地说，罗马时代的发展使欧洲范围内形成了四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而第一千年之初的欧洲还处于三速模式。第一千年之初，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凯尔特欧洲普遍比以维斯瓦河为界的日耳曼欧洲发达得多，而日耳曼欧洲又比更往东的地区发达。到了4世纪，与帝国的接触大大促进了日耳曼欧洲的发展，在从前的三速模式里属于中速的日耳曼欧洲，如今细分为上文讨论过的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34]与西罗马崩溃相关的移民活动不仅反映了欧洲各地的四种发展阶段，还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要体会这些变化有多深刻，只需要看看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墨洛温法兰克王国，想想为什么它是狄奥多里克帝国毁灭之后西方仅存的跨区域中心。

上一章谈过，克洛维统治期间，法兰克势力加速向超级大国的方向发展。克洛维不仅联合了一些原本独立的法兰克战队，还利用这一力量基础征服了如今法国和德国西部的大片领土。狄奥多里克的哥特帝国甫一瓦解，法兰克人就走上了极速扩张之路。从6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克洛维的儿孙们用霸权和征服控制了广阔得多的领土。和之前的狄奥多里克一样，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成就。克洛维的孙子提奥德贝尔特一世（Theudebert I）于540年左右写信给查士丁尼，自称为包括西哥特人、图林根人、萨克森人和朱特人在内的多个民族的统治者，他还说自己是法兰克、潘诺尼亚和意大利北部沿海地区的领主。提奥德贝尔特一世离皇帝头衔的确只有一步之遥。罗马皇帝的特权之一是只有他们能发行金币。这一特权可以追溯到许多罗马城市发行自己的贱金属铸币的时期，在476年以后也继续得到尊重。然而，提奥德贝尔特一世开始发行自己的金币，他的许多墨洛温继任者也有样学样。[35]

如果仅用查士丁尼摧毁东哥特王国之类的偶然事件来解释法兰克帝国的崛起，就会错失真正重要的东西。辉煌如狄奥多里克，也得竭尽全力才能牵制法兰克势力。他在6世纪第二个10年设计出联盟系统，就是为了遏制法兰克人的扩张。他庞大帝国的根基是西哥特王国和东哥特王国摇摇欲坠的联合，不管狄奥多里克多有野心，这种联合在他死后总是有瓦解的可能。

这个拼凑出来的非凡哥特帝国在526年一瓦解，法兰克人的扩张就又开始了——远早于查士丁尼进攻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6世纪30年代初，失去了哥特人支持的勃艮第王国和图林根王国很快落入墨洛温王朝手中，而这一切在第一批东罗马军队进驻意大利之前就已发生。[36]查士丁尼的战役让哥特人不再有任何机会在地中海西部制衡法兰克人——尽管本来就不太可能。从所有这一切中能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后罗马时代西欧最有可能出现跨区域势力的地方不是地中海，而是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

这一发展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不应站在现代人的立场，认为它理所当然。后来，法国、比荷卢地区（Benelux）和德意志西部成了军事和政治力量都强的实体的基地，因此这一发展看上去并不奇怪。但是，这样的事在6世纪第一次发生时，代表了一个巨大的突破。亚欧大陆西部的古代世界秩序是这样的：地中海地区在发展上遥遥领先，资源丰富，因此任何以地中海为基地的国家都比北方的国家更为强大。[37]6世纪，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支以欧洲北部资源为基础的帝国力量。这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罗马时期帝国边陲发展进程的直接产物。帝国周边地区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有助于产生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法兰克人的崛起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新的力量。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罗马的控制和哥特人的影响力先后消失后，希尔德里克、克洛维和他们的后代吞并了莱茵河以西的罗马领土，以及莱茵河以东一度是帝国远边缘区和近边缘区的大片土地。莱茵河以东的另一批法兰克人，也就是所谓的里普利安（Ripuarian）法兰克人，很快加入了他们，505—506年在克洛维手下遭受重创的阿勒曼尼人也加入了。在随后的几代人中，墨洛温王朝征服和统治并用，在更东边的邻居（弗里斯兰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和巴伐利亚人）中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霸权。看上去，就连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部分地区都多少承认法兰克人的优越地位。这个新的跨区域大国，其权力基础西起大西洋，大致延伸到东部的易北河（地图13）。因此，它既包括莱茵河以西原本属于罗马帝国的大量领土，又包括西罗马东面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的一大部分。[38]

古代世界见识过大大小小以地中海为基地的跨区域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距离移民（例如狄奥多里克的东哥特人）在那里建立的继承国不过是历史悠久的主题的新变种。而如今，欧洲大地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现象，法兰克超级大国的存在明确体现了5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在北方的外交、经济等工作带来的转变。如果罗马帝国没有刺激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那些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这些地区就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帝国势力的基地。早年间的这些转变催生了法兰克人主导下的北方权力集团，从而使第一千年下半叶的欧洲走上了新的历史发展道路。从6世纪开始，新的超级大国将成为推动欧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

素。

话虽如此，第一千年下半叶，对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这个帝国来说，路并不像第一千年上半叶的地中海帝国那么好走。罗马帝国的皇帝换了又换，到3世纪时已经损失了一些外围领土。罗马帝国的政府模式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但至少到3世纪为止，这都还是一个有机的内部演变过程。在这50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帝国可以说是统治着大致相同的领土的同一个国家。[39]而到了第一千年的下半叶，西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6世纪，墨洛温王朝如日中天，而到了7世纪下半叶，权力实际上已落入纽斯特里亚（Neustria）、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和勃艮第等地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精英之手（地图13）。边缘地区趁机再次主张独立。图林根人似乎自639年拉多尔夫（Radulf）起义后就保持独立，650年之后，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也独立了。即使是长期臣服的阿勒曼尼人也在8世纪初主张了独立。[40]

墨洛温王朝后期发生了政治分裂，随后，在同一个世纪里，帝国在第二个法兰克王朝——加洛林王朝——治下经历了戏剧性的复兴。加洛林家族最初崛起时，身份是效忠于墨洛温王朝的地主，他们的土地位于科隆和梅斯（Metz）之间（大概是如今的比利时）——墨洛温人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也是在此地。那些研究过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人在“说出五个著名的比利时人”这个传统游戏上挺占便宜的。加洛林人故事的细节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但是7世纪末，第一个真正声名显赫的加洛林家族成员丕平（Pippin）在687年的泰尔特里（Tertry）战役之后，统治了法兰克北部（包括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到了下一代，他的儿子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他一开始是在墨洛温家族的挂名国王背后施行统治的——成功地将墨洛温家族鼎盛时期控制的高卢旧领土收回，并入这个北部法兰克核心地带。733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将支持者迁移到勃艮第，以确立对东南部的控制。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他在735年征服了西南的阿基坦。查理·马特也向莱茵河以东地区发起攻势，迫使弗里斯兰人再次向他进贡，更在738年迫使萨克森人进贡。[41]

帝国的势头起来了，而他的儿孙们所做的可不只是维持势头。首先，他们抛弃了墨洛温家族。确立地位后，查理·马特那个也叫丕平的儿子完成了迈向王朝的最后一跃，他废黜了最后一位墨洛温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自己在752年加冕为国王。加洛林家族称王后迅速扩大了控制范围，8世纪下半叶是一场征服的狂欢；征服最初由丕平领导，但更主要是由他的儿子兼继承人查理领导。这位查理更以“查理曼”（Charlemagne），意即“查理大帝”（Karolus Magnus，768—814年在位）之名为人所知。在莱茵河以东，法兰克人第一次直接统治了那些有时服从于墨洛温人，但往往自治甚至完全独立的群体。到了780年，阿勒曼尼亚、图林根和巴伐利亚那些自

称公爵的家族已被全部消灭，更北边的弗里西亚也已臣服。最终，萨克森也首次被彻底征服，但那是在经过约20年的艰难战争之后，在9世纪初才实现的，采用的手段包括强制受洗、人口迁移和大屠杀。取得这些成功后，查理曼望向了更远处。8世纪70年代中期，他粉碎了独立的伦巴第王国，而在一系列战役之后，他最终于796年摧毁了阿瓦尔人的中欧帝国。这次远征的战果大家都知道了。[42]

由此，查理曼的征战将高卢、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领土、意大利北部、多瑙河中游的大部分地区，连同西班牙北部的部分地区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地图13）。墨洛温王朝曾对前述地区中的大部分施加过影响，但从未直接统治过所有这些地方，影响力也从未达到意大利或多瑙河中游。因此，查理曼并不自谦，而是宣称自己建立了一个帝国。从大约790年开始，他的宫廷知识分子团队就围绕一条主线写作，那就是盛赞他的成功和虔敬，并宣布成功与虔敬表明他是一位（甚至是唯一一位）真正的基督教皇帝。因此毫无疑问，800年的圣诞节时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查理曼加冕礼并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特意设计的。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324年后，全盛的西方帝国又获重生。[43]

然而，尽管加洛林帝国十分伟大，也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但事实证明它不比先前的墨洛温王朝更稳定。9世纪末的时候，加洛林国王固然还存在，但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仅限于巴黎周围有限的领土。在法兰克以西的其他地方，权力再次落入当地诸侯之手，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从前查理曼在整个帝国中行使的各种权力（司法、铸币、教会任命等）。有时这些权力得到了正式授予，有时只是篡夺过来而已。正如当时的编年史家普吕姆的雷吉诺（Regino of Prüm）所说，在查理曼的孙子“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于877年去世后，各个地区都产生了“土生土长的”诸侯。在西方，查理曼加冕后的一个世纪之内，加洛林帝国经历了兴起和衰败。[44]

在东法兰克，莱茵河的那一边，统一的程度则比较高，这最终产生了公元第一千年下半叶的第三个法兰克帝国。查理曼的另一个孙子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在此地统治的时间非常长，给组成东法兰克的各个公爵领留下了政治凝聚力这个更重要的遗产。最初的公爵领是萨克森、图林根、法兰克尼亚（Franconia）、士瓦本（Suabia）、巴伐利亚，后来路易又加进了洛泰尔尼亚（Losharingia）和阿尔萨斯（Alsace）（地图14）。路易一支在10世纪初绝嗣后，东法兰克仍保持着凝聚力，并先后在康拉德和亨利治下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统一。康拉德（911—918年间的东法兰克国王）原本是法兰克尼亚公爵。亨利的父亲是奥托（Otto），祖父是柳多尔夫（Liudolf），他自己于912年成为萨克森公爵，919年成为东法兰克国王，一直统治到936年去世。亨利即位后不到3年，就迫使士瓦本

人和巴伐利亚人认他为东法兰克人的国王。然后，他有效领导军队对抗信异教的马扎尔游牧民族，马扎尔人在900年左右从欧亚草原西部进入了多瑙河中游地区。马扎尔人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发动了全面袭击，在907—910年间击败了不少于3支东法兰克大军，很快成了法兰克人的头号公敌。以10世纪20年代后期精心设计的军事改革计划为基础，亨利最终在933年的里阿德（Riade，在图林根北部）战役中击败了马扎尔人。胜利巩固了亨利的国王地位，他的儿子奥托一世则将王朝的权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过程并不容易。直到950年，奥托才终于压制住了造反的公爵和家族中的对手组成的各种联盟。他还有效地延续了父亲的另一项重要政策：向东扩张。奥托于951年向意大利发起了一次浩大的远征，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这表明他现在是拉丁基督教世界最有力的统治者。他在955年的莱希战役中痛击还是异教徒的马扎尔人，巩固了这一身份。这让他在显赫的权力之外，又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更加难以击败，因为显然是上帝允许他击败了那些其他许多基督教统治者都没能击败的异教徒。在奥托的压力下，教宗主持了又一个皇帝加冕礼。第二次意大利远征于961年发动，此后奥托于962年被加冕为皇帝。第一千年下半叶的第三个帝国就此诞生。尽管奥托帝国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奥托于萨克森继承而来的地位，但它显然是后加洛林时代的统治实体，可以合理认为是9世纪东法兰克王国的直接承继。[45]

就这样，几个牢牢扎根于欧洲北部的法兰克帝国在约500年至1000年间相继统治着欧洲西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它们从未像其之前的罗马帝国那样稳定，法兰克帝国的权力在两个政治上相当混乱的时期中难以行使，即约650—720年和约850—920年。这是因为这三个法兰克帝国的国家结构都比较弱。在罗马帝国中，很多日常控制权掌握在地方当局手中，但中央政府始终保留着一些关键的权力杠杆。中央有权对最大的经济部门——农业——系统性征税，从而获得可观的年收入。这些收入被用于支持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一套政府机器和国家法律结构（包括法律本身和法院），这些在罗马世界是合法性的象征。尽管有很多局限性，但罗马帝国还是用前现代的方式维持住了一个较大的国家结构。第一千年下半叶的三个法兰克帝国有很多具体的不同之处，但它们都没有对农业生产进行系统性征税以维持庞大的职业军队。它们都是从所控制的地方军事化地主那里获得大部分武装力量的。有时可以靠胁迫来让地主提供军事支持，但通常得用奖赏来吸引。而且，由于后来这些统治者并不依靠每年大规模征税来不断获得收入，财富往往从帝国中心流向各地的地主精英。

可以看出，第一千年后期的三个法兰克帝国都是在有利于进行扩张性、掠夺性战争的环境中产生的。有了战争的收益，帝国统治者（无论是墨洛温

王朝、加洛林王朝，还是奥托王朝）就可以奖赏军事化的地主支持者而不必把自己搞穷。可一旦扩张停止，政治分裂就迅速重现，因为如今奖赏只能从一系列不再增加的资源中出了。[46]我们将会看到，第一千年下半叶帝国的这一特殊性将在蛮族欧洲的进一步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法兰克帝国“停停走走”的特点。即使如此，从外部的观点来看，第一千年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存在一个重要的西欧大国，其影响力覆盖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接下来的各章采取的正是外部视角，也就是欧洲其他地区的那些蛮族的视角。我们将研究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如何应对这一欧洲北部的全新帝国势力及其扩张模式带来的刺激，不过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先谈谈古代世界秩序的另外两次重大重组。

日耳曼欧洲的离奇灭亡

第一次重组多少与第一个法兰克帝国（墨洛温帝国）的崛起同步。这个帝国的疆域从大西洋延伸到易北河。参考6世纪欧洲各地的主要发展模式，很快就能看出该帝国在莱茵河以东的领土，与原先罗马帝国边缘区（包括内边缘区和外边缘区）的部分地区基本重合。就存在已久的日耳曼物质文化和相关的社会政治组织水平而言，罗马帝国走向崩溃的时期并没有给这些地区造成太大影响。这是至关重要，但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因为它涉及的欧洲地区的历史在现存史料中很少或根本没被提及。但只要稍微看一下考古证据，就能发现它的重要性。

罗马时代晚期，主要在日耳曼人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内外边缘区覆盖了大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大片土地。它的北部边界从莱茵河东岸到刚过维斯瓦河，跨度约1 000千米。它的南部更宽一些，从多瑙河的铁门峡（Iron Gate）到顿河西岸，跨度约1 300千米（地图15）。这片土地上的多个社会人口都相对密集且在不断增长，农业相对发达，与罗马帝国有某种联系，其物质文化通常包括大量精心制作的金属制品和陶器。6世纪时，文化崩溃已经影响了这里的大部分区域。在乌克兰和波兰南部，发生文化崩溃是因为切尔尼亚霍夫和南部的普热沃斯克系统在400年后不久便告瓦解。在波兰中部，文化崩溃发生在500年前后，波罗的海边的波美拉尼亚则是约500—525年。在易北河-萨勒河地区，彻底的崩溃发生在6世纪末；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地区，没有迹象表明日耳曼文化延续到了7世纪。在该区域以南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可以观察到日耳曼类型遗存在5—6世纪变得稀少，然后在6世纪中期到7世纪早期完全消失。到了700年左右，传统日耳曼物质文化的典型风格完全局限在了易北河以西的地区（地图15）。[47]

墨洛温法兰克王国的扩张并未触及上述受日耳曼文化崩溃影响的地区，这并非偶然。法兰克人的扩张与罗马人的扩张一样，是通过军事吞并来实现

的，扩张的潜在收益总是要与种种成本相权衡。扩张必然要打仗，而即使历史证据不足以让我们详细重构每次战斗，我们也知道发生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但我们也有走运的时候。比如，法兰克人占领阿勒曼尼王国这个行为的性质，就充分体现在了广泛遭到严重破坏的古老山丘堡垒上——第二章讲过，这些堡垒在罗马晚期是阿勒曼尼国王行使权力的中心。大约在500年，也就是史料所记克洛维取得大胜的时候，这些堡垒（或者说所有得到了研究的堡垒）遭受了重击，而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整个阿勒曼尼亚的物质文化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是堡垒被废弃了，而且墓地中还出现了新的葬仪，某些地方甚至启用了全新的墓地。侵略性如此之强的攻占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只有在有望获得相应的巨大回报的情况下才会发动。[48]

中欧长期存在的模式（主要是日耳曼物质文化）在5—6世纪的崩溃，意味着在易北河以东没有了需要去对抗的具有凝聚力的政治结构，能积累可移动财富供人劫掠的相对发达经济体也不再有了。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扩张到了那个时代靠有利可图的战争所能达到的极限，6世纪的墨洛温王朝也是如此。日耳曼欧洲中，唯一保留了旧有文化模式，没有落入法兰克人之手的地区是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日德兰半岛、波罗的海西南诸岛，以及现在挪威和瑞典的南部海岸。墨洛温王朝并没有直接征服邻近的萨克森，而只是通过行使霸权施加影响，斯堪的纳维亚可能因此没有成为法兰克人进一步野心的目标。不过，这一例外并不能改变对总体情况的判断：只有保持了发展连续性的原罗马帝国内外边缘区才值得法兰克人去征服。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晚期新出现的发展轨迹，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后罗马世界新的跨区域力量的势力范围。[49]到目前为止都还好。但是，在日耳曼尼亚的其他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确立已久的物质文化模式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破坏？

思考这个现象时，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性质。波兰考古学家卡齐米日·戈德洛夫斯基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在5—6世纪的文化崩溃过程中，中欧大片地区长期存在的物质文化发展模式消失了。这些模式通常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千年之初，有些甚至更早。变化突然到来，这在物质文化遗存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大到与地中海世界的持久经济联系（定期带来罗马进口物品），小到陶器和金属制品的工艺传统。从技术上看，陶器生产大大简化了，不再使用转轮。与此相应，不仅陶器样式减少，生产总量也明显减少了。冶金生产的规模变小了，所生产的（或至少是留存下来的）装饰物种类几乎降到了零。定居点规模也大大缩小。[50]基本上，考古记录表明，与罗马时期相比，该地区人口生活中一般可供分析、比较、断代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简单化趋势，这一切说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考古发现揭示的这些惊人变化，背后是怎样的人类历史？

戈德洛夫斯基所主张的解释是，传统文化模式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形成这些文化的人口本身基本消失了。相关的文字资料告诉我们，前述物质文化的崩溃在地理和时间上与我们所知的日耳曼人向罗马领土迁移的活动相吻合。切尔尼亚霍夫和普热沃斯克系统崩溃，与哥特人、汪达尔人及其他组成人口因匈人力量在中欧崛起而迁移发生在同一时期（第五章），而5世纪易北河沿岸日耳曼物质文化的消退，长期以来被视为与盎格鲁人、撒克逊/萨克森人等群体迁至不列颠，以及伦巴第人向南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有关。如前文所述，这些人口流动一直持续到6世纪，这主要是因为法兰克帝国势力向东扩展，促使大量萨克森人加入伦巴第人，一起向意大利进发。[51]

迁移和文化崩溃在年代上很接近，这不可能是偶然，但对于这一不寻常的现象，日耳曼人全体撤离并不是唯一的解释，甚至不是最可能成立的解释。由于必须将考古文化理解为系统，理论上，既有文化形式的消失可能有很多原因。在本例中，正如戈德洛夫斯基之后的其他评论者所强调的，消失的是装饰性金属制品、武器和专门的轮制陶器，而这些东西主要是为日耳曼社会中的精英生产的。因此，可见的考古遗存中没有这些物品，只能说明使用它们的政治和军事阶层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说不定，当时有大量农民留了下来（也许数量非常大），但他们的物质文化简单得多，无法通过考古发掘发现。[52]因此，从理论上讲，文化崩溃可以有许多种解释，从该地区的所有居民都迁出，到只有精英离开，居于两者之间的不少解释都能成立。从证据上看，日耳曼文化崩溃背后的人类历史应该落于何处呢？

下一章我们会研究斯拉夫人，这些人最终控制了中欧和东欧这些去日耳曼化的地区；到时我们会回过头来更仔细地研究一些证据。目前，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总体上的结论。首先，日耳曼文化的崩溃肯定不代表相关地区的人口全部迁出了。以黑海以北的哥特人为例，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3世纪臣服于哥特入侵者的当地群体，有许多后来并未加入从376年开始迁往罗马帝国的移民队伍。而且从总体上讲，在罗马后期进入帝国的日耳曼移民，似乎也没有多到能清空他们迁出的广大地区的地步。

显然，我们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人被卷入了匈人帝国兴衰引发的迁移，又有多少人抓住了因罗马失去维持边境安全的能力而出现的扩张机会。不过，有必要来一场反面的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想一想已知有多少移民来自经历了文化崩溃的地区。例如，有合理证据表明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都可以投入2万名或更多的战斗人员。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军队规模可能差不多——在406年他们在西班牙遭受重大损失之前肯定如此；而勃艮第的军队即使规模较小，也不是不值一提。有多少多瑙河中游的难民被招进了意大利军队或东罗马巴尔干的军事部门，我们对此没有概念；但

是从资料记载的赫鲁利人的人数来判断，许多不同的群体可能都至少有1万名战士，而且很可能是2万名。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人数也许是所有数字中争议最大的，人们猜测的从2万到20万人不等。[53]

如果我们取证据中的最大值（很快就会清楚为什么要这样），那么可以合理推算出，离开经历文化崩溃地区的日耳曼战士多的话有10万人以上，但肯定到不了20万人。虽然猜测成分不小，但这个数字并不算过分夸大，确实需要有这种军事实力，移民才有可能推翻始终坚决抵制其入侵的西罗马。我觉得这个10万人里可能没包括迁徙过程中丧生的移民战士。尽管如此，超过10万这个大略估计的数字还是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参与迁徙的总共有多少人，取决于妇女儿童与战士随行的情况有多普遍，也取决于有多少奴隶同行（这个话题就比较阴暗了）。我们在此还是取最大值——尽管最近有人加以否定，但还是有不错的证据表明，大多数较大的群体中都包括了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的成员，这也有进一步的理由支撑。前文提过，传统上会将战斗人员的人数乘以5，得出混合群体的总人口数量，但接近4的倍数可能更准确。而且，这类计算都没有把奴隶考虑在内。综上所述，取合理估计的最大值，经历文化崩溃的地区的外流人口总数应该是50万人或略多一些。[54]

费心进行此类计算，是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受影响的区域的大小。日耳曼文化的崩溃大致影响了北至易北河和维斯瓦河、南到铁门峡和顿河下游的地区，粗略计算面积接近100万平方千米。如果罗马时代晚期的移民潮带走了这片区域中的所有人，那么那里原先的人口密度就应该是每平方千米0.5人左右。人口密度是不可能这么低的。即使考虑到当时那里的农业制度不是密集型农业，50万人离开也根本不可能清空这么大的区域。这些数字只是估计，但最近的一项研究（颇为合理地）表明，仅在所谓的本都-多瑙河地区（地图15），古代时就容纳了300万到400万人，在中世纪早期的匈牙利平原一处，人口就有30万左右。尽管我们在前两段中用的数字都是估计值，我们仍然可以放心地认为，中欧和东南欧的文化崩溃不是人口全部撤离造成的。[55]

因此，总的来说，日耳曼文化崩溃是相关地区中某些精英群体的消失造成的。但是，对于这个结论，还需要有两点补充。首先，经过之前几个世纪中的种种变革，统治4世纪日耳曼社会的并不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精英群体。在1世纪到4世纪之间，确实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分配，但比起在罗马占统治地位的少量地主，日耳曼世界的精英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是要高很多。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也是被称为“民族大迁徙”的事件所证实的，应当认为，社会和政治权力（以及群体身份）是由范围相当广的自由民寡头分有的，自由民的人口为战士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至少在像哥特人和伦巴第人这样的较大群体中，参与迁徙的不是只有这些占统治地位

的寡头。这些侵略性群体中至少有两个社会阶层的战士（可能相当于中世纪早期法典中所说的自由民和被释奴），而不是只有一群精英战士，有时，他们还会带上奴隶，当然还有家眷。[56]因此，精英的离开并不是规模很小的现象。

第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证据表明，某些地区的人口水平确实经历了急剧下降。这也说明日耳曼人迁徙在人口统计学方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上述两点可以联系在一起。因为日耳曼精英的人数原本就不少，还有一些社会群体依附于他们（奴隶和被释奴），所以当一群移民离开某个地区时，有可能把那里的人口都带走。[57]

因此，不仅普遍的发展模式决定了4世纪末和5世纪的迁徙进程，而且反过来也成立：移民影响了发展模式。如我们所见，这种互动的一个主要结果是，亚欧大陆西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以欧洲北部资源为基础的帝国力量。而在罗马帝国走向终结时，边缘地区大量有武装、有组织的群体迁入了罗马故地的心脏地带，因此帝国崩塌的过程也伴随着边缘地带大部分地区的转型。日耳曼欧洲精英的背景还是比较广泛，他们离开引起的文化崩溃彻底改变了从前帝国边缘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标志着古代世界秩序的第二次重大改变，其重要程度与法兰克北欧帝国的崛起相当。第八章会讲到，这对斯拉夫欧洲的崛起意义重大，而同时，这一进程也受到了第一千年中期旧世界秩序第三次重大重组的深刻影响。

走出阿拉伯半岛

直到约600年，罗马帝国的东半部（首都位于君士坦丁堡）都保持着其作为地中海地区主导力量的帝国地位。尽管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在6世纪的第二个10年权势很盛，但由于害怕疏远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他没有对帝权提出明确的主张。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狄奥多里克的明智得到了证明。在从536年开始的20年残酷战争中，查士丁尼的部队击垮了东哥特人的意大利王国，这件事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帝国力量的崛起过程中可不是无关紧要的。这次军事冒险之前，查士丁尼于532—534年征服了汪达尔人的北非王国，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接着，6世纪50年代初，在查士丁尼的晚年，东罗马在西班牙南部建立了一个据点。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对地中海地区的支配从潜在控制转为了明确统治。

东罗马在7世纪从如此辉煌的帝国巅峰跌落，与西罗马在5世纪的陨落一样令人震惊。在7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初，东罗马似乎有被其宿敌萨珊波斯征服的危险，波斯控制了东罗马许多主要的创收区，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626年时，甚至已有一支波斯军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南侧扎营，波斯的游牧盟友阿瓦尔人则在海峡另一边围攻君士坦丁堡。令人惊讶

的是，帝国奋力避免了战败。君士坦丁堡没有被攻下，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发起了一系列战役，从亚美尼亚打到美索不达米亚。到了628年秋天，反倒是波斯处在了崩溃边缘。发起征服战争的萨珊国王库思老二世（KussroII）被废，大部分被占领土回到了希拉克略手中。

但是，书写希拉克略伟大胜利的纸上的墨水还没变干（暂定标题："翻盘小子之原型"），这些莎草纸就得进废纸篓了。在近东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角落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在最近10年内才由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统一起来的阿拉伯部落，这个敌人比之前所有的敌人都要强大。希拉克略的胜利失去了意义：他的统治尚未结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就再次失陷，小亚细亚成了饱受战火摧残的荒原。到了652年，其他阿拉伯军队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之后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新的伊斯兰帝国控制了从印度到大西洋的广大土地。[58]

世界历史上这场惊人革命的细节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此需要说明的只是，人们为东罗马崩溃找的理由，和为西罗马崩塌找的一样多（这不足为奇）。传统的解释往往关注查士丁尼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征服，认为他野心太大，给继任者留下了装着毒酒的金杯——一个扩张过度的破产帝国。但这样的联系似乎很难成立，毕竟正如一位英国首相所说，"在政治的世界里，一周就算是很长的时间了"。查士丁尼于6世纪60年代中期去世，阿拉伯人的征服则是在70年（差不多整整3代人）之后。当然，这些事件多少有点关系，但肯定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近来，研究东罗马崩溃内因的人注意到了别的解释：从540年开始困扰地中海世界的周期性瘟疫，以及（也许相关的）可能出现在6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迹象。

这些解释都有些道理，但外部因素也需要考虑在内：最重要的是，就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不久，君士坦丁堡与波斯进行了二十几年的艰苦战争。整个6世纪，波斯和东罗马之间断续交战，但大多数情况下战事的规模有限：要么通过高加索的代理人进行，要么是旨在占领零散的战略要塞的围城战。这种有限战争的模式在7世纪初逐渐消失。当时，两个大国直接对抗，最终陷入僵局。眼看要失去一切之时，希拉克略发起了胜利大反攻，但628年和平条约的条款表明，最终结果实际上是双方因疲惫不堪而打了平手。尽管希拉克略取得了胜利，君士坦丁堡还是没能收回在602年以后丢掉的所有领土。这自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阿拉伯帝国随后对东罗马和波斯两个帝国都取得了胜利。[59]

但是，也需要注意阿拉伯世界本身。在这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穆罕默德新宗教的刺激作用，它联合了原先分散的人口。但是，类似于4世纪末和5世纪西罗马边缘区出现能建立继承国的联盟的情况，阿拉伯世界的变化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全面看来，证据表明在4—6世纪，处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边缘的阿拉伯附属国的规模和实力稳步增长，就像1—4世纪西

罗马欧洲边境地区的附属国一样。[60]在此，我们关心的是这一7世纪的革命对整个欧洲的权力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两方面影响很突出。

首先，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沉重打击了东罗马，东罗马再也不是真正的跨地区帝国了。仅从劫难后君士坦丁堡产生的文本中，不太读得出这层意思，而君士坦丁堡本身直到1453年才落入伊斯兰势力之手，当时“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二世用大炮在宏伟的狄奥多西城墙（离现在的托普卡皮公交站很近）上炸开了一个洞。在那之前的约700年时间里，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基本上自称为“罗马人”（即使希腊语是他们的书面语言），罗马传统的君主意识形态也都得到了保留：他们自称神所命定的皇帝，有责任为整个人类世界建立恰当的秩序。

但就像很多事情一样，透过表面看问题很重要。君士坦丁堡在7世纪中叶之后流失了多少国家权力才是关键。伊斯兰势力的征服让君士坦丁堡失去了许多富庶的行省：第一代人的时间里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大约40年后是北非，最后是西西里。东罗马保住了小亚细亚，但那里成了后来与新的伊斯兰国家交战的主要战场，考古证据表明其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古代的大城市即便幸存下来，也不再是人口、生产和交换的中心，而是成了军事要塞和指挥所。硬币也变得极为稀缺，一切都说明，经济被大大简单化了。这些灾难发生之前，东罗马的“状态”与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颇为相似，当时一些值得注意的税收记录流传了下来。这些数据可以用来估算以国家收入而言君士坦丁堡在早期遭受的损失的程度（虽说灾难的总体性质无论如何都是很明确的）。而如果我们做些计算和适当的调整，就能看出伊斯兰势力的崛起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2/3到3/4的收入，也就是说，君士坦丁堡的行动能力降低了2/3到3/4。[61]

如此衰落的后果在公元600年之后的欧洲历史大局中清晰显现出来。从7世纪初开始，东罗马不再是泛地中海大国，也不是再是广阔欧洲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尽管它在地中海以东仍然重要，但在许多方面它已不情不愿地成了伊斯兰世界的附属国，不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繁荣和衰落与新兴伊斯兰权力集团的实力呈密切负相关。伊斯兰世界一取得政治上的团结，君士坦丁堡就必定衰落；当伊斯兰世界本身分裂时（这有时会发生），君士坦丁堡就有了适度扩张的空间。简而言之，7世纪后君士坦丁堡统治者自称统治罗马帝国只是谵语。伊斯兰势力手上遭受重大损失后，那些皇帝统治的仅仅是罗马帝国的继承国——与一个世纪前出现在西罗马的那些新国家一样。实际上，我个人喜欢用“拜占庭”而不是“东罗马”来称呼7世纪中期以后的这个国家，以反映出伊斯兰势力的兴起给地中海历史带来了多么大的转变。[62]

硬币的另一面是，伊斯兰势力崛起后，在欧洲东南边缘建立了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它不仅吞并了东罗马的大部分地区（当然包括其最富裕的领

土），也吞没了东罗马宿敌萨珊王朝的领土。8世纪初差不多尘埃落定后，一个庞大的帝国出现了，其疆域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印度北部。依靠前现代的交通和通信手段来统治如此庞大的实体，就交通运输而言已经是噩梦了，更何况在伊斯兰帝国如何运作以及由谁统治的问题上，还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因此毫不奇怪，它的内部必然不稳定。而尽管政治控制力经常不灵，离首都越远的地方越难控制，但倭马亚（Umayyad）哈里发王朝（7世纪60年代至8世纪中叶，权力中心在大马士革）和阿拔斯（Abbasid）哈里发王朝（8世纪末到10世纪初，权力中心在巴格达）都使得帝国的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其规模甚至超过了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情况。[63]这个位于欧洲大陆近东边缘的超级大国地处偏远，无法直接干预正在蛮族欧洲展开的移民和发展的历程，但它的间接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将东罗马从欧洲历史主要参与者的名单上删除，而且正如我们将在随后章节中看到的那样，它外交和经济的触角穿过高加索伸到了欧亚大草原西部，并从那里延伸至东欧甚至北欧。

系统的崩溃和欧洲的诞生

一定程度上，应当将西罗马的陨落（就此而言，也包括东罗马的陨落）理解为罗马帝国约500年的存续期间，一系列发展进程的全部后果的表现。从约公元500年起盛行于欧洲各地的新战略模式，是欧洲北部出现跨区域势力集团的结果；而之所以能出现这样一股势力，是因为之前的500年里发生了种种变化。如我们所见，5世纪后期，法兰克人在旧帝国的内边缘区崛起，成为一支新力量。接着，他们将自己的家园与莱茵河以西的原帝国领土及罗马内外边缘区的其他地区并到了一起。由此产生的帝国是第一个以欧洲北部而非地中海地区资源为基础的帝国。因此从长远来看，罗马帝国的确播撒了使自己毁灭的种子。它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触手改变了附近的人口群体，直到后者强大到足以将罗马帝国撕裂。

虽说罗马之后的帝国会如何基本可以预见，但历史的偶然也起了作用。考虑到总体的转型模式，我们可能会认为，原罗马领土的边缘部分会落入雄心更大、更具侵略性的边境王朝手中，因为经济和政治变革会逐渐增强可供它们支配的力量，慢慢侵蚀最初使罗马帝国得以建立广泛统治的力量优势。事实上，在罗马时期的确发生了一系列这样的事件。3世纪，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以及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土地被割让给了帝国东欧边缘区的哥特人和其他新势力，而在西部，阿勒曼尼人拥有了被遗弃的阿格里-戴可美特。4世纪的情况与此类似，像克诺多马里斯这样特别有侵略性的阿勒曼尼国王能将控制权扩展到莱茵河河谷的西侧，而萨利安法兰克人则在莱茵河下游边境以西的土地上采取了行动。此时，罗马帝国的力量仍然强大到足以遏制这种野心，但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然而，匈人势力的兴衰并没有遵循这种模式，而是带来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出于政治动机而迁徙的移民，将内外边缘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群体出人意料地突然带到了罗马的土地上。在375—380年的第一次危机中，哥特人、萨尔马提亚人和泰法尔人从多瑙河下游边境区域之外的内边缘区进入罗马领土；随后在405—408年，多瑙河中上游地区的类似群体——苏维汇人（如果他们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话）和勃艮第人——也来了。参与这场迁徙的外边缘区群体包括阿兰人，不同的阿兰人群体在375—380年和405—408年进入帝国领土；在405—408年的危机中，阿斯丁格和西林格汪达尔人加入了他们，这些汪达尔人原本住在内外边缘区之间的某个地方——他们的领地离边境不远，但在大动荡的匈人时代之前，他们似乎和罗马帝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64]这些移民使西罗马核心地带的税基遭受了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损失，加速了其军事和政治体系的全面崩溃。

相互竞争的各个王朝慢慢扩张领地，蚕食罗马帝国的领土，吓退边境之外的对手，逐步在欧洲北部形成新的跨地区力量，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匈人的干预大大加速了扩张进程，其性质也有了变化。4世纪时，罗马外边缘区包括了广袤的领土，主要由讲日耳曼语的群体统治，有非常特殊的物质文化体系。6世纪，经过了匈人时代的人口迁徙，以及与之相关的普热沃斯克、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系统崩溃，旧有的物质文化模式在易北河以东和多瑙河中游盆地以外消失了。史料中也没有迹象表明罗马时代的基本政治架构在那些地方得到了保留。就这样，西罗马崩塌之时，日耳曼人统治的范围大幅缩水，剩下的大部分地区统一于法兰克霸权之下。罗马的迅速崩塌，日耳曼欧洲的急剧萎缩，都是匈人引发的人口迁移的结果。总的来看，欧洲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衡量罗马帝国及其陨落对欧洲发展模式的总体影响时，我们会看到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第一，在罗马时期（就说一直到350年吧），与帝国的交往有助于在欧洲广大地区传播更发达的政治结构、更复杂的经济互动模式。我不知道这对人类历史总体而言是“好”还是“坏”。文明的进程根本不是那么容易衡量的。但我可以有信心地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第二个结论是，帝国的崩溃大幅缩小了发达欧洲的地理范围，因为（既为了掠夺，也有消极动机的）人口迁移过程吸引了南部和西部有武装、有政治组织的群体。新的法兰克超级大国是相对弱势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罗马时代那种发达欧洲和不发达欧洲之间的差异。而到了6世纪，由于罗马帝国崩溃的手风琴样效应，较发达欧洲（包括帝国和边缘区）所包含的范围就更小了。

但从长远来看，比第二点重要得多的，是地中海对亚欧大陆西部的统治被打破了。法兰克人启动了这个进程，他们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位于欧洲北部的帝国。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则完成了这一进程，东罗马从此成为卫星

国拜占庭，地中海地区的政治乃至文化统一都被破坏了。欧洲北部由此摆脱了古代世界秩序中那种长期的政治干预模式。罗马帝国陨落之后，欧洲经历了诞生之痛，因为在此期间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的扩张破坏了地中海对北部内陆的支配。到了第一千年末期，发达欧洲和基督教君主国的支配范围已不像500年时那样止步于易北河，而是一直向东延伸到伏尔加河。移民与发展的相互作用催生了欧洲格局的又一惊人转变，而这就是本书其余章节的主题。

---

[1] 在身份认同及所谓迁徙主题上持激进论点的，以Amory (1996)和Kulikowski(2002), (2007)为代表，而长期以来，德语世界传统上都认为群体身份是非常易变的：见Wenskus (1961); Wolfram (1988)。认为西罗马陨落过程惊人平静的观点，主要见Goffart (1980), (1981), (2006。Halsall (2007) 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了前述新观点，他认为帝国从边境开始崩溃，主要是因为自身的内部分裂，特别是东西罗马的分裂，蛮族入侵是后果而不是原因。这些新观点的种种组合在过去20年间对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见Ward Perkins (2005)的精彩论述。

[2] 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里见过这样的例子。在468年征服北非的尝试失败之后，西罗马行将终结的想法才真正在西罗马的大部分地区出现：见Heather (2005), chapter 9。

[3] Heather (2005), 375—84.

[4] 见本书第四章。

[5] 见Halsall (2007), chapter 7，参见本书第四章。

[6] 按照我的统计，这11次战役是：柳树边的小镇之战（Ad Salices）(377)、阿德里安堡之战（378）、马其顿人击败狄奥多西的战役（381）、冷河之役（394）、马其顿战役（395）、伊庇鲁斯之战（397）、维罗纳和波兰提亚之战（402）、击败拉达盖苏斯之战（406）、洗劫罗马之战（409/410）、君士坦提乌斯三世的进攻（413/415），以及对汪达尔人之战（416—418）。

[7] 见本书第五章。

[8] 就较小的移民群体（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而言，虽然年代范围不同，但情况大致相同。移民建立的新国彼此竞争的第三阶段也充满了暴力，并偶尔引发进一步的迁移，例如西哥特人迁移到西班牙[见Heather (1996), chapter 9]，不过这超出了本书探讨的范围。

[9] 有关此模型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Heather (1995)。请注意，就蛮族群体进入罗马土地之后的情况而言，我关于帝国解体过程的论述与Goffart (1981等的

描述并没有显著不同。

[10] 见Jones (1964), vol. 3, Appendix III。

[11] 更详细的讨论，见Heather (2005), chapter 6。

[12] 不列颠低地的情况，见本书第六章。

[13] 5世纪30年代，勃艮第人先是在匈人的手上遭受了严重的军事失利，然后被重新安置在罗马的土地上：相关介绍见Favrod (1997)。

[14] 关于这些新的大规模群体的建立，见本书“为生存而战”这一小节及后面内容。

[15] 见本书第五章。

[16] 对群体身份的新认识，见本书第一章。

[17] 有很好的证据表明，376年哥特人的迁徙动机是政治的，也是消极的。在我看来，可以推出405—408年的移民很可能也是一样，尽管缺乏明确的证据，其他的因果关系也可能成立（见第五章）。这些观点不影响我对5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移民数量的看法。

[18] 还没有能证明苏维汇人带着妇女儿童迁移的证据，但许多其他群体都如此迁徙，有理由认为苏维汇人也可能这么做。

[19] 见本书第六章。

[20] 见本书第四章注20，其中提到《罗马君王传》记载哥特移民队伍中有大量奴隶，这表面上说的是3世纪的移民，但其实与376年后的事件相关。

[21] 人们常常注意不到本地罗马人的生活与国家结构之间有区别（同时又相互交织），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仅举一个例子，Brown (1996) 和Markus (1997) 所研究的高度分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生动体现了将教会从罗马背景中抽离出来的结果。

[22] Goffart (1980)最早提出这一主张，回应了Goffart (2006), chapter中的一些批评。Halsall (2007), 422—47很好地总结了这些批评，还提出了额外的见解。

[23] 相对于其他入侵群体，狄奥多里克领导的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活动被记录得更为详细，有充分证据表明，东哥特人里有一些介于国王和自己的随从之间的中间领导者。这些领导者可能会在自己人中分配战利品和财产。见Heather(1995a)。

[24] Victor of Vit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1.13, with Moderan (2002).

[25] 关于该观点的概述以及定居点的证据，请参阅Heather（1996), chapter 8。顺带一提，Goffart (2006), chapter评论说，并无证据表明除私人土地外还有公共土地被蛮族收缴。但这是忽略了*Novels of Valentinian* 34中的记述：罗马正是用公有土地的收入来补偿普罗康苏拉里斯流离失所的地主的。

[26] 关于勃艮第定居点，见Wood（1990)；参见Halsall（2007), 438ff中提到的西哥特遗存。

[27] 西班牙的冲突，见本书第236—237页。征服北非，见Heather（2005), chapter 6。

[28] 关于东哥特人，见本书第五章。Wood（1990)对勃艮第人遭受的创伤做了一些思考。

[29] 某种程度上，这延续了3世纪的模式，只是多了匈人带来的负面刺激（见本书第三章）。

[30] 或者，至少要有能力组建能进一步迁徙的大型队伍，见本书“为生存而战”这一小节及后面内容。

[31] 关于东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分别见本书第287—288页和第354—355页。

[32] 前文提过，普里斯库斯的证据清楚地表明，阿提拉进攻罗马帝国的主要目的是攫取财富。

[33] “您（阿纳斯塔修斯）为全天下的国度增色……”，见Cassiodorus, *Variae* 1.1.,trans. Hodgkin (1886)。更多背景参见Heather (1996), chapter 8，附完整参考文献。

[34] 见本书第二章，但需要注意的是，3世纪的迁徙活动使远边缘区的一部分成了近边缘区。

[35] 关于提奥德贝尔特一世，具体见Collins（1983)；墨洛温王朝权力增长的更一般介绍，参见Wood (1994), chapters 3—4。

[36] 查士丁尼向西进攻的决定有很多偶然因素：见Brown（1971)。关于狄奥多里克的准帝国的崩塌，见Heather（1996), 248ff以及Wood（1994）中有关法兰克扩张的第3—4章。

[37] 罗马凭借地中海地区的资源征服了已知世界的大片地区，这是个例证。

[38] 见Wood (1994), chapters 4 and 10。

[39] 在我看来，这一过程可以大致概括为从一心对外征服的国家，转变为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行省共同体：见Heather (2005), chapters 1 and 3。

[40] 有用的概述，见Wood (1994), chapters 13 and 15。

[41] 更详细的讨论，尤其是关于查理·马特统治的性质以及巩固统治所使用的策略，见Wood (1994), chapter 16; Fouracre (2000)。

[42] 比较出名的一件事是，加洛林家族在夺取王权的过程中，询问教宗撒迦利（Zacharias），撒迦利回答说，有实权的人称王，比徒有国王虚名的人称王更好。而没那么有名，但在当时可能更重要的是，王朝的变更得到了法兰克大会的批准。McKitterick (1983)中有很好的记述。

[43] 所有这些，见最近的Collins (1988)。

[44] Dunbabin (2000)做了精彩的介绍。

[45] 关于奥托帝国的有用介绍，见Leyser (1989)及Reuter (1991)。

[46] 见Reuter (1985), (1990)。

[47] 卡齐米日·戈德洛夫斯基发现了文化崩溃的现象，确定了崩溃发生的具体年代：见如Godlowski (1970), (1980), (1983)。这个整体模式的一个特例是“奥尔什丁（Olsztyn）群体”。该群体立足于维斯瓦河以东、波罗的海东南岸的马佐夫舍，在日耳曼人长期统治的界限之外。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特征是有一些传统的日耳曼物品，也有相当数量的地中海进口物品，这两类物品都将该群体活跃的年代确定在6世纪。当然，我们还不确定这些遗存是新来的日耳曼移民留在此地的，还是体现出一些当地人（也许是说波罗的语的人）采纳了一种新的物质文化。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个群体都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断代到7世纪的奥尔什丁遗存：见Barford (2001), 33及参考文献。

[48] 比如见Koch and Koch (1996); Wieczorek (1996); Hummer (1998)。

[49] 那些萨克森人从未被墨洛温王朝彻底征服，只是被置于法兰克人的霸权之下。斯堪的纳维亚因此被隔开，不至于受到法兰克人的直接干预。

[50] 主要参考资料，见前注47，进一步的扩展见Parczewski (1993), 120ff., (1997。

[51] 史料中记载了与奥尔什丁群体类似的例子，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该群体的情况。前文提过（第五章），赫鲁利人的一个分支在508年被伦巴第人击败，于是从多瑙河中游地区向北迁移，最终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定居。因此，完全可以想象有其他日耳曼群体采取了类似行动，最终到达了更东边的地方。

[52] 见Urbanczyk (1997b), (2005)等。

[53] 法兰克人迁徙到今法国北部的案例也值得讨论，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移民是否来自经历了文化崩溃的地区，所以我在这个思想实验中省略了他们。

[54] 见本书第四章。

[55] 见Batty (2007), 39—42。针对大波兰地区（属于经历了普热沃斯克和维尔巴克文化崩溃的地区），一个广泛的实地考察和调查项目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即那里的人口密度在文化崩溃后仍然约为每平方千米1人：见Barford (2001), 89—91（附参考文献）。这再次表明，虽然50万人离开算是多的，但这最多只占原先人口的1/3，不至于让该地变得空无一人，而众多受影响的更南部地区可能人口还要多。

[56] 见本书“国家与社会”这一小节及以后内容。

[57] 见本书第八章。

[58] 近期比较精彩的论述，见Kennedy (2007)。

[59] 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这两个帝国会放弃原先的有限战争，陷入相互毁灭的冲突？

[60] 这点在Sartre (1982)中表述得很清楚。

[61] 有用的介绍，见Whittow (1996); Haldon (1990)。

[62] 10世纪拜占庭的大扩张发生在阿拔斯哈里发国（Abbasid Caliphate）这个政治实体分裂的时候，而11世纪塞尔柱人（Seljuks）在伊斯兰世界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后，拜占庭的扩张就结束了。

[63] 介绍见Kennedy (2004)。

[64] 至少从2世纪起没有外交关系。马科曼尼人战争期间对汪达尔人和罗马帝国之间的正式关系有所记录：见本书第二章。

第八章
斯拉夫欧洲的创生

讲斯拉夫语的人目前有近2.7亿，这是现代欧洲最大的语言群体之一，而主要讲斯拉夫语的国家的领土约占欧洲大陆的一半。而至少后面这一点也适用于第一千年即将结束时的欧洲。早在900年，讲斯拉夫语的人就支配了欧洲易北河以东的大片土地，甚至还控制了易北河以西的小片土地，比如波希米亚盆地和萨勒河周围的一些地区。当时斯拉夫人控制的地区最东到哪里尚不完全清楚，但肯定包括了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部——东至伏尔加河，北至伊尔门湖（Ilmen）。说斯拉夫语的人也统治着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地图16）。

但是，地域如此广大的斯拉夫欧洲，是不久前才创造出来的。在罗马时期，欧洲东至维斯瓦河的地区，也就是易北河以东500千米范围内的大部分土地，是由讲日耳曼语的人统治的，易北河就是后来斯拉夫人统治疆域的西部边界。同一时期，巴尔干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那里住着讲拉丁语、讲希腊语、讲各种本地方言和语言的不同族群。河流名（水文名）也表明，支配俄罗斯中欧部分大片地区的一度是讲波罗的语的人，而不是讲斯拉夫语的人，北部地区则一度受芬兰人控制（地图16）。更令人吃惊的是，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于476年被废，在那之前写成的所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罗马文献中都没有提到“斯拉夫人”，而当时一些罗马地理学家的知识范围已经很广，包括了北欧和东欧。虽然英语圈里讨论得不多，但斯拉夫欧洲的崛起是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斯拉夫欧洲是如何形成的？移民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寻找斯拉夫人

尽管历史意义重大，但斯拉夫欧洲的创生过程却很难重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些很容易想到，有些则比较特殊。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关于这一进程，我们没有同时代斯拉夫作者留下的记述。斯拉夫世界在改宗基督教后才有了文字。但那是在9世纪中叶的摩拉维亚，拜占庭传教士西里尔（Cyril）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us）为翻译《圣经》而创造了第一个斯拉夫语的书写体系。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即便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读写能力也局限在宗教环境中，直到12世纪初，斯拉夫世界才开始描述自己的过去：在波希米亚，布拉格的科斯马斯（Cosmas of Prague）写下了《编年史》（*Chronicle*，1120年左右）；在波兰，有高卢无名氏（Gallus

Anonymus）的《编年史》（约1115年）；在基辅，有《罗斯最初编年史》［*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又称《往年纪事》（*Tale of Bygone Years*），1116年］。最早这批由斯拉夫人写下的斯拉夫历史，距斯拉夫人在欧洲大片土地上建立统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500年。而且，这些文本的重点是离它们的时代较近的所在国的历史，以及统治王朝的历史，对更久远的历史则很少提及。因此，我们现有的关于斯拉夫人崛起的同时代资料，基本出自东方的东罗马或拜占庭作家，以及西方的后罗马（主要是法兰克和意大利）作家之手。这些文本中，处处可以看到希腊罗马的“蛮族”观念的影响。因此，拿出一份资料来，很难说它究竟是真实可信的记载，还是为迎合作者和受众的先入之见而做出的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建构。

但还有比这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即便是前面说的那些局外人，对斯拉夫人的情况也着墨不多。东罗马的资料谈到了6—7世纪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化的一点情况，西罗马的资料里，有一些斯拉夫人沿喀尔巴阡山脉向西进入阿尔卑斯山麓地区的零散片段，维京时代的资料多少让我们看到了斯拉夫群体沿东北方向最终推进到伊尔门湖的过程。但是，对于欧洲北部易北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大片土地的斯拉夫化，则一点历史记载也没有。史料究竟是建构还是反映了现实，能有机会考虑这个问题就算好的了，很多时候，史料少到我们连这个问题都问不出来。书面记载实在太少，斯拉夫欧洲的创生基本上只能当成史前问题来研究，用到的几乎都是考古证据。

傲慢与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代学者又一次让我们受益，他们在东欧国家对考古研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第一次去波兰时，仅华沙的考古研究所就有大约2 000名本科生，每个人都必须参与3次发掘才能拿到学位。除此以外，该国还有几家考古机构，原属苏联阵营的各国情况也类似。因此，我们有大量遗存可用于史前欧洲的研究，尤其是对研究斯拉夫人崛起至关重要的6—8世纪的遗存。值得一提的是，中欧和东欧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物质文化组合，这种组合在大致正确的时间和地点经常可以看到，足以让我们认为，它与这个关键时期的至少某些斯拉夫群体之间有合理的关联。这些“科尔恰克”（Korchak）类型的遗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彭考夫卡”（Penkovka）遗存——包括几种简单的陶器，其中大部分是手工制作的炊具，它们与由小屋组成的定居点关联在一起，聚在一处的小屋通常不超过10个。小屋有部分沉入地下，屋子角落处有一个通常用石头搭出的烤炉。有时，定居点附近能发现小型的火葬墓地，骨灰安放在简单的手工骨灰瓮中。以上种种反映了小规模农业社群的生活方式，人们使用一些铁制工具实践总体而言自给自足的混合农业制度。可以想见，这些定居点通常建立在附近有肥沃土地的地区，位于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的上方阶地。还

值得注意的是，科尔恰克遗存中几乎没有从其他地方进口的物品，也没有精美的金属制品，不管是本地产的还是进口的。[1]

将科尔恰克遗存与一些早期的斯拉夫群体大致关联起来问题不大，但这些物质遗存还是存在严重问题。年代是一大问题。科尔恰克遗存里没有精美的金属制品和比较精致的陶器，也就无法通过制品的风格变化来大致推算出年代。第一千年上半叶的日耳曼遗存，其年代通常可以确定在25年的区间内，而仅凭科尔恰克物质遗存本身，年代范围只能划定在200年的区间，大致从公元500年到700年。遗存中如果有木材或含有碳，还可以使用碳14或年轮学等定年技术来更精确地确定年代，但这些技术用起来比较费钱，而且到目前为止仅适用于相对较少的遗址。

更重要的问题是，科尔恰克遗存与早期斯拉夫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的关联有多密切、多排他？公元500年前后的讲斯拉夫语的社群，是不是都过着那种能形成科尔恰克遗存的生活？是不是只有讲斯拉夫语的人才能产生科尔恰克类型的遗存？有些斯拉夫人肯定过着科尔恰克式的生活，但未必所有斯拉夫人都是如此。反过来说，至于产生科尔恰克遗存的那些简单农耕社区，没有任何理由断定人们不会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2]

此外，就早期斯拉夫历史而言，还有其他让事情更复杂的固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一幅地图来体现（地图17），地图上标出了过去一个世纪中人们认为是斯拉夫人故乡的地方。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知道，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个版本说斯拉夫人的家园向西延伸到波希米亚，另一个版本则说是向东延伸至顿河。而这些不同的观点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模式。首先，学者们明显倾向于将斯拉夫人的故乡确定为自己国家的所在地。如地图17所示，博尔科夫斯基（Borkorsky）认为斯拉夫人的故乡是波希米亚，而他是捷克人；科斯切夫斯基（Kostrzewski）认为是波兰，而他是波兰人；科罗舍茨（Korosec）认为是潘诺尼亚，而他是南斯拉夫人（前南斯拉夫北部包括了原罗马潘诺尼亚行省的一部分）；苏联学者特列季亚科夫（Tretiakov）和雷巴科夫（Rybakov）则选择了更往东的地区。当然也有例外。卡齐米日·戈德洛夫斯基是波兰人，他全面而冷静地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土的所有证据后，认为斯拉夫人的故乡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外缘。弗洛林·库尔塔（Florin Curta）最近提出，斯拉夫人的故乡在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区域，而我不认为他的罗马尼亚血统与此有关。

但总体说来，民族主义竞争（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时代间的竞争）的影响再明显不过了。可以想见，斯拉夫国家内部的竞争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主义时代的显著特征。斯拉夫知识分子试图将最早的斯拉夫人与自己的祖国联系起来，在自己的国家中争取地位和恩宠。这在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波兰还从属于俄罗斯帝国。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古老的争斗一直持续到苏

联时代。如前文所述，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意识之外的任何意识都是“虚假意识”，也就是由精英制造出来，用于控制群众的意识形态。苏联学术界恐怕不会为“虚假”的斯拉夫民族意识最早出现在何处而烦恼，但苏联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无缝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带来了一些问题。当时一个似乎很明显的事实是，命运选择了斯拉夫人作为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秩序付诸实践的民族，而这只会给旧的民族对抗火上浇油，后果可能是残酷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讲斯拉夫语的人是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地区（1945年后波兰的领土）的原住居民这种看法，有些波兰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们随后就因自己的观点而受到了惩处。[3]

有时，关于斯拉夫历史的不同观点被用来抵制外来者。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古斯塔夫·科辛纳准备通过宣扬所谓的日耳曼人历史来为现代德国的领土主张辩护。而学习了科辛纳方法的科斯切夫斯基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科斯切夫斯基的论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新波兰的核心地带一直被讲斯拉夫语的人占据，这不仅是在对抗俄罗斯人的主张，也是对科辛纳观点的反抗。但要让这个论点站住脚，还需要解决一些棘手的学术问题。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载，1世纪时，讲日耳曼语的群体（特别是在历史上很突出的哥特人）占据了东至维斯瓦河的领土。乍一看，这很难与该地区自古以来就由斯拉夫人占据的理论调和。然而，科斯切夫斯基提出，哥特人和其他讲日耳曼语的群体只是人口中的少数，在他们之下“隐藏”着讲斯拉夫语的占多数的群体。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科斯切夫斯基将这个占多数的群体的历史从中世纪早期向前推到了罗马时代早期（通过普热沃斯克文化），甚至推到了约公元前1000年［通过所谓的波美拉尼亚文化和卢日茨（Lusatian）文化］。[4]

斯拉夫知识分子自然希望尽可能将早期斯拉夫人与“最好的”（换句话说，技术上最先进的）古代遗存联系起来，而这给争论带来了一丝学术阴谋的味道。希特勒看到一些据说出自波罗的海青铜时代的早期日耳曼人的用具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因为同时代的埃及人已经在建造金字塔了，相比之下，他看到的那些简单手工陶器真是不怎么样。同样的反应也扭曲了关于斯拉夫历史的争论，许多研究人员希望将他们假想中的先民与比易碎的手工陶器更像样的东西联系起来。例如，雷巴科夫将斯拉夫人最初的家园定在乌克兰，为的是将斯拉夫人与铁器时代东欧最丰富的遗存之一——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关联起来。我们看到，切尔尼亚霍夫文化有规模不小的定居点、铁制武器和工具、形式多样的轮制陶器，以及令人感兴趣的珠宝——这样的斯拉夫先民显然更好，毕竟当时其他的东欧人生活在下沉式小屋中，只有手工制作且样式平庸的陶器。科斯切夫斯基也有类似的目的：从技术角度看，普热沃斯克文化系统是铁器时代中欧“最好”的系统之一。

纳粹时代之后，我们自然会更认同科斯切夫斯基的反驳，而不是科辛纳最

初提出的论点，但两种观点同样扎根于所处时代的政治需要。和20世纪70年代之前许多关于斯拉夫历史的替代叙述一样，构建出最好的中欧和东欧史前史叙述，这样的尝试是服务于政治议程的。但是在上一代学者那里，尤其是柏林墙倒塌以来（而当时苏联阵营中的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10年或更长时间的知识革命），这些古老的政治使命基本失去了力量。20世纪70年代，马克·休金证明，在时间上，黑海以北切尔尼亚霍夫文化体系的兴衰与该地区哥特势力的起落之间有很多重合，因此，当时主导那里的只可能是哥特人。讲斯拉夫语的人也可能生活在这个地区，但使其成形的是哥特人的军事力量。在波兰，科斯切夫斯基对斯拉夫连续性的看法也受到了挑战，学者们发现，公元前1000年的史前卢日茨文化和波美拉尼亚文化，与罗马时期同一片土地上的维尔巴克文化和普热沃斯克文化系统之间，有深刻的断裂。[5]人们不在相信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有一个历史可以连续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000年的斯拉夫群体，针对斯拉夫早期历史的研究，也不再执着于排斥其他的斯拉夫群体、尽可能贬低日耳曼人的作用、将“最好的”的遗存都划给斯拉夫人。这并不是说关于中欧和东欧的历史已不再有争论，但当前的争论要温和很多，而且更多是为了理解历史本身。

去掉这么多让人分心的上层建筑之后，我们现在对欧洲斯拉夫化的了解有多少？

原始斯拉夫人

我们只能从史料记载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现身开始。据记载，斯拉夫人，更确切地说是斯克拉文人（Sclavenes），于6世纪上半叶在东罗马的多瑙河下游边境以北首次亮相。根据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在550年左右的记录，斯克拉文人和（据他说关系很近的）安特人（Antae）人多次越过多瑙河，对东罗马巴尔干各省发动袭击。这些袭击，或者确切地说是安特人的袭击，始于查士丁一世（Justin I）统治时期（518—527年），不过安特人最终成了东罗马的盟友。到了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斯克拉文人造成了更大的问题，从普罗柯比的叙述中可以明显感到，他们袭击的频率和烈度都在稳步增加。从所记下的领袖的名字上看，两个群体都是讲斯拉夫语的，而且没有什么理由怀疑普罗柯比基本准确的说法。[6]据记载，从大约500年开始，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活跃于现在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南部，也就是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区域。

该地区还出土了有办法准确定年的科尔恰克类型遗存。仅凭其本身，科尔恰克遗存是无法精确定年的，但是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南部出土的物质遗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年代可以确定的进口物品。在瓦拉几亚的敦布勒韦尼（Dragosloveni），一座典型的科尔恰克下沉式建筑中发现了

一个5世纪末的胸针，它与一些科尔恰克陶器放在一起。该地区还发掘出了著名的萨拉塔-蒙泰奥鲁（Sarata Monteoru）墓地，那里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4世纪末和5世纪初的扣针和皮带扣。在摩尔达维亚，人们也发现有些典型的科尔恰克物品与可定年到5世纪或6世纪初的进口轮制陶器放在一起，而在基什尼奥夫（Kishinev）附近一个地方出土的科尔恰克物品中，发现了5世纪中叶的匈人式样的镜子。当然，我们无从得知某件物品在被埋下之前流通了多长时间，但是在该地区的科尔恰克物品边上，发现了足够多的5世纪中后期的物品，足以确认这些物品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流通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而正是在这个时间，普罗柯比的作品和其他东罗马史料中首次记录下斯拉夫人在同一地点的身影。[7]这些是大家都接受的。但是，那些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的斯拉夫人，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而来的，还是一直在这里居住？

传统的答案是“迁移”。首先，这里离罗马边境很近，有些地方在2—3世纪还是罗马帝国的领土，所以关于第一千年上半叶的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地区，相关记录还是比较多的。因此，根据公元500年之前的史料都没提到此地有斯拉夫人，来推测出当时那里没有斯拉夫人，并不是犯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默证法错误。在罗马时期，占据此地的是不讲斯拉夫语的其他群体。其次，同样突出的是，没有证据表明斯拉夫人在5世纪中叶阿提拉的匈人帝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个地区肯定是在匈人帝国的范围之内的。前文提过，在关于匈人帝国兴衰的记述中，不同时间点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臣属群体，却唯独没有斯拉夫人。想主张阿提拉的帝国里有斯拉夫人，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声称strava一词源自斯拉夫语。6世纪的约达尼斯说匈人在为去世的领袖致悼词时，会用到strava一词。也许是这样，但我们对匈人的语言一无所知，这个词其实也有可能源自匈人自己的语言。这个证据显然非常弱，不足以证明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记录的斯拉夫人在阿提拉帝国中起了重要作用。

主张他们是移民的论点也有更积极的方面。约达尼斯（大约与普罗柯比同时代）在君士坦丁堡写作时，对6世纪中叶的斯拉夫人做了如下著名描写：

> 达契亚地处这些河流中间，被高耸的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脉）环绕，仿佛戴了一顶王冠。在山脉靠向北方的左侧山脊附近，维斯瓦河发源的地方，居住着人口众多的威尼蒂人，他们占据了广阔的土地。尽管他们的名字如今散布在各个部落和地方，但他们主要被称为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斯克拉文人的住所从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延伸到……德涅斯特河，向北直到维斯瓦河……安特人是这些人中最勇敢的……（他们的住所）从德涅斯特河到第聂伯河，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要走上许多天。

上述描写基本与普罗柯比的记载相符，但多了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来自早期的威尼蒂群体这个信息。这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罗马时期的资料中虽然没有提到斯拉夫人，但是提到了威尼蒂人。我们看到，塔西佗认为威尼蒂人居住在维斯瓦河以东，在芬尼人居住的北极圈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广阔地带。稍早时候的普林尼也听说过威尼蒂人（他称其为Venedae），但没有提供更多信息。2世纪的地理学家托勒密也只是多知道几个群体的名称而已。毫无疑问，威尼蒂人存在，而且在第一千年的上半叶生活在东欧，但罗马人也只知道这么多了。在他们看来，欧洲的这一区域比更远的区域也就少那么一点点神秘感，传说更远区域的人“面目是人，身体四肢却和野兽一样”。当然，关键在于，如果将这些早期记录与约达尼斯的记载对照来看，就自然会得出结论：源自威尼蒂人的斯拉夫人在公元500年或之后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地区，是从北方迁徙而来的结果。[8]

一定程度上，约达尼斯的记载符合斯拉夫早期研究中源自语言学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也符合一些更受人认可的考古学观点。所有现代斯拉夫语言中，指代鹅耳枥（hornbeam）的词都来自古斯拉夫语，而指代山毛榉、落叶松和紫杉的词都是借自日耳曼语的外来词。这想必是因为鹅耳枥在最初的“斯拉夫家园”的植被中占主导地位，这个观点在20世纪初很有影响力。经调查，唯一符合这种情况的地理区域是波来希的普里佩特沼泽地带，也就是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约350千米的潮湿地带（地图17）。可以想见，后来在普里佩特地区进行了许多考古挖掘工作，伊里娜·鲁萨诺娃（Irina Rusanova）则提出，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该地区的广泛研究，她发掘出了最早的科尔恰克物质遗存。科尔恰克这个标准遗址（type-site）就是她的发掘成果之一。她称这个遗址的年代更早，因此不再沿用博尔科夫斯基提出的“布拉格遗存”这个名称，而是用“科尔恰克”这个标签来代表下沉式小屋加手工炊具这个特征组合。[9]

但是，这个一度是斯拉夫早期历史标准观点的论点最近受到了库尔塔的挑战。他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历史上斯拉夫人最早出现的地方，就是史料中第一次提到他们时他们的所在地：喀尔巴阡山脉的东南边缘。他的推理结合了历史和考古。首先，对于约达尼斯所说的斯拉夫人源自威尼蒂人，他认为并不准确。已经证明，约达尼斯作品里的一些地方得自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而库尔塔认为，所谓威尼蒂人和斯拉夫之间的关联是约达尼斯根据塔西佗的话自己发明出来的——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罗马作家往往声称没有“新的蛮族”，只有换了新名字的旧蛮族。在考古方面，库尔塔也抨击了鲁萨诺娃的结论，认为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地区科尔恰克遗存的年代早于在波来希发现的遗存，因此不可能从后者衍生而来。从更积极的方面讲（这也是他整体研究的重点），库尔塔提请人们注意，有大量历史和考古证据表明，6世纪与东罗马世界接触的那些斯拉夫人被卷

入了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动态过程。他认为，正是这个过程“创造”了“第一批”斯拉夫人或原始斯拉夫人。[10]

库尔塔的许多观点都是正确的。他很有说服力地否定了鲁萨诺娃提出的年代顺序。波来希的科尔恰克遗存，其年代肯定晚于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的物质遗存。至少那些最终在6世纪现身东罗马势力范围内的斯拉夫人，有可能起源于喀尔巴阡系统中的某个地方。库尔塔本人主张他们的起源地在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另一种新观点由弗拉基米尔·巴兰（Volodymyr Baran）首先提出，由所谓克拉科夫学派（Cracow School）的波兰考古学家进一步发展，该观点认为斯拉夫人可能起源于更偏东北的地方。在现代的波多利亚出土了大量早期的科尔恰克物质遗存（比更东北的波来希出土的遗存早得多）。科尔恰克遗存定年这个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但比起库尔塔主张的东南部，波多利亚有更多可定年在稍早时期的进口物品。库尔塔所说的喀尔巴阡山脉南部科尔恰克定居点，也是在波多利亚有人零星定居后一个世纪才形成的。出于这些原因，第一批在历史记录中明确出现的斯拉夫人有可能直接源自喀尔巴阡山脉东北部的一个人口群体。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的播迁速度很快。波多利亚的科尔恰克遗存有可能比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相应遗存早一到两个考古世代（每个世代约25年）。[11]

我也不认为库尔塔如此轻视约达尼斯是正确的。显然，由于约达尼斯没有描述自己的工作方法，我们也无从核对，因此所谓约达尼斯基于塔西佗的说法发明出斯拉夫人与威尼蒂人的联系，这样的看法只是种假说。这不仅无法证明，还有一些与之相悖的证据。约达尼斯原本是驻扎在多瑙河边境的一位东罗马指挥官的军事秘书，当时斯拉夫人的袭击正在加剧。他还（大概是基于自己的认识）精确描述了阿提拉帝国崩溃后各群体重新定居在多瑙河下游边境以南的情况。可见，他对这一地区颇为了解，也完全有可能知道该地区的斯拉夫人对自己起源的看法。事实上，约达尼斯可能也写下了关于斯拉夫群体行动的最早记录，他提到了一场哥特国王维尼塔里乌斯对安特人发起的战争。但约达尼斯搞错了年代，以为维尼塔里乌斯生活在4世纪后期，而他实际上是瓦拉米尔击败的战队领袖之一。瓦拉米尔战胜这些领袖后，建立了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东哥特群体，时间应该是在阿提拉去世之后。但约达尼斯将此次战争放在了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向喀尔巴阡山脉以西迁移至匈牙利大平原之前，因此这确实与5世纪喀尔巴阡山脉东部边缘有讲斯拉夫语的安特人活动的描述相符。而从7世纪开始，中世纪早期的许多西欧人群开始用“文德人”（源自古老的罗马标签“威尼蒂”）一词来指代自己的斯拉夫新邻居。我们将看到，从6世纪开始，有文献记载的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就常常迁徙。从7世纪初开始，大量来自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出现在巴尔干半岛，而早在6世纪，就有了其他斯拉夫群体穿过欧洲中部高地向西迁移的记录。

由于迁移习惯在人口群体中是会累积的，所以的确有可能，6世纪初出现在多瑙河下游边境以北的第一个斯拉夫群体是不久前才迁来的。这样看来，库尔塔对约达尼斯的贬低充其量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我认为，这一次，历史学家约达尼斯是可靠的。[12]

但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我们稍后会仔细探讨），一个宏大的扩张进程使讲斯拉夫语的人主导了从易北河到伏尔加河的欧洲大片地区。关于这个进程的书面记录不多，但要说一切都始于活动范围局限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原始人口群体，恐怕不太可能。即使你确实不相信约达尼斯对威尼蒂人的描述，而认为史料中第一次提到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时他们的所在地就是其起源地，你也还需要去解释斯拉夫化这个整体现象。除树木名称外，语言学还提供了两个较宏观的可供参考的证据。

第一，现代的斯拉夫语族（包括东部、西部和南部语支）的语支之间，关系始终很近，近到不同语支彼此都能理解。种种证据表明，这种接近并不是因为不久之前发生了语言融合，而是因为这些语言是相对晚近的时候才各自分裂出来的。第二，从整体上看，斯拉夫语和欧洲的波罗的语关系最近。从水文名字上看，讲波罗的语的人过去在东欧的分布比如今要广泛得多（地图16）。如我们讨论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时看到的，较大河流的名字就像化石，可以经重大文化转型而保留下来。因此，在斯拉夫语的各个语支分裂前不久，讲斯拉夫语的人和讲波罗的语的人之间想必先有了分裂。他们以前共用一套比较古老、彼此关系很近的印欧方言。[13]从同样宏观的视角看，考古证据也描绘出一幅非常相似的景象。科尔恰克遗存及约500年时其他与之有紧密关联的遗存，都反映了极为简单的农业生活方式，而过着这种生活的，只可能是罗马时期维斯瓦河以东和喀尔巴阡山脉以北那些自给自足的农业社群。两组证据说明了相同的故事。显然，欧洲大量讲斯拉夫语的人来自东欧不讲日耳曼语的人群。即使约达尼斯臆想出了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之间的联系（我认为不大可能），他也很可能是对的。

欧洲的斯拉夫化

但是，语言证据在确定年代上对我们没什么帮助。我们知道斯拉夫语族是比较晚才出现的，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些专家认为，讲斯拉夫语者与讲波罗的语者之间的分裂是第一千年中期才开始的，当时正是讲斯拉夫语者出现在史料中的时候。另一些专家则认为要早一些，可能要早1 000多年。如果要了解欧洲在约公元500年后的斯拉夫化，就有必要研究这种意见分歧。如果公元500年时语言分裂才刚刚开始，欧洲讲斯拉夫语的人还很少，仅限于据说留下了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遗存的斯克拉文人和安特

人，那么公元900年前后斯拉夫人在欧洲各地的广泛统治，就是从数量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人开始建立的。而如果斯拉夫语族出现得早得多，那么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就可能是某个大得多的斯拉夫群体中的两个子群体。目前我们无法确定，但大多数专家认为斯拉夫语族出现的时间比第一千年中期早得多；而且，从关于斯拉夫扩张的更广泛证据看，认为当时说斯拉夫语的人并不只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确实更合理一些。[14]不管怎么说，要理解斯拉夫人在三个主要方向（向南进入巴尔干岛，向西和向南进入易北河和波罗的海流域，向东和向北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和北极苔原边界）上的爆发式扩张，就有必要考虑这两种可能性。

巴尔干半岛

关于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大致同时代的东罗马和拜占庭史料还算全面。在后来发现的考古材料可用之前，这些史料基本就是关于早期斯拉夫历史的最早记录了，但质量参差不齐。太多的聪明人花了太多时间研究有限的信息，结果自然是让这个领域成了一场棋赛，这边出招，那边就算好了反击策略。幸运的是，我们不用再打这种攻防战，因为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地区扩张的大体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前文说到，到了6世纪中叶，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地区的袭击无论是范围还是野心都有所增加。547—548年，一支庞大的袭击队伍从多瑙河出发向西南挺进，经过伊利里库姆，一路开到亚得里亚海的主要港口埃庇丹努斯（迪拉基乌姆）。据普罗柯比记载，这些袭击者占领了许多要塞——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这次得手之后，他们继续进攻。549年，3 000名斯拉夫人渡过多瑙河并沿着埃夫罗斯河（River Hebrus）前进。他们将城市的守军诱入埋伏，击败了当地的几支罗马军队，拿下了规模相当大的定居点托皮鲁斯（Topirus）。据说在随后的劫掠中，有大约1.3万名男性居民被杀，许多妇女和儿童被俘。然后在550年，一支空前庞大的队伍向南越过奈苏斯。他们雄心勃勃，目标是占领塞萨洛尼基——西巴尔干防卫森严的地区首府。最终，袭击者转身离开，穿过群山进入达尔马提亚，在罗马大军面前分散开来——这支罗马军队正向北穿越巴尔干半岛，准备完成对东哥特意大利的征服。罗马军队通过后，袭击者折回西巴尔干，在阿德里安堡击败了另一支（临时凑成的）罗马部队。此次胜利后，袭击者就进入了离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仅有一日行军路程的范围。[15]

但是，并无充分证据表明这些斯拉夫人当时已永久或半永久地定居在帝国边界之内。根据条约，安特人在540年得到了原罗马要塞图里斯（Turris），但那是在多瑙河以北，而且这么安排主要是为了防止斯克拉文人进一步袭击。普罗柯比列出了查士丁尼皇帝（527—565年在位）修复或建造的巴尔干要塞的清单，其中或许有一些斯拉夫地名。但就算是这

样，斯拉夫地名和要塞联系在一起，也不能代表出现了斯拉夫移民，而更可能是因为斯拉夫人被招入罗马军队后获准定居。不管怎么说，那些年里，斯拉夫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正式征服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地方，也不足以占领塞萨洛尼基这样的主要城市。[16]然而从大约570年开始，总体形势发生了剧变，因为阿瓦尔帝国崛起了。

阿瓦尔人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上起了很大作用，有必要介绍一下他们。他们和匈人一样，原本是游牧骑兵，继匈人之后，阿瓦尔人扫荡了欧亚大草原，在中欧建立帝国。幸运的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比对匈人的要多。阿瓦尔人讲的是突厥语，此前曾是中国边境一个大型游牧民族联盟背后的支配力量。6世纪初，阿瓦尔人的地位被敌对势力（所谓的西突厥人）取代，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来到了欧洲边缘，并在558年向查士丁尼的宫廷派遣使节，宣布了自己的存在。查士丁尼皇帝将他们看作分而治之的外交大博弈中的新棋子，皇帝希望借此避免东北方向出现严重的麻烦。但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了。阿瓦尔人不满足于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很快就形成了能构成真正威胁的帝国力量。到了570年，他们将游牧的保加尔人拉进队伍，迁到匈牙利平原——阿提拉的老战场。在那里，他们把格皮德人拉了进来，被他们征服的群体越来越多。阿瓦尔人的到来也促使伦巴第人去阿尔卑斯山另一边寻找更安全的意大利领地。[17]不仅如此，阿瓦尔人的到来还标志着斯拉夫历史上的分水岭。

和多瑙河中下游的众多邻居一样，喀尔巴阡地区的斯拉夫人意识到自己成了野心勃勃的阿瓦尔人的目标。安特人似乎在604年与阿瓦尔人的艰难交战中损失惨重，失去了政治独立。某种程度上，阿瓦尔人的崛起促使一些斯拉夫群体永久迁到多瑙河以南，以逃避阿瓦尔人的统治。而阿瓦尔人在该地区对东罗马发起的大规模进攻，尤其是在6世纪七八十年代和7世纪第二个10年间的大范围攻击，也给了这些斯拉夫群体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追求野心而不必担心罗马的反击。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当局不得不捍卫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东方领土，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先后发起的攻击。与饱经战乱的巴尔干地区相比，东方领土是富庶得多的税收来源，自然要优先保护。

新时代在6世纪80年代开始了。皇帝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在近东卷入与波斯帝国的一场大战，巴尔干地区的大多数罗马机动部队因而撤出，阿瓦尔人借机在色雷斯发动了大范围猛攻。与此同时，斯克拉文人在色雷斯和伊利里库姆发起了一系列破坏性很强的攻击。586年，伊利里库姆地区首府塞萨洛尼基首次遭遇了真正构成威胁的袭击。同年，“莫里斯皇帝在位第五年”，著名作品《莫奈姆瓦夏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甚至记载，斯拉夫人接管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只剩东部沿海地带仍在东罗马人手中。根据《莫奈姆瓦夏

编年史》的说法，这导致“所有希腊人”大规模撤离被占领的地区：帕特雷（Patras）的居民去了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雷焦（Rhegia，意大利南部），阿尔戈斯（Argos）的居民去了优洛克（Urok）岛，科林斯人（Corinthians）去了埃伊纳岛（Aegina），斯巴达人（Spartans）到了西西里岛和莫奈姆瓦夏——一个位于伯罗奔尼撒南部的多岩石、可防御的半岛。

然而，伯罗奔尼撒最终的斯拉夫化是后来才发生的。《莫奈姆瓦夏编年史》成书年代比较晚，尽管其中有一些真实的信息，但它把斯拉夫人的定居过程写得太简单了。6世纪90年代，取得波斯战争的胜利后，莫里斯在巴尔干地区发起了反击。外交上，他付钱给安特人，让他们去攻打发起袭击的斯克拉文人，而他的军队则在593—595年和599年大败阿瓦尔主力军队。602年，莫里斯的部队甚至在多瑙河下游以北地区行动，发起一系列先发制人的打击，摧毁了一些斯拉夫群体。教宗格列高利一世在这个时期的信件表明，教会的结构在伊利里库姆地区，尤其是在伯罗奔尼撒得到了恢复。因此，尽管确实发生了斯拉夫人的定居，但莫里斯的反攻吞噬了6世纪80年代最初的那些斯拉夫定居点。[18]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从604年开始，莫里斯继任者福卡斯（Phocas）和希拉克略又陷入了6世纪80年代的模式，再次卷入与波斯的战争。到了7世纪第二个10年初，东罗马的局面已非常不利，几乎失去了对整个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控制。能用的军事资源都被调到了东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得以发起规模空前的袭击。614年，灾难降临。塞萨洛尼基勉强逃过陷落的命运。萨洛纳（Salona），罗马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上最大的中心地区，落入了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之手，帝国在巴尔干北部的许多重要城市，比如奈苏斯和塞迪卡（Serdica），也一并丢失了。袭击行动随后向南扩展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别的不说，此时斯拉夫袭击者庞大的独木舟船队来到了沿海水域。626年，袭击威胁到了君士坦丁堡，那里被阿瓦尔人围困长达一周。伴随着此次军事攻击，斯拉夫人的定居也启动了。[19]

希拉克略最终赢得了与波斯的战争，但马上就得面对好战的阿拉伯势力的崛起。不同于6世纪90年代，这次他不再有机会修补巴尔干地区遭到破坏的罗马式生活了。因此，614年的灾难标志着原东罗马多瑙河边境的彻底崩溃，为斯拉夫人在整个巴尔干地区——从东北部的多布罗加一直到西南部的伯罗奔尼撒——的定居铺平了道路。这一定居过程我们无法详细重构，但种种史料中的小故事让我们清楚看到了它的规模。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马其顿，《圣德米特里的神迹》（*Miracles of St Demetrius*）表明，塞萨洛尼基周围斯特里蒙河（Strymon River）地区的大规模斯拉夫定居点在7世纪中叶就很稳固了。其中一段叙述让我们看到，大约670年的时候，就有好几个斯拉夫群体在城市附近定居了，后来发生的事也为此提供了佐

证。7世纪80年代后期，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设法在马其顿发起攻势，制服了该地区的斯拉夫群体，恢复了中央帝国的控制（尽管只是暂时的）。据说，他将多达3万名斯拉夫人迁到了小亚细亚。相关记载还得到了一些考古发现的呼应。在马其顿和北方邻近地区，并没有发现7世纪的比较成形的科尔恰克文化系统，但是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墓地和发掘点，则发现了许多彼此独立的科尔恰克遗存，相关地点有巴卡蒙提亚克（Bakar Muntjac）、奥西耶克（Osijek）、斯坦耶瓦茨（Stinjevac）、温科夫奇（Vinkovci）。[20]

在更东边的色雷斯，斯拉夫人定居点的存在也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约680年第一个保加尔人国家在巴尔干山脉以北建立之时，该地区已有7个斯拉夫部落居住。他们被重新安置，搬到了多瑙河平原后来保加利亚心脏地带附近高地上的弧形地带。这里的考古遗迹模式与马其顿不同。在边境要塞，特别是多罗斯托鲁姆（Durostorum）和博诺尼亚（Bononia）附近的墓地和农村地区，6世纪地层中发现了与本地遗存混在一起的斯拉夫陶器。但是在保加利亚北部的发掘也发现了波皮纳（Popina）等遗址，那里科尔恰克类型的遗存并没有和进口物品混在一起。波皮纳和相关遗址的年代层被确定在6世纪，但现在已经证明它们的年代要晚一些，应该是在614年多瑙河边界彻底崩溃之后；也是从614年开始，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这一地区全面定居。从考古学和历史学角度来看，原本游牧的讲突厥语的保加尔人到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但这些进一步的发展是以更早的大规模斯拉夫定居点为基础的。[21]

文献和考古证据也证明，在更往南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希腊的中心地带和伯罗奔尼撒，斯拉夫人的势力更大。《圣德米特里的神迹》附带提到了更多的斯拉夫群体，包括定居在色萨利和德米特里亚斯（Demetrias）附近的贝莱吉西塔人（Belegezitae）。比较晚近的文本里具体提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其他斯拉夫人，尤其是帕特雷附近的米林加斯人（Milingas）和埃泽里塔人（Ezeritae），他们在9世纪初起义，反对（略有）中兴的拜占庭要求它们纳贡的行为。就考古的情况而言，这批斯拉夫人更接近巴尔干半岛西北部马其顿的斯拉夫人，而不是东北部色雷斯的斯拉夫人。那里仅发现了一些相对零星的科尔恰克遗存，没有迹象表明斯拉夫移民引入了完整的物质文化系统。而某些曾被认为属于他们的遗存可能有其他来源。例如，在奥林匹亚的一处墓地发现了12个有武器随葬的火葬墓穴，死者的骨灰放置在科尔恰克式的骨灰瓮里。墓主很可能是东罗马士兵（也许有斯拉夫血统），而不是独立的斯拉夫移民。在阿尔戈斯、墨西拿（Messina）和德米特里亚斯发现了更有说服力的斯拉夫陶器，而希腊各地（像巴尔干其他地区一样）也出土了一系列“指状”扣针。这种扣针是中世纪早期的斯拉夫人经常佩戴的，但不是只有斯拉夫人佩戴。对于这种相对缺乏斯拉夫遗存的情况，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其中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是，第一批古

典考古学家对中世纪遗迹完全不感兴趣，他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破坏了希腊的大部分主要遗址，并简单粗暴地扔掉了后古典时期的所有物件。不管怎么说，斯拉夫群体进入希腊后，似乎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尔恰克类型物质文化系统。[22]

到了7世纪中叶，斯拉夫人的定居点已经多少影响了整个巴尔干地区，但这也许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根据一份资料，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出现了另一波斯拉夫人定居潮。根据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yogenitus）的《帝国治理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第一批斯拉夫人（没有划分群体）以阿瓦尔人臣民的身份最初定居在现在主要由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分据的土地上；当时阿瓦尔人正在中欧建立统治（从约560年起）。在这批斯拉夫人之后，但还是在希拉克略统治时期（610—641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这两个组织更严密的斯拉夫群体从北方前来，驱逐了该地区的大多数阿瓦尔人（并让其他人臣服），在塞尔维亚和达尔马提亚分别建立了统治。关于克罗地亚人，《帝国治理论》保留了两个版本的故事，一个显然是拜占庭版本，另一个则是克罗地亚版本。你可能已经想到了，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说克罗地亚人是应邀到巴尔干，另一个说他们不请自来，至于克罗地亚人定居时是否有承认拜占庭统治权这个条件，两个版本的说法也不同。

这些故事很出名，但说到该怎么理解，就有些困难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将它们尊为本“民族”的起源故事——两个民族都是作为完整单元来到巴尔干地区的。但是，故事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些故事太独特，因此缺乏佐证。记录它们的史料年代也相对晚——《帝国治理论》是10世纪中叶的文本，其叙述有明显的传奇色彩：克罗地亚人跟随五兄弟向南方进发。自然，学者们通常认为这样的叙述不可信。不过，10世纪的阿拉伯资料来源证实，当时喀尔巴阡山脉以北有其他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资料大概记录了他们的行动，其中也没有什么不可能成立的地方。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故事有真实的成分，那么情况就可能是这样：一些更有组织的斯拉夫群体南下迁入巴尔干地区，在希拉克略去世前与拜占庭建立了某种关系，由此脱离了阿瓦尔人的统治。实际上，630年前后，北部的塞尔维亚族人［或索布人（Sorbs）］曾与前法兰克商人萨莫（Samo）结盟，（也许只是暂时）摆脱了阿瓦尔人的统治；而这正是在希拉克略统治期间。而此时，阿瓦尔帝国也面临着重大危机——它在626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城以惨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当政可汗名望大损。也是在此时，相当数量的保加尔人逃到意大利，摆脱了阿瓦尔人的统治；因此，其他斯拉夫群体完全有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无论是否受到拜占庭的邀请。[23]

上述情况固然可能成立，但给巴尔干半岛这些地区带来全面人口变化的群

体，并不是只有7世纪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我们看到，有据可查的第一千年的移民案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彻底人口替代的情况：原本居住在当地的人口总是会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实际上，这个故事可能有一个额外的转折。不管是群体名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还是史料记载的一些领袖的名字，都可能来自波斯语族而非斯拉夫语族。因此有人提出，这两个群体可能原本处于波斯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24]这并非完全不可能。比方说，在黑海地区北部定居的斯拉夫群体有可能加入波斯游牧民族主导的军事联盟。并没有叙事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但是像匈人这样的游牧民族往往会在欧洲边缘采取这样的做法。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希拉克略统治时期（也许是在630年左右阿瓦尔帝国陷入危机时）宣布脱离阿瓦尔人的统治，拜占庭则利用他们来实施遏制阿瓦尔人在巴尔干地区势力的策略，这完全是可能的。但尚不清楚这些群体当时究竟已完全是斯拉夫人，还是只是以一些说波斯语的游牧民为核心的有组织联盟。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是随另一波斯拉夫移民大潮进入巴尔干西北部的，还是原本就在那个地区，只是组织起了先前臣服于阿瓦尔人的斯拉夫群体。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们就与巴尔干东部的保加尔人没有太大差别了。[25]

中欧

斯拉夫人向中欧易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地区的扩张同样彻底。关键的证明文字来自一份简短朴实，但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文本，也就是被归于“佚名巴伐利亚地理学家”（Anonymous Bavarian Geographer）名下的文本。该文本写于9世纪20年代，作者是在巴伐利亚某地工作的佚名地理学家。他调查了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法兰克帝国的邻居，写出了它们的名字，还根据每个单元包含多少“城市”（civitates）来给它们的势力评级（地图18）。这些城市看起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关键是，所有这些单元都有斯拉夫名称。我们从其他资料知道，在加洛林家族崛起之前，一些讲斯拉夫语的人就已渗透到了易北河以西，但是这些移民在这些地区的数量不够多，不足以挑战说日耳曼语的萨克森人和图林根人的统治地位。这位佚名作者的记录差不多到奥得河流域为止，而对于更往东的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地区，9世纪初加洛林欧洲的人也许并不怎么了解。[26]

斯拉夫人支配中欧的程度，到10世纪的奥托王朝时期才显出了更清晰的面貌。作为法兰克帝国的第三个王朝，奥托王朝统治的触角从易北河向东延伸。962年，历史记录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生的波兰国家，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斯拉夫人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地区的统治，这在阿拉伯的资料中也有佐证。最迟从10世纪中叶开始，讲斯拉夫语的人就占据了易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欧洲中北部地区。确实，记录奥得河以东地区情况的只有10世纪的历史文献，但这绝不代表波兰斯拉夫化的时间比波希米亚或摩拉维

亚更晚。10世纪是这些地区与西欧帝国势力间互动加速的时期，而不是斯拉夫人最初占领这些地区的时期。斯拉夫扩张给中北欧整体带来的变革显而易见。在第一千年的前半段，统治易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这片地区的还是讲日耳曼语的人。[27]

不过，加洛林时期和阿拉伯人的资料虽然记载了900年左右中欧完全斯拉夫化的情况，但并没有就相关历史进程发生的年代和性质给出什么信息。西罗马在476年宣告终结，历史打在欧洲中北部的灯光在接下来的300年里几乎消失了（在罗马时期也不过是断断续续的）。书面资料里只有一些零碎的片段，让我们大略看到斯拉夫人对欧洲中部高地的统治：从喀尔巴阡山脉向西，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第一个片段说的是512年的事件，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不幸的赫鲁利人开始了向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长征。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他们首先穿过“斯拉夫人的土地”。赫鲁利人最有可能经摩拉瓦河河谷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这也是向北离开匈牙利大平原的主要自然线路。如果是这样，那么斯拉夫人当时就已经在现在的斯洛伐克定居了。这一结论得到了发生在543年的第二个事件的佐证。那年，一个名叫希尔德盖苏斯（Hildegesius）的伦巴第王公带着6 000名战士袭击了东罗马军队，这些战士大多数是斯拉夫人。由于当时伦巴第人（在阿瓦尔人到来之前）仍住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因此他有可能是从该地区的边缘地带（摩拉瓦河河谷或周围）招募了那些斯拉夫士兵。第三个事件发生在6世纪末，当时，巴伐利亚民兵不得不起来抵抗斯拉夫人在593年和595年发起的袭击。也就是说，在希尔德盖苏斯事件发生后的半个世纪内，就有记录称向西250千米处接近巴伐利亚边缘的地方有了斯拉夫群体。

同样反映出7世纪初斯拉夫人向西扩张的程度的，是斯拉夫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也就是法兰克商人萨莫变成斯拉夫王公的冒险故事。他的经历十分丰富，包括娶了12个斯拉夫妻子，生下了22个儿子和15个女儿。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630年的时候，索布人这个斯拉夫群体已经在图林根附近定居了。[28]这表明，他们在易北河地区南部的某个地方可能已经建立了根据地。根据法兰克编年史家弗雷德加（Fredegar）的说法，当时他们已经与图林根邻居建立了“长期关系”；由此可以推测，索布人最晚在约600年时就占领了这片土地。从这几处史料中可以大致看到，斯拉夫人在6世纪时大致沿喀尔巴阡山脉和阿尔卑斯山的北部腹地行进，向西进入中欧（地图18）。但我们只能知道这些，前述史料中并没有关于北部低地或波罗的海沿岸的信息。

考古证据尽管有限，但大致证实了这一图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科尔恰克类型的遗存可能最早出现于5世纪后期的喀尔巴阡山脉外弧，但随后散布到更广阔的区域。在西部，它们分布在喀尔巴阡山脉外沿，穿过欧洲中部高地，一直到波希米亚以西以及易北河南部周边地区。在西北方的梅克

伦堡和卢日茨，还发掘出另一批科尔恰克遗存（地图18）。这里的考古模式与巴尔干大部分地区很不相同。在欧洲中部高地发现的不是一些零星的科尔恰克陶器或特有的墓葬，而是一个完整的科尔恰克文化综合体。欧洲中部高地不是只有零散的科尔恰克遗存，而是曾有过完整的科尔恰克生活方式，包括农业生产方法和社会联系方式。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科尔恰克遗存在刚出土时，被认为是5世纪中叶的产物。但现在很清楚，波希米亚科尔恰克遗存的年代不会早于6世纪下半叶。布热伊诺（Brzeźno）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科尔恰克遗址，其年代不会早于550年。这也与往东一些的摩拉维亚的新定年证据相符。摩拉维亚的证据表明，那里科尔恰克遗存的年代绝不会早于550年。借助年轮学，波希米亚以西易北河-萨勒河地区的科尔恰克遗址得以精确定年，遗存的年代也被往后推了。过去，易北河-萨勒河遗存的年代一直被定在5世纪末或6世纪初；如今，最早的遗存被确定为不早于7世纪60年代。[29]

因此，科尔恰克遗存在整个欧洲中南部的地理分布确证了零散史料暗示的斯拉夫人扩张的图景。新确定的年代也推翻了早先的理论：5世纪末或6世纪第一批斯拉夫人进入易北河地区后，在7世纪又出现了第二波斯拉夫移民潮。这种假说考虑到了与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存在相似的可能。但是，该假说的基础是易北河地区出现的新型陶器，这些陶器是慢轮制作，而不是完全手工成型。这类陶器在地理上的分布大致对应于加洛林时期和奥托时期的主要部落联盟（地图18）：威尔兹［Wilzi，对应费尔德贝格（Feldberg）陶器］，劳西兹［Lausitzi，对应托尔诺（Tornow）陶器］和索布（对应莱比锡陶器）。因此，人们一度认为新陶器类型在该地区出现，标志着这些部落群体的到来。但年轮学表明，包含这类轮制陶器的遗址的年代并不是6世纪末和7世纪，而是8世纪末和9世纪。那时，加洛林时期对该地区的记载已经很充分，足以排除进一步大规模迁徙的可能性。因此，这一新的陶器类型反映的，是新的制陶技术在已定居于易北河地区的斯拉夫人中的传播。这类陶器的年代定得较晚，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陶器与8世纪加洛林时代的陶器很像——它们显然是受到了后者的影响。[30]

因此，从上述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出，公元500年左右，有一条斯拉夫人的定居带，它从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部腹地向西一直延伸至斯洛伐克北部。大约50年后，一种科尔恰克类型的物质文化向南渗透到多瑙河中游附近的河谷中，又向西渗透到波希米亚。又过了50年，斯拉夫群体开始威胁巴伐利亚的边缘地区，同时在易北河-萨勒河地区定居下来。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我们还没有触及斯拉夫人接管中欧的关键。我们已经知道，9—10世纪的资料表明，当时讲斯拉夫语的人支配着易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北至波罗的海的欧洲平原北部。但比起这个广大区域，沿中

欧高地延伸到易北河部分地区的科尔恰克遗址带只是很细的一条，而且，相关的历史证据是在斯拉夫人在此定居下来之后才出现的。那么，考古资料到底揭示了怎样的欧洲中北部斯拉夫化进程？

波兰东南部克拉科夫地区所谓的莫吉拉内（Mogilany）遗址群似乎反映了第一阶段。最好将它们视为喀尔巴阡山脉附近地区科尔恰克类型遗址的变体，两者非常相似。莫吉拉内遗址出土了各种与之类似的手工陶瓷，也有我们熟悉的带有石头炉子的下沉式小屋。迄今为止，在莫吉拉内村旁边没有发现任何墓地，而这是该遗址没有被判为科尔恰克类型的唯一原因。这个遗址群没有办法通过年轮学定年，因此只能先用老一点的方法定年。老方法是这样的：在欧洲中部的大部分地区，通常无法定年的科尔恰克类型遗存在年代上都晚于日耳曼人的遗存；文化崩溃现象出现之前，日耳曼人统治着这些地区，他们的遗存更为丰富，定年也更容易。因此，在满足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斯拉夫人前来定居的年代，不会早于该地区日耳曼类型文化终结的年代。第一个条件，斯拉夫移民群体，与留下用于定年的丰富物质遗存的日耳曼群体，二者在该地区没有共存过。而第二个条件是，该地区日耳曼遗存消失与斯拉夫人到来之间没有太长的时间间隔。

两个条件都有潜在的问题，但在有办法用南部地区的年轮学证据来比照的地方，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例如，没有证据表明曾主导斯洛伐克北部和东部、摩拉维亚东北部的日耳曼文化在公元500年后还继续存在。而在斯洛伐克南部和摩拉维亚，还有下奥地利（多瑙河以北的奥地利），则发现了许多后来的日耳曼遗存，足以表明日耳曼文化在那里一直存在到550年左右。波希米亚的日耳曼类型文化也持续到差不多的时间段。[31]这些年代，大致就是使用新的科学方法给这些地区最早的斯拉夫定居点确定的年代可见，在没办法使用更科学的定年方法的地区，老方法还是可以用的。

罗马时期，莫吉拉内遗址群所在的克拉科夫在原普热沃斯克系统的南部范围内。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普热沃斯克系统崩溃的时候，正是匈人势力在5世纪上半叶崛起的时候。在库亚维地区拉杰尤夫（Radziejow Kujawski）的莫吉拉内遗址内，发现了一种进口扣针，其年代可以确定为5世纪末或6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遗址群的下一个文化阶段以金属制品的出现为开始标志，而这些在莫吉拉内第45号挖掘点发现的金属制品，年代可以确定为约600年，也就是说，之前那个文化阶段最晚延续到了这个时候。综上，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留下科尔恰克类型遗存的那些讲斯拉夫语的人，在5世纪末或6世纪初进入了因普热沃斯克文化崩溃而在波兰东南部形成的权力真空，而在那之前不久，他们首次在喀尔巴阡地区为人所知。[32]

但是，在中世纪早期的今波兰大部分地区，科尔恰克类型遗存并没有广泛

分布。在卢布林（Lublin）以北向西延伸到易北河的地区，发展出了另一种区域性考古系统，也就是所谓的苏科-杰济采（Sukow-Dziedzice）文化（地图18）。目前，苏科-杰济采遗址与莫吉拉内遗址之间已经有了清晰的界限。尽管两类遗址中，一些较小的陶器类型相同，但较大陶器的形状完全不同，苏科-杰济采的陶器种类也比科尔恰克类型的种类多。有些陶器甚至有点像之前日耳曼人统治时期当地普热沃斯克文化陶器的手工仿制品。下沉式小木屋（Grubenhäuser）是科尔恰克地区的标志性特征，在苏科-杰济采地区通常见不到。除了定居在马佐夫舍、库亚维亚（Kuiavia）和切尔姆诺（Celmno）肥沃黄土地上的一个独立的群体外，迄今为止确定的主要房屋类型是建在地面上的木屋。这种不同的建筑传统支持了这样的一个论点：波兰斯拉夫化的历史发展轨迹截然不同于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易北河南部地区。一些学者认为，既然苏科-杰济采文化与科尔恰克文化差别这么大，那它们一定是在两群完全不同的斯拉夫人中形成的。它们认为，形成苏科-杰济采文化的群体要么原本就居住在波兰（其存在长期被日耳曼精英遮蔽），要么在公元500年后迁入波兰，但其迁出地不是喀尔巴阡山脉，而是科尔恰克文化主导下喀尔巴阡地区之外的另一个“斯拉夫故乡”，也许是白俄罗斯（Byelorussia）。不管是哪种情况，根据这一观点，加洛林时期资料明确记载的中欧斯拉夫化过程，都产生于两股同时发生但彼此独立的斯拉夫扩张潮，这两个群体，一个是来自喀尔巴阡地区的科尔恰克文化群体，另一个是来自白俄罗斯或波兰内部的苏科-杰济采文化群体。[33]

认定波兰理当有自己独特的斯拉夫化轨迹，这样的想法有从前民族主义议程的影子。人们一度认为可以通房屋类型来绝对可靠地区分两个人口群体，但最近的一些发掘动摇了这种看法。在三个以前没有发现下沉式小屋的地区，发掘出了一批下沉式小屋：维绍格鲁德（Wyszogrod）、沙尔里格（Szarlig）和兹米耶沃（Zmijewo）。此外在维绍格鲁德，在同一处遗址发现了同时代的下沉式小屋和地面小屋。鉴于这些发现，如果继续调查下去，有可能会在苏科-杰济采地区发现更多科尔恰克类型的下沉式小屋，从而模糊两种文化间原本清晰的分界线。[34]即便如此，由于语言证据并不确定，完全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5世纪末，讲斯拉夫语的人在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和维斯瓦河以东广泛分布，而留下科尔恰克遗存的波多利亚人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子群体。同样完全有可能的是，这个广泛分布的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如果存在的话）后来参与了波兰等地的总体斯拉夫化进程。苏科-杰济采地区使用的陶器样式要多得多，这很值得注意，说明与莫吉拉内遗址不同，苏科-杰济采很可能不是科尔恰克文化在波兰的变体，而是更独特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苏科-杰济采的斯拉夫人来自另外的群体，但我们很快会看到，这更有可能与移民抵达波兰时面临的条件有关。

很难知道新的苏科-杰济采文化系统在维斯瓦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区域传播得

有多快，因为该系统内部的年代情况还没能确定。公元500年或那之后不久，北边的普热沃斯克和维尔巴克地区发生了日耳曼文化崩溃，这与东罗马历史学家提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在作品里顺带提及的一致；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一些斯拉夫人在6世纪90年代已经在波罗的海了（不过这也许什么也不能说明）。而在原民主德国境内的卢日茨，对苏科-杰济采遗址的科学定年表明，它们属于相当晚的时期。在克拉科夫罗斯托（Rostow）的苏科-杰济采遗址中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金属制品说明，该遗址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700年。对苏科-杰济采遗址本身和同一地区的许多水井进行年轮学测定后，也发现其年代应该是在8世纪。这些年代仅适用于最西端的苏科-杰济采地区，而由于有充分理由认为斯拉夫人的扩张大体上是从东到西的，因此某些波兰遗存的年代被确定为6世纪未必与此矛盾。目前我们能知道的只有这么多，将来更多的科学调查肯定会揭示更多的信息。[35]

因此，大致说来，加洛林时期文献记载的欧洲中北部的斯拉夫化，可能是从两个方向（不一定是从两个出发点开始）往易北河推进的。一条路线以布拉格-科尔恰克遗址带为标志，该遗址带穿过中欧的高地，延伸至波希米亚，甚至达到易北河以西的一些地方。这个方向上的扩张在约500年至600年间延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另一条路线的标志是苏科-杰济采文化在北欧平原上的传播，这个方向上的扩张同样成功。最终（尽管比从前人们认为的要慢一些），该文化可能在700年左右传播到了易北河以西。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但维斯瓦河以西的欧洲最初斯拉夫化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勾勒出来的。

俄罗斯及周边

关于直到伏尔加河的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拉夫化，主要有两方面资料。第一方面是历史资料。多亏了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我们知道维斯瓦河以东相当于现代白俄罗斯和沃伦（Volhynia）的地区当时处在“东斯拉夫人”的控制之下。不过，对中世纪早期即将结束时该地区情况的最全面描述，来自一份比较晚近的资料，即《往年纪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本形成于12世纪。其中记载，到大约900年时，一些彼此独立的斯拉夫群体已经占据了东欧相当广大的地区。书中有很多关于波利亚尼亚人（Polyanians）的讨论，这是一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往年纪事》成书之时定居在基辅附近，但书里顺带提及了许多其他群体及其大致分布范围。显然，《往年纪事》是回顾性的文字，但没有理由认为它严重歪曲了公元1000年前后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东欧平原上扩张的情况。拜占庭的资料，尤其是《帝国治理论》（这次它的信息没什么问题，而且讲的是同时代的内容），证实了基本的轮廓。公元1000年的时候，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统治着东欧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延伸到第聂伯河以东的领土，其中

的斯洛文尼亚人则将控制权扩展到了北至伊尔门湖的地区（地图19）。[36]

在现代人看来，讲斯拉夫语的人广泛分布于俄罗斯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我们另一方面的资料说明这不是自古以来的情况。在维斯瓦河和伏尔加河之间，普里佩特河和第聂伯河交汇处以北的大片土地上，所有主要河流的名字都源于波罗的语而非斯拉夫语。似乎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讲波罗的语的人一度主导着这片土地。因此，10世纪时该地区基本由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控制，这种情况必然是斯拉夫人的扩张在某个时候带来的。这就是俄罗斯史前史的根本难题。[37]在完全没有史料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知道在第一千年的俄罗斯大地上（那里一度由讲波罗的语的群体支配），哪个考古文化体现了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最早侵入时的情况？

1945年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考古事业，让众多领域受益匪浅，我们讨论的领域也是其中一个。在这个领域，苏联时代的许多议程早已沉寂。某种程度上，现在已经可以构建出一种简明的叙事，从约500年时喀尔巴阡地区肯定讲斯拉夫语的科尔恰克世界开始说起。到6世纪中叶，科尔恰克类型的物品不仅向西、向南传播，还向东传播到了乌克兰。在此期间，标准遗址（科尔恰克村发现的遗址）形成于日托米尔（Zhitomir）附近的捷捷列夫河（River Teterev）畔，随后科尔恰克文化扩散开来。在更北面的波来希，发现了7世纪的科尔恰克遗存，发现地是以树名闻名的普里佩特沼泽地带。差不多同一时间，对我们的故事很重要的另一个文化区，即彭考夫卡系统形成了，它在550—650年间主导了乌克兰森林草原区的大片土地。

在许多方面，彭考夫卡遗存与科尔恰克遗存没什么区别。两个系统都在河流阶地上建造了小的聚落，这很适合自给自足的农业。彭考夫卡系统的房屋也是部分沉入地下，角落处也安有石头搭成的烤炉。彭考夫卡遗存仅有的特别之处是，一些较大的陶器是双锥形的，铁制工具和装饰性金属制品的种类也比较多。因此，在外行（甚至许多内行）看来，系统间的相似之处比差异要显著得多，大多数学者相信，如果科尔恰克类型遗存是讲斯拉夫语的人留下的，那么彭考夫卡系统也是如此。确实，不少人根据约达尼斯笔下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的地理分布情况，认为彭考夫卡是安特人的产物，科尔恰克则是斯克拉文人的产物。这么判定本身有问题，但这两个系统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它们的分布范围与6世纪讲斯拉夫语者的分布范围重合，因此的确有理由认为，彭考夫卡和科尔恰克一样，至少是由斯拉夫人主导的。[38]

然而，7世纪末是发生了重大变革的时代。650—750年，在原先的科尔恰克地区和彭考夫卡地区大部，以及第聂伯河两岸以北原本不属于这两个系统的大片土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卢卡-莱科维茨卡亚（Luka

Raikovetskaia）文化。和斯拉夫地区西部同一时期的文化（托尔诺、费尔德贝格和莱比锡系统）一样，卢卡-莱科维茨卡亚与之前文化的主要区别是，它的大部分陶器是慢轮制成的。总体而言，一切都表明，卢卡-莱科维茨卡亚相当于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系统在技术进步时代的重生，尽管关于它究竟是一个统一的系统，还是有许多各地的变体，一直有争议。

同时，彭考夫卡区域的最东端出现了进一步的独特发展。在这个地区，以及从前完全在彭考夫卡系统之外的一些地区，发展出了所谓的伏林察沃（Volyntsevo）文化。除了陶器略有不同外，金属制品和堡垒的普遍程度是它和卢卡-莱科维茨卡亚文化的一大区别。伏林察沃文化的历史也始于7世纪，但到8世纪还在传播。8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使它获得了新名字"罗姆内-博尔舍沃"（Romny-Borshevo）。该系统的陶器与伏林察沃有直接的联系，但分布范围更广（这也是它更名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包括了顿河上游和奥卡河（Oka）盆地。相关的定居点中，防御工事也使用得更广。在最初的形成阶段之后，卢卡-莱科维茨卡亚文化和罗姆内-博尔舍沃文化一直到10世纪都持续发展，地理分布范围不断扩大。10世纪，它们拓展到了《往年纪事》中提到的大多数斯拉夫群体所在的地区（地图19），因此毫无疑问，在10世纪讲斯拉夫语的人与这两个考古系统之间可以建立起直接的联系。[39]

我们现在可以轻松勾勒出东欧平原物质文化系统兴衰的轮廓，也能比较有信心地确定两组关联：科尔恰克、彭考夫卡系统与6世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有关，卢卡-莱科维茨卡亚、伏林察沃、罗姆内-博尔舍沃系统和10世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有关。

但这不是历史叙述，也不应把它与历史叙述混淆。现在比较确定的是第一千年下半叶东欧平原上陶器风格的发展顺序。历史资料也清楚地表明，伏林察沃和罗姆内-博尔舍沃文化后来的阶段，与10世纪讲斯拉夫语群体的统治，在地理和时间上是吻合的。但陶器不是人，试图通过陶器风格的变化来了解背后的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历史与国家形成、移民等宏观历史模式的关系，会带来许多问题。

其中两个问题很重要。首先，因为轮制陶器的引入，我们很难确定从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到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的演化有多直接。新系统出现，仅仅是因为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的陶工采用了新的制陶技术吗？如果是这样，考虑到主导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文化的极有可能是讲斯拉夫语的人，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文化大概也是由斯拉夫人主导的。这是通常的假设，但陶器的演变背后可能是更复杂的人类历史，至于改良的陶器（轮制陶器比手工陶器要好），非斯拉夫人也是有可能使用的。其次，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文化系统在8—10世纪向北方和东方传播，其背后的人类历史是什么？是人群扩张迁徙到了那些地方，还是说，

只是新的习惯传到了那些地区，为当地人所采用？我们之后会回答这两个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背后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涉及语言学对考古学的挑战。史料记载，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系统向北和向东扩张，承继它们的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系统也继续在这两个方向上扩张，是不是从这时起，俄罗斯和乌克兰就走上了斯拉夫化的道路，脱离了从讲波罗的语的群体的势力范围？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前文提过，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斯拉夫语族和波罗的语族的最初分离是在第一千年中期，那么，将喀尔巴阡山脉边缘出现科尔恰克类型文化的时间与斯拉夫语独立的时间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相关考古文化之后向北和向东传播，很可能就是俄罗斯斯拉夫化的开始。

但另一些语言学家可能会将波罗的语和斯拉夫语分离的年代定得更早，甚至早到公元前第二千年。而与此相应，也有一些考古学家主张，第一千年中叶水文名分界线的波罗的语这一侧的一些系统，特别是所谓科洛钦（Kolochin）文化，其生活模式与科尔恰克系统的十分相似，因此要说后者由斯拉夫人统治而前者不是，就太武断了。理论上，这个观点完全有可能成立。根据这种观点，在科尔恰克系统扩张的过程中，有一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特别成功，在已经基本是斯拉夫语区的地方大范围建立了统治。第一种模式是，斯拉夫语出现的时候，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建立了政治统治，这类似于我们在巴尔干和中欧观察到的普遍模式。但还有一种不那么戏剧化的可能性，那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斯拉夫化了。[40]

移民和斯拉夫人

5世纪末，斯拉夫群体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外围的丘陵地区，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在进行侵略性袭击，并在7世纪果断向南进入巴尔干地区。同一时期，其他讲斯拉夫语的群体进入波兰南部（6世纪初的莫吉拉内部落），并沿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向西扩张，在6世纪上半叶进入摩拉维亚，6世纪下半叶到达波希米亚，7世纪早期来到哈弗尔河（Havel）、萨勒河和易北河的交汇处。沿另一条路线推进的斯拉夫群体也到了易北河地区，时间上也许略晚一些，它们从维斯瓦河向北和向西推进，但如前文所述，苏科-杰济采系统内部的年代仍比较模糊。6世纪，斯拉夫人向西大举扩张，喀尔巴阡山脉另一侧的乌克兰也有类似的情况，在那里，科尔恰克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彭考夫卡系统在6世纪传播到广大地区。然而，即使如此大的扩张，也不能解释为什么10世纪时斯拉夫语群体能统治此前说波罗的语的大片地区。这多少反映于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系统随后在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地区之外的传播，但我们已经看到，实际情况可能远

比物质文化体现的简单线性发展复杂得多。

没有历史证据，就无法知道约500年时讲斯拉夫语的人在东欧的分布情况。但他们活动的地理范围和所采取的种种形式确实表明，当时讲斯拉夫语的人肯定远远不只有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但斯拉夫人的扩张，特别是其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过程，仍然问题很大。彭考夫卡、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系统在东欧平原不同地区的传播既可以是这些地区斯拉夫化的开端，也可能代表某一斯拉夫群体战胜了其他群体。但从更根本上说，这只不过是斯拉夫扩张的最粗略的轮廓。

讲斯拉夫语的人是如何将统治范围拓展到欧洲这么大片的地区的？又是什么引起了欧洲历史上的这场根本性革命？

了解斯拉夫欧洲创立背后的人类历史，比探索卷入罗马帝国陨落过程的日耳曼群体的迁徙活动还要难。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历史证据还有很多漏洞。而哪怕有了更充分的文献证据，第二个原因也还是个问题。公元500年前后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出现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这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革命，因为之前没有过该地区有讲斯拉夫语者的记载。随后，其他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举扩张，最终创建了第一千年末期的那个斯拉夫欧洲：6世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扩张到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乌克兰，7世纪是巴尔干半岛，8—9世纪是俄罗斯森林地区，之间的某个时间是欧洲中北部。如果说跨越如此广大时空的扩张活动只有一种形式，那实在是难以想象。

移民潮

现有历史资料质量不佳，要估计斯拉夫移民的人口单元规模非常困难。仅有的过得去的数字和6世纪的袭击队伍有关，袭击者通常以数千人的小组为单位行动。有一次，一支包括了匈人、安特人和斯克拉文人的1 600人队伍闯入了东罗马领土；还有一次，3 000名斯拉夫袭击者必须每人向格皮德人支付1枚金币，才能被运送到安全地带。希尔德盖苏斯的格皮德人和斯拉夫人混合战队有6 000名士兵。据记载，5 000名士兵组成的斯拉夫“精锐”部队在598年出其不意地攻打了塞萨洛尼基的防御工事。[41]这些数字相当一致，但它们代表的是另外一种行动，不同于7世纪影响了巴尔干地区、6世纪影响了喀尔巴阡山脉和中欧高地的扩张性移民。实施袭击和移民的不太可能是相同类型的社会群体。

从6世纪的中欧到9世纪的伊尔门湖，环境有很多种，可见斯拉夫欧洲的建立涉及许多不同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先将讨论局限在6世纪和7世纪的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因为我们至少有一些相关的历史文献。但即使在这个范围内，考古学也揭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某些环境中，特别是在6世

纪时的喀尔巴阡山脉丘陵地带、摩拉维亚、波希米亚、易北河-萨勒河地区、乌克兰西南部，以及公元600年后不久的色雷斯部分地区，科尔恰克类型的物质文化可以说完全转移到了新地区，从生活方式、技术和社会模式等可衡量的方面看都是如此。这些地区间仅有的不同是某些陶器的形状。在我们所知斯拉夫人统治的许多其他地区，发现了完全不同的考古结果。这些地区总体来说遗存的形式要更加多样，但发掘出的考古物品里只有零星的科尔恰克遗存。从7世纪开始，这种模式主导着原罗马巴尔干地区大部以及维斯瓦河以西的北欧平原大部，那里的考古调查仅发现少量科尔恰克类型陶器，而不是整个系统都转移到了新地区。关于斯拉夫扩张的任何论述都必须考虑这两种情况。

尽管缺乏叙事资料，但科尔恰克类型的社会经济系统整个转移到全新地区，暗示着一种特殊的移民过程。这些地区的定居点一般规模很小，因此社会经济单元大概也很小。科尔恰克小村庄通常由10—20个小型住宅组成，住宅都明显是为核心家庭设计的。思考后可知，这些小村庄也体现了形成“纯”科尔恰克地区的基本移民单元的最大规模。科尔恰克欧洲很明显是这样的移民单元从喀尔巴阡山麓向外扩张的产物，它们既可能整个社区一起迁移（取最大值的观点），也可能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迁移，到了目的地后才聚在一起。科尔恰克的住宅看上去可以容纳差不多5个人，所以移民单元的规模应该在50人到100人之间。参考我们见识过的其他移民形式，这个现象最可能产生于“推进浪潮”。我们看到，在大约150年的时间里，科尔恰克遗存从喀尔巴阡山脉边缘扩散到易北河下游，同时保留了大部分的基本文化形式。遗存的年代范围很大，清楚表明这群欧洲的讲斯拉夫语者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还要保守。以前，科尔恰克定居点的年代被限定在5世纪和6世纪初，但我们现在知道有些群体将这种生活方式维持了两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并以小群体的形式在欧洲各地缓慢扩散。[42]

不过，在此有必要做一提醒。通常认为，“推进浪潮”是比较随意的行动，某个定居点的人口越来越多，于是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个子群体迁移出去，搬到最近的适宜地点。将该模型应用到欧洲首批农业人口的扩散上，通过数学计算可以得出，以这种方式实现的人口扩散，一年可能只能推进1千米。但是科尔恰克斯拉夫人从喀尔巴阡山脉边缘到易北河-萨勒河地区只用了150年的时间，而两地相距约900千米。这个速度很快，足以表明推进浪潮模型中一些固有的预设不适用于他们的迁徙。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斯拉夫人的行动和法兰克定居者在高卢北部的扩张一样，并不随意。莫里斯的《战略》（*The Strategicon of Maurice*）这本拜占庭军事专著称，一些斯拉夫人更喜欢居住在树木繁茂的高地上，而不是居住在更开放的平原上，而穿越欧洲中部高地的科尔恰克遗址带可以视为对这一说法的佐证。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每一代科尔恰克人选择目的地时，都会去寻找类似的环境，而这的确有道理。欧洲的大多数平原都在较大政治势力（包

括拜占庭人、法兰克人和阿瓦尔人）的统治之下，因此如果想以科尔恰克世界特有的那种小社群为单位独立生活，就不能选低地。对于科尔恰克斯拉夫人来说，移民很可能是人口增长时维持传统生活方式（包括规模很小的社会组织）的一种手段。[43]

相比之下，7世纪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斯拉夫定居点的是规模较大的单元，因为没有更好的词，所以我们姑且称之为部落。在7世纪中叶的塞萨洛尼基附近，一些有名字的较大斯拉夫群体已经在斯特里蒙河河谷中定居了。史料《圣德米特里的神迹》还告诉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个斯拉夫群体贝莱吉西塔在南边某个地方拥有土地。更往南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9世纪初也居住着有名字的斯拉夫群体——米林加斯人和埃泽里塔人。在9世纪的斯拉夫波希米亚，以及佚名巴伐利亚地理学家的作品中提及的更广泛地区，都发现了相同的模式。在这些中欧地区，可能也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有名字的较大群体可能并不是整体迁徙到史料中所记的地方的，而是后来更零散的“推进浪潮”式移民的产物。至少在波希米亚，一开始斯拉夫移民定居并形成了“纯”科尔恰克的情况，其9世纪更有组织的结构显然是后来发展的结果。但我们似乎无法用迁徙结束后的发展来解释7世纪贝莱吉西塔人或在塞萨洛尼基附近定居的其他群体的规模和组织。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地区一开始形成了科尔恰克文化，而部落存在的历史证据可追溯到最初的移民后不久。《圣德米特里的神迹》成书于当时当地，其中记录了670年前后的事件，而我们刚才看到，定居本身不可能早于7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不到两代人的时间，似乎不足以从较大家庭单元的迁移中产生出全新的社会政治秩序。[44]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较大的群体呢？历史资料对早期斯拉夫人生活的描述很一致：他们生活在较小的社会政治单元中，但具体多小呢？有些确实很小。6—7世纪，科尔恰克系统在欧洲大陆上的传播可能是由不到100人的社会单元实现的。但最近一项重要研究正确地强调，斯拉夫语世界的其他地区在6世纪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社会政治革命。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在史书中花了大量篇幅书写约530年到560年间斯拉夫人的种种活动，但没有提到任何斯拉夫领袖。然而到了6世纪的最后25年，模式突然发生了变化。许多不同的东罗马文献提到了各种各样的斯拉夫领袖，有足够的间接细节表明他们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例如，一个叫穆索修斯（Musocius）的人统治的领土要花3天时间才能穿过，也就是说疆域的跨度在100到150千米之间。另一位领袖阿达加斯图斯（Ardagastus）的统治也足够稳固，在585—593年维持了差不多10年。听从佩里加斯提斯（Perigastes）指挥的人不少，足以杀死1 000名东罗马士兵。而另一位有名字的人物达布里塔斯（Dabritas）对自己的军事力量充满信心，他杀了阿瓦尔可汗的外交使节，以那个时期的男子气概豪言道：“有哪个为人所生、为阳光所温暖的人，能让我们屈从于他？别人不能征服我们的土地，

只有我们可以征服他们的土地。”

即使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疆域跨度超过100千米，社会单元的规模也能有几千人，这得到了唯一还算可信的总体数字的印证。东罗马人摧毁了阿达加斯图斯的统治后，罗马人和阿瓦尔人之间爆发了战俘归谁控制的争论，最终阿瓦尔人占了上风，罗马人移交了5 000名战俘。这个数字与6世纪末新的斯拉夫国王治下臣民的数量吻合，这些国王治下的人口差不多有1万，还没有到好几万的程度。尽管这也不算特别大的规模，但和将科尔恰克文化向北传播的社会单元相比，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了。如果可以从阿达加斯图斯事件中大致估计出约600年时东罗马领土边缘较大斯拉夫群体的规模，那么4个定居在塞萨洛尼基地区的群体可能包括了数万名斯拉夫移民。不管怎么说，这个数字符合拜占庭资料的记载，即后来在7世纪80年代平定该地区时，3万名斯拉夫人被转移到了小亚细亚。[45]

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可能算是6—7世纪斯拉夫大迁移中的第三类移民群体。君士坦丁七世在10世纪的重构显然错误很多，但如果说有什么真实的成分，那就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从阿瓦尔帝国中独立出来的；之前，阿瓦尔帝国将他们作为军事力量使用。570—620年，阿瓦尔人打了很多场仗，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卷入这个新登场的游牧民族战争机器的斯拉夫人经历了社会政治的进一步演变，在中欧站稳脚跟，形成规模够大或军事力量够强的第三类斯拉夫移民群体，摆脱了阿瓦尔人的统治。这可能与对塞萨洛尼基发动突袭的5 000名“精锐”斯拉夫人是同一种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移民可能采取了某种精英转移的形式，他们中间一支高效的军事力量摆脱了阿瓦尔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占据了一席之地。[46]这是猜测，但确实有可能性，而且也有同时代的独立证据表明，当时正经历演变的斯拉夫社会中出现了专业军事人员。至少它揭示出，我们这些后来者眼中的“欧洲斯拉夫化”，其实是多种多样的移民过程带来的。

将历史证据和考古证据放在一起对照，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在科尔恰克类型物质文化系统完全转移过去的地区，斯拉夫移民的社会单元却非常小；而在历史证据表明较大斯拉夫移民社会单元（无论是“部落”还是专业军人，后者实际上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到达的地区，考古学家却尚未发现“完整”科尔恰克类型社会经济系统大规模转移的情况。乍看之下，这实在出人意料。一般会认为，移民单元越大，引入和维持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能力就越强。但仔细一想就能想到，较大的斯拉夫社会单元其实是不久前才创建的，当时在罗马边境周围或被卷入阿瓦尔帝国的斯拉夫人中，社会政治和经济正快速发展。我们在第十章还会讨论这些发展，有充分理由认为，其背后的动力来自相关群体与体量更大、物质更丰富的东罗马和阿瓦尔帝国空前近距离接触时趋利避害的做法。换句话说，比起科

尔恰克世界中的小群农民，较大的斯拉夫群体反倒更容易接受将其物质文化模式带离早期科尔恰克类型的力量的影响。

信息不足，没必要在此花太多时间，但我们可以想想，对于史料中完全没有记载的斯拉夫移民单元（活跃于7—8世纪的中北欧、8—9世纪的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拉夫移民），上述种种有什么启发。在中欧的维斯瓦河和易北河之间，考古学家发现了第三种情况。苏科-杰济采文化无疑是外来的斯拉夫人吸收本地物质文化模式（尤其是陶器种类）后形成的。但开启斯拉夫化进程的莫吉拉内文化实际上是科尔恰克文化的一个变种，即便是苏科-杰济采文化，在其最早的发展阶段也没有太过偏离这些规范。在其最初形成的“岛”（地图18）中，定居点一开始是小型的开放村庄，其规模与科尔恰克村庄相似，但建筑物通常在地面之上而不是下沉式小屋。尽管与其他地方相比，它们吸收了更多的本地文化，但其最初的斯拉夫移民单元在规模上可能与创建科尔恰克欧洲的移民单元相差无几。为什么它们后来偏离了科尔恰克的文化规范？我们稍后将会讨论。

就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而言，关于移民，我们还是只有考古学的证据，这实际上是间接证据。但和科尔恰克欧洲的定居模式一样，从这里的一些定居模式中可以推测出参与扩张的社会单元的类型，让我们对扩张过程多少有些了解。以乌克兰北部普索尔河（Psiol）流域新特罗伊茨科耶（Novotroitskoe）的博尔舍沃时代山顶遗址为例，此地山坡陡峭的一边形成了天然屏障，挖掘者发现了由差不多50个8—9世纪的下沉式小屋组成的聚落。这表明该定居点的总人口应该只有几百人。选择这样险峻的地方，可见当时的情况远远算不上太平，这个最初的占领阶段也不是和平结束的，因为此地显然被袭击者破坏了。新特罗伊茨科耶不是孤例。罗姆尼-博尔舍沃的定居点通常位于易守难攻的山顶或沼泽地带，往往有围墙，一般也聚集着密度差不多的人口。

所有这些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很明显，讲斯拉夫语的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推进远非畅通无阻。不到迫不得已，人们是不会去费劲修建那种定居点的，而这些定居点最终的命运也表明这是必要的。第二（这是从第一点推出的），斯拉夫人在该地区的扩张可能是由规模足以建立和维持这种定居点的群体进行的。在扩张受到抵抗的时候，小群体是没法简简单单换个地方安顿下来的。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建立一个定居点，保护自己和家人。

因此，尽管缺乏史料记录，但从8世纪开始在俄罗斯西北部活动的移民单元，其规模应该大于早先那些传播科尔恰克文化及其变体的移民单元，后者将文化从中欧高地和喀尔巴阡山脉以东传播到了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活跃于俄罗斯西北部的这些移民的定居点有防御设施，与6—7世纪科尔恰克、彭考夫卡甚至科洛钦系统中那些不设防的小型定居点形成了鲜明对

比，这说明之后几个世纪中的斯拉夫扩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斯拉夫人在这个地区的扩张一开始仍然类似于“推进浪潮”，而不是一下子占领整片土地，但情况逐渐变化，最终，更大的社会单元进入了有过抵抗的地区。总体而言，斯拉夫人向俄罗斯欧洲部分扩张时，很可能先是一些小规模社会单元迁徙，积累起势头，然后在遭遇重大对抗时，小群体被迫重组为较大的群体；这也是古代和现代一些群体的做法，比如3世纪的哥特人和其他群体、9世纪的维京人、19世纪的布尔人。[47]

与斯拉夫移民潮的性质和规模有关的一系列现有证据远非理想，但这些正是中世纪早期历史有趣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证据足以表明斯拉夫人的扩张采取了多种形式，而考虑到他们所到之地的环境如此多样，扩张采取多种形式也很合理。在扩张的多种形式中，一个极端是科尔恰克类型定居点的扩散，从喀尔巴阡山脉开始，扩散到易北河和乌克兰之间的中东欧广袤土地上。与此相对，在更北和更东的罗姆尼-博尔舍沃系统中，更大规模的定居点是常态，建造它们的是由数百人组成的斯拉夫人口单元。还有一种形式是整个“部落”在7世纪迁入原罗马巴尔干地区，如果是阿达加斯图斯或佩里加斯提斯领导下的那种单元，那么规模最大的群体可能有1万人。由于资料极少，具体细节上的争论可能永无休止，而且很有可能出错。但我们知道，欧洲的斯拉夫化显然涉及多种多样的移民活动，移民单元的规模小至几个家庭，大至由数千人组成的社会单元。

移民与本地人

一部在公元600年前后写成，通常认为出自皇帝莫里斯（582—602年在位）之手的东罗马军事著作中，有段值得注意的评论，说的是一些早期斯拉夫群体对待战俘的做法：

> 他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将俘获的人永久奴役，而是规定了一个期限。期限过后就让这些人选择，如果他们愿意返乡，就支付一小笔赎金，如果不愿意，就以自由人和朋友的身份留下来。[48]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学术问题：对于中世纪早期从易北河到伏尔加河的区域内斯拉夫群体的惊人崛起，我们该如何理解？一方面，没有人会认为斯拉夫人的崛起与人口迁移，也就是讲斯拉夫语的人在这片地区迁徙无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历史观的准民族主义观点认为斯拉夫人是“民族”，作为单一的人口群体从某个地理位置出发，然后在欧洲大片土地上繁衍，但这并不可信。同样，尽管移民加起来形成了可观的人口流动，但之前4—6世纪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迁徙，其规模并没有大到能清空欧洲受日耳曼文化崩溃影响的大片地区的地步。这些地区大都重新出现在加洛林时期的资料

中，只是支配者已经成了斯拉夫人，而斯拉夫移民一开始还是与本地人口有不少交往的。因此，我们需要探讨两个关键问题：其一，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斯拉夫移民的规模如何？其二，在各个迁入地，外来的斯拉夫人与本地人形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目前尚无全面的信息，但是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外来的斯拉夫人确实在受到日耳曼文化崩溃影响的地区见到了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完全被废弃了。能对定居点做大致调查的只有少数地区。例如在波希米亚，人口在罗马时代晚期似乎大量减少。已知有24个主要的挖掘点（多数是墓地）属于罗马时代早期，而属于罗马时代晚期的只有14个。因此，斯拉夫移民进入波希米亚时，看到的并不是空无一人的土地，但此地的人口肯定比以前要少。在其他地方，花粉图谱提供了更多信息。花粉随风飘扬，落下后有的会沉到静水的底部。可以从静水（尤其是湖泊）底部提取岩芯，从而绘制出在不同时段沉积的花粉的变化图表。如果本地农业人口一直活跃，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受干扰的花粉序列，没有草木花粉突增的情况，谷物的种类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花粉图谱在东欧大部分地区都没办法绘制，但它们确实表明在某些地方，大量本地人口并没有在斯拉夫人到来之后背井离乡。来自波罗的海吕根岛（Rügen）和萨勒兰（Saaleland）的样本显示，虽然两个地方在公元80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都改为由斯拉夫人统治，但从罗马帝国时期到斯拉夫时期大致保持了连续性。在其他地方，情况就不同了。在德国梅克伦堡的大部分地区，花粉图谱表明罗马时期既有的耕作方式在斯拉夫时期受到了极大破坏。至少在此地，斯拉夫时期的移民似乎是从头开始耕种的。在现代波兰的比斯库平（Biskupin），也发现了类似的破坏和森林再生的证据。[49]

在没有花粉图谱可用的地方，我们只能借助更一般的证据。有些人提出，不应低估斯拉夫化对人口组成的影响。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512年，一群运气不佳的赫鲁利人被逐出多瑙河中游（见第五章），他们先向北穿过斯拉夫人的土地，然后进入“无人之地”，最终走上了通往斯堪的纳维亚的道路。这里说的“无人之地”应该是欧洲中北部摩拉维亚隘口（Moravian Gap）以北的某个地方。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大幅减少，因为在罗马时期，摩拉维亚隘口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之间各地的人口都不少。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迁徙过程能大大促进斯拉夫移民的人口增长。限制人口的一个因素是粮食供应。如果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就能有更多儿童活下来，人们更不容易生病，结婚年龄也往往会提前，也就是说，只要额外食物供应充足，人口就会迅速增加。对于斯拉夫人的情况，我们没有具体数字，但有充分理由认为迁徙对总体人口结构的影响会很大。说斯拉夫语的人通过迁徙走出了俄罗斯的森林地带，进入了中欧一般来说土壤更肥沃的地区。此外，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的农民很快采用了公元400年时已在罗马世界及其周边地区使用的更高效的犁，摒弃了最初的

浅耕犁。使用新式耕犁后，他们就能翻动土壤，让杂草回到土壤中腐烂，从而增加并保持土壤肥力，提高产量。即使我们无法估算产量，也必能猜想到，迁徙大大增加了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的人口，显然也让它们更有能力在中欧占领更多土地。并非所有斯拉夫人都像法兰克商人萨莫那样，家庭人口增长差不多3倍——萨莫和他的12个妻子生下了22个儿子和15个女儿；但人口增长是确确实实的。[50]

其他迹象使吕根和萨勒兰的花粉证据显得更有说服力。苏科-杰济采系统覆盖了现代波兰的大部分地区，那里出土了许多标准科尔恰克类型的陶器，但正如我们所见，苏科-杰济采遗存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陶器种类非常多。除了标准的科尔恰克炊具（但比一般的科尔恰克炊具开口更大，形制也更开放），苏科-杰济采遗址通常还会出土各种各样朴素的中型广口瓶、球形碗和广口碗。实际上，所出土的非科尔恰克类型陶器中，有许多很像日耳曼人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同一地区生产的普热沃斯克轮制陶器，只不过是手工制作的。两种陶器之所以相似，有可能是因为科尔恰克陶匠在废弃的定居点中发现了普热沃斯克陶器，但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的模仿现象。陶器相似，更有可能是科尔恰克斯拉夫人与普热沃斯克文化崩溃后仍留在原地的本地人口间互动的结果。[51]

现有证据多种多样，有的比较具体，有的笼统一些，显然，要估计日耳曼文化崩溃和斯拉夫移民在人口方面的影响并不简单。尽管4—6世纪出现了人口流动，但至少在原日耳曼欧洲的某些地区，仍有大量农民留下来耕作。然而，来自波希米亚的证据表明，本地人口普遍减少的情况也是有的，而且如花粉图谱所示，本地人口减少甚至导致一些地方完全放弃了农业——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许多边缘地区都有这种情况。[52]如果再考虑到迁徙会增加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的人口（因为他们在更肥沃的土壤上应用了更成熟的耕作技术），那么斯拉夫移民在人口统计学上的确有重大意义，即使斯拉夫移民定居于废弃土地上的情况既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有，也不常见。

如今在某些圈子里有这样的说法：公元第一千年期间并没有规模大到足以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移民（不代表对政治或文化没有影响）。对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当然，在有等级的社会中，与社会精英消失有关的那种文化崩溃未必伴随着人口大量外流。前文提过，《莫奈姆瓦夏编年史》记载，斯拉夫人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原本住在那里的希腊人都撤离了。然而，9世纪初帕特雷周围的斯拉夫人起义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讲希腊语的本地居民。讲希腊语的人在这段时间里从卡拉布里亚返回，这种可能性也不能说没有，但并不高。从交通运输上说，鉴于当时的船运方式，通过海上运输来疏散整个区域的人是不太可能的。在西方，类似情况下，只有拥有一些动产的富裕地主才会倾向于逃离。

从巴尔干其他地区对日益增长的斯拉夫人势力的反应看，当时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肯定也出现了只有富人逃离的情况，尽管《莫奈姆瓦夏编年史》不是这么说的。另有一部虽然成书年代较晚，但通常认为所用资料年代较早的编年史，其中记载，在西北部的萨洛纳，当地人发现本地名流将财物转移到港口的船上后陷入恐慌，后来萨洛纳就落入了斯拉夫人之手。同样，根据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拉古萨（Ragusa）的居民们仍然记得他们的城市是由逃离皮塔拉（Pitaura）的移民建立的。据记载，那些移民的名字是：格雷戈里（Gregory）、阿斯克勒庇乌斯（Asclepius）、维克托利努斯（Victorinus）、维塔里乌斯（Vitalius）、副主教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以及卫队长（protospatharius）斯蒂芬的父亲瓦伦提尼安。“卫队长”是宫廷中级别很高的贵族，加上副主教，似乎当时只有一小群名流（应该还有他们的家人和随从）离开，而不是整个人口群体大规模转移。[53]因此，罗马帝国境内的文化崩溃和精英移民可能只涉及一小部分人口，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移民可能一直与住在那里的大量本地人共存。

但是，罗马晚期日耳曼欧洲的社会经济模式大不相同。尽管在之前的4个世纪中经历了重大变化，但日耳曼欧洲并没有像罗马晚期或拜占庭早期社会那样有明显的分层。确实，1—4世纪之间出现了新的日耳曼精英阶层，但比起统治罗马世界的少量地主，日耳曼精英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我们在第二章中讲过，种种迹象表明，在日耳曼欧洲，社会和政治权力（以及群体身份）是由范围相当广的自由民寡头分有的，并不是只有一小群贵族掌握着权力。而参与大迁徙的也不限于这些寡头。在一些侵略性群体中，战士至少分成两个社会阶层，此外还有数量不明的奴隶，所形成的群体有时能有一万多名战士，再加上妇女儿童。[54]此类社会精英带着众多依附者出走，所产生的影响肯定完全不同于几个罗马贵族带着家眷移民。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否认，在斯拉夫移民扩张之时，欧洲中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本地人口的家园。

那么，从证据角度看，在这里，以及讲斯拉夫语的群体与本地社会有了接触的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欧洲部分，本地人口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如何？

最近的一种处理方法是参考《战略》中的记载，然后基于对斯拉夫人在中东欧崛起的物质文化影响的一些笼统观察，来进一步发展论点。斯拉夫人崛起的最显著影响是，在从陶器技术到定居点规模的几乎所有方面，规模更大、更复杂的方式都被规模更小、更简单的方式取代了（至少受日耳曼文化崩溃影响的地区是这样）。有人认为，这种简单化并不是来自东欧森林地区的群体（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很简单）占据大片土地的附带结果，而是这些群体成功的关键。按照这种观点，旧精英离开中欧，向南和向西迁往罗马后，与其说斯拉夫群体接管了中欧地区，不如说是斯提夫文化模式

吸引了非军事化的本地农民，引发了积极效仿。该观点认为斯拉夫人实际上是另类生活方式的先行者，是中世纪早期的嬉皮旅行者（他们比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嬉皮士受欢迎得多）。据普罗柯比记载，他那个时代的斯拉夫人中盛行平等主义的积极意识形态（尽管比较朴素），据说，这对从前在中欧日耳曼军事精英剥削之下终日劳作的农民们非常有吸引力。[55]根据这种模式，斯拉夫化实际上是个非精英转移加文化模仿的过程，一些移民散布到中欧，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被大量本地人采用而在中欧大片地区传播开来。这样的模型与现有证据的匹配度如何？

至少在某些地方，比起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之类的情况，外来的斯拉夫移民确实对本地人口要仁慈一些。当然，同化肯定存在。《战略》一书提到，一些早期的斯拉夫群体在群体身份方面非常“开放”，愿意接纳战俘为社会中地位平等的正式成员。这很了不起。许多社会都愿意接纳外人，但外人通常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必须接受次等的社会地位。例如，“迁徙时期”的日耳曼群体就不可能给外人完全平等的待遇。迁徙过程中，两个等级的战士和奴隶之间的身份区隔始终稳固，显然，在途中招募的新兵都没有获得最高等级的地位。而一些早期的斯拉夫群体似乎本来就没有什么社会等级需要保护，而是更看重招募新成员，因此没有对外来者设置实质性的障碍。除了《战略》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关于这个过程的叙述性资料，但萨莫的故事也算一个佐证。法兰克商人萨莫是个外人，但他具备合适的品质，最终成了阿瓦尔和法兰克边境地区索布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中有势力的人物。[56]

当然，吸收外来者也可以在较低的社会层次上进行。耕作方法改进带来的人口增长，远不足以说明为何欧洲的广袤大地从800年开始被斯拉夫人统治。即使（我倾向于如此认为）第一千年中期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斯拉夫语族，500年前后讲斯拉夫语者的分布范围要比科尔恰克遗存所提示的更广，问题也仍然存在。因此，在易北河到伏尔加河之间创建一个几乎完全由斯拉夫人主导的欧洲，似乎确实需要吸收大量人口。当然，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讲斯拉夫语的人从他们的邻居那里学习了更先进的农业技术，而苏科-杰济采系统的斯拉夫人还借鉴发展出了更丰富的陶器种类。[57]这并不是在鼓吹回归旧的民族主义观点，即一直居住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隐藏的斯拉夫人”摆脱了日耳曼人的统治，重新崛起。情况根本不是如此：坦率地说，对于经历过日耳曼文化崩溃的地区，我们并不知道留下来的农民可能有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但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日耳曼式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日耳曼人统治了数百年。但无论当时情况如何，从长期看，他们都被斯拉夫文化环境下不断发展的规范同化了。需要强调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同化与现代种族研究完全吻合；种族研究表明，群体会视情况设置或高或低的门槛。对早期的斯拉夫人（至少是其中一些人）而言，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这自然也是莫里斯《战略》

中的记载所暗示的。还需要指出的是，《战略》中的这段评价很独特，并不是罗马作家每次谈到蛮族时都会抛出的套路。

话虽如此，我们肯定不能据此匆忙得出斯拉夫人多少算是和平接管了欧洲大片土地的结论。苏联时代，东德的一些学者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迫切希望找到斯拉夫人与讲日耳曼语的本地居民和平共存的例子，也为此篡改了证据。那些年里，号称发现了一系列能体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一度和平相处的遗址，两个在柏林［柏林-马察恩（Berlin-Marzahn）和柏林-赫勒斯多夫（Berlin-Hellersdorf）］，其他的则分布得较为分散，以德绍-莫西考（Dessau-Mosigkau）和托尔诺最为出名。

柏林墙倒塌后，学者们做出了重大修正。在上述遗址中，固然同时发现了日耳曼时代晚期和斯拉夫时代早期的遗存，但学者重新调查后发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一度共存的说法并不成立。在柏林-赫勒斯多夫，日耳曼遗存和斯拉夫遗存之前隔着一层沉积物。一看就知道，这说明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并未同时占有此地，1989年以后进行的碳14定年更证实了这一点。在柏林-马察恩，根据碳14定年，日耳曼时期遗存的年代在240年到400年之间，斯拉夫时期遗存的年代在660年到780年之间。在这里，碳14定年证实了之前年轮学的结论，即斯拉夫阶段的一些木材年代在8世纪。一心想证明共存的最初发掘者认为，这个通过年轮学定出的年代“不太可能”成立，所以不值得发表。[58]我们看到，后来在俄罗斯西北部的斯拉夫扩张似乎对抗性很强，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关系恐怕不能算和平。和平互动的证据并不是都有缺陷，但那也不是资料中记载的唯一一种互动。

第一千年下半叶中欧和东欧发生的文化和语言变革明确表明，从长远来看，讲斯拉夫语的人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导力量。斯拉夫社会可能是对外人开放的，但只对愿意加入并完全成为斯拉夫人的外人开放。没有迹象表明在斯拉夫移民创造的世界中，移民和本地人以不同的生活方式愉快共存。斯拉夫移民创造的是斯拉夫人主导的统一的文化形式。和那种诺曼征服式的精英转移不同，斯拉夫人并不是仅仅渗入中欧社会既有结构的顶层，而是按自己的意思重新定义了社会规范。换句话说，更长期的斯拉夫化有点像罗马化，它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全新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个秩序有强烈的文化色彩，斯拉夫文化是唯一的选项。最终，受影响的人口无从选择是否加入，斯拉夫语成为这一广阔地区的主流语言。

我们也得考虑，斯拉夫社会平等接纳外人的做法保持了多长时间。显然，到了800年左右，新的斯拉夫社会中有一些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层，对战俘开始采取压迫态度，对此第十章还会详细探讨。到了此时，战俘不再得到平等接纳，而是被投进了高利润的奴隶贸易。在9世纪之前，还没有能明确反映出精英阶层存在的物质文化差异，你可能会因此认为斯拉夫社会不再接纳外人是比较晚的现象。但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精英可以在没

有消费品的情况下存在。让依附于自己的奴隶去做那些繁重的耕作工作，而你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享受更多的休闲，那么即使你并不拥有很多闪闪发光的物品，也可以称得上是“精英”。

还有必要记住，尽管史料中记载的最早的斯拉夫社会群体规模不大，有些还非常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群体就很和平。从6世纪中叶开始，小群的斯拉夫人几乎不间断地袭击罗马巴尔干半岛，并迅速赢得了好战的名声。一些落入他们手中的战俘遭受了远非仁慈的对待。549年在托皮鲁斯城外被杀的1.5万名罗马战俘，还有594年斯拉夫劫掠者被包围时杀掉的那些俘虏，是不会认同《战略》中关于斯拉夫人仁慈对待俘虏的说法的。[59]按照《帝国治理论》的说法，组织程度更高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群体大概还要可怕，毕竟它们有能力摆脱阿瓦尔人的统治。因此，在研究欧洲的斯拉夫化时，要看到在斯拉夫扩张之时，斯拉夫社会本身也在发生重大变革。这样的变革形成了具有强大军事能力的武装团体，而在这类团体活动的地方，斯拉夫化是不可能只通过和平手段推进的。

尽管《战略》对族群开放性的描述确实适用于一些斯拉夫群体，但我们不可过度浪漫化早期的斯拉夫人。斯拉夫扩张是由一系列不同类型、动机各异的群体推动的，这些群体对待原住居民的方式可能也很不同。在欧洲中北部的某些地区，斯拉夫移民要么占据“民族大迁徙”时代日耳曼移民留下的空地，要么开垦从前被认为没有吸引力的森林高地，发展农业。相比之下，在本地人口幸存下来而没有国家结构的地方，斯拉夫移民所做的可能相当于一种“精英再创造”，有点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英格兰或高卢东北部的情况。在这些地方，最终产生了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混合。但即使某些斯拉夫群体特别愿意接纳外人，即使整个过程比高卢或英格兰的进程要和平一些，移民也确实以大一统的方式主导了新构建的社会。[60]

尽管我们没有相关数据，但总体上，用现代比较研究的定性术语说，斯拉夫人的扩张无疑构成了大规模迁徙。从政治和文化上讲，移民迁入地受到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巴尔干半岛大部、西至易北河的中欧地区、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部的广阔地区，在公元500年之后的三四个世纪里，都落入了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的统治。这是新的现象。这些地区中，有许多曾被讲日耳曼语者和讲波罗的语者统治，也有的曾是东罗马的一部分。考虑到证据上的缺失，有一种反对意见是，斯拉夫扩张是个缓慢的过程，而不是一次真正的“冲击”。这个论点有一定道理。日耳曼文化的崩溃表明，早在斯拉夫人到来之前，一些受斯拉夫势力扩张影响的地区就经历了第一次重大冲击。即使从最低限度看，这一现象也造成了社会政治精英阶层的消失，以及曾延续数百年的物质文化传统的消亡，这绝非微不足道，而日耳曼文化的崩溃也无疑为斯拉夫人借助小规模移民单元的扩张铺平了道路。然而在其他地方，斯拉夫势力是通过主动的激烈过程一下子建

立起来的。直到7世纪第二个10年，东罗马军队还能勉强守住多瑙河防线，不让斯拉夫人将袭击变成定居。但在那之后，边境崩溃了，大规模定居随之而来。而且，正如罗姆尼-博尔舍沃时代的设防定居点所揭示的，没理由认为只有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扩张受到了激烈抵抗（这意味着那里的斯拉夫移民单元更大、更具侵略性）。

从经济和社会政治的混乱程度来衡量，迁徙也极大冲击了至少某些斯拉夫群体。对于大迁徙之前的斯拉夫人，我们的了解十分有限，只知道他们起源于欧洲大平原东部的某个地方。我们看到，科尔恰克系统的一般特征说明，那里盛行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混合农业形式，人们的物质财产非常少，而这大致符合东罗马文献对早期斯拉夫社会的描述，即贫穷、朴素、相对平等。迁徙最终改变了这一切，虽然不同的斯拉夫群体改变的速度不同。职业战士阶层这部分人口很早就受到了影响，这些人在喀尔巴阡山麓迅速崛起，利用靠近罗马帝国巴尔干各省的位置四处袭击。从长远来看，斯拉夫人统治的广大地区都会出现这样的变化。[61]如果说，斯拉夫人的扩张是大规模迁徙已没什么疑问，那么，斯拉夫扩张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会如此展开呢？

移民、发展和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扩张涉及多种类型的移民单元和许多不同的环境，动机多种多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斯拉夫人基本出于自愿，在经济动机的驱使下迁徙。这在6世纪罗马巴尔干的斯拉夫掠夺者身上最明显，他们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攫取当地的动产。袭击是攫取财富的一种手段，而作为斯拉夫辅助部队受雇于罗马则是另一种。特别是安特人，他们似乎从6世纪30年代起因成为罗马的正牌盟友而获益不少。大体上说，正是因为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一开始进入了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和以东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斯拉夫人才能接近东罗马，获得上述赚钱的问路。没理由认为这不是最初行动的目的之一。

将斯拉夫时代初期和末期的物质文化相比较，就能明显看出，5—8世纪的移民活动至少给斯拉夫世界中的一部分人带来了物质利益。在此期间，出现了更精致的金属制品（包括一些贵金属制品）、种类更多的物品，甚至一些有层次区别的住房，从中受益最多的是战士，他们如今离发达欧洲更近，也因此获得了新机遇。当然，这样的动机并没有直接证据，而是从他们的行动及其结果判断出来的，但仍不失为合理。[62]这也意味着斯拉夫移民（或其中的一些）可以归入前文提到的一种模式：来自较不发达的边缘地区的群体，迁往紧邻罗马帝国或其腹地的地方，那里到处是攫取财富的新机会。由此看来，斯拉夫移民非常符合现代移民研究的基本结论之一：财富和发展的不平等是移民的根本性刺激因素之一。

但是，在斯拉夫扩张的进程中，欧洲最外围的部分和帝国部分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整合到了一起。第一千年上半叶，讲斯拉夫语的人出现在维斯瓦河以东、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非常简单的农业社会中，而这与是否认同约达尼斯所说斯拉夫人是威尼蒂人分支的关系不大。那时，讲斯拉夫语的人所处的世界，与存在了半个千年的罗马帝国从未有过真正的接触。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斯拉夫人想离开边缘地区，以获得更多掠夺财富的机会（这从历史和考古证据中大致能看出来），那么为什么他们直到5世纪末和6世纪才这么做，而不是更早？在那之前的500年中，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迈出这一步去攫取财富，但他们并没有去。为什么这个过程偏偏开始于那个时候呢？

在我看来，最可能成立的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很明确，涉及匈人势力兴衰给罗马帝国边缘带来的变革。关于日耳曼移民人口规模的争论仍将继续，但对于先前日耳曼人统治下的罗马世界边缘地区，日耳曼移民带来的政治影响是无可争议的。我们看到，376—380年和405—408年的两波入侵潮，以及阿提拉死后多瑙河中部控制权之争带来的连锁反应，使中东欧地区日耳曼人主导的权力集团急剧减少，其控制的领土也大大缩水。无论其对更大范围内人口的影响如何，日耳曼文化的崩溃都反映出具有军事实力的大规模政治结构在中欧和东欧消失了。这为斯拉夫人后来进入罗马边缘区的扩张铺平了道路，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许多曾占据帝国边境附近有利位置的居中日耳曼势力在此期间消亡了。讲斯拉夫语的人得以进入这个边缘区，是因为有组织的武装群体已经离开了。

在此有必要多说一些。要想利用好紧邻罗马边境的赚钱机会，斯拉夫群体就得转变为军事力量更强、结构更完善的实体。当然，这是一个双向过程，因为从帝国攫取的动产反过来又为6世纪末的斯拉夫新领导人提供了成功所需的庇护力。如果是在罗马时期，野心勃勃的斯拉夫人就得对付当时占据边境地区、组织结构已然完善的日耳曼附属国，那样的话，斯拉夫人就需要进行更彻底也更难实现的重组。而且，相关的斯拉夫群体必须在欧洲大平原东部边缘的森林中先完成重组，才有可能进入有利可图的边缘区，与当地的日耳曼人竞争。很难想象第一千年上半叶在这些地方，有哪位领袖能找到足够的资源、召集足够的追随者来发起有效的挑战。匈人帝国的兴衰在多瑙河下游边境以北形成了相对的权力真空，规模较小的斯拉夫武装群体才得以进入。

第二方面猜测的成分多一些，但是从第一方面衍生出来的。6世纪与罗马巴尔干地区有了接触的那些斯拉夫群体，最初在4世纪时可能聚集在波来希，至少肯定在喀尔巴阡山麓地带，而这个地区是在由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范围内的（第三章）。如果这样的判断正确，那么就是哥特人的统治促成了这些斯拉夫人最初的转变，斯拉夫人求变，是为了推翻

哥特人的统治或至少摆脱一部分重压。和匈人帝国或阿瓦尔帝国一样，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统治者应该会要求臣服的当地人用粮食供应来提供经济支持，可能还会要他们提供兵员。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历史叙述中，不管是哪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第一次出现时都在与哥特人发生冲突。约达尼斯记录道，5世纪中叶的哥特人领袖维尼塔里乌斯在对战安特人时取得了一次大胜：

> （维尼塔里乌斯）向他们发起攻击，第一回合遭遇战失利。之后，他奋起反击，将他们的国王［名叫伯兹（Boz）］、国王的众子，还有70个贵族钉死在十字架上，尸体挂在那里示众，这一恐怖的做法大大增加了已投降之人的恐惧。[63]

一个例子不能代表整个过程，但这里的模式很说明问题。即使看起来是受经济因素驱使的移民，政治动机也往往起着作用，这在现代移民的例子中也很常见。之前的日耳曼领主离开后，边境地区出现了新的经济机遇；但如果没有匈人带来的政治变化，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即便在军事上已更加成熟，也很难把握这样的机遇。

6世纪上半叶之后，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的比例在不同的斯拉夫移民群体中有很大不同。科尔恰克类型的大家庭式定居点在中欧高地上扩散，其动机大概与人口增长有关，而人口增长是吸收外来者和粮食供应增加的结果。但即使是科尔恰克群体的扩张，也可能带有政治动机。一方面，将哥特人、赫鲁利人、苏维汇人、鲁吉人和其他群体赶出多瑙河中游地区，将伦巴第人从波希米亚及更远处向南拖进多瑙河中游的争斗，想必也极大促进了科恰克群体的迁移（第五章）。这些冲突发生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恰好是科尔恰克斯拉夫人从喀尔巴阡山脉向西扩散的时候，这显然让他们在控制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时容易多了。另一方面，科尔恰克群体可能还有一层政治动机。我们看到，这些移民的组织形式是小规模农业社群，不同于规模更大、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斯拉夫实体，后者在更往东的地区和南方通过与东罗马的直接接触而发展起来。有鉴于此，科尔恰克类型的移民可能也在四处奔波，以免被拉到那些新兴强大斯拉夫政治实体的轨道上去。后民族主义观点也适用于斯拉夫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说的语言关系比较近，就认为不同群体的斯拉夫人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科尔恰克类型的移民做出的生活选择，就截然不同于他们那些一心想着罗马的财富的远亲。科尔恰克群体做此选择，目的之一可能是躲开其他斯拉夫群体的注意和掠夺。

阿瓦尔势力的崛起也为斯拉夫移民进程增添了动力。阿瓦尔帝国与之前匈人帝国的运作方式大致相似，都依靠下属的盟友群体提供兵员和经济支

持。简言之，这是通过军事征服建立、靠胁迫维持的霸权。东罗马的史料中有许多例子，说明阿瓦尔可汗们即便战败也决不愿意丢面子，因为只要他们显出软弱的迹象，心怀不满的臣属就有可能反叛。历史学家米南德（Menander）的作品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围攻辛吉杜努姆（Singidunum，今贝尔格莱德）失败的阿瓦尔领袖向该城指挥官索要大笔礼物，以便他英名无损地退兵。更为引人注目的是，626年阿瓦尔人最后一次试图攻下君士坦丁堡未果，队伍中的斯拉夫步兵开始逃跑时，阿瓦尔人的杀戮就临到了他们。[64]

在阿瓦尔人眼里，喀尔巴阡地区军事化的斯拉夫人是潜在的子民，可供利用。阿瓦尔人很快拉了一些斯拉夫人入伙。为了实现目标，阿瓦尔人愿意在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受雇于罗马来攻击斯拉夫群体，甚至一度乘罗马船只沿多瑙河而下，攻击分别在喀尔巴阡山脉西南和南面边境［可能是巴纳特（Banat）地区和瓦拉几亚］造成麻烦的斯拉夫人。斯拉夫群体被纳入这个新的游牧帝国，恐怕不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的，它们与其阿瓦尔主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看到，阿瓦尔战争机器（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协助下）在巴尔干半岛的东罗马防御工事上炸了一个洞，这的确使7世纪斯拉夫人在那里大规模定居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阿瓦尔统治本身是许多斯拉夫群体想要避免的，对于曾与之发生冲突的斯拉夫群体来说则是需要摆脱的。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据说正是这样做的，萨莫领导下更西边的索布人也是如此。为该事件提供资料的弗雷德加明确指出了起义的原因：

> （阿瓦尔人）每次在战场上向别的群体发起攻击，都是自己以作战队形扎下营来，却让（斯拉夫人）去战斗……每年，（阿瓦尔人）都会与斯拉夫人一起过冬，霸占他们的妻女。斯拉夫人还得向他们进贡并忍受许多其他负担。[65]

因此，阿瓦尔人的统治为斯拉夫群体迁出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中游地区提供了更多的理由。首先，虽然科尔恰克类型社群最初的扩散显然有其他源头，那时阿瓦尔人还没有成为一个因素，但6世纪中叶以后，科尔恰克类型从波希米亚向萨勒河沿岸以及易北河的进一步扩散就有了额外的动机：避免被并入剥削成性的阿瓦尔帝国。这很可能促使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向北扩散到波兰。[66]其次，公元610年之后，规模更大的“部落”斯拉夫社群之所以能扩散到巴尔干地区，是因为阿瓦尔人破坏了罗马边境的安定。而这些斯拉夫人在之前的50年间都在为阿瓦尔人战斗和服务，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也想让自己（更不用说他们的妻子和子女）脱离阿瓦尔人的控制。第三，和匈人一样，阿瓦尔人将一些臣属群体重新安置在匈牙利大平原的核心领地附近。史料记载，他们如此安置了保

加尔人、格皮德人，以及从巴尔干带走的罗马战俘。考古证据还表明，他们对受其统治的那些斯拉夫群体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67]

因此，动机和情境对解释斯拉夫人的各种移民过程是很有帮助的。斯拉夫扩张的过程中，群体的规模有大有小，方式有时比较和平，有时更具侵略性，我们不应为此困惑。有时，移民主要受政治动机驱动，有时经济动机的作用更大。在缺乏关于迁徙及其政治背景的历史记载的情况下，我们无从得知在始于7世纪的朝向东欧平原的扩张中，哪种动机占主导地位。后来向第聂伯河以东迁徙的群体很快开始从皮毛和奴隶贸易中获益，如我们将在第十章看到的，这些贸易从8世纪开始在该地区逐步建立。但是，这些贸易究竟是他们去往那片土地的原因，还是迁移带来的意外结果，就很难说了。

移民与斯拉夫欧洲

面对财富与发展的不平等，在相互作用的经济及政治动机的驱动下，受周围政治结构的决定性影响，5世纪末及之后的斯拉夫移民开始了迁徙，其方式与现代移民多有相似之处。一些移民单元是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完整”人口群体，和前文提到的日耳曼世界的情况一样。前面谈过，这种单元体现了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的特殊情况，在现代世界中相对少见。但总的来说，与现代移民的比较是可行的。斯拉夫移民潮的性质和方向，是符合现代移民潮背后的更深层原则的。在某些方面，斯拉夫人的迁徙和后来一些有较多文献记载的人口迁移颇为相似。

通常情况下，少数人（通常是较年轻的男性）率先进入新地盘。通过这些人，留在原地的人口群体中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新机会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斯拉夫人在6世纪袭击巴尔干（公元610年后斯拉夫人全面定居的前奏）就属于这种情况。发动袭击的年轻人通过自己（有时比较痛苦）的经历，掌握了该地区的路线和潜力，这种知识为7世纪的全面移民提供了信息。至于科尔恰克移民向西扩散到中欧高地的过程，新确定的理据比较充分的年代说明，这一移民过程花费的时间比以前认为的要长得多。别的不说，这意味着参与迁徙的群体在下一次迁徙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去主动了解下一个目的地，而这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就现代移民而言，和目的地有关（但不一定准确）的信息在刺激和引导移民潮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5世纪的许多日耳曼移民以分几步“跳跃”的方式长距离迁徙，每次迁徙之间有很长的休息时间，之所以有这种模式，原因之一是他们需要在下次迁徙前获得更多的信息，而6—7世纪的斯拉夫群体想必也是如此。[68]

与现代移民潮一致的还有，同一批斯拉夫群体似乎不是仅仅迁徙一次，而

是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多次迁徙。正如现代研究所强调的那样，移民习惯会渐渐在人口群体中形成。如果有亲友移民的经历或记忆，那么这个人口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就更有可能将迁徙当作生活策略。斯拉夫人的迁徙情况符合这个模式。斯拉夫人可能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先迁入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三代人之后，最早那批移民的后代中有不少人又迁到了东罗马巴尔干地区。在此期间，几代人也接连向东、向西迁入乌克兰和中欧高地，这两支都继而向北形成了扩张带，这样的扩张是历经好几代人才完成的。迁徙显然已经在许多斯拉夫群体中确立为生活策略，因此对周围地区的了解增加后，新的移民就做好了入侵的准备，以前的成功则巩固了他们的移民习惯。

此外，由于农业技术的局限性，5世纪末的第一代斯拉夫移民可能原本就有把迁徙当作生活策略的倾向。且不论他们到底是谁，我们都知道第一批斯拉夫人起源于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和维斯瓦河以东。该地区的人口是实实在在的农耕者，而不是游牧民，但公元500年以前，他们没有足以长期保持土壤肥力的耕作技术，因此差不多每过一代人就要换一个定居点。直到公元600年或更晚的时候，情况仍然如此。最近对瓦拉几亚的早期斯拉夫村庄杜尔西内亚（Dulcinea）的发掘表明，由于需要开辟新的耕地，这一由10到15座房屋构成的定居点几次迁址。罗马时代早期的日耳曼人一开始是小规模移动，后来发展为大规模迁徙；同样，讲斯拉夫语的农民没有固定在某一片土地上的习惯，这无疑让他们在看到罗马帝国从前基本由日耳曼人支配的边缘区发生内爆时，更能抓住机会。[69]这需要他们朝着新的方向进行更大规模的迁徙，但这些已经习惯了流动的人早就具备了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

斯拉夫人的扩张是否也产生了大量的返乡移民？目前还不清楚。返乡移民是现代人口流动中常见的附带现象。而除了成功完成探险行动后回家的袭击者外，史料中并没有提到返乡移民。不过，考古证据表明7世纪及之后，科尔恰克人从喀尔巴阡山脉向北、向东扩张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北部，这也可能是一种返乡移民，如果最初推动斯拉夫移民的力量从这个方向而来的话。返乡移民产生，通常是因为迁入新环境后情感和其他代价太大，在迁入地也无法获得成功。在本例中，阿瓦尔势力崛起，对臣属的斯拉夫群体提出种种要求，加上科尔恰克移民对东欧森林的天然向往，可能促使他们改变了前进方向。但这基本是猜测，还有其他可能性。比方说，从发达地区获取的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再加上新的军事能力，可能使那些最初进入喀尔巴阡以南的斯拉夫群体比原本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拉夫群体更具战略优势，前者因此得以侵蚀后者的地盘，逐步实现扩张。

最后，交通运输在塑造斯拉夫移民方面似乎没有发挥太大作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斯拉夫人不用跨越海洋，尽管在袭击罗马巴尔干半岛时，

多瑙河或萨维河（Save）等主要河流可能造成麻烦。如前文所述，在550年或551年，3 000名斯拉夫突袭者必须每人付给格皮德人1枚金币，以求被用船运出罗马领土，但这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快点离开，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跟水域打交道。7世纪第二个10年之初，斯拉夫人使用独木舟袭击希腊海岸，效果明显；在626年阿瓦尔人领导的君士坦丁堡围城中，尽管没有什么军事效果，但也出动了类似的一批船只。欧洲的河流系统可能并没有给迁徙中的斯拉夫人带来太大问题，因此（尤其是考虑到他们没有什么物质财富），他们不必像5世纪的日耳曼移民那样带上庞大的车队，就径直出发了。至少，并无资料记载斯拉夫人使用过运货车；斯拉夫的袭击者肯定不会带着运货车，他们可以不依靠巴尔干半岛的罗马道路网行动，而狄奥多里克或阿拉里克领导下的哥特人就做不到。目前尚不清楚，在塞萨洛尼基附近定居的较大斯拉夫单元是否也是如此，但科尔恰克群体选择的主要路线是通过中欧高地向西前进，这也许是个提示，因为在这条路线上，运货车是个负担。[70]

实际上，科尔恰克类型聚居点这个现象也可能是一种移民策略。通常认为，下沉式小屋加朴素陶器，这样的特征说明所用的技术很简陋，进而表明欧洲这批最早有记录的斯拉夫人相对落后。但近期有人指出，这些物品虽然简单，但制作得很好，完全合用。有人特别提出，科尔恰克类型是当时斯拉夫物质文化的简化版，其目的是方便迁移。斯拉夫物质文化完全符合其需要，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也可以用来合理反击贬低斯拉夫人历史重要性的倾向。但是，考虑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口（斯拉夫人起源于此）的总体生活方式，科尔恰克系统的朴素特征可能有一种更简单的解释：它是斯拉夫物质文化的起点（后来更复杂的文化由此而出），而不是为方便迁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物质文化。当然，如果日后有比科尔恰克系统更复杂的同时代相关斯拉夫人遗址出土，科尔恰克系统为迁移而生这个论点就会更有说服力。[71]

关于斯拉夫移民的讨论一直受限于可用的资料。斯拉夫人如何从5世纪后期开始迁移，最终形成第一千年结束之时那些有名字的斯拉夫群体扩散到整个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局面，我们基本无从知晓。我们对更西边的迁徙活动也不甚了解，尤其是苏科-杰济采系统从波兰中部向北和向西扩散背后的人类历史。即使是记载相对较多的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占领，也留下了许多谜题。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究竟如何推翻了阿瓦尔人的统治，它们原本是什么样的群体？在某些领域，我们有望获得新知。恐怕很难再发现新的史料，但应该会有更多的考古遗存得到发掘，阐释的方法也会更成熟。因此，在某个时候，我们应该能更清楚地了解斯拉夫移民在人口稀少、政治权力分散的土地上的扩张到了何种程度，以及相关地区有多少说日耳曼语或其他语言的本地人口留了下来。当然，苏科-杰济采系统的年代也有望得到更有把握的判定。

目前，应该强调的是整个斯拉夫移民过程的复杂性：移民采取了多种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展开。在某些情况下，小型人口单元的迁徙模式与“推进浪潮”模型所预测的相似，尽管科尔恰克人穿过中欧高地也许不是随机行为。在另一些情况下，随着抵抗力量增强，移民（和哥特人、布尔人、维京人移民一样）被迫重组为规模更大的群体，最初的那种小规模移民获得了更多的动力。至少，斯拉夫人扩散到欧洲大平原东北边缘时建立的较大设防定居点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在其他地方，规模还要大的单元（有数千人）以日耳曼移民的那种类似于“侵略假说”的方式迁徙，只是规模要小一些，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6世纪后期的东罗马巴尔干边缘形成的较大单元，到了7世纪就开始吞并巴尔干的土地。近似于“推进浪潮”的迁徙应该和出于自愿的经济动机有关，尽管政治背景对移民的成功始终重要；较大规模的“部落”迁徙看起来则不完全出于自愿，而更多受政治动机驱动。

还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涉及的移民单元有多大，这些讲斯拉夫语的移民都成了中东欧广大地区的文化主导力量。由斯拉夫欧洲的规模可见，斯拉夫移民在确立自己统治地位方面极为高效，他们早在6世纪时就以军事效率闻名。至少在早期阶段，斯拉夫化可能有比较多的自愿成分，因为一些斯拉夫群体愿意接纳采用新文化形式的本地居民。但早期的斯拉夫人不太可能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嬉皮士。斯拉夫人不像罗马人那样有竞技场、托加袍、拉丁诗歌和中央供暖系统，但他们和当初罗马人在西欧和南欧一样，成功地在中欧和东欧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这一切能够实现，仅仅是因为本地居民认为变成斯拉夫人很棒？斯拉夫人的军事效率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早期斯拉夫人可没有那么和平；我认为，不管是9—10世纪最终出现的第一批斯拉夫国家的性质，还是促使其形成的进一步转变，都可以揭示这一点。很大程度上，6—9世纪的扩张属于同一个故事，可以说，最初的斯拉夫移民和最终的斯拉夫国家是同样的力量催生的。不过，要真正了解最终产生的斯拉夫国家，就需要将其放在北欧和东欧更大范围内转型的背景之中——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爆炸式扩张也体现了这一转型。因此，在讨论斯拉夫国家形成的过程之前，我们需要探讨第一千年中欧洲的最后一次大迁徙。虽然考虑到与斯拉夫国家形成之间的联系，斯堪的纳维亚人越过波罗的海向南和向东的扩张可以说是我们关注重点，但这种扩张本身必须放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迁移的背景中才能理解。

---

[1] 这些遗存原本被博尔科夫斯基（Borkovsky）称为“布拉格”遗存，他在1940年的研究中首次在今捷克共和国境内发现了它们。关于更名的情况，请参见本章注释9。

[2] 特别是因为采用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分布在欧洲第三区的大部分地区（罗马外边缘区以外的地区）。因此，像从前的文化历史那样（见本书第一章），认定斯拉夫人整体和科尔恰克遗存之间存在一种排他的一对一联系，是不稳妥的。

[3] 地图17参考了Barford (2001), 326。铁幕倒塌后，人们可以更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关于斯拉夫研究政治化的历史，英语世界中很好的介绍性著作包括Barford (2001)，特别是引言和第13章，以及Curta (2001），第1章。

[4] 科斯切夫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中很好地总结了自己的立场，那一年，他不平凡的一生走向了终点。他从1910年开始师从科辛纳，而由于他的观点（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完全由斯拉夫人主导的波兰）被视为不可接受，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东躲西藏，以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

[5] 见Shchukin (1975), (1977)。在波兰，戈德洛夫斯基在普热沃斯克系统和斯拉夫早期文化方面的工作至关重要；英语读者可以通过Godlowski (1970)很容易地了解到他的成果。得益于他和学生们的努力，人们逐渐接受，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系统都是完全由讲日耳曼语的群体主导的，而原先有人说那里的日耳曼人只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极少数移民，支持这种说法的考古“证据”也被推翻了。戈德洛夫斯基还证明，将罗马时期日耳曼人支配下的波兰与中世纪早期斯拉夫人统治下的波兰区分开的考古学变化有多么大。

[6] Procopius, *Wars* 8.40.5提到攻击始于查士丁时代。在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叙述中，经常提到斯拉夫群体的种种袭击：Curta (2001), chapter 3是比较新的精彩分析。

[7] 见Barford (2001), 41f.; Curta (2001), 228—46。

[8] Jordanes, *Getica* 5.34—5；参见Tacitus, *Germania* 46.2（关于威尼蒂人）和46.4（关于更远区域的情况）。威尼蒂人的其他资料，见Pliny, *Natural History 4.97; Ptolemy, Geography* 3.5.1 and 7。

[9] “树木论”最早由波兰植物学家罗斯塔芬斯基（Rostafinsk）在1908年提出：见Curta (2001), 7—8。鲁萨诺娃的著作都是俄语的；对她著作的讨论及完整参考资料，见Curta (2001), 230ff。

[10] 见Curta (1999), (2001)，特别是39—43（约达尼斯）; 230ff. 鲁萨诺娃）, chapters 3 and 6（与东罗马接触使斯拉夫人经历了转变）。

[11] Godlowski (1983); Parczewski (1993), (1997: an English summary); Kazanski (1999),chapter 2；参见Barford (2001), 41ff（他的观点保持开放）。

[12] 见Jordanes, *Getica* 48.247（伯兹和安特人），Heather (1989)确定了年

代顺序；50.265—6。

[13] Dolukhnaov (1996)对东欧简单农业文化长期发展的背景很有研究。

[14] 对语言证据的有用介绍，见Birnbaum (1993); Nichols (1998)。

[15] Procopius, *Wars* 7.29.1—3 (547 AD); 7.38 (548 AD); 7.40 (550 AD). 普罗柯比在别的地方说这样的袭击每年都有：*Secret History* 18.20；参见Curta (2001), 75—89。

[16] 图里斯，见Procopius, *Wars* 7.14.32—5。关于要塞的更一般性介绍，见Curta(2001), 150ff。

[17] 关于阿瓦尔人，见如Pohl (1988), (2003); Whitby (1988)等；Daim (2003)是英文写成的对阿瓦尔帝国考古材料的介绍。

[18] 见Whitby (1988)，特别是156ff。

[19] 关于波斯战争，见本书第七章。关于7世纪第二个10年的灾难，见John of Nikiu, *Chronicle* 10;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I.12, 13—15; II.1, 2。君士坦丁堡的围城见*Chronicon Paschale* AD a. 626。

[20]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II.4, 5. *Miracles*II.4指出Runchine、Strymon和Sagoudatae这几个斯拉夫群体是此时进攻塞萨洛尼基的群体；*Mirachles* II.1加上了Baiounitae和Buzetae这两个名字。关于迁移，参见Theophanes, *Chronicle* AM 6180（687/8 AD）。查士丁尼后来试图利用这些人与阿拉伯人作战，但在692年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关键时刻，他们改变了立场：Theophanes, *Chronicle* AM6184（691/692年），此处出现了3万人这个数字。关于巴尔干北部和西部的考古遗存，见Kazanski (1999), 85—6, 137; Barford (2001), 58—62, 67ff。

[21] 7个斯拉夫部落：见Theophanes, *Chronicle* AM 6171（678/679 AD）。关于不断发展的考古图景，见Kazanski (1999), 138; Barford (2001), 62ff及参考文献。有关保加尔人的介绍，见Gyuzelev (1979)。

[22] 关于帕特雷，见*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II.4，以及*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49—50。关于考古，见Kazanski (1999), 85f., 137；Barford (2001), 67f.；特别参见Curta (2001), 233—4正确的批评意见，他批评了过去一些学者的狂热做法，即试图用这些遗存“证明”*Chronicle of Monemvasia*中有关伯罗奔尼撒早期大规模斯拉夫化的叙述：见如Charanis (1950)。

[23]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30 and 31（分别谈到了克罗地亚人到来的克罗地亚版本和拜占庭版本）。萨莫：见Fredegar, *Chronicle* 4.48; cf. 4.72（关于保加尔人）。更多的评论，见Pohl (2003)。学者对《帝国治理论》的可信度有不同

的看法。

[24] 进一步的评论，见Barford (2001), 73—5; Curta (2001), 64—6及参考资料。也有人主张，史料中一些安特人领袖的名字起源于波斯语，但其词源仍存在争议。

[25] 参考资料见前注21。

[26] 对9世纪斯拉夫中欧的所有叙述都是以这位地理学家的记载为基础的，对之前几个世纪的讨论也受此影响。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外交行动主要涉及这一地区的群体，包括易北河的斯拉夫人、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

[27] 关于10世纪，见本书第十章。关于罗马时期，见地图1。

[28] 512年的事件：见Procopius, *Wars* 6.15.1—2。希尔德盖苏斯：见Procopius, *Wars* 7.35.16—22；参见Curta (2001), 82及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包括提及希尔德盖苏斯可能从斯洛伐克征兵的第二手资料。萨莫：见Fredegar, *Chronicle* 4.48, 68。

[29] 文献数量很多，近期的一般性论述见Brachmann (1997); Parczewski (1997);Kazanski (1999), 83—96; Barford (2001), 39—44; Brather (2001)。这些文献参考了早期的论述并加以修正，早期论述如Donat and Fischer (1994); Szydlowski (1980);Brachmann (1978); Herrmann (1968)。

[30] 关于新的轮制陶器，见Barford (2001), 63ff., 7—9, 104—12; Brather (2001)；参见Brather (1996)。有关第二拨移民的老观点，见Brachmann (1978)及参考资料。

[31] 一般性的讨论见Godlowski (1980), (1983)。伦巴第人于568年前往意大利，大大改变了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考古格局。

[32] Barford (2001), 53—4, 65—6及参考资料。

[33] 基本信息见Kobylinski (1997); Barford (2001), 65—7, 76—7。有关较旧观点的介绍，见Herrmann（1983）。尚不清楚苏科-杰济采的丧葬习俗，但应该是没法留下考古痕迹的那种，例如将尸体留在地面上或火化，而且没有用其他能说明身份的物品随葬。

[34] 见Kobylinski (1997)。

[35] 参考资料见前注33。

[36] 有用的介绍，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71ff.; Goehrke (1992), 3—43。

[37] 有关语言证据，见前注14。

[38] 有关证据，见Goehrke (1992), 14—19。Parczewski (1993); Kazanski (1999), 96—120；Barford (2001), 55—6, 82—5, 96—8。特意使用“由斯拉夫人主导”这个说法，是为了提醒读者，传统上那种文化历史的解释方法会误导我们对日耳曼时代的看法，也会给对斯拉夫时代的研究造成同样的误导：参见本书第一章。

[39] 相关梗概和进一步的介绍，见Goehrke (1992), 20—33；Barford (2001), 85—9, 96—9。

[40] 近期两本关于斯拉夫早期历史的书很好地介绍了不同的答案。Kazanski（1999）主张（特别参见第120—142页），布拉格-科尔恰克、彭考夫卡和科洛钦文化的生活方式大致相似，因此如果前两种是斯拉夫文化，那么第三种也是。他认为，东欧平原大部，也就是科洛钦文化覆盖的范围，在约500年时已经讲斯拉夫语了（参见本书地图16）。从7世纪开始的科尔恰克/彭考夫卡扩张是政治革命，而不是语言革命。Barford（2001）认为，布拉格-科尔恰克文化形成的时候，就是斯拉夫化开始的时候，当时讲波罗的语的人和讲斯拉夫语的人彼此区分开来。因此，在他看来，7世纪布拉格-科尔恰克文化向北和向东的扩张，以及后来卢卡-莱科维茨卡亚、伏林察沃和罗姆内-博尔舍沃传统的产生，不仅体现了政治革命，也代表着斯拉夫人统治这片土地的开始，尽管他们将大量本地人口吸收进了新的社会结构。

[41] 1 600名匈人、安特人和斯克拉文人的混合群体：见Procopius, *Wars* 5.27.1；3 000名斯拉夫人：见Procopius, *Wars* 7.38。希尔德盖苏斯：见Procopius, *Wars* 7.35.16—22。塞萨洛尼基的5 000名斯拉夫人：见*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I.12。

[42] 可能也与某种“推进浪潮”模式一致的事实是，移民进程结束时，处于不同地区的不同斯拉夫群体好像使用了相同的名字。对这种现象的通常解释是，原本统一的斯拉夫群体分裂为小群体，向不同方向迁移。这也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巴尔干地区会有布拉格-科尔恰克、彭考夫卡，甚至一些科洛钦遗存相互混合的情况（见前注40）。但还有个问题，就是史料中提到名字最多的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似乎是专业军人（见本书第【481—483】页），而不是带着完整的科尔恰克文化穿越欧洲大陆的小型保守社会团体。

[43] *Strategicon of Maurice* 11.4。考虑到他们群体的规模很小，他们应该不是出于本身的喜好而选择高地的，而是想通过高地获得更多的保护。关于印欧语系人群的推进浪潮，见Renfrew (1987)。

[44] 参考资料见前注20和22。政治背景也能充分说明为什么在巴尔干的定居点是较大的单元建立的。同样，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名字的斯拉夫群体与当地说希腊语的人群是不同的，因此，这些有名字的单元应该是由斯拉夫人组成的，而不是本地居民和移民重组的产物。

[45] 穆索修斯：见Theophylact 6.8.13—6.9.15。阿达加斯图斯：见Theophylact 1.7.5,6.7.1—5, 6.9.1—6。佩里加斯提斯：见Theophylact 7.4.8 ff。达布里塔斯：见Menander fr.21。关于战俘的争论：见Theophylact 6.11.4—21。关于距东罗马边境最近的斯拉夫人的社会政治转型，见Curta (2001)，特别是第7章。需要强调的是，总人口约1万人的群体能派遣的战士人数也就是一两千，而匈人时代某些日耳曼移民群体的规模大概是其10倍（见本书第四章）。

[46] 参考资料见前注23和24；关于塞萨洛尼基的5 000名“精锐”斯拉夫人，见前注41。

[47] 一般性的参考资料，见前注39。关于新特罗伊茨科耶，见Liapushkin (1958)。

[48] Maurice, *Strategicon* 11.4.

[49] 关于波希米亚，见Godja (1988)；背景情况参见Kolendo (1997)。花粉研究，参见Brachmann (1978), 31—2; Herrmann (1983), 87—9。不连续性也是Henning (1991)的主题。关于日耳曼文化崩溃。

[50] Fredegar, *Chronicle* 4.48。有关农业以及扩张，见Barford (2001), chapter 8, (2005)及完整的参考资料。虽然只有少数地区有关于人口扩张的充分信息，但在大波兰地区进行的实地勘察和调查项目已经证明，人口密度从约500年时的每平方千米不到1人，增加到900年时的每平方千米3人，1200年时的每平方千米7人：见Barford (2001), 89—91及参考资料。农业科技方面的迹象从定性角度体现了人口增长。比方说，在俄罗斯森林地带更往北的地区，直到斯拉夫人在第一千年下半叶的统治开始，犁才投入使用：见Levaskova (1994)。

[51] 参考资料见前注33。

[52] 见Halsall (2007), 383ff。

[53] 关于《莫奈姆瓦夏编年史》，见Charanis (1950)。关于帕特雷和拉古萨，见*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49—50；（关于萨洛纳的撤离）参见Whitby (1988), 189—90及参考资料。

[54] 见本书第四章。

[55] Urbanczyk (1997b), (2005)。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表明日耳曼农民受到

了这种剥削，但可供参考的是，受沉重剥削的罗马农民有时会去边境以外的（也许只是相对的）避税天堂寻求庇护。358年，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多瑙河以北活动的一个方面是“解放”边境以北的农民：见本书第三章。

[56] Fredegar, *Chronicle* 4.48；参见Urbanczyk (2002)。

[57] 斯拉夫人也许就是这样采纳了一些日耳曼语的河流名和地名，比如，吕根岛和西里西亚这两个地方似乎分别得名于鲁吉人和西林格汪达尔人。

[58] 见Henning (1991)，他揭示并纠正了在Herrman (1984), (1985), 33ff中存在的东德时期的政治偏见。

[59] 托皮鲁斯：见Procopius, *Wars* 7.39。594年的事件：见Theophylact, 7.2.1—10。

[60] 比起“隐藏”的斯拉夫人被一小批日耳曼精英统治这个受意识形态推动的民族主义模型，这种不同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61] 见本书第十章。

[62] 精彩的综述，见Barford (2001), chapters 3—8。

[63] Jordanes, *Getica* 48.247，见前注12。

[64] *Chronicon Paschale* (626 AD)；对阿瓦尔——斯拉夫关系的概述，参见Whitby (1988),80ff.; Curta (2001), 90f。

[65] Fredegar, *Chronicle* 4.48。

[66] 莫吉拉内群体在阿瓦尔人到来之前就有了，但阿瓦尔人可能是苏科-杰济采系统产生的额外驱动力，尽管我们看到，该系统内部的年代顺序尚不清晰，还不能过于强调这一因素的作用：相关参考资料，见前注33。

[67] 关于阿瓦尔帝国的历史和考古的有用引介，见Pohl (2003); Daim (2003)。

[68] 见本书第235—236页。

[69] 关于杜尔西内亚，见Curta (2006), 56—7。

[70] 斯拉夫人的独木舟：见*Chronicon Paschale* (626 AD);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II.1。

[71] Buko (2005), chapter 3.

第九章
维京人的大迁徙

> 要去格陵兰，请在挪威中部向左转，在设得兰群岛以北、法罗群岛以南航行，你的位置要离两个群岛足够远，远到只有能见度很好时才能看到设得兰群岛，海平面看起来出现在法罗群岛上山坡的中部。至于冰岛，你要一直在它的南边，远到只能看到成群的鸟和鲸鱼。[1]

中世纪的一本冰岛语手册中有一段航海指南，以上只是大意，不过已经足以让人汗毛直立了。有这么详细的说明，怎么会到不了目的地呢？你所需要的只是：能够识别设得兰群岛附近的能见度好不好，如果不好（通常都不好），就猜一下该岛的方位；能够凭本能知道法罗群岛的高度；知道如何依靠星星，在两地之间以直线航行。再加上对冰岛周围海洋动物的深刻了解，还有不被臭名昭著的大西洋狂风吹走的运气（或者一旦被吹走，能自己重新定向的能力），然后你就到了。所有这些航行都是用一艘敞舱木船完成的，它靠风力行使，没有无线电（也没有你想要的救生艇服务）。有鉴于此，寻找格陵兰岛的维京人却来到了美洲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第一千年末期，北大西洋上到处是勇敢、灵巧却迷失了方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在摸索中“发现”事物。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800—1000年间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以极大的热情探索着不同深度的水域。除了在北大西洋的著名发现之旅外，维京人还出于各种目的，坐着形状和大小各异的船去探索西欧、中欧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内河航线。在这几个世纪里，维京人沿水路离开波罗的海沿岸的狭窄故土，突然现身于从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到乌拉尔山脉的广大地区，进行贸易，发起袭击，定居下来，形成政治共同体。他们一路上遇到的社会和他们自己的社会都被完全改变。本章无意讨论维京时代的全貌，而是希望探讨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并参考本书中讨论过的现代和其他中世纪早期移民的例子，检视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形式、动机和影响。

维京人和西欧 [2]

在欧洲西部，维京人的袭击始于8世纪末的一次复仇。维京人第一次大举破坏是在793年：6月8日（恰好是我的生日），他们在不列颠诺森布里亚

海岸附近洗劫了林迪斯法恩岛（Lindisfarne）上的著名修道院。在此后的两年中，袭击者在苏格兰北部海岸和西部群岛开展行动，洗劫了拉斯林岛（Rathlin）上的一所爱尔兰修道院。实施这些破坏的似乎主要是挪威人，风向和洋流的自然组合将他们带到了不列颠群岛的北部海岸。春季盛行的东风带着挪威袭击者横渡北海，来到设得兰群岛、奥克尼（Orkney）群岛和苏格兰东北部。他们需要在挪威和设得兰群岛之间的开阔海域中冒险，一开始的时候是看不到陆地的。任务艰巨，但并非无法完成。从挪威西部的卑尔根（Bergen）到设得兰群岛，只需要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穿过斯卡格拉克（Skagerrak）海峡并进入波罗的海就可以了。一旦到达设得兰群岛，就可以在一直看得到陆地的情况下完成余下的航行。苏格兰近在咫尺，海岸线也不曲折，挪威袭击者绕过北部海岸，就能来到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爱尔兰海、不列颠西部以及爱尔兰。然后，如果他们不想长期停留的话，北海秋季盛行的西风正好可以带他们回家。如果季风和洋流的方向反过来，那么我们现在研究的可能就是中世纪苏格兰人入侵挪威的历史了。[3]

在不列颠北部和爱尔兰受到攻击的同时，英吉利海峡两岸也出现了麻烦。在786年至802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采用的日期系统变来变去，所以无法更确切地判定事件的时间），3艘载有北欧人的船抵达了不列颠南部海岸的波特兰岛——这可能是第一次有记录的维京时代的袭击。当地的王室官员想把他们带到国王那里，却被他们杀了；有人认为，这位官员误以为他们是商人。这些船来自挪威的霍达兰（Horthaland）。至于北欧人制造的其他麻烦，证据没那么直接，但也足够清楚。792年，麦西亚国王、亨伯河（Humber）以南英格兰的领主奥法（Off）下令，允许肯特郡一所沿海的修道院在内陆修建一个避难所，避难所设在仍有罗马城墙围绕的坎特伯雷城内。英吉利海峡以南也做了准备。800年，查理曼加强了塞纳河河口处的防御。维京袭击者已经航行到更远的地方。前一年，他们绕过布列塔尼海岸，袭击了法国西部卢瓦尔河河口处努瓦尔穆捷岛（Noirmoutier）上的修道院。10年后，皇帝决定在根特（Ghent）和布洛涅（Boulogne）建立舰队，这还是为了遏制来自海上的袭击。[4]

和对林迪斯法恩岛的劫掠一样，劫掠波特兰岛也是来自挪威的维京人干的。不过，9世纪在南线的行动大多是来自丹麦的北欧人发起的。因为地理上比较近，所以丹麦的航海者去英格兰东部沿海地区和整个英吉利海峡地区都比较容易。但这只是一种趋势。谈论维京时期时，用“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这样的范畴是犯了时代错误。一开始的时候，这三个群体都不是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而那些著名的领袖则从波罗的海各地募集人力。

袭击

维京人在西欧第一阶段的行动以规模较小的暴力袭击为主，其中一些方面得到了比较好的记载。对不列颠北部的袭击很猛烈，开始得也很早。到9世纪中叶，维京人不仅袭击了设得兰群岛、奥克尼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还大规模定居下来。史料中没有什么相关记载，但在850年的时候，西部群岛上已经有了地位稳固的北欧领袖，至于他们的北方同伴，地名和考古证据也都很有说服力。从长远来看，设得兰群岛和奥克尼群岛上从前命名的痕迹都被抹去了；这些岛屿上的所有地名都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考古证据也体现了类似的控制水平，皮克特式定居点被新的斯堪的纳维亚式定居点取代。在北部和西部岛屿，凯尔特人和皮克特人传统的圆形和8字形建筑风格很快让位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横平竖直的房屋——这是另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在赫布里底群岛，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名字虽然不是全面流行，但也很多，考古证据也类似。在这个时期，马恩岛（Isle of Man），可能还有威尔士的西部边缘也遭到了袭击，最初的北欧定居点也出现了。[5]

在南边的英格兰、爱尔兰和欧洲大陆，历史资料让我们看到了比较清晰的模式。9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欧洲大陆和岛上的资料都零星提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袭击，但在那之后袭击大为加剧。在爱尔兰的资料中，第一个有名字的维京人领袖出现在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 of Ireland*）中，可见更密切的接触产生了更多的知识。叙事证据证实了这一点。836年，爱尔兰境内的修道院（不光是沿海的修道院）首次遭到攻击；在那之前，维京人已经深入该岛的内陆河流系统和湖泊，这说明维京人对目标了解得越来越多。在此期间，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港口也受到沉重打击。835—837年，弗里西亚港口多雷斯塔德（Dorestad）连续3年遭到袭击，肯特的谢佩（Sheppey）在835年遭袭，韦塞克斯则是在836年。同一时期，维京袭击者迫使努瓦尔穆捷的修士放弃修道院，走上撤进内陆的漫长道路。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一些维京袭击者走得更远。844年，一群维京人越过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进攻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王国加利西亚（Galicia，在现在的西班牙西北部），然后向南进入富饶的安达卢斯，那里是西班牙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也许是最惊人的一次袭击发生在858年，当时西班牙被包围，直布罗陀海峡被渗透，意大利海岸被攻击。这群袭击者在地中海地区过了冬，然后在859年一直攻到罗讷河，还在861年返乡的途中绑架了西班牙北部的潘普洛纳（Pamplona）王国的国王，向他勒索了6万金币。[6]

但此类长距离袭击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持续的袭击没有超出法国西南部及阿基坦的加龙河水系的范围。最终，该地区的统治者——查理曼的孙子“秃头查理”和他的侄子丕平——遏制了这些袭击。但比起北面英吉利海峡两岸经受的越发猛烈的袭击，阿基坦地区遭受的袭击只能算是小事件。维京人袭击的加剧体现在三个方面：参与袭击的维京群体增多；袭击的频

率和单次袭击持续的时间增加；袭击的目标从沿海通过河流系统延伸到内陆，如爱尔兰的情况所示。富有的圣旺德里尔（St Wandrille）修道院于841年被洗劫，昆都维克（Quentovic）港在842年被洗劫，南特在843年被洗劫。两年后，一位名叫雷金哈里斯（Reginharius）的维京领袖（和爱尔兰的情况一样，编年史家写出人物的名字意义重大）带着随从沿塞纳河一直打到巴黎，在那里他闯入了可能是西欧最富有的修道院：圣日耳曼修道院。但修士们已经事先得到警告。修道院的圣物（包括圣日耳曼本人）和所有珍宝已经转移到塞纳河更上游的地方。6周后修士返回时，发现教堂仅有一些表面损坏，还有几栋附属建筑被烧毁。真正的损失在酒窖，维京人发现酒窖后，结果可想而知。巴黎其他地方就没那么幸运了。总而言之，雷金哈里斯通过制造麻烦索取了3 000多千克的金银，包括保护金、战利品和赎金。

从大约850年起，攻击强度进一步提升。维京人第一次在西欧过冬。通常，11月到次年3月是休整期，因为北海在这段时间过于危险，不适合航行，但休整期被缩短了。这说明袭击者对其斯堪的纳维亚家园产生了疏离，不是个好兆头。袭击者分别于850—851年冬天和854—855年冬天占领了肯特郡东部的萨尼特岛（Thanet）和谢佩岛。法国北部的塞纳河地区在856—866年间遭受了几乎连续不断的袭击。在此阶段，维京袭击者已成为政治格局中的固定角色，内部政治纠纷中的不同派别都雇用他们。862年，布列塔尼的统治者萨洛蒙公爵（Duke Salomon）和他的劲敌安茹的罗贝尔公爵（Duke Robert of Anjou）各自雇用了维京帮手。维京人也被雇来与其他维京人作战。860年，秃头查理雇了一个名叫韦兰（Weland）的维京人首领，让他带兵攻打在塞纳河沿岸造成严重破坏的其他维京人。双方讨价还价，事情稍有延迟，但在861年，韦兰还是带着200艘船出现了。然而，形势错综复杂，韦兰原本要攻打的那些维京人又给他付了笔钱。不过到了861—862年冬，这些维京人好歹分散成了一些独立的群体，威胁小了一些。实际上，在当时的阶段，付钱给一群维京人，让他们帮忙对付另一群维京人，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战术。秃头查理的父亲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在9世纪20年代与一位叫哈拉尔（Harold）的丹麦国王达成过这种交易，查理自己在841年也雇用了雷金哈里斯——几年后，雷金哈里斯就顺着塞纳河打进了巴黎。[7]

在爱尔兰，压力也不断增加。《爱尔兰编年史》记录了830—845年间约50座修道院遭受的针对性袭击，以及伦斯特（Leinster）和乌伊尼尔（Uí Néill）王国等较大地区的人和教堂遭遇的9次一般性袭击。9世纪中叶，较大的修道院中心［例如阿尔马（Armagh）、基尔代尔（Kildare）和克隆马克诺伊斯（Clonmacnoise）］的财富和人口集中度是爱尔兰最高的，因此是理想的袭击目标。面对这种侵略，爱尔兰的国王们毫不退缩。848年，塔拉的至高王（High King of Tara）迈尔·塞奇奈尔（Mael

Sechnaill）在米斯郡（Meath）击败了一批维京人，杀死了约700人。同年，芒斯特（Munster）和伦斯特的国王在基尔代尔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在战场上杀死了维京人伯爵托瑞尔（Tomrair）和他的1 200名士兵。爱尔兰获胜的消息传到了法兰克宫廷，但要说已完全胜利还为时过早。849年，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情况。《爱尔兰编年史》首次提到被称为“国王”的维京首领的到来。此人率领120艘船，着手征服那些已经向西迁移的维京人，同时继续从不幸的爱尔兰人那里索取更多的贡物。到了853年，已有两个“国王”（某些资料中认为他们是兄弟）在爱尔兰水域活动，他们迫使已在爱尔兰居住的所有维京人承认自己的领导地位。他们一直在爱尔兰水域待到9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两个国王究竟是谁，一直存在争议，但他们可能是无骨者伊瓦尔（Ivar the Boneless）和白色奥拉夫（Olaf the White）两兄弟，他俩从866年起将注意力转向英格兰。我们稍后将看到，他们可能在第三位兄弟希夫丹（Healfdan）的帮助下，再次升级了维京人的危险进攻。虽然有争议，但他们可能是在9世纪50年代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直接来到了不列颠群岛，而不是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从苏格兰和/或赫布里底群岛而来。更有传奇性质的材料保存在事件发生200多年后写下的资料中，这些材料也认为这三人是朗纳尔·洛德布罗克（Ragnar Lothbrok，“毛裤子”）的儿子。朗纳尔曾误把意大利城市卢尼（Luni）当作罗马洗劫。这次大劫掠之后，他死于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尔（Aelle）的蛇坑中。据说他的死开启了维京人对英格兰的征服。这一切都不大可能，但传说中的朗纳尔可能确实体现了人们对巴黎的雷金哈里斯的名声的一些记忆，而伊瓦尔、奥拉夫和希夫丹如此重要，必然出自显赫的家族。因此他们也很可能是雷金哈里斯的儿子。不过，历史上的雷金哈里斯并未死于埃尔的蛇坑，而是在丹麦国王霍里克（Horik）的宫廷中死去的，据说是圣日耳曼因雷金哈里斯洗劫了自己的修道院而报复了他。[8]如果是这样，萨迦中所说兄弟俩攻击诺森布里亚是为了复仇也就不成立了，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就连伊瓦尔、奥拉夫和希夫丹的家庭关系也不是那么重要。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抵达不列颠本土后，开启了维京人活动的新时代。

“大军”

维京人的进攻加剧，最终在9世纪60年代用暴力征服了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维京部队基本来自丹麦，被称为“大军”（Great Armies，盎格鲁-撒克逊语是micel here）。第一批大军于866—867年的冬天聚集在东盎格利亚王国，从那里攫取马匹和补给。867年，诺森布里亚王国的继承纷争将该国的军事力量一分为二，一部分归了奥斯伯特（Osbert），一部分归了埃尔，大军趁机攻入。两位国王最终团结起来，但为时已晚。维京人闯入约克城，杀死了两人。868年，受此次成功的激励，大军转向了麦西亚，

但被麦西亚和韦塞克斯的联合部队击退。虽然这次受了挫折，但大军还是在870年征服了东盎格利亚，又通过漫长的战斗，最终在874年击败了麦西亚。

国王阿尔弗雷德领导下的韦塞克斯此时成了攻击目标。4年的战争之后，他在878年取得了爱丁顿大捷，得以勉强保持独立。关键的事件发生在877—878年冬天，当时维京人出其不意地攻入了阿尔弗雷德王国的心脏地带。阿尔弗雷德藏在阿赛尔内（Athelney）岛上，在思考怎么扭转局势才好时把蛋糕给烤坏了——这件事很出名。到了春天，阿尔弗雷德发起反击（蛋糕已经不重要了），集中力量赢得了他那场著名的胜利。爱丁顿大捷之后，维京领导人古斯鲁姆（Guthrum）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然后撤退到东盎格利亚。阿尔弗雷德的胜利给丹麦征服英格兰的范围划定了边界，但无法阻止维京人瓜分先前打了胜仗后攫取的土地。在爱丁顿的两边，不同的维京群体分别于876年和877年瓜分了诺森布里亚和麦西亚的部分地区。880年，古斯鲁姆的追随者也瓜分了东盎格利亚。丹麦律法区（Danelaw）由此诞生。[9]

阿尔弗雷德之所以能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维京人的部队是最后才转向韦塞克斯的。所有的“大军”都是联军，联军才能形成这么大的规模。例如，第一支大军建立于865年，联合了几位国王（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朗纳尔的儿子）的部队和更多的军事力量，其中一些军事力量相当可观，领导它们的是地位略低但本身独立的首领（称为jarls，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伯爵”）。到878年袭击韦塞克斯之时，这支大军中的一些部队要么退出行动，要么只是敷衍着行动，因为876年和877年分别瓜分诺森布里亚和麦西亚的土地后，有些人（得到了土地的人）已经输不起了。但爱丁顿大捷只能代表大军时代第一回合的结束。第一支大军中的一些军事力量（从866年开始，大军有在不同地区间往来的情况，我们稍后会讨论）可能并没有分到土地。而大军的胜利也无疑吸引了更多的维京人加入。《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写到了一支特别庞大的新部队，这支部队于879—880年在富勒姆的泰晤士河河畔过冬（当时此地显然还不属于伦敦）。

所有这些新的维京人，还有那些期望尚未得到满足的人，仍准备战斗。但是，在英格兰已经没有机会了：阿尔弗雷德国王领导下的韦塞克斯重新崛起，土地分配本身也有问题，古斯鲁姆在爱丁顿之役后又承诺维持和平。他们自然将目光投向了其他地方。根据法兰克资料的记录，880年春天之后，大群斯堪的纳维亚人又开始在欧洲大陆上活动。

880年，此前到访富勒姆的部队离开英格兰，寻找新的获利地区。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看起来有机可乘。查理曼的法兰克帝国最终被其孙子划分为三个王国：秃头查理控制的西部王国、长孙洛泰尔（Lothar）的中间王国洛泰尔尼亚（Lotharingia）、日耳曼人路易的东部王国。洛泰尔的儿子无

嗣而终，没有给洛泰尔尼亚留下统治者，查理和路易的争夺开始了。回来寻找机会的维京人注意到了洛泰尔尼亚北部沿海地区（今比利时和荷兰），以及东部和西部王国的边缘地带。880年，法兰克人一开始打了胜仗。路易在斯海尔德（Scheldt）河击败了一群维京人，让他们损失了5 000多人。不过，东边的另一群维京人在萨克森获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杀了2名主教、12名伯爵及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维京人的主要成就是攻入了低地国家，也就是从前洛泰尔尼亚的核心地带。

881年，尽管据说遭遇失败并损失了9 000人，维京大军还是劫掠了康布雷（Cambrai）、乌特勒支（Utrecht），以及查理曼在亚琛的宏伟宫殿，并焚烧了科隆和波恩。这支大军也是3位斯堪的纳维亚国王领导下的联合部队，这次的国王是戈德弗里德（Godfrid）、西格弗里德（Sigfrid）和戈姆（Gorm）。日耳曼人路易的儿子路易年纪大了，身患重病，无法出手干预，自己也于882年1月20日去世。因此那一年，集结法兰克军队的是日耳曼人路易唯一还活着的儿子——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胖子查理决定效法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于是与戈德弗里德缔结了条约，条约要求他改宗基督教，大概是希望对维京人的部队分而治之。该政策的效力维持了3年，尽管维京人于883年袭击了斯海尔德河，然后于884年沿索姆河（Somme）袭击亚眠。884年，西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在狩猎时去世。维京人趁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戈德弗里德得以在885年撕毁条约。戈德弗里德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维京人的部队在西边取得了巨大成功，大批维京人进入内陆，在886年越过巴黎，887年到达兰斯（Rheims）。一直到891年，法兰克王国都因内部纷争而无法做出有效反应。891年，日耳曼人路易之子卡洛曼的私生子、东法兰克国王阿努尔夫（Arnulf，他在887年废黜了他的叔叔胖子查理）在今比利时勒芬（Louvain）附近的代勒河（River Dyle）上将一支丹麦军队困在了堡垒里。法兰克人冲进堡垒，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杀死两名国王，缴获了16面王旗。[10]

法兰克人再度崛起，效果与阿尔弗雷德差不多10年前的成功一样，只是方向相反。既然对付欧洲大陆上的对手不再轻松，欧洲大陆上的维京大军就又返回了英格兰。英格兰在整个9世纪80年代一直很平静，除了罗切斯特在886年遭遇过一次半途而废的袭击。但是阿尔弗雷德一直很清楚，维京人的威胁只是得到了遏制，并没有消除。《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9世纪80年代每一年维京军队的活动地点都有记录。看起来，惊恐不安的他们正监视着维京人。阿尔弗雷德急切地发起了防御性建设计划，在他的王国中建起了一系列防御工事（burhs）。他不仅要建立避难所，还要组织驻军并改造野战部队。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第一支维京大军曾在英格兰畅通无阻，短时间内就推进了很长的距离。堡垒改变了这一切：它们没那么容易攻下，而军队若想前进，就得先攻克堡垒，因为堡垒中有可以发起

骚扰行动的武装驻军。显然，阿尔弗雷德的计划是先用堡垒拖住发起进攻的维京人，消耗他们的力量，然后在必要时再用新的野战部队迎战。

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与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样，在9世纪90年代返回的维京人军队还是分作几支。一支由200多艘船搭载的部队在肯特郡东部登陆，在阿普尔多尔（Appledore）建了一个基地，另一支部队在不远处的泰晤士河河口登陆，在锡廷伯恩（Sittingbourne）附近的米尔顿里吉斯（Milton Regis）建立了根据地。尽管丹麦律法区的一些丹麦人与这些新来的人联合了起来，但3年的行动没能给斯堪的纳维亚人带来太多回报，这与第一支大军的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能在英格兰各处行军，甚至可以像在877—878年冬天那样自由地进入韦塞克斯王国的心脏地带，但第二支维京大军没能胜过阿尔弗雷德改编后的野战军，而且由于遭遇反攻加上攻城失败，它失去了发起袭击的动力。结果，这支大军基本只能在韦塞克斯（属于肯特郡和埃塞克斯的那部分地区）边缘活动，而且由于供应不足而力量日渐衰落。从古至今，有不少将领都因基于过去的战役制订未来的战争计划而遭遇失败，但阿尔弗雷德的情况有所不同，上一场战争是不久前才发生的，性质也与他要打的这场类似，所以他的计划获得了回报。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的那样："然后，在今年（896年）夏天，丹麦军队分裂了，一支部队进入东盎格利亚，另一支部队进入诺森布里亚。那些没钱的人就找来船只，向南跨海进入塞纳河。"[11]

于是，维京人行动的大方向又转向了欧洲大陆。在欧洲大陆，因为没赚到足够的钱而无法在英格兰定居的维京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援。9世纪末，维京人在爱尔兰的据点仅剩数量有限的沿海堡垒飞地，主要有利默里克（Limerick）、韦克斯福德（Wexford）、沃特福德（Waterford），以及最重要的都柏林。在9世纪的最后10年里，爱尔兰国王团结起来打击维京人仅存的势力。利默里克、韦克斯福德和沃特福德的维京人独立部队被各个击破，902年，就连都柏林的维京人都被赶出了据点。一些难民定居在马恩岛和不列颠群岛西海岸，特别是在坎布里亚（Cumbria）和威尔士。而被驱逐的爱尔兰维京人也可能促成了在法国北部发生的事件。[12]

可惜，当时欧洲大陆的资料过于零散，无法重建历史叙述。即使是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样的编年资料，也往往写成记录国王事迹的歌颂作品。10世纪初是西法兰克王国政治大分裂的时期，查理曼的后代在该地区失去了权力，一系列本地领主夺取了权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人写下有连续性的历史记录，我们也无从知道事件的具体进展。

但我们知道维京人取得了重大进展。原本独立的布列塔尼王国在10世纪第二个10年里屈服于维京人的袭击，一些政治领导人逃往韦塞克斯宫廷寻求庇护。维京人在此后20年的时间里始终控制着布列塔尼，直到936年艾伦二世（Alan II）统治下的本地王朝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这段维京人的插

曲对地名几乎没有持久的影响，但留下了后来在格鲁瓦岛（Île-de-Groix）出土的壮观战船。面对领土北部和西部边缘的这种压力，法兰克国王采取了一种古老的策略。911年，塞纳河入海口的鲁昂（Rouen）港及其周围土地被授予维京人首领罗洛（Rollo）。以他这一支和这个定居点为起点，最终将发展出诺曼底公国（Duchy of Normandy）。另一个维京人定居点于921年获得许可，设立在卢瓦尔河河口的南特，但仅维持了16年。两个定居点都旨在扶植听话的维京首领，让他们协助控制维京人的威胁。但这样的定居点只是故事一部分。同一时期，其他维京人群体在科唐坦（Cotentin）半岛和巴约（Bayeux）附近的诺曼底高地定居。我们并不知道（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来自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哪些维京人群体建立了鲁昂和南特的定居点，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维京人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来。

但这些基本上是细节问题。10世纪最初的20年，因为有了英格兰、爱尔兰和法国北部那些或是获准或是凭武力设立的定居点，大多数在9世纪末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来到西方的武装漂泊者停歇了下来。[13]

就这样，从针对西欧的袭击和大军时代中，产生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大迁移。9世纪初，不列颠北部和西部岛屿（可能包括马恩岛）上已经有了他们的定居点。西北方向的法罗群岛紧随其后，只是该过程没有得到记载。显然，那里最迟在9世纪中叶就有了定居点，大军时代则见证了更多的定居活动。最有名的是，在公元900年之前一代人的时间里，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大量移居冰岛。12世纪冰岛人对这次定居的“官方”讲法是，当时挪威王室的中央权力不断扩大，促使挪威人以及一些北部和西部岛屿的早期定居者走上迁徙之路。但这种说法可能犯了时代错误，所反映的是12世纪挪威国王向北方的扩张，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9世纪的挪威国王有这么大的权力。但是在9世纪晚期（860年到880年之间），北部和西部岛屿确实出现了另一种中央权力：位于奥克尼的摩尔伯爵国（Earldomof More）。促使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迁往冰岛的，似乎正是这股新势力。当然，从冰岛出发，格陵兰岛从10世纪中叶开始就可以定居了。摩尔伯爵似乎还组织了苏格兰本土北部的战役，使更多斯堪的纳维亚人有机会进入凯斯内斯（Caithness）——那是同一时期他们从皮克特人手中夺取的。[14]

大军时代最后的定居实际上是移居。爱尔兰国王破坏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基地，最终这些人在902年被驱逐出都柏林，促成北欧人在马恩岛和不列颠西部的进一步定居。但是在914年，一支庞大的斯堪的纳维亚舰队从布列塔尼出发，停泊在沃特福德。3年后，一位名叫西特里克（Sihtric）的国王加入了舰队，他是从9世纪中期到902年统治了都柏林的伊瓦尔国王（King Ivar）的后裔。同时，他的兄弟拉格纳尔（Ragnall）成为约克的维京人国王。拉格纳尔在921年去世后，西特里克统治了都柏林和约克的

联合王国。在此后的30多年中，这个维京时代的奇特衍生物创造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历史（但具体细节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直到954年血斧埃里克（Eric Bloodaxe）失败，这两个维京中心的联系才被切断，走上了不同的轨道：约克成为统一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一部分，都柏林则在爱尔兰政治中扮演一个小角色。[15]但整个西方的大迁移仅仅是一个更大现象的一部分。在袭击者和大军重组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同时，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正探索着俄罗斯西部的河道。

俄罗斯的维京人

10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出现了重大的外交变化，伏尔加保加尔人（Volga Bulgars）正式宣布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处在保加尔人和伊斯兰核心世界（哈里发国）之间的是哈扎尔人（Khazars），他们自7世纪以来占领了伏尔加河下游以及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地区（地图20）。长期以来，哈扎尔人与哈里发国之间的关系一直稳定，而外交关系良好，贸易关系也逐渐发展起来。保加尔人也进入了这个在8—9世纪外交稳定、交流互利的世界，参与了有利可图的贸易联盟。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是要宣示对文化的忠诚，这也是他们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世纪早期的伊斯兰世界，繁荣程度和政治凝聚力如日中天。这是一个有着大量财富和奢侈宫廷生活的世界，学者们对保留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知识饶有兴趣，尤其是在科学和地理领域，而这些学科在基督教世界的发展已陷入停顿。

伏尔加河被拉进这条轨道后，不仅是哈里发的大使，还有对这个神秘角落的族群和风俗感兴趣的商人、旅行者和学者，都开始了向北的旅程。在保加尔人的土地上，在中世纪早期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布尔加尔（Bulgar），他们遇到了许多陌生的族群。他们很快知道了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罗斯人（Ar-Rus）。这些穆斯林是非常好的民族志学家，探险家利文斯通式的人物，仅仅听说过罗斯人，或是在布尔加尔集市上见过一些罗斯人，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向西方和向北方行进，去直接了解罗斯人的情况。他们在当地发现了一种处于国家和富商联盟之间的结构。罗斯人有一位国王，住在一个设防的小岛上。他维持了一个拥有大量战士的军事机构，向联盟中的所有商人征收10%的利润来为部队提供资金。那里也有神职人员，但作用最大的还是这个强大的商人阶级，商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了规则。侮辱富商的人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者损失50%的财产。[16]

这些罗斯人是谁？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

罗斯人

过去，罗斯人的身份引起过极大争议。第一回合的战斗照例带着19世纪末典型的民族主义狂热。斯堪的纳维亚学者认为，Rus一词源于芬兰语中指代瑞典人的词，因此罗斯人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他们继而宣称，中世纪的罗斯这个以基辅为中心，从那些穆斯林见到的小政权发展而来的国家，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创造！在19世纪末，这种说法不太可能没人回应。不可否认，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发挥了作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不少急流（苏联时代的大水利工程之后，这些河流不复存在）都有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名字，这些名字保存在第八章谈到的《帝国治理论》这一拜占庭史料中。另外，罗斯最早的编年史保存了10世纪与拜占庭谈判达成的两项罗斯贸易条约的文本，参与其中的许多罗斯人的名字显然是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然而，倾向于强调斯拉夫人作用的学者并未退缩，而是在所谓的诺曼之争（Normanist debate）中发起了反击。他们认为Rus这个词源自黑海地区北部的一条小河罗斯河（Rhos），只有很小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作为商人和雇佣军起了作用。在他们看来，中世纪的罗斯当然是斯拉夫人创立的。

到了20世纪，俄国革命间接巩固了强调斯拉夫人作用的立场。当然，这与民族主义自豪感无关。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历史上的重大变化都是由内部的社会经济转型推动的。按照这种理论模型，每种生产方式，包括古代的（奴隶制）、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都会产生巨大的内部矛盾，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并导致其被下一种生产方式取代。根据这种观念，基辅罗斯代表封建制度来到了俄罗斯森林。但这里有些问题。对于此地应该出现在封建制和基辅罗斯成立之前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同样，封建生产方式的特征应该是大型庄园农业，从中受益的主要是人数极少的完全军事化的地主阶级。虽然10世纪时确实有某种基辅国家，但从历史证据看，并没有在11世纪之前有大型庄园的迹象。“国家封建主义”概念的发明解决了一个问题，国家封建主义的意思是国家机构可以执行地主阶级的职能，但奴隶问题则被悄悄地遗忘了。实际上，苏联一方面坚持马克思的国际主义观念，认为民族主义是精英为了分裂和统治工人阶级，避免工人联合起来反抗而发展出来的虚假意识，另一方面又保持着民族主义的热情。因此，旧的论点总是与强调内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论点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哪种观点，都认为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家们在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建立时并没有起什么作用。[17]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现代议程对俄罗斯历史研究的压力减小了许多，共识开始出现。现在，大多数学者乐于承认，Rus这个名称的确源于芬兰语中的“瑞典人”，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形成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839年，一些罗斯人被从君士坦丁堡派往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的宫廷，法兰克人显然认为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其他的历史证据（例如10世纪贸易条约中的人名）也同样具有决定性。学者们

开始公开表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发现的源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遗存比先前承认的要多。阿拉伯旅行者的一些记载虽然在民族志方面有些问题，但也很能体现出罗斯人起源于北方。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在保加尔人的土地上目睹了罗斯人的船葬，他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维京人。他描写了用动物甚至人类献祭的血腥细节，描述了尸体及陪葬品如何被放上船，拖到岸上，然后点火，再用土盖住灰烬，在土堆顶端立起一根木柱。[18]

那么，如果俄罗斯北部的罗斯人和他们在岛上的国王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对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又起了什么作用？

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沿东欧河道网前来的情况，并没有当时的记载。这一切开始于8世纪，当时波罗的海地区的东南腹地离欧洲（或者说实际上是穆斯林）文化中心都太远，因此这里发生的事件都没有被当时的人记录下来。后来，一些斯堪的纳维亚萨迦提到了维京人在俄罗斯地区的活动。有关中世纪俄罗斯史前史的最连贯记载保留于《罗斯最初编年史》（这个书名描述性比较强，另一个名字《往年纪事》倒有点像普鲁斯特的书）。该书现存的抄本年代都不早于14世纪，但其中的文字是12世纪初写成的。从考古资料中我们知道，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晚从8世纪下半叶开始渗透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森林中，因此，即使是《往年纪事》的最初编纂者，所写的也是350多年之前的事了，许多事件都发生在罗斯世界的居民普遍会书写之前。作者可能是在12世纪时罗斯的首都基辅（位于今乌克兰）的某个修道院中写作的。但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较晚的时期才南下基辅，而且我们会看到，就罗斯历史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第聂伯河流域远不如伏尔加河流域重要。

因此，和文字叙述关注的地区相比，更北边和更东边的地方才是大部分俄罗斯史前史发生的地方。《往年纪事》的作者大概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后来统治基辅的留里克（Riurikid）王朝最初落脚的地方在俄罗斯北部。据说，留里克王朝的创建者、斯堪的纳维亚人留里克是受邀而来，邀请他的是俄罗斯北部5个常年交战的部落：源自芬兰的楚得人（Chud）、梅里亚人（Merja）和维斯人（Ves），属于斯拉夫人的克里维奇人（Slavic Krivichi）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留里克来的时候，应该还带上了两位兄弟西纽斯（Sineus）和特鲁沃尔（Truvor），他们在此地建立了秩序——事情就是这样。这段叙述的历史真实性我们稍后讨论，重点是，仅凭文字传统无法知道罗斯最初的历史。[19]因此，考古材料就很重要了。

前文多次提到，试图通过考古遗存重建历史叙述是很危险的。考古遗存很能说明变化的长期模式，但未必能体现出历史叙述关注的那种短期交流。不过，和欧洲斯拉夫化研究一样，由于苏联对史前史的关注，1945年以后发现了大量新材料，也出现了一些惊人的见解。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

以肯定，在8世纪中叶，对西欧的袭击开始前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斯堪的纳维亚冒险家开始从波罗的海以南和以东迁往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波罗的海从来都不是行动的障碍。在波罗的海南海岸的最西端，现在的波美拉尼亚，早就发现了斯堪的纳维亚社区的遗迹，其历史可追溯至5—6世纪。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社区直到7世纪还作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社区存在，相关群体要么被新来的斯拉夫人吞并，要么返回了家园。但在7世纪中叶的短暂中断后，后来被认定为斯堪的纳维亚遗存的物品出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东边，以及始于埃尔布隆格（Elblag）和格洛宾（Grobin）的由爱沙尼亚人统治的地区。8世纪，一股斯堪的纳维亚势力现身于维斯瓦河三角洲的亚努夫（Janów）；差不多同一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汇入芬兰湾的河流的探索越来越多，在靠近拉多加湖（Lake Ladoga）的沃尔霍夫河（River Volkhov）河畔建立了永久定居点（尽管规模不大）。我们可以通过年轮学来确定定居的年代：用在最早房屋上的木材是737年砍伐的。[20]

从后来的历史证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方森林中做了什么。在布尔加尔这个贸易中心，从南方来的穆斯林商人与罗斯商人会面，罗斯商人卖的主要是奴隶和皮草，还有琥珀、蜂蜜和蜡。10世纪，这些商品也出现在与拜占庭的交易中，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应该是在那之前先到了波罗的海的南面和东面，以收集北方森林的这些出产。除了奴隶贸易外，这是古代世界中又一个长距离贸易（尽管成本高昂且运输困难）带来高收益的经典例子。斯堪的纳维亚人从一个生态区（亚北极区北部）获取货物，然后高价出售到另一个地区——在严寒的亚北极区，动物有厚厚的毛皮，品质很高，而南方的气候温暖，那里的动物就长不出这样的毛皮。

这些8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是如何获得他们贩卖的商品的，目前尚无严格意义上同时代的证据，但后期的证据给出了重要的线索。当然，奴隶贸易是强制进行的，奴隶通常不会自愿提供服务。文字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阿拉伯地理学家称，罗斯人经常攻击波罗的海东部一带讲波罗的语的普鲁士部落，实力较弱的东斯拉夫人则总是畏惧实力较强的西斯拉夫邻居。[21]阿拉伯银币只出现在维斯瓦河以西的西斯拉夫人中间，更往东的地方就没有了，这说明东斯拉夫人的畏惧与奴隶贸易密切相关。在罗斯人和西斯拉夫人活动的地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白区域（地图20）。阿拉伯奴隶市场上那些不幸的受害者应该大多来自这个区域。

其他货物也有可能是强制取得的。在谈及毛皮交易的资料中，北方森林出产、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出售的毛皮常常被称为“贡品”。这个词有强制的意味，也得到了一些证实。与此有关的一桩逸事见于9世纪的《圣安斯卡生平》（*Life of St Anskar*，圣安斯卡是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教传教

士）。书中写到瑞典人袭击波罗的海南部的科斯人（Curs），因为后者不愿缴纳之前说好的贡品。而从有记录的时候开始，俄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就要求其政治轨道内的斯拉夫群体进贡。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也有要求纳贡的情况。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宫廷里，创作出了一本讲述奥罗修斯（Orosius）生平的书（也可能是他亲自写的），盎格鲁-撒克逊译本的附录写到了国王与一位名叫奥塔尔（Ottar或Othere）的挪威商人的对话。奥塔尔经常和同伴一起向北航行到挪威西海岸，从北极圈内的拉普兰人（Laplanders）那里取得毛皮、羽毛、鲸骨，以及用海豹皮和鲸皮制成的船用绳索。奥塔尔活动的范围是挪威北部而不是俄罗斯北部，但有充分的理由推测，俄罗斯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是不会介意用强力来说服人的。[22]

但是，这些证据并不能说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都是靠强力来与本地生产者建立关系的。即使是奥塔尔，他卖的一些东西也是自己弄来的。他告诉阿尔弗雷德国王，自己和5个朋友在两天内杀死了60条鲸鱼。一般来说（对奥塔尔也一样），在取得货物时，小群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人数多得多的本地居民中行动，而本地人口才是贸易过程的中心。例如，诱捕对技能的要求很高，需要对当地的兽群有充分的了解，而外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只是偶尔到访，无法在当地高效获取动物皮毛，因此诱捕应该基本是由当地居民完成的。[23]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10世纪。《帝国治理论》比较详细地描述了罗斯商人如何在冬季巡行于臣属的斯拉夫人之中，获取来年可以贩卖的商品。实际上，使俄罗斯森林的不同区域（每个区域各自生产贸易品）接入围绕俄罗斯河道网建立的更大交易系统的，是规模较小、彼此相对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群体。这在当时穆斯林对北方国王和商人的记述中有所体现。据记载，北方国王从独立商人的贸易活动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在伊本·法德兰笔下，一些商人会向商业之神献祭，然后说出合适的祷词：

> “愿您眷顾我，为我带来一位钱袋充盈的商人，他们将从我这里买走我想卖的一切，而且不会与我发生争执。”……如果（商人）的货卖不出去，延长了逗留时间，那么他第二次和第三次来献祭的时候时就会再带一份祭品。[24]

商人们可能成群而来，但各卖各的东西。这充分体现在罗斯人10世纪与拜占庭谈判达成的贸易条约中。这些文件表明，尽管基辅大公拥有最高权力，但地位低一些的斯堪的纳维亚诸侯也经营着河道网各处的其他中心。这些人有自己的谈判代表，最后达成的条约中会单独列出他们的名字。[25]

在森林地区活动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结成的群体规模较小，彼此基本独立，如果他们与本地人口的关系很糟，就会非常容易受到攻击。有鉴于此，成堆的阿拉伯银币（这是贸易活动的成果）广泛分布于俄罗斯森林地区（地图20）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可能表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从贸易所得中拿出了一部分，送给斯拉夫生产者和其他本地生产者，用钱财与后者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斯拉夫人也有其他办法从贸易网络中获利。例如，《帝国治理论》告诉我们，罗斯人沿第聂伯河而下，渡过黑海，将货物运往君士坦丁堡，所用的船只是从克里维奇人和伦萨内内斯人（Lenzanenes）那里买来的，这两个斯拉夫群体在冬天造船。[26]也就是说，斯拉夫人提供的适合在河道中航行的船只并不是强征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斯拉夫人之间也不完全是约束和被约束的关系。应该说，开发北部森林的斯堪的纳维亚群体有点像一批小公司，通过谈判和/或强制获得对各自商品产地的一些权利。当地人主要负责供货；斯堪的纳维亚人负责组织、运输，他们也知道该怎么把这些货物卖到遥远的市场并带着可观的利润返回。这种观点强调，在地方层面上发展出了共生的关系，比起从前没什么结果的诺曼之争，已经前进了一大步。9—10世纪的情况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抗斯拉夫人，而是一批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相互竞争。各个贸易团体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当地居民（不管是芬兰人、波罗的海人还是斯拉夫人）组成，在同样的市场上销售同样的产品。

北方的国王

从旧拉多加（Staraya Ladoga）获取的物品，一开始是要卖到西方去的。这个定居点建立之时，正是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多的时候，但俄罗斯北部和伊斯兰世界产生接触还要等到很久以后。那时，从拉多加湖一带获取的毛皮和其他产品被运往西方，卖给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精英们。8世纪中叶正是加洛林家族及其支持者崛起的时候，许多皮草肯定是为了这个市场而收集的。但不久之后，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冒险家就意识到了东欧地理的一个关键。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一些河流向北流入波罗的海，另一些则向南流入黑海和里海。而且，整个地区非常平坦，不管是向南流还是向北流的河，其源头都非常接近。从拉多加湖向南沿沃尔霍夫河而下，就能发现新的好机会。这里有众多的支流（特别是自西向东流的奥卡河），仔细探察后，可以借助滚木将船从一个河道网拖拉到另一个河道网，这样一来，就能通过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这两条主要航线进入黑海和里海了。

两条航线中，最吸引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是伏尔加河，尽管基辅的和拜占庭的文字资料对第聂伯河这条航线的描述要多得多，基辅最终也是在这条航线上建立起来的。第聂伯河中游沿岸遗址中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年代都不早于9世纪末；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那之前很久，伏尔加河航线

就已经开通了。证据就是罗斯商人卖出商品后获得的阿拉伯银币。在俄罗斯西北部和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已经发现了数千枚这样的银币。就定年而言，银币窖藏比零星发现的银币更为重要。通过窖藏中年代最晚的银币，可以推测出这批银币于何时存放；而在窖藏丰富的地方，银币发行和存放之间的时间间隔很有可能并不太长。俄罗斯西北部森林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银币窖藏中，年代最晚的银币是在787年铸造的。考虑到银币从铸造到存放要经过一段时间，该窖藏应该是在800年前后的某个时间存放下来的，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也发现了年代相近的窖藏。阿拉伯银币最晚在800年的时候就流通到了北方，也许还要稍早一些，而不管怎么说，都是在第聂伯河航线开通的一两代人以前。[27]

这完全说得通。伏尔加河航线直接通往里海和哈里发治下经济发达的世界，当时的哈里发国以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为基地。从大西洋延伸到印度的庞大帝国的税收汇入巴格达，供极为奢华的宫廷消费。对奢侈品商人而言，这里才是真正的需求中心。此外，人们对于伏尔加河航线南部的情况已经相当清楚了，因为哈扎尔人早就在北至伏尔加河中游的地区做起了毛皮生意。相比之下，第聂伯河航线要难走得多，路上会遇到一些特别湍急的急流，必须将船抬起来绕过急流，再驶入克里米亚附近的黑海——而不是里海。走这条线的人还是可以通过向东航行到达伊斯兰世界，但就要曲折一些了，更直接的贸易路线是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比起在查士丁尼治下的辉煌岁月，此时的拜占庭已势力衰微，令人唏嘘。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和宫廷贵胄要富有得多，更有能力购买斯堪的纳维亚人贩卖的奢侈品。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是不是会定期到访里海那么往南的地方，我们很难考证。有些人应该是这么做了，但路途遥远，可能还要借助一系列的中间人。至少在8世纪下半叶，这么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数量还是很有限。除旧拉多加外，至今为止，俄罗斯西北部只有一个遗址出土了年代在公元800年左右的银币和斯堪的纳维亚遗存，那就是萨斯基堡（Sarskoe Gorodishche或Sarski Fort）。[28]

由于没有叙事资料，我们无法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全貌，但斯堪的纳维亚与东方关系的发展轨迹，可能类似于我们在西方看到的那种模式。一个体现是，9世纪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阿拉伯银币，其数量有缓慢但可见的增加。在9世纪的进程中，北方有越来越多的冒险者（或是自己直接售卖，或是通过中间人）将北方的商品通过水路卖到伊斯兰世界。从理论上讲，即使没有更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迁居到波罗的海以南，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但保留下来的证据足以表明他们确实到那里定居了。

前文提过，839年，一些瑞典维京人来到了加洛林皇帝虔诚者路易的宫廷。他们从君士坦丁堡而来，一路上遭遇了强悍的部落，希望找一条更安

全的返乡之路。如果他们来的时候沿第聂伯河而下（的确有可能），就会遇到急流，不得不把船抬过去，当地的居民应该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发起伏击的好机会。972年，罗斯后期的一位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就是在此地丧命的——还被割去了头颅（游牧的佩切涅格人把他的头颅做成了饮器）。[29]使者们向皇帝报告说，他们已经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统治者，称为可汗，他们此行正式作为可汗的代表，试图与君士坦丁堡建立友好关系。这里说罗斯人早在839年就有了可汗，有些可疑，但至少说明俄罗斯森林中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发展出了某种政治组织。不过，东方的政治发展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西方一样，并非一帆风顺；在西方，赫布里底群岛和爱尔兰的维京人形成了一些政治结构，但随着850年左右一批更强大的“国王”的到来，原本的政治结构就被淹没了。

可能是在860年，来自俄罗斯某地的维京人首次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攻击。200艘船驶过黑海，劫掠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郊。拜占庭人将幸存归因于圣母玛利亚的代求，而不管相关数据的可信度如何，这显然都是一次重大袭击。[30]随后，人们做了很多外交努力，以阻止进一步的入侵，其中包括派遣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俄罗斯森林。但867年拜占庭宗主教宣称取得最初成功之后，传教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之后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再没有听说与北方有进一步的外交接触。可见传教团被派去接触的政治势力本身没能长期存在——后文会谈到，维京时代的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君主政权都是如此。还有其他明显的迹象表明出现了麻烦。差不多同一时间，拉多加湖的定居点遭到烧毁。年轮学证据表明，这场灾难可能发生在863年至871年之间。灾难是人为的，是故意造成的。原本的定居点由彼此不相连的木屋组成，这些屋子全部被同时摧毁了。意外的火灾是不可能蔓延得这么快的。同一时期，一位波斯历史学家记载，罗斯人袭击了里海东南岸的阿巴斯科斯（Abaskos）港，但该事件发生的年代只能估计到约864年至883年这个范围。[31]

在没有更好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这幅拼图很难拼好。但是，从旧拉多加的大火，以及对阿巴斯科斯和君士坦丁堡的袭击来看，斯堪的纳维亚的新势力已经进入了竞技场，非常凑巧的是，就在那个时候，西方迎来了国王们，大军也开始形成。因此我认为，俄罗斯北部航道发生动荡的同时，足以攻击君士坦丁堡的势力突然出现，这很可能说明组织程度更高、规模可能更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军队入侵了维京人在东方和西方的活动区域。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实力更强的新势力肯定都想接管已有的敛财活动并加以拓展。9世纪东西方维京时代的发展使我想起了禁酒令时代的芝加哥。一开始是小团体通过走私和贩卖私酒来赚点小钱，然后，更有组织的帮派成立了，帮派视情况需要，会要求分享利润或压制竞争对手。财富的积聚和流动一旦开始，已经具备实力的势力就会介入，要求控制财富，从中分一杯羹：按照伊本·法德兰的说法，不多不少，拿走10%。

在罗斯，另一个因素加剧了竞争。从钱币窖藏来判断，在约870年到900年之间，阿拉伯银币流向北方的速度显著下降。实际上，银币流入放缓的时期，哈里发国的内部政治正陷入混乱，861年到870年是“萨迈拉混乱期”；银币流入放缓，可能就是因为贸易中的需求方遇到了麻烦。这种程度的危机必然对哈里发宫廷的奢侈品需求产生不利影响，也会加剧俄罗斯北部斯堪的纳维亚不同皮草及奴隶供应商群体间的竞争。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争夺北方奢侈品贸易仅存部分的主导权而进行的斗争，进而解释了拜占庭外交探员为何一无所获。但最后，伊斯兰世界和北方都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关于这个过程，虽然一直缺乏叙事资料，但我们可以通过间接的证据有所了解。[32]

应该是在10世纪初，旧拉多加最终得以重建，这次用的是石头。在一系列北部遗址中也发现了可追溯到约90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相关遗址位于戈罗季谢［Gorodishche，以前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蒂莫雷沃（Timerevo）、米哈伊洛夫斯科耶（Mikhailovskoe）、彼得罗夫斯科耶（Petrovskoe）、普斯科夫（Pskov）、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穆罗姆（Murom）。这些定居点交通便利，离沿伏尔加河而下的主要贸易路线很近，居民可以从中获利（地图20）。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数量超过了9世纪的任何遗址。遗存包括了妇女的珠宝，这表明当时至少有一些地方居住着混合移民群体，而不是只有武装起来的北欧男性。

斯堪的纳维亚人再次涌入的同时，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白银也重新流入。从约900年开始，流入的白银数量空前。根据现有的窖藏证据，在约750年至1030年（此时白银供应量几乎减少到零）之间流入俄罗斯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所有伊斯兰世界的白银中，大约80%是在900年后流入的，而且来自一条不同的路线。我们先说10世纪20年代，当时伏尔加保加尔人已经控制住了伏尔加河中游，改信了伊斯兰教。穆斯林旅行者的报告显示，这个时候，斯堪的纳维亚的罗斯人基本不再与伊斯兰世界进行直接贸易。大部分交易是在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地盘上进行的，穆斯林商人和维京商人在那里见面、做生意。这体现在10世纪钱币的起源上。8—9世纪的钱币大多在从前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如今的伊拉克和伊朗）铸造，但10世纪流通的硬币来自更东边的地方，主要由新近统治东伊朗的萨曼王朝（Samanid）铸造。此时，由萨曼王朝控制的呼罗珊（Khurasan）银矿产量达到巅峰，每年的银矿产量在120～150吨，或者说是数目惊人的4 000万～4 500万枚硬币。于是，萨曼王朝的领土自然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想要卖东西（或者卖人）的人，也有现成的贸易路线从那里向东直达伏尔加河中游。这是一个巨大的新市场，通往那里的路线也便利得多，数量空前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受此吸引，来到了俄罗斯森林。[33]

在此背景下，穆斯林旅行者见到的那位岛上的罗斯国王崛起了。从我们对这位国王的了解以及他掌控的结构看，他应该是“头领中的头领”（capo di capi）。他从其他所有人的商业活动中抽头10%，建立了一支永久武装（据估计有400人）来执行他的命令。如果《往年纪事》没说错，那么此类国王中的第一个应该是留里克（留里克王朝的建立者），但我们并不能确定。无论他是谁，都基本可以确定他住在戈罗季谢。斯堪的纳维亚人从9世纪后期开始占领此地，而正如穆斯林旅行者所描述的，国王住在岛上，岛屿位于战略要地，在沃尔霍夫河从伊尔门湖流出的地方（地图20）。与同时代的其他斯堪的纳维亚遗址不同，岛上建了防御用的围墙，可见它很可能是权力中心。凡不听从由此地发出的命令的人，都将遭遇沃尔霍夫河畔旧拉多加的居民那样的命运——9世纪60年代，旧拉多加的房屋遭遇了相当严重的事故。毫无疑问，大火来临之前，其中一些人收到了威胁警告。[34]

然而，这种政治结构很不稳定，尽管有很多财富流入，但10世纪初的俄罗斯北部绝非和平繁荣之地。当时，奴隶贸易是个重要的生意，其本质就是暴力蛮横的。贩奴者武装袭击潜在的受害者，把俘虏运往市场，一路上残酷对待他们。他们在想攫取战利品或得到更好的贸易条件的时候，也会发动武装袭击。例如，与拜占庭达成的两项贸易条约都是炫耀武力的结果，他们用武力迫使皇帝及其顾问给出更好的贸易条件。伊斯兰世界的记载也提到，912年，里海遭遇了一次大规模袭击。北方世界的内部也不太平。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定居的商人们来自许多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群体，而不是共同服从于一股将他们组织起来的权威势力。我敢打赌，至少在一开始，商人上交10%的利润给北方国王肯定不是自愿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头领肯定会遇到新的对手。

看起来，戈罗季谢的国王在北方取得了成功。但就在穆斯林旅行者写下相关记载的时候，南边第聂伯河天然渡口处的基辅出现了另一股斯堪的纳维亚势力，推翻了他治下的政治结构。根据《往年纪事》的说法，最早来到基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阿斯科尔德（Askold）和迪尔（Dir），他们是留里克的追随者，在留里克的许可之下离开诺夫哥罗德（戈罗季谢），前往君士坦丁堡。途经基辅的时候，他们决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领地，后来他们就是从基辅用200艘船向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的。《往年纪事》将他们抵达基辅的时间定在862年，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时间定在863—866年。大约20年后，留里克的继任者奥列格（Oleg）率军南进，奥列格是留里克的“亲属”，以留里克的小儿子伊戈尔（Igor）的名义统治。他率领的混合部队由斯堪的纳维亚人、芬兰人和斯拉夫人组成。阿斯科尔德和迪尔上当后被杀。奥列格建起一个防御要塞，向周围的斯拉夫部落索取贡品。奥列格统一了北方和南方，罗斯王国诞生了。据说，这些事件发生在880—882年。

这个故事的梗概听起来颇有道理。基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西部活动的第二中心，后来成了第一中心。它是第聂伯河沿岸后来发现斯堪的纳维亚遗存的地点之一，但遗存的年代在约900年以后。第聂伯河下游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位于格涅兹多沃（Gnezdovo）的定居点，这个定居点控制了从伊尔门湖到第聂伯河上游的通道，使维京人从拉多加地区北部向南进入黑海成为可能。斯堪的纳维亚人直到9世纪末才在格涅兹多沃定居，然后才定居到了基辅和其他一些地区，比如舍斯托维斯基亚（Shestovitskia）和戈罗季谢，它们都离雅罗斯拉夫尔不远，雅罗斯拉夫尔也出土了大约同一时期的说明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存在的考古证据。历史资料中还提到，柳别奇（Liubech）和切尔尼戈夫（Chernigov）等地也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显然，从约900年开始，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就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了，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表明来到此地的维京人比北方的少，北方约900年及之后的相关遗存要丰富得多。[35]《往年纪事》中大致的年代可能是对的，但故事的其他方面就没那么可信了。

《往年纪事》中的具体日期只不过是后人为了理解口述资料而试着加进去的，根本靠不住。前面提到的袭击君士坦丁堡，袭击的日期直接得自修士乔治的拜占庭编年史，但资料并没有提到发动袭击的维京首领的名字。在编纂《往年纪事》的某个阶段，有人把拜占庭资料所记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与对阿斯科尔德和迪尔的攻击当成了一回事，并据此确定其余事件的日期。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在基辅进行的大规模发掘（波多尔发掘）并未发现早于88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因此，拜占庭资料记载的9世纪60年代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可能是从北方发起的。

《往年纪事》中的叙事还有其他的问题。编纂者显然弄不清奥列格和留里克的关系。在基辅的主要传统中，他被描述为留里克的亲戚，而在北方的传统中，在可能源自诺夫哥罗德的一个编年史版本中，他是留里克手下的一个司令官，和留里克没有亲戚关系。阿斯科尔德和迪尔出发前往南方，还得先获得留里克的许可，这也不可信。[36]我们知道，在9世纪和10世纪初，罗斯大公不过是同侪之首（primus inter pares），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扩张是由一系列独立的群体推动的，"头领"提出抽头是后来的事。没有理由认为向基辅的扩张会采取不同形式（不论去基辅的是谁）。也许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最终主导维京罗斯的是南方的基辅，而不是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基辅原本是次要的中心，建立得比较晚，而且位置还在拜占庭/第聂伯河这条穷得多的贸易线上，定居在此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不多。不过，这是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是来分析东西方维京人大迁移的移民潮吧。

移民潮

规模问题引发了维京研究中的一场著名争论。过去，人们往往从“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这种传统视角来看待维京时代。据说，迫于资源短缺，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加入了迁徙，空前暴力的迁徙洪流淹没了西欧。老课本里收录了著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祷词“仁慈的主，救我们脱离北方人的愤怒”，学术性强一些的读物里也有类似的内容。一本845年左右在爱尔兰抄写的拉丁文语法教科书后来被带到了欧洲大陆上的圣加尔（St Gall）修道院。在这本书的页边处，抄写员用古爱尔兰文写下了这首令人回味的短诗：

今夜的狂风

激起白浪千丈。

肆虐在爱尔兰海域上的维京蛮族啊，

我可不怕你们！[37]

20世纪60年代，当时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维京历史学家彼得·索耶（Peter Sawyer）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激烈的反驳。他认为，传统观点严重夸大了维京部队的规模。写下流传至今的讲述维京人暴力行为的历史作品的大多是教会人士，有的还是修士，而我们已经知道，教堂和修道院财物丰富，容易得手，是维京掠夺者的目标。因此他认为，这些历史资料原本就倾向于突出维京人的暴力，而黑暗时代总的来说是相当暴力的。在这个时期，也许唯一的新鲜事是不信基督教的维京人袭击基督教的宗教场所时更放肆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修道院里的编年史家忽略了维京人活动的其他重要方面也就是贸易之类比较不暴力或根本不暴力的活动，他们也大大高估了维京人的数量。在他看来，更具体的证据表明部队规模较小：看看在波特兰参与第一次劫掠的3艘船就知道了，船上可能只有90或100人。索耶还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妇女和儿童参与其中。维京人的活动不是由“全体”移民进行，而是由战队进行，而战队中军人的数量最多也就是几百人。[38]

这种说法做出了必要的纠正，人们也普遍接受，这种对9世纪维京人早期活动的论述是合理的。排除一些例外情况后，参与维京时期活动的主要是战队中的男性这一说法似乎也很有道理。但9世纪30年代之后，维京人在西方的活动越来越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比索耶最初设想的更大的力量开始参与行动。例如，《爱尔兰编年史》中记载，9世纪30年代，各有60艘船的两支维京舰队同时出现在爱尔兰水域。1880年在挪威韦斯特福尔（Vestfold）出土的9世纪的科克斯塔德号（Gokstad）十分漂亮，现于奥斯陆展出。它可以搭载30人，再多几个也没问题。以每艘船30多人

计，一支舰队就有1 000多人。这一总体数量级也符合同一资料中记录的一些可信的具体伤亡数据。848年，在不同爱尔兰国王与不同维京部队的3次交战中，维京人分别损失了700人、1 200人和500人。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船队从大约850年起袭击西方水域，当时爱尔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资料都非常一致地描述，这些国王率领的船队有100到200艘船。这意味着武装部队中有数千人。[39]

大军时期的证据也体现了这种情况。大军是混合部队，每支大军中都有几名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和他们的追随者，有时还会有一些在独立伯爵领导下的战士。第一支大军于866—867年冬在东盎格利亚集结，其中可能就有伊瓦尔和奥拉夫的部队——863年至871年间他们没有出现在爱尔兰水域［伊瓦尔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英格瓦”（Ingvar）］——以及在那之前已骚扰塞纳河法兰克世界近10年的维京人。欧洲大陆的资料表明，维京人的暴力活动在866年至880年间出现中断，这与大军在英格兰行动的第一阶段相对应，而秃头查理在塞纳河沿岸建造了设防的桥梁，使得维京人很难向内陆渗透，也可能促使他们离开法兰克水域。除伊瓦尔外，《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还提到了另外两名国王，希夫丹（可能是伊瓦尔和奥拉夫的三弟）和巴格塞格（Bagsecg），以及5名伯爵［两个叫西德罗克（Sidroc），分别是大西德罗克和小西德罗克；还有奥斯伯恩（Osberan）、弗雷纳（Fraena）和哈拉尔（Harold）］。这些国王和伯爵各自领导联军中的独立部队。875年，又有3名国王［古斯鲁姆、奥斯塞特尔（Oscetel）和安温德（Anwend）］加入。加起来，有11支维京部队在英格兰集结。几年后，更多的维京人抵达，于879—880年在富勒姆过冬。后来的大军也是多方联合而成的。

组成大军的不同部队并不总是一致行动。各个部队会视机会决定去留。但是5位国王和至少5位伯爵的部队，加上其他部队，显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战士群体。878年，希夫丹在德文郡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840名追随者（另一版本说是860名），可见这名国王率领的部队可能有1 000名士兵。《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还记载，这支部队由23艘船运载，每艘船大约载有36名人员，与科克斯塔德号的运载能力吻合。我们估计，大军中各个主要部队的人数在数百到一千，这与9世纪30年代袭击加剧后在爱尔兰行动的部队的规模也相符。如果这么推论正确，那么一支大军（每支大军都由6个或更多这样的部队组成）能集结的战士就有好几千名，可能最多不超过1万名。这种规模的军队足以征服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40]而且，这样的军队还有好几支。史料记载，两支大军分别在865—878年和892—896年进攻了英格兰。另外两支规模相近的军队在9世纪80年代进攻了欧洲大陆的北部海岸；还有一些部队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活动，在9世纪的最后10年和10世纪的前20年间往返于爱尔兰和欧洲大陆之间。即便把不同部队中人员重叠的情况考虑在内，参与行动的战士加起来也至少有

2万人。

这与维京移民的规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英格兰东部和法兰克北部，正是大军将胜利变成了定居。无论最初是不是有这样的动机，第一支大军都击溃了9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4个独立王国中的3个，将这些王国的大部分土地资源重新分配给了大军的成员。9世纪70年代建立最初的定居点后，后来的大军又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定居者。其中一批定居者的涌入有明确的记载，是在896年；应该还有其他的定居潮。前文提过，在欧洲大陆，大军的进一步活动最终使维京人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定居，其中一个定居点是获得许可后设立的，另一个则不是。我们无从得知参与大军行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中有多大的比例最终在西方定居下来，只知道众多定居点的人数加起来可能有1万多人，即便考虑到某些人肯定更愿意带着财富返回波罗的海地区。相关地区的总人口至少有数十万，有鉴于此，定居的人数是可观的，但还没有到庞大的地步。[41]

但是，大军的定居点形式很特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在896年的记录很有启发性，其中讲到了进攻英格兰的第二支大军解体的情况：“这一年，军队分散到各处，有的去了东盎格利亚，有的去了诺森布里亚，没有财富的人在那里弄到了船，然后向南跨海航行到塞纳河。”记载中还是有让人困惑的地方。这里提到财富，意思是不是维京人得在丹麦律法区花钱买地产，而不是夺取就够了？我对此深表怀疑，但不管怎么说，这条记录充分体现了加入大军、积累财富和后来的定居之间的联系。维京人远离家乡，经历种种危险去跨海作战，可不是为了成为身无分文的农民定居下来。对那些想在西方定居的人来说，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源，让自己在理想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立足。如果他们只想当农民，就没必要打仗了，因为盎格鲁-撒克逊地主一直都在寻找劳动力。[42]

丹麦律法区内林肯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提供了详细的证据，从相关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军中的一支部队是如何通过土地分配定居下来的。林肯郡是丹麦律法区核心地带的5个行政区之一，行使某种独立的政治权力；878年以后，丹麦律法区中有了一些国王，但并不存在整个丹麦律法区的国王。林肯郡的中心也许有一些维京人定居点，定居点在9—10世纪肯定也有很大扩张。在城镇之外，维京人的定居似乎有两种形式。一些较大的庄园被维京领袖整个占领。这种定居点的地名往往采用混合形式，比如著名的格里姆斯顿（Grimston），由一个北欧人名（Grim-）加上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表示定居点的后缀（-ton）构成，丹麦律法区中最好的土地基本是以这种方式命名的。另一种定居形式是将原本的庄园拆散，分给地位较低但仍是自由人的维京人当作个人财产。这种情况的证据是，北欧地名的分布（以-by和-thorp结尾，经常与北欧人名结合使用）与地位特别高但地产较少的佃农——称为“索克曼”（sokemen）

——的分布是重合的。索克曼的分布情况记录在林肯郡被并入10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后的官方文件中。这些索克曼似乎也将源自北欧的日常金属制品的装饰品味保留到了10世纪。

如果林肯郡不是孤例（应该不是），那么大军中的部队在登陆后似乎保留了一些原本的社会形态，因为在维京领袖的组织下定居下来的人，都已经攫取了足以满足野心的战利品，找到了一小块地产安顿下来（像诺曼人那样）。那些还做不到如此的人大概只能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去寻找新的领导者。定居点中的全部地产都是从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没收来的。有些地产原本属于世俗地主，他们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但丹麦律法区中原本的盎格鲁-撒克逊地主似乎并没有被完全消灭），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许多地产是从教会机构那里夺走的——9世纪时，教会可能已握有英格兰四分之一的土地资源。[43]

如果林肯郡是一般规则的具体例子，那么丹麦律法区和法兰克北部的情况就可能是下面说的那样。基本的迁徙单元并不是大军，而是大军中的单支部队，差不多1 000人，国王领导下的部队人数多一些，伯爵领导下的则少一些，部队的领袖将土地分配给准备定居的人。谁有资格得到土地、得到多少，这样的事项可能在组成大军时的谈判中就已经定下来了。这些定居点的形式有点像5世纪原罗马欧洲行省中的一些日耳曼人定居点，属于部分精英替代的情况，但是，建立那些名字带着-by和-thorp后缀的定居点的索克曼可能只是拥有小块地产的精英，社会地位比罗马故地上的定居者要低。我们这么认为的理由是，根据《土地调查清册》中的记录，他们活到了1066年的后代的资产规模都很小，而且，与后罗马时代的西方相比，这些人给当地带来了语言等方面的更大的文化改变。

显然，斯堪的纳维亚语至少在丹麦律法区北部成了主流语言，而日耳曼语却基本没能取代拉丁语及其方言，只有多少完成了精英替代过程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例外。有人提出，要解释语言变化和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地名，有必要设想在大军的各支部队定居后，还有文献中没有记录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前来定居。但这似乎没有必要。分配土地时要顾到至少1万名维京人，甚至可能还要多得多，这足以在地方层面上形成由北欧人主导的地主阶级，带来相应的文化变化。相比之下，诺曼征服后分配土地时，需要考虑的只是约5 000名新地主，而且是在整个英格兰（而不是一部分）分配。因此，比起后来的诺曼人，新的北欧统治阶级无疑与被他们当作劳动力的盎格鲁-撒克逊农民更紧密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除了大军中的部队，向西方迁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不少。在爱尔兰的定居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斯堪的纳维亚人从未成功（也许从未试图）破坏那里各个王国的连贯性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资产。那里只有零星的定居点，位于一些沿海城镇，其中最重要的是都柏林。定居点都相当

大，经济状况也很不错。10世纪爱尔兰重新崛起后，国王们相互竞争，争夺都柏林有价值的雇佣军和货币资产。而尽管那里的移民单元也必然是有组织的战队，但爱尔兰的斯堪的纳维亚永久定居点最多只能容纳数千人。[44]

在北方和西方岛屿以及苏格兰北部和西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方式更像丹麦律法区。也就是说，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入侵的人口控制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地产。文献中没有记载来了多少人，也没有记述定居过程，但定居的影响体现在了地名证据中。在设得兰群岛和奥克尼群岛这样的北方岛屿，斯堪的纳维亚时期以前的地名都没有保留下来；维京时代定居点的文化影响抹去了之前所有命名活动的痕迹。在西部岛屿和苏格兰本土受影响的地区，从前的地名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而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分布得非常密集。9世纪的定居规模要有多大，才能达成如此惊人的结果？

首次评估地名证据时，研究人员认为，从前一次次命名的痕迹都消失了，说明原本住在那里的人口（可能是讲凯尔特语的人）已被彻底消灭——这是发生在中世纪早期的种族清洗。但是，近来对地名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在现代的分布，体现的是许多个世纪以来北欧人对相关地区的统治，而不是北欧人某一次破坏性占领的结果。北欧人的定居点显然规模可观，而要造成这样的地名改变，占统治地位的北欧人肯定得完全接管土地，他们侵入当地社会的程度至少与丹麦律法区的索克曼达到的差不多。但这并不需要种族清洗，如最近的一些考古学证据所示。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式房屋取代了早期皮克特式房屋的地方，比如巴克奎（Buckquoy），仔细的发掘工作也表明，本地人制造的许多小件物品仍在流通。可见北欧定居者与本地人口住在一起，尽管后者臣服于前者。[45]

人们一直认为，原本住在那里的当地人口在西部群岛和苏格兰本土延续了下去，因为这些地方的地名体现了不同文化的混合。更重要的是，《爱尔兰编年史》从9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条目记录了加罗葛迪尔人（Gallgoidil，“斯堪的纳维亚化的爱尔兰人”）的活动。这些神秘人物得到了很多讨论，“加洛韦”（Galloway）这个地名似乎得自他们的名称，一般认为，他们在赫布里底群岛活动，是那些很快与前来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达成协议的凯尔特人。[46]这些地区现代人口的DNA模式证明了这一点。设得兰群岛的现代人口中，40%具有可以体现他们是北欧人后裔的基因型。在奥克尼群岛，这一比例为35%，在苏格兰和西部群岛大约为10%。[47]我们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例子中看到，将现代DNA模式看成定居开始阶段留存下来的化石是很危险的。从开始定居到现代，其间有太多事件都可能使某一种基因比其他传播得更广。但这一证据确实表明，尽管有大量斯堪的纳维亚人涌入，但我们先前以为的那种全面种族清洗当时并未发生。关于来到这些地区的移民单元的类型，更精确的证据来自斯堪的

纳维亚人在西方定居的最后地区——北大西洋。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法罗群岛上的定居完全没有记载，但既然他们从9世纪70年代开始在冰岛地区定居，而法罗群岛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那么在法罗群岛的定居大概最晚到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至于冰岛的情况，相关的信息就比较多了。和其他地方的维京人社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2世纪初开始，定居在冰岛的北欧人就写下了自己的历史，似乎主要是记录对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大约在1100年，冰岛的北欧人写道，最早来这里定居的是400名主要的移民，他们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个大型农庄，当时统治冰岛的就是这些农庄。这400个农庄并不仅仅是农场而已，围绕它们形成了更大的农业活动网络。据估计，当时实际上有超过4 000个规模不等的农场。每个农场养活一个家庭和一些依附者，由此可以推算出1100年左右冰岛的人口应该有小几万。冰岛的文献也多少体现了建立定居点的移民单元类型。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或者实际上是从不列颠群岛——许多定居者行程的中间点）到冰岛的花费高到让人望而却步。主要的定居者似乎都是有钱人，有能力制造或租用不可或缺的船只来运送建立农场所需的人员和设备。穷人要么根本不参加，要么不得不投靠某个大人物。看起来，这里的移民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渐渐流入的，而不像英格兰和法兰克发生的那样，大军中的一支部队在某个明确的时间点定居下来。在贵族率领下前往冰岛的船队究竟有多少船，并没有留下记载，不过，后来前往格陵兰岛的一个类似船队中有25艘船，但有13艘最终未能抵达。[48]

当然，那时的冰岛是没有本地人口需要征服的，因此定居者可以安全地分批进入，而不像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那样，得靠规模更大的大军部队才能建立政治上的生存空间。北部和西部诸岛可能也是如此。如前文所述，那里的本地地主肯定是被征服了的，但在维京人到来之前，当地政治结构似乎只发展到局部的小规模水平，要赢得主要战争并不需要大型的北欧部队。因此，一个或一小群贵族加上随从，很可能就足以拿下一小块领地。当然，由于没有直接的叙事证据，这么说还是有很大的假设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更大的政治结构——奥克尼伯爵国（Earldom of Orkney）——直到9世纪末才在北部和西部诸岛中的北欧人中出现，那时离最初的定居已经过去了很久。伯爵国的出现促使一些北欧人为了重获独立而前往冰岛。这两点都佐证了以下论点：后来前往冰岛和格陵兰的移民潮，类似于与9世纪初在西部和北部诸岛建立起最初的北欧人统治的移民潮。

尽管证据尚有很多缺失，但对于9世纪和10世纪初向西方迁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显然，不同环境下有两种不同的移民单元。如果需要征服大型本地政治实体才能实现定居，那么典型的移民单元就是1 000人左右的大型战队。需要对付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之类的大

目标时，战队也能联合起来。在不需要面对本地人反抗或本地社会政治单元规模较小的地方，贵族领导下规模较小的移民单元就足以取得统治权。不同的移民潮加起来，移民的总人数是很多的。通过大军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行动，远超过1万名（也许能到2万名）北欧战士定居了下来。另有数千人定居在爱尔兰，向北迁移，分布在不列颠北部和大西洋诸岛上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可能还要更多。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这些带着武器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的男人，有多少是带着家眷的？如果一个成年男子有4到5名家属（这是约定俗成的计算方法），那么在移民总人数的估算方面，计入家属前可能是几万人，计入家属后则可能超过10万人。我们掌握的关于大军的信息很少，但多少还是有一点。9世纪90年代第二支进攻英格兰的大军中，一支部队发动进攻前将妇女儿童留在了丹麦律法区，以确保他们的安全。目前尚不清楚军队中带家属的人占多大比例，也不清楚家属来自何处。他们是从斯堪的那维亚来的，还是在军队行进的途中成为随军家属的？

对于最后这个问题，近来对现代冰岛人DNA的研究工作有一些发现。自维京时代以来，冰岛从未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出或流入，因此现代DNA模式更有可能反映最初定居者的DNA模式。这项工作研究了仅通过父系传播的Y染色体和仅通过母系传播的线粒体DNA，发现了很值得注意的反差。在男性人口中，75%的Y染色体可以追溯到斯堪的纳维亚人，而只有25%可能起源于不列颠群岛。线粒体DNA的证据却截然不同。现代冰岛人口中有36%是斯堪的纳维亚女性的后代，而62%的人则具有表明祖先为不列颠群岛女性的DNA。因此，女性定居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大概有1/3），但也有大约2/3是维京男性在迁徙途中接上的。

对法罗群岛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但在维京苏格兰和北部、西部诸岛，模式又有不同。在这些地区，现代人口中斯堪的纳维亚男性和女性DNA的比例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也许表明，在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定居下来的地区，基本的迁徙单元是家庭，从斯堪的纳维亚前来定居的男性和女性数量相近。而等到他们去法罗群岛和冰岛定居的时候，已有更多的维京男性从不列颠群岛娶妻。我们无法确定大军的随军家属中本地女性和斯堪的纳维亚女性各占多大比例，但是来自更北方地区的DNA证据表明，本地女性肯定是存在的。因此，在估算随行家属时，将斯堪的纳维亚男性的数量乘以4或5显然是不对的，可能乘以2或3比较合适。[49]

维京人向东欧的迁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形式。并无迹象表明迁入俄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依靠军队征服来创造定居所需的政治生存空间，也没有什么小贵族农场主去建立农庄。由考古研究可知，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侵入有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8世纪末和9世纪初，只在两个地点发现了比较重要的遗迹：旧拉多加遗址最古老的地层，以及伏尔加河上游的萨斯基堡

遗址。但是，旧拉多加只开挖了半公顷，我们无从得知它当时的规模，也根本没法估算萨斯基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口数量。这还不算什么，要不是早在839年就有记载称俄罗斯北部存在一个北欧人治下的汗国，我们很可能会以为当时只有极少数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开始探索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河道。[50]如果没有大量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没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汗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关于8世纪和9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证据，也许还有更多有待出土。

与西方的情况一样，9世纪下半叶和10世纪初，涌向东欧的移民大量增加。此时，斯堪的纳维亚移民聚集在三个不同的区域（地图20）。第一个区域是拉多加湖和伊尔门湖之间的沃尔霍夫河沿岸。在北端，旧拉多加得到了重建，拓展到10公顷这个最大面积。往南则是前面提过的戈罗季谢［北欧萨迦中的霍姆加德（Holmgard）］，那是该地区的主要权力中心，戒备森严，周围环绕着3米高、3米厚的石墙。第三个已知的斯堪的纳维亚中心是伊兹博尔斯克-普斯科夫（Izborsk-Pskov）。在这三个中心的墓地里都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足以说明当时存在活跃斯堪的纳维亚社区，其中的男男女女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带了过来。在其周围的乡村——普利拉多哲（Priladozhie）——也零星出土了斯堪的纳维亚遗存，说明该地区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和商人。[51]

伏尔加河上游沿岸的遗址表明，那里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聚集的第二个区域。18世纪的发掘出土了来自雅罗斯拉夫尔、佩雷斯拉夫（Pereslavl）和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Suzdal-Vladimir）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但采用的挖掘方法过于随意，无法得出很精准的结论。不过，近来人们在该地区其他许多地方进行了更仔细的发掘，证实了当时有大量斯堪的纳维亚人涌入。例如，蒂莫雷沃的一个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定居点最终占地超过10公顷。此处的发掘发现了50多所住宅和一处墓地。最终占领这个定居点的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芬兰人和斯拉夫人，但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得最早。大量斯堪的纳维亚人出现在彼得罗夫斯科耶（那里有两个定居点）和米哈伊洛夫斯科耶（那里发现了一处有400个墓葬的墓地，其中63%为火葬）。此处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遗存的年代在10世纪。

第三个定居区以第聂伯河为中心，不过也许应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因为虽然第聂伯河上游仍可通向伏尔加河航线，但从第聂伯河中游出发的路线无疑是通往黑海和拜占庭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址是第聂伯河上游的格涅兹多沃——可能是萨迦中的斯摩勒斯基（Smaleski，或斯摩棱斯克Smolensk）。10世纪20年代，它的规模扩大至3倍，加修了防御工事，墓地（现已部分受损）中的墓葬最少有3 000个，甚至也许有6 000个。最初的苏联调查人员声称，其中只有大约1 000个墓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但这是大大低估了。格涅兹多沃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建立并受其

统治，在其10世纪的扩张之后，人口约为1 000。在南边的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出土了一些斯堪的纳维亚遗存。从10世纪初开始，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占领了河边的三个山头。不过，在北边约100千米处的切尔尼戈夫和舍斯托维斯基亚（它们是重要的10世纪遗址）出土了更丰富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52]

斯堪的纳维亚人聚居地的地理位置很符合他们活动的性质。北部沃尔霍夫河及其周围的聚居地把守着通往波罗的海的主要贸易路线，要去那里也很容易；从伏尔加河上游和第聂伯河上游的定居点出发，可以轻松踏上通往伊斯兰世界的主要贸易路线；而从第聂伯河中游出发，最终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可见，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集中在主要贸易路线的周围，这些发掘出来的遗址应该都是贸易中心。贸易商们在那里与周围乡村的毛皮猎人建立关系，在春季出发，前往布尔加尔或君士坦丁堡。

这些都很明确，但我们无法从中知道向东方迁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到底有多少。所有挖掘出的遗存都与贸易中心有关。这里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有没有像冰岛以及北部和西部诸岛的定居者那样建立农村定居点？来自沃尔霍夫河地区的零星发现表明至少当地有这种情况，这样的话，移民人数就应该比我们原先设想的多很多。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们已知的是不是俄罗斯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旧拉多加和萨斯基堡不足以支撑起记载中提到的汗国，但迄今为止，只找到这两个到839年时还存在的遗址。我认为，已知的这大约14个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遗址很可能也不是故事的全部。移民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也不清楚，尽管我们知道除第聂伯河中游地区以外，所有10世纪的定居点中都有女性存在。未知的太多了，不能冒险去猜测，但到10世纪的时候，肯定已经有了超过1万名男性移民，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还是大大低估了。

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单元在俄罗斯定居的过程，还是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但至少一部分人可能是通过像奥塔尔及其同伴那样的小规模商业冒险定居下来的，他们要么自己有船，要么与别人共享一艘船——至少有一块如尼石上记录了这种做法。11世纪中叶，乌普兰（Uppland）的斯威纳冈（Svinnegarn）立起了一组20块的如尼石，这组著名的如尼石纪念的是一群随某位英格瓦去远征，却没能回来的当地商人。[53]当然，这体现的是后来的情况，商人群体的规模也比较大，但起初在俄罗斯的河道网中应该也能常常见到奥塔尔这样的人物。而至少从9世纪开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变得更有组织，规模也更大，往往是伯爵或国王带着数百名随从前来。要想在9世纪建立起第一个汗国，就还需要一个这种规模的团体，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的大军时代到来之时，也是规模更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军队开始在俄罗斯的河流上往来的时候。

因此，斯堪的纳维亚人向俄罗斯的迁移很可能既包括一系列小规模的商人

流动（其中一些商人最终定居在那里），又包括不时入侵的较大武装部队。和西方一样，这两类移民中可能都包括女眷，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有多普遍。不过，这些移民带来的总体影响与西方大不相同。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到俄罗斯，是看中了那里的自然资源，想借此做生意谋利，而不是为了攫取动产或从原主人手中夺取农场、控制地产。因此在俄罗斯，连部分精英替代的迹象都没有。在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人形成了新型的精英阶层，他们赚钱，靠的是把原材料丰富的地区与西欧和近东已有的消费中心联系起来。

尽管考察证据很重要，对确定不同类型的北欧移民潮而言尤为重要，但执着于数字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对公元第一千年的研究往往如此。我们要么不知道有多少移民，要么不知道他们与本地人口的比例，要么两个都不知道。采用定性方法会更有成效。移民潮有几种形式。西北欧的土地掠夺是由小群的精英领导的，他们买得起船，能召集少量武装随从；定居到丹麦律法区和法兰克北部的，是国王和伯爵率领下规模大得多的战队；商人冒险家与国王或伯爵则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迁往俄罗斯欧洲部分的移民。即使在有地产被没收的地方，情况也完全不同于4世纪末和5世纪由匈人引起的向罗马帝国的迁徙。各地的维京移民都是在较长的时间里（有的花了超过150年）逐渐流入，而不是一下子大批涌入。在我看来，其中一些迁徙过程很像2—3世纪北方日耳曼群体向南和向东扩张到黑海地区的过程，和现代布尔人的扩张也颇为相似。尤其是在西方，斯堪的纳维亚人意识到有怎样的机会摆在眼前后，移民潮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动力也越来强。

尽管各地的情况不同，但维京移民对受其影响的所有地区都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冲击，往往还伴随着文化冲击。在北部和西部诸岛以及丹麦律法区和诺曼底，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被完全摧毁。当地精英全部或部分失去了对地产的控制权，在有的地方，旧王国被摧毁，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结构。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暴力的程度。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落入维京人之手而成为丹麦律法区的诺森布里亚和麦西亚，这两个旧王国中9世纪以前的特许状基本没有流传下来的。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多特许状，但有一些保留了下来。丹麦律法区的特许状之所以没能留下，是因为存放特许状的修道院被焚毁了。我们也知道，比德的故乡诺森布里亚王国在7—8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基督教知识体系。阿尔昆（Alcuin）是中世纪早期最伟大的学者，他曾是诺森布里亚的教士，留下了关于约克图书馆的详细介绍。维京人摧毁了所有的书籍和保存书籍的机构。在某些地方，甚至连主教辖区这样极为稳固的机构都被消灭了。维京时期之后，有3个古老的英格兰教区再也没能恢复。[54]

大军时代的一些定居点没能作为政治独立的实体存续太久。10世纪初，韦

塞克斯征服了丹麦律法区，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英格兰王国。但就连这次征服也体现了北欧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如果不是维京人先摧毁了麦西亚和诺森布里亚——韦塞克斯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韦塞克斯王国是不会有这么大的优势的。同样重要的是，韦塞克斯的征服并没有让大批被没收的地产物归原主：1066年时还有索克曼。苏格兰也大致如此，一个联合王国的出现取代了三个原本独立的政治体——达尔里亚达斯科特人（Dalriada Scots）、皮克特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不列颠人（Strathclyde British），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维京人袭击对后两个政治体造成的破坏。[55]

在其他地方，维京人迁移的政治影响更为深远。塞纳河边的鲁昂定居点将会成为诺曼底公国。不列颠的北部和西部诸岛，加上苏格兰北部和大西洋上的岛屿，也被纳入了存续时间很长的斯堪的纳维亚联邦。而从不同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间的交往，以及商人与抽取商人财富的国王间的互动之中，将产生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下一章会再讨论），这个俄罗斯国家将稳健发展，直到蒙古人入侵。在受维京人袭击影响的所有地区中，只有威尔士和爱尔兰可以说没有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即使在这些地方，我们至少也有理由认为，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政治发展走上了新的复杂道路。[56]太过关注维京时代的移民人数，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定性的角度讲，所有（通常并不情愿地）接受了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社会显然都受到了“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潮必然属于大规模迁徙。但这只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迁徙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当时走上了大迁移之路，为什么迁徙的形式如此多样？

维京人的扩张

至少在一开始，驱动9—10世纪这些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潮的主要是积极的经济动机，而不是消极的政治动机。20世纪中叶以前的学者看到这个结论可能会有些惊讶，毕竟当时普遍认为人口过剩是造成斯堪的纳维亚男女老幼大量出走的罪魁祸首。那时许多人认为，哥特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用约达尼斯的话说，那里是“族群的母体”。在现代，斯堪的纳维亚也出现了大规模移民，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向美国的移民。这么一来，似乎不可避免要得出结论：维京人的大迁移只是一系列外迁潮中的一个，每当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口数量达到爆发点时，就会发生一次外迁。

不过，使用现代考古方法仔细考察环境和人口后，我们发现波罗的海世界的一些主要地区，比如罗加兰（Rogaland）、厄兰（Öland）和哥得兰（Gotland），6世纪时的人口比9世纪还多。而在维京时期告一段落后的11世纪，丹麦各地出现了为获得可耕地而砍伐大片森林的情况。这个顺序讲不通。如果9世纪也有人口过剩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去开垦新的土地

呢？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挪威西部的资源已经很紧张，对农业人口而言，峡湾和山区能提供的生态空间很有限。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开始在北部和西部诸岛上定居时，中等富裕的挪威农民及其家属似乎一直走在前面。但这仅适用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上部分地方，而且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经过证明的事实。总的来说，维京人迁移不能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人口过剩来解释。[57]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地方在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其动产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觊觎的目标。在一段时间里，这些财富会被带回斯堪的纳维亚，而不是用来让（无论是西部还是东部的）新家园中的人受益。9世纪60年代之前，可能除了不列颠北部和西部诸岛以外，各地并没有大量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维京人种种活动的真正目的都是攫取财富。商人冒险家想从东方获得阿拉伯人的银币。惊人的是，仅从波罗的海和俄罗斯北部地区那些有5枚及以上硬币的窖藏中，就发现了超过20万迪拉姆的银币。当然，这只是留存下来的钱币。白银一直都是贵金属，我们无从猜测在一千年中，有多少迪拉姆被一遍又一遍地熔化，制成从私人首饰和教堂银器的各种物品。与东方的贸易尽管最终在经济上占了主导地位，但与西方的贸易是先展开的。早在勘察出通往伊斯兰世界的航道之前很久，旧拉多加就已建立，与西方的贸易联系带来了许多的财富，足以带动其他贸易中心的发展（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讨论）。

要在东方和西方赚大钱，除了做生意以外，还可以靠袭击——有时袭击和贸易是相伴的。袭击获得的不仅有各种战利品，还有奴隶。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这几个世纪里最终成为国际奴隶贸易的活动中，维京人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很重要，因为近来有人以维京人仅仅是商人为理由，主张维京人其实并没有那么暴力，而考虑到维京人在奴隶贸易中的作用，这样的观点就不成立了。要做贩奴的生意，就必然要去袭击。袭击中如果抓获了地位较高的俘虏，就能勒索赎金，要求他们付一笔保护费后才能离开。成功的袭击能形成各种各样的赚钱机会，带来可观的收益。仅看有记载的部分（没有理由认为记录是全面的），维京人9世纪袭击法兰克，就得到了340千克黄金和20 000千克白银。[58]

就连维京人最终的定居，也至少有一部分积极的经济动机。没有证据表明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土地资源特别紧张，因此理论上可以假定，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别处占领土地，是因为那里的土地更充足，土壤更肥沃，或者是持有土地的条件更好。这往往有详细证据的支持。在西方，北欧移民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地主定居下来。他们的地产规模相差很大。在最顶层，较大的地主成了伯爵和戈达（godar）——就是这些人在丹麦律法区获得了土地，留下了“格里姆斯顿”这样的混合语地名。但即使在不那么富有的索克曼阶层中，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也是重要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

地产可能有限，但属于自己，可以靠依附于自己的劳动力来经营，他们的政治权利比较充分，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即使各个农场都不大，这样的生活对移民们来说应该也算比较理想，他们来到西欧后，生活水平会比来之前高。在东欧，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至少是目前能在文献或考古证据中看到的那些）是为方便贸易而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前往俄罗斯，与当地的毛皮猎人建立关系，占据贸易河道网上的有利位置。在某些地区，例如沃尔霍夫河沿线，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斯拉夫人到来之前就占据了适合耕作的地方，可能也掠夺了一些地产，和西欧的情况一样。

但不管他们有没有掠夺地产，都不影响基本的观点：真正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北部和西部岛屿可能算是例外）是以先前攫取新型财富的接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贸易和袭击必然先于移民，还有一个原因。通过贸易和袭击，斯堪的纳维亚人积累了关于东欧和西欧的详细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最终的定居就不可能实现。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从未与欧洲其他地区完全隔离。罗马时期，琥珀之路从波罗的海的南岸一直延伸到中欧和黑海，促进并维持了南北之间的大量接触。日德兰半岛上的一些居民参与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罗马不列颠的占领，东盎格利亚的统治王朝似乎与挪威有某种联系，而6世纪初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一些赫鲁利人遭遇失败后就决定向北迁移。但是，经过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贸易和袭击，更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与西欧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获得了定居所需的地理、经济乃至政治信息。[59]

对地理知识的需要可能是最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经过长时间试错，就连本章开头引用的那种极为含糊的航行指示都不会有。要打通北海/北大西洋航线，无畏的航海家们必须先从挪威西部航行到奥克尼，然后绕过不列颠群岛的北部海岸，进入大西洋，打开通往法罗群岛、冰岛、格陵兰岛甚至最终到北美的航线。爱尔兰人可能已经对法罗群岛和冰岛有所了解，这可能激发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大西洋的兴趣，但所谓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人到达冰岛时，发现已有爱尔兰修士住在那里的说法，从未在考古上得到证实。[60]也许不那么有挑战性但同样重要的是，此时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正忙于探索不列颠、爱尔兰和欧洲大陆的河道网。我们很容易将这些视为理所当然，但要知道，如果没有事先积累详细的知识，斯堪的纳维亚袭击者就不可能向上游推进，将舰队运送到爱尔兰的内陆河谷，沿特伦特河（Trent）而上劫掠位于雷普顿（Repton）的麦西亚王室中心，或者沿塞纳河而上攫取圣日耳曼和巴黎的财富。

俄罗斯的河道网也需要大量勘察工作。8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只能沿着流入波罗的海的河流，寻找更多能出产毛皮的森林。找出这些河流的支流通向何方，连接到哪里，最终抵达巴格达，这些地理发现都是巨

大的飞跃。他们必须避开急流，记下浅滩和沙洲的位置，在不同河流系统的源头之间建立运输通道。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信息和组织，更何况还要更换船只。在拉多加附近，有必要把远洋航行用的船换成内河船。考古证据表明，此地有些居民靠服务于这种需求谋生。在其他地方，最大的问题是怎么组织起搬运工。尽管只在1150年的特许状中找到了斯摩棱斯克人要向中世纪的罗斯国王缴纳码头搬运税的规定，但这是该地区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特许状，很可能反映了长期以来的惯例。考虑到有多少信息需要收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从为西方市场服务的旧拉多加建立，到与南方穆斯林接触的第一份证据出现，中间会隔了两代人的时间。对于迁往的每个地理区域，斯堪的纳维亚冒险家都需要获取大量详尽的地理知识，这反映在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地理记述中。这些记述中，有许多知识来自古典文献和《圣经》（可以想见，这是修士们维护的传统），但除此之外，还有数百年航海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具体而准确的信息。[61]

经济信息也很关键。如果商人对市场没有充分的了解，不知道伊斯兰世界对北方森林的出产有着几乎无限量的需求，俄罗斯河道网沿线的贸易就不可能繁荣起来。对西方发起袭击的人很早就掌握了另一种经济信息：基督教修道院存放了很多贵金属，有时（尤其是在爱尔兰）还能在修道院里掳到有价值的人。对不同地区土地资源价值的了解也算是一种经济信息，这种信息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定居过程。

政治知识也很要紧，对定居而言尤其重要。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如果希望能作为相对富裕、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地主定居下来，就得了解目的地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出发之前，他们必须先确定自己和随从（这似乎是北部和西部诸岛的情形）有足够的力量赶走当地的精英。如果力量不足，他们就得计算出需要多少力量才能在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更强的地区（例如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和北法兰克）取得相似的结果，并为此集结相应的军事力量。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意图，但大军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模够大，足以摧毁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不造成这种破坏，就不可能进行财产的重新分配。有时，他们显然掌握了更具体的政治知识。大军在东盎格利亚集结后便出发前往诺森布里亚，如果认为这是巧合，那也太牵强了。他们往哪里走都可以（除了向东——东边是海），但选择了向北，而此时的诺森布里亚正处于内战之中。在9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维京人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往来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与欧洲大陆之间，可见他们获得了具体的情报。

当然，活跃的信息场域对公元第一千年中的每次移民潮都很重要。维京时代的信息流通更为复杂，由于涉及的距离很远，地方很杂，建立信息场域耗费的时间要长得多。从雷克雅未克到巴格达的直线距离超过5 000千米，中间要穿过很多危险的水域、海岸线和河岸。出于同样的原因，维京

人大迁移涉及的交通问题比前面提到的那些移民潮都要复杂。[62]

除了都重视产生财富（也许应该说是收集财富，因为劫掠修道院不能算是产生财富的活动），维京人迁移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种种活动都在水上进行。贸易、袭击乃至定居都利用了海洋及河流系统。因此，有运输手段（船只）至关重要，而船并不便宜。直到19世纪末出现了跨大西洋的船舶，特别是它有着容量巨大的统舱，才有可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将大量人口运送到海外。在此之前，海上交通的花费过高，穷人是不可能大规模跨海移民的，除非各国出于自身原因决定提供运输补贴，比如免费运输新殖民地所需的工人，或是将罪犯运到博塔尼湾（Botany Bay）。我们现有的几份证据都凸显了维京时代的船运成本。正因如此，如萨迦和其他冰岛文本所表明的那样，在北大西洋上的定居是由贵族（尽管地位不一定高）领导的。只有他们才有财力购买所需的船只，不那么有钱的随从可以作为军事力量跟着他们迁徙，为征服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或为在法罗群岛和冰岛开垦农场出力。后来进入西方水域的国王应该是自己装备了一部分船队，又雇了一些已经有船的人。例如，瑞典的前国王回归并在比尔卡（Birka）重新掌权时，他的船队里有11艘船是自己的，另外21艘是雇来的。在能够负担起整支船队的国王或伯爵的随从队伍中效力，肯定是穷人迁居海外的一种途径，这应该也是丹麦律法区许多索克曼的成功之路。

钱不够多的人如果想拥有船只，跟其他人一起凑钱买船也是个办法。奥尔胡斯（Aarhus）的一块如尼石记录，有个叫阿塞尔·萨克斯（Asser Saxe）的人跟人凑钱买了一艘商船。根据同一块如尼石上的记录，他还是名雇佣兵（lithsman），是战船队伍中的一员。一些用于袭击的船很可能也是凑钱凑出来的。一份法兰克资料称861—862年在塞纳河上过冬的维京人队伍是“兄弟会”（sodalitates）。从这个很有意思的词上看，说不定一艘船就是一个专营袭击的合资小公司。类似的结论从瑞典南部的如尼石中也能得出，就是那些纪念随英格瓦远征俄罗斯却未能归来的人的如尼石。他们的家人（应该是家人）有能力立起这些如尼石，可见他们并非来自社会底层。[63]

因此，不管是什么船，获得船只是交通的关键。《埃伊尔萨迦》（*Egil’s Saga*）中有一个常被引用的著名段落，说的是埃伊尔有时出去做生意，有时出去袭击。阿塞尔·萨克斯因如尼石而为人所知，他的事迹说明，前述萨迦中的记载虽然完全来自后维京时代的资料，但所说的事并非不可思议，即使商人也会有武器。第一次去丹麦时，圣安斯卡是跟着一队商人去的，这些人有能力在海盗来袭时全天战斗。但是，贸易和袭击需要的是不同类型的船只（也许正因如此，如尼石记录的那个阿塞尔·萨克斯对两种船都有兴趣）。战船更多搭载划船和战斗的人，船身较窄，便于深入河道网航行。商船则要宽一些，以便运载更多的货物。有时候，还得在中途换成河

船。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斯拉夫人提供了第聂伯河上使用的河运工具——独木舟（monoxyla），这个词的意思是它们是用单根树干建造的。[64]

因此，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迁移深受运输问题的制约。光是费用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维京人的移民单元比所谓民族大迁徙时代的移民单元小很多。航海也许比走路快，但也贵得多。那些激动人心的发财新机会，比较贫穷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应该是没有办法把握了。这也是我不相信在大军时代的定居之后还会有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农民迁到丹麦律法区的另一个原因。既然可以几乎免费地使用大量完全臣服的盎格鲁-撒克逊劳力，谁还会愿意支付交通费用呢？这和有多少家眷随军西迁的问题也有关系。虽然没有很好的明确证据，但是，如果迁入的地方也有女性，那么考虑到交通成本，参与迁徙的斯堪的纳维亚女性可能就不会很多了。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维京人大迁移所依赖的航海技术不仅花费高昂，而且大多是新技术。公元800年左右的时候，地中海乃至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地区的海上航行技术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波罗的海地区长期使用设计精巧的近海船，但在维京时代初期，远洋船还是个新东西。罗马晚期波罗的海水上运输工具的代表是著名的尼达姆船（Nydam boat）。这艘在19世纪中叶出土的船建造于310—320年，本质上是一艘独木战舟，由14对桨提供动力。船和船上袭击者的装备一起被献祭，沉入沼泽——情况有点像第二章提到的那些揭示了军事随从情况的沼泽遗存。从这艘船可以推断，它的主人应该发动了很多次袭击。就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而言，关键在于它是近海船。它没有帆，航程有限，船体设计也不适合在开放水域航行。这样的情况直到8世纪都没什么改变。水下考古发现的设计上适合航海的斯堪的纳维亚沉船，还没有哪艘的年代早于公元700年。另一种有名的信息来源证实了这一点。哥得兰岛除了有许多宝物外，还有一系列带图画的石头，其中一些描绘了波罗的海上的船只，而年代早于8世纪的石头上都见不到有帆的船。

具体的年代无法确定，但从约700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航海技术的重大革命体现在图画和像科克斯塔德号那样的壮观船棺上，也体现在沉船上，特别是在斯库勒莱乌（Skuldelev）发现的5艘船，这些船损坏后被用来堵上通往罗斯基勒（Roskilde）峡湾的一条航线。新的样式有两个基本要素。首先，船体的强度足以应付开放海域。叠接列板、整体中央龙骨加上高昂的船首和船尾，构成了干舷够高的船体，既结实又有柔韧性，可以在海洋中破浪前进而不会沉没或解体。遭遇强风时，现代摩天大楼的摇摆度可达6米，同样道理，柔韧性强的船体比刚性船体更不容易损坏。第二，帆的技术出现了。这不仅需要了解帆本身，比方说如何制作帆并利用它们御风而行，还需要了解桅杆，知道如何将其固定在船体上。到8世纪初，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远洋船只取代了近海作战独木舟。如果没有

这场技术革命，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大迁移就不可能实现，而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第一批维京袭击者就涌入了西部水域。[65]

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第一千年末期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潮？对于这样的关键问题，上述观察给出了一部分答案。维京时期实际上始于波罗的海的航海技术发展起来的时候，而不是在那之前，因为如果没有航海技术，维京人就不可能扩张。但还有别的问题：这样的技术已经在附近地区流传了几百年，为什么到了700年左右才输入波罗的海？

我们没有造船者的日记，但可以根据一系列其他证据做出比较好的猜测。西罗马在5世纪崩溃，极大破坏了欧洲北部既有的区域间贸易结构。但到了7世纪，贸易再次繁荣起来，国王们得以建起贸易中心。交易很明确。国王承诺为所建市场上的所有商业活动提供保护，条件是以过路费和关税的形式向商人收取一定比例的抽成。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体现了随后发生的革命：一个接一个的贸易中心——学术文献通常称之为emporia——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沿岸建起。最先得到发掘的是多雷斯塔德，在发掘之前，人们就从那里出产的硬币得知了它的存在，它隐藏在莱茵河河口上游一点的位置（地图20）。为建造码头而砍伐的木材表明它在650年启用。除了多雷斯塔德，欧洲大陆北海岸还有许多重要的贸易中心，比如位于如今布洛涅港上游的昆都维克，以及荷兰瓦尔赫伦（Walcheren）岛上的贸易中心。在英吉利海峡以北，哈姆威克（Hamwic，南安普敦的旧名）于675年启用，仅比多雷斯塔德晚了一点点；伦敦威克（Londonwic）位于罗马古城伦敦上游，是撒克逊时代中期的贸易港，沿泰晤士河运作，在如今的河岸街（Strand）一线。新的贸易网络始于英吉利海峡——北海地区，但很快扩展到日德兰半岛，然后进入波罗的海。里伯（Ribe）是日德兰半岛西海岸的一个贸易中心，在700年时已经投入运营。8世纪，波罗的海周围陆续开辟了其他市场：比尔卡和雷里克（Reric）较早，海泽比（Hedeby）稍晚。正是为了满足以这一系列市场为代表的不断增长的西欧需求，旧拉多加建立了。[66]

这样的年代顺序也可能是巧合，但我不这么认为。只要有明确的动机，人类往往就能实现技术飞跃。很有可能，斯堪的纳维亚人觊觎欧洲北部新兴贸易网络的新财富，因而发展出了远洋航海技术。年代顺序没有问题，动机也有了。

文本资料表明，此类交通最初主要由弗里西亚商人控制，但从长远来看，他们输给了斯堪的纳维亚人。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交易系统，赚钱最多的都是中间人，不是初级生产者。转变出现在8世纪，此时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开始拥有船只，可以进行货物运输而不仅仅是充当其他人的原料供应商。这标志着贸易模式开始了重大调整。维京时期的北欧袭击者和贸易商不仅将交易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利用他们控制下的中心改变了贸易的

方向。洗劫古老的贸易中心自然是所有真正的维京人都喜欢的游戏，到了10世纪，仍在运作的那几个贸易中心（包括鲁昂、约克和都柏林）都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控制之下。维京人是不是有计划地去消除非维京人贸易中心的竞争，我们无法确证，但这样的结果很说明问题。[67]9—10世纪的维京人大迁移是7—8世纪的贸易中心网络带来的。流入北部水域的新财富成为动力，促使斯堪的纳维亚造船者大大拓展了技能，并最终将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和冒险家吸引到了波罗的海近海之外。

移民与发展

目前为止的证据表明，维京人大迁移中的各种活动（包括贸易、袭击和定居）都受“积极”的经济动机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维京人的迁徙符合财富悬殊推动人类迁移的经典模式。当然，“积极”这个词是现代移民研究中的术语，是从维京人的角度说的——毕竟赚大钱的是他们。失去土地、遭到袭击、被迫离开亲人成为奴隶的人，他们的看法肯定截然不同。但即使从那些参与其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角度来看，一些行动也是受消极得多的政治动机驱动的，消极动机往往与积极的驱动力同时起作用，就像在现代移民潮中一样。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定居冰岛。我们看到，根据冰岛早期的记述，定居者从大约870年起前往那里，为的是逃避挪威君主国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这个君主国可能是奥克尼的摩尔伯爵国，但不管是哪个国家，我们都可以认为上述冰岛文本记载了定居的消极动机，也就是政治因素。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政治动机在维京时期其实是比较普遍的，至少从大约850年开始是这样。若干年前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帕特里克·沃莫尔德（Patrick Wormald）认为，从带着武器离开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这种当时常见的做法可知，该地区内部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危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尽管近年来有了一些进展，但政治危机的起源还是极不明朗。不过，700年左右，日德兰半岛南部和一些邻近的岛屿上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丹麦”君主国。从8世纪中叶开始，它就有了足够的权力来实施大型公共工程，在其南部边界上建起了庞大的防御工事，也就是“丹纳维尔克”（Danevirke，丹麦人的防御工事），还挖出了一条穿过萨姆索（Samsø）岛的运河。在约800年的加洛林文本中，我们见识到了一位国王戈德弗里德。他能组织起成百艘船、成千名战士，还能让商人们从邻近的斯拉夫土地上迁到他自己新规划的建于海泽比的贸易中心（无论他们愿不愿意），这应该是因为他想向商人收税。

我们不应高估这个政治体的政治稳定性。戈德弗里德本人最终被暗杀，9世纪上半叶的法兰克编年史让我们得见那里后来政治历史中的一些坎坷：为获得控制权，同一个王朝的两个分支之间、两个不同的王朝之间都发生

了争斗。但到了9世纪中叶，所爆发的暴力的超出了常规。传教士圣安斯卡第二次访问斯堪的纳维亚时，发现国王霍里克二世（Horic II）和他上次在宫廷里见过的所有人都死了，而从约850年到950年，完全没有迹象表明丹麦是个统一的君主国。有人主张，这是法兰克人的资料中没有对此进行描述而造成的错觉，但问题没那么简单。在日德兰半岛和丹麦诸岛上崛起的第一个真正有权势的人物是10世纪中叶耶灵（Jelling）王朝的蓝牙王哈拉尔（Harold Bluetooth）。在因他而闻名的纪念碑中有一块如尼石，上面写着在哈拉尔治下的疆域统一是他自己的政治成就。我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因为这个声明与所有其他证据都吻合。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约750年到850年）的行动（史料中有充分记载），丹麦中央化的君主国崩塌了。正如沃莫尔德所指出的，这一分裂与斯堪的纳维亚地位较高的首领及随从向东西两面的扩张几乎同时发生。我们知道，正是后一种现象创造了大军时代。而它正好在国内政治结构崩溃时发生，这肯定不是巧合。[68]

和第一千年的其他移民潮一样，外部政治结构影响了移民行动。发展是一个大概念，既涉及政治也涉及经济。更多的财富或获得更多财富的机会将北欧人吸引到波罗的海圈之外，而财富所在地政治结构的性质决定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可以采取的手段和机制。我们看到，当地的政治结构完全决定了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单元的规模。在本地政治结构规模较小的地方，比如不列颠北部和西部诸岛，以及整个北大西洋地区，定居者不需要成群结队而来。俄罗斯北部的情况也类似，如果那里确实发生过掠夺土地的事的话。但是，如果本地的政治结构稳固，已经成了规模，那么斯堪的纳维亚人就需要通过间接手段或带上足够人马来实现目的了。在不去直接征服的地方，他们会用间接手段来获取当地的财富，比如与伊斯兰世界做生意，或是像对待爱尔兰诸王那样与当地人建立共生关系。或者，他们会带上足够的人马，以期打赢必须要打的战争——大军时代，他们在英格兰和法兰克北部就是这么干的。在这两个地方，维京人如果想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定居下来，就要先摧毁当地的政治结构，而大军就是所需的工具。其他短期政治因素也影响了他们行动的方式。大军先攻打诺森布里亚，是因为该王国当时陷于内战，而在接下来的30年中，大军则随着法兰克王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实力的消长在英吉利海峡两边往来。

维京时代，移民与政治发展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发生了相互作用。回到沃莫尔德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引爆了9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政治危机？我们没有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记述，法兰克的编年史家对这些行动也是局外人，因此没有留下可以说明情况的详细的记述。不过，霍里克二世被杀前50年左右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发生了什么，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很有关联的。我们已经看到，维京时期贸易与袭击的强力结合带来了大量财富，而且财富来源是全新的——阿拉伯的白银、西欧的贵金属、东西方

间奴隶和皮革贸易的回报。而且，这些财富流入，并不受日德兰君主的直接控制。加洛林王朝希望制止海盗行为时，不得不去说服丹麦国王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来自海外的财富有时被用来实现国内的政治野心。《圣安斯卡生平》中提到了国王安纳达斯（Anoundas），他的故事很有启发性。他被赶出比尔卡，但在西欧赚到了钱，于是他雇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重新掌权。一份法兰克史料还隐晦地表示，洗劫圣但尼修道院的雷金哈里斯在霍里克的宫廷中丧命，也许是因为霍里克对加洛林王朝的指示做出了回应。也许如此吧，但霍里克这么干也有他自己的理由，而这就是我想在沃莫尔德的论点之上补充的内容。[69]

我要说的是，维京人大迁移头50年所产生的大量财富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引发了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摧毁了丹麦君主国，促使许多地位较高的斯堪的纳维亚领袖转向西方。正如安纳达斯的逸事所示，在9世纪的波罗的海地区，财富就是力量的直接体现。有了黄金白银，就能招募和控制更多的军事随从。但是，约800年时的丹麦君主国，政治架构基本上是维京时代之前的。尽管丹麦君主肯定能从经济活动中获取额外的财富（围绕贸易中心形成的贸易网尤其重要，戈德弗里德造起海泽比就是证明），但它既无法直接控制因维京人活动而涌入波罗的海地区的新财富，也不是其主要的受益者。这些财富中很大一部分落入他人之手，对丹麦君主构成了直接威胁。君主必须成为该地区最富有的人，才能控制足够多的战士来保住自己的位置。霍里克肯定明白这一点，他除掉野心勃勃的雷金哈里斯可能也是为此。但是，由于流入了太多黄金白银，建立在斯堪的纳维亚财富来源上的旧权力结构无法维持下去。现代发展中世界的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非国家组织（特别是毒品卡特尔）赚到的钱，有时比本国机构能从常规税收中收取的钱多得多，这些组织因此成为实际主导该国全部或部分地区的势力。[70]而且，这么多的动产掌握在这么多不同的人手中，维京时代大量财富流入，在政治上必然挑起斯堪的纳维亚首领之间的激烈竞争。

按照这种观点，财富流入引发了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危机。之所以出现大军时代那种首领纷纷向外扩张的情况，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国内的竞争过于激烈，海外的发展前景比较好。像霍里克那样的人太多了，他们都有能力雇来大量战士，对日德兰半岛和丹麦诸岛的统治权因而迅速失去了吸引力。因此，不仅定居冰岛背后有消极的政治动机，而且整个大军时代都可以视为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移民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地位较高的领袖去西欧当然是为了寻求财富，但他们倾向于留在那里而不是返回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关于在丹麦律法区和北法兰克定居的记载体现了这种倾向），原因之一是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竞争太激烈了，相比之下，在西方（或俄罗斯北部）开辟一席之地更有引力。

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迁移再次说明，移民和发展是第一千年中两个密切相关的主题，但此时移民和发展相互作用的模式与前文提到的一些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波罗的海并没有与欧洲其他国家隔绝开来，但那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直到8世纪后期才被纳入新的北欧贸易网络，在贸易网中一开始的地位似乎是所需原材料的产地。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很快看到了眼前的种种机会，他们发展出新的航海技术，更直接地从贸易网中获利，附带着也在富裕的伊斯兰世界中开发了新的市场。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后，他们也发现了从那里赚钱的种种方式，以贸易、袭击、定居为特征的维京时期由此开始。

和其他许多移民潮的情况一样，财富不平等是维京时期大迁移的根本原因，而迁往财富集中的地区，则是人们对财富不平等现象做出的反应之一。

但是，在这个时代，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直接迁入较富裕地区的情况比较少，不像罗马时代外边缘区的群体分批迁入较富裕的近边缘区，也不像匈人时代的大规模群体从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直接迁入罗马帝国。在维京人的大迁移中，至少在开始阶段，将财富带回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和直接侵占本地资产的情况差不多多。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交通运输，维京时代的迁徙也因此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维京人大迁移的关键在于船只，造船费用大大限制了迁徙的规模和可以去到的地方。即使发生了移民，也不会像4—5世纪的几次迁徙那样采取大规模混合人口群体的形式。我们知道，较早时期的一些包括了男人、女人、儿童的移民群体，人数可能多达10万。9—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国王运去了追随他们的战士，小贵族带着自己的随从和一些农场工人坐船，更穷的人则凑钱购买用于战争或贸易的船只。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移民所需的交通工具，走路的话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过不了海。

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船只，尽管船只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但也是靠船只才使一切成为可能。可以说，那是欧洲一体化的早期阶段。中世纪早期，在陆路上行进的速度大概是每天40千米，但维京人的船一天就能前进4倍甚至更多的距离。在人看来，8世纪引入波罗的海地区的新航海技术使欧洲其他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距离缩短了4倍。这在中世纪早期相当于现在建了个机场，或是波罗的海地区通了高铁。新的运输工具到位后，斯堪的纳维亚人很快意识到，欧洲其他地区的发财机会比他们周边的社会多得多。有办法利用这些机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从中大大获利，但其他人的情况就比较糟糕了。并不是欧洲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能产生决心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演那样的积极效果——1945年以来，这再明显不过了。

在斯堪的纳维亚人迁移的过程中，中欧和东欧的文化模式渐渐趋近于公元

1000年时的模式。与罗马时代相比，日耳曼（更确切地说是日耳曼人统治下的）欧洲在第一千年下半叶大幅缩水，被斯拉夫人统治的庞大边缘区逐渐侵蚀。斯拉夫人的领地只是略微受到了向俄罗斯西部扩张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因为没有迹象表明那里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打算同化当地的斯拉夫群体和其他群体。但是，如果说移民和同化的强大结合，最终使得与现代更接近的文化模式取代了罗马时代的模式，那么中欧和东欧的创生就还有另一个层面需要探索。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欧和东欧由讲斯拉夫语者主导，也有一些地方受斯堪的纳维亚人控制，除此之外，近似国家的强大政治结构取代了罗马时期常见的那种小规模社会。这些新的实体是什么？这些新实体为什么能主导原本人类活动以数百人为单位的大片土地？

---

[1] 来自14世纪的*Hauksbok*，转引自Bill (1997), 198。

[2] 从不列颠的角度，人们往往认为维京人发起过两次重大入侵：一次在9世纪，另一次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但后面那次入侵的性质有很大不同，是由掌握集中权力的丹麦君主组织的，基本不涉及移民，因此那次入侵将在第十章中讨论。

[3] 关于在这些北方水域航行的后勤支持，见Crawford (1987), chapter 1。

[4] 研究维京人对西欧的袭击的书几乎列不完，但其中Nelson (1997), Keynes (1997)和Ó Corráin (1997)是很好的导论，Forte (2005)和Loyn (1995)中的相关章节是有益的补充。

[5] 见Crawford (1987), chapter 4（地名）; 136ff. 定居点类型）；参见Ritchie (1993)。从在爱尔兰展开的行动中可以推测出北方发生了什么（见下注）。

[6] 例子可以参见《爱尔兰编年史》中807、811、812、813年的记述；从821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攻击的记录，这表明爱尔兰略早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经历了袭击的加剧。《爱尔兰编年史》（848年）称维京首领托瑞尔（Tomrair）为tanaise rig，这在爱尔兰语中指国王的法定继承人或地位仅次于国王的人[Charles-Edwards(2006), vols. 2, 11]。因此，他很可能是个“伯爵”（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是Jarl）而不是“国王”：请参见下文。Nelson (1997); Keynes (1997)充分讨论了他们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行动。

[7] 更多细节，见Nelson (1997); Keynes (1997); Coupland (1995), 190—7。

[8] 见Ó Corráin (1997)，Charles-Edwards (2006) 的《爱尔兰编年史》译本注解也非常有用。关于这两位国王，见Smyth (1977)的开创性著作。更多关于雷金哈里斯去世情况的信息记录于*Translatio of St Germanus*：见Nelson (1997)。

[9] 有用的总结见Coupland (1995), 197—201; Keynes (1997)。对于这些年间的情况，《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叙述（以中世纪早期的标准来说）非常完善。

[10] 关于大军的性质，可以参考Brooks (1979)；另参见Smyth (1977)。军队往来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更多细节，可参见Nelson (1997)和Keynes (1997)。

[11] 关于阿尔弗雷德改革的研究很多，其中Brooks (1979)的介绍非常有帮助。Smyth (1995); Abels (1998) 是很好的补充。Keynes and Lapidge (1983)收集和翻译了很多相关的文本。

[12] 更多细节，见Nelson (1997); Ó Corráin (1997)。

[13] 关于布列塔尼，见J. Smith (1992), 196—200; Searle (1988), 29—33。对诺曼底历史的（可以说是）不同的介绍，见Bates (1982); Searle (1988)，特别是第5章和第8章。

[14] 关于奥克尼，见Crawford (1987), 51ff，以及Rafnsson (1997)对爱尔兰和大西洋大迁移的论述。

[15] 大概的摘要，见Ó Corráin (1997)；更详细，也确实略有争议的处理方法，见Smyth (1979)。

[16] 各种资料通过中世纪伊本·鲁斯泰[Ibn Rustah，见Wiet (1957)]、伊本·雅库布[Ibn Jaqub，见Miquel (1966)]和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见Canard (1973)]的摘抄留存了下来；参见Melnikova (1996), 52—4。

[17] “急流”，见*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chapter 9。贸易条约，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911年和944年）。对诺曼之争的介绍（附有完整资料），见Franklinand Shepard (1996), 27—50; Melnikova (1996), 47—9; Duczko (2004), 3ff。

[18] 伊本·法德兰对罗斯人的描述也很像我们对北欧人的刻板印象：身材高大，白皮肤略微泛红。

[19]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860—862 AD)。文本传统，见Cross and Sherbowitz Wetzor (1953)译文中的引介，进一步的探讨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27ff；Melnikova (1996), chapters 7—8。

[20] Noonan (1997) 是很好的入门介绍著作，完整的论述有Duczko (2004)。

[21] Ibn Jaqub, *Relation*，见前注16.

[22] *Life of St Anskar* 30。关于奥塔尔，见Lund（1984）；参见Melnikova (1996), 49—52。

[23] 我们将在第十章中看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许多奴隶也是通过当地的中间人获得的。

[24] Ibn Jaqub, *Relation*（见前注16）。10世纪上半叶罗斯人的冬季巡回路线，见*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9。

[25]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911年和944年）；详细的评论，见Franklin and Shepard（1996), 106ff以及118ff：通过比较可知，与君士坦丁堡交易的罗斯人越来越多。

[26]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9.

[27] 精彩的介绍，见Noonan (1997)。

[28]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北部活动的这个最早阶段的考古学证据，见Duczko(2004), chapter 2。君士坦丁堡和哈里发国这两个潜在市场的比较，参见本书第七章。

[29] 瑞典维京人：见*Annals of St Bertin* AD a 839。（这是不是第一次有人尝试第聂伯河航线？）斯维亚托斯拉夫之死：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72 AD)。

[30] 他们用以渡海的船大概是斯拉夫人的独木舟（monoxyla），是用树干挖空造出的，而不是在西方很常见的长船。

[31] 对阿巴斯科斯港的袭击及后续情况，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50ff.; Duczko(2004), chapter 1。

[32] 关于萨马拉混乱期，见Kennedy (2004)。

[33] 关于这些硬币的流通，见Noonan (1997)。

[34] 这一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的考古证据，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91ff.;Duczko (2004), chapters 3—5。

[35] 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chapter 3; Melnikova (1996), 54—60; Duczko (2004),chapter 6。

[36] 见Likhachev (1970); Melnikova (1996), 105—9。

[37] 引文来自Ó Corráin (1997), 94。

[38] 见Sawyer (1962)。

[39] *Chronicle of Ireland* AD a. 848.

[40] 希夫丹：见*Anglo-Saxon Chronicle* (878 AD)。Brooks (1979)充分论证了大军的规模问题；大军的结构及奥拉夫和英格瓦的身份，参见Smyth (1977)。（数据已经被索耶接受。）欧洲大陆方面，法兰克人在代勒河取得大胜时，杀死了两名维京国王，缴获了16面王旗。

[41] 定居点的记录：见*Anglo-Saxon Chronicle* (876, 877 and 880 AD)。基于《土地调查清册》估算，1086年英格兰的总人数也许有150万，维京定居点并未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

[42] *Anglo-Saxon Chronicle* (896 AD).

[43] 见Vince (2001); Leahy and Paterson (2001)；参见Hart (1992)更宏观的研究；对地名证据的概述及完整的参考资料，见Fellows-Jenson (2001)。

[44] 见Ó Corráin (1997), (1998); Smyth (1979)。

[45] 有用的介绍，见Ritchie (1993), 25—7。

[46] *Chronicle of Ireland* (856, 857, 858 AD)；参见Ó Corráin (1998), 326—7；Charles Edwards (2006), vol. 2, 4—5。

[47] DNA证据，见Helgason et al. (2000), (2001), (2003); Goodacre et al. (2005)。

[48] 有用的引介，见Rafnsson (1997)。

[49] 大军：见*Anglo-Saxon Chronicle* (892 AD)。DNA证据，见前注47。正如盎格鲁-撒克逊证据（第六章）的情况所示，现代人口中的比例不能直接反映过去人口的比例，会有很大误差。

[50]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北部活动的这个最早阶段的考古学证据，见Duczko(2004), chapter 2。君士坦丁堡和哈里发国这两个潜在市场的比较，参见本书第七章。

[51] 这也说明斯堪的纳维亚人是早于斯拉夫移民到来的：见前注34。

[52] 参考资料见前注35。

[53] 维京时期后期，这种纪念性的如尼石摆放得越来越多：见B. Sawyer (1991)。

[54] 见Wormald (1982)。

[55] 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后维京时期历史的介绍，分别见Campbell (1982)

和Broun et al. (1998)。Davies (1990), chapter 4讨论了威尔士后维京时期的情况。

[56] 参考资料见前注13和14。

[57] 见如P. Sawyer (1982), (1997a); Sawyer and Sawyer (1993), chapter 2，附参考资料。

[58] 关于迪拉姆，见Noonan (1997), 145（参见阿拉伯旅行者对罗斯商人拥有惊人白银财富的评论：见前注16）。关于法兰克，见Nelson (1997), 37。

[59] 罗马时期的背景，见本书第二章。

[60] 有用的引介，见Crawford (1987), chapter 1; Bill (1997); Rafnsson (1997)。

[61] 见Melnikova (1996), 3—18（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地理记述结合了实践得来的信息，以及学术知识和《圣经》知识），31—44（对俄罗斯主要河道及其相互连接的精彩论述）。

[62] 不过，盎格鲁-撒克逊人扩张到英格兰的过程可以作为比较：见本书第六章。

[63] 阿塞尔·萨克斯：奥尔胡斯如尼石第6号；参见Roesdahl (1991), 58。兄弟会：见*Annals of St Bertin* (862 AD)；参见Nelson (1997), 36。

[64] 关于阿塞尔·萨克斯，见前注63。关于船只类型，见Bill (1997)。关于独木舟，见前注26；参见Melnikova (1996), 33。因为沃尔霍夫河有激流、浅滩和沙洲，船只必须在拉多加换成河船。

[65] 有用的引介，见Bill (1997)。

[66] 近期的精彩概述见Wickham (2005), 680—90, 809—11，附有关于考古发掘的全面参考文献，其中大部分发掘是上一代学者完成的。

[67] 贸易中心有许多可以搬动的财物，因此有可能最初劫掠这些地方是出于偶然，后来就成了有计划的行动；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68] 见Wormald (1982)。关于这个“第一个”丹麦国家的介绍，见Roesdahl (1982)，特别是第5章和第8章；Hedeager (1992)；Lund (1995), 202—12。

[69] 安纳达斯：见*Life of St Anskar* 19。雷金哈里斯：见前注8。

[70] 基于这种现象，国际关系理论中产生了“新中世纪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揭示的情况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其名义上的领土空间内，实际上并不能垄

断权力或权威。相关争论的介绍，见Friedrichs (2004), chapter 7。

第十章
第一个欧洲联盟

999年冬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离开罗马城。他是萨克森人，不是罗马人，也算不上虔诚，但帝国之城吸引着他。他来这里，既是为了表明自己的重要地位，也是为了利用罗马的宗教声望举行宗教会议，以镇压一名给他找麻烦的大主教。这像是皇帝通常会做的事。但真正值得注意，也和本书主题有关的是奥托三世接下来去的地方。在冬季，皇帝的活动一般包括狩猎、去宜人的地方举行宗教会议、与（宗教的和世俗的）重要人物一起庆祝某个重要的基督教节日。但那年冬天，奥托没有做这些事。这位皇帝听说了阿达尔贝特（Adalbert）坟墓上发生的神迹，决定前去拜访。阿达尔贝特是主教，也是传教士，于不久前殉道。这大概也没什么不寻常。公元第一千年的皇帝，不管是不是罗马人，都自认为由上帝授命，神迹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走上传教之路不久后，阿达尔贝特就去世了，在那以前，他一直是波希米亚的布拉格主教。但奥托去的地方并不是布拉格，甚至不是波希米亚，而是波兰。当时执政的皮雅斯特（Piast）王朝统治者勇敢者博莱斯瓦夫（Bolesław Chrobry）赎回了阿达尔贝特的遗体，在格涅兹诺（Gniezno）为其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陵墓。从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梅泽堡主教蒂特马尔（Bishop Thietmar of Merseburg）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 （奥托）被带入教堂，放声哭泣，深受触动，向这位基督教殉道者请求恩典。他立刻在当地建起大主教辖区……并将新建的辖区托付给殉道者的兄弟拉迪姆（Radim），让他管辖科尔贝格（Kolberg）主教莱茵伯恩（Reinbern）、克拉科夫（Krakow）主教波普（Poppo）和弗罗茨瓦夫（Wroclaw）主教约翰……他庄重地在建于那里的圣坛中放置了圣物。所有问题解决之后，（波兰）大公向奥托赠送了丰厚的礼物，但更令人高兴的是还有300名身披铠甲的战士。皇帝离开时，博莱斯瓦夫和一支庞大的随行队伍将他带到了马格德堡（Magdeburg），在那里他们隆重地庆祝了棕枝主日（Palm Sunday）。[1]

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奥托此行的背景才是关键。

公元第一千年之初，波兰和波希米亚由讲日耳曼语者统治，人们基本以森林中或大或小的木屋群为中心生活。第一千年末的时候，仍有大片森林，但统治波希米亚的普舍美斯（Premyslid）王朝和统治波兰的皮雅斯特王朝都是讲斯拉夫语的。木屋已被城堡、教堂和披甲骑士取代——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些成了中欧和东欧统治势力的标准配置。不仅如此，波兰中部还成了皇帝愿意到访的地方，成为独立的基督教教区，有自己的大主教。皇帝的到访足以说明，波兰被迎进了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俱乐部。

波兰不是唯一的例子。我们刚才看到布拉格也有一个主教，而尽管波希米亚尚未成为大主教辖区，那里也有相当多的城堡、教堂和骑士。10世纪20年代，统治波希米亚的普舍美斯王朝在好国王瓦茨拉夫（Good King Wenceslas）的带领下，全面改信了基督教。普舍美斯王朝之后的成员在奥托帝国中有时得宠有时失宠，波兰的统治者也是如此，但这两个斯拉夫统治家族始终是欧洲基督教国家俱乐部的稳定成员。实际上，第一个申请加入这个俱乐部并获得认可的斯拉夫实体是大摩拉维亚。它于9世纪中叶在阿瓦尔帝国的废墟上崛起，是第一个改信基督教的斯拉夫国家，在9世纪60年代接待了著名的拜占庭圣徒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当然还有其他传教士）。这两人发明了第一种书面形式的斯拉夫语，用于为新信徒翻译重要的基督教文本。[2]

纷乱的维京世纪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事态也在朝相似的方向发展。从10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以日德兰半岛和丹麦诸岛为基础的强大国家结构，由耶灵王朝（耶灵是他们的起源地）的成员统治。耶灵王朝是从蓝牙王哈拉尔之后才改信基督教的。他们维持着比欧洲大陆斯拉夫人更强的海军能力，也很快建起了城堡和教堂，他们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不同皇帝交往时，有时起争执，有时则受到青睐。很快就出现了丹麦王朝与斯拉夫王朝（特别是波兰王朝）之间的通婚，而这些都属于一个更大的外交和文化圈子。[3]

另外，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扩张有东西两个方向，向东扩张的主要成果之一是留里克统治下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比起西方的王朝，这个王朝改信基督教的时间要晚一些，由于其起源特殊，城堡和教堂建得也比较晚。但也没有晚太久：弗拉基米尔大公（Prince Vladimir）在10世纪80年代末带领国家彻底转向基督教，公元1000年后不久就在基辅建造了著名的献给圣母的什一教堂（Tithe Church）。这个砖石建筑长27米，宽18米，有三条走廊、三个后殿和一个穹顶，是当时欧洲东北部最大的建筑。[4]

可见，第一千年最后的两百年里，具有相当实力的新的政治力量在中欧和东欧各地崛起，那里一度是亚欧大陆西部最不发达的地区。这些势力崛起后，欧洲终于呈现出了基本存续至今的形态：在亚欧大陆的西部，一些彼

此有相似之处、文化上互有联系的政治社会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些新出现的实体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和前两章研究的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扩张模式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是原先蛮族欧洲的某些地区恰好被斯拉夫王朝统治，另一些地区被斯堪的纳维亚王朝统治，还是说移民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政治与发展

在研究第一千年历史的时候，提出问题往往比回答问题容易，其理由无非就是那么几个，不过到该时期结束时，历史资料已经比斯拉夫扩张时代丰富得多了。我们刚才看到，9世纪中叶摩拉维亚改信基督教后，文字终于进入了斯拉夫世界。但在这个时期，书面斯拉夫语只为宗教目的服务，在900—1100年这段时间里，这些新国家中就连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用途都基本限于宗教。直到12世纪初，这些新王朝宫廷中的编年史家才开始撰写本地的历史：在波希米亚，有布拉格的科斯马斯的《编年史》；在波兰，有高卢无名氏的《编年史》；在基辅罗斯，有《往年纪事》。这些文本确实包含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但它们的目标受众是王室和恩主，因此多少有歌功颂德的成分，文本中记述的9—10世纪的事往往近乎神话。[5]

因此，我们往往不得不退回来依赖外人所写的历史，他们来自前述新国家很快就开始接触的西欧和南欧国家。他们写下的文本还是有一般材料都有的可靠性问题，但比罗马作者的作品还是强一些。首先，这些材料中的信息要丰富得多。维京人给波罗的海带来了运输革命，让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有文字的欧洲地区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而摩拉维亚、波兰和波希米亚都在附近。不管怎么说，得益于9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对文化的重新重视，有文字的欧洲记录下了更多的内容。查理曼决心把提升人们的读写水平当作教会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即便在加洛林帝国崩溃之后，人们的读写水平仍在不断提升。而考虑到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作家在东方也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说相关的资料比较丰富了。[6]

第二点与第一点差不多一样重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这些新国家都改信了基督教。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更发达的欧洲（基督教传来的地方）的关系就一直风平浪静。事实远非如此；但既然他们改信了基督教，也就不能像古典作家对待所有的非罗马人那样，将他们一概视为蛮族“外来者”了。1002年，波兰之行过后不久，奥托三世又踏上了旅程，这次他去见了上帝。由于他没有儿子，他的堂兄亨利二世（Henry II）继位。亨利二世登基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了与波兰之间超过10年的战争。梅泽堡的主教蒂特马尔对战争过程精心记述，而尽管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蒂特马尔却没有妖魔化波兰人。从蒂特马尔对亨利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这么写的部分原因在于波兰人是基督徒：蒂特马尔指责亨利和还是异教徒的易北

河斯拉夫人结盟，一起对抗波兰人。[7]

此外，对这些新兴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国家的研究，也从苏联时代的战后考古大行动中受益匪浅。当然一开始总会有些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但因为考古发现非常丰富，所以那样的说法在柏林墙倒塌前就失去了可信度。总体而言，归功于苏联时代的发现，学术界掌握的信息大大丰富了。总之，关于这些新王朝和它们建立的政治结构，文字和考古资料都提供了大量信息。基于这些信息，我们能对这些新国家的运作方式得出怎样的看法呢？

国家和边缘

就像4世纪罗马帝国边缘的那些实体一样，这些新实体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现代的“国家”概念。罗马边境地区那些基本由日耳曼人统治的政治体能力有限，无法采取集中化、有组织的行动。从政治上讲，它们算是联邦，也就是说，除了统治全体的统治者，还有一些也许只在地方上掌握实权的“国王”。这些实体中，中央能够调配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也是有限的。国王的随从可能只有几百人，尽管加起来整个集团可以投入超过1万的兵力。同样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实体有能力建造维护防御工事或其他类型的纪念物。这些实体的规模也不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罗马人的反制措施，而东边哥特特温吉人的领土则覆盖了从多瑙河到德涅斯特河的大片区域。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第一千年末期崛起于北欧和东欧的政治实体都更为强大。

从地理上讲，9—10世纪的这些新国家是很庞大的。罗斯国南至基辅，北到诺夫哥罗德，西至第聂伯河，东至伏尔加河，总面积达到或接近惊人的100万平方千米。其他国家也比罗马晚期的那些国家大得多。波希米亚是最小的，但这个名称有误导性，因为波希米亚王国通常包括现在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9—10世纪时称为摩拉维亚），比任何罗马附属国统治的地区都大得多。同样，波兰的皮雅斯特王朝统治的范围一般是从奥得河一直到维斯瓦河以外的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这样巨大的领土面积在第一千年中叶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是丹麦，也比现代的丹麦更大。耶灵王朝迅速整合了丹麦和邻近岛屿中那些最大的岛屿［厄兰岛、斯科讷岛（Skåne）和西兰岛（Sjaelland）］，势力范围也扩展到了挪威南部几乎所有最肥沃的土地，尤其是奥斯陆峡湾附近以及现在的瑞典西部。水域将这些不同的部分结合到一起（这符合维京人的传统和第一千年的交通方式），让蓝牙王哈拉尔及其儿子斯韦恩（Svein）和孙子克努特（Cnut）掌握了足够强大的权力根基，他们可以由此出发，通过从1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20年战争，征服人口众多、繁荣富裕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8]

从政府能力，也就是政府拥有的权力和实施权力的机构看，后来这些实体

与罗马时期那些附属国间的差别就更大了。考古发现，后来这些国家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城堡。这些新的政治势力有大量建造城堡的能力。到1000年，皮雅斯特王朝已经在其领土上建了至少50个城堡。普舍美斯王朝也使用驻军要塞来控制其中心区域。在这方面，10世纪的摩拉维亚王朝紧随其9世纪的先行者。皮雅斯特和普舍美斯的防御工事主要用木头建造（用“防御工事”而不用“城堡”，是为了防止有人联想到另一个时代的宏伟建筑，比如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建的城堡），但摩拉维亚人很快就学会了用石头建造，而且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一位编年史家写道，869年，加洛林的军队在拉斯蒂兹（Rastiz，可能是如今捷克共和国内的梅斯托州）遇上了“无法逾越”的防御工事（可能是用石头建造的），深感沮丧。在先前的战争中，他们总能一路烧掉摩拉维亚人设下的障碍，但再也不是如此了。摩拉维亚人还使用设防的中心来控制陆地。他们位于尼特拉（Nitra）的主要政治中心周围环绕着多个堡垒：德文（Devin）、诺维伏伊（Novi Voj）、科利卡（Kolyka）和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

同样，基辅罗斯的各个人口中心也得到了充分的防御，但这里的考古发现更多反映出留里克的力量。从基辅向南和向东延伸100多千米的是“蛇墙”（Snake Wall）：城墙最初高3.5米到4米，外面有12米的壕沟加强防卫。它们是在11世纪之初建造的（因此，在这本号称写到公元1000年为止的书里谈它也算合适），为的是应对佩切涅格人的带来的威胁；佩切涅格人是新近闯入黑海以北邻近草原的游牧民族。这些新兴的斯拉夫王朝可以说是建造城堡的老手，这个习惯至少也部分传给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战后丹麦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是一批设防的权力中心，而得益于年轮学，这些中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蓝牙王哈拉尔统治的时期。它们被命名为“特雷勒堡（Trelleborg）要塞”，因为第一个发掘出来的中心位于特雷勒堡，它们大小各异，但都是精美的圆形遗迹，内部对称地分布着大礼堂。除了这些要塞，耶灵王朝并不热衷于建造城堡，毕竟其统治下的各地主要由水路而非陆路连接。尽管如此，第一千年晚期的遗迹还是凸显了这些新国家进行协同建设的惊人能力。罗马附属国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在国王的山堡周围建起围墙（阿勒曼尼人），或是修复既有的罗马防御工事线（特温吉人），而就算只做这些事，也有可能让群体的忠诚崩溃。而周围有防御的单独住宅（比如阿勒曼尼的那些），反映的是国家或类国家实体的公共权力（如第一千年晚期建筑的规律性和规模反映的那样），还是某个重要人物的势力，我们尚不清楚。[9]

这些新国家筹建和维持部队的能力也很了不起。显然它们得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光建城堡而不派驻军是毫无意义的。关于摩拉维亚，我们没有很详细的证据，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们一心征服这片土地，却以失败告终，率先崛起的这个新国家的总体军事实力可见一斑。关于波兰的证据更为明确。首先，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告诉我们，皮雅斯特国王有能力用自

己的钱养活3 000名身披铠甲的骑士。这个数字可能有问题，但军队性质没问题，因为在公元1000年的大主教协议中，勇敢者博莱斯瓦夫承诺在皇帝需要时提供300个“身披铠甲”的人来协助他。

这里的关键词在拉丁语中是loricati，意为“锁子甲”（coat of mail）。锁子甲是当时最昂贵的军事装备，配备这种昂贵装备的士兵成为军队中的主导力量，是第一千年末期的革命性发展。皮雅斯特的随从们如此装备完全符合潮流。根据伊本·法德兰的记载，勇敢者博莱斯瓦夫承诺在需要时派出300名士兵，那么他随从的总人数可能有几千人，因为没有人会同意派出全部的兵力去外国打仗。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随从只是皮雅斯特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而战争机器的基础是对较广泛人群中的至少一部分施加军事义务。11世纪初的资料也没有给出全部的统计，但是在针对奥托的继任者亨利的战役中，我们看到了一支有数千名战士、能够分组共同作战的皮雅斯特军队——1003年，抵抗亨利的帝国军队的是一支3 000人的部队，而波兰还有另外3支这样的部队。最惊人的是开销。罗马晚期的日耳曼随从部队只有几百人，而从种种迹象判断，当时的锁子甲仅配备给少数精英。据记载，皮雅斯特可以维持10倍规模的随从队伍，还能为他们所有人配备最新的装备。关于资金从何而来，并没有当时的文献流传下来，但从后来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皮雅斯特控制的地区都由离得最近的城堡管理，产生的收入中，三分之一交给城堡指挥官，应该一部分用于维持驻军，而三分之二交给了国王。也许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收入来源，但这一系统的前身可能有助于皮雅斯特王朝维持军事力量。[10]

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军事力量模式是相似的，也必须如此。皮雅斯特、普舍美斯、留里克这几个王朝经常互相开战，力量对比随情况变化（主要看哪个国家的王朝陷入了危机），摇摆不定。如果三个国家不能部署规模和性质大致相当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在一份与拜占庭帝国签订的条约中，基辅罗斯同意承担的义务之一是在需要时向皇帝派遣一支数千人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在面对一场重大动乱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保住了巴西尔二世（Basil II）的皇位。由此可以看出基辅罗斯军队的整体规模，因为这支远征军只是基辅罗斯军队的一部分。军队的兵员，一部分是职业的军事随从（叙事资料中多次提到他们），一部分是从王国内主要定居点征召来的分遣队。我们不知道随从规模的具体数字，但是《往年纪事》记下了两个地区分遣队的详细情况。一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分遣队在1015年的内战中非常突出，而来自切尔尼戈夫的另一支分遣队则在1068年的另一场内战中表现出众。据说两支队伍的人数都达到了3 000。早期的波希米亚资料中也提到了随从，但直到后来，文件中才有了关于普遍军事义务的记录。但我相信，如果只靠随从，波希米亚的统治者们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的。[11]

耶灵王朝很少参与这些王朝间的斗争，但确实需要抵抗历代皇帝的敌意，而且正如我们所见，斯韦恩（986/987—1014年在位）和克努特治下的丹麦完全有能力维持进攻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部队。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还有争议。他们是只用了随从和雇佣军，还是也凭借更普遍的军事义务征召了部队？在13世纪的丹麦文献中，征召来的部队称为leding，当时的国王已经能组建起号称有1 000艘船、每艘船40名战士的船队。斯韦恩和克努特肯定用到了雇佣军（lithsmen），但争论点在于他们是否也用到了征召部队的前身。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用了。规定和动员军事义务属于统治者的基本权限。如果耶灵王朝的统治者不能在至少一部分领地内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算有势力。这也体现在一些更详细的证据中。《致埃玛王后的赞美诗》（*Encomium of Queen Emma*）——埃玛先后是昏庸者埃塞尔雷德（Aethelred the Unready）和斯韦恩之子克努特的妻子——中写道，斯韦恩在集结远征军时下令“奴隶、被释奴和出身低微者不得参加”。这听起来像是总动员令。显然，海外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例如维京时期在苏格兰诸岛上建立的社会）已经迅速组织起来并明确规定了军事义务。[12]

这些中央政治机构的权力不仅限于发动战争。前文提到的位于基辅的弗拉基米尔什一教堂，在当时就相当于帝国大厦（至少就直到第聂伯河的地区而言），但它只是弗拉基米尔在斯塔洛基辅斯卡娅（Starokievskaia）山上建造的大型宫殿建筑群的一部分。教堂的南面、西面以及可能还有西北面分别建有两层高的石头礼堂，每个礼堂长40多米。所有地面都铺有釉面瓷砖，其图案包括雄鹰（帝国最古老的象征之一），并装饰有马赛克和绘画。其他建筑的恢宏程度也不相上下。在大摩拉维亚发现的最宏伟的基督教教堂建于米库尔奇采（Mikulčice），面积达400平方米，与什一教堂的规模十分接近，但我们对其装饰知之甚少。这是已知建于9世纪摩拉维亚的25座石头建造的教堂之一，可能还有许多木头建造的教堂。丹麦和波希米亚也迅速建起了一批比较宏伟的教堂，特别是分别位于罗斯基勒和布拉格的主教堂。由于独立的大主教辖区建立得很早，皮雅斯特王朝在宗教竞赛中击败了对手。波兹南（Poznan）的教堂是一个巨大的三通道大教堂，面积不小于1 000平方米，而格涅兹诺的阿达尔贝特墓则由勇敢者博莱斯瓦夫装饰，上面有一个纯金十字架，据说是他体重的三倍。据估计，到1025年博莱斯瓦夫逝世时，皮雅斯特王朝的大波兰中心地带已经又建了三四十座教堂。[13]

这些新国家的行动能力也体现在交通领域。叙事资料中有一些零星的相关证据，比方说桥梁和道路的建设在《往年纪事》中就很突出。波兰和波希米亚最早的修道院文件中记录，为建造桥梁和道路而征用劳动力是王室的权利，哪怕土地被移交给教堂，王室也不会放弃这项权利。换句话说，这片土地上的劳动力会定期被统治者征用去建造公路。丹麦考古学家的发现说明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他们在战后挖掘出的另一瑰宝是莱夫宁桥

（Ravning Edge Bridge），还是依靠年轮学，它的年代被明确定在蓝牙王哈拉尔统治时期。这座桥有1千米长，一部分是堤道，一部分是在日德兰半岛中部特别潮湿的地方架起的桥梁。它需要400个独立节段和1 700个桥柱来完成。它固然比不上金门大桥，但仍是人们下定决心完成的宏伟工程，是人们为使北欧平原的沼泽地区更适合陆运而做的种种努力之一。[14]

从上述不同方面看（我仅选择了几个例子），北欧和东欧的新国家确实表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它们对人口享有相当大的权力，能动员精英去参加战斗，征用较穷的人去建造道路、宫殿、教堂和防御工事，还可以调动经济资源来供养统治者及其庞大的随从队伍，更不用说与之相关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了——在王室的赞助下，该群体的规模正在迅速增加。毫无疑问，这样的成就使当初罗马帝国边缘出现的政治结构相形见绌。话虽如此，新的国家仍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受到很大制约。

虽然书写在这些国家中的重要性比在4世纪的罗马附属国中略高，但它们的行政或书面记录还是很少。国际条约只是偶尔以书面形式订立。《往年纪事》中有两份基辅统治者和拜占庭帝国在911年和944年订立的贸易条约的文本。所有内部证据都表明这些文本是真实的，但《往年纪事》是条约签订200年以后才编纂出来的。教宗档案馆里也有一份简短但重要的文本，称为“达戈梅大公”（*Dagome Iudex*）。它的摘要大约在1080年被抄录到教宗格列高利七世的名册中。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摘要作者错误地认为该文本谈的是撒丁尼亚！），事实上，这是第一千年末期一场国家间斡旋的文件，记录的是在991年，皮雅斯特王朝统治者梅什科一世（Miesco I，也就是勇敢者博莱斯瓦夫的父亲）承认教宗对他的王国有名义上的统治地位，以换取教宗为波兰在皇帝面前游说。波兰的原件丢失了；但很明显，奥托公元1000年波兰之行的一些外交背景得到了书面记录。[15]

在内部资源的管理上，文字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本书讨论的历史阶段中作用很小。波希米亚最古老的书面土地赠予记录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它们详细记录了王室土地如何被赠予受青睐的修道院，也让我看到国王是如何与新兴的宗教机构分享自己对人民及其劳力的权利的。但即使在波希米亚，这种文本也很少，而且不同文本间往往相隔很长时间，而在其他大多数新国家中，直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了关于授予的书面记录，基辅罗斯则是在12世纪。正如这些国家中留存下来的实体纪念物所暗示的，这些早期文件表明统治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权利确立已久，而且像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英格兰一样，这些国家有能力评估人口和土地的经济潜力，也有能力记录相关义务的履行情况，但文本很少，可见很多这样的事都没有得到书面记录。

这也得到了这些国家流传下来的其他类型书面文件的佐证，比如正式的法

律法规。公元1000年以前，以书面形式颁发规章制度的证据都来自教会机构。例如，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在摩拉维亚翻译成第一种斯拉夫文字的书面材料中，就包括了拜占庭的教会法文本《东方教会法纲要》（*Nomokanon*）。教会法的书面文本在波希米亚也出现得比较早，现存的文本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下半叶。而尽管编年史中有提到具体王室法令的可信记录，统治者执行法令的能力也体现在实物上，但这些国家以书面形式编纂的王室法令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波兰和罗斯的第一部世俗法典出现在13世纪，但就算是这样的法典，也更像是对现有习俗的汇编，而不是象征王室权力的纪念物。即便到了这么晚的时候，实际的法律权力也更多掌握在地方当局手中。与西欧对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教会法律文本在7世纪初由传教士传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而直到10世纪，王室立法才开始一致采用书面形式，到了12世纪末和13世纪，英格兰君主才建立了复杂的法律官僚机构和记录保存系统——如果没有这些，人们就无法将案件提交给由中央组织的法院。[16]

但是，官僚机构欠发达不是我们将这些新实体视为有限国家组织形式的主要原因。在关于它们950年至1050年间历史的整体叙述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似乎能轻易交换大片土地。就拿摩拉维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斯洛伐克）来说吧。它在博莱斯拉夫一世（Boleslav I，929/935—967/972年在位）时期落入波希米亚的普舍美斯王朝之手，然后在1003年被勇敢者博莱斯瓦夫统治下的波兰控制，1013年又给了普舍美斯王朝，1017年又落入皮雅斯特王朝手中，两年后又回到了普舍美斯王朝的统治之下。摩拉维亚在东欧的易手简直就是击鼓传花，而其他一些地区也有相似的历史。西里西亚和弗罗茨瓦夫在10世纪中叶被普舍美斯王朝控制，989—990年到了皮雅斯特王朝的梅什科一世手中，1038年又回到了普舍美斯王朝的控制之下，最后在1054年彻底给了皮雅斯特王朝，而作为回报，后者每年支付230千克的白银和14千克的黄金。波兰南部的克拉科夫经历了类似的皮雅斯特/普舍美斯身份危机。在如今的波兰东南部，从布格河上游（Upper Bug）到喀尔巴阡山脉的地区也几经易手，不过是在皮雅斯特王朝和留里克王朝之间。从弗拉基米尔时代的981年起，它在留里克王朝的控制之下，在1018年改为由皮雅斯特王朝控制，然后在11世纪30年代又到了留里克王朝的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手里。

在耶灵王朝领土的外围地区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模式，虽然规模略有不同。奥斯陆峡湾周围的挪威南部一直在与更西边的敌对领主竞争：先是10世纪90年代的奥拉夫·特里格瓦森（Olaf Tryggvason），后是奥拉夫·哈拉尔森（Olaf Haraldsson）的王朝——中世纪的挪威国王就是由此而出的。如今瑞典的西海岸这片地区，最终也被更东边的瑞典国王从耶灵王朝的控制下夺走了。[17]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说这些国家有明确的领土边界是不符合当时的情况的。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王朝的控制权都很不稳

固。

不过，这些王朝的领土内都有一个治理程度比较高的核心地带，统治者始终能加以控制，也很少会落入其他王朝之手。皮雅斯特王朝的心脏地带是大波兰地区，这片土地的中心在格涅兹诺，奥得河、瓦尔塔河（Warthe）及维斯瓦河之间，奥托三世曾在1000年到访此处。10世纪的皮雅斯特城堡分布标明了其范围（地图20）。普舍美斯王朝在波希米亚的统治以布拉格及周边的地区为核心，早期普舍美斯要塞的分布同样标出了其范围。上一章提过，基辅罗斯有两个中心：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南部基辅周围的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即便在小得多的丹麦，耶灵王朝对日德兰半岛和各主要岛屿的控制也更直接、更稳固，对在不同时间被并入克努特的波罗的海帝国的地区的控制则弱一些。1003—1004年，普舍美斯王朝经历了极为严重的危机，皮雅斯特王朝的波兰驻军来到了远至布拉格的地方，但为时很短，波希米亚于1038年对格涅兹诺的吞并也没有维持多久。除此之外，各个王朝都牢牢控制着各自的核心地区。我们显然需要从“核心”和“边缘”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国家：它们对核心领地的控制更牢固、更深入，而边缘领地受王朝兴衰影响较大，更容易落入他人之手。

这是中世纪早期的常见模式，多见于较少依赖官僚机构来获得凝聚力，而更多仰赖君主的权力和个人魅力的政治体。展现君主权力和个人魅力的经典方式是定期巡游。统治者在王国中巡行，与手下的军人一起进食，到各处聆听广大子民的想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个人政府在小王国中运作得很好，但领地规模扩大后，通常会出现“核心/周边”的模式。大致经验法则告诉我们，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真正能控制的只有他们经常巡行的地方。种种证据表明，巡游是北欧和东欧这些新实体的关键治理机制。例如，最早的波希米亚和波兰文本提到，统治者的主要经济权利包括接受食品进奉，这是巡游中的统治者养活自己和随行人员的基本手段。受交通条件限制，进奉的食品都在靠近来源的地方享用，而不是运输到指定的王室中心。皮雅斯特王朝和普舍美斯王朝建的那些较大的城堡应该是当地的食品集散中心。[18]

基辅罗斯的起源不同，一开始，政治上的巡游对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收集皮草、奴隶和其他贸易品的活动而言并不重要，尽管这些东西往往是在冬季巡回的路线上收集来的。不过，到了10世纪后期，巡游机制以及中世纪早期政府的更常规模式已经得到确立。我们尚不清楚所需的交通条件是何时具备的。但《往年纪事》的记录显示，伊戈尔的遗孀奥尔加（Olga，约890—969年，摄政时期为945—约963年）除了为丈夫之死而向德列夫利安人（Derevlians）报仇外，还在他们的领土内建了不少城镇、贸易站和狩猎场，北至诺夫哥罗德附近，南至第聂伯河及其支流杰斯纳河（Desna）附近的地区。狩猎是王室的主要娱乐活动，也是统治者的随从

们在大多数下午主要从事的工作。弗拉基米尔·莫诺马库斯（Vladimir Monomachus）的遗嘱告诉我们，他一度每年打猎100次。因此，说来有点奇怪，王室猎场往往是政府开始规律运作的重要标志。我认为，奥尔加有可能将已在基辅这个主要政府中心附近建立起来的统治和支持机构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19]

耶灵王朝的丹麦国王们最终也开始巡游。早期的一些工程（例如莱夫宁桥）显然是为了提高陆路旅行的效率而建的，很可能是考虑到了王室的巡游。如果不是为了君主的巡游，很难看出特雷勒堡要塞还能派什么用场。最初发现要塞时，人们认为那是为斯韦恩和克努特征服英格兰的军队专门建造的基地。但是，这些要塞的实际建造年代要早于那个时代，它们是在斯韦恩的父亲蓝牙王哈拉尔的统治期间建起来的。而且，正如不少人注意到的，这些要塞的布局是无法直接服务于军事需要的。仔细检查就能发现，看似相同的建筑实际上具有多种用途：有些配有壁炉，可以作为住宅或娱乐场所，有些则是储藏室，还有一些供匠人（如铁匠甚至金匠）使用。[20]在我看来，这一谜团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建造这些要塞是为了协助蓝牙王哈拉尔通过巡游来表明其政治实权，这是耶灵王朝统治领土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此，我们看到了北欧和东欧这些新国家的一个矛盾之处。它们展现出了不起的统治能力，有办法在广袤的地理区域中建起权力机构，但同时，它们又很脆弱。由于官僚机构不发达，它们能完全控制的只有范围相对较小的地区，而在王朝面临危机的时候，大片的边缘地区很容易被敌对势力夺走。巡游君主的统治基本可以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些王朝从何而来，一开始又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的？

王朝

事情发生在995年，圣瓦茨拉夫纪念日的早晨，利比采（Libice）与易北河交汇处的波希米亚东部地区。当时并没有圣诞颂歌《好国王瓦茨拉夫》里唱的那种厚厚的积雪，因为圣瓦茨拉夫纪念日在9月28日。地点也不是颂歌里唱的森林围栏边的阿格尼丝泉，而是在木头搭建的利比采城堡之外。该城堡是斯拉夫尼克（Slavník）这个显赫家族的总部，领导家族的目前是斯拉夫尼克的儿子索比伯（Sobibor）。他的7个兄弟中有4个在城堡内，他自己则在去德意志拜访皇帝的途中。宁静被喧嚣和暴力破坏。策划这场破坏的是博莱斯拉夫二世，他是好国王瓦茨拉夫的侄子，也是另一个波希米亚大家族——普舍美斯家族的现任首领。迅速而果断的行动过后，建筑群和城堡都被烧毁，斯拉夫尼克家族的男人和他们的随从都被消灭。这次极为有效的打击彻底摧毁了斯拉夫尼克家族的力量，其有效程度可以和1929年2月发生的事相提并论——那天，疯子莫兰（Bugs Moran）的德

国/爱尔兰帮派“北边帮”的6名成员（加上一名不幸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机修工）在车库墙边排成一行，被阿尔·卡彭（Al Capone）的意大利帮派“南边帮”的枪手枪杀。995年唯一少了的是伪造的不在场证明。阿尔·卡彭给自己安排了在佛罗里达的假期作为不在场证明，博莱斯拉夫二世可不需要费这个劲。[21]

这是个精彩的故事，不仅如此，圣瓦茨拉夫纪念日的大屠杀还完成了催生普舍美斯王朝治下的波希米亚的政治进程。由于靠近法兰克帝国边境，文字传统也出现得比较早（在10世纪产生了两批本土文献，一批是10世纪30年代围绕瓦茨拉夫的文本，另一批是10世纪末围绕阿达尔贝特的文本），波希米亚成了我们这个王朝崛起研究中记载最充分的个案。我们也得以建立理解中东欧新崛起的王朝的思维框架。显然，各个王朝崛起的政治过程肯定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共同点很多，波希米亚是可以充当中东欧新王朝运作方式的一般模型的。

从历史资料中，很容易分辨出故事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个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公元800年之后，查理曼摧毁了阿瓦尔帝国，波希米亚出现，它划分为一系列有各自领袖的独立政治单元（法兰克资料称这些领袖为duces或大公，但这种称呼的意思是“领袖”，并没有现代英语中那种世袭公爵的意味）。从9—10世纪资料展现的一系列片段中可以看出，普舍美斯家族是不同的领袖派系相互厮杀后留下的那一个，其崛起是个适者生存的过程。

第一个片段发生在845年，当时，来自波希米亚的14位大公在法兰克国王日耳曼人路易的复活节礼堂接受洗礼。他们有14个人，可见每个人统治的区域范围都比较小，而大公的人数很快就减少了。872年，只有5名波希米亚大公出现日耳曼人路易的宫廷，895年就只有两名了。大公人数减少，和史料有一定的关系。比方说，我认为凭现有的史料，还不足以确定早在895年，权力游戏中就只剩下了两个主要的领袖。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普舍美斯和斯拉夫尼克这两个家族在最后对战之前就存了一个世纪，而这似乎不太可能。不过，基本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波希米亚国家的形成，是查理曼摧毁阿瓦尔帝国后差不多200年间政治进程的结果，在此期间，一个领袖派系消灭了其他派系，控制了更大范围的核心区域。与在第一千年早期日耳曼群体的经历的类似进程一样，并非每个阶段都像圣瓦茨拉夫日大屠杀那样暴力。其他一些原本平起平坐的家族可能更愿意接受降级而不是被消灭。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一过程中常常出现暴力。[22]

据我们所知，类似的王朝游戏催生了另外两个在阿瓦尔帝国废墟上崛起的新国家：大摩拉维亚和波兰。大摩拉维亚是最早出现的，形成于9世纪中叶。约800—820年的加洛林资料约略提到，阿瓦尔帝国在中欧的统治瓦解后，该地区出现了一批有各自领袖的小规模政治群体。有个名叫伏伊诺米尔（Vojnomir）的人支持法兰克人去对抗阿瓦尔人，然后一个叫马诺米

尔（Manom ir）的人活跃了一小段时间，而柳代维特（Ljudevit）则领导了一场反对加洛林统治的大起义。现有资料不够完善，无法重构不同家族互相结合、互相对抗，形成大摩拉维亚这个更大实体的具体政治过程。但大摩拉维亚显然是这么来的，史料中有一些片段可以体现。第一个地位突出的摩拉维亚统治者，也许是这个显赫王朝的真正奠基人，是莫伊米尔（Mojmir）。加洛林的资料记下了9世纪3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此事件的发生时间只能确定在833—836年这个范围内）。莫伊米尔将竞争对手普里比那（Pribina）大公赶出了斯洛伐克的尼特拉，将更大的区域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有了这个权力基础后，王朝继续扩大控制范围。在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加洛林尚能遏制摩拉维亚向西方扩张的野心，但随着加洛林帝国在9世纪90年代初衰落下去，摩拉维亚人获得了对波希米亚行使霸权的权利。要不是游牧的马扎尔人到来，成为中欧的一支主要力量，在896年终结了摩拉维亚人的野心，摩拉维亚的统治者肯定还会继续扩张。[23]

如果我们手上只有这些历史资料可用，那么皮雅斯特治下波兰的崛起就是个谜团。皮雅斯特王朝梅什科一世统治下已完全成形，在10世纪60年代突然出现在奥托王朝在的纪事中。这个新的波兰国家的心脏地带在维斯瓦河以西，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直接边境地区之外。它离帝国统治的地区太远，我们的编年史资料没法记录它的成长过程。甚至连佚名的巴伐利亚地理学家都不知道当时东边土地的政治格局。不过要感谢年轮学带来的奇迹，考古证据（通常更能体现长期的发展，而不是短期的政治情况）至少很好地体现了皮雅斯特王朝崛起的最后阶段的情况。由于这个王朝的城堡是木头建造的（1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城堡基本都是），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精确判定其建造时间的方法。结果是革命性的。

第一个波兰国家的出现曾被认为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政治巩固过程，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大的地区逐渐落入同一个王朝的控制。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长期发展对创造必要的条件固然至关重要，但考古发现清楚表明，皮雅斯特王朝崛起的最后阶段是突然而猛烈的。皮雅斯特王朝建造城堡集中在10世纪的第二个25年间，表明该王朝跨出最初作为基地的小片区域，迅速控制了大波兰广大地区（地图20）。不仅如此，在许多这样的地区，皮雅斯特王朝的城堡取代了规模更大的防御中心——这些防御中心通常可以追溯到8世纪，而且其中很多防御中心被摧毁的时间就是皮雅斯特王朝开始建立城堡的时间。结论再明显不过了。皮雅斯特波兰这个在10世纪中叶突然进入历史的政治实体，在创建过程中摧毁了长期存在的地方社会，用皮雅斯特的军事力量施加压力。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地方社会中有多少个是“部落”（用这个词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词了），也就是佚名的巴伐利亚地理学家列出的西方斯拉夫世界中的那种单元，我们也不清楚地方社会在这片区域中是如何分布的。[24]就像大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一样，新波兰

国家的出现是王朝斗争的结果，皮雅斯特王朝消灭了较古老的敌对政治单元的领袖。

关于留里克王朝的崛起，也有很多地方不清楚。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往年纪事》主要关注基辅，而且是在留里克王朝已经获得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写的，因此没能阐明早期罗斯历史的复杂性。至少在目前阶段，考古给出的图景也不像皮雅斯特的波兰那么精确。但不管怎么说，斯堪的纳维亚人进入俄罗斯的基本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使留里克王朝得以建立国家的关键政治发展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除了别的问题外，《往年纪事》对政治权力何时、如何从北方的戈罗季谢转移到基辅的叙述也完全无法令人信服。《往年纪事》所记的权力转移时间比实际情况早了一代人，而且，其中有关奥列格（与基辅有关的第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与伊戈尔（留里克的儿子和继承人）间关系的叙述比较零散，似乎被审查过，可能掩盖了王朝的不连续性（或者至少说是混乱）。《往年纪事》还告诉我们，奥列格在北部集结军队，强行控制第聂伯河中游地区。但故事的结尾是，在这些行动结束之后，诺夫哥罗德每年要向奥列格纳贡300格里弗尼（grivny），以换取和平。《往年纪事》称，这笔款项一直支付到雅罗斯拉夫大公于1054年去世为止，12世纪初的《往年纪事》编纂者应该能够知道这么晚近的事。因此，应该的确发生过纳贡的事。但是，为什么故事中从北方来的统治者征服南方后，却去要求北方纳贡呢？

除此以外，还有两个大问题。首先，与拜占庭的贸易条约证实，直到10世纪，非留里克家族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还对自己统治下的俄罗斯定居点有很大的自主权，因为他们在谈判中有各自的代表。其次，对于10世纪末之前的留里克王朝，《往年纪事》只保存了一个非常简化的版本。10世纪末以后，书中提到的权力代际交接总会涉及许多竞争者和内部冲突；而对于那之前的王权继承，哪怕我们知道早期的大公都是一夫多妻（他们的继承者也是如此），《往年纪事》每次也只提到一个儿子，所叙述的权力交接过程也非常平稳。

这些都不可信。944年与拜占庭签订的贸易条约告诉我们，伊戈尔有两个侄子，地位重要到需要单独列出他们的名字，而在《往年纪事》的其余部分中，这两人以及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再也未被提及。我们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被修改了，为的是给人以留里克王朝统治稳固的印象。奥列格的故事也是如此：他究竟是留里克的一位先征服基辅又统治北方的旁系亲属，还是说，他完全是个外来者，也许通过联姻进入了留里克王朝，以在事后合法化自己的统治？还有，权力后来是怎么从他那里传到留里克的儿子伊戈尔手中的？很难相信奥列格没有自己的继承人，而这些人身上又发生了什么？10世纪初的罗斯政治显然比《往年纪事》想要我们相

信的混乱得多，独立的维京首领和自立王朝都为了地位而激烈斗争。

我们无法掌握这些内部政治斗争的所有细节，但大致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有位评论家意味深长地说，在这个阶段，这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个“高级版本的哈得孙湾公司”。它由主要河道各个中心点上基本独立的贸易团体组成，贸易团体间的关系非常松散，只是都得向其中最强大的团体支付保护费。它们仅在某些情况下协同行动，例如团结起来要求拜占庭人提供有利的贸易条件，也毫无疑问会实施一些价格垄断。因此，罗斯国首先是作为这些商人的保护伞出现的，其中有等级划分，而且肯定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即便如此，最初那些商人冒险家或其后代仍保有相当大的权力和独立性，直到944年都还统治着自己的地盘。[25]

但到了11世纪，这类有自己地盘的非留里克王朝统治者就消失了。到了这个时候，解决留里克王朝代际权力交接时动荡的方法，往往是给每个有资格的竞争者一个权力中心。1000年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往年纪事》具体列出了弗拉基米尔授予他12个儿子的12座城市，这些孩子是他5个更正式的妻子生下的。至于他在维什哥罗德（Vyshgorod）的300个嫔妃、别尔哥罗德（Belgorod）的300个嫔妃以及别列斯托沃（Berestovoe）的200个嫔妃还为他生下了多少孩子，并未得到记录。然后，到了10世纪的某个时候，第一代商业诸侯的后代们被削弱了自主权，他们以前的自治定居点变成了王朝的封地。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平稳的过程，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奥列格对阿斯科尔德和迪尔的镇压（如果可以作为历史佐证的话）就是这样的行动。《往年纪事》还记录了之后发生的类似行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两个儿子雅罗波尔克（Yaropolk）和弗拉基米尔内战时，新的商业定居点还在不断建立。罗格沃洛德（Rogvolod，或Ragnvaldr）和图里（Tury）这两名斯堪的纳维亚领袖在波洛茨克（Polotsk）和图罗夫（Turov）建立了自己的贸易中心。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没有记录，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两个中心就出现在了分配给弗拉基米尔12个儿子的12座城市的清单中——显然，他们出局了。也是在这场内战中，另一个也有自己地盘、历史显然更长的统治家族——斯韦纳德（Sveinald）家族也灭亡了。[26]我们不了解独立的商人派系被镇压的完整情况，但这样的事显然发生了，也代表着商业定居点发展为成熟的政治联盟的最后阶段。尽管罗斯国的独特起源意味着留里克家族开始时是若干商业诸侯中的一个，而不像皮雅斯特家族和普舍美斯家族那样是几个地方部落群体中的一个，但暴力的王朝争斗同样是国家形成过程的核心。

这些新国家中的最后一个——丹麦——也是如此，但丹麦的情况与阿瓦尔继承国的有很大不同。在日德兰半岛中部耶灵的小定居点，有一座不是很大的教堂和两个大土墩：北面的土墩直径65米，高8米，南面的则是直径77米，高11米。在北面的土墩中，有一个木头搭建的密室，根据年轮学判

断建于958年，这差一点就成了戈姆国王的最后安息之地。戈姆的儿子兼继承人蓝牙王哈拉尔原本将父亲埋葬在那里，但他自己改信基督教后（大约在965年），就将父亲的遗体移到了教堂。和摩门教徒一样，哈拉尔希望先人也能受益于他的新宗教。除了改变遗体的安葬之处，他还立了一块巨大的如尼石，其铭文到今日仍然清晰可辨：“哈拉尔立了这些纪念碑，以纪念他的父亲戈姆和他的母亲瑟尔（Thyre）。正是这位哈拉尔赢得了整个丹麦和挪威，并使丹麦人成为基督徒。”

丹麦的情况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这也适时地警告我们，政治发展并不总是一路向前。如我们所见，在维京时代之前，至少从8世纪中叶“丹麦人的防御工事”建立开始，日德兰半岛南部就有了强有力的集权政治结构。但随着维京人带来的新财富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个王国被摧毁了。可以说，有多少财富就有多少战士，而有多少战士就有多少权力，因此，新财富越来越多，必然引发政治革命。旧王国崩溃，是因为出现了太多能够买到军事力量的“国王”，使得政治不再稳定。[27]

10世纪中叶，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出现了。一方面，国王的数量似乎减少了。维京时期的资料表明，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有许多国王。除了在日德兰半岛南部争夺政权一个大家族或两个独立家族（戈德弗里德、哈拉尔及其子孙）之外，9世纪挪威奥斯陆峡湾以西的韦斯特福尔以及博恩霍尔姆（Bornholm）岛上还有更多自治的国王。东边的比尔卡和瑞典也有国王。大军时代，从9世纪60年代起，西方水域也出现了不少国王，他们肯定都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根据我的计算，在不同材料中被提到名字的有十几个人，但这并不代表什么人都能自称“国王”，我们也知道一些地位稍逊的人（伯爵）不会自称国王。相比之下，从蓝牙王哈拉尔的时代起，历史叙述只会在讲到瑞典（偶尔也有挪威）时提到其他“国王”。可见该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也是），从原先的“来自极其重要家族的人”变成了“大片领土的统治者”——这也是这个词在今天的意思。[28]

话虽如此，在9世纪后期的混乱中，耶灵王朝似乎确实控制了一些原本有各自首领的领土，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当然，也许是耶灵王朝的成功让“国王”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另外一段铭文中，戈姆的妻子瑟尔被称为“丹麦的骄傲”。有人基于当时的用法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900年前后，“Denmark”中的“mark”意为“与丹麦王国接壤的地区”；换句话说，这里是丹麦王国主要中心以外的地区，也许是日德兰半岛北部或波罗的海南部诸岛。因此，尽管历史背景存在巨大差异，但耶灵王朝与刚才谈到的其他王朝一样，是逐渐积累起政治势力的，也就是将从前独立的地区并到一起。此过程由戈姆开始并由后续的王朝成员继续进行。利姆海峡（Limfjord）战役之后，蓝牙王哈拉尔将挪威南部的控制权加入了王

朝的资产组合，但他是通过拉德伯爵（Jars of Lade）间接统治的。斯韦恩和克努特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这种霸权，有时还能统治现在的瑞典西海岸。即便如此，自治的旧传统也没有一夜之间消失。从11世纪的丹麦历史记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日德兰半岛以及菲英岛（Fyn）和西兰岛有时还是能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运作。[29]

因此，催生这些新国家的政治进程是相似的，都是一个家族打压或消灭了本来地位相似、位置相近的竞争对手，将更大的地区纳入自己的控制。这样的过程变数很大，也是新国家会交换中间地区的领土的原因之一。考虑到所有这些地区本来都是独立的，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中一些在接受新王朝的统治之后，还能长时间保持自主政治活动的能力，更何况王朝统治这些地区靠的是巡游和个人魅力，而不是发达的官僚机构。尽管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具有惊人魅力的个人，但第一千年末期北欧和东欧国家形成的情况，远不是讲述成功王朝的历史叙述展现的那么简单。历史上有许多雄心勃勃的个人，他们努力积聚力量，让所有对手在自己面前黯然失色。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雄心并不能产生强大的国家结构。我们不仅要注意关于个人雄心的历史记述，也要考虑更宏观的结构转变，正是这样的转变让普通的雄心成就了不普通的结果。

国家的建立

许多变化与促成第一千年上半叶罗马帝国边缘更大政治结构形成的变化相似。从长远来看，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对北欧和东欧国家的形成起到了结构性的关键作用。这在斯拉夫世界中最明显，但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直到第一千年中叶，斯拉夫社会或斯拉夫人统治的社会中都没有明显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不管其具体起源于何处，讲斯拉夫语者在6世纪突然出现在地中海边缘时，显然来自东欧不发达的森林茂密的地区。那里的定居点很小，只能称得上是小村庄，铁器时代的农民只是勉强维生，几乎没有能代表不同社会地位的物质标记。这种状况在6世纪发生了根本变化，其直接原因是，一些讲斯拉夫语的人在迁徙过程中与较发达的地中海地区建立了直接联系。空前数量的财富（来自袭击、军事服务和外交补贴）流入斯拉夫世界，很快产生了不平等现象和随之而来的新的社会结构。575年左右，新的社会结构成形，出现了军事领袖这个新阶级，控制着相当大的区域和几千人的群体——尽管也有理由认为，以科尔恰克遗址为代表的其他斯拉夫社会保留了更平等的社会形式，甚至为此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方式，向远离东罗马边境的方向迁移。[30]

9—10世纪新的斯拉夫国家建立时，不平等现象已大大加剧，最明显的体

现是军事随从：他们是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工具，在日耳曼世界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世纪兴起的斯拉夫领袖应该也有自己的追随者，但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没有提到可以视为军事和社会力量的大规模永久随从队伍。9—10世纪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阿拉伯地理学家写道，波兰的梅什科维持了一支有3 000名战士的私人部队，而且这只是众多部队中的一支，可见当时随从有多重要。在波希米亚，14位大公在845年接受洗礼时“与他们的人”一起，而与瓦茨拉夫有关的早期波希米亚文本既提到了他的随从，又提到了他的兄弟博莱斯拉夫一世的随从。法兰克的文本也提到摩拉维亚人莫伊米尔和他的侄子斯瓦托普鲁克都有自己的“手下人”。在罗斯，随从同样重要。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到900年前后统治北方的罗斯大公有400名随从。根据《往年纪事》的叙述，对于几位早期国王来说，随从似乎也是重要的政治压力集团。例如，伊戈尔要求德列夫利安人多纳贡，正是因为他需要满足他“手下人”的要求。他可能后悔了，因为这导致他死于心怀不满的纳贡者之手。正如我们在罗马帝国周围的日耳曼人中所看到的那样，永久性的军事随从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的力量，有助于他们统一敌对的家族，对广大民众施加一系列义务（如军事义务和劳役）。军事随从创造了能自上而下施行统治的强大王朝（和在日耳曼人中一样），从而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在6世纪末的斯拉夫人中间，也没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世袭权力，哪怕的确有人可以建立强大的权力基础。[31]但9—10世纪的时候，王朝就主导了政治，权力世袭成了通行的做法。

随从只是广泛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了解全局的障碍之一在于无法确定变革是从何时开始的。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大众中间，都流传着公元500年前后斯拉夫社会高度平等的说法。人们因此认为斯拉夫化是“快乐嬉皮士”的扩张，这种想法尤其得到了一些东罗马史料的支持，据记载，6世纪的斯拉夫社会没有结构化的社会差异，还很不寻常地乐意接纳战俘作为其社会自由平等的成员。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种认为斯拉夫社会平等的想象。我们之前讨论日耳曼人的时候讲过，社会地位高完全可以在非物质层面上展现，比如不用工作得太辛苦，能得到更多食物，解决群体内部争端时说的话更算数。[32]

但即使考虑到500年左右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平等（哪怕之前有平等，此时也在移民和发展的双重作用下迅速瓦解了），10世纪时情况比起那时来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政治领导层有了世袭权力，影响力因永久性的军事随从而扩大，此外，斯拉夫社会中出现了分化明显（可能是世袭）、等级有高下的社会类别。

处于社会底层、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口群体在第一千年末期这些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8世纪开始，奴隶贸易就是中欧和东欧的重要现象。而随着新的国家结构的发展，无自由者组成的“服务

村”成了他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稍后详细讨论）。根据现有资料，尚不完全清楚这些村庄中居民的地位是否比常被贩卖的奴隶高，他们的地位也许类似于日耳曼世界中的永久“被释奴”（更确切地说是“半自由民”）。但无论是哪种情况，10世纪时，斯拉夫人口中的一大部分显然已经落入了一种世世代代低人一等的地位（或者说两种地位，如果要区别对待奴隶和服务村的居民的话）。不管你如何构想公元500年前后的斯拉夫社会，后来发生的变化都是惊人的。

社会顶层的人地位同样永久不变，我们的资料中常常称他们为“权贵”（optimates）。据记载，一批这样的人在982年参加了在波希米亚的集会，批准任命斯拉夫尼克家族的阿达尔贝特成为布拉格的主教；在留里克统治下的罗斯，也是这样的人统治着各自的定居点（其中一些人的独立程度相当高，在贸易条约谈判期间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自己的使节）。某些具有同样高地位的人也出现在11世纪初波兰国王的队伍中。他们应该是波兰国王和其他国王巡游路上会宴请的那种大人物。经考古发现，米库尔奇采外围100公顷的区域中有5个所谓的大公领地，这可能说明10世纪时摩拉维亚就有了这样的权贵，不过他们也可能是统治王朝中的年轻成员。有证据表明，这个阶层由三种人组成。第一种是新王朝家族内部的支持者。第二种是原本独立的单元（包括俄罗斯的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贸易团体，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的“部落”单元）中接受新王朝统治的精英。第三种是统治家族中的年轻成员。在他们接受基督教之前甚至之后，一夫多妻制都很普遍，因此，年轻的王室成员人数众多——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的嫔妃就数以百计。渐渐地，这三种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他们成了最终成形的王国中的贵族。

和早期的日耳曼世界一样，在贵族和非自由民之间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自由民阶级。几乎所有主要王国的书面法律资料都提到了他们，摩拉维亚除外——摩拉维亚的存续时间不够长，没法形成自由民。如果这些王国的情况和第一千年末期欧洲其他地区相似的话，自由民可能在王国可部署的军事力量中占了一大部分，是统治者自己的职业军事随从之外的一股力量。在其他地方，通常是非自由民群体履行较低等的职能，例如提供劳力，建造应该是由这些王国立起的那些壮观的纪念碑。相比之下，提供军事服务尽管显然更危险，但地位更高。[33]

即使我们不相信6世纪的斯拉夫社会完全平等，斯拉夫社会也在500年到1000年之间经历了全面重组。6世纪，斯拉夫世界的首领一生浮浮沉沉，并没有明确的世袭权力，也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世袭贵族或永久性的非自由民群体。在7世纪，至少某些斯拉夫群体仍然如此。像法兰克商人萨莫这样完全的局外人，在当时仍可能被选为地位高于许多斯拉夫大公的领袖，可见那些人应该并不在等级分明或世袭的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但到了10世

纪，一切都变了。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过渡性转变，后来的新国家就不可能出现。世袭的王朝权力，随从和贵族的社会和军事影响力，社会分化，能够（自愿或非自愿）实现提供食物、劳力、军事服务等社会功能的人口群体：所有这些都是新国家的关键结构要素，而它们在6世纪都不存在。

重组所需的不同要素是什么时候具备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最有可能成立的答案往往有很多面。总体来说，某些变化似乎有着悠久的历史。8世纪90年代，查理曼的战役之后，中欧的斯拉夫社会脱离了阿瓦尔人的控制，当时就出现了一批强势的诸侯。短短几十年内，就有一组领袖被记录在编年史中，比如伏伊诺米尔、马诺米尔和柳代维特，他们能动员大量军事力量用于各种目的。这种控制程度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而更可能是在阿瓦尔时期形成的。早在9世纪中叶的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就有了在自己领地内握有世袭权力的领袖（duces）。虽说如此，还是要把另一个事实考虑在内才比较平衡，即直到9世纪，斯拉夫世界中的大部分山堡似乎都还是社区自建的避难所。发掘时，并没有在这些山堡发现有精英居住的迹象（通常连永久性住宅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其他迹象表明有某个大人物在推动这些工程。[34]800年前后可能就有了世袭领袖，但我们不应高估他们的社会力量。

同样重要的是，国家的建立能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变革。最明显的是，财富增加后，某个王朝就能拥有规模和力量更大的随从队伍。同时，新国家中新兴的贵族大多是王朝崛起的副产品，有时是王朝的拥护者和年轻亲属地位提升后成了贵族，有时是原本独立的地区首领地位下降，被贬为贵族。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在建造城堡时，还推倒了原来社区自建用于避难的山堡，用新的王朝城堡取而代之。奴隶贸易肯定开始于8世纪，但急速增长是在9—10世纪。最后两个方面的发展可能在增加人口中非自由民的数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即便没有增加，至少也在一开始带来了非自由民）。因此，我自己的最佳猜测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800年左右产生了一批世袭领袖，阿瓦尔帝国崩溃后国家形成的过程又进一步改变了局势。

这个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型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丹麦则是另一个问题。丹麦的国家形成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因为在丹麦发生的是国家重建。8世纪以来，日德兰半岛南部和附近岛屿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国家的结构，但它被维京时期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新财富摧毁了。这表明（史料也证实），800—100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比斯拉夫世界要根深蒂固得多。维京时期的资料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国王、伯爵、自由民和非自由民（奴隶）。这很说得通，不仅是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类似国家的结构，还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或至少丹麦）曾是日耳曼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可能算是远边缘区而非近边缘区），与罗马帝国在第一千年上半叶就有互动，还参与了早期的社会政治转型过程（如流入的罗马商品和沉没在沼泽中的武器所示）。9世纪晚期和10世纪的丹麦国家的形成，可能更多涉及的是既有权力集团及其领导王朝的起落，而不像附近的斯拉夫人那样经历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35]

因此在当时，至少就斯拉夫世界而言，社会革命既是国家形成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就不可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当时中欧和东欧也有大量证据表明了这一点。与社会变革一样，一些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出现在国家形成之前，也是国家形成的必要前提。国家出现后，又推动了进一步的变革。

最难精确记录的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粮食生产的情况。当然，讲斯拉夫语者统治着的广阔领土上环境多种多样，因此各地农业发展的轨迹不可能相同。但证据充分表明（尽管证据可能还比较笼统）农业产量急剧增加。不同地方的速度不同，但都发生了一场革命，使更多的土地成为耕地，更有效率的耕作方式（包括耕种技术和土壤肥力管理）也投入了使用。最明显的是，第一千年下半叶，中欧和东欧砍伐了大量的森林。在波兰那些适合采取花粉岩芯的湖泊地区，草木与谷物花粉的比例在这300年内从3比1急剧下降到差不多1比1，这表明耕地数量翻了一番。这个结果不能简单套到整个斯拉夫欧洲。我认为北边和东边的变化程度会比较小。尽管如此，即使在俄罗斯地区，斯拉夫文化向北和向东的传播也与全面农业活动在树木繁茂的草原和东欧平原上气候比较温和的森林地带中的传播密切相关。因此，即使无法确定农业扩张在某个地区的具体影响和发生年代，农业普遍扩张的现象也已经足够明确了。[36]

更高效的耕作技术传播的情况也很容易勾勒。讲斯拉夫语者与地中海世界的最初接触让一些斯拉夫人用上了更有效的耕犁，这种犁能将土壤翻过来，使腐烂杂草和作物残茬的养分释放到土壤中。这既能增加预期的产量，又能延长耕地使用的时间。9—10世纪的国家形成的时候，进一步的发展还未出现。例如，中世纪最成熟复杂的农耕方式是庄园。庄园的优势在于它是自给自足的综合性生产单元，有大量劳动力，可以集中制定农耕策略，特别是用轮作维持土壤肥力，使效率最大化，而成本（特别是耕犁设备）则可以通过共享而达到最低。庄园也是进行残酷社会控制的工具，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就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而言，关键是中欧和东欧的耕种生产直到新国家形成后的11世纪才完全庄园化。这一发现给固守教条的人带来了挑战，因为这些国家原本被认为是农业庄园化后才发展起来的“封建制”国家，但庄园和这些国家孰先孰后已经有了定论。然而，即使庄园化在9—10世纪只有萌芽，也有证据表明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特别是在第一千年下半叶的花粉岩芯中发现了黑麦数量的稳定增长。

在秋季而非春季播种的黑麦与从二圃制向三圃制的发展有关。三圃制既可以增加一个时间段内的可用耕地面积（2/3的耕地可用，而不是原来的1/2），又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这一发展也许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家见到的现象奠定了基础：斯拉夫人每年收获不止一次，而是两次。[37]之后还会有更多重要的发展，不过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欧和东欧的粮食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500年前的产量。

这对国家形成至关重要，体现在多个方面。除非粮食有大量盈余，否则这些地方的领袖就会像第一千年上半叶日耳曼世界的领袖一样，无法供养大批专业军事人员和其他不从事初级农业生产的工作人员。同样，如果没有经济盈余，社会分化就不可能根深蒂固。更多的食物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口，[38]如果人口没有增加，国家可能永远无法形成。新增的人口为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提供了所需的额外人力。更重要但更难具体衡量的是，中欧和东欧的人口密度增加后，资源竞争也大大加剧。为了过得好而归属于一个群体，这样的需要一直是人们愿意为加入某一群体付出代价的重要原因。简单说，农民（或其中一些农民）愿意上交一部分粮食并为崛起的王朝提供劳务，原因之一在于王朝能用力量足够大的军事组织来保证农民安全保有土地。[39]

但是，除了有更多人生产更多食物，蛮族欧洲在500—1000年间还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对国家形成的重要性与之不相上下。例如，军事随从需要武器和铠甲，而且我们知道，10世纪的新统治者控制着大量的贵金属储备（看看勇敢者博莱斯瓦夫在阿达尔贝特墓上立起的金十字架就知道了），手握劳动力和大量资源，可以实施那个时期常见的宏伟工程，比如建造、装饰、修缮教堂和宫殿等。统治者之所以具备这样的能力，一方面原因在于当时影响整个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这些进程并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这些王朝本身采取的政策。

这些年中，最重要的非农业经济现象是皮草和奴隶国际贸易网的兴起。西部的一些线路7世纪就投入了使用，但贸易网到8世纪才延伸到波罗的海，9世纪才遍布整个东欧。前文谈过擅长水上运输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如何使贸易网在长距离内运作，这对整个维京时期都很重要。其结果是，这个时期，欧洲北部和东部输出了大量的原材料（主要是人口和毛皮），获得了大笔金钱的回报。应该也有大量的拜占庭丝绸在这个网络中交易，但流传下来的史料中对此记录寥寥，也没有什么考古证据。拜占庭主要靠输出精美的丝绸来进口其他产品。但考古发现的是大量的银币，大部分来自伊斯兰世界，但也有来自西欧的。这些银币的留存量非常惊人：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根据最近的估计，超过22万枚阿拉伯钱币被收藏在有5枚或5枚以上钱币的窖藏中。白银从来都是有价值的，因此这样的发现很值得注意。

银币的数量很多，不少后来又经过了多次重铸，留存下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么大规模的财富流动，国王们自然非常感兴趣。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能以提供安全的交易场所为条件向商人收取费用，从中获利。9世纪初，丹麦王国尚未崩溃的时候，国王戈德弗里德迫使以前在斯拉夫地区交易中心雷里克经营的商人搬到他在日德兰半岛南部海泽比新建的交易站。此举被记录在当时的文献中并得到考古证实。对海泽比出土的早期木材进行年轮定年后发现，海泽比建于约810年（与文字记载一致），正值戈德弗里德的鼎盛时期。在这里，国王追求的肯定是经济利益。布拉格的情况也类似，它是波希米亚普舍美斯王朝的主要中心之一，如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说，也是奴隶贸易的主要中心。过路费肯定大大充盈了王朝的金库，贸易非常重要，瓦茨拉夫被杀，原因之一就是他试图取缔贸易。

10世纪留里克王朝的新家基辅也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中心。拜占庭和俄罗斯的资料来源都证实，从10世纪初开始每年春天都去君士坦丁堡的罗斯贸易船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到了11世纪初，梅泽堡的蒂特马尔告诉我们，这座城市已经有了不少于8个市场。唯独在波兰缺少有关其参与新的国际贸易网络的明确文字证据，但这应该是因为文字因意外而没能留存下来。在皮雅斯特王朝的领土上发现了大量阿拉伯银币，其人口无疑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新的贸易网络。[40]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些新王朝都有效地利用了新产生的财富。

王朝也不是只会收钱，它们有时还积极推动重塑网络，以获取更多利润。留里克王朝是最明显的例子。10世纪，该王朝在911年和944年两次发起集体军事行动，迫使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当局给罗斯商人更优惠的贸易条件，包括为前来做生意的商人在城中免费提供一个月的食宿。考虑到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俄罗斯的兴趣是怎么来的，这些条约体现出的情况也就在意料之中了：留里克王朝的成员（而不仅仅是其现任领袖）本身就是活跃的商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增加交易量和市场份额。但这么做的应该并不是只有留里克王朝。拜占庭与罗斯的贸易联系恰好留下了比较充分的文字记录，而在我看来，尽管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但其他王朝很可能也会用最适合它们的方式积极地发展国际贸易联系。[41]

即使我们对此的了解并不是太多，也足以认识到至少在自己治下的核心地带，这些王朝都积极组织经济活动。这也是可以从历史资料和考古调查中得出的。从考古发现看，10世纪波兰和波希米亚的王朝心脏地带人口密度相当高。该结论也是基于对陶器年代的详细了解得出的，而从陶器的分布可以合理推断出定居点的存在。证据表明，这样的人口密度不是偶然，而是刻意干预的结果。如考古发现所示，普舍美斯王朝和皮雅斯特王朝在崛起的关键时刻，都摧毁了与旧的社会政治结构（“部落”）相关的防御中

心，并分别在9世纪和10世纪建起一系列城堡取而代之。在此过程中，应该至少有一部分被征服的人口被有意迁移到王朝的核心地带。其中一些迁移在史料中有记载。例如，《往年纪事》记载，弗拉基米尔大公与10世纪后期不同群体［斯拉夫人、克里维奇人、楚得人和维亚蒂奇（Viatichi）人］大规模转移到杰斯纳河沿岸各地有关。这次转移可能不用靠武力强迫，靠说服就够了。在其他地方，比如波兰和波希米亚，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迁移过程在考古上的反映，也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口特别密集的聚居区；不过来自这些王国（实际上还要包括罗斯）的早期文本（都出自修道院）说明了重新安置人口的目的。这些早期文本中体现的经典经济形式是前文提到过的“服务村”。没有人身自由的村民除了要提供粮食，还得为国王承担养蜂养马之类的其他经济功能。这些人不是自由民，很可能是通过强制性的重新安置来到村子里的。[42]

可见，国王（或者再加上他们的顾问）有充分的经济意识来尽可能开发利用王朝的核心地带。从利用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所在的世界中，围绕农产品的市场经济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无法购买到所需的物品，而必须将专门的任务分配到具体的定居点。这并不奇怪。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也是这样，其治下的某些地区仍有服务村，这既体现于钱币证据，也体现于农民给国王上缴的是粮食而非现金税款这种情况。当时欧洲北部和东部的经济中都缺乏小面额钱币。阿拉伯银币是很充足，但它们的价值太高，无法用于日常购物。一枚银币可以买几大袋面包，没等吃完就该坏了。同样，尽管国王通常更喜欢现金形式的税款（因为现金灵活得多），但只有在农民有可能将多余产品出售给商人时，国王才能要求农民用现金缴税。

第一千年晚期的这些国家倾向于以不同方式管理核心和边缘地区，而上述情况为此增加了一个维度。这不仅是巡游的运输局限性带来的偶然结果，还反映了国家建设更根本的方面。由于这些最终获胜了的王朝的政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组织完全不同。在基辅罗斯，由于其起源特殊，核心区的形成过程有额外的重要意义。到10世纪中叶时，留里克王朝已展现出转移其运营中心的独特能力。它先是在北方——似乎是在戈罗季谢（旧诺夫哥罗德）——崭露头角，然后如我们所见，在9世纪末奥列格率军南下时转移到了第聂伯河畔的基辅。

这种转移背后的原因令人费解。乍一看，这个举动很奇怪，因为如前文所述，戈罗季谢的这个位置，更有利于控制沿伏尔加河到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路线，而这条路线比沿第聂伯河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更有利可图。但是，基辅有其他的优势。基辅坐落在树木繁茂的草原上，从这个位置正好可以统治现在的乌克兰周边地区，而此地在7—8世纪已成为大量斯拉夫农业人口的家园。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到来之前，这些人口已被组织成单元，有了稳固的政治结构。波利安人（Polian）统治了基辅的周边地区，其附近的

其他群体包括德列夫利安人、谢韦尔人（Severians）、拉迪米奇人（Radimichi）和德列戈维奇人（Dregovichi）（地图19）。虽然地理位置对贸易而言不是最有利，但基辅为斯堪的纳维亚王朝的野心家提供了多得多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往年纪事》告诉我们，在奥列格时期，大公的军队中不仅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讲斯拉夫语和芬兰语的人。大公不满足于当个商业贵族，对他来说，乌克兰能提供的东西比北方要多得多。尽管如此，留里克王朝还没有做好放弃动荡生活的准备。奥列格的儿子兼继承人斯维亚托斯拉夫四处征战，范围东至伏尔加河，南至高加索地区。《往年纪事》称，他去世之前还在考虑第三次迁都，打算将王朝的首都迁至多瑙河。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最终成了他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在沿杰斯纳河的基辅及周边建立了更强大的经济核心区，使留里克王朝永久扎根在了乌克兰心脏地带。[43]

当然，关于第一千年末期国家形成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还有许多是我们想知道的。铁矿开采和铁加工的详细情况是资料中的一大空白。新王朝部署的军队需要大量铁制品，至于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相关的信息并不多。不过，大体情况很清楚。国家形成有赖于先前发生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后，人口大量增长，动产大量增加，围绕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形成了更成熟的社会等级制度。

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国家形成的必要背景，而这些王朝自身又促成了意义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在贸易方面，它们不仅从新的国际贸易网中榨取过路费，还尽可能扩大贸易网。在国内，王朝也尽可能扩大核心地区的农业生产。这些过程在1000年时都还没有完成。从11世纪开始，以庄园为基础对农业生产进行了重组，王朝建立者的后代也聘用了招募代理人，向数十万日耳曼农民提出后者无法拒绝的条件让其东迁，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产量。[44]尽管1000年时这些进程尚未完成，但我们的问题已经有了部分答案。一般王朝都有的野心在这个时期内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结果，因为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已经为王朝的领袖铺好了路。

但这充其量只是一半的答案。王朝的野心刺激了国家的形成，它既是我们所见政治革命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而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则是其必要的背景。但是，让王朝野心家能够自由重塑中东欧版图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最初是怎么发生的呢？

国家的崛起

苏联时期通行的说法很简单。从5世纪开始，常与其他群体共居、奉行平等主义的斯拉夫人控制了后来成为斯拉夫欧洲的土地。在接下来的四五百年中，该地区内部的社会经济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直到围绕以

庄园为基础的农业形成了阶级，第一个国家基于农业生产手段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出现。但是，这种叙述并不符合历史现实，最近的著作都强调，国家形成是个很有戏剧性的过程。在许多地方，斯拉夫化开始的时间比以前认为的晚了150年，庄园化农业出现在国家形成之后，而不是之前，考古发现则揭示了这一过程中突然而暴力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摧毁原有社会经济秩序，用新王朝的秩序取而代之，靠的不是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崛起王朝的军事力量。可见，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9—10世纪的王朝突然如此有力地握住了权力的缰绳。和第一千年上半叶的日耳曼世界出现更大政治结构的过程一样，斯拉夫欧洲与发达的帝国邻居间日益紧密的联系网络发挥了关键作用。

帝国游戏

在中欧，斯拉夫世界先后与两个帝国有过直接接触：8—9世纪的加洛林帝国，以及10世纪的奥托帝国。两者都不像之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强大，但在鼎盛时期，这两个帝国还是有强大的实力，它们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深刻影响着周边的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和罗马时期一样，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与邻居打交道的最常见方式是帝国侵略。第一千年后期的这两个帝国内部的政治凝聚力，都要靠奖赏地方精英来维系，地方精英不仅管理自己的地盘，还为皇帝提供军事力量。

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的皇帝并不像控制了发达地中海世界的罗马皇帝那样有巨大的财富储备，就连自己控制下的土地，他们也没有完整的征税权。因此，他们往往只能用不可再生的资产来奖赏当地精英（例如来自皇家内库的土地），这导致帝国出现了内部分裂的趋势，因为本地精英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扩张，在无法大规模征税的情况下，扩张带来了另一种可再生的财富，让统治者可以在奖赏本地精英的同时维持自己的权力。因此，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后来这两个帝国在维护中央权力时，比罗马帝国更依赖扩张，只要有可能，它们就会去劫掠邻国。在715年查理·马特上台执政和他的孙子查理曼晚年之间有9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加洛林的军队没有争战掠夺的时间只有5年。10世纪上半叶，统治萨克森的公爵家族发起东进（Drang nach Osten），这是亨利一世和他的儿子奥托一世能击败竞争者，自己成为加洛林帝国继承人的关键原因。[45]

掠夺性的扩张总是会带来劫掠，但带来真正利益的是有组织的长期剥削。就连没有被完全征服的领土也会受到剥削。波希米亚从亨利一世的时代起就必须每年进贡，公元950年后还要为王朝提供军事支持。1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大约10年，波兰的梅什科一世也成了进贡者。受帝国控制程度更深的地区，负担也相应加重。击败所谓易北河斯拉夫人（10世纪上半叶大致

生活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小规模群体，见地图14）后，奥托王朝在易北河以东建立了9个主要的收集中心（“城镇”，urbes，史料中称为burgward）。这些中心从斯拉夫人那里收集贡物（特许状委婉地称其为“年度礼物”），其中一些收入分配给了奥托王朝最宠幸的两个神职人员，即马格德堡大主教和迈森（Meissen）大主教。这些安排记录在奥托将教区授予主教时的特许状中。从新财富中受益的不是只有教会机构。在这种堪称殖民的环境下，奥托王朝的权贵都觊觎对边境的指挥权，因为这是发财的机会。在一个分支得到肥差而另一个分支没有得到的情况下，边境指挥权的分配甚至能激起权贵家族的激烈争斗。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赫尔曼（Herrman）和维克曼·比隆（Wichman Billung）两兄弟的争斗。赫尔曼得到了关键的职位，始终忠于奥托；维克曼则在其漫长而痛苦的一生中满怀嫉妒，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反对奥托。[46]

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扩张政策对帝国的影响，而是被剥削的人口对资产被剥夺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们会努力抵制帝国的扩张，如果无法全面抵抗，就尽可能减少影响。一批原本独立的小规模政治单元联合为少数几个大型政治单元，这是抵挡帝国的最有效策略之一；也正因如此，帝国的剥削和本章要讨论的政治巩固有很大的关系。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来自易北河斯拉夫人（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国家形成是失败的）。刚才提过，他们全面受制于奥托帝国。983年，易北河斯拉夫人趁奥托王朝在其他地方遇到困难，发动大规模起义，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他们不满奥托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对那些通过剥削他们而大量获利的教会机构心怀怨恨，因而对教会和神职人员实施了一系列暴行，这些都记在出自教会的史料中。不过，这次起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政治重组，而这是起义成功的关键。落入奥托王朝之手时，易北河斯拉夫人由一组小型的政治团体构成。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这些团体间建立了新的同盟——此次事件后不久，我们的史料就给他们打上了“柳蒂奇人”（Liutizi）的标签。柳蒂奇人不是新的族群，而是旧的群体重组后形成的。和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人一样，易北河斯拉夫人从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不同群体团结在一起，可以更有效地抵抗帝国的侵略。[47]

最初的扩张和征服之后，帝国邻居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奥托三世在统治期间与波希米亚人和波兰人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以皇帝朝拜阿达尔贝特之墓为代表。但在奥托死后，帝国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没有留下儿子，他的堂兄亨利1003年登基后，帝国与皮雅斯特王朝之间进行了约20年持续不断的战争，新皇帝也愿意使用不信基督教的易北河斯拉夫人来对抗自己从前的基督教兄弟。亨利这么做当然有他的理由，但政策上的矛盾之处反映出易北河之外的人口实际上相当于二等公民，因此剥削他们的想法往往被视为合法，也会不断出现。这种做法背后的态度不同于罗马人对

蛮族的那种彻底贬损；罗马人的态度倒是没有矛盾之处，但同样令人不快，他们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把那些“野蛮人”当作野兽来对付。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因为是基督徒而得到一定的保护。也难怪，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易北河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异教徒受到了帝国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的残酷伤害：所谓北方十字军（Northern Crusades）中的基督教条顿骑士团和其他人一起，一路向北和向东烧杀抢掠。而即使是信奉基督教的斯拉夫国家，也只能处于二等地位，也无法确定帝国剥削外人的本能会不会让它们遭遇厄运。[48]而事实上，11世纪早期让波兰人吃了苦头那种帝国政策变化，在9—10世纪的外交中还有很多例子。

比方说，8世纪后期，在查理曼试图征服萨克森的漫长曲折过程中，易北河斯拉夫人中的一个群体奥波德里特（Abodrites）是其主要盟友。奥波德里特人的基地在萨克森的东部边境，加洛林王朝从南部和西部向萨克森进攻，奥波德里特人则开辟了极为有用的第二战线，查理曼对他们的支持深表感激。作为回报，他给了他们更多的土地、直接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以及贸易特权。萨克森被并入帝国后，特别是它成了帝国中心后，奥波德里特人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战略地位。他们不再是有用的盟友，反倒像是未来的臣民，帝国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奥波德里特人虽然没有被马上征服，但侵略性的外交已成为常规。这方面的集中体现是边疆伯爵格罗（Margrave Gero）的一次宴会，当时他谋杀了30名奥波德里特人的领袖，相比之下罗马时代的宴会暗杀都不算什么了——罗马的宴会暗杀很常见，但通常一次只杀一个领袖。9世纪摩拉维亚的统治者也体会到生活在帝国边缘的不确定性。斯瓦托普鲁克国王早年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870年，他在东加洛林人的帮助下首次掌权；此后不到3年，帝国政策出现变化，他被监禁了好几个月；最终，他袭击了巴伐利亚，为自己遭受的对待报仇。[49]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帝国附近，但只有（从大部分人的角度看）二等公民的地位，就特别容易受到危险的政策变化的影响。帝国统治圈内的某个派系为了获得政治资本，随时有可能去倡导对你不利而对他们有利的做法。

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没有必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帝国的掠夺对处于前线的社会造成了怎样的总体影响。易北河斯拉夫人的叛乱是怨恨在行动上的充分体现，他们也有理由心怀怨恨，其他地方的人也一样。例如，摩拉维亚王朝自然会有的猜忌体现在了宗教领域。和其他许多新王朝一样，新的统治者上台后，很快决定改信基督教。然而，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从加洛林王朝那里接受基督教，而是探索了其他所有可能的途径。众所周知，他们在863年请来了拜占庭传教士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并得到了教宗的祝福。这是在对抗加洛林王朝，充分体现出对帝国及其种种行动的怀疑。最终，在美多迪乌斯死后，摩拉维亚被迫加入加洛林王朝的宗教阵营，美多迪乌斯剩下的门徒于885年被驱逐，由法兰克神职人员取而代

之。摩拉维亚人还是认为帝国会剥削他们，这样的猜忌体现在本书开篇的882年的事件中：摩拉维亚公爵斯瓦托普鲁克和他的手下抓住了法兰克伯爵弗林哈和威兹洛，割掉了他们的舌头、右手和生殖器。

摩拉维亚人之所以报仇，是因为恩格尔沙克管理这个边境地区时对他们施暴，他们还想阻止恩格尔沙克的儿子获得他们父亲的职位。摩拉维亚人的行动有明确的目的，他们的报仇也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我显然不了解9世纪摩拉维亚人的思维方式，但这种行为很像黑手党用致人伤残来传递信息的做法。我能做出的最好猜测是，砍断右手和舌头的意思是行为和言语都不可信，而割掉生殖器则是诅咒这一家族绝后。说这么多的意思是，帝国的军事和外交侵略自然会引起怨恨，而这种怨恨可以成为新王朝实践和意识形态上的基石，新王朝可以借此为自己的统治获得同意。加入较大的实体，必然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但如果这样就能抵御掠夺带来的最糟糕影响，那就可以接受。易北河斯拉夫人和摩拉维亚人的例子是最明确的，而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帝国的掠夺对所有边境国家（波兰、波希米亚和丹麦）都施加了这样的影响。

在这些王朝建立国家结构的过程中，除了前述与帝国的军事和外交接触带来的影响（可以称之为“消极收益”），还有一些积极收益。在帝国政策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有了很多曝光的机会。奥托三世的阿达尔贝特墓之行是个重大的国际场合，而勇敢者博莱斯瓦夫想必就像出席峰会的当代领导人一样，很乐意让臣民看到自己被当政的皇帝如此厚待。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坟墓上巨大的金十字架，皇帝的随从们动了心思，开始计算打败皮雅斯特王朝能带来多少财富（这最终导致长达20年的战争，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当然，暴力的方向不是只有一个。和当时的皇帝一样，这些新王朝的统治者必须获得权贵的政治支持才能有效实施统治，奖赏在易北河以东和以西在当时都是风尚。而他们的婚姻政策让问题更加严重。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们确实开始从明晃晃的一夫多妻制转向连续一夫一妻制，但有多个妻子和大量后代才是普遍情况——虽然可能比不上7世纪的萨莫，他一共娶了12个妻子，生了37个孩子。婚姻上的无度使继承纠纷和王朝内斗极为普遍。例如，弗拉基米尔的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斯维亚托波尔克（Sviatopolk）进行长期内战后，才在1018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这场战争经历了许多起伏，至少还有3名兄弟和同父异母兄弟死亡。弗拉基米尔自己在10世纪70年代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雅罗波尔克打过类似的战争，王室死亡人数相近。只有获得权贵和随从的广泛支持才能赢得这类战争，而动员他们需要大量的财富。而且就和罗马时期一样，如果既想分发奖赏，又不想让自己破产，那么对附近更富裕、更发达的地区发起突袭是极为有效的手段。因此，关于对抗易北河斯拉夫人袭击的叙述，重点

都是这些人如何烧杀抢掠，也就不奇怪了；而我们关注的其他边境王朝也经常发动类似的袭击，只是组织程度略高一些。9世纪每次与摩拉维亚人的冲突，10世纪与波希米亚人和波兰人发生的冲突，都释放出了相应的财富。[50]

除了财富和声望，与附近的帝国进行密切接触也以更具体的方式巩固了新王朝的权力。我们的资料中有两个例子很突出。第一个是10世纪的斯拉夫诸国，它们的战争模式非常先进，配备了大量披甲骑士。公元800年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9世纪，加洛林的军队一开始只有步兵和轻骑兵，即使东法兰克王国的萨克森分遣队也是如此。奥托时代全副武装、配备锁子甲的萨克森骑士到9世纪后期和10世纪初才出现，萨克森人终于赶上了时代。考虑到这种背景，10世纪的波希米亚和波兰军队至少配备了一些披甲重骑兵是很让人惊讶的。我们对公元800年之前的斯拉夫战争一无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连萨克森人都没有最新的军事装备，斯拉夫人肯定也没有。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他们是从哪里知道和得到这些军事装备的呢？最可能的答案是从帝国向东传过了易北河。早在805年，皇帝查理曼在蒂永维尔（Thionville）发布的法令就试图将与斯拉夫世界的贸易限制在易北河沿岸的几个指定地点，包括巴多维克（Bardowick）、马格德堡、爱尔福特（Erfurt）、哈尔施塔特（Hallstadt）、福希海姆（Forchheim）、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洛尔希（Lorch），他自己也承认对武器运输很担心。我们马上就能想到，跨边境的武器流动是相当自由的，因为在公元第一千年，就连帝国也缺乏官僚机构来维持有效的边境管制。显然，加洛林王朝的先进武器对可能不得不迎战法兰克军队的斯拉夫群体来说极具吸引力，但武器进口对斯拉夫人的内部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代欧洲的常备军与王室专制联系在一起，这不是没有缘由的。崛起的王朝统治者获得能使军队占据主导地位的装备后，也就得到了打压内部竞争对手并压制异议的力量。因此，帝国军事技术的引入直接推动了边缘地区的国家形成。[51]

除此之外，这些新国家核心地区的经济组织也很值得注意。我们看到，所有国家都迅速演变出基于大庄园的松散格局，服务村除了负责基本的粮食供应外，还履行专门的职能。这种组织方式在9世纪的加洛林帝国中也很普遍，特别是其在莱茵河以东的欠发达地区。也许这只不过是在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重要产品生产的明智措施，易北河以东的这种格局也许是完全独立形成的。但若说这是帝国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密切接触带来的比较意外的另一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

和罗马时期比起来，这一时期帝国与边缘地区的种种接触中，少了罗马皇帝擅长的那种外交操纵。罗马皇帝会重新安排政治地理格局，有系统地支持某些王朝，只因它们有可能保证边境的中期安全。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

朝的皇帝偶尔会青睐一些群体（比如奥波德里特人），但史料中并没有他们始终尝试干涉邻国政治结构的证据。不过，另一个帝国的外交议程很可能在这些转型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以及（某种程度上）波兰都可以看作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前不久摧毁的阿瓦尔帝国的继承国。我们对阿瓦尔帝国的内部运作情况了解不多，但现有的资料表明其运作方式与匈人帝国非常相似。和匈人一样，阿瓦尔人经营着一个不平等的联盟。在联盟中，原本游牧的核心群体调动了军事力量，迫使一批一开始不愿接受其统治的臣民效忠于阿瓦尔人。在联盟中，有的臣民比较受青睐，有的地位则低一些。现有资料中体现联盟运作方式的一个有意思的片段，说的是一群人（其中许多人是罗马俘虏的后代）如何获得了自由的地位（不必为奴），并获准拥立自己群体的领袖。这听起来很像匈人帝国。由于缺乏复杂的政府机构，阿瓦尔人有可能是通过他们信赖的联盟诸侯来统治子民的。如果是这样，那么阿瓦尔人的统治很可能巩固了约600年时出现在某些斯拉夫群体中的领袖的力量，这些领袖通过控制从东罗马边境流入的新财富而崛起。在我看来，6世纪的发展，加上后来阿瓦尔人的外交操纵，这种组合最有可能解释为什么阿瓦尔人统治瓦解后，马上兴起了一批似乎很强大也很有地位的斯拉夫领袖。[52]

总的来说，这些新国家与帝国邻居间的军事和外交联系有多种形式。帝国往往意在掠夺，汹涌的侵略浪潮越过边界涌入这些新国家。相应而言，只要条件合适，新国家也会反击，去劫掠易北河以西的丰富资产。我们能想象到的就这么多，但这两种现象都有助于促进国家形成，让新生的王朝要么获得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要么获得建立国家所需的资金。除了这些主要的接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接触也推动了这一进程，比如军事和其他技术的出口，帝国偶尔的善意表现也增加了个别王朝统治者的资本。

纵观9世纪以后的普遍发展模式，还有两点值得指出。首先，与帝国相邻会带来两种影响："消极收益"（利用帝国的侵略来增强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积极收益"（对帝国发动袭击，获取资金）。比较易北河斯拉夫人的命运与皮雅斯特和普舍美斯王朝的命运后，我们发现"消极收益"更为重要。尽管易北河斯拉夫人处于更便于袭击的位置（就在帝国边境上），也常常发动袭击，但帝国对付他们也容易得多。而且，帝国之所以是帝国，就在于只要它想，只要没有其他因素干扰，就能施加比任何周边国家强大得多的影响力。因此，在帝国与易北河斯拉夫人的正面对抗中只能有一个胜利者。波兰离帝国很远，以它的地理位置是不会直接受到帝国侵略的影响的，而波希米亚的丘陵和盆地则受到了波希米亚森林、厄尔士山脉（Ore）和克尔科诺谢山脉（Krkonoše）的地缘保护。因此，光凭处在便于发动袭击的位置上这一点，还不足以形成国家。通过袭击，可以获得有用的额外资源，但前提是你得经得住帝国的反击，还能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怨恨都拿来为己所用。

其次，种种积极的和消极的接触，从长远来看都将相关社会推向了相同的方向——当然，前提是这些社会没有被帝国征服。在生存斗争中产生的凝聚力、帝国偶尔青睐的效果、袭击得来的资金、从帝国得来的军事装备与行政手段，所有这些都极大提升了新生王朝统治其所在区域的能力。给王朝带来有利影响的也不限于军事和外交互动。

全球化

显然，要想建立国家，王朝领袖就需要获得某些人口群体的同意。至少在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波兰，新领袖是先在本地的群体（“部落”）中获得了声望，然后才获得了人们对其统治更广阔区域的支持，而人们的支持程度应该是取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成就。即使在形成更大的国家结构之后，统治者仍需要获得同意，不仅要得到核心地区权贵的支持，还可能需要人数更多的自由阶级的支持——如果这样的社会团体的确在第一千年末的斯拉夫社会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话。同时，建立国家也需要动用暴力。如果想将权力扩大到原有的群体之外，就需要摧毁周边的山堡避难所，将那里的许多人重新安置到自己的核心地区。庞大而装备精良的军事随从是新的国家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军事力量肯定在摧毁旧秩序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都表明，能以空前规模大量积聚财富对王朝统治者至关重要。军事随从会消耗很大一部分财富。显然，他们需要食物，而且是很多食物。关于军事随从的比较证据（也包括和这些新国家有关的证据）表明，有充足丰盛的食物是战士们的基本要求。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贪吃。他们往往会花一早上的时间用双倍重量的剑击打木头（以磨炼技巧、增强肌肉力量），并进行提升感知力的活动，这些都要消耗大量的热量。但光为战士供应食物还远远不够。我们看到，这些新王朝的随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有先进的武器和铠甲，特别是防御铠甲。这些装备非常昂贵，不管是从法兰克的军火商那里购得（考虑到蒂永维尔法令，有人认为这是主要来源），还是自己生产。正是由于这些随从的军事能力，普舍美斯、皮雅斯特乃至摩拉维亚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那种迅速的暴力扩张才成为可能。但是，建立军队需要大量资金。我们显然要问：这些钱来自何处？王朝领袖又是如何得到这些钱的？

考虑到800—1000年间中欧和东欧的情况，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他们通过围绕毛皮和奴隶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网获得了资金。这种现象与先前改变了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社会的过程有些相似。罗马的常驻军队向来是农产品和各种劳力（包括额外的士兵和奴隶）需求的来源。前文谈过，从边境帝国那一侧稳定流入的现金促进了新社会结构的建立，为罗马后期出现的较大日耳曼联盟奠定了基础。但是，两种情况间存在一些关键差异。首

先是运作规模。后来的毛皮和奴隶贸易在地理范围和货币规模方面都远远大于罗马时期的贸易。奴隶贸易的利润自然一直很高，而第一千年上半叶的资料都没有提到的毛皮贸易，其价值要远高过罗马时期的任何贸易。也没有迹象表明罗马时期奴隶贸易的范围达到了后来贸易所及的北方和东方。因此，比起早期的贸易，后期贸易网络的运作在历史和考古资料中留下了更多的痕迹，我认为这不是出于偶然。

其次，第一千年末期的贸易网涉及多个帝国，它们都对高价值的物品有需求，而这也是贸易规模扩大的原因之一。最先产生这种需求的似乎是西欧，从8世纪中叶开始，远至俄罗斯北部的商品都运往了那里。与伊斯兰世界建立联系之前，旧拉多加的贸易站已经运行了几代人的时间。这完全说得通，因为西欧需求增加时，正是加洛林王朝崛起的时候。但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公元800年后不久，阿拉伯银币开始大量向北流动，部分贸易转向了第二批客户，也就是阿拔斯帝国的精英。那是当时最大的国家，那里的需求很快超过了来自西方的需求——至少从最终流入波罗的海地区的阿拉伯白银数量判断，情况是这样。阿拔斯哈里发国在10世纪初崩溃后，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也没有中断，因为东伊朗萨曼王朝统治下的一个重要继承国迅速崛起，该国拥有银矿，因而异常富裕。最后，在9世纪中后期的某个时候，君士坦丁堡登台了，虽然富裕程度比伊斯兰世界差得多，但它仍是精英需求的第三个中心。[53]

比起罗马时期的贸易网，涉及新贸易网的史料要多一些，我们得以更详细地探索这个网络的运作情况。前文提过，斯堪的纳维亚冒险家在9世纪开辟了一些主要的水路，特别是沿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到伊斯兰世界，以及沿第聂伯河跨过黑海再到君士坦丁堡的水路。也有穿过中欧进入西欧的陆路，而布拉格是路线上一大补给站。我们还能知道奴隶通常是在哪里被俘的，这很重要。阿拉伯地理学家写道，为获得奴隶，罗斯人向西发起袭击，“西斯拉夫人”则向东袭击。在奴隶和毛皮贸易中，大量阿拉伯银币流回北方，银币的分布确证了前述情况。银币集中的地方很值得注意。其中两个地方你应该能想到：一个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沿岸，另一个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第三个地方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正处在皮雅斯特王朝的腹地。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维斯瓦河以东，第聂伯河以北和以西的广大地区完全没有发现银币。显然，银币的分布证实了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没有硬币的地区正是奴隶被俘虏的区域，也就是罗斯和西斯拉夫这两块硬骨头之间的地方。[54]

这让我们对新王朝从国际贸易网中赚钱的方法有了进一步想法。所有王朝都忙着收取过路费，但我们看到，留里克王朝的统治者做的远不只是这些。作为贸易网络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也会开发市场，而不仅仅是对它们征税。考虑到奴隶贸易占了很大比例，新网络的发展可能与那些极为重要

的军事随从有很大关系。在奴隶贸易中，暴力和恐吓是少不了的，这不仅是因为被抓的人会反抗，还因为惊恐害怕的人运起来更容易。记得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曾拿起一本关于中世纪奴隶制的普通教科书浏览，我没有仔细读，因为它是用法语写的，中世纪奴隶制也不是我那一周作业的主题。但我被一张地图吸引了，地图上似乎用常见的那种交叉剑符号标出了一系列作战地点，但有点奇怪。我仔细一看，发现这些符号不是交叉的剑，而是剪刀，而图例写的是“阉割处”（points de castration）。这就不需要翻译了。妇女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阿拉伯地理学家显然热衷于描述北方社会有多野蛮，还特意强调了罗斯奴隶贩子的恶行有多么令人发指。伊本·法德兰说罗斯奴隶贩子是所有造物中最污秽的，还强调他们的个人卫生习惯有多糟糕。在被沿伏尔加河售卖的奴隶中，他只提到了妇女和儿童，还以窥私的口吻写下奴隶贩子与受害者发生了多少性行为。

很难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光看文字叙述，你可能会认为卖到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只有女人，但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一点。也许因为运输距离太远，用船运输男人太危险了——尽管在水上航行，但沿岸的潜在避难所离得并不远（这与后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不同）。但我毫不怀疑性剥削在运送过程中很常见，在谈论妇女和奴隶制这个话题时，总会讲到这种情况。而且你得想想，弗拉基米尔是从哪儿找到他在维什哥罗德的300个嫔妃、别尔哥罗德的300个嫔妃和别列斯托沃的200个嫔妃的？[55]

关键在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事随从不仅是建立国家的重要工具，也是俘虏奴隶的利器。有些袭击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但罗斯人也亲手做了不少坏事，而且有充分理由认为西斯拉夫人（可能是皮雅斯特王朝和普舍美斯王朝的随从）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看到，皮雅斯特王朝的领土上出土了许多阿拉伯钱币，而这个王朝的地盘十分靠近（可以通过文字记载和未发现阿拉伯钱币判断为）奴隶被俘的地区。很容易就能想到，皮雅斯特王朝和留里克王朝一样，不仅收取过路费，还积极参与国际奴隶贸易，以此增强其随从的军事能力。

新的贸易联系不是仅仅产生新财富而已。与财富至少具有同等革命性的是新的权力结构发展带来的乘数效应，新的权力结构攫取更多的财富，也控制财富的流动方向。和现代全球化一样，新的联系既产生了大赢家，也产生了大输家。最大的赢家是新王朝及其主要支持者：王朝背后的领导者及其随从。大输家当然是成为奴隶的那些人，以及崛起的王朝周边的人民，他们失去了独立，沦为没有自由的服务村中的居民。还是和今天的全球化一样，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新建立的联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理念也跨越了边境，新联系引发了巨大的变革。

人们早就认识到，在这几个世纪中将各地联系在一起的无疑是基督教。到1000年，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大部以及中欧和东欧的统治者都正式信奉了基

督教。皮雅斯特王朝在10世纪70年代改宗，丹麦人在蓝牙王哈拉尔的领导下差不多同时改宗，普舍美斯王朝的改宗要早大概一代人的时间，弗拉基米尔领导下的留里克王朝改宗要晚半代人。当然，摩拉维亚人9世纪中叶就接受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帝国欧洲之外的新王朝的统治者发现，他们新宗教的一个方面可能会造成问题。尽管在当时就不算新的想法，但从查理曼时代开始，皇帝头衔就带有特殊的意味：拥有皇帝头衔的人才是最高的权威，上帝亲自拣选他来代表自己统治世人。因此，接受基督教就意味着要承认帝国的上位权，新王朝自然会犹豫不决。如果你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教省，就还会面临一个实际问题：你领地上任何和宗教有关的收入（例如什一税）中都有一部分不受你控制，因为这些收入是属于大主教辖区的。大主教至少在名义上对主教的任命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因此“帝国”的大主教可能会干扰你领土内主教的选择。

这些潜在问题无疑对摩拉维亚王朝接受基督教产生了妨碍。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试图从罗马教宗和拜占庭那里获得基督教信仰，而不是通过离他们太近的法兰克人。也许出于类似的原因，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基督教化早期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传教士，而不是附近的帝国教士。但从长远来看，来自邻近帝国的庇护往往难以抗拒，最好的选择是从帝国那里接受基督教，但是要取得自己任命大主教的权利（就像波兰那样），以防自己受到严重危害。[56]

但是，为什么要接受基督教呢？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如果想摆脱“蛮族”的标签并得到基督教国家俱乐部的接纳，那么接受富裕、帝制、发达欧洲的宗教信仰是重要的一步。即使这么做可能会遭遇帝国的霸权，至少是遭遇帝国对霸权的主张，也好过仍被归类为“蛮族”；如果你还是“蛮族”，那么帝国内某个有影响力的派系就随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你，没有任何顾忌。显然，这就是易北河斯拉夫人最终灭亡的原因——哪怕在11世纪初，他们曾因亨利二世想要遏制皮雅斯特王朝的权力而曾短暂受益。在改宗基督教时对内说明一系列好处，早已是那些雄心勃勃的王朝的一贯做法。

好处大致有三类。首先，改宗基督教提升了国王和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地位。在第一千年中被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个基督教观点是，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任何统治者都无法赢得权力。因此，改宗基督教可以让统治者自称是被上帝拣选的，从而让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遥遥领先于最厉害的对手。这在政治上可能很有用，因为大多数雄心勃勃的王朝统治者是不久前才从一帮统治者之中脱颖而出的，而且大多靠的是暴力。其次，基督教是基于圣书的宗教：它的基本文本、对文本的注释，以及数百年来为组织其活动而发展起来的实践规则都是书面的。因此，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精英人口中，教会人士的整体文化程度是比较高的。神职人员因此可以充当国

王的侍从，据我们所知，改宗后的统治者都雇用了神职人员当仆从。从长远来看，教会人士的读写能力使行政管理的官僚化成为可能，这在评估和征收现金形式的税款方面特别有用。第三（这是第二点的自然结果），基督教的维护费用很高。建筑、书籍、全职的神职人员，所有这些都要花很多钱。因此，基督教总要设立新税种（第一千年末期常见的是什一税）来为宗教活动提供资金。种种证据表明，国王自己保留了一部分收入，有时是直接挪用什一税，有时则用间接的方法。间接方法能行得通，是因为国王往往保留了任命教士领袖（例如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权利，可以任命自己的支持者来担任这些职务，确保他们在财务和其他方面听命于自己。[57]

我一直对列出来的这些好处有所怀疑。比方说，宣称都需要得到检验。改宗后的统治者可以自称被上帝拣选，理当得到更多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真的就尊重他们。而在大多数有记载的例子中，改宗对当时的政治文化几乎没有影响。改宗后的国王照样会遭到反对、废黜和谋杀。博莱斯拉夫二世选择在圣瓦茨拉夫纪念日消灭斯拉夫尼克家族，就特别能说明问题。这肯定是故意的，你也许会想，他们选中以普舍美斯家族中的圣人命名的纪念日，尽管很残酷，却使该行为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但是博莱斯拉夫二世是博莱斯拉夫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而博莱斯拉夫一世是瓦茨拉夫的兄弟、谋杀者和继任者，因此，也许只是因为博莱斯拉夫一世这一脉喜欢在9月下旬杀掉竞争者，并选择这一天来提醒想要与之竞争的人，他们是如何对付对手的。而前述第二方面的好处是长期来看的好处，恐怕不是那些改宗领袖在考量中最关注的事。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资料比较充分的例子中，从改宗基督教到出现比较成熟的书面行政体系，中间隔了几个世纪，一开始的那些人恐怕并不是为了政府变革的前景而改宗的。[58]

因此，在通常认为改宗能带来的好处中，只有第三方面看起来比较重要，而这点就和摆脱蛮族地位一样，是9—10世纪各王朝改宗的真正原因。当时在帝国欧洲，教会税已经根深蒂固，将其拓展到新的区域再简单不过，况且新区域的国王们还有可能从中获利。[59]但我认为，这些好处都比不上改宗在另一个很少得到讨论的层面上的影响。有些矛盾的是，改宗的这方面影响是在这种新宗教遭遇强烈抵制的背景下显现出来的。

基督教是发达的帝国中依托文字的宗教，拥有意识形态上的威望，毕竟那是和人们眼中的成功者关联在一起的宗教，因此在中世纪早期的文化冲突中，基督教往往“胜出”——这有点像李维斯和麦当劳在世界范围内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们与美国这个成功的品牌关联在一起。不过，与基督教的接触偶尔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就像美国的成功在现代社会中造成的反弹一样）。我们之前看到，4世纪的哥特特温吉领导者迫害基督徒，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与罗马霸权有关系。600年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例如，公

元983年后易北河斯拉夫人反抗奥托统治的起义，就是公开反基督教的，他们劫掠、焚烧教堂和修道院，甚至死去主教的遗体也被挖出来侮辱。在这些地区，教会是殖民剥削的工具，他们如此愤怒也许并不奇怪。差不多同一时间，俄罗斯地区也出现了由统治者主导但略有不同的反基督教行动。尽管伊戈尔的遗孀奥尔加在拜占庭的影响下改信了基督教，可能在957年访问君士坦丁堡时接受了洗礼，但她的两个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拉基米尔在她死后先后继位，他们积极倡导非基督教的宗教，对抗其母亲选择的宗教。这里的问题似乎更多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实践上的，因为当时基辅并没有建起带有殖民意味的拜占庭教堂。[60]

在这些咄咄逼人的反基督教活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之外的宗教要想与基督教竞争，自己就先得改变。为了将他治下的众多族群团结起来对抗基督教的影响，弗拉基米尔虽然没有不让人们崇拜各自的神明，但将佩伦（Perun，波罗的海和斯拉夫人从前崇拜的雷电之神）的地位提升为至高神，并强迫臣民崇拜佩伦。弗拉基米尔把斯堪的纳维亚人、讲斯拉夫语的人、讲芬兰语的人，以及天知道还有什么人拉到了一起，要想让他们统一起来反对基督教，就得从他各类追随者信奉的众多异教中选出一个来信奉。甚至在文化上比较统一的易北河斯拉夫人中，反基督教的行动也带来了重大的宗教变革。虽然其他异教并不是都被取缔，但新建立的柳蒂奇联盟是用对瑞特拉（Rethra）的共同信仰凝聚起来的。人人都要向祭司和神庙缴纳奉献，每次打仗之前都要向瑞特拉问询，之后还要奉上十分之一的战利品。对于改宗之前斯拉夫世界中的异教，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但从他们需要设立一种新的总体宗教来对抗基督教来看，当时应该有很多种宗教，每个社会政治群体（“部落”）想必都有自己的宗教。[61]

在这种背景下，对需要将空前广大的领土统一在自己控制之下的王朝而言，基督教格外有吸引力。王朝所面对的种种非基督教宗教，属于久已确立的政治旧秩序中的文化结构。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吸引力在于它的不宽容：基督教拒绝承认其他宗教是正当的。接受基督教后，统治者就能去消灭先前存在的其他宗教习俗，而不管他是否有足够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来建立可以取而代之的教会。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打破可能妨碍他建立新政治秩序的一大文化障碍。除了其他更“积极”的吸引力，基督教还赋予了统治者摧毁既有宗教结构的权利，它的确是政治统一过程中理想的意识形态助手。

同等政治体与边缘区

第一千年末期出现在北欧和东欧的新国家是漫长复杂的转型过程的产物，其中一些过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5世纪末和6世纪的移民扩张让欧洲讲斯拉夫语的群体中出现了较大的社会分化。当时，阿瓦尔帝国似乎

在受其统治的斯拉夫群体中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世袭领导权，而9—10世纪的新国家能够在一度是蛮族欧洲最不发达地区的地方极大提高粮食产量和人口水平。种种转变中，至少有一些可能产生了以共识为基础的较大社会政治单元，个人为了从较大的群体中获得经济和政治保障，接受了作为群体一员要承担的义务。至少这部分情况可以从公元800年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山堡中看出来。这些山堡基本是社群的产物，是出于共同需要而建立的避难所，而不是在权贵的命令下建起的防御工事。

到这里为止，国家形成的过程都相当符合行话称为“同等政治体互动”（peer polity interaction）的社会变革模型。这个拗口说法的意思是，规模和实力相当的社会单元间的竞争逐渐带来了变革。[62]然而在9—10世纪中，这一渐进演变的过程迅速被一系列戏剧性的发展取代，而促成这些发展的是与外界日益复杂的联系。首先，查理曼摧毁了阿瓦尔帝国，开启了帝国臣属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斗争进行的同时，新的贸易网，加上军事和外交联系，为东欧和北欧带来了大量的新财富，尤其是贵金属。能大量积聚财富的成功王朝发展出在该地区前所未见的武装力量，靠武力骤然扩大了统治范围。

对王朝而言，在这两阶段的发展中，关键是要占据有利的地理或经济位置，从流通于国际贸易网的新财富中尽可能获取利润。在9—10世纪蓬勃发展的4个王朝中（不包括短命的摩拉维亚王朝），有3个的崛起得益于完美的位置。普舍美斯王朝的老家布拉格是中欧陆上奴隶贸易之路上的主要贸易中心。留里克王朝涉入奴隶和毛皮贸易的程度很深，而阿拉伯资料中的线索和出土的集中度惊人的阿拉伯银币表明，皮雅斯特王朝也深深参与其中。摩拉维亚的统治家族可能也是如此，因为在布拉格相交的路线也穿过摩拉维亚的心脏地带，但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在主要是斯拉夫欧洲的大陆上，在贸易网中占据顶级位置和成功形成国家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在这方面，最大的谜团也许是丹麦的耶灵王朝。没有具体的证据表明它参与了新的商业活动。比起欧洲北部和东部，日德兰半岛及其附属岛屿上的国家形成有更深的根源。考虑到此地在维京时代之前就有了某种形式的国家，丹麦的国家形成可能是重启了一度中断的进程，因此其军事力量的发展不那么依赖于积聚新财富。但还是可以说，耶灵王朝的命运也与国际贸易网紧密联系在一起。10世纪60年代，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向东对伏尔加河流域发动进攻，差不多同一时期，白银不再向北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但还继续流入俄罗斯。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一样，留里克王朝在这里发动的战争与争夺市场份额至少有一定的关系，战争的目的之一是将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从伏尔加河航线上赶走。短暂的中断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显然找到了一条通往南方的新路线，

白银再次流入，这次持续了差不多10年。然后在10世纪80年代，阿拉伯白银向波罗的海地区的流动终于完全停止。

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堪的纳维亚袭击者又开始骚扰起西欧水域，特别是昏庸者埃塞尔雷德治下繁荣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袭击者一再向后者索取银币和金条。实际上，我们对埃塞尔雷德时期银币的详细了解还要归功于这些10世纪的维京人，因为有成千上万的银币留在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手中。这种模式表明，阿拉伯银币不再流入后（可以说是留里克王朝干预伏尔加河流域的结果），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寻找另外的来源，耶灵王朝走在了最前面。这样，它避免了9世纪上半叶的戈德弗里德王朝的命运：当时出现了维京时代财富向波罗的海的第一次回流，破坏了戈德弗里德王朝的权力基础。更明确地说，耶灵王朝又开始率军袭击西方，说明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不久前被切断的阿拉伯白银流。这些白银可能来自过路费，也可能是像留里克王朝一样直接买卖贡品得来的。[63]如果是这样，那么丹麦王朝与10世纪其他王朝的成功故事并没有太大不同。

与帝国欧洲的其他形式接触对王朝的成功也很重要。除了（如易北河斯拉夫人那样）离帝国野心的威胁太近的情况，只要你的王朝能有效领导，就可以利用帝国的侵略来在国内获得同意和支持。新的军事技术、经济发展、帝国基督教，当然还有通过掠夺邻近的富裕帝国来获得财富，与帝国欧洲的这些互动推动了新国家形成的进程，也成为主要由斯拉夫人统治的东欧和北欧在9—10世纪转型的关键催化剂。当然，6世纪开始出现的社会分层，以及更成熟的耕犁技术的引入，都和此前与帝国的接触有关。用分析行话来说，第一千年末期的情况，与其说是“同等政治体互动”，不如用“核心——边缘模型”来描述，也就是说，交往各方的实力是很不平等的。而关于核心——边缘模型，有两个特点需要强调。首先，核心区和边缘区的交往涵盖了多种多样的联系。这个模型和之前的一些模型不同，它不是只以经济交换（贸易）为基础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技术接触都发挥了作用，在大致相同的方向上推动了社会政治变革。其次，和第一千年早期的日耳曼人一样，帝国欧洲之外的地区绝不是帝国赏赐的被动接受者。恰恰相反：北欧和东欧的人口或其中的某些群体在这些交流中积极发挥能动性，力求多获益、少受害。[64]

最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移民在这场大戏中的作用。与5世纪西罗马继承国的那一代移民相比，在北欧和东欧国家形成的最后阶段，移民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在我们讨论的五个国家结构中，只有留里克王朝治下的那一个在移民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形态，而即便在那里，前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数量也比较少。如果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没有果断插手，决心从彼此的业务中抽成，诺夫哥罗德和基辅之间就不会形成哪怕是松散的相互联系。但是他们人数太少，甚至在新国家的军事力量中都无法占据主导地

位——新国家的军队中包括了斯拉夫人、芬兰人等等。这种移民的规模很小，甚至比不上通过部分精英替代建立起来的罗马继承国所经历的移民规模。丹麦、波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些国家都是完全基于本地人口建立的。实际上，移民在这些地方起的作用，甚至还不如在2—3世纪推动罗马帝国边缘日耳曼势力形成时的作用大。

那是古典时代晚期欧洲蛮族中出现的第一次变革，移民的作用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但总是和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进程相伴。通常会有某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往往是向着罗马边境的方向，为的是增加与发达地中海世界的接触，获取更多的财富。斯拉夫时代始于5世纪末和6世纪时的类似移民，讲斯拉夫语的群体通过迁移与东罗马产生接触，从邻近东罗马的地理位置中获利，这在斯拉夫社会中引发了深刻的变革。但是，在9—10世纪国家形成进程加速的时候，这样的移民模式却看不到了。新的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当地形成了，却没有人因更发达的帝国欧洲的吸引而迁徙。

在这本研究蛮族欧洲的书收尾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探讨。为什么在公元第一千年的前三分之二时间里如此历史悠久、如此普遍的移民模式，在第一千年最后的几百年里停止了运作？

---

[1] Thietmar, *Chronicle* 4.45—6.

[2] 研究这三个王国的经典英文著作是Dvornik (1949)；参照Dvornik (1956)。如今相关的著作已有很多，下面只列一些用西欧语言写成的文献，而现在斯拉夫世界中的许多主要作者都开始用西欧语言写作。对Dvornik做出重要补充的，首先是如Barford (2001); Curta (2006) 这样的一般性著作，其次是关于各个斯拉夫国家的论文集，如Manteuffel and Gieysztor (1968); Settimane (1983); Brachmann(1995); Urbancyzk (1997a), (2001); Curta (2005); Garipzanov (2008)。此外，还有针对各个王国的研究。波兰：见Manteuffel (1982); Urbancyzk (2004。波希米亚：见Wegener (1959); Graus and Ludat (1967); Turek (1974); Sasse (1982); Prinz (1984);Godja (1988), (1991)。摩拉维亚：见Dittrich (1962); Bosl (1966); Graus and Dostál(1966); Poulik et al. (1986); Bowlus (1995); M. Eggers (1995)。这些著作是我理解第一千年后期东欧国家形成过程的基础；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只会在一些地方加出处注释，但这些著作是我认识的基础。

[3] Dvornik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对丹麦王国的研究不像对斯拉夫王国的那样详细。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形成的一些论文列入了前注2所列著作参考书目中的

二次文献。此外，在大量文献中，以下有关丹麦早期国家在维京时期崛起的研究特别有帮助：见Randsborg (1980); Roesdahl (1982); Hedeager (1992); Sawyer and Sawyer (1993); Rumble (1994); Lund (1997)。

[4] Dvornik对第一个罗斯国的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见前注2，前注也列出了补充著作）。进一步的信息，见Kaiser and Marker (1994); Franklin and Shepard(1996); Melnikova (1996); Duczko (2004)；法律结构，参见D. Kaiser (1980),(1992)。

[5] 丹麦的第一位本土历史学家是萨克索（Saxo Grammaticus），他的作品比斯拉夫历史学家的晚了约75年。

[6] 有关加洛林时代及之后新的文化模式的介绍，见McKitterick (1989),(1994)。

[7] 有关蒂特马尔的编年史的有用评论，见Schröder (1977)。Dvornik对这些国家改宗基督教的过程非常感兴趣：见前注2中提到的作品，尤其是Dvornik (1969)。前注2—4中引用的许多研究都涉及斯拉夫人的改宗，其他有用的补充信息和分析可以参见Wolfram (1979), (1995); Kantor (1990); Urbancyzk (1997b); Wood(2001)等。

[8] 除了前注3中引用的研究外，Scragg (1991)和Cooper (1993)还收录了不少有用的论文，特别是Sawyer (1993）和Lund (1993)。另参见Rumble (1994)、Sawyer(1994)和Lund (1994)。试图恢复埃塞尔雷德（Aethelred）声誉的著作——如Keynes (1987)——仅强调了丹麦君主的军事能力。

[9] 关于摩拉维亚拉斯蒂兹的工事：见*Annals of Fulda* 869（参见855年）。关于斯拉夫和丹麦的防御工事，见前注2—4，但特别有用的是Kurnatowska (1997a);Dulinicz (1997); Petrov (2005)。关于阿勒曼尼人，见本书第二章。的确，特温吉的领袖劝说特温吉人建造防御工事时，特温吉的政治统一瓦解了，但这是因为他们同时遭到了匈人的袭击：Ammianus 31.3.8，另见本书第四章。

[10] 见Ibn Fadlan, *Relation*，以及Thietmar, *Chronicle* 4.46（见第582页引文）。1003年的波兰军队：见Thietmar, *Chronicle* 5.36—7。

[11] 一份拜占庭的资料记载，协助巴西尔二世的罗斯部队有6 000人：见Franklinand Shepard (1996), 161—3。地方分遣队：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1015 AD,1068 AD）。在由Kantor (1990)翻译的波希米亚文献中，经常提到随从。

[12] *Encomium of Queen Emma* II.4. Lund (1986), (1993)坚定认为完全是雇

佣军，但赞美诗中的描述听起来更像是混合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实力弱得多的奥克尼伯爵很早就对其治下人口规定了明确的军事义务：见Crawford, 86—91。我认为，与斯拉夫国家一样，丹麦国家的各个部分间可能差异很大。

[13] 关于什一教堂，见Franklin and Shephard (1996), 164—5。其他参考资料，见前注2—4，以及Kurnatowska (1997a); Shepard (2005); Font (2005)。

[14] 丹麦的运输基础设施，见Randsborg (1980), 75ff.; Roesdahl (1982), chapter。

[15] 相关介绍见Dvornik (1949), 105—10以及附录5，尽管文本涉及的领地具体有哪些还有很大争议。

[16] 关于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一些文本，见Jirecek (1867)和Friedrich (1907)，以及Kantor (1983), (1990)中的评论。关于罗斯，见D. Kaiser (1980), (1992)。

[17] 但这个模式不适用于摩拉维亚。它作为国家中心运作的能力在9世纪90年代被崛起的马扎尔人摧毁了，此后它才成为被交换的领土。

[18] 叙述得比较详细的英语著作，见Dvornik (1949)。Randsborg (1980), 75ff出色阐明了巡游的原则。波希米亚的文本，见前注16。对波兰资料的出色评论，见Lowmianski (1960); Gorecki (1992)。

[19]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45—55).

[20] 见如Roesdahl (1982), 147—55。比方说，Fyrkat的建筑中，1/4是住宅，1/3是储藏室。

[21] 索比伯1004年死于布拉格，当时他带着一支波兰军队回到布拉格，与被赶出的普舍美斯家族的亚罗米尔（Jaromir）交战：见Thietmar, *Chronicle* 6.12。背景见Urbanczyk (1997c)。

[22] *Annals of Fulda* (845, 872, 895 AD)，二次文献见前注2。

[23] 评论见Wolfram (1995)；参见Bowlus (1995); M. Eggers (1995)重构的不同地理格局。但不管位于何地，基本的政治进程都一样。

[24] 传统的看法是在7世纪有30个小“部落”，在9世纪演变成8个更大的“部落”（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主要是从佚名的巴伐利亚地理学家的作品中推测出来的，他的作品并未涉及括奥得河以外的土地（参见本书第八章），波希米亚的情况也是据此推测出来的：参见Barford (2001), chapter 12。这种模式可能与历史现实相去不远，但最后阶段应该更加暴力：特别参见Kurnatowska

(1997a);Dulinicz (1994), (1997)。

[25] 罗斯国的崛起，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chapter 3。

[26]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74 AD: 斯韦纳德；978 AD：罗格沃洛德以及图里；993 AD：嫔妃）。

[27] 关于耶灵王朝更全面的讨论，见前注3中的参考资料。

[28] 与9世纪大军相关的国王，见本书第九章。10世纪模式的更多细节，见前注3中的文献。

[29] 一般性参考资料，见前注28。关于Denmark中的mark，见Lund (1984), 21—2；参见Lund (1997)。

[30] 见本书第八章，以及Curta (2001), chapter 7。

[31] 梅什科：见Ibn Jaqub。波希米亚：见*Annals of Fulda* (845 AD)，其文本的翻译见Kantor (1990)。摩拉维亚：见*Annals of Fulda* (894 AD)。罗斯：见Ibn Fadlan,*Relation*;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45—6 AD)。4世纪的日耳曼：见本书第二章。6世纪的斯拉夫：见Curta (2001), chapter 7。

[32] 更多讨论，见本书第八章和第一章（早期日耳曼世界）。

[33] 更完整的讨论，见前注中引用的文献。

[34] 对于后阿瓦尔时期的领袖，请参阅前注23中引用的文献。Wiztrach和他的儿子在波希米亚统治着自己的城市：见*Annals of Fulda* (857 AD)。关于摩拉维亚，见前注2中引用的研究。有关山堡变化模式的精彩介绍，见Godja (1991),chapter 3; Kurnatowska (1997a)及完整的参考文献。在早期斯拉夫世界，找不到与4世纪阿勒曼尼领袖的圆山和其他庄园（Herrenhöfe）类似的东西：见本书第二章。

[35] 特别参考Roesdahl (1982); Hedeager (1992); Sawyer and Sawyer (1993)。

[36] 关于花粉，见Donat (1983)；参见Barford (2001), 153—9，两书都附有完整的参考资料。

[37] 除了前注2中引用的文献，关于农业扩张的近期著作见Henning (2005)；Barford (2005)。这些研究表明，全面的庄园化发生在国家形成之后而不是之前。不过，6—10世纪的农业扩张确实也采取了别的形式。

[38] 基于我们之前看到的理由，可用的食物是限制人口数量的基本因素之一。

[39] 日耳曼世界中的类似进程，见本书第二章。

[40] 海泽比：见*Royal Frankish Annals* (808 AD)，以及Roesdahl (1982), 70—6。布拉格：见Ibn Rusteh。基辅：见*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chapter 9；参见Thietmar, *Chronicle* 8.2。波兰参与了这些网络，从银迪拉姆的分布图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见地图16。

[41]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11 and 945 AD). 早在808年，戈德弗里德就为了收取费用而将商人迁往海泽比：见前注40。

[42] 有关部落要塞被破坏的文献，见前注24。弗拉基米尔组织的迁移，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1000 AD)。关于波希米亚和波兰的服务村和核心地带的组织情况，分别见Godja (1991), chapters 3—4; Kurnatowska (1997a)。

[43] 奥列格的军队：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880—2 AD)。斯维亚托斯拉夫：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971—2 AD）。弗拉基米尔，见前注，一般性的评论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chapter 4。

[44] 介绍见Bartlett (1993), chapter 5。最高的估计是有差不多20万日耳曼农民被优越条件吸引，来到易北河以东。

[45] 加洛林王朝的扩张及其在结构上的重要性，见Reuter (1985), (1990)。

[46] 关于争斗，见Leyser (1989)。关于城镇，见Reuter (1991)。

[47] 关于易北河斯拉夫人的介绍和相关材料的汇编，见Lübke (1984—88) 和Lübke(1994), (1997) 中的进一步分析。

[48] Dvornik (1949)提供了有用的叙述。关于北方十字军，见如Christiansen (1980)。

[49] 格罗：见Widukind of Corvey 2.20，Heather (1997) 里包括了奥波德里特人的背景信息。斯瓦托普鲁克：见*Annals of Fulda* (870—2 AD)。

[50] 关于摩拉维亚的基督教化，见前注2中的参考文献。对弗林哈的残害：见*Annals of Fulda* (882 AD)。暴力和掠夺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很常见，这在蒂特马尔的《编年史》、《往年纪事》、不来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的《汉堡主教史》（History of the Bishops of Hamburg）、赫尔莫尔德（Helmold）的《斯拉夫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Slavs）中都有记载。最后两本书对帝国与易北河斯拉夫人之间的掠夺和战争有许多记载。

[51] 萨克森的军事演变，见Leyser (1982), essay 1 and 2。蒂永维尔的法令，见Boretius (1883), 44.7。

[52]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II.5；像柳代维特那样强大的领袖的迅速崛起，参见前注23中的参考资料。

[53] 更多讨论和参考资料，见本书第九章。

[54] 罗斯和西斯拉夫为获得奴隶而发起袭击：见Ibn Jaqub；这些新联系的重要性，参见McCormick (2001)。

[55] Ibn Fadlan, *Relation*；弗拉基米尔，参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93 AD)。如果被卖的奴隶全是女人，那么罗斯人可能不得不在第聂伯河的急流处自己扛船，但说只有女人可能只是文学上的夸张。（通过陆路和海路）被贩卖到西方的奴隶肯定有男有女；地图出处参见Verlinden (1955)。

[56] 这方面的基本文献，见前注7。保加尔人也避免从邻近帝国那里获得基督教。保加尔人试图避免与拜占庭的联系：见如Browning (1975)的介绍。保加尔人同样未能避免与帝国的联系，但最终和波兰人一样获准拥有自己的大主教。

[57] 因为有比德的精彩叙事作品和英格兰改宗时期之初的许多资料，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案例经常被当作探索这些想法的工具。出色的介绍，见Mayr Harting(1972)；参见Mayr Harting (1994)中与保加利亚的比较。

[58]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改宗基督教改变了当时斯拉夫世界的政治竞争，改宗也没有改变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情况——见Wormald (1978)的精彩论文。至于行政方面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最后一个改宗的国家是681年改宗的，当时韦塞克斯征服了怀特岛，但在我看来，两三代人之后，那里才开始出现真正基于书面文字的行政体系，而相关证据大量出现要等到9—10世纪。

[59] 加洛林帝国从8世纪后期起将什一税定为规范：见McKetterick (1977)。后来斯拉夫人改宗时的情况与此不同，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改宗时一样，宗教税还没有牢固确立。

[60] 特温吉人，见本书第二章。983年起义，见Reuter (1991); Lübke (1994)特别评论了Thietmar, *Chronicle* 3.17f中的叙述。《往年纪事》是罗斯情况的基本信息来源，Shepard (2005)近期的精彩研究充分参考了较早的文献。

[61] 弗拉基米尔：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78—80 AD)；以及Shepard (2005)的评论。关于易北河斯拉夫人，见前注47中的参考资料。

[62] “同等政治体互动”这个概念的介绍和一些案例研究，见Renfrew and Cherry(1986)。

[63] 关于银币流动的详细讨论，见Noonan (1997), (1998)。

[64] （古代的和现代的）比较案例研究，见Gottmann (1980); Rowlands et al. (1987);Bilde et al. (1993); Champion (1995)。但非常有必要考虑到能动性这个一般概念：参见Wilson (2008)。

第十一章

移民的终结与欧洲的诞生

9世纪90年代中期，游牧民族骤然闯入欧洲的心脏地带。马扎尔人追随着匈人和阿瓦尔人的足迹，将行动中心从黑海北岸转移到了匈牙利大平原。这次行动的结果和从前游牧民族力量带来的没有太大不同：

> （马扎尔人）将整个意大利夷为平地。他们杀死了许多主教，意大利人试图反抗，一天内有两万名士兵在一场战斗中丧命。摧毁潘诺尼亚大部之后，他们沿原路返回家乡。他们还阴险地派出使者到巴伐利亚议和，以便窥探这片土地。唉！这给巴伐利亚王国带去了前所未有的不幸和损失。马扎尔人出其不意地派出一支大军横渡恩斯河（River Enns），入侵了巴伐利亚王国。他们烧杀抢掠，一天之内就让五十里长、五十里宽的区域成了一片废墟。[1]

匈牙利大平原和周边地区，尤其是以斯洛伐克为中心的大摩拉维亚，很快就臣服了。马背上的侵略狂欢开始了，马扎尔袭击者横扫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自阿提拉时代以来，人们还未见识过如此的凶猛的力量。在1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内，马扎尔军队3次击败了东法兰克的军队。

但是，马扎尔人这次的欧洲之旅中，少了一个游牧活动中常见的要素。500年前，匈人两次向西迁徙的浪潮（4世纪70年代到达黑海北岸，一代人之后到达匈牙利大平原）给主要讲日耳曼语、半臣服的罗马帝国边境附属国带来了大量人口。那之后200年，阿瓦尔人来到喀尔巴阡山脉以西，促使伦巴第人前往意大利，使讲斯拉夫语的人向各个方向扩散：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向西直至易北河，向北到了波罗的海，甚至可能向东进入了俄罗斯的心脏地带。马扎尔人的到来尽管在许多方面很有破坏性，但并未产生有记录的人口流动（当然除了马扎尔人自身之外）。为什么没有出现人口流动？答案就在移民和发展的动态关系之中，在之前的一千多年里，这样的关系影响了整个欧洲。

移民

马扎尔人的活动没有引发进一步的人口迁徙，这的确出人意料，因为本研

究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人口迁移是公元第一千年历史中的重要主题，必须认真对待，而这与近期一些学术潮流主张的不同。近期的潮流并未将人口迁移从第一千年的历史陈述中抹去，但无疑倾向于贬低人口迁移的重要性。某些学术圈子里连“人口迁移”这个词都不愿意提，因为人口迁移与“侵略假说”这个简单化的神兵天降式模型联系在一起。侵略假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都还很流行，该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意味着混合人口群体的到来，这类群体是男女老少都有的“完整”群体，它们逐出了土地上原先的住户并加以接管，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当地的物质文化特征。这个模型被滥用得很厉害，将发展中的考古学科带入了以人口迁移为中心的模型，限制了它的创造力。此外，正如许多考古学家指出的，该模型其实什么也解释不了，因为对于为什么一大群人会按这种方式行事，它始终不能给出答案。因此，后来的考古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物质文化变革的其他可能原因上，是既合理又自然的。物质文化变革的原因有很多。宗教信仰转变、农业技术革新、社会发展等等都能对物质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高度怀疑移民作用的态度也跨越了学科之间的界限。现在，也有一些研究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相信，旧的侵略假说形容的那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他们乐于认为，记载了类似现象的历史资料必然是在误导。

而本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则是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重新审视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证据，特别是借鉴现代移民研究的成果，来重新理解第一千年的移民。在这方面，本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关于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证据比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的要更充分，也更容易理解。因此，一心避免提到人口迁移只会把针对第一千年历史中一些重要事件的讨论带偏，让人无法接受最可能成立的事件重构，也会妨碍对当时宏观发展模式的分析。

读过种种比较文献之后，不免要得出的结论是：智人总是在不断迁移，移民是一种策略，目的在于提升生活质量，尤其是获得更丰富的粮食供应和各种各样的财富。移民单元的大小、动机的构成、目的地的类型和其他具体的机制都随情况变化，但人口迁移这个基本现象是无处不在的。实际上，在最近的讨论中，还是保留了两种人口迁移模型：“精英替代”用于较大群体的迁移，“推进浪潮”用于较小的移民单元。这两个模型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它们与旧的侵略假说不同，比较安全。根据精英替代模型，参与迁徙的总人数并不多，他们的移民活动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只是一群精英换成了另一群精英，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根据推进浪潮模型，参与迁徙的是混合的移民单元（可以说是家庭），这些移民一点一点地慢慢占领土地，过程基本和平，而且肯定不是有意为之——在修正论者眼中，动机是旧的侵略模型问题最大的地方。第一千年欧洲的人口迁移，有多少可以用这些模型来解释呢？

人口迁移模型

当然，是有一些符合模型的人口迁移活动的。精英替代的一个经典例子是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相关的记载也很充分，只是年代顺序上有点小问题。如《土地调查清册》所示，在随后的20年里，以诺曼人为主的外来精英接管了英格兰乡村的农业资产，原有的地主要么被赶出去，要么地位降低。但是，绝大多数当地人的生活和诺曼人到来之前没什么区别。同样，维尔巴克文化在1—2世纪的扩张以及后来斯拉夫人的扩张中至少有某些元素——特别是科尔恰克农民在基本无人占据的欧洲高地上的扩张——也可能具备推进浪潮的特征。但就整个第一千年而言，这些模型过于简单也过于狭隘，不足以概括全部的人口迁移活动。

首先，模型本身需要大修大补。它们要么将不同的情况揉成一团，要么适用性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至少对描述第一千年的欧洲而言基本无用。目前的精英替代模型没有区分出像诺曼征服这种情况的特殊性。在诺曼征服的过程中，入侵的精英比较容易地融入并保留了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人口总体的影响也相应较小，尽管不像那些希望证明人口迁移没起什么作用的人认为的那么小。[2]但是，这种精英替代只有在新来的精英与本地精英的规模大致相同时才有可能发生。虽然无法证明，但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恐怕并不多见。

第一千年中，其他情况的例子倒是更多。入侵的精英即使相对于本地人口来说是少数（甚至是很少数），但数量还是太多了，无法靠重新分配原有结构下的土地资产来得到安置。因此，他们需要至少把既有地产的一部分打散，劳动力也要重新分配。经过这样的调整，人口中精英和非精英的比例变了，移民带来的文化影响和其他影响也相应较大。这种精英移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后果，随着当地居民与入侵精英的接触更加深入，移民在文化上的影响应该也会比较大，毕竟入侵精英的人数要多于原先的本地精英。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和巴黎以北的法兰克高卢，外来精英和本地人口从5世纪开始密切接触，公元870之年后的丹麦律法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接触没有那么密切。正是这样深入的接触带来了包括语言在内的巨大文化变革，本地人口被迫接受了与他们住得很近、人数较多的外来精英的行为方式。[3]

只出现部分精英替代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在5—6世纪西罗马故地比较靠近地中海的地区尤为普遍。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调整，以容纳入侵者（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等等），但原先的罗马地主精英幸存了下来。在较长的时间内，在这些地方需要努力保住自己文化的是移民，长期的语言变化也朝着不同于移民语言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说，作为第一千年人口迁移形式中最受限制的一种，它对相关地区的影响微不足道。首先，主导高级政治的是入侵的精英，而不是本地精英，至少在王位继承之类的事情上是这样，而这在政治方面的总体影响足以引发重大的

结构性变化。从中长期看，集中组织的对农产品的大规模征税逐渐消失，后罗马时代西方的国家结构因而弱化，对此的最佳解释是，入侵精英创建这些结构后，精英的生活方式走向了军事化。

推进浪潮模型同样需要做比较大的理论修订。它的基本问题在于，第一千年的欧洲已经几乎没有4 000年之前第一批农民开始耕种时那样的无人争夺的土地了，哪怕表面上与该模型相关的情况（例如在5—6世纪的斯拉夫科尔恰克扩张，或1—2世纪的维尔巴克扩张）也有这个问题。1000年的时候，欧洲仍然有大片森林，而在本书讲述的历史时期结束的时候，另一波农业扩张浪潮即将在森林中开垦出大片耕地。到这个时候，农民对土地的开垦已经进行了数千年，许多好的土地早就有了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随意而不发生争斗的扩张，哪怕实行扩张的是规模很小的群体。科尔恰克家庭或家族扩张的时候很可能基本没有发生争斗，但他们的扩张绝不随意，他们选择了不那么受人觊觎的地方，就是中欧高地上的那些更边缘的栖息地。甚至在这里也可能出现过胁迫的情况，因为整个地区后来被斯拉夫的文化模式征服，也有文献记载斯拉夫群体在其他地方扩张。早期的维尔巴克群体可能也是如此。维尔巴克的早期扩张似乎是小型的社会单元实现的，而随着它们的扩张，附近的普热沃斯克北部社区也进入了维尔巴克文化的范围。这有可能是出于自愿，但我认为，情况可能更接近于维京时期的小规模人口迁移。

从9世纪初开始，小型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单元就在苏格兰北部以及不列颠的北部和西部诸岛上开辟地盘。这些移民需要有船才能来，交通问题对他们构成了限制，而科尔恰克或维尔巴克的扩张并不受这样的限制。因此，正如文献记载中斯堪的纳维亚人后来向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扩张所示，哪怕移民单元很小，也必须由伯爵或地位较低的地主（holds）来组织，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财富来获得船只。但冰岛和格陵兰可以说是人烟稀少的地方，苏格兰北部和不列颠诸岛却并非如此，哪怕单个的移民单元规模很小，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这些地区的扩张也无疑是侵略性的。认为扩张带来了种族清洗的陈旧看法已经过时，但本地人口被贬抑到了较低的地位，也渐渐被吸收进入侵者的文化模式。因此，小规模人口迁移不一定意味着迁徙过程是和平的。只要它们面对的本地居民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区域性政治结构，小规模的移民单元就可以通过侵略手段成功深入当地。因此，在方向随机、基本和平的小规模移民“推进浪潮”模型之外，还需要另一种模型，就是非随机或有侵略性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小规模移民潮。这种模型对第一千年时基本没有无主土地的欧洲很适用，不仅可能适用于维尔巴克、科尔恰克和维京人的一些扩张，也许还适用于东日耳曼人在3世纪向黑海扩张的早期阶段、易北河日耳曼人向阿格里-戴可美特的扩张，以及斯拉夫群体在7—9世纪向北、向东进入俄罗斯的活动。

证据还告诉我们，推进浪潮与大规模迁徙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从小规模的移民单元开始的扩张，未必会一直保持这种规模。维京人是这方面记录最充分的例子。8世纪末和9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初的袭击和定居都是由小群体实现的。记录在案的最早的暴力事件涉及3艘船的船员（也许有100人），没有理由认为需要比这个大得多的群体才能在苏格兰和诸岛周围定居。但他们遇到的抵抗越来越多，得到的利润越来越多，又有了定居在不列颠群岛肥沃大地上的愿望，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这样更大的政治结构成了障碍，于是，更重要的斯堪的纳维亚领袖出手，移民中形成了规模更大的联盟。在865年的大军时期，规模庞大的联盟出现了，其目标是先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后在法兰克北部划出定居区。发动早期袭击的可能是不超过100人的团体，而每支大军的人数应该都在5 000人到10 000人。我们要始终记住，维京时代的行动以水上活动为主，因为它涉及其他情况下没有的运输问题；但是，从袭击小队到强大军队的这种被充分记录下来的演变让我们看到，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显著成功后，原本小规模的扩张是如何最终吸引到多得多的参与者的。一些年代较早的扩张没有那么充分的记录，也不受水上运输问题的影响。尽管如此，维京时代的人口迁移势头不断扩大，为理解第一千年的一系列其他人口迁移现象提供了有用的模型，尤其是2—3世纪的哥特人扩张和4—5世纪的伦巴第人扩张。这些扩张在一开始似乎规模很小，但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吸引了大到足以对抗罗马军队和地区内竞争对手（比如卡皮人）的力量。这种模式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向原罗马不列颠的扩张，可能也适用于3世纪的阿勒曼尼人。

因此，都不必进入真正有争议的领域，第一千年的证据就足以表明，我们需要对现在通行的人口迁移模型做出重大修正。但除了小规模移民、精英替代和势头越来越大的移民潮外，第一千年的资料来源中还不时提到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的迁移：这样的群体里往往有1万名或更多的战士，再加上他们的家眷。这样的记载听起来和陈旧的侵略假说太像，引起了怀疑，而且，在现代移民中也没有见到这种类型的移民单元。在现代人口迁移模式中，大型混合移民群体只有在受消极的政治动机驱动时才会出现，比如逃离镇压、大屠杀和种族灭绝，20世纪90年代的卢旺达就是如此。第一千年的资料可不是这么写的，这些资料描述的是组织程度更高的群体受更积极动机的驱动，以掠夺的方式闯入他人的地盘。我们可以相信资料所写的吗？在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总体图景中，我们是否应该保留大型、混合且有组织的人口群体呢？

侵略

即使采用最新的方法（DNA或稳态同位素分析），考古研究为这场辩论提供的证据充其量也只是一把钝器。仍然非常有争议的是，从第一千年埋葬

在欧洲北部寒冷潮湿地下的人类遗骸中，是不是还能找到有用的DNA。更何况自第一千年以来，人口发生了太多变化，现代人DNA模式的百分比分布，已经无法体现其1 500年前祖先的相对比例了；也许只有冰岛是例外，因为维京时代之前那里没有人类居住。[4]而稳态同位素分析也只能根据这个人牙齿的情况来判断其是在哪里长大的。两名移民在迁入地所生的孩子，牙齿里的矿物质和当地人的是一样的，因此这种分析本身就有低估人口迁移重要性的倾向。基于更传统的考古调查（某处特有的物品或习俗向另一处的转移）的论点也不会更有决定性。

理由很简单。公元元年的时候，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差不多经过了几千年的定居和耕种。由于哪怕是极具侵略性的占主导地位的移民，通常也会利用本地居民来从事农业劳动，人口迁移并不会导致大片土地无人居住。此外，正如比较研究所强调的（也是现代经验表明的），移民进入之前有人居住的土地后，双方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就会互相影响。对任一群体来说，其物质文化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有重要的意义而被长期坚守（无论好坏）。在新形式的刺激下，其他一切都可以改变，因此在第一千年欧洲的一般环境下，恐怕不能指望移民会将整个物质文化从A点到全面转移到B。任何有移民迁入的地区，其物质文化中总会有些元素留存下来，因此只要你愿意，就完全可以用内部演变来解释观察到的变化。物品和思想可以在不依附于人的情况下流动，如果考古观察到的仅仅是物品或思想的有限转移，那么其实总是可以用人口迁移之外的理由来解释。但是，始终可能有其他的解释，不代表其他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而且考古证据往往模棱两可，有时会被误读。如果说，关于人口迁移的考古证据模棱两可（通常是这样），那么它固然不能证明人口迁移在所有可观察到的物质文化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不能否定这一点。实际上，这意味着仅靠考古证据无法得出定论。坚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最近的一些工作中有一种趋势，认为模棱两可的考古证据基本否定了移民的存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从总体来说，这自然迫使我们回去寻找历史证据。从历史资料中可以得出多好的论据，来说明第一千年中大规模、有组织和多样化的入侵群体的重要性呢？

答案必然比较复杂。的确有一些文本将迁徙主题或误导性的侵略叙述套到了更复杂的事件上。约达尼斯对2世纪后期和3世纪哥特人向黑海以北地区扩张过程的描述是个典型的例子，加洛林时代及后来的资料中对4—5世纪伦巴第人的描述也是如此。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有充分得多的历史证据说明发生过大规模迁徙，移民群体中有1万多名战士，还有大量家眷：比如376年请求在罗马帝国内避难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或者488—489年在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率领下前往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两个案例的资料来源分别是阿米阿努斯和普罗柯比的作品，有人试图证明它们可信度不高，但并没有什么说服力。阿米阿努斯在他的历史作品中描述了不同蛮

族群体在罗马土地上的迁徙，但仅有一次提到了男人、女人和儿童组成的大规模混合群体。很难相信他只在这个时候受到了迁徙主题的影响，而在其他时候没有。普罗柯比也是一样：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他将跟随狄奥多里克迁往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描写为类似侵略假说意义上“民族”，也就是有男人、有女儿、有儿童的大型混合人口群体。一位当时的评论家当着狄奥多里克和宫廷里其他参与迁移的人的面，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相关的证据可能还没到铁证的程度，但可信度至少不低于第一千年中的其他证据。以所谓的迁徙主题为由拒绝它就太武断了。[5]

还有一系列证据（可信度不一，但还是在第一千年资料可信度的常规范围内）表明，大型、有组织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群体从406年开始向罗马的迁徙，以及拉达盖苏斯领导下的哥特人在405年的迁徙，都属于这种情况。[6]尽管肯定还需要更多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对阿拉里克领导下西哥特人发展过程最可能成立的重构说明，这个群体是在动员376年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通过382年的条约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从395年开始又进行了一系列迁徙。这些都是大型混合群体迁徙的实例，而且都算是第一千年的证据里比较可靠的。有了这么多的例子，我们就应该知道，不应仅仅因为相关证据略弱一些就轻易否定其他的一系列人口迁移，特别是与匈人帝国兴衰相关的人口流动——以日耳曼人为主的武装群体先是聚集在一起，后因匈人帝国崩溃后内部竞争加剧而撤离了匈牙利大平原。这些案例中，大型群体迁移的证据要么不够全面（鲁吉人和赫鲁利人的情况），要么只是暗示而不够明确（斯基里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的情况）。因此，尽管的确有一些案例被错误描述为侵略假说主张的那种人口迁徙，但对于许多其他案例，如此描述并无不妥。实际上，即使是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案例也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

对于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迁徙，后来作者的回溯性描写都出了错。约达尼斯写的是发生在他生活的年代之前300年的事件，而9世纪及之后的伦巴第作者，写的则是在他们之前四五百年的人口迁移活动。很容易看出为什么他们会犯错，但我们要说的不只是这个。其实，将当时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活动视为某种人口迁徙并非全然妄想。关于2—3世纪哥特人和4—5世纪伦巴第人的证据确实表明，当时有大量人口迁移，影响力也不小。

关于哥特人的证据质量要高一些。有当时的记录表明1—2世纪时哥特人就来到了波兰北部，但到3世纪中叶才出现在黑海以北。3世纪，黑海以北地区还经历了重大的物质文化变革，一系列新的习俗和物品出现在那里。而在这些新的特征中，有一部分早在1—2世纪时就在波兰确立了，代表了当时人的生活方式和对死亡的看法。这些考古证据本身不能证明哥特人从波罗的海迁移到了黑海地区，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证据后，它们就成了值得认真考虑的论据。而即使历史证据表明一开始参与迁徙的是许多独立的群

体，而不是一个“民族”，即使一开始的群体人数很少，但随着迁徙过程的深入，移民的人数也可能增加。实际上，3世纪的哥特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人口迁移的势头越来越大，直到哥特特温吉人在290年到310年之间取代卡皮人成为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统治群体为止。与伦巴第人相关的证据与此类似，尽管没那么详细。

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伦巴第人在1—2世纪出现在如今丹麦南边的易北河下游地区。没有任何当时的历史记载表明罗马时期该地区出现过重大的人口迁移，仅有的考古证据也只能说明有过一系列规模较小的迁移，比如第一批迁入黑海地区的哥特人。但到了5世纪90年代，伦巴第人又出现在易北河上游，他们人数众多，足以用主力部队摧毁赫鲁利人在匈牙利大平原西半部的霸权。因此，不管其早期形式如何，伦巴第人向多瑙河流域的扩张就像哥特人向黑海地区的扩张一样，最终都采取了较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形式。因此，约达尼斯和伦巴第史料写大规模迁徙并非无中生有，尽管这些作者弄错了迁徙的形式。还可以再为他们说句话，就是在哥特人和伦巴人首次迁徙和这些史料编纂完成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哥特人和伦巴人向意大利方向的迁徙采取了大型复合群体的形式：东哥特人迁徙发生在488—489年，伦巴第人则在大约80年后。[7]

因此，仔细审视后发现，无论是约达尼斯的作品还是伦巴第的资料，都没有给出足以否认其他资料记载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理由。话虽如此，有必要认识到，即使是第一千年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最典型例子，也不完全符合旧的侵略假说模型。不管迁移的群体有多大，都不是整个“民族”从一个地方完好无损地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些群体既会流失人口，也会增加人口；持续时间很长的移民潮更是如此，例如2—3世纪的哥特人和4—5世纪的伦巴第人，但在符合该模式的迁徙中，只有一些大型群体的移民活动在史料中有明确的记录。做出大规模迁徙的决定从来都不容易，而且常常引起分裂。376年，一批特温吉人进入帝国，而相当一部分原属同一群体的特温吉人留在了多瑙河以北，继续效忠于原先的领袖。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在473年将当时的潘诺尼亚哥特人迁至罗马巴尔干地区，也引起了分裂，而狄奥多里克本人在率部迁徙的时候，至少将一些哥特精英留在了身后，这些哥特人后来被纳入了东罗马的军事政治体系。迁移中的群体也会吸收新人，伦巴第人前往意大利时，吸收了有2万名萨克森人的混合群体，还有因后阿提拉时代多瑙河中游权力斗争而无家可归的人的后裔。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在伯父和他自己两代人经营的基础上，让鲁吉人加入了哥特人的队伍。面对罗马在西班牙的反攻，两个汪达尔群体和阿兰人（他们一同跨过了莱茵河）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在429年入侵北非时，这些群体中的幸存者团结在阿斯丁格君主身后，形成了一个比23年前的松散联盟更有凝聚力的政治单元。近期的不少研究表明，在这些移民行动中，雪球和台球一样多。

旧的侵略模型没能体现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大型群体中不仅有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也有不同地位的人。根据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鼎盛时代形成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观点，当时大量有人身自由且地位平等的战士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形成了侵略性的群体。但是据记载，较大的群体中有两种身份不同的战士，因此有理由假设非军事化的奴隶也参与了至少一些迁徙活动。只有地位较高的战士才能被归为“自由”，而他们属于精英阶层，在群体中必然只占少数。因此，当时做出迁徙这个关键决定的只是少数人，地位较低的战士和奴隶几乎没有发言权。认识到地位差异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我们就能知道，目前流行的那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放弃群体身份的思想，在实践中有多么受限。如果群体身份完全由个人选择，那么谁会傻到选择去当地位较低的战士或奴隶？相应而言，我们也要谨慎看待雪球现象所起的作用。蛮族欧洲的大部分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选择是否加入大型移民群体的权利必然只能由少数的精英分子行使。[8]

最后，关于大型群体移民的旧侵略假说模型还需要进一步修正，需要改变大规模入侵逐出现有人口这个假设。第一千年中有一些大规模入侵的例子，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中任何一次引发了大规模种族清洗。本地人口经常面临臣服还是离开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对本地精英来说非常艰难，新主人到来，他们的损失是最大的。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文献记录表明这样的选择会清空大片土地上的人口。至少，本地人口可以充当农业劳动力，而且许多移民群体中也有社会地位较低的类别，可以轻易将新征服的本地人口纳入其中。

这些都是重要的修正，但只是修正，而不是否定这个基本主张：关于第一千年中有组织的大型混合移民群体的证据，至少就这个时期而言在表面上有说服力的。那种整个先祖“民族”清空整片土地为己所用的民族主义观点，已经可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我们资料中提到的群体是政治实体，可以成长或分裂，群体成员的地位有高地之分，这些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迁入对它们而言全新，但已经有人居住的环境中。尽管根据现有的历史证据，这个结论已经很明确了（考古证据也没有否定），但是，现代移民中并没有类似的现象，我们还能继续如此主张吗？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一个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为什么第一千年的欧洲人口迁移采取了那样的形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以探讨人口迁移这样一个普遍现象的比较移民研究为背景，研究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间可观察到的人口迁移模式。

人口迁移机制

从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活动中，可以找出很多和记录更完备的近现代移民

呼应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第一千年和后来的时代，活跃的信息场域对确定目的地而言都至关重要。日耳曼人在3世纪向黑海地区扩张之前，显然通过运营琥珀之路得到了有关该地区的信息。斯拉夫群体先通过袭击了解罗马巴尔干半岛，然后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时候利用这些知识在那里定居下来。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西方的扩张，也是基于参与8世纪贸易中心网时获得的情报，而向东方扩张的人花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才沿着俄罗斯西部的水路找到了通往伊斯兰世界重要城市的路线，伊斯兰世界对北方物品的需求很大，而商人们原本是通过波罗的海东部腹地来为西方市场输送物品的。这些例子都没有什么争议，我还可以举出别的例子。400年前后某些群体迁入罗马领土时，一路上走走停停，这种人口迁移模式有点古怪，而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再次上路之前，需要知道下一个有可能成为目的地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例如，哥特人，特别是于376年进入帝国的特温吉人原本就知道巴尔干半岛，但不知道意大利和高卢，他们到下一代人的时候才移居到那里。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参加两次罗马内战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向那个方向行进了很长的距离）才准备好下一步。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一样：他们最初的移民野心以西班牙为终点，后来又花了20年的时间，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海上袭击，才准备好冒险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前往北非。更一般地说，移民潮的势头越来越大这一现象本身显然是知识增加的产物。对新地区的探索性扩张为先驱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从而鼓舞其他人也加入。在一些现代的例子中（例如布尔人从好望角向北扩散），先驱者都是特意招募来的，他们前去侦察，看看大规模扩张是不是可行。但使用非正式的消息渠道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对现代移民的研究还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某些社区中的某些人选择迁移，而另一些多少处于相同情况下的人却选择了留下？要全面解决这个复杂问题所需的那种详细信息在第一千年根本无法获得，但有必要指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史料有所记载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每一次都在受影响的人口群体中引发了分裂。持续时间更长的人口迁移活动也是如此，或者说更是如此。起源于波兰的日耳曼人中，有一批在3世纪到达了黑海地区，还有许多人留在了后方，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文化体系仍在运转就是证明。同样，许多盎格鲁人和萨克森/撒克逊人并没有在5—6世纪移居英格兰，维京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也没有变成无人之地。当然，考虑到所涉及决策的重要性，出现分歧是很自然的，即使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种种反应的细节，第一千年的人显然也感受到了现代移民承受的那种压力。

在现代社会，压力的另一体现是移民返乡现象。仔细观察可知，所有的现代移民潮中都有大量移民返回原籍国。同样受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具体讨论第一千年的移民返乡现象，但是维京时期的方方面面都表明这样的现象

真实存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扩张的最初阶段都围绕着收集财富展开，他们或是袭击或是贸易，或者两者兼有。积累财富之后，不同的人会对投资做出不同的选择。有些人早早选择留在东方或西方的目的地（如苏格兰北部和诸岛上的早期定居点所示），而另一些人则选择将新获得的财富带回斯堪的纳维亚老家，最终造成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大动荡。考虑到这个例子，我（和其他人一样）很乐意相信关于一些新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最终也选择返回欧洲大陆的记载。[9]

与移民压力关系密切，但我们有办法更详细地探讨的，是固有的移民习惯对迁移模式的重大影响。在现代移民潮中，迁移传统往往能决定某一人群中的哪些人会迁移。搬过家的人往往会再次搬家，但不那么直观的是，迁移习惯会一代一代传下去。移民的后代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再次迁移。个人或家庭迁移的传统显然会让这些人更倾向于通过迁到新的地方来解决问题或寻找机会。只要促进因素足够强，任何人都可能走上迁徙之路，但对已经有了迁移习惯的人来说，促进因素并不需要太强。

在第一千年中，至少可以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看到迁移习惯的影响。首先，至少在两个主要的迁移潮（2—3世纪的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的日耳曼人，以及300年后的早期斯拉夫人）中，相关人口的耕种技术最多只能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维持同一块耕地的肥力。对他们而言，在居住地附近定期迁移是常态，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迁移有助于比较随意的推进浪潮式扩张最终转变为渠道化移民潮，人们得知更远的地方有新的机会后，就会改变移民方式。其次，第一千年的某些人口群体显然已经确立了长距离迁移的独特传统。4世纪的哥特特温吉人可能是最出名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决定在376年去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近期移民的鲜活记忆极大促进了这一决定。同一个哥特群体在公元3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才拥有了他们在多瑙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土地，而在差不多一代人之后的4世纪30年代，他们就开始尝试整体迁移到多瑙河中游地区边缘的新地盘。4世纪30年代走上迁徙之路的，就是那些迁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人的孩子们，而这些人的孩子和年龄较大的孙辈则在376年决定迁往罗马帝国寻找新生活。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受匈人帝国兴衰影响的其他群体，包括在376—380年和405—408年的危机中逃进罗马的人，以及在匈人的影响和/或压迫下先是移居多瑙河中游，然后在阿提拉死后离开那里的人。9世纪后期，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迁往冰岛和格陵兰岛，他们之所以愿意迁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是迁移到苏格兰和诸岛的人的后代。事实上，像哥特人或斯拉夫人这样的例子表明，最初产生于本地迁移传统的行动，是能够催生出大规模迁移的传统的，而正是这种传统促使许多特温吉人在376年向罗马帝国迁移，就像19世纪前往北美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在欧洲各地迁移。

除了移民的情感代价外，经济代价也是移民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我们有所了解的大多数第一千年移民主要靠步行和运货车迁移。除了动物、人和轮子的损耗之外，并不涉及昂贵的运输成本，因此许多人都可以参加。然而，它涉及许多间接成本，最重要的问题是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因为迁移干扰了正常的农业活动。因此，除非情况完全不允许，否则在迁移之前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粮食储备，这意味着秋天是搬家的常规时节——作物刚刚收获，拉运货车的牛和其他牲畜吃的草还能长一段时间。阿拉里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401年和408年秋天进入意大利，拉达盖苏斯领导的哥特人在405年秋天进入意大利。在406年年底渡过莱茵河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大概也是在那年秋天从多瑙河中游启程的。[10]

对于第一千年移民成本的影响，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最基本的方面，但现有的资料的确不时提到运输问题。最重要的是，持续时间很长的迁徙会让各个群体在经济上特别脆弱。君士坦提乌斯三世在414—415年让阿拉里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当时的领导人是阿陶尔夫和瓦利亚（Vallia）］挨饿，最终降服了他们。到那时为止，这些哥特人在那片土地上已经六七年没有种庄稼了。5世纪晚些时候匈人帝国崩溃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采取的运输战略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也有所体现。他领导的群体在5世纪70年代用车辆带着大量谷种在巴尔干半岛行进，而他与罗马帝国外交谈判的一个方面是取得农业用地。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行军过程中，他领导的群体也一直寻求与巴尔干社群建立更常规的经济关系，而不仅仅是劫掠当地人。当地社群会继续耕种并生产剩余食物，哥特人可以从中抽取一定比例，而如果通过掠夺摧毁这些社群，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就只能饱餐一顿而已。

交通因素对不只有陆路交通需求的人口流动的影响比较大。直到19世纪后期大型跨大西洋轮船中有了统舱，大规模海上运输才成为可能。在那之前，旅行费用必然会限制人们对基于海上的扩张的参与。对此，维京时期的例子是第一千年中记录最完备的。船太贵了，即使是特制的货轮也只能运载有限数量的人员和货物。因此，维京人发起袭击时，不那么富有的人就需要凑钱买船或者租船（但我想没有多少船主会愿意把船租给别人当袭击船用吧），或者自己依附于地位更高的领袖。[11]到了定居阶段，交通限制的问题就更突出了，因为此时需要更多类型的人员和更多种类的笨重农业设备。单单是相关的运输费用，就使斯滕顿所说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定居丹麦律法区的阶段变得难以想象。如果当地已经有了现成的低地位盎格鲁-撒克逊劳力，谁还会付钱去运输劳力呢？交通对定居冰岛也有影响，每个移民单元都由一个地位较高的人领导，因为大概只有他们出得起运输所需的一大笔初期费用。与这一时期的陆上迁移相比，交通也可能限制了参与北欧移民潮的斯堪的纳维亚妇女的数量。现代DNA模式表明，当时来到冰岛的妇女中只有1/3是直接或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其余妇

女则从不列颠群岛而来，迁移距离较短。这可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交通的费用太高了，只有一小部分战士带上了自己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家眷。另外，参与迁徙男子相对富有，而且他们不信基督教，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女性的人数在早期可能超过了男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男人可能不仅会带上他的斯堪的纳维亚爱人，还会带上几个不列颠或爱尔兰的女子。

虽然维京时期的证据很有限，但已经算比较详细的了，第一千年其他几次海上行动的证据还不如它，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跨越北海的迁移，还有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远征。不过，交通需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相似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许能用恐吓的手段去征用一些交通工具，但我估计他们自己还是得自己承担大部分费用。有理由认为，每次迁移都只能带上相对少的人，这决定了他们对落脚点的选择：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摩洛哥，那里远离防御得更好的罗马北非心脏地带。一次运送许多人在交通上无法实现，这可能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移民到不列颠南部用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个主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虽然可用的资料有限，但比较研究文献可以通过一系列方法促进我们对第一千年人口迁移情况的理解。但是，还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回答。最重要的问题是：史料提到第一千年中有过有组织的大型混合人口群体迁移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史料所写的？而如果可以相信，我们该怎么在第一千年的背景下解释这个现象，而这种人口迁移模式未见于资料记录比较充分的近现代时期，这又该如何解释？我还是认为，现代移民研究有助于回答这类问题，但是要获得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得将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模式放在当时蛮族欧洲发生的一系列转型的背景中研究。

移民与发展

比较研究为我们考察移民潮的可能原因提供了两个基本方向。首先，如果两个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就非常有可能出现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人口会从欠发达的地区向邻近的富裕地区流动。在不同的时代，因可用的交通方式不同，“相邻”的含义也大不相同，而本来会产生人员“自然”流动的情况，也可能受到两地政治结构的干扰或可用信息的限制。但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人口流动是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果，毕竟智人天生倾向于把迁移当作获得最好结果的战略。第二个方向也很基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迁移的具体动机都是自由意志和强制、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的混合。当然也有例外，尤其是一心逃离死亡的政治难民，但大多数移民受上述四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将两方面观点放在一起，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结论是，移民问题几乎都需要从普遍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来理解。我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既可以令人满意地解释第一千年移民的总体地

理分布，也能解释其标志性移民单元看似古怪的性质。

罗马欧洲的移民

第一千年开始之时，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角度看，欧洲最发达的地区都是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圈，南方和西方主要属于拉坦诺文化的地区是在那之前不久归入罗马治下的。拉坦诺欧洲的特点是农业制度发达，剩余粮食可以养活相对密集的人口，还能支撑其他经济部门的大量生产和交换。拉坦诺人口向北移动时，罗马人征服了他们，而罗马的征服差不多停在拉坦诺欧洲的外围，这并非偶然。理由很简单：在那个界限之外，征服带来的收益还抵不过出征的代价。拉坦诺欧洲以外，是主要说日耳曼语的后亚斯托夫世界。该地区内各地的经济模式差异很大，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某些人口与拉坦诺邻居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实质性接触。但总的来说，这里政治单元的规模比并入罗马帝国之前的拉坦诺欧洲的单元小得多，农业生产力也比较低。因此，这里的人口密度较小，非农业生产和交换的迹象较少，也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至少在物质文化方面）。在亚斯托夫欧洲之外，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在生态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居住的还是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农业人口，他们的农业生产制度效率更低，定居点规模更小、使用时间更短，几乎没有物质文化产品。

根据比较移民研究，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在明显以三种速度发展的欧洲（地图1），人口会从不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大体上是向南和向西）。罗马时期（1—3世纪）的情况基本就是如此。比较发达的罗马欧洲凭借其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从较不发达的邻近地区吸收了人口，特别是从附近基本上由日耳曼人统治的后亚斯托夫欧洲。许多人自愿加入罗马军队，从而进入帝国，还有许多人是作为奴隶被迫来的，他们将服务于各种经济目的。这些人口流动是众所周知的，无须进一步评论。但2—3世纪规模较大也较有争议的日耳曼人口流动也符合这个模式，也就是他们也大致向南、向西进入更发达的欧洲地区。但是，要全面理解人口流动的具体历史，就需要理解与罗马帝国的广泛互动如何改变了公元元年时主导欧洲的三速模式。

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从根本上解释了这些年中日耳曼人扩张在地理上的不对称。推动扩张的力量似乎在日耳曼人主导的中欧地区普遍发挥了作用，但由此产生的人口流动并不平衡，在东南部特别是黑海以北地区的影响远大于西南部。在西南部，日耳曼移民接管的只有阿格里-戴可美特这一个地方，而东边的达契亚被废弃，黑海以北的政治结构被完全改造。各个方向上的移民的规模可能有所不同，但也是使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结果的根本因素造成的。向南和向东的流动要对抗的是罗马近边缘地区的附属国，而不是直接对抗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因此成功的可能性比在需要对

抗直接帝国的西南部移民要大得多。

为什么那些成功实现扩张的领袖往往乐于安顿在帝国边缘，而不是继续追求永久性地越过边境？部分原因也可以从1—2世纪与罗马世界互动的较长期影响中找。贸易机制的运作（包括长距离的奢侈品贸易和以农产品为主的短距离贸易）、袭击更富裕的罗马领土的机会，以及帝国通过外交补贴来增强附属国力量的做法，都意味着在这两个世纪中，直接与帝国边境接壤的日耳曼宫廷积累起了新的财富。因此，三速欧洲出现了第四种速度：内边缘区附属国的财富，超过了之前与它们同等而如今成为外边缘地区的后亚斯托夫欧洲地区。带领日耳曼人扩张的领袖将行动限制在帝国边境之外的地区，不仅能大大降低军事风险，而且能获得的财富也不少，因为边境地区与帝国经过两个世纪的交往，积累了不少财富，本身就是掠夺性扩张的诱人目标。在这些进程展开之前，野心勃勃的日耳曼领袖没有必要从中欧北部迁到南部，或者从喀尔巴阡山脉以北迁到东南，因为这么做得不到什么物质收益。

这么理解2世纪末和3世纪的移民，也就能知道为什么至少一些移民单元采取那种看似古怪的形式了。外边缘区的势力觊觎帝国边境附近地区累积起来的新财富，染指这些财富的第一次有记录的尝试采用了袭击的形式。以波希米亚为基地的马科曼尼国王瓦尼乌斯年老后失势，一名被赶下台的政治对手组织起一支来自波兰中部（可能还有波兰北部）的战队，前来洗劫国王宫廷的动产，其中大部分来自外交补贴和国王从罗马商人那里获得的抽成。尽管无法证明，但我敢打赌这是种常见的现象。但是，打了就跑的袭击不是获得帝国边境地区新财富的最有效方法。由于与贸易、罗马外交手段、袭击罗马领土的方便程度等有关的结构性原因，在地理上，最有机会从与罗马帝国的交往中获得新财富的地方是紧邻帝国的边境地区。外边缘区的群体和领袖如果想获得更多财富，就需要搬到边境地区。难怪在2—3世纪，移民取代了袭击；来自外边缘区的领袖及其追随者雄心勃勃，试图控制蛮族欧洲以罗马为中心的新财富流动。

而到了1世纪末，边境上所有可能带来丰厚利润的地方都已经被多少算是军阀的力量占据了，居住在那里的群体不可能不经战斗就放弃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这个时候若想永久迁入罗马边境地区，就必须破坏既有的政治结构，这解释了为什么2—3世纪的移民潮得动用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庞大军事力量，而不是仅仅由一两百人组成的战队。战队可以实行有效的袭击，但战队的力量不足以重塑整个政治结构，因此来自外边缘区的领袖别无选择，只能招募更庞大的远征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此有必要暂停一下，看看更晚近、记录更充分的例子对这种移民扩张模式有什么启示。成千上万的武装人员组织起来，进行这种有意的掠夺性入侵，在现代世界中并不常见，有人据此认为过去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对于这样的反对意见，一部分回答是，尽管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但确实可以在近现代世界中看到：布尔人大迁徙时就采用了这种移民模式。布尔人的入侵单元可以小一些，因为布尔人的火力比他们要对抗的祖鲁人和马塔贝勒人高出一大截。在2—3世纪，掌握技术优势的更可能是作为目标的内边缘区群体，因为它们很可能一直在购买罗马的武器装备，因此来自外边缘区的入侵军队规模必须够大，至少不能小于边境地区国王所部署的军队。

答案的另一部分来自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为什么即便是累积起来规模很大的现代移民潮，也往往是基于只有几个人的小规模移民单元实现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移民单元的规模是由现代移民从吸引他们的较发达经济体获取财富的方式决定的。在现代，个体移民可以在经济体的工业或服务业中找到工作，从而获得财富，至少从移民本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收入属于相对高薪。基本情况并不是移民单元的规模都很小，而是移民单元的规模需要与获取较发达经济体中财富的方式相匹配。欧洲第一千年的所有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农业，技术含量极低。因此，即使是比较发达的罗马帝国周边，也无法为个体移民（除了少数能依附于边境地区国王的军事随从）提供许多哪怕只是相对高薪的工作。对想在这里获得更多财富的人来说，自己单独移民或者和一小群人一起移民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击败现有的居民，让帝国将你认定为这个边境地区的首选贸易伙伴和外交伙伴。因此，那种移民群体虽然在现代世界中并不常见，但实际上符合我们见到的移民潮背后的基本原则。第一千年的大规模掠夺性入侵与当今的个体移民一样，是通过迁徙获得财富的恰当方式。

发展水平的不同也能解释2—3世纪人口流动的另一个奇特之处：很多战士都带着家属。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日耳曼人主导的欧洲是一个遍布技术水平低下、规模极小的农场的世界，生产出来的剩余粮食有限。因此，经济水平无法支撑大量的战士随从。即使是4世纪的国王，能调配的食品供给也只能让他养活一两百个人。因此，和布尔人的情况类似，仅靠日耳曼世界中的少量职业军人，是不可能实现占领罗马边境利润丰厚地区所需的大型军事远征的。他们需要从社会各阶层招募军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有了家眷。这些参与者（也许一些年轻的十几岁少年除外）显然不想将家属长期留在后方，而即使是将他们短期留在后方，直到远征告一段落，也会使他们面临巨大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一两百名男子组成的日耳曼远征军有众多家属陪伴是很自然的事。[12]布尔人的侦察行动甚至还有妇女参与，而参与布尔人大迁徙的群体都是混合的，战斗时，妇女远非旁观者；她们都有填好弹的燧发枪，在必要时会开枪射击。2世纪的日耳曼妇女没有枪，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使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中，她们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尽管从一些比较移民文献的角度看，史料中描述的这些日耳曼移民潮在规模和构成方面有些古怪之处，但在适当考虑了第一千

年和第三千年之间的差异后，我们发现日耳曼移民潮确实符合移民行为背后的基本原理。

民族大迁徙及其他

罗马时期形成的发展和移民模式一度被归结为“民族大迁徙”。在4世纪末和5世纪，有记载的欧洲历史中出现了一系列由1万名或更多名战士及大量家属构成的移民群体。这些移民群体的力量很强，经得起与罗马帝国军事和政治结构的直接对抗。从最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移民群体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关键时刻，若干相关的发展之间有了交叉。首先，到了4世纪中晚期，以日耳曼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程度，政治结构已经足以将人数众多的战士及其家属聚集在一个相当稳定的团体里。其次，这些结构是2—3世纪扩张的产物，当时的扩张还没有过去太久，因而群体中尚有移民传统可以利用，在情况合适或有必要时能动员人们移民。第三，也许这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他们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在某个区域的耕地上扎下根来，因此换个地方生活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从日耳曼世界长期发展的背景，以及尤其是3世纪的危机的角度看，这些庞大移民群体的存在及活动无疑可以得到解释，但它们的活动还是非同寻常。尽管其规模和凝聚力都大于1世纪的同类群体，但这些最初崛起于帝国边缘地区的群体光凭自身都不足以击败罗马帝国，然而我们看到，这些群体的种种活动累积起来，造成了西罗马的灭亡。这样的结果谁都想不到，它本身是偶然的历史事件与长期发展模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虽然匈人本身没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匈人活动的驱动下，大量主要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群体大致在同一时间从罗马莱茵河及多瑙河边界以外的地区转移到罗马境内，人数众多，罗马帝国无法将他们消灭。如果这些群体是分头进入罗马领土的（即使规模更大、凝聚力更强），等待它们的就将是灭亡的命运；这些群体的数量也太多，无法一致行动来消灭帝国。罗马帝国边境的日耳曼世界缺了一个关键因素：那里没有像阿拉伯世界的穆罕默德一样的人物，来提出足以对抗罗马帝国理念的另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其次，这些群体在罗马境内定居后，边境之外长期的政治融合进程相对迅速地走上了巅峰。传统的民族主义史学大多没有抓住这个关键点。民族主义史学认为最终建立了西罗马继承国的群体是古老且不变的“民族”，[13]却忽略了以下事实：史料明确记载，这些群体大多是在罗马领土上由几个群体（通常是三到四个）组成的新联盟，而它们在边境之外的时候是彼此独立的。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墨洛温法兰克人、汪达尔人-阿兰人的联盟都代表了蛮族政治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而正是这样的发展，产生了大到（可以投入2万名甚至更多战士）足以摧毁西罗马的群体。[14]

这有很大的偶然性（并无迹象表明，如果匈人没有入侵，还会有那么多人涌入罗马境内），但他们行动的一个方面却绝非偶然。奠定继承国基础的新的、更大的政治组织不可能在远离边境的地方形成。4世纪帝国边缘地区的普遍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不出足够的盈余，政治领袖无法以此聚集足够的追随者。只有在利用罗马帝国的经济攫取财富成为可能，罗马帝国成为实实在在的外来威胁和促进统一的额外政治因素时，这些较大的实体才能在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上形成。政治结构是普遍发展水平的产物并受其制约，形成国家的新群体不可能在只有蛮族活动的背景下出现。[15]

大迁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蛮族欧洲罗马时期发展模式的顶点，而迁徙的结果却彻底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普遍发展模式。首先，在原罗马领土上出现的新国家使帝国欧洲不那么像帝国了。西欧跨地区力量的中心在公元500年左右发生了决定性的北移，第一千年下半叶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基于地中海的帝国势力，而主要是一系列大致属于法兰克人的势力，它们的突出地位有赖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大西洋和易北河之间的经济和人口资源。同样，这可以看作始于罗马时期的发展趋势的顶点。西欧的新帝国力量结合了原属罗马帝国的大片领土和原先属于边缘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土地，可见之前几个世纪与罗马帝国的交往给边缘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公元元年时，莱茵河两岸的土地是不可能支撑起帝国的，这里一点也不富裕，人口也不多，但罗马时代莱茵河两岸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而后罗马时期法兰克人统治下西欧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地主精英的军事化，意味着这个新的帝国与罗马帝国是不同的。新的帝国没有对农业生产系统征税的能力，统治力度较低，不能自给自足，统治者需要通过扩张来攫取财富，以凝聚手下的地主。一旦大环境不允许扩张，分裂就会随之而来，权力迅速从中央下放到周边地区。因此，在第一千年的下半叶，中央掌握权力和对外侵略（这两个是帝国的标志）的时期和不统一的时期交替出现，而之前的罗马帝国看起来凝聚力更强。由于帝国欧洲变得不再始终像个帝国，第一千年上半叶的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从上层开始被侵蚀了，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

大迁徙对蛮族欧洲的影响更为根本，也因之前讨论得较少而更值得注意。到了6世纪，罗马时代的日耳曼欧洲几乎完全崩溃了。一直到4世纪，日耳曼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还遍布在北至莱茵河和维斯瓦河、南至顿河的广袤土地上；而到了550年左右，那些日耳曼人的直接后裔就基本上只能在易北河以西的土地上生活了，他们在匈牙利大平原上还有一块地盘，但很快就会因阿瓦尔人的到来而失去（地图15）。大迁徙在这场变革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不是通过清空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在某些地区，定居点确实完全消失了，但即使取最大的估计值，4—6世纪日耳曼欧洲的人口迁出规模也不足以清空整个中欧和东欧。但是，大迁徙的确清空了从前帝国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的大部分有武装、有组织的社会精英。从蛮族欧洲的角

度来看，这不仅是罗马帝国崩溃的时期，也是边缘地区较大的类国家结构和团体瓦解的时期，绝大部分这样的团体通过移民迁到了莱茵河、易北河和匈牙利大平原之间原来的近内边缘区，以及原属西罗马的领土上。

蛮族欧洲的第一次非凡变革为中东欧大部分地区超过500年的连续发展画上了休止符。它还为另一个同样重大的转变铺了路。日耳曼欧洲崩溃后，据我们所知，来自欧洲第三区的人口（他们从罗马时代之初就定居在那里）第一次与欧洲其他地区发展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实质性交往关系。罗马人对离他们最近、属于欧洲慢速发展区的威尼蒂人有一定了解。1世纪的塔西佗知道他们在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外；生活在几代人之后的托勒密又记下了几个社会群体的名称。但值得注意的是，并无证据表明这些人以任何方式卷入了第一千年上半叶的政治事件。就我们所知，威尼蒂人没有在罗马领土上发动过袭击，也没有出现在关于马科曼尼战争或3世纪危机的叙述中，甚至似乎都没有进入阿提拉帝国的组织结构，而阿提拉帝国整合了中欧和东欧的众多其他人口群体。从罗马进口物品的分布图上，也看不出这些来自维斯瓦河以东和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群体在罗马时期扩展到蛮族地区的贸易网中有什么作用，尽管某些贸易路线肯定通过了他们的地盘。

日耳曼欧洲崩溃之后，讲斯拉夫语者几乎马上崛起于欧洲的低速发展区，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记载中。公元500年前后，他们向喀尔巴阡山脉以南、以东迁移，与东罗马边境直接接触，开始越境袭击。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先前与哥特人以及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边缘区中更有组织的群体之间有过往来，这些往来在史料中基本没有提及。[16]尽管如此，与东罗马的新接触大大加快了相关斯拉夫群体的发展，因为袭击和外交补贴带来的空前动产促进了军事化，形成了更大的政治结构，而这两者又大大增加了与君士坦丁堡的新关系带来的利润。所有这些都与罗马早期日耳曼世界中的一些转变有相似之处，而随着日耳曼欧洲的崩溃，到550年时，讲斯拉夫语者已经成为东南欧对抗东罗马文明的主要蛮族“他者”。

就在此时，游牧民族带来的第二次“意外”改变了既有的发展路线，成为蛮族欧洲进一步转型的关键催化剂。像匈人一样，阿瓦尔人迅速在中欧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同盟，主要效果之一是更多在地中海产生的财富流入了现在主要由斯拉夫人统治的中欧。当然，这激化了争夺财富控制权的斗争——这样的斗争甚至在阿瓦尔人出现之前，就在斯拉夫世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王权。同样重要的是，和匈人一样，阿瓦尔人缺乏直接统治其众多臣属群体的政府能力，只能通过一系列从臣属群体中挑选的中间领导人来统治。我们缺乏详细的信息，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样做产生的政治效果是，被选中的臣属领袖的社会力量将得到巩固，至少会促进将他们斯拉夫

子民的政治团结。[17]阿瓦尔人的第三个主要影响是推动并扩大了斯拉夫人的迁移，为逃离阿瓦尔人的压迫，一些斯拉夫群体搬去了更远的地方。在原罗马巴尔干地区建立大规模的斯拉夫定居点（而不仅仅是袭击），只有在阿瓦尔帝国（加上波斯人以及后来阿拉伯人的征服）摧毁君士坦丁堡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之后才有可能。但是，至少有一些斯拉夫人走上迁徙之路，既有逃避阿瓦尔人统治的消极动机，又有进入罗马领土的积极动机。我们没有关于其他地方的历史叙述资料，但逃脱阿瓦尔人统治的渴望肯定在公元550年以后斯拉夫群体的进一步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斯拉夫人向西到了易北河，向北到了波罗的海，甚至向东进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心脏地带。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次向东的扩张究竟是讲斯拉夫语者第一次侵入俄罗斯西部，还是说，这次扩张只是某些斯拉夫群体在与东罗马和阿瓦尔人的接触中建立了更完善的政治组织，获得了更强的军事力量，从而征服了原本住在那里的其他斯拉夫人。

不管是哪种情况，斯拉夫化，也就是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中欧和东欧广大地区建立统治地位的过程，都再次将移民与发展紧密联系到一起。与经济更发达的罗马帝国的交往带来了新的财富，在至少一些斯拉夫群体中促成了政治整合和军事化。但是，受益于这些新财富的群体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匈人帝国崩溃后搬到了离罗马帝国更近的地方，他们迁移大概也是为了攫取新财富。他们搬到那里后经历的社会政治变革为他们后来的行动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阿瓦尔人带来的额外刺激下，他们向中欧和东欧的广大地区继续迁移，扩大自己的统治。迁移过程中，他们肯定吸收了日耳曼欧洲崩溃后幸存下来的大量本地居民。如一些东罗马资料表明的那样，其中一些吸收过程应该是和平的，但与此同时，许多斯拉夫群体变得越来越军事化，而斯拉夫化对各地的影响惊人一致。一直到公元600年，一些斯拉夫群体，尤其是科尔恰克群体，可能仍然是和平的小规模农民群体，而随着新财富带来社会分化和军事化，其他的许多斯拉夫群体迅速发生了转变。接下来在欧洲发生的斯拉夫化，大部分显然是武装起来的危险斯拉夫人带来的，而不是科尔恰克农民带来的——尤其是在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在那里，数百人的群体攻下一个又一个防御森严的敌对定居点，建立了斯拉夫人的统治。

欧洲的诞生

东罗马的财富和阿瓦尔人的介入只是更宏观的发展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在第一千年下半叶席卷了斯拉夫人统治的欧洲广大地区。到了10世纪，该进程产生了北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第一批类国家的王朝结构。这些新实体在1000年时仍有很多局限，名义上受它们统治的广大领土，明显有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分别。基于巡游的政府机制无法以同等的强度来管理广袤领土的各个区域，于是，这些王朝时常交换对大片中间领土的控制权。尽管

如此，这些国家仍能集中组织起一些了不起的活动。与4世纪罗马帝国边缘出现的日耳曼附属国相比，这些国家的地理范围要大得多，也能用权力做更多的事。它们建造了更多、更宏伟的建筑物，支撑起规模更大、装备更完善、更专业的军队，并迅速接受了更发达的帝国欧洲的一些文化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形成这些新实体的变革机制在本质上与形成4世纪罗马帝国外围那些较大的日耳曼附属国的机制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一系列借由贸易、袭击和外交实现的新接触，使得空前的财富流入帝国之外的社会。为控制新流入的财富而出现的内部争斗带来了军事化和重要王朝的崛起，这些王朝最终利用对财富的支配制造出了永久性的军事机器，军事机器则通过摧毁和/或威胁既有的本地权力结构来确立王朝的权威。结果，潜在的竞争对手被一个个淘汰，权力日益集中。

基本的进程虽然类似，但比起第一千年上半叶日耳曼人主导的世界，第一千年下半叶斯拉夫世界的发展更深入、更快。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元500年后蛮族欧洲受到了更广泛的刺激。斯拉夫世界的西部地区与西欧法兰克人的一系列帝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联系。而阿瓦尔帝国在中欧中心地带统治了200年，对更大范围内的斯拉夫附属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远处较弱的欧洲帝国势力，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交往也是如此。同样甚至更重要的是，主要由斯拉夫人统治的更远的蛮族地区与第四个，也是更强大的帝国势力有了往来，那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第一千年上半叶，中欧和东欧以外有为满足近东和地中海需求而建立的大规模奴隶或毛皮贸易网，而后来建立的那些贸易网带来了罗马时期所没有的财富流动。有数量惊人的阿拉伯银币保存了下来，它们都与新的斯拉夫国家核心地区有关联，由此判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欧洲以外的帝国带来的刺激在斯拉夫欧洲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拉夫欧洲发展得更快，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一千年的最后两个世纪中，出现了新的军事技术，尤其是披甲骑士和城堡，王朝的统治者们利用新技术控制新财富，震慑潜在的对手。尽管这些新国的领土都包括了治理程度较低的边缘地区，但它们能在王朝核心地区行使的权力是很了不得的。在波希米亚和波兰，老的部落据点被摧毁，新王朝的据点取而代之，实现这一过程的残酷力量在近年来发现的考古证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朝将所征服的人口迁往新国家的核心地区，广泛组织起经济活动，这些都是权力的体现——这是结合了考古证据和这些新国家流传下来的最早文献证据而得出的结论。

这些发展进程的性质和总体意义再清楚不过，其影响也是巨大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是，作为可运作实体的欧洲诞生了。10世

纪时，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网络已经遍布大西洋和伏尔加河之间、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欧洲。这片土地原本支离破碎，公元元年时，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彼此普遍缺乏联系；如今，它成了因大量互动而统一起来的区域。欧洲不是自然地理单元，而是人文地理单元；公元1000年时，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之间的人口终于有了实质意义上的互动。贸易网络、宗教文化、政府模式，甚至是耕地的利用方式，第一千年结束之时，欧洲各地在这些方面都形成了明显的共性。

但就本书研究的问题而言，发展过程的更直接影响在于它消除了形成往往带有掠夺性的大规模移民的条件，在第一千年的欧洲，时常会出现这样的移民，其形式既包括民族大迁徙那样的集中移民潮，也包括较为普通而势头逐渐增加的移民潮。欧洲各地发展程度的不平等尚未完全消失，但已大大减少。本质上说，新的贸易网加上更普遍的农业扩张（远未完成），意味着中欧和东欧那些有政治组织的势力能够在其现有地点获取大量财富。农业和更普遍的经济发展，也意味着这些势力会以全新的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至少是它们的核心领地）扎下根来。

于是，不时驱动大型群体移民的那种积极动机大大减少，甚至可以说从结构上被消除了。在第一千年的欧洲，移民从来不是可以轻易做出的选择，也不普遍，而是一种策略：只有在收益够大，值得去发起一次通往只是略有所知的土地，而且并不一定能成功的远征时，人们才会采取这种策略。只要社会精英在不需要冒险迁徙的情况下还能获取财富，就不太可能采用移民的策略。当然，他们在实践中越是不去迁徙，就越不可能迁徙，以前的移民习惯在精英和精英控制下的更广泛的人口中逐渐消失，耕种模式走向集约，耕作的地点也固定下来。总的来说，蛮族欧洲的精英和普通人在特定地区的根扎得越来越深，而结果就是，即使面对以往会让他们搬家的强大刺激，他们也不太可能通过移民来应对。

在我看来，这是对本章开头那个问题的基本解释。许多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人（虽然肯定不是全部）面对匈人威胁时，斯拉夫人面对阿瓦尔人威胁时，做出的反应都是去别处寻找新的家园；而游牧的马扎尔人来到匈牙利大平原后，据我们所知却并未引发进一步的移民。这一差异在摩拉维亚国家的行动、性质和最终命运中得到了体现。摩拉维亚人并没有逃跑，而是像法兰克帝国的军队一样留在原处，与马扎尔人作战。他们失败了（许多法兰克人一开始也失败了），但摩拉维亚人留在原地，说明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扎下了根，也说明第一千年末蛮族欧洲政治权力的性质已经全然不同。从前，蛮族欧洲的农业技术普遍有限，人们经常需要在当地搬迁，而财富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则鼓励更具冒险精神的人不时去尝试占领更有吸引力的土地，而这些土地通常离产生财富的帝国比较近。相比之下，摩拉维亚人则依靠更集约的农业制度和更广泛的贸易网络所产生的财富，用

石头建起了城堡和教堂。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做出如此投资后，运营中心要换地方就没那么容易了。第一千年末的其他新王朝也是如此。比起之前的政权，它们更深地扎根在了特定的地方，因为农业技术有了发展，贸易网络也在远离帝国边境的地方产生了其他类型的财富。总体而言，发展进程既消除了巨大的不平等（这是之前欧洲蛮族有理由选择大型群体长距离移民的原因），又使中欧和东欧的人口更深地扎根于特定的地方。

当然，并不是说移民就此结束了。有些人一直在迁移，寻求更多的财富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在10世纪之后的欧洲历史上，仍不时能见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但从第一千年末期开始，中世纪移民的主要形式就是两种。一是以骑士为基础的精英转移。诺曼征服是这种现象的规模特别大的成功例子。更常见的是一两百名装备精良的男人为建立小公国而出发，他们或是赶出当地的精英，或是确立从依附于自己的劳动力那里获得经济供养的权利，有时是赶出原有的精英后确立权利。农业生产扎根于特定地区，新军事技术能增强实力，这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种移民形式的特点。凭借城堡和铠甲，少数人就能建立统治，而且统治地位很难撼动。移民的另一种常见形式是招募农民来耕种土地，领主提供有吸引力的土地保有条款作为激励，并雇用中间人开展招募活动。新的发展模式在这里也至关重要，因为第一千年后期投入使用的新耕作技术增加了农业生产力，让土地的主人非常需要足够的劳动力来扩大农业产量。尽管走了很长一段路，但新的斯拉夫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落后于西欧和南欧。因此，它们成了欧洲较发达地区调动起来的新农业劳动力的主要客户，较发达地区的人口水平比较高，有雄心的农民不容易以较好的条件获得更多的土地。于是，欧洲中西部的数十万农民被优惠得多的条件吸引，来到了东方，而中世纪早期原日耳曼欧洲的斯拉夫化，则因日耳曼农民的流入而被部分逆转了。[18]

帝国的牛顿第三定律？

后来的这两种中世纪移民形式得到了很好的记录，因为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读写能力都在提高，因此，它们在欧洲历史叙述中占据了第一千年的移民形式无法比拟的地位。但是，后来的时代中盛行这两种与之前不同的移民形式，并不代表本书的主要论点就不成立，本书的论点是：在第一千年中，比基于骑士的扩张规模更大、社会基础更广泛的掠夺性移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欧洲的形成。后来的移民形式完全符合中世纪中期遍布欧洲各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本书所研究的大规模掠夺性移民潮（农民和精英在移民群体中一起迁移，而不像中世纪中期那样分别迁移）同样符合自己时代的条件。第一千年中，各地的发展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农业生产并不固定在某个地方，农产品产量也比较低。这意味着蛮族欧洲的经济只能支持少数职业军人，有雄心的领袖有必要也有可能组建社会基础广泛的庞大远征队，以期在较发达的帝国欧洲的边缘地区拿下一块能产生财

富的地盘。如此产生的移民形式与中世纪中期的不同，也不同于现代世界中常见的移民形式。第一千年的移民之所以看起来如此，不是因为史料受到了扭曲的文化反射的影响，而是因为当时的普遍情况和后来的情况在一些关键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千年的移民完全符合现代移民的基本原则，移民单元的迁移方向和组成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由普遍的发展模式决定的。

简而言之，有充分理由认为，虽然旧的侵略假说模型有局限性，但我们不应就此否认移民是第一千年历史的重要解释因素，我们应该做的，是引入一系列更复杂的移民模式。合理分析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把移民当作替代围绕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更复杂”解释的简单化笼统解释了。根据恰当的理解（这也是比较移民文献想要传递的中心信息），移民不是独立于社会和经济转型并与之对立的解释，而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后者的补充。移民模式取决于当时普遍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也是政治经济状况演变的一个方面；移民模式和社会经济状况都反映了既有的不平等，有时还有助于消除不平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看到移民现象真正的意义。由此产生的另一种思路是，史前史学家也许不必急着否认，在古代欧洲的形成过程中，掠夺性移民时常做出贡献。如果说，第一千年中不时出现掠夺性移民，原因在于相距不远的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一些社会中的农民也参与作战，而且并不固定在特定的土地上，那么这些条件也可能在许多其他古代环境中存在，有理由认为那些环境里也会不时出现掠夺性移民。

不过，这只是本研究的附带问题。如果总体考虑第一千年蛮族欧洲的转型，那么毫无疑问，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比移民更重要。旧的说法则与此相反，它们强调，在第一千年的不同时间，有各自名称的民族来到了欧洲版图上相应的地方，直到所有的现代民族各就各位。按照这种观点，迁移和到达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随后发生的事情只是细节问题。这实在错得离谱。比起移民零零星星的到达（其中大部分都没什么影响），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帝国势力与附近蛮族之间的互动更为重要：在第一千年上半叶，这样的蛮族主要是日耳曼人，在下半叶主要是斯拉夫人。最终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是这些互动，而不是迁徙本身；新的结构让从前的蛮族欧洲在第一千年末的时候变得更像它的帝国邻居。并不是说这些转变本身就是好事，也不是说帝国欧洲有什么天然的长处，但从证据可以直接得出结论，正是与帝国欧洲新建立的联系，以及蛮族社会中一些成员对这些新联系的回应，最终消除了公元元年时存在的巨大发展差异。简单说，这就是我想提出的第二个主要论点。1000年的时候，欧洲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信奉基督教，也没有到处是建立在城堡、骑士和有生产力的农民之上的国家，但已经有许多地方信奉了基督教，这样的国家也有了不少，1世纪的塔西佗如果见到这种情况，一定会非常惊讶。塔西佗曾说，欧洲东部的人“面目是人，身体四肢却和野兽一样”；他口中的蛮族

欧洲，如今再也不野蛮了。[19]

在这个不断展开的故事中，移民扮演了角色，有时还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如果你采用比较移民研究中对大规模或大型迁徙的定义（我发现这非常有帮助），就可以将移民理解为第一千年中几个关键时刻的行动的核心。也许最重要的是，意外到来的匈人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将足够多有组织的日耳曼群体驱赶到了罗马的土地上，这既动摇了罗马帝国的中央权力，也使蛮族中欧的旧权力结构发生了大范围的崩塌。这进而引发了非同寻常的斯拉夫大移民，其文化影响——中欧和东欧广泛的斯拉夫化——至今仍是欧洲大陆的主要特征。这些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小现象。尽管如此，在解释蛮族欧洲如何在第一千年的进程中逐渐失去蛮族特性时，移民只是次要的因素，更主要因素的还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转型。首先，除了像匈人或阿瓦尔人突然到来这样特殊的情况外，移民模式完全取决于发展模式，相对于发展模式来说也是次要的。直到游牧入侵者给移民带来了更强烈的政治动机，这种关系才逆转过来，移民开始决定发展模式，一举摧毁了西罗马和日耳曼欧洲。

其次，即使匈人不来，种种发展进程最终也会动摇罗马帝国。总的来说，从第一千年的证据中可以看出，一个军事上更强大、经济上更发达的侵略性帝国，会促使其周边的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变化累积起来，就会产生更有能力抵御帝国侵略的新结构。在第一千年中，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次，先是4世纪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附属国崛起，后是9—10世纪新的斯拉夫国家崛起（这次的影响更大）。我认为，这种模式重复出现并非偶然，也是帝国不像钻石那样“恒久远”的根本原因之一。帝国通常的行为方式，加上经济机会与帝国固有的侵略行动，会促使受帝国影响的人做出反应，而从长远来看，这种反应削弱了帝国的能力，使帝国无法维持一开始使之成为帝国的力量优势。罗马帝国受到了匈人带来的意外冲击，迅速灭亡，但并不是所有的帝国都那样。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许多帝国灭亡都是因为受到了周边地区王朝的蚕食，周边王朝的力量增强后，就成了掠夺者。简而言之，说到帝国统治为什么不能持久，一个答案是，帝国的牛顿第三定律在起作用。帝国的权力作用于其他社会，产生了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而等到其他社会有能力充分重组的时候，帝国的优势就会被削弱。你是会因此感到宽慰还是恐惧，大概取决于你生活的地方是帝国社会还是边缘社会，以及舞台上现在上演着哪一出。但是，这条定律存在，是第一千年中帝国与蛮族的互动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

[1] *Annals of Fulda* (900 AD).

[2] 关于诺曼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管理农民生活的规则，见Faith (1997)。

[3] 特别参见本书第六章和第九章。

[4] 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现代英格兰人口样本中记录到有50%～75%的人带有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Y染色体，这可以由人口数量为5—6世纪人口50%～75%的入侵群体带来，而如果入侵者有一点生育优势的话，他们在当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降到10%。

[5] 对阿米阿努斯和普罗柯比笔下的这些关键案例的详细研究，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

[6] 这些群体是不是真的跨过了边境，现有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但至少有可靠的同时代资料描述了他们后来以这种迁徙方式迁往西班牙、北非和加入阿拉里克的队伍。

[7] 本书第三章和第五章讨论了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移民潮。

[8] 这里和之前各章陈述的想法，在Heather (2008a)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9]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返乡移民，见本书第六章。

[10] 376年秋也是哥特特温吉人开始迁移的最可能的时间（虽然有人提出质疑）：见Heather (2005), 153。

[11] 这可能限制了新财富在促进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社会（而非政治）发生根本变革方面的作用，因为财富在一开始必然是落到已经相当富裕的人手中的。

[12] 甚至可能还有非军事化的奴隶随行：见本书第四章。

[13] 当然，约达尼斯作品中的迁徙主题让他们有充分理由这么认为：见本书第三章。

[14] 唯一一个不是由迁徙中形成的新联盟创立的继承国是勃艮第人的国家，但叙事证据实在太少，我们无法了解5世纪的勃艮第历史，不过那段历史肯定不会愉快。

[15] 匈人帝国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阿提拉及其前任创造的庞大跨区域势力完全依赖于地中海地区财富的大量流入：见本书第五章。

[16] 史料中只留下了哥特人和斯拉夫人交往的一段小插曲：见Jordanes, *Getica*48.247。

[17] 但资料表明，在6世纪流入的新财富的基础上，某些斯拉夫群体已经发展出程度相当高的政治和军事组织：见本书第八章。

[18] Bartlett (1993)，特别是第2章和第5章，很好地介绍了这些新模式。

[19] Tacitus, *Germania* 46.4.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按照常规，古典文献的具体版本及译本概不列入参考文献，本书中引用的古典文献如下，其中多数都有英译本，见于洛布古典丛书和企鹅古典丛书。所有基督教作者的著作都见于《拉丁教父文集》（*Patrologia Latina*）或《希腊教父文集》（*Patrologia Graeca*），不过有的比较过时。介绍和注释中引用的大部分文本都有比较新的版本（有的相互冲突），可见于 *GCS*（*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der ersten Jahrhunderte*）、*CSEL*（*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CC*（*Corpus Christianorum*）、*SC*（*Sources Chrétienne*）。许多文本已有译文，收录于《尼西亚及后尼西亚教父集》（*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和《教父丛书》（*Library of the Fathers*）。本书所引其他罗马晚期及中世纪早期史料的版本和译本见下。

Adam of Bremen, *History of the Bishops of Hamburg*, ed. Schmeidler (1917); trans.Tschan (1959)

Agathias, *History*, ed. Keydell (1967); trans. Frendo (1975)

Ammianus Marcellinus, ed. and trans. Rolfe (1935—39)

Anglo-Saxon Chronicle, ed. and trans. Whitelock et al. (1961)

Annals of Fulda, ed. Pertz and Kurze (1891); trans. Reuter (1992)

Annals of St Bertin, ed. Waitz (1883); trans. Nelson (1991)

Anonymous Bavarian Geographer, ed. Bielowski (1946)

Anonymous Valesianus, ed. and trans. in Rolfe (1935—39), vol. 3

Aurelius Victor, *Caesars*, ed. Pichlmayr (1911); trans. Bird (1994)

Bed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ed. and trans. Colgrave and Mynors (1969)

Caesar, *Gallic War*

Cassiodorus, *Variae*, ed. Mommsen (1894b); trans. Hodgkin (1886); Barnish (1992)

Chronicle of Ireland, trans. Charles-Edwards (2006)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ed. and trans. Charanis (1950)

Chronicon Paschale, ed. Dindorf (1832); trans. Whitby and Whitby (1989)

Claudian, *Works*, ed. and trans. Platnauer (1922)

Codex Theodosianus, ed. Mommsen and Kreuger (1905); trans. Pharr (1952)

Constantius, *Life of St Germanus*, ed. Noble and Head (1995), 75—106

Consularia Constantinopolitana, ed. Mommsen (1892)

Cosmas of Prague, *Chronicle of Bohemia*, ed. Bretholz and Weinberger (1923)

Crith Gablach: ed. Binchy (1970).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ed. and trans. Moravcsik and Jenkins (1967)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ed. and trans. Cary (1914—27)

Encomium of Queen Emma, ed. and trans. Campbell (1949)

Ennodius, *Works*, ed. Vogel (1885)

Eugippius, *Life of Severinus*, ed. Noll and Vetter (1963); trans. Bieler (1965)

Eunapius, *Histories*, ed. and trans. Blockley (1982)

Eutropius, *Breviarium*, ed. Santini (1979); trans. Bird (1993)

Fredegar, *Chronicle*, ed. and trans. Wallace-Hadrill (1960)

Gallic Chronicle of 452, ed. Mommsen (1892)

Gallus Anonymous, *Chronicle*, ed. Maleczynski (1952); trans. Knoll and Schaer (2003)

Gildas, *Ruin of Britain*, ed. and trans. Winterbottom (1978)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es*, ed. Krusch and Levison (1951); trans. Thorpe (1974)

Helmold, *Chronicle of the Slavs*, ed. Lappenberg and Schmeidler (1909); trans. Tschan(1966)

Herodotus, *Histories*

Historia Augusta, ed. and trans. Magie (1932)

Hydatius, *Chronicle*, ed. Mommsen (1894); trans. Burgess (1993)

Ibn Fadlan, ed. and trans. Canard (1973)

Ibn Jaqub, ed. and trans. Miquel (1966)

Ibn Rusteh, ed. and trans. Wiet (1957)

Jerome, *Chronicle*: an online edi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may be found at 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jerome_chronicle_oo_eintro.htm

John of Antioch, ed. Mueller (1851—70); trans. Gordon (1966)

John of Nikiu, *Chronicle*, trans. Charles (1916) (from the Ethiopian)

Jordanes, *Romana* and *Getica*, ed. Mommsen (1882); *Getica*, trans. Mierow (1915)

Laws of Ine, ed. Liebermann (1903—16); trans. Whitelock (1955)

Life of A nskar, ed. Trillmich et al. (1978); trans. Robinson (1921)

Malchus, ed. and trans. Blockley (1982)

Menander Protector, ed. and trans. Blockley (1985)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ed. Lemerle (1979—81)

Notitia Dignitatum, ed. Seeck (1962)

Novels of Valentinian III, ed. Mommsen and Kreuger (1905); trans. Pharr (1952)

Origo Gentis Langobardorum: see Paul the Deacon.

Olympiodorus of Thebes, ed. and trans. Blockley (1982)

Orosius, *Against the Pagans*, ed. Arnaud-Lindet (1990—91); trans. Defarri (1964)

Panegyrici Latini, ed. and trans. Nixon and Rogers (1994)

Passion of St Saba, ed. Delehaye (1912); trans. 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ed. Bethmann and Waitz (1878); trans. Foulke(1974)

Paulinus of Pella, *Eucharisticon*, ed. and trans. Evelyn White (1961), vol. 2

Peter the Patrician, ed. Mueller (1851—70)

Pliny, *Natural History*

Priscus, ed. and trans. Blockley (1982)

Procopius, *Works*, ed. and trans. Dewing (1914—40)

Prosper Tiro, *Chronicle*, ed. Mommsen (1892)

Ptolemy, *Geography*

Royal Frankish Annals, ed. Kurze (1895); trans. Scholz (1972)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trans. Cross and Sherbowitz-Wetzor (1953)

Saxo Grammaticus, *History of the Danes*, ed. Knabe et al. (1931—57); trans. Fisher (1996)(Books I—IX); Christiansen (1980—81) (Books X—XVI)

Socrate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ed. Hansen (1995); trans.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vol. 2

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ed. Bidez and Hansen (1995); trans. in *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 vol. 2

Strabo, *Geography*

Strategicon of Maurice, ed. Dennis (1981); trans. Dennis (1984)

Synesius of Cyrene, ed. Garzya (1989)

Tacitus, *Annals* ; *Histories* ; *Germania*

Themistius, *Orations*, ed. Schenkl et al. (1965—74); trans. 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Orations* 8 and 10); Heather & Moncur (2001) (*Orations* 14—16 and 34)

Theodoret, *Historia Ecclesiastica*, ed. Parmentier and Hansen (1998); trans.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vol. 3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ed. Niebuhr (1839—41); trans. Mango and Scott (1997)

Theophylact Simocatta, *History*, ed. De Boor and Wirth (1972); trans. Whitby and Whitby(1986)

Thietmar of Merseburg, *Chronicle*, ed. Holtzmann (1935); trans. Warner (2001)

Victor of Vit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in Africa*, ed. Petschenig (1881); trans.Moorhead (1992)

Widukind of Corvey, ed. Lohmann and Hirsch (1935)

Zonaras, *Chronicle*, ed. Weber (1897)

Zosimus, *History*, ed. Paschoud (1971—89); trans. Ridley (1982)

参考书目

Abels, R. (1998). *Alfred the Great: War, Kingship and Culture in Anglo-Saxon England*(London)

Achelis, H. (1900). ‘Der älteste deutsche Kalender’, *Zeitschrift fü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1, 308—35

Adamson, S. et al., eds. (1990)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Agadshanow, S. G. (1994). *Der Staat der Seldschukiden und Mittelasien im 11.—12. Jahrhundert* (Berlin)

Ament, H. (1996). ‘Frühe Funde und archäologische Erforschung der Franken in Rheinland’, in *Die Franken: Wegbereiter Europas: vor 1500 Jahren, König Chlodwig und seine Erben* (Mainz), 22—34

Amory, P. (1997).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489—554* (Cambridge)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okhin, V. A. (1980). *The Coinage of Chersonesus* (Oxford)

Antony, D. W. (1990). ‘Migration in Archaeology: the Baby and the Bathwate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2, 895—914

—— (1992). ‘The Bath Refilled: Migration in Archaeology Aga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4, 174—6

Arnaud-Lindet, M-P., ed. and trans. (1990—91). *Orose: Histoires contre les païens* (Paris)

Arnold, C. J. (1997). *An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Anglo-Saxon Kingdoms*, 2nd ed.(London)

Arnold, E. (1973). *The Kingdom of the Scots: Government, Church and Society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Bacall, A. (1991). *Ethnic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View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Ethnicity* (Coventry)

Bachrach, B. S. (1973). *The Alans in the West* (Minneapolis)

Bailyn, B. (1994). 'Europeans on the Move, 1500—1800', in Canny (1994), 1—5

Bakony, K. (1999). 'Hungary', in Reuter (1999), 536—52

Barford, P. (2001). *The Early Slavs* (London)

—— (2005). 'Silent Centuries: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of the Northwestern Slavs', in Curta (2005), 60—102

Barnes, T. D. (1998). *Ammianus Marcellinu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Reality*(Ithaca; London)

Barnish, S. J. B. (1992). *The Variae of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Senator* (Liverpool)

Barrett, J. C. et al., eds. (1989). *Barbarians and Romans in North-west Europe from the Later Republic to Late Antiquity* (Oxford)

Barrow, G. W. S. (1973). *The Kingdom of the Scots: Government, Church and Society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Barth, F., ed.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Ethnic Differenc* (Boston)

Bartlett, R. (1993).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 (London)

Bassett, S., ed. (1989). *The Origins of Anglo-Saxon Kingdoms* (London)

Bates, D. (1982). *Normandy before 1066* (London)

Batty, R. (2007). *Rome and the Nomads: The Pontic-Danubian Realm in Antiquity*(Oxford)

Baxter, S. (2007). *The Earls of Mercia: Lordship and Power in late Anglo-Saxon England*(Oxford)

Bentley, G. C. (1987). ‘Ethnicity and Practic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25—55.

Bethmann, L. and Waitz, G., eds. (1878). *Pauli Historia Langobardorum*,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Hanover)

Bichir, G. (1976). *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the Carpi* (Oxford)

Bidez, J. and Hansen, G. C., eds. (1995). *Sozomenus Kirchengeschichte* (Berlin)

Bieler, L. (1965). *Eugippius: The Life of Saint Severinus* (Washington)

Bielowski, A., ed. (1946). *Descriptio civitatum et regionum AD septentrionalem plagam Danubii, Monumenta Poloniae Historica* 1, 10—11

Bierbrauer, V. (1980). ‘Zur chronologischen, soziologischen und regionalen Gliederung des ostgermanischen Fundstoffs des 5. Jahrhunderts in Sudosteuropa’, in Wolfram and

Daim (1980), 131—42

—— (1989). ‘Ostgermanische Oberschichtsgräber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und des frühen Mittelalters’, in *Peregrinatio Gothica* 2, *Archaeologia Baltica* 8 (Lodz),40—106

Bilde, P. et al. (1993).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Aarhus)

Bill, J. (1997). ‘The Ships’, in P. Sawyer (1997a), 182—201

Binchy, D. A. (1970a). *Celtic and Anglo-Saxon Kingship: the O’Donnell Lectures for 1967—8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23 and 24 May 1968* (Oxford)

——, ed. (1970b). *Críth gablach* (Dublin)

Bird, H. W. (1993). *Eutropius Breviarium* (Liverpool)

—— (1994). *Liber de Caesaribus of Sextus Aurelius Victor* (Liverpool)

Birley, A. R. (1966). *Marcus Aurelius* (London)

—— (2005). *The Roman Government of Britain* (Oxford)

Birnbaum, H. (1993). 'On the Ethnogenesis and Protohome of the Slavs: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1.2, 352—74

Blair, J. (1994). *Anglo-Saxon Oxfordshire* (Oxford)

Blench, R. and Spriggs, M., eds. (1998).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II*: Correlating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Hypotheses* (New York)

Blockley, R. C. (1981).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vol. 1 (Liverpool)

—— (1983).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vol. 2 (Liverpool)

—— (1985).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Liverpool)

Boeles, P. C. J. A. (1951). *Friesland tot de elfde eeuw* (Gravenhage)

Böhme, H.-W. (1974). *Germanische Grabfünde des 4 bis 5 Jahrhunderts zwischen untere Elbe und Loire. Studien zur Chronologie und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Munich)

—— (1975). 'Archäologische Zeugnisse zur Geschichte der Markomannenkriege(166—80 n. Chr.)', *Jahrbuch des römischgermanischen Zentralmuseums Mainz* 22,155—217

Bohner, K. (1958). *Die frankischen Altertumer des Trierer Landes*, 2 vols. *(Berlin)*

Bohning, W. R. (197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Western Worl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6, 1—15.

Boretius, A., ed. (1883). *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 (Hanover)

Borodzej, T. et al. (1989). *Période romaine tardive et début de la période des migrations des peuples (groupe de Masłomecz)* (Warsaw)

Borrie, W. D. (1994). *The European Peopling of Australasia: A Demographic History, 1788—1988* (Canberra)

Bosl, K. (1966). *Das Grossmährische Reich in der politischen Welt des 9. Jahrhunderts*(Munich)

Bowlus, C. (1995). *Franks, Moravians, and Magyars: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Danube, 788—907* (Philadelphia)

Brachmann, H. (1978). *Slawische Stämme an Elbe und Saale: zu ihrer Geschichte und Kultur im 6.—10.* (Berlin)

—— (1993).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 Befestigungsbau in Mitteleuropa: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Entwicklung und Function im germanisch-deutschen Gebiet* (Berlin)

——, ed. (1995). *Burg — Burgstadt — Stadt: zur Genese mittelalterlicher nichtagrarischer Zentren in Ostmitteleuropa* (Berlin)

—— (1997). 'Tribal Organizations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6th—10th Centuries AD:Reflections on the Ethn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in Urbanczyk (1997a), 23—38

Brather, S. (1996). *Feldberger Keramik und frühe Slawen: Studien zur nordwestslawischen Keramik der Karolingerzeit* (Bonn)

—— (2001). *Archäologie der westlichen Slawen: Siedlung,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m früh- und hochmittelalterlichen Ostmitteleuropa* (Berlin)

Braund, D. C. (1984). *Rome and the Friendly King: The Character of Client Kingship*(London)

—— (2005). *Scythians and Greeks: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Scythia, Athens and the early Roman Empire (Sixth Century BC—First Century AD)* (Exeter)

Bretholz, B. and Weinberger, W., eds. (1923). *Die Chronik der Böhmen des Cosmas von Prag,*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n.s.2 (Berlin)

Brooks, N. (1979). 'England in the Ninth Century: The Crucible of Defea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ies, 29, 1—20

Broun, D. et al., eds. (1998). *Image and Identit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Scotland through the Ages* (Edinburgh)

Brown, P. (1971).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London)

—— (1996).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riumph and Diversity, AD 200—1000* (Oxford)

Browning, R. (1975). *Byzantium and Bulgaria: A Comparative Study across the Early Medieval Frontier* (London)

Buko, A. (2005). *Archeologia Polski* (Warsaw)

Burgess, R. (1993). *The Chronicle of Hydatius and the Consularia Constantinopolitana*(Oxford)

Bury, J. B. (1928).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London)

Cameron, A. D. E. (1970). *Claudian: Poetry and Politics at the Court of Honorius* (Oxford)

Cameron, A. D. E. and Long, J., with a contribution by Sherry, L. (1993). *Barbarians and Politics at the Court of Arcadius* (Berkeley)

Campbell, A. (1949). *Encomium Emmae Reginae* (London)

Campbell, J., ed. (1982). *The Anglo-Saxons* (Oxford)

—— (2000). *The Anglo-Saxon State* (London)

Canard, M. (1973). *Miscellanea Orientalia* (London)

Canny, M., ed. (1994). *Europeans on the Move: Studies on European Migration 1500—1800* (Oxford)

Carroll, M. (2001). *Romans, Celts and Germans: The German Provinces of Rome* (Stroud)

Cary, E. (1914—27). *Dio's Roman History* (London)

Castellanos, S. (2000). 'Propiedad de la tierra y relaciones de dependencia en la Galia del siglo VI. El Testamentum Remigii', *Antiquité*

Tardif 8, 223—7

Chadwick-Hawkes, S., ed. (1989). *Weapons and Warfare in Anglo-Saxon England*(Oxford)

Champion, T. C. (1995). *Centre and Periphe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Archaeology*(London)

Champion, T. C. and Megaw, J. V. S., eds. (1985). *Settlements and Society: Aspects of West European Prehistory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Leicester)

Chapman, R. and Dolukhanov, P., eds. (1993).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 Eastern Europe* (Aldershot)

Charanis, P. (1950). '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Slavic Settlements of Greece', *Dumbarton Oaks Papers* 5, 141—66

Charles, R. H. (1916). *The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London)

Charles-Edwards, T. C. E. (1989). 'Early Medieval Kingships in the British Isles', in Bassett (1989), 28—39.

——, ed. (2003). *After Rome* (Oxford)

—— (2006). *The Chronicle of Ireland* (Liverpool)

Chastagnol, A. (1973). 'Le repli sur Arles des services administratifs gaulois en l'an

407 de notre ère', *Revue Historique* 97, 23—40

Childe, V. G. (1926). *The Aryans: A Study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London)

—— (1927).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London)

Christiansen, E. (1980). *The Northern Crusades: The Baltic and the Catholic Frontier, 1100—1525* (London)

—— (1980—81). *Saxo Grammaticus: Danorum Regum heroumque historia: Books X—XVI* (text and translation), 3 vols. (Oxford)

—— (2002). *The Norsemen in the Viking Age* (Oxford)

Christie, N. (1995). *The Lombards: The Ancient Longobards* (Oxford)

Christlein, R. (1978). *Die Alamannen* (Stuttgart)

Claessen, H. J. M. and Skalnik, P. (1978). *The Early State* (The Hague)

—— (1981). *The Study of the State* (The Hague)

Claessen, H. J. M. and van de Velde, P. (1987). *Early State Dynamics* (Leiden)

Claessen, H. J. M. and Oosten, J. G. (1996).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Leiden)

Clark, G. (1966). 'The Invasion Hypothesis in British Archaeology', *Antiquity* 40, 172—89 Cohen, R., ed. (1995). *The Cambridge Survey of World Migration* (Cambridge)

——, ed. (1996). *Theories of Migration* (Cheltenham)

——, ed. (1997).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Cheltenham)

—— (2008).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Abingdon)

Colgrave, B. and Mynors, R. A. B., eds. (1949).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Oxford)

Collins, R. (1983). 'Theodebert I, "Rex Magnus Francorum"', in P. Wormald (ed.), *Ideal and Reality in Frankish and Anglo-Saxon Society* (Oxford), 7—33

—— (1998). *Charlemagne* (Basingstoke)

Collinson, S. (1994). *Europ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nd ed. (London)

Constantinescu, M. et al., eds. (1975) *Relations Between the Autochthonous Population and the Migratory Populations on the Territory of Romania* (Bucharest)

Cooper, J., ed. (1993). *The Battle of Maldon: Fiction and Fact* (London)

Coupland, S. (1995). ‘The Vikings in Francia and Anglo-Saxon England’, in McKitterick(1995), 190—201

Courtois, C. (1955).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aris)

Crawford. B. (1987). *Scandinavian Scotland* (Leicester)

Cribb, R. J. (1991). *Nomads in Archaeology* (London)

Croke, B. (1977). ‘Evidence for the Hun Invasion of Thrace in AD 422’,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18, 347—67

Cross, S. H. and Sherbowitz-Wetzor, O. P., eds. (1953).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Cambridge, MA)

Cunliffe, B. (1997).*The Ancient Celts* (Oxford)

Cunliffe, B. and Rowley, T., eds. (1976). *Oppida: The Beginnings of Urbanization in Barbarian Europe: Papers Presented to a Conference at Oxford, October 1975* (Oxford)

Curta, F. (1999). ‘Hiding behind a Piece of Tapestry: Jordanes and the Slavic Venethi’,*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7, 1—18

—— (2001). *The Making of the Slav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Lower Danube Region, c.500—700* (Cambridge)

——, ed. (2005). *Eas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n Arbor)

—— (2006). *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500—1250* (Cambridge)

Daim, F. (2003). ‘Avars and Avar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in Goetz et al. (2003),463—570

Dark, K. R. (2002). *Britain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Stroud)

Davies, W. (1978). *An Early Welsh Microcosm: Studies in the Llandaf Charter* (London)

—— (1990). *Patterns of Power in Early Wales* (Oxford)

De Boor, C. and Wirth, P., eds. (1972).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Stuttgart)

Defarri, R. J. (1964). *Orosius: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Washington).

Delehaye, H. (1912). 'Saints de Thrace et de Mesie', *Analecta Bollandia* 31, 161—300

Demandt, A. (1984). *Der Fall Roms: die Auflösung des römischen Reiches im Urteil der Nachwelt* (Munich)

Demougeot, E. (1979). *La Formation de l'Europe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II. *Dès l'avènement de Dioclétien (284) à l'occupation germanique de l'Empire romain d'Occident (début du VIe siècle)* (Paris)

Denison, D. (1993). *English Historical Syntax* (Harlow)

Dennis, G. T., ed. (1981). *Das Strategikon des Maurikios* (Vienna)

—— (1984). *Maurice's Strategikon: 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Pennsylvania)

Dindorf, L., ed. (1832). *Chronicon Paschale* (Bonn)

Dittrich, Z. R. (1962). *Christianity in Great Moravia* (Groningen)

Dolukhanov, P. M. (1996). *The Early Slavs: Eastern Europe from the Initial Settlement to the Kievan Rus* (London)

Donat, P. (1983). 'Die Entwicklung der Wirtschaft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bei den slawischen Stämme zwischen Oder und Elbe nach archäologischen Quellen', in *Settimane* (1983), 127—45

Donat, P. and Fischer, R. E. (1994). 'Die Anfänge slawische Siedlung westlich der Oder',*Slavia Antiqua* 45, 7—30

Drijvers, J. W. and Hunt, D., eds. (1999). *The Late Roman World and its Historian: Interpreting Ammianus Marcellinus* (London)

Drinkwater, J. F. (1989). 'Patronage in Roman Gaul and the Problem of

the Bagaudae', in *Patronage in Ancient Society*, ed. A. Wallace-Hadrill (London), 189—203

—— (1992). 'The Bacaudae of Fifth-Century Gaul', in Drinkwater and Elton (1992),208—17.

—— (1998). 'The usurpers Constantine III (407—411) and Jovinus (411—413)',*Britannia* 29, 269—98

—— (2007). *The Alamanni and Rome 213—496* (Oxford)

Drinkwater, J. F. and Elton, H., eds. (1992) *Fifth-Century Gaul: A Crisis of Identity?*(Cambridge)

Duczko, W. (2004). *Viking Rus: Studies on the Presence of Scandinavians in Eastern Europe* (Leiden)

Dulinicz, M. (1994). 'The Problem of Dating of the Strongholds of the Tornow Type and Tornow-Klenica Group', *Archeologia Polski* 39, 31—49 (English summary)

—— (1997). 'The First Dendrochronological Dating of the Strongholds in Northern Mazovia', in Urbanczyk (1997a), 137—42

Dumville, D. N. (1977). 'Kingship, Genealogies and Regnal Lists', in Sawyer and Wood(1977), 72—104

Dunbabin, J. (2000).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1180*, 2nd ed. (Oxford)

Dvornik, F. (1949). *The Making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 (1956). *The Slavs: Their Early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 (1969). *Les légendes de Constantin et de Méthode vues de Byzance*, 2nd ed.(Hattiesburg, MS)

Earle, T. K., ed. (1984). *On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 Essays in Honor of Harry Hoijer, 1982* (Malibu)

——, ed. (1991).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Eggers, H. J. (1951). *Der römische Import im freien Germanien*, Atlas der

Urgeschichte 1 (Berlin)

Eggers, M. (1995). *Das ‘Grossmährische Reich’: Realität oder Fiktion?: eine Neuinterpretation der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mittleren Donauraumes im 9.Jahrhundert* (Stuttgart)

Elton, H. (1996).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Esmonde-Cleary, S. (1989). *The Ending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Evelyn White, H. (1961). *The Works of Ausonius* (London)

Faith, R. (1997).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Growth of Lordship* (Leicester)

Farrell, R. T., ed. (1978). *Bede and Anglo-Saxon England* (Oxford)

——, ed. (1982). *The Vikings* (London)

Faulkner, N. (2000). *The Decline of Roman Britain* (Stroud)

Favrod, J. (1997). *Histoire politique du royaume burgonde (443—534)* (Lausanne)

Fellows-Jenson, G. (2001). ‘In the Steps of the Vikings’, in Graham-Campbell et al. (2001),279—88

Fielding, A. (1993a). ‘Mas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King (1993), 7—18— (1993b). ‘Migration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The Evolution of Emigration Policies’, in King (1993), 40—62

Fisher, P., trans., ed. Davidson, H. E. (1996). *Saxo Grammaticus: The History of the Danes: Books I—IX* (Woodbridge)

Font, M. (2005). ‘Missions, Conversions, and Power Legitimiz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in Curta (2005), 283—296

Forte, A. et al. (2005). *Viking Empires* (Cambridge)

Foulke, W. D. (1974).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Philadelphia)

Fouracre, P. (2000). *The Age of Charles Martel* (Harlow)

——, ed. (2005).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1, c.500—c.700*(Cambridge)

Franklin, S. and Shepard, J. (1996). *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 (Harlow)

Freeman, E. A. (1888). *Four Oxford Lectures 1887* (London)

Frendo, J. D. (1975). *Agathias History* (Berlin)

Fried, M. H. (1967).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iedrich, G. (1907). *Codex Diplomaticus et Epistolaris Regni Bohemiae*, vol. 1 (Prague)

Friedrichs, J. (2004). *Europe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House With Many Mansions* (London)

Frolova, N. A. (1983). *The Coinage of the Kingdom of Bosporos AD 242—341/2* (Oxford)Fulford, M. (1985). 'Roman Material in Barbarian Society c.200 BC—AD 400', in Champion and Megaw (1985), 91—108

Garipzanov, I. et al., eds. (2008). *Franks, Northmen, and Slavs: Identiti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Turnhout)

Garzya, A. (1989). *Opere di Sinesio di Cirene: epistole, operette, inni* (Turin)

Geary, P. (1983). *Ethnic Identity as a Situational Construc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Vienna)

—— (1988). *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rovingian World* (New York)

—— (2002). *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Gebuhr, M. (1974). 'Zur Definition alterkaiserzeitlicher Fürstengräber vom Lubsow Typ',*Prähistorische Zeitschrift* 49, 82—128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Geuenich, D., ed. (1998). *Die Franken und die Alemannen bis zur 'Schlacht bei Zulpich'*Gillet, A., ed. (2002). *On Barbarian Identit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Turnhout)

Godja, M.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 in the Basin of the Lower Vltava (Central Bohemia) 200—1200* (Oxford)

—— (1991). *The Ancient Slavs: Settlement and Society* (Edinburgh)

Godlowski, K. (1970). *The Chronology of the Late Roman and Early Migration Periods in Central Europe* (Cracow)

—— (1980). 'Das Aufhören der Germanischen Kulturen an der Mittleren Donau und das Problem des Vordringens der Slawen', in Wolfram & Daim (1980), 225—32

—— (1983). 'Zur Frage der Slawensitze vor der grossen Slawenwanderung im 6.Jahrhundert', in Settimane (1983), 257—302

Godman, P. and Collins, R., eds. (1990). *Charlemagne's Heir* (Oxford)

Goehrke, C. (1992). *Frühzeit des Ostslaventums* (Darmstadt)

Goetz, H.-W. et al., eds. (2003). *Regna and Gen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edieval Peoples and Kingdo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Leiden)

Goffart, W. (1980). *Barbarians and Romans AD 418—584: The Techniques of Accommodation* (Princeton)

—— (1981). 'Rome, Constantinople, and the Barbarians in Late Antiquit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275—306

—— (1988). *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 (AD 550—800): Jordanes, Gregory of Tours, Bede, and Paul the Deacon* (Princeton)

—— (2006). *Barbarian Tides: 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hiladelphia)

Goodacre S. et al. (2005). 'Genetic Evidence for a Family-Based Scandinavian Settlement of Shetland and Orkney during the Viking Periods', *Heredity* 95, 129—35

Gordon, D. C. (1966). *The Age of Attila* (Ann Arbor)

Gorecki, P. (1992). *Economy, Society and Lordship in Medieval Poland 1100—1250* (New York)

Gottmann, J., ed. (1980). *Centre and Periphery: Spatial Variation in Politics* (London)

Gould, J. D. (1980). 'European Inter-Continental Emigration, The Road Home: Return Migration from the USA',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9.1, 41—112

Graham-Campbell, J. et al., eds. (2001). *Vikings and the Danelaw* (Oxford)

Graus, F. J. and Dostál, A. (1966). *Das Grossmährische Reich: Tagung der wissenschaftlichen Konferenz des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der Tschechoslowak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rno-Nitra, 1.—4.x.1963* (Prague)

Graus, F. and Ludat, H., eds. (1967). *Siedlung und Verfassung Böhmens in der Frühzeit*(Wiesbaden)

Green, D. H. (1998).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the Early Germanic World* (Cambridge)

Gyuzelev, V. (1979). *The Proto-Bulgarians* (Sofia

Haarnagel, W. (1979). *Die Grabung Feddersen Wierde : Methode, Hausbau-, Siedlungsund Wirtschaftsformen sowie Sozialstruktur* (Wiesbaden)

Hachmann, R. (1971). *The Germanic Peoples* (London)

Haldon, J. F. (1990).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Cambridge)

Hall, C. (1983). *Periphrastic Do: History and Hypothesis* (Ann Arbor)

Halsall, G. (1992). 'The Origins of the Reihengräberzivilisation: Forty Years On', in Drinkwater and Elton (1992), 196—207

—— (1995a). *Settle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Merovingian Region of Metz*(Cambridge).

—— (1995b). *Early Medieval Cemeteries: An Introduction to Burial Archaeology in the Post-Roman West* (Skelmorlie)

—— (1999). 'Movers and Shakers: The Barbarians and the Fall of Rome', *Early Medieval Europe* 8, 131—45

—— (2001). 'Childeric's grave, Clovis' Success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erovingian Kingdom', in Mathisen and Shanzer (2001), 116—33

—— (2005). 'The Barbarian Invasions', in Fouracre (2005), 35—55

—— (2007). *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 376—568* (Cambridge)

Handley, M. (2001). 'Beyond Hagiography: Epigraphic Commemoration and the Cult of the Saints in Late Antique Trier', in Mathisen and Shanzer (2001), 187—200

—— (2003). *Death, Society and Culture: Inscriptions and Epitaphs in Gaul and Spain, AD 300—750* (Oxford)

Hannestad, K. (1960). 'Les forces militaires d'après la guerre gothique de Procope',*Classica et Mediaevalia* 21, 136—83

Hansen, G. C., ed. (1995). *Sokrates: Kirchengeschichte* (Berlin)

Harhoiu, R. (1977). *The Treasure from Pietroasa, Romania* (Oxford)

Härke, H. (1989). 'Early Saxon Weapon Burials: Frequencies, Distributions and Weapon Combinations', in Chadwick-Hawkes (1989), 49—61.

—— (1990). '"Warrior Grav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Anglo-Saxon Weapon Burial Rite', *Past and Present* 126, 22—43

—— (1992). *Angelsächsische Waffengräber des 5. bis 7. Jahrhundert* (Cologne)

—— (1998). 'Archaeologists and Migrations: A Problem of Attitude?',

Current Anthropology 39.1, 19—45

Hart, C. (1992). *The Danelaw* (London)

Haubrichs, W. (1996). 'Sprache und Sprachzeugnisse der merowingischen Franken', in *Die Franken: Wegbereiter Europas: vor 1500 Jahren, König Chlodwig und seine Erben* (Mainz), 559—73.

—— (2003). 'Remico aus Goddelau: Ostgermanen, Westgermanen und Romanen im Wormser Raum des 5./6. Jahrhunderts', in *Runica — Germanica — Mediaevalia*, ed. W.Heizmann and A. van Nahl (Berlin), 226—42

—— (forthcoming). 'Ein namhaftes Volk: Burgundische Namen und Sprache des 5.und 6. Jahrhunderts', in *Die Burgunder: Ethnogenese und Assimilation eines Volkes*,ed. V. Gallée (Worms), 135—84

Heather, P. J. (1986). 'The Crossing of the Danube and the Gothic Conversion',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27, 289—318

—— (1988). 'The Anti-Scythian Tirade of Synesius' De Regno', *Phoenix* 42, 152—72—(1989). 'Cassiodorus and the Rise of the Amals: Genealogy and the Goths under Hun Dominatio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9, 103—28

—— (1991). *Goths and Romans 332—489* (Oxford)

—— (1993). 'The Historical Culture of Ostrogothic Italy', in *Teoderico il grande e i Goti d'Italia, Atti del X*II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Spoleto), 317—53

—— (1995a). 'The Huns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0, 4—41

—— (1995b). 'Theodoric King of the Goths', *Early Medieval Europe* 4.2, 145—73

—— (1996). *The Goths* (Oxford)

—— (2001). 'The Late Roman Art of Client Management and the Grand Strategy Debate', in Pohl and Wood (2001), 15—68

—— (2003). ‘Gens and regnum among the Ostrogoths’, in Goetz et al. (2003),85—133

—— (2005). *The Fall of Rome: A New History* (London)

—— (2007). ‘Goths in the Roman Balkans c.350—500’, in Poulter (2007), 163—90

—— (2008a). Review of John Drinkwater (2007),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52,243—5

—— (2008b). ‘Ethnicity, Group Identity, and Social Status in the Migration Period’,in Garipzanov et al. (2008), 17—50

—— (forthcoming). ‘Why Did the Barbarian Cross the Rhine?’, *Late Antiquity*

Heather, P. J. and Matthews, J. F. (1991). *The Goths in the Fourth Century: Translated Texts for Historians* (Liverpool)

Heather, P. J. and Moncur, D. (2001).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mpire in the Fourth Century: Select Orations of Themistius, Translated Texts for Historians* (Liverpool)

Hedeager, L. (1987). ‘Empire, Frontier and the Barbarian Hinterland: Rome and Northern Europe from AD 1—400’, in Rowlands et al. (1987), 125—40

—— (1988). ‘The Evolution of Germanic Society 1—400 AD’, in Jones R. F. J. et al.(1988), 129—44

—— (1992), trans. John Hines. *Iron-Age Societies: From Tribe to State in Northern Europe, 500 BC to AD 700* (Oxford)

Hedeager, L. and Kristiansen, K. (1981). ‘Bendstrup — A Princely Grave from the Early Roman Iron Age: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Kuml* (1981), 150—62

Helgason, A. et al. (2000). ‘Estimating Scandinavian and Gaelic ancestry in the male settlers of Iceland’,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7, 697—717

—— (2001). ‘mtDNA and the Islands of the North Atlantic: Estimating the Proportions of Norse and Gaelic Ance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8,723—37

—— (2003). ‘A Reassessment of Genetic Diversity in Icelanders: Strong Evidence from Multiple Loci for Relative Homogeneity caused by Genetic Drift’, *Annals of Human Genetics* 67, 281—97

Henning, J. (1991). ‘Germanen-Slawen-Deutsche: Neue Untersuchungen zum frühgeschichtlichen Siedlungswesen ostlich der Elbe’, *Praehistorische Zeitschrift* 66,119—33

—— (2005). ‘Ways of Life i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Which Way was Normal?’, in Curta (2005), 41—59

Herrmann, J. (1968), *Siedlung,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 der slawischen Stamme zwischen Oder/Neisse und Elbe* (Berlin)

—— (1983), ‘Wanderungen und Landnähme im Westslawischen Gebiet’, in Settimane (1983), 75—101

—— (1984), *Germanen und Slawen in Mitteleuropa* (Berlin)

Hermann, J. et al., eds. (1985). *Die Slawen in Deutschland: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slawischen Stämme westlich von Oder und Neisse vom 6. bis 12. Jahrhundert,* 2nd ed.(Berlin)

Higham, N. (1992). *Rome, Britain and the Anglo-Saxons* (London)

—— (1994). *The English Conquest: Gildas and Britain in the Fifth Century*(Manchester)

——, ed. (2007). *The Britons in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Hills, C. (2003).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London)

Hines, J. (1984). *The Scandinavian Character of Anglian England in the pre-Viking Period* (Oxford)

——, ed. (1997). *The Anglo-Saxons from the Migration Period to the Eighth Century: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Woodbridge)

Hodder, I. (1982). *Symbols in Actio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Material Culture*(Cambridge)

—— (1991).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Cambridge)

Hodder, I. and Hutson, S., eds. (2003).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Hodges, R. and Bowden, W., eds. (1998). *The Sixth Century: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Demand* (Leiden)

Hodgkin, T. (1886). *The Letters of Cassiodorus: A Condensed Translation* (London)

Holmes, C., ed. (1996). *Migration in European History* (Cheltenham)

Holt, J. C. (1987). '1086' in Holt, ed., *Doomsday Studies* (Woodbridge), 41—64

Holtzmann, R., ed. (1935). *Thietmari Merseburgensis episcopi chronicon*,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vol. 9 (Berlin)

Hooke, D. (1997). 'The Anglo-Saxons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Aspects of Location in Space', in Hines (1997), 65—99

—— (1998). *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Hummer, H. J. (1998). 'The Fluidity of Barbarian Identity: The Ethnogenesis of Alemanni and Suebi AD 200—500', *Early Medieval Europe* 7, 2—26

Ilkjaer, J. (1995). 'Illerup Adal (Danemark). Un lieu de sacrifices du IIIe siècle de n.è. en Scandinavie meridionale', in Vallet and Kazanski (1995), 101—12

Ilkjaer, J. and Lonstrup, J. (1983). 'Der Moorfund im Tal der Illerup-A bei Skanderborg im Ostjutland', *Germania* 61, 95—126

Ionita, I. (1975). ‘The Social-Economic Structure of Society During the Goths’ Migration in the Carpatho-Danubean Area’, in Constantinescu (1975), 77—89

James, E. F. (1988). *The Franks* (Oxford)

—— (1989). ‘The Origins of Barbarian Kingdoms: The Continental Evidence’, in Bassett (1989), 40—52

James, S. (1999). *The Atlantic Celts: Ancient People or Modern Invention?* (London)

Jarnut, J. (2003). ‘Gens, Rex, and Regna of the Lombards’, in Goetz et al. (2003), 409—28 Jerome, H. (1926). *Migration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Jirecek, H. (1867). *Codex Juris Bohemici*, vol. 1 (Prague)

Johnston, D. E., ed. (1977). *The Saxon Shore* (London)

Jones, A. H. M. (1964).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3 vols. (Oxford)

Jones, M. E. (1996). *The End of Roman Britain* (Ithica).

Jones R. F. J. et al., eds. (1988). *First Millennium Papers: Western Europ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Oxford)

Kaiser, D. H. (1980). *The Growth of the Law in Medieval Russia* (Princeton)

——, ed. (1992). *The Laws of Rus’: tenth to fifteenth centurie* (Salt Lake City)

Kaiser, D. H. and Marker, G., eds. (1994). *Reinterpreting Russian History: Readings 860s—1860s* (Oxford)

Kaiser, R. (1997). *Die Franken: Roms Erben und Wegbereiter Europas?* (Idstein)

Kantor, M. (1983). *Medieval Slavic Lives of Saints and Princes* (Ann Arbor)

—— (1990).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in Bohemia* (Evanston)

Kapelle, W. E. (1979). *The Norman Conquest of the North: The Region and Its Transformation 1000—1135* (Chapel Hill, NC)

Kazanski, M. (1991). *Les Goths (Ier—*VII*e siècle après J.-C.)* (Paris)

—— (1999). *Les Slaves: les origines, Ier—*VII*e siècle après J.-C.* (Paris)

Kelly, C. (2008). *Attila the Hun: Barbarian Terror and the Fall of Rome* (London)

Kelly, G. (2008).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Allusive Historian* (Cambridge)

Kennedy, H. (2004). *The Court of the Caliphs: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s Greatest Dynasty* (London)

—— (2007). *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How the Spread of Islam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 (London)

Keydell, R., ed. (1967). *Agathias Historiae,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erlin)

Keynes, S. (1986). 'A Tale of Two Kings: Alfred the Great and Aethelred the Unready',*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6, 195—217

—— (1997). 'The Vikings in England, c.790—1016', in Sawyer (1997a), 48—81

Keynes, S. and Lapidge, M., eds. (1983). *Alfred the Great: Asser's Life of King Alfred, and Other Contemporary Sources* (London)

Khazanov, A. M. (trans. Julia Crookenden, with a foreword by Ernest Gellner) (1984).*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King, R., ed. (1993). *Mass Migration in Europe: The Legacy and the Future* (London)

King, R. and Oberg, S. (1993). 'Europe and the Future of Mass Migration', in King (1993),1—4

Kivisto, P. (1989). *The Ethnic Enigma: The Salience of Ethnicity for European-Origin Groups* (Philadelphia)

Klose, J. (1934). *Roms Klientel-Randstaaten am Rhein und an der Donau: Beiträge zu ihrer Geschichte und rechtlichen Stellung im 1. und 2. Jhdt. n. Chr.* (Breslau)

Kmiecinski, J. (1968). *Odry: cmentarzysko kurhanowe z okresu rzymskiego w powiecie chojnickim* (Lódz)

Knabe, C. and Herrmann, P., eds. (1931—57). *Saxonis Gesta danorum* (Copenhagen)

Knoll, P. W. and Schaer, F. (2003). *Gesta principum Polonorum* ['The deeds of the princes of the Poles'] (Budapest)

Kobylinksi, Z. (1997). 'Settlement Structures in Central Euro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Ages', in Urbanczyk (1997a), 97—114

Koch, R. and Koch, U. (1996). 'Die frankische Expansion ins Main und Neckargebiet',in *Die Franken: Wegbereiter Europas: vor 1500 Jahren, König Chlodwig und seine Erben* (Mainz), 270—84

Kokowski, A. (1995). *Schätze der Ostgoten* (Stuttgart)

Kolendo, J. (1997). 'Centr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1st—5th Centuries AD', in Urbanczyk (1997a), 5—22

Kossinna, G. (1928). *Ursprung und Verbreitung der Germanen i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r Zeit* (Leipzig)

Kostrzewski, J. (1969). 'Über den gegenwärtigen Stand der Erforschung der Ethnogenese der Slaven in archäologischer Sicht', in Zagiba (1969), 11—25

Krader, L. (1963).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The Hague)

Kristiansen, K. and Paludan-Muller, C., eds. (1978). *New Directions in Scandinavian Archaeology* (Copenhagen)

Krüger, B. et al., eds. (1976—83). *Die Germanen: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germanischen Stämme in Mitteleuropa, 2 vols. *(Berlin)*

Krusch, B. and Levison, W., eds. (1951).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e*,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1.1 (Berlin)

Kuhn, W. (1963). 'Die Siedlerzählen der deutschen Ostsiedlung', in *Studium Sociale. Karl Valentin Muller dargebracht* (Cologne), 131—54

—— (1973).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en zur mittelalterlichen Ostsiedlung*(Cologne)

Kuhrt, D., ed. (1984). *The Politics of Return: International Return Migration in Europe*(New York)

Kulikowski, M. (2000a). 'Barbarians in Gaul, Usurpers in Britain', *Britannia* 31, 325—45

——— (2000b). 'The Notitia Dignitatum as a Historical Source', *Historia* 49, 358—77

——— (2002). 'Nation versus Army: A Necessary Contrast?', in Gillet (2002), 69—84

——— (2007). *Rome's Gothic Wars* (Cambridge)

Kunzl, E., ed. (1993). *Die Alamannenbeute aus dem Rhein bei Neupotz*, 4 vols. *(Mainz)*

Kurnatowska, Z. (1995). 'Frühstadische Entwicklung an den Zentrum der Piasten in Grosspolen', in Brachmann (1995), 133—48

—— (1997a). 'Territorial Structures in West Poland Prior to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 Organization of Miesco I', in Urbanczyk (1997a), 125—36

—— (1997b). 'Die Christianisierung Polens im Lichte der Materiallen Quellen', in Urbancyzk (1997a), 101—121

Kurze, F., ed. (1895). *Annales Regni Francorum 741—829*,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vol. 6 (Hanover)

Lappenberg, J. M. and Schmeidler, B., eds. (1909). *Helmoldi presbyteri Bozoviensis Cronica Slavorum*, 2nd ed. (Hanover)

Leahy, K. and Paterson, C. (2001). 'New Light on the Viking presence in Lincolnshire:the Artefactual Evidence', in Graham-Campbell et al. (2001), 181—202

Leach, E. R. (1954).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Lemerle, P. (1979—81). *Les plus anciens recueils des miracles de Saint Démétrius* (Paris)

Lenski, N. (1995). 'The Gothic Civil War and the Date of the Gothic Conversion',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36, 51—87

—— (2002). *Failure of Empire: Valens and the Roman State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 (Berkeley)

Levaskova, V. P. (1994). 'Agriculture in Rus', in Kaiser and Marker (1994), 39—44

Lewitt, T. (1991).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Roman Economy AD 200—400* (Oxford)

Leyser, K. (1982). *Medieval Germany and its Neighbours, 900—1250* (London)

—— (1989). *Rule and Conflict in an Early Medieval Society: Ottonian Saxony*(Oxford)

Liapushkin, I. I. (1958). *Gorodishche Novotroitskoe* (Moscow).

Liebermann, F., ed. (1903—16). *Die Gesetze der Angelsachsen* (Halle)

Liebeschuetz. J. H. W. G. (1990). *Barbarians and Bishops: Army,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 (Oxford)

—— (1992). 'Alaric's Goths: Nation or Army?', in Drinkwater and Elton (1992),75—83

Likhachev, D. S. (1970). 'The Legend of the Calling-in of the

Varangians’, in K.Hannestad et al. (eds.), *Varangian Problems*, 178—85

Lindner, R. (1981). ‘Nomadism, Huns, and Horses’, *Past & Present* 92, 1—19

Lohmann, H.-E. and Hirsch, P., eds. (1935). *Widukindi monachi Corbeiensis Rerum Gestarum Saxonicarum*,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5th ed. (Hanover)

Loseby, S. T. (1992). ‘Marseille: a Late Antique Success Story?’,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2, 165—85

—— (1998). ‘Marseille and the Pirenne Thesis I: Gregory of Tours, the Merovingian kings and ‘un grand port’, in Hodges and Bowden (1998), 203—29

—— (2000). ‘Urban Failures in late Antique Gaul’, in Slater (2000), 72—95

Lowmianski, H. (1960).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Early Feudal Polish State’,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3, 7—32

Loyn, H. (1995). *The Vikings in Britain* (Oxford)

Lubke, C. (1984—88). *Regesten zur Geschichte der Slaven an Elbe und Oder (vom Jahr 900 an)* (Berlin)

—— (1994). ‘Zwischen Triglav und Christus: Die Anfänge der Christianisierung des Havellandes’, *Wichmann-Jahrbuch des Diozesangeschichtsverein Berlin*, n.f. 3,Jahrgang 34—5, 15—35

—— (1997). ‘Form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Polabian Slavs (until 10th c.)’,in Urbanczyk (1997a), 115—124

Lund, N. (1984). *Two Voyagers at the Court of King Alfred: Othere and Wulfstan* (York)

—— (1986). ‘The Armies of Swein Forkbeard and Cnut: leding or lith?’, *Anglo Saxon England* 15, 105—18

—— (1993). ‘Danish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Cooper (1993), 109—26

—— (1994). ‘Cnut’s Danish Kingdom’, in Rumble (1994), 27—42

—— (1995). ‘Scandinavia’, in McKitterick (1995), 202—27.

—— (1997). ‘The Danish Empire and the End of the Viking Age’, in Sawyer (1997a),156—81

Lund Hansen, U. (1987). *Römischer Import im Norden: Warenaustausch zwischen dem Römischen Reich und dem freien Germanien während der Kaiser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Nordeuropas* (Copenhagen)

McCormick, M. (2001).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AD 300—900* (Cambridge)

MacGeorge, P. (2002). *Late Roman Warlords* (Oxford)

McKitterick, R. (1977). *The Frankish Church and the Carolingian Reforms, 789—895* (London)

—— (1983). *The Frankish Kingdoms under the Carolingians, 751—987* (London)

—— (1989).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Written Word* (Cambridge)

——, ed. (1994).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Cambridge)

——, ed. (1995).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I*, c.700—c.900*(Cambridge)

Maenchen-Helfen, O. J. (1945). ‘Huns and Hsiung-nu’, *Byzantion* 17, 222—43

—— (1973).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Magie, D. (1932). *The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London)

Maleczynski, K., ed. (1952). *Anonima tzw. Galla Kronika* (Cracow)

Mango, C. and Scott, R. (1997). *Chronographia: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Oxford)

Manteuffel, T.,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 Gorski (1982).*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sh State: The Period of Ducal Rule, 963—1194 (Detroit)

Manteuffel, T. and Gieysztor, A., eds. (1968).*L'Europe aux IX.—XI. siècles aux origines des états nationaux: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es origines des états européens aux IX.—XI. siècles, tenu à Varsovie et Poznan du 7 au 13 septembre 1965* (Warsaw)

Markus, R. A. (1997). *Gregory the Great and his World* (Cambridge)

Mathisen, R. W. and Shanzer, D., eds. (2001). *Society and Culture in Late Roman Gaul: Revisiting the Sources* (Aldershot)

Matthews, J. F. (1970). 'Olympiodorus of Theb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AD 407—425)',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0, 79—97

—— (1975). *Western Aristocracies and the Imperial Court AD 364—425* (Oxford)

—— (1989). *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 (London)

Mayr Harting, H. (1972). *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to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 (1994). *Two Conversions to Christianity: The Bulgarians and the Anglo-Saxons*(Reading)

Melnikova, E. A. (1996). *The Eastern World of the Vikings* (Gothenburg)

Mierow, C. C. (1915). *Jordanes: Getica* (New York)

Minns, E. H. (1913). *Scythians and Greeks: A Survey of Ancien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North Coast of the Euxine From the Danube to the Caucasus* (Cambridge)

Minor, C. (1996). 'Bacaudae — A Reconsideration', *Traditio* 51, 297—307

Miquel, A. (1966). 'Ibn Jacub', *Annales* 23, 1048—63

Moderan, Y. (2002). 'L'établissement des Vandals en Afrique', *Antiquité Tardif* 10, 87—122

Moisl, H. (1981). ‘Anglo-Saxon Royal Genealogies and Germanic Oral Tradition’,*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7, 215—48

Mommsen, T., ed. (1882). *Jordanes Romana et Getica*,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Auctores Antiquissimi 5.1 (Berlin)

——, ed. (1892). *Chronica Minora 1*,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Auctores Antiquissimi 9 (Berlin)

——, ed. (1894a). *Chronica Minora 2*,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Auctores Antiquissimi 11 (Berlin)

——, ed. (1894b). *Cassiodori Senatoris Variae*,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Auctores Antiquissimi 12 (Berlin)

Mommsen, T. and Kreuger, P., eds. (1905). *Codex Theodosianus* (Berlin)

Moorhead, J. (1992). *Victor of Vit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in Africa* (Liverpool)

Moravcsik, G. and Jenkins, R. J. H., eds. (1967).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Washington)

Mueller, K., ed. (1851—70).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s. 4—5 (Paris)

Muller-Wille, M. (1999). *Opferkulte der Germanen und Slawen* (Darmstadt)

Myhre, B. (1978). ‘Agrarian Development, Settlement Histor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west Norway in the Iron Age’, in Kristiansen and Paludan-Muller (1978),224—35, 253—65

Nelson, J. L. (1991). *The Annals of St-Bertin* (Manchester)

—— (1997). ‘The Frankish Empire’, in Sawyer (1997a), 19—47

Nichols, J. (1998). ‘The Eurasian Spread Zone and the Indo-European Dispersal’, in Blench and Spriggs (1998), 220—66

Niebuhr, B. G., ed. (1839—41).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Bonn)

Nixon, C. E. V. and Rodgers, B. S. (1994). *In Praise of Later Roman Emperors: The Panegyrici Latini* (Berkeley)

Noble, T. F. X. and Head, T., eds. (1995). *Soldiers of Christ: Saints and Saints' Lives from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Pennsylvania)

Noll, R. and Vetter, E., eds. (1963). *Eugippius Vita Sancti Severini, Schriften und Quellen der Alten Welt* 11 (Berlin)

Noonan, T. S. (1997). 'Scandinavians in European Russia', in Sawyer (1997a), 134—55

—— (1998). *The Islamic World, Russia and the Vikings, 750—900: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Aldershot)

Ó Corráin, D. (1997). 'Ireland, Wales, Man, and the Hebrides', in Sawyer (1997a), 83—109.

—— (1998). 'The Vikings in Scotland and Ireland in the Ninth Century', *Peritia* 12,296—339

Ørsnes, M. (1963). 'The Weapon Find in Ejsbøl Mose at Haderlev: Preliminary Report',*Acta Archaeologica* 34, 232—48

—— (1968). *Der Moorfund von Ejsbøl bei Hadersleben. Deutungsprobleme der grossen nordgermanischen Waffenopferfunde: Abhandlung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in Göttingen* (Göttingen)

Painter, K. (1994). 'Booty from a Roman Villa found in the Rhine', *Minerva* 5, 22—7

Palade, V. (1966). 'Atelierele pentru lucrat pieptini din os din secolul at IV-leas e.n. de la Birlad-Valea Seaca', *Arheologia Moldovei* 4, 261—77

Parczewski, M. (1993). *Die Anfänge der frühslawischen Kultur in Polen* (Vienna)

—— (1997). 'Beginnings of the Slavs' Culture', in Urbanczyk (1997a), 79—90

Parmentier, L. and Hansen, G. C., eds. (1998). *Theodoret: Kirchengeschichte*, 3rd ed.(Berlin)

Paschoud, F. (1971—89). *Zosimus: Historia Nova*, 6 vols. (Paris)

Pearson, M. P. (1989). ‘Beyond the Pale: Barbarian Social Dynamics in Western Europe’,in Barrett (1989), 198—226

Peregrinatio Gothica 1. (1986). Archaeologia Baltica VII (Lodz)

Peregrinatio Gothica 2. (1989). Archaeologia Baltica VIII (Lodz)

Perin, P. (1980). *La datation des tombes mérovingiennes* (Geneva)

—— (1987). *Les Francs à la Conquête de la Gaule* (Paris)

—— (1996). ‘Die Archäologische Zeugnisse der frankischen Expansion in Gallien’,in *Die Franken: Wegbereiter Europas: vor 1500 Jahren, König Chlodwig und seine Erben* (Mainz), 227—32.

Perin, P. and Feffer, L. C. (1987).*Les Francs à l’Origine de la France*, 2 vols. (Paris)

Perin, P. and Kazanski, M. (1996). ‘Das Grab Childerichs I’, in *Die Franken: Wegbereiter Europas: vor 1500 Jahren, König Chlodwig und seine Erben* (Mainz), 173—82

Pertz, G. H. and Kurze, F., eds. (1891). *Annales Fuldenses, sive, Annales regni Francorum orientalis ab Einhardo, Ruodolfo, Meginhardo Fuldensibus, Seligenstadi, Fuldae, Mogontiaoi conscripti cum continuationibus Ratisbonensi et Altahensibus* (Hanover)

Petrov, N. I. (2005). ‘Ladoga, Ryurik’s Stronghold, and Novgorod: Fortifications and Power in Early Medieval Russia’, in Curta (2005), 121—37

Petschenig, M., ed. (1881). *Victoris Episcopi Vitensis Historia persecutionis Africanae provinciae* (Vienna)

Pharr, C. (1952).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New York)

Phillips, J. R. S. (1988). *The Medieval Expansion of Europe* (Oxford)

—— (1994). ‘The Medieval Background’, in Canny (1994), 9—25

Pichlmayr, F., ed. (1911). *Sexti Aurelii Victoris liber de Caesaribus* (Leipzig)

Pinder, M., ed. (1897). *Ioannis Zonarae Epitomae historiarum libri* XVIII (Bonn)

Pirling, R. (1966). *Das römisch-fränkische Gräberfeld von Krefeld-Gellep* (Berlin)

Pirling, R. and Siepen, M. (2003). *Das römisch-fränkische Gräberfeld von Krefeld-Gellep 1989—2000* (Stuttgart)

Platnauer, M. (1922). *The Works of Claudian* (London)

PLRE: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d. A. H. M. Jones et al., 3 vols.(Cambridge, 1971—92)

Pohl, W. (1980). 'Die Gepiden und die Gentes an der mittleren Donau nach dem Zerfall des Attilareiches', in Wolfram and Daim (1980), 239—305

—— (1988). *Die Awaren: ein Steppenvolk im Mitteleuropa, 567—822 n. Chr.*(Munich)

—— (2000). *Die Germanen* (Munich)

—— (2003). 'A Non-Roman Empire in Central Europe: The Avars', in Goetz et al. (2003), 571—595.

Pohl, W. and Erhart, P. (2005). *Die Langobarden : Herrschaft und Identität* (Vienna)

Pohl, W. and Wood, I. N., eds. (2001) *The Transformation of Frontiers from Late Antiquity to the Carolingian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Plenary Conferenc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Project* (Leiden)

Poulik, J. et al., eds. (1986). *Grossmähren und die Anfänge der tschechoslowakischen Staatlichkeit* (Prague)

Poulter, A., ed. (2007). *The Transition to Late Antiquity on the Danube and Beyond*(Oxford)

Powlesland, D. (1997). ‘Early Anglo-Saxon Settlements: Structures, Forms, and Layout’,in Hines (1997), 101—24

Preucel, R. and Hodder, I., eds. (1996).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in Theory* (Oxford)

Preussler, W. (1956). ‘Keltischer Einfluss im Englischen’,*Revue des Langues Vivantes* 22,322—50

Prinz, F. (1984). *Böhmen im mittelalterlichen Europa* (Munich).

Proussa, P. (1990). ‘A Contact-universals Origin for Periphrastic Do, with Special Consideration of OE-Celtic Contact’, in Adamson (1990), 407—34

Raev, B. A. (1986). *Roman Imports in the Lower Don Basin* (Oxford)

Rafnsson, S. (1997). ‘The Atlantic Islands’, in Sawyer (1997a), 110—33

Randsborg, K. (1980). *The Viking Age in Denmark: The Formation of a State* (London)

Rau, G. (1972). ‘Körpergräber mit Glasbeigaben des 4. nachchristlichen Jahrhunderts im Oder-Wechsel-Raum’, *Acta praehistorica et archaeologica* 3, 109—214

Reichmann, C. (1996). ‘Frühe Franken in Germanien’, in *Die Franken: Wegbereiter Europas: vor 1500 Jahren, König Chlodwig und seine Erben* (Mainz), 55—65

Renfrew, C. (1987).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London)

Renfrew, C. and Bahn, P. (1991).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London)

Renfrew, C. and Cherry, J. F., eds. (1986). *Peer Polity Interaction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Reuter, T. (1985). ‘Plunder and Tribute in the Carolingian Empir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75—94

—— (1990). ‘The End of Carolingian Military Expansion’, in Godman and Collins(1990), 391—407

—— (1991). *German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800—1056* (London)

—— (1992). *The Annals of Fulda* (Manchester)

——, ed. (1999).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3, 900—1024* (Cambridge)

Ridley R. T. (1982). *Zosimus: New History* (Canberra)

Ritchie, A. (1993). *Viking Scotland* (Bath)

Robinson, C. H. (1921). *Anskar: The Apostle of the North, 801—865* (London)

Roesdahl, E., trans. S. Margeson and K. Williams (1982). *Viking Age Denmark* (London)

——, trans. S. Margeson and K. Williams (1991). *The Vikings* (London)

Rolfe, J. C., ed. (1935—39). *Ammianus Marcellinus* (London)

Rostovzeff, M. I. (1922).*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Oxford)

Rowlands, M. et al., eds. (1987).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Rudkin, D. (1986). *The Saxon Shore* (London)

Rumble, A. R., ed. (1994). *The Reign of Cnut: King of England, Denmark and Norway*(London)

Rystad, G. (1996).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6.4, 555—86

Sabbah, G. (1978). *La méthode d’Ammien Marcellin: recherches sur la construction du discours historique dans les Res Gestae* (Paris)

Salt, J. and Clout, H., eds. (1976). *Migration in Post-War Europe: Geographical Essays*(Oxford)

Salway, P. (2001).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Oxford)

Sanchez-Albornoz, N. (1994). ‘The First Transatlantic Transfer: Spanish Migration to the New World’, in Canny (1994), 26—36

Santini, C., ed. (1979). *Eutropius 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 (Stuttgart)

Sartre, M. (1982). *Trois études sur l’Arabie romaine et byzantine: Revue d’Études Latines*(Brussels)

Sasse, B. (1982). *Die Sozialgeschichte Böhmens in der Frühzeit: Historisch archä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9.—12. Jahrhundert* (Berlin)

Sawyer, B. (1991). ‘Viking-Age Rune-Stones as a Crisis Symptom’,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24, 97—112

Sawyer, B. and Sawyer, P. H. (1993). *Medieval Scandinavia: From Conversion to Reformation c.800—1500* (Minneapolis)

Sawyer, P. H. (1962). *The Age of the Vikings* (London)

—— (1978). *From Roman Britain to Norman England* (London)

—— (1982), ‘The Causes of the Viking Age’, in Farrell (1982), 1—7

—— (1993). ‘The Scandinavian Background’, in Cooper (1993), 33—42

—— (1994). ‘Cnut’s Scandinavian Empire’, in Rumble (1994), 10—22

——, ed. (1997a).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Vikings* (Oxford)

—— (1997b). ‘The Age of the Vikings, and Before’, in P. Sawyer (1997a), 1—18

Sawyer, P. H. and Wood, I. N., eds. (1977). *Early Medieval Kingship* (Leeds)

Schenkl, H. et al., eds. (1965—74). *Themistii Orationes* (Leipzig)

Schmeidler, B., ed. (1917). *Adam von Bremen: Gesta Hammaburgensis ecclesiae pontificum*,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Hanover)

Schmidt, L. (1933).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tämme bis zum Ausgang der Völkerwanderung: Die Ostgermanen*, 2nd ed. (Munich)

Scholz, B. W. (1972). *Carolingian Chronicles* (Ann Arbor)

Schröder, F. J. (1977). *Völker und Herrscher des östlichen Europa im Weltbild Widukinds von Korvei und Thietmars von Merseburg* (Munster)

Scragg, D. (1991). *The Battle of Maldon, AD 991* (Oxford)

Searle, E. (1988). *Predatory Kin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Norman Power 840—1066* (Berkeley).

Seeck, O., ed. (1962). *Notitia dignitatum* (Frankfurt am Main)

Service, E. R. (1975).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Settimane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Settimane di studio] (1983).*Gli Slavi occidentali e meridionali nell'alto medioevo, Atti del xx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Spoleto)

Shanzer, D. and Wood, I. N., eds. and trans. (2002). *Avitus of Vienne: Letters and Selected Prose* (Liverpool)

Shchukin, M. (1975). 'Das Problem der Cernjachow-Kultur in der sowjetischen archäologischen Literatur', *Zeitschrift für Archäologie* 9, 25—41

—— (1977). 'Current aspects of the Gothic Problem and the Cherniakhovo Culture',*Arkheologichesky sbornik* 18, 79—92 (English summary)

—— (1990).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st Century BC—1st Century AD* (Oxford)

—— (2005). *The Gothic Way: Goths, Rom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Chernjakhov/ Sintana de Mures* (St Petersburg)

Shennan, S. (1989).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hepard, J. (2005). ‘Conversions and Regimes Compared: The Rus’ and the Poles, ca.1000’, in Curta (2005), 252—82

Sherwin-White, A. N. (1973). *The Roman Citizenship*, 2nd ed. (Oxford)

Siegmund, F. (1998). ‘Social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in Wood (1998), 177—98

Sinor, D. (1977). *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 (London)

—— (199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Skalnik, P., ed. (1989). *Outwitting the State* (New Jersey)

Slater, T., ed. (2000). *Towns in Decline AD 100—1600* (Aldershot).

Smith, A.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 (Oxford)

Smith, J. M. (1992). *Province and Empire: Brittany and the Carolingians* (Cambridge)

Smyth, A. P. (1977). *Scandinavian Kings in the British Isles, 850—880* (Oxford)

—— (1979). *Scandinavian York and Dublin: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wo Related Viking Kingdoms* (New Jersey)

—— (1995). *King Alfred the Great* (Oxford)

Speidel, M. P. (1977). ‘The Roman Army in Arabia’,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Antiken Welt* II. 8

Stallknecht, B. (1969). *Untersuchungen zur römischen Aussenpolitik in der Spätantike*(Bonn)

Stenton. F. (1971). *Anglo-Saxon England* (Oxford)

Steuer, H. (1982). *Frühgeschichtliche Sozialstrukturen Mitteleuropa* (Göttingen)

—— (1998). ‘Theorien zur Herkunft und Entstehung der Alemannen:Archaeologische Forschungsansatze’, in Geuenich (1998),

270—334

Stockwell, S., ed. (2008). *The British Empire: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Oxford)

Syme, R. (1968). *Ammianus and the Historia Augusta* (Oxford)

—— (1971a). *Emperors and Biography: Studies in the Historia Augusta* (Oxford)

—— (1971b). *The Historia Augusta: A Call for Clarity* (Bonn)

Szydlowski, J. (1980). 'Zur Anwesenheit der Westslawen an der mittleren Donau im ausgehenden 5. und 6. Jahrhundert', in Wolfram and Daim (1980), 233—7

Tejral, J. et al., eds. (1999). *L'Occident romain et l'Europe centrale au début de l'époque des Grandes Migrations* (Brno)

Theuws, F. and Hiddinck, H. (1996). 'Der Kontakt zu Rom', in *Die Franken: Wegbereiter Europas: vor 1500 Jahren, König Chlodwig und seine Erben* (Mainz), 64—80

Thomas, M. G. et al. (2006). 'Evidence for an Apartheid-lik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273, 2651—7

Thompson, E. A. (1965).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 (1966). *The Visigoths in the Time of Ulfil* (Oxford)

—— (1995). *The Huns* (Oxford)

Thorpe, L. (1974). *Gregory of Tours: 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 (London)

Todd, M. (1975).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100 BC—AD 300* (London)

—— (1992).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Trillmich, W. et al., eds. (1978). *Quellen des 9. und 11. Jahrhunderts zur Geschichte der hambürgischen Kirche und des Reiches,* 5th ed. (Darmstadt)

Tschan, F. J. (1959). *Adam of Bremen: History of the Archbishops of*

Hamburg-Bremen(New York)

—— (1966). *Helmold, Priest of Bosau: The Chronicle of the Slavs* (New York)

Turek, R. (1974). *Böhmen im Morgengrauen der 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der slawischen Besiedlung bis zum Eintritt in die europäische Kulturgemeinschaft (6. bis Ende des 10 Jahrhunderts)* (Wiesbaden)

Ucko, P. 1995). *Theory in Archaeology: A World Perspective* (London)

Urbanczyk, P., ed. (1997a). *Origins of Central Europe* (Warsaw)

—— (1997b). ‘Changes of Power Structure During the 1st Millennium A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entral Poland’, in Urbanczyk (1997a), 39—44

——, ed. (1997c). *Early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 (Warsaw)

——, ed. (2001). *Europe around the Year 1000* (Warsaw)

——, ed. (2004). *Polish Lands at the Turn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Millennia*(Warsaw)

—— (2005). ‘Early State Form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in Curta (2005), 139—51

Vallet, F and Kazanski, M., eds. (1995). *La noblesse romaine et les chefs barbares du* III*e au* VII*e siècle* (Paris)

Van Dam, R. (1985).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in Late Antique Gaul* (Berkeley)

Van Es, W. A. (1967). *Wijster: A Native Villag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 150—425 AD*(Groningen)

Van Ossel, P. (1992). *Etablissements ruraux de l’antiquité tardive dans le nord de la Gaule* (Paris)

Van Ossel, P. and Ouzoulias, P. (2000). ‘Rural Settlement Economy in Northern Gaul in the Late Empire: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13,133—60

Verlinden, C. (1955).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Bruges)

Vertovec, S. and Cohen, R. (1999). *Migration, Diasporas, and Transnationalism*(Cheltenham)

Vince, A. (2001). 'Lincoln in the Viking Age', in Graham-Campbell et al. (2001), 157—80 Voets, S. et al., eds. (1995). *T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Migration* (The Hague)

Vogel, F., ed. (1885). *Ennodius Opera*,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Auctores Antiquissimi 7 (Berlin)

von Schnurbein, S. (1995). *Vom Einfluss Roms auf die Germane* (Opladen)

Waitz, G., ed. (1883). *Annales Bertiniani* (Hanover)

Wallace-Hadrill, J. M. (1960).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London)

Ward Perkins, B. (2000). 'Why did the Anglo-Saxons not become more British?',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5, 513—33

—— (2005).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Oxford)

Warner, D. A. (2001). *Ottonian Germany: The Chronicon of Thietmar of Merseburg*(Manchester)

Weale, M. E. et al. (2002). 'Y 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nglo-Saxon Mass Migration'*Molecular Biology & Evolution* 19.7, 1008—21

Wegener, W. (1959). *Böhmen/Mähren und das Reich im Hochmittelälter* (Cologne)

Welch, M. (1992). *English Heritage Book of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Wells, P. S. (1999). *The Barbarians Speak: 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Roman Europe* (Princeton)

Wenskus, R. (1961). *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 Das Werden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gentes* (Cologne)

Werner, J. (1935). *Münzdatierte austrasische Grabfunde* (Berlin)

—— (1950). ‘Zur Entstehung der Reihengräberzivilisation’, *Archaeologica Geographica* I, 23—32

Weski, T. (1982). *Waffen in germanischen Gräbern der älteren römischen Kaiserzeit südlich der Ostsee* (Oxford)

Whitby, L. M. (1988). *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 Theophylact Simocatta on Persian and Balkan Warfare* (Oxford)

Whitby, L. M. and Whitby, J. M. (1986).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Oxford)

—— (1989). *The Chronicon Paschale* (Liverpool)

Whitelock, D., ed. (1955).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1, c.500—1042* (London)

Whitelock, D. et al. (1961).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A Revised Translation* (London)

Whittaker, C. R. (1994).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Baltimore).

Whittow, M. (1996). *The Making of Orthodox Byzantium, 600—1025* (London)

Wickham, C. (1992). ‘Problems of Comparing Rural Societies in Early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6th series 2, 221—46

—— (2005).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Wieczorek, A. (1996). ‘Die Ausbreitung der frankischen Herrschaft in den Rheinland vor und seit Chlodwig I’, in *Die Franken: Wegbereiter Europas: vor 1500 Jahren, König Chlodwig und seine Erben* (Mainz), 241—61

Wiet, G. (1957). *Les Atours Précieux* (Cairo)

Williams, A. (1991). *The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Woodbridge)

Wilson, J. (2008). ‘Agency, Narrative, and Resistance’, in Stockwell (2008), 245—68

Winterbottom, M., ed. and trans. (1978). *Gildas: The Ruin of Britain, and other works*(London)

Wolfram, H. (1979). *Conversio Bagoariorum et Carantanorum: das Weissbuch der Salzburger Kirche über die erfolgreiche Mission in Karantanien und Pannonien*(Vienna)

—— (1985). *Treasures on the Danube: Barbarian Invaders and their Roman Inheritance* (Vienna)

——, trans. T. J. Dunlap (1988). *History of the Goths* (Berkeley)

—— (1994). ‘Origo et Religio: Ethnic Traditions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Medieval Texts’, *Early Medieval Europe* 3, 19—38

—— (1995). *Salzburg, Bayern, Österreich: die Conversio Bagoariorum et Carantanorum und die Quellen ihrer Zeit* (Vienna)

——, trans. T. J. Dunlap (1997). *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Berkeley)

Wolfram, H. and Daim, F., eds. (1980). *Die Völker an der mittleren und unteren Donau im fünften und sechsten Jahrhundert, Denkschriften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 145 (Vienna)

Wolfram, H. and Pohl, W., eds. (1990). *Typen der Ethnogenese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Bayern, Denkschriften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 193 (Vienna)

Wood, I. N. (1985). ‘Gregory of Tours and Clovis’,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63, 249—72

—— (1990). ‘Ethnicity and the Ethnogenesis of the Burgundians’ in Wolfram and Pohl (1990), 53—69

—— (1994).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London)

——, ed. (1998). *Franks and Alamanni in the Merovingian Period: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Woodbridge)

—— (2001). *The Missionary Life: Saints and the Evangelization of Europe, 400—1050* (Harlow)

Woolf, A. (2003). ‘The Britons: from Romans to Barbarians’, in Goetz et al. (2003),345—80

—— (2007). ‘Apartheid and Economics in Anglo-Saxon England’, in Higham (2007),115—29

Wormald, C. P. (1978). ‘Bede, Beowulf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 Aristocracy’, in Farrell (1978), 32—95

—— (1982). ‘Viking Studies: Whence and Whither’, in Farrell (1982), 12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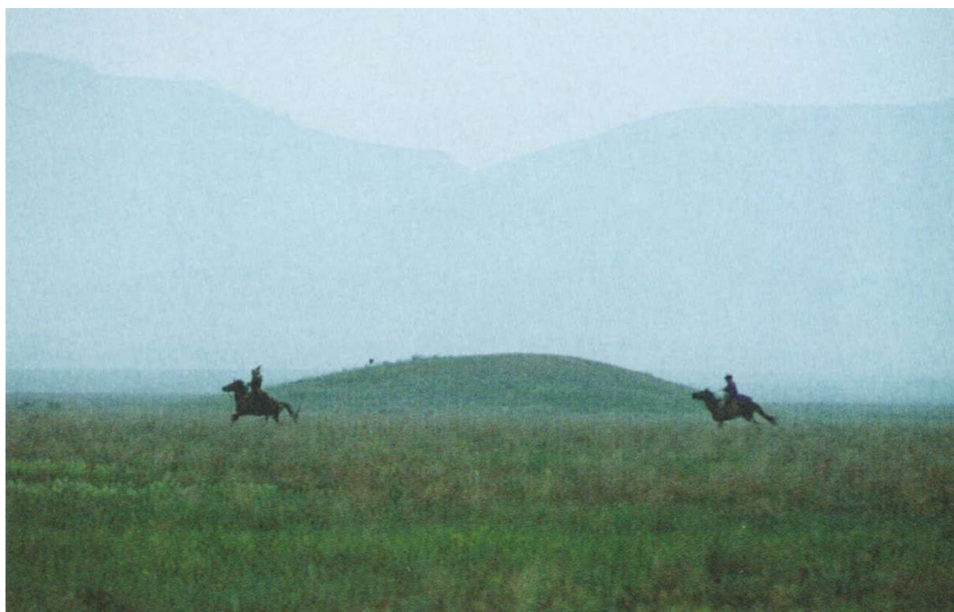
—— (1986). ‘Celtic and Anglo-Saxon Kingship’, *Studies in Medieval Culture* 20,151—83

Zagiba, F., ed. (1969). *Das heidnische und christliche Slaventum* (Wiesbaden)

Zollner, E. (1970). *Geschichte der Franken bis zur Mitte des sechsten Jahrhunderts*(Munich)



1. 北欧平原是欧洲面积最大的地理区域。公元元年前后，北欧平原上树木繁茂，土壤以重黏土为主，缺乏相应技术的农民生活艰难。而到了公元1000年的时候，这片平原巨大的经济潜力头一次显露了出来（Getty）



2. 欧亚大草原西至顿河东岸。以顿河为界，西边降水还算充足，不需要灌溉也能发展常规农业，而东边就不同了（Getty）



3. 在欧洲东北部，可以发展常规农业的区域以芬兰的针叶林为界。这条界限以北的地区冬季严寒，贫瘠的土壤中缺乏腐殖质，常规的耕作无法进行（Getty）



4. 特温吉人地盘上的一个4世纪村庄专门生产梳子，在古代社会里，发型有时能起关键作用。法兰克国王会蓄发表明自己的王族身份，塔西佗告诉我们，有些苏维汇人会把头发打结，显示自己的群体归属，这张图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AKG Images）



5. 马可·奥勒留的暴雨神迹。这位皇帝在所谓马科曼尼人战争中击败中欧那些不安分的部落后，立起了一块碑来纪念自己的胜利。这些动荡背后，是外边缘区群体向罗马边境的掠夺性扩张（Bridgeman Art Library）

6. 乌尔菲拉在4世纪发明了一种日耳曼语言的书写形式，以便为改信基督教的哥特人翻译《圣经》。图片上这份精美的抄本是6世纪在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宫廷中制作出来的，但基本采用了乌尔菲拉的译文

（AKG Images）



7. 即使是友好的蛮族国王也会被要求在皇帝面前下拜，这样的场景往往会被呈现出来（如图），以彰显皇帝的威严，表示皇帝能保护神所赐的文明不受蛮族侵犯（Bridgeman Art Library）



8. 这个浮雕展现了罗马皇帝瓦勒良在萨珊人的“众王之王”沙普尔一世面前受辱的情景，极好地说明了3世纪波斯帝国崛起带来的威胁。新兴的波斯将资源吸引到东边，日耳曼人趁机向罗马的欧洲边境扩张（Bridgeman Art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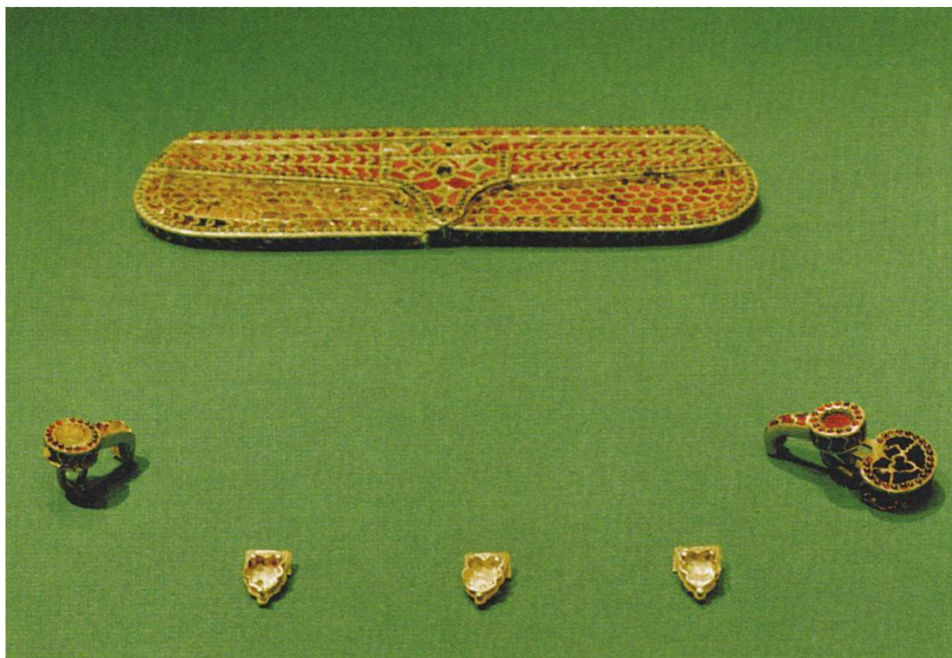
9. 19世纪30年代，布尔农民为逃离英国的控制，拖家带口从好望角向北迁移。遇到阻力时，他们会结成足够大的群体来对抗，他们的迁徙是一种掠夺性迁徙，公元第一千年中的一些群体也很可能采取了这种迁徙形式（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10. 君士坦丁堡令人叹为观止的三重城墙是5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建成的，为的是应对匈人从黑海以北向中欧的迁徙。匈人沿途遇到的群体也视匈人为严重的威胁，这些群体在405—408年迁到了罗马境内（AKG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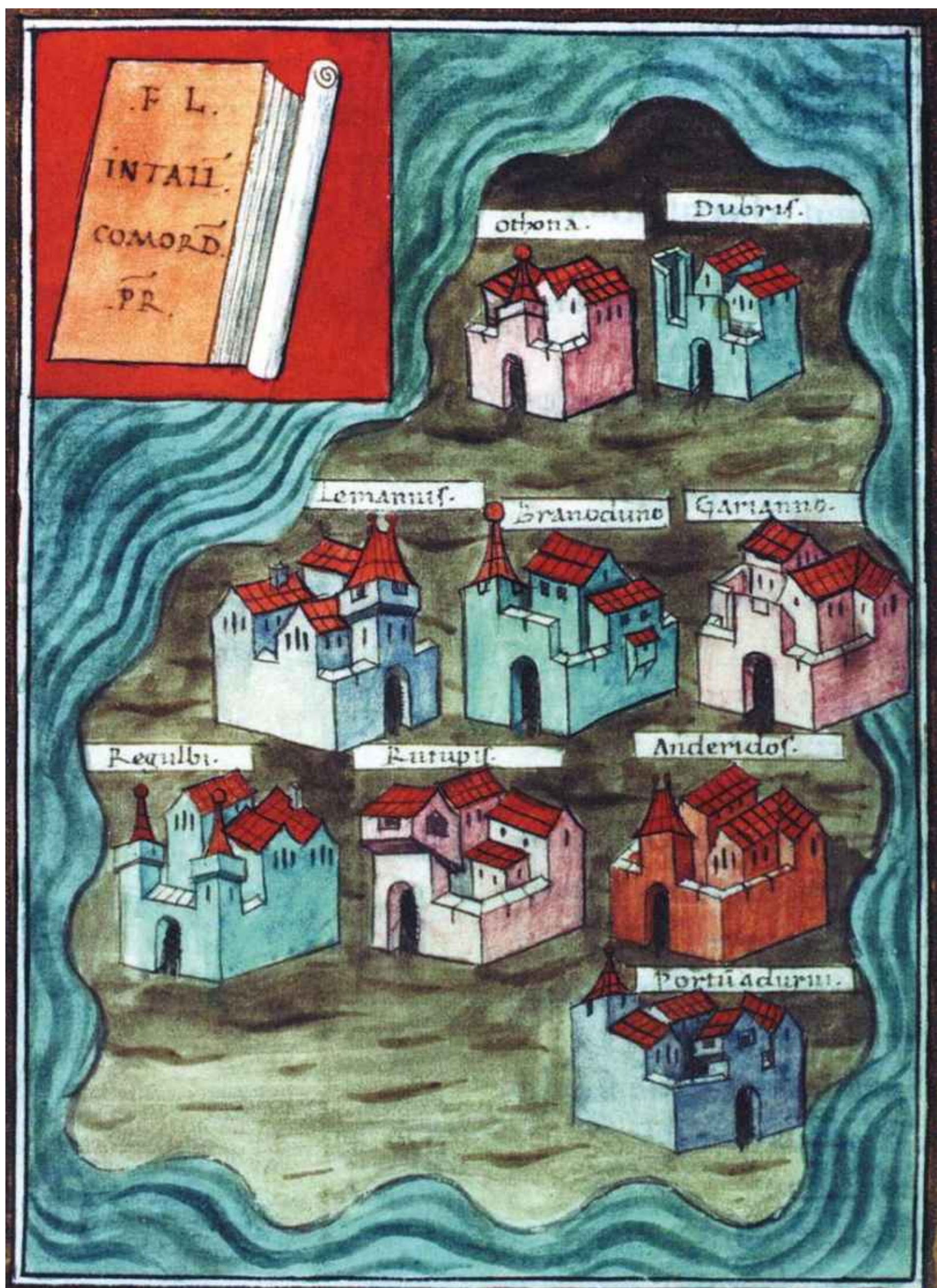
11. 1837年出土的彼得罗阿萨宝藏原本有22件物品，但只有12件流传了下来。图片上是著名的patera，即祭祀用的圆盘，这个盘子上，一群俄耳甫斯教人物环绕着坐在中间的女神，女神是立体的。原本人们认为它属于4世纪特温吉人的领袖阿塔纳里克，但实际上这代表了阿提拉从地中海世界劫掠而来的财物（AKG Images）



12. 5世纪中叶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匈人珠宝。从这时起，蛮族世界的墓葬中才开始出现大量黄金。图片中的物品是此类墓葬中常见的珐琅制品，石榴石（正好是代表皇家的紫色）镶嵌在一个个金制的“格子”中。匈人主导下中欧的财富和艺术风格给欧洲蛮族精英的炫富设立了新标准（AKG Images）



13. 1939年的发掘出土了可能属于7世纪东盎格利亚王室伍法家族（Wu.ngas）的墓葬。5—6世纪，使用随葬品的做法风行英格兰中部和东部，这些发现于著名船棺中的物件对此有所体现，但它们比一般的随葬品要精美得多（British Muse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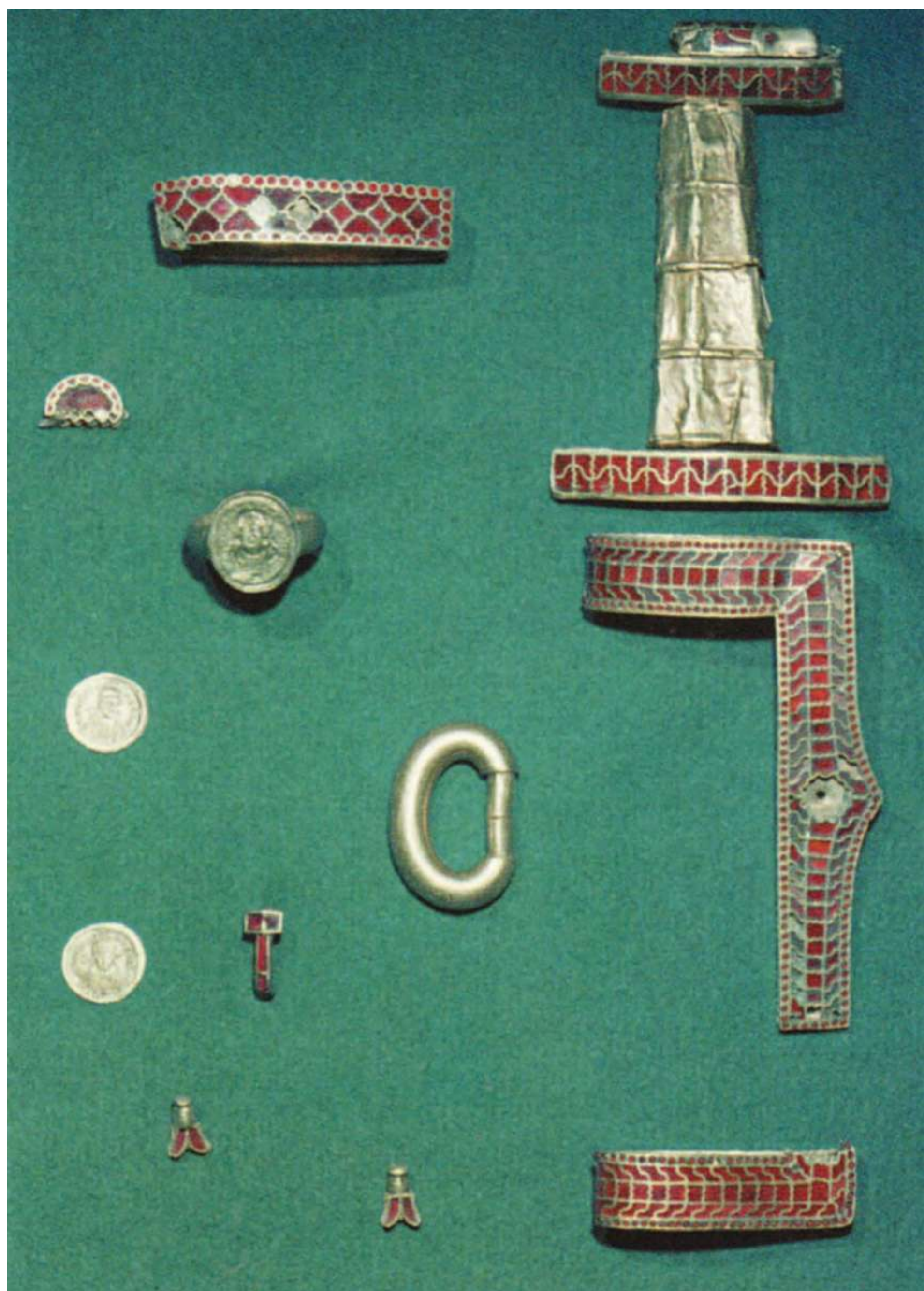


14.罗马晚期的官僚手册《百官志》的一份加洛林时期精美抄本收藏于博德利图书馆，这一页展现了4世纪萨克森/撒克逊海岸伯爵可以调用的一些

资源，这些资源是用来对付从北海那一边而来的萨克森/撒克逊人对不列颠东部和英吉利海峡地区的威胁的（Bodleian Library）



15. 不列颠东海岸和南海岸都有一些防御工事留存下来，其中波特切斯特堡垒尤为壮观。它规模很大，又位于索伦特海峡边，可见当时萨克森/撒克逊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罗马不列颠失去中央帝国的保护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掠夺成性的萨克森/撒克逊移民就占据了这个战略要地，以控制产出最多的农田（Corbis）



16. 从法兰克国王希尔德里克（482年去世）的墓中发掘出的物品，留存至今的不多了。坟墓的封土是在1653年打开的。从留存下来的物件以及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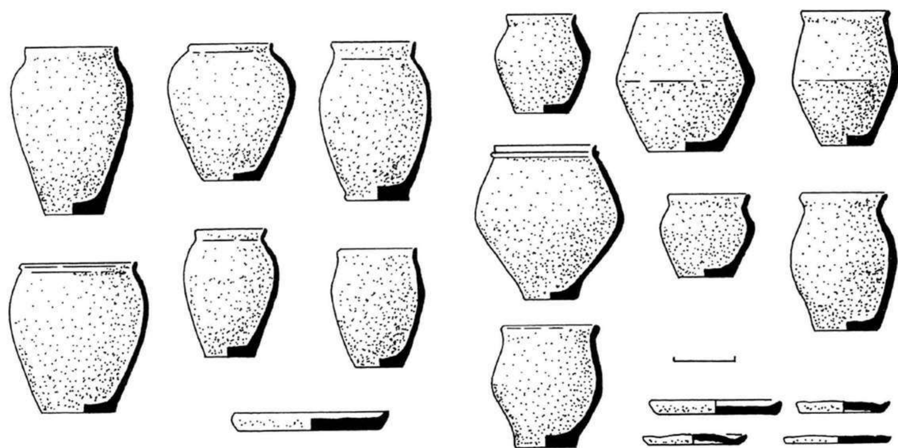
时绘制的物件图中，可以看出其工艺和华丽风格受到了5世纪中期匈人时代多瑙河中游王室墓葬的影响（Bridgeman Art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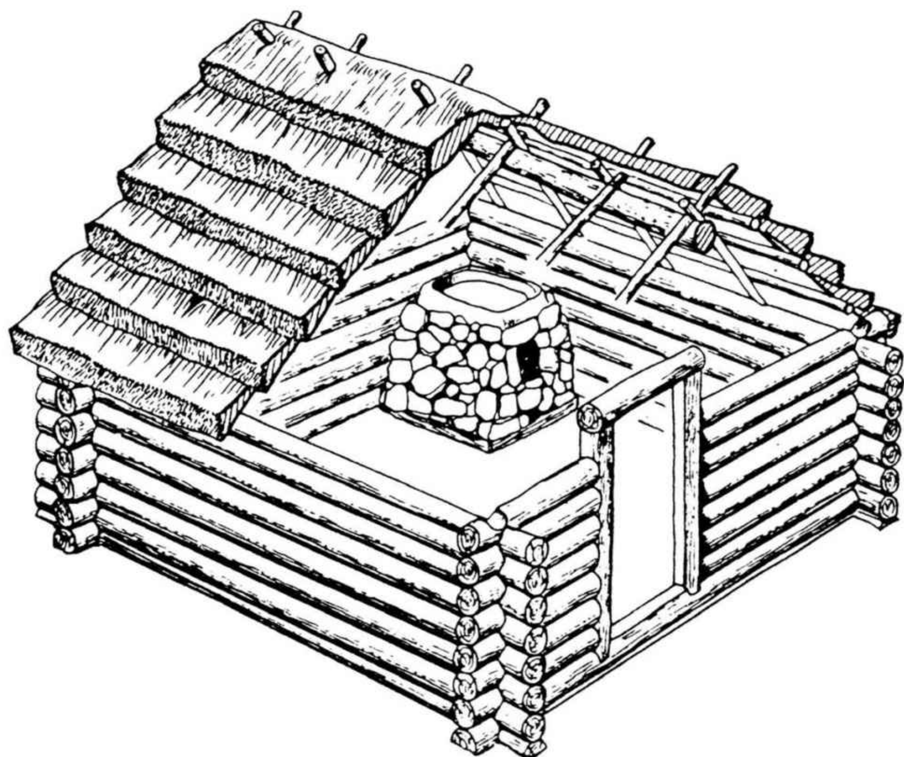
17. 查理曼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加冕称帝，墨洛温王朝为这个第一千年下半叶的西北欧新帝国铺了路，查理曼在统治期间整合并扩大了帝国的权力基础（AKG Images）



18. 691年竣工的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是最古老的伊斯兰公共建筑。7世纪中叶，崛起的阿拉伯军队使东罗马沦为地区性力量（AKG Images）



19. 一类斯拉夫移民（自给自足的农民组成的小规模社群）在欧洲中部和东部的扩散过程，可以通过所谓科尔恰克（左）和彭考夫卡（右）式样的手工陶器及相应的定居点来追踪。更广泛的证据表明，6世纪和7世纪迁徙的斯拉夫群体不是只有这一种（British Museum Press）



20. 这种早期斯拉夫下沉式小屋很适合对付中欧和东欧的严冬。这是在以小规模农业社群的形式迁徙的斯拉夫群体中常见的家庭住宅，住宅里使用的是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陶器（British Museum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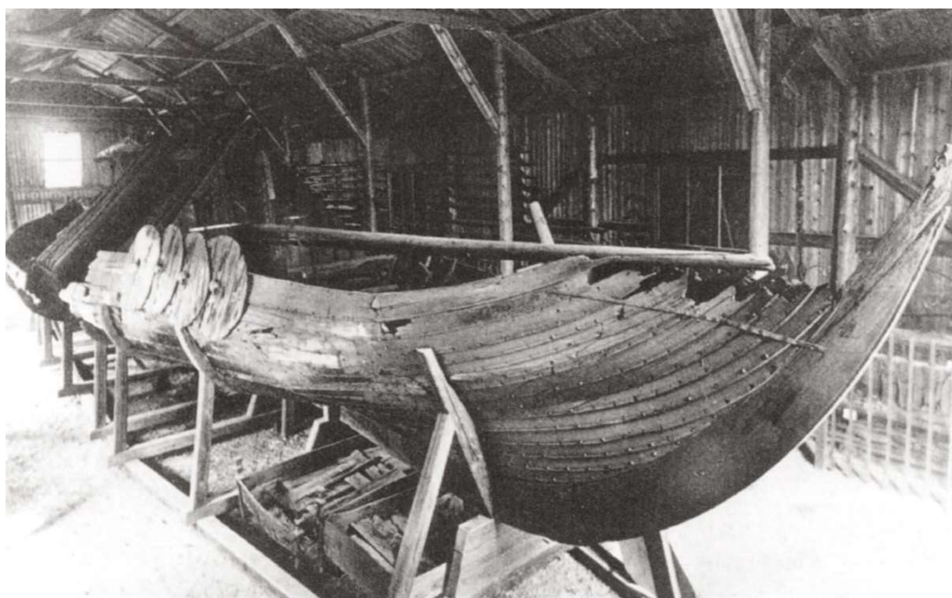
21. 因为具备水上（包括海上和河上）迁徙的空前能力，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维京时期大举扩张。每个扩张阶段都有赖于通过反复试错得来的详细知识，他们的扩张是从征服波罗的海及其多岩石的海岸线（如图）开始的（Getty）



22.贸易、劫掠、勒索，维京人在东部和西部的种种活动让空前的财富流向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该地区聚集了大量银制品（图中展示的远非最大的窖藏），现代的相关发掘仍在进行。随着新财富落入新人的手中，旧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已知的第一个丹麦王朝）失去了力量（Bridgeman Art Library）



23. 并无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在8世纪之前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从沉船证据和图中这些著名的哥得兰石画中可以看出，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网产生的大量财富，是促使他们使用坚固龙骨和帆的必要动力（Getty）



24. 科克斯塔德号在公元900年前后被埋下，1880年出土。这艘船很好地体现了8世纪维京战船设计实验的成果。它可以搭载30多人，经得住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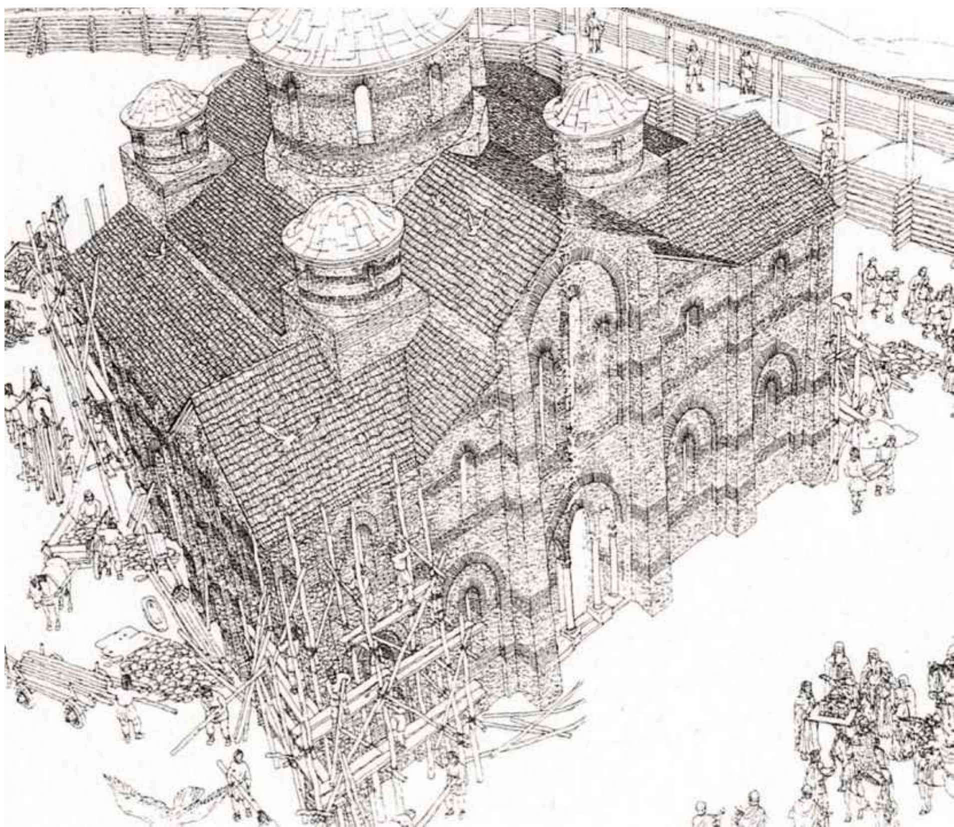
的风暴，还能在河道网中行驶很长的距离，这种高速的运输方式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欧洲的其他部分联结在了一起（Getty）



25. 公元1000年，奥托三世（在他之前还有两个叫奥托的皇帝）对格涅兹诺的殉道者阿达尔贝特之墓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亚欧大陆西部摆脱了公元元年前后那种蛮族和帝国二分的格局，欧洲作为有意义的历史实体开始成形（Bridgeman Art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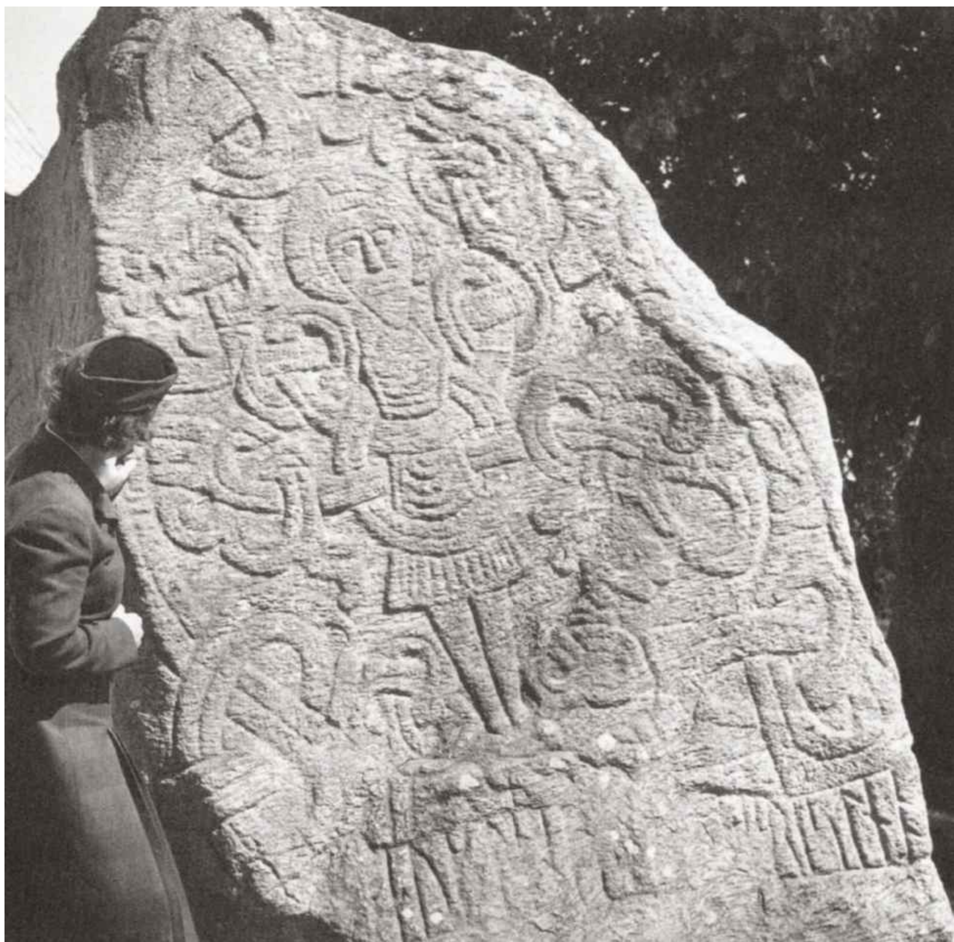
26. 弗拉基米尔一世（约958—1015）让他的王国彻底转向基督教，他启动了一系列建筑工程，发起了政治变革，将这个罗斯政治体从“高级版本的哈得孙湾公司”转变为有资格加入欧洲基督教国家俱乐部的中世纪早期国家（AKG Images）



27. 弗拉基米尔一世在989年和996年之间下令建造的基辅什一教堂，是到那时为止欧洲东北部最宏伟的建筑（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8. 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被他的兄弟博莱斯拉夫一世杀死，原因之一是他打算限制奴隶贸易，而普舍美斯家族的财富与权力有赖于这种贸易。博莱斯拉夫一世的儿子博莱斯拉夫二世选在955年的圣瓦茨拉夫纪念日这一天，摧毁了波希米亚境内的最后一个竞争家族——斯拉夫尼克家族（Getty）



29. 蓝牙王哈拉尔在耶灵的如尼石。这块著名的如尼石宣布哈拉尔改宗基督教，也宣扬了他重新统一日德兰半岛和附近沿海地区的大业。这标志着丹麦宣布加入9—10世纪出现的第一个欧洲联盟（Get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英）彼得·希瑟著；任颂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12
（罗马史诗三部曲）
书名原文：Empires and Barbarians: Migration，Development and the Birth of Europe
ISBN 978-7-5217-2242-0

I.①帝·…II.①彼…②任…III.①罗马帝国——历史——通俗读物②拜占庭帝国——历史——通俗读物IV.①K126②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3886号

Empires and Barbarians by Peter Heather
Copyright © Peter Heather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罗马史诗三部曲）

著者：[英]彼得·希瑟
译者：任颂华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550千字
版次：2020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3-5783
书号：ISBN 978-7-5217-2242-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克兰，东方与西方之间（套装共7册）/（美）浦洛基，（英）安格斯·罗克斯伯勒，张树华等著；曾毅，胡利平，林华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